斯大林全集

二十卷总目录

告 读 者

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共二十卷，为文字版 PDF 电子书，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 1953 年起出版的繁体竖排的第 1 至第 13 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现全部按简体横排格式重新编辑排版，并新增了插图；

二是根据上述单位 1985 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以及其他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编辑的第 14 至第 16 卷和第 20 卷；

三是根据原苏联政府有关机构编译出版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的通信集，以及三次三国首脑会议记录的中译本编辑的第 17 至第 19 卷。

为便于读者查阅，特将以上二十卷汇编成一册《合集》。点击该集的书签条目，可链接所需页面；在阅读器页码框内键入目录文章篇目后的页次（卷数 01—20 及页数），然后回车，也可达此页面。

新编《斯大林全集》除这二十卷正卷外，还有根据近年来解密的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文件编纂的附卷，目前已完成“生平综合篇”、“中国革命篇”、“苏中关系篇”、“朝鲜战争篇”四卷，还将陆续编辑多卷。

现发布的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系经多次校对、修改及增补的最新版本，读者下载时可将原保存的各卷删除，不便之处，还望鉴谅！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二〇一六年十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第一卷说明 …… 4
著者第一卷序言 …… 5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一年

编辑部的话 …… 3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 8

一九〇四年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 23
库泰依斯来信 …… 40
库泰依斯来信（也是那位同志的信） …… 43

一九〇五年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 46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 …… 54
各民族友爱万岁！ …… 59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 …… 61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 65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 97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 102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 …… 119
反动加紧起来了 …… 129
资产阶级在布置圈套 …… 133
公民们！…… 138
告全体工人书 …… 141
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144

一九〇六年

两次搏斗（论一月九日事变） …… 146
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 153
土地问题 …… 158
论土地问题 …… 169
论修改土地纲领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二十六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说） …… 173
论目前形势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七日[三十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演说） …… 176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 …… 178
国际反革命 …… 183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 185
阶级斗争 …… 204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
（关于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 …… 210

一九〇七年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16
一　辩证方法 …… 218
二　唯物主义理论 …… 228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241
附录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270
辩证唯物主义 …… 270

注释 …… 288
年表(1879 年至 1906 年) …… 304
插图(新增)
一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 …… 22
二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父母 …… 64
三 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哥里城 …… 118
四 青年时期的柯巴（斯大林） …… 175
五 沙俄警察局档案中的斯大林入狱资料 …… 215
六 第一卷原书繁体竖排页面 …… 287

目　录

第二卷说明 …… 1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

一九〇七年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
　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 3
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 …… 12
立宪民主党人专制还是人民专制？ …… 17
无产阶级在斗争，资产阶级在和政府缔结联盟 …… 19
悼念捷里亚同志 …… 23
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 27
一塌糊涂…… …… 29
我们高加索的小丑们 …… 31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 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 38
　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 …… 39
　二　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 …… 42
　三　关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 …… 47
　四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 …… 53
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
　（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库市工人选民团
　初选人大会通过）…… 62

应当抵制协商会议！ …… 64

一九〇八年

选举以前 …… 68
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 …… 71
我们最近时期的罢工说明了什么？ …… 76
石油业主在策略上的转变 …… 79
必须作好准备！ …… 83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 85
石油业主对经济恐怖的看法 …… 88
报刊评论 …… 99
奴颜婢膝的“社会主义者” …… 99
假仁假义的祖巴托夫分子 …… 100
协商会议和工人 …… 103

一九〇九年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 111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罢工 …… 120
党的生活 …… 124
巴库委员会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内
意见分歧的决议 …… 125
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合同（为纪念其五周年而作） …… 127

一九一〇年

高加索来信 …… 131
一 巴库 …… 131
石油工业的状况 …… 131
油矿区自治 …… 133

组织状况 …… 135
“合法机会” …… 136
二　梯弗里斯 …… 140
纲领上的取消主义 …… 141
策略上的取消主义 …… 143
巴库委员会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
（为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而通过）…… 147
一　关于党的政治鼓动和真正团结 …… 147
二　关于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 …… 148
德国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 …… 150
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 …… 156

一九一二年

拥护党！…… 159
五一万岁！…… 163
新的时期 …… 168
自由派的伪君子们 …… 170
无党无派的怪物们 …… 172
实际生活在胜利着！…… 174
他们干得好 …… 176
奔流起来了！…… 178
他们怎样准备迎接选举 …… 181
结论 …… 184
我们的目的 …… 187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 …… 189
初选人的意志 …… 191

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 193
一 初选人的选举 …… 193
二 复选人的选举 …… 193
三 两种统一 …… 194
四 代表的选举 …… 196
今天选举 …… 198

一九一三年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一月九日） …… 201
彼得堡的选举（圣彼得堡来信） …… 205
一 工人选民团 …… 205
一 为选举而斗争 …… 205
二 给代表的委托书 …… 207
三 假统一和代表的选举 …… 209
二 城市选民团 …… 211
三 结论 …… 214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高加索来信） …… 21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221
一 民族 …… 223
二 民族运动 …… 230
三 问题的提法 …… 236
四 民族文化自治 …… 242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 251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 262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 271
社会民主党党团状况 …… 277
连纳惨案一周年 …… 281

注释 …… 284
年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306
插图（新增）
一　巴库时期的斯大林 …… 61
二　20世纪初的斯大林故乡——哥里 …… 119
三　斯大林又一次被沙俄警察逮捕 …… 180
四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几个中文译本 …… 220

目　录

第三卷说明 …… 1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三　月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 3
论战争 …… 5
在取得部长职位的道路上 …… 9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 11
论取消民族限制 …… 14
二者必居其一 …… 17
反对联邦制 …… 19

四　月

两个决议 …… 25
给农民土地 …… 26
五一 …… 28
论临时政府（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
在瓦西里岛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 30
关于玛丽亚宫的会议 …… 3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
会议）（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 36
一　为捍卫列宁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同题的决议案
而发表的演说（四月二十四日） …… 36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九日） …… 37
三 关于民族民族的结论（四月二十九日） …… 41

五 月

革命的落伍者 …… 43
我们期待于代表会议的是什么？ …… 47
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 …… 49

六 月

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机） …… 60
反对分散的游行示威 …… 66
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 …… 68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 72
游行示威 …… 76

七 月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 80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 83
一 中央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七月十六日）…… 83
二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七月十六日） …… 87
三 对几个书面问题的答复（七月十六日） …… 92
四 结论（七月十六日） …… 94
发生了什么事情？ …… 96
反革命的胜利 …… 99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 102
告被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 104
两个代表会议 …… 109
新政府 …… 110

论立宪会议的选举 …… 112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 117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七月二十七日） …… 117
二　结论（七月二十七日） …… 125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七月三十日） …… 127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
的答复（七月三十一日） …… 132
五　结论（七月三十一日） …… 135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驳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八月三日） …… 138

八　月

资本家要什么？ …… 141
反对莫斯科会议 …… 145
再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 147
莫斯科会议把俄国引向何处？ …… 150
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 …… 155
两条道路 …… 158
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 161
前线我军失败的真相 …… 164
论前线七月失败的原因 …… 167
前线失败究竟是谁的罪过？ …… 173
美国的数十亿贷款 …… 177
今天选举 …… 180
挑衅时期 …… 184
“社会革命党”党内的分工 …… 186
黄色联盟 …… 189

二者必居其一 …… 192
我们的要求 …… 196
阴谋在继续 …… 199
反对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 …… 203

九 月

危机和执政内阁 …… 204
走自己的路 …… 207
论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 …… 209
第二次浪潮 …… 212
外国人和科尔尼洛夫阴谋 …… 217
论民主会议 …… 220
两条路线 …… 224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 227
论革命战线 …… 229
他们在制造镣铐 …… 233
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 236
评论 …… 240
铁路罢工和民主主义的破产者 …… 240
俄国的农民和蠢才们的党 …… 241
向工人的进攻 …… 243
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 …… 245
评论 …… 248
“态度暧昧的”党和俄国士兵 …… 248
阴谋家掌握政权 …… 250
纸上的联合 …… 251

十 月

评论 …… 253
农村在挨饿 …… 253

工厂在挨饿 …… 254
他们鞭打了自己 …… 256
反革命的阴谋 …… 258
谁在破坏立宪会议？ …… 274
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 …… 276
谁需要预备国会？ …… 278
苏维埃政权 …… 280
看看无耻到什么程度 …… 283
破坏革命的工贼 …… 286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 291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 292
我们需要什么？ …… 296

注释 …… 300
年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 315
插图(新增)
一 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 …… 59
二 列宁和斯大林在拉兹里夫湖畔 …… 140
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 239
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 …… 299

目　录

第四卷说明 …… 1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七年

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3
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 …… 6
关于乌克兰拉达（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12
乌克兰拉达是什么？ …… 14
关于芬兰的独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 16
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 …… 18

一九一八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
问题的讲话（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简要记录） …… 19
关于基辅资产阶级拉达 …… 20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 21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 21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 22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 23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的话传电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 26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 27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 29
乌克兰是个交叉点 …… 31
关于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 …… 34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 …… 35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47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联邦 …… 47
在形成中的俄罗斯联邦同这种联邦有什么区别 …… 47
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 …… 4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成员 …… 49
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 …… 49
中央政权的建立 …… 50
政权的执行机关 …… 50
联邦制的过渡作用 …… 51
俄罗斯联邦政治建设的过程。俄国的联邦制是走向
社会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 …… 51
当前任务之一 …… 52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草案） …… 55
给士尔克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56

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57
停战协定的签订 …… 57
今后的谈判 …… 57
乌克兰政变的影响 …… 58
政变的原因 …… 58
在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 60
一　开幕词（五月十日） …… 60
二　闭幕词（五月十六日） …… 63
又一个谣言 …… 65
高加索的局势 …… 66
一　南高加索 …… 66
二　北高加索 …… 68
关于高加索的局势（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通报）…… 70
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事实和诡计） …… 72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 82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 …… 84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 85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 …… 86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89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90
给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 91
给察里津战线司令员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92
南方战线（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93
事物的逻辑（论孟什维克中央的“提纲”） …… 95
一　关于十月革命 …… 95

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 97
三 小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 …… 99
四 今后怎样？…… 101
在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上关于南方战线形势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报纸纪要） …… 104
关于俄国南部（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06
南方战线的重要性 …… 106
察里津是被突击的中心 …… 106
我军的力量在哪里？ …… 107
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 …… 109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1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1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3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 116
障壁 …… 119
不要忘记东方 …… 121
乌克兰在解放中 …… 123
光明来自东方 …… 125
事情在发展 …… 129

一九一九年

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 …… 131
给弗·伊·列宁的报告 …… 133
在维亚得卡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记录） …… 137
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 …… 138
溃败的一般情况 …… 138

第三集团军和预备队 …… 142
结论 …… 145
集团军的指挥系统和总部的训令 …… 146
结论 …… 148
不稳固的后方与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 …… 149
结论 …… 151
供给机关和撤退机关 …… 152
结论 …… 154
物资和人员的损失总数 …… 155
为巩固前线而采取的措施 …… 155
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政策 …… 158
致土尔克斯坦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党组织 …… 161
两个阵营 …… 162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 …… 165
两年以来 …… 167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 171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174
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 176
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 …… 177
给希格雷国家监察部特派检查员的电报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 180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 181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 183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 184

关于彼得格勒战线（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86
一、彼得格勒接近地 …… 186
二、敌军兵力 …… 186
三、敌人的如意算盘 …… 187
四、前线的情况 …… 188
五、舰队 …… 189
六、总结 …… 189
向弗·伊·列宁报告西方战线情况的信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 …… 191
自南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 194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197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98
南方战线给彼得格勒的致敬电 …… 200
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 …… 201
一 协约国计划的失败 …… 201
二 反革命失败的原因 …… 202
三 南方战线的目前情况 …… 205

一九二〇年

给乌克兰劳动军的命令（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 208
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 210
一 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三月十七日） …… 210
二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三月十九日） …… 211
三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的结论（三月二十日） …… 215
四 代表会议的闭幕词（三月二十三日） …… 216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 218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 219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 221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 226
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 …… 228
一　总的情况 …… 228
二　后方。突击地域 …… 230
三　前途 …… 233
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和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 235
突破 …… 235
突破的结果 …… 236
波兰第三集团军的命运 …… 236
前线的情况 …… 237
结论 …… 237
克里木战线 …… 238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 240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241
一、五月—六月 …… 241
二、日托米尔的突破 …… 241
三、突破的结果 …… 242
四、来自南方的危险 …… 243
五、记住弗兰格尔 …… 244
红军受到怎样的欢迎（向“红军战士报”发表的谈话） …… 245
给各级党组织（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 …… 246
关于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 …… 247
一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 247
二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 248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 …… 251
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 260
著者的话（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民族问题论文集的序言） …… 264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举行的
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上的报告） …… 267
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在巴库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272
第一个时期 …… 273
第二个时期 …… 274
第三个时期 …… 275
前途 …… 277
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281
一 宣布达格斯坦实行苏维埃自治 …… 281
二 结束语 …… 283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 285
一 关于捷列克区域实行苏维埃自治的报告 …… 285
二 结束语 …… 288
高加索的局势（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291
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 …… 295

注释 …… 297
年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 …… 315
插图（新增）
一 察里津不能丢！ …… 81
二 斯大林给列宁的信的手稿 …… 132
三 列宁主持苏维埃会议 …… 225
四 头戴“布琼尼”军帽的斯大林 …… 280

目　录

第五卷说明 …… 1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记录）…… 3
我们的意见分歧 …… 5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 5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 7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12
一 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压迫 …… 12
二 苏维埃制度和民族自由 …… 14
三 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17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23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三月十日） …… 23
二 结论（三月十日）…… 30
给弗·伊·列宁的信 …… 34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 36
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 41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小册子的大纲） …… 42
一 术语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 42
二 俄国发展中的历史转变 …… 45
三 问题 …… 48
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里斯党组织全体
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 59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 68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 76
前途 …… 79

一九二二年

给“真理报” …… 86
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 …… 87
一 连纳事件 …… 87
二“真理报”的创办 …… 88
三“真理报”的组织作用 …… 89
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 …… 92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苏维埃的贺电 …… 95
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96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01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 109

一九二三年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 113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 113
一、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 …… 113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 114
三、战略 …… 115
四、策略 …… 117
五、斗争形式 …… 118
六、组织形式 …… 119
七、口号。指示 …… 120
二　战略计划 …… 121
一、历史转变。战略计划 …… 121
二、第一个历史转变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针 …… 122
三、第二个历史转变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 123
四、第三个历史转变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 125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127
一 …… 127
二 …… 13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135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月十七日）…… 135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四月十九日）…… 151
三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三日）…… 160
四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四月二十五日）… 177

五 对决议案的修改意见的答复（四月二十五日）…… 185
六 对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四月二十五日）…… 187
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 …… 188
欲盖弥彰…… …… 191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
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194
一 提交第四次会议讨论并经中央政治局
批准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 …… 194
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工作的总路线 …… 194
同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和组织
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 …… 195
吸收当地居民中的劳动分子参加党的建设
和苏维埃建设的办法 …… 197
关于改善当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的措施 …… 197
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
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 198
关于组织民族部队的实际措施 …… 198
组织党的教育工作 …… 199
为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
的决议挑选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 …… 199
二 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
（关于会议第一项议程“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说）
（六月十日）…… 200
三 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
决议的实际措施（关于第二项议程的报告）（六月十日）…… 207
四 结论（六月十二日）…… 215
五 对发言的答复（六月十二日）…… 223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 225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 …… 230
在军事学院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简要报道）…… 232
关于党的任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
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 234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 234
争论的原因 …… 235
党内生活的缺点 …… 236
造成缺点的原因 …… 238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239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
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 245
关于争论 …… 245
关于拉法伊尔 …… 247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 249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 251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 253
必要的指摘（关于拉法伊尔）…… 257
致“共产党人报”的贺电 …… 260

附录
附录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 261
附录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 …… 263

注释 …… 268
年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 283
插图（新增）
一 身穿民族服装的斯大林 …… 22
二 列宁和斯大林在哥尔克村 …… 91
三 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国徽 …… 112
四 斯大林接见女先进工作者 …… 229

目　录

第六卷说明 …… 1

一九二四年

（上）

关于争论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和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5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一月十七日） …… 5
二 结论（一月十八日）…… 19
悼列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 34
论列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军校
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 39
山鹰 …… 39
谦逊 …… 40
逻辑力量 …… 41
不灰心 …… 41
不骄傲 …… 42
原则性 …… 43
相信群众 …… 44
革命天才 …… 45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召开的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 48
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 51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 53
二 方法 …… 58
三 理论 …… 64
四 无产阶级专政 …… 78
五 农民问题 …… 88
六 民族问题 …… 100
七 战略和策略 …… 108
八 党 …… 121
九 工作作风 …… 13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136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五月二十四日）…… 136
一、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 …… 137
二、国家机关 …… 141
三、党员成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 …… 143
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干部和新党员 …… 145
五、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 147
六、党在登记、分配和提拔工作人员方面的工作 …… 148
七、党内生活 …… 149
八、结论 …… 150
结论（五月二十七日）…… 156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俄共(布)中央
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166
外部状况 …… 167

结合问题 …… 170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 …… 174
党 …… 177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 182
论工人通讯员
（和“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 184

（下）

关于波兰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共产国际
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186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192
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 195
论国际形势 …… 198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 198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 202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 205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召集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 212
各地报告的缺点 …… 212
党的主要缺点是党的农村工作薄弱 …… 213
我们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里？…… 213
我们农村工作的薄弱表现在哪里？…… 214
基本任务是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 …… 214
必须使苏维埃活跃起来 …… 215
必须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 …… 215
格鲁吉亚暴动的教训 …… 216
必须以敏锐的态度对待农民 …… 217

党的基本任务 …… 218
工作的条件 …… 218
主要是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保持联系 …… 219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
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220
在“狄纳莫”工厂留言簿上的题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225
致骑兵第一集团军 …… 226
致“农民报”…… 227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229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 229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 234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 245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 253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 253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 255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 269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 279

注释 …… 284
年表（一九二四年） …… 296
插图（新增）
一 斯大林主持悼念列宁的仪式 …… 38
二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译本 …… 99
三 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者 …… 197
四 斯大林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 228

目　录

第七卷说明 …… 1

一九二五年
（上）

女工和农妇们，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3
致教师代表大会 …… 4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 …… 5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6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9
致“工人报” …… 12
给德—奥夫同志的信 …… 13
关于“得莫夫卡事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 15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 19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 25
给麦—尔特同志的信 …… 30
庆祝国际妇女节 …… 34
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36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 37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41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48
关于农村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
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 53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信）…… 58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 62
一 国际形势 …… 62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69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 72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 74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 83
六 关于金属工业 …… 88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 92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 93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 99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 …… 104
问题和答复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107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庆祝本科和专科第二届毕业典礼）…… 145
再论民族问题
（关于谢米奇的文章）…… 148

（下）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
（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156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 160
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162
论共青团的任务
（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166
在米·瓦·伏龙芝葬礼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172
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 …… 173
给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 17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178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十八日）…… 178
一　国际形势 …… 178
一、资本主义的稳定 …… 180
二、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 184
三、战胜国和战败国 …… 185
四、战胜国间的矛盾 …… 189
五、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 191
六、苏联的外部状况 …… 196
七、党的任务 …… 200
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 …… 202

一、整个国民经济 …… 202
二、工业和农业 …… 214
三、商业问题 …… 216
四、各个阶级，它们的积极性和相互关系 …… 218
五、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口号 …… 220
六、农民问题上的两种危险和两种倾向 …… 227
七、党的任务 …… 230
三 党 …… 233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十二月二十三日）…… 241
一 索柯里尼柯夫和我国道威斯化 …… 241
二 加米涅夫和我们对农民的让步 …… 243
三 谁的失算？…… 246
四 索柯里尼柯夫是怎样保护贫农的 …… 247
五 思想斗争还是诬蔑？…… 248
六 关于新经济政策 …… 249
七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 250
八 季诺维也夫和农民 …… 255
九 意见分歧的历史 …… 261
十 反对派的政纲 …… 266
十一 他们的“爱和平” …… 267
十二 党一定能达到统一 …… 269

注释 …… 271
年表（一九二五年）…… 281
插图（新增）
一 苏联大学生学习生活剪影 …… 61
二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 144
三 斯大林观看新款轿车 …… 176
四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 240

目　录

第八卷说明 …… 1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上）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3
“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 …… 10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 11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 11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 13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 15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17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 25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47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 59
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
（答波尔特涅夫、叶弗列莫夫、伊甫列夫三同志） …… 70
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答坡柯也夫同志） …… 73
纪念柯托夫斯基同志 …… 76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法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 …… 77

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 8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84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
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 89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 89
二 工业化方针 …… 91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 92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 97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 102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 103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 104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 106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 107
十 结论 …… 108
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
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 …… 110
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在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报告）…… 114
英国为什么发生罢工？ …… 114
英国总罢工为什么失败了？ …… 116
总罢工的教训 …… 119
几个结论 …… 120
关于波兰最近的事件 …… 122
对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欢迎词的答词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 125

（下）

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 128
费·捷尔任斯基
（悼费·捷尔任斯基） …… 141
关于英俄委員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143
致美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部 …… 150
给斯列普柯夫的信 …… 151
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演说）…… 153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
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 156
一　“新反对派”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
基本問題上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57
二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 …… 161
三　反对派联盟的“革命”言论和机会主义行为 …… 164
四　结论 …… 167
论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68
一　反对派联盟发展的几个阶段 …… 168
一、第一阶段 …… 168
二、第二阶段 …… 169

三、第三阶段 …… 171
四、第四阶段 …… 172
五、列宁和党内联盟的问题 …… 173
六、反对派联盟的瓦解过程 …… 174
七、反对派联盟指望什么？ …… 175
二 反对派联盟的基本错误 …… 177
一、几点预先的说明 …… 178
二、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 181
三、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 …… 191
四、“新反对派”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94
五、托洛茨基的支吾搪塞。斯米尔加。拉狄克 …… 198
六、我国建设前途问题的决定意义 …… 202
七、反对派联盟的政治前途 …… 204
三 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 207
四 几个结论 …… 211
“论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 216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 216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216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級专政的几点意见 …… 223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 …… 227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 230
三 不可思议的糊塗想法或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 237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42
一、托洛茨基的戏法或“不断革命”的问题 …… 242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49
三、“小事”和笑话 …… 253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 255
六 总结 …… 258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260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 260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 261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 263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 264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 266
六　中国的无产阶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 269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 269
八　几个结论 …… 270

注释 …… 272
年表 …… 283
插图（新增）
一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 83
二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 …… 142
三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 215

目　录

第九卷说明 …… 1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3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3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 3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 3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 8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 10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 15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 16
二、“喘息”的因素 …… 19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 20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 21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 26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 …… 29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 30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 32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 33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 35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38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 42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 44

结论
（十二月十三日） …… 45
一 几点意见 …… 45
一、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 45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50
三、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 54
四、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 57
五、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 60
六、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 62
七、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 69
二 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72
一、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 72
二、季诺维也夫怎样“改正”列宁的话 …… 80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 83
一、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 83
二、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 91
三、我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 99
四、蜕化问题 …… 101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 102
五 结论 …… 106
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 …… 109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111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 116
给连纳的工人们 …… 119
致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 …… 120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121
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 …… 125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 127

给申凯维奇的信 …… 135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137
给邱贡诺夫的信 …… 143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斯基）…… 145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157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 157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158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 160
四　反对派的错误 …… 161
给“真理报”（纪念创刊十五周年）…… 164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 …… 166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171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答坡克罗夫斯基）…… 191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201
一　几个小问题 …… 201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 203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
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 209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 211
五　两条路线 …… 218
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 …… 223
答坡克罗夫斯基 …… 224

时事问题简评 …… 229
一 论战争的威胁 …… 229
二 关于中国 …… 235

注释 …… 257
年表 …… 266
插图（新增）
一 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 108
二 《真理报》创刊号（1912 年 5 月 5 日）…… 165
三 中国大革命风云突变 …… 222

目　录

第十卷说明 …… 1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3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八月一日的演说）…… 3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3
二　关于中国 …… 8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 …… 27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 30
八月五日的演说 …… 43
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
（八月九日的演说） …… 61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 68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 68
二　斯大林同志的问题和代表们的回答 …… 95
致玛·依·乌里杨诺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 …… 104
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节录） …… 107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纲要 …… 117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 120
一 几个小问题 …… 120
二 关于反对派的“政纲”…… 124
三 列宁对争论和对一般反对派的看法 …… 127
四 反对派和“第三种势力”…… 128
五 反对派在怎样“准备”代表大会 …… 132
六 从列宁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34
七 关于近几年来党的政策的几个最重要的总结 …… 137
八 退到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了 …… 140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144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164
致联共（布）莫斯科军区代表会议 …… 173
党和反对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
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74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 174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 176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 179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 182
五 今后怎样？…… 184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186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三日）…… 186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86

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尖锐化 …… 186
二、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 190
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 …… 194
四、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 196
五、结论 …… 199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 200
一、整个国民经济 …… 201
二、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速度 …… 206
三、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 …… 209
四、阶级。国家机关。我国文化的发展 …… 216
三 党和反对派 …… 224
一、党内状况 …… 224
二、争论的总结 …… 230
三、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 232
四、今后怎样？…… 240
四　总结 …… 243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七日）…… 245
一　关于拉柯夫斯基的发言 …… 245
二　关于加米涅夫的发言 …… 247
三　总结 …… 255
就伪造“斯大林论文”事向外国报刊代表发表的声明 …… 259

注释 …… 262
年表 …… 274
插图（新增）
一　苏维埃和美利坚工人 …… 67
二　俄罗斯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172
三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 258

目　录

第十一卷说明 …… 1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二八年（上）

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简要记录）…… 3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9

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贺电 …… 16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
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 17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 22

一　关于自我批评 …… 22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 29

三　沙赫特事件 …… 38

四　总结 …… 45

致科斯特罗马工人的贺电 …… 47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 48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 48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 51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 53
给“青年团真理报”
（纪念创刊三周年） …… 57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纪念成立十周年） …… 58
在粮食战线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谈话节录） …… 59
给共产主义科学院党组织组员的信 …… 70
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
（答斯·同志） …… 73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答弗鲁姆金）（关于弗鲁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 …… 84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 92

一九二八年（下）

联共（布）中央全会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100
论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说） …… 100
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说）…… 110
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说节录）…… 131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38
一 共产国际的问题 …… 138
一、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 …… 138
二、 共产国际纲领 …… 141

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143
一、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问题 …… 143
二、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 …… 149
结论 …… 151
给列宁格勒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 …… 152
给古比雪夫同志的信 …… 153
悼念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 …… 154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155
答什·同志 …… 167
致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的贺电）…… 170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周年 …… 172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173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 173
二　谷物问题 …… 181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 188
给斯摩棱斯克省“线轴”工厂的工人和
雅尔采沃工厂的工人 …… 204
给“红色工会国际”工厂的工人（别日察市）…… 205
纪念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十周年 …… 207
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208
一　资本主义稳定问题 …… 209
二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 …… 211

三 德国共产党问题 …… 213
四 德共党内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分子 …… 216
五 关于秘密信和公开信的草案 …… 218
答库什特谢夫 …… 220

一九二九年（1-3）

堕落到极点了 …… 222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简要记录）…… 226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 231
给“红三角”工厂的男女工人 …… 234
致普罗斯库罗夫城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贺电 …… 235
给“农业报”的祝词 …… 236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237
一 “民族”概念 …… 237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 239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 243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 248

注释 …… 253
年表 …… 263
插图（新增）
一 苏联红军军旗军徽 …… 21
二 列宁著《青年团的任务》…… 171
三 咱们工人有力量 …… 206

目　录

第十二卷说明 …… 1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3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4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 9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 15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 21
一、阶级斗争问题 …… 21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 26
三、农民问题 …… 30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 32
五、所谓“贡税”问题 …… 36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 42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 50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 59
九、播种面积问题 …… 61
十、粮食收购问题 …… 63
十一、外汇后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 68
五　党的领导问题 …… 70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 70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 72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 75
六 结论 …… 77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 79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抄致中央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分局
书记柯洛齐洛夫同志） …… 82
祝贺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十周年 …… 85
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志上的题词 …… 86
大转变的一年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 88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 88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 90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 92
结论 …… 99
给特别远东军“警钟报”编辑部 …… 101
必要的修正 …… 102
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 …… 104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05
一 “平衡”论 …… 106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 108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 110
四 城市和乡村 …… 114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 118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 121
七 结论 …… 124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 126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 130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 …… 134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 134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 135
胜利冲昏头脑
（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140
给别泽缅斯基同志的信 …… 146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 147
给工业学院第一期毕业生 …… 166
答姆·拉法伊尔同志（列宁格勒，省工会委员会）
（抄致联共（布）省委员会书记基洛夫同志）…… 167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 …… 169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 …… 17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171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71
一、世界经济危机 …… 172
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 …… 179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 183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 188
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188
二、工业化的成就 …… 190
三、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地位及其增长速度 …… 192
四、农业和谷物问题 …… 198
五、农民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与国营农场和
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速度 …… 202
六、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 …… 210
七、增长中的困难，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 …… 216

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227
九、当前的任务 …… 232
（甲）一般任务 …… 232
（乙）工业方面的任务 …… 237
（丙）农业方面的任务 …… 238
（丁）运输方面的任务 …… 240
三 党 …… 241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问题 …… 244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 …… 251

注释 …… 267
年表（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 277
插图（新增）
一 斯大林和海军官兵在一起 …… 87
二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 139
三 列宁主义万岁！…… 266

目　录

第十三卷说明 …… 1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〇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的结论
（1930 年 7 月 2 日）…… 3
给沙屠诺夫斯基同志的信 …… 14
给契·同志的信 …… 16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
（摘自原信） …… 19

一九三一年

论反犹太主义
（答美国犹太电讯社问） …… 23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
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 24
给艾特琴同志的信 …… 34
致阿捷尔拜疆石油联合厂和
格罗兹内石油联合厂工作人员的贺电 …… 36
致电器工厂 …… 37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38

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
各机器拖拉机站 …… 39
致谷物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各国营谷物农场 …… 42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 43
一 劳动力 …… 43
二 工人的工资 …… 45
三 劳动组织 …… 48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 51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 54
六 关于经济核算 …… 57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 59
致“阿模”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 …… 62
致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建筑工程的工人和
行政技术人员 …… 63
给“技术报” …… 64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 65
下新城。汽车制造厂 …… 78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79

一九三二年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建筑工程处处长和
汽车制造厂厂长 …… 93
致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建筑工程处处长和
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厂长 …… 94

答奥列赫诺维奇和阿利斯托夫
（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95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101
给“美联社”代表理查逊先生的回信 …… 102
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 …… 103
答拉尔夫·瓦·巴尔涅斯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104
库兹涅茨克。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106
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贺电 …… 107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贺电 …… 108
致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建设者 …… 109
致列宁格勒的贺电 …… 110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 111
坎伯尔先生在胡诌 …… 113
附：和坎伯尔先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114
纪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十五周年 …… 121

一九三三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12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122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 122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 130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35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41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47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51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54
八 总结 …… 157
关于农村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说）…… 161
给“女工”杂志 …… 174
给伊·恩·巴让诺夫同志的信 …… 175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176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176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
生活富裕的人 …… 182
三 几点意见 …… 185
庆祝红军建军十五周年贺电
（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191
给巴尔涅斯先生的回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192
致谢·米·布琼尼同志 …… 193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简要记录）…… 194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十五周年贺电 …… 203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4

一九三四年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20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208
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 …… 209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 …… 213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 219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 …… 224
一、工业的高涨 …… 226
二、农业的高涨 …… 232
三、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 242
四、商品流转的高涨和运输业 …… 247
三　党 …… 251
一、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 252
二、组织领导问题 …… 263
致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沙波什尼柯夫同志和政治工作助理沙金柯同志 …… 274
代替结论的话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275

注释 …… 276
年表（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 289
插图（新增）
一　为农业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 …… 41
二　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 …… 112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 …… 160
四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 190

目　录

第十四卷说明 …… 1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四年

给新乌达村集体农庄青年学校少年先锋队员和
小学生们的信 …… 3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 4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 年 7 月 23 日）…… 11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 27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 30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1934 年 12 月 26 日） …… 33

一九三五年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 37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
的讲话（摘录）（1935 年 2 月） …… 38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五一”阅兵参加者时
的讲话（报道）…… 40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1935 年 5 月 4 日） …… 41

在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1935 年 5 月 14 日）…… 47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铁路运输工作者时
的讲话（报道）…… 49
致巴黎《人道报》加香、多列士、古久里 …… 52
致著名科学家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志 …… 53
附录：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 …… 53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种植甜菜的
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1935 年 11 月 10 日） …… 55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1 月 17 日） …… 59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 59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 63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 67
4. 最近的任务 …… 70
5. 简单的几句话 …… 71
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2 月 1 日） …… 73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
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2 月 4 日）…… 79

一九三六年

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
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 年 3 月 1 日） …… 81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
别利亚科夫时的讲话（报道）…… 91
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何塞·迪亚斯的电报 …… 93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94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 94
二　1924－1936 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 95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 101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 105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 111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 120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
的报告（1936 年 12 月 5 日） …… 122
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 …… 126

一九三七年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
两面派的办法（1937 年 3 月 3-5 日在
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 129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 130
二　资本主义包围 …… 132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 134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 139
五　我们的任务 …… 141
结束语 …… 151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给
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 165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冶金工业和
煤炭工业领导工作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
的讲话（1937 年 10 月 29 日） …… 169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
的演说（1937 年 12 月 11 日于大剧院） …… 171

一九三八年

给伊万诺夫同志的复信（1938 年 2 月 12 日） …… 177
附录：伊万诺夫给斯大林的信 …… 182
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
出版社的信（1938 年 2 月 16 日） …… 185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
的讲话（1938 年 5 月 17 日） …… 186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年 9 月） …… 189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英雄的“祖国号”飞机机组时
的讲话（报道） …… 219

一九三九年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
的总结报告（1939 年 3 月 10 日） …… 221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 221
1．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
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 222
2．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 225
3．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 230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 232
1．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 233
2．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 243
3．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 247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 250
1．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
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 250
2．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 252
3．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 255
4．几个理论问题 …… 258

一九四〇年

（注：《斯大林文集》未收录一九四〇年的著作。）

附 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36 年）…… 271
年 表（1934 年至 1941 年 5 月） …… 293
插 图
一 斯大林接见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 …… 58
二 苏联 1936 年宪法中文译本 …… 125
三 斯大林的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证书 …… 270

目　录

第十五卷说明 …… 1

一九三八年

代 序 言（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 年 10 月 1 日）（节选） …… 3—3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 35—444
导　言 …… 35—36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
（1883—1901 年） …… 37—63
一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 37
二　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及其
“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 43
三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
斗争协会” …… 52
四　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 …… 55
五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 59
简短的结论 …… 62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1901－1904年） …… 64－94

一 1901－1904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 64

二 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 68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党章的通过和统一的党的成立。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 78

四 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 84

简短的结论 …… 94

第三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1904－1907年） …… 95－141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的罢工。1905年1月9日工人在冬宫前举行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遭到枪杀。革命的开始 …… 95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 …… 100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 104

四　革命的进一步高涨。1905 年 10 月的全俄政治罢工。
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
的出现 …… 121
五　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革命的退却。
第一届国家杜马。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 125
六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开。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
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 133
简短的结论 …… 140

第四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8－1912 年） …… 142－199
一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
颓废情绪。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
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
主义分子而捍卫马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 142
二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152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
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 182
四　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反党的八月联盟 …… 187
五　1912 年召开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
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191
简短的结论 …… 197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1912－1914年） …… 200－216
一 1912－1914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 200
二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 205
三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增长。帝国主义战争前夜 …… 213
简短的结论 …… 216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1914年－1917年3月） …… 217－240
一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和起因 …… 217
二 第二国际各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第二国际瓦解为各个社会沙文主义党 …… 221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 225
四 沙皇军队在前线的失败。经济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 232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覆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234
简短的结论 …… 240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17年4月－1918年） …… 241－291
一 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走出地下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 …… 241

二　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四月
代表会议 …… 248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
进攻的失利。工人和士兵七月游行示威的被镇压 …… 253
四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
第六次代表大会 …… 257
五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阴谋。阴谋被粉碎。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 262
六　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 267
七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布列斯特和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 279
八　列宁关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贫农
委员会和制裁富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
叛乱及其被镇压。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 286
简短的结论 …… 290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020 年） …… 292－315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 292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 297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高尔察克
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
三个月的喘息时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 303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波兰计划的失败。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 308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 311
简短的结论 …… 315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 年） …… 316－350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 316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 320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328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 334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 341
简短的结论 …… 350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029 年) …… 351－374

一　社会主主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 351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 359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 366

简短的结论 …… 374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 年） …… 375－409

一　1930－1934 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两个战争策源地 …… 375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 379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390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 403
简短的结论 …… 409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1935—1937年） …… 410—433
一 1935—1937年间的国际形势。经济危机的暂时缓和。新的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 410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 415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 422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 427

结 束 语 …… 434—444

插图
一 斯大林在演说 …… 34
二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 199
三 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态势图 …… 270
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278
五 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成就 …… 358
六 广大农民踊跃加入集体农庄 …… 389
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433

目　录

第十六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

广播演说
（1941 年 7 月 3 日）…… 3
关于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一六一步兵师
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近卫师的命令（摘录）…… 9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10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 11
“闪击战”的破产 …… 12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 14
“民族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 …… 16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 19
我们的任务 …… 21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1941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红场）…… 24

一九四二年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1942 年 1 月 10 日）…… 27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55号。1942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31
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弗·列·科马罗夫的两个电报
（1942年春）…… 37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130号。1942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38
答美联社记者问 …… 4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07号。1942年10月9日于莫斯科市） …… 46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49
1．后方的组织工作 …… 49
2．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 50
3．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 53
4．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
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 55
5．我们的任务 …… 58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45号。1942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61
给朱可夫的电报 …… 64
答美联社记者问 …… 65
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
（1942年秋）…… 67
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 69
关于剧本《前线》的一个电报
（1942年）…… 71

一九四三年

最高统帅给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
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 72
最高统帅给顿河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 74
最高统帅命令
（第95号。1943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75
最高统帅命令
（第195号。1943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81
答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 …… 86
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
（1943年5月8日） …… 87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 89
最高统帅给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同志、瓦图京大将同志、
波波夫上将同志的命令 …… 91
最高统帅给波波夫上将、索科洛夫斯基上将、罗科索夫斯基
大将、瓦图京大将、科涅夫上将的命令 …… 93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269号。1943年9月8日于莫斯科市） …… 9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1943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96
1. 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 97
2. 全民支援前线 …… 100
3. 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 104
最高统帅命令
（第309号。1943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09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13号。1943年12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13

一九四四年

最高统帅命令
（第16号。1944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114
最高统帅命令
（第70号。1944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120
答《真理报》记者问 …… 124
最高统帅命令
（第152号。1944年8月2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2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1944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128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 128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 132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和平与安全问题 …… 135
最高统帅命令
（第220号。1944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40
最高统帅命令
（第225号。1944年11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44

一九四五年

最高统帅命令
（第5号。1945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146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1945年3月5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军事思想》杂志和《军事通报》杂志）…… 149
在签订苏联和波兰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的讲话
（1945年4月21日） …… 151

最高统帅给作战部队的命令
（第346号。1945年4月27日） …… 153
告红军和盟军书
（1945年4月27日） …… 154
最高统帅命令
（第20号。1945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155
告人民书
（1945年5月9日）…… 159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69 号。1945年6月6日） …… 161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 …… 163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1945年5月24日）…… 164
致《少先队真理报》 …… 165
最高统帅命令
（第370号。1945年6月22日） …… 166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1945年6月26日）…… 167
最高统帅给苏联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71 号。1945年7月22日）…… 168
最高统帅命令
（第51号。1945年8月19日于莫斯科市）…… 170
告人民书
（1945年9月2日）…… 172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73号。1945年9月3日）…… 175

补　遗（两篇）

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节选）…… 176

给瓦杜丁的训令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177

年表（1941 年至 1945 年） …… 178

附录（视频）

电影剪辑：《莫斯科保卫战》、《解放》…… 185

插图

一 在红场检阅红军时发表演说 …… 23

二 伟大卫国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 48

三 美英终于决定 1944 年开辟第二战场 …… 88

四 德国侵略者被全部驱逐出苏联国境 …… 127

五 战胜德国法西斯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 …… 162

目　录

第十七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艾德礼的通信

一、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 号—第 27 号） …… 3
二、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8 号—第 54 号） …… 29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55 号—第 97 号） …… 44
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98 号—第 167 号）…… 75
五、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68 号—第 218 号）…… 129
六、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19 号—第 287 号）…… 167
七、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88 号—第 380 号）…… 219
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381 号—第 498 号）…… 276

九、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一月

（信件第499号—第516号）…… 358

插图

一 斯大林、丘吉尔（1）…… 74

二 斯大林、丘吉尔（2） …… 166

三 斯大林、丘吉尔（3） …… 357

目　录

第十八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的通信

一、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 号—第 10 号） …… 3
二、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11 号—第 24 号） …… 11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5 号—第 64 号） …… 20
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65 号—第 98 号） …… 41
五、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99 号—第 153 号）…… 69
六、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154 号—第 210 号）…… 106
七、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11 号—第 255 号）…… 139
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56 号—第 347 号）…… 170

九、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348号—第384号）…… 234

插图

一 斯大林、罗斯福（1）…… 68

二 斯大林、罗斯福（2） …… 169

三 斯大林、罗斯福（3） …… 233

目　录

第十九卷说明 …… 1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　记录·文件

德 黑 兰 会 议

（194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一、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1 月 28 日） …… 4
二、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
（11 月 28 日） …… 8
三、附录　军事代表会议
（11 月 29 日）…… 18
四、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1 月 29 日）…… 25
五、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会议
（11 月 29 日）…… 30
六、斯大林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1 月 30 日）…… 42
七、午餐时的会谈
（11 月 30 日）…… 47

八、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三次会议
（11月30日）…… 49
九、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四次会议
（12月1日） …… 53
十、德黑兰会议文件
（1943年12月1日）…… 66
1、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同盟国领导人
德黑兰会议公报 …… 66
2、三国宣言 …… 66
3、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 67

雅 尔 塔 会 议[①]

（1945年2月4日—11日）

一、里瓦基亚宫第一次会议
（2月4日〉…… 70
二、里瓦基亚宫第二次会议
（2月5日）…… 81
三、里瓦基亚宫第三次会议
（2月6日）…… 95
四、里瓦基亚宫第四次会议
（2月7日） …… 111
五、里瓦基亚宫第五次会议
（2月8日） …… 118
六、里瓦基亚宫第六次会议
（2月9日） …… 128

————————————

① 即克里米亚会议。——本书制作者注

七、里瓦基亚宫第七次会议
（2 月 10 日）…… 138
八、里瓦基亚宫第八次会议
（2 月 11 日）…… 143
九、克里米亚会议文件
（1945 年 2 月 11 日） …… 148
1、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盟国领导人
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 148
2、克里米亚会议议定书 …… 154
3、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 …… 157
4、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 158

波 茨 坦 会 议

（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

一、第一次会议
（7 月 17 日）…… 161
二、第二次会议
（7 月 18 日）…… 173
三、第三次会议
（7 月 19 日）…… 183
四、第四次会议
（7 月 20 日）…… 200
五、第五次会议
（7 月 21 日）…… 214
六、第六次会议
（7 月 22 日）…… 230
七、第七次会议
（7 月 23 日）…… 246

八、第八次会议
（7月24日）…… 257
九、第九次会议
（7月25日）…… 271
十、第十次会议
（7月28日）…… 277
十一、第十一次会议
（7月31日）…… 290
十二、第十二次会议
（8月1日） …… 311
十三、第十三次（最后一次）会议
（8月1日） …… 326
十四、波茨坦会议文件
（1945年8月2日）…… 337
1、三国柏林会议公报 …… 337
2、三大国柏林会议议定书 …… 351

附录 丘吉尔评说斯大林 …… 358
插图
一 德黑兰会议 …… 65
二 雅尔塔会议 …… 147
三 波茨坦会议 …… 336

目　录

第二十卷说明 …… 1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四六年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 年 2 月 9 日）…… 3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8 号。1946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15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1946 年 2 月 23 日）…… 18

附录：拉辛给斯大林的信 …… 21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6 年 3 月 13 日）…… 25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1946 年 3 月 22 日）…… 31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 7 号。1946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 32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1946 年 9 月 17 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35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 年 10 月 23 日接到的问题） …… 38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
（1946 年 12 月 21 日） …… 42

一九四七年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10号。1947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46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 50
贺 词
（1947年9月7日） …… 60

一九四八年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1948年4月7日）…… 62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1948年5月17日）…… 64
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8年10月29日）…… 66

一九四九年

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问
（1月27日接到的问题） …… 68

一九五〇年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 69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69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 91
答同志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 97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 98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 100

一九五一年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06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1951 年 10 月 6 日） …… 111
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
（1951 年 12 月 31 日）…… 113

一九五二年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1952 年 2 月—9 月）…… 115
对于和 1951 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115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115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 121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 127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
对立的问题以及若干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 132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危机加深的问题 …… 135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 137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 141
8. 其他问题 …… 144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 147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 148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 149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 155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 156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 164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 175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175
2．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
办法问题 …… 177
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提出的问题
（1952 年 4 月 20 日） …… 184
致苏联少年先锋队员
（1952 年 5 月 20 日） …… 185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4 日）（视频）…… 186
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
（1952 年 12 月 21 日接到的问题）…… 190

补 遗（一）

给萨拉托夫—莫斯科煤气管建设与开采管理局的
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8 月 16 日） …… 192
给查坡罗什建设工程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 3 日） …… 193
给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1 月 4 日） …… 194
给阿尔泰农业机械厂的同志们的信
（1948 年 10 月 25 日）…… 195
庆祝荣膺列宁勋章索尔莫沃工厂
建立一百周年的信
（1949 年 7 月 19 日） …… 196
电贺苏联内河航运部北极远征队
经北海航行欧亚成功
（1949 年 9 月 12 日） …… 197

庆祝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
　　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电报
　　（1949 年 11 月 19 日）…… 198
庆祝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建厂二十周年
　　（1952 年 4 月 3 日）…… 199

补 遗（二）

给芬兰总统的信
　　（1948 年 2 月 22 日） …… 201
关于苏联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
　　（1948 年 10 月 12 日）…… 202
给金斯布里·史密斯的复电
　　（1949 年 2 月 2 日）…… 203
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先生及
　　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先生
　　（1949 年 10 月 13 日）…… 204
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1949 年 11 月 28 日）…… 206
复尼赫鲁先生电
　　（1950 年 7 月 15 日） …… 207

补 遗（三）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1950 年 9 月 30 日） …… 20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 年 2 月 13 日） …… 210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 年 9 月 2 日）…… 212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
（1951 年 9 月 28 日） …… 214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 年 2 月 12 日） …… 215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 年 9 月 2 日）…… 217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1952 年 9 月 29 日） …… 21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祝贺
（1953 年 2 月 11 日） …… 220

代 跋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
（1953 年 3 月 9 日）…… 223
视 频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4 日）…… 186
年 表
（1946 年至 1949 年） …… 227
插 图
一 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 …… 49
二 最后两部伟大的经典著作 …… 114
三 约·维·斯大林与世长辞 …… 222

新编《斯大林全集》
二十卷总目录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十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一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

1901–1907

斯大林全集

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一九五三年·北京

И. Сталин.

本版『斯大林全集』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纂、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方括弧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第一卷说明 …… 4
著者第一卷序言 …… 5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一年

编辑部的话 …… 3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 8

一九〇四年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 23
库泰依斯来信 …… 40
库泰依斯来信（也是那位同志的信） …… 43

一九〇五年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 46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 …… 54
各民族友爱万岁！ …… 59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 …… 61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 65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 97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 102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 …… 119
反动加紧起来了 …… 129
资产阶级在布置圈套 …… 133
公民们！…… 138
告全体工人书 …… 141
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144

一九〇六年

两次搏斗（论一月九日事变） …… 146
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 153
土地问题 …… 158
论土地问题 …… 169
论修改土地纲领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二十六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说） …… 173
论目前形势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七日[三十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演说） …… 176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 …… 178
国际反革命 …… 183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 185
阶级斗争 …… 204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
（关于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 …… 210

一九〇七年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16
一　辩证方法 …… 218
二　唯物主义理论 …… 228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241
附录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270
辩证唯物主义 …… 270

注释 …… 288
年表(1879 年至 1906 年) …… 304
插图(新增)
一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 …… 22
二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父母 …… 64
三 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哥里城 …… 118
四 青年时期的柯巴（斯大林） …… 175
五 沙俄警察局档案中的斯大林入狱资料 …… 215
六 第一卷原书繁体竖排页面 …… 287

出　版　说　明

这部《斯大林全集》是根据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版的。

在这以前，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只有一部分出过单行本。例如，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论文和演说，曾收集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于一九二五年出过两版。一九三二年印行了《论十月革命》文集，其中包括论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文和演说。论民族问题的著作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文集中，出了几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主要为说明党内问题和粉碎各种敌视我党的反对派集团而作的论文和演说，曾编成《论反对派》一书，于一九二八年出版。此外，还有包括约·维·斯大林论述某一问题的论文和演说的文集，例如《论列宁》、《关于乌克兰的论文和演说》、《农民问题》、《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等。

在各个不同时期，弗·依·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的著作曾编为几种文集出版，如《一九一七年文选》、《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三卷本的《研究联共（布）历史参考文集》、一卷本的《列宁斯大林文选》、《论党的建设》、《论社会主义竞赛》、《论劳动》等等。

到目前为止，斯大林同志的文集流传最广的是已经出过十一版的《列宁主义问题》。这书的篇目，每新出一版，都有相当大的变更：几乎每版都增添了一些新的著作，同时为保持该书原有篇幅起见，著者又删去了其中某些著作。斯大林同志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时期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命令，都收集在《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中，已经出了五版。

但是，约·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著作，还有许多

只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以后再没有重新印行，并且至今也没有收集成册。此外还保存着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斯大林同志的论文和书信。

这部全集是想把约·维·斯大林的著作差不多全部编辑在一起的第一次尝试。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包括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的著作。

第二卷包括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的著作。

编入第三卷的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著作。其中主要是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论文。

编入第四卷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初几个月以及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的著作。

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包括苏维埃国家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的著作。第五卷包括一九二一年至弗·依·列宁逝世（一九二四年一月）这个时期的著作。编入第六卷的是一九二四年的著作。第七卷包括一九二五年的著作。

约·维·斯大林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著作，编入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卷。第八、第九两卷包括一九二六年的论文、演说、报告和讲话。第十、第十一两卷包括一九二七年的论文、演说、报告和讲话。第十二卷包括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论文、演说、报告和讲话。

第十三卷包括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论述农业集体化问题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第十四卷包括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的著作，这些著作是论述苏联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斗争、苏联新宪法的制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环境中争取和平的斗争。

第十五卷的内容是约·维·斯大林著的、在一九三八年以单行本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

第十六卷包括约·维·斯大林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著作，即当时他在各次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报告、讲话和命令，在德国和日本战败和投降时发表的告人民书，以及其他文件。

编入各卷的全部著作都是按照写作或发表的年月顺次排列的。每卷都附有说明、供参考的简注和著者的年表。日期在改用新历以前（即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以前）按旧历，改用新历以后则按新历。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完全保持原状，只有某些论文由著者作了很少的纯属文字上的修改。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

第 一 卷 说 明

编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是著者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主要在梯弗里斯进行革命活动时期的著作。

在这几年中，布尔什维克在弗·依·列宁领导下逐渐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及其思想体系和组织原则的基础。

这个时期，斯大林同志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作斗争中，在南高加索建立了列宁火星派即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并领导了这些组织的活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证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

编入第一卷的约·维·斯大林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用俄文印行过，大部分曾刊登在格鲁吉亚文的报纸上并出过格鲁吉亚文的单行本。这些著作大部分是第一次用俄文印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档案和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所出版的某些载有约·维·斯大林著作的刊物，至今尚未找到。例如，《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学习大纲》（一八九八年）和《信条》（一九〇四年）等著作就是如此。

本版第一卷并未包括约·维·斯大林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四月的全部著作。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

著者第一卷序言

编入全集第一卷的著作是著者在活动初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写的，当时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尚未完全形成。这种情况也多少反映到全集第二卷。

为了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些著作，应该把它们看做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中自然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这些论点以后都被我党纠正了。我指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纲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

从第一卷里（见《土地问题》三文）可以看出，当时著者主张把地主的土地分归农民所有。在我党统一代表大会[①]上讨论土地问题时，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赞成分配土地的观点，大多数孟什维克代表主张土地市有[②]，而列宁和其余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则主张土地国有；在这三个草案的斗争过程中，当土地国有的草案显然没有希望被代表大会通过时，列宁及其他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就在代表大会上赞成分配土地的草案。

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提出了三个理由反对土地国有：（甲）农民不会赞成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土地归为己有；（乙）农民将反对土地国有，因为他们会把土地国有看成废除当时已归农民

——————————————

①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旨在把党内两派统一起来，故称“统一”代表大会。——译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把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所谓地方自治局支配。——译者注。

所有的那些土地的私有权的一种措施；(丙)即使能够说服反对土地国有的农民，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不应当主张土地国有，因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俄国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会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假使大量的收归国有的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国家手中，那就会过分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而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

当时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依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也在内）所公认的前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革命中断时期，即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间歇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将有可能更自由更蓬勃地发展起来，而且扩展到农业方面去，阶级斗争将更加深入而极其广泛地展开，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将增长起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将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且只有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会到来。

应该指出，两种革命之间会有长期间歇这一前提，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对，当时无论是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和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或主张土地市有的人，都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应促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蓬勃地向前发展。

我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是否知道列宁当时主张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不间断的革命呢？是的，知道的。这是从他的小册子《两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五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里面知道的，在那里他说：“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但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并没有好好钻研这个问题，没有了解它的伟大意义，这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修养不够，也是由于我们犯了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关心理论问题的通病。大家记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列宁在当时没有发挥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的论据，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运用这些论据来论证土地国有的主张。他当时没有运用这些

论据，是不是他认为问题尚未成熟，而且没有指望出席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能了解和接受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呢？

只是过了些时候，当列宁关于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路线时，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才消除了；因为当时已很明显，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特殊的发展条件已经给由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党除了土地国有的纲领而外，是不能有任何土地纲领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从第一卷里（见《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出，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同样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是大家公认的。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这样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间产生的。大家知道，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据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而首先会在资本主义阵线薄弱、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这个阵线、资本主义即使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里获得胜利。

对搜集在第一卷里的著作，著者的意见就是如此。

约·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一月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

编 辑 部 的 话[①]

我们这一部分格鲁吉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深信创办一种自由的定期刊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会使共同事业受到损害；我们深信每一个觉悟的读者都会欢迎这种刊物并给以各种帮助；因此，针对着这种需要，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愿望。今天，我们办的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刊物《**斗争报**》[1] 创刊号出版了。

为使读者对于我们这个刊物，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有明确的认识起见，我们要讲几句话。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也波及我们称之**为**高加索的这一个俄国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们的格鲁吉亚同样被波及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它一共只有几年的历史，确切一点说，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们这里也像其他各地一样，最初时期的工作也没有超出秘密活动的范围。我们近来所看到的那种鼓动工作和广泛宣◇3◇[②]传工作，当时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只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小组上面。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已经在工人群众中间传播开来，于是工作也就超出了狭小的秘密活动的范围，而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间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向第一批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过去还不突出、也不十分需要加以阐明的问题。首

————————————————

① 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斗争报》社论。——著者注

②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 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

先极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更广泛地展开斗争？口头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广泛地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然而革命者现在的工作条件却是如此矛盾，如此困难，并且要求作如此重大的牺牲，以致无论宣传工作或鼓动工作，往往都不能像运动初期所需要的那样进行。

靠书本和小册子进行小组活动渐渐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宪警的迫害，其次也由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动工作就会松懈下来，要和工人保持联系，要时常到工人那里去，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对于许多迫切的问题都盼望得到解释。残酷的斗争在工人周围进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对付工人，而工人却无法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时局，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邻近某工厂遭到小小的挫折，就会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消沉下去，对前途失掉信心，于是领导者又得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靠那种只能解答某些具体问题的小册子进行鼓动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效果是很小的。因而创办一种能够解答日常问题的刊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是无须我们证明的。在格鲁吉◇4◇亚工人运动中，以定期刊物作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为了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起见，我们认为关于合法报纸应该讲几句话。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无论这个报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版的，也无论它的方针怎样）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只要有一丝真理的光芒从缝隙里透露出来，他们就用红墨水和剪刀来对付。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地飞到书报检查局：

“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报纸是不能真正办好的，工人要想在报纸上，哪怕是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有关工人问题的报道和正确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有人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上面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员的疏忽而放过的寥寥几行顺便涉及工人问题的文字，那末应该指出：谁要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片言只字上面，谁要靠这些零碎消息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宣传工作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一点，不过是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罢了。

总之，创办格鲁吉亚的自由的定期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现在问题只在于怎样办这个刊物，它应当以什么为指南，它应当给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些什么。

如果从旁观者的地位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的存在问题，尤其是内容和方针问题，那末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自然地简单地自行解决：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5◇动，并不仅仅是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和全俄的运动携手并进，因而是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由此可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抹杀了我们所不能回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难。我们所讲的是语文方面的困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可能通过全党机关报来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而把阐明仅属地方性问题的事情交给各个地区委员会去做，然而格鲁吉亚报纸在其内容方面都处于困难的境地。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

鲁吉亚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对任何事实都不能不加以解释，并且还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别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这个报纸的内容和方针。

我们应当要求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战斗的工人身上。我们认为用不着多说，在俄国，而且到处一样，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显然，◇6◇只有工人运动才有自己的坚固根基，也只有它才没有任何荒诞无稽的空想。因而这个报纸，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地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可是，因为在俄国今天的情况下，除工人以外，社会上还可能有其他阶层的人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姿态出现，并且因为这种自由是俄国战斗工人当前的目标，所以这个报纸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应该给以篇幅，哪怕这个运动是发生在工人运动范围以外的。我们说“给以篇幅”，不是仅仅顺便刊载一些报道或简讯，不，这个报纸必须特别注意其他社会阶层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必须解释每一社会现象，从而影响每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因此，这个报纸应该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形势，估计到这个形势的一切后果，而且要把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尽可能提得更广泛些。

我们确信，谁也不能利用我们这些话来证明我们似乎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和实行妥协的人。对于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哪怕这个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生的）给予应有的估价，指出弱点和错

误，也不会给社会民主党人涂上机会主义的污点。不过我们决不应忘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每一个运动，我们就会避免伯恩施坦派的一切呓语。

这样，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必须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经常给以明确的答复，解释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7◇

同时，这个报纸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必须及时向读者报道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一切策略观点。它必须向读者介绍其他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干什么，在怎样斗争，必须及时地号召格鲁吉亚工人起来参加斗争；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应不加以注意，不应不给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用依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就能全部完成这些任务的诺言来欺骗自己，又欺骗读者。要把这个报纸办好，就需要读者和同情者方面的帮助。读者会看出《斗争报》创刊号是有许多缺点的，然而只要读者能给以帮助，这些缺点是能够改正的。例如，我们可以指出地方新闻报道做得不够。我们远离故乡，没有可能注视格鲁吉亚的革命运动，没有可能及时报道和阐明这个运动中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格鲁吉亚当地人士的帮助。谁愿意在写作方面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找出办法来和《斗争报》编辑部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我们号召全体战斗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亲切关怀《斗争报》的命运，对于它的出版和散发予以多方的协助，从而把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的报纸《斗争报》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

载于一九〇一年九月《斗争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8◇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乌托邦（空想的、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出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要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实于工作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家们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9◇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柏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抹杀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家们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不依靠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而用制定法律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

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在欧洲资产阶级制度的头上，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与自由党”、“民意◇10◇党”），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仍然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随后，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还不够觉悟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脱离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他们竭力发扬工人的觉悟性，竭力把个别工人集团反对个别业主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派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限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派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材。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11◇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派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散布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里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了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派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派清清楚楚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使工人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团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的试图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

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末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这个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用全力在工人中间◇12◇传播这些思想的。他们的力量就在于此，他们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此。一八九六年彼得堡各织布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现在某些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也不了解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像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

说：“对我们，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13◇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2]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3]所废除的节日。”(!!!)①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竟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他们。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派另一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一辈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容纳到现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14◇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

————————————————

① 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粹经济斗争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著者注

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可见这些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渺茫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某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想到，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末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要给经济斗争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宪警的恶毒迫害使得任何◇15◇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宪警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宪警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

身、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经济斗争琐碎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普通一次小小的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政治经济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企图，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企图，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旧有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一九〇〇年哈尔科夫五一大运动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经济罢工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16◇**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

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了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唯利是图的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关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地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17◇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各种教派的千百万信徒，他们不愿依照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 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明白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末俄国的暴政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它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它们的时候，它们简直不敢想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

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去独享。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凶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一下（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个道理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 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18◇工人阶级和一般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古老的真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企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4]），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

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十二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19◇对于广大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拿过来，在上面大书“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显示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散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①]。在◇20◇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斗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见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

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从前他们总是这样说），今天他们却挤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情况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响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些人是普通的“好奇者”，哪些人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能◇21◇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从我们阵营中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

————————————————

① 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著者注

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的胜利”[①]。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散播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魔影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枪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枪弹这种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是不亚于皮鞭的。我们并不以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派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派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而奋斗。◇22◇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

———————————————

① 皮洛士是伊壁鲁斯王（公元前三一九年至二七二年）。公元前二八〇年他与罗马作战终于取得胜利，但损失惨重。他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也就完了！”“皮洛士的胜利”表示得不偿失之意。——译者注。

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结束。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末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要知道，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无伤大体◇23◇的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魔影”，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所惊吓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①]。

————————————

①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派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著者注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政权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有本事站在总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呢，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闭塞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24◇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载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斗争报》第二、三两期合刊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5◇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

一切都在变化…… 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过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于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们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借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把格鲁吉亚贵族反对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统治者的个别阴谋计算在内，那末这个“运动”就没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荣誉的事情，没有在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显着的痕迹。只要社会◇27◇生活事变稍微触到这个本来就很软弱的“运动”，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坏。的确，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除、贵族银行的创立、城市和乡村中阶级对抗的加剧、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这一切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给**“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

和农具，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胁等等。格鲁吉亚贵族的另一派，更软弱的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一派热中于恢复那些已被破坏的格鲁吉亚教堂（这是他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文！），即“昔日伟业的纪念碑”，并且虔诚地等待一个能实现他们**农奴君主制**“愿望”的奇迹的到来。

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28◇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阉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5]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诃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渐渐在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和“俄罗斯”之间架起一座桥◇29◇梁，使这些人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罗斯”发生联系，从而使本来已经动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打击！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正如无产阶级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也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

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30◇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6]也再三重复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我们想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接近起来**。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疏远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把无产者联合成一个政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把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各个政党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

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31◇意！总之，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得使敌人拍手称快，并且亲手葬送你们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们就暂且同意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意见，跟着他们走，看他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俗语说得好：追问撒谎人，就要追到撒谎的大门。

假定我们听从了我们那些联邦主义者的意见并建立了各个民族的政党，那末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难了解的。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都成为建立各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和阿尔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①]。◇32◇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

———————————————

① “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刚刚采取了这样一个值得夸耀的步骤。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坚决地宣称：“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分开；[转下页]

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拨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33◇

————————————

[接上页]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应当是阿尔明尼亚人民的最有理性和最有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结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应竭力确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思想，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将是自己种族的嫡子”等等（见“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的“宣言”第三条）。

第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能把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呢？难道它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分开”吗？当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于一九〇〇年(在梯弗里斯)对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阿尔明尼亚人宣战时，难道它不是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了”吗？“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如果不是一个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其他各阶级“分开了”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又是什么呢？也许“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一个包括一切阶级的组织吧？！难道战斗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于“确定阿尔明尼亚社会思想”吗？难道它不应当前进，向这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宣战并给它灌输革命精神吗？事实证明它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不言而喻，“宣言”应当使读者注意的就不是“确定社会思想”，而是同这个思想作斗争，而是必须使这个思想革命化：这样一来，“宣言”就会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义务最后，既然这个种族中的一部分——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像蜘蛛那样吮吸着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的血液，而另一部分——阿尔明尼亚僧侣——不仅吮吸工人的血液，并且一贯地腐蚀他们的意识，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又怎能成为“自己种族的嫡子”呢？[转下页]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采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像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34◇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

————————————————

[接上页]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却看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是用从崩得（犹太工人联盟）[7]那里抄袭来的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的。一般讲来，“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处处模仿崩得。他们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的决议第二条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们把“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叫做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保护者（见上述“宣言”第三条）。“宣言”的起草人忘记了我党在高加索各处建立的委员会[8]几年来在高加索一直被认为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产者的代表，忘记了这些委员会在用阿尔明尼亚文进行口头的和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在斗争时领导他们等等，而“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却是不久前才产生的。他们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并且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为了一丝不苟地抄袭崩得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一定会忘掉更多的东西的。——著者注

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35◇

其次，我们党已经清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借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民族问题”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

① 不妨指出，下面所写的都是对我们党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所作的一些说明。——著者注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先生们要求些什么呢？

（一）要求“**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现在俄国盛行的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吗？你们想把政府剥夺去的公民权利归还俄国各民族，所以要为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权利吗？难道我们反对这个要求吗？我们非常了解公民权利对于无产者有多么大的意义。公民权利是一种斗争武器，剥夺这些权利就等于剥夺武器；谁不知道没有武器的无产者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呢？俄国无产阶级正需要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都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无产者斗争得愈好，他们的阶级觉悟就愈高，而他们的阶级觉悟愈高，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也就愈紧密。是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因此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用全◇36◇力为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而斗争！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七条上党所规定的“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权利”，就会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负有实现这些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二）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语言自由**”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各“异”族无产者几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学习，几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形吗？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各“异”族的无产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难道我们能够默不作声吗？究竟我们的党纲是怎样回答俄国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八条上我党所要求的“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设立为保证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学校，每个公

民都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你们只要读了这一条，就会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负有实现这一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37◇

（三）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自治**”吗？

你们想借此说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样适用于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吗？你们想让这些地方都有权使**一般的**国家法律适合于它们的独特条件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求的内容是这样，那就必须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这个要求，必须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即糊涂观念而直截了当地述说出来。如果你们听从这个劝告，那末你们就会相信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这个要求。我们毫不怀疑，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不能同样应用国家宪法，这样的地方应该有权用适当的形式来实施一般的国家宪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以便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中间的政治力量。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们再读我们党纲第三条上我党所要求的“施行广泛的地方自治，保证各个具有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权实行区域自治”，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要把这个要求的民族主义烟雾廓清，然后把实现这个要求的责任担负起来。

（四）你们是向我们指出沙皇专制制度野蛮地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横暴地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并从各方面压制他们，野蛮地破坏了（并继续破坏着）芬兰人的文化机关，残暴地掠夺了阿尔明尼亚的民族财产等等吗？你们要求保证不受专制制度残暴的蹂躏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行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反对这种暴行吗？！目前谁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俄国政府是如何在压制和绞杀俄国各“异”族的人民。同样毫无疑义，政府的这种政策每天都在腐蚀俄国无◇38◇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

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反对沙皇政府这种含有腐蚀作用的政策。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保卫这些民族的各种机关，使之免受专制制度宪警暴力的摧残，我们不仅要保卫它们的有益的机关，并且要保卫它们的无益的机关，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向我们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权消灭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请读一读我们的党纲第九条吧。难道我们的党纲第九条不就是讲的这一点吗？要附带说一句,这一条无论在我们的敌人或友人中间都引起了纷纷的议论。

但是在这里，有人打断我们的话，劝我们停止谈论第九条。我们问道：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和同一党纲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根本矛盾”，如果赋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的权利（见第九条），那末在上述党纲中就不应当有第三、第七、第八各条，——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文在党纲中仍然保留，那末毫无疑问，就应当把第九条从党纲中删去。毫无疑问，“格鲁吉亚报”[①]也是讲的这一类的话，它居然以其固有的轻率态度问道：“对一个民族说‘我给你以区域自治权’，而同时又提醒这个民族,说它有权依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这是什么逻辑呢？”（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可见”纲领中含有逻辑上的矛盾，“可见”为了清除这个矛盾，必须把党纲中某一条或某几条删去！是呀,“无条件地”必须删去,否则怎么行呢？◇39◇请看，逻辑本身在通过不合逻辑的“格鲁吉亚报”表示抗议了。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位“解剖圣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毕业证书、工作场所、解剖器具、无比的奢望,他样样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样小小的东西——

——————————————

① 我们在这里提到“格鲁吉亚报”，只是为了更好地阐明第九条的内容。本文的目的是批判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而不是批判根本和他们不同的“格鲁吉亚报派”（见第一章）。——著者注

解剖学知识。有一次，人家请他说明那些胡乱摆在解剖台上的一套骨头彼此间有什么联系。于是我们这位“著名的圣手”有机会大显身手了。“圣手”堂而皇之、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可是糟糕得很！这位“圣手”对解剖学却一窍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头接在哪些骨头上才可以成为一副完整的骨骼！这个可怜虫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费气力！最后，当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抓起几根骨头扔得远远的，同时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大骂特骂，说是“居心叵测的”人竟把一些假骨头放在他的解剖台上。当然，观众对这位“解剖圣手”只好报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鲁吉亚报”也发生了这类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们的党纲，但它却不知道我们的党纲究竟是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加以分析，它不懂得这党纲中的各个条文彼此有什么联系，每个独立条文有什么意义，于是就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忠告我们说：因为我不能了解你们的纲领的某某条文，所以(？!)必须把它们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我并不想耻笑这个本来就够可笑的“格鲁吉亚报”，因为俗语说，好汉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愿帮助它理解我们的党纲，不过要它履行下面几个条件：（一）要亲口承认自己的无知；（二）要仔细听我的话；（三）要顾到逻辑[①]。◇40◇

请看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是根据**政治集中主义**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这些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时所持的理由是：所谓“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即“解放”俄国各“异”族人民，一般讲来，在政治统治权还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

————————————————

① 我认为必须告诉读者，“格鲁吉亚报”从最初几期起就向逻辑宣战，认为逻辑是必须捣毁的一种镣铐。你们不要理会“格鲁吉亚报”常用逻辑名义讲话这回事，因为它这样做不过是由于它秉性轻浮和患有健忘病罢了。——著者注

办不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各异族”和“俄罗斯”之间逐渐搭起一座桥梁，使其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中间产生友好的感情，结果就使他们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据；第二、**一般讲来**，无产阶级是不会赞助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任何**这样的**运动总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腐蚀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这些理由就产生了**政治集中主义**的思想，以及由这个思想所决定的我党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

然而，这正像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造成某种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各“异”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运动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有利的。

那时我们党应该怎么办呢？

正因为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把第九条列入我们的党纲，正因为预见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赋予◇41◇各民族一种权利，使他们能竭力本着自己的愿望（例如，完全“解放”，实行分立）去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我们党是一个以领导全俄战斗无产阶级为目的的党，它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去适应无产阶级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应该把这样的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

任何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都应该这样做。

然而，“格鲁吉亚报”的“圣手”和某些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原来并不以第九条的这种意思为满足。他们要求“断然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利还是无利？①

————————————

① 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所载“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著者注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断然地”回答他们。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

可是，这一类的例子并没有使“格鲁吉亚报”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们也曾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断然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合作社（即消费生产互助社）对于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42◇他们很简明地解释了：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提高到应有程度的地方，在无产者已团结成一个强固的政党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党着手建立和领导的，那它对无产阶级就会有很大的益处；而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是有害的，因为合作社能使工人产生小商人的倾向和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从而损害工人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个例子也没有使“格鲁吉亚报派”得到教益。他们还更加固执地问道：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请你们断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们看到，那些能在各“异”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此刻还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它们不过是我们所假定的一些可能产生的条件罢了。此外，究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那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有多大益处或害处，目前也无法知道！试问，有什么根据[①]来“断

① “格鲁吉亚报派”先生们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筑在沙滩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够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坚固的基础！——著者注

然地”回答这个问题呢？从什么地方能得出这样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断然地”回答，难道不是愚蠢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让各“异”族人民自己去解决，而我们则应当为他们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让各民族在必要时自己去决定：“民族独立”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末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43◇

可见，依据第九条的规定，各“异”族人民有按照自己愿望来处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而我们，依据同一条规定，则应该设法使这些民族的愿望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愿望，使这些愿望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为此就必须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去教育这些民族的无产者，而对某些反动的“民族的”习惯、风俗和机关则进行严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这些习惯、风俗和机关，使之不受宪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条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们纲领中的这一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原则有着多么密切的逻辑上的联系。既然我们的整个纲领建立在这个原则上，我党党纲第九条和其余各条有逻辑上的联系自然也就很明显了。

愚蠢的“格鲁吉亚报”之所以被称为“圣明的”机关报，也是因为它不能领会这种简单的道理。

关于“民族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到呢？

（五）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

但是，这种“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学老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谁驳倒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吗？历史告诉我们，谁也没有驳倒过。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上述的科学观点，应该同科学一起重复说：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44◇

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不良的）后果。也许只有“格鲁吉亚报”，即“革命的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机关报”（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①]，才适于谈论这种“哲学的”蠢话。

* * *

民族问题就是如此。◇45◇

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民族问题分成了各个部分，吸取了这个问题中的精华，把它注入自己纲领的血管中，并借此表明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垒而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原则。

试问，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民族政党呢？或者：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借以建立自己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基础”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悬在半空中的。

他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彻底抛开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采取巩固民族壁垒的原则（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抛弃党组织内的任何联邦主义，而大胆地举起消灭民族壁垒的旗帜，并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阵营中。

载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七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46◇

————————————

① 把自己称呼得这样奇怪的“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格鲁吉亚报”叙述说（见“格鲁吉亚报”第十期增刊第一号）：[转下页]

[接上页]“今年春天，格鲁吉亚革命者，即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格鲁吉亚报’的拥护者、格鲁吉亚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集会并且……结成……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 是的，正是这些一心一意轻视任何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崇拜政治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否认任何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措施的“格鲁吉亚报派”，——正是这样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群人，居然结成…… 一个“党”了！这样理想的杂凑班子，真是人们任何时候也想像不到的呀！这就是人们不会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组织家认定，要把人们结合成一个党就必须有共同原则。他们弄错了！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向我们说：“党”所借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原则，而是没有原则！我们不要“理论”和原则，不要这些奴隶的枷锁！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谈哲理的口吻说道：我们把这些东西摆脱得愈快愈好。果然，这些人一摆脱了原则，一下子就建立了…… 一座纸房子——对不起——建立了“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原来“七个牛人”只要凑在一块，随时就能建立一个“党”！这班不学之徒、无兵之“将”竟密谈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等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是“沙文主义者”，我党高加索联盟“奴隶般地”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等等（见格鲁吉亚革命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怎能不令人发笑。本来也不应该期待巴枯宁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能做出什么好事情。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厂出什么货。

* 应当指出，我党各个部分的一致行动，在某些神经失常的“分子”看来就是“奴隶般地服从”。医生断定说：这都是神经衰弱的结果。——著者注

库 泰 依 斯①来 信[9]

这里现在需要从第六十三期起的“火星报”[10]（虽然它没有火星，但还是需要它，因为这报上至少还有一些时事简讯，那有什么办法呢，对敌人也必须好好地了解才行）。十分需要由邦契-布鲁也维奇负责出版的东西[11]：“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告全党书”（是否就是二十二人的宣言？[12]），略多沃依②写的“我们之间的争论”、“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罢工”等文章（如果出版了的话），列宁反驳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小册子[13]，“同盟代表大会记录”[14]，“进一步”[15]（如果此刻来不及，可缓寄）。任何新的刊物，从简短的宣言到较大的著作，只要是稍微涉及现在党内斗争问题的都在需要之列。

我读了加略尔卡③写的小册子“打倒拿破仑主义”。写得还不错。假使他那个铁锤打得更重一点，砸得更深一点，那就更好一些。开玩笑的语气和请原谅的字句使他的打击失去了力量和分量，因而损害了读者的印象。作者大概很懂得我们的立场，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发挥都很巧妙，所以这个缺点就特别刺目。凡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人，就应当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讲话。在这一点上说，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山鹰。

普列汉诺夫分析“做什么？”[16]的几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此人

———————————————

① 格鲁吉亚西部的城市。——译者注。

② 略多沃依是阿·阿·波格丹诺夫（又名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译者注。

③ 加略尔卡即布尔什维克米·斯·奥里明斯基（又名阿历山得罗夫）。——译者注。

人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47◇和敌意。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有的。我觉得普列汉诺夫是落在**新问题**的后面了。他以为在他面前的还是旧时的论敌，所以他总好唱老调，说“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好像列宁说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时期便能出现似的。现在就连那些中学生也知道“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而现在所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一般的公式我们早就领会了，现在已到详细说明这个一般性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关心的是，怎样把各个思想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怎样把大大小小的思想结成一个严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理论，并且由谁来创造和结成。究竟是群众向自己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假若群众自己和群众的自发运动能向我们提供社会主义理论，那就用不着去护卫群众，使他们不受修正主义、恐怖主义、祖巴托夫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有害影响，因为“自发运动**本身**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如果说自发运动本身**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不要忘记，列宁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理论），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自发运动**之外**产生的，是由具备现代知识的人在观察和研究自发运动以后得来的。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依赖自发运动的增长”，甚至是违背着这个运动而创造的，然后才**从外面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依照自己的内容，即依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客观要求而**纠正**这个运动。

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结论）就是：我们应把无产阶级提高到能够认识真实的阶级利益，认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把这个理想琐碎化,或者使它去适应自发运动。这个实际结论正是建筑在列◇48◇宁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面。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前提，任何机会主义都沾染不上你。列宁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之所以称它为列宁思想，是因为在俄国文坛上没有人像列宁把它说得那样清楚。普列汉诺夫以为自己仍然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咀嚼着已经咀嚼过十七八遍的道理，

说什么“二二得四”。他居然不以重复马尔丁诺夫的思想为耻……

你大概读过二十二人的宣言…… 你们那里来过一位同志，他带走了高加索各委员会主张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

你以绝望的眼光看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库泰依斯委员会动摇过，可是我已经说服了他们,以后他们也就誓为布尔什维主义效忠了。说服他们并不困难，因为有了这个宣言，中央的两面政策也就昭然若揭，而在得到关于这事的新消息之后，就更不能有所怀疑了。它（中央委员会）一定会碰垮台的，这里的同志和俄罗斯的同志都将竭力使它垮台。大家都在咬牙切齿地反对它。

写于一九〇四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次刊印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49◇

库 泰 依 斯 来 信

（也是那位同志的信）

回信写迟了，请不要生气。一向都很忙。你寄来的东西（“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加略尔卡和略多沃依两人写的“我们之间的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火星报”最近几期）都收到了。略多沃依的见解（“结论之一”）我是喜欢的。反驳卢森堡的那篇文章也很好。这些先生——卢森堡、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等——竟像至亲好友似的，树立了一种什么家风。他们不能彼此“背弃”，就像宗法氏族的成员一样，互相包庇，丝毫也不去考察究竟亲人有无过失。正是这种家庭“亲属”的情感使得卢森堡不能客观地观察党内危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对事实了解很差，戴着外国眼镜看问题等等）。这也就说明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他诸人的某些不体面的行为。

这里大家都爱读邦契出版的刊物，因为这些刊物很巧妙地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假如加略尔卡**切实地**论述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那就好了。加略尔卡论文的基本意思是说：普列汉诺夫从前讲的是一套，现在讲的又是一套，自相矛盾。这有什么了不得！这算什么新发现！这并不是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的自相矛盾。也许他还要以此自夸，以为自己就是“辩证◇51◇过程”的活的体现。自然，前后不一致是“领导者”政治面貌上的一个污点，而这（污点）无疑是应当指出的。但这里（即在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所说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存在对意识的关系问题）和策略问题（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依

我看来，加略尔卡本应指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进行的论战，是十足的唐·吉诃德式的举动，是同风车搏斗，因为列宁在自己的书里是始终一贯地遵循着马克思**关于**意识**起源**的原理的。至于普列汉诺夫在策略问题上所进行的攻击，则是转到机会主义者阵营去的“个人”所特有的彻头彻尾的糊涂观念。假如普列汉诺夫把问题提得很明确，譬如这样说：“究竟是谁制定纲领，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又如：“究竟是谁把谁提高到了解纲领的水平，是领导者提高被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提高领导者？”或者是：“也许不需要领导者把群众提高到了解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水平吧？”假如普列汉诺夫如此明确地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提出这些性质单纯、内容重复因而本身就包含着答案的问题，那末他也许会对自己的意图大吃一惊，不会这样大吹大擂地来反对列宁了。可是由于普列汉诺夫没有这样做，就是说，由于他用“英雄和群众”的词句混淆了问题，所以他在**策略上**就走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混淆问题乃是机会主义者的特色。

在我看来，假如加略尔卡从本质上提出了此类的问题，那就更好了。你也许会说这是列宁的事情，但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列宁这些受人指摘的观点并不是列宁私人的观点，所以这些观点之被曲解，对其他党员也像对列宁一样，是关系重大的。当然，列宁能比别人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52◇

已经通过了一些支持邦契的出版物的决议。也许还能弄到一些经费。你大概已在“火星报”第七十四期上读过一些“拥护党内和平”的决议。**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的决议和**巴库委员会**的决议没有被提到，是因为那上面丝毫也没有谈到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我写信告诉过你，九月的决议是坚决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我们且看将来怎样吧，就是说，且看党总委员会[17]开会的结果怎样吧。你收到六个卢布没有？最近几天内，你还会收到一些钱。不要忘记托那个人把“给一位同志的信”[18]这本小册子带给我们，因为这里还有很多人没有读过。请把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寄来。

柯斯特罗夫[19]又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信内说到精神和物质（彷佛讲的是印花布一类的物质）。这个蠢驴竟不懂得他在这里遇见的对象并不是“犁沟报”[20]的读者。组织问题和他有什么相干呢？

“无产阶级斗争报”[21]最近一期（第七期）已经出版了。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反对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联邦主义的论文[22],顺告。如有可能，就将这一期寄给你。

写于一九〇四年十月

第一次刊印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53◇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

（论党章第一条）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末就很明显，和这◇55◇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①]。

————————————

①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著者注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56◇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承认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57◇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只以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为满足，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很明显，就是党员也只有当他们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做这个党的一员，算做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

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①]。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58◇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才能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像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而另一方面，又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承认党纲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末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必要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59◇

——————————————

① 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便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著者注

列宁同志[①]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方便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自以为既不“狭隘”又非“不方便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②]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像什么“党”呵！），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像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60◇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承认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

———————————————

① 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著者注

② 马尔托夫是“火星报”编辑之一。——著者注

以“承认”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方便”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只以承认党纲为满足，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承认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末实现他所承认的纲领就不十分需要了。马尔托夫好像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并不一定要求党员非组成严整的部队不可，非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成了。

我们要问：那末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做这个组织中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61◇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承认我们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个别“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才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做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

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 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像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可疑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承认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62◇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当然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承认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像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末丢掉马尔托夫的条

文是会正确一些。

这就是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反的多么荒谬的条文！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末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63◇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末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载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八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64◇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

沙皇陆军大量减员，沙皇舰队相继覆没，旅顺口终于可耻地投降了，——这又一次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衰朽腐败……

由于饮食恶劣和缺乏任何卫生设备，在士兵中间流行着各种传染病。又因为连起码的住所和服装都没有，这种不堪忍受的情况就更加恶化了。瘦弱而又疲惫的士兵，像苍蝇一样地死去。而在这以前还有成千上万的阵亡者！…… 这种情况在士兵中间引起了波动和不满。士兵逐渐从沉眠中觉醒过来，开始觉得自己是人；他们不再盲目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时常用口哨声和威吓声来对待那些作威作福的军官。

一个军官从远东给我们来信说：

“我做了一件蠢事！不久以前，我遵照长官的要求向士兵讲了一次话。当我刚刚提到必须保卫沙皇和祖国的时候，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一片口哨声、谩骂声、威吓声…… 我不得不躲开这群狂怒的人……”

远东的情况就是如此！◇65◇

如果再加上俄国国内后备军人中间的骚动和他们在敖德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库尔斯克、平兹及其他城市里举行的革命的游行示威，新兵在古里亚、依麦列梯亚、加尔塔里尼亚、俄国南部和北部的抗议，如果再注意到无论是监狱或子弹都阻止不住抗议的人们（不久以前，在平兹有几个后备军人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枪决），那末就容易了解俄国士兵的心事了……

沙皇专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它的“可靠的军队”！

另一方面，沙皇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军事失败一个接着一个。沙皇政府在外国政府面前逐渐丧失了信用。目前它只能勉强弄到必需

的款项，再过些时候，任何贷款也会弄不到手了！“无疑地，你很快就要垮台了；你被推翻以后，谁来还债？”这就是外国政府对信用扫地的沙皇政府的回答！至于困苦饥寒的人民，连自己都不能糊口，还能拿出什么给沙皇政府呢？

这样，沙皇专制制度连它的第二个主要靠山，即仰给于贷款的富裕国库也要丧失了！

同时，工业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工厂不断地倒闭，数百万工人要求面包和工作。更严重的饥荒笼罩着受尽苦难的农村贫民。日益高涨的人民的怒潮愈来愈猛烈地冲击着沙皇的宝座；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摇摇欲坠了……

当俄国愤怒的人民准备进行坚决冲锋的时候，四面受敌的沙皇专制政府像毒蛇那样蜕去老皮，竟放下（彷佛是放下！）**皮鞭**，披上羊皮，宣布了**和好政策**！

同志们，听见了吗？沙皇政府现在请求我们忘掉皮鞭的响声和子弹的啸声，忘掉成百成千被杀◇66◇害的英勇同志，忘掉他们的英灵，而这些英灵正环绕在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耳语说：“要复仇呀！”

专制制度竟恬不知耻地向我们伸出沾满鲜血的双手，劝我们同它和好！它下了一道什么“圣旨”[23]，答应给我们什么“自由”……真是一群老练的强盗！他们想用空话来给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俄国无产阶级群众充饥！他们想用空话来满足千百万穷困疲备的农民的要求！他们想用诺言来压倒战争的牺牲者孤儿寡妇的哭声！可恶的东西！他们快淹死了，还想抓住一根草来救命！……

是的，同志们，沙皇的宝座摇摇欲**坠**了！沙皇政府把从我们身上刮去的脂膏作**为**俸禄分给那些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大臣、省长、县官、狱吏、警官、**宪兵和暗探**；这个政府把我们的子弟抓去当兵，又强迫他们来枪杀我们；这个政府千方百计地支持那些时时刻刻反对我们的地主和老板；这个政府给我们戴上脚镣手铐，使我们沦**为**毫无权

利的奴隶；这个政府野蛮地践踏和侮辱了我们最神圣的东西——人格；正是这个政府，现在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要失去它的立足地了！

是复仇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为那些在雅罗斯拉夫里、多姆布罗夫、里加、彼得堡、莫斯科、巴土姆、梯弗里斯、兹拉托乌斯特、梯霍列茨卡雅、米哈伊洛夫、基什涅夫、哥美里、亚库茨克、古里亚、巴库及其他地方被沙皇暴吏残杀的光荣同志复仇的时候了！现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对远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无辜死难者负责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擦干他们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的时候了！现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对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对它一向用来拘禁我们、侮辱我们的锁链负责的时候了！现在是打倒沙皇政府、为社会主义制度扫清道路的时候了！现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了！◇67◇

我们一定要**推翻**沙皇政府。

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他们竭力想在沙皇那里求得一点恩施，使沙皇采纳他们所拟定的“宪法草案”[24]，以便用一些小小的**改良**给他们自己铺平走上政治统治的道路，并且把沙皇变成他们的工具，用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然后有步骤地扼杀无产阶级和农民！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自由派的先生们，已经太晚了！请睁开眼睛看看沙皇政府究竟给了你们些什么吧，请读一读那道“圣旨”吧：那里有微不足道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的“自由”，有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不受侵害”的“保障”，有微不足道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时还有大书特书的训诫，说“一定要维护不可变更的帝国根本法”，说“要采取切实办法来保持法律的全部效力，因为这种法律是专制国家内最重要的朝廷柱石”！……结果呢？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可笑的沙皇所下的可笑的“勅令”，而对各报社的“警告”就雪片似地飞来，宪兵警察到处横行，甚至连平常的宴会也被禁止了！沙皇政府自己就已竭力证明：它那些微不足

道的诺言都不过是无聊的空话而已。

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他们坚信这句谚语：“驼背只有坟墓能医治。”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这个革命的主力是城乡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旗手是社会民主工党，**而决不是你们这班自由派的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忘记了这件显而易见的“小事”呢？◇68◇

暴风雨即将来临，它是曙光到来的先声。从巴库到巴土姆的高加索无产阶级，在两三天前就已一致表示了他们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痛恨。无疑地，高加索无产者这次光荣的尝试对俄国其他各处的无产者不会没有影响。其次，请读一读各地工人群众对沙皇政府表示深恶痛绝的无数决议，请听一听农村中那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沸腾的怨声，你就会确信俄国像一枝装上子弹、扣起扳机的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是的，同志们，俄国革命即将爆发，“根除”可恶的沙皇的龌龊宝座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我们的重大的责任是充分准备迎接这个时机。同志们，我们就来准备吧！来吧，我们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撒播好的种子吧！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才能和我们同甘共苦而且总是走在我们前头！今后还是它来领导我们前进，也**只有**它才能领导我们前进！

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

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

同志们，前进吧！当沙皇专制制度动摇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准备坚决冲击！是复仇的时候了！◇69◇

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一九〇五年一月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尔印刷所）一九〇五年一月八日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联盟委员会◇70◇

各 民 族 友 爱 万 岁!

公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正在发展,民族间的壁垒正在崩溃！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正在团结成一支各民族的大军，无产阶级运动的许多细流正在汇合成一条总的革命洪流。这条洪流的浪潮日益高涨，日益猛烈地冲击着沙皇的宝座。腐朽的沙皇政府摇摇欲坠了。无论监狱、苦役或绞架，都阻止不住无产阶级的运动。这个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了！

沙皇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它煽动俄国各民族互相敌视，它唆使俄国各民族互相残杀，它力求把无产阶级总的运动分裂成一些零星的运动并使其互相对抗，它组织蹂躏犹太人、阿尔明尼亚人的暴行，如此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用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离间俄国各民族，削弱它们，然后毫不费力地把它们一一征服！

分而治之，——这就是沙皇政府的政策。沙皇政府在俄国各个城市是这样干的（请回顾一下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城市的蹂躏行为），在高加索也是这样干的。下贱的东西！它力求用公民的鲜血和尸体去巩固它那可恶的宝座！巴库城内濒于死亡的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呻吟，妻子、母亲和孩儿的眼泪，诚实而尚未觉悟的公民的无辜鲜血，手无寸铁、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惊惶神色，被毁坏的◇71◇家园，被劫掠一空的商店和不绝于耳的可怕的枪声，——这就是屠杀诚实公民的刽子手沙皇用以巩固他那宝座的东西。

是的，公民们！是他们这帮沙皇政府的走卒唆使一部分还没有觉悟的鞑靼人去残杀和平的阿尔明尼亚人！是他们这帮沙皇政府的走狗

把枪枝和子弹发给鞑靼人，叫警察和哥萨克穿上鞑靼服去残杀阿尔明尼亚人！这帮沙皇的奴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造这次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他们的野蛮目的毕竟达到了。罪该万死的沙皇政府！

现在，可鄙的沙皇手下这帮可鄙的奴仆又竭力要在我们梯弗里斯挑起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他们要你们流血，他们想分裂你们，统治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呀！阿尔明尼亚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你们要携起手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政府企图分裂你们，你们就一致回答它：打倒沙皇政府！各族人民友爱万岁！

大家携起手来，联合起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团结在这个真正能把巴库惨案的唯一祸首沙皇政府葬入坟墓的力量的周围。

你们应当一致高呼：

消灭民族纠纷！

打倒沙皇政府！

各族人民友爱万岁！◇72◇

民主共和国万岁！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印刷所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员会◇73◇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

大希望变成了大失望！不是民族敌视，而是互相友爱,互相信任！不是兄弟间的自相残杀，而是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这个制造蹂躏行为的祸首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沙皇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它毕竟没有挑起梯弗里斯各民族的互相残杀！……

沙皇政府早已在竭力唆使无产者自相残杀，早已在竭力分裂总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以它在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蹂躏少数民族的暴行。为了同一目的，它又在巴库挑起了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现在，沙皇政府又把视线投向梯弗里斯来了。它想在这里，在高加索的中心演出一出流血的惨剧，然后再搬到各地去重演！它唆使高加索各民族互相残杀，使高加索无产阶级淹没在自己的血泊里。多妙呵！沙皇政府洋洋得意了。它甚至散发传单,号召屠杀阿尔明尼亚人！它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在二月十三日那天，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和俄罗斯人，好像偏要和沙皇政府作对，集合在万克教堂院子里发誓要“在反对离间我们的魔鬼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的气概。有些人发表演说,号召“团结”，群众报以掌声。我们的传单散发了三千份。群众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群众的情绪高昂起来了。他们简直有意和政府为难，决定次日还在这个教◇75◇堂院子里集合，以便再次“宣誓互相亲爱”。

二月十四日。教堂的整个院子和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散发和阅读我们的传单，都是完全公开的。民众成群结队地讨论着传单的内容。有些人发表演说。群情高昂，当即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从锡安教堂和回教寺院近旁经过，在途中“宣誓互相亲爱”，直到波斯

墓场停下，再作一次宣誓，然后解散。群众立刻实行自己的决议。在途中，在回教寺院附近和波斯墓场上，都有人发表演说并散发我们的传单（这天总共散发了一万二千份）。群众情绪越来越高。蓄积的革命精力正在奔放。群众又决定通过总督府大街及戈洛文大街继续游行示威，然后解散。我们委员会利用机会立刻组织了一个小小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由一个先进工人率领，位置在队伍的中心，于是一面临时制成的红旗就在总督府前飘扬起来了。由示威者抬起来的旗手发表了富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演说。他首先请同志们不要因旗帜上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而惶惑。示威者回答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口号已经牢记在我们心里了！”然后旗手说明红旗的意义，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批评先前发言的人，揭露他们言论的不彻底，指出消灭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必要并号召示威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红旗下进行斗争。“红旗万岁！”群众回答说。示威群众向万克教堂行进，途中停留三次并听旗手演说。旗手再次号召示威群众和沙皇制度作斗争，并请大家宣誓：要像现在参加游行示威一样，万众一心地举行起义。“我们宣誓！”群众回答说。以后，示威群众到达万克教堂近旁，同哥萨克发生了小小的冲突，然后就解散了。◇76◇

“梯弗里斯八千公民大示威”的情形就是如此。

梯弗里斯公民就这样回答了沙皇政府的伪善政策。他们为了讨还巴库公民的血债，就这样对万恶的政府实行了报复。光荣和荣誉归于梯弗里斯公民！

梯弗里斯数千公民集合在红旗下，几次宣判沙皇政府的死刑；面临着这种情形，万恶的沙皇政府的那帮万恶的奴才不得不实行退却，放弃了这次蹂躏少数民族的暴行。

可是，公民们，这是不是说沙皇政府今后再不设法组织这种暴行呢？绝对不是！只要沙皇政府存在一天，它愈失去立足之地，它就要愈频繁地对少数民族采取蹂躏行为。根绝这种暴行的唯一方法就是消

灭沙皇专制制度。

公民们，你们珍重你们自己和你们亲人的生命吗？你们爱护你们的亲戚朋友，而不愿遭受蹂躏吗？如果这样，那你们就要知道，只有消灭沙皇制度，才能消灭一切蹂躏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流血惨剧！

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就是你们首先应该达到的目的！

公民们，你们想消灭**任何**民族敌视吗？你们想求得各族人民的完全团结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你们就要知道，只有消灭不平等现象，只有铲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一切民族纠纷！

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是你们最后应该达到的目的！

可是，有谁能把卑鄙龌龊的沙皇制度连根铲除，有谁能使你们永不遭受蹂躏呢？只有社会民主◇77◇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有谁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有谁能使地球上的各民族团结一致呢？也只有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为你们争得自由与和平。

那末，你们就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站到社会民主党旗帜下面来吧！

公民们，站到红旗下面来吧！

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民主共和国万岁！

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万岁！

红旗万岁！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五日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印刷所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员会◇78◇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父母

略 论 党 内 意 见 分 歧[25]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像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案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三年)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本来应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79◇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会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

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八九八年），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必须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26]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80◇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不过当时还看不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①。

————————————

①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著者注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①。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81◇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

————————————————

①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27]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一九〇一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28]“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还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著者注

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82◇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29]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琐碎化，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要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

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的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①]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83◇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末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 **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正”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

① 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30]和列宁六人组成。——著者注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84◇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做什么？”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①，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②，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觉悟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③。◇85◇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②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③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六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页）——著者注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像“经济派”一◇86◇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末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②]。**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总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③]。但在那时以前怎◇87◇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像“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摈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④]，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八页。（同上，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二十九页。（同上，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④ 马克思：“宣言”第十五页[31]。——著者注

下来”①。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造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88◇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②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来。“但这是极大的错误”③。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七页，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32]（见该杂志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三期第七十九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同上，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二十六页。（同上，第二〇九页）——著者注

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多少能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多少参加这一创◇89◇造工作”②。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像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页至第二十一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七页。（同上，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动，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90◇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造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

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安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33]第六期“什么是党？”一文）。◇91◇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①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证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末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②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末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末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92◇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 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③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②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五十三页。(同上,第四一五页)——著者注

③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二一九页。——著者注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琐碎化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93◇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①]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②]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

---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②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出来的意识。——著者注

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六期）。“批评家”安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94◇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着重号是我加的）‘崇高理想’等等。”①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完全是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②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

① 见“旅行家”杂志第六期第七十一页。——著者注

②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那末安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安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做什么？”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造**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①]。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造**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安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95◇到**领会**“最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安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不管怎样，安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做什么？”一书,这倒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①]。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②]，并且正确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96◇“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 工人按其**地位**（着重号是我加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①]真是蠢话，我简直没有料到这样的作者会说出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在这种场合，工人阶级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地说，作者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②]，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97◇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③]，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十五页。——著者注

③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四七页。记录里载有一项次议，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著者注

本矛盾的”…… 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不能结合起来。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请记住：是**工人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98◇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①]。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地方，工人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那末归根到底它一

——————————————

①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五十三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一五页）——著者注

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①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②。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国社会民主党◇99◇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派的批评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确认社会主义生产之必要性的**意识**（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国草案）看来，可以设想：奥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这一……观点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五页。——著者注

②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才能产生出来……　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加因斐纲领’[34]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①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100◇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它们这样“轻视”读者呢？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像一种鸟，把自己的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像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②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

① 见“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二十卷第三期第七十九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做什么？”一书第二十七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页至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② 并且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著者注

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独创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①]（空想◇101◇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职工运动**”[②]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琐碎化而具有“狭隘职工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 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像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 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瞎闯，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引导到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102◇

————————————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三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② 同上，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少数派“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里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②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103◇“**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末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

————————————————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四页。——著者注

⑵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五页。——著者注

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代表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如此”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104◇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上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社会前进的**一部分，而在理论上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

① 如果读者手边没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35]，就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一一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著者注

是的，思想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推动社会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末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的情形很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相似。

当时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105◇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末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瞎闯，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瞎闯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什么？”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106◇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里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发表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

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107◇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①

再看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　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　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②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曾在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做什么？”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给我一篇“祷告词”，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108◇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

————————————

① 马尔托夫：“红旗”第三页。——著者注

② 见“曙光”杂志[36]第四期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页。——著者注

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达。’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达。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他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逼，那末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①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末它的作者恐怕也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109◇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

——————————————

①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二三页。——著者注

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110◇

“恢复旧有的‘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①]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

① 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二十六页。——著者注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都**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恼羞成怒了，——真的，他们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了，——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①]，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111◇**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

————————————————

① 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果然和总委员会一位委员去找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经过是这样的：

普列汉诺夫说：‘要知道，世上常有一种爱吵爱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们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我回答说：‘也许是这样，但让步要让得保证自己有力量能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37]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38]。——著者注

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112◇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 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会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①]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自己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一期第三页。——著者注

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113◇

不难想像，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里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 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里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决死的斗争”[①]，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做机会主义又叫做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②]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114◇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当无产者还是一个孤立的个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著者注

②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八十八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人时，他是什么力量也没有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期待，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被派到任何岗位上都能尽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浸透他的全部感觉、全部思维的纪律”①。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浸透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②。“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承认需要纪律，但只是对群众而言，而不是对上等人物而言。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里的…… 李卜克内西却是一位理想的模范知识分子，他浑身浸透了无产阶级情绪，他……在被指定的任何一个岗位上努力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弃……知识分子落到少数地位时所常常发出的那种颓唐的啜泣。在这里还可以举出马克思，他从来◇115◇也没有想争第一把交椅，在国际中他会不止一次落到少数地位，但他还是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③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情绪”呢？他们的行为像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

————————————————

①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九十三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六六页）——著者注

② “同盟代表大会记录”。——著者注

③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九十三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著者注

溺于“颓唐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末，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做夜莺夸。◇116◇

* *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像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呼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的什么病，谁就老是谈着这种病。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17◇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革命运动“目前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的地步了”，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这个估计日益证实是正确的。革命的火焰燃烧得越来越猛烈，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引起地方性的起义。洛兹的三天街垒战和巷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几万工人参加的、和军队发生过多次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的罢工，敖德萨的起义，黑海舰队和里巴瓦港海军的“骚动”[①]，梯弗里斯的“一周”[②]，——这一切都是暴风雨来临的先兆。暴风雨迫近了，不可遏止地迫近了，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在俄国爆发；它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毁一切衰老腐朽的东西，洗掉俄罗斯人民身上那数百年来的耻辱——专制制度。沙皇政府最后的拚命挣扎：加紧采取各种镇压手段，在全国一半地区宣布戒严，大量增设绞架，同时对自由派发表诱惑的言论，假意允诺实行各种改良，——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它的历史命运。专制制度的灭亡指日可待，暴风雨必不可免。全体人民所欢迎的新制度已在萌芽，人民都期待它带来革新和复兴的气象。

日益迫近的暴风雨向我党提出了些什么新问题呢？我们应如何使自己的组织和策略适应实际生◇119◇活的新要求，以便更积极地、更有组织地参加革命开端所唯一必需的武装起义呢？工人阶级不仅是革

————————————

①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七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铁甲舰、二六七号水雷艇、“胜利者乔治”铁甲舰和“普鲁特”教练舰相继举行起义。一九〇五年七月，拉托维亚里巴瓦港的海军举行起义。——译者注。

② 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梯弗里斯开始总罢工。城内各处举行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言论出版的自由等等。六月末，总罢工有组织地结束了。——译者注。

命的先锋，而且是革命的主要行动力量；为了领导起义，我们作为这个阶级的先进部队，是应当建立一些专门机关呢，还是依靠现有的党的机构就够了？

这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摆在我党面前已经有几个月了。崇拜“自发运动”的人把党的目的降低到仅仅跟在生活进程的后面，做了运动的尾巴，而不像先进的觉悟部队所应做的那样走在运动的前头；对于这样的人，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起义是自发的，组织和准备起义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预定的行动计划都是空想（他们反对任何“计划”,因为计划是“自觉性”的东西,而不是“自发的现象”!），都是白费气力；社会生活有它自己的令人莫测的道路，它是会打破我们的一切计划的。他们说,因此我们只应限于宣传和鼓吹起义的思想、群众“自我武装”的思想；我们只应实行“政治领导”，至于“在技术上”领导起义人民，那随便让谁去做都可以。

反对“尾巴政策”的人驳斥说：可是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实行这种领导的。显然，广泛进行鼓动和宣传，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领导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若是仅仅限于这种一般性的任务，就等于我们不是避免回答实际生活所直接提出的问题，就是暴露我们根本不善于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不待说，现在我们应当大大加强政治鼓动工作，应当竭力设法不仅要使无产阶级受我们的影响，而且要使那些逐渐向革命靠拢的广大“人民”阶层也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在社会各阶级中努力传播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只限于这一点！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利◇120◇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利于自己的阶级斗争，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最能保证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无产阶级（在它的周围团结着沙皇制度的反对派）不仅处于斗争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起义的领袖和领导者。**在技术上领导和在组织上准备全俄起义**，这正是实际生活向无产阶级提出来的新任务。如果我党要想成为工人阶级真正

的政治领导者，就不能而且不应当拒绝执行这些新任务。

那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们最初的步骤应当是什么呢？

我们有许多组织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去武装无产阶级。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现已进入大家都承认的必须武装起来的时期。然而仅仅意识到武装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直接地清楚地向党提出实践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委员会应当立刻着手就地武装人民，成立专门办理这件事情的小组，成立各区收集武器的小组，设立制造各种炸药的小工厂，制定夺取国家的和私人的军械库和兵工厂的计划。我们不仅应当像新“火星报”所劝告我们的，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武装人民，并且应当像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责成我们的，切实“采取最积极的办法武装无产阶级”。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也罢（只要他们是确实认真考虑武装问题，而不是只空谈什么“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和抱着同一目的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例如阿尔明尼亚联邦主义者等等也罢，都要比在其他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协议。在巴库已经作过这样的尝试，那里在二月惨案以后，我们的委员会，“巴拉汉内-比比-爱巴特”集◇121◇团和公察克党人[39]委员会，曾联合设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委员会。当然，要创立这样一种艰巨的事业，必须大家共同努力，所以我们认为派别的计较要尽量少妨碍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

除了扩大军火储藏、设法弄到武器和由工厂制造武器之外，还必须极端注意建立各种战斗队去使用获得的武器。把武器直接发给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我们的经费很少，并且很难隐藏武器不使嗅觉锐敏的警察发觉，所以我们无法武装比较广大的民众，如果这样做，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是白费的。当我们建立起专门战斗组织的时候，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的战斗队将学会很好地使用武器，并且在

起义时（不管它是自发的，还是早有准备的）都能成为主要的先进的队伍而行动起来，起义人民将团结在它们的周围，并在它们的领导下去参加战斗。由于战斗队的经验丰富和组织严密，又有很好的武装，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起义人民的一切力量，从而达到当前的目标，即武装全民并实现预定的行动计划。战斗队会很快地夺得各种军械库、政府机关、公用事业机关、邮政局、电话局等等，这都是革命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

但是，这些战斗队不仅在革命起义已普及全城时才需要，而且在起义前夜所起的作用也是重大的。最近半年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在社会各阶级的心目中已经丧失威信的专制制度，竭力把全国各地的黑暗势力，不管是职业流氓，还是鞑靼人中间那些狂妄无知之徒，都动员起来对付革命者。这种黑暗势力被警察武装起来并在其庇护下用恐怖手段恫吓民众，造成一种阻碍解放运动的困难环境。◇122◇我们的战斗组织应当随时准备对这种黑暗势力的一切企图予以应有的反击，并设法把那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引起的愤怒和反抗变为反政府的运动。能够随时走上街头去率领人民群众的武装战斗队不难达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目的：“组织武装抵抗去对付黑帮及其他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行动。”（“关于在革命前夜对待政府策略的决议”——见“通报”）[40]

我们的战斗队和一般军事技术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应当是制定本区域的起义计割，并使这计划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全俄计划相适合。找出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指定向敌人进攻的出发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布置在本区各处，将全城的地形考查清楚,——这一切都应预先完成，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措手不及。在本文中详细分析我们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完全不适宜的。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严守秘密，同时还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尽量广泛地传播进行巷战所绝对必需的军事技术知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吸收党组织中的军人来参加这个工作。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其他许多同志，按照他们的本领和性情说来对这件事情都会很有益处的同志，吸收来参加这个工作。

只有这样周密地准备起义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在必将到来的人民和专制制度间的战斗中起领导作用。

只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才能使无产阶级把与军警的零碎冲突变成全民起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将违背“尾巴政策”崇拜者的主张，竭力把武装起义的技术领导和政治领导◇123◇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种领导是保证我们能够利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有裨于我们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载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24◇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41]

一

人民革命日益发展。无产阶级正在武装自己并高举起义的旗帜。农民正在伸直腰干，并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爆发总起义和“根除”那可恨沙皇的可恨宝座已为期不远了。沙皇政府将被推翻。在它的废墟上，将建立起革命的政府——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定会解除黑暗势力的武装，把人民武装起来并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这样，沙皇的统治就将由人民的统治来代替。现在，人民革命正在顺着这条道路前进。

临时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

它应当解除黑暗势力的武装，制裁革命的敌人，使他们不能再恢复沙皇专制制度。它应当武装人民，促使革命进行到底。它应当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它应当取消间接税，施行累进的利润税和遗产税。它应当组织农民委员会来调整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它还应当使教会和国家分离，使学校和教会分离……

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外，临时政府还应当实现工人的阶级要求：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八小时◇125◇工作制、实行国家劳动保险、保证劳动卫生条件、设立“劳动介绍所”等等。

总之，临时政府必须完全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①，并立即着手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立法手续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革“永远”固定下来。

————————————

① 关于最低纲领，请参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报”。——著者注

谁应当参加临时政府呢？

革命将由人民来完成，而人民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显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担负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制裁反动势力、武装人民等等的责任。为此，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临时政府中就需要有保护自己利益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在街头占统治地位，他们将流血牺牲，自然他们在临时政府中也应当占统治地位。

有人向我们说：这都是对的，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有什么共同点呢？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憎恨农奴制的残余，他们都在和沙皇政府进行决死的斗争，他们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忘记一个真理，即他们之间的差别比他们的共同点要大得多。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敌人，仇恨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只是为◇126◇了聚集力量，然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农民对私有制却恋恋不舍，拥护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则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不用说，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农民[①]才会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农民才会拥护无产阶级。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它不触犯私有制，因而农民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掉转自己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况且今天的革命是要根本推翻沙皇政权，所以农民愿意坚决向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革命力量靠拢。很明显，无产阶级同样也愿意援助农民，愿意同农民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无怪乎伟大的恩格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同小资

——————————————

① 即小资产阶级。——著者注

产阶级一起反对现存的制度①。如果在革命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制裁以前，我们的胜利不能称为胜利，如果制裁敌人和武装人民是临时政府的责任，如果临时政府应当负起完成胜利的责任，那就不言而喻，除了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应当参加临时政府而外，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的无产阶级代表也应当参加临时政府。假如负责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单独地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太不明智，那就是背叛自己。只是不要忘记；反对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并且一分钟也不应当走偏了路。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共同努力推翻沙皇政府，应当共同努力制裁革命的敌人；正因为◇127◇如此，所以无产阶级跟农民一样，也应当有自己利益的保护者即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政府。

这个道理如此清楚，如此明显，再来加以说明似乎是多余的了。

但是，“少数派”对这一点却表示怀疑，他们一味固执地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是不合身份的，是和原则相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吧。“少数派”的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援引了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42]的文件。这次代表大会和饶勒斯主义相反,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社会主义者不应力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参加临时政府在我们是不能容许的。“少数派”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如果像小学生那样理解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我们连革命也不应当参加了。实际上成了这样：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今天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就完全不应当参加这个革命！“少数派”的逻辑就是要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社会民主党却说，我们无产者不仅应当参加今天的革命，并且应当在这个革命中起带头作用，领导这个革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但是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六期。这段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转载过。见“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一文。——著者注

不参加临时政府，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不容争辩，“少数派”的逻辑在这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仿效自由派，应当抛弃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于是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也就自行消失；或者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就要承认参加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但“少数派”既不愿抛弃前者，也不愿抛弃后者，他们既想做自由派,又想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就是这样残忍地糟蹋无辜的逻辑……◇128◇

至于说到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那末它所指的是法国正式政府而不是临时革命政府。法国政府是反动的保守的政府，它保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显然，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会加入这样的政府的。可是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进步的政府，它反对旧事物而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它为革命的利益服务；显然，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要加入这个政府并积极参加完成革命事业的。可见这是两回事情。可见“少数派”死抓住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并不能使“少数派”免于破产。

看来“少数派”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求助于另一个论据：他们现在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灵呼救。例如“社会民主党人报”顽固地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反对”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反对过？例如，马克思究竟是怎样说的？原来马克思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向无产阶级鼓吹……要它力求建立一个大的反对党，这个党应当把民主党内的各种派别都包括进去……”“这样的联合对于无产阶级无疑是有害的，而只有对于他们（小资产者）才是有利的”①等等[43]。一句话，无产阶级应当有单独的阶级政党。但是“渊博的批评家”呵，究竟有谁反对这一点呢？为什么你同风车搏斗呢？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著者注

虽然如此，“批评家”还是继续引证马克思的话。“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129◇合。既然必须和这种敌人进行直接斗争，两党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 也就会产生一个只适合当时需要的同盟…… 在斗争时和在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需要（应该说：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需要（要求）并列起来…… 一句话，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就必须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对那个想独占共同胜利果实的政党……表示不信任。”[①]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只有在不和本身利益相抵触的条件下，才支持小资产阶级。但是奇怪的“批评家”呵，究竟有谁反对这一点呢？你引证马克思的话有什么必要？难道马克思说过什么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话吗？一个字也没有说过！难道马克思说过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临时政府是和我们的原则相抵触的吗？一个字也没有说过！那末，我们的这位作者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狂喜呢？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我们和马克思之间的“原则上的矛盾”呢？可怜的“批评家”呵！他拚命想要找到这种矛盾，但是不幸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找到。

照孟什维克的声明，恩格斯究竟说了些什么？原来恩格斯在给屠拉梯的信中说过：必将到来的意大利革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应该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现存的制度，但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党；可是社会主义者假使在革命胜利后参加新政府,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他们就会重复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一八四八年所犯的◇130◇错误等等[②]。换句话说，既然意大利革命将是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著者注

②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把这几句话加上引号来引证的，使人觉得恩格斯的话被引证得丝毫不差。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这里引证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话来转述了恩格斯那封信的内容。——著者注

所以幻想无产阶级能占统治地位和**在胜利后**仍然可以留在政府里，那就会是很大的错误，无产阶级只有**在胜利以前**才能够同小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然而究竟谁反对这一点呢？谁说我们应当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呢？为什么要援引伯恩施坦的信徒屠拉梯的话呢？为什么还要提起路易·勃朗呢？路易·勃朗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而我们所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路易·勃朗时代还没有社会民主党,而这里所说的正是这样的党。法国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夺取政权，而我们所注意的则是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难道恩格斯说过，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临时政府是和我们的原则相抵触的吗？一个字也没有提过！那末我们的这位孟什维克，你为什么要这样夸夸其谈呢？混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你怎么不明白呢？为什么要无故地惊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灵呢？

看来“少数派”自己也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不能挽救他们，于是他们现在又抓住了第三个“论据”。“少数派”向我们说：你们想给革命的敌人以双重的约束，你们想“使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从街头，而且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大厦里去对革命施以压力”[①]。但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呀！——“少数派”责备我们说。◇131◇

由此可知，“少数派”断定我们应当“只从下面”影响革命的进程。相反地，“多数派”却认为我们应当以“来自上面”的行动去补充“来自下面”的行动，使我们所施展的压力更为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谁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相抵触呢？是“多数派”呢，还是“少数派”？

让我们来请教一下恩格斯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爆发了起义。于是发生了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当时在那里活动的是巴枯宁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三期。——著者注

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否认任何来自上面的行动，而这一点曾引起他们和恩格斯之间的争论。当时巴枯宁派所鼓吹的正是今天“少数派”所说的东西。恩格斯说：“巴枯宁派多年来鼓吹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组织和实行。”①在他们看来，“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政权或革命政权，都只能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于无产阶级是同样危险的”②。恩格斯嘲笑这种观点，并且说实际生活已经无情地推翻了巴枯宁派的这一学说。巴枯宁派不得不对实际生活的要求让步，结果他们……“只好违反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③。于是他们“就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只是一种新的欺骗，只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叛变行为”④。◇132◇

恩格斯就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少数派”的原则——仅仅“来自下面”的行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确实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根本抵触的。“少数派”认为任何参加临时政府的举动对于工人都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就是早已受到恩格斯嘲笑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很清楚：实际生活必将抛弃“少数派”的观点，必将轻而易举地粉碎他们的这种观点，正像粉碎了巴枯宁派的观点一样。

“少数派”却仍然固执地说：我们是不会反对原则的。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抱着一种奇怪的想法。我们只就他们对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国家杜马所持的原则观点来看一看吧。“少数派”反对参加为适应革命利益而将要产生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

——————————————

① 见“无产者报”第三期，那里引证了恩格斯的这句话[44]。——著者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他们主张参加为适应专制制度利益而已经产生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少数派”反对参加由革命的人民创立并由人民使之合法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他们主张参加由专制沙皇召开并由沙皇使之合法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少数派”反对参加负有埋葬专制制度使命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他们主张参加负有巩固专制制度使命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 最可敬的先生们。你们谈的是什么原则，是自由派的原则呢，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如果你们能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们就很不错了。不过我们对这一点总有些怀疑。

但是，我们且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吧。

问题是“少数派”在探求原则时已滚到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去了。◇133◇

这就是现在已经弄明白了的事实。

二

我们的孟什维克不喜欢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决议中真正革命的道理震动了孟什维克的“泥潭”，激起了孟什维克进行“批评”的欲望。看来，使他们的机会主义头脑受到刺激的，主要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所以他们就着手“消灭”这个决议。但是他们在决议中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和可以大肆批评的东西，所以就只好求助于他们那套惯用而又一钱不值的蛊惑宣传手段！这些“批评家”写道：这决议是为了引诱工人、欺骗和蒙蔽工人而草拟的！可见他们是很满意于自己所玩的这套戏法的。他们设想敌人已经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而自己则是得胜了的批评家，因而大声叫喊：“他们（决议的起草人）还想领导无产阶级呢！”当你瞧着这些“批评家”

的时候，你就好像碰见了果戈里小说中一个因神经失常竟以西班牙国王自居的主人公。这就是患狂热病的人的必然归宿！

我们且来仔细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的那篇“批评”吧。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孟什维克一想起临时革命政府的血迹斑斑的魔影时，就不免恐惧万分，于是去祈求自己的神仙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一流人物，盼望他们给自己驱除这个怪物，而代之以全俄缙绅会议，现在却要代之以国家杜马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把“全俄缙绅会议”捧上了天，力图把腐朽的沙皇制度的腐朽产物◇134◇当做真货来卖。他们写道：“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没有临时政府也建立了**共和国**。”就只有这么多吗？“可敬的”先生们，此外什么也不知道吗？太少了！应该多知道一点！例如，也应该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获得胜利的，而俄国的“革命运动则将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或是完全不会获得胜利”，就像普列汉诺夫公正地说过的一样。在法国，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在俄国则是无产阶级。**在那里**，支配革命命运的是资产阶级，**在这里**则是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力量这样转换的情形下，这两个阶级决不能有同等的结果，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因领导革命而享受了革命的果实，那末在俄国，既然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难道革命的果实也应由资产阶级来享受吗？我们的孟什维克说道：是的，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这些先生好像棺材匠一样，拿早已死去的人的尺寸来量活人。此外，他们在这里还玩了不少骗人的戏法：他们去掉了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的头部，而把争论的中心移到问题的尾巴上去了。我们也和任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是在谈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们却藏起“民主”一语而大谈其“共和国”。他们鼓吹说：“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是的，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但究竟是怎样的共和国呢？是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那种共和国吗？这个共和国

给了人民以普选权吗？当时的选举是完全直接的选举吗？施行过累进所得税吗？难道在那里谈过什么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等等问题吗？……　没有。这样的事情在那里根本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因为工人们当时还没有受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利益竟被当时法兰西共◇135◇和国的资产阶级遗忘和抹杀了。先生们，难道你们就向这样的共和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吗？你们的理想就是这样的吗？祝你们一路平安吧！不过，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应该记住：崇拜这样的共和国，是和社会民主党及其纲领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这是最坏的一种民主主义，而你们却假借社会民主党的名义用走私的方式来干这一切勾当。

此外，孟什维克应当知道，俄国资产阶级及其缙绅会议，就连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也不会赐给我们，因为它根本不打算消灭君主制。资产阶级明明知道在没有君主制的地方，工人们是“傲慢不逊”的，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把这个堡垒完整地保存下来，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去反对和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无产阶级。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就假借“人民”的名义和刽子手沙皇进行谈判，劝他为了“祖国”和皇位的利益召开全俄缙绅会议，以期避免“无政府状态”。难道你们孟什维克连这些也不知道吗？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那种共和国，而是二十世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共和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胜利的人民起义和它提出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把这样的共和国建立起来。只有这样的临时政府才能临时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并把类似的改革办法提交它所召开的立宪会议批准。

我们的“批评家”不相信根据我们的纲领召开的立宪会议能够表达人民的意志（他们既不能比一百十五六年前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更前进一步，当然也就无法想像到这一点）。“批评家”继续说道：◇136◇“有钱有势的人，有很多办法操纵选举，使之有利于自己，所

以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人民的意志。为了使穷人中的选民不致代表富人的意志，就需要进行巨大的斗争，就需要有长期的党的纪律。”（就是孟什维克所不承认的纪律吗？）“甚至在欧洲（？），虽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教育，这一切也没有实现。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却以为这个法宝已掌握在临时政府手里了！”

真是十足的尾巴主义！“早已魂归九天的”“过程策略论”和“过程组织论”[①]又借尸还魂了！“批评家”教训我们说，要想在俄国要求欧洲尚未实现的东西，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最低纲领不仅在“欧洲”，并且在美洲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按照孟什维克的意见，谁要在俄国接受这个纲领，并在推翻专制制度之后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那他就是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就是可怜的唐·吉诃德！一句话，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虚假的，空想的，是和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批评家”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按照你们的说法正是这样。既然这样，就请你们不要支支吾吾，大胆一些，把这一点爽直地说出来！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和谁打交道，而你们也就不必受你们所憎恨的这个纲领的形式手续的拘束了！不然的话，你们这样羞答答地，畏首畏尾地谈论纲领的不重要性，就会使得许多人（当然布尔什维克除外）还以为你们承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又何必这样假惺惺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了。你们不相信我们的纲领并且否认它的正确性，而我们和你假相反，总是以这个纲领为依据，力求使我们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和它相符合！◇137◇

我们相信，在自由竞选运动的条件下，“有钱有势的人”要想收买和欺骗全体人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将用社会民主党的真话（我

————————————————

①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五八四页正文和脚注。——译者注

们和你们不同，丝毫也不怀疑这种真话）去对抗他们的势力和金钱，并以此来阻遏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你们却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就把革命拉到改良主义方面去了。

“批评家”继续说道：“一八四八年，也有工人参加的法国（又是法国！）临时政府召开了连一个巴黎无产阶级代表也没有被选举进去的立宪会议。”这又一次表明你们完全不懂社会民主主义学说，而对历史抱着死板的看法！何必这样白费唇舌呢？“批评家”作出结论说：在法国，虽然工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可是什么出息也没有；所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应当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因为在这里也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是，难道问题就在于工人参加吗？难道我们说过任何一个工人，不论他是谁，不论他属于哪一派，都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吗？不，我们目前还没有成为你们的追随者，我们决不会给每个工人发一张社会民主党人的鉴定表。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参加法国临时政府的工人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你们何必作这种不恰当的比拟呢！况且，怎能把一八四八年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现今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相提并论呢？难道那时候法国无产阶级举行过一次反对当时制度的政治游行示威吗？它什么时候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标志下纪念过五一节呢？它会组成社会民主工党吗？它有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吗？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没有过。这一切，法国无产阶级连想也没有想过。试问，法国无产阶级当时能不能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像这个早已组成社会民主党、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并自觉地为自己开辟走向目标的道路的无产阶级一样，享受◇138◇革命的果实呢？每一个稍微能够了解真情实况的人，对这个问题都一定给予否定的回答。只有那些仅会死记历史事实而不能依据地点和时间去解释历史事实的来源的人，才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情形等量齐观。

“批评家”再三再四地教训说：“所需要的是人民方面的暴力，是不间断的革命，而不是满足于选举，便各自分散回家。”这又是诽

谤！可敬的先生们，谁对你们说过我们满足于选举，便各自分散回家呢？请指出名字来！

我们的“批评家”还因为我们要求临时革命政府实现我党最低纲领而焦急不安，于是大声叫道：“这是完全不明事理；问题在于我们纲领上的各种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只能用立法手续来实现，而临时政府并不是立法机关。”当你阅读这篇反对“违法行为”的检察官式的演词时，你会怀疑：这岂不是一位崇拜法制的自由资产者献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论文吗[①]？否则，认为临时革命政府似乎无权废除旧法律和施行新法律的这种资产阶级妙论，又应作何解释呢！难道这种议论不是含有庸俗自由主义的意味吗？从革命者口中发出这种议论，岂不令人奇怪吗？这就好像一个判了死刑的囚◇139◇犯，脑袋将被砍掉的时候，却恳求别碰着他脖子上的疙瘩。不过，这些“批评家”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临时革命政府和普通的内阁有什么区别（这并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他们的老师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之流把他们弄成这样的）。内阁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结果。而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被**消灭**的结果。前者依靠常备军来执行**现行**的法律，后者则废除现行的法律，依靠起义的人民把革命的意志变成法律。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假定说，革命获得了胜利，而且胜利的人民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政府无权废除法律和施行法律，那它将怎么办呢？等待立宪会议吗？可是为了召集立宪会议，同样必须施

————————————————

① 这种念头之所以更加自然而然地发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宣布整个梯弗里斯的资产阶级中间只有十个左右商人是“共同事业”的叛徒。显然，其余的人都是孟什维克的拥护者并和他们具有一个“共同事业”。如果这些拥护“共同事业”的人当中，有谁忽然把一篇反对毫不妥协的“多数派”的“批评”文章寄给自己同事的刊物去发表，那又有什么奇怪呢！——著者注

行新的法律，例如必须施行普通、直接等等的选举制，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已包括在我党最低纲领里了。如果临时革命政府不能实行这个纲领，那末它在召开立宪会议时又将以什么为指南呢？莫非以布里根起草而由尼古拉第二批准的那个纲领[45]为指南吗？

再假定说，获得胜利的人民因缺乏武器而遭受很大的牺牲，他们为了和反革命作斗争，要求临时革命政府取消常备军而武装人民。这时孟什维克却宣传说：取消常备军而武装人民，不是这个官厅（临时革命政府）的事情，而是另外一个官厅——立宪会议的事情，大家去向它申诉吧，可别要求采取违法的行动，如此等等。还用说，出这种主意的人是多么高明呵！

现在我们且来看看，究竟孟什维克根据什么理由剥夺临时革命政府的“权能”。第一个理由，临时革命政府不是一个立法的机关；第二个理由,他们说立宪会议将无事可做。看,这些政治上的黄口◇140◇小儿竟说出何等可耻的话！原来他们竟不知道，获得胜利的革命和代表这个革命的意志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乃是时局的主宰，所以它们有权废除法律和施行法律！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临时革命政府没有这种权力，那末它的存在就会毫无意义，起义的人民也就不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关。奇怪的是孟什维克竟把这种起码的革命道理都忘记了。

孟什维克问道：如果临时革命政府实现了我们的最低纲领，那末立宪会议又应当做些什么呢？可敬的先生们，你们担心立宪会议会失业吗？请不要害怕，它的工作多着哩！它既要批准临时革命政府在起义人民帮助下所实现的改革，又要制定国家宪法，而我们的最低纲领不过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对立宪会议的要求！

“批评家们”写道：“他们（布尔什维克）想像不到小资产阶级本身和工人之间的分裂，想像不到这种分裂也会在选举中反映出来，

所以临时政府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就要压迫工人选民。”谁懂得这种奥妙思想！“临时政府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就要压迫工人选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临时政府呢？这些唐·吉诃德究竟是在同什么样的风车搏斗呢？难道谁说过，小资产阶级在单独掌握临时革命政府时也仍旧会保护工人利益吗？为什么硬要把自己的糊涂思想加诸别人呢？我们说：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可以和民主派的代表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假使是这样，假使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那末，它按成分说又怎么会是小资产阶级的呢？我们主张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理由就是：实现我党的最低纲领，和民主派——农民及城市小◇141◇资产阶级（你们孟什维克邀请加入你们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认为和民主派一起实现我党的最低纲领是可能的。倘若民主派阻碍实现这个纲领中的某些条文，我们这些有街头选民即无产阶级来支持的代表就会设法用实力去实现这个纲领，只要这种实力已经具备（如果还没有这种实力，我们也就不会参加临时政府，人家也不会把我们选进临时政府）。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应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正是为了要在那里保卫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即不让其他阶级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

临时革命政府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决不会像孟什维克随便设想的那样向无产阶级宣战，而是要和无产阶级一起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宣战。但是这些事情和你们孟什维克有什么相干，革命和革命的临时政府和你们又有什么相干！你们的位置在那里，在“国[①][家杜马”]……

————————————

① 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本文第一部分载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
第二部分根据手稿第一次刊印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42◇

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诞生的小木屋

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哥里城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46]

首先我应当向读者道歉，答复迟了一点。可是又没有办法：环境迫使我做别的工作，所以不得不把我的答复暂时搁下；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支配自己的。

我还要指出一点：许多人认为“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是联盟委员会写的，而不是某一个人写的。我应当声明,写这本书的就是我。联盟委员会只负编辑的责任。

现在我们来讲本题吧。

反对者责难我，说我“看不见争论的对象”，说我“模糊了问题”①，说“所争论的是组织问题而不是纲领问题”（第二页）。

只要有一点观察能力，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这种断语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那本书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的答复，等“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期出版时，我那本书已经付印了。这位作者在创刊号上说了些什么呢？只是说“多数派”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他们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143◇矛盾”的。**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组织问题。我那时应该怎样回答呢？我只能这样回答：“多数派”是站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如果“少数派”不了解这一点，那就表明“少数派”自己离开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凡是稍微懂得论战的人都一定会这样做。可是作者一味固执己见地说：你为什么不谈组织问题呢？可敬的哲学家，我之所以没有谈到组织问题，是因为你当时对这些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问题既没有谈到，当然就无从回答。所谓“模糊了问题”、“回避争论对象”等等，都显然是作者的臆造。

————————————

① 见“答联盟委员会”[47]第四页。——著者注

恰恰相反，我倒有理由怀疑作者自己在回避某些问题。他说：“所争论的是组织问题。”其实我们之间还存在着**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比组织上的意见分歧更重要得多。然而我们的“批评家”在他的小册子中，对这种意见分歧却只字未提。这才真是“模糊了问题”。

我那本书究竟谈些什么问题呢？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因此，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意识，领会这种意识，加倍努力地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不用说，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意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谁在创造、谁有可能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考茨基说（我是重述他的意见）：无产者群众还处于无产者地位的时候，是既没◇144◇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考茨基说：“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①]科学的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领导科学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显然，创造社会主义意识乃是少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可能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

---

① 见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论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①]，指的也就是这一点。

可见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是少数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而把这种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它使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具有自觉的性质。

我那本书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和“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的论敌提出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一点呢？◇145◇

老实说，他并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理由。他忙于谩骂而少作说明。看来他是很生气了！他既不敢公开提出问题，也不敢直接回答问题，却像个胆小的“斗士”，回避争论的对象，口是心非地抹杀已明确提出的问题，并且还要大家相信：“我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了！”譬如说，这位作者根本没有提出**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意识的问题，不敢直率地说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赞同谁的意见：赞同考茨基的意见，还是赞同“经济派”的意见。诚然，我们的“批评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上作过颇为大胆的声明，当时他是直接用“经济派”的口吻讲话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是一回事，而现在他已有“另一种心情”了；他不进行批评而回避这个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已深信自己犯了错误，不过不敢公开承认罢了。总之，我们的作者已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根本弄不清楚究竟应该赞同谁的意见。如果赞同“经济派”的意见，他就必须同考茨基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

———————————

① 见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论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这是对他不利的；如果和“经济主义”决裂而赞同考茨基的意见，他就一定要赞同“多数派”的说法，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所以他始终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那末我们的“批评家”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认为在这里最好是闭口不言，而他真的懦怯地回避了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灌输意识**这一点，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在这里也表现了同样的动摇和懦怯。他偷换了问题，刚愎自用地宣称；考茨基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知识分子从外面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第七页）。

好极了，可是“批评家”先生，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这样说过，你为什么要同风车搏斗呢？◇146◇按照我们的意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是社会民主党[①]，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你怎么不能了解呢？为什么你以为社会民主党内只有知识分子呢？难道你不晓得，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先进的工人要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吗？难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吗？

看来作者自己也感到他这个“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就改用另一个“证据”。

我们的“批评家”继续说：“考茨基写过‘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我们的“批评家”继续解释说：“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的头脑中去的。”（“答联盟委员会”第八页）

———————————

① 见“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第十八页。——著者注

我们的“批评家”就是这样写的，并自以为把问题弄清楚了！考茨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是说：社会主义**倾向**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我们所争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倾向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意识**问题呀！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难道倾向和意识是一个东西吗？难道作者辨别不出“社会主义倾向”是不同于“社会主义意识”的吗？他从考茨基的话◇147◇中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这难道不是表明自己思想的贫乏吗？“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难道同一位考茨基不是说过“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吗？

看来作者已感到自己陷入荒谬的境地，所以在结语中不得不补充一句：“从考茨基这段话中确实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到阶级斗争中去的。”（见“答联盟委员会”第七页）但他终究不敢公开大胆地承认这一科学真理。这里我们的孟什维克在逻辑面前也表现了和先前一样的动摇和懦怯。

这就是“批评家”先生对两个主要问题所作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对于从这两个大问题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其余的小问题，又能说些什么呢？最好是读者自己拿我这本书和我们这位作者的那本小册子作个比较。不过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如果相信这位作者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我们认为“分裂的发生是由于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当编辑……”（“答联盟委员会”第十三页）因而我们也就“否认分裂，掩盖其高度的原则性，并把反对派的全部活动都看做三个‘造反的’编辑所干的事情”（同上，第十六页）。

这里作者又把问题混淆起来了。原来这里摆着两个问题：分裂的

原因和意见分歧的表现**形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148◇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见“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第四十六页）[①]可见在这里我**认为**意见分歧是由于我们党内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趋向和无产阶级的趋向，而不是由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的行为。马尔托夫等人的行为不过是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看来我们的孟什维克并没有了解我那本书中的这一段话。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确实说过，并且永远要说：“少数派”的头目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流涕，他们的确使党内斗争具有了这种**形式**。我们的作者不愿承认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少数派”的头目们会宣布抵制党，他们公开要求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要求中央机关报里的位置，要求党总委员会里的位置，并且宣称：“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致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见“述评”[②]第二十六页）这岂不是表明，写在“少数派”头目们旗帜上的不是思想斗争而是“争位置”吗？大家知遭，谁也没有阻碍他们进行思想原则的斗争。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向他们说过：你们去创办单独的机关报，并坚持自己的观点，党可以允许你们创办这种机关报（见“述评”）吗？如果他们真正是关心原则而不是关心“头等位置”，那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这样做呢？

我们把这一切叫做孟什维克领袖们没有政治气节。先生们，我们这样直言不讳，请不要见怪。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点，“少数派”的领袖们先前并没有同马克思◇149◇主义和列宁发生过意见分歧

———————————

① 见本卷第一一七页。——编者注

② 即“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译者注

（见“火星报”创刊号所载的纲领性的论文）。可是后来他们却动摇起来，开始和列宁作斗争，把他们自己昨天崇拜过的东西都推翻了。我把这叫做反复无常。孟什维克先生们，也不要因此见怪。

昨天你们崇拜中央机关，对我们大发雷霆，责备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今天你们却不仅破坏中央机关，而且破坏集中制（见“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我把这叫做无原则性。孟什维克先生们，希望你们也不要因此对我发脾气。

如果把没有政治气节、争位置、不坚定、无原则以及诸如此类的特点综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会看出一个总的特性，即**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这种动摇性是知识分子最常犯的毛病。很明显，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就是“争位置”、“无原则”等等所由产生的土壤（基础）。而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又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就是这样解释党内分裂的。我们的作者，你究竟是否懂得了分裂的原因和分裂的形式之间的区别呢？我很怀疑。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奇怪的“批评家”所采取的多么荒谬和模棱两可的立场。但这位“批评家”却又在另一方面大显身手。这位作者在他那本总共不过八张纸的小册子里，居然异想天开地一连八次诽谤布尔什维克，简直诽谤得令人发笑。不相信吗？请看事实。

谎言第一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想把党缩小，把党变成狭小的职业家组织”（第二页）。而列宁说的却是：“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各色各样、或大或小的各种不同◇150◇的组织——从极狭小而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极广大而自由的组织为止。”（见“记录”第二四〇页）

谎言第二号。照作者的说法，列宁想“只把委员会的委员们吸收到党内来”（第二页）。而列宁说的却是：“一切**集团、小组、分委员会等等**都应当和委员会的机关或委员会的分部列于同等的地位。其

中有一些将公开声明愿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一经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见“给一位同志的信”第十七页）①[48]

谎言第三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要求在党内建立知识分子的统治”（第五页）。而列宁说的却是：“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包括工人运动中工人出身的所有主要**带头人物**。”（见“给一位同志的信”第七页至第八页）这就是说，不仅在其他一切组织里，而且在委员会里，先进工人也应当占大多数。

谎言第四号。作者说，我那本书第十二页上所引证的“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等语，“完全是臆造的”（第六页）。其实这句话是我直接从“做什么？”一书翻译过来的。该书第二十九页有以下一段话：“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在我那本书第十二页上所翻译的正是这一段话。我们的“批评家”就把这叫做臆造的引证！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作者的粗心大意，还是由于他有意骗人。◇151◇

谎言第五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工人‘自然而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第七页）。而列宁说的却是：“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

谎言第六号。作者硬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的”（第七页）。而我说的却是：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运动中去（第十八页）。

谎言第七号。照作者的意见，列宁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而产生的（第九页）。而列宁却分明连想都没有这

————————————

① 可见照列宁的意见，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地方委员会也可以把一些组织吸收到党内来。——著者注

样想过。列宁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见“做什么？”第二十一页）。

谎言第八号。作者说我所讲的“普列汉诺夫**正在离开‘**少数派’”这句话似乎是“造谣中伤”。然而我这句话被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已经**离开了“少数派”……[①]

至于作者慷慨地用来点缀他那本小册子的许多琐碎谎言，我就不必再提了。

不过应该承认，作者毕竟说了句唯一的真话。他向我们说：“任何一个组织要是造谣中伤，那它的末日就快到了。”（第十五页）这当然是确确实实的真理。问题只是谁在造谣中伤：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奇怪的骑士呢，还是联盟委员会？这一点要由读者来判断了。◇152◇

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作者郑重其事地宣称：“联盟委员会责备我们，说我们重复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重复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他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我们认为是一种美德。”（第十五页）可见你们认为重复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意见是一种美德。好极了，先生们，那就请听一听吧：

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见“做什么？”第二十七页所引证的考茨基的一段话）同一个考茨基又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同上）孟什维克先生，我们希望你把考茨基的这些话重复一下，借以消除我们的疑问。

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说：“……我也不懂，

———————————

① 这位作者竟敢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责备我们，似乎我们曲解了有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实！——著者注

为什么有人认为列宁的草案[①]一被通过，就会使我们党对很多工人关起大门。愿意入党的工人是不怕参加组织的。他们并不害怕纪律。怕参加组织的只是许多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浸透了的知识分子。这倒很好。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就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要使他们远远地离开我们。列宁的草案可以作为防止他们侵入党内的堡垒，所以单凭这一点，凡是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也都应当赞成这个草案了。”（见“记录”第二四六页）◇153◇

“批评家”先生，我们希望你摘下假面具，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爽直精神重复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

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表示你在报纸上所作的声明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载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54◇

————————————

① 这里指的是列宁所拟定的党章第一条和马尔托夫所拟定的党章第一条。——著者注

反 动 加 紧 起 来 了

乌云在我们头上密布着。衰朽的专制制度正在抬头，用“火和剑”武装自己。反动势力出动了！再别对我们讲那一套为巩固卑鄙的专制制度而实行的沙皇“改革”了，所谓“改革”，不过是残暴的沙皇政府用以掩饰它那慷慨款待我们的枪弹和皮鞭的一种伪装罢了。

有一个时候，政府避免在国内制造流血惨案。当时它正和“外敌”作战，需要“国内安定”。所以它对“内敌”采取了某种“放任”态度，对于如火如荼的运动“佯作不知”。

现在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慑于革命魔影的沙皇政府，为了聚集力量并“彻底地”镇压“内敌”，急忙和“外敌”日本签订了和约。于是反动开始了。早在这以前，沙皇政府就在“莫斯科新闻”[49]上暴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反动报纸写道：政府……“不得不同时进行两个战争……对外战争和对内战争。它之所以没有用足够的力量进行这两个战争……部分地是由于一个战争妨碍了另一个战争……如果远东的战争现在结束……”那末政府“……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以便不用任何谈判来制服……内敌……而胜利结束对内战争”……“对外战争一结束，俄国（应读作：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将集中在国内生活上，而且会以戡乱为主。”（见八月十八日“莫斯科新闻”）◇155◇

沙皇政府和日本签订和约时的“计划”就是如此。

后来，和约刚一签订，沙皇政府便通过它的一位大臣又把这套“计划”重述了一遍。那位大臣说：“我们要把俄国的过激党派都淹没在血泊里。”沙皇政府已通过自己的总督和督办在实行上述“计划”。无怪乎它把俄国变成了军营，无怪乎它把哥萨克和兵士密布在

运动的中心地区，并把机枪对准无产阶级，——可以认为政府预备再度征服辽阔广大的俄国！

可见政府正向革命宣战，而首先打击的对象就是革命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我们应当这样去了解沙皇政府对“过激党派”所施的威胁。当然，农民如果“不大知趣”，竟要求享受人的生活，政府也不会“委屈”他们，一定会慷慨地用皮鞭和枪弹款待他们。不过在目前，政府还是竭力欺骗他们：允诺给他们土地，邀请他们参加杜马，答应将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自由”。

至于“洁净的人士”，政府对他们当然会“客气一点”，并设法和他们结成联盟。其实国家杜马的存在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用说，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是不会拒绝“协议”的。还在八月五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领袖声明说，他们对沙皇的改革欢喜若狂：“……必须竭力使俄国……不致走上法国的革命道路。”（见八月五日“俄罗斯新闻”[50]所载维诺格拉多夫的论文）不用说，狡猾的自由派宁可叛变革命也不背弃尼古拉第二。他们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句话，沙皇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要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

以枪弹对付无产阶级，以虚伪的诺言欺骗农民，以“权利”笼络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反动势◇156◇力用以武装自己的手段。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粉碎革命，——这就是今天专制政府的口号。

另一方面，革命势力也没有打瞌睡，而是在继续创造自己的伟大事业。由于战争而更加尖锐的危机和日益频繁的政治罢工，惊醒了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使它和沙皇专制制度直接对立起来。军事戒严不但没有吓倒无产阶级，反而火上加油，使局面更加恶化了。谁要是听过无产者无数次的高呼“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沙皇杜马！”，谁要是仔细听过工人阶级的脉搏，谁就不会怀疑：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领袖的革命精神必将日益旺盛起来。至于农民，军事动员早已激起了他们反对

现存制度，因为军事动员夺去了他们家中最好的劳动力，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如果再注意到还有弥漫了二十六省的饥荒，那就不难了解灾难深重的农民将会走上什么道路。末了，士兵也开始发出怨言，这种怨言对于专制制度日益具有威胁性。专制制度的支柱哥萨克开始引起士兵的仇视：不久以前，在新亚历山大里亚，士兵们打死打伤了三百名哥萨克①。这样的事件正在逐渐增加……

一句话，实际生活在酝酿着新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正在逐渐高涨并向反动势力冲去。莫斯科和彼得堡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是这个浪潮的先声。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些事件,应当做些什么呢？◇157◇

如果听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话，我们就应当立即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以便永远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照他的意见，在进行合法杜马选举的同时，还应当进行不合法的选举。应当在各地成立选举委员会来号召“居民用普遍投票办法选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应当在一定的时候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开会，并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消灭专制制度的过程就应当是”这样的②。换句话说，尽管专制制度仍然存在，我们还是可以在全俄实行普选！尽管专制制度仍然猖獗，“不合法的”人民代表还是可以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说，既不需要武装，又不需要起义，也不需要临时政府，只要“不合法的”代表们宣布自己是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的！不过善良的马尔托夫忘记了，这种异想天开的“立宪会议”必有一天会落到彼得巴甫洛堡大狱③里去的！住在日内瓦的马

---

① 见“无产者报”[51]第十七期。——著者注

② 见“无产者报”第十五期,那里引用了马尔托夫的“计划”。——著者注

③ 彼得巴甫洛堡大狱在冬宫对面，是沙皇时代囚禁革命者的地方。——译者注

尔托夫不懂得：俄国的实际工作者是没有工夫玩资产阶级那套无聊把戏的。

不，我们想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凶恶的反动派在集结黑暗势力并竭力想把它们联合起来；而我们的任务则是集结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并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凶恶的反动派在召开杜马，它想找到新的同盟者，扩大反革命的队伍；而我们的任务是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向全世界揭穿它的反革命面目，扩大革命拥护者的队伍。◇158◇

凶恶的反动派在向革命进行致命的攻击，它想使我们的队伍惊惶失措，想葬送人民革命；而我们的任务则是紧密团结，在全国各地同时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攻击，永远根除沙皇专制制度。

我们需要的不是马尔托夫的纸房子，而是总起义。

只有人民自己的胜利起义才能拯救人民。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革命胜利，——这应当是我们今天的革命口号。

载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二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59◇

资产阶级在布置圈套

九月中旬举行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为领导、并在各城市设有地方机关的新“党”[52]。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规定了“策略”，并拟定了这个刚刚孵出的“党”要向人民发表的特别宣言。一句话，“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已经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党”。

这班“活动家”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名称是什么呢？

就是自由资产者。

自由资产者又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富裕资产阶级的自觉的代表人物。

富裕资产阶级是和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的富裕建立在我们的贫穷上面，他们的欢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上面。很明显，他们的自觉的代表人物将是我们的死敌，将企图**自觉地**击溃我们。

总之，人民公敌的“党”成立了，这个“党”要向人民发表自己的宣言。

这些先生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坚持的是什么呢？

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仇恨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说，他们在巩固资产阶级制度，同无产阶◇161◇级进行决死的斗争。这就证明为什么他们博得了资产阶级集团大大的同情。

他们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仇恨民主共和制。这就是说，他们在巩固沙皇宝座，并且也狂热地反对灾难深重的农民。这就说明为什么尼古拉第二“恩准”他们集会，允许他们召开“党”代表大会。

他们只想把沙皇的权力稍微削弱一点，而且连这一点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权力只能够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至于沙皇制度，他们则认为必须加以保存，作为富裕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可靠堡垒。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宪法草案”中说：“罗曼诺夫皇朝的宝座仍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说，他们要的是一个限制君主权力的残缺不全的宪法。

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毫不反对”也给人民以选举权，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民代表议院要受富豪议院的控制，而富豪议院一定要竭力修改和取消人民代表议院所通过的种种决议。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说：“我们需要两院制。”

自由资产者先生们“很欢迎”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只要罢工自由受到限制就行。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大谈其“人权和公民权”，而对于罢工自由则含糊其词，只是假惺惺地嘟哝些什么“经济改革”罢了。

这些奇怪的先生们也没有忘记对农民施舍恩惠：他们“毫不反对”把地主的土地转归农民，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农民应向地主赎回这些土地，而不能“白白得到土地”。这班可怜的“活动家”，看来是多么善良呵！◇162◇

如果他们能活到这一切愿望都实现了的时候，那末沙皇的权力就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沙皇专制制度就会逐渐变成资产阶级专制制度。这就是“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想把我们拉去的地方。所以他们甚至在梦里也害怕人民革命，并大谈其所谓“绥靖俄国”。既然如此，也就难怪这些倒霉的“活动家”对于所谓国家杜马抱着莫大的希望。大家知道，沙皇杜马根本否定人民革命，而这对于我国自由资产者是极其有利的。大家知道，沙皇杜马给予富裕资产阶级“某种”活动地盘，而这对于我国自由资产者是极其需要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纲领”和全部活动都寄托在杜马的存在上面，

杜马一垮台，他们的一切“计划”势必跟着破产。所以他们害怕杜马受到抵制，所以他们劝我们加入杜马。他们通过自己的领袖雅库什金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参加沙皇杜马，那将是严重的错误。”的确，这将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要看对谁来说：对人民来说，还是对人民的敌人来说，——问题就在这里。

沙皇杜马的使命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说些什么呢？

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说：“……杜马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造杜马本身。”他们在同一宣言中又说：“选民应当责成复选人选举那些**首先**愿意改造杜马的候选人。”

这种“改造”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杜马“在制定法律……以及在讨论国家收支时有决定权……并且有权监督政府大臣的行动”。这就是说，复选人**首先**应当要求扩大杜马的权限。原来“改造”杜马就是这么一回事。谁会被选进杜马里去呢？大部分是大资产阶级。很明显，扩大杜马权◇163◇限就是在政治上加强大资产阶级。于是“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就劝人民把自由资产者选进杜马里去，委托自由资产者**首先**协助加强大资产阶级！原来我们所应该关心的，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亲手加强我们的敌人，——这就是自由资产者先生们现在劝我们去做的事情。多么“友好的”劝告，还有什么可说！那末究竟有谁关心人民的权利呢？噢，还用说，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是不会忘记人民的。他们保证说，**当**他们被选入杜马**的时候**，**当**他们在杜马中的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替人民要求权利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活动家”希望用这种假仁假义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劝我们**首先**扩大杜马的权限……

倍倍尔说过：凡是敌人劝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害的。敌人劝我们参加杜马，显然，参加杜马对我们是有害的。敌人劝我们扩

大杜马的权限，显然，扩大杜马的权限对我们是有害的。破坏人民对杜马的信任，使杜马在人民面前丢脸，——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是扩大杜马的权限，而是扩大人民的权限，——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个敌人同时还向我们说些甜言蜜语，答应给我们一些什么“权利”，那末这就是说，敌人在给我们布置圈套，想用我们的手替他们筑起堡垒。我们能期待于自由资产者的，至多也不过如此。

但是，关于某些向我们鼓吹自由资产者策略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该说些什么呢？关于逐字逐句地重复我们敌人的阴险劝告的高加索“少数派”，又该说些什么呢？例如高加索“少数派”说：“我们认为必须参加国家杜马。”（见“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七页）这和自由资产者先生们“认为必须”这◇164◇样做的说法真是如出一辙！

又是那些“少数派”劝告我们说：“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把选举议员的权利**只**给予**有产者**，那末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手段迫使选民选举进步的候选人，并在全俄缙绅会议上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最后，用一切办法……迫使全俄缙绅会议召开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这就是说，即使只是有产者享有选举权，即使参加杜马的只是些有产者，我们还是应当要求这个有产者会议享有立宪会议的权限！即使人民的权利被缩小，我们还是应当尽量扩大杜马的权限！不用说，既然只是有产者才享有选举权，那末所谓选举“进步的候选人”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如上所述，自由资产者向我们鼓吹的也就是这么一套。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自由资产者已经孟什维克化了，或者是高加索“少数派”已经自由主义化了。

不管怎样，这个刚刚孵出的自由资产者的“党”，无疑是在巧妙地布置它的圈套……

粉碎这个圈套，揭穿这个圈套，无情地反对人民公敌自由派，——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

载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三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65◇

公　　民　　们！

雄伟的巨人——全俄国的无产阶级又活动起来了……　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席卷了整个俄国。全俄国辽阔国土上的生活，好像听从魔杖的一挥，都立刻停止了。仅仅在彼得堡和它的各条铁路上就有一百多万工人罢工。莫斯科这个静谧的、死气沉沉的、忠于罗曼诺夫皇朝的古都，到处弥漫着革命的火焰。哈尔科夫、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及其他文化中心和工业中心、整个俄国中部和南部、整个波兰和整个高加索都停止了脚步，正颜厉色地盯着专制制度。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全俄国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这个问题的回答。无产阶级正在向那万恶的双头妖怪[①]挑战。真正的搏斗是否就会跟着发生呢？罢工是会变成公开的武装起义，还是像从前的罢工一样“和平”结束并“沉寂下去”呢？

公民们！不管这个问题的回答怎样，不管目前罢工的结局怎样，有一点却是大家应该明白而无庸怀疑的，就是我们正处在整个俄国全民起义的前夜，而且这个起义的时刻已经迫近了。目前已爆发的政治总罢工，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俄国史上，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次总罢工也许今天就结束，不致酿成全民起义，但这只是为了明天又重新爆发起来，并以更大的力量震撼全国而变成声势◇167◇浩大的武装起义；其结果必定会解决俄国人民和沙皇专制制度历来的争端，必定会打碎这个万恶妖怪的脑袋。

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我国最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切事变的总和在历史上必然要引起的、无可避免的结局！全民武装起义，

———————————

① 双头妖怪指以双头鹰为国徽的沙皇俄国而言。——译者注。

——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急待解次的一个伟大任务！

公民们！为了你们本身的利益（除一小撮财政贵族和土地贵族而外），大家都必须响应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和无产阶级一起奔向这一挽救大家的全民起义。

罪恶滔天的沙皇专制制度把我国引到了毁灭的边缘。亿万的俄国农民贫穷破产，工人阶级受尽压迫，贫困不堪，国债累累，捐税重重，全体居民毫无权利可言，层出不穷的专横暴虐笼罩着生活的各方面，公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这就是目前在俄国呈现出的一幅可怕的图画。长此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消灭造成这种惊人惨象的专制制度！它一定要被消灭！专制制度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它愈是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惨象也就显得愈加凄惨，而专制制度在自己周围散布的妖氛也就变得愈加阴森可怕。专制制度除了在城市街头屠杀了成百成千的和平公民——工人以外，除了把数万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民的优秀子弟囚禁在监狱和流放地受折磨以外，除了利用沙皇的暴徒在农村中、在农民中间、在整个俄国的疆土上不断屠杀和不断逞凶以外，最后又想出了一套新的残酷手段。它开始煽动人民互相仇恨，挑拨各个居民阶层以至各个民族互相攻击。它武装俄罗斯的地痞流氓并◇168◇唆使他们去反对俄罗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它武装贝萨拉比亚那批饥饿而落后的俄罗斯人和莫尔达维亚人并唆使他们去反对犹太人，它武装一群无知狂信的鞑靼人并唆使他们去反对阿尔明尼亚人。它利用鞑靼人击破了俄国革命中心之一、高加索最革命的中心——巴库，并使整个阿尔明尼亚地区吓得离开了革命。它把整个多民族的高加索变成了军营，高加索的居民不仅会随时遭受专制制度的攻击，而且会随时遭受邻族——这些专制制度的不幸的牺牲品的攻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只有革命才能完全消灭这种情形！

如果指望那造成这一切惊人惨象的专制制度自己愿意消灭并能够消灭这些惨象，那就未免太奇怪太可笑了。自由党所能采取的任何改

良办法，任何补救专制制度的办法，如国家杜马、地方自治局之类，都不能消灭这种惨象。恰恰相反，在这方面的任何企图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怒潮的抵御都会使这种惨象变得愈加严重。

公民们！无产阶级是我国社会中最革命的阶级，这个至今担负着反专制制度斗争的全部重任的阶级，这个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反对专制制度的阶级，目前正在准备举行公开的武装发动。它号召你们，号召社会上一切阶级来帮助它，支援它。武装起来吧！帮助它武装起来并准备作决死的战斗吧！

公民们！起义的时刻迫近了!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地来迎接起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武装总起义的时候，我们才能战胜我们的卑鄙的敌人——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169◇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我们迫切需要的自由民主共和国。

打倒专制制度！

武装总起义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战斗的俄国无产阶级万岁！

按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梯弗里斯委员会印刷所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员会◇170◇

告 全 体 工 人 书

革命像霹雳一样震响着！俄国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了，包围了沙皇政府，并要向它冲击！红旗在飘扬，街垒在构筑，人民拿起武器，向国家机关冲击。勇士们的呐喊声又响起来了，沉寂的生活又沸腾起来了。革命的大船已经扬帆向自由飞驶而去。驾着这只大船的就是俄国无产阶级。

俄国无产者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奔向哪里呢？

我们要推翻沙皇杜马，要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就是俄国无产者今天所说的话。无产阶级不会向政府要求微小的让步，它不会要求政府取消某些城市和乡村中的“戒严”和“鞭笞制度”，无产阶级不会舍本逐末，去做这种小事情。谁向政府要求让步，谁就是不相信政府会灭亡，但无产阶级却充满着这种信念。谁期望政府“开恩”，谁就是不相信革命的雄厚力量，但无产阶级却充满着这种信念。不！无产阶级不会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在一些不明智的要求上。无产阶级对沙皇专制制度只有一个要求：打倒它，消灭它！于是工人的革命呼声就在俄国大地上喊得越来越勇敢。他们高呼：打倒国家杜马！全民立宪会议万岁！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今天奔向的目标。◇171◇

沙皇决不会给予全民立宪会议，也决不会消灭他自己的专制制度；他决不会这样做！他所“给予”的残缺不全的“宪法”，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让步，不过是他的虚伪的诺言罢了！自然，我们要利用这种让步，我们不拒绝夺取乌鸦嘴里的硬果，以便用这硬果打碎它的脑壳。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人民是不能信赖沙皇的诺言的，人民只应当信赖自己，只应当依靠本身的力量，人民的解放必须由人民亲手来完成。

只有在压迫者的骸骨上才能建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压迫者的血液才能使人民专制制度的土壤肥沃！只有当武装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率领下发动起来并举起总起义旗帜的时候，依靠刺刀的沙皇政府才能被推翻。不是空洞的词句，不是虚妄的“自我武装”，而是真正的武装和武装起义，——这就是全俄无产者今天奔向的目标。

胜利的起义将使政府遭受失败。然而遭受失败的政府往往又重新站立起来。在我国遭受失败的政府也可能站立起来。起义时向四处躲藏的黑暗势力，在起义的第二天就会从洞里钻出来设法支持政府。遭受失败的政府就是这样死而复苏的。人民一定要制裁这种黑暗势力，人民必须根除这种黑暗势力！但为了这一点，必须使胜利了的人民在起义的第二天就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组成革命军队，准备随时拿着武器保卫已经取得的权利。

只有胜利了的人民组成革命军队，那时他们才能彻底粉碎隐藏的黑暗势力。只有革命军队才能使临时政府的行动具有力量，只有临时政府才能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便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革命军队和临时革命政府，——这就是俄国无产者今天奔向的目标。◇172◇

这就是俄国革命已经走上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通向人民专制的，所以无产阶级号召人民的全体朋友都循着这条道路前进。

沙皇专制制度阻碍着人民革命的道路，它想用昨天的宣言来制止这个伟大的运动；很明显，革命浪潮一定会卷走沙皇专制制度，把它完全吞没……

凡是不踏上无产阶级道路的人都应当受到鄙弃和憎恨，因为他们卑鄙地背叛革命！凡是实际上踏上了这条道路而口头上却说着另一套的人也是可耻的，因为他们是胆小鬼，害怕真理！

我们不害怕真理，我的不害怕革命！让霹雳响得更厉害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胜利的时刻迫近了！

让我们欢欣鼓舞地高呼俄国无产阶级的口号：

打倒国家杜马！

武装起义万岁！

革命军队万岁！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无产阶级万岁！ ◇173◇

按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九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尔印刷所)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署名：梯弗里斯委员会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74◇

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了！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革命的懔然可畏的第一幕,这一幕在形式上是以十月十七日的宣言结束的。“受命于天”的专制沙皇在革命人民面前低下了他那“戴着皇冠的头”，答应人民实现“确定不移的公民自由的原则”……

但这不过是第一幕。这不过是结局的开端。我们正处在堪称为伟大俄国革命的伟大事变的前夜。这些事变循着冷酷无情的历史法则，循着铁一般的必然法则向我们迫近了。沙皇和人民，沙皇专制和人民专制是互相敌视、根本对立的两极。谁胜谁败只能是彼此决斗的结果，拚命斗争的结果，生死斗争的结果。这个斗争还没有开始。这个斗争远在前面。俄国革命的雄伟巨人——全俄国的无产阶级，正用一切力量和一切办法准备迎接这个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企图防止这个必不可免的搏斗。它认为现在已经是结束“无政府状态”、开始和平“建设”、开始“国家建设”的时候了。它确实是对的。对自由资产阶级说来，无产阶级在第一次革命发动中从沙皇制度那里夺得的东西已经足够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大胆地同沙皇政府结成有利于己的联盟，同心协力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自己的“掘墓人”——革命无产阶级了。资产阶级的自◇175◇由即剥削的自由已经有了保证，这对资产阶级说来，已经十分足够了。从来就不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公开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了。让它去好了！我们决不会对此特别惋惜。革命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操在自由派手里。俄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实际行动。

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城市革命无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革命农民，不顾自由派的任何诡计，总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斗争的，他们不到完全推翻专制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自由民主共和国时，是决不罢休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当前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它在这次革命中的目的，它在农民的支持下无论如何要达到这个目的。

走向民主共和国的必经之路，也由无产阶级明确地规定了。

（一）进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坚决的殊死的搏斗；（二）在这个“搏斗”过程中组织一支革命军队；（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其形式就是由于胜利的“搏斗”而产生的临时革命政府；（四）由临时革命政府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在达到圆满结局以前所必须经历的各个阶段。

无论政府的任何威胁或沙皇的任何冠冕堂皇的宣言，无论专制制度为拯救自己而捧出的如维特政府之类的任何临时政府，无论沙皇政府召开的、即使是根据普遍等办法的选举制召开的任何国家杜马，都不能引诱无产阶级离开唯一正确的、走向民主共和国所必经的革命道路。◇176◇

无产阶级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走完这条道路，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光荣地结束它在这条道路上所要遇到的巨大的流血斗争呢？

有，它有足够的力量！

无产阶级自己是这样想的，并且大胆地坚决地准备迎接战斗。

载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高加索工人小报”[53]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177◇

两 次 搏 斗

（论一月九日事变）

你们大概还记得去年一月九日的事变……　那天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同沙皇政府直接碰头了，并且迫不得已和它搏斗了一场。的确是迫不得已，因为彼得堡的无产阶级那天和平地走到沙皇那里去本来是要求“面包和正义”，可是人家却用敌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用冰雹般的枪弹扫射他们。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本来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沙皇肖像和教堂旗幡上的，可是人家却把这些肖像和旗幡撕成碎片扔到他们的脸上，这样就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证明：只有武器才能对抗武器。于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有什么武器就拿起什么武器，为的是要用敌对态度去对付敌人，向敌人报仇。但是他们在战场上留下几千个牺牲者，受到巨大损失以后，怀恨在心地退却了……

这就是我们对于去年一月九日事变的回忆。

今天，当俄国无产阶级纪念一月九日事变的一周年时，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搏斗中退却了，当时的搏斗和十二月的总搏斗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他们之所以退却，是因为他们当时连保证起义胜利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革命觉悟也◇179◇没有。既然无产阶级怀着祈祷和希望的心情去找那个完全以压迫人民来维持自己生存的血腥沙皇，既然无产阶级是抱着轻信态度去向自己的死敌请求“少许恩惠”，——难道这样的人民能在巷战中取得胜利吗？……

诚然，后来经过很短一个时期，排枪的射击使受骗的无产阶级睁开了眼睛，并向他们揭穿了专制制度的可憎面目；诚然，无产阶级已

在愤怒地叫喊：“沙皇揍了我们一顿，来，我们也去揍他一顿！”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武器，这又有什么用处；即使你很觉悟，但若赤手空拳，你能在巷战中干出什么来呢？难道敌人的枪弹只会打穿不觉悟的脑袋，而不会打穿觉悟的脑袋吗？

是的，缺乏武器，——这就是彼得堡无产阶级退却的第二个原因。

然而，单是一个彼得堡，即使有武器，又能干出什么来呢？当彼得堡城内正在流血和构筑街垒的时候，其他城市却毫无动作，——正因为这样，政府才能从各处调来军队，使鲜血染遍了街道。只是后来，当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埋好被杀同志们的尸体并回到自己日常工作岗位的时候，其他城市才发出罢工工人的呼声：向彼得堡的英雄们致敬！但是这种迟迟而来的敬礼又能对谁有用呢？正因为这样，政府才没有重视这些零碎而无组织的发动，并且没有费多大气力就把分散为一些零星集团的无产阶级驱散了。

可见缺乏有组织的总起义，无产阶级发动的无组织性，——这就是彼得堡无产阶级退却的第三个原因。◇180◇

当时谁能组织总起义呢？人民是不能全体都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当时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又因党内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以致没有组织起来；党内的纷争，党内的分裂，使党一天天削弱下去。分裂成两部分的年轻的党不能担当组织总起义的责任，这是毫不足怪的。

可见缺乏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这就是无产阶级退却的第四个原因。

末了，当时农民和军队之所以没有响应起义，没有支援起义，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力量薄弱、时间短促的起义看成特殊的力量。大家知道，弱者是不会有人响应的。

这就是英勇的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去年一月退却的原因。

——————————————

过了些时候，由于危机和无权状况所激起的无产阶级又准备迎接新的搏斗了。有人以为无产阶级受到一月九日的牺牲以后就会丧失斗志，他们想错了；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更加热烈更加奋勇地准备迎接“最后的”搏斗，更加勇敢更加顽强地向军队和哥萨克作斗争。黑海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起义，敖德萨、洛兹及其他城市的工人起义，农民和警察不断的冲突，这一切都很清楚地证明人民心中燃烧着不可扑灭的革命怒火。

最近无产阶级以惊人的速度具备了一月九日所缺乏的那种革命觉悟。有人说，在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方面，十年宣传还不如几天起义的效果来得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阶级搏斗过程就是一所使人民的革命觉悟与时俱增的伟大学校。◇181◇

最初只有无产阶级中不多的一批人在从事宣传的武装总起义，有些同志甚至表示过怀疑的武装起义，已渐渐引起无产阶级的同情，于是无产阶级热烈地起来组织红色队伍，设法弄到武器，如此等等。十月总罢工已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同时发动是可能的。因而也就证明，有组织的起义是可能的，于是无产阶级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当时只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党、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民主党来主持总起义的组织工作，来统一各城市单独进行的革命准备工作，并担负发动进攻的责任。何况实际生活本身已在准备着新的高潮：城市中的危机，乡村中的饥荒，以及其他类似的原因已使新的革命爆发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可惜这样一个党此时才在建立：因分裂而削弱了的党刚刚在恢复元气，刚刚在实现统一。

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这个时候遇到第二次搏斗，遇到光荣的十二月搏斗。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次搏斗。

如果我们说一月搏斗缺少革命觉悟，那末我们就应该说十二月搏斗已具备了这种觉悟。十一个月的革命风暴已经足以使俄国战斗的无

产阶级睁开眼睛，于是“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就成为目前的口号，成为群众的口号了。此时你们已经看不见教堂旗幡，也看不见神像和沙皇肖像，你们所看见的是飘扬着的红旗和很耀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了。此时你们已经听不到圣歌和“上帝呵，保佑沙皇！”，你们所听到的是到处迸发着的震聋压迫者的“马赛曲”和“华沙曲”了。

所以就革命觉悟这一点来说，十二月搏斗是根本不同于一月搏斗的。◇182◇

一月搏斗缺乏武器，那时人民是赤手空拳投入战斗的。十二月搏斗已经前进了一步，这时全体战士拿着手枪、长枪、炸弹，在某些地方甚至带着机关枪去拚命地弄武器了。用武器夺取武器，——这就是当时的口号。大家都在寻找武器，大家都感到需要武器，所可惜的只是武器很少，只有很小一部分无产者能拿着武器去进行战斗。

一月起义是完全分散的，无组织的，当时每个人都是带着侥幸心去行动的。十二月起义在这方面也前进了一步。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多数派”中央机关和“少数派”中央机关都尽量“设法”使各地的革命同时发动起来，它们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进攻。一月起义时却丝毫也没有这样做。可是，因为党在提出这个号召以前，对于起义没有进行过长期和顽强的准备工作，所以这个号召始终只是一个号召，而这次发动实际上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当时只有同时举行有组织的起义这一愿望而已。

“领导”一月起义的主要是加邦一流的人。十二月起义在这方面则有自己的优点：领导起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很可惜，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不是一个统一团结的党，因此他们的行动不能协同一致。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一次没有准备地、力量分散地迎接了起义……

一月搏斗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作为指南，在它面

前也没有发生过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十二月搏斗的优点只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只是在斗争进程中而不是在斗争一开始时就提出的。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那末十二月起义所暴露的弱点也和一月起义一样。假◇183◇如莫斯科的革命者一开始就实行进攻政策，比方说，假如他们一开始就进攻尼古拉车站并占领这个车站，那末这次起义自然会更持久，而发展的方向也会更恰当。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拉脱维亚的革命者坚决执行进攻政策而没有动摇过，那末他们首先定会夺得大炮，从而使政府当局丧失任何支柱；政府当局起初让革命者占领了城市，然后重新转入进攻并依靠大炮夺回了所有被占领的地方[54]。其他城市的情形也是这样。无怪乎马克思说：在起义中勇敢就能致胜，而只有坚持进攻政策的人才是始终勇敢的人。

这就是无产阶级在十二月中旬退却的原因。

至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军队没有响应十二月搏斗，至于这次搏斗甚至引起了某些“民主”集团的不满，那是由于这次搏斗缺乏保证起义扩展和起义胜利所十分必需的力量和持久性。

根据以上所述，就可以明白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今天应当做些什么。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完成我们已经开始了的事业：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党。“多数派”全俄代表会议和“少数派”全俄代表会议已经制定了实行统一的组织原则。它们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入党条件的条文和民主集中制。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的中心机关已经合并，而地方组织的合并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只是必须召开统一代表大会来正式完成事实上的统一，使我们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的任务是促进这个我们所珍视的事业，周密地准备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大家知道，这次代表大会是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的。◇184◇

第二、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党来组织武装起义，积极地参与这一神

圣事业，毫不倦怠地为这一事业服务。我们的任务是扩大红色队伍，训练它们，团结它们；我们的任务是用武器夺取武器，研究国家机关的分布状况，精确计算敌人力量，研究敌人的强弱方面，并以此为根据来拟定起义计划。我们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和乡村中，特别是在城市附近的乡村中，为起义进行有系统的鼓动工作，把这些乡村中的可靠分子武装起来，如此等等……

第三、我们的任务是消除任何动摇，反对任何犹豫，坚决执行进攻政策……

一句话，**团结的党、党所组织的起义和进攻的政策**，——这就是我们今天保证起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

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工业危机愈加剧烈愈加深刻，这个任务也就愈加紧急愈加迫切。

有人竟怀疑这个起码的真理是否正确，因而绝望地说：即使党是统一的，如果不善于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末它是一事无成的；而无产阶级已被击溃了，它已失望了，它已顾不及什么主动性了，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期待农村来解救，主动性应当出于农村等等。不能不指出这样推论的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无产阶级决没有被击溃，因为无产阶级被击溃就等于无产阶级死亡；其实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仍旧活着，并且日益强大起来。无产阶级仅仅是退却了，为的是要聚集力量来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搏斗。

莫斯科（实际领导了十二月起义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十二月十五日向全国人民宣告：我◇185◇们暂时停止斗争是为了认真准备，以便重新举起起义的旗帜，这样苏维埃就表达了全俄国无产阶级衷心的愿望。

倘若某些同志还否认事实，倘若他们再也不指望无产阶级而现在竟想依靠农村资产阶级，——那末就要问，这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是社会革命党人呢，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

怀疑城市无产阶级是农村的实际领导者（而不只是思想领导者）这一真理的。

有些人从前硬要我们相信专制制度在十月十七日以后已被击溃了，但我们并没有相信这一点，因为专制制度被击溃就等于专制制度死亡，然而它不仅没有死亡，反而聚集新的力量准备新的进攻。我们说过专制制度仅仅是退却了。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不对，同志们！俄国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击溃，它仅仅是退却了，目前它正在准备迎接新的光荣的战斗。俄国无产阶级决不会放下染满鲜血的旗帜，决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它将是俄国革命的唯一胜任的领袖。

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86◇

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55]

大概你们听说过农民解放的事情吧。那时政府受着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外来的打击——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内部的打击——农民运动。正因为这样，两面挨打的政府不得不实行让步，谈起农民解放来：“我们应当自己从上面来解放农民，否则人民就会暴动，就会自己动手从下面来取得解放。”我们知道所谓“从上面来解放”是怎么一回事……　既然当时人民上了当，既然政府那种假仁假义的计划得以实现，既然政府用改良办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而延迟了人民的胜利，那末，这也就说明当时人民还缺乏锻炼，容易受骗。

这样的情形目前又在俄国生活中重复着。大家知道，现在政府又是受着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外来的打击——满洲之战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内部的打击——人民革命。大家知道，两面挨打的政府不得不再作一次让步，并且也像上次那样谈起所谓“从上面来改革”：“我们必须从上面给人民以国家杜马，否则人民就会暴动，就会自己从下面召开立宪会议。”由此可见，他们想用召开杜马的手段来平息人民革命，正像他们会一度用“解放农民”的手段平息了伟大的农民运动一样。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万分坚决地破坏反动派的计划，推翻国家杜马，从而为人民革命扫清◇187◇道路。

但是，杜马是什么，它是由谁组成的呢？

杜马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国会。它只能在口头上拥有表决权，事实上却只有发言权，因为上议院和武装到了牙齿的政府将在上面监督它。宣言上公开说：杜马的任何一个决议，若不经上议院和沙皇批准就不能付诸实施。

杜马不是人民的国会，而是人民公敌的国会，因为杜马的选举既不会是普遍的、平等的，也不会是直接的、无记名的。给工人的那一点点选举权不过是纸上空文罢了。在参加梯弗里斯省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九十八名复选人当中，只能有两名工人，其余九十六名必须属于其他阶级，——宣言上这样说。在参加巴士姆和苏胡姆两州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三十二名复选人当中，只能有一名工人，其余三十一名必须由其他阶级选出，——宣言上这样说。其他各省的情形也是如此。不用说，当选为杜马代表的只能是其他阶级的分子。**一名工人代表也没有，一个议席也不给工人，——这就是成立杜马的原则**。此外，如果再加上戒严，如果还注意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一概被禁止的事实，那末将来聚集在沙皇杜马里面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用说，我们应该更加坚决地力求推翻这个杜马并举起革命的旗帜。

我们怎样才能推翻杜马：是参加选举呢，还是抵制选举？目前的问题就在这里。

有些人说：我们一定要参加选举，以便使反动派投进自己所布置的罗网，从而彻底破坏国家◇188◇杜马。

另外一些人回答他们说：你们参加选举，无意中就帮助反动派成立杜马，因而也就会全身投进反动派所布置的罗网。这就是说，你们起初同反动派一起成立沙皇杜马，后来却为实际生活所迫而企图毁坏你们自己成立的杜马，这是和我们政策的原则性的要求不相容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们拒绝参加选举而着手破坏杜马，或者你们拒绝破坏杜马而着手参加选举，免得你们后来要破坏你们自己成立的东西。

显然，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积极抵制选举；这样我们就能使反动派在人民中孤立起来，就能组织破坏杜马的工作，因而也就使这种不伦不类的国会丧失任何基础。

主张抵制选举的人的论点就是这样。

他们中间究竟谁对呢？

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不应当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进程矛盾；第二、它应当不断地提高群众的革命精神。

参加选举的策略是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进程矛盾的，因为实际生活破坏着杜马的基础，而参加选举就会巩固杜马的基础，因而也就和实际生活背道而驰。

抵制的策略却是从革命进程中自然产生的，因为它一开始就同革命一起破坏警察式杜马的威信，摧毁这个警察式杜马的基础。◇189◇

参加选举的策略定会降低人民的革命精神，因为主张参加选举的人是号召人民参加警察式的选举，而不是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把选票看做救星，而不是把人民的发动看做救星。可是参加警察式的选举却会使人民对国家杜马产生一种错觉，对它抱着一种幻想，使人民不自主地抱着这样的想法：大概杜马并不那么坏，否则社会民主党人就不会劝我们去参加杜马了，——说不定碰到好运气，杜马会对我们有利的。

抵制的策略却不会使人对杜马抱任何幻想，而是直截地肯定地表明：唯一的救星就是人民的胜利发动，人民的解放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实现，既然杜马阻碍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就应该立刻设法铲除它。在这里，人民只有依靠自己，并且一开始就对杜马这个反动势力的堡垒采取敌对的立场，这样就会不断提高人民的革命精神，为胜利的总发动打下基础。

革命的策略应当是明白、确切和肯定的，而抵制的策略恰恰具有这些特点。

有人说：单靠口头上的鼓动还不够，必须用事实来说服群众，使他们确信杜马是要不得的东西，从而促进对杜马的破坏工作；要达到这一切，就必须参加选举而不是积极抵制。

下面是我们对这一点的回答。不待说，用事实来鼓动比用口头解释的作用当然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参加**人民的**选举大会，以便**在**和其他政党**斗争时，在**和它们发生**冲突时**，具体地向人民指明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背信弃义的行为，从而“用事实来鼓动”选民。如果同志们不以此为满足，如果他们除此以外还要参加选举，那就必须指出：选举本身，投票或不投票，不论对于“用事实”鼓动◇190◇或“用口头”鼓动，都是毫无裨益的。但是它的害处却很大，因为主张参加选举的人一旦这样“用事实来鼓动”，就无意中赞成杜马的存在，因而也就巩固了它的基础。这些同志究竟想用什么来补偿这种巨大的损害呢？用投票的办法吗？这简直是不值一谈的。

另一方面，“用事实来鼓动”也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加邦拿着十字架和圣像带着彼得堡工人行进时也曾说过：人民相信沙皇的仁慈，他们还没有识破政府当局的罪恶，所以我们应当把他们带到皇宫跟前去。加邦自然是错了。他的策略是一种有害的策略，这一点已由一月九日的事变证实了。而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远远地离开加邦策略。至于抵制的策略，正是根本摈弃加邦那种妄诞思想的唯一策略。

有人说：抵制手段会使群众离开自己的先进部分，因为在采取抵制手段时跟着你们走的只会是先进部分，而群众却会同那些把群众拉到自己方面去的反动派和自由派待在一起。

我们对于这一点的回答是这样：凡是发生这种现象的地方，那里的群众大概是同情其他政党的，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怎样参加选举，反正也不会被选为初选代表。要知道选举本身是不能使群众革命化的！至于选举前的鼓动，那末这种鼓动双方都在进行，不同的是主张抵制选举的人所进行的反对杜马的鼓动，要比主张参加选举的人所进行的鼓动更为彻底、更为坚决，因为激烈批评杜马就能鼓励群众拒绝选举，而这却不是主张参加选举的人所要做的。假如这种鼓动发生效果，人民就会团结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周围；而当社会民主党人一号

召抵制杜马时，人民就会立刻跟着他们走，这时反◇191◇动派和他们那帮大流氓就要陷于孤立。倘若这种鼓动“不发生效果”，那时参加选举就有百弊而无一利，因为一采取参加杜马的策略，我们就不得不赞同反动派的活动。由此可见，抵制是把人民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周围的最好手段，当然这只限于有可能达到这种团结的地方，至于那些没有这种可能的地方，参加选举对我们就有百弊而无一利。

此外，参加杜马的策略会模糊人民的革命意识。问题在于一切反动的和自由主义的政党都参加选举。这些政党和革命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参加选举的策略对这个问题不能给群众以直接的回答。群众容易把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混淆起来。抵制的策略却在革命者和那些想借杜马来拯救旧制度基础的不革命者之间划出很明显的界限。而划清这种界限对于用革命精神来教育人民是有重大意义的。

最后，有人向我们说，我们可以利用选举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从而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团结起来。

对于这一点，我们回答说：在目前这种连召开无关紧要的会议都会有人遭到逮捕的情况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完全无法活动的，所以提出这样的任务就是欺骗自己。

总之，采取参加选举的策略就是无意中帮助巩固沙皇杜马，降低群众的革命精神，模糊人民的革命意识，无法建立任何革命组织，并且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背道而驰，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摈弃这种策略。◇192◇

抵制的策略就是现在革命发展的方向。社会民主党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行进。

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八日
“黎明报”第三期
署名：依·贝索什维里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93◇

土 地 问 题[①]

一

旧秩序在破坏着，农村动荡起来了。昨天还是受践踏受侮辱的农民,今天已开始站起来并伸直腰干了。昨天还是软弱无力的农民运动，今天已像汹涌的洪流冲向旧制度：滚开去！不然就要冲掉你！“农民要取得地主的土地”，“农民要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这就是现时俄国各个起义农村中发出的呼声。

那些打算用枪弹迫使农民沉默下去的人是错了。实际生活向我们表明：这种办法使农民革命运动更加剧烈、更加尖锐起来。

那些企图用空洞的诺言和所谓“农民银行”来安抚农民的人也错了。农民要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土地，显然他们在没有夺得地主土地以前，是不会安静下来的。空洞的诺言和所谓“农民银行”能给他们什么呢？◇195◇

农民要夺取地主的土地。他们力求用这种手段去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谁不背弃农民，谁就应当努力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

但是，农民怎样才能把地主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呢？

有人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廉价赎买”土地。这班先生对我们说，政府和地主有很多闲地，如果农民们赎买这些土地，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这样，狼既能果腹，羊也可保全。但是他们却不问一下，农民不仅被刮光了钱，而且被剥光了皮，还能拿什么去赎买这些土地呢？他们却不想一下，在赎买土地时，人家只会把坏的塞给农民，把好的留

——————————————

① 关于“土地纲领”问题务请参阅“著者第一卷序言”——本书制作者注

给自己，就像他们在“解放农奴”时做过的那样！而且农民为什么要赎买向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呢？难道官家和地主的土地不是浸透了农民的血汗吗？难道这些土地不是属于农民的吗？难道不是从农民手里剥夺去了这些祖传的财产吗？要求农民赎买从他们那里剥夺去的土地，这难道是公平的吗？难道农民运动问题就是买卖问题吗？难道农民运动的目的不是解放农民吗？然而除了农民自己，谁会把农民从农奴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呢？但是这些先生却硬要我们相信地主会解放农民，只要农民送给地主一点现钱就行了。你猜怎么样！原来这种“解放”应该在沙皇官僚领导之下来实现，应该在那帮屡次用大炮和机枪对付饥饿农民的官僚领导之下来实现！……

不！赎买土地的办法决不能拯救农民。凡是劝农民采用“廉价赎买”办法的人都是叛徒，因为他们力图使农民陷入经纪人的罗网，而不愿意农民亲自动手来完成农民的解放事业。◇196◇

既然农民要夺取地主的土地，既然他们应当用这个办法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既然“廉价赎买”的办法不能拯救他们，既然农民应当亲动手完成农民的解放事业，那末毫无疑问，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地主的土地，就是说，没收这些土地。

出路就在这里。

现在要问：这种没收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它有没有限度，农民只应当夺取一部分土地，还是应当夺取全部土地？

有些人说：夺取全部土地未免过分，只夺取一部分土地来满足农民就够了。假定是这样，但如果农民要求得更多，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决不能拦住他们的路，说“你们停住吧，不要再往前闯了！”要知道这是反动的作法！俄国各次事变不是已经证明农民确实要求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吗？而且“夺取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究竟应当夺取地主的多大一部分土地呢？是夺取一半呢，还是夺取三分之一？谁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单是由地主解决呢，还是由地主和农民一起解决？

可见这里还给经纪行为留下许多空子，这里还留下一些地主和农民讨价还价的余地，而这是和农民解放事业根本矛盾的。农民必须永远记住这个道理：不要和地主讲价钱，而要向他们进行斗争。不应该修理农奴制度的羁绊，而应该打碎这个羁绊，以便永远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只夺取一部分”的意思就是扶植农奴制度的残余，而这是和农民解放事业不相容的。

很明显，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运动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197◇能使人民更加积极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度的残余。

总之，今天农村中的运动是农民民主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而要消灭这些残余，就必须没收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

有些先生责备我们说：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前没有要求没收全部土地，为什么它在这以前只讲到没收“割地”呢？

先生们，这是因为在一九〇三年我党讲到“割地”的时候，俄国农民还没有卷入运动。当时我党的责任是向农村提出一个能够激起农民和发动农民去反对农奴制度残余的口号。归还“割地”正是这样的口号，因为“割地”很明显地向俄国农民指出农奴制度的残余是不公道的。

可是以后情况变了。农民运动成长起来了，现在用不着再去激起它，它已经像怒潮似地汹涌起来了。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应当怎样发动农民**，而是**已发动起来的农民应当要求什么**了。很明显，这里需要有明确的要求，所以党就向农民说，他们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

而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无论归还“割地”或没收全部土地都是如此。

二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农村中的运动是农民解放运动；同时我们也看到，要解放农民就必须消灭**农**◇198◇**奴制度**的残余，要消灭这些残余就必须夺取地主和官家的全部土地，以便为新的生活、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

假定这一切都已实现了，那末这些土地以后应当怎样分配，应当归谁所有呢？

有些人说：夺得的土地应当归农村**公**有，应当**立即**消灭土地私有制，这样，农村就应当成为土地的全权主人，以后农村自己会分给各个农民以**等量的**“份地”；这样，社会主义就会立即在农村中实现，——雇佣劳动制就会由土地平均使用制来代替。

社会革命党人向我们说：这叫做“**土地社会化**”。

这样的办法我们可以采纳吗？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问题的实质吧。首先要说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想从农村**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城市比农村发达，城市是农村的领导者，所以任何社会主义事业都应当从城市开始。但社会革命党人想把农村变为城市的领导者，想迫使农村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不待说，由于农村的落后，这是办不到的。由此可见，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死胎般的社会主义。

现在来谈谈他们想**立即**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革命党人却想使这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只是使土地公有，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如果商品生产原封不动，那末土地也就会成为商品，很快出现于市场，于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就会烟消云散。很明显，他们想在资本◇199◇主义范

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人们说：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至于**土地平均使用制**，那末应当指出，这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平均使用土地就需要财产上的平等，但农民之间在财产上是不平等的，目前的民主革命又无法消灭这种情形。可不可以设想，有八对耕牛的农户竟会和连一头耕牛也没有的农户同等使用土地呢？而社会革命党人却以为“土地平均使用制”会消灭雇佣劳动，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终止，这当然是荒谬绝伦的。看来社会革命党人想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使历史开倒车，他们认为这就是救命的办法。但科学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谁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因此，人们又把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反动党人**。

更不用说，农民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基础上，力求废除封建所有制，——他们是想把夺得的土地分归各人私有，而决不会满意“土地社会化”。

由此可见，“土地社会化”的办法是不能采纳的。

另一些人说：夺得的土地应当交给民主的国家，农民只能向国家租佃土地。

这就叫做“**土地国有**”。

土地国有的办法可以采纳吗？如果我们注意到未来的国家，不管它怎样民主，终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把土地交给这样的国家势必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这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是极其◇200◇不利的；如果我们还注意到农民自己也会反对“土地国有”而不满于只充当租佃者的角色，那就显而易见，“土地国有”是不符合目前运动的利益的。

所以“土地国有”的办法也是不能采纳的。

还有一些人说：土地应当归地方自治局所有，而农民只能向自治

局租佃土地。

这就叫做“**土地市有**”。

土地市有的办法可以采纳吗？“土地市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农民不能把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夺得的地主土地和官家土地收归已有。农民对这一点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农民想把土地收归己有，农民想分配自己夺得的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这些土地是自己的财产，所以当他们听说土地不交给他们而交给自治局时，他们当然不会赞同这些主张“市有”的人。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此外，如果热中于革命的农民把夺得的土地全部据为已有，一点也不留给自治局，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不能拦住他们的路，不能对他们说：你们停住吧，这些土地应当交给自治局而不应当交给你们，你们有权租佃也就够了！

第二、要是采纳“土地市有”口号，我们就应当立刻把这个口号传播到人民中去，并且应当立刻向农民说明：他们所争的土地，他们想要夺到手的土地，将归自治局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当然，如果党对于农民有很大的影响，那末他们也许会赞同党，可是不用说，农民再也不会像先前那样努力斗争，而这对目前的革命将是极端有害的。如果党对于农民没有很大的影响，那末农民就会离开党，◇201◇背弃党，这就会使农民和党发生冲突而大大削弱革命的力量。

有人会向我们说：农民的愿望往往是和发展进程相矛盾的，可是我们又不能忽视历史进程而始终顺从农民的愿望，——党应当有自己的原则。这是十足的真理！党应当以自己的原则为指南。然而，假如一个党摈弃农民的上述一切意愿，那它就是背叛自己的原则。如果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分配这些土地的意愿并不和历史进程矛盾，如果这些意愿反而是完全从目前的民主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如果反对封建所有制的真正斗争只能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基础上进行，如果农民的意愿正是表现这种趋向，——那末自然很明显，党就不能拒绝农民的这

些要求，因为拒绝支持这些要求就是拒绝革命的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党有原则，如果党不愿变成革命的阻力，那末它就应当促使农民的这些意愿实现。而这些意愿是和“土地市有”根本矛盾的！

由此可见，“土地市有”的办法也是不能采纳的。

三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化”也罢，“国有”也罢，“市有”也罢，都不能适当地满足目前革命的利益。

那末，夺来的土地应当怎样分配，应当归谁所有呢？

很明显，农民夺得的土地**应当交给农民自己**，由他们自己去**分配**这些土地。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是◇202◇应当这样解决的。土地分配会引起产权的大变动。小有产者将出卖土地而走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富裕者将购得新的土地并着手改善耕作技术，农村将分为各个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展开，这样就会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可见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从目前经济发展中自然产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土地归农民，只归农民而不归任何人**”的口号能鼓励农民，能给他们增加新的力量，并促使农村中已开始的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可见目前革命的进程也指明土地分配的必要。

反对者责备我们，说我们用这一切来复活小资产阶级，说这是和马克思学说根本抵触的。请看“革命俄国报”[56]说些什么：

“你们既帮助农民剥夺地主，也就不自觉地帮助小资产阶级经济在或多或少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农业形式的废墟上确立起来。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不是‘退一步’吗？”（见“革命俄国报”第七十五期）

我必须说：“批评家”先生们把事实弄错了。他们忘记了，地主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农奴制经济的残余，所以剥夺地主就是破坏农奴制经济的残余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他们还忘记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紧随着农奴制经济到来的从来就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在这两种经济之间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经济，它代替农奴制经济，然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早◇203◇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说过：在历史上随着农奴制经济到来的首先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在此以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发展起来，——从农奴制经济直接跳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形，以前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然而这些奇怪的“批评家”却向我们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分配这些土地是一种倒退的运动！很快他们又会责备我们，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废除农奴法”也是倒退的运动，因为当时从地主那里“夺来”一些土地交给了小业主农民！可笑的人们！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用历史观点来观察一切事物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比农奴制经济进步；破坏农奴制经济和实行小资产阶级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以后又会排除这种小资产阶级经济……

我们且撇开这些“批评家”吧。

问题在于将**土地交给农民**然后**加以分配**，就能破坏农奴制度残余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大大促进革命的高涨，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民主党可以采纳这种办法。

总之，要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就必须没收全部的地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应由农民收归己有，并按照本身利益来自行分配。

党的土地纲领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和农民有关的，可是你们对农村无产者打算怎么办呢？我们回答他们说：如果农民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那末对于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则有反映其阶级◇204◇利

益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的日常利益则在最低纲领讲到改善劳动条件的十六条中照顾到了（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至于目前我党所进行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工作，其具体表现是党在农村无产者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里，并使他们和城市无产者结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党经常和这一部分农民发生关系，并向他们说：你们既然实行民主革命，就要和战斗的农民保持联系，反对地主；你们既然向社会主义前进，就要坚决地联合城市无产者，无情地反对一切资产者，不管他们是农民或是贵族。和农民一起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和工人一起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就是党对农村无产者所说的话。

如果无产者的运动和无产者的**社会主义纲领**会煽起**阶级斗争**的火焰，借以永远消灭一切**阶级性**，那末农民运动及其**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就会在农村煽起**等级斗争**的火焰，借以根本消灭一切**等级性**。

——————————————

附言：在结束这篇论文时，不能不回答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写信给我们说：“你的第一篇文章[①]还不能令我满意。难道党没有反对过没收一切土地吗？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末为什么党没有讲到这一点呢？”

不，可敬的读者，党从来没有反对过没收一切土地。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在通过了关于“割地”这一条的代表大会（一九〇三年）上，党就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言人说过：如果农民要求◇205◇没收**一切**土地，我们就要支持他们[②]。过了两年(一九〇五年)，

————————————

① 是指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因为这篇论文是在“闪电报”上分三期发表的。——译者注

②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著者注

党内的两派，即“布尔什维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曾一致宣称，他们在没收一切土地的问题上要完全支持农民①。后来党内两派的报纸，无论“火星报”和“无产者报”，或是“新生活报”[57]和“开端报”[58]，都一再号召农民没收一切土地…… 可见党一开始就主张没收一切土地，所以你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党似乎做过农民运动的尾巴。当农民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始时，当农民甚至还没有要求“割地”时，党在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讲到没收**一切**土地了。

倘若你还要问我们：为什么在一九〇三年我们没有把没收一切土地的要求列入纲领，那末我们就要反问你：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〇〇年没有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难道他们反对这个要求吗②？为什么当时只讲到国有，而今天却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社会化呢？假如我们今天在最低纲领中完全没有讲到七小时工作制，难道这就等于我们反对这一点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一九〇三年，当运动还没有巩固起来的时候，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还没有巩固的运动是无力实现这个要求的，因此归还“割地”的办法在当时是较为适当的。但是后来，当连动已经发展起来并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党应当指出：运动不能够也不应当局限◇206◇于归还“割地”，必须没收一切土地。

事实就是如此。

最后，关于“新闻小报”[59]（见第三〇三三期）还要说几句话。这个报纸讲了一些关于“时髦”和“原则”的废话，硬说我们党先前会把归还“割地”一项作为原则。读者从上文就可以看出这是**撒谎**，党一开始就从原则上**公开**承认没收一切土地。至于“新闻小报”区别

———————————

① 见“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和“第一次代表会议”。——著者注

② “我们的任务”，“社会革命者同盟”一九〇〇年出版。——著者注

不出原则和实际问题，那是没有什么不幸的，它长大一些就能学会区别这些问题了[①]。

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七、二十二、二十三日
“闪电报”第五、第九、第十各期
署名：依·贝索什维里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07◇

———————————————

① “新闻小报”不知从哪里“听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了新的土地纲领，据此……他们拥护土地市有。”我应当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通过任何类似的纲领。通过纲领是代表大会的事情，这样的代表大会却还没有召开。很明显，“新闻小报”是被某人或某种东西所迷惑了。“新闻小报”如果不用谣言来款待自己的读者，那就好极了。——著者注

论 土 地 问 题①

你们大概还记得最近一篇关于“土地市有”的论文（见“闪电报”[60]第十二期）。我们不想详细讨论作者所涉及的一切问题，因为这样做既乏味,又没有必要。我们只想谈两个主要问题：土地市有是不是和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矛盾？土地分配是不是一种反动的办法？我们那位同志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看来他觉得土地市有、土地分配以及类似的问题都是**原**则问题，而党都把土地问题放到**完全另一种基础上**去了。

其实，社会民主党并**不认为**土地国有、土地市有和土地分配**是原则问题，它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其中任何一种办法**。只要看一看马克思的“宣言”、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同一位考茨基的“俄国土地问题”，你们就会知道事实正是如此。党是用**实践**的观点观察这一切问题，并把土地问题放到**实践的基础上**：究竟哪种办法能**更充分地**实现我们的原则，——是土地市有，土地国有呢，还是土地分配？

党就是把问题放到这种基础上的。

当然，土地纲领的**原则**（农奴制度残余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仍旧没有改变**，改变的只◇209◇是实现这个原则的手段。

作者正是应当这样提问题：究竟**哪种办法更便于**农奴制度残余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土地市有呢，还是土地分配？而他却完全出人意料地跨进原则范围，把实践问题当做**原则**问题并问我们：所谓土地市有“是否和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及发展资本主义相矛盾”？无

———————————————

① 关于“土地纲领”问题务请参阅“著者第一卷序言”——本书制作者注

论土地国有或土地分配都是和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及发展资本主义不相矛盾的。但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就没有差别；也并不是说主张土地市有的人同时就应当主张土地国有和土地分配！很明显，它们之间是有某种**实践上的区别**的。问题正在这里，所以党才把这个问题放到**实践**的基础上。而作者却像我们上面所指出的，竟把问题移到完全另外一种基础上，把原则本身和实现原则的手段混淆起来，于是就无意中回避了党所提出的问题。

其次，作者硬要我们相信土地分配是一种反动的办法，换句话说，他责难我们的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所常常责难我们的。若是形而上学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我们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土地分配是反动的办法，那末这种责难丝毫也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不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他们不想了解：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那些**明天**要成为反动的东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但是，当辩证唯物主义者向我们发出同样的责难时，我们便不能不问一问：辩证论者和形而上学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自然，如果土地分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反动的办法；但如果土地分配是为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那它当然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应当拥护的革命手◇210◇段了。土地分配在今天反对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呢，还是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毫无疑义，它是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的。于是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当然，资本主义在乡村中相当稳固以后，土地分配就会成为反动的办法，因为那时它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民主党也不会赞成它。现在社会民主党热烈地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把它当做革命的办法。可是到以后，当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成为实践问题时，民主共和国就会成为反动的东西，而社会民主党就会竭力设法摧毁它。关于土地分配也必须这样说。土地分配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经济，**当**进行反对农奴制度残余的斗争**的时候**，是革命的；但是同一的土地分配，

当它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却是反动的。这就是对社会发展的辩证观点。马克思也是这样辩证地观察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和农奴制经济比较起来，是进步的。

除此而外，考茨基关于分配土地问题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土地的分配，俄国农民所要求而且实际上已在开始实现的土地的分配，即大地产的分配……不仅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而且是极其有益的。所以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支持这种过程。”（见“俄国土地问题”第十一页）

正确地提出问题对于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任何问题都应当辩证地提出，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忘记,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所以我们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问◇211◇题。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今天是把土地问题放到实践基础上的，凡是愿意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应当正是站到这个基础上。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第二个条件。而我们那位同志对于这两个条件连一个也没有注意到。

那位同志会回答说：好吧,我们就假定土地分配是革命的办法吧；很明显，我们要努力支持这个革命运动，但这决不等于我们应当把这个运动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在纲领中不能容许有这样的要求等等。可见作者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混为一谈了。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即在最高纲领中）只能包括无产阶级的要求，但他忘记了，民主主义的纲领（即最低纲领），尤其是土地纲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所以其中必定有我们所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尽管如此，它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用不着到远处去找例子，你在土地纲领第二条上就可看到：党要求“……取消一切束缚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请你读一读这一条并回答：这一条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呢？你会说：

这里一点社会主义的东西也没有，因为这一条是要求资产阶级财产私有的自由，而不是要求消灭它。虽然如此，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还是有这一条。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只在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当把它们混淆起来。诚然，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一点还会不满，但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呀！

至于农民对分配土地的渴望，那末我们已经讲过：这种渴望的意义要用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衡量；◇212◇因为农民的渴望是从这个趋势“直接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党应当支持这种渴望而不应当反对它。

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闪电报”第十四期
署名：依·贝索什维里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13◇

论 修 改 土 地 纲 领①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二十六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61]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说）

我首先要谈一谈某些同志的论证方法。普列汉诺夫同志关于列宁同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习气”，关于“列宁主义”的危害性等等讲了很多，但关于土地问题实际上给我们讲得很少。然而他是作为土地问题报告人之一讲话的。我以为这种制造刺激气氛的论证方法，除了和我们这次称为统一代表大会的性质相抵触以外，对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根本什么也阐明不了。我们本来也可以讲一讲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某些立宪民主党人的习气，但这样做并不能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

其次，约翰[62]依据古里亚、拉脱维亚边区等处的某些实际生活材料，就断定土地市有适用于整个俄国。我必须指出，一般说来，纲领是不能这样起草的。在起草纲领时不应从某些边区、某些部分的特点出发，而应从俄国大多数地区所具有的共同点出发：没有主导路线的纲领就不能算做纲领，而只能算做各种论点的机械凑合。约翰的草案就是如此。此外，约翰还引用了不正确的材料。照他的意◇215◇见，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本身证实他的草案是对的，例如古里亚，那里在运动过程中就成立了管理森林等等的区域自治局。但是，第一、古里亚并不是一个区域，而是库泰依斯省的一个县；第二、古里亚从来就没有过全古里亚统一的革命的自治局，那里只有过一些小自治局，因而它们决不等于区域自治局；第三、管理是一回事，而占有却完全是

———————————————

① 关于“土地纲领”问题务请参阅“著者第一卷序言”——本书制作者注

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关于古里亚的情形流行着许多传说，而俄罗斯的同志们却毫无必要地信以为真……

至于问题的本质，那末我应当说,我们的纲领必须依据这个原理：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末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采纳的。如果我们提出土地市有或土地国有的口号，我们不仅一无所获，反而使革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无法实现。那些说分配土地是反动办法的人，是把两个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之前的阶段混为一谈了。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阶段实行土地分配是反动的，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条件下（例如在俄国农村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分配大体说来是革命的。当然，森林、水源等等是无法分配的，但可以把它们收归国有，而这决不会和农民提出的革命要求相抵触。其次，约翰提出以革命委员会的口号代替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这是和土地革命的精神根本抵触的。土地革命的目的首先和主要的是解放农民，因此农民委员会这个口号是唯一符合土地革命精神的口◇216◇号。如果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那末农民的解放也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
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版
第五十九页至第六十页◇217◇

青年时期的柯巴（斯大林）

论 目 前 形 势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七日[三十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演说）

谁都晓得，在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中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伪改革的道路，另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同样也很明显，走第一条道路的是以沙皇政府为首的大厂主和大地主，走第二条道路的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日益发展的城市中的危机和农村中的饥荒使新的爆发不可避免，所以在这里是不容许动摇的：**或者**是革命走向高潮，那我们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或者**是革命走向低潮，那我们就不能也不应当提出这样的任务。鲁登科真是枉费心机，他认为这样提问题不是辩证的。鲁登科在寻找中间路线，他想说：革命又在高涨，又不在高涨；又应当把它进行到底，又不应当把它进行到底。因为在他看来，辩证法正是要求这样提问题的！我们却不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

总之，我们是处在新爆发的前夜，革命在高涨，我们应当把它进行到底。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呢？是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呢，还◇219◇是在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这就是基本分歧的起点。

马尔丁诺夫同志早就在“两个专政”中说过：在目前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有害的空想。他昨天的发言也透露了这种见解。那些对他鼓掌的同志大概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如果这样，如果照孟什维克同志们的看法，我们需要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民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那末自然很明显：无论是组织武装起义，或

是夺取政权，我们都不应当直接积极参加了。这就是孟什维克的“公式”。

反之，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必须走在现今革命的前头而不是做它的尾巴，那末自然很清楚：无产阶级既不能拒绝积极参加组织武装起义，也不能拒绝夺取政权。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式”。

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

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
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版第一八七页◇2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

孟什维克诺·赫·[63]知道,凭勇敢可以攻下城市，所以他……胆敢再次责骂布尔什维克是布朗基主义者（见“实话报”[64]第七期）。

当然，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早就称考茨基和倍倍尔为布朗基主义者了。法国机会主义者饶勒斯和米勒兰早就责骂盖得和拉法格是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了。虽然如此，但全世界都知道，伯恩施坦、米勒兰、饶勒斯等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考茨基、倍倍尔、盖得、拉法格等人却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机会主义者及其追随人诺·赫·也模仿欧洲机会主义者把我们称为布朗基主义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不过说明布尔什维克像考茨基和盖得一样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罢了[65]。

我们本来可以在此结束和诺·赫·的谈话。可是他偏要把问题“深入一步”，企图证实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好吧，我们别委屈他，就听听他的话吧。

诺·赫·不同意布尔什维克以下的意见：

“譬如说①,城市民众对政府②满怀愤恨，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起来进行斗争。这就是说，我们在数量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还**不够**。要使起义获得胜利，就必须预先拟定斗争计划,制定作战策略,◇221◇就必须建立有组织的队伍等等。”（见“新生活报”第六期）

————————————

① 这里诺·赫·把“譬如说”改成“当时”，因而把意思稍微改变了一点。——著者注

② 这里诺·赫·删去了“对政府”几个字（见“新生活报”[66]第六期）。——著者注

诺·赫·不同意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布朗基主义！可见诺·赫·既不愿制定“作战策略”，又不愿建立“有组织的队伍”，更不愿进行有组织的发动，——这一切好像都是无关紧要的，多余的。布尔什维克说：单是“对政府满怀愤恨是不够的”，只有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队伍和作战策略”。诺·赫·摈弃这一切，而把这叫做布朗基主义。

我们暂且记住这一点，继续听下去吧。

诺·赫·不喜欢列宁以下的意见：

“我们应当收集莫斯科、顿巴斯、罗斯托夫以及其他各处起义的经验，**传播**这种经验，顽强地耐心地**准备**新的战斗力量，并在一系列的游击性战斗发动中**训练和**锻炼这种新的战斗力量。新的爆发也许在春天还不会到来，但它一定要来的，大概不会很远了。我们应当武装起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并具有采取坚决进攻行动的能力，迎接新的爆发。”（见“党内消息”）[67]

诺·赫·不同意列宁这个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是布朗基主义！

总之，在诺·赫·看来，我们**不应当**“收集十二月起义的经验”，也**不应当**“传播这种经验”。诚然，爆发是愈来愈近了，但是据诺·赫·的意见，我们**不应当**“武装起来迎接它”，**不应当**准备“采取◇222◇坚决的进攻行动”。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们赤手空拳、毫无准备就更容易取得胜利吧！布尔什维克说，爆发是意料中的事，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既要在觉悟方面又要在武装方面作好准备。诺·赫·知道爆发是意料中的事，可是他除了口头鼓动以外，什么也不承认，所以也就怀疑武装的必要，认为这是多余的。布尔什维克说，必须把觉悟性和组织性灌输到自发的和零碎的起义中去。诺·赫·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他说，这是布朗基主义。布尔什维克说，在一定时机必须“采取坚决的进攻行动”。**坚决性**也罢，**进攻行动**也罢，诺·赫·一

概不喜欢。他说，这一切都是布朗基主义。

我们暂且记住这一切，再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武装起义的看法是怎样的。

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写的：

“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马克思“历史随笔”第九十五页）[68]

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谁要想使起义获得胜利，谁就应当走**进攻**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223◇要走进攻的道路，谁就必须既有武装，又有军事知识，并且有受过训练的队伍，——没有这一切，进攻是不可能的。至于勇敢的进攻行动，据马克思的意见，它是任何起义的血肉。而诺·赫·无论对勇敢的进攻行动，对进攻的政策，对有组织的队伍以及对传播军事知识一概加以讥笑，——，他说这一切都是布朗基主义！这样一来，彷佛诺·赫·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倒是布朗基主义者了！不幸的马克思！可惜他不能从坟墓中站起来听一听诺·赫·这番谬论了。

恩格斯关于起义说了些什么呢？恩格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有一处论到西班牙起义并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说：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

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者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样的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都**早已组成**义勇大队（同志，听见了吗，恩格斯说的是大队呀！）；这些队伍的纪律固然不好，但大概并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余坏些。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就是宪兵(guardias 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首先应当阻止宪兵队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开到野外去作战才能办到……（同志们，注意,注意！）要希望取得胜利,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其次，恩格斯斥责巴枯宁主义者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当做自己的原则，即“正是革命◇224◇力量的零星分散，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处起义陆续地镇压下去”（见恩格斯“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69]。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就是这样说的……

有组织的队伍，实行进攻的政策，组织起义，统一各处分散的起义，——这就是恩格斯认为保证起义胜利的必要条件。

原来诺·赫·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恩格斯倒是布朗基主义者！不幸的恩格斯！

由此可见，诺·赫·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起义所持的观点。

这还不要紧。不过我们要声明：诺·赫·所提出的策略降低了而实际上是否定了武装、红色队伍和军事知识的作用。这个策略就是赤手空拳举行起义的策略。这个策略将使我们再次遭受“十二月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在十二月起义时没有武器、队伍和军事知识等等呢？就是因为当时党内非常流行着类似诺·赫·的那些同志的策略……

可是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生活同样地驳斥了这种赤手空拳举行起义的策略。

事实证明是这样的。

载于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
“新生活报”第十九期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25◇

国 际 反 革 命

目前的俄国在许多方面都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相类似。这种类似一方面表现在：俄国也像当时的法国一样，反革命势力在扩大，并且越出了本国的范围，同其他国家的反革命结成联盟，——反革命逐渐具有国际性了。在法国，旧政府曾经同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结成联盟，请了他们的军队去援助，并向人民革命发动了进攻。现在在俄国，旧政府和德奥两国的皇帝结成联盟，想请他们的军队来援助并把人民革命淹没在血泊中。

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流行着一种传闻，说“俄国”和“德国”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见“北方土地报”[70]第三期）。此后传闻愈来愈厉害。现在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黑帮的“俄国报”[71]竟公开宣称：革命分子是造成“俄国”（即反革命）目前困难情况的罪人。该报说：“德意志帝国政府充分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它已采取了一系列适当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一定会产生圆满的结果。”原来这些措施就是“奥国”和“德国”准备在俄国革命一旦有所进展时便派兵援助“俄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达成协议，并且确认“在一定情况下，为镇压或限制革命运动而积极干涉俄国内政，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措施……”◇227◇

“俄国报”就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国际的反革命早就在大事准备。谁都知道，它早就用金钱援助反革命的俄国来反对革命。但它并不以此为限。现在它竟决定出兵来援助了。

既然如此，解散杜马的真正意图，也像斯托雷平“新”命令[72]的

意图和特列坡夫[73]“旧”暴行的意图一样，连小孩子也容易懂得了…… 既然如此，大概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天真幼稚的人所抱的幻想就会消失了，大概他们终究会相信：我们这里并没有“宪制”,我们这里在进行内战,因而斗争也应当按军事方式来进行……

可是目前的俄国在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法国相类似。当时国际的反革命使革命扩大起来，革命越出了法国的范围，像汹涌的洪流泛滥于欧洲各国。欧洲“戴皇冠的人们”既然结成总联盟，欧洲的人民自然也就携起手来了。我们今天在俄国也看到同样的情形。“田鼠挖得好呀”…… 俄国反革命和欧洲反革命联成一气，不断使革命扩大，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给国际革命奠定基础。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着**民主主义**革命，伸出兄弟的手去和将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大家知道，随着一月九日的发动，在欧洲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十二月的发动引起了德国和法国的游行示威。毫无疑义，必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发动一定会更坚决地推动欧洲无产阶级起来斗争。国际反革命只会使国际革命更加巩固，更加深入，更加强大，并使它的基础更加稳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将获得真正的体现。◇228◇

好吧，先生们，你们干吧，努力干吧！随着正在扩大的俄国革命到来的将是欧洲革命，那时…… 那时，不仅农奴制度残余的丧钟，就连你们所喜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也要响起来了。

是的，反革命先生们，你们“挖得好呀”。

载于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四日
“新生活报”第二十期
署名：柯巴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29◇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74]

一

我们殷切期待的事情实现了，——统一代表大会已和平结束，避免了分裂，党内两派的合并在形式上确定下来了，因而奠定了我党政治实力的基础。

现在必须了解，必须更仔细地认识代表大会的面貌，冷静地衡量这次大会的优点和缺点。

代表大会做了些什么呢？

代表大会本来应当做些什么呢？

对前一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已作了回答。对后一问题，要回答它，就应当知道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目前形势向它提出了什么任务。

我们从后一问题开始吧。

现在已经很明显：人民革命并没有灭亡，它虽然遭到了“十二月的失败”，但仍然在扩大并向最高点发展。我们说，这是必然的，因为革命的动力继续存在,继续起作用,已爆发的工业危机日益加◇231◇剧，使农村完全破产的饥荒日甚一日，——而这意味着人民的革命义愤很快就要像汹涌的洪流一样奔放起来。事实证明，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正酝酿着新的发动，比十二月进攻更坚决更强大的发动。我们正处在起义的前夜。

另一方面，人民深恶痛绝的反革命也正在积聚力量并逐渐加强起来。它已把权奸组织起来，它号召一切黑暗势力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

它领导着黑帮“运动”，它准备向人民革命进行新的袭击，它把嗜血成性的地主和厂主纠集在自己的周围，——可见反革命正在准备扑灭人民革命。

愈往前去，国家就愈加分明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即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这两个阵营的两个首领——无产阶级和沙皇政府也就对立得愈加厉害，它们之间的一切桥梁已被烧毁的迹象也就愈加明显。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革命胜利和人民专制，**或者**是反革命胜利和沙皇专制。谁若脚踏两只船，谁就是出卖革命。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可鄙的杜马和它那些可鄙的立宪民主党人正是脚踏两只船。它想调和革命和反革命，想把狼和羊豢养在一起，借以“一举”平息革命。所以杜马至今只是干臼中捣水的勾当，所以它没有能把任何人民集合到自己的周围，没有立足的基地而飘荡在空中。

斗争的主要场所仍然是街头。事实证明是如此。事实证明：在今天的斗争中，在街头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只会空谈的杜马中），反革命势力一天天在削弱和动摇，而革命力量则在增长并动员起来；团结和组织革命力量是在先进工人领导下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使目前革命获◇232◇得胜利和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只有**在这个革命今后还是由先进工人来领导的条件下，只有在觉悟的无产阶级能**胜任地**领导革命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因此，目前形势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什么任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就显而易见了。

恩格斯说，工人的政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换句话说，党应当自觉地走上实际生活本身所不自觉地走着的那条道路，党应当自觉地表达沸腾的生活所不自觉地提出的那种思想。

事实证明，沙皇制度没有能扑灭人民革命，恰恰相反，人民革命日益增长，日益高涨，并走向新的发动，——所以党的任务就是自觉地准备迎接这个发动并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很明显，代表大会应当指出这个任务并责成党员忠实地完成这个任务。

事实证明，调和革命和反革命是不可能的；杜马一开始就走上了调和它们的道路，但它做不出什么来；**这样的**杜马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永远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得不变成反动势力的附属品，——所以党的任务就是打破对杜马的幻想，纠正人民的政治错觉，并对全世界宣告：革命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能给人民带来胜利的**主要**是街头，是街头的斗争，而不是杜马，不是杜马中的空谈。

很明显，统一代表大会也必须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这个任务，以便确切地规定党的活动方向。

事实证明，使革命获得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建立人民专制，**只有**在以下场合才有可能：领导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233◇级手中，——所以党的任务就是埋葬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城乡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他们的革命斗争，领导他们今后的发动，这样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很明显，统一代表大会应该特别注意这第三个任务，即基本任务，借以向党指明这一任务的极重大的意义。

这就是目前形势所要求于统一代表大会的，这也就是代表大会所应当做的。

代表大会是否完成了这些任务呢？

二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代表大会本身的面貌。

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谈到了许多问题，但主要问题是目前形势问

题，其余一切问题都是以它为中心的。**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策略上一切分歧意见的焦点。布尔什维克说，城市的危机日益尖锐，农村的饥荒日益严重，政府腐败透顶，而人民的义愤则一天天增长，因此，革命不仅没有低落，反而一天天发展起来，并准备新的进攻。所以任务就是促成日益发展的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目前形势”）。◇234◇

孟什维克所说的几乎也是一样。

但是**怎样**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为此需要**哪些**条件呢？

据布尔什维克看来，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只在以下场合**才有可能：领导这个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其**必要条件就是它……引导**农民群众**前进**，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带有政治自觉性……”否则无产阶级就只好放弃“人民革命领袖”的角色，而成为那永远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见决议“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自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方面，它是和那被资产阶级享受了果实的法国大革命相似的。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在法国革命时期，还没有像我们今天在我国所看见的大机器生产，阶级矛盾也不像目前在我国这样尖锐，因此那里的无产阶级是软弱的，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是较强大、较团结的。还应该注意到：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而目前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有自己的政党及其纲领和策略。所以毫不奇怪，领导法国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却成了这些先生的尾巴，“工人进行了斗争，而资产者却获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满意做自由派的尾巴，它以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并且号召一切“被压

迫者和穷苦的人”集合到它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国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优越的地方，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国革命能够进行到底并能够最后建立人民专制。不过我们◇235◇必须自觉地促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把战斗的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以便有可能**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把革命进行到底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这个革命的果实不被资产阶级所独吞，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除了政治自由之外还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完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从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谁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谁若不愿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为它火中取栗，谁若争取使无产阶级变成独立的力量并利用目前的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应当公开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谁就应当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础。

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就是如此。

孟什维克说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们说：当然，革命在加强着，并且需要把它进行到底，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让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做革命的领导者吧。布尔什维克问道：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孟什维克回答说：因为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就应充当这个革命的领袖。那末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并且“推动他们”，这样来“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被孟什维克推举为“报告人”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说的。在孟什维克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也表现了这种思想，虽然表现得不这样明显。马尔丁诺夫早在他的“两个专政”中就说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危险的空想”，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极端民主反对派来领导”，而不是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236◇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并且推动他们走

上通向自由的道路(见马尔丁诺夫的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两个专政”)。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又重复了这种见解。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蓝本，而我国革命则是较蓝本逊色的副本；既然在法国领导革命的，起初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民会议”，后来又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公会”，那末在我国领导革命并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起初也应当是国家杜马，以后就应当是另一个比杜马更为革命的代表机关。无论在杜马中或是在这个未来的代表机关中，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将占统治地位，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而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资产阶级走，把它继续推向前进，推向真正的自由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对马尔丁诺夫的演说报以响亮的掌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任何决议中**都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领导权”一语在他们的决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被删掉了（见代表大会的决议）。

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里有两种互相排斥的立场，其他的意见分歧都是由此产生的。

既然目前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在现今的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立宪民主党的资产者，那就不言而喻，现今的杜马决不能变成“国家的政治中心”，决不能把革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无论它怎样努力都不能成为日益发展的革命的领导者。其次，既然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要通过杜马来领导革命又没有可能，那就不言而喻，目前我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应当是街头，◇237◇而不是杜马的会议厅。再其次，既然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斗争的主要场所又是街头，那就不言而喻，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参加组织街头的斗争，**加紧**注意武装工作，扩充红色队伍并在先进分子中间

传播军事知识。最后，既然革命的领袖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既然先进的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组织起义，那就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避开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应当和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参加临时政府[①]，因为革命街头的领袖同样应当是革命政府中的领袖。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就是如此。

反之，如果像孟什维克所想的，革命的领导权将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又“近于这类民主派”，那就不言而喻，现今的杜马能变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现今的杜马能把革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变成斗争的主要场所。其次，既然杜马能变成斗争的主要场所，那末**加紧**注意武装工作和注意组织红色队伍就是多余的事情，**特别**注意组织街头的斗争也不是我们的事情，和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并参加临时政府就更不是我们的事情了。让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关心这件事情吧，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领导者。诚然，拥有武器和红色队伍不仅不坏而且还是必需的，但其意义并不像布尔什维克所想的那么重大。

孟什维克的立场就是如此。◇238◇

代表大会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就是说，它摈弃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赞成孟什维克的立场。

这样，代表大会就清楚地证明了它不懂得目前形势的迫切要求。

代表大会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其余一切错误自然也就随着产生了。

三

代表大会既然摈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那末其余的问题如

———————————————

①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著者注

“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关于武装起义”等等，它会怎样去解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吧。

首先从国家杜马问题谈起。

我们不来分析究竟哪种策略较为正确，——是抵制选举还是参加选举。我们只指出以下一点：既然今天杜马除了空谈以外什么事也不干，既然它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这就是说，主张参加选举的人是错了，因为他们号召人民去参加选举，就使人民产生幻想。我们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谈吧。原来在代表大会开会时，选举已经结束（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我们已经知道选举的结果，因此当时可谈的只是过几天就要召开的**杜马本身**。很明显，代表大会不能回到已往的问题上去，而应该把主◇239◇要注意力放在杜马本身究竟是什么和我们对它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问题上面。

那末，现今的杜马究竟是什么，我们对它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大家从十月十七日的宣言中就已知道，杜马没有特别大的权力：这是一个“有权”开会讨论问题而“无权”逾越现行“根本法”的代表会议。杜马受到“有权”废除其任何决定的国家参议院的监视。而全副武装的沙皇政府在警戒着，要是杜马不满足于谘议的角色，沙皇政府就“有权”把它解散。

至于杜马的面目，那末我们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前就已知道它将由谁组成，当时我们已知道杜马的大部分代表一定是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并不是想借此说明，立宪民主党人一定将在杜马中占多数，我们只是说杜马五百个代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将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有三分之一是中间集团和右派（“民主改革党”[75]、无党派代表中的温和分子、十月党人[76]等等），这些人在和极左派（即工人集团和革命农民集团）作斗争时，一定会集结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周围并投票拥护他们，这样一来，在杜马中能左右一切的就会是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呢？能不能称他们为革命者呢？当然不能！那末立宪民主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立宪民主党人就是**一帮妥恊分子**：他们想限制沙皇的权力，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人民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想用来代替沙皇专制的是资产阶级专制而不是人民专制（见他们的纲领），——而是为了使人民也减弱自己的革命性，收回自己的革命要求，并尽量和沙皇妥协；立宪民主党人希望沙皇和人民达成协议。◇240◇

可见杜马中的多数一定会由妥协分子组成，而不是由革命者组成。这一点早在四月上半月就已看得非常清楚了。

由此可见，一面是遭受抵制，软弱无力，权限微不足道；一面又是不革命的和妥协的分子占多数，——这就是杜马的面目。软弱的人本来就惯于走妥协的道路，若再加上他们的倾向也是不革命的，那就更容易滚到妥协方面去了。国家杜马也一定会这样。它不会完全站到沙皇方面，因为它希望限制沙皇的权力；但它也不会转到人民方面，因为人民提出种种革命要求。因此它必定站在沙皇和人民之间进行调停，就是说，必定干臼中捣水的勾当。一方面它必须说服人民，使人民放弃“过分的要求”而尽量向沙皇妥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经纪人的身分在沙皇面前出现，请沙皇向人民让一点步，以便结束“革命的混乱局面”。

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所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杜马。

党对这样的杜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不用说，党决不能支持这样的杜马，因为支持杜马就是支持妥协政策，而妥协政策是和加深革命这一任务根本抵触的，——工人政党不应担任绥靖革命的角色。当然，党应当利用杜马本身以及杜马和政府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党就应当支持杜马的不革命的策略。恰恰相反，揭破杜马的两面性，无情地批评杜马，暴露杜马的背叛性的策略，——这就是党对国家杜马应当采取的态度。

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它不能起人民代表机关的作◇241◇用，不能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在这里，党的责任就是打破对杜马所抱的幻想，并且公开宣布：杜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所以它不能成为革命的工具；现在斗争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

同时也很明显，在杜马中人数比立宪民主党少得多的农民“劳动团”[77]，不会永远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妥协策略，它很快就会把立宪民主党人当做人民叛徒而开始和他们作斗争，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党的责任就是支持“劳动团”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彻底发展它的革命倾向，使它的革命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不革命策略对立起来，这样来更明显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倾向。

代表大会究竟是怎样做的，代表大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说了些什么呢？

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杜马是“从国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机关。这就是说，杜马虽然有它的缺点，但它似乎终究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

很明显，代表大会未能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作应有的估计，代表大会忘记了：杜马中的大多数是妥协分子，妥协分子既是摈弃革命的人，也就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因而我们无权说杜马是“从国民中间”产生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说：“现在已可看出（主要是）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国家杜马无论**如何不能负起**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使命。”这就是说，现在的杜马不是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它是反人民的，所以不能表◇242◇达人民的意志（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杜马”虽然具有“伪宪制的”性质，但终

究“会变成革命的工具”……它和政府的冲突能够扩大到“有可能使这种冲突变成旨在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广大群众运动的出发点”。这就是说，杜马似乎可能变成政治中心，把革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举起革命的旗帜。

工人们，你们听见了吗：妥协的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居然能变成革命中心，能领导革命，——狗居然能生出羊来！你们何必操心，今后既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用不着使人民一定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了，因为**不革命的**杜马自己是会把**革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原来进行革命是这么简单呀，原来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是应该这样做呀！

看来，代表大会不懂得，两面性的杜马及其两面性的立宪民主党人必然会脚踏两只船，必然会在沙皇和人民之间进行调解，然后就像所有两面派一样，不得不投到给予更多诺言的那一方面去！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宣称，“目前还没有可以使我党走上国会道路的条件”，就是说，我们暂时还不能开始过平静的国会生活，斗争的主要场所仍然是街头，而不是杜马（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这一点上也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的决议丝毫没有确切地说明：杜马中存在着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农民代表（“劳动◇243◇团”），他们将不得不摈弃立宪民主党的妥协政策而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必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帮助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革命的道路上。

看来代表大会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是目前革命中的两个主力；在现时，只要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那末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无论在街头或在杜马中都应当支持他们。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宣称：社会民主党应该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

性和动摇性，特别留心地注视农民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对立起来，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发言”（见决议）。

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这项提案。大概因为这项提案过于明显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在目前斗争中的先进作用，而代表大会，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却不信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说农民应当团结在杜马的周围，而不应当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的刊物“我们的生活报”[78]就称赞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报”的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就异口同声地叫喊：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回心转意，离开布朗基主义了（见“我们的生活报”第四三二期）。

显然，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代表大会的决议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无怪乎倍倍尔说：凡是我们的敌人所喜欢的事情，对我们都是有害的！◇244◇

四

现在我们来谈谈武装起义问题。

现在谁都晓得，人民的发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城市的危机和乡村的饥荒有加无已，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既然沙皇政府日趋腐败，既然革命因而高涨起来，——那末不言而喻，实际生活正在准备一次比十月和十二月两次发动更广泛更强大的新的人民发动。至于这种新的发动是否如愿，是好是坏，今天来说是多余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人民的发动正在自然地成熟着，它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发动是各有不同的。不待说，彼得堡的一月总罢工（一九〇五年）是人民的发动。十月的政治总罢工是人民的发动。莫斯科的

和拉脱维亚人的“十二月搏斗”也是人民的发动。显然，这些发动之间都有不同的地方。在一月发动（一九〇五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罢工，而在十二月发动中，罢工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它就转变为武装起义，把主要作用让给了武装起义。一月、十月和十二月的发动证明：不管你怎样“和平地”开始总罢工，不管你怎样“客气地”提出要求，不管你怎样赤手空拳地走上战场，事情还是要由搏斗来结束（请回忆一下一月九日彼得堡民众举着十字架和沙皇肖像游行的情形），政府还是要使用大炮和长枪，人民还是要拿起武器，因而总罢工还是会转变为武装起义。◇245◇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过说明：将来的人民发动不会是普通的发动，它一定具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而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武装**起义。至于流血冲突是否如愿，是好是坏,那是不必谈的。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武装**起义一定要发生，避免它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建立人民专制。我们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用总罢工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请回忆一下上述的情形）。也许杜马和它那些夸夸其谈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帮助我们，因而人民专制就会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吗？事实证明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所要的是大资产阶级专制而不是人民专制（请回忆一下上述的情形）。

很明显，唯一可靠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武装起义。只有靠武装起义才能推翻沙皇统治并建立人民统治，当然这个起义一定要以胜利来结束才行。既然如此，既然现今没有起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胜利，而另一方面，既然实际生活本身在准备着人民的武装发动，既然这个发动不可避免，——那末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自觉地准备迎接这个发动，自觉地使这个发动获得胜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应当摈弃人民专制（民主共和国）而满足于君主立宪制，那末我们就有权说组织武装起义不是我们的事情；或者我们仍旧

认定我们今天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人民专制（民主共和国）而坚决摈弃君主立宪制，那末我们就无权说自觉地去组织自发成长的发动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但是，怎样准备武装起义，怎样促使起义获得胜利呢？◇246◇

十二月的发动证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无产阶级面前除了其他一切过失外，还犯了一个很大的过失。这个过失就是我们对武装工人和组织红色队伍的事情没有关心或者关心太少。请回忆一下十二月事变。谁不记得当时梯弗里斯、西高加索、南俄、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巴库等处奋起斗争的人民呢？为什么专制政府能如此容易地驱散了这些愤激的人民呢？难道因为人民还不相信沙皇政府的腐朽无能吗？当然不是！那末究竟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样觉悟，赤手空拳是挡不住枪弹的！是的，群众骂我们：你们拿了钱，武器都没有看见。这是骂得很公道的。

第二、因为我们还没有受过训练的红色队伍来领导其余的民众前进，用武器去夺取武器并把民众武装起来：民众在街头战斗中是英雄，但是，如果武装的弟兄不引导他们，不给他们树立榜样，那末他们就会变成乌合之众。

第三、因为起义是零碎的，没有组织的。当莫斯科进行街垒战时，彼得堡却毫无动作。莫斯科已“被征服”了，梯弗里斯和库泰依斯才准备冲击。南方一带和拉脱维亚人已经“战败”了，西伯利亚才拿起武器。这就是说，在起义开始时，战斗的无产阶级是分散为一些个别集团的，所以就容易被政府“打败”。

第四、因为我们的起义所采取的是防御政策而不是进攻政策。政府自己激起了十二月起义,政府自己向我们进攻,它有自己的计划，而我们在应付政府的这种进攻时却是没有准备的，我们没有周密◇247◇的计划，我们不得不采取自卫政策，于是我们就做了事变的尾巴。假

使莫斯科民众一开始就选定进攻政策，那末他们就会立刻占领尼古拉车站，政府就无法从彼得堡调遣军队到莫斯科。这样，莫斯科的起义就会坚持得比较久，因而就会使其他城市也受到相当的影响。关于拉脱维亚人的起义也应该这样说：假使他们一开始就采取进攻的手段，那末他们首先就会夺得大炮并会破坏政府当局的力量。

无怪乎马克思说：

“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马克思“历史随笔”第九十五页）

十二月起义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勇敢”和进攻政策。

有人会向我们说：十二月“失败”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你们忘记了，在十二月，农民没有能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也是十二月退却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十足的真理！我们也并不打算忘记这一点。然而农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原因何在呢？有人会向我们说：由于没有觉悟。好吧，但我们应如何使农民有觉悟呢？散发小册子吗？这当然是不够的！那又怎么办呢？要斗争，◇248◇要吸引他们参加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我们要领导他们。今天城市负有领导乡村的使命，工人负有领导农民的使命，如果城市的起义没有组织好，那末农民在这方面是决不会跟着先进无产阶级走的。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应当如何对待武装起义，应当向党员同志提

出什么口号。党在武装工作方面有很多缺点，党的这一工作至今无人过问，——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说：**要武装起来**，要加紧注意武装工作，以便多少有准备地迎接必将到来的发动。

其次，党在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多缺点，它对扩大红色队伍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说：**要建立红色队伍，要在人民中间传播军事知识**，要加紧注意组织红色队伍，以便今后用武器去夺取武器并扩大起义。

再其次，无产阶级是在分散状态下迎接十二月起义的，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组织起义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提出口号，使党大力把战斗分子团结起来，按照统一计划把他们发动起来，积极组织武装起义。

再其次，无产阶级在武装起义中至今都是采取防御政策，从来也没有走上进攻的道路，而这种情况也就妨碍了起义的胜利，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员同志指出：起义胜利的时机已经迫近，**必须转入进攻政策**。

代表大会究竟怎样做的，它向党提供了些什么口号呢？◇249◇

代表大会说：“……目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革命，其办法就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以及在军队中扩大和加强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应当经常以参预全国一切政治生活来吸引他们参加积极反对政府的斗争……”党“不能承担会引起幻想的武装人民的义务，党的任务应限制于协助居民自我武装并进行组织和武装战斗队的工作……”“党必须反对一切引诱无产阶级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武装冲突的企图……”以及其他等等（见代表大会决议）。

这样说来，**今天，在目前**，当我们正处于人民新发动的前夜，**为了起义胜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鼓动工作**，而武装和组织红色队伍的工作却是一种不关紧要的事情，我们不应热中于这种事情，我们应把

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限制于”“协助”。关于我们必须组织起义而不应零碎地举行起义的问题，关于我们必须采取进攻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话），——关于这一切，代表大会竟只字未提。显然，这些问题对它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证明，必须武装起来和竭力巩固红色队伍；代表大会却回答说：不应太热中于武装和组织红色队伍的工作，要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限制一下”，因为最主要的事情是鼓动工怍。

这样说来，彷佛我们在这以前已十分关心武装工作，已武装了大批同志和组织了很多部队，而只是忽略了鼓动工作，——所以代表大会教训我们说：已经武装得够了，不要再去操心了，进行鼓动工作才是主要任务！

当然，鼓动工作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党的主要武器之一，可是鼓动工作难道会决定当前起义的胜◇250◇利吗？如果四年以前，当起义问题还没有提到我们日程上来的时候，代表大会说出这些话，那还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当我们已处在武装起义的前夜，当起义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当它不顾并违反我们的意志而开始的时候，鼓动工作“主要地”又能发生什么作用呢，凭这种“鼓动”又能做出什么事情呢？

再则，假定我们已扩大了鼓动工作，假定人民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又怎么办呢？人民没有武器怎能进行战斗呢？难道赤手空拳的人民的鲜血没有流够吗？并且，如果人民不会使用武器，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红色队伍，那末给他们武器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人会向我们说：我们并不拒绝从事武装工作和组织红色队伍呀。就假定是这样，但是你们若不充分注意，你们若不过问这一工作，那末事实上就等于你们拒绝这一工作了。

我们且不去说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谈到**组织**起义和**进攻**政策的问题。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比实际生活落后了四五

年，在代表大会看来，起义问题仍然是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说：“……在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应当加紧注意**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实际经验，**注意**以军事观点批判它并吸取直接的教训以供将来参考”，“应当**更加努力**扩充战斗队，改善它们的组织并供给它们各种武器。同时经验证明,不但应当组织党员战斗队,而且应当组织接近党的和完全非党的战斗队……”“由于日益增长的农民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可能爆发为整个的起义，我们最好是努力**把工人**◇251◇**和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以便尽可能组织共同的和同时的战斗发动……**”所以，“由于新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和尖锐化，**从武装斗争的防御形式过渡到进攻形式**已有可能”……必须同士兵一起“……**以最坚决的进攻行动反对政府……**”等等（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却被代表大会否定了。

由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么热烈的欢迎（见“我们的生活报”第四三二期），因为他们懂得：**这些决议**比目前革命落后了好几年，这些决议完全没有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按照**这些决议**去做，无产阶级势必变成自由派的附属品，而不会变成独立的力量，——他们了解了这一切，所以才大为称赞这些决议。

党员同志的任务，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适时加以相当的修改。

当我们着手写这本小册子时，我们所注意的正是这个任务。

诚然，我们在这里只谈到两个决议：“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但是毫无疑义，这两个决议是最确实地表明代表大会的策略立场的基本决议。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即问题在党内是这样提出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目前革命中的领导者呢，还是应当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我们知道，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为转移。◇252◇

因此，同志们必须更仔细地估量这两个立场的实质。

按“无产阶级报社”一九〇六年发行的小册子原文刊印
署名：科同志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53◇

阶　级　斗　争

只有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动摇资产阶级的联盟。

——马克思

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都可看到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封建主、中等封建主和小封建主，帮工、杂工和熟练产业工人，高级僧侣、中级僧侣和低级僧侣，大官僚、中等官僚和小官僚，各种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的集团，——这就是我们生活所呈现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

但同时也很明显，生活愈是向前发展，这个复杂生活也就愈加明显地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趋向，这个复杂生活也就愈加突出地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资本家阵营和无产者阵营。一月经济罢工（一九〇五年）清楚地显示出，俄国的确分为两个阵营了。彼得堡的十一月罢工（一九〇五年）和全俄国六、七两月的罢工（一九〇六年）使两个阵营的领袖发生了冲突，因而彻底揭露了现代的阶级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阵营就没有打瞌睡，这个阵营里在热烈地不断地进行着准备工作：建立资本家地方联合会，地方联合会结成区域联合会，区域联合会结成全俄联合会，创办基金会和机关刊物，召开全◇255◇俄资本家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可见资本家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以便制服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无产者阵营也没有打瞌睡。这里也在热烈地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斗争。不管反动势力怎样迫害，这里也在建立地方工会，地方工会结成区域工会，设立职工基金会，增办职工会刊物，召开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可见无产者也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以便制服剥削势力。

曾经有一个时期，生活中弥漫着一片“宁静”的气氛。当时这些阶级及其阶级组织还看不出来。当时固然也有过斗争，但这种斗争只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阶级性的：资本家们没有自己的联合会，所以他们每个人只有靠本身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工人也没有自己的工会，所以每个工厂的工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诚然，各个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曾领导过工人的经济斗争，但大家都认为这种领导是薄弱的，带偶然性的，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党组织甚至连党内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

一月经济罢工是个转折点。当时资本家手忙脚乱，于是就着手组织地方联合会。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联合会的组织就是由一月罢工促成的。至于石油业、锰矿业、煤炭业和糖业的资本家，则把自己原有的“和平的”联合会变成了“斗争的”联合会，并开始巩固自己的阵地。但是资本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决定成立全俄联合会，于是在一九〇五年三月由莫罗佐夫发起，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俄资本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成立了◇256◇协定，保证不经彼此协议不得对工人让步，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则宣布**同盟歇业**[①]。从这时起，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剧烈斗争就开始了。从这时起，俄国大规模的同盟歇业时期就开始了。严重的斗争需要有严密的联合会，所以资本家决定再次集会，以便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会。于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三个月（一九〇五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资本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再次确认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再次承认了同盟歇业的必要性，选出了一个常务局负责起草章程和筹备召开下届

——————————————

① **同盟歇业**是厂主的罢业。厂主为了打破工人的反抗和拒绝工人的要求而故意关闭工厂。——著者注

代表大会。与此同时，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已付诸实施了。事实证明，资本家是准确地执行这些决议的。如果回忆一下里加、华沙、敖德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的资本家所宣布的同盟歇业，如果回忆一下十一月间彼得堡的七十二个资本家以残酷的同盟歇业手段来威吓彼得堡二十万工人的事实，——那末就容易了解，全俄资本家联合会已是一支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是多么准确地执行自己的联合会的决议。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资本家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一月），最后在今年四月间又举行了全俄资本家联合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通过了统一的章程并选出了中央常务局。据报上消息，这个章程已由政府批准了。

由此可见，俄国大资产阶级无疑地已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了，它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区域组织和中央组织，它可以按照统一的计划使全俄国的资本家行动起来。◇257◇

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这就是资本家总联合会的目的。

同时，工人的工会运动也增长和发展起来了。一月经济罢工（一九〇五年）在这方面也发生了影响。运动已具有群众性，它的要求扩大了。以后的事实说明，社会民主党组织不能同时既做党的工作又做工会工作。党和工会需要有适当的分工。党的工作必须由党组织领导，工会工作则由工会领导。于是开始组织工会。在莫斯科、彼得堡、华沙、敖德萨、里加、哈尔科夫、梯弗里斯——到处都成立了工会。固然，反动势力对此多方阻挠，然而运动本身的需要毕竟占了上风，工会日益增多了。随着地方工会的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区域的工会，最后在去年九月间召开了全俄工会代表会议。这是工会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它使各个城市的工会彼此接近起来，而且终于选出了中央常务局去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十月大罢工的时期到来了，于是工会组织大大加强起来。地方工会和区域

工会日益发展。固然“十二月的失败”明显地阻碍了工会的建立，但是工会运动以后又恢复起来，并且进行得很顺利，到今年二月就召开了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其成分比第一次代表会议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第二次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地方的、区域的和全俄的中心机关，选出了“筹备委员会”负责召集即将举行的全俄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有关工会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决议。

由此可见，不管反动势力怎样嚣张，无产阶级无疑地也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它在不倦地巩固自己地方的、区域的和中央的工会组织,并且在不倦地努力把自己无数的弟兄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258◇

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改善劳动条件，制服剥削势力和破坏资本家联合会，——这就是工会的目的。

现代社会就这样分裂成两大阵营，每一阵营都组成单独的阶级，它们之间炽烈的阶级斗争在日益加深和加剧，其余一切集团都集合在这两个阵营的周围。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资本家有其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他们的经济组织就是专为保证这些利益而存在的。但是，除了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为了这种共同利益,他们需要进行政治斗争和成立政党。俄国资本家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看见了唯一“公开大胆”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党是**十月党**，所以就决定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并服从它的思想领导。从那时起，资本家就在这个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利用这个党来影响现在的政府（这个政府封闭工会，但同时却急忙地批准资本家联合会的成立），把它的候选人选进杜马，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依靠联合会进行经济斗争，在十月党的思想领导下进

行总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另一方面，现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无产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的利益，就建立工会来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等。但是，除了职业的利益以外，无产者还有共◇259◇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无产阶级作为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还没有夺到政治统治时，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这里无产阶级既需要政治斗争，也需要一个能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实行思想领导的政党。当然，工会大半是非党的和中立的组织。但这不过说明，它们只是财务上和组织上不依靠党，就是说，它们有自己的基金会，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在形式上不必服从某一政党的决定。至于工会在思想上依靠某一政党，那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工会的有各政党的党员，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政见带进工会里去。很明显，既然无产阶级不能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它也就不能没有某个政党的思想领导。不但如此，无产阶级自己还必须寻找一个足以引导它的工会走上“乐土”即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党。然而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应当随时警惕，谨慎从事。它应当细心研究各个政党的思想内容，不受约束地接受一个能勇敢地彻底地保护它的阶级利益、能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并大胆地把它引向政治统治、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思想领导。

到目前为止，这种使命都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担负的，所以工会的任务就是接受这个党的思想领导。

大家知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依靠工会来进行经济搏斗，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政治冲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260◇

毫无疑义，阶级斗争将更加剧烈。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斗争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斗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工会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一定能大有帮助。为了使无产阶级组成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而是工会代表大会。同时无产阶级应当把那个能对它的阶级斗争实现思想政治领导的党竭力巩固和加强起来。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新时代报”[79]创刊号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61◇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

（关于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

有一个时期，我国工人运动是处于开始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分成各个集团，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共同的斗争。铁路工人、矿山工人、工厂工人、手工业者、店员、办事员，——这就是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所分成的那些集团。此外，每个集团的工人又分散在各个市镇，他们彼此没有任何联系，既没有党的联系，也没有工会的联系。这样一来，就看不出无产阶级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因而也看不出无产阶级斗争是整个阶级的进攻。这就说明为什么沙皇政府能安然地继续其“祖传”的政策。这就说明为什么当一八九三年有人把“工人保险法草案”提交国家参议院讨论时，反动派的主谋人坡别多诺斯采夫就嘲笑该草案起草人，并神气十足地宣称：“先生们，何苦自找麻烦，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这里并不存在着工人问题……**”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经济危机愈益迫近，罢工更为频繁，分散的无产阶级也就逐渐组成统一的阶级了。一九〇三年的罢工已经表明：“我们这里”早就“存在着工人问题”。一九〇五年一、二两月的◇263◇罢工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正在成长和壮大。最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的总罢工和一九〇六年六、七两月的“照例的”罢工，事实上已使各城市的无产者互相接近，事实上已把店员、办事员、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阶级。这样就向全世界大声宣告：先前分散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已走上团结的道路，并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了。作为反对现存制度的无产阶级总斗争手段的政治总罢工，在这里也同样显示了力量……现在已无法否认“工人问题”的存在，沙皇政府已不得不重视这个运

动了。于是在反动分子的办公室里开始成立各种委员会，制定“工厂法”草案：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80]、柯柯甫采夫委员会[81]、结社法[82]（见十月十七日“宣言”）、维特—杜尔诺沃训令[83]、各种草案和计划以及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关于手工业者和店员的两项法令。

当运动还是软弱无力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带群众性的时候，反动派对付无产阶级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监狱、西伯利亚、皮鞭和绞架。反动派随时随地都力求达到一个目的：把无产阶级分裂成许多小小的集团，击破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胁迫中立的群众并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去，从而引起无产阶级阵营内的混乱。我们看见，反动派靠着皮鞭和监狱曾经极顺利地达到过这个目的。

但是当运动带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反动派所碰到的已不只是一些“祸首”，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已是具有浩大革命声势的不可胜数的群众了。所以他们应当重视的正是这种群众。而群众是不能尽行绞杀、尽行流放到西伯利亚、尽行投入监狱去的。用皮鞭抽打群众，对那基◇264◇础早已动摇的反动派并不总是有利的，很明显，除了旧的手段以外，还必须采取新的“较文明的”手段。在反动派看来，这种新手段会加深无产阶级阵营中的意见分歧引起落后工人的幻想，迫使他们放弃斗争并把他们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工厂立法”正是这样一种新手段。

这样，沙皇政府既不放弃旧的手段，同时又想利用“工厂立法”，就是说，想依靠皮鞭和法令来解决“迫切的工人问题”。它想用各种诺言，如缩短工作日，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改善卫生条件，施行工人保险，废除罚款制以及诸如此类的福利的诺言，来博得落后工人的信任，从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沙皇政府清楚地知道，这种“活动”对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因为在目前，十月总罢工已把各部门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摧毁了反动势力的根基，将来的总罢工可能变成武装斗争而把旧制度推翻，所以反动派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

在工人阵营中造成混乱，赢得落后工人的信任并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去。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反动派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法令只照顾**店员和手工业者**，而同时却把产业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子弟投入监狱和拖上绞架。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也就不会觉得奇怪。第一、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业机关职员并不像产业工人那样集中在大工厂里，他们分散在各个小企业中，觉悟程度较低，因而他们比别人容易受骗。第二、店员、办事员和手工业者在现时俄国的无产阶级中占相当大的数量，所以他们要是离开了战斗的无产者队伍，就会大大削弱无产阶级在目◇265◇ 前选举中和将来发动时的力量。最后，大家知道，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小的；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必须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化；大家同样知道，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比其余的无产者更接近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最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很明显，店员和手工业者离开无产阶级，就会使小资产阶级也离开无产阶级，并使无产阶级在城市中陷于孤立，而这正是沙皇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就可明白，反动派制定只涉及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的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命，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至于产业无产阶级，反正是不信任政府的，“工厂立法”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也许只有枪弹才能开导他们。法令办不到的事情，就得由枪弹来弥补！……

沙皇政府就是这样想的。

但是，不仅我国政府是这样想的，其他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封建专制的也罢，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也罢，资产阶级共和制的也罢，——也是这样想的。到处都利用枪弹和法令来和无产阶级作斗争，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爆发以前，在社会主义没有建立以前，情形总是这样的。请回忆一下立宪制的英国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五年的情形吧。那时一面在制定罢工自由法，一面监狱里却

关满了罢工的工人。请回忆一下共和制的法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情形吧。那时一面在谈论“工厂立法”，一面巴黎街头都洒遍了工人的鲜血。回忆一下这些事实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实，你们就会知道，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利用此类法令。反动派颁布“工厂法”时，固然有自己的计划，——◇266◇他们想压制无产阶级，但是实际生活却步步破坏他们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文夹进法令中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一项“工厂法”的出现，都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斗争的；在工人还没有起来斗争以前，在政府还没有感到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决不会颁布任何“工厂法”。历史表明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局部罢工或总罢工。一八八二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童工雇佣制、童工工作时间和施行工厂监督的法令）是同年在纳尔瓦、皮尔姆、彼得堡、日拉尔多夫发生罢工以后颁布的。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月颁布的几项法令（关于罚款、工资计算簿等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中部地区罢工的直接结果。一八九七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缩短工作日）是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间彼得堡罢工以后颁布的。一九〇三年的法令（关于“企业主责任”和“厂内工头”的法命）都是同年“南方罢工”的直接结果。最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关于缩短工作日以及关于店员、办事员和手工业者星期日休息的法令）也是本年俄国各地六、七两月罢工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群众运动，群众终于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即使不是全部的满足，至少也是部分的满足。因此非常明显，无论“工厂法”怎样坏，其中总有一些条文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斗争。不用证明，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些条文，利用它们作工具来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比先前更有力地发动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倍倍尔说得对：“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267◇

在这方面，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都很值得注意。当然那里面有很多坏的条文，但同时也有一些是反动派不自觉地列入而无产阶级应**自觉地**加以利用的条文。

例如这两项法令虽然都叫做“劳动保护法”，但里面列入了一些根本否定任何“劳动保护”、甚至连某些地方的老板也不屑利用的坏透了的条文。虽然有很多地方已经废除十二小时工作制而实行了十小时或八小时工作制，但这两项法令却规定商业和手工业部门施行十二小时工作制。虽然几乎到处都已废除任何额外加工制，但这两项法令却承认商店可以在四十天内、工厂可以在六十天内每天额外加工两小时（十四小时工作制）。同时还承认老板有权根据“和工人达成的协议”，即用强制工人的办法延长额外工作时间，把工作日延长到十七小时等等。

当然，无产阶级是丝毫也不会把已经争得的权利让给老板的，所以上述法命中所说的废话，始终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废话罢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条文，无产阶级可以好好地利用来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两项法令都说，凡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地方**必须给工作者两小时午餐的时间**，然而大家知道，现在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并不是到处都可享受两小时的休息的。这两项法令同时还说，**凡十七岁以下的青年除这两小时外，还有权每天离开商店或工厂三小时去上学**。这对于我们的青年同志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方便……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一定会好好地利用十一月十五日法令中的这种条文，一定会好好地加强自◇268◇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
“新时代报”第四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69◇

沙俄警察局档案中的斯大林入狱资料

1906 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斯大林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84]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决不能认为自由主义是什么不可分割的整体：它适应着资产阶级中各个不同的阶层而分为各种不同的派别。

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也包含各种不同的派别。

我们暂且不在本文内研讨自由主义，最好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只想把社会主义及其各个派别向读者介绍一下。在我们看来，这对读者是更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分成三个主要派别：**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改良主义（伯恩施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几篇阐述社会主义内容的论◇271◇文里研究它是毫无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它们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派别，它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们都力图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把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当然对读者的意义要大得多。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一听见有人提到“无政府主义”就轻蔑地转

过身去，把手一挥说：“你们何必理睬它，它是连谈都不值得一谈的！”我们认为这种没有价值的“批评”既不庄重，又无益处。

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说，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群众，因而并不怎样危险”。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而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根据是应当加以证明的。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只有策略上的分歧，所以在这些人看来，把这两个派别互相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也就承认对真正的敌人要进行真正的斗争。因此，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从头到尾审察一下，并从各方面把它彻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272◇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互相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我们这几篇论文的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加以对照，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加以比较，从而阐明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这几篇论文的梗概。

我们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开始，附带涉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然后再来批评无政府主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将首先说明辩证方法，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方法的看法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唯物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这里也将讲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专政、最低纲领并一般地讲到策略）；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和组织；最后则提出我们的结论。

我们将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是小村社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也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也要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273◇

现在我们就来讲本题吧。

一　辩证方法

> 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 生活在变化着，
> 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
>
>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阐明辩证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个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而**理论**是唯物的。

什么是辩证方法呢？

有人说，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274◇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民粹派硬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民粹派说：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占大多数，而且他们的生活又穷◇275◇又苦。

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是的，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目前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是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小资产阶级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成长壮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体和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另一方面，很明显，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流浪汉”比小资产阶级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阶级今天占大多数，或者哪一个阶级穷些，而在于哪一个阶级在壮大，哪一个阶级在解体。

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唯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末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现时运动中的主力，应该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回答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把社会生活看成停滞不前的东西。

辩证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发展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间”的运动，那时无产阶级挺起胸来，◇276◇袭击军械库，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须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

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

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自然界也有这样的过程。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277◇

至于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十分详尽地阐明了的各种事实，我们就不谈了。

辩证方法的内容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看辩证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辩证方法的创始人是黑格尔。马克思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当然，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们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骂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拚命“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赞美专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见“号召报”[85]第六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证明”这一点（见他用俄文发表的“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我们的克鲁泡特金派，从车尔凯兹施维里一直到沙·哥·都异口同声地附和克鲁泡特金（见“号召报”）。

其实，谁也不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比谁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书中证明过：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和人民专制根本矛盾的。虽然如此，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证明”并且认为必须每天“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278◇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读者觉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厌恶的”和非科学的吧。

无政府主义者想用这种手段来驳倒辩证方法。

我们说：他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们的进化论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　为什么不能承认黑格尔虽是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黑格尔创造出了叫做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这一事实呢？

不，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继续讲下去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他们既然“想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想把哲学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所以他们就驳斥辩证方法了（见“号召报”第三期和第九期沙·哥·的论文。又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咳，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真是“嫁祸于人”。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对一切◇279◇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后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86]

形而上学向我们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形而上学者蒲鲁东的格鲁吉亚的门徒却一味向我们重复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承认各种含糊不清的教条，例如所谓“不可认识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无内容的神学。与蒲鲁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方法来反对这些教条（见“费尔巴哈论”）。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斯宾塞的门徒向我们说：蒲鲁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骗自己，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混为◇280◇一谈。

不用说，以永恒观念为依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彻头彻尾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同样很明显，否定任何永恒观念的黑格尔辩证**方法**却彻头

彻尾是**科学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给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时又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认为他的辩证方法“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低头，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的跋）。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可能在这两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辩证**方法**当做主要东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可能持最极端的反对立场。”（见“费尔巴哈论”）

无政府主义者看不出这种区别，却一味轻率地重复说：“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我们再往下讲吧。无政府主义者说：辩证方法是“诡计”、“诡辩方法”、“逻辑的翻筋斗”（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方法能同样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初看起来，也许觉得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不无根据。现在请听听恩格斯论到形而上学方法信奉者的时候所说的话吧；◇282◇

“……他们的说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决不能同时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互相排斥的……”（见“反杜林论”引言）

无政府主义者狂叫道：怎么能够这样呢！难道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吗？这是“诡辩”呵，这是“玩弄字眼”呵，这就是说，“你们想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们且思索一下问题的本质吧。

今天我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能不能说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好或是在各方面都坏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共和国只有从一方面看，即当它破坏封建制度的时候，才是好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即当它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却是坏的。因此我们说：民主共和国既然破坏封建制度，所以它是好的，我们就要为它而奋斗；但是民主共和国既然巩固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它是坏的，我们就要和它作斗争。

由此可见，同一个民主共和国同时既“好”又“坏”，既“是”又“非”。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这样说，它在同一时候既然加强无产阶级，所以是“好的”；既然巩固雇佣劳动制度，所以又是“坏的”。

恩格斯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来描述辩证方法特征的时候，正是指这样的**事实**。◇282◇

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诡辩”。

无政府主义者看见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见沙子，——这是他们的权利。但这和辩证方法有什么关系呢，辩证方法和无政府主义相反，不是闭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并且直率地说：既然生活总在变化，总在运动，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现象都有两种趋势，即肯定的趋势和否定的趋势；我们应当维护前一种趋势，反对后一种趋势。

我们再往下说吧。在我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首先是过去的一切消灭干净，然后是将来的一切另行确立起来…… 居维叶的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则是由辩证法产生的”（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同一个作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见“号召报”第六期）

请注意一下！

居维叶否认达尔文的进化，只承认激变，而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发**。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因而是**排斥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否认居维叶的激变，承认逐渐的进化。于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居维叶的激变**。◇283◇

一句话，无政府主义者一面责备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同时又指摘他们附和达尔文而不附和居维叶。

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①]！显然，“号召报”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记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说的话。

究竟哪一期说得对：是第八期还是第六期呢？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但是，“不论哪种社会形态，当从它这里获得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87]

如果把马克思这个论点应用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会**性的现代生产力和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一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的（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

————————————

① 引自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市长对赫列斯塔科夫说的话。——译者注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284◇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很明显，居维叶的激变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

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这样，“号召报”在前后两种场合，即无论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弄错了。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责备我们说，“辩证法……并不使人有可能翻来翻去、跳蹦自如”（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可敬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这完全是真话，诸位在这里说得十分对，辩证方法确实不使人有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使人有这种可能呢？因为“翻来翻去、跳蹦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辩证方法是供人使用的。

秘密就在这里！……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辩证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他们虚构了自己的辩证法，并且正是这样无情地和自己的这套辩证法进行斗争。

我们瞧见这种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为看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幻想

作斗争，粉碎自己的虚构，同时◇285◇却竭力要别人相信他在打击敌人，这是不能不令人发笑的。

二　唯物主义理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
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

我们已经认识了辩证方法。

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呢？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生活中一切都在发展，但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发展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呢？

例如我们知道，地球原来是炽热的熔浆，后来逐渐冷却，然后生出植物和动物，随着动物界的进化出现了一种猿猴，最后才出现了人类。

一般说来，自然界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同时我们又知道，社会生活也不是停滞不前的。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靠原始的狩猎维持生存，出没于森林，寻找食物。后来原始共产主义为母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286◇靠原始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接着母权制为父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靠牧畜业维持生存。然后父权制为奴隶制所代替，这时人们已靠较为发达的农业来维持生存了。在奴隶制度之后出现了农奴制度，最后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制度。

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是的，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但这种发展的经过是**怎样**的，是意识引起“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呢，或者相反，是“自然”和

“社会”的发展引起意识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有些人说，在“自然”和“社会生活”出现以前就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它们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发展的外在形式或简单表现。

例如**唯心主义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唯心主义者分成了几派。

另外一些人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否定的力量：观念和物质，意识和存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互相否定，彼此斗争，所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

例如**二元论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二元论者也像唯心主义者一样分成了几派。

唯物主义的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287◇

当然，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方面和物质的方面是同一个自然或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决不能把它们看做不相依存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

由此看来，所谓二元论是没有根据的。

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就是如此。

同时，唯物主义理论也否定唯心主义。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彷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

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288◇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自然发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谓唯心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应该这样说。

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有一个时期，人们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和自然作斗争，当时他们的所有制也是共产主义的，因而他们几乎不分“我的”和“你的”，他们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后来生产中浸透了“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分别，于是所有制也就具有了私有性，即个人主义的性质，人们的意识中也就浸透了私有感。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生产又具有社会性，因而所有制也将很快地具有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意识也就逐渐浸透着社会主义思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

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换句话◇289◇说，这个鞋匠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已经**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没有消失，他的意识落后于他的实际地位。

很明显，就是在这里，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人们的地位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意识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我们还是回头讲我们那位鞋匠吧。我们已经知道，他打算积些钱，再开自己的鞋铺。这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鞋匠工作了一个时期就感觉到积些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领到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而且他又看到开个铺子并不是那样吸引人：要付房租、顾客刁难、手头无钱、大厂主的竞争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麻烦，——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而无产者可以少操这种心，既没有顾客的麻烦，也不必担心房租，早晨去上工，晚间“安心地”下工，星期六也同样安心地把“工钱”装进口袋。我们这位鞋匠的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就在这里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意向。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这位鞋匠觉察到：领到手的钱连买最必需的东西也不够，增加工资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发现他的工友们在谈论着什么工会和罢工。我们这位鞋匠在这里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和厂主作斗争，而不是开自己的鞋铺。他加入工会，参加罢工运动，并且很快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

这样，鞋匠的意识终于随着他的物质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了：首先是他的物质地位发生了变化，然◇289◇后经过一些时间，他的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关于各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也必须这样说。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彷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像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290◇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另一方面，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彷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萧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

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①]，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产生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东西）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

有人会向我们说：很好，这就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说来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所谓外部条件是否实际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们关于这些外部条件的观念呢？如果外部条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觉和认识它们的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唯物主义理论说道：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使我们的“我”发生印象的外部条件存在的缘故。谁要是轻率地断定说，除了我们的观念以外什么都不存在，谁就不得不否认任何外部条件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其余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认自“我”的存在，但这种◇292◇观点是荒诞无稽而和科学原理根本矛盾的。

显然，外部条件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条件存在于我们未生之前，也将存在于我们已死之后，并且它们愈是频繁而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愈能容易地感受和认识它们。

至于**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们应当指出，这里也是简略地重复着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形。在这种场合，我们身外的对象也是先于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观念即形式也落后于对象，即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我望着树，就看见了树，这只是表明，在我

————————————————

① 这并不与认为形式和内容间存在着冲突的意见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冲突不是存在于一般内容和形式之间，而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著者注

的头脑中还没有产生树的观念以前，树本身就已存在，树使我产生了相应的观念……

扼要说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就是如此。

不难了解，唯物主义理论对于人们的实际活动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既然**首先**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然后**是人们的意识相应地发生变化，那就很明显，我们要探求某种理想的根据，就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不应当在他们的幻想中去探求，而应当在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去探求。只有依据对经济条件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理想才是好的，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切不顾及经济条件、不以经济条件的发展为依据的理想都是坏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既然人们的意识、人们的风俗习惯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293◇决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以下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人是从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习惯于养成人的特性…… 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由于有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惩罚个别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应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见“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马克思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88]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　　*　　*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辩证方法导源于黑格尔，那末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利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缺陷来糟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方法，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294◇己的愚昧无知罢了。关于他们对费尔巴哈和对唯物主义理论的攻击也必须这样说。

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刚愎自用地向我们说：“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见“号召报”第七期杰连吉的论文）“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似乎马克思由此作出了结论：“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诚然，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时还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这是谁也不怀疑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认为必须把已经揭露的错误再“揭露”一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们想在痛骂费尔巴哈的时候，间接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也糟蹋一番。当然，我们要是大公无私地观察问题，那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费尔巴哈除了有不正确的思想外，还有一些正确的思想，正如历史上的许多学者那样。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继续“揭露”……

我们再一次声明：他们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罢了。

很有趣的一点（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看到）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理论毫无认识，竟想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因此他们往往互

相矛盾，互相驳斥，这当然就使我们的“批评家”陷于可笑的境地。例如，假若听信车尔凯兹施维里先生的话，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恶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论的了。他说：

“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具有进化论体系、变迁说和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科学，即**恩格斯极其**◇295◇**憎恶**的科学…… 是避开了辩证法的”等等（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说来，车尔凯兹施维里所赞同而为恩格斯所“憎恶”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值得赞同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却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显然是不值得承认的。

但是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应该摈弃的。他说：

“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黑格尔隔代遗传的东西。一般地说，绝对客观主义的一元论唯物主义，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经济一元论，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这样说来，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憎恶它，恰恰相反，他们自己就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者，因此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应该摈弃的。

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你去分辨一下看，谁说得对，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彼此之间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优点或缺点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自己还不懂得这个唯物主义是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比较可以接受的是庸俗唯物主义还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就大吹大擂地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粉碎了！◇296◇

是的，是的，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今后还是这样彼此拚命粉碎对方的观点，那末不用说，未来是要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了……

另一件同样可笑的事实就是某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大名鼎鼎”，但对于科学中各种不同的派别还没有初步的认识。他们原来不知道科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彼此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有否认观念方面的意义及其对物质方面的影响的庸俗唯物主义，也有科学地考察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相互关系的所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无政府主义者把这种种不同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甚至看不见它们之间有显着的差别，同时却又神气十足地声称：我们让科学复活起来了！

例如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自信地宣称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以“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为根据的，但是他却没有用片纸只字来说明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究竟根据哪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是根据庸俗的或一元论的，还是其他的什么“唯物主义哲学”。他大概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派别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他不了解把这些派别混为一谈并不是“让科学复活起来”，而是表现出十足的愚昧无知（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

关于格鲁吉亚的那些克鲁泡特金信徒也必须这样说。请听吧：

“在恩格斯看来，以及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也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学说。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凡认为社会机构彷佛是◇297◇受地理条件、气候和地球转动条件、宇宙条件、人类进化条件和生物条件推动的历史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全是唯物主义者**”（见“号召报”第二期）。

这样说来，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之间，或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摩莱萧特的“唯物主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了！这算什么批评！具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居然

也想来革新科学！俗语说得好：“皮匠做肉包，真是糟糕！……”

其次，我们那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填胃的理论”，于是责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这个公式迷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是生产关系……”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就用哲学家的口吻教训我们说：“如果**吃饭**和经济生产是达到这个目的（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错了…… 如果**思想体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饭**和经济地位**来决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会是天才人物了。”（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你看，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驳倒，原来多么容易呵。只须从某个贵族女学生那里听到一些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谈巷议，只须用哲学家的武断的口吻把这些街谈巷议在什么“号召报”上重复一下，就能马上博得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头衔了！

但是，请诸位先生告诉我们吧：究竟何时、何地、在哪个行星上，有哪个马克思说过“**吃饭决定思**◇298◇**想体系**”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话或一个字来证实你们这种论调呢？诚然，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思想，可是谁向你们说过吃饭和经济地位是同一种东西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像**吃饭**这样的生理现象是和人们经济**地位**这种社会现象根本不同的吗？要是有某个贵族女学生把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摧毁者”和“科学的复活者”，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地重复着贵族女学生的错误呢？

而且吃饭又怎能决定社会思想体系呢？请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所说的话吧：吃饭和吃饭的形式是不变的，人们吃饭、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样的，而思想体系始终在变化。例如古代的思想体系、封建

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几种形式。难道可以设想**不变的东西**能决定**经常变化的东西**吗？

我们再往下讲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平行主义……”或者说：“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论，是因为他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虽然存在但**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第一、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是和糊涂的平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物质方面（内容）**必然先于**观念方面（形式）。平行主义却驳斥这个观点并坚决宣称物质方面和观念方面**没有先后之分**，它们两者是一道地、平行地发展的。◇299◇

第二、即使实际上“马克思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难道这就表明马克思是二元论者吗？大家知道，二元论者是把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而认为它们有**同等**意义的。但是，如果据你们所说马克思是偏重物质方面而把观念方面看做没有意义的“空想”，那末你们这班“批评家”先生们又是从哪里弄出马克思的二元论来的呢？

第三、连小孩子也知道一元论从**一个原则**出发，即从具有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自然或存在这个原则出发，而二元论则从**两个原则**出发，即从物质和观念这两个按二元论说来是互相否定的原则出发，那末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又能有什么联系呢？

第四、马克思什么时候“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空想和幻想”呢？的确，马克思会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人们的意向和意志”，并且把某些书呆子的不适合于经济环境的意向叫做空想。难道这能表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意向一般地是空想吗？难道这还需要说明吗？真的你

们不知道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即一般说来，人类并不追求空想的目的。很明显，我们这位“批评家”不是不了解他自己所说的话，就是有意歪曲事实。

第五、谁告诉你们说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意向和意志是没有意义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指明他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一点呢？难道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及其他小册子中没有说过“意向和意志”的意义吗？如果马克思不承认“意向和意志”◇300◇的意义，那他为什么又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发展无产者的“意志和意向”，他为什么又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宣传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间发表的一些著名论文中说的不是“意志和意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诚然，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志和意向”是从经济地位中吸取本身的内容，然而，难道这就是说“意志和意向”丝毫不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吗？难道无政府主义者真是这样难于了解这一简单的意思吗？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责难”说：“不能想像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说“形式**跟随着**内容(落后于内容。——柯注)……它们‘同时并存’…… 否则一元论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见“号召报”创刊号沙·哥·的论文）。

我们这位“学者”又有点糊涂了。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没有了解这一点，这当然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不能怪唯物主义的理论。

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叫做观点的话，那末他

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就是如此。◇301◇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①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认识了他的**方法**，也认识了他的**理论**。

我们从这个学说中应当作出什么实际结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呢？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然而，服务和服务各有不同。伯恩施坦要无产阶级忘掉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克鲁泡特金向无产阶级提出分散的、没有广大工业基础的、村社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去争取以广阔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为依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服务。

我们应当怎样使我们的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应当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唯物主义理论说：一种理想，只有它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相矛盾，只有它完全适合于这个发展的要◇302◇求，才能对无产阶级有直接的帮助。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具有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根本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

———————————————

①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条件”的问题请参阅“著者第一卷序言”。文中说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本书制作者注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这就是说，鼓吹忘掉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学说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本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在一天天扩大，它不能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省份的范围内，它不断地打破这种范围而遍及全国。因此我们应当欢迎生意范围的扩大，承认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而是统一与不可分的全国的领域，这个领域将来当然会更加扩大起来。这就是说，把未来的社会主义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范围中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是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利益相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生活这一**主要**目的而奋斗，——我们就应当这样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很明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结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现代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阵营，一个是大多数人的即无产者的阵营。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彷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303◇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为什么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的正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自己呢？为什么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呢？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买卖原则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你们不仅能买消费品，买食品，并且也能买人们的劳动力，买他们的血汗和良心。资本家知道这一切，于是就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他们。而这就是说，资本

家成为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主人。无产者却失去支配这种已经卖出的劳动力的权利。就是说，由这种劳动力造成的东西已不归无产者所有，而只归资本家所有，只落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也许你们卖出的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值一百卢布的商品，但这和你们无关，不归你们所有，这只和资本家有关，归资本家所有；你们应得的只是你们一天的工资，这工资也许能满足你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你们要过得很俭省才行。简言之，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无产者，因此资本家也就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此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

但是，为什么是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呢？为什么是无产者被资本家雇佣，而不是资本家被无产者雇佣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因为工厂、土地、矿藏、森林、铁路、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是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304◇这一切。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厂开工必须雇佣无产者，否则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所以无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这一切都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质。第一、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是什么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它完全分散成各个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二、同样很明显，这种散漫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产出卖的商品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想多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尽量多生产商品，结果市场上商品充斥，物价下跌，普遍的危机就随之发生。

由此可见，危机、失业、生产中断、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无组织性的直接结果。

这种无组织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暂时还没有被摧毁，它之所以暂时还能坚强地抵抗无产阶级的攻击，首先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国家保卫它，有资本主义政府保卫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如此。

* * *

毫无疑义，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305◇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说，那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没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清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89]

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说道：

“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会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306◇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舘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90]

同时很明显，为了处理公共事务，社会主义社会除需要集中各种资料的地方局之外，还需要一个中央统计局来搜集有关全社会各种需要的资料，然后适当地把各种工作分配给劳动者。代表会议，特别是代表大会，也将是必要的；它们的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占少数的同志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没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细”工的差别，这时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一定大感困难，所以社会不得不**暂时**走上某一条中间道路。但同样很明显，当未来社会走上自己的轨道而资本◇307◇主义残余被连根铲除的时候，上述原则就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原则。

因此，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说道：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

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其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91]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情景就是如此。

这都很好。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以想像的吗？可以设想人们能铲除本身的“野蛮习惯”吗？

还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够得上这种需要吗？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记，在未来社会中，现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们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性；现在一个新的◇308◇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们的“情感”和观点吗？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呢？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学证明又在哪里呢？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要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

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309◇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　　*　　*

历史告诉我们说：凡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并掌握主要生产职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经过一些时候必然成为这种生产的主人。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而男子则出没于森林，寻找野兽。后来一个时期，即父权制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了。为什么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以戈矛、套绳、弓箭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牧畜经济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无产者开始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产职能都转入他们的手中，没有他们则生产一天也不能维持（且回忆一下总罢工吧），这时资本家不仅对生产无益，而且还妨碍了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或者是一切的社会生活都要完全遭到破坏，或者是无产阶级迟早一定会成为现代生产的主人，成为这种生产的唯一所有者，成为这种生产的社会主义所有者。◇310◇

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临终祈祷并确定地提出**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现代工业危机，使这个结论完全明显，并一目了然地揭露了资本家的寄生性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又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上，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义”上，并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热爱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学根据上。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

恩格斯还在一八七七年就说道：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根据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正义，认为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这里最主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力和由这生产方式造成的财富分配制度，已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惊人的矛盾，并且矛盾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想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的话，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对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根据这个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根据某个学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奠定的”（见“反杜林论”）[92]。

这当然不是说。既然资本主义已在腐朽，那只要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随时建立起来。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才这样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一切阶级的理想。这只◇311◇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对实现这一理想直接关心的并不是一切阶级，而只是无产阶级。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社会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然而社会主义可能还实现不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除这一切而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善于领导本身的事业。要获得这一切，又必须有所谓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一句话，就是必须有阶级斗争的自由。政治自由并不是到处都有同样保障的。因此，究竟无产阶级必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在专制的农奴制条件下（俄国）、君主立宪制条件下（德国）、大资产阶级共和国条件下（法国）还是在民主共和国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条件）进行斗争，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政治自由在民主共和国里有最好的和最完全的保障，自然只限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能够有的保障。因此，一切拥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都必须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它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桥梁”。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　　*　　*

要自觉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应当走什◇312◇么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不能靠和资产阶级妥协而达到社会主

义，它一定要走斗争的道路，而且这个斗争应当是阶级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应当依据的原则。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性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借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313◇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突然的、短促的打击，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群众用以击败资产阶级并夺取其阵地的长期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战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阶级冲**

突时期一个阶级的失败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应当采取的步骤。

这就是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战败时**，当它的财富还没有被没收时，无产阶级一定要拥有军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以便用它来打退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正如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时期曾有过的那样。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利用这种专政就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并没收整个资产阶级的土地、森林、工厂、机器、铁路等等。

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达到的结果。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就是如此。◇314◇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说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它应走的道路。

其余一切策略观点都是由这个总原则产生的。罢工、抵制、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只是在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　　*　　*

总之，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应当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来剥夺资产阶级。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必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使之不断地壮大起来。

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采取哪些形式呢？

最普遍的群众性的组织就是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产消费合作社）。工会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工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商业资本，用◇315◇减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工人的消费，这当然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论工会或合作社，作为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手段，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两种组织形式，巩固和加强它们，当然这要以现存政治条件所允许的程度而定。

然而，单有工会和合作社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这是因为上述组织不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其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工人所需要的，是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是根本打破这种范围，而不是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兜圈子。因此，还需要一个能把**各**行**各**业工人中的觉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觉悟的阶级、并以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最主要目的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这个党应当是阶级的党，应当完全不依赖其他政党，——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手才能获得解放。

这个党应当是革命的党，——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只有用革命手段、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宝现。

这个党应当是国际主义的党，党的大门应向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敞开，——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格鲁吉亚无产者，或是对俄罗斯无产者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都是同样重要的。◇316◇

因此很明显，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得愈紧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民族壁垒破坏得愈彻底，则无产阶级政党就愈强大，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可分的阶级就愈容易。

因此，必须尽可能在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中实行集中制原则，反对联邦主义的散漫性，无论党、工会或合作社都必须这样。

同样很明显，这一切组织都应当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自然要某些政治条件及其他条件不阻止这样做才行。

党和合作社、党和工会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合作社和工会应当是党的组织还是非党的组织呢？这个问题要以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来决定。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无论工会或合作社，它们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愈友好，其发展就愈充分。因为这两个经济组织若不接近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往往就会琐碎化，就会只顾狭隘的职业的利益而忘记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保证工会和合作社受到党的思想政治影响。只有这样，上述组织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学校，把分散为各个集团的无产阶级组成为觉悟的阶级。

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

——————————————

无政府主义者怎样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317◇

首先必须知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单是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旗帜，全世界无产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活生生的领袖。谁要反对这个学说，谁想“推翻”它，谁就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一切，免得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斗争时，使用着一种迥非寻

常的新武器。

这种新武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驳斥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是！也许他们是用“新事实”和“归纳”方法武装起来，“科学地”驳斥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吧？也不是！那末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盗窃他人的著作”!你们以为怎样？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捏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彻头彻尾都是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偷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比的领袖”车尔凯兹施维里却神气十足地向我们讲这个滑稽故事，而有位什么拉姆斯这样一个轻率的、车尔凯兹施维里的“门徒”和我们的那些土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如此拚命地重复这种“发现”，所以我们至少也要把这个“故事”简略地说一下。

请听听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话吧；

“‘共产党宣言’的整个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孔西得朗那里拿来的。因此马◇318◇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合法革命民主派的这部圣经——不过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头换面一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抄袭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内容，而且……甚至剽窃了个别的标题。”（见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奥拉三人论文集“‘共产党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页）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姆斯也重复着这一套：

“可以坚决地断定：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简直是一种盗窃（剽窃），一种无耻的盗窃，然而他们并不像普通的窃贼那样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论……”（见同书第四页）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号召报”、“工人报”[93]、“呼声报”[94]等报上面也重复着这一套。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原来是从孔西得朗“宣言”中“偷来”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孔西得朗是什么人呢？

马克思又是什么人呢？

孔西得朗死于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义者傅立叶的门生，始终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阶级**调和**才能“挽救法国”。

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义者，是**空想主义者的敌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319◇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继地主农奴制度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制度，那末这只能“归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制度必然产生出来。再就是，如果说继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末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由此就产生出资本主义毁灭和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就产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见“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吗？

我们断定说，无论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或是我们的“号召报派”，都**没有**从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话或**一个**字来证实孔西得朗是个唯物主义者，证实他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演进的。反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义者闻名的（见波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

既然这些奇怪的“批评家”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区别，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饶舌呢？为什么他们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难道是为了引入发笑吗？……◇320◇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叙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承认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吗？

从车尔凯兹施维里和拉姆斯的论文（见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而仅仅指出了阶级斗争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至于作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阶级斗争，那末请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对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 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 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是剽窃”第十四页，那里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证了这段话）

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布的口号。

这种阶级**调和**的策略和坚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策略，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321◇

那末，车尔凯兹施维里这伙先生们和他们的轻率的应声虫为什么

胡说呢？莫非他们把我们看成死人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使他们原形暴露吗？！

最后，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末写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欧洲各国文字再版多次。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论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无论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孔西得朗“宣言”里剿窃了“社会主义”。读者，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激起这些“归纳派的”风头家们……对不住，——“学者们”——胡说八道呢？他们究竟是用谁的名义讲话呢？难道他们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吗？或许他们以为孔西得朗及其信徒们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但是够了…… 已经够了，因为连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地注意拉姆斯和车尔凯兹施维里的唐·吉诃德式的讨伐，这种滑稽的讨伐的可耻结局已经过于明显，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批评的实质。

*　　*　　*

无政府主义者患有一种宿疾，就是很爱“批评”敌方的政党，但又不愿费一点力去稍微了解一下◇322◇这些政党。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批评”社会民主党人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见第一章和第二章）。他们讲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就拿下面一件事实来说吧。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这谁不知道呢？社会革命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否认它的辩证方法，否认它的纲领，

否认阶级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这谁不知道呢？对于即使偶然听到一些有关“革命俄国报”（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和“火星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论战的人，这种原则上的区别也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那些看不出这种区别而竟叫嚷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就硬说“革命俄国报”和“火星报”这两个机关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见无政府主义者文集“面包和自由”第二〇二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认识”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究竟他们的“科学批评”有多少根据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批评”吧。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责难”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复地说：你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323◇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得出和……社会民主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 我们……要达到的是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作者注)要达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见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所有一切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应当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将把这些财富交给工人团体，组织生产和交换，并注视着社会的生活和工作。”（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六十四页）

其次：

“集体主义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双重的错误。他们既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又要保存构成这个制度基础的两种制度：代表制和雇佣劳动制。”（见“争取面包”第一四八页）……“大家知道，集体主义……保存着……雇佣劳动。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这个政府的代表“有权为大家的利益而使用从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此外，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出工人的劳动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杂工的劳动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简单**劳动，而手工业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则从事马克思称为**复杂**劳动的工作，并有权获得高额工资”（见同书第五十二页）。这样，◇324◇工人在领取其必需的产品时，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为标准”（见同书第一五七页）。

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一套，不过讲得更加神气十足罢了。他们中间素以鲁莽见称的就是巴顿先生。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集体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的：每个人愿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国家规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报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劳动的价值……”于是，这里“必须有立法会议……（也）必须有执行机关，即阁员、各种行政人员、宪兵和侦探，如果不满分子过多，也许还要有军队”（见“号召报”第五期第六十八页至第六十九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责难”就是如此。

*　　*　　*

总之，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彷佛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非有政府不可，这个政府将以大老板的资格雇用工人，并且一定要有“阁员……宪兵、侦探”。二、彷佛照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粗”工和“细”工的区别不会消灭，那里将摈弃“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承

认“按功取酬”的原则。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难”就建立在这两点上。◇325◇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这种“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可以断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场合所讲的这些话，不是糊涂，便是无耻的造谣。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写道：“国家将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写道：“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会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26◇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复过同样的话（见“法兰西内战”引言）。

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会有所谓国家、政权及其阁员、省长、宪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余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是国家存在的最后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将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后，在各个阶级已经消灭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后，就再不需要任何政权了，所谓国家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此可见，上述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至于“责难”的第二点，马克思说过以下的话：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没有雇佣劳动存在的余地。

显然，这一“责难”也是毫无根据的。◇327◇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根本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或者是他们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谎。

第一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二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向我们这样说：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否认暴力革命，你们想单凭选票来建立社会主义。

请听吧：

“……社会民主党人……喜欢高谈‘革命’、‘革命斗争’、‘拿着武器斗争’等等题目…… 但是，如果你实心实意地向他们要武器的话，他们却会郑重其事地给你一张选票……”他们硬说：“革命者所宜于采取的唯一适当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进行议会活动，同时宣誓忠于资本主义,忠于既有的政权和整个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页和第二十二页至第二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当然是说得更加神气十足些。就拿巴顿来说吧，他写道：

“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公开宣称：用步枪和武器进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党只有凭选票，只有靠普选，才能取得政权，然后经过议会多数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会。”（见“夺取国家政权”第◇328◇三页至第四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是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个“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自己愚昧无知和热心诽谤。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共产党宣言”。在某些公开版本的译文中遗漏了几个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国即将有新的发动时，马克思写给当时的德国同志们说：

“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他们都不应当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工人们应当……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总参谋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是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注意的”（见“科伦审判记”中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书”）[95]

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329◇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 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选票”。

最后，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的历史，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样和平地行动的，当时公社竟满足于在巴黎的胜利，放弃对凡尔赛这个反革命巢穴的进攻。你们以为马克思当时说过什么话呢？他号召过巴黎人去进行选举吗？他赞同过巴黎工人（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态度吗？他赞同过他们对战败的凡尔赛人所表示的宽大态度吗？请听听马克思的话吧：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挨了六个月的饿……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近卫军反动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开始内战**，彷佛丑陋不堪的梯也尔在企图解除

巴黎武装时也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给库格曼的信”）[96]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一味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们只对选票感觉兴趣，他们不承认暴◇330◇力的革命行动！

可见这个“责难”也是一种诽谤，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为何物。

第二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三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性，把社会民主党人描写成一些官僚主义者，并且断定说：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使革命陷于灭亡，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这种专政，那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想建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请听一听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吧：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已对专政宣告了最后判决…… 我们知道：任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我们知道……专政这个观念无非是把政府偶像化的有害产物，它……力图永远保持奴役制。”（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二一页）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承认革命专政，并且他们“主张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对工人所以感到兴趣，只因为工人是一支被他们掌握的有纪律的军队…… 社会民主党力图利用无产阶级来把国家机器抓到自己手里”（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主张专政的人们是国家派，他们的专政不会是整个◇331◇无产阶级的自由活动，而是在社会头上建立一个现今也存在着的代表制政权。”（见巴顿“夺取国

家政权”第四十五页）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专政，不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 **“用自己的统治来建立新的奴役制”**（见“号召报”创刊号第五页巴顿的论文）。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第三个“责难”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个专为欺骗读者而进行的诽谤，也是不难揭破的。

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克鲁泡特金极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专政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的观点。这一点让我们在以后分析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时再说。现在我们只想就这个“责难”的本身谈一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说过，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治上的专政，以便运用这个专政来打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并没收其生产资料，这个专政不应当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 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几个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后来，他们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杜林论”等等著作中都重复过这种思想。◇332◇

但是还不仅如此，为了要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要弄清楚他们认为这个专政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极有意义的就是要知道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遭到指摘，而且在包括屠夫和酒馆老板在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在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庸人的人们中间都遭到指摘。下面就是恩格斯向这些庸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话：

“近来德国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引言）[97]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想像为巴黎公社那样的。

显然，谁想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所想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谁就应当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我们也来看看巴黎公社吧。如果巴黎公社真的是个别人物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末就打倒马克思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吧！但如果我们看出巴黎公社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末……那末我们就要尽情耻笑无政府主义的诽谤家，因为他们在和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时除了造谣之外是什么也不做的。

巴黎公社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有名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巴黎城内一切事情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央委员会”任期已满而将管理权交给了刚刚选出的公社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面前摆着**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史”，这部书，照阿尔努◇333◇说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的回答。斗争刚开始时，就有约三十万组成为中队和大队的巴黎工人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组成的。

阿尔努说道：“所有这些公民（即“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是由自己的中队或大队分别选出的，知道他们的只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小集团。这是些什么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无名的政府，差不多全由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组成，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本条街道或本事务所以外都是不知名的…… 传统被打破了。世界上发生了一种意外的事情。在那里没有一个是来自统治阶级的人。革命爆发了，代表这个革命的不是**律师**，不是**议员**，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将军**。代表革命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来自克列索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见“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页）。

阿尔努继续写道：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声明说，——是不出名的机关，是被攻击的人民手中顺从的工具…… 我们是…… 执行人民意志的仆人，我们在这里要响应人民的呼声，使人民取得胜利。人民要成立公社，我们就留下来着手选举公社。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专政者没有升到群众之上，也没有降到群众之下。令人感觉到他们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群众中间，并且是依靠群众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和群众商量，他们听从群众的话，传达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力求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三十万人的意见。”（见同书第一〇九页）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就是这样行动的。◇334◇

巴黎公社就是如此。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巴黎公社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公社已经代替了“中央委员会”。阿尔努讲到为时两月的这两个时期，欢欣地说，这是真正的人民专政。请听吧：

“这里的人民在两个月内所体现出的雄伟的图画，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正视未来。在这两个月内，巴黎有过真正的专政，有过最完备的和无可争辩的专政，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作为时局之唯一主宰的**全体人民的**专政…… 这个专政一直继续了两个多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八七一年）……”其实“……公社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政权，它除了……公民的普遍同情外，没有其他的物质力量；**人民成了统治者**，成了唯一的统治者，人民自己创立了自己的警察和法院……”（见同书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积极参加过白刃战的公社社员**阿尔努**就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

另一个同样积极参加过公社工作的公社社员**利沙加勒**，也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见他的“巴黎公社史”）。

人民是“唯一的统治者”，“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

“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大声地对庸人们说。◇335◇

你看，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对他们时常加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竟像我和读者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

很明显，专政有两种。有少数人的专政，一小群人的专政，特列坡夫和依格纳切夫之流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人民。这种专政通常由一群权奸把持，他们秘密决定问题，加紧绞杀大多数人民。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人，而且他们反对这种专政要比我们那些喜欢叫嚣的无政府主义者顽强得多，奋勇得多。

又有另一种专政，即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少数人。这里领导专政的是群众，这里不容权奸立足，也不容秘密决定问题，这里一切都公开进行，在街道上进行，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这因为它是街头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旨在反对任何压迫者的专政。

这种专政，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双手”支持的，因为这种专政是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雄伟的开端。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把这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因而陷于可笑的境地：他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而是和他们自己的幻想作斗争；他们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搏斗，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诃德当时那样同风车搏斗……◇336◇

第三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待续。）[①]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新时代报”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我们的生活报”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和十日“时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各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337◇

——————————————

① 续文不曾刊印出来，因为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年中被党中央委员会调到巴库做党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在那里被捕了，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著作末尾几章的笔记则在被搜查时遗失了。——编者注。

附录：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①]

辩证唯物主义

一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一听见有人提到“无政府主义”就轻蔑地转过身去，把手一挥说：“你们何必理睬它，它是连谈都不值得一谈的！”我们认为这种没有价值的“批评”既不庄重，又无益处。

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说，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群众，因而并不怎样危险”。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而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根据是应当加以证明的。

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也就承认对真正的敌人要进◇339◇行真正的斗争。因此,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从头到尾审察一下，并从各方面把它彻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

但是，在批评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阐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并这样来大致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这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散布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并使读者们的头脑趋于混乱。

现在我们就来讲本题吧。

———————————————

① 此文是斯大林于一九〇六年六、七两月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原稿，作为附录收入本卷。——本书制作者注

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 生活在变化着，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 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马克思

（见“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逻辑地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很明显，阐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阐明辩证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个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340◇

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而**理论**是唯物的。

什么是辩证方法呢？

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呢？

有人说，生活在于不断的成长和发展，这是正确的：社会生活不是什么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无怪乎马克思说；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生活中总是有什么在死亡，同时又总是有什么在产生……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生活走向哪里去，生活中死亡的是什么，产生的是什么，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辩证方法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此。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它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弱，怎样小，

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反之，生活中死亡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不管它今天还怎◇341◇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要失败和走进坟墓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辩证方法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如此。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当时民粹派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穷苦的农民。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农民在俄国社会里人数最多，同时处境最穷。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农民今天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很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农民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作为一个等级在**日益崩溃**，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则在**日益成长**壮大。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的意义：“流浪汉”比农民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问题只是生活中谁在成长起来，谁在衰老下去。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所以我们应该同它一道前进，并承认它是俄国革命的主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回答说。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问题，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因为他们把生活现象看做“不变的、凝固的、永恒的东西”（见恩格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辩证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运动的。◇342◇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间”的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挺起胸来，袭击军械库，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须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

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及其**质的**特点而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自然界也有这样的过程。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343◇

至于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十分详尽地阐明了的各种事实，我们就不谈了。

*　　*　　*

这样，我们现在已认识了辩证方法。我们知道：按照这个方法，世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必须把自然界和社会中任何一种现象当做动的东西，当做又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而不要把它看做凝固的和静止的东西。我们也知道：这个运动本身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化的，一种是革命的……，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看辩证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辩证方法的创始人是黑格尔。马克思只是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们也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骂黑格尔，诬称他是“反动分子”和“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拚命证明“黑格尔…… 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 他赞美专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见“号召报”第六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其实，谁也不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同意他是君主派。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总还

是要“证明”并且认为必须无止境地“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为的什么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读者觉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是“令人厌恶的”和非科学的吧。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真是想**用这种手段**来驳倒辩证方法，那我就应当◇344◇说：他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蠢笨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们的进化论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 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蠢笨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继续讲下去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见“号召报”第九期沙·哥·的论文），他们既然“想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想把哲学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见“号召报”第三期沙·哥·的论文），所以他们就驳斥辩证方法了。

咳，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真是“嫁祸于人”。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见爱尔茨巴赫尔“无政府主义”国外版第六十四页至第六十八页），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妄想（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形而上学者蒲鲁东的格鲁吉亚的门徒却出来“证明”说，“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承认“不可认识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无内容的神学。与蒲鲁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方法同形而上学斗争过，也同神学斗争过◇345◇（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和“反杜林论”）。他证明了它们那种可笑的空洞性。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证明”说：蒲鲁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自己骗自己，或者是他们自己不了解什么是形而上学。无论如何，辩证方法在这里是没有

什么罪过的。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对辩证方法有过什么责备呢？他们说：辩证方法是“诡计”、“诡辩方法”、“逻辑的和思维的翻筋斗”（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初看起来，也许觉得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是正确的。现在请听听恩格斯论到形而上学方法信奉者的时候所说的话吧：“……他们的说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决不能同时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互相排斥的……”（见“反杜林论”引言）无政府主义者狂叫道：怎么能够这样呢！难道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吗？！这是“诡辩”呵，这是“玩弄字眼”呵，这就是说，“你们想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们且思索一下问题的本质吧。今天我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民主共和国是巩固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能不能说民主共和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好的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共和国**只有在“今天”**，当我们破坏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才是好的，而**在“明天”**，当◇346◇我们着手破坏资产阶级所有制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时候，民主共和国就不会是好的了，恰恰相反，它将变成我们所要粉碎和抛开的桎梏；而既然生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既然过去和现在是不能分开的，既然我们同时既要反对封建主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就说：民主共和国消灭封建所有制，所以它是好的，我们就要维护它；民主共和国巩固资产阶级所有制，所以它是不好的，我们就要批评它。由此可见，民主共和国同时既“好”又“坏”，因而对于问题可以回答既“是”又“非”。恩格斯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来证明辩证方法正确的时候，正是指这样的事实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不了解这一点，竟认为这是“诡辩”！无政府主义者看见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见沙子，——这是他们的权利。但这和辩证方法有什么关系呢，辩证方法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是闭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并且直率地

说：既然生活总在变化，总在运动，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现象都有两种趋势，即肯定的趋势和否定的趋势；我们应当维护前一种趋势，反对后一种趋势。无政府主义者真是一些怪人：他们始终一味说着“公正”，而他们对于辩证方法采取十分不公正的态度！

我们再往下说吧。在我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首先是过去的一切消灭干净，然后是将来的一切另行确立起来…… 居维叶的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则是由辩证法产生的”（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同一个作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347◇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见“号召报”第六期）

读者，请好好地思索一下吧！

居维叶否认达尔文的进化，只承认激变，而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发。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因而是**排斥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否认居维叶的激变，承认渐次的进化。于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因而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拥护居维叶的激变的人**。

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显然，“号召报”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记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说的话。究竟哪一期说得对：是第六期还是第八期呢？或者是两期都在撒谎呢？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但是，“不论哪种社会形态，当从它这里获得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果把马克思的思想应用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会**性的现代生产力和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一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的（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由此可见，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毁灭”），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348◇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很明显，居维叶的激变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也摈斥按辩证法来了解的革命，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很明显，同样也决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这样，“号召报”在前后两种场合，即无论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是撒谎的。

这些撒谎的“批评家”纠缠着我们，一味固执地说：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谎话总比你们的真话好些！大概他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情有可原的。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在另一点上也不能宽恕辩证方法，他们说“辩证法……并不使人有可能翻来翻去、跳蹦自如”（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可敬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这完全是真话，诸位在这里说得十分对，辩证方法不使入有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使人有这种可能呢？因为“翻来翻去、跳蹦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辩证方法是供人使用的。秘密就在这里！……

一般说来，我们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辩证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他们虚构了自己的辩证法，并◇349◇且正是这样无情地和自己的这套辩证法进行斗争。

我们瞧见这种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为看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幻想作斗争，粉碎自己的虚构，同时却竭力要别人相信他在打击敌人，这是不能不令人发笑的。

二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
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

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呢？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但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运动是采取**什么形式**的呢，——问题就在这里。例如我们知道，地球原来是炽热的熔浆，后来逐渐冷却，然后产生出动物界，随着动物界的进化出现了一种猿猴，最后这种猿猴变成了人。但这种发展的过是怎样的呢？有些人说在自然界及其发展以前先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这种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的发展进程不过是观念发展的空洞**形式**。这些人叫做唯心主义者，他们后来分成了几派。有些人则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力量：观念和物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之间经常发生斗争；所以自然现象◇350◇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这些人叫做二元论者，他们也像唯心主义者一样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当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形式；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这样，所谓二元论就根本倒台了。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的发展。统一而不可分的生活也表现在观念的和物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生活的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

同时，马克思也否定唯心主义。认为观念和一般精神方面的发展彷佛是**先于**自然和一般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

时候，所谓外部的、无机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原形质）是没有任何意识（观念）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大大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会总是只向下方看并只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351◇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材料（印象）较猿猴为多；这样就会使人类意识的发展大大受到阻碍。由此可见，为了精神方面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适当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存在的发展，**先于**精神方面的发展，**先于**观念的发展。显然，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发生变化，**然后**意识和其他精神现象才相应地发生变化，——观念方面的发展**落后于**物质条件的发展。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应当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出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关于社会生活也要这样说。这里也是物质的发展先于观念的发展，这里也是形式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当科学社会主义还根本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并且进行着剧烈的阶级斗争了；当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生产过程就已经具有社会性质了。

因此，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认：“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见同书）◇352◇

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外部物质条件首先发生变化，**然后**才是人们的思维、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变化。内容的发展先于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当然，这决

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彷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像沙·哥·以为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往往“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生产品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另一方面，认为观念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彷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同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萧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精神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的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①]，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产生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东西）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因此我们认观念变化是相应的物质变化的形式。

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如此。◇353◇

有些人会向我们说：很好，这一切就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说来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些或那些对象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所谓外部条件是否实际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们关于这些外部条件的观念呢？如果外部条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觉和认识它们的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使我们的“我”发生印象的外部条件存在的缘故。谁要是轻率地断定说，除了我们的观念以外什么都不存在，谁就不得不否认任何外部条件的

————————————————

① 这并不与认为形式和内容间存在着冲突的意见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冲突不是存在于一般内容和形式之间，而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著者注

存在，因而也就否认其余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认自“我”的存在，但这是和科学原理和实际活动根本矛盾的。是的，外部条件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条件存在于我们未生之前，也将存在于我们已死之后，并且它们愈是频繁而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愈能迅速和容易地感受和认识它们。至于**现在**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些或那些对象的各种各样观念和思想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们应当指出，这里也是简略地重复着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形。在这种场合，我们身外的对象也是先于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观念即形式也落后于对象，即落后于自己的内容等等。如果我望着树，就看见了树，这只是表明，在我的头脑中还没有产生树的观念以前，树本身就已存在，树使我产生了相应的观念。

不难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元论唯物主义对于人们的实际活动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风俗习惯由外部条件引起，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决◇354◇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以下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人是从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习惯于养成人的特性…… 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由于有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惩罚个别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应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 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见“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马克思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与人们实际活动之间的联系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元论唯物主义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导源于黑格尔，那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利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缺陷来糟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黑格尔，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玩弄的这种诡计，◇355◇除了证明自己论战无力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关于费尔巴哈也必须这样说。例如无政府主义者竭力强调说；“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见“号召报”第七期杰连吉的论文）“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似乎马克思由此作出了结论：“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等等（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诚然，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时还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这是我们谁也不怀疑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认为必须把费尔巴哈那些已被揭露的错误再“揭露”一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们想在痛骂费尔巴哈的时候，把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然后科学地发展了的唯物主义也糟蹋一番。难道费尔巴哈除了有错误的思想而外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吗？我们断言，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诡计丝毫也动摇不了一元论论唯物主义，只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无力罢了。

在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中间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看法也是互不一致的。假若听信车尔凯兹施维里先生的话，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恶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了；按照他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论的了：“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具有进化论体系、变迁说和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科学，即**恩格斯极其憎恶的**科学……是避开了辩证法的”等等（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这样说来，车尔凯兹施维里所喜欢而为恩格斯所憎恶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却向我们说，马克思和恩◇356◇格斯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应该摈弃的。“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黑格尔隔代遗传的东西。一般地说，绝对客观主义的一元论唯物主义，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经济一元论，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

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这样说来，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东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不憎恶它，而且相反，他们自己就是一元论论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应该摈弃的。

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清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本质，他们自己还不懂得马克思唯物主义是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们彼此之间对这个唯物主义的优点和缺点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就大吹大擂地说：我们是在批评和消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单从这一点已可看出他们的“批评”能有多少是有根据的。

我们往下讲吧。原来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不知道科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彼此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有否认观念方面的意义及其对物质方面的影响的庸俗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也有科学地考察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相互关系的所谓一元论论的唯物主义。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一切混为一谈，同时神气十足地声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但我们是要彻底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请听吧：“在恩格斯看来，以及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也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学说”。“这种意见是否◇357◇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凡认为社会机构彷佛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和地球转动条件、宇宙条件、人类进化条件和生物条件推动的历史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全是唯物主义者**。”（见“号召报”第二期沙·哥·的论文）你跟他们说去吧！这样说来，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唯物主义”之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圣西门的“唯物主义”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了。这就是所谓了解敌人和彻底批评敌人呀！……

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填胃的理论”，于是他们就来普及这个“思想”，这大概是因为“号召报”编辑部对纸张价格估计很低,觉得这种做法花钱不多吧。请听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这个公式迷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由此就作出结论说，“因此，最

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是生产关系……”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就用哲学家的口吻教训我们说：“如果吃饭和经济生产是达到这个目的（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错了……　如果**思想体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饭**和经济生活**来决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会是天才人物了。”（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你看，要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驳倒，原来多么容易呵。只须从某个贵族女学生那里听到一些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谈巷议，只须用哲学家的武断的口吻把这些街谈巷议在什么“号召报”上重复一下，就能马上博得“批评家”的头衔了。但是，请诸位先生告诉我们吧：究竟何时、何地、在哪个国家，有哪个马克思说过“吃饭决定思想体系”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从马◇358◇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话或一个字来证实你们的这种责难呢？难道经济生活和吃饭是同一种东西吗？要是有某个贵族女学生把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摧毁者”和“科学的复活者”，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地重复着贵族女学生的错误呢？而且吃饭又怎能决定社会思想体系呢？请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所说的话吧：吃饭和吃饭的形式是不变的，人们吃饭、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样的，而思想体系始终在变化和发展。例如古代的思想体系、封建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几种形式。一般说来，难道不变的东西能决定经常变化的东西吗？经济生活决定着思想体系，马克思确实这样说过，而这是容易了解的，但是，难道吃饭和经济生活是同一种的东西吗？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糊涂观念加在马克思头上呢？……

我们再往下讲吧。在我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平行主义……”或者说：“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论，是因为他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虽然存在但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第一、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是和糊涂的平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同时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物质方面(内容)必然先于观念方面（形式），平行主义却驳斥这个观点并坚决宣称物质方面和观念方面**没有先后**

之分；它们两者是一道地、平行地运动的。第二、我们清楚知道（无政府主义者◇359◇先生们，如果你们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话，你们也应该知道！）马克思的一元论从**一个原则**出发，即从具有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自然这个原则出发，而二元论则从**两个原则**出发，即从物质和观念这两个按二元论说来是互相否定的原则出发，那末马克思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第三、谁说过似乎“人们的意向和意志是没有意义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指明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一点呢？难道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及其他小册子中不是说的“意向和意志”的意义吗？如果马克思不承认“意向和意志”的意义，那他为什么又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发展无产者的“意志和意向”，他为什么又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宣传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间发表的一些著名论文中说的不是“意向和意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人们的意向和意志是从经济生活中吸取本身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是说意向和意志丝毫不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难道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真是这样难于了解这一简单的意思吗？无怪乎有人说：热心批评是一回事，而批评本身是另一回事！真是一点也不错……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责难说：“不能想像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说“形式落后于内容…… 它们‘同时并存’…… 否则一元论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见“号召报”创刊号沙·哥·的论文）。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有点糊涂了。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像的，然而**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360◇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了解这一点，却固执地重复说：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会有的……

无政府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看法就是如此。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这也就够清楚的了：无政府主义者捏造出了一个自己的马克思，并把他们自己捏造出的一种“唯物主义”硬加在他头上，然后来攻击它。可是一粒子弹也没有打中真正的马克思和真正的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呢？

载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和七月九日“新生活报”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十六各期

署名：柯巴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361◇

編輯部的話㊀

我們這一部分格魯吉亞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深信創辦一種自由的定期刊物對於覺悟的格魯吉亞讀者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我們深信這個問題現在必須加以解決，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會使共同事業受到損害；我們深信每一個覺悟的讀者都會歡迎這種刊物並給以各種幫助；因此，針對着這種需要，我們將竭盡全力滿足讀者的願望。今天，我們辦的格魯吉亞第一個自由刊物『鬥爭報』〔一〕創刊號出版了。

爲使讀者對於我們這個刊物，同時也對於我們本身有明確的認識起見，我們要講幾句話。

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經波及全國每一個角落，也波及我們稱之爲高加索的這一個俄國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們的格魯吉亞同樣被波及了。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是不久以前才產生的，它一共只有幾年的歷史，確切一點說，這個運動的基礎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們這裏也像其他各地一樣，最初時期的工作也沒有超出秘密活動的範圍。我們近來所看到的那種鼓動工作和廣泛宣

㊀ 社會民主黨的秘密報紙『鬥爭報』社論。

注　释

〔1〕“斗争报”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火星派用格鲁吉亚文秘密出版的第一个报纸。“斗争报”的发起人是斯大林。关于创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问题，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中革命的少数（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进行斗争，反对该社机会主义的多数（饶尔丹尼亚等人），而“斗争报”的出版就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斗争报”在巴库秘密印刷所排印，这个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革命派责成斯大林最亲近的战友克泽霍越里设立的。该报出版方面的实际工作也由克泽霍越里负责。“斗争报”上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指导性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斗争报”出了四期：创刊号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版；第二、三两期的合刊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出版；第四期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除“火星报”之外，“斗争报”是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它坚决主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和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紧密联系。“斗争报”也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捍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宣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转而进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和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坚持了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列宁思想。“斗争报”在反“经济派”的斗争中，论证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并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的“火星报”曾指出，“斗争报”创刊号的出版是一个极重大的事件。——（正文第3页）。

〔2〕“工人思想报”是公开宣传“经济派”机会主义观点的报纸，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创刊，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十六期。——（正文第12页）。

〔3〕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一小时半，同时这法令又减少了工人的休假日。——（正文第12页）。

〔4〕指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政府批准的“高等学校学生兵役暂行条例”。根

据此项条例，凡参加集体行动来反对高等学校中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他们去当沙皇军队的普通兵士，期限一年至三年。——（正文第16页）。

〔5〕“格鲁吉亚报”是侨居外国的一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办的报纸，这批人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核心。该报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在巴黎用格鲁吉亚文和法文印行。

格鲁吉亚联邦主义党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在日内瓦成立，参加该党的，除“格鲁吉亚报派”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民族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的基本要求是格鲁吉亚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版图内实行民族自治。在反动时期他们变成革命的公开敌人。——（正文第25页）。

〔6〕“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阿尔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建立的。列宁指出，这个组织和崩得有密切关系。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七日（新历）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中写道：“这无非是专为滋养高加索崩得主义而制造出来的**崩得的走狗……**高加索的同志们都反对这伙捣乱的文人。”（见“列宁文集”第五卷第四九三页）——（正文第26页）。

〔7〕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是犹太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组织，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在维里诺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崩得主要是在犹太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工作。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才是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加入后就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传播者的姿态出现。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受到列宁“火星报”的严厉批评。高加索的火星派完全拥护列宁对崩得的斗争。——（正文第29页）。

〔8〕 这里所指的党委员会，于一九〇三年三月在梯弗里斯举行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统一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梯弗里斯、巴库、巴土姆、库泰依斯、古里亚及其他地方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赞同列宁“火星报”的政治路线，接受“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纲领草案为指南，制定并批准了联盟的专门章程。高加索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高加索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国际性结构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当时被监禁

在巴土姆监狱中的斯大林缺席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一九〇四年初，斯大林逃出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后，即行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正文第29页）。

〔9〕斯大林寄自库泰依斯的两封信，是在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两人同俄国国内各布尔什维克组织来往的信件中发现的。这两封信是斯大林于一九〇四年九、十月间逗留库泰依斯时写给一位曾在南高加索和他一起进行革命工作的同志达维塔施维里的，后者当时住在莱比锡（德国）并参加莱比锡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关于这两封信，莱比锡布尔什维克小组中的另一参加者苏里阿施维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收到斯大林同志兴奋地论及列宁的信。这些信是达维塔施维里同志收到的，在这些信中，斯大林同志对列宁表示钦佩，钦佩他那坚定不移的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钦佩他对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解决办法等等。斯大林同志在一封信中称列宁为'山鹰'，赞美他对孟什维克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把这些信转给了列宁，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称斯大林为'热烈的科尔希德[①]人'。"格鲁吉亚文的原信没有找到。——（正文第40页）。

〔10〕指新的、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协助下，夺取了"火星报"，利用它来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他们开始在该报公开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停刊。——（正文第40页）。

〔11〕一九〇四年秋，"火星报"编辑部被孟什维克夺去后，列宁责成邦契—布鲁也维奇组织了一个专门出版社，其任务是出版"党的书刊，特别是捍卫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原则立场的书刊"。当时落入孟什维克手中的党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多方阻挠布尔什维克书刊的出版和发行。因此，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举行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多数派的书刊"的如下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把邦契—布鲁也维奇和列宁出版的书刊和其他一切阐明党内意见分歧的党内书刊一并供给各地党委员会。"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底，出版工作交给了列宁创办的"前进报"。——（正文第40页）。

————————————

① 科尔希德是格鲁吉亚西部利昂河一带低地的古称。斯大林同志的故乡哥里城即在该地。——译者注

〔12〕“二十二人宣言”就是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一九〇四年八月由列宁主持在瑞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通过了这篇宣言。在斯大林信中提到的小册子“告全党书”，其内容除“告全党书”外，还有里加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和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小组对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决议表示赞成的决议。“告全党书”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的委员会赞成这次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一九〇四年九月，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梯弗里斯委员会和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都响应“二十二人宣言”并展开鼓动工作，主张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文第40页）。

〔13〕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写于一九〇四年九月。这篇论文是对“火星报”第六十九期和德国“新时代”杂志第四十二、四十三两期上卢森堡的小品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以及火星报第六十六期上考茨基的信的答复。列宁本来打算把他的答复登在德国“新时代”杂志上，但因该杂志编辑部同情孟什维克而遭到拒绝。——（正文第40页）。

〔14〕即“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旅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由该同盟于一九〇四年在日内瓦出版。——(正文第40页)。

〔15〕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写于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五月，并于五月六日（十九日）出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页至第三九二页）。——（正文第40页）。

〔16〕指列宁的“做什么？”一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页至第四九四页）。——（正文第40页）。

〔17〕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是全党最高机关。党总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各委派两位委员，第五位委员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活动协调一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孟什维克就在党总委员会内获得优势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派别组织的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消除了党内几个中央机关并存的现象，建立了统一的党中央机关，即中央委员会，而把它分成国外和国内两部分。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央机关报主笔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中央委员一人担任。——（正文第44页）。

〔18〕列宁的附有作者的序和跋的小册子“关于我党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

的信”，于一九〇四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二〇五页至第二二四页）。——（正文第44页）。

〔19〕柯斯特罗夫和安恩都是饶尔丹尼亚的笔名。——（正文第45页）。

〔20〕“犁沟报”是格鲁吉亚文周报，自由民族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八九三年至一入九七年间，这个周报常供给“麦撒墨达西社”中的初学写作者以篇幅。一八九七年底，该报转入“麦撒墨达西社”多数派（饶尔丹尼亚等人）手中而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产生了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后，“犁沟报”就成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了。该报于一九〇四年被政府封闭。——（正文第45页）。

〔21〕“无产阶级斗争报”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秘密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机关刊物，于一九〇三年四、五月创刊，一九〇五年十月停刊。第十二期出版后即被封闭。一九〇四年斯大林从流放地归来后便领导该报的编辑部。参加编辑部的还有：楚鲁启则、邵武勉等人。报上所载指导性的论文是斯大林写的。“无产阶级斗争报”是“斗争报”的继承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报”和“斗争报”合并为一个总的机关报，用格鲁吉亚文、阿尔明尼亚文和俄文三种文字出版，内容都是一样的，仍旧保持以前用上述文字出版的期次。“无产阶级斗争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原则、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除“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外，它是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阶级斗争报”编辑部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当“前进报”发表出版通告时，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就组织了一个写稿组来支持“前进报”。列宁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历）在答复联盟委员会请他参加“无产阶级斗争报”撰稿工作的来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我收到了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斗争报’的来信。我将尽力给你们写东西并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编辑部的同志们。”（见“列宁文集”第十五卷第二六七页）“无产阶级斗争报”经常从列宁“火星报”、后来又从“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上转载各种文章和材料。该报发表了列宁的许多论文。“无产者报”屡次登载对于“无产阶级斗争报”的良好的评论和介绍，并转载该报的论文和通讯。“无产者报”第十二期报道了俄文版“无产阶级斗争报”创刊的消息。在这段消息的末尾说道：“我们还要谈到这个极有意义的报纸的内容。我们热

烈庆贺高加索联盟出版事业的扩大，并祝它在高加索一带进行恢复党性的工作上获得进一步的成功。”——（正文第45页）。

〔22〕指斯大林的“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见本卷第二十七页）。——（正文第45页）。

〔23〕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沙皇尼古拉第二所下的“圣旨”连同政府特别通告，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报上公布。这道“圣旨”在允许实行某些不关重要的“改革”的同时，宣布专制政权的不可摇撼性，并包含许多不仅是对革命工农群众，而且也是对那些敢于向政府提出怯懦的宪制要求的自由派分子的威吓。照列宁的说法，尼古拉第二的“圣旨”是“直接赏给自由派的一个耳光”。——（正文第55页）。

〔24〕“宪法草案”是自由派“解放同盟”中一批盟员于一九〇四年十月间所拟定的，并于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题为“俄罗斯帝国根本法。俄国宪法草案”。——（正文第56页）。

〔25〕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写于一九〇五年四月底。这是对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关于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出版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国外中央很快就知道了。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八日，克鲁普斯卡娅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要求把这书寄一本到国外去。“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书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书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一九〇五年五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六月又用俄文和阿尔明尼亚文）印的，每种文字各印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正文第65页）。

〔26〕“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一九〇〇年由列宁创办。列宁“火星报”创刊号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四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几期在慕尼黑出版，自一九〇二年四月起在伦敦出版，自一九〇三年春天起则在日内瓦出版。当时在俄国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中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在南高加索坚持“火星报”思想的，有格鲁吉亚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的机关刊物“斗争报”（关于“火星报”的意义和作用，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

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四十六页至第五十六页）。——（正文第66页）。

〔27〕“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五年四月至十一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该报由饶尔丹尼亚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正文第67页）。

〔28〕“工人事业”杂志是侨居外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经济派”）的不定期机关刊物。该杂志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在日内瓦出版。——（正文第67页）。

〔29〕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四卷第三四三页。——（正文第68页）。

〔30〕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正文第69页）。

〔31〕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一五〇页。——（正文第72页）。

〔32〕“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德文杂志，于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在斯图加特出版。——（正文第73页）。

〔33〕“旅行家”是一种历史考古学和地理人种学的格鲁吉亚文杂志，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梯弗里斯出版。从一九〇五年一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马哈拉则主编。“旅行家”除刊登布尔◇368◇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正文第76页）。

〔34〕“加因斐纲领”是奥国社会民主党于一八八八年在加因斐城建党大会上通过的。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任务的论点。后来，在一九〇一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加因斐纲领”已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代替了。——（正文第83页）。

〔35〕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二七八页至第二七九页。——（正文第86页）。

〔36〕“曙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由列宁创办，同时与“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主编出版。该杂志于一九〇一年四月至一九〇二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正文第89页）。

〔37〕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七七页。——(正文第92页)。

〔38〕“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是一九〇五年三月至一九二一年四月由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出版的不定期杂志。共出十六期。一九一六年又出过一期。——（正文第92页）。

〔39〕公察克党人是阿尔明尼亚小资产阶级“公察克党”的党员。该党于一八八七年由阿尔明尼亚族大学生发起在日内瓦成立。“公察克党”在南高加索取名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分裂政策。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以后，“公察克党”已蜕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集团。——（正文第99页）。

〔40〕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四十五页。——（正文第100页）。

〔41〕“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只登载了斯大林的“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的前一部分。根据保存在档案中的、由斯大林拟定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各期（第十二、十三、十四期）编辑计划的手稿看来，该文后一部分原定在该报第十三期上发表。但因“无产阶级斗争报”出到第十二期就停刊了，所以这一部分也就未能发表。保存在宪兵局档案中的这一部分只有俄文译稿。格鲁吉亚文的原稿没有找到。——（正文第102页）。

〔42〕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于一九〇四年八月举行。——（正文第104页）。

〔43〕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三一、一三二页）。——（正文第105页）。

〔44〕指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其中引证了恩格斯的论文“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四四三、四四四、四四六页）。——（正文第108页）。

〔45〕指内政部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所制定的关于成立谘议性国家杜马的法令草案和杜马选举条例。法令草案和选举条例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十九日）和沙皇宣言一起公布的。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还没有召集起来就被革命力量扫除了。——（正文第115页）。

〔46〕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的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受到侨居外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热烈欢迎。列宁在“无产者报”上简括地说明斯大林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时写道：“在‘答“社会民主党

人报”’这篇论文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有名问题的绝妙提法。作者把这个问题分成四个独立部分：

（一）关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哲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

（二）‘谁能创造和谁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呢？’‘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考茨基），这就是说，这种意识的创造工作‘是几个具有为此所必需的经费和闲暇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

（三）这种意识怎样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呢？‘在这里也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它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四）社会民主党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时在无产阶级那里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者本身和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中间，必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是应当这样解释的。’（考茨基）

孟什维克却由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从无产阶级中间产生出来，然后灌输到那些领会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头脑中去的。’！”（见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二十四日）“无产者报”第二十二期“党内生活”栏第六页。）——（正文第 119 页）。

〔47〕“答联盟委员会”一文是以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期附张的形式出版的。该文作者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袖饶尔丹尼亚，他的观点在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及其他著作中受到无情的批评。——（正文第 120 页）。

〔48〕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二一九页。——(正文第 126 页)。

〔49〕“莫斯科新闻”是一七五六年创刊的报纸，代表最反动的农奴主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利益。一九〇五年起成为黑帮的机关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被封闭。——（正文第 129 页）。

〔50〕“俄罗斯新闻”是一八六三年起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局活动家们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

九〇五年起成为立宪民主党右派的机关报。——（正文第130页）。

〔51〕“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创办的党中央机关报，于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二十六期。该报主笔是列宁。“无产者报”继续了旧“火星报”即列宁“火星报”的路线，并且是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继承者。“无产者报”因列宁迁居彼得堡而停刊。——（正文第131页）。

〔52〕立宪民主党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十月。立宪民主党人以虚伪的民主主义为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竭力要把农民拉到自己方面去。他们力图用君主立宪形式把沙皇制度保全下来。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了许多反革命的阴谋和暴动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正文第133页）。

〔53〕“高加索工人小报”是高加索第一个公开的布尔什维克日报，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在梯弗里斯用俄文出版，由斯大林和邵武勉两人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第四次代表会议承认该报为高加索联盟正式机关报。共出十七期。最后两期曾改名“叶里萨维特波里通报”出版。——（正文第145页）。

〔54〕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拉脱维亚的若干城市，如杜库姆、达里森、鲁恩、弗利得利赫什达特等等都被起义的工人、雇农和农民的武装队伍占领。反对沙皇军队的游击战争开始了。一九〇六年一月拉脱维亚各地的起义都被沙皇的将军奥尔洛夫、索洛古布等人率领的讨伐队镇压下去。——（正文第150页）。

〔55〕斯大林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发表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八日的“黎明报”上。该报是俄国社会民工党梯弗里斯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日刊），于一九〇六年三月五日至十日出版了几次。这篇文章正式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对于杜马的策略问题的观点。在前一期“黎明报”上曾登一篇署名赫、标题为“国家杜马的选举和我们的策略”的文章，其中反映孟什维克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在斯大林的论文发表时，编辑部附有下列一段按语：“昨天我们在本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它所表明的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关于参加国家杜马问题的见解。今天又按照预告登了第二篇文章，它所表明的是我们另一部分同志关于本问题的原则性的见解。读者可以看出，这两篇文章彼此有原则上的差别：

前一篇的作者赞成参加杜马选举，后一篇的作者则反对参加。前后两种见解都不仅是个人的意见，它们表示党内存在着的两个派别的策略方针。不仅我们这里的情形如此，整个俄国的情形也如此。”——（正文第153页）。

〔56〕“革命俄国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于一九〇〇年底创刊，一九〇五年停刊；起初由“社会革命者同盟”出版，自一九〇二年一月起成为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正文第164页）。

〔57〕“新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公开报纸，于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彼得堡出版。自列宁回国后，“新生活报”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出版。高尔基积极参加过该报工作。“新生活报”出至第二十七期被当局封闭。该报最后一期（即第二十八期）是秘密出版的。——（正文第167页）。

〔58〕“开端报”是孟什维克公开出版的日报，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67页）。

〔59〕“新闻小报”是格鲁吉亚文日报，于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六年在梯弗里斯出版。该报自一九〇〇年底起就成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传声筒，自一九〇四年起又成为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者的机关报。——（正文第167页）。

〔60〕“闪电报”是格鲁吉亚文日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在“黎明报”被封后开始出版。创刊号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出版，最后一期出版于同年四月十五日。代表布尔什维克在“闪电报”上发表指导性文章的是斯大林。共出了二十七期。——（正文第169页）。

〔6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崩得的代表。有许多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后被政府击散，没有能够派出代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虽然为数并不怎样多）是在孟什维克方面。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既占优势，也就决定了代表大会对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性质斯大林化名依万诺维奇代表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大会。他在大会上参加了关于土地纲领草案、关于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关于国家杜马等问题的辩论，曾几次发言。此外，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几次声明，用具体事实揭露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对于国家杜马、对于和崩得订立协约等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正文第173页）。

〔62〕约翰是马斯洛夫的笔名。——（正文第173页）。

〔63〕诺·赫·就是孟什维克诺依·赫米里基。——（正文第178页）。

〔64〕“话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政治文艺日报，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178页）。

〔65〕考茨基和盖得在那个时期还没有转入机会主义者的营垒。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国革命对于国际革命运动，特别对于德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考茨基在这次革命影响下对于若干问题是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发表意见的。——（正文第178页）。

〔66〕“新生活报”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四日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日报。该报领导人是斯大林。经常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达维塔施维里、捷里亚、基柯则等人。共出二十期。——（正文第178页）。

〔67〕这里引证的是列宁的“俄国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九十八页至第九十九页）。这篇论文是在“党内消息”上发表的。“党内消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前夜在彼得堡秘密出版。共出两期：创刊号在一九〇六年二月七日出版；第二期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正文第179页）。

〔68〕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一〇页至第一一一页）。——（正文第18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一八页至第一一九页。——（正文第181页）。

〔70〕“北方土地报”是布尔什维克公开出版的日报，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83页）。

〔71〕“俄国报”是警察黑帮性质的日报，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创刊，一九一四年四月停刊。是内政部的机关报。——（正文第183页）。

〔72〕一九〇六年六、七月间，内政部大臣斯托雷平通令各地方当局对工农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采取残酷的军事惩治办法。——（正文第183页）。

〔73〕特列坡夫是彼得堡总督，曾领导镇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正文第184页）。

〔74〕斯大林的“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一文，于一九〇六年在梯弗里斯由“无产阶级报社”用格鲁吉亚文出版。这本小册子里附有布尔什维克提交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讨论的三个决议草案：（一）“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三〇页至第一三一页）；（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形势中的阶级任务”（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六十五页）；（三）“武装起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三一页至第一三三页）；还有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二六六页至第二六七页）。此外，这本小册子里还附有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关于目前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正文第184页）。

〔75〕“民主改革党”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期。——（正文第192页）。

〔76〕十月党人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斯托雷平制度，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正文第192页）。

〔77〕劳动团分子或“劳动团”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集团，一九〇六年四月由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团分子曾提出下列各项要求废止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使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民主化，实现国家杜马普选制，以及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正文第194页）。

〔78〕“我们的生活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至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时断时续。——（正文第196页）。

〔79〕“新时代报”是工会公开刊物，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〇七年一月八日每周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由斯大林、齐哈卡雅、达维塔施维里三人主持，后被梯弗里斯总督下令封闭。——（正文第209页）。

〔80〕参议员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员会，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沙皇下令设立，其目的彷佛是“为要刻不容缓地阐明圣彼得堡及其近郊工人不满的原因”。打算也吸收一些由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政府的这种谋划是企图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于是建议利用这个委员会的选举向沙皇政府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在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之后，复选人就拒绝选举工人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并号召彼得堡工人举行罢工。次日开

始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日，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才解散了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正文第211页）。

〔81〕财政部大臣柯柯甫采夫主持的委员会于一九〇五年二月设立。这个委员会也像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一样，是为审理工人问题而设立的，但没有工人参加。这个委员会只存在到一九〇五年夏季。——（正文第211页）。

〔82〕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颁布的结社法，规定各种团体和会社必须先将它们的章程向政府登记始可享受合法存在的权利。虽然这个法令对于各种会社的活动有许多的限制，而且违反法令者要受刑事处分，但工人还是广泛地利用了该法令所给予的权利，建立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这一时期，俄国初次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工会，这些工会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之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正文第211页）。

〔83〕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宣言公布以后，内阁首相维特和内政部大臣杜尔诺沃在发给各省市长官的许多通令和电报中，不顾官方正式宣布的“自由”，要求用武力驱散各种群众集会，封闭报馆，对各种会社采取断然措施，按行政手续把一切有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发配到流放地去等等。——（正文第211页）。

〔84〕一九〇五年末和一九〇六年初，在格鲁吉亚一带，由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崇拜者、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车尔凯兹施维里及其信徒米哈柯·策烈铁里（巴顿）、沙尔瓦，哥格利亚（沙·哥·）等人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展开了猛烈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这个集团在梯弗里斯出版了“号召报”“工人报”等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但他们在游民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就。斯大林发表了总标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前四篇论文是于一九〇六年六、七两月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以后几篇论文，因该报被当局封闭，没有登出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曾刊载于“新生活报”的论文又转载在“新时代报”上，不过略有修改。该报编辑部对这些论文加了以下的按语：“不久前职员工会写信给我们，要我们登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及诸如此类问题的文章（见“新时代报”第三期）。另一些同志也表示了这种愿望。我们很愿意满足这种愿望，就登了这样的文章至于这些文章的本身，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从前已在格鲁吉亚报刊上发表过（由于和作者无关的原因，这些文章没有登完）。虽然如此，但我们

认为必须把这些文章完全登出来，并请作者把文章修改得通俗一些，作者已经乐意地这样做了。”这样，“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部著作的前四部分就有了两种原稿。这部著作的续文是在一九〇七年二月“我们的生活报”和一九〇七年四月“时报”上发表的。在“新生活报”上发表过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原稿，作为附录收入本卷。

“我们的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自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起在梯弗里斯公开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共出十三期。该报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因持极端主张”被封闭。

“时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我们的生活报”被封闭后，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梯弗里斯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参加该报编辑部的还有齐哈卡雅和达维塔施维里。共出三十一期。——（正文第216页）。

〔85〕“号召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刊，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221页）。

〔86〕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八七页。——（正文第223页）。

〔87〕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二七页至第三二八页。——（正文第226页）。

〔88〕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的家族”中“对法国唯物主义进行的批评战”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六〇页）——（正文第234页）。

〔89〕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一四八页。——（正文第244页）。

〔9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上册第一四九页。——（正文第245页）。

〔91〕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五三页。——（正文第246页）。

〔92〕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二八、一二九页。——（正文第248页）。

〔93〕“工人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报，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254页）。

〔94〕“呼声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报，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254页）。

〔95〕见马克思“科伦共产主义者审判案真相记”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铁锤”出版社版第一一三页（第九节“附录”：一八五〇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三三、一三四页）。——（正文第263页）。

〔96〕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二七页。——（正文第264页）。

〔97〕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该书附有恩格斯的“序言”。一九〇五年版，从德文译出的俄文本经列宁校审过（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三六八页）。——（正文第266页）。

年　表

（一八七九年至一九〇六年）

一八七九年

十二月九日（二十一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诞生于哥里城（格鲁吉亚）。

一八八八年

九月

斯大林进哥里四级制正教小学读书。

一八九四年

六月

斯大林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哥里小学。

九月二日

斯大林进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一年级读书。

一八九五年

斯大林和当时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南高加索一带的俄罗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建立联系。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领导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阅读列宁的早期作品。

一八九八年

一月

斯大林开始领导梯弗里斯总铁路工厂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

八月

斯大林加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三人组成“麦撒墨达西杜”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的核心。

————————

斯大林编写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学习大纲。

————————

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三人提出必须创办秘密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的问题，因此“麦撒墨达西社”内部革命的少数和机会主义的多数之间开始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

一八九九年

五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开除学籍。

十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到梯弗里斯观象台工作。

一九〇〇年

四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城郊盐湖一带工人纪念五一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夏季

斯大林和当时来到梯弗里斯进行党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列宁“火星报”的拥护者库尔纳托夫斯基建立联系。

八月

斯大林领导梯弗里斯总铁路工厂的群众性的罢工。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

在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三人领导下逐渐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中心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进行由小组宣传过渡到群众政治鼓动的工作，设法印刷传单并在工人中间散发，建立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领导梯弗里斯无产阶级的罢工和政治斗争。

一九〇一年

三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观象台的住所被搜查。

三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辞去观象台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

四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领导在梯弗里斯城中心区士兵市场举行的五一工人游行示威。

九月

由斯大林发起的秘密刊物——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的机关报“斗争报”创刊号在巴库出版，上面载有斯大林写的一篇纲领性论文“编辑部的话”。

十一月十一日

斯大林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梯弗里斯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底

梯弗里斯委员会派斯大林去巴土姆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

十二月

“斗争报”第二、三两期合刊出版，上面载有斯大林的论文“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斯大林和巴土姆先进工人建立联系，并在路特希尔德、曼塔舍夫、西杰利吉斯及其他工厂中组织社会民主党小组。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以迎接新年的名义召开社会民主党小组秘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选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实际上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巴土姆委员会的作用。

一九〇二年

一月

斯大林在巴土姆设立秘密印刷所，起草传单，并布置印发传单的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组织曼塔舍夫工厂工人的罢工，结果工人获得胜利。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初

斯大林领导路特希尔德工厂罢工委员会的工作。

三月八日

斯大林领导罢工工人的游行，工人们要求释放因参加罢工而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志。

三月九日

斯大林组织并领导巴土姆各企业工人的巨大政治游行示威，参加者六千余人，要求释放三月八日被警察逮捕的三百个参加游行的工友。在拘禁被捕工人的递解站近旁，示威群众遭到军队开枪扫射，结果十五个工人被打死，五十四个工人受伤，约五百名示威者被捕。当夜，斯大林起草抗议枪杀示威群众的传单。

三月十二日

斯大林领导他所组织的为安葬三月九日死难同志的工人游行示威。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巴土姆党的领导集团会议上被捕。

四月六日

斯大林被囚禁于巴土姆监狱。

一九〇二年四月至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九日

斯大林虽被囚禁于巴土姆监狱，但仍设法建立并经常保持和巴土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系，指导其工作，起草传单，在囚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

一九〇三年

三月

在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当时斯大林被囚禁于巴土姆监狱，但他缺席当选为这次代表大会所成立的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

四月十九日

斯大林从巴土姆监狱被解到库泰依斯监狱。他在这里和政治犯建立联系，在他们中间宣传列宁火星派的思想。

秋季

斯大林被解回巴土姆监狱，随后又从那里被递次解往西伯利亚东部流放地。

十一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达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县新乌达村流放地。

十二月

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收到列宁寄去的一封信。

一九〇四年

一月五日

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走。

二月

斯大林到达梯弗里斯并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工作。

斯大林起草论述党内意见分歧和党的组织任务的纲领性文件“信条”。

六月

斯大林到巴库，他受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托解散孟什维克的委员会，成立布尔什维克的新委员会。

夏季

斯大林巡视南高加索各主要地区，在各次辩论会上发言反对孟什维克、联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斯大林在库泰依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

九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七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九月至十月

由于党内发生意见分歧，斯大林在库泰依斯时写信给侨居外国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信中发挥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思想。

十一月

斯大林到巴库，领导　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

十二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斯大林领导巴库工人总罢工。

一九〇五年

一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八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

一月八日

斯大林就沙皇政府在远东遭受失败事而写的宣言“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出版。

二月初

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解散了当时宣布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孟什维克梯弗里斯委员会，并建立了新的布尔什维克梯弗里斯委员会。

二月十三日

由于警察在巴库挑起了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间的互相残杀，斯大林写了“各民族友爱万岁！”的传单。

二月十五日

由于在梯弗里斯胜利地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抗议警察想在梯弗里斯也挑超民族互相残杀的企图，斯大林写了“告公民书。红旗万岁！”的传单。

四月

斯大林在巴土姆的大辩论会上发言，反对孟什维克的领袖拉米施维里、阿尔谢尼则等人。

五月

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出版。

六月十二日

斯大林在安葬楚鲁启则时发表演说，阐述工农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纲领，并对孟什维克的策略给以毁灭性的批评。

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七月十八日

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要求把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寄去，并经常寄去“无产阶级斗争报”。

七月

斯大林在齐阿土雷两千人的辩论会上发言，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

八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发表斯大林的两篇论文：“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和“答‘社会民主党人报’”。

十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二期发表斯大林的两篇论文；“反动加紧起来了”和“资产阶级在布置圈套”。

十月十八日

斯大林在纳札拉德维（梯弗里斯的一个区）工人群众大会上，就沙皇十月十七日宣言发表演说。

十月

针对着十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斯大林写了两个传单：“公民们！”和“告全体工人书”。

十一月二十日

“高加索工人小报”创刊号出版，上面载有斯大林所写的社论：“梯弗里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底

斯大林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高加索联盟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塔墨尔福斯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和列宁第一次会面。

一九〇六年

一月初

斯大林的小册子“两次搏斗”出版。

三月八日

斯大林的论文“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黎明报”第三期上发表。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闪电报”第五、第九、第十、第十四各期登载了斯大林的两篇论文：“土地问题”和“论土地问题”。

三月底

斯大林当选为梯弗里斯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

斯大林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他在发言反对孟什维克时，论证并捍卫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策略。

六月二十日

斯大林领导的“新生活报”创刊号出版。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九日

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第二、第四、第七和第十六各期刊载了斯大林的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

六月至十一月

斯大林领导组织梯弗里斯的第一批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和其他工会）的工作。

七月十三日

“新生活报”第十九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

七月十四日

“新生活报”第二十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国际反革命”。

七月至八月

斯大林的“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一书出版。

九月

斯大林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组织全区代表大会。

十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领导的“新时代报”创刊号出版，上面载有斯大林的论文“阶级斗争”。

十二月四日

“新时代报”第四期发表斯大林的论文“‘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

十二月十一日

“新时代报”第五期开始重新刊载斯大林的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至一九〇七年四月十日

“新时代报”、“我们的生活报”、“时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继续刊载斯大林的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

斯大林全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四萬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271,000字
印數1—50,000册

書號1397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乌托邦（空想的、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出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要性。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三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2
1907–1913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卷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

一九五三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方括弧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二卷说明 …… 1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

一九〇七年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
　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 3
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 …… 12
立宪民主党人专制还是人民专制？ …… 17
无产阶级在斗争，资产阶级在和政府缔结联盟 …… 19
悼念捷里亚同志 …… 23
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 27
一塌糊涂…… …… 29
我们高加索的小丑们 …… 31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 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 38
　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 …… 39
　二　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 …… 42
　三　关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 …… 47
　四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 …… 53
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
　（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库市工人选民团
　初选人大会通过）…… 62

应当抵制协商会议！ …… 64

一九〇八年

选举以前 …… 68
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 …… 71
我们最近时期的罢工说明了什么？ …… 76
石油业主在策略上的转变 …… 79
必须作好准备！ …… 83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 85
石油业主对经济恐怖的看法 …… 88
报刊评论 …… 99
奴颜婢膝的“社会主义者” …… 99
假仁假义的祖巴托夫分子 …… 100
协商会议和工人 …… 103

一九〇九年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 111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罢工 …… 120
党的生活 …… 124
巴库委员会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内
意见分歧的决议 …… 125
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合同（为纪念其五周年而作） …… 127

一九一〇年

高加索来信 …… 131
一 巴库 …… 131
石油工业的状况 …… 131
油矿区自治 …… 133

组织状况 …… 135
“合法机会” …… 136
二　梯弗里斯 …… 140
纲领上的取消主义 …… 141
策略上的取消主义 …… 143
巴库委员会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
（为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而通过）…… 147
一　关于党的政治鼓动和真正团结 …… 147
二　关于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 …… 148
德国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 …… 150
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 …… 156

一九一二年

拥护党！…… 159
五一万岁！…… 163
新的时期 …… 168
自由派的伪君子们 …… 170
无党无派的怪物们 …… 172
实际生活在胜利着！…… 174
他们干得好 …… 176
奔流起来了！…… 178
他们怎样准备迎接选举 …… 181
结论 …… 184
我们的目的 …… 187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 …… 189
初选人的意志 …… 191

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 193
一 初选人的选举 …… 193
二 复选人的选举 …… 193
三 两种统一 …… 194
四 代表的选举 …… 196
今天选举 …… 198

一九一三年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一月九日） …… 201
彼得堡的选举（圣彼得堡来信） …… 205
一 工人选民团 …… 205
一 为选举而斗争 …… 205
二 给代表的委托书 …… 207
三 假统一和代表的选举 …… 209
二 城市选民团 …… 211
三 结论 …… 214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高加索来信） …… 21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221
一 民族 …… 223
二 民族运动 …… 230
三 问题的提法 …… 236
四 民族文化自治 …… 242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 251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 262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 271
社会民主党党团状况 …… 277
连纳惨案一周年 …… 281

注释 …… 284
年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306
插图（新增）
一　巴库时期的斯大林 …… 61
二　20世纪初的斯大林故乡——哥里 …… 119
三　斯大林又一次被沙俄警察逮捕 …… 180
四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几个中文译本 …… 220

第 二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斯大林同志一九〇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一三年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区时（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著作，主要是斯大林同志革命活动中的两个时期即巴库时期和彼得堡时期的著作。

一九〇七年上半年的著作（“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等等）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策略。这个时期的文章刊载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我们的生活报”和“时报”上。这些著作第一次用俄文印行。

一九〇七年六月以后，斯大林同志主要在巴库进行革命活动，这一时期的著作（“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巴库委员会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高加索来信”）论述了布尔什维克为保全并巩固秘密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的斗争。论述领导革命工人运动和领导工会问题的文章有“我们最近时期的罢工说明了什么？”、“石油业主对经济恐怖的看法”、“协商会议和工人”等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是为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而写的。编入第二卷的斯大林同志这一时期的文章曾刊载在“巴库无产者报”、“汽笛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从一九一一年下半年起，开始了斯大林同志革命活动中的彼得堡时期（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斯大林同志主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领导党在俄国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时期的著作主要是论述工人运动中新的革命高潮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第四届国家杜

马时的任务。这些著作是“拥护党！”（传单）、“新的时期”、“他们干得好……”、“奔流起来了！……”、“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初选人的意志”、“彼得堡的选举”和其他文章。这些文章曾刊载在彼得堡的 “明星报”和 “真理报”上。

编入第二卷的还有斯大林同志的名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九一三年）。这部著作发展了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和纲领。

斯大林同志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写的“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和其他若干种著作，至今还没有找到。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考茨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大家早就知道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有资望的理论家。然而考茨基不仅在这方面著名，他还以切实认真、深思熟虑的策略问题研究家见称。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在欧洲同志中间，而且在我们这里也有了很高的威望。这并不奇怪：今天，当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的时候，当互相批评流为无谓争吵而常常把事情弄僵，阐明真理又极其困难的时候，听一听考茨基这样一位公正而有经验的同志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同志如此热心地着手研究考茨基的策略论文“国家杜马”、“莫斯科起义”、“土地问题”、“俄国农民和革命”、“犹太人在俄国遭受的蹂躏”等等，就是这个缘故。可是同志们之特别重视这本书，是因为其中谈到了使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的一切主要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普列汉诺夫请求外国同志阐明我们的各种迫切问题时，也以同样的问题请教过考茨基，请他予以相当的答复。从考茨基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本书就是他的答复。既然如此，同志们自然应当更加重视。很明显，这本书对于我们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3◇①

因此，我们哪怕是大致回顾一下我们意见分歧的问题，并顺便阐明考茨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是非常有益的。

考茨基站在哪一方面呢？他支持的是谁呢？是布尔什维克呢，还是孟什维克？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

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革命的一般性质问题。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封建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试问谁来领导这个革命，谁来把人民中的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呢？是资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像法国当时那样呢，还是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问题就在这里。

孟什维克通过**马尔丁诺夫**说，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既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末我国革命也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有害的空想……”“无产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极端反对派走。”（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

而布尔什维克说，固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决不是说，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它应当像法国那样一定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在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是觉悟不高的没有组织的力量，因此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是觉悟较高的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它已经不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附属品的角色，而要作为一个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当前的运动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空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无产阶级实际上正在把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谁劝它“跟◇4◇着资产阶级反对派走”，谁就是剥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谁就是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见列宁“两个策略”）。

考茨基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自由派常常引证法国大革命，却常常引证得毫无根据。现代俄国的条件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见本书第三章）……“俄国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于西欧的自由主义，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直接拿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今俄国革命的范例是非常错误的。

西欧革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曾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见第四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就俄国说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无产阶级不再像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是资产阶级单纯的附属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革命目标的独立阶级了。”（见第五章）

关于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在目前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了解的。资产阶级不能够领导俄国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当出来作革命的领袖。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由资产阶级是不是至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同盟者呢？

布尔什维克说，不可以。固然自由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曾起过革命的作用，但这是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没有这样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它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而在我国，阶级◇5◇斗争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高得多，它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凡是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斗争的地方，自由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所吓倒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便想托庇在反动派的卵翼之下。因此，他们反对革命甚于反对反动派。因此，立宪民主党[2]宁愿和反动派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却不愿和革命结成联盟。是的，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动派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文明”敌人。贫农却完全不然。布尔什维克说，只有贫苦农民才会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目前革命的整个时期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无产阶级也应当支持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如果这两支主力结成联盟，如果工人和农民互相支持，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否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杜马内或在杜马外即在初选阶段都不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

在选举中或在杜马内只支持革命的农民代表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只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而不把他们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因此，布尔什维克不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孟什维克的议论却完全不同。他们说，自由资产阶级固然摇摆于反动和革命之间，但归根到底，它仍然会靠近革命，仍然会起革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自由资产阶级起过革命的作用，因为它是站在反对旧制度的立场上的，所以不得不靠近革命。依照孟什维克的意见，不能把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叫做目前革命的叛徒，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这就是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和◇6◇在杜马内都支持他们的缘故。孟什维克硬说阶级斗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凌驾于共同斗争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号召人民群众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而不只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正因为如此，他们全力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甘愿把最高纲领视之脑后，削减最低纲领，并放弃民主共和制，只求不吓跑立宪民主党人。或许某些读者认为这一句都是对孟什维克的诽谤，因而要求列举事实。那末下面就是事实。

请看有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马里舍夫斯基**不久以前是怎样写的：

“我国的资产阶级不要共和制，所以我国是不会有共和制的……”，因而“……我国革命的结局应该产生立宪制，决不应该产生民主共和制”。因此，马里舍夫斯基劝告“同志们”[3]抛弃“对共和制的幻想”。（见“文集第一辑”第二八八、二八九页）

这是第一点。

在选举前夕，孟什维克的领袖**切列万宁**写道：

“无产阶级如果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企图同农民一起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以争取全权的和全民的立宪会议，那就是荒谬而

愚蠢的了。”他说，我们现在正力求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并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见“我们的事业”杂志[4]创刊号）。

这是第二点。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写写罢了。孟什维克的另一个领袖**普列汉诺夫**却觉得写写还不够，他希望把◇7◇所写的东西付诸实施。

当党内对竞选策略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的时候，当大家问到在初选阶段可否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竟认为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还不够，而开始鼓吹直接结成联盟，鼓吹暂时和立宪民主党人**合并**。请回忆一下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〇六年）登载着普列汉诺夫一篇短文的“同志报”[5]吧。“同志报”的一位读者向普列汉诺夫问道，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能不能有共同纲领，如果能有的话，那末“共同的竞选纲领……会是怎样的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共同的纲领是**必需的**，而且这种纲领应当是“全权的杜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另外的答复”（见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同志报”）。普列汉诺夫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的意思不过是：在选举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应当**附和**企业主的政党（即**附和**立宪民主党），应当和它一起印刷传单发给工人，实际上应当抛弃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抛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而提出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这个口号来代替它。事实上这就是抛弃我们的最低纲领去讨好立宪民主党人，抬高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声价。

这是第三点。

然而，普列汉诺夫说得不够大胆的地方，孟什维克的第三个领袖**华西里也夫**却特别大胆地说出来了。请听吧：

“首先让整个社会、全体公民……建立一个立宪政权，既然这个政权成了人民的，人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因阶级和利益而形成的集团

……着手解决一切问题。那时阶级斗争和集团斗争不仅是适宜◇8◇的，而且是必需的……在目前，这种斗争却是**致命的和罪恶的**……”因此，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必须“**暂时放弃一切‘最好的纲领’而合并成一个立宪党**……”“我的建议总括起来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作为纲领基础的是奠定一个全权的社团的始基，只有这个社团才能产生适当的杜马……”“这个纲领的内容……就是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的内阁……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等等（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志报”）。至于全民的立宪会议和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依照华西里也夫的意见，这一切都必须“放弃”……

这是第四点。

孟什维克的第四个领袖**马尔托夫**固然不同意孟什维克华西里也夫的意见，并因上述论文而傲慢地责骂他（见“评论”[6]第二集）。可是普列汉诺夫对华西里也夫大加赞扬,依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华西里也夫是“瑞士工人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受人爱戴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他“对俄国工人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见“世界”杂志[7]一九〇六年六月号）。究竟相信这两个孟什维克中的哪一个呢？相信普列汉诺夫呢，还是相信马尔托夫？此外，难道马尔托夫本人不久以前不曾写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纷争正在加强专制制度的阵地，因而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见爱里马尔“人民和国家杜马”第二十页）吗？谁不知道，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华西里也夫所提的自由主义“建议”的真正基础呢？

可见孟什维克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迷恋到何种程度，他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9◇抱着这么大的希望，以致为了讨好自由资产阶级而甘愿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置之脑后。

考茨基怎样看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呢？他认为谁是无产阶级的真正同盟者呢？他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呢？

“现在（即在目前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不再像以前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那样是资产阶级单纯的附属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革命目标的独立阶级了。但在无产阶级以这种姿态出现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俄国资产阶级既然一般地是自由主义的并且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毫无疑义，它也就仇恨专制制度，但是它更加仇恨革命……既然它要政治自由，那末它之要政治自由，主要因为它认为政治自由是结束革命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不是俄国当前革命运动的动力**……在革命斗争的整个时期内，只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有利益上的牢固共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应当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没有农民，我们现在就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见第五章）

考茨基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这是无须解释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国革命胜利的阶级实质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哪些阶级应当在我国革命中取得胜利？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

布尔什维克确认，既然目前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既然他们不互相支持就不能胜利，那◇10◇末将来取得政权的就一定是他们，所以革命的胜利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相反地，孟什维克却拒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取得政权。依照他们的意见，政权应当落到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手里，因此他们异常热心地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的责任内阁这一口号。这样，孟什维克向我们提议的就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专政了[8]（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和“劳动呼声报” 、“我们的事业”杂志等）。

考茨基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对于这一点，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及其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共同性。”（见第五章）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为共同的胜利而斗争，革命才会胜利，——立宪民主党人的专政是反革命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四个问题是：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当然，所谓临时革命政府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来，那末，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参加革命政府呢？

布尔什维克说，参加这种临时政府不仅从原则上看是容许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民主党能够在那里，在临时革命政府中，严正地保护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利益。既然在街头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和农民共同摧毁旧制度，既然无产阶级要和农民一起流血牺牲，自然，无产阶级就应当和农民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引导到预期的结局（见列宁“两个策略”）。◇11◇

孟什维克则拒绝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他们说，这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容许的，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不适合的，这似乎会葬送无产阶级（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

对于这一点，考茨基说些什么呢？

“很可能，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会得到胜利……”但这并不是说，“俄国所经历的革命能立刻在俄国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使革命**把政权暂时交给了社会民主党**”。（见第五章）

由此可见，在考茨基看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仅是可以容许的，甚至可能把“政权暂时”完全转到社会民主党一党手里。

这就是考茨基对于我们意见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最大的理论家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点连孟什维克也不否认，不用说，某些“正统的”孟什维克是要除外的。这些人大概根本没有看过考茨基的这本书。例如马尔托

夫就坦白地说：“考茨基在最后结论中是同意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列宁同志及其同道者的。”（见“评论”第二集第十九页）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不同意**考茨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考茨基**不同意**孟什维克。

那末，究竟谁同意孟什维克，而孟什维克到底又同意谁呢？

请看历史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六年），在盐区（彼得堡）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在辩论的时候，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司徒卢威宣称；“你们大家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12◇什维克已经被称为半立宪民主党人了。许多人都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确，普列汉诺夫现在所说的话，有许多是能够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欢迎的，只可惜在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些话。”（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志报”）

请看，到底是谁同意孟什维克。

如果孟什维克也会同意立宪民主党人并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按该书原文刊印
署名：柯巴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13◇

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

竞选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彼得堡这样激烈。党派间的冲突在任何地方也都不像在彼得堡这样尖锐。社会民主党人、民粹派、立宪民主党人、黑帮分子，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民粹派中的劳动团分子[9]、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主义者,立宪民主党内的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彼此之间都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同时，各党派的面目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彼得堡暴露得这样清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竞选是一件活生生的事情，而且各党派的面目也只有在实际中才可以认清。很明显，斗争进行得愈激烈，斗争者的面目也一定暴露得愈清楚。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竞选时的行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你们大概记得孟什维克的谈话吧。还在选举以前他们就宣称，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制是赘疣，首先需要的是杜马和立宪民主党内阁，因此必须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竞选协议。他们说，不这样的话，黑帮分子就会获得胜利。下面就是孟什维克领袖**切列万宁**在选举前夕所写的：

“无产阶级如果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企图同农民一起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以争取全◇15◇权的和全民的立宪会议，那就是荒谬而愚蠢的了。”（见“我们的事业”杂志创刊号）

孟什维克的另一个领袖**普列汉诺夫**附和切列万宁，他也反对成立全民的立宪会议而提出“全权的杜马”来代替它，说争取这个全权的杜马应当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纲领”（见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同志报”）。

著名的孟什维克**华西里也夫**则更加露骨地说，阶级斗争“在目前是致命的和罪恶的……”，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必须“暂时放弃一切‘最好的纲领’而合并成一个立宪党……”（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志报”）

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

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斥责了孟什维克的这种立场。他们说，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是不合乎社会主义者的身分的，社会主义者在竞选中必须独立活动。在初选阶段容许成立协议只是一种例外，而且只容许和那些把全民的立宪会议、没收一切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等等作为当前的口号的政党成立协议，立宪民主党人却摈弃这一切。“黑帮的危险”，——这是自由派捏造出来恐吓某些天真幼稚的人的。黑帮分子是“驾驭”不了杜马的。孟什维克谈论“黑帮的危险”，不过是重弹自由派的老调。可是“立宪民主党的危险”确实存在着，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和那些跟反动派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我们必须同时进行两种斗争：既要反对反动派，又要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16◇

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

社会民主党彼得堡代表会议[10]开幕的日期临近了。在这里，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必然会有两种策略出现在无产阶级面前：一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的策略，一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的策略……那时在这个会议上，无产阶级必须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以前所说的一切作一番评价。但是孟什维克已经感到失败在等待着他们，感到代表会议要斥责他们的策略，于是决定退出代表会议，和社会民主党决裂。孟什维克为了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而闹起分裂来了。他们想用和立宪民主党人作买卖的办法把“自己人”安置到杜马中去。

布尔什维克坚决斥责了这种没有气节的行为。他们用手头掌握的数字证明“黑帮的危险”并不存在。他们无情地批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公开号召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去反对反革命和立宪民主党人。

当布尔什维克把革命分子联合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的时候，当他们不屈不挠地实行无产阶级不调和的策略的时候，孟什维克却背着工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

立宪民主党人逐渐右倾了。斯托雷平把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米留可夫**请去“进行谈判”。立宪民主党人一致同意委托米留可夫以“党的名义”去和反动派进行谈判。很明显，立宪民主党人是愿意和反动派成立协议来反对革命的。同时，立宪民主党人的另一个首领**司徒卢威**公开宣称“立宪民主党人为了获得宪法，愿与皇上成立协议”（见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八日“言论报”[11]）。显而易见，立宪民主◇17◇党人就要和反动派结成联盟了。

可是孟什维克仍然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谈判，仍然力求和他们结成联盟。可怜的人们！他们竟没有想到，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就是和反动派成立协议呵！

这时，政府当局所许可的辩论会开始了。在这里，在这些大会上直接弄清是了所谓“黑帮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幻想，主要的斗争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进行的；谁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谁就是背叛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大会上再也看不见孟什维克了。他们曾两三次企图袒护立宪民主党人，但显然是丢了脸，所以销声匿迹了。立宪民主党的喽罗孟什维克已经失去信用。辩论场中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了。在大会上完全是他们在进行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拒绝和立宪民主党人谈判。人民社会主义者摇摆不定。于是布尔什维克就成为竞选的领导者了。

孟什维克这时候在哪里呢？

他们在和立宪民主党人商谈三个代表席位的问题。这真令人难以相信，但确是事实；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公开说出来。

布尔什维克声明说：打倒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权！

孟什维克却**拒绝这个口号**，因而也就服从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权，做他们的尾巴。

这时，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也在进行。事实表明，**在孟什维克影响比较大的区里工人几乎到处都选社会革命党人为初选人**。“我们不能投票拥护那些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人，社会革命党人总比他们◇18◇好一些。”原来工人是这样说的。工人把社会民主党人叫做自由派，宁愿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走！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造成的结果！

布尔什维克继续实行自己的不调和的策略，并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公开赞同布尔什维克“打倒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权！”的口号。人民社会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了。大家渐渐明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劳动团分子之间的协议，无论如何也不会分散选票而使黑帮分子取得胜利。会取得胜利的不是立宪民主党人就是极左派分子，至于“黑帮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这时，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停止谈判了。看来，事情没有如愿以偿。布尔什维克却和社会革命党人、劳动团分子及人民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协议，孤立了立宪民主党人，并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发动了总进攻。在彼得堡曾公布三种竞选名单：黑帮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和极左派的。和孟什维克的意愿相反，布尔什维克关于三种名单所说的话就这样应验了。

孟什维克既被无产阶级摈弃，对立宪民主党人大失所望，又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耻笑，并为历史唾骂，就只好放下武器，投票赞成极左派的名单，**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维波尔格区选

举委员会公开宣称，孟什维克将投票赞成极左派分子，反对立宪民主党人。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否认有“黑帮的危险”，拒绝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打倒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权！”的口号了。◇19◇

其次，这就是说，孟什维克摈弃自己的策略，并公开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了。

最后，这就是说，孟什维克不再做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而无精打彩地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了。

选举终于举行了，结果全彼得堡没有一个黑帮分子当选！

这样就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的策略是正确的。

孟什维克就这样遭到了失败。

载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
“我们的生活报”[12]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0◇

立宪民主党人专制还是人民专制？

谁应当在革命时期掌握政权呢？哪些阶级应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掌舵呢？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回答。依照他们的意见，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专制），以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并确立民主制度。孟什维克否定人民的专制，而对于谁应当掌握政权的问题，在这以前一直没有直接回答过。现在，当孟什维克公然转向立宪民主党人的时候，他们才比较大胆地宣称，掌握政权的应当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请听吧：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怪论”（无稽之谈）……这是“社会革命党观点的倾向”（见孟什维克的机关[13]刊物“当代”第四期第四页至第五页坡特列索夫的文章）。

不错，很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清楚地说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必需的。可是考茨基怎么能和坡特列索夫相比：谁都知道，坡特列索夫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考茨基倒不是！

另一个孟什维克补充道：

“责任内阁的口号会变成争取政权、争取把政权从官僚手中转到人民手中的口号。”（同上，◇21◇第三页柯里佐夫的文章）

由此可见，照柯里佐夫的看法，责任内阁的口号应当变成人民斗争的口号，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正应当在这个口号下进行斗争，他们不应当为民主共和制而应当为立宪民主党内阁流血牺牲。

孟什维克所称的人民夺取政权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想想看，原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有害的，立宪民主党人的专政倒是有益的！照他们的说法，我们要的不是人民专制，而是立宪

民主党人专制！

对了，对了！难怪人民的公敌立宪民主党人赞扬孟什维克！……

载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三日
“时报”[14]第二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2◇

无产阶级在斗争，
资产阶级在和政府缔结联盟

“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资产阶级……已经堕落到某个等级的水平……它一开始就有背叛人民而和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妥协的倾向。”

关于普鲁士的自由派，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

的确，革命还没有真正开展，德国自由派就和“最高当局”进行勾结。他们很快地勾结上了，后来就和政府一起反对工人和农民。大家知道，马克思多么尖锐而准确地揭露了自由派的这种两面性：

“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埋怨上层，害怕下层，对上层和下层都是利己主义的，而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利己主义，对保守派是革命的，对革命派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惧怕世界的风暴，但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它，失去任何毅力，全盘抄袭别人，它庸俗，因为它没有任何独特的东西，它的独特的东西就是庸俗，它自己和自己讨价还价，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肩负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招人咒骂的老头子……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完全是一个废物。三月革命后掌握◇23◇普鲁士国家政权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样子。”（见“新莱茵报”）[15]

现时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原来我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快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它“要和最高当局成立协议”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即所谓立宪民主党人，早就背着人民开始和斯托雷平秘密谈判了。如果他们

真的不背叛人民的利益，那末，这种谈判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立宪民主党人和“军法”大臣有什么可谈的呢？关于这一点，不久以前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报道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正在缔结联盟以便镇压革命。这一秘密联盟的条件是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人应当放弃各项反政府的要求，为此，政府将给几个立宪民主党人以大臣的席位。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叫屈，说并没有这回事。但事实表明的确有这回事。事实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跟右派和政府结成联盟了。

杜马中最近的一次投票不是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和政府的联盟，又是说明什么呢？请回顾一下事实吧。社会民主党人提议成立饥饿农民救济委员会。他们希望除了议员和官僚外，让人民自己也来从事饥民救济工作，自己来揭穿古尔柯和利德瓦里[16]之流的“英雄行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这一切都会加强议员和人民的联系，这一切都会使人民低沉的怨言具有自觉的性质。显然，谁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谁就一定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提议，把它看做有益于人民的办法。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做呢？他们支持了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呢？没有！他们跟十月党人[17]和黑帮分子一◇24◇致否决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提议。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盖森**回答社会民主党人说：“实行你们的提议就会引起人民运动，因此你们的提议是有害的。”（见“帆报”[18]第二十四号）斯托雷平给立宪民主党人以应得的报答说：“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我完全同意你们，你们是对的。”（同上）结果，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大多数劳动团分子。

这样，杜马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反对人民运动的阵营和拥护人民运动的阵营。前者包括黑帮分子、十月党人、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后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大多数劳动团分子等等。

这不是说明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和政府缔结了联盟，又是说明什么

呢？

可见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即宣传不要相信人民的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并号召对他们作斗争的策略，已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不仅如此。原来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所散布的上述传闻已完全证实。最近几天首都各报根据“可靠消息”报道，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和政府勾结好了。你们可知道，这种勾结的条件，原来连细节也被透露出来了。固然立宪民主党人否认这一点，但这不过是粉饰一下罢了。请听吧：

“‘今日报’[19]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报道，斯托雷平昨天在国家杜马中的演讲，对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决不是意外的事。关于这件事，首相、库特列尔……和代表右派中央的费多罗夫进行了一整天的预备谈判。这些人之间的决定性的协议是在‘言语报’[20]编辑部进行的，而维特◇25◇伯爵也曾打算前去…… 协议大致可归结为下列几点：（一）立宪民主党人公开和左派各党断绝一切关系，并在杜马内严守中间立场；（二）立宪民主党人放弃其土地纲领的一部分，使之接近于十月党人的土地纲领；（三）立宪民主党人暂时不坚持民族平等的主张；（四）立宪民主党人拥护借外债。其交换条件是答应立宪民主党人：（一）立宪民主党立即合法化；（二）……给立宪民主党人以下列各部大臣的席位：农业与土地调整部、国民教育部、工商部和司法部；（三）局部特赦；（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废除军事法庭的法案。”（见“帆报”第二十五号）

事情就是如此。

当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当工人和农民为了打倒反动派而流血牺牲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却和这个反动派缔结联盟来镇压人民革命！

立宪民主党人原来是这样的人！

他们要“保存”杜马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这就是他们不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成立饥饿农民救济委员会的提案

的缘故！

孟什维克对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所持的论点就这样破产了。

孟什维克所采取的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就这样破产了，自此以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就等于支持政府！

在紧要关头，只有觉悟的农民代表如社会革命党人等才会支持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这个观◇26◇点已证明是正确的。

很明显，我们也应当支持他们去反对立宪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也许还想继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吧？……

载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七日
“时报”第六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27◇

悼念捷里亚同志[21]

过分赞扬死去的同志，在我们党内已经成了一种风气。隐瞒弱点，夸大优点，是现时悼念文字的特色。这当然是不好的风气。我们不愿意顺从这种风气。关于捷里亚同志，我们要讲的只是真话，我们要向读者介绍捷里亚实实在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先进工人和党的工作者，捷里亚同志是一个毫无瑕疵、党所非常宝贵的人。一切最能表明社会民主党特色的东西：渴求知识、独立自主、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爱好劳动、道德高尚，——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捷里亚同志的身上。捷里亚体现了无产者最优良的品质。这并非言过其实。他的简历立刻就会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捷里亚同志并不是什么“学者”。他靠自修获得了知识，成了有觉悟的人。他从察岗村（捷里亚生于库泰依斯县察岗村）出来以后，在梯弗里斯一个私人家中当仆人。就在那里他学会了俄语，并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但他很快就讨厌仆人的职业，不久以后他进了铁路工厂的木工车间。这个工厂使捷里亚同志得益不浅。工厂是他的学校，在那里他成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在那里他受到锻炼而成为坚定的战士，也就在那里他成了一个有才干的觉悟的工人。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捷里亚在先进工人中已成了有声望的领导者之一。从一九〇一年梯◇29◇弗里斯游行示威[22]时起，捷里亚同志就不知休息地工作着。热烈地进行宣传，建立组织，参加重要会议，为获得社会主义知识而刻苦自修，——他的全部工余时间就是用在这些方面。警察追捕他，“打着灯”到处搜查他，但这一切只是更加增强他的毅力和斗争的渴望。捷里亚同志是一九〇三年游行示威(在梯弗里斯)[23]的鼓舞者。虽然警察跟踪追捕他，他还是高举旗帜，

还是发表演说。在这次游行示威以后，他便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从这一年起，他受组织的委托开始到南高加索各城市去“旅行”。同年，他受组织的委托到巴土姆去建立秘密印刷所。但他带着印刷器材到巴土姆车站时就被捕了，不久以后他被解到库泰依斯监狱。从这时起，在他的“不安定的”生活中开始了新的时期。捷里亚这一年半在监狱里并没有虚度。监狱成了他的第二个学校。由于经常学习、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并参加讨论，他的学识显著地增进了。就在那里，终于养成了他那种为许多同志所羡慕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性格。但也就是这个监狱给他打上了死亡的烙印，也就是这个监狱使他得了致命之症（肺痨），这种病终于把我们这位最优秀的同志的生命夺去了。

捷里亚虽然知道自己的健康已无可挽救，但并没有感到不安。唯一使他不安的是“虚度光阴，无所作为”。“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从心所欲地在广阔的天地间展开活动，重新看到人民群众，投入他们的怀抱，并为他们服务呵。”这就是这位被监禁的同志的理想。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过了一年半，他被转移到库泰依斯“小”监狱，但他立刻就从那里逃出而出现于梯弗里斯。这时党内已发生分裂。捷里亚同志当时是靠近孟什维克的，但是他完全不像那些“正统的”孟什维克，把孟什维主义奉为“可◇30◇兰经”，把自己当做正教徒而把布尔什维克当做异教徒。捷里亚也不像那些把自己形容成“天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先进”工人，这些人本是无知已极，却很可笑地叫嚷我们不需要知识，我们是工人。捷里亚的特性恰恰是：反对派别成见，痛恨盲目模仿，凡事都要寻根究底。正因为如此，他逃出监狱后就立刻钻研“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马尔托夫的“危急状态”、列宁的“做什么？”和“进一步，退两步”等书。只要看见过捷里亚当时读书的情形，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面黄肌瘦的捷里亚一边发愤读书一边微笑地说：“我看，要决定作布尔什维克还是作孟什维克，并不那么容易；在我没有研究完这些书籍以前，我的孟什维主义是建

筑在沙滩上的。”于是，捷里亚同志研究了必要的文献，深刻地考虑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衡量了这一切，以后他才说：“同志们，我是布尔什维克，照我看来，那些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无疑地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从此以后，他就成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使徒。根据组织的决定，他在一九〇五年到巴库去。建立印刷所，整顿各区组织的工作，参加领导机关，给“无产阶级斗争报”[24]写稿，——这就是捷里亚同志在那里做的工作。在那次众所周知的组织遭受破坏的时候，他也被捕，但这一回他又“脱逃”，重新赶回梯弗里斯。在梯弗里斯的领导机关工作一个时期后，他参加了一九〇五年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留给他的印象是很有意义的。他抱着极大的希望注视着党的未来，目光炯炯地说：为了这个党，我不吝惜最后的一分力量。但不幸的是，他刚从俄罗斯回来就卧病不起了。只是在这时他才开始真正写作。在患病期间他写了“我们需要什么”（见“新◇31◇生活报”[25]）、“陈尸和新尸”（答佐尔扎泽）、“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①、“为什么把我们称为布朗基主义者”等等。

他在临终前几天曾写信给我们说，他正准备写一本关于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历史的小册子，但是无情的死神从这个不知疲倦的同志手中过早地夺去了笔杆。

这就是捷里亚同志短短的然而充满着风暴的一生的经历。

惊人的才能、无穷的精力、独立的精神、对事业的热爱、英勇不屈的气概、宣传者的天赋，——这就是捷里亚同志的特点。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才能遇到捷里亚这样的人，只有无产阶

——————————————

① 上面两本小册子未能出版，因为在搜查时被警察抢去。——著者注

级才能产生捷里亚这样的英雄，也只有无产阶级才会竭力向吞噬了我们的同志——**工人捷里亚**的可恨制度复仇。

载于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时报”第十号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32◇

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快要结束了[26]。各派力量的对比逐渐明显起来了。很清楚，工业区大多数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区、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边区、乌拉尔，——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得到信任的地方。高加索、里海东岸边区、俄罗斯南部、“崩得”[27]势力地区内的若干城市、农民的组织“斯皮尔卡”[28]——这是孟什维克同志们汲取力量的地方。俄罗斯南部是孟什维克得到信任的唯一工业区。孟什维主义的其余据点大半是小生产的中心。

很清楚，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落后城市的策略，在那些地方，人们对革命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增长都是蔑视的。

很清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先进城市即工业中心的策略，在那些地方，人们对革命的深入和阶级意识的发展都是重视的……

有一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当时它带有知识分子的性质，还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当时党的政策是由某几个人执行的，无产者党员群众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今天却完全两样了。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党◇33◇员达二十万之多，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逐渐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把全俄国的革命民主派都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并使“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感到恐惧。而这个伟大的党之所以特别伟大和卓越，在于它的舵柄掌握在党员群众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个别的 “有教养的人物”手中。这一点在选举杜马时表现得最为清楚。当时党员群众抛弃了“权威人士”普列汉诺夫的提议，不愿和立

宪民主党人有一个“共同纲领”。固然，孟什维克同志们仍旧称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党就其大多数来说不是孟什维克的缘故吧。可是，既然在一千八百万无产者中仅拥有四十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权叫做无产阶级政党，那末在俄国九百万无产者中拥有二十万党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有权称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来，批判地对待它的旧“领袖”的吩咐。

最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会议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起了决定作用，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占代表总数的十分之九。两个代表会议都背弃了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旧领袖”的陈旧而不适宜的“指示”。两个代表会议都公开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必需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就这样表示了对孟什维克策略的不信任，承认了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

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出了整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声音。莫斯科和彼得堡领导着其余的城市。在◇34◇一月和十月的发动时期，指示是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发出的，在光荣的十二月的日子里，运动是由莫斯科和彼得堡领导的。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革命进攻的信号也一定会由这两个城市发出。

而彼得堡和莫斯科是采取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策略，——这就是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对俄国无产阶级所说的话……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八日
“时报”第二十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35◇

一 塌 糊 涂 ……

“标枪报”[29]的“政论家们”至今还不能决定自己的策略。他们在创刊号上曾写过他们所支持的只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措施”，而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本身。我们曾指出这是滑稽可笑的诡辩，因为孟什维克曾投票拥护被选入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只是拥护他们的“措施”；他们把立宪民主党人带进杜马，而不只是带进他们的“措施”；他们推举一个立宪民主党人为杜马主席，而不只是执行他的“措施”，——这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事实。这是如此明显，孟什维克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话是如此之多，再来否认这一事实就只有令人发笑了……

现在他们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又说出另一套来：不错，“在选举时我们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人”（见“标枪报”第三号），可是这只是在选举时，至于在杜马内，我们支持的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而只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措施”；你们却“不把杜马内的策略和选举时的策略区别开来看”。第一、只在杜马内防止干蠢事而在选举时却怂恿干蠢事的那种“策略”是非常可笑的。第二、孟什维克推举立宪民主党人为杜马主席，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推举立宪民主党人为主席，这应当算哪一种策略呢？算“杜马内的策略”呢，还是杜马外的策略？我们认为戈洛文是在杜马内被推举为杜马主席的，而不是在街◇37◇道上被推举为街道主席的。

显然，孟什维克在杜马内也实行了他们在杜马外所实行的那种策略。这种策略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如果他们现在否认这一点，这是由于他们思想一塌糊涂所致。

“标枪报”宣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并不等于抬高他们的声价，

否则，你们支持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抬高他们的声价了。这些“标枪报分子”真是爱开玩笑的人！原来他们没有料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任何支持都会替它所支持的那个政党抬高声价！因此，他们也就这样慷慨地说出各种“支持”的诺言……是的，可爱的同志们，社会民主党支持社会革命党人是会抬高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声价的，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支持**只是作为例外和作为使立宪民主党人失败的手段**才是可以容许的。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决不是我们的理想，而是用来压制立宪民主党人的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你们支持的恰恰是出卖工人和农民的立宪民主党人，比起这些人来，社会革命党人却有一个优点：他们靠近革命……

“比如说，立宪民主党人要求普选制。这本来是一种下策，因为这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要求。”（同上）

真是爱开玩笑的人！你们看，原来普选制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要求”呀！原来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竟不知道普选制并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要求，而是革命民主派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坚持这个要求比谁都更彻底！不，同志们，如果你们竟不能了解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革命民主派，如果你们竟不能◇38◇了解和他们作斗争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我们当前的问题，如果你们竟弄不清你们昨天说的是什么，今天说的又是什么，那末你们最好暂时把笔搁下，首先澄清一下自己一塌糊涂的思想，然后再来“批评”吧……

这样会更好些，我们拿杜马来赌咒……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十日
“时报”第二十六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39◇

我们高加索的小丑们

我们的文章惹得孟什维克的“标枪报”大发雷霆，——看来，斥责是命中要害了。这当然是非常有趣的场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写过，杜马之向右转并不使我们惊奇。为什么呢？因为在杜马内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已和政府结成联盟而和工人农民决裂了。这就是杜马软弱的一个原因。既然工人和革命的农民不跟随反革命的杜马走，既然他们也和杜马中的大多数决裂，这就是说，我国人民比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民更有觉悟。这是杜马软弱的又一个原因。我们对杜马的软弱和它的向右转就是这样解释的。

听了这番解释以后，我们的孟什维克竟吓得魂不附体了，于是他们惊惶地哀号：

“不对，假如布尔什维克的解释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只好把手一摊说，俄国的革命完了。”（见“标枪报”第六号）

可怜的人呵！他们相信自己的革命性竟不像相信立宪民主党人的革命性那样坚定！自由派叛变◇41◇了革命，因此革命就削弱了！原来工人和革命的农民只等于零。如果你们没有远大的眼光，那就活该你们倒霉！

他们甚至对自己也不忠实。例如一年半以前，这些孟什维克在“光线报”[30]上写的却是另外一套：

“十二月罢工使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并**使它变成了保守的**。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是**反对自由派**。革命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这要看谁是革命的推动者。**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袖当然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强大而忠实的同盟者，它是不能单独把革命

进行到底的，而**惟有农民**才是这样的同盟者。”（见“光线报”第十二号）

是的，孟什维克在抱着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时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当他们背向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他们就唱起另一种调子，宣布自由派是革命的中心，是革命的救星。

尽管事实如此，他们却有勇气要我们相信：高加索的孟什维克不是小丑，他们并没有披上社会民主党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立宪民主党的本质！

孟什维克说：“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干得比较勇敢，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解散后的第二天就在维波尔格宣言[①]上签了字，这应当怎样解释呢？

为什么他们今天不这样做呢？◇42◇

对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哲学**没有给予而且不能给予答复**。”（同上）

失魂落魄的同志们，你们安慰自己也是枉然的。我们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本届杜马之所以更加惨淡，是因为无产阶级现在比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更有觉悟，更加团结，这就把自由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方面去了。高谈自由主义的同志们，你们永远要牢牢记住，**无产阶级愈是自觉地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就愈是反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解释。

可爱的同志们，而你们究竟怎样解释第二届杜马的惨淡呢？

例如你们在“标枪报”第四号上写道，杜马的软弱和惨淡应当归咎于“人民的没有觉悟和没有组织”。如你们自己所说，第一届杜马比较“勇敢”，可见那时人民是“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第二届杜马比较惨淡，可见今年人民的“觉悟和组织”不如去年，可见，革命

———————————————

① 此注释见篇末。——本书制作者

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事业是倒退了！同志们，你们要说的不就是这些吗？可爱的人呵，你们不就是想借此来辩护自己倾向于立宪民主党人吗？

如果你们今后还要当小丑，那就活该你们和你们混乱的“逻辑”倒霉……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三日
“时报”第二十九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43◇

————————————

① 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后，杜马的一些代表（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于一九〇六年七月在维波尔格举行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号召人民在沙皇没有定期重新选举杜马以前，对政府采取不纳税、不服兵役的“消极抵抗”。——译者注。◇44◇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31]。解散它不是平平常常的，而是吵吵嚷嚷的，正和解散第一届杜马时一模一样。伪善的沙皇这次解散杜马也颁布了“解散宣言”，“深表惋惜”。同时颁布了“新选举法”，把工人和农民的选举权剥夺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发出“革新”俄国的诺言，这种“革新”当然要靠枪杀和靠第三届杜马来实现。一句话，不久以前解散第一届杜马时所干过的一切，这次又都搬出来了。沙皇简略地重演了一遍第一届杜马的解散……

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并不是没有原因，也决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本想通过杜马来和农民建立联系，想使农民由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政府的同盟者，这样来隔离无产阶级，孤立无产阶级，以便破坏革命事业而使革命的胜利成为不可能。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曾求助于自由资产阶级，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在那些无知的农民群众中暂时还有点影响。政府就是想通过自由资产阶级来和千百万农民建立联系。它就是想这样利用第二届国家杜马。

可是结果相反。第二届杜马的头几次会议就暴露出农民代表不仅不信任政府，而且不信任自由资产者的代表。在对一系列问题的表决中，这种不信任不断增长起来，终于发展到了公开敌视自由资◇45◇产阶级代表的地步。这样，政府就没有能够把农民代表团结在自由派的周围，因而也就没有能够通过自由派把他们团结在旧政权的周围。政府想通过杜马来联系农民并孤立无产阶级，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地，农民代表却愈来愈团结在无产阶级代表的周围，团结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周围，并且他们愈是疏远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就愈加坚决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这就大大便利了在杜马外把农民团结

在无产阶级周围这一事业。所以结果不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而是自由资产阶级和政府脱离了农民而陷于孤立（无产阶级团结了千百万农民，使他们紧紧地跟着自己走）；可见政府并没有如愿以偿，遭受破坏的不是革命事业，而是反革命事业。由于这种原因，第二届杜马的存在对政府就愈来愈危险了。于是政府“解散了”杜马。

为了更顺利地破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接近，为了在那些无知的农民群众中播下敌视社会民主党人的种子而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政府采取了两种办法。

第一、政府攻击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给它的成员捏造罪名，说他们号召立刻暴动，这样把他们说成是解散杜马的主要罪人。它说，亲爱的农民们，我们本来不想解散你们“心爱的杜马”，可是社会民主党人用暴动威胁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解散”它。

第二、政府颁布了“新选举法”，根据它，农民复选人名额缩减一半，缩减之数则加在地主复选人名额上，让后者在全体大会上选举农民代表；工人复选人的人数也几乎缩减一半（由二百三十七个复选人缩减至一百二十四个）；政府保留了“按地区、资格和民族”重新分配选民的权利，取消了任何竞◇46◇选宣传的自由，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为的是：不让革命的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进入第三届杜马；使杜马里尽是些自由主义的、反动的地主和厂主的代表；损害农民的代表权，不顾农民本身的愿望，使最保守的农民代表也能够当选，借此使无产阶级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公开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而政府自己就能公开接近农民。

这就是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真正目的。

大概自由资产阶级了解了这一切，所以它通过自己的立宪民主党人去协助政府。还在第二届杜马中，它就和旧政权勾结上了，一面又向农民代表讨好,力图孤立无产阶级。杜马解散的前夕,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米留可夫曾号召他的党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斯托雷平政府”

的周围，和它成立协议，向革命（实际上就是向无产阶级）宣战。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二个首领司徒卢威甚至在杜马解散以后还替那种把社会民主党代表“引渡”给政府处理的“主张”作辩护，号召立宪民主党人公开走上和革命作斗争的道路，跟反革命的十月党人合伙，孤立不安分的无产阶级并和它作斗争。立宪民主党默不作声，可见它是同意自己的首领的。

显然，自由资产阶级是了解目前形势的全部重要性的。

推翻沙皇政权的任务更加明确地摆在无产阶级面前了。请想一想吧。有过第一届杜马，也有过第二届杜马。可是，无论第一届或第二届都没有“解决”而且也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革命问题。一切依然如故：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全体公民没有政治自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沙皇◇47◇政权还没有死亡，它还继续存在，它在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以后，接着又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时组织反革命，力图破坏革命力量，使千百万农民离开无产者。但是革命的潜在力——城市中的危机和农村中的饥荒——继续在起作用，日益猛烈地激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日益坚决地要求解决我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沙皇政权的挣扎只有使危机尖锐化。自由资产阶级力图使农民离开无产阶级，这只能加强革命。很明显，不推翻沙皇政权，不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就不能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要求。同样很明显，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去反对沙皇政权和自由资产阶级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

推翻沙皇政权和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就是第二届杜马的解散所指给我们的道路。

和惯于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作斗争，和农民紧密联合起来，——这就是第二届杜马的解散所告诉我们的办法。

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自觉地走上这条道路，并光荣地完成革命领袖的使命。

载于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4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

（一个代表的札记）[32]

伦敦代表大会结束了。和那些自由派的无聊文人、形形色色的维尔格什斯基[33]之流及库斯柯娃[34]之流的希望相反，代表大会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党的分裂，而是进一步的团结，是全俄国先进工人的进一步统一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党。这是真正的全俄国的统一代表大会，因为我们的波兰同志、崩得同志和拉脱维亚同志第一次最广泛最全面地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们第一次积极地参加了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从而他们也就第一次把自己组织的命运和全党的命运最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伦敦代表大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结和巩固的事业。

这就是伦敦代表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成果。

但是伦敦代表大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同样和那些自由派的无聊文人的愿望相反，代表大会是以“布尔什维主义”对“孟什维主义”的胜利、以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对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胜利而结束的。当然关于各阶级和各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我们对它们的态度问题,在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所共知的。党的正式中央(按成分来说是孟什维克的中央)在一系列的行动中和整个◇49◇党抵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不妨回忆一下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中央委员会提出立宪民主党责任内阁的口号被党拒绝的事实，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一个中央提出的“恢复杜马常会”的口号也被党拒绝的事实，中央因第一届杜马被解散而发出的著名的总罢工的号召又被党拒绝的事实……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必须结束的。为此必须总结党对机会主义的中央所取得的实际胜利，即过去一年来我党发展历史中的种种胜利。于是

伦敦代表大会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所有这些胜利作了一番总结，巩固了这些胜利，并采纳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策略。

因此，今后党将奉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的红旗再不会倒向自由主义的狡辩家了。那种为无产阶级所不容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就是我党伦敦代表大会第二个同等重要的成果。

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全俄国的先进工人事实上联合成一个全俄国的统一的党，——这就是伦敦代表大会的意义，这就是它的一般性质。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次代表大会。

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

到会代表共约三百三十人，其中三百零二人有表决权，代表十五万以上的党员；其余代表只有发◇50◇言权。按派别来分，情形大致如下：（只指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九十二人，孟什维克八十五人，崩得代表五十四人，波兰代表四十五人，拉脱维亚代表二十六人。

从代表大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工人和非工人）来看，代表大会的情形如下：体力劳动的工人共有一百一十六人，办事员和店员二十四人；其余代表都不是工人。而体力劳动的工人按派别来分，其情形如下：布尔什维克派三十八人（百分之三十六），孟什维克派三十人（百分之三十一），波兰代表二十七人（百分之六十一），拉脱维亚代表十二人（百分之四十），崩得代表九人（百分之十五）。职业革命家按派别来分，其情形如下：布尔什维克派十八人（百分之十七），孟什维克派二十二人（百分之二十二），波兰代表五人（百分之十一），拉脱维亚代表二人（百分之六），崩得代表九人（百分之十五）。

我们大家对这个统计数字都感到“惊讶”。怎么回事呢？孟什维

克老是叫喊我们党的成分是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他们日夜谩骂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他们以驱逐一切知识分子出党相威胁，他们一贯蔑视职业革命家；可是他们这个派别的工人竟比“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少得多！他们的职业革命家竟比布尔什维克多得多！不过我们认为孟什维克的这种叫喊就是：“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

从代表的“地区分布”来看，代表大会成分的数字更加有趣。原来大批的孟什维克代表主要是农业区和手工业区派来的：古里亚（九个代表），梯弗里斯（十个代表），小俄罗斯农民组织“斯皮尔卡”（似乎是十二个代表），崩得（极大多数是孟什维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顿巴斯（七个人）。但大批◇51◇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却完全是大工业区派来的：彼得堡（十二个代表），莫斯科（十三个或十四个代表），乌拉尔（二十一个代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十一个代表），波兰（四十五个代表）。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

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

数字就是这样说明的。

不难了解，在洛兹、莫斯科或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中是不能认真地谈论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一事情的，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正和工人进行残酷的斗争，时常以部分解雇和纷纷歇业来“惩罚”工人，—— 在那里，孟什维主义是不得人心的，那里需要布尔什维主义，需要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反之，给古里亚的农民或什克洛夫的某些手工业者灌输阶级斗争的思想却是极困难的；他们没有感觉到阶级斗争的剧烈的、经常的打击，所

以他们乐意作任何妥协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那里，暂时还不需要布尔什维主义，那里需要孟什维主义，因为那里充满着妥协和调和的气氛。

从民族观点来看，代表大会的成分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统计数字表明孟什维克派大多数是犹太人（当然不算崩得代表），其次是格鲁吉亚人，再次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派绝大多数却是俄罗斯◇52◇人，其次是犹太人（当然不算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再次是格鲁吉亚人等等。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35]）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两个派别的成分如此，是不难解释的，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策源地主要是大工业区，除波兰外，都是纯粹俄罗斯人的区域；孟什维克的区域却是小生产的区域，同时是犹太人、格鲁吉亚人等等的区域。

至于说到出现在代表大会上的派别，那就应当指出代表大会之在形式上分为五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代表等等），只在讨论原则性的问题（关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等等问题）以前才保有一定的作用，固然，并不是很大的作用。从讨论原则问题时起，实际就不分什么形式上的派别了，而在表决时，代表大会通常分为两部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所谓中派或泥潭派在代表大会上是没有的。托洛茨基成了“漂亮的废物”。而且全体波兰代表都明确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大多数拉脱维亚代表也明确地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大多数的崩得代表事实上总是支持孟什维克，而形式上却十足地奉行了两面政策，这种政策使一方面喜欢，另一方面恼怒。卢森堡同志非常艺术地描述了崩得的这种政策。她说崩得的政策不是能影响群众的成熟的政治组织的政策，而是小商人的政策；这种小商人永远在观望，永远在等待明天糖也许会跌价。崩得代表中只有八个

到十个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且不是经常的。◇53◇

一般说来，优势，相当大的优势，是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可见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的，虽然并不很突出地是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只通过了有关游击活动的决议，并且是完全偶然通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应战，确切些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种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

二 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

从代表大会的政治派别来看，代表大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一些形式问题的讨论，如代表大会议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等。这些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但它们都和某些派别的“荣誉”、和“千万别得罪”某些派别“千万别引起分裂”的想法直接或间接联系着，所以叫做形式问题。代表大会的这一部分工作进行得最热烈，耗费的时间也最多。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道德”上的考虑（“千万别得罪”）重于原则上的考虑，所以严格固定的政派并没有形成，当时不能立即猜出“谁将占上风”，各个派别都想拉拢“谨慎的中立分子”而醉心于疯狂地争夺优势。

第二部分：关于原则问题的讨论，如关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原则问题。在这里已经没有“道德”上的考虑，各派按照严格固定的原则主张而形成了固定的政派，各派之间的力量◇54◇对比立刻清楚地显现出来；所以代表大会的这一部分工作进行得最心平气和，最有成果，这鲜明地证实了，讨论时的原则性是代表大会的工作获得成果和得以心平气和进行的最好保证。

现在我们简略地谈谈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分工作。

普列汉诺夫同志致开幕词，指出“有时”必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分子”成立协议；以后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五个人（每派一人）组成的主席团，选出了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而拟定了议事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和在去年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一样，非常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把对时局的估计问题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阶级任务问题列入议程的提议。革命在走向高潮呢还是在走向低潮，根据这种情况，应当把革命“取消”呢还是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使自己和俄国社会其他阶级划清界限的阶级任务是怎样的，——这都是孟什维克同志们所害怕的问题。他们像阴影不敢和太阳见面一样逃避这些问题，他们不愿把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公之于世。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派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因为孟什维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派别，孟什维主义是许多派别的混合物，这些派别在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派别斗争时不容易看出来，但当从原则上提出时局问题和我们的策略问题时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孟什维克不愿暴露自己派别内部的这个弱点。布尔什维克知道这一点，为了使讨论具有更高的原则性而坚持把上述问题列入议程。孟什维克看出原则性可以制他们的死命，便开始顽强抵抗并向“谨慎的同志们”示意说他们会感到“委屈”，于是代表大会没有把时局等问题列入议程。最后通过了下面的议事日程：中央委员◇55◇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杜马问题、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工会问题、游击活动问题、危机、同盟歇业和失业现象、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36]、组织问题。

——————————————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问题，主要报告人是马尔托夫同志（代表孟什维克）和略多沃依同志[37]（代表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报告本来就不是认真分析各种现象的报告，而是一场倾心的谈话，

说无过的中央曾怎样从事领导党的工作，然后怎样从事领导杜马党团的工作，而“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又怎样用他们的原则性来麻烦中央，妨碍中央的活动。关于中央所提出而后来没有被党采纳的成立立宪民主党责任内阁、“恢复杜马常会”等等口号，马尔托夫曾辩护说，当时的局势不稳定，而且在沉寂时期不能提出其他口号。关于中央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立即发出总罢工而后来又发出局部发动的不成功的号召，马尔托夫还是用情况不稳定和不可能准确判定群众情绪这一理由来作辩护。关于中央在彼得堡组织的分裂[38]上所起的作用讲得很少。可是关于根据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倡议而召开的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却讲得非常之多。照马尔托夫的意见，这个代表会议在党的组织中引起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报告结束时，马尔托夫号召代表大会注意由于时局特别复杂和混乱而造成的党的领导工作的困难条件，不要对中央要求过苛。显然，马尔托夫自己承认了中央有严重的罪过。

略多沃依同志的报告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照他的意见，党中央有责任：（一）维护和实行党◇56◇纲；（二）实现党代表大会给它的策略指示；（三）保持党的完整；（四）把党的有益的工作统一起来。可是中央对于这些责任一项也没有执行。中央本应维护和实行党纲，可是在第一届杜马的著名的土地宣言[39]问题上却向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提议，为了统一反对派，为了争取立宪民主党人，不要把我们土地纲领中关于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的著名条款列入杜马的宣言，而只限于简单地声明主张让出土地，不说明要不要赎金。

请想一想：党中央竟提出去掉党纲中没收土地这一极重要的条款。中央破坏了党纲！中央是党纲的破坏者，这种闻所未闻的可耻的事情，你们想得到吗？

其次，中央委员会不但不遵行统一代表大会的指示，不但不经常加强各党派在杜马内部的斗争使杜马外的阶级斗争更有自觉性，不但不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的严格的阶级政策，反而提出成立立宪民主党

责任内阁、“恢复杜马常会”、“拥护杜马，反对权奸”等等口号，借以冲淡党在杜马中的斗争，模糊杜马外的阶级矛盾，抹去无产阶级的战斗政策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之间的一切界限而使前者适应后者。并且当中央机关报编委之一因而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更进一步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向党提议跟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抛弃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提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采纳的“全权的杜马”的口号时，中央不仅没有抗议普列汉诺夫同志这种侮辱党的轻举妄动，反而表示赞同，不过不敢正式表示自己的赞同罢了。

党中央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和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两者的起码要求！◇57◇

中央在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中央在使无产阶级的政策服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央在使无产阶级的旗帜倒向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骗子，——请看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把我们弄到了何等地步！

至于中央委员会不仅没有保持党的统一和纪律，反而经常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自己带头分裂彼得堡的组织，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也不愿多谈中央没有把党的工作统一起来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有这一切，中央的这一切错误由于什么呢？当然不是由于那些“可怕的”人物参加了中央的会议，而是由于当时充满了中央的孟什维主义没有能力领导党，它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已经彻底破产了。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央的全部历史就是孟什维主义破产的历史。当孟什维克同志责备我们，说我们“妨碍了”中央，说我们“麻烦了”中央等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回答这些爱讲道德的同志们：是的，同志们，我们“妨碍了”中央来破坏我们的纲领，我们“妨碍了”中央来使无产阶级的策略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口味，而且今后我们还要妨碍它，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略多沃依同志所讲的大体上就是如此。

在讨论中已经弄清，大部分同志，甚至某些崩得代表，都赞同略多沃依同志的观点。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指出中央错误的决议终究没有通过，这无非是因为“千万别引起分裂”这种顾虑大大影响了同志们。当然，孟什维克的信任中央的决议也没有通过。于是大会对中央的工作没有作出估计就直◇58◇接转到下一个问题了……

——————————————

对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讨论，一般说来，就是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的重复。这也很明白，杜马党团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自然，批评或捍卫中央也就是批评或捍卫杜马党团。

第二报告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第一个报告人是策烈铁里同志）的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照他的说法，杜马党团（孟什维克占多数）的口号，即统一杜马中的反对派、不要分裂反对派、必须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走的口号，——这一孟什维克的口号在杜马中完全破产了，因为在最重要的问题如预算、军队等等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都和斯托雷平一道走，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就不得不和农民的代表携起手来反对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自己立场的破产，并在杜马中实行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必须引导农民的代表去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

波兰同志的意见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说，不能容许杜马党团同人民党人[40]一起开会，因为这些波兰黑帮分子曾一再组织而且现在还在组织屠杀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暴行。对于这一点，高加索孟什维克的两个首领[41]相继回答说，对于杜马党团重要的不是各个政党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而是它们在杜马中的表现怎样，人民党人在杜马中却多少表现着自由主义的态度。原来要鉴别各个政党，不应当根据它们在杜马外做些什么，而应当根据它们在杜马内说些什么。这种机会主义真是登峰造极了……◇59◇

大多数发言人都同意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观点，但是关于这个问

题仍然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这又是考虑到“别得罪”的缘故。代表大会把决议问题搁下，直接转到了下一个问题。

三　关于非无产阶级的政党

现在我们从形式问题转到原则问题，转到我们意见分歧的问题。我们策略上的意见分歧的问题，就是我国革命可能遭到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各阶级和各政党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应当是粉碎农奴制度，而不是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它只能以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完成，这一点大概在我们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其次，我国革命，整个说来是在走向高潮，而不是走向低潮；我们的任务不是“取消”革命，而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大家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因为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派别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但是，怎样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呢？无产阶级、农民、自由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怎样呢？各种斗争的力量要怎样配合才能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呢？联合谁？打击谁？如此等等。我们的意见分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孟什维克的意见。既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惟有资产阶级才能是革命的领袖。资产阶级曾是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曾是欧洲其他国家革命的领袖，所以它也应当是我们俄国革命的领袖。无◇60◇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战士，但是它应当跟着资产阶级走，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农民也是革命的力量，但是农民的反动东西太多，所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就该大大少于和民主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对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比农民更可靠的同盟者。一切斗争的力量都应当以民主派的自由资产阶级为领袖而团结在它的周围。因此，决定我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不应当是革命的原理：以无产阶级为首、和农民一起反对政府和自由资产阶级；而应当是机会主义的原理：以自由资产阶级为首、和一切反对派一起反对政府。

由此就产生了和自由派妥协的策略。

孟什维克的意见就是如此。

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我国革命确实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还不是说，革命的领袖将是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法国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无产阶级当时是软弱的，它没有进行独立自主的行动，它没有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它既没有阶级觉悟又没有组织，它当时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所以资产阶级就利用它作为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目的的工具。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当时并不需要国王政府做同盟者来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仆人，所以资产阶级当时是能够革命的，甚至能领导革命。我们俄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俄国无产阶级决不能说是软弱的：它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完全独立自主地行动已经有好几年了；它已经具有了解自己的利益的足够的阶级觉悟，它已经结成自己的政党，它有一个在俄国最强大的具有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原则、组织原则的政党；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它已经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许多辉煌的胜◇61◇利…… 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无产阶级能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尾巴的角色，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手中的可怜工具的角色呢？它能不能、应不应跟着资产阶级走，奉它为自己的领袖呢？它能不能不做革命的领袖呢？请看看我国自由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情形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我国资产阶级，不但不去领导革命，反而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和反革命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我国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则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和斯托雷平妥协，投票赞成有利于沙皇制度反对人民革命的预算和军队的提案。因此，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力量，必须和这种力量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这不是很明白的吗？考茨基同志说，在无产阶级独立自主行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 他说得不对吗？

总之，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

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我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它既关切俄国革命，又能引导俄国的革命力量去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全国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有它才能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培养无产阶级去起革命领袖的作用。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实质。

在把我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事业中，究竟谁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呢？对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是：无产阶级唯一比较可靠的强有力的同盟者就是革命的农民。将要和无产阶◇62◇级共同作战以反对农奴制度的一切基础的，不是惯于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而是革命的农民。

根据这一点，确定我们对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的应当是这样的原理：以无产阶级为首、和革命的农民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自由资产阶级。因此就有必要反对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也就不容许和立宪民主党妥协。

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就是如此。

报告人列宁和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一切发言人的讲话都没有超出这两个立场的范围。

马尔丁诺夫同志既然绝对否认可以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并绝对拥护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主张，也就彻底“加深了”孟什维克的观点。

其他极大多数发言人的讲话都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立场的精神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同志的演说。她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向代表大会致贺并说出我们的德国同志对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看法（这里我们把卢森堡在不同时间发表的两次演说合在一起来谈）。关于无产阶级起革命领袖的作用、关于自由资产阶级起反革命力量的作用等问题，卢森堡完全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她批评了孟什维主义的首

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把他们的立场比作法国饶勒斯派的立场。卢森堡说：我知道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失策、怪脾气、过分的强硬，但是我完全了解他们并为他们辩护，因为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这种暧昧不明模棱两可的东西是不能不强硬的。法国的盖得派[42]也表现过这种过分的强硬，他们的领袖盖得同志在著名的竞选◇63◇招贴中宣称：“任何一个资产者也不许投票选我，因为我在议会中将只维护无产者的利益，反对一切资产者。”尽管如此，尽管这些话这样激烈，在盖得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反对饶勒斯派的斗争中，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总是站在盖得派方面。对于布尔什维克也必须这样说，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支持他们反对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

卢森堡同志所说的大致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卢森堡同志宣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给代表大会的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劝告党去和自由主义**进行斗争**，承认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俄国革命领袖的特殊作用，因而也就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

因此显而易见，欧洲最有经验的和最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地明确地支持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反对**孟什维克。

主席团中波兰代表团的代表梯什科同志演说中的某些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梯什科同志说，两个派别都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容易了解：究竟是谁站在这个立场上，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几个孟什维克“从左面”插嘴说：“是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梯什科回答他们说：“不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这个立场上，因为你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这个事业中完全无能，你们只会死记伟大的马克思的伟大的词句而不会运用这些词句，这一切都说明你们不是站在

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64◇

这说得真够艺术。

的确如此，就拿下面的事实来说吧。孟什维克常常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无产阶级变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这对不对呢？无疑是对的！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时时刻刻都应当记住的马克思一句伟大的话。但是，孟什维克同志怎样应用这句话呢？他们是否在促使无产阶级从它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群众中实际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自主的阶级呢？他们是否在把革命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是否在培养无产阶级去起革命领袖的作用呢？事实表明孟什维克根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孟什维克劝告无产阶级更经常地去和自由资产阶级成立协议，因此他们就不是促使无产阶级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阶级，而是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孟什维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领袖的作用，把这个作用让给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因此，他们就不是促使无产阶级变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而是促使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这就是说，孟什维克所做的和他们根据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应当做的恰恰相反。

是的，梯什科同志说得对：孟什维克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

讨论结束后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中布尔什维克的草案被大会以极大多数票通过作为决议的基础。

接着，大会进行修正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约八十件，主要是针对草案中的两项：一项是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另一项是关于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力量。这是讨论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因◇65◇为这里特别鲜明地暴露了各个派别的面目。第一个重要的修正案是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他要求以“无产阶级是**先锋队**”的字句代替“无产阶级是革命**领袖**”的字句。他的理由是“先锋队”一词能更

确切地表达意思。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反驳了他。他说，问题不在于确切与否，而在于这一项中表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因为“先锋队”和“领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先锋队（先进部队），这就是在前列作战，站在受射击最厉害的地方，流血牺牲，同时却**受别人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因为先锋队从来不领导总的斗争，而总是受别人的领导。相反地，作为领袖，这就是不仅在前列作战，而且**领导总的斗争，引导**这个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布尔什维克不愿让资产阶级民主派来领导无产阶级，我们要使无产阶级自己去领导人民的全部斗争，引导这个斗争达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的。

结果，马尔托夫的修正案被否决了。

其他这类性质的修正案同样被否决了。

另一部分修正案是针对关于立宪民主党人这一项的。孟什维克提议承认立宪民主党人还没有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但是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议，所有这类性质的修正案都被否决了。接着孟什维克提议容许在某种情况下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哪怕是技术性的协议。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这个提议，否决了与此有关的修正案。

最后，整个决议提付表决，结果一百五十九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一百零四票反对，其余的◇66◇弃权。

代表大会以极大多数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从此，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成了党的观点。

此外，这次表决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这次表决使代表大会不再形式地、人为地划分为五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代表、拉脱维亚代表、崩得代表），而开始了新的、有原则的划分：布尔什维克派（其中包括全体波兰代表和大部分拉脱维亚代表）和孟什维克派（其中几乎包括一切崩得代表）。

第二、这次表决得出了工人代表在两派中分布状况的最精确的统计数字：已经弄清布尔什维克派中的工人代表不是三十八个，而是七十七个（三十八个加二十七个波兰代表，再加十二个拉脱维亚代表）；孟什维克派中的工人代表不是三十个，而是三十九个（三十个加九个崩得代表）。原来，孟什维克派是知识分子的派别。

四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

在说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情形以前，必须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①，因为这个问题是极端错综复杂的，没有弄清的。在我们意见分歧的其他问题上，党内已有两个极其明确的派别，即布尔◇67◇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而在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上，我们有着不是两个，而是一大堆完全没有弄清的和彼此对立的派别。的确，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团结的，明确的：他们根本反对工人代表大会。然而孟什维克的行动是极端混乱的：他们分成了许多集团，各唱各的调子，谁也不理谁。以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来**建立党**。以艾里为首的莫斯科的孟什维克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却不是为了建立党，**而是为了建立非党的“全俄工人联合会”**。以拉林[44]为首的南方的孟什维克扯得更远，他们号召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既不是为了建立党，也不是为了建立“工人联合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除一切无产阶级分子外，还可包括社会革命党分子、半资产阶级分子和“劳动团”分子的**更加广泛的“劳动联合会”**。至于其他影响比较小的集团和个别人物，如敖德萨和里海东岸

———————————————

① 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在于转到资产阶级报纸编辑部里去的孟什维克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散播了许多谎言（见“同志报”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写的，并在“‘巴库之日’报”[43]上转载过）。

地区的小集团，如一本可笑的小册子的傻头傻脑的“作者”即所谓“流浪汉”和 “舒拉”[45]，那就不用提了。

孟什维克队伍中的混乱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工人代表大会怎样召开，怎样组织，选什么日子召开，请谁参加，由谁发起召开呢？

在这些问题上，也和在代表大会的目的问题上一样，在孟什维克中间显得一团混乱。◇68◇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提议把工人代表大会的选举和杜马的选举联系起来，从而用“强制手段”组织工人代表大会；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指望政府的“放任”，不得已时就请求政府的“许可”；第三部分人却建议把代表送到国外去，哪怕是三四千人也罢，就在那里秘密举行工人代表大会。

一部分孟什维克提议只让正式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另一部分则主张人数不下一千万的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无产阶级一律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一部分孟什维克提议由社会民主党发起召开有知识分子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另一部分则主张把党和知识分子撇开，而只由工人自己发起召开完全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的代表大会。

一部分孟什维克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另一部分则提议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暂时只限于宣传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

那末，对现存的社会民主工党怎么办呢？这个党领导无产阶级斗争已达数年之久，在自己队伍中团结了十五万党员，已经开过五次代表大会，如此等等。“把它一笔勾销”呢，还是另有什么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的孟什维克从阿克雪里罗得到拉林，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没有无产阶级的党**。“问题正在于我们没有党”，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向我们说，**“我们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必须通过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党来代替这个组织。孟什维

克的报告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可是对不起，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党历次的代表大会，从第一次（一八九八年）到最近一次（一◇69◇九〇七年）的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同志一直极热烈地参加组织的历次的代表大会；无产阶级的这一切财力和人力的巨大耗费，为组织代表大会所必需的这种耗费，孟什维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要负责的这种耗费，——这一切，难道说都是骗局和作假吗？！

党对无产阶级发出的所有这些战斗的号召，孟什维克也签了字的号召；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时常由党发起而爆发的所有这些罢工和起义；无产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获得的所有这些胜利；**在**党的**旗帜下**，**为了**党而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街头殉难的，在西伯利亚过着囚禁生活的，在狱中受着残害的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牺牲者，——所有这一切，难道说都只是喜剧和骗局吗？

难道说我们没有党吗？我们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吗？

当然，这简直是谎话，令人愤怒的无耻的谎话。

大概也就因为这一点，阿克雪里罗得的上述声明引起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代表的无限愤怒。这些工人代表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坚决地回答报告人阿克雪里罗得说：“正是你这个老待在外国的人是资产者，我们却不是；我们是工人，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不允许你侮辱这个党”……

可是，假定说工人代表大会能够举行，假定它已经举行，因而现存的社会民主党就被送到档案库里去了，工人代表大会不管怎样是召开了，在代表大会上就要组织一个什么“工人”联合会或者什么“劳动”联合会了。以后究竟怎样呢？这个代表大会会通过什么样的纲领呢？工人代表大会的面目◇70◇将是怎样的呢？

一部分孟什维克回答说，工人代表大会可能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是要删削一些的；可是他们立刻又补充说，工人代表大会也可能不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认为这对于无产阶级并不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另一部分人则更坚决地回答说，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带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工人代表大会就很可能不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而通过**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在工人代表大会上无产阶级将失去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可是它将因此而得到一个把所有工人结合在一个联合会中的工人组织。例如莫斯科孟什维克的首领切列万宁就是这样说的（见“策略问题”）[46]。

总之，“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工人联合会”，——这就是工人代表大会的可能成果。

至少孟什维克自己是这样想的。

显然，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目的和方法的某些问题，孟什维克的意见是互不一致的，他们一致的是：“我们没有党，而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必须把这个组织送进档案库去**”……

阿克雪里罗得的报告也正是在这个范围内兜圈子。

从阿克雪里罗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实际上必然要变成**反**党的宣传，变成对党作战。

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也必然要变成对我们现在的党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实际工作。

可是孟什维克通过他们的报告人和他们的决议草案，请求党代表大会**禁止**那种反对组织工人代◇71◇表大会的**宣传**，即禁止反对破坏党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发言人（普列汉诺夫除外，因为他根本没有谈到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的演说中所特别强调的是打倒党、打倒社会民主党、无党无派万岁、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万岁一类的口号。虽然这些口号不是由发言人公开提出的，却从他们的

演说中透露出来了。

无怪乎所有资产阶级的文人，从工团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到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都这样热烈拥护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要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党的敌人，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会大大削弱党，破坏党。他们怎么会不欢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呢？

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所讲的却完全不同。

布尔什维克的报告人林多夫同志[47]简略地指出了孟什维克中各个主要派别的特点以后，进而说明产生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的各种条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是在一九〇五年，即在十月事件前的反动高压时期开始的。在十月、十一月间，这种宣传停止了。在反动高压重新开始后的几个月中，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又活跃起来。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在比较自由的日子里，这种宣传沉寂了。后来，在杜马解散以后又加紧起来，如此等等。结论是明显的：在比较自由的日子里，在党有可能自由扩大的时候，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建立“广大的非党的党”的宣传自然就失去了基础；反之，在反动高压、党员纷纷退党而不是新党员大批入党的时候，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即采取人为的办法来扩大狭隘的党或代之以“广大的非党的党”的宣传，就获得一定的基础。可是不言而喻，◇72◇任何人为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因为要真正扩大党，需要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工人代表大会，因为工人代表大会本身还需要这种自由呢。

其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具体说来，是根本荒谬的，因为这种主张所依据的不是事实，而是不正确的论点：“我们没有党”。问题在于我们有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大声疾呼，说明自己的存在，这个党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非常头痛，——这一点孟什维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正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党，正因为如此，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根本是荒谬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拥有十五万以上先进无产者并领导着几十万战士的党，如果我们只是影响很小的一

小群人，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或七十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那样，那末我们自己就会竭力设法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便从这个代表大会中挤出一个社会民主党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党，有了在群众中有巨大影响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党，所以为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建立幻想的“非党的党”，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首先要“取消”现存的党，首先要毁掉现存的党。

正因为如此，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实际上就必然要变成破坏党的工作。而能否在某个时候建立起“广大的非党的党”来代替党，是否需要建立这样的党，这还是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才这样热心赞扬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

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才认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危险的，有害的，因为这种工作会破◇73◇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会使群众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

林多夫同志所说的大致如此。

拥护工人代表大会而反对社会民主党呢，还是拥护党而反对工人代表大会？

问题就这样摆在党代表大会的面前。

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立即了解了这个问题，并坚决地起来“保护党”。他们说：“我们是党的爱护者，我们爱自己的党，我们不允许萎靡不振的知识分子破坏党的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卢森堡同志完全赞同布尔什维克。她说：“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能了解孟什维克同志的可笑的张皇失措，他们在摸索着寻找群众，而群众自己却在寻找党，紧紧地向党靠拢。”……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极大多数的发言人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在讨论结束以后，大会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和孟什维克的决

议草案提付表决。其中布尔什维克的草案被通过作为决议的基础。带原则性的修正案几乎都被否决，通过的只有一个多少还算重要的修正案，即反对限制自由讨论工人代表大会问题的修正案。全部决议说明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会使党遭受破坏”，“会使广大工人群众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说明了这个主张本身对无产阶级是有害的。同时这个决议把工人代表大会跟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代表大会严格地区别开来。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代表大会不仅不破坏党，不仅不和党竞争，反而会巩固党，跟着党走，帮助◇74◇党解决革命高潮时期的各种实际问题。

最后，全部决议以一百六十五票对九十四票的多数被通过。其余代表弃权。

这样，代表大会就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个有害的、反党的主张抛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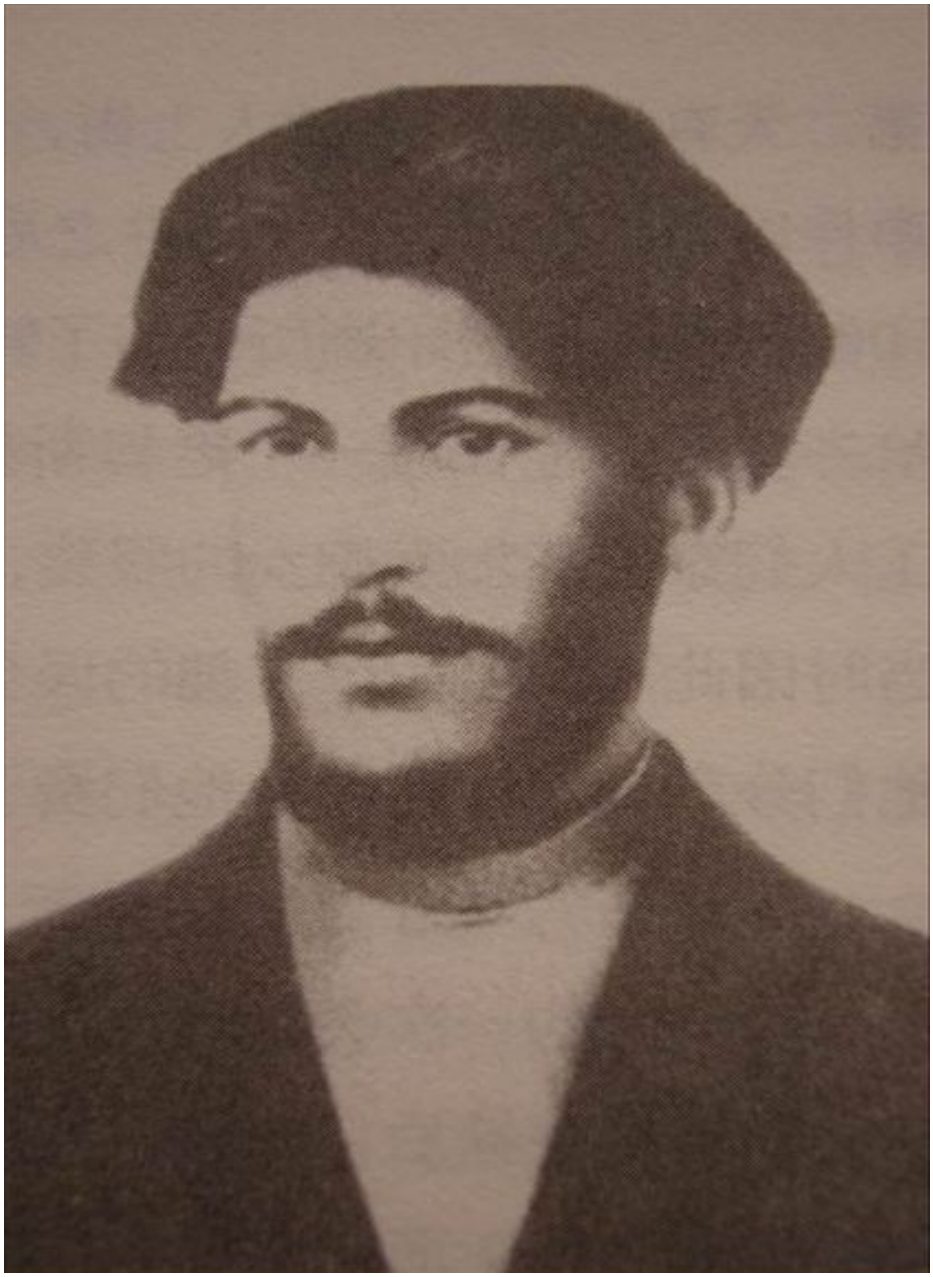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的表决给我们揭示了如下的重要现象：参加表决的一百一十四个工人代表中，赞成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原来只有二十五人，其余都投反对票。按百分比计算，工人代表中百分之二十二赞成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百分之七十八反对。特别重要的是：在赞成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九十四个代表中，工人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知识分子却占百分之七十四。

要知道，孟什维克老是叫喊，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工人的主张，只有“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才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等等。如果根据这次投票来判断，那最好应当承认：相反地，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知识分子幻想家的主张……

要知道，甚至工人中的孟什维克显然也不是都赞成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在三十九个工人代表（三十个孟什维克加九个崩得代表）中，赞成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只有二十四人。

一九〇七年于巴库

第一次载于一九〇七年
六月二十日和七月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创刊号和第二号
署名：柯巴·伊万诺维奇◇75◇



巴库时期的斯大林

给第三届国家杜马
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

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库市
工人选民团初选人大会通过[48]

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应当组成一个特别的党团，这个党团作为党的组织之一，必须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中央的指示。

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基本任务就是协助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以便使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使无产阶级完成它在俄国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应当担负的政治领袖的使命。

为了这个目的，党团在一切场合下都应当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政策，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其他一切组织和一切革命党派（从立宪民主党人起到社会革命党人止）。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和杜马中任何党派在对付政府方面保持一致行动而抛弃这个任务。

我们的代表应当在杜马中坚持不懈地揭露各种地主黑帮政党和惯于叛变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反革命实质。另一方面，他们应当竭力使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社会革◇77◇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劳动团分子）摆脱自由派，推动它们走上彻底的民主革命政策的道路，领导它们进行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和反动的假社会主义的空想作斗争，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党派利用这些空想来掩盖他们那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用这些空想来模糊工人阶级纯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我们的党团应当借杜

马讲坛向全国人民阐明目前革命的全部真实情况，应当大声疾呼地向人民说明，在俄国不可能用和平方法求得人民的解放，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全体人民起来反对沙皇政权。

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就是召开由全体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在彻底推翻沙皇专制政体后，将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口号，社会民主党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新的公开斗争。自由资产阶级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口号而提出的其他任何口号，如责任内阁等等，都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团所能接受和支持的。

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参加国家杜马的日常立法工作和其他活动时，应当追求的是完成自己的经常批评和经常鼓动的任务，而不是直接立法的目的，同时要向人民说明，当实权还全部操在专制政府手中时，立法是完全不可靠的和毫无效果的。

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能这样工作，就会有助于无产阶级和跟它一道的农民目前在杜马外所进行的反对沙皇专制政体的革命斗争。

一九〇七年九月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78◇

应当抵制协商会议![49]

关于参加或抵制同石油业主举行的协商会议的问题在我们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做才算合理的实践问题。我们不能像某些被激怒的和不完全正常的“个人”所提议的那样，对任何协商会议一概加以抵制；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像我们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型的同志们所想像的那样，对协商会议一概决定参加。我们应当根据活的事实，而且只能根据事实来处理参加或抵制的问题。并且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在某种实际情况下，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团结群众的任务使参加成为必要，那时我们就一定参加协商会议；反之，在另一种条件下，同样的任务却可能使抵制成为必要，那时我们就一定抵制协商会议。

其次，为了避免发生混乱，我们必须预先确定我们所运用的概念。“参加”协商会议是什么意思呢？“抵制”协商会议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各种会议上说明共同的要求，选举初选代表等等，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协商会议，相反地，是为了参加协商会议，以便遵照协商会议的规章，依据这种规章去和石油业主进行谈判，并在最后订立某种合同，那末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这种行为叫做参加协商会议。但是，如果我们拟定要求，选出初选代表来更好地说明这些要求，传播并公布已经拟定的◇79◇要求，目的不是为了参加同石油业主举行的协商会议，而是为了破坏协商会议，破坏**在斗争前**和石油业主订立任何合同（我们认为**在斗争后**，特别是在胜利的斗争后，订立合同是必要的），那末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这种行为叫做抵制协商会议。当然这是积极的抵制，因为这种抵制最后会破坏协商会议。

同时，决不应当把对付杜马的策略和对付协商会议的策略混为一

谈。参加或抵制协商会议是为了准备条件以改善**石油业中**现存的制度，而参加或抵制杜马则是为了**改善国内**一般的状况。协商会议的命运完全是由当地的无产阶级**独自**决定的，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协商会议自然就开不起来，而参加或抵制杜马的命运则不单由无产阶级决定，还要由农民决定。最后，积极的抵制（破坏）协商会议即使没有积极的发动也能顺利实现，至于抵制杜马，其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一般意见已经说明了。现在我们来谈谈抵制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这个具体问题。

巴库工人经济斗争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到最近为止的斗争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活动人物是机电工人，而油矿工人[50]则幼稚地轻信地跟着机电工人走，就像跟自己的领袖走一样，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石油业主在这个时期的策略可以说是向机电工人讨好的策略，向机电工人一贯让步而对油矿工人一贯不理的策略。

第二个时期是以油矿工人的觉醒、他们在舞台上的独立活动、同时把机电工人排挤到次要地位而开始的。可是这种活动带着滑稽可笑的性质，因为：（一）它所要求的没有超越可耻的奖金的范围，◇80◇（二）它染上最有害的、不信任机电工人的色彩。石油业主竭力利用已经改变的情况并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不再向机电工人讨好了，他们不再竭力笼络机电工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油矿工人是不会总跟着机电工人走了。相反地，石油业主自己却竭力挑拨机电工人举行**没有油矿工人**参加的罢工，借以表明机电工人的力量相当薄弱并使他们俯首听命。与此同时，从前丝毫不注意油矿工人的石油业主，现在却极其厚颜无耻地向油矿工人讨好，用奖金来拉拢他们。石油业主竭力用这种方法使油矿工人完全离开机电工人，使他们完全腐化，使他们慢慢养成一种对石油业主唯命是听的心理，使他们以讨价还价和苦苦哀求的“原则”代替不调和的斗争的原则，从而使

任何重大的改善都成为不可能。

就是为了这些目的，他们才“想出了”这次协商会议。

由此可见，先进同志当前的任务就是为争取油矿工人而进行殊死的斗争，为争取油矿工人团结在机电工人同志的周围而进行斗争，**办法就是把极不信任石油业主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意识中去，消除他们头脑中的讨价还价和向人乞怜的有害成见**。我们应当向初次登场表演并且表演得如此笨拙可笑（“别什凯什”[51]及其他）的油矿工人群众大声疾呼地说明（用事实说明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明！）：生活的改善不是可以从上面、不是可以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得到的，而是要从下面、要用和机电工人一道进行斗争的办法得到的。

只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协商会议的问题。◇81◇

所以我们认为，现时，在总斗争之前，当局部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当总斗争还在前面的时候，当石油业主还在滥发奖金、企图使油矿工人离开机电工人并腐蚀他们幼弱的意识的时候，在这时候“**参加协商会议**”，参加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号召工人和石油业主一起订立双方必须遵守的合同，那就不是消除而是巩固群众头脑中“别什凯什”的成见。这就是说，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的不是不信任石油业主的思想，而是信任他们的思想。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把油矿工人团结在机电工人的周围，不是使他们靠拢机电工人，而是暂时把他们撇开，把他们抛到资本家的魔掌中去。

当然，“因祸得福”，协商会议目前就其组织斗争方面来说，就**柯切加尔**同志[52]所说的“扩大斗争”方面来说，也能够带来**某些**好处。但是，如果协商会议带来的害处绝对超过上面所说的**某些**好处，那就一定要抛弃协商会议这个废物。因为，如果柯切加尔同志主张“参加协商会议”**主要是**由于协商会议能“组织”和“扩大斗争”，那就简直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群情愤激的时候，在总斗争的前夕，

在组织中的总斗争的初期不去“参加协商会议”呢？怕什么呢？那时不正是特别需要“普遍组织”和“扩大斗争”吗？那时不正是群众最不应当接受上面的让步吗？但是问题也正在于选举初选代表并不等于组织群众。问题也正在于所谓组织（当然是**我们**所了解的，而不是加邦所了解的）**首先**就是发展劳资间势不两立的意识。只要有了这种意识，其他一切自然就好办了。

可是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恰恰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符合我们的任务的唯一策略只能是抵制协商会议的策略。◇82◇

抵制的策略能最好地发展工人和石油业主之间势不两立的意识。

抵制的策略能动摇“别什凯什”的成见，使油矿工人抛开石油业主，从而把他们团结在机电工人的周围。

抵制的策略能灌输不信任石油业主的思想，从而能在群众面前最好地强调指出斗争的必要性，强调指出这是改善生活的唯一手段。

因此，我们应当展开抵制运动：举行工厂大会，拟定要求，选出初选代表来更好地说明共同的要求，印发这些要求，解释这些要求，把这些要求再一次交给群众去最后批准，如此等等。而这一切都要在抵制的口号下进行，以便使共同的要求成为普遍欢迎的要求，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去抵制协商会议，使它成为笑柄，从而强调指出，为实现共同的要求，必须进行斗争。

总之，应当抵制协商会议！

载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汽笛报”第四号
署名：柯……
按报上原文刊印◇83◇

选　举　以　前

石油业主先生们退却了。不久以前他们还通过自己的“石油事业报”[53]编辑说，巴库的工会是“外来的非工人的东西”。政府当局遵照他们的意旨，到处张贴布告，请工人推举初选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想借此排除工会对协商运动的领导。这是昨天的情形。而现在，一月七日，工厂视察员通知各工会的书记说，石油业主举行了会议，决定建议市长先生发给各工会在油矿和工厂举行会议的许可证。

资本家先生们惧怕工会的影响加强，他们希望工人处于散漫和解体状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肯承认油矿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工人委员会。但是我们现在已迫使他们承认：领导解决工人生活中最大问题之一即协商会议和集体合同问题的，将是而且必须是工会。

达什纳克党人[54]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虽然帮助石油业主先生们和政府当局反对工人的组织，但我们已迫使他们承认工会的领导作用了。

达什纳克党人先生们急忙响应了市长先生的号召，立刻着手进行选举。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目的：破坏工会所提出的进行协商运动的条件，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承认工人的组织。◇85◇

但是石油业主先生们并不满意达什纳克党人的匆忙活动。附和达什纳克党人的只有一些小公司，如阿比杨茨、“霓虹”、阿拉拉特、法罗斯等公司，而在大公司中，只有两三个阿尔明尼亚公司进行了选举。

“里海－黑海”、诺贝尔、柯柯列夫、“波尔恩”、施巴也夫、阿萨杜拉也夫、“莫斯科－高加索”等公司的工人都通过了决议，抗议这种选举，并拒绝在许可证发给工会之前参加选举。

规模最大又最有势力的各公司的工人都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这样，他们就不仅答复了石油业主先生们，而且答复了那些太爱讲漂亮话的“朋友们”。

工人们的决议明确地证实：工会提出的条件并不是“领袖们”捏造的，像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小册子“为什么我们不去参加协商会议”中所武断的那样。

政府当局、石油业主和达什纳克党人都竭力阻挠工会影响的扩大。工人却信任工会并表示赞同工会所提出的条件。

“协商”和“谈判”这些字眼对于工人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可怕的东西，正如工人不怕在罢工前夕进行谈判和提出要求一样。提出要求有时可以使冲突不必用罢工方式来解决。不过往往有相反的情况。为了使“谈判”能向工人揭示事情的全部真相，为了使协商运动能广泛提出和公开讨论工人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从而使工人获得极宝贵的帮助，就必须实行工会所提出的、将列入给当选初选代表的委托书中的条件。◇86◇

任何谈判，只要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进行，就“没有什么可怕”。工会所提出的条件将保证全体工人能广泛参加讨论和协商会议有关的一切问题。

申德里柯夫式的协商会议的覆辙，永远不会重蹈了。

我们已经做到使那些“靠拢”机械工会的弟兄们放弃“不论条件如何都要协商”的口号而跟着我们走了。他们并且决定抵制那种不接受基本条件，即不承认工会领导作用的选举。我们还要做到再不会有人赞成“不论条件如何”都要抵制的主张。协商会议，主要是协商运动，只要提供这方面所必要的条件，工人是可以参加的。

工人们最近通过的几项决议已证实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许可证已经发给我们了。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使政府当局和石油业主承认工会的领导作用了。

大公司的大多数工人都赞成在我们所指出的条件下参加选举。

我们现在可以沉着而有信心地着手推举初选代表，我们建议给他们提出如下的委托书：选出十六名协商代表，由他们要求首先承认下列各项作为参加筹备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必要条件：

（一）举行协商会议的时间，应由工人和业主的初选代表作为平等的双方（即根据双方协议）确定。

（二）根据每一百工人产生一个初选代表的原则而选出的全体初选代表的会议，必须存在到协商会议结束为止。此项会议必须定期召开，必要时得随时召开，以便讨论工人、协商委员和协商代表◇87◇的报告，并给他们以指示。

（三）初选代表有权在工厂、油矿和修理厂中举行会议，以讨论所要求的和所提出的合同条件。

（四）石油工会和机械工会理事会都有权派没有表决权的协商代表参加跟石油业主举行的协商会议，并有权在协商会议的各个委员会中、在初选代表的会议上、在工厂、油矿等集会上作报告。

（五）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协商代表由初选代表委员会作为统一的整体不分生产部门地选出，在筹备委员会中，同样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谈判（为全体工人商定统一的合同）。

载于一九〇八年一月十三日
“汽笛报”第十四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88◇

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

协商运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初选代表的选举即将结束。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不久就要召开。要不要举行协商会议，最好是在什么保障（条件）下举行协商会议，该怎样了解这些保障，——这就是初选代表委员会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上的行动路线应当是怎样的呢？

再说一遍，和石油业主举行协商会议，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新事情。我们在一九〇五年举行过一次协商会议。一九〇六年又举行过第二次协商会议。这两次协商会议给了我们些什么，教会了我们些什么，是否对我们有用呢？

无论当时或是不久以前，都有人向我们说，没有任何条件的协商会议本身就能把群众团结起来。然而事实表明，过去的两次协商会议没有一次把群众团结起来，而且也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因为仅仅进行了选举，全部“团结”就以此告终了。

为什么呢？◇89◇

因为在筹备前两次协商会议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没有可能在各工厂、油矿和工人宿舍召集群众，也没有可能就每一个问题拟定委托书并一般地让群众积极参与协商会议的全部工作。所以当时群众只好不进行活动，仅仅一些协商代表离开工人群众很远地在进行活动。可是我们早已知道，群众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组织起来……

其次，因为当时没有**初选代表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的常设机关能够在协商会议整个开会期间自由活动，把各公司和各区的工人联合在自己的周围，拟定这些工人的要求，并根据这些要求来监督工人协商

代表。但设立这种初选代表委员会，石油业主不肯同意，而协商会议的发起人对这一点也就顺从地妥协了。

我们更不必说，当时还没有**工会**这种领导运动的中心能够把初选代表委员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引导它沿着阶级斗争的道路前进……

以前有人向我们说，甚至协商会议**本身**就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前两次协商会议的经验把这种说法也驳倒了。因为当我们的协商代表在第一次协商会议上一谈到工人的要求时，石油业主们就打断他们的话，说“这和协商会议的议程无关”，说协商会议的使命是谈“以液体燃料供应工业的问题”，而不是谈什么要求。当我们的协商代表在第二次协商会议上要求让失业工人的协商代表也参加会议时，这一次石油业主们又打断他们的话，说他们没有受权来考虑这类要求。这样，他们就粗暴地把我们的协商代表推出来了。当某些同志提出要用共同斗争来支持我们的协商代表时，人们才明◇90◇白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次协商会议都是由资本家们挑选在对他们有利的淡季——冬季举行的，那时伏尔加河封冻，石油产品价格下跌，因此，那时要想工人取得胜利，简直是愚蠢的。

以前两次协商会议就是这样对我们“有用”的。

很明显，**为开会而开会**的协商会议，没有能自由活动的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协商会议，没有工会参加和领导而且是在冬季召开的协商会议，——总之，**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这样的协商会议不仅不能团结工人，不仅不能促使我们的要求实现，反而会破坏团结并推迟满足我们要求的时机，因为它只用空洞的诺言来搪塞工人而不给工人任何东西。

这就是前两次协商会议给我们的教训。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抵制了第三次协商会议的缘故。

机械工会的个别同志不顾前几次协商会议的全部经验，不顾石油业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更不顾工会之间所订立的公约**，竟为**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大吹大擂，让那些同志记住这一点吧！

让他们记住这一点，并且不要破坏这个公约。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干脆拒绝一切协商会议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主张抵制的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不应当参加协商会议，因为请我们去的是我们的敌人，是资产者。对于这种意见，惟有一笑置之，因为请我们到工厂或油矿去做工的也是这些敌人，也是这些资产◇91◇者。是否仅仅由于请我们去的是敌人，是资产者，我们就应当抵制工厂或油矿呢？这样做岂不是要饿死！既然工人接受了资产者的招请去做工，他们岂不是都发了疯！

达什纳克党人说，我们不应当参加协商会议，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机构。对于这种荒谬的说法也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为目前的社会生活也是资产阶级的“机构”，工厂、油矿这一切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形像和样式”、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机构”，是否仅仅因为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便加以抵制呢？这样一来，我们应当搬到哪里去呢？到火星、木星上去呢，还是到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的空中楼阁里去？……[①]

不，同志们！我们不应当背向资产阶级的阵地，而应当冲击这个阵地！我们不应当把阵地留给资产阶级，而应当一步步地夺取阵地，把资产阶级从那里赶走！只有住在空中楼阁里的人才不能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

————————————

① 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对印刷工人及其老板举行的协商会议和他们双方订立的集体合同颇有好感。此外，他们并不拦阻他们的个别党员参加这种工作。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抵制主张是很不严肃很不切实的。——著者注

如果我们没有预先得到所要求的保障，我们就不去参加协商会议。反之，如果我们得到了所要求的保障，我们就去参加协商会议，以便凭借这种保障，把协商会议由乞怜的工具变为进一步斗争的工具，正如在满足了某些必要的条件以后，我们就不拒绝上工，以便把工厂、油矿由进行压迫的场所变为争取解放的场所一样。◇92◇

我们筹备有保障（工人争得的保障）的协商会议，号召五万工人群众来选举初选代表委员会并拟定我们的要求，我们便会把巴库的工人运动引上新的对它有利的斗争道路，即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的道路，而不会引上自发的（分散的）别什凯什运动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于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或者是有保障的协商会议，或者是不要任何协商会议！**[55]

让那些老协商派先生们去鼓吹反对保障吧，让他们去颂扬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吧，让他们在祖巴托夫的泥坑里爬吧；可是无产阶级要把他们从泥坑中拖出来，并要教会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广场上行走！

让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临空翱翔”吧，让他们从他们高高的天空来抵制工人的有组织的行动吧；可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要把他们拉到我们罪恶的地上来，并迫使他们向有保障的协商会议低头！

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把无产阶级聚集在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周围，把初选代表委员会团结在工会的周围，以达到我们的共同要求，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道路是明显的：从有保障的协商会议走向满足石油业无产阶级的切身需要。

我们将及时号召初选代表委员会既和陷在泥坑中的协商派作斗争，也和主张抵制的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的稀奇古怪的幻想作斗争。◇93◇

或者是有一定保障的协商会议，或者是不需要协商会议！

载于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日
“汽笛报”第十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94◇

我们最近时期的罢工说明了什么？

一二月间罢工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些给我们的运动加进了新因素的新特点。这些特点之一，即罢工的防御性，在“汽笛报”[56]上已经谈过了。然而这是外部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表明我们的运动向前发展的其他一些内部的特点。这里我们说的是关于要求的性质、罢工的方式、新的斗争方法等等。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的内容。必须指出大部分的罢工都没有提出奖金的要求（如诺贝尔、莫托维利哈、“铁锤”、米尔佐也夫、阿达莫夫等公司）。就是提出奖金要求的公司，工人也总是竭力把它列在自己要求的最后面，感到仅仅为“别什凯什”而进行斗争是可耻的（如皮托也夫等公司）。显然，别什凯什的旧习正被彻底打破。工人开始瞧不起“别什凯什”。工人正从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奖金）转到无产阶级的要求：开除最蛮横的管理人员（如诺贝尔、“铁锤”、阿达莫夫等公司），重新收用被解雇的工人弟兄（如米尔佐也夫公司），扩大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权利（如诺贝尔、米尔佐也夫两公司）。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尔佐也夫公司工人的罢工[57]。他们要求承认工人委员会并使被解雇的工人弟兄复职，作为公司今后不经工人委员会同意不得解雇任何一个工人的保证。罢工已经继续◇95◇了两个星期，并且是以罕有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进行的。必须看一看这些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多么自豪地说：“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奖金或毛巾、肥皂，而是为了工人委员会的权利和荣誉。”所以我说，必须知道这一切，才能了解工人脑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最近几次罢工的第二个特点是油矿工人群众的觉醒和积极性。原来，在此以前，油矿工人只好跟着机电工人走，跟着他们走并不常常

是乐意的，而独立起来从事斗争也只是为了奖金。以前他们对于**机电工人**有些仇视，这种仇视是由石油业主的挑拨离间的别什凯什政策煽起的（如去年在比比－爱巴特公司和不久以前在拉普申公司）。最近几次罢工表明油矿工人的消极性正在逐渐消除。诺贝尔公司的罢工（一月间）是他们发动起来的，并且他们还领导了机电工人；米尔佐也夫公司的罢工（二月间）也是油矿工人鼓动起来的。不用说，随着油矿工人积极性的提高，他们对于机电工人的仇视也在逐渐消除。油矿工人开始和机电工人携手并进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特点，就是罢工者对我们工会抱着友好的态度，而且一般说来，罢工也进行得较有组织。首先必须指出那些妨碍事情顺利进行的过多的要求已经没有了（请回忆一下去年的“里海”公司吧），现在提出的仅仅是几项能够团结群众的重要要求（如诺贝尔、米尔佐也夫、莫托维利哈、“铁锤”、阿达莫夫等公司）。其次，这些罢工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工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工人们认为邀请工会代表来参与是必要的（如柯柯列夫、诺贝尔、“铁锤”、米尔佐也夫及其他公司）。油矿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工人委员会以前同工会对立的态度正在逐渐消除。工人开始把工会看做自己◇96◇的亲生子。油矿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工人委员会开始由工会的竞争者变成工会的支柱。因而最近几次罢工很有组织。

由此就产生了第四个特点，就是最近几次罢工比较成功，或者确切些说，局部罢工并不是常常失败，也不总是完全失败。我们首先指的是柯柯列夫公司的罢工。我们认为柯柯列夫公司的罢工是我们斗争方法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次罢工和其他几次罢工（如皮托也夫、莫托维利哈两公司）表明：如果（一）有组织地进行罢工，（二）有工会的积极参与，（三）有相当的坚持性，（四）选择恰当的斗争时机，那末局部罢工决不会没有结果。至少大家可以看出“反对局部罢工”这种“带原则性的”呼声是冒险的口号，最近运动中没有一件事

实足以证明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相反地，我们认为在有工会领导和时机选择得当的条件下，局部罢工可以变成团结无产阶级的很重要的因素。

在我们看来，最近时期几次罢工的最重要的内部特点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二日
“汽笛报”第二十一号
署名：科·卡托
按报上原文刊印◇97◇

石油业主在策略上的转变

我们的石油业主“谈论”“欧洲式的”劳资关系，这是不久（不过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

那时他们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深思熟虑的”李恩孜孜不倦地鼓吹集体合同的神圣来源，局部罢工的浪潮日益高涨，石油业主打算用“欧洲式的”协商方法“调整生产”，政府当局施以一定的压力，——这一切使石油业主产生的正是调和的“欧洲式的”情绪。

李恩大声叫喊：“打倒罢工的无政府状态。”

石油业主附和他说：“秩序万岁。”

于是“秩序”似乎建立起来了。资方迫害的次数似乎减少了。罢工的次数也减少了。石油业主“认为需要协商了”（见十二月份“石油事业报”）。

于是掀起了协商运动。工人坚决拒绝旧的幕后协商会议。他们绝大多数赞成有保障的协商会议。这样，工人便表示了明确的愿望：要充分利用协商会议，把它变成有组织的自觉 的斗争工具。

现在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欧洲式的”劳资关系的论调再也听不到了。“调整生产”的“打算”只字不提了。“罢工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使石油业主害怕了，相反地，他们自己却向工人进攻，夺去工人既得的果实，解雇先进◇99◇的工人弟兄，用这种种行动把工人推向“无政府状态”。

显然石油业主不再认为需要协商，他们宁愿进攻了。

早在一月底的石油业主代表大会上，他们就开始向工人进攻。他们根本不让工会代表发言。他们拒绝商谈工人住宅区问题。他们决定

把学校、医疗等等问题一笔勾销。他们剥夺了工人参加管理民众文娱馆的权利。

石油业主的这一切行动使人感到他们正在走上“新的”“非欧洲式的”道路，走上公开进攻工人的道路。

石油业主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继续进行他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委员会向工人进攻——征收“十戈比医药捐”。至于委员会所采取的同样说明石油业主转变策略的一些细小措施，就更不用提了。

迫害依然在变本加厉，其形式为剥夺油矿工人和工厂工人已经争得的种种权利，裁减员工，解雇先进分子，关闭工厂等等。

他们把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化为乌有。在路特希尔德（巴拉汉内）、“里海”、施巴也夫（巴拉汉内）、“波尔恩”（巴拉汉内）、比也林格、米尔佐也夫、纳甫塔兰等公司，由于工人委员会而引起的冲突，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借口“裁员”而“赶走”最有威望的工人弟兄，特别是“赶走”协商会议的初选代表。“里海”、“波尔恩”、穆赫塔罗夫（巴拉汉内）、施巴也夫（巴拉汉内）、拉普申（比比－爱巴特）、马里尼柯夫等◇100◇公司所发生的事情，更使人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

沃坦公司的歇业是石油业主“新”策略的杰作。

他们用这些办法把工人推上无组织无政府的爆发的道路来消耗工人的力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罢工工人的镇压方式。我们是指米尔佐也夫公司，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公司的经理马尔卡罗夫先生，他唆使携带单响枪的回民攻击罢工的阿尔明尼亚人，因而造成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冲突的条件。

这就是石油业主在策略上的转变。

显然，石油业主再也不要“欧洲式的条件”了。

石油业主对协商会议的“成功”大失所望，对单单依靠不能满足

工人基本要求的协商会议来“调整生产”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眼看协商会议正从瓦解工人的工具变成组织五万群众的工具，于是想尽方法摆脱协商会议，无限期地延迟协商会议的召开，或者至少也要使它毫无作为。

为此，他们使用一套迫害手段，挑逗工人进行过早的发动，使正在形成的总的运动分散成个别的局部的运动，把工人从阶级斗争的广阔大道推上集团冲突的弯曲小路。

他们想用这些办法来转移工人对有保险的协商会议的注意力，来使那能够团结工人的初选代表委员会在工人心目中失去意义，来阻止工人的联合，从而不让工人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斗争。

他们这样做，是要竭力挑逗暂时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去进行过早的总发动，使自己得以“永◇101◇远”征服工人，保证长期“不间断地”开采石油。

石油业主转变策略的用意就是这样。

根据上述一切，我们的策略应当怎样呢？

石油业主利用我们的无组织性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我们工会的周围团结起来，用我们现有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不受打击。

他们要挑逗我们进行自发的局部的爆发，想分裂我们的总的运动，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上石油业主的圈套，尽可能不要举行局部罢工，不要分散总的运动。

他们要夺去我们团结的武器，取消我们的初选代表委员会，无限期地延迟协商会议的召开，强使我们进行过早的总发动，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求立刻召开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着手拟定工人的要求，并在这一工作的进程中把群众团结在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周围。

只要我们巩固了初选代表委员会，把五万群众集合在它的周围，我们就不难适当地对付石油业主先生们的非欧洲式的阴谋诡计。

载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九日
“汽笛报”第二十二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102◇

必 须 作 好 准 备!

石油工会理事会决定设法使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58]尽速召开。

理事会之所以这样做，是根据许多工人的声明，工人不愿再等待了，要求立即召开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

机械工会也决定这样做。

前几天，这两个工会已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送交工厂视察长。

应该认为，问题很快就会得到一定的解决。

政府当局和资本家究竟对工会的声明怎样答复，当然，我们还不知道。

也许他们会接受工人的要求，立即召开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这样，协商会议的工作大概就能“正常地”进行。

也许他们会拖延下去，暂时不作正面答复。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准备应付一切，不让石油业主欺骗工人。

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有充分准备地去和石油业主见面。◇103◇

为此，必须立刻着手拟定要求。

我们同意参加有保障的协商会议。但是，我们去和石油业主见面，如果不带全体石油业无产阶级群众所赞同的要求去，又带什么去呢？既然如此，我们就来拟定工人对工资、工作时间、工人住宅区、民众文娱馆、医疗等要求吧。

我们的工会已经开始工作了。它在“汽笛报”上发表了对工人住宅区、医疗、民众文娱馆、学校等问题的意见。这些要求已由工会编成题名“协商会议参考资料”的小册子印发出去。

但是这还不够。

必须把所有这些要求告诉群众，让他们讨论，让他们发表非发表不可的意见。

此外，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问题，工会还没有研究，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也必须立即着手拟定要求。

为了这些目的，我们工会先要选出一个拟定要求的专门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要和协商会议的初选代表及四个区的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保持联系，以便和他们共同研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迫切问题。

然后召开各工厂、油矿、工人宿舍的全体大会，最后批准这些要求。

我们筹备参加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工作计划就应当是这样。

只有在拟定了要求并使这些要求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些群众团结在初选代◇104◇表委员会的周围。

我们使群众聚集在他们的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周围，便能保证他们不受石油业主的意外侵害。

不要怯懦地空谈各项保障的“具体化”（见“油矿公报”[59]），也不要轻率地叫喊“春天来到了”（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吧），而要坚持不懈地拟定工人的要求，这才是我们在事变迫近的情况下首先应当做的事情。

总之，我们要更加同心协力地作好准备，去参加有保障的协商会议！

载于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六日
“汽笛报”第二十三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105◇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采取同样形式的。

有过一个时期，工人和厂主作斗争就捣毁机器，烧掉工厂。那时工人说：机器，这是贫困的根源！工厂，这是压迫人的地方！既然如此，就捣毁它，烧掉它！

这是一个没有成形的、**无政府主义骚动式的冲突**时期。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情况：当工人对纵火和破坏的效力感到失望时，就改用“更激烈的形式”，如杀死厂长、经理、主任等等。那时工人说：机器和工厂是毁坏不完的，而且这种毁坏对工人也没有好处，但是用恐怖手段吓唬吓唬经理，使他们驯服总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得揍他们，使他们心惊胆颤！

这是一个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恐怖的冲突**时期。

工人运动断然否定了这两种斗争形式，把它们抛弃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疑地，工厂确实是剥削工人的地方，机器至今也还在帮助资产阶级扩大这种剥削，但这并不是说，机器和工厂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相反地，正是工厂、正是机器使无产阶级能◇107◇粉碎奴隶的锁链，消灭贫困，推翻一切压迫，只是必须把它们从各个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变成人民的公共财产。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若我们当真捣毁并烧掉机器、工厂、铁路，那末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知道，那时生活就会变成一片荒漠，而工人首先就会没有饭吃！……

显然我们不应当捣毁机器和工厂，**如果我们真正渴望消灭贫困，那末一有可能，我们就应当占有机器和工厂**。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无政府主义骚动式冲突的缘故。

无疑，经济恐怖能使资产阶级惧怕，所以它也有某种表面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惧怕是一时的，瞬息即逝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经济恐怖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即使只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种惧怕只能是一时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背后没有工人的强有力的群众组织随时准备为工人的要求进行斗争并能保持住已争得的让步，那末资产阶级一时的惧怕以及因此而作的让步又能给我们什么呢？而且事实很清楚地证明，经济恐怖会取消工人对这种组织的需要，会消除工人对团结一致和独立行动的热望，因为他们有实行恐怖的英雄可以替他们行动。我们是否应当发扬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呢？我们是否应当增进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呢？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既然经济恐怖会扼杀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团结愿望，那末，我们能不能使用经济恐怖呢？

同志们，不能！我们不应当暗中用个别的袭击去吓唬资产阶级，这种“事情”让那些有名的打手◇108◇去干吧。我们应当**公开**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应当**时时刻刻**使资产阶级感到惧怕，**直到最后胜利为止！**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不是经济恐怖，而是能引导工人去斗争的坚强的群众组织。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经济恐怖的缘故。

鉴于上述种种，米尔佐也夫公司罢工工人最近通过的反对放火和“经济”杀人的决议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这个决议中，代表米尔佐也夫公司一千五百名工人的联合委员会指出焚烧锅炉房（在巴拉汉内）和由于经济关系杀死主任（在苏拉汉内）的事实，同时声明“反对这种杀人放火的斗争方法”（见“汽笛报”第二十四号）。

米尔佐也夫公司的工人就这样完全摆脱了旧日恐怖主义骚动的倾向。

他们就这样坚决地走上了真正的工人运动的道路。

我们向米尔佐也夫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并号召全体工人同样坚决

地走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道路。

载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汽笛报”第二十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109◇

石油业主对经济恐怖的看法

经济恐怖问题还在吸引着“公众”的注意。

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表了意见，指责经济恐怖，因为它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因此也就是不适当的斗争方法。

油矿和工厂的工人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当然，石油业主也在发表意见。而且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和工人的观点根本不同，因为他们在咒骂“来自工人方面的”经济恐怖时，丝毫不提要反对来自石油业主方面的同样的恐怖。这里我们指的是著名的石油业主机关报上一篇论经济恐怖的著名社论（见“石油事业报”[60]第六号卡－查先生的文章）。

我们就谈谈这篇社论吧。这篇社论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它论证了石油业主的“观点”，而且因为它反映了石油业主对现阶段工人斗争的情绪。为了方便起见，必须把这篇社论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卡－查先生谈到攻击工人及其组织的若干枝节问题；第二部分谈到经济恐怖的原因；第三部分谈到对付经济恐怖的办法。◇111◇

我们先从枝节问题谈起。首先是关于米尔佐也夫公司的工人。大家知道，在苏拉汉内油矿的一个主任被杀和锅炉房失火以后，米尔佐也夫公司工人的联合委员会立即代表一千五百名工人一致抗议这种斗争方法，否定了杀人放火和罢工的联系。这个抗议的诚意看来是没有理由怀疑的。但是卡－查的想法不同。他这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仍认为必须怀疑工人的诚意，说“委员会错了”，说杀人放火和罢工有直接联系。而且这是在一千五百名工人的代表一致抗议以后说的话！这不是居心歪曲事实、侮辱工人、甚至用造谣的手段诬蔑工人，又是什么呢？既然如此，怎能相信这位在自己的文章中大谈其“使人们的

犯罪意志高尚化”的卡－查先生的诚意呢。

卡－查先生从米尔佐也夫公司工人又转而谈到我们的工会。谁都知道我们的工会发展得很快。只要看看整个协商运动都是在它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它在工人中间的影响之大了。“汽笛报”说，“工会的影响和作用正与日俱增，它甚至在工人群众最落后最没有文化的阶层的心目中，也逐渐成为他们经济斗争的天然领导者了”，这不过是指出尽人皆知的事实罢了。是的，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我们这位执拗的“批评家”却不肯承认事实，他“怀疑”一切的一切，他甚至不惜否认事实，只要能破坏工会在读者心目中的威信和声望就行！尽管这样，卡－查先生居然还有勇气说他是我们工会的赞助者，是“使经济斗争高尚化”的辩护人！

谁说了**第一**，谁就一定会说**第二**；谁骂了我们的工会，谁就一定要骂我们的报纸，果然卡－查先生大骂“汽笛报”了。而且据说是因为“汽笛报”“没有竭尽全力把不必要的怨恨、危险的刺激、过分◇112◇的神经质和不文明的险恶行为从经济斗争的气氛中清除出去”，“汽笛报”专事“攻击其他组织、党派、阶级、报纸和个别人物，甚至还攻击自己的兄弟报纸‘油矿公报’”。

卡－查先生唱的调子就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位大名鼎鼎的“批评家”的一套胡说当做耳边风，因为资本家的奴才为了讨好自己的主子是一定会胡说的！尽管这样，我们这次对这位巴库的大批评家还是要讲几句话。据他说，“汽笛报”“没有把不必要的怨恨、危险的刺激从斗争的气氛中清除出去”…… 就假定这一切都说得对。但是看在神圣的资本的面上，请你说一说：什么东西能造成更大的怨恨和刺激呢？是“汽笛报”上印出来的字呢，还是石油业主不断解雇工人、征收十戈比医药捐、夺去工人的民众文娱馆、求助于柯企[61]和暴力镇压等实际行动？为什么卡－查先生，这位“使经济斗争高尚化”的“忠心耿耿的”辩护人，对石油业主那种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

动认为一句话也用不着说呢？须知那些会采用经济恐怖手段的“愚昧无知的”分子是不读我们的报纸的，须知最能刺激和激怒他们的是石油业主的迫害和压榨，那末，为什么这位大肆攻击“汽笛报”的卡－查先生绝口不谈石油业主先生们的“卑鄙勾当”呢？既然如此，卡－查先生的恬不知耻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卡－查先生从哪里看出“汽笛报”没有努力“把不必要的怨恨和危险的刺激从经济斗争的气氛中清除出去”呢？“汽笛报”鼓吹反对经济恐怖和意大利式罢工[①]，反对无政府主义骚动式罢工而主张有组织的罢工，反对局部的发动而主张维护整个阶级的利益，这不是“把不必要的怨恨和危险的刺激从斗争的气氛中清除出去”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一切，卡－查先生都不知道吗？或许他认为◇113◇需要假装不知道，以便扮演一个替资本家进行狡辩的角色吧？不然，又何必来这套“道德”和“人类良心”的花言巧语呢？

卡－查先生接着责备“汽笛报”“攻击其他组织、党派、阶级、报纸、个别人物，甚至还攻击‘油矿公报’”。完全正确，卡－查先生，你无意中说了真话，“汽笛报”的确是对其他阶级及其机关报进行斗争的！但是，难道还能要求受其他一切阶级和集团剥削的工人的报纸不这样做吗？够了，不要再装“圣洁的天使”了，不要扭扭捏捏，就直截了当地说吧。难道你不知道石油业主的机关报“石油事业报”的创办及其老板——石油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为了“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工人政党、“攻击”工人报纸的吗？难道你不记得代表大会委员会最近实行的征收十戈比医药捐、提高份饭价格、减少学校和病房、夺去工人的民众文娱馆等等措施吗？石油业主的机关报“石油事业报”不是在竭力替这些亚洲式的措施辩护吗？

————————————

① 即罢工者不离开生产地点，以消极怠工去反对厂主的压迫和剥削的一种罢工形式。——译者注。

或许这不是在“攻击”工人，而是在“使犯罪的意志高尚化”、在整顿经济斗争等等吧？但是，你要工人报纸怎样对待剥削工人的石油业主，怎样对待他们那些欺骗工人的组织，怎样对待他们那个腐蚀工人的机关报，又怎样对待那个为石油业主的亚洲式野蛮措施寻找“哲学”根据而可笑地卖劲的卡－查呢？难道卡－查先生真不了解工人和老板之间必然有阶级斗争吗？呵，当然！卡－查先生是十分了解这一切的，他自己正在对无产阶级及其组织进行斗争！不过，第一、他反对来自工人方面的斗争，而不反对一般的斗争；第二、石油业主不是在斗争，而只是在“使斗争高尚化”；第三、要知道卡－查并不是反对工人，他完全拥护工人为……石油业主谋利益；◇114◇第四、要知道卡－查有“收入”，这一点也应该估计到……

看来，卡－查先生的勇气和他的“良心”都能随需要而增长，二者大可媲美。

在卡—查先生的社论中用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若干枝节问题就是如此。

*　　*　　*

现在我们来谈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

作者在他的文章的这一部分里谈到经济恐怖的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原因是工人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愚昧的头脑”和“犯罪的意志”。而“愚昧”和“犯罪”是因为工会和工人报纸没有竭尽全力教育工人和使他们高尚化。卡－查先生补充说，当然，“各项纲领（工会的？）是不赞成经济恐怖的”，但是，“既然我们看到实际生活已误入歧途，那末仅仅在纲领上不赞成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一切党派和工会”“对已经产生的祸害进行积极的斗争……”。卡－查先生解释自己的意思说，“只有当……工人的一切朋友不分党派地努力反对……经济恐怖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杀人事件才会绝迹”等等。

总之，工人是愚昧的，所以他们往往敢于杀人，但他们之所以愚

昧，是在于他们的工会和报纸没有努力“教育”他们，使他们“高尚化”，所以一切都是工会和工人报纸的过错。

卡－查先生唱的调子就是这样。

我们不想多谈卡－查先生满脑子对经济恐怖的糊涂观念，——我们所指的是他无知地把经济恐怖说成纲领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一点：（一）当卡－查先生讲“纲领性的恐怖”时，如果指的是工会，◇115◇那末，难道他不知道俄国的工会根本没有纲领吗，——每个工人都知道这一点！（二）如果他指的是党，那末，难道他不知道经济恐怖是策略问题而不是纲领问题吗，——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点！这一切关于纲领的宏论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石油业主先生们竟雇不到一个高明一点的、至少也不是这么无知的“思想家”。

我们也不想多谈卡－查先生另一个非常蠢笨（不仅是无知！）的声明，他说由于经济恐怖，“实际生活已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应当和实际生活作斗争。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假若误入歧途的正是实际生活，**而不是个别的落后于实际生活的人**，那末我们的事业就糟糕了。我们的鼓动宣传之所以有力，正是在于实际生活这个全能的、不断发展的生活本身要求和经济恐怖作斗争。如果卡－查先生不懂得这一点，那末我们奉劝他搬到另外一个什么星球上去，或许在那里会用得上他那套和不断发展的实际生活作斗争的蠢笨理论……

我们最好来谈谈卡－查先生的“分析”吧。

首先我们要问，难道卡－查先生真认为经济恐怖的原因正是在于工会和工人报纸吗？

“教育”工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教工人去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斗争！（这是卡－查先生同意的！）但是除了工会和工人报纸在口头上和报刊上宣传有组织的斗争以外，还有谁能做这种工作呢？

使经济斗争“高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经济斗争去反对

制度，无论如何不是反对**个人**！◇116◇（这也是卡－查同意的！）但是除了工会和工人报纸以外，又有谁能做这种工作呢？

难道不就是石油业主剔除和解雇最觉悟的工人，把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化为对个别工人的斗争吗？

如果卡－查先生确实相信他对工会和工人报纸的责备是正确的，那末他为什么又偏偏劝告这些工会和报纸呢？难道他不知道“攻击其他阶级、报纸、人物”等等的组织是不会照卡－查先生的劝告行事的吗？他究竟为什么要干这种臼中捣水的勾当呢？

显然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责备。

如果卡－查先生不管这些，还是发表言论来反对工会，那末这就是为了要转移读者对真正原因的注意力，使读者认不清真正的“罪犯”。

可是不行，卡－查先生！你想把经济恐怖的真正原因瞒过读者，那是办不到的！

“经济杀人”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工人，也不在于他们的组织，而在于石油业主先生们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动。

你指出无产阶级某些阶层的“愚昧”和“无知”。但是不靠学校和讲演会来扫除“愚昧”和“无知”，又靠什么呢？石油业主先生们为什么要减少学校和讲演会呢？而你这位“诚心”主张扫除“愚昧”的先生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地反对石油业主剥夺工人的学校和讲演会呢？

你说要使风气“高尚化”，但是在石油业主先生们夺去工人的民众文娱馆这种民众娱乐中心的时◇117◇候，悲天悯人的阁下，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呢？

你高唱“使经济斗争高尚化”，但是当资本家的雇佣走狗杀死工人汉拉尔[62]（纳甫塔兰公司）的时候，当“波尔恩”、“里海”、施巴也夫、米尔佐也夫、“铁锤”、莫托维利哈、比也林格、穆赫塔罗夫、马里尼柯夫等公司解雇最先进的工人的时候，当施巴也夫、穆

赫塔罗夫、“铁锤”、“卢诺”、比比－爱巴特区的柯柯列夫等公司毒打工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呢？

你谈论工人“犯罪的意志”和“不必要的怨恨”等等，但是当石油业主刺激工人，激怒工人中最敏感最容易发火的临时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时候，你躲到哪里去了？正是这一部分工人被有名的十戈比医药捐和代表大会委员会所办的食堂份饭的涨价弄得忍饥挨饿，悲天悯人的阁下，你知道不知道？

你谈论经济恐怖所引起的“血和泪”的惨状，但是大批残废工人在代表大会委员会所办的医院里无法得到一个床位，这使人流了多少血和泪，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石油业主先生们减少病房？为什么你对于这件事情不像反对工会和工人报纸一样地大声叫喊？

你高唱“良心”等等，可是，你的“无瑕的”良心为什么对石油业主先生们的这一切迫害行为无动于中呢？

你谈论…… 好，够了！看来已很明显：“经济杀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工人，也不在于他们的组织，而在于石油业主先生们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动。

同样很明显，卡－查先生是石油业主先生们的可怜的雇佣走狗，他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组织，力◇118◇图借此在“公众”面前替自己主子的行动辩护。

* * *

现在我们来谈谈卡－查先生的文章的第三部分。

卡－查先生在自己文章的第三部分谈到对付经济恐怖的办法，而且他的“办法”和他说明经济恐怖“原因”的那套“哲学”是完全符合的。

大家来听听这位巴库大哲学家的论调吧：

“必须对已经产生的祸害进行积极的斗争，并且应当提出这个斗争的口号。现在对于一切政党、团体、工会和小组都应当提这样的口

号：‘打倒经济恐怖！’只有在勇敢地举起写着这一口号的洁白旗帜的时候，只有那时……杀人才会绝迹。”

卡－查先生就是这样大发其哲学议论的。

由此可见，卡－查先生是彻头彻尾地忠于他的上帝——资本家的。

第一、他把“经济杀人”的全部“罪过”，从石油业主身上卸下来（哲学地卸下来！）转嫁到工人、工会和工人报纸身上去。这样，他就能在所谓“世人”面前“证明”石油业主先生们的**亚洲式的**进攻策略是完全“无罪”的了。

第二、这在石油业主是最主要的一点，他“想出了”不要石油业主花费一文钱就可以祛除“杀人”的最便宜的方法——让工会和报纸加紧宣传鼓动反对经济恐怖，于是他就再次强调石油业主不应当◇119◇对工人让步，不应当“有所花费”。

既便宜，又漂亮！石油业主先生们听了卡－查先生的话，可以赞叹不已了。

当然，石油业主先生们可以“随便唾弃”所谓“世人”的意见。但是，既然有一个什么卡－查为了“全人类的良心”肯在“世人”面前为他们辩护，那他们怎么会反对呢？

相反地，同一个卡－查在作了这样的辩护之后，又提出祛除经济恐怖的最“可靠”而又最便宜的方法，他们怎么会不高兴呢？让工会和报纸完全自由而毫无阻碍地去宣传鼓动吧，只要石油业主的钱袋万岁就行。看，难道这不是很开明吗！……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不让自己的“夜莺大盗”[①]卡－查先生登上文坛呢。

可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只要以觉悟工人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可以立刻明白卡－查先生所提出的办法多么可笑。

———————————————

① 夜莺大盗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善学夜莺鸣声和巨蛇猛兽叫声，借此拦劫路人，后为勇士伊里亚·姆罗梅茨所杀。——译者注。

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工会和报纸，工会和报纸早就进行宣传鼓动，反对经济恐怖，可是，虽然如此，“杀人”仍没有绝迹。问题主要地在于石油业主先生们采取刺激人的和激怒人的行动，在于石油业主先生们实行经济迫害、压榨和**亚洲式的**进攻策略，这一切正在造成并且将来还会造成引起我们注意的“经济杀人”。

请你讲一讲：石油业主先生们接二连三地夺去工人已经争得的果实，**这种激怒人的行动**已逼得最没有觉悟的工人都去进行“经济杀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工会和报纸的**宣传鼓动**，哪怕就是◇120◇影响很大的工会和报纸的**宣传鼓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很明显，仅仅是反恐怖的宣传鼓动，即使打着“洁白的旗帜”，也是无力祛除“经济杀人”的。

显然，为“祛除”“经济杀人”，必须采用比单纯的宣传鼓动更切实一些的办法，这首先要石油业主放弃压榨和迫害的行为，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只有在石油业主把他们**亚洲式的**进攻策略放弃，即把减低工资，剥夺民众文娱馆，减少学校和病房，实行十戈比医药捐，提高份饭价格，不断解雇先进工人，以暴力对付工人等等手段放弃之后，只有在石油业主确实以文明的欧洲式的态度对待工人群众及其工会、承认他们的“平等”权利之后，只有在那时才会奠定“祛除”“杀人”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得无须再加证明了。

但是，卡－查先生不懂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能懂得这一点，实在说，是不愿懂得这一点，因为这对于石油业主先生们不“利”，因为这需要他们一定的破费，因为这会把经济“杀人”的“罪犯”的全部真相揭露出来……

结论只有一个：卡－查是资本家的奴才。

但是从这一点，从卡－查这个奴才角色的身上，究竟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从这一点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卡－查先生所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鼓舞着”他的石油业主的话。所以卡－查的文章并不是他自己的哲学，而是石油业主先生们的哲学。显然，石油业主通过卡－查的嘴说话，卡－查只不过传达他们的“心思、愿望和情绪”罢了。◇120◇

在这一点上，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应当看出我们所分析的卡－查这篇文章的主旨。

卡－查作为卡查[①]或作为“个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是无足轻重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卡－查先生倒无须抱怨“汽笛报”似乎在“攻击”他“个人”，我们敢向卡－查先生保证，“汽笛报”对他这个所谓“个人”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兴趣。

但是，卡－查作为没有人格的东西、卡－查作为并非“个人”的东西、卡－查作为单纯表达石油业主先生们的意见和情绪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倒无疑地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就是从这一观点来看卡－查本人和他的文章的。

显然，卡—查先生没有白唱。既然他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猛烈攻击工会，竭力破坏工会的威信，既然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控诉工会有助长经济恐怖之罪，而对石油业主的亚洲式的措施却只字不提，既然他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指出反恐怖的宣传是祛除“杀人”的唯一办法，而对他的主子们的进攻策略则避而不谈，那末这就是说，石油业主是不打算向工人群众让步的。

石油业主是要进攻的，石油业主是应该进攻的，而你们工人和工会，请退却吧，——这就是卡－查先生的文章对我们说的话，这就是石油业主通过自己的“夜莺大盗”的嘴对我们说的话。

这就是卡－查先生这篇文章的主旨。

———————————————

① 俄文“卡查”的意思就是山羊。——译者注。

我们工人、我们的组织和报纸应该对石油业主先生们警惕，不要上他们挑逗行为的当，要像从前一样坚定而沉着地沿着把我们的自发斗争变成有计划的、有明确目标的、严正的阶级斗争的道路◇122◇前进。

至于资本家的形形色色的雇佣走狗的假仁假义的哀号，那我们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载于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五月四日、十八日“汽笛报”
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二各号
署名：科·卡托
按报上原文刊印◇123◇

报 刊 评 论[63]

奴颜婢膝的“社会主义者”

在梯弗里斯出版的报纸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格鲁吉亚文报纸叫做“火花报”[64]。它是一种新的但同时又是最老的报纸，因为它是梯弗里斯过去所有的孟什维克报纸（从一九〇五年的“光线报”起）的续刊。“火花报”是由一个老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集团编辑的。但问题当然不止于此。问题主要在于这个集团的机会主义是特别稀奇古怪的。机会主义本来就是个没有原则没有政治气节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集团的没有气节，从来没有达到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集团这样无耻的地步。一九〇五年，这个集团曾经承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见“光线报”）。一九〇六年，它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扬言“靠工人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农民才能表现主动性”（见“光线报”）。一九〇七年，它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说“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应当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见“思想报”[65]），如此等等。

但是，这个集团的没有原则从来还没有达到现在（一九〇八年夏天）这样无耻的地步。我们指的是“火花报”对在思想上奴役被压迫者的所谓教区长的被杀所作的评论。这次暗杀的经过是尽人皆知◇125◇的。有某个集团杀死了教区长，又杀死了从“肇事地点”带着案情调查记录回去的宪兵上尉，后来还袭击了护送教区长尸体的一群流氓。这个集团显然不是流氓集团，但也不是革命团体，因为目前正值聚集力量的时候，任何革命团体都不敢冒险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事业而去干这种勾当。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集团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查

明产生这个集团的条件，努力消除这种条件，同时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这个集团本身作斗争，使它们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无产阶级和它们划清界限。“火花报”却不这样做。它既不调查什么，也不提出什么，只是乱讲几句一般反对恐怖手段的鄙俗的自由主义的话，接着就劝告读者，岂止是劝告，而且责成读者向警察**告发**（不多不少，正是**告发**！）这些集团，把它们**交给**警察！这是可耻的，然而遗憾得很，这却是事实。请听听“火花报”上的这段话吧：

“把杀死教区长的凶手交给法庭审判，这就是永远洗清自己身上的污点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先进分子的责任。”（见“火花报”第五号）

要社会民主党人充当自愿的告密者，——你看，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

机会主义者没有政治气节，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他们没有政治气节是由于他们拚命想投合资产阶级的口味，讨好“老爷们”博得他们的夸奖。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迁就策略的心理基础。为了在“老爷们”面前炫耀一番，为了讨好他们，为了至少不使他们因教区长的被杀而发怒，我们的孟什维克机◇126◇会主义者便充当了警犬的角色，在他们面前摇尾乞怜！

迁就策略真无过于此了！

假仁假义的祖巴托夫分子

高加索的一些城市真出现了机会主义的特种典型，巴库也是这样。巴库也有一个比梯弗里斯的机会主义集团更右因而也更无原则的集团。我们指的不是和资产阶级的“今日报”姘居的“油矿公报”；关于这个报纸，我们的报刊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说的是巴库孟什维克的老祖宗申德里柯夫的“正义事业”集团。诚然，这个集团早就不在巴库了，它受到巴库工人及其组织的攻击，不得已搬到彼得堡去了。

可是它还不断把自己写的东西寄到巴库来，它只写巴库的事情，它正是要在巴库寻找同道，它在竭力“争取”巴库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不妨谈谈这个集团。正好我们面前放着“正义事业”杂志第二、三两期的合刊。翻开一看，我们眼前就呈现出一幅老图画，画着申德里柯夫先生们[66]一帮打得火热的老伙伴。这个是依里亚·申德里柯夫，钟柯夫斯基先生面前有名的“拍马专家”，干幕后勾当的老手。这个是格列勃·申德里柯夫，从前当过社会革命党党员，也当过孟什维克，又当过“祖巴托夫分子”，现在是个退休者。这个是出名的长舌妇，“冰清玉洁”的克拉芙吉娅·申德里柯娃，一位各方面都令人惬意的女士。形形色色的“门徒”也不少，如格罗舍夫之流和卡利宁之流，这些◇127◇从前在运动中起过作用、现在却落在实际生活后面、专靠回忆来过日子的人物,甚至已故的列甫的影子也浮现在我们面前……一句话，这幅图画里真是应有尽有！

然而，谁需要这一切呢？为什么要让过去黑暗时期的可耻的阴影来纠缠工人呢？他们是不是要邀请工人去焚毁井架呢？或者是要工人去辱骂党，糟蹋党？去开没有工人参加的协商会议，然后去和钟柯夫斯基先生干些什么勾当呢？

不是！申德里柯夫们是想要“拯救”巴库工人！他们“看到”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即申德里柯夫们被工人赶走以后，“工人已经濒于灭亡”（见“正义事业”杂志第八十页）。所以申德里柯夫们便出版了“正义事业”杂志，为的是“拯救”工人，把工人从“绝路”中引导出来。为此，他们提议恢复老样子，抛掉最近三年的成就，背弃“汽笛报”和“油矿公报”，不理睬现存的工会，摈弃社会民主党，并且把一切非申德里柯夫分子赶出工人委员会，然后团结在**调解室**的周围。工人不再需要罢工，也不再需要秘密组织，只需要调解室；申德里柯夫们和古卡索夫们[67]将在钟柯夫斯基先生的许可下在调解室里“解决问题”……

他们想这样把巴库工人运动从“绝路”中引导出来！

完全和“石油事业报”的变色蜥蜴卡－查先生一模一样（见“石油事业报”第十一号）。

但是，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彼得堡的加邦、敖德萨的沙也维奇难道不也是这样“拯救过”工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工人的死敌吗？◇128◇

那末，这些假仁假义的“救世主”究竟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谁呢？

不行，申德里柯夫先生们，尽管你们和卡－查都硬说巴库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还“应当受一次考试（受谁的考试？），看看是否成熟”（见“正义事业”杂志第二页），然而你们毕竟是欺骗不了巴库的无产阶级的！

巴库的无产阶级已经相当觉悟，能够摘下你们的假面具，给你们指出应得的下场！

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你们是靠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党性起家的！

你们也不是工会活动家，因为你们在践踏那自然而然浸透了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工会！

你们就是假仁假义的、戴着“人民之友”的假面具的加邦分子和祖巴托夫分子！

你们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因而也是最危险的敌人！

打倒申德里柯夫们！唾弃申德里柯夫们！

我们就是这样回答你们的“正义事业”杂志，申德里柯夫先生们！

巴库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回答你们假仁假义的讨好！……

载于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五号
署名：柯……
按报上原文刊印◇129◇

协 商 会 议 和 工 人

协商运动停顿了。双方谈判中断了[68]。旧的但也永久是新的协商会议又一次被破坏了。成立初选代表委员会，成立筹备委员会，拟定要求，向群众做报告，**广泛地**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委员会的周围，把工人委员会团结在工会的周围,把工会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所有这一切都中断了，都成为过去了。通过协商会议来“调整生产”，使劳资“关系高尚化”，——这些陈词滥调也都被遗忘了。梯弗里斯的老牌小丑钟柯夫斯基先生宣布这出“戏”闭幕了。资本家使唤惯了的走狗卡拉－穆尔查先生给他鼓掌。幕落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早已熟悉的场面：石油业主和工人仍旧各守原来的阵地，等待着新的风暴，新的冲突。

只是有点“不明白”：石油业主明明昨天还恳求工人去开协商会议，恳求结束“历次局部罢工的无政府状态”并要和他们“取得协议”，而政府当局则以臭名远扬的钟柯夫斯基为代表，邀请有威望的工人去和他们举行正式谈判，要他们相信集体合同的好处；但突然又发生了这样剧烈的变化：他们宣布协商会议是多余的，集体合同是有害的，“历次局部罢工的无政府状态”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怪事”的原因在哪里？破坏协商会议的“罪魁”究竟是谁？◇131◇

钟柯夫斯基先生回答说：当然是工人的过错，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判，他们就提出准许工会参与谈判这一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来捣乱；让工人先放弃工会，我们就开协商会议，否则我们不要协商会议！

石油业主们异口同声地附和说：我们同意，正是工人的过错，让他们放弃工会，我们不要工会！

没有工人的工会“机械工会”跟在工人的敌人后面附和说：他们本来是对的,这实在是工人的过错。的确,工人为什么不放弃工会呢？先放弃自己的要求来讲价钱，然后再谈要求，岂不更好吗？

没有读者的报纸“油矿公报”随声附和没有工人的工会说：对，对，循规蹈矩的工人先讲价钱，然后再谈最后通牒，先让出阵地，然后再把它夺回；巴库的工人却缺乏这种循规蹈矩的精神，他们太不循规蹈矩，差不多成为抵制主义者了。

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本正经地指出：我们本来就知道会这样，我们早就料到这一切了，如果工人和工会完全决裂而高喊抵制，并且不作任何准备，也不团结什么广大群众就直接举行罢工，那末他们就会懂得没有“土地和自由”就没有协商会议，就会懂得“在斗争中才能取得自己的权利”[69]……

巴库无产阶级的“朋友”和敌人就是这样说的。

这些对巴库无产阶级的责备的毫无根据是否需要证明呢？只要把责备工人**热爱**协商会议的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跟责备这些工人抵制协商会议的机械工会和石油业主对照一下（我是说，只要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对照一下），就会立刻明白上述责备完全是荒诞无稽的……◇132◇

假使是这样，那末究竟谁是破坏协商会议的真正“罪魁”呢？

我们先大略地看看协商会议的历史。石油业主并不是第一次邀请工人去开协商会议，我们现在经历的已是第四次协商会议了（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向来是石油业主首先提议召开协商会议，也向来是政府当局帮助他们和工人“取得协议”订立集体合同。石油业主有自己的目的：他们想用极小的让步来保障自己的公司不发生罢工，保证自己的公司能不断吊油。对于石油王国的“平静无事”政府当局是更为关心的，不用说，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几家最大石油公司的股东，石油工业方面的捐税是国家预算中最

重要的收入之一，“祖国工业”是靠巴库重油来滋养的。因此，石油工业稍一停顿就必然影响俄国的工业。

但还不仅如此。对上述各点姑且不谈，政府所以重视巴库的安宁，还在于巴库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发动，无论是石油工人的发动，或是和他们有联系的海员工人的发动，都能感染其他城市的无产阶级。请回忆一下事实吧。一九〇三年春天，巴库的第一次总罢工掀起了南俄各城市著名的七月罢工和游行示威[70]。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间的第二次总罢工[71]成了全俄一二两月间光荣发动的信号。一九〇五年，巴库无产阶级迅速治愈了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的创伤，又重新投入战斗，以自己的热忱感染了“全高加索”。最后，从一九〇六年起，即在俄国革命已经退却之后，巴库仍然没有“平静下来”，直到目前实际上还享有某些自由，并且每年都能比俄国任何地方较好地庆祝无产阶级的五一节，引起其他城市工人的羡慕…… 既然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政府当局竭力不去激◇133◇怒巴库工人，而每当石油业主想和工人协商，想和他们“取得协议”并订立集体合同时都予以支持。

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每次都加以抵制。

为什么呢？

因为石油业主所要的不是当着群众的面和群众进行协商，订立合同，而是背着群众和一小撮人进行协商，订立合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欺骗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群众。

我们的协商会议的实质何在呢？我们的协商会议，这就是石油业无产阶级和石油业资产阶级就彼此的要求所进行的谈判。如果谈判达成协议，那末协商会议就以订立双方在一定期间必须遵守的集体合同而结束。**一般说来**，我们毫不反对协商会议，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共同要求的基础上，协商会议**能够**把工人团结成统一的整体。但是协商会议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团结工人：（一）群众能最积极地参

加协商会议，自由地讨论自己的要求，监督自己的协商代表等等；（二）必要时群众能以总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如果在油矿和工厂中没有一定的集会自由，没有可以自由开会的初选代表委员会，没有工会的领导，工人能够积极协商、讨论要求等等吗？当然不能！在冬天，当航运停止、石油无法外运的时候，当老板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旷日持久地对抗总罢工的时候，工人能坚持自己的要求吗？当然也不能！可是以前各次协商会议都正好选定在冬天举行，都正好在没有讨论要求的自由、没有自由活动的初选代表委员会、没有工会的参与等情况下建议召开的；工人群众及其组织被处心积虑地排挤出活动场所；一切事情都由一小撮亲申德里柯夫派的“个人”包办。他们说，工人◇134◇先生们,你们去选举协商代表吧,选完以后就可以各自回家了！**没有**工人参加的协商会议，**欺骗**工人的协商会议，——这就是他们三年来向我们建议的东西。对**这样的**协商会议只应当抵制，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就向它宣布抵制……

工人不能一下子就弄明白这一切，因此，他们在一九〇五年参加了第一次协商会议。但是后来他们不得不退出协商会议而使它破裂。

工人在一九〇六年又犯错误而参加了第二次协商会议。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抛弃协商会议而使它再一次破裂。

这一切都说明实际生活本身指摘并纠正了工人的错误，把他们推上了抵制申德里柯夫式幕后的、骗人的协商会议的道路。

邀请工人参加**这种**协商会议的孟什维克不自觉地帮助了石油业主欺骗工人……

但是在一九〇七年，事情起了变化。一方面是两次协商会议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的大力宣传，——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工人坚决地拒绝了政府当局和石油业主召开协商会议（已经是第三次协商会议了！）的建议。

从此，巴库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然而，这是不是说工人怕开协商会议呢？当然不是！像他们这样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的人，还会怕和石油业主谈判吗？◇135◇

这是不是说工人逃避订立集体合同呢？当然不是！像他们这样订立过“十二月合同”的人，还会怕订立集体合同吗？

工人抵制了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的协商会议，这也就说明工人已经相当成熟，不致再容许他们的敌人用申德里柯夫式的幕后协商会议来愚弄他们了。

政府当局和石油业主一看到抵制的阴影，就问我们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参加协商会议，我们回答说：在协商会议的整个进程中都必须有工人群众及其工会的广泛参加。只有让工人能够（一）自由讨论自己的要求，（二）自由召集未来的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三）自由利用自己工会的帮助，（四）自由选择召开协商会议的时间，工人才能参加协商会议。而且要把承认工会这一项放在第一位。这几项条件就叫做保障。于是一个著名的公式便开始流行了：**或者是有保障的协商会议，或者是不要任何协商会议！**

我们这样做是否就背弃了抵制没有工人参加的申德里柯夫式的旧协商会议的策略呢？丝毫也没有！抵制旧协商会议的策略完全没有改变，我们宣布要参加的只是新的协商会议，有保障的协商会议，只参加这样的协商会议！

是否需要证明这种策略的正确性呢？是否需要证明只有采取这种策略，我们才能将协商会议由欺骗工人的工具变成团结工人的工具而把工人团结在工会的周围，并组成一支能够坚持自己要求的数万人的大军呢？◇136◇

甚至孟什维克、机械工会、“油矿公报”也不能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也跟着我们宣布准许工会参与谈判这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手头有文件证明，如果这一项要求不先得到满足，许可证不发给工会，孟什维克就不仅不同意参加协商会议，而且不同意推举初选代表。所

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筹备委员会进行谈判之前、在初选代表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在推举初选代表之前。当然现在他们可以说“只有**在**谈判**结束**的时候才应当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说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见“油矿公报”第二十一号），但这本来就是孟什维克阵营中那些毫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做惯的、早为人所共知的“反复无常的行为”。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策略是坚定不移的！

甚至曾经咒骂过“和协商会议有关的一切的一切”的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也在我们的策略面前“低了头”，决定参加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了！

工人明白了我们主张的正确性，所以绝大多数都拥护我们的主张。在被征询过意见的三万五千工人中，拥护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主张无条件抵制）的只有八千人，拥护孟什维克（主张无条件协商）的有八千人，拥护我们的策略即拥护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策略的却有一万九千人。

这样，工人没有采纳孟什维克的策略，即主张参加没有工人、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策略。工人也没有采纳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即脱离实际地抵制协商会议并举行无组织的总罢工的策略。工人赞成有保障的协商会议，赞成有计划地利用协商会议的全部进程来组织总罢工。

协商会议所以被破坏的秘密就在这里！◇137◇

石油业主异口同声地赞成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这样，他们也就是赞同孟什维克的策略。我们说，这就是孟什维克主张错误的最好的证明。

但是，因为工人拒绝参加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石油业主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而……破坏协商会议，抵制协商会议。这样，他们也就是赞同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我们说，这就是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不对的最好的证明。

巴库无产阶级的策略原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因此，石油业资产阶级就以全力攻击这个策略。石油业资产阶级完全赞同孟什维克的没有保障的协商会议，迫不得已时则抓住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抵制策略，可是它无论如何也不肯迁就要求召开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巴库无产阶级！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请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满足了尽人皆知的各项条件（即保障）；掀起了对工人各种要求的极其广泛的讨论；初选代表委员会在群众中日益巩固起来；在拟定要求的进程中，群众团结在自己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周围，又通过初选代表委员会团结在工会的周围，结成一支统一大军的五万群众向石油业主提出要求；石油业主只得不战而降，或者不得不重视这个在对他们最不利的时候发动起来的组织得很好的总罢工；——难道这对石油业资产阶级有利吗？既然如此，资产阶级所豢养的“石油事业报”和“巴库报”[72]的阿猫阿狗怎能不咪咪汪汪地乱叫起来呢？石油业主一面在破坏协商会议，一面却说：既然这个协商会议没有可诅咒的保障就开不成，那就打倒它。◇138◇

政府当局和石油业主破坏协商会议的原因就在这里。

协商会议的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而“油矿公报”忘记了这一切，继续高唱着“领导者冒失”，愚蠢地唠叨着、重复着“巴库报”和“石油事业报”社论上的话！甚至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报纸也认为需要“放开自己的嗓门”来给巴库的立宪民主党人帮腔[73]！可怜的应声虫！

然而，根据新的情况，我们的策略应当怎样呢？

石油业主破坏了协商会议。他们在挑逗总罢工。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立刻用总罢工来回答他们呢？当然不是！石油业主已经储藏了大量石油，他们老早就在准备反击总罢工，这且不谈；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进行这样严重的斗争。我们暂时决不应当举行

经济总罢工。

应当承认，只有各公司分别举行罢工才是合乎时宜的适当的退却形式。孟什维克看来是从“原则”出发来否认这种罢工的适当性（见李恩的小册子[74]）。他们是大错特错了，春天几次罢工的经验证明，在工会和我们组织的积极参与下，各公司分别举行的罢工可以成为团结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应当紧紧掌握这一手段：我们不应当忘记，只有愈积极地参与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我们的组织才愈会成长壮大。

我们最近的策略任务就是如此。

政府当局破坏协商会议之后就想完全取消所谓“巴库的自由”。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完全转入地◇139◇下，把活动地盘让给黑暗势力呢？当然不是！不管反动派多么猖狂，不管他们怎样破坏我们的工会和组织，他们总不能消灭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因为这样做会在工厂和油矿中引起“无政府状态和冲突”。我们的责任是巩固这些工人委员会，以社会主义精神感染它们，并且以公司为单位把它们联合起来。为此，我们工厂和油矿的支部必须经常出来领导这些工人委员会，而各个支部又必须通过自己的代表以公司和区为单位联合起来。

我们最近的组织任务就是如此。

只要完成这些最近的任务，从而巩固工会和我们的组织，我们就能把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群众团结在一起，以便将来和石油资本家进行战斗。

载于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五号附刊
署名：柯巴
按“巴库无产者报”附刊
原文刊印◇140◇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有一个时期，我们各地的组织都有几千党员，领导几十万群众。那时党在群众中有牢固的根基。现在都不同了。各地组织已没有几千人，只剩下几十人，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至于领导几十万群众，那就更谈不上了。固然我们党**在思想上**对群众有广泛的影响，群众是认识党的，群众是尊重党的。“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区别首先就在这里。但是党的全部影响实在也仅限于此。单有思想上的影响，那还是非常不够的。问题在于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况，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机的全部严重性：彼得堡在一九〇七年约有八千党员，而现在连三四百人都难凑足了。至于处在同样状态中的莫斯科、乌拉尔、波兰、顿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还不止此。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统一◇141◇的党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正处在最严重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中。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一方面是“无产者报”[75]和“呼

声报”[76]，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报”[77]，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诚然，在各个彼此隔离的组织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从思想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它们有一个经过革命考验的共同纲领，有经过革命肯定下来的共同的实际工作原则，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正是“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但这还不够。因为党组织**在思想上**的统一还远不能把党从组织涣散和彼此隔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连党内普通的书信往来也没有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至于把党真正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一）党和广大群众脱节，（二）党组织彼此隔离，——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

不难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机，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发动失败后的沉寂和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两年所享有的些微自由的完全丧失，都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在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在有自由的时候，党发展了，扩大了，巩固了。在革命退却的时候，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党就开始衰弱了。起初◇142◇是知识分子脱党，随后一些最动摇的工人也脱党了。党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先进工人的成长，这局部地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脱党，因为“一九〇五年知识分子”贫乏的知识已赶不上先进工人的复杂要求。

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将来的自由来到以前，党应当在危机中苟延残喘，像某些人错误设想的那样。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来多半取决于党是否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是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政党。第二、尽人皆知的阶级斗争的法则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组织性日益加强，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相应地加强起来。而谁

都知道，先行革新我们的党——唯一的工人政党，是增强我们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组织性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自由来到以前，使党健全，使党摆脱危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全部问题在于要找出使党健全的办法，要开辟这样的途径，使党借以（一）联系群众,（二）把彼此隔离的各个组织结成统一的机体。

* * *

那末我们党怎样才能摆脱危机，为此需要采取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对我们说，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并把它团结在公开的杜马党团的周围。但是，当最无关紧要的文化团体之类的公开机关都受到残酷压制的时候，怎能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呢？难道能采取放弃党的革命要求的办法吗？要知道，这是葬送党而不是革新党了！此外，既然杜马党团本身◇143◇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党组织，它又怎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呢？

很明显，这样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混乱，使党更难摆脱危机。

另外一些人对我们说，尽量把党的职责交给工人，以便使党摆脱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无疑地，使党摆脱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职责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这对于党的革新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但是同样很明显，仅仅“转交职责”，同时却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那是不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不能把党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

显然用治标的办法是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必须找到根本办法来根治党的疾病。

党首先苦于和群众脱节，所以无论如何要使党联系群众。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拿群众日益贫困的事实和资本

家的进攻来说吧。大规模的歇业已像暴风似地从工人头上掠过，而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总之，资本家的进攻，至今还在继续着。很难想像，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谁都应当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而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144◇

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不过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为了接近群众，还必须把党的其他更高级的组织建立得不仅适于保卫群众的政治利益，而且适于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为此就必须在建立组织时，除按照地区的原则外，还要采用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

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145◇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口号应当是：“给先进分子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参加党的各部门工作”，“给他们更广大的活动范围”！

不言而喻，先进分子除了要有做领导工作的愿望和主动性以外，还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做报告，“尽量实习”，不要因为怕在听众面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要永远抛弃过分的谦虚和在听众面前的惶恐，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开始时失败了也不要紧，跌一两次交，你就会像“基督履海”似地行走自如了。

总之，（一）根据那些和无产阶级总的阶级需要有关的日常需要，努力进行宣传；（二）组织并巩固工厂党委会，作为党在各区中的最重要的据点；（三）把党的最重要的职责“交给”先进分子；（四）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这就是使我们的组织能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办法。

不能不指出，解决党内危机的上述办法是实际生活本身提供的。中央区和乌拉尔早已不依靠知识分子，那里是由工人自己处理党组织

的工作的。在索尔莫沃、鲁干斯克（顿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发了传单；在尼古拉也夫，除传单外，还出版了秘密的机关报。而巴库的组织，过◇146◇去和现在都不断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过去和现在几乎没有放过工人和石油业主的任何一次冲突，当然，同时还进行一般的政治鼓动工作。这也就是巴库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原因之一。

党联系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组织彼此隔离。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后一个问题。

* * *

那末，怎样把彼此隔离的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怎样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有联系的过着统一生活的党呢？

也许可以认为时而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就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能把各地组织联合起来。或者在国外出版的“无产者报”、”呼声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会把党的组织集合起来，团结起来。无疑地，不论前者或后者对于联系各地组织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是联合彼此隔离的组织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会议，而且是不常举行的代表会议，只能暂时把各地组织连成一气，因而这样的联系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样牢固。一般说来，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这种联系便断了，实际上仍旧用手工业方式进行工作。第二、至于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姑且不论它们运到国内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它们当然落后于俄国的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147◇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不能把我们的地方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自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党虽能召开两次代表会议[78]，在国外出版了几十期机关报，但是我们的组织之联结成一个真正的党这一事业，危机之解决这一事业，还只是勉勉强强地进展了一点。

因此，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对于党内的联系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于克服危机，对于牢固地把地方组织联合起来还是不够的。

显然，需要治本的办法。

只有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这个报纸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并在俄国国内出版才是治本的办法。

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的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即领导党的工作、统一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是这个报纸为了能真正领导工作，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声明、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触及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工作就失去了领导；党的工作没有领导，就不能把各个组织牢固地团结成一◇148◇个整体！

正因为如此，我们着重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正是起领导作用的（而不仅仅是通俗的）报纸。

不用说，能负责创办和领导这种报纸的唯一机关就是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但这个任务现在执行得不好，结果使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陷于分离状态。办得很好的全国性的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央从有名无实的核心变为名副其实的全党的核心，变为真正把党连成一气并真正在党

的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核心。因此，创办和领导全国性的报纸是中央委员会直接的任务。

总之，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它成为把全党联合起来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机关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克服党所遭遇的危机的办法。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由于革命的危机，党内也发生了危机——党组织失掉了和群众的牢固联系，党分成了一些单独的组织。

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149◇

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必须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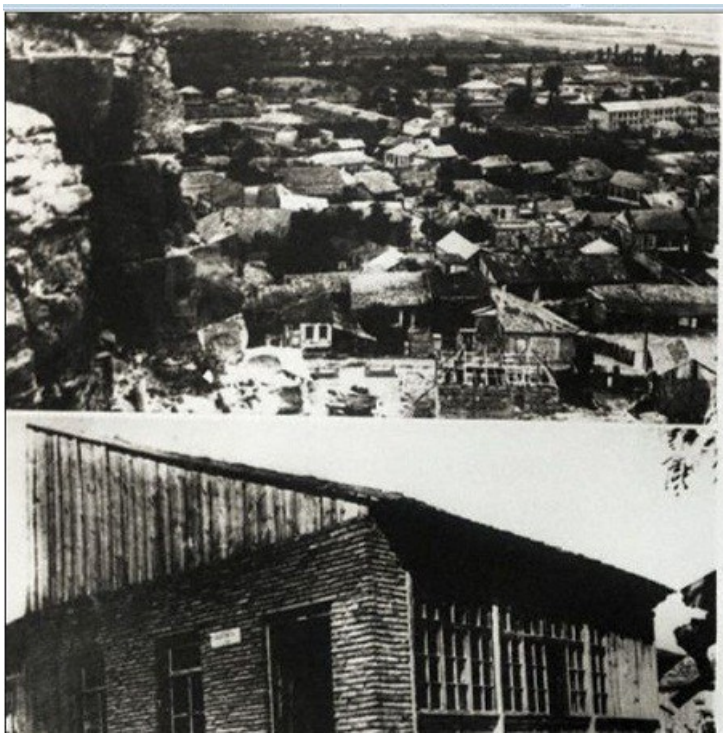
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任务，党才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党才能扭负起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先锋队这一重大使命。

克服党内危机的办法就是这样。

不用说，党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围的各种合法机会——从杜马讲坛和工会直到合作社和丧葬基金会，就愈能迅速地完成克服危机的任务，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

载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和二十七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六号和第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150◇



20 世纪初的斯大林故乡——哥里

斯大林故乡地理位置

（图中粉红色区域，现南奥赛梯）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罢工

巴库工人正处在艰苦的时期。石油业主去年春天开始的进攻仍在继续。工人以前争得的成果被彻底地剥夺着。而工人“只好”默不作声，“无尽期地”忍受下去。

工资因直接减少或因取消房租津贴、奖金等等而日益降低。三班制既改成两班制，而加班和包工事实上又成为强制性的，所以工作日就延长了。所谓“裁减员工”还在进行。石油业主常因一点小事，有时竟平白无故地解雇工人，特别是觉悟的工人。他们并且肆无忌惮地乱开“黑名单”。“固定”工人制度改成了以票计工的“临时”工人制度，这种工人随时都可能为一点小事而失去工作。罚款和打骂“制度”到处盛行。油矿一工厂工人委员会不再被承认。残废法被变样地扔在一边。医药治疗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十戈比医药捐的“苦役法”仍在实行。清洁卫生工作被置诸脑后。学校办得很坏。民众文娱馆没有了。夜校没有了。讲演会没有了。有的只是解雇，再解雇！石油业主蛮横到什么程度，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许多大公司，例如“里海”公司为了避免支付房租津贴，竟公然宣布“自己的”工人未经公司行政当局许可不得结婚。尽管如此，石油大王们还是逍遥法外。他们感到自己有势力，看到他们狡诈的进攻策略已经得逞，所以继续侮辱工人。◇151◇

石油业主进攻得逞决不是偶然的。这完全是由许多有利于这次进攻的外部情况促成的。这首先是俄国普遍的沉寂状态，是既成的有利于资本进攻的反革命局面。不用说，没有这种情况，石油业主就不得不节制自己的贪欲。其次是以蹂躏少数民族的暴徒马尔丁诺夫为首的地方当局完全像奴才一样地为石油业主效劳，为了讨好他们，什么都

肯干（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米尔佐也夫公司事件”就行了）。再次是工人的组织不坚强，这多半是由油矿工人的成分不固定而造成的。谁都明白在和石油业主作斗争时，油矿工人是很重要的，然而正因为他们和农村联系得最密切，他们就最不“善于”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最后是工资项目的繁多（其中包括奖金、房租津贴、车费、洗澡费等等）使资本家易于减少工资。无须证明，直接减少工资并不像暗中减少工资那么容易，所谓暗中减少工资就是利用保持工资“本身”原额的错觉来零敲碎打地逐渐取消奖金、房租津贴、车费等等。

这一切再加上石油业主经验的增多和组织性的加强，自然就大大便利了资本在石油王国的进攻。

石油大王们这种疯狂进攻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他们的蛮横无理有没有止境，这就要看他们会不会遇到工人方面的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抵抗而定。

目前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石油业主打算“完全”征服工人，“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的斗志，“无论如何”要把“自己的”工人变成唯命是听的奴隶。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想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他们破坏了协商会议，企图挑逗工人去进行无组织的总罢工，以便一下子打垮工人。他们现在还是想◇152◇达到这个目的，心怀恶意地有步骤地进攻工人，经常挑逗工人去进行自发的发动。

工人暂时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地怀恨在心地忍受着石油业主的打击。可是，我们眼看一方面石油业主一天比一天蛮横，无止境地夺取工人最后的一块面包，把工人弄到赤贫的地步，愚弄工人并挑逗他们去进行自发的爆发；另一方面工人一天比一天忍耐不住，对石油业主的怨言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我们眼看到这一切，可以确信地说，石油工人的愤怒的爆发，在最近的将来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真能“无尽期地”忍受下去，沦于奴隶般顺从的中国苦力的地位，或者是他们奋起反抗石油业主，扫清走向较好生活的

道路。群众的愤怒日益不可遏止，证明工人必然要走第二条道路，即和石油业主斗争的道路。

而石油工业的现状是这样的：它不仅完全容许工人进行防御性的斗争，保持旧有的阵地，而且完全容许工人转入进攻，夺取新的阵地，进一步增加工资，进一步缩短工作日等等。

实际上，既然目前石油业主的利润比俄国和欧洲其他企业主的利润大得多，既然石油市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起来，扩张到新的地区（如保加利亚），既然喷油井的数目日益增加，既然石油价格非但没有下跌，反而有上涨之势，那末工人完全有可能挣断奴隶般忍受的锁链，摆脱可耻的沉默的桎梏，举起向石油业主反攻的旗帜，从他们那里争得新的较好的劳动条件，这岂不是很明显的吗？……

但是，记住了这一切，还不应当忘记：即将到来的总罢工将是巴库历来罢工中最严重、最持久、◇153◇最顽强的一次。应当注意到我们以前的罢工具备下列有利的条件：（一）俄国革命的普遍高涨；（二）由此造成的地方当局的相对“中立”；（三）石油业主由于经验不够和组织性不强，一遇到罢工就张皇失措。现在我们既没有第一个条件，又没有第二个条件，更没有第三个条件。普遍的高涨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使石油业主称心如意的普遍的沉寂；地方当局的相对“中立”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们使用一切“镇压”手段的充分决心。石油业主不再是经验不够和组织性不强，而是组织性加强了。并且石油业主在斗争中已经老练得自己会挑逗工人罢工了。他们甚至不怕挑逗工人举行总罢工，只要这种罢工是无组织的，是使他们有可能“一下子制服”工人的。

这一切都说明工人就要和有组织的敌人进行严重而困难的斗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许多不利的条件，胜利还是可能的。只是必须使工人的斗争不是自发的和分散的，而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自觉的。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指望获得胜利。

我们不知道总罢工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但无论如何不会在对石油业主有利的时候。现在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必须立即开始坚持不懈的准备工作来迎接总罢工，并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精力和勇气贯注到这一工作上去。

加强我们的团结性，加强我们的组织性，——这就是我们准备工作的旗帜。

因此，应当立刻着手把工人广泛地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团结在工会的周围。这首先应当结◇154◇束组织中的分裂状态，把两派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也应当结束各工会的分裂状态，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必须使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活跃起来，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感染它们，使它们和群众联系起来，并通过它们把我们和整个石油工人大军联系起来。必须着手拟定能把工人团结成一支有力大军的共同要求。必须经常参与工人和石油业主的一切冲突，从而实际上把工人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总之，应当坚持不懈地竭尽全力地进行准备，以便应付自如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困难而光荣的总罢工。

我们号召同心协力地准备经济总罢工。

载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七号
署名：科·柯……
按报上原文刊印◇155◇

党　的　生　活[79]

下面我们刊登了巴库委员会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内意见分歧的决议。这种意见分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我们国外出版的报刊上早就对这种意见分歧进行过争论。有人甚至说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在闹分裂。可是巴库工人很少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这种意见分歧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这个决议的前面加上一些说明。

首先谈谈布尔什维克派内部闹分裂的问题。我们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现在和过去都没有闹过任何分裂，只是对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有意见分歧。在布尔什维克派这样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政派中，无论过去或将来，这种意见分歧总是会有的。谁都知道，有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对于土地纲领、游击活动、工会和党等问题都有过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尽管这样，布尔什维克派却没有分裂，因为它的内部对于其他重大的策略问题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一次的问题也应该这样说。因此，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内部闹分裂的说法纯粹是捏造。

这里所说的意见分歧是指十二人组成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80]分成了两派：编辑部内的多数（十人对二人）认为为了巩固党，应当利用工会、俱乐部，特别是杜马讲坛等合法机会，党不应当从◇157◇杜马中召回杜马党团，相反地，应当帮助杜马党团改正错误，利用杜马讲坛进行社会民主党的正确而公开的鼓动工作；周围聚集着所谓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编辑部内的少数（二人）却认为合法机会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杜马党团，认为不需要支持它，甚至不反对在一定条件下把它从杜马中召回。

巴库委员会认为编辑部内少数人的观点不符合党和无产阶级的利

益，因此，坚决拥护以列宁同志为代表的编辑部内多数人的立场。

巴库委员会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内意见分歧的决议

巴库委员会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两派送来的印就的文件，讨论了编辑部的情况，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从问题的本质看来，编辑部内多数人对于在杜马内外进行工作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巴库委员会认为，只有这样的立场才能称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 精神上的而不仅是字面上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二）“召回派”，作为布尔什维克派中的一个派别，它的产生，是对合法机会，特别是对杜马讲坛作了有害于党的过低估计的结果。巴库委员会确认，在目前沉寂的环境中，在没有其他更重要的手段◇158◇来公开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杜马讲坛进行工作可以是而且应当是党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

（三）经常提醒杜马党团注意党纪的“最后通牒派”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派内的什么派别。既然它竭力站在一个仅限于对杜马党团显示中央权力的特殊派别的立场，所以“最后通牒派”是最坏的一种“召回派”。巴库委员会确认，只有中央在杜马党团内部和对整个杜马党团进行不倦的工作，才能使杜马党团成为真正有党性的守纪律的党团。巴库委员会认为杜马党团最近几个月来活动的事实显然证明了这一切。

（四）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所谓“造神派”，以及一般地把宗教成分注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它的产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作了非科学的因而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解释的结果。巴库委员会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及其形成为确定的世界观，并不是和宗教成分结合的结果，而是和宗教成分进行无情斗争的结果。

（五）根据这一切，巴库委员会认为，对聚集在编辑部内少数人周围的上述派别进行无情的思想斗争是党当前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

（六）另一方面，编辑部的两部分人虽有上述意见分歧，但对于布尔什维克派极为重要的问题（如对时局的估计、无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彼此的意见是一致的，根据这一点，巴库委员会认为，布尔什维克派的统一，即编辑部两部分人的共同工作，是可能而且必要的。◇159◇

（七）因此，巴库委员会不同意编辑部内多数人的组织政策，并反对把站在编辑部内少数方面的人“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巴库委员会同样反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行为，因为他声明不服从编辑部的决定，而这会引起新的更激烈的摩擦。

（八）巴库委员会建议举行一个和全党代表会议平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作为消除现存不正常状态的实际措施[81]。

————————————————

关于“某地学校”和对“左派孟什维克”的态度问题，巴库委员会因尚未掌握充分材料，暂不作出确定的决议。

一九〇九年八月二日

载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七号
按报上原文刊印◇160◇

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合同

（为纪念其五周年而作）

同志们！

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巴库各区宣布经济总罢工那天起，到今天整整五年了。

从工人和石油业主订立著名的十二月合同即我们的“重油宪法”那时起，到最近几天也快满五年了。

我们以自豪的心情回忆这些日子，因为这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是石油业主失败的日子！

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壮丽场面：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包围了“电力”公司，责成自己的协商代表提出十二月要求，而躲在“电力”公司里面被工人包围的石油业主代表则“表示赞同”，签订了合同，“同意了一切”……

这是贫民无产者对富翁资本家的真正胜利，是给石油工业中的“新制度”奠定基础的胜利。

订立十二月合同以前，我们平均每天工作十一小时；订立合同以后，规定工作九小时,对采油工人逐渐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161◇

订立十二月合同以前，我们平均每天收入约八十戈比；订立合同以后，工资提高到每天一个卢布零几个戈比。

十二月罢工以前，既不发给我们房租津贴，也不供给我们宿舍；由于举行了罢工，我们为机电工人争得了前者，又争得了后者，只是还必须把这一切推广到其他工人身上。

十二月罢工以前，资本家的走狗在油矿和工厂里无法无天，对我们横加殴打，肆意罚款；由于举行了罢工，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宪

法”建立起来了，我们根据这个“宪法”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协商代表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志，和石油业主一起谈判，和他们一起确定相互间的关系。

我们一下子就从“阿姆沙拉”[82]和“负重的牲口”变成了为较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

这就是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合同给予我们的东西！

但还不止这些。十二月斗争给予我们的基本东西是：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必定获得胜利，有决心迎接新的战斗，认识到“单靠自己的手”就可以砸碎资本主义奴隶制的锁链……

从那时起，我们总是向前进展：增加了工资，使油矿工人也争得了房租津贴，巩固了“重油宪法”，使油矿一工厂工人委员会得到了部分的承认，组织了工会，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继续多久。革命退却和反革命加紧以后，特别是从一九〇八年年初起，石油业主竟假借石油产量减少和市场缩小的理由，开始剥夺我们原已争得的果实。他们取消奖金和房租津贴。他们实行十二小时的两班制来代替八小时的三班制。他们减少了医药治疗。他们已经夺去民众◇162◇文娱馆，现在又要把学校夺去，他们用在学校方面的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文钱，而每年花在警察身上的竟达六十多万卢布。至于打骂和罚款的恢复，工人委员会的取消，沙皇政府的奴才——大资本家的走狗对工会的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最近两年来，他们不但使我们不能继续改善生活，而且使原来的情况更加恶化，把我们原已争得的果实夺去，将我们抛到十二月以前的旧时代。

现在，十二月十三日，在这个胜利的十二月罢工五周年纪念的日子，在这个石油业主曾在我们面前发抖而我们举行进攻并争得新权利的日子，——正是在今天，我们面前摆着石油工人群众所关切的重大问题：我们还要沉默多久？我们的忍耐有没有尽头？我们应当不应当

挣断沉默的锁链，为我们的切身要求举起经济总罢工的旗帜？

你们自己判断吧。今年的产量达到了五亿普特，这是最近四年来任何一年的产量都没有达到过的数字。石油的价格绝没有下跌，因为今年的平均价格和去年一样是二十一戈比。无须任何花费的自喷石油一天比一天增多。因为各地不用石炭而改用石油，石油市场一天天扩大，石油的输出量也不断增加。可是石油业主的生意愈好，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愈多，他们就愈加恶毒地对待工人，愈加厉害地压迫工人，愈加猖狂地解雇觉悟的工人弟兄，愈加狠心地夺去工人的最后一块面包！

同志们，石油工业的状况愈来愈有利于石油工人的共同斗争，而石油业主的挑衅行为必然推动工人去进行这样的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163◇

同志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无尽期地忍受下去，落到一声不响的奴隶地位，或者是起来为我们的共同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胜利都证明我们要选择第二条道路，即举行总罢工的道路，以争取提高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人住宅区和房租津贴，争取民众文娱馆和学校，争取医疗和残废工人抚恤金，争取油矿一工厂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的权利。

同志们，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有闻所未闻的迫害手段，尽管石油业主的组织性正在加强，只要我们加紧总罢工的准备工作，只要巩固我们的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只要扩大我们的工会，只要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我们就会像五年前那样使我们的老板们就范。

社会民主党既引导我们获得了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的胜利，也就会引导我们通过有组织的总罢工获得未来的胜利。

这就是光荣的十二月斗争的经验。

那末就让今天，一九〇四年十二月胜利罢工开始的日子，鼓舞我

们去同心协力、坚持不懈地准备总罢工吧！

让我们大家对这一天的共同怀念成为石油业主预感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总罢工即将到来的不祥之兆吧！

即将到来的总罢工万岁！ ◇164◇

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文曾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165◇

高 加 索 来 信[83]

一 巴 库

石油工业的状况

在国内比较“平静”之后，在俄国丰收和中部工业区工作活跃之后，石油工业已进入比较高涨的阶段。由于局部罢工次数减少（因为政治上的残酷迫害和石油业主组织性的不断加强），罢工所造成的石油减产量已降低到五十万普特左右（一九〇八年为一千一百万普特，一九〇七年为二千六百万普特）。没有罢工而吊油又能顺利进行，这成为自喷石油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之一。石油业中已经形成的（相对的）稳定状态，又使它恢复了近几年来所失去的市场。今年石油产量已提高到五亿普特，这是最近四年中任何一年都没有达到的数字（去年是四亿六千七百万普特）。由于中部工业区对液体燃料的需要增加，又由于东南铁路、梁赞－乌拉尔铁路和莫斯科－喀山铁路不用顿巴斯的煤而改用石油，今年石油的输出量就大大超过了去年。虽然石油业主叫苦连天，相反地，石油价格却没有下跌，依然照旧，因为今年的平均价格和去年一样（二十一戈比）。而得天独厚的油井往往喷泉似地喷出石◇167◇油来，下雨似地赐给石油业主。

一句话，石油业主的“生意”正在好转。

可是经济上的迫害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取消了“奖金”和房租津贴。两班制（每班十二小时）代替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加班包工逐渐成为制度。医疗和学校经费减到最低限度（而石油业主用在警察方面的经费每年竟达六十多万卢布！）。食堂和民众

文娱馆已被夺去。油矿一工厂工人委员会和工会极被轻视，觉悟的工人弟兄照旧被解雇。罚款和打骂制度也在恢复。

沙皇政权的奴仆，警察和宪兵，完全为石油大王们效劳。暗探和奸细密布巴库石油区，工人每因与石油业主发生极小的纠纷而被大批驱逐，实际“自由”（巴库特权）被剥夺净尽，逮捕事件不断发生，——地方当局“立宪”工作的情形就是这样。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地方当局“按其本性”来说不能不窒息任何“自由”，即使是最起码的 “自由”；第二、地方当局之所以必须这样做，还在于石油业以普特税、官地抽成、消费税和运输税等形式每年使国库得到不下四千万卢布的“收入”，它“需要”平静，“需要”不间断的吊油。至于石油业中任何些微的停滞都会严重地影响中部工业区，而这又会搅乱政府的“事业”，那就更不用说了。固然，不久以前政府曾认为在石油区必须容许某些“自由”，并布置了工人和石油业主的“协商会议”，但这是过去的事情，那时反革命得势的可能性还不明显，那时讨好工人的政策还是最有利的政策。现在情势已经明显了，反革命“完全”站稳了，于是野蛮的迫害政策代替了讨好政策，蹂躏少数民族的暴徒马尔丁诺夫代替了甜言蜜语的钟柯夫斯基。◇168◇

这时，工人完全懂得局部罢工是不适当的了，他们日益坚决地谈到经济总罢工。石油业主的“生意”日见好转，而压榨却不断加重，这一事实使工人恨入骨髓，使他们有了战斗情绪。工人以往已争得的果实被剥夺得愈厉害，总罢工的思想在工人头脑中就成熟得愈充分，工人“期待”“宣布”罢工也就愈焦急。

组织考虑到石油业状况有利于罢工，也考虑到工人有罢工情绪，于是决定展开总罢工的准备工作。目前巴库委员会正在征求群众意见，拟定能团结全体石油业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要求大概将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住宅区、房租津贴、民众文娱馆和学校，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包工，增加医疗，承认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组织及其执行机

关巴库委员会认为尽管反革命日益猖獗，尽管石油业主的组织性日益加强，只要工人以自己阶级的组织性，即联合各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扩大和巩固工会并团结在社会民主党的周围来对抗敌人的力量，他们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机的选择取决于种种条件，事先很难估计。现在有一点是明显的：罢工不可避免，必须抓紧“每一分钟”准备罢工……

油矿区自治

石油业的好转并不是巴库无产阶级生活中唯一重要的现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件是我们这里不久以前展开的“地方自治运动”。我们指的是巴库各石油区的油矿区自治。在内政部提出边区地方自治的著名“奏摺”和高加索总督遵此发布高加索地方自治实施办法的“通令”以后，石油业主已着◇169◇手草拟油矿区自治方案。此项方案的原则无疑将由石油业主这次（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这些原则大致如此：油矿区（巴拉汉内、罗曼内、萨崩奇、苏拉汉内、比比－爱巴特）单独成立一个不属于市、县的特别地方自治单位，称为油矿区自治局。油矿区自治局的职务是管理给水、供电、修路、电车、医疗、民众文娱馆、学校，建设屠宰场、澡堂、工人住宅区等等。地方自治局本身大体上按照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二日的“条例”[84]组织，所不同的是按照“条例”必须保证贵族占地方自治局委员的半数，因为这里没有贵族（石油业主既把油矿区从县治里划分出来，也就使自己不受占优势的地主的威胁，并造成本身的优势），就保证石油业主占半数，并且所保证的还不是全体石油业主而只是二十三个大石油业主。地方自治局的四十六个席位中，官厅和公共机关的代表占六席；十万工人居民占四席；缴纳全部捐税（全部预算约六十万卢布）三分之二的纳税人，即二十三个大石油业主占十八席；缴纳六分之一捐税

的纳税人，即从属于大石油业主的一百四五十个中等石油业主占九席；工商业小资产阶级（约一千四百人）占其余的九席。

你们可以看出站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特权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必然成为劳资双方尖锐的冲突场所的纯粹工业界的地方自治局。

石油业主组织这样一个地方自治局，第一、是想把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大部分职务从他们的“代表大会”推给油矿区自治局，使“代表大会”变成纯粹的辛迪加；第二、是想把其余的资产阶级即辅助企业、钻井包工等业主拉来共同负担花在油矿工人居民身上的经费。至于“按照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条◇170◇例”所选出的工人的四个席位（从工人选民团选出初选人，然后选出四个复选人），这在石油业主来说，不但不是损失，而且很有利，因为这四个工人席位是为了给地方自治局装门面而给的，——多么“开明”而又……便宜合算，石油大王何乐而不为。

另一方面，无疑地，既然油矿区自治局能把石油业资产阶级和所谓“辅助企业”资产阶级联合成一个整体，那末它也一定能把至今还是分开的石油工人和辅助企业的工人联合起来，使他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四个代表表明他们的共同要求。

巴库委员会有鉴于此，便在它的关于油矿区自治的决议中决定利用筹划中的自治局，即参加自治局，以便宣传工人的一般经济需要，并加紧组织工人。

其次，为了扩大选举制度的范围，并鉴于油矿区自治局所要处理的问题大体上也就是过去召开的协商会议所要处理的那些工人关切的问题，而工人在协商会议上一直和石油业主占相等的席位，所以组织在自己的决议中要求工人在自治局中也要占相等的席位，并在决议中着重指出，自治局内的斗争只有在得到自治局外的斗争的支持并为后者的利益服务时才会有力量。

此外，鉴于省府会议决定把巴拉汉内、 萨崩奇、 罗曼内三个区

（实际上都是工人住宅区）划出油矿自治区是对工人不利的，组织要求把这三个区划入油矿自治区。

最后，巴库委员会在决议的总论中指出，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是地方自治自由发展和现存阶级矛盾自由表现的必要条件。同时着重指出，必须推翻沙皇政权，必须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171◇此作为建立彻底民主的地方自治局的先决条件……

油矿区自治局目前还在筹备阶段。石油业主委员会的草案须经石油业主代表大会批准，再经总督办公室送交内政部，然后送交国家杜马等等。虽然如此，组织仍决定立即展开运动，在油矿和工厂中召开大会，以揭穿石油业主，使广大群众普遍知道我们的纲领，并鼓吹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为了这些目的，组织既不拒绝“参加”石油业主的代表大会，也不放弃利用杜马讲坛，并预先供给我们的党团以必要的材料。

组织状况

由于巴库油矿区的某些特殊条件（集会的某种可能性还没有被政府当局完全取消，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还存在），巴库的组织状况优于俄国其他地区。此外，所谓合法机会的存在也使工作便于进行。因此，我们组织的联系是相当多的。但是由于人力和经费的不足，这些联系还没有充分利用。本来需用鞑靼文、阿尔明尼亚文及俄文进行口头的和主要是文字的宣传，但因为经费（和人力）不足，只得限于俄文，然而，例如回民工人在生产（吊油）中就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且他们的人数也比俄罗斯人或阿尔明尼亚人多。用俄文出版的“巴库无产者报”[85]（巴库委员会的机关报）已经三个月没有出版了，主要是因为没有经费。巴库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接受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提议，尽可能用四种或三种文字（俄文、鞑靼文、格鲁吉亚文、

阿尔明尼亚文）出版一种总的机关报。我们组织内的◇172◇党员（严格地说）不过三百人。和孟什维克同志（约一百人）的联合还没有进入实现阶段，—— 暂时仅仅有联合的意愿，但是仅仅有联合的意愿还不能消除分裂状态。……宣传工作只在我们称为“学习讨论会”的高级组内进行，其方式是讲演。重要的宣传书籍深感缺乏…… 和党脱离的状态、对俄国各地党组织情况的完全隔膜，这对于党员群众有很坏的影响。创办全国性的机关报，经常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有计划的巡视，是会有助于工作的。在巴库委员会通过的具有全组织性的决定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和创办全国性机关报的两个决定。关于第一个问题，巴库委员会认为必须尽速召开代表会议以解决已经成熟的、主要是组织上的各项问题。巴库委员会认为与召开代表会议的同时召开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以消除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最近数月来所形成的不正常状态也是必要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巴库委员会鉴于组织彼此隔离分散，认为只有在俄国出版一种全国性的机关报才能把党的组织连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建议党着手创办这样的报纸。

“合法机会”

我们的组织比较容易地应付了危机，我们的组织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活动，并且对一切日常问题不管怎样总有反应，这一切，在许多方面都应当归功于至今还在我们组织周围继续存在的“合法◇173◇机会”。当然，“合法机会”的存在又应归功于石油业的特殊条件及其在全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但是现在且不谈这些……在巴库的“合法机会”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这些委员会是由各该公司的全体工人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信仰而选出的。它们的职能是代表工人去和公司行政当局谈判属于油矿－工厂性质的问题。

在直接意义上说，它们还不是合法的组织，但在间接关系上和实际上却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它们的存在是根据“十二月合同”，而十二月合同全文都载在工人“工资计算簿”上，工人“工资计算簿”则是经政府当局许可而印制的。油矿－工厂工人委员会对于我们的组织显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组织通过它们可以有组织地去影响全体石油工人群众，但必须使这些委员会在群众面前坚持我们组织的决定。固然，因为现在石油业主不再重视这些委员会，它们的作用已经不那么大，但工人“重视”这些委员会，这一点在我们比什么都重要……除了工人委员会，存在的还有工会，实际上是两个工会，即“石油工人”的工会（约九百会员）和“机械工人”的工会（约三百会员）。“采油工人”的工会可以不算，因为它的作用太小了。至于和石油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行业的工会，以及受社会革命党影响的秘密的海员工会（约二百会员），我们就不谈了，虽然海员工会对石油业也有意义。在上述两个工会中，前者（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在工人中特别有威信，它是按生产部门的原则建立的，它并且把石油业中各劳动部门的工人（采油、钻井、机械、炼油、杂工）都联合起来了。这种组织形式是由斗争条件来决定的，例如，斗争条件使机械工人脱离采油工人而举行的罢工成为不适当的行动。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①] 就开始大批退出“机械工◇174◇人”的工会。因为按行业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工人”的工会（受孟什维克影响的）反对按生产部门的原则建立工会，而主张成立三个独立的工会（机械、采油、石油加工）来代替一个总的工会。但是按行业建立组织的原则早就被巴库的实际经验

————————————

① 德米特里也夫还不懂得这一点，他在“职工运动实际经验点滴”一书中“证明”必需有三个工会，他的根据不是对石油工人的斗争条件的“分析”而是对……劳动技术的“分析”。他说，行业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工会也应当是各种各样的…… ——著者注

否定了。这就是“机械工人”的工会日趋衰落的一个原因。“机械工人”的工会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容许非机械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因而破坏了自己的原则。假若这些领导者没有虚伪的自尊心，“机械工人”的工会早就会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石油工人”的工会合并了。

顺便谈谈合并问题。工会合并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年，但至今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因为（一）孟什维克的领导者们怕自己被淹没在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中，因而有意阻挠合并；（二）影响这两个工会活动的那两个政派，目前还没有联合起来。究竟和谁联合呢？可以算在孟什维克名下的也许有八十到一百个“党员”，但他们自己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至少最近八个月来我们没有看见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发过一张传单，没有听见他们做过一次演讲，虽然在这期间石油区经历了总罢工、地方自治、戒酒等等重要运动。孟什维克的组织事实上已取消而不存在了。简单地说，没有谁可以联合。而这种情况自然就阻碍了工会的合并……◇175◇

两个工会都是非党的。但这并不妨碍和党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工会，特别是“石油工人”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是不小的。这就自然而然易于把最活跃的分子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在其余的“合法机会”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俱乐部（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和“劳动”消费合作社[86]（受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这都是巴库无产阶级中最活跃的分子聚集的中心。在对我们组织的关系上，它们，特别是在整个石油区内活动的“知识就是力量”俱乐部[87]（“科学”俱乐部只在城里活动），可以说是和工会一样的……

最近两星期来忙于戒酒运动，这个运动几乎需要所有合法机构都参加工作。巴库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在自己的决议中表明了。决议把酗酒看做资本主义制度下必不可免的恶习，只有随着资本主义

的垮台，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把它根除。同时现存的专制农奴制度使工人和农民沦于毫无权利的奴隶地位，并剥夺他们满足文化要求的可能性，因而使酗酒在劳动阶层中剧烈地流行起来。至于“政府”代表公然鼓励酗酒，作为充实国库的来源，那就不用说了。根据这一切，巴库委员会断言：无论是正在组织的戒酒代表大会和“戒酒协会”的“自由派”的说教，或者是神甫的劝导，都不能减轻、更不能根除这种由于生活不平等所造成而为专制制度所加甚的酗酒恶习。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只有不以根除酗酒为目的而以把它减到最低限度为目的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为使这种斗争得到胜利，首先必须推翻沙皇政权，争取成立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样才能自由发◇176◇展阶级斗争，并组织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广泛地培养他们的力量，以便为社会主义进行伟大的斗争。巴库委员会把即将召开的戒酒代表大会[88]看做宣传俄国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和社会主义要求的手段，并建议我们的代表跟参加代表大会的那些模糊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

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〇年二月
十三日（二十六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一号
署名：科·斯·
“合法机会”一节写于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署名：科·斯杰芬
按报上原文刊印
“合法机会”一节按手稿刊印

二 梯弗里斯

就工业发展来说，梯弗里斯和巴库截然不同。巴库之受人注意，因为它是石油工业的中心，梯弗里斯之受人注意则仅仅因为它是高加索的行政、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梯弗里斯全部产业工人约有两万，就是说，比士兵和警察还少。唯一的大企业是铁路工厂（约有三千五百工人）。其余各企业多的有一二百人，大部分只有二十到四十人。然而梯弗里斯简直尽是商店以及与之有关的“商业无产者”。由于和经常活跃而又很多波动的俄国大市场的联系不够密切，梯弗里斯呈现停滞状态。它没有那种仅为大工业中心所特有的尖锐的阶级冲突，这又使它变成一种有待外力来搅动的泥潭之类的东西。正是这个缘故，孟什维克派，真正“右的”孟什维克派，才能在梯弗里斯盘踞了这么久。巴库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布尔什维克明显的阶级立场得到工人的热烈拥护！

在巴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梯弗里斯则要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才能弄明白，——布尔什维克坚定不移的言论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人理解。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梯弗里斯的布尔什维克“酷嗜”辩论，而孟什维克却相反地希望尽可能“逃避”辩论。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梯弗里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经常会而且必然会采取对孟什维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形式。因此，对于目前还在梯弗里斯占优势的孟什维克所造成的、我们首先必须与◇178◇之斗争的那种思想气氛，即使简略地加以分析也是特别有意义的。这种气氛可以说是取消主义的，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策略上、纲领上都是取消主义的。我们就从分析这种气氛着手，简略地谈谈梯弗里斯党的工作情况。

纲领上的取消主义

格鲁吉亚文的孟什维克报刊是反映孟什维克“舆论”的机关报。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信条表现在“几个迫切问题”的几篇文章中（见“思想报”和“开端报”[89]各号）。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中影响最大的**安恩**同志[90]。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几篇在思想上培植了梯弗里斯取消主义的文章。

作者在这几篇文章里“重新评定一切价值”并得出结论说，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在某些纲领原则上，尤其是在策略原则上迷失了方向。按作者的意见，必须“根本改变党的全部策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才有可能，这是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不过还是让作者自己来说吧。

作者说：“布尔什维克曾经证明它（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现自己的全部最低纲领。但是要知道，如果实现了这个最低纲领的社会部分，就会束缚资产阶级的生产，引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抗议，成为大规模反革命的开端……谁敢断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符合目前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呢？”很明显，“要实现布尔什维克的最低纲领，简直是唱高调”（见一九◇179◇〇八年二月“思想报”第十七号）。

当然，不单是布尔什维克说过要实现全部最低纲领，因为除了全党的最低纲领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最低纲领，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这一点。重要的是我们的作者鉴于“资产阶级的不发达”和由此产生的反革命的危险，于是起而反对纲领中的“社会部分”，认为这是“唱高调”，显然应予取消。

在**安恩**同志的文章里找不到他对工业实际状况的任何分析（显然，**安恩**同志措词不当，他把工业的落后称为“资产阶级的不发达”。——科·斯大·注），找不到任何数字，任何稍微重要一些的材料，他

随便从虚无缥缈的论点出发，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受不了，而且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联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所以要打倒纲领中的“社会部分”……

作者的论断其实也就是现代自由派时常提出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其荒诞无稽是无须我们证明的。我们以为只要从这些论断中摘引几句就可以立刻看清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面目了……

但是我们的作者不仅起而反对纲领中的“社会部分”，并且他也不饶恕（虽然并不那么明目张胆）纲领中的政治部分。我们且听他说吧：

“单是一个无产阶级或单是一个资产阶级[①]进行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反动势力……◇180◇很明显，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它们用某种方式配合起来并且使它们走向一个共同目标，才是战胜反动势力的**唯一道路**（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反动势力的失败，宪法的争得和实施都取决于怎样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自觉地联合起来和怎样使它们走向一个共同目标”……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前进时应当不让自己的不调和的态度削弱了共同运动”。但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目前要求只能是温和宪法”，如果无产阶级不愿“让自己的不调和的态度削弱了共同运动”，不愿破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自觉地走向一个共同目标”，总之，如果无产阶级不愿为反革命准备胜利的条件，那末显而易见，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抛弃自己的“激进宪法”（见一九〇八年“开端报”第四号）。

结论很明显：打倒民主共和国，“共同运动”和……“温和宪法”万岁，当然这是“为了”革命的“胜利”……

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文章不过是笨拙地转述前社会民主党党

———————————————

① 所谓“资产阶级”，作者处处都是指的“中等”自由资产阶级，“其思想代表者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斯大·注

员华西里也夫的一篇大家知道的文章罢了，这篇文章于一九〇六年发表在“同志报”上，谈的是“各阶级联合起来”，暂时忘却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取消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等等。不同的地方只是华西里也夫说得直截了当，清清楚楚，而**安恩**同志却不好意思说得十分露骨罢了。

我们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来分析自由派的这一套胡言乱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此早已从根本上作过分析和评价了。我们只想如实地说：我们的作者拾人牙慧地大谈纲领问题，梯弗◇181◇里斯的孟什维克曾以为他是发表“新的”派别宣言，其实他是要取消党的最低纲领，是要拿我们的纲领去适应立宪民主党的纲领。

现在我们就从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新”纲领谈到他们的“新策略”吧。

策略上的取消主义

安恩同志特别不满意党的策略，照他的意见，这个策略必须“根本改变”（见“开端报”第四号）。因此，他的文章大部分是对于这个策略的批评。他特别攻击著名的“普列汉诺夫公式”（“俄国革命如果是工人运动就能胜利，否则决不能胜利”[91]），把它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点混为一谈，并断定它是经不起批评的。他提议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以进行“共同运动”……“走向一个共同目标”的“新的”（其实是旧的！）论点来代替这个“公式”。请听吧：

“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或是历史事实，都不能证实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论点是正确的。”

引证的理论：“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己的手建立自己的敌人的制度。因此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引证的历史事实：◇182◇“我们的革命曾经同时是我们的工人运动，尽管如此，革命并没有胜利。很明显，普列汉诺夫的公式没有得到证实。”（见“思想报”第十七号）

真是简单明了。只是不得不替德国社会民主党惋惜，它居然还在致伦敦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承认（大概是由于轻率吧！）：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或是“历史事实”都完全证实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有领导作用是正确的。更不用说我们的（不幸的！）党了……

我们的作者究竟用什么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提议用什么来代替呢？

安恩同志说：“单是一个无产阶级或单是一个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反动势力……很明显，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它们用某种方式配合起来并且使它们走向一个共同目标，才是战胜反动势力的唯一道路”。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前进时应当不让自己的不调和的态度削弱了共同运动”……（见“开端报”第四号）作者保证说，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愈微弱**，资产阶级革命就**愈能胜利**（着重号都是我们加的。——科·斯大·），当然要在其他同等的条件下”。（见“思想报”第十五号）

作者说的是什么“其他同等的条件”，只有天晓得。明显的只有一点：他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宣扬削弱阶级斗争。为我们全部革命的经验所证实的一个论点，即革命愈是依靠领导贫农反对地主和自由资产者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个革命的胜利就愈是彻底，——这一论点对于我们的作者仍然是无法理解的神秘莫测的东西。“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这◇183◇就是**安恩**同志所认定的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但是我们的作者寄予这样大的希望的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资产阶级呢？请听吧：

我们的作者说：“反动派反对立宪民主党特别猛烈……因为……

俄国未来的统治者是要从这个以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其思想体系的中等阶级产生出来的。只有统治能力已经成熟的中等资产阶级才能夺取反动派的国家政权，这个阶级是反动派的直接竞争者，因此反动派最怕这个阶级。”一般说来，“在一切革命中，与其说反动阶层怕革命者，还不如说怕**温和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呢？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只有这个阶级才是从旧制度手中接受政权的人。因此正是这一阶级负有使命，以自己的**温和的**宪法使新制度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这样来消灭反动势力的基础”（见“思想报”第二十四号）。但是，“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不能建立新制度”，所以“无产阶级不得不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见“开端报”第四号）。

总之，手捧“温和的”君主宪法的“温和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才是拯救我国革命的人。

而农民呢，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作者说，“当然，农民会参加运动并使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两个现代的阶级”，即温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见“开端报”第四号）。

总之对农民是不能有什么特别指望的。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为了革命的胜利，就需要手捧温和宪法的温和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但◇184◇单是它一个阶级还不能胜利，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无产阶级应当帮助温和的资产阶级，因为除了它，无产阶级是没有谁（连农民也在内）可以指望的。但是为此，无产阶级就必须抛弃自己的不调和的态度，并伸手给温和的资产阶级，为争取立宪民主党的温和宪法而进行共同斗争。其余的一切就自然好办了。把工人和农民反对温和资产阶级和农奴主的斗争当做革命胜利的保证的政党，是误入歧途了。

一句话，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引导着农民前进的无产阶级，而是牵着无产阶级鼻子走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

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新”策略就是如此。

据我们看来，分析这些庸俗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有必要指出：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新”策略就是要取消已由革命证明为正确的党的策略，使无产阶级变成温和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小尾巴。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六月七日）“辩论专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第二号
署名：科·斯大·◇185◇

巴库委员会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

（为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而通过）

一　关于党的政治鼓动和真正团结

俄国革命动力一个时候有过的沮丧和麻痹状态开始消失了。

沙皇政权的政策在巴尔干、波斯和远东的破产，政府想借十一月九日颁布的使贫者失地富者更富的法令[92]来安定农民的可笑挣扎，政府剥夺工人起码的自由并使工人受资本家任意宰割的“劳动政策”的大失人心，国债的日益增加和把俄国零碎拍卖给外国资本家的事实，在军需官和铁路头子们的贪污盗窃、侦缉队的敲诈勒索、暗探局的营私舞弊等等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行政机关的极端腐败，——这一切都使群众看清反革命并不能战胜暂时打瞌睡的革命力量，使最近数月来工人所表现的活跃更为加强，使他们对国内政治生活发生兴趣，同时提出究竟做什么、往哪里去等等问题。

党的面前发生了一个火急的问题，即必须广泛地展开党的政治鼓动。那些享有出版自由的自由◇187◇派反革命分子想用合法的“代表大会”和“社会团体”等手段来使群众驯服并破坏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样也就使我党必须展开政治鼓动的问题变成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组织互相隔离，又没有一个经常在我国活动并在实际上把各个地方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政党的（领导的）实践中心，因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党的（而不是手工业小组方式的）政治鼓动，使党不可能采用某种严正办法对付“自由派”方面的有系统的陷害，以致降低了党在工人中的威信。

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分散的因而软弱的不合法组织不能利用“合法机会”，反而真正被“合法机会”所利用，当然是有损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

有鉴于此，巴库委员会认为，拟定一个真正团结党以及实现党的政治鼓动的办法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问题。

巴库委员会认为，在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中占主要地位的应当是：

（一）把（领导的）实践中心移到俄国来；

（二）创办在俄国国内出版的、由上述实践中心编辑的并和各地有联系的全国指导性的报纸；

（三）在最重要的工人运动中心（乌拉尔、顿巴斯、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等地）创办地方机关刊物。

巴库委员会坚信实现上述措施就可以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分子不分派别地团结到社会民主党里来，就可以造成广泛展开政治鼓动的可能性，并使广泛地利用“合法机会”这一工作易于进行，以扩大并巩固我们的党。◇188◇

因此，巴库委员会建议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全党代表会议，把上述问题提交会议讨论。

二 关于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

巴库委员会研究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组织计划（见“无产者报”第五十号“当前任务”一文），认为在规定的代表以外应当吸收确实存在的并正在活动的党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而且主要应当注意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所集中的大的中心城市。

这种代表之所以必要是无须论证的（见关于代表会议议程问题的特别决议）。

巴库委员会承认增加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是必要的，但同时仍坚决反对那些在合法“组织”内工作的小组特派代表。

巴库委员会认为一个小组，无论它是参加党的地方组织并服从其领导的，或仅仅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组织而不承认地方组织的领导的，其特派代表对代表会议的工作都不会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前一种情形下，党组织既有代表就不必再有任何特派代表。在后一种情形下，那种特派代表是和代表会议本身的性质相抵触的，因为这个代表会议必须绝对是党的代表会议。

本文曾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189◇

德国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

谁不知道年高望重的德国工人领袖倍倍尔呢？他过去是一个“普通的”镟工，而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他的批评之下，就像在铁锤的打击之下一样，“戴皇冠的人物”、第一流的学者都不止一次地退却了，德国千百万无产者听他的话就像听先知的话一样。

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是他的七十寿辰。

在这一天，全德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局和世界各国有组织的工人都隆重地庆祝了这位高龄的倍倍尔的七十寿辰。

倍倍尔怎么会受到这样的尊敬？他为无产阶级做了些什么？

倍倍尔是怎样从工人下层中奋斗出来的？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镟工变成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的？

他一生的历史是怎样的？

倍倍尔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才三岁他就失去了抚育他的父亲——一个贫穷而有肺痨的士官。为了给孩子们另找一个抚育者，倍倍尔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狱吏。母亲带着孩子们从一向居住的兵◇191◇营中搬进监狱的房子。

但是过了三年，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再度陷于无人抚养的一家大小就迁回故乡——内地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全家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倍倍尔这个穷孩子被收入“贫民学校”，十四岁即以优良成绩毕业。但在毕业前一年，他又遭到新的不幸，他失去了母亲——他的最后的依靠。倍倍尔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他不能升学，于是到一个熟识的镟工那里去当学徒。

单调的、苦役般的生活开始了。倍倍尔在作坊里从早上五点一直做到晚上七点。只有书本才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他把全部空闲

时间都用在读书上。每天早晨上工前，他给女主人打水，每星期赚得五六文钱；为了读书，他把这些钱都用作图书馆的借书费了。

显然，贫困不仅没有使年轻的倍倍尔沮丧，不仅没有打消他对光明的憧憬，相反地，却更加锻炼了他的意志，加强了他的求知欲，使他心里产生了许多问题，使他贪婪地从书本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个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毫不倦怠的未来战士就是这样在跟贫困作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十八岁，倍倍尔学徒期满，从此开始了独立的镟工生活。二十岁，他已经出席莱比锡的工人集会，听工人社会主义者的演说。这是倍倍尔和工人演说家会面的第一次集会。倍倍尔那时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同情自由派的，但是他看见工人能够独立演说而衷心高兴，他羡慕他们，他心中燃起了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工人演说家的愿望。◇192◇

从这时起，倍倍尔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已经有了确定的道路。倍倍尔加入了工人组织，并在组织中努力工作。他很快就成为一个有威望的人物，他被选入工会委员会。在工会工作时，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和自由派一致行动，但是在对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他逐渐相信他们是正确的。

二十六岁，他已经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倍倍尔的声望增长得如此迅速，过了一年（一八六七年）他就被选为工会委员会的主席和国会中的第一个工人代表了。

倍倍尔这样斗争着，胜利着，一步步地克服周围的障碍，终于从工人下层中奋斗出来，变成德国战斗工人的领袖。

从这时起，倍倍尔已经公开地拥护社会民主主义了。他当时的最近目标是对自由派作战，把工人从他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工人结成一个工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次年，一八六八年，倍倍尔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倍倍尔的巧妙而无情的攻击使自由派完全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自由主义的废墟上诞生了。

倍倍尔在代表大会上说，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所以工人应当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决裂，结成一个工人自己的政党。不管一小撮自由派怎样反对，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都跟着他拥护了马克思的这句至理名言。

倍倍尔说，为了工人的完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因此应该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又跟着他一致拥护了伟大导师的这句至理名言。◇193◇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党就这样诞生了。接生的就是倍倍尔。

从那时起，倍倍尔的生活就和党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了，他的忧乐就和党的忧乐融合在一起了。倍倍尔自己则成了德国工人所爱戴的人和鼓舞者，同志们，因为这样一个人不能不叫人敬爱：他为了使工人能够自己站立起来，为了把他们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并为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党而做了这样多的工作。

一八七〇年，年轻的党受到了第一次考验。对法战争爆发了，德国政府向国会要求战费，倍倍尔是国会议员，对战争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赞成或反对。倍倍尔当然知道战争仅仅对于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利，可是德国社会的各阶层，从资产者到工人，都充满了错误的爱国热情，把拒绝给政府拨款叫做背叛祖国。但是倍倍尔不顾这种“爱国”偏见，不怕逆流而进，他在国会讲坛上大声地宣称：我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我不赞成战争而赞成各民族友爱；我不赞成与法国工人为敌而赞成我们德国工人和他们团结起来。甚至工人方面对倍倍尔的大胆发言也报之以责骂、嘲笑和蔑视。但是忠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倍倍尔一分钟也不垂下旗帜去迁就自己的弟兄们的偏见，相反地，他用各种办法努力提高他们，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战争的危害性。后来，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更加爱戴他们自己的刚毅坚强的倍倍

尔。政府却因此赏了他两年徒刑，然而他在监狱里也没有虚度光阴，写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这一名著。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党又受到新的考验。被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所震惊的德国政府颁布了“反◇194◇社会主义者特别法”，破坏党和工会的组织，毫无例外地封闭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取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昨天还是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今天就被打入地下了。政府想用这一切手段来挑逗社会民主党进行不会成功的徒然有害的发动，使它丧失斗志，然后一举而歼灭之。当时要有非凡的坚定和卓越的远见，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改变策略，才能理智地适应新的条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上了挑拨的当而热中于无政府主义。另一些人则完全庸俗化，堕落成自由派。可是倍倍尔始终如一地站在岗位上，鼓舞了一些人，节制了另一些人的不理智的热情，揭穿了又一些人的空论，灵活地引导党沿着真理的道路一直前进，再前进。过了十年，政府只得对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让步，废除了“特别法”。倍倍尔的路线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党又受到一次考验。社会民主党中的温和分子迷惑于工业的高涨和比较容易取得的经济胜利，开始否认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说，不需要不调和性，不需要革命，需要的是各阶级的合作，我们需要和资产阶级及政府妥协，和它们一同修补现存的制度，因此让我们投票拥护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吧，让我们参加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吧。温和分子就这样破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倍倍尔知道这种情势的全部危险性，便和党的其他领袖一同向温和分子宣战，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一九〇三年）上，他宣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的必要性，彻底击败了德国温和派领袖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在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面前，他再度宣布了不调和的斗争的必要性，击◇195◇败了国际温和派的领袖

饶勒斯。从那时起，他就没有让“党的温和敌人”安宁过，而是使他们在耶拿（一九〇五年）和纽伦堡（一九〇八年）接二连三地失败。结果，党经过内部斗争以后更加统一而强有力了，异常地巩固了，大规模地发展了，所有这些主要应归功于这位奥古斯特·倍倍尔……

但是倍倍尔并不满足于仅在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他在德国国会中发表霹雳般的演说，斥责腐败的贵族，摘下自由派的假面具，暴露“帝国政府”的罪恶，他在工会中的多年活动，——这些都说明倍倍尔是无产阶级的忠实的捍卫者，只要哪里斗争在沸腾着，只要哪里需要他蓬勃的无产阶级的精力，他就出现在哪里。

这就是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者这样尊敬倍倍尔的缘故。

当然，倍倍尔也有过错误，——谁没有错误呢（只有死人才不犯错误），——可是这些小错误和他对党的大功劳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现在，党经过倍倍尔四十二年的领导，共计有六十多万党员，两百万左右有组织的工会工人，博得三四百万选民的信任，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在普鲁士举行几十万人的游行示威。

最有意义的是庆祝倍倍尔寿辰的日子适逢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鲜明地表现自己威力的日子，适逢普鲁士的广大群众为争取普选而举行组织得严密无比的游行示威的日子。

倍倍尔有充分的权利说，他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

这就是高龄的倍倍尔的生平事业。是的，他很老了，可是他的精神还非常年轻，他依旧站在岗位◇196◇上，等待着新的战斗，新的胜利。

只有战斗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像它自己那样生气勃勃、永远年轻、永远向前看的倍倍尔。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给倍倍尔的奔放的性格以发展的广阔天地，使他毫不倦怠地致力于破坏旧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

倍倍尔以他的生平事业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及其不可战胜性，

证明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同志们，让我们向亲爱的导师——镟工奥古斯特·倍倍尔致敬！

他的确值得做我们俄国工人的榜样，俄国工人特别需要许多像倍倍尔这样从事工人运动的人。

倍倍尔万岁！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

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197◇

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

谢明同志！昨天我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宁及其他同志致热烈的敬礼。然后再谈你的来信和一般的“棘手问题”。

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真正符合俄国国内工作的利益，即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分子团结起来的利益；（二）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能在孟什维克工人和取消派之间挖掘一道鸿沟，驱散并歼灭取消派，使合法组织赶快从取消派的挟持之下解放出来。争取在合法组织中的影响是很迫切的问题，是使党走向复兴道路的必要阶段。而结成联盟则是从这种组织中清除取消主义垃圾的唯一方法。

联盟的计划显然是列宁的主意，——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这并不是说任何联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联盟（他会说，这是“综合”）就是腐朽的没有原则性的东西，是各种不同原则的马尼洛夫式的混合，是无原则的人想念“好”原则的无可奈何的表现。事物的逻辑本来就有严格的原则性，它是不容混淆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它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在于它的◇199◇基础是对复兴党的方法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为这是联盟而不是合并，所以布尔什维克必须有自己的派别组织。很可能在工作进程中布尔什维克会使普列汉诺夫分子终于驯服；但这仅仅是可能而已。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躺在床上期待这样的结果，即使这样的结果是十分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在行动上愈团结，在发动上愈有组织，那末使他们驯服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此，我们应当毫不倦怠地多方努力。

关于前进报派我就不谈什么了，因为现在他们没有取消派和普列汉诺夫分子那样值得注意。如果他们有一天醒悟过来，那当然很好，否则由他们去吧，让他们自行其是吧。

关于国外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组织俄国国内的工作。我党历史证明，意见分歧的问题不是在辩论中，而主要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在运用原则的过程中解决的。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以严格确定的原则为中心来组织俄国的工作。取消派立刻了解到这种情形（他们的嗅觉很发达），开始向公开的工人组织里钻（已经钻进去了），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秘密的俄国中央来指导工作等等。可是我们还在“准备着”，还停留在排演阶段。据我看，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组织中心小组（俄国国内的），这个小组应该先把各主要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南方）的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工作统一起来。这个小组可以随便叫什么名字，叫“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或中央委员会直属辅助小组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小组却像空气和面包一样地需要。目前各地的工作者都是茫无所知，孤孤单单，互相隔离，灰心丧气。这个小组却能使工作活跃起来，使思想明确起来。这样就会扫清◇200◇障碍并开辟一条真正利用合法机会的道路。据我看，从此就可以开始复兴党的事业。不妨预先组织一个承认全会[93]决议的工作者的会议，当然这要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这一切都要在各中央机关“改革”[94]之后和在普列汉诺夫分子同意的条件下进行。这个会议很可能给上述的中心小组提供适当的人选。据我看，就是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个会议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行动必须坚决而无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报派方面的责难。只要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列宁的拥护者在俄国国内工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们对任何责难都可以置之不理。

关于俄国国内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现在来谈我自己。我还有六个月期满[95]。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使唤。如果实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

“思想”杂志[96]创刊号我已经读过。我可以想像得出：昨天的敌人今天已共同行动起来，单凭这一事实，就会使工人多么清醒多么奋发，就会在取消派的队伍中造成多大骚动多大混乱。任何正派的人都会说，这真不坏。

流放地有不少正派的人，如能供给他们秘密的定期刊物，那就很好了。请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七号和以后各号寄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也请寄来。“工人报”[97]创刊号和第二号我们这里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没有。“明星报”[98]大概就会收到。寄邮包的地址是：（一）沃洛果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镇伊万·伊萨柯维奇·波哥莫洛夫；（二）沃洛果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镇彼得·米海洛维奇·谢拉费莫夫。我的通信地址是：沃洛果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镇格里果罗夫住宅，尼◇201◇古拉·阿历山大罗维奇·沃兹涅先斯基。　　致

同志的敬礼

科·斯·

不要寄挂号信。恳切地请你多写一些你们那里的情况。

写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信件抄本刊印◇202◇

拥　护　党！[99]

现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兴趣又高起来了，与此同时，我们党的危机也就要结束了。死气沉沉的麻痹状态开始过去了。不久以前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100]是党的新生的鲜明标志。我们的党既然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而巩固，随着俄国革命的低落而被破坏，也就必然随着全国的政治觉醒而恢复过来。各主要工业部门日益活跃，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在下降；资产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自由发展着，无产阶级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却横遭破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日益上涨，地主的利润不断增长，农民经济却陷于破产；二千五百多万人口的遭受饥荒正表明反革命的“革新的”制度一筹莫展，——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劳动阶层，首先影响到无产阶级，使他们对政治生活发生兴趣。今年一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就是这种觉醒的鲜明表现之一。

然而内心的激动不能不形之于外，——在目前政治条件下，它必然转为公开的群众发动。

必须改善工人的生活，必须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必须根本改变厂矿工人的现状。但是不通过现在还被禁止的局部的和总的经济发动，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203◇

必须争取和老板自由斗争的权利，争取罢工、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等的权利，因为没有这些权利，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就会极端困难。但是不通过公开的政治发动，不采取游行示威、政治罢工等等，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

必须使连年饥荒的国家恢复元气，必须结束目前的状况，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千千万万土地劳动者不得不遭受周期性的饥荒和饥荒所

引起的一切灾祸，因为对那些饥饿不堪的父母含泪“贱卖”亲生儿女这一情景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根本消灭目前掠夺性的财政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使困窘的农民经济陷于破产，而每当歉收时必然把千百万农民推上毁灭性的饥饿的道路！必须把国家从贫困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但是不自下而上地推翻沙皇制度的全部建筑，能不能做到这一切呢？不通过负有历史使命的领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革命运动，又怎能推翻沙皇政府并扫除一切农奴制的残余呢？……

然而为了使必将到来的发动不分散不混乱，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光荣地完成将来发动的统一者和领导者的崇高使命，——为了这一切，除了广大人民阶层的革命觉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以外，还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灵活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能把各个地方组织单独的努力联合成一个总的努力，从而把群众的革命运动指向敌人的主要堡垒的政党。整顿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使无产阶级能胜任地迎接必将到来的革命发动所特别需要的。

由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期的迫近，党的团结一致更显得迫切需要了。◇204◇

但是怎样整顿党呢？

首先必须巩固党的地方组织。这些分得小而又小的组织，四周是一片悲观失望的海洋，缺乏知识分子的力量，而且往往被奸细所破坏，——谁不知道地方组织生活中这种糟糕的情形呢？必须结束而且可以结束这种力量涣散的状态！一方面工人群众的开始觉醒，另一方面表现这种觉醒的不久以前召开的代表会议，都大大有助于这种涣散状态的消灭。我们必须竭力消灭组织上的涣散状态！让每个城市和每个工业据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凡是相信必须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都不分派别地集合起来吧，——让他们都集合到党的地方组织里来吧！让那些把工人联合成一支被剥削者大军的车床再把他

们结成一个反对剥削和暴力的战士的统一政党吧！……同时不必追求党员的数字庞大：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这甚至会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同志的质量，关键在于使集合在地方组织内的有威信的同志能觉悟到他们所担当的事业的重要性，并遵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坚强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让这样形成起来的地方组织不要闭关自守；让它们不断地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事情，从最“小的”寻常事情直到最大的“不寻常的”事情；让任何一次劳资间的冲突或任何一次工人群众对沙皇政府暴行的抗议都逃不出它们的影响：应当永远记住，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并健全地方组织。正因为如此，它们必须跟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跟工会和俱乐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些组织发展。

工人同志们不要因缺乏知识分子的力量而须单独担负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就感到惶惑不安，应当◇205◇永远抛弃那种谁都不需要的谦逊和惧怕“不习惯的”工作的心理，应当有勇气把党的复杂的工作担当起来！如果因此发生某些错误，那也不要紧：跌一两次交，以后就会行走自如的。像倍倍尔那样的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党的一切部门的工作过程中从下面成长起来的……

但是地方组织，即使是巩固而有影响的地方组织，单独来看，还不算是党。因此还需要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结成一个过着共同生活的整体。分散的地方组织不仅彼此没有联系，而且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完全各行其是的组织各自担惊冒险地行动，往往在工作中走着彼此相反的路线，——这一切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党内手工业方式的情况。把各个地方组织彼此联系起来，把它们集合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这正是抛弃手工业方式而为整顿无产阶级党的事业开辟道路。必须有一个和地方组织千丝万缕联系着的、经常把消息供给地方组织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有威信的中央委员会，一个不断地参与全体无产阶级发动的一切事情的中央委员会，一个为了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工作而

在俄国国内出版秘密报纸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革新和团结党所应走的方向。

不用说，仅仅一个中央委员会是担负不了这个困难任务的。各个地方组织的同志必须记住，没有地方上同志们的经常支持，中央委员会必然会变成一个徒有其名的东西，而党就会变成空架子。因此，中央和地方组织同心协力地工作，——这就是革新党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们向同志们发出的号召。

总之，同志们，拥护党，拥护正在新生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06◇

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一二年三月印成传单
按手稿刊印◇207◇

五　一　万　岁！[101]

同志们！

早在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工人就决定每年纪念今天这个日子——五月一日。这是一八八九年的事情。那时在世界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上，工人决定在今天，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负有在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革新世界的使命。

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所喜爱的节日。贵族们有自己的节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宣布“有权”掠夺农民。资产者有自己的节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证明”“有权”剥削工人。神甫们也有自己的节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赞美现存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死于穷困，寄生虫却沉溺于豪华奢侈的生活。

工人们也应当有自己的节日，在这一天，他们应当宣布：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这个◇209◇节日就是五一节。

工人们早在一八八九年就这样决定了。

从那时起，在五一节这一天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中愈来愈有力地响起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战斗呼声。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把欧洲和美洲到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新的地域和国家卷进去了。从前工人的薄弱的国际间的联系，不过几十年就成长为一个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并团结着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千百万工人的宏伟的国际间的亲密联盟了。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日益猛烈

地冲击动摇着的资本主义堡垒。不久以前在英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等地爆发的引起全世界剥削者和帝王们恐惧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日益迫近的鲜明标志……

“我们不崇拜金偶像！”我们不需要资产者和压迫者的王国！让资本主义及其所引起的穷困和流血的惨象受人诅咒吧，让这些东西死亡吧！劳动王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这就是全世界觉悟了的工人在今天所宣布的。

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逐步地实现马克思的伟大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自由国家的工人就是这样庆祝五一节的。

俄国工人自从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以来，就不愿落后于自己的同志们，总是不顾一切，不顾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而和自己的国外同志们一起行动，和他们共同庆祝五一节。诚然，◇210◇最近两三年来，在反革命猖獗和党内紊乱、工业萧条和广大群众死气沉沉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时期，俄国工人被剥夺了照旧庆祝自己光辉的工人节日的可能。但是国内最近开始的活跃状态，经济罢工和因重审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而在工人中引起的政治抗议，因遍及二十多省的饥荒而在广大农民阶层中产生的不满情绪，几十万店员对俄国死硬派的“革新的”制度的抗议，——这一切都说明死气沉沉的冬眠即将过去，继之而起的是国内的政治活跃，首先是无产阶级中的政治活跃。正因为如此，今年俄国工人能够而且应当在今天向自己的国外同志们伸出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应当以种种方式和国外同志们一起庆祝五一节。

他们今天应当告诉大家，他们和自由国家的同志们是一致行动的，——他们现在不崇拜、将来也不崇拜金偶像了。

除了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要求以外，他们还应当加上推翻沙皇制度、

建立民主共和国等俄国本身的要求。

“我们仇恨戴皇冠的暴君!”“我们尊敬带着枷锁的受苦难的人民!”消灭血淋淋的沙皇制度!消灭贵族的土地私有制!消灭厂矿老板的横行霸道!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给全体俄国公民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俄国工人今天还应当宣布的。

俄国的自由派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沙皇制度在俄国已经很巩固,而且它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211◇需要;这是撒谎,这是向尼古拉末世献殷勤。

俄国的自由派用各种调子高唱革命已经死亡,我们生活在“革新的”制度中;这是欺骗,这是捏造。

请环顾一下:难道灾难深重的俄国像一个“革新的”、“安排得很好的”国家吗?

不是民主宪法,而是绞架和野蛮专横的统治!

不是全民议会,而是黑帮地主们的黑帮杜马!

不是“确定不移的公民自由的原则”,不是早已在十月十七日宣言中所许诺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是“酌情处理”和“根本杜绝”的魔手、被查封的报馆、被流放的编辑、被破坏的团体、被驱散的集会!

不是人身不可侵犯,而是监狱中的毒打、对公民的侮辱、对连纳金矿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

不是农民需要的满足,而是进一步使农民群众失去土地的政策!

不是整顿好了的国家经济,而是军需机关中的盗窃行为、铁路管理机关中的盗窃行为、林业中的盗窃行为、海军系统中的盗窃行为!

不是政府机关中的秩序和纪律,而是法庭的伪造证据、侦缉队的敲诈和勒索、暗探局的暗杀和挑衅!

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是俄国的“政策”在近东

和远东问题上可耻的破产，在波◇212◇斯流血事件[①]中扮演刽子手和破坏者的角色！

不是居民的安宁和幸福，而是城市中的自杀现象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三千万农民的饥饿！

不是淳正的风尚，而是寺院中即官方道德的堡垒中闻所未闻的荒淫无耻！

而作为这一幅图画的最后一笔的是对连纳金矿几百个劳动者的残酷枪杀！……

已争得的自由的破坏者、绞架和枪杀的崇拜者、“酌情处理”和“根本杜绝”的拟订者、贪污的军需官、盗窃的工程师、行劫的警察、杀人的暗探、荒淫无耻的拉斯普庭[②]之徒，——他们就是所谓俄国的“革新者”！

而世界上还有一些人竟敢断言：俄国万事大吉，革命已经死亡！

不，同志们！在那千百万农民挨饿、工人因罢工而被枪杀的地方，革命会活下去，一直活到人类的耻辱——俄国沙皇制度——被彻底扫除的时候。

在今天，在五一这一天，我们应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在大小群众集会上或秘密会议上告诉人们：我们誓为彻底推翻沙皇君主制而斗争，我们欢迎必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俄国的解放者！

现在我们就向我们的国外同志们伸出手去，并和他们一同宣布：

——————————————

① 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波斯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发生革命。一九〇八年，沙皇政府和英国一同派兵赴波斯干涉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译者注

② 拉斯普庭是沙皇尼古拉第二宫廷中势力极大的一个恶棍，当时贵族迷信愚妄，拉斯普庭利用巫术，得以进入宫廷，先取得皇后的宠信，进而挟制沙皇，独揽大权，左右国政，恣意横行。——译者注

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举起俄国革命的旗帜，并写上：◇213◇

打倒沙皇君主制！

民主共和国万岁！

同志们！我们今天庆祝五一节！

五一节万岁！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一二年四月印成传单
按手稿刊印◇214◇

新　的　时　期

随着工人的经济发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发动。

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连纳惨案而引起的抗议、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里加和基辅、在萨拉托夫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在巴库和尼古拉也夫，——在各处，在俄国的各个角落，工人们都奋起声援他们在连纳被残害的同志们。

“我们活着！未用尽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鲜血沸腾！”……

日益活跃的工人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是在反革命猖獗之后发生的。

大约两年以前，工人们就试图反抗那些贪得无厌的老板们日益猛烈的进攻。防御的罢工，个别地方则有进攻的罢工，——这就是运动日益活跃的表现。这是第一个阶段。莫斯科区是先锋。

大约一年半以前，工人们转入了进攻的罢工，提出了新的经济要求，争取实现他们在反革命猖獗时期被剥夺的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条件。这是第二个阶段。西部边区是先锋。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政治运动的时期了。

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215◇

这应当是意料中的事。各主要工业部门日益发展，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在下降；资产阶级各种行业的和政治的组织日益增多，工人的组织却横遭破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日益上涨，地主的收入不断增加，三千万农民却忍饥挨饿，被穷困所迫的父母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儿女，——这一切不能不使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政治生活活跃起来。

连纳的枪声不过是一个信号。

看来，“在施普卡并非完全平静无事”[①]。这种情形连那些急急忙忙准备“绥靖”国内的政府代表人物也感觉到了。看来这甚至反映到我国对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去了……

关于政治的抗议罢工的消息仍然不断地传来。

无疑地，解放运动的潜在力量已经动起来了……

向你们致敬，第一群燕子！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 “明星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斯·
按报上原文刊印◇216◇

——————————————

① 俄土战争（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时，曾在巴尔干的施普卡山隘进行激战，当时俄军司令部却发出战报说：“在施普卡平静无事。”——译者注。

自由派的伪君子们

“言论报”又一次“错了”！原来它“没有料到”“政府”对连纳暴行会作“不机智的”解释。你瞧，它曾“希望”马卡罗夫大臣要特列申柯先生们“负法律责任”。可是马卡罗夫突然声称：特列申柯是对的，今后还要枪杀工人！

对于这一点，自由派的“言论报”假装痛心地说：“我们错了。”（见四月十二日“言论报”）

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不知多少次对政府指望“错了”！

不久以前，他们还“以为”俄国是有宪法的；他们曾用各种语言对欧洲发誓说，“我们的联合政府”“完全是立宪的”。这是他们在远离俄国的伦敦时的事情。但是他们一回到俄国，回到“酌情处理”和“根本杜绝”的国家，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失望”起来了。

不久以前，他们还“相信”斯托雷平已经使国家走上议会“革新”的道路。可是斯托雷平一实施众所周知的第八十七条[102]，立宪民主党人就重弹起“错误”和“误解”的老调来了。

立宪民主党人拿俄国政府对罢工的态度（请回忆一下码头工人的罢工）和英国政府对罢工的态度相比拟，这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可是连纳惨案一爆发，立宪民主党人就又一次弹起他们伪善◇217◇的老调：“我们错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错误”和“失望”日益增长，立宪民主党讨好政府的策略却原封未动！

可怜的，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呵！看来他们在“指望”天真的读者相信他们的真诚。

他们“以为”民众看不出他们在俄国解放事业的敌人面前表现的

那副奴才相。

他们还不知道，如果他们直到现在对政府还是时常指望“错了”，那末他们现在就会对民众感到“失望”，因为民众最后是会了解他们的反革命性质而唾弃他们的。

那时，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将去欺骗谁呢？

在政府面前奴颜婢膝，在全国人民面前假仁假义，——究竟有什么理由称他们为“人民自由党”呢？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号
署名：斯·
按报上原文刊印◇218◇

无党无派的怪物们

无党无派的进步主义时髦起来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天性就是如此，他们的天性就是需要时髦。他们过去热中于沙宁精神[①]，醉心于颓废主义，现在又主张无党无派了。

什么是无党无派呢？

俄国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可是无党无派不顾这一事实，有意掩饰利益的矛盾。

俄国存在着资产者和无产者，其中一个阶级的胜利就等于另一个阶级的失败。可是无党无派抹杀利益的对立性，闭眼不看它们之间斗争的事实。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具有特别纲领和特殊面貌的党。党领导着阶级斗争：没有党就不是斗争，而是一团混乱，缺乏明确性，混淆利益。可是无党无派不喜欢明确性和肯定性，宁愿模糊不清，宁愿没有纲领。

掩饰阶级矛盾，抹杀阶级斗争，没有固定面貌，反对纲领，力求混乱和混淆利益，——无党无派就是这样的。◇219◇

无党无派力求什么呢？

——联合不能联合的东西，实现不能实现的事情。

把资产者和无产者联合成一个联盟，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利用天鹅、龙虾、梭鱼来拉车，——这就是无党无派所力求的。

————————————

① 沙宁是俄国无政府主义作家阿志巴绥夫所著长篇小说“沙宁”中的主人公，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人生目的只在于执行自己的意志，打破一切限制以获得个人的幸福而满足肉欲。——译者注。

无党无派感到自己在联合不能联合的东西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因而叹息道：

“美哉！妙哉！

要是嘴里长出蘑菇来！”

可是嘴里是不会长出蘑菇的，所以无党无派每次的希望都落了空，仍然是怪物。

没有脑袋的人，或者更确切些说，两个肩膀当中长的不是脑袋而是萝卜，——这就是无党无派。

“进步的”杂志“生活需要”[103]所采取的正是这样的立场。

“生活需要”杂志说：“右派的政党已经作出自己的决定，它们将联合成一个反动集团来和整个进步的反对派作斗争……　因此，包罗社会上一切进步分子的左派联盟应该和右派联盟对立起来。”（见“生活需要”杂志第六期）

可是这些“进步分子”是些什么人呢？

这就是和平革新党人[104]、立宪民主党人、劳动团分子、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进步的”资产者、侈谈自由主义的地主、渴望地主土地的农民以及和资产者进行斗争的无产者。◇220◇

“生活需要”杂志竟力图把这些“分子”联合起来！

说这是很独特而又……不聪明的，难道不对吗？

这个无原则的人们的机关刊物还打算向社会民主党人作关于第四届杜马竞选策略的演讲吗？

怪物们呵！……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斯一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21◇

实际生活在胜利着！

“工人发出要求…… 结社自由的请愿书一点也没有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恰恰相反，对这种要求的答复是工人的横遭枪杀……”

——摘自库兹涅佐夫代表的演说

不怎么久，不过是一年以前，“合法的党”的热心家们，取消派先生们大吹大擂地展开了所谓请愿运动。

大家都知道的取消派的“政论性”机关刊物“生活事业”杂志[105]写道：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就是以请愿的方法争取结社的权利。

取消派的“科学性”机关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106]在“论证”这一任务时，硬要工人相信请愿会把“广大群众”组织在自己的周围。

可是连纳金矿的流血惨剧发生了，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及其毫不留情的矛盾出现了，于是取消派的请愿策略也就化为乌有了。合法的罢工、请愿、恳求一概落空了。“革新的”制度现出原形了。似乎为了更明确起见，这个制度的代表人物马卡罗夫大臣声明说，枪杀了五百个工人还没有完，仅仅是开◇223◇始，靠上帝的帮助，今后还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真是命中要害！大吹大擂地搬出来的请愿策略在实际生活上碰得粉碎了！原来请愿政策是毫无力量的！

可见，请愿是决不能解决新旧俄国之间历来的争端的……

俄国每个角落都因连纳惨案而举行了许多次的工人群众大会和罢工，——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又一次说明工人不会走请愿的道路吗？

请听听工人代表库兹涅佐夫的话：

“实质上，工人发出要求结社自由的请愿书一点也没有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恰恰相反，对这种要求的答复是工人的横遭枪杀……”

这就是库兹涅佐夫代表所说的。

凡是倾听自己最亲近的工人的意见的工人代表都不能有另外的说法。

不，取消派不走运！……

那末请愿策略呢？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当然是放到离开工人远远的某个地方去……

是的，是的，看来实际生活的教训甚至对取消派也并非无用。请愿的迷梦似乎开始消逝了。好吧，我们庆贺他们的清醒，由衷地庆贺！

要知道，我们早就一再地说：实际生活是万能的，它总是在胜利着……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萨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24◇

他 们 干 得 好 ……

连纳惨案以后，俄国各地纷纷罢工，纷纷抗议。

马卡罗夫大臣在杜马中作了“解释”以后，俄国首都举行了游行示威。

政府想把俄国置于血腥“指令”的箝制之下。

俄国却显得比政府更强，它决定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再来看看连纳事件的经过吧。

连纳金矿六千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是和平的，有组织的。当然，撒谎的“言论报”可以说在连纳发生了“自发的骚动”（见第一〇三号）。可是我们并不是根据撒谎的“言论报”，而是根据目击者屠里庆斯基的“报告”来判明真相的。屠里庆斯基先生肯定地说，那一天工人表现得非常好，他们“并没有带一块石头和一根棍子”。此外，矿上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人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并自愿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情愿继续让步，——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和平的连纳罢工的情况。

虽然如此，政府却认为需要枪杀工人，枪杀手里拿着旱烟包、口袋里装着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申请书的、和平的、赤手空拳的工人……◇227◇

特列申柯没有受到惩办，——他是奉命行事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决定惩办工人，而不惩办特列申柯，——有人需要无产阶级流血，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们在枪杀工人那天想一举两得：第一、满足连纳吃人者的贪婪胃口；第二、恐吓其他城市和地方的工人，——他们说你们乖乖地套

上资本的羁绊吧，否则我们就要像对付连纳工人一样地对付你们了。结果哪一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连纳吃人者没有得到满足，因为金矿的罢工继续着。

其他城市的工人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接连地掀起罢工，抗议枪杀工人。

不仅如此，俄国首都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人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来回答马卡罗夫的“解释”。

俄国社会中最敏感的部分——青年学生已经向俄国人民中最革命的部分——无产阶级伸出手来，并高举红旗宣布：是的，“从前如此”，可是今后就不许如此了！

从连纳的和平的经济罢工发展到俄国各地的政治罢工，从俄国各地的政治罢工发展到俄国心脏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人的游行示威，——这就是政府代表人物在和工人作斗争中所得到的。

是的，有远见的俄国政府，解放运动的“田鼠挖得好呀”！

再有两三次这样的“功绩”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马卡马夫大臣的大话只能留下可怜的回忆◇228◇罢了。

干吧，先生们，干吧！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一号
署名：科·索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29◇

奔 流 起 来 了！……

被镣铐锁住的国家躺在它的奴役者的脚下。

它需要的是人民的宪法，然而得到的是专横暴虐、“根本杜绝”和“酌情处理”的措施。

它需要的是人民的国会，然而奉献给它的是士绅的杜马，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的杜马。

它需要的是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结社的自由，然而它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只是被破坏的工人组织、被查封的报馆、被逮捕的编辑、被驱散的集会、被流放的罢工者。

它要求给农民土地，然而奉献给它的是有利于一小撮农村富有者而使农民群众愈加缺乏土地的土地法。

答应它的是保护“人权”和“财产”，然而监狱和流放地充满了“不稳分子”，侦缉队的头目们（请回忆一下基辅和梯弗里斯吧！）竟和强盗小偷串通一气来侵犯人权，抢劫财产。

答应它的是“幸福”和“繁荣”，然而农民的经济每况愈下，千千万万的农民忍饥挨饿，坏血病和伤寒症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231◇

可是全国忍耐又忍耐……

忍耐不下去的人自杀了。

然而一切总有个尽头，全国的忍耐到了尽头了。

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

奔流起来了！……

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

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

从这里而且只有从这里，才能给最近的事件找到解释。

可是杜马中发号施令的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107]——却等待来自上面的、出自政府代表人物口中的“解释”！

十月党人在“质问”，进步派只是在“询问”，立宪民主党人却“合乎时宜地”谈论特列申柯这类事变中的可怜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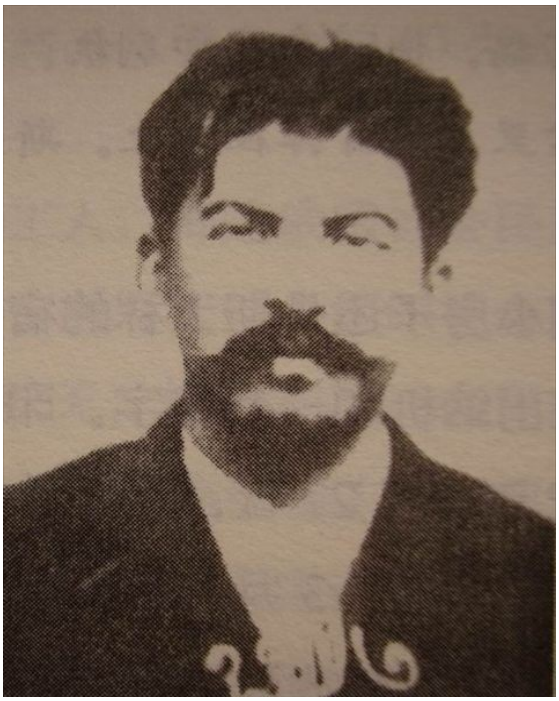
而这些都是发生在马卡罗夫已经向他们大发狂言“从前如此，将来还会如此”的时候！

俄国的首都几万工人举行罢工，军队进入备战状态，“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上的外交工作因内部“纠纷”而遭受破坏，——他们却等待来自“上流社会”的答复！◇232◇

瞎子们！他们看不见，在这些日子里，发言权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政府代表人物……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二号
署名：科·斯·
按报上原文刊印◇233◇

斯大林又一次被沙俄警察逮捕



他们怎样准备迎接选举

第四届杜马的选期[108]迫近了，解放运动的敌人正在动员力量。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反革命的政党：极右派、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他们反正都是支持政府的。他们在这次竞选中所能指望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广大居民阶层的同情，因为把自己的命运和在连纳枪杀工人的政府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政党是不能指望群众的同情的！它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的“指令”。而“指令”照例是不会少的。内政部早已通令各省长“采取保证各乡选出完全可靠而不属于左派的人为初选人的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从实践中知道，就是从名单上删去左派候选人，诬告他们，然后加以逮捕、流放，就是这些“办法”！另一方面，正教行政总署劝告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热烈参加这次选举，把坚决维护教会利益的人选入杜马，劝告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要召开准备选举的教区神甫代表大会，出版专门的竞选报纸等等。

各政府党的事情真是糟糕透了，甚至连教会的神甫都不得不因此抛开“教会的事情”而为“世俗的事情”奔走！

使选举处在教会和世俗省长们的压力之下，这就是他们所能指望的手段了。

固然，还有一种手段，那就是贴上无党无派的商标，蒙蔽选民，设法钻进杜马，然后摘下假面具。◇235◇近来戴着无党无派假面具登场的科甫诺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想这样办“事情”的。可是这种手段太巧妙了，大概不适合于我们笨拙的死硬派……

俄国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平革新党人和进步派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群油滑的人，他们大概可以把这个无党无派的商标使用

到底…… 而这种无党无派正是褪色的立宪民主党人所需要的，而且是极其需要的。

问题在于：第三届杜马时期，一般人都学会了批判地看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另一方面,“第一选民团”的人即城市的大资产者对那些有负厚望的十月党人“大失所望了”，所以就有可能把这些和立宪民主党人争往大臣客厅的十月党人“打下马去”。但是不通过进步的和平革新党人，怎样架设通向“第一选民团”的桥梁呢？因此——与和平革新党人的联盟万岁！固然，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稍稍”右倾一点，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呢：既然如此有利，难道不能右倾一点吗？

于是，向右看齐！

另一方面，“第二选民团”的“中小市民”即知识分子、 店员以及其他等人，特别是由于日益扩大的连纳事件，都已大为左倾了。立宪民主党人感到自己有重大的政治罪过，因为他们以前老是企图背叛“人民自由”的事业；要是他们现在相信会允许他们进大臣的客厅，那末他们是会高兴跑去的，——天晓得！但是，正因为如此，城市的民主阶层就开始怀疑立宪民主党人了。在这样的选民面前，不戴假面具而以自由派叛徒的本来面目登场是有些危险的，这还用说吗？但是在这种情形下，究竟捏造◇236◇些什么去欺骗已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但还没有走到社会民主党人方面的左倾了的市民呢？当然是进步的烟雾……对不起，是进步的无党无派。噢，不要以为进步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不，他们决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只是会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罢了，他们只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无党无派的”伙计罢了……立宪民主党人却替“无党无派的”进步派大吹大擂：至少必须在口头上左倾到……无党无派方面去，否则是不行的！

于是，向左看齐！

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一会右些……一会左些……这

就是自由欺骗人民的党——立宪民主党的政策。

蒙蔽选民，——这就是俄国自由派所指望的手段。

无党无派的骗术在选举中可以发生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揭露戴假面具的自由派先生们，如果他们不为这一次选举积极活动，如果他们不竭力使城市的民主阶层团结在解放运动领袖的周围，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周围，那末这种无党无派的骗术是可以发生巨大的作用的。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二号
署名：科·索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37◇

结　　论

第一次政治高潮开始退落了。现在进行的是“最后的”罢工。各地罢工者还在发出抗议的呼声，然而这将是“最后的”呼声。国家暂时开始恢复“常”态了……

无产阶级从最近的事件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运动的日子”的情景吧。

四月四日。在连纳枪杀了工人。死伤五百人左右。看来全国是平静的。政府的态度很强硬。南方开始抗议罢工。

四月十日。在杜马中提出质问。罢工的次数增加。人心皇皇。

四月十一日。马卡罗夫大臣答复：“从前如此，将来还会如此。”齐马晓夫“不完全”同意马卡罗夫。政府代表人物的队伍中第一次发生慌乱。彼得堡举行群众集会和罢工。各地的运动加强起来。

四月十五日。彼得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游行示威。

四月十八日。彼得堡有十万以上的工人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当局张皇失措。马卡罗夫不敢在杜马中露面。齐马晓夫表示歉意。政府当局退却。向“社会舆论”让步。◇239◇

结论很明显：缄默、忍耐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工人的呼声愈响亮，反动的势力就愈张皇失措，他们的退却也就愈快……

“运动的日子”是考验各政党的最好场所。评价政党不应根据它们说的话，而应根据它们“在斗争的日子里”的表现。在这些日子里，那些自称为“人民的”政党究竟表现得怎样呢？

可是以查梅斯洛夫斯基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为首的极端的黑帮地主集团却很难掩饰自己对于连纳枪杀事件的高兴：这有什么了不起，政府当局不过显示了力量和厉害，——让那些“游手好闲”的工人知

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吧！他们给马卡罗夫鼓掌。他们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提出的质问。他们的“庶民报”[109]千方百计地怂恿政府当局去惩办连纳的“鼓动者”，惩办全俄各地罢工的工人，惩办工人的报纸“明星报”。

以巴拉朔夫之流和克鲁平斯基之流为首的温和的黑帮地主集团实质上不反对杀人，——他们所惋惜的只是政府当局的行动太明显太露骨。因此，他们一面猫哭老鼠似地为“被害者”流泪，一面又希望政府在杀人方面做得“机智”一点。他们投票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质问，他们的机关报“新时报”[110]则向政府当局建议，对那些“死心塌地的罢工者”“不要客气”，对游行示威者要“严办，而不是轻微的罚款或逮捕”，不要再把逮捕起来的“鼓动者”从监狱里释放出去。

以古契柯夫之流和郭洛洛波夫之流为首的保守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寄生阶层的政党——十月党所哀痛的不是被枪杀的死者，而是它所支持的那个部由于在连纳“不得当地使用武器”而遇到了“麻烦”◇240◇（罢工）。它称马卡罗夫的演说是“不够机智的”演说，它在自己的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111]上表示深信政府“在流血事件上是无过的”。它否决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质问。它唆使政府当局向“煽动者”进攻。而当齐马晓夫着手恢复马卡罗夫的名誉时，它就给他鼓掌，认为“事件”已经解决了。

以米留可夫之流和马克拉柯夫之流为首的自由派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对连纳枪杀工人的事件大肆攻击，可是它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制度的基础，而在于特列申柯和别洛佐罗夫这一类人物。因此，它针对马卡罗夫的演说弹了“我们错了”的虚伪调子以后，就完全满意齐马晓夫那篇“忏悔的”演说，并且缄默起来了。它一方面支持那个要求全国裁判政府代表人物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另一方面又欢迎那些请求政府代表人物以“文明的办法”制服罢工工人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和不革新党人先生们。为了使人对它，对立宪民主党

的好意丝毫不加怀疑，它居然在自己的“言论报”上宣布连纳的罢工是“自发的骚动”。

这就是所有这些“人民的”政党在“运动的日子”里的表现。

让工人们记住这些，并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日子”里给他们以应得的报答吧。

只有社会民主党在“斗争的日子”里捍卫了工人的利益，只有它说出了全部真相。

结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捍卫者。上述其他一切政党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不过它们和工人作斗争的方式各有不同罢了：有的用“文明的办法”，有的用“不完全文明的办法”，有的则用“完全不文明的办法”。◇241◇

现在，当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时候，曾经躲在猫哭老鼠这一烟幕后面的黑暗势力又开始出现了。“庶民报”号召采取“办法”来惩办工人报刊。“新时报”请求不要饶恕“死心塌地的”工人。政府当局则动手“干”起来，一再逮捕“不稳分子”。他们在自己的“新进军”中究竟能指望些什么呢，曾经张皇失措的政府当局从哪儿来的这种勇气呢？

他们能指望的只有一点：指望不可能每一次都掀起群众性的抗议，指望工人没有组织，指望工人没有足够的觉悟。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彼得堡“明星报”第三十三号
署名：科·索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42◇

我 们 的 目 的

谁经常阅读“明星报”并且知道它的撰稿人（也是“真理报”[112]的撰稿人），谁就不难了解“真理报”的工作方针。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芒照耀俄国工人运动的道路，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敌人的真情，捍卫工人事业的利益，——这就是“真理报”所要追求的目的。

我们提出这样的目的，决不是有意掩饰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的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我们以为强大而充满生命力的运动，没有意见分歧是不可想像的，——“观点的完全相同”只有在墓地里才能实现！但这并不是说，分歧之点多于一致之点。远非如此！无论先进工人的意见如何分歧，他们总不会忘记他们不分派别地一样遭受剥削，他们不分派别地一样毫无权利。因此，“真理报”首先而且主要地将号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无论如何要统一起来。既然我们对敌人应该势不两立，我们之间就得互相忍让。对工人运动的敌人要斗争，在运动内部却要和平，要同心协力地工作，——这就是“真理报”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所将遵循的方针。

现时，在连纳事件和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都非常坚决地向工人提出必须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阶级组织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一点是必须特别着重指出的……◇243◇

我们着手进行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只要回忆一下“明星报”遭到很多次没收和“惩办”就可以明白。但是，如果工人们今后还继续保持现时对“真理报”的同情，那末荆棘是不可怕的。“真理报”将从这种同情中吸取斗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同情增长起来。此外，我们还希望工人不要仅限于同情，而要积极地

参加我们的办报工作。工人们不要说写作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

总之，更加同心协力地工作吧！

载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244◇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113]

一九〇五年的运动所提出的俄国人民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反动势力和“革新的制度”的发展不仅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反而使得这些要求更加迫切了。

工人往往不仅没有举行罢工的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不因此而被枪杀；不仅没有组织工会和举行集会的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不因此而被逮捕；而且没有选入杜马的可能，因为他们总是要被“解释”[114]掉或被驱逐掉的：前几天普梯洛夫工厂和涅瓦造船厂的工人不就是被“解释”掉了！

至于遭受地主和地政官任意欺压的千千万万饥饿的农民，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切都说明必须满足一九〇五年的要求。

俄国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已经出现的未来工业危机的征兆，以及广大农民阶层日益加剧的贫困化，使解决一九〇五年的任务成为迫不及待了。

因此，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一九〇五年更加深入。连纳的发动和反对“解释”的抗议罢工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245◇

这一运动的先锋，也像一九〇五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

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

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封建官僚制度，又反对力求和旧政

权结成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未来的人民发动应当采取的形式。

只有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人民运动，这一斗争才能获得胜利。但是工人阶级为了能光荣地完成人民运动领袖的使命，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杜马讲坛在目前条件下也是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最好工具之一。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派我们的代表到杜马中去，委托他和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利用杜马的讲坛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要求，而不是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把戏。

我们希望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和我们的代表在敌视他们的、反动的杜马阵营中高高举起工人阶级的旗帜。

我们希望从杜马讲坛的高处响亮地发出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的呼声，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提出一九〇五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是人民运动的领袖，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说明自由资产阶级是“人民自由”的叛徒。

我们希望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根据上述口号进行工作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246◇

希望它在和广大群众经常的接触中吸取力量。

希望它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步调一致。

一九一二年十月上半月

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247◇

初 选 人 的 意 志

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终于揭晓了[115]。六个复选人中，三个是取消派，三个是“真理报”的拥护者。从他们中间提谁来当代表呢？究竟应当提谁呢？关于这一点，初选人大会是不是给了某种指示呢？

取消派之所以能使他们的拥护者当选，在于他们玩弄“统一”的把戏，对初选人隐瞒了自己的观点，掩饰了意见分歧。那些不喜欢意见分歧而相信他们口头上那一套的无党无派的初选人支持了他们。可是不管取消派怎样努力淆乱视听，初选人的意志毕竟在一个问题上，而且在最主要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关于委托书的问题。初选人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份给代表的明确的委托书，即“真理报”拥护者的委托书。

“光线报”[116]在它的选举报道中对这一点默不作声，但是它对读者隐瞒不住全体初选人都知道的真相。我们不让它歪曲初选人的意志。

委托书就是给代表的指令。委托书左右着代表。委托书怎样，代表也就怎样。彼得堡各大工厂所提出的并为初选人大会所通过的委托书究竟说些什么呢？◇249◇

委托书首先说明一九〇五年的任务，说明这些任务还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国内经济政治状况必能使这些任务得到解决。根据委托书，要使国家得到解放只能靠斗争，即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封建官僚的残余，另一方面反对背叛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而且只有农民才能是工人的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工人愈有觉悟，愈有组织性，他们就能愈好地完成人民领袖的使命。既然杜马讲坛在目前条件下是

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最好工具之一，工人也就要派遣一个代表到杜马中去，让他和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去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坚持全国人民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

这就是委托书的内容。

不难了解，这个委托书和取消派的“纲领”是根本不同的，它完全是反取消派的。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初选人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决定代表必须执行委托书，如果取消派竟敢提出自己的代表候选人，那末对委托书该怎么办呢？

由取消派分子执行反取消派的委托书，——我们的取消派是否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呢？

他们是不是感觉到“统一”的把戏已使他们走投无路了呢？也许他们打算违背委托书，打算把它置之脑后吧？

但是，那时对于初选人的意志又怎么办呢？彼得堡的工人无疑是会出来维护它的。

取消派敢不敢践踏初选人的意志呢？◇250◇

现在他们还谈论着胜利，可是他们是不是感觉到委托书已使他们遭到致命的失败呢？因为委托书着重指出只有反取消派的人才能充当代表。

载于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一四七号
署名：科·斯大·
按报上原文刊印◇251◇

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一　初选人的选举

和一九〇七年相比，工人情绪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选举的兴趣大大提高了。如果不算分散在各企业中的小撮抵制分子，那就可以大胆地说，抵制的情绪完全不存在了。奥布霍夫[117]并没有抵制，而是工厂行政当局的意志使它不能进行选举。涅瓦造船厂是抵制分子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唯一工厂，然而那里的工人绝大多数也赞成参加选举。广大的工人群众拥护选举。不仅如此，只要他们面前没有扫除不了的障碍，他们就争得了选举，并且以极大的兴趣进行了选举。不久以前反对“解释”的群众性抗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选的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或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由于某些客观情况，尤其是由于取消派处心积虑地向工人隐藏自己的纲领，彻底的工人民主派的纲领只在某些企业中得到了传播。然而，凡是这一纲领得到传播的地方，工人都以“委托书”的形式通过了反取消派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派看来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自己的观点，竟宣称“他们实际上也拥护这样的委托书”（涅瓦◇253◇造船厂），同时他们还提出关于缔结联盟的自由的“修正案”，这种“修正案”被当做多余的东西否决了。因此，主要是“看人”选举的。结果绝大多数的初选人是社会民主党人或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

初选人的选举说明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二　复选人的选举

在出席大会的八十二个初选人中，确定的反取消派有二十六人，确定的取消派有十五人，其余的四十一人是“一般社会民主主义者”，靠近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非党的左派分子。

这四十一人将拥护谁，他们将赞成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这是“派别分子”最关心的问题。

初选人大会绝大多数赞成“真理报”拥护者提出的委托书。大会就这样确定了自己的面貌。反取消派的政治路线胜利了。取消派阻碍这件事的企图失败了。

假若取消派在政治上是诚实的，假若他们尊重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应当撤销自己的候选人，把全部席位让给“真理报”的拥护者。因为很明显，只有委托书的拥护者才能当候选人。委托书的**反对者**充当委托书的**辩护人**，——只有政治上的破产者才能走这一步。取消派却走了这一步！他们对初选人隐瞒了自己的观点，暂时装作“自己人”，似乎“一点也不反对”所通过的委托书，玩弄统一的把戏，埋怨反取消派是分裂派。总之，他们力求搏得无派别的初选人的同情，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人“拉◇254◇进去”。果然他们欺骗了初选人，把自己人拉进去了。

很明显，取消派的冒险主义是不会有止境的。

同样很明显，“真理报”的政治路线，而且只是这条路线，才得到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同情；按照初选人的意志，只有“真理报”的拥护者才能当工人的代表。

我们并没有希望更大的胜利……

三　两种统一

在谈到代表的选举之前，对于所谓“统一”必须说几句话，这种“统一”在选举复选人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所以取消派抓住它就像快

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光线报”上写过，“真理报”从前拥护统一，可是现在它似乎反对统一了。这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说“真理报”过去拥护统一，这是对的；说它现在反对统一，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报”一向号召彻底的工人民主派统一起来。

那末，关键究竟在哪里呢？关键在于“真理报”对统一的看法同“光线报”和托洛茨基完全不同。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统一。

“真理报”以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分子才能联合成统一的整体。统一是以和反党◇255◇分子，和取消派划清界限为基础的！这样的统一，“真理报”过去一向拥护，将来还要拥护。

托洛茨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把所有的人，无论是反对党性的或拥护党性的人都搅在一起。这样，他自然得不到任何的统一，他这样幼稚地鼓吹联合那些不能联合的东西已经五年了，其结果是：两种报纸、两套纲领、两个代表会议，而工人民主派和取消派之间的统一一点也没有！

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分子日益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时，取消派却在自己和这个整体之间挖了一道鸿沟。

运动的实践证明“真理报”的统一计划是正确的。

运动的实践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联合不能联合的东西的幼稚计划。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正在从空想的统一的说教者变成取消派的伙计，专干有利于取消派的勾当。

托洛茨基曾用一切办法使我们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报纸，两套互相竞争的纲领，两个互相否定的代表会议，——现在这个假装的大力士自己却向我们唱起统一的高调来了！

这不是统一，这是小丑才玩得出的把戏。

如果说这个把戏使取消派有可能弄到三个复选人，那末这是因为在短时间内没有可能揭穿那些向工人隐藏自己的旗帜而玩弄统一的把

戏的小丑们……◇256◇

四 代表的选举

当取消派向“真理报”拥护者建议只提出一个杜马候选人的时候，就不难了解他们所能谈的是什么样的“统一”。他们不顾初选人的意志，违反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委托书，干脆提议投票选举取消派的候选人。“真理报”的拥护者除了说初选人的委托书是神圣的、当代表的只能是委托书的拥护者以外，对这样的提议能回答什么呢？是违反初选人的意志去迎合取消派的没有气节呢，还是不顾取消派的刁难来服从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委托书？“光线报”叫嚣“真理报”闹分裂，并造谣诬蔑复选人，但是，为什么取消派不同意“真理报”向他们提议的在六个工人复选人中进行抽签呢？为了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候选人，我们甚至作了这样的让步，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取消派拒绝抽签呢？为什么“光线报”的拥护者宁愿有六个杜马候选人而不愿只有一个杜马候选人呢？也许这是为了“统一”吧？

“光线报”说，古德柯夫提出“真理报”的拥护者巴达也夫作候选人，但是这个取消派报纸轻描淡写地补充说，这个提议没有通过。难道“光线报”的取消派忘记了：拒绝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的不是“真理报分子”，而是他们的拥护者彼得罗夫。彼得罗夫这样做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取消派如何热心于“统一”。然而他们还是把这种做法叫做统一！“光线报”的另一个拥护者古德柯夫在“真理报”的拥护者巴达也夫当选以后，又提出自己作候选人，这也算统一吗？谁会相信这一点呢？◇257◇

“光线报”假仁假义地替没有一定政治面目的苏达柯夫吹了一通，说他为了统一才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但是苏达柯夫根本不能竞选，因为他只得到两票，难道“光线报”不知道吗？应该怎样称呼这种竞

敢在万目睽睽之下撒谎的报纸呢？

政治上没有气节，难道这就是取消派唯一的“美德”吗？

取消派不顾彼得堡工人的意志，竭力照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意志把自己人拉进杜马去。但是，难道脱离了工人群众的“光线报”还不了解彼得堡工人会宣布不信任这样的代表吗？

载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一号
署名：科·斯大·
按报上原文刊印◇258◇

今 天 选 举

今天在彼得堡进行选举。是第二选民团的选举。两个阵营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进行斗争。选民必须决定，他们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谁。

社会民主党人所想的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人所想的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力求把人类从一切剥削中解放出来。

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却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固然这是粉饰过的剥削，然而毕竟是剥削。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国家革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必须解决，必须依靠全国的努力来解决。

立宪民主党人却以为谈论革新是多余的，因为“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宪法了”……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走向国家革新的道路上，俄国已经分成了两个：旧的、官方的俄国和新的、未来的俄国。

立宪民主党人却以为在“恩赐宪法”以后，两个俄国的“这种对立”“再不可能了”，因为“俄国只◇259◇有一个”。

结论只有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宪理想已经实现了。他们对于六三政制的范围并不感到什么拘束。

例如一九〇九年米留可夫曾和十月党人古契柯夫及“温和的”黑帮分子鲍勃凌斯基一起“代表”俄国在伦敦参加一次宴会，在宴会上他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看出面前的人们在政治信仰上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但是这些色彩互相补充，代表着我们立宪俄国的伟大理想。”（见叶弗

列莫夫“俄国的人民代表和……”第八十一页）

由此可见，黑帮分子鲍勃凌斯基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补充”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人的“伟大理想”原来如此。

当时在伦敦的宴会上既没有**一个**工人代表，也没有**一个**农民代表；立宪民主党人的“伟大理想”原来是用不着工人和农民的……

不要工人代表、**不要**农民代表参加而制定鲍勃凌斯基之流、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宪法，——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

既然如此，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投票赞成（一）反人民的预算，（二）间接税，（三）监狱拨款等等，又有什么奇怪呢？

既然如此，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工人、农民和整个民主派提出的要求，又有什么奇怪呢？◇260◇

既然如此，立宪民主党人通过马克拉柯夫来要求“更猛烈、更严厉和更残酷地”对付学生运动，在“言论报”上轻蔑地说连纳工人的和平罢工是“自发的骚动”，又有什么奇怪呢？

不，这不是“人民自由”的党，而是出卖“人民自由”的党。

这样的人只会背着人民同官僚做买卖。他们过去和维特、斯托雷平、特列坡夫而现在又和萨宗诺夫“谈判”决不是偶然的。

这样的人只会在哈尔科夫、科斯特罗马、叶加特林诺达尔、里加等地的选举中勾结黑暗势力以击败社会民主党人。

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无异于把国家交给敌人去作践。

我们相信自重的选民不会把自己的荣誉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让立宪民主党人今天因反俄国人民的严重罪行而受到应得的惩罚吧！

工人选民们！投票选举你们的利益的代表者，选举社会民主党人

吧！

店员选民们！不要选举漠视你们的休息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投票选举唯一彻底维护你们的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吧！

波兰选民们！你们正在争取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要记住，没有一般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是不可想像的，立宪民主党人却出卖自由！

犹太选民们！你们正在争取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但是要记住，和鲍勃凌斯基之流依依不舍的米◇261◇留可夫之流以及和右派结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人是不会争取平等权利的！

拥护人民自由的出卖者还是拥护人民自由的保卫者，拥护立宪民主党人还是拥护社会民主党人，——请选择吧，公民们！

载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一五二号
署名：科·斯大·
按报上原文刊印◇262◇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18]

一月九日

同志们！

一月九日这个浸透了我们数百工人弟兄鲜血的日子又来到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枪杀了我们的和平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弟兄，因为他们到他那里去请求改善生活。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在这漫长的八年中，除了有过昙花一现的自由以外，我们的国家一直受着沙皇和地主的蹂躏和折磨！

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在俄国，工人常因和平罢工而遭到枪杀，连纳发生的事件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千千万万的农民被弄得饥饿不堪，一九一一年的情形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在沙皇的监狱里，人民的优秀儿女受着拷打和侮辱，被弄得大批自杀，不久以前在库托马尔、阿尔加契等地发生的事情[119]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陆海军士兵为农民要求土地、为全体人民要求自由，常被沙皇的法庭判处枪毙，不久以前枪毙十七名黑海水兵的事情[120]就是例子。这是地主拥戴的全俄专制皇帝尼古拉·罗曼诺夫在行使他的“天赐”皇权——正教行政总署里披着法衣的恶◇263◇棍们以及黑帮分子普利什凯维奇和赫沃斯托夫之流所祝福的皇权。

罗曼诺夫君主制依旧紧紧扼住俄国的脖子，今年它还打算庆祝血腥统治我国的三百周年。

但是，俄国已经不是那个在罗曼诺夫皇朝压迫下长年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的驯服的俄国了。首先是领导着一切争取自由的战士——我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们现在不是以弯腰曲背、受尽屈辱的奴隶的样子，而是以昂首阔步、结成大军的战士的姿态来迎接

一九一三年的一月九日了。我们的战士感觉到并了解到人民的俄国又觉醒了，反革命的冰层被打碎了，人民运动的江河重新奔流起来了，“新战士的队伍在跟着我们前进了”……

八年！经过的时间虽不长，经历的苦难却不少……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三届国家杜马。头两届杜马中自由派虽占多数，但从那里却响亮地发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呼声，因此沙皇遵照黑帮地主们的意志把这两届杜马解散了。第三届杜马本身就是黑帮杜马，五年来它和沙皇的狐群狗党串通一气，力图更残酷地奴役并压迫农民、工人，奴役并压迫整个人民俄国。

在反革命猖獗的岁月中，工人阶级忍受了最深重的苦难。一九〇七年，旧制度的势力暂时压下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从那时起，工人一直呻吟在双重的压迫下。沙皇匪帮比谁都更残酷地向工人进行报复。资本家也向他们大举进攻。厂主们利用政治的反动，得寸进尺地把工人费了这么多的气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争得的一切都夺去了。老板们用同盟歇业的手段，在宪兵和警察的保护下延长工作日，减低工资，恢复工厂的各种旧制度。◇264◇

工人咬紧牙关默不作声。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是黑帮分子对自己的胜利最得意和工人运动最消沉的年头。但到一九一〇年的夏天，工人的罢工就开始复活了。一九一一年底，有几万工人提出积极抗议，反对被陷害而判刑的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继续服苦役[121]。

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是**以**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被判处苦役而举行的罢工**来结束的**。一九一一年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为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这些先进的战士们、这些工人阶级的英雄们（现在他们的事业正由第四届杜马的工人代表们继承着）的命运而重新**活跃起来了**。

随着政治斗争的活跃而来的是工人经济斗争的活跃。政治罢工造成经济罢工，反过来，经济罢工也造成政治罢工。工人运动像汹涌的

洪流，后浪逐前浪地冲向沙皇君主制和资本独裁的堡垒。觉醒起来追求新生活的工人阶层日益扩大。投身于新斗争的群众日益增多。连纳惨案所引起的罢工、五一节的罢工、抗议剥夺工人选举权的罢工和抗议处死黑海水兵的罢工吸引了大约一百万人来参加。这是革命的罢工，罢工的旗帜上写着：“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打倒整个陈旧的、腐朽的、扼杀俄国的地主制度！”

工人的革命运动在扩大着，发展着。工人阶级开始唤醒其他人民阶层去作新的斗争。一切正直的人、一切渴望较好生活的人都开始抗议沙皇的狐群狗党的暴行了。甚至资产阶级也在抱怨，甚至它也不满意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专横独霸的统治了。◇265◇

六三政制并没有使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安定下来。反革命年代表明，只要罗曼诺夫君主制还完整，只要地主统治还保全，俄国就没有自由生活。

新的革命在高涨，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又将负起整个解放大军的领袖的光荣使命。

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仍旧写着三个原来的要求，为了这些要求，工人们曾有过那么大的牺牲，流过那么多的鲜血。

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农民无偿地没收地主、沙皇和教堂的全部土地！

为全体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现代的俄国，围绕着这些要求曾经进行过并且进行着斗争。在不久以前连纳罢工的日子里，工人提出过这些要求。一月九日，工人阶级又要提出这些要求。

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彼得堡、里加、尼古拉也夫的工人曾试图用罢工和游行示威来表示纪念。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我们要**在全俄国**各地都这样做。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工人的血泊中诞生了俄国第一次革命。让一九一三年的开始成为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开端吧。罗曼

诺夫皇朝准备在一九一三年庆祝自己的三百周年，他们还打算长久地骑在俄国的背上。让我们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对这帮强盗说：

够了！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民主共和国万岁！◇266◇

同志们！凡是有俄国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地方，都不要让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毫无表示地过去。

我们要以到处集会，以决议、以群众大会、如果那里有可能，就以**一天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来纪念这个日子。

这一天我们要追念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我们追悼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这一天使全俄国到处都响彻着我们原来的要求：

建立民主共和国！

没收地主土地！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准备一月九日的抗议吧！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底一九一三年一月初印成传单
按传单原文刊印◇267◇

彼 得 堡 的 选 举

（圣彼得堡来信）

和一九〇七年的选举不同，一九一二年的选举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举行的。在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浪潮低落了，反革命胜利了；在一九一二年却掀起了第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因为如此，**那时**工人是无精打彩地进行选举，有些地方甚至抵制选举，当然是**消极**抵制。这也就表明消极抵制就是无精打彩和力量衰落的无可怀疑的征象。正因为如此，**现在**在革命高涨的气氛中，工人就抛弃了松懈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以极大的兴趣去参加选举。不仅如此，工人还为选举进行了斗争，虽然警察施尽诡计，横加阻挠，他们还是用反对“解释”的大规模罢工来争取选举权，并且争得了选举权。这是政治上的麻木状态已成过去、革命已由停滞状态向前推进的无可怀疑的征象。固然，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提出像政治总罢工那样的问题。然而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在一些地方冲破“解释”的罗网，使选举工作趋于活跃，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并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了。◇269◇

一　工人选民团

一　为选举而斗争

应当指出，罢工运动是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彼得堡委员会发起的。十月四日夜晚，即选举复选人的前夜，我们听说最大工厂（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初选人受到县选举委员会的“解释”。一小时后，彼

得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的代表[122]一起举行会议，会上拟定了复选人的新名单，通过了罢工一天以示抗议的决议。当夜，普梯洛夫工厂的社会民主党工厂小组开会，接受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五日，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是全厂罢工。七日（星期日），涅瓦造船厂的社会民主党工厂小组开会，赞同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八日全厂罢工。其他工厂也相继罢工。罢工的不仅有受到“解释”的企业，而且有没有受到“解释”（帕里工厂）以及根据“选举条例”没有权利参加工人选民团选举的一些企业。这是同情的罢工。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和游行示威…… 十月八日深夜听说省选举委员会宣布复选人的选举无效，撤销县选举委员会的“解释”，“恢复”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权利”，并吸收更多的企业参加选举。工人欢庆胜利。工人胜利了。

涅瓦造船厂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宣布罢工时所通过的决议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抗议破坏我们的选举权利，我们声明：只有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民主共和国，才能保障工◇270◇**人的选举权和真正的选举自由。”**

取消派的“……只有实行**国家杜马**普选制才能保障选举权”的决议被否决了。这两项决议事先都在社会民主党各工厂小组中讨论过，当看出（例如在涅瓦造船厂的小组中）取消派的决议得不到同情时，拥护这个决议的人就答应在群众大会上不把它向非党群众提出，而支持党小组所通过的决议。应该指出，他们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这是他们的光荣。但是反取消派也报之以同样的忠诚，使古德柯夫当选为初选人，因为反取消派在工厂中占多数，本来是可以“搞垮”他的。假若“光线报”稍有一点这样的责任感，那就好了。“光线报”对于工厂里**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会描写得那么好，可是对涅瓦造船厂的上述决议却默不作声，而且还歪曲了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决议。

这样，工人为选举进行了斗争，并且争得了选举。让那些在涅瓦造船厂中反对选举而一无所成的彼得堡社会革命党人从这里取得教训吧。

工人是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为选举而斗争的。让那些“局部改良”的信徒、“光线报”的取消派从这里取得教训吧。

二　给代表的委托书

反对“解释”的罢工还没有停止，初选人代表大会就召开了。本来就料到彼得堡委员会所拟订的而为彼得堡各大工厂（普梯洛夫工厂、涅瓦造船厂、帕里工厂）所赞同的委托书会被初选人通过。果◇271◇然，委托书以压倒的多数被通过了，只有极少数的取消派弃权。这些取消派阻碍投票的企图受到了“不要捣乱！”的呵斥。

初选人给代表的委托书中谈到“一九〇五年的任务”，说这些任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说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使这些任务必然会得到解决”。工人和革命农民不顾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要为推翻沙皇制度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的领袖只能是无产阶级），——照委托书所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的任务（见刊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号合刊上的“委托书”）。

可见这绝不是自由主义取消派的“重新审查第三届杜马[123]的土地决议”或“普选国家杜马”（见取消派的纲领）。

彼得堡的工人仍然忠于我党的革命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也只有这些口号，才得到了初选人代表大会的承认。在大会上左右全局的是非党分子（八十二个初选人中有四十一个是“一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非党分子），既然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托书在这样的大会上也能通过，那末这就是说，彼得堡委员会的口号在工人阶级的情感

和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取消派怎样对待这一切呢？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且政治道德也不太坏的话，他们就会提出自己的委托书，进行反对我们的委托书的公开斗争，或者在遭受失败以后从名单上删去自己的候选人。他们既然提出了自己的复选人的候选人名单来和反取消派的名单相对抗，为什么不也公开地◇272◇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委托书呢？在反取消派的委托书通过以后，他们为什么不开诚布公地声明，他们是反对委托书的，决不能作为委托书未来的维护者而当选；并且他们为什么不声明，他们将撤销自己的候选人，以便腾出位置让给赞成委托书的人呢？要知道这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取消派所以不谈委托书，也许是因为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辩论，而在代表大会上问题是由**非党分子**投票决定的缘故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们不服从二十六个**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决议呢？

这些人曾在初选人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秘密集会，经过讨论以后通过反取消派的纲领（以十六票对九票的多数通过，一票弃权），并且取消派的首领和他们的初选人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取消派既把整个初选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践踏了，又把二十六个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意志践踏了，他们究竟有什么高尚想法呢？显然这里只能有一个想法：跟反取消派捣乱，“无论如何”要把自己人弄进去。但是问题的奥妙就在这里：如果取消派还进行公开斗争，他们的同党就连一个也选不上，因为大家都明白取消派的“重新审查第三届杜马的土地决议”在初选人中是得不到同情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自己的旗帜卷起来，假装赞成委托书，声明“实际上我们所赞成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委托书”，其实却是“无论如何”要把自己人弄进去。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取消派这样一做，也就是把自己归入政治破产者之列而自认失败了。

但是，迫使敌人卷起他的旗帜就是迫使他承认自己的旗帜**不中用**，

也就是迫使他承认他的对方在思想上是优越的，——这就等于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273◇

真是“怪事”：取消派有“广大的工人政党”，反取消派只有“干瘪的小组”，而“狭隘的小组”居然战胜了“广大的政党”！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

三　假统一和代表的选举

资产阶级外交家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高喊“和平”和“友好关系”。如果有哪一个外交部大臣开始为“和平会议”奔走呼号，那末你就应当知道“他的政府”已经定购了新的无畏舰和单翼飞机。外交家的言行**应当**不一致，否则他还算什么外交家呢？说话是一回事，行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好话是掩盖坏事的假面具。真诚的外交家就是干燥的水，木质的铁。

对取消派及其关于统一的假叫喊也应当这样说。不久以前，赞成党内统一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关于取消派代表会议[124]的决议曾写道：“十里以外就闻到他们的外交气味。”后来同一位普列汉诺夫同志又把他们的代表会议称为“分裂的”会议。更直截了当地说，取消派是用外交式的叫喊统一来欺骗工人的，因为他们一面在谈论统一，一面却在制造分裂。并且取消派确实是社会民主党里的外交家，他们用统一的好话来掩盖他们制造分裂的坏事。取消派为统一而奔走呼号的时候，你就应当知道他们已经为分裂而把统一践踏了。

彼得堡的选举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274◇

统一，这首先就是在还没有组织起来的、还没有受到社会主义光辉照耀的工人阶级内部那些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行动的统一。那些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自己的集会上提出问题，加以讨论并作出决议，然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非党群众面前提出这种少数人绝

对必须执行的决议。**不这样，就没有并且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彼得堡是否有过这样的决议呢？是的，有过。这就是接受反取消派纲领的二十六个社会民主党初选人（两派的初选人）的决议。为什么取消派不服从这个决议呢？为什么他们违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意志呢？为什么他们践踏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呢？因为取消派是社会民主党内假统一之名行分裂之实的外交家。

其次，统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面前的行动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代表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作出决议，并执行这些决议。**不这样，就没有并且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统一！**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是否有过这样的决议呢？是的，有过。这就是初选人代表大会以多数通过的反取消派的委托书。为什么取消派不服从初选人的委托书呢？为什么他们违背大多数初选人的意志呢？**为什么他们践踏彼得堡工人阶级的统一呢**？因为取消派的统一是掩盖破坏统一**政策**的外交**辞令……**

当取消派违背大多数初选人的意志，把动摇分子（如苏达柯夫）推选出来，滥发一些极端外交式的诺言而终于搞到三个复选人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就发生了。

唯一**公平的**办法是抽签。所以反取消派就向取消派提议抽签，但取消派却**拒绝了！！**◇275◇

和布尔什维克X讨论这个提议的取消派Y（必要时，在保守必要秘密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出双方谈判人的名字）[125]在征求了自己一伙人的意见以后回答说：“抽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复选人要受我们领导集团的决定的约束。”

取消派先生们，试反驳反驳我们的这段话看！

违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初选人的意志，违背初选人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拒绝抽签，拒绝提出共同的杜马候选人，这一切都是为了统一，取消派先生们，你们的“统一”也太稀奇古怪了！

然而取消派的分裂政策并不是什么新花样。早从一九〇八年起他们就鼓吹取消秘密的党了。取消派在彼得堡选举中的胡作非为就是他们的旧分裂政策的继续。

有人说，托洛茨基以其“统一”运动给取消派的旧“事业”注入了“新血液”。这是不对的。虽然托洛茨基作了“英勇的”努力和“来势汹汹的威胁”，但他到底不过是一个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罢了，因为他五年来的“工作”，除了取消派，就没有能够团结任何一个人。新的吵嚷—— 旧的勾当！

我们回过来再谈谈选举。取消派拒绝抽签后，他们所能指望的只有一点，就是指望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偏爱取消派**！为了打破这个如意算盘，彼得堡委员会只好发出指示，让全体复选人参加竞选，因为取消派方面还有“动摇分子”（苏达柯夫），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好好团结的组织。反取消派的全体复选人执行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参加了竞选。于是取消派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并不是反取消派方面，而是取消派的复选人中间发生了涣散现象，他们违反自己“集团”的决议，争◇276◇先恐后地参加竞选。值得奇怪的倒不是古德柯夫同意巴达也夫作候选人（古德柯夫所在的那个工厂通过的反取消派的委托书给古德柯夫以很大的压力！），而是取消派彼得罗夫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古德柯夫本人在巴达也夫**当选之后**仍旧参加了竞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取消派来说，统一就是掩盖他们分裂政策的假面具，就是他们想不顾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的意志而骑着走进杜马的宝驹。

二 城市选民团

连纳惨案和工人中间的一般活跃气象对于第二选民团的选民并不

是没有影响的。城市居民的民主阶层大大地左倾了。如果说五年以前，在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埋葬了”一九〇五年的理想，那末现在，在群众性的罢工以后，旧的理想又开始复活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两面政策已造成了一定的不满情绪，这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不能不觉察到的。

另一方面，十月党人“有负”大商人和大厂主的厚望。杜马中出现了缺额，这也是立宪民主党人不能不觉察到的。

于是立宪民主党人在今年五月间便决定玩两条战线的把戏。不是作斗争，而是玩把戏。

立宪民主党人在两个不同的选民团中所进行的竞选运动之所以有不能不使选民惊奇的两面性，◇277◇原因就在这里。

和立宪民主党人争取对民主阶层的影响的斗争成为社会民主党竞选运动的中心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还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式”，取消派多年来一直绝望地反对这个“公式”，现在他们却不得不把它当做显而易见的和必不可免的切身要求来服从了。

在第二选民团中的胜利取决于民主阶层的行动，这些阶层按地位来说是民主的，但它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这些阶层将跟着谁走，跟着社会民主党走呢，还是跟着立宪民主党走？当时也有过第三个阵营，就是右派和十月党人，但是关于“黑帮的危险”是没有必要认真来谈的，因为很明显，右派能够搜罗到的选票为数很少。“不要吓唬资产阶级”的论调虽然有过（见“涅瓦呼声报”[126]所载弗·德·的文章），但是这只会引人发笑，因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 “吓唬”，而且要从阵地上打倒这个由其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是社会民主党掌握领导权还是立宪民主党掌握领导权，——实际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在整个运动进程中必须特别团结。

正因为如此，彼得堡委员会的选举委员会就和另一个由孟什维克与个别取消派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取得协议。关于人选的协议，有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在进行竞选宣传的充分自由下，“凡其名字或活动和反党斗争有关的人不得列入”（摘自谈判“记录”）杜马候选人的名单。反取消派方面要求把◇278◇“其名字或活动和反党斗争有关”的两位彼得堡著名的取消派阿布××××和列×××除名之后，才得以开出第二选民团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著名名单。为了说明“统一的赞成者”的特点，这里不妨指出他们在梯弗里斯选出齐赫泽以后，坚决拒绝前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坡克罗夫斯基代替他作候选人，并且以另提平行的候选人名单和破坏运动相威胁。

但是，“有进行竞选宣传的自由”这个保留条件，大概是多余的，因为运动的进程昭然若揭地表明，在对立宪民主党的斗争中，除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的竞选宣传运动以外，任何其他竞选宣传运动都不能有什么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发言人和候选人所作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抗“新的议会斗争方法”的“旧的斗争方法”、“第二次运动”以及“立宪民主党责任内阁的口号不适用”等演说，谁不记得呢？而取消派所作的“不要分裂反对派”、“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左倾了”、对这一资产阶级“施以压力”等等哀号又到哪里去了呢？而“光线报”中的取消派分子在进行反立宪民主党的鼓动时有时甚至过分地“责骂”并“恐吓”立宪民主党人，——难道这一切不是证明实际生活本身甚至也通过“小儿的嘴”说出真理吗？

而唐恩、马尔托夫和其他反对“责骂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子的有原则的良心又到哪里去了呢？

取消派的“广大的工人政党”在和“地下小组”的斗争中又一次遭到了失败。请想一想：“广大的工人（？）政党”却做了小而又小的“小组”的俘虏！怪事……◇279◇

三 结 论

从上面所说的首先可以明白，说选举中只有两个阵营即赞成六三政制的阵营和反对六三政制的阵营，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在选举中进行活动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即革命的阵营（社会民主党人）、反革命的阵营（右派）和给革命拆台、给反革命助威的妥协者的阵营（立宪民主党人）。至于什么反对反动势力的“统一反对派”，那是根本没有的。

其次，选举说明，两个极端阵营之间的界限将更加分明，中间阵营将因此分化，使那些抱有民主思想的人解放出来跑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去，而中间阵营本身则渐渐地转到反革命方面去。

因此，说什么来自上面的“改革”、说什么“爆发”的不可能以及说什么俄国在“宪法”保护下的“有机发展”就都失去了任何基础。事件的进程必然会引向新的革命，不管拉林之流及其他取消派怎么说，我们定会经历“新的一九〇五年”。

最后，选举说明，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负有使命去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逐步把俄国一切渴望祖国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诚实的、民主的人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只要看一下工人选民团的选举进程，只要看一下彼得堡工人在初选人的委托书中所明白表示的同情，只要看一下他们为争取选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就能相信这一点了。◇280◇

根据这一切可以断言，彼得堡的选举完全证实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正确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生气勃勃而强大有力，这是第一个结论。

取消派在政治上破产，这是第二个结论。

载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斯大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281◇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

（高加索来信）

在使取消派代表会议流芳百世的一系列决议中，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决议也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请看这项决议：

“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各地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和这些组织的机关刊物都表达了高加索同志们的一个意见，即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并希望把民族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

这个决议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表现了取消派对已经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显出机会主义的模棱态度，它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这个决议简直是字字珠玉。

例如，决议中声明说，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但加以“认定”并作出决定，这是多么珍贵？要知道只有在轻歌剧里才能这样作出“决定”！◇283◇

又如这样的话，“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真是耐人寻味！党纲的这一条（第九条）说到各民族的自由、各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和党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责任。一般说来，按照这一条的原意，民族权利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是可以一直扩大到实行自治制和联邦制，甚至实行分离制的。这是不是说，某一民族，不管它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拥护中央集权制或决定实行分离制，对党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都是同样好的呢？

这是不是说，仅仅根据一项抽象的民族权利，“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就可以建议（哪怕是间接地）一些民族实行自治制，另一些民族实行联邦制，再一些民族实行分离制呢？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不是说，党就不应当影响民族的意志去作最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呢？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赞成人们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党将拥护波兰的天主教、格鲁吉亚的正教、阿尔明尼亚的格列高里教①而不和这一类的世界观作斗争呢？……　而且党纲第九条和民族文化自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互相“抵触”，就像海奥勃斯的金字塔②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可能互相“抵触”一样，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可是要知道代表会议正是用这种圆滑的手腕去“解决”问题的。在取消派上述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高加索取消派在思想上的混乱，他们背弃了高加索旧日的国际主义旗帜而使代表会议通过了这项决议。

高加索取消派转到民族主义方面去并不是偶然的。取消党的传统，这是他们早已开始了的。废◇284◇除最低纲领的“社会部分”，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见“辩论专页”第二号[127]），宣布秘密的党是附属合法组织的辅助组织（见“日志”第九期[128]），这一切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现在又轮到民族问题上来了。

高加索组织从刚产生时（九十年代初）起就具有严格的国际主义性质。格鲁吉亚的、俄罗斯的、阿尔明尼亚的和回民的工人结成统一的组织，同心协力对敌斗争，——这就是当时党的生活情形……　一九〇三年，给高加索联盟奠定了基础的高加索（实际上是南高加索）

———————————————

①　格列高里教会是阿尔明尼亚基督教最早的组织之一，因该教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个大主教是格列高里，故名格列高里教。——译者注

②　该金字塔是埃及国王海奥勃斯时建筑的，故称海奥勃斯金字塔。——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再次宣布按国际主义精神建立组织的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从那时起，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就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本族的”民族主义者，同民族民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进行了斗争；阿尔明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本族的”达什纳克党人进行了斗争；回民社会民主党人同大伊斯兰主义者[129]进行了斗争。而且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在反对这些分子的斗争中不分党内派别，扩大并巩固了自己的组织…… 一九〇六年，在高加索区域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冒出个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来。一小撮库泰依斯人把它提出来并要求作正面的决定。照当时的说法，问题“被断然否决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以柯斯特罗夫和本文作者为代表的两派都同样激烈地反对它。当时作了决定：所谓“高加索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最符合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的，一九〇六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以后的几次代表会议上都曾一再申述此项决议，无论是孟什维克的或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或秘密的高◇285◇加索报刊都维护它并广泛地传播它……

可是，到了一九一二年，“原来”“我们”也需要民族文化自治了，当然（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变化了吗？也许是高加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降低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末在工人之间树立民族组织的和“文化的”壁垒是最不明智的了！也许是高加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末又该怎样称呼那些人为地竖起并巩固正在瓦解着的谁也不需要的壁垒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呢？…… 那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农民的库泰依斯拖走了梯弗里斯的“社会民主党的十月党人”。高加索取消派的活动今后将由被黩武的民族主义所吓倒的库泰依斯农民来支配。高加索的取消派挡不住民族主义的浪潮，他们已经失掉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去“随着”民族

主义的“浪潮”起伏，并把最后的财富扔到海里：“去它的吧，多么无用的东西。”……

但是，说了第一的人，必然要说第二，因为一切东西都有自己的逻辑！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回民和其他取消派的政党都将附和高加索取消派所提出的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的、回民的（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了。结果就不是共同的组织，而是按民族划分的单独组织，可以说就是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的和其他的“崩得”。

高加索取消派先生们不正是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引到这个方向去吗？

好，我们但愿他们拿出勇气，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286◇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使他们相信，高加索组织中的另一部分人，即格鲁吉亚、俄罗斯、阿尔明尼亚和回民组织中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将坚决地和民族主义取消派的先生们，和这些背叛了光荣的国际主义旗帜的高加索叛徒们一刀两断。

载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斯大·
按报上原文刊印◇287◇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的几个中文译本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30]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九〇五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长，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著。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团结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一般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人民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造成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用来报复“爱好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种种◇289◇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131]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大伊斯兰主义的盛行，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一般庸人的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崩得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行话”当做自己竞选纲领中的战斗性条文[①]。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做◇290◇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②]。至于取消派代表会议用外交手腕批准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③]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显然，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

————————————————

①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著者注

② 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著者注

③ 同上。——著者注

一 民　　族

民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剌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291◇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国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国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奥国和俄国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

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几种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像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292◇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末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做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时期以前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

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才成为民族，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区域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293◇

其他一切度过了封建制度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和爱尔兰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294◇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末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末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的日耳曼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他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他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石普林格尔，特别是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石普林格尔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295◇地方。

鲍威尔却扯得更远了。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②]

那末，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一九〇九年“公益”出版社版第四十三页。——著者注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③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族人区别于另一族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④。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共同的命运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情况决定的”⑤。◇296◇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最“完备的”民族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⑥

总之，就是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却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试问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⑦，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格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

———————————————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一页至第二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六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⑤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二十四页至第二十五页。——著者注

⑥ 同上，第一三九页。——著者注

⑦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格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薰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相同之处，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297◇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要知道，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一般地是个统一的民族。

那末，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还叫做“新英吉利”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究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吉利”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特别的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特别环境和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个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

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298◇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像格鲁吉亚的、达格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人种志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①]，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②]而使他们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③]，例如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299◇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八九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三八八页。——著者注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①]，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扯得很远。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

“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②] 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百三十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③]（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④]，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300◇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一般的情况。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 三九六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一三〇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一三〇页。——著者注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国，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日耳曼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国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札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展、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团结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动作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哈斯拉特（奥国国会）和杜马（俄国国会）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301◇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国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尔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302◇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①]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为了追求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追求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联合一致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

① “只捉不放”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篇中描写一警察名梅穆列佐夫者，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译者注。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触犯了他们，引起他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他们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303◇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末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阿尔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阿尔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阿尔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决定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自己的”官吏或组织自己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

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石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①。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304◇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还被禁止入学读书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能转移广大阶层的视线，使之漠视社会问题，漠视阶级斗争问题而只注意民族问题，注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末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305◇

———————————————

① 见石特拉塞尔《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工人和民族”）一九一二年版第三十三页。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灾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最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

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在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加紧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量齐观[①]，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适应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307◇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三 问题的提法

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侵犯其他民族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

① 见鲍威尔那本书第一六六页。——著者注

那末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来的宪法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制或分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例如，南高加索的鞑靼民族尽可召开本族的议会，并在本族地主和毛拉[①]的摆布之下恢复他们的旧制度，尽可决定从俄国分离出去。根据民族自决的条文，他们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但这对鞑靼民族的劳动阶层是否有利呢？社会民主党能否漠不关心，听任地主和毛拉领着群众去解决民族问题呢？难道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不应当给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响吗？难道它不应当◇308◇提出最有利于鞑靼群众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吗？

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制，联邦制，还是分离制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

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把较高的文化从破坏它的那种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起来了。此外，在这个时期，分离问题已由实践

————————————————

① 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其中有的兼教长职），我国一般称阿訇。——译者注。

的问题变成至多只能引起国外知识分子注意的学院式的争论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会出现某种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使波兰分离问题又成为迫切的问题。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一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309◇

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崩得所创始的那种很流行而又很笼统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指的是有人轻率地拿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①]做榜样，说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要抄袭它们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同时，他们竟以为凡在奥国是正确的东西，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整个俄国的和俄国境内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具体历史条件。

例如，请听听有名的崩得分子柯索夫斯基的话吧：

“当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指民族问题而言。——斯大林注）的原则方面时，代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博得了全体的赞同。”[②]

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族自治。

如此而已！既没有分析俄国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俄国境内犹

——————————————

①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是在奥国南部进行工作的。

② 见柯索夫斯基“民族问题”一九〇七年版第十六页至第十七页。——著者注

太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抄袭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法，接着“赞同了”，然后“一致通过了”！崩得分子就是这样提出并“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的……

然而奥国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奥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九年在布隆代表大会[132]上根◇310◇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通过民族纲领（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时，根本就不是俄国式地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会俄国式地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问题的提法。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奥国理论家、布隆民族纲领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解释者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石普林格尔说：“对于多民族的国家一般能否组成，或具体地说，奥国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组成一个政治整体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来回答：我们应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们看来，我们的研究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题是：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么样的**法权形式**才能使他们**生活得最好**呢？”（着重号是石普林格尔加的）①

总之，出发点就是奥地利国家的完整。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国各民族将仍然留在他们现时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他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②又是把奥国的完整列在第一位。

俄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于它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自◇311◇决，根据这种主张，民族有分离权。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九九页。——著者注

甚至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民族自决的主张。当时哥里德勃拉特说：

“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为独立而斗争，那就不要阻拦它；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妨碍它。”

这都是事实。可是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不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还说得上抄袭奥国人的民族纲领吗？

其次，奥国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鲍威尔说：“当然很难设想民族自治是靠一个重大的决定，靠大胆的坚决行动就可以实现的。奥地利将逐步走向民族自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艰苦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立法和行政事宜将陷于慢性的麻木状态。不，新的国家法权制度决不是通过一次伟大的立法行动就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为各别区域、各别村社而颁布的许多各别的法律才能实现的。”①

石普林格尔所说的也是如此。◇312◇

他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机关（民族自治机关。——斯大林注）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单是为了改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就用了很长的时间…… 普鲁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四二二页。——著者注

己的主要行政机关。因此，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奥地利要用多少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吧。”①

这一切都是很明确的。但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不把民族问题和“大胆的坚决行动”联系起来呢？他们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许多各别的法律”作为争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们不能而且不应这样做，那末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国人的斗争方法和前途与俄国人完全不同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局限于奥国人那种片面的不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张抄袭的人不指望俄国有“大胆的坚决行动”，或者是他们虽指望有这种行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最后，俄国和奥国当前的任务完全不同，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奥国生存在国会制度的条件下，目前那里没有国会就不能有什么发展。可是奥国的国会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党间的剧烈冲突而完全陷于停顿。这就是奥国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机病的原因。因此，民族问题在那里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怪乎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设法解决◇313◇民族冲突问题，当然是以现存的国会制度为基础用国会方法去解决的……

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第一、在俄国，“谢天谢地，没有国会”[133]。第二、这是主要的，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因此，俄国问题的命运即各民族“解放”的命运在俄国是和解决土地问题，即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亦即和国家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总的和更加重要的全国解放问题中的一部分。

石普林格尔说：“奥国国会之所以没有成果，只在于每一种改良都在各个民族政党内部引起矛盾而使这些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于是

————————————

① 见石普林格尔 “民族问题”第二八一页至第二八二页。——著者注

各政党的领袖对于一切带有改良气味的东西都竭力回避。奥国的进步只有在各民族都获得不可剥夺的法权地位时才谈得上；这样就使各民族不必在国会里保持常备的战斗队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决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任务。”①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决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极无聊的语言问题，因民族境界上某个地方某些气愤的人彼此发生一些极小的争执，因每设立一所新的学校而陷于停顿。”②

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314◇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

总之，有不同的问题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顾空间时间而“解决”民族问题的书蠹才会拿奥国做榜样，才会抄袭他们的纲领，这难道不明显吗？

再说一遍：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做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奥国民族纲领的形式方面，谈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模仿奥国社会民主党和简单地采用它的纲领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根据。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纲领的实质。

那末，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怎样的呢？

一句话，这个纲领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三十六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四〇一页。——著者注

第一、这就是说，自治权不是给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兰人的捷克或波兰，而是给予一般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不分地域，不管他们居住在奥国什么地方，都一律给予。◇315◇

因此，这种自治就叫做**民族**自治，而不叫做地域自治。

第二、这就是说，分散在奥国各地的捷克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等等都以个人资格分别组成完整的民族，并以这样的民族的资格加入奥地利国家。这样，奥地利将不是由各自治区域组成的联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来的各自治民族组成的联盟。

第三、这就是说，为着这种目的而应当替波兰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来的全民族机关将只管“文化”问题，不管“政治”问题。专门政治性的问题都集中在全奥国会（莱哈斯拉特）手中。

因此，这种自治还叫做**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

下面就是一八九九年奥国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原文①。

纲领上先提到“奥国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然后说：

“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没有任何压迫的条件下，奥国各民族的**民族特点**[2]**的保存和发展**才有可◇316◇能。因此，首先必须摈弃官僚政治

————————————————

①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也曾投票拥护这个纲领。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九〇六年版第七十二页。——著者注

② 在帕宁的俄译本中，“民族特点”译成了“民族个性”（见鲍威尔此书帕宁译本）。帕宁把这个地方译错了，因为在德文原本上并无“个性”一词那里所说的是《nationalen Eigenart》，即民族特点，而这和“民族个性”是完全不同的。——著者注

的国家集权制和各个领地上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消除奥国的民族纠纷而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则如下：

一、奥国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二、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代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手续选举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

三、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四、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

纲领的结语号召奥国各民族团结起来[①]。

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中还留下一些“地域主义”的痕迹，但它大体上是民族自治的纲领。无怪乎第一个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石普林格尔热烈地欢迎这个纲领[②]。鲍威尔也赞同这个纲领，称它为民族自治的“理论上的胜利”[③]；不过为了更明确起见，他才提议用更确定的条文代替第四条，其内容是说必◇317◇须“把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组成公法团体”来掌管学校及其他文化事宜[④]。

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就是如此。

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科学根据。

我们来看看奥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论证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

我们来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家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意见吧。

——————————————

① 见布隆一八九九年《Verhandlungen des Gesammtparteitages》（“党代表大会的讨论”）。——著者注

②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八六页。——著者注

③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四九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五五五页。——著者注

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无关的人们的联盟。

石普林格尔说：“民族和地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①

鲍威尔也说民族是“不在某个固定区域内独占统治的”“个人的共同体”②。

但组成一个民族的那些人并不总是密集在一个区域里的，他们往往分成许多集团而搀杂在别的民族机体中。这是资本主义驱使他们到各个区域和城市去谋生的缘故。可是这些集团既然搀杂在别的民族区域，并在那里占少数，于是在语言、学校等方面就会受到人数众多的当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产生了民族冲突。由此就证明地域自治是“毫无用处的”。照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意见，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把这个散处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组成一个共同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他们◇318◇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纠纷。

石普林格尔说：“必须使各民族有正确的组织，必须给它们以权利和义务”③…… 当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发生人们所预期的作用呢？”…… “要想给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这些民族建立起来”④…… “不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制和消除民族纠纷”⑤。

鲍威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借口“工人阶级的要求”，提议“根据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十九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二八六页。——著者注

③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七十四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八十八页至第八十九页。——著者注

⑤ 同上，第八十九页。——著者注

个人原则把各个少数民族组成一些公法团体”[①]。

但是，怎样组织民族呢？怎样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呢？

石普林格尔说：“用民族名册来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区域的每个人都应当声明自己属于某一民族。”[②]

鲍威尔说：“个人原则的前提是根据成年公民的自由声明按民族划分居民……”为此就“应当编制民族名册”[③]。◇319◇

其次。

鲍威尔说：“居住在单一民族区内的一切日耳曼人以及登记在杂居区的民族名册上的日耳曼人共同组成一个日耳曼民族，并选出民族委员会。”[④]

应该说，捷克人、波兰人等也是如此。

石普林格尔说：“**民族委员会**就是民族文化议会，它有权规定原则并批准经费，借以照管民族学校事宜，照管民族文学、艺术和科学，借以建立学院、博物馆、美术陈列馆、剧院”等等[⑤]。

民族组织及其中央机关就是如此。

照鲍威尔的意见，奥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这种包括各阶级的机关是想“使民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并且用这种唯一可能的办法**把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只和奥国有关。但是鲍威尔不以为然。他坚决认定在其他和奥国一样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也必须实行民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二页。——著者注

②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二六页。——著者注

③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六八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三七五页。——著者注

⑤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三四页。——著者注

⑥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三页。——著者注

族自治。

鲍威尔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320◇去对抗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即夺取政权的政策”①。

然后，鲍威尔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换了民族自决而继续说：

“这样，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就必然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②

但他还不以此为限。他深信他和石普林格尔所“成立”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雏形。因为他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把人类分成一些以民族为界限的团体”③；在社会主义时代，“人类将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团体”④；“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地是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⑤；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综合”⑥。

大概够了……

在鲍威尔和石普林格尔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论证民族文化自治的。

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们用民族自治来替换民族自决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做法。二者◇321◇必居其一：或者是鲍威尔不懂得自决是什么，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为什么竟故意把它缩小了。因为毫无疑义：（甲）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乙）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三七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三三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五五五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五五六页。——著者注

⑤ 同上，第五四三页。——著者注

⑥ 同上，第五四二页。——著者注

民族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这是第一。

第二、将来内外情况完全可能配合成这样，那时某一民族会决定退出多民族的国家，例如退出奥国，——小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声明他们要把本族人民的“两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①]。那时，对“**各族无产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民族自治怎么办呢？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民族逐渐团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的人开始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他区域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例如，难道可以把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322◇索一带的日耳曼人“团结成一个民族”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不可能做到的，那末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老民族主义者的空想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人口分散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

——————————————

① 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第四十八页。——著者注

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①]吗？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抵触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暂且假定“组织民族”这个口号是可能实现的口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会议员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而力图“组织”民族，那还可以理解。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竟也开始干起“组织”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来了呢？

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去组织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这算做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呢？到现在为止，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可是◇323◇这个任务看来“已经陈旧了”。于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更引人入胜的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组织”民族。

不过，逻辑上必然如此：既然采取了民族自治，当然就要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而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就是离开阶级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

奥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责成大家关心“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②]自己打自己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三页。——著者注

② “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哀悼日。伊斯兰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外孙忽辛于公元六八〇年被害，什叶派伊斯兰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举行种种哀悼仪式，痛哭流涕，以掌自击，甚至以剑自刺，借示同情。——译者注。

这种条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它既然出现在奥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那就因为民族自治和这类条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触的。

然而对现在的社会不适用的民族自治，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不适用的。鲍威尔的“人类将分成一些以民族为界限的团体”[①]这一预言已被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驳倒了。民族壁垒并不是在巩固下去，而是在毁坏下去，泯灭下去。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说过：“各族人民间的民族隔离性和对立性已日益消失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更将加速它们的消失”[134]。人类后◇324◇来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各民族的杂居和人们在愈益广阔的地域上的结合，都十分肯定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把巴枯宁的学说改头换面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威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而更加顽强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了。

————————————

① 见本章前一部分。——著者注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分裂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变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325◇的民族细流。

奥国，“民族自治”的故乡，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惨痛的例证。奥国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一八九七年（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135]）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一八九九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日耳曼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国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这就令人担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日耳曼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局时和捷克族资本家一起反对日耳曼族工人。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获。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上面我们说过，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326◇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鲍威尔回答道：

“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① 根据鲍威尔的意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即犹太人。——斯大林注）保全为一个民族”②。

简言之，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

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③[136]，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一九〇三年重述过这种观点④，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国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不过有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⑤。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327◇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地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

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他民族区域里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处，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八一、三九六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八九页。——著者注

③ 见马克思“论犹太问题”一九〇六年版。——著者注

④ 见考茨基“基什涅夫惨案和犹太问题”一九〇三年版。——著者注

⑤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八八页。——著者注

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

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九〇五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

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且仅仅作为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一八九七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①]。一八九七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328◇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 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子愈见狭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总的国际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

所谓“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崩得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抄来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国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

———————————————

① 见卡斯切梁斯基编的“民族运动的形式……”第七七二页。——著者注

这样，崩得在一九〇一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一九〇五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

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其他多数民族密集的各完整区域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329◇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这就难怪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哥里德勃拉特要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斯大林注）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①]。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

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

上面我们已经一般地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的归宿就是民族主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着重

———————————————

①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七六页。——著者注

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但“保障……的机关”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330◇

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

崩得认为能保障。

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

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和俄国一般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

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像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的一般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像过去一样，像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末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

政治议会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古老机关尚且如此，年轻的议会，年轻的机关，尤其像“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

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的一般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331◇就愈多。

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

限度的。

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

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

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他们是少数民族或多数民族都是一样的。

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

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在俄国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137]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

有一个崩得领袖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①

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手续**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显然，崩得当做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根据“立法”手续，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职的。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一九一一年版第六十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八十三页至第八十四页。——著者注

那末，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专门的“文化机关”来“保障……”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石普林格尔的“民族委员会”之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末，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

总之，在现时是软弱的，在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末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333◇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行话”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人）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②]。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行话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八十五页。——著者注

②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一九一二年版第四十二页。——著者注

承认行话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末，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手续”“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他们也过另一个节日”①。

应该想到崩得会“更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迷信，不愿过这种节日，那末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宣传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334◇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发表的“热烈的言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说“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②。

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特别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要使社会主义适应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柯索夫斯基和像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煽动分子”③[138]（纸上不妨乱骂），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简直是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煽动”一类的恶毒字眼来掩护自己……

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陷于孤立的道路，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集团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八十三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六十八页。——著者注

③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一九二一年第九、十两期合刊第一二〇页。——著者注

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

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按民族实行划分”①。然后，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独存”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335◇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独存”②。

组织上的联邦主义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国际主义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主义原则实行改组，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或者是这些集体的国际主义地域原则仍然有效，那时崩得就要像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国际主义原则实行改组。

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原则实行改组”③，原因就在这里。

一九〇六年，崩得因受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所迫而选定了中间道路，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

① 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139]第七页。——著者注

②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七十二页。——著者注

③ 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一九〇二年崩得版。——著者注

“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①◇336◇

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

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

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

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140]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

“‘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国社会民主党根据一八九七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②

这是在一九〇二年写的。

现在已经是一九一三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337◇

我们先来看“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一八九六年

——————————————

① 见“我们的话”杂志第三期，一九〇六年维里诺版第二十四页。——著者注

② 见“论民族自治问题……”一九〇二年崩得版第十七页。——著者注

以前，奥国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一八九七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国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①。至于分离主义的宣传可以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工贼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国党内联邦主义造成了丑恶已极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像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末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他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

完全独存，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主义的“俄国实践”所表明的。

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意志沮丧，而且这种沮丧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338◇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

“……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

——————————————

① 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二十九页所援引的瓦聂克[141]的小册子的一段话。——著者注

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

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独存”。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分离得厮打起来，分离得做起工贼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意志的沮丧，——这就是崩得联邦主义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国更为有害。◇339◇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抗拒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

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

“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发展程度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

①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十九页。——著者注

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材去执行。因此，颁布和当地各项问题有关的法律的权限是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物质繁荣的法律。”①

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340◇

如果把**诺**某提出的那些有点含糊不清互不连贯的理由撇开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凡是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部各地不同的边区皆得实行区域自理。”

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

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 “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 “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

————————————

① 见 “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十九页。——著者注

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341◇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阿尔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阿尔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里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泰依斯、彼得堡及其他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①。

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般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如果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那更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原因如下：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的、较为发展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族只有原始的文化，他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他们那◇342◇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族呢？怎样以民族文化自治为必然前提把他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人、阿布哈兹人、阿札里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

——————————————

① 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42]一九一二年第十二号。——著者注

“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那些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族文学的沃舍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札里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许多族摈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

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末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万能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 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343◇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站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曾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

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

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和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

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

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

这样，一般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344◇

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前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主义，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八九七年起就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主义，而民族自治纲领是两年以后（一八九九年）才通过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一九〇一年，而组织上的联邦主义远自一八九七年就实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还继续跟着崩得走，那末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国际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

但是通过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纲领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①]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

————————————————

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末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

“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345◇党纲原意并不抵触。”

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认定”。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

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认定”了什么呢？

就是认定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党纲“原意并不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

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

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末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去做，谁也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管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

————————————

①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毁了有名的亚尔蒂米司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成为追求个人荣誉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译者注

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

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

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这◇346◇里所说的是党纲，而不是民族权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末代表会议就会直接认定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固然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究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党纲的“原意”**“抵触”。

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党纲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

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党纲“原意”抵触。

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要这样做，在于新教、天主教和正教等等无疑是和党纲“原意抵触”的，即和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抵触的。

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347◇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宣传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宣传，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适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进行宣传，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党纲“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

显然，“民族权利”和党纲“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党纲“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能依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势力和影响为转移，而表现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后者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像谈论海奥勃斯金字塔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党纲“原意抵触”！

他们太滥用逻辑了……◇348◇

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

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

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党纲“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

问题的发言吧：

“**哥里德勃拉特**（崩得代表）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斯大林注）

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

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柯里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

……结果，“**哥里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

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党纲“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党纲。

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柯索夫斯基说：

“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①

但取消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柯索夫斯基

——————————————

①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一九一二年第九、十两期合刊第一二〇页。——著者注

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

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

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350◇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

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

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者取消派面前献媚，——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351◇

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

———————————————

① 见“我们的话”杂志一九〇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三页。——著者注

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纠纷扰攘”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

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总之，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国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143]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

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勉强凑成的，不切实际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352◇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哈斯拉特中的莫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日耳曼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莫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莫拉维亚“集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行话”，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

的“领导机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①]。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

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

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总的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353◇

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区域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区域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耽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忧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忧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在当地拥有实权。**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他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关于犹太教公会的决议末尾一段。——著者注

的权利。让他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他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徙等等的自由。给他们这种自由，他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354◇需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关于组织上的联邦主义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可不争。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主义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国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末无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散播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一般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工贼行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精神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主义的结果。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国际主义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团结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

集体团结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355◇

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各个区域**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自治。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阿尔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正轨，那末，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主义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独存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356◇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国际主义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

调和这两种形式的企图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九七年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调和性的党章已成了废物。奥国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石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主义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144]，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145]事件。

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末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357◇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九一三年一月于维也纳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
“启蒙”杂志[146]第三期至第五期
署名：科·斯大林◇358◇

社会民主党党团状况

在“真理报”第四十四号上出现了七个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的“声明”，他们以敌对的态度攻击六个工人杜马代表[147]。

六个工人代表在同一号的“真理报”上答复了他们，把他们的攻击称为走向分裂的第一步。

这样，工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不会存在？

在这以前，社会民主党党团是统一的，因统一而有力，有力得足以使无产阶级的敌人不得不重视党团。

现在它也许要分裂成两部分而使敌人拍手称快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之间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意见分歧呢？什么事情使得七个代表在报纸上当着工人阶级敌人的面攻击自己的同志呢？

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两个问题：参加“光线报”和“真理报”问题，两报合并问题。

七个代表以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必须参加两个报纸，六个代表既拒绝参加“光线报”就是破坏社◇359◇会民主党党团的统一。

然而是不是这样呢？七个代表对不对呢？

第一、很奇怪，你对一个报纸的方针不但不赞同而且认为有害，你怎么能参加这个报纸呢？比如说，怎么能迫使正统派的倍倍尔参加修正派的报纸，或迫使修正派的福尔马尔参加正统派的报纸呢？在德国，人们对这样的要求是会哈哈大笑的，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行动的一致并不一定要观点的相同。但是在我们这里……托天之福，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这种文明。

第二、俄国的经验已给我们直接指出，代表们分别参加两个不同的报纸决不会破坏党团的统一。我们所说的是第三届党团[148]。谁都知道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十三个成员中有九个**只**参加了“明星报”，有两个只参加了“活的事业报”[149]，其余两个则完全拒绝参加任何一种报纸…… 但是这一情况丝毫没有破坏第三届党团的统一！党团始终是行动一致的。

显然，七个代表要求别人必须参加“光线报”是错误的。看样子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完全弄清。

其次，七个代表要求把“真理报”和“光线报”合并成一个非派别组织的报纸。

但是怎样把它们合并起来呢？能不能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报纸呢？难道这七个代表，这些“光线报”的“思想拥护者”不知道“光线报”就是第一个拒绝这种合并的吗？他们有没有读过“光线报”第一〇八号？这一号上写道：**“用合并两个机关报之类的简单的机械办法是不能达到统一的。”**◇360◇

如果读过，那末他们怎能一本正经地谈合并呢？

再者，这七个代表是不是知道取消派的首领们一般地对于统一问题，具体说来，对于一个共同机关报问题的态度呢？

请听一听“光线报”的鼓舞者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吧。当一部分彼得堡工人决定出版一种非派别的报纸以对抗“明星报”和“活的事业报”的时候，他却在“涅瓦呼声报”第六号上写道：

“创办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思想，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这种空想客观上是和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无产阶级在党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和在组织方面的联合的利益相抵触的。把空气从大门赶出去，它又会从窗口钻进来…… 计划中的工人机关报能不能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呢？…… 显然是不能的。”（见“涅瓦呼声报”第六号）

可见，在阿克雪里罗得看来，一个共同的报纸的存在不但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是和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发展的利益相抵触的”。

我们再听一听“光线报”的另一个鼓舞者，一个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的话吧。

他写道：“巨大的政治任务使我们必不可免地要和反取消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反取消主义是永远的阻碍，永远的破坏。”必须……“趁它还在萌芽的时候就用全力把它扼杀”（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一九一一年第六期）。

可见“和反取消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就是和“真理报”作无情的斗争，“扼杀反取消主义”就是扼◇361◇杀“真理报”，——这就是唐恩的建议。

既然如此，这七个代表怎能一本正经地谈两个报纸的合并呢？

他们究竟想合并谁，联合谁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他们没有弄清问题，没有来得及认清“光线报”的立场，就认为自己是它的拥护者，——那末他们是“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他们是真正的光线报派，和唐恩一起准备“扼杀反取消主义”，和阿克雪里罗得一起不相信能有一个共同的报纸，但是大声叫喊统一，以便**偷偷摸摸地**为分裂党团打下基础……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工人面临着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否完整的问题，因为党团有分裂的危险。

党团在危急中！

谁能拯救党团，谁能保障党团的完整呢？

工人，只有工人！除了工人再没有别人！

因此，觉悟工人的责任就是大声疾呼地反对党团内部不论来自何方的分裂企图。

觉悟工人的责任就是要那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团另一半人的七个社会民主党代表遵守规矩。

工人应当立刻干预这件事，以维护党团的统一。◇362◇

现在不能缄默了。不仅如此——现在缄默就是犯罪。

载于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四十七号
署名：科·斯大林
按报上原文刊印◇363◇

连 纳 惨 案 一 周 年[150]

同志们！

自从我们的五百个同志在连纳被枪杀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在连纳金矿，仅仅因为和平的经济罢工，当局竟奉沙皇之命枪杀了我们五百个弟兄，以讨好一小撮富豪。

以沙皇名义大肆屠杀的宪兵上尉特列申柯这次得到了政府的重赏和金矿业主的厚酬，并且现在正逍遥在贵族酒吧间里，等待就暗探局长之职。在民情鼎沸之下，他们答应保证被害者家属的生活，这不过是无耻的谎言。他们答应给连纳工人实行国家保险，这也不过是欺骗。他们答应“追查”案情，但实际上连自己的使者——议员马努兴所作的调查也藏起来了。

刽子手马卡罗夫大臣在杜马讲坛上凶狠地说：“从前如此，将来还会如此。”他说得很对：沙皇和他的执政者过去是而且将来还是撒谎者、背信者、大屠杀者和执行一小撮野蛮地主和富豪意旨的匪帮。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宫广场上已经枪杀了人们对旧的、革命前的专制制度的信仰。◇365◇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在遥远的连纳又枪杀了人们对现在“革新的”、革命后的专制制度的信仰。

凡是相信我们现在存在着立宪制度的人，凡是以为旧日的暴行不可能重演的人，都已经确信：事情并不如此，沙皇匪帮依旧骑在伟大俄国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尼古拉·罗曼诺夫君主制依旧要用成百成千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尸体供在自己的祭坛上，沙皇的奴仆——把手无寸铁的俄国公民当靶子打的特列申柯之流的皮鞭和枪弹依旧在俄国各地挥舞着，呼啸着。

连纳惨案在我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已经忍无可忍了。阻挡人民怨恨的堤坝崩溃了。人民的愤怒之河奔流起来了。沙皇的走狗马卡罗夫说的“从前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是火上加油。这句话和一九〇五年沙皇的另一个走狗特列坡夫的命令“不要吝惜子弹！”起了同样的作用。工人之海汹涌澎湃起来了。俄国工人以同心协力的、将近五十万人参加的抗议罢工来回答了连纳惨案。同时他们高举起我们旧日的红旗，在那上面，工人阶级重新写上了俄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的要求：

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农民没收一切地主和沙皇的土地。

为全体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

斗争的一年过去了。回顾已往，我们可以满意地说：已经开了头，一年没有白过。

连纳罢工和五一罢工汇合起来了。一九一二年光劳的五一纪念在我们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从那时起，斗争一分钟也没有平息过。政治罢工在扩大着，增长着。十五万工人用革◇366◇命的罢工来回答枪杀十六个塞瓦斯托坡里水兵的暴行，宣告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军队结成了联盟。彼得堡无产阶级以罢工来抗议伪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结果。在第四届杜马开幕的那一天[151]，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国家保险提出质问的那一天，彼得堡工人举行了一天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而最后，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近二十万的俄国工人举行了罢工，以悼念殉难的战士并号召整个民主的俄国起来进行新的斗争。

这就是一九一二年的主要总结。

同志们！连纳惨案的一周年临近了。在这一天，我们应当有所表示，无论如何必须有所表示。我们应当表示我们悼念我们的被害同志。我们应当表示我们没有忘记四月四日这个流血的日子，正像没有忘记

一月九日这个流血的星期日一样。

必须到处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募捐等等以纪念连纳惨案一周年。

让整个工人的俄国在这一天融合在共同的呼声中吧：

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

新的革命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光荣归于殉难的战士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367◇

欢迎翻印和散发！

准备纪念五一节！

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

按胶版印刷传单原文刊印◇368◇

注　　释

〔1〕考茨基这本书于一九〇七年三月译成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一九〇七年三月十八日布尔什维克的“时报”第七号发表消息，报道附有柯巴（斯大林）序言的考茨基这本书的格鲁吉亚文译本已经出版。——（正文第3页）。

〔2〕立宪民主党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一九〇五年十月间组成（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七一页注五二）。——（正文第5页）。

〔3〕“文集第一辑”是孟什维克的文集，于一九〇六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6页）。

〔4〕“我们的事业”（周刊）是孟什维克的杂志，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7页）。

〔5〕“同志报”（日刊）于一九〇六年三月至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形式上它不是任何政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孟什维克也参加这一报纸的工作。——（正文第7页）。

〔6〕“评论”是孟什维克的文集，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三集。——（正文第8页）。

〔7〕“世界”（月刊）是自由派的杂志，于一八九二年在彼得堡出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发表过“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孟什维克参加了这一杂志的工作，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改名“现代世界”出版。——（正文第8页）。

〔8〕“劳动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七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9页）。

〔9〕劳动团分子或“劳动团”，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集团，于一九〇六年四月由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七四页注七七）。

人民社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成立于一九〇六年，是由社会革命

党右翼分化出来的。人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超出君主立宪的范围。列宁把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正文第12页）。

〔10〕指为讨论选举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竞选策略问题而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彼得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四十个布尔什维克和三十一个孟什维克。以孟什维克占多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代表们建议分为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两种。孟什维克想用这种办法取得较多的选票。代表会议拒绝执行这一违反党章的要求。孟什维克代表就退出大会以示抗议。留下的代表决定继续开会。会议听取了列宁的报告，宣布反对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竞选协议，认为这种协议不仅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而且在政治上是绝对有害的。会议通过决议，“立即把和革命民主派成立协议的这一对彼得堡极为重要的问题提到议程上”。出席代表会议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称，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组织不一定要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而退出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则在报纸上建议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联盟。——（正文第13页）。

〔11〕“言论报”（日刊）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4页）。

〔12〕“我们的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在梯弗里斯公开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共出十三号。该报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因持极端主张”被查封。——（正文第16页）。

〔13〕“当代”（周刊）是孟什维克的杂志，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七年三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四期。——（正文第17页）。

〔14〕“时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我们的生活报”被封闭后，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梯弗里斯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参加该报编辑部的还有齐哈卡雅和达维塔施维里。共出三十一号。——（正文第18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七卷第五十五页至第五十六页。

“新莱茵报”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伦出版该报领导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文第19页）。

〔16〕古尔柯是内政部次长，利德瓦里是大投机商和冒险家，一九〇六年古尔柯把运送粮食到饥馑省份去的差事包给利德瓦里。这位沙皇大臣参与了利德瓦里的投机勾当，造成轰动一时的“利德瓦里事件”诉讼案。但古尔柯除被撤职外，并未因此案而受到任何惩罚。——（正文第20页）。

〔17〕十月党人，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组成。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斯托雷平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正文第20页）。

〔18〕“帆报”（日刊）是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于一九〇七年在莫斯科创刊。——（正文第20页）。

〔19〕“今日报”是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晚报，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21页）。

〔20〕“言语报”（日刊）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创刊。从一九〇五年十月至一九〇六年七月是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正文第21页）。

〔21〕捷里亚生于一八八〇年。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九日在苏胡姆逝世，三月二十五日葬于库泰依斯县察岗村。——（正文第23页）。

〔22〕指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梯弗里斯工人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五一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在梯弗里斯的中心区士兵市场举行，参加者约二千人。游行示威中与军警发生冲突。十四个工人受伤，五十多个工人被捕。关于梯弗里斯的这次游行示威，列宁的 “火星报”报道说：“四月二十二日（旧历），星期日，在梯弗里斯发生的事件是全高加索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这一天起，高加索开始了公开的革命运动。”（见“火星报”一九〇一年七月第六号）——（正文第23页）。

〔23〕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决定，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梯弗里斯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参加者约六千人。游行示威以和军队发生冲突而结束。一百五十人被捕。——（正文第23页）。

〔24〕“无产阶级斗争报”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秘密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机关刊物（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六页注二一）。——（正文第25页）。

〔25〕“新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四日在梯弗里斯出版。共出二十号。该报领导者为斯大林，经

常撰稿人有达维塔施维里、捷里亚、基柯泽等人。——（正文第25页）。

〔2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伦敦举行。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斯大林代表梯弗里斯组织出席大会。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中总结了大会的工作（见本卷第四十九页至第七十五页）。——（正文第27页）。

〔27〕崩得即“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一八九七年十月组成（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四页注七）。——（正文第27页）。

〔28〕“斯皮尔卡”是接近孟什维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斯皮尔卡”于一九〇四年年底成立，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革命乌克兰党”中分裂出来的。它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已不存在。——（正文第27页）。

〔29〕“标枪报”是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于一九〇七年四月至六月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29页）。

〔30〕“光线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至一九〇六年一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正文第31页）。

〔31〕第二届国家杜马于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被沙皇政府解散。拥有六十五个成员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被诬告进行军事阴谋。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被判处苦役和长期流放。——（正文第34页）。

〔3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没有写完；这是一九〇七年下半年警察监视加紧和后来斯大林被捕的缘故。——（正文第38页）。

〔33〕维尔格什斯基是立宪民主党“言论报”撰稿人梯尔柯娃的笔名。——（正文第38页）。

〔34〕库斯柯娃是“经济派”纲领《Credo》（“信条”）的起草人之一，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为半立宪民主党－半孟什维克的杂志和报纸撰稿。——（正文第38页）。

〔35〕阿列克辛斯基是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加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布尔什维克方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曾坚持抵制第三届国家

杜马的策略，后来脱离布尔什维克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亡命国外。——（正文第41页）。

〔36〕关于国际社会党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起初曾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议程，但后来又被代表大会撤销。国际社会党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八月五日至十一日（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举行。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有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李维诺夫等人。——（正文第43页）。

〔37〕略多沃依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他的更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是波格丹诺夫（也用过笔名“马克西莫夫”）。一九〇三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之后，脱离布尔什维克党（见本卷注80）。死于一九二八年。——（正文第43页）。

〔38〕关于彼得堡组织的分裂，参看斯大林“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一文（见本卷第十五页至第二十页）。——（正文第44页）。

〔39〕关于土地问题的“国家杜马宣言”草案是立宪民主党人为回答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政府公布农民地产通告而拟定的，发表于一九〇六年七月五日。立宪民主党人劝农民等待杜马拟就土地法。孟什维克所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草案。但党团投票反对这一草案。——（正文第44页）。

〔40〕人民党（民族民主党）是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政党，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人民党成为波兰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政党，波兰黑帮分子的政党。——（正文第46页）。

〔41〕指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孟什维克查帕里泽和策烈铁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五年版第二五〇页和第三五四页至第三五五页）。——（正文第46页）。

〔42〕盖得派即盖得的拥护者，是法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左的马克思主义派。一九〇一年盖得派组成“法国社会主义党”。盖得派对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反对和资产阶级妥协及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盖得采取护国主义立场并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一部分仍旧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盖得派，后来加入法国共产党。——（正文第50页）。

〔43〕指彼列雅斯拉夫斯基（赫鲁斯塔廖夫）的文章。

“‘巴库之日’报”是自由派的日报，于一九〇七年六月创刊，一九〇八年一月停刊。——（正文第53页）。

〔44〕拉林、李恩（卢利叶）是孟什维克取消派。一九〇七年他曾鼓吹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艾里（卢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正文第53页）。

〔45〕指一九〇七年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小册子“全俄工人代表大会和‘布尔什维克’”。“流浪汉”是指孟什维克艾拉泽，“舒拉”是他的妻子，即孟什维克培施金娜。——（正文第54页）。

〔46〕切列万宁论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曾收入孟什维克“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文集一九〇六年莫斯科版。——（正文第56页）。

〔47〕林多夫是列切曾的笔名。——（正文第57页）。

〔48〕一九〇七年秋，巴库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进行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竞选运动。在九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巴库工人初选人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复选人。斯大林草拟的“委托书”经大会通过，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拉汉内区委会印刷所印成传单。——（正文第62页）。

〔49〕本文是为行将召开的石油业主和巴库工人代表协商会议而写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抵制协商会议的策略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支持。自一九〇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巴库油矿和工厂中举行了几次讨论协商会议问题的工人大会。出席这些大会的工人有三分之二表示反对参加协商会议。主张无论如何要参加协商会议的孟什维克遭到了失败。——（正文第64页）。

〔50〕油矿工人是开采石油和钻凿油井的工人。机电工人是机械厂、发电厂和为油矿服务的其他辅助企业的工人。——（正文第65页）。

〔51〕“别什凯什”（直译为礼物）是一套以发给奖金略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曾被巴库石油业主广泛用来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并分裂工人运动。奖金多寡不一，由业主随意决定。在罢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要求奖金，而为提高工人工资进行斗争。——（正文第66页）。

〔52〕柯切加尔是“汽笛报”正式编辑兼发行人施齐柯夫（萨马尔采夫）的笔名。——（正文第66页）。

〔53〕“石油事业报”是石油业主的机关报，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〇年

由石油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在巴库出版。

代表大会委员会这一石油业资产阶级的组织是在石油业主代表大会上由各大公司的代表中选出的。代表大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在政府面前坚持石油业主的利益，保证石油业主获得高额利润等等。——（正文第68页）。

〔54〕达什纳克党人是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楚纯”的党员。达什纳克党人为维护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利益曾在南高加索劳动者之间挑起民族仇恨。——（正文第68页）。

〔55〕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以斯大林为首的巴库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或者是有保障的协商会议，或者是不要任何协商会议”的口号。工人同意参加协商会议的条件如下：工会可以积极参加协商运动，工人可以广泛讨论要求，工人可以自由召开未来的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和选择召开协商会议的时间。在巴库的油矿和工厂中展开了选举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广泛运动，这个初选代表委员会应当最后通过工人参加协商会议的条件和选出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工人选举初选代表的集会是公开举行的。大多数工人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主张抵制协商会议的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主张举行没有任何保障的协商会议的孟什维克都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文第74页）。

〔56〕“汽笛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巴库石油工会的机关周报。“汽笛报”创刊号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出版。“汽笛报”上刊载过斯大林许多篇指导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现已收入本卷。积极参加“汽笛报”工作的有邵武勉、查帕里泽、斯泮达梁等人。布尔什维克编的该报最后一号（第三十四号）于一九〇八年六月一日出版。“汽笛报”从第三十五号起转入孟什维克手中。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巴库出版一种新的工会的公开报纸“巴库工人报”，其创刊号于一九〇八年九月六日出版。——（正文第76页）。

〔57〕参加巴库米尔佐也夫油矿罢工的工人达一千五百名，罢工从一九〇八年二月十四日开始，继续了七十三天。——（正文第76页）。

〔58〕工人选举初选代表的工作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初结束。但是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召开因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柯夫的命令而推迟了。初选代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举行，以后的几次会议在四月六日、十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九日举行。奥尔忠尼启泽后来就初选代表委员会的工作

写道：“在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全俄国的时候，在巴库却有真正的工人议会在开会。在这个议会上公开拟定了巴库工人的一切要求，并由我们的发言人阐明了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在初选代表委员会会议上，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提案的，即赞成参加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的，有一百九十九个初选代表，赞成抵制协商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四票。赞成抵制的，即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退出了会议。关于委托书的最后通牒式的提案则以一百十三票对五十四票的多数通过。——（正文第83页）。

〔59〕“油矿公报”是孟什维克的公开报纸，机械工会的机关报，于一九〇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及一九〇八年三月至七月在巴库出版，每星期出版两三号。——（正文第84页）。

〔60〕卡－查（卡拉－穆尔查）是立宪民主党党员，巴库石油业主的机关报“石油事业报”的编辑。——（正文第88页）。

〔61〕“柯企”——格鲁吉亚语，意即强盗或雇佣的刺客。——（正文第89页）。

〔62〕汉拉尔·沙法拉利也夫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工人，阿捷尔拜疆工人的天才组织者。汉拉尔在纳甫塔兰油矿成功地组织了罢工以后，在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九日午夜遭石油业主雇佣的刺客暗杀，受致命的重伤，几天后就死了。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比－爱巴特区委会的号召，举行了两天总罢工，要求纳甫塔兰公司把杀死汉拉尔的凶手钻井工头贾法尔和经理阿布札尔别克赶出油区。汉拉尔的葬礼变成了有两万工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斯大林在汉拉尔墓前发表了演说。——（正文第93页）。

〔63〕“报刊评论”是斯大林一九〇八年夏天在巴库监狱里写的。从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九日被流放到索里维切果茨克时止，他一直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正文第99页）。

〔64〕“火花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一九〇八年五月至七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正文第99页）。

〔65〕“思想报”是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报纸，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日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99页）。

〔66〕申德里柯夫兄弟（列甫、伊里亚、格列勃）于一九〇四年在巴库建立了以“巴拉汉内和比比－爱巴特工人组织”为名的（后来改名为“巴库工人

同盟”）祖巴托夫组织。申德里柯夫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大肆诬蔑。申德里柯夫分子提出狭隘行会的经济口号来瓦解罢工斗争，竭力破坏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鼓吹建立“调解室”和劳动组合等等。申德里柯夫兄弟领取石油业主和沙皇政府的津贴。孟什维克正式承认申德里柯夫分子的祖巴托夫组织是党的组织。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揭露申德里柯夫分子是沙皇暗探局的雇佣走狗，并击溃了他们。

“正义事业”杂志是申德里柯夫兄弟在彼得堡出版的。该杂志创刊号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出版，两二、三两期合刊于一九〇八年五月出版，下面提到的格罗舍夫和卡利宁是孟什维克，申德里柯夫兄弟的拥护者。——（正文第 101 页）。

〔67〕古卡索夫是巴库最大的石油业主之一，是石油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的领导人。——（正文第 101 页）。

〔68〕讨论召开与石油业主举行协商会议问题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于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石油业主十四人和工人十五人。当天报上载有消息，说工会代表未被允许参加筹备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工人代表团由于没有工会代表参加而拒绝讨论问题。筹备委员会主席钟柯夫斯基（沙皇高加索总督府谘议会委员）借口工人拒绝开会而宣布筹备委员会会议停开。——（正文第 103 页）。

〔69〕“土地和自由”和“在斗争中才能取得自己的权利”是社会革命党的口号。——（正文第 104 页）。

〔70〕巴库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开始总罢工，梯弗里斯在七月十四日，巴土姆在七月十七日。罢工席卷了整个南高加索，并波及南俄（敖德萨、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地）。——（正文第 105 页）。

〔71〕巴库总罢工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是由巴拉汉内和比比－爱巴特两个油矿区的路特希尔德、诺贝尔、米尔佐也夫油矿的罢工开始的。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罢工扩展到巴库大多数的企业。这次罢工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巴库委员会在罢工的头几天散发的传单中提出了政治口号并拟定了经济要求，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等。在罢工时期举行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罢工的结果，工人获得胜利，工人和石油业主订立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这次罢工好像是大革命风暴将临时的雷前闪电”（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

第七十七页）。巴库十二月罢工的意义的详细说明，见本卷第一六一页至第一六五页。——（正文第105页）。

〔72〕“巴库报”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九〇二年创刊，一九一八年停刊，其间有过几次短期的中断。该报主要代表阿尔明尼亚石油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文第109页）。

〔73〕而这里指的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霍姆里报”于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七日第四号上刊载的“巴库工人委员会”一文。——（正文第一三九页）。

〔74〕李恩（拉林）的小册子“关于同石油业主举行协商会议”于一九〇七年由机械工会出版。——（正文第109页）。

〔75〕“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在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之后创办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三日）创刊，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一日）停刊。“无产者报”出了五十号，前二十号在芬兰出版，其余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无产者报”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由列宁主编。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正文第111页）。

〔76〕“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创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鉴于“呼声报”所持的显然是取消主义方针，普列汉诺夫从一九〇年十二月起停止在该报工作，后来又正式退出辑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虽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决定停止出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但孟什维克置之不理，继续出版，在报纸上公开鼓吹取消主义的思想。——（正文第112页）。

〔77〕“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创刊，一九一七年一月停刊。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过列宁的许多篇指导性的文章。列宁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部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进行斗争。一部分编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调和态度，企图破坏列宁路线的执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实行怠工，同时在“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上公开为取消主义辩护。由于列宁毫不调和地反对取消派，马尔托夫和唐恩于一九一一年六月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收入本卷的几篇斯大林的文章曾登载在这个报上。“社会民主党人报”有系统地登载了有关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材料，其中包括有关南高加索党组织工作的材料。——（正文第 112 页）。

〔7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俄代表会议”）于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举行。——（正文第 116 页）。

〔79〕“党的生活”是“巴库无产者报”一个专栏的名称。——（正文第 124 页）。

〔80〕“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事实上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是一九〇七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上选出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是一九〇九年六月八日至十七日（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列宁领导下于巴黎举行的。会议斥责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是“变相的取消派”。会议认为召回派所设立的喀普里“党”校是“脱离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派别组织的中心”。波格丹诺夫（得到尚采尔支持）拒绝服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决议而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正文第 124 页）。

〔81〕巴库委员会的决议于一九〇九年十月三日（十六日）刊载在“无产者报”第四十九号上，编辑部加按语如下：“除巴库同志们关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说了一些话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巴库的同志们‘反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行为，因为他声明不服从编辑部的决定’。但是，如果马克西莫夫同志服从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的决议并且不对布尔什维克派进行许多破坏活动，那就不会有什么‘分裂’。而‘不服从’当然也就是‘分裂’。关于我们的似乎是‘分裂的’政策，我们在本号刊载的‘和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谈话’一文中已详加说明， 因为编辑部在巴库的决议送来之前，已收到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份类似的决议”。编辑部所提到的“和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谈话”一文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六卷第四十九页至第五十九页）。——（正文第 126 页）。

〔82〕“阿姆沙拉”直译是老乡或同乡，人们这样称呼到巴库去谋生的伊朗杂工。——（正文第128页）。

〔83〕“高加索来信”写于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月间，预定在“无产者报”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因为当时“无产者报”已停刊，“来信”就被转寄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高加索来信”之一是尖锐批评取消派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的孟什维克拒绝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这封信后来在“辩论专页”（“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上发表。——（正文第131页）。

〔84〕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二日的地方自治局条例是沙皇政府用以代替一八六四年的条例的。新条例规定以等级资格代替以前的财产资格，这就使贵族在大部分县的地方自治局中取得了绝对多数，并加强了地方自治局对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正文第133页）。

〔85〕“巴库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库出版。共出七号。“巴库无产者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巴拉汉内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第二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巴拉汉内区和黑城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从第三号起该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机关报。“巴库无产者报”是由斯大林主编出版的，报上刊载过他的好几篇指导性的文章，现都收入本卷参加“巴库无产者报”工作的还有邵武勉、查帕里泽、斯泮达梁等人。“巴库无产者报”出到第五号中断。后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即斯大林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逃回巴库之后复刊。最后一号即第七号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巴库无产者报”编辑部和“无产者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曾有密切联系。——（正文第135页）。

〔86〕“劳动”合作社是巴库市和各石油区工人的联合消费合作社，创办于一九〇八年初。“劳动”合作社有社员一千二百人左右。合作社在巴拉汉内比比－爱巴特、后车站和黑城等区设有分社。合作社于一九〇九年出版“劳动呼声”杂志（周刊）。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该社工作。——（正文第138页）。

〔87〕“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这两个俱乐部的目就是帮助石油工人自学。俱乐部曾举办一般知识学习班和技术学习班，组织各种小组和讲演会。

俱乐部的经费靠会费和举办讲演会、戏剧演出的收入。为各石油区服务的“知识就是力量”俱乐部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科学”俱乐部是孟什维克领导的——（正文第 138 页）。

〔88〕戒酒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彼得堡开幕，一连开了几天。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五百一十人。大会的工人代表有四十三人，其中二人是巴库工人代表。会后一部分工人代表立即被警察逮捕。——（正文第 139 页）。

〔89〕“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公开报纸，于一九〇八年三月四日至三十日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 141 页）。

〔90〕安恩、诺、柯斯特罗夫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取消派首领饶尔丹尼亚的笔名。——（正文第 141 页）。

〔91〕这是普列汉诺夫于一八八九年在国际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上所作演讲中的话。——（正文第 143 页）。

〔92〕指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沙皇大臣斯托雷平所颁布的关于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另立田庄的土地法（指令）。——（正文第 147 页）。

〔93〕信中是指一九一〇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日（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五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全会通过必须“消灭一切相当有组织的派别，把它们变成不违反党的行动一致的政派”的决议。由于列宁的坚持， 全会斥责了取消派和召回派（但在决议中没有把“取消派”和“召回派”的真名称提出来）。由于调和分子在会上占优势，所以他们得以通过几个反列宁路线的决议。虽然列宁曾提出抗议，但仍有几个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被选入党的中央机关。全会闭会后，取消派更加紧他们的反党活动。——（正文第 157 页）。

〔94〕指一九一〇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改组（“改革”）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一五七页和第一五八页）——（正文第 157 页）。

〔95〕信中说到，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还有六个月（到一九一一年六月底）期满。——（正文第 158 页）。

〔96〕“思想”（月刊）是布尔什维克公开的哲学和社会经济的杂志，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五期。这杂志是列宁创办的，他并且实际领导了这杂志的工作。在“思想”杂志上，自创刊号至第四期，刊载了列宁的一些论文。积极参加这杂志工作的有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给该杂志撰稿的，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护党分子。——（正文第158页）。

〔97〕“工人报”是发行很广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于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二日）在巴黎出版。该报创办人和领导者为列宁。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一九一二年一月）曾表扬“工人报”在保卫党和党性方面的功绩，并承认它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正文第158页）。

〔98〕“明星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周刊，后来每周出两三号）“明星报”的活动是由列宁指导的，他经常从国外寄文章给这个报纸。经常给“明星报”撰稿的有莫洛托夫、奥里明斯基、坡列塔也夫、巴图林、叶列梅也夫等人。高尔基也曾参加该报工作。一九一二年春，斯大林留居彼得堡时曾直接领导该报工作，并在该报发表几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已收入本卷。该报的发行数有几号曾达五六万份。“明星报”为出版布尔什维克“真理报”（日刊）做了准备工作。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皇政府封闭“明星报”。继“明星报”之后的是“涅瓦明星报”，该报出到一九一二年十月。——（正文第158页）。

〔99〕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初写的传单“拥护党！”和列宁写的传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纲领”曾一起在全国各地广泛散发。中央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十六号上发出通报说：“中央在俄国国内印发两种传单：（一）拥护党（六千份）；（二）竞选纲领（一万份）。这些传单送到十八个地方，其中包括一些最大的中心城市……　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到处受到欢迎，莫不以数量太少而引以为憾。”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奥尔忠尼启泽从基辅来信说，两种传单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大家都很欢迎”。稍后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来信说：“我们收到了你们的两封信（一封关于地方工作，一封关于拟定的计划）和两份传单：‘拥护党’和‘纲领’。我们致热烈的敬礼。”——（正文第159页）。

〔100〕传单中是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至十七日（十八日至三十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统一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正式确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拉格代表会议给新型的党奠定了基础（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七三页至第一八一页）。——（正文第159页）。

〔101〕“五一万岁！”这一传单是斯大林一九一二年四月初在莫斯科写的传单由梯弗里斯的一个公开印刷所秘密印刷，以后全部运往彼得堡。——（正文第163页）。

〔102〕国家根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在国家杜马休会期间，内阁有权提出法案交由沙皇直接批准。根据这一条，斯托雷平不经过杜马而施行了许多重要法令，关于土地问题的法令即是其中之一。——（正文第170页）。

〔103〕“生活需要”杂志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一二年夏列宁写信给高尔基谈到这个杂志说：“顺便谈到，这个奇怪的杂志是取消派、劳动团和路标派的杂志。”（见“列宁文集”第一卷第一二五页）——（正文第173页）。

〔104〕和平革新党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列宁称和平革新党是“和平掠夺党”。——（正文第173页）。

〔105〕“生活事业”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杂志，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74页）。

〔106〕“我们的曙光”（月刊）是公开的杂志，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74页）。

〔107〕进步派是俄国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集团，他们采取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中间立场。进步派的首领是莫斯科的厂主列布申斯基和柯诺瓦洛夫等。——（正文第179页）。

〔108〕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秋季举行的。但是从这一年的春季起，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就开始进行竞选运动的准备工作。布尔什维克党在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独立活动的。一九一二年三月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纲领”，纲领印成传单在俄国许多大城市中散发。在竞选运

动中，斯大林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因被捕而暂时中断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一九一二年九月，正当竞选运动最热烈的时候，斯大林逃出纳赖姆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正文第181页）。

〔109〕“庶民报”是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黑帮报纸，是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的机关报。——（正文第185页）。

〔110〕“新时报”是于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出版的报纸，是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机关报。自一九〇五年起成为黑帮的机关报之一——（正文第185页）。

〔111〕“莫斯科呼声报”（日刊）是十月党人的机关报，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五年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编辑兼发行人为古契柯夫。——（正文第185页）。

〔112〕“真理报”是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日报，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和斯大林的倡议创办的。斯大林作为党的中央委员领导拟定“真理报”编辑方针的工作，并参加该报创刊号的编辑工作。四月二十二日即“真理报”创刊号出版的那天，斯大林被捕。直到一九一二年秋天，从纳赖姆流放地逃出之后，他才得以重新在“真理报”工作。自一九一二年十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真理报”刊载了斯大林的好几篇指导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已收入本卷。“真理报”的编辑委员和经常撰稿者有莫洛托夫、奥里明斯基、巴图林、斯维德洛夫、高尔基、萨莫依洛娃等人。在两年半中，沙皇政府曾八次封闭“真理报”，但是由于工人的支持，“真理报”又以新的名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等等）重新出版（关于“真理报”的意义和作用，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八七页至第一九二页）。——（正文第187页）。

〔113〕“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是一九一二年十月初写的，在彼得堡各大企业的工人大会上和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的工人初选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斯大林在若干工厂的飞行集会上领导讨论“委托书”。列宁特别重视这个“委托书”。他把这个“委托书”送往印刷所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时候，曾在原稿上批示：“一定要交还！！不要弄脏。保存这

个文件极端重要。”“委托书”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五日（十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号合刊上发表。列宁在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坚持说：“一定要把这个给彼得堡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显著地位。”（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八页）——（正文第189页）。

〔114〕“解释”这个名词是因“已经政府化了的”参议院遵照政府的意图解释选举法而产生的。政府当局在“解释”选举法时，蛮横无理地把已经进行的选举宣布无效。——（正文第189页）。

〔115〕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复选人的选举，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五日的省的初选人代表大会上举行的。虽然彼得堡二十一个大企业被剥夺了选举权，但是在代表大会选出的六个复选人中有四个是布尔什维克。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解释”的企业的工人恢复了选举权。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日在这些企业中重新进行初选人的独举，十月十七日举行了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第二次初选人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又进行了复选人的第二次选举，五个人——两个布尔什维克和三个孟什维克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次日举行补充投票，结果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当选为第六名复选人。

关于竞选的过程，在刊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斯大林通讯“彼得堡的选举”中有详细的描述。（见本卷第二六九页至第二八一页）——（正文第191页）。

〔116〕“光线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日报，于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彼得堡出版。取消派在“光线报”上公开反对秘密的党。该报主要是靠资产阶级的经费维持的。——（正文第191页）。

〔117〕指奥布霍夫工厂。——（正文第193页）。

〔118〕“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这一传单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为纪念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八周年写的。关于印发这种传单的必要性，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六日）从克拉柯夫写信给彼得堡的斯大林说：“亲爱的朋友，关于纪念一月九日，预先考虑好和准备好是极端必要的。应当预先准备好传单，号召举行群众大会，罢工一天和游行示威（这些事情应当在当地决定，在当地要看得清楚些）……传单的口号应当是三个革命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并要特别着重指出

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的‘可耻’。如果没有充分的而且是极充分的把握能够在彼得堡弄好传单，那就必须及时在这里预先准备好再运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四〇一页）——（正文第201页）。

〔119〕一九一二年八月至十月，库托马尔和阿尔加契两个苦役监狱（尼布楚苦役流放地，位于外贝加尔）的政治犯为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发生大批绝食和自杀事件。为了对此表示响应，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学生举行集会。——（正文第201页）。

〔120〕一九一二年十月，塞瓦斯托波里海军军事法庭判决一百四十二名被控准备在黑海舰队起义的水手。被告中十七人被判处死刑，一百零六人被判处苦役，十九人被判决无罪。为反对法庭的判决，莫斯科、彼得堡、哈尔科夫尼古拉也夫、里加和俄国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群众性的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正文第201页）。

〔121〕一九一一年底，报刊上发表揭露政府陷害行为的新文件：控告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的材料完全是彼得堡暗探局一手捏造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向杜马提出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代表的案件。这一要求被杜马否决了。因此，彼得堡、里加、华沙和俄国其他城市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释放被判刑的代表。——（正文第202页）。

〔122〕彼得堡进行竞选期间，党中央的代表是斯大林。彼得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彼得堡委员会中少数委员组成，负责进行日常工作。——（正文第206页）。

〔123〕取消派从他们一九一二年九月发表的竞选纲领中取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的基本政治口号。他们用“国家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时”应有普选权的要求代替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用“重新审查第三届杜马土地立法”的要求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正文第207页）。

〔124〕指一九一二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的所谓“八月”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是为了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召开的。——（正文第209页）。

〔125〕布尔什维克“Ｘ”是坡列塔也夫，取消派“Ｙ”大概是马耶夫斯基（古托夫斯基）。下面提到的彼得堡取消派分子“阿布×××和列×××”

是阿布罗西莫夫和列维茨基（策杰尔包姆）。——（正文第210页）。

〔126〕“涅瓦呼声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周报，于一九一二年五月至八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212页）。

〔127〕见“高加索来信”，本卷第一七九页至第一八二页。——（正文第217页）。

〔128〕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九期上，普列汉诺夫批评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取消派季布拉泽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发表的言论。——（正文第217页）。

〔129〕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宗教政治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苏丹土耳其的土耳其地主、资产阶级和僧侣中，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回教民族的有产阶级中。大伊斯兰主义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各回教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力图利用大伊斯兰主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扼杀东方各族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利用大伊斯兰主义作为准备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正文第218页）。

〔130〕“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是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二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一九一三年“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这篇论文于一九一四年由“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内政部大臣下令一切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查禁此书。一九二〇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重印这一著作，把它编入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集”（土拉国家出版社版）。一九三四年，这篇文章编入了斯大林的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论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重要地位的原因，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实际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有详细论述（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一九一三年二月（公历），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当列宁知道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他坚决反对：“当然我们绝对反对。文章写得好极了。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对崩得混蛋们丝毫也不放弃原则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文献资料）在

斯大林被捕后不久，即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宁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说：“……国内逮捕事件严重。柯巴被抓去了……柯巴在被捕前写了一篇很长的（可供“启蒙”杂志三期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好！应当为真理而对崩得和取消派中的分离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文献资料）——（正文第221页）。

〔131〕锡安主义[①]是犹太资产阶级一种反动民族主义，为犹太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最落后的犹太工人所拥护。锡安主义者竭力使犹太工人群众脱离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而孤立起来。锡安主义组织现在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间谍组织，专事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正文第221页）。

〔132〕奥国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于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举行。斯大林在本文第四章所引用的便是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原文。（见本卷第三一六页至第三一七页）——（正文第239页）。

〔133〕“在我国，谢天谢地，没有国会”，这句话是沙皇政府的财政部大臣（后来任内阁首相）柯柯甫采夫于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国家杜马中说的。——（正文第241页）。

〔134〕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一五四页）——（正文第250页）。

〔135〕奥国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或称维姆堡代表大会，因大会在维也纳维姆堡旅馆举行）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六月六日至十二日）举行。——（正文第251页）。

〔136〕指一八四四年刊载于“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的论文“论犹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卷）——（正文第252页）。

〔137〕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一〇年九月在里沃夫举行。——（正文第256页）。

————————————

① 旧约“以赛亚书”中称锡安为圣城，是犹太国被“外邦侵吞，倾覆荒凉”之后一个仅存的地方，先知以赛亚预言“锡安必蒙救赎”，故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称锡安主义者。——译者注。

〔138〕一九一二年十月二日（十五日），普列汉诺夫在“护党报”上发表了“又一个分裂的代表会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斥责了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并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崩得分子首领柯索夫斯基致函取消派杂志“我们的曙光”编辑部批评普列汉诺夫。——（正文第258页）。

〔139〕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公历）在里沃夫举行。——（正文第259页）。

〔140〕“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〇年由列宁创办。（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八页注二六）——（正文第260页）。

〔141〕瓦聂克是一个公开站在沙文主义和分离主义立场上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正文第261页）。

〔142〕“我们的生活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库泰依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正文第264页）。

〔143〕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交战一方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彻尔诺戈里亚，另一方是土耳其。——（正文第272页）。

〔144〕见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和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至九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一九〇八年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一一八、一三一页）——（正文第276页）。

〔145〕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由崩得、波兰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而组成的联盟选为华沙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以孟什维克取消派（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多数票对六名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通过决议，接受亚格洛加入社会民主党党团。——（正文第276页）。

〔146〕“启蒙”（月刊）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杂志，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在彼得堡出版。列宁领导这杂志的工作，他和在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萨维里也夫、奥里明斯基、叶利札罗娃）保持着经常的通信关系。斯大林在留居

彼得堡期间曾积极参加这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和“真理报”有密切联系。一九一四年六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政府将该杂志封闭。一九一七年秋，这杂志又出过一次两期的合刊。——（正文第276页）。

〔147〕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第四届杜马的工人代表表示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光线报”工作人员的名单中。同时他们仍继续在“真理报”工作。实际上工人代表并没有参加“光线报”的工作。中央对这问题发出指示后，他们就声明将自己的名字从“光线报”工作人员名单中勾销。由于这个声明，在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两派（布尔什维克的六人团和孟什维克的七人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正文第277页）。

〔148〕指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正文第278 页）。

〔149〕“活的事业报”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公开周报，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至四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278页）。

〔150〕“连纳惨案一周年”这一传单是斯大林于一九一三年一、二月间在克拉柯夫写的。传单由克鲁普斯卡娅誊写，用胶印机印刷，然后转运俄国，在彼得堡、基辅、莫吉廖夫、梯弗里斯等城市散发。——（正文第281页）。

〔151〕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正文第282页）。

年　表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九〇七年

一月一日

斯大林领导的格鲁吉亚文“火炬报”创刊号出版。格鲁吉亚文“新时代报”第八号继续刊载斯大林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二月十日

斯大林为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作序言。

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领导的格鲁吉亚文“我们的生活报”创刊号出版，上面刊载斯大林的“彼得堡的竞选和孟什维克”一文。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我们的生活报”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号继续刊载斯大林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三月十一日

斯大林领导的格鲁吉亚文“时报”创刊号出版。

三月十三日

“时报”第二号刊载斯大林的“立宪民主党人专制还是人民专制？”一文。

三月十七日

“时报”读六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无产阶级在斗争，资产阶级在和政府缔结联盟”（社论）。

三月二十二日

“时报”第十号刊载斯大林的“悼念捷里亚同志”一文。

三月二十八日和三十日

“时报”刊载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工人关于选举斯大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决议。

四月四日至六日和十日

“时报”第二十一号至第二十三号和第二十六号继续刊载斯大林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四月八日

“时报”第二十五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社论）。

四月十日

“时报”第二十六号刊载斯大林的“一塌糊涂……”一文。

四月十三日

“时报”第二十九号刊载斯大林的“我们高加索的小丑们”一文。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

斯大林代表党的梯弗里斯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

六月上半月

斯大林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后回国，到巴库和梯弗里斯；在巴库、梯弗里斯和格鲁吉亚西部几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作有关代表大会总结的报告，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作斗争。

六月二十日

斯大林主编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巴库无产者报”创刊号出版。报上刊载他的两篇文章：“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社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

夏季至秋季

斯大林在巴库各区举行的辩论会上发言，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

斯大林领导抵制和石油业主举行协商会议的运动。

七月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二号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的续稿。

七月底

巴库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举行党的石油区代表会议，会议赞成组织总罢工。

八月十二日

“汽笛报”创刊号出版。这是由斯大林发起创办的巴库石油工会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机关报。

八月二十四日

在五个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回民小组“古墨特”的联席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当选为党的全市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

九月至十月

斯大林领导第三届国家杜马竞选运动。九月二十二日，在巴库工人选民团初选人大会上，通过斯大林起草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

九月二十九日斯大林在被资本家雇佣的刺客所暗杀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汉拉尔·沙法拉利也夫墓前发表演说。

“汽笛报”第四号刊载斯大林的“应当抵制协商会议！”一文。

十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全市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上半月

斯大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萨崩奇医院举行的会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斯大林领导下举行罢工一天，以抗议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审判。

十一月底

斯大林因党的工作到梯弗里斯。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至一九〇八年三月

斯大林领导巴库工人在工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参加与石油业主举行协商会议的运动。

一九〇八年

一月十三日

“汽笛报”第十四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选举以前”（社论）。

一月至二月

巴库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多次大罢工。

二月三日

“汽笛报”第十七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再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社论）。

二月

因黑帮袭击事件越来越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斯大林领导下成立“自卫司令部”。

三月二日

“汽笛报”第二十一号刊载斯大林的“我们最近时期的罢工说明了什么？”一文。

三月九日

“汽笛报”第二十二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石油业主在策略上的转变”（社论）。

三月十六日

“汽笛报”第二十三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必须作好准备！”（社论）。

三月二十五日

化名为盖奥兹·尼札拉泽的斯大林被捕，囚禁于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在狱中和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并保持联系，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并给“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写文章。

在狱中，斯大林在政治犯中进行工作，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论，组织政治犯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三月三十日

“汽笛报”第二十五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社论）。

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八日

“汽笛报”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二各号刊载斯大林的“石油业主对经济恐怖的看法”一文。

七月二十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五号刊载斯大林的两篇文章：“奴颜婢膝的‘社会主义者’”和“假仁假义的祖巴托夫分子”。该报附刊刊载斯大林的“协商会议和工人”一文。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沃洛果达省，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两年。

一九〇九年

一月

斯大林被递解到沃洛果达后，关在沃洛果达监狱里。

一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的流放地被确定为沃洛果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镇。

二月八日

斯大林在被递解到流放地的途中，患回归热，从维亚得卡监狱转送到维亚得卡省地方医院。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从医院又被转送到维亚得卡监狱。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达索里维切果茨克。

六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逃走。

七月初

斯大林路过彼得堡，停留了几天。

七月上半月

斯大林秘密到达巴库，领导巴库和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恢复和巩固工作。

八月一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六号出版（停刊一年后），刊载斯大林写的社论“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八月二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情况的决议，表示“拥护以列宁同志为代表的编辑部内多数人的立场”。

八月二十七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七号刊载斯大林的两篇文章：“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续完）和“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罢工”。

九月上半月

斯大林从巴库到达梯弗里斯，组织和指导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

九月底

斯大林设法恢复巴库委员会秘密印刷所的工作。

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初

斯大林到达梯弗里斯，筹备召开党的梯弗里斯全市代表会议和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梯弗里斯无产者报”。

十一月十二日以前

斯大林由梯弗里斯返回巴库。

十二月十三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印发斯大林写的传单“十二月罢工和十二月合同”（为纪念巴库一九〇四年罢工五周年而作）。

十一月至十二月

斯大林给党中央机关报写“高加索来信”。

一九一〇年

从一九一〇年起，斯大林是党中央委员会特派员（“中央委员会代办”）。

——————————

一月五日

在斯大林直接参加下创办的“梯弗里斯无产者报”创刊号出版。

一月二十二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通过斯大林起草的关于必须召全党代表会议、把实际领导党工作的中心移到俄国国内和出版全俄指导性报纸的决议。

三月二十三日

化名为查哈尔·格里哥良·梅利疆涅茨的斯大林被捕。斯大林写的传单“德国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印就并散发。

三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被囚禁于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九月七日

斯大林在监狱里接到高加索总督八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年内禁止斯大林在高加索居住的决定。

九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被递解往索里维切果茨克。

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到达索里维切果茨克。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一年六月

斯大林和列宁建立联系，举行流放者会议，会上做学术演讲，讨论当前政治问题。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写信给党中央（“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

一九一一年

三月至六月

在索里维切果茨克斯大林（在库查柯娃家里）被搜查多次。

六月一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巴黎举行会议，斯大林缺席被任命为召开党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候补委员。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因组织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被拘禁三天。

六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流放期满，免除警察的公开监视。斯大林被禁止在高加索、省会和各工业中心居住，于是他选择位于通往彼得堡大路上的沃洛果达作为居住地。

七月六日

斯大林持通行证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前往沃洛果达。

七月十六日

斯大林到达沃洛果达。

七月至九月

斯大林在沃洛果达受警察秘密监视。

七月

斯大林写信给列宁领导的“工人报”编辑部。斯大林在信里说明他打算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工作。

九月六日

斯大林秘密地从沃洛果达前往彼得堡。

九月七日

斯大林到达彼得堡，用契日柯夫的居民证报户口。

九月七日至九日

斯大林会见布尔什维克托德利亚和阿利路也夫，和党的彼得堡组织建立联系。

九月九日

斯大林被捕入狱（彼得堡拘留所）。

十二月十四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沃洛果达受警察的公开监视，期限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到达沃洛果达。

一九一二年

一月五日至十七日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代表会议”）上，斯大林缺席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代表会议上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俄国实际革命工作的中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二月中旬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受列宁的委托到沃洛果达见斯大林，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面告斯大林。

二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从沃洛果达流放地逃走。

三月初

斯大林写传单“拥护党！”。这传单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行，在俄国各地广泛散发。

三月上半月

斯大林到达巴库和梯弗里斯，组织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以执行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他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党的各地组织的第一号通知书，通知它们中央委员会已完全组成。

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召开巴库布尔什维克区组织的工作人员会议。会议表示拥护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

三月三十日

斯大林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关于巴库会议情况的通讯。

四月一日

斯大林从巴库前往彼得堡。

四月初

斯大林在往彼得堡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会见奥尔忠尼启泽。

斯大林写传单“五一万岁！”。

斯大林把莫斯科一部分党的工作者表示拥护布拉格代表会议决议和拥护新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全文寄往梯弗里斯。

斯大林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蔡特金，请她把保管的党的经费交给中央委员会作为进行第四届国家杜马竞选运动之用。

四月十日

斯大林秘密到达彼得堡。

四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斯大林主编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纸“明星报”。“明星报”刊载斯大林的几篇文章：“新的时期”（社论）、“实际生活在胜利着！”、“他们干得好……”、“奔流起来了！……”（社论）、“他们怎样准备迎接选举”、“结论”（社论）等等。

四月中旬

斯大林和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坡列塔也夫和坡克罗夫斯基，以及布尔什维克著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商谈“真理报”的出版和方针问题，并和他们一起编辑该报创刊号。

四月二十二日

工人的日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刊载斯大林的“我们的目的”一文。

斯大林被捕，监禁狱中（拘留所）。

七月二日

斯大林从彼得堡被递解到纳赖姆边区流放，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三年。

七月十八日

斯大林由监视员押解乘“柯尔巴什维茨”号轮船从托姆斯克开往纳赖姆流放地。

九月一日

斯大林从纳赖姆流放地逃走。

九月十二日

斯大林到达彼得堡。

九月至十月

斯大林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竞选运动，组织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

斯大林主编“真理报”。

十月四日

在斯大林领导下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举行罢工一天的决定，以抗议取消彼得堡各大工厂（普梯洛夫等工厂）选举初选人的权利。

十月初

斯大林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会议上讨论了对取消派斗争的策略并拟定第四届国家杜马工人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斯大林写“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

十月中旬

斯大林把“彼得堡工人的委托书”寄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给列宁（“委托书”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五日〔十八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号合刊上）。

十月十七日

彼得堡省工人选民团初选人代表大会通过斯大林起草的“委托书”。

十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一四七号刊载斯大林的论文“初选人的意志”（社论）。

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三日）

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的委托写信给“真理报”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们，请斯大林务必去克拉柯夫一行。

十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一号刊载斯大林的“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一文。

十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一五二号刊载斯大林的“今天选举”一文。

十月底

斯大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和新当选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布尔什维克工人建立联系。

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从莫斯科返回彼得堡。

十一月十日前

斯大林秘密到克拉柯夫见列宁。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四日）

列宁把斯大林寄给他的“委托书”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建议“用大号字登在显著地位”。

十一月上半月

斯大林参加在克拉柯夫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斯大林从克拉柯夫回到彼得堡之后，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六日）

列宁写信给斯大林谈到准备纪念一月九日事件和必须印发传单的问题。

十二月上半月

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的委托写信给斯大林，要他务必到克拉柯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和第四届杜马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六人团”）的联席会议。

十二月底

斯大林秘密赴克拉柯夫。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至

一九一三年一月一日（十四日）

斯大林参加列宁主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人员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布尔什维克）的“二月”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拟定了改进“真理报”编辑工作的措施。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底至
一九一三年一月初

斯大林写的传单“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印就并散发。

一九一三年

一月十二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号刊载斯大林的两篇文章：“彼得堡的选举（圣彼得堡来信）”和“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高加索来信）”。

一月下半月

斯大林从克拉柯夫到维也纳，办理在巴黎印刷列宁写的关于“二月”联席会议和会议决议的“通报”。

一月

斯大林写“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该文刊载在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上。

一月至二月

斯大林写传单“连纳惨案一周年”。

二月中旬

斯大林从国外回到彼得堡，遵照列宁的指示，和斯维德洛夫一起着手改组“真理报”编辑部。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假卡拉什尼柯夫交易所会场举行的音乐会上被捕，监禁狱中。

二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四十七号刊载斯大林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状况”一文。

七月二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四年。

七月十一日

斯大林到达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七月十五日

斯大林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被解往土鲁汉斯克。

八月十日

斯大林到达土鲁汉斯克，被解往柯斯廷诺小村流放地。

一九一四年

三月上半月

斯大林被转解至北极圈内的库莱卡村。警察对斯大林的监视更为严密。

一九一五年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修道院村访问当时在流放中的斯泮达梁，从那里写信给列宁。信中批判了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护国主义路线。

夏季

斯大林在修道院村参加被流放的政治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成员）会议。会议讨论党团审判案问题。

十一月十日

斯大林从土鲁汉斯克流放地写信给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

一九一六年

二月五日

斯大林写信给在国外的党中央，报告他在写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

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经由阿尔曼德致函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信中询问由阿尔曼德转寄国外的“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的下落。

三月十二日

斯大林和斯泮达梁以及其他流放者联名写信给“保险问题”杂志编辑部。

十二月十四日

因征召流放政治犯入伍，斯大林被递解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一九一七年

二月初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徵兵委员会免除斯大林的兵役。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赴阿琴斯克，他被准许在那里住到流放期满。

三月八日

斯大林和一批流放者从阿琴斯克出发赴彼得格勒。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四萬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 276,000 字
印數 1—50,000 册

書號 1433

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
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
去对抗民族主义。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四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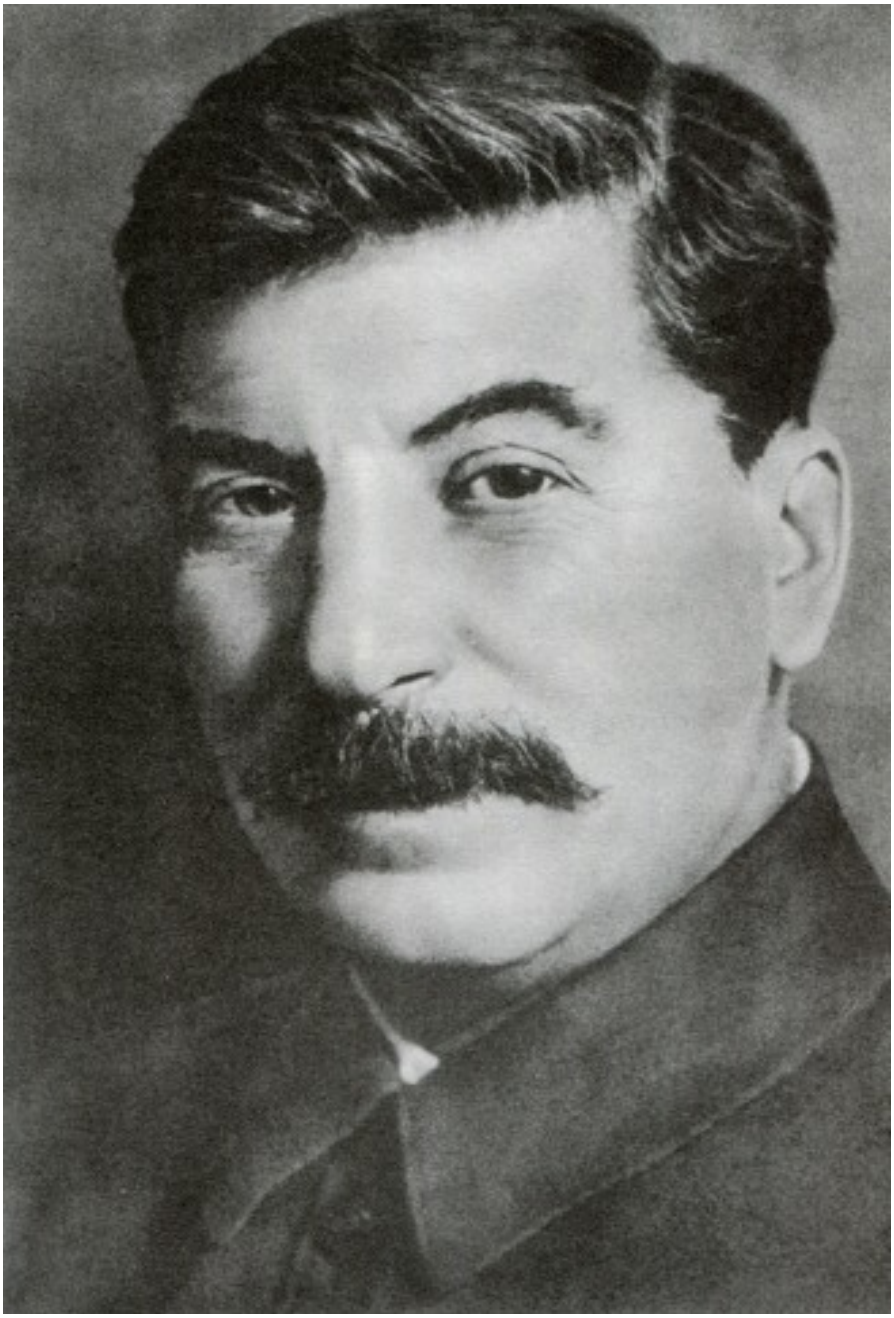
ТОМ
3
1917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一九一七年

一九五五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方括弧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三卷说明 …… 1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三　月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 3
论战争 …… 5
在取得部长职位的道路上 …… 9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 11
论取消民族限制 …… 14
二者必居其一 …… 17
反对联邦制 …… 19

四　月

两个决议 …… 25
给农民土地 …… 26
五一 …… 28
论临时政府（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
在瓦西里岛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 30
关于玛丽亚宫的会议 …… 3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
会议）（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 36
一　为捍卫列宁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同题的决议案
而发表的演说（四月二十四日） …… 36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九日） …… 37
三 关于民族民族的结论（四月二十九日） …… 41

五 月

革命的落伍者 …… 43
我们期待于代表会议的是什么？ …… 47
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 …… 49

六 月

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机） …… 60
反对分散的游行示威 …… 66
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 …… 68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 72
游行示威 …… 76

七 月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 80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 83
一 中央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七月十六日）…… 83
二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七月十六日） …… 87
三 对几个书面问题的答复（七月十六日） …… 92
四 结论（七月十六日） …… 94
发生了什么事情？ …… 96
反革命的胜利 …… 99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 102
告被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 104
两个代表会议 …… 109
新政府 …… 110

论立宪会议的选举 …… 112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 117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七月二十七日） …… 117
二　结论（七月二十七日） …… 125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七月三十日） …… 127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
的答复（七月三十一日） …… 132
五　结论（七月三十一日） …… 135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驳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八月三日） …… 138

八　月

资本家要什么？ …… 141
反对莫斯科会议 …… 145
再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 147
莫斯科会议把俄国引向何处？ …… 150
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 …… 155
两条道路 …… 158
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 161
前线我军失败的真相 …… 164
论前线七月失败的原因 …… 167
前线失败究竟是谁的罪过？ …… 173
美国的数十亿贷款 …… 177
今天选举 …… 180
挑衅时期 …… 184
“社会革命党”党内的分工 …… 186
黄色联盟 …… 189

二者必居其一 …… 192
我们的要求 …… 196
阴谋在继续 …… 199
反对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 …… 203

九 月

危机和执政内阁 …… 204
走自己的路 …… 207
论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 …… 209
第二次浪潮 …… 212
外国人和科尔尼洛夫阴谋 …… 217
论民主会议 …… 220
两条路线 …… 224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 227
论革命战线 …… 229
他们在制造镣铐 …… 233
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 236
评论 …… 240
铁路罢工和民主主义的破产者 …… 240
俄国的农民和蠢才们的党 …… 241
向工人的进攻 …… 243
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 …… 245
评论 …… 248
“态度暧昧的”党和俄国士兵 …… 248
阴谋家掌握政权 …… 250
纸上的联合 …… 251

十 月

评论 …… 253
农村在挨饿 …… 253

工厂在挨饿 …… 254
他们鞭打了自己 …… 256
反革命的阴谋 …… 258
谁在破坏立宪会议？ …… 274
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 …… 276
谁需要预备国会？ …… 278
苏维埃政权 …… 280
看看无耻到什么程度 …… 283
破坏革命的工贼 …… 286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 291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 292
我们需要什么？ …… 296

注释 …… 300
年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 315
插图(新增)
一 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 …… 59
二 列宁和斯大林在拉兹里夫湖畔 …… 140
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 239
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 …… 299

第 三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包括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著作。

一九一七年，约·维·斯大林在和弗·伊·列宁密切合作之下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在第三卷中，约·维·斯大林论述布尔什维克领导群众问题的著作占很大的篇幅：六月游行示威和七月游行示威时期的著作以及彼得格勒区杜马和市杜马选举时期的著作有“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反对分散的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发生了什么事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今天选举”等等；粉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发动时期的著作有“我们的要求”、“阴谋在继续”、“外国人和科尔尼洛夫阴谋”等等；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直接准备武装起义时期的著作有“论民主会议”、“两条路线”、“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他们在制造镣铐”、“看看无耻到什么程度”等等。

本卷中的若干著作论述了党争取把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的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和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破坏革命的工贼”和“我们需要什么？”)。

编入本卷的约·维·斯大林的文章大部分曾经在一九二五年出过两版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过。这些文章最初曾经刊

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该报曾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和“工人之路报”等名称出版)和布尔什维克的“士兵真理报”、“无产阶级事业报”、 “工人和士兵报”等报纸上。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俄国革命的车轮风驰电掣般地前进。革命战士的队伍到处在成长和扩大。旧政权的基石已经根本动摇并日趋崩溃。现在也和往常一样，走在前面的是彼得格勒，跟在它后面时而颠踬的是辽阔广大的俄国各地。

旧政权的势力日趋衰落，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隐藏了起来，等待适当时机，以便抬起头来向自由的俄罗斯反扑。环顾一下四周就可以看到，黑暗势力在不断地干着卑鄙勾当……

保持既得的权利，以便彻底消灭旧势力并和各地一道把俄国革命向前推进，——首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就应当如此。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些什么呢？

要**摧毁**旧政权，起义的工人和士兵结成临时联盟就够了。因为不言而喻，俄国革命的力量在于工人和穿上军衣的农民结成联盟。◇3◇[①]

但是，要**保持**已经争得的权利并**继续扩大**革命，单靠工人和士兵的**临时**联盟是绝对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这个联盟成为自觉而坚强的、持久而稳固的联盟，使它稳固得足以抵抗反革命的挑衅性的袭击。因为谁都知道，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无保证，在于革命工人同革命士兵的联盟是否巩固。

工兵代表苏维埃也就是这种联盟的机关。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

这种苏维埃团结得愈紧密，组织得愈巩固，它们所体现的革命人民的革命政权就愈有力量，战胜反革命的保证就愈加实际。

加强这种苏维埃，使它们遍于各地，使它们在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机关领导下彼此连成一气，——这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方向。

工人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周围！

农民们！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在俄国革命的领袖——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士兵们！组织自己的联合会，集合在俄国革命军队唯一可靠的同盟者——俄罗斯人民的周围！

工人、农民、士兵们！联合到俄国革命力量的联盟机关和政权机关——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去！

要完全战胜旧俄国的黑暗势力，其保证就在这里。

要实现俄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劳动保护，给俄国全体公民民主共和国，其保◇4◇证也就在这里！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八号
署名：科·斯大林◇5◇

论　战　争

最近，科尔尼洛夫将军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报告说，德国人正准备进攻俄国。

于是罗将柯和古契柯夫号召军队和民众准备作战到底。

资产阶级的报刊则发出警报说：“自由在危急中，战争万岁！”同时俄国革命民主派中也有一部分人发出这种警报……

听了发出警报的这些人的言论，就会以为俄国目前的情况和一七九二年的法国相似，当时中欧和东欧的反动国王们为了恢复法国的旧制度曾经组织了反对共和制的法国的联盟。

如果俄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真的和一七九二年法国所处的环境相似，如果目前是反革命的国王专门为了恢复俄国的旧政权而结成专门的联盟来反对我们，那末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像当时法国的革命者一样，万众一心，奋起保卫自由。因为不言而喻，用血换来的自由必须用武力来捍卫，不让它受到任何反革命的袭击，不管这种袭击来自何方。

但是情形真的是这样吗？

一七九二年的战争是独裁专制的国王——农奴主由于害怕共和制的法国的革命火焰而对它发动◇6◇的皇朝战争。战争的目的是扑灭法国的革命火焰，恢复法国的旧制度，藉以保证这些张皇失措的国王不致在本国看到革命的传染病。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者才那样奋不顾身地和各国国王的军队搏斗。

目前的战争却不是这样。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去侵占(吞并)别国的领土，主要是农

业国的领土。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需要新的销售市场和通往这些市场的方便道路,需要原料和矿产，所以它们竭力到处掠夺这些东西，不管被侵略国的内部制度如何。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目前的战争一般说来不会而且不可能导致被侵略国的内政遭到必然的干涉，即恢复被侵略国的旧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根据俄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理由敲起警钟和宣布“自由在危急中，战争万岁！”

俄国目前的情况倒像一九一四年的法国，即战争开始时的法国，当时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正像现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一样，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阵营中也有人发出警报说：“共和国在危急中，打德国人去！”

正像当时这个警报在法国俘虏了许多社会党人(盖得、桑巴等人)一样，现在俄国也有不少社会◇7◇党人跟在那些宣布“革命的国防”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后面走。

后来法国事变的进程表明，警报原来是假的，而叫嚷自由和共和国在危急中原来是为了掩盖法国帝国主义者夺取亚尔萨斯-洛林和威斯特伐里亚的真正野心。

我们深信，俄国事变的进程将会暴露出“自由在危急中”这种狂叫的全部虚伪性：“爱国的”烟幕一消散，人们就会亲眼看到俄国帝国主义者的真正用心——想……占领海峡，侵略波斯……

盖得、桑巴等人的行为，已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两次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1](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的一些反对战争的决议中受到应有的和权威性的批评。

后来的事变证实了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两次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原则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如果已能推翻可恶的沙皇制度的俄国革命民主派竟屈服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假的警报，而重复盖得、桑巴的错误，那实在是可悲了……

作为一个政党来说，我们对目前战争的态度应该怎样呢？

有哪些实际方法能够使战争尽速停止呢？

首先，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它只限于一般和平思想的宣传，在实际影响各交战国停止战争方面，它没有发生而且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其次，应该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号召各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大屠杀的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如能深入广大群众，无疑会使数百数千的工人重新记起已经被遗◇8◇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不能不指出，这个宣言终究不能直接达到目的。因为即使这个宣言能在各交战国的人民中得到广泛传播，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认清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及其侵略目的，那就很难设想他们会响应这个号召。我们更不用说，宣言既然以先推翻德国“半专制制度”为“停止可怕的屠杀”的条件，实际上就是把“停止可怕的屠杀”这件事无限期地拖下去，从而陷于“作战到底”的观点，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德国人民才能推翻“半专制制度”，一般说来，是否最近的将来就能把它推翻……

那末出路何在呢？

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工人、士兵和农民应当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应当要求临时政府**当众公开表示它试图促使一切交战国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只有这样，“打倒战争！”的口号才不会有变成毫无内容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和平主义的危险；只有这样，这个口号才能形成摘下帝国主义者假面具和揭露目前战争真正内幕的强大的政治运动。

因为即使有任何一方拒绝根据上述原则进行谈判，那末这种拒绝，即不愿意放弃侵略野心的表示，也会在客观上成为加速消灭“可怕的

屠杀”的工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会亲眼看到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帝国主义集团的血迹斑斑的面目，会认清他们牺牲自己儿子的生命原来是为了这些帝国主义集团贪得无厌的利益。◇9◇

摘下帝国主义者的假面具，在群众面前揭露目前战争的真正内幕，这也正是向战争宣布真正的战争，使目前的战争不能进行。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十号
署名：科·斯大林◇10◇

在取得部长职位的道路上

几天以前，报刊上出现了“统一派”[2]关于临时政府、关于战争和关于联合的几个决议。

这个派别是普列汉诺夫—布利杨诺夫的“护国主义的”派别。

要想了解这个派别，只要看看他们的意见就够了。他们认为：

（一）“要对临时政府的活动进行必要的民主监督，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人民主派**参加**临时政府”；

（二）“无产阶级不得不**继续**战争”，这也是“为了使欧洲摆脱德奥反动势力的威胁”。

简单地说：工人先生们，请把人质送到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里去，请把战争继续下去，以便……夺取君士坦丁堡！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布利杨诺夫派的口号。

既然如此,这个派别居然还敢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他们联合！

可敬的“统一派”忘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拥护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这些决议既否定护国主义，也反对参加目前的政府,即使是临时政府(不要和革命的临时政◇11◇府混为一谈！)。

“统一派”没有注意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是对盖得—桑巴的否定，反过来说，联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就决不能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

“统一派”没有看到，李卜克内西和谢德曼早已不在而且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处了……

不，先生们，你们号召统一找错了对象！

当然，可以谋取部长职位，可以联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以便……“继续战争”等等，这都是爱好问题，但是这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何相干，和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何相干呢？

不，先生们，走你们的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十一号
本文没有署名◇12◇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革命正在前进。它在彼得格勒爆发之后，正向各地蔓延，逐渐续展到辽阔广大的俄国全境。不仅如此，革命还在不可避免地从政治问题转到社会问题，转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的问题，因而使目前的危机更加深刻和尖锐。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俄国某些有产集团的惊惶。沙皇地主的反动势力正在抬头。帝国主义集团敲起了警钟。金融资产阶级正向没落的封建贵族伸出手来，以便共同组织反革命。今天他们还很软弱，还不坚决，但是明天他们就可能坚强起来和动员起来反对革命。不管怎样，他们现时正在毫不放松地干着卑鄙勾当，在一切居民阶层中(包括军队在内)纠集力量……

如何制止正在抬头的反革命呢？

俄国革命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彼得格勒一直是革命的根据地。搏斗和枪杀，街垒和牺牲，斗争和胜利，主要是在彼得格勒及其郊区(喀琅施塔得等地)发生的。地方只不过坐享胜利果实并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而已。◇13◇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实际上分掌政权的局面，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这种局面使反革命的佣仆们感到不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斗争机关，临时政府是被革命的“极端行动”吓倒的、以地方的消极性为靠山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情况就是如此。

革命的弱点就在这里，因为这种情况使地方和首都更加脱节，使它们之间更加缺乏联系。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地方也在革命化。各地都在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不断卷入运动并组织在自己的协会中。军队也在民主化，各地都在成立士兵联合会。地方的消极性正在消失。

因此，临时政府的立足之地动摇起来了。

同时，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也显得不足以应付新的形势了。

全俄民主力量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斗争机关，这个机关要有高度的威信，以便把首都和地方的民主力量联合在一起，并在必要时从人民的革命**斗争**机关变成动员人民中一切有生力量以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政权**机关。

只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能够成为这样的机关。

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其次，战争也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除了消极的方面还有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战争既然几乎动员了俄国所有的成年人,就使军队有了人民的性质,因而促进了士兵和起义工人的联合。这也就◇14◇是我国革命比较容易爆发和胜利的原因。

但是军队的流动性很大，特别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必须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军队不能永久驻在一个地方来保卫革命，使它不受反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建立另一种武装力量，建立一种自然地和革命运动中心联系着的武装工人的军队。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如果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末我国革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和革命利益血肉相连的工人近卫军。

立即武装工人，建立工人近卫军，——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二个条件。

许多国家革命运动的特点，例如在法国，表现在下面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上：那里的临时政府通常是在街垒中产生的，因此，它们是革命的，至少比它们后来(通常在国家“安定”之后)召开的立宪会议

要革命些。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最有经验的革命者总是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力求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通过革命政府来实现自己的纲领。他们所以这样做，是想把立宪会议置于各种改革已经实现这一既成事实的面前。

我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我国临时政府不是**在**街垒**中**而是**在**街垒**旁**产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勉强跟在革命后面，绊革命的脚，妨碍革命前进。如果根据革命正在一步步深入，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土地等社会问题并使地方革命化这个事实来判断，那末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全民立宪会议将比六三杜马所选出的目前的临时政府民主得多。◇15◇

同时，令人担心的是，被革命的规模吓坏了的和渗透了帝国主义倾向的临时政府，在某种政治局势下**可能**成为正在组织起来的反革命的“合法的”挡箭牌和掩蔽物。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

因此，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翼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

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三个条件。

必须在尽速开始和平谈判这样一个总的条件下，在停止惨无人道的战争的条件下来实现这一切，因为长期的战争及其所引起的财政、经济和粮食危机的后果，是使革命大船可能撞碎的暗礁。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
署名：科·斯大林◇16◇

论取消民族限制

旧俄身上有许多使它蒙受耻辱的脓疮，民族压迫就是其中的一个。宗教迫害和民族迫害，强迫“异族人”俄罗斯化，排挤民族文化机关，剥夺选举权，剥夺移动自由，挑拨各民族互相攻击,蹂躏和残杀,——这就是令人感到可耻的民族压迫。

如何摆脱民族压迫呢？

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它和政权愈接近，它掌握政权愈牢固，民族压迫就愈残酷，压迫的方式也就愈野蛮。

在旧俄，当旧的农奴主土地贵族掌握政权的时候，民族压迫非常厉害，并且往往酿成蹂躏(蹂躏犹太人)和残杀(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

在英国，土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那里早已没有这种土地贵族的独占统治了，因此，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当然，这里不包括战争时期的情况，在战争进程中，政权一转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压迫就大大加剧了(例如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在瑞士和美国，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大地主统治，那里的政权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各◇17◇民族的发展比较自由，一般说来，民族压迫几乎不存在。

这一切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土地贵族按其本身地位来说是(不能不是！)各种自由(包括民族自由)的最坚决和最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因为一般自由(包括民族自由)会破坏(不能不破坏！)土地贵族政治统治的基础。

把封建贵族赶出政治舞台，从他们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这也就等于消灭民族压迫并为民族自由创造必要的实际条件。

既然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它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即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权并确立了自由。

现在必须：

（一）把摆脱了压迫的各民族的权利规定出来；

（二）把这些权利用法律固定下来。

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产生了临时政府关于取消信教限制和民族限制的法令。

被日益发展的革命所驱使的临时政府应当在解放俄国各民族方面采取这第一个步骤，现在它已经采取了。

法令的内容归结起来大体上就是取消对非俄罗斯民族和非正教徒的下述几种公民权利的限制：（一）对定居、居住和移动的限制；（二）对取得财产权等的限制；（三）对从事各种手工业、商业等的◇18◇限制；（四）对加入股份公司及其他公司的限制；（五）对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等的限制；（六）对入学的限制；（七）在私人公司的文牍工作方面，在各种私立学校的教学工作方面，在商业簿记方面，对使用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方言的限制。

临时政府的法令就是如此。

过去一直受到怀疑的俄国各民族现在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感觉到自己是俄国的公民了。

这一切都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以为这个法令已经足以保证民族自由，以为解除民族压迫的事业已经彻底完成，那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首先，法令没有规定各民族在语言方面的平等权利。法令最后一条说，在**私人**公司的文牍工作方面，在**私立**学校的教学工作方面，有使用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权利。但是，对于那些不说俄语的非俄罗

斯民族公民聚居的区域(南高加索、土尔克斯坦、乌克兰、立陶宛等地)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这些区域将有(一定会有！)自己的议会，因而也将有“文牍工作”(决不是“私人的”！)，以及学校（不仅是“私立的”！)的“教学工作”，——这一切当然不仅要用俄语，而且也要用本地语言！临时政府是不是想把俄语宣布为国语，从而**剥夺上述区域在自己的决不是“私人的”机关中用本族语言来进行“文牍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权利**呢？显然是这样。但是除了头脑简单的人以外，谁能相信这就是“言论报”[3]和“日报”[4]的资产阶级长舌妇到处吹嘘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呢？谁不明白这就是使◇19◇各民族在语言方面权利**不**平等的事实合法化呢？

其次，谁想确立真正的民族权利平等，谁就不能只限于采用取消限制的消极办法，而应当由取消限制进而采取保证消灭民族压迫的积极方案。

因此，必须宣布：

（一)凡在经济上构成一个整体、居民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并用本族语言进行“文牍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区域都可以实行政治自治(不是联邦制！)

（二)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民族都有自决权。

这就是真正消灭民族压迫和保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实行的最高限度的民族自由的道路。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十七号
署名：科·斯大林◇20◇

二 者 必 居 其 一

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先生在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著名谈话中发挥了他的关于目前战争目的的“纲领”。读者从昨天的“真理报”[5]上可以看出，这种目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侵占君士坦丁堡，侵占阿尔明尼亚，瓜分奥地利和土耳其，侵占波斯北部。

原来俄国士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并不是为了“保卫祖国”，并不是为了“保卫自由”，像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侵占别国的土地，以满足一小撮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至少米留可夫先生是这样说的。

米留可夫先生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这些话究竟是代表谁呢？

当然不是代表俄国人民。因为俄国人民，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反对**侵占别国的土地，**反对**蹂躏各民族。俄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出的著名“宣言”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末米留可夫先生究竟代表谁的意见呢？◇21◇

也许代表整个临时政府的意见吧？

但是，昨天的“晚间报”[6]对这一点报道说：

“对于三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各报刊载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的谈话，司法部部长克伦斯基已授权司法部新闻情报局发表声明：**“谈话中关于俄国在目前战争中对外政策任务的说明，是米留可夫个人的意见，决不是临时政府的见解。”**

总之，如果相信克伦斯基，那末米留可夫先生在关于战争目的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就不是代表临时政府的意见了。

简单地说，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先生向全世界宣布目前战争的侵

略目的，不仅违反俄国人民的意志，而且也违反他所参加的临时政府的意见。

还在沙皇时代，米留可夫先生就主张部长对人民负责。我们同意他的意见，部长应向人民报告工作并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要问：现在米留可夫先生是不是还承认部长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呢？如果他还承认这个原则，那末为什么他不辞职呢？

也许克伦斯基的声明不……真实？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克伦斯基的声明不真实，那末革命的人民就应当要临时政府守规矩，迫使政府承认人民的意志。◇22◇

或者克伦斯基说的是事实，那末在临时政府中就不应当有米留可夫先生的位置，他**应当**辞职。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十八号
社论◇23◇

反 对 联 邦 制

“人民事业报”[7]第五号刊载了一篇题为“俄国——区域联盟”的短文。这篇短文恰巧是主张把俄国变成“区域联盟”，变成“联邦国家”。请看：

“让联邦的俄国接受各个区域(小俄罗斯、格鲁吉亚、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等)的主权吧……但是，它要赋予各个区域以内部的主权。让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建立一个俄国区域联盟。”

这篇短文的作者(约斯·奥库里奇)对上面这段话做了如下的解释：

“让统一的俄国军队、统一的币制、统一的对外政策、统一的最高法院建立起来吧。但是这个统一国家内的各个区域要有独立创造新生活的自由。美利坚人已经在一七七六年……用缔结盟约的办法建立了‘合众国’，难道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区域联盟吗？”

“人民事业报”是这样说的。

不能不承认这篇短文的许多地方是很有趣的,至少是新奇的。它那种庄严隆重的和那种可以说是“宣言式的”腔调(“让”，“让……吧”！)也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但是终究应该指出，整个说来，这篇短文是一种奇怪的误解，这种误解所以产生，是由于对北美◇24◇合众国(以及对瑞士和加拿大)国家制度的历史事实采取了极端轻率的态度。

这段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一七七六年的合众国不是联邦，而是直到那时还保持着独立的各殖民地或各州的邦联。就是说，本来是一些独立的殖民地，后来为了

保卫共同的利益，为了反对敌人(主要是外部敌人)，各殖民地彼此之间结成了联盟(**邦联**)，但是这些殖民地仍不失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单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个转变：和反对“集中制”、主张保持旧制度的南部各州相反，北部各州要求各州在政治上有更巩固的结合。“内战”爆发了，结果北部各州占了上风。于是美国建立了**联邦**，就是说建立了和联邦(中央)政府**分掌**政权的各个自主州的联盟。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维持很久。联邦制原来也像邦联制一样，是一种过渡办法。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两重政权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由于进一步的发展，合众国就从联邦变为有统一宪法规范的**单一的**(合为一体的)国家，各州在这种宪法规范所许可的范围内实行有限的自治(不是国家自治，而是行政上的政治自治)。对于合众国来说，“联邦”这个称号已经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变成早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陈迹。

关于该文作者同时援引的瑞士和加拿大也必须这样说。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最初也是一些独立的州(邦)，也曾为了实现各州之间更巩固的联合而进行过斗争(瑞士有各邦和宗得崩德[8]的战争，加拿大有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的斗争)，后来也由联邦变成了单一的国家。◇25◇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事实只能说明，美国以及加拿大和瑞士是从各个独立的区域，经过它们的联邦发展为单一的国家的，发展的趋势不是有利于联邦制，而是不利于联邦制。联邦制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因此而引起的经济领域的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的集中趋势所要求的国家生活形式不是联邦制，而是单一制。

当然，如果我们不打算扭转历史车轮，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种趋势。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力求在俄国实行联邦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生活本身已经注定联邦制必然要消失。

“人民事业报”主张在俄国应用一七七六年合众国的经验。但是，一七七六年的合众国和我们今天的俄国有没有相似之处，哪怕是极小的相似之处呢？

当时的合众国是各个独立的殖民地的总合，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希望至少通过邦联制来建立联系。它们的这种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俄国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呢？当然没有！谁都知道，俄国各区域(各边区)和俄国中部是由许多经济和政治的纽带**联系起来**的，并且俄国愈民主，这些纽带就愈牢固。

其次，当时为了在美国建立邦联或联邦，必须把彼此之间还没有联系的各殖民地**联合起来**。这是有利于合众国的经济发展的。但是要把俄国变成联邦，就不得不**割断**那些已经存在的、把各个区域彼◇26◇此联系起来的经济和政治的纽带，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和反动的。

最后，美国(加拿大和瑞士也一样)各州(邦)不是按照民族特征划分的，而是按照地理特征划分的。那里的州是由各个殖民小区发展而成的，和民族成分毫无关系。合众国有几十个州，但是民族集团总共只有七八个。瑞士有二十五个邦(区域)，而民族集团总共只有三个。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在俄国通常称为区域而需要实行自治的地区(乌克兰、南高加索、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等)，并不像乌拉尔或伏尔加河流域那种纯属地理上的区域，而是俄国一定的角落，那里的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和(非俄罗斯的)民族成分。正因为如此，美国或瑞士各州的自治(或联邦)不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它本来也没有追求这个目的！)，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主张俄国实行区域自治(或成立联邦)正是为了提出和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因为俄国的区域的划分是以民族特征为基础的。

一七七六年的合众国和我们今天的俄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捏造的

和荒谬的，这不是很明显吗？联邦制在俄国不会解决而且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它只能用唐·吉诃德式的挣扎来扭转历史车轮，把民族问题弄得错综复杂起来，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主张在俄国应用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经验是完全不适当的。不彻底的过渡形式——联邦制，不会满足而且不能满足民主的要求。

民族问题的解决应当是切合实际的，同样应当是根本的和彻底的，即：

(一)凡居住在俄国一定区域内而不能或不愿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民族都有分离的权利；◇27◇

(二)凡具有一定的民族成分而仍旧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可以在具有统一宪法规范的统一的(合为一体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

关于俄国各个区域的问题，应当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来解决。①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九号
署名：科·斯大林

---

① **著者注**

本文反映了当时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对国家联邦制度的否定态度。这种对国家联邦制度的否定态度，在列宁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致邵武勉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列宁在这封信中说：“我们无条件地拥护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联邦制……我们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因为它削弱经济联系，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合适的型式。你愿意分离吗？如果你能割断经济联系，或者说得确切些，如果‘共处’所引起的压迫和纷争竟能损害和毁坏经济联系的事业，那末你就滚吧。你不愿意分离吗？那末对不起，请不要代我做决定，不要以为你有‘权利’建立联邦。”（见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四五三页）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七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9]所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完全没有提到国◇28◇家联邦制度的问题。决议谈到民族分离权，谈到在统一的(单一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谈到颁布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根本法，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可以实行国家联邦制度的问题。在列宁的“国家和革命”(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书中，党以列宁为代表第一次在承认联邦制可以作为“向集中制共和国”过渡的一种形式方面跨进了一大步，但承认的同时又附有许多重要的附带条件。

列宁在这本书中说：“恩格斯也和马克思一样，是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他把联邦共和国或者看做例外情形和发展的障碍，或者看做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看做在一定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在这些特殊条件中突出的是民族问题……甚至在英国，在这个无论从地理条件、共同的语言或数百年的历史方面看来都似乎已经把国内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解决了’的国家，恩格斯也估计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消失，因此，他承认联邦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统一的、集中制的民主共和国而进行最坚决的宣传和斗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一八页至第四一九页）

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党才明确而肯定地采取了国家联邦制的观点，把国家联邦制作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的方案提出来。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由列宁起草经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著名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第一次反映了这个观点。在这个宣言中说：“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29◇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五页）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10]正式确定了这个观点。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在这个党纲中说：“党主张按照苏维埃型式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见“俄国共产党党纲”）

这就是党从否定联邦制到承认联邦制，承认它是“各民族劳动人民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民族问题提纲”[11]）所经历的道路。

我们党在国家联邦制问题上的观点的这种演变应由下面三个原因来说明：

第一、到十月革命时俄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处于完全分离和彼此完全隔绝的状态，因此，联邦制是使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由分散趋于接近，趋于联合的前进一步。

第二、在苏维埃建设进程中确立起来的联邦形式本身，远不像从前所想象的和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在经济上接近起来的目的有那样大的抵触，甚至像后来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联邦形式和这些目的完全不相抵触。

第三、民族运动所占的比重，比从前，比战前时期或十月革命以前时期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各民族联合的方法也要复杂得多。

约·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30◇

两 个 决 议

两个决议：第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二个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车辆制造厂机械工段四百名工人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支持所谓“自由公债”。

第二个决议表示反对。

第一个决议毫无批判地把“自由公债”看做名副其实的“自由公债”，看做**有利于自由**的公债。

第二个决议认定“自由公债”是**反对自由**的公债，因为它“发行的目的是继续进行仅仅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相残杀的战争”。

第一个决议的产生是由于那些张皇失措的人们发生了疑问：军队的供应怎么办，不支持公债是否会使军队的供应受到损害。

第二个决议没有这种疑问，因为它看到了出路：它“承认要供应军队一切必需品就必须有钱，同时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指出，这笔钱应该取自那些发动这次战争、继续这次战争并利用这种杀人的狂热来攫取巨额利润的资产阶级的私囊”。◇31◇

第一个决议的起草人大概满意了，因为要知道他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第二个决议的起草人提出抗议，认为第一个决议的起草人用这种态度对待无产阶级事业是“背叛国际”。

真是一针见血！

对于旨在反对自由的“自由公债”，一个是拥护，一个是反对。

——哪一个对呢？——工人同志们，你们来判断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真理报”第二十九号
署名：科·斯大林◇32◇

给 农 民 土 地

梁赞省农民向盛加略夫部长声明说，他们将耕种地主荒废的土地，不管地主是否同意。农民声明说，地主荒废土地是一种有害的行为，立即耕种荒废的土地不仅是保证后方居民粮食供应而且也是保证前方军队粮食供应的唯一方法。

盛加略夫部长对农民声明的回答(见他的电报[12])是断然禁止农民自行耕种荒废的土地，说农民的这种行为是“越轨行动”，并要农民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说立宪会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因为立宪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因为立宪会议的召开被盛加略夫先生所参加的临时政府延期了，所以**实际上**土地仍然要荒废下去，地主仍然**占有**土地，农民仍然**没有**土地，而俄国，而工人、农民和士兵仍然没有足够的粮食。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地主不吃亏，即使俄国陷入饥饿的魔掌也在所不惜。

盛加略夫部长所参加的临时政府的回答就是如此。

我们对这种回答并不感到惊奇。厂主和地主的政府不会不这样对待农民：只要地主无恙，哪管◇33◇农民死活！

因此，我们号召农民，号召全俄国所有的贫农：把自己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它向前推进。

我们号召他们组织到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乡的、县的等等)里，通过这些委员会把地主的土地夺取过来，有组织地自行耕种这些土地。

我们号召他们立刻做这件事情，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不要理会阻碍革命前进的部长们的反动禁令。

有人对我们说，立即夺取地主土地会破坏革命的“统一”，使社会上的“进步阶层”离开革命。但是，如果以为不同厂主和地主争吵就能把革命向前推进，那就太幼稚了。

难道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使厂主及其同伙“离开”革命吗？谁敢断言因为改善了工人的状况，缩短了工作日，革命就受到了损失呢？

农民自行耕种地主的土地并夺取这些土地无疑会使地主及其同伙“离开”革命。但是，谁敢说我们把千百万贫农团结在革命周围就是削弱革命的力量呢？

凡是愿意对革命进程起作用的人都应当彻底认清：

（一）工人和因战争而穿上军衣的贫农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扩大，那些口头上进步而实际上反动的所谓“进步分子”必然会“离开”革命。

如果要阻挠这种从革命中清除无用“分子”的有益过程，那就是反动的空想。◇34◇

等待和拖延到立宪会议再作处理的政策，民粹派分子、劳动团分子和孟什维克所推行的“暂时”不没收土地的政策，在各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千万不要得罪人！)和可耻的裹足不前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

俄国革命的胜利进军，一定会把这种政策当做多余的废物扫开，因为这种政策只是合乎革命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三十二号
社论
署名：科·斯大林◇35◇

五　一

自从交战国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把世界拖入血腥屠杀以来，已经快要三年了。

自从昨天还是同胞兄弟而今天已经穿上军衣的世界各国工人像敌人似地分兵对垒，自相残杀，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以来，已经快要三年了。

各国人民被大批屠杀，广大群众陷于破产和贫困，从前繁荣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无数的人忍饥挨饿，过着野兽般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一小撮在朝在野的强盗去掠夺别人的土地和攫取暴利)，——这就是目前战争所导致的结果。

世界已经被战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欧洲人民感到窒息，他们已经抬起头来反对好战的资产阶级了。

俄国革命最先把那堵使工人彼此隔开的墙壁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普遍沉醉于“爱国”狂热的时候，俄国工人最先提出了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俄国革命的霹雳声中，西方工人也从沉眠中惊醒。德国的罢工和示威，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游行，各中立国的罢工和群众大会，英法两国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前线群众性的联欢，——这就是社◇36◇会主义革命日益迫近的先声。

而我们今天的节日——五一节，难道不是各国人民新的兄弟关系在血泊中锻炼成长的象征吗？

资本家强盗脚下的土地燃烧起来了，因为国际的红旗又在欧洲的上空飘扬起来了。

就让今天这个日子，这个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向全世界工人友爱地伸出手来的五一节的日子，成为新的革命国际诞生的保证吧！

让今天在彼得格勒广场上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飞扬全世界，把世界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吧！

我们要越过资本家强盗，越过他们的强盗政府，向世界各国工人伸出手来，高呼：

五一万岁！

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三十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37◇

论 临 时 政 府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一日〕在
瓦西里岛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在革命进程中国内产生了两个政权：六三杜马选出的临时政府和工人、士兵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化，它们原来的合作正在破裂，如果我们抹杀这个事实，那就是犯罪。

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两个政权的问题，他们首先提议选择：**或者**是临时政府，**或者**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果我们对这个明白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那是不体面的。工人和士兵应当明确肯定地说：他们究竟认为哪一个是自己的政府，临时政府还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有人说要信任临时政府，说这种信任是必要的。但是，既然政府自己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上都不信任人民，那末，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政府呢？现在战争正在进行。这个战争是根据沙皇背着人民和英法两国签订的条约而进行的，临时政府未经人民同意就把这些条约当做圣旨来奉行。人民有权◇38◇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工人和士兵有权知道为什么要流血。工人和士兵要求公布条约，临时政府是怎样回答的呢？

——声明条约仍旧有效。

可是条约仍然没有公布，而且不打算公布！

临时政府对人民隐瞒了战争的真正目的，而隐瞒这些目的就是坚决不信任人民，这不是很明显吗？既然临时政府自己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上都不信任工人和农民，工人和农民又怎么能够信任临时政府呢？

有人说要支持临时政府，说这种支持是必要的。但是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革命时代是否可以支持一个从它一成立起就阻碍革命发展的政府呢？过去的情形一直是这样：革命的创举和民主的措施都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提出的，而且仅仅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提出的。临时政府总是固执己见，顽强抗拒，只是在后来才同意苏维埃的意见，而且这种同意也不过是部分的和口头上的，实际上仍然加以阻挠。现在的情形还是这样。怎么能够在革命高涨时支持一个妨碍革命前进并把革命拉向后退的政府呢？叫临时政府不要妨碍工兵代表苏维埃使国家进一步民主化，——这样提出问题不是更好吗？

国内反革命势力正在动员起来。他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在农民和小市民中进行鼓动。反革命的鼓动首先是反对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鼓动是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为掩护的。而临时政府公然纵容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攻击。试问，究竟为什么要支持临时政府呢？难道因为它纵容反革命的鼓◇39◇动吗？！

俄国到处掀起了土地运动。农民都在设法自行耕种地主所荒废的土地。不这样，全国就会濒于饥饿。针对着农民的要求，全俄苏维埃会议[13]决定“支持”农民的这种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而临时政府现在做了些什么呢？它宣布农民运动是“越轨行动”，禁止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并给自己的专员发出“相应的”命令（见四月十七日“言论报”）。试问，究竟为什么要支持临时政府呢？难道因为它向农民宣战吗？

有人说，不信任临时政府就会破坏革命的统一，就会使资本家和地主离开革命。但是谁敢说资本家和地主实际上是在支持或能够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呢？

难道工兵代表苏维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使资本家离开自己，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革命周围吗？谁敢断言一小撮厂主的值得怀疑的友谊比数百万工人用血结成的真正友谊对革命更可贵呢？其次，难

道全俄苏维埃会议决定支持农民没有使地主离开自己，把农民群众和革命结合起来吗？谁敢说一小撮地主的值得怀疑的友谊比现在穿上军衣的千百万贫农的真正友谊对革命更可贵呢？革命不能使人人满意。它总是一方面满足了劳动群众，另一方面打击了劳动群众的暗藏的和公开的敌人。

因此，这里必须选择：或者和工人、贫农一起**拥护**革命，或者和资本家、地主一起**反对**革命。

那末，我们究竟支持谁呢？◇40◇

我们可以把哪一个当做自己的政府，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是临时政府？显然，工人和士兵只能支持他们自己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士兵真理报”第六号
署名：科·斯大林◇41◇

关于玛丽亚宫的会议

资产阶级报刊上已经出现了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举行联席会议的报道。这个报道总的说来是不……正确的，某些地方简直是歪曲事实，把读者引入迷途。至于资产阶级报刊所特有的那种报道作风，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必须把会议的真相恢复过来。

会议的目的在于弄清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因为米留可夫部长的照会[14]使它们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了。

李沃夫总理宣布开会。他的开幕词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直到最近为止全国都信任临时政府，事情也进行得令人满意。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没有这种信任了，甚至出现了对抗行为。近两周来，当有名的社会主义人士在报刊上开始攻击临时政府的时候，令人更加有这种感觉。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需要工兵代表苏维埃方面的坚决的支持。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然后是各部(军事、农业、交通、财政、外交)部长做“报告”，其中讲得最肯定的是古契柯夫、盛加略夫和米留可夫。其余几个部长的演说只是重复前三人的结论而已。

古契柯夫部长的演说总起来说是论证对我国革命所持的一种有名的帝国主义观点，根据这个观◇42◇点，应当把俄国革命看做“作战到底”的工具。他说：我曾经深信俄国所以需要变革是为了避免失败。我曾经希望革命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胜利因素，并且我相信革命一定能把这种因素创造出来。广义的护国主义，即不仅为了现在而且为了将来的护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近几周来发生了许多坏

现象……“祖国在危急中”…… 主要的原因在于某些社会主义人士所鼓吹的“和平主义思想的泛滥”。部长明显地暗示，这种鼓吹应当制止，纪律应当整顿，在这方面需要执行委员会的帮助……

盛加略夫部长描述了俄国粮食危机的景象…… 基本问题不在于照会和对外政策，而在于粮食：如果粮食问题不能解决，那我们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泥泞时期以及其他各种暂时的现象对于粮食危机的加深有不小的影响。但是盛加略夫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下面这种“可悲的现象”：农民“开始过问土地问题”，擅自耕种地主的土地，叫战俘离开地主的庄园，他们一般地都沉溺于土地的“幻想”。在盛加略夫看来，农民的这种有害的运动所以“燃起”，是由于“列宁派”进行了没收土地的鼓动，是由于“列宁派”“狂热地迷惑于党”。从“散播毒素的巢穴”“克舍辛斯卡娅宫[15]发出的有害的鼓动”应当终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信任现在的临时政府，那末农民的“过火行为”就应当终止；**或者**建立另外一种政权。

米留可夫：照会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临时政府的意见。对外政策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是否准备履行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的问题。我们是和盟国相关联的…… 人们一般都把我们当做一◇43◇种对实现某种目的是否有用的力量来看待。我们只要表现软弱，关系就会恶化…… 因此，放弃兼并政策是含有危险的…… 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请给我们信任吧，有了信任，军队就会有高昂的士气，我们就可以为了战线的统一而发动攻势，我们就可以对德国人施以压力，把他们从法国人和英国人方面吸引过来。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米留可夫最后说：你们可以看出，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在我们希望不破坏盟国对我们的信任的情况下，照会只能是这样。

这样，部长们的冗长演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国家经历着严重的危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革命运动，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制止革命和继续战争。

因此，要救国就必须：(一)压制士兵(古契柯夫)，(二)压制农民(盛加略夫)，(三)压制摘下临时政府假面具的革命工人(各部长)。请你们支持我们这一艰难的事业，请你们帮助我们进行进攻性的战争(米留可夫)，——这样做一切就会很好。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部长们是这样说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部长们的这些极端帝国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演说竟没有遭到执行委员会多数的代表策烈铁里的反驳。被部长们的尖锐提出问题所吓倒的策烈铁里，看到部长们打算辞职就慌了手脚，竟在演说中哀求他们做还可能做的让步，哀求他们颁布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照会的“说明”[16]，哪怕只是为了“内部使用”。他说，如果临时政府肯做这种其实是口头上的让步，那末“民主派将以◇44◇全力支持临时政府”。

想掩盖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决心让步，只求协议能够保持，——这就是策烈铁里的演说的基本精神。

加米涅夫发言的精神完全相反。他说，如果说国家濒于灭亡，如果说它经历着经济、粮食等等危机，那末摆脱现状的出路不在于继续战争，而在于尽速结束战争，因为继续战争只能使危机加深，只能葬送革命果实。现在的临时政府显然不能担负结束战争的任务，因为它竭力要“作战到底”。因此，出路就在于把政权交给另一个能把国家从绝境中挽救出来的阶级……

加米涅夫讲完之后，部长席上发出了喊声：“那你们就把政权拿去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四十号
署名：科·斯大林◇4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一　为捍卫列宁同志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决议案而发表的演说

（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布勃诺夫所提的问题，列宁同志的决议案也注意到了。列宁同志并不反对群众的发动和游行示威。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意见的分歧发生在监督问题上。要监督就要有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就要有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某种协议。我们有过监督，也有过协议。但是，监督起过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在米留可夫发表演说(四月十九日)以后，这种监督的虚幻性就特别明显了。

古契柯夫说：“我认为革命是更好地作战的工具，**我们要进行小小的革命以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和平主义思想深入了军队，因而无法作战。于是政府向我们说：“你们要消灭反战宣传，否则◇46◇我们就要辞职。”

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也不能照顾农民的利益，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他们向我们说：“你们要帮助我们压制农民，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米留可夫说：“必须保持战线的统一，我们必须进攻敌人，你们要鼓起士兵的斗志，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有人向我们提议实行监督。这是很可笑的！

最初拟定纲领的是代表苏维埃，而现在拟定纲领的却是临时政府了。苏维埃和政府在危机发生(米留可夫演说)后的第二天所缔结的联盟，意味着苏维埃跟着政府走了。政府在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在退却。在这种情形下谈苏维埃监督政府的问题，等于讲空话。所以，我提议不采纳布勃诺夫关于监督问题的修正案。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民族问题本来应当做一个详尽的报告，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好把报告压缩一下。

在谈到决议草案之前，必须确定几个前提。

民族压迫是什么？民族压迫就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一套办法，就是他们用◇47◇强力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这一切总括起来就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那一政策的轮廓。

第一个问题：一个政权是依靠哪些阶级来实行它的民族压迫政策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压迫方式，为什么某一国家的民族压迫比别一国家的民族压迫要沉重和粗暴。例如在英国和奥匈帝国，民族压迫从来没有采取过蹂躏的方式，它所采取的方式是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权利。但是在俄国，民族压迫往往采取蹂躏和残杀的方式。而在某些国家则根本没有对付少数民族的特殊办法。例如在瑞士就没有民族压迫，那里自由地居住着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

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对民族有不同的态度呢？

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同。从前，当旧的土地贵族掌握俄国国家政权的时候，民族压迫会采取而且实际上采取了残杀和蹂躏的野

蛮方式。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英国，民族压迫没有那么粗暴。至于瑞士，因为它是近于民主社会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各民族都有相当充分的自由。一句话，国家愈民主，民族压迫就愈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既然我们认为民主和掌握政权的一定的阶级有关，那末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说：旧的土地贵族愈接近政权，像旧的沙皇制度的俄国那样，民族压迫就愈残酷，其方式也就愈野蛮。

但是，支持民族压迫的不仅有土地贵族。除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力量——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48◇把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国内部，因而成了土地贵族的天然同盟者。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他们也分享掠夺的果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土地贵族和财政贵族为首的、包括各种支持民族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合唱队。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扫净地基，把这个合唱队从政治舞台上清扫出去。（宣读决议案）

第一个问题：怎样安排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生活？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这样回答：应当使俄国国内各被压迫民族有权利自己决定，愿意留在俄罗斯国家内还是愿意分离为独立的国家。现在我们面前摆着芬兰人民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实际冲突。芬兰人民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要求临时政府把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以前所享有的权利归还他们。临时政府拒绝这个要求，不承认芬兰人民有自主权。我们应当站在哪一方面呢？显然应当站在芬兰人民方面，因为承认把任何一个民族强留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也就把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提到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高度。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承认芬兰人民有表示其分离意志的权利和实现这种意志的权利，那我们就会变成沙皇制度的政策的继承人。

决不容许把民族**有权利**自由分离的问题和某一民族在某一时期是

否**一定要**实行分离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截然有别地加以解决。我们承认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权利，有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解决了◇49◇某个民族在目前是否**应当**和俄罗斯国家分离的问题。我可以承认某一民族有分离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我一定要它这样做。一个民族有分离的权利，但是根据具体条件它也可以不行使这种权利。而我们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来鼓动赞成分离或反对分离的自由。总之，分离的问题在每个不同的场合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以解决，正因为如此，不应当把承认分离权的问题和在某些条件下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说，从南高加索和俄国的共同发展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些条件等等着想，我个人是反对南高加索分离的。但是，如果南高加索各民族仍旧要求分离，那末它们当然可以分离，而且它们是不会遭到我们的反对的。(继续宣读决议案)

其次，对于那些愿意留在俄罗斯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如果说各民族过去不信任俄罗斯，那末这种不信任首先是由沙皇制度的政策培植的。既然沙皇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它的压迫政策已经不存在了，那末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就必然减弱，对它的向心力就必然增长。我认为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十分之九的民族是不愿意分离的。所以党主张，凡是不愿意分离而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区域，如南高加索、土尔克斯坦、乌克兰等，都可以实行区域自治。这种自治区域的边界应当由当地居民根据经济、生活习惯等条件来自行决定。和区域自治相对峙的有另外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崩得[17]而首先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在很早以前就推荐的，他们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原则。我认为这个方案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接受的。它的实质是：俄国应当成为民族联盟，而民族应当成为个人联盟，不管这些个人居住在国内哪一个地◇50◇区，都应当凑成统一的共同体。所有俄罗斯

人，所有阿尔明尼亚人等，不分地域，都组织在自己的特别的民族联盟中，然后加入全俄国的民族联盟。这个方案是极端不适宜和不妥当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驱散了整批整批的人，使他们离开本民族而散居在俄国的各个角落。在经济条件所造成的民族散居的情形下，硬把各该民族的各个人凑在一起就是用人工方法来组织民族，建立民族。而用人工方法把人们凑成民族，就是陷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崩得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赞同的。这个方案在一九一二年我们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被否决，而且除了崩得以外，它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一般是不受欢迎的。这个方案又叫做文化自治，因为它从和民族有利害关系的各种问题中分出了一类文化问题，并把这种问题交给民族联盟去处理。这种分法的出发点是认为文化可以把民族联合成统一的整体。这个方案认为在民族内部一方面有分裂民族的利益，例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有把民族结成一个整体的利益，文化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

最后，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权利应当给以特别保护。因此，党要求在学校、宗教等问题上给少数民族以完全平等的权利，取消对他们的任何限制。

第九条规定了各民族权利平等。但是实现这一条所必需的条件只有到整个社会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具备。

我们还应当解决如何把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组成一个共同政党的问题。有一种方案主张按民族来组织工人，就是说，有几个民族就有几个政党。这个方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了。实践表明，把◇51◇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

总之，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条：

(甲)承认各民族有分离权；

(乙)留在同一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

(丙)为少数民族制定特别的法律以保障它们的自由发展；

(丁)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三　关于民族问题的结论

(四月二十九日)

两个决议案大体上是一致的。除了“承认分离权”一条外，皮达可夫照抄了我们决议案中的一切条文。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否认各民族有分离权，那末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或者我们不否认这一权利。现在芬兰正在进行保障民族自由的运动，而临时政府正在反对这个运动。这就产生了支持谁的问题。或者我们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把芬兰强留在俄国，把它的权利减到最低限◇52◇度，那末我们就成了兼并主义者，因为我们帮助了临时政府；或者我们支持芬兰的独立。这里应当肯定地表明支持前者还是后者，只限于承认权利是不行的。

爱尔兰正在进行争取独立的运动。同志们，我们支持谁呢？或者我们支持爱尔兰，或者我们支持英帝国主义。请问，我们支持那些反对压迫的人民呢，还是支持那些压迫他们的阶级？我们说，社会民主党既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应当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支持奋起反抗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建立后方：那末我们就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那末我们就真正采取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或者我们不这样做，那末我们就要陷于孤立，那末我们就放弃了利用被压迫民族内部一切革命运动以消灭帝国主义的策略。

我们应当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否则芬兰工人会对我们说什么呢？皮达可夫和捷尔任斯基对我们说，任何民族运动都是反动的运动。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难道爱尔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运动不是一种打击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吗？难道我们不应当支持这个运动吗？……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一书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53◇

革 命 的 落 伍 者

革命正在前进。它不断地深入和扩大，由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使国家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从下到上革命化。

革命一侵入工业领域，就提出了工人监督和调整生产的问题(顿巴斯)。

革命一蔓延到农业领域，就推动了农民去集体耕种荒废的土地，就提出了供给农民以农具和牲畜的要求(什吕谢尔堡县)[18]。

革命揭露了战争的痈疽和在战争条件下造成的经济破坏，它一冲进分配领域，就提出了一方面供给城市以粮食(粮食危机)和另一方面供给乡村以工业品(商品危机)的问题。

要解决诸如此类的业已成熟的问题，就要求革命群众发挥最大的主动性，就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积极参与建设新生活的事业，最后，就要求把全部政权交给能把国家引上革命大道的新阶级。

各地的革命群众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某些地方的革命组织已经夺到了政权(乌拉尔、什吕谢尔堡)，并没有理睬所谓“公安委员会”。

但是，负有领导革命的使命的彼得格勒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却一筹莫展，裹足不前，落后于群◇54◇众并脱离了群众，它竟以参加临时政府的“人选”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来代替夺取全部政权的根本问题。执行委员会既然落后于群众，也就落后于革命，阻碍了革命的进展。

在我们面前摆着执行委员会的两个文件：“前线工人代表手册”(这些代表是带着慰问品去慰问士兵的)和“告前线士兵书”。怎么样

呢？这两个文件说明了什么呢？它们也说明了执行委员会的落后，因为执行委员会在这两个文件中对目前最重要的问题给了极可恶的和极反革命的回答！

战 争 问 题

当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对割地和赔款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当临时政府编造了“照会”、执行委员会竟以“胜利者”自居、而侵略战争依旧继续进行的时候，战壕中的生活，士兵们的实际生活提出了新的斗争手段——群众性的联欢。毫无疑问，联欢本身不过是一种渴望和平的自发形式。但是，有组织有意识地举行的联欢能够变为工人阶级使各交战国家内部形势革命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而执行委员会对待联欢的态度怎样呢？

请听：

“士兵同志们！你们靠联欢是得不到和平的……要你们相信通过联欢可以得到和平的人正在把你们引向毁灭，把俄国的自由引向毁灭。不要相信他们。”（见“告士兵书”）

执行委员会不但不支持士兵的联欢，反而建议士兵“不要拒绝战局可能要求采取的进攻行动”◇55◇（见“告士兵书”）。原来问题在于：防御、“防卫就政治意义来说决不排斥战略进攻，决不排斥占领新地区等等。为了防卫……发动进攻和占领新阵地是完全必要的”（见“手册”）。

简单地说，为了取得和平,必须发动进攻和侵占别国的“地区”。

这就是执行委员会的论调。

但是，执行委员会的这种帝国主义的论调和阿列克谢也夫将军的、宣布前线联欢是“叛变”并命令士兵“对敌人进行无情斗争”的那个反革命的“命令”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这种论调和米留可夫在玛丽亚宫的会议上所发表的、要求士兵为了“战线的统一”采取“进攻行动”和遵守纪律的那个反革命的演说有什么区别呢？……

土 地 问 题

大家都知道农民和临时政府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农民要求立即耕种地主荒废的土地，认为这一措施不仅是保证后方居民粮食供应而且是保证前方军队粮食供应的唯一方法。临时政府对这个要求的回答是向农民宣布决战，宣布土地运动为非“法”，并且派遣专员分赴各地以保护地主的利益，使之免受“越轨”农民的“侵害”。临时政府要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没收土地，说立宪会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样呢？它支持谁呢，支持农民还是支持临时政府？◇56◇

“革命民主派在**未来**的立宪会议中将最坚决地坚持……无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 而在**目前**，鉴于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能引起……国内严重的经济动荡……所以革命民主派警告农民干万不要擅自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农民骚动不会对农民有利，而会对反革命有利”，因此，建议“在立宪会议做出决定之前不要擅自夺取地主的财产”（见“手册”）。

执行委员会是这样说的。

可见执行委员会不是在支持农民，而是在支持临时政府。

执行委员会采取这种立扬，就等于支持盛加略夫的“压制农民！”这一反革命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一般说来，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土地运动成了“农民骚动”，而“擅自解决”问题成了不能容许的呢？苏维埃，包括彼得格勒苏维埃

在内，不是“擅自”成立的组织又是什么呢？执行委员会是不是以为“擅自”成立组织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呢？

执行委员会以擅自耕种地主土地会引起“粮食恐慌”来恫吓。但是，请看“擅自”成立的什吕谢尔堡县革命委员会为使居民能有更多的粮食而做的决定吧：

“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以应当前的急需，决定由村社耕种原属教堂、寺院、从前的皇族以及私有主的闲置的土地。”◇57◇

执行委员会能拿什么来反对这个“擅自”做出的决定呢？

它除了套用盛加略夫先生指令中的一些空洞词句，如“越轨行动”、“农民骚动”、“擅自解决问题”等等以外，还能拿什么来对抗这一英明的决定呢？

执行委员会已经落后于地方的革命运动，它一落后就和这个运动发生了抵触，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展开了一幅新的图画。革命正在扩大和深入，它不断蔓延到新的领域，侵入工业、农业和分配的领域，提出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走在运动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说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末现在它开始落后了。同时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竭力要**停留**在已经达到的一点上。

但是，在革命时期是不可能停留在一点上的，只能经常地运动——前进或者后退。因此，凡是在革命时期力求停止不动的人都必然要落后，而凡是落后的人都不会得到宽恕：革命一定会把他推到反革命阵营里去。

载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
“真理报”第四十八号
署名：科·斯大林◇58◇

我们期待于代表会议的是什么？

我们党是全俄国——从彼得格勒到高加索，从里加到西伯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盟。

建立这个联盟是为了帮助劳动者对富人，对厂主和地主进行胜利的斗争，争取美好的命运，争取社会主义。

但是，只有当我们党统一和团结、同心同意、在俄国各地都步调一致的时候，这种斗争才能获得胜利。

可是，怎样才能达到党的统一和团结呢？

实现这个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让俄国各地觉悟工人的代表聚集一堂，共同讨论我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取得一个共同的意见，然后分头回去，深入到人民中，引导他们循着一条共同的道路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样的会议就叫做代表会议。

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都曾经焦急地等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革命前我们党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它是一个被禁止的党，它的党员常被逮捕和流放去服苦役。因◇59◇此，当时它是适应地下工作的情况组织起来的，它是“秘密的”党。

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革命带来了自由，地下状态消失了，因此，党应当公开，它应当按照新的方式组织起来。

我们面前摆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正在夺去并将继续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战争使数百万家庭破产。它给城市带来了饥饿和贫困。它使乡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战争仅仅有利于那些靠公家定货发财的

富人。战争仅仅有利于那些掠夺别国人民的政府。目前的战争就是为了这种掠夺而进行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对待战争，停止战争还是继续战争？把绞索继续往脖子上套还是把它完全割断？

代表会议本来应当回答这个问题。

其次，俄国，它的后方和前线，都面临着饥荒。如果不马上耕种一切“闲置的”土地，那末饥荒还会加倍严重。可是地主让土地荒废，不去耕种，而临时政府又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耕种这些土地……该怎样对待这个千方百计支持地主的临时政府呢？该怎样对待地主本人呢？把土地留给他们还是把土地转归人民所有？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本来应当给以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的回答才能使党达到统一和团结。

只有团结一致的党才能引导人民走向胜利。◇60◇

代表会议是否实现了我们的期望呢？

它是否给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呢？……让同志们研究一下本报第十三号附刊[19]所登载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
“士兵真理报”第十六号
社论
署名：科·斯大林◇61◇

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20]

区杜马的选举就要来到。候选人名单已经通过和公布。选举运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

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党派”：真的和假的，旧的和新的，严肃的和儿戏的。有立宪民主党，也有“诚实负责公正党”；有“统一派”和崩得，也有“比立宪民主党稍左的党”；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也有各种“非党的”和“超党的”集团。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最初的几次竞选大会就已经表明，运动的中心问题不是地方自治机关“改革”本身，而是国内总的政治形势。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不过是各种基本政纲藉以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一块画布罢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当战争已经使国家面临破坏的深渊，当多数人民的利益要求对国家全部经济生活进行革命的干涉，而临时政府显然不能把国家引出绝境的时候，一切地方问题，包括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在内，只有同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总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和得到解决。如果不这样同总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就会变成关于盥洗器镀锡和“建造好厕所”(见孟什维克护国派纲领)一类的空谈。

因此，在运动的进程中，透过许许多多党派的旗帜所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必然要突现出两条◇62◇基本的政治路线：进一步发展革命的路线和反革命的路线。

运动开展得愈加猛烈，党派之间的批评就会愈加尖锐，这两条路线就显得愈加突出，而力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的中间集团的

地位就会愈加难以维持，大家也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孟什维克中的和民粹派中的护国派实际上是在阻挠革命，促进反革命事业。

* * *

“人民自由党”

从沙皇制度被推翻的那天起，右派各党就东奔西散了。这是因为它们照老样子存在下去已经没有好处。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它们在所谓“人民自由党”的周围，在米留可夫一伙人的党的周围聚集起来了。米留可夫党现在是最右的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这个党现在才成了纠集反革命力量的中心。

米留可夫党是主张压制农民的，因为它主张镇压土地运动。

米留可未党是主张压制工人的，因为它反对工人的“过分”要求，并且它把工人的一切重大要求都说成“过分的”。

米留可夫党是主张压制士兵的，因为它主张“铁的纪律”，即主张恢复指挥人员对士兵的统治。

米留可夫党主张进行使国家遭到破坏和破产的掠夺战争。◇63◇

米留可夫党主张采取“坚决办法”来反对革命，它“坚决”反对人民的自由，虽然它自命为“人民自由党”。

能不能希望这样的党为了贫苦居民阶层的利益来改进市政建设呢？

能不能把城市的命运托付给它呢？

永远不能！无论如何不能！

我们的口号是：绝对不信任米留可夫党，一票也不投给“人民自由党”！

* *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我们党和立宪民主党完全相反。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的资产者和地主的党。我们党是城市和乡村革命工人的党。这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党，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尽人皆知的。我们的道路是明确的。

我们反对目前的战争，因为它是掠夺的侵略的战争。

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普遍的和民主的和平，因为这样的和平是摆脱经济破坏和粮食恐慌的最可靠的出路。

有人抱怨城市中粮食不够。但是粮食所以没有，是由于劳动力“被驱入了”战争，播种面积因缺◇64◇少劳动力而缩小了。粮食所以没有，是由于铁路忙于为战争服务，甚至连现有的存粮也无法运来。停止战争就会有粮食。

有人抱怨农村中商品不够。但是商品所以没有，是由于很大一部分工厂在为战争服务。停止战争就会有商品。

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它号召进攻，延长战争，使破坏和饥荒更加严重。

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它保护资本家的利润，破坏工人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革命干涉的事业。

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它妨碍农民委员会处理地主的土地，破坏从地主统治下解放农村的事业。

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它从调走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来开始它的“事业”，现在又要调走革命工人(疏散彼得格勒！)，使革命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因为它根本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

我们主张把全部政权交给革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

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结束旷日持久的掠夺战争。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控制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把革命向前推进，把国家从彻底的破坏中挽救出来。

最后，我们反对恢复警察，反对恢复旧时那种脱离人民、服从上级委派的“官吏”的可恨的警察。◇65◇

我们主张建立普遍的、由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的民警，因为只有这样的民警才能成为人民利益的保护者。

我们最近的要求就是如此。

我们肯定地说，不实现这些要求，不为这些要求而斗争，任何重大的地方自治机关改革，任何市政建设的民主化都是不可能的。

谁想保证居民有粮食，谁想消除房荒，谁想把城市的捐税仅仅加在富人身上，谁力求使所有这些改革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实现，谁就应当投票选举那些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地主资本家政府、反对恢复警察、主张实现民主的和平、主张把政权交给人民自己、主张建立全民的民警、主张市政建设真正民主化的人。

不具备这些条件，“根本的地方自治机关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 * *

护国派联盟

在立宪民主党和我们党之间有许多正在从革命方面向反革命方面动摇的中间派别。“统一派”、崩得、孟什维克中的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护国派、劳动团分子[21]、人民“社会主义者”[22]就是这样的派别。他们在某些区是单独提名的，在另外一些区则彼此联合起来，提出共同的名单。他们联合起◇66◇来反对谁呢？口头上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们的联盟毫无原则性。比如说，在激进资

产阶级的劳动团同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孟什维克护国派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鼓吹战到最后胜利的劳动团分子从什么时候起成了自命为“不容忍战争”的“齐美尔瓦尔得主义者”的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战友呢？再看普列汉诺夫(就是那个还在沙皇时代就已经卷起国际的旗帜，确定无疑地站到别人的旗帜即帝国主义的黄色旗帜之下的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试问在这个顽固的沙文主义者和那个孟什维克护国派代表会议的名誉主席，“齐美尔瓦尔得主义者”策烈铁里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普列汉诺夫号召支持沙皇政府对德国进行战争，而“齐美尔瓦尔得主义者”策烈铁里因此“攻击”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难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统一派”和“工人报”[23]之间的论战正酣，而这两位先生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已经开始“联欢”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只能组成一个偶然的和无原则的联盟，因为他们组织这个联盟不是本着什么原则，而是由于害怕失败，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次，惹人注意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喀山和斯巴斯这两个区(见“候选人名单”)，“统一派”、崩得以及孟什维克中的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护国派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名单，而这两个区(仅仅这两个区)的区工兵代表苏维埃却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可见我们那些勇敢的联盟分子因为怕落选，而宁愿躲在区苏维埃的背后，决定利用后者的威信。可笑的是这些以自己的“责◇67◇任心”自傲的高贵的绅士们竟没有勇气公开出场，——他们宁愿怯懦地逃避“责任”……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结成联盟呢？

那就是他们都同样没有信心，但又依依不舍地追随着立宪民主党人的脚步，他们都同样肯定地不大喜欢我们党。

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都拥护战争，但并不是为了侵略（老

天在上！),而是为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和平而战……

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都拥护“铁的纪律”，但并不是为了压制士兵(当然不是！)，而是为了……士兵本身的利益。

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都拥护进攻，但并不是为了英法银行家(老天在上！)，而是为了……“我们的年轻的自由”。

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都反对“工人那种夺取工厂的无政府主义意图”(见五月二十一日“工人报”)，但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不把资本家从革命中吓跑，也就是说为了革命。

总之，他们都拥护革命，不过仅仅(仅仅！)是当革命在资本家和地主看来并不可怕，革命同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并不抵触的时候，他们才拥护革命。

简单地说，他们都拥护立宪民主党人也拥护的那些实际步骤，不过加上了一些“自由”、“革命”◇68◇等等的附带条件和漂亮字眼。

因为语句和漂亮字眼毕竟是口头上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实行的还是立宪民主党的那条路线。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词句不过是掩盖他们的立宪民主党的实质罢了。

正因为如此，他们组织这个联盟不是为了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为了反对革命的工人，反对我们党同“区联派”[24]和革命的孟什维克所结成的联盟。

既然如此，可不可以指望这些几乎和立宪民主党人完全相同的绅士们能够改进和改造混乱不堪的市政建设呢？

既然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损害贫苦居民阶层的利益，支持掠夺战争，支持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那怎么能够把这一居民阶层的命运托付给他们呢？

为了使市政建设民主化，保证居民得到粮食和住宅，免除贫民的城市捐税并把一切捐税负担移到有产者身上，必须摈弃妥协政策，控制资本家和房主的利润……　护国派联盟的温和的绅士们既然害怕触

怒资产阶级，也就不能采取这样的革命步骤，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在目前的彼得格勒杜马中有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市政派”，它主要是由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和孟什维克组成的。它组织了一个“财政委员会”来制定整顿市政建设的“紧急办法”。结果怎样呢？结果这些“革新者”认为，为了使市政建设民主化必须(一)“**增加**水费”，(二)“**增加**电车票价”。“关于士兵坐电车买票的问题，决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商议”（见“新生活报”[25]第二十六号）。委员会的委员◇69◇们大概有向士兵收费的打算，但是在没有取得士兵同意之前他们不敢这样做。

这些可敬的委员们不但不取消贫民的捐税，反而决定增加捐税，甚至对士兵也不怜悯！

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中和孟什维克中的护国派的市政实践的范例。

花言巧语和冠冕堂皇的“市政纲领”是掩盖护国派那种可怜的市政实践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

他们愈是巧妙地用“自由”和“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对他们的斗争就应当愈加坚决和无情。

摘下护国派联盟的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揭露它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实质，——这就是目前运动的迫切任务之一。

决不要支持护国派联盟，决不要信任这个联盟中的先生们！

工人们应当明白，谁不拥护工人，谁就是反对工人，护国派联盟不拥护工人，因而就是反对工人。

* * *

“无党无派”

在已经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中，立场最不

明确的就是无党无派集团。这种无党无派集团为数不少，整整有一大堆，几乎有三十个。其中真是什么人都有！“住宅联合委员会”和“教养机关职员集团”、“无党无派实业界集团”和“党外选民集团”、“住宅管理集团”和“房东协◇70◇会”、“超党共和派”和“妇女平等同盟”、“工程师联合会集团”和“工商业联合会”、“诚实负责公正派”和“民主建设派”、“自由和秩序派”等等集团，——混乱不堪的无党无派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就是如此。

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呢？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工业家、房主、“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

他们没有原则性的纲领。选民也就无从知道这些请市民选举他们的集团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没有市政纲领。选民也就无从知道他们要在市政建设方面进行哪些改革，投票选举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他们没有自己的过去，因为他们过去根本不存在。

他们也没有将来，因为他们在选举之后就会像来年的雪一样消失掉。

他们仅仅在选举的日子里出现，仅仅在选举的时候存在；他们想方设法要钻进区杜马，钻进之后就什么也不管了。

这是害怕光明和真理的没有纲领的资产阶级集团，他们竭力用走私的办法把自己的候选人塞进区杜马。

他们的目的是卑鄙龌龊的。他们的道路是黑暗的。

这些集团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71◇

从前，在沙皇时代，无党无派集团的存在还可以理解，当时的党派——**左的**党派受到“法律”的残酷制裁，当时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捕和迫害不得不以无党无派人士的面目出现，当时无党无派成了对付沙皇法官的挡箭牌。但是现在，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条件下，当每个政党都可以公开自由活动而不会受到追究的时候，当党的明确立场和

各政党的公开斗争已成为常规和使群众受到政治教育的条件的时候，无党无派集团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们害怕什么，究竟要对谁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呢？

毫无疑问，群众中有许多选民还不了解各政党的纲领，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政治上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使他们的意识不能迅速明确起来。而无党无派和没有纲领只会使这种落后性和保守性得到巩固和合法化，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谁敢否认各政党的公开而诚实的斗争是唤醒群众和提高他们政治积极性的最重要手段呢？

再问一次：无党无派集团害怕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光明，他们究竟躲避谁呢？秘密何在呢？原来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情况下，当群众的政治觉悟性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时候，资产阶级公开出场对自己来说是极端冒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带着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政纲出场，那就一定要在群众面前遭到破产。因此，“挽救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戴上无党无派的假面具，装做像“诚实负责公正派”这种安分守己的派别。这是非常便于浑水摸鱼的。毫无疑问，在无党无派候选人名单的幌子下隐藏着立宪民主党化的和立宪◇72◇民主党型的资产者，他们害怕公开出场，力图用走私的办法钻进区杜马。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集团，所有这些无党无派集团都是而且仅仅是从资产阶级队伍中招募来的。毫无疑问，如果革命分子不给以应有的反击，他们可能把不少头脑简单而易于轻信的选民诱入他们的罗网。全部秘密就在于此！

因此，“无党无派的”危险是目前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中的真正危险之一。

因此，摘下这些先生们的无党无派的假面具，迫使他们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让群众有可能对他们做出应有的评价，——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摘下无党无派的假面具，明确肯定的政治路线万岁！——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 * *

同志们！明天就要选举了。要以整齐的队伍走向投票箱，要一致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名单。

一票也不投给和俄国革命为敌的立宪民主党人！

一票也不投给主张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护国派！

一票也不投给和你们的敌人暗中为友的“无党无派”！

载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真理报”
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和第六十六各号
署名：科·斯大林◇73◇

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部长们

昨 天 和 今 天

(革命危机)

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在离开临时政府之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恢复**纪律**，(二)宣布**进攻**，(三)**压制**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古契柯夫在玛丽亚宫的著名会议(四月二十日)上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军队正在瓦解，军队中已经毫无秩序，你们要恢复纪律，要制止和平宣传，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米留可夫在同一个会议上“报告”说：我们是和盟国相关联的，为了战线的统一，它们要求我们给以支持，你们要号召军队进攻，要压制反对战争的人，否则我们就要辞职。

这是“政权危机”时期的事情。

当时执行委员会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装出了不肯让步的样子。

后来米留可夫对自己的“照会”发表了一个“说明”，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人为此宣布了“革命民主派”的“胜利”，于是“怒火平息”了。

但“胜利”原来是假的。过了几天又宣布了“危机”，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不得不”下台了，执◇74◇行委员会和部长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会谈，结果以执行委员会的几个代表参加临时政府而“解决了危机”。

轻信的观众松了一口气。终于“战胜了”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终于就要来到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就要结束了！

结果怎样呢？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所谓“民主派”的“胜利”，还没有来得及“安葬”那些退休的部长，而新任的部长，“社会主义者”部长却说起使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感到安慰的话来了！

真是“死人抓住了活人”！

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新任军事部部长，公民克伦斯基在农民代表大会[26]上所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就已宣布他立意恢复军队中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克伦斯基签署的“士兵权利宣言”[27]给了明确的说明，宣言中说，在“战斗环境”中长官“有权使用武力……以对付不执行命令的部下”（见“宣言”第十四条）。

过去古契柯夫那样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现在克伦斯基在自由、平等、正义这些空洞的漂亮字眼的掩护下一下子就“做成”了。

究竟为了什么需要这种纪律呢？

关于这一点，策烈铁里部长已先于其他部长告诉了我们。他向邮局的职员说：“我们力求消灭战◇75◇争，但是我们所要采取的方法不是单独媾和，而是和我们的盟国共同战胜自由的敌人。”（见五月八日“交易所晚报”[28]）

如果把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关于自由的话撇开不谈，如果把这种含糊不清的官腔译成普通话，那就只能这样说：为了和平必须联合英法打败德国，而为了打败德国就必须发动进攻。

为了战线的统一，为了共同战胜德国而准备进攻，——这就是需要“铁的纪律”的原因。

过去米留可夫那样胆怯地但又毫不放松地追求的东西，现在被策烈铁里部长宣布为自己的纲领了。

这还是危机“解决”以后最初几天的事。可是后来“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加明目张胆了。

克伦斯基在五月十二日给军官、士兵和水兵下了一道“命令”：

“……你们要向着领袖和政府引导你们去的方向前进……你们要前进……履行束缚着你们的义务……你们应当按照人民的意志去肃清蹂躏祖国和世界的暴徒和侵略者。我号召你们建立这种功勋。”（见五月十四日“言论报”）

克伦斯基的命令实际上和沙皇政府的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的命令如“我们应当战到最后胜利，我们应当把狂妄的敌人赶出我们祖国国境，我们应当把世界从德国军国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等等区别很小，难道不是这样吗？

因为进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某些团队，例如第七集团军的四个团认为不能服从“出动”◇76◇的命令，所以临时政府就和克伦斯基一起从言论转到“行动”，下令立即解散“犯罪的”团队，并威胁说要把犯罪者“送去服苦役和剥夺其一切身分地位上的权利”（见六月一日“晚间报”）。因为这一切好像还不够，于是克伦斯基又下了一道“命令”专门对付联欢事件，威胁说要把“犯罪者”交付“法庭依法严惩”，就是说，还是送去服苦役（见六月一日“新生活报”）。

简单地说，你们要立即进攻，无论如何要进攻，不然我们就要用苦役和枪决来对付，——克伦斯基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

与此同时，沙皇和英法资产阶级订立的条约仍然有效，有人在根据这些条约强迫“我们”积极支持英法对美索不达米亚、对希腊、对亚尔萨斯—洛林的侵略政策！

那末，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新的临时政府所承担的采取一切“坚决办法”来谋求和平的义务，——在“政权危机”时期所提出的这一切诺言都到哪里去了呢？

噢，我们的部长们并没有忘记和平，并没有忘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他们嘴里起劲地说，说了又写，写了又说。并且不仅我们的部长们如此。还在几天以前，英法两国的政府在回答临时政府要求说明

战争目的的提议时就声明说，他们也反对割地，但是……要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原则不相抵触才行。而临时政府为了答复这一声明，就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照会中声明说，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忠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同时为了修改关于战争目的的协议，它提议召开“盟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具备有利条件的时候举行”（见“工人报”第七十二号）。但是，既◇77◇然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具备有利条件”，既然所谓“最近的将来”无论如何不会很快到来，那末**实际上**就是把争取不割地的和平的“坚决斗争”束之高阁，使这种斗争变成空洞的和虚伪的关于和平的饶舌。但是，用一切“坚决办法”（以至用苦役和枪决来威胁）所准备的进攻原来是刻不容缓的……

不容置疑，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在**实际准备进攻的**时候**来谈论不割地的和平，无非是想掩盖战争的掠夺性质而已。临时政府已经确定不移地走上**积极的**帝国主义的道路。昨天看来还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已经因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而成为可能的了。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盖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实质，因而就巩固和扩大了正在抬头的反革命的阵地。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社会主义的”部长们来实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获得胜利的不是幼稚的“革命民主派”，而是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但是，对外政策的向右转必然引起对内政策的同样的转变，因为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对外政策是其他一切政策的基础，是全部国家生活的中心。

果然，临时政府愈来愈明显地走上“坚决反对”革命的道路了。

不久以前，临时政府曾经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进攻，同时又阻挠彼得格勒县以及平兹、沃龙涅什等省的农民实现一般的民主原则。◇78◇

后来，即在几天以前，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又因为把罗柏特·格里姆[29]逐出俄国而使自己出了名(赫罗斯特拉特式地出名！)，固然，把他驱逐出境并没有经过审判和侦查，而是干脆用了宪兵手段，然而俄国的帝国主义者却大为高兴。

但是，把临时政府对内政策的新方针反映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彼列维尔节夫部长(“也是”社会主义者！)。他恰巧是要求“急速实行扰乱国家治安治罪法”。按该法规定(第一二九条)……“凡当众进行或利用散发的或公开张贴陈列的印刷品、手抄文字或画片来进行如下号召者：(一)号召别人去犯重大的罪行，(二)号召一部分居民用强暴行为对付另一部分居民，(三)号召不服从或违抗当局的法律和必须遵守的决定或法令——概处以三年以下的感化院监禁”，而“在战争期间……则处以有期苦役徒刑”(见六月四日“言论报”)。

这就是这位所谓“社会主义的”部长在苦役徒刑立法方面的创作。可见临时政府正在坚定不移地投向反革命的怀抱。

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也可以看出：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米留可夫已经因此而先尝新胜利的果实了。他说：“如果临时政府在长期拖延之后终于理解到政府当局除了说服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即它现在已经开始采用的那些办法，如果它能走上这条道路，那末俄国革命的成果(不要笑！)一定会巩固起来”……“我们的临时政府逮捕了柯雷什柯，赶走了格里姆。而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却逍遥法外……我们希望什么时候也把列宁和他的同志送到那些地方去……”(见六月四日“言◇79◇论报”)

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老狐狸米留可夫先生的“希望”。

一向倾听米留可夫的话的临时政府是否会执行米留可夫的诸如此类的“希望”，这种“希望”现在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点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

但是有一点总是毫无疑问的：临时政府的对内政策是完全服从于

它的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的。

结论只有一个。

我国革命的发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革命冲进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它们从下到上革命化，革命的这个新阶段正把新旧世界的一切力量发动起来。战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破坏使阶级矛盾尖锐到极点。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随风转舵的政策，显然愈来愈站不住脚了。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前进，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把政权交给劳动者，争取消灭战争和破坏，争取组织生产和分配；

或者后退，拥护资产阶级，拥护进攻和延长战争，反对用坚决办法来消除破坏，拥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拥护公开的反革命政策。◇80◇

临时政府正确定不移地走上公开反革命的道路。

革命者的职责就是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把革命向前推进。

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士兵真理报”第四十二号
署名：科·斯大林◇81◇

反对分散的游行示威

几天以前，临时政府决定把无政府主义者赶出杜尔诺沃别墅。这项决定是根本不正确的，它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毫无疑问，工人认为这项决定侵犯了一个组织存在的权利。在原则上我们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是既然无政府主义者还受到一部分(虽然是一小部分)工人的拥护，那末他们就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有存在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说，工人抗议临时政府的侵犯是对的。何况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以外，使用这所别墅的还有几个工厂和工会。

读者知道，工人用抗议争得了临时政府的让步，把别墅保留下来了。

现在发现杜尔诺沃别墅中正在“组织”新的工人发动。有人告诉我们说，杜尔诺沃别墅中正在举行以无政府主义者为首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其目的是要在今天举行游行示威。**如果真是这样**，那末我们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动。个别区和个别团队在不明时局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举行的游行示威，违背多数区和多数团队的意志、违背总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意志、违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志举行的游行示威——我们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游行示威**是会危害工人革命事业的**。◇82◇

当有人想使某些组织(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内)无地容身的时候，对这些组织存在的权利可以而且必须加以维护。但是，和无政府主义者融合在一起，和他们一道举行事先就注定失败的轻率的发动，对觉悟的工人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犯罪的。

让工人和士兵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他们自己是什么人，是社会主

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们是社会主义者，那就让他们决定，他们能不能违背我们党的决定而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肩地举行显然未经充分考虑的发动。

同志们！我们准备在六月十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使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30]承认了游行示威的必要性。你们大概知道，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在六月十八日举行总示威，并预先宣布了可以自由地提出口号。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彼得格勒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在我们的革命口号下举行。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根本制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发动，以便用更多的精力来准备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

反对分散的发动，拥护六月十八日的总示威，——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号召。

同志们！时间是宝贵的，一分钟也不要浪费！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区、每一个团队和连队都要准备好自己的写着革命无产阶级口号的旗帜。同志们！大家都动起来，大家都来准备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83◇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发动，拥护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总示威，——我们的号召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八十一号
署名：科·斯大林◇84◇

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

彼得格勒各区杜马(十二个区)的选举已经结束。虽然数字和其他材料的综合公报还没有公布，但是根据各区的若干材料已经可以对选举的进程和结局有个轮廓的了解。

一百多万选民中行使了选举权的约有八十万人。平均占百分之七十。弃权的人数绝不是“很惊人的”。像涅瓦区和纳尔瓦区(都是郊区)的那些还没有划归市区的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地区，都未能参加这次选举。

竞选并不是围绕着地方自治机关的地方性的要求展开的，如“通常”在欧洲那样，而是根据基本的政纲展开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因战争和破坏而加剧的非常的革命动荡时期，当阶级矛盾已经表现得极为尖锐的时候，要把竞选局限在地方性的问题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地方性的问题和国内总的政治形势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必然要突出地表现出来。

因此，这次选举中的主要竞争者是根据立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护国派(民粹派、孟什维克和“统一派”的联盟)的三个基本政纲所产生的三个名单。在这种实际情况下，那些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没有纲领的无党无派集团必然要消失，而且实际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85◇

选民应当选择：

或者后退，拥护和无产阶级决裂，拥护采取“坚决办法”来反对革命(**立宪民主党人**)；

或者前进，拥护和资产阶级决裂，拥护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

拥护继续发展革命(**布尔什维克**)；

或者拥护和资产阶级妥协，拥护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随风转舵的政策，就是说，既不后退，也不前进(**护国派联盟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

选民已经进行了选择。八十万选票中拥护护国派联盟的有四十多万；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有十六万多一点，而且无论在哪一个区，立宪民主党人都没有取得多数；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有十六万多，而在首都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即维波尔格区，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绝对的多数。其余的(**为数不多**)选票则分散在三十个“无党无派的”、“超党的”以及其他一切偶然的集团和组织之间。

选民的答复就是如此。

这个答复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一眼可以看出的，就是无党无派集团的软弱无力。所谓俄国平民具有无党无派的“天性”的鬼话被这次选举彻底揭穿了。可见无党无派集团赖以生存的政治落后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批选民已经确定不移地走上**公开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第二个特点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完全失败。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怎样支吾搪塞，他们总不得不承◇86◇认，在**选举自由**的条件下，他们在第一次公开斗争中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连一个**区杜马也没有弄到手里。不久以前，立宪民主党人还认为彼得堡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不止一次地写过，彼得格勒“只对人民自由党表示信任”，并且他们举出按六三选举法进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做例子。现在完全清楚了，立宪民主党人过去在彼得堡的统治是靠了沙皇及其选举法的恩典。旧制度一垮台，立宪民主党人马上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简单地说，大批民主的选民是不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党的力量明显而肯定地增长了。我们党在彼得堡的党员有二万三千到二万五千名；“真理报”的发行

数是九万份到十万份，其中彼得堡一地就有七万份；我们在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有十六万多张，就是说比党员数多六倍，比“真理报”在彼得堡的发行数多一倍。况且当时几乎一切所谓报刊，从庸俗的“交易所报”和“晚报”起到官办的“人民意志报”[31]和“工人报”止，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恶毒的狂吠和攻击，以恐吓市民。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强无比、“威武”不屈的革命分子才会投票拥护我们党。这样的人，首先就是革命的领袖——使我们在维波尔格杜马中取得了优势的无产阶级，其次就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革命的团队。此外还应当指出，自由的选举把新的、还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广大居民阶层吸引到投票箱前来了。这首先是妇女，其次就是挤满了政府各部的几万小官吏，再其次就是无数的“小市民”、手工业者、小店主等等。 我们根本没有指望而且不能指望这些阶层立刻就会和“旧世界”决裂并坚决地站到革命无产阶级的◇87◇立场上来。其实正是他们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他们能抛弃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那已经是一个大的进步了。

简单地说，大批选民**已经**离开立宪民主党人，但是还没有走到我们党方面来，他们停在半路上。然而，最坚决的分子即革命无产者和革命士兵**已经**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了。

大批选民是停在半路上的。他们停下来，就在那里，在半路上，找到了相称的领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不明时局而徘徊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小资产阶级选民，既然对立宪民主党人失望，自然就倾向于完全迷失了方向而无望地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随风转舵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真是物以类聚！护国派联盟的“辉煌胜利”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选举的第四个特点也就在这里。毫无疑问，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护国派联盟这个成分复杂的队伍一定会逐步瓦解，一部分后退，走到立宪民主党人方面去，一部分前进，走到我们党方面来。不过目前……目前这个联盟的领袖们还可以

拿“胜利”来安慰自己。

最后，选举的第五个即最后一个特点(所谓最后，不是按其重要性而言！)，就是这次选举具体地提出了我国的政权问题。这次选举完全证明了立宪民主党人是少数派，因为他们勉强才收集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绝大多数选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选民拥护右翼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即拥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拥护布尔什维克。有人说，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是将来立宪会议选举的雏型。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在全国占极少数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占着绝大多数，这难道不◇88◇是怪事吗？在**多数**民众显然不信任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容忍立宪民主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占统治地位呢？国内对临时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并愈益频繁地爆发出来，其原因不就是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吗？

继续维持这种不相称的现象既不合理又不民主,这不是很明显吗？

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出版局公报”创刊号
署名：科·斯大林◇89◇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32]

同志们！

俄国正经受着深重的灾难。

夺去无数生命的战争还在继续。大发横财的**强盗，嗜血成性的银行家**故意把战争延长。

战争引起的工业破坏使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贪图暴利的**同盟歇业资本家**故意加深这种破坏。

战争引起的物资缺乏愈来愈严重。物价高涨窒息着城市贫民。而物价还在继续上升，满足着**投机倒把的奸商**的欲望。

饥荒和破产的凶恶魔影正在我们的头上盘旋……

同时反革命的乌云也日益逼近。

过去帮助沙皇压迫人民的六三杜马，现在正要求立即在前线发动进攻，为了什么呢？为了把已经获得的自由淹没在血泊中，以博得“盟国”和俄国掠夺者的欢心。

过去向沙皇供给刽子手大臣的国家参议院，现在正悄悄地编织卖国的绞索，为了什么呢？为了在适当时机把它套在人民的脖子上，以博得“盟国”和俄国压迫者的欢心。◇90◇

而处在沙皇杜马和代表苏维埃之间的临时政府，这个包括十个资产者的临时政府，显然是听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指使的。

它不但不保障士兵的权利，反而以克伦斯基的“宣言”来破坏这些权利。

它不但不巩固士兵在革命时期所获得的自由，反而颁布新的“命

令”，以苦役和解散相威胁。

它不但不保障俄国公民已经获得的自由，反而在兵营中布置政治密探，不经审判和侦查就进行逮捕，对于规定判处苦役徒刑的第一二九条又提出新方案。

它不但不武装人民，反而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相威胁。

它不但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反而对芬兰和乌克兰无端寻衅，害怕给它们自由。

它不但不和反革命作坚决斗争，反而纵容那些公开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横行霸道……

战争依然在进行，可是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停止战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破坏依然在扩大，可是没有采取任何办法去制止它。

饥荒依然在逼近，可是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办法去防止它。◇91◇

难怪反革命分子愈来愈狂妄，难怪他们鼓励政府对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采取新的高压手段。

同志们！不能再继续默默忍受这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形下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你们是自由的公民，你们有权利提出抗议，趁现在还不晚，你们应该行使你们的这种权利。让明天(六月十八日)这个和平游行的日子变成革命的彼得格勒对正在复活的压迫和专横提出严厉抗议的日子吧！

让胜利的旗帜在明天飘扬起来，使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胆颤心惊吧！

让你们的呼声，革命战士的呼声传遍全世界，使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欢欣鼓舞吧！

在那里，在西方各交战国内，已经出现了新生活的曙光，伟大工人革命的曙光。让你们的西方弟兄在明天知道，你们的旗帜带给他们

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奴役，而是解放！

工人们！士兵们！像兄弟一样携手前进,站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同志们！大家走上街头去！

紧密地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周围！

以整齐的队伍在首都的街道上行进！

沉着地、满怀信心地宣布你们的愿望：

打倒反革命！

打倒沙皇杜马！◇92◇

打倒国家参议院！

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

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修改“士兵权利宣言”！

取消反对士兵和水兵的“命令”！

反对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装！

民警制万岁！

消灭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打倒同盟歇业资本家！

拥护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和组织！

反对进攻政策！

结束战争的时候到了！让代表苏维埃宣布公正的和平条件！

决不同威廉单独媾和，决不同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签订密约！

面　包！和　平！自　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局◇93◇

彼得格勒市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

“真理报”编辑部

“士兵真理报”编辑部

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八十四号◇94◇

游 行 示 威

晴朗的日子。望不见尽头的游行示威行列。队伍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地走向马尔斯校场。望不见尽头的旗帜密集如林。所有的企业和机关都关了门。交通已经断绝。示威群众垂下旗帜走过烈士墓。“马赛曲”和“国际歌”换成了“你们牺牲了生命”。口号声响彻云霄。队伍中不时发出“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喊声，周围报以惊天动地的赞同声“乌拉！”

观察一下这次游行示威，一眼就会看出这里没有资产阶级和同路人。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和送殡游行不同，在送殡的那天，工人消失在市民和小资产者的汪洋大海中，而这次游行示威却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因为参加游行示威的主要是工人和士兵。立宪民主党人还在游行示威前夕就宣布了抵制，他们通过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声称必须“拒绝”参加游行示威。果然，资产者不但没有参加，简直是躲了起来。涅瓦大街平常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而在这一天，经常光临此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也不见了。

简单地说，这是革命工人率领革命士兵举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游行示威。

工人和士兵**在**市民中立的情形下结成联盟反对逃跑的资产者，——这就是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的外貌。◇95◇

不是游行，而是游行示威

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不是普通的散步，也不是讲究排场的游行，

而送殡那天的游行无疑是讲究排场的游行。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是表示抗议的游行示威，是显示革命实力的游行示威，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示威群众不仅宣布了自己的意志，而且还要求立即释放前“战壕真理报”[33]的工作人员哈乌斯托夫同志①。这里我们说的是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我党全俄军队党组织代表会议向以齐赫泽为代表的执行委员会提出了释放哈乌斯托夫同志的要求，当时齐赫泽答应采取一切办法争取“当天”释放。

这次游行示威提出了抗议临时政府的“命令”和抗议临时政府的全部政策的口号，口号的全部性质无疑说明了“和平游行”变成了对政府施以压力的强大的游行示威，而这种“和平游行”有人原想使它成为单纯的散步。

不信任临时政府

这次示威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团队，都没有提出“信任临时政府”的◇96◇口号。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忘记了**(不如说是不敢！)提出这个口号。他们什么口号都有：“反对分裂”，“拥护统一”，“支持苏维埃”，“拥护普及教育”(要是不喜欢，就不要听好了)，只是没有一个主要的口号，没有**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即使是加上“只有……，才……”这类狡猾的附带条件的口号也没有。只有三个集团敢于提出信任的口号，但就是它们也一定后悔。这三个集团就是哥萨克集团、崩得集团和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神圣的三位一体”，——工人们在马尔斯校场上

① 这里的哈乌斯托夫是一个准尉，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和他同姓的另一个哈乌斯托夫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孟什维克，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著者注

这样挖苦说。在一片“打倒”声中，工人和士兵迫使其中的两个集团(崩得和“统一派”)卷起了旗帜。哥萨克不愿意卷起旗帜，工人和士兵就把他们的旗帜撕成了碎片。另外在马尔斯校场的入口处，“半空中”横挂着一幅写着“信任”而没有注明单位名称的标语，这幅标语也在群众高喊“对临时政府的信任**悬在半空中了**”的赞同声中被一群士兵和工人撕毁了。

简单地说，绝大多数示威群众不信任政府，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显然不敢“违反潮流”，——这就是这次游行示威的总的特色。

妥协政策的破产

在所有的口号中最受欢迎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决不同威廉单独媾和，决不同英法资本家签订密约”，“拥护对生产实行监督和组织”，“打倒杜马和国家参议院”，“取消反对士兵的命令”，“宣布公正的和平条件”等等。绝大多数示威群众和我们党是一致的。甚至◇97◇像沃伦和凯克斯戈里姆这样的团队也在“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参加了游行示威。执行委员会多数方面的委员对这种“意外事件”感到不胜惊异，因为他们平时只和团队委员会打交道，而不和士兵群众往来。

简单地说，绝大多数示威群众(参加示威的共有四五十万人)公开表示不信任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游行示威是在我们党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

不容置疑，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胡说被彻底揭穿了。得到首都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信任的党是不需要“阴谋”的。 只有居心不良或政治上无知才会使“最高政策的创造者”产生关于布尔什维克

“阴谋”的“思想”。

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真理报”第八十六号
署名：科·斯·◇98◇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变是国内总危机所引起的。战争旷日持久，全国疲惫不堪，物价空前高涨，人民半饥半饱，反革命气焰上升，经济破坏日益加剧，前线团队纷纷被解散，土地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国家疮痍满目，临时政府无力使国家摆脱危机，——这就是促使群众在七月三日和四日走上街头的原因。

如果把这次发动说成是某个政党恶意煽动起来的，那就是暗探的观点，因为暗探总喜欢把一切群众运动说成是由于“煽动者”和“挑拨者”的指使而发生的。

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没有号召群众在七月三日举行发动。不仅如此，彼得格勒最有威信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七月三日还号召工人和士兵不要举行发动。可是当运动终于爆发起来的时候，我们党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袖手旁观，于是尽一切可能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但是，反革命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组织了挑衅性的射击，用流血事件给游行示威的日子罩上一层阴霾，并依靠从前线调来的一些部队向革命发动进攻。反革命的核心立宪民主党好像早就料到这一切，事先退出了政府，取得了行动的自由。而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保持已经动摇的阵地，于是背信弃义地把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游行示威宣布为反苏维埃的暴动，唆使从前◇99◇线调来的部队中的落后部分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他们被派别的狂热冲昏了头脑，竟没有看到他们打击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也就是削弱整个革命阵线，鼓舞反革命。

结果，反革命势力猖獗起来，军事专政建立了。

捣毁“真理报”报馆和“士兵真理报”报馆[34]，捣毁“劳动”印刷所[35]和我们的区组织，殴打和杀害，不经审判进行逮捕和一系列“擅自进行的”迫害，下贱的密探卑鄙地污蔑我党领袖和被收买的报纸的耍笔杆的强盗为非作歹，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装和解散团队，恢复死刑，——这就是军事专政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在“挽救革命”的幌子下遵照全俄执行委员会所支持的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内阁”的“命令”干出来的。同时，被军事专政吓倒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竟欣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出卖给革命的敌人，庇护捣毁行为和横暴行为，不制止“擅自进行的”迫害。

在执行委员会的公开纵容下，临时政府和反革命的大本营立宪民主党成立了默契，以反对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执政党愈让步，反革命分子就愈狂妄。他们已经从进攻布尔什维克转到进攻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和苏维埃本身。他们捣毁彼得格勒区的和奥赫塔的孟什维克区组织，捣毁涅瓦关卡外的五金工会分会。他们闯进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场，并逮捕苏维埃代表(萨哈罗夫代表)。他们在涅瓦大街组织特别队来逮捕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肯定地说要解散执行委员会。至于他们“阴谋”迫害临时政府◇100◇的某些阁员和执行委员会的首领，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反革命分子的狂妄性及其行动的挑衅性正在与时俱增。而临时政府却继续解除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武装来“挽救革命”……

所有这一切加上国内发展着的危机，加上饥荒、破坏、战争以及和战争有关的意外事件，就使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使新的政治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切实地有组织地迎接这些搏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因此：

第一个训条就是不接受反革命分子的挑衅，要具有坚韧沉着的精神，养精蓄锐，迎接即将来临的斗争，不许举行任何为时过早的发动。

第二个训条就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付向我们进攻的无数敌人，把旗帜高高举起，鼓励不坚强的人，带动落后的人，启发不觉悟的人。

决不和反革命妥协！

决不和充当狱卒的“社会主义者”联合。

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反革命及其庇护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事业报”(喀琅施塔得)第二号
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斯大林◇10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36]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一　中央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

(七月十六日)

同志们!

有人谴责我们党，特别是谴责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说我们党挑起和组织了七月三日和四日的发动以便迫使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如果它不愿意夺取政权，那末我们党就要自己来夺取。

首先我必须驳斥这种谴责。七月三日，机枪团的两位代表闯进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声称第一机枪团要举行发动。你们记得，我们当时曾经向代表们说,党员不能违反自己党的决定,但是该◇102◇团的两位代表表示抗议，说他们宁可退出党也不违反团的决定。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目前情况下举行发动是不适当的。中央委员会所以认为这次发动不适当，是因为情况很明显，政府在前线策动的进攻是一种冒险行为，士兵们既然不明白进攻的目的，也就不会去进攻，如果我们在彼得格勒举行发动，革命的敌人就会把前线进攻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却要使策动这一冒险行为的真正罪魁来担负前线进攻失败的责任。

但是发动开始了。机枪团的士兵向各个工厂派遣了代表。将近六点钟，广大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发动已经成为事实。而在五点钟左右，我曾经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

名义正式声明我们决定不举行发动。可见谴责我们组织发动就是造谣，这只有卑鄙龌龊的诽谤者才干得出来。

发动已经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估计到事态可能更严重地复杂化，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

请你们回忆一下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类似情形。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当加邦带领群众去见沙皇时，党并没有拒绝和群众一起去，虽然党知道他们是到什么鬼地方去。现在，当运动已经不在加邦的口号下而在我们的口号下进行的时候，我们更加不能避开运动。我们应当作为运动的调节者，作为控制运动的政党来参与这个运动，使运动避免可能的复杂化。◇103◇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领导工人运动，但是他们不像能领导工人阶级的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暴露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工人阶级政党的责任。他们对最近一次工人发动的议论就像和工人阶级断绝关系的人们的议论一样。

夜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局决定参与士兵和工人的这个自发运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看到有四十多万士兵和工人跟着我们走，他们感到快要失去立足之地，于是把工人和士兵的发动宣布为反苏维埃的发动。我敢断定，七月四日晚上，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布布尔什维克是革命叛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卖了革命，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和反革命结成了联盟。他们打击布尔什维克，也就是打击革命。

七月五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布戒严，组织了司令部，并把一切事务都交给军事集团。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人倒变成苏维埃的武装敌人了。当时造成的情况是布尔什维克军队可能处在反对苏维埃军队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应战

那就太愚蠢了。我们向苏维埃的领导者说：立宪民主党人已经退出政府，你们要和工人们联合起来，使政权对苏维埃负责。但是他们采取了背信弃义的做法，他们布置了哥萨克、士官生、打手和从前线调来的几个团来对付我们，他们欺骗这些人，说布尔什维克在反对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迫使我们接受的战斗。所以我们决定退却。

七月五日，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李伯尔进行了谈判。李伯尔提出条件，要我们布尔什维◇104◇克从克舍辛斯卡娅宫撤走装甲汽车，要水兵由彼得巴甫洛要塞撤到喀琅施塔得。我们表示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护我们党组织不致遭到可能的捣毁。李伯尔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我们做了保证，说一定履行我们的条件，说在分配给我们固定地方之前克舍辛斯卡娅宫仍由我们使用。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装甲汽车撤走了，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同意撤回，只不过仍旧携带武器。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自己承担的义务一项也没有履行。七月六日，社会革命党的军事代表库兹明打电话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要求，限我们在三刻钟内撤离克舍辛斯卡娅宫和彼得巴甫洛要塞，否则，他威胁说要使用武力了。我们党中央务员会决定尽力避免流血冲突。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里终于说服了水兵卫戍部队不去应战，因为形势已经变成我们可能处在反对苏维埃的地位了。我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一同去找库兹明。库兹明那里的炮兵、骑兵、步兵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劝他不要使用武力。库兹明很不满意，说“文官们总是用自己的干涉来阻碍他”，他勉强同意服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我很清楚，社会革命党的军人们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给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教训”。我们阻碍了他们完成他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

同时反革命开始了进攻：捣毁“真理报”报馆和“劳动”印刷所，

殴打和杀害我们的同志，封闭我们的报馆等等。领导反革命的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跟在它后面的是军队的司令部和指挥人员，——他们是那个想进行战争、靠战争发财的资产阶级的代表。◇105◇

反革命一天比一天加强起来。在我们每次质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后，我们就更加确信，中央执行委员会无力防止捣乱行为，政权并不是掌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而是掌握在指挥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军事集团手中。

部长们像傀儡似地换来换去。现在又有人想以莫斯科非常会议[37]来代替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二百八十个委员将淹没在数百名公开的资产阶级代表中间，像苍蝇淹没在牛奶里一样。

被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吓倒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和反革命缔结可耻的联盟，满足反革命的种种要求：交出布尔什维克，逮捕波罗的海代表团[38]，解除革命士兵和工人的武装。这一切都做得很简单：护国派集团先用挑衅性的射击制造解除武装的借口，然后就来解除武装。例如对付未曾参加发动的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工人[39]就是这样。

任何反革命的第一个标志都是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在我国，这种反革命的卑鄙勾当是假手于策烈铁里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部长”干出来的。全部危险就在这里。“挽救革命的政府”正在用绞杀革命的手段来“巩固”革命。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巩固现有的组织并防止群众举行为时过早的发动。反革命要我们现在应战，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挑衅，我们应该表现出最大的革命坚韧性。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策略路线。◇106◇

有人卑鄙地诬蔑我们的领袖，说他们拿了德国的津贴，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曾经以叛国罪诬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如在德国对李卜克内西，在俄国对列

宁。党中央委员会对于俄国资产者采取这种惯技来对付“不良分子”并不感到惊奇。工人们必须公开地说，他们认为自己的领袖是无可责难的，他们和自己的领袖是团结一致的，并且认为自己是这些领袖的事业的参加者。工人们自己曾经要求彼得堡委员会起草反对迫害我们领袖的抗议书。彼得堡委员会已经草拟了将有无数工人签名的抗议书。

我们的敌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忘记了引起事变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革命的潜在力量，因此他们就陷入了暗探局的观点。

你们知道，“真理报”报馆从七月六日起就被封闭了，“劳动”印刷所被查封了，而特务机关答复说，侦查结束后可能启封。在停工期间，必须发给“真理报”和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和职员三万左右的卢布。

经过了七月事变，经过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再认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者了。现在工人们把他们叫做社会主义者狱卒。

既然如此，再谈同社会主义者狱卒联合那就是犯罪。必须提出另一个口号：联合他们的左翼，联合那些还有一点革命诚意并愿意和反革命作斗争的国际主义者。

这就是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107◇

二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七月十六日）

同志们！

政权危机是目前形势的特点。其他次要问题都以这个问题为中心。政权危机是政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现在人们对政府的命令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漠不关心，谁也不肯去执行。政权愈来愈不得人心。政权正摇摇欲坠。政权危机的基础就在这里。

我们正经历着第三次政权危机。第一次危机是沙皇政权的危机，这个政权已经不存在了。第二次危机是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危机，结果是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退出政府。第三次危机是联合政府的危机，这时政权的不稳定已经达到极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授权克伦斯基组阁，而资产阶级却对克伦斯基表示不信任。内阁组成了，但是第二天就陷入了同样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不仅是从表面上而首先是从阶级观点来看政权危机。政权危机是各个阶级争夺政权的紧张而公开的斗争。第一次危机的结果是地主政权让位于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得到“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苏维埃的支持。第二次危机的结果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成立了联合政府。不论在第一次危机期间还是在第二次危机期间，政权都是反◇108◇对工人的革命发动的(二月二十七日的发动和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发动)。第二次危机的解决是“有利”于苏维埃的，因为苏维埃中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在第三次危机中，士兵和工人公开提出了劳动者即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派夺取政权、排除政府中一切资本主义分子的问题。

第三次危机是什么引起的呢？

现在有人把全部“罪过”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七月三日和四日的发动似乎是危机尖锐化的原因。卡·马克思早已说过，革命每前进一步就使反革命后退一步。布尔什维克认为七月三日和四日的发动是革命的一步，所以接受了社会主义叛徒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前进运动的先锋的荣誉。但是，这次政权危机的解决是不利于工人的。这是谁的罪过呢？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工人和布尔什维克，那末反革命是可以击败的，但是他们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于是危机就在不仅对布尔什维克不利而且对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这是危机尖锐化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立宪民主党人觉察到事情就要恶化，觉察到经济危机正在加剧，财力不足，于是决定溜走。他们的退出是柯诺瓦洛夫抵制的继续。立宪民主党人一发现政府不稳定，就首先退出了政府。

使政权危机暴露和尖锐化的第三个因素是我国军队在前线的失败。战争问题现在是一个基本问◇109◇题，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以它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前线的进攻是一种冒险行为，这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传说我们投降的人有几十万，士兵混乱不堪，纷纷逃跑。把前线的“混乱”完全归罪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就是夸大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没有力量负起这样的重担。总共不过二十万党员的我们的党竟能“瓦解”军队，而联合着两千万公民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控制不住军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士兵不愿意作战，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作战，他们已经疲倦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分配土地等问题。指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引导士兵去作战，就等于指望奇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可能在军队中进行比我们所能进行的规模大得多的鼓动，它也进行了这样的鼓动，然而反战斗争的强大的自发力量占了上风。这不是我们的罪过，这是革命的“罪过”，因为革命给了每个公民以求得答复“为什么进行战争？”这个问题的权利。

由此可见，引起政权危机的有三个因素：

(一)工人和士兵对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政策太右了；

(二)资产阶级对政府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太左了；

(三)前线失利。

这是引起政权危机的表面的力量。

而引起危机的潜在力量却是战争所造成的国内经济破坏，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就是在这个基◇110◇础上才产生了这三个动摇联合政府政权的因素。

既然危机是各个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那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要掌握政权的是哪一个阶级？事实说明，现在要掌握政权的是工人阶级。很明显，不经过战斗资产阶级是不会让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时而同我们联合，时而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他们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政权危机的阶级内容就在于此。

在这次危机中究竟谁胜谁败呢？显然，在目前掌握着政权的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当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时候，政权曾经在一个极短时间内落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手里，可是它放弃了这个政权，委托原来的阁员们组阁。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权的附属品，内阁中的部长们不断地更换，没有换过的只有一个克伦斯基。有人在发号施令，部长们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必须执行这些人的意志。显然，这是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的意志，首先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意志。资产阶级在发号施令，提出自己的条件，它要求掌握政权的是“实业家”而不是党派代表，要求废除切尔诺夫的土地纲领，要求修改七月八日的政府宣言[40]，要求把布尔什维克赶出一切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资产阶级面前步步退却，同意了它的条件。

昨天还在退却的资产阶级，今天竟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起命令来了，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原来前线失败以后，这个政权在外国银行家的眼中失去了信用。从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是出于英国大使布卡南和那些银行家之手，他们表示如果政府不放弃自己的◇111◇“社会主义”意图，他们就拒绝贷款给政府。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资产阶级战线比革命战线组织得好。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反

革命就明白革命统一战线已经破裂了。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首而组成为军事集团和帝国主义财政集团的反革命向护国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唯恐失去政权，于是连忙执行反革命的要求。

这就是反革命取得胜利的背景。

很明显，目前反革命所以战胜了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孤立了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同样很明显，对我们有利的时机一定会来到，那时我们就能对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反革命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即护国派苏维埃所掩护的立宪民主党。它的执行机关是那些控制着全部指挥人员的著名将军们所领导的司令部。另一个中心是和英法两国有联系而控制着全部贷款的帝国主义财政集团。控制贷款的几国国会委员会的委员叶弗列莫夫参加政府并不是偶然的。

以上列举的事实造成了反革命对革命的胜利。

那末前途如何呢？只要战争还在进行(战争是还会进行下去的)，只要工业破坏问题还没有解决（工业破坏问题是不会解决的，因为用高压手段来对付士兵和工人是不能解决破坏问题的，而统治◇112◇阶级又不能采取果断的办法)，只要农民还没有得到土地(农民是得不到土地的，因为连提出温和的土地纲领的切尔诺夫也成了不合适的内阁阁员)，——只要这一切还存在，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

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新的时期，尖锐冲突、短兵相接的时期已经来到。生活将沸腾起来，危机将不断发生。士兵和工人将不再沉默。甚至对封闭“战壕真理报”报馆一事也有二十个团提出了抗议。把新的部长塞到政府里去，还是没有解决危机。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弄得软弱无力。工人阶级原来比敌人所想象的更有理智：当他们明白苏维埃已经叛变的时候，他们在七月四日和五日就没有应战。而

土地革命不过刚刚开展起来。

我们应当切实地有组织地迎接即将来临的搏斗。

我们的基本任务应当是：

（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要坚韧、沉着和有组织性；

（二）恢复、巩固并扩大我们的组织；

（三）不要忽视合法的机会，因为任何反革命都不能真正把我们赶到地下去。

能够肆意捣毁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到了“合法”迫害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抓住并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和反革命结成了联盟而背叛了我们，使布尔什维克陷于孤立，◇113◇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苏维埃和苏维埃中的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马尔托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责备了郭茨和唐恩，说他们把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开会通过的决议带到了会议上来。布尔什维克遭受迫害的过程，证明布尔什维克已经没有同盟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听到我们的领袖被捕和我们的报馆被封闭的消息都热烈鼓掌。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就等于向反革命伸出手来。

我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某些工厂中有人企图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这是对革命作斗争的一种伪装形式，因为同护国派结成联盟是会断送革命的。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些人是愿意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有卡姆柯夫派[41]，在孟什维克中有马尔托夫派)，我们准备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同他们联合起来。

三　对几个书面问题的答复

（七月十六日）

(一)**马斯洛夫斯基的问题**：在将来发生冲突，也可能是发生武装发动的时候，我们党将给以何种程度的协助？党是否出面领导武装抗议？

斯大林答：应当料到未来的发动是武装发动，并且应当对一切做好准备。将来的冲突会更尖锐，◇114◇党不应该袖手旁观。萨伦代表拉脱维亚区责备党没有负起领导运动的责任。这是不对的，因为党所抱的目的恰恰是要把运动转上和平的轨道。可以责备我们没有尽力去夺取政权。我们本来可以在七月三日和四日夺到政权，我们本来可以责成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我们的政权。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保住政权。前线、全国各地和许多地方苏维埃都会起来反对我们。不依靠全国各地的支持的政权是没有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政权我们就会丢脸。

(二)**伊万诺夫的问题**：我们对“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态度如何？还没有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吗？

斯大林答：政权危机获得了解决，这就是说某个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目前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能不能停留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旧的口号上面呢？当然不能。把政权交给事实上同资产阶级默然携手并进的苏维埃，那就是替敌人效劳。如果我们获得胜利，我们只能把政权交给有农村贫苦阶层拥护的工人阶级。我们应当提出另外一种最适当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政权形式依然照旧，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个口号的阶级内容，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说：全部政权归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和贫苦农民。

(三)**未署名的问题**：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说少数要服从多数，那时我们应当怎么办？那时我们是否要退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斯大林答：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已经举行过会议并准备好了答复，其大意◇115◇是：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们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不反对这些决议，可是

作为党员，我们可以独立行动，我们不怀疑苏维埃的存在并不取消各个政党的独立存在。我们的答复明天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四 结 论

（七月十六日）

同志们！

为了起草一项决议以表明我们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的态度，曾经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中也有我。委员会拟定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我们服从多数，可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我们可以独立行动，也可以反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普罗霍罗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我们党的专政，而我们所说的是一个领导贫苦农民阶层的阶级的专政。

有几个人在发言中用词不当，他们没有弄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反动还是反革命。在革命时期反动是没有的。当掌握政权的阶级更换时，这不是反动，而是革命或反革命。◇116◇

至于哈利东诺夫提到的引起政权危机的第四个因素即国际因素，我认为只有战争以及与战争相联系的对外政策问题才和我国政权危机有关。我在我的报告中对战争这个引起政权危机的因素赋予了主要的意义。

至于小资产阶级，它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它的内部正在迅速地分化(如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背道而驰)。在农村中正进行着斗争，除了原有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以外，新的、自动组织的苏维埃正陆续成立起来。我们指望的就是这些站起来的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按经济地位来说，只有他们能跟我

们一起走。那些把阿夫克森齐也夫一类渴望喝无产阶级血的人安置到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里去的农民阶层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也不会动摇到我们这边来。当策烈铁里宣布逮捕列宁同志的命令时，我看到这些人是怎样鼓掌喝采的。

有些同志说，因为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这些同志机械地理解多数的力量。要知道，苏维埃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它所组织起来的两千万人，但是它依靠自己的组织性领导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会跟着那种能够冲断经济破坏的锁链的有组织的力量走的。

沃洛达尔斯基同志对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看法和我不同，然而他的观点究竟怎样却很难理解。

有些同志问，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是用于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用起义来战胜反革命是现在转移政权的条件之一。当我们提出关于苏维埃的口号时，政权实际上是在苏维埃手里。当时对苏维埃施以压力我们就◇117◇可以使政府的成分改变。现在政权是在临时政府手里。我们不能再指望用对苏维埃施以压力的方法来使政权和平转到工人阶级手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说：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我们当然拥护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我们要竭力建立的正是这样的苏维埃。我们不能使政权转到那种同反革命结成联盟的苏维埃手里。

综上所述可以说：运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结束，因为运动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现在除了贫苦农民阶层以外，小资产阶级都是拥护反革命的。所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目前来说已经过时了。

第一次载于一九二三年
“红色史料”杂志第七期◇118◇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情。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并肩行进，高呼着“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时工人和士兵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推翻苏维埃吧？

当然不是！

当时工人和士兵所争取的是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改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困苦不堪的生活。

他们所争取的是加强苏维埃，而不是削弱和消灭苏维埃。

他们所希望的是苏维埃取得政权，同地主决裂，立刻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不要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他们所希望的是苏维埃取得政权，同资本家决裂，在工厂中改善劳动条件并实行工人监督。

他们所希望的是苏维埃宣布公正的和平条件，最后停止那种夺去数百万青年生命的痛苦的战争。这就是当时工人和士兵所争取的。◇119◇

可是执行委员会的头子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愿意走革命的道路。

他们不愿意同革命农民联合，宁愿同地主妥协。

他们不愿意同革命工人联合，宁愿同资本家妥协。

他们不愿意同革命的士兵和水兵联合，宁愿同士官生和哥萨克联合。

他们背信弃义地宣布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是革命的敌人，掉转枪口来反对工人和士兵以讨好反革命。

瞎子！他们竟没有看到向布尔什维克开枪就是向革命开枪，为反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

正因为如此，一直在暗中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那时都爬出来了。

而当时已经开始了的、暴露了护国派政策的危害性的前线溃败，更加鼓舞了反革命。

反革命也没有忘记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错误”。

反革命头子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恫吓和迷惑他们，使他们服服贴贴并把他们收罗在自己身边，然后对革命展开了进攻。捣毁和封闭报馆，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逮捕和毒打，造谣和诬蔑，被收买的密探对我党领袖进行卑鄙无耻的诬蔑，——这就是妥协政策的后果。

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狂妄无耻的立宪民主党人提出最后通牒，对苏维埃进行威胁和恫吓，谩骂和污辱，而骇得魂不附体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步步退让，同时勇敢的部长们也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打击下一哄而散，这样就替米留可夫的代理人扫清了道路来……“挽救”……革命。◇120◇

既然如此，反革命高奏凯歌有什么奇怪呢？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这种情况是不会长久的。

反革命的胜利就是地主的胜利。但是没有土地农民就活不下去。因此，反对地主的坚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胜利就是资本家的胜利。但是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工人就不会罢休。因此，反对资本家的坚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争的延长，但是战争决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被战争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因此，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巩固的，是瞬息即逝的。

未来是属于新的革命的。

只有实现完全的人民政权，才能使农民得到土地，才能整顿国家的经济生活，才能保障痛苦不堪的欧洲各国人民所如此渴望的和平。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工人和士兵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121◇

反 革 命 的 胜 利[42]

反革命组织起来了。它正在成长并展开全面的进攻。反革命的首领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昨天还在抵制政府，今天却准备重掌政权统治国家了。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及其“挽救革命”的政府正在狼狈溃退。只要下命令，他们就准备做一切让步，他们就准备执行一切。

交出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吗？

—— 请吧，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布尔什维克带去吧。

交出波罗的海代表团和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吗？

—— 听你们吩咐，“特务”先生们，把代表团带去吧。

封闭立宪民主党人所讨厌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的报馆吗？

—— 谨遵台命，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一定封闭。

解除革命的武装，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吗？

—— 非常高兴，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我们不仅要解除彼得堡工人的武装，而且要解除谢斯特罗◇122◇列茨克工人的武装，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变。

限制言论、集会的自由，取消人身、住宅的不可侵犯性，实行书报检查和暗探制度吗？

—— 一切照办，黑帮先生们，完全做到。

恢复前线的死刑吗？

—— 非常高兴，贪得无厌的先生们……

解散拥护苏维埃所通过的政纲的芬兰议会吗？

—— 一定执行，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

修改政府纲领吗？

—— 谨遵台命，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准备继续让步，只求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只求设法同他们讲好价钱……

而反革命愈来愈狂妄，他们要求别人作更多的牺牲，迫使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可耻地自动下野。为了博得立宪民主党人的欢心，有人提议在莫斯科召开“非常会议”，邀请已经被废除的国家杜马的议员及其他有资格的人士参加。在这个总的合唱队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成为极不雅观的少数。部长们张皇失措，纷纷向克伦斯基辞职。目前正根据立宪民主党人的指示草拟阁员名单。

在沙皇杜马和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帮助之下葬送用血换来的自由，—— 这就是现时我国政治生活◇123◇的舵手使我们蒙受的奇耻大辱……

战争还在进行，使前线的灾难日益加深，可是有人想用恢复前线的死刑来改善目前的情况。瞎子！他们没有看到，只有当战争目的为军队所了解并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只有当军队认识到他们流血是为了自己的切身事业的时候，进攻才能得到普遍的同情；他们没有看到，在士兵可以举行群众大会和自由集会的民主的俄国，没有这样的认识是不能举行大规模的进攻的。

破坏还在继续，使人们日益感到饥荒、失业和普遍破产的威胁，可是有人想用对革命采取警察手段来解决经济危机。反革命的意志就是如此。瞎子！他们没有看到，不采取革命手段来对付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把国家从崩溃中挽救出来。

工人受到迫害，组织遭到破坏，农民被欺骗，士兵和水兵被逮捕，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遭到诬蔑和诽谤，而反革命分子却高奏凯歌、造谣中伤、横行霸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挽救”革命的幌子下干出来的，——请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把我们国家糟蹋到了什么地步。

尽管如此，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见“新生活报”)建议我们联合这些以绞杀革命来“挽救”革命的先生们!

他们究竟把我们看成什么人？！

不，先生们，我们和革命的叛徒的道路是不同的!

工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七月事变的困难关头，当疯狂的反革命向革命开火的时候，布尔什维克◇124◇党是唯一没有离开工人区的政党。

工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困难的关头，“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处在摧残工人、士兵和水兵并解除他们武装的那伙人的阵营里的。

工人们将记住这一切，并由此做出相当的结论。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工人和士兵报”创刊号
署名：科·斯·◇125◇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更换阁员的把戏看来还没有结束。立宪民主党人同克伦斯基还在讨价还价。一种“组合”接着另一种“组合”。

立宪民主党人当然会参加政府，因为现在一切事情都是遵照他们的指示进行的。切尔诺夫可能留在政府里。策烈铁里看来再“没有人要了”。“过去需要”策烈铁里是为了解除工人武装。工人武装一解除，他的作用也就宣告结束。“摩尔人已经做完自己的事情，摩尔人可以告退了”[43]。他的职位将由阿夫克森齐也夫代替。

但是，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人选。切尔诺夫、策烈铁里或者另外一个和他们同类的什么人，难道不都是一样吗？谁不知道，这些可怜的齐美尔瓦尔得主义者为帝国主义事业效劳并不比韩德逊之流和托马[44]之流差呢？

再说一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人选。

问题在于在这场追逐部长职位等等的混战中(其实质是争夺政权的斗争)，占了上风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路线，即对内政策上的反革命路线，对外政策上的“作战到底”的路线。◇126◇

问题本来是这样：

或者继续战争，那末结果就是完全依附于英美的金融市场，立宪民主党人执政，革命受到压制，因为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盟国”资本家都不会同情俄国革命。

或者把政权交给革命的阶级，打断盟国资本家束缚俄国手脚的财政锁链，宣布和平条件，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润来整顿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必然要失败的。

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比较清醒些。

“言论报”写道：必须“使政府同齐美尔瓦尔得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害倾向坚决断绝关系”。

换句话说：无条件地进行战争，把战争进行到底。

涅克拉索夫在一次会议上说：“必须做出最后的结论”，或者你们自己取得政权(他对苏维埃说)，或者使别人有可能取得这个政权。

换句话说：或者是革命，或者是反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走革命的道路，这就是说，他们必然要受立宪民主党人的控制，受反革命的控制。

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上台就能保证取得内债。◇127◇

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上台就能和盟国资本家保持友谊，就是说能保证借到外债。

由于后方的破坏,尤其是前线的破坏,钱成了非常需要的东西……

“危机”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立宪民主党人胜利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

这个胜利能维持多久，最近的将来就会见分晓。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二号
社论　◇128◇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45]

同志们！

俄国正处在困难的时期。

三年的战争吞噬了无数的生命，把国家弄得疲惫不堪。

运输业的破坏和粮食恐慌有造成普遍饥荒的危险。

工业破坏和工厂停工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而战争还在进行，使总危机日益加剧，把国家引向彻底的崩溃。

负有“救”国使命的临时政府已经显出无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不仅如此，它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它在前线发动了进攻，因而延长了战争，而战争正是造成国内总危机的主要原因。

结果就使政权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造成政权的危机和垮台；虽然大家都在叫嚷这件事情，可是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加以制止。◇129◇

立宪民主党人的退出政府再一次表明了联合内阁完全是勉强凑成的，缺乏生命力的。

我国军队在前线举行了有名的进攻之后的退却，暴露了进攻政策的全部危害性，使危机达到了极点，使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使它失去了“本国”资产阶级和“盟国”资产阶级的贷款。

危急的局面形成了。

在革命“救星”面前出现了两条道路。

或者继续战争和继续“进攻”，那末就必然把政权交给反革命资产阶级，以便通过内债和外债获得金钱，因为不这样，资产阶级就不

会参加政府，内债就借不到，英美就会拒绝贷款，而在这种情形下“挽救”国家，只能是靠压榨工农来支付战费，以博得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豺狼的欢心。

或者使政权转到工人和无产农民的手里，宣布民主的和平条件并停止战争，以便把革命向前推进，把土地交给农民，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用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来整顿日趋崩溃的国民经济。

第一条道路会加强有产阶级对劳动者的统治，会使俄国变成英美法三国的殖民地。

第二条道路将开辟欧洲工人革命的纪元，冲破束缚着俄国的财政罗网，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为俄国的真正解放扫清道路。

七月三日和四日的游行示威是工人和士兵群众向各社会主义政党发出的号召：走第二条道路，走继续发展革命的道路。

这次游行示威的政治意义和极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130◇

可是，临时政府以及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是从工农的革命行动中而是从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建立妥协性的联合中汲取力量，他们宁愿走第一条道路，走迁就反革命的道路。

他们不但不向示威群众伸出手来，不但不夺取政权并同示威群众一道反对“盟国的”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真正地挽救革命，反而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掉转枪口来反对示威群众，反对工人和士兵，唆使士官生和哥萨克向他们进攻。

这样他们就出卖了革命，为反革命敞开了大门。

于是肮脏的渣滓都从生活的底层升了起来，玷污了一切诚实的、高尚的东西。

搜查和捣毁，逮捕和毒打，蹂躏和杀害，封闭报馆和解散组织，解除工人武装和解散团队，解散芬兰议会，限制自由和恢复死刑，打手和特务猖獗横行，造谣和卑鄙诽谤，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默许，——这就是反革命的最初的步骤。

盟国的和俄国的帝国主义者及立宪民主党，高级军官及士官生、哥萨克和特务，——这就是反革命的力量。

临时政府的阁员名单就是遵照这些集团的指示拟定的，而部长们不过像傀儡一样地上场下场罢了。

交出布尔什维克和切尔诺夫，清洗团队和船员，在前线枪决士兵和解散部队，把临时政府变成克伦斯基手中的玩具，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这个玩具的普通的附属品，“革命民主派”可耻地◇131◇放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恢复不久以前被废除的沙皇杜马的职权，这一切都是根据这些集团的指示进行的。

他们甚至在冬宫的“历史性的会议”(七月二十一日)[46]上明目张胆地商谈(阴谋!)如何进一步压制革命，但是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来揭露，所以没有邀请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个会议。

他们还计划将来召开“莫斯科会议”，打算在那里彻底葬送用血换来的自由……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之下进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怯懦地交出一个个的阵地，卑鄙无耻地斥责自己和自己的组织，罪恶地践踏革命成果……

民主派的“代表们”从来没有像在目前这种有历史意义的时候表现得这样卑鄙!

他们从来没有堕落到像现在这样可耻的地步!

既然如此，反革命狂妄无耻，玷污一切诚实的和革命的东西，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既然如此，被收买的仆从和卑怯的诽谤者敢于公开“控告”我们党的领袖“叛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耍笔杆的强盗无耻地把这种“控告”大加渲染，而所谓检察机关又公然公布所谓“列宁案件”的材料，如此等等，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先生们显然打算瓦解我们的队伍，在我们中间散布怀疑和惶

惑的种子，培养对我们领袖不信任的情绪。

可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像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132◇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

下贱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

无耻的诬蔑者这一耻辱烙印，——这就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和布尔采夫之流、彼列维尔节夫之流和多布龙拉沃夫之流的先生们。请接受选举我们的那三万二千名有组织的彼得格勒工人送给你们的这个烙印并把它带进棺材去吧。你们是受之无愧的。至于你们这些资本家和地主、银行家和投机分子、神甫和特务先生们，所有你们这些为人民制造枷锁的先生们，你们庆祝胜利未免太早了，你们开始埋葬伟大的俄国革命未免太早了。

掘墓的先生们，革命活着，它还将显出自己的威力。

战争和破坏还在继续，用野蛮的高压手段是不能医好它们所带来的创伤的。

革命的潜在力量活着，它正在不倦地促进国家的革命化。

农民还没有得到土地。他们一定会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就活不下去。

工人还没有达到监督工厂的目的。他们一定会继续争取，因为工业破坏有使他们遭到失业的危险。

有人想把士兵和水兵往后拖，拖去受旧纪律的束缚。士兵和水兵一定会为自由而斗争，因为他们◇133◇应该享受自由。

不，反革命先生们，革命并没有死，它只是潜伏起来了，以便聚集新的拥护者，更加有力地向敌人冲击。

“我们活着！未用尽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鲜血沸腾！”[47]

而在西方，在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和奥地利，难道那里不是已经飘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吗？难道那里不是已经在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吗？

战斗还在前头！

胜利还在前头！

全部问题在于切实地有组织地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工人们！你们肩负着领导俄国革命的光荣责任。要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把他们集合在我们党的旗帜下！要记住，在七月事变的困难关头，当人民的敌人向革命开火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没有离开工人区的政党。要记住，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处在摧残工人并解除工人武装的那伙人的阵营里的。

同志们，站到我们的旗帜下面来。

农民们！你们的领袖辜负了你们的期望。他们跟着反革命走了，而你们依然没有土地,因为只要反革命的统治还存在,你们就得不到地主的土地。工人是你们唯一的忠实同盟者。只有同他们联合◇134◇起来，你们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团结在工人的周围吧！

士兵们！革命的力量在于人民同士兵结成联盟。部长们上台下台，而人民还是人民。要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要同人民并肩作战！

打倒反革命！

革命万岁！

社会主义和各民族的友爱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二号◇135◇

两 个 代 表 会 议[48]

两个代表会议。两个都是彼得格勒全市的代表会议。

一个是孟什维克的。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

前者总共代表八千名工人。

后者代表三万二千名工人。

前者一团混乱，分崩离析，它眼看就要分裂成两部分了。

后者统一而团结。

前者从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妥协中汲取力量。它的分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因为在孟什维克当中还有些人没有丧失良心，他们不愿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后者则相反，它不是从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中汲取力量，而是从工人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中汲取力量。

前者认为要“救国”必须根除布尔什维主义和出卖革命。

后者认为要救国必须扫除反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的”附属品。◇136◇

有人说，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消灭，已经被埋葬。

掘墓的先生们埋葬我们未免太早了。我们还活着，资产阶级还将不止一次地被我们的呼声吓得胆颤心惊。

一方面是三万二千名团结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拥护革命，一方面是八千名分散的孟什维克，其中多数已经背叛革命。工人同志们，你们选择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二号
本文没有署名◇137◇

新　政　府

更换阁员的把戏结束了。新政府已经组成。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化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政府的成分就是如此。

立宪民主党心满意足了。它的基本要求已经被接受。这些要求已经成为新政府活动的基础。

立宪民主党人力求用削弱苏维埃的办法来加强政府，使政府不依赖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的“坏牧人”所领导的苏维埃对这一点做了让步，于是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

临时政府成了唯一的政权，——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所得到的东西。

立宪民主党人要求“整顿军队”，就是说要求在军队中恢复“铁的纪律”，要求军队只服从直属长官，而长官只服从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对这一点也做了让步，从而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苏维埃没有了军队,军队只服从立宪民主党化的分子的政府,——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所得到的东西。

立宪民主党人要求无条件地和盟国一致行动。苏维埃“坚决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来……“保卫国◇138◇家”，忘记了自己的“国际主义的”宣言。同时所谓七月八日纲领也已经成了一纸空文。

“无情地”进行战争，“作战到底”，——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所得到的东西。

请听立宪民主党人自己的话：

“立宪民主党人的要求已经无疑地成为整个政府活动的基础……

正因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基本要求已经被接受，所以党认为不可能再因纯系党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而继续争论。”因为立宪民主党人知道，在目前情况下，“很少有时间和可能来实现臭名远扬的七月八日纲领中的民主因素”（见“言论报”）。

看来是很明显了。

有一个时期，苏维埃创造新生活，实行革命的改革，并迫使临时政府用法令和指令把这些改革固定下来。

这是三月到四月的事情。

那时临时政府遵从苏维埃的意志，用它不革命的旗帜来掩盖苏维埃的革命措施。

现在的时期是：临时政府开倒车，实行反革命的“改革”，而苏维埃在自己的模糊的决议中“不得不”默认反革命的“改革”。

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所有苏维埃的代表机关遵从临时政府的意志，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临时政府的反革命面目。◇139◇

角色显然是更换了，而这种更换是不利于苏维埃的。

是的，立宪民主党人有理由“心满意足”。

这能有多久，最近的将来就会见分晓。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三号
社论　◇140◇

论立宪会议的选举[47]

立宪会议的选举运动开始了。各个党派已经在动员自己的力量。立宪民主党人的未来候选人正分赴俄国各地去检查他们成功的可能性。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组织”选举，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各省农民代表会议。另外一群民粹派分子为了同样的目的就要在莫斯科召开全俄农民联合会[50]代表大会。同时，自动组织的无党无派的“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也纷纷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顺利地在农村进行选举。为了同一目的还成立了许多供应农村书刊和人力的工人同乡会。最后，个别工厂也向农村专门派了代表去进行选举鼓动。此外，还有无数的个人“代表”(主要是士兵和水兵)遍走俄国，把“城里的新闻”告诉农民。

看来，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认识到目前形势的重要性和立宪会议的决定意义。同时大家又都感觉到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将起决定作用，正应该把一切多余的力量派到农村去。所有这一切，加上农业工人(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的散漫性和无组织性，使我们在农村中的任务大为复杂。农村工人和一切城市居民阶层中最有组织的城市工人不同，他们是最无组织的群众。农民代表苏维埃所组织起来的主要是中等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农民，他们自然地倾向于“同自由派地主和资本家”妥◇141◇协。同时农民代表苏维埃还领导着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受妥协主义政党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农业资本主义和农村阶级斗争没有足够发展，为这种妥协主义的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就是使贫苦农民阶层摆脱劳动团分子和社会革

命党人的影响，使他们和城市工人团结成一个友爱的家庭。

实际生活本身正向这个方向发展，它正一步步地揭露妥协政策的无用。党的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用种种办法参与立宪会议的选举，以便揭穿这种政策的全部危害性，从而使贫苦农民阶层易于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周围。

为此必须立即在农村建立我们党的核心，并使它们和城市的党委会密切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在每个乡、每个县、每个选区组织男女贫苦农民的党小组。这些小组应当和各省工业中心我们党的委员会联系起来。党委会的任务就是供应各小组必要的选举材料、书刊和人力。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只有在运动的进程中，才能建立城乡无产者的真正统一。

我们反对同资本家和地主成立协议，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协议只会损害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这还不是说，我们一般地反对任何协议。

我们主张同无产农民的无党无派集团成立协议，因为实际生活本身正把他们推上同地主和资本家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142◇

我们主张同士兵和水兵的无党无派组织成立协议，因为他们所信任的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如果因为这些集团和组织不能或者不愿意同我们党融为一体而把它们推开不管，那是愚蠢的和有害的。

因此，同这些集团和组织取得一致的意见，制定共同的革命的政纲，和它们拟定各个选区的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列入名单的不是“教授”和“学者”，而是决心用胸膛捍卫人民的要求的农民、士兵和水兵)，——这就是我们在农村选举运动中应当遵循的方针。

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村广大的劳动阶层团结在我国革命领袖周围，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

这样的无党无派集团并不难找，因为它们随时随地都在产生。由于对阻挠农民委员会处理地主土地的临时政府愈来愈不信任，这样的

集团还会不断出现。由于对追随临时政府的全俄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的政策不满，这样的集团正在发展并将继续发展起来。不久以前成立的“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51]就是一个例子，它联合了全市的卫戍部队，它一开始活动就同临时政府和全俄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发生了冲突。

下面就是一个可以作为我们同这种农民和士兵的无党无派组织成立协议的基础的示范政纲。

(一)我们反对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人民自由党”，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绝不信任、绝不支持富人和他们的政府！

(二)我们主张信任和支持奋不顾身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战士工人阶级，我们主张农民、士兵、水◇143◇兵同工人成立联盟和协议来反对地主和资本家。

(三)我们反对战争，因为它是侵略性的战争。只要战争还在根据沙皇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密约继续进行，关于不割地的和平的谈论都是空谈。

(四)我们主张通过各国人民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坚决斗争来尽速停止战争。

(五)我们反对被资本家弄得日益严重的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我们主张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我们主张在工人自己和他们所承认的政府参与之下根据民主的原则来组织工业。

(六)我们主张组织合理的城乡产品交换，使城市得到充分的粮食，使农村得到糖、媒油、鞋子、布匹、铁制品及其他必需品。

(七)我们主张把全部土地(皇族的、官家的、阁部的、地主的、寺院或教堂的)无偿地交给全体人民。

(八)我们主张把地主的全部闲置的土地(耕地或牧场)**立即**交给民主选出的农民委员会处理。

(九)我们主张把地主的和仓库中的全部闲置的牲畜和农具**立即**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供耕地、刈草和收割庄稼等等之用。

(十)我们主张发给所有在战争中丧失劳动能力的残废者以及孤儿寡妇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补助金。

(十一)我们主张建立没有常备军、没有官僚、没有警察的人民共和国。◇144◇

(十二)我们要求建立长官由选举产生的全民民兵，不要常备军。

(十三)我们要求实行工作人员的选举制和罢免制，不要不负责任的官僚。

(十四)我们要求建立可以选举和罢免的民警，不要那种监视人民的警察。

(十五)我们主张撤销那些旨在反对士兵和水兵的“命令”。

(十六)我们反对解散团队，反对唆使士兵自相残杀。

(十七)我们反对迫害工人和士兵的报刊；我们反对限制后方和前线言论、集会的自由；我们反对不经审判和侦查进行逮捕，反对解除工人武装。

(十八)我们反对恢复死刑。

(十九)我们主张给俄国各民族以自由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使这些民族不受压迫。

(二十)最后，我们主张把国家的全部政权交给革命的工农苏维埃，因为战争、破坏、物价高涨以及靠压榨人民而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地主已经把国家驱入绝境，惟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国家从绝境中挽救出来。

可以作为我们党组织同农民和士兵的无党无派革命集团成立协议的基础的政纲，大体上就是如此。

同志们！选举的日子快到了。趁现在还不晚，赶快行动起来，组织选举运动。

要建立由男工和女工、士兵和水兵组成的流动鼓动小组，要进行解说上述政纲的简短的演讲。◇145◇

要给这些小组供应书刊，要把它们派到俄国各地。

让它们的呼声唤起农村来参加即将来到的立宪会议的选举。

要在各乡各县建立党小组，把广大的贫农阶层团结在它们周围。

要召开各乡、各县、各省的会议，以加强党的革命的联系，拟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

立宪会议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那些在立宪会议以外的群众的意义更大得多。力量不在于立宪会议本身，而在于那些以自己的斗争创造出新的革命的法权并将推动立宪会议前进的工人和农民。

要知道，革命群众愈有组织，立宪会议就愈倾听他们的呼声，俄国革命的命运就愈有保障。

因此，选举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同志们，行动起来！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四号
署名：科·斯大林◇14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52]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包括中央最近两个半月即五月、六月和七月上半月的活动。

中央**在五月份**进行了下列三方面的活动:

第一、提出了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中央认为我国革命正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用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方法可以改变苏维埃的成分,也就是说,可以改变政府的成分。敌人硬说我们企图夺取政权。这是诽谤。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们说过,我们有可能用改选苏维埃的方法来改变苏维埃的活动的性质以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我们很清楚,只要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有一票的优势就能◇147◇使政权走上另一条道路。因此,五月份的全部工作是在改选的旗帜下进行的。我们终于在苏维埃的工人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一半的席位,在士兵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

第二、进行了反对战争的鼓动。我们利用弗里·阿德勒[53]被判处死刑的事件,组织了许多次抗议死刑和抗议战争的群众大会。士兵们很好地领会了这个运动。

中央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参加了五月份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中

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一起竭尽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有意无意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战。彼得格勒有八十万人投票，我们得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并且争得了整个维波尔格区杜马。给了党以特别帮助的是士兵和水兵同志们。

总之，五月份是在(一)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二)进行反对战争的鼓动，(三)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标志下过去的。

六月份。前线准备进攻的传说使士兵很受刺激。出现了一连串的命令，使士兵的权利化为乌有。所有这一切都激动了群众。每一个传说顷刻就传遍全彼得堡，在工人中尤其在士兵中引起波动。发动进攻的传说，克伦斯基的命令和士兵权利宣言，执政当局的所谓疏散彼得格勒“不必要的”分子（其实很明显，当局是想清除彼得格勒的革命分子)，愈来愈明显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使工人和士兵很受刺激。工厂里经常集会，各个团队和工厂纷纷建议我们组织发动。本来预定在六月五日举行游行示威发动。但是中央决定暂时不举行发动，而在七日召集各区、各工厂、各团队的代表举行◇148◇会议来决定发动的问题。这次会议召开了，到会的代表约有二百人。已经判明特别激动的是士兵。表决时，绝大多数人赞成发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发动该怎么办。绝大多数发言的同志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发动。既然如此，中央就决定把组织和平游行示威的责任担负起来。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说武器是防止资产阶级分子捣乱的唯一实际保证，说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

六月九日，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局举行联席会议。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问题：鉴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我们举行游行示威，我们应否延期发动。大家的回答是否定的。

六月九日夜十二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在宣言中利用它的全部威信来反对我们。中央决定六月十日不举行游行示威，延至六月十八日举行，因为中央考虑到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在六月十八日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可以在这次游行示威中表明自己的意志。工人和士兵心里很不满意中央的这一决定，但他们还是执行了这一决定。同志们，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十日那天早晨，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许多发言人为了“打消举行游行示威的企图”在各工厂发表演说时，绝大多数工人只愿意听我党发言人的演说。中央终于说服了士兵和工人。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的组织性。

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在六月十八日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宣布在游行示威中可以自由提出口号。显然，代表大会决定向我们党挑战。我们接受了挑战，并开始准备力量迎接即将来到的游行示威。◇149◇

同志们都知道六月十八日游行示威的经过情形。连资产阶级报纸都说，绝大多数示威群众是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下行进的。基本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参加游行示威的不下四十万人。只有崩得、哥萨克、普列汉诺夫派这三个小集团敢于提出“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可是就连他们也后悔，因为群众强迫他们卷起了自己的旗帜。苏维埃代表大会亲眼看见了我们党的力量和影响的巨大。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这次比四月二十一日的游行示威更强大的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是不会白白地过去的。的确，它也不应该白白地过去。“言论报”说，政府的成分很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苏维埃的政策不受群众欢迎。可是正好在这一天，我国军队在前线开始了进攻，进攻是顺利的，因此，“黑帮分子”开始在涅瓦大街上举行游行。这种情形使布尔什维克在游行示威中获得的道义上的胜利化为乌有。而“言论报”以及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官方代表们所说的那个可能发生的实际效果也成了泡影。

临时政府仍旧掌握着政权。顺利进攻的事实，临时政府的局部成

就，以及关于把军队调出彼得格勒的一系列的计划，对士兵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们根据这些事实深信，消极的帝国主义正在变成积极的帝国主义。他们已经明白新的牺牲的时期来到了。

前线对积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有它自己的反应。许多团队不顾禁令对进攻与否的问题举行表决。最高指挥部不了解，在俄国的新的情况下，在群众还没有弄清战争目的的情况下，盲目地驱使群众去进攻是不可能的。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进攻注定了失败。◇150◇

六月底和七月初是在进攻政策的旗帜下过去的。当时盛传着恢复死刑、许多团队被解散、前方士兵遭到毒打的消息。从前线来的代表们报告他们部队中逮捕和毒打的情形。精选团和机枪团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这一切为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新的发动造成了基础。

现在我来谈谈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变。这一事变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彼得堡委员会的所在地开始的。

七月三日。下午三时。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正在开会，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这个最一般的问题。这时来了卫戍部队某团的两个代表，他们提出了一个议程以外的声明，说他们那里“决定今晚举行发动”，说他们“不能再默默忍受前线团队一个个地遭到解散”，说他们“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分赴各工厂和团队”，建议它们参加发动。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代表沃洛达尔斯基同志回答说，“党已经做了不举行发动的决议，该团的党员不得违反党的决定”。

下午四时。彼得堡委员会、军事局和党中央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不举行发动。代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代表们分赴各工厂和团队去劝说同志们不要举行发动

下午五时。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会议。斯大林同志受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并传达了布尔什维克的不举行发动的决定。

晚上七时。彼得堡委员会门前。有几个团队举着旗帜经过。口号

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们在彼得堡委员会门前停下来，要求我们的党员“讲几句话”。发言人布尔什维克拉舍维奇和库拉也夫◇151◇在演说中阐明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号召不举行发动。但是他们遇到了“滚下去！”的喊声。于是我们的党员建议各团队选出代表团，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愿望，然后回到各团队去。这一建议博得了震耳的欢呼声“乌拉！”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消息传遍了全彼得格勒，使工人激动起来。继士兵之后，又出现了工人队伍。他们的口号同士兵的一样。士兵和工人都向塔夫利达宫走去。

晚上九时。彼得堡委员会的所在地。各工厂的代表陆续来到这里。他们都建议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参与并领导游行示威。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有人喊道，各工厂必须选出代表团，让代表团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陈述示威群众的意志，至于群众，他们听了代表团的报告后可以各自和平地散去。

夜十时。塔夫利达宫。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在工人们报告了业已开始的发动的情形后，工人部的多数人为避免发生过火行为决定参与游行示威，使游行示威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少数人不同意这个决定退出了会场。留在会场的多数选出了一个干事会以执行刚刚通过的决定。

夜十一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改在塔夫利达宫。示威群众从黄昏起就向这里汇合。各区鼓动员和各工厂代表纷纷来到这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军事局、区联派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干事会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从各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152◇

（一）明天将无法阻止工人和士兵举行游行示威；

（二）示威群众将纯粹为了自卫而携带武器出动，这样可以造成真正的保证以防止从涅瓦大街方面来的挑衅性射击，因为“射击有武

装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会议决定：当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权利袖手旁观，不管运动，它不能让群众去任凭命运摆布，它应当和群众一起，使自发的运动具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建议工人和士兵选出各团队各工厂的代表，通过他们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愿望。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拟定了一篇号召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的宣言[54]。

夜十二时。三万多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来到塔夫利达宫前。举着旗帜。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选举代表。代表们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要求。塔夫利达宫前的士兵和工人开始散去。

七月四日。白天。工人和士兵的游行队伍。旗帜。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游行队伍向塔夫利达宫走去。走在最后的是数千名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据资产阶级报纸(“交易所报”)报道，参加游行示威的不下四十万人。街上一片欢腾气象。市民向示威群众欢呼“乌拉！”午后开始发生捣乱事件。资产阶级区的黑暗势力用罪恶的挑衅性的射击给工人的发动罩上了一层阴霾。甚至“交易所新闻”也不敢否认射击是从游行示威的敌人方面开始的。“交易所报”(七月四日晚刊)写道：“下午二时正，武装示威◇153◇群众经过花园街和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聚集在路旁的大批观众安然望着他们，这时，花园街右方传来一响震耳的枪声，接着开始了连珠般的射击。”

显然，先开枪的不是示威群众，而是“身分不明的人”，是他们射击示威群众，而不是示威群众射击他们。

射击在资产阶级区的各个地方同时进行着。挑衅者并没有打瞌睡。虽然如此，示威群众还是没有越出必要的自卫范围。这里根本谈不到阴谋或起义。没有发生任何占领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的事件，也没有

这样做的任何企图，虽然示威群众依靠他们所拥有的巨大武装力量，不仅能够占领个别机关，而且完全能够占领整个城市……

晚上八时。塔夫利达宫。中央委员会、区联派及我党其他组织的会议。会议决定：既然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意志已经表明，发动就应当停止。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拟定了一篇宣言：“游行示威已经结束……我们的口号是：刚毅、坚韧、沉着。”（见载于“真理小报”[55]的宣言）交给“真理报”发表的这篇宣言未能在七月五日刊出，因为“真理报”报馆在四日到五日的夜里被士官生和特务捣毁了。

夜十时至十一时。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讨论政权问题。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处境十分危急：他们“需要”同资产阶级联合，但是没有联合的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不愿再同他们成立协议。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思想破产了。因此，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154◇

德军突破我军战线的传说固然还没有证实，但已经引起了惊惶。

传说明天报上将发表卑鄙地诽谤列宁同志的消息。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沃伦团的士兵调来保卫塔夫利达宫，这是防备谁呢？原来是防备那些来到塔夫利达宫似乎是为了“逮捕”执行委员会和“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这里指的是一贯为加强苏维埃、为把国家的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

夜二时至三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把政权拿过来。它授权“社会主义者”部长组织新政府，并且要吸收哪怕是个别的资产者参加政府。部长们被授予“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特别全权。事情很明显：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来应当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这是它所特别害怕的，因为它一向是从同资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联合”中汲取力量的），可是它却同工人和布尔什维克断然决裂，以便同资产阶级联合，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的工人和士兵。这样，对革命的进攻就展开

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革命开火，而使反革命拍手称快……

七月五日。报上(实际上就是“活的言语报”[56])刊载了卑鄙地诽谤列宁同志的消息。“真理报”没有出版，因为该报报馆在四日到五日的夜里被捣毁了。设法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社会主义的”部长们的专政建立了。不愿掌握政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次所以掌握政权(短时间地)，是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街上出现了从前线调来的军队。士官生和反革命匪帮进行捣毁、搜查和凌辱。反革命彻底地利用了阿列克辛斯基、潘克拉托夫、彼列维尔节夫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攻◇155◇击。反革命非常迅速地增长着。专政的中心是军事司令部。特务、士官生、哥萨克猖獗横行。逮捕和毒打到处发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的公开进攻，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气焰……

为了回答阿列克辛斯基及其伙伴们的诽谤，我党中央印发了“把诽谤者送交法庭！”的传单[57]。中央印发了关于停止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单张的宣言(宣言没有发表在“真理报”上，因为该报报馆已被捣毁)。令人惊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布尔什维克是孤立的。一切比布尔什维克右的分子，从苏沃林和米留可夫到唐恩和切尔诺夫，都默默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七月六日。各处桥梁都被旋开。出现了刽子手马祖连柯的混合大队。在街上，军队镇压不顺从的人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戒严状态。“嫌疑分子”被抓到司令部去。工人、士兵和水兵被解除武装。彼得格勒已经处在军阀控制之下。尽管“当权者”希望挑起所谓“战斗”，但是工人和士兵没有上挑衅的当，没有“应战”。彼得巴甫洛要塞给解除武装者打开了大门。混合大队占据了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在各个工人区进行着搜查和解除武装。策烈铁里于六月十一日第一次畏畏缩缩地表示出来的解除工人和士兵武装的思想，现在已付诸实施。工人愤怒地说他是“解除武装的部长”……

“劳动”印刷所被捣毁。“真理小报”出版。发卖“小报”的工人沃伊诺夫被杀害……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叫嚣，把对列宁同志的卑鄙诽谤说成是事实，并且它们攻击革命时已经不限于攻击布尔什维克，它们已经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苏维埃，扩大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了。◇156◇

很明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出卖了自己，出卖了革命，助长和纵容了反革命势力。反革命专政在后方和前线全力向自由进攻。昨天还在埋怨革命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和盟国的报刊，今天突然感到心满意足了。由此可以断定，本国的和盟国的资本家是参加了镇压的“事业”的。

二　结　论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没有一位同志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反对党中央的口号。中央提出了三个基本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监督生产，没收地主土地。这三个口号得到了工人群众和士兵的同情。这三个口号是正确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斗争，也就保证了群众对我们的拥护。我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央的基本事实。既然中央在最困难的关头提出了正确的口号，那就是说，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

批评所涉及的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是次要的问题。这些批评主要是说中央没有同地方取得联系，中央的活动主要是在彼得格勒。责备中央脱离地方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中央没有任何可能顾到全国各地。责备中央实际上变成彼得堡委员会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这是事实。但是，俄国的政策是在这◇157◇里，在彼得格勒锤炼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里。地方响应彼得格勒所做的事情。最后，这是因为掌握

着全部政权的临时政府在这里，作为整个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的喉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这里。另一方面，事变正在迅速发展，公开斗争正在进行，谁也不能断定现存的政权明天不会垮台。在这样的情形下，要等待我们地方的朋友发表意见是不行的。大家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革命问题是不等待地方的。他们掌握着整个政府机关。而我们呢？我们有中央委员会这个机关。中央委员会这个机关的力量当然是很弱的。要求中央没有预先征求地方的意见不要采取任何步骤，就等于要求中央不要走在事变的前面，而落在事变的后面。但这就不成其为中央了。只有运用我们一向采取的那种方法，中央才能担负得起自己的任务。

有些责难所涉及的是个别性质的问题。同志们说，七月三日至五日的起义失败了。是的，同志们，是失败了，可是这不是起义，而是游行示威。这次失败是因为背叛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变节行为破裂了革命战线。

别兹拉波特内依[58]同志说，中央没有努力把说明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的传单大量供应彼得格勒和地方。可是我们的印刷所已经被捣毁，也没有任何实际可能在其他印刷所印刷东西，因为这样就会使这些印刷所遭到捣毁。

但这里的情形还不算太坏：虽然在某些区我们遭到逮捕，而在另一些区我们却受到欢迎，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现在彼得堡工人的情绪很好，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也很高。◇158◇

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对我们领袖的诽谤。由于最近发生的事变，我们必须草拟一篇告全体人民的宣言来说明一切事实，为此应当选出一个委员会。如果你们选出这个委员会，那末，我建议这个委员会还要发表一篇报道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的告德英法等国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宣言，我们应当在这个宣言中痛斥诽谤者。我们是无产阶级最

先进的部分，我们对革命担负着责任，我们应当说明事变的全部真相并揭露卑鄙的诽谤者。

第二、关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回避出席“法庭”的问题。政权在谁的手里目前还没有明朗化。谁也不能担保他们出庭不会遭到粗暴的迫害。如果法庭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并担保不使用暴力，那又当别论。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当形势还没有明朗化，当正式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之间的暗斗还在进行时，让同志们出席“法庭”是根本不必要的。如果领导国家的是一个能够保证我们同志不受迫害的政权，那末他们就会出庭。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159◇

俄国的政治形势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命运的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胜败的问题。

早在二月里就已经很明显，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因战争而穿上军衣的农民。当时的情况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和这两支力量处在同一阵营内彷佛是和它们结成联盟的还有另外两支力量，即自由资产阶级和盟国资本家。

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死敌。

农民是信任无产阶级的，他们看到不推翻沙皇制度就得不到土地，所以跟着无产阶级走。

自由资产阶级对沙皇制度感到失望而离开了它，因为沙皇制度不仅没有替它夺到新市场，而且连旧市场也没有保住，把十五个省给了德国。

盟国资本家，即尼古拉第二的朋友和同情者也“不得不”背叛沙皇制度，因为沙皇制度不仅没有给他们保证他们所希望的“战线统一”，而且公然准备同德国单独媾和。

这样，沙皇制度陷于孤立了。

其实，这也说明为什么沙皇制度竟会如此“无声无臭地死去”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

但这些力量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自由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家想在俄国制造一个类似青年土耳其党所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的**革命，以鼓起人民大众的热情，然后利用这种热情来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样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的根基◇160◇就不会发生动摇。

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制造小规模的革命！

相反地，工人和农民的目的是要根本摧毁旧制度，进行我们所说的那种伟大的革命，以打倒地主并压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

伟大的革命与和平！

这个根本矛盾也就成了我国革命发展的基础，成了历次“政权危机”的基础。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危机”是这个矛盾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如果说在这几次“危机”史上胜利每次都是暂时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那末这不仅因为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战线组织得好，而且首先因为常常动摇到帝国主义方面去的、暂时还有广大群众的妥协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每次都破坏革命战线，投奔到资产阶级的阵营里，因而造成了反革命战线的优势。

四月的情形是如此。

七月的情形也是如此。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的“原则”实际上成了有害的工具，资本家和地主的立宪民主党利用它来孤立布尔什维克并假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逐步巩固自己的阵地……

三月、四月、五月这三个月的前线沉寂时期曾经被利用来进一步发展革命。在国内普遍破坏的推◇161◇动之下，在任何一个交战国所没有的那种自由的鼓舞之下，革命日益加深，把社会问题一一提到日程上来。革命侵入了经济领域，提出了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土地国有、供给无产农民以农具、组织城乡之间的合理的交换、银行国有以及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夺取政权等问题。革命已经逼近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

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末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一切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条件下的必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在德国，这个问题也已由实际生活提出来了，不过它的解决没有群众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我们俄国的情形不同。我国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在战争条件下都没有我国所具有的这种自由。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工人的高度组织性：例如我们彼得堡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最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显然，享有充分自由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杀，就不能拒绝积极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要求俄国在欧洲没有“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暂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可耻的迂腐之见了。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可能，那个国家就先“开始”……

革命既然向前迈进了这样一大步，它就不能不引起反革命分子的

警惕，它就必然要使反革命受到刺激。这是使反革命动员起来的第一个因素。◇162◇

第二个因素是由前线的进攻政策开始的冒险行为和使临时政府威信扫地并使反革命鼓舞起来去进攻政府的一连串的前线溃败。传说在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挑衅时期。前线的代表认为，无论进攻或退却，总之，前线发生的一切，都是用来准备践踏革命和推翻苏维埃的。我不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真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二日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三日开始七月事变，而四日就接到战线被突破的消息。多么凑巧！不能说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是由于对乌克兰问题通过的决议而引起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并不反对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有另一个事实也证明挑衅时期的确已经开始：我说的是乌克兰发生的互相射击的事件[59]。根据这些事实，同志们应当明白，战线被突破在反革命的计划中是要使革命思想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眼里破产的因素之一。

使俄国反革命力量加强起来的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盟国资本家。既然盟国资本家看到沙皇制度准备单独媾和而背叛过尼古拉政府，那末只要目前的政府无力保持“统一”战线，谁也就不能阻止他们和这个政府决裂。米留可夫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俄国在国际市场上被当做人力的供应者，并因此而获得金钱，如果事实表明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新政权无力保持进攻德国的统一战线，那末这样的政府也就不值得资助了。没有金钱，没有贷款，政府就一定要垮台。立宪民主党人在危机时期所以有很大的力量，其秘密就在这里。克伦斯基以及全体部长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手中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有盟国资本家的支持。

俄国面前曾摆着两条道路：◇163◇

或者停止战争，割断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财政联系，向前推进革命，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基础，开始工人革命的纪元；

或者走另一条道路，即继续战争，继续在前线进攻，服从盟国资本家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命令，那末结果就是完全依附于盟国资本家(在塔夫利达宫纷纷传说美国将供给八十亿卢布，将供给“恢复”经济的资金)，反革命获得胜利。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企图把七月三日和四日的发动说成武装叛乱，这简直是可笑的。七月三日，我们提出了革命战线统一起来反对反革命的建议。我们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也就是说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可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脱离资产阶级，于是离开了我们，这样就破坏了革命战线而满足了反革命分子的心愿。如果追究谁是造成反革命胜利的罪魁，那末罪魁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我们的不幸就在于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它暂时还跟着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走。而在群众对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思想还没有感到失望以前，革命总是会遭到挫折和阻难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将军的专政的图画。表面上和这个专政进行斗争而实际上执行着它的意志的政府，不过是替这个专政阻隔人民怒火的屏风而已。被削弱被凌辱的苏维埃只是以自己的无止境的退让政策给这幅图画添上了几笔。苏维埃现在没有被驱散，这◇164◇是因为“需要”它充当“必需的”和非常“方便的”掩护物。

可见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

我们的策略也应当改变。

从前我们主张使政权和平地转到苏维埃手里，并且我们推断：只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夺取政权的决议，资产阶级就会和平地让开道路。的确，在三月、四月和五月，苏维埃的每一项决议都被当做法律，因为每一次都可以用实力做决议的后盾。随着苏维埃被

解除武装并(在实际上)被降低到普通“职业”团体的地位，情况就改变了。现在谁也不理会苏维埃的决议。现在要夺取政权，必须先推翻现存的专政。

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这应当是党在目前的迫切的口号。

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

推翻目前的专政这一口号，只有在全国规模的新的强大政治高潮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国家发展的整个进程以及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土地、工人监督、和平、政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规定了这种高潮的必然性

高压手段不能解决革命的任何一个问题，只能使形势尖锐化。

新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城市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他们一旦胜利，就要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65◇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的措施都是假“社会主义者”之手实行的。反革命只有制造了这样的屏风才能再苟延一两个月。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七月三十一日)

第一点：“报告人想用什么样的战斗组织形式来代替工人代表苏维埃”，我的回答是，问题的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反对把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但是决定口号的不是革命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构成这一机关的血肉的那种内容。假如参加苏维埃的有立

宪民主党人，我们决不会提出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

现在我们提出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可见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把政权交给哪个**阶级**，问题在于苏维埃的成分。

苏维埃是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但苏维埃并不是革命组织的唯一形式。这是纯粹俄国的形式。在外国，起过同样作用的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市政厅，巴黎公社时期的国◇166◇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我们也想到过革命委员会。也许工人部能成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

但是应当弄清楚，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组织形式问题。

实际上，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人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专政的问题，而其余一切都好办，都会由革命的创造力创造出来。

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们在实践中将如何对待现存的苏维埃，答案是十分明白的。既然这里说的是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那这个口号已经过时了。而这里说的仅仅是这一点。推翻苏维埃的问题是臆造的。这里谁也没有这样提过。我们提议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苏维埃！”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但同时我们甚至没有退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它近来扮演着很可怜的角色。

地方苏维埃还能起作用，因为它们将来必须抵御临时政府的侵害，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将支持它们。

总之，我再说一遍，取消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打倒苏维埃！”“我们对那些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是十分同情的。愿这样的苏维埃永久存在并日益巩固。但是权力已经不在苏维埃手里。从前临时政府颁布一道法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颁布一道反法令，并且只有后者具有法律效力。请你们回忆一下颁布第一号命令[60]的经过情形。而现在临时政府已经不理会中央执行委员会◇167◇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没有撤销自己要参加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侦查

委员会的决定，可是因为克伦斯基下了一道命令而没有能够参加进去。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而在于推翻反革命专政。

第四点——给“贫苦农民”这个概念下个更具体的定义并指明他们的组织形式，我的回答是，“贫苦农民”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新术语。从一九〇五年起列宁同志就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用过这个术语，此后几乎每一号“真理报”都用过这个术语，在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能找到这个术语。

贫苦农民阶层是指那些和农民上层背道而驰的人。那个似乎“代表”八千万农民(连妇女在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农民上层的组织。农民下层对这个苏维埃的政策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当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切尔诺夫以及阿夫克森齐也夫等人建议农民不要立即夺取土地，而要等待立宪会议来总的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民对这一建议的回答是夺取土地，耕种土地，夺取农具，如此等等。我们从平兹、沃龙涅什、维切布斯克、喀山及其他许多省份都得到这样的消息。单单这一点就清楚地说明农村已经分化为下层和上层，说明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上层多半跟着社会革命党人走，下层没有土地就活不下去，因而采取反对临时政府的立场。下层就是指少地的农民，有一匹马或没有马的农民等等。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乎没有土地的半无产者阶层。

如果在革命时期不设法同这些农民阶层成立某种协议，那是愚蠢的。但是同时必须把雇农阶层单独组织起来，把他们团结在无产者的周围。◇168◇

这些阶层将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现在很难预言。现在农民下层有的组织在自动建立的苏维埃里，有的竭力夺取现存的苏维埃。例如大约一个半月以前在彼得堡建立了贫苦农民苏维埃（由八十个部队和许多工厂的代表组成），它对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政策正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苏维埃一般是最适宜的群众组织形式，但是我们不应当强调**机关**的形式，而应当指出**阶级内容**，应当力求使群众也能区别**形式和内容**。

一般说来，组织形式问题不是基本问题。革命高潮到来时，组织形式也会创造出来。不要让形式问题遮住政权应转归**哪个阶级**这个基本问题。

今后我们不能再和护国派联合了。护国派各政党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因此，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都联合起来的这个思想已经遭到破产。当前的问题是同贫苦农民阶层结成联盟来反对苏维埃的上层并肃清反革命。

五　结　论

（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首先我必须提出几点事实上的修正。◇169◇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驳斥我的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最有组织性这个说法时，指出了奥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同志们，我说的是“红色的”即革命的组织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不像俄国无产阶级有这样强的组织性。

安加尔斯基说我似乎在传播联合一切力量的思想。这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不同的原因，不仅农民和无产阶级，而且俄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也抛弃沙皇制度了。这是事实。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回避事实，那就不好了。后来前两种力量走上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道路，而后两种力量则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现在来谈问题的本质。布哈林把问题提得最尖锐，但是他也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布哈林硬说，帝国主义资产者同农夫结成了联盟。但是同哪种农夫呢？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农夫。同右的农夫的联盟是结

成了，可是我国还有下层的、左的、代表贫苦农民阶层的农夫。要知道同他们结成这种联盟是不可能的。他们并没有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是不自觉地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他们纯粹是受了欺骗而跟着别人走的。

联盟是反对谁的呢？

这一点布哈林没有说到。这是盟国资本家、俄国资本家、军官和以切尔诺夫型的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农民上层的联盟。这个联盟是成立起来反对农民下层和反对工人的。

照布哈林看来前途如何呢？他的分析根本不正确。在他看来，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实行的是农民革◇170◇命。但是，要知道农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会师，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汇合在一起。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同时为其本身的要求而斗争。因此，我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布哈林认为第二阶段是在西欧支持下的、没有农民参加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已经心满意足)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反对谁呢？布哈林在他的儿戏般的方案中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回答。此外再没有人对事变进行另一种分析。

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正因为如此，现在不能“随便”把政权交给它。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61]中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不存在，因为全部政权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现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那就是唐·吉诃德式的举动。

从前不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可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可是现在甚至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就是把所有的苏维埃都夺过来，你们还是得不到政权！

在进行区杜马选举时，我们嘲笑过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当时

只是一个获得百分之二十选票的非常可怜的集团。现在他们嘲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纵容之下，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里了。

同志们急于解决组织政权的问题。可是要知道你们还没有什么政权呀！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推翻**现存政权的必要性。我们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必须◇171◇准备好。

应该使工人、农民和士兵懂得，不推翻目前的政权，他们就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土地！

总之，当前的问题不是组织政权的问题，而是推翻政权的问题，一旦我们取得政权，我们一定能把它组织好。

现在我用几句话来答复安加尔斯基和诺根两人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还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们就说过，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刻已经来到（宣读四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决议的结尾）：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内，在小农居民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实行若干实际上业已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的迫切性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而在实践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这两位同志落后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小资产阶级分化了，下层正在离开上层，无产阶级正在组织起来，破坏日益加剧，因而更加迫切地把实行工人监督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如在彼得堡、顿巴斯等地）。这一切都证明还在四月就已经通过的决议中的原理是正确的。而这两位同志却拉我们后退。◇172◇

关于苏维埃。我们取消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旧口号，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苏维埃。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苏维埃中，甚至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掩护反革命的机关中进行工作。虽然现在苏维埃仅仅是团结群众的机关，但是我们是永远和群众在一起的，只要不赶我们，我们是不会退出苏维埃的。要知道我们也留在工厂委员会和地方自治机关中，虽然它们并没有掌握政权。不过我们留在苏维埃里，就要继续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策略。

在反革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我国资产阶级和盟国资本家的联系之后，已经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我们应该依靠三种力量：俄国无产阶级，我国农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因为我国革命的命运同西欧的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驳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八月三日）

斯大林宣读决议第九条：

九、“那时这些革命阶级的任务将是竭尽全力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然后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173◇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提议决议的结尾改用另外的词句：“然后引导政权走向和平，并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采用起草委员会的词句，那就会同布哈林提出的业已通过的决议发生分歧。

斯大林：我反对做这样的修改。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条件下像俄国一样具有这样的自由，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此外，我国

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在西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面对面孤军作战的，我国工人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最后，德国的国家权力机关要比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完善的机关优越得多，并且我国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欧洲资本的纳贡者。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主席：现在表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修正案。没有通过。①

第一次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一九一九年“共产党人”出版社版◇174◇

———————————————

① 鉴于在代表大会两年后才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过于简短和显然不完全，编辑部认为在确定斯大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文时，除利用“记录”外，还必须参看与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有关的公报，这些公报曾经分别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和八月的“工人和士兵报”第七号、第十四号和“无产者报”第三号。——著者注

列宁 1917 年 8 月在芬兰使用的证件

列宁和斯大林在拉兹里夫湖畔（画）

斯大林领导党中央机关报工作

资 本 家 要 什 么?

全俄工商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几天前在莫斯科开幕了。民族主义者的首领，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在开幕词中发表了纲领性的演说。

列布申斯基说了些什么呢？

资本家的纲领是怎样的呢？

工人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尤其是现在，当资本家操纵政权，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当做“有生力量”向他们献媚的时候。

因为资本家是工人的死敌，而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认清敌人。

那末，资本家要什么呢？

*　　*　　*

政权在谁手里？

资本家不是空谈家。他们是讲实际的人。他们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以，◇175◇列布申斯基在演说中首先讲到这个基本问题是不足为奇的。

他说：“我们的临时政府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政权，实际上是处在局外人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支配着我国的是一伙政治骗子。苏维埃的冒牌人民领袖把人民引上了死亡的道路，因此，整个俄罗斯国家已经站在万丈深渊的边缘。”（“言论报”）

说“实际上支配着我国的是一伙政治骗子”，这当然是对的。但另外一点同样也是对的：这些“骗子”不应当在“苏维埃的领袖”中间去寻找，而应当在列布申斯基之流中间，在列布申斯基的朋友们中

间去寻找。列布申斯基的朋友们在七月二日退出了临时政府，接连几个星期在部长职位问题上讨价还价，以停止贷款给政府的威胁来恫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蠢才们，并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迫使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

因为指使政府逮捕和捣毁、枪杀和施行死刑的是他们这伙“骗子”，而不是“苏维埃的领袖”。

因为对政府施以“压力”，把政府变成替自己阻隔人民怒火的屏风的是他们这伙“骗子”。

因为“现在实际上支配着”俄国的是他们这伙“骗子”，而不是“苏维埃的”没有权力的“领袖”。

但是，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昨天还受资本家阿谀奉承而现在已经被击溃的苏维埃还保持着一点点政权，现在资本家想把苏维埃最后的这一点点政权也夺去，以便更加巩固自己的政权。◇176◇

这就是列布申斯基先生首先谈到的问题。

你们想知道资本家要什么吗？

全部政权归资本家，——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 * *

谁在毁灭俄国？

列布申斯基不仅谈到现在。他也不反对“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结果怎样呢？他在“总结”时发现了一点：“我们已经走到一个无法逃脱的绝境……粮食情况已经恶化到极点，俄国的经济和财政生活已经陷于混乱状态等等。”

原来这些都要归咎于苏维埃中的“同志们”，归咎于那些必须“加以管制”的“浪费者”。

“俄国的大地正由于他们同志般的拥抱而呻吟，现在人民还不了解他们，可是一旦了解了，人民就会说：‘人民的骗子！’”

说俄国已经被驱入绝境，说它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说它已经濒于毁灭，这当然是对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

(一)在战前，俄国的粮食有剩余，我们每年输出四亿到五亿普特粮食，而现在，在战争期间，我们却缺少粮食，我们不得不挨饿。◇177◇

(二)在战前，俄国的国债是九十亿卢布，每年支付的利息共四亿卢布，但是在三年的战争期间，国债达到了六百亿卢布，仅利息一项每年就要支付三十亿卢布。

把俄国驱入绝境的是战争，而且仅仅是战争，这不是很明显吗？

可是，把俄国推上战争道路、现在又把俄国推上继续战争的道路的不是列布申斯基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和维纳维尔之流又是谁呢？

俄国有很多“浪费者”，他们在毁灭俄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样的人不应当在“同志们”中间去寻找，而应当在列布申斯基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这些靠军事定货和国债大发横财的资本家、银行家中间去寻找。

俄国人民一旦认清他们，就会严厉地惩办他们，这一点他们是可以确信的。

但是，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资本家渴望把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战争进行到底”，可是又害怕对战争的后果负责，因此，他们竭力把罪过推到“同志们”身上，以便更容易地把革命淹没在战争的浪潮里。

这就是列布申斯基先生在演说中所追求的。

你们想知道资本家要什么吗？

把战争进行到完全战胜革命为止，——他们要的就是这个。◇178◇

* * *

谁在出卖俄国？

列布申斯基描述了俄国的危急情况之后，指出了一条“摆脱现状的出路”。但是，请听这是一条怎样的“出路”：

“国家既没有给居民面包，也没有给煤炭和布疋……要摆脱现状，也许需要饥饿的魔掌和人民的贫困来扼杀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

你们听：“**需要**饥饿的魔掌和人民的贫困……”

原来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先生们不惜赐给俄国“饥饿”和“贫困”来“扼杀”“民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

原来他们不惜关闭工厂，造成失业和饥荒来挑起人民的为时过早的战斗，从而更顺利地镇压工人和农民。

请看，这就是被“工人报”和“人民事业报”评定为我国“有生力量”的那些人。

请看，这就是俄国的真正的卖国贼和叛徒。

在俄国，现在人们纷纷谈论卖国。从前的宪兵和现在的特务、无能的佣仆和靠妓女维生的淫棍现在都在写文章大骂卖国，并示意说卖国的是“民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要让工人们知道，他们那些大骂卖国贼的谎话，无非是掩护多灾多难的俄国的真正的卖国贼！◇179◇

你们想知道资本家要什么吗？

保证自己腰包的利益，即使以毁灭俄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十三号
社论 ◇180◇

反 对 莫 斯 科 会 议[62]

反革命的发展正进入新阶段。它正由捣毁和破坏转向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由横行霸道和为非作歹转向“宪政建设”的“合法轨道”。

反革命分子说，能够而且必须战胜革命。可是这还不够，还必须使这一点得到赞同。并且必须做到使这一点得到“人民”、“国民”自己的赞同，不仅在彼得堡或前线得到赞同，而且在全俄国得到赞同。那时胜利才会巩固。那时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才能成为反革命的未来新胜利的基础。

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可以迅速召开作为全俄人民的唯一代表的立宪会议，请它赞同战争和破坏、捣毁和逮捕、毒打和枪杀的政策。

但是资产阶级不同意这样做。他们知道，在农民占多数的立宪会议上，他们既不能使反革命政策得到承认，也不能使它得到赞同。

因此，他们力求做到(已经做到了！)延期召开立宪会议。他们今后大概还会使它再度延期，以便最后达到完全破坏立宪会议的目的。◇181◇

可是“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就在于以“莫斯科会议”代替立宪会议。

“出路”就在于以“莫斯科会议”代替立宪会议而使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

召开商人和工业家、地主和银行家、沙皇杜马议员和已经驯服的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的会议，把这个会议宣布为“全国会议”，使它赞同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政策，并把战争的重担转嫁到工人和农民的肩上，——这就是反革命的“出路”。

反革命需要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中央机关，并且它正在建立这样的机关。

反革命需要“社会舆论”的信任，并且它正在制造这种信任。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在这方面，反革命正走着革命所走的道路。它在向革命学习。

过去革命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真正的中央机关，所以它感到自己是有组织的。

现在反革命力图建立自己的议会，它正假手(命运真会捉弄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俄国的心脏莫斯科建立这种议会。

与此同时，革命的议会已经沦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普通附属品，决死的战争已经向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宣布了！

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八月十二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必然变成反革命反对工人(用同盟◇182◇歇业和失业威胁他们)、反对农民(“不给”他们土地)、反对士兵(剥夺他们在革命时期所获得的自由)的阴谋机关，变成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支持这个会议)的“社会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阴谋机关。

所以先进工人的任务是：

(一)摘下这个会议的人民代表的假面具，揭露它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质。

(二)揭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挽救革命”的幌子掩饰这个会议并欺骗俄国各族人民的行为。

(三)组织群众大会，抗议“挽救”……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救星们”的这种反革命诡计。让革命的敌人知道，工人决不会受骗，他们决不会放弃革命的战斗旗帜。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十四号
社论 ◇183◇

再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63]

战争正在进行。它那血腥的车轮正可怕地不断地滚动。它一步步由欧洲的战争变成全世界的战争，把愈来愈多的国家卷入自己的卑鄙勾当。

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正在垮台并失去自己的意义。

调和派所宣布的“为和平而斗争”和对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施以“压力”的策略变成了“空话”。

调和派想用各国“护国主义多数派”之间达成协议的方法来加速结束战争和恢复工人国际的企图遭到了完全的破产。

包藏着种种帝国主义阴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斯德哥尔摩计划，必然变成软弱无力的示威，或是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手中的玩物。

现在谁都清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周游欧洲[64]和护国派举行盛大宴会款待英法社会帝国主义代表们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外交手腕，并不是恢复工人国际友谊的道路。

我们党做得对，它还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就同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划清了界限。

战争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局势必然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必然导向大规模的社会搏斗的时代。◇184◇

应当在这里，而且仅仅应当在这里寻找消灭战争的民主道路。

有人说英法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见解已经有了“进化”，说他们已经决定去斯德哥尔摩等等。

可是，难道这能改变事态吗？难道俄国和德奥两国的社会爱国主

义者不是也曾决定(比英法社会爱国主义者更早！)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吗？谁能断定说他们的这种决定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呢？

难道决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谢德曼的党已经不再支持自己的那个举行进攻的、侵略加里西亚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了吗？

难道谈论“为和平而斗争”、谈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列诺得尔的党和韩德逊的党不是同时又在支持自己的侵略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的政府吗？

面对这些事实，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谈论**对于消灭战争能有什么意义呢？

用好听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坚决支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行为，——谁不知道这一套帝国主义欺骗群众的老而又老的手段呢？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比较起来已经有了改变，因此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态度也应当改变。

是的，情况改变了，但是这种改变不是有利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而是完全不利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85◇

首先，改变的是：战争已经从欧洲的变成全世界的，它把总危机扩大和加深到极点了。

因此，实现帝国主义的和平和实行对各国政府施以“压力”的政策的可能性就降低到最小限度了。

其次，改变的是：俄国已经走上前线进攻的道路，它以压制自由来使国内生活适应于进攻政策的要求。因为终究应当明白，进攻政策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不兼容的，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还在六月间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布尔什维克“变成了”狱中的“囚犯”，而护国派则变成了进攻派，扮演了狱卒的角色。

因此，“为和平而斗争”的拥护者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如果说从前可以谈论和平，不怕别人揭露这种谎话，那末现在，在实行了“护国派”所支持的进攻政策之后，“护国派”嘴里喊出来的和

平词句就等于一种讽刺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斯德哥尔摩关于和平的“同志般的”**谈论**和前线的流血**事实**是绝不相容的，说明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十分明显了。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破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

因此，我们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态度也有些改变。

从前我们揭露过斯德哥尔摩计划。现在未必值得去揭露了，因为它自己揭露了自己。◇186◇

从前对它应当加以痛斥，应当指出它是欺骗群众的和平把戏。现在未必值得去痛斥它了，因为好汉是不打落水狗的。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斯德哥尔摩的道路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走向和平的道路不是经过斯德哥尔摩，而是经过工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十五号
社论 ◇187◇

莫斯科会议把俄国引向何处？

逃出彼得格勒

莫斯科会议开幕了。它不是在彼得格勒，不是在革命的中心开幕的，而是远离革命中心，在“莫斯科这个寂静的地方”开幕的。

在革命的日子里，重要的会议通常都是在彼得格勒这个推翻了沙皇制度的革命堡垒召开的。当时人们并不害怕彼得格勒，当时人们都很亲近它。但是现在，革命的白昼已经被反革命的黄昏代替了。现在彼得格勒成了危险的地方，现在人们害怕它，像害怕瘟疫一样，于是……都躲避它，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跑得远远地，跑到莫斯科去，“那里不这样不安宁”，在反革命分子看来，那里是最便于干自己的卑鄙勾当的。

“会议将在莫斯科的旗帜下进行，莫斯科的思想，莫斯科的情绪是和腐烂的彼得格勒这个给全俄国传染毒素的痈疽离得很远的。”（八月十一日“晚间报”）

反革命分子是这样说的。

“护国派”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188◇

——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国家的救星们”从彼得格勒逃走的时候悄悄地说。

——滚你们的吧，——革命的彼得格勒回答他们说。

——抵制你们的会议，——彼得格勒工人追着他们喊道。

而莫斯科呢？它会满足反革命分子的愿望吗？

看样子是不会的。报纸上满篇都是莫斯科总罢工的消息。莫斯科

工人宣布了罢工。和彼得堡的工人一样，莫斯科的工人也在抵制会议。莫斯科并不落后于彼得格勒。

莫斯科工人万岁！

怎么办，再跑吗？

从彼得格勒跑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又跑到哪里去呢？

也许跑到察聊沃柯克塞斯克去？

凡尔赛分子先生们的大事不好了，不好了……

*　　*　　*

从会议到“长期国会”[65]

“救星”先生们在筹备莫斯科会议时，曾装做他们是在召集一个不决定任何问题、不叫人担负任何义务的“普通会议”。但是，这个“普通会议”渐渐变成了“国务会议”，后来又变成了“最高会议”，◇189◇而现在竟有人肯定地说要把会议变成决定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的“长期国会”。

捷列克哥萨克军队的首领卡拉乌洛夫说：“如果在莫斯科会议上不形成一个统一全国的中心，那末俄国的前途将是悲惨的。然而我认为这样的中心一定会建立起来……而如果……这样的据点出现了，那末莫斯科会议就不仅将成为有生命力的机关，而且将有可能像克伦威尔时代的‘**长期国会**’那样极为长久而光辉地存在下去。在我来说，作为哥萨克的代表，我将以各种方法竭力促使建成这样一个统一全国的中心。”（八月十一日“俄罗斯新闻”晚刊）

“哥萨克的代表”是这样说的。

莫斯科会议是“统一”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卡拉乌洛夫冗长演说的简单内容就是如此。顿河哥萨克在给自己代表的委托书中也是这样说的：

“政府应当由莫斯科会议或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来组织，而不应当像从前那样由某个政党来组织。应当让这样的政府有全部的权力和独立性。”

顿河哥萨克的军人会议是这样说的。

现在谁不知道“哥萨克就是力量”呢？

不容置疑，除非会议不召开，否则它必将变成反革命的“长期国会”。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集了会议，也就帮助了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190◇

事实就是这样。

* * *

他们是什么人？

这些反革命的头子，他们是什么人呢？

首先是军阀，是上层军官，他们掌握着一些哥萨克和佩带乔治勋章的军人。

其次是我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它的首脑是列布申斯基，就是那位以“饥饿”和“贫困”来胁迫人民放弃自己要求的列布申斯基。

最后是那个联合将军和工业家来反对俄国人民和反对革命的米留可夫党。

这一切，在八月八日至十日举行的将军、工业家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预备会议”[66]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交易所报”写道：“大家都在谈论科尔尼洛夫将军。**以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为首的所谓军人党的代表和哥萨克联合会的代表在会议上占优势**。阿列克谢也夫将军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说受到会议的热烈欢迎，这篇演说将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再讲一次。”（八月十一日“交易所晚报”）

这就是米留可夫提议把它单张印发的那篇演说。◇191◇

其次：

“卡列金将军非常引人注目。大家特别注意他并倾听他的谈话。全部军界人士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八月十一日“晚间报”）

最后，大家都知道那些已被打倒的和还没有被打倒的将军们率领的佩带乔治勋章的军人和哥萨克联合会所发出的最后通牒。

并且最后通牒立刻就被执行。因为军人是不喜欢“讲废话”的。

不容置疑，事情正向确定和建立军事专政的方向发展。

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将“仅仅”从金钱方面来支持它。

难怪“布卡南爵士”这样“关心会议”（见“交易所报”），似乎他也打算到莫斯科去。

难怪米留可夫先生的好汉们都洋洋得意。

难怪列布申斯基感到自己是“挽救”……的米宁。

*　　*　　*

他们要什么？

他们要的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请听听预备会议的决议吧。

“让军队中的纪律恢复起来，让权力转到指挥人员手中。”◇192◇

换句话说，要压制士兵！

“让统一而坚强的中央政权取消合议制机关的不负责任的管理制度。”

换句话说，打倒工农苏维埃！

让政府“坚决地断绝对任何委员会、苏维埃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切依赖关系”。

换句话说，让政府仅仅依赖哥萨克的“苏维埃”和佩带乔治勋章的军人的“代表们”。

决议断言，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挽救俄国”。

看来是很明显了。

那末，妥协派先生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同意和“有生力量”的代表们成立协议吗？

也许你们已经改变了主意？

不幸的妥协派……

* * *

莫斯科的呼声

莫斯科正进行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各报报道说，莫斯科已经不顾至今还给人民的敌人当尾巴的全俄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开始了总罢工。◇193◇

执行委员会真可耻！

莫斯科的革命无产阶级万岁！

让我们莫斯科的同志们发出更有力的呼声来使一切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们欢欣鼓舞吧！让全俄国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准备用胸膛捍卫革命的事业。

莫斯科在罢工。莫斯科万岁！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无产者报”创刊号
社论 ◇194◇

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

在革命和民主改革的时期，运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进行的。

农民从地主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了。工人从工厂当局的任意蹂躏下解放出来了。士兵从将军的专横暴戾下解放出来了……

这种解放的过程也不能不触及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着沙皇制度压迫的俄国各民族。

民族“平等”的法令的颁布和民族限制的实际取消，乌克兰人、芬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代表大会和关于联邦共和国的问题，民族自决权的郑重宣布和“不加阻挠”的官方许诺，——这一切都说明俄国各民族展开了伟大的解放运动。

这是革命时期的事情，当时地主退出了舞台，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处于民主派的压力之下。

随着地主(将军们！)的重掌政权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取得胜利，情形完全改变了。

关于自决的“伟大言词”和“不加阻挠”的庄严许诺被遗忘了。制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甚至直接干涉各民族的内部生活。解散了芬兰议会[67]并威胁说：“如果需要的话，将宣布芬兰戒严。”(八月九日“晚间报”)对乌克兰拉达和书记处[68]展开了进攻，这显然是企图使乌克兰的自治失去领导。◇195◇

同时采用了挑拨民族冲突和罪恶地诬蔑为“叛逆”这种卑鄙的老手段，以便把反革命沙文主义的势力发动起来，使民族解放的思想淹没在血泊中，在俄国各民族之间挖掘一道鸿沟，播下互相敌视的种子，从而使革命的敌人拍手称快。

这样就给这些民族联合为统一友爱大家庭的事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因为不言而喻，对各民族“寻衅”的政策不能联合而只能分散各民族，加强它们的“分离”趋势。

因为不言而喻，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有使俄国“解体”的危险，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如此假仁假义地大声疾呼反对这种“解体”。

因为不言而喻，挑拨民族冲突的政策是卑鄙的政策，它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猜疑和敌视，分裂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破坏革命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同情那些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的没有充分权利的被压迫民族。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把我们的矛头对准那些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实行帝国主义兼并和强迫“联合”的政策的人。

我们完全不反对把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决不主张把大国分裂成小国。因为不言而喻，把小国联合为大国是促进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之一。

我们坚决主张这个联合是**自愿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才是真正的和巩固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承认俄国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以至有从俄国◇196◇分离出去的权利。

其次，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种口头上的承认，立即让各民族在其立宪会议上确定它们的领土和政治组织形式。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为各民族真正联合的事业开辟道路。

毫无疑问，俄国各民族不会是绝无过错的，它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向它们，首先是向它们的无产者指出这些错误，力求用批评的方法，用说服的方法来纠正这些错误。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对各民族的内部

生活**强加**干涉和以**强力**“纠正”它们的错误。各民族有全权处理自己的内部生活，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革命所宣布的、现在被反革命所践踏的俄国各民族的基本要求。

当反革命还掌握政权的时候，要实现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革命胜利，——这是俄国各民族摆脱民族压迫的唯一道路。

结论只有一个：摆脱民族压迫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这就等于使俄国各民族从民族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197◇

或者俄国各民族支持工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那末它们将得到解放；或者它们不支持这个斗争，那末它们就看不到自己的解放，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无产者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198◇

两 条 道 路

目前形势的基本问题是战争问题。经济破坏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和政治自由，——所有这些都是战争这一个总问题的局部问题。

粮食恐慌是怎样引起的呢？

——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了运输业，使城市得不到粮食。

财政经济的破坏是怎样引起的呢？

——永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俄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前线和后方的高压手段是怎样引起的呢？

——战争和进攻政策要求“铁的纪律”。

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呢？

——战争的整个进程还需要数十亿的巨款，而在没有消灭革命的基本成果之前，盟国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本国资产阶级拒绝给以贷款。

如此等等。◇199◇

因此，解决了战争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目前窒息着国家的一切“危机”。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俄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或者继续战争，继续在前线“进攻”，那末就必然把政权交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便通过内债和外债获得金钱。

这样的“救”国就是靠榨取工人和农民(间接税！)来支付战费，以博得俄国和盟国帝国主义豺狼的欢心。

或者把政权交给工人和农民，宣布民主的和平条件并停止战争，以便把革命向前推进，把土地交给农民，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用

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来整顿崩溃着的国民经济。

这样的救国就是使工人和农民摆脱战争的财政重荷，使帝国主义豺狼受到损害。

第一条道路将导致地主和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政，使国家担负极其繁重的捐税，把俄国一块一块地逐渐卖给外国资本家(租借！)，使俄国变为英美法三国的殖民地。

第二条道路将开辟西方工人革命的纪元，冲破束缚俄国的财政罗网，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为俄国的真正解放扫清道路。

这就是反映两个对立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利益的两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00◇

这两条道路是无法调和的，正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调和一样。

同资产阶级妥协(联合)的道路注定了必然要破产。

护国派先生们关于莫斯科会议写道：“在民主政纲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这就是出路。”(“消息报”[69])

——不对，妥协派先生们！

你们同资产阶级建立过三次联合，每一次都碰到新的“政权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道路是掩盖目前形势中的痈疽的骗人的道路。

因为联合不是变成空话，就是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假手“社会主义者”来巩固自己政权的工具。

曾经企图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目前的联合政府，难道后来不是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吗？

“莫斯科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在确立反革命的阵地之后去取

得“国人”对这一步骤的赞同(并获得贷款！)又是为了什么呢？

克伦斯基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忍受“牺牲”和实行“阶级自制”(当然是为了“祖国”和“战争”)，归结起来，这篇演说不是为了确立帝国主义又是为了什么呢？

普罗柯坡维奇声明说，政府“决不允许工人干预(工人监督！)企业管理”，这是什么意思呢？◇201◇

同一位部长又声明说，“政府在土地问题方面决不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这是什么意思呢？

涅克拉索夫声明说，“政府不同意没收私有财产”，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直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事业效劳又是什么呢？

联合仅仅是合乎米留可夫之流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假面具，这不是很明显吗？

妥协的道路和在各阶级之间随风转舵的道路是欺骗和愚弄群众的道路，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妥协派先生们！已经到了不应当再有动摇和妥协的时候了。在莫斯科，人们已经肯定地说反革命分子正在制造“阴谋”。资产阶级报刊正在试用它们那种惯用的欺诈伎俩，散布“放弃里加”[70]的谣言。在这样的时刻应该有所抉择。

或者拥护无产阶级，或者反对无产阶级。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正在抵制“会议”，他们号召走上真正挽救革命的道路。

倾听他们的呼声吧，不然就让开道路。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无产者报”第二号
社论 ◇202◇

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莫斯科会议闭幕了。

既然“两个对立的阵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既然米留可夫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了“血战”，既然“战斗”已经结束，伤兵已经抬走，那末请问：莫斯科“会战”的结果如何呢？谁胜谁败呢？

立宪民主党人心满意足，得意洋洋。“他们说，人民自由党可以自豪了，因为它的口号……已经被承认为……全民的口号。”（“言论报”）.

护国派也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在谈论“民主派的(应读为护国派的！)胜利”，他们断言“民主派经过莫斯科会议更加巩固了”（“消息报”）。

在会议上，米留可夫在“有生力量”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说道：“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策烈铁里回答说，我们正在这样做，因为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特别法令已经实施”。不过“革命(应读为反革命！)还没有和左的危险作斗争的经验”，让我们积累一些经验吧。

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逐渐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比一下子消灭好，并且不要直接干，不要自己动手，要假手于他人，假手于那些“社会主义者”护国派。◇203◇

卡列金将军在“有生力量”代表们的掌声中说道：必须“取缔委员会和苏维埃”。

策烈铁里回答他说，对，可是还嫌太早，因为“在自由革命(应读为反革命！)的大厦还没有建成之前，这些脚手架还不能拆掉”。让我们把大厦“造成”，以后苏维埃和委员会就会完蛋！

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委员会和苏维埃贬为帝国主义机器的普通附属品比一下子消灭它们要好些。

结果是“大家称心”和“满意”。

难怪报纸上写道：“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和立宪民主党人部长们比会议以前更加团结一致了。”（“新生活报”）

你们会问，得胜的是谁呢？

得胜的是资本家，因为政府在会议上已经答应“不允许工人干预(监督！)企业管理”。得胜的是地主，因为政府在会议上已经答应“在土地问题方面不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

得胜的是反革命将军，因为莫斯科会议已经赞同施行死刑。

你们会问，得胜的是谁呢？

得胜的是反革命，因为它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把国内一切“有生力量”如列布申斯基和米留可夫、策烈铁里和唐恩、阿列克谢也夫和卡列金之流团结在自己周围。

得胜的是反革命，因为它已经控制了所谓“革命民主派”，把它变成阻隔人民怒火的方便的屏风。◇204◇

现在反革命分子不孤立了。现在整个“革命民主派”都为他们效劳。现在他们控制着“俄罗斯大地”的“社会舆论”，而护国派先生们还将“不断地”制造这种“社会舆论”。

反革命登极加冕，——这就是莫斯科会议的结果。

现在大谈“民主派的胜利”的护国派，甚至没有想到他们简直当了奴才，为高奏凯歌的反革命分子效劳。

策烈铁里先生所“祈求”的、米留可夫先生们毫不反对的“诚意联合”，其政治意义就是如此，并且仅仅是如此。

护国派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有生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莫斯科会议的总结就是如此。

护国派能把这个反革命的“联合”维持多久，最近的将来就会见分晓。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无产者报”第四号
社论 ◇205◇

前线我军失败的真相

下面我们刊载了两篇具有文件性质的文章的摘录，这两篇文章是论述前线我军七月失败的原因的。

这两篇文章——不论阿尔谢尼·麦利奇的文章(载于“人民事业报”)或弗·波利索夫的文章(载于“新时报”[71])，都竭力撇开卑鄙小人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廉价的责难而公正地研究七月的失败。

因此，他们所承认的和论述的就更有价值。

阿·麦利奇的文章所谈的主要是失败的**罪魁**问题。原来罪魁是“从前的巡警和宪兵”，首先是那些不知是谁的“什么汽车”，这些汽车在防卫塔尔诺坡里和切尔诺维茨的军队中穿来穿去，命令士兵退却。这是些什么汽车，指挥官怎么能容许这种公开的煽动，——可惜作者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他明确而肯定地说**“退却是被煽动的”**，**“叛变是按照事先充分考虑过的周密计划演出的”**，并说调查正在进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而布尔什维克呢？“布尔什维主义的叛变”呢？◇206◇

关于这一点，阿·麦利奇的文章只字未提！

载于“新时报”的弗·波利索夫的文章更值得注意。这篇文章所谈的与其说是失败的罪魁，不如说是失败的**原因**。

这篇文章公开声明要**“取消那种说布尔什维主义造成我军失败的无稽责难”**，说问题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必须查明并加以消除的。而这些原因是什么呢？这首先就是在我们的“将军经验差”、我们的军队“物资”不足、我们的士兵缺乏组织性的情况下，进攻策略对我们不适宜。其次是“门外汉”(没有经验的人)的干预，他们坚持实行进攻并终于在六月里使进攻实

现了。最后是政府执行盟国的必须进攻的意见的决心过强，没有考虑前线的实际情况。

简单地说，“我们”对进攻在各方面没有准备，致使这次进攻变成了流血的冒险。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和“真理报”所屡次警告(这曾使他们受到别人任意攻击)的那一切，现在都证实了。

昨天还在责难我们造成前线失败的人，现在就是这样说的。

“新时报”从战略方面和其他方面进行了揭露，认为现在必须“取消那种说布尔什维克造成我军失败的无稽责难”。我们对这种揭露和见解决不引为满足。

同样，我们也决不认为阿·麦利奇的报道是详尽无遗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既然官方的报纸“人民事业报”已经认为再不能绝口不谈失败的真正罪◇207◇魁，既然甚至(甚至！)昨天还在责难布尔什维克造成失败的苏沃林的“新时报”今天已经认为必须“取消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那末这就说明口袋里是藏不住锥子的，说明失败的真相太明显，使人无法保持沉默了，说明被士兵们自己揭露出来的失败的罪魁的真相眼看就要打到责难者自己的脸上，再不作声就等于自招灾祸了……

显然，革命的敌人(如“新时报”的先生们)所捏造的并得到革命的“朋友”(如“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支持的那种硬说布尔什维克是失败的罪魁的责难**已经彻底失败了**。

因为这个缘故，并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先生们现在才决意谈到失败的**真正**罪魁。

这些先生们很像那些最先离开就要沉没的轮船的聪明的老鼠，难道不是这样吗？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有人向我们说，前线失败的事情正在调查，而且断言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但是，怎能保证调查的结果不会束之高阁，调查会客

观地进行，而罪犯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呢？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提议是：**要使士兵自己的代表参加调查委员会**。

只有他们参加才能保证真正揭露出“被煽动的退却”的罪魁！

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此。

有人向我们谈到失败的原因时提议不要重犯旧“错误”。但是怎能保证“错误”是真正的错误，而不是“事先充分考虑过的计划”呢？谁能担保在“煽动”放弃塔尔诺坡里之后，不会再“煽动”放弃◇208◇里加和彼得格勒，以破坏革命的威信，然后在革命的废墟上确立可恨的旧制度呢？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由士兵自己的代表监督他们长官的行动，立即撤换一切可疑分子**。

只有这样的监督才能保障革命不受到大规模的罪恶的挑衅。

第二个结论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无产者报”第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209◇

论前线七月失败的原因

大家都记得那些无稽地责难布尔什维主义造成前线失败的恶毒诽谤。资产阶级的报刊和“人民事业报”、“交易所报”的挑拨分子和“工人报”、“新时报”的曾为沙皇效劳的奴才们和“消息报”——他们都曾一致希望霹雷打在被宣布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的布尔什维克的头上。

现在判明，**罪魁**不应当在布尔什维克中去寻找，而应当在那些出动了“神秘的汽车”号召退却并在士兵当中制造惊惶的人们中去寻找(见八月十六日“人民事业报”)。

这是些什么“汽车”，听任这些神秘的汽车东冲西撞的**指挥官在什么地方**，——可惜“人民事业报”的记者对于这一点只字未提。

现在判明，失败的**原因**不应当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更深刻的原因”中去寻找，应当在进攻策略对我们不适宜、我们对进攻无准备、“我们的将军经验差”等等方面去寻找(见八月十五日“新时报”)。

让工人和士兵读读并且反复地读读上述两天的“人民事业报”和“新时报”吧，他们读了就会相信：

(一)布尔什维克是多么正确，他们早在五月底就警告不要在前线进攻(见“真理报”)；◇210◇

(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们的行为是多么罪恶，他们鼓动进攻，并在六月初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否决了布尔什维克反对进攻的建议；

(三)七月失败的责任首先应该由米留可夫之流和马克拉柯夫之流、

叔尔根之流和罗将柯之流担负，他们早在六月初就以国家杜马的名义“要求”在前线“立即进攻”。

下面就是上述两篇文章的摘录：

（一）阿尔谢尼·麦利奇的文章的摘录（八月十六日“人民事业报”）：

“为什么？为什么在塔尔诺坡里和切尔诺维茨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发生了这种不幸？为什么驻守在那里的各个团队的士气突然低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情绪上突然变化的原因何在？军官和士兵都很愿意回答。他们的回答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每个人的回答都在细节上给这幅惊心动魄的图画添上鲜明的几笔……

前线上的人认为，制造惊惶和使前哨部队一哄而退的主要祸首是**从前的巡警和宪兵**。

他们的活动是不是有组织的呢？

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准尉，社会革命党党员，地方兵工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回答说：很难说，不过每一次总是判明，制造恐怖和散布荒谬情报的人**都是从前的‘法老’**[①]，他们说敌人已经逼近，说敌人为数众多，说再过一二小时敌人就要向我们施放窒息瓦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认为这些从前的巡警和宪兵还**不是自觉的叛徒，不过是些‘自私自利的人’，不过**◇211◇**是些胆小鬼**。而那些神出鬼没的间谍——挑拨分子则靠着自己特有的嗅觉在他们中间寻找可靠的人……

根据那些聪明的和善于观察的人们的叙述，我军的可耻退却就是这样发生的……

部队以连为单位行进，道路很宽阔……各连之间隔着不大的距离……

————————————

①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称号，后来在俄国成了对巡警和宪兵的鄙称。——译者注

突然，尘土滚滚……前面停住了，谁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各连都停了下来，踌躇不前，互相交谈着……人们伸长脖子想看看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这逼近的滚滚尘土中究竟有什么东西……汽车飞驰着，喇叭吼叫着，这些汽车已经很近了，有人喊道：‘往后退……往后退……奥国人。’谁在叫喊，谁坐在汽车里——看不清楚，开得太快了。有时勉强可以看见有人穿着军服，佩着什么肩章，有时什么也看不见……结果，还没有人来得及想一想，究竟奥国人在哪里，究竟是谁发警告，队伍就已经转回头来退却了……还没有来得及把脑子清醒一下，第二辆汽车又来了。又有人喊道：‘奥国人!!!奥国人!!!阵地……已经放弃了……瓦斯。快，快……往后退……往后退……’

这种惊惶气氛像闪电般的传染病一样一下子攫住了所有的人……这种像按照乐谱非常巧妙地演出的叛变显然是按照事先充分考虑过的周密计划演出的……这种没有号码的汽车，我们数了一下约有二十辆……抓到了七辆，当然，坐在里面的都是和我们的团队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大约有十八辆溜跑了。各个连一听到这种喊声，一看见先头部队往后退，就慌乱起◇212◇来，纷纷回头逃跑……奥国人进入一座空城，又进入空空的郊区，并且一直向前推进，深入我方地区，如同星期日的散步一样，一路无阻……

从塔尔诺坡里来的士兵一个一个地走近另外一群人，其中有两三个带着大学毕业证章。他们都**在细节上**给这幅**被煽动的退却的**图画添上**几笔**。退却的主角是骗子、间谍、叛徒……他们是谁？**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答复**。其余那些至今还没有拿获和发现踪迹的人躲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什么幌子下进行活动？他们现在拿什么样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活动？那些亲眼看到塔尔诺坡里退却惨状的人，那些前线上的人，都相信至今还是秘密的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而随着可耻秘密的揭露，极其卑鄙的叛卖行为和欺骗行为的牺牲者——在塔尔诺坡里城下作战的军队所蒙受的耻辱也将得到洗雪。”

（二）波利索夫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我们的失败”（八月十五日“新时报”）一文的摘录：

“我们要取消那种说布尔什维主义造成我军失败的无稽责难。我们要弄清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演我们的不幸**。就军事艺术来说，最有害的就是不在造成军事失利的地方寻找军事失利的原因。七月失败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失败是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否则，这样的惨败倒表明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在我们军队中起了巨大的和非常的作用，这样大的作用当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真能收到这样大的效果，大概布尔什维克自己也会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说一切问题都在于布尔◇213◇什维克，那末俄国军队的不幸现在倒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了。可惜失败的实质要复杂得多：还在六月十八日进攻开始之前，军事艺术专家就已经看到这种实质；在六月十八日关于‘革命’团队的‘热烈’宣告中以及在‘红’旗中等等，就已经显露出致命的危险。

当大本营接到所谓六月十八日的辉煌战果的战报时，我们就意识到实在毫无辉煌战果可言，因为我们所占领的工事仅仅是敌人在目前的斗争条件下为保证自己的胜利所必须放弃的，所以当时我们说：‘如果德国人不举行反击，那就是我们莫大的幸运了。’但是反击跟着就来了，俄国军队像一八一五年的法国军队一样，马上就变成了一群张皇失措的人。很明显，灾祸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而是由于深深隐伏在**军队机体**中的、**最高指挥部所不能猜透和理解的**某种东西。这就是我们要在报纸的论文中尽可能指出的那个比布尔什维主义更重要的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时间已经不容许再拖延了。

德国‘军国主义’规定了一个军事科学公式：‘**进攻是最有力的作战形式**。’这个德国公式从战争一开始(萨姆索诺夫和连宁坎普夫的惨败）就表明对我们是不适用的，因为对于经验差的将军和训练差

的士兵来说，只能在侧翼有保障的条件下实行防御。随着战争中必不可免的损失的增加，将军、军官和下级军士的质量也就越来越差，于是防御对我们就成了最适宜的作战形式。如果这里再加上阵地战的发展和**物资惊人的缺乏**，那末不必说布尔什维克，就是仅仅懂得一般事理的人也会避免‘进攻’的！‘人民言语报’说，照波·维·萨文柯夫的说法，在布尔什维克鼓◇214◇动的影响下，士兵群众已经开始相信：逃兵不是祖国的叛徒，而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信徒。凡是比‘委员会’更了解我们的士兵的老军官都会说，这样想未免太小看我们光荣的和十分有理智的下级军士了。我们的下级军士具有十分健全的头脑，具有完全而明确的国家观念；他们完全懂得，将军和军官也就是士兵；他们嘲笑那种拿士兵这个总称号来代替(毫无意义地代替)下级军士这个称号的新花样，认为这样做有损这个荣誉的称号，因为现在大后方的缝衣队就是由‘士兵’组成的；他们完全了解，‘逃兵’就是逃兵，就是卑鄙可耻的逃跑者。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所宣传的‘拒绝进攻’的思想已经由我们军队中这些有理智的人开始加以实现，那末这只是因为这个思想是根据一般的事理，根据我们在战争中的全部经验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对英国人、法国人说进攻、打击和对俄国人说进攻、打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完备的掩蔽所里，等到他们强大的炮兵把一切扫除干净的时候，他们的步兵才开始进攻。而我们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都是靠大批的人来作战，我们把整团整团的优良部队消耗掉**。我们的近卫军在哪里呢？我们的射击手在哪里呢？一个被消灭过两三次的团甚至用比实际上所补充的更为优秀的分子补充过两三次，它也未必会认为‘进攻是最有力的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那就更是这样了。根据这种经验，以前的最高指挥部只在极端必要的时候才同意进行攻击；例如一九一六年五月曾经允许布鲁西洛夫在加里西亚实行攻击。这次效果很小的攻击只是证实了经验的结论。

完全可能，如果还是原来的最高指挥部，那末◇215◇‘进攻’二字只会作为提高士气的一种思想留在指令上面，直到现在也不会实现。可是突然发生了一种超出军事艺术之外的情况：‘门外汉’取得了领导，于是所有的人都叫嚷‘进攻’，似乎进攻是极端必要的，他们相信特别的‘革命营’、‘敢死营’、‘突击营’这些为正确的军事理论所摈弃的东西，他们不懂得这些都是极粗糙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许会夺去各团最有勇气的人，那时这些团队就根本变成了‘乌合之众和补充队’。有人会向我们说，盟国要求‘进攻’，他们称我们为‘叛徒’。我们非常尊重有才干有能力的法国总参谋部，所以我们不相信它的意见同军事艺术方面的门外汉的所谓舆论会一致。当然，在敌人处在中央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处在四周的战争情况下，我们对敌人的任何一个攻击，即使我们的人力损失很大而与战果很不相称，也总是对我们的盟国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为盟国牵制敌人的力量。这是一般的道理，不是盟国的冷酷。但是，在考虑这一点时应当理智些，应当有分寸，不要只是因为盟国要求这样做就急忙把自己的人民赶去送死。军事艺术不容许任何幻想，如果想把幻想付诸实现，那立刻就会受到军事艺术的惩罚。有受过良好锻炼的总参谋部的敌人经常窥伺着这种机会。”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无产者报”第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216◇

前线失败究竟是谁的罪过？

现在每天都会得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材料。并且每天都会证明那些力图把前线七月失败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的人是何等下贱，何等卑鄙。

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消息报”第一四七号上刊载了一篇“关于姆伦诺夫团的真相”的文章。这是一个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文件。七月七日，当彼得格勒的事件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时候，报刊上突然出现了大本营的电报，说第六〇七姆伦诺夫团“擅自放弃了战壕”，使德军有可能冲入我军地区，而这一切不幸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责难一个接着一个落到本已受尽诽谤的布尔什维克头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一切“爱国的”报刊每天都在火上加油。造谣诽谤愈来愈厉害。

这还是刚过去不久的事情。

而现在我们又听到了什么呢？

原来大本营发出的那个成为整个诽谤运动的出发点的第一个基本报道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第◇217◇六〇七姆伦诺夫团的团委员会现在向诽谤者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中说：

“你们参加过七月六日的战斗吗？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团只有七百九十八名士兵和五十四名军官，而防卫的战线有二俄里半长呢？你们知不知道在战斗中保全了生命的只有十二名军官和一百一十四名士兵，其余的都已经为国捐躯(损失百分之七十五)了呢？

你们知不知道第六〇七团在空前猛烈的炮火下守了七个钟头，而

且尽管有命令叫我们在八点半撤到据点，我们仍坚持到上午十一点(从早晨三点半起)呢？

难道你们知道我们守的是什么样的战壕，我们用来防御的是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吗？……”

不仅如此，“消息报”还刊载了由戈什托弗特少将、加甫利洛夫少将和代理参谋长柯列斯尼柯夫等人签署的**官方调查**文件，这些文件中写道：

“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看……**决不能**给第六〇七姆伦诺夫步兵团和整个第六精选师加上叛变、卖国和擅自退出阵地的罪名。**该师在七月六日作战，遭到惨重损失**……该师遭到敌人二百多门大炮的扫荡，可是他们自己只有十六门大炮。”

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布尔什维克的恶毒鼓动。

事实就是如此。

关于这件事，甚至对布尔什维克恨入骨髓的“消息报”也这样说道：◇218◇

“当然，失败不能归咎于军队中的革命制度。**但是，对它加以诽谤就能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布尔什维克**，推给纵容这种宣传的委员会。”

原来是这样，“消息报”的先生们！请问，你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你们自己不也是跟随着所有的黑帮混蛋刊登过对布尔什维克的无耻诽谤和卑鄙诬告吗？你们自己不也是喊过钉上十字架，把布尔什维克钉上十字架，都是他们的罪过吗？……

请再听下去：

官方的“消息报”继续说：“这种诽谤(大本营所制造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大本营的官方报道也同样地说过近卫军团背叛祖国……我们是见证人，我们亲眼看到无能的**反革命将军**企图把由于自己的无能而牺牲了成千生命的责任推到军队组织的头上……这种事

情在斯托霍得曾经小规模地发生过，现在正在大规模地重演……要知道反革命司令部发出诽谤的通报，就可以要求解散团队和取缔委员会。他们利用诽谤就可以枪杀成百的人，就可以**重新填满空出来的牢狱**。他们在破坏了军队的革命组织之后，就可以重新把军队变成自己手中的工具，就可以**用它来反对革命**。”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甚至连“消息报”中的我们的狂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反革命将军利用诽谤重新填满了空出来的牢狱。先生们，拿**什么人**填满牢狱呢？拿布尔什维克，拿国际主义者！而你们，“消息报”的先生们，当他们拿我们的同志填满牢狱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同反革命将◇219◇军一道在我们后面大喊大叫：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你们同革命的死敌一道把那些以几十年的忘我斗争证明自己忠实于革命的老革命家钉上十字架。你们同卡列金之流、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卡林斯基之流、彼列维尔节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以及布尔采夫之流一道把布尔什维克投入牢狱，任人散布所谓“布尔什维克拿德国津贴”的诽谤！……

“消息报”又坦白地继续说：

“当然，他们(即反革命将军)知道，所谓一个团队跟着一个团队放弃阵地的假报道，已使一切部队丧失信心，使它们怀疑它们是否还能得到友邻部队和后方的支持？它们的友邻部队是否已经撤退？如果它们留守原地，是否会白白地落入敌人手中？

他们知道这一切，但是对革命的憎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既然这样，那末各个团队放弃阵地，听从那些劝告它们这样做的人，在群众大会上讨论是否需要执行命令的问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惊惶更甚了。军队变成了发狂的畜群……接着又开始了迫害。士兵们知道他们的罪过是什么，也知道指挥人员的罪过是什么。他们每天发出数百封信抗议说：**在沙皇时代我们被人出卖过，今天我们又被人出卖了，而且我们还要因此受到惩罚！**”（“消息报”第一四七号）

“消息报”是否懂得自己在这些话中承认了什么呢？它是否懂得这些话完全是给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辩护，完全是谴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整个立场呢？◇220◇

怎么！你们自己承认士兵像在沙皇时代一样被人出卖，你们自己承认士兵受到卑鄙的迫害，——而你们又对这种迫害表示赞同(赞成死刑)，为它祝福，给它帮助？应该用什么话来咒骂这种人呵？！

怎么！你们自己承认掌握着我国几十万士兵的生命的将军们是以对革命的憎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而你们又把数百万士兵交给这些将军,你们又为进攻祝福,你们又在莫斯科会议上同这些将军联欢？！

但是先生们，你们这样做就是自己给自己签署判决书！你们要堕落到什么地步呵？

我们听过了“消息报”先生们的证词。我们要问：照“消息报”的话，既然大本营诽谤过姆伦诺夫团，既然它在斯托霍得玩弄过肮脏的把戏，既然它的行动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存心反对革命，既然是这样，那末我们怎能保证现在关于罗马尼亚前线事变的消息不也是被歪曲了的呢？怎能保证反动派不是故意地和有意识地在前线制造接二连三的失败呢？

载于“前线失败究竟是谁的罪过？”小册子
一九一七年彼得堡“波涛”出版社版◇221◇

美国的数十亿贷款

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愈来愈明显。

据“俄罗斯新闻”[72](八月十七日晚刊)报道：

“昨天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米留可夫做了报告，建议各中央委员就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发言的人一致拥护联合制的原则。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莫斯科会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们对它的期望。”

这样看来，米留可夫先生的党已经心满意足。它赞成联合。

护国派写道：“莫斯科会议是民主派的(即护国派的？)胜利，民主派在目前这种灾难深重的时刻已经作为真正的国家力量出现，俄国所有一切(！)有生力量都团结在它的周围了。”(“消息报”第一四六号)

看来，护国派的党也已心满意足。至少它是装出满意的样子，因为它也赞成联合。

而政府呢？它对莫斯科会议的评价如何呢？

据“消息报”(第一四六号)报道，“临时政府阁员们的一般印象”是这样：◇222◇

“会议是名副其实的国务会议。**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的路线大体上都获得赞同**。政府的经济纲领没有遭到反对。政府的土地政策实际上也没有受到抨击。”

总之，政府对会议也很满意，因为它原来也是赞成联合的。

事情很明显。政府、立宪民主党人和护国派这三种力量的联合正在建立起来。

打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铁里这块招牌的“诚意联合”，暂时可以认为是有保障的了。

莫斯科会议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没有资本。目前所组成的这个以政府为首的联合是俄国最大的企业。如果没有相当的资本，它连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生存。现在，在这种需要无数资财的战争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试问：

新的(崭新的！)联合打算靠什么资本生存呢？

请听“交易所报”(八月十七日晚刊)是怎样说的：

“据说，莫斯科会议的最直接的结果，特别是美国人对这个会议表示同情的结果，就是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借到**五十亿国债**。这笔国债将**在美国市场上**推销。临时政府的小财政计划靠了这笔国债将得以实现。”

答案很明显。这个联合将靠美国的数十亿贷款来生存，而这笔贷款以后却要由俄国工人和农民来承担。◇223◇

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资助**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军阀(克伦斯基！)和奴颜婢膝地效劳于俄国“有生力量”的小资产阶级上层(策烈铁里！)所结成的联合，——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美国资本家对莫斯科会议的“同情”再加上五十亿的贷款，——召集会议的先生们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

过去俄国曾经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光明来自西方。这句话在当时是对的。因为我们从那里，从西方学到了革命和社会主义。

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开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

一九〇六年，当革命还在俄国发展的时候，西方给了沙皇反动势力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帮助它恢复了元气。沙皇制度当时也就以俄国受西方新的财政奴役为代价而真的巩固起来了。

因此，当时有人指出，西方输入俄国的不仅有社会主义，而且还

有以数十亿贷款为形式的反动。

现在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更为鲜明的图画。当俄国革命奋力捍卫自己的成果而帝国主义力图把革命彻底击败的时候，美国资本家却以数十亿贷款供给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铁里的联合，以便在完全制止俄国革命之后摧毁西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事实就是如此。

西方输入俄国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和解放，不如说是奴役和反革命，难道不是这样吗？◇224◇

但是，联合就是同盟。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铁里的同盟是要反对谁呢？

显然，是要反对那些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人，反对那些抵制这个会议的人，反对那些和会议作斗争的人，就是说，反对俄国的革命工人。

美国资本家所资助的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策烈铁里的“诚意联合”是**反对**俄国的革命工人的，——护国派先生们，是这样吧？

那我们就这样记载下来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
“无产者报”第六号
社论 ◇225◇

今 天 选 举

今天选举彼得格勒市杜马。工人同志们和士兵同志们，选举的结果将取决于你们。选举是普遍的和平等的。每个士兵、每个男工、每个女工的选票和资本家、房主、教授、官吏的选票是一样的。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善于利用这个权利，那就是你们的过错，而且只能是你们的过错了。

过去你们善于在街上对沙皇的法老作战，现在你们也要善于用投票拥护我们党的方法来为自己的利益作斗争。

过去你们善于保卫自己的权利使之免遭反革命的侵犯，现在你们也要善于在今天的选举中拒绝信任反革命！

过去你们善于摘下革命叛徒的假面具，现在你们也要善于向他们大喝一声：“滚开！”

首先，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米留可夫党**，即**人民自由党**。这个党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个党反对工人、农民和士兵，因为它反对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反对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主张对前线士兵施行死刑。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早在六月初就要求立即在前线发动进攻，而这次进攻使国家丧失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是这个立宪民主党曾力图达到并且终于达到了使反革命取得胜利以及◇226◇对工人、士兵和水兵进行迫害的目的。投票拥护米留可夫党，就等于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妻子儿女，出卖后方和前线的弟兄。

同志们！**一票也不要投给人民自由党**！

其次，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护国派，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党都保护城市和乡村富裕小业主的利益。因此，每当阶级斗争

具有决定性的时候，它们就同地主、资本家站在一个阵营中反对工人、农民和士兵。七月事变时是如此，当时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并进攻他们。莫斯科会议时也是如此，当时这两个党又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批准了对付工人和前线士兵的高压手段和死刑。

如果说反革命取得了胜利，那末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地主、资本家成立了协议，帮助反革命来压制革命。如果说反革命现在巩固起来了，那末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替反革命挡住了人民的怒火，打着革命的旗帜执行反革命的命令。

投票拥护这两个党，就等于投票拥护同反革命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人和贫苦农民。

投票拥护这两个党，就等于投票批准后方的逮捕和前线的死刑。

同志们！**一票也不要投给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最后，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新生活报”集团**，即第十二号名单。这个集团反映了那些脱离生活◇227◇和运动的、没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情绪。因此，它总是在革命和反革命、战争和和平、工人和资本家、地主和农民之间动摇不定。

这个集团一方面拥护工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同资本家决裂，——因此，它这样无耻地背弃了工人和士兵的七月游行示威。

这个集团一方面拥护农民，另一方面又不同地主决裂，——因此，它反对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建议等待那个延期召开、也许永远不会召开的立宪会议。

“新生活报”集团口头上拥护和平，实际上反对和平，因为它**号召支持**旨在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自由公债”。

但是，谁支持“自由公债”，谁就是促使战争延长下去，谁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谁就是实际上反对国际主义。

“新生活报”集团口头上反对迫害和监禁，实际上主张迫害和监禁，因为它同那些拥护迫害和监禁的护国派结成了联盟。

但是，谁同护国派结成联盟，谁就是帮助反革命，谁就是实际上反对革命！

同志们，你们要学会根据行动而不是根据言论来鉴别人！

你们要学会根据行为而不是根据诺言来评价各党各派。

既然“新生活报”集团一方面提议和平而斗争，同时又号召支持“自由公债”，那末你们就应该◇228◇知道，它是在给帝国主义者助长声势。

既然“新生活报”集团有时候一面奉承布尔什维克，同时又支持护国派，那末你们就应该知道，它是在给反革命助长声势。

投票拥护这个两面派集团，投票拥护第十二号名单，就等于替那些为反革命服务的护国派分子效劳。

同志们！**一票也不要投给“新生活报”集团。**

我们的党是城乡工人的党，是贫苦农民的党，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党。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一切资产阶级报刊，一切动摇的和不彻底的集团都仇视和诽谤我们的党。

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我们的党主张对地主和资本家进行革命斗争；

只有我们的党主张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

只有我们的党主张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以对付一切资本家；

只有我们的党主张用民主的方法组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以对付投机分子和奸商；

只有我们的党主张彻底肃清后方和前线的反革命；

只有我们的党毫不动摇地捍卫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革命组织；

只有我们的党坚决而革命地为和平和各民族的团结友爱而斗争；

只有我们的党坚定不移地为工人和贫农取得政权而斗争；

只有我们的党，而且只有它没有染上支持前线施行死刑的污点。

正因为如此，资产者和地主才这样仇视我们的党。

正因为如此，你们今天应当投票拥护我们的党。

工人们，士兵们，女工们！

投票拥护我们的党，投票拥护第六号名单！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无产者报”第七号
社论　◇230◇

挑　衅　时　期

挑衅是反革命的惯技。

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大屠杀，一八七一年的放弃巴黎，为反对革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挑衅，——谁不知道资产阶级的这些背信弃义的手段呢？

但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都没有像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这样无耻和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恶毒手段。

难道列布申斯基不久以前不是曾经明目张胆地公开威胁说，资产阶级在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忘记求助于“饥饿的魔掌和贫困”以减少工人和农民的人口吗？

难道资产阶级不是已经从言论转到行动，把工厂关闭，把数万工人抛到街上吗？

谁敢说这是偶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旨在挑起大屠杀并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的计划呢？

但是，挑衅的主要领域不是后方而是前线。

早在三月间就有人谈到某些将军放弃里加的计划，不过由于“外在原因”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231◇

今年七月，俄国军队撤出塔尔诺坡里和切尔诺维茨。这时资产阶级报刊的仆从们就异口同声地责难士兵和我们党。结果怎样呢？已经判明，“退却是被煽动起来的”，“叛变是按照事先充分考虑过的周密计划演出的，像按照乐谱演出的一样”。而且人们明确指出了某些组织汽车在军队中东冲西撞、命令士兵退却的将军。

谁敢说反革命分子是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空谈家呢？

现在又轮到里加了。电报传来了放弃里加的消息。资产阶级报刊的仆从们已经开始攻击士兵，诬蔑他们狼狈溃逃。反革命大本营也和“晚间报”一鼻孔出气，竭力把罪过推在革命士兵的身上。如果今天在涅瓦大街上有人在“打倒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游行，那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可是，里加战线的副专员沃依廷斯基的电报证明了这是对士兵的诽谤。

沃依廷斯基在电报中说：“我可以在全俄国面前做证：部队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忠实地执行了指挥人员的一切命令。”

目击者是这样写的。

可是大本营还在诽谤士兵，说团队逃跑。

而资产阶级的报刊还在继续高唱前线“叛变”的滥调。

反革命将军和资产阶级报刊对士兵进行诽谤是在执行某种计划，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个计划和在塔尔诺坡里、切尔诺维茨两地演出的那个计划是一模一样的，这不是很明显吗？◇232◇

最后，在俄国已经开始的挑衅时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铲除这个专政，这不是很明显吗？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无产者报”第八号
社论　◇233◇

“社会革命党”党内的分工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人投票赞成取消死刑，并同意抗议逮捕布尔什维克。

这当然很好，并且值得赞扬。

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想在这里提出。

究竟是**谁**在前线施行了死刑，是**谁**逮捕了布尔什维克？

正是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善意帮助之下！)。据我们所知，内阁总理，公民亚·费·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他的名字曾经给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名单增加了光彩。

据我们所知，军事部副部长，公民波·维·萨文柯夫也是社会革命党党员。

而这两位出色的“社会革命党人”正是恢复前线死刑的主要人物。(此外还应该加上科尔尼洛夫将军，不过这位将军暂时还没有加入社会革命党。)

其次，我们知道，农业部部长，公民切尔诺夫好像也是社会革命党党员。◇234◇

最后，内务部部长，公民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就是那位在内阁中除了克伦斯基以外占着最显要地位的人物，也是社会革命党党员。

就是所有这些高贵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前线施行了死刑，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逮捕。

在这个社会革命党内，一部分党员竭力抗议施行死刑，而另一部

分党员亲手施行死刑，试问，这种奇怪的分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是奇怪的事情！我们刚刚推翻专制制度，我们刚刚开始“按欧洲方式”来生活，可是“欧洲生活方式”中一切坏的方面我们马上就学会了。拿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党，比如拿法国资产阶级的激进党来说吧。这个党总是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的党：“激进社会党”，“独立社会党”，如此等等。这些党在选民面前，在群众面前，在“下层”面前，总是满口“左的”词句，特别是在选举前夜，特别是在它们的竞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排挤它们的时候。而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激进社会党”和“独立社会党”的部长们却“在上面”安然地干着资产阶级的勾当，丝毫不理会自己选民的社会主义愿望。现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做法也是这样。

多么幸福的党呵！谁施行了死刑？——社会革命党人！谁抗议施行死刑？——社会革命党人！爱怎样就怎样……

社会革命党人想拿这种行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在群众面前不失去声望)并得到资本(保住部长◇235◇职位)。

但是，有人会说，每一个党内都会有意见分歧：一部分党员这样想，而另一部分党员那样想。是的，但分歧各有不同。如果一部分人拥护刽子手，而另一部分人反对刽子手，那末在一个党内要把这种“分歧”调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如果拥护刽子手的正是该党最负责的领袖，正是那些能立即实现自己意见的部长们，那末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在判断这个党的政策时，就只能根据这些部长的活动，而不能根据普通党员所赞同的某种抗议性的决议。

污名仍然没有洗掉。社会革命党仍然是施行死刑的党，仍然是逮捕工人阶级领袖的狱卒的党。社会革命党人永远也洗不掉自己的污名：**他们**党内最著名的党员恢复了死刑。社会革命党人永远也洗不掉自己

的污点：**他们的**政府鼓励对工人政党的领袖进行卑鄙的诽谤，**他们的**政府曾经企图对列宁制造新的德雷福斯案件[73]……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无产者报”第九号
本文没有署名◇236◇

黄　色　联　盟

俄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和西方的革命运动血肉相连。不仅如此，它并且是以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基础为使命的全世界无产者伟大运动的一部分。十分明显，我国革命的每一步都必然引起西方的反应，我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必然引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活跃和发展，并推动世界各国的工人去和资本家作斗争。

西欧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决定对俄国革命宣布决死的战争。

还在我国革命刚开始时，英法资本家就对我国革命发动了进攻。他们的机关报“泰晤士报”（《Times》）[74]和“晨报”（《Matin》）[75]那时就已经辱骂革命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并号召把它们解散。

过了两个月，帝国主义者在瑞士的秘密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对付“日益发展的革命”的办法问题，把俄国革命作为他们首先打击的目标。

现在他们正转入公开的攻击。他们把里加战线的失败当做攻击的借口。并且把一切罪过都推在士兵身上，号召进一步，加强俄国的反革命。

请听“交易所新闻”的电讯。◇237◇

巴黎电：

“**第二集团军**的撤退，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不战而逃**，以及里加的陷落，引起了此间人士**万分的痛心、愤恨和憎恶**。

‘晨报’（《Matin》）肯定地说，俄国的和平主义者，这次惨变的罪魁，**简直像从前帝王跟前的馋臣一样庸碌无能，甚至比他们为害更大**。

该报声称，**真不了解工兵代表苏维埃为什么这样顽固不化**，为什么不顾如此惨痛的实际教训而仍然卫护**军队委员会这种如此荒诞的机关**。”

法国资本家的机关报就是这样写的。

下面是伦敦的电讯：

“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写道：“首先必须恢复军队中的纪律。德国人所以迅速取得了这样重大的胜利，也和他们所以能够占领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一样，是由于**俄国军队中常常发生不服从命令和叛变的事情**。”

英国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

“……不战而逃”……“荒诞的军队委员会”……“恢复纪律”(施行死刑他们还嫌不够！)……“俄国军队中的叛变”……

请看，这些钱袋子用多么好听的话来安慰流血牺牲的俄国士兵！◇238◇

而这种话竟然出现在目击者已经公认了如下的事实之后：“军队在退却时一直是忠实地和敌人厮杀”，“在被敌人突破的地区，军队无条件地和忠实地执行了授予他们的任务”!!!

但是，这里的问题当然不仅在于对士兵进行攻击和卑鄙的诽谤。

问题在于诽谤士兵的英法资本家想利用前线的失利来彻底消灭俄国的革命组织，使帝国主义的专政得到彻底胜利。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因为里加陷落而假惺惺地流眼泪，诽谤士兵，同时辱骂苏维埃和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很高兴有机会要求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手段来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彻底胜利。

西方帝国主义者因为里加陷落而大谈其“万分的痛心”，把一切罪过推在士兵身上，同时辱骂“荒诞的军队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很高兴有机会彻底消灭俄国残存的革命组织。

他们对那些在北方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俄国士兵所进行的造谣诽谤的联合进攻，其政治意义就在这里，并且仅仅在这里。

本国帝国主义者同欧洲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利用里加战线的军事失利对士兵进行诽谤来反对身负重伤的俄国革命，——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让工人和士兵记住这一点！

让他们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239◇胜利！

让他们懂得这一点，并让他们竭尽全力来用世界各国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红色联盟对抗帝国主义者的黄色联盟。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日报”创刊号
社论◇240◇

二 者 必 居 其 一[76]

事变正在发展。联合一个接着一个出现，随着前线的迫害后方也实行迫害，可是“收效不大”，因为我们目前的主要痈疽即全国普遍的破坏仍在继续增长，并且愈来愈严重。

全国正处在饥荒的前夜。喀山和下新城、雅罗斯拉夫里和梁赞、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顿巴斯和中部工业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前线和接近前线的后方——所有这些地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经历着严重的粮食危机。饥民的骚动已经开始，不过反革命的走狗暂时利用得还不高明……

到处都在埋怨：“农民不拿出粮食来。”

但是农民“不拿出粮食来”并不是“由于愚蠢”，而是由于他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再来“帮助”它。在三月和四月间，农民相信苏维埃，而通过苏维埃也相信政府，于是粮食源源不绝地运到城市和前线。现在他们对这个保护地主特权的政府失去了信心，于是粮食没有了。农民宁愿把粮食储藏起来，等待“好日子”的到来。

农民“不拿出粮食来”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他们拿粮食换不到什么东西。农民需要花布、鞋子、铁制品、煤油、糖，可是这些产品他们得到的很少；拿粮食去换那些不但换不到工业品而且又◇241◇在不断贬值的纸币，那是没有意义的。

运输业的“失调”更不用说了，它非常不完备，不能同样很好地既为前线服务又为后方服务。

所有这些，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动员，使最好的劳动力离开了农村，使播种面积缩小，这就必然引起粮食恐慌而使后方和前线同样受苦。

同时，工业破坏也在增长和扩大，而这种现象又使粮食恐慌加剧。

煤和石油的“恐慌”、铁和棉花的“危机”，引起了纺织、冶金和其他企业的停工，——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情况，这些情况使国家遭到了工业破坏、大批群众失业和商品缺乏的危险。

问题不仅在于各个工厂主要是为战争服务而不能同时在同样的程度上满足后方的需要，而且在于这种种“恐慌”和“危机”都被资本家人为地加剧了，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抬高物价(投机！)，或者是为了挫败因为物价高涨而力争提高工资的工人们的反抗(资本家的意大利式罢工!)，或者是为了以关闭工厂来造成失业(同盟歇业！)，使工人走投无路，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工人的“过分要求”。

顿巴斯的媒矿主正在缩减生产和制造失业，这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里海东岸边区的植棉业主一面叫喊棉花“恐慌”，一面自己却把大量的棉花隐藏起来从事投机。他们的朋友纺织工厂厂主，一面享受这种投机的果实，自己也组织投机，一面却假惺惺地叫喊棉花供应不足，关闭工厂，使失业现象更为加剧。◇242◇

大家都记得列布申斯基的威胁，他说要以“饥饿的魔掌和贫困”来“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已经从言论转到行动，他们关闭了许多工厂，疏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

结果就是日益逼近的工业生活的瘫痪和商品极端缺乏的危险。

至于俄国现在所经历的深刻的财政危机就更不用说了。在生产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每年要支付三十亿卢布利息的五百亿到五百五十亿卢布的债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俄国财政情况的严重。

某人用巧妙的手腕非常成功地制造出来的最近前线的“失利”，只不过给这幅总的图画添上了几笔。

国家正不可遏止地走向空前的灾难。

在短短的时期内进行了无数次迫害而没有实行过一次“社会改革”的政府，绝对不能把国家从致命的危险中挽救出来。

不仅如此，政府一方面执行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立刻取缔“苏维埃和委员会”，因此就引起了左右两方面普遍不满的爆发。

一方面，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大肆攻击政府，要求它采取“坚决”办法对付革命。普利什凯维奇最近声称必须实行“督军”的“军事专政”和“逮捕苏维埃”，不过是公开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愿望而已。盟国的资本家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正在用大大降低交易所的卢布行市的办◇243◇法来对政府施以压力，并大肆叫嚣：“俄国应当作战，不应当空谈。”（“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见八月十八日“俄罗斯意志报”[77]）

全部政权归本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另一方面，在遭受着无地和失业厄运、忍受着高压手段和死刑的广大工农群众中，深刻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使妥协政党的力量和威信受到损害的彼得格勒选举，特别鲜明地反映了那些昨天还信任妥协派的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向左转。

全部政权归贫苦农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这就是革命的口号。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同地主和资本家在一起，那就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

或者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在一起，那就是革命的完全胜利。

妥协和联合的政策是注定要破产的。

出路在哪里呢？

必须同地主决裂，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农民一定会明白这一点，那时粮食就会有了。

必须同资本家决裂，对银行和工厂实行民主监督。工人一定会明白这一点，那时“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

必须同投机分子和奸商决裂，按民主原则来组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换。居民一定会明白这一点，◇244◇那时饥荒就会消除。

必须冲破从各方面束缚着俄国的帝国主义罗网，并宣布公正的和平条件。那时军队一定会明白他们手持武器是为了什么，如果威廉不接受这样的和平，俄国士兵就会像猛狮一样同他搏斗。

必须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西方工人一定会明白这一点，那时他们就会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展开冲击。

这将是战争的结束和欧洲工人革命的开始。

俄国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形势所规定的出路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日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245◇

我 们 的 要 求

事变正在迅速发展。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放弃了里加，并提出采取高压手段的要求。在对前线士兵的诬蔑失败之后，制造了所谓“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挑衅性的谣言，并再一次提出采取高压手段的要求。在挑衅性的谣言被揭穿之后，科尔尼洛夫举行了公开的发动，要求取消临时政府和宣布军事专政。同时米留可夫党即人民自由党也和七月事变时一样退出了政府，从而公开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阴谋。

结果就是科尔尼洛夫部队为建立军事专政向彼得格勒进军，临时政府把科尔尼洛夫撤职，克伦斯基宣布危机，基什金退出那个参与阴谋活动的立宪民主党，成立所谓革命的执政内阁。

总之：

事实是：反革命需要制造所谓“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谣言，以便替那位似乎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而向彼得格勒进军的科尔尼洛夫扫清道路。

事实是：在这些日子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从“俄罗斯意志报”和“交易所报”到“新时报”和“言论报”，都给科尔尼洛夫帮忙，加紧散布所谓“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谣言。◇246◇

事实是：科尔尼洛夫目前的发动只不过是反革命高级将领的那种人所共知的阴谋的继续，他们七月里放弃了塔尔诺坡里，八月里放弃了里加，企图利用前线的“失利”来达到反革命“最后”胜利的目的。

事实是：现在也和七月里一样，立宪民主党同前线的叛徒以及后方的万恶的反革命分子是站在一个阵营里的。

我们党做得对，它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鼓舞者。

我们党做得对，它早在六月初就要求同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并逮捕“有关的”人(卡列金等)。

反革命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也不是由于科尔尼洛夫的阴谋而开始的。至少是在六月间，当政府在前线转入进攻而开始执行高压政策的时候，当反革命将军放弃了塔尔诺坡里并把全部罪过推在士兵身上而得以在前线施行死刑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人早在七月里就对政府实行怠工并依靠盟国资本家的支持在临时政府内取得领导权的时候，最后，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但不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不但不去联合七月示威的参加者，反而掉转枪口对付工人和士兵的时候，反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这是事实，要否认它那就太可笑了。

现在联合政府和科尔尼洛夫党之间发生的斗争，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而是反革命政策的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斗争；而革命的死敌科尔尼洛夫党为了给恢复旧制度准备条件，甚至不惜◇247◇在放弃里加之后向彼得格勒进军。

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匪帮出现在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给他们以坚决的回击。

工人和士兵决不会容许革命的敌人的脏手玷污俄国的首都。

他们将用胸膛来捍卫革命的战斗旗帜。

但是，他们捍卫革命的旗帜不是为了使一个敌视他们的专政由另一个同样敌视他们的专政来代替，而是为了给俄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现在，当国家被破坏和战争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反革命黑暗势力准备把国家置于必死之地的时候，革命应当找到必要的力量和手段来挽救国家免于崩溃和瓦解。

现在需要的不是由另一些“统治”集团来代替这一些“统治”集团，也不是玩弄专政的把戏，而是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反革命，并采取坚决手段以满足俄国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需要。

为了这些目的，布尔什维克党要求：

（一） 立即把后方和前线的反革命将军撤职，让那些由士兵和军官选出的人来代替他们，一般地说，使军队从下到上完全民主化。

（二） 恢复唯一能够在军队中建立民主纪律的革命士兵组织。

（三） 废除一切高压手段，首先废除死刑。◇248◇

（四） 把地主的全部土地立即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并保证贫苦农民得到农具。

（五） 以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对工厂、银行实行以工人代表为主的民主监督。

（六） 使财政完全民主化，首先对资本和资本家的财产课以重税，没收可耻的战争利润。

（七） 组织城乡之间的合理交换，使城市获得必需的粮食，使农村获得必需的商品。

（八） 立即宣布俄国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

（九） 恢复自由，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并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十） 废除和盟国签订的密约，提出普遍的民主和平的条件。

党声明，不实现这些要求就不能挽救半年来被战争和普遍的破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革命。

党声明，实现这些要求所必须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资本家决裂，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反革命，使国家政权转归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能够把国家和革命从毁灭中挽救出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工人日报”第四号
社论 ◇249◇

阴 谋 在 继 续[78]

他们是什么人？

昨天我们说过，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鼓舞者。我们这样说不仅是根据“传闻”，而且是根据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七月“放弃”塔尔诺坡里和八月科尔尼洛夫阴谋叛乱的紧急关头，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七月和八月同前线的叛徒和后方的万恶的反革命分子站在一个阵营中反对俄国人民，这绝不会是偶然的。

今天，“消息报”和那些对立宪民主党人一贯妥协的护国派完全证实了我们昨天所做的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声明。

护国派写道：“李沃夫并不掩饰，希望这样做的(即实行军事专政)不仅有科尔尼洛夫将军，**而且还有**目前处在大本营里的**一批社会活动家**。”（“消息报”）

总之：

事实是：大本营是反革命的司令部。

事实是：反革命的总参谋部是由“某些社会活动家”组成的。

◇250◇

而这些“社会活动家”究竟是什么人呢？

请再往下看：

“已经**确切判明**，参与这次阴谋的有许多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思想上和私人关系上同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物都非常接近。”（“消息报”）

总之：

事实是：昨天还和国内的“有生力量”即“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物”非常亲昵的护国派先生们，今天不得不把他们贬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了。

事实是：组织和指导阴谋的是“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物”。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言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

他们指望的是什么？

昨天我们说过，科尔尼洛夫党是俄国革命的死敌，只要能够保证反革命的胜利，科尔尼洛夫是不惜在放弃里加之后放弃彼得格勒的。今天“消息报”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话：

叛乱的实际灵魂总参谋长卢柯姆斯基将军宣称：“如果临时政府不同意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要求，那末，前线的内讧可能造成战线被突破和敌人在我们最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251◇

这难道不是很像以放弃彼得格勒相威胁吗？

下面这一段话说得更明确：

“看来，卢柯姆斯基将军为了使阴谋成功是不惜公然背叛祖国的。他威胁说，拒绝实现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要求，将在前钱引起内战，给敌人开放战线，并引起可耻的单独媾和。这种威胁不能看做别的，只能看做坚决要同德国人妥协来保证阴谋的成功。”

你们听：“同德国人妥协”，“开放战线”，“单独媾和”……

“参与阴谋”并利用自己在大本营的地位来掩盖“开放战线”、“同德国人妥协”等威胁的立宪民主党人，——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和“叛徒”！

这些“开放战线”的英雄们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诬蔑我们党，诬蔑我们党“叛变”，说我们党拿“德国津贴”。“新时报”和“交易所

报”、“言论报”和“俄罗斯意志报”的那些受银行雇佣的黄色分子好几个月以来一直替这种卑鄙的无稽之谈大加渲染。结果怎样呢？现在甚至连护国派也不得不承认，前线的叛变是由指挥人员和他们的思想上的鼓舞者干出来的。

让工人和士兵记住这一点吧！

让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士兵和布尔什维克“叛变”的挑衅性的叫嚣，**不过是掩盖**那些将军和立宪民主党“社会活动家”的真正叛变**而已**。

让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报刊叫嚣士兵“叛变”，这正是一种可靠的标志，说明这种报刊的鼓舞者◇252◇已经准备好叛变，并力图把罪过推在士兵身上。

让工人和士兵知道这一点，并由此得出相当的结论。

你们想知道他们指望的是什么吗？

他们指望“开放战线”、“同德国人妥协”，想以单独媾和的思想来引诱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士兵，然后推动他们去反对革命。

工人和士兵一定会懂得，对大本营的这些叛徒是不应该宽恕的。

阴谋在继续……

事变正在飞快地发展。新的事实和消息迅速传来。据尚未证实的消息说，科尔尼洛夫正在和德国人谈判。有人肯定地说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在彼得堡附近同革命士兵开火了。科尔尼洛夫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自己是独裁者，是俄国革命成果的敌人和掘墓人。

可是临时政府不以敌对的态度对付敌人，而宁愿和阿列克谢也夫将军进行协商，三番五次地和科尔尼洛夫谈判，三番五次地劝说那些公开出卖俄国的阴谋者。

而所谓“革命民主派”则正在准备召开一个新的“将有国内一切有生力量的代表出席的类似莫斯科会议的特别会议”(见“消息报”)。

同时，昨天还在大喊“布尔什维克阴谋”的立宪民主党人，由于科尔尼洛夫阴谋的被揭露而受了◇253◇伤，今天却号召起“理智”和“协议”来了(见“言论报”)。

看来，他们想同那些一面叫嚣布尔什维克阴谋，同时自己却在组织阴谋反对革命和反对俄国人民的“有生力量”“成立”新的协议。

但是，他们这些妥协分子是背着主人擅自行动的。因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工人和士兵是不愿意和革命的敌人进行任何协商的。来自各区和各团队的消息都一致说明，工人在动员力量，士兵在拿起武器。看来，工人宁愿以敌对的态度对付敌人。

事情只能是这样：对敌人要搏斗而不是协商。

阴谋在继续，准备反击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工人日报”第五号号外
社论 ◇254◇

反对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

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已被打垮，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

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已被击溃，但是革命的胜利还没有得到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妥协派不但不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反而同他们进行谈判。

因为护国派不但不同地主资本家决裂，反而同他们成立协议。

因为政府不但不宣布他们为非法，反而邀请他们参加内阁。

卡列金将军在俄国南部掀起暴动来反对革命，而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也夫将军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米留可夫党在俄国首都公开支持反革命，而该党的代表人物马克拉柯夫之流和基什金之流却被邀请参加内阁。

是结束这种反革命罪行的时候了！

是坚决不移地宣布**对敌人要搏斗而不是妥协**的时候了！◇255◇

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反对**将军和银行家，**保卫**俄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争取**和平，**争取**自由，**争取**土地，——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地主资产阶级决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

成立工农政府，——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任务。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工人日报”第九号
社论 ◇256◇

危机和执政内阁

在科尔尼洛夫发动阴谋和政权解体以后，在阴谋失败和克伦斯基—基什金内阁成立以后，在发生了“新的”危机和策烈铁里—郭茨又跟克伦斯基进行了“新的”谈判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崭新的！)五人政府。

克伦斯基、捷列申柯、维尔霍夫斯基、维尔杰列夫斯基和尼基廷的五人“执政内阁”——这就是由克伦斯基“选出”、由克伦斯基批准、对克伦斯基负责而**不依赖**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新”政权。

有人说，这个政权同样也不依赖立宪民主党人，但这纯粹是胡说。因为在政府中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不过是掩盖政府完全依赖立宪民主党人而已。

表面上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是最高总司令，实际上掌握总参谋部即完全控制前线的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卒阿列克谢也夫将军。

表面上“左的”执政内阁不依赖(不要笑！)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卒操纵着政府各部和实际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

口头上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实际上同后方和前线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卒成立协议。

执政内阁是掩盖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的幌子；克伦斯基的专政是替地主资本家的专政阻隔人◇257◇民怒火的屏风——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而今后还要召开一个有“有生力量”的代表参加的新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策烈铁里之流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的先生们，这些一贯的妥协分子将竭力把昨天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的秘密协议变成公开

而确定的协议，以取悦于工人和农民的敌人。

最近六个月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三次尖锐的政权危机。每次危机都是靠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而获得解决的，同时工人和农民每次都受了欺骗。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参与争夺政权的斗争时每次都站到地主和资本家方面去，使争端的解决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

科尔尼洛夫的阴谋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反革命性。护国派整整叫喊了三天，说立宪民主党人叛变了，说联合没有生命力，跟反革命刚一交锋就土崩瓦解了。结果怎样呢？尽管如此，他们除了同原来那些被人唾骂的立宪民主党人建立隐蔽的联合以外，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出路。

就在昨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护国派投票决定了“支持”五人执政内阁，这个执政内阁是在损害工人和农民的基本利益而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幕后协议之后产生的。

在这个时候，在政权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因科尔尼洛夫的失败而加剧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再一次**帮助了地主和资本家来保持政权，**再一次**帮助了反革命的立宪民主◇258◇党人来欺骗工人和农民。

中央执行委员会昨天投票的政治意义就是如此，并且仅仅是如此。

让工人知道这一点，让农民知道这一点，并让他们由此做出相当的结论。

和昨天的公开联合一样，今天的秘密联合也是不巩固的，因为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能成立持久的协议。因此，争夺政权的斗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日益加剧和尖锐起来了。

让工人知道，只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群众中还有影响，

工人在这个斗争中就必然还会遭到失败。

让工人记住，要夺取政权就必须使农民和士兵群众离开妥协派，离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他们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让他们记住这一点，让他们打开农民和士兵的眼睛，在农民和士兵面前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背叛行为。

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作无情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努力把农民和士兵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的周围，——这就是刚刚经历过的危机的教训。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
“工人之路报”创刊号
社论 ◇259◇

走 自 己 的 路

马克思认为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是那里没有能鞭策革命并在斗争的烈火中加强革命力量的强大的反革命。

在这一点上，我们俄国人没有权利埋怨命运，因为我国有反革命，并且是相当强大的反革命。最近将军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动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革命运动的浪潮特别清楚地表明：革命正是在和反革命的搏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在七八月间被资产阶级阴谋所击溃的气息奄奄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在这些搏斗的烈火中又复活起来并展开了自己的活动。

依靠这些组织，革命战胜了反革命。

现在，当科尔尼洛夫分子狼狈退却，而克伦斯基毫不客气地攫取别人的荣誉的时候，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这些组织——铁路员工的、士兵的、水兵的、农民的、工人的、邮电职工的及其他“擅自组织的”委员会，如果没有它们的革命创举和战斗的主动性，革命就被完全消灭了。

因此，应当更加尊重这些组织。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巩固并扩大这些组织。让“擅自组织的”◇260◇委员会存在并发展起来，让它们不断地巩固并获得胜利，——革命的朋友的口号应当是这样的。

只有敌人，只有俄国人民的死敌才会侵害这些组织的完整性。

可是克伦斯基政府从反革命发动的最初几天起就怀疑这些“擅自组织的”委员会。克伦斯基政府不能而且不愿意和科尔尼洛夫叛乱作斗争，它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革命，从科尔尼洛夫发动的最初几天起，它就阻挠彼得堡反对反革命人民斗争委员会的活动。并

且它对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始终采取这样的怠工态度。

但是这还不够。九月四日，克伦斯基政府又颁布了一道特别命令，向革命的委员会公开宣战，宣布它们为非法。它把这些委员会的活动蔑视为“越轨行动”。它说：

“今后决不允许擅自行动，临时政府将把这种行动视为越轨的和危害共和国的行动而和它作斗争。”

看来克伦斯基忘记了，“执政内阁”还没有被“三执政”代替，而他也不是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一执政。

看来克伦斯基不知道，在“执政内阁”和“三执政”之间还隔着一个国家政变，在颁布这样的命令之前，必须首先实行这种政变。

克伦斯基不知道，在同后方和前线的“越轨的”委员会作斗争时，他必须依靠卡列金之流和科尔尼洛夫之流，并且只有依靠他们，而这些人的命运，无论如何他是应当记得的……◇261◇

我们深信，革命的委员会对克伦斯基的来自背后的打击一定会给以应有的反击。

我们坚决相信，革命的委员会**不会离开自己的道路**。

如果“执政内阁”和革命的委员会已经彻底分道扬镳，那末这对“执政内阁”就更糟糕了。

反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过去，革命的委员会万岁！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号
社论 ◇262◇

论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

科尔尼洛夫叛乱不仅有消极的一面。它和生活中的任何现象一样，也有积极的一面。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扼杀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叛乱侵害革命并把一切社会力量发动起来的时候，它一方面鞭策了革命，促使革命提高积极性和加强组织性，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各阶级和各政党的真正的性质，摘下了它们的假面具，帮助人们认清它们的真面目。

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那些濒于死亡的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瞬息间就复活起来并展开了自己的活动。

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现在人人都谈论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了，连那些昨天还“拚命”要和他们成立协议的人也不例外。

“在发生这一切之后”，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不再认为可以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了。这是事实。

甚至克伦斯基所组织的五人“执政内阁”也可以不要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了。这是事实。可以认为，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已经成为各“民主”政党的训条。

这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积极的一面。◇263◇

但是，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是什么意思呢？

假定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彻底”和作为一个政党的党员的立宪民主党人决裂。这是不是说，这样他们就和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假定说，护国派能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民主会议上建立一个没有

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新政权，而克伦斯基服从这样的决议。这是不是说，这样他们就和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法兰西帝国主义共和国提供了许多例子：资本家的代表自己不参加内阁，而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放到”那里去，以便自己躲在幕后，假他人之手不受阻碍地对国家进行掠夺。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法国的金融寡头曾经推举“社会主义者”(布利安！维维安尼！)去主持内阁，而自己站在他们背后顺利地推行本阶级的政策。

这样的非立宪民主党的内阁在俄国存在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盟国资本家(俄国正在变成他们的纳贡者)的压力，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这种内阁会认为必须把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当做唯一可行的政策来实行。

不用说，在不得已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是决不会反对这样的内阁的，因为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由◇264◇谁来执行归根到底都是一样，只要这个政策能够实现就行！

显然，问题的重心不在于政府的成员，而在于它的政策。

因此，谁想真正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而不仅是为了装样子，谁就首先应当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

但是，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就是和地主决裂并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即使这样做会使某些万能的银行受到沉重的打击也在所不惜。

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就是和资本家决裂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即使为此必须侵犯资本家的利润也在所不惜。

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决裂就是和掠夺战争与秘密条约决裂，即使这样做会使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受到沉重的打击也在所不惜。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能不能和立宪民主党人这样决裂呢？

不，不能。因为这样他们就不成其为护国派，也就是说，不成其

为前线战争和后方阶级和平的拥护者了。

既然这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停地叫嚷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那是什么意思呢？

——口头上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如此而已！

问题在于：在科尔尼洛夫阴谋失败以后，在米留可夫党的反革命本质被揭穿以后，和这个党进◇265◇行公开的妥协在工人和士兵中间已经非常不受欢迎了。只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这样的妥协，他们马上就会失去最后的一点点群众。因此，他们只好放弃公开的妥协而实行隐蔽的妥协。由此可见，叫嚷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是为了掩盖和立宪民主党人实行幕后的妥协。表面上，打倒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表面上，政府**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实际上，政府是**为**那些指使“当权者”执行自己的意志的本国的和盟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效劳**。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俄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政治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公开妥协已经成为冒险的事情了。我们正处在社会护国主义政府执政的时期，这种政府按其成分来说是非立宪民主党的，但是它的使命却是执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

最近出现的“执政内阁”就是建立这种政府的初次尝试。

应该认为，定于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会议如果不是以滑稽剧结束，那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大概“更左的”政府。

先进工人的责任就是要摘下这些非立宪民主党政府的假面具，向群众揭露它们的真正的立宪民主党的实质。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号
署名：科·斯·◇266◇

第 二 次 浪 潮

俄国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旗帜下开始的。当时工人和士兵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力量。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自由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和英法资本家，前者离开沙皇政府是因为沙皇政府没有能力开辟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后者背叛沙皇政府是因为沙皇政府想同德国单独媾和。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隐蔽的联合，在这种联合的逼迫下，沙皇制度不得不退出舞台。而在沙皇制度垮台后的第二天，这个隐蔽的联合就成了公开的联合，其表现形式就是在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但这些力量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英法资本家只想来一个小规模的革命，以便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进行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工人和士兵恰恰相反，他们所要达到的是根本摧毁旧制度并争取伟大革命的完全胜利，以便打倒地主和压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而结束战争，保证公正的和平。

这个根本矛盾成了革命继续发展的基础。它预先决定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是不巩固的。◇267◇

一切所谓政权危机，直到最近的八月政权危机，都是这个矛盾的表现。

如果说在这些危机的进程中胜利每次都是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如果说在每次危机“解决”之后工人和士兵总是受了欺骗，而联合不管其形式如何还是保存了下来，那末，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和雄厚的财力，而且因为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

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它们暂时还受到我们这个一般说来是小资产阶级国家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拥护)每次都站到“街垒的那一边”，使政权斗争的解决有利于立宪民主党人。

在七月事变时，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达到了最高峰，当时联合的成员结成战斗的统一战线，把自己的枪口对准“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

在这一点上来说，莫斯科会议不过是七月事变的回声，而不准布尔什维克参加会议是为了造成必要的保证来巩固同国内“有生力量”的“诚意联合”，因为**孤立**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能够巩固的必要条件。

科尔尼洛夫暴动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随着科尔尼洛夫的发动，情况改变了。

还在莫斯科会议上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有变成同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卡列金之流联盟的危险，这个联盟反对的……不仅是布尔什维克，而且是整个俄国革命，它反对的是革命成果的存在。对莫斯科会议的抵制和莫斯科工人的抗议性罢工摘下了反革命的集会的假面◇268◇具，打乱了阴谋者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抵制和罢工不仅是一种警告，而且是一种准备行动的号召。大家知道，号召并没有成为旷野的呼号，当时许多城市都以抗议性的罢工响应了这个号召……

这曾是一种可怕的预兆。

科尔尼洛夫暴动只是替蓄积已久的革命义愤打开了活门，只是替几乎被完全束缚住的革命解开了手脚，鞭策并推动革命前进。

正是在这里，在和反革命力量搏斗的烈火中(在这里，言论和许诺在直接斗争的实践中受到了检验)，显出了谁是革命的真正朋友和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工人、农民、士兵的真正同盟者和谁是他们的叛徒。

用各种不同的材料苦心拼凑起来的临时政府，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风暴刚一吹来的时候就四分五裂了。

说来“可悲”，然而是事实：当需要空谈“挽救革命”的时候，联合看起来很有力量，可是当需要真正把革命从死亡的危险中挽救出来的时候，联合却成了空架子。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公然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站在一起。各色各样的帝国主义者、银行家和厂主、企业主和投机分子、地主和将军、“新时报”的耍笔杆的强盗和“交易所报”的卑怯的挑拨分子，——所有这些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并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结成联盟的人都和反革命分子站在一◇269◇个阵营中来反对革命和革命的成果了。

很明显，联合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联合地主来反对农民，联合资本家来反对工人，联合将军来反对士兵。

很明显，谁同米留可夫妥协，谁就是同科尔尼洛夫妥协，谁就一定会反对革命，因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都是“一路货”。

对这个真理的初步认识也就成了产生新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基础，产生俄国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基础。

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结局**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的凯旋(莫斯科会议！)，那末第二次浪潮的**开始**就是这个联合的破产，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开战争。

在反对反革命的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后方和前线的气息奄奄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复活并壮大起来了。

在反对反革命的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产生了工人和士兵、水兵和农民、铁路员工和邮电职工的新的革命的委员会。

在这个斗争的烈火中，在各个地方，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在彼得堡和乌拉尔，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产生了新的政权机关。

这里问题不在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新决议，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无疑是变左了，这件事◇270◇情本身当然有不小的意义。

问题也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报刊正以布尔什维主义的魔影来恫吓“日报”和“人民意志报”那些惊惶万状的庸人。

问题在于在公开的搏斗中战胜了反革命的队伍的新政权，**在**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不顾**他们的**反对**而成长起来了。

问题在于这个政权从防御转到进攻时，必然会触犯地主和资本家的切身利益，从而把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问题在于这个“没有被承认的”政权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就会被客观环境所迫而提出本身“合法化”的问题，同时那个已经暴露出同反革命阴谋分子有明显的血缘关系的“正式”政权则渐渐失去坚固的立足之地。

最后，问题在于当新的革命浪潮急速蔓延到更多的城市和地区时，昨天还害怕同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作坚决斗争的克伦斯基政府，今天已经同科尔尼洛夫以及后方和前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联合起来，并“下令”解散革命的核心——工人、士兵和农民“擅自组织的”委员会。

克伦斯基同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卡列金之流结合得愈紧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裂痕也就愈大，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决裂也就愈有可能。

正是这些事实，而不是个别政党的决议，宣布了旧的妥协主义口号的死刑。◇271◇

我们决不过高估计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的程度。我们知道，这个决裂暂时还只是形式上的决裂。但是这种决裂作为一个开端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于余下的步骤，应该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会自己去完成的。他们已经在抵制民主会议。工商界的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狡猾的战略家们本来想把他们“诱入自己的罗网”)现在也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了。应该认为他们还会干下去，继续关闭工厂，拒

绝给“民主派”的机关以贷款，故意加剧破坏和饥荒。而“民主派”既然要同破坏和饥荒作斗争，就必然卷入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从而加深自己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裂……

从这种前途看，从这一方面看，定于九月十二日召开的民主会议具有特别的征兆性的意义。会议的结局如何，它会不会“夺取”政权，克伦斯基会不会“让步”，——所有这些问题暂时还无法答复。很可能，会议的发起人将竭力找出一种狡猾的“协议”方案。但是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革命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政权问题，不是靠会议来解决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会议将对近日的事件做出总结，它会计算一下力量，它将揭示出俄国革命的已经过去的第一次浪潮和正在成熟的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差别。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那时，在第一次浪潮中，是同沙皇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现在，在第二次浪潮中，是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

那时，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现在，是同他们决裂。◇272◇

那时，是孤立布尔什维克。现在，是孤立立宪民主党人。

那时，是同英法资本家结成联盟并进行战争。现在，是同英法资本家酝酿决裂并争取和平，争取公正的和普遍的和平。

不论民主会议做出怎样的决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将走这样的道路，并且只能走这样的道路。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九日
“工人之路报”第六号
署名：科·斯大林◇273◇

外国人和科尔尼洛夫阴谋

由于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失败，近来有大批外国人离开俄国。资产阶级报刊的仆从们企图把这个现象同“和平的传闻”联系起来，甚至同彼得堡和莫斯科“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联系起来。但是，这不过是黄色分子所玩弄的表面上热闹而实际上拙劣的把戏而已，其目的是要对读者隐瞒外国人离境的真正原因。外国人离境的真正原因是某些外国人确实参与了科尔尼洛夫阴谋，而这些勇敢的先生现在力图聪明地逃避责任。

大家知道，护送“野蛮师”向彼得堡进发的装甲汽车队是由外国人组成的。

大家知道，外国使馆驻大本营的某些代表不仅知道科尔尼洛夫的阴谋，而且帮助了科尔尼洛夫准备这个阴谋。

大家知道，直接从英国来参加莫斯科会议而后来又“去过”大本营的“泰晤士报”（《Times》）和伦敦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冒险家阿拉季因，是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灵魂和主脑。

大家知道，驻俄国的一个最有名的大使馆的某一著名代表在六月里就已经确定无疑地同卡列金之流及另外一些人的反革命阴谋取得联系，并且从他主人的金库里拿出大量金钱来巩固这种联系。◇274◇

大家知道，“泰晤士报”（《Times》）和“时代报”（《Temps》）[79]并没有掩饰它们对科尔尼洛夫暴动失败的不满，同时还辱骂和诽谤革命的委员会和苏维埃。

大家知道，临时政府在前线的专员们不得不向某些外国人提出一定的警告，因为这些外国人在俄国的行为就像欧洲人在中非洲一样。

大家知道，正是由于这种“措施”，外国人才开始大批离境，而俄国当局因为不愿意放走这些宝贵的“见证人”，不得不采取阻止他们离境的措施，可是布卡南(布卡南本人！)看来害怕被人揭发，他也采取了“措施”，建议不列颠的官员离开俄国。现在布卡南又“断然驳斥”关于大不列颠大使曾经建议不列颠驻彼得格勒的**全体**官员离开俄国的这种“传闻”(见“言论报”)。然而，第一、这种奇怪的“驳斥”只是证实了“传闻”。第二、现在当某些外国人(不是“**全体**”，而是某些！)已经离境，已经溜之大吉的时候，谁还需要这种虚伪的“驳斥”呢？

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和说过多次的。

对于这些，连“不会说话的石头”也在鸣不平了。

在这种情形下，某些“政府人士”，尤其是资产阶级报刊还想竭力抹杀问题，把“罪过”推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这就确实证明这些“人士”和这种报刊“内心里”是完全赞同“某些外国人”的反革命阴谋的。

请听听“社会主义思想”的机关报“日报”的一段话吧：◇275◇

“对于大批外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离开俄国一事，临时政府的人士带着惋惜的心情指出：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动荡局面下，外国人不愿意自找麻烦是毫不奇怪的。遗憾的是有人不无根据地说，一旦布尔什维克完全胜利，外国的代表会宁愿离开俄国国境。”(九月十日“日报”)

被布尔什维主义的魔影吓倒了的庸人们的机关报就是这样写的。

临时政府的某些谁也不知道的“人士”就是这样“指出”的，而且“带着惋惜的心情”。

不容置疑，世界各国的黄色分子正在联合起来，制造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银行界机关报的滥作家企图用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这种喧喧嚷嚷的骗人鬼话来掩盖这个“工作”；而政府的某些谁

也不知道的“人士”则执行着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意志，无中生有地诬蔑布尔什维克，拿所谓俄国正处在“动荡局面”下这种伪造的警句来笨拙地掩护逃跑的罪犯。

这个情景多么……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工人之路报”第八号
署名：科• ◇276◇

论 民 主 会 议

民主会议今天要开幕了。

为什么召开的正是这个会议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不准备谈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困难的历史关头不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呼吁而向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会议呼吁，这不仅是粗暴地破坏规章，而且是令人不能容忍地以反革命阶级的意志代替革命阶级的意志。显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抱有一种无论如何要把有钱人拉进去的“思想”……

许多在公开搏斗中战胜了反革命队伍的工兵苏维埃，在这次负有解决政权问题的使命的会议上被剥夺了表决权，而那些直接和间接支持过反革命的有钱人却获得了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准备谈这一点。在革命史上，资产阶级总是喜欢让工人和农民单独作战，担当风险，同时他们总是反对获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反对工人和农民自己掌握政权。我们没有想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竟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而使自己名誉扫地……

在各个地方，在后方和前线，在俄国中部和哈尔科夫，在顿巴斯和西伯利亚,在萨马拉和得文斯克,许多工人和士兵的组织激烈地抗议这种令人愤怒的破坏革命权利的行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77◇

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准备谈这一点。我们要谈主要问题。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规定“组织革命政权”所必需的条件。

那末，怎样组织政权呢？

毫无疑问，只能组织自己所有的东西，不能组织为别人所掌握的政权。民主会议正着手组织自己所没有的、集中在克伦斯基手中的政

权，这个政权曾一度被克伦斯基用来反对彼得堡的“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因此，这次会议只要企图从言论转到行动，它就会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会议不顾一切真去“夺取”政权，那末就可以而且必须谈到组织它所争得的革命政权。或者会议不去“夺取”政权，不同克伦斯基决裂，那末关于组织政权的谈论就必然变成废话。假定说(暂且这样假定)由于某种奇迹夺到了政权，剩下的只是组织政权的问题了，试问，怎样组织政权呢？在什么基础上建立政权呢？

——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上——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不同资产阶级联合，就不能得救！——“日报”、“人民意志报”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其他应声虫大声叫道。

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联合已经六个月了。除了破坏的加剧和折磨人的饥饿，除了战争的延长和◇278◇经济的崩溃，除了四次政权危机和科尔尼洛夫暴动，除了国家疲惫不堪和财政遭受西方奴役之外，这个联合还给了我们什么呢？

难道妥协派先生们还嫌这些不够吗？

有人在谈论联合的力量和威力，谈论革命“基础的扩大”等等。但是为什么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风暴刚一吹来的时候，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就烟消云散了呢？难道立宪民主党人没有从政府中开小差吗？联合的“力量”在哪里呢？革命“基础的扩大”又在哪里呢？

妥协派先生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同逃兵结成联盟是不能“挽救革命”的呢？

谁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捍卫了革命和革命的成果呢？

也许是“自由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那些日子里是和科尔尼

洛夫分子站在一个阵营里反对革命和革命的委员会的。关于这一点，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现在都公开地说了。

也许是“工商业阶级”？但是，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也是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站在一个阵营里的。关于这一点，以前科尔尼洛夫大本营的“社会活动家”古契柯夫、列布申斯基及其同伙们现在都公开地说了。

妥协派先生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同资产阶级联合就是同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卢柯姆斯基之流结成联盟呢？

有人在谈论工业破坏的加剧，但确凿的事实揭穿了同盟歇业资本家在故意减缩生产…… 有人◇279◇在谈论原料的不足，但确凿的事实揭穿了投机商人把棉花、煤炭等囤积起来…… 有人在谈论域市闹饥荒，但确凿的事实揭穿了从事投机的银行在人为地阻挠粮食的运输…… 妥协派先生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有钱人联合就是同骗子和投机分子结成联盟，就是同奸商和同盟歇业者结成联盟呢？

只有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只有同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只有同他们作斗争并战胜他们，才能把国家从饥饿和破坏，从经济疲敝和财政破产,从崩溃和退化中挽救出来,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既然苏维埃和委员会是革命的主要堡垒，既然苏维埃和委员会战胜了掀起暴动的反革命，那末它们而且只有它们现在应该成为国内革命政权的基本的体现者，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们要问：怎样组织革命政权呢？

革命政权已经在会议之外，也许还违反这个会议的意志，在和反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在和资产阶级实际决裂的基础上，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由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了。

这个政权的成分就是后方和前线的革命的委员会和苏维埃。

这个政权的萌芽就是大概要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左翼。

这次会议必须组成革命政权和结束革命政权成长的这个过程，否

则就只有向克伦斯基投降，求他开恩，并退出舞台。◇280◇

中央执行委员会昨天已经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打算走革命的道路。

但是立宪民主党是唯一重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妥协派先生们是否会懂得在资产阶级集团中再没有谁可以联合了呢？

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选择呢？

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号
社论　◇281◇

两 条 路 线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所谓政权危机，无非是各个阶级争夺政权斗争的外部表现。革命时代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争夺政权的斗争在这时具有最尖锐和最明显的性质。因此就产生了我国“慢性的”政权危机，由于战争、破坏和饥荒，这种危机愈来愈严重。因此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任何一个“会议”，任何一个“代表大会”在今天都不能不谈到政权问题。

在亚历山大剧院举行的民主会议也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政权问题出现了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同立宪民主党公开联合的路线。孟什维克中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护国派宣传这条路线。一贯的妥协分子策烈铁里在会议上捍卫这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同立宪民主党根本决裂的路线。我们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中和孟什维克中的国际主义者宣传这条路线。加米涅夫在会议上捍卫这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会确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因为联合政府的经验证明：同立宪民主党◇282◇人的联合就是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农民得不到土地；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工人遭到失业；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受战争和破坏、饥饿和破产的折磨。

第二条路线会确立人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因为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这正是保证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实行监督，占大多数的劳动者得到公正的和平。

第一条路线表示信任现存的政府，主张全部政权仍留在这个政府手中。

第二条路线表示不信任现存的政府，主张把政权交给工农兵苏维埃的直接代表。

有人幻想把这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调和起来。例如切尔诺夫就是这样，他在会议上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又主张同资本家联合，只要(！)资本家放弃(！)自己的利益。切尔诺夫“立场”的内在虚伪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个立场的自相矛盾，而在于它以走私的办法贩运了策烈铁里所主张的同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废物。因为这个“立场”给克伦斯基开辟了道路，使他能够“依据会议的政纲”把各色各样的布雷什金分子和基什金分子“补充到”政府中去，这些人对任何一个政纲都准备签名，但签名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这个政纲。

因为这个虚伪的“立场”把咨议性的“预备国会”这个武器交给克伦斯基，使他易于同苏维埃和委员会作斗争。

切尔诺夫的“路线”就是策烈铁里的那条路线，不过它“狡猾地”伪装了起来，以便使某些头脑◇283◇简单的人陷入“联合”的罗网。

有理由推断，会议将循着切尔诺夫的足迹前进。

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最后一级。

上述两条路线仅仅反映了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东西。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两个政权：正式的政权——执政内阁，非正式的政权——苏维埃和委员会。

这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暂时还是隐蔽的和未被意识到的，——这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

看来这个会议的使命就是作为一个多余的砝码使政权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执政内阁。

但是，让隐蔽的和公开的妥协派先生们知道，谁拥护执政内阁，谁就是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谁就必然要同工人和士兵群众发生冲突，谁就一定会反对苏维埃和委员会。

妥协派先生们不会不知道，最后决定权是属于革命的委员会和苏维埃的。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二号
社论 ◇284◇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革命正在前进。在七月事变时遭到枪杀和在莫斯科会议上“被埋葬了的”革命，现在又抬起头来，打破旧障碍，创立新政权了。反革命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攻破。继科尔尼洛夫之后卡列金正在退却。奄奄一息的苏维埃在斗争的烈火中又复活起来。它们重新掌住了舵，引导革命群众前进。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新运动的口号。

克伦斯基政府对新运动展开了斗争。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最初几天，它就威胁说要解散革命的委员会，并把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诬为“越轨行动”。从那时起，同委员会的斗争就日益加剧，最近竟转为公开的战争。

西姆费罗坡里苏维埃逮捕了科尔尼洛夫阴谋的参与者——并非无名的列布申斯基。而克伦斯基政府对这件事的回答却是下令“采取措施释放列布申斯基，并审判非法逮捕列布申斯基的人”（“言论报”）。

在塔什干，全部政权正转到苏维埃手中，旧政权正被推翻。而克伦斯基政府对这件事的回答却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暂时还保守秘密，但是它们一定会使塔什干工兵代表苏维埃的◇285◇那些胆大妄为的活动家彻底醒悟过来”（“俄罗斯新闻”）。

苏维埃要求严格而全面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而克伦斯基政府对这件事的回答却是“把侦查限制在一小部分人中，不去利用某些能判定科尔尼洛夫的罪行不仅是叛乱罪而且是叛国罪的极重要的证据”（舒布尼柯夫的报告，“新生活报”）。

苏维埃要求和资产阶级决裂，首先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而克伦

斯基政府对这件事的回答却是和基什金之流、柯诺瓦洛夫之流进行谈判，邀请他们参加政府，宣布政府“不依赖”苏维埃。

全部政权归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口号。

毫无凝问，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政权：克伦斯基及其政府的政权和苏维埃及委员会的政权。

这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

或者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政权，——那就会是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就会是战争和破坏。

或者是苏维埃的政权，——那就会是工人和农民的统治，就会是和平的到来和破坏的消除。

实际生活本身就是这样而且仅仅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每当政权危机发生时革命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妥协派先生们每次都逃避直接的回答，他们一面逃避回答，一面把政权交给敌人。妥协派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召开民主会议，也就是想再来一次逃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打错算盘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容许再逃避的时候。

对于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需要给以明确而肯定的回答。◇286◇

拥护苏维埃还是反对苏维埃！

让妥协派先生们去选择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七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三号
社论 ◇287◇

论 革 命 战 线

“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满意布尔什维克。他们辱骂布尔什维克，诽谤布尔什维克，以至威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呢？因为“肆无忌惮的煽惑”，因为“宗派活动”，因为“分裂行为”，因为缺乏“革命纪律”。简单地说，因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和“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统一战线。

和“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可是你们自己判断一下，现在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是否可能。

当民主会议在彼得堡争论不休，而会议的发起人匆忙地拟定“挽救”革命的方案的时候，当布卡南—米留可夫所鼓舞的克伦斯基政府继续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为生存而拚命斗争的真正人民的和真正革命的新政权的有决定意义的成长过程正在俄国进行着。一方面是苏维埃，它领导着革命，领导着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反革命还没有被击溃，它只是退却了，聪明地躲在政府背后。另一方面是克伦斯基政府，它庇护着反革命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向苏维埃宣战，力图击溃苏维埃，以免自己被击溃。

谁在这个斗争中获得胜利，——现在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288◇

或者是苏维埃的政权，——那就会是革命的胜利和公正的和平。

或者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政权，——那就会是反革命的胜利和使俄国“战到完全”……精疲力尽。会议没有能解决问题，只是反映了这个斗争，当然，反映得太晚了。

因此，现在的基本问题不是拟定“挽救”革命的一般方案，而是直接支持苏维埃反对克伦斯基政府。

你们要革命统一战线吗？那末你们就要支持苏维埃，就要和克伦斯基政府决裂，这样，统一战线自然就会建立起来。统一战线不是经过讨论而形成的，而是在斗争进程中形成的。

苏维埃要求撤换立宪民主党的专员。克伦斯基政府却用武力威胁，强迫苏维埃接受这些不受欢迎的专员

“人民事业报”的公民们，你们拥护谁呢？拥护苏维埃还是拥护克伦斯基的专员呢？

在塔什干，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苏维埃把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撤换了旧官吏。而克伦斯基政府却派讨伐队到那里，要求恢复旧政权和“惩办”苏维埃，如此等等……

“人民事业报”的公民们，你们拥护谁呢？拥护塔什干苏维埃还是拥护克伦斯基的讨伐队呢？ ——没有回答。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民事业报”的信徒们对克伦斯基先生的这些反革命勾当提过任何抗议，作过任何斗争。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是事实：坐在执政内阁中的彼得堡的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用“机关◇289◇枪”武装起来，向坐在塔什干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发动进攻，而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却若有所思地缄默不言，似乎这和它毫不相干！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打算和塔什干的社会革命党人厮杀，而“人民事业报”在刊登克伦斯基的横暴的“命令”时，却认为可以对这个命令默不作声，看来它想保持“中立”！

但是，同一个党的党员在其中央机关报的公开纵容之下竟至互相厮杀起来，这还算什么党呢？ 有人向我们说，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同谁统一呢？

同那个沉默而没有意见的社会革命党统一吗？

同那个打算捣毁苏维埃的克伦斯基集团统一吗？

还是同那些为了革命和革命的成果而在创立新政权的塔什干社会革命党人统一呢？

我们准备支持塔什干苏维埃，我们将同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队伍中作战，我们将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人民事业报”的公民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决不能既支持塔什干派同时又支持克伦斯基，谁支持塔什干派，谁就一定要同克伦斯基决裂呢？

他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他们不同克伦斯基政府决裂而保持“中立”，这样就背叛了他们塔什干同志们的事业呢？

他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在要求同布尔什维克建立统一战线之前，必须首先在自己家里，在自己◇290◇党内建立起这种统一，肯定地**或者**同克伦斯基决裂，**或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决裂呢？

你们要同布尔什维克建立统一战线吗？那末你们就要同克伦斯基政府决裂，就要支持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统一战线就会建立起来。

为什么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统一战线的形成是那样容易和简单呢？

因为当时统一战线不是经过无休止的讨论，而是在同反革命直接斗争的进程中产生的。

反革命还没有被击溃。它只是退却了，躲在克伦斯基政府背后。如果革命想获得胜利，那它还应当攻破反革命的这第二道防线。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成功，这也就是这个胜利的完成。谁不愿意跑到“街垒的那一边”，谁不愿意受到苏维埃的轰击，谁愿意革命获得胜利，谁就应当同克伦斯基政府决裂，谁就应当支持苏维埃的斗争。

你们要革命统一战线吗？

那末你们就要支持苏维埃反对执政内阁，就要坚决而彻底地支持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这样，统一战线自然就会形成起来，就会像在科

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那样简单和自然地形成起来。

和苏维埃在一起还是反对苏维埃？——“人民事业报”的公民们，你们选择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四号
社论 ◇291◇

他 们 在 制 造 镣 铐

妥协的机器开动了。冬宫这个政治幽会所挤满了客人。这里什么人没有呢？莫斯科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彼得堡的萨文柯夫分子，科尔尼洛夫的“部长”纳波柯夫和缴械英雄策烈铁里，苏维埃的死敌基什金和有名的同盟歇业者柯诺瓦洛夫，政治逃兵党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和柏肯盖姆一类的合作社派的顽固分子，讨伐党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和杜舍奇金一类的右派地方自治分子，执政内阁中的政治皮条匠和“社会活动家”中的有名富翁，——这就是那些高贵的客人。

一方面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业家。

另一方面是护国派和合作社派。

一方面，工业家是靠山，立宪民主党人是军队。

另一方面，合作社派是靠山，护国派是军队，因为在护国派失去了苏维埃之后，他们一定转到旧的阵地，转到合作社派方面。

——“你们要同布尔什维克一刀两断”，这样“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就会有共同的战线”，——基什金对护国派说。◇292◇

——谨遵台命，——阿夫克森齐也夫回答说，——但是首先让我们建立起“国家观点”来。

——“资产阶级注意布尔什维主义的增长和关心联合政权的建立是应该不亚于民主派的”，—— 柏肯盖姆提醒阿夫克森齐也夫说。

——谨遵台命，——阿夫克森齐也夫回答说。

你们听：联合政权所以需要，原来是为了对付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为了对付苏维埃，对付工人和士兵。

——预备国会应该是“咨议机关”，而政权应该是“不依赖”它

的，——纳波柯夫说。

——谨遵台命，——策烈铁里回答说，因为他同意“临时政府对预备国会不负正式……责任”（“言论报”）。

——不是预备国会建立政权，恰恰相反，而是政权建立预备国会，“宣布其成员、职权和规程”，——立宪民主党人在宣言中说。

——同意，——策烈铁里回答说，——“应该由政权批准这个机关”（“新生活报”）并决定“其组织形式”（“言论报”）。

而冬宫的诚实的经纪人克伦斯基先生却庄严地宣称：

（一）“目前只有临时政府有权组织政权和补充人员。”

（二）“这个会议（预备国会）不能有国会的职能和权利。”

◇293◇

（三）“临时政府不能对这个会议负责。”（“言论报”）

总之，克伦斯基“完全同意”立宪民主党人，而护国派又谨遵台命，——那还需要什么呢？难怪普罗柯坡维奇离开冬宫时说：“协议可以认为已经达成了。”

诚然，民主会议昨天还在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但是这和一贯的妥协分子有何相干呢？既然他们敢于伪造革命民主派的意志，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召开民主会议，那末，他们为什么不会也伪造民主会议的意志呢？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诚然，民主会议昨天还做出决议说，由预备国会来“建立”政权，后者对前者“负责”，但是这和一贯的妥协分子有何相干呢？只要联合好好存在下去就行，至于民主会议的决议……既然它们挖联合的墙脚，那它们还有什么价值呢？

可怜的“民主会议”！

可怜的天真而轻信的代表们！

他们会不会料到他们的领袖真正背叛呢？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

克不是从群众革命运动中汲取力量，而是从资产阶级政客的那种妥协手腕中汲取力量，所以他们不能采取独立的政策。

我们党说得对，它说，采取妥协政策就会背叛革命利益。

现在大家都看到，护国派的政治破产者正在亲手给俄国各族人民制造镣铐以取悦革命的敌人。◇294◇

难怪立宪民主党人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并预报胜利。

难怪妥协派先生们羞愧满面地走来走去，“好像挨了打的狗一样”。

难怪在克伦斯基的声明中听得出胜利的音调。

是的，他们在庆祝胜利。

但是他们的“胜利”是不稳固的，他们的凯旋是瞬息即逝的，因为他们的计划是背着主人，背着人民制定的。

因为时机已经不远了，受骗的工人和士兵终于会说出有分量的话来，把他们粉饰“胜利”的纸牌搭的房子弄成碎片。

那时候，如果妥协派先生们的护国主义废物连同联合的一切糟粕全被扫除，就让他们自己埋怨自己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九号
社论 ◇295◇

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在制造了民主会议的骗局和政府可耻地垮台以后，在同莫斯科的交易所经纪人进行了“会谈”并秘密拜访了布卡南爵士以后，在冬宫举行了幽会以及妥协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变活动以后，“新的”（崭新的！）政府终于成立了。

六个资本家部长，他们是“内阁”的核心，十个为资本家部长效劳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他们是前者意志的执行者。

政府的宣言还没有公布，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应读做同苏维埃作斗争！），“同破坏作斗争”（应读做同罢工作斗争！），“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应读做继续战争和恢复“纪律”！）。

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的“纲领”大体上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农民得不到土地，工人不能实行监督，俄国得不到和平。

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是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296◇

十个“社会主义者”部长是一个幌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将在这个幌子下进行其加强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统治的勾当。

过去科尔尼洛夫想直接地、用将军的简单方式实行的东西，“新”政府将力图逐渐地、不声不响地假“社会主义者”之手来加以实现。

资产阶级的专政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只有对多数人施以暴力才能实现，这种统治要求进行反对多数人的内

战。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它完全可以不要内战。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新”政府的政策将是挑起不能成功的局部发动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唆使士兵反对工人，或者说唆使前线反对后方，从而把革命的力量淹没在血泊之中。

区别还在于：资产阶级专政是秘密的、隐蔽的、幕后的专政，它需要用某种漂亮的掩护物来欺骗群众。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公开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它对内不需要欺骗，对外不需要秘密外交。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资产阶级的独裁者将力图背着群众、不要群众参加、用反对群众的阴谋手段来解决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的最初的一些步骤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外交方面最重要的职位都转到立宪民主党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要人的手里了。捷列申柯是外交部部◇297◇长，纳波柯夫是驻伦敦大使，马克拉柯夫是驻巴黎大使，叶弗列莫夫是驻伯尔尼大使——现在伯尔尼就要举行国际和平会议(预备会议！)。而这些脱离群众的人，这些公开与群众为敌的人，将要决定同数百万士兵生命有关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此外，据各报报道，“克伦斯基、捷列申柯、维尔霍夫斯基、维尔杰列夫斯基今天将前往大本营”，在那里，“除了在捷列申柯参加之下讨论前线一般情况外，还将举行外国驻大本营军事代办会议”(“交易所报”晚刊)……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盟国代表会议的召开，而并非无名的策烈铁里也将作为捷列申柯先生的桑乔·邦萨被带去参加这个会议。这些忠实于帝国主义事业的人，除了本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以外，还能嘀咕些什么呢？老实说，他们对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所进行的幕后谈判，除了阴谋反对人民的利益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容置疑，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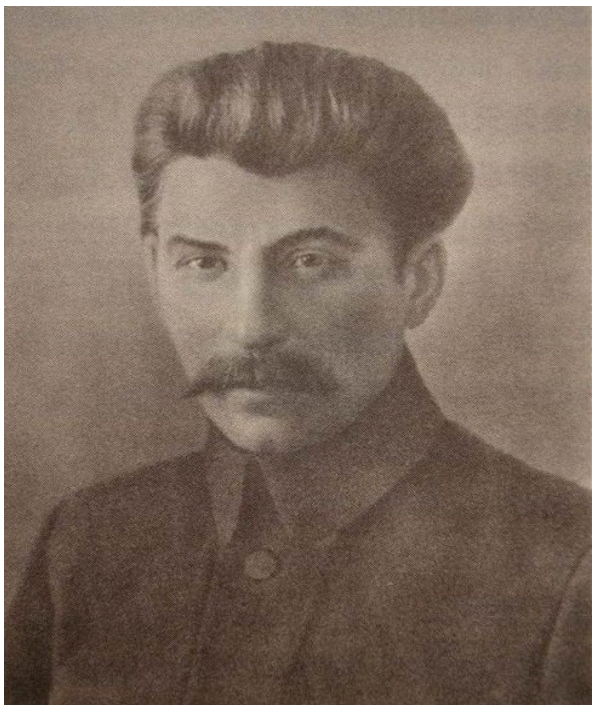
的政府。挑起内战，——这就是它的对内政策。幕后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确立少数人对俄国多数人的统治，——这就是它的目的。

作为俄国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摘下这个政府的假面具，向群众揭露它的反革命的真面目。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广大的士兵和农民阶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且防止他们举行为时过早的发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倦地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搏斗。

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已经走了第一步，他们表示不信任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并号召群众◇298◇“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自己的苏维埃周围，不要举行局部的发动”（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80]）。

现在该地方说话了。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一号
社论 ◇299◇



斯大林在 1917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画）

评　论

铁路罢工和民主主义的破产者

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铁路罢工[81]看来快要结束了。胜利是属于铁路员工的，因为很明显，科尔尼洛夫—护国派阵营的儿戏般的联合是无力抵御国内整个民主派的强大压力的。现在大家都明白，“引起”罢工的不是铁路员工的恶意，而是执政内阁的反革命政策。现在大家都明白，给国家造成罢工的不是铁路员工委员会，而是克伦斯基—尼基廷的反革命威胁。现在大家都明白，如果这次罢工被破坏，铁路就可能军事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起来。铁路员工做得对，他们对克伦斯基—尼基廷的卑鄙诽谤给了严厉的谴责：

“公民克伦斯基和尼基廷，不是我们背叛了祖国，**而是你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是临时政府背叛了自己的诺言**，现在任何言词和威胁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了。”

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和人所共知的。

可是，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命为民主派，但认为可以在这个严重的关头责难铁路员工，◇300◇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懂得，他们这样做就助长了“言论报”和“新时报”的食人者的气焰。

我们说的是孟什维克“工人报”的编辑部。

该报责备罢工的领导者，说他们宣布罢工是“迎合自发势力”，同时以威胁的口吻说道：

“民主派**不会宽恕**铁路员工总司令部的这种行动。决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整个民主派的利益这样轻易地作孤注一掷。”（“工人报”第一七〇号）

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是事实：毫无民主气息的没落的报纸自认为有权利对真正的民主派，对铁路员工进行威胁。

“民主派不会宽恕”……但是“工人报”的先生们，你们是代表什么样的民主派说话呢？

是不是代表那个已经离开了你们而你们却在民主会议上伪造它的意志的苏维埃民主派说话呢？但是，谁给了你们权利代表**这个**民主派说话呢？

也许你们是代表那些在民主会议上伪造苏维埃意志而在冬宫“谈判”时又出卖了这个会议的策烈铁里、唐恩、李伯尔和其他伪造者说话吧？

但是，谁给了你们权利把民主派的这些叛徒同“全国民主派”混为一谈呢？

你们是否有一天会懂得，“工人报”和“全国民主派”已经确定不移地背道而驰了呢？

可怜的民主主义的破产者……◇301◇

*　　*　　*

俄国的农民和蠢才们的党

不久以前我们说过，在政府同苏维埃的斗争这个基本问题上，社会革命党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当社会革命党右翼号召消灭“无政府主义的”苏维埃(请回想一下塔什干事件！)并组织讨伐队，而其左翼支持苏维埃的时候，充满哈姆雷特式的犹疑精神的切尔诺夫中派却没有自己的意见，宁愿保持“中立”。固然，后来中派“恢复了神智”，决定从塔什干苏维埃召回社会革命党党员，从而支持讨伐政策。但是，这种召回行动只是表明社会革命党的无耻，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退出塔什干苏维埃，“发动的反革命性”并不在苏维埃方面，而是在

克伦斯基政府及其喽啰方面，这一点现在谁不知道呢？……

但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摆脱这个“事件”，他们就又陷入了新的、更加丑恶的“事件”中。我们说的是他们在所谓预备国会中对土地问题的投票。

事情是这样，当预备国会讨论八月十四日宣言[82]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把地主的全部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民主派有责任支持这个提议，这还需要说明吗？土地问题是我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还需要说明吗？结果怎样呢？当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议把土地交给农民，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李伯尔唐恩分子[83]一起反对这个提议的时候，切尔诺夫中派又没有“自己的◇302◇意见”，在投票时**弃权**了！

“乡下佬部长”切尔诺夫不敢赞成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让伪造农民意志的人来决定问题！

社会革命党，即所谓“土地革命”和“完整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对农民的根本问题竟没有明确的意见！

真是蠢笨的空谈家的党！

不幸的俄国农民……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一号
本文没有署名◇303◇

向 工 人 的 进 攻

还在一个星期以前，资产阶级报刊就向顿巴斯的工人展开了攻击。“无政府状态”，“捣毁企业”，“逮捕和殴打”职员，——哪一种谎言没有被那些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纸用来诬蔑工人呢？那时就已经可以预见到，正在准备向顿巴斯工人进攻，正在为政府的这种进攻扫清道路。果然如此，政府对资产阶级仆从们的号叫“并没有置若罔闻”。它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据各报报道，临时政府的总经济委员会，当然是在克伦斯基的“同情”之下，“认为派一个拥有**独裁者**大权的人到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去……是适当的。应授权该员强迫工业家继续生产，并说服工人群众，使他们安定下来。这个特派员有权使用政府当局拥有的一切强制手段”（九月二十六日“工商报”[84]）。

请注意：有权使用“强制手段”的“独裁者”…… 派遣这个暂时还不知其名的“独裁者”去反对谁呢？也许是反对那些三个月以来故意缩减生产，罪恶地加剧失业，而现在又明目张胆地组织同盟歇业，以国家经济生活的破坏相威胁的顿巴斯的企业主吧？

当然不是！◇304◇

总经济委员会直截了当地说，全部罪过在“怀有恶意的鼓动者”身上，而不在企业主身上，因为“根据现有的材料，骚乱是个别怀有恶意的鼓动者集团引起的”（九月二十六日“工商报”）。

他们派遣有权使用“强制手段”的“独裁者”，首先就是为了反对这些人。

不仅如此，据“交易所报”报道，哈尔科夫的工业家代表会议已

经通过决议：

（一）“宣布解雇和雇用职工是企业的绝对权利。”

（二）“不准工人代表苏维埃干预生产的管理和监督。”

（三）“企业不能负担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会委员的办公费和薪金。”

（四）“无论给工人增加多少工资都改善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九月二十七日“交易所新闻”）

简单地说，工业家向工人及其组织宣战了。

不用说，同盟歇业者柯诺瓦洛夫的政府是不会不来领导这个反对工人的战争的。

既然工人不会不战而降，那就需要“独裁者”和“强制手段”。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萨文柯夫因为起草国防企业军事化草案而被称为反革命分子。

科尔尼洛夫因为要求实行这个草案而被谴责为叛徒。

应该怎样称呼这个为了同工人群众作战，为了摧毁他们的组织，“干脆”就把有权使用“一切强◇305◇制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独裁者”派到顿巴斯去的政府呢？

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者”部长先生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二号
本文没有署名◇306◇

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并不存在，它是由于科尔尼洛夫暴动而出现的。

在战胜沙皇制度之后，在革命的最初几天，政权落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掌握政权的不是工人和士兵，而是一小撮立宪民主党的帝国主义分子。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当时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统治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事情是这样：当时工人和士兵(主要是士兵)信任资产阶级，希望同它结成联盟来获得面包和土地、和平和自由。群众对资产阶级的“盲目信任”，——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统治所依靠的东西。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过是这种信任和这种统治的表现而已。

但是革命的六个月并没有白白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所给予群众的不是面包而是饥饿，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失业，不是土地而是空洞的诺言，不是自由而是对苏维埃的斗争，不是和平而是把俄国弄得疲惫不堪的战争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在塔尔诺坡里及里加附近的叛变。科尔尼洛夫暴动不过是总结了六个月的联合的经验，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以及同他们妥协的政策的危害性。◇307◇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白白过去的。群众对资产阶级的“盲目信任”消失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裂代替了同他们的联合。对资产阶级的信任让位于对它的憎恨。资产阶级的统治失去了它的可靠的支柱。

固然，在工人和士兵显然不信任的情形下，靠护国派的妥协奸计，靠欺诈和伪造，靠布卡南和立宪民主党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帮助，妥

协派终于用欺骗的方法把已经过时的破烂不堪的联合拖了出来，拼凑了旧资产阶级专政的“新”政府。

但是，第一、这个联合是脆弱的，因为在冬宫缔结的这个联合在国内遇到的只是反抗和愤怒。

第二、这个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它没有群众的信任和同情做基础，群众对它只是憎恨。

因此，在政府和国家之间就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这个政府还要继续掌握政权，如果它执行少数人的意志，打算统治显然和它为敌的多数人，那末很明显，它只能指靠一个东西：对群众施以暴力。这样的政府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支柱。

因此，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捣毁塔什干苏维埃，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个政府已经开始镇压顿巴斯的工人运动，把神秘的“独裁者”派到那里去，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个政府在他们昨天的会议上向农民“骚动”宣战，这也不是偶然的。它决定：

“在各地成立临时政府的委员会，委员会的直接任务就是反对无政府状态和镇压骚动。”◇308◇（“交易所报”）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失去了群众信任而仍然希望保持政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没有“无政府状态”和“骚动”就不能活下去，它企图用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反对“骚动”的斗争来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它睡觉也梦见布尔什维克“组织了暴动”，或者农民“劫掠了”地主，或者铁路员工“发动了有害的罢工”而使前线得不到粮食……它“需要”这一切是为了激起农民反对工人，激起前线反对后方，从而造成武装干涉的必要性，以便暂时巩固它的不稳定的地位。

因为终究应该知道，失去了全国的信任和遭到群众憎恨的政府只

能是**挑起“内战”的政府**。

难怪临时政府的半官方报纸“言论报”警告政府不要“让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选择宣布内战的时机”，并劝告政府不要“忍耐和等待到他们(布尔什维克)选好总发动的适当时机”(星期三“言论报”)。

是的，他们渴望喝人民的血……

但是他们的期望是要落空的，他们的挣扎是可笑的。

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自觉地和有组织地走向胜利。农民和士兵正齐心地和确信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呼声愈来愈响亮了。

冬宫的纸上的联合…… 经得住冲击吗？◇309◇

你们想要布尔什维克举行分散的和为时过早的发动吗？

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先生们。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三号
社论 ◇310◇

评　论

“态度暧昧的”党和俄国士兵

在沙皇专制时代，社会革命党到处叫喊必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当时农民相信社会革命党人，并团结在他们的周围，认为社会革命党是农民自己的党。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和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从言论转到行动和最后实现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土地的“珍言”的时候来到了。但是……(好一个出色的“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动摇了，他们吞吞吐吐地建议农民等到立宪会议召开时再去解决土地问题，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已经延期了。

原来叫喊土地和农民要比实际上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得容易。原来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口头上“心疼”农民，一到从言论转到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宁愿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躲在立宪会议的后面……

农民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发动强大的土地运动，自行“夺取”地主的土地，“强占”“别人的”农具，从而表示不信任社会革命党的等待政策。

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立即对农民进行报复，逮捕了数十数百的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社◇311◇会革命党的部长们逮捕那些实现社会革命党诺言的社会革命党的农民，——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一幅图画就是如此。

结果就是社会革命党完全瓦解，这种情形在预备国会投票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赞成**把土地立即交给农民，右派

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反对**，而切尔诺夫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哈姆雷特和中派却煞有介事地**弃权了**。

士兵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大批地退出社会革命党。

一部分暂时还没有退出社会革命党的士兵则坚决“请求党中央”在消除“暧昧态度”的基础上来最后达到党的统一。

请看：

“彼得格勒、皇村、彼得戈弗等地的团队和特种部队党组织的代表联席会议认为在目前党的困难时期，必须根据消除党的暧昧面貌把一切有生命力的党员团结起来的纲领……把党内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会议主张……把一切可耕种的土地立即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人民事业报”）

总之，又是“**立即**移交土地”的问题！

士兵们希望在承认这个要求的基础上把社会革命党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党员”团结起来！

多么天真的人！他们在多次失败之后还想再一次把革命者卡姆柯夫、立宪民主党人阿夫克森齐◇312◇也夫[①]和“态度暧昧的”切尔诺夫套在一辆马车上！

士兵同志们，你们现在应该明白，社会革命党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态度暧昧的”人群，其中一部分已经陷入萨文柯夫的立场，另一部分仍旧留在革命队伍中，第三部分则犹疑不决，踌躇不前，实际上在给萨文柯夫分子打掩护。

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并抛掉那种想把不可联合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企图了。

*　　*　　*

——————————————

① 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是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之一，但他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都站在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因此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译者注

阴谋家掌握政权

今天布尔采夫在他的“共同事业报”[85]上写道：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本没有过科尔尼洛夫阴谋！事实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曾经有过政府与科尔尼洛夫将军关于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协定**！政府代表和科尔尼洛夫将军所协商的事情——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各个不同政党(无论是民主主义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们的宿愿。在倒霉的八月二十六日以前，他们都把科尔尼洛夫将军看做使自己摆脱日益逼近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救星。”

不是“阴谋”而是“协议”，——布尔采夫还加上了着重号。◇313◇

他说得对。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曾经签订过关于组织阴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即反对工人阶级，反对革命军队和农民的协定，曾经有过**关于阴谋反对革命的协定**！

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最初几天起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数十件数百件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被揭露出来的谁也没有驳倒的事实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一点。

阴谋家仍在掌握政权或接近政权。把戏仍在继续，侦查的把戏，“革命”的把戏……

和阴谋家联合，阴谋的政府，——原来这就是护国派先生们赐给工人和士兵的东西！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三号
本文没有署名◇314◇

纸 上 的 联 合

有人在谈论破坏。有人在写文章评论破坏。有人以破坏的魔影进行恫吓，并常常把责任推到怀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工人身上。但是谁也不愿意公开承认：破坏往往是资本家制造和故意加剧的，他们关闭工厂，使工人遭到失业。“交易所报”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有趣的报道：

“在莫斯科省巴维尔镇俄法纺纱公司的工厂中，由于不遵守奥列哈沃—祖也沃区委员会在普罗柯坡维奇部长主持下所订的合同而发生了纠纷。这个工厂约有四千名工人。工人委员会向劳动部报告了由于企业主不愿意服从仲裁法庭的判决和故意降低劳动生产率而造成的严重情况。谈判进行了四个月，现在关闭工厂的危险已经迫近。与此同时，俄法公司的工厂董事会向法国大使馆声明说，工人不愿服从仲裁法庭的判决，并以骚乱和破坏相威胁。法国大使馆已经请求外交部协助消除冲突。”

结果怎样呢？原来“工厂董事会”和“法国大使馆”都同样在诬蔑工人，竭力为同盟歇业资本家辩护。请看：

“这件事已交由劳动部驻莫斯科专员处理，他就地对纠纷进行调查后向劳动部部长报告说，◇315◇“**工厂行政当局一贯逃避执行仲裁法庭的判决**。劳动部驻莫斯科专员的报告已经转交外交部。”

可见连反革命的劳动部的专员也不得不承认工人是正确的了。

不仅如此，同一个“交易所报”还报道了另一个更加有趣的事实：

“据莫斯科向劳动部的报告，亚·瓦·斯米尔诺夫工厂行政当局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并且需要进行大修而宣布关闭这个有三千名工人

的工厂。由‘莫斯科燃料公司’和莫斯科工厂会议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会同该厂工人委员会对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说，关闭企业的理由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有足够的原料可供生产之用，而且不停工也可以进行修理。于是**工人逮捕了企业主。地方自治局会议主张查封工厂**。坡克罗夫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县专员都参加了这一纠纷的解决。”

事实就是如此。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分子到处叫喊必须同国内的“有生力量”联合，并肯定地指出同莫斯科的工业家联合。同时他们每次都着重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冬宫里的口头上的联合，而是全国的真正联合……

我们要问：

在故意加剧失业的厂主和因此而在临时政府专员的善意参加下把厂主逮捕起来的工人之间能不能有某种真正的联合呢？◇316◇

那些还在歌颂和罪恶的同盟歇业者联合的“革命”空谈家的愚蠢是否有个限度呢？

这些宣传联合的可笑的吹鼓手们是否想到，现在除了在冬宫内缔结的、预先就注定要破产的纸上的联合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联合呢？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四号
本文没有署名◇317◇

评　论

农 村 在 挨 饿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城市中的粮食危机。饥饿的“魔掌”的幻影正在城市上空盘旋。但是谁也不愿意承认，饥饿也悄悄地来到了农村。谁也不愿意了解，现在足有半数的“农民骚动”和“暴行”正是由于饥饿而发生的。

下面是一个农民关于农民“骚动”的来信：

“我想请求你们给我们这些‘愚味无知的农民’解释一下，为什么发生了暴行？你们以为这一切都是流氓、无赖和醉鬼干出来的，可是你们想得有点不对。这不是无赖，也不是醉鬼，而是饿醉了的人。就拿穆罗姆县阿列芬诺乡来说吧。他们打算把我们饿死在这里。他们每月发给我们每人五磅面粉。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怎么活命呢？在这里不仅喝醉了酒的人制造暴行，可是我们自己就是‘饿醉了的人’。”（见“交易所报”）

“日报”和“俄罗斯意志报”中的资产阶级的看家狗不倦地狂吠，说农村富足，说农民富裕等等。但是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农村发生了饥饿和贫困，发生了因饥饿而引起的坏血病和其他疾病。而且◇318◇愈是往后，农村的情况就愈严重，因为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政府给农村准备的不是粮食，而是新的讨伐队，同时即将来到的冬天在向农民预报新的更严重的灾难。

同一个农民写道：

“冬天很快就要来到，河流将要封冻，那时我们就只好饿死了。

火车站离我们很远。我们将要到街上去讨饭。随便你们叫我们什么，但是饥饿迫使我们这样做。”（“交易所报”）

这就是农民的动人的叙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分子曾经吹嘘联合和联合政府有挽救一切的力量。现在我们既有“联合”又有“联合”政府。试问：

这个政府挽救一切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除了讨伐队以外它还能拿什么给挨饿的农村呢？

妥协派先生们是否觉得，农民的这封朴实的信给他们所拼凑的联合宣判了死刑呢？

* * *

工 厂 在 挨 饿

工厂区遭到的灾难更加严重。饥饿并不是第一次光顾工厂区居民，不过这一次特别猖獗。战前◇319◇俄国每年输出四亿到五亿普特的粮食，而现在，在战争时期，竟不能养活本国的工人。工厂相继停工，由于工厂区没有面包，没有粮食，工人纷纷弃工而去。

下面是各地的报道：

“舒雅来电：全县劈柴业都已经停工。粮食没有了。由于缺少工人食用的粮食，柯留柯夫炼糖厂有关闭的危险。甜菜已经开始腐烂。雅尔采沃纺织工厂(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万二千人正处在绝望的境地。储存的面粉和米粮已经全部用尽。省粮食委员会无力帮助。工人因得不到粮食而皇皇不安。骚动已经不可避免。库夫申诺夫公司造纸厂(特维尔省)的工长会议来电：工人正处在饥饿的前夜。到处拒绝供给粮食。我们请求立即予以援助。维邱加城莫罗金公司工厂董事会来电：粮食问题非常严重。工人在挨饿，皇皇不安。必须在供给方面采取紧急措施。该公司的工厂委员会向部里发出电报：我们恳切地请求急速

供给工人面粉，因为已经开始断炊了。”

事实就是如此。

农业区埋怨工厂区供给他们的商品太少。因此，农业区供给工厂区的粮食也就同样地少。但是，工厂区的粮食不足会使工人离开工厂，会使生产缩减，也就是说，会使供给农村的商品更加减少，而这种情形又会使供给工厂的粮食更加减少，工厂的饥饿更加严重，离开工厂的工人更多。

试问：

摆脱这种像铁钳一样紧扼住工人和农民的魔圈的出路在哪里呢？◇320◇

除了把臭名远扬的“独裁者”秘密派到挨饿的工业区以外，所谓联合政府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妥协派先生们是否觉得，他们所一直支持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已经把俄国驱入不停止掠夺战争就别无出路的绝境呢？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六号
本文没有署名◇321◇

他们鞭打了自己

不久以前在塔什干发生了一个“最普通的”事件，目前在俄国“这样的事件很多”。塔什干的工人和士兵遵循着事变革命化的逻辑，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旧成员表示不信任，并在选出新的革命的委员会之后，推翻了科尔尼洛夫式的政府，建立了新政府，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仅仅这一点就足够临时政府的那些别列赫瓦特-札里赫瓦特斯基[①]作为向“无政府主义的”塔什干苏维埃宣战的借口了。固然事实说明，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这和临时政府的“戡乱者”有何相干呢？

而“人民事业报”中的社会革命党的哈姆雷特们却跟着克伦斯基的屁股转，煞有介事地宣布塔什干苏维埃是“反革命的”，要求召回塔什干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并宣布必须在土尔克斯坦建立“革命秩序”。

甚至连衰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认为必须向不幸的塔什干派踢一脚……

只有我们党彻底而坚决地支持了革命的塔什干苏维埃来对付政府及其走狗的反革命侵犯。

结果怎样呢？◇322◇

总共才过了几个星期，“怒火就平息了”，昨天从塔什干来的一位代表向我们揭露了塔什干“事件”的真相，——原来塔什干派不顾

————————————————

① 别列赫瓦特-札里赫瓦特斯基是俄国著名作家谢德林的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人物。他任格鲁波夫市(愚蠢市)市长，“焚学校，废科学”，目光狭小，刚愎自用，是沙皇俄国反动统治者的典型。——译者注

临时政府走狗们的反革命勾当，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职责。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一致**通过决议表示信任塔什干的同志，“苏维埃中的各个党团都表示有充分决心支持塔什干革命民主派的正义要求”。同时在表决前发言的施罗柯娃代表社会革命党声称，该党将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

那末，对于从塔什干苏维埃中召回社会革命党人这件事该怎么办呢？这个苏维埃的“反革命性”，这个苏维埃的“不成体统的行为”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切现在都被忘记了……

那有什么呢？我们欢迎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转变”：晚转变总比不转变好。

但是“人民事业报”的首领们是否觉得，两星期以前当他们卑怯地避开塔什干苏维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无情地鞭打了自己呢？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323◇

反 革 命 的 阴 谋

布尔采夫不久以前在“共同事业报”上写道，“根本没有过科尔尼洛夫**阴谋**”，“仅仅有过”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政府之间关于根除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以建立军事专政的“**协定**”。布尔采夫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在“共同事业报”第六号上刊登了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是由几个描述阴谋经过的文件组成的。布尔采夫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要造成一种有利于科尔尼洛夫的气氛，并使对科尔尼洛夫的审判成为不可能。

我们决不认为科尔尼洛夫的材料已经详尽无遗了。例如科尔尼洛夫除了为自己的叛国罪辩护以外，没有提到某些参与阴谋的人物和组织，首先是没有提到外国大使馆驻大本营的某些代表，而根据见证人的证词来看，这些代表所扮演的决不是次要的角色。还应该指出，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经过了布尔采夫的密探式的修改，布尔采夫已经从“说明书”中删去了某些也许是极其重要的地方。然而作为文件来说，“说明书”仍有很大的价值。在没有其他同样重要的证词和这个文件相抵触以前，我们将把它当做文件来看待。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和读者谈谈这个文件。◇324◇

他们是谁？

科尔尼洛夫的顾问和鼓舞者是谁呢？科尔尼洛夫把他的阴谋意图首先告诉了谁呢？

科尔尼洛夫说：“我想请米·罗将柯、格·李沃夫公爵和巴·米

留可夫来参加讨论关于国内情况以及为挽救国家和军队免于完全瓦解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问题，并且曾电告他们，请他们至迟在八月二十九日到达大本营。”

科尔尼洛夫本人所承认的主要顾问就是这些人。

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顾问和鼓舞者以外，还有一些主要的合作者，科尔尼洛夫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想依靠他们并打算和他们一起来实现自己的阴谋。

请看：

“曾经草拟了‘人民国防委员会’的方案，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最高总司令(主席)、克伦斯基(副主席)、萨文柯夫、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和菲洛年柯。这个国防委员会**必须实行集体专政**，因为建立个人专政是不受欢迎的。其他部长职位拟由塔赫塔梅舍夫、特列齐雅柯夫、坡克罗夫斯基、依格纳切夫、阿拉季因、普列汉诺夫、李沃夫和札沃依柯等先生担任。”

这就是鼓舞科尔尼洛夫并为科尔尼洛夫所鼓舞的、背着人民和科尔尼洛夫秘密会谈并在莫斯科◇325◇会议上向他鼓掌的那打得火热的一伙值得尊敬的阴谋家。人民自由党的首领**米留可夫**、社会活动家会议的首领**罗将柯**、工业家的首领**特列齐雅柯夫**、社会革命党中的护国派的首领**克伦斯基**、孟什维克中的护国派的导师**普列汉诺夫**、伦敦某公司的代理人**阿拉季因**，——这就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希望和靠山，反革命的灵魂和神经。

我们相信历史不会把他们遗忘，同时代的人会给他们以应得的报偿。

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明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整顿后方”以“挽救俄国”。

科尔尼洛夫说，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我曾经指出”：

“必须在战场上立即恢复死刑法。”

科尔尼洛夫继续说，为了整顿后方“我曾经指出”：

“必须把死刑和军事革命法庭法推广到内地各军区，因为如果从后方补充到军队里来的人员是一帮纪律松弛、没有受过训练而受了宣传影响的士兵，那末任何恢复军队战斗力的措施都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不仅如此，在科尔尼洛夫看来，“要达到战争的目的”……必须有三支军队：“战壕里的，后方工人的和铁路的”。换句话说，“必须”把军事“纪律”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措施推广到为国防进行生产◇326◇的工厂中和铁路上去，就是说“必须”使它们军事化。

总之，在前线施行死刑，在后方施行死刑，使工厂和铁路军事化，把国家变为“军”营，最后,建立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军事专政,——这伙阴谋家所追求的目的原来就是如此。

这些目的在那个还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已颇负盛名的特别“报告”中叙述过。现在这些目的又作为“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出现在科尔尼洛夫的电报和“说明书”中了。

克伦斯基政府是否知道这些“要求”呢？

——无疑是知道的。

克伦斯基政府是否同意科尔尼洛夫呢？

——看来是同意的。

科尔尼洛夫说：“我在签署了已由萨文柯夫和菲洛年柯两位先生签署过的关于整顿军队和后方的办法的总报告之后，就把它递交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申柯三位先生所举行的非正式的临时政府会议。他们审查报告后通知我说，政府同意我所提出的一切办法，至于实施这些办法，那是政府采取措施的速度问题。”

萨文柯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在八月二十四日向科尔尼洛夫声称：

“临时政府最近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人民自由党是否知道科尔尼洛夫的目的呢？◇327◇

——无疑是知道的。

它是否同意科尔尼洛夫呢？

——看来是同意的。因为人民自由党的中央机关报“言论报”曾经公开声称，它“完全赞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理想”。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人民自由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克伦斯基政府是掩盖这种专政的屏风。

现在，当科尔尼洛夫分子遭受第一次打击以后恢复了元气的时候，掌握政权的阴谋家又重新谈起“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整顿后方”来了。

工人和士兵应当记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整顿后方”意味着在后方和前线施行死刑。

他们的方法

他们的方法也像他们的目的一样“简单而明白”。这就是根除布尔什维主义，解散苏维埃，把彼得格勒划为特别军事管制区，解除喀琅施塔得的武装。一句话，击溃革命。为此就需要第三骑兵军。为此就需要野蛮师。

萨文柯夫在和科尔尼洛夫一起讨论了确定彼得格勒军事管制区的界线的问题后曾对科尔尼洛夫说过这样的话：◇328◇

“这样，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临时政府最近就会满足你的要求，不过政府担心彼得格勒会发生严重的纠纷。你当然知道，大约在八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举行严重的发动。把你这些由临时政府来实现的要求加以公布，当然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导因。虽然我们也拥有足够的军队，可是我们不能完全指

望他们。况且还不知道工兵代表苏维埃对新法律的态度如何。它也可能反对政府，那时我们就不能指望我们的军队了。因此，我请你下令把第三骑兵军在八月底以前调到彼得格勒，交由临时政府指挥。如果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参加发动，那末我们就不得不也对他们采取行动。”

萨文柯夫又说，行动必须是最坚决和最无情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回答说，他“不知道有其他行动。既然布尔什维克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要举行发动，那只好用全部力量把它镇压下去”。

为了直接执行这些措施，科尔尼洛夫给第三骑兵军和土著师的长官克雷莫夫将军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从我(科尔尼洛夫)这里或者直接从当地得到布尔什维克开始发动的消息时，要立即率领骑兵军向彼得格勒前进，占领全城，解除那些参加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武装，解除彼得格勒居民的武装，并解散苏维埃。

(二)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克雷莫夫将军应派遣一个配有炮队的旅到奥拉尼恩包姆去，到达该地后，要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解除炮台的武装并转移到陆地上。◇329◇

关于解除喀琅施塔得炮台的武装和调走该地卫戍部队的问题已在八月八日得到总理的同意，海军总参谋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和总理的批示已经附在马克西莫夫海军上将的信中交给最高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就是那打得火热的一伙阴谋家反对革命和革命成果的方法。

克伦斯基政府不仅完全知道这个恶毒的计划，而且亲自参加了这一计划的拟定，并打算和科尔尼洛夫一道来实现它。

当时还掌管着军事部的萨文柯夫曾对这一点发表公开声明，而且还没有任何人否认过他的这个人所共知的声明。

下面就是他的声明：

“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我认为我有义务声明，我受总理的委托，曾经请你(科尔尼洛夫)把骑兵军调来，以便保证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和镇压一切反对临时政府的骚动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来自何方……”

看来是很明显了。

立宪民主党是否知道科尔尼洛夫的计划呢？

——无疑是知道的。

因为该党的中央机关报“言论报”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前夕曾经加紧散布所谓“布尔什维克暴◇330◇动”的挑衅性的谣言，**从而**为科尔尼洛夫侵入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扫清道路**。

因为从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中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的代表马克拉柯夫先生是“亲自”参加萨文柯夫和科尔尼洛夫商谈侵入彼得格勒计划的一切谈判的。据我们所知，当时马克拉柯夫不论在临时政府直属机关或在临时政府都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如果他不是以自己党的代表的资格参加这种谈判，那他是以什么资格参加的呢？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克伦斯基政府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科尔尼洛夫分子，它和后者的区别只在于它比较“不坚决”。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反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线索都掌握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手里。

彼得堡和莫吉廖夫阴谋家的反革命计划没有得逞，这不应当归咎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也不应当归咎于马克拉柯夫和萨文柯夫，而应当归咎于那些他们打算“解散”但又无力对抗的苏维埃。

现在，当科尔尼洛夫分子已经在妥协派的帮助下篡夺了政权而恢复元气的时候，对苏维埃作斗争的问题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工人和士兵应当记住，如果他们不支持苏维埃去反对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政

府，那他们就有落到军事专政的铁蹄之下的危险。◇331◇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专政

反革命的阴谋家科尔尼洛夫和米留可夫、阿拉季因和菲洛年柯、克伦斯基和李沃夫公爵、罗将柯和萨文柯夫所阴谋建立的“集体专政”是什么呢？他们想给这个专政套上什么样的政治形式呢？为了把“集体专政”建立起来并安排妥当，他们认为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机关呢？

让文件来证明吧。

“科尔尼洛夫将军问菲洛年柯，他是否认为只有宣布军事专政才是摆脱已经形成的困难状况的唯一出路。

菲洛年柯回答说，切实地考虑到专政者，在目前情况下就只能想到科尔尼洛夫将军。菲洛年柯对个人专政提出了这样的反驳意见：科尔尼洛夫将军本人对于政治局势没有足够的知识，所以在他的专政之下就会造成通常所说的权奸当政的局面。民主派和共和派一定会反对这种情况，因而也一定会反对个人专政。

科尔尼洛夫将军：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该怎么办呢？

菲洛年柯：可以在组织执政内阁中找到出路。必须在政府中建立一个小型军事内阁，参加这个内阁的应当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将军和萨文柯夫必须参加这个内阁。这个内阁可以叫做“人民国防委员会”或什么别的，——问题不在于名称。这个小型内阁应◇332◇该把保卫国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样的执政内阁方案一定会被政府通过。

科尔尼洛夫：你说得很对。执政内阁是必要的，应当尽快……”（“新时报”）

再往下看：

“曾经草拟了‘人民国防委员会’的方案，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最高总司令(主席)、亚·费·克伦斯基(副主席)、萨文柯夫先生、阿列克谢也夫将军、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和菲洛年柯先生。

这个国防委员会必须实行集体专政，因为建立个人专政是不受欢迎的。”(“共同事业报”)

总之，**执政内阁**，——这就是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集体专政”所应当套上的政治形式。现在谁都明白，克伦斯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以后建立执政内阁也就是用另一种手段实现**同一种科尔尼洛夫专政**。

现在谁都明白，衰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那次夜间举行的会议上表示拥护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也就是拥护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计划。

现在谁都明白，“人民事业报”的才子们口沫飞溅地为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辩护也就是不自觉地背叛了革命，使公开的和隐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拍手称快。

我们党说得对，它断定说，执政内阁是反革命专政的一种伪装形式。

但是，只靠执政内阁“成不了大事”。反革命的能手们不能不知道，要“统治”一个已经尝到民主果实的国家，不加某种“民主的”伪装，只靠一个执政内阁是不行的。执政内阁形式的“集体专◇333◇政”，——这很好！但是何必让它赤裸裸的呢？用某种“预备国会”来把它掩盖一下不是更好吗？让“民主的预备国会”保存下来去空谈吧，只要国家机关掌握在执政内阁的手里就行！大家知道，最先提出组织“预备国会”作为执政内阁的靠山和屏风，并由执政内阁对这个“预备国会”“负责”(不要笑！)的方案的就是科尔尼洛夫的代办札沃依柯先生、伦敦某公司的代理人阿拉季因先生和米留可夫的朋友科尔尼洛夫“本人”。

让文件来证明吧。

“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周围的人坚持建立执政内阁，没有想到执政内阁是不对国家负责的。马·马·菲洛年柯是阿拉季因所提出的成立代议机关的方案的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根据这个方案，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政府应当对这个代议机关绝对负责。

照阿拉季因的意思，参加这个代议机关的应该有第四届国家杜马(除了它的右翼和一切不起作用的议员以外)、前三届杜马中的左派分子、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不管是什么党派的代表)以及十个至二十个由这个代议机关本身推选出来的最有名的革命活动家，如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克鲁泡特金、菲格涅尔等人。由此可见，最先提出组织‘预备国会’的思想的是阿·费·阿拉季因。”(“新时报”)

总之，“**预备国会**”，——这就是那个应该成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集体专政”的“民主”靠山的“代议机关”。◇334◇

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预备国会”是政府对它“负责”的一个机关，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预备国会”**将代替**立宪会议；如果立宪会议延期召开，“预备国会”就**代替**立宪会议；“预备国会”为**延期**召开立宪会议**提供**“法律上的**根据**”(欢呼吧，法学家们！)；“预备国会”是**破坏**立宪会议的**手段**，——反革命阴谋家的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

现在谁都明白，克伦斯基“批准”两天后就要召开的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不过是用另一种手段来实现反革命阴谋家的**同一个反革命计划**罢了。

现在谁都明白，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和唐恩之流组织“预备国会”并为此布置许多骗局，就是为公开的和隐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效劳，就是反对革命和革命的成果。

现在谁都明白，“人民事业报”的才子们叫喊立宪会议，同时又

加强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就是在破坏立宪会议。

做科尔尼洛夫的门徒，——这就是“民主会议”上那些“负责的”空谈家即策烈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所能做的一切。

*　　*　　*

第一个结论

从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科尔尼洛夫案件”不是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也不是好大喜功的将◇335◇军的单纯的“冒险”，而是反对革命的真正阴谋，而是有组织的和经过周密计划的阴谋。

阴谋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是一部分反革命将军、立宪民主党代表、莫斯科“社会活动家”代表、临时政府中最“亲信的”阁员以及(按其重要性来说却不是最末位的！)某些大使馆的某些代表(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没有提到他们)。

也就是所有那些在莫斯科会议上“热烈”欢迎过科尔尼洛夫、把他看做“俄国公认的领袖”的人们。

“科尔尼洛夫阴谋”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对俄国各革命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阴谋。

阴谋的目的是击溃革命和建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

在阴谋家之间有过分歧，但这种分歧是细小的、量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政府采取措施的速度”上：克伦斯基想小心谨慎地干，而科尔尼洛夫则要“横冲直撞地干”。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建立以**执政内阁**“集体专政”为形式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用“民主的”**预备国会**掩饰这种专政以欺骗头脑简单的人。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这种专政是少数好战的剥削者对多数渴望和平的劳动者的

统治。请读一读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请看一看和政府阁员们的“谈判”，其中说到镇压革命的措施，说到巩固资产阶级制度和延长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但是没有一句话说到要求土地的农民，说到要求面包的工人和渴望和平◇336◇的大多数公民。而且整个“说明书”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把群众紧夹在铁钳之中，政权应该操在一小撮专政者的手中。

其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旨在欺骗群众的、幕后的、秘密的、隐蔽的专政。只要看一看“说明书”就会了解，阴谋家先生们多么热心地想把自己的卑鄙计划和幕后奸计不仅瞒过群众而且也瞒过自己的同僚和党内“朋友”。为了欺骗群众，他们编造了组织“民主的”预备国会的计划，其实在后方和前线施行死刑的情况下能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为了欺骗群众，他们保存了“俄罗斯共和国”，其实在五人专政集团独揽大权的情况下能有什么共和国可言！

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对群众使用暴力的专政。除了对群众一贯使用暴力以外，这种专政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支柱。后方和前线的死刑，工厂和铁路的军事化，枪杀，这就是这个专政的武库。用暴力辅助“民主的”欺骗，用“民主的”欺骗掩盖暴力，——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的全套伎俩。

阴谋家们想在俄国建立的正是这种专政。

* * *

第二个结论

我们决不能把个别英雄的恶意看做产生阴谋的原因。我们也决不能用阴谋发动者的政治野心来◇337◇解释阴谋的产生。产生反革命阴谋的原因要深刻得多。这些原因必须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中去找。这些原因必须在这个战争的要求中去找。临时政府在六月间采取的前

线进攻的政策，——就是应该在这种地方去找产生反革命阴谋的根源。在一切地方，在所有交战国内，在帝国主义战争气氛中实行的进攻政策都必然要求取消自由、实行戒严和建立“铁的纪律”，因为在具有最大限度自由的条件下，不可能为所欲为地把群众驱入世界各国掠夺者所策动的大屠杀中。在这一方面，俄国也不能例外。

在本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压力之下，六月间宣布在前线进攻。士兵拒绝顺从地去进攻。团队开始被解散。这种措施并没有奏效。因此，军队被认为是“没有战斗力的”。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科尔尼洛夫(不只是科尔尼洛夫！)要求在前线施行死刑法，并且预先禁止了士兵的集会。后方的士兵和工人对这件事情提出了抗议，激起了前线士兵的愤怒。为了回答这一点，前线的将军们在资产阶级支持之下要求把死刑推广到后方，要求工厂和铁路军事化。专政的计划和阴谋不过是这些措施的逻辑发展而已。这就是科尔尼洛夫的“说明书”所生动地描述的“恢复铁的纪律”和反革命发展的简单历史。反革命来自前线，它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由于进攻的要求而产生的。阴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业已存在的反革命，使它合法化，把它扩展到全俄国。

沙皇杜马的六三政变的顽固分子知道，当他们早在六月初就要求和盟国密切配合“立即”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是在干什么。这批经验丰富的反革命能手知道，进攻政策必然引来反革命。◇338◇

我们党说得对，当时它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警告说，前线的进攻会使革命遭到致命的危险。

护国派的首领们否决了我们党的声明，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政治上的幼稚和思想上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依赖。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只有一个：上述阴谋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进攻政策的要求而产生的反革命的继续。只要这个战争和这种政策存在，反革命阴谋

的危险也就存在。为了使革命免遭这种危险，必须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必须消灭进攻政策的可能性，必须争得民主的和平。

* * *

第三个结论

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者”已经被逮捕。政府所组织的侦查委员会正“匆忙地”进行工作。临时政府装成最高审判官。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者”扮演“叛乱者”。“言论报”和“新时报”的一伙人扮演科尔尼洛夫的辩护人。好打听消息的人说：“审判一定很有趣。”“人民事业报”意味深长地指出：“审判将揭发出许多重要材料。”

叛乱是反对谁呢？当然是反对革命！而革命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临时政府中，因为叛乱是为反◇339◇对临时政府而发动的。这个革命包括哪些人呢？包括“还是那位”克伦斯基、立宪民主党的代表、莫斯科“社会活动家”的代表和站在这些绅士背后的一位爵士。甲问：“但是那里不是少了一个科尔尼洛夫吗？”乙答：“这和科尔尼洛夫有何相干，他已经受命坐到被告席上”……

不过我们要放下帷幕了。科尔尼洛夫确实组织了反革命的阴谋。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干的。鼓舞他的有米留可夫和罗将柯、李沃夫和马克拉柯夫、菲洛年柯和纳波柯夫。和他合作的有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阿列克谢也夫和卡列金。诸如此类的绅士现在仍安然无事地逍遥法外，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在根据科尔尼洛夫“本人”的宪法“管理着”国家，这难道是神话吗？此外，科尔尼洛夫还得到俄国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支持，现在所有这些科尔尼洛夫的合作者都在为了这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管理着”国家。对科尔尼洛夫一人的审判是一出可怜而又可笑的喜剧，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另一方面，怎样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个组织反革命阴谋的主犯提交法庭

审判呢？司法部的高明匠师们，请你们解决吧！

显然，问题不在于喜剧式的审判。问题在于：在科尔尼洛夫的发动以后，在进行了轰动一时的逮捕和“严格的”侦查以后，政权又完整无缺地“落到”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手里了。科尔尼洛夫想用武力得到的东西，现在正由当权的科尔尼洛夫分子逐渐地但又坚定不移地实现着，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甚至连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也被实现了。

问题在于：在顺利地“扑灭”反革命的阴谋以后，我们又“落在”阴谋家的司令部——还是那个◇340◇克伦斯基和捷列申柯、还是那些立宪民主党代表和“社会活动家”代表、还是那些爵士和爵士之类的将军们的统治之下了。少了一个科尔尼洛夫，但是阿列克谢也夫爵士哪一点比不上科尔尼洛夫呢？现在任何一件国家大事没有阿列克谢也夫爵士都不能办，而且他打算代表或者俄国或者英国参加协约国代表会议。

问题在于：再不能容忍这个阴谋家的“政府”了。

问题在于：不能信任这个阴谋家的“政府”了，如果信任，就会使革命遭到新阴谋的致命危险。

是的，必须审判反革命的阴谋家。但不应当是喜剧式的和虚伪的审判，而应当是真正的和人民的审判。这种审判就是要剥夺目前的阴谋家“政府”所效劳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这种审判就是要从下到上把政权中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彻底清洗出去。

上面我们说过，不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不争得民主的和平，就不能使革命免遭反革命阴谋的侵害。但是只要目前的“政府”还掌握着政权，就休想有民主的和平。要获得这种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个政权，“安上”新的政权。

为此就必须把政权转到新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手中。为此就必须把政权集中在群众的革命组织内部，即工兵农代表苏

维埃的内部。

就是而且仅仅是这些阶级和这些组织把革命从科尔尼洛夫阴谋中挽救出来的。它们也一定能保证革命获得胜利。◇341◇

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阴谋家的审判应当是这样。

* * *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几星期以前，当政府的(不是科尔尼洛夫的，而是政府的！)反革命的丑恶阴谋第一次在报刊上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向“科尔尼洛夫事件”时期的前任临时政府阁员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斯柯别列夫提出质问。质问中所注意的是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斯柯别列夫在良心上和根据对民主派的义务就揭露临时政府参与阴谋的问题所应提供的证词。我们党团的质问在当天就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通过了，因此，它就成了“整个革命民主派”的质问。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事实一件一件地被揭露出来，并且一件比一件丑恶，而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斯柯别列夫却继续装聋做哑，默不作声，似乎这和他们毫无关系。读者们是否认为，这些“负责的”公民现在应该想起普通礼貌的起码规矩并终于答复“整个革命民主派”向他们提出的质问了呢？

第二个问题。当对克伦斯基政府的新的揭发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民事业报”却号召读者对这个政府“容忍”一下，“等到”立宪会议再说。当然，现在从那些为了“救国”而亲手建立这个政府的人的口中听到关于“容忍”的言论是很可笑的。难道他们建立政府仅仅是为了忍气吞声地对它“容忍”一个“短时期”吗？…… 但是“容忍”克伦斯基政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千百万人民◇342◇的命运交给反革命的阴谋家。这就是把战争与和平的命运交给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是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交给警觉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怎样称呼这种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反革命阴谋家的“政府”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政党呢？有人说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幼稚”。有人说“人民事业报”“近视”。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的“负责的”首领们并不缺少这些“美德”。但是…… 读者们难道不认为政治上的幼稚就是近于背叛行为的罪行吗？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五日和七日“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和第三十各号

署名：科·斯大林◇343◇

谁在破坏立宪会议？

当妥协派的空谈家大谈预备国会，而他们的同伴和似乎在破坏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时候，反革命的能手已在试验自己的力量，准备真正破坏立宪会议了。

就在一星期以前，“顿河哥萨克”的领袖们还借口“居民没有准备”而建议延期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

过了两天，立宪民主党“言论报”的亲密伙伴“日报”透露说：“农民骚动的浪潮……可能使立宪会议的选举延期进行。”

昨天的电报传来消息说，那些现在操纵着临时政府的莫斯科的“社会活动家”也“认为不可能”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

“国家杜马议员尼·尼·李沃夫指出，由于国内存在着无政府状态，从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来看，目前进行选举是不可能的。库兹明-卡拉瓦也夫补充说，政府当局对立宪会议尚无准备，未曾拟定任何法案。”

显然，资产阶级蓄意破坏立宪会议的选举。◇344◇

显然，在今天，当资产阶级披上了反革命的预备国会这件“民主”外衣，从而在临时政府中巩固了自己地位的时候，它就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再一次使立宪会议“延期”召开了。

“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妥协派先生们能用什么来对付这种危险呢？

如果临时政府“倾听全国的呼声”，步着“社会活动家”的后尘，延期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那末，他们能用什么来对付临时政府呢？也许用臭名远扬的预备国会？但是要知道，按照科尔尼洛夫计划成立

的、负有掩盖克伦斯基政府痈疽的使命的预备国会的产生，正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延期召开时来代替立宪会议。这个科尔尼洛夫的流产儿在争取立宪会议的斗争中能有什么用处呢？

也许用老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这个脱离群众的、时而欺负铁路员工、时而欺负苏维埃的机关能有什么威望呢？

也许用“人民事业报”如此讨厌而虚伪地吹嘘的“伟大的俄国革命”？但是要知道，“人民事业报”的才子们自己也说革命和立宪会议是不兼容的(“或者是革命，或者是立宪会议”！)。关于“革命威力”的空洞词句在争取立宪会议的斗争中能有什么力量呢？

那末，能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力量就是日益增长的俄国革命。妥协派不相信它。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它的增长，并不能阻止它向农村蔓延和扫除地主政权的基础。◇345◇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既然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86]，加强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也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破坏立宪会议。但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走这条道路就必然要和日益增长的革命打交道。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五日
“工人之路报”第二十八号
社论　◇346◇

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

革命活着。它击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并震撼了前线，飞遍了城市并活跃了工厂区，现在它又蔓延到农村，扫除可恨的地主政权的基础了。

妥协派的最后一个支柱正在倾倒。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扫除了工人和士兵的妥协主义幻想，并把他们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对地主的斗争也一定会扫除农民的妥协主义幻想，并把他们集结在工人和士兵的周围。

和护国派的愿望相反，在反对护国派的斗争中，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战线形成起来了。和妥协派的愿望相反，在反对妥协派的斗争中，这个战线正日益增长和巩固起来。

革命正在动员自己的力量，从自己的队伍里清除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分子。

同时反革命也在动员自己的力量。

立宪民主党这个反革命的巢穴和温床首先展开了斗争，鼓动拥护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篡夺了政权，放出了苏沃林的看家狗，披上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的外衣并取得了反革命将军们的支持，现在正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使革命受到毁灭的威胁。◇347◇

曾经帮助科尔尼洛夫绞杀士兵和工人、解散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的那个莫斯科“社会活动家联合会”，即同盟歇业者和“饥饿的魔掌”的联合会，再过两天就要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现在正大力邀请“哥萨克军队联合会”的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在前线，特别是在南方和西方，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的秘密联合会正在疯狂地组织反革命的新进军，正在把一切适于从事卑鄙“工作”的力量集合在自己周围……

而那个曾经和科尔尼洛夫一道组织过反革命阴谋的克伦斯基政府正准备逃往莫斯科，以便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并同列布申斯基之流和布雷什金之流，同卡列金之流和阿列克谢也夫之流一道来组织新的、更可怕的反革命阴谋。

不容置疑，和革命战线对抗的反革命战线即资本家和地主、克伦斯基政府和预备国会的战线也在形成和巩固起来。反革命正在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一次阴谋已经被击破。但是反革命并没有被摧毁。它只是退却了，躲在克伦斯基政府的背后并在新的阵地上巩固起来了。

为了长久地保障革命免遭危险，应该彻底扑灭现在正在酝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二次阴谋。

反革命的第一次发动已经被工人和士兵的力量，被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的力量打垮了。

苏维埃和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用伟大革命的全部威力来消灭反革命的第二次发动。

让工人和士兵知道，让农民和水兵知道，目前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和平**和**面包**，争取**土地**和**自由**，◇348◇反对资本家和地主，反对投机分子和奸商，反对叛徒和卖国贼，反对所有不愿意一劳永逸地消灭正在组织起来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人们。

科尔尼洛夫分子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二号
社论　◇349◇

谁需要预备国会？

几个月以前，科尔尼洛夫在计划解散苏维埃和组织军事专政的时候，曾决定建立“民主的”预备国会。

为了什么呢？

为了用预备国会来代替苏维埃，用它来掩盖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反革命本质，并对人民隐瞒科尔尼洛夫“改革”的真正目的。

在科尔尼洛夫暴动“被扑灭”之后，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切尔诺夫和莫斯科的工业家组织了“新的”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同时决定建立科尔尼洛夫的预备国会。

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对付苏维埃？也许是为了掩盖那个和科尔尼洛夫叛乱区别很小的克伦斯基阴谋？阿夫克森齐也夫硬说建立预备国会是为了“挽救祖国”。切尔诺夫向前“发展了”阿夫克森齐也夫的思想，他硬说建立预备国会的目的是“挽救国家和挽救共和”。但是要知道，科尔尼洛夫在实行军事专政并用预备国会来掩盖军事专政的时候，也曾想到“挽救国家和挽救共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350◇诺夫的“挽救”和科尔尼洛夫的“挽救”有什么区别呢？

那末，现在的科尔尼洛夫的流产儿即所谓预备国会是为了什么而产生的呢？

我们来听听预备国会第一批建筑师中的一员，立宪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前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现在的预备国会议员阿哲莫夫先生的话吧。我们所以要听他的话，是因为他比别人坦白些：

“预备国会的任务首先应该是给政府以立足的基地，给政府以权

力，当然是它现在所没有的那种权力。”

但是政府需要这种“权力”，是为了什么呢？这种“权力”应该用来反对谁呢？

请听下去：

阿哲莫夫说：“主要的问题在于预备国会能否经得起考验，它能否给予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应有的反击。毫无疑问，苏维埃和预备国会是对立的，正像两个月以后这种组织又将和立宪会议相对立一样。如果预备国会经得起考验，那末工作就能够做好。”（见星期日“日报”）

很好！说得很坦白，甚至可以说很老实！

预备国会给政府创造“权力”，以便“给予苏维埃以反击”，因为预备国会而且只有预备国会能够和苏维埃“对立”。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建立预备国会不是为了“挽救国家”，而是为了对付苏维埃。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民主队伍中的投敌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躲在预备国会里不是为了“挽救革命”，而是◇351◇为了帮助资产阶级对付苏维埃。难怪他们正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决死的斗争。

阿哲莫夫先生相信：“如果预备国会经得起考验，那末工作就能够做好。”

工人和士兵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科尔尼洛夫的流产儿**不能**“经得起考验”，使它的卑鄙“工作”**不能**“做好”。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二号
本文没有署名◇352◇

苏 维 埃 政 权

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新口号。四月间，“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同临时政府的政权对立起来。当时首都的多数人还拥护不包括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在内的临时政府。六月间，这个口号在示威中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承认。临时政府在首都已经陷于孤立。七月间，围绕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爆发了首都的革命多数同李沃夫—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的斗争。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藉地方的落后性转到了政府方面。斗争的结局是有利于政府的。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被宣布为非法。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的”迫害和“共和主义的”监狱、拿破仑主义的陷害和军事阴谋、前线的枪杀和后方的“会议”的黑暗时期来到了。这是八月底以前的事情。八月底，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尔尼洛夫暴动使一切革命力量都振作起来。在七八月间气息奄奄的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现在“突然”又复活起来。它们复活以后就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芬兰和乌拉尔、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等地夺取政权。不这样做，不夺取政权，革命就会被击溃。于是彼得堡“一小群”布尔什维克在四月间宣布的“苏维埃政权”，在八月底几乎获得了俄国各革命阶级的公认。◇353◇

现在谁都明白，“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口号，而且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现时情况下的唯一出路。

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可是，“苏维埃政权”是什么,它和其他各种政权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说，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就是说组织“清一色的”民主政

府，组织由“社会主义的”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总之，就是“大大改变”临时政府的成员。但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用另一批人来代替临时政府的这一批人。问题在于使新的革命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问题在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手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换一个政府还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彻底清洗政府的一切部门和机关，把科尔尼洛夫分子驱逐出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忠诚可靠的人安插进去。只有到那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到“中央和地方”的政权转归苏维埃。

怎样解释临时政府“社会主义的”部长们的人所共知的软弱无力呢？为什么这些部长成了站在临时政府外面的那些人们手中的可怜玩具呢？(请回忆一下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札鲁得尼和彼舍霍诺夫在“民主会议”上的“报告”！)首先因为不是他们支配自己的机关，而是机关支配他们。并且还因为每个机关都是一座堡垒，沙皇时期的官僚直到现在还盘踞在那里，他们把部长们的善良愿望变为“空话”，并准备对政府的任何革命措施实行怠工。为了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必须夺取这些堡垒，把立宪民主党—沙皇制度的奴仆们驱逐出去，把那些经选举产生并且◇354◇可以罢免的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工作者安置在他们的位置上。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从下到上彻底清洗后方和前线的所有一切政府机关。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后方和前线的所有“长官”都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城市和农村、陆军和海军、各“部门”和各“机关”、铁路和邮电机关的“政权代表”都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建立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

这个专政同不久以前科尔尼洛夫、米留可夫在克伦斯基和捷列申

柯善意参加之下所力图建立的那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劳动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专政，即对地主和资本家、对投机分子和银行家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为了取得民主的**和平**，为了使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为了使农民获得**土地**，为了使人民得到**面包**。

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公开的、群众性的、在大众面前实行的、没有阴谋和幕后活动的专政。因为这种专政用不着掩饰：它将毫不留情地对付那些用各种“疏散”办法来加剧失业的同盟歇业资本家和那些抬高物价、制造饥荒的投机银行家。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不对群众使用暴力的专政，是群众意志的专政，是用以压制群众公敌的意志的专政。◇355◇

这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阶级实质。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的事件，战争的延长和对和平的渴望，前线的失败和保卫首都的问题，临时政府的腐败和“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破坏和饥荒，失业和疲敝，——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遏止地引导俄国各革命阶级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国内实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专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五号
社论 ◇356◇

看看无耻到什么程度

被革命的攻击逼到墙角的资产阶级宠臣政府试图挣扎脱身，它发出虚伪的声明，要人相信它没有打算逃出彼得格勒，没有想放弃首都。

昨天还有人(“消息报”！)高声宣布：政府认为首都情况“不佳”，正在向莫斯科“迁移”。昨天还有人(“国防委员会”[87]！)公开谈到“放弃”彼得格勒，而且政府要求撤除通往首都的各要道的大炮。昨天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策划反革命阴谋的伙伴——地主罗将柯还在欢迎政府关于“放弃”首都的决定，希望彼得格勒、舰队和苏维埃遭到毁灭。昨天“伦敦”还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希望政府迅速摆脱彼得格勒和舰队。昨天一切还是这样…… 而今天政府中的张皇失措的宠臣们却在坚定不移地决心捍卫首都的舰队和卫戍部队面前狼狈退却了，他们混乱不堪，自相矛盾，怯懦地试图抹杀事实，竭力在他们昨天如此不成功和如此笨拙地准备出卖的革命面前为自己辩护。

同时，克伦斯基的关于延至春天“迁移”的“坚决”声明被基什金的同样坚决的声明推翻了，基什金说：某些政府机关“**现在**已经可以迁到”莫斯科了。而“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人布·波格丹诺夫(决不是布尔什维克！)同样坚决地声称：“政府方面曾表明**要离开彼得格勒**，而广大的民主阶层则◇357◇把政府的迁移看成可能**放弃彼得格勒**。”(“消息报”)我们更不必说，根据晚报的报道，“拥护临时政府迁往莫斯科的人获得……**多数**赞成”(“俄罗斯新闻”)。

临时政府的可怜而又渺小的人呵！他们总是欺骗人民，除了力图再用欺骗群众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狼狈退却以外，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但是，如果宠臣们只限于欺骗，那就不成其为宠臣了。克伦斯基在退却和用欺骗的方法掩盖自己的同时，还发出许多责难，诬蔑我们的党，并大谈其“复活暴行”和“革命的危险敌人”、“欺诈”和“腐化群众”、“染满了无辜牺牲者的鲜血的手”等等。

克伦斯基说反对“革命的敌人”，可是同一个克伦斯基却同科尔尼洛夫和萨文柯夫一道制造了反对革命、反对苏维埃的阴谋，用欺骗的方法把第三骑兵军调到了首都！……

克伦斯基说反对“复活暴行”，可是同一个克伦斯基却抬高粮价，驱使农村走上暴行和放火的道路！请你们读读社会革命党人护国派的“人民权力报”，并且自己判断一下：

“本报某些记者写道，应该把最近的骚动和固定价格的提高联系起来看。新的价格立即引起了生活费的普遍提高。因此出现了不满、愤慨和神经过敏,这样群众就比从前更加容易走上暴行的道路!……”(第一四〇号)

克伦斯基说反对“腐化群众”，可是同一个克伦斯基却玷污了革命，歪曲了它的纯洁风尚，恢复了以卑鄙的温略尔略尔斯基之流和舒金之流为首的暗探和特务机关！……◇358◇

克伦斯基说反对“欺诈”，可是同一个克伦斯基的全部制度都是对民主派的彻头彻尾的欺诈，他公然以虚构陆战队在芬兰海岸登陆来欺诈“民主会议”，从而顺利地和哈巴洛夫将军进行竞争！……

克伦斯基说到“染满了无辜牺牲者的鲜血的手”，可是同一个克伦斯基的双手却真正染满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即今年六月前线冒险进攻的牺牲者的无辜鲜血！……

人们常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限度的。可是资产阶级宠臣们的厚颜无耻却是没有限度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消息报”报道说，“共和国会议”的议员们以“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欢迎克伦斯基。我们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受过

克伦斯基洗礼的奴仆式的预备国会本来就没有期待其他什么东西。

不过，让这些先生们知道，让一切暗中准备迫害“左倾分子”的人和一切预先为这种迫害喝采的人知道，当决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同样都要受到他们想出卖但又欺骗不了的革命的惩罚。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七号
社论 ◇359◇

破坏革命的工贼

在莫斯科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分子卡列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热烈掌声中说，必须“取缔苏维埃和委员会”。

妥协分子策烈铁里回答他说，对，可是还嫌太早，因为“在自由革命(即反革命？)的大厦还没有建成之前，这些脚手架还不能拆掉”。

这是八月初莫斯科会议上的事情，那时科尔尼洛夫和罗将柯、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反革命阴谋刚刚开始形成。

当时阴谋“没有成功”，因为它被莫斯科工人的政治罢工粉碎了。可是策烈铁里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的联合却形成了。这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士兵的联合。同时很明显，联合不过是一面屏风，在它后面酝酿着反对苏维埃和委员会、反对革命和革命成果的真正阴谋，即八月底所爆发的那个阴谋。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能否知道，他们赞扬同莫斯科会议的“有生力量”联合，就是为科尔尼洛夫阴谋分子效劳呢？“人民事业报”的自由派市侩们和“消息报”的资产阶级吹鼓手们能否知道，◇360◇他们“孤立”布尔什维克，挖苏维埃和委员会的墙脚，就是为反革命效劳，就是把自己列入破坏革命的工贼的队伍呢？

科尔尼洛夫暴动暴露了全部真相。它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反革命性。它揭露了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对革命所造成的全部危险性。它昭然若揭地表明，如果没有护国派同卡列金所阴谋反对的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革命早就被击溃了。

大家知道，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严重关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

党人不得不庇身于他们曾经同卡列金之流及其他“有生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过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和委员会的保护之下。

这是一个宝贵而又极深刻的教训。

但是……人们的记忆力太差了。而“消息报”和毫无气节的“人民事业报”的投敌分子的记忆力尤其差。

科尔尼洛夫暴动总共才过去了一个多月。似乎科尔尼洛夫叛乱已经永远被消灭了。可是“命运的意志”和克伦斯基的“意志”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却使我们进入了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科尔尼洛夫“被捕了”。可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首领们还掌握着政权。同“有生力量”的旧联合被粉碎了。可是同科尔尼洛夫分子成立了新联合。莫斯科会议没有变成像哥萨克首领卡拉乌洛夫所梦想的那种“长期国会”。可是建立了负有“代替旧苏维埃组织”的使命的科尔尼洛夫预备国会。黑帮分子在莫斯◇361◇科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退出了舞台。可是黑帮分子的第二次会议最近又在莫斯科开幕了。这次会议的首领地主罗将柯公开声称，**“如果苏维埃和舰队被毁灭，而彼得格勒又被德国人占领”**，他**“将感到高兴”**。政府装出了一副审判科尔尼洛夫的样子。其实它在筹备科尔尼洛夫的“上台”，它在同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密谋，力图把革命军队调出彼得格勒，打算逃往莫斯科，准备放弃彼得格勒，并且同“我们勇敢的盟友”拥抱接吻。而“我们勇敢的盟友”正焦急地期待波罗的海舰队被歼灭、彼得格勒被德国人占领以及……科尔尼洛夫爵士登极……

我们正处在比旧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更加危险的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前夜，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我们应当加倍地警惕和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苏维埃和革命的委员会，这难道不是很

明显吗？

使我们摆脱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救星是什么呢？能以群众运动的全部威力去镇压即将来临的反革命进攻的革命堡垒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奴仆式的预备国会！

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和支持苏维埃的工人和士兵群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负有把革命从即将来临的反革命中挽救出来的使命，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362◇

看来，革命者的职责就是保护并巩固这些组织，把工人和农民群众团结在这些组织的周围，把这些组织联合在区域的和全俄的代表大会中。

然而“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变节者忘记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时的“严重考验”，他们好几天以来一直在诬蔑苏维埃，攻击苏维埃，破坏苏维埃的区域代表大会和全俄代表大会，瓦解并摧毁苏维埃。

“消息报”说：“地方苏维埃的作用正在降低。苏维埃已不再是整个民主派的组织了……

我们想以永久性的、完备而全面的、能代表国家和地方生活制度的组织来代替临时性的苏维埃组织。当专制制度及其全部官僚制度垮台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代表苏维埃作为整个民主派藉以栖身的临时性的木棚。而现在正在建造新制度的永久性的砖石大厦来代替木棚，自然，人们会随着大厦一层一层的建成而陆续走出木棚，搬到更舒适的房子里去。”

失去廉耻的“消息报”，即由于苏维埃的长期忍耐而还在苟延残喘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就是这样说的。

而毫无气节的“人民事业报”的略布金-加布金们则蹒跚地跟在“消息报”的后面煞有介事地说道：必须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革命和立宪会议。

你们听到了吗？推翻了沙皇制度及其暴政的革命的苏维埃是“临时性的组织”。为阿列克谢也夫和克伦斯基效劳的奴仆式的预备国会是“永久性的和全面的组织”。驱散了科尔尼洛夫部队的革命的◇363◇苏维埃是“临时性的木棚”。科尔尼洛夫的流产儿，以空谈来掩盖正在动员起来的反革命为使命的预备国会是“永久性的砖石大厦”。一面是沸腾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生活。一面是安静“舒适”的反革命办公厅。“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的投敌分子匆匆忙忙地从斯穆尔尼学院的“木棚”搬到冬宫的“砖石大厦”里去，把自己从“革命的领袖”降为阿列克谢也夫爵士的勤务兵，这有什么奇怪呢？

阿列克谢也夫爵士说：必须取缔苏维埃。

“消息报”回答道：谨遵台命，你们去把冬宫“砖石大厦”的最后“一层”造好吧，到那时“我们”，我们就拆完了斯穆尔尼学院的“木棚”。

阿哲莫夫先生说：必须以预备国会代替苏维埃。

“人民事业报”的人们回答他说：谨遵台命，让我们先来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

而他们这样做是在现在，在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前夜，当反革命势力已经在莫斯科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当科尔尼洛夫分子已经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在农村组织了暴行，在城市制造了饥荒和失业，并准备破坏立宪会议，公开在后方和前线聚集力量以便进行新的反革命发动的时候。这不是直接背叛革命和革命成果又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破坏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卑鄙的工贼又是什么呢？

既然如此，如果“消息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在未来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严重关头”“依旧”向工人和士兵“伸手乞怜”，请求保护他们免遭反革命的侵害，那末，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工人◇364◇和士兵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工人通常用独轮车把破坏罢工的工贼运走。

农民通常把破坏共同事业的工贼钉柱示众。

我们不怀疑，苏维埃一定会找到方法来适当地制裁破坏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卑鄙工贼。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365◇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起义的日子应该选择得适当。只能这样来理解决议[88]。有人说，必须等待政府方面的进攻，但是，应该懂得什么是进攻。抬高粮价、派遣哥萨克到顿巴斯去等等，这一切已经是进攻了。如果没有军事进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而不让反革命组织起来呢？

斯大林同志接着分析了国际关系，他证明说，现在应该有更大的信心。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争取革命胜利的方针和回头看看欧洲，第二条路线是不相信革命，只打算做一个在野党。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赞同调走军队。舰队已经起义了，因为它已经起来反对克伦斯基。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上起义的道路。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
简要记录◇366◇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①

布尔什维克发出了号召：要准备好！这个号召是因为形势的紧张和反革命力量的动员而提出的。反革命想进攻革命，企图把首都让给威廉而使革命失去首脑，打算把革命军队撤出首都而使首都失去血液。

但是，人们对我们党发出的革命号召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

工人“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号召，他们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他们(工人)要比许许多多“聪明的”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有远见得多。

士兵也不比工人落后。他们昨天还在首都卫戍部队团、连委员会会议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用胸膛捍卫革命及其领袖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他们保证说，只要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发出号召，他们就立即行动起来。

工人和士兵的情形就是这样。

其他阶层的情形就不同了。

资产阶级知道虾在哪里过冬。他们“干脆”就拖出大炮架在冬宫门前，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准尉”和“士官生”，我们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准尉”和“士官生”的。◇367◇

“日报”和“人民意志报”的资产阶级走狗向我们党展开了进攻，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同黑帮分子“混为一谈”，并竭力向布尔什维克打听“起义的日期”。

他们的应声虫，克伦斯基的勤务兵比纳西克之流和唐恩之流，则发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宣言，他们号召不要发动，他们像

————————————————

① 此语出自旧约“诗篇”。——译者注

“日报”和“人民意志报”一样地打听“起义的日期”并请工人和士兵向基什金和柯诺瓦洛夫叩头。

而“新生活报”中吓得魂不附体的神经衰弱者已经忍耐不住了，因为他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他们恳求我们最后说明：布尔什维克究竟在什么时候发动。

总之，如果不算工人和士兵，那真是：“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又诽谤又告密，又威胁又恳求，又质问又打听。

下面是我们的回答：

关于资产阶级及其“机关”：对他们我们另外再谈。

关于资产阶级的走狗和佣仆：我们将打发他们到特务机关去，他们可以在那里“打听到”“发动”的“日期”和“时刻”，同时向有关的人“报告”，而发动的行进路线已经由“日报”中的挑拨分子拟好了。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比纳西克之流、唐恩之流以及克伦斯基的其他勤务兵：我们不向这伙站到基什金—克伦斯基政府方面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英雄们”做报告。可是，我们要竭力使他们◇368◇这些工贼英雄们来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做报告。他们昨天还企图破坏这个代表大会，今天他们却在苏维埃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实行退却而召开这个代表大会了。

至于“新生活报”的神经衰弱者，我们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向我们要求什么。

如果他们想知道起义的“日期”是为了预先把张皇失措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及时……逃跑，比如说跑到芬兰去，那我们只能……赞扬他们，因为我们“总是”赞成动员力量的。

如果他们打听起义的“日期”是为了镇静他们“钢铁般的”神经，那末我们要告诉他们，即使起义的“日期”已经确定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把这个消息“附耳”告诉了他们，那也不会使我们的神经衰弱者

感到丝毫“轻松”，因为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发生歇斯底里等等。如果他们只是想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我们，希望和我们党划清界限，那我们又只能赞扬他们，因为第一、在可能发生的“恶化”和“失利”之后无疑会有人考虑到他们的这一贤明措施；第二、这个措施会使工人和士兵的认识明确起来，他们终于会知道，“新生活报”已经是第二次(像七月事变那样！)从革命队伍中跑到布尔采夫之流—苏沃林之流的卑鄙的队伍中去了。谁都知道，我们总是赞成认识明确的。但是，也许他们不能“默不作声”是因为目前在本国的知识分子张皇失措的泥潭里大家都在哇哇叫吧？高尔基说“不能默不作声”不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这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是事实。当地主及其仆从们把农民弄到绝望和饥饿“骚动”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资本家及其走狗给工◇369◇人制造全俄同盟歇业和失业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反革命企图放弃首都并从首都撤出军队的时候，他们能够默不作声。但是，当革命的先锋彼得格勒苏维埃起来保护受骗的工人和农民的时候，这些人却“不能默不作声”了！并且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责难反革命，不是的，而是责难那个他们在茶余酒后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最紧要关头却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开的革命！这难道不“奇怪”吗？

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睡不着觉。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

那有什么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

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工人之路报”第四十一号
本文没有署名◇370◇

我 们 需 要 什 么 ？

在二月，士兵和工人推翻了沙皇。但是，他们在战胜沙皇之后并没有想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坏牧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工人和士兵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地主和资本家的代理人米留可夫之流和李沃夫之流、古契柯夫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

这是胜利者的严重错误。现在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工农正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工人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面包和工作。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物价高涨和饥饿、同盟歇业和失业。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资本家和投机分子的代理人，他们想用饥饿征服工人。

农民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土地。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自己代表的被捕和讨伐队的光临。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地主的代理人，他们决不会把土地让给农民。◇371◇

士兵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和平。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有人还想把它拖到明年秋天。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英法银行家的代理人，他们是靠战争掠夺致富的，“迅速”结束战争对他们不利。

人民推翻沙皇本来想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召开立宪会议。可是立宪

会议的召开已经延期一次，现在敌人竟公然准备把它彻底破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人民的敌人，及时召开立宪会议对他们不利。

二月革命胜利之后，政权落在地主和资本家、银行家和投机分子、包买主和奸商的手里，——这就是工人和士兵的严重错误，这就是目前在后方和前线发生各种灾难的原因。

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

必须以人民承认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选出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这个不是由人民选出和不对人民负责的冒牌政府。

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372◇

二月里所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应该做到了。

用这种方法，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争取到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

工人、士兵、农民、哥萨克以及全体劳动者们！

你们愿意使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掌握政权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根据农民的要求宣布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公布沙皇的秘密条约，承认这些条约无效，并建议一切交战国人民缔结公正的和约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彻底压制那些故意加剧饥荒和失业、加剧破坏和物价高涨的同盟歇业者和投机分子吗？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致奋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明天在斯穆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末谁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到那时全国就会勇敢而坚决地起来为人民争取和平，为农民争取土地，为饥民争取面包和工作。

政权应该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373◇

掌握政权的应该是由苏维埃选出的、苏维埃可以罢免并对苏维埃负责的新政府。

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及时召开。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工人之路报”第四十四号
社论 ◇374◇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

（画）

注 释

[1] 国际主义者国际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代表会议在宣言中承认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斥责“社会主义者”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并号召欧洲工人为反对战争和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而展开斗争。国际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十一日至十七日)在昆塔尔举行。昆塔尔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是反战国际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前进的一步。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一样，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正文第 6 页)

[2]“统一派”在组织上形成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它联合了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在“统一派”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和从前的取消派布利杨诺夫与约尔丹斯基。“统一派”无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要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和黑帮分子一道攻击布尔什维克。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派”的成员参加了反革命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正文第 9 页)

[3]“言论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 16 页)

[4]“日报”是由银行界出资创办的报纸，于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创刊，为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操纵，因为进行反革命活动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封闭。——(正文第 16 页)

[5] 由于米留可夫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真理报”第十七号以“打倒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述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社论。

二月革命以后(自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起)，“真理报”开始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出版。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约·维·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弗·伊·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国以后领导了“真理报”的工作。“真理报”的经常撰稿者有维·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米·斯·奥里明斯基、克·恩·萨莫依洛娃等人。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真理报”编辑部被士官生和哥萨克捣毁。七月事变以后，由于弗·伊·列宁转入地下，约·维·斯大林担任了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笔。自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局终于出版了“工人和士兵报”。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说，在党中央机关报复刊以前，“工人和士兵报”应起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在七月至十月这个时期，党中央机关报在把工人和士兵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和准备武装起义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以“无产者报”的名称出版，“无产者报”被封闭后，以“工人日报”的名称出版，后来又以“工人之路报”的名称出版。“工人之路报”出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重新以“真理报”的名称出版。——(正文第17页)

[6]“晚间报”是阿·谢·苏沃林创办的一种反动的晚报，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17页）

[7]“人民事业报”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19页)

[8]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天主教邦在一八四五年结成的反动联盟，它主张国家在政治上的分散。一八四七年，宗得崩德和主张瑞士政权集中的其他各邦之间爆发了武装斗争。战争的结果是宗得崩德遭到失败，瑞士从国家联盟变成了统一的联盟国家。——(正文第20页)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代表会议。它在党的生活中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弗·伊·列宁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发展了他从前在四月提纲中所阐述的原理。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捍卫弗·伊·列宁的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决议案的演说，并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斥责了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立场，因为他们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民族问题上则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四月代表会议给布尔什维克党规定了争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四月代表会

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三四五页。——(正文第23页)

[1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观点。关于大会所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党纲”，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〇九页至第四三〇页，——(正文第23页)

[11] 见“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四九二页。——(正文第24页)

[12] 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第三十三号上发表的“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自愿协议’吗？”一文中引用了盛加略夫的电报原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〇八页)。——(正文第26页)

[13]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进行的。——(正文第31页)

[14] 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向盟国发出照会，表示临时政府一定忠实执行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并声明临时政府准备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怒。——(正文第33页)

[15] 沙皇宠妃克舍辛斯卡娅的宫院，在二月革命时期为革命士兵所占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局、士兵俱乐部以及工人和士兵的其他组织曾经设在这里。——(正文第34页)

[16] 在玛丽亚宫会议以后，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对米留可夫照会发表了一个“说明”说“坚决战胜敌人”这个口号意味着“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确立持久的和平”。妥协主义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政府的修正和“说明”是令人满意的，认为“问题业已解决”。——(正文第35页)

[17] 崩得(即“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十月(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64页注[7])。——(正文第39页)

[18] 在乡、镇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什吕谢尔堡县革命人民委员会采取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的土地委员会决定：(一)由村社耕种原属教堂、寺院、皇族以及私有主的闲置的土地；(二)按照最低的价格从私有主的庄园和仓库中征购必需的牲畜和农具等等。根据这个决议，各个乡的委员会控制了该县的全部土地，进行了农具的登记，确定了护林工作，组织了对闲置土地的耕种等等。——(正文第43页)

[19]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三日“士兵真理报”第十三号附刊上公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正文第48页)

[20] 彼得格勒的区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号召工人和士兵积极参加选举并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一九一七年五月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在约·维·斯大林的参加之下召开了会议，会上听取了全市选举委员会和各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进程的报告。彼得格勒的区杜马选举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五日举行的。约·维·斯大林曾经写了“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一文，评述选举的结果(见本卷第八十五页)。——(正文第49页)

[21] 劳动团分子或“劳动团”，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集团，于一九〇六年四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一九一七年，劳动团分子和“人民社会主义党”合并。——(正文第52页)

[22]“人民社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成立于一九〇六年，是由社会革命党右翼中分化出来的。“人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超出君主立宪的范围。列宁把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人民社会主义者”的党在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党中是采取最右的立场的政党之一。十月革命以后，“人民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正文第52页)

[23]“工人报”是孟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该报报馆就被封闭。——(正文第53页)

[24]“区联派”(即“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联组织”)是一九一三年在彼得堡产生的。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分子和一部分以前的脱离党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区联派采取了中派的立场，并进行了

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区联派发表声明，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五月选举彼得格勒的区杜马时，布尔什维克同区联派结成了联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被接收入党。后来发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部分区联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正文第 54 页)

[25]“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创刊。在它的周围团结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分子和带有半孟什维克倾向的个别的知识分子。“新生活报”集团经常动摇于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七月事变以后，该集团的成员同孟什维克护国派一起参加了统一代表大会。十月革命以后，“新生活报”集团(除了一些参加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人以外)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对的立场。“新生活报”报馆于一九一八年夏天被封闭。——(正文第 55 页)

[26]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靠近他们的集团。各省选出的农民代表绝大部分是代表农村富农上层的。——(正文第 61 页)

[27]“士兵权利宣言”是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克伦斯基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一日对陆海军发布的关于军人的基本权利的命令。“宣言”大大地限制了士兵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初期所争得的权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士兵权利宣言”表示欢迎，而士兵和水兵则报以抗议性的群众大会，称它为剥夺权利的宣言。——(正文第 61 页)

[28]“交易所晚报”是“交易所新闻”的晚刊。“交易所新闻”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八八〇年在彼得堡创刊。“交易所报”成了称呼没有原则和被收买的报刊的普通名词。该报报馆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底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正文第 61 页)

[29] 瑞士社会党书记罗柏特·格里姆于一九一七年五月来到俄国。资产阶级报纸在六月初发表了一个消息，说格里姆所负的任务是来试探一下德俄两国有无单独媾和的可能。因此，临时政府把格里姆赶出了俄国。——(正文第 64 页)

[30] 由彼得格勒苏维埃筹备和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至二十四日举行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人(有二百八十五名代表)和孟什维克(有二百四十八名代表)占多数。当时在

苏维埃中还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一百零五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以及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危害性。弗·伊·列宁发表了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关于战争的演说，他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口号，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进行的。——(正文第67页)

[31]“人民意志报”是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70页)

[32]“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篇宣言，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定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举行的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而写的。这篇宣言起初是在六月九日以传单形式发表，在彼得格勒各区散发。这篇宣言本来应当在六月十日登在“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上，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在六月九日晚间被迫取消了游行示威，所以它又从“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的铅版上被铲去。发出的“士兵真理报”只有一小部分印上了这篇宣言。六月十三日，这篇宣言发表在“真理报”第八十号上，登在“关于游行示威的真相”一文的下面。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为了迎接定于六月十八日举行的新的游行示威，这篇宣言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次。——(正文第72页)

[33]“战壕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里加创刊。该报最初几号是由新剌多牙团士兵委员会用士兵的钱出版的。从第七号(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起，该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里加委员会军事局和俄罗斯部的机关报。从第二十六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起，成了里加委员会第十二集团军党组织的机关报，后来又成了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局的机关报。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该报报馆被封闭。但是过了一天，即七月二十三日，就出版了“战壕警钟报”来代替“战壕真理报”。“战壕警钟报”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联合军事局的机关报，它一直出版到德国人占领里加时为止。十月十二日，“战壕警钟报”在文登城复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该报采用了原来的名称——“战壕真理报”。从那时起，该报一直出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正文第77页)

[34]“士兵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五日创刊，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局的机关报，自五月十九日起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局的机关报。“士兵真理报”在

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中间很受欢迎。工人们为该报的出版和在前线士兵中的免费散发捐助资金。该报发行额达五万份，其中有半数是送到前线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时，“士兵真理报”报馆和“真理报”报馆同时被临时政府捣毁和封闭。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不久“士兵真理报”就复刊了，该报一直出版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正文第81页)

[35]“劳动”印刷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购买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书籍在该所印刷。购买印刷所的款项是工人和士兵响应“真理报”的号召自行捐助的。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该印刷所被士官生和哥萨克的队伍捣毁。——(正文第81页)

[36] 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紧急代表会议)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一百四十五人，代表三万二千二百二十名党员。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是因为在前线开始的进攻以及临时政府企图调走彼得格勒革命部队和“疏散”彼得格勒革命工人等情况使彼得格勒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更加严重了。代表会议曾因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变而中断，直至七月十六日才复会。代表会议复会后的全部工作都是在约·维·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正文第83页)

[37] 莫斯科非常会议(即莫斯科国务会议)是临时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多半是地主、资产阶级、将军、军官和哥萨克上层的代表。苏维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卡列金等人在会上提出了镇压革命的计划。克伦斯基在演说中威胁说要镇压革命运动和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企图。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约·维·斯大林所写的宣言中号召无产阶级抗议莫斯科会议。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开幕的当天组织了有四十多万人参加的一日罢工。其他许多城市也举行了抗议性的群众大会和罢工。约·维·斯大林写了好几篇文章来揭露莫斯科会议的反革命本质(见本卷第一八一、一八八、一九九、二〇三等页)——(正文第86页)

[38] 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代表团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从赫尔辛福斯来到彼得格勒。代表团到彼得格勒来的原因在于临时政府企图利用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来对付积极参加彼得格勒七月三日和四日游行示威的喀琅施塔得革命水兵。七月七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了这个由六十七名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正文第86页)

[39] 临时政府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下，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下令解除了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工人的武装。当局向工人提出最后通牒，要工人交出武器，并以动用武力相威胁。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工厂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被逮捕。——(正文第86页)

[40] 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临时政府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中写了许多蛊惑民心的诺言。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想用这些诺言来安定经过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的群众。临时政府一方面号召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又答应在规定的日期(九月十七日)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拟定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等法律草案。虽然七月八日宣言完全是形式的，但它仍然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攻击目标。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取消这个宣言作为他们参加政府的条件。(正文第90页)

[41] 卡姆柯夫派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不久形成的社会革命党左翼的首领之一卡姆柯夫·布(卡茨)的拥护者。——(正文第92页)

[42]“反革命的胜利”一文曾以“反革命的凯旋”为题登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喀琅施塔得的“无产阶级事业报”第五号上。——(正文第99页)

[43] 这是弗·席勒的悲剧“菲艾斯柯在热那亚的作乱”中的主角之一突尼斯的摩尔人穆莱-哈桑所说的话(“弗·席勒全集”一九三六年“科学院”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六〇页)。——(正文第102页)

[44] 阿·韩德逊是英国工党的领导者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德逊是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曾为劳合-乔治内阁的阁员。阿·托马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者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社会沙文主义者，曾参加法国内阁。——(正文第102页)

[45]“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篇宣言是约·维·斯大林在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变后受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写的。这篇宣言刊载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工人和士兵报”第二号上(该报的第一版把日期误排为七月二十四日)。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要求，这篇宣言又在八月一日在第八号上重载。——(正文第104页)

[46]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七月二十一日的会议称为“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临时政府因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和克伦斯基提出辞职引起政府危机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妥协政党的代表。在会议上，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建立一个行动不受苏维埃和各民主党派牵制并能用高压

手段恢复军队中的“纪律”等等的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意这些要求，并授权克伦斯基组织新的临时政府。——(正文第106页)

[47] 这是美国民主诗人华·惠特曼的歌词中的一句话(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出版的“革命歌集”一九一六年版第九页)。——(正文第108页)

[48] 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至三日、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紧急代表会议(见注[36])和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举行的孟什维克第二次市代表会议。——(正文第109页)

[49]“论立宪会议的选举”一文是因为立宪会议选举运动的开始而写的(照临时政府规定，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七日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该文第一部分曾刊载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真理报”第九十九号上。但因七月事变后“真理报”报馆被封闭，该文续稿的发表便告中断。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该文才在“工人和士兵报”第四号上全部刊出。——(正文第112页)

[50] 全俄农民联合会是一九〇五年产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联合会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和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要求。农民联合会到一九〇六年瓦解。一九一七年联合会又恢复活动，并于七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表示完全拥护临时政府，赞成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一九一七年秋天，农民联合会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正文第112页)

[51]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后来改称为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由彼得格勒军队中和某些企业中的代表组成的。该苏维埃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对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斗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该苏维埃积极参加了组织农村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法令的工作。一九一八年二月，由于旧军队复员，该苏维埃停止了活动。——(正文第114页)

[5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下列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各地的总结报告，战争和国际形势，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工会运动，立宪会议的选举运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建立青年团的特别决议。约·维·斯大林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政治形

势的报告。代表大会否决了企图破坏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的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提案，通过了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案。代表大会给党规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正文第117页)

[53] 弗里德利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之一。一九一六年，他为抗议战争而杀死了奥地利总理斯图克，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五月被判处死刑。阿德勒在一九一八年出狱后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对立场。——(正文第117页)

[54] 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在工人区散发了一篇宣言：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既然反革命资产阶级公开反对革命，那就让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拿到自己手里吧！

这是彼得格勒革命居民的意志，彼得格勒居民有权利通过**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把他们的这种意志传达给正在开会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意志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联合政府垮台了，它已经分崩离析，不能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摆在革命面前的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需要有一个能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和革命农民联合在一起坚决地巩固和扩大人民的胜利成果的新政权。只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才能成为这样的政权。

昨天彼得格勒革命的卫戍部队和工人为了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举行了发动。我们号召把各团队和各工厂里爆发的这个运动变成和平的、有组织的、表达彼得格勒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的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局
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干事会”

——(正文第122页)

[55] “真理小报”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为代替当天的“真理报”而出版的，因为“真理报”编辑部已被士官生捣毁。“真理小报”以“沉着和坚

韧”为题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局的宣言。——(正文第123页)

[56]“活的言语报”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一种黑帮派的黄色报纸。一九一七年,该报进行了猛烈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该报出到十月革命时停刊。——(正文第124页)

[57]“把诽谤者送交法庭!”这一传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以后印发的,并于七月九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赫尔辛福斯委员会出版的“浪潮报”上发表。传单上写道:“反革命想用最简单的方法使革命失去首脑,他们在群众中制造混乱,并唆使群众去反对最有声望的领袖,有功的革命战士……我们要求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公开地调查**暴徒和被雇佣的诽谤者为损毁工人阶级领袖的荣誉和生命而进行卑鄙阴谋的一切情况……把诽谤者和散布诽谤言论的人送交法庭。把暴徒和造谣分子钉柱示众!”——(正文第124页)

[58] 别兹拉波特内依是德·查·曼努伊里斯基的笔名。——(正文第126页)

[59]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运送乌克兰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团队开往前线的军用列车在基辅附近各车站以及在基辅当地遭到哥萨克和重骑兵的射击。——(正文第130页)

[60] 第一号命令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根据革命军队代表的要求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颁布的。革命军队的代表们声明说,士兵对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由临时委员会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越来越不信任。“命令”指示各部队(连、营等)选出士兵委员会并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规定了部队中的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掌管,准许士兵只执行军事委员会的那些不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议相抵触的命令等等。——(正文第133页)

[61] 约·维·斯大林指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写的小册子“论口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十六页)。——(正文第136页)

[62]“反对莫斯科会议”一文是约·维·斯大林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五日讨论了莫斯科会议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决定印发决议和传单,并决定在中央机关报上登载一些评论莫斯科会议的文章。“反对莫斯科会议”一文最初作为社论发表在“工人

和士兵报”第十四号上，后来发表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喀琅施塔得“无产阶级事业报”上，八月十三日又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发表在“无产者报”创刊号上。此外，“反对莫斯科会议”一文曾印成传单散发。

在宣言和传单上，该文最后几行改成了如下的字样：

“同志们！要召集群众大会并通过抗议‘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要响应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并在今天进行募捐，帮助遭受迫害的党报，以表示对‘会议’的抗议。不要接受别人的挑衅，不要在今天举行任何街头的发动！”——(正文第145页)

[63]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问题发生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博格别尔格来到彼得格勒，他代表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的联合委员会邀请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讨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执行委员会以及后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都决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发起人。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坚决反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揭穿了这个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八月六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时，加米涅夫号召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同意加米涅夫的发言，党中央委员会指斥了他的路线，并决定在中央机关报上阐明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八月九日在“工人和士兵报”上发表了约·维·斯大林的“再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一文，八月十六日在“无产者报”上又刊载了弗·伊·列宁的一封信“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就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正文第147页)

[64] 为了筹备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决定派遣代表团到各中立国和盟国去。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个决议。代表团到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在这些国家里和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进行了谈判。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未曾召开。——(正文第147页)

[65] 长期国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国会，该国会开了十三年(一六四〇年至一六五三年)的会。——（正文第151页)

[66] 所谓“社会活动家”预备会议或“非正式会议”是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至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的目的是要把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和军阀联合起来，并制定统一的政纲来迎接即将召开的国务会议。会上成立了反革命的“社会活动家联合会”。——(正文第152页)

[67] 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召开的芬兰议会要求实行芬兰自治。在同临时政府进行了长期而无结果的谈判以后，芬兰议会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通过了“最高权力法”，根据这项法律，除了属于全俄机关管辖的对外政策、军事立法和军事管理等问题以外，议会的权力扩展到芬兰生活的各个方面。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说芬兰议会在立宪会议没有表示态度以前通过了法律，于是把该议会解散了。——(正文第155页)

[68] 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建立的。七月事变前夕，组织了拉达总书记处作为乌克兰的最高管理机关。临时政府在摧毁了彼得格勒的七月游行示威以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从乌克兰境内划出了顿巴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地区和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乌克兰的最高权力转到了临时政府所任命的专员手中。但是面临着日益逼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拉达的首领们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了，于是拉达成了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的堡垒。——(正文第155页)

[69]“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创刊。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自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自一三二号起)，该报改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在上述时期内，该报一直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操纵，并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残酷的斗争。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消息报”就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一九一八年三月，由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迁移，该报也从彼得格勒移至莫斯科出版。——(正文第159页)

[70]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德军开始突破里加战线。俄军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以科尔尼洛夫为代表的最高指挥部却下令退却，于是八月二十一日德国人占领了里加。科尔尼洛夫放弃里加的目的是给革命的彼得格勒造成威胁，把革命军队调出彼得格勒，给实现反革命阴谋造成方便条件。——(正文第160页)

[71]“新时报”是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机关报，于一八六八年在彼得堡创刊。自一九〇五年起，该报成了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底被封闭。——(正文第164页)

[72]“俄罗斯新闻”于一八六三年在莫斯科创刊，该报代表自由派地主和

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九一八年和其他反革命报纸一起被封闭。——(正文第177页)

[73]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集团所组织的挑衅性的审判案，根据这一审判，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于一八九四年被军事法庭依据显然是捏造的间谍罪和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当时在法国掀起的援救德雷福斯的社会运动揭露了法庭的贪赃枉法，并使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尖锐化。一八九九年德雷福斯被赦免和释放。一九〇六年在重新审查该案时被宣判无罪。——(正文第188页)

[74]“泰晤士报”(《Times》)是英国大资产阶级的权威报纸，于一七八八年在伦敦创刊。——(正文第189页)

[75]“晨报”(《Matin》)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八八四年在巴黎创刊。——(正文第189页)

[76]“二者必居其一”一文曾经稍加删节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出路何在？”为题先在“无产者报”第十号上刊载。——(正文第192页)

[77]“俄罗斯意志报”是由大银行出资创办的资产阶级报纸，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194页)

[78]“阴谋在继续”一文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刊载在“工人日报”第五号上。在这一天，由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该报除了正刊以外还出了一张号外。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九日，“阴谋在继续”一文又以“政治评论”为题重新发表在“工人日报”第六号上。——(正文第199页)

[79]“时代报”(《Temps»)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八二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出版(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一年一度停刊)。——(正文第217页)

[80]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发表在“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一号上。——(正文第239页)

[81] 铁路罢工发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铁路工人和职员要求提高工资、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改善粮食供应。罢工蔓延到国内所有的铁路，并且得到了工业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正文第241页)

[82] 八月十四日宣言(即所谓“革命民主派”的纲领)是齐赫泽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代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多数、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宣布的。该宣言号召支持临时政府。——(正文第243页)

[83]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四一号上，刊载了杰·别德内依的题为“李伯尔唐恩”的小品文，从那时起李伯尔唐恩就成了讽刺孟什维克首领李伯尔和唐恩及其拥护者的绰号。——(正文第 243 页)

[84]“商报”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 244 页)

[85]“共同事业报”是弗·布尔采夫所创办的每日出版的晚报，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支持科尔尼洛夫，并疯狂地诬蔑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正文第 251 页)

[86]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各县各省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参加)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开幕。代表大会一共开了两次会议——十月二十五日一次，二十六日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到有六百四十九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是代表大会中最大的党团，它有三百九十名代表。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拒绝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大会开幕后不久就退出了代表大会。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了政权归苏维埃，并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弗·伊·列宁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被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正文第275页)

[87] 国防委员会或国防执行委员会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所召开的国防会议产生的。国防执行委员会拥护临时政府为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利益而实行的军事措施(把革命军队调出彼得格勒等等)。——(正文第 284 页)

[88] 指弗·伊·列宁所起草的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页)。——(正文第 292 页)

年 表

（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

三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因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从土鲁汉斯克流放地获释来到彼得格勒。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论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八号上。

三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参加“真理报”编辑部。

三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论战争”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十号上。

三月十八日

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派约·维·斯大林参加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的“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十二号上。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玛·伊·乌里杨诺娃偕同彼得堡和谢斯特罗列茨克的男女工人代表团在白岛车站（在芬兰铁路线上）迎接自国外流亡归来的弗·伊·列宁，并陪同列宁到彼得格勒。

四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干部的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弗·伊·列宁论述了他的四月提纲。

四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在讨论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问题时发言。

四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支持所谓“自由公债”的决定的抗议书。

四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给农民土地”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三十二号上。

四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工作。

四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瓦西里岛交易所广场举行的五一群众大会上发表“论临时政府”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的“五一”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三十五号上。

四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出席因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米留可夫照会而在玛丽亚宫召开的临时政府阁员、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的会议。

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主持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工作。

四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发表捍卫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演说，并被选为关于弗·伊·列宁报告的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做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斯大林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五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革命的落伍者”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四十八号上。

五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并就彼得格勒委员会的组织机构问题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问题发言。

五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瓦西里岛证券交易所大厦爱沙尼亚工兵俱乐部举办的音

乐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表演说。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地方自治机关选举运动”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和第六十六各号上。

五月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立，约·维·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从那时起斯大林始终是政治局委员。

六月三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

六月六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斯大林支持列宁的关于组织工人和士兵和平游行示威的提议。

约·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为讨论游行示威问题而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发言，论述彼得格勒的政治形势。

六月九日夜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接着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决定取消定于六月十日举行的游行示威。

由于中央委员会决定取消游行示威，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在深夜为“真理报”准备材料并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六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昨天和今天(革命危机)”一文刊载在“士兵真理报”第四十二号上。

六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一文刊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公报”创刊号上。

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六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致贺词。

约·维·斯大林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刊载在“真理报”第八十四号上。

六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六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全国代表会议上做“关于民族运动和民族团队”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了约·维·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六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约·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局委员的非正式会议上报告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于要求采取坚决办法以对付日益增长的反革命的声明。

七月一日至三日和十六日至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组织的第二次代表会议(紧急代表会议)的工作。

七月三日

在约·维·斯大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来阻止群众举行自发的武装游行示威，当情况表明不能阻止这一运动时，中央委员会就决定参加这一游行示威，以便使游行示威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七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制止散布对弗·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诽谤。

七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在那里说服了革命水兵不采取武装

行动。约·维·斯大林使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取消了对水兵采用武力的命令。

七月七日至八日

约·维·斯大林、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和弗·伊·列宁一起决定列宁离开彼得格勒的问题。

七月八日至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为弗·伊·列宁离开彼得格勒做准备。

七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谢·雅·阿利路也夫陪同弗·伊·列宁到海滨车站。列宁从那里乘火车到拉兹里夫车站。

七月十一日至十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转入地下的弗·伊·列宁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根据列宁的指示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文刊载在喀琅施塔得“无产阶级事业报”第二号上。

七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紧急代表会议)的上午会议上做中央委员会关于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在下午会议上做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和结论。

七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讨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改选问题和其他问题时发言。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起草“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篇宣言刊载在“工人和士兵报”第二号上。

七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反革命的胜利”两文刊载在“工人和士兵报”创刊号上。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七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结论。

七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七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代表大会一部分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并做关于政治形势报告的结论。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八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案。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八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党中央全会选为“工人和士兵报”的编辑。

八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被党中央全会选入中央委员会核心组。

八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核心组会议，会上批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八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反对莫斯科会议”一文刊载在“工人和士兵报”第十四号上。

八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的“再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一文刊载在“工人和士兵报”第十五号上。

八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托，组织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出版。

约·维·斯大林的“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一文刊载在“无产者报”创刊号上。

八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被中央委员会选为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

八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纳尔瓦区委员会给士兵做报告，题目是“社会民主党和城市的选举”。

八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前线我军失败的真相”和“论前线七月失败的原因”两文刊载在“无产者报”第五号上。

八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挑衅时期”一文刊载在“无产者报”第八号上。

八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二者必居其一”一文刊载在“工人日报”创刊号上。

八月二十七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约·维·斯大林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案。

八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我们的要求”一文刊载在“工人日报”第四号上。

八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和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发动作斗争的问题。

八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宣言。

党中央委员会委托约·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做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的“反对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一文刊载在“工人日报”第九号上。

八月至十月

约·维·斯大林主编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和“工人之路报”等名称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

九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走自己的路”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三号上。

九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的“第二次浪潮”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六号上。

九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对加米涅夫要求烧毁弗·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的来信，提议把这两封信发给最大的党组织加以讨论。

九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十三号上。

九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做报告，在报告中他捍卫了弗·伊·列宁的关于抵制预备国会的指示。

九月二十三日

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中有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

九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一号上。

九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瓦西里岛区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做关于民主会议的报告。

九月二十九日

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公布各选区立宪会议候选人名单。约·维·斯大林被提为下列各选区的候选人：彼得格勒、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南高加索、斯塔夫罗坡里。

约·维·斯大林的“你们等着吧，你们是等不着的……”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二十三号上。

十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决定在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召开有中央委员和彼得格勒、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

十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访问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的弗·伊·列宁，并和他讨论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

十月十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弗·伊·列宁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并建立了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为首的由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来领导起义。

约·维·斯大林的“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准备反击吧！”一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二号上。

十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看看无耻到什么程度”和“破坏革命的工贼”两文刊载在“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七号上。

十月十六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主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约·维·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的发言。会上选出了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

十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提议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弗·伊·列宁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工贼行为的来信。

约·维·斯大林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约·维·斯大林在斯穆尔尼举行的彼得格勒工会代表会议上就准备武装起义问题发言。

十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为加强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影响，决定派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斯大林的建议：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关于土地问题、关于战争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弗·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约·维·斯大林)的报告和提纲；会议决定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

当天的“工人之路报”在上午十一时出版，刊载了约·维·斯大林的“我

们需要什么？”一文，该文号召推翻临时政府。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做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弗·伊·列宁于傍晚来到斯穆尔尼。约·维·斯大林向他报告政治事变的进程。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领导十月武装起义。

斯大林全集

第三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48・787×1092耗1/25・16$\frac{2}{5}$印張、283,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5,000　　定價：1.70元

“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口号，而且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现时情况下的唯一出路。

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4

НОЯБРЬ 1917 - 1920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五六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四卷说明 …… 1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七年

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3
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 …… 6
关于乌克兰拉达（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12
乌克兰拉达是什么？ …… 14
关于芬兰的独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 16
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 …… 18

一九一八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
问题的讲话（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简要记录） …… 19
关于基辅资产阶级拉达 …… 20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 21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 21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 22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 23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的话传电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 26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 27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 29
乌克兰是个交叉点 …… 31
关于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 …… 34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 …… 35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47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联邦 …… 47
在形成中的俄罗斯联邦同这种联邦有什么区别 …… 47
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 …… 4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成员 …… 49
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 …… 49
中央政权的建立 …… 50
政权的执行机关 …… 50
联邦制的过渡作用 …… 51
俄罗斯联邦政治建设的过程。俄国的联邦制是走向
社会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 …… 51
当前任务之一 …… 52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草案） …… 55
给士尔克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56

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57
停战协定的签订 …… 57
今后的谈判 …… 57
乌克兰政变的影响 …… 58
政变的原因 …… 58
在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 60
一　开幕词（五月十日） …… 60
二　闭幕词（五月十六日） …… 63
又一个谣言 …… 65
高加索的局势 …… 66
一　南高加索 …… 66
二　北高加索 …… 68
关于高加索的局势（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通报）…… 70
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事实和诡计） …… 72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 82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 …… 84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 85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 …… 86
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89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90
给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 91
给察里津战线司令员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92
南方战线（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93
事物的逻辑（论孟什维克中央的“提纲”） …… 95
一　关于十月革命 …… 95

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 97
三 小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 …… 99
四 今后怎样？…… 101
在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上关于南方战线形势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报纸纪要） …… 104
关于俄国南部（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06
南方战线的重要性 …… 106
察里津是被突击的中心 …… 106
我军的力量在哪里？ …… 107
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 …… 109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1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1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113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 116
障壁 …… 119
不要忘记东方 …… 121
乌克兰在解放中 …… 123
光明来自东方 …… 125
事情在发展 …… 129

一九一九年

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 …… 131
给弗·伊·列宁的报告 …… 133
在维亚得卡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记录） …… 137
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 …… 138
溃败的一般情况 …… 138

第三集团军和预备队 …… 142
结论 …… 145
集团军的指挥系统和总部的训令 …… 146
结论 …… 148
不稳固的后方与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 …… 149
结论 …… 151
供给机关和撤退机关 …… 152
结论 …… 154
物资和人员的损失总数 …… 155
为巩固前线而采取的措施 …… 155
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政策 …… 158
致土尔克斯坦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党组织 …… 161
两个阵营 …… 162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 …… 165
两年以来 …… 167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 171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174
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 176
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 …… 177
给希格雷国家监察部特派检查员的电报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 180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 181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 183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 184

关于彼得格勒战线（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86
一、彼得格勒接近地 …… 186
二、敌军兵力 …… 186
三、敌人的如意算盘 …… 187
四、前线的情况 …… 188
五、舰队 …… 189
六、总结 …… 189
向弗·伊·列宁报告西方战线情况的信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 …… 191
自南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 194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197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98
南方战线给彼得格勒的致敬电 …… 200
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 …… 201
一 协约国计划的失败 …… 201
二 反革命失败的原因 …… 202
三 南方战线的目前情况 …… 205

一九二〇年

给乌克兰劳动军的命令（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 208
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 210
一 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三月十七日） …… 210
二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三月十九日） …… 211
三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的结论（三月二十日） …… 215
四 代表会议的闭幕词（三月二十三日） …… 216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 218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 219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 221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 226
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 …… 228
一　总的情况 …… 228
二　后方。突击地域 …… 230
三　前途 …… 233
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和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 235
突破 …… 235
突破的结果 …… 236
波兰第三集团军的命运 …… 236
前线的情况 …… 237
结论 …… 237
克里木战线 …… 238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 240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241
一、五月—六月 …… 241
二、日托米尔的突破 …… 241
三、突破的结果 …… 242
四、来自南方的危险 …… 243
五、记住弗兰格尔 …… 244
红军受到怎样的欢迎（向“红军战士报”发表的谈话） …… 245
给各级党组织（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 …… 246
关于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 …… 247
一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 247
二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 248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 …… 251
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 260
著者的话（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民族问题论文集的序言） …… 264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举行的
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上的报告） …… 267
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在巴库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272
第一个时期 …… 273
第二个时期 …… 274
第三个时期 …… 275
前途 …… 277
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281
一 宣布达格斯坦实行苏维埃自治 …… 281
二 结束语 …… 283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 285
一 关于捷列克区域实行苏维埃自治的报告 …… 285
二 结束语 …… 288
高加索的局势（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291
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 …… 295

注释 …… 297
年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 …… 315
插图（新增）
一 察里津不能丢！ …… 81
二 斯大林给列宁的信的手稿 …… 132
三 列宁主持苏维埃会议 …… 225
四 头戴“布琼尼”军帽的斯大林 …… 280

第 四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包括约·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后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的著作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红军的建立和巩固、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军事战略与战术等问题。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的谈话中，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中，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等论文和其他著作中，发挥了关于国家建设问题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问题。

在若干著作(“乌克兰是个交叉点”、“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光明来自东方”等文)中，阐明了乌克兰、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分析国内战争各战线情况的有“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给各级党组织”、“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和“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等文，关于察里津战线、彼得格勒战线、西南战线的军事评论以及给弗·伊·列宁的许多信件和电报。

在约·维·斯大林的“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这两个报告中，总结了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的斗争和胜利。

本卷刊印了描述伟大列宁形象的“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和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约·维·斯大林自察里津给弗·伊·列宁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关于西方战线情况的信(一九一九年八月)关于建立共和国战斗预备队给党中央的信和报告(一九二〇年八月)及其他文件。

本卷并未包括许多电报、信件、以直达电报谈话的记录、命令和其他作战文件以及给红军某些兵团、战士和指挥员的贺电。

在改用新历以前(即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以前)，日期均按旧历。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

在赫尔辛福斯
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

我被派到你们这里，是为了代表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俄国工人革命向你们祝贺。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代表俄国工农政府，代表在这次革命火焰中诞生的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祝贺。

但是，我到你们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祝贺。我首先是要向你们报告喜信：俄国革命胜利了，革命的敌人瓦解了，在帝国主义战争筋疲力尽的情况下，革命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长。

地主的奴役被摧毁了，因为农村的政权已经转到农民手中。将军的权力被剥夺了，因为军队中的权力已经集中在士兵手里。资本家被约制住了，因为工人对工厂和银行的监督正在迅速建立。城市和乡村，后方和前线，全国各地布满了正在夺取统治权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委员会。◇3◇[①]

有人拿克伦斯基和反革命将军来吓唬我们，可是克伦斯基被赶跑了，而将军们被那些也赞成工人和农民要求的士兵和哥萨克包围住了。

有人拿饥饿来吓唬我们，预言苏维埃政权必将在粮食恐慌的魔爪下灭亡。但是我们一制裁投机商人，一向农民发出呼吁，粮食就几十万几十万普特地流入城市。

有人拿国家机关的混乱、旧官吏的怠工等等来吓唬我们。我们自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

已也知道，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可能简单地把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变成自己的机关。但是我们一着手革新旧机关，清洗坏分子，怠工现象就开始消失了。

有人拿战争的“意外事件”，拿帝国主义集团由于我们建议民主的和平而可能制造纠纷来吓唬我们。的确，有过危险，而且是致命的危险。不过这种危险是发生在埃捷尔失守〔1〕以后，当时克伦斯基政府准备逃往莫斯科，放弃彼得格勒，英德帝国主义者已经商妥牺牲**俄国**来缔结和约。在**这种**和约的基础上，帝国主义者的确可以破坏俄国革命事业，也可能破坏国际革命事业。但是，十月革命适时地爆发了。它把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击落了国际帝国主义手中最危险的武器，这样就保卫了革命，使它免遭致命的危险。帝国主义老狼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向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屈服而接受和平，或者在**继续**战争的基础上把斗争进行下去。可是，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全世界在战争的魔爪下喘不过气来，“即将来临的”冬季战局在各国士兵中激起了愤怒的风暴，肮脏的密约已经被公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战争显然要使自己遭到失败。帝国主义老狼这一次失算◇4◇了。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的“意外事件”是吓唬不了我们的。

最后，有人拿俄国要崩溃，俄国要分裂成许多独立国家来吓唬我们，并且暗示说人民委员会宣布民族自决权是一个“招致灭亡的错误”。但是，我必须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俄国各民族有自由自决的权利，那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了（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恢复芬兰工人和俄罗斯工人之间的兄弟般的信任，那我们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但是谁都知道，不坚决承认芬兰人民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就不可能恢复这种信任。这里重要的不只是在口头上（即使是正式地）承认这种权利，重要的是这种口头上的承认将由人民委员会以行动来证实，这种承认将毫不犹豫地实

现。因为讲空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老口号应当实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芬兰人民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安排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芬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应该结成自愿的真诚的联盟！不应该对芬兰人民实行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这就是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的指导原则。

只有实现这种政策,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俄国各族人民才能团结成一支大军。只有实现这种团结，十月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才能向前推进。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向我们说到俄国必将因实现民族自决权思想而崩溃的时候，我们总是一◇5◇笑置之。

这就是敌人过去用来吓唬我们而且现在还继续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困难，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我们正在逐渐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我们听说你们国家正遇到类似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夜所遇到的那种政权危机。我们听说有人也在拿饥饿、怠工等等来吓唬你们。请允许我根据俄国革命运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你们，这些危险即使真的存在,也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坚决而毫不动摇地行动起来，这些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在战争和破坏的情况下，在西方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和俄国工人革命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危险和困难经得住你们的猛攻。在这种情况下，站得住脚和能够取得胜利的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只有一种战术，那就是丹东的战术：勇敢，勇敢，再勇敢！

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那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一定向你们伸出友谊的手。

这一点你们是可以相信的。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九一号◇6◇

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

自从和乌克兰拉达〔2〕的关系恶化以来，我接到乌克兰同志们寄来的许多关于和拉达的冲突问题的决议和信件。分别答复每一个决议和每一封信，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因为这些决议和信件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我决定选出其中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给以明确肯定的答复。这些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二)冲突是在哪些问题上发生的？

(三)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和平解决冲突？

(四)难道两个兄弟民族要流血吗？

接着一致表示相信，两个亲如骨肉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会不经过兄弟之间的流血而和平解决的。

首先必须指出乌克兰同志们的某些混乱观念。他们有时把和拉达的冲突说成乌克兰人民和俄罗◇7◇斯人民之间的冲突。这是不对的。在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冲突。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以及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构成的。他们曾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统治，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他们一起为争取土地和和平、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流过血。在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中,他们都是兄弟和同志。在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中，他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冲突。当然，把和拉达的冲突说成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之间的冲突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因为这样最容易唆使两个亲如骨肉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互相攻击，而使这两族人民的压迫者拍手称快。凡是对人民的压

迫者有利的事情，对人民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很难理解吗？

冲突并不是发生在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之间，而是发生在人民委员会和拉达总书记处之间。

冲突是在哪些问题上发生的呢？

有人说，冲突是在中央集权制和自决问题上发生的，人民委员会不让乌克兰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不对。人民委员会所力求达到的正是使乌克兰的全部政权归乌克兰**人民**，即归乌克兰的工人和士兵,农民和水兵。苏维埃政权，即**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参加的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政权，这正是人民委员会在努力争取的那种**人民**政权。总书记处不要这种政权，因为它不愿意离开地主和资本家。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中央集权制。◇8◇

人民委员会一开始就主张而且现在仍然主张自由的自决。即使乌克兰人民分离出去成立独立的国家，它也丝毫不反对。关于这一点，它曾经正式声明过好几次。但是，当有人把人民的自决和卡列金专制混为一谈的时候，当拉达总书记处企图把哥萨克将军们的反革命暴行说成是人民自决的表现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就不能不指出：总书记处是在打出自决的幌子来掩饰自己同卡列金和罗将柯的联盟。我们主张**各民族**实行自决，但是，我们反对在自决的旗号下用走私的方法偷运昨天还主张扼杀芬兰的卡列金专制。

有人说，冲突是在乌克兰共和国问题上发生的，人民委员会不承认乌克兰共和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不对。人民委员会在“最后通牒”和给彼得格勒乌克兰司令部的“复文”〔3〕中正式承认了乌克兰共和国。它准备承认俄国任何民族区域的共和国，只要那个区域的劳动人民希望这样做。它准备承认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联邦制度，只要俄国各区域的劳动人民希望这样做。但是，当有人把人民共和国和

卡列金的军事专政混为一谈的时候，当拉达总书记处企图把保皇派卡列金和罗将柯捧为共和国的台柱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就不能不指出：总书记处是在打出共和国的幌子来掩饰它对豪门保皇派的完全依附。我们主张成立乌克兰共和国，但是我们反对拿共和国的旗号来掩护人民的死敌，掩护昨天还主张恢复旧制度和对士兵恢复死刑的保皇派卡列金和罗将柯。

不，中央集权制和自决问题是和同拉达的冲突没有关系的。争执不是发生在这些问题上。总书记处故意把中央集权制和自决扯进来是打算作为一种战略手腕向乌克兰人民群众隐瞒冲突的真正◇9◇原因。

冲突不是在中央集权制和自决问题上，而是在下面三个具体问题上发生的。

第一个问题。冲突是由总书记处书记佩特留拉给前线的那些使前线有完全瓦解危险的命令引起的。佩特留拉不顾大本营，不顾前线的利益，不顾和平谈判和整个和平事业，竟下令把陆海军中的全部乌克兰部队调回乌克兰。不难想象，如果乌克兰部队服从了佩特留拉的命令,那末前线在瞬息之间就会崩溃：北方的乌克兰部队就要调到南方，南方的非乌克兰部队就要调到北方，其他民族的部队也都要开回“老家”，铁路就只能忙于运送士兵和装备，粮食就会因为没有车辆载运而不再运往前线，而前线就会瓦解。这样，停战和和平事业就会根本动摇。不用说，在平常时期乌克兰士兵首先应该驻扎在自己家里，驻扎在乌克兰。不用说，军队“民族化”是可行的和合乎愿望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会已经正式声明过好几次。可是在战争情况下，当和平问题还没有解决，而战线又不是按民族标志部署的时候，当由于我们运输力量薄弱，立即实行军队“民族化”就会有士兵撤离、前线崩溃、和平和停战遭到破坏的危险的时候，——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谈不到立即把各民族部队撤走的。我不知道佩特留拉是否意识到他正在以轻率的命令瓦解前线，破坏和平事业。但是，乌克兰

的士兵和水兵立即了解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全体(除了极少数)都拒绝服从佩特留拉而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坚持到缔结和约。这样，乌克兰战士就拯救了和平事业，而关于佩特留拉的轻率的命令问题目前也已经显得不特别尖锐了。◇10◇

第二个问题。佩特留拉的命令所引起的冲突因拉达总书记处实行解除乌克兰代表苏维埃武装的政策而尖锐化了。在基辅，总书记处的部队夜间袭击苏维埃军队，并解除了它的武装。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也有过类似的企图，不过这些企图都因为遭到回击而失败了。但我们确实得悉，为了解除苏维埃军队的武装，总书记处正在调集军队进攻敖德萨和哈尔科夫。我们确实得悉，在其他许多较小的城市里，苏维埃的军队已经被解除武装并“遣散回家了”。可见拉达总书记处的目的是要实现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阿列克谢也夫和罗将柯的解除苏维埃的武装的计划。但是，苏维埃是革命的堡垒和希望。谁解除苏维埃的武装，谁就是解除革命的武装，谁就是毁灭和平和自由的事业，谁就是背叛工人和农民的事业。苏维埃使俄国摆脱了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束缚。苏维埃使俄国摆脱了克伦斯基统治的耻辱。苏维埃给俄国各族人民争得了土地和停战。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因此，谁举手反对苏维埃，谁就是帮助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谁就是帮助卡列金和阿列克谢也夫巩固他们对士兵和哥萨克的“铁的”统治。

请不要对我们说：总书记处里的人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不会背叛人民的事业。克伦斯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却率领军队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郭茨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却发动士官生和军官攻击彼得格勒的士兵和水兵。萨文柯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对前线的士兵施行死刑。判断人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不应当根据他们的言论，而应当根据他们的行动。总书记处正在破坏乌克兰苏维埃并解除它们的武装，使卡列金便于在顿河

和煤矿区建立◇11◇血腥的制度——这是任何社会主义幌子都掩盖不住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人民委员会肯定说，总书记处的政策是反革命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人民委员会希望曾经站在俄国最前列为建立革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乌克兰工人和士兵能够使总书记处俯首听命，否则就改选它，使两族人民能够和平相处。

有人谈到乌克兰和俄国之间“交换”军队、划定境界等等。人民委员会完全知道划定境界的必要性。但是划定境界应该以兄弟般的友善态度按照协议来进行，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按照“能抢什么就抢什么”、“能缴谁的械就缴谁的械”的“原则”来进行，像目前总书记处所干的那样，抢却粮食，掠夺货物，使军队挨饿受冻。

第三个问题。当总书记处断然拒绝让苏维埃的革命军队过境去消灭卡列金的时候，冲突达到了顶点。总书记处的部队拦住载着革命军队的列车，毁坏铁路，以开枪射击来威胁，声称他们不能让“异”军通过他们的领土。这是昨天还和乌克兰人一起同妄图扼杀乌克兰的刽子手将军们作斗争的俄罗斯士兵,然而今天他们竟成了“异”军!可是与此同时，就是这个总书记处却允许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和从四面八方来投奔卡列金的反革命军官自由地通过他们的领土前往罗斯托夫！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卡列金分子在残杀罗斯托夫的赤卫队，而拉达总书记处却阻挠我们去援助我们罗斯托夫的同志！卡列金的军官在枪杀我们矿井中的同志，而总书记处却阻挠我们伸手援助矿工同志！昨天还是被击溃的卡列金，今天竟一直向北推进，占领顿巴斯,威胁察里津，这有什么可以奇◇12◇怪的呢？**总书记处同卡列金和罗将柯结成了联盟**，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总书记处宁愿同科尔尼洛夫分子结成联盟，而不愿同人民委员会结成联盟**，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有人谈到人民委员会有必要同拉达总书记处达成协议。但是，同目前的总书记处达成协议，就是同卡列金和罗将柯达成协议，这难道很难理解吗？人民委员会不能自杀，这难道很难理解吗？我们进行反

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并不是为了同刽子手卡列金之流缔结联盟来断送革命。工人和士兵流血牺牲并不是为了向阿列克谢也夫之流和罗将柯之流投降，求他们开恩。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拉达同卡列金决裂，向苏维埃伸出手来，开放道路，让革命军队过境去消灭顿河反革命巢穴，——那末，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工人和士兵将以更热烈的联欢来巩固自己的革命联盟；

或者拉达不愿意同卡列金决裂，不开放道路让革命军队过境，——那末，拉达总书记处就会得到人民的敌人竭力追求而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就是两个兄弟民族的流血。

使总书记处俯首听命，或者改选它使危险的冲突能够和平解决，这取决于乌克兰工人和士兵的觉悟性和革命性。

迫使总书记处肯定地表明现在它主张哪一种联盟：主张同卡列金和罗将柯结成反对革命的联盟，还是主张同人民委员会结成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将军的联盟，这取决于乌克兰工人和士兵的刚毅性和坚强性。◇13◇

冲突的和平解决掌握在乌克兰人民的手里。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真理报”第二一三号◇14◇

关 于 乌 克 兰 拉 达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一向坚决坚持自决原则的人民委员会竟和也以自决原则为出发点的拉达发生了冲突。为了弄清这个冲突的起因，必须研究一下拉达的政治面貌问题。

拉达是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农民分掌政权的原则为出发点的。而苏维埃则反对这种分掌政权，主张把全部政权交给人民(不包括资产阶级)。这就是拉达拿自己的“全部政权归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即人民和资产阶级)的口号来对抗“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即人民)的口号的原因。

有人说，冲突是在自决问题上发生的。这是不对的。拉达主张在俄国建立联邦制。而人民委员会比拉达更进一步，直到承认分离权。可见人民委员会和拉达之间的分歧并不在这个问题上。拉达硬说中央集权制是分歧点，这也是完全不对的。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型式建立起来的各区域中央(西伯利亚、白俄罗斯、土尔克斯坦)曾经向人民委员会请求指示。人民委员会答复说：你们自己就是当地的权力机关，自己就应当制定指示。可见分歧也不在这里。人民委员会和拉达的真正分歧是在以下三◇15◇方面。

第一个问题：把乌克兰部队调往南方战线。毫无疑问，本民族的军队能够最好地保卫本民族的领土。但是，目前我们的战线不是按照民族标志部署的。在运输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按照民族标志来重新部署战线就会使战线彻底瓦解。这样，和平事业就会遭到破坏。乌克兰的战士们要比总书记处明智和忠诚，因为大部分乌克兰部队都不愿意

服从拉达的命令。

第二个问题：关于解除乌克兰苏维埃军队的武装。乌克兰拉达维护乌克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解除苏维埃军队的武装来打击革命。拉达在这方面的行动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的行动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不用说，人民委员会将以全力反对拉达的这种反革命政策。

最后，第三个问题：关于不让苏维埃军队过境去消灭纠集着俄国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卡列金。拉达不让苏维埃军队过境的理由是拉达对“实行自决的”卡列金保持“中立”。可是，拉达在这里是用卡列金专制代替哥萨克劳动人民的自决。拉达阻碍苏维埃军队过境，就是帮助卡列金向北推进。同时，拉达却允许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自由地开往顿河。当我们的同志在罗斯托夫和顿巴斯遭到枪杀的时候，拉达阻碍我们去援助他们。不用说,对拉达的这种叛逆行为是不应当宽容的。人民委员会不能放弃反对卡列金的斗争。卡列金的反革命巢穴一定要捣毁。这是必然的。如果拉达要阻碍我们去消灭卡列金，掩护卡列金，那末对卡列金的打击就会落到拉达的头上。人民委员会不惜对拉达进行坚决斗争，因为它知道拉达和卡列金结成了秘密联盟。人民委员会截获了一封密码◇16◇电报，从这封电报中可以明白看出：为了把和谈拖延到春天，拉达直接和法国使团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法国使团和卡列金建立了联系。这个联盟是反对和平和革命的。这个联盟必须粉碎，而且一定会被粉碎。

有人责备我们对拉达实行了坚决的政策。然而，正是这种坚决的政策使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睁开了眼睛，揭露了拉达的资产阶级本质。这一点就从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反对资产阶级拉达的新的乌克兰革命政权在乌克兰已告成立的电报〔4〕中也可以看出。(鼓掌)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消息报”第二五四号◇17◇

乌克兰拉达是什么？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所截获的密码电报，这封电报揭露了拉达的真面目和“我们盟国”的军事使团在和平问题上的真正意图。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在法国使团和拉达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盟，并且“法国使团官员和拉达有直接的联系”。其次，从电报中可以看出，这个联盟的目的是“把俄国战线在形式上维持到二月或三月，把停战协议的最后签订**拖延**到春天”。最后，从电报中还可以看出：为了“给罗马尼亚战线和西南战线（这两条战线按计划应由拉达占领。——斯大林注）供应煤和粮食”，法国使团已经“同军人会议（即同卡列金“政府”）达成协议”。

简单地说，原来在拉达、卡列金和法国军事使团之间存在着一个旨在破坏和谈即把和谈“拖延”“到春天”的联盟。并且法国军事使团不是自主地而是遵照“法国政府的紧急指示”行动的。

我们不想在这里谈“我们盟国”军事使团的行为。他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已经十分清楚：他们在八月帮助了科尔尼洛夫，在十一月帮助了拉达和卡列金，在十二月供给叛乱分子装甲车。这一切都是为了“作战到底”。我们毫不怀疑：“盟国”的这种强制别人作战的诡计一定会被俄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所粉碎。使团的行为和他们在中非洲的行为一样。但是，“盟国”很快就得确信俄国◇18◇并不是中非洲……这里我们感到兴趣的主要是拉达所扮演的那种丑恶的角色。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拉达要把乌克兰部队调往罗马尼亚战线和西南战线。原来它企图以军队“民族化”的幌子来掩盖它和法国使团订立的旨在把停战拖延到春天的条约。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拉达不让苏维埃军队过境去消灭卡列金。原

来它力图以对卡列金保持“中立”的幌子来掩盖它和卡列金结成的反苏维埃联盟。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拉达抗议人民委员会“干预”乌克兰的内部生活。原来它力图以不准干预的词句来掩盖法国政府为消灭革命成果而对乌克兰和全俄国的生活的真正干预。

乌克兰的同志们时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拉达是什么？

现在我来回答。

拉达，或者更正确地说，拉达总书记处，是一个为了欺骗群众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它同也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的政府一模一样。

拉达，或者更正确地说，拉达总书记处，是一个和卡列金结成联盟来反对苏维埃的资产阶级政府。从前克伦斯基政府和科尔尼洛夫结成联盟解除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武装。现在拉达政府和卡列金结成联盟来解除乌克兰苏维埃的武装。

拉达，或者更正确地说，拉达总书记处，是一个和英法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和平的资产阶级政府。从前克伦斯基政府拖延了和平事业，使数百万士兵当了炮灰。现在拉达政府正竭力破坏和平事◇19◇业，“把停战拖延到春天”。

克伦斯基政府因此在俄国工人和士兵的共同努力下被推翻了。

我们毫不怀疑：拉达政府同样也会在乌克兰工人和士兵的努力下被推翻。

只有新的拉达，只有乌克兰工兵农苏维埃的拉达，才能捍卫乌克兰人民的利益，反对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反对地主和资本家。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一五号◇20◇

关 于 芬 兰 的 独 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最近芬兰代表要求我们立即承认芬兰的完全独立并确认芬兰脱离俄国的事实。人民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决定颁布关于芬兰完全独立的法令，此项法令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原文如下：

“对芬兰政府请求承认芬兰共和国独立一事，人民委员会完全按照民族自决权原则做出决议，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提案：(甲)承认芬兰共和国的国家独立，(乙)和芬兰政府协商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双方代表组成)，以拟定有关芬兰脱离俄国的实际措施。”

很明显，人民委员会不能有别的做法，因为既然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代表要求承认自己的独立，那末无产阶级政府就应当根据赋予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答应它的要求。

资产阶级报刊说我们把国家弄得分崩离析，失去了许多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但是，同志们，我们不可能失去芬兰，因为实际上它从来就不归我们所有。如果我们用暴力手段留住芬兰,那也决不是◇21◇说我们得到了芬兰。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威廉是怎样用强力和横暴手段“得到”许多国家的，因而给人民及其压迫者的相互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基础。

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它的口号和意愿，就是要造成一种期待已久的各族人民相互信任的气氛，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一切都是早就说过的,尽人皆知的。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芬兰获得独立的情形,那末我们就会看出，

实际上人民委员会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把自由交给了芬兰资产阶级，而不是交给芬兰人民，不是交给芬兰无产阶级的代表；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芬兰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从俄国社会主义者手里取得了独立。芬兰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们必须仰仗芬兰资产阶级得到自由，而不是直接从俄国社会主义者手里得到自由。我们认为这是芬兰无产阶级的悲剧，因此不能不指出：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只是由于优柔寡断和令人不解的怯懦而没有采取坚决措施使自己掌握政权，并从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自己的独立。

可以责骂人民委员会，可以对它采取批评态度，但是没有人能够断言人民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迫使人民委员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十分公正地对待了芬兰资产阶级关于让芬兰独立的要求，并且立即颁布了关于芬兰独立的◇22◇法令。

愿芬兰的独立能够促进芬兰工人和农民的解放事业，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打下牢固的基础。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三三号◇23◇

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

所谓“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要算是俄国“按战争的权利”占领的唯一国家。这就是那个多年来成为(而且现在还是)西方实现其贪得无厌的外交野心和东方实施其血腥统治的对象的“天府之国”。一方面蹂躏和残杀阿尔明尼亚人，另一方面各国外交家以假仁假义的“保护”来掩盖新的残杀，结果阿尔明尼亚血迹遍野，受尽欺骗和奴役，——谁不知道“文明”强国的外交“艺术”所创造的这些“平常的”图画呢？

阿尔明尼亚的儿女是自己祖国的英勇保卫者，但是远不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帝国主义外交强盗的欺骗。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走外交折冲的老路并不是解放阿尔明尼亚的道路。现在很清楚：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始的工人革命。现在谁都明白：俄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特别是阿尔明尼亚人民的命运是和十月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十月革命扭断了民族压迫的锁链。十月革命撕毁了束缚各族人民手脚的沙皇密约。十月革命，也只有十月革命才能把俄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

人民委员会根据这些理由决定颁布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自由自决的专门法令。在目前，◇24◇当具有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本性的德国—土耳其当局毫不掩饰他们想用暴力控制占领区的意图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让俄国各族人民知道，俄国革命及其政府是决没有侵略野心的。让大家都知道，人民委员会是以彻底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政策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的。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二二七号◇2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简要记录)

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采用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帮助了帝国主义。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不能叫做立场的。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那就会加强我国的反革命。德国是能够举行进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军队——“近卫军”。十月间我们谈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因为当时有人向我们说，单单“和平”两个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革会把西方激动起来，但是为了实行这种改革，我们需要时间。如果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那我们就会给西方革命运动造成最恶劣的条件。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议通过列宁同志的关于同德国缔结和约的提案。

第一次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26◇

关于基辅资产阶级拉达

资产阶级报纸正在加紧散布“拉达和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谈判”的谣言。接近反革命分子的人们竭力传播这些谣言，强调它们的“特殊”意义。以至许多同志也相信和基辅拉达谈判的传说，而且其中很多人已经写信问我这种传说是否真实。

我现在公开声明：

(一)人民委员会没有而且也不准备和基辅拉达进行任何谈判。

(二)基辅拉达已经完全和卡列金勾结在一起，并且正在背着俄国各族人民和奥德帝国主义者进行卖国谈判。人民委员会认为，对这样的拉达只能进行无情的斗争，直到乌克兰苏维埃获得完全胜利。

(三)只有彻底消灭基辅资产阶级拉达，只有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拉达(其核心已经在哈尔科夫形成)，乌克兰才能得到和平和安宁。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真理报”第九号◇27◇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5〕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报告人指出，民族问题是目前俄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大俄罗斯人不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被居住在俄国边疆地区的其他“弱小”民族团团包围着，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

沙皇政府鉴于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曾经极力严酷处理民族事务。它实行了强迫边疆地区各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它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本族语言、蹂躏和其他迫害。

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消灭了这些民族障碍，但是由于它的阶级性，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28◇革命初期的政府不但没有走上彻底解放各民族的道路，而且往往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来镇压民族运动，像对乌克兰和芬兰那样。

只有苏维埃政权才公开宣布了一切民族都有直到同俄国完全分离的自决权。在这一方面，新政权甚至比某些民族内部的民族集团还要激进。

虽然如此，在人民委员会和各边疆地区之间仍然发生了许多冲突。不过，这些冲突不是围绕着民族问题，而恰恰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讲演人举出许多例子，说明由有产阶级上层代表匆忙拼凑起来的各边疆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如何极力借口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而对苏

维埃和其他革命组织进行一定的斗争。各边疆地区和中央苏维埃政权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政权问题。某些区域的资产阶级集团力图给这些冲突涂上民族的色彩，只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便于他们用民族的外衣来掩盖同本区域劳动群众的政权进行斗争。

讲演人详细说明了拉达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乌克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集团如何利用自决原则来实现其本阶级的帝国主义目的。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的联邦制度问题，讲演人指出：苏维埃联邦的最高机关应该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代表大会的职权。◇29◇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一)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在俄国各民族自愿联盟的基础上，是这些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

(二)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会议至少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关；

(四)联邦政府即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全部或部分)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

(五)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各个区域的苏维埃共和国参加联邦政府的方式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和区域机关职权范围的划分，在各区域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立即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30◇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

(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斯大林同志就所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做了结论。

他指出，所提出的决议并不是法律，它只是拟定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未来宪法的一般原则。在两个政治派别即民族主义反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以前，是谈不到制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机构一切细节的严密宪法的。

这个决议只包含宪法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将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研究并提请下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批准。

有人责备苏维埃政权在和资产阶级拉达斗争时表现得过分严酷。**斯大林**同志在回答这种责备时指出，因为这是和披上民族民主外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领导拉达的某些政治活动家(如文尼阡柯)的民主招牌决不是实行真正民主政策的保障。

我们判断拉达不是根据它的言论，而是根据它的行动。

拉达中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31◇

口头上他们在宣言〔6〕中宣称自己主张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而实际上他们却在他们颁布的说明书中加以限制，宣布地主的一部分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当交给人民。

口头上他们宣称自己顺从苏维埃，而实际上他们却和苏维埃进行殊死斗争，解除苏维埃军队的武装，逮捕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杜绝苏维埃继续存在的任何可能。

口头上他们说忠于革命，而实际上却表明自己是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们说在反对顿河反革命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而实际上却给卡列金将军以直接的和积极的援助，帮助枪杀苏维埃军队,不让粮食北运。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拉达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马尔托夫在这里所说的苏维埃反对民主派的斗争究竟是什么呢？

右派发言人，特别是马尔托夫，称赞拉达并替它辩护，大概是因为看到拉达的政策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政策。妥协派先生们把他们如此称心的这个一切阶级的联合政权——拉达看做立宪会议的雏型。大概拉达听到右派代表的发言以后也会衷心地称赞他们。难怪常言道：臭气相投。(笑声，鼓掌。)

其次，讲演人谈到高加索的自决，并且根据确实材料证明，高加索行政委员会〔7〕正对高加索的苏维埃组织和前线的苏维埃实行公然侵犯的政策，同时和高加索反革命运动的英雄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保持联系。◇32◇

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必须继续进行所谓内战，这种内战实质上是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一个派别力图在各边疆地区建立妥协主义的联合政权，另一个派别则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为建立劳动群众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而斗争。

人民委员会和各边疆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联合政府之间所发生的那些尖锐冲突的内容和历史意义就是如此。这些政府说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这种借口不过是他们向劳动人民进攻的一种虚伪掩饰而已。(热列鼓掌)

马尔托夫责备苏维埃政权自相矛盾，说它一面要求在俄国各边疆地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一面又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所坚持的在库尔兰、立陶宛、波兰等地实行全民投票表示满意。斯大林同志在回答这种责备时指出，当西部地区还没有苏维埃，当那里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要求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是愚蠢之至的。

讲演人说：如果依照马尔托夫的方案去做，那就不得不在不仅没有苏维埃，而且还没有开辟走向苏维埃道路的地方臆造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说通过苏维埃来实行自决，那是荒谬绝伦的。

报告人在结束报告时再一次谈到民主派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基本分歧。左翼争取建立下层的专政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右翼则建议曳足后退，退到已经走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阶段上去。法国和美国的议会制度的经验明显地表明，经过普选制产生的表面上民主的政权，实际上是和真正民主制相去很远而且背道而驰的一种同财政资本结合的联合政权。在法国，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制◇33◇的国家里，议员是由全民选举的，但是部长是由里昂银行指派的。在美国，选举是普遍的，但是执掌政权的是亿万富翁洛克菲勒的傀儡。

讲演人问道：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是的，我们已经埋葬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马尔托夫分子要把我们拖到三月革命[①]时期去是枉费心机的。(笑声，鼓掌。)我们工人代表必须使人民不仅成为投票者，而且成为统治者。执政的并不是选举者和投票者，而是统治者。(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34◇

——————————————

① 三月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旧历)革命。俄语中“三月”和“马尔托夫”两词的形容词是相同的。——译者注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的话传电报

我们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一小时也不要丧失，立即把全体工人发动起来，以便遵照彼得堡苏维埃今晚将要通过的决议，组织几万工人，把全部资产阶级一无例外地带到彼得堡近郊在工人监督之下挖战壕。在革命危急的今天，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战壕线路由军人指定，你们把武器准备好，而主要的是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并动员起来。

列　宁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35◇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8〕的电报

五天前霍夫曼将军通知我们停战协议〔9〕已满期，隔了一天便开始军事行动。人民委员会关于主张恢复和谈的声明还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德国政府所以迟迟不作答复是为了先把我国掠夺一空，然后开始和谈。德军已经占领得文斯克、罗夫诺、明斯克、沃尔马尔、加普萨尔，现在正向彼得堡和基辅推进。显然，进军的目的不仅是掠夺，主要是扼杀革命和摧毁革命的成果。

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彼得堡组织抵抗，动员全体工人居民，也动员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不愿意挖战壕，就强迫他们去，强迫他们在工人监督下挖战壕。

同志们的共同意见是这样：你们基辅人应该不要丧失一分钟，立即在基辅城西组织同样的抵抗，动员一切有生力量，配备大炮，挖掘战壕，驱使资产阶级在工人监督下挖战壕，宣布戒严，严厉执行。

总的任务就是保卫住彼得格勒和基辅，无论如何要拦住德寇。

情况比你们所能设想的更为严重。毫无疑问，德寇想畅行无阻地进到彼得堡至基辅一线，然后在◇36◇那里，并且仅仅在那里，在这两个首都，才提起和平谈判。我想，你们还没有废除旧拉达和德军签订的条约〔10〕。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认为你们不必急于废除。

再说一遍：不要丧失一分钟，不要多费唇舌，立即行动起来，让大家看到，苏维埃政权是能够自卫的。

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在工人身上，因为正在遣散的所谓军队只会惊

惶和逃跑。

即等回电。

约·斯大林

（受人民委员会委托）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彼得格勒

第一次载于“关于一九一八年粉碎
乌克兰德国占领者的文献”一书
一九四二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版◇37◇

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直达电报稿

人民委员**斯大林**受人民委员会委托。

前天，二月二十二日，接到德国政府的苛刻的、可以说是蛮横的议和条件,而且德国人要求我们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这些条件。同时，德国部队向列维里和普斯可夫进攻，威胁彼得格勒，而我军完全不予抵抗。你们是否得悉这些条件，我不知道。我们曾经用无线电向各地广播了这些条件。现在我把其中主要的几条告诉你们。

“第四条：俄国立即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缔结和约。俄国军队和赤卫队立刻撤出乌克兰和芬兰。”“黑海及其他海上的俄国军舰应立即驶回俄国港口，停泊在那里，直到全面缔结和约，否则就解除其武装。”“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恢复黑海及其他海上的商务航运。立即开始清除水雷。”

“第三条：俄国军队和赤卫队立即撤出里夫兰和爱斯兰，在国家机构未能保障当地社会安全和国家秩序之前由德国警察占领。必须立即释放一切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居民。”◇38◇

“第五条：俄国应当尽力做到一切，保证立即有步骤地归还土耳其东安那托里亚各省，并承认土耳其撤回投降书。”

后面是关于贸易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基础是你们所知道的旧拉达和奥匈帝国订立的条约。

总之，应该说，条件的蛮横是难以置信的。我们认为，关于乌克兰的一条并不是要恢复文尼阡柯政权(这个政权本身对于德国人并没有价值)，而是要对我们施加极实际的压力，以期迫使我们和你们同意接受旧拉达同奥匈帝国订立的条约，因为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文尼阡柯，而是拿工业品来换取粮食和矿石。

我们对目前因德国人进攻和我军溃逃而造成的形势是这样估计的：由于西方革命运动发展缓慢、我军不坚强和德帝国主义者的贪婪至极，我们在推翻了本国帝国主义者之后，又暂时落入外国帝国主义的魔掌，为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我们应该立即准备力量组织卫国战争，同时期待西方革命力量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这种准备，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喘息时机；即使是蛮横的和约也能给我们提供喘息时机。无论如何不能抱幻想。要有勇气正视现实并承认我们已经暂时落入德帝国主义的魔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晨三时决定缔结条件蛮横的和约并委托人民委员会派代表团去布列斯特（代表团今天已经动身），就是根据这些考虑。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持苏维埃政权。而现在要为组织反对德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准备再准备。

我们都认为，你们人民书记处应该派自己的代表团去布列斯特，并在那里声明，如果奥德不再支◇39◇持文尼阡柯的冒险行为，人民书记处将不反对旧基辅拉达所订条约的原则。你们采取这种步骤，第一、可以强调出南方和北方苏维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第二、可以保持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这对整个国际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我们很希望你们能了解我们，并且在不幸的和约的这些最重要问题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请立即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你们是否今天就派代表来彼得格勒，或者更简单些，直接去布列斯特，以便共同和德国人进行谈判？这是第一。第二、你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在排斥文尼阡柯及其党徒的前提下可以接受文尼阡柯条约的看法？我等待你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以便准备委任状和办理你们赴布列斯特的事宜。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彼得格勒

第一次刊印◇40◇

乌克兰是个交叉点

二月底，在同德国签订和约以前，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就派了代表团到布列斯特，声明它同意在前基辅拉达和德意志同盟所缔结的条约上签字。

在布列斯特的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并非无名的霍夫曼没有接见人民书记处的代表团，他说没有必要同这个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与此同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突击部队同佩特留拉—文尼阡柯的盖达马克[①]部队联合起来开始进犯苏维埃乌克兰。

不是和平，而是反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战争，——这就是霍夫曼的答复的内容。

根据前基辅拉达所签订的条约，乌克兰必须在四月底以前供给德国三千万普特粮食。至于德国所要求的“自由输出矿石”，那就更不用提了。

苏维埃乌克兰人民书记处无疑是知道条约上的这一条的，而且它知道当它正式表示同意签署文尼阡柯和约时，它是在做什么。◇41◇

然而，以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政府拒绝同乌克兰所有城乡苏维埃都承认的人民书记处进行和平谈判。它宁愿同死人结成联盟，同已经被推翻和被驱逐的基辅拉达结成联盟，而不愿意同乌克兰人民所承认的、唯一能够拿出“必需数量”粮食的入民书记处缔结和约。

这就是说，奥德进犯的目的不仅是要得到粮食，主要是要推翻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和恢复资产阶级旧制度。

————————————

① 盖达马克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乌克兰哥萨克和农民反对波兰地主的起义队伍。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乌克兰的反革命首领为了欺骗群众，也把自己的队伍称为盖达马克。——译者注

这就是说，德国人不仅想从乌克兰榨取千百万普特粮食，而且还企图剥夺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夺去他们用血换来的政权并把它交给地主和资本家。

奥德帝国主义者用刺刀带来新的可耻的压迫，这种压迫丝毫不比旧日鞑靼人的压迫轻些，——这就是来自西方的进犯的内容。

乌克兰人民显然感觉到这一点，正慷慨激昂地准备抵抗。组织农民红军，动员工人赤卫队，经过最初的惊惶之后同“文明”暴徒进行了一系列的胜利的小战斗，夺回巴赫马奇、柯诺托普、涅仁，迫近基辅，群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成千上万的人去和奴役者作战，——人民的乌克兰就是这样来回答暴徒的进犯。

为了反对来自西方的外国压迫，苏维埃乌克兰掀起了卫国解放战争，——这就是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的内容。

这就是说，德国人要想拿到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块金属，都必须经过战斗，经过和乌克兰人民的◇42◇殊死搏斗。

这就是说，德国人要想取得粮食并把佩特留拉和文尼阡柯扶上王位，就必须真正征服乌克兰。

德国人为了一举两得（既获得粮食，又摧毁苏维埃乌克兰）而进行的“短促突击”，完全有可能变成外国奴役者同两千万乌克兰人民——外国奴役者夺取粮食和自由的对象之间的持久战争。

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将不惜一切力量同“文明”暴徒进行英勇斗争，这还用得着多说吗？

在乌克兰开始的卫国战争完全可以期望得到整个苏维埃俄国的全力支持，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如果乌克兰的战争形成持久战，终于变成俄国全体正直而高尚的人们反对来自西方的新压迫的战争，那会怎样呢？

如果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在这样的战争的进程中终于了解到德国首脑们所遵奉的目的并不是“保卫德国人的祖国”，而纯粹是饕餮的帝

国主义野兽的贪得无厌并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立即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那会怎样呢？

现在在乌克兰形成了整个国际时局的主要交叉点——俄国开始的工人革命和来自西方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交叉点，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饕餮的帝国主义野兽一定会在苏维埃乌克兰碰得头破血流，——事件的不可更改的逻辑现在不◇43◇是正导向这个结局吗？

载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消息报”第四十七号
署名：约·斯大林◇44◇

关于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

自从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俄罗斯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度以来，已经有两个月了。而还在忙于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各边疆地区，到今天还没有对联邦的具体形式明确地表示意见。如果不算现在正受着“文明”暴徒残酷蹂躏的乌克兰以及已经表示赞成同俄罗斯建立联邦关系的克里木和顿河区域，那末鞑靼—巴什基里亚要算是赞成同苏维埃俄罗斯建立联邦关系的唯一的区域，因为该地革命组织已经明确拟定了此项计划。我们指的是那个拟定得清楚明白的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大纲，目前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大纲，它是鞑靼人和巴什基里亚人的最有威望的苏维埃组织拟定的。

为了满足鞑靼—巴什基里亚革命群众的愿望，并根据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俄罗斯为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决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遵照人民委员会的指示拟定了如下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例。不久就要召开的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将定出这一条例的具体形式和细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批准这次大会的工作成◇45◇果，这一点我们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三号◇46◇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
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

在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地区中，就民族成分的繁多复杂来说，南高加索是最突出的一个地方。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鞑靼人，土耳其人和列兹金人，沃舍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这就是南高加索七百万居民的复杂民族成分的一幅远不完全的图景。

在这些民族集团中，无论哪一个民族集团都没有明确划定的民族境界，他们都是交错地杂居着，不仅在城市是这样,在农村也是这样。其实这也正说明为什么南高加索各民族集团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常常盖过他们反对俄罗斯中央的共同斗争。这种情况就给用民族的旗帜和装饰品来掩盖阶级斗争造成了极“方便的”条件。

南高加索的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经济落后。如果把巴库这个主要靠外资发展的全区工业绿洲除外，那末南高加索就是一个农业地区，只是在沿海一带边沿地方有比较发达的商业，而在中部则是还很牢固的纯粹农奴制度的残余。梯弗里斯省、叶里萨维特波里省和巴库省到今天还有很多◇47◇农奴制的鞑靼公卿和封建制的格鲁吉亚王公，他们占有大地产，拥有专门的武装匪徒，掌握着鞑鞑、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农民的命运。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那里农民的不满情绪往往酿成激烈的农民“骚动”。正应该在这里来寻找常常被农民“骚动”所盖过的南高加索(巴库除外)工人运动的软弱和不纯的原因。这一切就给有产阶级和所谓“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贵族出身）结成政治同盟来反对目前国内爆发的工农革命造成了有利的基础。

二月革命并没有使边区劳动阶级的状况发生本质变化。农村中最革命的分子——士兵当时还在前线。而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由于边区经济落后，一般还软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单位来说,还不巩固；他们陶醉于已得的政治自由，看样子不打算继续前进。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死死抓住政权，等待时机，乐意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略家们用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实现等等奇谈怪论来麻痹工人和农民。

十月革命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一下子就把一切关系倒转过来，提出了政权转到劳动阶级手中的问题。“全部政权归工人和农民！”的呼声像雷鸣一样响彻全国，唤起了被压迫的群众。当俄国北部发出的这种呼声在那里开始实现的时候，南高加索的有产阶级亲眼看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正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死亡。因此，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成了他们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已经尝到政权美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失掉政权的危险，于是就自然而然和有产阶级勾结起来了。◇48◇

这样就形成了南高加索的反苏维埃同盟。

可汗霍伊斯基和哈斯马麦多夫之类的鞑靼公卿同饶尔丹尼亚和格格奇柯利之类的格鲁吉亚贵族知识分子所参加的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就是这个反苏维埃同盟的活的化身。

为了把民族集团内部的各阶级联合起来,组织了格鲁吉亚、鞑靼、阿尔明尼亚等民族的“民族委员会”。它们的鼓舞者是孟什维克饶尔丹尼亚。

为了把南高加索一切主要民族的有产阶层联合起来，成立了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它的领导者是孟什维克格格奇柯利。

为了把边区“全体居民”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组织了所谓“南高加索议会”，由南高加索出席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和可汗等等的代表组成。它的点缀品，不，应该说它的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

这里既有“社会主义”，又有“民族自决”，还有比这些旧装饰品更实际的东西：有产阶层反对工农政权的实际联盟。

但是，靠装饰品过日子是不能长久的。联盟需要“行动”。当第一个实际危险刚一出现，“行动”就立刻出场了。我们说的是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从土耳其战线回来的革命士兵的事。这些士兵必须经过反苏维埃同盟的首都梯弗里斯。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对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存在会形成严重的威胁。危险是非常实际的。于是就在这里，在这个危险面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装饰品都销◇49◇声匿迹了。这个同盟的反革命性质暴露出来了。行政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对前线回来的部队进行了叛变性的射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把野蛮的“民族”团练武装起来。为了使“行动”更有把握并保证自己北部的安全，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同卡拉乌洛夫和卡列金达成协议，给卡列金运去了整整几车厢弹药，帮助他解除那些他自己无力解除的部队的武装，总之，用各种手段支持他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择手段地保护南高加索有产阶级，使他们不受革命士兵的侵犯，——这就是这种卑鄙“政策”的实质。唆使觉悟低的伊斯兰教武装队伍攻击俄罗斯士兵,把后者诱入预先布置好的埋伏地点，殴打和枪杀,——这就是这种“政策”的手段。在沙姆霍尔(位于叶里萨维特波里和梯弗里斯之间)附近枪杀从土耳其战线开来进攻卡列金的俄罗斯士兵，是这种可耻的解除武装“政策”的最明显的例证。

下面是“巴库工人报”〔11〕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一九一八年一月上半月，在梯弗里斯至叶里萨维特波里的铁路线上，几千名伊斯兰教武装匪徒在叶里萨维特波里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委员们的率领下,在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派出的装甲火车的援助下，对开往俄罗斯的部队强迫缴械多次。并且击毙击伤俄罗斯士兵几千名，铁路线上布满尸体。夺去俄罗斯士兵步枪一万五千支，机关枪七十挺，炮二十门。”

事实就是这样。

南高加索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士兵的联盟在官方的孟什维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活动，——◇50◇这就是上述事实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巴库工人报”上摘引几段论述叶里萨维特波里—沙姆霍尔事件的文章：

“孟什维克力图掩盖叶里萨维特波里事件的真相。连他们昨天的盟友梯弗里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劳动旗帜报”也认定他们企图“抹杀事件”，并要求在边区中央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欢迎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要求，因为今后南高加索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沙姆霍尔惨案的罪魁是否能被正式揭发出来，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事件的真相是否能大白于世。

我们认为，在叶里萨维特波里事件的罪魁中首先应该指出一度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现在是所谓“格鲁吉亚民族之父”的诺伊·尼古拉也维奇·饶尔丹尼亚。边区中央主席团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决议解除过境军用列车的武装并以此来武装民族部队的。就是由他签发电报给叶里萨维特波里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把聚集在沙姆霍尔附近的军用列车解除武装的。他，诺伊·饶尔丹尼亚，还从梯弗里斯派出了若干同样负有解除军用列车武装使命的代表团。这话是代表团的一员，士兵克鲁普柯在叶里萨维特波里市民委员会召开的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公开说出来的。诺伊·饶尔丹尼亚和他的一向热心得超乎常情的助手纳·拉米施维里派出了一列由阿勃哈查瓦率领的装甲火车，阿勃哈查瓦把武器分发给伊斯兰教徒，帮助他们枪杀几千名士兵并解除军用列车的武装。◇51◇

诺伊·饶尔丹尼亚辩护说，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几十名阿尔明尼亚人和伊斯兰教徒都肯定说，电报是他签名的,而且这封电报还在。饶尔丹尼亚说，他知道事情复杂化之后，曾经打电话给阿勃哈查瓦，请他不要强行解除军用列车的武装，让他们过去。阿勃哈查瓦已经被

击毙，这个声明已经无法查对，我们姑且假定通过电话……

如果撇开死人(俗语说，一切都可以推在死人身上)，那末还有活的证人，他们驳斥了饶尔丹尼亚的申述，证实了收报地址和饶尔丹尼亚的签名以及负有解除武装使命的代表团的派遣等等。

如果他们说谎，为什么饶尔丹尼亚不处分他们呢？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想“抹杀事件”呢？

不，饶尔丹尼亚、拉米施维里等诸位公民，你们对一月七日至十二日击毙几千名士兵的流血事件负有重大的责任。

你们能推掉这个滔天罪行的责任吗？但是，我们说的不是推卸“个人责任”。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注意饶尔丹尼亚的不是他个人，我们所以注意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制定南高加索政策的政党的领袖，是南高加索当局威望最高、责任最大的代表。

他干出这种罪行，第一、是根据边区中央主席团和全边区民族委员会的决议的，第二、无疑是取得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同意的。我们对饶尔丹尼亚个人的谴责，也就是对整个孟什维克◇52◇党，对边区中央，对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谴责；在这个行政委员会里，契恒凯里和格格奇柯利先生同伊斯兰教公卿和可汗结成紧密的公开的联盟，竭尽全力来消灭革命。我们提到饶尔丹尼亚和拉米施维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同电报、命令、派遣“强盗”装甲火车连在一起。要弄清真相，必须从他们身上着手进行侦查。

但是还有一些名字必须指出，还有一个罪犯的巢穴必须扫除。这个巢穴就是全部由反动的公卿和可汗组成的叶里萨维特波里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它在一月七日晚间根据饶尔丹尼亚的电报做出了“无论如何”要解除军用列车武装的决议，并于一月九日至十二日极端无耻地残酷地执行了自己的决议。

孟什维克报刊在谈到叶里萨维特波里事件的时候，竟把事情说成

似乎是南高加索常有的“强盗”袭击铁路的事件。这真是最无耻的谎话！

在沙姆霍尔和达里亚尔干出罪行的不是强盗，而是由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公开领导的几千名伊斯兰教平民，他们被大批战利品所诱惑，他们确信这是遵照南高加索当局的命令办事。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在叶里萨维特波里公开纠合了几千名伊斯兰教徒，把他们武装起来，在叶里萨维特波里车站把他们载上火车，开往沙姆霍尔。据目击者称，在获得“胜利”之后，“社会革命党人”萨菲丘尔斯基由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的其他英雄陪着，骑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炮上凯旋入城。◇53◇

“这里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强盗袭击呢？”（“巴库工人报”第三十号和第三十一号）这些就是制造这一罪恶的冒险行为的主要英雄。

这里还有两份揭露冒险行为制造者的文件。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边区中央主席诺·饶尔丹尼亚关于解除军用列车武装给各地苏维埃的电报：

“南高加索各地苏维埃

梯弗里斯发。第五〇五号甲。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收到，发报号码五六三六三。收报员纳乌莫夫。字数五十九。发报时间五日十八时二十四秒。通报。

由于返回俄罗斯的军队随身带去武器，如果停战谈判失败，民族部队将无足够的武器防守战线，因此，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边区中央决定建议各地苏维埃设法夺取撤退部队的武器，并将每次执行情况报告边区中央。

边区中央主席**饶尔丹尼亚**”

骑兵上尉阿勃哈查瓦给鞑靼骑兵团团长马加洛夫的电报：

“叶里萨维特波里

鞑靼骑兵团团长马加洛夫收。泽加姆发。第四十二号。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收到。发报机关茹。发报号码一八五七。收报员瓦塔。字数三十。发报时间七日十五时。◇54◇

五列武装兵车正在开来，载有一门炮，带着几名苏维埃代表，我乘装甲火车去抵抗。希接济各种武器。

骑兵上尉**阿勃哈查瓦**

通信值班员沙齐拉什维里”

（“巴库工人报”第三十三号）

文件就是这样。

在事变的进程中，“社会主义”装饰品就这样销声匿迹而让位给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反革命“行动”了。齐赫泽、格格奇柯利、饶尔丹尼亚不过是用自己的党的旗帜来掩盖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卑鄙行为而已。事物的逻辑比其他任何逻辑都有力。

反革命的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解除从前线回来的俄罗斯士兵的武装来和“外部的”革命者作斗争，是打算一举两得：一方面，消灭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即消灭布尔什维克边区委员会的主要支柱——俄罗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这样可以得到“必需的”武器来武装孟什维克反革命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靠山，即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伊斯兰教部队。由此看来，对“外部的”革命者作战的使命是保证南高加索“内部的和平”。格格奇柯利和饶尔丹尼亚先生对他们的“后方”即卡列金之流和菲里莫诺夫之流所盘踞的北高加索愈感觉到它的稳固，他们实行这个阴险的政策就愈坚决。

但是事变的进程粉碎了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打算。◇55◇

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的避难所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攻克根本动摇了“北面的后方”。北高加索全线(直到巴库)的完全肃清已经使这个后方化为乌有。来自北方的苏维埃革命的浪潮毫不客气地闯进了南高加索同盟的王国，威胁着它的存在。

南高加索本身的情况也同样“不利”。

从前线回来的南高加索士兵给农村带来了土地革命。伊斯兰教地主和格鲁吉亚地主的庄园烧起来了。农奴制残余的基石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士兵农民的坚决冲击。可见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空口诺言已经不能使卷入土地革命浪潮的农民满意了。要求行政委员会的是行动，但不是反革命的行动，而是革命的行动。

工人也没有而且不会落在事变的后面。第一、来自北方的、给工人带来新的成果的革命，很自然地唤起了南高加索无产阶级去进行新的斗争。甚至孟什维克反革命的支柱即死气沉沉的梯弗里斯的工人，也开始离开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而拥护苏维埃政权了。第二、北高加索在卡列金和菲里莫诺夫时期是梯弗里斯的粮食供应地，苏维埃在北高加索胜利以后，梯弗里斯的粮食恐慌不能不加剧，这自然就引起了许多次的粮食“骚动”，因为革命的北高加索坚决拒绝供养反革命的梯弗里斯。第三、纸币的缺乏(地方流通券不能代用！)扰乱了经济生活，首先是铁路运输，这无疑就加深了城市下层群众的不满。最后，从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起就承认苏维埃政权并且不断同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巴库没有让南高加索的无产阶级睡觉，而成了他们向往仿效的榜样和照亮走◇56◇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活的灯塔。

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不能不使南高加索的整个政治形势革命化。结果连“最可靠的”民族部队也开始“瓦解”而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

在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或者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反对地主和资本家，那末同盟就要瓦解。

或者坚决反对农民和工人运动以保持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同盟。

饶尔丹尼亚和格格奇柯利两位先生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首先，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宣布格鲁吉亚和鞑靼农民的土地运动

是“抢劫”和“捣乱”，逮捕并枪杀了“祸首”。

保护地主反对农民！

其次，行政委员会封闭了梯弗里斯所有布尔什维克报纸，逮捕和枪杀抗议这种暴行的工人。

保护资本家反对工人！

最后，饶尔丹尼亚和格格奇柯利先生显然为了“躲避雷雨”，竟采取教唆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的手段，——真是无耻，连立宪民主党人现在也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

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南高加索议会和各“民族委员会”反对工人和农民，——这个“新”方针的内容就是如此。◇57◇

这样，南高加索的反革命分子补充了对“外部的”革命者的斗争即对俄罗斯士兵的斗争，并把它发展为对内部革命者的斗争即对“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斗争。

前几天接到高加索的一位亲眼看到格格奇柯利和饶尔丹尼亚先生反革命暴行的同志写给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用这封信来说明南高加索同盟参加者在政策上的这种“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把这封信全文一字不改地引在下面：

“近来这里发生了一些新事件，现在情况非常严重。二月九日早晨逮捕了我们的四个同志，其中有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委员弗·卡兰达泽。并且逮捕其他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纳查烈强、沙维尔多夫和边区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拘票也已经签发。被饶过的只有米哈·齐哈卡雅，大概是因为他生病。全体同志都转入地下。同时查封了我们的“高加索工人报”、“斗争报”(格鲁吉亚文)和“工人斗争报”(阿尔明尼亚文)，并封闭了我们的印刷所。

这件事情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就在九日这一天，铁路修理厂举行了群众大会，到会工人达三千名。除四人弃权外，大会一致决定宣布罢工，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志和启封报馆。并决定不达到要求不复工。

但是并不是全体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一伙顽固不化的孟什维克在大会上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举手反对，仍然去上工。在同一天，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也召开了会议，会上以二百二十六票对一百九十票决定罢工一天以示抗议，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电气工人、制革工人、缝纫工人、兵工厂、托列工厂和查尔加利雅茨工厂等都更为一致地通过了罢工的决议。◇58◇

市内的居民也被激怒了。但是次日(二月十日)发生了一桩事件，使人们忘记了逮捕和报纸问题。

铁路员工和其他工人的罢工委员会决定十日这天早晨在亚历山大罗夫花园举行抗议大会。虽然有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大会，但到会的仍有三千多工人和士兵（士兵不多，因为军用列车停在离城十五俄里的地方）。已经隐蔽起来的卡夫塔拉泽、马哈拉泽、纳查烈强等同志也出席了大会。在大会进行中，民警和“赤卫队”(约有两个连)开进花园。他们手里拿着红旗，还做手势要大会不要惊惶，悄悄地走近了与会群众。

一部分群众想走散，但是又留下来了，他们以为来的是自己人，甚至喊起“乌拉”来欢迎。主席卡夫塔拉泽想停止讲演人的讲话，向进来的人表示欢迎。这时进来的人迅速向四周散开，包围了会场，用步枪和机关枪疯狂地向大会开火。主要的射击目标是讲演台上的主席团。八人被击毙，二十余人受伤。一个貌似卡夫塔拉泽而服装也和他相似的同志身中十弹而死，于是“赤卫队”大叫大嚷，说卡夫塔拉泽已经打死。一部分群众逃散了，另一部分伏在地上。射击进行了十五分钟左右。

恰好在这个时候，南高加索议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刚刚开幕，齐赫泽就在离会议厅不很远的地方所发出的步枪和机关枪的哒哒声的伴奏下发表演说。

这次突如其来的并且用这样的叛变方式进行的枪杀，激起了工人

更大的愤怒。我想，这次枪◇59◇杀已经使工人彻底离开孟什维克了。

大会被驱散之后，匪徒们追上了纳查烈强和秦查泽，要把他们拉去枪毙，但是社会革命党人麦尔哈列夫救了他们。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愤怒”，提出抗议等等。达什纳克党人和全城人民也都被激怒了。但是毫无办法。匪徒们从农村调来了武装“赤卫队”和伊斯兰教野蛮师，横行不法。他们公开威胁说要枪杀所有领导同志。在射击群众大会的那一天，城里出现了许多佩带着白臂章的白卫军军官。他们在全城各处搜索布尔什维克。他们从电车上拉下了一个似乎像邵武勉的人，对准他开枪，叫嚷说，这就是邵武勉，可是结果大失所望。

昨天，十一日，在军用列车旁举行了群众大会，有我们的同志参加。会上六千名士兵(炮兵没有参加)决定要求释放被捕同志、启封报馆并调查十日的事件(即群众大会遭到射击的事件，有军用列车中的一个士兵在会场上被击毙)。昨天就派出了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今天到期，听说行政委员会正在调集军队准备抵抗。详细情形还不知道。负责同志从军用列车那里暂时还不回来，他们怕在途中被捕，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被选为军用列车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在等候更确实的消息。

市杜马定于明天开会，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将提出抗议，我们也将有代表出席会议。全城人心皇皇。由于饥荒开始发生，妇女们今天在杜马附近举行游行示威。全城到处都在举◇60◇行飞行集会。在从俄罗斯回来的格鲁吉亚士兵的影响下，全格鲁吉亚都掀起了农民运动，这些士兵不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孟什维克宣布这是逞凶抢劫的运动，并派出“赤卫队”去镇压。在哥里逮捕了我们的同志。今天听说，那里解除了我们士兵的武装，并且枪杀已经在进行。据库泰依斯消息，该市掌握在以布杜·穆吉万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手里。孟什维克军队从各地往那里调集，我们派出去的人还没有

回音。我每分钟都在等候。有一个布尔什维克采尔茨瓦泽老人昨天在穆赫拉尼被逮捕，他是因为农民预定在昨天发动反对穆赫拉尼的王公和封建领地的斗争而去那里的。

现有九人被捕并被关入麦捷赫监狱。一直守卫监狱的社会革命党的赤卫队由于这次逮捕而停止守卫，并表示愿意给我们效劳。

前面列举的那些企业的代表所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昨天发表宣言，号召举行总罢工。今天到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看梯弗里斯的无产阶级怎样表现自己了。

二月十日议会开幕的时候，到会的只有孟什维克(三十七人)和一个伊斯兰教徒。此外再没有别人。伊斯兰教徒代表要求延至十三日开会,当经同意。大概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将派代表参加。”

“情形”就是这样。

这个已经被历史宣判了死刑的反革命的行政委员会是否还能长久存在，——这很难说。无论如◇61◇何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见分晓。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最近的事件完全摘下了孟什维克社会反革命分子的社会主义假面具，现在整个革命世界都有可能亲眼看到：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及其附属品“民族议会”是旨在反对南高加索工人和农民的最凶恶的反革命联盟。

事实就是这样。

可是谁不知道，空话和装饰品会消失，而事实和行动将存在……

载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真理报”第五十五号和第五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62◇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由于近日在苏维埃报刊上对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和方式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报记者特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斯大林同志对本报记者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做了如下答复。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联邦

在现有一切联邦制联合中，最能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是美国和瑞士的联邦。这两个国家是在历史上由许多独立国家经过邦联而形成联邦的，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单一制的国家，仅仅保留了联邦制的形式。从独立到单一制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经过许多次的暴力、压迫和民族战争的。只要回忆一下美国的南北战争〔12〕和瑞士的宗得崩德〔13〕同其余各邦的战争就够了。这里不能不指出，瑞士各邦和美国各州不是按照民族特征，甚至不是按照经济特征建立的，而是完全由于偶然，即由于外来移民或村社偶然占领了某些领土而建立的。

在形成中的俄罗斯联邦同这种联邦有什么区别

目前俄国正在建立的联邦将是而且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俄国分离出去的各区域就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来说都是完全固定的单位。乌克兰、克里木、波兰、南高加索、土尔克斯坦、伏

尔加河中游、柯尔克兹边区和中部的不同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是边疆地区！)，而且还在于都是完整的经济地域，其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

第二、这些区域并不是自由独立的地域，而是被强迫并入全俄政治机体的单位，它们现在渴望得到必要的行动自由，建立联邦关系或完全独立。这些地域“联合”的历史就是旧俄当局施行暴力和压迫的整幅图昼。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将意味着这些地域和居住在这些地域的各族人民摆脱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从单一制走向联邦制！

第三、在西方的联邦国家那里，领导国家生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不会没有暴力，这是并不奇怪的。在我们俄国这里则恰恰相反，领导政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的死敌无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并且必须在各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度。

这就是俄国的联邦和西方的联邦之间的本质差别。

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由此可见，俄罗斯联邦不是各个独立城市的联盟(像资产阶级报刊的漫画家所想象的那样)或一般区域的联盟(像我们某些同志所揣度的那样)，而是在历史上分离出来的、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一定地域的联盟。这里问题决不在于某些区域的地理位置，甚至不在于某些地域有江河(土尔克斯坦)、山脉(西伯利亚)或草原(土尔克斯坦)和中部相隔。拉齐斯所宣传的这种地理联邦制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联邦制毫无相同之处。波兰和乌克兰并没有山脉和江河同中部相隔，但是谁也不会武断地说，没有这些地理特征，上述区域就不能有自由自决的权利。

斯大林同志说：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莫斯科的区域分离派的特殊联邦制(他们力图把莫斯科周围的十四个省人为地联合起来)也和苏

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联邦问题的人所共知的决议毫无相同之处。总共不过包括几个省的中部纺织区无疑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像这样的地区无疑将由自己的区域机关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个独立部门来管理。可是在没落的卡卢加和工业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之间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现在的区域人民委员会根据什么特征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呢？真是莫名其妙。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成员

显然，应该而且可以成为联邦的主体的不是任何地区和单位，也不是任何地理上的地域，而只能◇65◇是自然地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特殊的民族成分和某种最低限度的经济地域的完整性的一定区域。这样的区域就是波兰、乌克兰、芬兰、克里木、南高加索(而南高加索还可以分成若干一定的民族地域单位，如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鞑靼等等)、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边区、鞑靼—巴什基里亚地区和西伯利亚等等。

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

这些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限将在整个苏维埃联邦的建设过程中非常具体地规定出来,但是这些权利的一般轮廓现在就可以钩划出来了。陆海军、外交、铁路、邮电、货币、通商条约和总的经济、财政、金融政策，——这一切大概将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其余一切事宜，首先是一般法令的执行方式、学校、诉讼、行政管理等等，则归区域人民委员会负责。无论在诉讼方面或在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

多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

中央政权的建立

中央政权的建立，它的组织方式是由俄罗斯联邦的特点决定的。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实际上形成了两院制：一方面是根据普选原则选出的议会，另一方面是由各州或各邦组成的联邦院。这也就◇66◇是事实上造成资产阶级立法滞缓的那种两院制。不用说，俄国的劳动群众是不会同意这种两院制的。至于这种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完全不符合，那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将是由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代行其职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必须抛弃那种认为普选制“原则”绝对正确的资产阶级偏见。选举权想必只给那些被剥削的或至少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居民阶层。这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这一**事实**的自然结果。

政权的执行机关

至于俄罗斯联邦政权的执行机关，即中央人民委员会，我们认为应该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中央和加入联邦的各区域所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这样，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之间就不会有而且不应该有所谓第二院了。毫无疑问，在建立政权方面，实践会创造出而且大概正在创造出使各区域的和中央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其他更适宜和更有伸缩性的形式。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实践创造出什么样的形式，它决不会复活已经被我们的革命铲除和埋葬了的两院制。

联邦制的过渡作用

我们的谈话人接着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眼前正在形成的俄罗斯联邦的一般轮廓。很多人倾◇67◇向于把联邦制度看做最稳固的甚至是理想的制度，并且时常以美国、加拿大和瑞士为例。可是，历史证明迷恋联邦制是不对的。第一、美国和瑞士已经不是联邦国家。它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是联邦国家，从十九世纪末全部政权由各州、各邦转归中央联邦政府的时候起，它们事实上已经变成单一制的国家了。

历史证明，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是各州、各邦从独立走向完全联合的过渡阶段。联邦制作为从独立到帝国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是一种完全适宜的形式，但是各州、各邦联合成统一的国家整体的条件一成熟，联邦制就被废除和抛弃了。

俄罗斯联邦政治建设的过程。俄国的联邦制是走向社会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

俄国的政治建设是相反地进行的。这里沙皇时代的强制性的单一制正被自愿的联邦制所代替，以便逐渐使联邦制让位给俄国各民族和各部落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愿联合。**斯大林**同志在结束谈话的时候说：俄国的联邦制也同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一样注定要起过渡作用，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和四日
“真理报”第六十二号和
第六十三号◇68◇

当 前 任 务 之 一

俄国革命发展的最近两个月，特别是签订对德和约和镇压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的时期，可以说是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时期，有计划地把衰朽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造到新的社会主义规范上去的开端。工厂国有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对主要贸易部门的控制日益加强，银行国有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细胞的各色各样业务一天比一天开展，——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政权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细小的地方。中部的政权已经成为从劳动群众中间成长起来的真正的人民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威力就在于此。看来，连苏维埃政权从前的敌人，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师和工程师、职员和一般有专门知识的人们，也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昨天还对苏维埃政权怠工，而今天已经准备为它效劳了。

但是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民政权。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扩展到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疆地区是比较晚了一些。由于这些边疆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条件，再加上经济落后，使那里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作有些复杂了。为了使那里的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使劳动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还必须采取特别的办法把这些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69◇和被剥削群众吸引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来。必须把群众的觉悟提高到苏维埃政权的水平，使他们的优秀的代表和苏维埃政权融合起来。但是，如果这些边疆地区不实行自治，也就是说，不建立地方学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机关、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社会政治机关和教育机关，不保证在社会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为边区劳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的充分权利，那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为此目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度。

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在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所居住的各边疆地区和土尔克斯坦边区出现的资产阶级自治团体的真面目逐渐被革命进程揭露出来了。为了使“他们自己的群众”完全离开他们而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必须从他们那里“夺取”自治，首先清除它身上的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使它由资产阶级的自治变为苏维埃的自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要求自治是为了使自治成为奴役“自己的”群众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他们“承认中央苏维埃政权”，但是同时却不愿意承认地方苏维埃，要求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因此，有些地方苏维埃就决定完全抛弃一切自治，宁愿用武力来“解决”民族问题。但是这种办法对苏维埃政权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种办法只能使群众团结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周围，使这些上层显得是“祖国”的救星、“民族”的保卫者，这无论如何是不符合苏维埃政权的意图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不是否认自治，而是承认自治。只是必须把这种自治建立在地方苏维埃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政权才能成为人民的群众自己的政权。因此，必须使自治能保证政权不属于该民族的上层,而属于该民族的下层。全部实质就在这里。◇70◇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宣布了鞑靼—巴什基里亚地区实行自治。为了同样的目的还打算宣布柯尔克兹地区和土尔克斯坦边区等地实行自治。这一切都是以承认这些边疆地区的乡、县、市地方苏维埃为基础的。

需要搜集为确定这些地区自治的性质和形式所必需的材料和各种数据。必须成立有各该民族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参加的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这些成立大会应当划定这些自治区域的境界。必须召开这些成立大会。这个必要的准备工作应当立即完成，以便使未来

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能够制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宪法。

鞑靼—巴什基里亚地区的各个苏维埃及其所属的伊斯兰教徒人民委员部已经行动起来了。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将在莫斯科召开喀山、乌发、奥连堡、叶加特林堡等地苏维埃和伊斯兰教徒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会议以组织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

在柯尔克兹边区和土尔克斯坦这种工作还刚刚开始。这些边疆地区的苏维埃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吸引有关各民族的一切苏维埃分子和革命分子参加工作。任何把居民划分为代表“少数”民族的和代表“多数”民族的民族集团的做法，像某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所主张的那样，都是不能容许的。这种划分只能加深民族仇视，巩固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壁垒，堵塞落后民族走向光明、走向文化的道路。应该成为成立大会的选举原则和自治基础的不是把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和民主分子分隔为各个民族集团，而是把他们团结在各有关的苏维埃组织的周围。◇71◇

总之，搜集关于边疆地区自治问题的材料，成立苏维埃直属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委员部，组织各自治区域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这些成立大会，使各个实行自决的民族的劳动阶层和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接近起来，——这就是各苏维埃的任务。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帮助地方苏维埃进行这一困难而重要的工作。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
“真理报”第六十七号◇72◇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14〕通过的草案）

目前过渡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基本任务在于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即强有力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以彻底镇压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建立既没有阶级区分也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俄罗斯共和国是联合在城乡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的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各区域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联合成自治的区域联盟，受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领导。

三、各区域苏维埃联盟根据联邦原则联合成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73◇代表大会领导，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消息报”第八十二号◇74◇

给土尔克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5〕的电报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人民委员会一定会支持你们边区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自治。我们欢迎你们的创举，深信你们会在全边区普遍建立起苏维埃，并同现有的苏维埃取得紧密联系，一致行动。请你们派遣你们已经着手组织的土尔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到莫斯科来，以便和我们共同研究关于确定你们边区的全权机关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谨向你们的代表大会祝贺，并希望大会胜任地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

列　宁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消息报”第八十三号◇75◇

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

（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斯大林**同志奉人民委员会之召从库尔斯克回到莫斯科报告工作。他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如下：

停战协议的签订

摆在苏维埃和谈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战线上即在同乌克兰的交界线上实行停战。我们的和谈代表团就是根据这一方针开始同德国—乌克兰统帅部进行谈判的。我们已经争取到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沃龙涅什等战线上停止军事行动。现在摆在议程上的问题是在南方战线也停止军事行动。这样，在我们看来，签订停战协议和确定分界线就是和谈的第一阶段。

今后的谈判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即正式开始和谈，由于必须长久地等待中央拉达的代表团而复杂化了。该代◇76◇表团刚到沃罗日巴，就得悉乌克兰发生政变和废除小拉达和大拉达的消息，这当然给实行停战，给确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的事先联络造成了困难。

为了完成后一个任务，我们特别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到乌克兰—德国统帅部所提议的地点即该统帅部总参谋部所在地柯诺托普去。我们的代表在商定谈判地点方面有最广泛的全权。

乌克兰政变的影响

乌克兰发生的政变对和平谈判的命运的影响如何还很难下定论，因为还不知道乌克兰的新政府对和平谈判的看法。在斯柯罗帕茨基统领的宣言中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在政变以前，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拉达的明确的和平纲领。而乌克兰新政府关于领土的纲领我们还不知道。

一般说来,乌克兰的政变对和平谈判暂时还没有发生不好的影响。相反地，可以认为乌克兰的政变并没有排除苏维埃政权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缔结和约的可能。应当指出，在政变以后，乌克兰人在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方面已经不再犹豫和拖延了。

政变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谈到乌克兰发生政变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次政变是必然的。发生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拉达的立场的矛盾，它一方面玩弄◇77◇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把外国军队引进来攻击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中央拉达使自己在财政上、军事上处于依赖德国的地位，同时向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许下一大堆诺言，并且很快又开始同工人和农民顽强地作战。乌克兰拉达由于采取了后一个步骤而使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在遭到资产阶级地主集团攻击的紧急关头，它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

而且实际上，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中央拉达是不能长久地掌握政权的，因为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只有那些得到一定的阶级支持的分子才能牢固地掌握政权。因此，乌克兰只能有两条出路：或者是工人和农民的专政，而中央拉达由于它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能促成这

种专政的；或者是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专政，这又是拉达所不能赞成的。拉达宁愿采取不彻底的立场，因而注定了自己的死亡。

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
“消息报”第九十号◇78◇

在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16〕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一　开 幕 词

（五月十日）

同志们！这个会议是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倡议下，经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意而召开的。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组织本区域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将来的成立大会的目的是确定鞑靼—巴什基里亚自治区的境界和性质。自治思想是给各民族带来自由的十月革命的本质产生的。人民委员会在十月的日子里发表的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俄国为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居民的自治区联邦的著名决议，不过是十月革命的本质在形式上的表现。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总纲，号召俄国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表示他们◇79◇愿意在自己的区域内建立怎样的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他们愿意和中央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所有的区域中，似乎只有芬兰和乌克兰作了肯定的表示……表示要独立。而当人民委员会确信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独立的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也有无产阶级分子之后，这些国家就毫无阻碍地获得了它们所要求的东西。

至于其他区域，它们的劳动人民在民族运动的问题上是有些消极的。而他们愈消极，资产阶级就表现得愈积极。几乎在所有的区域内

都建立了资产阶级自治团体，它们组织了“民族委员会”，在自己的区域里划分了各个拥有民族部队、民族预算等的民族集团，这样就把自己的地区变成了民族斗争和沙文主义的舞台。这些自治团体(我指的是鞑靼、巴什基里亚、柯尔克兹、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等的“民族委员会”),所有这些“民族委员会”都追求一个目的：获得自治，使中央政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不监督它们。“让我们自治，那我们就承认中央苏维埃政权，可是地方苏维埃我们不能承认，它们不应当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怎样组织就怎样组织，想怎样组织就怎样组织，我们愿意怎样对付本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就怎样对付。”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治，要求对自治区内“自己的”劳动者实行全权统治的资产者所追求的自治。

不言而喻，苏维埃政权不能批准这种自治。给予自治竟是为了使自治区的全部政权属于要求不受苏维埃干涉的民族资产阶级,把鞑靼、巴什基里亚、格鲁吉亚、柯尔克兹、阿尔明尼亚等民族的工人交给鞑靼、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以及其他民族的资产者去宰割，——不，苏维埃政权不能这样做。◇80◇

自治是一种形式。全部问题在于这种形式包含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内容。苏维埃政权决不反对自治，它主张自治，但是它主张的是全部政权掌握在工人和农民手里的自治，是各民族的资产者不仅无权执政而且无权参加政府机关选举的自治。

根据苏维埃原则实行的自治就是这种自治。

有两种类型的自治。第一种类型是纯粹民族主义的自治。这种自治是超地域地根据民族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支配的民族部队，居民划分为几个民族集团，由此必然发生的民族纷争，——这些就是这种类型的自治的结果。这种类型的自治必然使工农代表苏维埃灭亡。资产阶级拉达曾经追求过这种类型的自治。拉达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自然不得不同工农苏维埃作战。在南

高加索，由于存在着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和鞑靼民族委员会，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格格奇柯利向南高加索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行政委员会所说的话是很对的：“你们是否知道，行政委员会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形同虚设，因为全部权力实际上已经转到拥有自己民族部队的民族委员会手中了。”

这种类型的自治我们是根本反对的。

我们主张另一种类型的自治，即一个或几个民族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区域的自治。没有任何民族集团，没有任何民族壁垒！自治应该是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苏维埃自治。这就是说，该区域的居民不应当按照民族特征划分，而应当按照阶级特征划分。具有阶级性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自治的基◇81◇础，自治是这些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意志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苏维埃自治的性质。

资产阶级世界给自治区域对中央的关系确定了一种固定形式。我指的是北美、加拿大和瑞士。在这些国家里，中央政权是由各州(或各邦)全体居民所选出的全国议会和各州(或各邦)政府所选出的联邦院这两个平行的机关组成的。这样就形成了立法滞缓、扼杀任何革命事业的两院制。

我们反对在国内实行这种政权建设制度。我们反对它，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根本否定这种两院制，而且还因为实际考虑到目前的局势。问题在于：在目前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已被打垮，但还没有被镇压下去；由于资产阶级的阴谋诡计而加深了的经济破坏和粮食恐慌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旧世界已经被摧毁,但是社会主义新世界还没有建成，——在这个时候，国家必须有一个能够彻底镇压社会主义的敌人，组织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全俄政权。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有一个通常所说的城乡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时候，如果建立同中央政权平行的地方的和区域的自主政权机关，那实际上就会使任何政权瓦解而倒退到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必须使中央政权掌握全国一切重要

职权，而把纯系地方性的主要是行政、政治、文化方面的职权交给地方机关。诸如学校、法院、行政管理、必要的政治措施、实施适合于民族生活条件的一般法令的方式和方法，——这一切都要用当地居民懂得的本族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公认的由区域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区域组织这一类型是这种自治最适当的形式。

这就是目前过渡时期所必需的那种自治，所以必需，是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以及俄国各◇82◇民族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一帝国主义最后堡垒所进行的共同斗争决定的。

这一切十分明白地确定了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会议将听取各地的报告，以便了解本区域各族劳动群众的一般要求。其次，会议将制定初步的地域概图，这个地域的劳动人民将参加区域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的选举，并且享有选举权的不仅是本自治地区的，而且还有邻近地区的组成苏维埃的劳动群众。最后，会议将选出负责召开本区域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自治问题的解决，自治权限的确定和区域境界的最后划定等工作交给成立大会。

这个会议的任务就是如此。

当会议开幕之际，我谨表示深信：会议一定能胜任地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

二　闭 幕 词

（五月十六日）

请允许我代表中央苏维埃政权向你们声明：人民委员会一向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援助东部各民族首先是受践踏最甚的东部伊斯兰教民族的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解放运动是自己神圣的职责。我国革命的全部性质，苏维埃政权的本质，整个国际环境，乃至俄国在帝国主义的欧洲和被压迫的亚洲之间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无疑地决定苏维埃政

权应该采取兄弟般支持东部各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83◇政策。

在现有一切压迫形式中，民族压迫是最精巧最危险的一种形式。所以精巧，是因为它便于掩盖资产阶级的强盗面目。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挑起民族冲突来巧妙地使资产阶级免受打击。过去欧洲的掠夺者所以能够把工人抛到世界屠场上去互相残杀，至今他们所以还能够使这种屠杀继续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麻醉欧洲工人头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没有祛竭。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但是不谈民族问题，忽视和否定民族问题，像我们某些同志所做的那样，这还不就是摧毁民族主义。远远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只能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利。要摧毁民族主义，首先必须提出并解决民族问题。但是要公开地、用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把它放到苏维埃的轨道上来，使它完完全全服从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击落资产阶级手中最后的精神武器。现在建立鞑靼—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就是实际解决对我国整个革命很重要的这一总问题。让这个自治共和国成为给东部伊斯兰教民族照耀摆脱压迫道路的活的灯塔吧！

请允许我宣布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闭幕，并祝你们在组织你们自治共和国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和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九十六号和第一〇一号◇84◇

又 一 个 谣 言

“我们的时代报”〔17〕(晚刊)第九十七号根据该报记者的报道发表了德国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无线电报，电报原文如下：“布尔什维克从土尔克斯坦和阿斯特拉罕得到有力增援之后，已转入进攻；伊斯兰教徒虽英勇抵抗，但布尔什维克仍占领了巴库城。”

现在我公开声明：这个挑拨性的无线电报与事实根本不符。

巴库从革命一开始就承认而且现在还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没有而且也不会向巴库举行任何进攻。只是有过一小撮鞑靼和俄罗斯的地主和将军的冒险进攻，由于伊斯兰教的和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十分憎恨他们，这一进攻遭到了惨败。布尔什维克没有而且也不会同伊斯兰教徒进行任何斗争。巴库苏维埃政权过去是现在还是巴库和巴库区各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政权，首先是伊斯兰教民族的政权。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九十七号◇85◇

高 加 索 的 局 势

一 南 高 加 索

南高加索的局势愈来愈严重。议会在四月二十二日宣布南高加索独立,这本来应该能使梯弗里斯“政府”获得行动自由,但是实际上却把它投入国际强盗们的陷阱。在巴土姆举行的所谓“和平谈判”〔18〕的结局如何，最近的将来就会见分晓。有一点是毋庸怀疑的：梯弗里斯孟什维克及其政府脱离俄国革命而**独立**必然会使他们奴隶似地**依附**于土耳其和德国“文明”强盗。这将是执政的梯弗里斯孟什维克同土德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革命的联盟。孟什维克契恒凯里将扮演未来高加索的果卢鲍维奇的角色……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先生们，这不是大有教益的借镜吗？……

议员卡尔契强自梯弗里斯报道说：

“梯弗里斯在骚动中，阿尔明尼亚人退出了内阁，工人和农民在街头组织反对政府宣布南高加索独立的游行示威。库泰依斯、霍尼、列契胡姆、哥里、杜舍特等地都在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对独立问题举行全民投票。”◇86◇

整个阿尔明尼亚都在抗议冒牌梯弗里斯“政府”的篡夺行为，要求议会议员滚蛋。而伊斯兰教人民的中心，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巴库把南高加索整个东部(从连柯兰和库巴到叶里萨维特波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手持武器捍卫着竭尽全力要同苏维埃俄国保持联系的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权利。至于黑海沿岸的英雄的阿布哈兹〔19〕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里的人民一致起来反抗梯弗里斯“政府”的黑暗

匪徒，手持武器保卫苏胡姆，使它免受他们侵犯。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艾什巴写信告诉我们说：“整个阿布哈兹，不分老少都起来反抗来自南方的两千名侵略匪徒，保卫苏胡姆以南二十俄里的苏胡姆接近地，已经有八天了。”根据若干情报来看，南高加索部队的进攻获得海上武装运输舰队和驱逐舰队的支持。而依照布列斯特和约和德国对布列斯特和约的解释，我们不但不应当从海上进攻来保卫苏胡姆，而且甚至没有防守的权利。这就是德国“和平使者”给南高加索侵略者的实际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不难了解，苏胡姆的命运几乎已经被决定了。南高加索居民反对梯弗里斯“政府”。南高加索居民反对从俄国分离出去。南高加索的工人和农民不顾一小撮议员的反对而主张全民 投票，因为谁也没有，确实谁也没有授权议会使南高加索同俄国分离。情况就是这样。

无怪乎孟什维克中最有良心的饶尔丹尼亚、策烈铁里，甚至(甚至！)格格奇柯利都洗手不干， 把这种肮脏勾当交给孟什维克中最卑鄙龌龊的人了。

我们得到梯弗里斯的消息说：在阿尔明尼亚人放弃卡尔斯的时候，卡尔斯附近的土耳其军长声◇87◇称，他认为派土耳其军队去占领巴库并拯救巴库区的伊斯兰教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南高加索政府不能很快去做这件事的话；与此同时，“在维希勃巴夏给南高加索政府主席的信中，也暗示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有文件来证实这些消息，但是有一点是毋庸怀疑的：如果土耳其“救星”真的向巴库推进，那他们将遭到广大居民首先是伊斯兰教工人和农民的坚强抵抗。，

不用说，那时苏维埃政权将以全力捍卫南高加索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反对掠夺性的侵犯。

二 北 高 加 索

还在一九一七年，北高加索一小撮退职将军如菲里莫诺夫、卡拉乌洛夫、切尔莫也夫、巴马托夫之流就宣布自己为山民联盟，自称是从黑海到里海一带的北高加索政府，并且偷偷地准备同卡列金一起举行发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苏维埃政权在俄国中部获得胜利以后，这个所谓“政府”曾经向英法军事使团献媚，暗地破坏俄德战线的停战。一九一八年初，在卡列金的冒险行动失败以后，这个莫名其妙的“政府”就从政治地平线上消失，专门去抢劫列车和骚扰域乡和平居民了。到今年春天，大家都把这个“政府”忘了，因为在北高加索的库班区域和捷列克区域，真正人民的代表苏维埃已经◇88◇巩固起来，它们已经把北高加索的一切部落和民族的广大阶层团结在自己周围了。卡巴尔达人和哥萨克、沃舍梯人和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像一个巨环团结在**捷列克**代表苏维埃的周围。**库班**区域的彻岑人和英谷什人、哥萨克和乌克兰人、工人和农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织了许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所有这些部落和民族的广大劳动阶层，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都高声宣布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切不能不迫使切尔莫也夫之流和巴马托夫之流的冒牌“政府”悄悄地退出政治舞台。大家都认为这个奇怪的“政府”是永远被埋葬了。不错，巴马托夫之流的密友，所谓达格斯坦的教长在三月间还曾组织抢劫彼得罗夫斯克和杰尔宾特附近的铁路线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但是到四月中旬教长的冒险行动就被巴库工人的苏维埃部队和达格斯坦人自己肃清了，教长及其俄国军官随员们被他们**赶到**达格斯坦山里去了。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不会从“阴世”招引鬼魂来实现其阳世的目的，那它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不过一星期以前，我们收到由还了魂的切尔莫也夫和巴马托夫签署的一篇正式声明，宣布从黑海到里海

一带的(不多不少！)独立的(不要笑！)北高加索国家成立了。

这个冒牌政府宣布：“高加索山民联盟决定脱离俄国，成立独立国家。”

“新国家的疆域，北部的境界将与旧俄帝国时代的达格斯坦、捷列克、斯塔夫罗坡里、库班和黑海各区域各省份的境界相同，西部以黑海为界，东部以里海为界，南部的确切边界将同南高加索政府协商确定。”◇89◇

这样，南高加索“政府”同土耳其—德国“解放者”建立“关系”，而北高加索“政府”则同南高加索“政府”建立“关系”。事情是很清楚的。北高加索的冒险家们既然已经对英法失望，目前便指望英法的敌人了。而由于土耳其—德国人的侵略野心漫无止境，应当认为北高加索冒险家们同土耳其—德国“解放者”“达成协议”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毫不怀疑，土耳其—德国一定会保证他们忠于德国条约，决意维持友好关系等等。但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相信行动，而不是言论，而这些先生们的行动已经很明确，所以，苏维埃政权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来保卫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免遭可能发生的掠夺性侵犯。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二日
“真理报”第100号◇90◇

关于高加索的局势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通报）

星期日各报登载了英国人占领巴库和阿普舍朗半岛的消息。消息称：

“据敖德萨报纸载巴库来人谈：从美索不达米亚取道波斯侵入高加索的英国军队已经在三周前乘卡车入城。这支队伍人数很多，看样子是前锋。据闻英国人似乎在同科尔尼洛夫部队建立联系。另一报纸报道，英国人已经占领阿普舍朗半鸟和巴库，正从那里向梯弗里斯、亚历山大罗波尔、萨利卡梅什、卡尔斯、埃尔斯伦方面推进。五月二十四日。”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对此必须声明，这个挑拨性的而且来源极为可疑的消息，与事实根本不符。没有任何英国部队在巴库出现，而且也不可能在那里出现，这至少是因为整个巴库省和整个南高加索东部都有苏维埃军队防守，他们准备一有号召就跟不管穿什么样服装的外来势力作战。据特派专员邵武勉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如果不算最近袭击阿德日卡布尔而被苏维埃军队打退向西远扬的鞑靼地主，那末巴库和巴库区目前还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

至于南高加索南部的局势，那里倒确实存在着威胁，但是不是英国人方面的威胁,而是土耳其人方面的威胁,因为土耳其人正沿着亚历山大罗波尔—德茹尔法铁路线向塔夫利兹突进,“以便回击波◇91◇斯北部的英国人”。

关于这件事，南高加索议会议员卡尔契强在五月二十日报告说：

“五月十三日，土耳其在巴土姆提出允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亚历山大罗波尔—德茹尔法铁路线前往波斯的要求，理由是英国人正从穆苏

尔方面进攻，土耳其人必须在最短期间占领波斯北部。土耳其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要求。十五日晨开始炮轰亚历山大罗波尔。遭到突然袭击的我军未能阻住敌人的进攻，十六日放弃了亚历山大罗波尔。十七日土耳其人要求保证他们的军队自由开往德茹尔法，答应不触犯居民。否则，他们威胁说，要用武力强行过境。鉴于亚历山大罗波尔的退却已经使军队混乱不堪，如欲起而抵抗，苏尔曼林和埃契米阿德津两县全体居民就要遭到可怕的灾难，因此，我们不得已同意了土耳其的要求。亚历山大罗波尔县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聚集在班巴克—洛利地区。苏尔曼林县的居民也是如此。今天得到消息，阿哈尔卡拉基县居民已经离开当地向查尔卡方面移动。在巴土姆的代表团对最后通牒提出了抗议，但是并没有使它成为开战的理由，并决定继续进行谈判。”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通报这一切情况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来自敖德萨的伪造消息的目的显然在于掩盖破坏一切法权的、旨在占领波斯铁路线的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载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〇四号◇92◇

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

(事实和诡计)

乌克兰代表团在基辅和平会议〔20〕第一次会议上声明，他们手头有顿河、北高加索及其他区域的“政府”宣布脱离俄国而同乌克兰—德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声明书。乌克兰代表团团长舍卢兴先生说：“我们不反对和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谈判，可是我们想知道俄罗斯联邦的权力究竟及于哪些区域，因为我手头有许多政府(顿河、北高加索等地)不愿意再做俄国成员的声明书。”

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不但不反对乌克兰人的这种行动，相反地，在一连串正式声明中确认上述半合法“政府”的要求，抓住这些要求作为合法的借口，以达到使又一批领土实行“自决”(即被侵占)的目的……

但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政府”是什么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充当这些“政府”的庇护者和整个这一运动的正式发起人的是由于……的(决不是人民的)恩典而在昨天刚刚出世的乌克兰统领政府。乌克兰代表团究竟有什么权利敢向苏维埃政权这样讲话呢？苏维埃政权是由俄罗斯联邦数千万居民自由选出的，并且把顿河、库班、黑海、◇93◇捷列克等区域数百万居民选出的各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区域苏维埃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现在的乌克兰政府不但不是由人民选出的，并且连即使像上层选出的兰达格这类伪造的资格议会都没有。这样的政府能有什么威信呢？此外，可以确信，假如这次和平会议不是在基辅而是在中立区某地举行，那末不久以前被推翻的乌克兰拉达一定会出面声明：同统领政府订立的条约，不能约

束不承认这个政府的乌克兰人民。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在这种情况下，谁的代表权可以认为更有效，是统领政府的还是乌克兰拉达的？(二)目前这个极其重视一切“声明”的乌克兰代表团，那时能作出什么声明来为自己辩护呢？……

第二、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德国既然支持乌克兰代表团的声明并极力用“自决”讨好顿河和北高加索的冒险家“政府”，但是它对于波兰的波兹南，丹麦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法国的亚尔萨斯—洛林的自决，却一字不提。同上述地区的丹麦人、波兰人和法国人的群众性抗议比较起来，俄国南部这些匆促焙制出来的而且谁也不承认的“政府”的冒险声明是毫无份量的，毫无价值的，毫不体面的……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但是这一切都是“小事”。现在来谈谈主要的。

那末，俄国南部的这些神秘的“政府”是怎样产生的呢？

顿河“政府”在其“照会”中说：“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签订了成立新的联邦国家即东南联盟的条约，加入这个联盟的有顿河、库班和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军队居◇94◇住地区的居民，北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的山民以及俄国东南部的自由的各族人民。”

我们在五月十六日收到的北高加索“政府”代表切尔莫也夫和巴马托夫的无线电报，说的话几乎相同：

“高加索各族人民依法选举了国民会议，国民会议曾经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会议，宣告成立高加索山民联盟”，而且“高加索山民联盟决定脱离俄国，成立独立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北部的境界将与旧俄帝国时代的达格斯坦、捷列克、斯塔夫罗坡里、库班和黑海各区域各省份的境界相同，西部以黑海为界,东部以里海为界”。

这样看来，原来在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前夜，和这个政府有联系的一小撮冒险家就已经在弗拉基高加索集会，宣布自

己是“全权的”政府，宣布俄国南部同俄国脱离关系，并且他们竟没有费一点心去征求居民的同意。当然，在像俄国这样自由的国家里，不禁止任何人沉溺于分离主义的幻想，而且不难理解，苏维埃政权不能并且也不应当理会那些同俄国南部各族人民毫无关系的幻想家的冒险声明。我们相信，假如德国赋予公民以目前俄国公民所享有的这种自由，那末波兹南、亚尔萨斯—洛林、波兰、库尔兰、爱斯兰等地就会普遍建立起民族政府，这些政府比那些被自己的人民赶跑而现在亡命在外的鲍加也夫斯基之流和克拉斯诺夫之流、巴马托夫之流和切尔莫也夫之流……有充分得多的理由称为政府。

俄国南部那些神秘的“政府”产生的情形就是这样。◇95◇

顿河“政府”的“照会”和切尔莫也夫的无线电报都是讲过去，讲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讲退职将军们的避难所弗拉基高加索。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在这期间，顿河、库班—黑海和捷列克的区域人民苏维埃成立了，他们把数百万居民，把哥萨克和外乡人、阿布哈兹人和俄罗斯人、彻岑人和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和卡巴尔达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尔明尼亚人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些区域的居民早已承认苏维埃政权，广泛行使着赋予他们的自决权。而从前卡拉乌洛夫之流和鲍加也夫斯基之流、切尔莫也夫之流和巴马托夫之流的官邸所在地弗拉基高加索，则早已宣布为捷列克人民苏维埃的所在地了。试问，在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面前，老朽的将军们和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夏季发表的冒险声明能有什么意义呢？九月和十月，俄国还存在着克伦斯基政府，当时它气焰万丈地迫害被赶入地下而现在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既然在乌克兰代表团和德国政府看来，一九一七年的九月和十月具有那样神圣的意义，为什么他们不邀请那时还健在的克伦斯基政府的余孽来参加和平会议，就像他们邀请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同样健在的切尔莫也夫之流和卡拉乌洛夫之流“政府”的余孽那样呢？

其次,究竟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九月比一九一八年四月好些呢?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已经准备好代表团和苏维埃政权进行谈判的乌克兰拉达顷刻之间就被“根据”德国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解释”推翻了……

最后，为什么被哥萨克所驱逐的、一九一七年末在加特契纳附近被苏维埃军队俘获后来因为起◇96◇誓不再造反而被苏维埃政权释放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的声明，被认为是“极重要的政治文件”，而已经把数十万俄罗斯和鞑靼居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曾经三次广播，宣布克里木同俄罗斯联邦的关系不可分离的克里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却被认为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呢？

为什么被哥萨克赶走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受着乌克兰—德国统治者的特别保护，而由居民自由选出的克里木人民委员会却遭到野蛮枪杀呢？……

显然，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声明”是否真实，也不在于有没有拥护这些“声明”的群众。问题更不在于官方强盗们如何粗暴地歪曲地理解“自决”。问题只是在于：这些“声明”对乌克兰和德国喜欢玩弄帝国主义诡计的人们非常有利，因为它们巧妙地掩盖了他们侵占和奴役新的领土的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顿河政府的许多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代表团同样“合法的”代表团中，乌克兰—德国人方面只选择了克拉斯诺夫的代表团，因为其余一切代表团所遵循的不是德国的“方针”。而克拉斯诺夫—鲍加也夫斯基“政府”的空幻和虚假又是这样明显，以至连克拉斯诺夫所任命的几个部长(国民教育部部长帕拉莫诺夫和农业部部长谢明诺夫)都以“克拉斯诺夫将军是在他们不在场时任命他们做部长的”为理由正式拒绝接受委任。但是，这显然一点也没有使乌克兰—德国自决论者感到难堪，因为克拉斯诺夫作为一个帷幕是合乎他们的心意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还在一月里就已经魂归九天的所谓东南联盟，

五月间突然在乌克兰某地或者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复活了，并且北高加索各族人民还不全都知道，早已被他们埋葬了的这些“政◇97◇府”或许在君士坦丁堡，或许在基辅继续秘密“存在着”，打算在那里为他们拟定法律。显然，这种笨拙的诡计也没有使乌克兰—德国自决论者感到难堪，因为这使他们有利可图。

这就是渴望掌权的俄国南部的冒险家和政治诡计制造者的“事业”。

自决论者先生们盗用俄国南部各族人民的名义掩饰自己，那末俄国南部各族人民自己对独立问题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从顿河谈起。从二月起，顿河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就已经存在，它把这个区域的绝大多数居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谁都知道，四月召开的有七百多代表参加的区域代表大会曾经响亮地确认了同俄国的不可分离的关系，顿河共和国是俄国的一个自治部分。

关于新焙制出来的克拉斯诺夫—鲍加也夫斯基“政府”的野心，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五月二十八日的决议中说道：

“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知人民委员会和基辅和平会议，顿河区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以外，再没有别的政权。任何其他已经宣布或行将宣布成立的政府，都是国事犯，将以叛国罪交付人民法院惩办。现在我们获悉，有代表团以顿河政府名义在和平会议上发言。我们以国家政权的资格向人民委员会和基辅和平会议声明，不得让任何没有取得顿河共和国苏维埃政权的证书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如果有这样的代表，我们宣布他们是不合法的和冒充的，他们将被当做国事犯交付法院惩办。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和平会议驱逐冒充的“顿河政◇98◇府”代表团，因为它是不合法的，不能让它进行和平谈判。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弗·柯瓦寥夫**

秘书**弗·普日列夫**

（五月二十八日通过）于察里津”

现在来谈谈**库班**。库班—黑海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把所辖区域所有一切分区和专区的百分之九十的居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今年四月间在哥萨克亚·波卢杨主持下举行的、有彻岑人和英谷什人参加的人数众多的库班—黑海区域代表大会，郑重地确认该区域同俄国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同样郑重地宣布冒险爱好者即一切菲里莫诺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为非法，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此外，从苏胡姆到巴泰斯克，有数万库班人手执武器挺身保卫苏维埃俄国，这也十分有力地表明了库班和黑海两地人民的感情和心意。至于克拉斯诺夫之流和菲里莫诺夫之流的善人们所急切盼望其覆没的舰队，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谈谈**捷列克区域**。谁都知道，在捷列克有捷列克区域人民苏维埃，它把全部或几乎全部(百分之九十五)村落乡镇(城市更不用谈了)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在今年一月举行的第一次区域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代表都毫无例外地拥护苏维埃政权，赞成同俄国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四月举行的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更广泛、人数更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郑重地确认了同俄国的关系，宣布该区域◇99◇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目前举行的第三次区域代表大会更向前进一步，从言论转到行动，号召公民武装起来保卫捷列克(而且不仅是捷列克)，防御不速之客的侵犯。所谓顿河政府的所谓照会大谈“东南部的自由的各族人民”，说他们似乎渴望同俄国分离。我们认为事实是这些“声明”的最好的反驳，就让事实来说明吧。

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捷列克人民苏维埃的决议。

“捷列克人民苏维埃从电报中得知，似乎有北高加索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宣布北高加索独立，并且已经照会土耳其帝国政府及其他国家。

由彻岑人、卡巴尔达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哥萨克和外乡人

的各代表组所组成的捷列克人民苏维埃断言：捷列克边区各族人民从来没有为上述目的派出任何代表到任何地方去，目前在君士坦丁堡的个别人物冒充捷列克边区各族人民的代表，假借这些民族人民的名义进行活动，这不外乎是他们的一种冒充行为和冒险行为。

捷列克人民苏维埃对土耳其政府的政治目光的短浅和幼稚表示惊异，因为它竟被一些骗子哄骗了。

由上述各代表组组成的捷列克人民苏维埃声明：捷列克边区各族人民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捷列克人民苏维埃抗议南高加索政府把北高加索拉入宣布南高加索独立的行为。”（见捷列◇100◇克人民苏维埃机关报“人民政权报”）

（本决议一致通过。五月九日。）

现在让遭到僭窃者及其庇护者诽谤的彻岑人和英谷什人来说话吧。下面是团结了全体或几乎全体英谷什人和彻岑人的这两个民族的代表组的决议。

“捷列克人民苏维埃彻岑—英谷什代表组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了北高加索宣布独立的消息，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宣布北高加索独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应当让全体有关居民知道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彻岑—英谷什代表组断定：彻岑—英谷什人民没有派遣任何代表去和特拉布松的奥托曼代表团或君士坦丁堡的奥托曼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在代表彻岑—英谷什人民意志的任何机关里和任何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独立问题。

因此，彻岑—英谷什代表组认为：不是由人民选出而敢于假借人民名义说话的那些人，是冒充分子，是人民公敌。

彻岑—英谷什代表组声明：拯救北高加索全体山民和由革命争得的各项自由的唯一办法是同俄国革命民主派紧密团结起来。

他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因为生来热爱自由，而且还因为最近数

十年来的经济关系已经把北高加索和俄国中部紧紧地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01◇

（五月九日通过。见捷列克人民苏维埃机关报“人民政权报”。）

再看英谷什人和彻岑人的发言人舍利波夫同志在捷列克人民苏维埃会议上的热情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十分明确，足以杜绝对达格斯坦人的种种非难。

“由于伟大的俄国革命，我们获得了数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那种美好的自由。现在我们得到了自决权的保障，人民永远不会把这种权利让给任何人。目前，地主、王公、挑拨者、奸细以及所有那些沙米尔曾经和他们进行了五十年殊死斗争的人们正在谈论北高加索的独立。这些人民公敌几次企图宣告高加索独立，并宣布它是教长的辖区。但是我肯定地说，沙米尔砍过这些王公祖先的脑袋，如果今天他活着，他还会这样做。我们代表组代表英谷什人民和彻岑人民在紧急会议上以人所共知的决议表达了我们对宣布北高加索独立问题的看法。”（同上，摘自“人民政权报”。）

事实就是这样。

德国、乌克兰和土耳其的自决论者是否知道这一切呢？当然知道！因为俄国南部各区域苏维埃的行动是完全公开的，是大家看得到的，这些先生们的走狗阅读我们的报纸又十分仔细，决不致看漏尽人皆知的事实。

既然这样，上述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所支持的乌克兰代表团关于那些神秘的“政府”的声明的目的究竟何在呢？◇102◇

目的只有一个：利用这些虚有其名的“政府”作为帷幕来侵占和奴役新的领土。德国人曾经利用乌克兰拉达做掩护，“根据布列斯特条约”（哦，当然啦！）向前推进并占领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作为一个帷幕，作为一个掩盖物，看来现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是德

国人需要继续推进。由此产生了对新的掩盖物、新的帷幕的需求。因为有需求就有供应，于是克拉斯诺夫之流和鲍加也夫斯基之流、切尔莫也夫之流和巴马托夫之流就马上出来自愿效劳。因此，毋庸置疑，由德国人指挥和豢养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和鲍加也夫斯基分子最近将向俄国进军以“解放”顿河区域，而德国人也会竭力再次宣誓恪守布列斯特条约。库班、捷列克等等区域的情况也是这样。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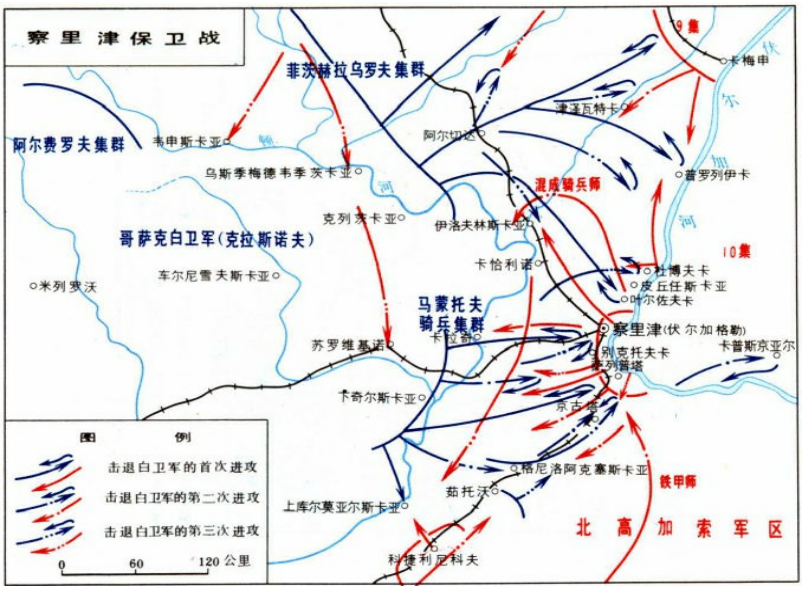
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动员所有一切力量来抗击侵略者和奴役者，那末它就会把自己活活埋葬。

但是，苏维埃政权是会做到这一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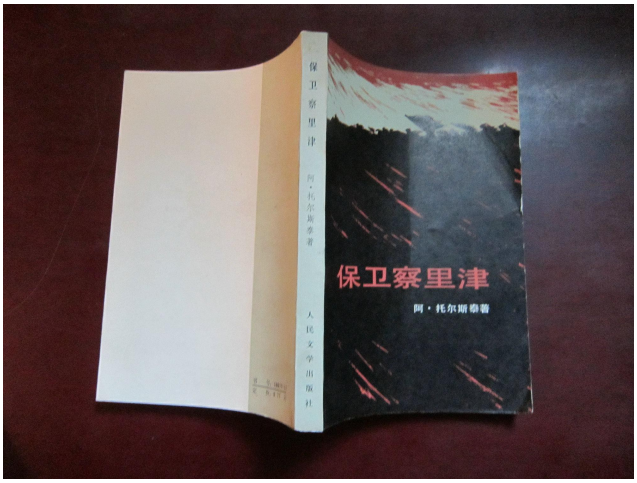
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
“真理报”第一〇八号◇103◇

察里津不能丢！（电影镜头）



阿·托尔斯泰著《保卫察里津》　　察里津保卫战态势图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我六日抵达察里津[21]。尽管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紊乱，但是还是可能整顿好的。

在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被苏维埃取消，因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在察里津，现在已经做到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在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也应做到这一点，否则全部粮食都将从这些投机孔道流走。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出面要求这些苏维埃禁止投机活动。

铁路运输因许多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都热心过问而被完全破坏了。我不得不派专员去主持，他们不顾各委员会的抗议，已经着手整顿。专员们在各地发现许多机车，各委员会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些机车。根据调查，在察里津—波沃利诺—巴拉朔夫—柯兹洛夫—梁赞—莫斯科线上，一天可以行驶八次以上直达列车。目前在察里津忙着调集列车。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宣布“粮食周”，把近百万普特粮食一次运往莫斯科，由铁路员工专门押运，事前会通知。

由于下新城不放出轮船(大概因捷克斯洛伐克人之故)，水路运输陷于停滞。请下令立即让轮船开来察里津。◇104◇

听说，在库班、斯塔夫罗坡里有十分可靠的采购经纪人，他们在南部收购过粮食。从基兹里亚尔通往海岸的线路已经在铺设。哈萨夫尤尔特—彼得罗夫斯克线路还没有恢复。请派施略普尼柯夫、建筑工程师、能干的技工以及机车乘务组来。

我已经派信使去巴库，日内我就动身南下。商品交换特派员札依采夫因为盗窃公家货物，投机倒把，今天将要逮捕。请转告施米特不

要再派坏蛋来。让柯鲍捷夫下令，要沃龙涅什的五人委员会〔22〕即使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别阻挠我的特派员。

据悉巴泰斯克被德国人占领了。

人民委员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六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七期◇105◇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

列宁同志：

急赴前线，只写要事。

（一）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二）察里津以南有很多粮食装车待运。等铁路打通，我们就用直达列车把粮食运给你们。

（三）你的通知已经收到〔23〕。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

（四）已经派信使持信去巴库〔24〕。

（五）土尔克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特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106◇

由于各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很差，必须派一掌握大权的人常驻当地，以便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如果为此目的任命什么人（不论是谁）来担任，请以直达电报告我，委任状也请由直达电报拍发，否则有重演牟尔曼斯克事件〔25〕的危险。

送上关于土尔克斯坦的电码纸条。

暂写至此。

你的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于察里津

部分曾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三〇一号◇107◇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列宁同志：

只说几句话。

(一)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坡里)，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托洛茨基现在的行径正和安东诺夫某一时期的行径一样。请让他牢牢记住，不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不应该随意委任，否则就会给苏维埃政权丢脸。

(二)如果不给我们飞机和飞行员、装甲汽车、六吋口径炮，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铁路也将长期丧失。

(三)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有一个不受各军用列车、各集团军司令员等等阻挠的健全的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使军人帮助粮食工作人员。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108◇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约·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刊印◇109◇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

南方情况严重。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员的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供应工作已经整顿就绪，成立了作战部，与战线各地段建立了联系，撤销了旧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命令，在这以后才向卡拉奇举行了进攻，并向南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进攻。实行进攻是希望保障米罗诺夫和基克维泽的北部地段(包括波沃利诺地段)不被击破。原来这些地段是最薄弱最不稳固的。你已经知道,米罗诺夫和其他等人已经向东北撤退，哥萨克已经占领从里波克到阿列克西柯夫的全部铁路线，个别哥萨克游击队已经调到伏尔加河方面并数次企图切断卡梅申和察里津间伏尔加河的交通。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弹药，罗斯托夫战线和整个卡尔宁部队已经不能坚持，放弃了梯霍列茨卡雅和托尔果瓦亚，现在大概正处在完全瓦解过程中(我说“大概”，是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得到关于卡尔宁部队的确切消息)。

至于基兹里亚尔、布良斯柯叶和巴库所处的危急情况，那就更不用说了。亲英派的方针已经彻底◇110◇破产，但是那边战线的情况还很不妙。基兹里亚尔、普罗赫拉德纳亚、诺沃高凯夫斯柯叶、斯塔夫罗坡里都已经落入暴动的哥萨克之手。只有布良斯柯叶、彼得罗夫斯克、矿水城、弗拉基高加索和皮亚齐果尔斯克，似乎还有叶加特林诺达尔，目前还坚守着。

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同南方,同南方产粮区的交通被切断了，

而联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绝，或几乎隔绝了。

因此，我们决定停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进攻，采取守势，把战斗部队调离察里津战线各地段，组成一支六千名士兵的北上突击队，沿顿河左岸直向霍泊尔河进发。这一措施的目的是扫清察里津—波沃利诺一线，进入敌人后方，扰乱并击退敌人。我们有一切根据预期这一计划在最短期间实现。

造成上述不利情况的原因是：

(一)前线的士兵即“富裕农夫”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在十月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而现在却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从心底里仇恨粮食垄断、固定价格、征集和反投机斗争)；

(二)米罗诺夫军队是由哥萨克组成的(自命为苏维埃部队的哥萨克部队，不能也不愿意同哥萨克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哥萨克整团整团地投到米罗诺夫方面来是为了取得武器，就地了解我们部队的分布状况，然后再把整团整团的人带到克拉斯诺夫方面去；米罗诺夫曾经三次被哥萨克包围，因为他们知道米罗诺夫地段的全部底细，自然就把它彻底击破了)；◇111◇

(三)基克维泽部队的编制是以支队为单位的，因而各队之间不能相互联络和配合作战；

(四)西维尔斯部队因上述原因而陷于孤立，失去了左翼的支持。

完全消灭了队伍的混乱现象，及时撤除了所谓专家(一部分极力拥护哥萨克，一部分极力拥护英法)，因而能使军队靠近自己并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这应当认为是察里津—加舜战线上好的一面。

同北高加索的交通中断以后，粮食情况已经陷于绝境。七百多节车厢停在北高加索，一百五十多万普特粮食已准备妥当，但是毫无办法把所有这些货物运走，因为不论铁路或海路都已经中断(基兹里亚尔、布良斯柯叶不在我们手里)。察里津、柯切尔尼柯沃、加舜等区粮食

不少，不过需要收割，但是区域特别粮委会〔26〕不会并且到今天还不会做这件事。必须收割庄稼，把干草压紧，运到一处，但是区域特别粮委会没有压机。必须组织大规模的粮食收割工作，但是区域特别粮委会的组织者是些废物。结果收购工作无法进行。

卡拉奇的攻克，使我们得到好几万普特粮食。我拨了十二辆卡车到卡拉奇，等一运到铁路线，就发往莫斯科。粮食收割工作好歹总算在进行。希望最近几天能弄到几万普特粮食，也运给你。这里牲畜过剩，但是干草极少；因为没有干草就不能运出，所以大批运送牲畜现在还不可能。最好至少建立一个罐头食品工厂、开办一个屠宰场等等。但是很可惜，暂时还找不到内行的创办人。我已经命令柯切尔尼柯沃的特派员组织大量腌肉的工作，工作已经开始，并有成绩；如果工作开展起来，那末冬季◇112◇就会有足够的肉食(单是一个柯切尔尼柯沃地区就聚集了四万头牛)。阿斯特拉罕的牲畜不比柯切尔尼柯沃少，但是地方粮食局什么也不干。农产品采购部的代表正在酣睡，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收购肉的。我已经派特派员查尔马也夫到那里去收购肉和鱼，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信息。

在粮食方面，萨拉托夫省和萨马拉省的希望要大得多，那里粮食很多，我想，雅库鲍夫的采粮队可以采办到五十万普特粮食，甚至更多。

总之，应当说，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复以前，对察里津区(在粮食方面)不能(特别)指望。

你的 **约·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一年

“列宁文集”第十八卷◇113◇

给弗·伊·列宁的信〔27〕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列宁同志！

南方和里海一带的保卫战正在进行。要守住这整个地域（这是能够守住的！），必须有几艘轻型雷击舰和两艘潜水舰（详情请问阿尔焦姆）。请求你打破一切障碍，使我们立即得到所要求的东西。如果要求能立即满足，那末巴库、土尔克斯坦、北高加索将（一定！）是我们的。

我们战线的情况很好。相信以后还会更好（哥萨克正在彻底瓦解）。

紧握我亲爱的和敬爱的伊里奇的手。

你的**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八年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114◇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得悉资产阶级的佣仆恶毒地行刺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镇压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以回答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

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察里津

载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革命士兵报”(察里津)第二十一号◇115◇

给人民委员会的电报

察里津地域苏维埃军队的进攻已经获胜：北面占领伊洛夫里亚车站；西面占领卡拉奇、里亚皮切夫、顿河大桥；南面占领拉什基、涅姆柯夫斯基、杰姆金。敌人被彻底击溃,退过顿河。察里津局势稳固。进攻在继续中。

人民委员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于察里津

载于一九三九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一期◇116◇

给察里津战线司令员
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请向为巩固工农政权而奋不顾身作战的察里津战线的英勇部队和一切革命军队转致我们的兄弟般的敬礼。请转告他们，苏维埃俄国正以敬佩的心情庆贺哈尔阡柯和柯尔帕柯夫的共产党员团队和革命团队、布拉特金的骑兵队、阿里雅比也夫的装甲火车队、伏尔加河舰队的英勇的功勋。

高举红旗，举着它无畏地前进，无情地根除地主、将军和富农反革命势力，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俄国是不可战胜的。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兼南方战线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于莫斯科

载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报”第二〇五号◇117◇

南　方　战　线

（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在返回南方战线前对本报记者发表了他对察里津战线情况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首先必须指出两个令人高兴的现象：第一、在战线的后方，从工人中提拔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但善于为苏维埃政权进行宣传鼓动，而且能根据新的共产主义原则建设国家；第二、出现了一批士兵出身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受过实际锻炼的军官——新的指挥人员，他们得到红军士兵的完全信任。

由于居民的情绪发生了转变，他们懂得必须拿起武器来反对反革命匪徒，因此动员工作进行得非常好。

我们各个部队纪律严格。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的关系再好也没有了。”

“军队的粮食问题怎样？”

“实在说，我们的军队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各战斗地段自己设立的供应站组成了一个配置适当的网，前线没有感到粮食缺乏。现在，一个红军战士一天的口粮是两磅面包，另加肉类、马铃◇118◇薯和白菜。

前线一切粮食供应事宜都由共和国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军粮委员会管理，就是这个委员会对前线各部队组织了正常供应。”

据**斯大林**同志说，前线的鼓动工作是用散发“革命士兵报”〔28〕、“斗争报”〔29〕、小册子、传单等等方法进行的。部队士气振奋，信心很高。

士兵没有一定的服装制式是我军在服装方面的一个大缺点。希望

尽快规定士兵的新的服装制式，并立即在前线实行。

据**斯大林**同志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关于授予个别红军战士奖章、授予整个部队奖旗来奖励他们的英勇行为的指令，具有莫大的意义。

在这个指令颁布以前，得到革命奖旗的部队就已经像狮子一样奋勇作战。

至于和我们对垒的敌军部队的情况，那末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是由所谓外乡人即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和志愿军官组成的。哥萨克不满百分之十。敌人的优越处是他们有机动骑兵，而我们的机动骑兵目前还处于初建状态。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的战斗部队日益团结一致，敌人则日趋完全瓦解。

载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报”第二〇五号◇119◇

事 物 的 逻 辑

（论孟什维克中央的“提纲”）

我们收到了一份名为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和决议”(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的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苏维埃政权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的活动，并确定了看来对孟什维克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远景。但是，文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却是那些推翻了孟什维主义在革命一年中全部实践的结论。对“提纲和决议”的分析留到以后再谈,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和读者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　关于十月革命

这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压下弄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的前线已经无力继续作战。可是，英帝国主义者(布卡南！)把我们国家愈缠愈紧，千方百计地不让它脱离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了里加〔30〕，又准备放弃彼得堡，只是为了证明战争和军事专政的必要。资◇120◇产阶级了解这一切并公开地走向军事专政，走向扑灭革命。

布尔什维克那时做些什么呢？

布尔什维克准备革命。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摆脱战争和经济破坏的唯一出路。他们认为，没有这种革命，就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把俄国从帝国主义魔爪中解放出来。他们召开了国家政权唯一继承者的苏维埃代表大会。

先进行革命，然后取得和平！

孟什维克那时做些什么呢？

他们宣布布尔什维克的“计谋”是“反革命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多余的，并且加以阻挠，说苏维埃本身是“老朽的木棚”，注定要拆毁。他们不要苏维埃“木棚”，而主张要“欧洲”式的“坚固大厦”——预备国会〔31〕。在预备国会里，他们和米留可夫一起拟定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计划。他们不同帝国主义决裂，而主张在巴黎召开盟国会议，作为摆脱战争的可能的出路。他们认为，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参加这个会议，以及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召开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之流和海德门之流的代表大会的可疑行动，是“彻底的和平政策”。

从那时起已经一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扫除了国内外帝国主义者的狡猾的机器。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俄国说来已经成了回忆。俄国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它正在实行并希望以后也实行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现在谁都明白，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就不能脱出帝国主义◇121◇战争的绝境，农民就不能得到土地，工人就不能管理工厂。

而**现在**孟什维克,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又说些什么呢？请听：

“一九一七年十月实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因为它割断了劳动群众同各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联系，表现了劳动群众使革命方向完全服从于他们的利益的期望，没有这种革命，就不可能使俄国摆脱盟国帝国主义的压制，就不可能实行彻底的和平政策，就不可能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就不可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由国家调整全部经济生活，因为这个革命阶段还有使俄国革命对世界事变进程的影响更加扩大的趋势。”（见“提纲和决议”）

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现在就是这样说的。

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是事实。原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没有这种革命，就不可能使俄国摆脱盟国帝国主义的

压制”，“就不可能实行彻底的和平政策”，“就不可能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就不可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由国家调整全部经济生活”。

但是，这不就是早在一年前布尔什维克反复说过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那么疯狂地反对过的那些话吗！

是的，就是那些话。

生活能教导和改造哪怕是最不可救药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生活是万能的，不管怎样，它总会占上风……◇122◇

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大约十个月以前的事。当时立宪会议召开了。被彻底击溃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重整旗鼓，得意洋洋，预言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国外帝国主义(盟国)的报刊向立宪会议致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举行“非正式”会议，拟定把政权从苏维埃手中交给“俄罗斯大地的主人”——立宪会议的计划。恢复“诚意联合”和消灭布尔什维克的“错误”的阴影在空中飘荡。

布尔什维克那时做些什么呢？

他们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作。他们认为，“诚意联合”及其机关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宪会议是历史注定要灭亡的；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已经产生了新的力量——无产阶级政权，新的政体——苏维埃共和国。在一九一七年初，立宪会议的口号是进步的，所以布尔什维克拥护这个口号。在一九一七年末，十月革命以后，立宪会议的口号就是反动的了，因为它不再适合于国内互相斗争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对比关系了。布尔什维克认为，在欧洲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在俄国进行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只可能有两种政权：采取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采取军

事专政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任何寻找中间形式和恢复立宪会议的企图，都必然会导向恢复旧制度，导向反动，导向消灭十月的成果。布尔什维克深信，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123◇级民主共和国是已经过去的革命阶段……

从那时起已经十个月了。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了。国内农民甚至没有感觉到它的解散，工人兴高采烈地欢迎它的解散。一部分“立宪会议”的拥护者跑到乌克兰，请求德帝国主义者帮助他们进行反苏维埃的斗争。另一部分“立宪会议”的拥护者跑到高加索，在土德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中得到安慰。还有一部分“立宪会议”的拥护者跑到萨马拉，和英法帝国主义者一起同俄国工人和农民作战。这样，立宪会议的口号就变成了吸引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的手段和掩护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进行反苏维埃斗争的旗帜。

孟什维克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始终拥护已经变成反革命的立宪会议口号。

而**现在**孟什维克，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又说些什么呢？请听：

它“摈弃同敌视民主派的各阶级进行任何政治合作，拒绝参加一切即使是用民主旗帜掩盖的组织政府的勾当，因为这些勾当是以民主派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政权或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依赖为基础的”（见“提纲”）。

又说：

“依靠着城市非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群众的革命民主派，想以对苏维埃政府和对拥护苏维埃政府的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来恢复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企图，由于国际局势的性质和俄国民◇124◇主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过去和现在都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部署，这种部署破坏争取恢复民主制度的斗争的最革命的意义，会直接威胁到基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无论如何要同各资本主义阶级妥协并利用外国武器来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意图，会使革命民主派的政策丧失任

何独立性，使它变成这些阶级和各种帝国主义同盟的工具。”（见“提纲和决议”）

简单地说：坚决而无条件地“摈弃”联合政权，承认争取恢复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的斗争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会直接威胁到基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

结论只有一个：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唯一可能的革命政权。

但是，这不就是布尔什维克早已反复说过而孟什维克昨天还反对的那些话吗！

是的，就是那些话。

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别的逻辑(孟什维克的逻辑也不例外)都更加有力，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　小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

总之：

事实是：孟什维克中央在同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进行了一年的斗争以后，不得不承认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必要性”。◇125◇

事实是：孟什维克中央在为立宪会议和“诚意联合”进行了长期斗争以后，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是终究不得不承认“全民族”联合政权是不适宜的，争取“恢复民主制度”和立宪会议的斗争是反革命的。

诚然，这种承认迟了一年，是在立宪会议口号的反革命性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必要性的真理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之后。这是和妄想充当革命领导角色的孟什维克中央的身分完全不相称的。但是孟什维克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是第一次落于事变进程之后。

我们认为，他们也不是最后一次企图穿着布尔什维克的旧裤子出来炫耀……

也许有人会以为，在孟什维克中央作了这种承认以后，就不应当再有严重分歧了。如果我们不是和孟什维克中央，而是和善于透彻思考、首尾相符的彻底的革命者打交道,那末情形就确实会这样。然而，糟糕的是我们目前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打交道，它们永远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言行矛盾、永无信心和思想游移。

不妨欣赏一下。你们看，孟什维克中央

“仍然认为民权制度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民主制度，是唯一能准备和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它认为由自由选出的全权的立宪会议所组织的民主共和国、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等等，不但是对这些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使无产阶级在本身利益的旗帜下实现阶级团结的不可代替的工具，而且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能够借以发挥自己的社会创造力的唯一基础”（见“提纲◇126◇和决议”）。

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是事实。一方面，“争取恢复民主制度的斗争”原来“会直接威胁到基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因此这种斗争就被宣布为反革命的，另一方面，孟什维克中央“仍然”表示赞成已经被埋葬的“全权的立宪会议”！或许孟什维克中央想不经过“武装斗争”来争得“立宪会议”吧？那末又怎样解释把“全权的立宪会议”抛掉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呢？

其次，孟什维克中央所要求的不多不少，正是：

“取消特别的警察弹压机关和特别法庭”并“停止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见“提纲和决议”）一方面承认负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使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取消为实行这种镇压所绝不可少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政权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的成果又怎么办呢？资产阶级是竭尽全力直到组织恐怖行动和强

盗阴谋来反对十月革命的。不承认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和影响，又怎么能承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呢?|

孟什维克中央会不会在什么时候摆脱这种乱七八糟的小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呢？

四　今后怎样？

不过，它是在试图摆脱这种混乱思想的。请听：◇127◇

孟什维克党“坚持实行在革命成果的基础上用民主派本身的力量来恢复俄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任务，并借此反对外国资本家对俄国内政的任何干涉”，所以它“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因为苏维埃政府坚持把俄国领土从占领下其中包括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反对非无产阶级民主派扩大或保持这种占领的企图。但是，只有苏维埃政府真正表示准备在互相协议而不是在镇压和恐怖的基础上来建立自己和各边疆地区非布尔什维克民主派的关系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干涉问题的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才能导向直接支持苏维埃政府解放俄国沦陷区的军事行动”。（见“提纲和决议”）

这就是说，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转向和苏维埃政权“协议”。

“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一致”……我们不知道这种一致的程度如何，但是,布尔什维克不会反对孟什维克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一致，这还用说吗？我们完全了解和苏维埃政府的一致同和萨马拉的“立宪会议”议员的一致之间的差别。

“直接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我们不知道孟什维克中央能把多少军队交给苏维埃政权支配，它能用什么样的军事力量来充实苏维埃军队，但是，在军事上支持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只有欢迎，这还用得着证明吗？我们完全了解在军事上支持苏维埃政府同孟什维克在克伦斯基统治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参加“国防会议”〔32〕之间的巨大差别。

一切就是如此。但是经验教会我们不能根据言论相信人，我们已经习惯于不仅根据各党派的决◇128◇议，而且首先是根据它们的行动来判断它们。

孟什维克的行动究竟怎样呢？

乌克兰的孟什维克至今没有和斯柯罗帕茨基反革命政府断绝关系，正用一切手段和乌克兰的苏维埃分子作斗争，从而协助国内外帝国主义者在南方的统治。

高加索的孟什维克早已同地主和资本家结成联盟，向十月革命的拥护者宣布神圣的战争，并向德帝国主义者求援。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孟什维克已经和英法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事实上过去帮助而且现在还在帮助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

克拉斯诺沃茨克的孟什维克给英帝国主义者打开了里海东岸边区的大门，使他们便于摧毁土尔克斯坦的苏维埃政权。

最后，欧俄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宣布必须同苏维埃政权进行“积极”“斗争”，在为解放俄国而流血作战的我军后方组织反革命的罢工，从而使孟什维克中央所宣传的“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无法实现。

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的所有这些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孟什维主义分子，到今天仍然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党员，而该党中央现在却郑重地宣布自己和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我们要问：◇129◇

(一)孟什维克党中央对上述反革命孟什维主义分子采取什么态度？

(二)它想不想坚决不移地和他们断绝关系？

(三)它有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了哪怕是初步的措施？

所有这些都是问题，而我们不论在孟什维克中央的“决议”中或在孟什维克的实践中，都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是毫无疑问，只有和反革命孟什维主义分子坚决断绝关系，才

能把实现孟什维克中央现在所宣布的“互相协议”的事情向前推进。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二三四号
署名：约·斯大林◇130◇

在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上
关于南方战线形势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报纸纪要)

斯大林同志说：“无须证明，苏维埃俄国的力量日益增长，它的胜利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苏维埃俄国的敌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顽强地企图摧毁我们。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的计划是夺取俄国最富饶的产粮区，迫使俄国不战而降。五六个月前，他们选定萨马拉和西伯利亚两地来实现这个计划。最近两个月的情况已经向我们的敌人证明，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实现不了的。目前他们力图在南方再一次进行这种冒险行动。南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里至少有一亿五千万普特可动用的粮食。那里有数十万普特煤。俄国南部在战略上的意义更大。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为新的国际焦点的区域。这一点可以从那里发生的事情看出。在叶加特林诺达尔成立了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新政府。有三支军队在那里联合起来了。反革命分子力图占据南方，以察里津为他们的主要突击方向。克拉斯诺夫曾经在八月发出占领察里津的命令。命令没有实现，倒是克拉斯诺夫的军队不得不拔脚逃命。克拉斯诺◇131◇夫又在十月发出命令：无论如何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占领察里津并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会师。当时许多将军的联军不下四十个团投入了战斗。尽管这样，将军们又不得不拔脚逃命，甚至有一位将军丢掉了一只皮靴。(笑声)

那时将军们才知道：我们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日益强大的力量，这支军队他们是难以战胜的。

我们军队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它能这样准确地打击敌人呢？

我们军队的力量在于它有觉悟有纪律。觉悟和无产阶级的纪律是我们在南方战线胜利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出现了新的红色军官。他们大部分过去是士兵，在多次战役中受过战斗洗礼并谙练军事。他们引导着我们的军队走向胜利。

这些就是决定我军获胜的主要因素。我认为这就是黑帮匪徒永远不能在南方战胜我军的原因。”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消息报”第二三七号◇132◇

关 于 俄 国 南 部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人民委员**斯大林**最近出差回来，他向本报记者发表了他对南方战线情况的印象。

南方战线的重要性

只是处于顿河反革命和阿斯特拉罕—乌拉尔—捷克斯洛伐克匪帮之间的**战略地位，就已经**说明南方战线的重要性。和英国势力范围(恩捷里、克拉斯诺沃茨克)靠近，只是加深了这种重要性而已。俄国南部的富源(粮食、石油、煤炭、牲畜、鱼类)本身就使帝国主义强盗馋涎欲滴,所以他们力图夺取俄国这块重要的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由于秋季到来和萨马拉冒险行动被肃清，战事中心将移到南方。其实这也正说明南方反革命分子目前为什么正在展开“狂热的”工作，匆忙拼凑由沙皇的奴仆希波夫、萨宗诺夫、卢柯姆斯基组成的新的(崭新的！)“全俄政府”，把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和斯柯罗帕茨基匪帮合成一支军队，向英国求援等等。◇133◇

察里津是被突击的中心

敌人攻击最猛的地点是察里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敌人拿下察里津，切断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证达到他们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顿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建立起一条从顿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可以使南方

和里海一带都归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苏维埃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就是南方白卫分子如此顽强地力图占领察里津的主要原因。

还在八月间，克拉斯诺夫就发出命令：“拿下察里津。”克拉斯诺夫匪帮疯狂地向我方阵地猛扑，力图摧毁我方阵地，但是他们被我们红军击退并赶过了顿河。

十月初，又发出拿下察里津的命令，这一次是由罗斯托夫的反革命哥萨克会议发布的。敌人集结了四十多个团，这些团是在顿河、基辅(斯柯罗帕茨基的各军官团！)、库班(阿列克谢也夫的“志愿军”！)招募来的。但是，克拉斯诺夫匪帮这一次也被我们红军的铁拳击退了，而且敌人的许多团被我军包围歼灭，炮、机关枪和步枪都落入我军之手。马蒙托夫、安东诺夫、波波夫、托尔库什金等将军和一大群上校不得不拔脚逃命。

我军的力量在哪里？◇134◇

我军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有觉悟有纪律。惊人的愚钝无知，和外界完全隔绝是克拉斯诺夫的士兵的特点。他们不知道他们作战是为了什么。他们在被俘后受审问的时候说：“命令我们，我们就不得不去打仗。”

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是这样。他们骄傲地自称为革命战士，他们知道他们作战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俄国的解放，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能自觉地勇敢地投入战斗。红军战士如此渴望秩序和纪律，以至他们自己常常处罚他们中间“不听话的”和不大守纪律的同志。

从那些在多次战役中受过战斗洗礼的士兵中出现了一批红色军官干部，这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些红色军官构成我军的基本骨干，

把我军结成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机体。

但是军队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素质。军队没有巩固的后方就不能长久存在。要有巩固的前方，就必须使军队不断地从后方得到兵员补充、弹药和粮食。在这方面起巨大作用的是后方出现了熟练能干的、主要来自先进工人的、忠诚不倦地做着动员和供给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行政管理人员，察里津就无法抢救。

这一切使我军变成能够摧毁敌人任何抵抗的可畏的力量。

一切情况都使南方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焦点。英国傀儡组成的“新的”“全俄政府”在叶加特林诺达尔的出现，在察里津附近一度被我军击败的三支反革命军队(阿列克谢也夫、斯柯罗帕茨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军队)的联合，英国打算干涉的传闻，英国从恩捷里和克拉斯诺沃茨克方面给捷列克反革命◇135◇分子的供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萨马拉遭到破产的冒险行动，现在他们又力图在南方重演。但是他们不会有(决不会有)取得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说，不会有相信反革命的卑鄙勾当并能作战到底的军队。只要给予有力的一击，反革命冒险家的纸牌搭的房子就会被打得粉碎。保证这一点的是我军的英勇作战，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也夫“军队”的士气低落，乌克兰不满情绪的增长，苏维埃俄国实力的增强以及西方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南方的冒险行动的结局，将和萨马拉的冒险行动的结局一样。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三五号◇136◇

十 月 革 命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
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

加速十月起义的最重要事件是：临时政府打算(在放弃里加后)放弃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准备迁往莫斯科；旧军队的指挥人员决定把彼得格勒的全部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使首都成为不设防的城市；在莫斯科举行的以罗将柯为首的黑帮代表大会〔33〕进行狂热的活动，组织反革命的活动。这一切再加上日益深重的经济破坏和前线士兵的厌战，就决定了摆脱当时局势的唯一出路必然是迅速而严密地组织起义。

还在九月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就已经决定动员全党力量来组织胜利的起义。为此，中央决定在彼得堡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争取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留守首都并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能够成为政权的唯一继承者。先行争取在后方和前线最有威信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代表苏维埃无疑是列在组织起义的总计划之内的。

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34〕遵照中央的指示，开始公开号召起义，准备工人和农民迎接◇137◇决战。

和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公开冲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之路报”被封而发生的。临时政府下令封闭报馆。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用革命手段启封报馆。封条被撕毁了，临时政府的专员被赶走了。这是十月二十四日的事。

十月二十四日，在许多极重要的国家机关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用强力撵走临时政府的代表，结果这些机关落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

手中,于是临时政府的全部机构就解体了。在这一天(十月二十四日),除了几个士官学校和一个装甲营外,彼得格勒的全部卫戍部队和所有团队都坚决地 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方面了。临时政府在行动上显出犹豫不决。只是到了傍晚才派出突击营占领桥梁,把其中几座桥梁旋开。为了对付这个行动,军事革命委员会调派水兵和维波尔格区赤卫队击退了突击营,占领了桥梁。从这时起,公开的起义开始了。我们的许多团奉命把司令部和冬宫所在的整个地区团团包围起来。这时临时政府正在冬宫开会。装甲营倒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方面了(十月二十四日深夜),这加速了起义的顺利完成。

十月二十五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军事革命委员会把已经夺得的政权交给了代表大会。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在“阿芙乐尔”炮轰冬宫和司令部之后,在苏维埃军队和士官生在冬宫前面交锋之后,临时政府投降了。

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是革命的鼓舞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维◇138◇波尔格区的一个秘密住宅里。十月二十四日傍晚,他被请到斯穆尔尼去领导运动。

波罗的海水兵和维波尔格区赤卫队在十月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由于这些人异常勇敢,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主要是在精神上、部分是在军事上起了支持先锋战士的作用。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真理报”第二四一号
署名:约·斯大林◇139◇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民族问题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九一七年二月)，各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带有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世世代代受“旧制度”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民族，初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奋起投入反对压迫者的战斗。“消灭民族压迫”，这就是当时运动的口号。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领导运动的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区、立陶宛、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北高加索、柯尔克兹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140◇白俄罗斯的“拉达”；贝萨拉比亚的“斯法图尔—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亚的“库鲁尔泰”；土尔克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当时的问题是摆脱沙皇制度这一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自决权被解释为各边疆地区民族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没有列入而且也不

能列入上述资产阶级机构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注意到，前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戴假面具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它是新的民族压迫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的当政并没有使民族压迫消灭。旧的粗暴的民族压迫形式，被新的精致的因而是更危险的压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还组织了反对芬兰(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议会)和乌克兰(捣毁乌克兰的文化机关)的新进攻。不仅如此，这个本性是帝国主义的政府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和民族，还号召居民继续进行战争。推动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性，而且还由于西方存在着老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可抑制地力图统辖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这个政府势力范围缩小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为征服小民族而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展现的一幅图画。沙皇制度的消灭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的上台，丝毫没有使这幅丑恶的图画有一点改观。既然各边疆地区的“全民族”机构表现出实现国家独立的趋向，自然它们就遭到俄国帝国◇141◇主义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对。既然它们在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置诸不顾，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谓“民族部队”只是火上加油：对付从上面来的危险，它们无能为力，而从下面来的危险，它们又只能使它加强和加深。“全民族”机构既无法抵御外来的打击，又无法对付内部的爆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开始凋谢了。

这样，对于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释就成了空谈，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消灭民族压迫和确保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了。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由劳动群众自己来掌握政权，被压迫民

族劳动群众是不能解放的， 民族压迫是不能消灭的。

这在十月革命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资产阶级所有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继续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经◇142◇济破坏和粮食恐慌要求为了工人的利益剥夺资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侵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剥削者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重压之下。前线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含有内部矛盾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崩溃的绝境，必须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变革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没收工厂，把它们交给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揭穿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143◇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府，根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决裂，相反地，只要有机会，它们从不放松去侵占并统辖“异”民族的几块或几小块领土。所以，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会主义政府宣战是并不奇怪的。它们一经宣战，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谁都知道，所有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些基地上编成了白卫“民族”部队。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仿照俄国中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断绝过联系。他们同样力求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同样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所以，他们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冲突与日俱增是并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鼓舞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则使各民族的群众同这些“政府”的冲突达到完全决裂的地步，达到以公开起义反对它们的地步。

这样就形成了反对俄国各边疆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联盟的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联盟。◇144◇

有些人把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描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情的中央集权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像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给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35〕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尔克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145◇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被采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近国家。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146◇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国际及其首领考茨基的该死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始终和资产阶级◇147◇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解放问题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伦纳一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问题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问题范围之内，忘记了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的存在这样的“小事”。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已经被事变进程本身废弃了。事实上，被废弃的不是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沦陷区，只要看一看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强盗侵害而进行着革命战争的俄国，只要想一想奥匈帝国目前爆发的事变，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经自行组织苏维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国)就足以理解按照社会主义解释的自决原则的全部革命意义了。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总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148◇

(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群众现在以难于描述的热情对待俄国的无产阶级。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目前这样疯狂地攻击苏维埃俄国。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
“真理报”第二四一号和第二五〇号
署名：约·斯大林◇149◇

障　壁

在社会主义的俄国和革命的西方之间，沦陷区形成了一道障壁。

在俄国，红旗已经飘扬了一年多，在西方，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无产阶级的起义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可是在沦陷区，在芬兰、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波兰、贝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仍然依靠日趋没落的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恩惠苟且偷生。

在东方和西方，“伟大的”国王和“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已经被投入地狱；可是在沦陷区，小国王和小强盗依旧主宰一切，横行霸道，压迫工人和农民，逮捕和枪杀他们。

不仅如此，他们这些衰朽的“政府”还狂热地建立自己的“民族”白卫“部队”，准备“发动”，同暂时还没有被消灭的帝国主义政府勾勾搭搭，拟定“扩大”“自己”地域的计划。

他们，这些已经被打倒的“伟大的”国王的活活腐烂着的化身，这些由于命运的支配而处在东方和西方两处革命的熊熊大火之间的渺小的“民族”“政府”，现在竟梦想扑灭燃遍欧洲的革命火焰，维持自己可笑的生存，扭转历史的车轮！……

“伟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强大的”国王所没有能做到的事情，这些“小国王”竟梦想依靠两◇150◇个支离破碎的白卫“部队”“一举”告成。

我们毫不怀疑，俄国和西方的汹涌的革命浪潮一定会无情地卷走沦陷区的反革命梦想家。我们毫不怀疑，这些地区的“小国王”和他们旧日的俄国和德国“强大的”庇护者落得同样下场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革命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俄国之间的反革命障壁终究会被推倒。

在沦陷区已经呈现革命的最初征象。爱斯兰的罢工，拉脱维亚的游行示威，乌克兰的总罢工，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普遍的革命酝酿，——这一切都是革命先声。不用说，这些地区的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已经指日可待。

无产阶级革命凛然可畏地、气势雄伟地横扫大地。东方和西方旧日的世界“统治者”惶恐战栗地在它面前低下头来，旧的皇冠纷纷落地。沦陷区及其“小国王”也不能例外。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民族生活报”第二号 社论
署名：约·斯大林◇151◇

不 要 忘 记 东 方

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在欧洲铸炼而用来扼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锁链。在西方，应当首先沸腾起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从视野中消失了，被忘记了。

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①]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他们那样热心地维持东方各国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不这样做，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就会没有保障。◇152◇

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富源。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顺从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

————————————————

① “纠纷的苹果”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海娜、亚芙罗德、雅西娜三个女神拿了一个金苹果请牧童巴里斯评判一下，看谁最美丽，就把苹果给谁。结果牧童把苹果给了亚芙罗德，从此苹果就成了这三个女神之间不和的根源。——译者注

用它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吞并行为会给东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为这种吞并行为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以前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代表会议〔36〕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153◇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伊斯兰教民族的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族生活报”第三号 社论◇154◇

乌 克 兰 在 解 放 中〔37〕

乌克兰和它的富源早已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对象。

革命前，西方帝国主义者可以说是悄悄地不动“干戈”地剥削乌克兰。法国、比利时和英帝国主义者在乌克兰开办了许多大企业(采煤、金属等等方面的)，攫取了大部分股票，公开地、“合法地”、不声不响地榨取乌克兰人民的脂膏。

十月革命以后情况改变了。十月革命斩断了帝国主义的绳索，宣布土地和企业为乌克兰人民的财产，使帝国主义者无法进行“惯常的”“不声不响的”剥削。这样，帝国主义就被逐出了乌克兰。

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步，它无论如何不肯顺应新局面。由此产生了用暴力来奴役乌克兰的“必要性”，占领乌克兰的“必要性”。奥德帝国主义者是第一个去占领乌克兰的。“独立自主”的“拉达”和“统领府”不过是傀儡，不过是宜于掩盖这种占领的屏风，在形式上“批准”奥德帝国主义者对乌克兰的剥削而已。

乌克兰在奥德占领期间受到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工人和农民组织横遭破坏，工业和铁路运输混乱不堪，绞刑架密布,枪杀声不绝,——谁不知道乌克兰在奥德帝国主义者保护下的这些“独立自◇155◇主”的平常景象呢？

然而，奥德帝国主义的溃败和德国革命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乌克兰的情况。劳动人民的乌克兰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打开了。乌克兰的破产和奴役就要结束了。在乌克兰燃烧着的革命火焰将把帝国主义的最后余孽及其“民族的”装饰品毁灭尽净。在革命浪潮中产生的“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38〕将根据乌克兰工农统治的原则安排新生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宣布把地主土地归还农民，把工厂

归还工人，把全部自由归还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一定会像一声霹雳，响彻乌克兰，使乌克兰的敌人胆颤心惊；一定会像祝福的钟声，传遍乌克兰，使乌克兰的被压迫儿女欣慰欢腾。

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胜利还没有得到保障，乌克兰的真正斗争只是刚刚开始。

当德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统领府”在临死痉挛的时候，英法帝国主义集中军队，准备在克里木登陆来占领乌克兰。他们，英法帝国主义者，想占据乌克兰的德国占领者现在让出来的空位子。同时以冒险家佩特留拉为首的打着“新”装璜的“独立自主”旧口号的“乌克兰执政内阁”〔39〕也就钻出水面来了，——这是一个比“统领府”更适于掩盖对乌克兰的新的占领(英法占领)的新屏风！

乌克兰的真正斗争还在前面。

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给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应得的打击。

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揭穿文尼阡柯—佩特留拉阵营中有意或无意地准备英◇156◇法奴役者到来的那些冒险家的反动作用。

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把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光荣地引导他们走向斗争和胜利。

我们号召苏维埃乌克兰的全体忠实儿女都来帮助年轻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协助乌克兰进行反对乌克兰的刽子手的光荣斗争。

乌克兰在解放中，快来帮助它！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民族生活报”第四号 社论
署名：斯大林◇157◇

光明来自东方〔40〕

解放运动的浪潮慢慢地然而是不可遏止地从东方向西方沦陷区奔流。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的“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慢慢地然而同样是不可遏止地垮下去，让位给工农政权。俄国和德国之间的障壁正在倒塌、消失。“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口号正在被“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口号所代替。

一年前，在十月革命以后，解放运动就是朝着同一方向，在同一口号下进行的。当时在各边疆地区成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政府”想阻挡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就向苏维埃政权宣战。他们要在各边疆地区建立单独的资产阶级国家，以便使政权和特权掌握在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手中。读者都记得，这个反革命计谋失败了，这些“政府”由于内部受到“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攻击而不得不退却了。后来德帝国主义的侵占中断了边疆地区的解放过程，造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政府”的优势。现在，在击溃了德帝国主义并把占领军逐出各边疆地区以后，解放斗争的过程又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恢复起来了。◇158◇

爱斯兰工人最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爱斯兰劳动公社〔41〕正在胜利地前进，摧毁着爱斯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基础，发动爱斯兰城乡劳动群众起来斗争。俄国苏维埃政府根据爱斯兰苏维埃政府的请求庄严地承认了爱斯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这样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苏维埃俄国从来没有把西方各地区看做自己的领地。它一向认为，这些地区是居住在那里的

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可侵占的领地，这些劳动群众享有自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充分权利。自然，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苏维埃俄国对我们爱斯兰同志争取劳动人民的爱斯兰摆脱资产阶级压迫的解放斗争会给予全力帮助。

拉脱维亚的工人也开始解放自己的受尽苦难的祖国了。拉脱维亚的维罗、瓦尔克、里加、里巴瓦及其他地方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已经恢复，里加工人正试图用革命手段取得必需的政治自由，拉脱维亚射击队正向里加方面迅速推进，——这一切都说明拉脱维亚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将遭到和爱斯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同样的命运。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拉脱维亚临时苏维埃政府不日将正式宣告成立〔42〕。不用说，这件事如果真的实现，那一定会加速并完成拉脱维亚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事业。

跟在拉脱维亚工人后面的是立陶宛的工人和农民。立陶宛的维尔纳、沙弗里、柯夫诺及其他地方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固然还是半合法的)，立陶宛农业工人在保护大田庄不被地主窃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无比的革命积极性，立陶宛射击队向立陶宛内地的迅速推进，以及据我们所得到的消◇159◇息，立陶宛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正在筹划宣告成立，——这一切都说明臭名远扬的立陶宛塔利巴〔43〕逃不了它在拉脱维亚和爱斯兰的同类的命运。

各沦陷区的民族“政府”所以短命，不仅因为它们具有违反工人和农民利益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首先因为它们是占领当局简单的附属品，这不能不使它们在广大居民阶层心目中威信扫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边疆地区的发展中，沦陷时期无疑地起了它的积极作用，彻底揭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叛卖行为。

看来，事情的趋势是，至今一直是帝国主义者施行诡计的对象的西方各地区及其劳动群众，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要冲向自由，终究会自己站立起来……

在北方，在芬兰，目前还“平静”。但是这种平静无疑是隐藏着深刻的内部活动：一方面工人和托尔帕利力求解放，另一方面斯文胡伏德政府有些形迹可疑地常常更换部长，总是和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勾勾搭搭。占领军退出芬兰，无疑会加速消灭斯文胡伏德匪帮，这个匪帮是完全应该受到芬兰广大居民阶层极端鄙视的。

在南方，在乌克兰，并不像芬兰那样平静，远不是那样平静！起义的军队日益壮大和团结，正向南方推进。哈尔科夫经过组织得极好的三天罢工〔44〕，已经转入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佩特留拉匪徒、德国占领者和斯柯罗帕茨基的走狗们不得不重视工人的意志。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农代表苏维埃公开进行工作。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的著名宣言公开印发，并张贴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街◇160◇道上。“当局”已经无力干涉这种“无礼行动”。至于把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当做福音书的乌克兰农民的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就更不用说了。

而在遥远的南方，在北高加索，连英谷什人和彻岑人、沃舍梯人和卡巴尔达人都整批整批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们手持武器肃清祖国境内的英帝国主义的雇佣匪帮。

这一切对于西方各被压迫民族，首先对于目前尚处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但是由于事物的发展已经进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阶段的奥匈帝国各民族是不会没有影响的，这难道还用得着说吗？

世界革命的旗手——苏维埃俄国站在所有这些极伟大的事变的中心，它鼓舞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对胜利的信心，支持他们为世界社会主义利益而进行的解放斗争。

当然，另一个阵营即帝国主义阵营也没有打瞌睡。它的走狗们奔走各地，从芬兰到高加索，从西伯利亚到土尔克斯坦，供应反革命分子，制造强盗阴谋，组织对苏维埃俄国的进犯，给西方各民族铸造镣铐。可是，帝国主义者匪帮在被压迫民族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他们

永远失掉了旧日的“文明”和“人道”旗手的声望，而依靠收买手段和雇佣匪帮，利用非洲的所谓“有色人种的”奴隶地位和愚昧无知来维持自己的强盗生活，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光明来自东方！

帝国主义吃人者所盘踞的西方变成了蒙昧和奴役的策源地。任务就在于摧毁这个策源地，使世◇161◇界各国劳动人民欣慰欢腾。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民族生活报”第六号 社论
署名：约·斯大林◇162◇

事 情 在 发 展

西部各地区在解放中。革命浪潮继续高涨，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旧世界的代理人和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反动分子纷纷逃跑，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

爱斯兰射击队已经包围重要交通枢纽塔普斯。我们的舰队遵照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保卫着苏维埃爱斯兰以防可能来自海上的意外事件。社会主义的红旗在爱斯兰的上空飘扬。爱斯兰的劳动群众欢天喜地。列维里的解放已经为时不远。不用说，英国军队如果要来侵占爱斯兰，一定会遭到爱沙尼亚全体人民的共同回击。

立陶宛的革命火焰日益猛烈地燃烧着。维尔纳已经掌握在工人和无地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最近维尔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45〕，使西泽的塔利巴完全瓦解了。维尔纳苏维埃给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热烈的致敬电〔46〕十分明显地说明立陶宛解放运动的性质。柯夫诺、沙弗里和其他城市以及各农村的苏维埃就在刽子手霍夫曼将军的眼前相继成立，这证明苏维埃革命的攻击力量的强大。在维列伊卡成立的、发表了热烈宣言的立陶宛工人政府〔47〕，无疑地将建立起联合立陶宛革命力量的可靠中心。立陶宛的红色射击队一定会解放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对立陶宛工人政府的承认〔48〕一定会巩固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心。

拉脱维亚的革命汹涌地不可遏止地发展着。光荣的拉脱维亚红色射击队已经占领瓦尔克，正胜利地包围里加。最近成立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正满怀信心地引导拉脱维亚工人和无地农民走向胜利。它揭穿柏林政府和德国占领当局的两面政策，在自己的宣言中毫无保留地声明：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利于我们的敌人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干涉，即使对我们的这种干涉来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府。”

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只指望得到世界各国的首先是俄罗斯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说：

“我们向全世界的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特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呼吁援助，并且等待他们的援助。”

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将全力支持解放中的拉脱维亚及其英勇的射击队，这难道还用得着证明吗？

在北方，在芬兰，还是那样“平静”。但是在平静和安谧的外表下，反革命并没有打瞌睡，而在准备新的战斗。斯文胡伏德的下台和曼纳兴的上台意味着拒绝实行国内的“改革”，意味着英国策划通过芬兰向彼得格勒进攻。而这就不能不加深芬兰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

在乌克兰，按照乐谱演出的斯柯罗帕茨基的逃亡和协约国对文尼阡柯执政内阁的承认，展开了协约国新的外交“工作”的一幅新图画。很明显，昨天还扬言要用武力维护“独立自主”的佩特留拉先生，今天却拥护“前来”援助他的协约国军队，即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军队了。起义军队和苏维◇164◇埃被宣布为乌克兰的主要的敌人。“久候之客”协约国和它的朋友——已经占领顿巴斯的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白卫分子却被宣布为主要的朋友。曾经一度把乌克兰出卖给德国人的佩特留拉先生，现在又要把乌克兰出卖给英帝国主义者。不用说，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是会清算文尼阡柯—佩特留拉的这个新的叛卖行为的。乌克兰的革命运动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佩特留拉的军队已经开始瓦解，这些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在发展……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民族生活报”第七号◇165◇

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49〕

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调查已经开始。调查进行情况将随时报告。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第三集团军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急需。这就是第三集团军(原有三万多人)只剩下一万一千名左右筋疲力尽的残兵，勉强抵挡着敌人的攻击。总司令①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须严加审查。为挽救第三集团军残部和防止敌人迅速推进到维亚得卡(根据战线指挥人员和第三集团军指挥人员的一切情报，这种危险是完全实际的)，**绝对**必须**火速**从俄罗斯至少调来三个**完全**可靠的团交由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我们坚请向有关军事机关催办此事。再说一遍：不采取这种措施，维亚得卡将蹈皮尔姆的覆辙。这是有关同志的共同意见。我们根据现有的一切材料也同意这个意见。

斯大林

费·捷尔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晚八时于维亚得卡

第一次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三〇一号◇164◇

————————————

① 总司令，指时任红军总司令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齐斯（1873-1938），原为沙俄军队军官，十月革命后作为军事专家在苏俄武装部队中工作，曾任步兵军军长、红军副总司令、东线司令员。1918 年 9 月至 1919 年 7 月任总司令，1922 年开始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本书制作者注

Председателю Совета Обороны
тов. Ленину.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днак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удет
слишком поздно. Пока считаем нужным заявить
Вам об одном, не терпящем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а, нужде
XII-ой армии.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от III-ей армии (было
30 тысяч) осталось около 11 тысяч усталых, изне-
моженных солдат, вс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наше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иказом главкома часть ненадежная, часть сама
враждебно к нам и нуждается в серьезной дисци-
плине. Для спасения остатков III-ей армии и предот-
вращения быстрого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о Вятки
(по всем данным, полученным от каждого со-
става фронта и III-ей армии, на опасность совер-
шенно реальна)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очно пере-
кинуть из России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командарм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3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адежных полка.
Надеемся просим сделать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
лении нажим 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военкомпе-
дений. Повторяем: без такой меры Вятки угро-
жает успех Перми, таков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прикаспи-
ца и всех товарищей, к которому мы присоеди-
няемся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всех имеющихся у нас
данных.

Сталин

5/I 1919. Вятка
8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Ф. Дзержинский

1919年1月5日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給
列寧的信的手稿
(製版縮小的)

给弗·伊·列宁的报告

列宁同志：

你的密码电报收到了。关于溃败的原因，我们已经根据调查所得向你做过报告〔50〕：我第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没有预备队和坚强的指挥，又加上位于侧翼，有遭到敌人从北面包抄的危险，这样的军队，不能不在敌人优势生力军的猛烈攻击下溃退。在我们看来，问题不仅在于第三集团军各机关和接近前线的后方的薄弱，而且还在于：

(一)总参谋部和军区军务部所编制和派赴前线的显然是一些不可靠的部队；

(二)全俄政治委员局给后方编制的部队派去的是些小孩子，而不是政治委员；

(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它的所谓训令和命令扰乱战线和各集团军的指挥事宜。军事总部不进行适当的变动，前线是没有打胜仗的保障的。

我们对军人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两个团**。有两个团投降：苏维埃第一团和彼得堡来的水兵团。他们对我们没有敌对行动。乌拉尔军区军务部所编制的、驻扎在伊林斯柯叶村的第十师骑兵第十团对我们有敌对行动。此◇169◇外，也是乌拉尔军区军务部所编制的、驻扎在奥切尔工厂的工程兵第十团的叛乱已经被防止了。产生投敌和敌对行动的原因是这几个团的反革命性，而造成反革命性的原因是旧的动员方法和编制方法，对应征服役的人员事先没有进行清洗，团队中缺乏最低限度的政治工作。

二、**莫托维利哈**。工厂的机器部件和电器车间的部件(连同全部部件的**清**单)已经及时拆下并装入车厢，但是没有运出,也没有毁坏。这应当由中心委员会〔51〕、军事交通处处长和无能得惊人的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莫托维利哈工厂六分之五的工人留在皮尔姆，该厂全体技术人员和原料也都留下了。根据各种情况看来，大约一个半月后工厂就可以开工。关于莫托维利哈工人在皮尔姆陷落前夜举行暴动的传闻不确，只是由于粮食供应混乱而产生过极度不满。

三、**关于炸毁桥梁和重要建筑物**。由于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理不当以及撤退的部队同该集团军司令部之间没有联系，桥梁等等没有炸毁。据说负责炸桥的同志所以没有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因为他在炸桥前几分钟被白卫分子打死了。目前无法查对这种说法，因为桥梁警卫队已经逃走，许多“苏维埃”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

四、**关于皮尔姆的预备队**。预备队只是一个不巩固的和不可靠的“苏维埃团”。这个团一上前线就投到敌人方面去了。没有其他预备队。

五、**物资和人员的损失**。目前无法查明全部损失情况，因为许多文件已经失落，许多与此事有关的“苏维埃”专家都投到敌人方面去了。◇170◇

根据现有的有限材料，我们的损失如下：机车二百九十七台(其中八十六台是有毛病的)，车厢约三千节(可能还要多)，石油和煤油九十万普特，烧碱数十万普特，食盐二百万普特，价值五百万卢布的药品，莫托维利哈工厂和皮尔姆铁路修理厂存有大量物资的材料仓库，莫托维利哈工厂的机械和部件，卡马河船队的船舶机械，皮革六十五车厢，第三集团军供给处的粮食一百五十车厢，区水路运输管理局存有棉花、布匹、润滑油等物资的最大的仓库，载有伤员的车厢十节，存有大量美国车轴的铁路局车轴库，炮二十九门，炮弹一万发，枪两千支，子弹八百万发，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这个期间伤亡和

失踪的有八千多人。全部铁道专家和几乎全部供给专家都留在皮尔姆。损失的清查工作在继续中。

六、**集团军现有战斗人员名额**。第三集团军目前是由两个师(第二十九师和第三十师)组成的，共有步兵一万四千名，骑兵三千名，机关枪三百二十三挺，炮七十八门。预备队是从俄罗斯调来的第七师的一个旅；这个旅由于不可靠，必须严加清洗，还没有使用。瓦采齐斯所应许的三个团还没有来（而且也不会来了，因为他们昨天接到开赴纳尔瓦的新任务）[52]。作战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在前线勉强支持着。

七、**第三集团军的指挥系统**。表面上指挥系统是正常的，“按照条例”的，事实上没有任何系统，一团混乱，脱离自己的战斗地段，各师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

八、**为中止退却而采取的措施够不够**。在已经采取的措施中，可以认为重要的有：(一)第二集团◇171◇军向昆古尔方面推进，这无疑是给第三集团军的很大支持；(二)由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努力，九百名完全可靠的步兵生力军已经派赴前线，其使命是扭转第三集团军低落的士气。两天后我们要调两个骑兵连和第三旅第六十二团(已经经过挑选)到前线去。十天后再开去一个团。第三集团军前线士兵知道这个情况，看到后方的关怀，士气日益振作。毫无疑问，目前的情况比两星期前好了。该集团军在有些地方甚至转入进攻，并且不无进展。如果敌人再给我们两星期左右的喘息时间，就是说，如果敌人不再投生力军到前线来，那就可以希望在第三集团军的地段内造成稳固状态了。

现在我们正在肃清从北方沿大道经盖果罗德向维亚得卡进行包抄的几个敌军支队。我们到维亚得卡来，也顺便是为了派一个滑雪队到盖果罗德去，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做到。至于说到采取其他措施（巩固后方的)，那末我们正在动员工作人员(普通人员和领导人员），派他

们到后方的军队里去，并且正在清洗格拉佐夫和维亚得卡两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不过这项工作的成绩当然不会很快表现出来。

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绝对不能认为这些措施已经够了，因为疲惫不堪的第三集团军各部队，如果得不到即使是部分的替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因此，至少必须调两个团到这里来。只有这样，才能认为前线的稳固有保障。此外必须：

（一）撤换集团军司令员；

（二）派三个能干的政治工作人员来；◇172◇

（三）立即解散区域委员会、区域苏维埃和其他组织，以便加速动员已经撤退的工作人员。

约·斯大林

费·捷尔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于维亚得卡

附言：几天之后我们将回格拉佐夫，结束调查工作。

第一次载于一九四二年

“列宁文集”第三十四卷◇173◇

在维亚得卡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记录)

谈到总的形势，应当说，最近期间前线某种程度的稳定是有保障的，因此正是现在必须成立维亚得卡省军事革命委员会。如果敌人向前推进，内部反革命就会举行暴动援助他们。只有人数不多、机动灵活的组织才能有成效地镇压反革命暴动，军事革命委员会就应该成为这样的组织。

必须立即组织新的领导中心，由下列各机关的代表组成：

(一)省执行委员会，

(二)区域苏维埃，

(三)党的省委会，

(四)肃反委员会，

(五)军区军务部。◇174◇

应该把一切人力和物力集中在维亚得卡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但是苏维埃机关的日常工作不应当停止，而应当加强。

各县应当仿照省领导中心建立同样的机关。

依靠这种革命委员会，同地方的联系就会实现。

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准备新的进攻。

斯大林同志把他的建议归纳为：

为了巩固和保障后方并统一维亚得卡省一切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活动，成立维亚得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它是省内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上述各机关和组织都要服从它的决定。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高尔基公社报”第二九〇号◇175◇

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

溃败的一般情况

溃败的不可避免性早在十一月底就已经确定，那时敌军沿着纳杰日丁斯基—维尔霍土尔叶—巴兰琴斯基—克恩—伊尔金斯基—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直至卡马河左岸一线以半圆形包围第三集团军并以右翼加强佯攻，然后对库什瓦进行猛攻。

第三集团军当时是由第三十师、第五师、一个特别旅、一个特别支队和第二十九师组成的，共有步兵和骑兵三万五千名左右，机关枪五百七十一挺，炮一百一十五门(见“战斗序列及宿营配备表”)。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六个月没有换防，弄得疲惫不堪，全军士气非常低落。没有任何预备队。后方◇176◇毫无保障(军队后方的铁路路基曾被炸毁多次)。军队的给养不经常，无保障(在第二十九师受到猛烈攻击的最艰难时刻，该师各部队抵抗五昼夜而没有得到一点面包和其他食物)。

第三集团军位于侧翼，但是没有防备来自北面的包抄(没有采取措施在该集团军最左翼特别配置部队以防包抄)。至于最右翼，友邻的第二集团军，则因受了总司令的含糊其词的训令的束缚(在占领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之后，第二集团军因接受新的任务就没有投入战斗)而不得不在原地停留十天，没有能在库什瓦失陷前的最危急的时机(十一月底)向前推进，给第三集团军以及时的援助。

这样，第三集团军孤立无援(在南部),听任敌军包抄(在北部),筋疲力尽，没有预备队和稍微稳固的后方，给养恶劣(第二十九师)，军鞋破烂(第三十师)，身受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拉长在从纳杰日丁斯基到卡马河左岸奥萨以南的广大地域上(四百多俄里)，加上集团军司令部软弱无能，缺乏经验，当然抵挡不住敌军优势生力军(五个师)的猛攻，况且敌军还拥有经验丰富的指挥人员。

十一月三十日，敌人占领维亚车站，切断了我军左翼同中路的联系，几乎全歼二十九师的第三旅(只有旅长、参谋长和政治委员脱险，第九号装甲车落入敌手)。十二月一日，敌人在雷西瓦方面占领克鲁托伊洛格车站，并夺去我们的第二号装甲车。十二月三日，敌人占领库什瓦工厂(我军放弃维尔霍土尔叶和与中部失去联系的整个北部地域)。十二月七日，敌人占领比谢尔。十二月九日，占领雷西瓦。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由于苏维埃第一补充营投敌，敌人占领丘索夫斯卡雅、卡里诺、谢◇177◇良卡等车站。十二月二十日，敌人占领瓦列日纳亚车站。十二月二十一日，由于苏维埃第一步兵团投 敌，敌人占领哥里、莫斯托瓦亚。在我军总退却的时候，敌人迫近莫托维利哈。二十四日夜，敌人不战而占领皮尔姆。所谓炮兵城防只落得一场空想，反而给敌人留下了二十九门炮。

我军就这样在二十天内，从维尔霍土尔叶到皮尔姆，狼狈退却三百多俄里，损失一万八千名战士，数十门炮，数百挺机关枪。(皮尔姆陷落后，第三集团军只剩下两个师，原有的三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只剩下一万七千名，五百七十一挺机关枪只剩下三百二十三挺，一百一十五门炮只剩下七十八 门。见“战斗序列及宿营配备表”。)

严格地说，这不是退却，更不能说是部队有组织的转移阵地，——这实实在在是一支被彻底击溃而士气丧失殆尽的军队的狼狈逃窜，这支军队的司令部不能觉察到正在发生的情况，不能多少预计到溃败的必不可免，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来保存军队，即使以放弃土地为代价，

也要把军队撤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第三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哀叫溃败“出于意外”，这只说明这些机关脱离军队，不了解库什瓦事件和雷西瓦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指挥军队作战。

这一切情况就是造成无比的惊惶和混乱的根本原因。这种惊惶和混乱，表现在第三集团军地域的许多城市和据点的狼狈撤退上，表现在没有炸毁桥梁和毁掉留下的物资的可耻事情上，表现在城市守备和所谓炮兵城防上。

虽然还在八月间就开始谈论撤退，但是组织撤退的实际工作却丝毫没有或几乎丝毫没有做。没◇178◇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曾试图制止中心委员会的错误，这个委员会妨碍着各机关的行动，它无休止地讨论撤退计划，却丝毫不做，真正丝毫不做撤退工作(连“本机关物资”的清单都没有开出来)。

没有一个人，一个机关曾经试图对乌拉尔铁路管理局组织有效的监督，该局在处理铁路职员所巧妙组织的怠工时表现了可疑的软弱无能。

十二月十二日委派军事交通处处长斯托果夫担任撤退主任，但是这并没有使撤退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尽管斯托果夫庄严地保证立即撤出皮尔姆(“我以脑袋担保——一定撤出一切”)，但是他既没有撤退计划，又没有撤退机关，也没有武装力量来制止个别机关和散乱部队混乱地擅自“撤退”的企图(强占机车和车厢等等)。结果撤出的都是些小东西，破椅子和其他破烂，而装有莫托维利哈工厂和卡马河船队的机械和部件的待发列车，载有伤员的列车和存储的贵重美国车轴，几百辆完好的机车和其他贵重物资却没有撤出来。

区域委员会和区域苏维埃，第三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不会不知道这一切，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干预”这件事，因为调查后得悉，这些机关对撤退机关的活动并没有进行有系统的检查。

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还在十月间就开始谈论皮尔姆的炮兵城防，但

也只是谈谈而已，因为二十六门炮(还有三门不十分中用)连同全副挽具未发一弹就全部留给敌人了。据调查，如果当时司令部抽出时间检查一下旅长在架炮方面的工作，它就会看出：在皮尔姆陷落前夕(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军◇179◇队狼狈退却和总崩溃的情况下，当旅长没有执行命令而把架炮工作拖延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时候(这个旅长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投敌了)，问题只能是抢救炮，把它们运出来，或者至少把它们毁掉，而决不是谈炮兵城防。为什么这也没有办，那也没有办，这只能用司令部的粗心大意和昏庸无能来解释。

这种昏庸无能和领导无方也表现在炸毁卡马河桥和毁坏留在皮尔姆的物资的问题上。皮尔姆陷落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在桥下埋好地雷，但是谁也没有去检查过地雷的敷设情况(谁也不敢肯定说，地雷在预定爆炸时刻之前敷设得十分完好)。爆炸任务委托给一个“完全可靠的”同志(梅德维捷夫)，但是谁也不敢肯定桥梁警卫队是否完全可靠，它(警卫队)是否直到预定爆炸时刻之前的最后一分钟都没有撇下梅德维捷夫，警卫队是否完全保障了梅德维捷夫的生命安全，使他免遭白卫奸细的杀害。因此不能确定：

(一)是否梅德维捷夫在炸桥之前，在桥梁警卫队逃得“不知去向”的时候，真的被白卫奸细杀害了(某些人这样推测)；

(二)是否梅德维捷夫不愿意炸桥，自己逃走了，还是

(三)或许梅德维捷夫已经尽力做了炸桥的一切工作，但是由于导火线失效和地雷损坏，桥梁没有炸毁；导火线和地雷也许被敌人向桥梁发射的炮火击坏，也许在炮火射击以前就已经坏了。而梅德维捷夫也可能是被后来赶到的敌人杀害的。◇180◇

其次，第三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没有设法把毁坏不运走的物资的责任明确地交给某个机关或一定的人。而且这两个机关没有发出关于必须炸毁或毁坏留下的建筑物和物资的正式的(书面的)命令。因此，根据个人的主意毁坏了(焚毁了)大部分价值不大的物资

(例如车厢)，而极重要的物资(布匹、被服等)却留下未动，而且有些负责人竟为了“防止惊惶”，不许焚毁和炸毁不运走的东西(这些人还没有查明)。

除了军队和后方全面崩溃、瓦解，集团军的、党的及苏维埃的机关昏庸无能和不负责任以外，还发生了闻所未闻的、大批负责干部几乎普遍投敌的现象。防御工事领导人巴宁工程师及其全体同事，铁道工程师阿德利安诺夫斯基和铁路管理局全体专家，军事交通部部长苏霍尔斯基及其同事，军区军务部动员处处长布金及其同事，警备营营长乌菲姆采夫和炮兵旅旅长瓦留热尼奇，特编部队部部长艾斯金和工程兵营正副营长，皮尔姆第一车站和皮尔姆第二车站的管理主任，第三集团军供给部统计处全体人员和中心委员会的一半委员，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很多人都留在皮尔姆投靠敌人了。

这一切不能不加重普遍的惊惶。不仅撤退的部队惊惶失措，而且在皮尔姆陷落前夕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以及省军务部也惊惶失措了，革命委员会未能维持住市内的革命秩序，省军务部和市内各区失去联系。结果是：警备营的两个连没有撤出皮尔姆，后来被白军消灭了，损失一个滑雪营，也是被白军消灭的。白军奸细在市内各区巧妙组织的挑衅射击(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越发加深了普遍的惊惶。◇181◇

* * *

第三集团军和预备队

第三集团军疲惫不堪(连续作战六个月，没有换防)和缺乏比较可靠的预备队是失败的直接原因。第三集团军像一根细线拉长在四百俄里的距离上，并且北面容易遭受敌人的包抄，这迫使它更加向北拉长，它成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敌人突破的最适当的目标。关于这一切以及关于缺乏预备队，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

会远在九月间就已经知道(见“附件”中第三集团军的一些负责人要求“换防”，要求“预备队”和报告第三集团军所部疲惫情形等等的电报)，但是军事总部要就是不派预备队，要就是派去一点不中用的部队。十二月初，在库什瓦失守以后，要求换防和申述军队疲惫情形的次数特别多起来了。十二月六日，拉舍维奇(集团军司令员)向东方战线告急，说明形势危险，请派预备队，但是斯米尔加(东方战线)答复说：“很遗憾，增援部队不会有。”十二月十一日,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特利弗诺夫用直达电报向斯米尔加(东方战线)提出：“很可能，我们在最近几天内将被迫放弃皮尔姆。来两三个坚强的团就足够了。请设法从维亚得卡或附近地方抽调。”斯米尔加(东方战线)的回答是：“增援部队不会有，总司令拒绝援助。”(见“附件”)从八月到十二月，根据总部命令开来补充第三集团军的共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带有步枪三千◇182◇三百八十八支，机关枪一百三十四挺，炮二十二门，马九百七十七匹。其中喀琅施塔得水兵第一团(一千二百四十八人)投降了，海军步兵第十一独立营(八百三十四人)逃散了，喀琅施塔得要塞第五野炮连因凶杀连长而被监禁起来，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一千二百一十四人)又被调回西方。至于总部允许调派二十二个连的命令，总部根本没有执行。总部答应调派的第七师第三旅(三个团〕直到一月初，皮尔姆已经陷落以后，才开到格拉佐夫。而且和这个旅一接触就可以看出，它和红军毫无相同之处(有明显的反革命情绪，憎恨苏维埃政权，旅内有团结很紧密的富农分子集团，扬言“放弃维亚得卡”等等)。此外，这个旅没有战斗准备(不会射击，它的行李是夏季的)，指挥员不了解自己的团队，政治工作极薄弱。只是在对这个旅进行了三四个星期的清洗和严密审查之后，在把大批党员编进去充当普通红军战士并加强了政治工作之后，到一月底才使它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战斗单位(组成这个旅的三个团之中有一个团在一月二十日开赴前线，一个团可能在一月三十日以后开出去，另一

个团在二月十日以后)。关于我军编制制度的这些缺点，骑兵第十团和驻扎在奥切尔工厂的工程兵第十团(这两个团都是乌拉尔军区军务部编制的)的事件，也可以证明。骑兵第十团袭击了我军后方，工程兵第十团也企图这样做，因为采取了预防措施而未得逞。

军队编制制度的缺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在五月底以前，红军是在全俄编制委员会主持下按志愿原则在吸收**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工人和农民参军的基础上编制的(见全俄编制委员会制定的“证明书”和“履历表”)。志愿兵役制时期编成的军队所以坚强，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从五月底起，即在◇183◇全俄编制委员会解散，把编制工作移交全俄总参谋部以后，情况就变坏了。全俄总参谋部完全搬用了沙皇时期的编制制度，把所有动员来的人不分财产状况一律吸收参加红军，而且，全俄编制委员会的“履历表”中关于财产状况的各项规定，在全俄总参谋部制定的“人员登记表”上都被去掉了(见全俄总参谋部的“人员登记表”)。固然，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委员会曾经公布动员**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的第一个法令。可是，这个法令无论在全俄总参谋部的实际工作中，或在它的命令中，或在“人员登记表”中，显然都没有得到反映。这主要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编制机关所编成的军队，与其说是红军，不如说是“国民军”。只是在一月中旬，国防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逼迫乌拉尔军区军务部交出总参谋部关于编制方法的全部材料和命令的时候，全俄总参谋部才抽出时间认真地考虑了一下编制制度，向各军区军务部发出电令：“在人员登记表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三项中，填上党派关系，应征服役者是否剥削别人劳动，是否受过普通教育。”(总参谋部的这一电令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出的，见“附件”。)这是在有十一个师远在十二月一日以前被认为已经编好，而其中已经开赴前线的一部分表现出白卫军一切征象以后的事。

编制制度上的毛病，因军区军务部对正在编制的部队的照料工作

惊人的不关心(伙食很坏，被服很坏，没有浴室等等。见“维亚得卡委员会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完全不加区别地录用没有审查过的军官担任指挥员(这些军官往往引诱部队投敌)而更加严重了。

最后，总参谋部没有采取措施把在一个地方动员来的人员转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军区)去编◇184◇练，而这样做是可以大大消除大批脱逃现象的。至于部队里缺乏比较令人满意的政治工作(全俄政治委员局很弱，不称职)，那就更不用说了。

十分明显，总部既然派来这样的半白卫军的预备队(通常在路上就逃走一半)，那就不能给第三集军以重大的援助了。而且，第三集团军各部队在退却中这样筋疲力尽，以致士兵成群地躺在雪地上，请求政治委员枪毙他们：“我们站都站不住，走路更不能了，累极了，同志们，打死我们吧。”(见 “师政委穆拉契科夫斯基的报告”)

结 论

不应该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必须实行常备预备队制度，没有常备预备队就不能保持现有的阵地，也不能扩张战果。不这样，溃败就不能避免。

但是，只有把总参谋部的一套旧的动员制度和编制制度加以根本改变，把总参谋部本身的人员加以更换，预备队才能发生作用。

首先，必须把动员来的人严格地分为有产者(不可靠的)和贫穷者(唯一适于在红军服役的)。

第二、必须把一个地方动员来的人送到另一个地方去编练，而且应该按照“离本省愈远愈好”(取消地域原则)的原则派赴前线。

第三、必须停止编制不适于国内战争条件的庞大臃肿的单位(师)，宣布旅为最大的战斗单位。◇185◇

第四、必须对各军区军务部(先更换其人员)确立严格的经常的监

督，这些军务部因对正在编练的部队的宿营、给养和被服采取漠不关心的罪恶态度,引起了红军战士的愤怒(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大批脱逃)。

最后，必须更换全俄政治委员局的人员，它派给各部队的是一些娃娃“政委”，根本不能组织令人稍微满意的政治工作。

由于不遵守这些条件，所以我们的编制机关送到前线去的部队与其说是红军，不如说是“国民军”，而且“政治委员”这个词竟变成骂人的话了。

此外，为了保持第三集团军的战斗力，绝对必须立即供给它预备队，其数量至少是三个可靠的团。

* * *

集团军的指挥系统和总部的训令

第三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由两个委员组成的。其中一个委员(拉舍维奇)指挥作战。至于另一个委员(特利弗诺夫)，始终没有能够弄清楚他的职务和作用：他不监督供给工作，也不监督军队政治教育机关，似乎根本什么也不做。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186◇

集团军司令部脱离自己的战斗地段，它在各师各旅中没有向它报告情况并监督各师长和旅长准确执行集团军司令员命令的特派代表，集团军司令部满足于师长旅长的官样报告(常常是不确实的)，集团军司令部完全为师长和旅长所操纵(他们觉得自己像封建诸侯一样)。因此，集团军司令部脱离了自己的战斗地段(它丝毫不了解战斗地段的实际情况)，军内缺乏集中指挥(它一直悲叹集团军各战斗单位间的接合部薄弱)。不仅在集团军内部缺乏集中指挥，而且在战线(东方战线)各集团军之间也是如此。从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月底，当第三集团军同敌人作力量悬殊的浴血苦战的时候，和它邻近的第二集团军却在

原地停留了整整两个星期。这是事实。可是很明显，第二集团军早在十一月十日就结束了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克战役，如果它向前推进(它是可以自由推进的，因为当时没有或几乎没有敌军和它对抗)，那末敌军甚至不能向皮尔姆发动大的战役(因为敌军后方受到第二集团军的威胁)，第三集团军就可免于灾难了。

调查的结果证明，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没有配合作战是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脱离战线和总司令滥发训令造成的。我们问过战线司令员加米涅夫，他对这一点报告如下：

“还在占领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以前，即在十一月初(至迟不过十日)，就接到一个训令，要把第二集团军在占领这些据点以后调到另一个战线去，但是没有指明到哪里去。接到这个训令以后，就不能充分使用该集团军了，就不能让它和敌人接触，否则以后就无法使它退出战斗，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而该集团军只限于清剿当地白匪。为了撤销这个训令，就需要什捷尔◇187◇别尔格和索坷里尼柯夫赶到谢尔普霍夫去斡旋。这就费去了十天左右。这样第二集团军就浪费了十天时间，它被迫停留原地。后来，第二集团军司令员绍林突然被召去谢尔普霍夫。这就瘫痪了同绍林个人有关联的第二集团军，又迫使它在原地停留五天。在谢尔普霍夫，柯斯嘉也夫接见了绍林，问他是不是总参谋部的人，知道他不是以后就让他走了，并且说本想委任他为南方战线副司令员，‘但是改变了主意’。”(见“东方战线司令员的报告”)

总之，应该指出，总司令在发训令方面表现了不可容许的轻率。据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报告(十二月二十六日)：“不久以前，东方战线在五天内收到三个电报：(一)主攻方向是奥连堡；(二)主攻方向是叶加特林堡；(三)援助第三集团军。”(见古谢夫给俄共中央的信)如果注意到执行每一个新的训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就不难明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对待他们自己训令的态

度是多么不严肃。

应该指出，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斯米尔加，完全同意其他两个委员——加米涅夫和古谢夫的报告(见一月五日“斯米尔加的报告”)。

结 论

集团军没有坚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不行的。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至少应该由三个委员组成，其中一个监督集团军的供给机关，一个监督集团军的政治教育机关，另一个指挥作战。只有这样◇188◇才能保证集团军的正确行动。

集团军司令部不应当只限于看师长和旅长的官样报告(常常是不正确的)，它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代理人)，这些代表定期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消息并严密注意对集团军司令员命令的准确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令部和集团军的联系，才能消除各师各旅实际存在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并建立集团军的真正的集中指挥。

集团军不能作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完全自主的单位行动，它的行动完全系于它的友邻集团军，首先是系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令，因为即使是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总部的训令不正确，缺乏同友邻集团军的真正联系，也会遭到失败。在各战线上，首先是在东方战线，必须建立严格集中指挥各军行动的制度来实现确定的、经过周密思考的战略训令。在决定训令时专横武断或不加考虑，不认真估计一切情况，因而朝令夕改，以及像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那样发下的训令含糊不清，这会使人无法指挥军队，造成兵力和时间的浪费，使战线瓦解。必须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成一个人数不多的、同各战线有密切联系的组织，比如说由五个

人组成(其中有两个专家，第三个监督中央供给部，第四个监督总参谋部，第五个监督全俄政治委员局)，这五个人要很有经验，在指挥军队上不致专横武断，草率从事。◇189◇

*　　*　　*

不稳固的后方与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

调查的结果，只得肯定第三集团军的后方是十分混乱的。这个集团军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对付那些总还可以看见、可以知道的敌人；另一方面又要对付神出鬼没的后方居民，他们在白卫奸细指使下炸毁铁路，造成各种障碍，以致在集团军的后方不得不专门用装甲火车来保护铁路。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都一致认定，皮尔姆省和维亚得卡省的居民“全都是反革命”。区域委员会和区域苏维埃以及皮尔姆省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委会都肯定说，这个地区的村庄里“全都是富农”。我们指出，全都是富农的村庄是没有的，没有被剥削者，富农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富农总要剥削别人。上述机关听了我们的话，只把两手一摊，再不做任何别的解释。经过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调查，发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盘踞着不可靠的人，贫农委员会掌握在富农手里，党组织很弱、不可靠、脱离中央，党的工作无人过问，而且地方干部竭力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来补救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普遍的软弱无能。在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普遍混乱的情况下，肃反委员会成了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唯一代表。只有拿没有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中央起码领导的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空虚才能解释如下惊人的事实：颁布征收特别税的革命法令〔53〕的目的本来是要在农村起划分阶级的作用，唤起贫农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法令竟变成了富农团结全村居民反对苏维◇189◇

埃政权的最危险的武器(通常都是由盘踞在贫农委员会里的富农分子发起，税款按人头摊派，而不是按财产状况征收，这就激怒了贫农，便利了富农鼓动反对捐税、反对苏维埃政权)。可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一无例外地认为，对特别税的“误解”即使不是农村反革命化的唯一主要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内务人民委员部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苏维埃组织的日常工作没有给予任何领导(皮尔姆省和维亚得卡省贫农委员会的改选到一月二十六日还没有开始，这点可以概括地说明这个情况)。党中央对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也没有给予任何领导。在我们逗留前线的全部时间内，好容易才弄到一份由一位姓诺夫果罗德采娃的“秘书”签署的关于把柯罗鲍夫金同志从皮尔姆调到平兹去的党中央的文件(这个命令显然不妥当，所以没有执行)。

这一切情况使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在农村中失去了支柱，失去了同贫农的联系，使它们开始依靠肃反委员会，依靠高压手段，因此农村叫苦连天。而肃反委员会本身则由于它的工作没有同时辅以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积极的宣传工作和建设工作而处于完全特殊的孤立地位，损害了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如果善于安排工作是能够及时揭发我们机关的毛病的，但是皮尔姆和维亚得卡的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既不善于安排工作，又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这些报刊上，除了关于“世界社会”革命的一些空洞词句外，什么东西也看不到；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具体任务，乡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改选，关于特别税问题，同高尔察克及其他白卫分子作战的目的，——对于这一切“微末的”问题，报刊都傲慢地忽视了)。例如维亚得卡市苏维埃机关的四千七百六十六个工作◇191◇人员中，有四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沙皇时代是在省地方自治局中担任同样职务的，这就是，不客气地说，只把旧的沙皇时代的地方自治机关改名为苏维埃机关而已（请不要忘记，这些“苏维埃工作人员”掌握着我们维亚得卡省的整个皮革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惊人现象是我们在一月中

旬从调查表中发现的。区域委员会和区域苏维埃，当地报刊和当地党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种现象呢？当然不知道。党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否知道这种现象呢？当然不知道。中央不仅不知道地方的一般主要毛病，而且不知道我们地方苏维埃机关的主要毛病，那怎么能进行领导呢？

结 论

我军的弱点是后方不稳固。这主要是由于党的工作无人过问，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不善于贯彻中央的训令，地方肃反委员会处于特殊的(几乎是孤立的)地位。

为了巩固后方，必须：

一、建立地方党组织对中央的严格的定期报告制度；中央要经常给地方党组织以指示信；中央机关报成立报刊部以领导地方党的报刊；设立党务干部学校(主要吸收工人中的党的干部)和正确分配干部。这一切由中央委员会中选出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办理。

二、严格划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领导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日常工作方面的职权范围，把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①]，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92◇正确地及时地执行中央政权的法令和命令；责成各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定期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工作；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经常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必要的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54〕成立报刊部来领导地方苏维埃的报刊。

三、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监察—检查委员会来调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前后方各地有关部门的“机构上的缺点”。

———————————————

① 捷尔任斯基同志对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并问题另有意见。——著者注

* * *

供给机关和撤退机关

在供给方面的主要毛病是供给机关的极度重迭和它们之间的缺乏配合。

供给皮尔姆的军队和居民食物的有“乌拉尔供给部”、“省供给部”、“市供给部”、“县供给部”和“第三集团军供给部”。可是供给工作糟糕到极点，因为军队(第二十九师)挨过饿，皮尔姆的居民和莫托维利哈工厂的工人由于口粮不断减少，甚至减少到挨饿的地步(四分之一磅)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193◇

军队供给工作的混乱是由上述供给机关的不协调造成的，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不理会皮尔姆省已经失守，直到现在还没有把给第三集团军筹粮的命令从皮尔姆省和其他遥远各省转到维亚得卡省，这使供给工作更加混乱。还应该指出，粮食人民委员部还没有着手把粮食运到港口，而水路运输管理总局还没有着手修理轮船，毫无疑问，这会给将来的供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军队装备物品的供给方面，因机关重迭和办事拖拉而受害更大。“中央供给部”、“总军械部”、“供给非常委员会”和“第三集团军军械供给部”常常互相干扰，阻碍并破坏灵活的供给工作。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摘录一段第三集团军司令员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皮尔姆陷落前给战线司令员的电报(副本已经给托洛茨基)：

“东方战线供给部部长在第三二四九号电报中通知说，拨发六千支日本步枪的命令已经发给雅罗斯拉夫里军区，而且从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柯斯嘉也夫第四九三号电报中得知，总司令已经批准这一命令。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在一个月前，派接收员去领取枪支。接收员到雅罗斯拉夫里军区军械部后来电说，那边一点也不知道命令的事，

因为总军械部没有命令去。接收员去莫斯科找总军械部，从那里来电说，不得总司令允许，不能发枪支。昨天接收员来电说，总军械部断然拒发枪支，于是他就回来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在第二〇八号电报中说，已经发出命令由第二集团军拨发六千支步枪给第三集团军，而第二集团军司令员也拍来第一五六〇号电报，要求迅速派接收员到伊热夫斯克领取枪支。接收员派去了，但是到伊热夫斯克后又不发◇194◇给他枪支，说是没有接到命令。第二集团军司令员以第六五四二号电报和东方战线供给部部长以第六五四一号电报请求命令伊热夫斯克工厂发给上述枪支。到十六日为止，关于拨发枪支的命令还没有发给工厂，据接收员报告，伊热夫斯克的所有枪支必须在星期一运往总部。两道命令上的一万支步枪，第三集团军就这样失去了。第三集团军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没有步枪就不能把补充兵员送上前线，而没有补充兵员，前线就会瓦解，就会造成你们所知道的后果。要雅罗斯拉夫里军区军械部拨发枪支的命令是经总司令同意发出的，因此，第三集团军统帅部正式控告总军械部的怠工行为并坚决要求彻查此事。”

战线司令员加米涅夫完全确认这个电报的内容(见“战线司令员的报告”)。

在撤退方面，各机关也是同样混乱和重迭。铁路管理局局长完全没有能力制止巧妙组织的铁路职员的怠工行为。在撤退的最困难时刻，不断发生列车颠覆、运输停滞、军需品无故失踪等情事，而管理局没有采取或者是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这些坏事发生。中心委员会“做了工作”，就是说进行了讨论，但是没有，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有计划地撤退物资。第三集团军军事交通处处长(他又是撤退主任)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运出最贵重的物资(莫托维利哈工厂的机械和部件等等)。运走的是各种各样破烂，所有机关毫无例外地都干预撤退工作，因此，撤退过程一团糟，混乱不堪。

结 论◇195◇

为了改善军队的供给工作，必须：

一、消灭中央军队供给机关的重迭现象(中央供给部、供给非常委员会和总军械部各行其是的现象)，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机关，极严格地负责迅速执行命令。

二、责成集团军供给部在各师中储备两周战用粮。

三、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把给各集团军筹粮的命令转到离各军最近的省份去，其中给第三集团军筹粮的命令要(火速地)转到维亚得卡省。

四、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刻着手把粮食运到各港口，责成水路运输管理总局立即着手修理轮船。

为了整顿撤退工作，必须：

一、撤销地方中心委员会。

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有权分配撤退物资的统一撤退机关。

三、责成这个机关在必要时向某个地区派出专员主持撤退工作，但是必须吸收该地区的军方代表和铁路管理局的代表参加。

四、给各有关铁路管理局，首先是给乌拉尔铁路管理局(因为它的人员不能令人满意)委派能使铁道专家服从并能击破铁路职员怠工行为的铁道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代表。

五、责成铁道人民委员部立即着手从机车和车厢多的地区调拨机车和车厢到产粮区去，并着手◇196◇修理损坏的机车。

* * *

物资和人员的损失总数

因为许多文件已经“失落”，许多经办事务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专家已经投敌，损失情况无法全部查明。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的损失如下：木柴四十一万九千立方俄丈，烟煤、无烟煤和泥炭二百三十八万三千普特；矿石和其他原料六千六百八十万普特；主要材料和产品(铸铁、铝、锡、锌及其他)五百万普特；钢锭、钢坯和平炉钢锭、转炉钢锭六百万普特；铁和钢(型钢、屋面铁、钢丝、铁轨及其他)八百万普特；食盐四百万普特；烧碱和纯碱二十五万五千普特；石油和煤油九十万普特；价值五百万卢布的药品；莫托维利哈工厂和皮尔姆铁路修理厂的材料仓库；存有大批美国车轴的铁路局车轴库；区水路运输管理局的存有棉花、布匹、润滑油、铁钉、运货车等等物资的仓库；皮革六十五车厢；第三集团军供给部的粮食一百五十车厢；机车二百九十七台(其中八十六台是坏的)；车厢三千多节；阵亡、被俘和失踪的战士约两万人，载有伤员的车厢十节；炮三十七门，机关枪二百五十挺，步枪两万余支，子弹一千多万发，炮弹一万余发。

我们没有计算丢失的全部铁路、重要建筑物等等。◇197◇

*　　*　　*

为巩固前线而采取的措施

一月十五日，给前线派去了一千二百名可靠的步兵和骑兵；过了一天又派去了两个骑兵连，二十日派出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团(预先仔细挑选过)。派去这些部队后使我军得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扭转了第三集团军的士气，使我军开始向皮尔姆进攻，进攻现在还顺利。一月三十日，第三旅第六十三团(经过了一个月的清洗)开赴前线。第六

十一团可能在二月十日以后开出去(需要特别仔细地清洗)。鉴于最左翼薄弱，有遭到敌人包抄的危险，维亚得卡的滑雪营补充了志愿兵(共一千名战士)，装备了速射炮，于一月二十八日从维亚得卡开往切尔登方面去同第三集团军的最左翼会合。必须从俄罗斯再派三个可靠的团去支持第三集团军，以便真正巩固它的状况并使它能扩张战果。在第三集团军后方，清洗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正在认真进行。已经在维亚得卡和各县城组织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中成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在继续进行中。党的和苏维埃的全部工作正在重新安排。军事监察机关已经清洗并进行了改组。省肃反委员会进行了清洗并补充了新的党的工作人员。维亚得卡枢纽站的卸货工作已经整顿就绪。为了彻底巩固第三集团军的后方，必须调派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并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工作。◇198◇

———————————

调查委员会在结束本报告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绝对必须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监察—检查委员会，以便调查各人民委员部及其在前后方各地的机关的所谓“机构上的缺点”。

为了纠正中央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苏维埃政权通常是对犯错误的工作人员采取督促和处分的办法。调查委员会认为这种办法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是完全适当的，但是认为这还不够。工作中缺点的造成，不单是由于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消极疲蹋、敷衍塞责和缺乏责任心，而且还由于一部分工作人员没有经验。调查委员会在各地发现许多十分正直、孜孜不倦、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由于经验不够而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如果苏维埃政权设有专门机构来积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交给那些已经出现的、极愿帮助无产阶级的青年工作人员，那末社会主义俄国的建设就会大大加快并少受许多损失。

上面提到的直属国防委员会的监察—检查委员会应该成为这样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可以补助中央对工作人员的督促工作。

调查委员会　**约·斯大林**

费·捷尔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于莫斯科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十六号◇199◇

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政策

一年前，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中。古老的“辽阔广大的俄罗斯强国”旁边，有许多力图脱离俄国的新兴的小“国”，——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和约只是加深和进一步促进了分裂的过程。人们已经开始说大俄罗斯，而不说俄罗斯了，同时各边疆地区成立的对中部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满怀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府也向苏维埃政府宣战了。

毫无疑问，除此以外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工农苏维埃力图和中部统一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愿望被干涉内政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相反意向所压制并且被压下去了。

当时充当首要角色的奥德帝国主义者巧妙地利用旧俄的分裂，大量供应各边疆地区政府反对中部所必需的一切，占领了某些边疆地区并一般地促进了俄国的彻底分裂。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不愿落在奥德的后面，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当然(当然！)把分裂的罪过推到苏维埃政权身上。但是不难理解，苏维埃政权不能而且也不愿意阻止这种不可避免的暂时分裂过程。苏维埃政权知道，俄国用帝国主义的刺◇200◇刀所维持的强制性的统一，必然会随着俄国帝国主义的崩溃而瓦解。苏维埃政权是不违背自己的本性的，它不能用俄国帝国主义的方法来维持统一。苏维埃政权懂得，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不是随便一种统一，而是兄弟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通过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自愿联盟才能实现，否则就根本不能实现……

奥德帝国主义的溃败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一方面，饱受沦陷灾难的各边疆地区产生了对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其国家建设形式的强烈向往，这种向往压倒了各边疆地区政府分离的挣扎。另一方面，阻碍沦陷区劳动群众表现自己政治面貌的外国武装力量(奥德帝国主义)不再存在了。随后在沦陷区掀起的强大的革命高潮和许多工农民族共和国的成立，使人对沦陷区的政治趋向不再怀疑了。俄国苏维埃政权根据各民族苏维埃政府的请求无条件地承认了已经成立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独立。苏维埃政权这样做是遵守自己久经考验的老政策的，这个政策反对对各民族使用任何强力，要求各民族劳动群众有充分的发展自由。苏维埃政权知道，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相互了解，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各族人民的持久的、牢不可破的联盟。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有忘记再一次责备苏维埃政权，说它有分裂俄国的“新企图”。其中最反动的分子觉察到各边疆地区倾向于中部，就标榜出复兴“大俄罗斯”(当然是用火和剑，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办法)的“新”口号。昨天还企图把俄国分成许多独立反革命基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和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子和柴可夫斯基分子，今天却突然满脑子“全俄国家的”“思想”。昨天还在玩弄分◇201◇裂俄国把戏的英法资本家代理人(不能否认他们有政治敏感)今天却猛然换了一套把戏，一下子就成立了整整两个“全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和南方)。这一切无疑地说明，各边疆地区不可遏止地倾向于中部，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现在都在竭力利用这种倾向。

不用说，在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进行了一年半的革命工作之后，“旧俄国”(当然连同旧制度)复辟者的反革命野心是注定要破产的。而我们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愈空幻，苏维埃政权的完全以俄国各族人民兄弟般相互信任为依据的政策就显得愈现实。不仅如此，在目前国际环境下，这个政策是唯一现实唯一革命的政策。

最近白俄罗斯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55〕关于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联邦关系的宣言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被承认独立的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自愿宣布同俄罗斯共和国建立联盟。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二月三日的宣言中声明："只有一切现在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人民结成自由自愿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和农民在同整个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一切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人民结成自愿的联盟"……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向反复指出的各族人民联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目前正在产生着良好的效果。

此外，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和立陶宛共和国联合，并且认为这两个共和国必须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联邦关系。据电讯，立陶宛苏维埃政府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且在立陶宛所有政◇202◇党中最有威信的立陶宛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也确认立陶宛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有一切理由可以期望：目前正在筹备的立陶宛苏维埃代表大会〔56〕将走同样的道路。

这是苏维埃政权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的正确性的又一个证明。

俄国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从**旧的帝国主义统一的瓦解，**经过**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达到**新的自愿的兄弟的统一。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条最容易走的道路，但是它是导向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持久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唯一道路。

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
"消息报"第三十号
署名：约·斯大林◇203◇

致土尔克斯坦工兵农代表
苏维埃和党组织

随着东部边疆地区的解放，在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面前提出了吸引这些边疆地区各民族劳动群众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的任务。必须提高各劳动阶层的文化水平，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当地语言的文学，使当地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人参加苏维埃组织，吸收他们参加管理边区的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尔克斯坦劳动人民所亲近和爱戴的政权。

应当注意到，土尔克斯坦按地理位置来说是连接社会主义俄国和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桥梁，因此，土尔克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会对整个东方的革命化发生极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上述任务对土尔克斯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提请注意党中央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许多和这封指示信的精神相同的决议，并深信土尔克斯坦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各工兵农代◇204◇表苏维埃的民族事务部门一定能光荣地完成他们所负的任务。

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委员、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于莫斯科

载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民族生活报”第七号◇205◇

两 个 阵 营

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他们的阵营**里**，有美国和英国，法国和日本，他们有资本、武器装备、老练的代理人和富有经 验的行政管理人员。.

在我们的阵营**里**，有苏维埃俄国和一些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欧洲各国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没有资本，没有老练的代理人，没有富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但是有善于在劳动人民心中燃起解放火焰的富有经验的鼓动家。

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整个现代生活的轴心，它构成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活动家当前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

爱斯兰和立陶宛，乌克兰和克里木，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波兰和高加索，以及俄罗斯本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两种力量即力图巩固奴隶制束缚的帝国主义和争取摆脱奴隶制的社会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场所。

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于那些使主人发财致富而给自己铸造压迫镣铐的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但是◇206◇群众的愚昧无知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前进，随着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随着革命运动的扩展，它必然会消失。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但是谁不知道，资本在必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不长久的，不稳固的。

帝国主义的弱点在于它**不**造成灾难，**不**加剧群众失业，**不**进一步掠夺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不**进一步侵占别国的土地，就无力消除战争。问题不在于结束战争，甚至也不在于战胜德国，而在于数十亿战费由

谁来负担。俄国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获得新生，因为它牺牲国内外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消除了战争，它把战费加在直接发动战争的人们身上，剥夺了他们。帝国主义者不能这样做，他们不能剥夺他们自己，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者了。要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消除战争，他们就“不得不”使工人挨饿(由于关闭“亏本的”企业而造成大批群众失业、新的间接税和物价飞涨)，他们就“不得不”掠夺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这一切都在扩大革命的基地，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加速不可避免的崩溃，这还用得着说吗？

三个月以前，被胜利陶醉了的帝国主义以武力相威胁，恫吓说要以大军淹没俄国。苏维埃俄国既“穷困”又“野蛮”，难道它抵挡得住“纪律严明的”、“甚至”打败过以技术装备驰名于世的德国人的英法军队吗？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小事”，他们没有考虑到和平，即使是“屈辱的”和平也必然会破坏军队的“纪律”，唤起他们反对新战争，而失业和物价高涨必然会加强工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运动。◇207◇

结果呢？“纪律严明的”军队原来不适于进行干涉：它害了不可避免的病症——瓦解。曾经夸耀一时的“国内和平”和“秩序”变成了适得其反的国内战争。匆匆忙忙焙制出来的俄国各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府”成了泡影，不适于用来掩盖干涉，这种干涉所追逐的目的当然(当然！)是“人道”和“文明”。至于苏维埃俄国，他们不但没有轻而易举地打败它，甚至认为对它必须作一点让步，邀请它参加太子群岛的“会议”〔57〕。因为红军的胜利、以革命精神感染邻近国家的新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西方革命的发展、各协约国内工兵苏维埃的出现等都不能不发生非常有说服力的作用。不仅如此，事情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妥协的”克列孟梭昨天还拒绝签发参

加伯尔尼代表会议〔58〕的护照并准备一口吞下“无政府主义的”俄国，而今天因为受到革命的一些打击，也就不拒绝利用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纪人考茨基老头子的效劳，派他到俄国来谈判……不，应该说来“调查”了。

真是：

“帝王的刚强，威武的力量，

大言壮语，而今安在？……”〔59〕

这一切变化是在短短三个月中发生的。

我们有一切根据肯定说，今后也将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下去，因为必须承认，在目前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俄国是社会经济生活“正常”、没有罢工和反政府游行示威的**唯一**国家，而苏维埃政府是欧洲现存的一切政府中**最稳固的**政府，并且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这◇208◇同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和威信日益下降成了尖锐的对照。

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抓住最后一个工具——“国际联盟”，力图用纠合各国强盗结成统一同盟的方法来挽回局势。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环境和时代都对他们不利，而对社会主义有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消息报”第四十一号
署名：约·斯大林◇209◇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

随着红军向东部的推进和通往土尔克斯坦的道路的打开，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

俄国东部的居民在成分上不像中部各省那样单纯，使社会主义建设易于进行，在文化上也不像西部和南部边疆地区那样成熟，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而顺利地具有相应的民族形式。东部各边疆地区同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以及俄国中部不同，这里有鞑靼人和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和乌兹别克人，土尔克明人和塔吉克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学上的集团(约有三千万人)，民族成分非常复杂，文化落后，他们不是还没有脱离中世纪，就是不久以前才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这种情况无疑地给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东部的任务方面造成了障碍和一些困难。

除了纯粹属于内部生活性质的障碍，还有一种可以说是外来的“历史”性质的障碍。我们指的是沙皇政府的旨在扼杀东部各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以东部各边疆地区主人自居的俄罗斯商人的贪得无厌，以及不择手段地极力把各伊斯兰教民族拉入正教怀抱的俄罗斯神甫的阴险政策。这些情况给东部各民族造成了不信任和仇恨俄罗斯的一切的心理。

诚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政策无疑地清除了民族仇视◇210◇的气氛，使俄罗斯无产阶级取得了东部各民族的信任和尊敬。并且有一切根据肯定说，东部各民族，它们的觉悟的代表，开始把俄罗斯看做他们挣脱帝国主义镣铐的支柱和旗帜。但是，文化不发达和生活落后的现象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这些现象在东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仍然(将来还会)发生影响。

俄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起草委员会〔60〕正是注意到这些困难，所以

它在草案中声明，在民族自由的问题上，“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民主制”，“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于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留心，特别注意”。

我们的任务是：

(一)竭尽全力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广设学校和教育机关，用周围劳动居民所懂的本族语言开展口头的和文字的苏维埃宣传。

(二)吸引东部的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用一切办法帮助他们建立由拥护苏维埃政权并接近当地居民的人组成的乡、县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三)取消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在内战环境中所造成的各种各样形式上和实际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妨碍东部各民族在摆脱中世纪残余和已经被摧毁的民族压迫残余的道路上发挥最大的主◇211◇动性。

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成为辽阔的东部的被奴役民族所亲近和爱戴的政权。

只有这样才能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在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周围建立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在东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在喀山和乌发，在撒马尔汗和塔什干竖起给受尽苦难的东部各民族照亮解放道路的社会主义灯塔，——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毫不怀疑，肩负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重担的党和苏维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作人员，一定也能够光荣地完成历史交给他们的这个任务。

载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真理报”第四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212◇

两 年 以 来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

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成立。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彼得格勒苏维埃四五百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四五十名。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61〕上勉强得到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票。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是俄国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弱的一个。它的机关报“真理报”〔62〕被看做“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到处受到鄙视。它的演讲员在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时被士兵和工人拉下讲台。列宁同志关于苏维埃政权的著名提纲〔63〕没有被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社会爱国主义派的护国派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处在全盛时期。

同时，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停止，它继续发生着致命的破坏作用，瓦解工业，毁坏农业，破坏粮食供应和运输业，吞噬几万几十万的新生命。

*　　*　　*◇213◇

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三月

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苏维埃政权在中央和各地成立。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土地交归人民所有。建立工人监督。组织赤卫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的企图没有得逞。解散立宪会

议，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破产。赤卫队在南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获胜。被彻底击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到各边疆地区，在那里和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缔结同盟，向苏维埃俄国宣战。

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所有政党中最强大最团结的一个。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就已经获得绝大多数的票(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后来，苏维埃的发展一直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代表总共占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苏维埃，也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士兵苏维埃，而且还有布尔什维克争得大多数的农民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不仅是俄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是俄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那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和都托夫，同克拉斯诺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同奥德帝国主义者和英法帝国主义者拥抱接吻，在俄国无产阶级中间丧尽了威信。

但是，国内这种非常有利的情况被另一种情况削弱和抵销了：俄国在国外还没有同盟者，社会主◇214◇义俄国是被好战的帝国主义汪洋大海所包围的一座孤岛。欧洲工人已经筋疲力尽，遍体鳞伤……而且他们还被战争牵制着，因此，他们没有时间来考虑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摆脱战争的方法等等问题。至于欧洲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们既然已经投效帝国主义者，难道还能不辱骂布尔什维克这些拿“代价很高的”“危险的实验”来“扰乱”工人的“捣乱”分子吗？因此，这个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要求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引导西方(以及东方)工人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和各国革命工人建立经常的联系的趋向特别加强起来，这是并不奇怪的。

* * *

一九一九年二月至三月

俄国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它的领土扩大。建立红军。红军在南部、北部、西部、东部获胜。在爱斯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出现苏维埃共和国。奥德帝国主义被击溃，德国、奥国、匈牙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谢德曼—艾伯特政府和德国立宪会议成立。巴伐利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各地发生政治罢工，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打倒艾伯特—谢德曼！”的口号。英国、法国、意大利发生罢工，出现工人苏维埃。各协约国的旧军队瓦解，产生士兵苏维埃和水兵苏维埃。苏维埃制度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通用形式。欧洲各国的左派共产主义分子日益增多，德国、奥◇215◇国、匈牙利、瑞士诞生共产党。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并配合行动。第二国际瓦解。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64〕并成立世界各国战斗工人的总的战斗机关——第三共产国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孤立状态宣告结束，现在俄国有了同盟者。巴黎的帝国主义“国际联盟”和给它帮忙的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竭力防止欧洲工人被“布尔什维克瘟疫”传染，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苏维埃俄国必然要变成并且确实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手，变成了集结西方和东方先进革命力量的中心。布尔什维主义由“纯粹俄国的产物”变成了动摇世界帝国主义基础的凛然可畏的国际力量。

现在连孟什维克也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再关心”立宪会议，并且丧失了自己的“军队”，渐渐转移到苏维埃共和国阵营中来。

现在连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把立宪会议输给了高尔察克之流和都托夫之流，不得不到苏维埃国家来避难。

* * *

总 结

无产阶级两年的斗争经验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关于右派“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腐朽和第二国际的解体，关于苏维埃制度的国际意义和立宪会◇216◇议口号的反革命性，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意义和战斗的第三国际的必然建立等等预言。

载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
“民族生活报”第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217◇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争仍在进行。民族“自由主义”和“保护”“小”民族，协约国“爱好和平”和“放弃”干涉，要求“废除军备”和“准备”谈判，“关心”“俄国人民”和“愿意”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帮助”俄国人民，——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是遮掩他们加紧给社会主义的敌人运送坦克和弹药的屏风，不过是平常的外交手腕，其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寻找”新的、为“社会舆论”“所能接受的”形式来扼杀社会主义，扼杀“小”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大约四个月以前，盟国帝国主义打败了奥德敌手之后，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武装干预(干涉！)“俄国事务”的问题。不和“无政府主义的”俄国进行任何谈判！把一部分“空出来的”部队调到俄国境内，把他们编入**斯柯罗帕茨基之流和克拉斯诺夫之流、邓尼金之流和比切拉霍夫之流、高尔察克之流和柴可夫斯基之流**的白卫部队里，把革命的策源地苏维埃俄国压在“铁环”之中，——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被革命浪潮冲毁了。卷入革命运动的欧洲工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对武装干预的运动。“空出来的部队”显然不适于用来和革命作武装斗争。而且他们一和起义的工人接触，自己就被布尔什维主义“传染了”。苏维埃军队占领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两地的协约国军队拒绝和工人作战)一事特别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他们所准备的“铁环”，不仅不“可畏”，而且发生了许◇218◇多裂口。因此，直接的、不隐蔽的干涉计划是显然“不适当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劳合—乔治和威尔逊最近才发表了“容许”同布尔什维克谈判

和“不干预”俄国内政的声明，伯尔尼委员会〔65〕才被派赴俄国，协约国理事会才打算邀请(第二次！)俄国一切“实际存在的”政府参加“和平”会议〔66〕。

但是，决定放弃**不隐蔽的**干涉的原因不仅在于此。其原因还在于在斗争进程中策划了新计谋，即新的、隐蔽形式的武装干预，固然这种干预比公开的干预更复杂，但是对“文明的”和“人道的”协约国却更加“方便些”。我们指的是帝国主义匆忙拼凑起来的罗马尼亚、加里西亚、波兰、德国、芬兰等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联盟。固然这些政府昨天还在为了“民族”利益和民族“自由”而彼此厮杀。固然昨天还在到处叫喊罗马尼亚反对加里西亚、加里西亚反对波兰、波兰反对德国的“卫国战争”。但是，同下令停止“内乱”的协约国的钱袋子比较起来，“祖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协约国下令组织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统一战线，他们这些帝国主义的佣仆能不“列队”听命吗？甚至被协约国污辱和践踏的德国政府也丧失了起码的自尊感，央求为了……这个协约国的利益而给予它参加讨伐社会主义的十字军的权利！协约国有一切根据得意洋洋，大谈“不干预”俄国事务，大谈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和平”谈判，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既然有可能利用别人，利用“小”民族来组织用民族旗帜掩盖的而又“完全没有危险的”干涉，那又何必进行对帝国主义“有危险”而且还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公开干涉呢？而罗马尼亚、加里西亚、波兰、德国同俄国进行的战争呢？这本是争取“民族生存”、“保卫东部边界”、反对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罗马尼亚人、加里西亚人、波兰人和德国人◇219◇“自己”进行的战争，——这和协约国有什么相干呢？不错，是协约国供给他们金钱和武器，但是这本是“文明”世界的国际法奉为神圣的普通财政活动。协约国像鸽子一样纯洁，它“反对”干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样，帝国主义就不得不从拔刀要挟的政策，从公开的干涉政策，

转到伪装的干涉政策，即转到把不独立的大小民族拖入反社会主义斗争的政策。

由于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工人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公开的干涉政策遭到了失败。这种政策被革命的社会主义充分利用来揭露了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诉诸最后的后备军即诉诸所谓“小”民族的政策，把这些“小”民族拖入反社会主义战争的政策，归根到底要遭到同样的失败。这不只是因为西方日益增长的革命正不顾一切地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也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小”民族内部的革命运动正不断发展，而且还因为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和俄国的革命工人接触必然会“传染上”布尔什维主义的病菌。社会主义将利用一切可能使这些民族的工人和农民认清帝国主义的“父亲般的关怀”的掠夺性质。

“小”民族被卷入革命，社会主义的根据地扩大，——这就是帝国主义伪装的干涉政策的必然结果。

载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消息报”第五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218◇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67〕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里所谈到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俄国要不要建立一支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

半年前，我们有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是在沙皇的旧军队瓦解之后建立的一支志愿军，它组织得不好，实行集体指挥，并不总是服从命令。那正是协约国开始进攻的时期。军队的成员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于这支志愿军中缺乏纪律，由于并不总是执行命令，由于军队指挥混乱，我们一再遭到失败，把喀山交给了敌人，而克拉斯诺夫则从南方顺利地展开了进攻……事实说明，志愿军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我们不另外建立一支军队，一支充满纪律精神、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并且一接到命令就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那我们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我必须说，那些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221◇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铁的纪律的精神去改造这些分子，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引导他们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使他们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规军。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论反对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论文和演说）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222◇

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

（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报纸纪要）

斯大林同志指出，国家监察部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进行**清**洗和改造的唯一部门，其他一切机关都**清**洗和改造过了。要做到真正的、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监督，报告人认为，应当用充实新生力量的方法来改组现有的国家监察部。必须把现有的各个工人监督机关统一为一个整体，把一切做监督工作的力量都归并到总的国家监察部中去。因此，改组国家监察部的主旨就是使它民主化并接近工农群众。

报告人提出的法令草案〔68〕被一致通过。

载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
“消息报”第七十七号◇223◇

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

我们请读者注意证明去年秋天英帝国主义者野蛮地杀害巴库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干部的两个文件〔69〕。这两个文件的出处是巴库社会革命党人的“劳动旗帜报”〔70〕和巴库的“统一俄国报”〔71〕，也就是那些昨天还向英国人求援，出卖布尔什维克，而现在由于事变的发展竟不得不揭露其昨天的同盟者的人们。

第一个文件叙述巴库市的二十六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邵武勉、查帕里泽、菲奥列托夫、马里根等)被野蛮地枪杀的经过，他们是没有经过审讯和侦查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夜被作为战俘由英国上尉蒂格-琼斯从克拉斯诺沃茨克押往阿什哈巴德的途中被蒂格-琼斯杀害的。蒂格-琼斯同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伙伴本来想要掩盖这一事件，打算发出巴库布尔什维克在监狱或医院中“自然” 死亡的假证明书，但是这个计划显然破产了，原来还有不愿意沉默的见证人，他们准备彻底揭露英国野人。这个文件是社会革命党人蔡金署名的。◇224◇

第二个文件描述一九一九年三月底英国汤姆生将军和第一个文件的作者蔡金的谈话。汤姆生将军要蔡金指出英国上尉蒂格-琼斯野蛮地杀害二十六个巴库布尔什维克的见证人。蔡金准备在由英军统帅部代表、巴库居民代表和土尔克斯坦布尔什维克代表组成侦查委员会的条件下提出文件和指出见证人，同时蔡金要求保证土尔克斯坦的见证人不遭到英国爪牙杀害。由于汤姆生不接受成立侦查委员会的提议，不保证见证人的人身安全，谈话中止，蔡金也就离去。这个文件值得

注意的地方是它间接证实英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不是说出而是喊出英国爪牙的为所欲为和横行霸道，他们残害巴库和里海东岸的“土著居民”，像残害中非洲的黑人一样。

二十六个巴库布尔什维克事件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土耳其军队逼近巴库，而巴库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不顾布尔什维克反对，在拉到苏维埃的多数之后，就向英帝国主义者求援，当时以邵武勉和查帕里泽为首的巴库布尔什维克成为少数之后，就辞去职务，把地盘让给政敌。布尔什维克取得当时在巴库新成立的英国—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政权的同意，决定撤到离巴库最近的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据点彼得罗夫斯克去。但是，巴库布尔什维克及其家属所乘的轮船在去彼得罗夫斯克的途中遭到了追赶他们的英国船只的袭击，并且被押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去。这是八月的事情。

事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曾经几次要求英军统帅部释放巴库同志及其家属以交换英国战俘，但是英军统帅部每一次都避而不答。早在十月间就从个别人士和组织那里得到巴库同志被枪杀的消息。一◇225◇九一九年三月五日，阿斯特拉罕收到梯弗里斯的广播说：“查帕里泽和邵武勉不在英军统帅部手中，据地方消息，他们于九月间在基泽尔—阿尔瓦特附近被一群工人擅自打死了。”显然，这是英国凶手企图把他们的行凶罪过推在无限热爱邵武勉和查帕里泽的工人身上的第一次正式尝试。现在，在上述两个文件公布之后，应当认为已经证实：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并以撤退方式前往彼得罗夫斯克去的我们的巴库同志，确实是没有经过审讯和侦查就被“文明的”和“人道的”英国吃人者枪杀了。

在“文明”国家中常常谈论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手段和骇人行为。并且把英法帝国主义者通常描写成反对恐怖和枪杀的人。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像“文明的”和“人道的”英国人那样卑鄙龌龊地屠杀自己的敌人，只有腐朽透顶和毫无道德的帝国主义吃人者才需要夜

间杀人和强盗式地袭击手无寸铁的对方阵营的政治工作人员，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请他们看一看下面所刊登的文件，辨明是非黑白。

巴库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英国人请到巴库，出卖布尔什维克，是想把英国“客人”作为一种力量来“利用”一下，他们以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然是国家的主人，而“客人”是要回家的。事实上适得其反：“客人”成了绝对的主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为残酷地卑鄙地杀害二十六个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当然参加者，同时社会革命党人又不得不转而采取反对立场，小心翼翼地揭露新来的主人，而孟什维克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巴库“火星报”〔72〕上宣传和布尔什维克结成同盟来反对昨天的“久候之客”。◇226◇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帝国主义爪牙的联盟，是奴隶和仆从同主人的“联盟”，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请他们看一看下面所刊登的汤姆生将军和蔡金先生的“谈话”，并且请他们凭良心说：蔡金先生像不像主人，而汤姆生将军像不像“久候之客”。

载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消息报”第八十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227◇

给希格雷国家监察部特派检查员的电报

在调查发生农民骚动的原因时，除调查该县农民群众的一般政治情绪外，请你注意：

（一）土地科和国营农场管理局在组织国营农场时的政策：是否有过违法征用农民使用的土地来组织国营农场的事情；在组织国营农场时是否发生过其他影响农户物质状况的强迫行为。

（二）土地科在组织集体耕作时的政策：在组织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等等工作中是否有强迫成分；在组织集体耕作时是否有违反当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

（三）糖业总局在征用土地用做甜菜种植场方面的政策：在进行征用土地的工作时是否有侵害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征用的土地是否在农民使用土地方面造成了困难；是否有其他会激起农民愤怒的行为（例如留给各糖厂的土地面积显然超过它们的实际需要，征用从前没有种过甜菜的土地等等）。

（四）还有下面的一些问题：农民骚动是否由于该区土地少而引起的；不劳动者的土地是否已经给农民使用，什么条件；一般在县土地科或它的个别代表的活动中，或者在乡土地股的活动中，是否有因不符合中央命令和因地制宜的要求而足以引起农民愤怒的行为，以及是否有政权不起作用和在◇228◇工作中滥用职权的现象。

把收到电报和采取的措施电告国家监察部。

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229◇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73〕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毫无疑问，部队的调动工作现在比三个月以前进行得好些，但是，我也很清楚，不论总司令或他的参谋长都不了解那些调到彼得堡的部队。因此发生这种料想不到的事：从喀山调来的第二旅或骑兵旅的几个团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现在彼得堡至多只得到六百名真正有战斗力的军校生。

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部队的数量，而在于质量。我们总共只需要三个步兵团(当然是有战斗力的)和一个(至少一个)骑兵团就能把全部匪徒赶到纳尔瓦河对岸。如果你能及时满足这个小小的要求，昨天就把爱沙尼亚人赶走了。

虽然如此，但是可以不必焦急，因为前线情况已经开始稳定，战线已经巩固，而且有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已经向前推进。

今天视察了我们卡列里亚的工事，发现前线一般情况还不错。芬兰人毫无动静，不利用良机，真使人奇怪。但是发生这种怪事的原因，正如知道内情的芬兰同志告诉我们的，是由于芬兰军队内部愈来愈不稳定。

今天我看到总司令关于因燃料恐慌而要缩小舰队的建议。我和我们所有的海军工作人员曾经就此事开会讨论，结果使我深信总司令的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大军舰如果变成漂浮的木筏，那就不能使用炮，就是说，炮根本不能发射，因为舰艇的运动和炮的发射有直接关系；第二、说我们没有大口径炮弹，这是不对的，最近

“发现了”十二驳船的炮弹；第三、燃料恐慌将要过去，因为我们已经积蓄了四十二万普特的煤，重油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且我们每天还能运到一列车煤；第四、我深信，我们的舰队将变成一支拥有守纪律并决心全力保卫彼得格勒的水兵的真正舰队。

我不想在这里说出已经准备好的战斗单位的数量，但是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我们以现有的海军力量能够光荣地捍卫住彼得格勒，使它免受来自海上的任何侵犯。

因此，我和彼得堡的全体同志都坚决主张否定总司令的建议。

其次，我认为在三四个星期内每天运来两列车煤是绝对必要的。据我们的海军工作人员说，这将使我们的潜水舰队和水上舰队有充分可能完全动作起来。

斯大林

写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九年
彼得格勒英勇保卫战文献”
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231◇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74〕。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为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三〇一号◇232

自彼得格勒给弗·伊·列宁的直达电报稿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我认为必须请你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点。高尔察克是最严重的敌人，因为他有足够的退却地域，有充分的补充军队的人力，有粮食充足的后方。和高尔察克比较起来，罗将柯将军是一只苍蝇，因为他的后方没有粮食，又没有退却地域，也没有充足的人力。由于人力不足，现在他不得不在他的两三个县内动员二十岁的人参军，这种动员一定会把他送进坟墓，因为农民受不了这种动员，他们必然要摈弃罗将柯。因此，从东方战线给彼得格勒战线抽调军队的数量**无论如何**不应该迫使我们停止东方战线的进攻。把罗将柯逼到爱斯兰边境(我们用不着再前进)，有一个师就够了，抽调一个师不致使东方战线停止进攻。请特别注意这一点。

第二点。在喀琅施塔得地域发现了一个大阴谋。整个喀琅施塔得筑垒地域所有炮台的指挥员都参与了阴谋。阴谋的目的是：夺取要塞，使舰队屈服,向我军后方开火，给罗将柯扫**清**去彼得堡的道◇233◇路。我们手中已经掌握有关文件。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罗将柯狂妄无度地竟敢用较小的兵力进攻彼得堡。也明白了为什么芬兰人那样蛮横无礼。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指挥军官纷纷投敌。也明白了红丘炮台叛变时英国军舰就消失不见了的奇怪现象。显然，英国人认为直接干预这件事(干涉！)不“方便”，等以后，在要塞和舰队　入白军手中之后，再出来“帮助俄国人民”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显然，罗将柯和尤登尼奇(英国通过意大利、瑞士、丹麦等国使馆所资助的这一阴谋的全部线索都是他一手牵着)的全部计谋是以这一阴谋的成功为基础的，我想这个阴谋在刚萌芽时就被我们扼死了(一切有关人员都被逮捕，侦查在继续进行)。

我的请求：对被逮捕的使馆人员不要丝毫放松，把他们严密看管起来，直到侦查结束为止，因为在侦查中已经发现很多新线索。

如果你不反对，我想过三四天到莫斯科去一天，那时再详细奉告。

寄上地图一张。过去未能寄出,只是因为一直出外料理战线事务，多半是在前线。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晨三时

第一次载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三号◇234◇

关于彼得格勒战线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斯大林同志日前从彼得格勒战线回来，向本报记者发表了他对前线情况的印象。

一、彼得格勒接近地

彼得格勒接近地是这样一些据点，敌人从这些据点出发，在顺利的情况下可以合围彼得格勒，使它和俄国隔离，并最后把它占领。这些据点就是：(甲)彼得罗查沃茨克地段，进攻方向是兹万卡，目的是从东面包围彼得格勒；(乙)奥洛涅茨地段，进攻方向是洛捷诺叶波列，目的是进入我彼得罗查沃茨克部队的后方；(丙)卡列里亚地段，进攻方向直指彼得格勒，目的是从北面夺取彼得格勒；(丁)纳尔瓦地段，进攻方向是加特契纳和红村，目的是从西南占领彼得格勒，或者至少占领加特契纳—托斯诺一线，从西南包围彼得格勒；(戊)普斯可夫地段，进攻方向是德诺—鲍洛果叶，目的是切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联系；(己)芬兰湾和刺多牙湖，它们使敌人有可能从彼得格勒的西面和东面登陆。◇235◇

二、敌军兵力

敌人在这些地段的兵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在彼得罗查沃茨克地段活动的有塞尔维亚人、波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和一群俄国白卫军官。他们全都是依靠所谓盟国来供养的。在奥洛涅茨地段的是芬

兰政府根据为期两三个月的合同雇佣的芬兰白军。领导芬兰白军的是德国撤退时留下来的德国军官。驻在卡列里亚地段的是芬兰的所谓正规部队。驻在纳尔瓦地段的是从俄国战俘中征募来的俄国部队和从当地居民中征募来的英格尔曼兰部队。领导这些部队的是罗将柯少将。驻在普斯可夫地段的也是由战俘和当地居民组成的俄国部队，领导这支部队的是巴拉霍维奇。在芬兰湾活动的有雷击舰(五艘至十二艘)和潜水舰(两艘至八艘)，根据一切情报来看，这是英国和芬兰的。

一切情报都说明，敌人在彼得格勒战线的兵力并不大。敌人活动最积极的地段——纳尔瓦地段对战斗“人力”的缺乏并不亚于其余活动不大积极的、虽然是同样重要的地段。

其实也正是这个缘故，尽管“泰晤士报”(《Times》)〔75〕还在两个月以前就高奏凯歌，说“过两三天”彼得格勒就会陷落，可是敌人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总目的——合围彼得格勒，而且在这个期间连一个局部的地段任务即占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显然，以待在芬兰的尤登尼奇将军为首的喧嚣一时的“西北军”目前还没有孵出来，老狐狸古契柯夫在给邓尼金的报告中是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西北军”身上的。◇236◇

三、敌人的如意算盘

根据一切情报来看，敌人指望的不仅仅是自己本身的力量，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指望自己本身的力量，不如说是指望自己的伙伴——在我军后方即彼得格勒的以及在各战线上的白卫分子的力量。首先是设在彼得堡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大使馆(法国的、瑞士的、希腊的、意大利的、荷兰的、丹麦的、罗马尼亚的等等)，这些大使馆资助白卫分子并且为尤登尼奇和英国、法国、芬兰、爱沙尼亚等资产阶级从事间谍活动。这班先生们到处花钱，在我军后方收买一切可

以收买的人。其次是一部分卖身投靠的俄国军官，他们忘掉了俄国，丧失了良心，甘愿投到工农俄国的敌人方面去。最后是受到过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打击的旧时人物即资产者和地主，他们收藏武器(据后来发现)，等待适当机会打击我军后方。敌人进攻彼得格勒就是指望这些力量。占领红丘炮台这个喀琅施塔得的门户，从而使筑垒地域瘫痪，在各炮台掀起暴动并炮击彼得格勒，以便趁普遍惊慌时把前线的总进攻和彼得格勒的暴动结合起来，随后合围并占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敌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这样。

四、前线的情况

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如愿以偿。由于内部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变而被敌人占领一昼夜◇237◇的红丘炮台，在波罗的海水兵从海陆两面猛烈攻击之下很快就重归苏维埃俄国了。由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护国派和一部分卖身投靠的军官的叛变而一度发生动摇的喀琅施塔得的各筑垒据点，已经被波罗的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铁腕迅速整顿好了。所谓大使馆官员和他们的间谍已经被捕，并且押往比较安静的地方，同时在某些大使馆中搜出了机关枪、步枪(罗马尼亚大使馆甚至有一门炮)、秘密交换机等等。对彼得格勒资产阶级住宅区进行了挨户搜查，搜出了四千枝步枪和数百枚炸弹。

至于敌人的总进攻，它不但没有像“泰晤士报”叫喊的那样获得胜利，甚至没有来得及开始。在奥洛涅茨附近力图占领洛捷诺叶波列的芬兰白军已经被击溃并被赶入芬兰境内。驻扎在离彼得罗查沃茨克几俄里地方的敌方彼得罗查沃茨克部队，在抄到他们后方的我军猛攻之下正迅速败退。敌人的普斯可夫部队失去了主动，阻留在一个地方，在某些地方甚至后退了。至于敌人最积极的纳尔瓦部队，它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在我军猛攻下节节败退，在退往杨堡的路上，

受到红军打击正在瓦解溃散。可见协约国的凯歌未免奏得太早了。古契柯夫和尤登尼奇的愿望没有实现。卡列里亚地段仍取守势，关于它暂时还不能说什么，因为芬兰政府在维德里查工厂〔76〕遭到失败以后，显然降低了声调，停止了对俄国政府的辱骂，而所谓卡列里亚战线的冲突事件也差不多完全停止了。

这是不是暴风雨前的寂静，只有芬兰政府知道。不管怎样，我可以说，彼得格勒准备迎接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五、舰 队

关于舰队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们应该庆贺：被认为已经毁灭的波罗的海舰队，正在最有成效地恢复着。这一点不仅朋友承认，连敌人也承认。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一部分俄国军官身上的痈疽(他们的卖身投靠)对波罗的海舰队指挥人员的遗害非常小，因为毕竟有人还有气节,把祖国的尊严和独立看得比英国的黄金宝贵。更使人高兴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恢复了旧日的光荣，在自己的英勇行动中重新表现出俄国革命舰队的优良传统。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守住彼得格勒，使它免遭来自海上的最危险的突然事变。六月间我们的两艘雷击舰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和三艘潜水舰进行了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由于水兵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作战队队长的巧妙指挥，我们的雷击舰获得了胜利，击沉了敌人的一艘潜水舰，这是我们舰队复兴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六、总 结

人们时常拿罗将柯和高尔察克对苏维埃俄国威胁的程度来作比较，一般认为罗将柯的危险不亚于高尔察克。这种比较是不对的。高尔察克确实是危险的，因为他有退却地域，有人力补充军队，有粮食供养

军队。罗将柯和尤登尼奇的不幸在于他们既缺乏退却地域，又缺乏人力，也缺乏粮食。当然，芬兰和爱斯兰是用俄国战俘编制白卫部队的一种基地。但是，第一、战俘不能为白卫部队提供足◇239◇够的和完全可靠的人力。第二、由于芬兰和爱斯兰的革命酝酿日益发展，这种情况本身是不能为编制白卫部队提供有利条件的。第三、罗将柯和巴拉霍维奇所占领的地域(总共不过两个县)逐渐地、不断地缩小，而喧嚣一时的“西北军”，即使它一定会产生，那也很快就会没有扩展和活动的地方。因为必须承认这一点：无论芬兰，或爱斯兰，至少目前不能把“自己的地域”让给罗将柯—巴拉霍维奇—尤登尼奇。没有后方的军队，——“西北”军就是这样。不用说，这样的“军队”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新的、严重的、对敌人有利的国际性事件的话。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敌人没有任何根据指望发生这种事件。

彼得格勒附近的红军必定胜利。

载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

“真理报”第一四七号◇240◇

向弗·伊·列宁
报告西方战线情况的信〔77〕

列宁同志：

西方战线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第十六集团军的筋疲力尽的旧部队正受到西方战线活动最积极的敌人——波兰军队的围攻，它不仅受不住猛烈攻击，不仅不能防御，而且失去了掩护炮兵连撤退的能力，这些炮兵连自然就落入敌人手中了。既然第十六集团军各部队已经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担心它在向别列季纳河退却的过程中会把炮和辎重丢干净。还有一种危险：大多数团队中的干部已经筋疲力尽，士气非常沮丧，他们很快就会无力同化补充的兵员，而补充兵员的开到，应当指出，又慢得惊人。

敌人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向别列季纳河方面进攻：一路沿着通向波利索夫的路线，另一路沿着通向斯卢茨克—鲍勃鲁伊斯克的路线。敌人的进攻很顺利，因为他们已经向波利索夫推进了约三十俄里，在南面，他们占领斯卢茨克以后，就控制了鲍勃鲁伊斯克的门户——该地域唯一的一条宽阔的公路。

如果敌人占领波利索夫，而第十六集团军的筋疲力尽的第十七师可能因此后退，那末第十五集团军就会遭到打击，波洛茨克和得文斯克就会受到直接威胁。如果敌人占领鲍勃鲁伊斯克并向列契◇241◇查(这是敌人直接攻击的目标)突击，那末第十六集团军的整个普利皮亚特部队即第八师就会自行崩溃，同时哥美里就会处于敌人的直接打击之下，第十二集团军的侧翼就会暴露。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让敌人击溃我们的第十六集团军（敌人已在

这样做），就会因此牵累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那时需要整顿的就已经不是一个第十六集团军，而是整个战线，并且花费的代价要大得多。

显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和去年东方战线所处的情况大致相似，当时瓦采齐斯和柯斯嘉也夫让高尔察克先击溃第三集团军，接着击溃第二集团军，然后击溃第五集团军，这样就毫无必要地使整个战线的情况恶化了整整半年。

有一切可能使这种前途在西方战线也成为现实。

以前我已经报告过，西方战线是个烂摊子，没有现成的预备队就不可能把它整顿好，只要敌人在一个重要据点给我们一个严重打击，整个战线就会动摇，确切些说，就会崩溃。

很遗憾，我的这些忧虑现在已经开始得到证实。

同时，在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的西方敌人还没有调用他们在里加、华沙和基什涅夫已经准备好或差不多准备好的**俄罗斯**军。

三个星期以前，我认为只要有一个师就足以展开进攻并占领莫洛杰奇诺和巴拉诺维奇这两个交通枢纽。现在用一个师也许连守住波利索夫—鲍勃鲁伊斯克—莫泽尔一线都不够了。◇242◇

关于胜利的进攻，想都不能想了，因为目前(八月十一日)要这样做至少需要两三个师。

现在请你自己决定：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师，即使分旅调来也好，否则就要让敌人消灭本来已经瓦解的第十六集团军了。但请迅速决定，因为每小时都是宝贵的。

你的 **约·斯大林**

附言：这封信经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包括西线司令员在内）看过并同意。类似的报告最近就可以寄给共和国革命军事

委员会。

约·斯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于斯摩棱斯克

第一次刊印◇243◇

自南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78〕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列宁同志！

大约两个月以前，总司令在原则上是不反对经过顿巴斯从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的。但他所以终究没有进行这样的突击，是因为他拿南线军队夏季退却后留下来的“遗产”为借口，即借口目前东南战线地域的军队部署已经自发地形成，要变更部署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会对邓尼金有利。**仅仅**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反对已经正式确定的突击方向。但是，目前的情况和与之有关联的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变化：第八集团军(过去南方战线的基本兵力)转到南方战线地域并直指顿巴斯；布琼尼的骑兵军(另一基本兵力)也转到南方战线地域；增加了新力量——拉脱维亚师，这个师经过一个月的休整后，又会成为邓尼金望之生畏的力量。

可见旧的部署(“遗产”)已经不存在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总司令(大本营)坚持旧计划的呢？显然，只是一种固执，也可以说，就是派别成见，最愚蠢和对共和国最危险的派别成见，这种派别成见是斗鸡式的“战略家”古谢夫在总司令部里培植起来的。前几天总司令给绍林下令，要他从察里津地域经顿河草原向诺沃罗西斯克进攻；这条路线对我们的飞行员也许是方便的，但是我们的步兵和◇244◇炮兵根本无法通过。用不着证明，这种在**敌视**我们的环境，在完全**无路可行**的条件下的荒谬的(预定进行的)进军，使我们有完全瓦解的危险。不难了解，这种向哥萨克村镇的进军，正像不久以前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只能使哥萨克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村镇而团结在邓尼金周围来反对

我们，只能使邓尼金显得是顿河区的救星，只能给邓尼金建立哥萨克军队，就是说，只能加强邓尼金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必须毫不迟缓地立即改变已经被实践摈弃的旧计划，用从沃龙涅什地域经哈尔科夫—顿巴斯向罗斯托夫进行主要突击的计划来代替它。第一、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敌视我们的环境，相反地，是同情我们的环境，这会便于我们向前推进。第二、我们将获得最重要的铁路网（顿巴斯铁路网）和邓尼金军队得到补给的主要命脉即沃龙涅什—罗斯托夫铁路（没有这条铁路，哥萨克军队冬季就得不到补给，因为顿河军队的补给线——顿河将要封冻，而东部顿巴斯的里哈亚—察里津铁路将被切断）。第三、我军这样推进能把邓尼金的军队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志愿军，把它留给马赫诺去吃掉；另一部分是哥萨克军队，使它受到后路被抄的威胁。第四、我们将有可能使哥萨克和邓尼金发生纠纷，因为邓尼金在我们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一定会极力设法把哥萨克部队向西移动，而大多数哥萨克是不会同意的，当然，如果那时我们向哥萨克提出和平问题，提出和平谈判等问题的话。第五、我们会得到煤，而邓尼金却得不到煤了。

采用这个计划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总司令的调动和分配团队的计划有使我们最近在南方战线的胜利化为乌有的危险。更不用说大本营根本不理会党中央和政府最近通过的“一切为了南方战线”的◇245◇决议，实际上这个决议已经被它取消了。

简单地说，已经被实际生活摈弃的旧计划无论如何不应当再采用了，——这样对共和国是危险的，这样一定会使邓尼金的状况改善。应当用另一个计划来代替它。情况和条件不仅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而且无条件地要求这种代替。到那时团队的分配也要按照新方式来进行了。

不这样做，我在南方战线的工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罪恶的、不

必要的工作了，这就给我权利，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就是要我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魔鬼那里去，只是不要留在南方战线。

你的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于谢尔普霍夫

第一次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三〇一号◇246◇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协约国和邓尼金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反革命的主要支柱——什库罗骑兵军和马蒙托夫骑兵军，在沃龙涅什附近的战斗中被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军彻底粉碎了。沃龙涅什已经由红色英雄占领。缴获大批战利品，现正清查统计中。已经查明，以什库罗将军号装甲火车为首的所有以人名命名的敌军装甲火车全被缴获。残敌现正继续追击中。马蒙托夫和什库罗的无敌将军的威名已经被布琼尼同志骑兵军的红色英雄们的英勇精神彻底埋葬了。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载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彼得袼勒真理报”第二四四号◇247◇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宣告东部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79〕开幕。

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在这期间，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个是西欧和美洲的革命化，共产党在西方的诞生；第二个是东方各民族的觉醒，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在那里，在西方，无产者大有消灭帝国主义列强的先锋队并夺取政权之势。在这里，无产者大有摧毁帝国主义的后方——东方这个财富的泉源之势，因为东方是帝国主义建立财富的基础，东方是帝国主义汲取力量的泉源，是他们一旦在西欧被击溃时的退路。

一年以前，在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曾经以紧紧包围苏维埃俄国相威胁。现在看来，它自己被包围了，因为它无论在侧翼或后方都受到了打击。一年以前，东部各伊斯兰教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248◇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曾宣誓要尽一切力量把东部各民族从沉睡中唤醒，在西方革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现在来看这个工作，可以很满意地肯定说，这个革命工作并没有落空，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自由的扼杀者的桥梁已经建立起来了。

最后，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红军能如此神速地进入东部，当然，代表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现在，通往东部的道路已经打开了，革命也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在最近期间完成这一工作

的我们代表同志们的极大努力。

东部的事变所以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发展速度，只能是因为东部各伊斯兰教民族，首先是鞑靼、巴什基里亚、柯尔克兹等民族以及土尔克斯坦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的团结一致。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都胜过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深信，它一定能够把已经开始了的唤醒东部各民族和巩固西方与东方之间已经架起的桥梁的工作继续下去，一定能够使劳动群众摆脱帝国主义世世代代压迫的工作继续下去。

我们希望，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人员把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举起的解放东部劳动群 众的旗帜，消灭帝国主义的旗帜光荣地高举到最后胜利。（鼓掌）

载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民族生活报”第四十六号◇249◇

南方战线给彼得格勒的致敬电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你们的祝贺和你们约许赠送红旗给南方战线各团队表示同志的感谢。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不会忘记彼得格勒最先援助了南方战线，派来了数千名经过战斗锻炼的先进工人，他们鼓舞了我们各师的胜利信心，并且完全改变了我们战线的面貌。

南方战线最近的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些工人——红色彼得格勒的优秀儿女。

同志们，请你们相信，南方战线的军队决不会辜负俄国无产阶级的期望，一定会把你们赠送的旗帜光荣地高举到最后胜利。

基辅和库宾斯克已经被我们占领，红旗飘扬在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上空的日子不远了。

向彼得格勒的工人致敬，向光荣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致敬！

斯大林

载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彼得格勒真理报”第二八九号◇250◇

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

一　协约国计划的失败

一九一九年春天，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拟定了联合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高尔察克应该担任主要突击，邓尼金希望和高尔察克在萨拉托夫会师，以便共同从东面进攻莫斯科。尤登尼奇担任辅助突击——进攻彼得格勒。

进军的目的在古契柯夫给邓尼金的报告里是这样规定的："夺取布尔什维主义的生命攸关的主要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一举而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在邓尼金给高尔察克的信里约略地叙述了这个进军计划。这封信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格里申—阿尔马佐夫司令部被我军夺获的时候得到的。邓尼金写信给高尔察克说："主要的是不要停留在伏尔加河，而是继续向前打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心脏——莫斯科。我希望和你在萨拉托夫会师……波兰人自有活动，至于尤登尼奇，他已经准备好了，将立刻进攻彼得格勒……"◇251◇

在春天，当高尔察克向伏尔加河的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邓尼金是这样写的。

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高尔察克被赶过乌拉尔。邓尼金被阻于谢伊姆河—里斯基—巴拉朔夫一线。尤登尼奇被压到杨堡以西。

苏维埃俄国仍然完整无缺。

但是协约国的吃人者并没有死心。一九一九年秋天，拟定了新的歼灭性的进军计划。自然，高尔察克已经不算数了。重心从东部移到南部，邓尼金应该从南部施行主要突击。尤登尼奇和春天一样担任辅

助突击——再一次进攻彼得格勒。前志愿军司令迈-马耶夫斯基将军在占领奥勒尔的第二天在他的演说中说，他和他的部队将“不迟于十二月底，在一九一九年圣诞节以前”进入莫斯科。

邓尼金匪徒竟狂妄自信到这种程度：顿巴斯的资本家还在十月间就宣布以百万卢布奖金(尼古拉货币)奖赏给志愿军中第一个进入莫斯科的团……

但是命运注定这个计划也要破产。邓尼金的军队被赶过波尔塔瓦—库宾斯克—切尔特柯沃一线。尤登尼奇被击溃并被赶过纳尔瓦河。至于高尔察克，在诺沃尼古拉也夫斯克附近被击溃以后，他的军队只不过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回忆而已。

这一次俄国仍然完整无缺。

反革命的这次失败是如此意外和突然，以致那些战胜了德帝国主义的协约国的老狼们不得不公开宣称：“用武力不能战胜布尔什维主义。”而帝国主义的卫护者甚至惊惶得失去了寻找反革命失败◇252◇的真正原因的能力，他们把俄国忽而比做“流沙”，说“最优秀的统帅”在那里也必然要失败，忽而比做“大沙漠”，说任何“精锐部队”到了那里也一定要灭亡。

二 反革命失败的原因

反革命首先是邓尼金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甲)反革命军队的**后方不稳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没有稳固的后方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邓尼金的后方(高尔察克的后方也是一样)是十分不稳固的。反革命军队的后方不稳固这一事实是由建立这些军队的邓尼金—高尔察克政府的社会性质决定的。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不仅带来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而且还带来了英法资本的**枷**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胜利就是俄国独立的丧失，就是俄国变成英法钱袋子

的奶牛。从这一方面来说，邓尼金—高尔察克政府是极端反人民反民族的政府。从这一方面来说，苏维埃政府是唯一人民的和唯一民族的(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的)政府，因为它不仅使劳动者从资本压迫下获得解放，而且还使整个俄国从世界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使俄国从殖民地变成独立自由的国家。

邓尼金—高尔察克政府及其军队既不能受到俄国广大居民阶层的尊重，也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难道还不明显吗？◇253◇

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不可能有强烈的胜利愿望和奋发的热情，而没有这些就决不能取得胜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后方日趋瓦解，前线的基石日趋崩溃，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政府是奴役俄国人民的政府，是广大居民阶层最不信任的政府。

苏维埃部队的后方日益巩固，全力支持着红色前线，因为苏维埃政府是解放俄国人民的政府，是广大居民阶层最信任的政府。

(乙)反革命**处在边疆地区**。还在十月革命开始的时候，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某种地理界限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而在内战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革命地区和反革命地区就完全确定了。俄国内地成了革命的根据地，这里有工业和文化政治的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的民族成分是单一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而俄国的各边疆地区，主要是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则成了反革命的根据地，那里没有工业和文化政治的重要中心，居民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一方面包括享有特权的哥萨克殖民者，另一方面包括没有充分权利的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在东部)、乌克兰人、彻岑人、英谷什人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民族。

不难理解，俄国的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形成这样的地理区划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除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谁又能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呢？除了本来就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享有特

权并形成军人阶层、早就在边疆地区剥削非俄罗斯民族的哥萨克，还有谁能成为邓尼金-—高◇254◇尔察克反革命势力的支柱呢？

不会有任何其他“地理区划”，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然而这种情况所引起(而且将继续引起)的结果是：必然给反革命造成一系列致命的不利条件，也必然给革命造成一系列有利条件。

在残酷的内战时期作战的军队，要获得胜利，就绝对需要它所赖以取得人力补充和物力支持的当地居民的团结一致，而这种团结可能是民族的(特别是在内战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阶级的(特别是在内战展开的时候)。没有这种团结就不可能有长期的军事胜利。而问题也正是在这里，俄国各边疆地区(东部的和南部的)不论在民族方面或在阶级方面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提供哪怕是当地居民的最起码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要获得重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在东部)、卡尔梅克人、彻岑人、英谷什人、乌克兰人(在南部)的民族愿望和邓尼金—高尔察克的纯俄罗斯的专制统治之间能有什么**民族**团结呢？

其次，在乌拉尔、奥连堡、顿河、库班的享有特权的哥萨克和边疆地区其余一切居民(包括一向备受邻近哥萨克压迫和剥削的俄罗斯“外乡人”)之间能有什么**阶级**团结呢？

由这样一些不同民族的分子组成的军队一受到苏维埃军队的严重打击就必然瓦解，而每一个这◇255◇样的打击就必然会加强俄国边疆地区的非哥萨克人对根本没有大国野心而且愿意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的苏维埃政府的向往，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和边疆地区相反，俄国内地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第一、它在民族方面是单一的和团结的，因为这里十分之九的居民是大俄罗斯人。第二、由于在当地居民中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民中享有威信并把农民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因而使支持苏维

埃军队前线和直接后方的居民易于达到阶级团结。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俄国的后方和前线会有这种惊人的联系：只要苏维埃政府一发出支持前线的号召，俄国转瞬间就会出现整批整批的新部队。而高尔察克—邓尼金政府是永远也不能以此来炫耀的。正是应该在这里寻找苏维埃俄国在紧急关头所常常表现的那种惊人力量和无比坚韧的泉源。正是应当在这里寻找协约国有教养的术士们所不能理解的下述事实的解释：“反革命部队进到一定的地方（进到俄国内地！）就必然遭到毁灭……”

但是，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反革命首先是邓尼金失败的远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近因(我们主要是指南方战线)。

这就是：

(一)苏维埃南方战线的预备队和补充兵员的工作改善了。◇256◇

(二)供给工作改善了。

(三)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依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大批共产党员工人涌向前线，加入了我们的南线团队，因而完全改变了南线团队的面貌。

(四)以前因马蒙托夫的袭击而完全破坏的指挥机关整顿好了。

(五)南线统帅部在进攻时巧妙地采用了侧翼突击。

(六)进攻本身有条不紊。

三　南方战线的目前情况

邓尼金所有部队中力量最强的要算是志愿军(步兵)及什库罗和马蒙托夫两个骑兵军(骑兵)。志愿军最精锐，它们团队里有大量后备基干军官。志愿军的任务是占领莫斯科，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骑兵的任务是突破并摧毁我南线军队的后方。

我们步兵的最初几次决定性胜利是在奥勒尔附近，即克罗梅—德

米特罗夫斯克地域的战斗中显示出来的。我们的步兵在这里击溃了志愿军的第一军(最精锐的一个军)，即库捷波夫将军的一个军，其中包括科尔尼洛夫师、德罗兹多夫师、马尔柯夫师和阿列克谢也夫师。

我们骑兵的最初几次决定性胜利是在沃龙涅什附近，即伊柯列茨河—乌斯曼河—沃龙涅什河—◇257◇顿河地域的战斗中显示出来的。布琼尼同志的骑兵部队在这里同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联合军初次短兵相接，一接触就把他们打败了。

我们在奥勒尔和沃龙涅什附近的胜利给我军全面向南推进打下了基础。在基辅、哈尔科夫、库宾斯克和里斯基附近的胜利不过是奥勒尔和沃龙涅什附近的主要胜利的结果和发展。现在志愿军正在我军面前狼狈退却，它失去了联系和指挥，伤亡和被俘人数占原有人员半数以上。可以确信地说，如果不撤到后方并大加休整，它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战斗力。

至于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骑兵部队，尽管它用两个新的库班军(乌拉盖将军和纳乌缅柯将军的两个军)和切斯诺柯夫将军的一个骑兵混合师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对于我们的骑兵还不能成为严重的威胁。不久以前在里西昌斯克附近的战斗就是一个证明，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加强骑兵兵团在那里被我们的骑兵彻底打垮，就地遗弃了十七门炮，八十挺机关枪，一千余具尸体。

当然不能说邓尼金的军队已经被消灭了。邓尼金军队还没有瓦解到高尔察克军队的瓦解程度。邓尼金目前还能玩弄一些策略诡计，也许还能玩弄一些战略诡计。也不要忘记，在十个星期中我们从邓尼金手中总共只缴获了大约一百五十门炮，六百挺机关枪，十四列装甲火车，一百五十台机车，一万节车厢，一万六千名左右俘虏。但是有一点总是毫无疑问的：**邓尼金的军队正不可遏止地步着高尔察克军队的后尘急转直下**，而**我们的军队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则日益加强**。

彻底消灭邓尼金的保证就在这里。◇258◇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谢尔普霍夫

载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

附言〔80〕：这篇文章是我军在塔干罗格附近突破邓尼金战线之前写的。文章措辞谨慎，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但是现在，邓尼金战线已经被突破；志愿军各师同邓尼金的顿河和高加索的军队的联系已经被切断；在塔干罗格接近地所进行的两天战斗(一月一日至二日)中，我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二百多门炮、七列装甲火车、四辆坦克和大批其他战利品；我军在解放塔干罗格之后包围了反革命的策源地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因此现在可以确信地说，邓尼金的军队在加速崩溃。

再来一次突击，全部胜利就有保证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于库尔斯克

载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革命战线”杂志创刊号
署名：约·斯大林◇259◇

给乌克兰劳动军的命令

（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军总司令调字第二一四七号和参字第一二三号训令及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七一号命令，第四十二师自三月七日起编入乌克兰劳动军〔81〕。

勇敢的第四十二师，过去和本战线其他各师并肩同俄国的敌人英勇作战，并且同他们一起彻底击溃了邓尼金的志愿军，而现在则必须放下武器，投入消除经济破坏的战斗，保证给国家供应煤炭。

第四十二师的指挥员们！在对邓尼金的战斗中，你们善于率领红军战士从胜利走向胜利，而现在你们一定要证明，在同煤炭恐慌进行斗争中，你们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

第四十二师的政治委员们！在战场上你们善于使红军战士保持模范的秩序和纪律，而现在你们一定要证明，在为获得煤炭而进行的斗争中，你们也能保护劳动纪律的神圣旗帜不被玷污。

第四十二师的红军战士们！你们善于忠诚地忘我地同工农俄国的敌人作战，而现在你们一定要证明，你们也能同样忠诚地忘我地劳动，把煤炭运到车站，装入车厢，护送到指定的地方。

要记住，煤炭对于俄国同战胜邓尼金一样重要。◇260◇

乌拉尔的第三集团军各团在采伐和运输木柴的工作中成绩卓著。伏尔加河流域的后备军各围在修理机车和车厢的工作中已经使自己满身荣光。第四十二师必须表明自己不落人后，保证为国家做好运煤、装煤和送煤工作。

这就是工农俄国期待于你们的。

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第一次载于一九四〇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三期◇261◇

在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82〕上的讲话

(一九二〇年三月日至二十三日)

一　代表会议的开幕词

(三月十七日)

同志们！以前摆在你们乌克兰前后方共产党员面前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制止波兰人的进攻，粉碎佩特留拉和驱逐邓尼金。现在这个任务胜利地完成了，这一点不但朋友承认，而且敌人也承认。

现在，当乌克兰已经从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邓尼金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另一个同样重要和复杂的任务——恢复乌克兰被破坏的经济。毫无疑问，你们战胜了邓尼金，也一定能够战胜破坏，你们一定会拿出全部力量，拿出共产党员特有的那种充沛精力来减轻破坏和帮助北方的同志。◇262◇

北方已经有了开始执行这个任务的迹象。劳动军的通报上说，机车和车厢的检修工作日益进展，燃料的开采量日益增加和提高。乌拉尔的工业也在发展并欣欣向荣。我相信，你们仿效北方同志们的榜样会获得同样的成绩。

共产党员一定能胜利地解决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党是团结的、统一的、忠于事业的，而且我们党还有高于这一切的格言："死也要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只有依靠纪律和团结，党才能顺利地调派成千的工作人员到各省各区去。这种纪律和团结过去使我们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现在使我们有希望也能战胜第二个敌人——破坏。

二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

（三月十九日）

我必须谈谈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

一年前，当我们的联邦被国际帝国主义者资助的军队紧紧包围着的时候，国防委员会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建设工作都　上了支持前线巩固前线的轨道。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国防委员会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一年内，我们的凶恶敌人被击退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基本上被粉碎了。这样，切实执行“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63◇

大约两个月以前，国防委员会提出了另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就是说，必须按新规范即经济规范来改组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必须把一切人力投入经济方面。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再没有军事任务了。协约国曾经两次企图消灭苏维埃联邦俄国：第一次依靠高尔察克从东面进攻，第二次依靠邓尼金从南面进攻。可是都失败了。看来，现在正在策划新的进攻，从西面进攻。协约国并没有愚蠢到不去利用波兰小贵族的力量，哪怕是为了阻挠我们联邦进行新的建设工作。此外，我们还不知道，德国政变〔83〕在最近将造成怎样的前途。很清楚，西方正孕育着某些新的然而是十分明显的纠纷。因此决不能说，既然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工作转到恢复国民经济上去，那末我们就可以抛开军事任务了。不过，主要的口号总应该是主要的。

国防委员会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究竟为什么提出新的口号呢？同志们，这是因为在粉碎了国外敌人以后，环顾四周，我们看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国民经济完全破坏的景象。

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任务向我们提出哪些问题呢？

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是燃料问题。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为

了夺取燃料。协约国的一切诡计归结起来就是要夺取我们的燃料。

燃料有三种：煤、石油、木柴。

我们先从煤的问题谈起。

在一九一六年，就是在革命前，我们每月至少采煤一亿四千万至一亿五千万普特，运到其他地区◇264◇的至少有一亿二千万普特。现在我们每月最多开采一千八百万普特的烟煤和无烟煤，最多运出四百万至五百万普特。情况是很清楚的。

第二种燃料——石油。主要的石油燃料区是巴库区。一九一六年巴库总计开采石油约五亿普特。格罗兹内开采近一亿普特，乌拉尔(恩巴)开采约一千五百万普特。大家知道，主要的石油产区巴库不在我们手里。格罗兹内也用不着说。我不知道我们收复格罗兹内的时候，它将是什么样子。就燃料的蕴藏来说，那里有极丰富的石油层。去年那里的开采量达到两亿普特。但是我们收复的时候，它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只知道一点，白匪把它彻底破坏了。

第三种燃料——木柴。如果把木柴折成煤来计算，那末过去每年总计采伐五亿普特左右。现在，根据森林总管理委员会的材料来看，木柴采伐量不超过从前的百分之五十。

可见在燃料方面，我们的情况是危急的。

第二个问题是冶金工业。可以认为，顿巴斯—克里沃罗什矿区过去和现在差不多是我们矿石、生铁和成品的唯一产地。一九一六年每月炼出的生铁不下一千六百万普特。在顿巴斯区当时我们至少有六十五个高炉进行生产。现在六十五个高炉一个也没有进行生产。一九一六年我们从我们的冶金工厂每月得到将近一千四百万普特半成品。现在却不超过原来的百分之五。一九一六年每月得到将近一千二百万普特的成品。现在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因此，冶金工业方面的情况也非常糟糕。◇265◇

第三个问题是粮食。要恢复工业，就必须让工人有饭吃。没有粮

食，这是我们的主要缺陷和我国工业瘫痪的基本原因。战前我们在联邦境内收获的谷物将近五十亿普特。其中我们向国外输出的有五亿多普特。余下的全部粮食都供应国内需要。甚至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已经开始，在国境被封锁的情况下，十个月内我们还输出了三亿普特粮食。后来输出额落到三千万普特。

这一切说明，我们有余粮，而且应该有余粮。显然，如果要问，有没有获得粮食和建立为发展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粮食储备的客观可能性，那末可以回答说，肯定是有的。我们的同志们在叫喊着要收集三亿普特粮食，客观地来看，这对于我们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全部问题在于建立灵活的机构，研究农民的情绪，要有耐性和本领，要给这个工作投入必要的人力，这些人要具有能把言论变为行动的业务才干。在这方面我可以举我们在乌克兰的实例来说。不久以前断定乌克兰在去年收获中至少储存了六亿普特粮食。经过一定努力这六亿普特粮食是可以拿到手的。但是，我们的粮食机关决定宣布征集数量不超过一亿六千万普特，并且决定到三月要征收到四千万普特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没有能够达到。由于我们的机关松懈涣散，由于马赫诺匪徒专门捕杀粮食工作人员，由于若干地区富农掀起暴动，我们没有能够征收到四千万普特，而只征收了二百万普特左右。

其次一个问题是食糖。一九一六年我们出产了一亿一千五百万普特左右的食糖。需要量是一亿普特，而现在总共只有三百万普特左右。

我们目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状况就是这样。◇266◇

联邦的这种经济状况自然就要我们提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它归结起来就是我们的全部鼓动工作和建设工作都要改建到新的经济规范上去。现在我们必须从工人中间提拔自己的管理经济的士官和军官，他们将教导人民同破坏作斗争和建设新经济。只有在同破坏作斗争的进程中才能进行新的建设，为此就

必须培养自己的劳动军官。去年我们举行了部队之间的竞赛，现在我们对企业、工厂、铁路、矿井的劳动者也必须这样做。显然，不仅要吸引工人而且要吸引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参加这种竞赛。

其次，除上面所讲到的以外，还必须指出，应当使地方经济机关，特别是省和区的经济机关，在恢复工业方面有比过去更大的职权，更大的独立性。过去的情形是这样：“总局”而且仅仅是“总局”在领导工作；现在必须特别注意地方，让地方能够发挥主动性，没有这种主动性就很难把经济整顿好。

最后，应当注意帮助那些被国防委员会从军事工作轨道转到发展经济轨道的组织。我说的是劳动军委员会。经验证明，把军队的整个整个部队机械地调去做经济工作并不总是妥当的。这里必须使预备部队的工作和后方劳动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起来。

讲到乌克兰劳动军，我应当指出，由于许多原因它只是不久以前才开始工作。第一个任务是调查现状，然后提出必须采取实际措施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的情况是不堪言状的。铁路运输的情况特别严重。必须指出，乌克兰的四条铁路——西南铁路、南部铁路、顿巴斯铁路和叶卡特林娜铁路上有◇267◇不少机车，但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有毛病的。这就是说，过去每天行驶在哈尔科夫—莫斯科线上的四十五对列车，现在我们总共只能开动四对至五对，最多是八对。

劳动军委员会得到所有这些关于乌克兰情况的材料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其中我必须指出以下几个：

第一、在煤矿工业中使劳动军事化，对农村居民也进行劳动动员，利用他们做运送煤炭的工作；

第二、从工人中间吸收新力量参加工业生产，因为我们知道，革命前的二十五万工人中现在留下的只有八万人。而要吸收这些新力量，就必须调配粮食，我们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三、建立中央管理局来领导煤矿工业，并在中央管理局之下设

立卫生处、联络处、供给处、军事法庭、政治处。

为了使乌克兰的工业和运输业正常化，为了使人力和粮食、医疗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供应经常化，为了使自私自利的和逃避劳动的人不再逃出顿巴斯，为了在工业中和运输业中建立劳动纪律，这一切都是必要的。经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同意，今后共产党顿巴斯省委员会主席将兼任煤矿工业政治处主任。根据煤矿工业的任务分配党的工作人员、把这些工作人员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的全部工作都由政治处负责。

为开始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联邦国民经济并把它推上最大限度发展的道路所必须实行的措施，大致上就是这样。◇268◇

在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注意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建设的提纲〔84〕。

三　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的结论

（三月二十日）

应当认定，没有一个代表企图拿另外的什么决议来对抗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哈尔科夫代表会议的决议只是对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85〕各项决议的补充，并且它没有接触到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

我已经说过，现在的基本任务是恢复煤矿工业。因此，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组织煤矿工业管理局的工作上，使这个管理局能够安排好正规的供应并在煤矿工业中建立起纪律。

你们知道，我们全联邦的工业目前正经历着红军一年半以前所经历的那个松懈涣散和游击主义的时期。那时党中央曾经号召：振奋起来，建立纪律，把游击队变为正规军。现在我们对解体了的工业也必须这样做。必须收拾并组织这个解体了的工业，否则我们就无法摆脱破坏状态。

这里有一位同志说，工人是不怕军事化的，因为优秀的工人是看不惯没有秩序的现象的。这是完全对的。工人看不惯管理不善的情况，他们愿意接受能够在工业中建立秩序和劳动纪律的领导。◇269◇

四　代表会议的闭幕词

（三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结论中总结了全乌克兰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对各种问题的决议做了评价并阐述了有关农村工作和经济建设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后一个问题将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86〕上最后解决。

“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得正确的。我认为，在乌克兰这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俄罗斯一年半以前所经历过的那个农村发展阶段，那时伏尔加河流域和俄罗斯中部的许多地方处在暴动时期。这个时期正像俄罗斯所经过的那样，在你们这里也将成为过去。

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中，我们必须依靠贫农。中农只有在他确信苏维埃政权是强大的时候才会转到我们方面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中农才会转向我们。

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说你们通过的决议无疑是正确的。

代表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鲍罗齐巴分子〔87〕合并到我们党内来的问题。鲍罗齐巴分子是一个靠农村供养的政党。现在，在鲍罗齐巴分子同我们党合并以后，我们就能够充分实现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盟了。你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联盟是我们联邦共和国强大有力的基础。◇270◇

请允许我向你们庆贺代表会议成果丰硕的工作。我宣布会议结束。(鼓掌)”

本文按乌克兰劳动军司令部秘书处的记录
和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一日、
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哈尔科夫“共产党人报”
第六十二、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和第六十六
各号的报纸纪要刊印◇271◇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模拟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88〕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272◇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模拟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

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89〕。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成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国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了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被沙皇宪兵抓出了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273◇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

当时的任务是：分清良莠，和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在各地组织有经验的革命干部，给予他们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策略，以及把这些干部集合成统一的战斗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要十分秘密，足以阻住宪兵的袭击，但是同时又要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足以在必要时率领群众进行斗争。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的，那末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

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预定要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主义者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274◇

创办全俄政治报，作为集结党的力量的中心；把各地坚定的党的干部组织起来，作为党的“正规部队”；通过报纸把这些干部联合在一起，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做什么？”〔90〕和“进一步，退两步”〔91〕中所发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在为这个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坚决拥护列宁，不怕分裂。这个计划的胜利为世无伦比的、团结一致和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获得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

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92〕

责难者通常以当时“统一”局面兴盛的德国党为例。可是，第一、并非任何统一都是强有力的标志；第二、现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德国党已经分裂为三个党〔93〕的事实，就足以了解谢德曼和诺斯克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统一”是完全虚假的了。如果德国党内的革命分子及时地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决裂，那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会是更好吗……不，列宁领导党同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做得万分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275◇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受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并且获得了从来没有的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党就是靠了这种本领，才能在任何时候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数十万党员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会使自己的队伍混乱。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党的纲领和策略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口号不能激起工人群众，不能把革命运动向前推进，那末党就不能这样迅速地成长壮大。现在我们来谈谈事情的这一面。

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时同西方进行革命变革时所处的条件(例如法国和德国)是不同的。西方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阶级斗争还不发展的条件下爆发的。那时无产阶级很软弱，人数少，没有自己的能够提出本阶级要求的政党；而资产阶级很革命，足以使工人和农民相信它，并引导他们去同贵族进行斗争。在俄国却相反，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机器时期、阶级斗争已经

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一九〇五年)。那时人数较多而且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进行过多次战斗，已经有自己的、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团结的政党，已经有自己◇276◇的阶级要求，而俄国资产阶级(何况是靠政府定货生存的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吓坏了，竟设法勾结政府和地主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俄国革命因俄国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军事失败而爆发这一事实，只是加速了事变，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当时的环境要求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把革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以使国家完全民主化并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

可是，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却按照自己的观点解决问题：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的(参看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历史”)，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主义者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彻底揭穿了孟什维克的历史比拟的空虚无聊和孟什维克的把工人事业交给资产阶级宰割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险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抵制布里根杜马〔94〕并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参加杜马并在杜马里进行正常工作；在杜马终于召集起来时成立“左派联盟”并利用杜马讲台来配合杜马外面的斗争，而不是成立立宪民主党的内阁并反动地“保护”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和它建立联盟，——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95〕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277◇和工人政党的任务”〔96〕中所发挥的策略计划。

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直截了当地坚决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促进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且含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在为这个策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是坚决不移地拥护列宁的。这个计划的胜利为我们党现在震撼世界帝国主义根基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

事变的继续发展，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荡，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临时政府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策源地和彼得堡代表苏维埃成为萌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十月革命和立宪会议的解散，资产阶级国会制的废除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布成立，帝国主义战争的转变为国内战争，世界帝国主义同那些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那些被无产阶级抛入海中而被革命浪潮冲到资本主义岸边的死死抓住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可怜姿态，——这一切只是证明了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规定的革命策略原理的正确性。拥有这种遗产的党是能够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的。

——————————————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278◇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

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97〕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质量。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载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八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279◇

主持苏维埃会议（画）

列宁在 1918 年　　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98〕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都被感动了。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278◇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关——预备国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秘密状态

中。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驱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十月二十五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感动了。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281◇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鼓掌)

第一次载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五十寿辰纪念文集”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282◇

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

不容置疑，地主波兰对工农俄国的进攻实质上是协约国的进攻。问题不仅在于：国际联盟的领导者就是协约国，波兰又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国际联盟显然赞成波兰进攻俄国。问题首先在于：没有协约国的支持，波兰就不可能组织它对俄国的进攻；首先是法国，然后是英国同美国都极力以武器、被服、金钱和教官来支持波兰的进攻。协约国内部在波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使事情有所改变，因为这些意见分歧只接触到支持波兰的方式，而根本没有接触到支持本身。克逊给契切林同志的外交信件〔99〕和英国报刊上反对干涉的冠冕堂皇的文章也不能使事情有所改变，因为这一切喧嚷都追求一个目的：遮住幼稚的政治家们的眼睛，用同俄国讲和的词句来掩盖协约国所组织的真正武装干涉的卑鄙勾当。

一　总的情况

协约国的这次进攻是第三次进攻。◇283◇

第一次进攻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发动的。这一次是联合进攻，因为这一次计划由高尔察克、邓尼金、波兰、尤登尼奇以及土尔克斯坦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俄混合支队同时进攻，并且进攻的重心放在高尔察克的地域。

在这个时期，协约国是**团**结一致的，它主张公开干涉，协约国的首领们鉴于西方工人运动软弱无力、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很多，他们有战胜俄国的充分信心，就实行了无耻的不隐蔽的干涉政策。

在这个时期，俄国处在危急关头，因为它同产粮区（西伯利亚、乌克兰、北高加索）和燃料区（顿巴斯、格罗兹内、巴库）的联系被切断了，并且被迫在六条战线上作战。协约国看到这种情况就预尝胜利的美味，“泰晤士报”则敲锣打鼓。

尽管如此，俄国还是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而最强大的敌人高尔察克却被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俄国的后方以及俄国的军队比敌人的后方和军队稳固和灵活。

协约国**第二次进攻**是在一九一九年秋季发动的。这一次也是联合进攻，因为这一次计划由邓尼金、波兰、尤登尼奇同时进攻(高尔察克已经不算数了)。这一次进攻的重心放在南方，放在邓尼金的地域。在这个时期，协约国内部开始发生意见分歧，它开始压低了它的狂妄无耻的声调，试图表示它是反对公开干涉的，扬言可以同俄国谈判，开始从北方撤退自己的军队，因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增长和高尔察克的失败显然使以前的公开干涉政策成了对协约国不无危险的政策。协约国已经不敢公开谈论◇284◇不隐蔽的干涉。

俄国虽然战胜了高尔察克并收复了一个产粮区(西伯利亚)，但是在这个时期又处在危急关头，因为主要的敌人邓尼金站在我军弹药、步枪和机关枪的主要补给基地土拉的门口。尽管如此，俄国仍然度过了危险，没有受到损害。原因同样在于我们的后方以及我们的军队有较大的稳固性和较大的灵活性。

协约国**第三次进攻**是在完全新的形势下开始的。首先，这一次进攻和前两次不同，它不能叫做联合进攻，因为这时不仅协约国的旧盟友(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已经完结，而且如果把可笑的佩特留拉和“他的”可笑的“军队”除去不算，那末新盟友(如果有的话)还没有加入。波兰目前还是孤立地对抗着俄国,没有有力的战斗盟友。

其次，臭名远扬的封锁不仅在道义上和实际上被冲破了，而且在形式上也被冲破了。协约国不得不承认有必要同俄国建立外交关系，

容许俄国的官方代表驻在西方。欧洲各国的群众革命运动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口号，苏维埃军队在东部获得了新的胜利，这种情况加深了协约国内部的分裂，提高了俄国在中立国家和边疆国家的威信，使协约国孤立俄国的政策变成了空想。波兰的“天然”盟友爱斯兰宣布了中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昨天还是波兰的战斗盟友，今天却在同俄国进行和平谈判了。芬兰的情况也是这样。

最后，在协约国举行第三次进攻的时候，应该认为俄国的内部状况已经根本好转。俄国不仅打通◇285◇了通向产粮区和燃料区(西伯利亚、乌克兰、北高加索、顿巴斯、格罗兹内、巴库)的道路，而且已经把六条战线缩减到两条，因而有可能把军队集中在西部。

除上述情况以外，还应该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波兰是拒绝俄国和平建议的进攻的一方，而俄国是自卫的一方，这就给俄国在道义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优势。

所有这些情况造成了一种新局面，造成了俄国获得胜利的新条件，这些条件在协约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进攻俄国的时期是没有的。

西方帝国主义报刊在估计波兰军队的成败时声调阴沉犹豫，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二　后方。突击地域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没有稳固的后方就不能获得胜利(当然是指持久的牢固的胜利)。后方对于前线极为重要，因为它，也只有它，不仅以各种给养支持前线，而且还以人力——战士、情绪和思想来支持前线。不稳固的尤其是怀有敌意的后方，必定会使最精锐最团结的军队变成一群不稳固的乌合之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所以软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后方，他们充满了纯俄罗斯的大国主义野心，但是又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依靠那些仇视这种野心的非俄罗斯人建立

战线，供应和补充战线，不得不在分明是敌视他们军队的地域作战。自然，内部没有民族团结特别是阶级团结，并且◇286◇又为敌视的气氛所包围的军队，一受到苏维埃军队强有力的打击就瓦解了。

在这方面，波兰军队的后方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后方大不相同，这对波兰是很有利的。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后方不同，波兰军队的后方是单纯的，民族方面是团结的。因此，它的后方是统一的和坚固的。后方居民的普遍情绪——“祖国情感”通过很多条线传到波兰前线，在部队中造成了民族团结和坚定精神。因此，波兰军队是坚强的。当然，波兰后方在阶级方面不是单纯的(也不可能是单纯的！)，但是，阶级冲突还没有达到使民族一致的感情被冲破并使阶级情况复杂的前线发生矛盾的程度。如果波兰军队是在波兰本土活动，和它们作战无疑是困难的。

但是波兰不愿局限在自己的地域内，它把军队向前推进，征服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侵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腹地。这种情况根本改变了局势，对波兰军队的稳固性是大大不利的。

波兰军队越出波兰境界，深入和波兰毗邻的地域，这样就远离本国的后方，削弱了同后方的联系，陷入异族的而且大部分是敌视他们的居民中间。更糟糕的是，这种敌视日益加深，因为和波兰毗邻的地域(白俄罗斯、立陶宛、俄罗斯、乌克兰)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受波兰地主压迫的非波兰农民，这些农民把波兰军队的进攻看做波兰地主夺取政权的战争，看做反对被压迫的非波兰农民的战争。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军队的“打倒波兰地主！”的口号在上述各地域的大多数居民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为什么这些地域的农民把苏维埃军队看做是使他们摆脱地主束缚的解放者，为什么他们等待苏维埃军队的到来，并且一有适当机会就举行起义，从后方打击波兰军队。也就是这个原因，◇287◇苏维埃军队的士气无比高涨，像我们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确认的那样。

这一切不能不在波兰军队内部造成没有信心和没有保障的气氛，不能不破坏波兰军队坚定的士气，破坏它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信念和胜利的信心，不能不使波兰军队的民族团结由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

他们愈向前推进(他们未必会推进)，波兰进军的这些消极方面就会愈强烈地表现出来。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能不能展开强有力的保证取得长期胜利的进攻呢？

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军队能不能不陷入类似一九一八年同自己后方断绝了联系的德国军队在乌克兰的那种境地呢？

现在我们谈一谈突击地域的问题。在一般战争中，特别是在国内战争中，胜利和决定性胜利往往取决于正确地选择突击地域，取决于正确地选择对敌人实施主要突击并继续扩大这个突击的地域。邓尼金的重大错误之一在于他把顿巴斯—哈尔科夫—沃龙涅什—库尔斯克这一地带选作主要突击地域，就是说选择了对邓尼金分明是靠不住的、敌视他的地域，在这个地域内，邓尼金既不能建立巩固的后方，也不能为他的军队的推进创造有利条件。苏维埃军队在邓尼金战线上获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苏维埃统帅部及时地把自己的主要突击从察里津地域(不利的地域)转到了顿巴斯地域(非常有利的地域)，这个地域的居民热烈欢迎苏维埃军队，从这里最容易突破邓尼金战线，把它分裂成两部分，并继续推进，直到罗斯托夫。◇288◇

这个常常被旧军人忽视的因素，在国内战争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应该指出，波兰在这方面即在主要突击地域方面的条件是很不好的。问题在于根据上述原因，不论就突击地域来说或就进一步扩大这个突击来说，和波兰毗邻的任何一个地域都不能认为是对波兰军队有利的，因为不管波兰军队向哪里推进，他们到处都将遇到那些等待苏

维埃军队把他们从波兰地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农夫的抵抗。

相反地，苏维埃军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却是十分有利的：所有地域对于他们都可以说是“合适的”，因为苏维埃军队向前推进不是去巩固波兰地主的政权，而是去推翻它，把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三　前 途

波兰目前还是单独地和俄国作战。但是，如果以为它始终是单独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协约国所给予波兰的全面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还指波兰的战斗盟友，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协约国找到(例如邓尼金军队的残部)，一部分为了欧洲“文明”的荣誉大概也会被找到。波兰的进攻开始于圣勒摩会议〔100〕(没有准许俄国代表参加)期间决不是偶然的。罗马尼亚搁下了同俄国进行和平谈判的问题也不是偶然的…… 而且很可能，初看起来波兰的进攻似乎是冒险行◇289◇动，而事实上是逐渐实现缜密考虑过的联合进攻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毕竟应该说，如果协约国对俄国组织第三次进攻时打算战胜俄国，那他们是失算了，因为一九二〇年俄国失败的可能性比一九一九年小，并且小得多。

上面我们谈过俄国胜利的可能性，谈过这种可能性正在增长并且将来还会增长，但是这当然不等于说，我们把胜利已经取到手了。**只有**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也能像以前邓尼金进攻的时候那样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队能按时地正常地得到供给和人员补充，我们的宣传员能加倍努力地教育红军战士及其周围的居民，我们能把后方的坏分子清除掉并能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方法把它巩**

固起来，在这种条件下，上面所说的胜利的可能性才有实际的意义。

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认为胜利是有保证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一一号和第一一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290◇

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

(和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维·斯大林**同志日前回到哈尔科夫。

斯大林同志在前线停留将近三个星期；由红色骑兵出色地突破波兰战线而揭开的红军进攻战役是在他停留期间开始和逐渐发展的。

斯大林同志向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突　　破

谈到布琼尼同志的骑兵集团军六月初在波兰战线的战役，许多人拿这次突破敌人战线同去年马蒙托夫骑兵的袭击相比。

然而这种比较是完全不正确的。

马蒙托夫的战役带有偶然性质即所谓游击性质，它和邓尼金军队的整个进攻战役没有联系。而骑兵集团军的突破则是红军进攻战役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91◇

我们骑兵的袭击是在六月五日开始的。这天早上，红色骑兵集结成一个拳头，打击波兰第二集团军，突破敌人战线，以袭击方式穿过别尔季切夫地域，六月七日早晨占领日托米尔。

关于占领日托米尔的详细情形和缴获的战利品，报上已经报道过，我就不谈了。我只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向战线司令部报告说：“波兰军队极端轻视我们的骑兵。我们认为有责任向波兰人证明：必须尊重骑兵。”布琼尼同志在突破敌

人战线以后写信给我们说：“波兰地主学会尊重骑兵了；他们正在逃跑，自相践踏，给我们让路。”

突破的结果

突破的结果如下：

被我们的骑兵集团军穿过的波兰第二集团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它的损失是被俘千余人，被砍死约八千人。

后一个数字我根据几个不同来源的材料检查过，是接近实际情况的，尤其因为波兰人起初坚决拒绝投降，我们的骑兵简直不得不给自己杀开一条血路。

这是第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波兰第三集团军(基辅地域)同自己后方的联系被切断了，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因此它开始朝着基辅—柯罗斯天的方向总退却。◇292◇

第三个结果：波兰第六集团军(卡麦涅茨—波多尔斯克地域)在它的左翼失去依靠以后，唯恐被压到德涅斯特尔河岸，已经开始总撤退。

第四个结果：我军一突破敌人的战线，就开始了猛烈的全线总攻。

波兰第三集团军的命运

关于波兰第三集团军的命运问题，因为并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所以我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波兰第三集团军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并失去了联系，面临着全部被俘的危险。因此它就开始烧辎重，炸仓库，毁大炮。

它最初曾经几次企图有秩序地退却，但是遭到失败以后，就不得

不四散逃走(全军逃散)。

这个集团军的三分之一(波兰第三集团军总共有战士约两万名)被俘或被砍死。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丢下武器，逃到沼泽地带和森林地中，以后就逃散了。只有余下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要少)经过柯罗斯天跑回自己那边去了。并且毫无疑问，如果波兰人没有及时调派生力军经过舍培托夫卡—萨尔内予以援助，那末波兰第三集团军的这一部分也会成为俘虏或者在森林地中逃散。

不管怎样，应当认为波兰第三集团军已经不存在了。就是那些跑回去的残余也需要大加休整。

为了说明波兰第三集团军的被歼灭，必须指出：整个日托米尔公路被半焚毁的辎重和各种汽车堵塞了，据通信主任报告，汽车数目达到四千辆。我们缴获七十门炮，二百五十余挺机关枪，大量的◇293◇步枪和弹药(数量还没有计算)。

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

前线的情况

目前前线的情况可以这样描述：波兰第六集团军正在撤退，第二集团军正调去改编，第三集团军实际上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从西方战线和从遥远的后方调来的新的波兰部队。

红军展开了全线进攻，越过了奥夫鲁奇—柯罗斯天—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卡查廷—卡里诺夫卡—文尼查—日麦林卡一线。

结 论

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已经完结，那就错误了。

要知道，我们不仅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

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

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已经调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毫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

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294◇战斗。

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

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这种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的情况的。

我必须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后方和前线不全力以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我们就战胜不了西方的敌人。

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特别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进攻像“晴天霹雳”一样，并且它的规模是惊人的。

克里木战线

丝毫用不着怀疑，弗兰格尔的进攻是协约国授意的，目的在于缓和波兰人的严重处境。只有幼稚的政治家才会相信，克逊给契切林同志的信件除了用和平的词句掩盖弗兰格尔和协约国从克里木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用意。

弗兰格尔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这个缘故(只是为了这个缘故！)，“仁爱为怀的”克逊才请求苏维埃俄国饶恕弗兰格尔的部队，保全他们的生命。

显然，协约国指望在红军击退波兰人并向前挺进的时候，弗兰格

尔进入我军后方，破坏苏维埃俄◇295◇国的一切计划。

毫无疑问，弗兰格尔的进攻大大缓和了波兰人的处境，但是还未必有根据认为弗兰格尔能冲进我们西线军队的后方。

不管怎样，弗兰格尔进攻的力量和影响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显示出来。

载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共产党人报”(哈尔科夫)
第一四〇号◇296◇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十日在克里木战线上被我们俘虏的指挥作战的将军列维申当面向我供称：（甲）弗兰格尔军队的被服、炮、步枪、坦克、军刀主要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其次是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乙）英国的大军舰和法国的小军舰从海上援助弗兰格尔；（丙）弗兰格尔从巴土姆得到燃料（液体的）（就是说，巴库不应当发售燃料给梯弗里斯，因为梯弗里斯会把燃料卖给巴土姆）；（丁）被格鲁吉亚扣留而应当交给我们的艾尔杰里将军，五月间已经在克里木（就是说，格鲁吉亚在要滑头，欺骗我们）。

列维申将军关于英法援助弗兰格尔的供词正在整理，由他签字后就寄给你，作为给契切林的材料。

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三一三号◇297◇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最近从西南战线地域回来的**斯大林**同志向本报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

一、五月—六月

最近两个月，五月和六月，前线上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五月是波兰军队非常得势的一个月。在右翼，波兰人胜利地越过基辅—日麦林卡一线，威胁着敖德萨。在左翼，波兰人胜利地击退了我军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面的进攻。在中路，波兰军队巩固了莫泽尔，占领了列契查，威胁着哥美里。

相反地，六月是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波兰军队的五月胜利的一个月。波兰人向乌克兰的推进已经被粉碎，因为波兰人不仅被赶出基辅，而且被击退到罗夫诺—普罗斯库罗夫—莫吉寥夫一线以西。波兰人向哥美里方面的推进也被粉碎了，因为波兰军队已经被击退到莫泽尔以西。至于波兰人的左翼(据波兰报刊评论，它是最稳固的)，那应该说，最近我军在这个地域举行的向莫洛杰奇诺方面的强◇298◇大突击毫无疑问也是会把这个地域的波兰人打回去的。

七月在前线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根本转变，优势显然在苏维埃军队方面。

二、日托米尔的突破

不容置疑，我们的骑兵在日托米尔地域的突破对前线情况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很多人拿这次突破同马蒙托夫的突破和袭击相比，并认为两者是相同的。这是不对的。马蒙托夫的突破带有偶然性质，和邓尼金的进攻战役没有直接联系。布琼尼同志的突破则相反，它是我们进攻战役这根不可割断的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其目的不仅是摧毁敌人的后方，而且是直接执行一定的战略任务。

突破是在六月五日拂晓开始的。在这一天，我们的骑兵部队集结成一个拳头，粑辎重集中在拳心，突破了分布在波培尔尼亚—卡查廷地域的敌军，以袭击方式穿过别尔季切夫地域，六月七日占领日托米尔。由于波兰人拚命抵抗，我们的骑兵简直不得不给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结果波兰人在当地留下的伤员、被击毙和砍死的战士，据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证明，不下八千名。

三、突破的结果

在日托米尔被突破以前，波兰人和邓尼金不同，他们在前线各重要据点布满了战壕和铁丝网，把◇299◇运动战和堑壕战成功地配合起来。他们这样就大大地阻碍了我们向前推进。日托米尔的突破打翻了波兰人的如意算盘，使这一联合作战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这是突破的第一个好结果。

其次，这次突破使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和通信联络受到了直接威胁。其结果是：

(甲)波兰第三集团军(基辅地域)因为怕被围而开始急速退却，这种退却后来变成全军四散逃走；

(乙)受到骑兵集团军主要打击的波兰第二集团军(别尔季切夫地域)仓卒退却；

(丙)左翼失去依靠的波兰第六集团军(日麦林卡地域)开始有秩序地向西撤退；

(丁)我军展开了猛烈的全线进攻。

这是日托米尔突破的第二个好结果。

最后，这次突破挫折了波兰人的骄气，粉碎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摇了他们坚定的士气。在突破以前，波兰部队非常轻视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我们的骑兵，他们拚命反抗，不肯投降。只是在突破以后，波兰人才开始整批整批投降和大批地逃跑——这是波兰部队的刚毅精神被摧毁的第一个标志。布琼尼同志向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样写道："波兰地主学会尊重我们的骑兵了。"◇300◇

四、来自南方的危险

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是无疑的。这些胜利将继续扩大也是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波兰人基本上已经完结，我们今后只是"向华沙进军"，那就是不应有的骄矜了。

这种破坏我们工作人员的毅力并助长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情绪的骄矜所以不切实际，不仅是因为波兰国内有预备队，它无疑会把这些部队投入前线，也不仅是因为波兰不是单独作战，在它背后有完全支持它反对俄国的协约国，而且首先是因为在我军后方出现了波兰的新盟友——弗兰格尔，他要从后方来**破坏**我们对波兰人的胜利果实。

不应当拿弗兰格尔不会和波兰人呼应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弗兰格尔已经和波兰人呼应了，而且正在和他们协同行动。

弗兰格尔匪徒的鼓舞者——在塞瓦斯托坡里出版的叔尔根的报纸"大俄罗斯报"在六月间的一份报上写道：

"毫无疑问，我们是以自己的进攻支持波兰人，因为我们牵制住一部分预定调到波兰战线的布尔什维克兵力。同样毫无疑问，波兰人也以自己的战役有力地支持着我们。对波兰人既不必同情，也不必厌恶；我们只应当遵循冷静的政治打算。今天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反对共

同的敌人是对我们有利的，而明天……明天再说。”

显然，弗兰格尔战线是波兰战线的继续，而其区别只在于弗兰格尔是在正和波兰人作战的我军的后方活动，就是说，在对我们最危险的地方活动。◇301◇

因此，在弗兰格尔的危险还没有消除以前，就说“向华沙进军”和一般地说我军的胜利是巩固的，那是可笑的。何况弗兰格尔的力量正在增强，而又看不到我们采取了什么特别的重大的措施来对付来自南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

五、记住弗兰格尔

由于我们向波兰人展开了进攻战役，我军战线形成弧形，弧口向西，两端向前，其中南端在罗夫诺地域，北端在莫洛杰奇诺地域。这叫做对波兰军队的包围形势，即对波兰军队威胁最大的形势。

毫无疑问，协约国是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因此，它千方百计地要把罗马尼亚拖入对俄战争，狂热地给波兰寻找新盟友，用一切力量支持弗兰格尔并极力设法挽救波兰人。协约国给波兰找到新盟友是完全可能的。

俄国一定能在本身找到力量来反击新的敌人，这是没有理由怀疑的。但是有一点毕竟应当记住：只要弗兰格尔完整无损，只要弗兰格尔有可能威胁我们的后方，我们的战线就不会是牢靠的，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就不能是巩固的。只有消灭弗兰格尔才能认为我们对波兰地主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因此，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当前的新口号：“记住弗兰格尔！”“消灭弗兰格尔！”

载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真理报”第一五一号◇302◇

红军受到怎样的欢迎

（向“红军战士报”〔101〕发表的谈话）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志说，他不能不指出波兰战线上的当地居民对红军的绝无仅有的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道：“不论在东部或在南部，我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态度。

虽然西部的农民群众比　尔加河流域和南部的农民贫困，他们还是把仅有的食物分给红军战士。

他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了异常繁重的‘马车运输’勤务。

红军战士得到各种协助和支持，当我们在五月底不得不开始撤退的时候，居民都悲痛万分。

战线附近一带的居民曾经饱受波兰占领的一切痛苦，因此，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波兰地主的侵入会带给他们什么威胁。

在我们的战线上有大批军队，军队的全部救护工作都由男女农民担负，他们对我们的红军伤员给了极大的关怀和照顾。◇303◇

至于战线地带以西的白俄罗斯农民的情绪，据我们了解，那里不断举行起义，有游击队活动，他们焚毁仓库，消灭地主，破坏着敌人的后方。

可以大胆地说，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遭遇正在那里重演着。

随着我们部队的逼近，敌人的后方到处都在开始从内部爆炸。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白俄罗斯反对波兰地主的真正农民革命。”

载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红军战士报”第三三七号◇304◇

给 各 级 党 组 织

（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102〕）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弗兰格尔周围聚集了一群老练的凶暴的杀人将军，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

弗兰格尔的士兵组织得非常好，打起仗来不顾死活，宁可自杀也不投降。

弗兰格尔的军队在技术供应方面比我军好，直到现在西方还在继续供应他们坦克、装甲车、飞机、弹药和被服，虽然英国声明停止供应。

和弗兰格尔作战的我军的弱点在于：第一、我军中掺杂有战俘——从前的邓尼金部下，他们常常跑到敌人方面去；第二、我军从中央方面既得不到整队的或单个的志愿兵，也得不到动员来的共产党员。

必须把过去的战俘从这些军队中清除掉，给它们不断地输送大批志愿兵或动员来的共产党员，以便改变军队的情况并使它们能战胜凶暴的敌人。

俄国无论如何必须收复克里木，否则乌克兰和高加索将永远受到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的威胁。◇305◇

中央委员会责成你们根据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加强群众宣传工作，立即组织向克里木战线不断输送共产党员的工作，即使会使其他战线受到损害也在所不惜。

写于一九二〇年七月

第一次载于一九四五年

“列宁文集”第三十五卷◇304◇

关于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

一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方面，法国和美国公开支持波兰人和弗兰格尔，英国默许这一支持；另一方面，波兰人取得胜利，弗兰格尔将得到新的兵力而加强起来，罗马尼亚东部军队在多罗霍伊地域集中，——这两方面情况给共和国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必须立即考虑保证共和国得到新的步兵(约十万人)和新的骑兵(约三万人)以及相应的军需供给。

波兰人最近的胜利暴露了我军的主要缺点：没有有力的战斗预备队。因此，必须把建立随时能够调往前线的强大的预备队的工作放在当前的加强共和国军事实力计划的首要地位。

根据上述情况，我建议采纳如下的**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的计划**：

一、继续正常地补充火线上有战斗力的各师，立即开始把那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有名无实和半◇307◇有名无实的各师(步兵师)撤到后方去。

二、预计应当撤出的步兵师约有十二个至十五个，把这些师集中在这样的地域(必须是产粮区)，从那里可以不特别**耽搁**地根据情况把它们调往弗兰格尔战线、波兰战线或罗马尼亚战线（撤出各师的三分之一大概可以集中在奥尔维奥波尔地域，三分之一可以集中在柯诺托普—巴赫马奇地域，其余三分之一可以集中在伊洛瓦斯卡亚—沃尔诺瓦哈地域）。

三、对这些师的补充和供给的要求是：每师步兵人数达到七千名

至八千名，所有的师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都完全做好出动的准备。

四、立即着手补充我们正在作战的骑兵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在年前)使骑兵第一集团军得到一万名骑兵，骑兵第二集团军得到八千名骑兵，盖伊骑兵军得到六千名骑兵。

五、立即着手建立五个骑兵旅，每旅一千五百名骑兵(一个旅由捷列克的哥萨克组成，另一个旅由高加索的山民组成，第三个旅由乌拉尔的哥萨克组成，第四个旅由奥连堡的哥萨克组成，第五个旅由西伯利亚的哥萨克组成)。各旅在两个月内编成。

六、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和发展汽车工业，要特别注意修理工作和制造“奥斯汀”牌和“费阿特” 牌的汽车。

七、用一切办法发展装甲工业(主要是汽车的装甲)。

八、用一切办法发展航空工业。◇308◇

九、根据上述各点扩大供给计划。

约·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二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托洛茨基关于预备队的答复是敷衍塞责的。关于建立预备队的**计划**和这一计划的必要性，在他的答复中所引证的他的前一个电报里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何时**撤出各师，撤到**何地**，在**多长**期限内完成各师的补充、补充兵员的训练和紧密结合，——所有这些问题（决不是细节！）都没有谈到。

在夏季战局中，预备队离前线太远（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

加索）这一点起了重大的（**消极的**）作用：预备队来得不及时,太迟，并且大部分没有到达目的地。因此，预备队的集中地域应该作为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预先加以考虑。

补充的兵员**缺乏训练**这一点也起了同样重大的（也是消极的）作用：训练差的、结合得不紧密的补充兵员只是在总进攻的洪流里有用，他们通常经不住敌人的猛烈反击，几乎缴出了全部物资配备，投降敌人的有数万人。因此，训练和补充的期限也应该作为极重要的因素预先加以考虑。

我们的预备队是**偶然**组成的即**临时**组成的这一点起了更加重大的(也是消极的)作用：因为我们◇309◇没有专门的预备部队，所以预备队往往是偶然地、极匆忙地从各种七零八落的部队中，甚至从共和国国家内卫部队〔103〕中抽调来的，这就破坏了我军的坚强性。

简单地说：必须开始(立即！)进行**有计划的**工作来保证共和国得到有力的预备队，否则我们有遭到新的“突然的”(“意料之外的”)军事溃败的危险。

供给工作并不像托洛茨基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最重要的因素”。国内战争的历史证明，虽然我们穷困，我们毕竟保证了供给，然而发给士兵的“衬衫”和“皮靴”还是有半数落到农民手中。为什么呢？因为士兵拿这些东西向农民换取(以后还要换！)牛奶、油、肉，就是说换取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在这次(夏季)战局中我们也保证了供给，然而我们仍然遭到了失败(似乎还没有人敢谴责我们的供给人员，说他们是我们在波兰战线上失败的祸首……)。显然，还有比供给工作更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参见上文)。

必须彻底抛弃军队的供给工作由非军事部门负责，其他一切工作由野战参谋部负责这个有害的“学说”。中央委员会如果不愿意遭到新的溃败，就应该了解并监督军事部门各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战斗预备队的训练和战役的准备。

因此，我坚决主张：

(一)军事部门不要用“士兵的衬衫”的词句来支吾搪塞，而要制定(立即着手制定)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的具体计划；◇310◇

(二)中央委员会要审查(通过国防委员会)这个计划；

(三)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对野战参谋部的监督，实行总司令或野战参谋部参谋长向国防委员会或由国防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定期报告的制度。

约·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次刊印◇311◇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

俄国三年来的革命和国内战争证明，如果没有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的相互支持，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俄国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铁爪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富产原料、燃料和食物的边疆地区的援助，俄国中部这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不能维持长久。同样地，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俄国中部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援助，俄国边疆地区也必然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比较发达的无产阶级的西方没有不大发达但富有原料和燃料的农民的东方的支持，就不能致世界资产阶级于死命，如果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末另一个原理，即比较发达的俄国中部没有不大发达但富有必需资源的俄国边疆地区的支持，就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样是正确的。

协约国从苏维埃政府出现的最初几天起无疑地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它(协约国)实行了经济上包围俄国中部的计划，使最重要的边疆地区和俄国中部分离。后来，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经济上包围俄国的计划是协约国各次进攻俄国的始终不变的基础，目前协约国在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和土尔克斯坦玩弄的阴谋诡计也不例外。

因此，保证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巩固联盟具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在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必须建立一定的关系，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保证它们之间的紧◇312◇密的牢不可破的联盟。

而这种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它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换句话说：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要求把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作为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种要求应当摈弃，因为它不仅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

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抵触的，而且首先因为它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抵触的。至于边疆地区的分离会破坏激发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俄国中部的革命威力，而分离出去的边疆地区本身必然会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奴役，那就更不用说了。只要看一看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和芬兰等等（它们只保留了独立的外貌，而实际上已经变为协约国的十足的附庸国），只要回想一下乌克兰和阿捷尔拜疆不久以前的历史（前者被德国资本侵吞，后者被协约国侵吞），就会明白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要求边疆地区实行分离的全部反革命性。在无产阶级俄国和帝国主义协约国之间展开殊死斗争的环境中，边疆地区只能有两条出路：

或者和俄国在一起，那末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就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或者和协约国在一起，那末必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和芬兰等等这些所谓独立国家的所谓独立，只不过是掩饰这些所谓国家对某一帝国主义集团完全依附的骗人幌子而已。◇313◇

当然，俄国的边疆地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也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有同俄国分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这些民族中的某一民族的大多数人民决定同俄国分离，像一九一七年芬兰所发生的那样，那末俄国大概必须确认事实而批准分离。但是，这里说的不是民族权利，这种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这里说的是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由这种利益所决定的宣传的性质。如果我们党不愿意背弃自己，如果我们党想要根据一定的方向去影响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意志，它(党)就一定要进行这种宣传。而人民群众的利益告诉我们，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边疆地区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

要求把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作为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的

形式，这种要求同样也应当摈弃。近十年来奥匈帝国（民族文化自治的故乡）的实践完全证明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族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盟的形式是转瞬即逝的，不现实的。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这两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创立者就是一个活的证据，现在他们的玄妙的民族纲领已经完全破产了。最后，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传布者——闻名一时的崩得，不久以前自己也不得不正式承认民族文化自治的无用，公开声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失去了它的意义。”（见“崩得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一九二〇年版第二十一页）

只有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边疆地区的区域自治，才是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的唯一适当的形式；这种自治必须用联邦关系的纽带把俄国边疆地区和中部联结起来。这就是苏维◇314◇埃政权从它出现的最初的日子里就宣布了的而且现在以行政公社和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在边疆地区所实行的那种苏维埃自治。

苏维埃自治并不是一种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从狭隘的行政自治(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楚瓦什人、卡列里亚人)过渡到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巴什基里亚人、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柯尔克兹人)，从广泛的政治自治过渡到更加扩大的自治形式(乌克兰、土尔克斯坦)，最后，从乌克兰式的自治过渡到最高的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阿捷尔拜疆)。苏维埃自治的这种伸缩性，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它(伸缩性)可以照顾到俄国处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的各式各样的边疆地区。三年来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表明，苏维埃政权通过各种形式实行苏维埃自治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政策，苏维埃政权才给自己开辟了通向俄国边疆地区的穷乡僻壤的道路，发动了最落后的、民族成分最复杂的群众参加政治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把这些群众同中部联结起来，——这样的任务，世界

上不但没有一个政府解决过，而且也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它们不敢提出！)。根据苏维埃自治原则重新划分俄国行政区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北高加索人、卡尔梅克人、切列米斯人、沃加克人、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民族还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不管未来俄国行政区划图是什么样子，不管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缺点(确实有过一些缺点)，应当承认，俄国根据区域自治原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就是已经在把边疆地区团结在无产阶级中部的道路上，在使政权接近边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路上向前◇315◇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宣布某一种苏维埃自治的形式，颁布相应的法令和决议，甚至建立边疆地区的政府即自治共和国的区域人民委员会，都还远不足以巩固边疆地区和中部之间的联盟。要巩固这种联盟，首先必须消灭沙皇政府的野蛮政策留给边疆地区的遗产——疏远和闭塞，宗法制度和文化落后，对中部的不信任。沙皇政府故意在边疆地区培植宗法式的封建压迫，以使群众永被奴役，愚昧无知。沙皇政府故意把边疆地区的好地方塞满殖民分子，把当地各民族的群众挤到坏地方去而加深民族纠纷。沙皇政府限制而且有时干脆取消当地的学校、剧院和教育机关，以使群众愚昧无知。沙皇政府压制当地居民中的优秀人士的一切主动性。最后，沙皇政府扼杀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性。沙皇政府的这一切办法在当地各民族群众中间造成了对俄罗斯的一切的极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时变成敌视态度。要巩固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就必须消灭这种不信任，就必须造成互相谅解和友好信任的气氛。而要消灭不信任，首先就必须帮助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摆脱宗法式封建压迫的残余，必须废除（真正废除，而不只是口头上废除）殖民分子的种种特权，必须使人民群众享受到革命的物质福利。

简单地说：必须向群众证明，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而且只是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不只是

采取镇压殖民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往往完全不能为群众所了解，而首先是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和周密考虑的经济政策。◇316◇

大家知道，自由派要求实行普遍义务教育。边疆地区的共产党员不能比自由派更右，如果这些共产党员想要消灭人民的愚昧无知，如果他们想要在精神上使俄国的中部和边疆地区接近起来，那就应该在那里实行普遍义务教育。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当地的民族学校、民族剧院、民族教育机关，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因为几乎用不着证明，愚昧无知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成绩怎样，但是据我们所知，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疆地区，当地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总共只拿它的经费的百分之十用在当地学校方面。如果这是确实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方面，很遗憾，我们同“旧制度”相差无几。

不能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脱离人民的政权，恰恰相反，它是唯一的来自俄国人民群众并为他们所亲近和爱戴的一种政权。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政权通常在危急关头会表现出空前未有的力量和韧性。

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同样成为俄国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所亲近和爱戴的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要成为人民群众所亲近的政权，首先应该成为他们所了解的政权。因此，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必须把当地人民群众中的一切优秀人士吸收到这些机关中来，必须把当地劳动群众吸引到国家各个管理部门(包括军事部门)里来，必须使群众看到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的愿望的体现。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在群众和政权之间建立不可◇317◇摧毁的精神联系，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成为边疆地区劳动群众所了解

和亲近的政权。

有些同志把俄国各自治共和国并且一般地把苏维埃自治看成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毕竟是一种暂时的坏事情，认为由于某些情况不得不允许这种坏事情存在，但是必须同它作斗争，以便将来铲除它。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无论如何同苏维埃政权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不能把苏维埃自治看成一种抽象的和臆造的东西，尤其不能认为它是宣言式的空洞诺言。苏维埃自治是边疆地区和俄国中部实行联合的一种最实际最具体的形式。谁也不会否认，既然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巴什基里亚、鞑靼及其他边疆地区要力求达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繁荣和物质繁荣，那就不能没有本民族的学校，不能没有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并且，不广泛设立地方学校，不成立由熟悉居民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政权机关等等，**就不可能**使这些区域真正苏维埃化，**就不可能**使这些区域变成苏维埃国家，同俄国中部紧密地结成一个国家整体。而设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也正就是真正实现苏维埃自治，因为苏维埃自治不是别的，正是所有这些具有乌克兰、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等等民族形式的机关的总和。

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认真地说苏维埃自治是转瞬即逝的，必须同它作斗争之类的话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乌克兰、阿捷尔拜疆、柯尔克兹、乌兹别克、巴什基里亚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是真实的现实，◇318◇因此，这些区域绝对需要发展本民族的学校和由当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那末苏维埃自治在这些区域里就应当无条件地彻底实行；

或者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是凭空臆造，因此也就不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其他机关，那末苏维埃自治就应该

当做废物抛掉。

想找第三条道路，不是不明事理，就是可悲的轻率。

在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之一，是边疆地区十分缺乏当地出身的知识分子，苏维埃和党的所有一切工作部门都缺乏指导员。这种缺乏不能不阻碍边疆地区的教育工作和革命建设工作。而正因为如此，丢开这些为数很少的地方知识分子是愚蠢的，是对事业有害的。这些知识分子也许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也许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认为自己被不信任的气氛所包围，怕可能遭到迫害。对于这种人，采取吸引他们参加苏维埃工作的政策，采取吸收他们在工业、农业、粮食及其他部门担任工作的政策，以便使他们逐渐苏维埃化，可能是有成效的。因为未必能够断定说，这些知识分子比那些反革命的军事专家还不可靠，而那些军事专家，尽管是反革命的，但是仍然被吸收参加了工作，并且后来在极重要的岗位上苏维埃化了。

但是，利用民族知识分子还远不足以满足对于指导员的需要。同时还必须在边疆地区大量开办训练班和学校来为一切管理部门培养当地人的指导干部。因为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干部，要设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本民族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和其他机关是极端困难的。◇319◇

在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道路上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是某些同志在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工作中所表现的那种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常常变成粗暴无礼的行为。如果这些同志决意要在那些比俄国中部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区，在那些还没有完全消灭中世纪经济结构的地区用“英雄的努力”来实行“纯粹的共产主义”，那末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骑兵式袭击，这种“共产主义”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我们想提醒这些同志记住我们党纲中的人所共知的一条，这就是：

“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

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等等。”

又说：

“在任何情况下，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于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留心，特别注意。”（见“俄国共产党党纲”）

这就是说，例如在阿捷尔拜疆，采用直接增添住户到他人住宅里去的方法会使阿捷尔拜疆群众离开我们，因为他们认为住宅和家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明显，这种直接增添住户的方法就需要代之以间接的迂回的方法，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宗教成见很深的达格斯坦群众是“根据沙利阿特①”跟着共产党人走的，很明显，在这个国家进行反宗教偏见的斗争，就应当以间接的比较慎重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方法。如此等等。

简单地说：必须放弃使落后人民群众“立即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袭击，采取谨慎小心和深思熟◇320◇虑的把这些群众逐步引入苏维埃发展总轨道的政策。

实现苏维埃自治的实际条件大致就是这样，执行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在精神上接近并建立巩固的革命联盟。

苏维埃俄国正在进行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实验：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范围内，根据相互信任的原则，根据自愿的、兄弟般的协议的原则组织许多民族和部落的合作。三年来的革命证明，这个实验有获得成功的一切条件。但是，只有我们在地方上实行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实际政策同已经宣布的、具有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苏维埃自治的要求相一致的情况下，只有我们在地方上实行的每一个实际措施都会促进边疆地区人民群众去接触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民族面貌形式的最高的

——————————————

① 沙利阿特是伊斯兰教的法律，根据可兰经制定。——译者注

无产阶级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情况下，才能指望这种实验获得完全胜利。

这就是巩固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之间的革命联盟的保证。协约国的种种阴谋诡计在这个联盟面前都会彻底破产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真理报”第二二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321◇

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我现在宣布全俄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开幕。

同志们！在进入会议的具体工作之前，请允许我就下面一个问题发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意见：在工农国家里是否需要检查院，如果需要，那末它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什么。

俄国是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掌握了政权的唯一国家。夺取这一政权的前提是发生了世界上最深刻的革命，革命之后，接着就消灭了旧的国家政权机关和产生了新的国家政权机关。过去的情形是：工人通常为老爷工作，老爷则管理国家。正因为这样，在革命前管理国家的一切经验都集中在统治阶级的手中。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工人和农民掌握了政权，他们从来没有管理过国家，过去他们只知道为别人工作，因此，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足够经验。

这是第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苏维埃国家的国家管理机关产生各种缺点的根源。◇322◇

其次，随着旧的国家管理机关的被消灭，官僚主义被摧毁了，但是官僚主义分子还保留着。他们改扮成苏维埃工作人员，混入我们的国家机关，利用刚刚掌握政权的工人和农民的经验不足，施展旧的一套盗窃国家财产的鬼蜮伎俩，带来旧的资产阶级的作风。

这是第二个情况，这个情况是我们国家机关产生缺点的基础。

最后，新政权从旧政权那里接受来的是完全破坏了的经济机构。这种破坏由于协约国强加于俄国的内战而更加严重起来。这个情况也

是我们的机体中存在缺点和毛病的条件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产生缺点的主要条件。

很明显，只要这些条件存在，只要国家机关中还有缺点，我们就需要检查院。

当然，工人阶级正在努力取得管理国家的经验，但是掌握了政权的新阶级的代表所具有的经验毕竟是不够的。

当然，改头换面钻进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分子受到了制裁，但是他们受到的制裁还不够。.

当然，由于我们各个国家机关积极热情的工作，我们面前的经济破坏逐渐减轻了，但是这种破坏仍然存在。

正因为这样，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只要还有这些缺点，就需要有专门的国家机构来研究这些缺点，纠正这些缺点，帮助我们各个国家机关沿着日趋完善的道路前进。

检查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323◇

基本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是检查院的工作人员根据自己检查工作的结果或在检查工作进程中帮助我们在中央和地方上执掌政权的同忠建立最合理的国家财产统计制度，帮助建立合理的报告制度，帮助整顿供给机关、和平时期的机关和战争时期的机关以及经济机关。

这是第一个基本任务。

第二个基本任务在于工农检查院在工作进程中要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能够通晓全部国家机关事务的指导员。同志们，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定

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足够的管理国家的指导干部。工农检查院的基本任务在于吸引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参加自己的工作，培养和训练这些干部。工农检查院应当成为这种工农干部的学校。这就是工农检查院的第二个任务。

由此就产生了工农检查院必须采用的工作方法。在革命前的旧时代：监察机关是在国家机关之外的，这是一种外部力量，它对机关进行检查的时候，竭力设法找祸首，找罪犯，而且只限于此，这◇324◇种方法，依我说是一种警察式的方法，是一种搜捕犯人的方法，是想使一切报刊都为之喧嚷叫喊的一种耸人听闻的揭露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抛到一边去。这不是工农检查院的方法。我们的检查院不应当把它所检查的机关看做别人的机关，而应当看做自己的机关，应当教导它们，应当改进它们。主要的不是要找个别罪犯，而首先是要研究被检查的机关，细心地研究，认真地研究，研究缺点和优点，从而推动这些机关进一步改进工作。如果检查院醉心于警察式的方法，如果它对被检查的机关吹毛求疵，如果它专找岔子，如果它注意表面现象，而把主要缺点抛开不管，那就是最糟糕最不能容忍的了。

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方法应该是揭露主要的缺点。我知道，工农检查院走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这种方法时常会引起被检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满。我知道，工农检查院的最忠诚的工作人员时常被某些肆行妄为的官吏以及某些附和这些官吏的共产党员所憎恨。但是工农检查院不应该怕这个。它应该遵循一个基本训条：不怜惜个别人物，不管他们身居什么职位，怜惜的只是事业，只是事业的利益。

这是一个很困难而极须慎重执行的任务。它要求工作人员要有很大的坚毅精神和高度的纯洁，无可非难的纯洁。可悲的是，我必须指出，在我们莫斯科，在对某些机关所进行的一些实际检查的过程中，监察人员本身是不称职的。我必须声明，人民委员部对这些人将毫不

留情。人民委员部将要求严惩这些人，因为他们玷污了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荣誉。既然工农检查院担负着纠正我们各机◇325◇关的缺点和帮助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前进和改进的崇高任务，既然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不怜惜任何人，只怜惜事业的利益，那末很明显，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本身就必须是纯洁的，无可非难的，大公无私的。为了使他们能够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道义上的权利来检查别人，教导别人，这是绝对必要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月
“工农检查院通报”第九、第十
两期合刊◇326◇

著 者 的 话

（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民族问题论文集的序言）

编入这本小册子的总共只有三篇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出版社选这三篇论文，大概有这样一个意思：所选的三篇文章反映着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三个最重要的时期，而整个小册子的目的显然是要比较完整地介绍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

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一九一三年“启蒙”杂志）〔104〕反映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前一年半的地主沙皇反动时代，即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时代对民族问题进行原则争论的时期。当时有两种民族理论相互斗争着，因而相应地也就有两个民族纲领：一个是**奥国的**即崩得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纲领，一个是**俄国的**即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读者在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到对这两派的评述。后来的事变，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奥匈帝国分裂为各个民族国家，十分明显地证明了真理是在哪一方面。现在，在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民族纲领完全破产的时候，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就是历史已经给“奥国学派”下了判决。连崩得也不得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即奥国民族纲领。——斯大林注）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327◇下失去了它的意义。”（见“崩得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一九二〇年版）崩得也没有想到，它这样就承认了（无意中承认了）奥国民族纲领的理论基础根本没有根据，也就是说，奥国的民族理论根本没有根据。

第二篇论文（“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见一九一八年“民族生活报”）〔105〕反映着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战胜了

俄国中部的反革命以后，和各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即和反革命策源地发生了冲突。当时协约国因苏维埃政权对它们(协约国)的殖民地的影响日益增长而感到不安，开始公开支持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以期扼杀苏维埃俄国。当时在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作胜利斗争的进程中，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关于苏维埃区域自治的具体形式、关于在各边疆地区成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关于通过俄国东部各边疆地区扩大苏维埃俄国对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影响、关于建立西方和东方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等实际问题。这篇论文指出了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明民族政策是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奥国学派”、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第二国际通常所反对而后来为事变的全部进程所证实的那个东西。

第三篇论文（“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见一九二〇年十月“民族生活报”）〔106〕属于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俄国根据苏维埃区域自治原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个时期在各边疆地区正在成立行政公社和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这些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328◇的组成部分。这篇论文的重心是关于真正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问题，即关于保证中部和边疆地区结成革命联盟的问题，这个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措施的保障。

这篇论文坚决反对各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的要求，认为这是反革命的计谋，这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主张**印度、阿拉伯、埃及、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同协约国分离，因为这种分离意味着这些被压迫国家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意味着削弱帝国主义阵地而加强革命阵地。我们**反对**各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因为这种分离意味着使各边疆地区受帝国主义奴役，意味着削弱俄国的革命实力而加强帝国主义阵地。正因为如此，协约国反对印度、埃及、阿拉伯和其他殖民地实行分离，同时却争取各边疆地区同

俄国分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主张殖民地同协约国分离，同时又不能不反对各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显然，分离问题是依据具体的国际条件，依据革命的利益来决定的。

第一篇论文本来可以删去一些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但是由于这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应当不加修改地全部保留下来。第二篇和第三篇论文这次刊印时也未加修改。

一九二〇年十月

“斯大林论文集”一九二〇年
土拉国家出版社版◇329◇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举行的
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十月革命以前，在西欧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中间有过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爆发并获得胜利，而且有一些人推测这样的国家将是英国，另外一些人推测是比利时等等。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在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而且组织得很差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这个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也就是在俄国开始的。

其次，一部分十月革命参加者曾经确信：只有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紧接着爆发更深刻和更严重的革命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这个胜利才能巩固，因为西方的革命能够支持并推进俄国革命；并且人们预料一定会爆发这种革命。这个观点也被事变推翻了，因为社会主义俄国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直接的革命支持，而是处在敌对国家包围之中，但是它胜利地存在和发展已经三年了。

原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中开始，而且还能获得胜利，向前发展，给资本◇330◇主义发达的国家做榜样。

因此，列入会议议程的关于俄国目前形势的问题应该是：俄国这个多少是孤立无援的国家，这个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绿洲，今后能不能像它过去那样支持下去，击破并消灭自己的敌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现在保证而且今后还能保证苏

维埃俄国存在和胜利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是两方面的：不变条件(不取决于我们)和可变条件(取决于人们)。

我们应该首先把如下情况列入第一种条件：俄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可以在它的领土上长久地支持，失利时可以退入腹地，以便聚集力量重新转入进攻。如果俄国是一个小国，像匈牙利那样，只要敌人来一个猛烈攻击就会很快决定国家命运，很难回旋，没有退却地域，如果俄国是这样的小国，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必能够支持这样久。

其次，还有第二个有利于社会主义俄国发展的不变条件。这就是：俄国是世界上富有各种燃料、原料和粮食的少数国家之一，就是说，是一个在燃料、粮食等等方面独立的国家，是一个在这方面能够不依靠外国的国家。毫无疑问，如果俄国是靠外国的粮食和燃料生活(例如意大利)，那末它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陷入危急境地，因为敌人只要把它一封锁，它就会没有粮食和燃料。然而协约国对俄国实行的封锁，不仅仅损害了俄国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协约国本身的利益，因为协约国失去了俄国的原料。◇331◇

但是除了不变条件以外，还有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和发展与不变条件同样必要的可变条件。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保证俄国有后备军的条件。问题在于：在俄国和协约国之间进行激烈战争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延续了三年，并且可能再延续三年)，战斗后备军的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协约国的后备军是什么呢？

我们的后备军是什么呢？

协约国的后备军首先是弗兰格尔的军队和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等等)的暂时还没有染上“阶级矛盾毒素”的年轻的军队。协约国在这方面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自己的反革命军队。由于西方有革命运动，协约国不能把自己的即

英、法等国家的军队调到俄国来；因此它必须利用别人的军队，这些军队虽然是由它资助的，但是它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像支配自己的军队那样去支配它们。这些军队按照协约国的训令行动这一事实，决不能否定协约国和那些有军队被协约国使用的国家的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摩擦，这种摩擦现在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尽管协约国暗中挑拨，但是对波和约仍然签订了，这再一次证实这种摩擦的存在。而这种情况不能不破坏协约国战斗后备军的内部实力。

其次，协约国的后备军是反革命势力，他们在我军后方进行活动，组织各种游击活动和其他活动。

最后，协约国还有一种后备军，他们在被协约国所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活动，目的在于◇332◇窒息这些国家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

至于协约国在欧洲本部的后备军——那些旨在窒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各式各样的蝎子直到第二国际，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俄国的后备军首先是红军，也就是由工农组成的军队。同协约国雇佣和收买的军队不同，红军为本国的自由和独立作战，它的利益同它为之流血的那个国家以及命令它作战的那个政府的利益是融合为一的。苏维埃俄国的主要后备军的无穷尽的内部实力就在这里。

其次，俄国的后备军是西方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正在发展并转为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如果西方没有这个革命运动，那末协约国就会组成自己的反革命军队，就会敢于冒险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最后，俄国的后备军是东方和协约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正转变为东方国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公开革命运动，使协约国有失去原料和燃料来源地的危险。应该记住，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打击这一环就会使协约国陷入危急境地。毫无疑问，东方的革命运动一定会给协约国造成没有信心和瓦解

的气氛。

这就是我们的后备军。

这些因素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国就是一个俄国内地，它同原料、粮食和燃料产地(乌克兰、高加索、西◇333◇伯利亚、土尔克斯坦)的联系被割断了，它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那时协约国能够谈得上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并且也这样做了。过了两年，俄国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西伯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和土尔克斯坦都已经解放。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都已经被击溃。一部分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宣布了中立。邓尼金的残余军队（弗兰格尔的军队）处在被歼灭的前夕。西方各国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巩固着自己的战斗机关——第三国际，同时协约国已经不敢梦想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东方反对协约国的革命运动正在增长，产生了自己的核心——革命的土耳其，建立了自己的战斗机关——行动和宣传委员会〔107〕。

简单地说：协约国的后备军在一天一天地瓦解着，苏维埃俄国的后备军在一天一天地扩充着。很明显，现在，在一九二〇年，俄国失败的可能性比两年前小了，小得无比了。很明显，既然俄国在两年前经得住协约国的攻击，那末现在，当俄国的后备军在各个斗争领域中日益壮大的时候，它就更能经得住协约国的攻击。

这是不是说，同协约国的战争即将结束，我们可以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开始和平劳动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协约国虽然勉强认可了对波和约签订的事实，但是根据一切材料来看，协约国并不打算放下武器，看样子它打算把战场转移到南方即南高加索地域；而且完全有可能，格鲁吉亚这个协约国的外妾将根据义务给协约国效劳。◇334◇

协约国和俄国在地球上一起生活看来是太挤了，要在地球上确立

和平，其中有一方必须灭亡。如果问题是这样，如果协约国这样提出问题(而它只能这样提出问题)，那末很明显，俄国不能放下武器。相反地，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使全国所有力量都动起来，以便打退新的进攻。加强和巩固我国自由和独立的保卫者——红军，全力支持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尽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支持那些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反对协约国斗争的东方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如果我们想胜利，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以赴地来完成这些任务。

只要我们忠诚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必定胜利。

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提到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西方革命要获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我是说要为西方革命建立粮食储备。因为西方国家(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是完全依靠供给欧洲粮食的美国的。如果资产阶级美国拒绝供给这些国家粮食(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当这些国家革命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会遭到粮食恐慌。俄国没有特别的粮食储备，但是它毕竟是能够储备一些的，由于上述的粮食方面的前景很可能发生，应该立即提出在俄国为我们西方的同志建立粮食储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但是要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西方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共产党人报”(弗拉基高加索)
第一七二号◇335◇

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在
巴库苏维埃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在报告之前，我要代表俄国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你们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致敬，代表人民委员会向阿捷尔拜疆革命委员会和它的领导者纳利马诺夫同志致敬，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解放了阿捷尔拜疆并挺身捍卫着它的自由的红军第十一集团军致以热烈的敬礼。（鼓掌）

——————————

毫无疑问，在苏维埃政权三年的活动中，关于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问题是俄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没有注意苏维埃俄国，不重视它，不承认它。这是第一个时期，即从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那一天起到德帝国主义被击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即两个同盟——英国同盟和德国同盟，由于彼此厮杀而没有注意到苏维埃俄国，可以说，他们还顾不到俄国。第二个时期是从德帝国主义被击溃和德国革命开始起到邓尼金大举进攻俄国的时期。那时邓尼◇336◇金已经站在土拉的门口。从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协约国——英法美同盟打败了德国以后，用空出来的全部兵力来攻击苏维埃俄国。这就是后来成为神话的十四国联盟威胁我们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现在人们不仅注意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强国，不仅实际上承认我们，而且还有点怕我们。

第一个时期

三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历十一月七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开会决定包围克伦斯基的宫殿，俘获他的已经瓦解的军队，把政权转交给当时已经在召开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好则把我们看做怪人，坏则把我们看做“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国际环境来看，这个时期可以叫做苏维族俄国完全孤立的时期。不仅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俄国采取敌视态度，连我们西方的社会主义“同志们”也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们。

那时苏维埃俄国还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全下来，那只是因为西方各帝国主义者正忙于彼此间的激◇337◇烈的斗争。再加上他们以讥讽的态度对待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他们估计布尔什维克会自行灭亡。

从国内形势来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破坏俄国旧制度的时期，破坏资产阶级旧政权的全部机关的时期。

在理论上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把旧的国家机器拿过来并运用它。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原理完全被事实证实了，当时我们经历了沙皇官吏、职员和一部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整整一个怠工时期即国家政权十分混乱的时期。

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机关——旧军队及其将领集团被摧毁了。这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由于它们被摧毁，我们不得不暂时没有任何军队，并且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但是其他出路是没有的，历史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其他解放无产阶级的道路。

其次，资产阶级手中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机关——官吏机关即资产阶级的行政机关被破坏和摧毁了。

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银行。资产阶级的银行被剥夺，因而可以说，资产阶级就失去了灵魂。接着就进行摧毁经济生活的旧机关的工作和剥夺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工厂并交给工人阶级。再其次，摧毁旧的粮食机关，试图建立能够收集粮食并把粮食分配给居民的新的粮食机关。最后就是解散立宪会议。苏维埃俄国在这个◇338◇时期为了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大致就是这些。

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英法美同盟打败德帝国主义以后，动手惩治苏维埃俄国的时候开始的。

从国际方面来看，这个时期是协约国的军队和苏维埃俄国的军队公开作战的时期。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人们没有注意我们，并且讥笑和嘲弄我们，那末在这个时期就恰恰相反，一切黑暗势力都惊慌不安起来，要消灭俄国的有瓦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危险的所谓“无政府状态”。

从国内方面来看，这个时期应该称为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破坏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新的建设阶段开始了；整顿从厂主手中没收的工厂，建立真正的工人监督，然后无产阶级又从监督转到直接管理；建立新的粮食机关代替已经破坏的粮食机关，建立新的铁路机关代替已经破坏的中央和地方的铁路机关，建立新军队代替旧军队。

应当承认，这个时期的建设工作一般说来是搞得不好的，因为主要的建设力量(十分之九的力量)是用于建立红军。这是因为和协约国军队的殊死斗争关系着苏维埃俄国本身的生存，而它的生存在这个时期只有靠强大的红军的力量才保得住。还应当指出，我们的努力并没

有白费，因为在这个时期红军战胜了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它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威力。◇339◇

从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这第二个时期可以叫做俄国的孤立无援状态逐渐消除的时期。俄国的第一批盟友开始出现了。德国革命产生了团结一致的工人干部即共产主义干部，奠定了以李卜克内西集团为代表的新的共产党的基础。

在法国，以前不被注意的洛利欧小集团，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集团。在意大利，起初微弱的共产主义思潮，几乎笼罩了整个意大利社会党，笼覃了它的大多数党员。

在东方，由于红军的胜利而产生了对协约国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有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已经变成反对协约国及其盟友的直接战争。

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已经不再像第一个时期那样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敌视俄国的整体了，至于协约国内部在承认苏维埃俄国问题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他们开始发出同俄国谈判、同俄国成立协议的呼声。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就是这样。

最后，“不许干涉俄国”的口号在英法工人中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使得协约国不可能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协约国不得不停止派遣英法士兵来攻打俄国。协约国不得不只限于利用别人的军队攻打俄国，但是它又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这些军队。

第三个时期◇340◇

第三个时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叫做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前半期的特点是：俄国在击溃了主要敌人邓尼金以后，预见到战争将要结束，决定把那些适应战争目的的国家机关转上新轨道，即转上经济建设的轨道。以前说“一切为了战争”、“一切

为了红军”、“一切为了战胜外部敌人”，而现在则开始说“一切为了巩固经济生活”。但是，在击溃邓尼金并把他赶出乌克兰以后开始的第三个时期的这个阶段，由于波兰进攻俄国而中断了。这次协约国的目的是要阻挠苏维埃俄国在经济上巩固起来，使它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协约国就怕这一点，因而它唆使波兰进攻俄国。

已经适应经济建设的国家机关不得不重新改组，在乌克兰、乌拉尔和顿河建立起来的劳动军不得不按战时体制重新改编，以便把战斗部队团结在它们周围并把它们调去抗击波兰。这个时期是以波兰宣布中立和我们暂时没有新的外部敌人而告终的。唯一的直接的敌人就是以弗兰格尔为代表的邓尼金军队的残部，我们的布琼尼同志正在歼灭它。

现在有根据可以预料，苏维埃俄国至少会得到一个时间不长然而很重要的喘息时机，这样它就可以把那些仿佛在一天内就建立起红军的不知疲倦的工作人员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去，使工厂、农业和粮食机关恢复起来。

从外部关系即国际关系来看，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敌人不仅不再不注意俄国，不仅开始和它打仗，以全力把丘吉尔用来威胁俄国的神话般的十四国搬上舞台，而且敌人由于几次被打败，竟开始◇341◇有点怕俄国了，感觉到俄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不容欺侮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人民国家。

从国内方面来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国在粉碎弗兰格尔以后腾出了手，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国内建设，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经济机关的工作比第二个时期好得多，切实得多了。

一九一八年夏季，莫斯科的工人每两天只得到八分之一磅掺有豆饼的面包。这个悲惨的时期，这个艰难的时期过去了。莫斯科的工人和彼得格勒的工人现在每天领到一磅半面包。这就是说，我们的粮食机关整顿好了，工作改进了，学会收集粮食了。

至于我们对于内部敌人的政策，那我们应该保持而且是在保持着三个时期一直采取的那个政策，即镇压无产阶级的一切敌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当然不能认为是“普遍自由”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我们不给资产阶级任何普遍自由，就是说，不给他们任何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我们的对内政策归结起来就是：给予城乡无产者阶层以最大的自由，使资产阶级残余连最低的自由也得不到。

我们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依据的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

前 途

当然，我们这三年的建设工作没有像所愿望的那样顺利，但是应该注意到那些困难的难以设想◇342◇的工作条件，对这些工作条件不能躲避，也不能否认，而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第一、我们必须在炮火中进行建设。好像一个泥瓦匠，一只手在建筑房屋，另一只手在保护他所建筑的房屋。

第二、我们建设的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就是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不关心国家整体，不向自己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全国规模的经济的问题。不是的，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应该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需要，应该有计划地、有意识地、以全俄规模来组织经济。毫无疑问，这个任务是无比复杂和困难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建设工作没有产生最大的效果。

在这种实际情况下，我们的前途是很清楚的：我们正站在消灭我们外部敌人的门坎上，站在把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从军事轨道转到经济轨道的门坎上。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拥护和平，我们不主张战争。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身上（有些材料证明，协约国正力图把战场移到南方，移到南高加索），如果几次被我们打败的这个协约国想再一次强迫我们进行战争，那自然很明显，我们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不会解散我们的军队。和过去一样，我们将竭尽全力使红军健

壮并保持战斗准备，使它能够和从前一样勇猛地保卫苏维埃俄国，打退敌人。

回顾苏维埃政权的过去，不由得想起三年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的情况，当时我们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一小群布尔什维克掌握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它是布尔什维克的)和一支不◇343◇大的赤卫队，拥有一个总共不过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党员而且组织得还不十分紧密的很小的共产党，就是我们这一小群人打倒了资产阶级代表，把政权转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从那时起已经三年了。

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俄国经历了炮火和风暴，锻炼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我们手中只有一个彼得格勒苏维埃，而现在，过了三年，俄国所有的苏维埃都团结在我们周围了。

现在，我们的敌人所筹划的立宪会议已经被我们的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展成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替了。

那时我们只有一支由彼得格勒工人组成的很小的赤卫队，它们能镇压在彼得堡举行暴动的士官生，但是不能抗击外部的敌人，因为它的力量不强，而现在我们有一支数百万人的光荣的红军，这支军队正在消灭苏维埃俄国的敌人，这支军队战胜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我们骑兵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布琼尼同志正用铁拳消灭着弗兰格尔军队的最后残余。

三年前，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组织得还不十分紧密的共产党(总共不过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党员)，而现在，过了三年，在苏维埃俄国经历了风暴和炮火以后，我们有一个拥有七十万党员的党，这个党是钢炼成的，这个党随时都可以调动自己的队伍，把几十万党员集中到党的任何一个工作上去，这个党不怕自己的队伍混乱，只要中央委员会把手一挥，就能改编自己的队伍，使它们冲向敌人。◇344◇

三年前，在西方同情我们的只有一些很小的集团，只有法国的洛利欧集团、英国的马克林集团以及被德国资本主义的恶棍杀害的李卜

克内西的集团等，而现在，过了三年，在我们面前成长了强大的国际革命运动组织——第三共产国际，它争得了欧洲的主要政党：德国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我们现在有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核心——粉碎了第二国际的共产国际。

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先生被革命逐出德国，他不得不在落后的梯弗里斯，在格鲁吉亚小酒馆老板社会党人那里寻找避难所〔108〕，这不是偶然的。

最后，三年前我们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中所遇到的只是一种对革命的冷淡态度，而现在东方动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东方可以看见许多反对协约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我们有了把其他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革命核心——基马尔政府，它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但是还是手持武器进行着反对协约国的斗争。

三年前我们甚至不敢梦想东方会动起来，而现在我们不仅有了东方的革命核心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土耳其，而且我们还掌握了东方的社会主义机关——“行动和宣传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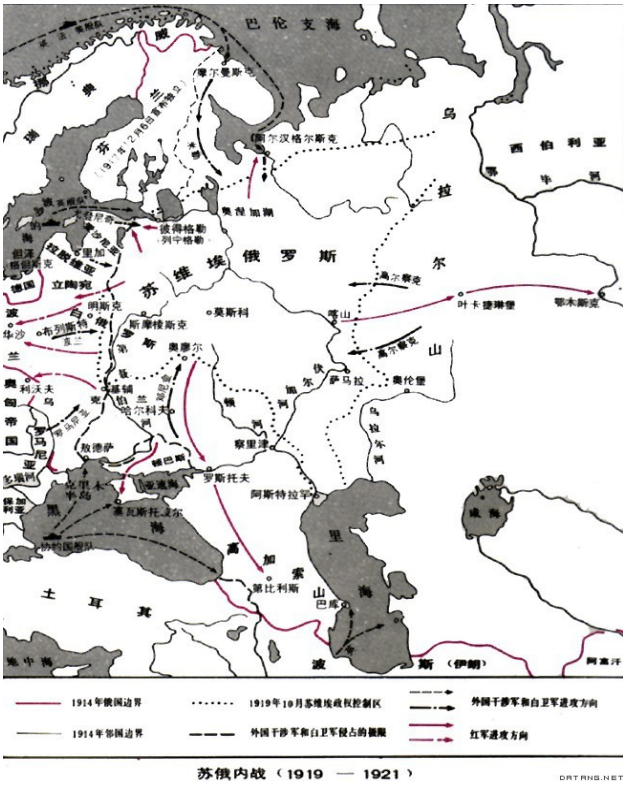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三年前我们在革命方面多么贫困，而现在我们又变得多么富有。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有根据断言，苏维埃俄国将继续生存下去，它将继续发展，它一定能战胜自己的敌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困难是吓不倒我们的。只要把路德的名言〔109〕改动一下，俄国现在就可以说：◇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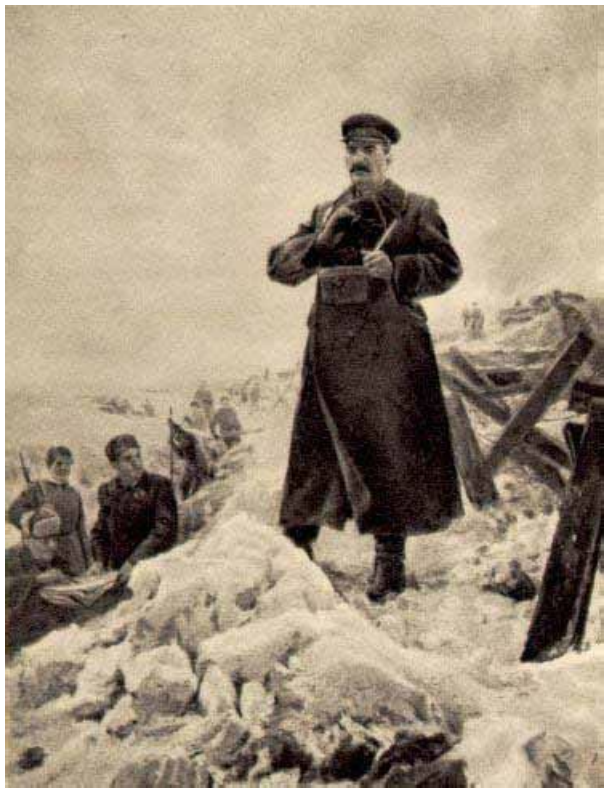
“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者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和十一日“共产党人报”(巴库)第一五七号和第一六〇号◇346◇

头戴“布琼尼”军帽的斯大林



国内战争态势图



斯大林在前线（画）

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10〕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　宣布达格斯坦实行苏维埃自治

同志们！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政府直到最近一直忙于同南部和西部的外部敌人作战，同波兰和弗兰格尔作战，因此没有可能和时间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达格斯坦人民深切关心的问题。

现在，弗兰格尔的军队已经被击溃，它的一小撮残余逃往克里木去了，我们同波兰也签订了和约，因此，苏维埃政府有可能来解决达格斯坦人民的自治问题。

在过去，俄国的政权掌握在沙皇、地主和厂主手中。过去的俄国是沙皇和刽子手的俄国。那时俄国是靠压迫旧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而生存的。俄国政府是靠受它压迫的各民族(其中包括俄罗斯民族)的脂膏和劳力而生存的。

这是各族人民咒骂俄国的时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已经被埋葬，永远不会复◇347◇活了。

在这个压迫者沙皇俄国的骸骨上诞生了新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俄国。

俄国境内各民族的新生活开始了。备受沙皇和富豪、地主和厂主压迫的各民族解放的时代开始了。

十月革命后，政权转到工人和农民手中，并且成为共产主义的政权。这个新时期不仅标志着俄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它还提出了解放所有一切民族的任务，其中也包括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东方各民族。

俄国变成了解放运动的杠杆，它不仅使我国各民族动起来，而且也使全世界各民族动起来了。

苏维埃俄国是一把火炬，它给全世界各族人民照亮着摆脱压迫者的羁绊的解放道路。

现在，当我们战胜了敌人而有可能来解决内部发展问题的时候，苏维埃俄国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宣布：达格斯坦应该实行自治，达格斯坦将享有内部自治权，同时和俄国各民族保持兄弟关系。

达格斯坦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生活和习惯来管理自己。

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中，沙利阿特[①]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我们得到消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散布谣言，说苏维埃政权禁止奉行沙利阿特。

我受权在这里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声明，这些传闻是不正确的。俄国政府赋予每个民族以充分的权利根据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来管理自己。◇348◇

苏维埃政府认为沙利阿特和居住在俄国的其他民族所有的习惯法一样，是一种有权能的习惯法。

如果达格斯坦人民愿意保存自己的法律和习惯，那末这些法律和习惯就应该被保存下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声明，达格斯坦实行自治并不表示而且不能表示它同苏维埃俄国分离。自治并不是独立。俄国和达格斯坦应该保持相互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达格斯坦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苏维埃政府让达格斯坦实行自治是有一定目的的，就是从当地工作人员中选拔出热爱本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人，把达格斯坦的一切管理机关，不论是经济方面的或是行政方面的，都托付给他们。只有这样，只有用这种

————————————————

① 沙利阿特是伊斯兰教的法律，根据可兰经制定。——译者注

方法才能使达格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接近起来。除了用吸引当地工作人员参加管理的方法来把达格斯坦提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以外，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苏维埃政权知道，愚昧无知是人民的第一个敌人。因此必须建立更多的使用当地语言的学校，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管理机关。

苏维埃政权希望用这种方法把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从旧俄国把他们抛入的那个愚昧无知的泥塘中拉上来。

苏维埃政府认为，在达格斯坦实行像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那种自治是必要的。

苏维埃政权向你们——达格斯坦各族人民的代表建议：责成你们的达格斯坦革命委员会选举代表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和最高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共同制定达格斯坦的自治计划。◇349◇

最近在达格斯坦南部发生了一些事件。叛徒果秦斯基在那里执行弗兰格尔将军(就是在邓尼金时代镇压起义人民、毁坏北高加索山民的山村的那个弗兰格尔)的意志，反对达格斯坦的自由。这些事件说明了很多问题。

我应当指出，以红色游击队为代表的达格斯坦人民和果秦斯基进行战斗，保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从而证明自己对红旗是忠诚的。

如果你们能赶走达格斯坦劳动人民的敌人果秦斯基，那你们就没有辜负最高苏维埃政权所给予的信任——让达格斯坦实行自治。

苏维埃政府是第一个自愿地让达格斯坦实行自治的政府。

我们希望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不辜负苏维埃政府的信任。

达格斯坦各族人民和俄国各族人民的联盟万岁！

达格斯坦苏维埃自治万岁！

二 结 束 语

同志们！现在当苏维埃政权的最后一个敌人被击溃的时候，苏维埃政府自愿让达格斯坦实行自治的政治意义就愈来愈明显了。◇350◇

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沙皇政府以及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通常都是在处于困难情况下，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人民让步或进行某些改革，苏维埃政权却恰恰相反，它是处在高潮的时候完全自愿地让达格斯坦实行自治的。

这就是说，达格斯坦的自治将成为达格斯坦共和国生活的牢固的不可摧毁的基础。因为只有自愿给予的东西才是巩固的。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希望达格斯坦各族人民在将来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不会辜负苏维埃政权给予你们的高度信任。

自治的苏维埃达格斯坦万岁！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苏维埃达格斯坦报”
第七十六号◇351◇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11〕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　关于捷列克区域实行苏维埃自治的报告

同志们！召开今天的代表大会，是为了宣布苏维埃政府在捷列克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安排和他们对哥萨克的态度这两个问题上的意旨。

第一个问题是对哥萨克的态度。

实际生活表明，哥萨克和山民共同居住在一个行政单位内产生了无休止的纠纷。

实际生活表明，要避免彼此欺侮和流血事件，必须把哥萨克群众和山民群众分开。

实际生活表明，划定界限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因此，政府决定让大多数哥萨克特别成立一个省，让大部分山民成立一个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以捷列克河为界。　.

苏维埃政权一向力求使哥萨克的利益不受损害。哥萨克同志们，苏维埃政权没有打算夺取你们◇352◇的土地。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你们从沙皇将军和富豪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从革命一开始就实行这个政策。

而哥萨克的行动却是非常令人可疑的。他们总是三心二意，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他们不是和比切拉霍夫搅在一起，就是和邓尼金、弗兰格尔勾勾搭搭。

不久以前，那时对波和约还没有签订，弗兰格尔正向顿巴斯进攻，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捷列克哥萨克背信弃义(不能用别的话来表达)，在后方举行了反对我军的暴动。

我说的是不久以前松查线上的暴动，这次暴动的目的是切断巴库和莫斯科的联系。

哥萨克的这个企图暂时是得逞了。

山民在这个时候表明自己是比较优秀的俄国公民，哥萨克应当感到羞耻。

苏维埃政权忍耐了很久，但是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由于有些哥萨克背信弃义，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不得不把犯罪者全部赶出村庄，让彻岑人居住。

山民把这件事情了解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地欺侮捷列克的哥萨克，可以掠夺他们，抢劫他们的牲畜，侮辱他们的妇女。

我要说明，如果山民是这样想的，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山民应该知道，苏维埃政权对于俄国公民是不分民族一律加以保护的，不管他们是哥萨克还是山民。应该记住，如果山民不停止暴行，苏维埃政权将用革命政权最严厉的办法来惩罚他们。◇353◇

今后，不论是到另行成立的省里去的哥萨克还是留在山民自治共和国的哥萨克，他们的命运将完全决定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如果哥萨克对工农俄国仍有背信弃义的行动，我必须指出，政府将不得不重新采取高压手段。

但是，如果哥萨克今后表现为俄国的忠实公民，我在这里向大会全体代表声明：哥萨克的头发一根也不会被碰掉。

第二个问题是对捷列克区域的山民的态度。

山民同志们！在俄国历史上的旧时期，沙皇和沙皇将军践踏你们的权利,摧残你们的自由，这个压迫和奴役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俄国政权已经转到工人和农民手中，俄国不应该再有被压迫者了。

俄国让你们实行自治，就是把吸血鬼沙皇和压迫者沙皇将军从你们手中夺去的自由归还你们。这就是说，你们的内部生活应该根据你

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风俗加以安排，当然是要在俄国的共同宪法的范围内。

每个民族，彻岑人、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也夫人以及留在山民自治地区的哥萨克，都应该有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特点来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民族苏维埃。至于外乡人，他们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苏维埃俄国的忠实儿女，苏维埃政权将永远尽力保护他们，那就不用说了。◇354◇

如果事实证明需要沙利阿特，那就让沙利阿特继续存在。苏维埃政权并不想向沙利阿特宣战。

如果事实证明肃反委员会和特别处不善于适应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特点，那末很明显，在这方面也应该作适当的改变。

领导各民族苏维埃的应当是由山民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和莫斯科有直接联系的山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这是不是说，山民因此将同俄国分离，俄国将抛开他们，红军将撤回俄国，像山民担心地询问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俄国懂得，如果让捷列克的小民族自己管自己，那它们就不能保住自己的自由，就不能对抗世界强盗及其走狗——逃到格鲁吉亚并阴谋从那里反对山民劳动群众的山民地主。自治并不是分离，而是实行自治的山区各民族同俄国各民族结成联盟。这种联盟是山区的苏维埃自治的基础。

同志们！过去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很多政府只有当它们处在困难的时候，即处在因为被削弱而需要本国人民同情的时候，才答应实行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改革和让步。沙皇政府和一般资产阶级政府向来是这样做的。苏维埃政府和它们不同，它是按照另一个原则行动的。苏维埃政府让你们实行自治不是在困难的时候，而是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是在克里木完全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最后的支柱的时候。

实际生活表明，政府在危急的时候给予的东西是不巩固的，不可靠的，因为当危急时刻过去以◇355◇后，这种东西往往就会被收回。

只有在不是迫于暂时的片刻的需要，而是由于完全意识到改革的好处，并且是在政府力量强大的时候给予的改革和自由才是巩固的。现在苏维埃政府正是这样做的，把你们的自由归还你们。

苏维埃政权这样做是想说明，它完全信任你们山民同志们，它信任你们的自治能力。

我们希望你们不会辜负工农俄国的这一信任。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和俄国各族人民的联盟万岁！

二 结 束 语

同志们！我收到了几张有关自治问题的条子。我应当答复这些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山民苏维埃共和国的疆界问题。共和国的境界大体上这样确定：北面以捷列克河为界，其他方面以捷列克区域各民族即彻岑人、英谷什人、卡巴尔达人、沃舍梯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也夫人的地域为界，包括捷列克河这边的外乡人和哥萨克村镇。这就是山民自治共和国的领域。至于境界的详细轮廓，应该由山民共和国的代表和邻近各省的代表组成委员会来确定。

第二个问题：山民自治共和国的中心设在哪里，格罗兹内市和弗拉基高加索市是否划归共和国？当然划归共和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定为共和国的首都。我个人认为弗拉基高加索应当成为◇356◇这样的中心，因为它是联系捷列克区域各民族的中心。

第三个是关于自治本身的权限问题。有人问我：山民共和国将实行哪种类型的自治？

自治有各种各样的：有像卡列里亚人、切列米斯人、楚瓦什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所实行的行政自治，也有像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所实行的政治自治。山民共和国

的自治是政治自治，当然也是苏维埃自治。这是巴什基里亚、柯尔克兹和鞑靼型的自治。这就是说，山民苏维埃共和国将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产生人民委员会，它和莫斯科直接联系。共和国的经费将从联邦共和国的总经费中支拨。管理经济和军事的各人民委员部直接同中央有关的人民委员部联系。其他人民委员部,如司法、农业、内务、教育等人民委员部，隶属山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则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系。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完全由中央政权掌管。

其次是关于实行自治的时间问题。为了制定详细的章程，用科学的说法，为了制定共和国的“宪法”，每个民族必须选出一名代表，由这些代表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共同拟定山民自治共和国的宪法。

你们不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从彻岑人、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也夫人和加入山民自治共和国的哥萨克村镇各选出一名代表，一共选出七名代表。

有人问我民族苏维埃的选举制度。选举应该根据宪法进行，就是说，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苏维埃◇357◇的权利。苏维埃应该是劳动人民的苏维埃。

在我们俄国大家都公认，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应该声明，不劳动者不得参加选举。这是苏维埃自治的基础。资产阶级自治和苏维埃自治的区别就在这里。

再其次是关于军队的问题。

军队应该绝对是共同的，因为山民共和国靠自己的一支很小的军队是保卫不住自己的自由的,是根本抵抗不了协约国所资助的军队的。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想着重谈谈自治能够给予你们山民的主要东西。

使山民终身受压迫的主要祸害就是他们的落后,他们的愚昧无知。只有铲除这个祸害，只有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才能拯救山民免于灭

亡，才能使他们达到高度的文化。这就说明为什么山民在自己的自治共和国中必须首先从建立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做起。

实行自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吸引山民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在你们这里，能够管理本民族的本地人太少了。因此，在粮食委员会、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和国民经济的各机关中工作的是不懂得你们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俄罗斯人。必须使你们的人参加国家各个管理部门。这里所说的自治应当这样理解，就是在一切管理机关中都是懂得你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的自己人。

实行自治的意义就在这里。

自治应该使你们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实行自治的目的就在这里。◇358◇

实行自治的效果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因为决不能在一天内就从当地人中间造就出有经验的国家管理人员。但是，过不了两三年，你们就能学会管理自己国家的本领，就会从自己人中间产生出教师、经济工作人员、粮食工作人员、土地规划人员、军事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到那时你们就会看见，你们学会自治了。

山民自治一定能教会你们管理自己的国家，一定能帮助你们成为像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样自觉的人，他们不仅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学会了战胜自己的死敌。山民自治万岁！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和十五日“民族生活报”
第三十九号和第四十号◇359◇

高 加 索 的 局 势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从南方出差回来的**斯大林**同志就高加索局势向本报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

“高加索对革命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原料、燃料和粮食的产地，而且还在于它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特别是位于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并且有几条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极重要的道路(巴土姆——巴库，巴土姆——塔夫利兹，巴土姆——塔夫利兹——埃尔斯伦)。

协约国估计到这一切，因此，它现在控制了君士坦丁堡这个黑海的门户，想保持经由南高加索直通东方的道路。

谁能最后在高加索站住脚，谁就能利用那里的石油和通向亚洲腹地的最重要的道路，是革命还是协约国，——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阿捷尔拜疆的解放大大削弱了协约国在高加索的地位。土耳其和协约国的斗争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可是协约国并没有灰心，它继续在高加索编织它的蜘蛛网。

把梯弗里斯变为反革命活动的根据地；组织阿捷尔拜疆、达格斯坦和捷列克区域山民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是由协约国出钱并在资产阶级格鲁吉亚帮助之下组织的）；讨好基马尔主义者，鼓吹高◇360◇加索各民族在土耳其保护下组织联邦的思想；协约国在波斯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西拍埃[①]充斥波斯，——这一切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协约国老狼并没有打瞌睡。毫无疑问，在弗兰格尔被击溃以后，协约国走狗在这方面的活动大大加强，达到狂热的程度。

————————————

① 英国在印度招募当地居民组成的殖民地雇佣军的士兵。——译者注

协约国在高加索胜利的可能性怎样？革命在高加索胜利的可能性又怎样？

毫无疑问，协约国在达格斯坦和捷列克区域胜利的可能性已经降落到零。弗兰格尔已经被击溃，达格斯坦和捷列克区域宣布实行苏维埃自治，同时在这些区域进行了紧张的苏维埃建设工作，这些情况使得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巩固了。捷列克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和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地数百万居民庄严宣誓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为苏维埃而战，这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政权不是在困难的时候而是在其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宣布山民实行自治，山民把这一点正确地评价为苏维埃政权信任山民的标志。山民和我个人谈话时说：“政府在困难的时候，迫于一时之需而给予人民的东西是不巩固的。只有像现在苏维埃政府所做的这样，在战胜了敌人之后从上面给予人民的改革和自由才是巩固的。”

协约国在阿捷尔拜疆胜利的可能性也同样是很小的，因为阿捷尔拜疆已经获得独立并加入了俄国各族人民的自愿联盟。几乎用不着证明，协约国向阿捷尔拜疆和巴库石油伸出的掠夺魔爪只能引起阿捷尔拜疆劳动者的憎恶。◇361◇

在弗兰格尔被击溃以后，协约国在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胜利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小了。毫无疑问，达什纳克党人的阿尔明尼亚成了协约国的挑衅行为的牺牲品，协约国唆使它进攻土耳其，然后又可耻地把它抛弃，任凭土耳其人宰割。几乎不用怀疑，阿尔明尼亚除了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生路。这种情况，对那些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仍然在向协约国卑躬屈膝的各民族，首先是对格鲁吉亚，无疑是一个教训。

格鲁吉亚的经济和粮食处于崩溃状态，这一事实连目前格鲁吉亚的首领也确认了。格鲁吉亚陷入协约国的罗网，因而失去了巴库的石油和库班的粮食；格鲁吉亚变成了英法帝国主义军事行动的主要根据

地，因而采取了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态度，——这个格鲁吉亚现在已经在苟延残喘。无怪乎垂死的第二国际的堕落领袖考茨基先生被革命浪潮冲出欧洲以后，在陷入协约国罗网的陈腐的格鲁吉亚，在破产的格鲁吉亚小酒馆老板社会党人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几乎不用怀疑，到困难的时候，格鲁吉亚也会像阿尔明尼亚一样被协约国抛弃。

英国人在波斯的征服者的地位愈来愈明显了。大家知道，在瞬息万变地更换着成员的波斯政府不过是英国武官的帷幕。大家知道，所谓波斯军队已经不存在，因为它被西拍埃代替了。大家知道，由于这个缘故在德黑兰和塔夫利兹产生了许多次反英发动。几乎不用怀疑，这种情况是不能增加协约国在波斯胜利的可能性的。

最后谈谈土耳其。毫无疑问，反对土耳其、特别是反对基马尔主义者的色佛尔条约〔112〕的时期快◇362◇要结束了。一方面，基马尔主义者同协约国的斗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英国殖民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另一方面，弗兰格尔的被击溃，威尼齐洛斯在希腊的垮台，——这两方面的情况迫使协约国大大缓和了对基马尔主义者的政策。阿尔明尼亚在协约国绝对“中立”下被基马尔主义者击败，关于打算把弗拉基亚和士麦那交还土耳其的传闻，关于基马尔主义者和协约国走狗苏丹之间进行谈判的传闻，关于打算让出君士坦丁仅的传闻，最后，土耳其西方战线的沉寂，——这一切都是说明协约国向基马尔主义者极力讨好和基马尔主义者的立场可能稍许变右的征候。

协约国讨好的结果怎样，基马尔主义者将向右转多少，——这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总是没有疑问的：几年以前开始的争取殖民地解放的斗争无论如何将加强起来，这个斗争公认的旗手俄国将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支持这个斗争的拥护者，如果基马尔主义者不背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个斗争将和他们一起走向胜利，如果基马尔主义者站到协约国的阵营中，这个斗争将不顾基马尔主义者而走向胜利。

西方的革命运动日益炽烈和苏维埃俄国的实力日益增长说明了这一点。”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六九号◇363◇

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

多灾多难的、受尽折磨的、承蒙协约国和达什纳克党人的恩惠而弄得挨饿、破产和流离失所的阿尔明尼亚，这个受尽一切“朋友”欺骗的阿尔明尼亚现在得到解救，宣布自己是苏维埃国家了。

无论阿尔明尼亚利益的“永久保护者”英国的虚伪保证，无论臭名远扬的威尔逊十四条〔113〕，无论国际联盟的堂皇诺言及其对阿尔明尼亚的“委任统治”，都没有能够(而且也不可能！)把阿尔明尼亚从残害和杀戮中拯救出来。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才给阿尔明尼亚带来了和平和民族复兴的可能性。

促使阿尔明尼亚苏维埃化的一些事实如下。协约国的代理人达什纳克党人的毁灭性的政策把这个国家弄得混乱不堪和贫困万分。达什纳克党人策动的对土战争使阿尔明尼亚的困难状态达到极点。深受饥饿和无权之苦的阿尔明尼亚北部各省份在十一月底举行起义并建立了以卡西杨同志为首的阿尔明尼亚军事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三十日列宁同志收到阿尔明尼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致敬电，电文中报告苏维埃阿尔明尼亚已经诞生，革命委员会占领了杰里然城。十二月一日苏维埃阿捷尔拜疆自愿放弃引起争执的几个省份并宣布把赞格祖尔、纳希切万和纳果尔内卡拉巴赫交给苏维埃阿尔◇364◇明尼亚。十二月一日革命委员会收到土耳其统帅部的贺电。十二月二日收到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报告，内称埃里温的达什纳克党人政府已经被赶走，阿尔明尼亚军队听从革命委员会指挥。

现在阿尔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已经在阿尔明尼亚苏维埃政权手中。

阿尔明尼亚和它周围的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宿仇，由于在阿尔明尼

亚、土耳其、阿捷尔拜疆的劳动人民之间建立了兄弟般的团结而一举消释了。

让一切该知道的人都知道，帝国主义外交老狼绞尽脑汁所未能解决的所谓阿尔明尼亚“问题”，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解决。

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365◇

注　释

〔1〕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德国陆战队开始在波罗的海里加湾入口处的埃捷尔、达果和其他岛屿登陆。——(正文第4页)

〔2〕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联盟在基辅建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拉达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并支持顿河的卡列金和其他白卫将军，走上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一九一八年四月德占领军以斯柯罗帕茨基的统领府代替了拉达。——(正文第6页)

〔3〕在弗·伊·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或称“告乌克兰人民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中说道：“……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我们人民委员会无保留无条件地立即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三页至第三二五页)

人民委员会在给代表中央拉达同人民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彼得格勒乌克兰司令部(确切些说，是乌克兰彼得格勒区军事拉达司令部)的“复文”中说：“至于拉达所提出的条件，其中带有原则性(自决权)的几条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争论或冲突的原因，因为人民委员会完全承认并在彻底贯彻这些原则。”(见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消息报”第二四五号)——(正文第7页)

〔4〕电报中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全乌克兰工兵代表苏维埃和部分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握了乌克兰全部政权(见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消息报”第二五二号)。——(正文第13页)

〔5〕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一千零四十六名代表。弗·伊，列宁做了关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做了关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约·维·斯大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的决议，批准了弗·伊·列宁在约·维·斯大林参与下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批准

了人民委员会关于芬兰和阿尔明尼亚独立的法令，同时批准了约·维·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正文第21页)

〔6〕指乌克兰中央拉达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通过的第三个宣言。——(正文第23页)

〔7〕高加索或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派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梯弗里斯成立的。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正文第24页)

〔8〕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是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由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一九一八年四月由于德军占领乌克兰，人民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其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群众起义反对德国占领军和盖达马克部队。——(正文第27页)

〔9〕俄国和四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之间的停战协议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期限为二十八天。由于缔结和约谈判的拖延，停战期限延长了。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德国人破坏了停战协定，转入全线进攻。——(正文第27页)

〔10〕指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和四国同盟经过秘密谈判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条约。——(正文第27页)

〔11〕“巴库工人报”是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机关报，于一九〇六年、一九〇八年九月至十月和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出版。苏维埃政权在阿捷尔拜疆胜利后，该报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复刊，初名“阿捷尔拜疆贫民报”，后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起仍用原名。现在“巴库工人报”是阿捷尔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巴库委员会的机关报。——(正文第37页)

〔12〕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以北部各州获胜而告终。战争的结果之一，是克服了南部各州的分离主义，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正文第47页)

〔13〕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天主教邦的反动联盟，成立于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宗得崩德和主张政权集中的瑞士其他各邦间爆发了武装斗争。战争的结果是宗得崩德失败，瑞士从几个国家的联盟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正文第47页)

〔1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草案起

草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成立。委员会由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委员会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约· 维·斯大林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为工作基础。约·维·斯大林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草案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正文第55页)

〔15〕土尔克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一日举行。代表大会宣布土尔克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实行自治，并选出了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正文第56页)

〔16〕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在约·维·斯大林主持下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楚瓦什人和马里人的代表。会议选出了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因内战爆发，没有召开成立大会。——(正文第60页)

〔17〕“我们的时代报”是社会革命党人派的晚报，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65页）、

〔18〕南高加索议会代表和土耳其代表之间的和平谈判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在巴土姆开始。五月二十六日南高加索共和国瓦解后，巴土姆的和平谈判由“独立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进行。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签订和约；按照和约规定，巴土姆、阿哈尔齐赫县和阿哈尔卡拉基县的一部分割给土耳其。此外，土耳其并取得土军在格鲁吉亚铁路上自由通行的权利。——(正文第66页)

〔19〕一九一八年三月，阿布哈兹发生起义，反对反革命的南高加索议会，废除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政权机关，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孟什维克调动大队人马，进攻起义人民。虽然起义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斗争延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但是他们的抵抗仍然被孟什维克军队击破。接着就是残酷的镇压，甚至累及和平居民。——(正文第66页)

〔20〕指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基辅开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和乌克兰统领政府代表的和平会议。——(正文第72页)

〔21〕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委员会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南俄粮务总领导者。给斯大林同志的委任状的内容如下：

“人民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为特命全权南俄粮务总领导者。各地方各区域人民委员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司令部和各部队长官、各铁路机关和车站站长、各内河和海上商船的组织、各地邮电和粮食机关、所有专员和代表均须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正文第82页)

〔22〕五人委员会是莫斯科—基辅—沃龙涅什以及其他铁路的管理局的行政技术领导机关；委员会设在沃龙涅什。——(正文第83页)

〔23〕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夜，弗·伊·列宁以直达电报告知约·维·斯大林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发动叛乱的消息。约·维·斯大林在察里津亲自收到弗·伊·列宁的电报，电报中说：“各地必须无情地镇压那些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手中工具的卑鄙的疯狂的冒险分子……因此，要无情地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把情况随时告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二十一号)——(正文第84页)

〔24〕这是指给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的信，见“苏联内战史文件”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卷第二八九页。——(正文第84页)

〔25〕指一九一八年英军占领牟尔曼斯克的事件。——(正文第84页)

〔26〕区域特别粮委会即南俄区域特别粮食委员会。——(正文第88页)

〔27〕弗·伊·列宁收到约·维·斯大林的信后，涂去对他个人的称呼和署名，把约·维·斯大林的信作为自己的指示送往彼得格勒。——(正文第89页)

〔28〕“革命士兵报”是察里津战线的军队报纸，由约·维·斯大林发起创办。该报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起作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自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二号)起“革命士兵报”是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而自十月二十九日(第六十九号)起至停刊止，是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正文第93页)

〔29〕“斗争报”自一九一七年五月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察里津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自一九一七年年底起，“斗争报”成为察里津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该报出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正文第93页)

〔30〕里加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被科尔尼洛夫将军让给德国人的。——(正文第95页)

〔31〕预备国会或共和国临时会议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咨议机关，由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民主会议产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立预备国会，是企图制止已经高涨的革命并把国家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引到资产阶级国会制度道路上。——(正文第 96 页)

〔32〕“国防会议”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目的是动员居民的人力和物力以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正文第 101 页)

〔33〕黑帮代表大会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罗将柯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地主、厂主、僧侣代表、将军和军官会议是在集结反革命力量以扑灭布尔什维主义和已经高涨的革命的标志下进行的。——（正文第 109 页）

〔34〕“工人之路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它代替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时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而出版。该报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创刊，十月二十六日停刊。“工人之路报”的主笔是约·维·斯大林。——(正文第 109 页)

〔35〕托尔帕利，意即芬兰的无地农民，他们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正文第 115 页)

〔36〕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了俄共(布)伊斯兰教民族组织的中央常务局。——(正文第 122 页)

〔37〕“乌克兰在解放中”一文经过某些修改后，以“解放中的乌克兰”为题，作为社论也刊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真理报”第二六一号上。——(正文第 123 页)

〔38〕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最初设在库尔斯克城，后来设在苏札城。政府由克·叶·伏罗希洛夫、费·安·谢尔盖也夫(阿尔焦姆)等人组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推翻统领，建立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正文第 123 页)

〔39〕乌克兰执政内阁是一九一八年年底在基辅由佩特留拉和文尼阡柯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革命民族主义政府。一九一九年二月，执政内阁为乌克兰起义的工人和农民所推翻。——(正文第 124 页)

〔40〕“光明来自东方”一文同时作为社论刊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第二七三号上，没有署名。——(正文第125页)

〔41〕爱斯兰劳动公社即爱斯兰苏维埃共和国，是在红军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纳尔瓦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约·维·斯大林起草的关于承认爱斯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的法令。——(正文第125页)

〔42〕拉脱维亚苏维埃政权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宣告成立。拉脱维亚临时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布告拉脱维亚劳动人民书，宣布国家政权已经归苏维埃所有。其中说道：“我们知道，在这困难的道路上，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后面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后我们仍旧要和它保持紧密联系，而且不仅仅是外部的联系。”——(正文第126页)

〔43〕立陶宛塔利巴(资产阶级的民族委员会)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德国占领当局操纵下成立的。——(正文第126页)

〔44〕哈尔科夫的三天罢工发生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罢工是因佩特留拉分子逮捕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团而引起的。参加罢工的有各企业、电车公司和发电站的工人。佩特留拉当局被迫释放被捕者。之后，根据苏维埃的决定罢工停止了。——（正文第127页）

〔45〕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立陶宛的维尔纳和其他城市发生了游行示威和政治总罢工。这是根据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为抗议资产阶级塔利巴和德国占领者的政策而组织的。参加维尔纳游行示威的约有两万工人和城市贫民。游行示威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游行示威群众并要求德国人停止从立陶宛运走铁路器材和其他物资，要求释放政治犯。——(正文第129页)

〔46〕给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致敬电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维尔纳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在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致敬电中说：“由久经考验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同志领导的人民委员会，是立陶宛工人阶级日益扩大的争取自己彻底解放的斗争的指路明星。”在给红军的致敬电中说：“……我们立陶宛工人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你们在反对反革命武装力量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加入这支军队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共同解放，并为了呻吟在占领者残酷压迫下的本国弟

兄们的解放而流血牺牲的立陶宛儿女——工人和农民致敬……”——（正文第129页）

〔47〕立陶宛临时革命工人政府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上半月成立的。领导这个政府的是布尔什维克维·谢·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临时工人政府发表宣言，宣言中说：一、全部政权归工人、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代表苏维埃。二、从现在起宣布废除德国占领者的政权。三、宣布推翻立陶宛西泽塔利巴及其内阁，并宣布它们为非法。”——(正文第129页)

〔48〕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颁布由列宁签署的法令，承认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全俄中央执行委真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通过革命斗争而建立的爱斯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再度证明，这些国家过去隶属于旧俄帝国这一事实，并不使它们负有任何义务，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坚信，只有在目前，在承认有完全自决自由并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掌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居住在旧俄帝国领土上的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的自由的、自愿的和牢不可破的联盟……”(正文第129页)

〔49〕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由于东方战线特别是第三集团军地段的情势危急，俄共(布)中央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决定派约·维·斯大林前往东方战线。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成立了由中央委员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皮尔姆失陷和前线失败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以恢复第三和第二集团军地域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前往东方战线，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恢复第三集团军战斗力和巩固前后方的巨大工作。东方战线经委员会工作后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底转危为安。——(正文第131页)

〔50〕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把调查皮尔姆溃败原因的情况，做成“初步简要报告”，送给弗·伊·列宁和党中央。报告中并提到委员会所拟定的恢复第三集团军地段的局势和保证该军转入进攻的措施。一月十四日弗·伊·列宁回电答复如下：

“格拉佐夫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住所

第一封密码电报收悉。务请你们二人亲自就地领导实行既定的措施，否则胜利便无保障。

列宁”——(正文第133页)

〔51〕中心委员会是全俄撤退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正文第134页)

〔52〕这里指的是总司令根据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的要求应当派往第三集团军的几个团。弗·伊·列宁把这个报告送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时在上面写道：“……我认为，瓦采齐斯把三个团调往纳尔瓦附近**简直是岂有此理。请撤销这个命令！！**”(见“列宁文集”第三十四卷第九十页)——(正文第135页)

〔53〕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颁布的向城乡居民有产者征收一次特别税的法令。法令中规定贫农免缴特别税，中农适当地缴纳，特别税重担全部加在富农身上。——(正文第149页)

〔54〕“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是日报，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创刊，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名称出版。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该报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自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名称出版。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该报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起用“全俄农工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名称在莫斯科出版。自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消息报”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机关报，后来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正文第151页)

〔55〕白俄罗斯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明斯克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百三十名代表。代表大会宣布白俄罗斯为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批准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宣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承认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独立的决议。——(正文第160页)

〔56〕立陶宛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维尔纳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二百二十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立陶宛临时工农政府的总结报告、和白俄罗斯联合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代表大会认为立陶宛

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合并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联邦关系，因此它在决议中说：“代表大会深深地感到自己同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它委托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立即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乌克兰和爱斯兰诸工农政府进行谈判，以便使所有这些共和国组成统一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文第160页)

〔57〕指协约国理事会预定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在太子群岛(马尔马拉海)举行的会议。会议邀请苏维埃政府代表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反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被宣布为恢复俄国国内和平。会议没有举行。——(正文第163页)

〔58〕伯尔尼代表会议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至十日在伯尔尼(瑞士)举行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的国际会议。—— (正文第164页)

〔59〕引自阿·瓦·科里佐夫的诗“森林”(见“阿·瓦·科里佐夫诗歌全集”一九三九年列宁格勒版第九十页)。—— (正文第164页)

〔60〕俄共(布)党纲草案起草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由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等人组成。该委员会拟定的草案成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的基础。文中所引草案的一部分，未加更改地列入了党纲(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一七页)。——(正文第165页)

〔61〕指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召集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会议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正文第167页)

〔62〕“真理报”是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日报，是根据弗·伊·列宁的指示和约·维·斯大林的倡议创办的，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彼得堡出版。二月革命以后(从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起)，“真理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重新出版。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约·维·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一九一七年四月弗·伊·列宁回到俄国后，“真理报”由弗·伊·列宁领导。“真理报”的经常撰稿者有维·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克·恩·萨莫依洛娃等人。在这个时期，“真理报”尽管受到追究和迫害，但是仍然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把

工人、革命士兵和农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揭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正文第167页)

〔63〕见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十七页至第二十二页)。——(正文第167页)

〔64〕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欧洲和美洲各主要国家的五十二名代表。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瓦·瓦·沃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宣布此次会议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弗·伊·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文第169页)

〔65〕伯尔尼委员会是伯尔尼社会沙文主义者代表会议“为调查俄国社会政治情况”而任命的委员会。被指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考茨基、希法亭、龙格等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苏维埃政府对该委员会请求允许入境一事发表声明说，苏维埃政府虽然认为伯尔尼委员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委员会，也决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是还是允许它进入苏维埃俄国。“伯尔尼的著名的钦差大臣”(弗·伊·列宁这样称呼该委员会的委员)的访问没有进行。——(正文第172页)

〔66〕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底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协约国理事会打算再次邀请俄国一切“实际存在的”政府参加太子群岛会议的消息。——(正文第172页)

〔67〕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二)俄共(布)党纲；(三)关于共产国际；(四)军事情况和军事政策；(五)农村工作；(六)组织问题；(七)选举中央委员会。弗·伊·列宁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和军事小组会上讨论了军事问题。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所谓“军事反对派”。“军事反对派”纠集了以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一部分没有参加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工作人员。

“军事反对派”反对托洛茨基歪曲党的军事政策，反对他的反党活动，但是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并在一系列的军事建设问题上 维护其他不正确的观点。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驳斥了“军事反对派”。代表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的许多提议（斯米尔诺夫草案），同时也斥责了托洛茨基的有害立场。代表大会产生的由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等同志组成的军事问题委员会拟定了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关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及其关于军事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六页至第三一一页。——(正文第 174 页)

〔68〕改组国家监察部的法令草案是由约·维·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的。这个草案曾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和四月三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约·维·斯大林做了几次关于草案的报告。弗·伊·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草案的起草和最后修订工作。——(正文第 176 页)

〔69〕两个文件：第一个题为“二十六个委员的被害”，第二个题为“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汤姆生将军和蔡金先生的会见”。这两个文件作为本文的附件刊载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消息报”上。——(正文第 177 页)

〔70〕“劳动旗帜报”是社会革命党巴库委员会的报纸，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创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刊。——(正文第 177 页)

〔71〕“统一俄国报”是立宪民主党派的报纸，由所谓“巴库市俄罗斯民族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七月出版。——(正文第 177 页)

〔72〕“火星报”是孟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报纸，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创刊，一九二〇年四月停刊。——(正文第 179 页)

〔73〕由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尤登尼奇的进攻和因此而造成彼得格勒有被白军包围和占领的危险，约·维·斯大林被作为国防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派往彼得格勒战线。在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所发的委任状中指出，“鉴于西方战线所造成的情况”，特派约·维·斯大林到彼得格勒地域和西方战线其他各地域，“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约·维·斯大林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到达彼得格勒。——(正文第 181 页)

〔74〕红丘和灰马是彼得格勒附近的两个炮台。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这两个炮台的卫戍部队受了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相勾结的白卫分子的反革命的煽动，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为了镇压叛乱分子，六月十三日

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命令出动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同时在奥拉尼恩包姆组织了以水兵支队为核心的岸防部队。六月十四日约·维·斯大林来到奥拉尼恩包姆，召开了海陆军统帅部代表、各支队和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会议。会上通过了约·维·斯大林所提出的从海上和陆上同时攻击以夺取红丘炮台的计划。六月十五日，岸防部队和其他部队在约·维·斯大林亲临战线直接领导下，在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的支持下举行了进攻。苏维埃军队歼灭了红丘炮台接近地的叛乱分子后，于六月十六日零时三十分占领了红丘炮台。数小时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正文第183页)

〔75〕“泰晤士报”(《Times》)是英国大资产阶级的权威报纸，于一七八八年在伦敦创刊。在尤登尼奇进攻的时期，该报号召援助尤登尼奇。——(正文第187页)

〔76〕维德里查工厂位于刺多牙湖东岸，是活动在彼得格勒战线奥洛涅茨地段上的芬兰白军的主要基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红军部队在奥涅加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的支持下以突击方式占领了维德里查，消灭了所谓“奥洛涅茨志愿军”的司令部，并缴获了存有大批弹药、装备和粮食的仓库。芬兰白军被击退到芬兰境内。——(正文第189页)

〔77〕一九一九年七月初，波兰白军转入总进攻，从西方威胁苏维埃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派约·维·斯大林直接领导西方战线。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被任命为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约·维·斯大林到达斯摩棱斯克的战线司令部。——(正文第191页)

〔78〕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派约·维·斯大林到南方战线去组织消灭邓尼金的工作。十月三日，约·维·斯大林到达战线司令部。约·维·斯大林提出的消灭邓尼金的计划经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正文第194页)

〔79〕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约有八十名代表，他们是土尔克斯坦、阿捷尔拜疆、希瓦、布哈拉、柯尔克兹、鞑靼、楚瓦什、巴什基里亚、高加索和某些城市(皮尔姆、维亚得卡、奥连堡等)各伊斯兰教民族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弗·伊·列宁做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代表大会听取了俄共(布)伊斯兰教民族组织中央常务局的工作总结报告，讨论了东部问题和其他问题，并规定了党和苏维埃在东部的工作任务。——(正文第198页)

〔80〕因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机关刊物“革命战线”采访要发表“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一文，约·维·斯大林便写了这篇附言。——(正文第207页)

〔81〕乌克兰劳动军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它是由西南战线抽调出来的军队组成的，目的是用来进行经济建设，主要是恢复顿巴斯。为了领导乌克兰劳动军，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共同成立了劳动军委员会，它由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以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特派全权代表约·维·斯大林为主席。——(正文第208页)

〔82〕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哈尔科夫举行。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二百七十八名代表。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下列问题：(一)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二)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相互关系；(三)对其他政党的态度；(四)经济政策；(五)土地问题和农村工作；(六)粮食问题；(七)选举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约·维·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出席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政策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驳斥了反对工业领导中一长制原则的“民主集中主义”反党集团(萨普龙诺夫等人)。在农村工作方面代表会议通过了在乌克兰建立少地和无地农民联合会(贫农委员会)的重要决议。代表会议选举约·维·斯大林为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正文第210页)

〔83〕指德国反动派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在柏林组织的反革命政变(所谓卡普叛乱)。过了几天，由于工人举行总罢工,卡普政府即被推翻。——(正文第211页)

〔84〕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这个提纲发表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纪事”第十四号上。——(正文第215页)

〔85〕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至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听取了弗·伊·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讨论了军事情况、苏维埃建设、粮食情况、燃料等问题。代表

大会就议程中各个主要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工作的组织问题”、“关于苏维埃建设”、“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燃料工作的组织问题”等决议)都是有关组织苏维埃经济和苏维埃管理的任务的。

哈尔科夫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省代表会议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根据经济政策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决议。——(正文第215页)

〔86〕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一)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二)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三)工会运动；(四)共产国际的任务；(五)组织问题；(六)对合作社的态度；(七)过渡到民警制度；(八)选举中央委员会。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就经济建设和合作社问题发表了演说。

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家在运输业和工业方面最近的经济任务。代表大会特别重视统一经济计划的问题。计划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国民经济电气化问题。代表大会驳斥了反对在工业中建立一长制的“民主集中主义”反党集团(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正文第216页)

〔87〕鲍罗齐巴分子是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一九一八年五月组成独立政党，因他们的党中央机关报“鲍罗齐巴报”而得名。一九二〇年三月，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鲍罗齐巴分子不得不解散其政党而同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合并。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接收鲍罗齐巴分子入党的决议，并且对全部重新被接收入党的人进行了重新登记。后来许多鲍罗齐巴分子走上了玩弄两面手腕和欺骗党的道路，他们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的斗争，从而暴露了他们是乌克兰人民的死敌。——(正文第216页)

〔88〕伦敦代表大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伦敦举行。——(正文第218页)

〔89〕见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四页。——(正文第219页)

〔90〕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页至第四九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页至第三四六页。——(正文第220页)

〔91〕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页至第三九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四七页至第五六六页。——(正文第220页)

〔92〕这句话出自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弗·伊·列宁在“做什么？”一书的题词中引用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页)。——(正文第221页)

〔93〕指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所形成的三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正文第221页)

〔94〕布里根杜马是沙皇政府预定在一九〇五年召集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成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令草案和杜马选举条例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所制定，并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和沙皇的宣言一起公布。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二三九页)——(正文第222页)

〔95〕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页至第二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六九页至第六八〇页。——(正文第222页)

〔96〕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七五页至第二五〇页。——(正文第222页)

〔97〕“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是弗·伊·列宁于一八九七年年底在流放中写的。该书第一版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的序言，于一八九八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出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九九页至 第三二六页)。——(正文第224页)

〔98〕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即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举行。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第一次会面。在此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书信和其他同志联系的。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有下列问题：(一)各地的报告；(二)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三)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部分的统一问题；(五)关于党的改组问题；(六)土地问题；(七)关于国家杜马的问题。

弗·伊·列宁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同时并对维特杜马的

态度问题发表了演说。约·维·斯大林在会上做了关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的报告，并发言捍卫列宁的积极抵制杜马的策略。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党的统一(当时党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党)的决定和弗·伊·列宁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约·维·斯大林和弗·伊·列宁一起参加了对杜马态度的决议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决议中，代表会议号召党和工人阶级抵制杜马，并建议各级党组织广泛利用选举大会来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并在一切居民阶层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正文第 226 页)

〔99〕指与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英国外交大臣克逊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的照会有关的外交信件。在这个照会中，克逊向苏维埃政府提议以赦免为条件，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和他的军队可全部投降。关于这个信件可参看本卷第二九五页至第二九六页。——(正文第 228 页)

〔100〕协约国列强会议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圣勒摩(意大利)举行。会上讨论了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对土耳其和约草案以及其他问题。——(正文第 233 页)

〔101〕“红军战士报”是西方战线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红军的日报，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停刊。——(正文第 245 页)

〔102〕在这封指示信草稿上有弗·伊·列宁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批语，批语中说：“我主张**立即**把它分发下去，它是无可争辩的东西。”这封指示信由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下半月分发给各级党组织。——(正文第 246 页)

〔103〕共和国国家内卫部队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期间担任警卫后方和临近战线地域的城市、工厂、铁路、仓库等职务。——(正文第 249 页)

〔10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八九页至第三五八页)是约·维·斯大林于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在维也纳写的，该文第一次发表在一九一三年“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启蒙”(月刊)是布尔什维克的杂志，自一九二年十二月起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一四年六月被沙皇政府封闭。一九一七年秋，这个杂志又出过一次两期的合刊。弗·伊·列宁领导这杂志的工作。约·维·斯大林在留居彼得堡期间积极参加了这个杂志的工作。——(正文第 264 页)

〔105〕“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本卷第一四〇页至第一四九页)曾发表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民族生活报”创刊号上。

“民族生活报”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每周出版一次。自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该报改为杂志，仍用旧名称出版，一九二四年一月停刊。——(正文第264页)

〔106〕见本卷第三一二页至第三二一页。——(正文第265页)

〔107〕行动和宣传委员会或东方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库东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宣传工作，援助和联合东方的解放运动。该委员会存在将近一年。——(正文第270页)

〔108〕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第二国际的领袖(王德威尔德、麦克唐纳、列诺得尔等人)披着“社会主义代表团”的外衣来到格鲁吉亚。作为“代表团”领导人之一的卡·考茨基于九月三十日来到梯弗里斯。孟什维克为“代表团”和考茨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两星期后，“代表团”返回西欧，而考茨基则留在梯弗里斯，在那里一直住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正文第279页)

〔109〕指路德①在伏尔姆斯议会上发表的辩护词中的话(一五二一年)。在议会中，天主教会建议路德背弃自己的学说(见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mtausgabe. Weimar, 1897, Band 7, S. 838)。----- (正文第279页)

〔110〕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捷米尔汉舒拉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将近三百名。约·维·斯大林宣布达格斯坦实行自治后，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在代表大会上致贺词。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决议中宣布达格斯坦各族人民和苏维埃俄国各族劳动人民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正文第281页)

〔111〕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百多名代表。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和谢·米·基洛夫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表示确信“自治将使捷列克区域劳动群众和苏维埃俄国的友谊更加巩固”——(正文第285页)

————————————

① 路德，即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著名宗教改革领袖。——本书制作者注

〔112〕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强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同盟者——土耳其签订的和约，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色佛尔(巴黎附近)签字。和君士坦丁堡政府签订的这一条约的奴役性的条件，实际上取消了土耳其的独立。——(正文第293页)

〔113〕威尔逊十四条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提出的和平纲领。其中有一条说到保证大国和小国的独立和完整。——(正文第295页)

年　表

（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主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十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批准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十月二十七日夜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在那里和军事工作人员拟定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军队的作战计划。

十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资产阶级报纸出版的决定。

十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前线情况的报告。

十一月二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由约·维·斯大林起草的“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

十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各政党代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和全俄铁路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铁总执委会)的会议上进行辩论时发言。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发言。

十一月九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撤销杜鹤宁将军最高总司令职务的命令。

十一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赫尔辛福斯举行的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十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将珍贵的历史文物移交乌克兰人民，并被选为革命法庭法令起草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了两个报告：(一)关于和芬兰的贸易；(二)关于乌克兰和拉达。

十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将苏维埃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并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的反革命活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就查封反革命报纸问题发言。

十一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就在财经方面实施社会主义国家政策问题发言。

不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起草和谈纲领提要。

十一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由弗·伊·列宁起草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均参加。

十二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就归还伊斯兰教徒“欧斯曼本可兰经”事和全俄伊斯兰教民族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谈话。

十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乌克兰和关于组织白俄罗斯苏

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十二月五日

“真理报”公布由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约·维·斯大林和白俄罗斯区域委员会的代表缔结关于为巩固白俄罗斯苏维埃政权而协同工作的协议。

十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一文。

十二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和乌克兰拉达的相互关系的报告。

十二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奥连堡、乌拉尔专区、土尔克斯坦和高加索的局势的报告。

十二月十八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奥连堡专区的军事情况。

十二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出席全俄红军组织和编制委员会会议。

十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芬兰独立问题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弗·伊·列宁休假期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十二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并做关于顿河情况、关于哥萨克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关于革命部队准备进攻奥连堡等报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约·维·斯大林主持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关于普梯洛夫各工厂国有化的决议和关于没收辛费罗波尔的阿纳特尔飞机工厂的法令等等。

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同顿河区域哥萨克军人会议左派代表和哥萨克第八师代表谈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的“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二二七号上。

由约·维·斯大林起草的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的法令刊载在同号“真理报”上。

一九一八年

一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措施制定委员会委员。

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捍卫弗·伊·列宁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提议。

一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做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上做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代表大会通过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

一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为筹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而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主张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纲。

约·维·斯大林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召开欧美各国社会党革命派活动家会议。

一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电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苏维埃和谈代

表团必须立即和德国签订和约。

二月二十一日(八日)[①]

因德军进攻，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党彼得堡市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发出组织反击德国侵略者及动员资产阶级在工人监督下挖掘战壕的指示。约·维·斯大林向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发出同样指示。

①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八日)起年表日期按新历记载。——编者注

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支持弗·伊·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二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发出关于派遣和谈代表团到布列斯特去以及代表团在同德帝国主义者谈判时应采取的策略原则的指示。

不早于三月二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和牟尔曼斯克苏维埃主席通话，要求采取紧急外交措施以保卫牟尔曼斯克不被英法占领。

三月六日至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纲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三月十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

三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随同政府迁往莫斯科。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乌克兰是个交叉点”一文刊载在“消息报”第四十七号上。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写信给乌克兰特派专员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要求建立克里木、顿巴斯同全俄国的统一战线以抵抗德国占领者的侵犯。

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十六日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选约·维·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斯·邵武勉和阿·查帕里泽的信中指示必须加强巴库的军事防卫。

三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五十五号和第五十六号上。

三月三十日夜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和塔什干苏维埃主席谈土尔克斯坦的内部情况。

四月一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选约·维·斯大林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日

因德国人进攻哈尔科夫，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议立即和乌克兰中央拉达开始和平谈判。

四月三日和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真理报”记者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的谈话在“真理报”第六十二号和第六十三号上发表。

四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四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的题为“当前任务之一”的告喀山、乌发、奥连堡、土尔克斯坦及其他地方苏维埃书在“真理报”第六十七号上发表。

四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形式的报告。

四月十九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讨论并批准约·维·斯大林起草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四月二十七日

人民委员会任命约·维·斯大林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缔结和约谈判的全权代表。

四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偕代表团到达库尔斯克。

不早于五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从库尔斯克到莫斯科向人民委员会做报告。

五月五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向沃龙涅什、罗斯托夫和布良斯克发出关于签订乌克兰战线停战协议的无线电报。

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五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高加索的局势”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一〇〇号上。

五月二十九日

人民委员会任命约·维·斯大林为特命全权南俄粮务总领导者。

六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的“关于顿河区域和北高加索(事实和诡计)”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一〇八号上。

六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前往察里津。

六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察里津。

六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就整顿运输、在察里津建立革命秩序和把粮食运往中部等事所采取的措施电告弗·伊·列宁。

六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中报告运输情况好转以及收购粮食和把粮食运往莫斯科的计划。

六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为整顿运输和运送粮食事到达喀尔梅申。

六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从察里津以直达电报报告弗·伊·列宁运粮直达列车已经北上。

七月七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事件互通电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信中报告察里津地域的军事情况和土尔克斯坦的情况。

七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阿捷尔拜疆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写信给巴库的斯·邵武勉。

七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信中抗议托洛茨基的会使察里津战线瓦解和北高加索边区失守的命令。

七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电告军事人民委员部必须急速援助苏维埃土尔克斯坦。

七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把他巡视察里津战线的结果电告弗·伊·列宁。

七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报告弗·伊·列宁，从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有五次运粮列车开往莫斯科。

七月十九日

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成立。

七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斯·邵武勉的电报中，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要求巴库苏维埃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并同外国资本家的爪牙进行

坚决的斗争。

七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和弗·伊·列宁交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情况。

八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信中报告南方的军事和粮食情况。

八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关于改组管理前线供应的一切机关的命令。

八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在柯切尔尼柯沃车站；因为克拉斯诺夫匪帮的进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向察里津战线南段司令员发出调动军队的命令。

八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军事委员会宣布察里津和全省戒严的命令。

八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军事委员会关于动员察里津资产阶级挖战壕的命令。

八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把察里津战线情况好转的消息电告莫斯科帕尔霍缅柯。

八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因战线进行战斗而留在萨列普塔。

八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签署关于在察里津战线上展开进攻的作战命令。

八月二十六日

因为前线需要装甲汽车，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签署改建察里津的火炮制造厂的命令。

八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就敌人恶毒行刺弗·伊·列宁事致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九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把察里津地域苏维埃军队的胜利进攻电告人民委员会。

九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电告弗·伊·列宁，在察里津消灭了由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木材装卸”团的反革命暴动。

九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察里津的群众大会上代表人民委员会和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向战功卓著的察里津各团队致敬，并以题有“战斗骁勇”的锦旗授予它们。

九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莫斯科向弗·伊·列宁报告有关南方战线情况的问题。

九月十五日

弗·伊·列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就察里津战线的问题举行会议。

九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任命为重新成立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九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研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的成员和工作程序的问题。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向察里津战线的革命部队致贺电。

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报”发表约·维·斯大林和“消息报”记者关于察里津战线情况的谈话。

九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返回察里津。

九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把战线上的军队划分为四个集团军的问题。

十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致电弗·伊·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的有使南方战线瓦解危险的行动的问题。

十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再次前往莫斯科。

十月八日

人民委员会决议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返回察里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报告察里津战线情况。

十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和军事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的“给顿河贫农的一封信”刊载在“革命士兵报”第五十八号上。

十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电告弗·伊·列宁在察里津附近击溃了克拉斯诺夫军队。

十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从察里津前往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致电祝贺在察里津附近击溃了白卫军队的各革命团队。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十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做关于南方战线情况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的“事物的逻辑(论孟什维克中央的“提纲”)”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二三四号上。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二四一号上。

十一月六日至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一月九日

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选约·维·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向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贺词。

十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障壁”一文刊载在“民族生活报”第二号上。

十一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不要忘记东方”一文刊载在“民族生活报”第三号上。

十一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任命为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副主席。

十二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时发言。

国防委员会决定授予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批准国防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的决议的权利。

十二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国防委员会整顿铁路运输问题委员会的会议。

十二月七日

人民委员会批准约·维·斯大林起草的关于承认爱斯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的法令草案。

十二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关于政治鼓动和派遣政治委员到正在编制的各师去以及关于军队宿营问题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事情在发展”一文刊载在“民族生活报”第七号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白俄罗斯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人员谈白俄罗斯国家机构问题。

约·维·斯大林就成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的问题以直达电报给在斯摩棱斯克的米雅斯尼柯夫发出指示。

十二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临近战线地区的粮食情况。

十二月三十日

俄共(布)中央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决定派约·维·斯大林到东方战线。

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成立由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党的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皮尔姆失陷的原因并采取措施恢复东方战线第三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地域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到达维亚得卡。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从维亚得卡写信给弗·伊·列宁，提出给第三集团军调遣增援部队的问题。

一月六日夜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赴格拉佐夫第三集团军司令部。

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向维亚得卡党的区域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的指示。

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把关于皮尔姆陷落原因调查经过的初步简要报告寄给弗·伊·列宁。

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离格拉佐夫赴维亚得卡。

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由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召集的乌拉尔和维亚得卡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联席会议上就成立维亚得卡军事革命委员会问题发言。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就维亚得卡铁路枢纽站卸货事召开铁道人民委员部、第三集团军军事交通处和其他机关的代表会议。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把关于巩固第三集团军前线和后方

的措施的报告寄给弗·伊·列宁。

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报告弗·伊·列宁东方战线情况好转。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从维亚得卡前往格拉佐夫第三集团军司令部。

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从格拉佐夫返回维亚得卡。

一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离维亚得卡前往莫斯科。

一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费·艾·捷尔任斯基从东方战线回来后把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弗·伊·列宁。

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的“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文刊载在“消息报”第三十号上。

二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组织直达列车运送粮食和煤炭的报告。

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两个阵营”一文刊载在“消息报”第四十一号上。

三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我们在东部的任务”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四十八号上。

三月二日至六日

约·维·斯大林作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团员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法令草案的报告。

三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的“两年以来”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五十三号和“民族生活报”第八号上。

三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帝国主义的后备军”一文刊载在“消息报”第五十八号上。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党纲最后修订委员会委员。

三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军事问题发表演说。

三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入军事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

三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消息报”发表由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里亚政府关于巴什基里亚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

三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批准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三月三十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看通过决议，批准约·维·斯大林为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法令草案的报告。

四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关于改组国家监察部的报告。

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宁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批准的关于国家监察部的法令。

四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

四月二十一日

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为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军事物资统计情况清查委员会委员。 .

四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一文刊载在“消息报”第八十五号上。

四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关于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设立中央控诉申诉局的通告：“告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公民”。通告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消息报”第九十七号上。

五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

五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检查苏维埃各机关的总结报告。

五月八日

由于顿巴斯受到邓尼金的威胁，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向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发出俄共(布)中央关于加强对南方战线军事援助的指示。

五月十七日

由于尤登尼奇的进攻和彼得格勒受到威胁，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派约·维·斯大林前往彼得格勒战线。

五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后，同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七集团军司令员举行会议，研究战线情况。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弗·伊·列宁报告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和为

巩固战线所采取的措施。

五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离彼得格勒到旧鲁萨西方战线司令部。

五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弗·伊·列宁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加特契纳附近战线的情况。

五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从旧鲁萨前往处于白军直接打击下的加特契纳地域。

五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喀琅施塔得了解波罗的海舰队的情况。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卡列里亚地段的工事。

五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彼得格勒。

五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同总司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西方战线统帅部代表、第七集团军代表和波罗的海舰队代表举行会议，研究保卫彼得格勒接近地的问题。

六月初

约·维·斯大林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前线上的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六月八日至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战线纳尔瓦地段。

六月十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约·维·斯大林对西方战线实行集中指挥。

六月十三日

由于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约·维·斯大林命令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出港轰击红丘炮台，并指示在奥拉尼恩包姆组织岸防部队从陆上进攻红丘炮台。

六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奥拉尼恩包姆，同海陆军统帅部代表、岸防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们举行会议，研究进攻红丘炮台的计划。

六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从奥拉尼恩包姆前往作战地域领导夺取红丘炮台的战役。

六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占领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

约·维·斯大林到达红丘炮台，并参加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红军部队举行的群众大会。

六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在彼得格勒战线开始进攻。

六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向步兵第一师、奥涅加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致贺电，祝贺他们占领芬兰边境上的芬兰白军的军事基地——维德里查。

七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莫斯科。

七月三日至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

七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被任命为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七月八日

“真理报”发表约·维·斯大林和“真理报”记者关于彼得格勒战线情况的谈话。

七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斯摩棱斯克西方战线司令部。

七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明斯克和立陶宛—白俄罗斯政府委员举行会议，研究解散政府和明斯克国防委员会以及使各委员参加战线各机构的问题。

七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防御据点给彼得格勒军区军务部及西方战线军区军务部的训令。

八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方战钱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彼得格勒筑垒地域的命令。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消灭彼得格勒接近地的白军和占领普斯可夫给战线各集团军的训令。

八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信中报告西方战线的情况。

八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询问西方战线第十六集团军作战地域的情况。

八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占领普斯可夫。

八月

约·维·斯大林主持西方战线负责政治工作人员特别会议，制定“作战部队团政治委员守则”。

九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在得文斯克附近开始反攻。

九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斯摩棱斯克前往莫斯科。

九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返回斯摩棱斯克。

九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从斯摩棱斯克前往莫斯科。

九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派约·维·斯大林到南方战线去组织粉碎邓尼金的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关于用西方战线的团队建立混合师以调往南方战线和关于建立南方战线编成部队的指挥部的决议。

九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斯摩棱斯克。

九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斯摩棱斯克前往莫斯科。

十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给调到南方战线的拉脱维亚师补充兵员的决议。

十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谢尔吉也夫斯柯叶村南方战线司令部。

十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突击兵团以抗击奥勒尔附近邓尼金军队的训令。

十月十一日

由于南方战线司令部的迁移，约·维·斯大林从谢尔吉也夫斯柯叶前往谢尔普霍夫。

十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信中提出从沃龙涅什地域经哈尔科夫—顿巴斯向罗斯托夫进攻邓尼金的战略计划。

十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占领奥勒尔给第十四集团军统帅部的训令。十月二十日红军部队占领奥勒尔。

十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战线各集团军的关于以库尔斯克为主要突击方向来追击退却的邓尼金军队的训令。

十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布琼尼骑兵军在沃龙涅什附近粉碎了什库罗骑兵军和马蒙托夫骑兵军，红军占领了沃龙涅什。

十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谢尔普霍夫前往南方战线作战地域。

十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谢尔普霍夫。

十一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给南方战线补充兵员的决议。

十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返回谢尔普霍夫南方战线司令部。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展开全线进攻和粉碎库尔斯克的邓尼金部队的训令。

十一月十一日

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建立骑兵集团军的决定。

十一月上半月

约·维·斯大林领导拟定解放地区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检查条例及南方战线地域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

十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建立骑兵集团军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返回谢尔普霍夫南方战线司令部。

十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骑兵第一军改名为骑兵集团军的命令。

十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由弗·伊·列宁主持的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预备会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授予约·维·斯大林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保卫彼得格勒的功勋和在南方战线的忘我工作。

约·维·斯大林从谢尔普霍夫前往南方战线作战地域。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沃龙涅什。.

十二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喀尔斯托尔纳亚车站，从那里前往旧奥斯柯尔。

十二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骑兵第一集团军作战地域(靠近新奥斯柯尔的维里克—米哈依洛夫卡村)。

约·维·斯大林在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骑兵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就骑兵第一集团军在实现粉碎邓尼金的计划中所担负的任务发表演说。

十二月六日至七日

约·维·斯大林了解骑兵集团军各部队的情况和作战的进程。

十二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谢·米·布琼尼视察维里克-米哈依洛夫卡附近的战场。

十二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新奥斯柯尔。

十二月九日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选约·维·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沃龙涅什。

十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谢尔普霍夫南方战线司令部。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占领基辅和顿巴斯给战线各集团军的训令。

十二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从谢尔普霍夫前往莫斯科。

十二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返回谢尔普霍夫。

十二月十八日

“彼得格勒真理报”发表约·维·斯大林代表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给

彼得格勒工人的致敬电，感谢他们对南方战线的帮助。

十二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关于南方的军事情况”一文。该文刊载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二九三号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从谢尔普霍夫前往莫斯科。

一九二〇年

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奥勒尔。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占领罗斯托夫给战线各集团军的训令。

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库尔斯克南方战线司令部。

一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占领罗斯托夫。

约·维·斯大林签署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战线各集团军的命令，祝贺他们粉碎邓尼金军队和占领顿巴斯及罗斯托夫。

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从库尔斯克前往西南战线[①]第十四集团军作战地域。

①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南方战线改名为西南战线。——编者注

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追击退向黑海各港的邓尼金军队给战线各集团军的训令。

一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库尔斯克。

一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从库尔斯克前往莫斯科。

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的报告。人民委员会批准这个“条例”，并任命约·维·斯大林为乌克兰

劳动军委员会主席。

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前往库尔斯克西南战线司令部。

二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制度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二月十日

由于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迁移到哈尔科夫，约·维·斯大林到达哈尔科夫。

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召开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委员预备会议。

二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弗·伊·列宁报告关于组织乌克兰劳动军所采取的措施。

二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成立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及其住务的报告。

二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关于顿巴斯煤矿工业实行军事化和供给工人日用必需品的决议。

三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乌克兰劳动军的命令中号召被编入乌克兰劳动军的第四十二师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们在为煤炭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三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召开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委员、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委员及其他组织的联席会议，讨论粮食工作问题。

三月十五日

由于弗·伊·列宁建议划定顿巴斯省的边界，约·维·斯大林召开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紧急会议。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乌克兰共产党(布)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全乌第四次代表

会议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

三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

三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经济政策的报告的结论。

三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为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约·维·斯大林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全乌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致闭幕词。

约·维·斯大林从哈尔科夫前往莫斯科。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四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工会及其组织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

四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上被批准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四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顿巴斯煤矿工业情况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八十六号上。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发表演说。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二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参加拟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组织对波兰作战的宣传工作大纲。

五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关于成立鞑靼苏维埃自治共和国问题委员会主席。

五月十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住命约·维·斯大林为西方战线军队服装供给委员会主席。

五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供给西方战线军队服装的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住命约·维·斯大林为供给军队弹药、步枪、机关枪和制定加强弹药与枪械制造厂工作措施问题委员会主席。

五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召开供给军队弹药、步枪、机关枪和制定加强弹药与枪械制造厂工作措施问题委员会会议。

五月二十日

“消息报”公布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工农检查院选举程序和工农参加工农检查院的条例”。

五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供给军队弹药、步枪、机关枪问题委员会的工作结果的报告。

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一一一号和第一一二号上。

五月二十六日

由于波兰进攻苏维埃共和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派约·维·斯大林前往西南战线。

五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哈尔科夫西南战线司令部。

五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中报告为巩固西南战线克里木地段而采取的措施。

约·维·斯大林从哈尔科夫前往克列门楚格。

五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西南战线的情况。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第十三和十四集团军统帅部的关于保卫敖德萨的措施的训令。

六月初

约·维·斯大林和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员在克列门楚格举行会议，并就战线情况和骑兵集团军的作战计划问题发言。

六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粉碎基辅的波兰部队给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的训令。

六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弗·伊·列宁，对弗·伊·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草案提出了意见。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占领基辅。

六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克列门楚格返回哈尔科夫。

六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锡涅尔尼柯沃(西南战线克里木地段)。

哈尔科夫“共产党人报”发表约·维·斯大林和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关于西南战线情况的谈话。

七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从锡涅尔尼柯沃返回哈尔科夫。

七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七月十一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和总司令、野战参谋部参谋长以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举行会议，讨论向西南战线克里木地段调遣增援部队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

“真理报”发表约·维·斯大林和“真理报”记者关于波兰战线情况的谈话。

七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从莫斯科返回哈尔科夫西南战线司令部。

七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沃尔诺瓦哈(战线克里木地段)。

七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访问马林波尔，了解了亚速海舰队的情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约·维·斯大林所拟定的组织粉碎弗兰格尔的提案。弗·伊·列宁将此事告知约·维·斯大林。

七月十九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写完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共产党员到克里木战线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草稿。根据弗·伊·列宁的建议，这封信分发给了各级党组织。

七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从沃尔诺瓦哈前往洛佐瓦亚。

七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哈尔科夫。

七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洛佐瓦亚。

八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接到弗·伊·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弗兰格尔战线划为一个独立战线的通知。政治局委托约·维·斯大林组织该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战线上。

八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向弗·伊·列宁报告红军部队强渡德涅泊河并占领阿聊什基、卡霍夫卡及德涅泊河左岸的其他据点。

八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从洛佐瓦亚前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

八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视察战线后返回哈尔科夫。

八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八月十九日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和西伯利亚局、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援助克里木战线的措施的指示。

八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建立共和国战斗预备队的计划。

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九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发言。

十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二二六号上。

十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工农检查院负责工作人员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十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前往北高加索和阿捷尔拜疆。

十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顿河岸罗斯托夫，了解党的工作情况。

十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弗拉基高加索。

十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把关于高加索的局势的报告寄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弗·伊·列宁。

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弗拉基高加索主持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的工作。

十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上做“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的报告。

十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弗拉基高加索前往巴库。

十一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阿捷尔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委员举行的会议，讨论关于同格鲁吉亚进行谈判和关于阿尔明尼亚的情况等问题。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巴库苏维埃庆祝大会上做“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的报告。

十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阿捷尔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和巴库的党组织及苏维埃组织的联席会议上做关于阿捷尔拜疆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任务的报告。

十一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捷米尔汉舒拉。

十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在达格斯坦宣布自治后的任务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在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达格斯坦实行苏维埃自治。

十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到达弗拉基高加索。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捷列克区域实行苏维埃自治”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接见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哥萨克农民代表团的团员。

十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从弗拉基高加索前往莫斯科。

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发表约·维·斯大林和“真理报”记者关于高加索的局势的谈话。

十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一文刊载在“真理报”第二七三号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选约·维·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635×927公厘1/16・印張27$\frac{1}{4}$・插頁6・字數315,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6,500　　定價(5)3.50元
統一書號1001・305

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者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5
1921–1923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五七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 ……）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目　录

第五卷说明 …… 1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记录）…… 3
我们的意见分歧 …… 5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 5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 7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12
一 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压迫 …… 12
二 苏维埃制度和民族自由 …… 14
三 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17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23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三月十日） …… 23
二 结论（三月十日）…… 30
给弗·伊·列宁的信 …… 34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 36
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 41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小册子的大纲） …… 42
一 术语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 42
二 俄国发展中的历史转变 …… 45
三 问题 …… 48
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里斯党组织全体
党员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 59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 68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 76
前途 …… 79

一九二二年

给“真理报” …… 86
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 …… 87
一 连纳事件 …… 87
二“真理报”的创办 …… 88
三“真理报”的组织作用 …… 89
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 …… 92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苏维埃的贺电 …… 95
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96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01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 109

一九二三年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 113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 113
一、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 …… 113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 114
三、战略 …… 115
四、策略 …… 117
五、斗争形式 …… 118
六、组织形式 …… 119
七、口号。指示 …… 120
二　战略计划 …… 121
一、历史转变。战略计划 …… 121
二、第一个历史转变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针 …… 122
三、第二个历史转变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 123
四、第三个历史转变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 125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127
一 …… 127
二 …… 13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135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月十七日）…… 135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四月十九日）…… 151
三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三日）…… 160
四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四月二十五日）… 177

五 对决议案的修改意见的答复（四月二十五日）…… 185
六 对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四月二十五日）…… 187
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 …… 188
欲盖弥彰…… …… 191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
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194
一 提交第四次会议讨论并经中央政治局
批准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 …… 194
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工作的总路线 …… 194
同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和组织
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 …… 195
吸收当地居民中的劳动分子参加党的建设
和苏维埃建设的办法 …… 197
关于改善当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的措施 …… 197
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
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 198
关于组织民族部队的实际措施 …… 198
组织党的教育工作 …… 199
为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
的决议挑选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 …… 199
二 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
（关于会议第一项议程“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说）
（六月十日）…… 200
三 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
决议的实际措施（关于第二项议程的报告）（六月十日）…… 207
四 结论（六月十二日）…… 215
五 对发言的答复（六月十二日）…… 223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 225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 …… 230
在军事学院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简要报道）…… 232
关于党的任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
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 234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 234
争论的原因 …… 235
党内生活的缺点 …… 236
造成缺点的原因 …… 238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239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
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 245
关于争论 …… 245
关于拉法伊尔 …… 247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 249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 251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 253
必要的指摘（关于拉法伊尔）…… 257
致“共产党人报”的贺电 …… 260

附录
附录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 261
附录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 …… 263

注释 …… 268
年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 283
插图（新增）
一 身穿民族服装的斯大林 …… 22
二 列宁和斯大林在哥尔克村 …… 91
三 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国徽 …… 112
四 斯大林接见女先进工作者 …… 229

第 五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著作。

本卷主要包括关于党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关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农联盟的新形式、关于加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以及关于党和群众联系的形式和方法的论文、报告和演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前途”、在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编入本卷的还有小册子的大纲“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以及“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两篇论文，在这些著作中约·维·斯大林发展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学说。

编入第五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论述了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苏联第一个宪法基本原则的拟定（提交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在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论民族问题的提法”、“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等论文）。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小册子的大纲）、“民族问题纲领草案”、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的“贯彻党的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的报告、报告的结论和对发言的答复。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1〕上的开幕词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记录）

斯大林同志宣布会议开幕，指出中央局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中央局应当改选，接着他简短地说明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中的发展情况。

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发展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内部有几十年理论工作和理论斗争的悠久历史。经过这种斗争，形成了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他们在理论方面很强，并且能坚持原则，足以领导党员群众。

我国东部的共产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不久前在为社会主义而进行实际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预先经过理论发展阶段。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主义在理论方面差，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只有用我国突厥语系民族各种语言出版有原则性的共产主义书刊，才能消除这种缺点。

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同民族主义倾向作斗争从未有过重大的意义。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过去都是统治民族，他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一般说来，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用不着，或者几乎用不着◇3◇[①]去克服这种倾向。

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党员是经历过民族压迫阶段的被压迫民族的儿女，他们与此不同，他们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倾向和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民族主义残余，因此克服这种倾向和铲除这些残余是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的当前任务。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阻碍了我国东部共产主义的形成。

但是东部的共产主义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俄罗斯共产党员在实行社会主义方面，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欧洲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利用（欧洲所提供的主要是国会斗争的经验），因此，他们就不得不用所谓自己的方法去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

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在和俄罗斯同志并肩为社会主义而进行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有可能利用俄罗斯同志的实际经验而避免犯错误。这种情况保证东部共产主义完全有可能迅速发展和巩固。

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党中央对还很年轻的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主义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帮助东部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同突厥语系民族共产主义的上述弱点和缺点进行斗争。

中央局是一个应当采取各种办法同民族主义残余进行斗争并在理论上加强我国东部共产主义的机关。

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六号◇4◇

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在对工会的原则性的估价方面。托洛茨基经常援引的我们党纲中关于工会作用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条文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2]，现在有效，将来仍然有效。工会和经济机关应当而且一定要融合起来（“结合”），这是没有人争论的。我国现今的经济恢复时期要求目前还只是口头上的产业工会逐渐变成能振兴我国各基本工业部门的真正的产业工会，这是没有人争论的。简单地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也很少涉及在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中建立劳动纪律的必要性问题。有人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放松了缰绳”，因而使群众受自发势力的玩弄，这是一种未加思考的说法。党员在工会中和工会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我们的意见分歧更少涉及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成员的质量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机构的成员远不够理想，工会已被一连串军事动员和其他动员弄得空虚不堪，应当把工会旧的工作人员交还工会并增添新的工作人员，必须供给它们设备等等。

不，我们的意见分歧不在这方面。◇5◇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我们的意见分歧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的**方式**问题；对待被吸引来参加恢复工业事业的工人群众的**方法**问题；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我国工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产业工会

的**途径**问题。

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军事方法）和**说服**方法（工会方法）。第一种方法决不排斥说服的因素，而说服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第二种方法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而强迫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说服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把这两种方法混淆起来是不能容许的，正像不容许把军队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一样。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醉心于军队中军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间来，搬到工会中来，以便在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方面获得同样的成就。可是这批人忘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军队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和有害的。

军队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两个基本社会集团即农民和工人组成的，而前者比后者多好几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3〕在论证军队中主要采用强迫方法的必要性时所持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军◇6◇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纪律处分、全面委任制等等纯粹军事性的工作方法。

与军队相反，工人阶级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自愿地组织工会，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和精华。因此，主要采用说服方法是我们产业工会的实际工作基础，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就产生了像解释、群众性的宣传、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自动精神、选举制等等纯粹工会的工作方法。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低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把军事组织和工会混为一谈，企图（大概是由于惰性）把军事方法从军队中搬到工会中来，搬到工人阶级中来。

托洛茨基在一个文件中说道：“把军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释、宣传、自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组织和军事组织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把“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废话撇开不谈，很明显，托洛茨基不了解工人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的差别，不了解**在消除了战争和恢复工业的时期**把军事方法同民主方法（工会方法）对立起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是错误的、有害的。◇7◇

这种不了解就是不久前出版的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一些论战性小册子的基础。

这种不了解就是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根源。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有些人认为，谈论工会内的民主是放空炮，是党内生活的某些现象所引起的时髦风气，认为关于民主的“空谈”将被厌弃，而一切将“照旧”进行。

另外一些人认为，工会内的民主在实质上是一种让步，是对工人的要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认为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在严肃认真地办事，不如说是在耍外交手腕。

不用说，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工会内的民主，即通常称为“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所固有的自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认识到**对组织在工会内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经常采用说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为前提的。不认识到这一点，民主就会变成空谈。

当战争正在进行和危险迫近的时候，我们组织发出的“支援前线”的号召得到了工人热烈的响应，因为灭亡的危险在当时很容易觉察，因为这种危险十分具体，大家一目了然，这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的军队在向前推进并在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当时发动群众是不困难的。但是现在，当军事危险已经消除，而群众对于新的危险即经济危险（经济破坏）◇8◇还远不那么容易觉察的时候，单靠号召来发动广大群众就不行了。当然，粮食和布匹的缺乏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但是，第一、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寻找粮食和布匹，因此粮食不足和商品缺乏的危险远没有像军事危险那样鞭打群众；第二、谁也不会断言群众一定认识到经济危险（缺乏机车、农业机器、纺织工厂和冶金工厂，缺乏电站的设备等等）和不久以前的军事危险同样现实。为了推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就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动精神，必须用具体事实来说服他们，使他们**确信**经济破坏也和昨天的军事危险一样是现实的致命的危险，必须通过按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会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恢复生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机关同经济破坏的斗争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否则就不可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

简单地说，自觉的民主，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是产业工会唯一正确的方法。

被迫的“民主”同这种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读了托洛茨基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后，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在实质上“也”赞成“民主”方法。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工会的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我们的分歧点。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托洛茨基的“民主”是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能补充对工会不适用的军事官僚主义方法。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决定，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9◇了下面的决议：“必须最坚决最有计划地反对由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官场习气和对工会的琐碎监督……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人中央委员会）来说，因特殊条件而实行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铁道总政治部）的时期也开始结束”，因此，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党团“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大力推行和广泛使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责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并以与其他工会组织同等的资格加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见“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但是，托洛茨基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竟不顾这项决议，在整个十一月份内继续实行半官僚主义半军事的老路线，照旧依靠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企图“整刷”和破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捍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其他工会组织的特权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突然”声明说：“水运总政治部……在最近两三个月内**无论如何**还不能解散。”结果怎样呢？在这封信发出六天以后（十二月七日），同一个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员会“突然”赞成“立即撤销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则将这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员和资产移交给工会组织”。他是赞成这一点而反对七个中央委员的八个中央委员之一，当时有七个中央委员认为撤销这些机关还不够，他们要求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为了挽救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托洛茨基赞同撤销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总政治部。

这六天内有什么变化呢？也许铁路员工和水运员工在这六天内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铁道总政治◇10◇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了吧？或者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吧？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水运员工坚决要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撤销总政治部，

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托洛茨基集团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旧有的成员，于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谁也不能满足的局部的让步。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同“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党中央还在十一月初就提出了“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它对振兴我们的产业工会是非常必要的。

* * *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讨论会〔4〕上，托洛茨基在他的结束语中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去，断言这和政治毫不相干。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未必用得着证明，在工农国家里，没有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决议，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决议，可以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而被通过。并且一般说来，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对每一项这样的决议必须预先也从政治方面来评价。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现在可以认为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经被运输工会中◇11◇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换句话说，不但没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连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无疑问，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会出现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结果工人阶级中就会产

生涣散和分裂。

工人阶级政党能不顾这些事实吗？能不能断定说，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在统一的工会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敌对的集团，这对我国的政治情况来说都是一样呢？能不能说，在估计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政治因素不应当起任何作用，说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显然不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现在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领导这样的国家。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12◇

用强迫和从上面“整刷”工会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方法会分裂工人阶级(请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此外，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显然，只有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团结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自动精神和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的任务，为了发动全国去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这种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见，政治也是赞成用说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13◇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并
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5〕）

一　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压迫

一、现代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发展时形成民族的。

二、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英国（爱尔兰除外）、法国、意大利的情形都是如此。东欧却与此相反，由于自卫（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早于封建主义的消灭，因而也早于民族的形成。所以这些地方的民族没有发展成也不能发展成民族国家，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都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从属民族组成。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就是这样。

三、像法国和意大利这种最初主要是依靠本民族力量的民族国家，一般说来是没有民族压迫的。◇14◇而建筑在一个民族（确切些说是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余民族的统治上面的多民族国家则与此相反，它们是民族压迫和民族运动的发源地和主要舞台。统治民族的利益和从属民族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多民族的国家就不能稳

固地存在。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悲剧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它想在保存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的情况下使各民族“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结果每一次总是失败，民族冲突更加尖锐化。

四、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新的销售市场的需要，对原料和燃料的寻求，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的输出以及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必须保证，一方面促使旧的民族国家去夺取新的领土，促使旧的民族国家变成必然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的多民族（殖民）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另一方面加强了旧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民族的野心，它们不仅想保持原有的国界，还想向外扩张，靠侵占邻国使新的（弱小的）民族隶属于自己。于是民族问题扩大了，并且终于自然而然地同整个殖民地问题融合起来了，而民族压迫就由国内的问题变成国际的问题，变成帝国主义“大”国为征服弱小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而进行斗争（和战争）的问题。

五、帝国主义战争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多民族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的软弱，它使战胜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内部的民族冲突极端尖锐化，使战败的旧的多民族国家（奥地利、匈牙利、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彻底崩溃，最后，使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等）组织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激进◇15◇的”办法。但是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组成并没有确立也不可能确立各民族的和睦共处，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新的民族国家自己要存在下去，那就必须——

（甲）压迫自己的少数民族（波兰压迫白俄罗斯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压迫沃舍梯人、阿布哈兹人、阿尔明尼亚人；南斯拉夫压迫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等等）；

（乙）靠侵占邻国来扩张自己的领土，这就会引起冲突和战争（波

兰侵犯立陶宛、乌克兰、俄罗斯；南斯拉夫侵犯保加利亚；格鲁吉亚侵犯阿尔明尼亚、土耳其等等）；

（丙）在财政、经济和军事方面依附帝国主义“大”国。

六、这样，战后时期便展现了一幅令人不愉快的图画——民族仇视，不平等，压迫，冲突，战争，文明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对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民族所进行的帝国主义野蛮行为。一方面，几个“大”国压迫和剥削所有附属的和“独立的”（实际上完全是附属的）民族国家，这些强国彼此间为争夺剥削各民族国家的独占权而斗争；另一方面，附属的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反对“大”国的难以忍受的压迫而斗争；民族国家彼此间为扩张自己的民族领土而斗争；民族国家各自为压迫自己的被压迫少数民族而斗争。最后，殖民地反对“大”国的解放运动日益加强，这些“大”国内部以及一般都有几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日益尖锐。

帝国主义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和平图画”就是这样。◇16◇

资产阶级社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完全破产了。

二　苏维埃制度和民族自由

一、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没有民族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农民（以及整个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沙文主义和民族斗争就必不可免，相反地，如果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也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有了保证，那就可以认为民族和平和民族自由有了保证。因此，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消灭民族压迫、确立民族平等、保证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条件。

二、苏维埃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个原理。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因而不仅取得了俄国其他民族工人兄弟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也取得了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工人兄弟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并且已经把这种信任化为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决心。苏维埃共和国在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的成立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民族冲突消灭了，土耳其和阿尔明尼亚劳◇17◇动群众间、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劳动群众间的“百年”仇视也消除了。苏维埃在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拉脱维亚的暂时胜利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可以确信地说，不消灭自己家里的民族仇视和民族压迫，没有西方和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和热情支援，俄罗斯工人就不能战胜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阿捷尔拜疆共和国和阿尔明尼亚共和国也就不能立足。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民族压迫的消灭，是劳动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三、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即使是面积很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对帝国主义都是致命的威胁。这个威胁不仅在于各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后已经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真正独立的国家，因而使帝国主义者失去了一块额外的领土和额外的收入，而首先在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本身，这些共和国在镇压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鼓动，都是号召附属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鼓动，都是使各色各样的资本主义瓦解和解体的不可克服的因素。因此，帝国主义“大”国就必然要反对苏维埃共和国，力图消灭这些共和国。“大”国同苏维埃俄国斗争的历史，“大”国唆使一个个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府和一群群反革命将军反对苏维埃俄国，严密封锁它和竭力设法在经济上孤立它的历史，雄辩地说明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在资本主

义包围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都不能认为自己能保证不会在经济上枯竭，不会在军事上被世界帝国主义打败。

四、因此，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孤立的存在是不稳固不牢靠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着它们的生◇18◇存。第一、各苏维埃共和国国防的共同利益，第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的任务，第三、产粮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不产粮的苏维埃共和国必要的粮食帮助，——这三者绝对要求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国家联盟，这是免遭帝国主义奴役和民族压迫的唯一道路。从“本族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的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只有联合成紧密的国家联盟才能使自己生存下去，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否则就要完全失败。

五、以军事和经济事务的共同要求为基础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是国家联盟的一般形式，这种形式可以——

（甲）保证各个共和国和整个联邦的完整性和经济发展；

（乙）把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一切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和经济状况包罗在一起，并根据这种不同情况采用这种或那种联邦形式；

（丙）建立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同联邦的命运这样或那样联系起来的民族和部族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

俄国采用各种形式的联邦的经验，从以苏维埃自治（柯尔克兹、巴什基里亚、鞑靼、山民、达格斯坦）为基础的联邦，过渡到以与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建立条约关系为基础的联邦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形式（土尔克斯坦、白俄罗斯）的经验，完全证实把联邦作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国家联盟的一般形式是很适当很灵活的。◇19◇

六、但是，只有依靠加入国相互信任和自愿协议，联邦才能巩固，才能得到实际的效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世界上对许多民族和部族和睦共处及兄弟合作的试验获得成功的唯一国家，因

为这里既没有统治者，也没有从属者；既没有宗主国，也没有殖民地；既没有帝国主义，也没有民族压迫，——这里联邦是以各民族劳动群众的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的愿望为基础的。联邦的这种自愿性质今后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只有这样的联邦才能成为一种过渡形式，使世界各国劳动人民达到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高度团结，这种团结的必要性已愈来愈明显了。

三　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非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土尔克明人、塔吉克人、阿捷尔拜疆人、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巴什基里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彻岑人、卡巴尔达人、沃舍梯人、切尔克斯人、英谷什人、卡拉恰也夫人、巴尔卡尔人[①]、卡尔梅克人、卡列里亚人、阿瓦里亚人、达尔根人、卡集·库穆赫人、库林人、库梅克人[②]、马里人、楚瓦什◇20◇人、沃加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等）约有六千五百万。

沙皇政府，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是：铲除它们中间任何国家制度的萌芽，摧残它们的文化，限制它们的语言，使它们愚昧无知，尽量使它们俄罗斯化。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这些民族不能充分发展并造成了它们政治上的落后。

现在，当这些地区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已经被推翻，人民群众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党的任务就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

——————————————

① 后面七个部族统称为“山民”。

② 后面五个部族统称为“达格斯坦人”。

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

（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面貌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乙）在他们那里设立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

（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

二、在六千五百万非大俄罗斯人口中，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阿捷尔拜疆的一小部分和阿尔明尼亚以外，剩下的约二千五百万主要是突厥语系人口（土尔克斯坦、阿捷尔拜疆大部分、达格斯坦、山民、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多半还保存着游牧经济和父权制氏族生活方式（柯尔克兹、巴什基里亚、北高加索），或者还没有脱离半父权半封建的原始生活方式（阿捷尔拜疆、克里木等），但是已被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总轨道。◇21◇

党对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任务（除第一点所指出的以外），就是帮助他们消灭父权制封建关系的残余，并且以劳动农民苏维埃为基础，通过在这些民族中间建立坚强的共产党组织的办法帮助他们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这些共产党组织要能够利用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同时要能够在自己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每个民族的具体经济状况、阶级结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切特点，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只适用于另一种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俄国中部的经济措施。

三、在二千五百万主要是突厥语系人口中，除了阿捷尔拜疆、土尔克斯坦大部分、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和克里木的）、布哈拉、希瓦、达格斯坦、一部分山民（卡巴尔达人、切尔克斯人、巴尔卡尔人）和其他某些已经定居并固定在一定地域的民族以外，剩下的约六

百万是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他们的土地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移民的殖民对象，这些俄罗斯移民夺去了他们较好的耕地，一步步地把他们排挤到贫瘠的荒地上去。

沙皇政府，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就是在这些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和哥萨克中间培植更多的富农分子，把他们变成满足大国野心的可靠支柱。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被排挤到穷乡僻壤而逐渐死亡。

党对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任务（除了第一点和第二点所说的以外），就是把他们和当地俄罗斯居民中的劳动群众为摆脱富农、特别是为摆脱掠夺成性的大俄罗斯富农的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帮助他们打倒富农殖民者，从而保证他们有可耕的、为过人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22◇

四、除了上述那些具有一定阶级结构和占有一定地域的民族和部族以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有一些流动的民族集团和少数民族（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它们搀杂在其他聚居的民族中，多半没有一定的阶级结构，也没有一定的地域。沙皇政府的政策就是采用一切手段，直到采用蹂躏的手段（蹂躏犹太人）来消灭这些少数民族。

现在，当民族特权已经消灭，民族平权已经实现，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已为苏维埃制度性质本身所保证的时候，党对这些民族集团的劳动群众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这个给他们保证了的自由发展的权利。

五、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阻碍了党在这些地区的正常成长。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是在“统治”民族存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压迫，往往缩小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者完全不重视民族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考虑某一民族的阶级结构、

文化、生活习惯和过去历史的特点，因而把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这种情况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抹杀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者把某一民族劳动者的利益和这一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简单地混淆起来，不善于把前者同后者区别开来，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6〕的形式（在东方）。◇23◇

代表大会坚决斥责了这两种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害的和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指出第一种倾向即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和特别有害的。代表大会提醒大家，不铲除党的队伍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残余，就不可能在边疆地区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把当地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自己队伍中的坚强的、联系群众的、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因此，代表大会认为，消除共产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首先是殖民主义的动摇，是党在边疆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六、由于军事战线上的胜利，特别是在消灭弗兰格尔以后，在一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边疆地区，市侩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升官发财而纷纷争取入党。这些人考虑到党实际上占着统治地位，常常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整批整批地钻到党里来，把掩饰不周的沙文主义和腐化思想带到党里来，边疆地区的党组织一般说来是软弱的，它们并不总是能够抵挡得住通过吸收新党员来“扩大”党的那种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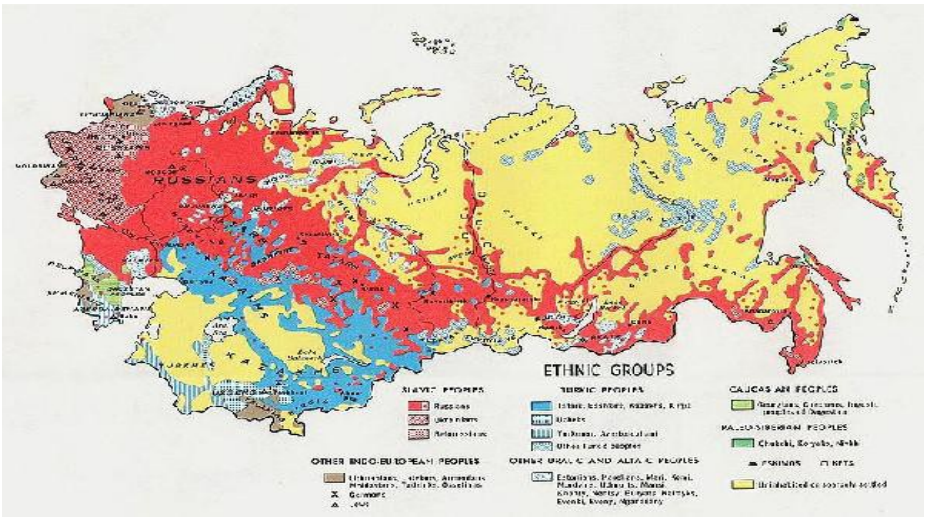
代表大会号召同一切混进无产阶级政党里来的冒牌共产党员作坚决斗争，警告党不要靠吸收知识分子中市侩民族主义分子来“扩大”

自己的队伍。代表大会认为，应当主要依靠吸收边疆地区的无产者、贫农和劳动农民来充实边疆地区的党，同时，应当用改善边疆地区党组织成员质量的办法来进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

载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真理报”第二十九号◇24◇

身穿民族服装的斯大林

与少数民族一家在一起



苏联各民族地区分布图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7〕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版◇25◇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三月十日）

在直接谈到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当前的具体任务以前，必须确定几个前提，没有这些前提，民族问题就不能解决。这些前提涉及民族的出现、民族压迫的产生、民族压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以及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解决方式等问题。

这样的时期有三个。

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人们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民族的。我指的是英国（爱尔兰除外）、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西方，即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封建主义消灭和人们形成为民族的时期与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时期在时间上大体是一致的，因此那里的民族在其发展时就具有国家的形式。这些国家内部没有其他比较大的民族集团，因此那里也就没有民族压迫。

在东欧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割据消灭的过程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俄国。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27◇然而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

能够抵御外侮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所以在那里就建立了混合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由尚未形成为民族但已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几族人民组成的。

这样，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出现了民族，并且在西欧产生了没有民族压迫的纯粹的民族国家，在东欧则产生了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比较发达的民族居于统治地位，其余不大发达的民族则在政治上以至后来在经济上都受统治民族支配。东欧的这些多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压迫的发源地，而民族压迫产生了民族冲突、民族运动、民族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方式。

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销售市场、原料、燃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争取输出资本和获得铁路与海上的交通干线而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靠侵占远近各邻国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在这第二个时期，西方的旧民族国家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已不再是民族国家了，就是说，它们因夺得了新的领土而变成了多民族的殖民国家，因而也就成了在东欧早已存在的那种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的舞台。在东欧，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从属民族（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觉醒和兴起了，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就造成了旧的资产阶级多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在所谓的列强奴役下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

第三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这时，统治民族和从属民◇28◇族、殖民地和宗主国的问题都放到历史档案库里去了。这时，我们看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有许多民族站起来了，它们有着同等发展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还保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平等。这种民族不平等的实质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种遗产，这就是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比其他民族发达些。因此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一年

之内就能铲除的，但是，只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就一定能够把它铲除。

这就是历史上所经过的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

前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这两个时期内，有些民族受到压迫和奴役，因此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民族问题没有解决。然而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第一个时期，民族问题并没有越出个别多民族国家的范围，只是涉及不多的几个民族，主要是欧洲的一些民族；而在第二个时期，民族问题就由国内的问题变成国际的问题，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彼此间为了控制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了使欧洲境外的新的部族和部落隶属于自己而进行战争的问题了。

这样，过去仅仅对那些文明国家有意义的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就失去了它的孤立性，而同整个殖民地问题融合起来了。

民族问题发展成整个殖民地问题，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这一发展首先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各交战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本身不得不求助于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人力来建立军队。毫无◇29◇疑问，这一过程，即帝国主义者必然求助于殖民地各落后部族的过程，不能不唤醒这些部落和部族去谋求解放，进行斗争。其次第二个因素是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土耳其并且使它亡国的尝试，这一因素使民族问题扩大和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问题，使它由解放运动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蔓延到全球各地。土耳其在国家制度方面是伊斯兰教民族中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不堪忍受这种前途，于是就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把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三个因素是苏维埃俄国的出现。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就自然而然地鼓舞了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唤醒了它们，发动它们去进行斗争，从而为建立一条从爱尔兰到印度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压迫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这一切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资

产阶级社会不仅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奠定民族之间的和平，反而使民族斗争的星星之火燃烧成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燎原烈火。

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唯一能够创造条件保证不同民族和部落和睦共处、兄弟合作的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

未必用得着证明，在资本统治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情况下，民族权利平等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只要资本政权还存在，只要争夺生产资料的斗争还在进行，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权利平等，也不可能有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合作。历史证明，消灭民族权利不平等的唯一方法，建立◇30◇被压迫民族和非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兄弟合作的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其次，历史表明，虽然某些民族已经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从“异族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是说，虽然它们自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没有邻近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它们就不能单独存在和顺利地捍卫自己的单独存在。匈牙利的例子雄辩地证明：如果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联盟，如果它们没有团结成统一的军事经济力量，那末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经济战线上都不可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是国家联盟最适当的形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这一形式活的体现。

同志们，这就是我首先要在这里谈到的一些前提，目的是为了在下面论证我们党在解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方面采取某些步骤的必要性。

虽然俄罗斯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在苏维埃制度下已经没有统治民族和无权民族、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了，但是民族问题在俄罗斯仍然存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问

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

在旧制度下，沙皇政权不努力也不可能努力发展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土尔克斯坦和其他边疆地◇31◇区的国家制度，它反对发展边疆地区国家制度，也反对发展它们的文化，力图用暴力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

其次，旧的国家、地主和资本家留下了像柯尔克兹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这些被摧残的部族，它们的土地过去是俄罗斯哥萨克和富农分子的殖民对象。它们过去注定要遭到浩劫和灭亡。

其次，大俄罗斯民族过去是统治民族，它的这种地位甚至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也留下了一些影响，这些俄罗斯共产党员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去接近当地居民中的劳动群众，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摆脱落后和不文明。我指的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俄罗斯共产党员，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特点，有时表现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再次，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为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

最后，必须把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和一些山民部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剥夺富农殖民者以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土地。

构成我国民族问题实质的一些问题和任务就是这样。

在说明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些当前的任务之后，我想来谈谈一般的任务，即谈谈使我们共◇32◇产党在边疆地区的政策适合于那些主要存在于东部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条件的任务。

问题在于：有许多部族，主要是突厥语系各部族（它们大约有二千五百万人），还没有经过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因此，它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它们必须越过工业资本主义，从原始经济形态转到苏维埃经济阶段。为了进行这项艰巨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部族的经济状况，甚至要考虑到它们过去的历史、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一切特点。把那些在俄国中部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措施搬到这些部族里去，是不可思议的和危险的。显然，在实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些边疆地区所碰到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和过去历史方面的一切特点。更不用说有些荒唐的事情是必须消除的，例如柯尔克兹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有些人是多么不愿意注意初到那里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生活习惯的特点。

刚才有人递了一张条子给我，要我答复契切林同志的论文。同志们，契切林的论文我仔细地读过了，我认为他的论文除了舞文弄墨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篇论文中有四点错误或者说四点误解。

首先，契切林同志有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倾向，他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联合，而忽略了和过低估计了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之间的内部矛盾，可是这种矛盾存在着，并且正酝酿着战争。他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上层联合的因素，而过低估计了这个“托拉斯”内部的矛盾。可是这些矛盾存在着，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正是以这些矛盾◇33◇为依据的。

其次，契切林同志犯了第二个错误。他过低估计了占统治地位的列强同不久前成立的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受这些列强支配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等）之间的矛盾。契切林同志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尽管这些民族国家隶属于列强，或者确切些说，正是

由于这种隶属关系，列强同这些国家之间才存在着各种矛盾，例如在列强同波兰、爱沙尼亚等国的谈判中就显露出了这些矛盾。外交人民委员部存在的作用就在于估计这一切矛盾，以这些矛盾为依据，并在这些矛盾的范围内随机应变。契切林同志竟过低估计了这一点，令人大为吃惊。

契切林同志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他过多地谈论民族自决这个实际上已变成便于帝国主义者利用的空洞口号。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竟忘记了我们抛弃这个口号已经两年了。在我们党纲中已经不再有这个口号了。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已经不是民族自决这个十分含糊的口号，而是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这个更清楚更明确的口号。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在他的论文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对那个已经是含糊不清的口号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无的放矢，因为不论在我的提纲中或者在党纲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自决”。那里谈到的只是关于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而现在，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口号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口号。因为各苏维埃国家是根据自愿原则联合成联邦的，所以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没有使用分离权。因为我们所说的是那些受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压制的殖民地，是阿拉伯、◇34◇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印度斯坦这类从属国家，即那些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各民族有分离权的口号就是革命的口号，抛弃这个口号就是为帝国主义者效劳。

第四个误解就是在契切林同志的论文中缺少实际的意见。写文章当然是容易的，但是，既然文章的标题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那就应当提出一些重要的东西，至少应当提出几个实际的反建议。可是我在他的论文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值得倾听的实际建议。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尝试中使民族

问题扩大为殖民地问题了，并且造成了一条从爱尔兰到印度斯坦的反对自己的新战线。唯一能够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即苏维埃国家。在苏维埃联邦国家内，不再有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民族压迫已经消灭，但是，由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和文化不大发达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由此就产生了一些实际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我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提纲中第三部分的内容。（鼓掌）◇35◇

二 结 论

（三月十日）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的讨论方面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已经从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宣言，经过重新划分俄国行政区域，进到在实践上提出问题了。在十月革命初期，我们只是宣布了民族分离权。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为了使各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接近俄罗斯无产阶级，我们按照民族特征重新划分了俄国的行政区域。而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则把党对各自治区和同俄罗斯联盟的各独立共和国的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应当采取的政策问题完全提到实践上来了。因此，查东斯基的关于提交大家的提纲带有抽象性质的说法使我感到惊奇。我手头有他自己的提纲，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提纲提交代表大会审查。在他的提纲中，我没有找到一个实际建议，除了提出用“东欧”一词代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用“俄罗斯”或“大俄罗斯”一词代替“俄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建议。我在这个提纲中没有找到其他实际建议。

现在来谈谈下面一个问题。

应当说，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抱的希望很大。俄国共有二十二个边疆地区，在这些边疆地区中，◇36◇有的工业非常发达，在工业方面和俄国中部很少有差别，有的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同俄国中部有根本的差别，另一种则是完全闭塞的。要把边疆地区这一切不同的情况都非常具体地包括在提纲内是不可能的。决不能要求有全党意义的提纲仅仅带有土尔克斯坦的性质，仅仅带有阿捷尔拜疆或乌克兰的性质。必须撇开细节，抓住各个边疆地区的共同特点，把它们列入提纲。其他起草提纲的方法在天地间是没有的。

必须把非大俄罗斯民族划分为几类，这在提纲中已经做了。非俄罗斯民族大约有六千五百万人。所有这些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国家制度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俄国中部。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力量帮助这些民族，帮助它们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劳动者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苏维埃国家机关。这种共同之点在提纲中，在提纲的实践部分中，都已经提到了。

其次，如果要使各边疆地区的特点更加具体化，就必须从大约六千五百万非俄罗斯民族的总人口中划出二千五百万左右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突厥语系民族人口。米高扬同志说阿捷尔拜疆的发展程度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各省高，这是不对的。他显然是把巴库和阿捷尔拜疆混为一谈了。巴库不是从阿捷尔拜疆内部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诺贝尔、路特希尔德、维沙乌等人的努力从上面建造起来的。至于阿捷尔拜疆本身，那它是一个最落后的父权制封建关系的国家。因此，我把整个阿捷尔拜疆列入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一类边疆地区，对于这类边疆地区，必须采用特殊的方法把它们纳入苏维埃经济的轨道。关于这一点提纲里也说到了。◇37◇

其次，还有第三类，这一类的人口不超过六百万，主要是还保留着氏族生活方式的游牧部落，它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经济。这主要是柯

尔克兹人、土尔克斯坦北部、巴什基里亚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对于这一类民族，首先必须保证它们有土地。这里没有让柯尔克兹人和巴什基里亚人发言就停止了讨论。他们对于居于山地的巴什基里亚、柯尔克兹和山民因无土地而日渐死亡的痛苦，是能够谈得更多一些的。而萨发罗夫关于这一点所说的只能涉及六百万人口的这一类。因此，把萨发罗夫的实际建议运用到一切边疆地区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对其余的约有六千万人口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些修正是毫无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不反对把萨发罗夫对某些民族所提出的某几点意见加以具体化、补充和修正，但是必须说明，决不能到处运用这些修正。其次，我必须对萨发罗夫的一项修正提出批评。在他这项修正中有一句关于“民族文化自决”的话。

那里写道：“在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俄国东部边疆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无法通过实行本民族文化自决和用本族语言进行教育的方法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成果”等等。

我必须说，我不能接受这项修正，因为它带有崩得主义的色彩。民族文化自决是崩得的公式。我们早就抛弃了那些含糊不清的自决口号，恢复它们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整句话不过是一些字的矫揉造作的堆砌。

其次，我接到一张条子，上面说我们共产党员似乎在人为地培植白俄罗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38◇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大约五年前，关于乌克兰，关于乌克兰民族，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说，乌克兰共和国和乌克兰民族是德国人臆造出来的。可是很明显，乌克兰民族存在着，发展它的文化是共产党员的义务。违背历史是不行的。很明显，如果乌克兰的各个城市至今还是俄罗斯人占优势，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城市必然会乌克兰化。大约四十年前，里加是一个德国人的城市，但是，由于城市是依靠农村发展的，而农村又是民族的保存者，因此里加现在就成了纯粹拉脱维亚人的城市了。大约五十年前，匈牙利所有的城市都带有德国性质，可是它们现在都马札尔化了。白俄罗斯将来也会这样，虽然现在在它的各个城市中非白俄罗斯人还占优势。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建议代表大会选举一个由各区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便讨论提纲中我们所有边疆地区都感到兴趣的实际建议，使它们更加具体化。（鼓掌）◇39◇

给弗·伊·列宁的信

列宁同志！

最近三天我有机会读完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汇编〔8〕。疾病帮了我的忙（因祸得福！）。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书。一个**不带引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

你还记得去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战前工业的废墟上依靠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劳动军）的劳动使俄国“经济复兴”的“计划”（他的提纲）吧。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 而常常出现在我们报刊上使我们感到羞耻的几十个“统一的计划”有什么价值呢，——简直是预备班学生说的孩子话…… 还有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其实是**马尼洛夫精神**）……

我的意见是：◇40◇

（一）不要再浪费一分钟去空谈计划；

（二）立即**开始实际行动**；

（三）我们在输送物力和人力、恢复企业、分配劳动力、供应食物、组织供应站和供应工作本身等等方面的工作，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服从于这一**行动**的利益（三分之二应“当前”的需要）。

（四）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虽然具有一切优良的

品质，但仍然缺乏健康的求实精神（在一些文章中使人感到有教授式的软弱气息），因此必须给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增添一些具有实际经验、能够按照“汇报执行情况”和“按期完成”等原则办事的人。

（五）责成“真理报”、“消息报”、特别是“经济生活报〔9〕”广泛宣传“电气化计划”，既宣传计划的基本内容，也宣传同各个方面有关的具体内容，让人们记住：**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即“电气化计划”，其余的一切“计划”不过是无谓而有害的空谈。

你的　**斯大林**

写于一九二一年三月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五十寿辰纪念文集”
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41◇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和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10〕的活动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等有本质的不同。

指出作为民族问题新提法的最显著的特征的四个要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对民族问题的新旧理解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捷克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当时人们都默默地认为：如果也需要为欧洲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那末“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就完全不应当真正谈到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甚至并不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欧洲民族压迫的消灭是不能想像的，他们并不认为前者和后者是◇42◇有机地联系着的。共产党人首先揭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革命实践的基础。因而，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

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

第二个要点是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明确的革命口号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谈到自决权的时候，通常总是不提国家分离权，至多只把自决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民族问题“专家”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的**条件下**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自决权变成统治民族享有政治权力的特权，而关于国家分离的问题则撇开不谈。第二国际的思想首领考茨基基本上同意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对自决所做的这个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解释。帝国主义者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自决口号的特点并把它宣布为自己的口号，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家知道，以奴役各族人民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在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含糊不清的自决口号就从民族解放、民族权利平等的工具变成驯服各民族的工具，变成使各民族顺从帝国主义的工具了。最近几年的世界事物的进程，欧洲革命的逻辑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增长，都要求抛弃这个已变成反动的口号，而代之以另一个革命的口号，即能够消除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对统治民族无产者不信任的气氛的口◇43◇号，能够为民族权利平等和这些民族劳动者的团结扫清道路的口号。共产党人提出的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就是这样的口号。

这个口号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

（一）消灭某一民族劳动者怀疑另一民族劳动者有掠夺意图的任何根据，从而为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打下基础；

（二）摘下帝国主义者一面虚伪地谈论自决，一面却力图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顺从自己并把它们强留在自己的帝国主义国

家范围内的假面具，从而加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

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蒙古、中国某些领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

同样不容置疑，用自决的旗帜巧妙地掩盖起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近来在东方仍然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政策在那里遇到了在以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的精神进行鼓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日益发展的解放运动。这一点是那些因巴库“行动和宣传委员会”〔11〕犯了一些不关紧要的过错而拚命辱骂它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所不了解的，但是任何一个愿意◇44◇知道上述“委员会”成立一年以来的活动和近两三年来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人，都一定会了解的。

第三个要点是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同资本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揭示。在第二国际时代，民族问题的范围被缩小到极点，通常被看做是孤立的、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联系的。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一些改良的办法，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认为不根本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实现，相反地，不推翻资本政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民族问题也能解决。这种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对民族问题的这种理解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腐朽的。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

（一）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

（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

（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

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进行主要战斗的前线和舞台，那末具有原◇45◇料、燃料、粮食和大批人力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应当算做帝国主义的后方和后备军，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在前线打胜仗，而且要使敌人的后方、敌人的后备军革命化。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活动家忽略了这件“小事”，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同在西方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权问题分割开来了。

第四个要点是给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只限于宣布“民族权利平等”。至多也不过是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平等。但是民族权利平等本身是很重要的政治成果，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和可能来行使这个极重要的权利，那它就有变成空谈的危险。毫无疑问，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没有力量像先进民族的劳动群众那样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他们的权利，因为某些民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性（文化的、经济的）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灭的，人们还是能感觉得到的。这种情

况在俄国也可以感觉得到，这里有许多民族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有些民族根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这里民族权利平等虽然已经完全实现，但是，由于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还没有力量充分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利。这种情况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46◇后的“第二天”还将更强烈地使人感觉得到，因为那时处于各个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无数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必将登上舞台。正因为如此，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不能只限于“民族权利平等”，必须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到采取使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办法，转到制定并实行下列实际措施：

（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

（二）发展它们的文化；

（三）对它们进行政治教育；

（四）把它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

（五）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

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新提法的四个要点就是这样。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
“真理报”第九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47◇

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2〕

谨向山民共和国〔13〕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代表大会，深感遗憾。

山民妇女同志们！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解放运动都不能没有妇女直接参加，因为被压迫阶级在解放道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妇女的地位改善一步。在古代的奴隶解放运动和近代的农奴解放运动的队伍中，不仅有男子，而且有妇女，她们是用自己的鲜血保证忠于劳动人民事业的女战士和女烈士。而在现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即在人类一切解放运动中最深刻最强大的解放运动中，不仅产生了女英雄和女烈士，而且产生了在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下胜利斗争的千百万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

同这个强大的劳动妇女的运动比较起来，资产阶级妇女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不过是一种为了消磨时光而臆想出来的儿戏。◇48◇

我深信，山民妇女代表大会一定会在红旗下进行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载于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东部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公报
一九二一年弗拉基高加索版◇49◇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

（小册子的大纲）

一　术语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一）**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活动范围及运用范围**。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运动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那末战略和策略的活动范围无疑就只限于运动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就是在无产阶级外部和周围发生的、不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发展过程，就是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那些过程。**主观**方面就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发生的、客观过程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得到反映的那些过程，就是加速或延缓客观过程、但决不能决定客观过程的那些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是研究客观过程的发展和消亡，断定发展的趋势，指出某个或某些阶级必然执掌政权或者必然没落，一定没落。

（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根据理论原理确定上升阶级（这里是指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或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内的运动目标（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50◇

（四）**战略**遵循纲领的指示并且根据对内部的（一国的）和国际的各种斗争力量的估计，规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当遵循的**总的道路，总的方向**，以便在力量对比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效果，战略根据这一点制定社会战线上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力量布置计划（**总的配置**）。不能把“力量布置计划的制定”同策略和战略共同进行的布置力量即配备力量的具体而实际的工作混淆起来。这并不是说

战略只限于规定道路和制定无产阶级阵营中战斗力量的布置计划，相反地，它还要指导斗争并修正整个转变时期的日常策略，巧妙地利用它的后备力量，并且机动灵活地支持策略。

（五）**策略**遵循战略的指示以及本国和邻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估计到某一特定时期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内部力量的状况（文化水平、组织性和觉悟性的高低、具有哪些传统、哪些**主要的**和**辅助的**运动形式和组织形式）和敌人阵营中力量的状况，利用敌人阵营中的不协调和种种混乱，拟定能够最稳当地使战略取得胜利的**具体办法**，把广大群众争取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把他们引到社会战线的战斗阵地上来（为了执行根据战略计划所制定的力量布置计划）。策略根据这一点提出或改变党的口号和指示。

（六）**战略**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历史转折关头变更的，战略所包括的时期是从一个转变（转折）到另一个转变，所以它把运动引向包含整个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总目标；它要设法使整个这一时期阶级之间的**战争赢得胜利**，因此它在这个时期内是不变的。

策略则相反，它是由某个转变即某个战略时期的来潮和退潮、斗争力量的对比、斗争（运动）的◇51◇形式、运动的**速度**以及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斗争场所来确定的，又由于这些因素的改变是取决于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时期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策略所包括的不是整个战争，而只是使战争胜或负的个别战役，它在战略时期内有好几次的变更（可以变更）。战略时期要比策略时期长。策略服从于战略的利益。一般说来，策略的胜利是为战略的胜利作准备。策略的任务是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提出口号，把群众引到新的阵地上，使斗争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是说，取得战略的胜利。但是，有时候策略的胜利会破坏或推迟战略的胜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放弃策略的胜利。

举例来说。在一九一七年初，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我们在工人

和士兵中间进行的反战鼓动在策略上无疑是不利的，因为群众把我们的演讲者拖下讲台，打他们，有时甚至把他们打死。群众不是流入党而是流出党。这个鼓动虽然在策略上失败了，但是，它加速了巨大的战略胜利，因为群众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反战鼓动是正确的，这就在后来加速和促进了他们转到党方面来。

又如共产国际为了执行二十一项条件〔14〕而要求同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划清界限这件事，在策略上无疑是有些不利的，因为这样就有意识地减少了共产国际“拥护者”的数量，并且暂时削弱了共产国际，但是，由于消除了共产国际内的不可靠分子，在战略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会巩固共产国际，加强它的内部团结，也就是说，会根本加强它的力量。

（七）**鼓动口号**和**行动**口号。不能混淆这两种口号，混淆起来是危险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52◇个口号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的时期是鼓动口号；十月初（十月十日）党中央通过“夺取政权”的决议后，它在十月里就成了行动口号。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四月在彼得堡举行发动就是混淆了这两种口号。

（八）**指示**（总的）是**一定时期**和**一定地点**行动的直接号召，是全党必须执行的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在四月初是**宣传**口号（“提纲”〔15〕），六月成为**鼓动**口号，十月（十月十日）成为**行动**口号，十月底就成为直接**指示**了。我说的是对全党的总指示，自然还应当有发展总指示的地方指示。

（九）**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特别是在政治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德国国会选举时；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四月、六月和八月间，以及一九二一年喀琅施塔得叛乱〔16〕）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必须仔细加以研究、利用和估计，但是同这种动摇妥协对无产阶级事业是危险的、有害的。决不能由于这种动摇而改变鼓动口号，但是可以而且有时必须改变或延期发出某个**指示**或口号（**行动的**）。“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策略

也正是改变**指示**，甚至是改变**行动口号**，但决不是改变鼓动口号（例如取消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的游行示威等等事实）。

（十）**战略家**和**策略家**的艺术在于既能巧妙而及时地把鼓动口号转变为行动口号，又能及时而巧妙地把行动口号转变为一定的具体**指示**。◇53◇

二　俄国发展中的历史转变

（一）**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转变**（**日俄**战争一方面揭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另一方面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实力）和适应转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计划——列宁的“两个策略”〔17〕。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面的转变（**转变的实质就在这里**）。不是实现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的勾结，而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略计划的实质就在这里**）。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使那里的革命发动起来，并促使俄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参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8〕，以及在代表大会上和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19〕小册子中对专政概念的分析）。**对国内和国际的斗争力量作必要的估计并对转变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作一般的分析**。二月革命至少实现了“两个策略”中的战略计划的三分之二，因而结束了这个时期。

（二）**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向苏维埃革命方面的转变**（帝国主义战争扫除了专制制度，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全部脆弱性，表明了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并且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由人民、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进行的“光荣的”**二月**革命（**这次**革命把政权交给了立宪民主党人，所以在国际关系方面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变化，它不过是英法资本的政策的继续）和翻天覆地的十◇54◇月革命之间的区别。

列宁的“**提纲**”是适应新转变的战略计划。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出路。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我们将在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西方的革命发动起来，然后西方的同志就会帮助我们把我国的革命进行到底。**”对这个转变时期的国内外的经济和政治（“两个政权并存”时期，联合的诡计，标志着克伦斯基统治死亡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西方各国因对战争不满而发生骚动）作必要的分析。

（三）**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转变**（不仅是俄国历史的转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转变），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建立（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一八年上半年），**突破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战线，确定了向消灭资本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转变**；同时开辟了用国内战争代替帝国主义战争的纪元（和平法令，土地法令，民族法令，公布密约，建设工作纲领，列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20〕，列宁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任务”〔21〕，经济建设）。

全面分析非执政的即在野的共产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同执政的共产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区别。

国际形势，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继续进行着的战争，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55◇

（四）在短促的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即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对武装干涉者采取军事行动的方针（一九一八年夏季到一九二〇年底）**。这个方针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开始实行的，布列斯特和约反映了苏维埃俄国在军事上的软弱，强调了俄国建立红军这个苏维埃革命的主要支柱的必要性。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行动，协约国军队侵占牟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海参崴和巴库，协约国向苏维埃俄国宣战，——这一切最后确定了**从已经开始的和平建设向军事行动，向保卫世界革命策源地使之免受国内外敌人侵犯的转变**（列宁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演说等等）。由于社会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特别是在上述地区被侵占以后并没有引起西方无产者的严重抗议，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签订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取得喘息时机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红军，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苏维埃共和国。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保卫共和国。”因此成立了国防委员会等等。这是在俄国国内外全部生活上打下烙印的军事时期。

（五）在粉碎弗兰格尔以后，**从一九二一年初实行和平建设的方针**，同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和约，同英国缔结条约等等。

战争结束了，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暂时还无力帮助我们恢复经济，而我们在经济上又被工业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因此不得不采用租让制，不得不同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并同一些资本家集团订立租让合同，我们在这方面（经济方面）也是孤立无援的，不得不想尽办◇56◇法克服困难。**一切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参见大家都知道的列宁的演说和小册子）。把国防委员会变成劳动国防委员会。

（六）党在一九一七年前的发展阶段：

（甲）**基本核心、特别是“火星”派的形成**等等。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信条〔22〕。

（乙）**党的干部**即未来全俄范围的工人政党的基础的**形成**（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丙）**把干部扩展成工人政党**，并且用无产阶级运动进程中动员来的党的新工作人员充实党（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丁）**孟什维克为了使党的干部瓦解成非党群众而同党的干部进行斗争**（“工人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为保存党的干部即党的基础进行斗争。伦敦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派的失败。

（戊）**取消派和党员**。取消派的失败（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

（己）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时期。**非法和合法工作方式结合的时期**，党组织在各个工作部门中的成长。

（七）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老近卫军在这个强大的骑士团中的作用。用最近三四年中锻炼出来的新工作人员**补充老近**◇57◇**卫军**。

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否正确？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党就会涣散，党就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各种分子的混合体，党的内部就不会团结一致，党就不会有无比的纪律性和空前的灵活性，而没有这些，党和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拉萨尔说得很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首先是质量，然后才是数量。

（八）是否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它领导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部门中的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一个整体。如果说不需要共产党，那就等于说无产阶级的斗争可以不要有专门研究斗争条件和拟定斗争方法的司令部和领导核心，就等于说没有司令部比有司令部要战斗得好，这样说是愚蠢的。

三　问　题

（一）**专制制度在日俄战争以前和以后的作用**。日俄战争揭露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和软弱性。获得胜利的一九〇五年十月的政治总罢工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这种软弱性（泥腿巨人）。其次，一九〇五年不仅揭露了专制制度的软弱、自由资产阶级的虚弱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强大，而且推翻了过去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俄国专制制度是欧洲的宪兵，说它似乎**能够担任**欧洲的宪兵。事◇58◇实表明，俄

国专制制度没有欧洲资本的帮助连自己的工人阶级也对付不了。当俄国工人阶级还在睡觉，俄国农民还相信沙皇爷爷而毫无动静的时候，俄国专制制度确实有可能担任欧洲的宪兵，但是一九〇五年，首先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枪声唤醒了俄国无产阶级，同年的土地运动打破了农民对沙皇的信仰。现在欧洲反革命的重心已从俄国地主转到英法银行家—帝国主义者身上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俄国是欧洲的宪兵，对俄国专制制度作战是进步的，他们企图借此来为自己在一九一四年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辩护，这实际上是拿过去的影子做王牌，当然，这是弄虚作假，因为拥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足以担当宪兵任务的欧洲真正的宪兵不是在彼得格勒，而是在柏林、巴黎和伦敦。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欧洲不仅给俄国输入社会主义，而且还以贷款给沙皇等等形式输入反革命，而俄国给欧洲输入的除了政治亡命者外，还有革命（一九〇五年俄国至少给欧洲输入了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总罢工）。

（二）关于“**果实的成熟**”。怎样判断革命爆发时机的到来？

什么时候可以说“果实已经成熟”，准备时期已经结束，可以开始行动？

——（甲）在群众的革命情绪洋溢和溢出边缘，而我们的**行动口号**和**指示**落后于群众运动的时候（见列宁的“拥护参加杜马”，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前的时期），在我们很难而且不总是能够阻止住群众的时候，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机枪团的士兵举行发动的时候（也见列宁的◇59◇“……幼稚病”〔23〕）；

——（乙）在敌人阵营动摇和混乱、瓦解和崩溃达到顶点的时候，在敌人阵营的背叛分子和变节分子的数量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时候，在所谓中立分子即千百万广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开始坚决地抛开敌人（抛开专制制度或资产阶级）而寻求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在敌人的管理机关和镇压机关由于这一切而不起作用、陷

于瘫痪、成为无用之物等等，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权利开辟道路的时候；

——（丙）在这两种情况（即**甲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情形是常有的）。

有些人认为，只要确认执政阶级衰亡的**客观**过程已经开始就可以发动攻击。这是不对的。除此以外，还必须为攻击取得胜利准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战略和策略的任务其实就在于巧妙而及时地使准备攻击的主观条件的工作与统治阶级政权衰亡的客观过程相适应。

（三）**时机的选择**。既然打击的时机实际上是由党选择的，而不是由事变强加的，那末要使时机选择得当，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果实的成熟”和（乙）发生某种特别突出的事件，如政府采取某种行动或发生某种地方性的自发行动，要这种事件能够成为广大群众易于理解的可以开始打击的**适当理由**。不遵守这两个条件，就会使打击不仅不能成为向敌人展开日益强大的总攻击的起点，不仅不能发展成雷霆万钧的致命打击（恰当选择时机的意义和目的就在这里），相反地，可能使它变成合乎政府和一切敌人心意、有利于提高他们威信的可笑的盲动，并且会变成使党毁灭或者至少使党涣◇60◇散的原因和起点。例如一部分中央委员提出的、中央以其不适合（**完全**不适合）第二个要求（见上）而加以否决的关于逮捕民主会议〔24〕代表的建议，从选择时机这一点来说就是不恰当的。

一般说来，应当防止第一次打击（时机的选择）变成盲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严格遵守上述两个条件。

（四）**“力量的试验”**。有时候，党把坚决发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自以为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后备力量，就认为举行尝试性的发动来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和检查一下自己的战斗准备是适当的。这种力量的试验或者是党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的（原定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后来取消,改在同年六月十八日举行），

或者是迫于环境，迫于敌方的过早发动和某种没有预见到的现象而进行的（一九一七年八月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和共产党的反发动，这种反发动是对自己力量的一次极好的试验）。不能认为“力量的试验”就是像五月示威那样的普通游行示威，因此不能把力量的试验看做普通的**力量计算**，力量的试验按其重要程度和可能的后果来说，虽然比起义小，但无疑比普通的游行示威大，它是介乎游行示威和起义或总罢工之间的一种中间物。在有利的条件下，它能够发展成第一次打击（时机的选择），发展成起义（我们党在十月底的发动），而在不利的条件下，它能够使党直接受到毁灭的威胁（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四日的游行示威）。因此进行力量试验最适当的时候，是“果实已经成熟”，敌人阵营十分涣散，党积聚了一定后备力量的时候，简单地说，就是党准备进攻，党不怕力量的试验会因情况的变化而变成第一次打击，以后变成向敌人总进攻的时候。◇61◇党在进行力量试验的时候应当准备应付一切变化。

（五）“**力量的计算**”。力量的计算是普通的游行示威，它在任何情况下（例如举行罢工或不罢工的五月游行示威）几乎都可以进行。如果力量的计算不是在直接爆发的前夜而是在比较“和平的”时期进行，那末它可能得到的结果至多是同政府的警察或一些军队发生一个对党和对敌人都不会有特别损失的小冲突。但是，如果它是在爆发日益逼近的炽热气氛中进行，那末它就会把党卷入同敌人进行为时过早的激烈冲突，如果党还很软弱并且对这种冲突没有准备，敌人就会顺利地利用这种“力量的计算”来击溃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间不止一次地发出了“不要受人挑衅”的号召）。因此，在革命危机已经成熟的气氛中采用计算力量的方法必须非常谨慎，要记住，在党软弱的时候，敌人可能会把这种方法变成击溃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大大削弱无产阶级的工具。相反地，在党有战斗准备，敌人的队伍显然涣散的情况下，就不应当放过机会，从“力量的计算”转到

“力量的试验”（预计到实行这种转变的有利条件——“果实的成熟”等等），然后展开总冲击。

（六）**进攻的策略**（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进行解放战争时的策略）。

（七）**有秩序地退却的策略**。如何在敌人力量显然占优势的情况下巧妙地退入腹地，以便即使不能保全军队的大部分，至少也能保全它的骨干（见列宁的“……幼稚病”）。例如，我们在抵制维特—杜巴索夫的杜马时是如何最后退却的。退却策略和逃跑“策略”之间的区别（和孟什维克比较）。

（八）**防御策略**是保存骨干和积蓄力量以等待未来战斗的必要手段。它要求党占领所有一切斗◇62◇争场所的阵地，把各种武器即各种组织形式准备好，决不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即使表面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组织形式，因为在开始进行决战的时候，谁都不能预先知道哪个场所是最初的战斗舞台，哪种运动形式或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的出发点和有力武器。换句话说，在防御和积蓄力量的时期，党应当做好一切准备以等待决战。……**等待**战斗。这并不是说，党应当袖手旁观，做一个无用的观望者，由革命的党（如果它是在野党）蜕化成消极等待的党，——不，党在这样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党**还没有来得及积蓄应有的力量，或者情况对党不利，党就应当避开战斗，不去应战，但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当然**不应当放过任何机会**，在对敌人不利的时候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使敌人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使敌人的力量一步步地削弱和瓦解，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关系到它日常利益的战斗中一步步地得到锻炼，从而增强本身的力量。

只有这样，防御才能成为真正**积极的**防御，党才能保持**真正行动的党**、而不是观望等待的党的一切特征；只有这样，党才不会错过和忽略断然发动的时机，不会遭到事变的突然袭击。考茨基及其同伙由于实行了“英明的”观望等待的策略和采取了更加“英明的”消极态

度而忽略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攻时机，这就是一个直接的警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在和平和土地问题上采取了漫无止境的等待策略而错过了夺取政权的机会，这也应当是一个警告。另一方面，不能滥用积极防御的策略、行动（举动）的策略，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样做的危险是可能把共产党的革命行动的策略变成“革命”操练的策略，即变成这样一种策略：它不是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战◇63◇斗准备，就是说不是加速革命，而是分散无产阶级的力量，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准备，因而延缓革命事业。

（九）**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般原则**。这样的原则有三个：

（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的并经革命实践证实的下面这个结论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关心人类摆脱资本主义而获得彻底解放，因此它的使命就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担当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领袖，因而必须把全部工作都导向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的并经革命实践证实的下面这个结论为基础：**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是正确的，就是它们的战略和策略不限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范围之内，相反地，是在估计自己国家的条件和情况的同时，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说它们的精神实质是国际主义的，它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25〕）。

（丙）以下列论点为出发点：否定在改变战略和策略、在制定新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时的一切右的和左的教条主义（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波格丹诺夫、布哈林），否定直观方法，否认引证、历史比拟、杜撰计划和制定死公式的方法（阿克雪里罗得、普列汉诺夫），

承认不应当“躺在”而应当◇64◇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应当“只是解释世界”，而应当“改造”世界，不应当“观察无产阶级的臀部”和做事变的尾巴，而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并成为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见列宁的“自发性和自觉性”〔26〕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最有远见的和先进的部分这段名言〔27〕）。

俄国和西方革命运动经验中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上述的每一个原则，**特别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则**。

（十）**任务**：

（甲）**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就是说要聚集干部，建立共产党，制定纲领和策略原则）。宣传是工作的基本方式。

（乙）**把广大工人群众和全体劳动者争取到先锋队方面来**（把群众引到战斗阵地上）。工作的基本方式是群众的实际行动，这是进行决战的前奏。

（十一）**规则**：

（甲）**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形式，一切运动和斗争形式**（场所）。（运动形式：国会内的和国会外的，合法的和非法的。）

（乙）**学会适应一种运动形式和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迅速更替**，一种形式和另一种形式的补充，学会合法的形式和非法的形式、国会内的形式和国会外的形式的**结合**（例如：一九一七年七月布尔◇65◇什维克从合法的形式向非法的形式的迅速转变，连纳事件时期国会外的运动和杜马内的活动的结合）。

（十二）**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战略和策略**。四个特点。

（甲）十月革命后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俄国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范围内**战胜了俄国资产阶级，从而**突破了国际社会战线**（同帝国主义**决裂，公布**密约，用国内战争代替帝

国主义战争，号召士兵联欢，号召工人起义反对本国政府）。这一突破开始了**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国际帝国主义的整座大厦受到了直接威胁，根本改变了西方斗争力量的对比，使之有利于欧洲工人阶级。这就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已经从**一国的**力量变成**国际的**力量，而且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旧任务已经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新任务所代替。国际资产阶级感到有致命的危险，因此就把**堵塞俄国这个缺口**作为自己的迫切任务，集中了他们的余力（后备力量）来反对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俄国也就不能不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行防御，被迫承受国际资产阶级的主要打击。这一切大大促使西方无产者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大大加深了西方无产者对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国际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同情。

这样，在一个国家内实现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之后，就产生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的新任务，即在另一个方面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国家同敌视它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过去是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之一，从今以后则变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即先锋队。◇66◇

这样，发动西方革命以使自己（俄国）易于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已经从愿望完全变成了当前的实践任务了。十月革命在各种关系方面（特别是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引起的这一变化应**完全**归功于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甚至没有触及国际关系方面。

（乙）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的情况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内的地位改变了。从前，在十月革命以前，无产阶级所关心的主要是组织一切战斗力量推翻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批评性的和破坏性的。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不掌握政权，国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了，因此旧任务已过时而让位于这样的**新任务：组织**俄国**全体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各落后部族）一方

面**建设新的苏维埃俄国**，建设它的经济机关和军事机关，另一方面镇压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的反抗[①]。

（丙）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改变的地位以及新的任务相适应，**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集团和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俄国各个居民阶层的**政策也改变了**。从前（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前夕），无产阶级拒绝同资产阶级集团达成个别协议，因为这种政策会巩固执政的资产阶级；而现在则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主张达成个别协议，因为这些协议能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瓦解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易于驯服和同◇67◇化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改良主义”**和达成**个别协议的政策**之间的区别（前者绝对拒绝革命行动的方法，后者则不是，而革命者在运用后者时是以革命的方法为依据的；前者的范围较窄，后者的范围较宽）。（见论“改良主义”和“协议政策”）

（丁）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增长相适应，**共产党的战略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从前，共产党的战略只限于制定战略计划，在各种运动形式和无产阶级组织形式之间，在运动的各种要求（口号）之间灵活运用，提出一些口号，更换一些口号，运用有限的后备力量即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党的软弱，利用这些后备力量的范围和可能性通常总是限于狭小的圈子，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第一、**后备力量增大了**（俄国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周围国家的各阶级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周围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和整个殖民地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等等）；第二、**可以灵活运用的方法和可能性增多了**(旧方法由新方法补充了，例如由外交工作、由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同东方革命运动建立更切实的

————————————————

① 与此相适应，某些旧的运动形式，如罢工和起义等等也过时了，工人阶级组织（党、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机关）的性质和形式（职能）也随着改变了。——著者注

联系等补充了）；第三、无产阶级在俄国已经成为统治的**政治力量**，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先锋队，由于它的人力和物力的增长，**出现了日益广泛地利用后备力量的可能性**。

（十三）**特别是**：（甲）关于运动的**速度**及其在确定战略和策略时的作用问题，（乙）关于**改良主义**、**协议**政策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十四）**“改良主义”**（“妥协主义”）、**“协议政策”**和**“达成个别协议”**是三种不同的东西（每种◇68◇将分别论述）。孟什维克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是以**改良主义**即**否认革命行动**为依据的，而布尔什维克的协议是以要求革命行动为依据的。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的协议成了一套体系，成了**协议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只主张达成个别的具体的协议，并没有把它们变成特殊的协议政策。

（十五）**俄国共产党的三个发展时期**：

（甲）**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党）的形成时期，党的干部的聚集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是**软弱的**，它虽然有纲领，有总的策略原则，但作为群众性行动的党还是**软弱的**）；

（乙）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时期**。这个时期党**从群众的鼓动组织**变成群众的行动组织，**革命行动**时期代替了**准备**时期；

（丙）**取得政权以后即共产党变成执政党以后的时期**。

（十六）**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力量**在于：在俄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无产阶级**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劳动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和前者对后者的**支持**，不仅政治上得到了保证，而且组织上在苏维埃中也得到了巩固，这就使绝大多数居民同情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即使无产阶级本身在国内不占多数也**不要紧**）。

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的弱点**在于：在欧洲，无产阶级和农

村没有**这种**联系，也得不到农村的**这种**支持，**在那里**，农民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而不是在当时还很软弱的无产阶级领导下从封建制◇69◇度下解放出来的，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村利益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仍长久地对资产阶级抱着同情。①

一九二一年七月

第一次刊印◇70◇

——————————————

① 这本小册子的大纲，作者曾用于写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该书于一九二四年出版，已编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大纲的第一部分曾用于写作“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该文于一九二三年发表，已编入“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大纲的某些论点，作者曾用于写作“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该文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发表，已编入“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编者注

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梯弗里斯党组织
全体党员大会[28]上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同志们！你们党组织的委员会要我向你们做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共产主义的当前任务——这是策略问题。要确定党的策略，而且是执政党的策略，就必须首先考虑到党周围的应该加以重视的总的情况。那末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未必用得着证明，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个是以协约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一个阵营里的，是各种各样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孟什维主义的国家，在第二个阵营里的，是各苏维埃国家，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目前各苏维埃国家周围情况的基本特点是：上述两个阵营之间的武装斗争时期因双方相当长期的停战而结束了，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已经代替了战争时期。在过去，在所谓军事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总的口号下行动的，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被帝◇71◇国主义国家包围封锁的兵营。在当时，在那个时期，共产党的全部精力集中在用一切人力去建设红军，加强前线，以便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不用说，党在这个时期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发展军事工业

和勉强维持国民经济中某些与战争也有关系的部门。各苏维埃国家的军事时期遗留给我们的经济破坏正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新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投到工业、农业、粮食工作、合作社、运输业等等上去。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战胜经济破坏。

如果说，军事时期给我们提供了军人型的共产党员，如供应工作人员、编制工作人员、作战参谋人员等等，那末在新时期，即在经济建设时期，在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经济恢复事业的同时，共产党还应当关心培养新型的做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如工业、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等等方面的工作人员。

但是，共产党员在开展经济建设工作时，不能不考虑过去遗留下来的两个极重要的情况。那就是：第一、各苏维埃国家周围存在着工业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第二、各苏维埃国家内部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农村小资产阶级。

因为历史的意志决定了苏维埃政权不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72◇的国家里取得胜利。历史表明，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推翻资产阶级，比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这类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容易得多，因为俄国的资本主义比较年轻，无产阶级强大而集中，民族资产阶级软弱；而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已存在几百年，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极重要的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确立的时候，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就比较容易，也就是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就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工业比目前各苏维埃国家的工业要发达，技术比较精湛，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比较多。可是目前摆在

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工业不大发达而小商品生产者阶级（农民）人数众多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专政在一些工业比较发达而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里还存在着。忽视这个事实是不明智的、轻率的。

苏维埃国家的原料产地和燃料产地很多，而工业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却缺少这种产地，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些资本家集团无疑地愿意同各苏维埃国家达成协议，以便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我们的原料产地和燃料产地。另一方面，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小生产者阶级（农民）需要工业品（布匹、农业机器），因此它无疑地也愿意同本国无产阶级政权达成协议，以便通过商品交换（用农产品交换）得到工业品。

而苏维埃政权也愿意同别国的一些资本家集团和本国的小商品生产者阶级达成临时协议，因为◇73◇这种协议无疑会加速和促进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加速和促进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技术工业基础的电气化的实现。

这些情况要求各苏维埃国家的共产党员实行这样的政策：同西方一些资本家集团达成临时协议（为了利用它们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同时也同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达成临时协议（为了获得必需的原料和粮食）。

有人会说，这种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策略带有孟什维主义的色彩，因为孟什维克在自己的行动中就是实行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策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共产党员现在提出的同一些资产阶级集团达成协议的策略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策略之间有天渊之别。孟什维克通常是在资本家执掌政权的时候，是在执政的资本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使无产阶级腐化而答应从上面赐给无产阶级个别集团一些“改革”和小小的让步的时候，提出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这种协议对无产阶级有害，对资产阶级有利，因为它不是削弱而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使无产阶级内部产生分歧，并使无产阶级分裂。正因

为如此，布尔什维克一向反对并且今后还要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执政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策略。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看做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同孟什维克的策略相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协议策略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它完全以另一种情况为前提，即执掌政权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而且一些资产阶级集团同无产阶级政权达成协议后，一方面必然使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另一方面又必然使资产阶级瓦解并使一些资产阶级集团◇74◇驯服。只是无产阶级必须紧紧握住它所夺得的政权，并且善于利用这些资产阶级集团的资金和知识来恢复国家的经济。

可见，这个策略和孟什维克的策略是有天渊之别的。

总之，把全部人力投到经济战线上，同时通过协议的方式利用一些资产阶级集团，利用它们的资金、知识和组织技能，以利于国家经济的恢复，——这就是总的情况要求各苏维埃国家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应当担负的第一项任务。

但要确定苏维埃国家的策略（这里指的是确定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策略），单考虑到总的情况是不够的。为了确定每一个苏维埃国家共产党员的策略，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存在的特殊的具体的条件。而苏维埃格鲁吉亚存在的特殊的具体的条件（格鲁吉亚共产党必须在这些条件下进行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呢？

可以毫不怀疑地举出一些说明这些情况的事实。

第一、毫无疑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各苏维埃国家极端仇视，因此无论从军事方面或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其他一切苏维埃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各苏维埃国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互相支援是这些国家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很明显，格鲁吉亚缺少粮食，它需要俄罗斯的粮食，没有是不行的。

第三、格鲁吉亚没有液体燃料，为了维持运输业和工业，显然需要阿捷尔拜疆的石油产品，没有◇75◇是不行的。

第四、同样毫无疑问，格鲁吉亚的出口商品不足，它需要俄罗斯用黄金来帮助它弥补商品预算的赤字。

最后，不能不考虑到格鲁吉亚居民中民族成分的特殊情况，阿尔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居民中占很大的百分比，而在梯弗里斯，即在格鲁吉亚首都甚至约占全部居民的半数。毫无疑问，这就要求格鲁吉亚在任何管理形式下，特别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要同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同阿尔明尼亚保持无条件的和平和兄弟合作。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条件要求苏维埃格鲁吉亚、苏维埃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彼此间在经济方面共同行动，在经济活动方面联合一致，比如说，共同加强运输，在国外市场上一致行动，布置土壤改良工作（灌溉、排水）等等。至于一旦需要抵御外侮时，南高加索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和这些共和国同苏维埃俄罗斯之间必须互相支援和联系，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无可争辩的。我所以又提到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是因为最近两三年以来，有一些情况妨碍着这种联合，并且有使这种联合的尝试遭到破坏的危险。我说的是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的、阿捷尔拜疆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最近几年来在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内极为猖獗，妨碍着联合事业。

我记得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中间呈现出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当时阿尔明尼亚工人、格鲁吉亚工人、阿捷尔拜疆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兄弟般地团◇76◇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而现在，当我到达梯弗里斯之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南高加索各民族工人之间过去的那种团结已经没有了。民族主义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增长了，对其他民族同志的不信任情绪加深了：反阿尔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格鲁吉亚的、反俄罗斯的和其

他种种民族主义现在极其盛行。旧的兄弟般的信任的关系破裂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削弱了。显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政府（孟什维克）、阿捷尔拜疆民族主义政府（木沙瓦特党人〔29〕）和阿尔明尼亚民族主义政府（达什纳克党人〔30〕）存在三年之久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民族主义政府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向劳动者灌输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致民族主义的仇视气氛包围住了这些小国中的每个国家，使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得不到俄罗斯的粮食和阿捷尔拜疆的石油，使阿捷尔拜疆和俄罗斯得不到经过巴土姆运来的商品。至于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的战争）和互相残杀（阿尔明尼亚和鞑靼的互相残杀），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都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毒素的环境里，原有的国际主义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意识遭到了民族主义毒素的侵害，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残余在工人中间还没有被铲除，这种情况（民族主义）就成了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活动方面联合起来的极大障碍。我已经说过，没有这种联合，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因此，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就是：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恢复孟什维克民族主义政府出现以前原有的那种兄弟般的国际主义关系，从而造成一种使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得以联合起来并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得以恢复所必需◇77◇的相互信任的健康气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再需要独立的格鲁吉亚或独立的阿捷尔拜疆等等了。在某些同志中间流传着一种计划，主张恢复旧省制（梯弗里斯省、巴库省、埃里温省），由南高加索政府统一领导。我认为这是空想，而且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因为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无疑是想扭转历史车轮。恢复旧省制和废除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的民族政府，就无异于恢复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葬送革命成果。这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正因为要消除互相不信任的气氛和恢复南高加

索各民族工人同俄罗斯工人之间兄弟般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就必须保持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的独立。这并不是排斥，相反地，这是预计到必须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互相支援，必须按照自愿协议原则和协商原则把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联合起来。

我得到的消息说，最近莫斯科决定给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一个小小的援助，即贷给它们六百五十万金卢布。此外，我知道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是无偿地从阿捷尔拜疆得到石油产品的，这种事情在资产阶级国家生活中，即使是在用有名的“诚意协定”（Entente cordiale〔31〕）联系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生活中也是不可想像的。未必用得着证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巩固这些国家的独立。

总之，要肃清民族主义残余，无情地铲除这些残余，并且在南高加索各民族劳动者中间造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健康气氛，以便在保持苏维埃格鲁吉亚独立的情况下促进和加速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78◇国经济活动方面的联合（没有这种联合，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经济就不可能恢复），——这就是格鲁吉亚的具体条件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当前应当担负的第二项任务。

最后，是当前的第三项任务，这项任务也同样重要和同样必要，这就是要保持格鲁吉亚共产党的纯洁性、坚定性和灵活性。

同志们！你们应当记住，我们党是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因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里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

的坚定和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俄国共产党总共只有七十万党员。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断定，俄国共产党是能够使自己的党员数量增加到七百万的，如果它想这样做的话，如果它不懂得七十万坚定的共产党员比七百万谁也不需要的什么也不能做的同路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话。俄国抵挡住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攻击，它在对外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极重大的胜利，它在两三年内发展成一支震撼世界帝国主义基础的力量，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应当归功于团结一致的、久经战斗锻炼的和百炼成钢的共产党，这个党从来没有追求过党员的数量，而认为自己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改善党员的质量。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除自身的肮脏东西而巩固起来的。另一方面，有些政党，例如世界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成了帝国主义◇79◇手中的玩具，而在战后则像一个泥腿巨人那样跌入深渊，那无疑是因为它多年来迷恋于靠吸收各种小资产阶级败类来扩大自己的组织，这批败类就窒息了党内的生气。

总之，要保持自己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不要追求党员数量，要不断地改善党员的质量，保护党，不让市侩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涌进党来，——这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即最后一项任务。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要结束了。现在来做几点结论：

（一）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这项工作，同时利用西方资本家集团和本国小资产阶级集团的人力和物力。

（二）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造成国际主义的健康气氛，以便在保持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的条件下促进这些国家经济活动方面的联合。

（三）保护党，不让市侩分子涌进党来，保持党的坚定性和灵活性，不断地改善党员的质量。

这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当前的三项基本任务。

格鲁吉亚共产党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掌稳船舵，战胜经济破坏。（鼓掌）

载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格鲁吉亚真理报”（梯弗里斯）
第一〇八号◇80◇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必须指出我们党的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这是我们党的**形成**、党的**建立**时期。它大致包括从创办“火星报”〔32〕到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一九〇〇年底至一九〇五年初）。

在这个时期，党作为动力来说是软弱的。它所以软弱，不仅因为它年轻，而且还因为整个工人运动年轻，没有或者只有不大发展的革命环境和革命运动，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农民默不作声或者至多是背后发些怨言；工人只知道局部的经济罢工或全市性的政治罢工；运动的形式带有地下的或半公开的性质；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也主要是带有地下的性质）。

由于战略是以拥有后备力量和可能灵活运用后备力量为前提，因此党的战略必然是狭窄的，受限制的。党只限于制定运动的战略计划，即规定运动应当遵循的道路，由于党的软弱，党的后备力量——俄国国内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还没有被利用或者几乎没有被利用。

由于策略是以对种种运动形式和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利用、这些形式的配合和互相补充等等为前提来争取群众和保证战略胜利的，因此党的策略也必然是狭窄的，没有广大的活动范围的。◇81◇

党在这个时期最注意和最关心的是党的本身，是党的生存和党的保存问题。这个时期党被看做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力量。沙皇政府对党的疯狂进攻，以及孟什维克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党和用不定形的非党团体来代替党的干部（请回忆一下一九〇五年从阿克雪里罗得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出版后开始的孟什维克

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运动），都威胁着党本身的生存，因此，保存党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俄国共产主义在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中最积极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站稳脚跟。列宁同志是这样表述这个任务的：“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见“……幼稚病”〔33〕）

第二个时期——这是**把广大工农群众争取到**党方面来，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方面来的时期。它大致包括一九〇五年十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这段时期。

这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的情况复杂得多，发生的事件也多得多。一是沙皇政府在中国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和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革命，一是日俄战争的结束、反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成果的葬送，还有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这一切事件激动了俄国的各个阶级，把它们一个个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巩固了共产党，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政治生活。

无产阶级运动增添了像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这样强有力的形式。

农民运动增添了对地主的抵制（把地主“赶出”庄园），这种抵制后来就变成了起义。◇82◇

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活动因争得了国会外的、合法的和公开的工作形式而活跃起来了。

工人阶级的组织不仅增添了像工会这样久经考验的和重要的形式，还增添了像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史无前例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

农民步工人阶级的后尘，也选出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党的后备力量也增多了。在斗争过程中表明农民能够而且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推翻资本政权事业中的领导作用。

党在这个时期已经远不像前一个时期那样软弱了；作为动力来说，党已经成了极重要的因素。现在它已不会再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力量了，它的生存和发展确实有了保证，现在它由独立自在的力量变成争取工农群众的工具，变成了领导群众进行推翻资本政权斗争的工具。

党的战略在这个时期有了广大的活动范围；它首先是用来保证和利用农民这种后备力量，而且这个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党的策略也有了广大的活动范围，因为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活动增添了过去所没有的新形式。

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把千百万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方面来，争取到党方面来，以便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党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党本身，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列宁同志是这样表述这个任务的：要在社会战线上“布置千百万群众”，以便保证“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获得◇83◇胜利。（见列宁同志的上述小册子）

我们党的前两个发展时期的特征就是这样。

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很大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共同之处。无论在第一个时期或在第二个时期，党十分之九是甚至完全是**一国的**力量，只对俄国或在俄国内部起作用（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一）。这是第一。第二、无论在第一个时期或在第二个时期，俄国共产党都是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和革命的党，因此在这两个时期内党的主要工作是批评和破坏旧制度。

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三个时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第三个时期——这是**夺取和保持政权**的时期。其目的一方面是吸引俄国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和红军的**建设**，另一方面是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帮助**国际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的斗争。它包括一九一七年十月到目前这段时期。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论在国际方面或在俄国内部，都形成了一种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完全特殊的局面。

首先，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社会战线的突破，并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中造成了一个转变。请想一想从落后的殖民地到先进的美国这条广阔的社会战线，后来国际无产阶级的俄国部队强有力地突破了这条战线，这一突破威胁了帝国主义的生存，打乱了帝国主义鲨鱼的一切如意算盘，并且促进了，从根本上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历◇84◇史意义。从那时起，我们党就从**一国的**力量变成了主要是**国际的**力量，而俄国无产阶级也就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落后部队变成了它的**先锋队**。从此以后，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扩大俄国这个缺口，帮助走在前面的先锋队，不让敌人包围这个勇敢的先锋队和使它离开基地。相反地，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要堵塞，一定要堵塞俄国这个缺口。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要想保持政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斯大林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34〕）。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从一国的力量变成了国际的力量，变成了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变革的党。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党在**国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两个时期，党是破坏旧制度和推翻俄国资本的杠杆。而现在，在第三个时期则相反，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从前党吸收优秀工人是为了冲击旧制度，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做好粮食、运输和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作。从前党吸引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是为了打倒地主，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改善农业，巩固劳动农民和执政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前党吸收各落后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是为了同资本作斗争，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根据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合作的原则来安排这些民族中劳动者的生活。从前党摧毁军队，摧毁旧的将军的军队，现在党必须建立为保卫革命成果免受外敌侵犯所必需的新的工农军队。

俄国共产党从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从事和平建设的党。正因为如此，党在无产阶级◇85◇武库中取消了现在俄国已经不需要的罢工、起义等斗争形式。

从前，没有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行家也过得去，因为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而批评是容易的……现在党不能没有各方面的行家了；党除了利用旧专家以外，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行家，如编制工作人员、供应工作人员、作战参谋人员（军事方面的）、粮食工作人员、农业工作人员、铁路工作人员、合作社工作人员、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行家（经济方面的）。不这样做就不能进行建设。

从党的人力物力和党的后备力量大大扩大和增多的意义上来说，党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

党的后备力量是：

（一）俄国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

（二）周围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有时酿成军事冲突的矛盾和纠纷。

（三）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运动。

（四）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

（五）俄国的农民和红军。

（六）外交机关和对外贸易机关。

（七）国家政权的全部威力。

一般说来，就是这样一些力量和可能性，党的战略可以在这些力量和可能性的范围（这些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内灵活运用，党的策略也可以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日常的动员力量的工作。◇86◇

这一切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积极的方面。

但是，十月革命也有它的阴暗的方面。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国内外特殊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这些条件给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的全部工作打上了烙印。

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能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是缓慢而痛苦的，但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某些性情急躁的同志忍耐不住了，要求迅速取得成绩和采取有效措施，但是必然性依然是必然性。

从经济方面来说，目前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纠纷和军事冲突，正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样，它的根源是目前的生产力同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本国帝国主义的框子以及同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框子和资本主义的形式窒息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根◇87◇据先进的（工业的）和落后的（燃料和原料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合作的原则（而不是根据前者掠夺后者的原则）来组织世界经济。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否则休想组织和正常地发展世界经济。但是要开始（至少是**开始**）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无产阶级至少必须在几个先进国家获得胜利。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党就必须寻求同各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迂回道路。

正因为如此，在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举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以后，只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

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的党的政策还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党就认为实行“放纵”我国的小生产和小工业的政策，实行在国家政权控制下容许资本主义局部恢复和吸引租赁者和股东等等政策是适宜的。

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一些积极的和阴暗的特殊条件，我们党在第三个时期就是在这些条件下活动和发展的。

我们党目前在俄国国内或国外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威力就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党所面临的而且无论如何应当加以克服的那些意料不到的困难和危险，也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

这个时期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由我们这个国际革命的党的地位决定的。这些任务就是：

（一）利用包围我国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和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一切矛盾和纠纷来瓦解帝国主义。

（二）不惜人力和物力帮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88◇

（三）采取一切办法加强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

（四）巩固红军。

这个时期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由我们这个从事和平建设工作的党在俄国内部的地位决定的。这些任务就是：

（一）巩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其方法是：

（甲）吸引农民中最主动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参加国家建设工作；

（乙）在推广农业知识和修理机器等等方面帮助农民经济；

（丙）发展城乡间正常的物资交流；

（丁）使农业逐步电气化。

应当记住一个重要的情况。与西方的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不同，我国革命的一个可庆幸的特点和我们党的巨大的优点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广大最有力的阶层——农民在俄国已经从资产阶级可能的后备力量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后备力量。这种情况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这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情况不

同，俄国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摆脱地主的奴役而获得解放的。在这个基础上也就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共产党员的责任是要珍视和巩固这个联盟。

（二）发展工业，其方法是：◇89◇

（甲）集中最大限度的力量掌握各基本工业部门和改善这些部门的工人的供应工作；

（乙）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

（丙）吸引股东和租赁者；

（丁）储存即使是最少数量的机动粮；

（戊）使运输业和大工业电气化。

一般说来，党在其目前发展时期的任务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九〇号
署名：约·斯大林◇90◇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的力量之一，就在于它和西方的历次革命不同，它把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把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人数最多的阶层——农民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就陷于孤立，失去了军队，而俄国无产阶级就变成了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不这样，俄国工人就保持不住政权。

和平、土地革命和民族自由——这就是使幅员广阔的俄国的二十多个民族的农民集合在俄国无产阶级红旗周围的三个基本要素。

头两个要素在这里没有必要谈了，因为在书刊上已经谈得够多了，而且不谈也是很清楚的。至于第三个要素，即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看来，它的重要性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因此,不妨简单地谈谈。

首先，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除外）的一亿四千万人口中，大俄罗斯人不超过七千五百万，其余的六千五百万人都是非大俄罗斯民族。

其次，这些民族主要是居住在边疆地区，即军事上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这些边疆地区富产原◇91◇料、燃料和粮食。

此外，这些边疆地区在工业方面和军事方面没有俄国中部发达（或者完全不发达），因此，没有俄国中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帮助，它们就无力捍卫自己的独立生存，正像俄国中部没有边疆地区在燃料、原料和粮食方面的帮助就不能保持自己军事和经济的威力一样。

这些情况加上共产主义民族纲领的某些原理，就决定了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的性质。

这个政策的实质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表述：放弃对非俄罗斯民族

居住地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权利”；承认（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这些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使这些民族同俄国中部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建立自愿的联盟，帮助落后民族发展文化和经济，否则所谓“民族权利平等”就会变成空谈；这一切都是以农民的彻底解放和把全部政权集中在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劳动者手中为基础的，——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就是如此。

不用说，如果执掌政权的俄罗斯工人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行这种民族政策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如果他们不打消俄国帝国主义者对蒙古和中国某些地区的野心，如果他们不帮助旧俄帝国的落后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发展文化和国家制度，那末他们就不会取得本国的其他民族的同志，首先是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被压迫群众对自己的同情和信任。

只有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联盟才能◇92◇产生，这种联盟是各式各样的“外交”诡计和处心积虑地实行的“封锁”所无力反对的。

不仅如此，俄罗斯工人如果没有旧俄边疆地区的被压迫群众对自己的这种同情和信任，就不能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不应当忘记，这些叛乱将军的活动地区只限于那些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的边疆地区，由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实行帝国主义的和俄罗斯化的政策，这些边疆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不能不憎恨他们。协约国干预这件事并支持这些将军时所能依靠的只是边疆地区的俄罗斯化分子。这样，协约国只能挑起边疆地区居民对叛乱将军的憎恨并加深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

这种情况决定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后方的软弱性，也决定了他们前线的软弱性，归根到底也就是决定了他们的失败。

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并不只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事实上，这种效果也在各邻国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系上间接地表现出来了。过去把俄国看做妖魔鬼怪的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同俄国的关系的根本改善，就是一件连克逊爵士那样勇敢的政治家也不敢反驳的事实。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四年以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没有一贯实行上述的民族政策，那末上面所说的各个邻国同俄国关系的根本改变就是不可能的。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所获得的结果就是如此。正是在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四◇93◇周年的时候，当沉重的战争已经结束，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为了一眼看清过去而不由自主地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这些结果就看得特别清楚了。

载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一号
署名：约·斯大林◇94◇

前　途

国际局势在俄国生活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俄国也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同邻近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首先因为俄国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它对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威胁”，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它受到敌对的资产阶级国家阵营的包围。因此很明显，这个阵营的状况，这个阵营内部斗争力量的对比，对于俄国就不能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下面这一事实应该认为是表明国际局势特征的主要因素：公开战争时期已经被“和平”斗争时期代替了；作为资产阶级反革命首领的协约国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进部队的俄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相互承认对方的斗争力量，并已实行停战。斗争表明，我们（工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消灭帝国主义。但是斗争也表明，他们（资产者）**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扼杀苏维埃俄国。

由于这种情况，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害怕”或“恐惧”（如他们在红军进攻华沙时所表现的）已经烟消云散。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人几乎每次得到苏维埃俄国的消息都要表现出的那种无限的热情，也在消失了。

冷静估计力量的时期到来了，为准备和积蓄力量迎接未来战斗而进行细致工作的时期到来了。◇95◇

这并不是说，还在一九二一年初就已形成的某种力量均势仍然毫无变动。情形远不是这样。

世界资产阶级由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遭到革命的打击，现在他们恢复过来、苏醒过来以后，就从防御转为向“他们自己的”工人进

攻，巧妙地利用工业危机，把工人抛到更坏的生活条件下（工资的降低，工作日的延长，大批群众的失业）。这种进攻所造成的后果在德国格外惨重，那里（除了其他一切原因）马克的大大贬值使工人的状况更加恶化。

因此，在工人阶级中间就产生了为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和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是在德国），这个运动要求工人阶级中一切或多或少带有革命性的派别（从“温和的”到“极端的”）达成协议和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没有理由怀疑，在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将站在最前列，因为这个斗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进一步瓦解，使现在的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但是，问题决不限于资产阶级向“他们自己的”工人进攻。资产阶级知道，不制服俄国，就不能击溃“自己的”工人。因此，资产阶级不断地加紧工作，准备向俄国发动比过去一切进攻更复杂更严重的新进攻。

当然，他们现在正同俄国而且将来还会同俄国签订贸易协定和其他协定，这对俄国来说是有极大意义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贸易的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和团体源源来到俄国，一方面同俄国做生意并帮助俄国，另一方面也是世界资产阶级最好的情报员，因此，现在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俄◇96◇国，对它的强弱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知道得清楚，这种情况在一旦发生新的武装干涉时就有非常严重的危险。

当然，东方问题上的某些摩擦可以归结为一种“误会”。但是不应当忘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黄金和其他“财富”源源流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远东，是为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建立一个经济的（不仅是经济的）包围圈。未必用得着证明，所谓华盛顿“和平”会议〔35〕是不会答应给我们什么真正的和平的。

当然，我们和波兰、罗马尼亚及芬兰的关系是“最友善的”。但

是不应当忘记，这些国家，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正在依靠协约国加紧扩军备战（不是对付俄国又是对付谁呢？），它们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帝国主义最亲近的后备军，正是它们不久以前还派遣萨文柯夫分子和佩特留拉分子的白卫军到俄国境内来（是为了侦察吗？）。

非常明显，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都是准备向俄国发动新进攻的全部工作中的个别环节。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配合，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联合——这就是这次进攻最可能采取的形式。

我们能否使这次进攻不能发动，或者在进攻终于发动时把它变成对付世界资产阶级的致命武器，这取决于后方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警惕性，取决于我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工作成就和红军的坚强性。

一般说来，外部状况就是如此。◇97◇

苏维埃俄国的内部状况同样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独特的”。这种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为巩固工农联盟以发展工业、农业和运输业而奋斗；也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说明：在经济破坏的情况下为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目前在西方有这样一种理论：只有在工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是工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工人才能取得和保持政权。考茨基之流的先生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否定无产阶级占少数的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的。这种理论默默地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不会支持工人夺取政权的斗争，农民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假设的历史根据是：西方（法国、德国）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危急关头**通常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法国，一九一八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一）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无

产阶级只是革命的担负者），那里的农民可以说是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土地，获得摆脱封建奴役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那时就已得到保障。

（二）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次尝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农民中分化出了在农村中很有势力的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它已经成了连接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的桥梁，因而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98◇

上述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俄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一、和西方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对资产阶级展开激战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激战过程中农民团结在自己的领袖无产阶级的周围。

第二、同样和西方相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了）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半个世纪开始的，而是紧接着它经过短短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开始的。当然，在这期间农民就不可能分化出强大而有组织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被推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了。

后一种情况更加巩固了工农联盟。

正因为如此，俄国工人虽然占俄国人口的少数，却做了国家的主人，争得了绝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农民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并且保持住了政权，而和一切理论截然相反，资产阶级却陷于孤立，失去了农民这个后备军。

由此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上面所说的无产阶级人数“必须占多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被考茨基之流的先生们解释得太简单太庸俗了。

（二）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在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劳

动农民的实际联盟是俄国苏维埃◇99◇政权的**基础**。

（三）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要保持和巩固这个实际联盟。

目前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联盟的形式并不总是相同的。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主要是实行**军事政治**联盟，就是说把地主赶出俄国，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当地主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而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对地主作战以捍卫革命成果，因此农民供给工人粮食，并且为军队提供人力。这是一种联盟形式。

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土地不会再有危险的时候，旧的联盟形式就不够了。需要有另一种联盟形式。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农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证农民有自由支配这块土地上的产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必然会使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使农业日趋衰落，使运输业和工业瘫痪（由于缺乏粮食），使军队瓦解（由于缺乏粮食），而这一切就必然导致工农实际联盟的破裂。未必用得着证明，国家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储备是复兴工业和保存苏维埃国家的动力之动力。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二一年春天）就是一次警告，这次叛乱表明旧的联盟形式已经过时，必须采取既能保证工人的经济利益又能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的新的**经济**联盟形式。

这就是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钥匙。

废除余粮收集制和消除其他诸如此类的障碍是新道路上的第一个步骤，这一步骤解开了小生产者的手，有力地推动了粮食、原料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注意到俄国目前掀起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100◇的热潮也和内战后的美国北部一样，那就不难理解这一步骤的巨大意义了。毫无疑问，这一步骤既然解除了对小生产者生产能力的束缚，并保证他们得到一定的利益，那就使他们处于不得不帮助苏维埃国家的境地，如果注意到运输业和工业已由国家控制的话。

但是提高粮食和原料的产量还不够。还必须收集和收购必要数量的为支持运输业、工业、军队等等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所以，如果

撇开单纯代替余粮收集制的粮食税不谈，那末第二个步骤就应当认为是把粮食和原料的收购工作交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办理。诚然，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地方机关不守纪律，不能适应商品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商品交换的实物形式不适宜和商品交换的货币形式迅速发展以及缺乏货币资金等等，使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这个大量收购粮食和原料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机关的作用将日益扩大，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怀疑的。只是国家必须——

（甲）使它成为国内贸易业务（非国营的）拨款的中心；

（乙）使它在财政上控制其他各种对国家还怀有敌对情绪的合作社；

（丙）用某种形式为它开辟一条进行对外贸易的途径。

第三个步骤应当认为是开办国家银行这一调节国内货币流通的机关，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货币流通的加速一定会产生下面两个主要后果：

（一）使贸易业务（私营的和国营的）和生产业务（各种费率及其他）完全以卢布的涨落为转移；◇101◇

（二）使俄国的国民经济从封锁时期的那种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变成同外界通商的即以卢布汇率的偶然涨落为转移的交换经济。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不整顿货币流通和提高卢布的汇率，我们国内外的经济业务就会陷于瘫痪。国家银行是货币流通的调节器，它不但能成为债权人，而且能成为汲取大量私人储蓄的抽水机，依靠这些储金不发行新币也可以周转，——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虽然这个国家银行有远大的前途，但在目前还是“未来的音乐”。

提高卢布汇率的第二个办法应该是扩大我们的输出和缩小我们的极大的贸易逆差。必须考虑到，吸引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来进行对外贸易只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帮助。

其次，我们需要借外债，因为这不仅是支付手段，而且是扩大俄国对外信贷的要素，也是提高我们卢布信用的要素。

再次，索柯里尼柯夫不久前在“真理报”上谈到的合营的贸易转运公司和其他公司无疑也能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里应当指出，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谈得很多的关于推广工业租让制和发展我国原料同外国机器和装备的正常交换的问题，虽然都是货币经济发展的要素，其本身却完全取决于预先提高我们卢布的汇率。

最后，第四个步骤应当认为是在我们企业中改行经济核算制，关闭和出租不盈利的小企业，挑选最富有生命力的大企业，大力精简我们过分臃肿的机关的人员，编制稳定的国家预算（物资的和货币◇102◇的）。这一切做到以后就能铲除企业和机关中的依赖供给的思想，使工人和职员普遍振作起来，并改善和强化他们的劳动。

一般说来，这就是我们已经采取的和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

不用说，我们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正如预料的那样，犯了很多错误，歪曲了它们的实质。然而有一点可以认为已经证实，就是这些措施开辟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就能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不怕外部的威胁和俄国内部的饥荒，推进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发展农业和工业，巩固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的经济联盟。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如耕地面积开始扩大，各企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情绪好转（制止了大规模的土匪骚动），都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结论。

载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八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103◇

给“真 理 报”

“真理报”是在有名的“连纳事件”时期在革命高涨的浪潮中诞生的。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恰恰在这种日子里出版，这就标志着：

（一）斯托雷平“平静”以后的国内普遍疲惫时期已告结束；

（二）俄国工人阶级猛然觉醒，走向新的革命即一九〇五年以后的第二次革命；

（三）把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的开端。

一九一二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
“真理报”第九十八号◇104◇

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

一　连纳事件

连纳事件是斯托雷平“平静”制度的产物。年轻的党员当然没有尝过也不记得这个制度的滋味。至于老年人，那他们一定还记得那些可诅咒的往事：讨伐队，对工人组织的野蛮袭击，农民的横遭鞭打以及这一切暴行的掩盖物——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在警察、地主和资本家的狐群狗党到处横行下，社会舆论受到束缚，工人普遍厌倦、冷淡、穷困、失望，农民受尽折磨，胆颤心惊——这就是斯托雷平“平静”的特征。

在表面观察问题的人看来，似乎革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普鲁士式的俄国“立宪”发展时期到来了。取消派——孟什维克公开叫喊这一点，鼓吹有必要组织合法的斯托雷平工党。某些老“布尔什维克”衷心同情这种鼓吹，提早离开了我们党的队伍。鞭子和黑暗势力大获全胜。“被蹂躏的圣地”——这就是当时俄国政治生活的特征。

连纳事件像一阵狂风扫过了这个“被蹂躏的圣地”，给人们揭开了一片新的景象。原来斯托雷平◇105◇制度并不那么巩固，杜马引起了群众的厌恶，而工人阶级已经积蓄了相当的力量，足以投入战斗，掀起新的革命。仅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一个荒僻的地方（连纳河畔的波戴勃城）发生了一桩工人被枪杀的事件，就掀起了全俄各地的罢工浪潮，使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走上街头，把那大言不惭的马卡罗夫大臣连同他的厚颜无耻的口号“从前如此，将来还会如此”一举而扫除了。这是即将到来的大运动的先声。“明星报”〔36〕当时做得对，它

喊道：“我们活着！未用尽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鲜血沸腾……”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来到了。

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就在这个运动的浪潮里诞生了。

二 “真理报”的创办

一九一二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当时我是一个不合法的人，在“不可侵犯的”波列塔也夫的寓所里“避难”）在一起商妥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真理报”的两位经常撰稿人杰米杨·别德内依和达尼洛夫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记不清了。

由于“明星报”的鼓动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以及工厂里大批工人为“真理报”自愿捐款，创办该报的技术前提和物质前提已经具备。“真理报”的确是俄国工人阶级首先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努力◇106◇的成果。没有这种努力，它就无法存在。

“真理报”的面貌很清楚：“真理报”负有向群众广泛宣传“明星报”的编辑方针的使命。“真理报”的创刊号写道：“谁经常阅读‘明星报’并且知道它的撰稿人（也是“真理报”的撰稿人），谁就不难了解‘真理报’的工作方针。”〔37〕“明星报”和“真理报”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真理报”的对象和“明星报”不同，“真理报”的对象不是先进工人而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真理报”应当帮助先进工人把俄国工人阶级中那些已经觉醒过来参加新斗争但在政治上还落后的广大阶层团结在党的旗帜的周围。正因为如此，当时“真理报”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培养工人出身的作家，并吸引他们参加报纸的领导工作。

“真理报”的创刊号这样写道：“我们还希望工人不要仅限于同

情，而要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办报工作。工人们不要说写作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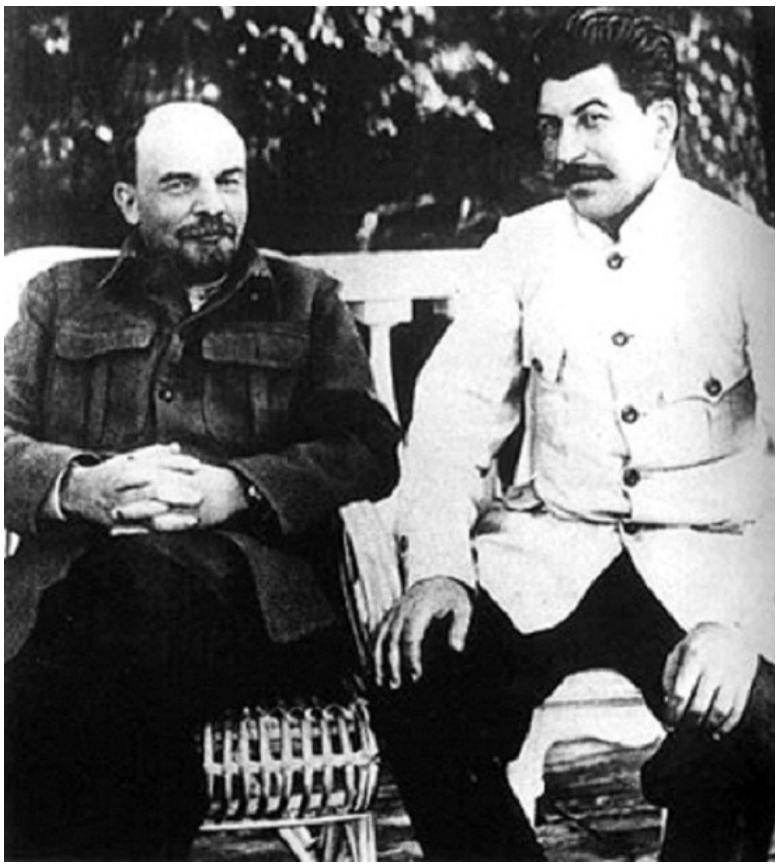
三 “真理报”的组织作用

“真理报”是在我们党的这样一个发展时期问世的，当时地下组织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107◇（孟什维克逃跑了），而合法的组织形式（杜马党团、报刊、疾病互助会、保险会以及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回。这是布尔什维克为把取消派（孟什维克）从工人阶级的合法形式的组织中驱逐出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把孟什维克“撤职”的口号是当时工人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真理报”刊载了很多关于驱逐一度盘踞在保险组织、疾病互助会和工会组织内的取消派的消息。工人选民团的六个代表席位都从孟什维克手中夺过来了。孟什维克的报刊也处于同样绝望或几乎同样绝望的境地。这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为维护党而进行的一场真正英勇的斗争，因为沙皇政府的爪牙并没有打瞌睡，他们在迫害和消灭布尔什维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党如果没有合法的掩蔽物就不能继续发展。此外，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如果不争得合法组织，党就不能接触广大群众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党就会脱离群众，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集团。

“真理报”在维护党性、争取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斗争中是个领导中心。它不仅仅是总结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合法工人组织方面的成就的报纸，也是把这些组织团结在党的地下根据地周围并把工人运动引向一定目标的组织中心。列宁同志在“做什么？”（一九〇二年）中就写道：一个办得很好的全俄的战斗报纸，不仅应当成为集体

的鼓动者，还应当成为集体的组织者。“真理报”在为保持地下组织和争取合法工人组织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时期正是变成了这样的报纸。不战胜取消派，我们就不会有因团结而强大，因忠于无产阶级而不可战胜的党，就不会有组织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党，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末另一种说法，即老“真理报”的顽强而忘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108◇上准备和加速了对取消派的胜利，也同样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真理报”无疑是俄国无产阶级未来光荣胜利的先驱者。

载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
“真理报”第九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109◇



列宁和斯大林在哥尔克村

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演说时的列宁

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

我觉得不应当在现在来写“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的文章，因为休养日期即将结束，列宁同志很快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此外，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丰富和宝贵，如果按照“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要求，把这些印象写成一篇短文，那是不十分恰当的。可是我必须写，因为编辑部坚持这样做。

我在战线上遇到过一些老战士，他们往往连续打仗，“一连”几昼夜，不休息，不睡觉，然后像鬼似的从战地跑回来，像割下的麦杆倒在地上，一睡就是“接连十八小时”，起来后精神焕发，又想去打仗，不打仗，他们就“不能活”。七月间，当我和列宁同志别离一个半月以后第一次会面时，他留给我的正是这种连续打仗后疲劳万分，休息后精神焕发的老战士的印象。虽然精神已经恢复，但是还看得出疲劳过度的痕迹。

列宁同志讽刺地说道：“我不能看报，不能谈政治，我竭力躲避桌上的每一片纸，因为我怕它是报纸，怕因此违反纪律。”

我哈哈大笑起来，极力称赞列宁同志的纪律性。同时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110◇

列宁同志那种如饥如渴地打听各种问题的精神，急于要做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热情，简直使我惊讶。显然他已经渴望好久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39〕，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40〕，今年年景，工业和财政状况，——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一提出来了。他并不急于表示意见，埋怨自己已落后于事变；他主要是打听情况，把情况记在心里。他听

说年景很好，就非常高兴。

一个月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一次，列宁同志周围堆满了书报（医生已准许他看报，也不限制他谈政治了）。不再有疲劳过度的痕迹了。急于要做工作的神经质的热情也没有迹象了，——饥渴已经过去了。他完全恢复了镇静和自信。我们的列老眯着眼锐敏地瞅着同他谈话的人……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谈话也更为生动了。

国内情况……收成……工业状况……卢布汇率……预算……

“情况是困难的。但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丰收会使情况根本改善。有了丰收，工业和财政状况一定会好转。现在问题是使国家免除不必要的开支，精简我们的机关和企业，改善它们的质量。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特别坚决果断，这样我们就能冲出窘境，并且一定能冲出窘境。”

外部状况……协约国……法国的行为……英国和德国……美国的作用……

“它们都贪得无厌，彼此深恶痛绝。它们会打架的。我们不必急。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主张和平和协议，但我们反对奴役和带奴役性条件的协议。必须紧紧地掌着舵，走我们自己的路，决不◇111◇要上别人阿谀奉承或恫吓讹诈的当。”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进行疯狂的煽动反对苏维埃俄国……

“是的，他们一心要诽谤苏维埃俄国。他们帮助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他们已跌入资本主义泥潭，滚到深渊里去了。让他们去打滚吧。在工人阶级看来，他们早就死去了。”

白匪报刊……亡命徒……他们详细描写列宁逝世的无稽的神话……

列宁同志微笑着说：“让他们造谣和自己安息自己去吧，用不着

夺走垂死者的最后一点安慰。”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二一五号标题为
“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的书刊专号
署名：约·斯大林◇112◇

致彼得格勒，致代表苏维埃的贺电

值此无产阶级专政诞生五周年之际，谨向这个专政的摇篮红色彼得格勒致敬。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彼得格勒真理报”
第二五一号◇113◇

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斯大林同志对本报记者提出的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些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41〕。

各独立共和国联合的运动是由谁发起的？

运动是由各共和国自己发起的。大约在三个月以前，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领导集团就提出了关于建立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的经济战线和把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问题。当时在阿捷尔拜疆、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的一些地区把这个问题提交党员群众广泛地进行了讨论，从有关的决议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激起了空前未有的热情。几乎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提出了联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那里的广大党员群众中间，也和南高加索一样，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应。

这些情况无疑说明这个运动富有生命力，也说明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确实已经成熟了。

这个运动是怎样引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帮助农民经济，发展工业，改进交通联络工具，财政问题，关于租让制◇114◇和其他经济协定的问题，作为商品买卖者在国外市场上一致行动，——这就是产生成立共和国联盟的运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内战使我们各共和国内部的经济资源枯竭，另一方面没有较多的外资流入，这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中没有一个能够靠本身的力量来恢复自己的经济。现在，当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认真着手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当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次感到单靠各个共和国孤军作战十分不够而完全

有必要联合行动并在经济方面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感到这种联合是真正恢复工业和农业的唯一途径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特别显著了。

但是要把各个共和国的经济活动真正联合起来，直到把它们联合成统一的经济联盟，就必须建立一些能够沿着一条确定的道路指导这些共和国的经济生活的相当的常设联盟机关。正因为如此，这些共和国之间原有的经济协定和贸易协定现在就显得不够了。正因为如此，建立共和国联盟的运动的发展超过了这些协定并提出了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

你认为这种联合趋向是一种崭新的现象，还是有它的历史？

各独立共和国的联合运动并不是一种什么突如其来的和“空前未有的”新现象。它有自己的历史。这个联合运动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现在它已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也就是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当时致命的危险威胁着各共和国的生存，当时这些共和国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在军事方面联合起来。这个阶段是以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联合、军事联盟而告结束的。◇115◇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二一年底到一九二二年初，也就是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时期，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武装干涉的力量丧失了信心，试图不用军事方式而用外交方式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内恢复资本主义所有制，当时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的外交战线是抵挡西方列强攻击必不可少的手段。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八个友好的独立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热那亚会议开幕前签订的著名协定〔42〕，这个协定不是别的，正是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联合。第二个阶段即我们各共和国的外交联盟阶段就是这样结束的。

现在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运动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经济联合阶段。不难理解，第三个阶段是联合运动的前两个阶段发展的结果。

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各共和国联合的结果，和远东共和国

一样，必定是同俄罗斯合并，同俄罗斯融合？

不，不是这个意思！远东共和国〔43〕和上述各民族共和国之间有原则的差别：

（甲）前者完全不是按照民族特征，而是根据策略上的理由（考虑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可以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帝国主义野心的可靠保障）用人工建立起来的（当作缓冲地带）；后者则相反，它们是各有关民族发展的自然产物，主要是以民族特征为基础的；

（乙）远东共和国可以取消，这丝毫不会触犯该共和国多数居民的民族利益（因为他们同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俄罗斯人），但是取消各民族共和国就是要求取消非俄罗斯民族和使它们俄罗◇116◇斯化的一种反动的荒谬举动，就是反动的唐·吉诃德式的举动，这种举动连黑帮分子叔尔根这样的俄罗斯沙文主义黑暗势力派也会反对的。

正因为如此，在远东共和国确信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不适于作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保障以后，它就能自行消亡，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像乌拉尔或西伯利亚那样的不设立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区；而民族共和国是完全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的，只要产生它们的各民族还存在，只要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取消，就不能没有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基础。这就说明为什么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结果，不可能是它们同俄罗斯合并，同俄罗斯融合。

在你看来，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的联盟的性质和形式是怎样的？

联合的性质应当是自愿的，完全自愿的，每个民族共和国都应当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因此，自愿原则应当作为签订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的基础。

签订联合条约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南高加索联邦〔44〕（也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布哈拉和花剌子模〔45〕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只是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当自然发展还没有使它们变成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前，它们还可能留在这个联合以外。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机关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人民委员会，前者由各加◇117◇盟共和国按它们所代表的人口的比例选出；后者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关，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

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是：制定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和各联邦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领导原则。

联盟人民委员会的职权是：

（甲）直接和统一管理联盟的军事、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邮电各项事务；

（乙）领导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和各联邦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检查等委员部的工作，而这些共和国和联邦的内务、农业、教育、司法、社会救济、人民保健各委员部仍由这些共和国和联邦统一和直接管辖。

在我看来，这就是联合成共和国联盟的一般形式，在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运动进程中所能摸索到的也就是这样的形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除了两个联盟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外，还必须设立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个联盟机关，即所谓各民族都有同等名额的代表参加的上议院。毫无疑问：这种意见是得不到各民族共和国的赞同的，这至少是因为设有上议院的两院制起码是和目前发展阶段上的苏维埃建设不相容的。

在你看来，共和国联盟是否很快就能实现，它的国际意义如何？◇118◇

我认为共和国联盟成立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完全可能，联盟的成立和即将到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第十次代表

大会的召开会在同一个时间。

至于这个联盟的国际意义，那就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了。如果说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联盟在内战时期使我们能够打退我们敌人的军事干涉，它们的外交联盟在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时期有助于我们抵抗协约国的外交进攻，那末毫无疑问，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将创立一种军事的和经济的全面合作形式，这种形式能够根本促进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繁荣，使它们变成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侵犯的堡垒。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六一号◇119◇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46]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前几天，在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南高加索各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些决定，其中陈述了这些共和国有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愿望和必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现在联合起来是适时的。由于这个决定，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便提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来了。

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运动还在三四个月以前就开始了。首先发起的是阿捷尔拜疆共和国、阿尔明尼亚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后来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也响应了。这个运动意味着，旧的条约关系，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协定关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显得不够了。这个运动意味着，旧的条约关系必然要过渡到更紧密的联合关系，即过渡到以建立设有相当的联盟执行机关和联盟立法机关（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人民委员会）的统一的联盟国家为前提的关系。简单地说：从前在协定关系范围内暂时解决了的◇120◇东西，现在要在运动进程中使它成为一种固定的东西。

推动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原因是什么呢？确定必须联合起来的情况有哪些呢？

确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情况有三类。

第一类情况是有关我国内部经济状况的一些事实。

第一、由于进行了七年的战争，我们各共和国现有的经济资源极为贫乏，这就迫使我们把这些贫乏的资财集中起来，更合理地使用它们，用它们来发展各共和国苏维埃政权的脊椎骨——各主要经济部门。

第二、在我们联邦的各个不同地区和共和国之间，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分工，即经济的分工。例如，北方供给南方和东方布匹；南方和东方供给北方棉花、燃料等等。各区域之间所确立的这种分工是不能一笔勾销的，因为它是联邦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同时，在各共和国独立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分工使各个地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它要求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三、全联邦的基本交通工具必须统一起来，因为交通工具是各种可能联合的神经和基础。不言而喻，交通工具决不能由各个共和国单独支配和只服从于各共和国的利益，因为这样会把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运输变成不能按计划使用的许多单独部分。这种情况也要求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国家。◇121◇

最后是我们财力的拮据。同志们，应当坦率地说，在目前，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六年，我们在财政方面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比在旧制度时小得多了。例如，旧制度每年有五亿卢布的烧酒税，而我们没有；旧制度能借到数亿卢布的外债，我们却不能。这一切说明，在我国财政发展的可能性如此小的情况下，如果各个共和国的力量不团结起来，各个共和国的财政力量不联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各共和国在财政方面当前的基本任务。

推动我们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一类情况就是如此。

确定各共和国联合起来的第二类情况就是同我国外部状况有关的一些事实。我指的是我们的军事状况。我指的是我们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外国资本发生的关系。最后，我指的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关系。同志们，应当记住，虽然我们各共和国都幸运地摆脱了内战状态，但是外敌入侵的危险还远没有消除。这种危险要求我们

的军事战线必须绝对统一，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统一，特别是在现在，在我们已经走上真正在物质上裁减军备（当然不是在精神上解除武装）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把军队裁减到六十万，那就特别需要有一个能够保证各共和国外部安全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军事战线。

其次，除了军事性质的危险以外，还有使我们的联邦在经济上陷于孤立的危险。你们知道，在热那亚会议、海牙会议以及同乌尔卡尔特谈判〔47〕以后，对我们共和国实行经济抵制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满足我国经济需要的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形却看不到了。使我们各共和国在经济上陷于孤立的危险◇122◇还是存在的。这种新的干涉形式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军事干涉，要消除这种危险，只有建立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经济战线来对付资本主义包围。

最后是我们的外交状况。你们都亲眼看到，不久以前，在洛桑会议〔48〕开幕前夕，协约国各国千方百计地力图孤立我们联邦。可是它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对我们联邦的有组织的外交抵制已经被打破了。协约国不得不重视我们联邦，不得不后退，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没有理由指望在外交上孤立我们联邦的诸如此类的事实不会再发生。因此，在外交方面也必须有一条联合战线。

推动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二类情况就是如此。

无论第一类情况或第二类情况，直到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整个时期内，都是起作用的、有效的。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在经济上的需要以及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需要，在过去无疑也是起作用的。然而，只是到现在，在内战结束以后，当各共和国第一次有了着手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经济资源极为贫乏，看到无论在内部经济方面或在对外方面都完全有联合的必要时，这些情况才具有特殊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目前，在苏维

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六年，各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后，第三类事实也要求联合，这类事实是同苏维埃政权结构的性质和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相联系的。苏维埃政权按其本质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用各种方法在群众中培植联合的思想，因此它本身就推动群众走联合的道路。如果说资本、私有制和剥削把人们分开，把人们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阵◇123◇营（在这方面，大不列颠、法国，甚至像波兰、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小国都可以做例子，这些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腐蚀着它们的基础本身），如果说在那里，在资本主义民主占统治的以私有制为国家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本身就在制造民族纠纷、冲突和斗争，那末在这里，在政权不是建筑在资本上而是建筑在劳动上，不是建筑在私有制上而是建筑在集体所有制上，不是建筑在人剥削人上而是建筑在同这种剥削作斗争上的苏维埃世界里，则恰恰相反，政权的性质本身在促使劳动群众自然而然地力求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在那里，在西方，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多民族国家的日渐衰落和瓦解成几个组成部分（如大不列颠，我不知道它将怎样处理印度、埃及、爱尔兰；又如波兰，我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处理本国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在这里，在我们这个联合了不少于三十个民族的联邦内，则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国家联系日益加强，各独立民族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独立国家。这种情况难道没有重大意义吗？这就是国家联合的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类型，是促使国家崩溃的类型，第二种是苏维埃类型，和第一种相反，它是使早先独立的民族逐渐而巩固地结成独立国家的类型。

推动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三类事实就是如此。

各共和国联合的形式应当怎样呢？联合的原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收到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决议中已经扼要地规定出来了。◇124◇

联合起来的有四个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南高加索共和国（也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花剌子模和布哈拉这两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人民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所以暂时还留在这个联合以外，只是而且完全是因为它们还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志们，我不怀疑，希望你们也不要怀疑，这两个共和国随着它们内部向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也一定会加入现在成立的联盟国家。

有人以为，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加入共和国联盟，而是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的各共和国分别加入共和国联盟，也许会更恰当些，显然，这就事先要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才行。我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合理的，不恰当的，并且是运动进程本身所排斥的。第一、它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各共和国的联合过程以外，还会有使已建立的联邦分离的过程，就是说，还会有和各共和国已经开始的革命的联合过程完全相反的过程。第二、如果我们走这条不正确的道路，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除了八个自治共和国以外，我们还必须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分出特殊的俄罗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人民委员会，这就会造成组织上的大变动，这种变动在目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和有害的；无论内部状况或外部状况都丝毫没有要求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联盟的主体应该是下面四个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起草联合条约的原则应当是这样的：对外贸易、陆海军、外交、交通、邮电各人民委员部只设立◇125◇在联盟人民委员会内。财政、经

济、粮食、劳动、检查各人民委员部设立在各缔约共和国内，但必须按照联盟中央的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办事。为了使各共和国的劳动群众在粮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或劳动方面的力量在联盟中央领导下联合起来，这样做是必要的。最后，内务、司法、教育、农业等其余一些人民委员部（总共有六个）因为同各共和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土地规划的特殊形式、法院组织的特殊形式以及语言和文化有直接关系，应当成为独立的人民委员部，受各缔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保证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各族人民有民族发展自由的实际条件。

在我看来，这些原则都应当成为我们各共和国之间最近就要签订的条约的基础。

根据这一点，我提出一个已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决议草案：

一、认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时的。

二、联合建立在各共和国的自愿平等的原则上，每个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共和国联盟的权利。

三、委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会同乌克兰、南高加索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各国代表团起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草案，说明要求各共和国联合成联盟国家的种种情况。◇126◇

四、委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起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共和国联盟的条件，责成该代表团在审查联盟条约时坚持下列各项原则：

（甲）成立相当的联盟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乙）陆海军、交通、外交、对外贸易、邮电各人民委员部必须

合并；

（丙）各缔约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工农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必须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丁）充分保证各缔约共和国内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利益。

五、条约草案在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必须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六、授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批准的联合条件，缔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乌克兰、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

七、条约必须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

这就是我提请你们审查的决议草案。

同志们！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起，世界各国就分裂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我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纠纷、压迫、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沙文主◇127◇义。相反地，在苏维埃阵营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看到的是相互信任、民族权利平等、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几十年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力图把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利益同剥削制度结合在一起来解决民族矛盾。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将来也不会做到。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线团愈搞愈乱了，大有扼杀资本主义之势。只有在这里，在苏维埃世界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才根除了民族压迫，树立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兄弟合作。也只有在苏维埃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才有了可能建成我们的联邦和抵御国内外敌人的进攻。

五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的基础。现在，当我们在这里解决联合的愿望和必要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造一座新的大厦，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劳动人民的联盟国家来完成这一事业。不久以前，我们各共和国的各族人民

都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共和国联盟的决议，他们的这种意志肯定地表明，联合事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是建筑在自愿和民族权利平等的伟大原则上的。同志们，我们希望我们联盟共和国的成立将竖立起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可靠支柱，希望新的联盟国家在把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到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去的道路上，将成为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鼓掌多时，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五号◇128◇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49〕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同志们！今天是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转折点。它在已经过去的旧时期和已经开始的新时期之间竖立了一个路标。在旧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是同时行动，但是是各自为政的，它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新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孤立存在的局面已经结束，它们正在联合成统一的联盟国家，以便顺利地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所考虑的已经不只是生存问题了，而且还有如何发展成一支能够影响和改变国际局势以利于劳动者的严重的国际力量的问题。

五年前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几乎不引人注目的渺小的政权，所有的敌人都讥笑它，很多朋友怜惜它。这是军事破坏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与其说是依靠本身的力量，不如说是依靠敌人的软弱无力，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分裂成两个联盟，一个是奥德联盟，一个是英法联盟，它们彼此间忙于战争，没有可能掉转枪口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是苏维埃政权历史上的军事破坏时期。但在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胜利地摆脱了军事破坏◇129◇时期。

以后就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即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有了成就，因为在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去年国内发生的饥荒。在这个时期，农业大大发展了，轻工业也大大活跃了。我们已经有了优秀的工业领导干部，

他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依靠。但是要战胜经济破坏，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要粉碎和消除经济破坏，还必须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必须把各共和国的一切财政和经济力量投到恢复我们各基本工业部门方面去。因此，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今天就是我们各共和国为了集中力量恢复我们的经济而联合成一个国家的日子。

同军事破坏作斗争的时期使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基础之一——红军。后一个时期，即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时期，将赋予我们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联盟无疑地会推进苏维埃经济的恢复事业。

现在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的政权呢？它是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强国，敌人已经不再讥笑它，而是切齿痛恨它了。

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以来发展的总结就是如此。

但是，同志们，今天不只是做总结的日子，同时也是新俄国战胜旧俄国，战胜作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战胜作为亚洲刽子手的俄国的日子。今天是新俄国高奏凯歌的日子，新俄国扭断了民族压迫的锁◇130◇链，组织了对资本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唤醒了东方各族人民，鼓舞着西方工人，把红旗由党的旗帜变成国家的旗帜，并把各苏维埃共和国各族人民集合在这面旗帜周围，以便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国家，联合成未来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雏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有人常常骂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没有能力从事建设。让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以来的历史作为共产党人也善于从事建设的证据吧。今天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使命是批准昨天全权代表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让这次联盟代表大会向那一切还没有丧失理解力的人们表明：共产党人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同志们，下面是昨天全权代表团会议〔50〕所通过的宣言，我现在来宣读一下。（见附录一①）

下面是在同一次会议所通过的条约原文。我也来宣读一下。（见附录二①）

同志们，我受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团会议的委托，建议你们批准刚才宣读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的原文。

同志们，我建议大家用共产党员所特有的一致精神来通过它们，让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章。（鼓掌）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二九八号◇131◇

——————————————

① 见本卷第261、263页。——本书制作者注

蘇聯憲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各加盟共和国国徽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51〕

本文是以我先后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俱乐部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52〕共产党党团里所做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的演讲为基础写成的。我决定把它发表出来，这不仅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满足勃列斯尼亚区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同志的愿望，而且还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身对于我们党的新一代的工作人员不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声明一下，这篇文章并没有打算要提供什么在实质上比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在党的俄文刊物上几次谈过的更新的东西。本文应该看做对列宁同志的几个基本观点所作的一个简要概括的叙述。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一、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

政治战略也和策略一样，是同工人运动有关的。但工人运动本身又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客观的或自发的因素，另一种是主观的或自觉的因素。客观的即自发的因素，就是不以无产阶级的自觉◇132◇的和调节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过程。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旧政权的瓦解，无产阶级和它周围各阶级的自发运动，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的现象，这是运动的客观方面。战略对于这些过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战略既不能取消它们，也不能改变它们，只能估计到它们并以它们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应当研究的范围。

但是运动还有它的主观的即自觉的方面。运动的主观方面，就是运动的自发过程在工人头脑中的反映，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一定目标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运动。其实，运动的这一方面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就是因为它不同于运动的客观方面，它完全是受战略和策略支配的。如果说战略不能改变运动客观过程中的任何东西，那末在这里，在运动的主观的自觉的方面则相反，战略的运用地盘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即战略，可以加速或延缓运动，也可以把运动导入捷径或引向更艰苦的道路，这是以它本身的完善或欠缺为转移的。

加速或延缓运动，促进或阻碍运动，这就是政治战略和策略运用的领域和范围。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战略本身并不研究运动的客观过程。但是，如果它不愿意在领导运动时犯重大的致命的错误，就必须了解这些过程并正确地估计到这些过程。研究运动的客观过程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133◇次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此，战略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客观过程的发展和消亡时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必然崩溃，无产阶级必然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必然由社会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战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这个基本结论作为自己的工作基础时，才能算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从理论原理出发，确定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并把这些目标科学地表述在纲领的条文中。纲领可以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以推翻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为目的，也可以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例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残余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创立条件的阶段。因此，纲领可以由两个部分即最

高部分和最低部分组成。不言而喻，纲领最低部分的战略和纲领最高部分的战略不能不有所区别；并且，战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表述的运动目标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时，才能算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

三、战　略

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工人阶级运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对敌人进行基本打击，以求达到纲领所提出的目标。战略计划是组织能够最迅速地获得最大效果的决定性打击的计划。

拿军事战略来对比，例如拿内战时期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军事战略来对比，政治战略的主要特点◇134◇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来。大家都记得一九一九年底邓尼金逼近土拉时的情景。当时在军事家中间在究竟应当从何处给邓尼金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有一些军事家建议选择察里津—诺沃罗西斯克一线作为基本打击方向。另一些军事家则相反，他们建议沿沃龙涅什—罗斯托夫一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以便经过这一线把邓尼金军队切成两段，然后再各个击破。毫无疑问，前一计划就其预定要占领诺沃罗西斯克以切断邓尼金军队的退路这一点来说，是有它的长处的。但是，一方面，它是不利的，因为它主张我军沿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地域（顿河区）推进，这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邓尼金军队开辟一条经土拉和谢尔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后一个进行基本打击的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一方面，它主张我军主力部队沿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沃龙涅什省—顿巴斯）推进，这样不必付出特别的牺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扰乱向莫斯科推进的邓尼金军队的主力部队的行动。大多数军事家都赞同后一个计划，因而也就决

定了对邓尼金战争的命运。

换句话说，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

政治战略也是一样。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日俄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方向问题上发生过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党内一部分人（孟什维克）所持的观点是：在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时，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方向应该遵循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135◇阶级联盟的路线，而作为革命极重要因素的农民则被排斥或几乎被排斥于计划之外，让自由资产阶级担任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党内另一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认为应该遵循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路线进行基本打击，无产阶级应当担任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自由资产阶级应当被中立起来。

如果把我国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的整个革命运动当做工农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战争来同我们对邓尼金的战争作对比，那末很明显，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命运主要是决定于采用哪一个（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计划，选择革命运动的哪一个基本方向。

如同在对邓尼金作战时军事战略规定了基本打击方向，从而十分之九决定了直到消灭邓尼金为止的所有各次战役的性质一样，在这里，在同沙皇制度作革命斗争时，我们的政治战略按照布尔什维克计划规定了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从而决定了我们党从日俄战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斗争的整个时期的工作性质。

政治战略的任务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出发，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规定某个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方向。

四、策　略

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它是服从于战略，服务于战略的。策略不是同整个战争有关，而是同战争◇136◇中的个别事件，即同个别战斗和个别战役有关。如果说战略是力求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者比方说，是力求把反沙皇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那末策略则相反，它是力求取得某些战役或某些战斗的胜利，力求胜利地进行某些多少适合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斗争情况的战局或发动。

策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最适合于某一时期具体情况的并能最有把握地准备战略胜利的斗争方法和手段，斗争形式和方式。因此，评价策略的作用和效果不应该从它的本身，从它的直接效果着眼，而应该从战略的任务和可能性着眼。

有时候，策略的胜利可以促进战略任务的执行。例如一九一九年底我军在邓尼金战线上解放奥勒尔和沃龙涅什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由于我们的骑兵在沃龙涅什附近和步兵在奥勒尔附近的胜利而造成了突击罗斯托夫的有利局势。一九一七年八月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由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而造成了有利于以后我党进行十月打击的新的政治局势。

也有这样的时候，策略胜利的直接效果十分辉煌，但是这种胜利和战略的可能性不相适应，因而造成了对整个战局有致命危险的“意外”局势。一九一九年底邓尼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他为迅速地浩浩荡荡地向莫斯科进军的轻易胜利所陶醉，把自己的战线从伏尔加河伸展到德涅泊河，因而准备了自己军队的覆灭。一九二〇年我们同波兰军队作战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我们对波兰民族因素的力量估计不足，为浩浩荡荡进军的轻易胜利所陶醉，担负了经过华沙突入欧洲的力所不及的任◇137◇务，激起了波兰绝大多数居民反对苏维埃军队，

因而造成了使苏维埃军队在明斯克和日托米尔附近的胜利化为乌有的局面，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在西方的威信。

最后，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放弃策略胜利，有意识地承受策略劣势和失败，以便保证以后取得战略优势。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交战的一方为了拯救自己军队的骨干，把他们从敌人优势兵力打击下转移出来，而开始实行有计划的退却，不经过战斗而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以便赢得时间和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新的决战。一九一八年俄国遭受德国进攻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党为了同渴望和平的农民保持联盟，取得喘息时机，建立新军队，从而保证以后获得战略优势，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虽然这个和约从当时的直接政治效果来看是极其不利的。

换句话说，策略不能服从于目前的暂时的利益，不应该从直接的政治效果着眼，更不应该离开地面去建造空中楼阁，——策略应该和战略的任务和可能性相适应。

策略的任务首先是遵循战略的指示并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规定最适合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斗争情况的斗争形式和方式。

五、斗争形式

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它们是随着发展的条件，首先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二十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十九世纪。◇138◇

现今条件下的作战艺术在于掌握战争的一切形式和这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机智地运用它们，善于把它们配合起来，或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及时地运用其中某一种形式。

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也是一样。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比作战形式

更为复杂。它们的改变取决于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取决于各阶级的情况、斗争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以及国际关系等等。在专制制度下的同工人局部罢工和游行示威相联系的秘密斗争形式；在有“合法机会”存在下的公开斗争形式和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国会内的斗争形式（如在杜马时期）和有时转变成武装起义的国会外的群众发动；最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国家斗争形式（这时无产阶级有可能保证自己掌握一切国家手段和力量，以至军队），——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所提出的斗争形式就是这些。

党的任务就是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在战场上把它们机智地配合起来，并且善于运用最适于某一情况的斗争形式来加紧进行斗争。

六、组织形式

军队的组织形式，兵种和军种，通常是和作战形式和方式相适应的。前者随后者改变而改变。在运动战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大量的骑兵。在阵地战中则相反，骑兵或者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次要作用，因为一切决定于重炮和空军，毒气和坦克。◇139◇

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拥有一切兵种，使它们日臻完善，并且善于把它们的行动配合起来。

政治方面的组织形式也是一样。这里也同军事方面一样，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是相适应的。专制制度时代的职业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杜马时期的文化教育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国会组织（杜马党团等）；群众发动和起义时期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联系所有这些组织形式的无产阶级大党；最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形式，——一般说来，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依靠的组织形式就是这些。

党的任务就是掌握这一切组织形式，使它们日臻完善，并且善于在某一特定时期把它们的工作配合起来。

七、口号。指示

表述得当、反映战争或个别战役目的并受部队欢迎的决定，有时在前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决定是鼓舞军队作战、维持士气等等的工具。对战争整个进程来说，适当的命令、口号或告部队书具有和头等重炮或头等快速坦克同样重要的意义。

口号在政治方面的意义更大，因为它是关系到具有各种不同要求和需要的千百万居民的。◇140◇

口号是某一领导集团，例如无产阶级领导集团——无产阶级政党对最近的或遥远的斗争目标所作的简要明确的表述。斗争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包括整个历史时期，有的包括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阶段和事件，口号则随着斗争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劳动解放社”〔53〕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是**宣传**口号，因为它是要把个别的和成批的最坚定不移的战士吸引到党方面来。在日俄战争时期，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已经多少看清了专制制度的不稳固，于是这一口号就成了**鼓动**口号，因为它是要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的时期，沙皇制度在群众心目中已彻底破产，于是“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就由鼓动口号变为**行动**口号，因为它是要发动千百万群众去冲击沙皇政府。二月革命时，这个口号已变成党的**指示**，即变成在一定期限内夺取沙皇政府的某某机关和某某据点的直接号召，因为当时已经是推翻沙皇政府、摧毁沙皇政府的问题了。指示是党在某时某地行动的直接号召，全体党员必须执行；这种号召只要是正确地恰当地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只要它真正成熟了，通常就能够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

把口号和指示，或者把鼓动口号和行动口号混淆起来，同举行过早或过迟的发动一样危险，有时甚至有致命的危险。一九一七年四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鼓动**口号。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堡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的人所共知的包围冬宫的游行示威，是一种想把这一口号变为**行动**口号的尝试〔54〕，是一种过早的因而有致命危险的尝试。这是把鼓动口号和行动口号混淆起来的最危险的典型。党当时斥责了这一游行示威的发起人，党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知道，把这个口◇141◇号变为行动口号所必需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而无产阶级举行过早的发动就会使它的力量瓦解。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党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取消或改变已经采取的和成熟了的口号（或指示），以免自己队伍陷入敌人所布置的圈套，或是暂时把指示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去执行。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彼得格勒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时经过周密准备并预定要在六月九日举行的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就因形势发生了变化，被我党中央“突然”取消了。

党的任务就是巧妙而及时地把鼓动口号变为行动口号，或者把行动口号变为一定的具体指示，或者是在情况需要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和坚决性，及时地停止执行某些即使是受人欢迎的和业已成熟的口号。

二　战略计划

一、历史转变。战略计划

党的战略不是什么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随着历史的转变和历史的变动而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对每一个历史转变都制定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整

个时期内都起作用。战略计划的内容就是规定革命力量的基本打击方向和制定在社会战线上相应地布置千百万群众的计划。自然，适用于一个有它本身特点的历史时期的战略计划，就不能◇142◇适用于另一个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转变都有它所必需的和适合于它的任务的战略计划。

军事方面也是这样。对高尔察克作战的战略计划不能适用于对邓尼金的战争，后者要求制定新的战略计划，而这个新的战略计划又不能适用于别的战争，例如一九二〇年对波兰军队的战争，因为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无论基本打击方向或基本战斗力量的布置计划，都不能不有所区别。

在俄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产生了我党历史上三个不同战略计划的三个主要历史转变。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简短地叙述一下，以便说明党的战略计划一般是如何随着新的历史变动而改变的。

二、第一个历史转变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针

这个转变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即日俄战争时期开始的。当时沙皇军队的失败和俄国工人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激动了居民中的一切阶级，并把它们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这个转变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结束的。

这个时期我们党内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孟什维克的（一九〇五年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九〇五年列宁同志的）计划。

孟什维克的战略主张遵循自由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联合的路线对沙皇政府进行基本打击。这个计划从认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出发，让自由资产阶级担任运动的领导者（领袖），要◇143◇无产阶级充当“极左的反对派”的角色，充当资产阶级的“推动者”

的角色，而作为革命主要力量之一的农民却被排斥或几乎被排斥于视野之外。不难理解，这个计划既然排斥了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的千百万农民，它就是极端的空想；它既然把革命的命运交给自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它就是反动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完全胜利并不关心，它随时都准备勾结沙皇政府结束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见列宁同志的“两个策略”〔55〕）主张遵循无产阶级同农民联合和中立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对沙皇政府进行革命的基本打击。这个计划是从自由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不关心，它宁愿牺牲工人和农民来同沙皇政府勾结起来，不顾革命取得胜利这一点出发，让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担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个计划所以高明，不仅因为它正确地估计了革命的动力，而且因为它本身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萌芽，它天才地预见到俄国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即更高的阶段，并且促进了向这一阶段的过渡。

以后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

三、第二个历史转变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第二个转变是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开始的。当时帝国主义战争割开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脓疮；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在实际上管理国家，不得不限于维持形式上◇144◇的政权（临时政府）；当时工兵代表苏维埃虽握有实际政权，但是没有经验也没有意志来把它加以必要的运用；当时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工人农民都被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担压得精疲力竭；当时“两个政权并存”和“联系委员会”〔56〕的制度被内部矛盾弄得焦头烂额，既无力进行战争，也无力取得和平，不但没有找到“摆脱绝境的出路”，而

且把局势弄得更加混乱了。这个时期是以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结束的。

这个时期苏维埃内部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战略最初是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直到民主会议召开时（一九一七年九月）才最后形成。这个战略所采取的路线是逐渐地然而不断地使苏维埃离开政权，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未来的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型“预备国会”手中。和平和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以及民族问题，都被推到立宪会议召开时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规定自己的战略计划的。这是一个准备资产阶级专政的计划，固然这个专政是打扮和装璜过的，是“完全民主的”，但毕竟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见列宁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发表的“提纲”〔57〕）主张遵循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合力量来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的路线，遵循组织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来进◇145◇行基本打击。同帝国主义决裂并退出战争；解放旧俄帝国的各被压迫民族；剥夺地主和资本家；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准备条件，——这就是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战略计划的要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规定自己的战略计划的。这个计划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正确地估计了俄国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且因为它促进并加速了发动西方革命运动的事业。

以后直到十月革命的事变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

四、第三个历史转变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第三个转变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当时西方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决死搏斗已经达到顶点；当时西方的革命危机已明显地增长了；当时俄国破产了的和矛盾重重的资产阶级政权已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下崩溃了；当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已同帝国主义决裂并退出了战争，因而使西方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它的死敌；当时新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和平、没收地主土地、剥夺资本家和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法令，因而博得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对它的信任。这是国际范围内的转变，因为国际资本战线第一次被突破，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到实践上来了。这样，十月革命便从一国的、俄国的力量变成了国际的力量，而俄国工人则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落后部队变成了以自己奋不顾身的斗争唤醒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转变还没有达到发展的终点，因为它还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它的内容和总的方向已经十分明显地确定了。◇146◇

当时在俄国各政治集团之间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积极分子拉进自己组织里去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

反革命分子、积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制定计划的路线是，把一切不满分子即后方和前线的旧军官、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被革命剥夺了的资本家和地主、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走狗等等联合成一个阵营。他们所持的方针是通过暴动或外国武装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府并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制定计划的路线是，在俄国内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俄国的和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

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以扩展无产阶级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范围。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战略计划所作的精确扼要的说明是非常出色的，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斯大林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战略计划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正确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动力，而且在于它预见到和促进了以后展开的使苏维埃俄国变为全世界革命运动注意中心、变为西方工人和东方殖民地的解放旗帜的过程。

以后全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五年的事实，都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曾经几次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都亡命国外了，而苏维埃政权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则正在变为世界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这些事实很明◇147◇显地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计划是正确的。

载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五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148◇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58〕）

一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敷设和资本的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末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

二、但是这种趋向是通过各种与其内在的历史意义完全不相适应的特殊形式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合，不是通过作为平等单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大发达的民族建◇149◇立起来的。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侵略，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帝国主义的专横暴虐，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民族的毫无权利，以及“文明的”民族为了统治“不文明的”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就是各民族经济上接近的过程所通过的形式。因此，除了联合趋向以外，还产生了消灭这种强制联合形式的趋向，产生了被

压迫的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既然这第二种趋向是表明被压迫群众对帝国主义的联合形式的愤怒，既然它要求各民族根据合作和自愿联合的原则联合起来，那末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进步趋向，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精神前提。

三、在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以资本主义固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两种基本趋向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两种趋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各资产阶级殖民国家内部的软弱和固有的不稳定的基础。这些国家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和这些国家间不可避免的战争；老殖民国家的崩溃和新殖民国家的形成；对殖民地的新的角逐和多民族国家的新的崩溃，这种崩溃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就是这个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后果。一方面，旧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瓦解，另一方面，大不列颠和旧德意志这些殖民国家的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大”战、殖民地民族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

因此，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和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150◇

四、我们党估计到了这种情况，它以民族自决权，以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为自己的民族政策的基础。党在它一成立的时候，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八九八年）上，当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确定的时候，就承认各民族有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后来，直到十月革命，它在它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专门决议和决定中毫不更改地确认了自己的民族纲领。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声势浩大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只不过再次确认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的要点是：

（甲）坚决摈弃对各民族的种种强制形式；

（乙）承认各民族有安排自己命运的平等权利和主权；

（丙）承认只有根据合作和自愿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牢固联合这一原理；

（丁）宣布只有推翻资本政权才能实现这种联合的真理。

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倦地拿这个民族解放纲领同沙皇政府的公开压迫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彻底的半帝国主义政策相对抗。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沙皇政府和旧俄各民族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半帝国主义政策使这些民族的优秀分子离开了克伦斯基统治，而我们党的解放政策则取得了这些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他们反对沙皇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毫无疑问，这种同情和支持是我们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1◇

五、十月革命给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做出了实践的总结。十月革命推翻了民族压迫的主要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从而一下子扭断了民族压迫的锁链，根本改变了各民族间的旧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为各民族的合作扫清了地盘，不仅取得了俄国其他民族兄弟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而且取得了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兄弟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种信任，俄罗斯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在俄国中部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各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获得解放。只要资本掌握着政权，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过去“统治”民族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跟着资本家走，民族仇视和民族冲突就必不可免；相反地，如果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跟着无产阶级走，也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有了保证，那就可以认为民族和平和民族自由有了保证。因此，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能够藉以建立兄弟合作的基础。

六、但十月革命的成果不只限于消灭民族压迫和建立民族联合的基础。十月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还制定了这种联合的形式，规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路线。在革命初期，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初次感到自己是独立的民族单位，而外国干涉的威胁还没有成为实际危险，这时各民族的合作还没有完全固定的严格确定的形式。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各民族共和国军事自卫的利益已提到首要地位，而经济建设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这时合作采取了军事联盟的形式。最后，在战后时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问题已提到首位，这时军事联盟就用经济联盟◇152◇补充了。各民族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合作形式发展的最终阶段，这一次已经具有各民族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了。

因此，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发现了根据民族权利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织稳固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

七、但是找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还不能说这一解决已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了。要正确实现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纲领，还必须克服过去民族压迫时期遗留给我们的那些障碍，这些障碍在短时期内是不能一下子割除掉的。

第一、这种遗产是大国沙文主义残余，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残余还存在于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头脑中，盘踞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里，它们得到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日益猖獗的“新”路标转换派〔59〕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潮的支援。这种残余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俄罗斯苏维埃官僚对各民族共和国的需要和要求采取傲慢轻视态度和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毅然决然地消灭这种残余，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巩固的国家，各民族的合作才能成

为真正兄弟般的合作。因此，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

第二、这种遗产是共和国联盟各民族在事实上即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获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是各民族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许多共◇153◇和国和民族没有经过或者几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因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的权利和可能，它们得不到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就不能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产生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民族的历史，也在于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力图使边疆地区变成受工业发达的中部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在短时期内铲除这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两年内消灭这种遗产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已指出：“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我们同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实行奴役的一切残余作不屈不挠的斗争。”〔60〕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铲除掉。而且只有通过俄罗斯无产阶级给予联盟各落后民族真正的长期的帮助，使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繁荣起来，才能把它铲除掉。不这样，就没有理由指望在统一的联盟国家范围内建立各民族的正确的巩固的合作。因此，为消灭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为提高各落后民族的文化和经济水平而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二项任务。

最后，这种遗产是许多民族中间的民族主义残余，这些民族曾经受过沉重的民族压迫，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民族耻辱感。民族之间的某种疏远和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人采取的措施的不完全信任，就是这种残余的实际表现。但是，在某些有几个民族的共和国内，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往往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成这些共和国内较强大的民族反对弱小民族的顽固的沙文主义。反对阿尔明尼亚人、沃舍

梯人、阿札里人和阿布哈兹人的格鲁吉亚沙文主义（在格鲁吉亚）；反对阿尔明尼亚◇154◇人的阿捷尔拜疆沙文主义（在阿捷尔拜疆）；反对土尔克明人和柯尔克兹人的乌兹别克沙文主义（在布哈拉和花剌子模），——这种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极大的祸害，它们因受新经济政策和竞争的条件的激励而日益猖獗，有使某些民族共和国变成争吵和纠纷的舞台的危险。不用说，所有这些现象都阻碍着各民族真正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事业。既然民族主义残余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那末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既然这种残余在变成反对各个共和国的弱小民族集团的地方沙文主义，那末同这种残余作直接斗争就是党员的义务。因此，同民族主义残余首先是同这种残余的沙文主义形式作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

八、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官僚不是把共和国联盟看做旨在保证各民族共和国自由发展的各平等国家单位的联盟，而是把它看做取消这些共和国的一个步骤，看做成立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开端，这一事实应当认为是旧遗产的鲜明表现之一。代表大会斥责了这种看法，认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同时号召党员密切注意，不要让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苏维埃官僚利用各共和国的联合和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来掩盖他们忽视各民族共和国经济和文化需要的企图。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是对苏维埃机关的考验：如果这一实验在实践中产生了大国主义倾向，那末党就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反对这种歪曲，甚至提出撤销某些人民委员部的合并问题，直到苏维埃机关经过适当的改造，能够用真正无产阶级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注意小民族和落后民族的需要和要求为止。◇155◇

九、既然共和国联盟是各民族共处的新形式，是各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内合作的新形式，而在这个联盟国家内应当在各民族共同工作过程中铲除上述残余，那末联盟的最高机关就应当不仅要充分反映

联盟内各民族的共同需要和要求，而且要充分反映个别民族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因此，除了现存的代表整个联盟劳动群众的不分民族的联盟中央机关以外，还应当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代表各民族的专门机关。这样组织联盟中央机关会使我们有充分可能倾听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及时给它们必要的帮助，造成完全相互信任的环境，从而用最无痛苦的方法消灭上述遗产。

十、代表大会根据上述各点，建议党员采取下列实际措施：

（甲）在联盟最高机关系统内，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一个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专门机关；

（乙）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应根据保证满足联盟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原则来建立；

（丙）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机关主要应当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本地人组成。

二

一、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里，我们的党组织是在不十分有利于自己成长和巩固的条件下发展的。◇156◇这些共和国在经济上落后，民族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缺乏甚至没有本地的党的老干部，缺乏用本族语言出版的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党的教育工作很差，还存在着激进民族主义传统（至今还没有消灭）的残余，——这一切在当地共产党员中间产生了过高估计民族特点、过低估计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一定倾向，即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现象在有几个民族的共和国里表现得特别危险，在那里，这种现象往往具有较强民族的共产党员反对弱小民族（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布哈拉、花剌子模）的共产党员的沙文主义倾向的形式。民族主义倾向的害处在于：它阻碍民族无产阶级摆脱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它给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成一

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组织的事业带来困难。

二、另一方面，在党中央机关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中，俄罗斯民族的党的老干部人数很多，他们不熟悉这些共和国劳动群众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此不能经常关心劳动群众的需求，这就使我们党产生了在党的工作中过低估计民族特点和民族语言的倾向，产生了对这种特点采取傲慢轻视的态度，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所以有害，不仅因为它阻碍了本地的通晓民族语言的共产党干部的形成，造成了使党脱离各民族共和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危险，而且首先因为它滋养和培植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倾向，增加了我们同这种倾向作斗争的困难。

三、代表大会斥责了这两种倾向，认为它们对共产主义事业都是有害的、危险的，并且提醒党员注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是特别有害和特别危险的，同时号召全党迅速消灭我们党的建设中的这些旧的残余。◇157◇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实行下列各项实际措施：

（甲）成立由各民族共和国当地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高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乙）增加用本族语言出版的有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丙）加强东方民族大学和它各地的分校；

（丁）在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立由当地工作人员组成的指导组；

（戊）增加用本族语言出版的党的群众性书刊；

（己）加强各共和国的党的教育工作；

（庚）加强各共和国的青年工作。

载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六十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158◇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61〕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159◇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四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认为刊登在“中央通报”〔62〕上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已经十分详尽了，所以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里就用不着再重复了。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应当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应当说明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也就是应当说明环绕着党的和党籍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借以变成党的军队的那些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

我认为报告的第二部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联系农民的那些组织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这就是国家机关。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关实现对农民的领导。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应当谈党的本身，党是一个本身具有特殊生活的机体，是一个提出口号并检查其实现情况的机关。

现在我来谈报告的第一部分。我把党比做先锋队，把工人阶级比做党的军队来谈。这样比较，有人可能认为这里的关系和军事方面一样，就是说，党发布命令，用电报传达口号，而军队即工人阶级◇160◇

执行这些命令。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在军事方面是指挥人员自己建立军队，自己编制军队。而在这里，在政治方面，党不是自己建立军队，而是找到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第二个区别是：在军事方面，指挥人员不仅要建立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和鞋袜。在政治方面就不是这样了。党不供给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给养、被服和鞋袜。正因为如此，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不是阶级依靠党，而是党依靠阶级。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就能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

现在让我来分析一下连接党和阶级的这些机关，这些引带，看看它们是怎样的一些机关，看看一年来党在巩固这些机关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工会是党联系工人阶级的第一根主要引带，第一个主要传达机关。在一年以来的活动中，就加强这个使党联系阶级的主要引带方面的数字来说，党扩大并且巩固了自己在工会领导机关中的影响。我不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它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不谈工会中央委员会。我要谈的主要是省工会委员会。去年，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省工会委员会的主席中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七，而今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这个成绩不算很大，但毕竟还是成绩。它说明，我们党十月革命前入党的领导人员已经掌握了工会的主要脉络，他们依靠这些脉络使党和工人阶级◇162◇联系起来。

我不打算谈整个工人工会的成分问题。数字表明，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工会会员约有六百万。而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却只有四百八十万。这似乎是后退了一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去年，——让我在这里说实话吧！——工会是虚肿的。当时提出的数字并没有确

切地反映实际情况。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所提出的数字，虽然比去年少，但这是比较真实、比较实际的。我认为这是前进了一步，尽管工会会员的人数减少了。因此，一方面是工会从虚假的和半官僚的工会变成和自己的领导机关过着共同生活的真正有生命的工会，另一方面是省级工会机关中的党的领导人员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这就是我们所确认的这一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工会的活动中的成就。

但是决不能说在这方面一切都很顺利。在工会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中，还不是处处都有我们的人。例如，哈尔科夫省的一百四十六个工厂委员会中，就有七十个工厂委员会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但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一般地应当承认，就巩固党在省级组织和下层组织中的影响来说，工会无疑是向前发展了。这条战线应当认为对党是有保证的。在工会方面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

合作社是党联系阶级的第二根引带，第二个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我指的首先是消费合作社，是其中的工人合作社，其次是农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里有贫农。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工人社员约有三百万。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稍有增加，总共有三百三十万人。◇163◇这个数目很小。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毕竟还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每个工人的家庭以三口人计算，那就是说，约有九百万的工人居民被作为消费者组织在消费合作社里了，而党在其中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在消费合作社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没有材料说明，可能占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会超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省级机关里，共产党员至少已经占百分之五十。这又前进了一步。

农业合作社的情况较差。这种合作社本身无疑是在发展着。去年，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至少有一百七十万。今

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不下四百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贫农。正因为如此，弄清党在农业合作社方面的影响怎样扩大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去年的数字我们没有。今年在农业合作社省级机关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共产党员（虽然我认为这个数字还值得怀疑）。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是一大进步。下层组织的情况较差，在那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

共青团是连接阶级和党的第三根引带。未必用得着证明，共青团和青年对于我们党的发展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现有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的共青团里至少有团员四十万人。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年中，由于裁减人员，由于为青年工人保留位置的制度还没有普遍实行和共青团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团员人数降到二十万。现在，特别是从去年秋天起，共青团又大大◇164◇发展了。目前至少有四十万团员。最令人高兴的是，共青团的发展首先是吸收青年工人。共青团有发展的首先是在我们工业有发展的地区。

你们知道，共青团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主要是在工厂艺徒学校进行的。这方面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约有五百所工厂艺徒学校，共有学员四万四千名。到去年年底我们有七百多所工厂艺徒学校，共有学员五万名。而重要的是共青团中的工人成分增多了。和上述农业合作社的战线一样，青年战线应当认为是特别受威胁的战线，因为我们党的敌人对这方面的攻击特别顽强。正是在这里，在这两方面，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竭尽全力来保证自己取得优势。

其次，我来谈谈女工代表大会。这可能没有引起我们各级组织的注意，但这是一个连接我们党和工人阶级中的妇女的极其重要的传动机构。我们现有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五十七个省和三个区域里，妇女代表大约有一万六千人，其中女工占大

多数。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在这些省和区域里，妇女代表至少有五万二千人，而其中女工有三万三千人。这是一大进步。应当注意到这是一条我们一直很少注意然而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线。既然事业在向前发展，既然有条件巩固和扩大这个机关，有条件用党的触角去破坏神甫在妇女所教养的青年中的影响，那末党的当前任务之一自然应当是在这条无疑是受威胁的战线上发挥最大的力量。

现在谈谈学校。我说的是政治学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这也是一种机关，◇165◇党依靠它们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让他们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会主义的种子，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从而把党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联系起来。数字表明，去年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的学员约有二万二千名。今年，如果把由政治教育总局经办的市立政治常识学校计算在内，至少有三万三千名。至于对共产主义教育有巨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大学，学员就增加得很少了，过去约为六千名，现在是六千四百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条战线上加紧努力，加紧培养和训练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

现在谈谈报刊。报刊不是群众性的机关，也不是群众性的组织，然而它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有人说，报刊是第六个强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强国，但是，它有力量，作用很大，这是无可争辩的。报刊是党每日每时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间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党应当特别注意这方面，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拿报纸来说。根据发表的数字，去年我们有三百八十种报纸，今年至少有五百二十八种。去年的发行额是二百五十万份，但是，这个发行额一半是依靠公家补助的，没有生命力的。去年夏天，由于报刊的补助金减少了，必须自

力更生，发行额降到九十万份。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发行额约近二百万份。就是说，现在报刊依靠公家比较少，它已靠自己的资金维持，并且成了党手中的锐利武器，使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否则发行额是不能增加和保持的。◇166◇

现在来谈下一个传达机关——军队。人们习惯把军队看做防御或进攻的机关。而我把军队看做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全部革命的历史表明，军队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不相往来的工人和农民的唯一集合点，他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大规模的动员和严重的战争总要引起某种社会冲突，某种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个遥远的角落里的农民和工人第一次在军队里见面。要知道，通常沃龙涅什的农夫是看不到彼得堡人的，普斯可夫人是看不到西伯利亚人的，在军队里他们却见面了。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学校，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从这个观点来看，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把党同工人、贫苦农民连接起来的最庞大的机关。军队是全俄全联邦的唯一集合点，在这里，来自不同省份和区域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学习并养成过政治生活的习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群众性的传达机关中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点五，今年已达到百分之十点五。在这段期间，军队减少了，但是，质量改善了，党的影响扩大了；在这个主要的集合点里我们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方面取得了胜利。

如果把排长以上的全体指挥人员都计算在内，去年共产党员在指挥人员中占百分之十，今年占百分之十三。如果不把排长计算在内，去年占百分之十六，今年占百分之二十四。这些就是环绕着我们党的引带，环绕着我们党的群众性机关，它们把党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了，使党有可能变成先锋队，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变成军队。◇167◇

这些就是党（和军事指挥人员不同）借以变成先锋队，工人阶级

借以从分散的群众变成真正的政治军队的联系网和传达网。

我们党所以能在这些领域在加强这些联系方面表现出成绩来，不仅因为党在这方面的经验丰富了，影响这些传达机关的方法改进了，而且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帮助和促进了这一点。

去年我们发生过饥荒，承担了饥荒的后果，产生过工业萧条和工人阶级涣散的现象等等。今年则恰恰相反，我们丰收了，工业局部高涨了，无产阶级的集合过程开始了，工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了。过去被迫分散到农村去的老工人现在又重新回到工厂，这一切就造成了一种在政治上有利的形势，使党能够展开广泛的工作来加强上述联系机关。

现在来谈报告的第二部分：党和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是主要的群众性机关，它通过工人阶级的政党把执政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连接起来，并使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其政党来领导农民。我把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和列宁同志的两篇著名的文章〔63〕直接联系起来谈。

许多人以为列宁同志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据我看，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去年就已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子里转了。你们大概还记得他去年所做的政治报告。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机关不协调，因此汽车不是向它应去的方向驶去，而是转了弯。我记得施略普尼柯夫曾经说这是司机不中用。这当然不对，完全不对。政策是正确的，司机很高明，汽车型式也是好的，是苏维埃型的，可是国家汽车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好，不是◇168◇我们的人。因此汽车不协调，结果就完全歪曲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结果不是实现而是歪曲政治路线。我再说一遍，国家机关就其型式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它的组成部分还是异己的、官僚的、半沙皇半资产阶级的。我们想使国家机关成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具，但是这个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人想把它变成他们一项收入的来源。这就是整个机关不协调的原因。我们不去改进机关的工作，单靠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走不远的，因为路线会被歪曲，工人阶级和农民之

间的关系会破裂。结果是：虽然我们操纵着方向盘，但是，汽车不听指挥。最后一定会翻车。这些思想列宁同志在去年就已经发挥了，只是在今年他才运用这些思想制定了一套严整的制度来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其目的在于使改组后的监察机关变成改装汽车各个组成部分的杠杆，变成用新的部分代替无用的旧部分的杠杆，如果我们真想把汽车开往它应去的地方的话。

列宁同志的建议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件事实，即对奥列哈沃—祖也沃托拉斯的检查，这个托拉斯是按苏维埃型式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生产大量工业品供应农民，可是这个按苏维埃型式组织起来的托拉斯却把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放进私人腰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于是汽车就不是开往它应去的地方了。

我还可以举出最近伏罗希洛夫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实。我们有一个名叫工业局的机关。这个机关是在东南部。这个机关大约有两千个工作人员，负责领导东南部的工业。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失望地对我说，领导这个机关可不容易，为了领导它，还得另外成立一个小机关来领导这个领导机关。我◇169◇们找到了伏罗希洛夫、埃斯蒙特和米高扬这几个好人，他们把这个机关彻底地整顿了一下。原来，这个机关只要一百七十个人就可以代替两千人的工作。结果怎样呢？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好得多。过去这个机关生产多少就吃掉多少。现在它正在为工业服务。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很多，比我的头发还要多。

所有这些事实只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就其型式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成员，它的习惯和传统，实际上往往会推翻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整个机器不协调，结果就造成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破裂的危险。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我们改善经济机关，裁减它们的人员，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并且把思想上靠近我们党的人补充进去，那末

我们就会达到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说，工业将生产出大量工业品供应农村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这样我们就能使农民经济和工业经济结合起来。或者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而遭到破产。

还可以这样说：或者精简国家机关，精简税务机关，把小偷和骗子驱逐出去，那末我们从农民那里拿到的就能比现在少，国民经济就能维持住。或者这个机关变成为自己服务的机关，像东南部所发生的那样，把从农民那里拿来的一切都花在本机关身上，那末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

我深信，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这两篇文章的指导思想。

在列宁同志的建议中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不但力求改善机关和最大限度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170◇（因为党既然建立了国家，就应当改善国家），而且显然还注意到道德方面。他想使国内没有一个大官僚，甚至也不要有一个因职位高而使普通人觉得对他没有办法的官员。道德方面是伊里奇的建议的第三方面，正是这个建议提出了不仅要从国家机关内，而且要从党内清除那些损害我们党的名誉的官场传统和官场习气的任务。

现在来谈谈关于挑选工作人员的问题，就是伊里奇早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谈过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在成员、习惯和传统方面很不好，有使工农之间的关系破裂的危险，那末很明显，党的领导作用就不仅应当表现在发指示上，还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无须证明，在中央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间决不能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你们中间未必有人会说，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

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登记分配局除此而外，说句俗话，就啥事不管了。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群众性的一般动员已经用不着，并已失去任何意义（去年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一千人而遭到◇171◇失败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工作已经深入，我们正在实行专业化的方针，并且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一般动员只能于事有害，对地方没有任何好处），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

我可以列举一些数字。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至少动员一千名莫斯科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估计动员一千五百名左右。由于被动员的人生病和其他种种原因，只动员了七百名；根据各地的反映，其中只有三百人比较合适。你们看，这件事实说明过去所实行的旧的一般动员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我们党的工作已经深入，党的工作已经随着不同的经济部门而专业化，如果随便调动人，第一、就会使这种人无所作为，第二、不能满足需要新的工作人员的各级组织本身的最低要求。

我想列举在登记分配局工作的索罗金所写的一本著名小册子〔64〕中关于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一些数字。但在谈这些数字以前，我应当谈谈中央委员会在登记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在登记分配局内所实行的改革。我已经说过，从前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使局长在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方面都有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长在登记企

业和托拉斯的指挥人员、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的指挥人员以及苏维埃和党内的指挥人员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协助工作。◇172◇

这一改革的效果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在很短的时期内就登记了将近一千三百个担任厂长职务的工业指挥人员。其中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九，非党员占百分立七十。有人会以为在主要企业中非党员占多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上，百分之二十九的党员领导着拥有三十多万工人的最大企业，而百分之七十的非党厂长领导着至多只有二十五万产业工人的企业。小企业是由非党员领导，大企业是由党员领导的。其次，在党员厂长中间，工人出身的比非工人出身的多两倍。这种情况说明，工业建设的下层即基层组织的情况和只有很少党员的上层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部门不同，在下层党员的力量，首先是工人，已经开始掌握企业了。值得注意的是，从质量和称职与否来看，党员中适合做厂长的比非党员要多。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党分配党员到企业中去，不仅要以纯粹党的考虑、以加强党在企业中的影响为指导原则，还要以业务考虑为指导原则。这不仅对党本身有利，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有利，因为党员中适合做厂长的比非党员要多得多。

这就是登记我们工业指挥人员的初次试验，我已说过，这是一次新的试验，它远没有包括一切企业，因为在这本小册子里所登记的一千三百个厂长，只占所有还应当登记的企业的厂长的一半左右。但是试验表明，这里的范围无限广阔，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应当大力展开，使党能够把党员补充到我们的主要企业的管理机关里去，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173◇

同志们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关于组织问题（党方面和苏维埃方面）的提案。至于我刚才在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里谈到的苏维埃方面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打算提交专门委员会进◇173◇行详细审查，这个委员会应当研究这个问题的党的方面和苏维埃方面，然后把自己的意见提交代表大会审查。

现在来谈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作为机体的党，作为机关的党。

首先应该谈谈我们党的数量问题。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有四十几万。今年，由于党的进一步缩小，由于党在许多地区清除了非无产阶级分子，党员的数量减少了，减少到四十万不到一点。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因为党的社会成分改善了。在我们党的发展中，在改善党的社会成分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在党内发生过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增多、工人阶级分子减少的倾向在报告所涉及的年度内停止了，转变已经开始了，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分子的百分数增加、非无产阶级分子减少的一定倾向出现了。这正是我们在清党以前所努力争取而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我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我们一切都做到了，还远不是一切都做到了。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转变，已经达到了某种是低限度的清一色，保证了党的工人成分，显然，今后还必须沿着这条继续减少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和继续增多无产阶级分子的道路前进。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进一步改善我们党的成分的那些措施，在中央委员会的提案里已有说明，我不再重复了。显然，必须加紧阻止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来，因为在目前，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党一定要受到新经济政策分子的有害影响，必须使我们党达到最大限度的清一色，至少达到工人成分对非工人成分的绝对优势。如果党想保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174◇

我现在来谈谈省委员会的生活和活动问题。报刊上有些文章时常流露出对省委员会的讽刺口吻，时常嘲笑省委员会，过低估计省委员会的活动。同志们，我应当说，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主要支柱，没有它们，没有省委员会，没有它们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的领导，党就会失去基础。尽管省委员会有很多缺点，尽管缺点到现在仍然存在，尽管省委员会有所谓纠纷和争吵，但是总的说来，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主要支柱。

省委员会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大约十个月以前，我看到过省委员会的来信，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对经济工作还漫无头绪，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十个月以后，我又看到了它们的来信，这一次我感到很满意很高兴，因为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省委员会已经成长起来了，它们已经熟悉业务，认真从事建设工作，编制地方预算，掌握地方的经济，并且真正能够领导本省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无疑地，省委员会也有缺点，但是，我应当说，如果省委员会没有在党和经济方面取得这种经验，如果省委员会在领导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熟练程度方面没有这种巨大的提高，我们甚至不能梦想党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有人在谈论省委员会的纠纷和摩擦。我应当说，纠纷和摩擦有不好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产生纠纷和争吵的基本原因是省委员会力图在自己内部形成一个能够经常进行领导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尽管为达到这个目的和满足这种愿望所采取的办法往往和目的不相适应，但是这种目的和愿望是完全健康的、合理的。这是因为我们党内成分不一，党内有老干部和新干部，有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有◇175◇中部地区的人和边疆地区的人，有各种民族的人，而且省委员会里的这一切不同成分的分子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习惯和传统，于是就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摩擦和纠纷。虽然纠纷和摩擦的形式是不能容许的，但是纠纷和摩擦十分之九是有健康愿望的，是要力求结成一个能够领导工作的核心。用不着证明，如果省委员会里没有这样的领导集团，如果“好人”和“坏人”参半，省里就没有任何领导了，我们就不能征收任何粮食税和进行任何运动了。这就是纠纷的健康方面，这个方面不应当被它有时具有畸形形式的事实所抹杀。这当然不是说，党不应当同纠纷作斗争，特别是因私人关系而产生的纠纷。省委员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遗憾的是，在省委员会以下我们党的力量还没有想像的那样

大。我们党在机关方面的主要弱点就是我们县委员会的弱点，缺乏后备力量——县委书记。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联系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即我在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里谈到的那些机关（我指的是下层组织、合作社、妇女代表大会、共青团等等），如果说省级机关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机关，这正是因为我们县的力量太弱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认为，我们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在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办一所学校，训练农民和工人出身的最忠诚最能干的同志来做县委书记。如果党在明年能够把一支二百或三百个县委书记的后备力量聚◇176◇集在自己周围，并且能够用这支力量去帮助省委员会，使省委员会对各县工作的领导易于进行，那末党也就能保证对一切群众性的传达机关的领导。到那时，在每一个消费合作社，每一个农业合作社，每一个工厂委员会，每一个妇女代表大会，每一个共青团支部，每一个群众性的机关里，党都将取得优势。

现在谈谈区域机关。过去一年表明，党和中央委员会设立区域机关（部分是选举的，部分是委派的）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讨论整个区域划分问题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设立党的区域机关的工作中，必须逐步从委派的原则过渡到选举的原则，因为这种过渡无疑会在党的区域委员会的周围造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气氛，使中央委员会易于领导党。

现在谈谈关于改善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关于明确划分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和政治局的职能的建议，想必你们都已经看过了。这个问题几乎用不着特别解释，因为它本身就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他们的动机，

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我简单地说一下应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理由。

目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二十七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177◇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某些中央委员，比如说，十五人的核心很有经验，很有才干，在拟定指示时十有九次不犯错误，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末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其次，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五年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只有把新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让他们担负全部领导重担，我们才能培养出在目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接班人。所以我认为，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四十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

在结束报告之前，我应当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许因为人人

都知道，所以不引人注目，但是应当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党的团结，就是使我们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样的◇178◇转变时能够避免分裂的史无前例的团结。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政党经受住这样急剧的转变而没有混乱，没有分裂，没有从党的大车上摔下某一个集团。大家知道，这样的转变通常总会使某个集团从大车上摔下来，党内即使不发生分裂，也会造成混乱。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转变，当时，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以后，我们习惯于进行革命斗争，不愿意转入日常的合法的工作，不想参加杜马，不想利用合法的机关，不想加强自己在合法机关中的阵地，总之是拒绝采用新方法。这个转变并没有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样急剧，但是很明显，那时作为一个政党来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还没有随机应变的经验，结果整整两个集团从我们的车上摔下去了。

现在我们实行进攻政策以后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急剧的转变。在作这样的转变时，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必须暂时放弃进攻而退回原来的阵地、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和农民断绝联系而必须转向农民的后方、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加强和巩固自己在东方和西方的后备力量时，党不仅没有发生分裂，而且转变时还没有发生混乱。

这说明党是无比灵活的，是团结一致的。

这就是我们党必胜的保证。

去年和今年我们的敌人一直在向我们报丧，说我们党要瓦解。但是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却保全了自己的阵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党在继续前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而我们的敌人确实在瓦解和破产。同志们，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社会革命党人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65〕的◇179◇事情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决定请求我们的代表大会给他们打开我们党的大门。此外，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关于孟什维主义过去的堡垒格鲁吉亚的消息了，这个至少拥有一万个

孟什维克党党员的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已经倒塌了，约有两千个党员离开了孟什维克的队伍。这似乎说明不是我们党在瓦解，而是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在瓦解。最后，你们大概知道，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最忠实最能干的人马尔丁诺夫同志离开了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央委员会已经接收他入党了，并且提请代表大会批准。（一部分人鼓掌）同志们，所有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我们党内的情况不好，而是说明他们，我们的敌人已经全线瓦解了，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热烈鼓掌多时）◇180◇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

（四月十九日）

同志们！结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谈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因为发言的同志批评了这项工作；第二部分是谈中央委员会对组织工作的建议，发言的同志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看来代表大会也是赞同的。

我首先谈谈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批评。

关于卢托维诺夫。他不满意我们党的制度，说我们党内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合法性，没有民主。他当然知道，最近六年以来中央委员会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民主。他知道，在二月全会以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分赴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卢托维诺夫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出了四期辩论专页〔66〕，拉杂地（的确是拉杂地）分析和解释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但卢托维诺夫还嫌不够。他要“真正的”民主，他要求把一切问题，至少是最重要的问题都交给各个支部自下而上地进行讨论，他要求全党干预每一个问题，参加每一个问题的讨论。但是，同志们，现在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至少有四十万党员和两万个支部，我不知道实行这种◇181◇制度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实行这种制度，我

们党就会变成一个空谈不休、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争论俱乐部。但是我们党首先应当是一个行动的党，因为我们执掌着政权。

此外，卢托维诺夫忘记了虽然我们在联邦内执掌政权并享有各种合法的优惠权，但是从国际方面来说我们还处于类似一九一二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当时党是半合法的，正确些说是不合法的，它有一些合法的环节，例如杜马党团、合法的报纸和俱乐部，而且那时党为敌人所包围，所以党竭力设法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向前推进，扩大合法范围。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被敌人包围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包围我们的帝国主义豺狼并没有打瞌睡。我们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抓住任何一个可以钻进来危害我们的空隙。没有根据断言包围我们的敌人不在进行什么封锁或干涉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一切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都搬到大街上去呢？要知道，在两万个支部大会上讨论问题也就是等于把问题搬到大街上去。如果我们把我们对热那亚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都预先搬到大街上去，那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完全失败。应当记住，在我们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我方的突然袭击、出其不意的机动和神速的动作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我们不是在受党委托的一小部分人中间讨论我们在洛桑会议上的政策，而是把全部工作搬到大街上去，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那会怎样呢？敌人就会估计到一切利弊得失，破坏我们的政策，我们就会带着耻辱离开洛桑。如果我们把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把一切重要问题中的最重要的问题预先搬到大街上去——因为，我再说一遍，把问题拿到两万个支部里去讨论也就等于把问题◇182◇搬到大街上去——那会怎样呢？我们就会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显然，同志们，无论从组织上或者从政治上来看，卢托维诺夫的所谓民主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民主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民主是虚伪而危险的。我们和卢托维诺夫走的不是一条路。

现在来谈奥新斯基。他抓住我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吸收能独立思

考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的，是的，索凌，是要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闹独立性的人。奥新斯基认为，我在这一点上和奥新斯基、民主集中派〔67〕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我的确说过，必须把能独立思考的同志补充到中央委员会中去。至于独立思考什么，这一点我当时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在一个主要的演说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是没有好处的，应当给结论留些话。（笑声，鼓掌。）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不，同志们，决不需要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你们记得列宁同志的那篇文章吧。那篇文章谈到我们有分裂的可能。列宁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谈到的这一点，可能使各级组织认为我们的分裂已在成熟，因此中央委员们一致决定消除可能引起的怀疑，说明中央内部没有任何分裂，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中央也说明分裂的可能并没有消除。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近六年来，在中央内部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不能不形成）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某些习惯和传统，这种习惯和传统有时造成一种不十分和谐的气氛。在最近举行的几次中央全会中，有一次二月全会使我感觉到这种气氛，我看出地方上的人的干◇183◇预往往决定一切。我们需要不受这些传统和这些个人影响的支配而能独立思考的人，以便在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时能给中央带来优良的工作经验和联系地方的经验，并成为一种水泥，把中央委员会凝结成一个领导我们党的统一而不可分的集体。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摆脱中央内部所形成的旧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因为他们能把新生的新鲜的成分带进中央来，巩固中央并防止中央内部发生分裂的种种可能。我所说的独立思考的人就是这个意思。

同志们，我不能不理会奥新斯基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他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只要除

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如果奥新斯基真想追求这样的目的，如果他真想这样来攻击我们中央委员会核心中的某个成员，那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

最后，关于穆吉万。请允许我谈谈这个整个代表大会已经感到厌烦的问题。他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动摇不定，他说今天决定把南高加索三个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联合起来，明天做出决议把这些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邦，后天又决定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共和国联盟。他把这叫做中央委员会的动摇不定。这对不对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动摇不定，而是整套步骤。各独立共和国最初是在经济基础上接近。这个步骤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开始了。在各共和国接近的试验产生良好结果以后，就采取了下一个步骤——联合成联邦。特别是像南高加索这样的地方没有维护民族和平的专◇184◇门机关是不行的。你们知道，南高加索在沙皇时代是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互相残杀的地方，在木沙瓦特党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时代是发生战争的地方。为了终止这种纷争，需要一个维护民族和平的机关即说话有力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建立这样的民族和平机关，没有格鲁吉亚民族的代表参加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在经济活动联合以后，过了几个月就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建立共和国联邦，过了一年又采取了另一个步骤，即各共和国联合道路上的最后阶段——建立共和国联盟。这哪里是动摇不定呢？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整套步骤。穆吉万根本没有抓住我们苏维埃政策的实质，虽然他自命为老布尔什维克。

他提出许多问题，暗示有关南高加索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既不是由中央决定的，也不是由个别人决定的。南高加索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让我读一个很短的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说明俄共中央制定成立南高加索联邦

的指示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列宁同志把他草拟的关于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提议草案寄给我。上面写道：

“（一）承认建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应该实行的，但是立刻实行还为时过早，就是说，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宣传，自下而上地推行；

（二）建议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中央委员会实现这项决议。”

我写信给列宁同志建议不要急于这样做，要等待一下，给地方工作人员一定的时间去推行联邦◇185◇制。我在信里写道：

“列宁同志：我不反对你的决议案，如果你同意作如下的修改：把第一条里的‘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改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其他不变。问题在于在格鲁吉亚按‘苏维埃方式’在‘几个星期’内‘自下而上地’‘推行’联邦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格鲁吉亚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它们还没有建成。一个月以前还完全没有苏维埃，而要在‘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南高加索联邦如果没有格鲁吉亚参加就将是一个纸上的联邦。我认为要使联邦制的思想在格鲁吉亚广大群众中取得胜利，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斯大林。”

列宁同志回信说：“我同意这个修改。”

过了一天，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季诺维也夫没有出席，莫洛托夫代替了他。可见，这个决定是在一九二一年底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这时起，以穆吉万为首的一批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就开始进行反对中央关于成立联邦的这一指示的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事情并不像穆吉万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我引用这个文件是为了反对穆吉万在这里所做的那些不体面的暗示。

第二个问题是：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把以穆吉万为首的那批同志调回来，原因何在？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同时也是确凿有据的原因。这一点我必须加以说明，因为有人责备中央，其中也责备到我。◇186◇

第一个原因是穆吉万集团在格鲁吉亚自己党内没有威信，它为格鲁吉亚共产党本身所摈弃。这个党曾经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初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初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穆吉万集团和它的否定联邦制的思想受到自己党的坚决的反击。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好像他在一百二十二票中收罗了大约十八票左右；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百四十四票中收罗了二十票左右；他始终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的观点不断遭到否决。第一次，在一九二二年初，我们中央委员会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不顾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意志迫使它接受老同志（毫无疑问，穆吉万是老同志，马哈拉泽也是老同志），当时我们认为两个集团，即多数派和少数派是会协调地进行工作的。可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许多次市代表会议和全格鲁吉亚代表会议，在每次会议上穆吉万集团都受到自己党的打击，最后，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穆吉万才在一百四十票中勉强收罗到十八票。

南高加索联邦是一个不仅关系到格鲁吉亚而且关系到整个南高加索的组织。通常在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就召开全南高加索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最近一次全南高加索代表大会上，穆吉万好像在二百四十四票中勉强收罗到十票左右。事实就是如此。既然党，既然格鲁吉亚组织本身不能容忍穆吉万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又怎么办呢？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偏见让步的政策。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能不能无止境地压制穆吉万集团必须在其中工作的党的意志呢？我认为不能。相反地，必须尽可能使我们的行◇187◇动同格鲁吉亚党的意志一致起来。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它把这个集团中的某些成员调回来了。

促使中央调回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同志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屡次违反俄共中央的决议。制定联邦决议的经过我已经向你们谈过了；我说过，没有这个机关，民族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只有成立联邦，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才能确立民族和平。因此我们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绝对必须执行的。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穆吉万集团不服从这个决议，不仅如此，它还反对这个决议。这已为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委员会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委员会所查明。甚至现在，在三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格鲁吉亚的决定以后，穆吉万还在继续反对成立联邦。这不是玩忽中央的决定又是什么呢？

迫使党中央调回穆吉万的情况就是如此。

穆吉万把事情描绘成这样：虽然他被调回，但他仍然胜利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不过大家知道，当先哲唐·吉诃德被风车撞伤时他也自认为是胜利者的。我认为在一块叫做格鲁吉亚的苏维埃领土上工作的某些同志，看来，他们的脑子并不是完全正常的。

现在来谈马哈拉泽同志。他宣称他是列宁教养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老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代表会议〔68〕上我曾和列宁同志一起对马哈拉泽同志进行斗争。他当时反对民族自决，反对我们的纲领基础，反对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他当时持着这种观点反对党。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当然使他很体面），但是，他仍然不应当忘记这件事！他在民族问题方面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是相当年轻的布尔什维克。◇188◇

马哈拉泽同志向我提出了国会式的质问：我是否承认，或者中央是否承认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组织是应当被信任的真正的组织，如果承认，那末中央是否同意这个组织有权提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承认这一切，那末中央是否认为在格鲁吉亚建立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

我来回答这个国会式的质问。

当然，中央是信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否则又信任谁呢？！格鲁吉亚共产党是格鲁吉亚人民的精华，是格鲁吉亚人民的优秀分子，没有他们就无法管理格鲁吉亚。但是每一个组织都是由多数和少数组成的。我们没有一个组织里没有多数和少数。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是由执行党的路线的多数和不经常执行这一路线的少数组成的。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信任多数所代表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是：各民族的中央委员会是否有创议即提出问题的权利，它们是否有提出建议的权利？

当然有，这是很明显的。只是不了解，为什么马哈拉泽同志不给我们提供事实，说明有人不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问题、提出建议和讨论建议？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实。我想，如果马哈拉泽同志真的有这样的材料，他是会向中央提出的。

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容许格鲁吉亚已经建立的那种制度？

可惜，问题提得不具体。是什么样的制度呢？如果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格鲁吉亚◇189◇苏维埃政权最近已把贵族以及孟什维克和反革命分子逐出他们的老窝，——如果指的是这种制度，那末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如果指的是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造成了一种使格鲁吉亚共产党不能发展的条件，那我拿不出这样的事实。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一百一十票对十八票的多数选出的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向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工作得非常融洽。如果有一个小集团、一个派别，一句话，如果有党员对党的制度不满，就必须向中央提供有关的材料。在那里，在格鲁吉亚，已经成立了两个受理这种申诉的委员会，一个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一个是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委员会。如有必要，还可以成立第三个。

关于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的结论的第一部分我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来谈第二部分，即关于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对组织工作的建议。据我所知，发言的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批评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我认为，这表明完全赞同我们提交你们审查的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建议。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帮忙提出一些意见。我将把这些意见提交中央认为必须成立的那个组即组织组，这个组的党方面的主要工作将由莫洛托夫同志负责，苏维埃方面的主要工作将由捷尔任斯基同志负责。

第一个意见是把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从五人至少增加到十五人。

第二个意见是应该特别注意巩固和扩大上下层的登记分配机关，因为这些机关目前具有巨大的◇190◇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党掌握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机关方面全部脉络的最实际的办法。

第三个意见是请代表大会批准在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办一所训练县委书记的学校的建议，这样到年底省委员会就能有二百到三百个县委书记。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报刊方面的。我在这方面提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代表大会特别注意把报刊提到应有的高度。报刊正在前进而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程度。报刊的成长不应当是与日俱增，而应当是与时俱增，因为这是我们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

最后，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再说几句。同志们！我必须说，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团结一致的、受同一思想鼓舞的代表大会了。很遗憾，列宁同志没有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他一定会说：“我培养了党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把它培养成一个伟大有力的党了。”（鼓掌多时）◇191◇

三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讨论民族问题了。第一次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第二次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是不是表明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根本的改变呢？不是的，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根本看法仍然和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一样。但是，自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从已经成为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的东方各国的作用日益增长这点来说，国际形势是改变了。这是第一。第二、自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的内部状况因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有了某些改变。这一切新的因素必须估计到并加以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是重新提出了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同志们，你们知道，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你们知道，我们首先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别人的前面。你们知道，我们在前进中曾经一直走到华沙，后来我们退却了，在我们认为最牢固的阵地上站稳了脚。从那时起，我们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从那时起，我们考虑到应当放慢国际革命运动的速度，从◇192◇那时起，我们实行的已经不是进攻政策，而是防御政策了。我们在华沙遭到失败（不必掩盖真相）以后，就不能再前进了，因为会有脱离后方的危险，而我们的后方是农民的后方，此外，我们跑得太远，就有脱离命运所给予我们的革命后备力量即西方和东方的后备力量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内转变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转变到实行缓步前进的方针，我们决定必须略事休息，医治一下自己的创伤，医治一下先进部队无产阶级的创伤，同农民的后方建立联系，并继续在落后

于我们的后备力量即西方后备力量和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后方的重要的东方后备力量中进行工作。这些后备力量，这些重要的而且是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后方的后备力量，正是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所要谈的问题。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因而巩固了帝国主义，削弱了我们运动的力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问题在于整个东方把我们共和国联盟看做实验场。或者我们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在实践中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就是说，或者我们在这里，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在各民族之间建立起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建立起真正的合作，那末整个东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联邦是它的解放的旗帜，是它的先进部队，它应当跟随这支部队前进，——这将是世界帝国主义崩溃的开端。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193◇

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就在这里。

从内部状况方面来说，民族问题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在数量上过去的统治民族大约有七千五百万人，其余的民族大约有六千五百万人（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仅因为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占据着经济发展方面最需要的地区和军事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据点，而首先因为这两年来我们实行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日益发展，日益猖獗，产生了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出现了通过和平方式建立邓尼金所未能建立的东西即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意图。

这样，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我们内部生活中正在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盘踞在我们的机关里，

它不仅透进了苏维埃机关而且透进了党的机关，它在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里蔓延着，并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它连根拔掉（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在培植它），就会使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有分裂的危险，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

可是新经济政策不仅在培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且还在培植地方沙文主义，特别是在有好几个民族的共和国里。我指的是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布哈拉和土尔克斯坦部分地区，这些共和国都有好几个民族，这些民族的先进分子大概不久就要开始互争雄长。当然，这种地方沙文主义就其力量来说没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那样危险。但它毕竟是一种危险，它会使某些共和国变成民族纠纷的舞台，会切断那里的国主义联系。◇194◇

这就是说明民族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时期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些国际和国内方面的理由。

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是什么呢？在现今苏维埃发展的条件下，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就是在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结合问题在这里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但是根据加米涅夫、加里宁、索柯里尼柯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等人的报告讨论结合问题时，主要涉及的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对俄罗斯农民的关系。在这里，在民族问题方面，有更复杂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涉及的问题，是在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它是我们全联邦无产阶级中最有文化的一个阶层）和农民（主要是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如果无产阶级能同其他民族的农民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摧毁对全部俄罗斯人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数十年来沙皇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是它种下的恶根）的一切残余，此外，如果俄罗斯无产阶级不仅能使无产阶级和俄罗斯农民之间，而且使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

之间得到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真正的联盟，那末任务就算解决了。为此，就必须使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其他民族的农民也像对于俄罗斯的农民一样是亲近的。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195◇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

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苏维埃环境下民族问题的基础之一。

现在，在一九二三年，解决民族问题的特征是什么呢？在一九二三年，民族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呢？采取的形式是在我们联邦的各民族之间建立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合作。我指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根本上要解决的任务是在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而目前所采取的是特殊形式，即在过去被分离而现在联合在统一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之间建立合作和兄弟般共处的关系。

这就是一九二三年民族问题所采取的形式的实质。

这种国家联合的具体形式就是共和国联盟，我们去年年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讨论过并且建立了这个联盟。

这个联盟的基础是联盟成员的自愿联合和法律上的平等。所以要做到自愿和平等，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纲领是从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过去叫做自决权）这一点出发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当肯定地说，任何民族联盟，任何组成统一国家的民族联合，如果它不以完全自愿为基础，如果各民族自己不愿意联合，那是决不能牢固的。第二个基础是加入联盟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现在不谈事实上的平等，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谈，因为在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之间确立事实上的平等是一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我现在谈谈法律上的平等。◇196◇这种平等表现在：加入联盟的各个共和国，即南高加索、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四个共和国都在同样程度上享受联盟的利益，同时也都在同样程度上为了联盟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某些独立的权利。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国都不设立外交人民委员部，那就很明显，撤销各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而在共和国联盟内设立统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必然会使这些共和国原有的独立受到同等程度的某种限制。很明显，过去这些共和国都设有自己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现在为了在共和国联盟内设立共同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各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撤销了，这样，这些共和国过去充分享有的独立就受到了某种限制，但是缩小这种独立是为了联盟的共同利益，如此等等。有些人提出了一个纯经院式的问题：各共和国在联合以后是否还是独立的？这是一个经院式的问题。各共和国的独立是要受到限制的，因为任何一种联合都会使联合者原有的权利受到某些限制。不过每个共和国都无条件地保留着独立的基本因素，这至少是因为每个共和国都有单方面退出联盟的权利。

总之，在目前，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民族问题的具体形式可归结为建立各民族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我们应当在这几方面把这些共和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目前民族问题的具体形式可归结为这一点。

但是说话容易做事难。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不仅有许多促进各民族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因◇197◇素，也有许多阻碍这种联合的因素。

促进联合的因素你们是知道的，这首先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所

确立的并由苏维埃政权巩固了的各民族在经济上的接近，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所确立的并由我们苏维埃政权巩固了的各民族之间的某种分工。这就是促进各共和国联合成联盟的基本因素。促进联合的第二个因素应当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苏维埃政权是工人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促使联盟内的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的劳动者彼此友好相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促进联合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共和国联盟不得不在这种包围的环境下进行活动。

但是也有妨碍和阻碍这种联合的因素。我已经说过，阻碍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统一联盟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我国日益发展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同志们，路标转换派受到大批苏维埃官僚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这决不是偶然的。路标转换派先生们夸奖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偶然的，他们好像在说：你们尽情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吧，尽情谈论你们的国际主义趋向吧，不过我们知道，你们是要建立邓尼金所未能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们布尔什维克已经恢复了大俄罗斯思想，或者至少将来要恢复大俄罗斯思想。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种思想甚至透进了我们党的某些机关，这也不是偶然的。在二月全会上第一次提出设立第二院的问题时，我亲眼看到中央委员中有人发表与共产主义不符的演说，发表了完全违背国际主义的演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时代的现象，都是一种流行病。由此产生的主要危险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在我们这里不是与日俱增而◇198◇是与时俱增，它竭力排斥一切非俄罗斯的东西，竭力使一切管理机关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并竭力压制非俄罗斯的东西。主要的危险是：在这种政策下我们有丧失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无产者的信任的危险，这种信任是俄罗斯无产者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取得的，当时他们打倒了地主和俄罗斯资本家，摧毁了俄国内部的民族压迫，从波斯、蒙古撤出军队，宣布芬兰、阿尔明尼亚独立，总之，把民族

问题提到了崭新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大家不武装起来反对这种新的——再说一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反对这种正在扩展蔓延，正在一点一滴地渗入我们工作人员的耳目，一步一步地腐蚀我们工作人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我们就会把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所取得的信任丧失无遗。同志们，这种危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铲除掉。否则我们就会有丧失过去被压迫民族工农的信任的危险，我们就会有使这些民族和俄罗斯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破裂的危险，因而我们就会有在我们专政体系中造成裂口的危险。

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举着展开的大旗反对克伦斯基并推翻临时政府，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背后有那些期待俄罗斯无产者来解放它们的被压迫民族的信任。不要忘记被压迫民族这样的后备力量，虽然它们沉默着，但是它们的沉默压制着和决定着很多东西。人们往往感觉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些民族活着，存在着，决不能把它们忘记。不要忘记，如果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尤登尼奇的后方没有所谓“异族人”，如果没有过去被压迫民族用它们对俄罗斯无产者的那种默默的同情来破坏这些将军的后方（同志们，默默的同情是我们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因素，这种因素谁也看◇199◇不到、听不见，但它决定着一切），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同情，那末我们就打不倒这些将军中的任何一个。当我们向这些将军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后方便开始瓦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将军依靠的是哥萨克中的殖民分子，他们在被压迫民族面前描绘了一幅继续压迫它们的远景，使被压迫民族不得不投入我们的怀抱，而我们是高举大旗解放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这就是决定这些将军命运的东西，这就是被我军的胜利所掩盖了的然而终究还是决定一切的综合因素。这一点是决不能忘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同新的沙文主义情绪作斗争时必须来一个急剧的大转弯，必须当众揭露我们机关中那些忘记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所获得的成果，忘记我们应该珍视的过去被压迫民族的信任的官僚和党员同志。

应该懂得，如果听任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力量蓬勃发展，猖獗横行，我们就得不到过去被压迫民族的任何信任，就不能在统一的联盟内建立起任何合作，也就没有任何共和国联盟。

这就是阻碍各民族和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联盟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最危险的因素。

同志们，妨碍过去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俄罗斯无产阶级周围的第二个因素，是沙皇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们已经宣布了法律上的平等，并且正在实现这种平等，这种平等虽然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它毕竟同事实上的平等还相距很远。所有落后的民族和部族在形式上和我们联邦内其他一切先进民族享有同等权利。可是不幸的是：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无产者，没有◇200◇经过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业的发展，文化上极端落后，完全没有力量享用革命给它们的权利。同志们，这是一个比学校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把学校和语言问题放在第一位，问题就解决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单靠学校是无济于事的，学校本身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可是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在这里单靠学校和语言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我们给文化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以真实的、经常的、真诚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帮助。除了学校和语言以外，俄罗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在各边疆地区、在文化上落后的各共和国（它们落后并不是它们自己的过错，而是人们过去把它们当做原料产地的缘故）内建立工业基地。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格鲁吉亚已经从莫斯科搬去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大概很快就会开工。布哈拉也搬去了一个工厂，而且还可以搬去四个。土尔克斯坦正在搬一个大工厂。总之，一切事实表明，这些在经济上落后和没有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必须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哪怕是很小的工业基地，以便在这些基地产生一批当地的无产者，使他们成为

俄罗斯无产者和农民同这些共和国劳动群众沟通关系的桥梁。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应当认真工作，在这里单靠学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还有阻碍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各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新经济政策不仅对俄罗斯居民，而且对非俄罗斯居民发生作用。新经济政策不仅使俄罗斯中部的私营工商业，而且使各个共和国的私营工商业得到发展。正是这个新经济政策本身和同它相联系的私人资本使格◇201◇鲁吉亚、阿捷尔拜疆、乌兹别克等地的民族主义发育滋长。当然，如果没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是进攻性的，因为它现在很强大，过去也很强大，它还保存着压迫人和鄙视人的习惯），那末地方沙文主义（这是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答复）也许只会有最小限度的、极微小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形式，只是一种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畸形的防御形式。如果这种民族主义只是防御性的，那就用不着为它喊叫了。那就可以集中自己活动的全部力量和斗争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且相信只要打垮这个强敌，也就会接着打垮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再说一遍，归根到底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应，是对它的答复，是一种防御。是的，如果各地的反俄罗斯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应，那末情形确实是如此。可是不幸的是：在某些共和国里，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就拿格鲁吉亚来说。那里百分之三十以上是非格鲁吉亚居民，其中有阿尔明尼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札里人、沃舍梯人、鞑靼人。为首的是格鲁吉亚人。在格鲁吉亚一部分共产党员中间产生了并且正在发展着一种不大重视这些小民族的思想，认为他们文化较低，不太发达，可以不必重视他们。这是一种沙文主义，有害而危险的沙文主义，因为它可以把小小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变成纠纷的舞台。而且已经把它变成纠纷的舞台了。

再拿阿捷尔拜疆来说。主要是阿捷尔拜疆族，可是也有阿尔明尼亚人。在部分阿捷尔拜疆人中◇202◇间也有这样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很露骨，他们认为阿捷尔拜疆人是土著居民，而阿尔明尼亚人是外来的，因此可以把他们放到较次要的地位，不必重视他们的利益。这也是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会破坏民族平等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再拿布哈拉来说。在布哈拉那里有三个民族：乌兹别克人，是主要民族；土尔克明人，从布哈拉的沙文主义观点看来，是一个“次要”的民族；柯尔克兹人。在那里柯尔克兹人很少，看来也是“次要”的民族。

花剌子模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有土尔克明人和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人是主要民族，土尔克明人是“次要”的民族。

这一切都导致冲突，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削弱。这种地方沙文主义倾向也是应当根除的。当然，同在民族问题总体系中占四分之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比较起来，地方沙文主义并不那么严重，但是，它对于当地的工作、当地的居民和各民族共和国本身的和平发展却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种沙文主义有时会发生很有趣的演变。我指的是南高加索。你们知道，南高加索是由包括十个民族的三个共和国组成的。南高加索早就是一个互相残杀和纠纷的舞台，后来，在孟什维主义和达什纳克党人统治时期，又成了战争的舞台。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的战争你们是知道的。一九〇五年年初和年底在阿捷尔拜疆发生的互相残杀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可以举出许多地区占多数的阿尔明尼亚人把其余的鞑靼居民杀光的事实，例如赞格祖尔。还可以拿另一个省份——纳希切万做例子。那◇203◇边鞑靼人占优势，他们把所有的阿尔明尼亚人都杀光了。这正是在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挣脱帝国主义枷锁以前发生的。（有人喊道：“这是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这不是苏维埃的解决方式。这种民

族之间互相仇视的情况当然和俄罗斯工人无关，因为互相斗争的是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俄罗斯人并没有参加。正因为如此，必须在南高加索设立一个能调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专门机关。

可以大胆地说，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其余一切民族的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占整个民族问题的四分之三。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则仅占这个问题的四分之一。

在这种互相不信任的环境里，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能在南高加索设立一个可以调解摩擦和冲突的民族和平机关，那末我们就会回到人们互相烧杀的沙皇统治时代或达什纳克党人、木沙瓦特党人、孟什维克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中央曾三次确认有必要保存南高加索联邦这个维护民族和平的机关。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批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他们不反对格鲁吉亚同共和国联盟联合，但是，他们反对通过南高加索联邦实行这一联合。你们看到没有，他们愿意跟联盟更接近些，他们说在我们格鲁吉亚人和共和国联盟之间不需要南高加索联邦这样的中间物，说联邦是多余的。这听起来似乎很革命。

但这是别有用心的。第一、这种论调表明，在格鲁吉亚，同俄罗斯人的关系在民族问题方面仅有次要意义，因为这些倾向分子同志（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们）丝毫不反对格鲁吉亚直接同联盟联合，也◇204◇就是说，他们并不害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认为它反正是要被砍倒的，或者它是没有决定意义的。显然，他们更害怕南高加索联邦。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厮杀很久、互相残杀、互相掠夺的南高加索三个主要民族，在现在，在苏维埃政权终于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联邦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关系的时候，在这个联邦已结出良好的果实的时候，一定要切断这种联邦关系呢？同志们，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南高加索的联邦关系使格鲁吉亚丧失了因地理位置可以获得的那些特权。请你们自己判断吧。格鲁吉亚有自己的港口——巴

土姆，从这里可以输入西方的商品；格鲁吉亚有梯弗里斯这样的铁路枢纽站，这是阿尔明尼亚人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阿捷尔拜疆从巴土姆取得商品的必经之路。如果格鲁吉亚是一个单独的共和国，如果它不加入南高加索联邦，那它就可以向不能不利用梯弗里斯的阿尔明尼亚和不能不利用巴土姆的阿捷尔拜疆提出某种小小的最后通牒。这对格鲁吉亚是有一些好处的。人所共知的粗暴的边防法令正是格鲁吉亚制定的，这并不是偶然的。现在人们把这一过错推在谢烈布利雅柯夫身上。就算是他的过错吧，但是要知道这项法令是在格鲁吉亚产生的，而不是在阿捷尔拜疆或阿尔明尼亚产生的。

其次，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梯弗里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但是那里的格鲁吉亚人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阿尔明尼亚人不下于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其他民族。你们看，这就是格鲁吉亚首都的情况。如果格鲁吉亚是一个单独的共和国，那就可以迁走一些居民，比如说，把阿尔明尼亚人从梯弗里斯迁走。格鲁吉亚曾经通过一项人所共知的“调整”梯弗里斯人口的法令，据马哈拉泽同志说，这项◇205◇法令并不是用来对付阿尔明尼亚人的。迁走一些居民的目的就是使梯弗里斯的阿尔明尼亚人逐年少于格鲁吉亚人，从而把梯弗里斯变成真正的格鲁吉亚首都。即使他们取消了关于迁徙的法令。可是他们还有许多办法，许多灵活的方式（例如“疏散”），依靠它们就可以在遵守国际主义的幌子下使梯弗里斯的阿尔明尼亚人减少。

这就是格鲁吉亚倾向分子不愿意丢掉的一些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格鲁吉亚人在梯弗里斯因人数比阿尔明尼亚人少而处的不利地位，这些情况促使我们的倾向分子为反对联邦而斗争。孟什维克曾经毫无顾忌地把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逐出梯弗里斯。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能再驱逐了，所以就要退出联邦，那时将获得法律上的可能单独进行一些活动，就能充分利用格鲁吉亚人的有利地位来对付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格鲁吉亚人在南高加索内部

的特权地位。全部危险就在这里。

我们能不能忽视南高加索民族和平的利益而创造一种使格鲁吉亚人对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两共和国处于特权地位的条件呢？不，我们不能容许这样做。

有一种旧的管理民族的特别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笼络一些民族，给它们特权，鄙视其余的民族，不肯同它们打交道。这样，它笼络了一个民族，就可以通过它去践踏其余的民族。例如奥地利就是这样做的。大家还记得奥地利的一个部长贝斯特的言论吧，他把匈牙利的一个部长请去说：“你管你们的一群，我来对付我们的一群。”这就是说，你压榨和践踏你们匈牙利的民族，我来践踏我们奥◇206◇地利的民族。你和我都是特权民族，让我们来践踏其余的民族。

奥地利也是这样对待国内的波兰人的。奥地利人笼络波兰人，给他们特权，使波兰人帮助奥地利人巩固他们在波兰的阵地，因此让波兰人有可能扼杀加里西亚。

分出几个民族，给它们特权，以便对付其余的民族，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纯粹奥地利式的制度。从官僚制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经济的”管理方式，因为这只要同一个民族打交道就够了；但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必然招致国家的灭亡，因为破坏民族平等原则，容许一个民族有某些特权，就是置自己的民族政策于死地。

现在英国也完全是这样管理印度的。为了从官僚制度的观点来更容易地对付印度的各民族和各部落，英国把印度划分为英属印度（二亿四千万人口）和土著印度（七千二百万人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想分出一部分民族，给它们特权，以便于管理其余的民族。印度有几百个民族，于是英国决定：与其同这些民族打交道，不如分出几个民族，给它们某些特权，通过它们来管理其他民族，因为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其余民族的不满就会针对这些特权民族，而不会针对英国；第二、同两三个民族“打交道”要合算些。

这也是一种管理制度，英国式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使机关“省钱”，这是对的。但是，同志们，如果撇开官僚主义的方便不说，那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必然死亡，在这种制度下英国的管理和英国的统治都必然死亡，正如二乘二等于四一样。◇207◇

我们的同志，格鲁吉亚的倾向分子正在把我们推上这条危险的道路，因为他们违反党的一切规章反对联邦，因为他们想退出联邦以保持他们的有利地位。他们把我们推上给他们某些特权而牺牲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两共和国的利益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这必然会使我们的全部政策和南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死亡。

我们格鲁吉亚的同志已经觉察到了这个危险，这不是偶然的。这种格鲁吉亚的沙文主义对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采取了攻势，使格鲁吉亚共产党感到不安。格鲁吉亚共产党自公开以来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每次都一致否决了倾向分子同志们的观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目前条件下，不建立南高加索联邦，就无法在高加索维护和平和建立平等。决不容许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享有更多的特权。我们的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为什么穆吉万集团斗争了两年还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常常为格鲁吉亚共产党所摈弃。

列宁同志那样着急和那样坚持立即成立联邦，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中央曾三次确认建立南高加索联邦的必要性，这个联邦要有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执行机关，它的决定各共和国必须执行，这也不是偶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两个委员会到莫斯科以后说非成立联邦不可，这也不是偶然的。

最后，“社会主义通报”〔69〕的孟什维克对我们的倾向分子同志反对联邦的斗争大加称赞，并对他们爱护备至，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臭味相投。◇208◇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必须用来克服阻碍联合的三个因素——大俄

罗斯沙文主义、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是当它变成沙文主义的时候）的手段或方法。在能够帮助我们无痛苦地铲除全部阻碍各民族接近的旧遗产的手段中，我提出三个来谈谈。

第一个手段是采取一切办法使各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成为人们所了解和亲近的政权，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成为各民族的政权。为此就必须不仅使学校，而且使一切机关，一切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逐步民族化，使用群众所懂得的语言，在适合本民族生活习惯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把苏维埃政权从俄罗斯的政权变成各民族的政权，变成所有共和国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共和国的劳动群众所亲近、了解和爱戴的政权。

第二个能够有助于我们无痛苦地铲除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所留下的遗产的手段，就是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应当这样来组织：至少使各个主要民族在部务会议中都有自己的人参加，造成一种使各个共和国的需要和要求都能无条件得到满足的环境。

第三个手段是必须在我们的中央最高机关中设立一个能够反映所有的共和国和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机关。

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最后这一点。

如果我们能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两个平等的院，第一院由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不分民族，第二院由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选出（各共和国的代表人数相等，各民族地区的代表人数◇209◇也相等），并由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我想那时我们的最高机关就能不仅反映所有劳动者的阶级利益，而且反映纯粹民族的需求。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能反映共和国联盟境内各民族、各部族和各部落特殊利益的机关。同志们，联盟总共不下一亿四千万人，其中约有六千五百万是非俄罗斯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在这里，在莫斯科，在最高机关内没有这些民族派来的代表，没有这种不仅反映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且反映特殊的独特的民族利益的代表，那就不可

能管理这样的国家。同志们，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进行管理。没有这种晴雨表，没有这种能够表达各个民族特殊需要的人，就不可能进行管理。

有两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使机关“简单化”，比如说，以一个集团或一个人为首领，他的耳目是各地的省长。这是最简单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下，首领依靠从省长那里能够得到的消息管理国家，他拿一种希望来安慰自己，希望自己是真诚而正确地管理国家的。后来发生摩擦，摩擦转为冲突，冲突又转为起义。然后起义被镇压下去。这种管理制度不是我们的制度，虽然它很简单，但是代价太大。还有另一种管理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我们在苏维埃国家内实行的是另一种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使人们能准确地预测农民、少数民族、所谓“异族人”和俄罗斯人的一切变化、一切情况，使最高机关系统内有许多晴雨表可以预测各种变化，估计和预防巴斯马奇运动〔70〕、土匪骚动、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及一切可能的风暴和不幸。这就是苏维埃的管理制度。它所以叫做苏维埃政权，人民政权，是因为它依靠的是最下层的群众，它能最先觉察到各种变化，如果路线被歪曲，它就能采取◇210◇相应的措施及时纠正路线，它能进行自我批评纠正路线。这种管理制度就是苏维埃制度，它要求在我们的最高机关系统内有能够彻底反映民族需要和要求的机关。

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制度将使管理工作复杂化，并将增加许多新机关。这是对的。以前我们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来设立了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而现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要分成两部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说过，最简单的管理制度是让一个人执政，给他一些省长。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已经不能再做这种实验了。制度复杂了，但是这种制度可以促进管理工作，使一切管理工作大大苏维埃化。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批准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一个专门机关——第二院，因

为这是绝对必需的机关。

我不是说，这是联盟各族人民之间合作的完善形式。我不是说，这是科学上的最新成就。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提出民族问题，因为国内和国际的情况在变化，而且以后还会变化。我不能否认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经验证明某些人民委员部合并后产生的效果不好，我们也许还要把合并在共和国联盟内的某些人民委员部重新分开。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还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和其他更适宜的机关。除了设立第二院外，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手段和其他办法来成立能够反映各个共和国内部的一切动态和一切变化的机关。

不言而喻，第二院内不仅应当有这四个已经联合起来的共和国的代表，还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因为这不仅与已经正式联合起来的四个共和国有关，而且还与共和国联盟内的一切民族和部族有关。◇211◇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能够反映所有民族和共和国的需求的形式。

同志们，我来概括地谈一谈。

总之，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是由新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是由下面的事实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里，在俄国，在我们联邦内正确地模范地解决民族问题，以便给东方的那些重要的革命后备力量做出榜样，从而增强它们对我们联邦的信心和向往。

从内部状况来说，新经济政策的条件、日益猖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沙文主义也都使我们不得不强调民族问题的特殊重要性。

其次，我说过，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在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统治民族的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从这个观点来看，目前民族问题的具体形式就是寻求在共和国联盟内、在统一的国家内建立各族人民合作的途径和手段。

其次，我谈过促进这种民族接近的各种因素。我也谈过阻碍这种联合的各种因素。我特别谈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日益

猖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主要的危险，因为它能破坏过去各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它打倒，因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国内过去保存下来的、现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打倒十分之九。

其次，我们还面临着一种危险，就是有一些同志会把我们推上给一些民族特权而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的道路。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它会破坏民族和平，摧毁其他民族群众对苏◇212◇维埃政权的信任。

其次，我说过，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第二院是使我们可能最无痛苦地铲除这些阻碍联合的因素的主要手段。关于第二院我在中央二月全会上谈得比较露骨，而在提纲中谈得比较含蓄，目的是使同志们也许有可能找出其他更灵活的方式，找出其他能反映各民族利益的更适当的机关。

结论就是这样。

我认为，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才能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才能把在未来的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搏斗中将起决定作用的重要革命后备力量——东方各国的同情和信任集合在这一旗帜的周围。（鼓掌）◇213◇

四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

（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在报告民族问题组的工作以前，请允许我先对那些就我的报告、就两个主要问题发言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大约至多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

第一个问题是以布哈林和拉柯夫斯基为首的一些同志过分强调了民族问题的意义，夸大了民族问题，并且因民族问题而忽视社会问题，

即工人阶级的政权问题。

我们共产党员看得很清楚，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巩固工人政权的工作，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谈另一个问题——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它是从属于前一问题的。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这一点，不应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可是很明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首先而且主要是中部地区即工业地区，而不是边疆地区即农民地区。如果我们矫枉过正地偏向农民的边疆地区而损害无产阶级地区的利◇214◇益，那就会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裂痕。同志们，这是危险的。在政策上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

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有时候会发生自决权同另一个权利，即同最高权利——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相抵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自决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利的障碍。前者必须向后者让步。例如一九二〇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权，不得不进军华沙。

因此，在对各少数民族许下种种诺言的时候，在奉承各民族代表的时候，如像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不应当忘记，应当记住：在我们国内外条件下，民族问题的活动范围和所谓管辖范围要受制于“工人问题”这个一切问题中的基本问题的活动范围和管辖范围。

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

正确，不恰当。然而我必须引证一段已成为公理的不会引起任何误解的话，以便使同志们对于民族问题所占的比重不发生怀疑。列宁同志在论民族自决权这篇论文中分析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一封信时，做了这样的结论：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71〕

这里总共只有一行字，但是它解决了一切问题。这是某些热心过度的同志应当牢牢记住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沙文主义问题。拉柯夫斯基和布哈林都在这里发了◇215◇言，特别是布哈林，他建议删去关于地方沙文主义危害性的那一点。他们说用不着为地方沙文主义这样的蛆虫操心，因为我们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样的“歌利亚”①。一般说来，布哈林有忏悔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否认自决权，对民族有罪，现在该是他忏悔的时候了。可是他在忏悔之后，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奇怪的是布哈林竟号召党也仿效他的榜样来忏悔，虽然全世界都知道，这和党毫不相干，因为党一成立（一八九八年）就承认自决权，因此它没有什么可忏悔的。问题在于布哈林不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当人们说在民族问题上必须把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的时候，那是想指出俄罗斯的共产党员的义务，想说明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有同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义务。如果从事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斗争的不是俄罗斯的共产党员而是土尔克斯坦或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那末这种斗争就会被认为是反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了。这会把全部事情弄糟，并且会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变本加厉。只有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才能从事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

————————————————

① 据旧约记载，歌利亚是一个巨人。——译者注

当人们建议同地方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那是想要说明什么呢？那是想指出地方共产党员的义务，指出非俄罗斯共产党员有同自己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义务。难道能否认反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存在的事实吗？要知道，整个代表大会亲眼看到，地方的沙文主义，即格鲁吉亚、巴什基里亚等等的沙文主义存在着，需要同它进行斗争。俄罗斯的共产党员不能同鞑靼的、格鲁吉亚的、巴什基里亚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如果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担负起反对鞑靼的或格鲁吉亚的沙文主义斗◇216◇争的艰巨任务，那末这一斗争就会被认为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反对鞑靼人或格鲁吉亚人的斗争。这会把全部事情弄糟。只有鞑靼、格鲁吉亚等等的共产党员才能反对鞑靼、格鲁吉亚等等的沙文主义，只有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才能顺利地同自己的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进行斗争。这就是非俄罗斯共产党员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在提纲中必须指出两方面的任务，即俄罗斯共产党员的任务（我指的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和非俄罗斯共产党员的任务（我指的是他们反对反阿尔明尼亚的、反鞑靼的、反俄罗斯的沙文主义的斗争）。否则提纲就是片面的，不论在国家建设中或党的建设中都没有任何国际主义。

如果我们只是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斗争，那末这一斗争就会遮盖住鞑靼等等沙文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后一种斗争正在各地展开，而且在现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是特别危险的。我们不能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只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同我们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不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和其他民族的工农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团结。不这样，就会助长地方沙文主义的气焰，造成奖励地方沙文主义的政策，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让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同志的话。我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随便引证列宁同志的话，歪曲了他

的话，那就让我来读一下列宁同志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的几句话：◇217◇

“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被‘它的’民族所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阶级团结就不可能实现。”〔72〕

这可以说是统治民族或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者的义务。

其次，列宁谈到过去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或共产党员的义务时说：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大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诡计、叛变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

可见，如果要追随列宁同志前进（在座的有些同志是向他宣过誓的），那就必须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和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这两个提纲保留在决议案中，并把它们看做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看做同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提纲。

我就以此结束我对发言人提出的反对意见。

其次，让我来报告一下民族问题组的工作。民族问题组采纳了中央的提纲作为决议的基础。它未加修改地保留了这个提纲中的六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各点。组内首先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是否应该先把各自治共和国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分出◇218◇去，再把高加索各独立共和国从南高加索联邦内分出去，让它们分别加入共和国联盟。这个建议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同志提出的，大家知道，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的代表团的支持。民族问题组讨论了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主张保留提纲中所发挥的那个论点，就是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南高加索联邦也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它们就用这种形式加入共和国联盟。格鲁吉亚的这一部分同志提出的建议并没有一一进行表决，因为提这些建议的人看到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就把它们撤回了。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是激烈的。

展开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组织第二院的问题。一部分同志（少数）建议第二院不应当由各共和国、各民族和各地区的代表组成，而应当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四个共和国的代表来组成。多数否决了这个建议，民族问题组也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来设立第二院比较适当，根据平等原则各共和国（不管是独立的还是自治的）和各民族地区都有代表参加。现在我不想陈述理由，因为这少数人的代表拉柯夫斯基将在这里发言论证他的那个在组内没有通过的建议。等他发表了意见，我再来谈我的看法。

对是否应当给提纲加进一个修改意见，即指出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必须不仅指靠东方而且要指靠西方的问题，也进行了不很激烈的争论。民族问题组对这个修改意见进行了表决。这个少数人的修改意见就是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见。民族问题组否决了这个修改意见。等拉柯夫斯基发表意见以后，我还要谈这个问题。◇219◇

现在我来读一下我们已经采纳的那些修改意见。前六点我们是无条件地采纳了。在第七点第二段第三行“因此坚决反对”这几个字前面加进下面一段话：

“若干民族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捷尔拜疆和土尔克斯坦）内的情况所以日益复杂，是因为作为苏维埃政权主要支柱的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在这些地区内，城乡之间的结合、工农之间的结合受到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残余的极大阻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俄罗斯文化的优越性和提出水平较高的俄罗斯文化必然战胜较落后民族的（乌克兰的、阿捷尔拜疆的、乌兹别克的、柯尔克兹等等的）文化的论点，无非是企图巩固大俄罗斯民族的统治。”

我所以采纳这个修改意见，是因为它可以使提纲更加完善。

第二个修改意见也是关于第七点的。在“否则就没有根据指望”这句话前面加进下面一段话：

“这种帮助首先应当表现在：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在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共和国内建立工业基地，并且尽量吸引当地居民参加这一工作。最后，根据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帮助应当同劳动群众反对当地的和外来的上层剥削分子（这种剥削分子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争取巩固自己的社会阵地的斗争相辅而行。因为这些共和国多半是农业地区，所以内部的社会措施首先应当沿着把国有的闲置土地分给劳动群众这条道路前进。”

下面还是关于第七点的。在第二段中间讲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等等的沙文主义的地方加进◇220◇“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沙文主义”几个字。阿尔明尼亚的同志希望不要委屈阿尔明尼亚人，希望也提到他们的沙文主义。

其次，在提纲的第八点“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几个字后面插进下面一段话：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某些主管机关企图使各自治共和国的独立的委员部也受它们的管辖并为撤销这些委员部开辟道路，这也应该认为是旧遗产带来的一种后果。”

其次，在第八点插进下面一句话：

“并宣布各民族共和国有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必要性。”

其次是第九点。开头的几句话应当是：

“各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根据平等和自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共和

国联盟，是无产阶级在调整各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做的第一次实验，也是建立未来的全世界苏维埃劳动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第十点有一个“甲”项，在“甲”项前面插进一个“甲”项，其内容如下：

“（甲）在设立联盟中央机关时，必须保证各共和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和对联盟中央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

其次，把原来“甲”项的内容作为“乙”项的内容：

“（乙）在联盟最高机关系统内，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一个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专门◇221◇机关，并尽可能考虑到使这些共和国内一切民族都有代表参加。”

其次，把原来“乙”项的内容作为现在“丙”项的内容：

“（丙）联盟执行机关应根据下述原则建立：保证各共和国都有代表实际参加并满足联盟内各族人民的需要和要求。”

其次，增加“丁”项：

“（丁）赋予各共和国相当广泛的财政权（其中包括预算权），以保证它们能够发挥自己在国家行政、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主动性。”

其次，把原来的“丙”项当作“戊”项：

“（戊）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

其次，另外增加一项，作为“己”项：

“（己）颁布特别法令，在为当地居民、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机构内，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颁布法律，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

其次，增补一项“庚”：

“（庚）加强红军的教育工作，以联盟各族人民友爱和团结的思想教育红军，采取实际措施◇222◇组织民族部队，遵行各项为保证各

共和国有充分国防力量而必需的措施。”

这就是民族组所采纳的各项补充，我不反对这些补充，因为它们可以使提纲更加具体。

至于第二部分，并没有作比较重大的修改。有一些不大的修改，民族问题组所选出的委员会决定把它们转交下届中央委员会。因此，第二部分仍照原来印发的材料，没有改动。◇223◇

五　对决议案的修改意见的答复

（四月二十五日）

虽然拉柯夫斯基把他在组内所提出的那个决议案改动了三分之二，删去了四分之三，可是我仍然坚决反对他的修改意见，理由如下。我们的民族问题提纲是这样拟定的：我们是面向东方，注意的是东方那些打瞌睡的重要的后备力量。我们是把整个民族问题和伊里奇的文章联系起来的，伊里奇似乎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西方，因为民族问题的中心不是在那里，而是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拉柯夫斯基要我们在转向东方的同时也转向西方。但是，同志们，这是不可能的，是反常的，因为人们通常总是不面向这一方，就面向另一方；在同一个时间内要面向两方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破坏提纲的总的精神，破坏它的面向东方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否决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见。

*　　*　　*

我认为这个修改意见就其意义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如果代表大会通过这个修改意见，那我必须说，提纲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拉柯夫斯基建议根据各个国家联合都有代表参加的原则来设立第二院。◇224◇他认为乌克兰是一个国家联合，而巴什基里亚不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撤销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难道巴什基里亚中央

执行委员会不是国家机关吗？！为什么巴什基里亚不是一个国家呢？难道乌克兰加入联盟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国家了吗？国家拜物教把拉柯夫斯基弄糊涂了。如果各民族有平等的权利，如果它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和习惯，如果这些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末所有这些民族就都是国家联合，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一个观点，即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特别是东部各民族在第二院的地位是平等的。

看来，拉柯夫斯基迷恋于普鲁士的联邦制。德意志联邦是根据国家之间完全没有平等的原则建立的。我建议除了阶级代表机关，即除了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选出的第一院以外，我们还要根据平等原则建立一个民族代表机关。东部各民族同中国、印度有机地联系着，它们在语言、宗教和习惯等等方面同这些国家是有联系的，因此，它们对于革命是极重要的。这些小部族的重要性比乌克兰大得多。

如果我们在乌克兰犯一个小错误，这对东方影响并不大。但是只要在阿札里斯坦（十二万人口）这样一个小国内犯一个小错误，那就会影响到土耳其，影响到整个东方，因为土耳其和东方有极密切的联系。只要在同西藏和中国接壤的卡尔梅克人的小地区内犯一个小错误，那对我们工作所起的坏影响比在乌克兰犯一个错误要糟得多。我们面临着东方即将到来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我们的工作首◇225◇先应当是唤醒东方，而不应当采取任何即使是轻微地间接地忽视东部边疆地区各个最小部族的作用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从管理拥有一亿四千万人口的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大国着眼，使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都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第二院是比较公正合理的、对革命比较有利的办法。我们有八个自治共和国，有八个独立共和国；俄罗斯也作为一个共和国参加；有十四个地区。这些共和国和地区组成第二院就能够反映各民族的一切要求和需要，并使我们易于管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否决拉柯夫斯基的修改意见。◇226◇

六　对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

（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我在向你们报告民族问题组的工作时，还忘记提到两点不能不提到的小补充。在第十点的“乙”项中谈到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一个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专门机关的地方，必须加一句“并尽可能考虑到这些共和国内的一切民族”，因为有些要派代表参加第二院的共和国里有好几个民族。例如土尔克斯坦，在那里除了乌兹别克人，还有土尔克明人、柯尔克兹人和其他部族，因此在规定代表资格时必须使这些部族中的每一个部族都有代表参加。

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再补充一段话，这就是：

“由于各自治共和国、各独立共和国和一般边疆地区的负责工作人员的活动有极大的重要性（建立某一共和国的劳动者和整个联盟的其余劳动者的联系），代表大会责成中央特别仔细地挑选这些工作人员，以便能够完全保证真正贯彻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决议。”

其次，就拉狄克发言中的一个意见谈一两句话。这是阿尔明尼亚的同志要求我谈的。在我看来，这个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拉狄克在这里说，阿尔明尼亚人在阿捷尔拜疆压迫或可能压迫阿捷尔拜◇227◇疆人，或者相反，阿捷尔拜疆人在阿尔明尼亚可能压迫阿尔明尼亚人。我必须说，天地间根本没有这样的现象。相反的现象倒是有的：在阿捷尔拜疆占多数的阿捷尔拜疆人压迫和屠杀阿尔明尼亚人，像在纳希切万所发生的那样，那里阿尔明尼亚人几乎全被杀光；而阿尔明尼亚人在他们的阿尔明尼亚也几乎把所有的鞑靼人都杀光了。这种事情在赞格祖尔就发生过。但是少数人要在别的国家里压迫多数人，——这种反常的事情从未有过。◇228◇

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

英谷洛夫在他的“挖掘根源”（见“真理报”第九十八号）一文中谈到了报刊对国家和党的意义这一重要问题。看来，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思想而援引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的一段话：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报刊是党每日每时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①]。

但是，英谷洛夫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歪曲了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的这段话的意思；第二、他忽略了报刊的极重要的组织作用。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应当简单地谈谈这两个错误。

一、报告的意思决不是说党的作用似乎仅限于向工人阶级**讲话**这项任务，党应当同工人阶级**交谈**，而不仅仅是向他们讲话。把“讲话”这种说法和“交谈”这种说法对立起来，无非是在玩弄无聊的把戏。实际上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表现在读者和作者、党和工人阶级、国家和劳动群众之间◇229◇的毫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上。这个现象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刚刚成立时起，从老“火星报”时期起就有了。英谷洛夫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只是在俄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过了几年才开始的，这是不对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的这段话的意思并不在于“讲话”，而是说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报刊的组织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里是把报刊作为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引带之一提出的。英谷洛夫

———————————————

① 见本卷第139页。——本书制作者注

不理解这段话，因而不自觉地歪曲了这段话。

二、英谷洛夫强调报刊的鼓动作用和揭露作用，认为定期刊物的任务仅限于此。他举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坏事，指出报刊的揭露工作和通过报刊所进行的鼓动是问题的“根源”。然而很明显，报刊的鼓动作用虽然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它的组织作用在目前是我们建设工作中最迫切需要的因素。问题不仅在于要使报纸进行鼓动工作和揭露工作，而且首先在于要使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在所有县和乡内有广大的工作人员、代办员和通讯员网，以便有一条线索经过报纸把党同一切工人地区和农民地区连接起来，使党和国家之间、工业地区和农民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发挥。如果“贫农报”〔73〕这种大众化的报纸能够经常召开自己在我国各地区的主要代办员代表会议来交换意见和总结经验，而每个主要代办员又为了同一目的召开自己的地区、市镇和乡的通讯员代表会议，那末这不仅在建立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国家和我国最偏僻的角落之间的组织联系方面会迈进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在改善和活跃报刊本身，在改善和活跃我国定期刊物的全体工作人员方◇230◇面也会迈进重要的第一步。在我看来，这种代表会议和这种会议比“全俄的”和其他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有更大的实际意义。使报纸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集体组织者，使报纸成为联系我国劳动群众并把他们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权周围的工具，——这就是目前报刊的迫切任务。

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同志的“从何着手？”（写于一九〇一年）一文中关于定期刊物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组织作用这段话：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刻画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和同报纸联系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经常性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仅从事地方工作，

而且从事经常的一般工作，教会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变，估计这些事变的意义和它们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影响这些事变的适当办法。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供给报纸材料和正常地推销报纸——就迫使我们必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有条理地执行全国工作中的零星职务，并组织某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将成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应当很庞大，遍布全国；它应当很广泛，很全面，实行严格而细致的分工；它应当很坚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能坚◇231◇定不移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它应当很灵活，一方面善于避免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当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们最难料到受攻击的地方和时机向他们攻击。”〔74〕

列宁同志当时说报纸是建设我们党的工具。没有理由怀疑，列宁同志的这些话在目前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环境中是完全适用的。

英谷洛夫在他的文章中忽略了定期刊物的这种重要的组织作用。他的主要错误就在这里。

我们报刊的一位主要工作人员怎么会忽视这个重要的任务呢？昨天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显然英谷洛夫除了提出解决报刊问题的任务以外，还提出了另一个附带的任务：“打这个人一下，捧那个人下。”我自己不想来肯定这一点，而且决不否认任何人除了提出直接任务以外还有提出附带任务的权利。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容许附带任务掩盖住阐明报刊在我们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中的组织作用的直接任务。

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
“真理报”第九十九号
署名：约·斯大林◇232◇

欲 盖 弥 彰 ……

我在“真理报”第九十九号上发表的关于报刊的组织作用那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英谷洛夫在报刊问题上所犯的两个错误。英谷洛夫在答辩的文章（见“真理报”第一〇一号）中支吾其词地说他没有犯错误，而是“误解”。我同意把英谷洛夫的错误叫做“误解”。但不幸的是：英谷洛夫在自己的答辩文章中又犯了三个错误，也可以说又有了三个“误解”。很遗憾，由于报刊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对这些错误置之不理。

一、英谷洛夫说，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报刊的组织作用问题上，只是探讨了“谁在办我们的党报”这个“局部问题”。就算是这样吧，但是，英谷洛夫为什么还引用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专门论述我们定期刊物的组织作用的一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小标题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英谷洛夫不了解那段话的意思，或者他的全篇文章是不顾和违背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关于报刊的组织作用那段话的原意写成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英谷洛夫的错误却是◇233◇一目了然的。

二、英谷洛夫说，“两三年以前我们的报刊和群众没有联系”，“没有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一般说来，报刊和群众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只要仔细看看英谷洛夫的这个论断，就会了解它是多么荒谬，多么无力和脱离实际。事实上，如果我们党的报刊以及我们党本身（通过报刊）“两三年以前”和工人群众“没有联系”，那末我们党就抵挡不住国内外革命敌人的进攻，党就会“一下子”被埋葬，化为乌有，这岂不是很明显吗！请想一想吧：当内战进行得正炽烈的

时候，党抗击敌人，取得了多次辉煌的胜利，党通过报刊号召工人和农民起来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几万几十万的劳动群众通过数百个决议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前线，不怕牺牲，这一切英谷洛夫虽然知道，但他认为还是可以断言，“两三年以前我们的报刊和群众没有联系，因而也没有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这不是很可笑吗？你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不”通过群众性报刊“和群众联系”而能使几万几十万工人和农民行动起来的党吗？党已经使几万几十万劳动群众行动起来了，群众性的党不依靠报刊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很明显吗？是的，的确有人和群众失去了联系，但这不是我们党，不是党的报刊，而是别的人。不能诬蔑报刊！问题在于“两三年以前”党通过报刊无疑是同群众有联系的，而且不可能没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比较薄弱，正像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任务是扩大这种联系，大力加强这种联系，使这种联系更加牢固，更加经常。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三、其次，英谷洛夫说，“两三年以前党和工人阶级没有通过报刊发生相互作用”。为什么呢？原◇234◇来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报刊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参加斗争，每天都在讲述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措施和党的各项决议，但是工人读者没有响应”。就是这样说的：“工人读者没有响应。”

这是难于置信的、骇人听闻的，然而这是事实。

谁都知道，当党通过报刊号召“大家都去支援运输业”的时候，群众便一致响应，他们给报刊寄来数百份决议书，表示他们的同情和对保卫运输业的决心，并且把他们的几万名子弟送去支援运输业。但是，英谷洛夫不同意把这种事情看做工人读者的响应，不同意把这种事情叫做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报刊发生的相互作用，因为这种相互作用与其说是通过通讯员实现的，不如说是党和工人阶级直接（当然是通过报刊）实现的。

谁都知道，当党号召“同饥荒作斗争”的时候，群众一致响应党的号召，他们给党的报刊寄来无数份决议书，并把他们的几万名子弟送去同富农作斗争。但是，英谷洛夫不同意把这种事情看做工人读者的响应，看做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报刊发生的相互作用，因为这种相互作用不是“按照规则”即不是通过某些通讯员等等实现的。

在英谷洛夫看来，几万几十万工人响应党的报刊的号召，并不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一二十个通讯员对党的报刊发出的同一号召所作的书面响应，那才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真正的实在的相互作用。这就是对党的报刊的组织作用所下的定义！英谷洛夫，看上帝面上，请你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文牍主义对相互作用的解释混为一谈。◇235◇

其实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用文牍主义者而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报刊发生的相互作用，那末这种相互作用无论在“两三年以前”或在更早的时候都一直是存在的，而且不能不存在，因为不这样党就不能保持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也就不能保持政权。显然，现在的问题是使这种相互作用更加经常，更加牢固。英谷洛夫不仅过低估计了报刊的组织作用，而且还歪曲了这种作用，在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报刊发生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用文牍主义的、表面的技术性的理解来顶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他把这叫做“误解”……

至于英谷洛夫所坚决否认的“附带任务”，应当说，他的第二篇文章并没有消除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点所表示的怀疑。

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
“真理报”第一〇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236◇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75〕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中央第四次会议速记记录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237◇

一　提交第四次会议讨论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76〕

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工作的总路线

从反对离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立场的意义上来说，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工作路线应当由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决议中有关的几点，即决议中第一部分的第七点和第二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各点来确定。

党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在当地居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培育和发展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年轻的共产党组织，用一切办法协助这些组织站稳脚跟、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把即使在开始时为数不多然而是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团结起来。只有当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组织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巩固的时候，苏

维埃政权才能在这些地方巩固起来。

但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共产党员应当记住，单是拿居民的社会成分不同这一点来说，他们那里的情况就已经和共和国联盟各工业中心大不相同了，因此在边疆地区必须常常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在这里，在竭力争取当地居民中的劳动群众的支持时，必须比在中部地区更加热诚地欢迎◇239◇那些革命民主人士，甚至欢迎那些仅仅忠顺于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内，本地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同共和国联盟中部地区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边疆地区本地的知识分子工作人员极感缺乏，所以应当尽一切力量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边疆地区的共产党员应当记住：我是共产党员，因此我应当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行动，向当地民族中的那些愿意和能够在苏维埃制度范围内忠顺地工作的分子让步。这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要有系统地进行维护马克思主义原则、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铲除地方民族主义，使当地的广大居民阶层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同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和组织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

根据还不够完全的材料，这样的问题共有七个：

（甲）**关于第二院的成员问题**。这个院应当由各自治共和国、各独立共和国的代表（每个共和国四名或四名以上）和各民族地区的代表（每个地区一名就够了）组成。最好能做到第一院的成员一般不兼第二院的成员。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代表应当由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第一院称为联盟苏维埃，第二院称为民族苏维埃。

（乙）**关于第二院同第一院关系上的权利问题**。应当规定第一院

和第二院享有**平等**权利，每院都◇240◇有创制法律的权利，并遵守凡提交第一院或第二院审查的法案如未经两院同意（两院分别进行表决）不得成为法律这一规定。有分歧的问题交由两院协商委员会解决，不能达成协议时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重付表决，如果有争论的法案经过这样修正后仍没有得到两院多数通过，就必须提交共和国联盟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或通常代表大会解决。

（丙）**关于第二院的权限问题**。凡苏联宪法第一条所载明的问题都应由第二院（第一院也一样）处理。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联盟人民委员会的立法职能仍然存在。

（丁）**关于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应当只有一个。它应当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两院选出，当然必须保证各民族至少其中最大的民族有代表参加。乌克兰人建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两院中每院都设立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主席团以代替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单一的主席团，这个建议是不适当的。主席团是在两届常会之间常设的联盟最高权力机关。设立两个具有立法职能的主席团就是把最高权力机关分成两部分，这势必造成工作上很大的困难。两院应当分别设立自己的主席团，但不能具有立法职能。

（戊）**关于统一的人民委员部的数量问题**。根据以往几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定，**统一的**人民委员部应当有五个（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军事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直属的**人民委员部也应当有五个（财政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其余的人民委员部应当完全自治。乌克兰人建议把外◇241◇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从统一的一类移到直属的一类，就是说，让各共和国的这两个人民委员部与联盟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时并存，并使它们服从后者的指示。如果我们确实要建立一个对外能够以联合的整体出现的联盟国家，这个建议是不

能接受的。关于租让合同的情况也是这样，订立这种合同的权力应当集中于共和国联盟。

（己）**关于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的机构问题**。应当扩大这些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吸收最大最重要的民族的代表参加。

（庚）**关于各共和国的预算权问题**。在分给各共和国的份额（其数量应特别加以规定）范围内，各共和国在预算方面应当有更大的独立性。

吸收当地居民中的劳动分子参加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的办法

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现在已经可以提出四个办法：

（甲）清洗国家机关和党机关中的民族主义分子（首先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清洗工作应当在党中央监督下根据审查过的材料慎重进行。

（乙）不断地坚定不移地使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内的国家机关和党机关民族化，就是说在文牍工作方面逐步使用当地语言，负责工作人员有义务学会当地语言。

（丙）挑选和吸收当地知识界中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同时我们各共和国◇242◇和各地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员中培养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干部。

（丁）召开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由人民委员和党的一般负责工作人员报告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最重要的措施。

关于改善当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的措施

大致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甲）开办使用当地语言的俱乐部（非党的）和其他教育机关；

（乙）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各级学校网；

（丙）吸收当地的多少对我们忠顺的人民教师参加教学工作；

（丁）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识字普及协会网；

（戊）组织出版工作。

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大致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甲）调整移民，有些地方如有必要可停止移民；

（乙）尽可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当地劳动居民，保证他们都有土地；◇243◇

（丙）发放低息农业贷款给当地居民；

（丁）加强水利工作；

（戊）大力帮助合作社，其中包括工艺合作社（为了吸引手工业者）；

（己）把工厂迁到富产所需原料的共和国去；

（庚）为当地居民开办工艺学校和技术学校；

（辛）为当地居民开办农业训练班。

关于组织民族部队的实际措施

必须立即着手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开办军事学校，以便在一定时期内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出以后能够成为组织民族部队核心的指挥人员。同时很明显，必须充分保证民族部队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党的成分和社会成分。凡在本地人中间有老军事干部的地方（鞑靼、巴什基里亚部分地区），可以立即组织民族民军团。在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

捷尔拜疆似乎都已经有一个师了。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特别是在乌克兰）都可以立即建立一个民军师。

建立民族部队的问题不论从防御可能来自土耳其、阿富汗、波兰等国的侵犯来说，或者从共和国联盟对邻国可能采取迫不得已的行动来说，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从共和国联盟的内部状况来看，民族部队的意义也是无须证明的。预计我们军队的数量一定会因此而增加二万到二万五千名。◇244◇

组织党的教育工作

大致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甲）创办使用本族语言的政治常识学校；

（乙）用本族语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刊；

（丙）用本族语言出版办得很好的定期刊物；

（丁）扩大东方民族大学在中央和地方的活动，给该大学以物质上的保证；

（戊）在东方民族大学设立党的争论俱乐部，吸收住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参加；

（己）加强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共青团工作和妇女工作。

为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挑选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

必须吸收一定数量的民族干部参加中央登记分配局、中央宣传鼓动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妇女部和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每个机关两个或三个），以便在他们帮助下促进中央在边疆地区的党的日常工作，并以保证实现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路线的精神，把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给各共和国和各地区。◇245◇

二　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

（关于会议第一项议程“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演说）

（六月十日）

我想对同志们在这里发表的演说提几点意见。至于苏丹—加里也夫事件所涉及的问题的原则方面，我将尽力在我关于第二项议程的报告中加以说明。

首先谈谈有关会议本身的问题。这里有人说（我忘了究竟是谁）这次会议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这是不对的。这种会议对我们党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这次会议已经是第四次了。截至一九一九年初，这种会议召开过三次。那时候环境允许我们召集这样的会议。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以后，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我们以全力对付国内战争，没有工夫召开这种会议。只是在现在，在我们结束国内战争以后，我们的工作已经深入到经济建设方面了，党的工作特别是在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共和国内的工作也更加具体了，我们才又有可能召开这种会议。我想，中央为了使地方上执行政策的人和制定政策的人之间达到充分的相互谅解，还将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办法。我想，这样的会议不但可以和所有共和国所有地区的代表共同举行，而且可以和个别地区个别共和国的代表单独举行，以便作出更具体的决定。只有这样提问题，才能既满足中央，又满足地方工作◇246◇人员。

我听到某些同志说当我有机会看到苏丹—加里也夫的第一封密信（好像是给阿季加莫夫的，他不知为什么默不作声，不发一言，虽然他应当比别人更早更多地发表意见）的时候，我警告过苏丹—加里也夫。我受到这些同志的指责，说我过分替苏丹—加里也夫辩护。是的，我确实是尽量替他辩护的，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不过我替他辩护有一定的限度。当苏丹—加里也夫超出这一限度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他的第一封密信说明他已经和党脱离关系，因为他那封信的口气差不多是白卫分子的，因为他谈到中央委员的那些话，只有对敌人才能那样说。我曾偶然地在政治局遇见他，当时他正在为鞑靼共和国所提出的有关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要求辩护。当时我警告过他，递给他一张条子，说他的那封密信是反党的，责备他是在建立瓦里多夫型的组织，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停止非法的反党活动，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并且将得不到我的任何支持。他很窘地回答说我被蒙蔽了，说他给阿季加莫夫确实写过信，但所写的不是那些事情而是别的事情，说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党员，并且发誓保证今后还要继续做党员。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寄出第二封密信，要阿季加莫夫同巴斯马奇匪徒和他们的头子瓦里多夫建立联系，并要他阅后把信“烧毁”。这样苏丹—加里也夫的卑鄙行为和欺骗手段就暴露了，这种手段使我同他断绝了任何联系。从这时起，在我看来，苏丹—加里也夫已经是一个站在党外，站在苏维埃以外的人了，我认为不能再同他讲话了，虽然他曾几次想找我“谈一谈”。“左派”同志们早在一九一九年初就指责我，说我支持苏丹—加里也夫，说我为党保护他，◇247◇怜惜他，希望他不再是民族主义分子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确实认为有义务支持他到一定的时候。知识分子，有思想的人，甚至一般识字的人，在东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少得屈指可数，这怎么能不珍视他们呢？不采取一切办法保护东部我们所需要的人，使他们不致腐化堕落，不为党保存他们，那就是犯罪。但一切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当苏丹—加里也夫从共产党人营垒跑到巴斯马奇匪徒营垒里去的时候，便超过了这个限度。从这时起，他对于党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他觉得土耳其大使比我们党中央更合乎他的心意的原因。

我也听到沙米古洛夫对我的同样的指责，说我不顾他的干脆开除瓦里多夫的坚决要求，而替瓦里多夫辩护，力图为党保存他。我确实

替瓦里多夫辩护过，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我们从许多政党的历史中知道，比他更坏的人也能改过自新。我认为沙米古洛夫解决问题太简单了。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诚然，一年以后沙米古洛夫的预言证实了，瓦里多夫并没有改过自新，他跑到巴斯马奇匪徒那里去了。但是，党还是胜利了，因为我们使瓦里多夫的脱党延迟了一年。如果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就制裁了瓦里多夫，那末我相信像穆尔塔津、阿季加莫夫、哈里柯夫和其他同志也就不会留在我们队伍里了。（喊声：“哈里柯夫会留下来的。”）哈里柯夫也许不会离开，但是我们队伍里的整整一批同志是会同瓦里多夫一起离开的。

这就是我们的忍耐和慎重的结果。

雷斯库洛夫的发言我听到了，应当说，他的发言是不十分诚恳的，是半外交式的，（喊声：“对！”）一般说来，他的发言使人感到很沉重。我本来以为他能谈得更明确更诚恳。不管雷斯库洛◇248◇夫怎样说，在他家里明明白白放着两封苏丹—加里也夫的密信，他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显然他在思想上是和苏丹—加里也夫有联系的。雷斯库洛夫竭力同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刑事部分划清界限，硬说他在巴斯马奇活动方面同苏丹—加里也夫没有联系，——这是胡说。这次会议上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要谈的是关于同苏丹—加里也夫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联系问题。雷斯库洛夫同苏丹—加里也夫有这种联系，这是很明显的，同志们，连雷斯库洛夫本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难道现在还不是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坚决地无条件地同苏丹—加里也夫主义最后划清界限的时候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斯库洛夫的发言是半外交式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延巴也夫也作了外交式的、不诚恳的发言。延巴也夫和一批鞑靼工作人员（虽然他们的思想是不坚定的，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出色的实际工作者）在苏丹—加里也夫被捕后曾要求中央立即释放他，并且愿意完全担保苏丹—加里也夫，暗示从苏丹—加里也夫那里搜出的

文件是不真实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然而经过调查以后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一切文件都是真实的。连苏丹—加里也夫本人也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而且说自己的罪过比文件中所说的还要多，他彻底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承认后还表示悔悟。既然如此，延巴也夫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同苏丹—加里也夫划清界限，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可是延巴也夫并没有这样做。他找到了机会嘲笑“左派”，而不愿以共产党员的精神坚决地同苏丹—加里也夫主义划清界限，同苏丹—加里也夫所陷入的深渊划清界限，似乎以为玩弄外交手腕就能得救。◇249◇

菲尔杰夫斯的发言是一套彻头彻尾的外交手腕。在思想上究竟是谁领导谁？是苏丹—加里也夫领导菲尔杰夫斯，还是菲尔杰夫斯领导苏丹—加里也夫？这个问题我留做悬案。但是，我认为在思想上与其说是菲尔杰夫斯领导苏丹—加里也夫，不如说是苏丹—加里也夫领导菲尔杰夫斯。我在苏丹—加里也夫的理论练习中并没有看到任何特别不能容许的东西。如果苏丹—加里也夫的问题只限于大突厥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那末这将是一种半不幸，这种思想虽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已被禁止，但是，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对它进行批评就行了。但是，如果思想练习的结果是同巴斯马奇匪徒的首领们即同瓦里多夫以及其他人建立联系，那末这就是拿思想无罪做借口来替巴斯马奇匪徒的实践辩护，像菲尔杰夫斯打算做的那样，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替苏丹—加里也夫的活动作这样的辩护是谁也欺骗不了的。这样也就可以为帝国主义和沙皇制度辩护，因为它们也有它们的思想，这种思想有时从表面上看也是毫无罪过的。这样谈论问题是不行的。在这里你们不是站在法庭面前，而是站在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面前，这些负责工作人员要求你们直爽、诚恳，而不是玩弄外交手腕。

我认为霍札诺夫讲得很好。伊克拉莫夫也讲得不错。但我必须指

出这两位同志的讲话中的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他们两个人都说，今天的土尔克斯坦和沙皇时代的土尔克斯坦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土尔克斯坦仍然和过去沙皇时代的土尔克斯坦一样。同志们，如果这不是失言，如果这是深思熟虑的发言，如果这完全是有意识地说出来的，那就应当说巴斯马奇匪徒是对的，我们是不◇250◇对的。如果土尔克斯坦真是殖民地，和在沙皇制度下一样，那末巴斯马奇匪徒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应当审判苏丹—加里也夫，而应当由他来审判我们这些容忍殖民地在苏维埃政权下存在的人了。如果这是对的，那末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参加巴斯马奇活动呢？显然，霍札诺夫和伊克拉莫夫对他们发言中的这一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不能不知道，今天的苏维埃土尔克斯坦和沙皇时代的土尔克斯坦是根本不同的。我指出这两位同志发言中的这个模糊的地方是为了要这两位同志好好考虑一下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伊克拉莫夫在谈中央的活动时，指责我们不能经常注意和经常及时提出东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所产生的那些实际问题，我承担这些责备的一部分。当然，中央工作繁忙，不能处处走在前面。如果认为中央一切事情都能及时做到，那是可笑的。当然，土尔克斯坦的学校很少。国家机关还没有通用当地语言，机关还没有民族化。文化水平一般很低。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难道能够真的希望中央或全党在两三年内提高土尔克斯坦的文化水平吗？我们大家都在叫嚷和埋怨，说俄罗斯的文化水平，俄罗斯人民的文化水平虽然比共和国联盟的其他各族人民高，但是俄罗斯本身文化水平很低。这一点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说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不可能在两三年内甚至在十年内大大提高俄罗斯的文化水平。既然在两三年内甚至在十年内不能大大提高俄罗斯文化，那末怎么能要求落后的、识字人很少的非俄罗斯地区的文化加速提高呢？这里十分之九的“过错”在于环境，在于落后，这一点像大家所说的不能不估计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251◇

现在来谈“左派”和右派。

在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中有没有“左派”和右派呢？当然有。这是无可否认的。

右派的罪过在哪里呢？右派的罪过在于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消除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变本加厉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解毒剂和反对这种思潮的可靠堡垒。苏丹—加里也夫主义的产生以及它在东部各共和国特别是在巴什基里亚和鞑靼能够得到一批人拥护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右倾分子在这些共和国内占绝大多数，他们不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坚强堡垒。

应当记住，各边疆地区、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只有把民族主义铲除掉，才能发展和站稳脚跟，才能成为真正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民族主义是在各边疆地区和各共和国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培养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我们党的历史说明，布尔什维克党的俄罗斯部分是在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因为孟什维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孟什维主义是向我们党输送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导者，不战胜孟什维主义，党就不能站稳脚路。这一点伊里奇曾经谈过好几次。只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战胜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成长和巩固起来，才能成为真正的起领导作用的党。关于民族主义和我们各边疆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的关系也应当这样说。民族主义对这些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孟什维主义过去对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作用一样。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影响，包括孟什维克的影响在内，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持护下才能渗入我们各边疆地区的组织。我们各共和国的组织只有抵抗住闯入我们各边疆地区党的民族主义思潮，才能成为◇252◇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种思潮所以能闯入，是因为资产阶级正在复活，新经济政策正在成长，民族主义正在发展，并且还存在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这种残余也推动地方民族主义）和千方百计支持民族主义的外国势力。如果我们各

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想要坚强起来，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那就必须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经过同这种敌人作斗争的阶段。其他道路是没有的。而右派在这一斗争中是软弱的。他们所以软弱，是因为他们染上了对党怀疑的毛病，因而很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这就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共产党组织里的右翼的罪过。

边疆地区“左派”的罪过不能说更大，也不能说更小。如果说不铲除民族主义，边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那末这些组织本身要能够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要能够把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只有学会十分灵活地吸收各民族中一切比较忠顺的分子参加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向他们让步，学会既能灵活地同党内的民族主义作坚决斗争，又能为吸收本地人和知识界等等中间的一切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来参加苏维埃工作而进行同样坚决的斗争。边疆地区的“左派”对党的怀疑比较少，并且没有那么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是“左派”的罪过在于他们不善于灵活地对待居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和仅仅对我们忠顺的分子，他们不善于也不愿意灵活地去吸收这些分子，他们歪曲了党的掌握国内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路线。可是这种既能灵活地同民族主义作斗争，又能灵活地吸收比较忠顺的分子加入我们国家机关队伍的灵活性和本领，无论如何必须培养和锻炼出来。**只有**估计到我们在我们各地区和各共和国内所遇到的全部复杂◇253◇性和特殊性，**只有**不简单地搬用在中部工业区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是不能机械地搬到边疆地区去的），**只有**不抛开居民中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者，**只有**学会吸收这些分子参加一般的国家工作，才能培养和锻炼出这种灵活性和本领。“左派”的罪过在于他们沾染了宗派主义习气，不了解党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这些复杂任务的头等重要性。

如果右派的危险在于他们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因而会阻碍我

们边疆地区的共产党干部的成长，那末“左派”对于党的危险就在于他们醉心于他们的简单的轻率的“共产主义”，会使我们党脱离农民和当地居民中的广大阶层。

这两种危险中哪一种最危险呢？如果“左”倾的同志们今后还想在各地实行用人工方法划分居民阶层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在彻岑和雅库特区实行了，不仅在土尔克斯坦实行了……（伊布拉吉莫夫：“这是分化的策略。”）现在伊布拉吉莫夫想用分化的策略来代替分层的策略（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我说，如果他们今后还想从上面实行分层政策，如果他们以为可以把俄罗斯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特殊的民族环境里去，不考虑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具体条件，如果他们以为同民族主义作斗争就必须抛弃一切民族的东西，一句话，如果边疆地区的“左派”共产党员还不想改正错误，那末我应当说，在这两种危险中“左”倾危险可能成为最大的危险。

这就是我在“左派”和右派问题上所要说的一切。我稍微冒进了一些，但这是因为整个会议冒进了，预先讨论第二项议程了。◇254◇

必须鞭策右派，迫使和教会他们去同民族主义作斗争，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但是也必须鞭策“左派”，教会他们机动灵活，善于随机应变，以便掌握广大的居民群众。这一切都必须做到，因为正如霍札诺夫所正确指出的，真理在“中间”，在右派和“左派”之间。◇255◇

三　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

（关于第二项议程的报告）（六月十日）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草案你们大概都已经收到了。（喊声：“不是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个纲领同第二项议程

的所有各项都有关联。中央用密码电报发出的会议议程大家一定都收到了。

政治局的建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问题是关于加强各共和国和各地区本地的共产党干部的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同实际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具体决议有关的一切问题，这就是：关于吸收当地居民中的劳动分子参加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关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问题；关于按照生活习惯的特点改善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经济状况的问题；◇256◇最后是关于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合作社问题，关于迁移工厂、建立工业基地的问题等等。这一类问题涉及到各地区和各共和国根据当地情况所提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任务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关于共和国联盟的宪法问题，特别是关于因设立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而修改这个宪法的问题。大家知道，最后一类问题是同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有关的。

现在我来谈第一类问题，即关于从本地人当中培养和提高能够成为各边疆地区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栋梁支柱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方法问题。如果拿我们党的发展来说（我是拿党的基本部分即俄罗斯部分来说的），考察一下党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然后照样绘制一幅在最近将来我们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图画，那末我想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一把从边疆地区我党的发展方面来了解这些地区所具有的那些特点的钥匙。

我们党的俄罗斯部分在第一个发展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造就干部，造就马克思主义干部。这些马克思主义干部是在我们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中造就和锻炼出来的。在那个时期（我指的是从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到孟什维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取消派被驱逐出党这一时期），这些干部的基本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中最有生气、最忠诚、最优秀的分

子争取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造就干部，锻炼先锋队。这里首先是同资产阶级性的派别作斗争，特别是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因为它们妨碍把干部团结成统一的整体，团结成党的基本核心。那时同千百万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广泛建立联系的任务，掌◇257◇握这些群众的任务，争取国内大多数的任务，还没有迫切地刻不容缓地摆在党的面前。党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

只有在我们党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阶段上，当这些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核心的时候，当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同情已经争得或者差不多已经争得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掌握千百万群众的任务，把党的干部变成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任务，才迫切地刻不容缓地提到党的面前。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核心与其说不得不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不如说不得不同我们党内的“左”倾分子即各式各样的“召回派分子”作斗争，因为他们企图用革命的词句来代替对一九〇五年以后新局势的特点的认真研究，他们的简单的“革命”策略阻碍了我们党的干部变成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他们的活动造成了使党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危险。未必用得着证明，不同这种“左”的危险作坚决斗争，不消除这种危险，党就不能掌握千百万劳动群众。

反对右派即孟什维克和“左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党的基本部分即俄罗斯部分发展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十分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共产党的这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列宁同志证明，西方的共产党都要经历并且已经在经历与此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我们补充一句，我们边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的发展情形也是这样。

但是应当指出，虽然我们党过去的经历同目前我们边疆地区党组织的经历有类似之处，但是我◇258◇们党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

区的发展仍然有某些重要的特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如果不周密地考虑这些特点，我们在规定从边疆地区本地人当中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的任务时，就有犯一系列极严重的错误的危险。

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些特点。

同我们边疆地区组织中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作斗争是必需的、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培养不出密切联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干部。这是很明显的。边疆地区的特点以及我们党的发展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边疆地区锻炼干部并把他们变成群众性的政党的工作，并不是像我们党过去那样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进行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在那时，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根据当时的条件是可以而且必须**首先**打击孟什维克（为了锻炼马克思主义干部），**然后**打击召回派（为了把这些干部变成群众性的政党），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充满了我党历史上的整整两个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现在党已经执政，执政党需要在边疆地区拥有同广大居民群众有联系的、可靠的本地马克思主义干部。现在我们不能像在我们党过去所做的那样**首先**利用“左派”来击败右的危险，**然后**利用右派来击败“左”的危险，现在我们应当**同时**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力求击败这两种危险，以便能够在边疆地区得到同群众有联系的、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本地干部。那时可以说干部还没有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应当在下一个发展时期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而现在连提这一点都是可笑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能设想马克思主义干部同广大群众没有◇259◇某种联系。这样的干部只能认为是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群众性政党毫不相干的。这一切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并且要求我们边疆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同时同右派和“左派”进行斗争。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对两种倾向的立场。

其次应当指出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并不是像我们党的俄罗斯部分过去那样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我们党的

基本核心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这个核心不仅在造就马克思主义干部方面受过考验，而且在使这些干部同广大居民群众联系方面，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革命的机动灵活性方面也受过考验。边疆地区在这方面的特点是：由于边疆地区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条件，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机动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并利用我们党前一时期的丰富经验来加强同广大居民群众的联系。直到最近，俄共中央通常总是越过边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有时甚至绕过这些组织，直接在边疆地区机动地吸收各民族中一切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来参加苏维埃建设的一般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应当由边疆地区党组织自己来做了。它们可以做这项工作，应当做这项工作，要记住这条道路是把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变成能够领导本地大多数居民的真正群众性政党的最好手段。

这就是在确定我们党在边疆地区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并通过这些干部掌握广大居民群众方面的路线时，所应当周密考虑的两个特点。

现在来谈第二类问题。因为不是每个同志都收到纲领草案，所以我来把它读一下并加以解释。◇260◇

第一、“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的办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是使党的机关特别是苏维埃机关接近居民。必须使这些机关使用广大居民群众所懂得的语言进行工作，否则就不可能使它们接近居民。既然我们党的任务是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群众所亲近的政权，那末只有使这个政权成为群众所了解的政权，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以及机关本身都必须用居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工作。必须把破坏共和国联盟各族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精神的沙文主义分子从机关里驱逐出去，必须把这类分子从我们莫斯科的机关和各共和国的机关里清除出去，指派通晓居民的语言和习惯的本地人领导各共和国国家机关的工作。

我记得两年前柯尔克兹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培斯特柯夫斯基就

没有掌握柯尔克兹语言。这种情况在当时就给加强柯尔克兹共和国政府和柯尔克兹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所以党尽力争取到使柯尔克兹人担任了现在柯尔克兹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此外，我记得去年有一些巴什基里亚的同志建议派俄罗斯的同志担任巴什基里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当时断然否决了这个建议，决定派巴什基里亚人担任这个职务。

任务就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首先是在乌克兰这样重要的共和国内，贯彻这条路线，贯彻使政府机关逐步民族化的路线。

第二、“挑选和吸收当地知识界中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同时应当从党员中培养苏维埃干部”。这一点不需要特别解释。现在，当工人阶级执掌政权，并把大多数居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时候，害怕◇261◇吸收多少对我们忠顺的分子甚至从前的“十月党人”参加苏维埃建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必须吸收所有这些分子参加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作，以便在工作过程中改造他们并使他们苏维埃化。

第三、“召开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由政府委员报告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措施”。我知道在有些共和国内，例如在柯尔克兹共和国内，有许多人民委员不愿意到各地去视察，不愿意出席农民的会议，不愿意在群众大会上讲演，不愿意向广大群众报告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对农民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所进行的工作。这种情况必须结束。必须召开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向群众报告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不这样做就休想使国家机关同人民接近。

其次，“改善当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的措施”。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当然不能认为很全面。这就是：（甲）“开办使用当地语言的俱乐部（非党的）和其他教育机关”；（乙）“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各级学校网”；（丙）“吸收多少对我们忠顺的人民教师”；（丁）“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识字普及协会网”；（戊）“组织出版工作”。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很清楚很容易理解的。因此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

其次，“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局所提出的有关措施是：（甲）“调整移民，有些地方如有必要可停止移民”；（乙）“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当地劳动居民，保证他们都有土地”；（丙）“发放低息农业贷款给当地居民”；（丁）“加强水利工作”；（戊）“把工厂迁到富产原料的共和国去”；（己）“开办工艺学校和技术学校”；（庚）“开办农业训练班”；最后，◇262◇（辛）“大力帮助合作社，其中包括工艺合作社（为了吸引手工业者）”。

我应当谈一谈最后一点，因为它有特殊的意义。过去，在沙皇时代，发展的方式是：富农成长，农业资本增长，中农群众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广大农民群众，广大农业小业主群众不得不在破产和贫困的逆境中挣扎；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当信贷、土地和政权都宣扬在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就不会沿着旧道路发展了，尽管新经济政策的条件还存在，尽管私人资本在复活。有些同志断言由于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似乎不得不重演靠大多数农民的普遍破产来培植富农的旧历史，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在新的条件下，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并掌握经济命脉的时候，就必须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即沿着把农村小业主联合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同私人资本斗争时得到国家的支持）的道路发展，沿着通过合作社逐步吸引千百万农村小业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沿着逐步改善小业主的经济状况（而不是使他们陷于贫困）的道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边疆地区，在这些主要是农民的地区，“大力帮助合作社”对共和国联盟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其次，“关于组织民族部队的实际措施”。我认为，这方面的措施我们制定得太迟了。我们必须建立民族部队。当然，民族部队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可以而且必须着手在各共和国和各地

区开办军事学校，以便在一定时期内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出以后能够成为组织民族部队核心的指挥人员。开始进行并向前推进这项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在土尔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263◇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这样的共和国内有可靠的民族部队和可靠的指挥人员，那末我们共和国无论在防御方面或在采取迫不得已的行动方面就要比现在有保障得多。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军队的数量一定会因此而增加二万到二万五千名，但是不能把这种情况看做不可克服的障碍。

关于其余各项（见纲领草案）我就不谈了，因为它们本身就很清楚，没有解释的必要。

第三类问题是同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和组织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在这里，基本问题，最惹人注目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当然不能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很全面了。

政治局认为第二院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曾经有人建议，除了现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再成立一个不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民族苏维埃。这个方案被否决了，政治局认为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分成两个院比较适宜，其中第一院可以称为联盟苏维埃，由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第二院应当称为民族苏维埃，由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民族地区的区域代表大会选出，每一共和国选举代表五人，每一地区选举代表一人，而选出的代表应经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

至于第二院同第一院关系上的权利问题，我们主张两院享有平等权利。两院应各有一个主席团，可是这两个主席团都不能具有立法职能。两院开会选举一个共同的主席团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的代表。凡提交某一院的任何一项法案，如未经两院通过，都不生法律效力，就是◇264◇说，应当确立两院的完全平等。

其次，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简略地

谈过了。政治局认为，不能容许两个具有立法权的主席团同时并存。既然主席团是最高权力机关，那末就不能把它分成两部分或更多的部分，最高权力机关必须是单一的。因此认为设立一个共同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适当的，这个主席团由第一院和第二院的两个主席团以及两院联席会议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的几个人组成。

其次，关于统一的人民委员部的数量问题。你们知道，根据去年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旧宪法的规定，军事、外交、对外贸易、邮电和铁路五项事务由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集中掌管，其他五个人民委员部是直属的，就是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带有双重的从属性，而其余六个人民委员部是独立的。这个方案曾经受到拉柯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等部分乌克兰人的批评。但是政治局否决了乌克兰人关于把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从统一的人民委员部一类移到直属的一类的建议，根据去年的各项决议的精神基本上通过了宪法的主要条文。

一般说来，政治局在制定纲领草案时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

我认为，关于共和国联盟的宪法和第二院的问题，会议只限于简单地交换意见就够了，何况中央全会委员会〔77〕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关于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实际措施问题，我认为应◇265◇该谈得更详细些。至于提高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干部问题，则应该着重讨论一下。

我认为，在展开讨论以前，先听取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同志根据本地的材料所做的报告是适当的。◇266◇

四　结　论

（六月十二日）

首先我想谈一下同志们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一般地谈谈会议的

性质。虽然这次会议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第四次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是过去一切会议中唯一完满的会议，会上听取了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比较完满的和有根据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干部成长了，并且在学习独立工作。我认为，同志们在这里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同志们在这里所介绍的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工作经验，一定能够用这次会议的记录形式保存下来，成为我们全党的财富。人们成长了并且在前进，他们在学习管理，——这就是从报告中得到的第一个结论，第一个印象。

如果谈到报告的内容，那末可以把提供的材料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告，一类是非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布哈拉、花剌子模）的报告。

现在来看看第一类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国家机关接近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应该认为格鲁吉亚是最发达最先进的共和国。格鲁吉亚后面是阿尔明尼亚。它们后面是其余的共和国和地区。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结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267◇亚的文化水平很高。格鲁吉亚识字人的百分数相当高——百分之八十，阿尔明尼亚至少占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这两个国家走在其他共和国前面的秘密。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识字人多和文化水平愈高的国家、共和国或地区，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就愈接近人民，愈接近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当然，这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正因为如此，这个结论经常被遗忘，人们往往竭力把文化的落后，国家的落后归咎于党的政策“错误”，归咎于纠纷等等，然而这一切的根源是缺乏识字的人，没有文化。要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先进国家，即想使自己的国家制度发达，就必须提高居民的识字能力，提高本国的文化水平，而其他一切也就好办了。

如果从这方面观察问题和根据这些报告估计各个共和国的状况，

那就必须承认，土尔克斯坦的状况，土尔克斯坦目前的情况是最不好最令人不安的。文化落后，识字人的百分数低得可怕，国家机关脱离土尔克斯坦各族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发展速度慢得可怕，——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很明显，从使东方革命化的意义上看，土尔克斯坦是所有苏维埃共和国中最重要的共和国，这不仅因为土尔克斯坦是同东方有最密切联系的民族的总汇，而且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它正插入最受剥削的、储藏了大量反帝国主义火药的东方的心脏。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土尔克斯坦是苏维埃政权最薄弱的地方。任务就是要把土尔克斯坦变成模范共和国，变成使东方革命化的前哨。正因为如此，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土尔克斯坦群众的文化水平，使其国家机关民族化等等方面。我们应当不惜任何力量，不怕任何牺牲，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这项任务。◇268◇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个薄弱的地方应当认为是乌克兰。这里的文化、识字能力等等方面的情况和土尔克斯坦一样或者几乎一样。国家机关也和土尔克斯坦一样，很少接近人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同时，乌克兰对西方各民族也具有土尔克斯坦对东方各民族那样的意义。乌克兰的工业发展的某些特点使它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乌克兰基本工业部门（煤碳工业和冶金工业）不是从下面产生的，不是国民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输入的，是用人工方法从外面建立的。因此这些部门的无产阶级成员都不是本地人，都不说乌克兰话。这种情况使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影响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因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族成分上的这些差异而遇到很大困难。在进行把乌克兰变成模范共和国的工作时，这一切情况都应当估计到。由于乌克兰对西方各民族有巨大的意义，把它变成模范共和国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来谈关于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的报告。我不打算谈花剌子模，因为花剌子模的代表没有出席，而且只根据中央所掌握的材料来批评花剌子模共产党和花剌子模政府的工作是不恰当的。布罗多在这里所

说的关于花剌子模的事情都是过去的。这和花剌子模的当前的情况很少有关系。在谈到党的时候，他说百分之五十的党员是商人等等。也许过去的情况是这样，可是现在那里正在清党，还没有发给花剌子模一张“统一的党证”，实际上那里还没有党，只有在清党以后才谈得上有党。据说那里有几千个党员。我想在清党以后那里至多剩下几百个党员。去年布哈拉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当时那里有一万六千个党员，但在清党以后剩下了不到一千个党员。◇269◇

现在来谈关于布哈拉的报告。在谈布哈拉的时候，我应当首先谈谈关于所听取的报告的总的精神和性质。我认为，关于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报告一般是真实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告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这就是关于布哈拉的报告。这甚至不是报告，而是一套外交手腕，因为把布哈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掩盖起来，粉饰起来，而把一切外表上光辉夺目的东西都提到首位，加以宣扬。结论是布哈拉一切都很好。我认为，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不是为了彼此玩弄外交手腕，互相恭维，背后互相瞒骗，而是为了说出全部真相，用共产党员的精神揭露一切脓疮，割开它们并且开出治病的药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向前迈进。从这一点来看，关于布哈拉的报告和其他一切报告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真实。我在这里向报告人提出关于布哈拉纳季罗夫苏维埃的成员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纳季罗夫苏维埃就是人民委员会。在这里面是否有杰赫坎即农民呢？报告人没有答复。但是据我了解，在布哈拉政府里一个农民也没有。在九个或十一个政府委员中，有富商的儿子、商人、知识分子、毛拉、商人、知识分子、商人，但没有一个杰赫坎。可是，大家知道，布哈拉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国家。

这个问题和布哈拉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个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这个政府是否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是否考虑到本国农民的利益？我只想举出两件事实来说明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布

哈拉政府的政策。例如，从高级负责同志和老党员签署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布哈拉国家银行自开办以来发放给私商的贷款占百分之七十五，发放给农民合作社的贷款只占百分之二。用绝对数◇270◇字来表明：贷给商人七百万金卢布，贷给农民二十二万金卢布。其次，在布哈拉没收土地的工作还没有进行。但是那里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没收了酋长的牲畜……结果怎样呢？从同一文件中可以看出，为农民没收了大约两千头牲畜，其中农民得到的总共只有二百头左右，其余的都卖掉了，当然是卖给富裕的人了。

而这个政府也叫做苏维埃政府，人民政府！几乎用不着证明，在上面所谈的布哈拉政府的活动中，既没有什么人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

报告人很愉快地说明了布哈拉人民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对共和国联盟的态度问题。照他说来，这方面也是一切都很好。原来布哈拉共和国愿意加入联盟。报告人大概认为只要愿意加入共和国联盟，联盟的大门就会敞开。不，同志们，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还必须问一下，是否准许加入共和国联盟？为了能够加入联盟，必须事先在联盟各族人民心目中博得加入联盟的权利，必须为自己争取这个权利。我应当提醒布哈拉的同志们，决不能把共和国联盟看做垃圾堆积处。

最后，在结束我关于报告结论的第一部分时，我想谈谈这些报告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报告人回答会议议程上的一个问题，即本地工作人员中是否还有没有被使用的闲置力量问题。除了格林柯（可是格林柯不是报告人）以外，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各共和国或各地区的本地人中间是否有没有被使用的闲人？如果有，那为什么没有被使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后备力量，而又总是感到工作人员缺乏，那末用◇271◇什么民族的人来填补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空

额？所有这些问题对党都是极其重要的。我知道，在各共和国和各地区有一部分领导人员，主要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员，有时阻挡本地工作人员的进路，阻挠把他们提拔到一定的岗位上，排挤他们。这样的情形是有的，而这就是引起各共和国和各地区不满的原因之一。但是引起不满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是：本地人中间适于工作的闲置的力量少得可怕，很可能完全没有。全部问题就在这里。既然本地的工作人员缺乏，显然就必须派外地的工作人员，其他民族的人去工作，因为时间是不等待人的，建设和管理都必须进行，而本地的干部又成长得很慢。我认为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只字不提这种情况，是有些狡猾的。但是很明显，误解十分之九是由于缺乏本地工作人员引起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把从本地人当中加紧造就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这项工作当做党的一项战斗任务提出来。

关于报告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发言。同志们，我应当指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发言人批评政治局所提出的纲领草案的原则性部分。（喊声：“很难提出批评。”）我认为这是表示代表会议赞同和拥护纲领的原则性部分中所阐述的那些论点。（喊声：“对！”）托洛茨基所作的补充或者说增补（它涉及原则性部分）是应当采纳的，因为这个补充丝毫没有改变决议中原则性部分的性质，并且是从决议的这个部分自然引伸出来的。何况，托洛茨基的补充实质上是对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著名的一点的重复，在那里说到不容许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各地区和各共和国里去。这当然是重复，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有时重复◇272◇一下是没有害处的。因此我不想多谈决议的原则性部分。斯克雷普尼克的发言为这样的结论，即他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这一原则性部分，竭力在基本任务面前，即在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一主要危险作斗争面前，遮盖另一危险——地方民族主义的危险这一结论，提供了某些根据。但是这种解释是极端错误的。

政治局的纲领的第二部分涉及到共和国联盟的性质问题和为设立所谓第二院而对共和国联盟宪法作某些修改的问题。我应当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政治局和乌克兰的同志们是有一些分歧的。政治局的纲领草案中所阐述的各点都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但是某几点曾遭到拉柯夫斯基的反对。这在中央全会委员会内也发生过。也许不应该谈这一点，因为这里并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报告过纲领的这一部分，并且说中央全会委员会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78〕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既然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我就不能避开不谈。

认为邦联和联邦的问题不值一谈是不对的。乌克兰的同志们在讨论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著名的宪法草案时，删去了草案中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句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他们没有这样做吗？为什么他们要删去这句话呢？乌克兰的同志们在自己的反草案中建议不要合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而把它们移到直属的一类，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假如每个共和国都保留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那末哪里还有统一的联盟国家呢？乌克兰人在自己的反草案中主张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力由两院的两个主席团分掌，而把中央◇273◇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力化为乌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拉柯夫斯基的所有这些修正中央全会委员会都记录下来了，并且加以分析研究，结果都被否决。那末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重复它们呢？我从某些乌克兰同志的这种固执中看出一种意图，这就是在确定联盟的性质问题上竭力使联盟成为某种介于邦联和联邦之间而又偏重于邦联的中间物。但是很明显，我们要建立的不是邦联，而是共和国联邦，是一个统一管理军事、外交、对外贸易以及其他事务的联盟国家，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不会缩小各个共和国的主权的。

如果我们在联盟内设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等，而同时在各加盟共和国里也设有所有这些人民委员部，那末很明

显，整个联盟对外就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合并这些机关而作为一个统一的联盟出现在外敌面前，或者是我们不合并这些机关，不建立联盟国家，而组成共和国的混合体，那末每个共和国都必须有自己的平行机关。我认为这里的真理是在曼努伊里斯基同志方面，而不是在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方面。

关于国家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纯系具体实践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部分和政治局的实践建议有关，部分和作实际工作的同志可能在这里提出的修正有关。我作为政治局的报告人没有说也不能说政治局的具体的实践建议很全面。相反地，我一开头就声明，这里可能有疏忽的地方，作一些补充是不可免的。斯克雷普尼克提出的关于工会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补充。这个补充是可以接受的。米高扬同志提出的一些补充我也采纳了。关于某些落后共和国和落后地区的出版工作和一般◇274◇报刊的基金问题，确实必须提出修正。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关于某些地区甚至某些共和国的学校问题也被忽略了。初级学校没有被列入国家预算。这的确是疏忽，而且类似这样的疏忽可能还很多。因此我建议那些对自己组织的情况谈得很多而具体建议提得很少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并向中央提出有关的具体补充、修正等等，中央把它们汇集以后，就可以补充到有关各项里去并分发给各级组织。

我不能不谈谈格林柯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必须规定一些优待条件，使文化水平较低或者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民族中的本地人易于入党和被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里去。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认为也应当采纳。

我在结束我的结论时提出下列建议：以政治局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草案为基础，同时也考虑到托洛茨基的修正。建议中央委员会把现有的和可能提出的具有实践性质的修正分别加到纲领的有关各项里去。建议中央委员会在一星期内把纲领草案、记录、决议、报告人留下的

是重要的文件印发给各级组织。不必成立专门委员会来通过纲领草案。

我没有谈到成立中央民族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同志们，我对成立这样的组织是否适当有些怀疑，第一、因为各共和国和各地区肯定地不会为这件事派给我们高级工作人员。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第二、我想，区域委员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一定不会同意把自己在分配工作人员方面的部分权利转让给中央直属的委员会。现在我们在分配人力时，通常都征求区域委员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如◇275◇果成立了这个委员会，重心自然就会移到委员会方面。民族问题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或农民工作问题委员会没有相似之处。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合作社委员会通常拟定一般指示。而民族问题方面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指示，而是拟定各个共和国和各个地区的具体步骤，这是一般委员会做不到的。任何委员会未必都能拟定和通过任何一项决议，例如关于乌克兰共和国的决议：两三个乌克兰人不能代替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不会产生重大效果的。这里所提出的那个步骤，即把民族干部派到中央各主要部门里去，我认为在目前已经足够。如果半年后没有显著成绩，那时就可以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276◇

五　对发言的答复

（六月十二日）

因为有人向我进攻，（笑声）请允许我回答关于“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问题。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在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第七点里斥责了“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这种说法。显然，这里说的不是成立“不可分的整体”，而是成立联邦，然而乌克兰人却硬要我们成立邦联。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拉柯夫斯基。我再说一遍（这一点我已经谈过

一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中载明，某某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人寄给中央一个反草案。其中说道：某某共和国“**组成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句话被删去了。总共删去了九个字。为什么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哪里还有联邦呢？我认为拉柯夫斯基的邦联制的萌芽还表现在：他删去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中著名的一条所说的主席团是“常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的代表”那句话，主张权力由两院的两个主席团分掌，就是说把联盟的权力化为乌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反对建立联盟国家的思想，反对建立真正的联盟政权，这是第二。◇277◇

第三是乌克兰人的草案不主张合并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而主张把它们从统一的一类移到直属的一类。

这就是使我在拉柯夫斯基的建议里看到的邦联萌芽的三点依据。宪法原文也是由乌克兰代表团通过的，你和宪法原文之间怎么会有这种分歧呢？（拉柯夫斯基：“已经有过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对不起，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你的修正，并通过了“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句话。

我看到，在从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这次会议期间，某些乌克兰同志已经逐渐从联邦制转向邦联制。我是赞成联邦的，就是说我反对邦联，反对拉柯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的建议。◇278◇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住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末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279◇阶层，首先是农民，好像生来就是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的发展方针，使无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过早”发动革命。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就从“原则上考虑”，把中间阶层完全交

给资本支配。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达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79〕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280◇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产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它不顾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一切“理论”和哭诉而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这里一般也称得上功绩的话。

但是：问题不限于此。十月革命还更进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上面已经说过，各被压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说明“被压迫民族”这一概念。被压迫民族通常不仅作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受压迫，而且作为民族，即作为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劳动者受压迫。双重压迫的压力不能不使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他们去同压迫的基本力量作斗争，去同资本作斗争。这种情况就成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结合，而且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战争”结合的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出俄国国境以外，不能不使资本的最深远的后备力量受到打击。如果说争取统治民族内部的中间阶层的斗争是争取资本的最接近的后备力量的斗争，那末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争取资本的某些最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摆脱资本压迫◇281◇的斗争。后面这一种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甚至还没有取得第一批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这个争取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并且它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实力的增长、随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而一步步扩展开来。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真正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争取资本的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开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举起了争取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功绩。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土地，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战胜了地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政权，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了解到他们的解放过程过去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的红旗下进

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从前农民所害怕的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吸引他们注意并促使他们摆脱愚昧、贫困和压迫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给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义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第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现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从前，在极◇282◇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末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无庸置疑，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话，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像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思想扫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内的中间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阶层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这些阶层所欢迎的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个功绩。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283◇

斯大林接见女先进工作者

集体农庄里的妇女们

女“康拜因”手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80〕五周年

五年前，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多人，代表着不下一百万劳动妇女。这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党的劳动妇女工作上是一个里程碑。这次代表大会的不可估量的功绩在于，它为组织我们共和国女工和农妇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有些人会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党对群众（其中也包括妇女）是经常进行政治教育的，既然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工农干部，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就不会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论断是根本不对的。现在，当政权已经转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时候，对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原因如下：

我国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至少半数是妇女，主要是女工和农妇，她们备受压抑，觉悟很低，愚昧无知。我们的国家已经认真动手建设苏维埃新生活了，如果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今后仍然受到压抑，没有觉悟和愚昧无知，她们就一定会成为一切前进运动中的绊脚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284◇

女工和男工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和男工一起进行我国工业建设的共同事业。如果她们是觉悟的，如果她们受到政治教育，她们就能推进共同事业。但是，如果她们受到压抑和愚昧无知，她们就会戕害共同事业，这当然不是出于她们的恶意，而是由于她们的愚昧无知。

农妇和农夫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和农夫一起推进发展和繁荣我国农业的共同事业。如果她们能摆脱愚昧无知，她们就会给这一事业带来莫大的好处。相反地，如果她们今后仍然做愚昧无知的俘虏，它们就会阻碍整个事业。

女工和农妇同男工和农夫一样是自由的公民。她们选举我们的苏维埃、我们的合作社，她们也可以被选入苏维埃、合作社。如果女工和农妇受到政治教育，她们就能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和合作社，使它们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女工和农妇愚昧无知，她们就会削弱并破坏苏维埃和合作社。

最后，女工和农妇是我们青年——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母亲和教养者。她们能摧残孩子的心灵，也能为我们教养出心理健全、能把我们国家推向前进的青年，这要看做母亲的是同情苏维埃制度还是做神甫、富农、资产阶级的尾巴。

正因为如此，现在，当工人和农民动手建设新生活的时候，对女工和农妇的政治教育工作是真正战胜资产阶级的头等重要的工作，极其重要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确是不可估量的，它为组织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285◇

五年前，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党的当前任务是吸引几十万**女工**参加建设苏维埃新生活的共同工作。当时站在最前列的是工业区的女工，她们是劳动妇女中最活跃最觉悟的分子。应当承认，五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党的当前任务是吸引千百万**农妇**参加建设我们苏维埃生活的共同工作。经过五年的工作，已经从农妇的队伍中选拔出许多领导者。我们希望农妇领导者的队伍能有新的觉悟的农妇来补充。我们希望党也能完成这项任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女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
署名：约·斯大林◇286◇

在军事学院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简要报道）

在我们红色骑兵建立四周年的庆祝大会上，骑兵集团军的创始人及其光荣的红色战士**斯大林**同志发表了演说。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在组织骑兵的基本核心这个未来的骑兵集团军的萌芽的时候，它的首倡者同军事领导集团和军事专家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根本否认有组织骑兵的必要。

骑兵集团军历史上最突出的一页是：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们的骑兵已经成为大量骑兵和大批机枪的结合。有名的“塔昌卡”就是这种结合的标志。

无论我们的骑兵怎样强大，如果它在作战时不善于把马的力量同机枪和炮的力量结合起来，它就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载入骑兵集团军史册的最光荣的一页是：一九一九年年底，在通向沃龙涅什的道路上，我们骑兵的十二个团打垮了敌人的二十二个团。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骑兵就开始真正成为骑兵集团军。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我们的骑兵又具备了一种使它能够战胜邓尼金骑兵的新的特性。这就是：它把若干步兵部队和自己联结起来，通常用大车调运步兵部队，并且用步兵部队作为抗击敌人的掩护，以便在其掩护下稍稍休息，聚集力量，重新打击敌人。这就是骑兵和作为辅助力量的步兵的结合。这种结合，这另一种新的性质，使我们的骑兵变成一个挥动自如、坚强有力的拳头，使敌人胆颤心惊。

斯大林同志在结束演说时说：同志们，我并不是一个易于陶醉的人，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们的骑兵集团军能够把这些新的性质保

持下去，我们的骑兵和它的领袖布琼尼同志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消息报”第二六五号◇288◇

关 于 党 的 任 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说明，在这里我不是代表党中央，而是以个人名义来做报告的。如果会议愿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就来谈谈。（喊声：“请讲吧。”）这并不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央有什么分歧，——绝对没有。我以个人名义讲话，只是因为中央关于制定改善党内状况办法的委员会〔81〕最近就要向中央呈报自己工作的结果；这个结果还没有呈报，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合法权利代表中央讲话，虽然我相信，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基本上会把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表达出来。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意义问题。这次争论说◇289◇明什么呢？它标志着什么呢？这是不是一场闯入党内平静生活的暴风雨？这次争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党瓦解和崩溃的标志，或者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党蜕化的标志？

同志们，我认为都不是：既不是蜕化，也不是瓦解。事实上，党在最近时期壮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废物，它更加无产阶级化了。你们知道，两年前我们至少有七十万党员，你们知道，当时有好几千党

员退出了党或者被驱逐出党。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由于熟练的老工人从农村归来，由于在产业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涨的新浪潮，党的成员改善了，党的质量提高了。

一句话，由于这一切条件，党壮大了，质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东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了。

已经展开的争论不是党软弱的标志，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标志，而是党有力的标志，党坚强的标志，党的成员质量改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

争论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恰恰在目前时期，恰恰在今年秋天，党内政策问题具有尖锐的性质。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原因在哪里呢？同志们，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290◇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八月我国某些地区因工资问题而掀起的不满和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我们一些组织的缺点，暴露了我们一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过问企业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现象；这次罢工浪潮也暴露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力求瓦解党的、实质上是反共的秘密组织。所有这些因罢工浪潮而暴露出来的缺点都以如此耀眼的闪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线映射到党的身上，使党感到必须改变党内状况。

党内政策问题恰恰在这个时期尖锐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员同志大批休假。休假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党内生活的节拍恰恰在工厂里产生不满情绪的时候大大地缓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积累下来的缺点恰恰在今年秋天这个时期暴露出来。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的问题。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像有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样是党的路线不正确？或者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而被歪曲了？

我认为我们党内生活的主要缺点是：虽然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区）上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民主◇291◇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

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历次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我们的地方组织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根源。

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问题（当然，那些急待解决的或者有关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问题除外）一定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党的路线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党的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实践却认为：党内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因为中央和其他领导组织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路线说，如果没有像党龄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碍存在，我们党的负责人就一定要由选举产生。你们知道，按党章规定，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党龄，支部书记必须有一年党龄。但是党的实践却往往认为，既然需要党龄，那就是说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了。

党的路线认为，必须使党员群众了解经济机关、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支部对企业中的缺点一定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

的责任。然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中央委员会向经济机关发布指示，既然经济机关受这些指示的约束，即使没有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指示也是会被执行的。

党的路线认为，各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论是党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或军事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专业，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要有联系，他们都是一个◇292◇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工作，而这个事业是不能分裂成几部分的。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工作上的专业化，有党本身的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等等的分工，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经济工作人员负责，经济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党的工作人员负责，一般说来，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们，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从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止）的一系列决议中所确定的党的路线和党的实践之间的那些矛盾，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我决不因为党的路线被这样歪曲而责备地方组织，因为，如果分析一下，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地方组织的过错，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幸。这种不幸表现在哪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讲到，但是，我想把这一事实肯定下来，以便解释这种矛盾，然后试图提出改进办法。我也决不认为我们中央没有过错。它同其他一切机关和组织一样也有一些小过错，——中央在这里也有一部分过错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这一部分过错，至少表现在它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没有设法克服这些缺点。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问题是要弄清我刚才讲过的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这些缺点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把它们消灭呢？◇293◇

造成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还没有铲除或者至今还没有铲除战争时期的某些残余，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头脑中留下了党内军事作风的残余。我认为这些残余表现在下面这种对党的看法上：党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战斗组织，而是某种类似机关系统的东西，某种由低级职员和高级职员组成的、类似许多机关的综合体的东西。同志们，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它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战争时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残余，那时我们使党军事化，不得不把党员群众的自动性问题挪到次要地位，那时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不记得这种看法是什么时候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看法的因素仍然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同志们，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这种看法作斗争，因为它是一种最现实的危险，它造成有利条件，使我们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受到歪曲。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一九一七年，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将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在最近时期内，那末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要◇294◇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分子，要把苏维埃社会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人民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围必须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军，保存常备军是需要大量的开支和庞大的机构的，因此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

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主义化。

同志们，造成缺点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些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边疆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支部很不积极，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给歪曲党的路线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听过一个乌克兰组织的代表的报告。做报告的同志极有才能，前途远大。他说，一百三十个支部中有八十个支部的书记是由省委会委派的。这位同志驳斥了认为这个组织这样做是不对的意见，他所持的理由是支部里没有识字的人、没有够党龄的人以及支部自己请求派书记给它们等等。我可以说，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说得过火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不但在于支部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而且在于省委会过于热心和沿袭旧传统。但是，如果省委会有百分之五十正确，那末，既然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在组织很年轻、党员干部和识字的人都比乌克兰少的边疆地区就更应该有这样的支部，这难道还◇295◇不明显吗？这也是造成有利条件，使我们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受到歪曲的一个原因。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的通报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报工作做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工作过于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们汇报。应该结束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我们党内的缺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们党内的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统，而不是积极思考、独立活动、充满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296◇

第三、如果没有像党龄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末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时，必须从实践中铲除忽视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现象，必须真正贯彻选举原则。

第四、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下面必须有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必须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必须使各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周围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检验我们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必须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们是支部的代表，你们一定知道我们生产部门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负

的道义上的责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领导并带领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负责（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的责任），就应该了解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须吸引支部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经常举行有托拉斯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经济会议来讨论与托拉斯各项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为丰富党员群众在经济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297◇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末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

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298◇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第八、必须加强农民工作。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支部枯萎了，它们的成员有时跑掉了，它们没有得到农民很大的信任（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向这些支部提出一些实际任务，例如提出下面两项任务：第一、解释和宣传同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律；第二、宣传和普及农艺基本知识，例如必须按时耕地，必须选种等等。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决心花一点工夫去选种，那末不经过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机器，每俄亩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左右？每俄亩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总产量每年增加十亿普特。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工作呢？难道这不比谈论克逊的政策重要吗？只有这样做，农民才能了解共产党员已经停止空谈，已经行动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农村支部才能得到农民极大的信任。

关于在能够提供新干部的青年中、在红军中、在妇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党人士中加强党的教◇299◇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是多么必要，我就不讲了。

加强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通报工作即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报工作对于我们是多么必要，我也不多讲了。

同志们，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规定的必须自下而上实行的改进办法，也就是党内民主的方针。

现在我想谈谈“真理报”上一些争论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的过分的看法。

第一种极端看法表现在选举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量选举吧！党龄吗？为什么要它呢？选你愿意选举的人吧。同志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战争，我们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清党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时，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失败的恐惧使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执行党的总路线。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这些箍了，因为已经没有战争了，现在我们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都使党纯洁，使党巩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资产阶级出生和成长的新气氛笼罩着我们，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开始清党，把党员的人数减少了◇300◇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决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使它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必须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条件更严格，必须规定党内负责人的党龄等等。党制定了这些限制“扩大的”民主的预防办法，是否做得对呢？我认为是做得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主是必需的，选举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办法，也应当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种极端看法表现在争论的范围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

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的积极的方面。至少腊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腊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腊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301◇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老实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鼓掌）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真理报”第二七七号◇302◇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关于争论

几星期以前展开的关于党内状况的争论，如果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情况看来，大概快要结束了。大家知道，彼得格勒拥护党的路线。莫斯科各个主要的区也拥护中央的路线。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市积极工作人员大会表示完全赞同党中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理由怀疑，即将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党代表会议一定会走莫斯科各区所走的道路。反对派，即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土柯夫、皮达可夫等）同所谓民主集中派（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等）的联盟，已经溃不成军。

争论的过程和反对派在争论期间的那些变化都是值得注意的。◇303◇

最初，反对派简直就要求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反对派要求彻底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同时坚决主张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禁止派别活动、规定党龄等等）。可是反对派并不以此为限。它还硬说党实际上已经变成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而要求自上而下整刷党机关

的全体成员，要求撤换主要工作人员等等。对中央的恶言和谩骂当然是够多的了。“真理报”载满了控诉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还没有把日本的地震归罪于中央罢了。

这个时期，整个中央都没有干预“真理报”上的争论，让党员完全自由地进行批评。中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驳斥批评家们常常提出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责难，认为党员有充分的自觉来独立解决所讨论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一个时期。

后来，恶言使人生厌了，谩骂不起作用了，党员要求认真讨论问题了，于是争论就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82〕公布后开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央十月全会〔83〕赞同党内民主方针的决定制定了一项有名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这样一来，争论的进程就发生了转变。现在已经不能局限于一般的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划，要求反对派或者接受这个计创，或者提出另外一个实行党内民主的、平行的、同样具体的计划。可是反对派无力提出一个自己的能够满足各级党组◇304◇织要求的计划来同中央的计划对抗。反对派开始退却了。取消近两年来党在党内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已经在反对派的武库中消失了。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限制民主办法的要求已经黯然无色了。自上而下整刷机关的要求缓和下来了，放到后面去了。反对派已经认为有必要用必须“确切阐明派别组织问题”、“改选过去委派的一切党机关”、“废除委派制”等等提议来代替这一切要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反对派的这些已经缓和了数倍的提议也被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的组织否决了，这两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二个时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对派继续退却，可以说是狼狈退却。连那些已经褪了色的、缓和了数倍的要求也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勾销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近向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提出的决议案（似乎已经是第三个）中写道：

“只有同心协力和真心诚意地迅速执行政治局的决议，特别是通过改选来革新党内机关，才能保证我们党没有震动和没有内部斗争地转到新的方向，才能加强党的队伍的真正团结和统一。”

就连反对派的这个完全没有害处的提议也被大会否决了，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关于“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这也不是偶然的。◇305◇

关于拉法伊尔

我认为拉法伊尔是目前反对派，或者确切些说，是目前反对派联盟最忠实最典型的代表。拉法伊尔在一次辩论会上说，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整刷党的全部机关，整刷这个不中用的、违背真正的党性的机构。据我看来，在目前反对派分子的头脑中是存在着这种或与此类似的思想的，但是，他们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把这种思想暴露出来。应当承认，拉法伊尔在这方面要比他的反对派同伙勇敢。

不管怎样，拉法伊尔的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对的。他的说法不仅在形式上不对，而且首先在实质上不对。因为我们党如果的确已经变成或者只是开始在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那末我们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革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什么是军队呢？

军队是从上面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军队的实质在于：领

导军队的是司令部，它由上面任命，按照强制原则编制军队。司令部不仅要编制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鞋袜等等。全军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司令部。军纪也建立在这上面，违犯军纪就要受到特殊的最严厉的处罚——枪决。也正因为如此，司令部仅仅根据自己的战略计划就能随时随地调动军队。◇306◇

什么是党呢？

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也有自己的司令部，但它不是由上面任命，而是由全党自下选举的。不是司令部编制党，恰恰相反，是党编制自己的司令部。党本身是根据自愿原则编制起来的。在党的司令部和全党之间没有上面所说的军队中的那种物质上的依赖关系。党的司令部不供给党给养、食物和被服。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司令部不能随时随地任意调动党的队伍，党的司令部只能根据本阶级（党本身就是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领导全党。因此，党纪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主要以说服方法为基础，而和主要以强制方法为基础的军纪不同。因此，党内最严厉的处罚（开除党籍）和军队中最严厉的处罚（枪决）有根本的差别。

只要把这两个定义比较一下，就能了解拉法伊尔的错误多么严重。

他说，党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但是，既然党在物质上不依赖自己的司令部，既然党是根据自愿原则自下建立起来的，既然党自己编制自己的司令部，那末党怎么能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呢？如果党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那末工人源源不断地入党，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在全世界劳动阶层中间享有威望，又怎样解释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党是极其消极的，被动的，——那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消极而被动的党怎么能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好几年来一直管理着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307◇

或者党是积极的，自动的，——那就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积极而自动的党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废除党内的军事制度，假如党内真有这种制度的话。

我们党进行了三次革命，击溃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正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党一星期也不能容忍拉法伊尔轻率地所说的那种军事制度和命令制度，它不等到拉法伊尔发出号召就会立刻废除这些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事实是，第一、拉法伊尔把党和军队混为一谈了，因为他显然既没有真正了解党，也没有真正了解军队。第二、看来拉法伊尔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发现。他所以要说党内有命令制度这类“可怕的”话，是为了论证目前反对派的基本口号：（甲）要有派别活动的自由；（乙）从上到下撤换党的领导人。

看来，拉法伊尔感到不说这类“可怕的”话就不能偷运这些口号。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不正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有两年了”，“新经济政策时期◇308◇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是不正确的。

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党通过这项决议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是正确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规定了严格限制民主的办法（禁止派别活动）。党规定这种限制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限制会束缚党的独立思考。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限制民主的新办法（规定一定的党龄

等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这些限制。党规定这些限制来防止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侵袭，这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限制会束缚各级党组织的自动性。结论很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取消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新经济政策情况下通过的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关于统一的决议）是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争取通过的。关于进一步限制民主（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的决议是列宁同志亲自参加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提议取消同列宁主义有着有机联系的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路线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开始懂得，他提议取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实质上就是重复那个要求修正列宁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匿名纲领”〔84〕中的某些提议呢？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党是不会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道路的。◇30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议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提议不折不扣就是恢复“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党内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当时的特点是：我们党内存在着派别集团，公开进行派别斗争，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至少“局部地”恢复这种已被第十次代表大会废除的党内制度。党能不能走这条道路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恢复新经济政策施行前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党在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即一九二三年条件下的要求。第二、因为恢复过去的派别斗争制度必然会破坏党的统一，特别是现在，在列宁同志不能视事的时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爱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党内生活状况描绘成一种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党内生活有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党的极大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理想的”旧制度呢？

显然，党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种“恢复”的。◇310◇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萨普龙诺夫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机关里存在着“党学究”和“女学监”，他们按照“学校方法”来“教育党员”，因而阻碍了党员在斗争过程中受到真正的教育。这样，萨普龙诺夫就把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成了“女学监”，他却不想问一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党学究”怎么会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占优势。萨普龙诺夫把这种极其危险极能蛊惑人心的论点当做已经证实的东西提出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格言，他首先应当了解现象（如果自然界的确有这种现象），说明现象，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可是，萨普龙诺夫显然是不理会马克思主义的。他不管怎样都要辱骂党的机关，以为这样做，其他一切就好办了。照萨普龙诺夫看来，“党学究”的恶意就是造成我们党内生活缺点的原因。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解释。

不过有两点令人不能理解：

（一）这些“女学监”和“党学究”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二）受“女学监”教育的我们“党的学生”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的领导？

显然，空谈“党学究”无论如何要比了解和评价我们党机关的极大的优点容易得多。

萨普龙诺夫打算怎样医治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呢？他用的药像他的诊断一样简单。“重新审查◇311◇我们的军官”，撤换现在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萨普龙诺夫所用的药。他认为这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我决不否认，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改选对改进我们党内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这一点看做基本保证，那就是既不了解党内生活，也不了解党内生活的缺点。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晋哥里茨、皮达可夫、阿里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晋哥里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而是痛哭；阿里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萨普龙诺夫是否认为，由上面列举的那些“可敬的同志”来代替现在的“党学究”，民主就能在党内取得胜利？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

显然，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自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工人的党内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首先必须铲除我们某些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

的那些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使他们不再把党看做一个机关系统，而看做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可是这些残余在最短期间是铲除不了的。

其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消除我们拥有近百万职员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只有两三万◇312◇工作人员的党机关所加的压力。但在最短期间是不能摆脱这部笨重机器的压力并使它服从自己的。

最后，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提高我们许多落后支部的文化水平，并且把积极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到全联盟的各个地区。这一点也不是最短期间所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保证充分的民主，并不像萨普龙诺夫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当然，如果指的不是萨普龙诺夫的那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工人的民主的话。

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和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必须自下而上集中全党的意志。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十二月七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可以预料，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地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托洛茨基在讲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讲到老近卫军即我们党的基本核心列宁主义者有蜕化危险的时候写道：◇313◇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

卜克内西、倍倍尔、津盖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末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

第一、我必须消除一种可能引起的误解。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命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以此表示他有决心承担那些可能落到老近卫军头上的责难，如果老近卫军真正走上蜕化道路的话。应当承认，这种自我牺牲的决心无疑是一种可贵的优点。但是，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理由很简单：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承担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骨干可能蜕化的责任。牺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老布尔什维克需要这种牺牲吗？我认为不需要这种牺牲。

第二、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把像伯恩施坦、阿德勒、考茨基、盖得等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同一直反对而且一定还会光荣地反对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314◇军混为一谈呢？这种混淆不清的糊涂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别有用心地抱着某种决不是以维护老近卫军为目的的想法，那末谁需要这种糊涂思想呢？关于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染上机会主义的那种暗示，又怎样理解呢？

第三、我决不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有蜕化的危险，正像没有理由断言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地震一样。可以而且应当设想，这

种危险是**可能**发生的。但这是不是说，这种危险是**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危险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说明蜕化的危险是现实的危险。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会使我们党的某些队伍产生真正蜕化的危险。我指的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加入我们党是**不得已的**，而且还没有根除机会主义的旧习气。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清党时期关于这些孟什维克和这种危险所写的一段话：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而孟什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像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起初可能而后无疑会获得胜利时混入俄国共产党的全部孟什维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十一页）

托洛茨基怎么会忽视这一类实际存在的危险，而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蜕化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打算破坏中央大多数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315◇的领导核心的威信，那末怎么能闭眼不看现实的危险，而把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这种“见解”只能有利于反对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四、托洛茨基怎么会把可能蜕化的“老头子”和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青年”对立起来，把可能官僚主义化的“老近卫军”和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的“青年近卫军”对立起来呢？怎么会把他们对立起来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呢？难道青年和老近卫军不是向来就团结一致地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吗？难道“老头子”和“年轻人”的团结不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吗？怎么会侮辱老近卫军并蛊惑性地阿谀青年，在我们党的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造并扩大裂缝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党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出发，而不是想动摇党

的统一以迎合反对派的心意，那末谁需要这样做呢？

难道是这样来维护中央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吗？

可是，当托洛茨基写信给各地党的会议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维护中央决议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对派反对党中央。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两面性的痕迹。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论的政治意义。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八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316◇

必 要 的 指 摘

（关于拉法伊尔）

我在“真理报”（第二八五号）上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等等”那篇文章中说，按照拉法伊尔在勃列斯尼亚会议上的说法，“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整刷党的全部机关，整刷这个不中用的机构”。关于这一点，拉法伊尔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正确地表达他的见解，说我“在激烈论战时”把他的见解“简单化了”等等。拉法伊尔说，他只不过是拿党和军队相比拟（相比较）罢了，而相比拟并不是说相等。他说：“说党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领导方式相类似，并不等于把它们看成一模一样，而只是把它们加以对比罢了。”

拉法伊尔说得对不对呢？

不，不对。原因如下：

第一、拉法伊尔在勃列斯尼亚会议上的发言并不像他现在所说的那样只是简单地把党和军队相比较，而是实际上把党和军队等量齐观，因为他认为党是按照军队的型式建立起来的。在我面前放着拉法伊尔本人审阅过的发言速记记录。记录中说：“我们全党自下而上都是按照军队的型式建立起来的。”未必可以否认，这里不是简单的比拟，而是把党的结构和军队的结构相提并论，等量齐观。◇317◇

能不能说我们党是按照军队的型式建立起来的呢？显然不能，因为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党在物质上并不依赖它自己选举出来的司令部；但是，大家知道，军队却是根据强制原则从上面建立起来的，它在物质上完全依赖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面任命的司令部。如此等等。

第二、拉法伊尔不是简单地把党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领导方式相比较，而是“干脆”把前者和后者相提并论，等量齐观。请看拉法伊尔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话：“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领导方式是相同的，这不是根据某些不相干的理由，而是根据对党内状况的客观分析。”不可能否认，拉法伊尔在这里并不是仅仅把对党的领导和对军队的领导相比拟，因为他“简直是”“干脆”把这二者混同起来了。

能不能把这两种领导方式混同起来呢？不，不能。因为作为一种方式来说，军队的领导方式无论同党的本质或者同党教育党员和争取非党群众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

第三、拉法伊尔在他的文章中断言，全党的命运和每个党员的命运归根到底是由中央登记分配局决定的，“党员被看做是动员来的，**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由登记分配局分配的，任何人都没有支配自己的丝毫权利，供给的多少即工资以及工作的形式等等都是由登记分配局或‘司令部’决定的”。这些话说得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在和平时期，由中央登记分配局分配工作的通常一年内只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从中央委员会向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85〕中可以知道，一九二二年由中央登记分配局分配工作的有一万零七百人（即比一九二一年减少了一半）。如果从这个数目中除去由各地派往◇318◇学校的一千五百人和因病休假的人（四百多人），大约还剩下八千多人。其中由中央分配的负责工作人员一年内有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即不到由登记分配局分配的总人数的一半）。但是当时全党的人数既不是五千，也不是一万，而是五十万左右，因此，大多数党员的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中央登记分配局分配的，显然，拉法伊尔忘记了在和平时期中央通常只是分配负责工作人员，忘记了中央登记分配局没有规定、不可能也不应当规定全体党员（其人数现在已超过四十万）的“工资”。拉法伊尔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可笑地加以夸大呢？显然是为了“用事实”

来证明党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领导方式是“相同”的。

事实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拉法伊尔“既没有真正了解党，也没有真正了解军队”。

至于拉法伊尔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引来的那些话，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所讲的只是我们党内战争时期的残余，而不是所谓“党的领导方式和军队的领导方式相同”问题。

拉法伊尔说得对，必须改正错误，不应该坚持错误。正因为如此，我对拉法伊尔终究会改正他所犯的错误这一点没有失掉希望。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四号
署名：约·斯大林◇319◇

致“共产党人报”〔86〕的贺电

衷心祝贺“共产党人报”第一〇〇〇号出版。希望它成为照耀东方劳动群众走向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的可靠灯塔。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巴库工人报”第二九四号
（总第一〇二二号）◇320◇

附　录

附录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起，世界各国就分成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是民族仇视和不平等，是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沙文主义，是民族压迫和蹂躏，是帝国主义的兽行和战争。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相互信任和和平，是民族自由和平等，是各族人民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

数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企图用各族人民的自由发展同人剥削人的制度结合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结果。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线团愈搞愈乱，它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资产阶级显然已无力建立各族人民的合作了。

只有在苏维埃阵营里，只有在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创造相互信任的环境，奠定各族人民兄弟合作的基础。◇321◇

只是由于这些情况，各苏维埃共和国才击退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即国内外帝国主义者的侵犯。

只是由于这些情况，各苏维埃共和国才胜利地扑灭了国内战争，保障了自己的生存，并着手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

可是连年战争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田地荒芜、工厂停工、生产力遭到破坏和经济资源枯竭的现象，使得各个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仅仅靠单独努力就不够了。在各个共和国单独存在的

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恢复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和新的侵犯的威胁，使得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包围。

最后，就阶级本质来说，苏维埃政权是国际主义的政权，因此它的结构本身就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群众走上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路。

所有这些情况都无条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

不久以前，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都举行了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他们的这种意志就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它保证这个联盟是各个不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加入联盟。新的联盟国家将是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已确立的各族人民和睦◇322◇共处和兄弟合作原则的辉煌实现，它将成为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靠堡垒，将是各国劳动者联合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已经体现在授予我们全权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里面。当我们，这些共和国的代表们，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宣告，并庄严地宣布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不可动摇的时候，根据授予我们的全权，决定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323◇

附录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三共和国组成）以下列各点为基础缔结本联盟条约，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机关行使下列职权：

（一）代表联盟发生国际关系；

（二）变更联盟的国界；

（三）缔结接收新共和国加入联盟的条约；

（四）宣战和媾和；

（五）订借外债；

（六）批准国际条约；

（七）规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制度；

（八）规定全联盟国民经济的原则和总计划，并缔结租让合同；◇324◇

（九）调整运输和邮电工作；

（一〇）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组织原则；

（一一）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一的国家预算，规定铸币制度、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并规定全联盟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税收制度；

（一二）规定全联盟境内的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以及矿藏、森林、水流使用的一般原则；

（一三）制定全联盟的移民法；

（一四）规定法院组织和诉讼程序的原则，并制定联盟的民法和刑法；

（一五）制定基本的劳动法；

（一六）规定国民教育的一般原则；

（一七）规定人民保健方面的一般办法；

（一八）规定度量衡制度；

（一九）组织全联盟的统计；

（二〇）制定联盟国籍和外籍人权利的基本法律；

（二一）决定大赦；

（二二）撤销各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与联盟条约相抵触的决议。◇325◇

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联盟最高权力机关。

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市苏维埃代表每二万五千选民选举一人；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每十二万五千居民选举一人。

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

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如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两个以上加盟共和国的提议，可以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按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口比例从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中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共三百七十一人。

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每年举行三次。如果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要，或者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或某一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议，可以召集非常会议。

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规定的程序依次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举行。

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主席团，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闭会◇326◇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联盟最高权力机关。

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十九人组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加盟共和国的数目从中选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四人。

十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机关，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其任期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外交人民委员，

陆海军人民委员，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交通人民委员，

邮电人民委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劳动人民委员，

粮食人民委员，◇327◇

财政人民委员。

十二、为了确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的革命法制并把各加盟共和国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最高法院，执行最高审判监督权；而

在联盟人民委员会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其主席参加联盟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

十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各加盟共和国必须执行，并直接在全联盟境内施行。

十四、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议用各加盟共和国通用的文字（俄罗斯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格鲁吉亚文、阿尔明尼亚文、突厥语系各种文字）公布。

十五、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对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和决议的异议，但不得停止执行。

十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才能撤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的命令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联盟人民委员会才能撤销。

十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的命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在该命令显然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由各加盟共和◇328◇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停止执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应将停止执行命令这一情况立即报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的人民委员。

十八、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人民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农业人民委员，

粮食人民委员，

财政人民委员，

劳动人民委员，

内务人民委员，

司法人民委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教育人民委员，

卫生人民委员，◇329◇

社会救济人民委员，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联盟的外交、陆海军、对外贸易、交通、邮电各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也有发言权。

十九、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粮食、财政、劳动、工农检查各人民委员部直属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并遵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应的人民委员的命令办事。

二十、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预算，此项预算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批准的全联盟预算的组成部分。各共和国预算的收入和支出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列入各加盟共和国预算的收入项目以及每项收入的数额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

二十一、对于各加盟共和国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二十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及国印。

二十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都是莫斯科城。

二十四、各加盟共和国按照本条约修改自己的宪法。

二十五、联盟条约的批准、修改和补充权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十六、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330◇

注　释

〔1〕俄共（布）中央召开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阿捷尔拜疆、巴什基里亚、土尔克斯坦、鞑靼、达格斯坦、捷列克区域、柯尔克兹和克里木等地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讨论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的报告以及组织问题等等。约·维·斯大林于一月二日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没有速记下来）。会议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央常务局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中工作的条例”。按照这个“条例”，一九一八年成立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改组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突厥语系民族宣传鼓动局。——（正文第三页①）

〔2〕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共（布）党纲中“在经济方面”这一部分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及其组织问题”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二一页至第四二四页，第四九〇页至第四九四页）。——（正文第五页）

〔3〕关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及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六页至第三一一页和“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〇七页至第四五五页。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二二一页至第二二二页），并参加了代表大会为起草军事问题决议而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正文第六页）

〔4〕指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省工会委员会的俄共（布）党团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举行的联席会议。——（正文第十一页）

————————————

① 此为《斯大林全集》中文第一版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5〕“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这一提纲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上决定成立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最后修订这个提纲。提纲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真理报”第二十九号上，并于同年出版了单行本。——（正文第十四页）

〔6〕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十九世纪末叶，这种思想在东方各国的剥削阶级中间广泛传播；土耳其曾利用这种思想来达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从于土耳其苏丹这个“全体穆斯林的哈利发”的目的。弗·伊·列宁评论说，大伊斯兰主义是企图“把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结合起来”的一个流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九四页）。大突厥主义所抱的目的就是使突厥语系一切民族受土耳其的统治。它产生在巴尔干战争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期间发展成一种极力主张侵略的沙文主义思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反革命分子曾利用大伊斯兰主义和大突厥主义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正文第二十三页）

〔7〕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讨论了关于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报告、关于实物税的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等等。弗·伊·列宁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实物税的报告以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代表大会做了关于工会的争论的总结，并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列宁的纲领。代表大会在弗·伊·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斥责了一切派别集团，责令它们立即解散，并指出党的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代表大会通过了弗·伊·列宁提出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斥责了所谓“工人反对派”，并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员的党籍不能相容。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三月十日听取了约·维·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以约·维·斯大林的提纲为基础，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进一步加工。约·维·斯大林在三月十五日

下午会议上报告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约·维·斯大林代表该委员会提出的决议。代表大会斥责了民族问题方面的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指出这两种倾向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都是有害而危险的。代表大会集中火力批判了大国沙文主义这一主要危险。（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六页至第三四二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一五页至第五七二页）——（正文第二十五页）

〔8〕“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汇编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版。——（正文第四十页）

〔9〕“经济生活报”（日刊）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财经人民委员部和财经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人民委员部等）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正文第四十一页）

〔10〕第二半国际，即“国际社会党工人联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维也纳成立，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是在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暂时退出第二国际的各中派政党和集团的代表。第二半国际的首领们（弗·阿德勒、奥·鲍威尔、拉·马尔托夫等人）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却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实行机会主义政策，并竭力利用这一联盟来抵制共产党人对工人群众的日益扩大的影响。一九二三年第二半国际重新和第二国际合并——（正文第四十二页）

〔11〕“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是根据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援助和联合东方的解放运动，该委员会存在将近一年。——（正文第四十四页）

〔12〕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遥远的山村的彻岑人、沃舍梯人、鞑靼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等等共一百五十二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东部妇女过去和现在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地位、手工业生产和山地妇女参加手工业生产、国民教育和东部妇女等问题，讨论了关于妇婴保健等问题的报告。在代表大会六月十八日下午会议上宣读了约·维·斯大

林的贺电。代表大会向约·维·斯大林发出致敬电。——（正文第四十八页）

〔13〕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法令成立的。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初包括彻岑州、纳兹腊诺夫州、弗拉基高加索州、卡巴尔达州、巴尔卡尔州和卡拉恰也夫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陆续分化出许多民族自治区。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取消了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正文第四十八页）

〔14〕指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正文第五十二页）

〔15〕指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六页）。——（正文第五十三页）

〔16〕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一页至第三三二页）。——（正文第五十三页）

〔17〕弗·伊·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页至第一一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六九页至第六八〇页）。——（正文第五十四页）

〔18〕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正文第五十四页）

〔19〕弗·伊·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七五页至第二五〇页）。——（正文第五十四页）

〔20〕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一七页至第二二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七二页至第二八四页。——（正文第五十五页）

〔21〕指弗·伊·列宁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页至第二四六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七二页至第四〇六页）。——（正文第五十五页）

〔22〕信条（《ｃｒｅｄｏ》）是一部分“经济派”分子的宣言。（关于信条，见弗·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抗议书”，“列宁全集”第

四版第四卷第一四九页至第一六三页）——（正文第五十七页）

〔23〕弗·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页至第九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页至第七七八页）。——（正文第六十页）

〔24〕民主会议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社会主义政党、妥协派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和部队的代表。会议选出了预备国会（共和国临时会议）——临时政府的咨议机关。妥协派想利用预备国会来制止革命并把国家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引上资产阶级立宪发展的道路。——（正文第六十一页）

〔25〕弗·伊·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九页至第三〇六页）。——（正文第六十四页）

〔26〕指弗·伊·列宁的“做什么？”一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页至第四九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页至第三四六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27〕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四十页至第四十一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28〕约·维·斯大林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底从纳尔契克（当时他在那里治病）到达梯弗里斯，参加有地方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全体会议的工作。全会于七月二日至七日举行，讨论了南高加索各全会在约·维·斯大林主持苏维埃共和国建设中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拟定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的决议中规定了南高加索共产党员的任务，并给予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以坚决打击。全会通过了关于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联合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活动的决议，讨论了关于南高加索的铁路状况关于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货币流通、关于纳果尔内卡拉巴赫的自治、关于阿札里亚、关于阿布哈兹的情况等问题。约·维·斯大林在七月六日的梯弗里斯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上做了“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报告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一〇八号上，并于同年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出版单行本。——（正文第七十一页）

〔29〕木沙瓦特（“木沙瓦特”党）是阿捷尔拜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民主义政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是阿捷尔拜疆的主要反革命力量，木沙瓦特党人在土耳其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后来又在英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于一九一八年九月至一九二〇年四月在阿捷尔拜疆执政。一九二〇年四月，木沙瓦特党政府被巴库工人、阿捷尔拜疆农民和前来帮助他们的红军合力推翻。——（正文第七十七页）

〔30〕达什纳克（“达什纳克楚纯”党）是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间，达什纳克党人领导了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把阿尔明尼亚变成了英国武装干涉者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据点。达什纳克党政府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被红军支持下的阿尔明尼亚劳动人民的起义所推翻。——（正文第七十七页）

〔31〕指一九〇四年英国和法国签订的军事政治协定，这个协定是成立协约国（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同盟）的开端。——（正文第七十八页）

〔32〕“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〇年由弗·伊·列宁创办。（关于“火星报”的意义和作用，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八页至第四十九页）——（正文第八十一页）

〔33〕尼·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彼得格勒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页至第九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页至第七七八页）。——（正文第八十二页）

〔34〕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三页。——（正文第八十五页）

〔35〕指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限制军备、关于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及其自治领、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虽然苏维埃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议，但会议没有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对战后世界重新进行了分割，企图建立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的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华盛顿签订的各项协定，规定了帝国主义列强海军军备的规模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统治权，确立了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即“各国

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华盛顿会议不仅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反而使它加深了。——（正文第九十七页）

〔36〕“明星报”是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周刊，后来每周出两三号）弗·伊·列宁对“明星报”进行了思想领导，他经常从国外寄文章给这个报纸经常给“明星报”撰稿的有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尼·尼·巴图林、克·斯·叶列梅也夫等人。阿·马·高尔基也曾参加该报工作。一九一二年春，约·维·斯大林留居彼得堡时曾直接领导该报工作，并在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一五页至第二四二页）。该报的发行额有几号曾达五六万份“明星报”为出版布尔什维克“真理报”（日刊）做了准备工作。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皇政府封闭“明星报”。继“明星报”之后的是“涅瓦明星报”，该报出到一九一二年十月。——（正文第一〇六页）

〔37〕引自约·维·斯大林“我们的目的”一文，该文发表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创刊号上（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四三页）。——（正文第一〇七页）

〔38〕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四四页。——（正文第一〇七页）

〔39〕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在莫斯科进行。在受最高革命法庭审判的三十四个被告中有十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审判中查明，社会革命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苏维埃政权组织武装暴动和策划阴谋，援助武装干涉者，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正文第一一一页）

〔40〕指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热那亚举行的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在海牙举行的两次国际经济会议。热那亚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确定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关系。参加会议的一方是英、法、意、日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苏维埃俄国。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向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提出几项要求（偿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款，把收归国有的财产归还外国产权人等等）；履行这些要求，就等于把苏维埃国家变成西欧资本的殖民地。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拒绝了外国资本家的这些无理要求。后来这个问题移交在海牙召集的专家会议进行讨论。海牙会议也因双方观点不一致而没有达成协议。——（正文第一一一页）

〔41〕约·维·斯大林领导了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成立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案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领导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正文第一一四页）

〔42〕指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克兰、花剌子模、布哈拉、远东等独立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授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其他共和国出席热那亚全欧经济会议的协定。——（正文第一一六页）

〔43〕远东共和国于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取消。远东共和国包括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外贝加尔湖地区、阿穆尔省、沿海区、堪察加和库页岛北部。——（正文第一一六页）

〔44〕南高加索联邦，即南高加索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制同盟，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在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会议上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联邦制同盟改为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存在到一九三六年。根据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的规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和格鲁吉亚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关于南高加索联邦，见本卷第一八四页至第一八八页第二〇三页至第二〇八页）——（正文第一一七页）

〔45〕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是从前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境内的人民起义胜利后于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由于中亚细亚各国按民族特征划分疆界，布哈拉共和国和花剌子模共和国的领土被划入新成立的土尔克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区。——（正文第一一七页）

〔46〕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二千二百一十五人，其中包括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缔约国的代表四百八十八人，他们到莫斯科来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被邀请作为贵宾出席

全俄第十次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共和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发展农民经济的工作总结）、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各缔约苏维埃共和国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提案。约·维·斯大林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做了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决议案。约·维·斯大林做报告后，乌克兰、阿捷尔拜疆、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发言，他们代表本国人民拥护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文第一二〇页）

〔47〕指苏维埃政府同英国工业家乌尔卡尔特就开采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的矿产签订租让合同的谈判。由于乌尔卡尔特提出的苛刻条件和英国保守党政府对苏维埃俄国的敌视政策，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否决了合同草案。资产阶级报刊利用苏维埃政府拒绝同乌尔卡尔特签订合同这件事大肆进行反苏宣传。——（正文第一二二页）

〔48〕洛桑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举行）是由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发起，为讨论近东问题（缔结希土和约、确定土耳其疆界、通过关于海峡航行制度的协定等等）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上述国家外，还有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会议）。苏维埃俄国只是在讨论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才被邀请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在海峡问题委员会里，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发言反对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让军舰通过海峡的草案，并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主张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国家的军舰都绝对不能通过海峡。苏维埃俄国代表团的草案被委员会否决了。——（正文第一二三页）

〔49〕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一千七百二十七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三百六十四人，南高加索联邦的代表九十一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三十三人。代表大会讨论了约·维·斯大林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选出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正文第一二九页）

〔5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团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会议审查并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约·维·斯大林在会议上报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日程。会议委托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的报告。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各全权代表团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上签字。——（正文第一三一页）

〔51〕约·维·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发表在纪念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真理报”第五十六号上，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十五日和十六日发表在“彼得格勒真理报”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和第五十九各号上，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发表在“共产主义革命”杂志第七期（总第四十六期）上。后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以“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为题刊载于约·斯大林“论十月革命”（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一书中。——（正文第一三二页）

〔52〕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就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一八年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发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附设宣传鼓动短期训练班，一九一九年一月该训练班改名为苏维埃工作学校。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改组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正文第一三二页）

〔53〕“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八八三年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创立于日内瓦。（关于该社的活动和它的历史作用，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页至第二〇页）——（正文第一四一页）

〔54〕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群众性政治游行示威时，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一部分委员（巴格达齐也夫等）违背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游行示威的和平性质的指示，提出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党中央委员会斥责了这些“左的”冒险主义者的行为（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三页至第一八四页）。——（正文第一四一页）

〔55〕弗·伊·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见“列

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页至第一一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五六九页至第六八〇页）。——（正文第一四四页）

〔56〕“联系委员会”由齐赫泽、斯切克洛夫、苏汉诺夫、菲里波夫斯基和斯柯别列夫组成（稍后加入的有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了同临时政府建立联系“影响”临时政府和“监督”它的活动而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设立的。事实上“联系委员会”帮助了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政策，阻挡了工人群众进行争取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积极革命斗争。一九一七年五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直接参加临时政府，“联系委员会”就撤销了。——（正文第一四五页）

〔57〕弗·伊·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六页）。——（正文第一四五页）

〔58〕提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问题提纲草案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讨论过。当时成立了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修订这个提纲。这个提纲于三月二十二日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查批准，三月二十四日发表在“真理报”第六十五号上。——（正文第一四九页）

〔59〕路标转换派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派，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国外的俄国白卫分子中间组成，由出版“路标转换”杂志（最初曾以此名出版过一本文集）的尼·乌斯特里雅洛夫、尤·克柳奇尼柯夫等人的集团领导。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反映了那些放弃同苏维埃政权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路标转换派分子指望苏维埃制度由于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逐渐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文第一五三页）

〔60〕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五三页）。——（正文第一五四页）

〔61〕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举行。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不能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讨论了关于工业的报告、关于党和国

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关于区域划分的报告等。代表大会在做决议时考虑了弗·伊·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信中的全部指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了两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总结坚决反击了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和他们的拥护者。代表大会对组织问题和民族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约·维·斯大林在四月十七日下午会议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代表大会在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批准了列宁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计划，指出了中央组织机关和全部组织工作已有改进。四月二十三日代表大会听取了约·维·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讨论了这一报告，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移至约·维·斯大林直接领导的代表大会民族问题组进行。四月二十五日代表大会通过了该组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以约·维·斯大林的提纲作为基础的。代表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并号召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关于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七页至第三四九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六八一页至第七五八页）——（正文第一五九页）

〔62〕“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通报”是一种通报性的杂志，根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出版（前二十期是作为“真理报”的附刊出版的）。“中央通报”由通报性的公报逐渐成为党中央的杂志并于一九二九年改编为“党的建设”杂志。“俄共中央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央通报”第四期（总第五十二期）上。——（正文第一六一页）

〔63〕约·维·斯大林指“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六页至第四五五页）。——（正文第一六八页）

〔64〕约·维·斯大林指“我们工业的指挥人员（根据俄共中央登记分配局的材料）”这本小册子（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正文第一七二页）

〔65〕全俄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认为社会革命党已经彻底瓦解，它的流亡国外的领导机关没有权利代表不存在的党进行活动。——（正文第一七九页）

〔66〕辩论专页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真理报”上刊出：它的名称是“代表大会召开前辩论专页”。总共出了五期，四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刊出，一期在代表大会期间刊出（见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二十四日及四月五日、十五日和二十日“真理报”第四十六、第六十五、第七十五、第八十二、第八十六各号）。——（正文第一八一页）

〔67〕约·维·斯大林指“民主集中派”反党集团（关于这个集团，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七页、第三三五页）。——（正文第一八三页）

〔68〕指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报告的决议案是由弗·伊·列宁起草的。（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三三五页至第三五三页）——（正文第一八八页）

〔69〕“社会主义通报”是白俄孟什维克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一年二月由马尔托夫创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前在柏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巴黎出版，后来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喉舌。——（正文第二〇八页）

〔70〕巴斯马奇运动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中亚细亚（土尔克斯坦、布哈拉、花剌子模）的一种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以公开的政治性的土匪活动的形式出现，由巴依和毛拉领导，其目的是使中亚细亚各共和国脱离苏维埃俄国并恢复剥削阶级的统治。英帝国主义者积极支持巴斯马奇运动，力图把中亚细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正文第二一〇页）

〔71〕见弗·伊·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四〇六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五九页）。——（正文第二一五页）

〔72〕弗·伊·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二三页至第一三七页）。——（正文第二一八页）

〔73〕“贫农报”（日刊）是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正文第二三〇页）

〔74〕“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一〇页至第一一页。——（正文第二三二页）

〔75〕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由约·维·斯大林发起，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代表五十八人。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约·维·斯大林“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的报告。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二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分别做了关于地方情况的报告。会议也审查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苏丹—加里也夫反党反苏维埃活动的报告。（会议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五九页至第七六六页）——（正文第二三七页）

〔76〕民族问题纲领草案是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底为筹备第四次会议而起草的，六月四日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该草案由会议作为关于约·维·斯大林“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的报告的决议而通过。——（正文第二三九页）

〔77〕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实际提案起草委员会是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决议成立的。委员会由约·维·斯大林领导，其成员有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代表。委员会领导了苏联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正文第二六五页）

〔78〕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的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约·维·斯大林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该委员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至十六日举行，讨论了宪法草案。——（正文第二七三页）

〔79〕约·维·斯大林引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俄文版）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卡·马克思给弗·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九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五四页）。——（正文第二八〇页）

〔80〕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十一月十九日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代表大会希望在各组党委员会下面设立专门的妇女工作机关。代表大会闭幕后，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在各级党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妇女宣传鼓动委员会，并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妇女宣传鼓动委员会。——（正文第二八四页）

〔81〕指根据政治局和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成立的委员会。——（正文第二八九页）

〔82〕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通过的，该决议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正文第三〇四页）

〔83〕指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举行的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六七页至第七六八页）——（正文第三〇四页）

〔84〕指自称“工人集团”的反革命秘密集团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发出的匿名纲领（“工人集团”是被开除出党的米雅斯尼柯夫和库兹涅佐夫于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组成的，参加的人数不多，一九二三年秋被消灭）。——（正文第三〇九页）

〔85〕约·维·斯大林指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共（布）中央通报”杂志第四期（总第五十二期）上的“俄共中央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正文第三一八页）

〔86〕“共产党人报”（日刊）是阿捷尔拜疆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巴库委员会的机关报，用阿捷尔拜疆文出版。创刊号是由阿捷尔拜疆布尔什维克组织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出版的，该报在创刊号发行后即被木沙瓦特党政府封闭。随着阿捷尔拜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该报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三十日复刊。约·维·斯大林的贺电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产党人报”上用阿捷尔拜疆文发表，并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巴库工人报”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东方曙光报”上用俄文发表。——（正文第三二〇页）

年　表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月一日至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致开幕词并做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

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该文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真理报”第十二号上发表。

一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第一海岸部队剧院（彼得格勒）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做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发表演说，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捍卫列宁的“十人纲领”。

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反对关于军队改行民军制的提议，拥护关于加强并巩固正规军的提议。

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民族委员会会议上担任主席并被选入民族委员会条例草案起草委员会。

二月五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约·维·斯大林的提纲“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当时成立了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最后修订这个提纲。

二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弗·伊·列宁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共同修订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

二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的提纲“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在“真理报”第二十九号上发表。

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代表谈话。

二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把俄共（布）中央对第十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电报通知巴库的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并要求每天把高加索事情的进程告诉他。

二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向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询问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的情况。

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便笺给弗·伊·列宁，谈到必须保卫巴土姆以防土耳其人的攻击。

三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以直达电报向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转达弗·伊·列宁的祝贺和指示。

三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民族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民族委员会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三月八日至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三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维埃政府同土耳其代表团的谈判。

三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做“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三月十三日

弗·伊·列宁写便笺给约·维·斯大林，谈派遣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去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问题。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三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代表民族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报告工作。

三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会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三月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弗·伊·列宁，谈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四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把他对燃料管理总局条例草案的意见寄给弗·伊·列宁。

四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并被选入关于扩大阿捷尔拜疆石油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

四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成立科米自治区的草案原文送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四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民族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民族委员会条例”所提出的修正，并在讨论成立科米自治区问题时发言。

五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文，该文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真理报”第九十八号上发表。

五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传达一项法令草案，规

定所有人民委员部都必须把有关各民族的一切法案和决议提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批准。

五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就工农检查院地方机关问题发言。

五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担任主席。部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雅库特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成立雅库特自治区问题的决议。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筹备和举行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工作。

五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托，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在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提出的决议案。

五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为调查托姆斯基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反党行为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工作。

五月底

约·维·斯大林去纳尔契克城就医。

六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向卡巴尔达州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致贺电。

六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向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贺电。

六月底

约·维·斯大林从纳尔契克前往梯弗里斯参加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体会议的工作。

七月二日至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全体会议的工作。

七月四日

弗·伊·列宁致电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询问约·维·斯大林停止休养的原因并要求把医生关于约·维·斯大林健康状况的诊断书寄去。

七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上做“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格鲁吉亚真理报”第一〇八号上发表。

七月七日、八日、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讨论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的政策问题。

七月二十五日

弗·伊·列宁询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约·维·斯大林停止休养了几天，并要求把给约·维·斯大林看病的医生姓名和地址告诉他。

八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从纳尔契克返回莫斯科。

八月十八日

弗·伊·列宁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协助约·维·斯大林熟悉一切经济材料，特别是关于金矿工业和巴库石油工业的经济材料。

八月二十二日

俄共（布）中央委托约·维·斯大林对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八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在“真理报”第一九〇号上发表。

九月六日至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铁路运输中央机关工作改进委员会。

九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被选入山地居民（彻岑人）和哥萨克人土地分配问题委员会。

九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宁“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的信并写“关于检查院问题的答复”的回信给弗·伊·列宁。

十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被选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十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一文在“民族生活报”第二十四号（总第一二二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党的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俱乐部做“论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与新经济政策”的讲演。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研究了农业集体组织——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问题。

十一月十八日

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通报”杂志的编辑之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宁关于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提议草案并写对草案的意见和修正。弗·伊·列宁采纳约·维·斯大林的修正。

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议案。

十二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前途”一文在“真理报”第二八六号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人民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在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的决议草案上签字。

十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选入主席团。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第九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被批准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十二月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

一九二二年

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就成立卡拉恰也夫—切尔克斯省问题发言。

一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把俄共（布）中央给土尔克斯坦共产党的通知信草稿寄给维·米·莫洛托夫。

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召开各独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来讨论出席热那亚会议的共同代表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就审查一九二二年预算问题发言。

一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第九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非常会议，会议讨论了派遣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的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成立会上就协会章程问题发言。

约·维·斯大林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就草拟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省特派员条例的训令问题发言。

二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亚·德·瞿鲁巴接见一批教授——高等技术学校的代表。

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格鲁吉亚共产党员，指出必须采取实际措施来执行弗·伊·列宁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的指示。

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宁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起草工农检查院监督私人合股商店和企业的草案的便笺。

三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收到弗·伊·列宁关于使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去帮助人民委员会机关检查决议执行情形的信。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三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二十二人（过去的“工人反对派”集团）案件调查委员会。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二十二人（过去的“工人反对派”集团）案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入关于党的财政政策的决议最后修订委员会。

四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月三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选举约·维·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四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弗·伊·列宁，谈改变供应农民种子的方式问题。

五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一文，该文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真理报”第九十八号上发表。

五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给该报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九十八号上发表。

五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机关相互关系的条例起草委员会。

五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就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在“真理报”第一一〇号上发表。

六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的会议。

六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给柯尔克兹共和国共产党员的信在“民族生活”杂志第十二期（总第一四七期）上发表。

七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就开展缴纳粮食税运动问题给各省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中央各民族常务局和各区域常务局的信在“真理报”第一五一号上发表。

七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探望在哥尔克休养的弗·伊·列宁。

七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把弗·伊·列宁的健康状况电告格·康·奥尔忠尼启泽。

八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各项工作组织委员会会议上担任主席。

八月四日至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八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选入主席团。

八月五日

弗·伊·列宁召约·维·斯大林前往哥尔克并委托他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祝贺。

约·维·斯大林在下午会议上向代表会议转达弗·伊·列宁的祝贺。

八月十一日

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准备向俄共（布）中央全会提出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联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九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关于他探望在哥尔克休养的弗·伊·列宁的短文。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联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弗·伊·列宁谈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联盟国家的问题。

十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高加索联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报告。全会决定成立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领导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准备工作。

十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向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传达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保留南高加索联邦以及它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

十月三十日

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约·维·斯大林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十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致彼得格勒的贺电在“彼得格勒真理报”第二五一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真理报”记者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联合问题的谈话在“真理报”第二六一号上发表。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委员会在约·维·斯大林领导下起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条文”。

十一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报告。

政治局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报告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条文”。

十二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委员会会议上被选入起草共和国联盟宪法原文和宣言原文的小组委员会。

十二月五日至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起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之间国联盟成立宣言”草案。

十二月十六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委员会在约·维·斯大林主持下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草案和约·维·斯大林提出的宣言草案。

十二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做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的报告。全会决定成立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筹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

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入主席团。

十二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发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第十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被批准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团会议上报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日程。会议委托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

十二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约·维·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代表大会选举约·维·斯大林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并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十二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的一九二三年祝词在“消息报”创刊号上发表。

一九二三年

一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问题委员会的会议。

一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选入苏联各人民委员部组织机构方案制定委员会。

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做“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讲演。

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成立代表苏联各民族利益的机关——第二院的建议。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约·维·斯大林提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会上成立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最后修订这个提纲。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会选入俄共（布）中央提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提纲最后修订委员会。

二月二十四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领导苏联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把弗·伊·列宁的健康状况用电报通知各省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各中央委员。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一文在纪念俄国共产党（布）建立二十五周年的“真理报”第五十六号上发表。

三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提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问题提纲。政治局决定把这个提纲作为俄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发表。

三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的提纲“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在“真理报”第六十五号上发表。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四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四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

四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

四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民族组的工作，并在该组就苏联宪法问题发言。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

四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全会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并被批准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五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在“真理报”第九十九号上发表。

五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的“欲盖弥彰……”一文在“真理报”第一〇二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宪法起草扩大委员会的代表。

五月至六月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宪法起草扩大委员会的工作。

六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关于召开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政治局批准约·维·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纲领草案。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的工作。

六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右派和“左派”的演说，并做贯彻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的报告。

六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做报告的结论。

六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宪法起草扩大委员会会议上就统一的联盟国籍问题发言。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

六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做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

七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号召把弗·伊·列宁的全部札记、书信、笔记和其他文件献给在莫斯科成立的弗·伊·列宁研究院的公告在“真理报”第一五一号上发表。

七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其他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宪法后签署的“告全世界人民和政府书”在“真理报”第一五六号上发表。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一文在“真理报”第二五三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一文，该文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女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军事学院纪念骑兵集团军建军四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

十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

十二月五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起草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草案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该决议于十二月五日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通过并在十二月七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发表。

十二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和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就党内状况问题的争论告俄共（布）各级组织书在“真理报”第二八五号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必要的指摘（关于拉法伊尔）”一文在“真理报”第二九四号上发表。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25}$ · 印張 $14\frac{22}{25}$ · 插頁 5 · 字數 260,000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
1964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41,501—57,500　　定價（5）1.40 元
統一書號 1001 · 352

共产党人既善于
破坏旧制度，也善于
建设新制度。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二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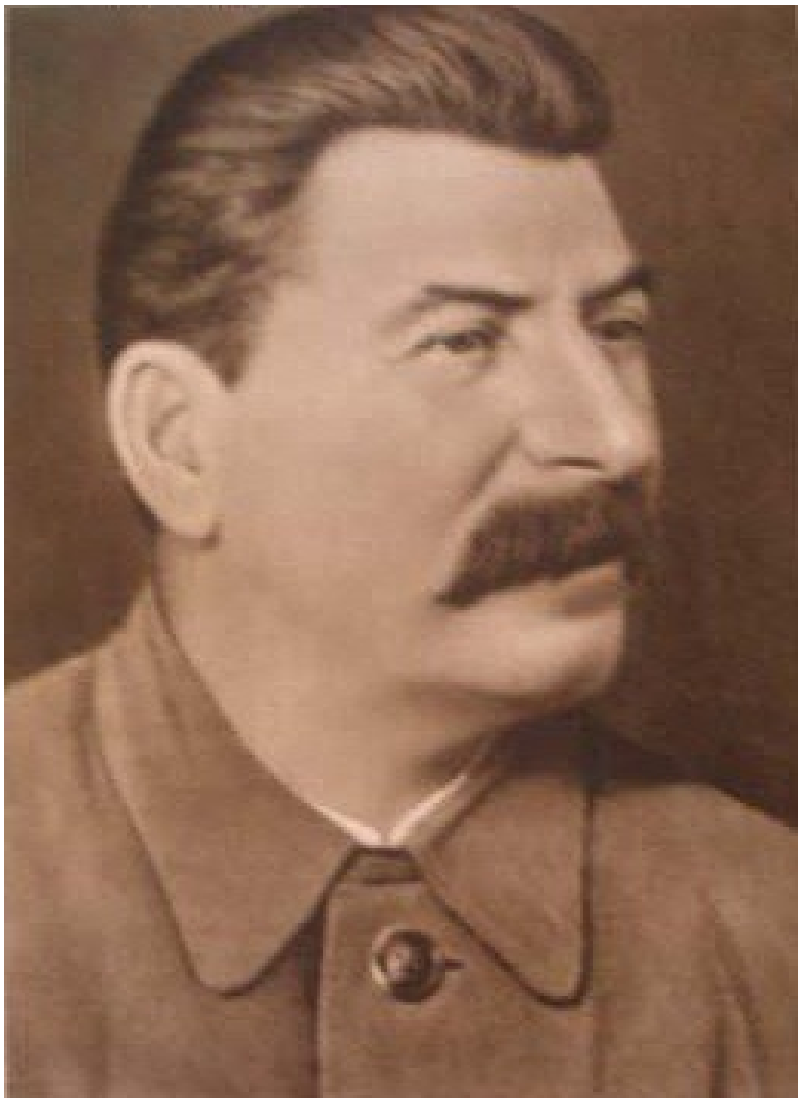
ТОМ
6
1924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五六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 ……）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目　录

第六卷说明 …… 1

一九二四年
（上）

关于争论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和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5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一月十七日） …… 5
二 结论（一月十八日）…… 19
悼列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 34
论列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军校
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 39
山鹰 …… 39
谦逊 …… 40
逻辑力量 …… 41
不灰心 …… 41
不骄傲 …… 42
原则性 …… 43
相信群众 …… 44
革命天才 …… 45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召开的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 48
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 51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 53
二 方法 …… 58
三 理论 …… 64
四 无产阶级专政 …… 78
五 农民问题 …… 88
六 民族问题 …… 100
七 战略和策略 …… 108
八 党 …… 121
九 工作作风 …… 13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136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五月二十四日）…… 136
一、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 …… 137
二、国家机关 …… 141
三、党员成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 …… 143
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干部和新党员 …… 145
五、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 147
六、党在登记、分配和提拔工作人员方面的工作 …… 148
七、党内生活 …… 149
八、结论 …… 150
结论（五月二十七日）…… 156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俄共(布)中央
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166
外部状况 …… 167

结合问题 …… 170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 …… 174
党 …… 177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 182
论工人通讯员
（和“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的谈话）…… 184

（下）

关于波兰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共产国际
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186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192
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 195
论国际形势 …… 198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 198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 202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 205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召集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 212
各地报告的缺点 …… 212
党的主要缺点是党的农村工作薄弱 …… 213
我们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里？…… 213
我们农村工作的薄弱表现在哪里？…… 214
基本任务是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 …… 214
必须使苏维埃活跃起来 …… 215
必须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 …… 215
格鲁吉亚暴动的教训 …… 216
必须以敏锐的态度对待农民 …… 217

党的基本任务 …… 218
工作的条件 …… 218
主要是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保持联系 …… 219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
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220
在“狄纳莫”工厂留言簿上的题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225
致骑兵第一集团军 …… 226
致“农民报”…… 227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229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 229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 234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 245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 253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 253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 255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 269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 279

注释 …… 284
年表（一九二四年） …… 296
插图（新增）
一 斯大林主持悼念列宁的仪式 …… 38
二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译本 …… 99
三 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者 …… 197
四 斯大林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 228

第 六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二四年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失去弗·伊·列宁以后，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继续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工作的第一年。斯大林同志把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并动员党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

编入本卷的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在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方面，在保卫、论证和发展列宁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卷是以斯大林同志和罗斯塔社记者“关于争论”的谈话和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开始的。这两篇谈话和报告是为揭穿托洛茨基主义和争取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而做的。

斯大林同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悼列宁”的演说中，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做了严格遵守和实现弗伊列宁遗训的伟大宣誓。

编入本卷的还有约·维·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这篇著作对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阐述和理论上的论证。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论国际形势”、“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以及其他著作论述了国际形势、党内生活和党的巩固、工农联盟、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群众等问题。

本卷以“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这篇著作结束，这篇

著作从理论上概括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论证并发展了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学说。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一九二四年

关 于 争 论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和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

只有在一星期后将要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才能对俄共(布)党内和党的刊物上已经广泛展开的争论做出最后的总结。现在根据各地党组织送来的决议已经可以看出，俄共（布）全体党员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毫无疑问是赞同中央委员会的立场的。

党很了解，我们的敌人企图利用已经展开的争论来散布他们所臆造的各种关于俄共（布）瓦解、苏维埃政权削弱等等的谰言。对我们的争论做这样的估计至少是可笑的。实际上，我们党内屡次发生争论的结果总是把意见分歧消除了。党通过这些争论总是变得更团结更巩固了。这一次的争论表明，作为苏联国家权力的体现者的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必须说明——任何一个知道争论内容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在政治和经济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党内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始终是不可动摇的。

在各级党组织所有一切会议上争论得十分热烈的问题的实质如下：

（一）我们党应当成为有统一意志的统一独立的有机体，还是相反地，应当容许在党内成立作为◇3◇[①]缔约双方的个别派别组织和集团？

（二）所谓新经济政策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还是需要修改？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 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中央委员会和党内绝大多数都认为党应当成为统一的党，新经济政策不需要修改。包括几个有名人物在内的人数不多的反对派集团却坚持着和全党不同的另一种观点。

党力求通过全面而又完全公开的争论来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全部细节。党的代表会议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对全体党员都有约束力的权威决定。

斯大林同志最后说：我深信，党通过争论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和更加统一，并能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和文化迅速高涨的条件下更好地执行领导巨大国家的生活的任务。

载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
“东方曙光报”第四七三号◇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公报
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6◇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通常我们在争论会议上发言的同志总是先谈问题的经过：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谁先谈了什么，谁后来又谈了什么等等。我认为这种方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因为它只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而不会有丝毫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我们先谈党怎样对待后来为中央全会批准的政治局关于民主的决议[2]的问题，那要好得多。

我必须指出，这项决议大概是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经过对民主问题的激烈争论后得到全党完全（我可以说，简直是一致）赞同的唯一的决议。即使是一向对党内多数和中央委员会怀有反对情绪的反对派的组织和支部，即使是这些竭力设法遇事就吹毛求疵的组织和支部，也没有找到吹毛求疵的藉口和理由。这些组织和支部通常在自己的决议中一面承认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一面又力求和其他组织有所不同，给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或者还这样说：你们一切都正确，但是晚了一点儿，这一切做得早一点就好了。这里我不提谁

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好好地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7◇奇[①]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笑声）我说过，我不来多谈这个问题。就算真的有什么人欺负托洛茨基。但是，难道问题在这里吗？在欺负的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东西呢？要知道，问题在于决议的原则方面，而不在于谁欺负了谁。我想以此说明，即使是激烈而粗暴的反对派的支部和组织，也不敢在什么原则上反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我肯定这一事实是为了再一次指出，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很难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事实，就是决议经过水火不相容的激烈争论后不仅得到了大多数的赞同，而且简直是得到了全党一致的赞同。

由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完全符合党在目前的需要和要求。第二个结论就是党通过这次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变得更巩固了，更团结了。这个结论可以说正击中了我们国外的敌对分子的要害，他们早就因为我们发生争论而得意洋洋，他们以为我们的党将会由于争论而削弱，政权将会瓦解。

我不来多谈党内民主的实质。党内民主的原则已经在决议中阐明，而决议是经全党详尽无遗地讨论过的，我何必还在这里重复呢？我只谈一点，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显然，党内民主将是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民主。这个范围是什么，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在这里重复了。我也不来多谈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使党内民主成为我们党的血和肉的基本保证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也十分详

——————————————

① 齐特·齐梯奇，是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代人受过"一剧中的主角。他是一个富商，一个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译者注

细地谈到了。◇8◇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种绝对的、超出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东西的问题。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两个条件或者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没有这两类条件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

第一、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为了能够提出真正实行党内民主而不是在纸上实行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单靠这些条件是不够的。我已经说过还有第二类条件，即外部性质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能的。我指的是某些多少能够保证和平，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侵犯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求保卫国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因为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党要动员起来，我们大概要使它军事化，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因为你们知道，实行党内民主是以每一个时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为转移的。

为了不会再有过多的迷恋和毫无根据的责备，我还必须提醒你们注意党在实行民主方面所面临◇9◇的那些障碍。即使在上述两个主要的有利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些障碍也妨碍民主的实行。同志们，这些障碍是存在的，它们深刻地影响到我们

党的工作，因此，我没有权利不谈它们。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同志们，第一、这些障碍就是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着过去战争时期的残余，即我们党实行军事化时期的残余，这些残余产生了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党似乎不是一个有独立的思想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独立的有机体，而是一种类似由下级、中级和上级机关组成的机关系统的东西。固然，这种绝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形成，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观点的因素却在我们一部分担任党的职务的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因素妨碍他们彻底实行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同这种观点作斗争，同中央和地方的战争时期的残余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在实行党内民主道路上的第二个障碍就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这种庞大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不总是明显的，不总是惹人注目的，但这种压力是一秒钟也不停止的。庞大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这种压力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往往不由自主地完全不自觉地离开了党内民主，离开了他们相信它是正确的可是往往不能贯彻的那条路线。请你们想一想，官僚主义国家机关拥有不下一百万职员，其中大部分是党的异己分子，而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两三万人，他们却负有使国家机关服从党，使国家机关社会主◇10◇义化的使命。没有党的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有什么价值呢？没有我们党的机关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可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每当我们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国家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时，它往往不得不使这些机构中的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路线相适应。具体地说：党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也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种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处于两条火

线中间：一方面必须纠正按旧方式活动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路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往往自己也官僚主义化了。

这就是第二个障碍，克服这个障碍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便于实行党内民主，无论如何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最后，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还有第三个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组织和支部，特别是边疆地区（决没有侮辱它们的意思）的组织和支部的文化水平很低，妨碍了我们的党组织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你们知道，实行民主要求支部的成员和整个组织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要求具有可以选举出来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某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内没有这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本身的文化水平很低，那该怎么办呢？这里自然就不得不放弃民主而采取委派负责人员等等的办法。

这就是过去摆在我们面前、将来还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为了诚实而彻底地实行党内民主，我◇11◇们必须克服这些障碍。

我所以提醒你们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障碍和那些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民主就会变成空洞的煽动性的词句），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民主问题偶像化和绝对化了，他们以为民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能的，似乎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妨碍着民主的实行。同志们，我提醒你们注意实行民主的条件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就是要反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反对这种不是我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同志们，我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我的报告，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争论做出总结，并从这些总结中得出某些对我们会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我想可以把我们在争论方面即在民主问题上的整个斗争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责备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两

年中，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内的整个路线似乎是不正确的。这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公布以前的时期。这里我不谈谁对和谁不对的问题。这些攻击是猛烈的，而且你们知道，这些攻击不是常常有根据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最激烈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反对派有必要提出什么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但是当时反对派任何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这是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最接近的时期。看来，只要反对派同中央的路线有某种调和，◇12◇问题就会结束或者可以结束了。我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在这个论战的中心，大概是十二月十二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圆柱大厅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由于某种原因被否决了，但这个决议案和中央的决议差别很少。这个决议案在原则上，甚至在某些次要的条文上，都和中央的决议完全没有分歧。当时我以为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有中央的决议，它使所有的人，至少使十分之九的人都感到满意，反对派本身显然也感到这一点，并赞成这个决议，因此，我们也许会就此消除意见分歧。这是第二个时期即调和时期。

但是接着就到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托洛茨基的发动，即发出告各地区书开始的。他的发动一下子就消除了调和的趋势，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这个发动以后，激烈的党内斗争时期开始了，——如果托洛茨基不在他赞成政治局决议后的第二天发表自己的那封信，斗争是不会发生的。你们知道，在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发动以后随即就有第二次，在第二次以后又有第三次，斗争因而更加尖锐起来了。

同志们，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几次发动中至少犯了六个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了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我现在来分析这些错误。

托洛茨基的第一个错误表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他发表文章这件事上，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的政纲。我再说一遍而且着重指出，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相对立的新政纲。同志们，只要想一想，政治局和中央监察◇13◇委员会主席团在某日举行会议并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问题，决议被一致通过，在这以后只过了一天，托洛茨基就违背中央委员会，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越过中央委员会，把文章分发给各个地区，这篇文章是重新提出机关和党、干部和青年、派别组织和党的统一以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新政纲，所有的反对派都抓住这个政纲，把它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这只能看做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相对立。这是托洛茨基公开地尖锐地把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相对立。于是在党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再也没有了？有全体委员尊重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只有不受法规约束，今天可以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明天又可以公布和提出新的政纲来反对这个决议的、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的超人？同志们，如果有一个中央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工人的纪律，另一种是要人的纪律。纪律应当只有一种。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自命为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站在它的法规上面、站在它的决议上面的超人，这样就给一部分党员造成藉口来进行破坏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的活动。

某些同志对“真理报”和个别中央委员在某些文章中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反党行为表示不满。同志们，我必须回答这些同志说：任何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如果在一个中央委员企图站在整个中央委员会之上这种困难的时刻不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来捍卫党的尊严，那末它是

不会得到这个党的尊重◇14◇的。如果中央委员会放过托洛茨基的这种企图，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毁灭自己。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他在整个争论时期都表现出暧昧的态度，粗暴地藐视希望知道他的真正立场的党的意志，外交式地逃避许多组织所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问题：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进行争论不是为了支吾搪塞，而是为了公开地真诚地在党的面前说出一切真话,像伊里奇所善于做的那样，像每个布尔什维克所应当做的那样。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无须证明，这种藐视许多组织的意志的态度不能不使党内斗争尖锐化。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发动中把党的机关和党对立起来，提出同“机关工作人员”作斗争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是不能同意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的。我们党的机关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党的机关就是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它们是不是服从党呢？当然是服从的，因为它们百分之九十是由党选举出来的。有些人说，省委员会是委派的。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正确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的省委员会正如县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一样，是选举出来的。它们是服从党的。但是它们被选举出来以后就必须领导工作，问题就在这里。不这样，即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以后，省委员会由省的代表会议选举出来以后不领导工作，党的◇15◇工作还能进行吗？要知道，不这样，我们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要知道，这是一种否认党的工作的领导原则的轻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我担心托洛茨基（我当然不想把他和孟什维克混为一谈）把党的机关和党这样对立起来会促使我们党的某些没

有经验的分子像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那样主张组织上的松懈和涣散。我担心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会使我们整个党的机关受到没有经验的党员的打击，而党是不可能没有机关的。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四个错误就在于他把青年和我们党的干部对立起来，他毫无根据地责备我们的干部正在蜕化。托洛茨基把我们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混为一谈，他援引马克思的某些学生即老社会民主党人的蜕化做例子，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党的干部也面临着这种蜕化的危险。一个中央委员昨天还同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七个年头，竟企图断定说（虽然是用推测的方式），在同孟什维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干部似乎面临着蜕化的境地，这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我再重复一遍，这种企图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但是既然这种论调不是在平时，而是在争论时说出来的，既然这里的问题是把那些可能蜕化的干部和据说没有这种危险或者几乎没有这种危险的青年对立起来，那末这种实质上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推测就可能带有而且已经带有某种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谈谈这个问题。

有时候人们说，应当尊敬老年人，因为他们比青年人日子过得多些，知道得多些，并且能够给予◇16◇较好的指示。同志们，我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不是任何老年人都应当受到尊敬的，也不是任何经验对我们都是重要的。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很有经验的干部，如谢德曼、诺斯克、维尔斯和别的一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富有斗争经验…… 但他们是同什么作斗争的呢？是同谁作斗争的呢？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那里，有些干部是在同革命精神作斗争中、在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丰富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是不好的。同志们，青年有责

任来粉碎这种经验，消灭这种经验，驱逐这种老年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青年没有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青年要比老年干部接近革命精神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老年干部拥有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拥有拥护机会主义反对革命主义的斗争经验。这样的干部应当受到痛击，而我们的全部同情应当给予那些青年，我再重复一遍，青年没有这种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更容易领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斗争方法。在德国，这样提出问题我是理解的。如果托洛茨基讲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党的干部，那我双手拥护他的声明。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讲的是另一个党，即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的干部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诞生的，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各色机会主义走狗作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取得政权的。这里有原则上的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而是凭良心说话，怎么能把我们的干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混为一谈呢？我们的干部是在维护革命精◇17◇神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进行了维护革命精神的斗争，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政权，他们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从前同威廉勾结在一起反对工人阶级，现在同谢克特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战斗中巩固和成长起来的。怎么能把这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干部混为一谈，怎么能把他们混淆起来呢？在这两种干部之间存在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托洛茨基的这种粗暴的歪曲和这种粗暴的混淆是打算破坏我们的革命干部，即我们党的核心的威信，这难道很难了解吗？这种歪曲只会燃起怒火并使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五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向学生青年，向这个“我们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看齐的理由和口号。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他们对党

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锐。”为了使人不致怀疑他指的是哪种青年，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补充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的是学生青年。”如果从这个绝对不正确的、理论上错误的和实践上有害的论点出发，那就应当更进一步提出下面的口号：“我们党内要有更多的学生青年，我们党的大门要为学生青年开得更大些。”

直到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指靠的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我们说，党的大门要为无产阶级分子开得更大些，并且我们党是靠吸收无产阶级成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托洛茨基却把这个公式完全颠◇18◇倒过来了。

关于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还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到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大家知道，马尔托夫当时要求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放宽入党的条件，反对要求坚决限制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列宁同志。后来，在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了。我记得，列宁同志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时列宁同志是这样说的：

“有人指出，领导分裂的通常总是知识分子。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解决问题……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广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我们委员会中有两个知识分子就有八个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七五页、第三七六页）

还在一九〇五年就这样提出问题了。从那时起，列宁同志的这个指示就成了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领导思想。而现在托洛茨基竟向我们提出实质上是要我们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建议。

最后，托洛茨基的第六个错误表现在他宣布集团的自由。是的，

是集团的自由！我记得，还在起草关于民主的决议草案的小组委员会上，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争论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的问题。托洛茨基不反对禁止派别组织的存在，却坚决地主张容许党内有集团存在。反对派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看来这些人不懂得，容许集团的自由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分子打开方便之门，使他们有可能欺◇19◇骗党，有可能拿派别组织冒充集团。而集团和派别组织有什么差别呢？只有表面上的差别。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对派别活动的评定，他把派别活动归入集团一类：

“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政纲、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搞小圈子和规定自己的集团纪律的集团。”（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三〇九页）

可见派别组织和集团实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既然在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建立了以谢烈布利雅柯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分派了自己的发言人，责成他们在某些大会上发言，提出某种反对意见；既然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进程中被迫退却并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那末这当然就是集团，就是集团的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组织，那末什么是派别组织呢？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解释吧。托洛茨基的发动，他的关于青年一代和派别组织问题的信和文章，都是要迫使党容许自己内部有集团存在。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

托洛茨基硬说，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所以有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容许恢复私人资本和恢复相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渗

入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20◇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这些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割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这里问题不在于制度。如果我们有极端自由的制度，那末集团就会多得多。因此，罪过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我们生活的条件，在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在于党本身发展的条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还容许集团存在，我们就会断送党，就会把党从完整的团结一致的组织变成彼此缔结条约、建立临时联合和取得临时协议的集团和派别组织的联盟。这将不成其为党，这将是党的瓦解。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把党看做别的东西，只把它看做由一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组织，它有一个意志，它在工作中把思想上的各种差异汇集在一条实际活动的洪流中。

而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是非常错误的，它违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会使党必然瓦解，会使党涣散，会使党软弱，会使统一的党变成集团的联盟。在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党,不仅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而且是一个能够经得住无产阶级敌人的攻击、能够引导工人去进行决战的真正钢铁般的党。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做出了明确具体的关于这次争论总结的决议，我们说，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组织，党应当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不能把党和机关对立起来,不能胡说干部有蜕化的危险,因◇21◇为这些干部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青年之间找空子，因为青年和这些干部现在步调一致地前进，将来还会步调一致地前进。

我们也看出某些肯定的结论。第一个和基本的结论是：党今后要坚决指靠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向他们看齐，收紧并缩小非无产阶级分子进入我们党的入口，或者完全堵死这个入口，对于无产阶级分

子，门要开得大一些。

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我认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公布关于统一的决议中的一项条文的时候了，这项条文根据列宁同志的提议，由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当时并没有公布。党员把这项条文忘记了。恐怕不是大家都记得这项条文的。直到现在还被保守秘密的这项条文应当公开了，它应当列入我们就要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问题的决议中。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就读一读。这项条文说：

“为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如遇违反纪律、恢复或容许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凡是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低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时，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22◇

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项条文放到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中去，并把它公布。

最后，谈一谈反对派经常提出的但是不一定经常得到满意答复的一个问题。他们时常问道：我们反对派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我认为反对派反映的是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情绪。我认为反对派不由自主地做了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的传播者，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反对派无限制地鼓吹他们常常加以绝对化和偶像化的民主，就是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你们知道像学生马尔丁诺夫、卡查尔杨等等这样一些同志的情绪吗？你们读过“真理报”上霍多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吗？他引了这些同志的演说中的一些话。例如马尔丁诺夫（原来他是个党员）的讲话：

“我们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执行，并且少进行一些讨论。”这里指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直属高等学校的支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党总共有不下五万个支部，如果每一个支部都这样对待中央委员会：支部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是进行讨论，那末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决议。马尔丁诺夫分子的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情绪呢？而马尔丁诺夫分子是拥护反对派的，——请注意这一点。马尔丁诺夫和托洛茨基之间有没有差别呢？差别只在于托洛茨基向党的机关展开攻击，而马尔丁诺夫要消灭党的机关。

还有一位高等学校学生卡查尔杨，原来他也是个党员。他问道：“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说这种话的不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而是“共产党员”◇23◇卡查尔杨。托洛茨基和卡查尔杨之间的差别在于：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干部在蜕化；根据卡查尔杨的说法，必须把干部赶走，因为在他看来，干部骑在无产阶级的脖子上。

我要问一问：马尔丁诺夫和卡查尔杨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是无产阶级的吗？当然不是。那末究竟是谁的呢？是党内和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些反映非无产阶级情绪的人拥护反对派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鼓掌）◇24◇

二 结 论

（一月十八日）

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我不想谈问题的经过，所以不想谈，是因为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这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但是既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愿意这样，既然他要求这样，那我就准备让步，简单地谈谈党内民主问题的经过。

在中央委员会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次是在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各企业中爆发了冲突，是由于某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有当时我们已经揭露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当时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缺点在党内积累起来了，必须成立一个有威信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研究这些事实，提出关于改善党内状况的具体建议。关于销售危机，关于“剪刀差”问题也必须这样说。无论是提出问题，无论是选举党内状况委员会和“剪刀差”委员会，都没有反对派参与其事。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萨普龙诺夫在基斯洛沃得斯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得斯克写完了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准备来莫斯科。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以前，中央委员会就已经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来到时一切都◇25◇已经准备好，他们既没有参与一句话，也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关于党内状况的问题，捷尔任斯基同志在九月省委书记会议上做过报告。我肯定地说，无论在九月全会上，无论在书记会议上，现在的反对派分子对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党内危机”和“民主”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由此可见，关于民主和“剪刀差”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出来的，主动权完全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而反对派分子没有讲过什么话，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场。

这可以说是第一幕，问题经过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幕是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开始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看到党内存在着缺点，中央委员会已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成立了委员会，——如果主动权仍旧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那就糟了，——于是他们就抱定决心，企图把主动权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夺取过去，并企图玩弄民主这个法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法宝很灵，可以试用它来欺骗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普

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详细谈到的那些文件，即四十六人的文件〔3〕和托洛茨基的一封信。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九月，即在他进行派别发动的前几天，在全会上还默不作声，至少并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过了两个星期却突然宣称，国家和党就要毁灭，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26◇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反对派真的愿意解决问题，真的愿意实事求是地同志般地对待问题，他们就应当首先向九月全会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声明，大致可以这样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要求你们向政治局报告你们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我们要向全会提出我们新的建议”等等。如果委员会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忽视反对派的意见或者拒绝召开全会来审查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的建议，那末在那个时候，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反对派才有充分权利越过中央委员会而公开地发表告党员书，并且向党说：“国家濒于灭亡，经济危机日益扩大，党就要毁灭，我们建议中去委员会各委员会审查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拒绝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曾试向政治局提出意见，但是毫无结果，我们现在不得不向党控诉，要求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我相信党会回答说：“是的，这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把问题的本质看得高于形式。”

但是，难道反对派这样做了吗？难道他们，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打算向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提出◇27◇自己的建议吗？难道他们曾经想过、曾经打算在中央委员会或在它的机关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吗？不，反对派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很明显，反对派不是想改善党内状况，帮助党改善经济状况，而是想抢先走在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工作的前面，夺取中央委员会的主动权，玩弄民主这个法宝，趁时间还不晚，就吵吵嚷嚷，企图破坏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看来，反对派急急忙忙地制造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声明，就是为了能够把它们分发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和各个地区，说他们反对派是拥护民主、主张改善经济的，而中央委员会却从中作梗，说他们需要大家的帮助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等等。

事实就是如此。

我要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我这些话。我要求他至少在报刊上反驳我这些话。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各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在反对派进行发动以前，就由中央九月全会成立了。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无论托洛茨基，无论其他的反对派分子都没有打算向这些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反对派知道有这些委员会存在，但他们藐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没有打算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在十月全会上声称他们想通过民主来挽救党，而中央委员会却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就嘲笑他们说：不，同志们，我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拥护民主，但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民主，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民主”是被你们的派别活动利◇28◇用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略步骤。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党内民主究竟做出

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及时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并完全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强同浪费现象和新经济政策对个别党员的腐蚀影响作斗争的建议。

全会委托政治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速政治局和九月全会所任命的下列各委员会的工作：（一）‘剪刀差’委员会，（二）工资委员会，（三）党内状况委员会。

政治局对这些问题制定必要措施后应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下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托洛茨基在他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主义路线的最高表现”。托洛茨基的这个声明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诬蔑，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失掉理智和被派别活动弄得头晕目眩的人才会在文件公布以后说十月全会是官僚主义的最高表现。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民主的”手腕做出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29◇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认为，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各个党员书的办法，而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坚决斥责四十六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

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同志们，可见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第三幕或者问题经过的第三个阶段是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十月全会决定建议政治局采取一切办法来保证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同志们，我应当声明，在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内，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要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虽然必须说明，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举行过两次非正式会议，谈到了经济方面和党方面的一切问题，并且取得了某些没有引起任何分歧的意见。这些非正式会议和这些想使政治局内部同心协力工作的尝试的下一步骤，我昨天已经报告过，就是成立三人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成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民主的决议。◇30◇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以为既然决议已经一致通过，就再没有理由进行争论，没有理由进行党内斗争了。事实上，在托洛茨基进行新的发动即发表他的告各地区书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违背中央委员会并越过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发动，却把一切事情都搅乱了，使情况根本改变了，它把党拉向后退去进行新的争论，去进行比过去更为尖锐的新的斗争。有人说，中央委员会应当禁止登载托洛茨基的文章。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对中央委员会非常危险的步骤。请你们试试禁止已经在莫斯科各区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中央委员会是不能采取这种轻率的步骤的。

问题的经过就是如此。

从上面所讲的应该得出结论：反对派的问题与其说是拥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的思想来损害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反对派不是一些

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他们暗自忖度：“也许中央委员会会犯错误，会有失策的地方，那我们就揍它一顿。”有一批党员，他们埋伏在胡同口等候党的中央机关，利用秋收或者切尔文贬值的机会，或者党的其他困难，以便暗地里从埋伏的地方跳出来揍党的脑袋，这就是派别组织。是的，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里是正确的，当时它告诉过你们，反对派分子同志们，民主是一回事，而陷害党是另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而利用民主的叫嚣来反对党的多数是另一回事。◇31◇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题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谈问题的经过，但是我终究对你的顽强的愿望做了让步，不得不讲到了这个问题。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当然，我们这些列宁同志的学生不会不了解列宁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这样的人物经过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但是请问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和这个最有天才的人发生了分歧呢？为什么你在困难的时刻离开了这个最有天才的人，不听他的话呢？你当时是待在哪里，待在哪一个阵营里呢？

萨普龙诺夫现在虚伪地伪善地赞扬列宁同志，而正是这位萨普龙诺夫曾经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无耻地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如果他真的认为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那末为什么，比如说，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支持天才的列宁，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始终站在对立的阵营里呢？列宁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派别分子开除出党，其中就有萨普龙诺夫，这一点萨普龙诺夫是否知道呢？

还有，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仅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而且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也站在和最有天才的列宁相敌对的阵营里呢？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这里就没有某种规律性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3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想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这很可嘉许。但是请看结果怎样呢？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你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失败了，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中，你又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又失败了；现在我不知道你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还是根据别人的见解工作，但是要知道，你似乎又失败了。（笑声）我始终认为，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多根据自己的见解而少根据托洛茨基在十月八日的信上所表明的那种见解来工作，那末他对我们会比对托洛茨基接近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责备中央委员会，他说，当伊里奇领导我们的时候，问题的解决是及时的，不耽误的，因为伊里奇善于掌握还在萌芽状态的新事变，并善于提出预告事变的口号。而现在，他说，在伊里奇不能视事以后，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落在事变的后面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想以此说明什么呢？想说明伊里奇比他的学生们高明吗？但是难道有谁怀疑这一点吗？难道有谁怀疑，伊里奇和他的学生们相比显然是歌利亚[①]吗？如果指的是党的领袖，不是指接到一大堆贺电的报刊上的领袖，而是指真正的领袖，那末我们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列宁同志。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目前列宁同志暂时不能视事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委员会制的方针。至于说到列宁同志的学生，可以举出同克逊的最后通牒〔4〕有关的事变做例子，这些事变对列宁同志的学生是一种典型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我们摆脱了困难而没有使事业受到损失，这件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列宁同志的学生已经

————————————————

① 据旧约记载，歌利亚是一个巨人。——译者注

从自己的导师那里学会了一些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硬说我们党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落在事变的后面，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不正◇33◇确，是因为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可以引证许多例子。就拿布列斯特和约来说吧。难道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不是签订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德国人的进攻和我们士兵的普遍逃跑这些事实才最后了解到和约的必要吗？战线的崩溃，霍夫曼的进攻〔5〕，他向彼得堡的进军，农民对我们的压力，——难道我们不是由于这一切事实才了解到国际革命的速度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我们的军队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巩固，农民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能忍耐，农民希望和平，他们要用强力取得和平吗？或者就拿废除余粮收集制来说吧。难道我们的余粮收集制不是废除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喀琅施塔得和唐波夫〔6〕这些事实才了解到不能再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过日子了吗？难道伊里奇自己不是承认，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遭到的失败要比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作战的战线上的任何一次失败都更严重吗？

党在这一切情况下都落在事变的后面，都稍微迟了一点，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这是合乎规律的。很明显，既然这里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上的预见，而是直接的实际领导，那末掌握政权而被卷进日常事变的执政党不可能立刻看出和掌握住生活深处所发生的过程，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力和新过程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使党看出这些过程并依据它们来确定方针。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过去稍微落在事变的后面，将来还会落在事变的后面。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落后与否，而在于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新过程的意义，然后按照总的发展趋向来巧妙地掌握这些事变和过程。如果我◇34◇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用到处找罪魁的派别分子的眼光来看事物，那末问题正是这样。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讲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而表示愤怒。他表示愤怒，但是实质上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并且根本不打算为自己的愤怒提出根据，他忘记了愤怒并不就是论据。是的，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确实离开了列宁主义。我们过去这样断定而且现在还是这样断定。布哈林所写的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题为“打倒派别活动”的著名文章，完全是论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问题的。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从实质上提出意见来反对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呢？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打算提出论据或者类似论据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愤怒呢？昨天我已经说过，今天还要重复一遍：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忽视许多组织要求托洛茨基明确回答问题的意志，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和党的干部对立起来，要党指靠学生青年和宣布集团自由，——托洛茨基的这些行为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不相容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究竟为什么不打算反驳我这种说法呢？

有人说托洛茨基受到了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都谈到这一点。同志们，我必须声明，这些同志关于攻击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使你们有可能判断，我提醒你们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事件，当时托洛茨基听到中央委员柯马罗夫关于中央委员不能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话，站起来就退出了全会会议。你们记得，中央全会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托洛茨基那里去，**请求**他回到全会会议上来。你们记得，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全会的请求，这◇35◇就表现出他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毫不尊重。或者再拿另一个事实的经过来说。虽然中央委员会曾经两次通过决议，要托洛茨基一定担任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但是托洛茨基坚决拒绝在苏维埃中央机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根本不打算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究竟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呢？为什么喜欢大谈计划

的托洛茨基对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屑一顾呢？一个中央委员蔑视中央的决议，这种情况能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呢？这一切事实不是说明了关于攻击的说法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说明了如果要责备什么人，那就应该责备托洛茨基自己（因为他的行为只能看做是对中央委员会的侮辱）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民主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我们有集团，那就有民主；或者你们禁止集团，那就没有民主。他的集团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民主的。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经常吸引党员群众不仅参加讨论问题,而且参加领导工作。集团的自由，即派别组织的自由（两者是一回事）是一种祸害，它使党有遭到分裂和变成争论的俱乐部的危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因为你坚持派别组织的自由。党员群众所理解的民主是创造条件保证党员积极参加我们国家的领导事业，而两三个反对派知识分子却把民主理解为给反对派建立派别组织的机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36◇

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关于党的统一的第七条呢？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第七条说：“为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难道你们反对“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吗？反对派同志们，难道你们反对这一点吗？同志们，我可不知道你们是反对这一点的。萨普龙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们反对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和“取缔派别活动”吗？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许我们会做小小的修正。（笑声）

再往下看：“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如遇违反党的纪律或恢复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可以采取党内处分的办法……”难道你们也害怕这一点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萨普龙诺夫，难道你们

想违反党的纪律，恢复派别活动吗？要是你们不想这样做，那末究竟害怕什么呢？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惊惶情绪揭露了你们自己。很明显，既然你们害怕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第七条，你们就是拥护派别活动，拥护违反纪律，反对统一。如果你们不反对这一切，那末你们究竟为什么惊惶不安呢？如果你们心地纯正，如果你们拥护统一，反对派别活动和反对违反纪律，那末党的惩罚的手是不会碰到你们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你们究竟害怕什么呢？（有人喊道：“既然没有什么可怕，你为什么提出来呢？”）我们是**提醒**你们。（笑声，鼓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在吓唬党。”）我们是吓唬派别分子，不是吓唬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认为党和派别分子是一回事吗？大概是做贼心虚。（笑声）◇37◇

再往下看：“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凡是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们不是派别分子，如果你们反对集团的自由，如果你们拥护统一，那末，反对派同志们，你们应当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七条，因为它是专门对付派别分子，专门对付破坏党的统一、党的威力、党的纪律的人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现在来谈谈拉狄克。有一种人，他们长了舌头是为了控制它和支配它的。这是平常人。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并且受舌头的支配。这是特殊的人。拉狄克就属于这种特殊的人。一个人如果长了舌头不是为了支配它，而是为了让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那他就不能知道，舌头会在什么时候顺口说出什么话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听过拉狄克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你们对他今天的演说就会感到惊奇。拉狄克在一次争论会议上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问题是不值得一谈的问题，他拉狄克，老实说是反对民主的，现在的问题实质上不是关于民主的问题，而是中央委员会考虑怎样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就是这个

拉狄克在另一次争论会议上又声明说，党内民主问题并不重要，中央委员会内的民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成立了一个执政内阁。还是这个拉狄克今天却又公开声明说，党内需要民主正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因为照他说来，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党。在这三个拉狄克中，叫我们相信哪一个呢？相信第一个，相信第二个，还是相信第三个呢？有什么可以保证拉狄克或者他的舌头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做出新的意外的声明来反驳他以前的一切声明呢？能◇38◇不能信赖拉狄克这样的人呢？既然如此，拉狄克的关于撤销鲍古斯拉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某些职务是由于“派别性的考虑”的声明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同志们，关于鲍古斯拉夫斯基我已经谈过了……至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让我告诉你们以下的事实。根据中央全会所批准的中央组织局的决议，撤销了安东诺夫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他所以被撤职，首先是因为他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分发了附有国际形势、党的建设等等议程的关于召开高等军事学校支部和空军支部代表会议的通知，虽然安东诺夫知道，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此外，所以撤销他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是因为他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不顾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的指示必须和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相符合的警告，把这个指示分发给所有的军队支部了。最后，他所以被撤职，是因为他送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封口气十分不礼貌而内容绝对不可容忍的信，威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它们使“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守规矩。

同志们！可以而且应该容许反对派分子担任职务。可以而且应该容许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不能容许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部长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

视起码的礼节。不能把教育红军的工作托付给这样的同志。关于安东诺夫的问题就是如此。

最后，我必须简单地谈一谈反对派同志们在他们的演说中反映的究竟是谁的情绪的问题。我必◇39◇须回到交通人民委员部训练班的卡查尔杨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事件”上来。这个“事件”说明，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的情况并不是一切都很好，他们身上的党性已经腐朽，他们内心里已经和党断绝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乐意拥护反对派。但是，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赞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中间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的。同志们，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人的。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话。这是社会革命党人“日报”〔7〕的话。反对派同志们，如果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队伍中有这样的拥护者，你们的立场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或者拿另一个同志即马尔丁诺夫同志来说吧。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默不作声，而由支部来做决定。他说，你们中央委员会可以执行我们支部的决定。但是我们有五万个支部。如果由它们来做决定，例如做关于克逊最后通牒问题的决定，那末我们花两年的时间也不能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知道，这是十足的无政府孟什维主义。如果这些失掉理智和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待在你们的派别组织里，你们的派别组织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喊声：“他们是党员吗？”）

是的，很遗憾，他们是党员，但是我决心采取一切办法使这种人不再做我们党的党员。（鼓掌）我说过，反对派所反映的是党内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意图。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这一点我昨天已经说过，今天再把它肯定下来。◇40◇

但是也许你们想听听其他新证人的话吧？好吧，我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举出你们大家知道的斯伊万诺维奇所说的话做例子。这个斯伊万诺维奇是什么人呢？他是孟什维克，当我们和孟什维克同在一个党内的时候他是党员。后来他脱离了孟什维克中央，成了右派孟什维克。右派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武装干涉主义者的集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即使要靠外国武力的帮助。他们的机关刊物是“曙光”杂志〔8〕。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就是斯伊万诺维奇。这个右派孟什维克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反对派的呢？他是怎样褒奖反对派的呢？请听吧：

“我们要感谢反对派，因为它把俄国共产党这个可怕的道德上的罪恶渊薮的情景如此逼真地描绘出来了。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给了俄国共产党以精神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工作帮助了所有那些认为推翻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的人。”

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的褒奖。

我在结束演说的时候，还是要对反对派的同志们表示一个希望，希望斯伊万诺维奇的这个吻不致在他们脸上贴得太紧。（鼓掌多时）

悼 列 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9]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把我们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沙皇◇42◇政府及其走狗的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暴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袭击，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的造谣和诬蔑，——二十五年来所有这一切恶毒的攻击都落在我们党的头上。可是，我们党像一座石山一样屹立着，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引导工人阶级向胜利前进。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劳动者备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治。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43◇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个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农民不结成这样的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和地主。工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农民没有工人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国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

形式。从前工农联盟具有军事联盟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目标的。现在工农联盟应当采取城市和乡村间、工人和农民间经济合作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商人和富农为目标的，因为它是以工人和农民互相供给一切必需品为目标的。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列宁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过这个任务。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基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巴什基里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阿尔明尼亚人和达格斯坦人，鞑靼人和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尔克明人，——他们都同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休戚相关。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使这◇44◇些民族摆脱枷锁和压迫，而且这些民族也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无限忠诚，以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决心来使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暗算和袭击。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和克逊最后通牒以及和德国危机〔10〕有关的事变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向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我国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

这不仅因为我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上，它体现着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它受到红军和红海军的强有力的保护。我国所以有力量，所以坚强巩固，还因为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深刻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都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是列宁同志用他百发百中的妙手射入敌人阵营的一枝箭，是他们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靠山，是给他们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赖的灯塔。他们◇45◇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不让地主和资本家破坏它。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软弱也在这里。

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看做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做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列宁知道，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劳动者去进行争取解放的坚决战斗。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倦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载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十三号◇46◇

斯大林主持悼念列宁的仪式

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画）

斯大林办公室悬挂的列宁像

病中的列宁

论 列 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接到通知，说你们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并邀请我也来做一个报告。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一个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宁的为人和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列宁的总的概念。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们讲的不可能比我刚才所答应的更多。

山　鹰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47◇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一九〇一年以后，在“火星报”〔11〕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

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48◇

谦　逊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塔墨尔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

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49◇

逻辑力量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 灰 心

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一九〇六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2〕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50◇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

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像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争取未来的胜利。我现在说的是列宁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须看一看列宁的反对者，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等人：他们很少像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宁用他对于孟什维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宁，问他的意见。在某些代表的言论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馁的情绪。我记得列宁对于这种言论用讽刺的蔑视的口气回答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维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

不 骄 傲

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13〕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51◇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像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

不困难地证明：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 则 性

党的领袖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52◇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秘密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

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53◇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相信群众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像列宁这样

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像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54◇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命天才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像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像鱼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我记得有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55◇

第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

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将军和资产阶级准备军事专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谓“舆论界”，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他们是“德国间谍”；克伦斯基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党驱入（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驱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纪律的德奥联军同我国疲惫的处于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结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堡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堡正酝酿着士官生◇56◇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堡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

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载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三十四号◇57◇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14]上的演说）

首先，我必须稍微谈一谈共青团中央对党内争论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在各地方组织已经表明了态度以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仍然顽固地保持沉默，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拿保守中立来解释共青团中央的沉默，那是不正确的。这简直是过于谨慎了。

现在稍微谈谈你们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你们中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研究了你们的提纲和文章，始终没有发现原则上的分歧。但是有一些糊涂思想和一大堆臆造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就是把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共青团和作为党的“工具”的共青团对立起来了。共青团是什么，是后备军还是工具？它既是后备军又是工具。这是很清楚的，并且在同志们自己的演说中也讲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后备军，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后备军，党就是用它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的。但它同时又是工具，是党用来影响青年群众的工具。可以更具体地说，团是党的工具，是党的辅助工具，这就是说，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是党用来影响团外青年的工具。这两个概念彼此并不◇58◇矛盾，决不能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

第二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某些同志认为“团的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成分，而是决定于领导人的坚定性”。他们把坚定性和成分对立起来了。这个矛盾也是臆造出来的，因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阶级政策既决定于前者，也决定于后者，既决定于成分，也决定于领导人的坚定性。如果坚定的人受到团内异己成分的影响（因为团员是

享有同等权利的），那末这种成分的存在对团的工作和政策就不会不发生影响。为什么党要调整自己的成分呢？因为党知道成分会影响它的工作。

最后，还有一个也是臆造出来的关于团的作用和团的农民工作问题的矛盾。有些人这样提出问题，说团的任务似乎是“巩固”它在农民中的影响,却不是扩大这种影响，而另一些人似乎想“扩大影响”，但是不同意巩固这种影响。他们想根据这种提法做出争论的纲领。很明显，这两个任务的对立是人为的，因为大家都很了解，团必须同时巩固和扩大它在农村中的影响。固然，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提纲中有一个地方关于农民工作有一句不妥当的话。但是无论塔尔哈诺夫，无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多数的其他代表都没有坚持这句不妥当的话，并且同意修改。既然如此，何必为小事争论呢？

但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生活和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矛盾，关于这个矛盾我想说几句话。我指的是团内存在着两种倾向：工人倾向和农民倾向。我指的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可以感觉到的，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在各个发言人的◇59◇讲话中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大家都说，必须广泛吸收工人入团，但是谈到农民，谈到吸收农民的问题时，大家就吞吞吐吐起来了。连那些不故作聪明和不耍手腕的发言人也对这个问题吞吞吐吐起来了。

很明显，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很明显，既然共青团是工人和农民的团，那末团内的这两种倾向，团内的这种矛盾今后仍然会存在。有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工人，对农民却只字不提；另一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农民，对团内的领导成分即无产阶级成分的作用却估计不足。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内部矛盾也就使得发言人吞吞吐吐起来了。人们在讲话中拿共青团和党相比拟。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比拟实际上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党是工

人的党，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党，而共青团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团。正因为如此，共青团不可能只是工人的团，它应当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目前这种团的结构下，团的内部矛盾和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说应该吸收中农青年入党，这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站在工农党的立场上。可是甚至某些负责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转到这种立场上去的。许多人大声喊道：“你们吸收工人入党，为什么不在同样的程度上吸收农民入党呢？让我们吸收十万或二十万农民入党吧。”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因为我们的党必须是工人的党。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非工人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是党内成分应有的大概比例数。共青团的情况和党却有些不同。共产主◇60◇义青年团是工农青年中的革命分子的自愿和自由参加的组织。没有农民，没有农民青年群众参加，共青团就不成其为工人和农民的团了。但是同时应当这样提出问题：领导作用要属于无产阶级成分。

第一次载于约·斯大林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书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版◇61◇

论列宁主义基础〔15〕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献给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62◇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末，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末

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63◇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64◇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

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65◇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66◇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口活动，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像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67◇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大战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会不会不竭尽全力拚命反对俄国革命以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甘心丧失像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富有人力物力的来源呢？当然不会！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打破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末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把西方财政资本和◇68◇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并推翻本国资本主义，替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像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现在的视线主要是萦注于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德国将在一般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69◇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6〕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一九〇二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

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页）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70◇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末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71◇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冲昏头脑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打死”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

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是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了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搁置起来。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财政资本的莫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72◇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战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

实践的一致，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而且值得受到这种信任。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风格，根据教育群众和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备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73◇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袖。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一些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既然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末，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17〕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

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相对地少些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74◇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无情地打破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18〕，——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

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75◇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和真正群众的、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19〕），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20〕），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21〕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却把巴塞尔决议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即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的口号，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76◇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

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度：“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个幻想。为了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提出种种‘口号’。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做个比较，不要听唯心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〇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尽净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的这种态度已经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检验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严肃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对**阶级**以至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77◇九页）

有些人说：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严肃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列宁还在一九〇四年，当我们党还幼弱的时候，就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斯大林注）看见我们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书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些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

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被工人运动的发展克服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78◇

三 理 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甲）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乙）对自发“论”的批判；

（丙）无产阶级革命论。

（一）**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79◇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一页）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一九〇二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第三四二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唯物主◇80◇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取新的形式。”〔23〕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4〕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81◇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

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25〕。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82◇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像“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变形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三）**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

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财政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财政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财政寡头的莫大势力是财政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粗暴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26〕）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财政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83◇**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同上）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①]（见“列宁◇84◇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五页）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个革命的一般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财政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85◇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一九一七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86◇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

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七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几、农民占百分之几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的统计数字，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87◇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像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反对资本主义的“决斗”。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

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88◇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其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个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一九一六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

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五年）上的著名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组织”，而是称为“战争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五三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一九〇五年）〔27〕的几篇著名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89◇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那时革命的火焰将延烧到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九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引‘**非**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奋斗，将来也要不屈不挠地为此目的而奋斗。无产阶级将**立刻**[①]利用资产阶级俄国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之下所获得的这种解放，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帮助富裕农民来反对农业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个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①]，而得出如下的结论：◇90◇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道，同半无产阶级一道，同一切被剥削者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

———————————————

① 见本卷第72页。——本书制作者注

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用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91◇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间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间断（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至多只实行上述要求就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28〕◇92◇

换句话说：

（甲）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乙）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奇特的”“漂亮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这个漂亮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见列宁“论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93◇二页）。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

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三次俄国革命所证实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为着革命，仅仅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并要求改变是不够的；为着革命，还需要剥削者已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而‘上层’也**不能照旧**时，只有在这种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换句话说，这个真理就是：**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危机（既触及被剥削者，又触及剥削者的危机），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①]。这就是说，为着革命，第一、必须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94◇觉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的必要性，并抱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使甚至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运动……使政府软弱无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至第六十六页）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95◇六九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甲）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乙）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丙）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设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末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96◇

“政权问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

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甲）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乙）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国外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97◇总是犹豫动摇，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难而张皇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心慌意乱，焦躁不安，东奔西跑，痛哭流涕，从这个营垒跑进那个营垒。”（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三页）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企图复辟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现象，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就**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同上，第二三二页）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事实上保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机会）的知识，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术人员（过资产阶级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员）有密切关系，有大得不可计量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在世界上可惜还保留着很多很多，◇98◇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一点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还是**消灭小商品生产者**，但这种人是不能驱逐、不能镇压的，必须和他们和睦共处，只有用很长时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而且应当）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和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七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的和最无情的战争，而资产阶级因为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强**它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

行政的斗争。”（同上，第七页和第二十七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99◇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你们必须熬过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斗争，以便不仅改变现存的关系，而且改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八卷第五〇六页）

列宁继续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长期的斗争中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的，这些偏见不是用神术，不是依圣母的意旨，不是依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所能摆脱的，而是只有在和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群众斗争中才能摆脱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五页至第九十六页和第九十四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孟

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像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来组织新内阁，上台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100◇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施普卡”[①]并非平静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藉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

————————————————

① 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施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施普卡平安无事。”——译者注

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101◇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和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①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②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四页）。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尔根之流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102◇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

————————————————

①、②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9〕。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藉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103◇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

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末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见◇104◇“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页）

（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

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财政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莫大势力的机关。◇105◇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页）。

————————————

① 着重号（黑体）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就结束了，世界历史的◇106◇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的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有国际性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使这个经验的指示易于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举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

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107◇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①]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四〇页）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108◇

（甲）问题的提法；

（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丙）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丁）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109◇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且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做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110◇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和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是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

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111◇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甲）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积聚程度。例如大家知道，

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112◇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丙）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性，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定货。

（丁）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戊）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己）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113◇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政纲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政纲。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末，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

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一般说来，当时在俄国是否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向和平的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114◇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暴动。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末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绵延不绝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

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115◇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末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

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拟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116◇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教训，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苏联农民既惯于重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因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而获得了自由，就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经是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党首先应当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有力量的党”（见恩格斯“农民问题”一九二二年版〔30〕）。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

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117◇所说的话吧：

“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生活得好些，使他们易于转到协作社，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定这样做，那我们就设法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小农可能转到我们方面来，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拯救而没有下降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极限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正是善于利用资本，因为这种物质牺牲会使以后实行整个社会改造时节省大批经费，也许节省十分之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见恩格斯“农民问题”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小农转到我们方面来”，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118◇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个极端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个极端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31〕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是和资◇119◇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体系，例如纺织业生产中的家庭工业体系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体系中，家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时继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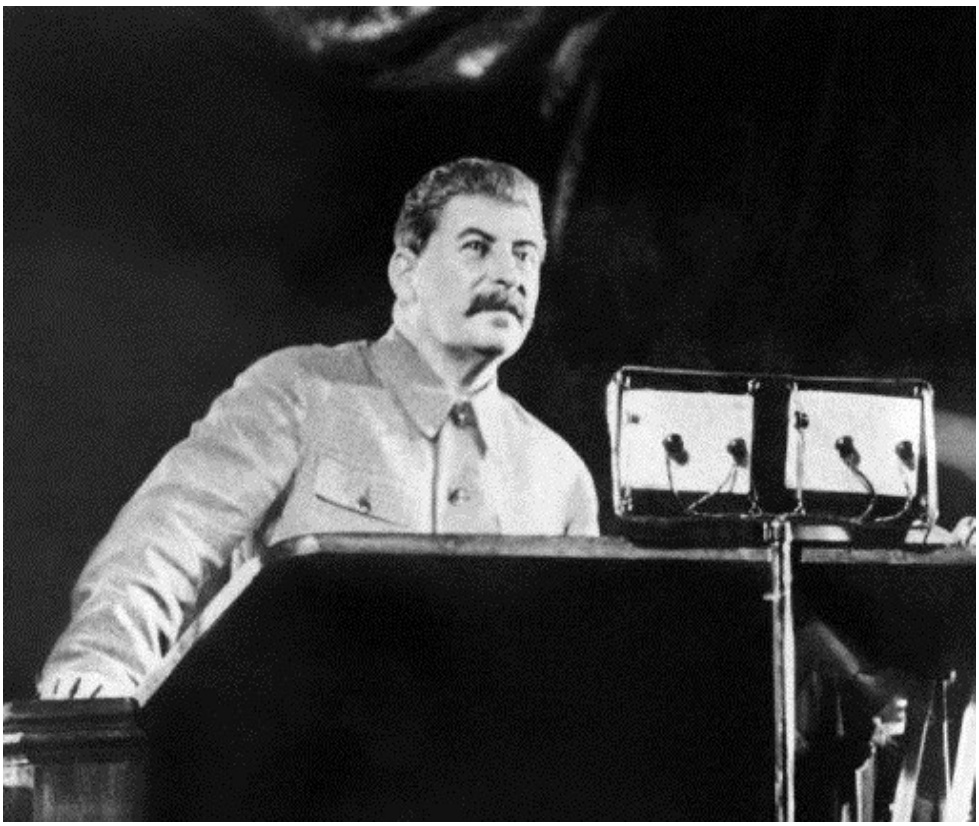
“每个社会制度的产生都需要有一定阶级的财政援助。不用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是◇120◇以好多亿卢布为代价的。目前我们应该特别援助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具体加以执行。可是必须名副其实地进行援助，就是说，不应该把这种援助仅仅理解为对随便一种合作社周转的援助，而应该把这种援助理解为对确实有真正的民众参加的合作社周转的援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斯大林在作演说

《论列宁主义基础》的中译本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121◇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藉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自决原则加以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

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吞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122◇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权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做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做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123◇经

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124◇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

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权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像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125◇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份，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

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不要孤立地看，而要以世界范围为标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甲）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财政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乙）被财政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126◇

（丙）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戊）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己）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末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庚）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末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

（辛）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

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壬）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癸）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127◇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见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趋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快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吞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

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128◇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旧俄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主义、狭隘观点和单干思想，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129◇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吞并的民族中和被吞并的民族中，**具体地说**能够**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有完全的平等权利、能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例如要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另一端向右走。如果压迫的、吞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吞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第二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第二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就是要宣传并坚持被压迫国家的分离自由。否则就**不会有**国际主义。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进行这种宣传，那末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把他鄙视为帝国主义者，鄙视为恶棍。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可以**既**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而◇130◇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主义和单干思想，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主张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对问题未加思索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〇页至第三三二页）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甲）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乙）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丙）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丁）战略指导；

（戊）策略指导；

（己）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131◇

（一）**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利用议会制度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始终处于在野党地位的那种条件。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做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32◇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做什么？”、“两个策略”、“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二） 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

卷第八十一页）

第二个阶段。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133◇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三）**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134◇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

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秘密状态，而群众的◇135◇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四）**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甲）本国的农民和一般过渡阶层，（乙）邻国的无产阶级，（丙）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丁）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甲）本国各个非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乙）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136◇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

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民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137◇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一）无论何时**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二）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三）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四）必须抓住时机，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五）**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力求获得胜利，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施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一）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十分混乱，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已十分厉害，他们已因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十分疲惫”；**如果**“（二）一切犹豫动摇而

不稳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有区别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露自己，已因实践方面的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三）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最◇138◇坚决最奋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情绪已开始高涨并猛烈高涨起来。那时，革命时机就成熟了；那时，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述一切……条件，并正确地选择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表现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不顾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阻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国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国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移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国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139◇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

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习。它们已经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页至第十二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从彼此敌对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下摆脱出来，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并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〇七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页）◇140◇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五）**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

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布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队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末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141◇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走，那末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揭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阴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的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142◇国十分有力地和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龌龊，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②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

②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年）是德国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译者注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143◇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的毒手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工业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目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商业正是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页、第八十九页）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六）**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

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144◇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持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在事前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勘察、未通人迹的高山，却在事前拒绝迂回前进，拒绝走回头路，拒绝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尝试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向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藉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145◇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准备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金子的作用”〔32〕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146◇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确切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稍微稳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做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

争的副产品……当无产阶级即使只是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和革命的关系方面就出现了一种新东西。在原则上仍然和以前一样，但是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一种马克思本人所不能预见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观点才能了解…… 在胜利以后，当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显然没有充分的力量来用革命手段实行这种或那种过渡的时候，它们（即改良。——斯大林注）（在国际范围内仍旧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和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页至第九十二页）◇147◇

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

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148◇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一）**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149◇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

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150◇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末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

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时代，甚至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密切地接近我们党；可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比较接近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一切群众◇151◇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就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〇页）

（二）**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末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

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152◇“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的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固定的，因为‘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为党员’。界限不清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在于能够造成一种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的**使组织涣散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六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

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党，这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三三八页至第三三九页）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末作为◇153◇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个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之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做出瞧不起人的嘴脸，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对中央机关人员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见而违反我的意见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依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依据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藉党的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顾到我想补选进去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六一页和第三三◇154◇五页）

——————————————

① 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斯大林

（三）**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上不会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155◇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

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页）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156◇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至高无上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

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末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大概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见，如果我们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一般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即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诚实、奋不顾身、有威信、能引导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最完全最忠诚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仅不能把政权保持两年半，甚至不能保持两月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157◇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受到本阶级全体忠诚分子信任的党，没有善于注意群众情绪并善于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五）**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158◇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列宁说：“在目前紧张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只有使党的中央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关，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五页）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二十七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159◇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内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33〕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六）**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领袖和议员。列宁说：“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

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160◇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末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有过**很多次**困难情况，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机，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161◇梯主义者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要去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出色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在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

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滚开，那末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七页、第三五八页、第三五九页）

九　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学作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很特殊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甲）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乙）美国人的求实精神。◇162◇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老旧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末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主义和“革命的”设计主义的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完善的共产主义的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些患有这种病症的“布

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标准……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像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主义和发号施令主义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夸”。

列宁说：“共产党员的骄夸，就是说，参加了共产党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产党员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自己的一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义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163◇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页和第三八六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主义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末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勃·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

有像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主义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164◇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五月九日、十一日、十四日、十五日和十八日“真理报”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〇七、第一〇八和第一一一各号◇165◇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34〕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一八号和第一一九号◇166◇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一年来在国内和党的周围所形成的总的环境可以说是有利的环境。主要的事实是：国内经济高涨，积极性普遍提高，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党的生活活跃。

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年来党在利用这个环境来加强自己在周围群众组织中的影响方面做得怎样，党在改善自己的成分、改善自己的整个工作、改善对负责工作人员的登记、分配和提拔方面做得怎样，以及党在改善自己组织的内部生活方面做得怎样。

因此，我想谈八个问题：

（甲）围绕在党的周围并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的状况和共产党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的增长；

（乙）国家机关即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实行经济核算的机关以及下层苏维埃机关的状况和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影响的增长；

（丙）党的成分和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169◇

（丁）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党的干部和新党员；

（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农村工作；

（己）党在登记、分配和提拔党员和非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方面的

工作；

（庚）党内生活；

（辛）结论。

我必须在下面举出一些数字，因为没有这些数字，报告将是不全面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同时应当预先说明，我不相信这些数字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统计工作很蹩脚，而这是因为，很遗憾，不是所有的苏维埃统计人员都有起码的职业荣誉感。

做了这个必要的说明之后，我来谈谈数字。

一、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

（甲）**工会**。根据统计材料，去年组织在工会里的有四百八十万人。今年有五百万。人数无疑是增加了。如果拿十二个基本产业工会来看，拿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人数和有组织的人数来看，那末有组织的工人占百分之九十二。在基本工业部门，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百分之九十一至九十二。这是工业方面的情况。

农业方面的情况就差了。农业工人约有八十万，如果拿不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农业工人来看，那◇170◇末组织在工会里的人数是百分之三。

至于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这里有省工会委员会和专区工会委员会主席的数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地下党员担任主席的占百分之五十七强。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减少了。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入党的人的百分数增加了。这是因为组织在工会里的人数增加了，地下党员不够，干部要靠新党员来补充。在这些主席中，过去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现在占百分之六十一。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改善了。

（乙）**合作社**。这方面的数字比其他任何方面更混乱，不能令人

相信。消费合作社去年约有五百万社员，今年就约有七百万了。即使上帝让我们天天过新年，我也不相信这些数字，因为消费合作社还没有完全实行自愿原则，这里无疑有死魂灵。农业合作社去年似乎有二百万社员（可是去年我从农业合作总社得到的数字是四百万社员），今年却只有一百五十万了。组织在农业合作社里的人数减少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消费合作社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党员去年占百分之八十七，现在占百分之八十六。减少了。在省社和区社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六十八，现在占百分之八十六。影响加强了。但是，如果提出的不是关于“领导”机关的问题，而是关于真正担任领导工作的负责工作人员的问题，那末在所有一切负责工作人员中间，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二十六。这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确实的。农业合作社领导机关中的党员数字，去年是百分之四十六，今年是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再深入一步，拿担任负责工作的领导人员来看，那末其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三。◇171◇

请看我们的某些统计人员多么会装饰门面，装饰外表，把腐朽的东西遮盖起来。

（丙）**共青团**。团员和候补团员数去年是三十一万七千（可是我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签署的去年的数字材料上看到的是四十万），今年是五十七万。尽管数字有些出入，加入共青团的人数增加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工人去年占百分之三十四，今年占百分之四十一；农民去年占百分之四十二，今年占百分之四十。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去年是五万人，今年是四万七千人。俄共（布）党员在整个共青团中的人数去年大约是百分之十，今年是百分之十一。增加也是毫无疑问的。

（丁）**女工和农妇的团体**。这方面的主要组织是代表大会。这里的混乱数字要多少有多少，简直太多了。但是，如果好好地清理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城市中去年有三万七千名代表，今年有四万六千名，

就是说，比去年多了一些。农村中去年有五万八千名代表，现在有十万名。这些代表所团结的广大的农妇和女工群众有多少，这方面我没有得到稍微准确的数字。

由于吸收女工和农妇参加苏维埃工作和党的工作的问题特别重要，研究一下女工和农妇参加工会机关、苏维埃、党的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的百分数不会是多余的。在村苏维埃中，妇女去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少得可怕），今年占百分之二点九（还是太少），但是总算增加了。在乡执行委员会中，妇女去年占百分之零点三，今年占百分之零点五，增加得太少了，简直不值得提。在县执行委员会中，妇女去年约占百分之二，今年比百分之二多了一点（我提出的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172◇国的数字，因为我没有所有共和国的数字）。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省执行委员会中，妇女去年占百分之二强，现在占百分之三强。在工会会员中，今年妇女占百分之二十六，没有去年的材料。在工厂委员会委员中，妇女占百分之十四。在省工会委员中，妇女占百分之六，在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妇女占百分之四强。在党内，妇女去年约占百分之八，现在约占百分之九。在候补党员中，妇女过去约占百分之九，现在约占百分之十一。这一切都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以前的情况。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省委员会中，妇女占百分之三，在县委员会中，妇女约占百分之六。在最重要的妇女团体中，即在代表大会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十，现在占百分之八。减少的原因是非党员代表数增加了。必须承认，占我们苏联人口半数的妇女仍然站在苏维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大道旁边，或者几乎站在旁边。

（戊）**军队**。在陆军、军事学校和海军中，共产党员的总数从六万一千名减少到五万二千名。这是一个必须消除的缺点。同时党员指挥人员的总数却增加了。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党员在指挥人员中占百分之十三，现在占百分之十八。从党龄来看军队中的党员

是很有意思的。在军队中工作的五万二千名共产党员中，地下党员占百分之零点九，不到百分之一；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到十月入党的占百分之三强；一九一九年以前入党的占百分之十一；一九一九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二〇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你们可以看出，在我们军队中服务的即使不完全是新党员，也主要是新党员。◇173◇

（己）**社会发起的自愿组织**。引人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组织——自愿的组织，社会发起的组织：各种文化教育小组和团体、体育组织、协会、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的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加，同时应当指出，其中不仅有同情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而且也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这种社会发起的组织去年约有七十八个至八十个，今年超过了三百个。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体育组织来说，这个组织的会员去年是十二万六千名，今年是三十七万五千名。这个组织的社会成分如下：工人去年占百分之三十五，现在占百分之四十二。这些组织的基本核心是工厂委员会和工厂俱乐部以及农村中的农民互助委员会〔35〕。引人注意的是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目的是要成为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工人通讯员组织拥有二万五千人，农村通讯员组织拥有五千人。如果看一看这些组织的省机关的成分，那就可以看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员去年占百分之十九，今年占百分之二十九强。最后，不能不提到昨天在列宁墓前举行庆祝游行〔36〕的新组织，即少先队组织。根据我们的统计材料（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统计工作有点蹩脚），少先队组织的人数在去年六月以前是七万五千人，在今年四月以前已经超过十六万一千人。在工业省份的少先队员中，工人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一，农民子弟占百分之七。在民族区域的少先队组织中，工人子弟占百分之三十八。在农业省份，工人子弟占百分之三

十六。

围绕在党周围并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大体上说来，党在这些组◇174◇织中的影响增长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二、国家机关

（甲）**职员人数**。根据统计材料，各人民委员部的职员，即列入国家预算的机关的职员，去年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今年似乎剩下一百二十万人了。减少了三十万人。但是，如果看一看实行经济核算的机关，那就可以看到，今年我们在这方面大约减少了二十万人（没有去年的数字），就是说，在减少职员方面，我们在列入国家预算的机关中取得了成绩，而在实行经济核算的机关中遭到了很大的失败。至于一部分职员转入地方预算，就是说没有算入上面的数字，我就不谈了。职员的人数大体上没有改变，也许还增加了。此外，合作社的职员去年是十万零三千人，现在是十二万五千人，增加了；工会的职员过去是二万八千人，现在是二万七千人，党机关的职员过去是二万六千人，现在是二万三千人。不算列入地方预算的职员，总共有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人。可见现在还没有根据来谈减少一般职员，特别是减少国家机关职员的成绩。

（乙）**国家高级机关的党员数**。就高级机关的人员、各委员会的人员、各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员及其助手（工业除外）来说，一九二三年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三，今年占百分之八十六。如果同两年前的情况比较，无疑是有某些进步的。在这些领导机关中，工人去年占百分之十九，今年占百分之二十一。很少，但是总算增加了。◇175◇

（丙）工业机关的党员数。至于工业机关、托拉斯、辛迪加和最大的企业，它们的情况如下：在苏联托拉斯的全部机关中，共产党员

去年占百分之六强，今年占百分之十强。在托拉斯、辛迪加和最大的企业的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去年占百分之四十七强，今年占百分之五十二强。如果拿最大的企业的经理来说，共产党员去年占百分之三十一，今年占百分之六十一。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托拉斯的全部机关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九点五，今年占百分之十二强（将近百分之十三）。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托拉斯的领导人员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三十七，现在占百分之四十九。在辛迪加的全部机关中，共产党员去年占百分之九，今年占百分之十。在辛迪加的领导人员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四十二，现在占百分之五十五。

总之，必须承认，如果拿经济机关的领导人员来说，共产党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八至五十。

（丁）**商业和信用机关的党员数**。目前在我国整个经济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我国商业和信用机关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拿在我们整个发展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在最近改组以前，在那里的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员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四。拿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机关——国家进出口贸易局来看，在那里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九，而这是一些什么共产党员呢，根据国家进出口贸易局中央机关内的共产党员百分之百被清洗了这个事实，你们就可以判断了。（笑声）在整个经济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个重要机关——粮食公司的情况如下：不算中央机关和派驻在分公司的正副全权代表，粮食公司的五十八个分公司共有九千九百名◇176◇工作人员。其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五点九，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百分之零点七，其余的是非党群众。在和农民最接近的机关中，即在谷物收集站中，在一切辅助采购站和代购员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七。在粮食公司的中央机关中，负责工作人员有一百三十七人，其中俄共（布）党员是十三人，占百分之九。应当指出，

在粮食公司中，党员的使用极不合理，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担任负责工作，而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则是下级职员。像国家银行这种信用机关的情况也并不好些。这是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重要的信用机关。你们知道信贷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只要发放优惠贷款就行）使任何一个居民阶层破产或上升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国家银行的全部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七，在领导人员中间只占百分之十二，而国家银行却决定着许多企业和很多经济机关的命运。

（戊）**苏维埃的党员数**。这里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材料。在村苏维埃中，共产党员去年约占百分之六，现在达到百分之七强。在乡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三十九强，现在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在县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八十强，现在达到百分之八十七强。在县辖市的市苏维埃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六十一，现在减少到百分之五十八。在省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九十，现在占百分之八十九。在省辖市的市苏维埃中，共产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七十八，现在占百分之七十一。在后面这三种苏维埃中，即在县辖市的市苏维埃、省执行委员会和省辖市的市苏维埃中，非党群众的影响不大，但是毕竟在增长着。至于省执行委员会全◇177◇会，这里有六十九个省的材料，上面有关于二千六百二十三个工作人员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党群众在省执行委员会全会中约占百分之十一。非党群众百分数最高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区域，那里非党群众占百分之二十。至于各民族共和国，那里非党群众占百分之七。这是非党群众在省执行委员会中所占的是低的百分数。而这是民族共和国的情况，一般说来，那里党员很少！

三、党员成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

（甲）**人数**。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的党员和候补党员

共计有四十八万五千余名。现在，不算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共计有党员四十七万二千名。加上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拿五月一日的材料（到这一天已经接收了十二万八千人）来看，可以肯定我们的党员有六十万人。假定再过两星期左右，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至少有二十万人，那就可以肯定党员总数为六十七万至六十八万人。

（乙）**党员的社会成分**。工人去年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今年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五（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不算在内），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八。农民过去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现在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即减少了百分之一点一。职员及其他成分过去占百分之二十九强，现在占百分之二十九多一点，即增加了不多。加上到五月一日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在俄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四，农民占百分之二十三，职员及其他成分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78◇

（丙）**党员的党龄**。一九〇五年以前入党的去年是百分之零点七，现在是百分之零点六。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入党的去年是百分之二，现在仍然是百分之二。一九一七年入党的过去是百分之九强，现在比百分之九稍微弱一些。一九一八年入党的过去是百分之十六点五，现在是百分之十五点七。一九二〇年入党的过去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现在是百分之三十点四。一九二一年入党的过去是百分之十点五，现在是百分之十点一。一九二二年入党的（没有当年的数字）现在是百分之三点二。一九二三年入党的是百分之二点三。所有这些数字都没有把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计算在内。

（丁）**民族成分和性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大俄罗斯人在党内占百分之七十二，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以后，百分数显然还会增加。第二位是乌克兰人，占百分之五点八八。第三位是犹太人，占百分之五点二。其次是突厥语系各民族，占百分之四强。再其次是其他民族，如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等等。女

党员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七点八，现在是百分之八点八。女候补党员过去占百分之九，现在是百分之十点五。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中，妇女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这稍微增加了上述妇女的百分数。

最后，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以前，产业工人党员（党员和候补党员）占百分之十七，加上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以十二万八千人计算），则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三。

（戊）**工人阶级中的党员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党内的工人党员总数，就是说，计算一下五月一日以前的数目和再过两星期左右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总数将达到（大概还会超过）二十万人的◇179◇那个数目，那末我们党内的工人党员总数将是党员总数六十七万二千人中的四十一万。这个数字占苏联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总人数四百一十万的百分之十。

我们达到了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十个党员。

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干部和新党员

（甲）地方机关的成员。我拿四十五个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全会来说。在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全会中，地下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二强，其余百分之六十七是入党较晚的：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二〇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九。在地方领导机关中，即在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不是地下党员，而是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党员。拿五十二个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主席团来说（这里有这些组织的党龄材料），在革命前入党的占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十九，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六，其余的占百分之六。在这里，二月以后加入我们党的党员还是占多数。

担任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组织部长的地下党员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三十；担任宣传鼓动部长的地下党员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三十一，现在占百分之二十三。至于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书记，我们可以看到相反的趋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地下党员在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书记中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在这次代表大会◇180◇以前则占百分之七十一。

任务很清楚：应当降低省委书记的党龄条件。

六十七个县的县委员会全会的成员如下：地下党员占百分之十二；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党的占百分之四十三。根据二百四十八个县的材料，在我们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县委书记中地下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一九年以前入党的占百分之三十七。二十八个省的支部书记（有六千五百四十一个书记的材料）中地下党员只占百分之三强，大部分——百分之五十五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即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入党的。

根据四十五个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社会成分来看，工人今年占百分之四十八。在五十二个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主席团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一。在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书记中，工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在六十七个县的县委员会全会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四。在二百四十八个县的县委书记中，工人占百分之五十。

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召开的省和县的党代表会议以前的材料。

但是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前，我收到了若干关于最近召开的一些代表会议的结果的材料。这些有关十一个省和十六个区域的材料表明：在省委员会全会和区域委员会全会中的地下党员数减少◇181◇到百分之二十七，工人数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现在有两种趋向：一方面是提拔新党员做干部并扩大干部的队伍，另一方面是改善党组织的社会成分。

（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分**。拿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有五十六人）来看，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农民和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三。因此，必须增加工人成分来扩大中央委员会。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农民和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五十二。这里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按党龄来看，地下党员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占百分之九十六。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二月以前入党的。五十六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入党较晚的，占百分之四。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六十个人中，有五十七个地下党员，三个非地下党员（占百分之五）。因此，应当增加新党员。

（丙）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分。共计有七百四十二名代表。其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二，地下党员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余都是入党较晚的党员。

五、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甲）**共产主义教育**。党内政治文盲的百分数大得惹人注目：某些省的政治文盲竟达百分之七十。俄罗斯中部某些省的政治文盲平均占百分之五十七（调查了六万人）；去年约占百分之六十。这◇182◇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显然，工作进行得与其说是深入，不如说是广泛。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的数目，确切些说，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的学员数目，由于一部分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转入地方预算而减少了一些。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数比去年增加了。但是为了按现有的经费来改善学生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尽力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必须把学生减少一些。特别应该强调列宁主义的宣传，因为这种宣传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意义。

（乙）**报刊**。我国报纸去年有五百六十种，今年减少到四百九十五种，但是发行份数却从一百五十万份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份。非俄罗斯文报纸的增加是值得注意的。有些共和国连一份俄文报纸也不出版，例如阿尔明尼亚，那里百分之百的报纸都是用阿尔明尼亚文出版的。格鲁吉亚有百分之九十一的报纸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白俄罗斯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报纸是用非俄罗斯文出版的。可以说在所有的民族区域和民族共和国内，民族报纸的数目都增加了。应当注意我们定期机关刊物编辑部的成分。调查了二百八十七个报刊机关，发现在这些报刊机关中地下党员担任编辑的只占百分之十。为数最多的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入党的党员。这是一个缺陷，应当派老的更有经验的报刊工作人员去帮助年轻的报刊工作人员，消除这个缺陷。

（丙）农民工作。这方面有许多缺点。村和乡的苏维埃目前还是税务机构的机关。农民首先把它们看做收税的机关。根据了解农村的工作人员的一般反应，农村地方机关的工作是这样：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地方上执行得不正确。村和乡的苏维埃机关的人员缺点很多。农村支部的行政工◇183◇作人员对工作发生不好的影响。发生更坏的影响的是接近农村的工作人员不懂苏维埃法律，不会向贫农解释这些法律，不会根据苏维埃法律，根据苏维埃法律给予贫农的优待来维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反对富农的横霸势力。其次，一般的错误是：人们只想从口头鼓动方面去接近农民，不了解农民需要的是实物鼓动，而不是口头鼓动，需要的是提供直接利益的鼓动。吸收入合作社，对贫农实行优待，农业贷款，农民互助委员会组织的互助，——这些就是最能使农民关心的问题。

六、党在登记、分配和提拔工作人员方面的工作

（甲）**登记和分配**。去年登记的负责工作人员约有五千名，今年

我们登记的各级负责工作人员约有一万五千名。我们的登记工作改善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数字表明，去年分配了一万名各种工作人员，其中负责工作人员有四千多名。今年分配了六千名，其中负责工作人员有四千名。过去党在分配方面的主要工作中心是：首先把工作人员供给党，其次供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机关，最后供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关，主要是它的税务机关。供给其余一切工作部门的共产党员为数极少。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很大的错误。当经济生活的中心转到商业的时候，我们在转而以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大量供给商业和信用机关及其地方和国外代表机关方面表现得不够主动，不够坚决。我指的特别是国家进出口贸易局和粮食公司这样的机关。◇184◇

七、党内生活

我不想列举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机关处理了多少问题和哪几类问题，因为这没有重大意义，并且在分发给你们的书面报告中已经讲到了。我只想请你们注意下述情况。

第一、我们组织的内部生活无疑是改善了。现在得到的印象是：各组织安定了，争吵少了，实际工作在进行。在边疆地区有例外情况，那里除了对共产主义不很坚定的老工作人员，进过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人员正在成长，他们在党的工作方面很强，在苏维埃工作方面却非常弱。边疆地区的这些年轻工作人员和老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是不会很快就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地区是例外。至于俄罗斯中部的多数省份，可以说那里的组织已经安定了，实际工作向前进展了。我们在上次代表大会上讲得那么多的最爱争吵的共和国——格鲁吉亚，现在在党内关系上已经和睦了。过去的倾向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如菲力浦·马哈拉泽和奥库札夫，已经彻底同极端的倾向分子断绝关系，并声明有决心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

第二、在这一年里，在省委员会特别是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重心由常务局或主席团移到全会了。以前中央全会转托政治局解决基本问题。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政策和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由全会解决。你们看一看我们全会的日程和分发给各省委的速记稿，就会知道重心由政治局和组织局移到全会了。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全会上聚集了一百至一百◇185◇二十人（这些人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由于重心移到了全会，全会就变成了培养工人阶级的领袖即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者的最大的学校。新的人材，工人阶级明天的领导者在我们眼前成长壮大起来，——我们扩大全会的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上也出现了这种趋向。最重要的问题由省委员会常务局转到全会，全会扩大了，全会会议的时间更长了，全会会议吸收了省的所有的优秀工作人员，省委员会全会因而变成了培养地方和区域的领导者的学校。必须使地方即省和县的这个趋向变成事实。

第三、在这一年里，我们党的内部生活空前热烈，可以说是沸腾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已经习惯于处理大事情，因而往往在完成极巨大的事业时看不到它的伟大。用不着证明，像争论和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这样的事实是国内和党内的最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当然不能不使党内生活活跃起来。这两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党经过了争论，现在已经坚如磐石。说明我们党既然按照整个工人阶级的意志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它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党，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机关。

八、结论

一、在围绕着我们党的群众组织中，应当特别注意合作社、女工和农妇的团体。我所以提出这些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在目前最令人担心。◇186◇

（甲）毫无疑问，消费合作社机关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把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的使命。农民社员在消费合作社社员总数中只占三分之一这个明显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应该使农民在消费合作社中占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员必须把工作中心从省移到县和区，以便同农民群众建立联系，从而把消费合作社变成联系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环节。

（乙）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并不好些。数字混乱，一年来社员数减少了，——这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事实。在这里，也同在消费合作社一样，共产党员应当把重心移到县和区——更接近农民群众，抱定目的使农业合作总社的地方机关不致成为富农横霸势力的掩护所。但是这还不够。应当用共产党员的力量来加强农业合作总社的领导机关，因为那里的情况最近已经开始大大恶化了。

（丙）妇女工作方面的情况更坏。固然，女工和农妇的代表大会正在增多和扩大，但是，妇女运动的工作人员在鼓动方面取得的成绩还远没有在组织方面巩固起来，连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巩固起来。女工和农妇参加苏维埃、工会和党的百分数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党应当采取一切办法在最近的将来弥补这个缺陷。苏联居民的半数仍然站在苏维埃和党的发展大道的旁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丁）社会发起的自愿组织，尤其是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组织，特别引人注意。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组织有很大的前途。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这些组织能够起无产阶级舆论的意志的最伟大的表达者和强有力的传播者的作用。你们知道无产阶级舆论在揭发和纠正我们苏维埃社会◇187◇的缺点方面的力量，这个力量比行政压力的力量大得多。正因为如此，党应当尽力帮助这些组织。

二、国家机关的情况特别引人注意。这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是无可怀疑的。

（甲）列宁的关于精简国家机关的遗训只执行了一部分，执行了一点点。各人民委员部机关减少了二三十万职员，可是另一方面新的机关——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机关增加了，老实说，这不能叫做精简机关。党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以坚定的手段使列宁在这方面的遗训得以实现。

（乙）我向你们列举了一些数字，说明非党群众参加我们苏维埃的百分数非常低。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再这样建设新国家是不可能的。不特别注意吸收非党群众参加省和县的苏维埃工作，进行巨大的建设工作是不可能的。这里可以指出各种方法。下面是一个合适的可以采用的方法：在省和县的苏维埃的各部门下面设立一些小组，更好的是定期召开非党群众——城市的工人，县的农民的业务会议，以便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各个管理部门的业务工作，然后再从被吸收参加业务工作的非党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优秀的最有能力的人，派他们担任国家工作。不这样扩大市和县的苏维埃的基础，不扩大苏维埃工作的基础，不吸收非党群众，苏维埃就会大大丧失自己的威信和影响。

（丙）我们党内有一种见解，认为省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县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党的工作。至于其他各种工作，好像都不是纯粹的党的工作。人们常常讥笑那些在托拉斯和辛迪加工作的人："他们同党脱离了。"（有人喊道："他们还受到清洗。"）无论在经济机关或在党组织里，都必须清洗某些同志。但是我讲的不是特殊情况，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况。在我们这里通常把党的工作分◇188◇成两面：高级的，这是省委员会、区域委员会、支部、中央委员会的纯粹的党的工作；低级的，带引号的所谓党的工作，这是一切苏维埃机关特别是商业机关的工作。同志们！这种对待经济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极端违反列宁主义的。在最讨厌的店铺里，在最讨厌的商业机关里工作的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只要他是在建设并推动事业前进，他就

是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受到党的全力支持。如果对商业采取这种老爷式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不久以前我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我说也许我们必须从党的方面或者工业方面调一万来个共产党员到商业工作方面去。他们哈哈大笑。不愿意搞商业！可是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在党内根除对商业的老爷式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掌握所有的商业部门，那末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言论就有变成空谈的危险。

（丁）同志们，任何建设工作，任何国家工作，任何计划工作，没有正确的**计算**是不可想像的。而没有统计，计算是不可想像的。没有统计，计算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不久以前李可夫在代表会议上说，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有一个统计人员，他今天对一个问题提出一种数字，明天对同一个问题又提出另一种数字。可惜这样的统计人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绝迹。整体的各个部门是互相衔接的环节，如果有一个环节弄坏了，那末整个工作就会有搞坏的危险，统计工作就是这样。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统计人员具有某种起码的职业荣誉感。他不会撒谎。他可能有某种政治信念和政治倾向，但是涉及事实，即涉及数字，他宁可牺牲自己，不说假话。这样的资产阶级统计人◇189◇员，尊重自己并具有某种起码的职业荣誉感的人，我们最好尽量多一些！如果我们不这样组织统计工作，那末我们的建设工作就不能前进一步。

关于**报表**也必须这样说。任何经济工作没有报表就不能前进。可是遗憾得很，我们的会计员不总是具有普通资产阶级的诚实会计员的那种起码的长处。我尊重他们之中的某些会计员，在他们中间有诚实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但是也有恶劣的会计员，他们会弄虚作假，他们比反革命分子还危险，——这是事实。不克服这些缺点，不消除这些缺点，我们就不能把国家的经济和国家的商业向前推进。

（戊）在某些国家机关的领导机关中，工人和共产党员的百分数

仍然很低，很不够。在商业机关（对外贸易、国内贸易、辛迪加）的领导机关和驻国外的代表机关方面，以及在目前国民经济生活中和国民经济首先是国营工业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信用机关方面，这个缺点特别明显。党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来弥补这个缺陷。不这样做，就休想实现党的经济和政治的指示。

（己）以前，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和成立托拉斯的问题。现在，当中心转到商业方面的时候，组织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合营公司和股份公司〔37〕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实际情况表明，我们解决了托拉斯问题，可是我们的机关在解决合营公司和股份公司的问题上却做得很差。现在有一种趋向，竭力要组织一种把这个大事业中的国家监督作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商业机关。毫无疑问，党将用一切方法同这种趋向作斗争。◇190◇

三、应当继续改善党的一般成分，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的干部看成一个小圈子。干部的队伍应当靠提拔新党员来逐步扩大。新党员应当补充干部。不这样做，干部的存在就是没有目的的了。

四、宣传方面：

（甲）党员的政治知识很差（政治文盲占百分之六十）。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使政治文盲的百分数增加了。需要在消灭这个缺点方面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任务在于推进这个工作。

（乙）电影方面的情况不好。电影是进行群众性宣传的最重要的工具。任务在于掌握这个事业。

（丙）报刊事业正在发展，但是还不够。任务在于把“农民报”〔38〕的发行份数增加到一百万份，“真理报”的发行份数增加到六十万份，创办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通俗报纸，发行份数至少要达到五十万份。

（丁）墙报工作正在发展，但是还不够。任务在于支持墙报通讯

员，把工作向前推进。

（戊）农村工作的情况不好。农村的鼓动主要应当是实物鼓动，给予贫农和中农各种帮助，包括优惠贷款，像乌克兰的贫苦农民委员会〔39〕那样发展集体经济的萌芽（不是农业公社），乌克兰现在约有五千个集体农庄，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首先是参加农业合作社。应当认为，掌握农民互助委员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应当记着，地方组建部队〔40〕对农村的鼓动具有巨大意义。

五、在登记、分配、提拔党员和非党员工作人员方面：◇191◇

（甲）登记工作多少走上了轨道。

（乙）分配工作稍微差些，因为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41〕上所提出的在国内发展的新情况下重新配备力量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给所有一切商业组织大量配备优秀干部的当前任务尚待解决。

老实说，去年登记分配局是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特别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税务机关工作的，它主要是把工作人员供给这些机关的。现在的任务在于把舵转向商业机关和信用机关，把工作人员优先供给这些机关。这里也许需要五千来个共产党员。

同时，任务在于用新的方法，即用自愿的方法，用征召志愿人员在苏维埃建设特别重要的地方组织工作的方法，来补充现行的分配力量的方法。这个方法对在某些地区组织典型工作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在现阶段不这样做（不组织典型工作）是不行的。列宁在“粮食税”〔42〕中提出的关于典型工作的思想应当实现。

（丙）应当特别注意提拔党员和非党员工作人员。仅仅从上面来提拔新人的方法是不够的。应当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在吸收新力量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从下面提拔的方法来补充这个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会议、工厂会议和托拉斯会议在提拔工人担负工厂和托拉斯的负责职务方面应当起很大的作用。必须发展省辖市和县辖市苏维埃各部门下面的小组，把它们变成定期的业务性会议，并吸收苏

维埃委员特别是非委员的男女工人和男女农民参加这些会议。只有在这种广泛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才能从非党工人和农民中提拔出新人。城市中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热潮和农民政◇192◇治积极性的提高明显地说明：这种提拔的方法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六、党内生活方面的两个结论：

（甲）所谓扩大党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

（乙）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反对派在争论期间说党正在瓦解是极端错误的。在我们党内，找不到一个严肃的组织，它在注视党内生活的进程和党的蓬勃发展的时候会不这样说：还在不久以前报丧说我们党要灭亡的人事实上是不了解党，同党离得很远，很像那种应当叫做党内异己分子的人。

总结：我们的党在发展，它在前进，它在学习管理，它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最有威信的机关。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就直接表明了这一点。（鼓掌经久不息）◇193◇

结　论

（五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我在所有发言人的讲话中没有看出对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有反对的意见。我认为这表明代表大会同意这个报告的结论。（鼓掌）

我在报告中有意不谈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我所以不谈，是因为我不想触动看来已经长好了的伤口。但是，既然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谈到了这些问题，讲了很多不确切的话并进行了挑战，那就不应当保持沉默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了。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这里反对重新讨论意见分歧。我也坚决反对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我在报告中没有谈到意见分歧。但是，既然反对派同志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挑战，我们就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了。

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人讲到意见分歧的时候，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决议上，即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上。他们忘记除了这个决议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决议——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43〕，他们忘记曾经召开过代表会议，在十二月五日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以后曾经发生过新的争论◇194◇浪潮，这个浪潮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总结的专门决议中得到了自己的评价。他们忘记了，避而不谈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反对派是不会有所裨益的。

我请代表大会注意：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经济政策通过了一个决议，关于党的建设却通过了两个决议。这是为什么呢？本来有一个为全党所确认的并在十二月五日经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后来又认为必须对同一个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问题再做出一个决议。怎么会有这种不幸的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整个争论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一致通过的十二月五日的决议告结束的，第二个时期是以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而告结束的。当时，即在第一个时期，我们预料党内争论大概会以十二月五日的决议而告结束，正因为如此，我在上一次即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谈到这个时期的时候说，只要反对派愿意，十二月五日的决议就能够结束党内斗争。我说过这一点，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时期争论没有结束。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以后，出现了托洛茨基的信，即出现了提出新问题的新政纲，并且掀起了比这以前更激烈的新的争论浪潮。因此，党内和平的可能性被破坏了。这就是反对派分子现在竭力避而不谈，想回避过去的第二个时期。

问题在于：在第二个时期的争论和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时期的争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没有提

出干部蜕化问题。当时我们和托洛茨基一起起草这个决议，他也没有提到干部蜕化。看来他为了自己以后的发动而把这个附加物收起来了。其次，在十二月◇195◇五日的决议中也没有提到学生青年是最可靠的晴雨表的问题。看来托洛茨基也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作为在争论中进行新的发动的后备了。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并没有攻击机关的倾向，也没有提出对党的机关采取惩罚办法的要求，而这些在他后来的几封信里却讲得非常多。最后，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根本没有讲过需要集团，然而关于这一点，即关于集团，托洛茨基在他后来的几封信里却讲得非常多。

请看反对派在十二月五日以前的立场和它的首领们在十二月五日以后的立场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

现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竭力保持沉默，隐藏自己在争论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政纲，他们大概是想欺骗党。不，这一点你们是做不到的！你们用愚蠢的花招和外交手腕是欺骗不了代表大会的。我相信代表大会会谈到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反映出来的争论的第一个阶段，也会谈到在代表会议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反映出来的第二个阶段。

这两个决议是叫做争论的这一个整体的两部分。谁想把这两部分混淆起来，并想这样来欺骗代表大会，那他就错了。党成长起来了，党的觉悟提高了，用外交手腕是欺骗不了党的。反对派的一切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让我们看一看，在关于十二月五日以后的反对派的政纲问题上谁是对的？在托洛茨基的信中提到的四个新问题上谁是对的？◇196◇

第一个问题：干部蜕化。我们一向都要求指出干部蜕化的事实。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事实，而且也提不出来，因为天地间没有这种事实。经过切实的考察，我们都看出蜕化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而某些反对派首领倾向于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倾向倒是有的。究竟

谁是对的呢？似乎不是反对派。

第二个问题：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

第三个问题：惩罚机关，攻击党的机关。谁是对的呢？仍然不是反对派。他们已经卷起攻击机关的旗帜而转为防御了。你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他们在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中是怎样狼狈退却，挣扎脱身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派别组织，关于集团。托洛茨基声明说，他坚决反对集团。这很好。但是，如果必须谈谈经过，那末请允许我再提一下某些事实。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成立了起草十二月五日公布的那个决议的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个人组成的。你们是否注意到，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没有关于集团的字句？在这个决议中提到禁止派别组织，但是一点也没有讲到禁止集团。我们只是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议。这◇197◇是什么原因呢？是偶然的吗？这不是偶然的。我和加米涅夫曾经坚决提出禁止集团的问题。托洛茨基最后通牒式地抗议禁止集团，说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赞同决议。于是我们就只限于引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托洛茨基当时大概没有读过这个决议，因为在这个决议中不仅讲到禁止派别组织，而且还讲到禁止集团。（笑声，鼓掌。）托洛茨基在当时是主张集团自由的。他在这里赞扬十二月五日的决议。而在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后过了四天，即十二月九日，托洛茨基在他给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写道：“政治局委员们在集团和派别组织问题上所采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立场使我感到特别忧虑。”你们怎么看呢？一个满口称赞这个决议的人，原来

在内心中却因政治局对集团和派别组织问题的态度而感到特别忧虑。这就不像他当时是主张禁止集团的了。不，托洛茨基当时是主张成立集团的，是主张集团自由的。

其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决议，要求把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派别组织问题提得更明确，即要求取消某些限制，这有谁不记得呢？这是莫斯科所有的人都记得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一些小品文里要求在党内恢复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存在过的那些制度，这你们有谁不记得呢？我们知道，党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容许派别组织存在。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当我提出了最简单的事情——要党员回忆一下关于统一即关于禁止集团的决议的第七条的时候，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如何大嚷大叫，要求不提出这一条，这有谁不记得呢？可见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持着集团自由的观点，他们以为他们说不要求◇198◇派别组织的自由而要求集团的自由就能麻痹党的警惕性。他们现在向我们声明说，他们反对集团，这很好。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叫做他们的进攻，因为这是狼狈退却，这是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标志。

同志们，在说明了这些事实以后，让我对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们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发言中所犯的某些原则性的错误讲几句话。

托洛茨基说，民主的实质归结起来就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是在原则上不对的。民主的实质完全不能归结为这一点。新一代和老一代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数字说明，我们党的生活说明，党的青年一代逐步地被培养成为干部，——干部的队伍是靠提拔青年来扩大的。党一向站在并且今后还是站在这条道路上。只有那种把干部看成一个小圈子，看成不让新的成员加入自己的队伍的特权阶层的人，只有那种把干部看成以为其他一切党员都

“低我一等”的旧时军官的人，只有那种想在干部和新党员之间制造罅隙的人，才会在党的新一代和老一代的问题上强调民主问题。民主的实质归结起来不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问题，而是主动性问题，是党员积极参加党的领导的问题。当然，如果指的不是形式上民主的党，而是和工人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党，那就只能这样提出民主问题。

第二个问题。托洛茨基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这也不对。危险不在这里，而在于党有真正脱离非党群众的可能性。你们可以有一个按民主形式建立机关的党，但是，如果党不◇190◇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那末这种民主将是毫不足道的，一钱不值的。党是为阶级而存在的。因为党和阶级结合在一起，和阶级有联系，有威信并得到非党群众的尊敬，所以它即使有官僚主义的缺点也能生存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一切，不管建立怎样的党组织，官僚主义的还是民主的，党也一定要灭亡。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它不是为自己本身，是为阶级而存在的。

第三个论点也有原则性的错误：托洛茨基说，党是不犯错误的。这不对。党是常常犯错误的。伊里奇教导我们拿党本身的错误来教党学习正确的领导。如果党不犯错误，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党学习了。我们的任务在于发现这些错误，揭露错误的根源，并向党和工人阶级指出我们怎样犯了错误，我们今后怎样不应当重犯这些错误。不这样，党就不可能发展。不这样，党的领导者和干部就不可能形成，因为他们是在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中，在克服这些错误中形成和培养起来的。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是带有某种嘲弄企图（实在是不高明的企图）的某种恭维话。

其次，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谈到了清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清党是党的多数对付反对派的手段，看来他是不赞同清党这一方法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严重错误就是不懂

得不定期清洗动摇分子，党就不能巩固。列宁同志教导说，只有逐步地把钻进党内来的而且今后还会钻进来的动摇分子驱逐出去，党才能巩固。如果我们对清党完全采取否定态度，那就是违反了列宁主义。至于目前的清党，它有什么坏处呢？据说有个别的错误。当然是有的。什么时候有过在一个大的事件中没有个别错误的情况呢？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的。会有而且必定有个别的错误，但◇200◇是清党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人对我说，知识分子和职员中的某些非无产阶级分子以害怕和恐惧的心情等待清党。有人给我讲过这样一种情景：在一间办公室里坐着一些应受清党审查的人。这是一个苏维埃机关的支部。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是清党委员会。支部的一个成员经过清党审查，浑身大汗，像箭一样冲出来。有人请他讲讲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回答说："让我喘口气，让我喘口气，我现在讲不出来。"（笑声）对于那些如此感到痛苦和浑身大汗的人来说，清党也许是不好的，可是对党来说，这是很好的。（鼓掌）很遗憾，在我们这里还有少数党员，他们一个月拿一千或者两千卢布，被算做是党员，却忘记了党的存在。我知道这样的事实：一个有这样的党员工作的人民委员部，在它的支部成员中也有汽车司机，当支部派汽车司机去做清党工作的时候引起了许多责难，说汽车司机不应当对苏维埃要人进行清党审查等等。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莫斯科。这些显然离开了党的党员大发脾气，不能容忍"一个汽车司机"对他们进行清党审查。对这样的党员应当进行教育和改造，有时要采取开除出党的办法。清党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这一种人感觉到有主人存在，有能够要求他们说明反党罪过的党存在。我认为有时候主人确实应当拿着扫帚在党的行列中走一遭。（鼓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你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而组织路线是不正确的，党可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同志们，这是胡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它由于组织路线上的缺点而灭亡了，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的基础不在

于目前党采取的或者可能采取的那些组织形式，而在于党的政策，在于党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201◇果党正确地提出对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那末组织方面的缺点就不会有决定意义，因为政策会挽救它的。过去一向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不懂得这一点的人是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

在进行争论的那些问题上，即在经济性的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党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谁想很快地直截了当地检查这一点，他就应当向党和工人群众提出如下问题：非党工人群众是怎样对待党的，同情还是不同情呢？如果反对派分子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他们问问自己：工人阶级是怎样对待党的，同情还是不同情呢？——那末他们就会了解，党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就是了解有关争论总结的一切事物的钥匙。既然工人阶级选出二十万最忠诚最坚定的人送入党内，那末这就是说，这样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党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享有工人阶级完全信任的机关。这样的党将生存下去而使敌人胆颤心惊，这样的党是不会瓦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来判定党的威信的，因为党的存在是为了群众，而不是相反。我们的反对派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用形式主义的观点，用“纯粹的”机关的观点来对待党的一些问题，对待争论总结的问题。为了找到了解争论总结的简单而直接的钥匙，需要注意的不是关于机关的空话，而是已经参加了党从而揭示了党的深刻民主性的二十万新党员。反对派分子在演说中提到的民主是无聊的空谈，而工人阶级向党输送二十万新党员，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机关。请指给我看看另外一个这样的党吧。你们是指不出来的，因◇202◇为世界上还没有另外一个这样的党。但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连这样强大的党也不喜欢，这真是怪事。他们究竟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能找到更好的党

呢？他们要找更好的党，恐怕就得搬到火星上去。（鼓掌）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问题，即关于责备小资产阶级倾向似乎不公平的问题。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种责备来自何处，这种责备的根据何在呢？责备的根据在于：反对派分子在无限制地鼓吹党内民主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成了新资产阶级的某种传声筒。新资产阶级不是重视我们党的民主，而是想得到国内的民主，非常想得到国内的民主。围绕着民主问题叫嚷的那一部分党员不知不觉地成了新资产阶级在国内进行被动的传声筒和孔道，而这种鼓动的目的是削弱专政，“扩大”苏维埃宪法，恢复剥削者的政治权利。无疑是爱党……的反对派分子变成了那些站在党外的、想削弱和瓦解专政的人的传声筒，而自己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和秘密就在这里。

无怪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情反对派。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国际范围内的力量配置是这样的：减低我们党的威信和削弱我国专政的巩固性的任何尝试，不管是我们的反对派的尝试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尝试，都一定会被革命的敌人看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加以支持。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了解我们党内派别斗争的逻辑，谁就不了解这个斗争的结局不是取决于人和愿望，而是取决于在苏维埃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斗争的总结算中得出的结果。我们说反对◇203◇派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根据就在这里。

列宁有一次讲到党的纪律和我们队伍的团结的时候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反对派同志们用自己对莫斯科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攻击来削弱党的纪律，破坏专政的基础（因为党是专政的基本核心），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说我们这里有小资产阶级

政策的倾向是正确的。这还不是小资产阶级政策。决不是！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说，倾向还是一种未完成的和未形成的东西。反对派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再坚持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不再坚持这些不大的错误，那末一切都能纠正，党的工作也会进展。如果你们坚持下去，那末小资产阶级倾向就能发展成小资产阶级政策。因此，反对派同志们，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你们。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这样：我们今后也应当在党的完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党内工作。请看一看一致拥护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代表大会，这就是党的统一。反对派在我们党内是不足道的少数。我们党是统一的，它将来还是统一的，这次代表大会、它的统一、它的团结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能和党内那个叫做反对派的不足道的集团统一，这要取决于他们。我们同意和反对派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去年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做过必须和反对派共同工作的声明。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肯定这一点。但是这个统一能不能实现，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以后的统一完全取决于反对派。在目前的情况◇204◇下，统一是两个因素即党的多数和少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多数愿意团结一致地工作。少数是不是真诚地愿意这样，我就不知道了。这完全取决于反对派同志们。

总结。总结就是：肯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代表大会会肯定这些决议并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鼓掌多时）◇205◇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俄共（布）中央
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同志们！我不准备详细分析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的决议很多，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现在未必有可能来详细分析它们，况且我和你们现在都没有时间这样做。因此，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是在报告中指出一些基本出发点并加以解释，使你们回去以后容易自己研究这些决议。

如果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拿来详细研究，那末决议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基本问题，这四个问题像一条红线似地贯穿着全部决议。

这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第一类问题是有关我们共和国的外部状况的问题，即关于巩固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第二个基本问题或者说第二类问题是有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问题。◇206◇

第三类问题包括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群众的问题。属于这一类问题的有国家机关、农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这样一些问题。

最后，第四类问题是有关党本身、党内生活、党的存在、党的发展的一些问题。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将要特别谈一下因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产生的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外 部 状 况

过去一年在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地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从旧的一年转到新的一年的时候，必须估计到的而且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不能不估计到的国际间的新的基本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这个新的变化是：在过去一年，我们有机会看到想使西欧在国内政策方面公开法西斯化的一些企图，这些企图原来是没有根据的，它们都失败了。如果撇开法西斯主义正在解体的意大利不谈，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里，即在法国和英国，使欧洲政治法西斯化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而这些企图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逊，干脆说，是已经被轰下台去了。这是过去一年所发生的第一个新的变化。

过去一年所发生的第二个变化是：好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几次企图孤立我国，这些企图都失败◇207◇了。几乎用不着怀疑，彭加勒的无数次反苏阴谋和大家知道的克逊的最后通牒，目的都是孤立我国。结果怎样呢？结果不是苏联被孤立了，而是它在事实上被承认了。不仅如此，结果不是苏联被孤立了，而是孤立别人的人孤立了，是彭加勒和克逊辞职了。我国的威信比某些帝国主义老政客所能想像的要高得多了。

这是过去一年对外政策方面的第二个新的变化。

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有些人爱用我们政策的英明来解释。我并不否认，我们的政策即使不英明，至少也是正确的，这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肯定了的。但是仅仅用我们政策的英明或正确来解释是不行的。这里的问题与其说在于我们的政策正确，不如说在于近来欧洲形成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政策的成功。这里必须指出三个情况。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无力处理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果实，无力在欧

洲确立像样一点的和平，它们不掠夺战败国和殖民地、不为分赃而互相倾轧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又在扩充军备。因此产生了新战争的危险。但是，人民群众不要战争，因为他们还没有忘记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遭受的牺牲。因此，各国人民愈来愈不满意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政策。

这就是帝国主义内部虚弱的原因。为什么克逊和彭加勒被赶下台去呢？因为舆论认为他们是新战争的挑拨者。因为他们用公开好战的政策激起了群众对整个帝国主义的不满，从而造成了对帝国◇208◇主义的危险。

第二、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等待我国苏维埃政权垮台的方针。唱赞美诗的人说，上帝有时候通过小孩的嘴说实话。如果把西方帝国主义看做上帝，那末它自己没有一个小孩自然是不行的。于是它就找到了并非无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贝奈斯作为自己的小孩，通过贝奈斯的嘴宣称：由于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不应该急于承认共和国联盟；因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会被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代替，最好暂时“抑制一下”，不要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帝国主义通过它的小孩的嘴说出来的“实话”只不过维持了几个月，因为大家知道，许多国家很快就以“承认”政策〔44〕代替了“抑制”政策。为什么呢？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是苏维埃政权坚如磐石。首先，即使是一个庸人，不管他在政治上多么幼稚，也不能不看到苏维埃政权大概是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巩固，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七年中，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下台，而苏维埃政权依旧存在。其次，这个庸人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的经济正在发展，例如我国的出口就在步步增加。这些情况都对苏联有利无害，这还用得着证明吗？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西欧进行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我必须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宣传，我们用不着进行这种宣传。在欧洲工人中间，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它的成长、它

的物质繁荣、它的无可置疑的巩固就是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最好的宣传。任何一个工人来到苏维埃国家，看一看我们的无产阶级制度，就会看到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看到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能够做出什么来。这才是真正的宣传，然而这是用事实宣传，这种宣传对工人的◇209◇影响比用语言或报刊来宣传要大得多。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东方进行宣传。这也是胡说。我们用不着在东方进行宣传。附属国或殖民地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来到苏维埃国家看一看我国人民怎样管理国家，只要看一看黑人和白人，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不同肤色和各个民族的人们怎样同心协力地共同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他就会深信这个国家是唯一的民族友爱不是空话而是事实的国家。既然我们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事实作宣传，我们也就不需要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

第三、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提高了，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中间的声望增高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执行并且真正执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它不是虚伪地而是真诚公开地、坚决彻底地执行和平政策。现在，不论敌人或朋友，全都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唯一的配称全世界和平政策的堡垒和旗手的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加深欧洲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和好感，这还用得着证明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欧洲某些当权者竭力把自己的官运建立在同苏联的“友好”上，他们中间连墨索里尼这样的人有时也不反对靠这种“友好”来“捞一把”呢？这正是表明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中是真正有声望的。但是，苏维埃政权所以有声望，主要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困难条件下真诚而勇敢地执行了和平政策。

过去一年决定我们的对外政策获得成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代表大会责成党今后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执行坚决反对新战争的政策，执行无情地揭露各种各◇210◇

样拥护或纵容新的军备扩充和新的冲突的分子的政策。

结 合 问 题

什么是结合呢？结合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农民经济不把粮食和原料拿到城市市场上去出卖，不藉此从城市得到必需的工业品和劳动工具，就不能生存，不能存在。同样，国营工业不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农民市场上去出卖，不从农村取得粮食和原料的供应，也就不能发展。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所赖以生存的是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即农民经济。因此，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是我们共和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

我们还没有做到通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来实现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这种结合，这种经常联系。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工业不够发达，我们还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供应机关，而整个国民经济在战后又处于破坏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实施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说，不得不宣布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动员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的力量，在国内建立商品流转的巨流，发展商业，然后占领商业方面的主要阵地，通过商业来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这就是用迂回的方法，如列宁所说的，不是直接地，不是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直接交换，◇211◇而是通过商业来建立这种结合。

任务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小业主的力量，掌握商业，把乡村和城市的主要供应网掌握到国家和合作社的手写，从而在工业和农民经济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分割的结合。

不能说这种任务是我们力不胜任的。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掌

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具有通过商业用迂回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结合的一切主要手段。第一、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第二、它有工业。第三、它握有信贷，而信贷是国家手中极大的力量。第四、它有自己的商业机构，不管这种机构是好是坏，它毕竟是在日益发展，日益巩固。最后，它握有一定的商品，随时可以抛到市场上去，以平服或稳定市场的波动，影响物价等等。工人国家拥有这一切手段，所以不能说通过商业来实现结合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任务。

建立城乡结合的问题和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就是这样。

那末，从建立城乡结合来看，过去一年有什么新的重要变化呢？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解决结合问题的时候根据什么新的材料呢？

一年来在这方面的新变化是：过去一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第一次碰到一个广泛的斗争，即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间的大规模的斗争，我们碰到这个斗争以后才第一次把结合问题极为具体地提到实践上来了。结合和商业问题在我们面前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切地要求立即解决的直接实践的问题了。◇212◇

你们可记得列宁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45〕，用国家和合作社的力量来控制市场，掌握主要的贸易网，将不是通过和平的工作，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成分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间的斗争，这种工作将通过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两种对立成分间拚命竞争的方式来进行。后来这个斗争激烈起来了。它主要是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城乡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信贷，主要是农村中的信贷。

这个斗争的结果究竟怎样呢？

第一、事实上私人资本并没有投入冒险性比较大而资金周转比较慢的生产，而是投入了商业，投入了列宁所说的构成我国过渡时期发展过程链条的基本环节的那个商业。并且，私人资本投入商业以后，就在那里巩固下来，竟掌握了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零售商业，约百分之五十的批发零售商业。这是由于我们的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还年

轻，还没有安排好；我们的辛迪加实行了不正确的政策，滥用自己的专营权，抬高物价，我们的负责从国家的角度来调节商业的国内商业委员会软弱无能；我们当时的苏维埃货币不稳定，主要打击了农民，因而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第二、事实上农村中的信贷完全落在富农和高利贷者的手中，没有农具的力量单薄的农民不得不去受高利贷者的盘剥，不得不付出极高的利息，忍气吞声地受高利贷者的支配。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基层的农业信贷网，不能够供给农民低息贷款，把高利贷者排挤到后面去，结果高利贷者就占据了全部阵地。

这样，在国家和农民经济之间钻进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因而◇213◇困难和混乱起来了。去年夏季的销售危机就是这种困难和混乱的表现。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采取措施来消除销售危机和奠定农业信贷的基础。发行了新的稳定的货币，这使情况有了好转。为了降低物价，把大批商品抛到市场上去，这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根据保证胜利地同私人资本作斗争的原则改组了国内商业委员会。提出了从结合的角度来改造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的工作问题。销售危机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党不能只限于采取这些措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在于把结合问题重新全部提出来，并制定在销售危机消除后的新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线。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究竟给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首先扩大轻工业和金属工业的口号。因为很明显，以我们现有的工业品储备，我们是不能满足农民对商品的渴求的。更不用说，失业现象的增长迫切地要求扩大工业。因此，进一步扩大工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46〕）

第二、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农民经济的口号，帮助农民经济进一步扩大耕地的口号。这也是建立结合所必需的措施，因为很明显，农民所关心的不仅是满足我们工业的需要（当然是为了换取工业品），而且是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当然是为了换取机器）。因此，进一步扩大农民经济是党的政策的当前任务。（见“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47〕）◇214◇

第三、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向我们的一切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提出了同私人资本作斗争的主要任务，掌握市场的任务，用经济性质的措施，即用降低物价和改进商品质量的办法，用调拨大批商品、实行优惠贷款等等办法，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商业领域的任务。（见“关于国内贸易”和“关于合作社”的决议〔48〕）

第四、代表大会提出并解决了最重要的农业贷款问题。这里指的不仅是中央农业银行，甚至不仅是各省农业贷款委员会。这里指的主要是在县和乡建立基层信用合作社网；这里指的是使信贷工作民主化，使农民可以得到农业贷款，以国家的低息贷款来代替高利贷者的盘剥性的贷款，而把高利贷者逐出农村。这是我国整个经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就不能有比较巩固的结合。正因为如此，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见“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曾经拨出四千万卢布作为农业银行的基金，以便在同国家银行保持一定的配合下把这四千万卢布增加到八千万卢布。我想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使这笔款项达到一亿卢布。当然，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算大的，但是这毕竟能使农民易于改善自己的经济并打破高利贷者的盘剥。我在上面说到了基层农民信用合作社对于力量单薄的农民的意义，对于农民和工人国家结合的意义。但是基层信用合作社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够成为不仅国家帮助农民而且农民帮助国家的极大泉源。的确，如果我们在各地，在各县各乡撒开一个广大的农业信贷

网，而且这些信用机关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威信，那末农民将不但向国家借钱，而且还会把钱存入◇215◇信用机关，就是说，这些机关将不但有资产业务，而且还有负债业务。不难设想，在基层信用机关的业务顺利发展的情况下，负债业务能够成为国家从千百万农民得到可靠援助的来源，这是任何外债都比不上的。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在农村中组织低息贷款是不错的。

第五、代表大会再次宣布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不可动摇的。我想，没有必要解释这种制度对于工业和农业以及对于工农业结合的意义。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根本意义是无须再加证明的。（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第六、代表大会认定必须增加一般出口，首先是粮食的出口。我想，这个决定也是无须加以解释的。（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一切办法，使币制改革〔49〕彻底实行，因为它能促进商品流转，便于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巩固的联系；使中央和地方都尽力实现币制改革的一切必要条件。（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这就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结合问题上的口号，这些口号的目的在于掌握商业，建立我国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牢固的结合，从而为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准备条件。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216◇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

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机关的改善工作、农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这就是党在实现这些任务时的主要活动范围。

（甲）**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国家机关问题上花的时间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同国家机关的缺点作斗争的报告没有讨论就批准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50〕也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在我看来，这是由于时间不够，提交代表大会的问题又很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党不把国家机关问题看做极重要的问题，那就完全不对了。恰恰相反，国家机关问题是我国整个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受贿；是实行节约，还是浪费人民财产；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还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是劳动者的累赘，还是帮助劳动者的机关；是培植无产阶级的法制思想，还是以否定这个思想的精神腐化人民的意识，是在向过渡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方向前进，还是向普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腐朽官僚制度倒退，——正确地解决这一切问题，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决定意义。我们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缺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十◇217◇分之九已经官僚主义化，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又在对党和党的组织施加压力，妨碍我们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这些情况是未必可以怀疑的。同时很明显，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摆脱了某些主要的缺点，它就会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阶层的极强大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列宁特别注意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党成立了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专门组织（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和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和我们国家机关的缺点作

斗争。

任务在于帮助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业检查院进行自上而下地改善、精简和在精神上健全国家机关的艰巨工作。（见代表大会“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

（乙）**关于农村工作**。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我们农村工作的基本路线的出色决议。只要拿这个决议同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51〕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党在这方面前进多少了。但是，如果以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今年已经全部解决或者能够全部解决最复杂的农村问题，那就错了。这些问题，如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国营农场的改造，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土地规划工作的调整，同农业合作社工作相关联的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对我国各种不同地区的特点的掌握和在工作中对这些特点的照顾，——所有这些问题，由于很明显的原因，都不能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全部解决。代表大会决议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制定了◇218◇基本的工作路线，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你们大概知道，中央全会〔52〕已经成立了一个农村工作常务委员会来详细研究这些问题。

决议的中心是农民群众合作化的口号。合作化应当从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三方面来进行。这是在农民中，在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和中农阶层中培植集体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见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丙）**关于劳动妇女工作**。我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说过，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这里是被轻视的，但这个工作对党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场合下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的工作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现在当然不必把已经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我只想请你们注意，代表大会可惜没有能专门讨论劳动妇女工作问题，但还是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这个决议说：“代表大会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必须加强女工和农妇工作，并把她们提拔到选举出来的党和苏维埃的机关里去。”（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我认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必须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全会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决定委托我们的中央组织局采取特别措施，把劳动妇女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

（丁）**关于青年工作**。代表大会对青年工作特别注意。在我看来，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代表大会所有的决议中最完善最详尽的决议。因此，这个决议对于党和青年都是很宝贵的。

青年（我说的是工农青年）的作用在于他们是建设未来的极良好的基础，他们是我国的未来，他◇219◇们是我国的未来的体现者。如果说，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农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在克服旧习气和旧传统方面，在**改造**劳动群众的老一代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那末在多少是不受这些传统和习气拘束的青年中进行工作，对于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者的新干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里的基础不言而喻是十分良好的。

因此，共青团和少先队就有了极重大的作用。

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自愿组织。它的中心、它的核心是青年工人。它的支柱是青年农民。工农青年的团就是青年组织的基础。把一切忠实的革命的青年农民聚集在无产阶级核心的周围；吸引自己的团员参加经济、文化、军事、行政各方面的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国家的战士和建设者、劳动者和领导者，——这就是共青团的任务。（见“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53〕）

党

这里有四个问题：关于反对派，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关于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关于一般理论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宣传。

（甲）**关于反对派**。现在，当反对派问题已经由代表大会解决，事件因而业已平息的时候，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对派是什么？争论时期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同志们，我认为这是有关党◇220◇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反对派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某个同志或某个反对派集团抱着什么目的。问题在于这个集团的行动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结果。要知道，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争论。我们争论得那样热烈，原因就在这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了这次代表大会**一致**斥责反对派的纲领这个空前未有的事实，原因也在这里。极严重的危险使党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反对派是有意义的。就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起吧。这是苏维埃政权出现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一八年初）。在那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反对派的就是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反对派的那些人物。当时所争论的是战争与和平，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拥护反对派的人占代表大会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总算不少了。难怪当时人们说到分裂。

两年以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同样一些人物为首的反对派在工会问题上又掀起了党内斗争。那时拥护反对派的人占代表大会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当然比四分之一少了。

此后又过了两年，在闭幕不久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新的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反对派，但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连一票也没有了。可见这对反对派已经十分不利了。

总之，反对派曾经三次企图同党的主要干部作战。第一次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第二次是在第◇221◇十次代表大会上，第三次是在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可是，反对派总是遭到失败，每次都失去一些人，一步步缩小自己的队伍。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最近六年来我们党的历史是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日益团结在党的主要干部周围的历史。第二、说明一批又一批的人逐步离开了反对派，而加入党的基本核心，补充这一核心。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和以往的情形一样，若干同志有可能脱离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我们这里没有比例选举制）但在党内无疑还有自己的拥护者的反对派，而加入党的基本核心。

我们对这些反对派分子，或者确切些说，对这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的政策应当怎样呢？应当完全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促使这些同志转向党的基本核心，和这个核心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

（乙）**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即把二十五万工人接收为我们党的新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党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说明了我们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机关，这一点我不打算多谈。在这方面，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一点。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是最近我们党内由于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而出现的那种危险的迷恋。有些人说，必须再进一步，使党员人数达到一百万。另外一些人想前进得更远些，硬说达到两百万才好。我相信还会有第三种人，他们想前进得更远。同志们，这是危险的迷恋。世界上最大的军队◇222◇之所以覆灭，往往是由于过分迷恋，过多地占有，后来不能消化所占有的东西而土崩瓦解。最大的党如果迷恋起来，过多地占有，后来不能包容和消化所占有的东西，也是会灭亡的。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党内政治文盲达到百分之六十。有百分之六十的政治文盲，这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以前的情况，在这以后恐怕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了。同志们，不是该停止的时候了吗？不是该以八十万党员为限，尖锐而肯定地提出改

善党员**质量**，以列宁主义基础**教育**那些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使他们成为觉悟的列宁主义者等等问题的时候了吗？我认为是时候了。

（丙）**关于党的领导的民主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这件事说明了我们党的深刻的民主性，说明了党的基本支部的无产阶级成分，说明了千百万非党群众对我们党的无可置疑的信任。但是，我们党的民主性不限于此。这仅仅是民主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党的领导本身正在逐步民主化。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表明，党的领导的重心日益由狭小的上层和各个局向广大的组织，向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的全体会议转移，同时这些全体会议本身在扩大，它们的成分在改善。你们大概知道，我们领导组织的发展中的这种趋向，代表大会是完全赞同的。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领导组织已经开始把自己所有的根伸展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深处去。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的数量和社会成分方面来考察一下我们党中央最近六年来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期（一九一八年），我们中央由十五个委员组成，其中工人只有**一个**（占百分之七），而知识分子有十四个（占百分之九十三）。这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形。而现在，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由五十四个委员◇223◇组成，其中有二十九个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和二十五个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七）。这是党的基本领导民主化的鲜明标志。

（丁）**关于一般理论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宣传**。我们党的危险的缺点之一，就是党员的理论水平低落。原因是实际工作过于繁忙，打消了理论学习的热望，滋长了某种至少是不关心理论问题的危险的态度。举几个例子来谈。

不久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了一位同志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大概是加米涅夫），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党的当前口号是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而且更坏的是把这个奇怪的口号硬加在列宁身上而不是硬加在别人身上。正是这样！可是大家知

道，列宁没有说过而且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耐普曼的”俄国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固然，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但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是一回事，而“耐普曼的”俄国（即耐普曼统治的俄国）完全是另一回事。加米涅夫是否懂得这个原则上的差别呢？当然是懂得的。那末，为什么他当时脱口说出这个奇怪的口号呢？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但是，如果错误不加纠正，这个奇怪的口号就很可能在党内产生一大堆误解。

再举一个例子。常常有人说，在我国是“党的专政”。有人说我赞成党的专政，我记得在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似乎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用过这样的语句，这当然是由于疏忽。看来同志们中间有人认为我国是党的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同志们，这是胡说。如◇224◇果这是对的，那末列宁当时教导我们说苏维埃**实现**专政而党**领导**苏维埃，就是错的了。列宁当时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党的专政，也是错的了。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当时就不需要苏维埃了，当时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用不着说必须“**划清**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界限**”了。可是，这种胡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怎样渗入党内的呢？这是由于对“党性”的迷恋，而这种迷恋正是对不带引号的党性为害最大；这是由于不关心理论问题；这是由于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因为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用党的专政来顶替阶级专政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荒谬的做法会在党内产生混乱思想和糊涂观念，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还有，大家知道，在争论期间，我们党内一部分人上了反对派分子反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反党宣传的当。任何一个进过最短期的列宁主义理论学校的布尔什维克都会一下子看出，反对派的说教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大家知道，党内一部分人未能一下子看清反对派的真面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仍然是因为不关心理论，因为

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低。

争论已经把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宁的逝世使这个问题更感到迫切，加强了党员对理论的兴趣。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若干决议中肯定了研究和宣传列宁主义的必要性，不过是反映了这种情绪。党的任务在于利用对理论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一切办法把党的理论水平终于提到应有的高度。不应当忘记列宁的话：没有明白而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225◇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同志们！我特地来给你们做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不是偶然的。我来给你们做报告，不仅是因为你们希望这样，而且还因为在发展的现阶段，县特别是县级工作人员是党和农民间、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的基本环节。而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建立城乡间的结合是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实践的基本问题。

我在上面说过，建立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必须从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基层信用合作社这三个主要方面做起。我说过，这三条孔道是建立结合的基本孔道。但是，如果以为现在就可以越过县而直接通过乡来把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那就是幻想。用不着证明，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本领和财力来这样做。因此，目前城乡结合的枢纽还是县和专区。为了在商业方面巩固起来，完全不需要把最后一个店主从最后一个乡挤出去，只需要把县变为苏维埃商业的基地，使所有的店主都不得不围绕县的合作社和苏维埃商店转，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一样。为了掌握信贷，现在也完全不需要把信用合作社网撒满乡和村，只要在县里建立基地，就足以使农民立即开始脱离富农和高利贷者。如此等等。

简单地说，在最近期间，县（专区）应当变为建立城市和乡村间、

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的主◇226◇要基地。

这种转变的快慢取决于你们县级工作人员同志们。现在你们有三百人。这是一支大军。只有依靠你们和你们在全国各县的同志，才能在最近期间使县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方面的工作枢纽。我相信县级工作人员一定能履行自己对党和国家的义务。

载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和二十日
“真理报”第一三六号和第一三七号◇227◇

论 工 人 通 讯 员

（和“工人通讯员”杂志〔54〕工作人员的谈话）

工人参加办报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报纸这样一个锐利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只有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

只有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才能在报刊发展的进程中起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和传播者的作用，起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的作用，起改进我们建设的不知疲倦的战士的作用。

工人通讯员是由工人大会选举呢，还是由编辑部挑选？依我看，第二种方法（由编辑部挑选）是比较合适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通讯员有独立性，他不受在自己的工作中与之有某种接触的机关和人们的支配，然而这决不是说他不受那种叫做无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捉摸的但是不断发生作用的力量的支配，因为工人通讯员应该是这种力量的传播者。

不能把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看做仅仅是狭义的将来的新闻记者或者工厂的社会活动家。他们首先是我们苏维埃社会的缺点的揭发者，是消除这些缺点的战士，是无产阶级舆论的指挥员，他们◇228◇竭力引导这个莫大的动力的无穷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事业中帮助党和苏维埃政权。

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教育问题。教给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某些最低限度的新闻技术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不在这里。主要的在于使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在自己的工作进程中学习，并锻炼出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

通讯员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这种敏感是不可能用人工训练的技术方法培养出来的。

对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直接的思想领导应当由同党有联系的报纸编辑部来进行。通讯检查应当集中在报纸编辑部手中。

迫害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是野蛮行为，是资产阶级习气的残余。报纸应当担负起保护自己的通讯员不受迫害的责任，因为只有报纸才能够展开激烈的揭发性的鼓动来反对黑暗势力。

祝“工人通讯员”杂志在各方面获得成就。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四年六月
“工人通讯员”杂志第六期◇229◇

关 于 波 兰 共 产 党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共产国际
波兰委员会[55]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像某些发言人那样肯定地谈。虽然如此，根据我终于得到的材料和这里的讨论，我有了一定的看法，我想把我的看法和你们谈谈。

毫无疑问，波兰共产党正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波兰党的内部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瓦列茨基承认这一点，你们大家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这一点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因为这里已经确认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担任实际工作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之间不协调。不仅如此，波兰党中央委员会本身在去年十二月全会和今年三月全会的决议中也承认了自己一系列行动的机会主义性，并直截了当地斥责了这些行动。看来已经尽够了。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切都说明波兰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危机。

产生这个危机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波兰共产党的正式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机会主义错误。◇230◇

请允许我举出几个例子来证实这种说法。

“俄国”问题。有些波兰同志说，这个问题是对外政策问题，对波兰党没有重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俄国”问题对西方和东方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决定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堡垒和保护者。如果在这个根据地，即在俄国，党和政权开始动摇，那就是说，全世界的整个革命运动必然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

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布）内发生争论的期间，党内开始动摇了。具有机会主义本质的反对派以其反党的斗争来动摇党，削弱党，从而削弱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它是国家政权的基本领导力量。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动摇自然会进而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动摇和削弱。而苏维埃政权的动摇就是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损害。正因为如此，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共产党（布）的整个命运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命运不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俄国”问题虽然对波兰来说是一个外部问题，但对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波兰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那末，波兰党的领袖们是怎样对待“俄国”问题的呢？他们支持了谁，支持了机会主义的反对派还是支持了俄国共产党（布）内的革命的多数呢？我很清楚，在俄共（布）党内斗争的初期，即同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作斗争的初期，波兰党的领袖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了反对派。我不来详细分析瓦尔斯基或瓦列茨基，因为瓦尔斯基在他起草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决议时所想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首先不是个人的意愿，而◇231◇是这个决议的客观效果。这个决议的客观效果归结起来就是助长了反对派的声势。这个决议是对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机会主义派的支持。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并把它送交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时期，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就成了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波兰支部。如果把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看做必须在各国设有分公司的某个公司，那末波兰共产党当时就是这个公司的波兰分公司。波兰党的领导者们在“俄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罪行的实质就在这里。这是令人痛心的，但可惜这是事实。

德国问题。德国问题是继“俄国”问题之后的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第一、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德国孕育着革命的程度

最大，第二、因为德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整个欧洲的胜利。如果欧洲的革命动荡要从某一端开始，那就是从德国开始。只有德国能够在这方面首先发动，德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国际革命胜利的保证。

你们知道，去年在德国共产党内，革命的多数和机会主义的少数之间的斗争激烈起来了。你们知道，德国共产党的左翼或右翼的胜利对整个国际革命进程会有多大的意义。结果怎样呢？在这场斗争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们支持了谁呢？他们支持了布兰德勒集团〔56〕，反对德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多数。现在所有的人，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承认这一点。结果也同“俄国”问题上的情况一样。假定说，在德国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公司，那末波兰的领导者就是这个公司的波兰分公司。这也是令人痛心的，但事实是不能违拗的：事实是必须承认的。◇232◇

关于同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方法。柯斯特尔热瓦说，他们，即波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实际上支持俄国中央委员会，大概也支持由现在的成员组成的德国中央委员会，但是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方法问题上和这两个机关有分歧。你们看到没有，他们要求对反对派采取温和的斗争方法。他们赞成同反对派作战，但是他们赞成的是不会招致牺牲的战争。瓦列茨基竟叫喊说：请原谅，我们支持“三人小组”！我必须说明，谁也没有要求瓦列茨基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并且，我不知道瓦列茨基如此卖力讨好的“三人小组”是什么。他忘记了，谁也不一定要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瓦列茨基在座位上说：“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这样做。”）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也应当懂得，这样做既使瓦列茨基也使俄国中央委员会处于难堪的境地。问题完全不在于附和与否，而在于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产生了新资产阶级，他们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公开活动，于是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的领导者中间寻找自己的英雄，竭力从内部来突破共产主义战线。而这种情况就使俄国共产党（布）

内部产生了反对派的情绪，给机会主义倾向建立了基础。因此，问题在于我们的兄弟党要确定自己对这种情况的态度，采取明确的立场。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在这里，而不在于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与否。

至于柯斯特尔热瓦的温和的方法，那末应当说，它是经不起一驳的。柯斯特尔热瓦赞成同机会主义反对派作斗争，但是他赞成的是不会破坏反对派首领的威信的斗争。然而，第一、历史上未曾有过这种不会招致某些牺牲的斗争；第二、要战胜反对派，就不能不估计到胜利会破坏反对派首领的威◇233◇信，否则就只好不同反对派作任何斗争；第三、彻底战胜反对派是避免分裂的**唯一**保障。党的实践不知道有其他的保障。俄国共产党（布）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还在战前，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正统派的时候，它就是用柯斯特尔热瓦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温和的方法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但是它这样做的结果，机会主义成了胜利者，而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俄国共产党（布）是用坚决孤立机会主义首领这个久经考验的方法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结果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认为俄国共产党（布）的教训对我们应该是大有教益的。柯斯特尔热瓦推荐的斗争方法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复活。它孕育着党内分裂的危险。

最后，关于党的领导问题。目前西方共产党发展中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党面临着按照新的革命的轨范改变党的实践的问题。这里不是指通过共产主义纲领和宣布革命口号。这里指的是把党的日常工作、党的实践加以改变，使党的每一个步骤和党的每一个行动自然而然导向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导向准备革命。现在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于通过革命的指示。

普鲁赫尼亚克昨天在这里宣读了波兰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们通过的一大串革命决议。他以胜利的神情宣读了这些决议，认为党的领导就

在于制定决议。他并没有想到制定决议只是党的领导的第一步，党的领导的开始。他不懂得领导的基础不在于制定决议，而在于执行决议，在于实现决议。因此，◇234◇他在冗长的演说中竟忘记告诉我们这些决议的命运，他不认为有必要谈谈波兰共产党是不是执行了这些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但是，党的领导的实质正是在于执行决议和指示。看着他，我就想起了在检查委员会面前“答辩”的常见的苏维埃官僚。检查委员会问：“某个指示执行了吗？”官僚回答说：“采取了措施。”检查委员会问：“采取了什么措施？”官僚回答说：“下了命令。”检查委员会要文件。官僚以胜利的神情拿出了命令的副本。检查委员会问：“命令的命运怎样，它是不是执行了，什么时候执行的？”这位官僚瞪大了眼睛说：“还没有消息。”当然，检查委员会给了这样的官僚以处分。当普鲁赫尼亚克在这里以胜利的神情宣读执行情况还“没有消息”的革命决议的时候，他使我想起的就是这位苏维埃官僚。这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对一切领导的嘲笑。

结论究竟是什么呢？结论归结如下：

第一、我坚决反对在波兰即将举行的党的争论中，在过去的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之间筑起一道分水岭。这对党是危险的。过去的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早就融合为统一的党了，它们在共同进行反对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如果追溯以往而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斗争不应该按照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旧路线进行，而应该按照孤立波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的新路线进行。彻底战胜机会主义派就是避免分裂的保障，就是党的团结的保证。

第二、我坚决反对所谓割除的办法；即反对取消某些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资格。我根本反对从上◇235◇面来改组中央委员会。完全应该考虑到，没有特别需要而施行外科手术会在党内留下不好的后果。让波兰共产党自己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改组自己的中

央委员会。日益发展的党不会不选拔出新的领袖。

第三、我认为温什里赫提出的实际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推选出由现在的波兰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上和实践上统一领导的中央来代替彼此分离的组织局和政治局，是完全合理的。

这里有人对波兰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新领导者的理论知识和党的经验表示怀疑。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有决定意义。在俄国共产党（布）的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理论知识和政治知识不足的工人成了一些最大的区域组织的领导者。可是这些工人和许多缺乏必要的革命嗅觉的知识分子相比，却是优秀的领导者。在最初一个时候，新领导者的工作进行得不十分顺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跌一两次交，就能学会领导革命运动。成熟的领导者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斗争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期◇236◇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亲爱的杰米杨！

给你的信写得太迟了。你有权利骂我。可是你一定知道，说到写信，我是一个少有的懒汉。

我逐点来谈。

一、你有“愉快的情绪”，这很好。“厌世”哲学不是我们的哲学。让衰亡的人和垂死的人去悲哀吧。美国人惠特曼十分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哲学：“我们活着！未用尽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鲜血沸腾。”正是这样，杰米杨。

二、你写道：“又怕得罪人，又得去治病。”我的意见是：得罪几个来访的人比不去好好地治病要好些。治病，治病，一定要治病。不得罪来访的人，这是片刻的利益。稍微得罪他们一下，去认真治病，这却是比较长远的利益。本来，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相反的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把第一种利益置于第二种利益之上。不用说，你是不会学机会主义者的样子的。

三、你写道：“你给县委书记们做的报告[①]里的宽恕的口气不是没有权变的成分的。”确切些说，其中是有**政策**的，一般说来，政策总不免带有某种权变的成分。我认为**既然**把反对派首领们打得落花◇237◇流水了，我们，就是说党，对普通的和中等的反对派分子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好促使他们离开反对派首领们。让将军没有军队——主要目的就在这里。现在反对派在党内有四五万人，其中大多数想丢开自己的首领们，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或者某些拥护中央的人的

———————————————

① 见本卷第166页至183页。——本书制作者注

粗暴和骄矜妨碍他们这样做。某些拥护中央的人的冷嘲热讽触怒了普通的反对派分子，因而妨碍了他们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我的报告的“语气”就是针对这些拥护中央的人的。既然反对派首领们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这样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击溃反对派。

四、你问：“收成会不会使我们困难。”收成已经使我们有些困难了。去年我们收获了（总收获量）二十七亿多普特，今年预料要少收两亿普特。这对出口当然是一个打击。歉收的农户现在确实比一九二一年少了五分之四，因此，我们不用特别费力就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这个不幸。这一点你不必怀疑。但是打击仍然是打击。然而人们常常会因祸得福。我们决定利用农民的坚定的决心尽一切可能来预防**将来**意外的旱灾，我们将竭力设法利用这种决心来实行（同农民一起）改良土壤、改进农业技术等等果断的措施。我们打算**首先**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斯塔夫罗坡里地区建立一个最低限度必要的土壤改良区。我们为这个事业准备了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卢布。明年我们要转向南方各省。这将是我国农业革命的开端。地方上的人说，农民是会大力支持的。天不◇238◇打雷，农民是不会划十字的。为了把农业提到最高程度，为了使我国能够时时刻刻预防意外的天气，让旱灾鞭挞我们一下看来是必要的。高尔察克教会了我们建立步兵，邓尼金教会了我们建立骑兵，旱灾正在教我们建设农业。这就是历史的道路。这里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

五、你写道：“请来吧。”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没有时间。我劝你安排“到巴库去玩一趟”，——这是必要的。梯弗里斯并不怎么有意思，虽然它在外表上比巴库诱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林立的石油井架，那末你就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相信巴库能提供你极丰富的材料来创作像“牵引力”〔57〕这样的杰作。

在我们莫斯科，一连串代表大会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讨论当然是好的，但是老实说，这不过是装

饰品。我们大家在这里同西方的代表（以及东方的代表）进行的亲切谈话要有意思得多。我同德国的、法国的、波兰的工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极好的革命“材料”！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西方，真正的革命仇恨，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仇恨，正在日益加深。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希望在本国“按照俄国方式实行革命”的纯朴而有力的话。这是一些新型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还不曾有过。当然，距离实行革命还不怎么近，但是正在走向革命，——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这些工人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感动：他们对我们国家怀着热诚而强烈的几乎是母性的爱，对于我们党的正确、能力和威力无限信任。不久以前的怀疑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革命日益发展的标志。◇239◇

正是这样，杰米杨。

好吧，谈得够了，再见。紧握你的手。

你的　**约·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240◇

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有些无产阶级的领袖，报刊上并不宣扬他们，也许因为他们本人不喜欢宣扬自己，但他们却是革命运动的血液和真正的领导者。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就属于这一类领袖。

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者，按性格，按作风，按革命教育，按敏觉性来说都不愧为一个组织者，在自己的全部沸腾般的活动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组织者，——这就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形象。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我国条件下做一个领袖和组织者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挑选助手，建立办公室并通过办公室来发号施令。在我国条件下做一个领袖和组织者，就是第一、了解工作人员，善于掌握他们的优缺点，善于使用工作人员；第二、能够这样配备工作人员：

（一）使每一个工作人员感到自己适得其所；

（二）使每一个工作人员一般能按他们个人的才能对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

（三）这样配备工作人员的结果不是使整个工作停顿，而是使整个工作协调、一致、普遍提高；◇241◇

（四）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作的总方向是要体现和实现把工作人员配备到合适的岗位上去的那种政治思想。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正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这种领袖和组织者。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这段时期是党和国家的转变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成为执政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即工农政权。把以前秘密的党转到新的轨道上，建

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基础，找出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党的领导，保证苏维埃的正常发展，——这就是当时摆在党面前的极复杂的组织任务。党内没有人敢否认，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是巧妙地顺利地解决建设新俄国这个组织任务的最初几个人中的一个，甚至是第一个。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代理人喜欢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布尔什维克不会建设，他们只会破坏。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对这些胡说的生动有力的驳斥。在我们党内，出现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他的工作并不是偶然的。产生了像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伟大的建设者的党能够大胆地说，它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我决不是认为我完全熟悉我们党的所有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但是我必须说，在我所熟悉的一切杰出的组织者中间，我知道继列宁之后只有两个人是我们党可以而且应该引以自豪的：一个是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逝世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个是在党和国家的建设工作中燃烧尽了的雅·◇242◇米·斯维尔德洛夫。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十一期（总第三十四期）
署名：约·斯大林◇243◇

Я.M.斯维尔德洛夫

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葬礼上

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者

电影《斯维尔德洛夫》剧照

论 国 际 形 势

我认为，为了说明目前的国际形势，丝毫没有必要把所有稍微重大的事情和现今国际事务中的一切特点都加以估计。为了说明目前的国际形势，只需要估计一下目前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依我看来，现在这样的问题有三个：

（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的到来；

（乙）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丙）欧洲工人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加强和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基本问题。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协约国已经显得无力处理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果实。击溃德国和包围苏联，它完全做到了。制定掠夺欧洲的计划，它也做到了。协约国各国无数的会议和条约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执行掠夺计◇244◇划，它就显得无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协约国各国之间的矛盾太大了。因为它们在分赃问题上过去没有谈好，今后也不能谈好。因为被掠夺的国家的反抗越来越厉害。因为掠夺计划的实现包含着军事冲突，而群众是不愿意打仗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为了消灭德国而进行的对鲁尔的帝国主义正面攻击，对帝国主义本身也是危险的。同样很清楚，为了孤立苏联而实行的露骨的帝国主义最后通牒政策，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已经形成了这种局面：彭加勒和克逊虽然忠心耿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但是他们的“工作”加剧了欧洲日益增长的危机，激

起了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推动了群众去进行革命。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会从正面攻击的政策转到妥协政策，从露骨的帝国主义转到隐蔽的帝国主义，从彭加勒和克逊转到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明目张胆地掠夺世界已经不无危险了。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左派联盟〔58〕必须掩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就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来源。

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奉行“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必要，而是出于自愿，出于所谓自由的选择。并且推想，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意大利和德国）击溃了工人阶级以后感到自己是胜利者，因而现在能够奉行“民主主义”。换句话说，当决定性的战斗进行的时候，资产阶级需要战斗的组织，即需要法西斯主义，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已被击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再需要法西斯主义，它可以用“民主主义”这一巩固自己胜利的更好的方法来代替法西斯主义。由此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了，“和平主义的时代”应该认为是长期的，而欧洲的革命则将无限期地搁置下来。◇245◇

这种推想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军事技术范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没有根据推想，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而能在战斗中或者在管理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也很少有根据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资产阶级战斗组织的积极支持，而能在战斗中或者在管理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如果认为“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消灭，那就错了。在目前情况下，“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随

着它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显露头角而巩固起来。

第二、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决定性的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他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这样的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西方的决定性战斗还是将来的事情。发生过的仅仅是被资产阶级击退了的最初几次严重攻击，仅仅是对力量的最初一次严重检验，这次检验表明，无产阶级还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了。正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使工人阶级屈服，它就不得不放弃正面攻◇246◇击而采取迂回的方法，实行妥协，奉行“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

最后，认为“和平主义”是资产阶级强大的标志而不是它软弱的标志，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目前的和平主义意味着第二国际各党直接或间接地执掌政权。但是，第二国际各党执掌政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它们必然会揭露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因为这些政党的执政活动只会产生一个结果：使它们在政治上破产，使它们的内部矛盾加剧，使它们土崩瓦解。而这些政党的瓦解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政权的瓦解，因为第二国际各党是帝国主义的支柱。没有特别的必要，资产阶级会不会出于自愿地来进行这种冒险的奉行和平主义的试验呢？当然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期内，资产阶级进行过两次奉行和平主义的试验：第一次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当革命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第二次是现在，在彭加勒和克逊的冒险试验以后。资产阶级这样从和平主义投向狂妄的帝国主义和从狂妄的帝国主义投向和平主义，对帝国主义不会没有影响，它把千百万工人群众推出他们习惯的平常的轨道，它把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政治，它促使他们革命化，这些有谁敢否认呢？当然，“民主主

义的和平主义”还不是克伦斯基统治，因为克伦斯基统治是以两个政权的并存为前提，即以资产阶级政权的瓦解和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产生为前提的。但是，和平主义意味着人民群众的高度觉醒，他们被卷入政治；和平主义动摇着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为革命动荡准备条件，——这一点是未必可以怀疑的。正因为如此，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削弱，而不会使它巩固；一定会加速革命的到◇247◇来，而不会使它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和平主义对革命不是严重的危险。和平主义会破坏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它为革命准备有利条件。但是，只有**违反**“和平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本身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对赫里欧—麦克唐纳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政权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本质进行有力的揭露工作的**条件**下，和平主义才能产生这种结果。至于和平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本身的意志，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本身的政策，那末他们奉行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专政而用“民主主义”的光辉来眩惑群众；为了更有效地准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在阿富汗和苏丹进行屠杀，瓜分波斯，而用关于民族和国家的“主”权的高调来麻醉群众；为了同那些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阴谋家更紧密地勾结起来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进行土匪式的骚扰，而用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同苏维埃政权缔结某些“条约”这种冠冕堂皇的废话来愚弄群众。资产阶级需要和平主义是为了打掩护。和平主义的主要危险就在于这种掩护作用。资产阶级能不能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这取决于西方和东方的共产党进行揭露工作的能力，取决于西方和东方的共产党摘下穿着和平主义法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假面具的本领。毫无疑问，事变和实践在这方面将有利于共产党员，因为它们将暴露出资本的民主主义奴仆的和平主义**言论**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动**是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不落后于事变，无情地揭

露第二国际各党为帝国主义效劳和背叛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248◇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协约国伦敦会议〔59〕非常充分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欺骗和虚伪。如果说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的上台执政和关于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喧嚷是掩饰和隐蔽欧洲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的势不两立的敌意，那末协约国的伦敦协定就是掩饰和隐蔽英国和法国夺取欧洲领导权的殊死斗争、英国和美国在争夺世界市场的霸权中日益增长的矛盾以及德国人民反对协约国压迫的非凡斗争。麦克唐纳之流和列诺得尔之流叫喊说：阶级之间再也没有战争了，革命结束了，现在事情可以用阶级合作来了结了。伦敦协定的朋友们和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弟兄们，即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英雄们随声附和说：法国和英国之间、美国和英国之间、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再也没有斗争了，战争结束了，现在事情可以用美国领导下的普遍和平来了结了。

但是在协约国伦敦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伦敦会议以前，赔款问题是由法国单独决定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取决于“盟国”的，因为法国在赔款委员会中占有可靠的多数。占领鲁尔是在经济上瓦解德国的手段，是法国从德国取得赔款，取得法国冶金工业用的煤炭和焦炭、法国化学工业用的化学半成品和颜料的保证，是亚尔萨斯的纺织品免税输入德国的保证。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但◇249◇是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占领的方法只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法国连稍微令人满意的数量的赔款或实物赔偿都没有得到。最后，占领的发起人彭加勒本人也由于他的孕育着新战争和革命的露骨的帝国主义

政策而被轰下台了。至于法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所以没有实现，那末这不仅由于占领和公开掠夺的方法取消了法国工业同德国工业之间的经济结合的可能性，而且由于英国坚决反对这种结合，因为英国不会不知道，德国煤炭同法国金属的结合不会不破坏英国的冶金工业。

协约国伦敦会议提出了什么方法来代替这一切呢？

第一、会议摈弃了法国单独决定赔款问题的方法，认为争执的问题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的协约国代表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最后解决。

第二、会议反对占领鲁尔，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撤退（立即）和军事撤退（一年后或一年内）。理由是：在现阶段占领鲁尔，从欧洲的政治情况来看是危险的，从有组织有步骤地掠夺德国来看是不合适的。而协约国是准备彻底地有步骤地掠夺德国的，——这一点是不必有任何怀疑的。

第三、会议摈弃了军事干涉，完全赞同进行财政经济的干涉，认为：

（甲）必须在德国设立由外国专员监督的发行银行；

（乙）把在外国专员监督下经营的国家铁路移交私人；

（丙）设立由协约国代表组成的所谓“移交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以德国货币支付的全部偿付金，分拨德国赔款总额中的实物赔偿部分，可以把某些偿付金（在这些钱交给法国不合适的情况下）◇250◇投资到德国工业中去，从而获得掌握德国金融市场的充分机会。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就是把德国变为协约国的殖民地。

第四、会议承认法国在一定期间有向德国强制取得煤炭和化学制品的权利，但是会议又附带说明，德国有向仲裁委员会要求减少甚至停止这种强制的实物赔偿的权利。这样就把法国的权利化为乌有，或者几乎化为乌有了。

如果再加上英国银行家和主要是美国银行家贷给德国的八亿马克借款，如果再注意到在会议上发号施令的是银行家，首先是美国银行

家，那末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情景：法国的领导权已经消失殆尽，法国的领导权为美国的领导权所代替了。

协约国伦敦会议的总结就是这样。

有些人根据这一点认为：今后欧洲内部的利害矛盾在美国领导权面前一定会减弱；关心向欧洲输出资本的美国为了使本国银行家大发其财，能够使欧洲各国仰其配给，并迫使它们唯命是听；因此，欧洲的和平，固然是强制的和平，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比较有保障的。这种推想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会议是在主人即德国人民不在场的情况下解决德国问题的。当然可以“计划”把德国变成永久的殖民地。但是现在，连落后的殖民地都很难使之顺从的时候，企图把德国这样的国家变成真正的殖民地，那就是在欧洲埋下地雷。◇251◇

第二、会议把推进太远的法国往后拉了一些，因此，英国自然而然在欧洲占了实际上的优势。但是认为法国能够容忍英国占优势，那就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逻辑，而事物的逻辑通常比任何别的逻辑都显得更有力量。

第三、会议承认了美国的领导权。但是美国资本所关心的是以资金供给法德工业，是最合理地利用法德工业，例如把法国的冶金工业和德国的煤矿工业联合起来。未必可以怀疑，美国资本正是在这个对它最有利的方面利用它的优越地位。但是认为英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不了解英国，不了解英国如何重视自己的冶金工业的利益。

最后，欧洲不是孤立的地区，它和自己的殖民地联系着，它靠榨取这些殖民地的脂膏活命。认为会议能使欧洲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好”转，会议能制止或延缓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发展，那就是相信奇迹。

由此究竟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只有一个：伦敦会议没有解决欧洲任何一个旧矛盾，反而给

旧矛盾添加了一些新矛盾，即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英国将用老办法来加深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以保证自己在大陆上的政治优势。毫无疑问，美国也将加深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对抗，以保证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领导权。至于德国和协约国之间极深刻的对抗，我就不谈了。

世界的事变将由这些对抗来决定，而不由该处绞刑的尤兹和爱吹牛的赫里欧的“和平主义”言论◇252◇来决定。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规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伦敦会议只是掩饰这些对抗，为它们空前未有的尖锐化造成新的前提。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不稳固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这个“制度”本身是漂浮在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上面的泡沫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应当认为是德国、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的积极性的提高，以及苏联在西方和东方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提高。

西方的共产党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第一、它们的成员是复杂的，因为它们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的。第二、那里的干部不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因为担任负责工作的是一些脱离其他党派的人，他们还没有彻底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断绝关系。第三、在它们面前有像阅历很深的社会民主党这样老练的敌人，这个敌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最后，和它们对峙的有像欧洲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拥有可靠的国家机关和万能的报刊。

如果认为这样的共产党“一夜工夫”就能够推◇253◇翻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西方的共产党成员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些党内培养出能够以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精神、以准备革命的精神来改变整个党的实践的真正的革命干部。

还在不久以前，西方共产党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最近半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了。最近半年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就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来说，就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化来说，就孤立机会主义分子来说，在西方共产党的生活中起了根本变化。

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对革命会有什么危险，这在萨克森工人政府〔60〕的惨痛经验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机会主义首领们企图把统一战线思想这个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手段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议会活动的方法。这是唤醒党员群众并激起他们反对机会主义首领们的转折点。

破坏右派首领的威信而提拔新的革命的领袖的第二个问题应当认为是所谓“俄国”问题，即俄共（布）内的争论。大家知道，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和法国的苏瓦林集团〔61〕坚决支持俄共（布）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主要干部，反对俄共（布）的革命的多数。这是对显然同情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者——俄共（布）的西方革命工人群众的挑战。这是对西方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和革命派的挑战。无怪乎这种挑战的结果是布兰德勒集团和苏瓦林集团的彻底粉碎。无怪乎这个问题在西方其他一切共产党内得到了反应。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末情况就全◇254◇面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62〕只是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的革命派的胜利。

毫无疑问，机会主义首领们的错误在加速西方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最近几年来资本的顺利进攻，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的恶化，失业大军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经济不稳定，广大工人群众中革命义愤的增长。工人正在走向革命，他们希望有革命的领袖。

总结：欧洲未来革命的支柱——西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终**形成过程**开始**了。这就是最近半年的总结。

————————————

西方工会的发展条件更艰难更特殊。

第一、它们局限于自己的“试验过的”行会实践并敌视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以前产生的，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政党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们惯于以自己的“独立性”自傲，把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除了“在一个卢布上加几个戈比”以外什么也不愿意承认。

第二、它们在精神上保守并敌视一切革命创举，因为领导它们的是旧的、卖身求荣的、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工会官僚，这些人随时准备使工会为帝国主义效劳。

最后，这些工会团结在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者的周围，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依恃的一支千百万人的改良主义军队。◇255◇

当然，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反动工会，还有靠近工会国际〔63〕的革命工会。但是，第一、相当一部分革命工会不愿造成工会运动的分裂，仍旧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64〕内，服从后者的纪律；第二、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阿姆斯特丹分子仍然代表着工人的多数。不应当忘记，阿姆斯特丹团结着不下一千四百万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如果认为可以**违反**这千百万工人的意志而在欧洲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基础，使自己必然遭到失败。因此，任务在于把这千百万群众争取到革命和共产主义方面来，使他们摆脱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影响，或者至少做到使他们对共产主义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

最近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了。曾

经在世界市场上掌握工业资本主义领导权的英国是闭关自守的反动工会的故乡。这种垄断权的失落是同财政资本的发展相关联的，因为财政资本的特征是许多大国争夺殖民地垄断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为狭隘的反动工会扩大了**地区**，但是却缩小了反动工会的物质基础，因为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是许多国家争夺的对象，而殖民地却越来越不甘心继续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也不应当忘记，战争大大地破坏了欧洲的生产。大家知道，现在欧洲的生产总额不超过战前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因此，生产缩减，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取得胜利。因此，工资减少，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被取消，再一次表明工会官僚背叛工人阶级的许多次防御性的罢工遭到失败。因此，大批工人失业，工人对反动工会的不满日益加剧。因此，产生了工人阶级在经济斗争方面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把两个工会国际联合成一个能够对资本组织◇256◇反击的工会国际的计划。改良主义者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关于同“俄国”工会进行谈判的讲话和英国工会在工联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九月初）上关于工会统一的号召，只是反映了群众对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压力日益加强。在这一切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应该认为是下面的事实：正是英国工会这个保守主义的巢穴和阿姆斯特丹的基本核心倡议把反动的工会和革命的工会联合起来。英国工人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出现是说明“在他们那里”，即在阿姆斯特丹并不是诸事如意的最可靠的标志。

有些人认为联合工会的运动正是目前所必需的，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绝对**需要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予以支持的左的因素。这是不对的，或者确切些说，这只有一部分是对的。问题在于西方的共产党正在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它们正在变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们正在随着广大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而发展起来并准备夺取政权，因而形势正在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但是不使资产阶级失去反动的阿姆斯特丹这个支柱，要推翻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不把阿姆斯特丹这

个资产阶级的堡垒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要取得专政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在目前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方面进行里外配合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关于工会的联合和加入各国际生产联合组织的问题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支持和推动左派前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只有不把革命工会的旗帜卷起来，只有斥责反动的阿姆斯特丹首领们的背叛和分裂行为，只有批评左派首领们在对反动首领的斗争中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才能有对左派的真正支持。只有这◇257◇样的政策才能够准备工会的真正联合。否则就会发生和去年十月在德国发生过的同样情况，当时列维左派集团〔65〕被反动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巧妙地利用来包围德国的革命工人。

————————————————

最后，谈谈苏联在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中的声望的提高。也许“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不稳固的最可靠的标志应当认为是下述明显的事实：苏联在西方和东方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年逐月地提高。问题不在于苏联得到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承认”。这种“承认”本身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第一、它是由力图在苏联市场上占得“自己的地盘”的各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需要促成的，第二、它是由要求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至少和苏联签订某种“条约”的和平主义的“纲领”促成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由于有“承认”苏联的政纲而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资产阶级竞选者，麦克唐纳之流和赫里欧之流由于（除其他原因外）常把“和俄国友好”挂在嘴边而掌握了政权并能继续执政，这些“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威信是苏维埃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连墨索里尼这样有名的“民主主义者”也认为必须经常在工人面前拿和苏维埃政权“友好”来炫耀自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现在的日本当

权者这样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掠夺别人财物的人也不愿意不和苏联“友好”了。至于苏维埃政权在土耳其、波斯、中国和印度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那就更不用说了。

像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专政的”和革命的政权，为什么在别国人民群众中有这种空前的威信和◇258◇这种非常的声望呢？

第一、因为工人阶级厌恶资本主义，他们渴望摆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同情苏维埃政权，这首先因为它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政权。英国铁路员工的代表，并非无名的布朗雷不久以前在工联代表大会上说：

“资本家们知道，全世界工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俄国，既然俄国革命会胜利，那末其他国家觉悟的工人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地消灭资本主义呢？”

布朗雷当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他所说的话却表达了欧洲工人的期望和想法。的确，既然“俄国人”没有资本家也已经过了六年多，而且过得很好，那末，为什么不能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中有极大声望的根源。因此，苏联国际声望的提高意味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厌恶的加深。

第二、因为人民群众厌恶战争，他们渴望粉碎资产阶级的战争计划。人民群众知道，苏维埃政权首先向帝国主义战争展开了攻击，因而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人民群众看到，苏联是进行反对者战争的斗争的唯一国家。他们同情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旗手，是反对战争的可靠支柱。因此，苏维埃政权国际声望的提高说明了全世界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组织者的厌恶的加深。

第三、因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群众厌恶帝国主义的枷锁，他们渴望粉碎这个枷锁。苏维埃◇259◇政权是粉碎“本国”帝国主义锁链的唯一政权。苏联是根据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则建设自己生活的唯一国家。苏联政府是世界上坚决捍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

以及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唯一政府。被压迫群众同情苏联，因为他们认定苏联是他们在摆脱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同盟者。因此，苏维埃政权国际声望的提高意味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厌恶的加深。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可以怀疑，这**三种厌恶**是不会巩固现代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的。

前几天，美国外交部长、“和平主义者”、高尔察克的支持者尤兹发表了一篇反苏的黑帮宣言。毫无疑问，彭加勒的桂冠使尤兹睡不着觉了。但是未必可以怀疑，尤兹的黑帮和平主义的宣言只会进一步加强苏联在全世界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

说明目前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期
署名：约·斯大林◇260◇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集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66〕上的演说）

各地报告的缺点

同志们！首先我想谈谈在这里所听到的报告中的缺点。我认为主要的缺点有两个。

第一个缺点是：代表们总是谈工作的成绩，对于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几乎没有提到，而这种缺点是多不胜数的。计算计算党龄，谁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支部里有多少党员等等，而对于我们工作的缺点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但是，关于我们农村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却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些报告带有一些官样文章的味道，——请原谅我这样说。任何一个旁观者听了都会以为，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中央做报告，说“工作进行得令人满意”，或者说“一切都很顺利”。同志们，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大家，无论是我们或你们都知道，不论在你们那里，在地方上，或者在我们这里，在中央，工作都不是十分顺利的。◇261◇

报告的第二个缺点是：报告中谈到的主要是支部本身，支部中的情绪，而千百万非党农民的情绪不知为什么被忽略了。原来共产党员最关心的是自己：他们的内部生活过得怎样，做过多少次讲演，进行着什么样的宣传等等。原来共产党员越来越注意自己，而忘记了他们的周围是非党员的汪洋大海，没有这些非党员的支持，支部的整个工作就会弄得一塌糊涂。党组织和非党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

这一点完全没有谈到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谈到。决不能只注意自己。首先应当注意千百万非党农民，研究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重视他们的要求和情绪。报告的枯燥无味和某些官僚主义气息就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我要指出来请同志们注意的两个主要缺点。

同志们，请再一次原谅我对你们直言不讳。但是我真挚地请求你们也对我们直言不讳地谈谈中央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现在来谈本题吧。

党的主要缺点是党的农村工作薄弱

目前，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当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已经提高，而他们对党的要求，比如说，已经比两年前多得多的时候，我们党的主要缺点何在呢？◇262◇

我们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们党的农村工作薄弱，在于党的农村工作没有上轨道，在于党的农村工作做得很坏。怎么会这样薄弱呢？为什么党的城市工作在突飞猛进，而党的农村工作却寸步难行呢？难道农业不在发展吗？难道农民的状况在余粮收集制废除以后的两年中没有得到改善吗？难道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品的输送不在改善农民的状况吗？难道稳定的通货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吗？我们党的农村工作究竟怎么会这样薄弱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党在城市中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里？

那末，我们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在哪里呢？我们党的基本力量在于：在我们城市中，党的周围有为数几十万的广大的非党**工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就是党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党在城

市中的力量在于：党和千百万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的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起连接作用的桥梁，即工人群众中为数几十万的非党积极分子。党是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汲取力量的。党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取得群众的信任。你们已经听说，半年前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我们的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非党积极分子中来的，这些积极分子对我们党充分信任，把党和其余的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因此，非党积极分子不仅是一座起连接作用的桥梁，并且是一个我们党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最丰◇263◇富的来源。没有这种积极分子，我们党就不可能发展。**如果**党周围的广大的非党积极分子在发展和巩固，那末党也会发展和巩固。**如果**没有这种积极分子，那末党就会衰败和枯萎。

我们农村工作的薄弱表现在哪里？

那末，我们党的农村工作的薄弱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党在农村中没有广大的能够把党同我国千百万劳动农民联系起来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农村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农村中有一根很细的党支部的线。此外还有一根同样很细的同情党的非党农民的线。可是在这根线的后面却牵着非党员的，即千百万农民的汪洋大海，而非党积极分子这根很细的线没有而且也不能把千百万农民同党联系起来。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这根线支持不住，常常扯断，于是在农村中，在党和非党群众之间形成的往往不是一座起连接作用的桥梁，而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基本任务是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

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为数几十万的、能够把党同千百万劳动农民连接起来◇264◇的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同

志们！**或者**我们培养这种积极分子，从而使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状况赶上城市中的状况，那末任何问题和任何困难都不可怕；**或者**我们不培养这种积极分子，那末我们的全部农村工作就寸步难行。现在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就在这里。没有这种积极分子（一定要人数众多，一定要由**真正的**农民组成），我们党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害慢性病。当然，这个工作是困难的，而且一两年内是培养不出这种积极分子的。但是必须把这种积极分子培养出来，而且培养的工作开始得愈快愈好。

必须使苏维埃活跃起来

但是怎样培养这种积极分子呢？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呢？如果以为双手捧着书本进行口头宣传就能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在围绕着农村实际需要而进行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在农村进行广泛的苏维埃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吸引农民参加管理乡、区、县、省的工作，才能在党的周围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使它站立起来，把农民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吸引到苏维埃里来，——这就是可以用来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的方法。

列宁说过，苏维埃是工农结合的机关，是工人领导农民的机关。所以，如果我们要使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不致离开工人的领导，那末我们就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把农民吸引到苏维埃里来，使苏维◇265◇埃活跃起来，使它站立起来，使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在切实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中找到出路。只有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才能从农民中选拔出广大的非党积极分子干部。只有从这样的积极分子中，党才能挑选出成万的农村党员。

必须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

但是要使苏维埃活跃起来，除其他一切外，还需要有一个条件。

这就是必须根本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而这种改变的关键何在呢？在于共产党员要学会以平等态度对待非党员。在于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倾听非党员的呼声。在于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也要向他们学习。非党员是有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党员和非党员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极重要的问题。列宁给这种相互关系下定义的时候用了相互信任这个词。但是在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非党农民的地方，是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并且结果往往是在党和非党员之间建立起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党脱离群众，工农的结合变为结合的破裂。

格鲁吉亚暴动的教训◇266◇

不久以前的格鲁吉亚暴动〔67〕就是这种变化的实际例子。我们的报纸报道说格鲁吉亚发生的是虚假的暴动。这是对的，因为格鲁吉亚的暴动一般说来是人为的，不是人民发动的。但是在某些地方，由于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很差，孟什维克得以引诱一部分农民群众参加暴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是共产党力量最雄厚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共产党员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就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大意了，疏忽了，没有觉察到农民中有波动，农民将有所举动，农民中间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一天天地积累起来了，而党却一点也不知道。原来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竟是对非党农民的情绪、思想和希望最隔膜的地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怎么会发生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因为共产党员不善于用列宁式的态度去对待农民，他们造成的不是信任的气氛，而是相互不信任的气氛，这样就使党脱离了非党农民。格鲁吉亚的一个最积极的工作人员的话是值得注意的，他说，这种不相称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地方苏维埃薄弱和党脱离了非党员。他说：“毫无疑问，使我们对日渐成长起

来的暴动疏忽大意的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到地方苏维埃的薄弱中去寻找。”列宁说，苏维埃是农民情绪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最可靠的指标。而在格鲁吉亚的某些县里，正是这个晴雨表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同志们，应当把格鲁吉亚事件当做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根本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在党和非党员之间造成充分信任的气氛，如果我们不倾听非党员的呼声，最后，如果我们不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给农民劳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开辟一条出路，那末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267◇事件。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能够确立正确的列宁式的对待非党农民的态度，把农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积极性纳入苏维埃建设的轨道，从而保证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或者**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就会不通过苏维埃，越过苏维埃而流为类似格鲁吉亚暴动的土匪式的骚扰。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必须以敏锐的态度对待农民

为了说明有时对待农民不敏锐到什么程度，应当稍微谈谈反宗教的宣传。某些同志有时把农民看做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以为只要做一次自然科学的讲演，就足以使农夫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他们往往不了解，农夫是从经济观点去看上帝的，就是说，农夫有时并不反对摈弃上帝，但是怀疑往往使他们苦恼：“谁知道呢，也许真有上帝；既敬拜共产党员，又敬拜上帝，使庄稼更靠得住些，不是更好吗。”谁不估计到农民心理的这个特点，谁就完全不懂得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谁就不懂得在反宗教的宣传问题上即使对农民的偏见也需要谨慎小心。◇268◇

党的基本任务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党的农村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党和千百万非党农民之间缺少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二）党的当前任务是：在农村党的周围培养这种积极分子，使党能够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力量。

（三）只有使苏维埃活跃和吸引农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才能培养这种积极分子。

（四）为了使苏维埃活跃，必须根本改变对待非党农民的态度，摈弃发号施令的作风，在党员和非党员之间造成相互信任的气氛。

党的任务就是这样。

工作的条件

实现这些任务的有利条件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这样的条件（我指的是主要的条件）有三个。◇269◇

第一、贫农的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应当注意农业发展的某些特点。工业的发展团结了工人，消灭了工人阶级中丧失阶级性的现象，使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一个整体；相反地，农村中农业的发展却引起农民的瓦解和分化，形成两个阵营：力图占据农村领导地位的富农阵营和寻求同盟者反对富农的贫农阵营。毫无疑问，使苏维埃活跃起来就能给贫农的日益增长的积极性开辟一条出路，来建立以工人为首的反对富农、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这些横霸势力的统一战线。

第二、编造地方预算是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的物质基础。不用说，预算、征税和开支方法等问题对农民是有头等意义的。因此，农民现

在参加苏维埃建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苏维埃政权对我国灾区给予及时的救济。毫无疑问，这种救济已经在农民中造成信任苏维埃政权的气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气氛是有助于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的。

主要是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保持联系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某些当前任务，而且也有许多便于完成这些任务的有利条件。现在的问题在于更加同心协力地来着手执行这些任务。

这里应该记住列宁的不朽名言：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就愈可靠。他这些话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请听：◇270◇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注）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就要毁坏。”①〔68〕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二四二号◇271◇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
俄共（布）中央全会〔69〕上的演说）

同志们！因为前面几位同志已经很详细地谈到了农村工作，所以我只就目前形势的特点发表几点意见。

从农民的状况来看，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我们在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旧资本，即精神资本，已经开始枯竭。有些同志说：“为什么叫嚷起农民工作来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农民，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农民，——这种关于农民的叫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来这些同志不了解我们党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所积蓄起来的旧的精神资本已经快要用光了。他们不了解现在我们需要新资本。我们必须在新的斗争条件下为党创造一笔新资本。我们必须重新争取农民。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帮助农夫打倒了地主并得到了土地，我们结束了战争，沙皇已经没有了，沙皇的爪牙也同沙皇一起被打倒了，——关于这一切，农民已经忘掉了。现在靠这一笔旧资本，已经不能维◇272◇持多久了。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了解新环境中，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何事物。我们要重新争取农民，——这就是我国内部状况的第一个特点。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重新谈到农民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谈得有点迟了。

第二个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的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了另一种样子了。从前无产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散漫的，而农民则殷切希望保持住从地主那里剥夺来的土地并

赢得对地主战争的胜利。从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战争再也没有了。工业在增长。农业在发展。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丧失阶级性的工人阶级，而是文化和需求日益提高的健壮的无产阶级了。至于农民，它已经不是深恐丧失土地而甘愿牺牲一切来摆脱地主压迫的受折磨的旧农民了。它已经是一个自由的积极的新阶级，它已经忘掉了地主，它现在关心的是获得廉价的商品和以高价出卖自己的粮食。它的特征是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现在已经不可以说：“党会料理好一切”，“党会给大家安排好一切”。这样的话现在农民不懂，工人更不懂。现在必须更加深入群众，必须比过去更多地进行说明、解释和说服。现在必须重新争取千百万非党员的信任，必须从组织上，首先通过苏维埃来巩固这种信任。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积极性要求这样做。

但是不仅阶级发生了变化，斗争场所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斗争场所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从前引起斗争的是什么问题呢？是需要余粮收集制还是不需要？更早以前是需要地主还是不需要？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地主和余粮收集制再也没有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地主和余粮收集制，而◇273◇是粮食价格了。这是一个广阔而又非常复杂的崭新的斗争场所，需要认真研究和认真斗争。现在的问题甚至不在于税收，因为只要粮食价格有“足够的提高”，布匹和其他工业品的价格有“足够的”降低，农民是会纳税的。现在的基本问题是市场以及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问题。

请看哥美里省省委书记给中央的报告：

“有三个乡发生群众拒绝接受税单的事件。纳税速度比应有的速度慢了三分之二。召开过的非党的乡代表会议开得都很激烈，以致有的不得不中途闭会，有的提出了修正案：请求中央减税和提高粮价。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况怎样，但是我们省的情况和你（即我）在最近那封不公开的信中所做的那些结论是不相符的。我们的地方工作人

员的情绪不大好。农村好像受了惊动的蜂房，纷纷谈论税收和粮价。”

西伯利亚、东南区、库尔斯克省、土拉省、下新城省、乌里杨诺夫斯克省和其他省份也送给中央同样的报告。

所有这些报告的意义是：我们的价格政策使农民感到困难，他们想削弱甚至抛掉实行这个价格政策的杠杆，可是没有这种杠杆，我们的工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农民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惟恐把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到极点，你们害怕外国商品充斥，因此，你们筑起重重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我国年轻的工业不受竞争的侵袭，但是你们的工业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廉价的商品，不管这些商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说：“你们害怕提高粮价，惟恐破坏工资制度，因此，你们发明了各种收购机◇274◇关，建立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等等，但是你们的壁垒与杠杆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提高粮价。”

这就是价格政策方面的斗争的意义。

最近的格鲁吉亚暴动特别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暴动当然是虚假的，但是在某些县，特别是在古里亚县，这种暴动无疑是具有群众性的。古里亚农民争取的是什么呢？是廉价的商品和提高玉蜀黍的价格。古里亚和西方国家接壤，当地的人看到外国商品比我们苏维埃商品便宜，于是希望我们商品的价格至少减低到和外国商品的价格一样，或者是玉蜀黍的价格提高到保证购买苏维埃商品不吃亏的程度。格鲁吉亚古里亚县暴动的经济基础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这个暴动证明整个苏维埃国家正处在新的斗争条件下。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格鲁吉亚的暴动和唐波夫的暴动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涉及的不是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而是取消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在市场上和在农村中煽动对苏维埃价格政策进行这个新斗争的是富农、投机分子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这些人竭力使千百万农民群众脱离工人阶级，藉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因此，我们的任务是

孤立富农和投机分子，使劳动农民脱离他们并吸引劳动农民参加苏维埃建设，从而给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开辟一条出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已经在这样做，因为劳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愿意同工人建立联盟，愿意保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愿意保存专政所赖以支持的那些经济杠杆。

为此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关心到在农村党的周围培养大批能够把我们党同千百万农民连◇275◇接起来的非党农民干部。否则就谈不上使农民脱离富农和投机分子，就谈不上争取千百万农民并把他们巩固在党的周围。这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不能成为我们不可克服的障碍。必须把数百个也许数千个（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能够发动和培养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的、熟悉农村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农村去帮助我们的支部。同时应当考虑到农民对城里人的那种自然的不信任的心理，这种不信任的心理还在农村中存在，而且大概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你们知道，农民对待城里来的人，特别是对待很年轻的人总是这样：“从城里又来了一个二流子，他是要骗我们的。”这是因为农民最相信的是那些自己经营农业并且多少懂得农业的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应当是培养党可以从中汲取新力量的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怎样进行这个工作呢？据我看来，为此首先必须使苏维埃活跃起来。必须吸引所有生气勃勃的、诚实的、觉悟的、有首创精神的人，特别是过去的红军战士（他们是农民中最觉悟最有首创精神的人）参加苏维埃工作。为什么正是参加苏维埃工作呢？第一、因为苏维埃是政权机关，而吸收劳动农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是党的当前任务。第二、因为苏维埃是工农结合的机关，是工人领导农民的机关，而工人领导农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第三、因为地方预算是在苏维埃中编制的，而预算是农民的切身问题。最后，因为苏维埃是农民情绪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而倾听农民的呼声是绝对必要的。农村

中也有其他极为重要的非党组织，例如农民互助委员会、合作社、共青团组织等。然而危险的是：这些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可能脱离工人的纯农民联合会。为了使这种情况不致发生，◇276◇必须把这些组织的工作统一在苏维埃中，因为苏维埃的结构本身保证了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因此，现在当农民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的时候，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不久以前，我在农村支部会议上号召同志们无情地批评我们党的农村工作的缺点①。这引起了某种不满。原来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害怕批评，不愿意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同志们，这是危险的。说得重一些：害怕自我批评或非党员的批评是现在最危险的病症。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自己批评自己，并让非党员严厉地批评我们的工作，那末就可以指望把我们的农村工作向前推进；或者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批评，那末就会有喀琅施塔得、唐波夫、格鲁吉亚的暴动这类事件来批评我们。我认为我们宁愿采取第一种批评而不采取第二种批评。因此，我们不应当害怕党员的批评，更不应当害怕非党员的批评。

第一次载于约·斯大林“农民问题”一书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277◇

———————————————

① 见本卷第 212 页至第 219 页。——本书制作者注

在“狄纳莫”工厂留言簿上的题词

我对“狄纳莫”工厂的工人和全俄国的工人的希望是：使我国工业向前发展，使俄国无产者的人数在最近时期内增加到两千万至三千万，使农村的集体经济繁荣并使个体经济接受它的影响，使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农村的集体经济把工厂中的无产者和田地上的劳动者最终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军队……

约·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二号◇278◇

致骑兵第一集团军

向光荣的骑兵集团军，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弗兰格尔和皮尔苏茨基的白卫军队的大灾星致敬！

向骑兵集团军的领导者，农民出身的红色将军布琼尼同志和工人出身的红色将军伏罗希洛夫同志致敬！

骑兵战士们！四年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的辉煌胜利给你们的红旗增添了不朽的光荣。在庆祝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你们应该宣誓：你们至死忠实于这些红旗，当工人阶级的意志号召你们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投入新的战斗的时候，你们一定能光荣地履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

你们的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六一号◇279◇

致“农民报”

向忠实地捍卫伟大的工农联盟事业的“农民报”致敬！

“农民报”！要记住三个训条：

（一）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农村通讯员，——这是你的军队；

（二）要更巩固地联系最忠诚最觉悟的农民特别是过去的红军战士，——这是你的支柱；

（三）要在农村中传播真理，要向全世界宣扬，不倦地宣扬：不同工人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农民的解放是不能想像的；没有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劳动对资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农民报”第五十一号◇280◇

斯大林在工农兵群众当中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
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在加米涅夫做了详细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话就不多了。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谈。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加紧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终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281◇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许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

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未必用得着证明，诸如此类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荒谬的谣言置之不理。

一般说来，在反对派分子或者离党很远的人的办公室里所编造的谣言还少吗？我们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像约翰·里德那样的错误，也没有设法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谈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现在有人正力图用这些奇谈来教育青年，并且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须拿真正的事实来驳斥这些荒谬的奇谈。

现在拿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来看。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表决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282◇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记录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机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

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列宁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情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党知道，列宁一分钟也不会同意把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同志留在党内，何况是把他们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党没有发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尽管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还都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农民的作用、党的领导原则等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没有这种共同的基础，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283◇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来谈谈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苏汉诺夫一类的庸人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事实，真正的事实却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九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加上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铁路员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克雷连柯、绍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

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284◇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无论苏汉诺夫怎么说，无论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说，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吗？但是，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意志的执行者。谁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实质，谁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说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谈。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决议案在中央委员会决定起义问题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并没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对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

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285◇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

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无可争辩，这是个困难关头，需要表现出特别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静，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退却，及时接受和约，把无产阶级的军队从德帝国主义的打击下撤出来，保存农民的后备力量，从而取得喘息时机，然后再以新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是，很遗憾，托洛茨基在这个困难关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这种革命的坚定性。

照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教训是：在十月革命时要“不畏缩后退”。这不对，因为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只包含革命教训的**一小部分**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全部**真理是：不仅在革命◇286◇进攻的日子里要“不畏缩后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里，当敌人占上风而革命失利的时候，也要“不畏缩后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为限。十月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如果在起义日趋高涨的时

候畏缩后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畏缩后退，那就更坏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权，和夺取政权同样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情势发展到几乎要“交出”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表现畏缩后退，那末他自己就应当明白，这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十月错误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十月起义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现在来谈谈十月革命的准备问题。

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月到十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绕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287◇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但是，托洛茨基以奇谈妙论款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应当认为，关于我们党的那些可笑言论是属于托洛茨基通常发表的奇谈妙论一类的。

现在我们按时期来简单地看一看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

（一）**党的新方针时期（三月至四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沙皇制度被推翻；

（乙）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专政）；

（丙）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丁）两个政权并存；

（戊）四月游行示威；

（己）政权的第一次危机。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时并存，而且后者对前者抱着信任态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图，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因而使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两个专政之间还没有严重的冲突。相反地，却有“联系委员会”〔70〕存在。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直接推翻政府，这个革命以前的旧政纲是很明确的，但是它已经不适合新的斗争条件了。现在已经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为它和处于◇288◇护国派影响下的苏维埃联系着；现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党就不得不进行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苏维埃的力不胜任的战争。但是也不能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和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需要有新方针。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71〕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针。我不来多谈这个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党和列宁之间是不是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见分歧延续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通过列宁提纲的彼得格勒组织的市代表会议〔72〕（四月下半月）是我们党的发展中的转折点。全俄四月代表会议〔73〕（四月底）只是在全俄范围内完成了彼得格勒代表会议的事业，把十分之

九的党员团结在党的统一的立场的周围。

在七年后的今天，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把这些意见分歧描绘成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两个党的斗争。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在这里无耻地把事情夸大了，因为这些意见分歧丝毫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的震动。第二、如果我们党不容许在自己成员中间有不同的◇289◇意见，那末我们党就是帮会，而不是革命政党了，而且大家知道，在过去，例如在第三届杜马时期，我们也曾有过意见分歧，但是那并没有妨碍我们党的团结。第三、不妨问一下，**现在**得意洋洋地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的托洛茨基自己**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场呢？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硬说，托洛茨基的美国来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宁的成为他的四月提纲基础的“远方来信”〔74〕（三月）。居然这样说：“完全先知。”这种比拟托洛茨基并没有反对，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这两类信，就会相信这一点。第二、列宁在他从国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这该怎样解释呢？列宁不止一次地声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这个口号就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①，这有谁不知道呢？

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提纲和托洛茨基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方案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人们这样把小茅舍

——————————————

①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八页和第二十九页，并见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著者注

同勃朗峰相比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连茨涅尔要这样冒险地给关于我国革命的一堆旧的奇谈再加上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美国来信“先知”列宁有名的◇290◇“远方来信”的奇谈[①]呢？

———————————————

① 应当列入这一类奇谈的还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说法，说托洛茨基似乎是国内战争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同志们，为了揭示真相，我应当声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体——俄国共产党。举几个例子也许不是多余的。你们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认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只有在战胜这些敌人以后才能自由呼吸。而历史证明，我们军队击溃这两个敌人，即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违反**托洛茨基的计划的。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关于高尔察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们的军队向高尔察克进攻，并在乌发附近作战。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建议停止沿白河线（乌发附近）进攻，让乌拉尔留在高尔察克手里，把一部分军队从东方战线撤出来调到南方战线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不能让乌拉尔和它的工厂以及铁路网留在高尔察克手里，因为他在那里容易重整旗鼓，纠集兵力并重新出现在伏尔加河；必须先把高尔察克驱逐出乌拉尔山脉，赶到西伯利亚草原去，只有这样做以后才能把力量调往南方。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托洛茨基提出辞职。中央委员会不接受辞职。拥护托洛茨基计划的总司令瓦采齐斯辞职了。他的职位由新的总司令加米涅夫接替。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参予东方战线的事务。

（二）**关于邓尼金**。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包围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的袭击）的“钢圈”显然被突破了。邓尼金拿下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从南方战线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央委员会认为情况危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要求托洛茨基“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著者注◇291◇

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①]。

（二）**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时期（五月至八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彼得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政府成立；

（乙）俄国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示威；

（丙）彼得格勒的以“打倒资本家部长！”为基本口号的六月游行示威；

（丁）前线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利；

（戊）彼得格勒的七月武装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退出政府；

（己）反革命军队从前线调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同苏维埃进行斗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联合政府成立；

（庚）我们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

（辛）反革命的国务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

（壬）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失败，苏维埃活跃，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执政内阁”成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尖锐化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那种不稳固的均势打破了。这种均势，不论是好是坏，在前一时期是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联系委员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已面临末日。“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把戏”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话。前线的危机和后方的破坏加强了两端的侧翼，从两方面对护国派妥协分子施加压力。革命动员起来◇292◇了，

———————————————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因而引起了反革命的动员。反革命又转过来激发革命，引起革命来潮的新浪潮。政权转归新的阶级的问题成了当时的迫切问题。

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说，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硬说彼得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谴责了一些同志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军队中还占少数的时候要逮捕临时政府的企图。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而是根据真实的文件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他就不难相信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断言“根据列宁的倡议”准备在六月十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被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责备为“冒险主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来写，他就一定知道，六月十日游行示威是在列宁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宁在大家知道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见彼得格勒委员会记录〔75〕）中是认为必须延期的。

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悲剧性”意见分歧是由七月武装游行示威引起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险行为”，这简直是捏造。托洛茨基当时还没有参加我们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只是我们的苏维埃委员，当然不一定知◇293◇道中央委员会只是把七月游行示威看做试探敌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不愿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苏维埃还拥护护国派分子的时候把游行示威变为起义。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

此做出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人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

托洛茨基声言，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在党的一部分上层分子中暴露出同护国派联盟的趋向，支持临时政府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指的当然是使托洛茨基睡不着觉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像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文件可以驳倒托洛茨基的说法。托洛茨基援引了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警告不要支持克伦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列宁的信，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使命。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应当比自己的战友看得远一些，他必须对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钟。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托洛茨基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内部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七月失败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间在苏维埃的命运问题上确实发生过意见分歧。大家知道，◇294◇列宁希望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苏维埃外面准备起义，警告不要迷恋苏维埃，他认为被护国派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变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更谨慎的路线，做出决定说，没有根据认为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不可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意见分歧对党没有重大影响。列宁后来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没有抓住这个意见分歧，也没有把它夸大到“惊人的”程度。

团结一致的党成了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景。

（三）**组织冲击的时期（九月至十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民主会议的召开，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思想的破产；

（乙）莫斯科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

（丙）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76〕，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军队撤出的决定；

（丁）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关于武装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

（己）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发动和临时政府阁员的被捕；

（庚）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迅速加剧，执政集团张皇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动◇295◇摇分子大批投向布尔什维克。应该指出这个时期革命策略的一个奇异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步骤，或者几乎每一个步骤，都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毫无疑问，拒绝从彼得格勒撤出军队是革命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进攻是在保卫彼得格勒以防外敌可能的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毫无疑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对临时政府进攻的一个更重要的步骤，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在建立苏维埃对军区司令部的行动的监督的口号下实现的。毫无疑问，卫戍部队公开转向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治委员网的建立标志着起义的开始，但是这些步骤都是在保卫彼得格勒苏维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发动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似乎用防御的外貌来掩盖自己的进攻行动，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坚定的动摇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演说、

文章和口号在外表上都带有防御性质，而在内容上却具有深刻的进攻性质。

这个时期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并且是相当重大的。起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已经谈过了。这些意见分歧在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完全反映出来了。因此，我不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话。现在必须谈谈下面三个问题：关于参加预备国会，关于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关于起义的日期。因为托洛茨基只想显露头角而“无意中”歪曲了列宁对后面两个问题的立场，所以就更需要谈谈这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预备国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具有严重性质的。所谓预备国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资产阶级把苏维埃排挤到后面去，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预备国会在革命已经成熟◇296◇的情况下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变证明这个目的是实现不了的，而预备国会本身则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但是很明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预备国会正是追求这个目的。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参加预备国会会有什么意义呢？只会使无产阶级群众看不清预备国会的真面目。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击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参加预备国会无疑是严重的错误。

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样认为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是为了进行正常的工作，是为了“把工人运动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而参加预备国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谎话。如果这是事实，党就不能用退出预备国会这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来“一下子”消除这个错误。我们党瞬息之间就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种表现。

其次，让我来纠正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在关于解决预备国会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的叙述中夹杂的一个小小的不确

切的地方。连茨涅尔说，这个会议上的报告人有两个——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预备国会（加米涅夫和诺根）。

当托洛茨基提到列宁在起义形式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更糟。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认为党在十月起义时应当“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然后又来批评这个硬加在列宁身上的胡说，他“手舞足蹈”，最后还说了一句宽容的话：“这或许是一个错误吧。”托洛茨基在◇297◇这里造列宁的谣，他在歪曲列宁对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证一大堆文件来证明列宁曾经建议要**通过**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不要**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谈呢？

当托洛茨基“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在起义日期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并不好些。托洛茨基在叙述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的有名会议时，肯定说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起义不得迟于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决议”。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规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内只通过了两个关于起义的决议——十月十日的决议和十月十六日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两个决议。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窒息俄国革命而媾和[①]的威胁）和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

———————————————

① 显然，这可能是“单独媾和”。——斯大林

斯基及其同伙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298◇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入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77〕

十月十六日有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78〕

你们看，托洛茨基竟把起义的日期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忘记了。

托洛茨基断言，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列宁不了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坚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列宁是根据两个原因建议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的。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彼得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误，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因为列宁把起义看做艺术，他不会不知道，敌人晓得了起义日期（由于彼得格勒苏◇299◇维埃的不谨慎），一定要竭力准备对付这一天，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就是说，一定要在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

他的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变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起义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政权实际上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夺取的，而且夺取政权的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合法性的意义的长篇大论完全是多余的。

生气勃勃而强有力的党领导着革命群众去冲击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状况。

关于十月革命准备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所散布的有关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的许多反党的和关于列宁的奇谈。我们揭穿了和驳斥了这些奇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所有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关于列宁和列宁的党的奇谈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00◇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托洛茨基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难道不再一次侮辱党和党的领袖列宁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吗？这部十月革命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破坏十月起义的主要活动家的威信，破坏组织和举行这次起义的党的威信，这算什么十月革命的“历史”呢？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研究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来研

究十月革命的。也不是**这样**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的。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著作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和列宁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301◇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

从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说，托洛茨基是如何评价列宁主义的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征”的理论。对列宁主义的这种气愤的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列宁主义当时捍卫了并且捍卫住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还不限于这种气愤的批评，他还更进一步断定说：“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见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和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敌意。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方面是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你们想必知道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的历史。在这个联盟中，马尔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大家知道，这个七拼八凑的“党”追求的目的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302◇认为消灭八月联盟是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把这个联盟看做建立“真正的”党的基础。可见又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三、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它企图损害他们的声誉，破坏他们的威信。我不知道党内还有哪一个派别，在损害列宁主义的领袖或党的中央机关的声誉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例如：托洛茨基把列宁评定为“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见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的这种“客气的”批评有什么价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所有的“客气的”批评中，这还远不是最“客气的”批评。

在十月运动期间，背着这种讨厌货色的托洛茨基怎么还能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呢？这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抛弃了（真正抛弃了）自己的货色，把它藏到柜子里去了。没有这个“行动”，同托洛茨基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联盟的理论，即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已经被革命粉碎和抛掉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展开

武装斗争的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保持统一呢？托洛茨基只好承认这个理论没有用处。

不断革命论也“碰到了”同样不幸的事情，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天立刻夺取政权，而且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容许他——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托洛茨基只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在苏维埃中扩大影响和努力争取农◇303◇民的政策。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由于头两个特点显然已经破产，它当然也退到后面去了。

托洛茨基已经没有像样一点的集团而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能够不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吗？当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只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长期合作，只有在后者完全抛弃旧的货色，完全赞成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写十月革命的教训，但是他忘记了除其他一切教训以外，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并且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具有头等意义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不妨也考虑一下十月革命的这个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看来对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什么益处。原来，在十月运动的日子里被藏进柜子里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旧货色现在又重新搬出来想找销路——恰好我们这里的市场正在扩大。毫无疑问，托洛茨基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狈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

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304◇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论。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结论：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个比较“可行的”必要步骤，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骤。

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

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一九〇三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见“列宁全◇305◇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页）

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论的。

（二）**关于党性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们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们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们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们党的新老干部之间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领袖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306◇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托洛茨基在他的“论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的评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没有根据的荒谬言论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中国官吏。

你们想知道我们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吗？

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列宁说：‘当然应该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纳坦松老人很使我们感到安慰。他来找我们‘商量’，开口就说：

‘要知道，也许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喊道：‘好极了！说得真对！你们的人都赞成吗？’

纳坦松回答说：‘我们有些人正在动摇，但是我想他们终究是会同意的。’”◇307◇

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们想知道党是怎样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破坏列宁声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难道是为了颂扬党的领袖弗·伊·列宁吗？不大像。

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评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宁，而是一个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议党“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但是我已经讲过，这种评述是一点也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做这种令人愤怒的……不确切的评述呢？这里没有“稍微”破坏列宁的威信◇308◇的企图吗？

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们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不愿意也不力求进行这种论战。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好吧，同志们，我们准备着！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六九号◇309◇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79]）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有三个外部情况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比较容易地打断了帝国主义链条，从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第一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即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开始的，当时这两个集团忙于决死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力来认真注意扑灭十月革命。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冲突来巩固和组织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中开始的，当时苦于战争而渴望和平的劳动群众被事物的逻辑引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强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于把苏维埃革命和结束可恨的战争◇310◇联结起来，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中间获得广大的同情。

第三个情况：在欧洲有雄伟的工人运动，在西方和东方有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这个情况对于俄国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保证了俄国革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可靠的国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况，十月革命还有许多使它易于获得胜利的内部有利条件。

其中主要的条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最积极的拥护。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与土地的贫农和大多数士兵的最可靠的拥护。

第三、它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为统帅，为领导力量，而这个政党所以有力量，不仅因为它有经验和多年来形成的纪律，而且因为它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这样一些比较容易战胜的敌人，如较为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被农民“骚动”弄得颓丧不堪的地主阶级、在战争进程中完全破产的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

第五、它拥有新国家的广大地域，它在这个地域内能够自由回旋，能够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实行退却，能够暂时休息，能够集结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能够指望得到国内充足的粮食、燃料和原料。

这些内外情况配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特殊环境，使十月革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311◇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在内外环境方面没有不利的条件。例如十月革命处于相当孤独的地位，它旁边和邻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苏维埃国家，这个不利条件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呢？毫无疑问，例如德国未来的革命在这方面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状况，因为它邻近有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至于无产阶级在国内不占多数，这个对十月革命不利的条件我就不谈了。

可是，这些不利条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内外特殊条件的巨大意义更加明显了。

一分钟也不可以忘记这些特殊条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的德国事变时，特别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托洛茨基首先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因为他竟笼统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国革命类比，并放肆地痛

斥德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和虚构的错误。

列宁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这个革命**继续下去**并贯彻到底，就比西欧各国困难了。我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这一点，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一）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和通过这个革命来结束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件事联系起来；（二）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决死斗争，这两个集团当时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敌人；（三）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这多少是因为我国幅员广阔和交通不便；（四）当时在农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接受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其大多数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通◇312◇过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立即加以实现；——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的重新出现是不很容易的。正因为如此——除其他许多原因以外——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要比我们困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五页至第四十六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
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第二、在我国确立

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而且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313◇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计不足或“稍微”估计过高，像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现在爱说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

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314◇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至第三五一页）

其次：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同上，第三八七页）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这些异民族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315◇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摆脱财政资

本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大战时期的立场，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316◇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大家知道，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说“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

我们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在这

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317◇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①

托洛茨基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318◇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319◇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顿，在另一些国家的

发展中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跃进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纪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已经跃进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规律的出发点是：

（一）“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见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言，“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九页）

（二）“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它们把全世界卷入**它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同上）

（三）财政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四）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320◇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五）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

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雄伟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对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说来，无◇321◇产阶级革命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来看吧。

托洛茨基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

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322◇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一九二四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

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323◇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可见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像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真正的建设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324◇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级

专政七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因为热中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不知不觉地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论据。

也许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325◇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

内**获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326◇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绝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的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327◇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说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一九〇五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当时

◇328◇跑得太远，企图在一九〇五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说，可是后来，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听听他的话：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斯大林注），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骂帕尔乌斯不该提出“不断革命”论。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应当也把帕尔乌斯的同伴托洛茨基骂一顿。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摈弃了的“不断革命”论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329◇正确的，这话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话和腐败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的。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要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至少必须弄清楚这个策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所以必须这样，尤其是因为在许多论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小册子中往往正是把这些特点忽略了。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以为在十月革命准备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即侦察时期和起义时期，此外的都是由于误信邪说。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比预定‘更左的’四月游行示威，是检验群众的情绪和群众与苏维埃内大多数人的相互关系的一次侦察性攻击。”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实质上这一次游行示威也不过是在运动的新的更高阶段上的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侦察”。不用说，依照我们党的要求举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游行示威，在托洛茨基看来，更应当称为“侦察”了。◇330◇

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有了由工农组成的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在四月、六月、七月都没有调用这支军队举行起义，而只进行了“侦察”，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情报”没有提供有利的“材料”。

不用说，这种对我们党的政治策略的简单化的看法无非是把通常的军事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混为一谈罢了。

实际上，所有这些游行示威首先是群众自发施加压力的结果，是群众激于反战义愤而涌现街头的结果。

实际上，当时党的作用在于给予自发产生的群众发动以一定形式并加以领导，使之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进行。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斗争和阶级冲突进程中才建立这支军队（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终于建立了这支军队），它是通过四月游行示威、通过六月游行示威和七月游行示威、通过区杜马和市杜马的选举、通过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通过对苏维埃的争夺来建立这支军队的。政治军队不是军事军队。军事指挥部在开始作战时就已经拥有现成的军队，而党却要在斗争进程中，在阶级冲突进程中，在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党的口号正确，相信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军队。

当然，每一次这样的游行示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见的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331◇上起侦察作用，但是侦察在这里不是游行示威的动机，而是游行示威的自然结果。

列宁分析十月起义前的事变并拿这些事变和四月至七月间的事变比较时说道：

“这时的情形恰巧跟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为当时所发生的是**自发激动**，而这种激动是我们党没有察觉到的（如四月二十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游行示威的（如六月九日和七月三日）。因为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还不能跟着我们走，所以起义还为时过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九页）

很明显，单靠“侦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侦察”，而在于：

（一）党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的斗争中始终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高涨；

（二）党依靠自发高涨，同时保持了自己对运动的独掌领导；

（三）对运动的这种领导使党易于编制群众政治军队去举行十月起义；

（四）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准备工作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

（五）十月革命的这种准备工作又使政权在十月起义胜利后落到**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

总之，**一个**党即共产党的独掌领导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332◇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十月革命优异于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地方。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领导由两个党分担，而其中哪一个党也不能称为共产党。

第二个特点。这样，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进行这种领导的，这种领导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呢？这种领导是循着使**妥协**政党——在革命总爆发时期内最危险的集团陷于孤立的路线，即循着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路线进行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承认：

（一）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二）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

（三）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应当指向使这些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群众离开它们。

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时期，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一九

〇五——一九一六年），自由保皇党即立宪民主党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是妥协政党，是主◇333◇张大多数人民即全体农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党。自然，党在当时把主要打击指向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不使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农民和沙皇制度**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战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仇恨立宪民主党人”，断言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遮掩了”反对主要敌人即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责备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不了解这个战略要求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是**为了**促进并加速对主要敌人的胜利。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样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会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各种斗争势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来了。沙皇不存在了。立宪民主党由妥协势力变成当权势力，变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了。斗争已经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进行，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党在当时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党。自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打击当时指向了这些党，因为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苏维埃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憎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备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主要目标。可是，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雄辩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只有采用这样的策略，才得以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334◇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劳动农民群众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望，他们离开这些党，他们转而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

这一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围。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争夺劳动农民群众，争取掌握这些群众的历史。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暴动，——这些事实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命运。而这些事实是以证实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正确来决定这个命运的。因为当时不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摆脱战争。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政策原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总之，使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陷于孤立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领导路线，——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二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就会悬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训”中一点也没有说到，或者几乎一点也没有说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这样，党对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领导是循着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陷于孤立的路线，循着使广大工农群众离开这些党的路线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具体实现了这种孤立，以什◇335◇么形式，在什么口号下实现了这种孤立的呢？这种孤立是以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式，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通过把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政权机关、变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斗争来实现的。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苏维埃作为能够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能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负有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使命的基本组织杠杆呢？

苏维埃是什么呢？

列宁还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说过：“苏维埃是新式国家机关，第

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和人民隔离，而是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关保证和群众，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关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关的成员是不经过官僚手续而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关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和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易于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关，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336◇说，把立法权**和法律执行权**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假如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关保持政权，而新的机关要一下子建立起来是不行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页）

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就抓住苏维埃作为便于组织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式强大机关的基本组织环节。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从它的内部发展方面来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以前，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和第二个阶段（在科尔尼洛夫暴动失败以后）。

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口号意味着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破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因为当时苏维埃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使在野党（即布

尔什维克）有自由鼓动权，使各政党在苏维埃内可以自由斗争，预期布尔什维克能够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这种斗争来夺取苏维埃并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成分。这个计划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无疑有助于准备保证专政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它既然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掌政权，迫使他们实施他们的反革命政纲，就更快地揭露了这些党的真正本质，使它们更快地陷于孤立，使它们更快地脱离群众。可是，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中断了这个发展过程，使反革命势力（将◇337◇军和立宪民主党）占了优势，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抛入反革命势力的怀抱。这个情况使党不得不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等到革命再度高涨时再把它提出来。

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失败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现在这个口号已经跟第一个阶段不同了。它的内容根本改变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并使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因为大多数苏维埃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革命经过起义直接进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并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国家形式。

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于它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摆脱帝国主义，揭露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政策是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而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如果我们不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能把自己的党的口号变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推进革命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不仅能使先锋队和大多数工人确信党的政策正确，而且能使大多数人民确信党的政策正确，那末情况就不全面了。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338◇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

召开和解散立宪会议的经验是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的明显例子。

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口号。大家知道，立宪会议是根本和苏维埃共和国基础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向着苏维埃共和国前进，同时又要求临时政府立刻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布尔什维克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在举行起义前一个月，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布尔什维克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会有”这种事情，是因为：

（一）立宪会议思想是当时在广大民众中间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二）立刻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易于揭露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三）要使立宪会议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就必须引导这些群众带着他们对土地、和◇339◇平和苏维埃政权的要求走到立宪会议门前，使他们和实际存在的立宪会议接触；

（四）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确信立宪会议的反

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五）这一切自然就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是消除立宪会议的手段之一；

（六）这种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实现的，那就只能使立宪会议服从苏维埃，使立宪会议变为苏维埃的附属品，使立宪会议无能为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政策，立宪会议的解散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后来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下的发动就不会遭到那样可耻的破产。

列宁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340◇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没有抵制立宪会议呢？列宁说，这是因为：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同

上，第四十二页）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341◇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就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引证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谈到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关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的有名的信〔80〕（写于一八七一年四月）时，清清楚楚地写过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所说的毁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意见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奇怪的，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想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

许会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极端僵硬的……一八七一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的革命只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参加进来，才能成为把真正人民的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342◇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和无产者的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八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总之，善于用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立场的方法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党的口号的正确，这是把千百万劳动者争取到党的方面来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四个特点。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完全足以使人认清这个策略的特征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七年的历史不是证实了这个理论，而是推翻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不可采用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展的方案，因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实抵触。它尤其不可采用来作为口号，因为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有可能独立突破资本战线的个别国家的

主动性；因为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积极进攻资本，而是推动个别国家消极等待“总◇343◇爆发”的时机；因为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者中间培养坚决革命的精神，而是培养哈姆雷特式的担心“万一别人不来援助”的犹疑心理。列宁说得十分正确，无产阶级在一国内胜利是“典型现象”，“几国同时发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可是，大家知道，列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它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发展论[①]。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像从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前，发达的帝国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出现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样简单了。因为出现了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样一个新因素，这个规律说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世界资本战线全线削弱，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因为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财政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所有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时不能不估计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谈了）。◇344◇

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

列宁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

————————————————

① 参看上面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

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做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终究能把这些国家里的革命运动推延下去，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六页至第四五七页）◇345◇

除此以外，不仅战败国和殖民地受战胜国的剥削，而且一部分战胜国也落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财政剥削的罗网中；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帝国主义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这些矛盾以外，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极深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正在发展；所有这些矛盾又由于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同这些国家并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国际形势的特点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我们看见，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第一个获得了胜

利的国家，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346◇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第二、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

列宁说：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

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347◇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而且那些虽然记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种只应接受外援的被动现象的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不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约·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国家出版局版◇348◇

注　释

〔1〕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二百二十二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代表会议根据约·维·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两项决议。

代表会议斥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宣布党内存在着以托洛茨基反对派为代表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并建议中央委员会公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第七条。代表会议的这些决议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七一页至第八〇三页）——（正文第五页）

〔2〕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的、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发表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做出了党内争论的总结，并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提交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六九页至第七七八页）。——（正文第七页）

〔3〕关于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文件，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一页至第三五三页。——（正文第二十六页）

〔4〕英国外交大臣克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向苏联政府提出带有诬蔑性责备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要苏联政府召回苏联驻波斯和阿富汗的全权代表，释放在苏联北部领海内非法捕鱼而被扣留的英国渔船等等。克逊威胁说，如果在十天内拒绝接受最后通牒的条件，那就要断绝贸易关系。克逊的最后通牒造成新的武装干涉的威胁。苏联政府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同时表示完全

准备以和平方式调整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采取了加强国防力量的措施。——（正文第三十三页）

〔5〕指一九一八年二月德国军队在霍夫曼将军指挥下向苏联领土的进攻（关于霍夫曼的进攻，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三十五页至第四十四页）。——（正文第三十四页）

〔5〕指一九二一年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富农暴动。——（正文第三十四页）

〔7〕“日报”是白俄社会革命党人的日报，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柏林创刊。——（正文第四十页）

〔8〕“曙光”是白俄右派孟什维克的杂志，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四十一页）

〔9〕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在莫斯科举行。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为追悼弗·伊·列宁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做了遵守和执行列宁遗训的伟大宣誓。代表大会为列宁逝世而通过了“告劳动人民书”。代表大会为永久纪念列宁做出下列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城改名为列宁格勒城，规定悼念日，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城内建立列宁纪念像。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政府的工作报告、苏联预算问题和设立中央农业银行问题。一月三十一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在约·维·斯大林领导下拟定的第一部苏联宪法（根本法）。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约·维·斯大林被选为联盟苏维埃委员。——（正文第四十二页）

〔10〕指一九二三年德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时德国国内展开了群众革命运动，结果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汉堡发生了武装起义。德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整个欧洲猖獗起来，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新干涉的危险也增大了。——（正文第四十五页）

〔11〕 “火星报”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由列宁在国外创办，从国外秘密送入俄国。（关于“火星报”的意义和作用，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八页至第四十九页）——（正文第四十八页）

〔12〕 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

代表大会，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举行。（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〇页至第一一三页）——（正文第五十页）

〔1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一日）举行。（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四十九页至第七十五页，“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六页至第一一九页）——（正文第五十一页）

〔14〕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俄共（布）中央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十个大省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代表。会议做了一九二四年初展开的关于共青团当前任务的争论的总结。俄共（布）中央讨论了会议的决议以后，建议党的地方组织和共青团的地方组织努力使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结一致、协调工作，号召共青团的领导人员同心协力地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正文第五十八页）

〔15〕 约·维·斯大林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和五月的“真理报”上。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了约·维·斯大林的小册子“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其中编入了回忆录“论列宁”和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

约·维·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编入了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各次版本中。——（正文第六十二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十一页。——（正文第七十页）

〔17〕 指卡·马克思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给弗·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八十六页）。——（正文第七十四页）

〔18〕 指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〇五页至第一二四页）。——（正文第七十五页）

〔19〕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三页）。——（正文第七十六页）

〔20〕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七四页至第二七五页）。——（正文第七十六页）

〔21〕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危险的迫近而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这一个问题。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宣言中号召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正文第七十六页）

〔22〕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一卷序言第二十三页。——（正文第七十八页）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七〇页。——（正文第八十一页）

〔24〕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四卷。——（正文第八十一页）

〔25〕 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一页至第四〇四页）。——（正文第八十二页）

〔26〕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〇三二页）。——（正文第八十九页）

〔27〕 约·维·斯大林援引的是弗伊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所写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从这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四七页至第二六三页、第二六四页至第二七四页、第四二七页至第四四七页）。——（正文第八十九页）

〔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八三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十八页）。——（正文第九十二页）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页和“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三页）。——（正文第一〇三页）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二二页和第四三六页。——（正文第一一七页）

〔31〕 农业合作总社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一九二九年六月撤销。——（正文第一一九页）

〔32〕 见弗·伊·列宁的著作“论金子在现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五页至第九十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一一页至第九一九页）。——（正文第一四六页）

〔33〕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由弗·伊·列宁起草，经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七页至第二二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一页至第八二四页，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五二七页至第五三〇页）——（正文第一六〇页）

〔3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约·维·斯大林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党员，其中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为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九十一名，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以前的候补党员为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为四百十六名。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党的组织问题、国内贸易和合作社问题、农村工作问题、青年工作问题等等。

代表大会一致斥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政纲，肯定这个政纲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

代表大会指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要党注意加强以列宁主义基础教育新党员的工作。代表大会责成弗·伊·列宁研究院准备十分科学地和最精确地用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为广大工人群众出版“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正文第一六七页）

〔35〕 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农民互助委员会）是根据弗·伊·列宁签署

的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的指令在村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下面成立的，一九三三年撤销。成立农民互助委员会的目的是改进对农民和红军家属的社会援助的组织工作，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九月批准的关于农民互助会的条例，又把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农村居民中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吸引农村的贫农和中农群众参加合作社的任务委托给农民互助委员会。——（正文第一七四页）

〔36〕 少年先锋队为庆祝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和少年先锋队组织改名为“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儿童团”，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检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检阅了约有一万名少先队员的队伍。——（正文第一七四页）

〔37〕 苏联的股份公司（国营的、合营的和合作社营的）是经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设立的。设立股份公司的目的是吸收资金，包括私人企业主的资金在内，以便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商品交换。

合营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种，它吸收外国资本来收购国内出口货物，把它们销往国外，并输入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品。合营公司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经营业务。股份公司存在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正文第一九〇页）

〔38〕“农民报”是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是为农村办的群众性报纸，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正文第一九一页）

〔39〕 团结了乌克兰少地和无地农民的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为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而成立的。一九二〇年成立，一九三三年实行全盘集体化以后撤销。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其存在的初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是在农村中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组织。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贫苦农民委员会改组为生产性的社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农民参加各种农业集体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是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正文第一九一页）

〔40〕 地方组建部队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颁布的法令建立的，它和红军的正规军并存。地方组建部队是根据轮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对劳动者实行军事训练。——（正文第一九一页）

〔41〕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一页至第二九一页。——（正文第一九二页）

〔42〕 指弗·伊·列宁的著作“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页至第八八〇页）。——（正文第一九二页）

〔43〕 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根据约·维·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七七八页至第七八五页）。——（正文第一九四页）

〔44〕 资本主义国家承认苏联的政策表现在：英国、意大利、挪威和奥地利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希腊和瑞典在三月，丹麦在六月，法国在十月，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先后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文第二〇九页）

〔45〕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一页至第二九一页。——（正文第二一三页）

〔46〕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十页至第十四页。——（正文第二一四页）

〔47〕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四十四页至第五十七页。——（正文第二一四页）

〔48〕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三十四页至第四十四页。——（正文第二一五页）

〔49〕 币制改革是以有稳定的黄金保证的切尔文来代替贬值的苏维埃纸币，这次改革是苏联政府在一九二四年内完成的。——（正文第二一六页）

〔50〕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二十八页至第三十四页。——（正文第二一七页）

〔51〕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四七页至第四五二页。——（正文第二一八页）

〔52〕 指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约·维·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讨论了

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问题、工资问题、金属工业问题、旱灾问题等等。为了详细研究农村工作问题，全会通过了成立俄共（布）中央全会农村工作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受全会的委托成立了由维·米·莫洛托夫（主席）、约·维·斯大林、米·伊·加里宁、拉·莫·卡冈诺维奇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一九二四年九月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定改组为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文第二一九页）

〔53〕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七十五页至第八十七页。——（正文第二二〇页）

〔54〕 “工人通讯员”杂志（月刊）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自一九二五年一月起改名为“工农通讯员”杂志。——（正文第二二八页）

〔55〕 波兰委员会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约·维·斯大林是代表大会各个最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正文第二三〇页）

〔56〕 布兰德勒集团是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布兰德勒分子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层实行了无原则的合作，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事变中遭到失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斥责了布兰德勒集团的投降路线。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决定禁止布兰德勒集团干预德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布兰德勒因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正文第二三二页）

〔57〕 指杰·别德内依的诗“牵引力”（见“杰·别德内依全集”一九二八年版第九卷第八十六页至第九十三页）。——（正文第二三九页）

〔58〕 法国的“左派联盟”是以爱德华·赫里欧为首的激进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联盟，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上台执政。“左派联盟”政府以“左的”词句为掩护，实际上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积极帮助法帝国主义。赫里欧政府执政到一九二五年四月。——（正文第二四五页）

〔59〕 协约国伦敦会议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六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会议是为讨论和解决德国赔款问题而

召开的。——（正文第二四九页）

〔60〕 萨克森工人政府是在整个德国展开了群众革命运动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成立的。参加这个政府的是五个社会民主党人和两个共产党员。政府由“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采格涅尔领导。参加萨克森政府的共产党员实行了德国共产党布兰德勒领导集团的投降政策，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破坏了武装无产阶级和发展德国革命的事业。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帝国军队解散了萨克森工人政府。——（正文第二五四页）

〔61〕 苏瓦林集团是法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集团，由托洛茨基的热烈拥护者苏瓦林领导。苏瓦林集团支持俄共（布）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诬蔑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粗暴地破坏党的纪律。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满足了法国共产党关于把苏瓦林开除出法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因为苏瓦林进行反革命宣传而把他开除出共产国际队伍。——（正文第二五四页）

〔62〕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一十人，代表四十九个国家的六十个组织。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关于世界经济状况、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争论、关于法西斯主义、关于工会运动中的策略、关于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和其他问题。约·维·斯大林是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是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致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决定，关于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并使它们变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党的决定。——（正文第二五五页）

〔63〕 工会国际即红色工会国际，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三七年底解散。工会国际团结了革命的工会，坚持了共产国际的立场。——（正文第二五六页）

〔64〕 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上成立。它包括西欧许多国家和

美国的改良主义工会，它在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中采取了敌视共产主义的反革命立场。由于在世界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上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就不复存在了。——（正文第二五六页）

〔65〕 列维左派集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集团。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萨克森工人政府成立的时候，列维集团害怕失去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声明准备和共产党人共同工作，但事实上却掩护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政策，帮助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正文第二五八页）

〔66〕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出席会议的地方工作人员有六十二人，其中中央各区域和省委员会代表四人，专区委员会和区委员会代表十五人，乡委员会代表十七人，村支部代表十一人，共青团支部代表十一人，乡农妇组织员代表四人。会议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的“关于农村支部的当前任务”、米·伊·加里宁的“农民互助委员会的新条例”、拉·莫·卡冈诺维奇的“关於下层苏维埃机关”、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农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报告、各地的报告和其他问题的报告。约·维·斯大林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并在十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发表了“关於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的演说。——（正文第二六一页）

〔67〕 指一九二四年八月底的格鲁吉亚反革命暴动，这次暴动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第二国际首领和外国代理人的支持下组织的。在格鲁吉亚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下，暴动很快就平息了。——（正文第二六七页）

〔68〕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六九页。——（正文第二七一页）

〔69〕 俄共（布）中央全会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举行。全会讨论了经济问题和维·米·莫洛托夫的“农村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在决议中向各级党组织做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的补充指示。约·维·斯大林主持了全会的工作，并在十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的演说。——（正文第二七二页）

〔70〕 “联系委员会”由齐赫泽、斯切克洛夫、苏汉诺夫、菲里波夫斯基

和斯柯别列夫组成（稍后加入的有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了同临时政府建立联系、“影响”临时政府和“监督”它的活动而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设立的。事实上“联系委员会”帮助了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政策，阻挡了工人群众进行争取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积极革命斗争。一九一七年五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直接参加临时政府，“联系委员会”就撤销了。——（正文第二八八页）

〔71〕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十七页至第二十二页。——（正文第二八九页）

〔7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四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有五十七人。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弗·伊·列宁做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以他的四月提纲为基础的。约·维·斯大林是关于弗·伊·列宁的报告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正文第二八九页）

〔73〕 关于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八页至第二五二页。——（正文第二八九页）

〔74〕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二八九页至第三三三页。——（正文第二九〇页）

〔75〕 见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十一日）“弗·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六十二页至第六十三页）。——（正文第二九三页）

〔76〕 北方区域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喀琅施塔得、诺夫哥罗德、列维里、赫尔辛福斯、维波尔格及其他城市的代表共九十四人，其中有布尔什维克五十一人。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立即把全部政权转归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的决议，号召农民支持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而苏维埃本身要积极行动并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便用军事来保卫革命。代表大会成立了北方区域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筹备召

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统一领导各区域苏维埃的活动。——（正文第二九五页）

〔77〕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五五页。——（正文第二九九页）

〔78〕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五页。——（正文第二九九页）

〔79〕 约·维·斯大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和五月出了两版。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和演说编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写完该书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在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各版中刊载过，此外还刊载在各种文集中和出过单行本。序言的另一部分作为“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注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中。——（正文第三一〇页）

〔80〕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六二页至第二六四页。——（正文第三四二页）

年 表

一九二四年（1—6月）

一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代表会议选为出席党的莫斯科省代表会议的代表。

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罗斯塔社记者谈党内状况问题的争论。

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一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做关于提交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党前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

一月十五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问题的报告人。

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选入代表会议主席团。

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报告的结论。

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

弗·伊·列宁逝世（在哥尔克村）。

晚九时三十分

约·维·斯大林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前往哥尔克村。

一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修改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因弗伊列宁逝世而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劳动者书”的草稿。

约·维·斯大林电告布哈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弗·伊·列宁逝世，号召拥护列宁的巩固工农联盟的路线并更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

约·维·斯大林同俄共（布）中央委员把弗伊列宁的灵柩抬出哥尔克村寓所。

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二时四十五分

约·维·斯大林同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工人、各种组织的代表把弗·伊·列宁的灵柩从帕维列茨车站抬至工会大厦。

晚六时十分

约·维·斯大林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弗·伊·列宁的灵旁守灵。

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建议保存关于弗·伊·列宁的一切资料并把这些资料送交俄共（布）中央弗·伊·列宁研究院的俄共（布）中央告各级党组织、机关、出版机关书，在“真理报”第二十号上发表。

一月二十六日晚八时二十四分

至八时四十分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上发表“悼列宁”的演说，并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做遵守和执行列宁遗训的宣誓。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

约·维·斯大林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弗·伊·列宁的灵旁守灵。

上午八时三十分

约·维·斯大林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站在弗伊列宁灵旁。

上午九时

约·维·斯大林和工人代表把弗·伊·列宁的灵柩抬出工会大厦。

下午四时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等人在红场的追悼大会结束后把弗·伊·列宁的灵柩从台座上抬入陵墓中。

一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克里姆林军校学员为纪念弗·伊·列宁逝世而举行的晚会上发表演说。

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

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一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委员。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第十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二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就红军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发言。

三月五日和十二日

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指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永久纪念弗·伊·列宁委员会举行有国内卓越的科学家参加的关于保存弗·伊·列宁遗体问题的会议。

三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列宁主义课堂讨论计划”。“列宁主义课堂讨论计划”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红色青年”杂志第一期上。

三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国内贸易和消费合作社的报告发言。

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四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就关于国内贸易和消费合作社的报告发言。

四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就米·伊·加里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发言。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召开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在“真理报”第七十六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说。

四月初

约·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

四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同其他老巴库工作人员电贺巴库共产党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

五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电告波罗的海舰队革命军事委员会，因为准备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不能应邀参加舰队的纪念日。该电报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红色波罗的海舰队报”第一〇六号上。

五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次代表会议选为党的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出席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被南高加索共产党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为出席俄（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弗·伊·列宁逝世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五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红场检阅庆祝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少年先锋队的队伍。

约·维·斯大林把“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送给谢·米·基洛夫，书上的题词是：“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作者约·斯大林。”

五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五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的结论。

五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五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六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六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其他委员会署的祝

贺巴库工人在苏拉汉内发现新石油喷泉的贺电在“巴库工人报”第一二五号上发表。

六月十二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中央全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

六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上做“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

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六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六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为代表大会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纲领委员会的委员。

六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批准为波兰委员会主席。

六月二十七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女工和农妇工作委员会委员。

六月

约·维·斯大林和“工人通讯员”杂志工作人员关于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任务的谈话在该杂志第六期上发表。

一九二四年（7—12月）

七月一日至三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波兰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七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波兰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关于波兰共产党”的演说。

七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其他委员签署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七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七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杰米杨·别德内依。

七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关于抗旱和防止旱灾后果的措施的告各级党组织书在“真理报”第一六七号上发表。

七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组织局委员会关于红军工作的报告发言。

七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致曼努伊里斯基的信中表示他对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欧和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关于东方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看法。

七月

约·维·斯大林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波兰共产党各级组织书”的草稿。

八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文。

八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组织局少先队运动委员会的报告发言。

八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发言。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九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论国际形势”一文。这篇文章在九月二十日“真理报”第二一四号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

十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青年建设者”杂志的青年通讯员谈话。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的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上发表“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的演说。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的演说。

十一月七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接见“狄纳莫”工厂工人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邀请他出席该厂全体人员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狄纳莫”工厂全体人员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周年和举行弗·伊·列宁一九二一年访问“狄纳莫”工厂纪念碑揭幕典礼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约·维·斯大林在“狄纳莫”工厂的留言簿上题词。

十一月十五日

为祝贺骑兵第一集团军建军五周年，约·维·斯大林向该集团军致贺电。

十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写信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揭露反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农民报”创刊一周年的贺电在“农民报”第五十一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十一月二十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约·维·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弗·伊·列宁研究院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

十二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发言。

十二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

十二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认真实现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内贸易问题的决议的通知信。

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635×927公厘1/16・印張23$\frac{3}{4}$・插頁6・字數261,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6,500　定價(5)3.20元
統一書號 1001・311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四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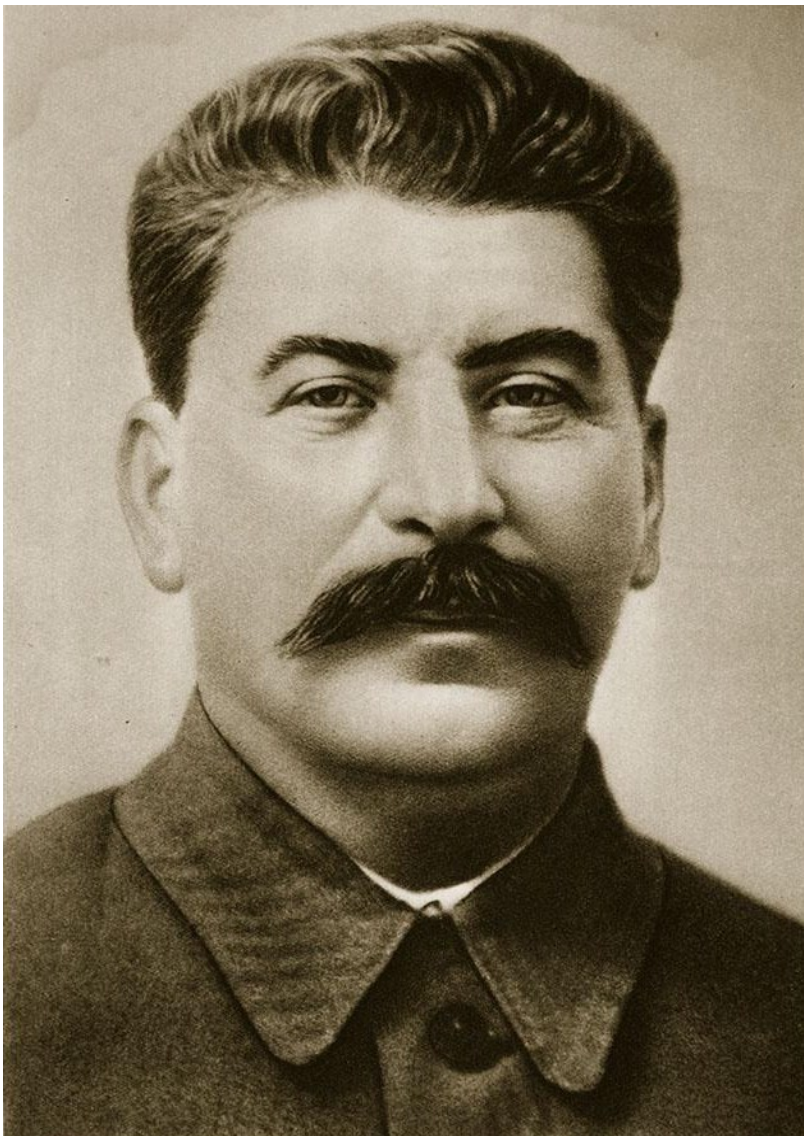
1925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五八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 ……）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1〕、〔2〕、〔3〕……）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1〕、〔2〕、〔3〕……），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目　录

第七卷说明 …… 1

一九二五年
（上）

女工和农妇们，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3
致教师代表大会 …… 4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 …… 5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6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9
致“工人报” …… 12
给德—奥夫同志的信 …… 13
关于“得莫夫卡事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 15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 19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 25
给麦—尔特同志的信 …… 30
庆祝国际妇女节 …… 34
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36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 37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41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 48
关于农村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
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 53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信）…… 58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 62
一 国际形势 …… 62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69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 72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 74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 83
六 关于金属工业 …… 88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 92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 93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 99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 …… 104
问题和答复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107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庆祝本科和专科第二届毕业典礼）…… 145
再论民族问题
（关于谢米奇的文章）…… 148

（下）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
（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156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 160
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162
论共青团的任务
（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166
在米·瓦·伏龙芝葬礼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172
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 …… 173
给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 17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178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十八日）…… 178
一　国际形势 …… 178
一、资本主义的稳定 …… 180
二、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 184
三、战胜国和战败国 …… 185
四、战胜国间的矛盾 …… 189
五、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 191
六、苏联的外部状况 …… 196
七、党的任务 …… 200
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 …… 202

一、整个国民经济 …… 202
二、工业和农业 …… 214
三、商业问题 …… 216
四、各个阶级，它们的积极性和相互关系 …… 218
五、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口号 …… 220
六、农民问题上的两种危险和两种倾向 …… 227
七、党的任务 …… 230
三 党 …… 233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十二月二十三日）…… 241
一 索柯里尼柯夫和我国道威斯化 …… 241
二 加米涅夫和我们对农民的让步 …… 243
三 谁的失算？…… 246
四 索柯里尼柯夫是怎样保护贫农的 …… 247
五 思想斗争还是诬蔑？…… 248
六 关于新经济政策 …… 249
七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 250
八 季诺维也夫和农民 …… 255
九 意见分歧的历史 …… 261
十 反对派的政纲 …… 266
十一 他们的“爱和平” …… 267
十二 党一定能达到统一 …… 269

注释 …… 271
年表（一九二五年）…… 281
插图（新增）
一 苏联大学生学习生活剪影 …… 61
二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 144
三 斯大林观看新款轿车 …… 176
四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 240

第 七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二五年的著作。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苏维埃国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下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性质和前途问题，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问题已成为党所面临的实践问题。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约·维·斯大林全面地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为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制定的总路线，并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资本主义复辟派分子的投降路线。

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关于农村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论共青团的任务”、“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等著作中，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中以及其他著作中，阐明了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教育和吸引劳动群众和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问题。

编入第七卷的还有论述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外国共产党的情况和任务的论文和演说：“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以及“给麦—尔特同志的信”。

第一次发表的有：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

上的演说、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给“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委员们的信、给德—奥夫同志的信、给麦—尔特同志的信以及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一九二五年

女工和农妇们，
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一年前，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们的列宁，在和我们永别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遗训，指出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最后胜利所应遵循的道路。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实现伊里奇的这些遗训！你们要用这些遗训的精神去教育你们的孩子！

列宁同志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巩固这个联盟！

列宁同志教导劳动人民要支持工人阶级去反对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记住这个遗训，你们要支持正在建设新生活的工人阶级的政权！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要高举起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共产党的旗帜。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它是你们的党！

值此伊里奇逝世一周年纪念之际，党号召：要为女工和农妇们，为正在和党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女◇3◇[①]工和农妇们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约·斯大林

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
“女工”杂志第一期◇4◇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致 教 师 代 表 大 会〔1〕

人民教师的队伍是我国正在按社会主义原则建设新生活的劳动大军中的一个最必需的部分。

只有千百万劳动农民群众紧随着工人阶级前进，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是一条胜利的道路。

乡村教师应当知道，没有这样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这样的专政，我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要成为一个连接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环节，——这就是乡村教师的主要任务，如果他们真正愿意为本国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自由独立的事业服务的话。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教师报”第二号◇5◇

论“红色青年”杂志〔2〕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和编辑部委员们谈话，在谈到杂志的任务时，他说：

杂志应当把吸引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大学生参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只有杂志在实际上成为真正苏维埃大学生的杂志时，才能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教育人民委员部各个机关以及其他机关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大学生对这些缺点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们应当经常地揭露、批评这些缺点，指出这些缺点，使我们能够依靠共同的力量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因此，必须广泛地吸引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大学生中的优秀人物来为杂志写稿。大学生应当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杂志，这个杂志能够帮助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进步。

在谈到杂志的某些栏的任务时，斯大林同志指出：

杂志的政治栏只须阐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的基本问题。这里不必重复别种杂志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联盟内的每一种刊物在整个工作中都应当有它的一定地位。“大学生生活”、“文学”、“科学和技术”等栏必须大大扩充。这些栏正是大学生能够积极投稿和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高等学校的改革”栏内的一些问题，除了吸收教员和教授以外，还要吸收大学生来研究。◇6◇

只有实现“接近大学生”这个口号，杂志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才能真正成为苏维埃大学生自己的刊物。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
“红色青年”杂志第一期
（总第五期）◇7◇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3〕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委托，就有关争论的一些问题以及和争论有关的各项决议做一些必要的传达。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情况下来讨论他的言论问题，因为今天接到通知，说他因病不能出席全会。

同志们，你们知道，争论是由托洛茨基的言论，由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引起的。

挑起争论的是托洛茨基。党是被迫进行争论的。

党对托洛茨基的言论提出了两点主要的责备。第一点是责备托洛茨基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第二点是责备托洛茨基企图彻底更换党的领导。

对于党的这两点责备，托洛茨基丝毫没有替自己辩护。

他为什么丝毫不替自己辩护，——这很难说。通常的解释是：他生病了，不可能说些什么来替◇8◇自己辩护。这当然不是党的过错。既然托洛茨基每次向党攻击以后都开始发高烧，这就不是党的过错了。

现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收到托洛茨基的声明（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的声明），其中写道，他所以不发言和丝毫不替自己辩护，是因为不愿意使论战激烈起来，不愿意使问题尖锐化。当然，相信或不相信这个解释的确凿性都可以。我个人是不相信的。第一、托洛茨基是不是早就了解到他的反党言论会使关系尖锐化呢？托洛茨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了解这个真理的？要知道托洛茨基并不是第一次反对党，也不是第一次对他自己的言论引起关系尖锐化这一点感到惊奇或表示遗憾。

第二、如果他真正关心党内的关系，不愿意使关系恶化，那末他为什么发表“十月革命的教训”来反对党的领导核心，蓄意使关系恶化和尖锐化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个解释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

现在简单地谈一谈托洛茨基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这篇声明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并且已经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声明，首先必须指出和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他说他愿意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任何职务，愿意接受对他今后的言论的任何监督，而且他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尽速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是绝对必要的。

这一切当然必须予以注意。

至于谈到问题的实质，应当指出下面两点：关于“不断革命”和关于更换党的领导。托洛茨基说，他在十月革命后因为个别原因而又一般地引用了“不断革命”的公式，这只是和党史委员会有关，这◇9◇只是追忆过去，而不是用来说明当前的政治任务。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我认为，既不能把托洛茨基的这篇声明称做解释，也不能把这篇声明称做辩护。这里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影子也没有。这是回避问题。说“不断革命”论是一种和党史委员会有关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了解这一点呢？党史委员会不但是党内文件的储藏所，而且是党内文件的解释者。那里有些文件在一定的时期是有用的，但是后来失去了效用。那里也有些文件无论过去或现在对党都有指导意义。那里还有些文件具有非常坏的性质，起非常坏的作用，党对这些文件是不能容忍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列入哪一类文件呢？列入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呢？托洛茨基在声明中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逃避问题。他对问题避而不谈。因此对他修正列宁主义这一点的责备仍然有效。

其次，托洛茨基说，他从来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更没有在国家面前提出过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的问

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任何建议。这种说法不对。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说过什么呢？他说过干部不中用，必须彻底更换党的领导。他现在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中说些什么呢？他说党的基本核心不中用，必须更换。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教训”的结论。出版“十月革命的教训”就是为了论证这个结论。“十月革命的教训”的目的就在这里。因此对他企图彻底更换党的领导这一点的责备仍然有效。

所以，托洛茨基的整篇声明不是真意的解释，而是外交辞令的汇集，是已经被党解决了的旧争论◇10◇的死灰复燃。

党要求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是这样的文件。

托洛茨基显然不了解，而且我怀疑他是否有朝一日会了解，党对自己过去的或现在的首领要求的并不是使用外交辞令，而是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托洛茨基似乎缺乏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他不了解党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已经加强了，党已经感到自己是主人，党要求我们在环境需要的时候能向它低头。托洛茨基不了解这一点。

我们的各级组织对托洛茨基的言论有什么反应呢？你们知道，各地方组织对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都发表在“真理报”上。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类。一类决议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一类决议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的职务，并且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第三类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乌拉尔、乌克兰等地的同志今天送交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决议草案也包括在内）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有条件地把他留在政治局内。

这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问题的主要的三类决议。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在这些决议中进行选择。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传达的有关争论的一些问题。

载于约·斯大林“论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11◇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我现在发言是要尽量支持伏龙芝同志的提议。我想我们在这里必须决定三件事情。

第一、必须采纳伏龙芝同志关于增拨五百万卢布，共拨款四亿五百万卢布的提议。

第二、必须通过关于批准伏龙芝同志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第三、必须责成党在人力方面尽量支援新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应当说，近来由于我们经济机关的要求增多了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要求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在军队问题上就产生了一种取消主义的情绪。我们有些同志说，应当逐渐取消军队，把军队变成民警。这里指的不是民军制，而是和平的军队，这里指的是把军队变成不能随时对付军事纠纷的普通的民警。

我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要坚决消除这种取消主义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近来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向我们预示新的纠纷即将发生的一些新的前提正日益成熟，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对付这些纠纷。武装干涉问题现在又成了现实◇12◇问题。

有哪些事实呢？

第一、在东方，殖民地运动和一般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中国、埃及、苏丹都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基地。那里的殖民地运动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列强的统治阶层反对我们，反对苏维埃，因为他们知道，落在东方这块肥沃土壤上的种子正在生长并且就要发芽。它们一定会发芽。

第二个事实是：在北非，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地区，正在酝酿纠纷。由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者正在重新部署力量，正在重新准备新的军事纠纷。西班牙在摩洛哥遭到了失败〔4〕；法国正在把手伸到摩洛哥去，而英国一定不会容忍法国在摩洛哥增强力量；意大利企图利用新的情况把手伸到突尼斯去，但是其他国家一定不会允许它这样做；英国和法国正在互相追逐，双方都竭力设法保证自己在巴尔干，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成立的那些国家里的势力，——这一切都使人回忆起我们所熟悉的上次大战过程中的一些事实，使人回忆起上次大战爆发前的一些事实。阿尔巴尼亚政变〔5〕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列强为了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确立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都说明：由于在远东已经开始引起纠纷，由于北非的局势将有新的发展，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这一切都是新战争的前提。而新战争是不能不波及我国的。

第三个事实是：英国工人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实。英国是欧洲的领导◇13◇国家。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工党已经开始分裂，英国工党内部已经发生裂痕，这一裂痕正日益扩大，——这一切都说明那里有一种革命的东西、新的东西正在成长。这就使英国的统治阶层担心。这就不能不促使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因为英国的运动是在和俄国友好的旗帜下活跃起来的。

第四个事实是：由于存在着上面所说的那些前提，由于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而是几年以后），由于战争不能不使东方和西方的内部革命危机尖锐化，准备对付一切的问题就不能不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认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力量正在壮大并且还会继续壮大，这种力量能够在某些地方推翻资产阶级。事实就是这样。但是要保持住这种力量是很困难的。例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边陲国家的例子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

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地反对谁。这样说是不对的。如果谁在言谈之间流露出这种口气，那是不对的。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有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要准备对付一切，要准备好自己的军队，要供给军队鞋子和衣服，要训练军队、改进技术装备，要改进化学部队和空军，要把我们红军的水平普遍提到应有的高度。这就是国际◇14◇形势要求我们做的事。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满足军事部门的要求。

第一次刊印◇15◇

致“工 人 报”〔6〕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

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这是伊里奇的重要遗训之一。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工人报”第十七号◇16◇

给德—奥夫同志的信

德—奥夫同志！

回信迟了，因为挤不出时间，不能及时答复。

（一）我想你没有很好地读那篇文章〔7〕，否则你一定会在那里找到从伊里奇的文章中引来的那段说明“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话。

（二）如果你聚精会神地读一读那篇文章，那你想必会了解，那里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如果确信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的公开同情之下，在没有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末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最普通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末伊里奇的下面这个论点便是不对的：我们一定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我◇17◇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见“论合作制〔8〕）。

（三）大概你没有注意到所发表的文章是“序言”的一部分。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我想你就会懂得必须把整篇“序言”拿来看的道理。

（四）我们政治实践中最危险的就是：企图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被动的东西，以为它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胜利了的无产

者的援助时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国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五年到十年内西方还没有爆发革命，假定我们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内仍然作为一个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①]，那末你是否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五年到十年内只去干些捣水勾当，而不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可能胜利的理论的全部危险性。

这是不是说，这个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见我的“序言”），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就随时有受军事干涉的危险。但是人人都会看到，这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且这个胜利也就是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前提，——这一点是未必有理由怀疑的。

我看到某些同志还没有抛弃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发◇18◇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根基的。

（五）我建议你再读读“逆流”文集〔9〕中伊里奇的几篇文章，读读他的“无产阶级革命”〔10〕和“幼稚病”〔11〕这两本书，以及他的“论合作制”这篇文章。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19◇

————————————

① 我做这第二个假定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力量正日益壮大并且还会继续壮大，同时来自西方同志的援助也正日益增多并且还会继续增多。——著者注

关于“得莫夫卡事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
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12〕）

首先来谈一谈关于索斯诺夫斯基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中心问题。人们责备他，说他似乎在刊物上断言全部苏维埃机关甚至制度都已经腐朽。我没有看到过这种断言，而且谁也没有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这一点。如果他在什么地方说过苏维埃制度已经腐朽，那他就是反革命分子。

他的书就在这里。书中写道：“我对乌克兰农村知道得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不来判断得莫夫卡对整个乌克兰农村具有怎样的典型性。让那些更熟悉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去判断这一点吧。但是我敢断言，得莫夫卡事件决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从地方报刊上，从我同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同农民的会晤中，以及偶然看到的一些文件中，都觉察到‘得莫夫卡事件’的因素在其他村庄中也存在。”

这话说得很温和，这里根本没有讲到苏维埃制度或全部苏维埃机关在腐化。因此，委员会或个别同志对索斯诺夫斯基提出的责备是不正确的。不管这种责备是省委员会还是专区委员会提出的，是◇20◇委员会还是个别人提出的，都毫无根据，都没有文件来证明。

相反地，我倒想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在这里的功劳。关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谈到。“真理报”的功劳，索斯诺夫斯基的功劳，杰米杨·别德内依的功劳，就在于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把实际生活中的片断抽出来给全国看。这个功劳一定要指出来。应该谈到这一点，而不应该说他们过火了。

有人说索斯诺夫斯基过火了。可是在普遍倾向于官僚作风，而脓

疮还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并且损害着全部工作的情况下，过火是应该的，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别的。当然，这要使某些人受到委屈，但是对事情有利。如果不使个别人受到某种委屈，事情倒搞不好了。

我认为这里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农村通讯员被害，甚至也不是我们这里发生了得莫夫卡事件，——这一切都很不好，但是事情的根源并不在这里。事情的根源在于：在村、乡、区、专区的某些地方，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只是面向莫斯科，而不愿意转向农民，他们不了解仅仅和莫斯科搞好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和农民搞好关系。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许多工作人员说在我们首都时兴发表关于农村的新言论，说这是对外耍外交手腕，说我们似乎并没有强烈而不可动摇的愿望要改进我们的农村政策。我认为这就是最危险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不愿意相信我们已经认真着手教导我们的工作人员用新的态度对待农村，对待农民，如果他们觉察不到这一点，不愿意相信这件事，那末这就是最严重的危险。消除地方工作人员的这种◇21◇情绪，急剧地把路线转向另一方面，使人们把我们对农村的政策看成一种重大的、绝对必需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三个同盟者：不急于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行动得很慢的殖民地以及农民。关于第四个同盟者，即关于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纷争，我现在不谈。很难说什么时候会爆发国际革命，但是它一旦爆发，就会成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也很难说什么时候殖民地会行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非常困难的问题，决不能下断语。至于农民，我们现在和他们一起工作着，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同盟者，并且是一个能够立刻给我们直接援助，能够提供军队、粮食等等的同盟者。我们和这个同盟者，就是说和农民一起工作着，我们和他们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不管好坏怎样，我们总是在建设着，因此正是在现在，特别是在

现在，我们应当善于重视这个同盟者。

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把农民问题提到我们工作的首要地位。

必须指出，目前我们的政治方针是新的方针，这个方针确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待农村的新的政治路线。有些同志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去了解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进行任何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既然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东西，而陶醉于所谓本位主义的思想，认为必须把“商品的外表”给莫斯科看，认为他们那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认为必须把脓疮掩盖起来，似乎用不着批评，因为批评会损害地方当局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威信，——既然存在着这类言论，我认为这就是产生最严重的危险的根源。必须消除这种现象，必须对◇22◇这些同志说，不要怕把生活中的片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管它们是何等令人不快。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有所转变，使他们不单是面向莫斯科，而且还学会面向他们所服务的农民，使他们不去掩盖脓疮，而相反地来帮助我们揭露我们的错误，纠正这些错误，并且按照目前党所拟定的路线进行工作。

二者必居其一（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一点）：或者是我们同非党农民一起，同我们苏维埃和党的地方工作人员一起进行自我批评，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至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新的唐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13〕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14〕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末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里应当谈的不是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陷的个别作家的缺点和他们的过激行为，而是他们的功劳。

这里我应当谈一谈关于我们的作家、我们的通讯员的问题。我认

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在改进我们的农村建设工作、揭露我们的缺点以整顿和改进苏维埃工作方面，能够成为一根主要杠杆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一点也许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了解到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要从这一端来开始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些人大多是富有感受力的，他们心里燃烧着真理的火花，愿意不顾一切地揭◇23◇露和纠正我们的缺点，这些人是不怕枪弹的。我认为正是这些人应该成为揭露我们的缺点和改进我们党和苏维埃的地方建设工作方面的一根主要的杠杆。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同志的呼声，而不应该指责我们的报刊工作者。通过他们，通过这个直接反映我们建设工作中的缺点的晴雨表，我们就能揭露和纠正许多缺点。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我认为它通过的决议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可能有些地方应该修改或重新修订。

在报刊上报道得莫夫卡事件时，应当使我们的同志了解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问题不在于农村通讯员被害，更不在于不使专区委员会书记或省委书记受到委屈，而在于把改进我们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纳入轨道。这是基本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

载于约·斯大林的“农民问题”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24◇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
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5〕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想简单地谈一谈现在党对农民的政策的基础。目前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许多人甚至津津有味地说，新的时代——农民的时代到来了。另一些人把“面向农村”的口号了解为应该背向城市。还有一些人甚至谈到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这当然是胡说。这一切当然都是极端的看法。但是撇开这些看法，剩下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目前，正是现在，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

这有两个原因。我说的是基本原因。

农民问题目前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个原因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同盟者中间，在无产阶级现有的一切基本同盟者（在我看来，这样的同盟者有四个）中间，农民是**立刻**可以给我们革命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这里指的正是现在的、目前的直接援助。其余一切同盟者虽然都有远大的未◇25◇来，虽然都是我国革命的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是很遗憾，他们现在还不能给我们的政权，给我们的国家直接的援助。

这是些什么同盟者呢？

第一个同盟者，即我们的基本同盟者，是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即西方的无产阶级，是一支极巨大的力量，是我国革命和我们政权的最可靠和最重要的同盟者。但是很遗憾，目前的情况，当前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运动的状况是这样的：西方无

产阶级现在还不能给我们直接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援助。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他们间接的道义上的援助，这种援助很重要，甚至无法说明它的价值，它是难以估价的。但是，这终究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那种直接的援助。

第二个同盟者是殖民地，是受比较发达的国家压迫的那些不大发达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同志们，这是我国革命的一支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是，他们行动得太慢了。他们是来直接援助我们的，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很快就来。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立刻给我们直接援助。

我们有第三个同盟者，一个不可捉摸的无形的然而极其重要的同盟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形的，但是对我们政权和我国革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援助。同志们，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主要联盟在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大战中不互相进行殊死的斗争，如果它们不互相扼住咽喉，如果它们不是自顾不暇，没有工夫来反对苏维埃◇26◇政权，苏维埃政权当时就未必站得住脚。重复一遍，我们敌人之间的斗争、冲突和战争是我们极大的同盟者。现在这个同盟者的情况怎样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世界资本在战后经受了几次危机以后，已经逐渐恢复元气。这一点是应当承认的。主要的战胜国——英国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力量，在物质上不仅能在本国相当不错地安排资本，而且还能输血给法国、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方面。这方面的情况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暂时不像战争刚一结束时那样快地发展。这对资本家有利，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另一方面，即相反的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在资本暂时能造成全面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相互关系另一端的矛盾，剥削的先进国家同被剥削的落后国家即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和日益加深，从新的“意外的”一端造成破坏资本“工作”的威胁。埃及和苏丹发生了危机，——

这你们大概已经在报上看到了。其次，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焦点，这些焦点会使目前的“同盟者”发生争吵，会破坏资本的威力。在北非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焦点，在那里西班牙将失掉摩洛哥，法国的手正向那里伸去，但是法国不可能把它拿到手，因为英国不会允许法国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些事实在许多方面都和战前时期相似，它们不能不威胁国际资本的“建设工作”。

这就是矛盾发展总平衡表上的正数和负数。因为在这方面资本的正数暂时还大于负数，在最近期间还不能盼望资本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很明显，我们第三个同盟者的情况还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27◇

剩下的第四个同盟者就是农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建设着新生活，好也罢，坏也罢，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你们都知道，这个同盟者不十分坚强，农民这个同盟者不像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那样可靠。但是，他们毕竟是同盟者，而且在现有的一切同盟者中间，他们是一直给我们直接援助并且立刻可以给我们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因而他们也换得我们的援助。

正因为如此，农民问题在目前，即在革命危机和其他一切危机的发展进程有些缓慢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个原因。

目前我们把农民问题放在我们政策的首要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社会主义基础和我们政权基础的我国工业，要依靠国内市场即农民市场。到我国工业十分发达的时候，到我们能应付国内市场的时候，到争取国外市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情形将会怎样，这我不知道。可是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摆在我们面前，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我们将来未必能指望从比我们更有经验的资本家手中夺取西方的国外市场。但是谈到东方市场，由于我们和东方的关系不能算坏，而且这

种关系还会改善，在这方面我们将具备最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在我们同资本家竞争时，纺织品、国防用品、机器等等将成为我们供给东方的主要产品。但是，这是谈到我国工业的未来。至于现在，那我们甚至还没有能满足我国农民市场的三分之一，因此现在，在目前，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市场问题，而首先◇28◇是农民市场问题。正因为目前农民市场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基地，所以我们作为当权者，作为无产阶级，所关心的是竭力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调整列宁说过的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调整的那种结合。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应当在目前把农民问题提到首位，应当特别注意和特别关心农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政策的前提就是这样。

同志们，糟糕的是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性。

常常有人说，在莫斯科，我们的领袖们时兴谈论农民问题；这大概不是认真的谈论，这是外交手腕。莫斯科是需要对外说这些话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执行旧政策。有些人这样说。另一些人说：关于农民的谈论只是闲谈罢了；如果莫斯科人不坐在办公室里，到地方上来走走，他们就会看到农民是个什么样子和税款是怎样征收的。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听到。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我们当前一切危险中最严重的危险。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了解农民问题的全部严重性，那他们就会真正动手吸引农民参加我们的建设工作，动手改善农民经济和巩固结合；或者是同志们不了解这一点，那结果就会是苏维埃政权垮台。◇29◇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谁。不是的，同志们，吓唬人没有必

要也没有意义。问题太严重了，必须像认真办事的人那样来对待这个问题。

有些同志来到莫斯科以后常常竭力拿“商品的外表”给人看，说在他们的农村中一切都很顺利。这样官僚主义地谈顺利有时简直令人作呕。其实很明显，没有而且也不会有顺利。显然，缺点是有的，但是不要害怕批评，应当揭露这些缺点，然后加以消除。要知道，现在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我们全党让非党的农民和工人来批评我们；或者是他们用暴动的方式来批评我们。格鲁吉亚暴动是批评。唐波夫暴动也是批评。喀琅施塔得暴动为什么不是批评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官僚主义地谈顺利，处理问题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害怕批评并且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要知道，他们亲身体验着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来批评我们；或者是我们不这样做，让不满情绪逐渐积累逐渐增长起来，到那时批评就会采取暴动的形式。

现在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目前情况的这一特点。

这个问题即农民问题是不是和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和你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呢？无疑是有的。

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结合。现在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用伊里奇的话来说，就是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实行结合，能不能◇30◇实现这个任务呢？不，不能。不粉碎这种不相信工农联盟的理论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能不能实行结合、建立工农联盟呢？不，不能。结论很清楚：谁要在新经济政策中取得胜利，谁就必须埋葬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思想流派。

伊里奇在十月革命前常常说，在所有的思想敌人中，孟什维克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竭力设法使人不相信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

因此，——他说，——不粉碎孟什维主义，就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我认为当时的即十月革命时期的孟什维主义和目前的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我认为在目前，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现今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的所有思想流派中，托洛茨基主义要算是最危险的思想流派了，因为它竭力设法使人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因此，不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取得胜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党对农民的政策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十四号◇31◇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海尔佐克）：你是否认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必然促使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答（斯大林）：如果讲的是期限而不是趋向，那末要极其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用不着证明，不论从国际条件或从国内条件来看，目前的局势和一九二三年的局势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可是，这并不是说，在最近时期内局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有利于革命的急剧转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就是这种设想很可能成为事实的保证。

第二个问题：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准备时期来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列宁曾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过这个要求，他认为这是夺取政权前极重要的任务）？

答：既然讲的是经济状况，那我只能根据我所掌握的一般材料来估计问题。我认为道威斯计划〔16〕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它已经使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美国资本的投入德国工业，通货的稳定，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改善（以上三点决不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好转），以及工人阶级物质◇32◇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国资产阶级的阵地得到一定的巩固。这可以说是道威斯计划的“好的”一面。

但是道威斯计划还有“坏的”一面，这一面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破坏这个计划的“好的”效果。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使德国无产阶级受到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双重压榨。

德国工业的扩大和它的国外市场范围的缩小之间的矛盾，协约国的过分要求和德国国民经济满足这些要求的最大可能之间的不相适应，——这一切必然使无产阶级、小农、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恶化，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革命爆发，促使无产阶级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但是，不能把这种情况看成德国革命的唯一有利条件。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党，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可以认为对革命最有利的形势是下面这种形势：一方面德国内部发生危机和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地增长，另一方面在德国外敌的阵营中发生严重的纠纷。

我认为，一九二三年的革命时期因为不具备上述形势的第二方面，所以情况极其不利。◇33◇

第三个问题：你说德国共产党必须使大多数工人跟自己走。至今大家还很少注意这个目标。在你看来，怎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成为这种力量不断增长的强有力的党呢？

答：有些同志认为巩固党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驱逐出党。这当然是不对的。只有在为工人阶级的具体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进程中，才能揭穿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地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不应当依靠世界性的大问题[①]，

——————————————

① 原译文为“依靠行星问题”，此处按《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改译。——本书制作者注

而应当依靠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时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保险问题、税收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生活费用高昂问题等等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应该起极重大的作用。每天都要在这些问题上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任务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把日常的实际问题和关于德国的国内外状况的一些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不从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来阐明这一切日常工作，那就不能完全实现这个任务。

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只有经验丰富和理论修养很高的干部所领导的党才有可能，因为这些干部的经验足以使他们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失算来加强自己的党，同时他们的理论修养足以使他们不致因个别胜利而看不见革命的发展前途。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问题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34◇根本问题之一。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

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35◇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36◇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

第四个问题：你说，除了道威斯计划的坏的一面以外，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的被彻底揭露，是它不是工人阶级中比较重要的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远的路程。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党目前的工作方法上有缺点和弱点。怎样才能消除这些缺点和弱点呢？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党——不但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获得了将近两百万张选票，你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估计？

答：这里问题不在于德国共产党工作上有缺点。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美国的借款，美国资本的输入加上通货的稳定使得状况有些好转，因而就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和德国状况有关的国内外矛盾似乎有可能根本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借着这种错觉，像骑在白马上那样进入了现今的德国国会。现在维尔斯正炫耀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但是，他大概不了解他占有了别人的胜利。胜利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摩根集团。维尔斯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摩根的一个代理人。

载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真理报”第二十七号◇37◇

给麦—尔特同志的信

敬爱的麦—尔特同志！

你二月二十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请接受我的问候。现在就来谈本题。

（一）你（而且不仅是你）过分夸大了和海尔佐克谈话这件事[①]。我所以不能并且不想把他赶走，不仅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因为他是拿着盖什凯同志的信来见我的，盖什凯同志在信中恳求我和海尔佐克谈一次话。我现在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你。德文原信我已经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了。我在盖什凯同志的书面请求下同海尔佐克谈了一次话，仅仅根据这件事就得出结论说，俄共（布）中央正在改变或者打算改变对布兰德勒的态度，这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如果俄共（布）中央知道你或者德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怀疑俄共（布）中央同情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17〕，怀疑俄共（布）中央从左派转向右派，那它是会捧腹大笑的。

（二）你说德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属于旧◇38◇式领导者的类型，他们已经过时了，已经被新型的领导者排挤到后面去了。在我们俄国，许多旧的文学界领导者和旧“领袖”也逐渐衰亡了。这种衰亡过程在革命危机时期加剧起来，在积聚力量时期则减缓下去，但它是始终存在的。卢那察尔斯基之流、坡克罗夫斯基之流、罗日柯夫之流、哥里登伯尔格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和克拉辛之流等等，——这就是我首先记起的过去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后来都退到次要地位了。

————————————

① 见本卷第三十二页至第三十七页[指旧版页次，下同]。——编者注

这是富有生命力和日益发展的党的领导干部更新的必要过程。顺便谈一下，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盖麦之流同上面这些同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盖麦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还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而上述俄国同志却没有这种货色。可见，这种差别不是有利于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而是不利于他们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盖麦之流排挤出去，把他们逐出舞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德国共产党在成长，在前进，在壮大。至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明显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些成就，你在信中写得完全正确。如果现在有人认为俄共（布）中央有人打算扭转德国共产党发展的车轮，那就未免把俄共（布）中央想得太坏了。麦—尔特同志，请你慎重些……

（三）你讲到德国共产党的路线。毫无疑问，德国共产党的路线——我指的是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俄共（布）和德共之间才有你在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密切友好的（而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掩饰德共或者俄共（布）的政治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断定说，德共中央或者俄共（布）中央没有个别的错误呢？能不能断定说，批评德◇39◇共中央的**部分**活动（没有充分利用巴尔马特事件〔18〕，普鲁士国会共产党党团在选举国会议长问题上的人所共如的投票，同道威斯计划有关的税收问题等等）是和完全赞同德共中央的**总**路线相抵触的呢？显然不能。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见面时，闭眼不看自己党的个别错误，而热中于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无事”，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们的党将成什么了呢？我认为这样的党永远也不能成为革命党。这将是木乃伊，而不会是革命党。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则时刻准备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从来信看，你也是反对这样做的。这对德国共

产党会更好。

（四）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内不仅害怕党的领袖，而且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我认为德国同志违反了这个无须论证的真理。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布）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40◇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非常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同志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惩罚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惩罚，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驱逐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惩罚只能损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真地启发思想。俄共（布）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是在这个斗争中才日益壮大并且不断培养出真正的干部。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同样是一条通过矛盾，通过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布兰德勒思想等等进行真正的、严肃的和长期的斗争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进行这种斗争，单靠惩罚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德共中央的党内政策应当灵活些。我相信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改正这方面的缺点。

（五）你对工会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德国工会的作用和俄国不同。在俄国，工会是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党的辅助机关。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不是这样。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且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绊脚石。如果问一问德国或者整个欧洲的广大群众，他们认为哪个组织对他们更亲近，是党还是工会，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工会比党对他们更亲近。欧洲的非党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们同资本家作斗争（工资、工作日、保险等等）的主要堡垒，而把党看做某种辅助的和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东西。不论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这是◇41◇事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广大的工人群众把“极左派”从外面同现在的工会进行的直接斗争，看做同他们的主要堡垒进行斗争，这个堡垒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现在“共产党员”却要来破坏。不考虑到这个特点，就会断送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由此应当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在西方，不掌握住工会，就不能掌握住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

第二、不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不在工会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住工会。

正因为如此，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请别责骂我的坦白和直率。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42◇

庆 祝 国 际 妇 女 节

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劳动妇女，一切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站在解放运动大道的旁边。大家知道，在奴隶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伟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争取农奴解放的战士行列中有过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无怪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群众的一切解放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把千百万劳动妇女吸引到了自己的旗帜下面。

国际妇女节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不可战胜的标志和伟大的未来的先声。

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支后备力量。这支后备力量足足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妇女这支后备力量是拥护工人阶级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决定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败，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胜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共产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把妇女——女工和农妇——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对女工和农妇进行政治教育和把她们组织起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国际妇女节是把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种手段。◇43◇

但是，劳动妇女不只是一支后备力量。只要工人阶级的政策正确，她们还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一支真正军队。从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中训练出一支能够同无产阶级大军并肩作战的女工和农妇的军队，——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第二项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国际妇女节应当成为一种把女工和农妇从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作战军队的手段。

国际妇女节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真理报”第五十六号◇44◇

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会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孙中山逝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岁！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六十号◇45◇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在国际形势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许多现象中，应当指出下面的主要事实：

一、毫无疑问，资本已经爬出了战后危机的泥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货的稳定，世界贸易的增长和个别国家生产的扩大，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向欧洲和亚洲国家的输出和投入，——这一切都表明资本的“建设工作”的成就。大家知道，这个“工作”是在英美集团领导下进行的。应当认为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使德国所谓“道威斯化”，即由军事干涉的方法转为财政干涉的方法，转为在财政上奴役德国的方法。

二、同样毫无疑问，革命的高涨时期已经在欧洲的中心，即在德国结束了。在革命的高涨时期，运动势如奔腾的洪流，汹涌澎湃，四处泛滥，而党的口号却落后于运动；群众打破了法制的范围，冲击旧制度，自动创立了新法制，——这个时期在德国已经过去了。德国的工人运动已经由冲击时期进入了积蓄力量的时期，进入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情况不会没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情况，以便迅速地熟悉新的环境，并且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做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些就是对资产阶级有**积极**意义的事实，因为它们表明了目前资本的力量和成就。◇46◇

但是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对资本主义有**消极**意义的事实。

一、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加强的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多了，削弱和瓦解资本主义的力量增长了。英美之间由于石油，

由于加拿大，由于销售市场等等而引起的斗争；英美集团和日本之间由于东方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英法之间由于争夺欧洲的势力而引起的斗争；以及被奴役的德国和占统治地位的协约国之间的斗争，——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表明，资本的成就是不巩固的，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过程里隐藏着它内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

二、印度、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加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后方。既然帝国主义的“恢复健康”要求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扩大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无疑地在日益加强，那末很明显，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决不会稳固的。

三、争取欧洲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19〕的危机。英国工会展开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苏联工会对这个斗争的支持，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变成反对实行分裂工会路线的阿姆斯特丹的反革命上层（乌捷格斯特、查辛巴赫、茹奥等等）的斗争，——这一切事实表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而阿姆斯特丹的危机是什么呢？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不稳固，因为阿姆斯特丹工会的官僚是这个政权的一分子，是它的支柱。

四、苏联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资产阶级论客所说苏维埃没有能力管理工业的谰言已经遭到彻底的破产。毫无疑问，在武装干涉和封锁消除后的最近两年来，苏联的工业恢复了并且巩固了。毫◇47◇无疑问，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状况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大大地提高了。毫无疑问，这种状况的改善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认为，西方工人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了关于这个名叫苏维埃联盟的工人国家的苏维埃工人的**新生活**的传说，并且他们想查对一下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数十数百不同派别的工人从欧洲来到俄国，在各处进行考察，这一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西方工人对俄国的关心将逐月增长。毫无疑问，对俄国的这种访问活动将日益频繁。

只要他们深信俄国工业发展的每一步骤同时就是改善工人状况的步骤，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发生的那种使工人状况恶化的步骤，他们就会理解到，他们西方工人在自己家里建立工人国家的时候也已经到了。正因为如此，单是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对帝国主义来说就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了。正因为如此，只要苏维埃国家存在于世界上并且日益发展，帝国主义的任何成就都不会巩固。

这些就是对资产阶级有**消极**意义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表明了最近的将来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它可能得到的成就。

这两种对立的趋向，即消极的和积极的趋向的斗争，构成了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和内容。

在这个对立性的斗争中，所谓和平主义兴起了，并且在它还没有来得及繁荣，也没有使自己形成一个“纪元”、“时代”或者“时期”的时候就没落了。它既没有满足妥协分子的希望，也没有证实反革命分子的担心是有根据的。◇48◇

彭加勒、尤兹、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的“煊赫的”名字就在这个斗争中毁灭了。

这两种趋向中哪一种会占上风呢，是积极的趋向还是消极的趋向？毫无疑问，对资本主义有消极意义而对革命有利的趋向**将来**一定会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不能解决腐蚀它的那些矛盾，只能暂时缓和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以后又会暴露出来，并且以更大的破坏力发展起来。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目前**占上风的是对资本主义有积极意义的和有利的趋向。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就在于此。

结果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受到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破坏”的和因苏联的存在、发展和强大而“黯淡无光”的一种平静时期。

对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喘息时机**，意味着加紧输出资本，日益发财致富，加紧对殖民地压迫和剥削，加强对苏联的压力，把一切反革命力量纠集在英美资本的周围。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积蓄力量的时期已经

来到，意味着在掺杂“自由”制度的迫害制度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已经来到。

对殖民地来说，这意味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加强，意味着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斗争的加强。

对苏联来说，这意味着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49◇

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就是：

一、尽量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来瓦解和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

二、制定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近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来尽力支援这一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三、推进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同时要记住，这个事业是掌握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最可靠的手段。因为不掌握住工会，就不能掌握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而不在工会中工作，不在那里逐年逐月地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就不能掌握住工会。不这样，就休想争取无产阶级专政。

四、制定工人阶级接近那些受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器摧残和受全能的托拉斯的掠夺价格压榨的小农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同时要记住，争取小农的斗争是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前任务。

五、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阴谋，同时要记住，苏联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支柱，维护和加强苏联意味着加速工人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六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50◇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20〕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如果撇开某些细节和某些同志掺杂在问题中的个人成分不谈，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可以归结为以下九个问题：

（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是否有危机？

（二）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三）危机是什么性质的，即危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左面还是从右面？

（四）哪一种危险最严重，左的危险还是右的危险？

（五）为什么从右面来的危险是最现实的危险？

（六）怎样同右的危险作斗争，才能从斗争中达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和找到摆脱危机的真正出路？

（七）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最近任务是什么？

（八）关于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权利。◇51◇

（九）关于克雷比赫同志和关于分裂的危险。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是否有危机呢？是的，是有的。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他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意见分歧。什麦拉里同志更进了一步，他说，危机要比某些同志平常所想像的更加深刻。

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什麦拉里同志断定说，危机主要是由革命高涨时期过渡到平静时期所造成的那些困难引起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过渡时期要求新的方针，通常会在党内引起某种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样。

危机是什么性质的，危险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左面还是从右面？什麦拉里同志断定说，危险是从两方面来的，既从左面来，又从右面来。这也是正确的。有一种危险是过高估计部分要求而损害根本要求，过高估计国会活动和工会工作。这是从右面来的危险，因为它会使我们迁就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有一种危险是过低估计部分要求，过低估计国会活动、工会工作等等。这是从左面来的危险，因为它会使我们脱离群众，产生宗派主义。什麦拉里同志想在这两种对立倾向的斗争中采取中间立场，他这种愿望是完全合理的。糟糕的只是他没能保持住这种立场，而跟着右派走了。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最严重，左的危险还是右的危险？我认为什麦拉里同志没有弄清这个问题。他把批评主要对准左派，认为主要的危险是在这里。然而事实表明，主要的危险是从右面来的，而不是从左面来的。什麦拉里同志不了解这一点，他的第一个错误也就在这里。

为什么从右面来的危险在目前是最严重的危险呢？原因有三个。◇52◇

第一、从高涨时期到平静时期这一过渡本身，这一过渡的性质，就增加了从右面来的危险的可能性。如果说高涨时期产生了革命的幻想，使左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那末平静时期则恰恰相反，它会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使右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在一九二〇年，当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列宁写了一本论“‘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为什么当时列宁写的恰恰是这本小册子呢？因为当时左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我认为，如果列宁还活着，他现在一定会写一本论“右派老成病”的新的小册子，因为在现在这个平静时期，妥协的幻想一定会增长，右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

第二、正像什麦拉里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复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

的。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加深从右面来的危险。

第三、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是捷克人取得民族胜利的国家。捷克人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已经获得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目前生活得还不坏：没有失业现象，完全沉醉在民族国家的思想中。这一切不能不使捷克斯洛伐克各阶级滋长民族和平的幻想。不用说，这种情况也引起和加剧了从右面来的危险。应当在这里寻找右派和左派在民族路线方面发生分歧的原因，寻找斯洛伐克人和德意志人（被压迫民族）站在左翼而捷克人站在相反一翼的原因。什麦拉里同志谈到了这种划分的危险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注意到前面指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特点和捷克人的统治地位，那末这种划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53◇

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从右面来的危险或为特别严重的危险的基本原因就是这些。

应当怎样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右的危险作斗争呢？这个问题使我们接触到了意见分歧的本质。本来，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应当是最坚决最无情的。但是在捷克共产党员那里情况却相反。什麦拉里同志是否在同右面来的危险作斗争呢？是的，是在作斗争。但他是这样斗争的：他不去消灭右派，因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培植和支持了右派，保护右派免受左派的打击。同志们，这未免有点奇怪，但这是事实。什麦拉里同志的第二个和主要的错误就在这里。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事实是：克雷比赫同志写了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事实是：这个文件在党内是大家都知道的，并且是广泛流传的。必须把这个文件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必须当着工人的面从思想上打垮它的作者，使党能够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能够以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干部。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如果不是从右面来的危险，那末又是什么呢？什麦拉里同志在这种情况下

是怎样做的呢？他不是把克雷比赫同志的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在全党公布，而是掩饰问题，抹杀问题，把问题拿到党的舞台后面，在那里用解决普通“误会”的方式极端秘密地“解决了”它。这样做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克雷比赫同志是有利的，对党是不利的。结果不是同右派作斗争，而是维护右派。

二、大家知道，三个工会，即运输工会、木工工会和建筑工会的某些首领发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文件，要求工会不依赖党而完全独立。大家知道，这个文件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内部存在许多右派分◇54◇子的标志。必须在党的面前分析这个文件，并且告诉党要提防工会同它脱离的危险。什麦拉里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做的呢？他又掩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文件，就这样把文件藏了起来不让党员群众看见。既使右派安然无恙，又使“党的威信”得以保持。这就叫做同右派作斗争！

三、大家知道，在国会共产党党团中有右派分子。大家知道，这些分子常常摆脱党的领导，企图同党中央对立起来。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特别在现在，特别在目前平静的情况下是迫切需要的。什麦拉里同志是怎样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呢？他不是揭露共产党党团中的右派分子，而是袒护他们，用关于承认党的领导的橡皮性的决议挽救他们，这个决议是在党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是在进行了幕后的内部斗争以后通过的。结果又是对右派有利，对党不利。

四、最后，关于布勃尼克的问题。同志们，我应当说明，平静时期并不就是没有任何发动的时期。平静时期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是无产阶级军队准备进行革命的时期。但是，只有在发动的过程中才能训练无产阶级军队。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生活费用高涨的现象就是进行这种发动的有利条件之一。大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了时机，它在不久前以生活费用高昂为理由举行了许多次游行示威。大家知道，现在已被开除出党的右派共产党员布勃

尼克也利用了时机，他打击党的后方，企图破坏工人的发动。为了保护党的后方免受右派的打击，什麦拉里同志做了些什么呢？什麦拉里同志不但没有利用布勃尼克“事件”和当着党的面在这一问题上无情地揭露整个右派集团，反而把关于右派这一原则性的问题说成是布勃尼克个人的事情，虽然全世界都知道，布勃尼◇55◇克不是孤立的，不论在工会中，在国会的共产党党团中或者在报界都有他的拥护者。什麦拉里同志以微小的牺牲（开除布勃尼克）作代价把右派集团从毁灭中挽救了出来，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受到了损害。这就是什麦拉里同志所谓的同右派作斗争的策略！

什麦拉里同志把这个策略叫做“细致的”、“慎重的”策略。也许这个策略是真正细致的策略，但是它和布尔什维克同右派作不调和斗争的策略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什麦拉里同志忘记了俄国的一句俗话：“细的地方是容易断的”。他忘记了细致是不能保证不遭破产的。大家知道，情况也正是这样，因为这个对付右派的“细致的”策略在初次尝试中就遭到了失败和破产，当时在这个策略养育下的布勃尼克集团差点破坏了捷克无产阶级不久以前的发动。右派的加强和布勃尼克的变节，这就是什麦拉里同志的“细致的”策略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什麦拉里同志的“细致的”策略是挽救右派的策略，是加深危机的策略，是孕育着党的毁灭的策略。

作为革命政党的旧社会民主党为什么毁灭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考茨基之流实际上采取了包庇和挽救右派的“细致的”策略，采取了同埃·伯恩施坦之流“统一和和平”的“慎重的”策略。由此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在面临战争的紧急关头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工人阶级，“正统派”做了右派的俘虏，而整个社会民主党成了“行尸走肉”。我认为，如果你们不迅速而坚决地用布尔什维克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集团作无情斗争的策略代替什麦拉里同志的“细致的”策略，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来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

不想因此就把什麦拉里同志同社会民主党人混为一谈。◇56◇我决没有这种想法。毫无疑问，他是共产党员，甚至还可能是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要说，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细致的”策略，他就必然会滚到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去。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是什么呢？

它的最近任务是：在同“极左”倾作斗争的时候，要同从右面来的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完全孤立右派和彻底消灭他们。团结党内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来彻底消灭右派集团，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摆脱危机的出路。不这样，就休想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

这当然还不是说一定要开除所有一切右派分子。开除在反右派斗争中并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主要的问题是在原则性的斗争过程中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粉碎右派集团，并把广大的党员群众吸引到这个斗争中来。这是以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教育党的一个主要的和重要的手段。如果开除作为在思想上粉碎敌人的自然结果，确实是需要的，那就应该采用开除的办法。在这方面，左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急急忙忙地开除了布勃尼克。他们没有彻底利用布勃尼克“事件”，没有把它同右派在群众发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联系起来以揭露右派的真面目，却急急忙忙地开除了布勃尼克，切断了在这方面继续向右派进攻的一切道路。

至于共产国际的权利和它对各国党的事务的干预，我坚决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张的缩小这些权利的意见。有人想使共产国际变成星球上的组织，使它只是冷漠地观察各国党内所发生的事情和耐心地登记事件。不，同志们，共产国际不能成为星球上的组织。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57◇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援助革命分子并同他们的敌人作斗争。当然，各国党都有它内部的自治权，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是不受约束的，

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但是，如果由此便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利，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

最后，关于克雷比赫同志。我认为他的整篇演说是打算用分裂的威胁来吓唬人。他说，不要触犯勃留恩的右派，否则就会坏事，不要同他们斗争，否则就会分裂。好吧，让我们看吧。只是克雷比赫同志别来吓唬我们了，反正我们是吓唬不住的。他不能不知道，我们是久经战斗的人，用分裂的威胁是吓不倒我们的。如果他企图从威胁转为行动，我敢肯定地对他说，在这件事情上吃亏的只会是他而不会是别人。

概括地说，党内是有危机的。危机的原因是无可怀疑的。主要的危险是从右面来的。同这种危险作坚决而不调和的斗争，这就是任务。团结党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来彻底消灭右派，这就是摆脱危机的出路。

必须利用平静时期来巩固党，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并使它“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纠纷”（因为“新郎来到”的“那日子、那时辰是不得而知的”），从而为新的革命高涨开辟道路。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七十二号◇58◇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无论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分开。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的实质，就是始终把民族问题和革命前途密切联系起来。

谢米奇引证了列宁的话，说列宁曾经主张把解决民族问题的某种办法规定在宪法中。显然，谢米奇想以此来说明列宁似乎曾经认为民族问题是立宪问题，即不是革命问题而是改良问题。这完全不对。列宁从来没有陷入而且也不可能陷入立宪的幻想。只要看一看他的著作，就会深信这一点。列宁谈到过宪法，但他所指的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立宪道路，而是革命道路，也就是说，他把宪法看做革命胜利的成果。在我们苏联也有宪法，并且它反映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某种办法。可是这个宪法的问世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的结果，而是革命胜利的结果。

其次，谢米奇援引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所写的那本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21]，◇59◇竭力想从那里找到哪怕只能间接证实他正确的一些话。但是，这种引证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不仅这些话，就连稍微能证实他对民族问题的“立宪”观点正确的间接暗示，他也没有找到，而且不可能找到。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可以提醒谢米奇注意斯大林那本小册子中的一段话，那里是把奥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立宪的）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办法（革命的）对照起来谈的。

这段话就是：

“奥国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看来是很明白了。

这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观点，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观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

可以毫不勉强地说，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问题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二个阶段，民族问题已经扩大和转变为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因而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60◇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可见，不论第一个阶段或第二个阶段的看法都是极其革命的。

我认为谢米奇还没有把这一切完全弄清楚。因此，他企图把民族问题贬低为立宪问题，即把民族问题看成改良问题。

这个错误使他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

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我认为谢米奇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是由于他过低估计了民族气动的内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过低估计蕴藏在运动中，比如蕴藏在克罗地亚人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的潜在力量，会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全党发生严重纠纷。

这就是谢米奇的第二个错误。

谢米奇企图脱离国际形势和欧洲可能的前途来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这无疑也应该认为是错误的。谢米奇根据目前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没有强大的争取独立的人民运动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民族分离权问题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决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当然是不对的。就◇61◇算这个问题在目前不是现实问题，可是**一旦战争爆发**（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一旦欧洲革命爆发**（或在欧洲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来看，战争一定会爆发，**他们**一定会在那里打起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一二年，当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拟定第一个民族纲领草案的时候，在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个边疆地区都还没有强大的争取独立的运动。然而当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民族自决权即每个民族都有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条列入我们的纲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以当时已经有的情况为出发点，而且以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不断发展和日益迫近的情况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那时不但估计到当前的情况，而且估计到将来的情况。我们知道，如果某一个民族要求分离，那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要为保证这个民族获得分离权而斗争。谢米奇在演说中不止一次地引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中的话。斯大林在这本小册子中关于自决和独立是这样说的：

“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

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话还是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你们知道，这个论点后来在战时和战后，特别是在俄国无产阶级◇62◇专政胜利以后完全被证实了。

特别是现在，在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和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应当更有理由估计到整个欧洲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这种可能性。同时应当注意下面这种情况：南斯拉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它和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有联系，因而它无法退出南斯拉夫外部所进行的激烈的角斗。如果你们要为南斯拉夫党起草民族纲领，——现在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那末必须记住，这个纲领不但应该以当前的情况为出发点，而且应该以日益发展的和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情况为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把民族自决权问题看成是一个现实的迫切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民族纲领。民族纲领的出发点应当是南斯拉夫苏维埃革命的原理：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取得革命胜利，民族问题便不可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例外。比如战前挪威脱离瑞典就是一个例外，列宁在他的一篇文章〔22〕中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不过这是在战前，在各种顺利情况偶然凑合的条件下发生的。战后，特别是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以后，就未必能发生这种事情。至少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机会现在已经少到可以说是等于零了。既然如此，那末很明显，我们不能制定等于零的纲领。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原理应当是民族纲领的出发点。

其次，一定要把关于直到国家分离的民族自决权这一专门条文列入民族纲领。为什么在目前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非有这一条不可，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了。

最后，在纲领中还应当包括一项允许那些认为不必同南斯拉夫分

离的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条文。有些人认为必须排斥这种结合，这是不正确的，不对的。在一定的条件◇63◇下，由于南斯拉夫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很可能会有某些民族不愿意分离，像在我们俄国所发生的那样。显然，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纲领中就必须有自治这一条，以便把南斯拉夫国家改变成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的各民族自治国家的联邦。

总之，给那些愿意分离的民族以分离权，给那些愿意留在南斯拉夫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以自治权。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说明，不应当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分离的责任。每个民族都可以行使这种分离权，但是也可以不行使这个权利，如果它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它自己的事情，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有些同志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比如说，要求克罗地亚人**无论如何**要分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必须抛弃。决不能把权利和义务混为一谈。

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64◇

关于农村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在俄共（布）中央
组织局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保证共青团有基本的无产阶级核心作为全国的领导核心。报告人一点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这里谈的是农村共青团的工作，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核心。但是，保证共青团有无产阶级核心，仍然应当是共青团的基本任务。我认为共青团在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比较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吸收工人青年加入共青团的工作是在顺利进行，十分之九以上的工人青年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核心中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到苏联各中心地点和主要地区去，以便用这个核心的力量保证对农民青年的实际领导。我的根据是：农民青年在数量上超过无产阶级青年，要把无产阶级青年的力量平均地分配到苏联的各县和各乡去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把这些力量分配到最容易保证对农民青年实行领导的那些地方去。我不认为共青团已经像完成第一个任务那样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仍然有根据认为，共青团正以全力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最近就会迅◇65◇速做出成绩来。

第三个任务就是要保证共青团在农村中拥有大量农民青年积极分子，要对这些积极分子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政策在农村中的执行者，使他们成为把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水泥。这是件困难而又极其复杂的事情。要在短期内解决这项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共青团的无产阶级核心必须尽量大的努力，必须全力以赴。然而，这项任务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决的。

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巩固共青团，也不可能保证工农结合。

但是，怎样保证共青团拥有农民积极分子，怎样教育这些积极分子，怎样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政策在农村中的执行者呢？

据说，共青团内单是农村支部书记就至少有二万七千人。据说，除了支部书记以外，还有在合作社、苏维埃、农民委员会、文化机关等等积极工作的共青团员。据说，把这一切都加起来，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至少有十万人。这一切是不是事实，——很难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末应当说，只要善于利用这些积极分子，他们就可以成为能够创造奇迹的极巨大的力量。由于目前党在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的数量要少得多，这种情况就显得更重要了。

因此，任务就是：**怎样教育这大量的积极分子，使他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成为无产阶级政策在农村中的执行者**。

我不想在这里做详尽的回答。要在一篇短短的演说中做到这一点是决不可能的。但是在短短的◇66◇演说中指出正确解决这项任务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条件，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些什么条件呢？这些条件至少有八个。

第一、必须供应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一些解释苏维埃政权维护贫农利益的法令的通俗小册子和参考书。必须使这些积极分子彻底了解这些法令，使他们善于向贫农解释这些法令，并且善于根据这些法令维护贫农的到益，反对富农的恶势力。我认为，不了解这些法令和农村“当权者”经常违反这些法令，是目前农村秩序的主要祸害之一。农村中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应当捍卫革命法制。他们应当尽力保护农村中的贫农。毫无疑问，这个任务是普通而平凡的。毫无疑问，空谈世界革命要比实现这项同苏维埃法令有关的普通而平凡的任务容易得多。但是同样毫无疑问，不实现这项任务，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结合。

第二、必须供应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关于农业基本知识的通俗小册子。必须使这些积极分子研究农业，懂得改进农业的方法，并且善于

在这方面向农民提供必要的意见。农民对共青团员往往采取不严肃的嘲笑的态度。这是因为农民认为共青团员是脱离农业的人，是不学无术的人，是游手好闲的人。因此，任务就是要使共青团员同农业接近，同农业结合。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只有同农业结合起来，只有善于提供有关提高农民经济、改进和巩固农民经济的有益的意见，才能得到农民的尊敬和信任。当然，这件事情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这样做仍然是必要的。◇67◇

第三、必须供应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关于农业税、关于地方预算、关于国家财政状况的通俗小册子。税收和地方预算现在是农村中的第一件大事。目前在这方面发生了无数违法乱纪的行为。怎样分摊捐税，使贫农不受委屈，使富农不致逃脱纳税的负担；怎样根据地方预算使用经费，必须把钱花在哪些方面；怎样才能揭发和杜绝这方面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共青团员积极分子不能忽视的。任务就是要干预这一切事情，帮助劳动农民。这件事情也是相当困难的，并且远不是有趣的。但是不这样做，农村中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苏维埃建设。

第四、必须供应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关于苏维埃建设，关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参加村、乡、区、县的管理工作等问题的通俗参考书。必须使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彻底了解关于地方苏维埃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农民对苏维埃的权利和义务，关于选举制度、关于选举程序等等的条例。任务就是要向农民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政策，使这个政策得到切实而认真的执行。不这样就休想取得农民的信任，休想扩大农民积极分子并且在农村中发扬无产阶级民主。

第五、必须供应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关于农业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关于劳动组合和一般集体经济的通俗小册子。必须使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善于吸引农民参加发展农村合作社组织的工作。这件事情是极复杂极困难的，但是为了吸引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这样做是绝对必需的。农业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现在对农民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任务就是要使合作社成为农民的切身事业。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贫农阶层没有农具，在农村中就造成了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情况有利于在国家◇68◇信贷机关的一定帮助下建立劳动组合和集体农庄。任务就是要使贫农阶层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到相当的优惠贷款。共青团员积极分子不能忽视这些重大的问题。

第六、必须供应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关于农村文化建设、关于发展农村阅览室和扫除文盲等等的必要指示和材料。任务就是要使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成为农村中的苏维埃和文化界在发展苏维埃文化方面的天然助手。

第七、必须使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得到关于共青团员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共青团和党之间、苏维埃和共青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指示。必须使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把自己看做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助手。农村中的命令主义，选举苏维埃时的不法行为，暗中代替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企图，在所谓反宗教宣传中的流氓行径，——这一切都玷污了共青团的旗帜，同共青团员的称号完全不相称，必须立刻抛弃和根除。任务就是要同这些罪恶行为作无情的斗争，并且在共青团同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

第八、必须供应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关于工农联盟，关于工农联盟的意义和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共产主义基础，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以及关于农民过去在沙皇和地主统治下的生活状况、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他们将来在结合已经巩固和社会主义已经确立时的生活状况的通俗小册子。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决不应当迁就农民的成见。注意这些成见和迁就这些成见是两回事。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应当善于用共产党员的语言同农民谈话。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应当善于用具体的事实说服◇69◇农民，使他们确信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别的生路。

这就是对农村共青团积极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并且使他们成为无

产阶级政策在农村中的执行者所必须实现的一些条件。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在于促进和监督这些条件的实现。

有人说到共青团在农村中大发展的危险，说到农民青年涌进共青团的现象。毫无疑问，这里是有某些危险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如果共青团能够光荣地完成上面提出的任务，它就不必害怕这种危险。农村中有十万共青团积极分子，——对于这样一支力量，农民青年不管怎样涌进来都不会有危险。全部问题在于：要加强对这些积极分子的政治教育工作。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指导这些积极分子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努力。全部问题在于：要利用这些积极分子去吸引农民参加新的苏维埃建设。

总之，（甲）保证共青团有无产阶级核心作为基本领导力量；（乙）从保证这种领导出发，把这个核心的积极力量分配到苏联各主要地区去；（丙）教育农村青年积极分子保证在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政策，——这就是整个共青团特别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当前任务。有了这些任务，并且在日常工作中完成这些任务，就不必害怕摆在农村共青团面前的危险了。

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八十六号◇70◇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23〕

（信）

同志们！你们的代表要我谈谈在无产阶级大学生中间党的任务和党的工作的任务。

让我同你们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环境。如果认为在一个战胜了并且驱逐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国家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不正确的。在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受到全世界无产者支持的国家里，是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说得对：我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现时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已经把社会主义由神像变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实际目标了。

无产阶级大学生在这个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应当是怎样的呢？◇71◇

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头等重要的。高等学校，共产主义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这都是培养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挥人员的学校。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社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采矿工程师和统计学家，技师和化学家，农业工作者和铁道工程师，兽医和林业工作者，电工技术员和机械师，——这都是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的指挥人员。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设新社会，正像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立新的军队一样。新的指挥人员的特色，就在于他们进行建设的使

命不是为了剥削劳动者以满足一小撮富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劳动者，反对一小撮剥削者。全部问题在于，要使高等学校学生——工人大学生和农民大学生，党员大学生和非党员大学生——了解自己的这个光荣的作用，并且自觉地忠实地起自己的作用。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的建设者，——这就是党的第一个任务。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指挥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挥人员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设的旧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脱离工人和农民，他们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视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适的。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72◇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能想像的。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把自己看做劳动群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竭力使大学生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社会活动家，——这就是党的第二个任务。

最后，专门谈一谈共产党员大学生的问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不大。据说他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非党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宁愿研究“高深的政治”，花费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漫无止境地讨论“世界问题”。这一切是不是事实呢？我想是事实。既然是事实，那末至少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共产党员大学生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拙劣领导者的危险，因为不掌握科学是不能领导社

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第二、培养新的指挥人员的事业有被那些需要由新的人材来替换的旧教授所垄断的危险，因为在不愿意或不善于掌握科学的人们中间，是培养不出新的换班人和新的科学工作者的。不用说，这一切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情况能不能容忍呢？显然不能。因此，共产党员大学生和全体苏维埃大学生应当明确而肯定地给自己提出如下的当前任务：掌握科学，从新的苏维埃人中间造就新的换班人来接替旧教授。我决不是说大学生不应当研究政治。决不是这样。我只是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73◇结合起来。有人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害怕过困难呢？困难之所以在我们的建设道路上存在，正是为了要我们去同它作斗争并且克服它。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种情况。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国家的革命习惯、传统，以及反对因循习惯和思想停滞的斗争，给繁荣科学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未必用得着怀疑，资本主义学校旧教授所特有的小市民的狭隘性和守旧思想，是科学的绊脚石。未必用得着怀疑，只有不沾染这些缺点的新人，才能从事充分而自由的科学创造。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有远大的前途，可以成为不受束缚的科学的堡垒和苗圃。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大学生依旧站在发展科学的大道旁边，那是可悲的，并且是不体面的。正因为如此，掌握科学的口号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首先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懂得掌握科学的必要性并且去掌握科学，——这就是党的第三个任务。致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八十七号◇74◇

苏联大学生学习生活剪影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
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里详细地分析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24]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没有意义的。重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认为只要指出基本路线就够了，因为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这些决议中。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着重指出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基本结论。这样做也便于今后研究这些决议。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决议，决议中所谈到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纳为六类主要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第二类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第三类问题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问题。第四类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第五类问题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党在新条件下的领导任务问题。最后，第六类问题是我国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即金属工业问题。◇75◇

一　国际形势

在国际形势中基本上决定目前时局性质的新的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在最近时期出现的对国际形势有影响的新情况，就是欧洲开始了革命的退潮，开始出现了某种平静现象，即在苏联经济发展和政治威力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

什么是革命的退潮，什么是平静现象呢？这是不是世界革命末日的开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的开始呢？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这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既然欧洲革命的退潮已经开始，那末这是不是说，列宁关于新时代即世界革命时代的论点因而也就失效了呢？这是不是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就取消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可能有而且应当有革命的退潮和寒潮。

我国革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两个战略时期，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第三个战略时期。第一个阶段（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延续了十五年以上。这个阶段的目的是推翻沙皇◇76◇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经历了许多次革命的退潮和来潮。我们经历了一九〇五年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革命暂时失败而结束的。之后，我们经历了延续好几年（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退潮。接着我们经历了因连纳事件（一九一二年）而掀起的新的来潮，这次来潮后来被大战时期的新的退潮所代替。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了新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人民战胜沙皇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结束的。在每次退潮以后，取消派都硬说革命完蛋了。但是，革命在经过了许多次退潮和来潮以后终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取得了胜利。

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阶段的目的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个阶段或者说这个战略时期一共延续了八个月。但这是革命危机极度加深的八个月，当时战争和经济破坏鞭策了革命，使革命的步伐极度

加快。正因为如此，这八个月的革命危机至少可以而且应当等于八年的通常的立宪发展。这个战略时期也像前一个战略时期一样，它的特征就是：革命并不是像革命的庸人通常所想像的那样一味直线上升，而是包含着退潮和来潮。在这个时期，在七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的来潮。接着，在布尔什维克七月失败以后，我们经历了革命的退潮。这次退潮紧接着被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的新的来潮所代替，而这次来潮是以十月革命胜利而结束的。这个时期的取消派瞎说什么在七月失败以后革命已被全部扑灭。但是大家知道，革命在经历了多次考验和退潮以后，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77◇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战略时期即革命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无论如何是很长的，同样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也会包含着来潮和退潮。世界革命运动目前已经进入革命退潮时期，但是这次退潮由于许多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一定会被来潮代替。来潮可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来结束，也可能不以胜利来结束，而被新的退潮代替，但是新的退潮也一定会被革命的新的来潮代替。现今时期的取消派说，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是世界革命的末日。但是，他们弄错了，正像他们过去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弄错了一样，那时他们把革命运动的每一次退潮都看成革命的毁灭。这就是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内即每个战略时期内的起伏情形。

这些起伏说明什么呢？它们是不是说明，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的论点已经失去意义或者可能会失去意义呢？当然不是！它们只是说明，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

但是退潮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除了欧洲革命的退潮以外，还有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苏联政治威力的日益增长。换句话说，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时还有苏维埃制度的稳◇78◇定。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这两种稳定之间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

但什么是稳定呢？这是不是停滞呢？如果稳定就是停滞，那末能不能把它应用到苏维埃制度上来呢？不，稳定不是停滞。稳定是目前局势的巩固，是进一步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不只是在目前局势下得到巩固。它还在前进和向前发展，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如果认为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25〕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理论似乎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不对的。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一书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而是预定和准备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

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一端是资本主义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现有的地位并且在继续发展。另一端是苏维埃制度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所夺得的阵地并且在继续走向胜利。

谁战胜谁，——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为什么一种稳定和另一种稳定同时并存呢？怎么会产生这两种的呢？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了。因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以英、美资产阶级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国际形势将愈来愈取决于这两个阵营间的力量对比。

可见，目前时局的特征不仅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已经稳定，

而且是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已经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稍为有利，而对革命运动稍为不利，因为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和革命◇79◇高潮比较起来，对社会主义无疑是不利的，虽然是暂时的不利。

这两种稳定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两种稳定各向哪一方面发展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稳定使资本的力量暂时增强，同时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甲）各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乙）每个国家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丙）帝国主义和世界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制度下的稳定则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增强，同时也必然使矛盾缓和，使相互关系改善。这里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就是：（甲）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乙）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丙）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各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

问题在于：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展：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状况，世界各国工人日益接近和联合，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周围。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在收买和豢养劳动者中间的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同时，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陷于贫困和过半饥半饱的生活的道路。◇80◇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道路，却是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产生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就无力解决这些矛盾。

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农民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

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全部问题在于：不使所有这些矛盾尖锐化，不积累那些归根到底促使资本主义垮台的条件，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全部问题在于：与此相反，不创造那些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极度高涨的条件，不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继续发展。

这就是两种稳定之间的差别。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稳定既不能持久又不能巩固。◇81◇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

资本主义的稳定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表现在美、英、法三国暂时在对德国进行掠夺的方法和范围方面达成了协议。换句话说，它们已经达成了它们称做德国道威斯化的协议。能不能说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为它是在没有主人即没有德国人民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第二、因为这个协议会使德国人民受到双重压迫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如果以为像德国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像德国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会甘受双重束缚而不企图进行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爆发，那就是相信奇迹。甚至像兴登堡当选总统〔26〕这样一件实质上是反动的事情，也毫无疑义地说明协约国暂时达成的对

付德国的协议是不牢靠的，而且不牢靠得令人可笑。

第二、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英、美、日三国的资产阶级暂时在确定他们在中国这个能大量容纳国际资本的市场上的势力范围方面，在对中国进行掠夺的方法方面，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还是不能。第一、因为在协议者中间由于分赃而发生过并且还会发生殊死的搏斗；第二、因为这个协议是背着中国人民达成的，中国人民是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服从外国强盗的法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增长难道不是说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诡计注定要破产吗？

第三、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暂时在互不干涉对方对“自己的”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或者说达成协议的这种尝试是比较牢靠的◇82◇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每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在拚命夺取并且还会拚命夺取别人的一小块殖民地；第二、因为帝国主义集团对殖民地的压榨和对它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只能使这些殖民地受到锻炼，并且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深革命危机。帝国主义者企图“平定”印度，控制埃及，驯服摩洛哥，束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手脚，因而施展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阴谋不会也不可能长久施展下去。

第四、资本主义的稳定可能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在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上达成协议。就算能够达成这个协议，就算它们能够靠施展各种各样的诡计直到在索非亚爆炸事件〔27〕上进行无耻的捏造等等而建立起某种类似统一战线的东西，有没有根据认为这种反对我国的协议或者说这方面的稳定能够比较牢靠、比较成功呢？我想这样的根据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资本家建立统一战线和举行联合进攻这种威胁会造成一个大圆箍，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地把我们全国束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使我国变成一座比“十四国”侵犯时更坚不可摧的堡垒。请回忆一下声名狼藉的邱吉尔所说的关于十

四国侵犯的威吓话。你们知道，光是这种威吓话，就足以使全国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第二、因为向苏维埃国家进攻，就一定会解开敌人后方的许多个革命纽结，使帝国主义的队伍瓦解和涣散。近来已经积下了无数个这样的纽结，它们不会是帝国主义有好结果的预兆，——这几乎是用不着怀疑的。第三、因为我国已经不再是孤独的了，它已经有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被压迫人民做同盟者。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的战争将成为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和◇83◇自己的殖民地的战争。用不着证明，如果他们一旦进攻我国，那我们是不会坐着等死的，我们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来驾御全世界的革命的狮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会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经验的。

以上这些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这种稳定产生着使资本主义失败的条件，相反，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则不断积累着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高涨和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两种稳定即资本主义的稳定和苏维埃的稳定之间的这种原则性的对立，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和两种管理制度之间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的表现。

谁不了解这种对立，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实质。

目前国际形势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类问题。

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革命的来潮时期被革命的退潮时期即平静时期代替了。任务就是要利用目前所处的平静时期来巩固各国的共产党，使它们布尔什维◇84◇克

化，使它们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分子首先是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且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去训练无产者。

我不打算一一列举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你们读一读各项有关的决议，特别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28〕，就不难了解这些任务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了。

我只想谈一谈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因为阐明了这项任务以后，其余各项当前任务就容易解决了。

这项任务是什么呢？

这项任务就是把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结合起来。这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绝对无条件地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进行工作，把工人联结成一条反资本的统一战线，从而创造各国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的条件。

不执行这项任务，就既不能使各国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必要的条件。

西方的工会和党并不像我们俄国的工会和党。在西方工会和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我们俄国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大不相同。我国的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周围形成起来的。当我国还没有工会的时候，党及其组织就已经不仅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且还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直到小规模的和极小规模的罢工。这主要是因为：二月革命以前我们党在工人中间所享◇85◇有的威信，比当时在我国各地存在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所享有的威信要高得多。我国真正的工会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才出现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成形的工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工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列宁还在那时就说过，没有像工会这样的支柱，就既不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保持住无产阶级专政。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的工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毫无疑

问，现在我们的强大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我国工会发展史的主要特征就是：我国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党的周围并且在和党友好的情况下产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西欧的工会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一、它们在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以前很久就在那里产生并巩固起来了。第二、在那里，工会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周围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却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第三、由于对工人阶级有极密切关系的经济斗争领域可以说已经被工会占领，因此党就不得不主要进行国会中的政治斗争，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工作性质和党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因为在那里党是在工会成立以后产生的，正因为工会在党建立以前很久就产生了，并且工会确实是无产阶级反资本斗争中的主要堡垒，——正因为如此，党就成了一支不依靠工会的独立力量，就退到了次要地位。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共产党想成为一支能够把革命向前推进的真正群众性的力量，它就应当和工会结合起来并且依靠工会。◇86◇

不估计到西方情况的这个特点，就一定会葬送共产主义运动事业。

在那里，在西方，现在仍然有个别“共产党员”不愿意了解这个特点，还继续沉醉于“退出工会”这一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口号。必须说，诸如此类的“共产党员”对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些人把工会看成敌对的营垒，企图从外面来“攻击”工会。他们不了解，实行这样的政策，工人就会把他们看成敌人。他们不了解，不管工会好不好，工人群众总是把工会看成帮助自己保持工资、工作日等等的堡垒。他们不了解，这样的政策不会促进而会破坏共产党员深入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中去的工作。

一个普通工人群众会向这样的“共产党员”说：“你们攻击我的堡垒，你们想要破坏我几十年来创造的事业，想向我证明共产主义比工联主义好。也许你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正确的（像我这样一个普通

的工人怎么能了解你们的理论呢），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有我的工会堡垒，它领导我进行斗争，它保护我（不管保护得好不好），使我免受资本家的攻击，谁想破坏这个堡垒，谁就是破坏我的事业即工人的事业。别再攻击我的堡垒了，加入工会吧，在那里工作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帮助我们改善和巩固工会，到那时候我再来看看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们真正够朋友，那我当然不会拒绝支持你们的”等等。

目前西方的普通工人群众就是这样或者大致是这样对待反工会主义者的。

谁不了解欧洲普通工人心理上的这个特点，谁就根本不会了解目前我们各国共产党的状况。◇87◇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于它依靠工会。

我们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弱点在哪里呢？

在于它们还没有和工会结合起来，而且这些共产党内的某些分子不愿意和工会结合。

因此，目前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个个都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耐心地进行工作，团结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从而使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这就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的意义。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三类问题。

这方面的新情况如下：

（甲）由于各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的资本增多（这是资本主

义的稳定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还会迅速地发展，它正在摧毁旧的社会政治条件，培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88◇

（乙）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并且还会迅速地成长；

（丙）殖民地内的工人革命运动和革命危机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

（丁）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最富裕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在成长并且还会继续成长，他们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奋斗，从而也就出卖他们的祖国（印度、埃及等国）；

（戊）由于这一切，只有和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

（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发达的和工业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内，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应当成为迫切的问题，就像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问题一样。

过去的情形是这样的：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明白，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了。

过去，人们总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一切民族力量即从最反动的资产者起到最革命的无产者止的一条全面性的战线。现在，在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的一翼和反革命的一翼以后，民族运动的面貌就有了一些改变。除了民族运动的革命分子以外，从资产阶级当中还产生出◇89◇妥协分子和反动分子，这些人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的解放事业奋斗。

因此，殖民地国家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分子结成的联盟，以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

结论只有一个：许多殖民地国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一九〇五年。

任务就是：把殖民地国家内的先进工人团结到能够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的统一的共产党里来。下面就是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殖民地国家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所说的话：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外汇问题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一九〇五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一九〇五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一二页）

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结论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意义也就是如此。◇90◇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现在来谈第四类问题。

前面我谈的是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与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直

接有关的，因而也是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联结环节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会怎样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呢？这种稳定是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末日或是末日的开始呢？

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一般说来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

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能不能完全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也就是说完全保证免除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危险呢？

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给予准确而肯定的回答是不行的。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91◇

现在来分别考察这两种矛盾。

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一点当然不能否认。只要回忆一下我国过去和现在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由于限价，由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运动等等而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了解这些矛盾的全部现实性。我们面前有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私有者阶级即农民阶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想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

这样回答的根据或理由是什么呢？

这样回答的理由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除了有矛盾以外，在

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遮盖着这些矛盾，并且无论如何会超过这些矛盾。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

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呢？

事实上农业有两条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而让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发财致富的道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则是使大多数◇92◇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农民，是乐意走第二条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因为这条道路是农民摆脱贫困和半饥半饱的生活的唯一生路。不用说，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农民是极乐意走这第二条发展道路的。

可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遮盖着他们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和农民一起并且依靠工农联盟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根据无产者和农民之间有共同利益这一点，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同意列宁主义的看法。例如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就这样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①]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见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93◇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和解决我国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只有依靠世界革命，我们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并且最后建成社会主义。

不用说，这个论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同一个托洛茨基还继续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换句话说，在西方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和给我们以国家援助以前，我们连梦想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

“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甚至在短时期内也无法“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仅支持住了，而且还打退了保守的欧洲向我国发动的多次疯狂进攻。

最后：

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94◇**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同上，第九十三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同志们，我引用这些话，是为了把这些话和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对照一下，使你们能够领会关于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本质。

现在来谈谈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

列宁早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就写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95◇

换句话说，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电气化问题时说过同样的话（虽然在形式上有些不同）。

“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否则国家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的。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一定会使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转到大工业经济。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①]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意识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荒谬的结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却认为我们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取得“最◇96◇后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请听列宁在一年以后即在一九二一年所说的话：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①]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一九二一年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意识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他却认为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完全能够取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但是，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什么呢？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一件完全由而且仅仅由我们这个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确定的东西。

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在他的论合作制这篇札记中更肯定地说过同样的话：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97◇**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①]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三页）

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有人反对说，我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因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反击并且驳倒了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

列宁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二页至第四三三页）

要不然，就用不着在十月夺取政权，用不着举行十月革命了。因为，如果根据某些理由而认为没◇98◇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和必要，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义了。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反过来说，谁不相信十月革命，谁就决不会承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相信十月革命和不承认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二者之间有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列宁说：“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关于第一种矛盾，关于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二种矛盾即外部的矛盾，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表现在哪里呢？

这种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

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99◇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企图、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企图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企图，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列宁说：“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立边区的时候，就以为……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当然，只这些根本的对立性存在，危险也就存在，你也就无法躲避这些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页）

其次：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八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100◇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地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关于第二种矛盾就是如此。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今年一月有位同志寄给我一封信，谈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这封信可以作为这种糊涂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困惑地写道：

“你说，列宁主义理论……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很遗憾，我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

当然，糟糕的不是这位同志（我认为他是我们青年学生中一位优秀的同志）“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他总有一天会找到和读到这种指示的。糟糕的是他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混为一谈，结果就纠缠在这种糊涂思想里。我不妨把我对这位同志的来信的答复告诉你们。我的答复如下：

“那里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101◇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如果确信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公开的同情之下，在没有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末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最普通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末伊里奇的下面

这个论点便是不对的：我们一定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①]（见“论合作制”）……

我们政治实践中最危险的就是：企图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被动的东西，以为它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胜利了的无产者的援助时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国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五年到十年内西方还没有爆发革命，假定我们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内仍然作为一个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那末你是否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五年到十年内只去干些捣水勾当，而不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可能胜利的理论的全部危险性。

这是不是说，这个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只要资本主义◇102◇包围还存在，就随时有受军事干涉的危险。”（一九二五年一月）

从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有名决议看来，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就是这样。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现在来谈第五类问题。

在谈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的决议以前，我想简单地谈一谈资产阶级报刊因我们党批评我们自己在农村中的缺点而发出的叫嚣。资产阶级报刊吵吵嚷嚷，要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公开批评自己的缺点是苏维埃政权软弱的标志，是苏维埃政权分崩离析的标志。不用说，所有这些叫嚣完全是捏造和欺骗。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敢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党，害怕阳光和批评的政党，并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资产者老爷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他们害怕阳光并且竭力对人民隐瞒真相，用粉饰太平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因此，他们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也一定会对人民隐瞒真相。他们所以害怕阳光，是因为只要他们进行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要他们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比较自由的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就◇103◇会彻底崩溃。因此，他们以为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进行自我批评，那就是我们被围困和无立足之地的标志。他们这些可敬的资产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正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只有后退的和注定灭亡的政党才会害怕阳光和批评。我们既不害怕这个，也不害怕那个，我们所以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上升的政党，是走向胜利的政党。正因为如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极度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它是巩固我们党的手段，而不是瓦解我们党的手段。

现在来谈谈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

在国内和国际的新形势下，在农村中可以指出哪些新的因素呢？

我认为可以指出四件主要的事实：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速度的缓慢要求选择一条痛苦最少的、哪怕是漫长的道路，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二）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分化过程要求肃清农村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

（三）农民的政治积极性要求改变农村中旧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方法；

（四）苏维埃的改选暴露出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在我国许

多地区内**中农站在富农方面反对贫农**。

根据这些新的事实，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有些同志根据农村分化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这种◇104◇说法是不对的。这是无谓的空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这是重弹孟什维克旧百科全书中的孟什维克老调。

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使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把他们争取过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主要的问题是：和农民一道，一定要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使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基本保障。

这就是党现在的基本任务。

不妨回忆一下伊里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关于这一点所说的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的几句话：

“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八九页）

其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前进，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那末到时候，我们的前进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八页）◇105◇

因此我们在农村中有两项基本任务。

第一、必须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从前我们

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城市走城市的路；农村走农村的路。资本家竭力把农民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但这是通过农民群众贫困和农民中的上层发财致富而实现的。大家知道，这条道路孕育着革命。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是为了创造条件以便能够在逐步地而又是不断地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福利的基础上，就是说在跟革命前资本家引导和邀请农民所走的道路相反的道路上把国民经济向前推进。

但是，怎样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体系呢？通过合作社。通过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

通过这些道路，农民经济一定会缓慢地然而彻底地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

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地而又不断地实现消灭农村中旧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路线，实现活跃苏维埃的路线、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选举机关的路线以及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的路线。伊里奇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伊里希说过，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我们有可能巩固这个政权以后，民主制的这种最高形式才能实现。可见，这个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时期已经开始。我们应当谨慎小心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要性急，我们应当在工作的进程中，在党的周围培养出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106◇

如果第一项任务，即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总体系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套在一辆马车上，那末第二项任务，即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和活跃苏维埃的任务，就一定会使我们有可能改建我们的国家机关，使它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使它成为健全的、真实的、朴素的和节约的机关，以便创造易于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所通过

的决议的基本路线就是如此。

因此，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方法也就应当有所改变。

我们党内有人断言，既然有新经济政策，既然资本主义开始暂时稳定，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压制政策，把周围的一切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必须说，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和有致命危险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最大限度的压制，而是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即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然，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掌不住舵。我们所以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是为了使党能掌住舵，保证党实现全面的领导。

其次，必须使农村中的共产党员放弃畸形的行政管理方式。决不能只对农民发号施令。应当学会耐心地向农民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应当学会说服农民，在这方面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像我们某些乡执行委员会主席那样常常只是发号施令，这当然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但是简单的容易做◇107◇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好事情。不久以前有一位乡支部书记在回答省委员会代表所提出的关于该乡没有报纸的问题时说：“我们干吗要报纸呢？没有报纸倒安静些，好些，不然，农夫们一读报就会提出种种问题，那简直麻烦透了。”这位书记也算共产党员！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种不幸。问题在于：现在要进行领导，没有“麻烦”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不必说没有报纸了。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和领会，如果我们愿意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住农村中的领导的话。

其次，现在要进行领导，就必须善于经营管理，必须懂得和理解经济。现在只是高谈“世界政治”，高谈张伯伦和麦克唐纳，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因此，只有通晓经济的人，只有善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向农夫提出有益意见的人，只有善于帮助农夫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能做领导工作。研究经济，和经济结合，

深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各项细节中去，——这就是农村中共产党员现在的任务。不这样做，连梦想领导也不可能。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苏维埃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这种积极性通过苏维埃，而不是绕过苏维埃。谁能在农村中活跃苏维埃和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谁就能做领导工作。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村中的经营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这种积极性通过合作社，而不是绕过合作社。谁能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谁就能做领导工作。◇108◇

农村中党的领导的具体任务大体上就是这些。

六　关于金属工业

现在来谈最后一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经济领导方面的新的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经济计划已经开始落后于我们经济的实际发展，我们的经济计划订得太低，因此它们常常赶不上经济的实际发展。

我们的国家预算就是这件事实的一个明显表现。你们知道，由于我们的预算草案没有估计到我们预算的收入项目的迅速增多，我们曾不得不在半年内三次更改我们的国家预算。换句话说，我们的预算草案和我们的预算计划赶不上国家收入的增多，因此国库中有了剩余。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生活的洪流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向前奔腾，把我们财政专家的一切科学计划都冲垮了。这就是说，我们正处于经济和劳动热情的蓬勃高涨中，这种情况和内战后的美国比起来，实有过之

而无不及。

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可以认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这种新情况的最明显表现。去年金属的产值为一亿九千一百万战前卢布。去年十一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年度计划的预计产值为二亿七千三百万战前卢布。今年一月，由于这个计划和金属工业的实际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因而修改了一下，◇109◇把产值提高到三亿一千七百万卢布。今年四月，这个扩大的计划又不切实际了，因此不得不把预计产值提高到三亿五千万卢布。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连这个计划也低了，因为还必须进一步扩大这个计划，使预计产值达到三亿六千万至三亿七千万卢布。

换句话说，今年金属工业的产值比去年的产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更不用说我们轻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运输业和燃料工业等等的发展了。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主要基础的工业方面，我们已经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至于说到作为全部工业的基本动力的金属工业，那末停滞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金属工业是有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一切条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说得对，我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金属国家。

几乎用不着再证明，这个事实无论对我国内部的发展或对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内部发展方面来看，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全部工业的发展，意味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金属工业是全部工业的主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轻工业、运输业、燃料工业、电气化或是农业就都不能立足。金属工业的发展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请听列宁关于“重工业”（列宁主要是指金属工业）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

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110◇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良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努力。”

还有：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五页）

至于我国金属工业发展的国际意义，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如果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新东西，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建成新工业和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那又是表明什么呢？用事实而不是用书本上的东西来证明这一点，这就等于有把握地彻底地把国际革命事业向前推进。西欧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并不是偶然的。这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极伟大的鼓动意义和实践意义。工人们到我国来，考察我们工厂的每个角落，——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不相信书本，而想用亲身的体验证实无产阶级有建设新工业和创造新社会的本领。你们可以深信，一旦他们证实这一点，国际革命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

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以缓慢的、逐步的——求速◇111◇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断的上升和前进去取得胜利。”[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们全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工业的发展的国际意义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大约有四百万工业无产者。这个数目当然很小，但毕竟还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起我国的国防，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发抖。然而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工业无产者，我们要使我国各主要地区电气化，我们要有合作化的农业和高度发达的金属工业。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危险了。到那时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这个伟大目标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列宁的道路，是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大体上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
“真理报”第一〇六号和第一〇七号◇112◇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首先让我向你们祝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校四周年纪念。不用说，我祝你们的大学在为东方培养共产主义干部的艰难的道路上获得各种成就。

现在我们来谈谈本题。

如果分析一下东方劳动者大学的成分，那就不能不发觉这个成分的某种两重性。这个大学里有不下五十个东方民族和民族集团的代表。这个大学的学生都是东方的儿女。但是这个定义还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而完整的概念。因为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由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人是从**苏维埃**东方，从不再有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且已经由工人执政的那些国家来的。第二部分学生是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的，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仍在统治、帝国主义压迫尚完全保存、还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以争取独立的那些国家来的。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过着不同生活并且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着的东方。◇113◇

不用说，学生成分的这种两重性不能不影响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工作。这恰恰说明这个大学的一只脚是踏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另一只脚是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土地上。

因此，这个大学有两个工作方针：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需要服务的干部；另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劳动群众的革命要求服务的干部。

因此在东方劳动者大学面前也就产生了两类任务。

现在让我们来分别地考察一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这两类任务。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这些国家，这些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不同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些共和国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

第二、它们是作为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而受苏维埃政权保护的民族在发展着和巩固着。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但这毕竟是事实。

第三、它们的工业不大发达，但是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完全可以依靠苏联工业无产阶级的援助。

第四、这些共和国已经摆脱了殖民压迫，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并且成为苏维埃联盟的成◇114◇员，因此它们可以而且应当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基本任务就是：促进这些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些共和国存在的特殊条件，创造和发展能够推进并且加速这一工作的前提。

因此，苏维埃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就是：

（一）在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内建立工业基地，以作为把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基础。你们知道，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并且将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而向前推进。这些共和国拥有各种原料，这是这项工作将来可以进行到底的保证。

（二）发展农业，首先是兴修水利。你们知道，这项工作也有进展，至少在南高加索和土尔克斯坦是如此。

（三）开展和推进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群众的合作化工作，这是把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苏维埃经济建设总体系的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苏维埃接近群众，使苏维埃的成分民族化，从而建立接近劳动群众并为他们所理解的本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五）发展民族文化，广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苏维埃干部、党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经济干部。

完成这些任务，也就是促进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15◇

有人在谈论苏维埃东方的模范共和国。什么是模范共和国呢？模范共和国就是能真心诚意地完成这几项任务，从而使邻近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人农民热中于解放运动的共和国。

上面我已经谈过使苏维埃接近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问题即苏维埃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接近怎样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呢？我认为，不久前在土尔克斯坦完成的民族疆界的划分〔29〕，可以说是这种接近群众的范例。资产阶级报刊认为这种疆界划分是“布尔什维克的诡计”。其实很明显，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诡计”，而是土尔克明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有接近他们并为他们所理解的自己的政权机关。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两个国家被分裂成许多小块，建立了好多个不同的大小国家，成为“当权者”实行剥削诡计的方便场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些被分裂的小块**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尔克明斯坦的劳动群众和政权机关接近并且打成一片。土尔克斯坦的疆界划分首先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分裂部分**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既然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维埃联盟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末这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把能满足东方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钥匙，说明苏维埃联盟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同民族劳动群众的自愿联合。资产阶级

为了使波兰重新统一，进行了许多次战争。而共产党人为了使土尔克明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重新联合，却只进行了几个月解释性的宣传工作。

这就说明应当怎样使管理机关（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和不同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接近。

这就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116◇

其次，我讲过关于提高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文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30〕怎样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谁不了解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则性的差别，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列宁主义，也永远不会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

人们（例如考茨基）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

理论。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117◇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去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遗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现在大家都说印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一旦在印度发生革命震动，就一定会有几十个早先大家不知道的、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独特文化的民族出现在舞台上。如果谈到各民族参加发展无产阶级文化，那末这种参加一定会采取符合这些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形式，这一点也几乎用不着怀疑。

不久以前我接到几位布里亚特同志的来信，他们要求我说明一下全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而困难的问题。这封信写道：

“我们恳切地请你说明下面几个我们感到非常重大和困难的问题。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创立统一的全人类文化。怎样设想通过在我们各个自治共和国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向统一的全人类文化过渡呢？各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等等）的特点怎样才能同化呢？”

我认为以上所说的可以作为对布里亚特同志所渴望解决的问题的答复。

布里亚特同志提出在创立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个别民族的同化问题。毫无疑问，有些民族可能会经受到、恐怕一定要经受到同化过程。这样的过程从前是有过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些民族的同化过程并不排斥许多有生气的和正在发展的民族的强盛和发展这一相反的过程，而是以这一过程为前提，因为个别民族的局部同化过程是各民族一般发展过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某些民族◇118◇可能发生的同化就不会削弱而会证实下面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全人类的无

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

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大体上就是这样。

这些任务的性质和内容就是这样。

必须利用已经到来的加紧进行经济建设和对农民实行新的让步的时期，来加速完成这些任务，从而促进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多半是农民国家）参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有人说，党对农民的新政策既然实行了许多新的让步（短期租佃、容许雇佣劳动），那末它就含有若干退却的因素。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对。但是，这是我们**在**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巨大的优势的**条件下**所容许的一些退却因素。稳定的通货、日益发展的工业、日益发展的运输业、日益巩固的信贷系统（依靠信贷系统，通过优惠信贷，可以使任何居民阶层破产或提到较高的阶段而不发生丝毫震动），——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手中的后备力量，有了这些后备力量，战线上某一地段的若干退却因素就只能促进全线的进攻准备。正因为如此，党对农民实行的一些新的让步在目前一定不会阻碍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而会促进这一事业。

这种情况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的意义，就是它给这些共和国的积极工作者一种新的武器，这种武器能促进和加速这些国家同苏维埃经济发展总体系的结合。◇119◇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苏维埃东方积极工作者当前民族任务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

因此，东方民族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共和国培养干部，以保证上述各项当前任务的完成。

东方民族大学不能脱离生活。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生活的机关。它应当使自己和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它不能撇开东方各

苏维埃共和国的当前任务。正因为如此，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在为这些共和国培养适当的干部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们的当前任务。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苏维埃东方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给苏维埃东方培养真正的干部和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在这个大学内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倾向就是简单化，就是把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些任务简单化，企图机械地搬用在苏联中央地区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适用、但是完全不适合所谓边疆地区的发展条件的一套经济建设办法。有这种倾向的同志不懂得两个道理。他们不懂得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差很远的。此外，他们还不懂得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彻岑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兹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这些同志不懂得，如果不适应当地的条件，不周密地考虑每个国家的各种特点，就办不成任何重大的事情。这种倾向的后果就是脱离群众，蜕化成左派清谈家。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用和这种简单化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来教育干部。◇120◇

第二种倾向恰恰相反，是夸大地方的特点，忘记了把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同苏联工业区联系起来的那些共同的和主要的东西，漠视社会主义的任务，迁就狭隘的有局限性的民族主义的任务。有这种倾向的同志很少关心自己国内的建设，而宁可听其自然发展。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不是国内建设，而是“对外”政策，是扩大自己共和国的疆界，同周围的各共和国争执，希图夺取邻国一小块土地以取悦于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的后果就是脱离社会主义，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用和这种隐蔽的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来教育干部。

这就是东方民族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问题。

这些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同于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些国家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生存着和发展着。

第二、双重压迫即内部压迫（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部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121◇迫）的存在使这些国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和深刻化。

第三、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如印度，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因而产生和形成了人数相当多的本国无产阶级。

第四、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

第五、除帝国主义联盟外，在这些国家中还形成了另一种联盟，即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摆脱帝国主义而谋求彻底解放为目的的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第六、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以及使人民群众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愈来愈带有迫切的性质。

第七、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不取得革命的胜利，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而获得解放，因为独立是不会无代价地得到的。

（二）不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摆脱这个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不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织成独立的共产党，革命就不可能向前推◇122◇进，资本主义发达的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争得完全的独立。

（三）没有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结合，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结论来进行革命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目前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就是：天地间不再有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殖民地东方了。从前人们把殖民地东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和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现在至少有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工业完全不发达。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内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

很明显，决不能把所有这些国家混为一谈。

在摩洛哥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基础。对于这类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类国家中，共产主义者只有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以后，才能结成统一的政党。

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123◇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

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不限制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自由，不妨碍把无产者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并且能使共产党便于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那它就是需要的和适当的。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符合这一切条件，那它就是不需要的和不适当的，因为它只会使共产主义者融化在资产阶级中间，使共产党失去无产阶级大军。

像印度这类国家的情况就有些不同。象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这部分资产阶级最富裕，最有势力，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更厉害，关心自己的钱袋比关心自己祖国的利益更多，因此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不摧毁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要摧毁这个联盟，就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揭穿他们的背叛行为，使劳动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并且要不断地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必要的条件。换句话说，问题是要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培养无产◇124◇阶级去担当解放运动的领袖，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从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挤下去。任务就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并且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个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在这类国家中，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应当是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口号，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但是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翼建立公开的联盟，以便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

城乡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因此，资本主义发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

（一）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并且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二）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以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

（三）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

（四）为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斗争。

（五）保证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这就是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积极工作者的三类当前任务。

如果就目前国际形势来考察这些任务，那末它们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暂时的平静时期。什么是平静呢？目前它能说明什么呢？它◇125◇只能说明对西方工人、对东方殖民地、而首先是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旗手苏联的压力的加强。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开始了。因爱沙尼亚的起义〔31〕而进行诬蔑性的宣传，因索非亚爆炸事件而无耻地攻击苏联，资产阶级报刊的一致攻击我国，——这一切都是进攻的准备阶段。这是舆论上的炮火准备，其目的是训练庸人来攻击苏联并且替武装干涉创造道义上的前提。这种造谣诬蔑性的宣传的效果如何，帝国主义者会不会冒险实行大规模的进攻，——这我们还要看一看。但是这些攻击注定对于殖民地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因此，准备革命的联合力量去反击可能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打击，这是当前必然产生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坚决完成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种情况下，东方民族大学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考虑这些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以便保证上述各项当前任务的完成。

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大约分为十个不同的班，他们来自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大家知道，这些同志渴望光明和知识。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同志造就成真正的革命者，造就成由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列宁主义的实际经验的、能够真心诚意地完成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当前任务的革命者。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殖民地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必须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126◇

第一种倾向就是过低估计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过高估计在这些国家建立无所不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状况和发展程度。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它包藏着降低革命运动的作用，使共产主义者的歌声融和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大合唱里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东方民族大学的直接义务。

第二种倾向就是过高估计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和过低估计工人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工作。爪哇的共产党人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在不久以前错误地提出了在本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

东方民族大学对苏维埃东方和殖民地东方的各族人民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东方民族大学能够光荣地完成这些任务。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一五号◇127◇

致“共青团真理报”〔32〕
编辑部全体委员

同志们！由于“共青团真理报”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想和你们谈一谈我们对该报登载的某些文章的初步印象。

（一）我们认为，在斯捷茨基的“新经济政策的新阶段”的一些文章中，某些地方是会引起疑问的。的确，在这些文章中转弯抹角地贯穿着“发财吧”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疑问和误解，在“共青团真理报”的指导性的文章中是不容许有这样的口号的。我们的口号是社会主义积累。我们正在扫除那些横在提高农村物质福利道路上的行政障碍。这个措施一定会促使各种积累，无论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或社会主义的积累增加起来。但是党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把私人积累当做自己的口号。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容许私人积累，是**为了**便于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口号。也许我们某些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争论。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说，关于“发财吧”口号的问题才是值得争论的，应当把赞成这种口号的文章登载出来让大家争论。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共青团真理报”不是争论性的刊物，它首先是一种把党一致公认的口号和论点提供给读者的正面刊物。◇128◇

总之，无论从形式上或者从实质上来看，都必须认为斯捷茨基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后应当慎重一些。

（二）在斯捷茨基的文章中，有一个地方谈到农村中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是不完全恰当的。从前，说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可以的。现在，当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间的斗

争实际上已经开始并且在激烈展开的时候，说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比较正确的。否则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以外，还有第三条道路。这是不正确的，并且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在斯列普柯夫的“论列宁的遗产”一文中，有一个地方谈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必须同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竞争**，我们认为这也是不正确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提出的是在党的周围培养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教育这种积极分子的问题，这是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现在斯列普柯夫却提出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那些还必须加以培养的非党积极分子竞争的新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同我们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整个运动不相符合的。不应当同这些积极分子竞争，而应当培养和教育他们。

（四）如果“共青团真理报”建立附刊制度，那是很好的。这种附刊可以采取通俗小册子的形式，由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负责写稿，来论述关于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十月革命以及关于同城乡共青团积极分子的实际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各个经济部门和管理部门的问题。这种小册◇129◇子形式的附刊以后可以编成一种共青团积极分子小丛书之类的东西，这对教育共青团积极分子不会没有极重大的意义。

（五）如果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写稿人写得朴实、简洁，并且像**伊里奇**那样尽量不用外来的术语，那是很好的。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用外来语不可，那末可以仍旧用“共青团真理报”附刊的形式附上个外来语小字典，或者至少在文章中做出适当的说明。

约·斯大林

维·莫洛托夫

安·安得列也夫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于莫斯科

第一次刊印◇130◇

问 题 和 答 复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一

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末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就是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131◇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

只有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保证巩固结合的若干措施才能组成这种政策。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

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

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村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到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农业税中◇132◇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做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的重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

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

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

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彻底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133◇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同这些群众背道而驰。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

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国家了。因

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看做一个东西。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134◇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

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堡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已经有了**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二十日领取一大笔钱。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七页）

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等等的周围所组成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着，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臭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

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135◇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巨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都是决不可能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同千百万劳动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

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136◇怀疑的。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二

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

一般说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危险呢？

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是同稳定无关的。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

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

（甲）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

（乙）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丙）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137◇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

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他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绝

无成效的。

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138◇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33〕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

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社会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以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到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假定是多么荒谬了。既然这种假定不能成立，那末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139◇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

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140◇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末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

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141◇

第一、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

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需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第二、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贷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142◇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

第三、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

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143◇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

三

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

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末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则我国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

（甲）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乙）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144◇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丙）贫农，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

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条战线。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考虑到我国工业薄弱和不可能为我国工业获得借款，规定了许多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我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竞争的侵袭，并且能够为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而加快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就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农业税、关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形式、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贯彻计划原则的措施。这一切都是以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业和信贷业的国有化为基础的。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就是说既制止了工业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又制止了农产品价

格的急剧上涨。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因为全体农民要购买工业品，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所以他们总想用尽量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品，用尽量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同时农民还希望完全没有农业税，或者至少把农业税降到最低限度。

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斗争的基础。

国家能不能不采取上述各项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为在目前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我国工◇145◇业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趋于毁灭，使我国变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殖民地，使我们的整个革命遭到失败。

全体农民是不是愿意取消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愿意。因为在目前取消这些措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发展道路。谁敢断言，农民愿意自己贫困，愿意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根本不愿意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联盟的基础。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抬高工业品价格，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工业本身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损害工业本身，使我国工业不可能从昨天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弱植物变成明天应有的坚固强大的工业。由此就产生了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随意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使农民破产，损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危害工业，因为，第一、它会使对工人的农产品供应发生困难，第二、它会完全瓦解和扰乱我们工业的国内市场。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所谓“剪刀差”的运动。你们知道，

这个运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机关或者中央机关，依靠农业税的法律和利用自己征税的权力，◇146◇就可以把这种法律看做某种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捣毁那些力量单薄的纳税者的谷仓，拆掉他们的屋顶，像在唐波夫省某些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会破坏农民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产生了党在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农业税，使这种税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顿我国的整个税收工作，消除那种由于征税而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盖着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减弱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147◇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

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中阶级斗争具有独特的形式一样。

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去。

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148◇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活跃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争取中农和组织贫农，以便减轻基本农民群众的纳税负担，而将税收的主要负担真正转到富农的肩上。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这些措施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对粮食市场施加压力，必要时加以干涉，为了保持劳动群众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而粉碎富农的投机阴谋，这种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你们知道，我们今

年在这方面已经用去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了。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不仅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依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地区保持住了低廉的粮价，而且还迫使许多地区的富农投降，强迫他们把过去的存粮按不高的价格抛到市场上去。

当然，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富农自己会挑起阶级斗争的，他们企图使阶级斗争达到沸点，企图使这种斗争采取匪徒骚扰或暴动的形式，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时挑起斗争的口号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富农的口号，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了。此外，毫无疑问，到那时，富农一定会亲身体验到这一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口号的一切不利之处了。

可见，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

第三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贫农，而首先是雇农；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这一条战线并不像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149◇蔽的。

这里的问题是富农—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减弱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

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

因此，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此。

可见，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问题。

四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有些荒谬的。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仅仅为了达到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称做“鼓动”的某种狡猾手腕的目的，党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就◇150◇是说，党可以提出一些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的口号。这是不是确实的呢？当然不确实。这样的党只能存在一个短时期，然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失掉。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是执行科学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漂浮在政治事变表面上的泡沫。

我们的政府，按它的性质、纲领和策略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和怀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无产阶级的纲领，另一个是别的什么纲领。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不同时是工农政府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政府虽然按它的纲领和工作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但同时又是工农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为由于这个缘故，农民的利益就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即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为苏维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农联盟，是在工农这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来的联盟。

最后，因为在政府机关的成员中，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在工人领导下和工人◇151◇一起反对共同敌人、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农民。

所以“工农政府”的口号就不是一个空洞的“鼓动”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纲领中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问题。

五

某些同志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解释成对农民扩大民主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在扩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扩大。

这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

当然是的。

这种让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于我国宪法范围以内？

我认为这里的让步并不很大，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宪法。

既然如此，我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让步到底表现在哪里呢？◇152◇

我们改变的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村工作方法。我们改变的是农村中阻碍结合工作和妨碍党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那些已经建立的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

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裂开了，那末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任意横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公文往返的手续。结果，就会有使苏维埃从一个同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变成一个同群众背道而驰的机关的危险，而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基础和堡垒，则有悬在半空中的危险。你们知道，党因此不得不设法改选了苏维埃，而改选证明：许多地区的旧的选举方法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应当消灭这种有害的腐朽透顶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

这就是让步的基础，在农村中扩大民主的基础。

这种让步不仅是农民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因为这种让步加强了无产阶级，提高了无产◇153◇阶级在农村中的威信，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大家知道，让步和妥协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

目前这些让步的界限怎样呢？

这些让步的界限已经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34〕作了规定。你们知道，这些界限并不很宽，而且只限于我刚才讲过的那些范围。但这还不是说这些界限永久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巩固，随着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国际地位的加强，这些界限无疑是会扩大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曾经说过，必须“**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苏维埃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三〇页）。可见，这里

所说的把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说的话。从那时起到列宁逝世有五年多的时间。可是，列宁在这段时期内一次也没提到实行这个原理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扩大界限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后，这种时候总会到来的，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预见到将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让步必须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呢？

不，不会改变。◇154◇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即会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呢？

绝对不会，一点也不会。

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削弱，它只是由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作而日益巩固了。由于扩大民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仅保持着，而且还获得新的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造成信任的气氛。要知道，如果就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这就是专政中主要的东西。

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党在苏维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针，会不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

某种恶化呢？

不，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针只会改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红军是暴力的表现，那末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只会改善红军的状况，把红军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我们的军队主要是农民。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155◇的**领导**因素，那几乎用不着怀疑，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只会使无产阶级便于实行这种领导，加强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建设**因素，那也几乎用不着证明，党的新方针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它的实施是为了巩固结合，而没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结论只有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的让步只会加强无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丝毫不会改变我国政权的性质。

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六个问题。

六

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

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35〕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156◇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

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政纲，即勃留恩派的政纲。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主义者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了，他们誓与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主义者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没有同列宁主义者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勃留恩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

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做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作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那末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主义者，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157◇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者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我们就是列宁主义者。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

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了。

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

七

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

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158◇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

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反苏维埃鼓动形成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于白卫分子有利。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159◇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

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末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那末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

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

八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

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是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160◇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大批的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

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党的危险，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培养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个月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发展合作社组织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末要求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161◇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

九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162◇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回答。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163◇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强国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虽然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如果以为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

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164◇能，那末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

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四页至第四五五页）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65◇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而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166◇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末，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167◇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①]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末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168◇“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的

——————————————

① 见本卷第七十五页至第一一二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36〕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里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169◇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

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170◇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推东推西，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地，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十

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171◇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像大战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37〕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8〕，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一般地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

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172◇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

过的话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

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

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是由于“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而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形成和固定起来，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中央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

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的危险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173◇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我们本

身的力量来克服的。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174◇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

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九、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号◇175◇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

从马拉耙犁到拖拉机

丰收的喜悦

年份 项目	1913 年	1920 年	1925 年
农业总产值(%)	100	67	112
种植业(%)	100	64	107
畜牧业(%)	100	72	121
粮食(万吨)	7 650	4 519	7 247
牛(万头)	6 060	5 250	6 210
猪(万头)	2 090	1 750	2 180
工业总产值(%)	102.5	14.10	77.39

一九二五年时的苏联农业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庆祝本科和专科第二届毕业典礼）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在培养党的领导群众的指挥人员方面是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在成立以来的几年内，已经献给党许多支积极工作者的队伍，这些积极工作者正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

现在大学又要将一支由二百十四人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的大学生队伍输送给党，把他们送到工作岗位上去。

为了使这支队伍将要从事的工作在党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任务下收到成效，就必须使这支队伍了解我们环境中在目前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些新情况。

这是些什么情况呢？

第一、我国的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最近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都更加积极了，因此就要求党用新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丧失阶级性的工人阶级了，现在这是完全定形的和健壮的无产者阶级，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提高了，因此就要求党◇176◇实行更灵活更慎重的领导。关于农民也可以这样说。这已经不是旧的农民，不是那些受尽旧日残酷迫害的折磨，唯恐失去以前属于地主的土地，或者受余粮收集制的限制而颓然不振的农民了。这是新的农民，他们在文化上提高了，他们已经忘掉了地主和余粮收集制，他们要求获得廉价的商品和高价出售粮食，并且已经会充分利用党的关于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了。要以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对待现在的农民，这就是现在对党的要求。重新把农民争取到无

产阶级方面来，这就是现在党的任务。

第二、在许多地区，中农同富农联合起来了。这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主要事实。从工农联盟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对农民的领导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完全恢复基本农民群众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在恢复基本农民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完全信任方面进行工作，这就是党和党的工作人员的任务。

第三、最近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由于“面向农村”的口号而渐渐把工人忘记了，他们忽略了在面向农村的同时，我们不能背向城市，首先不能背向无产阶级。这同样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新事实。应当记住，近来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别增长和加强了。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的主人翁感的增长。同志们，这是我们整个工作中最巨大的成就，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感到自己不仅是劳动阶级，而且是领导阶级，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哪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意到无产阶级的这种主人翁感，他就是一点也不了解新环境，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就一◇177◇定会失败。因此，我们在讲到“面向农村”的口号时应当同时记住：工人阶级是负有实现这个口号的使命的基本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真正的领导力量，这个口号才能实现。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终究会懂得：绝对必须用最关心和最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一切需要。

你们这支毕业生队伍的任务，就是要在当地的工作中注意到这一切情况。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让我祝你们在将要从事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胜利。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真理报”第一三二号◇178◇

再 论 民 族 问 题

（关于谢米奇的文章）

现在，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争论以后，谢米奇在文章中表示完全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立场，这一点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俄共（布）代表团和谢米奇之间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争论以前或争论期间不曾有过意见分歧，那是不正确的。看来，谢米奇正是想这样来看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他力图把这些意见分歧归结为误会。但是很可惜，他大错特错了。他在文章中硬说，同他的论战是由“许多误会”促成的，而这些误会是由于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没有被全部翻译过来的”演说所引起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过错是在翻译员，不知为什么这个翻译员没有把谢米奇的演说全部翻译过来。为了维护真理，我不得不声明，谢米奇的这种断言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谢米奇能够从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现在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馆里）中引用一些话来证实他的这种说法，那当然要好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代替谢米奇来完成这个不大愉快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手续。◇179◇

甚至现在，当谢米奇表示完全赞同俄共（布）代表团的立场的时候，他的立场仍然有不少不明确的地方，因此就更有这样做的必要。

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说（见“布尔什维克”杂志〔39〕第七期）[①]中曾经谈到三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一）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问题；（二）关于在当前历史时代民族运动的社会

① 见本卷第五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内容问题；（三）关于国际因素在民族问题中的作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他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分开，因此走上了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的道路。

这样说对不对呢？

请你们读一读谢米奇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能不能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呢？首先从理论上来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里有甲、乙、丙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都表示它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关系的调整上。就是说，这是立宪方面的问题。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民族问题就归结为立宪问题……如果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我们把民族问题◇180◇归结为立宪问题，那就必须说，——我经常强调这一点，——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权是解决立宪问题的条件。我只是在这种看法下提出立宪问题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谢米奇演说中的这一段话。很明显，谁把民族问题看成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谁就不会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反过来说，只有把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分开的人，才会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

在谢米奇的演说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革命斗争就不能争得民族自决权。谢米奇说：“很明显，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这种权利。用议会斗争的方法是不能争得这种权利的，只有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权利。”但什么是“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呢？能不能把“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同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以及争取革命胜利（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等量齐观呢？当然不能。把革命的胜利说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条件，这是一回事；把“革命行动”和“革命斗争”当做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这完全是另一回

事。必须指出，改良的道路即立宪的道路完全不排斥“革命行动”和“革命斗争”。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的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认为是“革命行动”本身，而应当认为是党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动”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务。大家知道，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俄国的孟什维克曾经提议组织“总罢工”，甚至提议组织“武装起义”。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孟什维克。他们当时提议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和组织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是为了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181◇行改良，扩大“宪法”的范围，召集“改善了的”杜马。在保留统治阶级政权的情况下，为了改良旧制度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一回事，这是立宪的道路。为了摧毁旧制度，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的道路，这是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这里是有根本的差别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在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的时候所说的关于“革命斗争”的那些话并没有推翻而只是证实了我的说法，即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因为他没有了解到，不应当孤立地看民族问题，而应当把民族问题和革命胜利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把它看成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我坚持这一点，决不是说我对谢米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有什么新的看法。丝毫没有。曼努伊里斯基同志早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40〕上就已经谈到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

“谢米奇在他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中以及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拉德尼克’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出把修改宪法的斗争作为共产党的实践口号，就是说，他实际上把整个民族自决问题仅仅归结为立宪问题。”（见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九六页至第五九七页）

季诺维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也谈到过这个错误，他说：

“在谢米奇的前途中显然缺少一样小东西——革命”，民族问题是“革命的问题，而不是立◇182◇宪的问题”（见“真理报”第八十三号）。

俄共（布）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谢米奇的错误所提出的这一切意见决不可能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无风是不起浪的。

关于谢米奇的第一个错误即基本错误就是如此。

他的其余的错误都是从这个基本错误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我的演说（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中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①]。

这样说对不对呢？

请你们读一读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谢米奇问道：“南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他接着就答道：“这个社会内容就是塞尔维亚资本同克罗地亚资本和斯洛文尼亚资本之间的竞争。”（见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这里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说成是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183◇竞争的人，不会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现在，当民族问题已经从地方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变成殖民地和从属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

——————————————

① 见本卷第六十一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在民族问题的这种提法下，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疑是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某种场合连重大的意义都没有。十分明显，这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打败或者可能打败另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而在于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帝国主义集团压迫和剥削他们，就促使他们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归结为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就不能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就不能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说成是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这两个公式之间是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的。

谢米奇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末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句话。那里说道：“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显然，他想用这句话来暗示他给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写的，当时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当时马克◇184◇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在他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41〕一文中就说过：民族问题中自决权这个要点已不再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后来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了。既然如此，那末在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

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时候，谢米奇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小册子中的一些话能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有这样的意义：谢米奇离开空间和时间，离开当前的历史环境来引证别人的话，因而违反了辩证法最基本的要求，他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说中说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和十月革命阶段。前一阶段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问题被看做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后一阶段进行的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恐怕谢米奇还没有理解民族问题提法的两个阶段之间的这种区别的用意和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企图不把民族运动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而把它看成各个不同民◇185◇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问题，“是由于他过低估计了民族运动的内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①]。

谢米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也谈到过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谢米奇说，南斯拉夫的农民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是不革命的。他的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见“真理报”第八十三号）

这是不是巧合呢？当然不是！

还是那句话：无风是不起浪的。

最后，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企图脱离国际形势和欧洲可能的前途来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②]。

————————————

① ② 见本卷第六十一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这样说对不对呢？

是对的。因为谢米奇在他的演说中甚至没有间接暗示过下面这一点：在现今条件下国际形势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对南斯拉夫来说尤其如此。南斯拉夫国家本身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帝◇186◇国主义联盟的格斗而形成的，南斯拉夫无法跳出它周围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目前所进行的激烈的角斗，——这些事实谢米奇都没有看到。谢米奇说他完全考虑到可能使自决权问题成为迫切实践问题的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这种说法在现在，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应当认为已经不够了。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在遥远的和可能设想的未来国际形势起某些变化的情况下承认民族自决权问题的迫切性，因为现在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在必要时也可以承认这种前途。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要把因战争和暴力而形成的现在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变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法律根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民族自决问题即根本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是民族纲领的**附加物**，这种附加物将在遥远的未来隐隐约约地出现，或者这个问题是民族纲领的**基础**。很明显，自决权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既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纲领的附加物，**又是**这一纲领的基础。恐怕谢米奇还要继续把自决权看成民族纲领的未来附加物。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把民族问题和一般国际形势问题分开了，因此他的关于自决权的问题即关于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

谢米奇的第三个错误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曼努伊里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谢米奇对民族问题的整个提法的基本前提，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在由多次战争和种种暴**◇187◇**行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内**夺取这个国家。”[①]（见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九七页）

能不能认为这是巧合呢？当然不能！

再说一遍：无风是不起浪的。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
十二两期合刊
署名：约·斯大林◇188◇

关 于 东 方 革 命 运 动

（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布施先生的问题和约·维·斯大林的答复

第一个问题：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最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日本人民愿意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在这个把东方被奴役的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中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但是，日本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有时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这个运动。（例如由于英日同盟，日本曾经在英国镇压印度的起义者时帮助过英国；又如在最近发生的上海事件中，日本同英国、美国、法国一起反对中国的工人。）

在你看来，要摆脱日本人民的民族意向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困难局面，能有什么出路呢？

答：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关心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这是事实。如果日本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结成同盟，这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事业中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样的同盟将标志着庞大的殖民帝国灭亡的开始，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灭亡的开始。这种同盟◇189◇将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驱使日本人民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为解放东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这也是事实。

你问：怎样才能从日本人民的利益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中摆脱出来？

出路只有一条：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俄国曾经有一个时候是东方民族的恶魔，是一切解放运动的宪兵。俄国由解放运动的宪兵变成这个运动的朋友和旗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俄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有了改变。

第二个问题：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东方部族，由于沙皇统治的专制制度而落后了许多世纪，他们只是在革命以后才获得独立发展工业、农业、文化等等的权利。

在你看来，苏联这些东方部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部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答：你问：苏联各东方民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这很难说。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我应当说，一般说来，预测的发展速度向来是不精确的，特别是讲到年数。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基本有利条件，就是像沙皇制度、俄国帝国主义、中央地区对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之类的主要发展障碍都已经扫除了。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苏联各东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但是这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到什么程度，这就要取决于各东方民族本身，并且首先取决于各东方民族在苏维埃革命完成时所处的那个文化发展阶段。◇190◇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苏联各东方民族在目前的发展条件下所具有的迅速而全面发展民族文化的可能性，要比他们在最“自由的”和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有的可能性大得多。

第三个问题：你说，东方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将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日本人民有个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意向和你们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具有共同性？

答：你问：“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有没有共同性？

既然“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是号召同西方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那末在这一点上（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有共同性的。

但是“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不仅包括问题的这一方面。它还包含着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不相容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一、这个口号避开东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似乎认为东方帝国主义要比西方帝国主义好些，因而可以不同东方帝国主义作斗争。第二、这个口号使亚洲工人产生不信任欧洲工人的感情，使前者疏远后者，割断两者之间的国际联系，从而破坏解放运动的基础。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不仅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是反对包括东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这个策略不是要削弱亚洲工人和欧美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而是要扩大和加强这种联系。◇191◇

因此，在“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在东方的策略之间除了共同性以外，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第四个问题：一九二〇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话时，对我提出的“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在哪里比较大，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一问题回答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暂时只能在西方取得胜利。但是要知道，西方是靠东方活命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致富，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武装自己的殖民地，并且教给它们如何进行斗争，这样，西方就亲自在东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你是不是认为，在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日益频繁地发生的事件，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答：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载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〇号◇192◇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

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

答复迟了，非常抱歉。我休假了两个月，昨天回到莫斯科，今天才有机会读到你的信。但是，答复迟总比不答复好。

恩格斯对“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答复，完全反映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前的时代，当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和跃进式发展的条件，因而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条件（大家知道，这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是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同这个规律有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原理，只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被列宁提了出来，而且也只有在那时才可能被列宁提出来。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前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恩格斯很有天才，他也不可能看出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写“共产主义原理”〔42〕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只是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说，列宁这◇193◇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可能不看出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东西。列宁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是把他们分隔开来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别。

根本谈不上“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恩格斯的学说是相同的”。恩格斯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有理由对第十九个问题（见他的“共

产主义原理”）给予否定答复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没有任何理由在二十世纪重复恩格斯的那个已经过了时的旧的答复，并且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新的帝国主义时代机械地应用它。恩格斯根据对他当时所处的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做出了自己的答复。托洛茨基却没有分析现时代，而是撇开了现时代，他忘记了他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他狡猾地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的鼻子按在二十世纪初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的下巴上，显然，他以为可以用这种办法来蒙哄历史。我不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可以作为理由来说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恩格斯的学说是相同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194◇

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问：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后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的稳定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在我们党内经常谈到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资本主义的稳定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某种暂时的缓和，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下一次新的资本主义危机。不管这方面发生什么变化，新的危机总是避免不了的。至于苏维埃制度的稳定，那末这种稳定正在加速发展，正在团结我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和铲除资本主义成分的根子。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成分完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了。

问：西方工会的左倾运动的日益发展，不会引起无产阶级的某个部分离开共产党吗？

答：不，一定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工会的左倾一定会加强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社会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不仅在于甚至并不在于他们控制着社会民主党，而主要在于他们依靠着工会。只要夺走他们的这个支柱，他们就会悬在半空中。工会的左倾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按职◇195◇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开始离开旧的改良主义的领袖，而在寻找新的左派领袖。共产党的错误就在于它们不了解这个有益的过程，它们不但不向社会民主党中的左倾的工人伸出手去，帮助他们跳出泥潭，反而骂他们是叛徒，使得他们离开了自己。应当看到，西方工会的情况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的工会是在党出现以

后，在党已经巩固并且已经在工人中间取得很高的威信以后产生的。我们的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帮助下，由党的力量培植和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党在工人中间的威信大大超过工会的威信的一个原因。我们在西方看到的则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里工会的出现要比工人阶级的政党早得多。在那里还没有党的时候，工会就已经领导工人罢工，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在同资本家作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而且，那里的党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这就是西方的工会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威信要比党高得多的一个原因。不管那里的工会和工会的领袖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毕竟是很明显的：工人都把工会当做他们反对资本家的堡垒。所有这些特点，在揭露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时都必须估计到。恶言谩骂改良主义的领袖，在这里于事无补。相反地，恶言谩骂只会在工人中间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清除不中用的领袖，而是破坏工会。

问：德国共产党在清除“极左派”以后的情况怎样？

答：毫无疑问，清除“极左派”，使德国共产党的情况有了好转。“极左派”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43〕同德国的工人阶级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清除“极左派”，使得共产党◇196◇的新领袖从工人中间涌现出来了。这对德国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好处。

问：苏联是不是由于和德国缔结了公约而拟定了新的方针？

答：没有。我们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我们指靠的是苏联以致苏联在国内外的成就。其他任何方针我们都不需要。不管缔结了什么公约，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一点。

问：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答：是消灭党的工作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而改用说服的方法。对待我国的剥削分子，我们有经过考验的老方法，即强迫的方法。至于对待我国的劳动人民，对待工人和农民等等，我们就应当采用说服

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党的指示和指令是正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问题在于使广大的劳动群众相信这些指令和指示的正确性。问题在于使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相信党的指令和指示的正确性。这就要求党进行巨大而复杂的、灵活而耐心的工作。而这是在目前劳动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

问：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宣传鼓动部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第一、应当注意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第二、应当注意农民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着重指出，工业化是维护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方法，没有工业化，我们的国家就有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的危险。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围绕着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展开工作，因为没有这种结合，就不可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197◇

问：由于党的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的必要性，产生了哪些问题？

答：最近党在数量上的发展是迅速的。这当然很好，因为党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工人阶级对我们党的信任的增长。但是这里也有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就是党的迅速发展使党的队伍的觉悟水平有某些下降，使党的质量有一定的降低。而质量对我们来说，其意义即使不大于数量，也应当不小于数量。要消灭这些缺点，必须使我们的某些同志不再过分迷恋党在数量上的发展，必须制止那种让大批人涌进党来的现象，并且在今后接收新党员入党时必须遵守严格选择的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新党员中间组织紧张的政治学习，把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到必要的水平。

问：现在怎样才能使我们同非党农民群众的联系更有保证：是吸收农民入党还是在党的周围培养非党积极分子？

答：我们既需要前者也需要后者。如果在农村中没有一定数量的、组织在党内的农民，就很难在我们党的周围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如果没有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就更难在农村中建立坚强

的党组织，因为党组织通常是靠那些积极分子建立起来的。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毕竟是更重要的任务。

从党同群众的联系来看，为什么党会强大有力呢？因为它在自己的周围有广大的同情党的非党积极分子。如果党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这些广大的同情党的积极分子，它就不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198◇的领导规律之一。

你们是否记得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万新党员即工人阶级的优秀子弟入党这件史实呢？这二十万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广大的同情我们党的非党工人积极分子的队伍中来的。

因此，非党积极分子是供给党生存和发展的滋养料的基地。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正确的。这对劳动农民来说也是正确的。

问：租让制在扩大工业方面预料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答：列宁早就说过，租让制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成。我们现在有可能根据所掌握的新材料来证实列宁的这个说法。我们现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租让制在我国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租让工业在我国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种比重有变为零的趋势。

第一次刊印◇199◇

论 共 青 团 的 任 务

（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一

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问题提得太一般化了，因此答复也只能是一般性的。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共青团要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支持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无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共青团只有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遵照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指示，才能完成自己的这个总任务。

二

由于取消主义（丧失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民族主义（丧失国际革命的前途）和缩小党的领导等等的危险的存在，即由于“问题和答复”小册子中所指出的那些危险的存在，摆在共青团面前的任◇200◇务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共青团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是要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我们的工农青年。而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这就是说，使青年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第二、这就是说，使青年确信我们的工人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

的产儿，确信它是发展世界各国革命的基地，确信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第三、这就是说，教育青年信任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共青团内培养出一些正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干部和积极分子。

共青团员在一切建设部门中，即在工业、农业、合作社、苏维埃、文化教育机关等等部门中进行着工作。必须使每个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都把自己在各个建设部门中的日常工作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必须使他们善于根据实现这一前途的精神和方向来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

共青团员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着工作。共青团本身好像是一个独特的国际。同时，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共青团的民族成分，而且是共青团直接靠近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队俄共（布）这一事实。国际主义是贯穿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基本思想。共青团的力量就在这里。共青团的威力就在这里。必须使共青团永远充满着国际主义的精神。必须使共青团员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成败是同国际革命运动的成败相关联的，必须使共青团员学会把我国的革命不是看做目的本身，而是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手段和助力。◇201◇

共青团在形式上是一个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这就是说，共青团在形式上是工人和农民的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务就是要保证青年对我们党的信任，保证我们党在共青团中的领导。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共青团员应当记住，没有这种领导，共青团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的任务。

三

现在应当怎样提出发展共青团的问题：应当在基本上继续贯彻吸收全部工人青年、雇农青年、贫农青年以及中农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方针，还是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和教育已经入团的青年群众上呢？

不能说是这样还是那样。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进行工作。必须尽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贫农和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里来。但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共青团积极分子教育新团员上。加强无产阶级核心是共青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共青团走正确的道路。但是共青团不仅仅是工人青年的组织。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组织。因此，在加强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应当进行吸收农民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工作，应当进行保证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农民青年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作。不这样，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就不可能领导农民青年。◇202◇

四

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某些省委员会援引妇女代表会议做例子，着手组织有固定成员的非党农民青年代表会议。这种会议的作用就是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农民青年积极分子，主要是中农青年积极分子。这种立场是不是正确，这里是不是包含着使这种代表会议蜕化成一种可能同我们的青年团对立的非党农民青年团的危险呢？

在我看来，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原因如下：第一、这里包含着某种害怕中农的心理，包含着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的意

向，包含着避开中农青年的企图。这种意向是不是正确呢？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当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而应当使他们接近我们，接近共青团。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中农青年对工人的信任，对共青团的无产阶级核心的信任，对我们党的信任。

第二、毫无疑问，在目前一切农民集团都活跃起来的条件下，共青团内特殊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必然会变成特殊的中农青年团。同时，这个特殊的青年团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把自己同现在的青年团及其领导者俄共（布）对立起来，会把共青团中的农民青年吸引到自己方面去，使共青团有分裂为两个青年团即工人青年团和农民青年团的危险。我们能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呢？当然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需要这种分裂呢？当◇203◇然不需要。恰恰相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使共青团内的农民青年和无产阶级核心疏远，而是使他们接近这个核心，不是使他们发生纠纷，而是使他们结成巩固的联盟。

第三、决不能用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做藉口，来为成立中农青年代表会议辩护。决不能把有自己的特殊组织即共青团的工农青年同没有自己的特殊组织的女工和农妇相提并论，就如同不能把**农民**中的中农青年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的女工混为一谈一样。中农青年代表会议的存在会给青年团造成危险，而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则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危险的威胁，因为目前女工和农妇并没有自己的类似青年团的特殊的固定组织。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共青团内成立特别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是多余的。

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44〕只建议在农村共青团的周围建立像自学小组、农业研究小组等等辅助组织，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五

在我们的条件下，共青团积极分子有没有可能把实际工作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组织和各个共青团员在这方面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种提法稍微发表一点意见。这样提问题，会使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列宁主义又是一回事；以为一个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是列宁主义者。◇204◇但是这种概念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的学说**减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加上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加进去的和必然从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党、关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倾向问题等等）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因此，最好在提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而不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第二、毫无疑问，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甚至没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这个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有信心，就不会认识到这个工作的正确性。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专

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是，在目前共青团积极分子负担过重的条件下，是不是有可能把理论和实践这样结合起来呢？是的，是有可能的。不用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是如此需要，既然没有这◇205◇个条件就不能在共青团内培养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那末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难、只找轻松工作做的懦夫一样。困难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要去同它们作斗争和克服它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学会克服困难，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一定灭亡了。如果共青团害怕困难，它就不成其为共青团了。共青团积极分子担负着伟大的任务。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这就是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如果他们真想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万青年群众的话。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共青团真理报”第一三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206◇

在米·瓦·伏龙芝葬礼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同志们！我不能讲很长时间的话，我的心情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只想说，我们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纯正、最真诚和最无畏的当代革命家。

党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忠实和最有纪律性的领导者。

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勇敢和最明智的我们国家的建设者。

军队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亲爱和最可敬的领导者和缔造者。

这就是党为失去伏龙芝同志而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

同志们！今年对我们来说是可诅咒的。它从我们中间夺去了许多领导同志。但是这还不够，它还要使我们再遭到一次损失。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年轻同志站起来接替老一辈却不是这样容易，也决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相信，我们希望，党和工人阶级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加速培养新干部来接替老一辈。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表达全党为失去伏龙芝同志而感到的悲痛。◇207◇

愿我的简短的演说能够表达这种悲痛，悲痛是无限的，它是不需要用长篇的演说来表达的。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真理报”第二五三号◇208◇

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

我认为在八年前的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和十月革命八年后的目前时期之间虽然有极大的差别，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时期都反映了我国革命发展中的转折点。那时，在一九一七年，问题在于把资产阶级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权。现在，在一九二五年，问题在于把目前的还不能完全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即转变为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那种经济。

在十月革命时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决议的时候，情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欧洲的两个联盟之间进行着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在整个欧洲日益增长，存在着和德国单独媾和以扼杀俄国革命的威胁。这是外部的情况。第二、我们党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前线革命运动高涨，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陷于孤立，存在着发生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威胁。这是内部的情况。

这主要是一条政治斗争战线。◇209◇

这个转折点当时是以工人和农民起义的胜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结束的。

现在，在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八年以后，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国、摩洛哥、叙利亚等等）的革命运动显著增长的情况下暂时达到稳定；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由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日益成长起来，它把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及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使短促的“喘息时机”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这是外部的

情况。第二、我国的工业和合作社日益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已有改善，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的威信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和农民一起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这是内部的情况。

这主要是一条经济建设战线。

目前的转变时期会不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这首先取决于我国建设的成就，取决于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成就，取决于腐蚀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矛盾的发展。

八年前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合起来，中立农民中的中农阶层，利用两个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殊死斗争，推翻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以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加强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推进。

经过了八年，现在的任务是：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同中农在建立巩固联盟的基础上结◇210◇合起来，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加紧发展和加速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吸引千百万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从而保证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核心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和世界各国的无产者以及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建立联盟，以便帮助革命的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

中立中农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以便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正确关系。因为既然列宁所说的**“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45〕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末列宁所说的**“……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45〕②的话也是正确的。

一般地发展国营工业现在已经不够了。何况战前国营工业的水平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本来就不高。现在的任务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我们的国营工业并使它进一步扩展。因为我们的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因为它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基础。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就谈不上把我国变成工业国，谈不上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一般地发展农村的合作社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吸引千百万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和**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存在的条件下，合作社是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211◇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大致就是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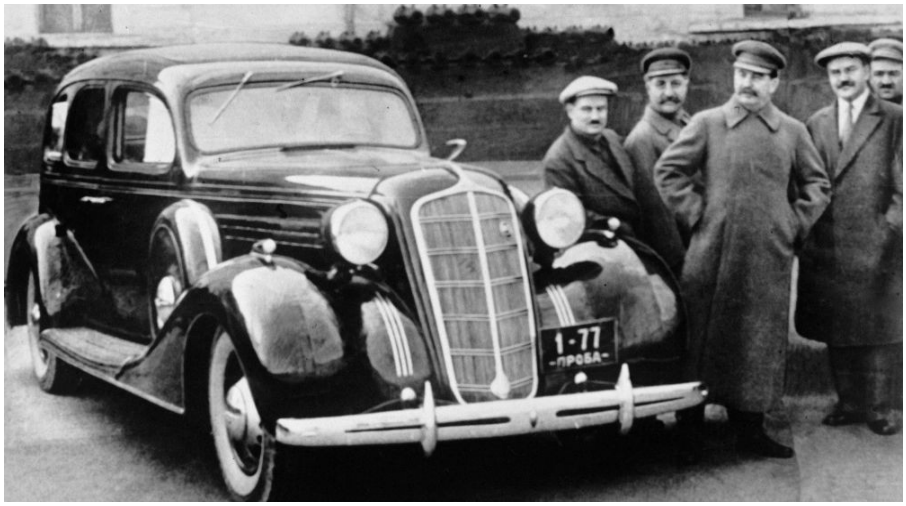
八年前，党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政权，是因为党在执行无产阶级的任务时不怕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不怕它的个别队伍发生动摇，而能够表现出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现在，经过了八年，如果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不怕它所面临的无数困难，不怕它的个别队伍可能发生动摇，而能够表现出过去的那种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党就完全能够保证战胜我们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在执行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时表现出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必需的条件。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212◇

斯大林观看新款轿车



给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47〕

亲爱的同志们！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得到消息，说你们代表会议的某些代表认为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48〕似乎是对付列宁格勒组织的；这些同志似乎还号召列宁格勒的代表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的斗争。如果这些消息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你们作如下的说明。

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是通过了一项关于原则性问题的原则性决议。无论从莫斯科代表会议或者各区代表会议的演说速记记录来看，或者从上面提到的决议来看，都不难令人相信，在莫斯科谁也不想破坏列宁格勒组织的威信，谁也不想号召大家同它作斗争。因此，萨尔基斯、萨发罗夫和其他一些人还在各区代表会议上就开始发表的、以后在你们省的代表会议上又继续发表的演说，使我感到不安。而某些同志最近在你们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号召你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斗争的演说，◇213◇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在目前情况下，列宁主义者的团结，——即使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有某些意见分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只要你们有强烈的愿望，列宁主义者的团结就不仅能够保持，而且能够加强。列宁格勒组织现在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我们党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作为你们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委员，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你们这一切。

列宁格勒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载于一九三四年“红色史料”杂志第一期（总第五十八期）◇214◇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216◇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们！最近两星期以来，你们已经听过好几位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关于中央委员会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报告都是很长的，基本上无疑都是正确的。我认为重复这些报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想这种情况减轻了我在这里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只谈谈有关我党中央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好的。

中央的工作报告通常总是先从外部状况谈起。我不违反这个惯例。我也先从外部状况谈起。

一　国际形势

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已经确立了某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决定了当

前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阶段。有一个时期被我们认为是战后的一个◇217◇短促的喘息时机，现在已经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了。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某种均势和一个“和平共处”时期。

产生这一切情况的根源，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内部的软弱，世界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革命运动的普遍增长，特别是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力量的增长。

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软弱的根源是什么呢？

产生这种软弱的根源，就是那些为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而决定整个国际形势的矛盾，就是那些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克服而只能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进程中被克服的矛盾。

这是一些什么矛盾呢？这些矛盾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矛盾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二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

第三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

第四类矛盾就是各战胜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

最后，第五类矛盾就是苏维埃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

这就是决定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的五类基本矛盾。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些矛盾的本质和它们的增长情形，我们就无法了解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所以，对这些矛盾的简单的论述就必然成为我的报告的一部分。◇218◇

一、资本主义的稳定

这样，我们就先来谈第一类矛盾即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的主要事实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党把这种情况叫做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

下面就是欧洲方面的一些数字。

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同一九一九年比较起来，有的已经在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某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有的处在原来水准上。只有英国还有某些生产部门没有恢复。从整个欧洲来说，生产和贸易基本上在向前发展，不过目前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拿粮食生产来说，英国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法国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德国达到百分之六十八。德国的粮食生产提高得很慢，法国没有提高，英国则下降。这些国家都要靠从美国输入粮食来弥补。一九二五年，英国在煤的产量方面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法国等于百分之一百零七，德国等于百分◇219◇之九十三。在钢的产量方面，英国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八，法国等于百分之一百零二，德国等于百分之七十八。在棉花消费量方面，英国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二，法国等于百分之八十三，德国等于百分之八十一。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四；德国较一九一九年稍有提高，也是入超；法国目前已经超过战前

水准，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二。整个欧洲的贸易水准，拿一九二一年来说，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六十三，而现在，即在一九二五年，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二。这些国家的预算不管怎样是保持平衡的，但这种平衡是靠拚命增加居民的捐税负担来维持的。在个别国家里有通货不稳定的现象，但是一般说来，从前的那种混乱状态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欧洲的一个国家法国在贸易和生产方面已经超过战前水准，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我说的是英国——则还停留在或几乎停留在原来水准上，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

第二、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不是战后危机年代曾经看到的革命来潮时期，而是革命退潮时期。这就是说，夺取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在最近夺取政权的问题，现今在欧洲还没有列入日程。革命浪潮高涨时期，即运动突飞猛进、向上升涨而党提出的口号却跟不上运动的发展的时期，像我国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样的高涨时期还在前面。这样的时期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所处的是暂时退潮时期，是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时期。这个时期，就确定运动的新的形式方面，◇220◇就在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旗帜下的群众性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方面，就建立和巩固西方的工人运动和苏联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方面，就工人运动（比如英国工人运动）左倾方面，就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瓦解及其内部产生深刻裂痕等等方面来说，都能产生重大的结果。我重复一遍，现在我们是处在积蓄力量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未来的革命发动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和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撤职”，像我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间的情形一样。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

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现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主要是北美合众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让我举一些数字来说明。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方面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221◇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

第四、我在上面讲到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主要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达到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举出欧洲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的数字就够了。这个数字至少达二百六十亿卢布。我还不说积欠美国的私人债款，即美国投入欧洲各国企业的资本，这种投资额在欧洲总共达数十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这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这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

第五、因此，欧洲各国为了有可能偿还利息和债款，就不得不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就不得不使工人的境遇恶化。现在欧洲各国的情形正是这样。虽然偿还债款和利息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始进行，可是现在例如英国的税收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已经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

十一增长到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三，法国已经从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一，意大利已经从百分之十三增长到百分之十九。不用说，在最近的将来捐税负担一定还会进一步加重。因此，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这种革命化的征兆无论在英国或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已经出现了。我指的是欧洲工人阶级显然在左倾这一事实。

以上这些主要事实都说明：欧洲各国所达到的资本主义暂时稳定是在腐烂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腐朽的稳定。◇222◇

很可能——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欧洲各国的生产和贸易也会达到战前水准。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因此就一定会达到它在战前所达到的那种稳定程度。那种稳定程度它永远达不到了。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欧洲是以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换得它的暂时稳定的，这就使人民的捐税负担大大加重，使工人的境遇必然恶化，使欧洲各国革命化；第二、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使目前的稳定成为不持久不巩固的稳定的原因，这些原因，我在下面就要谈到。

把我刚才在分析第一种矛盾时所讲的一切情况总结一下，总的结论就是：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

这还不是说，欧洲已经陷入殖民地的地位。欧洲各国继续剥削着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美国的支配，因此它们自己现在也受美国剥削而且将来还会受美国剥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世界进行财政剥削的主要国家的圈子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而被剥削国家的圈子扩大了。这就是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不巩固和内部虚弱的原因之一。

二、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现在来谈第二类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223◇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包括本国知识分子的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以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等等的解放斗争；印度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增长。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摩洛哥、叙利亚、中国）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作家——说殖民地危机的增长应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我应当说，人家把这一点归咎于我们，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遗憾得很，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直接帮助各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必须深入一层地去寻找原因。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必须向美国缴付利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就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

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坏透了。如果说在那方面，在第一类矛盾方面，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局部稳定，无产阶级在最近期间夺取政权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列入日程，那末殖民地危机却已经达到顶点，从许多殖民地中逐走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已经列入日程了。◇224◇

三、战胜国和战败国

现在来谈第三类矛盾即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有以下几点：第一、欧洲在凡尔赛和约缔结以后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战败国阵营（德国、奥国及其他国家）和战胜国阵营（协约国加上美国）。第二、必须指出一种情况，就是各战胜国从前企图用军事占领手段来扼杀各战败国（请你们回忆一下鲁尔问题），现在它们已经放弃这种手段而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即先对德国后对奥国进行财政剥削的方法。道威斯计划就是这种新方法的表现，而这个计划的恶果只是到了现在才表现出来。第三、罗迦诺会议〔50〕表面上仿佛消除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一切矛盾，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任何矛盾（不管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喧嚷），而只是使这些矛盾尖锐化。

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德国不折不扣地向协约国分期偿付约一千三百亿金马克。道威斯计划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这就是德国的经济状况恶化，整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多等等。这个由美国制定的道威斯计划的内容，就是要欧洲各国利用德国所应偿付欧洲各国的赔款去偿还积欠美国的债款，但是德国无法凭空找到这一大笔款项，所以德国就应当获得许多还没有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空闲市场，以便能够从那里汲取新的力量和新的血液来偿付赔款。美国在这里所指的市场，除了一些小市场以外，就是我们俄国市场。按照道威斯计划，这些市场应该让给德国，使它能够榨取一◇225◇些东西来向欧洲各国偿付赔款，而欧洲各国则应当向美国偿还国家债款。这个计划整个是编得很好的，但它是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编制成的，因为它对德国人民说来是双重压榨，即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压榨和外国资本对德国全体人民的压榨。如果以为德国人民会白白忍受这

种双重压榨，那就错了。所以，我认为道威斯计划在这方面必定会导致德国革命。道威斯计划本来是为绥靖德国而制定的，但是这个计划必定会引起德国革命。这个计划的第二部分规定德国应当靠剥削俄国市场来为欧洲榨取金钱，这也是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我们自己要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所以，指望我们会同意把我们的祖国变成受德国支配的农业国，那就是指望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在这方面，道威斯计划是毫无根基的。

至于罗迦诺公约，它不过是凡尔赛和约的继续，它的目的只能是像人们在办外交时所说的那样保持“现状”，即维持德国是战败国而协约国是战胜国这样的现状。罗迦诺会议在法律上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规定把德国的新国界保持下来而使波兰和法国得到利益，德国丧失它的殖民地，这个被绑在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的德国同时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榨取一千三百万亿金马克。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如果从前，在普法战争以后，当时的矛盾焦点之一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成了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那末，试问有什么办法保障这个在法律上确认德国丧失西里西亚、但泽走廊和但泽，乌克兰丧失加里西亚和沃伦省西◇226◇部，白俄罗斯丧失它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丧失维里诺等等的凡尔赛和约和它的继续罗迦诺公约，保障这个割裂了许多国家的领土和造成了一连串矛盾焦点的条约，不会遭到与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割去亚尔萨斯—洛林的那个旧普法条约同样的命运呢？

这样的保障是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

如果说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那末罗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

英国保守党人既想用保持“现状”的办法来对付德国，又想利用

德国来对付苏联。他们不是太贪得无厌了吗？

人们在谈论和平主义，在谈论欧洲各国间的和平。布利安和张伯伦拥抱接吻，斯特莱斯曼满口恭维英国。这一切都不足介意。我们从欧洲的历史中知道，每当缔结关于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条约的时候，总是把这种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在缔结包含有未来战争的因素的条约的时候，总是听到关于和平的叫嚷。在这样的时候，总是有伪善的和平歌手出现。我想起普法战争后的几件历史事实，当时德国是战胜国，法国是战败国，当时俾斯麦千方百计想保持“现状”，即保持在德国打败法国后所确立的秩序。当时俾斯麦主张和平，因为这种和平使他对法国享有许多特权。法国也主张和平，至少在初期即当它还没有从战争失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当大家谈论和平，伪善的歌手歌颂俾斯麦的和平愿望的时候，德国和奥国签订了一个完全和平性的和完全和平主义的协定，这个协定后来就成了未来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之一。我指的是奥国和德国在一八七九年签订◇227◇的协定。这个协定是对付谁的呢？是对付俄国和法国的。这个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听吧：

“鉴于德奥两国的密切合作并不威胁任何国家，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按照柏林条约所确立的原则来巩固欧洲和平，因此两国国王陛下决定缔结同盟和约和互助协定。”

你们听见了吧：德奥两国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而实行密切合作的。这个协定曾经被解释为“和平同盟”，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这个协定是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的直接准备。由于签订了这个表面上是维护欧洲和平而实际上是准备欧洲战争的协定，就产生了另一个协定，即俄国和法国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间签订的协定，——当然也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别的！这个协定里讲的是些什么呢？讲的是：

“法俄两国被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所激励而达成如下协议。”

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这点当时根本没有**公开**说明。但是在协定的秘密条文中规定：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应当派遣七十万军队对抗德国，而法国应当派遣（似乎是）一百三十万军队对抗德国。

这两个协定都被正式称为维持全欧的和平、友谊和安宁的协定。

最后，经过六年以后即在一八九九年召开了海牙和平会议，提出了裁军问题。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根据法俄协定到俄国来拟定战争爆发时调动军队的计划，而俄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则到法国去协同法国将军编制将来对德作战的计划。正是在那个时候，德奥两国的总参谋部共同拟制双方应当共同向它们的西方和东方的邻国进攻的计划和条件。正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一切都是◇228◇在背后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一八九九年的海牙会议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和平，发出了关于裁军的虚伪的喧嚷声。

你们看，这就是极端虚伪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外交，他们竭力用关于和平的叫嚷和歌唱来掩盖准备新战争的活动。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没有理由相信关于国际联盟和罗迦诺公约的歌唱呢？当然没有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既不能相信张伯伦和布利安互相拥抱接吻的玩意，也不能相信斯特莱斯曼的那套恭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罗迦诺公约是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计划，而不是为和平配置力量的计划。

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要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比任何人都卖力，他们硬要工人们相信罗迦诺公约是和平工具而国际联盟是和平救星，布尔什维克不愿加入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反对和平等等。根据上述情况看来，特别是根据我所举的说明在普法战争以后缔结的许多表面上称为和平协定而实际上是战争协定的那些历史考证看来，第二国际的这种种叫嚣究竟说明什么呢？第二国际目前对罗迦诺公约所采取的态度究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第二国际不但是资产阶级腐化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在道义上为凡尔赛和约的一

切不公正规定作辩护的组织。它说明第二国际是一个辅助协约国的组织，它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拥护罗迦诺公约和国际联盟的叫嚣来在道义上为凡尔赛和约—罗迦诺公约所造成的一切不公正情形和整个压迫制度辩护。◇229◇

四、战胜国间的矛盾

现在来谈第四类矛盾即战胜国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虽然美英两国成立了某种联盟，虽然它们两国成立了以反对废除盟国债务的美英协定为基础的联盟，但是我认为英美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现在世界列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石油问题。比如拿美国来说，它的石油产量约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同时它的石油消费量也占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正是在这方面，在世界列强全部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的神经中枢方面，美国随时随地都遇到英国的抵抗。拿全世界两大石油公司——代表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代表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在全世界一切出产石油的地方都在进行斗争。这是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因为石油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谁拥有更多的石油，谁就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指挥地位。谁拥有更多的石油，谁就能指挥世界的工业和商业。自从各先进国家的船只改用马达来发动以后，石油就成了世界列强在平时和战时争夺优越地位的命脉了。正是在这方面，英国的石油公司和美国的石油公司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但是它始终存在着并且微微地燃烧着，这可以从英美间谈判的历史中以及英美间因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冲突的历史中看出来。只要提起尤兹在他任美国外交部长期间关于石油问题向英国提出的多次照会就够了。在南美洲，在波斯，在欧洲，在罗马尼亚和加里西亚那些出产石油的地区，

在世界◇230◇各地都进行着这种明争暗斗。更不必说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样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实了。你们想必知道，这里进行的是暗斗，并且由于美国干得比较灵活，由于美国不采用英国贵族尚未抛弃的那些粗暴的殖民主义的方法，因此它往往能使英国在中国处于窘境，从而把英国排挤出去，为自己开辟一条打入中国的道路。当然，英国是不会漠视这一点的。

我也不多谈法英两国间因争夺欧洲大陆统治权而引起的利害冲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同样明显的是：英法两国不仅在欧洲大陆霸权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在殖民地霸权问题上也发生利害冲突。报刊上已透露这样的消息：叙利亚和摩洛哥进行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不是没有英国参加的。虽然我手头没有文件，但是我以为这种消息不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我也不想谈美日两国间的利害冲突，因为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不久前美国舰队在太平洋举行的演习以及日本舰队举行的演习，就会明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了。

最后，我必须指出一件必定会使大家感到惊奇的事实，这就是各战胜国在大量扩充军备。我说的是战胜国，是战胜国间的矛盾。这些战胜国都称为盟国。诚然，美国并没有加入协约国，但是它曾经同协约国结成联盟打过德国。现在正是这些盟国在拚命扩充军备。它们扩充军备是要对付谁呢？从前，当协约国扩充军备的时候，通常总是以德国为藉口，说它武装到了牙齿，说它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必须扩充军备来保卫自己。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现在德国已经不是一支武装力量，因为它已经被解除武装。但是现在各战胜国扩充军备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比如说，应当怎样解释法国空◇231◇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应当怎样解释英国军备特别是英国海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应当怎样解释美日两国海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这些共同战胜了德国并且共同解除了德国武装的“盟友”先生害怕的是什么，害怕

的是谁呢？他们害怕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扩充军备呢？第二国际的和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第二国际高喊和平却看不见——仿佛看不见——那些曾经正式自称为朋友的“盟国”正在疯狂扩充军备来对付“不存在的”敌人呢？国际联盟和第二国际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制止疯狂扩充军备的行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扩充军备的情况下“枪炮会不开自响”吗？不要期待国际联盟和第二国际的答复吧。这里的问题在于各战胜国彼此间因争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在日益增长和加深，它们之间的冲突日益成为不可避免，而它们既预察到新的战争，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扩充军备。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各战胜国间现在并没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那并没有夸大。现在各战胜国间的情况很像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的情况——武装和平状态。

欧洲各国的执政者现在力图用关于和平主义的叫嚣来掩盖这一事实。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和平主义有多大价值以及它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布尔什维克从热那亚会议召开时起就要求裁减军备〔51〕。为什么第二国际和其他和平主义的空谈家们不来支持我们的提议呢？

这种情况再次说明，欧洲各国用受人奴役的代价换来的那种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是不巩固的，因为各战胜国间的矛盾在日益增长和加深，更不必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的矛盾了。◇232◇

五、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现在来谈第五类矛盾即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主要的一点，就是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存在了。自从苏维埃国家出现以后，自从旧俄国变成苏联以后，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就不再存在了。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必须指出的第一点。

这方面必须指出的第二点，就是现在领导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是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美国即英美联盟。领导对帝国主义不满的国家和同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国家的是我国——苏联。

第三点，就是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并且与此相适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倾向于这两个吸引中心的两种趋向：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英美两国是用它们的财富来吸引人的，从它们那里可以得到借款。苏联是用它的革命经验，用它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为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来吸引人的。我说的是欧洲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向往于我国的趋向。你们知道，到我国来访问对于欧洲的工人或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怎样纷纷来我国访问，全世界的一切忠诚的革命者怎样向往我国。

两个阵营，两个吸引中心。◇233◇

第四点，就是在这个阵营里，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没有一致的利益和团结；那里充满着利害冲突、分崩离析的现象、战胜国和战败国间的斗争、各战胜国本身间的斗争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和利润而引起的斗争。由于这一切，这个阵营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而在我们国家里则有一个健康的日益巩固的稳定；我国的经济在日益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向前推进，在我们整个阵营里，西方和东方的一切不满分子和阶层逐渐地和不断地团结到我国无产阶级周围，团结到苏联周围来。

在资本主义阵营那里呈现着不和与瓦解的现象。在社会主义阵营这里大家在反对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和利益愈来愈趋于一致。

这就是我想在第五类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矛盾方面指出的几件主要事实。

我想特别谈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就是我说的全世界革命者和社会

主义者向往于我国无产阶级的那种趋向。我指的是各国工人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一事实，他们仔细地观察我国建设中的每个角落，以便深信我们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新东西。反映目前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整整一个阶段的工人代表团纷纷来我国访问这一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已经听到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是怎样接待英国工人代表团和德国工人代表团的。你们是不是注意到我们各个管理机关的领导同志不只是向工人代表团的代表们介绍情况而简直是向他们汇报工作？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我因事在外，但是我读到报纸，知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同志不是简单地向德国工人代表团介绍◇234◇情况，而是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我国生活中一种新的、特殊的现象，我们必须予以特别注意。我从报上知道，我国石油工业的领导人——柯秀尔在格罗兹内和谢列勃罗夫斯基在巴库——不是像对一般参观者那样简单地向工人代表们介绍情况，而是像对最高监督机关那样向工人代表团汇报工作。我从报上知道，我们的一切最高机关（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地方的执行委员会都准备向工人代表团汇报工作，认为他们是西方工人阶级派来对我国建设、对我们这个工人国家实行兄弟般的友好的监督的代表。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两件事情。第一、说明欧洲工人阶级——至少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的革命部分——认为我国是他们的产儿，说明工人阶级派代表团到我国来不是因为好奇，而是为了看一看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以及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对于我们在这里所建设的一切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第二、说明欧洲无产阶级中的革命部分把我国认做自己的子女，把我国看做自己的产儿，决心来捍卫它，并且在必要时甘愿为它战斗。你们试指出还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敢于把自己置于其他国家的工人代表团的兄弟般的监督之下！你们指不出这样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只有我们的国家，即工农国家，才能够这样做。我

国既然对各国工人代表团表示最大限度的信任，那末也就能取得欧洲工人阶级方面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在我们看来比任何借款都要宝贵，因为工人对我们国家的这种信任是抵抗帝国主义及其武装干涉阴谋的主要药剂。◇235◇

这就是我们国家和西方无产阶级相互关系上由于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而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那种变化的根源。这就是许多人所没有觉察到而在现在却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既然我们被认定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认定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产儿，既然欧洲工人阶级根据这一点而对我国担负道义上的责任，比如说，在我国一旦受到武装干涉时担负保卫我国免遭资本主义侵犯的任务，担负保卫我国利益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那末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力量正在增长，并且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软弱程度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因为在今天没有工人参加就不能作战。既然工人不愿意对我们共和国作战，既然他们认为我们共和国是他们的产儿，而这个产儿的命运又同他们紧密地联系着，那末要对我国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工人代表团纷纷来我国访问的秘密、根源和意义，这种访问已经进行并且还会进行，这种访问我们应当竭力鼓励，因为这是我国工人和西方各国工人互相团结的保证，是巩固我国工人和西方各国工人间的亲密友谊的保证。

这里不妨简略地谈一谈来我国访问的代表团的数量。不久以前，我听说在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有位同志向李可夫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代表团岂不是使我们耗费太大了吗？”同志们，决不能说这样的话。对于前来我国访问的工人代表团决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说是可耻的。为了帮助西方工人阶级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访问，帮助他们确信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但能够破坏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害怕任何耗费和任何牺牲。西方的工人，至少是他们中◇236◇间的许多人，至今还深信工人阶级非靠资产阶级不可。

这种偏见是西方工人阶级的主要病症，是社会民主党人传染给他们的。为了使西方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确信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怕任何牺牲。为了使西方工人阶级有可能确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国家，他们在西方值得为它战斗，他们值得保卫它而去反对本国资本主义，我们不怕任何牺牲。（鼓掌）

我们这里已经来过三种代表团：知识分子代表团即教师等等的代表团；成年工人代表团，这种代表团粗略地计算一下大约有十个；青年工人代表团。总共有五百五十位代表和参观者到我国来过。曾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登记过的还有十六个代表团，它们不久也要来访问。今后我们还要推动这件事情，以便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西方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从而造成一座屏障以防止任何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腐蚀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矛盾的特征。

从这一切矛盾中究竟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它们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正被许多内部矛盾腐蚀着，这些矛盾使资本主义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却愈来愈联合，愈来愈团结；因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结束了侵犯我国的战争，并且开辟了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阶段。

我还要提到两件事实，这两件事实对我们由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共处”阶段这一转变也有影响。◇237◇

第一件事实就是目前美国不希望欧洲爆发战争。它仿佛对欧洲这样说：我借给了你几十亿，如果你今后还想借钱，如果你不愿意你的通货大大贬值，那你就不要胡作非为，就应该安心工作，赚些钱来偿付债款的利息。未必用得着证明，美国所贡献的这种意见，即使对欧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发生影响。

第二件事实就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起，拥有庞大销售市

场和庞大原料产地的整整一个庞大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当然不能不影响欧洲的经济状况。失去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失去我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对资本主义的欧洲来说，意味着使它的生产缩小，根本动摇它的生产。因此，要消除欧洲资本和我国隔绝的状态，要消除欧洲资本和我国市场以及原料产地隔绝的状态，就必须和我们“和平共处”一个阶段，以便挤到我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里来，——不然，欧洲的经济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程度的稳定。

六、苏联的外部状况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因素，决定了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某种均势，使喘息时期代替战争时期，使短促的喘息时机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使我们有可能像伊里奇所说的那样去和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某种“合作”。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承认”苏联的时期，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而且还要延续下去。◇238◇

我不想列举有哪些国家“已经承认”我国。大国中还没有承认我国的仿佛只有美国了。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在被“承认”后比如说已经和德国及意大利签订了通商条约。我不想详细地谈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已经大大增加，对这种贸易特别感到兴趣的有向我国输出棉花的美国，有输入我国粮食和农产品的英国和德国。可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自从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阶段确立以来，我们今年才开始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纷繁而广泛的贸易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消灭了一切所谓隐讳的事，已经消灭了我国与西方各国间曾经有过而且现在还有的一切所谓要求和反要求。我们知道有人要求我们偿还债款。这点欧洲还没有忘记，大概也不会忘记，至少不是很快就会忘记的。他们对我们说，我国战前积欠欧洲

各国的债款等于六十亿卢布，军事债款估计为七十多亿卢布，这样总数就达一百三十亿卢布。如果估计到通货贬值并且从这个数目中除去边陲国家所应承担的部分，那末我们还欠西欧各国七十多亿卢布。大家知道，我国因在国内战争时期受英法美三国武装干涉而向它们提出的反要求，据拉林计算仿佛是五百亿卢布。这就是说，它们欠我们的债款比我们欠它们的要多四倍。（拉林喊道：“我们一定会取得这笔款子的。”）拉林同志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取得这笔款子的。（笑声）如果我们像财政人民委员部那样更精确地来计算一下，那末至少也能得到二百亿卢布。我们结果还是赢了钱的。（笑声）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容忍这一点，因此我们至今还是被他们列在债务人名单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时总是遇到各种困难和阻碍。过去跟英国谈判时是如此，将来◇239◇跟法国谈判时想必也是如此。

我们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中央的立场还是像同麦克唐纳签订条约〔52〕时所采取的立场一样。

我们不能撤销我国在一九一八年颁布的关于取消沙皇政府所欠债务的著名法令〔53〕。我们还要实行这项法令。我们不能撤销那些已经宣布的使剥夺剥夺者在我国合法化的法令。我们现在实行并且将来还要实行这些法令。然而我们并不反对在过去沙皇政府的债务方面用切合实际的谈判方式对英法两国作某些例外的让步，以便付出少量的钱而换回某些东西。我们并不反对把企业经营权出让给从前的私有者，但是仍然要使这种出让的条件不能是奴役性的。我们是在这种基础上和麦克唐纳达成协议的。事实上取消军事债款的思想是这次谈判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撕破了。是谁撕破的呢？无疑是美国。虽然美国并没有参加拉柯夫斯基和麦克唐纳的谈判，虽然麦克唐纳和拉柯夫斯基共同商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协定草案，虽然这个协定草案使双方都能有出路，使双方的利益多多少少都能得到满足，但

是因为这个草案是以取消军事债款的思想为出发点的，而美国又不愿意破这个例，怕那样做会丧失欧洲欠它的几十亿钱，所以美国便“提出忠告”，结果条约就被撕破了。

虽然如此，我们现在还是以上述草案为立足点的。

从我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中，从报告涉及的时期内发生的问题中，从牵涉到我国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相互关系的那些特别棘手和特别迫切的问题中，我想提出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240◇英国保守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而且还会继续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宣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论在欧洲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都进行着特种宣传来反对帝国主义。英国保守党人硬说，俄国共产党人是一些负有摧毁不列颠帝国威力的使命的人。我想在这里声明，这一切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西方或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各国工人代表团亲自到我们这里来认识我国制度并且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西方各国去。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宣传。这是拥护苏维埃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和最有效的宣传。（鼓掌）

有人说我们在东方进行宣传。我肯定说，这也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的。到我国来住过半年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埃及人，每一个印度人，都有可能深信，我国是唯一了解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意的国家，是唯一能使从前统治民族中的无产者和从前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者彼此合作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宣传，也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鼓动，只要那些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团在我们这里进行研究和考察以后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去就行了。这是最好的一种宣传，是各种各样宣传中最有效的一种宣传。

然而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而且一定会摧毁不列颠帝国。这就是英

国保守党人。这是一种必定会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的力量。只要回忆一下保守党人上台执政〔54〕时所施行的政策就够了。他们是◇241◇从哪方面开始的呢？是从制服埃及、加紧压迫印度、干涉中国等等开始的。这就是保守党人的政策。既然英国贵族没有本领施行别的政策，那末又能怪谁呢？又能责备谁呢？既然保守党人走上这条道路，那末他们必定会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这难道还难懂吗？

关于共产国际，现在我来讲几句话。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和伪造信件的人散布谣言，说共产国际是阴谋家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说共产党人到西方各国去制造阴谋反对欧洲各国的执政者。比如他们说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爆炸事件和共产党人有联系。我必须声明，每一个有文化的人，只要不是一窍不通或是被人收买，都一定会知道，共产党人无论过去或现在与个人恐怖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人无论过去或现在与阴谋陷害个别人物的理论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于组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去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对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任务。只有愚人和白痴才会把阴谋和个人恐怖手段与共产国际对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所采取的政策混为一谈。

关于日本，现在我来讲几句话。在西方，我们的某些敌人洋洋得意地说：看呀，中国境内已经开始了革命运动，这当然是布尔什维克收买了中国人民，不是他们又有谁会收买四万万中国人民呢？而这就一定会使“俄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同志们，这一切都是胡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力量。我们认为目◇242◇前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前美国在统一为一个国家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前德国在形成为一个

国家和实现统一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从前意大利在实现统一和逐走外敌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这里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谁在现在和将来不估计到这一力量，谁就一定要失败。我想日本一定会了解，中国民族运动这一日益壮大的力量，这一不断前进并在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力量，是日本也应该估计到的。张作霖之所以必定灭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的必定灭亡，还由于他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建筑在使苏日两国发生纠纷和关系恶化这个基础上。满洲的任何一个将军，任何一个执政者，要是他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发生纠纷，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恶化这个基础上，他就一定会遭到灭亡。他们中间只有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好转，使我国和日本接近这个基础上的人，才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的将军和执政者才能在满洲坐稳，因为使我国同日本关系尖锐化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才有好处。

七、党的任务

现在来谈谈我们党因外部状况而产生的任务问题。

就党的工作的内容来说，我认为党在这里的任务应该分为两方面，即**国际**革命运动方面和苏联◇243◇**对外政策**方面。

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有哪些任务呢？

第一项任务就是：巩固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使这些共产党争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第二项任务就是：加强西方各国工人为工会的统一，为巩固我们联盟的无产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间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这里也包括外国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的活动，关于这种活动和它的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三项任务就是：巩固我国无

产阶级和各被压迫国家解放运动间的结合，因为各被压迫国家是我们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第四项任务就是：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成分，使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胜利对于世界各国工人革命化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党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的任务时，通常总是局限于前三项任务而忘记第四项任务，殊不知我们在国内所进行的斗争，为使我国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进行的斗争，在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斗争，就其意义来说，也是国际性的斗争即国际主义的斗争，因为我国是国际革命的根据地，因为我国是使国际革命运动扩展的主要杠杆，如果我们这里的建设工作按照应有的速度进行，那就是表明我们在国际革命运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正是像党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进行的。

这就是党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些任务。

现在来谈党在我们联盟的**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

第一项任务就是：反对新战争，维护和平并保持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正常关系。我国政府的◇241◇对外政策是以和平思想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揭穿为准备新战争而采取的一切步骤，揭穿用和平主义幌子来掩盖事实上准备战争的那些步骤，——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掩盖战争准备工作的组织，要加入国际联盟，正像李维诺夫同志所正确说过的，就必须在铁锤和铁砧之间作一选择。然而我们既不愿意成为敲打弱小民族的铁锤，也不愿意成为受强大民族敲打的铁砧。我们既不想当这个，也不想当那个。我们主张和平，我们主张揭穿一切准备战争的步骤，不管这些步骤是用哪种和平主义幌子掩盖起来的。无论是国际联盟或是罗迦诺公约——反正都一样，用幌子是欺骗不了我们的，用叫嚣是吓唬不了我们的。

第二项任务就是：在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和外界的贸易。

第三项任务就是：和那些在帝国主义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国家接近，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最受委屈和分赃最少因而对占统治地位的强国联盟抱反对态度的国家接近。

第四项任务就是：联合附属国及殖民地国家。

以上就是目前党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任务。

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是我国的内部状况和中央委员◇245◇会在同内部状况有关的问题上的政策。我要举出一些数字。虽然近来在报刊上已经公布了不少数字，但是很遗憾，不举出一些数字是不行的。

一、整个国民经济

在没有列举数字之前，让我谈谈决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我想从经济方面谈起）。

第一个原理。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工作和建设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这样来建设我国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

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

有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246◇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要求收缩我国的工业。这条路线不久前在沙宁所写的提纲（也许有人已经在“经济生活报”〔55〕上读过这个提纲了）中得到了反映。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

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

这不是我们的路线。

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

如果革命在德国或者法国取得胜利，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如果那里开始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又是一回事了。那时，我们就会从把我国变成独立的经济单位的政策，转到把我国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总轨道的政策。但是当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绝对必须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

否则就不能保护我国，使我国在经济上不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247◇

这就是第一个原理。

第二个原理。我们在建设中应该像对第一个原理一样奉为指针的第二个原理，就是随时都要估计到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是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那里各个资本主义托拉斯、辛迪加和各个资本家集团所犯的错误，是由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来纠正的。如果生产得太多了，就会发生危机，但是在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又会转入常态。如果输入过多而造成贸易逆差，票据行市就会波动，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入口缩减，出口增加。这一切都是危机发生时的通常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种较为重大的错误，任何一次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生产和需求总量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都不可避免地要由某种危机来纠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是这样生活着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这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因此，我们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的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但是，同志们，很遗憾，既然我们不特别明智，也不特别谨慎小心，又不特别善于正确地领导经济，既然我们不过是在学习建设，那末我们就会有错误，并且将来还会犯错误。因此，我们在建设时应当拥有后◇248◇备，我们需要有能够弥补我们的各种缺陷的后备。我们最近两年来的全部工作表明，我们既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在农业方面，

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的经营管理，而且取决于自然界的力量（如歉收等等）。在工业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的经营管理，而且还取决于我们还没有掌握住的国内市场。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而且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而我国的出口和进口愈发展，我们也就愈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愈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为了保证自己不受这一切意外事件和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影响，我们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

我们在农业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歉收。因此就需要有后备。我们在我国工业发展方面不能保证国内市场不发生意外事件。更不用说我们既然是靠自己积累的资金过活，我们在花费所积累的资金方面就应该特别节省和审慎，尽力做到使每个戈比都用得合理，把每个戈比用到某一时期所绝对必需发展的事业上去。因此就需要有供工业使用的后备。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事件（隐蔽形式的抵制，隐蔽形式的封锁等等）。因此就需要有后备。

本来可以把农贷发放的数目增加一倍，但是这样做就会缺乏必要的后备来资助工业，工业发展就会远远落后于农业，工业品的产量就会缩减，结果就会发生工业品价格高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把用做扩展工业的拨款增加一倍，但是这就会使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我们会因大大◇249◇缺少闲置资金而不能保持这种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就一定会遭到挫折，更不用说缺乏充分的后备来发放农贷了。

本来可以把我国的进口额，主要是设备的进口额比现有的进口额增加一倍，以便迅速地推进工业发展，但是这会引起输入超过输出，造成贸易逆差，使我国金融受到破坏，就是说，使工业能够借以实行计划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受到破坏。

本来可以不管国内市场状况如何，不顾一切地拚命扩大出口额，但是这一定会在城市中引起严重后果，使农产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因

而使工资遭到破坏，发生某种人为的饥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尽量提高工人工资，不仅可以把它提高到战前水平，并且可以把它提得更高些，但是这种情况会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缺少外债、缺少贷款等等的情况下，扩展工业只能依靠积累某些为资助和滋养工业所必需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过快地提高工资，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能有比较大量的积累。

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在我国的建设工作中应该奉为指南，应该当做灯塔的两个基本指导原理。

现在让我来谈谈数字。

不过，我还要离开主题讲一点。我国经济体系中情况有些复杂，整整有五种经济成分。第一种经◇250◇济成分差不多是自然经济的成分，这就是商品产量极少的农民经济。第二种经济成分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成分，在这种成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第三种经济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还没有消灭掉，还在活跃，并且只要我们还实行新经济政策，它还会在一定范围内活跃着。第四种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我们容许它存在并且有可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来加以监督和限制的那种资本主义。最后，第五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工业，即我们的国营工业，在这种成分的生产中没有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

我想简单地谈谈这五种经济成分，因为不这样简单地说明一下，便很难了解我将要宣布的那些数字，很难了解我国工业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况且关于我国制度中的这五种经济成分，列宁曾十分详细地谈到过〔56〕，他教导我们要善于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这几种经济成分间的斗争。

我想简单地谈谈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工业，以便消除党内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误解和糊涂观念。

能不能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生产组织：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另一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不管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何种特殊形式，但是按实质来说它终究应当是资本主义的。伊里奇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所指的首先是租让企业。就拿租让企业来说，那里是不是存在着两个阶级呢？是的，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一个是资产阶级，即从事剥削和暂时占有生产资◇251◇料的承租企业家，另一个是受承租企业家剥削的无产阶级。这里是没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这一点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谁都不敢跑到租让企业中去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因为大家知道，租让企业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干的企业。

再拿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即国营企业来看。这种企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呢？不，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因为企业中生产出来的一切除了支付工资以外，最大部分是用来继续扩大工业，即用来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人会说，如果估计到我国企业管理机关中还存在官僚主义残余，那末这终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同国营工业按类型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这一点并不矛盾。有两种类型的生产：一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其中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存在着两个阶级，那里在为资本家的利润进行生产；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没有剥削，那里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那里企业不是为异己阶级的利润进行生产，而是为全体工人扩大工业进行生产。列宁正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按类型来说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

这里可以拿我们的国家来比拟一下。我们的国家也叫做非资产阶

级的国家，因为它按列宁的说法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并不像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那样为了压迫工人阶级而工作，而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虽然在这个国家的机关中还能找到许多坏分子和旧时代的残余。列宁宣布了我国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了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官僚主义残余。虽然如此，他始终肯定说我们的国家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把国家的类型同国家系统和国家机关中保留下来的那种遗毒和残余区别开来。同样也必须把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残余同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类型的那种工业组织区别开来。决不能因为经济机关或托拉斯中还存在着错误和官僚主义等等，就说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决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说，那末我们这个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能称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了。我可以举出许多资产阶级机关，它们比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得更好更节约。但这还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按类型来说就不高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机关虽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即使它有时不免摇摆不定，但它毕竟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而为无产阶级工作的。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关于国营工业也应当这样说。决不能因为我们国营企业管理机关中现在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有不协调现象和官僚主义残余，决不能因为这些残余和这些缺点存在，而忘记我们的企业按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比如说，在福特的那些工作得不错的企业中，也许偷窃现象要少些，但这些企业终究是在为福特，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企业，虽然有时发生偷窃现象，事情不总是很顺利的，◇253◇但它们终究是在为无产阶级工作。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来谈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数字。

农业。如果拿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水平和战前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相比，则我国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换句话说，在一九一三年出产了一百二十余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的产品，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出产了九十余亿卢布的产品。到下年度，即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根据我们各个计划机关的材料来看，产值将进一步提高到一百一十亿卢布，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农业在日益发展，——这是自然要得出的结论。

工业。如果拿我国全部工业，国营工业、租让工业和私营工业来说，全部工业在一九一三年的总产值为七十亿卢布，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五十亿卢布。这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七十一。我们各计划机关预定，下年度的产值将要达到六十五亿卢布，即约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三。工业在日益发展。它在本年度内比农业发展得更快。

特别有必要指出电气化问题。按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一九二一年的计划规定，在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内应该建成三十个电站，其发电能力总共为一百五十万瓦，费用为八亿金卢布。十月革命以前各电站的发电能力总共为四十万零二千瓦。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发电能力总共为十五万二千三百五十瓦的电站，预定在一九二六年将有发电能力达三十二万六千瓦的发电站发电。如果按这样的◇254◇速度发展下去，那末在十年内，即大约到一九三二年（最低限度的预定期限），苏联的电气化计划就可以实现。电力工业随着电站建设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它的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生产计划预定要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七十。但是，必须指出，建筑巨大水电站的费用竟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例如，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费最初预算“暂定”为二千四百三十万卢布，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却增加

到九千五百二十万切尔文卢布，即等于建造头批电站所花费的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而沃尔霍夫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只等于这批电站总发电能力的百分之三十。捷莫—阿夫恰里水电站的建筑费最初的预算为二百六十万金卢布，但是最近要求的费用约达一千六百万切尔文卢布，并且其中约有一千二百万切尔文卢布已经花掉了。

如果我们拿这样或那样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的生产同私营工业的生产来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占全年工业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三，而私营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三，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七，而是百分之二十点七了。

在这个时期内，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明年度预定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约达百分之八十，而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将减到百分之二十。在绝对数量方面，私营工业是有增长的，但是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增长得更快，所以私营工业所占比重也就逐渐下降了。◇255◇

这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实，它说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对私营工业的优势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如果拿集中在国家手里的财产和私有主所掌握的财产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我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占优势，因为国家拥有的基金总额至少等于一百一十七亿切尔文卢布，而私有主，主要是农户，所拥有的基金总额最多只达七十五亿切尔文卢布。

这一事实说明了，公营经济的基金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这种比重和非公营部分的财产所占的比重相比较，是在日益增长。

而我们整个制度终究是既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为社

会主义制度。我们整个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在这里，就总产值来说，私有主农民的生产还是占优势，但是这里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地增长。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地增长：它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组织性，利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运输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及信贷系统和银行都归我们掌握的事实，利用这一切，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不断向前迈进，开始使私营工业服从它，使其余一切经济成分都适应它并且跟着它走。农村的命运也是这样的：它应该跟着城市走，跟着大工业走。

这就是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提到我国制度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比重问题，私营资本主义工业所占比重问题，以及小商品生产，主要是农民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问题时，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256◇

现在简单地谈一下国家预算。你们大概知道，我国的预算已经增加到四十亿卢布。如果拿战前卢布来计算，那末我们现在的国家预算至少等于战前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一。其次，如果全国预算总额加上可能计算的地方预算额，那末我们现在的国家预算至少等于一九一三年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家预算结构中的非税收部分的比重大大超过税收部分的比重。这一切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在日益发展和向前迈进。

关于我们去年从我国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营企业方面所获得的利润问题，是有极重要意义的，因为我国是资金不足的国家，是得不到大批外债的国家。我们应该仔细地考察一下我国的工商企业、银行和合作社，以便知道我们能够用多少资金来进一步扩展我国工业。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国意义的国营工业和金属工业总局似乎提供了约一亿四千二百万切尔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七千一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们已经获得三亿一千五百万卢

布的利润，按计划规定，其中有一亿七千三百万缴入国库。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国意义的国营商业提供了约三千七百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一千四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五年度，由于实行了降低价格的政策，我们所获得的利润较少，即获得了二千二百万卢布，其中约有一千万将缴入国库。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获得了二千六百多万卢布的利润，其中约有一千七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五年度，对外贸易将要提供，正确些说是已经提供了四千四百万卢◇257◇布，其中有二千九百万缴入国库。

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计算，各银行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四千六百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一千八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提供了九千七百多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五千一百万缴入了国库。

消费合作社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五千七百万卢布的利润。农业合作社提供了四百万卢布的利润。

我刚才举出的这些数字，是多少估计低了些的。原因你们是知道的。你们知道，我们各个经济机关在计算时，总是考虑给自己多留一点来扩展业务。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数字小（这些数字确实是小），那你们就要估计到，它们是稍微估计低了些的。

现在简单谈谈我国的对外贸易额。

如果以我国一九一三年度的全部贸易额为一百，那末我国对外贸易额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达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出口额为五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进口额为四亿三千九百万卢布，进出口总额为九亿六千一百万卢布，出超八千三百万卢布。我国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发生贸易顺差。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出口额为五亿六千四百万卢布，进口额为七亿零八百万

卢布，进出口总额为十二亿七千二百万卢布，入超一亿四千四百万卢布。本年度我国对外贸易逆差是一亿四千四◇258◇百万卢布。

关于这一点，让我稍微说明一下。

有些人讲到本经济年度的这种入超的时候，往往爱说是由于我国在这一年遭到歉收而输入了许多粮食的缘故。但是我们只输入八千三百万卢布的粮食，而入超却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卢布。这种入超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买得多卖得少，输入多输出少，因而我们的收支情况发生了问题，我们的金融也发生了问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示说，党无论如何要做到贸易顺差〔57〕。我应当承认，我们大家，无论苏维埃机关或是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执行党给我们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抓紧点，至少还是可以得到某些出超的。我们既然犯了这个严重错误，代表大会就应该加以纠正。顺便说一句，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今年十一月的专门会议上已经竭力设法纠正了这个错误，当时中央委员会在审查了我国进出口的数字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我们在下年度——在会议上我们已经草拟了我国下年度对外贸易中的基本项目——对外贸易至少要有一亿卢布的出超。这是必要的。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资本很少，又没有从国外输入的资本，就是有，为数也极少，我国的收支要依靠贸易差额来维持平衡，才能使我国切尔文货币不致有涨落，才能使我们的金融稳定，从而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展我国工业和农业。你们大家都曾尝过金融不稳定的滋味。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倒霉的事情重新出现，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根除一切在今后可能使我国金融陷于不稳定的因素。◇259◇

关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关于工业和农业这两个部门，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对其他各种经济所占的比重，以及关于我讲过的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思想等等方面的数字和意见就是这样。

二、工业和农业

如果再拿直接关系到工业和农业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相互关系的各个问题考察一下，那末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

第一、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工业的基本状况是：它已经接近战前的水准，工业继续前进的步骤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扩展工业，利用新设备和建设新工厂。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跨过这道门槛，即从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工业中原有的一切的政策，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和在建设新工厂的基础上建设新工业的政策，是需要大量资本的。但是我国资本很不足，所以将来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大概不会像迄今以前那样快。

农业方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决不能说，农业在它现今的技术基础上所蕴藏着的一切潜力都已经挖掘尽了。农业不同于工业，它在现今的技术基础上也能迅速发展一个相当时期。单是把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一下，单是实行净种这样的办法，就能把农业的总产值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你们计算一下，这对全国有多大意义。可见，农业中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暂◇260◇时还没有遇到像我国工业所遇到的那种技术方面的困难。因此，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在今后几年内还会继续加剧，因为农业中还蕴藏着许多潜力，这些潜力还远没有利用，在最近几年内应该加以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无论如何要发展我们的国营大工业，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其次，就是要发展苏维埃**地方**工业。同志们，我们决不能只集中力量发展全国性的工业，因为全国性的工业，我们的集中化的托拉斯和辛迪加，不可能满足一亿四千万人民各种不同的口味和需求。

为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必须使每个区、每个专区、每个省、每个区域、每个民族共和国的生活，即工业生活沸腾起来。如果不发挥各个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潜力，不尽量帮助区和专区以上的地方工业，不发挥所有这些力量，我们就不能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达到像列宁所说的普遍高涨。不这样做，不把中央的利益同各个地方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就不能解决发挥建设的主动性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我国经济普遍高涨的问题，不能解决尽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第二、从前在燃料方面的问题是它的生产过剩。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却是燃料的危机，因为我国工业比燃料增长得更快。我们将接近我国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那种水平，当时我们由于燃料不够而不得不输入燃料。换句话说，就是燃料的产量和工业的需求量不相适应。因此，任务就是加紧发展我国的燃料业，改进燃料的开采技术，以便使燃料业的发展赶上或者说使它能够赶上工业的发展。◇261◇

第三、金属的产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需求量也有些不相适应。如果计算一下最低限度的金属需求量和最高限度的金属出产能力，那就可以看出我们还缺少价值数千万卢布的金属。我国的经济，特别是我国工业，决不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予以特别注意。金属是我国工业基础的基础，所以金属产量必须同工业和运输业的需求量相适应。

第四、我国熟练工人的数量和我国工业的需求量是不相适应的。报刊上已经公布过许多数字，因此我不想再列举这些数字，我只指出一点：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全部工业需要补充的熟练工人是四十三万三千人，而我们却只能提供这个需求额的四分之一。

第五、我还要指出一个缺点和一个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是各铁路上的车辆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一切限度。对于车辆的要求是很高的，明年机车和车厢的利用率不能只是百分之一百，而是必须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这样，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固定资本就会损耗过

度，我们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那在最近的将来灾祸就会临头。

以上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内部，特别是工业内部所存在的必须加以克服的缺点和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商业问题

现在让我来谈谈商业问题。数字表明，这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国营部分和私人资本主义部◇262◇分相比较，它的比重是向上增长的。如果认定战前的国内商业流转总额按商品卢布计算是二百亿卢布，那末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这项流转总额就是一百亿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是一百四十亿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国内商业流转额的总的增长是不用怀疑的。如果讲到国营部分在全部国内商品流转中所占的比重，那末它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百分之四十五，合作社部分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九，私人资本部分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国营部分的比重则为百分之五十，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七，私人资本部分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三十五，而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九了。私人资本部分在全部流转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则日益增长。如果把流转分成两个部分，即分为批发和零售，那末这里也有同样的趋势。在批发方面，国营商业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全部流转中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二强，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九。比重的增加是很明显的。合作社部分已经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九。私营商业在上年度占百分之二十一，现在只占百分之十一。在零售方面，国营部分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六，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部分上年度在零售方面的比重为

百分之二十五点九，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九。比重的增加是毫无疑问的。私人资本部分在零售方面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百分之五十七，现在则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在零售方面我们显然已经跨过门◇263◇槛。上年度在零售方面是私人资本占优势，本年度则已经是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占优势了。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原料和粮食收购方面的比重增长情况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在油子方面占百分之六十五，在亚麻方面占百分之九十四，在棉花方面几乎占百分之百，在粮食方面，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占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百分之七十。这方面我们有了某些下降。整个来说，在国内商业中，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无论在批发方面或零售方面显然都有增长。

虽然国营商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比重占了优势，但终究还是比去年少些，这个事实说明了在粮食收购中犯了错误。问题在于，收购工作的过错不仅是苏维埃机关的过错，而且也是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因为中央委员会应该监督苏维埃机关，它对苏维埃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要负责。这个过错就在于我们在做计划时没有估计到今年的市场情况和收购条件已有新的变化，同去年和前年有所不同。今年是我们在粮食市场上不采用行政压制手段的头一年，是我们把赋税的重担和赋税的压制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头一年，是农民和政府的收购机关以平等的身分在市场上直接接触的头一年。我们的计划机关竟没有估计到这些情况，而想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就能收购全年应当收购的全部粮食的百分之七十。我们没有估计到，农民也会耍手腕，他们会把自己值钱的货物即小麦留下，等待价格继续提高，而宁愿暂时把其他不很值钱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一点我们没有估计到。因此只好修改收购计划和缩减粮食的输出计划，同时也相应地缩减输入计划。现在正在重新审订进出口计划，计划中应该◇264◇规定最低限度要有一亿卢布的出超，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最后制定好。

四、各个阶级，它们的积极性和相互关系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工人阶级丧失阶级性的状况早已成为过去了。工人阶级在迅速地恢复和增长。请看下面这些数字：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截至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如果把包括小工业在内的各种工业中的全部工人，连同季节工人和农业工人合在一起计算，则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一百万雇农、七十六万失业者。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工人总数已达七百多万，其中有一百二十万雇农和七十一万五千失业者。工人阶级的增长是毫无疑问的。

在全部工业中，每个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按切尔文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三十五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五十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个别部门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每个工人每日的平均实际工资（按商品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零点八八卢布，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一卢布二十一戈比。在全部工业中，每人每日的平均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为四点一八卢布，而在一九二五年则为六点一四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拿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逐月的对比关系来看，那末可以看到它们是在并列前进：工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六月和七月，工资在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却◇265◇比工资增加得少些。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假期，并且工厂里来了新的工人阶层即半农民。

现在来谈**工资**基金问题。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来看，工资基金（我指的是工业，而不涉及其他部门），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八亿零八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十二亿多卢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十七亿卢布。

同志们，我不想谈**社会保险**基金的用途，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让我举出一个总的数字，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无产阶级国家究竟在工人保险事业上花费了多少钱。受保险的工人总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六百七十万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七百万人。从企业工资基金中拨充保险费的平均数额，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百分之十三点八四。拿经费的总数来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卢布。再说明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就是在去年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还有七千一百万卢布存放在社会保险基金会里。

在农民方面，农产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农民物质状况得到改善。从我们计划机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高于城市居民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农民已经吃得好些了，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无产阶级国家对贫苦农户的帮助，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帮助，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初步的不完全确切的统计，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对贫农财政上的帮助是一◇266◇亿至一亿零五百万卢布，其中减免的税款和保险费约六千万卢布，歉收灾害救济金二千四百万卢布，贷款一千二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年，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救济包括了计有七百余万人口的地区。在这方面总共花了一亿零八百万至一亿一千万卢布，其中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有七千一百万卢布，由社会组织筹集和银行机关发放的有三千八百万卢布。此外，筹集了七千七百万卢布的防旱基金。无产阶级国家对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的帮助就表现在这些地方。当然，这种帮助还是不够的，但这种帮助终究是值得我们简单地谈一下的。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状况的改善，是我国建设事业得以向前进展的必不可少的主要前提。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前提。

现在简单地谈谈群众积极性的提高。我国内部状况中引人注目而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就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物质状况的改善而提高了，他们开始更多地批评我们的缺点，更大声地说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了。我们已经进入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集团活跃的时期。工人阶级活跃起来了，农民和他们的各个集团都活跃起来了，新资产阶级、它在农村中的代理人（富农）和它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也活跃起来了。这一事实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反映的我们政策上的转变的基础。活跃苏维埃的政策，活跃合作社和工会的政策，在确定租佃问题和雇佣劳动问题上对农民让步，物质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消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这就是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的主要表现。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你们是知道得很清◇267◇楚的。当时，在农民中间普遍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某些地方甚至企图举行暴动。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

这就是党在群众积极性已经提高和他们各个组织已经活跃的时期对农民所采取的政策的基础，采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调整农村中的关系，提高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并保证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你们知道，这个政策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五、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口号

我们采取联合中农的方针是否做得正确呢？这个新方针的原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某种指示呢？

人们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在夺取政权的时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只有贫农，而中农只能使他们中立。这对不对呢？对。列宁起草这个决

议〔58〕时指的是夺取政权的党。而我们的党已经是执政的党了。差别就在这里。在农民问题上，在工人同农民或者同个别农民阶层结成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主义提出了适合于革命三个时期的三个基本口号。全部问题在于，要正确地掌握住由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由第二个口号过渡到第三个口号的时机。◇268◇

以前，当我们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最初拟定自己对农民的策略的时候，列宁说过：联合**全体**农民去反对沙皇和地主，中立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我们当时是以这个口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我们胜利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后来，当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即进入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适合新情况的新口号：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去反对全体资产者，**中立**中农。这是进行夺取政权的各国共产党所必须采取的口号。甚至在它们已夺得了政权但是还没有使政权巩固的时候，它们也还不能指望同中农结成联盟。中农是一种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他们在观望谁会获得胜利，他们在等待，只有在你赶走了地主和资产者而获得胜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同你结成联盟。这就是中农的本色。因此，在我国革命第二阶段，我们采取的已经不是工人**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而是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了。

以后又是怎样呢？以后，当我们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而使政权十分巩固，并且已经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第三个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个口号是适合我国革命新时期即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因为现在可以指靠这个联盟，而且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应该在农村中利用的不只是数百万人，而是数千万人。否则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城市。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69◇

列宁主义关于同农民联盟的几个口号就是如此。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你在夺取政权或者还没有把已经夺得的政权巩固起来的时候，你就只能指望同贫农结成联盟而中立中农。但是，当你自己已经巩固了，已经夺得了政权，已经开始建设，并且已经应当利用数千万人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口号了。

这个从“无产阶级联合贫农”的旧口号，从中立中农的旧口号过渡到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口号，早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让我从伊里奇在那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援引一段话。下面就是这段话：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①〔59〕]。◇270◇

这就是党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所持的理论基础。谁想拿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推翻列宁所说的这段话，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问题的理论方面就是如此。我们不要抓住个别部分，而要全面地领会列宁的学说。列宁对农民问题提出过三个口号：一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另一个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口号，第三个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的口号。谁想用某一个总的口号来代替这三个口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谁就要犯极严重的错误。

问题的理论方面就是如此。而问题的实践方面却是这样：在我们实现了十月革命，赶走了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很明显，我们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已经使俄国多少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在农村中占了多数，虽然那里存在着分化过程。

分化过程当然是存在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现阶段上，情况不能不是这样。但是分化过程是缓慢的。不久以前，我读过两本手册，一本似乎是由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另一本如果我没有弄错，是由列宁格勒组织的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如果相信了这两本手册，那就会得出如下的情况：在沙皇时代，我国的贫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在沙皇时代，富农约占百分之五，而现在则占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在沙皇时代，有若干中农，而现在则少了一些。我不愿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我必须说，这些数字比反革命还要坏。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虑问题的人怎么能开这◇271◇种玩笑，并且还把它刊印出来，还刊印在手册上呢？我既然是一个中央委员，当然也要对这种前所未闻的谬误负责。既然在沙皇时代实行了培植富农的政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集中（它特别加剧了分化过程），既然当时的政府是竭力促进分化过程的政府，而贫农终究不过是百分之六十，那末，在我们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不存在，就是说土地已经禁止买卖，因而存在着阻止分化的障碍，而且我们实行过一两年剥夺富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剥夺富农的一切方法，我们实行着一种阻碍分化过程的特殊的信贷和合作化政策，——试问，在有这种种障碍的条件下，我们这里的分化过程怎么还会比沙皇时代更加剧烈？富农和贫农怎么还会比以前更多呢？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呢？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笑声）

关于中央统计局在六月公布的那个倒霉的谷物饲料平衡表，也可

以这样说。根据这个平衡表来看，富裕农民的商品余粮似乎占百分之六十一，贫农一点也没有，而中农则占有其余的百分数。可笑的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中央统计局又公布了另一种数字：不是百分之六十一，而是百分之五十二。在不久以前，中央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已经不是百分之五十二，而是百分之四十二了。难道可以这样计算吗？我们相信中央统计局是科学的堡垒。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任何一个管理机关都不能进行计算和计划工作。我们认为中央统计局应该提供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客观材料，因为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的企图是一种带有刑事性质的犯罪行为。既然如此，如果中央统计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数字，那末人家又怎能相信它的数字呢？◇272◇

简单地说，既然我们由于实现土地革命而已经使农村中农化，既然尽管有分化过程发生而中农在农村中仍占多数，而我们的建设工作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都要求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这个事业，那末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政策了。

这就是问题的实践方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是怎样规定我们的任务的。我手头有列宁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大纲，他在这个大纲中明确地提出了基本的领导路线。“现在增加农产品成为（已经成了）**关键**和**枢纽**……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

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列宁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就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决议和那些对农民让步的办法，就是以这个思想为依据的。

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在十月一致通过（正如它一致通过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一样）的关于贫农工作的

决议〔60〕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摆在我们中央十月全会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防止我们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所制定的那个政策即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遭◇273◇到破坏，所以要防止这个政策遭到破坏，是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情绪，认为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情绪，认为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似乎是忘记了贫农，似乎有谁在力图越过贫农来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同志们，这是愚蠢的，但这是事实，因为这样的情绪是有过的。当我们参加十月全会的时候，贫农问题对于我们是不是什么新东西呢？当然不是。只要贫农还存在，我们就应当同贫农结成联盟。这一点我们从一九〇三年列宁的小册子“告贫农书”〔61〕最初出版时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我们在农村中就应当依靠贫农。难道还有谁可以依靠吗？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无论在四月或十月，无论在代表会议上或在中央全会上，对我们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并且也不可能是什么新东西。如果贫农问题终究提了出来，那是由于我们在改选苏维埃时积累了一些经验的缘故。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当时苏维埃活跃起来了，苏维埃民主开始建立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苏维埃民主——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领导。要知道，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任何苏维埃民主都不能称为真正苏维埃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民主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农村中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由谁来担任呢？应该由贫农的代表来担任。而在我们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的时候，贫农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他们当时是处在极端涣散的状况下。当时不仅某些贫农分子，而且某些共产党员也认为我们摒弃剥夺富农的政策和行政压制手段就是摒弃贫农，就是忘记贫农的利益。他们不去同富农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却很◇274◇不体面地诉起苦来了。

要克服这种情绪应该怎样做呢？第一、应该完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向党提出的任务，就是说，应该规定以物质援助贫农的条件、方式和方法。第二、需要提出成立专门的贫农组或贫农团的口号，以便在选举苏维埃和选举合作社时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来争取中农和孤立富农，如此等等。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所写的关于贫农工作的提纲中正是这样做的，这个提纲是他在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进行了三个月的工作以后写成的，并且已经由中央十月全会一致批准了。

由此可见，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是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直接继续。

在当时，第一、应当具体提出物质援助问题，以便改善贫农的物质状况，第二、应当提出组织贫农的口号。这种新东西完全是属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成立贫农团的口号就是他的思想。

为什么需要提出成立贫农团的口号呢？其所以需要，是为了消除贫农的涣散状态，并使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员帮助下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进行反对富农和争取中农的斗争的有组织的支柱。贫农还有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术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绪和依赖心理应该从贫农意识中清除出去。应当对贫农提出口号，以便使他们终于自立起来，使他们在共产党和国家的帮助下组织成一个集团，使他们在苏维埃舞台上，在合作社舞台上，在农民委员会舞台上以及在所有一切农村社会团体舞台上学习同富农作斗争，但不是用请求国家政治保术局帮助的方法进行斗争，而是用政治斗争的◇275◇方法，用有组织的斗争方法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锻炼贫农，只有这样才可以组织贫农，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贫农由一个依赖他人的集团变成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

这就是我们在十月提出贫农问题的原因。

六、农民问题上的两种危险和两种倾向

我们党内关于农民问题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轻视富农危险的倾向，另一种是夸大这种危险的倾向，即轻视或低估中农作用的倾向。我并不认为这两种倾向对于我们有什么致命的危险。倾向总是倾向，倾向是某种尚未成形的东西。倾向是错误的开始。或者我们让这种错误发展下去，那末事情就会不妙；或者我们把这种错误根除，那末危险就会消灭。倾向是某种错误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制止它，那它以后就会带来恶果。

现在简单地谈谈关于低估富农危险的问题。人们在谈论富农倾向。这当然是愚蠢的。在党内决不能有富农倾向。问题不是富农倾向，而是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即使还没有人成为这种倾向的牺牲品，还没有人站在这种倾向的立场上，但这种人反正是会出现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发展是向着容许资本主义某些活跃的方面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的活跃不能不在党的周围引起混乱。另一方面，我们这里发展着社会主义工业，在社会主义工业同私人资本之间进行着斗争。谁超过谁呢？现在的优势是在社会主义成分方面。我们将使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家都受我们的支配。但是目前的事实还是这◇276◇样：富农在发展着，我们在经济上还远没有把他们打垮。富农无疑是在聚集力量，谁不注意到这一点，说这是小事，说富农是个吓人字眼，谁就是使党在危险的面前失去警惕性，使党在同富农作斗争中，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中陷于被解除武装的地位，因为富农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代理人。

有人讲到鲍古舍夫斯基。他当然没有富农倾向。他有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如果他有富农倾向，那就应该把他开除出党了。但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要求把他开除出党。他这种倾向是低估农村中的富农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党不能保持在经常的战斗

准备状态中，并且在党同资本主义分子斗争时解除党的武装。大家知道，这种倾向受到了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斥责。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夸大富农危险的倾向，即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慌慌张张地喊叫“富农来了，救命！”。真是咄咄怪事！人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就知道新经济政策会使资本主义活跃起来，会使富农活跃起来，知道富农一定会抬起头来。可是当富农一出现时，他们就开始大叫“救命”而张皇失措了。他们竟慌张到把中农都忘记了。但是现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却是争取中农，使中农脱离富农，用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办法来孤立富农。而那些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的同志却把这点忘记了。

我认为如果要追究这两种倾向的根源，那末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几个出发点。

第一种倾向就是轻视富农和农村中所有资本主义分子的作用，抹杀富农的危险。这种倾向的出发点就是不正确地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不会使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活跃起来，认为我国富农和◇277◇所有资本主义分子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了，认为在农村中不会发生分化过程，认为富农是过去的回声，是吓人的字眼，如此而已。

这种倾向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事实上，这种倾向会引导到否认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第二种倾向就是夸大富农和农村中所有资本主义分子的作用，在这些分子面前张皇失措，否认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适当的。

这种倾向的出发点，就是认为现在我们农村中似乎在单纯地恢复资本主义，认为这种恢复资本主义的过程是把我国合作社也全部或绝大部分包括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认为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使大批农民的分化过程不断加剧，认为两个极端集团即富农和贫农一定

会逐年加强和增长起来，认为中间集团即中农也一定会逐年减弱和被冲刷。

事实上这种倾向是要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要恢复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富农的政策，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这样也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也就是要否认列宁的那个主张吸引千百万农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的合作化计划。

你们要问：哪一种倾向坏些？不能这样提问题。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鼓掌）虽然这两种倾向都坏，虽然提出它们中间哪一种倾向更危险些的问题是愚◇278◇蠢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应该用来对待这两种倾向的观点。党同哪一种倾向作斗争最有准备，是同第一种倾向还是同第二种倾向呢？这是实际上需要提出的问题。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都是坏的，决不能说它们中间哪一种要危险些，但是说党同哪一种倾向作斗争最有准备，则是可以的并且是应该的。如果有人向共产党员提出问题说，究竟党更有准备的是剥夺富农，还是不这样做而去同中农结成联盟呢，我以为，在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人会说，党最有准备的是这样的口号：打击富农。只要让他们干，那他们一下子就会把富农剥夺干净。至于不要剥夺富农，而要实行较为复杂的经过同中农联盟来孤立富农的政策，那他们就不那么容易领会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党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还是应该集中火力反对第二种倾向。（鼓掌）任何马克思主义，任何列宁主义，都不能掩盖富农是有危险的这一原理。富农总是富农。无论鲍古舍夫斯基怎样硬说富农只是吓人的字眼，但富农总是有危险的。这一点无论你用什么引证也不能把它从共产党员的意识中消除掉。至于必须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原理，那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些关于列宁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抹杀和遮盖的，因为伊里奇在第二次代表

大会决议中写的是中立中农。在这里，有着可以运用引证的广大地盘，在这里，每一个想搅乱我们党的人，每一个想对党隐瞒真相的人，即想隐瞒列宁对农民问题不止提出一个口号而是提出过三个口号这一真相的人，都有广大的活动地盘。在这里，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作种种篡改。正因为如此，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第二种倾向。

关于苏联的内部状况，即关于苏联的经济，关于工业和农业，关于各个阶级，关于各个阶级的积◇279◇极性，关于活跃苏维埃，关于农民问题等等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不来谈某些有关国家机关的问题了，国家机关在不断增长并力图脱离党的领导，当然这是办不到的。

我也不来谈我们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我所以不谈，是因为我的报告拖得太长了。我所以不谈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对党说来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七、党的任务

现在我来谈谈党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

我们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进一步增加国民经济的产值；

（乙）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丙）在国民经济中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优势；

（丁）保证苏联国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具有必要的独立性；

（戊）增加非税收部分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在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加速资金

周转的基础上扩展我国社会主义◇280◇工业；

（乙）使燃料和金属的产量以及铁路运输的固定资本的数额适应于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

（丙）加紧发展苏维埃地方工业；

（丁）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发展技术作物，实行农业工业化；

（戊）通过普遍合作化和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办法，吸引分散的农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商业**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进一步扩大和在质量上改进商品运销网（各种合作社和国营商店）；

（乙）最大限度地加速商品流转；

（丙）降低零售价格并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私营商业的优势；

（丁）在一切收购机关中建立统一战线并规定严格的收购工作纪律；

（戊）加强对外贸易，保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保证收支顺差，因为这是保持通货稳定的最必要条件和避免通货膨胀的必要保证。

在**计划**方面应当按照必须保证必要后备的方向进行工作。

顺便简单地谈一下后备泉源之一的烧酒问题。有人认为可以带着白手套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既然我们得不到借款，既然我们缺少资本，除此以外，我们又不能受西欧资本家的奴役，不能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而被我们拒绝了的奴役条件，我们就只有一条出路：在其他◇281◇方面寻找泉源。这样做总比受奴役好些。这里正是应该在奴役和烧酒之间进行抉择，而那些认为可以带着白手套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

在**阶级关系**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保证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

（乙）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

（丙）在政治上孤立和在经济上排挤富农和城市资本家。

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坚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吸引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这一斗争。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新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路标转换派分子。路标转换派，这是日益成长并逐渐同富农和旧知识分子勾结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思想。新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即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其内容就是认为共产党必定蜕化，而新资产阶级则必定团结起来，同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定会不知不觉地走近民主共和国的门槛，之后又必定跨过这道门槛，并在某一个不知是从军人中间还是从文官中间推举出来的“凯撒”帮助下，我们必定陷于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状态中。

这个新思想就是这样，这种思想力图迷惑我国旧知识分子，并且不仅迷惑他们，甚至也力图迷惑某些接近我们的人。我不来驳斥关于我们党蜕化的说法。这种蠢话不值一驳。我们党没有蜕化，并且一定不会蜕化。它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材料组成的，也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人锻炼成的。◇282◇（鼓掌）我们的干部，无论是年轻干部或者老干部，在思想方面都成长起来了。我们幸运的就是，列宁的一些著作我们已经出过好多版了。现在人们都在阅读，都在学习并开始了解问题了。不仅党的领导者，而且普通党员都开始了解问题了，他们已经不再受人愚弄了。现在蜕化的叫嚣已经吓不倒任何人了。人们自己能够判别问题。不管有人怎样叫嚣，不管有人怎样用引证来吓唬人，但是普通党员听了以后是能够判别的，因为现在他们手里都有列宁的著作。（鼓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党不会离开列宁主义道路的一个基本保证。（热烈鼓掌）

我所以终于讲到了路标转换派分子，是为了简单地回答所有那些

指望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蜕化的人。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这种思想的创始人。他在我们的运输部门中工作。据说他工作得很好。我认为，既然他工作得很好，那末就让他去幻想我们党蜕化吧。幻想我们是不禁止的。让他尽情地去幻想吧。但是，让他知道，他在幻想蜕化时，应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效力。否则他是会倒霉的。（鼓掌）

三　党

现在来谈党的问题。我把党放在我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来谈，并不是因为党是我国发展的一切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不，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党领导的。

我已经讲过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283◇下对外随机应变方面以及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我们党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如果党没有得到发展和巩固，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在这方面，作为领导力量的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所有的资产者都在疯狂地谈论我们的党。

我这样讲决不是想说我们党和国家是一个东西。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如果根据这一点说政治局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像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那是愚蠢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糊涂思想，它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政治局不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是党的最高机关，而党又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是党的机关。我并不想把国家机关和党看成一个东西。我只是想说，在我们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起领导

作用的是党。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我们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就。因此，关于党的成分，关于党的思想水平，关于党的干部，关于党在提出经济建设和苏维埃建设问题方面的领导能力，关于党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关于党的内部一般状况等问题，都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

首先来谈党的成分问题。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总共有四十四万六千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不包括在内）。其中工人十九万六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农民十二万八千◇284◇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二万一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已经不止四十四万六千人，而是九十一万一千人了，其中工人五十三万四千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农民二十一万六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六万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六。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我们已经有一百零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

工人阶级（如果拿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百分之几已经加入了我们党呢？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组织报告中说过，我们国内总共有四百一十万工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我当时没有统计小工业中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无法统计的，当时社会保险还不普遍，而统计机关又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我当时所举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数字。后来到了已经有可能统计小工业中工人的人数时，我们才知道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以前我国的工人总数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其中入党的工人有三十九万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七。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工人总数已经是六百五十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三万四千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以前我国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小工业和大工业内的产业工人统统包括在内）的总人数为七百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七万人，占百分之八。

我所以讲这一切，是为了指明那种关于要在一两年内使我国工人阶级全体成员中入党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说法是多么无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共（布）党内工人党员在标准工业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国◇285◇营工业和非国营工业，还包括军事工业、主要铁路修理厂和主要机车修理厂）中的固定工人（不是季节工人）的人数，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为一百六十万零五千人。当时我们有十九万六千工人党员。这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拿产业工人党员来说，并且确定一下他们在大工业工人阶级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那末我们可以看到，一月一日以前有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他们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都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的情形。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七十八万人；当时有三十八万九千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当时有二十六万七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八十四万五千人；当时我们工人党员的总数（包括产业工人党员和非产业工人党员）为四十二万九千人，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当时有三十万零二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二百零九万四千人；当时有五十三万四千工人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当时有三十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二。

你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在整个工人阶级方面，入党工人数目的增长比工人阶级本身的增长要慢些；在这里，在大工业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工人党员的百分比的增长比大工业工人数目的增长要快些。这一点必须指出来，以便我们在谈到党内的工人成分时能知道我们党的面貌究竟怎样。党内◇286◇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大工业中的工人。

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要在一年内把产业工人党员的人数增加到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愿意陷入空想。因为：既然我们有三十八万产业工人党员，那末为了使其余的——约七十万非产业工人党员——组成百分之十，就必须使党员的人数在一年内增加到七百万人。可见，某些同志根本就没有去计算一下，只是随便提出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而使自己出丑。

党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在增长呢？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未必还用得着证明。你们知道，我们的党实质上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我们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

至于我们党在农村中所占的比重，那末这方面的情况是很不好的。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国十八岁到六十岁的农村居民共有五千三百万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有五千四百余万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农村支部中的共产党员有十三万六千人，占农村成年居民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二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我们有二十万零二千农民党员，占百分之零点三七。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我并不想说党在那里必须一日千里地发展，但是我们农民党员的百分比终究还是很低的。我们党是工人的政党。这个党内总是要工人占多数的。这是我们的无◇287◇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下面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同农民联盟，那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的成分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优秀农民，作为党在农村中的支柱。从这方面来看，情形暂时还是不大好的。

其次，我必须指出我们党的思想水平普遍提高这一事实。关于组织方面，莫洛托夫同志将向你们做报告，我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不说明一点：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年轻的和年老的）的思想水平都已经大大提高了。可以拿去年我们同托洛茨基

主义进行的争论来做例子。你们知道，当时所涉及的是关于修正列宁主义的问题，是关于所谓随时更换党的领导的问题。当时党如何一致地对付了这次反党浪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党已经成长起来了。党的干部已经坚强了，党已经不怕争论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争论时期。我深信党一定也能在这次争论中很快地取得胜利，决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事故。（喊声：“对！”鼓掌。）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现在我不来谈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的行动的实质以及莫斯科的同志们对这种行动的反应的实质。我想大会代表自己会谈到这一点，而我只要在结论中做个总结就行了。

我就要结束我的报告了。

我已经讲过我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讲过腐蚀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矛盾。我已经讲过只有西方的工人革命才能克服这些矛盾。◇288◇

其次，我讲过决定我们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的那些矛盾。我讲过，这些国家将力图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它们将力图对我们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则将予以还击，而且我们指望获得西方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特别是在西方工人常到我们这里来并且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同时，我们预计到这种友好关系是不能为资本家所容许的。这些矛盾也正在被我们克服。但是归根到底我国外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间的矛盾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克服不了的，为此就需要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一援助。

其次，我讲过我国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间的矛盾。我讲过，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取消主义者，谁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并且我们已经在克服这些矛盾。当然，西方的援助来得愈快，情形也就愈好，我们也就能更快地克服这些矛盾，以便彻底消

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鼓掌）也不会惧怕困难。谁疲倦了，谁被困难吓倒了，谁失掉了理智，那就请他让路给那些能保持勇气和坚定性的人。（鼓掌）我们不是怕困难的人。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喊声：“对！”鼓掌。）

其次，同志们，我讲过我们党的成就和错误。我们犯过不少错误。不论在对外贸易方面，在收购工作方面或在其他一些工作方面，我们都犯过不少错误。伊里奇教导我们不要骄傲自大。我们决不◇289◇会骄傲自大。虽然我们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成就还是有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已经达到了，这是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用大规模的建设工作，用在经济战线上实行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用我们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种种成就向全世界表明，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仅能打败资本主义，能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使这个真理明显化了，这一成就是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是我们至今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中最大的和最难获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向西方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表明，历来只会替老爷们做工和听从老爷们指挥的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是能够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西方无产者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首先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认识到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过活，要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但有能力破坏旧东西，而且有能力建成新东西，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使工人产生怀疑主义思想，使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用强力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全部工作的意义，我们全部建设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和这种建设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过活，靠自身力量也能建设新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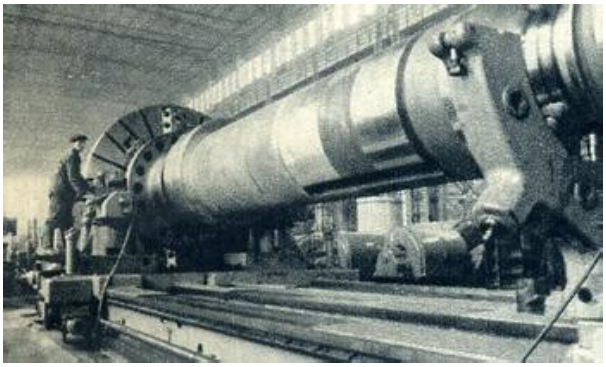
各国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各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我国考察我国建设中的每个角落并力求了解我国建设中的成就，——这一切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旨而开始相信自身的力量，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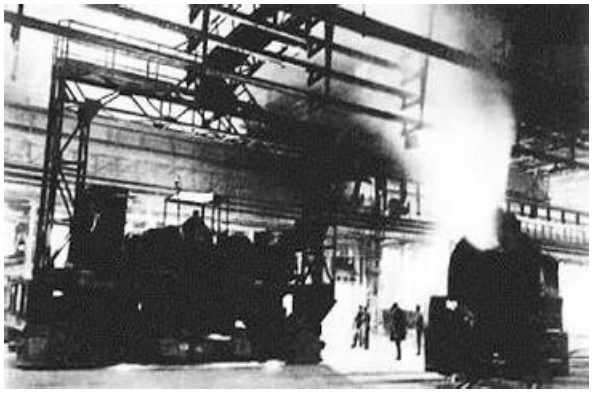
我并不想说我们在报告涉及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有一点终究必须承认，那就是◇290◇我们已经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表明和证明，工人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得政权以后能够按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任何人绝对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一成就是无法估价的。因为取得这一成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胜利。这就是交给他们一种新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至于他们正在拿起这种武器并准备使用这种武器，这只要从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活跃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那就可以确信这将是资本主义死亡的开端，这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最可靠的征象。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一定会获得国际范围的胜利。（热烈鼓掌多时。全场欢呼。）◇291◇

419. Кравченков П.
Нефтяники, больше нефти Родине! Выполним пятилетку в 4 года! 1948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不想一一答复字条上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我的全部结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字条的答复。

其次，我不打算答复那些个人的攻击和各种纯粹带个人成分的狂言，因为我认为代表大会拥有充分的材料来审查这些攻击的动机和内幕。

关于“穴中人”即曾在基斯洛沃得斯克附近某地集会并在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上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的人，我也不想谈。好吧，让他们去进行阴谋活动吧，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拉舍维奇在这里充满自信地发言反对进行阴谋活动的政策，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并且他在基斯洛沃得斯克附近召开的“穴中人”会议上还扮演过远非次要的角色。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笑声）

现在来谈本题。◇292◇

一　索柯里尼柯夫和我国道威斯化

首先谈几点反对意见。第一点反对意见是对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指出两条总路线，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两

条路线的时候，把我们弄糊涂了，因为他本来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两条路线，他本来不应该说输入装备而应该说输入成品。”我断言索柯里尼柯夫的这种说法恰巧表明他是沙宁提纲的拥护者。我是想说索柯里尼柯夫在这里实际上表明他是一个拥护我国道威斯化的人。我在报告中讲的是什么呢？难道我讲的是进出口计划吗？当然不是的。谁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种需要变成原则，变成理论，变成发展前途。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两条基本路线，即两条领导路线或总路线。我谈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什么是农业国呢？农业国就是输出农产品和输入装备而不能自力生产或几乎不能自力生产这种装备（机器等等）的国家。如果我们停留在只输入装备和机器而不能自力生产装备和机器的发展阶段上，那我们就不能担保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抱定在我国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难道索柯里尼柯夫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我在报告中所谈的也无非是这个道理。◇293◇

道威斯计划要求的是什么呢？它要求德国从国外市场，主要是从我们苏联市场榨取金钱来偿付赔款。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德国将卖给我们装备，而我们将输入这些装备，并向国外输出农产品。这样，我们，也就是说我国工业，就会处于依附欧洲的地位。这也就是道威斯计划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在报告中曾说，道威斯计划损害我国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筑在沙地上的。为什么呢？我当时说，“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因为“我们自己要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我们应当设法使经济工作人员的

全部思想和意图都集中到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国从一个输入装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这种装备的国家。因为这是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我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索柯里尼柯夫不愿意了解这个简单而明白的道理。他们这些道威斯计划的制定人，想使我们只生产花布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花布，而且要生产织造花布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汽车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汽车，而且要生产制造汽车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皮鞋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皮鞋，而且要生产制造皮鞋所必需的机器。如此等等。

这就是两条总路线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索柯里尼柯夫所不愿意了解的东西。离开我们的路线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就是主张我国道威斯化。◇294◇

二　加米涅夫和我们对农民的让步

第二点反对意见是对加米涅夫提出的。他说，我们既然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经济、关于活跃苏维埃、关于肃清战时共产主义残余以及关于确定租佃问题和雇佣劳动问题的一些有名的决议，那我们就是对富农让步而不对农民让步，就是不对农民让步而对资本主义分子让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可以肯定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党的诬蔑。我可以肯定说，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这样看问题，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

我们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所做的让步究竟是怎样一种让步呢？这种让步是不是在新经济政策范围以内呢？无疑是在范围以内的。也许是我们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把新经济政策的范围扩大了？让反对派来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是不是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

如果我们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那末他们为什么举手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呢？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们都是反对扩大新经济政策范围的吗？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加米涅夫糊涂了，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贸易，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容许雇佣劳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则是列宁在世时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表现。列宁是不是知道新经济政策在实行初期首先会被资本家、商人和富农利用呢？当然知道。但列宁是不是说过，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投机分子和资本主义分子让步而不是◇295◇对农民让步呢？列宁没有说过，而且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恰恰相反，列宁始终肯定地说，我们容许贸易，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保持和巩固我们和农民的结合而对农民实行让步，因为在现今条件下，没有商品流转，不容许资本主义有某种活跃，农民便不能生活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调整这种结合；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这种结合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当时列宁对让步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对一九二五年四月的让步问题应有的看法。

让我把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读给你们听一听。列宁在莫斯科省支部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论证党向新政策即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我想谈谈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政策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可以容忍的，为什么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会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好不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仔细地观察一下农民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化。最初的情况是全体农民反抗地主的权力。贫农和富农都一样反对地主，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打算：富农反对地主的目的是夺取地主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一来就暴露出富农和贫农之间的不同利益和不同意向。在乌克兰，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就是现在也比我们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贫农很少有可能直接利用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因为他们

既没有耕种土地的资料，又没有耕种土地的工具。于是贫农就组织起来，不让富农去霸占自己已经夺得的土地。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我们这里的贫农委员会和乌克兰的‘贫苦农民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中农在农村中占多**◇296◇**数**……富农和贫农这两个极端的人数都减少了，大多数农民接近于中农水平。如果我们要提高我国农民经济的生产率，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到中农。**共产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的……这样看来，对农民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农民本身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村已经更加中农化了，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一页至第二七二页）

其次，列宁在同卷第二〇三页上做了一个总的结论：“**我们必须适应中农经济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②，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过来。”

换句话说，我们实行贸易自由，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全国产品的数量，巩固我们同农民的结合。把同农民的结合，同农民结合的利益作为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所做的让步的基础，——这就是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时列宁知道不知道投机分子、资本家和富农一定会利用新经济政策，一定会利用我们对农民的让步呢？当然知道。这是不是说，这种让步实际上就是对投机分子和富农的让步呢？不，决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利用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利用商业的不但有资本家和富农，而且有国营商业机关◇297◇和合作社，因为做生意的也不但有资本家和富农，而且有国营商业机关和合作社，何况国营商业机关和合作社一旦学会了做生意，就一定会占私商的上风（现在已经占上风！），会把我国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让步主要是为了巩固结合，是为了同农民的结合。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以列宁主义者的态度而是以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来对待问题。

三　谁的失算？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对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说：“入秋以来，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不少损失，其原因就在于过高估计我们的力量，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过高估计我们的国营经济现在所具有的那种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可能性。”

照他说来，在收购工作方面的失算和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失算（我指的是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入超）并不是由于我们调节机关的错误，而是由于过高估计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照他说来，这也应当归咎于布哈林，因为布哈林“学派”专门培植迷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思想。

当然，在谈话时“可以”随便瞎扯一通，像索柯里尼柯夫所常常做的那样。但是也应当知道限度。◇298◇怎么能在代表大会上说出如此不近情理和公然撒谎的话来呢？政治局在十一月初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了收购工作和对外贸易问题，当时中央委员会——仿佛过高估计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纠正了调节机关的错误，难道索柯里尼柯夫不知道吗？怎么能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胡说八道呢？这与布哈林“学派”或布哈林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嫁祸于人的做法！难道索柯里尼柯夫不知道在中央的会议上关于失算问题的发言速记记录都已经分发给各省委员会了吗？怎么能说出抹杀明显的事实的话来呢？在谈话时瞎扯一通是“可以”的，但是也应当知道限度。

四　索柯里尼柯夫是怎样保护贫农的

第四点反对意见也是对索柯里尼柯夫提出的。他在这里说，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听见没有——，曾经竭力设法保证我国农业税按所得比例征收，可是人家妨碍他这样做，其所以妨碍他，是因为人家不让他保护贫农和约制富农。同志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党的诬蔑。关于在形式上把农业税改为所得税的问题——我所以说是形式上，是因为农业税实际上就是所得税——在今年十月的中央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当时除了索柯里尼柯夫以外，谁也不赞成把这个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讨论，因为当时还没有准备把这个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当时索柯里尼柯夫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提议。而现在索柯里尼柯夫竟利用这件事来攻击中央，这当然不是为了贫农的利益，而是为◇299◇了反对派的利益。好吧，既然索柯里尼柯夫在这里谈到贫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实，这件事实能揭穿这个似乎一贯保护贫农的索柯里尼柯夫的真正立场。不久以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米柳亭同志签署了一项决定：贫苦农户一概免纳税额在一个卢布以下的税款。从米柳亭同志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这种使农民生气的税额在一个卢布以下的税款，总共约有三四十万卢布，单单为征收这笔税款所需的费用却比这笔税款的总数小不了多少。而索柯里尼柯夫，这位贫农的保护者，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撤销了米柳亭同志的这个决定。中央收到了十五个省委员会对此提出的抗议书。但索柯里尼柯夫还是固执己见。只是受到中央的压力以后，索柯里尼柯夫才收回成命，没有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不征收税额在一个卢布以下的税款这个完全正确的决定撤销。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谓对贫农利益的“保护”。背着这种包袱的人

居然也有——说得轻一点——勇气来反对中央。同志们，这真是怪事。

五　思想斗争还是诬蔑？

最后，还有一点反对意见。这点反对意见是对“有关争论问题的材料汇编”的编者们提出的。昨天在这里有人把刚出版的“有关争论问题的材料汇编”秘密地专门发给大会的代表。在这本汇编中，◇300◇有一个地方说我在今年四月接见了农村通讯员代表团，说我对恢复土地私有制这种思想表示同情。原来在“贫农报”〔62〕上登载过一位农村通讯员所写的一篇内容相同的“感想”，这篇感想我并不知道，也没有经我看过。直到今年十月我才知道有这件事。还在这以前，即在四月，那个由于制造我们的各种谣言而与其他一切通讯社不同的里加通讯社也在外国报刊上报道了同样的消息，我们在巴黎的工作人员曾打电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这件事，并要求辟谣。我当时立即叫我的助手回答契切林同志说，“如果契切林同志认为有驳斥一切荒唐的流言的必要，那就去驳斥好了。”（见中央档案）这本珍贵的“汇编”的编者们是不是知道这一切情形呢？当然知道。那末他们为什么还继续散布种种荒诞无稽的言论呢？他们这些反对派分子怎么可以采用里加通讯社的手段呢？难道他们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喊声：“真可耻！”）

我既然知道“穴中人”的习性，既然知道他们善于采用里加通讯社的手段，也就写了一封辟谣的信寄给“贫农报”编辑部。本来这种谬论是不值得驳斥的，但是我知道我在和什么人打交道，所以我终于寄出了一封辟谣的信。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给‘贫农报’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不久以前我从一些同志那里得知，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的‘贫农报’上登载了一位农村通讯员所写的一篇关于农村通讯

员代表团和我谈话的感想。我当时没有机会读到这篇感想。在这篇感想中说我对在四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确保土地所有权这种思想，对保存土地私◇301◇有制等等思想表示同情。虽然这种悬空捏造的说法显然荒诞无稽，没有加以驳斥的必要，但是也不妨请你们准许我在‘贫农报’上作如下声明：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它完全是由它的报道人悬空捏造出来的。

约·斯大林”

“汇编”的编者同志们是不是知道这封信呢？无疑是知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继续散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呢？这是一种什么斗争方法呢？据说这是思想斗争。不，同志们，这决不是思想斗争。用我们的俄语来说，这纯粹是**诬蔑**。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几个带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六　关于新经济政策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我要谈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和她的那篇论及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演说。她说：“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在某种条件下被容许的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约束的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又对，又不对。我们约束着资本主义，并且只要它还存在，我们还会约束它，这是事实，这是对的。但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胡说，那就是极其荒谬的说法。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302◇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列宁主义。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是资

本主义，那末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俄国了。但是，难道现今的俄国是资本主义的俄国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吗？为什么当时列宁不干脆说“**资本主义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列宁愿提出另一个公式——“**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呢？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说法。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七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布哈林的错误是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布哈林的错误在哪里呢？列宁在哪些问题上曾经和布哈林争论过呢？列宁肯定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相容的。布哈林却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左派”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萨发罗夫）也和他一起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不能相容的。当然，列宁是对的，布哈林是错的。布哈林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这◇303◇个错误。布哈林的错误就在这里。但这是过去的事情。如果他在今天，即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还重提他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和列宁发生意见分歧，那末我认为这纯粹是误会。或者是他应当直截了当地抛弃这种说法；或者是出于误会，因为他现今在国营工业本质问题上所拥护的路线就是列宁的路线。不是列宁同意布哈林的意见，恰恰相反，是布哈林同意列宁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护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是辩证地，而是学究式地即脱离历史环境来研究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种研究问题的态

度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整个精神的。列宁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在一九二一年，列宁知道我国工业不发达而农民又需要商品，知道工业不能立刻得到发展，知道工人们因为受某种环境的影响不去进行工业生产而去制造打火机，所以当时列宁认为在一切可行的办法中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吸收外资，利用外资来振兴工业，也就是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它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村的结合。这条道路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来满足农民，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衰败，运输停顿或几乎停顿，没有燃料或缺乏燃料。当时列宁是否认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恰当的呢？是的，当时列宁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是一九二一年的情形。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现在能不能说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运输停顿，没有燃料等等呢？不，不能。现在我国工业和商业已经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建立着工业（**我国的**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一点能不能否认呢？不，不能。目前在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和◇304◇“社会主义”二者的地位已经互相转换，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而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所占的比重（前者有五万工人，后者有三万五千工人）则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一点能不能否认呢？不，不能。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说过，租让制和租赁制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成。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从一九二一年起，我国的情况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营商业以及合作社营商业已经是占优势的力量，我们已经学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建立城乡间的结合，国家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形式——租让制和租赁制——在这个时期内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所以**现在**，即在一九二五年，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那就是曲解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本质，那就是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的全部差别，那就是不是辩证地而是学究式地、形而上

学地来研究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你们愿意听一听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话吗？他在发言时说：

“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来经营的……我们的国内贸易公司也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同志们，我必须说，国家银行也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货币制度是怎样的呢？我们货币制度的基础就是：在苏维埃经济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采取了一种浸透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货币制度。”

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话。我看他很快就要把财政人民委员部也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以及我们大◇305◇家都认为，国家银行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个人以及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如果不把环绕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周围的那些国家资本主义机关计算在内）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机关。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认为，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这些机关的**唯一**主人。而现在照索柯里尼柯夫说来，这些作为我们国家机关组成部分的机关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机关。也许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也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像列宁所认定的那样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机关吧？怎么会不是呢？难道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不是利用着“浸透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货币制度”吗？你们看，这个人竟会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

让我先来引证列宁对国家银行的本质和意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同志们，我想引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我指的是“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所主张的是对工业实行监督（而不是实行国有），虽然如此，他已经认为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国家银行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机关。关于国家银行他这样写道：

“大银行**就是**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把它作为**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里的任务

只是把这个绝妙的机关中的**资本主义弊端除去**，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那时量变就会转为质变。统一而规模最大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和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是全国性的**计算**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306◇**干**。”（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二页）

你们只要把列宁的这段话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发言对照一下，就一定会了解索柯里尼柯夫滚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他把财政人民委员部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那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索柯里尼柯夫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问题在于索柯里尼柯夫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不了解在目前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条件下我国商业的两重性，他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过渡时期的环境下我国发展的辩证法，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主义成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武器来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问题决不在于商业和货币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时掌握着资产阶级的这些方法和武器来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在于社会主义成分**成功地**利用它们来**反对**资本主义，**成功地**利用它们来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所以问题在于：由于我国发展的辩证法，资产阶级的这些工具的职能和使命都发生了**原则性的**、根本的变化，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了。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我国经济中发生的种种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

现在让我来引证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问题所讲的话，让我引证一段话来说明列宁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提议把国家资本主义当做主要形式，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以及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提议这样做的。（喊声：“请吧！”）◇307◇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们时常看到的东西——国营工厂中工

人的社会主义态度；在那里，工人们自己收集燃料、原料和食物，或者工人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这就是社会主义**。可是与此并存的，还有小经济，这种经济往往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为什么它能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呢？**因为**大工业还没有恢复，**因为**社会主义工厂大概只能得到它所应得的十分之一的东西。既然社会主义工厂还没有得到它所应得的东西，小经济就仍然会离开社会主义工厂而**独立**存在。国家遭到难以置信的破坏，燃料、原料和运输工具缺乏，这就使得小生产离开社会主义而独立存在。所以我说如果要问这种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那就要说它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成长起来。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是没有用的。当然，**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要避开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想避开和抹杀这个事实，谁就是用空话来安慰自己。既然存在着小经济，既然存在着交换自由，也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掌握着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那末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我当时说，现在还要重复说，这种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反驳不了的。租让企业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三页）◇308◇

这就是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看法。在一九二一年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原料缺乏，运输停顿，所以当时列宁提议把国家资本主义当做一种手段，想通过它把农民经济和工业联结起来。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列宁认为这条道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恰当的呢？当然不是。他所以提议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建立这种结合，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现在没有发达的国营工业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们在另

————————————————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条轨道上发展，租让制几乎没有什么结果，国营工业已经成长起来，国营商业也成长了，合作社增多了，城乡间的结合已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而建立起来。我们所处的境地比我们自己所设想的更好。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呢？反对派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八　季诺维也夫和农民

农民问题。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过，而一些发言的同志也在这里肯定说，季诺维也夫有忽视中农的倾向，他在不久以前还坚决地抱着中立中农的观点，只是在现在，在党内展开斗争以后，他才企图转而抱定另一种观点，即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观点。这一切是不是事实呢？让我来引证几个文件吧。◇309◇

季诺维也夫在今年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写道：“有许多任务是**共产国际各个党完全共同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例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在全世界农业人口中间，有三个阶层（农业无产阶级，半无产者——极小农和不雇用别人劳动力的小农）是可以而且应当被我们争取过来并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阶层。还有另一个农民阶层（中农）至少是**我们应该使之中立的**阶层。”[①]（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摈弃了中立中农的口号，代之以坚固联合中农的口号）过了六年以后谈到中农时说的话。巴卡也夫问：这有什么了不得呢？我要请你把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和列宁关于指望中农的论点对照一下，再来回答季诺维也夫是不是离开了列宁的论点……（有人喊道：“这里指的是除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了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喧哗声。）同志，不能这样说，因为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说的是“共产国际**各个党完全**共同的任务”。难道你要否认我们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吗？这里是直截了当地说：“各个党”。（列宁格勒代表团中有人喊道：“在一定的时候。”大笑）把季诺维也夫文章中关于**中立**中农的这段话和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关于我们需要**坚固联合**中农的一段话对照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两段话是毫无共同之处的。◇310◇

值得注意的是，拉林同志这位主张在农村中实行“第二次革命”的人，读了季诺维也夫文章中这几行字，就立刻附和季诺维也夫了。我认为，虽然拉林同志在几天前曾反对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且反对得相当有成效，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我们和他的意见分歧，因此我们应当在这里和他划清界限。请看拉林同志是怎样评论季诺维也夫这篇文章的：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各个**[①]党的共同任务的观点出发，十分正确地表述了‘对待农民的正确态度’。”（拉林的“苏维埃农村”第八十页）

我知道拉林同志要提出抗议说，他在自己的书中已经声明他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因为季诺维也夫竟把中立中农的口号推广到俄国来了。他在自己的书中确实声明过这一点，并且断定说，中立中农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同中农成立协议反对富农”。但遗憾的是，拉林同志还搬出了他那个反对富农恶势力的“第二次革命”的方案，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使他和季诺维也夫接近起来了，因此我不得不多少和他划清一下界限。

可见，在我上面引证的文件中，季诺维也夫是公开和肯定地主张中立中农的口号而反对列宁的，因为列宁宣布说中立中农的口号是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够的，还必须坚固地联合中农。

请看下面一个文件。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引证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所说的一◇311◇段话：“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农民中的贫苦部分即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部分一起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现在关心的基本……问题……在所引证的列宁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和透彻的阐明了。**这里不能增加什么东西，也不能减少一个字**[①]。这里一切都用伊里奇那种简洁明确的口吻扼要而清楚地说明了，因此只要编进文选就行了。”（“列宁主义”第六十页）

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这就是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详尽无遗**的说明。联合全体农民去反对沙皇和地主，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联合贫农去反对资产阶级，这就是十月革命。这一切都很好。列宁的两个口号都提出来了。而列宁的第三个口号，即联合中农，反对富农，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口号又怎样了呢？列宁的这个第三个口号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口号不在季诺维也夫那里。这个口号不知下落了。虽然季诺维也夫肯定说“这里不能增加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不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第三个口号加进去，那我们就有歪曲列宁的话的危险，像季诺维也夫那样。列宁的这个目前对我们最迫切的第三个口号不知下落了，被季诺维也夫遗失了，能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的呢？不，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因为季诺维也夫所抱的是中立中农的观点。第一个文件和第二个文件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他在第一个文件中表示反对坚固地联合中农的口◇312◇号，而在第二个文件中却对这个口号避而不谈。

第三个文件是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一文。我指的是这篇文章未经中央委员修改和补充前的初稿。这篇文章的特点，就是它也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第二个文件一样完全避而不谈中农问题，避开了这个迫切的问题，却谈论着不指出平等的阶级背景的某种民粹派的含糊不清的平等。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了贫农，讲到了富农，讲到了资本家，讲到了攻击布哈林的话，讲到了社会革命党式的平等，讲到了乌斯特里雅洛夫，就是没有讲到中农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虽然这篇文章也叫做“时代哲学”。当莫洛托夫同志把这篇文章寄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外出了），我在回信中对这篇文章作了粗暴而严厉的批评。同志们，是的，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笑声）我所以在回信中粗暴地批评了这篇文章，是因为决不能容忍季诺维也夫一年来一贯抹杀或歪曲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重要的特征，一贯抹杀或歪曲我们党关于联合基本农民群众的当前口号。下面是我当时给莫洛托夫同志的回信：

“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一文用拉林的精神来歪曲党的路线。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但是对这次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中农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却避而不谈。中农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都消失掉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末谈论什么‘争取解释’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是实行破坏这些决议的路线。像季诺维也夫那样把布哈林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就是诬蔑布哈林。要是这样，那末也可以把列宁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了，因为◇313◇列宁说过：‘你们去做买卖吧，而且要学会做买卖。’平等的口号在目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恶意宣传。只要存在着阶级，只要存在着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就不会有任何的平等。（见列宁“国家和革命”）应当谈的不是模糊不清的平等，而是阶级的消灭，是社会主义。把我国革命称为‘非典型的’革命，就是滚到孟什维主义那边去了。在我看来，应当把这篇文章彻底修改一下，使它不致带有向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纲的性质。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这一切现在我还是要坚持的。我要坚持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

在主要的指导性文章中，不严格地说明这里指的是哪种平等：是农民同工人阶级的平等，是农民内部的平等，是工人阶级内部即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平等，还是指消灭阶级意义上的平等，就不能讲什么平等。在指导性的文章中决不能避而不谈党关于农村工作的当前口号。决不能玩弄关于平等的词句，因为这就是玩火，同样也决不能玩弄关于列宁主义的词句，而避而不谈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当前口号。

这里有三个文件：季诺维也夫的主张中立中农的文章（一九二五年一月）、季诺维也夫所写的对列宁关于中农的第三个口号避而不谈的“列宁主义”一书（一九二五年九月），以及季诺维也夫新写的对中农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避而不谈的“时代哲学”一文（一九二五年九月）。◇314◇

季诺维也夫在农民问题上这种经常摇摆不定的态度是偶然的吗？

你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关于中央总结报告所做的报告中，终于决定了拥护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口号。这是在中央委员会中经过斗争，经过摩擦和冲突以后的事情。这很好。但是我不相信他以后不会放弃这种意见。因为事实证明，季诺维也夫在农民问题的路线上从来没有过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坚定性。（鼓掌）

下面就是季诺维也夫在农民问题上动摇不定的几件事实。一九二四年，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全会上曾经坚持所谓“农民”政策，主张在中央和地方组织有自己的周报的非党农民团体。这个提案因为遭到中央反对而被否决了。在此以前不久，季诺维也夫甚至夸耀自己有“农民倾向”。例如，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人们对我说：你有一种‘倾向’，你倾向到农民方面去了，我就回答道：是的，我们不仅应当‘倾向’到农民和他们的经济需要方面去，并且我们应当

在跟随我们无产阶级走的那些农民的经济需要面前**鞠躬**，在必要时甚至应该在这种需要面前**磕头**。”你们听：“倾向”、“鞠躬”、“磕头”。（笑声，鼓掌。）后来，当农民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在农村中的情况有了改进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就不是那样心醉神迷，而是来了一个“转变”，对中农抱猜疑的态度，并提出了中立中农的口号。再过了一些时候，他又来了一个新的“转变”，实际上是要求修改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时代哲学”），他责难说几乎整个中央委员会都有农民倾向，而他自己则更坚决地“倾向”于反对◇315◇中农。最后，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他又来了一个“转变”，但这次已经是转到联合中农方面来了，也许他又会夸耀自己说，他又决心向农民“磕头”了。

怎样能保证季诺维也夫不会再来一次动摇呢？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是动摇，而不是政策。（笑声，鼓掌。）这是歇斯底里，而不是政策。（呼喊声：“对！”）

有人说，用不着特别注意对第二种倾向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两种倾向，即鲍古舍夫斯基的倾向和季诺维也夫的倾向，那末你们应当了解到，鲍古舍夫斯基是绝对比不上季诺维也夫的。鲍古舍夫斯基是一个已经完蛋了的人。（笑声）鲍古舍夫斯基没有自己的报刊。而中立中农的倾向，反对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倾向，即季诺维也夫的倾向，则有它自己的报刊，并且到今天还在继续反对中央。这个报刊叫做“列宁格勒真理报”〔63〕。因为“列宁格勒真理报”极力宣扬不久以前在列宁格勒制造出来的那个专门名词“中农布尔什维主义”，这不是表明该报在农民问题上离开了列宁主义，又是表明什么呢？单从这一情况就可以看出，同第二种倾向作斗争，要比同第一种倾向，即同鲍古舍夫斯基倾向作斗争困难些，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正因为我们面前有“列宁格勒真理报”这样一个第二种倾向的代表者，这样一个第二种倾向的保卫者和庇护人，我们就应当采取一切方法使

党特别有准备地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是强烈而复杂的，应当集中火力去反对它。正因为如此，第二种倾向应当是我们党特别注意的对象。（喊声：“对！”鼓掌。）◇316◇

九　意见分歧的历史

现在让我来谈谈在我们大多数中央委员中间的内部斗争的历史。我们的争执是从什么开始的呢？争执是从“怎样处理托洛茨基”这个问题开始的。这是一九二四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列宁格勒一批同志起初建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我这里指的是一九二四年的争论时期。当时列宁格勒省委员会通过了开除托洛茨基出党的决定。我们大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这样做，（喊声：“对！”）我们同列宁格勒的同志经过了一些斗争，并说服了他们从自己决议中删去关于开除托洛茨基一项。此后不久，当我们召开中央全会时，列宁格勒的同志和加米涅夫一起要求立刻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我们也没有同意反对派的这个建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内获得了多数，只是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担任的职务。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鼓掌）

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内部发生的这第一次冲突，暴露了我们之间在党的组织政策问题上的基本分歧。◇317◇

引起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同萨尔基斯针对布哈林而作的发言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列宁格勒第二十一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当时，萨尔基斯在发言中责备布哈林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下面是他讲的话：

“我们在莫斯科‘真理报’上读到了布哈林关于工农通讯员的文章。布哈林所发挥的那种观点，在我们组织中是没有人拥护的。但是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工团主义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的观点，却在许多甚至是负责同志（我重复一遍，不是在列宁格勒，而是在其他组织内的负责同志）那里存在着。这种观点是主张各种工农群众社会组织脱离共产党而取得独立和治外法权。”（列宁格勒第二十一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

第一、这个发言是萨尔基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布哈林在关于工农通讯员运动问题上是绝对正确的；第二、这里显然是受了列宁格勒组织领导人的鼓励而极粗暴地破坏了以同志态度讨论问题的基本原则。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央内部的关系恶化起来。结果萨尔基斯在报刊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个事件表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避免公开争论和用党内方式消除意见分歧的最好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列宁格勒共青团的问题。这里在座的省委会委员大概都记得，关于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未经共青团中央的许可和同意而企图在列宁格勒召开几乎是全国性的共青团代表会议这个问题，政治局曾经做了一个相当的决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你们是知道的。我们不能容许除◇318◇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以外，还存在另一个和它竞争，和它对立的中央。我们布尔什维克决不能容许有两个中央并存。正因为如此，中央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刷新容忍了这种分立主义的共青团中央，并撤销萨发罗夫在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的领导职务。

这个事件表明，列宁格勒的同志们有一种把自己列宁格勒组织变成反对中央的斗争中心的倾向。

第四个问题是季诺维也夫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在列宁格勒出版名为“布尔什维克”的专门性杂志，并由下面几个人组织编辑部：季诺

维也夫、萨发罗夫、瓦尔丁、萨尔基斯和塔尔哈诺夫。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并且声明说，这种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平行的杂志，必然会变成一个集团的机关刊物，必然会变成反对派的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且会破坏党的统一。换句话说，我们禁止出版这种杂志。现在他们想用“禁止”的字眼来吓唬我们。但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是的，我们禁止出版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并且今后也要禁止这类的东西。（喊声：“对！当然是这样！”热烈鼓掌。）

这个事件表明，列宁格勒的上层想独树一帜，成为特殊集团。

其次，关于布哈林的问题。我指的是“发财吧”这个口号。我指的是布哈林在四月里的演说，当时他脱口说出了“发财吧”这句话。过了两天我们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开幕了。当时在代表会议主席团上，索柯里尼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加里宁都在场，不是别人，正是我声明说，“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不记得布哈林曾经反对过这个抗议。当拉林同志在代表会议上好像是为了◇319◇反对布哈林而要求发言时，不是别人，正是季诺维也夫要求不准发言反对布哈林。可是，在此以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送来了一篇反对布哈林的文章，要求把它发表。布哈林当然不甘示弱，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反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大多数中央委员决定不发表任何一篇争论性的文章，也不展开争论，而建议布哈林在报刊上作一个声明，承认“发财吧”的口号是错误的。布哈林同意这个建议，并且后来在他休假回来以后就在反对乌斯特里雅洛夫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做了。现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用“禁止”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人，并且对我们禁止发表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文章表示了自由主义的愤慨。你们用这种方法是吓唬不了什么人的。第一、我们不仅没有发表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文章，而且也没有发表布哈林的文章；第二、既然党的统

一的利益要求我们禁止发表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难道反对派同志们不知道，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吗？（鼓掌）

让这些同志指出来，在党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上究竟有哪一篇文章是为“发财吧”的口号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辩护的。他们是指不出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文章。曾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斯捷茨基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力图用婉转而隐约的形式为“发财吧”的口号作辩护。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就由莫洛托夫、安得烈也夫和斯大林署名特别写了一封信警告该报编辑部。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的事情。过了几天，中央组织◇320◇局在布哈林完全同意之下决定先撤销该报主笔的职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摘录：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莫斯科。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我们认为，在斯捷茨基的‘新经济政策的新阶段’的一些文章中，某些地方是会引起疑问的。的确，在这些文章中转弯抹角地贯穿着‘发财吧’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疑问和误解，在‘共青团真理报’的指导性的文章中是不容许有这样的口号的。我们的口号是社会主义积累。我们正在扫除那些横在提高农村物质福利道路上的行政障碍。这个措施一定会促使各种积累，无论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或社会主义的积累增加起来。但是党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把私人积累当做自己的口号……”

反对派是不是知道这一切事实呢？当然知道。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不停止对布哈林的攻击呢？他们对布哈林的错误要叫喊到什么时候呢？我知道某些同志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错误，和这些

同志的错误比较起来，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这些同志当时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有“勇气”一连两次违反了在列宁领导和参加下通过的中央最重要的决议。虽然如此，在这些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党也就把这些错误忘掉了。但是，和这些同志比较起来，布哈林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而且他没有违反过中央任何一个决议。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他们对布哈林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321◇

关于布哈林的错误问题就是如此。

再次，关于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的文章和关于加米涅夫在今年夏末秋初在莫斯科全会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使我们党内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演说中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了。当时讲的是：关于“时代哲学”这篇文章，关于这篇文章的错误，关于我们怎样纠正了这些错误，关于加米涅夫所犯的那些同中央统计局谷物饲料平衡表有关的错误，关于加米涅夫怎样相信了中央统计局关于农民的上层集团拥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商品余粮的数字，后来又怎样在我们同志们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报上发表的那篇致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声明中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承认大部分余粮都掌握在中农手中。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使我们的关系紧张起来了。

再其次是同十月全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即一些新的纠纷，当时反对派要求进行公开争论，当时产生了关于查鲁茨基的所谓“特米多尔”问题，最后就是列宁格勒代表会议从开会第一天起就向中央开火。我指的是萨发罗夫、萨尔基斯、舍拉文和其他人的发言。我指的是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即他在代表会议闭幕时最后几次发言中的一次，当时他号召代表会议向莫斯科同志开战，提议选出一些决心反对中央的人来组成代表团。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柯马罗夫和洛波夫这两个工人布尔什维克没有被选进列宁格勒代表团（因为他们不接受对中央进行斗争的政纲）。代替他们而被选进代表团的却是戈尔

顿和塔尔哈诺夫。如果把戈尔顿和塔尔哈诺夫两人放在天平的一端，把柯马罗夫和洛波夫两人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秤一下，那末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会说，前两人是根本比不上后两◇322◇人的。（鼓掌）而洛波夫和柯马罗夫的过错在哪里呢？柯马罗夫和洛波夫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反对中央。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这里。但是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以前，列宁格勒的同志还提议柯马罗夫担任自己组织的第一书记。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呢？（列宁格勒代表团中有人喊道：“是这样，是这样”。）柯马罗夫在一个月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布哈林：“他在一个月内蜕化了。”）你们把自己提议来担任你们组织的第一书记的中央委员柯马罗夫赶出了列宁格勒省委员会书记处，并且认为不能把他选做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怎么会在一个月内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列宁格勒代表中有人喊道：“他侮辱了代表会议。”喊声：“纳乌莫夫，这是造谣！”喧哗声。）

十　反对派的政纲

现在来谈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舍维奇的政纲。现在已经是谈论反对派政纲的时候了。他们的政纲是很奇特的。反对派在我们这里讲了各种各样的话。加米涅夫讲的是一种话，他倾向于一方面；季诺维也夫讲的是另一种话，他倾向于另一方面；拉舍维奇讲的是第三种话；索柯里尼柯夫讲的又是第四种话。虽然他们讲的话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呢？他们的政纲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中央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这是奇怪而可笑的，但这是事实。◇323◇

这个问题是有它的历史的。一九二三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

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笑声）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得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笑声）

这就是所谓第一个阶段。

而现在我们竟进入同第一个阶段相反的第二个阶段了。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要求使书记处政治化，而是要求使书记处技术化；不是要求取消政治局，而是要求政治局拥有全权。

如果把书记处变成单纯的技术机关对加米涅夫真是方便的话，也许应当同意这样做。但是只怕党不会同意这样做。（喊声：“对！”）技术性的书记处是不是能够既为组织局又为政治局准备它应当准备的问题，这一点我是怀疑的。

至于说到使政治局拥有全权，那末这种政纲简直是荒唐透顶的。难道政治局不是拥有全权吗？难道书记处和组织局不是服从政治局吗？而中央全会呢？我们的反对派为什么不提中央全会呢？他们是不是想使政治局比全会更拥有全权呢？◇324◇

不，反对派和它的政纲或者关于书记处的各个政纲是肯定要倒霉的。

十一　他们的“爱和平”

你们要问，以后又怎样呢，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够摆脱现状呢？这个问题无论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或在代表大会以前都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需要党的队伍的统一，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反对派是爱谈论困难的。但是有一种困难比一切困难都更加危险，并且它是由反对派给我们造成的，这就是使党涣散和瓦解的危险。（鼓掌）首先应当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前两天曾经向反对派提出一些目的在于可能达到和解的协议条件，也就是为了这一点。下面就是这封建议信的原文。

“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员认为，列宁格勒组织的许多领导同志所进行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同党中央的路线背道而驰的，并且是在反对列宁格勒那些拥护中央路线的同志。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员认为，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无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完全正确的，并认为中央应该给予所有一切反对党的路线和瓦解党的倾向以回击。

但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党内的和平，为了防止俄国共产党最优秀组织之一的列宁格勒组织有可能离开党中央的危险，在下面署名的中央委员认为，在代表大会确认中央明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可以实行一些让步。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建议：◇325◇

（一）在起草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时，应当以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基础，而个别条文的措词可以稍微缓和些。

（二）为了党的统一，我们认为无论在报纸或公报上发表列宁格勒代表会议的来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回信都是不适当的。

（三）政治局委员……不得在代表大会上互相攻击。

（四）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要同萨尔基斯（调整党内成分问题）和萨发罗夫（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划清界限。

（五）在关于柯马罗夫、洛波夫和莫斯克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应当用组织方法纠正。

（六）中央关于吸收列宁格勒同志参加书记处的决议，在代表大

会闭会后立即执行。

（七）为了加强同中央机关报的联系，将吸收列宁格勒一个工作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

（八）鉴于‘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笔（格拉德涅夫）能力薄弱，我们认为必须在取得中央的同意之下由更得力的同志来代替他。

加里宁、斯大林、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和其他等人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些协议条件。◇326◇

但是反对派不同意。他们不要和平，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而残酷的斗争。这就是反对派的“爱和平”。

十二　党一定能达到统一

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坚持着这个文件的观点。你们知道，为了党内的和平，我们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已经缓和了某些条文的措词。我们反对割除办法。我们反对割除政策。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容许领袖们为所欲为，骑在党的头上。对不起，决不能这样。向领袖们磕头的事是不会有的（呼喊声：“对！”鼓掌。）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呼喊声：“对！”鼓掌。）

统一需要什么呢？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否则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党的任何的统一。我们反对出版争论专页。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辟有争论栏。这已经足够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至于在国外就更不用说了。◇327◇

中央各机关应该保持它们现有的状态。党是未必会同意把它们破

坏的。（呼喊声：“对！”鼓掌。）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这一点人们有时忘记了。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呼喊声：“对！”笑声，鼓掌。）

我们应该有统一，只要党，只要代表大会显示出刚强性而不怕恐吓，就一定会有统一。（喊声：“我们是不怕恐吓的，这里都是些久经战斗的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都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至于列宁格勒的工人共产党员，那我相信他们始终会站在我们党的前列。我们同他们一起建设了党，同他们一起养育了党，同他们一起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同他们一起战胜了资产阶级，过去同他们一起将来还要同他们一起克服我们建设道路上的困难。我相信，列宁格勒的工人共产党员在为争取党内铁一般的列宁式的统一的斗争中，是不会落后于其他工业中心的朋友们的。（热烈鼓掌。高唱“国际歌”。）

注　释

〔1〕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六百六十人，代表苏联的四十九个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四分之三是乡村教师。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下列几个报告：苏维埃建设的当前任务、教师和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建设中的教育任务、苏维埃学校、民族问题和学校、教师和共青团、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等等。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篇宣言，声明教师决不把自己的任务和共产党的任务分开，和共产党为争取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分开。——（正文第五页）

〔2〕“红色青年”（月刊）是大学生的杂志，于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无产阶级大学生中央常务局和无产阶级大学生莫斯科常务局共同出版。“红色青年”杂志的主笔是维·米·莫洛托夫。该杂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改名为“红色大学生”。——（正文第六页）

〔3〕俄共（布）中央全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举行。一月十七日举行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约·维·斯大林关于各地方组织对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的传达，全会通过决议，确认托洛茨基的言论是要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约·维·斯大林于一月十九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就米·瓦·伏龙芝“关于对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的报告发表演说（见本卷第十二页至第十五页）。——（正文第八页）

〔4〕指一九二四年秋西班牙军队的失败。当时西班牙的法西斯独裁者普利莫·德·利维拉派遣了十五万军队去镇压摩洛哥的西班牙占领区（利弗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果摩洛哥人取得了胜利，解放了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三分之二。——（正文第十三页）

〔5〕一九二四年夏，由于阿尔巴尼亚进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反动的阿罕默德－索古政府被推翻。范－诺里政府上台执政后开始和苏联政府进行关于建立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的谈判。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互相派遣了外交使节。英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三国政府要求阿尔巴尼亚同苏联断绝外

交关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阿罕默德－索古匪帮在南斯拉夫法西斯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援下侵入阿尔巴尼亚，推翻了范－诺里政府。于是阿罕默德－索古又执掌了阿尔巴尼亚的政权。——（正文第十三页）

〔6〕“工人报”（日刊）是群众性的报纸，是联共（布）中央机关报；于一九二二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出版，最初的名称是“工人日报”，从一九二二年七月起改名为“工人报”。——（正文第十六页）

〔7〕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报”第二九〇号上登载的约·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文。该文是“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的一部分。这篇序言约·维·斯大林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过。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刊载在各种文集中，出过单行本，并刊载在约·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各种版本中，同时还刊载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五八页至第四〇一页[①]。——（正文第十七页）

〔8〕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二页至第四三〇页。——（正文第十八页）

〔9〕“逆流”文集于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编入该文集的有弗·伊·列宁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所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论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他等文章，所有这些文章后来编入“列宁全集”第三版第十八卷和第十九卷。——（正文第十九页）

〔10〕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九页至第三〇六页）。——（正文第十九页）

〔11〕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页至第九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页至第七七八页）。——（正文第十九页）

〔12〕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讨论关于敖德萨省尼古拉专区得莫夫卡村的事件问题时发表了演说。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农村通讯员格里哥里·马林诺夫斯基在得莫夫卡被一伙为富农所唆使的罪犯分子杀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因农村通讯员马林诺夫斯基被害而引起的得莫夫卡事件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真理报”第三

十号上。——（正文第二十页）

〔13〕指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外国代理人组织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富农暴动和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正文第二十三页）

〔14〕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格鲁吉亚的反革命暴动。这次暴动是被击溃的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残余和饶尔丹尼亚孟什维克流亡“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及第二国际的首领的指示和资助下组织的。在格鲁吉亚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积极协助下，暴动于八月二十九日被平息。——（正文第二十三页）

〔15〕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人，代表六万四千零七十八个党员和三万零七百七十个预备党员。代表会议讨论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委员会的补充报告、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莫斯科省的预算和经济状况以及农村工作问题，并选出了领导机关。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就农村工作问题发表了演说。——（正文第二十五页）

〔16〕道威斯计划就是人所共知的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报告书，它是由美国财政家道威斯将军主持下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制定的，并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六日经盟国伦敦会议批准（关于道威斯计划，见本卷第二二五页至第二二六页）。——（正文第三十二页）

〔17〕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是德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的叛变政策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事变中遭到失败。一九二四年四月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撤销了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在德国共产党内的领导职务。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斥责了布兰德勒－塔尔盖麦集团的投降路线。一九二九年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因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正文第三十八页）

〔18〕指一九二五年初“巴尔马特兄弟康采恩”事件的审判。在审判中揭露了以维尔斯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曾接受康采恩的巨额贿赂这一事实，同时还发现他们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德国国会选举时曾利用康采恩以及和康采恩有联系的银行的资金反对过德国共产党。——（正文第四十页）

〔19〕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于一九一九年七月

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成立。加入联合会的有西欧许多国家和美国的改良主义工会。联合会会员在一九一九年达二千四百万人，至一九二三年末则减少到一千六百万人。往后数年内，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威信不断降低，其会员人数也不断减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取消了。——（正文第四十七页）

〔20〕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成立的。全会研究了下列几个问题，国际发展趋势和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农民问题、俄共（布）党内的争论、共产国际个别支部的问题等等。在全会上成立了政治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等等。约·维·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委员，三月三十日，约·维·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就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发表演说（见本卷第五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正文第五十一页）

〔21〕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八九页至第三五八页）。——（正文第五十九页）

〔22〕见弗·伊·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六五页至第四二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二一页至第八七八页）。——（正文第六十三页）

〔23〕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约有三百人，代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的二十五万名学生。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内部状况、工会和大学生、无产阶级大学生中央常务局的活动的总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职业教育总局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高等学校与生产的联系。约·维·斯大林于四月十三日和代表会议的代表团谈话，于四月十五日写了本卷所刊载的那封致代表会议的信。——（正文第七十一页）

〔24〕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合作社、关于单一农业税、关于金属工业、关于革命法制、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

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分册第二页至第五十一页）。——（正文第七十五页）

〔25〕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〇三二页）。——（正文第七十九页）

〔26〕与登堡元帅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被选为德国总统；他是狂热的保皇派分子，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意志的表达者。——（正文第八十二页）

〔27〕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索非亚“圣礼拜”大教堂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以粲柯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官员们也在教堂内。事后粲柯夫向美国发出一篇诬蔑性的声明书，指控苏联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外国的反动报刊发动了反苏宣传运动，要求本国政府改变对苏联的态度。一九二五年五月举行的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就粲柯夫政府残暴地迫害保加利亚人民的优秀代表一事发表告全世界劳动者书，驳斥了对苏联的诬蔑性的攻击。——（正文第八十三页）

〔28〕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正文第八十五页）

〔29〕指一九二四年实行的中亚细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土尔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和花剌子模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划分。在民族疆界划分以后，成立了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卡拉—柯尔克兹自治区（后来的柯尔克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加入柯尔克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区（后来并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二五年五月举行的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因此对苏联宪法提出了相应的修正。中亚细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划分是在约·维·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正文第一一六页）

〔30〕见弗·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一页至第三十四页）。——（正文第一一七页）

〔31〕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列维里（塔林）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是由爱沙尼亚法庭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对一百四十九个被控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政治犯案件的判决激起的。按照这一判决，大多数被告被判处多年苦役徒刑，其中三十九人被判处终身苦役徒刑，而爱沙尼亚工人的领袖汤普则被枪决。这次起义被爱沙尼亚反动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正文第一二六页）

〔32〕“共青团真理报”（日刊）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五月根据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出版。——（正文第一二八页）

〔33〕“最近新闻报”（日刊）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巴黎创刊。该报的编辑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巴·尼·米留可夫。——（正文第一三九页）

〔34〕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关于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政府的总结报告，苏联工业状况，苏维埃建设问题，提高和巩固农民经济的措施，关于红军以及其他问题。米·伊·加里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正文第一五四页）

〔35〕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演说，见本卷第五十一页至第五十八页）。——（正文第一五六页）

〔36〕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页至第八八〇页。——（正文第一六九页）

〔37〕指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始的摩洛哥利弗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二四年秋季，西班牙占领军在摩洛哥失败以后，法国就决定占据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占领区利弗区，并且挑起了战争。在一九二五年春季和夏季，利弗人使法国人遭到了一连串严重的失败。只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军事同

盟以后，这两国的军队才得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将利弗人击败。——（正文第一七二页）

〔38〕指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华南，英国人用自己的陆海军支援广州反革命商团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而举行的叛乱。在华北，英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中国而在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挑起了战争。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高涨，后来这一斗争发展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正文第一七二页）

〔39〕“布尔什维克”杂志（双周刊）是联共（布）中央的政治理论性的杂志，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创刊。——（正文第一八〇页）

〔40〕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德·查·曼努伊里斯基于六月三十日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正文第一八二页）

〔41〕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六页至第三四四页。——（正文第一八五页）

〔42〕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录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页至第九十七页。——（正文第一九三页）

〔43〕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集团的首领。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在撤销了已破产的布兰德勒—塔尔盖麦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在德国共产党内的领导以后，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在新选出来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攫取了领导。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及其信徒们于一九二五年秋被撤销了在德国共产党内的领导职位，并于一九二六年被作为阶级敌人的走狗开除出党。德国共产党由艾·台尔曼领导。——（正文第一九六页）

〔44〕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政治状况和青年的任务、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青年劳动的前途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经济工作的任务、关于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农村中的工作、关于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红军和海军中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俄国列宁共产主义

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斥责了共青团在同反党倾向斗争中保持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汇编”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正文第二〇四页）

〔45〕弗·伊·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正文第二一一页）

〔46〕弗·伊·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时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八九页）。——（正文第二一一页）

〔47〕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至十日，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举行。本卷发表的约·维·斯大林的信曾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代表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宣读过。——（正文第二一三页）

〔48〕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三日，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举行。代表会议在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赞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正文第二一三页）

〔49〕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和下列几个报告：关于工会工作，关于共青团的工作，关于修改党章以及其他报告。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出了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继续奋斗的道路，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计划，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工业化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同否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新反对派”作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根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开始称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五页至第三六九页）。——（正文第二一五页）

〔50〕罗迦诺（瑞士）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不列颠、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代表（关于罗迦诺会议，见本卷第二二六页至第二二七页）。——（正文第二二五页）

〔51〕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热那亚（意大利）举行了国际经济会议，参加会议的一方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苏维埃俄国。热那亚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确定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关系。在会议开幕时，苏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复兴欧洲的计划，并提出了普遍裁减军备的方案。但会议没有接受苏俄代表团的提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苏维埃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有西部邻国（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和立陶宛）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把按比例裁减军备的计划提出并进行了讨论。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中确认了苏维埃政府和平政策的路线，并号召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支持这个路线。一九二四年二月，苏维埃代表在罗马举行的海军会议上提出了裁减海军军备的具体议案。——（正文第二三二页）

〔52〕指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代表和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代表在伦敦签订的大不列颠和苏联的总的（一般性的）条约和商务条约。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上台执政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拒绝批准这些条约。——（正文第二四〇页）

〔53〕指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沙皇政府所欠国债的法令。——（正文第二四〇页）

〔54〕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代替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上台执政的鲍尔温—奥斯汀·张伯伦保守党政府。——（正文第二四一页）

〔55〕“经济生活报”（日刊）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财经人民委员部和财经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人民委员部等）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正文第二四七页）

〔56〕见弗·伊·列宁的下列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一页至第三一九页）、“一九二一年四月九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和支部负责人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二页至第二七六

页）”、“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页至第八八〇页）、“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七七页至第三九〇页）。——（正文第二五一页）

〔57〕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十页。——（正文第二五九页）

〔58〕见弗·伊·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页至第一四一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七九页至第七八九页）。——（正文第二六八页）

〔59〕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〇页。——（正文第二七〇页）

〔60〕指俄共（布）中央全会（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至十日）根据维·米·莫洛托夫“关于党在贫农中的工作”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分册第六十页至第六十五页）。——（正文第二七三页）

〔61〕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六卷第三二五页至第三九二页。——（正文第二七四页）

〔62〕“贫农报”（日刊）是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正文第三〇一页）

〔63〕“列宁格勒真理报”（日刊）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委员会和市委员会、列宁格勒区域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和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用“彼得格勒真理报”的名称创刊。一九二四年，该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一九二五年末，“列宁格勒真理报”——俄共（布）中央西北区常务局、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省工会联合会和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曾被“新反对派”利用来达到其派别组织的反党目的。——（正文第三一六页）

————————————

① 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卷第三一〇页至第三四八页。——译者注

年　表

一九二五年（1—6月）

一九二五年一月初

约·维·斯大林和“红色青年”杂志编辑部委员们谈杂志的任务。谈话记录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红色青年”杂志第一期（总第五期）上发表。

一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从斯大林诺城（旧名尤佐夫卡）来莫斯科参观的党校学生谈话。

约·维·斯大林写完“女工和农妇们，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一文。该文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女工”杂志第一期上发表。

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全苏教师代表大会。该信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教师报”第二号上发表。

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一批派往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谈话。

一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者谈关于召开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

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联席会议上传达各地方组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

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就米·瓦·伏龙芝“关于对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的报告发表演说。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弗·伊·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写给“工人报”的信在

“工人报”第十七号上发表。

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回信给德—奥夫同志谈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一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发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的演说。

一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演说。

一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及其主席团会议。

一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向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土尔克明斯坦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贺电，贺电中确定了这两个共和国的共产党在中亚细亚实行民族疆界划分后的任务。贺电分别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东方真理报”第二十九号及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土尔克明尼亚火星报”第三十四号上发表。

一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一次代表会议上被选入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

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代表团谈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二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海尔佐克的谈话“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在“真理报”第二十七号上发表。

二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人员谈共青团的工作问题。

二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无产阶级文化”全体人员大会的代表团谈“无产阶级

文化”的今后工作问题。

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工作人员谈共青团的工作问题。

二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向察里津省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致贺电。

二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二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土拉省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谈合作社工作问题和住宅建设问题。

二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麦—尔特同志谈关于德国共产党党内状况问题。

三月六日

为庆祝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成立，约·维·斯大林向塔吉克斯坦劳动人民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东方真理报”第五十八号上发表。

三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庆祝国际妇女节”一文在“真理报”第五十六号上发表。

三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关于召开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和关于代表会议的议程“致俄共（布）各级组织”的通知。

三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因下新城斯大林步兵学校选他为荣誉学员写信给该校学员、指挥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教员。该信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下新城公社报”第四十五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向察里津省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致贺电，祝代表们在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成就。

三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俄共（布）中央为哀悼孙中山逝世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唁电。唁电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真理报”第六十号上发表。

三月十四日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和全苏农村通讯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

三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向卡拉—柯尔克兹自治区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致贺电，贺电中确定了卡拉—柯尔克兹共产党员的当前任务。贺电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东方真理报”第六十七号上发表。

三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前来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谈话。

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工作。

三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委员。

三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一文在“真理报”第六十六号上发表。

三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工人代表团及“狄纳莫”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该两厂工人曾邀请他参加莫斯科工人农民红军代表苏维埃选举大会和莫斯科无产阶级区工人农民红军代表苏维埃选举大会。

约·维·斯大林和红色波罗的海舰队“斯大林号”雷击舰舰员代表团谈话。

约·维·斯大林和列宁研究院领导工作人员谈研究院的工作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前来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演说。

三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北方铁路机务第一段工人大会上被选为莫斯科工人农民红军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三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捷克斯洛伐克分委员会会议上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内状况作了几次发言。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和柯尔克兹共和国代表团谈柯尔克兹的情况。

约·维·斯大林和“贫农报”编辑部代表们谈该报农民栏的工作问题。

四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北方铁路机务第一段工人代表团谈话，该代表团曾将委任约·维·斯大林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的委任状授与斯大林。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致电阿捷尔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谢·米·基洛夫，祝贺阿捷尔拜疆共产党成立五周年。贺电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巴库工人报”第七十五号上发表。

四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发表“关于农村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的演说。

四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

四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团谈话。

四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写“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一信。该信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真理报”第八十七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部队和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出版节向“东方真理报”（塔什干）编辑部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东方真理报”号外上发表。

五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十月铁路工人代表团谈话。

五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向“在伊里奇旗帜下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机关报）致贺电，在贺电中确定了该报的当前任务。

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五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做“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的报告。

五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约·维·斯大林被全俄第十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五月十三日至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五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发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

五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委员。

五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委员。

五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土尔克明尼亚共和国及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代表谈话。

五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南沃舍梯自治省及北沃舍梯自治省的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代表谈各共和国的情况。

五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六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及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领导工作人员谈话。

六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和安·安·安得列也夫写信给“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委员们。

六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县级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谈话。

六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六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回答该校学生提出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给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庆祝本科和专科第二届毕业典礼）”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三二号上发表。

六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唐波夫省、奥勒尔省、沃龙涅什省及库尔斯克省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谈恢复黑土地带的国民经济的措施。

六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的“再论民族问题（关于谢米奇的文章）”一文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合刊上发表。

一九二五年（7—12月）

七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被选入波兰问题委员会。

七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委员会会议上就波兰共产党党内状况问题发表演说。

约·维·斯大林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关于东方革命运动”的谈话在“真理报”第一五〇号上发表。

七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选入德国问题委员会。

八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哥里亚切沃德斯卡亚村哥萨克，答谢他们在该村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授予选举斯大林为该村名誉哥萨克的证书。该信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捷列克报”第一八九号上发表。

九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维·米·莫洛托夫谈季诺维也夫“时代哲学”一文的反布尔什维克性。

九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来信。

九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致乌契—杰列疗养所的休养员的贺电在“苏维埃南方报”第二一五号上发表。

九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选入俄共（布）中央中亚细亚常务局关于中亚细亚土地—水利改良问题的提案审查委员会。

九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代表谈共和国的民族机构和国家机构的问题。

十月三日至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克拉拉·蔡特金谈德国共产党内的状况。

十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梯弗里斯及下新城党委员会的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宣传鼓动部负责人员会议的参加者谈话。

十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谈话。

十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召开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在“真理报”第二三六号上发表。

十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南沃舍梯自治省及北沃舍梯自治省的代表谈南沃舍梯和北沃舍梯的合并问题。

约·维·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发表关于鞑靼党组织工作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和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库尔斯克省党委员会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约·维·斯大林和土拉兵工厂厂长谈工厂工作问题。

十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苏联第一艘木材运输船“斯大林同志号”下水向波罗的海造船厂工人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消息报”第二四六号上发表。

十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关于共青团任务的问题在“共青团真理报”第一三三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在波特金（索尔达钦柯夫）医院探望患病的米·瓦·伏龙芝。

十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因米·瓦·伏龙芝的遗体当时安放在波特金医院而去该医院。

十一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追悼米·瓦·伏龙芝的纪念大会。

十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红场举行的米·瓦·伏龙芝的葬礼上发表演说。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一文在“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上发表。

十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人员谈共青团的工作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被十月铁路斯大林修理厂工人的党员大会选为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区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代表。

十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和阿捷尔拜疆五金工会分会及矿工工会分会的领导人员谈工人状况。

十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约·维·斯大林向俄共（布）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区第五次代表会议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汽笛报”第二六五号上发表。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致电在列宁格勒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谈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十二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十二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被选为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约·维·斯大林给“贫农报”编辑部的信在“贫农报”第二二七八号上发表。

十二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主席团。该信在一九三四年“红色史料”杂志第一期（总第五十八期）上发表。

十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选入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

十二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十二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就保持党的统一问题告“新反对派”书。

约·维·斯大林主持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并就俄共（布）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共（布）发表演说。

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向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发表声明。该声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真理报”第二九八号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党中央紧急全会的工作；由于“新反对派”利用“列宁格勒真理报”来达到其派别组织的反党目的，约·维·斯大林发表了关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演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全集

第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1/25・印張$14\frac{2}{5}$・插頁3・字數246,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本書在京、滬兩地印造）
印數（京）1—37,000　　定價（5）1.30元
統一書號1001・365

我们已经向西方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表明，历来只会替老爷们做工和听从老爷们指挥的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是能够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8
1926
ЯНВАРЬ – НОЯБРЬ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一九五四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八卷说明 …… 1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上）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3
“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 …… 10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 11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 11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 13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 15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17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 25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47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 59
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
（答波尔特涅夫、叶弗列莫夫、伊甫列夫三同志） …… 70
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答坡柯也夫同志） …… 73
纪念柯托夫斯基同志 …… 76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法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 …… 77

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 82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84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
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 89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 89
二 工业化方针 …… 91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 92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 97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 102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 103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 104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 106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 107
十 结论 …… 108
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
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 …… 110
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在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报告）…… 114
英国为什么发生罢工？ …… 114
英国总罢工为什么失败了？ …… 116
总罢工的教训 …… 119
几个结论 …… 120
关于波兰最近的事件 …… 122
对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欢迎词的答词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 125

（下）

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 128
费·捷尔任斯基
（悼费·捷尔任斯基） …… 141
关于英俄委員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143
致美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部 …… 150
给斯列普柯夫的信 …… 151
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演说）…… 153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
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 156
一　“新反对派”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
基本問題上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57
二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 …… 161
三　反对派联盟的“革命”言论和机会主义行为 …… 164
四　结论 …… 167
论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68
一　反对派联盟发展的几个阶段 …… 168
一、第一阶段 …… 168
二、第二阶段 …… 169

三、第三阶段 …… 171
四、第四阶段 …… 172
五、列宁和党内联盟的问题 …… 173
六、反对派联盟的瓦解过程 …… 174
七、反对派联盟指望什么？ …… 175
二 反对派联盟的基本错误 …… 177
一、几点预先的说明 …… 178
二、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 181
三、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 …… 191
四、“新反对派”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94
五、托洛茨基的支吾搪塞。斯米尔加。拉狄克 …… 198
六、我国建设前途问题的决定意义 …… 202
七、反对派联盟的政治前途 …… 204
三 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 207
四 几个结论 …… 211
“论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 216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 216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216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級专政的几点意见 …… 223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 …… 227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 230
三 不可思议的糊塗想法或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 237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42
一、托洛茨基的戏法或“不断革命”的问题 …… 242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49
三、“小事”和笑话 …… 253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 255
六 总结 …… 258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260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 260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 261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 263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 264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 266
六　中国的无产阶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 269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 269
八　几个结论 …… 270

注释 …… 272
年表 …… 283
插图（新增）
一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 83
二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 …… 142
三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 215

第 八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包括约·维·斯大林同志从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是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总方针而展开斗争的第一年。

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两篇著作中，约·维·斯大林同志揭发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对列宁主义基础的敌意歪曲，捍卫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揭穿了“新反对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苏联胜利的思想散布到党内来的企图。

约·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捍卫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投降思想和破坏、分裂活动。

约·维·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著作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学说，论证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国际意义；拟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践任务，规定了实现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总方针的具体道路和方法。

在“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和其他著作中，约·维·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了必须为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而进行顽强的彻底的斗争；揭露了

托洛茨基的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运动的冒险理论，指出了外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约·维·斯大林同志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它的性质和方向。

第八卷中第一次发表的文件有“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法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演说、“给斯列普柯夫的信”、“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约·维·斯大林同志“致美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部”的信。约·维·斯大林同志“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信是全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一

我认为汉逊和路特·费舍所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随时随地都要所谓公平地用同等的打击力量去反对右派和“极左派”。这种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公平地和均等地打击右派和“极左派”的观点是幼稚的观点。政治家是不能这样提问题的。对于跟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我们不应当从公平的观点来考察，而应当从政治情况的要求、从每个时候党的政治要求的观点来考察。为什么目前法国共产党**迫切的**突击任务是和右派作斗争，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却是和“极左派”作斗争呢？因为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目前这两个党的政治要求不同。

德国不久以前才度过了严重的革命危机〔二〕，当时党是以正面攻击的方法进行斗争的。目前德国◇3◇[①]共产党正处在积聚力量和组织群众去迎接未来决战的时期。为了在新的环境中达到旧的目的，正面攻击的方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现在要求德国共产党改用迂回的方法，以便掌握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出现一个“极左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派别像小学生一样重复着旧的口号，它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那种需要新的工作方法的新的斗争条件。于是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极左派”的政策就阻碍了党去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妨碍了党为自己开辟走向德国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道路。德国共产党如果粉碎“极左派”的反抗，那末它就会走上广阔的大道，争得工人阶级的多数；德国共产党如果不这样做，那末它就会把目前的危机变成慢性的置党于死地的危机。因此，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和党内的“极左派”作斗争。

在法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里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革命危机。那里的斗争是在合法的范围内用完全合法或者几乎完全合法的斗争方法进行的。但是法国现在已经显露出危机，我指的是摩洛哥战争、叙利亚战争和法国财政困难〔二〕。这个危机究竟严重到怎样的程度还很难说，但它毕竟是一个危机，它要求党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条件结合起来，要求党最高度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党内出现一个集团（我指的是右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集团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它仍然坚持旧的斗争方法，把旧的斗争方法当做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阻碍法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因此，法国共产党**当前的**危险是右倾的危险。因此，法国共产党的突击任务就是和右倾危险作斗争。◇4◇

从联共（布）历史中举几个例子来说吧。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我们党内也曾形成一个叫做“召回派”的“极左派”，它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它不赞成利用合法机会（例如杜马、工人俱乐部、保险基金会等等）的方法。大家知道，列宁对这个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党是在战胜了这个集团以后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的。一九一七年〔三〕革命以后，我们这里又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极左派”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大家知道，这个集团也被以列宁为首的我们党打垮了。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跟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抽象地而应当具体地根据政治情况来提出。

法国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反对自己党内右派分子的决议，而德国同志提出关于反对“极左派”的决议，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

因此，公平地和同等地打击右派和“极左派”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正因为如此，我建议从关于德国“极左派”的决议草案中把那句说到在德国共产党内必须同样强调对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话删去。我建议删去这句话的理由，和从关于法国共产党内右派的决议中把那句强调反对“极左派”的话删去的理由是一样的。至于随时随地都应当同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那是绝对正确的。可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目前在法国应当强调什么问题，在德国又应当强调什么问题。我认为在法国共产党内应当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当前政治情况所要求的；在德国共产党内却应当强调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德国共产党当前政治情◇5◇况所要求的。

假使用刚才讲过的观点来考察，那末，德国共产党内的中间集团即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依我看来，这个集团是在用外交手腕替萧列姆的“极左派”打掩护。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同情萧列姆集团，却竭尽全力去削弱党对萧列姆集团的打击。这样，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就阻碍着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克服并消除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偏见。因此，德国共产党必须和这个集团即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作坚决的斗争。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如果被打垮，那末党就有可能在和萧列姆集团的斗争中克服目前的危机；德国共产党如果上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外交手腕的当，那末斗争的胜利就将属于萧列姆。

二

我觉得汉逊在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上是在宣扬某种完全不适合于共产党的僧侣道德。看来他并不反对思想斗争，但是他想以丝毫不降低反对派领袖威信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斗争。我必须说，天下没有这样的斗争。我必须说，谁认为只有在丝毫不损害领袖威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斗争，谁就是实际上否认党内可以进行任何思想斗争。我们是否必须揭露党的某些领导者的错误呢？我们是否必须把这些错误公开出来，以便能够用领导者的错误来教育党员群众呢？我以为是必须的。我以为别的纠正◇6◇错误的方法是没有的。我以为掩饰错误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由此可见，党内的斗争和纠正错误不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某些领袖的威信是不成的。这也许是可惜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反对必然性。

汉逊问：我们是否必须一般地既反对“极左派”又反对右派呢？自然是必须的。这个问题我们老早就解决了。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是：在目前处在不同状况下的两个不同的党内，即法国党和德国党内，我们现在必须强调对哪一种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法国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反对右派的决议，德国同志却提出关于反对“极左派”的决议，这是偶然的吗？也许法国同志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是错了吧？那末，为什么汉逊不打算向主席团提出关于和法国“极左派”作斗争的对案呢？也许德国同志强调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是错了吧？那末，为什么汉逊和路特·费舍不打算向主席团提出关于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的对案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地同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抽象问题，而是目前德国党的迫切任务的具体问题。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克服“极左”倾的危险，正像法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克

服右倾的危险一样。

例如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本国工会运动中已经有了真正据点，已经为自己开辟了走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道路，并且已经开始取得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相当多的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可是德国在这方面还很弱，这种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呢？这◇7◇种情况首先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派”还很强，他们对工会、对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掌握工会的口号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极左派”还坚持“退出工会”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反无产阶级口号的余毒，直到今天在“极左派”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德国共产党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扫除“极左派”在群众工作方法问题上的偏见，彻底粉碎萧列姆集团，从思想上粉碎它；或者是德国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党内危机就会朝着极危险的方向发展。

有人说，在“极左派”那里有诚实的革命工人，不能也不应当把他们推开。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并没有提出要把他们推开。因此，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并没有提出关于把任何一个“极左派”分子，尤其是工人，推开或开除出党的任何建议。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工人提高到列宁党的觉悟水平呢？怎样才能使这些受了“极左派”领袖的错误和偏见影响的工人走出迷途呢？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上否认“极左派”的领袖，揭露“极左派”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把诚实的革命工人弄得糊里糊涂并阻碍他们走上广阔的大道。在党内思想斗争和群众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容许玩弄陈腐的外交手腕和掩饰错误呢？不，不能容许。要是容许，就是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有一条：揭露“极左派”领袖的错误，从而帮助诚实的革命工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有人说，打击“极左派”会引起别人的责难，说德国共产党向右转了。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一九〇八年，列宁在党的全俄代表

会议〔四〕上对俄国的“极左派”作了斗争并彻底打垮了他们，当时我们这里也有人责难列宁，说他右倾，说他向右转。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列宁当时是正确的，他的观◇8◇点是唯一革命的观点，而当时以“革命”词藻自炫的俄国“极左派”实际上却是机会主义者。

不应当忘记，右派和“极左派”实际上是双生子，所以他们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不同的只是右派并不经常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左派却经常用“革命”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我们不能根据某些造谣分子或庸人可能说我们些什么话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我们应当坚定地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管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还会造我们什么样的谣言。俄罗斯人有一句很好的谚语：“狗叫狗的，商队走商队的。”我们必须记住这句谚语，因为我们还会常常用得着它。

路特·费舍说，今后德国共产党内会出现右倾的危险，它将成为党的迫切问题。这完全可能，甚至一定会如此。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路特·费舍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对目前**已经**成为实际危险的德国“极左派”的打击应当减轻，而对**将来可能**造成严重危险的右派的打击现在就应当加重。不难了解，这样提问题是有些可笑的，而且是根本不对的。只有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这样目光短浅、玩弄外交手腕的集团才会落到如此可笑的地步；这个集团力图削弱党对“极左派”的斗争，从而搭救萧列姆集团使它免受打击。路特·费舍的建议的唯一意义就在这里。我想，在法国也一定有这种玩弄外交手腕的、力图以花言巧语来掩饰法国共产党内右派分子的中间集团。因此，不论在德国党内还是在法国党内，和这些玩弄外交手腕的中间集团作斗争都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路特·费舍硬说通过反对德国“极左派”的决议只会使党内情况更加紧张。我认为路特·费舍是要使德国共产党内的危机延续下去，使它成为长期的危机，使它变成慢性的危机。因此，不管路特·◇9◇费舍怎样玩弄外交手腕，不管她怎样用花言巧语来谈论党内和平，我

们是不能走她那条道路的。

同志们，我以为德国共产党内已经锻炼出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以为目前德国共产党的工人核心正是德国共产党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支持这个核心并帮助它和各种倾向首先和“极左”倾向作斗争，——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任务。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反对德国“极左派”的决议。

载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四十号◇10◇

“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五〕

“论列宁主义基础”〔六〕这本小册子应该看做本文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本小册子在将近两年前即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次出版，现在编入本文集，是第二次出版。这两年来发生了许多事件：党经过了两次争论，出版了许多关于列宁主义的小册子和必要的读物，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际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很明显，两年来发生的新问题以及这本小册子出版以后两次争论的结果都不可能包括在这本小册子内。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在著者后来写的一些小册子（“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七〕、“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八〕、“问题和答复”〔九〕等等）中加以阐明；这些小册子现已编入本文集，它们和初版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有机地联系着。由于上述情况，出版这一部统一的完整的论述列宁主义问题的文集是十分必要的。

最近一次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总结了最近期间即从第十三次到第十四次代表大◇11◇会这一期间党在思想方面和建设方面的工作。同时，这次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审查了“新反对派”当时提出的论点。试问：这次审查的结果怎样呢？

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12◇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献给

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约·斯大林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列宁主义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一〇〕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13◇**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别解释了。

然而我们党内竟有人认为必须给列宁主义下一个与此稍稍不同的

定义。例如季诺维也夫认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季诺维也夫所强调的几个字有什么意义呢？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

这就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

不用说，农民问题对于俄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确定◇14◇列宁主义基础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列宁主义仅仅是根据俄国的条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吗？难道列宁的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一〕、“国家和革命”〔一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四〕等等只是对于俄国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的吗？难道列宁主义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吗？难道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不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和必要的吗？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难道不对吗？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难道不对吗？

又如下面一段列宁的话难道说得不对吗：

“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有一些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之点**。”[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八十八页）

如果这一切都对，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吗？◇15◇

这种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列宁主义定义怎能和国际主义相容呢？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说：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一五〕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列宁主义定义中得出来的。的确，既然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是阐明这个问题，就是论证这个问题并把它具体化。

可是，看来季诺维也夫是不同意这个论点的。他在“纪念列宁”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文里说：

“我已经说过，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①

可见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不正确的定义中得出来的。因此，这◇16◇个论点也和他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一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一页），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那末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帝国主义问题，帝国主义发展的跃进性问题，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无产阶级国家问题，这个国家的苏维埃形式问题，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列宁都给阐明了的，这难道不对吗？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根基，这难道不对吗？不阐明这些基本问题，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上去阐明农民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不用说，列宁是个精通农民问题的人。不用说，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有极重要的意义，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派生问题，即农民问题，这难道不明白吗？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实践问题，就不会有和农民联盟的问题，◇17◇这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难道不明白吗？

如果列宁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为基础，并且不顾这个基础而站在这个基础以外来阐明农民问题，那他就不会是一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像他确实是的那样，而只会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哲学家”，像国外那些庸俗文人时常把他描绘的那样。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非农民的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

这里必须加以选择。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认为“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作用估计过低的“理论”。那里面说：◇18◇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力量的作用。”〔一六〕

对俄国“不断论者”的这个评语直到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认的。然而这个评语一般说来虽然正确，但还不能认为是详尽无遗的。一方面是一九二四年的争论，另一方面是对于列宁著作的仔细分析，都已表明俄国“不断论者”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过低估计农民的作用，而且在于他们过低估计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在于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因此，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那本小册子里已扩充了这个评语，并且代之以另一个比较完全的评语。在那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说的：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一七〕

这当然不是说列宁主义过去反对或者现在反对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那个没有带引号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一八〕。恰恰相反，列宁是唯一正确了解了并发展了不断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不断论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断论者”曲解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书本上的玄谈，列宁则接受了原来的不断革命思想并把它变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基础之一。必须记着，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就已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19◇义革命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请看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关于这一点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①。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力帮助全体农民去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一三页至第二一四页）

再看，经过了十六年，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对于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考茨基之流、希法亭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希尔奎特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英雄们，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关系。**前一革命转变为后一革命**[①]。后一革命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而且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20◇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二页）

请特别注意前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从列宁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引来的。我着重指出这一点是要一些人注意，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硬说列宁只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有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段话毫无疑义地说明这些人是大错而特错了。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21◇**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五）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吧：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22◇七页）

列宁继续说：“如果那种经历了一九〇五年伟大试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末苏维埃在十月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的成功全靠那包括

千百万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因此，我们在政治方面就能预期我们后来所经历的那些辉煌成就和不断的胜利进军，因为新政权形式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几道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七页至第六十八页）

列宁说：“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同上，第六十八页）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统计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容许像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23◇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八页）

“……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国际问题。如果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如果我们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实施了土地社会化和工人监督制的法令，——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

和国和平共处，——其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财政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同上，第六十九页至第七十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性质和基本意义就是如此。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特别着重特别坚决指出这个原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还只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被那些仇视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而且国际资本又不会不帮助这个国家里的资产阶级。◇24◇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六〇页）

“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①]：‘首先要使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情形下，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并且应当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九页）

“我们说[②]：‘首先要使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才能迅速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同上）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为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破坏其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25◇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二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既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那末，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又是什么呢？

请看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概括的定义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获得了胜利、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反对那虽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绝迹、还没有停止反抗的资产阶级，反对那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

列宁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的”“普选的”政权、和“非阶级的”政权混为一谈。他说：

“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意识到它是**独自**[①]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一点是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之内的。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26◇有意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五〇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权，即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竟不需要其他阶级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帮助，竟不需要和这些群众结成联盟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盟，一般说来，是否和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可见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完全推翻资本、完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打破其复辟企图而成◇27◇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精神上各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至第三五一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加米涅夫在他的一个指示性的报告中反对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专政**并不是**[①]一个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联盟。”

我想，加米涅夫在这里首先是针对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里的一段话而说的。这段话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一九〕

我完全坚持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因为我认为它和刚才所引证的列宁的定义完全相符。

我断定：加米涅夫的“专政**并不是**一个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联盟”这种武断说法是和列宁的无产阶◇28◇级专政理论毫无共同之点的。

我断定：只有不懂工农结合的思想、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的意义的人才会这样说。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论点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论点就是：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联合农民**[②]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页）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原理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原理就是：

“**专政的最高原则**[③]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同上，第四六六页）

列宁指出专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镇压剥削者。他说：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程拘束而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卷第三二六页）

“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着）不受限制的、凭藉暴力而不是凭藉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专政。”（同上，第三二〇页）◇29◇

固然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只限于暴力。

列宁说：“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富有生命力和获得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形式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的泉源和必然会完全胜利的保证就在这里。”（同上，第三八六页）

“它（即专政。——斯大林注）的主要实质就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其先锋队，其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使社会所有成员都成为劳动者，铲除任何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久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惯于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那种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上，第三五八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主要方面：◇30◇

（一）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二）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三）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有其各个时期、各种特别形式和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不进行建设工作就无法进行国内战争。反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不应忘记，革命暂时还只是在一个国家内获◇31◇得胜利。不应忘记，既然还有资本主义包围，也就有武装干涉的危险和由这危险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上面我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从其阶级内容的观点，从其国家性质的观点，最后从其在整个历史时期内即由资本主

义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过渡时期内所执行的破坏任务和创造任务的观点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需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的观点，从其“机构”的观点，从“引带”、“杠杆”和“指导力量”的作用和意义的观点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引带”、“杠杆”和“指导力量”综合起来就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列宁），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常工作就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实现的。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这种“引带”或“杠杆”是什么呢？这种“指导力量”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杠杆或引带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

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些引带、这些杠杆和这种指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无产阶级在其争取胜◇32◇利的斗争中，在有组织有武装的资本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军队。这些组织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这些组织，无产阶级在其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其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中，在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必然要遭到失败。这些组织的经常帮助和先锋队的指导力量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组织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工会**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即许许多多生产的、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组织。它们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联合起来。这是非党的组织。工会可以称为我国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优秀分子来担任一切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工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联系起来。工会把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先锋队连接起来。

第二、就是**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许许多多的支脉，即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国家组织，再加上无数自动组织起来的、环绕着这些组织并把这些组织和居民连接起来的劳动者的群众团体。苏维埃是全体城乡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这是非党的组织。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表现。所有一切巩固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是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苏维埃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连接起来。

第三、就是各种**合作社**及其所有支脉。这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合作社首先把劳◇33◇动者作为消费者联合起来，然后把他们作为生产者联合起来（农业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广泛的建设时期，合作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合作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便于和农民群众联系，并有可能把农民群众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第四、就是**青年团**。这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但它是很靠近党的。它的任务是帮助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年轻的一代。它以青年后备军供给一切管理部门中的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时期，青年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最后，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

作用。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34◇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连接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见“论列宁主义基础”〔二〇〕）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列宁）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用列宁的话来说：“整个来看，结果就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比较广泛的、很有力量的无产阶级的机关，党就是通过这个机关和**本阶级**以及**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在◇35◇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关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

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页）

这一点当然不能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苏维埃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藉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没有这些“引带”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

列宁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引带’，就不能实现专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页）

“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①]一系列的也是新式的特别机关，即**通过**[②]苏维埃机关。”（同上，第二页）

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二一〕上如何说明这一点：

“坦纳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过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36◇解的一样。他说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实质上**[①]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觉悟的少数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即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其人类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们所能包括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像在任何资本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些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是个反对政党的人，但同时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末我要说，我们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〇页）

然而这一点决不应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一个等号**，可以把前后二者**看做一个东西**，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这个论点显然是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如果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混同的看法是正确的呢？不，不可以。原因就是：

第一、上面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中引来的那一段话里，列宁根本没有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他只是说，“只有觉悟的少数（即党。——斯大林注）才能◇37◇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实质上**[①]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觉悟的少数的专政”。

说“实质上”，这还不等于说“完全”。我们往往说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等于说：农民问题可以代替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按内容来说和民族问题相等，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个东西。无须证明，民族问题按内容来说比农民问题更广泛，更丰富。同样，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那末这还不等于说：“党专政”（领导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东西**，前者按内容来说和后者**相等**。无须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按内容来说比党的领导作用更广泛，更丰富。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什么专政。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党的指示呢？这是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把党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呢？当然不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由此可见，这里有一系列的过渡和中间阶段，这些过渡和中间阶段是无◇38◇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因素。可见在党的指示和这些指示的实施之间有被领导者的意志和行动，本阶级的意志和行动，本阶级决心（或不愿意）拥护这些指示，本阶级善于（或不善于）实行这些指示，本阶级善于（或不善于）完全依照环境的要求来实行这些指示等等情况。未必用得着证明：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决不能不顾及被领导者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决不能忽视本阶级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的指示代替本阶级的意志和行动。

第三、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获得了胜利、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这种**阶级**斗争会怎样表现呢？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以一系列的武装行动去反对那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袭击或外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巩固时，它会表现为国内战争。在政权已经巩固后，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作。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活动者都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党，仅仅一个党，没有本阶级支持而单靠自身的力量来进

行所有这些活动，是从来没有的。党通常只是领导这些活动，它所以能领导这些活动，在于它有本阶级的支持。因为党不能包括本阶级，不能代替本阶级。因为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它毕竟是本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代替本阶级。

第四、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二二〕。在◇39◇这个意义上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然而决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无须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

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上层’和党‘上层’融成一体，——它们现时在我国是融成一体的，而且将来也会如此。”（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五三页）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决不是想藉此说我们所有一切苏维埃机关，例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运输机关，我们的经济机关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机关，说党能代替苏维埃及其支脉，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列宁屡次说“苏维埃体系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五页和第四四三页）；但他从来没有说党是国家政权，党和苏维埃是一个东西。拥有数十万党员的党，领导着包括千百万人——党员和非党员——的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但党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以自己代替它们。因此，列宁说：“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并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①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九页和第三十一页），专◇40◇政是“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页）。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者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来了解，那末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列宁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就是“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八十四页）。因此，说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那就等于说党不仅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并且应当是对本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专政者，这种说法当然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谁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默认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基础上，而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是和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正确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它的口号的正确，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41◇

（一）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藉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

（二）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

（三）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所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本阶级间、党和无产阶级间正确的相

互关系的起码要求。

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党和本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人阶级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关系问题了。

按列宁所下的定义，这种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信任**”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42◇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列宁说：“大概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见，如果我们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一般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②即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诚实、奋不顾身、有威信、能引导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最完全最忠诚的拥护**③，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仅不能把政权保持两年半，甚至不能保持两月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没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有那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那**受到本阶级全体忠诚分子信任的**[①]党，没有那善于注意群众情绪并善于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同上，第二十七页）

可是，党是怎样取得本阶级的这种信任和拥护的呢？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铁◇43◇的纪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是在什么基础上成长的呢？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

“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是靠什么来检查的呢？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毅、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②]，首先是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样也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打成一片**[③]。第三、是靠这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的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同时须使最广大的群众都能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的政党，真正能成为以推翻资产阶级而改造全社会为己任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就不能实现其内部的纪律。没有这些条件，所有要建立纪律的企图必然变为空谈，变为废话，变为装腔作势。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是一下子能产生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艰苦的试验，这些条件才能造成；只有用正确的革命理论，这些条件才容易造成，但革命理论又不是教条，它只有和真正群众的、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页至第九页）

其次：◇44◇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就要求领导的政党（共产党）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保持正确的相互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关系。只有共产党，如果它真是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它包括革命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如果它是由完全觉悟、忠心耿耿、受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育和锻炼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如果它能把自己和本阶级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而通过这个阶级又和全体被剥削群众联系起来，并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去对一切资本主义势力作最无情的、坚决的、最后的斗争。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它的革命进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那些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极少数的工人贵族和工联的、合作社的旧领袖等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至于反抗化为乌有，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它那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所致而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部分大得无比的全部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至第一六四页）

从这些引文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群众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的“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45◇护上；

（二）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取得的，不是靠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取得的，而是靠党在群众中的长期工作，靠党的正确政策，靠党善于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靠党善于保证自己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并善于引导工人阶级群众来取得的；

（三）没有以群众斗争经验为基础的党的正确政策，没有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没有而且不能有党的真正领导；

（四）如果党享有本阶级的信任，如果党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就不能把党及其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因为没有那深为工人阶级所信任的党的领导（党“专政”），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无产

阶级专政。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不是空话就是夸大和侥幸。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专政，而不是像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专政。其所以不能，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可以说是站在一条工作路线上按照一个方向行动的。

列宁说：“单从提出‘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这一问题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人们的思想糊涂到了难以置信的不可救药的地步……谁◇46◇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形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较为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那就荒谬愚蠢到令人发笑的地步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页和第二十五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的原理所根据的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本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它所根据的假设是：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常的，是保持在“相互信任”的范围内的。

可是，如果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如果党和本阶级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党这样或那样使自己和本阶级对立起来，破坏了自己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那又怎么办呢？

这种情形一般说来是否可能呢？

是的，是可能的。

这种情形在以下的场合是可能的：

（一）**如果**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建筑在它的工作和群众的信任上，而是建筑在它的“无限”权◇47◇力上；

（二）**如果**党的政策显然不正确，而党又不愿意重新审查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三）**如果**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但群众还领会不了它的政策，而党又不愿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让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却企图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各种集团和派别所以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就在于它们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有时甚至这三条全犯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只要在以下的场合，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领导）对立起来看，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一）**如果**不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这个名词的本义的专政（“凭藉暴力的政权”），而了解为党的领导，正如列宁所了解的那样，了解为决不容许对整个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大多数使用暴力的那种领导；

（二）**如果**党有根据做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就是说，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政策是符合本阶级利益的；

（三）**如果**本阶级，如果本阶级的多数都接受这种政策，领会这种政策，并由于党的工作而确信这种政策的正确，信任党和拥护党。

违背这三条就一定会引起党和本阶级的冲突，引起它们之间的分裂，引起它们彼此间的对立。◇48◇

可以不可以用暴力强迫本阶级接受党的领导呢？不，不可以。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党如果想始终做无产阶级的党，它就应当知道，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

导师。我们不能忘记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的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七六页）

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本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始终做领导者，它就应当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应当改正自己的政策，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这种错误。只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援引一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例如在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前，工会群众显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当时党就公开而诚恳地重新审查这个政策。请看列宁当时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废除余粮收集制而施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说了些什么：

“我们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爽直地说：农民不满意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关◇49◇系，他们不要这种关系，并且不会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志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这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志。我们应当顾及这一点，而且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说：**让我们重新审查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页至第一九三页）

如果党的政策，比方说，由于本阶级政治上的落后而还没有得到本阶级的信任和拥护，**如果**党，比方说，由于事件还没有成熟而不能使本阶级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可以不可以认为党只要以自己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为理由，就应当负责发起并负责领导组织群众进行决战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呢？不，不可以。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做真正的领导者，就应当善于等待，应当使群众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应当帮助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这个政策的正确。

列宁说：“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说不上什么起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〇七页）

“如果工人阶级多数的观点没有转变，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又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被我们争取过来。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就连向◇50◇胜利走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从这一点到胜利还距离得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至少没有站在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真正广大的被资本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大家知道，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从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到十月起义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行动的。正因为党依照列宁的这些指示而行动，所以它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大体上就是如此。

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关系又没有破坏，那末什么是**领导**呢？

这种条件下的领导就是要善于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提出并实行能把群众引到党的立场上并使他们易于根据本身经

验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的一些口号，把群众提高到党的觉悟水平，这样来保证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使他们具有坚决斗争的决心。

因此，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

列宁说：“假如我们现时在俄国，在取得了对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的两年半的空前胜利以后，竟以‘承认专政’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做了蠢事，破坏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51◇帮助了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整个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而不是凭空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来和他们**隔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六页）

这当然不应该理解成为：党应该说服所有工人，直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只有到那时才能着手行动，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行动。绝不是这样！这只是说，党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行动以前，应当进行长期的革命工作，以保证自己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至少取得本阶级多数的善意的中立。否则，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到党方面来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列宁的原理就毫无意义了。

可是，如果少数不愿意，如果少数不肯自愿服从多数的意志，那对他们该怎么办呢？党既已得到多数的信任，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当强迫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应当的。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党用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迫，只要这种强迫有工人阶级多数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做基础，只要这种强迫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对少数使用的。

应当回想一下我们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关于这一点的争执。当时反对派的错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二三〕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于反对派当时认为可以实行强迫呢？不是的，不在这里。当时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既不能使多数相信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既已丧失多数的信任，却还实行强迫，坚持“整刷”那些获得多数信任的

人。◇52◇

请看列宁当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那末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可是，当有人开始为这种错误辩护时，这就会成为政治危险的根源了。如果我们看到库图佐夫在这里所表现的那种情绪而不采取尽可能的民主办法，那我们就会陷于政治破产。**首先我们应当说服，然后强迫。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先说服，然后强迫**[①]。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页）

列宁在他的“论工会”〔二四〕这本小册子里也这样说：

“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迫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迫。”（同上，第十四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任何领导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党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就整个阶级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

党对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的原则大体上就是如此。◇53◇

对于领导的任何其他见解都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随便说它是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说是列宁主义。

如果在党和工人阶级间，在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存在着正确的相互关系，那就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尤其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把党的领导（“专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政”）和工人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索凌**根据**不能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

可是列宁不仅说这种对立是不可容许的，而且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也是不可容许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吗？如果我们循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们就一定会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领袖专政”**。而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的政策，实在说，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来的……

季诺维也夫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季诺维也夫实质上和索凌持着一样的观点，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不同的是索凌说得更直爽更明白，而季诺维也夫却在“兜圈子”。只要看看下面季诺维也夫所著“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季诺维也夫说：“苏联的现存制度按其阶级内容来看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政权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呢？谁在行使工人阶级的政权呢？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里**[①]**是党**◇54◇**专政**。苏联政权的法律形式是什么呢？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式国家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苏维埃制度。二者一点也不相矛盾。”

如果把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那末说二者不相矛盾当然是对的。可是，怎么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间、在苏维埃制度和党“专政”间划一个等号呢？列宁曾把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他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苏维埃，**我们的**苏维埃，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组织。可是列宁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著作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曾在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间、在党“专政”和苏维埃制度间划过等号，像现在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呢？不仅党的领导（“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而且领袖的领导（“专政”）也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宣布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党专政的国家，**也就是**领袖专政的国家吗？而季诺维也夫狡猾地胆小地推行的那个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的“原则”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来的。

在列宁的无数著作中稍许涉及党专政问题的，我只找到五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论战。他在那里说：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55◇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九六页）

第二个地方就是“就战胜高尔察克事致工人和农民的信”。他在那里说：

“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一党专政’即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的党专政当做纸老虎来吓唬农民。

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纸老虎了。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同上，第五一七页）

第三个地方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坦纳论战时的演说。这篇演说我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①

——————————————

① 见本卷第三十六页至第三十七页[指旧版页次，下同]。——编者注。

第四个地方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几行文字。这几行文字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①

第五个地方就是载于“列宁文集”第三卷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大纲的草稿，里面有一个小标题◇56◇叫做“一党专政”（见“列宁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页）。

必须指出，在这五个地方当中有两个地方，即最后一个和第二个地方，列宁给“一党专政”这几个字加上了引号，显然是着重指明这个公式含有不确切的转用的意思。

同样必须指出，列宁在所有这五个地方都把“党专政”了解为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铁的政权”），而并不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和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诬蔑论调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他解释或一般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的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恰恰相反，这些著作的每页每行都是坚决地反对这种公式的（见“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论政党的作用的提纲中〔二五〕**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说到党专政。这个提纲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定的，列宁在他的演说中一再地引证过并认为它是正确地规定了党的作用和任务的典范。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

（甲）列宁并没有认为“党专政”这个公式是无可指摘的、十分精确的公式，所以这个公式在列宁的著作中用得极少，有时还加上引号；◇57◇

——————————————

① 见本卷第四十三页、第四十四页至第四十五页、第四十六页至第四十七页、第五十页至第五十一页、第五十一页至第五十二页。——编者注。

（乙）在很少的地方，当列宁和敌人论战而不得不说党专政时，他通常说“一党专政”，就是说我们党**独掌**政权，**不**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而且他总是解释说，必须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

（丙）凡是列宁认为需要科学地规定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时，他**只**说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地方有几千个）；

（丁）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没有“想到”要把“党专政”这个公式写入论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中，——我是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戊）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些把党“专政”因而也就是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或企图看做一个东西的同志是不对的，并且在政治上是近视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

至于没有上述附带条件的“党专政”这个公式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险和政治缺点，那就不用说了。单拿这个公式而不加附带条件似乎就是：

（甲）向**非党群众**示意：千万别辩驳呀，千万别议论呀，因为党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乙）向**党员干部**示意：干得大胆些吧，压制得厉害些吧，不倾听非党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58◇

（丙）向**党的上层**示意：大可以自满自足了，甚至可以骄傲自大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因而“也就是”领袖专政。

正是现在，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时期，提醒对这些危险的注意是很适宜的，因为现在党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我们是有特殊价值的，现在关心群众的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训条，现在党在政策方面必须特别谨慎特别灵活，现在骄傲自大的危险是党在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

不可不回想一下列宁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至理名言：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注）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就要毁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三页）

“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这正是保证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基本领导力量这一光荣作用的必要条件。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那本小册子里，关于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59◇的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

“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 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见“论列宁主义基〔二六〕础”）

这个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须解释的。这是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有在其他各国内同时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要在一个国家内夺得政权，那就是空想。可是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还有第二种说法。那里说：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60◇力。”（见“论列宁主义基础”初版〔二七〕）

这第二种说法是用来反对那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的武断的，是用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因为他们宣称：当其他国家没有胜利时，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就这一点而论（但只是就这一点而论），这种说法在当时（一九二四年五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

可是后来，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问题即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第二种说法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

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61◇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我就在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

本小册子（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里改变了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二八〕那本小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见“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①。

这个问题的新说法就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二九〕这一著名决议的基础，这一决议联系着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而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一九二五年四月），并认为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新说法也是我的小册子“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的基础。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闭会后立即出版的。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一问题的提法，在这本小册子里说：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里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而言。——斯大林注）。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言。——斯大林注）”……“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62◇力才能解决，——

---

① 后来，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以后各版中已用这个问题的新说法代替了旧说法。——编者注。

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三〇〕）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说：“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同上〔三一〕）

关于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则说：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企图、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企图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企图，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同上〔三二〕）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大家知道，在我的“问题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那本小册子里，以及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政治报告〔三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也是以这种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事实就是如此。◇63◇

这些事实，我想所有同志都是知道的，季诺维也夫也是知道的。

如果现在，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之后将近两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后，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结论时，竟把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四月所写的小册子里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拖出来，作为解决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础，——那末，季诺维也夫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弄糊涂了。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由中央全会〔三四〕批准以后又避开这项决议，这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64◇

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否认这一个不容置辩的原理，就是离开国际主义，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所组成的体系里**，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而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页）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面前有某种极不稳固但毕竟是毫无

疑义、不容置辩的均势。这是否会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我们必须极端谨慎。我们政策中的第一个训条，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着，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着，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二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65◇

季诺维也夫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请听吧：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至少应当了解为（一）消灭阶级，因而也就是（二）取消一个阶级的专政，这里指的是取消无产阶级的专政”……　季诺维也夫往下又说：“为了更确切地弄清一九二五年我们苏联的问题是怎样的，必须分清两件事情：（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二）最后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

所有这些能表明什么呢？

就是表明季诺维也夫并不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了解为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免除复辟的保障，而了解为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季诺维也夫则把它了解为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使社会主义建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碰碰运气，茫无前途的建设，在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立场。

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去建设社会主义，**明知不能建设成功**而去建设，——请看，季诺维也夫荒唐到什么地步了。

但这是嘲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论中还有一段话：◇66◇

“你们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俄共（布）库尔斯克省代表会议上竟胡说八道起来。他问道：‘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四面受着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国家内，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据上述一切，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不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虽然暂时还是单独的，我们虽然暂时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但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库尔斯克真理报”第二七九号）**这难道是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吗？难道这里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吗？**”①

这样，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承认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采取民族狭隘性的观点，而否认这种可能却是采取国际主义的观点了。

可是，如果这是对的，那末，一般说来，还值得为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而进行斗争吗？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吗？

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季诺维也夫竟把这种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谬论当做“国际主义”，当做“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呈献给我们！

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离开列宁主义而滚到孟什维克◇67◇苏汉诺夫的观点上去了。

让我们请教列宁吧。列宁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月论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时，就已说过：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①]，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列宁的这句加上着重号的话——“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获得了胜利的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能够**而且**应当**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未必用得着证明：列宁的这个明确的原理是无须再加解释的。否则，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对无产阶级发出的夺取政权的号召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了。

可见列宁的这个明显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的所谓我们能够在**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68◇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个反列宁主义的糊涂“原理”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说的。可是也许有了夺取政权的经验以后，在一九一七年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吧？我们来看看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的小册子“论合作社”。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①]？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看来不容易说得更清楚了。

试把列宁这个经典性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反列宁主义的论调比较一下，就会懂得雅柯夫列夫只是重复列宁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季诺维也夫◇69◇反对这个原理，斥责雅柯夫列夫，因而背离列宁，采取了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采取了认为我国因技术落后而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

只是不明白，如果我们不打算建成社会主义，那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本来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反对**我们党的明确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著名决议里规定了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议吧。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在这个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障[①]……”“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②]，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能……”“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③]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70◇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④]〔三五〕（见决议 ）

由此可见，决议是把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解释为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保障，这和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

由此可见，决议认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也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结论时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论调是**完全相反**的。

试问，这不是季诺维也夫**反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什么呢？

当然，党的决议有时也免不了有差错。有时候，党的决议也含有错误。一般地说，可以假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含有一些错误。可能季诺维也夫认为这决议是错误的，那末他就应当像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那样明白而公开地指出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季诺维也夫没有这样做。他宁愿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绝口不谈，不作任何公开批评，却从背面袭击这个决议。季诺维也夫大概以为这条道路最容易达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改善”决议并“稍微”修改列宁的话。未必用得着证明，季诺维也夫打算错了。◇71◇

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这个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

————————————

① ② ③ 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据我看，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季诺维也夫深信我国技术的落后对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深信无产阶级因我国技术落后而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三六〕前的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曾试图提出这个论据。但是他们受到了反驳，不得不实行退却，**表面上**服从和他们相反的观点，即中央多数的观点。季诺维也夫虽然表面上服从这个观点，却始终和这个观点作斗争。请看我们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给俄共〔三七〕（布）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的“复信”中是怎样说明俄共（布）中央内的这次“事件”的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坚持过一种观点，似乎国际革命不来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因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而不能克服内部困难。而我们和中央多数一样却认为：虽然我国技术落后，但我们能够不管这种落后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并且一定会把它建设成功。我们认为：这样进行建设，当然比在全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下缓慢得多，然而我们还是在前进，而且要继续前进。我们同样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表现出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以及跟着我国工人阶级走的农民群众的内部力量。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见“复信”）

这个文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初几次会议时出现在报刊上的。季诺维也夫当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找到论据来反驳我◇72◇们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所提出来反对他们的这一严厉谴责。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这种谴责看来是命中要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缄默来“回答”这种谴责，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招架”。

“新反对派”抱怨人们谴责季诺维也夫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可是，既然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

整整一年，既然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已被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五年四月）摈弃，既然党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意见已经形成，并把这种意见载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五年四月）的著名决议中，既然在这一切之后，季诺维也夫还敢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九二五年九月）一书中反对党的观点，既然他以后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复这种言论，——那末这一切，这种坚持自己错误的顽强性和固执性，如果不是因为季诺维也夫中了毒，而且无可救药地中了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的毒，又是因为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可以随便把他这种不相信的态度解释为国际主义。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竟把那种在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的行为解释为国际主义呢？

在这里，违反国际主义和国际革命的不是党，而是季诺维也夫，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我们这个“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又是什么呢？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它能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真正根据地呢？如果它没有能力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没有能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它能不能继续成为吸引世界各国工人的最大中心，像它现◇73◇在无疑地是这样的中心一样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鼓吹这种不相信的思想，结果就会使我国丧失世界革命根据地的资格，而使我国丧失这种资格，结果就会削弱世界革命运动，——难道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社会民主党人是用什么来恐吓工人使他们离开我们的呢？就是鼓吹说“俄国人是完全做不成的”。我们现在用什么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代表团一批一批地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因而巩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阵地呢？就是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既然如此，那末谁鼓吹不相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谁就是间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谁就是缩小国际革命运动的规模，谁就必然背离国际主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的“国际主义”是和他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一样恶劣的。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新反对派”的观点确定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定为“曲解列宁主义”〔三八〕，那是很正确的。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我认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我看来，这个错误所以是基本错误，在于“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新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74◇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问题方面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从不相信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不相信由于我国发展中的一定条件，基本农民群众**可以被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这就是不相信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我国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反对派关于我国发展道路的论断就是默然从这两个论点出发的，——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反正都是一样。

能不能吸引苏联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呢？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论点：

（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教训，跟无

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75◇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未必用得着证明：苏联农民既惯于重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因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而获得了自由，就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个极端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个极端却是大众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社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三九〕

这两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这两个论点对于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整个建设时期都是正确而不容置辩的。◇76◇

这两个论点只是表达下述的列宁的几个著名论题：关于无产阶级

和农民的结合，关于把农民经济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体系，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和基本农民群众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关于使千百万农民普遍合作化是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条件下，“在我国，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页）。

那末，我国的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循着什么道路发展呢？

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

为什么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呢？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贷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农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通过农民最深刻的分化去发展，——一个极端是巨大的大地产，另一个极端是大众贫困化。这样的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村，农民经◇77◇济，是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城市的集中信贷和依赖政权性质的，而在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信贷系统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

在我们国家里，既然城市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信贷系统、国家政权等等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土地国有化是全国通行的法律，那末，农民经济是不是一定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呢？当然不是一定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城市是农村的领导者，而在我国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全部命脉的无

产阶级，所以农民经济就应当循着另外一条道路去发展，即循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去发展。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这就是用各种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周围的道路，在农民中间，起初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户所需要的城市产品**供应**方面，然后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集体制原则的道路。而且愈往前去，这条道路也就愈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不可避免的道路，因为销售方面的合作化、供应方面的合作化、以至于信贷和生产方面的合作化（共耕社）是增进农民福利的唯一道路，是使广大农民群众免于贫困和破产的唯一方法。

有人说，我国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因此，他们不能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既然证明农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78◇市里指挥一切的又是社会主义工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反对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论据了。在十月革命时，农民按其地位来说也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当时所争取的主要是消灭地主政权，结束战争，奠定和平。可是他们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当时是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为当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当时我们党已摸索到、寻找到一种能把农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国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后者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因此，农民虽有其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把农民引上这个建设的轨道也应当这样说。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

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为什么正是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呢？

因为普遍合作化就是“我们所找到的一种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业利益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的标准，能使这种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标准”（列宁）〔四〇〕，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这种标准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把基本农民群众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79◇业。正因为农民通过合作社来销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农庄得到机器供应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应当循着而且一定会循着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下实行农户普遍合作化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使小商品农民经济**离开**那条必然使农民大批破产的旧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新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就是为争取农民经济的新的发展道路而奋斗，为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因此，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很正确，它决定：“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国家信贷机关和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其他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导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同时利用、克服并排挤这种组织里的资本主义成分。”（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四一〕）

“新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农民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看不见或不懂得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绝对不可免的道路。而他们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向社会主义。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80◇主要是退却。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轻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杠杆（社会主义工业、信贷系统、合作社、无产阶级政权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正确。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农村中的分化，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轻视中农的作用，企图破坏党关于保证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并一般地在党的农村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党为了吸引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业和农业建设，参加活跃合作社和苏维埃，参加国家管理，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参加为改善并改造我们国家机关的斗争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这种工作标志着新的发展阶段，没有这种工作，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他们也就在我国建设中的困难面前灰心失望，茫无所措，怀疑我国工业化的可能，悲观地胡说党在蜕化等等。

在他们那里，在资产者那里，一切事情或多或少是好的；在我们这里，在无产者这里，一切事情却或多或少是坏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时发生革命，我们的事业就要破产，——这就是“新反对派”的一般论调，而这种论调在我看来是取消派的论调，但不知为了什么（大概是为了安慰自己吧）反对派竟拿它来冒充“国际主义”。

反对派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81◇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

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

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这种论点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种论点是从什么出发的呢？

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以为现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恢复过程，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回复”过程。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那样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业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并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不相信能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观点。

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单方面的资本主义恢复的过程，而是双方面的即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这无论对于以国营工业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城市，或是对于以和社会主义工业相◇82◇结合的群众性的合作社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的农村，同样是不容置辩的。

单一的资本主义恢复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事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农村中的分化绝不能像先前那样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增进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福利、消除农村

中的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而且是按照新的路线即按照巩固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这一点我就不说了。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的老路，滚到农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在这条老路上，富农和贫农是农村中的主要力量，中农却“被冲刷”。

反对派说合作社是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援引列宁的“论粮食税”〔四二〕，因而他们不相信可能利用合作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反对派在这里又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样来解释合作社，在一九二一年，在“论粮食税”写就时，是足够的，令人满意的，当时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当时列宁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设想为可能的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考察的。可是，这种解释现在已经不够了，已被历史所超过了，因为从那时起，情况改变了，我◇83◇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培植到所预期的那种程度，而现在拥有一千万以上社员的合作社却已经开始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

难道不就是这个缘故列宁才在“论粮食税”发表后两年即一九二三年用另一种看法考察了合作社，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两年内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壮大，国家资本主义却没有培植到应有的程度，列宁才不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考察，而把它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考察吗？

合作社的发展条件已经改变了。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也应当有所改变。

例如请看列宁的“论合作社”（一九二三年）那本小册子里说明

这个问题的一段精辟的话吧：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①]，合作社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第一是私人企业，第二是集体企业。**在我们的现存制度下**[②]，合作社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③]，如果它们是建筑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上的。”（同上）

在这一小段引文中解决了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关于“我们的现存制度”并非国家资本主义的问◇84◇题。第二是关于同“我们的制度”配合起来的合作社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的问题。

我认为很难说得比这更明白了。

再看看列宁那本小册子里的另一段话吧：

“在我国，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都有了根本的改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页）

显然，“论合作社”那本小册子对于合作社已经有了新的估价，而这种新的估价是“新反对派”所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反对派”违反事实、违反明显的真理、违反列宁主义而绝口不谈的。

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的合作社是一回事，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的合作社又是一回事。

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论粮食税”和“论合作社”这本小册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例如，只要援引“论粮食税”中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立刻看出“论粮食税”和“论合作社”在对合作社的估价问题上是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的。请看这一段话吧：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①]，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强的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深固的根拔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二◇85◇七页）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远在写“论粮食税”时，即在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时，就已经认为合作社**在成功时**能变为反对“社会主义以前的”关系因而也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强有力的斗争工具。我认为正是这个思想后来成了他的“论合作社”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可是，从这一切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新反对派”不是马克思主义地而是形而上学地看合作社问题的。“新反对派”不是把合作社看做和其他现象配合起来，比如说，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一九二一年）或者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一九二三年）的历史现象，而是把它看做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看做“自在之物”。

因此，反对派在合作社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反对派不相信农村可能经过合作社而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反对派滚到了老路上去，滚到了农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新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实际问题上的观点大体上就是如此。

结论只有一个：反对派的路线（既然他们有路线），反对派的游移和动摇，反对派的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和在困难面前张皇失措，这一切将导致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86◇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因为既然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既然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值得怀疑，既然富农几乎万能，合作社很少有希望，中农作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的新道路很成问题，党几乎在蜕化，而西方革命还不怎么逼近，——既然如此，反对派的武库里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他们打算靠什么去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呢？单靠一套“时代哲学”〔四三〕是不能作战的。

很明显，“新反对派”的武库，即使它一般可以称为武库，也是不值得羡慕的。这个武库不是为了进行斗争，更不是为了取得胜利的。

很明显，党如果靠这样一个武库去作战，它“一下子”就会断送自己，——它只好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完全正确，它决定：“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乃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条件之一就是“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反对那种把我们的‘彻底社会主义式的’（列宁）企业看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企图”；“这种思潮使群众不能自觉地对待一般社会主义建设，具体说来，不能自觉地对待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所以只能阻碍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而帮助私人资本来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作斗争”；“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去克服这种曲解列宁主义的观点”（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联共（布）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四四〕）。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87◇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88◇

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

（答波尔特涅夫、叶弗列莫夫、伊甫列夫三同志）

对不起，答复迟了。

在我的演说〔四五〕中根本没有说过，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只在现时才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

那里面并没有说过，革命在欧洲的一个国家里胜利以后，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会是多余的。我想你们没有好好阅读我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那里面只是说：“农民是**立刻**可以给我国革命以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由此可以不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欧洲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对于我国工人阶级就会成为多余的呢？当然是不可以的。

你们问：“当世界革命实现的时候，当不再需要第四个同盟者——农民的时候，情况会怎样呢？对农民的看法又将怎样呢？”

第一、说“在世界革命以后”就不再需要农民了，这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在世界革命以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必然一日千里地前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农民是不行的，同样地，农民要摆脱贫困，没有无产阶级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西方革命胜利以后并不会削◇89◇弱，相反地，一定会加强起来。

第二、“在世界革命以后”，当我们的建设工作百倍加强的时候，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集团势必消失，变成土地和工厂的劳动者，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将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将逐渐变成一个融合物，变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变成一个由过去是工人和农民后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就是我们对“世界革命胜利以后”的农民的看法。

在我的演说中所谈到的并不是我们党将来怎样看待农民的问题，而是在此刻，在目前，当西方资本家开始稍微恢复元气的时候，四个同盟者中间哪一个是工人阶级最直接的同盟者和最直接的助手的问题。

为什么我在演说中要这样提问题呢？因为我们党内有些人愚蠢地糊涂地认为农民不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党内有这种人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种人是有的。我的演说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人，并因此证明：目前农民是工人阶级最直接的同盟者，那些散布不信任农民的思想的人会不自觉地断送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说，既会断送工人的事业，又会断送农民的事业。

这就是我所谈到的。

我想，我把农民叫做不很坚强的同盟者和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可靠的同盟者，你们是有些见怪的。我看得出你们是因为这一点而见怪的。可是，难道我不对吗？难道我不应当直率◇90◇地说出真实的情况吗？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时期，农民往往一会儿动摇到工人方面，一会儿又动摇到将军方面，难道这话不对吗？而在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队里，农民，自愿加入的农民还少吗？

我并不责备农民，因为他们的动摇是由于觉悟不够。但我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应当直率地说出真实的情况。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向工人进攻的时候，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并不一向都表现出十分刚毅和坚定的精神。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农民搁在一边，像某些根本不承认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者的糊涂同志现在所做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把农民搁在一边，就等于对工人和农民犯罪。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教育他们，使他们靠近我国革命的领袖——工人阶级，这样，我们就会使农民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更坚定的更可靠的同盟者。

将来革命在西方爆发的时候，农民就已经完全坚强起来，并成为我国工人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之一。

应该这样来了解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的态度。致同志的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91◇

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答坡柯也夫同志）

坡柯也夫同志！

回信写迟了，请你和你处的同志们原谅。

很遗憾，你不了解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问题根本不在于似乎反对派断定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而代表大会似乎说我们已经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

代表大会上所争论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争论的是：代表大会说，即使西方不能及时发生胜利的革命而给我们以援助，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也能彻底打败我国资本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反对派却说，在西方工人取得胜利以前，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既然西方革命的胜利要延迟一些时候，看来我们只好开空车了。代表大会谈到过，并且在它的关于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四六〕中指出：反对派这种看法就是不相信我们能战胜本国资本家。

亲爱的同志们，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92◇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西欧工人的帮助。假定西欧工人不同情我们，不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援助，假定西欧工人不阻止本国资本家进攻我们的共和国，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是资本家向我们进攻，把我们的建设工作根本破坏，甚至把我们完全打垮。如果资本家现在没有做这样的尝试，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在出兵进攻我们共和国的时候，工人会在后方打击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欧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援助。

但是从西方工人的援助到西方革命的胜利是十分遥远的。没有西方工人的援助，我们未必抵抗得住包围着我们的敌人。如果这种援助今后会变成西方革命的胜利，那就好了。那时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就会是最后的胜利。但是，如果这种援助不变成西方革命的胜利，那又怎么办呢？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我们能不能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代表大会回答说：能。否则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了。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那末谁都会说，我们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是多余的。反对派却说，我们用本身的力量是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的。

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代表大会还谈到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问题。社会主义最后胜利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有免除外国资本家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有免除旧制度藉这些资本家的武装进攻我国而在我国复辟的完全保障。我们用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取得这种保障即能不能使国际资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呢？不，不能。这是我们和全西方的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只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欧洲主要国家工◇93◇人阶级的力量，才从最后制服国际资本。在这方面没有欧洲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是不行的，——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归根到底，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要保障我国不受国际资本的侵犯，单靠我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西方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可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可能保证我国不受国际资本的侵犯又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你和你处的同志们的错误就在于你们还没有弄清这件事情而把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 致

同志的敬礼

约·斯大林

附言：你最好找“布尔什维克”杂志〔四七〕（莫斯科）第三期读读我的文章。这对你是会有帮助的。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第一次刊印◇94◇

纪念柯托夫斯基同志

我知道柯托夫斯基同志是一个模范党员，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军事组织者和卓越的指挥官。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一九二〇年在波兰前线的情形，当时布琼尼同志突入波军后方日托米尔，柯托夫斯基则率领他的骑兵旅万分勇猛地袭击基辅的波军。他是波兰白军的大灾星，因为正像当时红军战士所说的他比谁都善于“斩杀”波兰白军。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共产党人报”（哈尔科夫）
第四十三号（总第一八二八号）◇95◇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四八〕法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

同志们！很遗憾，关于法国的事情我不大熟悉。因此，我不能照这里所需要的那样详尽地说明这个问题。然而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听了几次发言以后，对于法国问题就有了一定的看法，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根据这一点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些意见。

这里我们要谈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国的政治形势。同志们在关于法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发言中所流露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情绪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法国的形势多少是平稳的，一般说来，事情进行得还可以，固然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大概不致引起什么危机，如此等等。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我不能说法国正面临着自己的一九二三年〔四九〕，但是我以为它正在走向危机。在这方面，无论是委员会的提纲或某些同志的意见，我认为都是正确的。

这个危机很特别，因为在法国没有失业现象。法国现在靠德国供给黄金，因此，危机得以缓和。◇96◇但是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第一、因为德国的黄金不够法国弥补内部的亏空和偿还英美的债款；第二、因为失业现象在法国是不可避免的。当通货膨胀刺激着输出的时候，也许不会有失业现象，可是以后，当货币稳定而国际间债务清偿发生自己的作用的时候，法国的工业集中和失业现象就不可避免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普遍惊慌和法国内阁的经常更迭就是法国走向危机的最确实的征兆。

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危机的发展过程描绘成直线式发展着的失败过程，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危机。革命危机的发展通常是曲折的：小小的失败，以后是情况好转，以后是比较严重的失败，再后是某种程度的高涨等等。不应当因为有了这种曲折的发展就认为资产阶级的事情正在好转。

因此，满不在乎的情绪在这里是危险的。其所以危险，是因为危机的发展可能比人们所想像的更快，那时法国同志就要手足无措。手足无措的党是不能指导事变的。因此，我认为法国共产党应当采取适应革命危机逐渐增长的方针。法国党应当重视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工人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有准备地迎接这次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党内日益增长的从右面来的危险。我认为无论在法国共产党的周围还是在党内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战斗性的右派集团，其领导者有的是被开除出党的分子，有的是没有被开除出党的分子，这个集团将无时不消耗共产党的力量。我刚才和克列梅谈过话。他讲到一个新的事实：不仅党的系统，而且工会的系统都存在着右派集团，他们偷偷摸摸地进行工作，在某些地方则直接攻击共产党的革命派。甚至安格列尔今天的发言也含有这种意味，这一点必须引起同志们密切的注意。◇97◇

在危机增长的时期，右派总是要抬头的。这是革命危机的一般规律。右派所以抬头，是因为他们惧怕革命危机，因此，他们情愿用一切办法拉着党倒退而不让增长着的危机发展下去。因此，我认为既然法国共产党应当造就新的革命干部并组织群众去迎接危机，那末，它的当前任务就是给右派以反击，使他们孤立。

法国共产党是否准备好了这种反击呢？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问题**，讲法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情况。有些人说，要孤立右派，必须从法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清除两个虽和右派进行过斗争但犯过重大错误的同志。我所指的是特伦和修占努·日罗。

我要直截了当地说话，因为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再好不过的了。

从清除领导集团中那些对右派进行斗争的人来开始攻击右派，我不知道这究竟有多少道理。我原以为会相反地提出另一种建议，比方这样一种建议：既然右派变得厚颜无耻，既然他们把自己的机关报“共产党人公报”〔五〇〕停刊，发表了侮辱党的宣言，那末未尝不可作这样处理，在政治上揭露右派中间的某些人，甚至把他们根本开除出党。我原以为由于右倾的危险，问题定会这样提出来。我原以为我将在这里听到的正是这种意见。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有人倒向我们提议从孤立两个非右派分子来开始孤立右派。同志们，我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

但是在这里，和这个问题，和反对右派的问题交错着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内部缺乏一个团结的多数集团。党的领导集团如果没有一个能一致行动的紧密团结的多数，党就◇98◇既不能进行反对右派集团的斗争，又不能进行反对“极左”集团的斗争，这是很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这种集团应当形成起来，并且我以为它已经形成起来，或者很快就将在塞马尔、克列梅、多列士、蒙穆索这样的同志们的周围形成起来。建立这种集团，或者设法使我所说的这些同志在一个领导集团中步调趋于一致，这就等于集中力量和右派作斗争。你们不能打败右派，因为右派正在发展，而且看来他们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是有些基础的，我说，如果你们不把领导集团内部一切决心和右派斗争到底的革命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你们是不能打败右派的。从分散自己的力量来开始和右派作斗争，这是不合理的，不聪明的。如果不把力量集中起来，你们既会削弱自己，又会在和右派的斗争中失败。

当然，也许法国同志不认为集中一切力量（特伦和修占努·日罗也包括在内）是可能的。也许他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末就让法国同志在自己的中央全会上或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自己政治局的成分

作相当的变更吧。让他们不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而自己去做吧。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我们俄国同志不久前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定的决议，使共产国际各支部能更多地自己领导自己。这一点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应当尽量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直接干预各支部的事情，例如干预我们共产国际各支部领导集团构成的事情。同志们，不要迫使我们违反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当然，有时候处分个别同志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有这种必要。

因此，我以为我们的委员会应当做下列几件事情：◇99◇

第一、对法国问题做出明确的政治决议，提出坚决和右派作斗争的口号，指出那些犯错误的同志的错误。

第二、劝告法国同志把法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集团团结在这个以反对右派为目的的决议的周围，也就是说，责成这一集团的成员同心协力地、忠诚地执行这个决议。

第三、劝告法国同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不要醉心于割除的办法、惩处的办法。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法国工会的问题。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某些法国同志把这种事情看得太轻了。我认为工联代表方面可能犯过错误，但我同样认为法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在对待工联上也可能犯过错误。蒙穆索同志希望党少包办些，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党和工联是两个平行的组织，二者之间有时不能不有一些摩擦。这在我们俄国发生过，在各国共产党内也发生过，——这是难免的事。但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对工会的一切小事情过问得愈少，摩擦也就会愈少。领导工会应当通过在工会中进行经常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不应当撇开他们。在我们俄国党内曾有对工会领导得过多的情形。在我们党的档案中，你们可以找到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党对工会不要包办、关于党对工会要领导而不要包办的问题所通过的许许多多决议。我担心在

这方面法国党——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对于工会也有某些过错。我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正因为如此，对党的要求就应当更高些。因此，首先应当消灭中央的错误，以便改善并巩固对工会的关系，以便蒙穆索同志和其他工会工作者能根据共产党认为必需的方针去工作。◇100◇

党若没有工会和工会领导者作为极重要的支柱，它就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条件下），它就不能巩固。只有善于和工会及其领导者保持广泛的联系并善于和他们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联系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争取西方工人阶级的多数。你们自己知道，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归结起来是什么呢？

归结起来就是：

（甲）法国正走向危机；

（乙）右派感觉到这个危机并惧怕这个危机，它正在抬头并力图拉着党倒退；

（丙）党的当前任务是消灭右倾危险，孤立右派；

（丁）为了孤立右派，必须把党的领导机构中能够和右派斗争到底的一切真正共产主义的领导者集中起来；

（戊）为了使力量的集中能在和右派的斗争中并在组织工人迎接革命危机方面得到满意的结果，必须使领导集团依靠工会并善于和工会及其工作人员保持无产阶级的联系；

（己）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对个别同志不要醉心于割除的办法、惩处的办法，主要地应当利用说服的办法。

第一次刊印◇101◇

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向正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周围团结成一个劳动大家庭的全世界女工们和劳动妇女们致以热烈的敬礼。

祝她们在下列事业中获得完全胜利：

（一）巩固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和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二）把劳动妇女的落后阶层从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和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

（三）把农妇们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的周围；

（四）把两部分地位还不平等的被压迫群众变成一支为消灭任何不平等现象、为消灭任何压迫、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胜利、为在我国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统一的大军。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
“真理报”第五十五号◇102◇

МАРТ
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ЖЕНСКИЙ
ДЕНЬ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同志们！我只有几点意见。

一、有些同志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的话，西方各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右倾政策。同志们，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必须说，这个假定和我们俄国同志在工作上所遵循的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不能设想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什么时候会要求我们的兄弟党右倾。实行右倾政策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这就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我不能设想苏联的利益会要求我们兄弟党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哪怕是一秒钟。我不能设想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基地的我们共和国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西方工人的革命性和政治积极性，而是降低这种积极性，减弱这种革命性。这种假定对于我们俄国同志是一种侮辱。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宣布绝对不同意这种荒谬绝伦的完全不能容忍的假定。◇103◇

二、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有些知识分子议论纷纷，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很弱，说它领导得很弱，说中央没有知识分子以致工作做得不好，说中央并不存在等等。同志们，这一切都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些说法是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有失共产党人的身分。本届德国共产党中央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反对“极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因此，它既不是右倾的，也不是“极左”倾的。这是列宁式的中央。这正是现在德国共产党所需要的工人领导集团。

据说，本届中央在理论知识方面并不出色。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了正确的政策，理论知识是不难掌握的。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现在实行的正确政策，却不是某些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所容易领会的。本届中央的力量就在于它实行正确的列宁政策，而这是那些夸耀自己的“知识”的书生所不愿了解的。据某些同志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只要多读两三本书或多写一两本小册子，就可以要求党内的领导权了。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到很可笑的地步。你可以写一整套哲学书，但是，如果你没有领会德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政策，那就不能让你去领导党。

台尔曼同志！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真愿意为工人事业服务，那你让他们来服务好了，如果他们非要发号施令不可，那你可以叫他们滚开…… 本届中央工人占优势这个事实，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大优点。◇104◇

德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开辟一条道路去接近那些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而在杂乱的社会民主主义丛林中迷失方向的工人群众，从而把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任务就是要帮助迷失方向的弟兄走上大道并和共产党发生联系。这里可能有两种对待工人群众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方法，鞭笞工人的方法，可以说是拿着鞭子来“争取”工人的方法。无须证明，这种方法和共产主义的方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因为它不是争取工人而是推开他们。另一种方法就是和那些处在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的迷失方向的弟兄取得相互的了解，**帮助**他们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丛林，**使**他们**容易**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共产主义的工作方法。本届中央的成分是无产阶级的成分，这个事实大大便利了在德国采用第二种方法。本届德国共产党中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无疑是有成就的，而这些成就也应该用这一点来说明。

三、关于迈耶尔。我注意地听了迈耶尔的聪明的演说。但是应当说，他的演说有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在迈耶尔看来，不是他走到德国共产党中央这方面来，相反地，是中央走到他那方面去。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一点他没有率直地说出，但是他的全篇演说透露出这种思想。这是不对的，这是大错特错的。本届中央是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产生的，而迈耶尔不久以前还活跃在右派的队伍里。如果中央不愿变质，如果中央不愿扭转德国共产党的历史车轮，那末它是不能右倾的。然而，如果迈耶尔已经开始向这个中央靠拢，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迈耶尔开始左倾了，他开始承认右派的错误◇105◇了，他开始脱离右派了。可见不是中央走向迈耶尔，相反地，是迈耶尔走向中央。他在走向中央，但他还没有走到。他需要从右派方面向中央方面再走两三步，才能完全走到德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方面。我决不认为迈耶尔是一个患鼠疫的人，我不主张把迈耶尔推开，我只是说，他需要再向前走两三步才能彻底靠拢本届德国共产党中央。

四、关于萧列姆。我不多讲德国的“极左派”和萧列姆的政策。这一点这里已经讲得够多了。我只想指出萧列姆演说中的一个地方并加以批评。萧列姆现在主张党内民主。因此，他建议进行普遍的争论，邀请布兰德勒和拉狄克，邀请所有的人——从右派到“极左派”，实行大赦并进行普遍的争论。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不需要这个。从前萧列姆反对党内民主。现在他跑到另一个极端，主张没有边际的丝毫不受限制的民主。但愿老天爷不要把这样的民主给我们！俄国人说得好：“你让傻子去祷告，他就会把额头磕破。”（笑声）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已经害过右倾病了。我们现在用不着人为地给它培养这种病。德国共产党现在正害着“极左”倾的病。我们现在用不着使这种病加重起来，应当根除它，不应当使它加重起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争论，也不是任何一种民主，而是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好处的那种争论和那种民主。因此，我反对萧列姆

的大赦。

五、关于路特·费舍集团。关于这个集团，这里已经谈得很多，我只要说几句就可以了。我以为在德国共产党所有不可容忍的恶劣的集团中间，这个集团是最不可容忍的和最恶劣的。一个“极左派”的无产者在这里指出工人们对领袖逐渐不信任。如果这话不错，那末这是极其可悲的。因为凡是◇106◇对领袖不信任的地方，那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但这是谁的罪过呢？是路特·费舍集团，是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手腕，是它的言行不一致的做法，是这个玩弄外交手腕的集团在实际工作中言行的永不一致。凡是领袖在玩弄外交手腕方面腐朽透顶的地方，凡是诺言没有行为做后盾的地方，凡是领袖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就不可能信任领袖。

为什么俄国工人无限地信任列宁呢？是不是仅仅因为他的政策正确呢？不，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他们信任他，还因为他们知道列宁言行一致，列宁“不骗人”。这就是列宁的威信所以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列宁用以教育工人的方法，这就是他使工人信任领袖的方法。路特·费舍集团的方法，玩弄腐朽透顶的外交手腕的方法，是和列宁的方法完全相左的。我可以尊敬并信任波尔迪加，虽然我不认为他是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所以能信任他，是因为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我甚至可以信任萧列姆，虽然他所说的不总是他所想的，（笑声）但他有时还是脱口说出真话。（笑声）我无论怎样愿意，但是一秒钟也不能信任路特·费舍，因为她从来就不说她所想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路特·费舍集团是德国共产党所有恶劣集团中最恶劣的。

六、关于乌尔邦斯。我对于作为革命家的乌尔邦斯满怀敬意。我情愿崇敬他，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很好。但是必须说，单靠乌尔邦斯的这种品质是做不出什么事来的。革命性是好的，坚毅精神更好。但是，如果除了这种品质以外，武库里再没有什么，那末，同志们，

那就少了，太少了。这点本钱只够用一两个月，如果不以正确的政策做后盾，那它以后就会用完，一定会用完。现时在德国共产党◇107◇内，德国共产党中央和卡茨匪帮之间正在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乌尔邦斯拥护谁呢？拥护卡茨匪帮呢，还是拥护中央？拥护市侩哲学家柯尔什呢，还是拥护中央？这里应该有所选择。不能逗留在这两种斗争势力的中间。这里要有勇气公开地诚恳地说出乌尔邦斯拥护谁，拥护中央还是拥护那些反对中央的狂妄之徒。这里需要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乌尔邦斯糟糕的地方大概就在于他还没有这种明确的态度，他患了政治上的近视病。政治上的近视，一次可以原谅，两次可以原谅，但如果变成了政策，那就近乎犯罪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乌尔邦斯如果不愿失掉他在党内的最后一点威望，就应当公开地诚恳地表明态度。工人群众是不能靠回忆乌尔邦斯在法庭上表现得好来生活的。工人群众需要正确的政策。如果乌尔邦斯没有明确的政策，那末不是先知也可以说：乌尔邦斯的威望就连回忆也不会给人留下的。

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
“共产国际”杂志第三期
（总第五十二期）◇108◇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五一〕工作的报告）

同志们！让我开始报告吧。

我党中央四月全会的议程有四项：

第一项——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我党的经济政策。

第二项——根据精简方针改组我们的粮食收购机关。

第三项——从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角度来制定我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九二六年的工作计划。

第四项——另派什维尔尼克同志接替叶甫多基莫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如果除去最后一个关于更换书记的问题不算，那末成为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中心的其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问题。因此，我在这个报告中只要讲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我国经济状况的问题。◇109◇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

自从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宣布新经济政策以来，已经有五年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党面前的基本任务，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的条件下，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

础。这个战略任务现在还是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自一九二一年起，就从首先发展农业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基本任务。列宁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因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要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扩展工业，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工业，至少要有三个前提：第一、要有国内市场，而目前我们的国内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第二、要在农业中有较为◇110◇发达的原料生产（甜菜、亚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农村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供给工人。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

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这一回事。当时特别反对这一点的是所谓“工人反对派”。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党叫做工人的党，而它发展经济却从农业开始。他们说，这怎样理解呢？其他的反对派当时也表示反对，他们不顾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空地上也可以建设工业。可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党是正确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

我们必须从农业开始，那末现在要继续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推进整个经济，所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现在，如果不及时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工业品等等，农业本身就不能进展。因此，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末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111◇

二　工业化方针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宣布而现在正在实现的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其实质和基本意义就在这里。本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就是从这一基本口号出发的。所以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

正是现在，在目前，这一任务具有特别迫切的性质，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国，由于经济的一定方向的发展，在城乡对工业品的需求和工业对这些产品的供给之间就形成某种不相适应的现象，对工业品的需求比工业本身增长得更快，我们现有的商品极其缺乏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的表现和结果。几乎无须证明，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是消灭这种不相适应和商品极其缺乏的现象最可靠的手段。

有些同志认为工业化一般地就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甚至有这样的怪人，他们认为在很早以前创造过某种工业胚胎的伊凡·雷帝就已经是工业化主义者了。如果以此类推，彼得大帝就应该叫做第一个工业化主义者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112◇的机

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

拿印度来说吧。谁都知道印度是一个殖民地。印度有没有工业呢？无疑是有的。印度的工业是不是在发展呢？是的，在发展。但是，那里发展的是不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工业。那里的生产工具是从英国输入的。因此（当然不仅这一个原因），那里的工业完全隶属于英国的工业。还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法——在殖民地发展工业，使它受制于宗主国，受制于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所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可是，同志们，要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革新我们工厂的旧设备并建立新工厂。我们现在所处的我◇113◇国工业发展时期，其特点就是我们已经使沙皇时代资本家留给我们的旧工厂的设备能力充分利用了，而现在要继续前进，就应该改进技术，就应该重新装备旧工厂，建立新工厂。否则现在就无法前进。

同志们，要在新技术基础上革新我国工业，就需要大宗的、极大

宗的资本。可是我们的资本很少，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今年我们对工业基本建设这一主要事业大约只能投资八亿多卢布。这当然是很少的。但总算有了一些。这是我们对我国工业第一次较大的投资。我说这很少，因为我国工业随便就可以吞下比这大几倍的资本。我们必须推进我国工业。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扩大我国工业，把工人数量增加一两倍。我们必须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且愈快愈好。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大宗的资本。

因此，积累资本以发展工业的问题，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现在对于我们就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专靠自己，不借外债，凭藉我国内部力量，究竟能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拥有实行工业化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所必需的积累和后备呢？

这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

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的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工业化方法。

德国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当时德国向法国人索取了◇114◇五十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这是第二种工业化方法。

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因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

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贷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三种方法。但这是被奴役的或半被奴役的道路，是使俄国变成半殖民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我们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三年的国内

战争，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者的奴役。

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屡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

那末，我国工业化是否可能靠社会主义积累来实现呢？

我国有没有这种足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的来源呢？

是的，是可能的。有的，我国有这样的来源。

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我国地主和资本家已因十月革命而被剥夺，土地、工厂等等已不属于私人，而变成全民的财产了。几乎无须证明，这个事实就是相当大的积累来源。

其次，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沙皇债务的废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肩上卸下了几十亿卢布的债务负担。不应忘记，如果这些债务还存留下来，单是利息一项，我们每年就得付出几亿卢布，因◇115◇而使工业受到损害，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不用说，这种情况给了我们的积累事业以极大的便利。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工业，它已经恢复起来，正在发展，并且提供进一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若干利润。这也是积累的来源。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对外贸易，它提供若干利润，所以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举出比较有组织的我们国营的对内贸易，它也提供一定的利润，因而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银行系统这样的积累杠杆，它提供一定的利润，并尽力滋养我国的工业。

最后，我们有国家政权这样的武器，国家政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聚若干资金。

我国内部积累的主要来源大体上就是如此。

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必要的后备，没有这种后备，我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志们，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不善于办事，在积累的可能性和实际的积累之间就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以仅有可能性为满足。如果我们真想为我国工业建立必要的后备，我们就应当把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积累。

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必须怎样进行积累才能使工业得到好处呢？我们首先必须抓住经济生活中的哪些关键才能把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呢？◇116◇

积累的道路很多，其中必须指出的主要道路至少有下列几条：

第一，为了把国内余资首先用在工业的需要上，必须不让它分散，而让它集合到我们合作社的和国营的信贷机关中，同时要采用发行国内公债的办法。自然，存户因此应得到一定的利息。决不能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多少是令人满意的。改善我们的信贷网，提高信贷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发行国内公债等等，显然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解决。

第二、必须严密地堵塞一切使国内一部分余资流入私人资本的腰包因而损及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和漏洞。为此必须实行一种使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不太悬殊的价格政策，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降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零售价格，使余资不再流入私商腰包，或至少使它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我们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从那里会产生一种既有害于我们积累的事业又有害于切尔文[①]的严重危险。

第三、为了企业折旧、扩大企业和进一步发展企业，必须在工业

————————————————

① 1922 年 10 月苏俄国家银行发行了切尔文银行券，即金卢布，每个切尔文含金量为 7.742 克，由 25%的黄金和 75%的商品保证，含金量与沙俄金卢布相同，在苏联用于外汇贸易结算。1947 年币制改革，废除切尔文银行券。——本书制作者注

本身，在工业每个部门中，积存一定的储备。这件工作是必需的，是绝对需要的，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推进。

第四、国家手中必须积蓄为防备国家遭受任何意外（歉收），为滋养工业、扶助农业、发展文化等等所必需的一定后备。现在没有后备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就连一个从事小经营的农民现在也非有一定的储备不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更非有后备不可。

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需要有后备。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出口和进口经营得使国家手中能保持◇117◇一定的后备，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出超。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防备国外市场上的意外事情，而且是维持我们切尔文的手段。我们的切尔文暂时是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对外贸易出超的话，它还可能波动。加强我们的输出，使我们的输入和输出的能力相适应，——任务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像旧时那样地说：“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工人和农民要像人样地吃饭，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支持他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不损害人民消费的条件下采取一切办法使我国输出增加，使国家手中能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我们一九二三年能由苏维埃纸币进到稳定的货币，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出超而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想维持我们的切尔文，我们今后也应当把对外贸易事业经营得使我国手中能保有外汇储备，作为我们切尔文的基础之一。

其次，我们在国内贸易方面需要有一些后备。我所指的主要是国家手中要有粮食后备去干预粮食市场，以便跟那些肆意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富农和其他粮食投机者作斗争。即使为了防止各工业中心日用品的价格被人为地抬高和工人工资被破坏的危险，这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税收政策：把捐税负担转嫁到有产阶层的肩上，同时在国家预算方面使国家手中拥有一定的后备。我们四十亿卢布的国家预算执行的进程表明，我们能达到收入超过支出大约一亿

或者更多些。同志们当中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可是这些同志的眼光大概太短了，否则，他们会看到一亿卢布的后备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只是沧海一粟。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后◇118◇备。好吧，如果我们今年遭到歉收或受到其他什么灾害，那怎么办呢？我们将靠谁的资金来周转呢？要知道别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白白给我们帮助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点储备。如果今年一发生意外事情，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后备用于国民经济事业，首先是用于工业。放心吧，这些后备是一会没有用处的。

同志们，为了把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国内积累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在我们经济生活中首先必须抓住的几个关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但是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是迫切需要的方面。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所积累的资金就有被贪污的危险，就有被分散地使用在和发展工业、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毫无关系的各种大小开支上去的危险。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决不能说，我们，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在这方面是特别高明的。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远。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是很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是用任何决议都掩盖不了的。有时我们的管理机关真像这样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119◇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结果……破产了。至于所积累的后备被直接贪污的事实，我们许多国家机关大肆挥霍的事实，偷窃的事实等等，我就不说了。

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不离开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路线。

第一、必须使我国工业计划不是按照官僚主义的臆想而是密切联系我国国民经济状况、联系对我国货源和后备的估计来制定的。不能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

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就这方面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像美国，而不同于英国，因为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英国工业首先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英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产品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输往国外市场的。美国则相反，它一直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其产品输出国外市场的不过百分之十至十二。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

关于我国积累的速度，关于我们握有的用以发展我国工业的后备，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有些人有时喜欢制定空想的工业计划，而不顾我们的资源。人们有时忘记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后备，就不能制定工业计划，也不能建设任何“规模宏大”和“包罗万象”的企◇120◇业。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向前跑得太远了。在制定工业计划上向前跑得太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量力地建设。这就是高喊宏大计划，招收成千上万的工人到生产中来，大嚷大叫，到后来发现资金不够，就解散工人，发遣散费，于是遭受极大的损失，给建设事业带来失望，造成政治上丢脸的事情。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不，同志们，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既不需要落在工业发展进程的后面，也不需要向前跑得太远。我们需要和工业发展在同一水平上前进，我们需要推进工业而又使它不脱离自己的基础。我国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因素，它带领着、它引导着我

国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前进。它依照自己的面貌和模样改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它领导农业，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但是我国工业，只有在不脱离农业，只有在不撇开我国积累的速度，不撇开我们所握有的资源和后备的情况下，才能光荣地完成这个领导和改造的使命。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如果脱离自己的军队并失去跟它的联系，就不再成其为指挥人员了。同样，工业如果脱离整个国民经济并失去同它的联系，也就不再成其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因素了。

正确而合理地制定工业计划是适当利用积累的必要条件之一，其理由就在这里。

第二、必须自下而上地精简并健全我们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我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我们管理机关的编制庞大和挥霍无度已成为大家谈话的资料。难怪列宁曾几十次几百次重复说，工人和农民忍受不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机构臃肿和开支浩繁，无论如何要用一切办法和一◇121◇切手段来加以精简。最后，应该以认真的态度，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从事这种工作，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鼓掌）最后，如果我们今后不愿使我国的积累分散从而损害工业，就应该担当起这项工作来。

这里给你们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粮食输出是无利的，不合算的。为什么这是无利的呢？因为收购机关在收购粮食上花费了过多的钱。我们一切计划机关查明，收购一普特粮食只需八个戈比。实际上呢，收购一普特所花的不是八个戈比而是十三个戈比，多花了五个戈比。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因为每个比较独立的收购人员，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一样，在着手收购粮食以前，都认为必须扩充自己的工作人员名额，添用大批速记员和打字员，一定要置备一辆汽车，造成一大笔非生产的开支，等到后来结账时，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不合算的。假如我们收购了几亿普特粮食，每一普特多花五个戈比，那末浪费的钱就达几千万卢布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

待我们国家机关的大肆挥霍的现象，我们积累起来的资金就会这样花掉，而且将来还会这样花掉。

我在这里只举了一个例子。但是谁不知道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几百个几千个呢？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精简我们的收购机关。全会通过的与此有关的决议〔五二〕，你们大概已经看过。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将十分严格地执行这个决议。但是，同志们，这还是不够的。这只是我们国家机关的混乱状况和缺陷的极小部分。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应当采取办法来自下而上地精简整个国家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所有的合作社机关和整个◇122◇商品流转网。

第三、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中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铺张现象，反对我们这里最近可以看到的对人民财产和国家后备所采取的犯罪的态度。我们这里现在盛行着一种放荡风气，就是毫无节制地庆祝各种节日，举行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典礼、纪念碑揭幕式等等。几万几十万卢布白白糟蹋在这些“事业”上。各色各样被纪念的对象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们这里如此之多，纪念半周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典礼的心愿如此之大，要满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万卢布才行。同志们，应该结束这种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放荡行为了。最后，应该明白，我们背后既有我国工业方面的需要，面前又有大批失业和儿童流离失所的事实，自然就不能容许而且没有权利容许这种放荡行为和这种毫无节制的浪费行为。

最值得注意的是非党群众有时还比党员更爱惜我们国家的资财。共产党员在这种场合的行动是更勇敢更坚决的。他毫不在乎地发给许多职员补助金，称之为分红，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红利气味。他毫不在乎地逾越法律，回避法律，违犯法律。非党群众在这方面倒是较为小心较为审慎的。这大概是共产党员有时认为法律、国家等等东西都

是家里事情的缘故。（笑声）正因为如此，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就不费什么气力，像猪一样地（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笑声）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了。如果我们想真正保存我们的积累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那就应该展开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和我们日◇123◇常生活中的放荡行为和铺张浪费。

第四、我们必须和盗窃行为，和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机关里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不断的斗争。像报刊上所说的，有羞怯的隐蔽的盗窃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不久以前我在“青年团真理报”上读了奥库涅夫关于“快乐的”盗窃行为的短文。原来有这样一个潇洒放肆的家伙，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在我们的一个机关里快乐地进行盗窃，他经常地、不停手地进行盗窃，并且总是盗窃到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盗贼本人，而是这样的事实：周围的公众明明知道他是盗贼，可是不仅不和他斗争，反而觉得可以拍拍他的肩膀，称赞称赞他的手法高明，因而盗贼在公众眼里成了一种英雄。同志们，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最危险的。当捉到一个奸细或叛徒的时候，公众有无限的愤怒，都要求枪决他。可是当盗贼公然横行，盗窃国家财产的时候，周围的公众却只是和善地笑笑，拍拍他的肩膀。其实很明显，盗贼既然盗窃人民的财产，损害国民经济的利益，也就是奸细和叛徒，甚至比奸细和叛徒还坏。当然，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潇洒放肆的家伙终于被逮捕了。但是逮捕一个“快乐的”盗贼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盗贼在我们这里何止千百。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的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

生活并存在下去。和盗窃行为作斗争是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贪污◇124◇的手段之一，——任务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丢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卢布而使我国工业受到损害。如果旷工现象不停止，如果劳动生产率停留在一点上，我们就不能推进我国的工业，我们就不能提高工资。应该向工人们特别是向才进工厂不久的工人们说明，要是听凭旷工现象存在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实际上就是损害共同事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损害我国工业。为了我国工业的利益，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对旷工现象作斗争，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就是如此。

为了保护我们的积累和我们的后备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为了使这些积累和这些后备用在我国工业化方面，其必需的办法和手段就是如此。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我已经讲过工业化的方针，讲过积累后备来开展工业化的道路，最后，讲过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的办法。但是，同志们，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要实现党关于我国工业化的指示，除了这一切以外，还必须造就新的干部，新的工业建设干部。◇125◇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像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活的人，没有新的人材，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干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

家，——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 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

任务就在于造就这样的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给他们一切帮助。

近来我们老是爱斥责经济工作人员，说他们腐化堕落，而且爱把个别不好的现象推广到一切经济工作干部身上。无论是谁，只要他高兴，往往就会认为必须把经济工作人员痛骂一顿，斥责他们犯了万恶不赦的罪过。同志们，应该把这种恶劣习惯永远抛掉。要知道，丑事家家有。要知道，我国工◇126◇业化和提拔新的工业建设干部的任务，不是要求责骂经济工作人员，恰恰相反，而是要求在我国工业建设方面给他们一切帮助。使经济工作人员处在信任和支持的气氛中，在造就新的工业建设人材方面帮助他们，使工业建设者的岗位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岗位，——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工作现在应有的方向。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由于我国采取了工业化方针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近任务就是如此。

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直接支持，能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呢？不，不能。推进我国工业，提高工业生产率，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建立

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需要使每个工人和每个诚实的农民都帮助党和政府实行节约制度，对贪污和分散国家后备的现象作斗争，驱逐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盗贼和骗子，健全并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生产会议会给予不可估价的帮助。有一个时候，生产会议在我国非常盛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127◇却不听说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在生产会议上需要提出的不仅是小问题，比方说，卫生问题。必须使生产会议讨论的内容更广泛些，更丰富些。应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工业建设的基本问题。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工业建设的参加者。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在谈到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时，也不可把农民忘掉。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正像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一样。但农民对于我们不仅是市场，而且是◇128◇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正因为如此，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的基础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时常要求用过多增加税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等办法来加紧压榨农民。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不自觉地破坏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要做的是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不是破坏这种联盟。

但是我们所捍卫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我们所主张的是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体系中的领导作用，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就不可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知道有些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们说，联盟是好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只有久经考验和最革命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为什么普加乔夫或拉辛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呢？为什么当时农民没有能够把地主赶走呢？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法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胜利和早先被赶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结束呢？因为当时法国农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当时领导农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工农联盟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唯一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领导并且现在继续领导我国革命运动的是在战斗中久◇129◇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只要破坏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

权这一思想，工农联盟就会完全垮台，资本家和地主就会重回自己的老巢。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体系中的领导。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我已经讲过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问题，讲过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问题。可是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要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首先必须使党本身积极起来，必须使党本身毅然决然走上党内民主的道路，必须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吸引那些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广大党员群众来参加我国建设问题的讨论。否则就谈不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化。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列宁格勒组织不久以前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某些领导者不愿谈党内民主，不然就是带着嘲笑的口吻来谈它。我所指的是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时、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代表大会刚开完之后的那个时期，当时在列宁格勒不许党组织集会，当时党组织的某些领导者对于党组织俨然一个小警长（请原谅我的直率），禁止党组织开会。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新◇130◇反对派”就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的。

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们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帮助下，两周内就能把你们这里那个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反对派挤到一边并使它孤立，那末，这是由于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运动符合民主趋向，这种趋向在列宁格勒组织内曾经有过，它竭力要表现出来，而且终于表现出来了。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接受不久以前的这个教训。我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教训，忠实而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

性，吸引他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党中央四月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正确性。我所希望的就是你们要说服党员群众，因为说服的方法是我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有些同志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各派别集团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同志们，那可要请原谅了！我们不是这样理解党内民主的。党内民主和派别集团的自由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党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

派别集团的自由是什么呢？派别集团的自由就是瓦解党的队伍，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削弱党，◇131◇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在睡眠中也梦见全党展开了争论。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想像党会没有争论，他们满想得到职业争论家的头衔。让这些职业争论家离开我们远些吧！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臆造出来的争论，不是把我们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而是加紧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特别是加紧工业建设，把坚定而满怀信心地领导我国建设工作的党，战斗的团结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党巩固起来。谁力图进行永无止境的争论，谁力图争取派别集团的自由，谁就是破坏党的统一，谁就是损害我们党的实力。

我们过去的强大是靠什么，我们现在的强大又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正确的政策和我们队伍的统一。正确的政策已由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给我们制定出来了。现在任务就在于保证我们队伍的统一，保证我们党的统一。我们党决心不顾一切来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如此。

十 结 论

现在让我来做结论吧。◇132◇

第一、我们应当推进我国工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前进的领导力量。

第二、我们应当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因为他们是工业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

第三、我们应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应当积累后备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

第四、必须正确使用积累起来的后备，并建立最严格的节约制度。

第五、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并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六、必须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

第七、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实行党内民主。

第八、我们应当保护并巩固我们党的统一、我们队伍的团结。

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些任务呢？是的，能完成，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这样做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出来。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因为我们不怕困难，因为困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跟它作斗争并克服它。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走。我们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着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

同志们！九年以前，一九一七年二月，我们在列宁格勒是一个小小的集团，年老的党员都记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列宁格勒苏维埃中占极小的少数。年老的布尔什维克应当记得，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许许多多敌人都讥笑我们。但是我们前进了，夺取了一个阵地又一

个阵地，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是以团结的队伍来进行斗争的。后来这个小小的力量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133◇粉碎了资产阶级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我们从我国境内赶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强暴者。我们克服了经济破坏状态。最后，我们恢复了我国的工业和我国的农业。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新任务——我国工业化的任务。最严重的困难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可以怀疑我们能完成我国工业化这个新任务呢？当然不可以。相反地，我们现在有一切条件来克服困难并实现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在新的工业战线上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第八十九号◇134◇

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五三〕

我和舒姆斯基谈了一次话。谈话时间很长，继续了约两个多钟头。你们知道，他是不满意乌克兰的现状的。他不满意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两点：

一、他认为乌克兰化进行得很勉强，大家把乌克兰化看做一种负担，执行起来劲头不大，执行时间拖得很长。他认为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知识界发展得非常快，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个运动，它就会不按照我们的方向去发展。他认为领导这个运动的人应当对乌克兰文化事业有信心，懂得并且愿意懂得这种文化，拥护并且能够拥护日益高涨的争取乌克兰文化的运动。他特别不满意在他看来是阻挠乌克兰化的乌克兰的党和工会上层领导的行为。他以为党和工会上层领导的主要过错之一在于他们不吸引那些跟乌克兰文化有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党和工会的工作。他以为乌克兰化首先应该在党的队伍内和无产阶级中间推行。

二、他以为要改正这些缺点，首先必须从乌克兰化的观点来改变党和苏维埃上层领导的成分，只◇135◇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使我们乌克兰工作干部向乌克兰化方面转变。他建议提升格林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升邱巴尔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书记，改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分等等。他以为如果没有这样或类似的改变，他舒姆斯基今后就无法在乌克兰工作。他说，如果中央坚持，那末，即使目前工作条件照旧不变，他也准备回乌克兰去，但他确信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特别不满卡冈诺维奇的工作。他认为卡冈诺维奇确实

安排好了党的组织工作，不过他觉得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工作中主要是采用组织方法，因而使得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他肯定说，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工作中使用组织压力，对最高苏维埃机关和这些机关的领导者采用排挤方法，其后果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同时他不担保这些后果不会成为严重的冲突。

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在舒姆斯基的第一点声明中具有若干正确的思想。说广泛的争取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的运动在乌克兰已经开始并在发展，这是对的。说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运动交给异己分子，这是对的。说乌克兰许多共产党员不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因而没有设法掌握它，这是对的。说必须改变我们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干部在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问题上仍旧在透露着的那种讥讽和怀疑的情绪，这是对的。说应该细心地选拔并造就能够掌握乌克兰新运动的干部，这是对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同时舒姆斯基至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他把我们党的机关和其他机关的乌克兰化跟无产阶级的乌克兰化混为一谈。在保持一定◇136◇速度的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决不能从上面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决不能**强迫**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而把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认做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是跟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抵触的。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民族压迫。无疑地，随着乌克兰工业的发展，随着乌克兰工人从城郊的乡村流入工业，乌克兰无产阶级的成分将发生变化。无疑地，乌克兰无产阶级的成分将要乌克兰化，正像拉脱维亚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成分一个时期具有德国人性质而后来也开始拉脱维亚化和马札儿化一样。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自然的过程。企图从上面以强制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办法来代替这个自发的过程，这就等于实

行一种空想而有害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在乌克兰境内非乌克兰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引起反乌克兰的沙文主义。我觉得舒姆斯基没有正确了解乌克兰化，而且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危险。

第二、舒姆斯基强调在乌克兰争取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的新运动的积极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运动的阴暗面。舒姆斯基没有看到，在乌克兰本地共产党员干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个往往由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就会在某些地方带有使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离开全苏联文化和全苏联社会人士的性质，带有反对一般“莫斯科”、反对一般俄罗斯人、反对俄罗斯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列宁主义——的性质。我不想证明这种危险在乌克兰是愈来愈成为现实的了。我只想说，甚至某些乌克兰共产党员也不免犯这种毛病。我指的是大家都知道◇137◇的一件事，即著名的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在乌克兰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赫维列沃依要求在乌克兰“**立即**使无产阶级非俄罗斯化”；他主张“乌克兰诗歌应当尽快地摆脱俄罗斯文学及其风格”；他说“就是没有莫斯科的艺术，我们也知道无产阶级思想”；他迷恋着乌克兰“青年”知识分子的什么救世主的作用；他怀着使文化脱离政治这种可笑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现在这个乌克兰共产党员所唱的这一切和许多类似的调子，听起来是（不能不是！）非常奇怪的。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和他们的共产党都对“莫斯科”、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深表同情的时候，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尽快地”摆脱“莫斯科”，除此以外竟没有讲一句拥护“莫斯科”的话。这也叫做国际主义！如果共产党员都开始讲赫维列沃依这样的话，而且不仅在口头上讲，甚至还在我们苏联报刊上写文章，那末，关于其他非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舒姆斯基不懂得，在乌克兰要掌握争取乌克兰文化的新运动，只有反

对共产党员队伍中的赫维列沃依的极端行动才有可能。舒姆斯基不懂得，只有和这种极端行动作斗争才能把日益增长的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变成**苏维埃**文化和**苏维埃**社会人士。

二、舒姆斯基断言乌克兰的上层领导（党的和其他的）都应当乌克兰化，这是对的。但是他在速度方面却错误了。而这一点现在是主要的。他忘记了要完成这一事业，纯粹乌克兰族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暂时还不够。他忘记了不能勉强造就这样的干部。他忘记了这样的干部只能在工作进程中成长◇138◇起来，为此就需要时间……现在提升格林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什么意思呢？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会怎样估计这件事呢？他们不会把它了解为我们采取降低人民委员会作用的方针吗？因为格林柯的党龄和参加革命的年限比邱巴尔短得多，这是瞒不过党的。现在，在活跃苏维埃、提高苏维埃机关作用的目前时期我们能不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呢？为了工作，为了格林柯，暂时放弃这样的计划不是更好吗？我赞成增加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以及苏维埃上层领导中的乌克兰人成分。但是决不能把事情说成好像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里面就没有乌克兰人似的。斯克雷普尼克和查东斯基、邱巴尔和彼得罗夫斯基、格林柯和舒姆斯基，他们难道不是乌克兰人吗？舒姆斯基在这里的错误就是：他虽然对将来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没有注意到速度。可是速度现在是主要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全文刊印◇139◇

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在梯弗里斯
铁路总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让我来报道英国发生罢工〔五四〕的情况和波兰最近的事件〔五五〕吧。大会主席齐赫泽同志乐意把这个报道叫做报告，可是它只能叫做报道，不能有别的叫法，因为它很短。

英国为什么发生罢工？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英国罢工的原因。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势力雄厚、最富于妥协性的国家，近来怎么会变成了最大的社会冲突的舞台呢？“大英帝国”、“海上霸王”怎么会变成了总罢工的国家呢？

我想指出决定英国必然爆发总罢工的几种情况。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还不到时候。可是指出决定罢工必然爆发的某些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我们是能够的而且是必须的。从这些情况中可以指出主要的四种：◇140◇

第一、早先英国在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中是占垄断地位的。它握有许多大块的殖民地，拥有当时最完备的工业，它有可能自命为“世界工场”并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这是英国的“和平繁荣”时代。资本攫取了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零头落入英国工人运动的上层分子的腰包，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领逐渐为资本所驯服，而劳资冲突则通常以妥协方式解决。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发展（它们都是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新竞争者）根

本破坏了英国旧日的垄断地位。战争和战后的危机又给英国的垄断地位一个决定性的打击。超额利润减少了，落入英国工人首领腰包的零头快要没有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呼声愈来愈频繁了。“和平繁荣”的时代已为冲突、同盟歇业和罢工的时代所代替了。英国工人开始左倾，愈来愈频繁地采取和资本直接斗争的方法了。

不难了解，在这种情势下，英国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的粗暴叫喊，是不会不引起煤矿工人的反应的。

第二、第二种情况是国际市场联系的恢复和由此而来的各资本主义集团夺取市场的斗争的尖锐化。战后危机的特征是它几乎破坏了国际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联系，而以国际关系中的某种混乱代替了这些联系。由于资本的暂时稳定，现在这种混乱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国际市场原来的联系就逐渐恢复起来了。几年以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工厂并吸引工人为资本工作，现在的问题则是如何为恢复起来的工厂保证市场和原料。因此，夺取市场的斗争更加尖锐了，而在这个斗争中占上风的是◇141◇那些商品较为低廉、技术较为高明的资本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力量：美国、法国、日本、德国、英国的自治领、英国的殖民地，它们在战争期间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现在正进行着夺取市场的斗争。既是这样，现在英国要像历来那样轻而易举地从国外市场攫取利润自然就不可能了。垄断地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旧殖民方法，必须让位给以廉价商品占有市场的新方法了。因此，英国资本竭力缩减生产，至少是不笼统地扩大生产了。因此，英国工人大批失业成了最近几年来的经常现象。因此，失业的威胁使英国工人皇皇不安，并推动他们走上战斗的道路。因此，同盟歇业的威胁飞快地激动了全体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

第三、第三种情况是英国资本力求以牺牲英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来降低英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减低商品价格。煤矿工人成了目前主要打击的对象，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英国资本所以进攻煤矿工

人，不仅因为煤炭工业技术装备很坏而需要“合理化”，而且首先因为煤矿工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制服这支先进部队，减低工资，延长工作日，为的是把这个基本部队压制下去以后再去对付工人阶级的其他部队，——这就是英国资本的战略。因此，英国煤矿工人英勇地举行了罢工。因此，英国工人以无比的决心举行总罢工支援煤矿工人。

第四、第四种情况是保守党在英国执政。这个党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不用说，任何其他资产阶级政府，在镇压工人阶级这一点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也会和保守党政府一样。可是同样不容怀疑，只有像保守党人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死敌才会如此轻易地无耻地以同盟歇业的威胁手段向整个英◇142◇国工人阶级进行史无先例的挑战。英国保守党不但欢迎同盟歇业和罢工，而且为这件事准备了将近一年，这一点现在必须认为是完全得到证明了。它延迟了去年七月对煤矿工人的进攻，认为时机“不适宜”。可是它在这一整个时期进行了准备，贮藏了煤炭，组织了工贼，相应地制造了社会舆论，以便在今年四月打击煤矿工人。只有保守党才会采取这种阴险的办法。

保守党靠伪造的文件和挑衅的手段钻进了政府。它在执政后的第一天就利用一切挑衅的手段进攻埃及。它使用屡试有效的殖民地掠夺和压迫的方法对中国人民直接作战已有一年了。它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使苏联人民和大不列颠人民无法接近，一步一步地准备可能的武装干涉的因素。现在它正在进攻本国的工人阶级，它用了整整一年的工夫苦心孤诣地准备这种进攻。保守党没有英国国内外的冲突就不能过日子。既然如此，英国工人以打击还打击，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决定英国必然爆发罢工的几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如此。

英国总罢工为什么失败了？

英国总罢工是由于许多种情况而遭受失败的，其中应该指出的至少有以下几种：

第一、正像罢工进程所表明的，英国资本家和保守党比起英国工人及其领导者总委员会和所谓工党来，一般是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更坚决，因而也是更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没有担负得◇143◇起工人阶级的任务。

第二、英国资本家和保守党有把握地、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而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领们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就突然受到矿主同盟歇业的袭击。同时必须指出，在发生冲突前不过一个星期，工人阶级的首领们还表示他们深信冲突不会发生。

第三、资本家的大本营保守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进行了斗争，在斗争的带决定性的方面施以打击，而工人运动的大本营工会总委员会及其“政治委员会”（工党）内部却是堕落腐化的。大家知道，这个大本营的主要人物，不是英国煤矿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公开叛徒（汤姆斯、韩德逊、麦克唐纳及其伙伴），就是那些惧怕斗争尤其惧怕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叛徒的毫无气节的同道者（柏塞尔、希克斯等人）。

有人会问，英勇无比地进行过斗争的强大的英国无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怎么竟不是出卖工人就是怯懦畏缩，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他们是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上过培养英国工人首领的一定的学校，上过那样一个时期的学校，当时英国资本攫取到超额利润，能够笼络工人首领并利用他们来和英国工人阶级取得和解；这些工人阶级首领既然在生活和地位方面近似资产阶级，也就脱离了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背道而驰，不再了解工人群众了。就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首领被资本主义的光辉晃得眼花撩乱，为资本的威势所压倒，梦想“出人头

地”，梦想和“富裕的人”结成一体。毫无疑问，这些所谓首领是旧时代的渣滓，◇144◇已经不适合新环境了。毫无疑问，他们将来必定让位给那些符合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新领袖。恩格斯把这样的旧首领称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领袖〔五六〕是很对的。

第四、英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保守党懂得英国工人的大罢工是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只有用政治手段才能对这种罢工进行严重的斗争，要镇压罢工，既必须利用英王的权威，又必须利用下院和宪法的权威，不动员军队和宣布非常状态，罢工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可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大本营总委员会却不懂得这种简单的事理，或者不愿意懂得它，或者不敢承认它，却硬要每个人都相信：总罢工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手段，总委员会不愿意而且不打算把斗争转上政治斗争的轨道，总委员会不想打击英国资本的大本营保守党，总委员会不打算把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这样一来，总委员会就使罢工必然遭到失败，因为历史证明总罢工不转上政治斗争的轨道是必然要遭到失败的。

第五、英国资本家的大本营懂得国际上给英国罢工的援助对于资产阶级是一个致命危险，可是总委员会不懂得或者装做不懂得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同情协助的条件下，英国工人的罢工才能获得胜利。因此，总委员会拒绝了苏联工人的〔五七〕和其他国家工人的财政上的援助。

像英国总罢工这样的大罢工，要想产生显著的效果，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使罢工转上政治轨道，使罢工变成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行动。但是英国总委员会由于它所固有的特殊的“聪明”，放弃了这两个条件，因而就注定了总罢工的失败。◇145◇

第六、毫无疑问，在援助英国总罢工方面，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极其暧昧的行为起了相当坏的作用。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组织对于援助罢工所做的空头决议，就是事实上拒绝给予任何财

政援助，因为欧洲和美洲的工会所给予英国兄弟的财政援助总共不过苏联工会所能给予的八分之一，这一事实除了用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暧昧行为来解释以外，是不能有别种解释的。至于其他方面的援助，像停止运煤这样的援助（在这方面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行为简直和工贼一样），我就不说了。

第七、同样毫无疑问，英国共产党的软弱对于总罢工的失败有相当大的关系。必须说，英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优秀的支部之一。必须指出，在英国罢工的整个期间，它的立场完全正确。但是也必须承认，它在英国工人中的威信还不高。而这一情况在总罢工进程中不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的、决定了英国总罢工的坏结局的一些情况，至少是其中主要的情况。

总罢工的教训

英国总罢工的教训，至少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些教训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几点：

第一、英国煤炭工业的危机和由它引起的总罢工，正面地提出在建立工人监督的条件下在煤炭◇146◇工业方面实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问题。这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未必用得着证明，要根本克服煤炭工业的危机，除了英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办法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的。煤炭工业的危机和总罢工使英国工人阶级直接接触到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英国工人阶级不能不亲身体验到，在走向目的地的道路上主要的障碍是资本家的政权，在目前就是保守党及其政府。既然工会总委员会像怕瘟疫一样地怕承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分的联系，英国工人现在就不能不了解，在他们和有组织的资本进行艰苦的斗争

中，政权问题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不解决政权问题就不能克服煤炭工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英国整个工业的危机。

第三、总罢工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不使英国工人阶级确信，国会、宪法、英王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挡箭牌而已。罢工剥下了国会和宪法这类偶像和不可侵犯的圣物的外衣。工人会明白现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的武器。工人不能不明白他们也需要工人自己的宪法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我以为领会这个真理对英国工人阶级将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第四、罢工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不使英国工人群众确信，旧的领导者是不中用的，在旧的英国妥协政策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旧的领袖是不中用的。他们不能不明白必须以新的、革命的领袖代替旧的领袖。

第五、英国工人现在不能不明白，英国煤矿工人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因此，支持煤矿工◇147◇人的罢工并保证它获得胜利是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事情。罢工的全部进程向英国工人阶级指明这一教训是绝对无可争辩的。

第六、在总罢工的艰难时刻，在各种政党的立场和纲领受到实际考验的时候，英国工人不能不确信，能够彻底地、勇敢地、坚决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唯一政党就是共产党。

英国总罢工的主要教训大体上就是如此。

几 个 结 论

现在我来讲讲几个有实践意义的结论。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问题。英国的罢工证明，共产国际关于稳定局面的暂时性和不巩固性的决定〔五八〕是完全正确的，英国资本对英国煤矿工人的进攻是企图把暂时的不巩固的稳定局面变成巩固的和永久的稳定局面。这一企图没有成功，而且也不可能

成功。用大罢工来回答这一企图的英国工人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表明，要在战后时期的条件下建立资本主义的巩固的稳定局面是办不到的，像英国的这种试验是包藏着摧毁资本主义基础的危险性的。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已经巩固的论点是不正确的，那末，与此相反的论点，说稳定局面已经结束，稳定局面已经消除，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革命风暴最高涨的时期，也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是暂时◇148◇的，不巩固的，但毕竟是稳定局面，目前还存在着。

其次，正因为现在这种暂时的不巩固的稳定局面还存在，所以资本今后还要力图向工人阶级进攻。当然，英国罢工的教训一定会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表明，像保守党在英国所作的这种试验对于资本的生存有多么大的危险。恐怕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这种试验不会不给保守党带来恶果。同样不能怀疑，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考虑这个教训。虽然这样，资本还是会企图再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因为它感到自己不巩固，所以不能不感到有使自己更加巩固的必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准备力量来回击这种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今后要继续组织工人的统一战线，竭尽全力把资本家的进攻变成工人阶级的反攻，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变成工人阶级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

最后，为了完成当前这些任务，英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摆脱他们现在的那些领导者。有了汤姆斯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领袖，是不能和资本家作战的。后方有了韩德逊和克莱因斯之类的叛徒，是不能指望胜利的。英国工人阶级应当学会用优秀的首领去代替这类首领，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英国工人阶级学会撤去汤姆斯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的职位，或者是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胜利，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同志们，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几个结论。

现在让我来讲讲关于波兰事件的问题。◇149◇

关于波兰最近的事件

有人认为皮尔苏茨基领导的运动是革命运动。据说皮尔苏茨基拥护波兰的革命事业，拥护农民，反对地主，拥护工人，反对资本家，拥护波兰各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反对波兰的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据说，因此，皮尔苏茨基值得共产党人来支持。

同志们，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事实上，波兰现在发生的斗争是两个资产阶级政派——以坡兹南派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政派和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政派——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巩固、稳定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为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不是为保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斗争是由于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的方法不同而引起的。

问题在于波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彻底腐朽的阶段。财政破产。兹罗蒂贬值。工业瘫痪。非波兰民族备受压迫。而在上层，在接近领导阶层的各集团中，正像议会中一切派别〔五九〕的代表所公开谈论的那样，贪污之风非常盛行。因此，资产阶级只好二者择一：**或者**是让国家继续腐朽下去，结果促使工人和农民睁开眼睛，推动他们必然用革命的方法来改造政权以反对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资产阶级应当赶快设法中止崩溃状态，肃清贪污之风，从而及早防止工农革命运动的可能爆发。◇150◇

现在，问题在于由哪一个资产阶级政派担负稳定波兰国家的工作——是皮尔苏茨基派呢，还是坡兹南派？

毫无疑问，工人和农民是把根本改善自身状况的希望和皮尔苏茨基的斗争联在一起的。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的上层分子无论如何都支持这个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阶层的皮尔苏茨基去反对代表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坡兹南派。但是，同样毫无疑问，

波兰劳动阶级中的某些阶层的希望，现在没有被用在革命事业上，而被用在巩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秩序上。

当然，某些外部的因素在这里也起着作用。波兰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它在财政方面是和协约国的某些集团有联系的。它，资产阶级的波兰，处在目前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借外债当然不行。但是所谓列强是不能贷款给一个连领导集团都一致承认整个国家机构中盛行贪污之风的国家的。为了获得外债，首先必须“改善”国家机构，遏止贪污之风，创造某些能够支付债款利息的保证，如此等等。因此必须使波兰国家“合理化”。

引起波兰两个主要资产阶级政派现在这场斗争的内部和外部的前提基本上就是如此。

波兰目前有许多根本矛盾，这些矛盾再发展下去，必然要在波兰造成直接的革命形势。这些矛盾贯穿在三个主要方面：工人问题方面，农民问题方面，民族问题方面。如果波兰要进行军事冒险，如果它不能够和它周围的国家建立善邻关系，所有这些矛盾就会马上暴露出来，并引起爆发。皮尔苏茨基能不能、成分复杂的皮尔苏茨基集团能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这个小资产阶级集团能不能解决工◇151◇人问题呢？不，不能，因为它这样做，就一定要和资本家阶级发生根本的冲突；它既然不愿失掉列强方面的财政援助，所以它就不会，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资本家阶级发生根本冲突。它，这个集团，能不能采取没收地主土地那样的方式来解决农民问题呢？不，不能，它既然不愿使几乎全由中小地主组成的皮尔苏茨基军队的指挥机构完全瓦解，它就不会那样做。它，这个集团，能不能给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等等被压迫民族以民族自决的自由来解决波兰的民族问题呢？不，不能，它既然不愿在它自己存在的精神方面的主要来源——大波兰沙文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心目中失去任何一点信任，它就不会那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出路呢？

出路只有一条：在**军事上**战胜大资产阶级政派之后，**政治上**就服从这一个政派，做它的尾巴。当然，这是假定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农民中的革命部分最近期间不用革命方法改造波兰国家、不驱逐波兰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派——皮尔苏茨基派和坡兹南派的。

因此就产生了关于波兰共产党的问题。怎么波兰大部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的不满情绪竟有助于皮尔苏茨基，而无助于波兰共产党呢？其原因之一是波兰共产党软弱，非常软弱，是它对皮尔苏茨基的军队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而在这次斗争中更加削弱了自己，所以无法领导那些具有革命情绪的群众。

不久以前，我在我们苏联报刊上读到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台尔曼同志写的一篇论波兰◇152◇问题的文章〔六〇〕。台尔曼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波兰共产党人提出支持皮尔苏茨基军队这一口号的立场，并批评这种立场不是革命的立场。很遗憾，我应当承认台尔曼同志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我应当承认我们的波兰同志在这件事情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同志们，关于英国发生总罢工的情况和波兰最近的事件，我要向你们报道的就是这些。（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东方曙光报”（梯弗里斯）
第一一九七号◇153◇

对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欢迎词的答词

（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对工人代表们在这里所致的欢迎词表示同志的感谢。

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凭良心说，这里对我的颂扬，我连一半也不敢当。原来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什么等等。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都是绝对不必要的夸张。这种话通常是在革命烈士灵前讲的。但是我还不打算死呢。

因此，我不得不追想一下真正的情形，看看我从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我今天在我们党内所以得到这样的地位应当归功于谁。

阿拉凯尔同志[①]在这里说过，过去他认为他是我的一个老师，而我是他的学生。同志们，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过去的确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梯弗里斯铁路工厂先进工人的一个学生。◇154◇

让我来谈谈过去吧。

我想起了一八九八年，当时我第一次接受一个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工作。这是大约二十八年前的事情。我想起了我在司徒卢阿同志的家里，在季布拉泽（他当时也是我的一个老师）、乔德利什维里、齐赫泽、波乔利什维里、尼努阿以及梯弗里斯其他先进工人面前，怎样受到实际工作的初步教育。跟这些同志比较，我当时是一个年轻人。

———————————————

① 即奥库阿什维里。

也许那时我读的书比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稍微多一些。但是作为实际工作者来说，毫无疑问，我那时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人。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学徒。由此可见，我最初的老师是梯弗里斯的工人。

让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同志的感谢。（鼓掌）

其次，我想起了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当时党派我到巴库去工作。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一方面，在和巴库先进工人如瓦泽克、萨拉托维茨、菲奥列托夫等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业主最激烈的冲突的风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就在那里，在巴库，我受到了第二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那里，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帮工。

让我向我的巴库老师们表示由衷的同志的感谢。（鼓掌）

最后，我想起了一九一七年，当时，我在经历了牢狱和流放所的转徙流离的生活以后，奉党的命◇155◇令转到了列宁格勒。就在那里，在俄罗斯工人中间，在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身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搏斗的风暴中，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环境下，我第一次懂得了做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领导者是怎么一回事。就在那里，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斗争的急先锋——俄罗斯工人中间，我受到了第三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那里，在俄罗斯，在列宁的领导下，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师傅。

让我向我的俄罗斯老师们表示由衷的同志的感谢，并俯首默念我的伟大导师列宁。（鼓掌）

从学徒的称号（梯弗里斯），经过帮工的称号（巴库）而到我国革命的一个师傅的称号（列宁格勒），——同志们，这就是我学习革命的经历。

同志们，如果毫不夸大地凭良心说，我原来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成了怎样一个人的真正情形就是如此。（鼓掌，转为热烈欢呼。）

载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东方曙光报”（梯弗里斯）
第一一九七号◇156◇

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六一〕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六二〕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时期，争取群众并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新战斗的时期。但是群众在工会里。而西方的工会，其中多数现在多少是反动的。那末，我们对这些工会怎么办呢？我们共产党人应不应、能不能在这些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向我们提出的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早在托洛茨基之先，大约五年以前，德国的“极左派”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把它重新提出来。他究竟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让我来引托洛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吧：

“不列颠工人阶级目前的全部‘上层建筑’，不分色彩和派别，毫无例外地都是阻碍革命的机构。这预示着：在长时期内，自发的和半自发的运动将压迫**旧的组织形式**，并在这种压迫的基◇157◇础上**形成新的革命的组织**。”（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一九号）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不愿意“阻碍”革命，就不应当在“旧的”组织内工作。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已经处于直接革命形势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立刻建立独自行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来代替“旧的”组织，代替工会。这当然是不对的，是愚蠢的。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应当在“长”时期内用“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旧的工会。

———————————————

① 这里刊载的是演说的摘要。

这就是要组织“革命的工人联合会”来**代替**现有工会的信号。关于这种“革命的工人联合会”，大约五年以前，德国“极左派”共产党人曾经谈论过，而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坚决地反对过他们。这其实是要用“新的”、似乎是“革命的”组织来代替现在的工会的信号，因而也就是**退出**工会的信号。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它是根本不正确的。其所以根本不正确，是因为它和列宁式的领导群众的原则相抵触。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西方的工会不管多么反动，却是最基本的、为最落后的工人所最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撇开这些工会，我们就不能接近群众，我们就不能争取群众。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共产党人接近千百万群众的道路堵死，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六三〕去任意宰割，交给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六四〕去任意宰割。

在这里，反对派分子引证了列宁同志的话。让我也来援引一下列宁的指示吧：

“德国左派所发表的那种庄重的、非常渊博的、极端革命的论调，说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158◇不应在反动工会中工作，说什么可以拒绝这种工作，说什么必须退出工会，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粹的、由非常可爱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共产党人臆造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我们也不能不以为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胡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一页至第三十二页）

其次：

“我们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吸引工人群众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作斗争，是为了吸引工人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忘记这个最起码最明显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

种蠢事，他们以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为理由，主张……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造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最大效劳。”（同上，第三十四页至第三十五页）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里解释是多余的。

这里就产生了关于跳过西方工会的尚未根绝的反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季诺维也夫搬到这里的讲坛上来的。他引证了马尔托夫的话并且要人相信：不跳过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容许跳过群众的落后性、跳过群众领导者的落后性和反动性的观点，似乎是孟什维克的观点。

同志们，我肯定说，季诺维也夫这种引证马尔托夫的话的卑鄙龌龊的手腕只证明一点：季诺维也◇159◇夫**完全离开了**列宁主义的路线。

下面我就尽力来证明这一点。

一般地说，我们列宁主义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运动，跳过群众的落后性，我们可以背向它们，撇开它们呢，还是我们**应当**在群众中不倦地进行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来**根绝**这类现象？这是共产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列宁式领导群众的基本问题之一。反对派在这里谈到了列宁主义。让我引证一下原著，引证一下列宁的话吧。

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当时列宁和加米涅夫发生争论。列宁不同意加米涅夫过高估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但列宁也不同意托洛茨基过低估计农民运动的作用和“跳过”俄国的农民运动。请看列宁说的话吧：

“托洛茨基主义——‘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可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的部分是跟工人阶级一道走的。”（见列宁的演说，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代表会议记录第十七页〔六五〕）

“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末，这就是**跃过**[①]小资产阶级。”（见列宁的演说，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代表会议记录第七十六页〔六六〕）◇160◇

其次：“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陷入希望‘**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末我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回事，而是另一回事……在我的提纲中，我绝对担保自己不会有陷入任何**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危险，不会有陷入任何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危险，不会有陷入任何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的危险，因为我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八页和第二十九页）

看来是清楚的了。这种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运动的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列宁是不同意这种理论的。他认为这是冒险的理论。

请再看从其他著作中引来的几段话，这些著作是一位“很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写的，他的姓名我暂时不想说出来，但他也是反对跳过理论的。

“在托洛茨基总是‘跳过’的农民问题上，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有的将不是结合的萌芽，而是很严重的分离。”◇161◇

其次：

“这就是帕尔乌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后来又改铸成一些政治口号，例如‘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样的口号。现在，我们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在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夺得了苏维埃政权以后的现在，这个口号听起来是十分响亮的。不要沙皇！——好。工人政府——更好。但是，如果想起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这个口号是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那末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会同意：当时这个口号完全‘**跳过了**’农民。”

其次：

“而‘不断论者’在一九〇五年曾想强迫我们接受‘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这个口号。那末，农民在哪里呢？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完全不了解并忽视农民的事实，岂不令人痛心吗？如果这不是‘跳过’农民又是什么呢？”

其次：

“托洛茨基主义既然不了解农民在俄国的作用，既然在农民的国家里‘跳过’农民，也就更不能了解农民在国际革命中的作用了。”

你们要问：这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反对托洛茨基的跳过理论的声色俱厉的引文的作者究竟是谁呢？这些声色俱厉的引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季诺维也夫。这些引文是从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和“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中引来的。◇162◇

一年以前，季诺维也夫懂得跳过理论是反列宁主义的，而现在，过了一年，他却不懂得这一点了，怎么会这样呢？他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当时是所谓列宁主义者，而现在却不可救药地一只脚陷入了托洛茨基主义，另一只脚陷入了施略普尼柯夫主义即陷入了“工人反对派”〔六七〕。他就是这样在两个反对派之间挣扎，现在又不得不借用马尔托夫的话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发言了。他发言反对谁呢？反对列宁，拥护谁呢？拥护托洛茨基分子。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有人会说，这一切所涉及的都是农民问题，和英国的工会无关。但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上面说到的关于跳过理论在政策上行不通的话，和英国的工会，一般说来，和欧洲的工会是有直接关系的，和领导群众的问题，和把群众从反动的改良主义首领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方法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遵循跳过理论，

企图跳过英国工会的落后性，跳过它们的反动性，竭力设法使**我们**在**没有**英国工会的群众参加下从莫斯科去推翻总委员会。我们却肯定说，这种政策是愚蠢，是冒险主义；英国工会运动的反动首领是应当由英国工会的群众**在我们的帮助下自己**去打倒的；我们不应当跳过工会首领的反动性，而应当**帮助**英国工会的群众去**根除**这种反动性。

由此可见，一般政策和对工会群众的政策之间的联系是绝对存在的。

关于这一点列宁有没有指示呢？

请听吧：◇163◇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乃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进到**初步**阶级联合的过渡。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联成一个整体，联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就不配享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必然要暴露**一些**反动色彩，暴露一些行会的狭隘性，暴露一些不问政治的倾向和一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别的发展道路，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页至第三十三页）

其次：

“惧怕**这种**‘反动性’，企图**撇开**它，**跳过**[①]它，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等于惧怕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以及农民中最落后阶层和群众并吸收他们来参加新生活的那种作用。”（同上，第三十三页）

这就是跳过理论在工会运动方面的情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季诺维也夫最好不要借用马尔托夫的话到这里来发言。他最好对跳过理论默不作声。这样对他就会好得多。季诺维也夫用不着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来赌咒，我们本来就知道他已经离开列宁主义而◇164◇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

同志们，托洛茨基的跳过工会的落后性、跳过工会运动的落后性、跳过一般群众运动的落后性的理论就是如此。

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主义是另一回事。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了。在这里有人说，英俄委员会是我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的协定，联盟。这是完全对的。英俄委员会是我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的联盟的表现，协定的表现，并且这个联盟不是没有政治性的。

这个联盟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建立我国工会和英国工会的联系，组织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运动，扩大阿姆斯特丹和英国工会运动之间现有的并且我们将尽力加以扩大的裂痕，以及准备必要的条件把改良主义者挤出工会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这个联盟的第二个任务是组织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反对一般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说来，反对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

关于第一个任务在这里已经谈得够详细了。所以我不再谈它。在这里我想稍微谈谈第二个任务，特别是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的那一部分。有些反对派分子说，我国工会和英国工会联盟的后一个任务不值一谈，这个任务不是重要的任务。试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值一谈呢？难道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也是国际革命的堡垒和基地）的安全这样一个任务，不是革命的◇165◇任务吗？难道我国工会不依赖于党吗？难道我们主张我国工会闹独立性：国家是一回事，工会是另一回事吗？不，我们列宁主义者不赞成而且

不能赞成这种主张。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都应当关心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使它免受武装干涉。如果我国工会在这方面得　英国工会的支持，即使是改良主义的工会的支持，也是应当欢迎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些认为我国工会不可以执行国家任务的人，他们的观点是和孟什维主义的观点相同的。这是“社会主义通报”〔六八〕的观点。我们不能赞成这种观点。英国反动的工会如果愿意和我国革命的工会结成联盟，反对本国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那末，为什么不欢迎这个联盟呢？我着重指出问题的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我们那些力图破坏英俄委员会的反对派终于了解他们是在帮助武装干涉者。

总之，英俄委员会是我国工会和英国反动工会的联盟，其目的是：第一、加强我国工会和西方工会运动的联系并使西方工会运动革命化；第二、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说来，反对武装干涉。

但是，一般说来，能不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和反动的工会结成政治联盟呢？一般说来，这样的联盟是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许的呢？

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彻底加以解决。有一部分人认为政治联盟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却认为这样的联盟是可以容许的。

在这里，反对派分子提到了列宁的名字。我们就来看看列宁的话吧：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许许多多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就是那些一半靠出卖劳◇166◇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等形形色色的过渡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自己内部没有分为发展程度不同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以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各种无产者集

团、对各种工人政党和各种小业主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就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五页至第五十六页）

其次：

“至于说韩德逊之流、克莱因斯之流、麦克唐纳之流、斯诺顿之流是不可救药的反动派，这是正确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权），说他们想依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方式来‘实行管理’，说他们一旦抓到政权，他们的行为必定和谢德曼之流、诺斯克之流一模一样，这也是正确的。这些都说得对。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的利益应该在国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相当的支持。”（同上，第六十二页）

总之，在列宁看来，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反动首领的政治协定、政治联盟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可以容许的。◇167◇

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记住这一点吧。

但是，我们究竟为了什么需要这样的协定呢？

这是为了能够接近工人群众，为了启发这些群众去认识他们的政治首领和工会首领的反动性，为了使工人阶级中左倾的、革命化的部分脱离反动的首领，所以也是为了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因此，这样的联盟只有具备下述两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缔结：保证我们有批评改良主义首领的自由，保证有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必要条件。

请看列宁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共产党可以向韩德逊之流和斯诺顿之流提议‘妥协’，提议订立选举协定，向他们说：我们共同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或投给共产党人的票数（不是在选举时，而是用特

别的表决办法）来分配国会中的议席，同时我们要保留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去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这样做就是叛变；英国共产党人也绝对必须坚持并争得揭发韩德逊之流和斯诺顿之流的充分自由，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五年内**）曾坚持过并争得了揭发俄国的韩德逊之流和斯诺顿之流即揭发孟什维克的充分自由一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六页至第六十七页）◇168◇

其次：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也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动摇于爱护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利用这种动摇，就要对那些倾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让步，当他们倾向的时候予以让步，看他们倾向的程度来决定我们让步的程度；同时却要和那些倾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使孟什维主义**在我国过去和现在日益瓦解，使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使优秀工人、使优秀分子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转到我们阵营里来**。”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六页）

这就是联盟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和工会的反动首领的任何联盟、任何协定都是不容许的。让反对派也记住这一点吧。

试问，我国工会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列宁同志所谈到的那些条件呢？

我认为是完全符合的。第一、我们完全保留批评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首领的充分自由，并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个自由。第二、我们得以接近英国工人群众，加强我们和◇169◇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他们的联系。第三、我们正在顺利地使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脱离反动的首领，并且已使一整批队伍脱离了他们。我指的是煤矿工人脱离总委员会的首领。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里竭力避开关于俄英矿工柏林代表会议和他们的宣言的问题〔六九〕。然而这是近来最重要的事件。理查逊、库克、斯密斯、理查兹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机会主义者，是改良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一些叫左派，另一些叫右派。由他们去吧！他们之中谁较左些，历史自有定论。我们现在很难知道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已经使这些领导着一百二十万罢工矿工的动摇的改良主义首领脱离了总委员会，并且使他们和我国工会连接起来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反对派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呢？我们政策的成功难道不使他们高兴吗？西特林现在写道，他和总委员会都同意召开英俄委员会，这难道不是由于什瓦尔茨和阿库洛夫把库古和理查逊拉到了自己方面来，而总委员会怕和煤矿工人进行**公开**斗争，才不得不同意召开英俄委员会吗？谁能否认这一切事实都是说明我们政策的成功，说明反对派政策的完全失败呢？

总之，和工会反动首领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联盟是必要的。批评自由是第一个条件。我们党在实现这个条件。使工人群众脱离反动首领是第二个条件。我们党也在实现这个条件。我们党是正确的。反对派是不正确的。

试问，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他们要我们苏联工会或者是和英俄委员会决裂，或者是从这里，从莫斯科去推翻总委员会。但◇170◇是，同志们，这是愚蠢的。要求我们从莫斯科**撇开**英国工会，**撇开**英国工会的群众，**撇开**英国工会的干部，跳过他们，而从这里，从莫斯科去推翻总委员会，——同志们，这难道不愚蠢吗？

他们要求示威式的决裂。但是这样做除了丢脸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倘若决裂，我们将失去和英国工会运动的联系，把英国工会投入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的怀抱，动摇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使邱吉尔之流和汤姆斯之流大为称快，而后来的除了丢脸不会有什么别的，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

托洛茨基的故作声势的政策所根据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在英国生活并进行斗争的具体的活的工人，而是一种从头到脚都革命的、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在政策上从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出发，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故作声势的政策，从莫斯科——只用莫斯科的力量——去推翻总委员会的政策是可笑的冒险的政策。

故作声势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从他加入我们党那天起的全部政策的特点。我们都记得，托洛茨基**第一次**运用这种政策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时他不签订德俄和约而故作声势地反对和约，以为故作声势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故作声势的政策。这种故作声势使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故作声势帮助了谁呢？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那些力图扼杀当时还不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人。◇171◇

现在，他们还是建议我们对英俄委员会采用这种故作声势的政策。他们要求采用示威式的故作声势的决裂行动。但是，这种故作声势对谁有利呢？对邱吉尔和张伯伦有利，对查辛巴赫和乌捷格斯特有利。他们正希望这样。他们正期待这样。他们，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希望我们对英国工人运动来一个示威式的破裂，从而促进阿姆斯特丹的事业。他们，邱吉尔之流和张伯伦之流希望决裂，这样好使他们易于进行武装干涉，使他们获得有利于武装干涉者的精神上的论据。

请看，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是在帮助谁。

不，同志们，我们不能走这条冒险的道路。

但是，这就是“极左的”空谈家的命运。他们的话倒是左的，而事实上却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向左边走，却到了右边。

不，同志们，我们不同意采取这种故作声势的政策，我们今天不同意，正像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不同意一样。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不愿使我们党变成我们敌人手中的玩具。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论反对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论文和演说）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72◇

费·捷尔任斯基

（悼费·捷尔任斯基）

继伏龙芝之后，捷尔任斯基又逝世了。

列宁的老近卫军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和战士。党又遭受了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现在停立灵前，回忆捷尔任斯基同志所经历的全部路程——牢狱，苦役，流放，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恢复被破坏的运输业，建设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他这沸腾的一生：**燃烧**。

十月革命使他站上艰巨的岗位——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领导者的岗位。资产阶级最仇恨的名字，莫过于捷尔任斯基这个名字了，因为捷尔任斯基用铁臂回击了无产阶级革命敌人的历次打击。“资产阶级的大灾星”——当时人们这样称呼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同志。

“和平时期”来到后，捷尔任斯基同志继续他的沸腾的工作。捷尔任斯基同志燃烧般地整顿了被破坏的运输业，后来担任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时又燃烧般地从事我国工业建设的工作。不知休息，不辞劳苦，勇敢地和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把全部气力、全部精力献给党所托付给他的事◇173◇业，——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在工作中燃烧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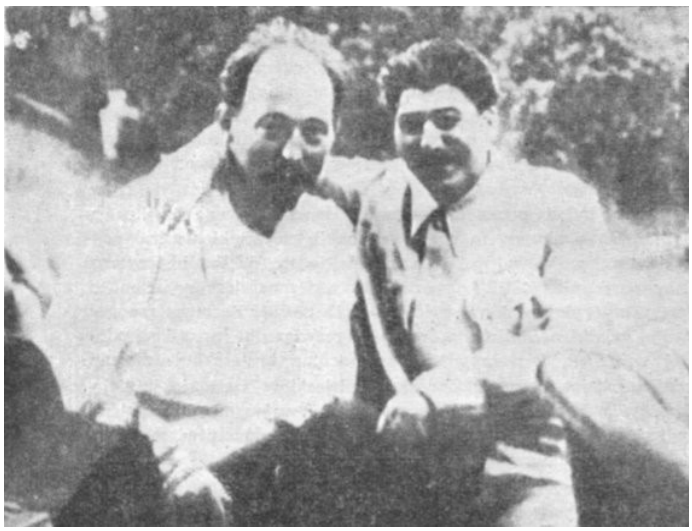
永别了，十月革命的英雄！永别了，党的忠实儿子！

永别了，为我们党的统一和强大而奋斗的建设者！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六六号◇174◇



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

资产阶级的大灾星

年轻时的费里克斯

“看着我的眼睛！”（电影剧照）

关 于 英 俄 委 员 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还在麦尔菲发言之前，联共（布）中央就收到了英国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抗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英国总罢工问题所发表的著名宣言〔七〇〕。我觉得麦尔菲是在这里重述这封信里的论据。麦尔菲主要是提出一些形式方面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说所争论的问题事先没有和不列颠共产党共同讨论过。我承认麦尔菲的这一理由是有其根据的。共产国际的确有时事先没有和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商量就得做出决定。但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某些问题十分急迫，不可能立即和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等等。

至于麦尔菲所持的有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宣言的其他理由和论据，那应当说是完全不正确的。

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表宣言是犯了形式方面的错误，因为它这样做似乎就是担负了工会国际或共产国际的职责，——这种断言是不正确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权发表自己的宣言，正像任◇175◇何职工联合会或其他联合会有权发表自己的宣言一样。怎能否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这种起码权利呢？

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表宣言是侵犯了工会国际或共产国际的权利，说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是遭到损失的受害的一方，——这种断言更不正确。我应当告诉大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表宣言是通知过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并得到它们同意的。其实就是这个缘故，无论工会国际或共产国际才都没有想到要责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侵犯它们应有的权利。这样，麦尔菲这次反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实际上

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

最后，麦尔菲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对英国工会总委员会的批评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似乎是对不列颠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是“一国的组织”，不应当进行这种“干涉”，——这种说法必须认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非常遗憾，麦尔菲竟在这里重述皮尤和柏塞尔在英俄委员会巴黎会议上所持的“论据”。皮尤、柏塞尔和西特林前几天正是用这种“论据”来反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单是这一点就已说明麦尔菲是不对的了。不能由于形式方面的理由而忘记事情的内容、事情的本质。一个共产党员是不能这样做的。假如除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以外，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等“一国的”职工联合会也批评了总委员会，那末英国矿工们的情况就会好得多，而总委员会的不正确的行动就会被揭露。应当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表宣言批评总委员会并不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犯了错误，而是它对英国工人立了功。◇176◇

对于麦尔菲的报告我所要讲的（主要是指事情的形式方面）就是这些。

既然这里讲的是事情的形式方面，那我本可以谈到这里为止。但问题在于麦尔菲所谈的并不止于事情的形式方面。他之需要形式方面是为了达到一些带有非形式性的实质上的结果。麦尔菲的策略就是用形式方面的理由做掩护，利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实际工作中某些形式方面联系得不好的情况，要在这里达到一定的实质上的决定。因此，我不得不对麦尔菲的论据的实质说几句话。

麦尔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大致说来，他要达到的是迫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停止对总委员会的**公开**批评，迫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默不作声，“不干涉”“总委员会的事务”。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或者我们的党，或者共产国际，能不能答

应呢？

不，不能。当总委员会设法使罢工的英国矿工陷于孤立并准备使他们遭受失败的时候，迫使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默不作声，那是什么意思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沉默会被怎样理解呢？在这种情况下沉默，——这就是对总委员会的罪过默不作声，对它的背叛行为默不作声。在总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着英俄委员会这个联盟的情况下，对总委员会的背叛行为默不作声，这就是默默地赞成这种背叛行为，因而也就是对全世界工人运动分担总委员会的背叛行为的责任。假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走上这条道路，假如它对总委员会的背叛行为哪怕是片刻放弃公开的批评，那末，它就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自杀，这还用证明吗？◇177◇

你们自己来判断吧。五月里总委员会停止总罢工，出卖了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特别是英国矿工。六七月里总委员会没有尽一点力去帮助罢工的矿工。不仅如此，总委员会反而竭尽全力准备使矿工遭受失败并藉此惩罚“不听话的”英国煤矿工人联合会。八月里总委员会的首领们在英俄委员会巴黎会议上拒绝讨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所提援助英国矿工的建议，虽然总委员会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出的这次会议的日程并没有表示过反对。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迷惑于腐朽的外交手腕的总委员会的一系列背叛行为。可是麦尔菲却要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对于这一切罪恶行为闭眼不看，用沉默的封条封住自己的嘴！同志们，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不能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它不愿意自杀。

麦尔菲认为：假如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由工会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来发表，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个“一国的”组织发表一个短短的决议来拥护工会国际的宣言，那就会更适当些。从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麦尔菲的方案是有若干主从层次的严整性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它是有若干根据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麦尔菲的方案就经不起

任何批评了。无须证明：就揭露总委员会和在政治上教育英国工人群众来说，麦尔菲的方案所能产生的政治效果还不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宣言确已产生的效果的百分之一。因为工会国际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名声不像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那样大，前者的声望比后者低，因而前者的比重也就较后者小得多。由此可见，出面批评总委员会的正应当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个在英国工人阶级心目中最有威信的机关。非这样做不行，因为既要揭露总委◇178◇员会的背叛行为，就应当打中要害。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在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首领中所引起的叫嚣来看，可以确信地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是打中要害了。

麦尔菲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对总委员会的公开批评可能引起和总委员会联盟的决裂，引起英俄委员会的破裂。我认为麦尔菲是不对的。**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很积极地援助煤矿工人的时候**，应当认为英俄委员会的破裂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任何人才都不像总委员会多数的代表柏塞尔和希克斯那样惧怕英俄委员会的破裂。当然，不论柏塞尔或希克斯都会用决裂的危险来恫吓我们。但是应当善于识别恫吓和真正决裂的危险。

此外，还应该记住英俄委员会对于我们并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参加并留在英俄委员会里不是无条件，而是有一定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自由批评总委员会的权利，正像总委员会有自由批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权利一样。我们不能为了情面，为了无论如何要保持联盟而放弃批评的自由。

联盟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在于组织盟员的共同行动以反对资产阶级，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盟员的共同行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如果盟员之一或联盟一方的某些首领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共同行动成为不可能，那怎么办呢？难道需要赞扬他们这种错误吗？可见需要互相批评，通过

批评来消灭错误，以便恢复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英俄委员会只在批评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179◇

有人说，批评会使工会中某些反动的首领信誉扫地。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如果使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旧首领信誉扫地，而代之以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新首领，那对于工人阶级只会有好处。撤换这种反动的和不可靠的首领，而代之以没有旧首领反动作风的优秀的新首领，撤换得愈快愈好。

然而，这并不是说，似乎一举就能摧毁反动首领的威力，在短期内就能孤立他们并以新的革命的领袖代替他们。

某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做一个“革命的”手势，只要来一个耸人听闻的举动，就足以摧毁反动首领的势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这种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另一些人认为：只要共产党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足以使广大工人群众在转瞬之间离开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并在转瞬之间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只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这样想。事实上，从党制定正确路线到群众领会这条路线并接受它作为正确路线，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使党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仅仅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还不够，为此还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确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必须使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和党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号，并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和口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具有正确政策的党才能变成阶级的真正领导力量。

不列颠共产党在英国总罢工期间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它没有能够把几百万罢工的工人领导起来呢？因为这些群众还没有确信共产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而要使群众确◇180◇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靠“革命的”手势更不可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需要毫不倦怠地积极努力地揭露反动

的首领，对工人阶级中的落后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把工人阶级的新干部提拔到前哨的岗位上去。

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不能在转瞬之间就消灭工人阶级反动首领的威力，为什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需要毫不倦怠地教育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

但是，由此更不应得出结论说：需要把揭露反动首领的工作拖上几十年，似乎不用丝毫得罪反动的首领，也不用触犯情面的“神圣常规”，就会自然而然、自流地揭露他们。不，同志们，任何东西永远不会“自然而然”来到。揭露反动的首领和在政治上教育群众是要你们共产党员自己以及其他左翼政治家通过毫不倦怠的群众政治教育工作来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化。

最后，对于麦尔菲的报告还有一点意见。麦尔菲固执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独有的特点、英国传统的作用和意义，并且我觉得他还暗示说，由于这些特点，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在英国可能不适用。我觉得麦尔菲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当然，英国工人运动独有的特点是存在的，并且一定要估计到这些特点。但是，把这些特点提高到原则并把它们当做工作的基础，就是采取那些宣布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英国条件的人的观点。我不认为麦尔菲和那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可是我要说，他已接近把英国的特点提高到原则的那个界限了。

关于胡姆勃特的演说，现在来讲两三句。胡姆勃特反驳说：批评不应当空洞无物，无的放矢。这◇181◇是对的。但是这跟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什么相干呢，它们的批评是十分具体的。对“黑色星期五”的英雄们〔七一〕的批评是不是空洞无物呢？当然不是，因为现在，在“黑色星期五”已成历史陈迹以后，人人都喜欢重复这个批评了。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对总委员会首领在总罢工期间以及后来在煤矿工人进行罢工时的背叛行为的批评叫做空洞无物呢？这里有什么逻辑呢？难道总罢工期间的背叛行为比

“黑色星期五”时期的背叛行为的危害性要小些吗？

我反对胡姆勃特所提批评个人的方法，如果提出这种方法来作为基本方法的话。我认为我们对反动首领的批评应当从总的领导路线着眼，而不应当从这些首领的个人特点着眼。我不反对把批评个人当做次要的、辅助的手段来运用。但是我主张把原则路线作为我们批评的基础。否则不会有原则性的批评，只会有无谓纠纷和私人争吵，这就不能不降低我们批评的水平而对工作有所损害。

第一次刊印◇182◇

致美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七二〕编辑部

敬爱的编辑同志！请不要拒绝在贵报刊登下面的声明。

八月十四日，纽约冒牌社会主义的周刊“新领袖报”〔七三〕刊登了完全没有指明出处的、捏造的、似乎是我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的演说（也是捏造的）的结论。

我不可能而且不高兴去阅读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报纸对苏联活动家的各种造谣报道，所以对于这一次资本家及其奴仆的报刊的谣言也就不会加以注意。

但是在这个捏造的结论发表了一个月以后，“新领袖报”打了一封电报给我，请我“证实美国报纸报道俄共中央会议的消息中所加在你身上的七月间对季诺维也夫的全部严厉批评”。

这个报社自己欺诈地捏造了我的演说的“结论”，现在竟又胆敢装出无罪的样子来问我这一“结论”是否真实，我认为不能和这个报社通信，所以请求你允许我通过贵报作如下声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新领袖报”所载关于“斯大林的结论”的报道，和我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无◇183◇论在内容上、形式上、语气上都绝对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因此，这个报道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无知的捏造。　　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工人日报”（美国芝加哥）第二二〇号

本文第一次用俄文刊印　◇184◇

给斯列普柯夫的信

今天我在“真理报”（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第二三二号）上读到你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是其中有一个损害文意的不正确的地方。

你写道，只在一年以前，托洛茨基“曾强调说，在我们这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能够用我国内部的力量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的**胜利进攻**，对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不应当有丝毫怀疑”。接着，你把这个论点和斯米尔加“在我们这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对立起来，并下断语说，斯米尔加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

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这里并没有矛盾。

第一、托洛茨基无论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那本小册子里或是在后来写的东西里，都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无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都不否认，并且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们能够在我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要否认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就是白痴行为了。但是他们坚决否认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米尔加等人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的是他们都否认列宁的论点：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七四〕。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他们都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欧◇185◇洲几个主要国家内胜利时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把托洛茨基和斯米尔加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对立起来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二、如果要说得确切，那末应该说，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说过“在我们这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我们能够用我国内部的力量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的**胜利进攻**”。托洛茨基的“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音乐”这句话是避免肯定地解答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一种空洞的，外交式的搪塞之词。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搪塞问题，而你却把这种搪塞之词当做真话。托洛茨基的另外一句话，说“既然讲的是我国经济的内部因素，那就毫无理由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这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怯懦地抹杀问题。托洛茨基可以说，我们**正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而且他既坚持现在的立场也就不会说：我们“**能够**用我国内部的力量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的胜利进攻”，因而，无须社会主义在欧洲几个先进国家的预先胜利，我们也**能够达到**社会主义。然而，托洛茨基却屡次说过和你强加在他身上的相反的话。你只要回想一下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一九二六年）上的演说就行了。托洛茨基在那次全会上否认我国有可能发动为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经济进攻。

由此可见，你无意地粉饰了托洛茨基，也可以说你诽谤了他。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第一次刊印◇186◇

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演说）

如果撇开枝节问题，那就可以直接谈到本题。

现在争论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使反对派遭到失败的这次党内斗争的总结。掀起斗争的不是我们，不是中央，而是反对派。中央曾几次劝告反对派不要进行争论，中央曾在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劝告反对派不要进行全国规模的争论，因为这样的争论会使斗争尖锐化，会造成分裂的危险，会使党和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至少要松懈两个月左右。

一句话，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一下反对派所掀起的斗争并做出适当的结论。

无疑地，反对派是惨败了。同样很明显，在党的队伍里对反对派的愤慨正在增长。现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保留反对派的首领们做中央委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让支持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的人们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是很难使人同意的。让支持各色各样的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我们党的路特·费舍之流和乌尔邦斯之流的人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很难使人同意的。◇187◇

我们是否愿意把反对派的首领们保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呢？我想是愿意的。但是要保留他们，他们就应当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和我们党内外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如果反对派愿意党内和平，它就应当接受这些条件。

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公开声明无条件服从党机关的决议。看来，这一点不会受到反对派的特别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老早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党

内一部分人成为少数，他们就不仅服从多数的决议，不仅实行这些决议，甚至公开做报告来维护党的决议。我们现在并不要求你们这样做，我们不要求你们做报告来支持你们原则上不同意的立场。我们不要求，因为我们愿意减轻你们处境的困难。

第二点是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派别活动是错误的，对党有害的。这难道不对吗？如果派别活动没有害处，那末，为什么反对派分子要放弃派别活动呢？他们提议解散派别组织，放弃派别活动，答应号召自己的同道、自己的拥护者、自己派别组织的成员放下武器。为什么？显然因为他们默认派别活动是错误的，是不可容许的。那末，为什么又不把这一点公开说出来呢？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反对派公开承认他们最近时期的派别活动是不可容许的，是错误的。

第三点是要和奥索夫斯基之流、梅德维捷夫之流等等划清界限。这个要求在我看来是绝对必要的。我个人现在不能想像，中央委员可以和奥索夫斯基（反对派曾投票反对开除他），或梅德维捷夫，或施略普尼柯夫结成联盟。我们要反对派和他们划清界限。这只会促进我们党内的和平。◇188◇

第四点是要和柯尔什、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韦柏等人划清界限。为什么？第一、因为这些人进行流氓式的鼓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联共（布）、反对我们苏维埃国家。第二、因为这个所谓“极左的”而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派别组织的首领们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已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第三、因为他们死抓住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和它勾搭在一起。反对派和这种废料的界限划清得愈快，对反对派或对共产国际就愈好。

最后一点是不要支持共产国际各支部内各种机会主义集团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派别斗争。

联共（布）中央的条件就是这些。

现在看看反对派提出的条件。

反对派要求中央委员会执行四点。

第一点是“宣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其后党的各项决议，应当从正面来进行，不要用孟什维主义等等来责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这一点应当怎样了解呢？如果反对派提议收缩中央反对反对派的宣传，要中央委员会（譬如在即将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放弃阐明自己的反对反对派错误的原则路线，那我们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但是，如果问题在于批评的语气，那末，当然可以使语气多少缓和一些。至于对反对派原则错误的批评本身，那末它在今后绝对还要保持不变，因为反对派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189◇

第二点是关于有权在自己的党支部内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要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党员过去就有而且永远会有这种权利。自己的意见可以而且应当在支部内坚持，但不要坚持到把工作上的批评变成全国性的争论。

第三点是对开除党籍的人重新加以审查。中央并不愿意把人开除出党。开除他们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就拿斯米尔诺夫来说吧，把他开除了，是在警告过他好几次以后才开除的。如果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他表现得忠诚老实，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可以把决议缓和一些的。但是他不仅不忠诚老实，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在自己的声明中诬蔑党。斯米尔诺夫既然有这样的行为，显然，他的问题是不能重新审查的。

一般说来，党对于被开除但又不承认自己错误的那些人所做的决议是不能重新审查的。

第四点是“在代表大会以前反对派应有机会向党陈述自己的见解”。反对派有这种权利是用不着说的。反对派不会不知道，根据党章，中央在代表大会以前应当印发辩论专页。反对派在这方面的要求不能叫做要求，因为中央并不否认在党的代表大会以前有印发辩论专页的必要。

第一次刊印◇190◇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
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七五〕）

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

世界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上包围我国，在政治上孤立我国，暗中封锁我国，并因苏联工人援助西方战斗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而企图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报复，——这造成了外部的困难，我国由恢复时期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工业的时期，以及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因这一过渡而日益复杂化，——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困难。

党看到这些困难，并且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党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已经在克服这些困难，满怀信心地引导着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并非我党所有的队伍都相信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我们党内某些人（固然为数很少）畏惧困难，因而感到疲倦，表现动摇，陷于绝望，滋长消沉的情绪，感染不相信无产阶级创造力的心理，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191◇

在这种意义上说，目前的转变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转变时期。当时，一九一七年十月，复杂的环境和由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困难使党内一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产生了失败情绪和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权并保持政权的心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现在，在目前的转变时期，也和那时一样，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过渡的困难使我们党内某些人发生动摇，产生不相

信我国社会主义成分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心理，不相信苏联能够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心理。

反对派联盟就是我们党内一部分人中间存在这种消沉和失败情绪的表现。

党看到这些困难，并且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但是，要战胜这些困难，首先必须克服党内一部分人中间的消沉情绪和失败主义思想。

反对派联盟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文件中表示放弃派别活动，并和联共（布）党内外那些显明的孟什维主义的派别划清界限，但同时又声明它仍保持自己原来的原则立场，坚持自己的原则错误，并将在党章范围内为这些错误观点辩护。

由此可见，反对派联盟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培植消沉情绪和投降主义思想，它今后还打算在党内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在于揭露反对派联盟的基本观点的毫无原则根据，说明这些观点和列宁主义基础绝不相容，并和反对派联盟的原则错误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以彻底克服这些错误。◇192◇

一　“新反对派”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基本问题上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党的出发点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第一、它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第二、它在苏联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如果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无产阶级就能够顺利地而且一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还需要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才行。

托洛茨基派对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持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尽管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跟着党走的，但是它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实质上**我国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只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如果世界革命延缓到来，西方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最近时期及时发生，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打击下，一定会垮台或蜕化（二者都是一样）。

党在组织十月革命时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193◇产"，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相反地，托洛茨基派在十月革命时期虽和布尔什维克合作，其出发点却是："……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一九一七年八月第一次发表的"和平纲领"）

党的出发点是：在苏联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论合作社"）；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发点却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三页，一九二二年为"和平纲领"所写的"跋"）

党的出发点是："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见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七六〕）；相反地，托洛茨基派的出发点却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

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194◇

代表会议确认：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

代表会议认为：这种观点降低作为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的我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比重，削弱苏联无产阶级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并因此阻碍国际革命力量的发展，从而违反真正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

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以其目前首领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托·鲍威尔硬说：“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不过是号召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火焰”，“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新反对派”的原则观点的代表大会）以后，联共（布）党内关系发展的主要事实是：从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已经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去了，他们放弃了自己以前和党一致的那些观◇195◇点，而完完全全投向托洛茨基主义了，他们现在**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就像他们从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一样热烈。

“新反对派”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是由两种主要情况决定的：

（甲）“新反对派”分子面对目前转变时期的新困难产生了疲倦、动摇以及无产阶级所不应有的消沉情绪和失败心理，并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现在的动摇和失败心理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旧病复发，重复他们九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面对当时转变时期的困难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消沉情绪；

（乙）“新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失败了，因此，它产生了一种意图：无论如何要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起来，以便用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的联合去弥补这两派的软弱和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缺点。而且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和“新反对派”目前的消沉情绪也是完全符合的。

也应该这样来说明下面的事实：反对派联盟已变成了联共（布）党内外的被党和共产国际所斥责的、已经破了产的各式各样派别的集合点，即从联共（布）党内的“民主集中派”〔七七〕和“工人反对派”到德国“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和法国苏瓦林之流取消派〔七八〕的集合点。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两点他们就不能把各种各样反党派别纠合在一起。

因此，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另一方面“新反对派”就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和各种各样反党分子◇196◇在反党斗争中无原则联合的**共同**立场上完全合乎规律地会合起来了，并形成一个类似在新形式下复活的八月联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反对派联盟。

二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就是它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一问题上的基本错误的直接继续。

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最重要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几点：

（甲）**国际运动问题**。党的出发点是：一般说来，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状态；目前时期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它责成各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资本因妄想巩固稳定状态而发动的进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的回击，不能不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资本而团结起来；各国共产党应当参与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把资本的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反攻以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各国共产党应当把至今还靠拢改良主义工会和第二国际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争取过来，因此，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各国共产党所必需的、非执行不可的。

反对派联盟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反对派联盟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并且看到世界革命延缓到来的情况而陷于绝望，于是从对革命中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立场滚到“极左的”自◇197◇欺和“革命的”冒险主义的立场，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状态的存在，因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因此，反对派要求修改统一战线策略并解散英俄委员会，因此，它不了解工会的作用而提出以新的臆造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代替工会的口号。

因此，反对派联盟支持共产国际内的（例如德国党内的）“极左的”空喊家和机会主义者。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在国际方面的政策是不符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利益的。

（乙）**苏联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党的出发点是：“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页）；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成为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者，正像一九一七年十月在政治方面、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当过农民的领导者一样；只有靠着逐渐改善大多数农民（贫农、中农）的物质生活状况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因为农民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市场；因此，应当实行巩固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保持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的经济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等）。

反对派联盟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反对派联盟在农民问题上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不相信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而且把农民主要是看做敌对的一群人，于是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的经济和财政措施。例如：（甲）反对派建议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这种提高势必引起零售价格的提高，贫农和大部◇198◇分中农的贫困化，国内市场容量的缩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切尔文汇率的降低，最后引起实际工资的降低；（乙）反对派建议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这种压榨势必在工农联盟事业中造成裂痕。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对农民的政策是不符合国家工业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的。

（丙）**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党的机关**。党的出发点是：党的机关和党员群众是统一的整体；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区域组织、省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等等）体现着整个党的领导部分；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我们对于这些人的错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刷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

装的危险去诬蔑这些人。

相反地，反对派联盟的出发点却是把党员群众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它竭力降低党机关的领导作用，把党机关的领导作用缩小为登记员和宣传员的职务，唆使党员群众反对党的机关，从而破坏党机关的威信，削弱它在领导国家方面的地位。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的这种政策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只能使党在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争取真正改造国家机关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解除自己的武装。

（丁）**在为党内民主而斗争的幌子下反对党内“制度”**。党的出发点是：“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99◇（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党内民主所以需要，不是为了削弱并破坏党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个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靠着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来增强的坚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相反地，反对派联盟的出发点却是把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对立起来，把派别和集团的自由跟党内民主混为一谈，并竭力利用这种民主来破坏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反对派联盟旨在反对党内“制度”的、实际上是保护党内派别和集团的自由的号召，自然就是被我国反无产阶级分子当做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最后希望而拚命抓住的号召。

代表会议认为：反对派联盟的反对党内“制度”的斗争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它只能破坏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助长国内力图削弱并破坏专政的反无产阶级的势力。

反对派联盟选择了全国性争论的方法作为破坏党的纪律并使党内斗争尖锐化的一种手段，今年十月该联盟曾企图强迫党进行这种争论。代表会议认为在我们党的理论杂志上自由讨论意见分歧的问题是必要

的，并且承认每个党员都有权自由批评我们党的工作缺点，代表会议同时请大家注意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党不是争论的俱乐部，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进行全国性争论的必要：（甲）至少党的若干省级或区域级的地方组织承认有这种必要；（乙）中央内部在党的政策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十分稳定的多数；（丙）虽然中央有站在一定观点上的稳定的多数，但是中央仍然认为必须通过党内争论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而且即使在这一切情况◇200◇下，也只有在中央做了相当的决议之后，全国性的争论才能开始进行。

代表会议确认：在反对派联盟要求展开全国性争论的时候，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具备。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是完全正确的：它承认争论是不适宜的，并且斥责了反对派联盟企图强迫党在党已经解决的问题上进行全国性争论。

代表会议总结了对反对派联盟实践纲领的分析，确定这个纲领表明反对派联盟在国际国内政策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路线。

三　反对派联盟的“革命”言论和机会主义行为

反对派联盟的特点是：它虽然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这因为反对派联盟主要是向共产主义无产者呼吁，而共产主义无产者是全世界无产者中最革命的，他们受过革命传统精神的教育，根本不会倾听明目张胆地从右面来批评党的批评家的话，所以反对派联盟为了推销

自己机会主义的货色，就不得不给这种货色贴上革命的标签，它很清楚，只有用这种诡计才能引起革命无产者对它的注意。

但是，因为反对派联盟毕竟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向导，因为它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所◇201◇以反对派联盟的言论和行为必然是互相抵触的。这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工作中的内部矛盾。这就产生了言论和行为的不一致，革命词句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不一致。反对派“从左面”大叫大喊地批评党和共产国际，同时提议修改统一战线策略，解散英俄委员会，脱离工会并以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工会，以为用这一切办法就可以推进革命，其实这样做就会帮助汤姆斯和乌捷格斯特，使共产党脱离工会，削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阵地，因而就会延缓革命运动。口头上是“革命者”，事实上却是汤姆斯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的帮凶。

反对派“从左面”吵吵嚷嚷地“责骂”党，同时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以为这样就可以加速工业化，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扰乱国内市场，破坏工业跟农业的结合，降低切尔文汇率，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就会破坏任何工业化。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

反对派责备党不愿意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同时建议提高出厂价格，大概以为提高出厂价格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没有关系，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使国家经济机关完全官僚主义化，因为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口头上反对官僚主义，事实上却是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化的保卫者和向导。

反对派大声高喊反对私人资本，同时建议从流通中抽回国家资本而用于工业，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私人资本，其实这样做就会多方加强私人资本，因为把国家资本从私人资本的主要活动场所即流通中抽回，不能不使商业完全受私人资本支配。口头上反对私人资本，事实

上却是帮助私人资本。◇202◇

反对派大叫党的机关蜕化，事实上，当中央提出开除一个真正蜕化了的共产党员奥索夫斯基先生的问题时，反对派却对这位先生表示最大的同情，反对开除他。口头上反对蜕化，事实上却是蜕化的赞助者和保卫者。

反对派大叫党内民主，同时要求全国性的争论，以为这样就是实现党内民主，事实上却是反对派代表党内极少数人强迫党内极大多数人进行争论，极粗暴地破坏了任何民主原则。口头上拥护党内民主，事实上却破坏任何民主的基本原则。

在我们所处的尖锐化的阶级斗争时期，在工人运动中，只能在两种可能的政策中实行一种：或者是孟什维主义政策，或者是列宁主义政策。反对派联盟企图在“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之下，在加强抨击联共（布）的情况下占据两条对立路线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企图一定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反对派联盟滚到列宁主义敌人的阵营即孟什维主义的阵营里去了。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敌人知道反对派联盟这种“革命”词句的价钱。因此，他们不注意这种一文不值的词句，而一致颂扬反对派联盟的非革命行为，并抓住反对派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基本路线的口号当做他们自己的口号。下面这个事实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可以对反对派联盟反对我们党的斗争公开表示同情，他们指望反对派联盟的斗争会造成分裂，而分裂则会助长我国反无产阶级的势力，使革命的敌人拍手称快。◇203◇

代表会议认为党必须特别注意揭穿反对派联盟的“革命的”假面具，揭露它的机会主义本质。

代表会议认为党必须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队伍的统一，认为我们党的统一是防止革命敌人各式各样反革命企图的主要抗毒素。

四　结　　论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在总结过去一个阶段的党内斗争时确认，党在这次斗争中显示了自己在思想上的显著提高，毫不犹豫地摈斥了反对派的原则观点，迅速而彻底地战胜了反对派联盟，迫使它公开放弃派别活动，使它不得不和联共（布）党内外那些显明的机会主义集团划清界限。

代表会议确认：由于反对派联盟企图强迫党进行争论并破坏党的统一，党员群众就更加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从而孤立了反对派，这样也就保证了我们党的队伍的真正统一。

代表会议认为：只有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中央才能获得这样的胜利；党员群众在和反对派联盟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党确实在真正党内民主基础上生存着并发展着的最好证明。

代表会议完完全全同意中央在保障统一的斗争中所执行的政策，并且认为今后党的任务应当是下列各点：◇204◇

（一）务使已经取得的、为党的统一所必需的最低条件真正实现。

（二）对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向群众说明反对派联盟原则观点的错误，揭露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内容，不管这些观点是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的。

（三）力使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

（四）尽力保护党的统一，制止各式各样恢复派别活动并破坏纪律的企图。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四七号◇205◇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七九〕上的报告）

一　反对派联盟发展的几个阶段

同志们！报告中要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反对派联盟的形成、关于它的发展阶段以及关于它已经开始崩溃的问题。为了阐明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这一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先谈谈这个题目是必要的。

早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就发出纠合一切反对派别并把它们结成一个力量的信号。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同志们想必记得季诺维也夫的这一演说。毫无疑问，这样的号召不会不得到托洛茨基派队伍的响应，因为托洛茨基分子一向主张派别应该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并且应该适当地联合起来，以反对早就为托洛茨基所不满的党的基本路线。

这可以说是形成联盟的准备工作。◇206◇

一、第一阶段

在中央四月全会〔八〇〕期间，由于李可夫发表了经济状况的提纲，反对派就采取了组织联盟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那时还没有完全谈妥，但联盟基本上已经准备好，——这一点已经不用怀疑了。凡是看过四月全会速记记录的同志都会明白这是完全确实的。这两个集团基本上已经谈妥，不过还有一些保留意见，由

于这些保留意见，他们对李可夫的提纲只得提出了两系列平行的修正意见，而不是全体反对派共同的修正意见。一系列修正意见是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提出的，另一系列的修正意见是托洛茨基集团提出的。但这两系列的修正意见基本上都是追求一个目的，所以全会当时就说他们是用新形式恢复八月联盟，——这是确凿的事实。

当时这些保留意见是什么呢？

当时托洛茨基说：

“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意见的缺点是把农村的分化看得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和工业化没有关系。其实，农民分化及其速度的意义和社会影响是由工业化的发展和速度对整个农村的发展的影响来决定的。”

这个保留意见是非同小可的。

加米涅夫也回敬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保留意见。◇207◇

他说：“对于他们修正意见中评价党过去的经济政策那一部分（即托洛茨基对李可夫所拟决议草案的修正意见那一部分），我无法同意，我是百分之百地拥护过这个经济政策的。”

“新反对派”不喜欢托洛茨基批评前一个时期加米涅夫所领导的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也不喜欢“新反对派”把农民分化问题和工业化问题分割开来。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中央七月全会〔八一〕。在这次全会上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结成的没有保留意见的联盟。托洛茨基的保留意见抽去了，归档了，正像加米涅夫的保留意见抽去并归档一样。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共同的“宣言”，同志们，你们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一个反党文件。反对派联盟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特点就是如此。

联盟在这个时期拼凑并形成起来，不仅由于彼此放弃保留意见，而且由于彼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个声明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在党的蜕化问题上，即在由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立场产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践立场这个主要问题上，反对派（即反对派一九二三年的基本核心托洛茨基分子）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发表的一个声明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那篇专为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写的“十月革命的教训”，把他们当做现在又在重犯十月错误的党内“右翼”，是一个错误；他说党内开始右倾和蜕化不应归咎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应归咎于，比如◇208◇说，斯大林。

请看季诺维也夫在今年七月是怎样说的：

“我们说，现在已不能有任何怀疑，正如派别组织（即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的领导路线的变化所表明的，反对派一九二三年的基本核心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路线有变动的危险和党机关的势力在惊人增长**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季诺维也夫不久以前的断言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八二〕说托洛茨基在修正列宁主义，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一切都是错误，都是误会，也就是说，危险不在于托洛茨基主义而在于中央。

这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极无原则的“大赦”。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七月间声明：

“的确，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我曾把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变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中央委员会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那时我没有可能观察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判明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

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公开背弃了他的喧嚣一时的“十月革命的教训”，藉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报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他的“大赦”。◇209◇

真是一笔肆无忌惮的毫无原则的交易。

总之，放弃四月的保留意见，牺牲党的原则来彼此“大赦”，——这就是决定这个反党联盟完全形成的因素。

三、第三阶段

联盟发展的第三阶段，——这就是今年九月底和十月初，反对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公开进行反党活动，这就是联盟的首领们到南方去休息并在那里养精蓄锐之后，回到首都对党发动正面进攻的时期。原来他们在反党斗争由秘密形式转为公开形式之前，曾在这里，在政治局里（那时我不在莫斯科）说过：“我们要给你们瞧瞧，我们去参加工人会议，让工人说谁对，我们要给你们瞧瞧！”于是他们开始从一些支部旅行到另一些支部。但是你们都晓得，这一活动的结果对反对派是够悲哀的。你们都知道他们惨败了。从报刊上可以知道，无论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无论在苏联的工业区或非工业区，反对派联盟都遭到党员群众的坚决回击。多少人拥护他们，多少人拥护中央，我不重复了，这从报刊上可以知道。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反对派联盟的期望落空了。从此反对派就开始转而主张党内和平了。可见失败对反对派并不是没有作用的。十月四日，反对派向中央提出关于和平的声明，过去反对派一向进行谩骂和攻击，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说出像党员所应说的话：是停止“党内纠纷”，搞好“共同工作”的时候了。◇210◇

由此可见，反对派是由于遭到失败才不得不谈中央屡次号召他们的事情即党内和平问题的。

自然，忠实执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统一的指示的中央委员会欣然同意了反对派的提议，虽然它也知道反对派的提议不是完全真诚的。

四、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这就是反对派首领们今年十月十六日的人所共知的“声明”拟定的时期。一般都把这个声明评为投降。我不打算给它尖锐的评语，不过这个声明显然不是说明反对派联盟的胜利，而是说明它的失败的。同志们，我不想叙述我们谈判的经过。谈判时有速记记录，你们可以根据速记记录来了解这件事情。我只想谈一个事件。反对派联盟提出要在“声明”的第一段说明他们仍旧保留自己的观点，并且不止是保留，而且是“完全地”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场。我们曾劝反对派联盟不要坚持这一点。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他们既然放弃了派别活动，也就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和奥索夫斯基、“工人反对派”、马斯洛夫—乌尔邦斯集团划清了界限，那末，这就是说，反对派这样做不仅放弃了派别组织的斗争方法，而且放弃了某些政治观点。既然这样，还能说反对派联盟“完全地”保留自己的错误观点，保留自己的思想观点吗？当然不能。

第二、我们对反对派说，他们这些反对派分子再嚷嚷什么保留而且是“完全地”保留原先的立◇211◇场，对他们自己是不利的，因为工人会有充分理由说：“可见反对派分子今后还想打架，可见他们还没有挨够打，可见今后还得揍他们。”（笑声，喊声：“对！”）然而他们还是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只接受删掉“完全地”这几个字的建议，而把他们保留原先的立场这句话保存下来了。现在就让他们自作自受吧。（喊声：“对！”）

五、列宁和党内联盟的问题

季诺维也夫在不久以前说：中央没有理由骂他们的联盟，因为依里奇似乎赞成党内的一般联盟。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和列宁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列宁从来不是对一切党内联盟都赞成的。列宁只赞成过有原则的和革命的反孟什维克、反取消派、反召回派的联盟。列宁始终反对无原则的和反党的党内联盟。谁不知道列宁为反对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即为反对一个反党的和无原则的联盟，曾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依里奇从来不是对一切联盟都赞成的。依里奇只赞成过这样的党内联盟：第一、它是有原则的；第二、它的目的在于巩固党而反对取消派，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动摇分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联盟，就是列宁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分子为反对取消派联盟而结成的联盟（这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因为当时形成了一个反党的八月联盟，坡特列索夫等取消派分子和阿列克辛斯基等召回派分子都加入了这个联盟，联盟的首领就是托洛茨基。当时一个联盟是反党的联盟，无原则的、冒险家的八月联盟；另一个联盟是列宁主义者◇212◇和普列汉诺夫分子即革命的孟什维克（那时普列汉诺夫是革命的孟什维克）结成的联盟。列宁所承认的是这样的联盟，我们大家所承认的也是这样的联盟。

如果党内有一个联盟能提高党的战斗力，引导党前进，那末我们是赞成它，赞成这样的联盟的。可是你们的联盟呢，可敬的反对派分子，难道它，你们这个联盟，能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吗？难道它，你们这个联盟，是有原则的吗？什么原则使你们，比如说，和梅德维捷夫集团联合在一起的呢？什么原则使你们，比如说，和法国的苏瓦林集团或德国的马斯洛夫集团联合在一起的呢？什么原则使你们自己，即不久以前还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的“新反对派”

和那些不久以前还认为“新反对派”的首领们是机会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分子联合在一起的呢？

其次，难道你们的联盟是向着党、有利于党而不是反对党的吗？难道它提高了我们党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战斗力和革命性吗？其实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你们联盟存在的八个月或六个月里，你们拚命拖着党倒退，退到空谈“革命的”词句，退到无原则的地步；你们竭力使党瓦解，使党瘫痪，使党分裂。

不，同志们，反对派联盟与一九一〇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分子为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八月联盟而结成的那个联盟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现在的反对派联盟，无论从它的无原则性或从它的机会主义基础来看，基本上都像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

反对派分子既然组织这样的联盟，也就离开了列宁所努力实行的基本路线。列宁经常告诉我们，◇213◇最正确的政策是有原则的政策。拼凑成一个集团的反对派却与此相反，断言最正确的政策是无原则的政策。

因此，反对派联盟不能长久存在，它必然要瓦解和崩溃。

反对派联盟发展的几个阶段就是如此。

六、反对派联盟的瓦解过程

反对派联盟目前状况的特点是什么呢？可以说，反对派联盟目前状况的特点就是联盟逐渐瓦解，联盟的组成部分逐渐脱离它，联盟正在崩溃。只能这样来说明反对派联盟目前状况的特点。状况也只能是这样的，因为无原则的联盟，机会主义的联盟，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是不能够长久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马斯洛夫和乌尔邦斯集团正在脱离反对派联盟。我们昨天已经听说，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已经表示悔过，并且要退出联盟。大家知道，除此以外，在联盟内部，在

“新”反对派和“旧”反对派之间也有小争执，这种小争执一定会在这次会议上暴露出来。

由此可见，联盟，他们倒是凑成了，而且倒也凑得富丽堂皇，可是结果呢，却和他们对联盟所抱的期望相反。当然，从算术观点来说，他们本来应该得到更大的力量，因为力量相加得出的是更大的力量；但是反对派分子没有想到，在算术之外还有代数，而在代数方面却不是任何力量相加都得出更大的力量，（笑声）因为问题不仅在于力量相加，而且要看被加数前面是什么符号。（鼓掌多时）原来◇214◇他们算术很行，代数却很差；他们把力量加在一起，不仅没有扩大自己的队伍，反而把自己的队伍弄得小到极点，弄到瓦解的地步。

过去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力量何在呢？

在于它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季诺维也夫集团放弃了自己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可以说，它就阉割了自己，他自己失去了力量。

过去托洛茨基集团的力量何在呢？

在于它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错误和现在所重犯的这些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这个集团放弃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倾向的斗争，它就阉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

结果加在一起的是一些被阉割者的力量。（笑声，鼓掌多时。）显然，这样做除了自讨没趣，是什么也不能得到的。显然，从此以后，季诺维也夫集团中最正直的人必然会离开季诺维也夫，正像托洛茨基分子中是优秀的人必然会离开托洛茨基一样。

七、反对派联盟指望什么？

反对派的前途怎样？他们指望什么？我认为他们指望国内和党内

情况恶化。现在他们正在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但是，既然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观点，既然他们决◇215◇心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场，那末，由此可见，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之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对党。这一点丝毫也不用怀疑。

不久以前有一位转到党这方面来的反对派分子——工人安得列也夫讲了一件关于反对派的计划的有趣事情，我认为有必要在代表会议上提一提。关于这件事，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的报告中这样讲给我们听：

“安得列也夫曾在反对派方面做过相当长时期的工作，但他最后深信他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工作了。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从反对派那里听到了两件事：第一件，反对派碰到了工人阶级的‘反动’情绪；第二件，经济状况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坏。”

我认为从前是一个反对派分子而现在是一个党员的安得列也夫说出了反对派不敢公开说出的真心话。大概他们感觉到现在的经济状况比他们所预料的好些，而工人的情绪又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坏。由此就产生了暂时收缩“活动”的政策。显然，如果以后经济状况稍微恶化一些（反对派分子深信会这样），并且工人的情绪也因此恶化起来（他们也深信会这样），那末，他们就会立即大肆“活动”，扩大他们没有放弃的思想阵地，对党进行公开斗争。

同志们，反对派联盟的前途就是如此。这个联盟正在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党如不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它也许还不会很快就完全崩溃。

既然他们准备斗争，等待“良机”，以便重新对党进行公开斗争那末党也不能麻痹大意。因此，◇216◇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然保留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揭露这些思想的机会主义本质（不管它们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着），务使反对派因怕彻底毁

灭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二　反对派联盟的基本错误

同志们，现在我来讲第二个问题，讲反对派联盟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所犯的基本错误的问题。

使党和反对派联盟发生分歧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否可能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如何和前途如何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九二五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即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曾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切实研究一下。并且，因为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曾经责备说，在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中把他们的观点叙述错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自己的报告中列举一些文件和引证来证实在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中所持的基本论点。预先请同志们原谅，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我们面前摆着三个问题：

（一）我国暂时还是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胜利，世◇217◇界革命的速度已经缓慢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否可能。

（二）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那末可以不可以把它称为完全的胜利，最后的胜利。

（三）如果这种胜利不能称为最后的胜利，那末要使这种胜利成为最后的胜利，需要哪些条件。

这就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即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这个总问题中所包括的三个问题。

一、几点预先的说明

从前，比如说，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总之，在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因而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提出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都持着这样的意见：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使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在几个国家内，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文明的国家内同时爆发革命。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为了说明这些观点，我想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初稿中引用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这一段话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这个初稿后来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基础。它写于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这部不过几年以前才发表的初稿中说：

“这种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注）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218◇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了。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大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

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全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全世界的活动场所。”[①]（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见“共产党宣言”国家出版局一九二三年版第三一七页）

这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写的，当时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甚至没有提到俄国，俄国根本不在论述之列。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拥有革命无产阶级的俄国，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俄国。

这里，这段引文里的话，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是正确呢？在恩格斯写这段话的那个时代是不是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219◇

现在，在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条件下，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不，已经不正确了。

在旧的时期，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世界还没有被各个财政集团瓜分完，以暴力重分已经分完的世界还不是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像并且不可能象后来那样突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使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那种程度，——在这个旧时期，恩格斯的公式不容争辩是正确的。在新的时期，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变成了帝国主义发展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战线并使这条战线在个别国家中可能被突破，列宁所发现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变成了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在这些条件下，恩格斯的旧公式就不正确了；在这些条件下，它必然要由另一个说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来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来不是马克思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主义字句的奴隶。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再三说过的指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认识这一点并严格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公开地、诚实地、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必须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新公式的问题，不怕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旧公式、拚命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220◇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如果要求他们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五六十年就准确地预见到在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可能性，那就太荒唐了。

列宁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既从马克思的方法出发，而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指的是类似的另一次，就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那一次。大家知道，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摧毁旧的国家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即新的无产阶级国家，这种无产阶级专政是大陆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马克思并把英国和美国看做例外，因为照他的说法，在这两个国家里，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不大发展，或者说根本不发展，所以这两个国家可能走另外一条道路，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和平的”道路。这在七十年代是完全正确的。（梁赞诺夫说：“就在那时也不正确。”）我认为在七十年代，军国主义在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发展的时候，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读一下列宁同志“论粮食税”那本小册子中的有关一章〔八三〕就会相信这个论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在那一章里，列宁认为七十年代的英国用本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协议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并非不可能，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多数，资产阶级惯于妥协，军国主义不发展，

官僚制度也不发展。但是这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正确的论点，在十九世纪以后，在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变成不正确的了，这时英国的官僚制度已不亚于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而军国主义呢，不仅不亚于也许还甚于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了。因此，列宁同志在他的“国家和◇221◇革命”一书中说，马克思以大陆为限的说法现在已经失效〔八四〕，因为产生了新的条件，不必再把英国当做例外了。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同志们，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情况就是如此。

二、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给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新的、最后的阶段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列宁是第一个人。我指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我指的是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我指的是当列宁初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时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关于欧洲联邦还是世界联邦的口号的论战。

那时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222◇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

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写的。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使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什么呢？

列举论述这个规律时的出发点是：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是在最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领土、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等等疯狂斗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世界已经被瓜分成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是平衡的，不是一个跟在另一个后面或同另一个并行的，而是跃进式的，就是把原先走在前面的一些国家排挤到后面，把一些新兴的国家推到前面；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发展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引起重新瓜分已经分完的世界的冲突和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会削弱帝国主义；因此，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线就容◇223◇易在某些国家内被突破；因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就成为可能的了。

大家知道，不多久以前英国还走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前面，大家也知道，后来德国开始越过英国，并向其他国家，首先是向英国，索取“阳光下的”地盘。大家知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爆发的。现在，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美国已经远远地跑到前面，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强国都落在后面了。几乎无须怀疑，这种情况正孕育着新的巨大的冲突和战争。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线在俄国被突破了，这种情况说

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今条件下，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被突破的地方不一定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而将在这根链条比较薄弱的地方，在无产阶级拥有像农民这样重要同盟军来反对帝国主义政权的国家，正像在俄国的情形一样。

将来帝国主义战线完全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比如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被突破，因为印度的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革命解放运动作为重要的同盟军。

大家知道，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首先就和托洛茨基进行了论战，同样也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论战。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论文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是怎样反应的呢？

请看托洛茨基那时（一九一五年）为答复列宁的论文写了些什么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224◇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

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①（“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我们的言论〔八五〕报”上是这样写的，后来这篇文章在俄国重新发表，收集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初次出版的题为“和平纲领”的托洛茨基文集中。◇225◇

你们可以看出，在所引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两段文字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不但能够保持它，而且能够继续前进，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以积极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革命，在最短期间没有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那末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甚至连政权也不能保持住（更不用说它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托洛茨基说，休想俄罗斯的革命政权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在列宁看来，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力量，它能够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并且能够继续前进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者。相反地，在托洛茨基看来，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会变成半消极的力量，它需要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内的立刻胜利作为立刻的援助，它觉得自己犹如宿营荒野，处在可能立刻丧失政权的恐怖之中。可是，如果其他国家的革命不能立刻胜利，那末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偃旗息鼓了。（有人喊道：“还要溜之大吉。”）对了，还要溜之大吉。说得完全对。（笑声）

有人会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一分歧是过去的事情，以后这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分歧在工作进程中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于完全消失了。不错，是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于消失的。但是，可惜得很，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发生。相反地，直到列宁同志逝世，这种分歧完全依然如故。你们自己可以看到这种分歧现在还继续存在着。相反地，我肯定地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因此而产生的论战一◇226◇直没有间断过，而且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曾一篇接着一篇地出现，隐蔽的论战也继续不停，诚然，他们都没有提名道姓。

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事实。

在一九二一年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已经以更具体的形式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胜利的问题，即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可能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在一九二一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工人反对派”，曾责备过列宁，说他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概是为了回答这种责备，当时列宁曾几次在他的发言和文章中声明说，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离开我们的道路，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走这条道路，以便“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和农民一道”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见列宁“论粮食税”和其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章）。

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发表了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说，在我国，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不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前，我国的生活中就会充满着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冲突。

托洛茨基在这篇“序言”中说：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①]。”◇227◇又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和农民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是可能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农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国内政治生活将充满着工人政权和大多数农民之间的敌对冲突，而这些冲突只有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决。

其次，此后一年，即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的讲话中又一次提起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228◇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托洛茨基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也许是为了解释他在上面引文中所说的话，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写了一篇“跋”。他在“跋”中说：“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三页）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两个相反的论点相互对立着。列宁认为我们已经把社◇229◇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纵然有困难，我们还是完全有可能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相反地，托洛茨基却认为我们不但不能把现在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且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前，我们甚至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

最后，还有列宁同志的文章“论合作社”和“论我国革命”（驳苏汉诺夫）。这是列宁在逝世前写的两篇札记，是他留给我们的政治遗嘱。这两篇札记极有意义的地方是列宁在这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我国胜利的问题，并下了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之处的一些定义。他在“论我国革命”的札记中说：

“……他们（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斯大林注）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230◇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七页至第四三九页）

再看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是怎样说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同上，第四二八页）

这样一来，在关于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关于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同志们，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这个基本问题上就有了两条路线。一条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231◇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第一条路线是我们党的路线，第二条路线却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因此，在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草案中说，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是一种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需的和足够的基础。

可见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能不能说这种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能这样说。我们能够战胜我国资本家，我们有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并把它建设成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有力量保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免于外来的危险，免于外国武装干涉和与此关联的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藉此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化，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仇恨和敌视。如果以为资本主义世界会漠不关心地看着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成就，看着这些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化的成就，——那就是陷于幻想了。所以只要我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至少在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因此，无论在我们的建设中得到怎样的成就，我们都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有免于外来危险的保障。所以要最后地取得胜利，必须努力使现在资本主义◇232◇的包围为社会主义的包围所代替，必须努力使无产阶级至少再在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有那时才能认为我们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把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看做目的本身，看

做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看做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的助力、手段和道路。

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曾这样写过：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所组成的体系里**，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

而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页）

由此可见，武装干涉的危险现在存在着，将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资本家现在能不能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是另一回事。这还是一个问题。这大抵将取决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行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同情，他们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程度。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现在不能用对本国资本家进行革命来支持我国革命，——这暂时还是事实。可是资本家无力发动“自己的”工人来进行反对我们共和国的战争，——这也是事实。而在现今这个时代，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打仗而没有工人参加，是不能不使资本主义遭到致命的危险◇233◇的。无数工人代表团到我国来考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全世界工人阶级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深厚同情也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就建立在这种同情的基础上。没有这种同情，我们现在就会受到许多次新的武装干涉，我们的建设工作就会中断，而“喘息”时期也就不会有了。

但是，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无力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这并不是说它永远无力这样做。无论如何，资本家们绝没有睡大觉，他们正百般设法来削弱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创造武装干涉的前提。因此，无论武装干涉的企图或与此关联的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可能性都不能认

为已经消除了。

所以列宁说得对：

“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立边区的时候，就以为……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些根本的对立性存在，危险也就存在，你也就无法躲避这些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地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那末，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战胜我国经济中的◇234◇资本主义成分。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最后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充分保障。

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一个国家（当然，我们指的是我国）完全可以克服的那些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那末，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间只有依靠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才能克服的那些外部矛盾的可能性。

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是毫无希望的糊涂虫或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如此。

三、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

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国际形势、资本主义稳定和在一个国家

内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著名决议中，第一次正式表述了我们党的这条路线。我认为这项决议是我党历史中最重要的党的文件之一，这不仅因为它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拥护列宁路线的最重大的表示，而且因为它同时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直接谴责。我认为指出这项决议中最重要的几点并不是多余的。说也奇怪，这项决议还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通过的。（全场微动）

请看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这项决议是怎样说的：◇235◇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①。”〔八六〕

关于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问题，决议中说：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八七〕

再看关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决议是怎样说的：

“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这一论断，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236◇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八八〕）

我认为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中这几个要点是无须解释的。不能说得更清楚更明确了。在决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托洛茨基主义和苏汉诺夫主义之间划了等号的地方。苏汉诺夫主义是什么呢？我们从列宁驳斥苏汉诺夫的几篇著名文章中得知，苏汉诺夫主义就是变相的社会民主主义即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以便弄清楚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拥护这个决议的季诺维也夫后来又背离了这个决议而去附和现在同他结成联盟的托洛茨基的观点。

其次，根据国际形势，决议指出了两种脱离党的基本路线的、会给党造成危险的倾向。

关于这些危险，请看决议中是怎样说的：

“鉴于国际舞台上的既定形势，在目前时期能够威胁到我们党的有两种危险：（一）消极倾向（这是由于过分夸大某些地方呈现出的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和国际革命的缓慢速度而产生的），缺乏一种在国际革命的速度缓慢情况下仍要坚决地有步骤地从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充沛的奋发热忱；（二）民族狭隘性的倾向，忘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自觉地忽略苏联的命运和发展着的（虽然是缓慢发展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不懂得不仅国际运动需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稳固和强盛，而且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援助。”（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237◇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说的第一种倾向是指普遍存在于托洛茨基分子中间的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胜利的倾向。它所说的第二种倾向是指国际政策方面某些工作人员中

多少存在的那种忘记我国革命的国际前途的倾向，这些工作人员有时竟站到要在附属国内建立“势力范围”的立场上。

全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痛斥了这两种倾向，并以此向这两种倾向所产生的危险宣战。

事实就是如此。

季诺维也夫既然做了专门报告拥护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怎么又会背离这个决议的路线也就是背离列宁主义的路线呢？他既然背离了列宁主义，怎么又会非常可笑地责备党有民族狭隘性，用这种责备来掩饰自己背离列宁主义的事实呢？同志们，我现在就来尽力把这套把戏讲给你们听吧。

四、“新反对派”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新反对派”现在的首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前夜初次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指的是代表会议前夜中央政治局的某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竭力坚持有关这个问题的特殊观点，这个观点和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而和苏汉诺夫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238◇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即七个月以后，答复前列宁格勒上层分子发表的人所共知的声明时，关于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坚持过一种观点，似乎国际革命不来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因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而不能克服内部困难。而我们和中央多数一样却认为：虽然我国技术落后，但我们能够不管这种落后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并且一定会把它建设成功。我们认为：这样进行建设，当然比在全世界革

命胜利的条件下缓慢得多，然而我们还是在前进，而且要继续前进。我们同样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表现出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以及跟着我国工人阶级走的农民群众的内部力量。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见“复信”）

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初几次会议时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莫斯科委员会的这个声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甚至没有试加反驳，这就是默认了莫斯科委员会提出的责备是与事实相符的。

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形式上承认党在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所以不得不这样做，看来是由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们的同情。不仅如此，我已说过，季诺维也夫甚至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做了专门报告拥护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人所共知的决议，而这个决议，你们已经可以确信无疑，是反映我们党的路线的。但◇239◇是以后的许多事件表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只是形式上、表面上拥护党的路线，实际上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一九二五年九月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的出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事件”，它就是在曾于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拥护党的路线的季诺维也夫和背离了党的路线、背离了列宁主义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的季诺维也夫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请看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书里是怎样写的：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至少应当了解为（一）消灭阶级，因而也就是（二）取消一个阶级的专政，这里指的是取消无产阶级的专政”……季诺维也夫往下又说：“为了更确切地弄清一九二五年我们苏联的问题是怎样的，必须分清两件事情：（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个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二）最后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

度，社会主义社会。”（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二九一页和第二九三页）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把一切都搅混了，都颠倒了。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获得胜利（指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只是说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可能把它建设成功。明知不能建设成功而仍要去进行建设。季诺维也夫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笑声）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最后胜利问题混为一谈，因而也就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整个问题是完全不懂的。明知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而仍要去进行建设，——请看季诺维也夫竟糊涂到什◇240◇么地步了。

不用说，这样的立场和列宁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路线毫无共同之处。不用说，这样的立场根本推翻国际主义的原则，它削弱我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从而阻碍其他国家革命的展开。这种立场是直接靠近和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的。

关于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应该这样说。请听他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批评雅柯夫列夫时说些什么：

“你们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俄共（布）库尔斯克省代表会议上竟胡说八道起来。他问道：‘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四面受着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国家内，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据上述一切，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不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虽然暂时还是单独的，我们虽然暂时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但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库尔斯克真理报”第二七九号）**这难道是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吗？难道这里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吗？**”[①]（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这样说来，基本上拥护党和列宁主义路线的雅柯夫列夫应该受到有民族狭隘性的责备。这样说◇241◇来，拥护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中固定下来的党的路线就是陷入民族狭隘性。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糊涂透顶！其实这就是季诺维也夫所玩弄的全套把戏：非常可笑地责备列宁主义者有民族狭隘性，藉此来竭力掩饰自己的背离列宁主义。

所以，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把千真万确的真相道破了，它断定“新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可能在我国胜利这个基本问题上，或者（其实是一回事）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已经转到托洛茨基主义那方面去了。

应当在这里指出，加米涅夫**形式上**对这个问题采取稍微特殊的态度。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相反，无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都公开声明他拥护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这是事实。然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认真看待加米涅夫的声明，并没有相信他口头上的话，在关于中央总结报告的决议中却把他列入背离列宁主义的那伙人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加米涅夫不愿意也不认为必须用行动来证实他拥护党的路线的声明。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和那些反对党的路线的人决裂。党内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在口头上声明拥护党，同时却和反党分子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友谊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列宁通常总是说，党路线的这种“拥护者”比反对者更坏。例如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屡次声明他拥护并忠于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列宁那时却把他叫做“社会沙文主义的帮凶”。为什么呢？因为托洛茨基既声明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又不愿意跟考茨基和马尔托夫、坡特列索夫和齐赫泽决裂。当◇242◇然列宁是对的。你想让你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声明被认真看待，那你就要用行动来证实你的声明，和那些反对党的路线的人断绝政治上的友谊关系。

因此我认为：既然加米涅夫不愿意用行动来证实他讲的话，既然他继续和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盟，那末，他那篇说他拥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的声明就不能被认真看待了。

五、托洛茨基的支吾搪塞。斯米尔加。拉狄克

有人会说：这一切都很好，都正确。但是，难道就没有什么根据和文件可以证明反对派联盟的首领们并不反对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转到列宁主义方面来吗？拿托洛茨基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为例来说，这本书不就是托洛茨基并不反对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的征象吗？有人甚至认为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确实放弃了或正在努力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我应当忏悔，这一次对于这件事情我犯了一点不相信的毛病，（笑声）并且我应当说，很遗憾，这样的推测完全与事实不符。

请看托洛茨基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最鲜明的一个地方：

“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了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综合统计表。这一切都是很枯燥的，可以说是官样文章。然而，从这些枯燥的一栏一栏的统计数字中，从这些差不多同样枯燥和压缩的统计说明中，可以听到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雄壮的历史音乐。”（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出版社一九二五年版第一页）◇243◇

什么叫做“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雄壮的历史音乐”呢？如果说这个句子里一般地还有什么含义的话，那末，这个“雄壮的”句子的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有没有对社会主义可能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答复，

哪怕是暗示性质的答复呢？一九一七年我们推翻资产阶级，一九二〇年我们把武装干涉者从我国驱逐出去，都可以说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雄壮的历史音乐，因为我们在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又赶跑了武装干涉者，而向全世界显示我国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势这些雄壮的事实，这的确是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的雄壮的历史音乐。可是这对我国可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没有、能不能有什么关系呢？托洛茨基说：我们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走到社会主义。明知走不到社会主义而仍然走下去，——难道这不是愚蠢吗？同志们，不是的，托洛茨基的关于音乐等等的“雄壮的”词句不是对问题的答复，而是律师的遁词，而是对问题的“音乐般的”支吾搪塞。（听众喊道：“对！”）

我认为可以把托洛茨基的这一个雄壮的音乐般的支吾搪塞和托洛茨基过去在他的小册子“新方针”里关于评价列宁主义的问题所做的支吾搪塞看做一路货色。不妨听一听：

“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托洛茨基“新方针”，“红色事物”出版社一九二四年版第四十七页）

把列宁主义看做“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这岂不是又新鲜，又奇特，又深奥。你们懂得一点◇244◇什么了吧？（笑声）这些话都很漂亮，很像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

例如列宁用下面这样辛辣但很确切的话描写托洛茨基，指的正是托洛茨基特别醉心于音乐般的词句一事。列宁说：

“发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很光辉很响亮，可是没有内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〇七页）

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情形就是这样。

至于说到更近的时期，例如一九二六年，那末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署名的一个文件，使人毫不怀疑托洛茨基仍旧保持着他被党驳斥过的观点。我指的是托洛茨基给反对派分子的那封信。

请看这个文件说些什么：

“关于抹杀农村分化，关于富农正在发展，关于富农不仅对经济的自发过程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影响正在增长，关于在布哈林庇护之下在我们自己党内产生了一个明显反映我国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的理论派别，列宁格勒反对派曾及时发出了警报；**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坚决反对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它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①]◇245◇（摘自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内情况问题的速记记录附件）

在托洛茨基署名的这个文件中什么都说到了：既说到“新反对派”的首领们已经背离列宁主义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又说到托洛茨基仍旧完完全全保持着他原先在我们党内采取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

而反对派联盟的其他首领，例如斯米尔加和拉狄克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些人也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斯米尔加和拉狄克，——他们怎么不是首领呢？他们对于党、对于列宁主义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评价的呢？

例如斯米尔加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共产主义科学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断言，他**（布哈林。——斯大林注）完全**当了**恢复思想的俘虏，他**认为我国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不能成为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障碍是已被证实了的事情**……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请问，恢复时期是否提供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根据来审查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一条中心原理——**在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呢？**”（斯米尔加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关于控制数字问题的◇246◇讲话）

你们可以看出，这种“立场”也是和苏汉诺夫先生在我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说斯米尔加的立场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立场（我有理由称这种立场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这难道不对吗？（喊声：“对！”）

可以不可以认为反对派联盟对斯米尔加诸如此类的讲话要负责任呢？可以而且应该。反对派联盟是不是曾经试过和斯米尔加划清界限呢？没有，没有试过。相反地，反对派联盟对斯米尔加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讲话还竭力加以鼓励。

再看看另一位首领拉狄克。他曾和斯米尔加一起在共产主义科学院里讲过话，而且在那儿把我们抨击得“体无完肤”。（笑声）我们有一个文件说明拉狄克讥笑并嘲弄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把这个理论叫做“在一个县里”甚至“在一条街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当场内有些同志提意见说这个理论是“列宁思想”的时候，拉狄克回答道：

“你们没有好好地读过列宁的著作，如果弗拉基米尔·依里奇还在世，他会说这是谢德林思想。在谢德林的‘彭帕杜尔列传’里一位绝无仅有的彭帕杜尔[①]要在一个县里建设自由主义。”（拉狄克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演说）

能说拉狄克对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的卑鄙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嘲笑不是完全和列宁主义决裂吗？反对派联盟对拉狄克的这种卑鄙庸俗的行为要不要负责任呢？毫无疑问是要负◇247◇责

——————————————

① 俄国著名作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在所著“彭帕杜尔列传”一书中以彭帕杜尔为名描绘沙皇时代的官僚典型，后来彭帕杜尔一词在俄文中成为普通名词，意即典型的专横官僚。——译者注

任的。为什么它又不和这种卑鄙庸俗的行为划清界限呢？因为反对派联盟不想放弃它那背离列宁主义的立场。

六、我国建设前途问题的决定意义

有人会问：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这一切争论有什么用处呢？关于将来怎样或将来可能怎样的这种争论有什么用处呢？丢开这一切争论来从事实际工作不是更好吗？

同志们，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根本不对的。

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没有前途，没有既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能把它建设成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建设。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我们不能按伯恩施坦的“变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相反地，我们既然是革命者，我们就必须前进，我们的实际工作就要服从无产阶级建设的基本阶级目标。不这样，我们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其次，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所以，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248◇

再其次，削弱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又是什么呢？工人阶级如果有颓丧和失败情绪就不能不鼓起资本主义成分对旧制度复辟的希望。谁低估了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决定意义，谁就是帮助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谁就是培植投降主义。

最后，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不应该忘记，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注视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成就，期望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期望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无数工人代表团从西方来到我国，仔细观察了我国建设的每一个角落，这说明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斗争就其使世界各国无产者革命化的作用来说是有巨大的国际意义的。谁企图缩小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谁就是企图打消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胜利的希望；而谁打消这些希望，谁就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列宁的这段话是万分正确的。他说：

“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以缓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断的上升和前进去取得胜利。”[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249◇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我国胜利的问题的争论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关于我们工作的前途，关于这一工作的阶级目标，关于这一工作在最近期间的基本方针等问题的解决都是要在这些争论中来锤炼并确定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七、反对派联盟的政治前途

反对派联盟的政治前途是从他们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的基本错误中生长起来的。

由于国际革命的延迟，而反对派对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又没有信心，反对派面前就摆着两个前途：

或者是党和国家机关蜕化，共产主义的“优秀分子”（即反对派）实际脱离政权，并由这些分子组成一个新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对正式的非“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采取反对的立场（奥索夫斯基的前途）；

或者是企图以自己的急躁心情冒充实际情况，否认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超乎常人地”“英勇地”跃进并且侵入对内政策方面（超工业化）和对外政策方面（“极左的”词句和“极左的”手势）。◇250◇

我认为在所有反对派分子中，奥索夫斯基是最勇敢最刚强的。如果反对派联盟有足够的勇气和始终如一的精神，那它就应当走上奥索夫斯基的道路。然而，反对派联盟既缺乏始终如一的精神，又缺乏勇气，所以它就滚到第二个前途的路上，即滚到“超乎常人地”跃进并且“英勇地”侵入事物客观进程的那条路上去了。

由此就否认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提出在西方脱离甚至退出工会的口号，要求拆散英俄委员会，要求几乎只在半年之内就使我国工业化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

因此，反对派联盟的理论（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就具有特别意义了。这种理论认为在我们这里，在我国，在我国工业化事业上，要跳过农民；而在那里，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这次罢工事件上，要跳过工会的反动性。

反对派联盟认为只要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就完全足以使党毫不迟延地立刻成为群众性的党了，就完全足以使党能够毫不迟延地立刻领着群众去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了。反对派联盟不懂得这样对待领导群众的问题是和列宁主义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的。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提出的关于苏维埃革命的“四月提纲”〔八九〕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那末，为什么那时列宁不号召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呢？为什么他反对当时提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口号的我们党内的“极左的”集团呢？因为列宁知道，要完成革命，只有党的正确路线是不够的。因◇251◇为列宁知道，要完成革命，还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使群众即广大的工人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需要党在群众中进行不倦的工作，为使群众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而进行不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列宁在提出他的革命的“四月提纲”的时候，同时提出向群众“耐心”宣传这个提纲的正确性的口号。为了进行这个耐心的工作，当时用了八个月的时间。但这八个月是革命的月份，至少相当于通常“宪政”时期的好几年。我们所以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因为我们能把党的正确路线和群众承认这个路线的正确性区别开来。“超乎常人地”跃进的反对派英雄们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懂得这一点。

英国共产党在英国罢工时期的立场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为什么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够**立刻**领导千百万英国工人群众跟着自己走呢？因为它来不及，并且不可能来得及在短促期间使群众相信它的路线的正确性。因为在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和党领导千百万群众跟着自己走这二者之间，还有一段间隔时期，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党应该进行不倦的工作，使群众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这段间隔时期是不能跳过的。认为这段时期可以跳过是愚蠢的。只有耐心地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度过并消除这段间隔时期。

反对派联盟不懂得列宁式的领导群众的这些起码真理，而它的政治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正应该在这里找寻。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的“超乎常人地”跃进的、拚命故作声势的政策的无数例证之一。◇252◇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尽管只是由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暂时形势）以后，必定遇到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方面有组织的敌对行为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方面有组织的支援决心。只有自身力量可以依靠的俄国工人阶级，一旦农民同它决裂，就必然要被反革命势力击溃。它只有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命运，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它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暂时形势所给予它的那种巨大的国家政治力量抛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天平盘里。**它手握国家政权，后有反革命势力，前有欧洲反动势力，它向全世界的自己的弟兄们高声发出老号召，这一次将是最后进攻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托洛茨基“回顾和展望”第八十页）

请看，原来俄国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可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定要跟农民厮杀起来，而在跟农民厮杀一阵之后，它又定要在“后有反革命势力”，前有“欧洲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挺身去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搏斗。

这里，在托洛茨基的这个“公式”里，有不少“音乐般的”、“超乎常人的”和“雄壮得了不得的”词句，——这一点大概是可以同意的。然而这里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革命气息，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对革命的无谓玩弄和政策上的冒险主义，——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253◇

而且不容置疑，托洛茨基的这个“公式”是反对派联盟现在的政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治前途的直接表现，是托洛茨基的“跳过”尚未完结的运动形式的理论的结果和收获。

三　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它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的直接继续。

我说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指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业化问题，党的机关和党内“制度”问题等等。

党的出发点是：在党的一般政策中，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不能把工业跟农业分割开来，这两个基本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循着使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互相配合互相结合的路线进行。

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即通过**不断改善**劳动群众包括基本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展开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来实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不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劳动阶层的千百万群众**贫穷化**来实现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缺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脱节，使◇254◇国内矛盾尖锐化，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它不是把利润用于改善国内最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而是用于资本输出并扩大国内外资本主义剥削的基地。

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优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在于它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是使国内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克服这些矛盾；在于它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的容量，从而建立展开工业化的牢固的内部基础。

由此就产生了基本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直接关心。由此就产生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具体地在国家的工业化方面，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首先是经过农民的普遍合作化）的思想，工业对农业起领导作用的思想。

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的税收政策，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照顾到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经济合作的利益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利益。

反对派联盟却正相反，它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并走上使工业脱离农业的道路。它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藉以发展的基地。◇252◇

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由此就产生了惧怕丰收的心理（托洛茨基），似乎丰收是会破坏我国经济的一种力量。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的独特政策，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

例如，不妨听听反对派联盟的首领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

“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仰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相反地，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

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仰赖于本国工业和本国农业的剩余生产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一文，载于一九二四年“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第八期）

几乎无须证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走上了使我国工业利益和我国农民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道路，——因而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

我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经济看成“殖民地”，企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造成一种**剥削**◇256◇关系，这样就是破坏，企图破坏（自己没有了解到这点）任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我断言，这种政策跟党把工业化事业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托洛茨基的情形也是这样，或者说几乎是这样。托洛茨基害怕“丰收”，大概他以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丰收是一种危险。例如他在四月全会上曾经说：

“在这样的条件下（托洛茨基说的是现时不按比例的条件。——斯大林注），**丰收**，即农业剩余商品数量的可能增加，**会成为使经济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相反地，会成为破坏经济**，使城乡关系尖锐化的**因素**，而在城市里则成为使消费者和国家的关系尖锐化的**因素**。**从实际上**说，**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会意味着把更大数量的粮食蒸馏为**私酒，延长城市居民购买粮食的行列**。**从政治上**说，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①]（中央四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托洛茨基对李可夫的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第一六四页）

只要把托洛茨基的这个荒谬已极的声明和列宁同志在商品极端缺乏时期说丰收就是“救国”〔九〇〕的声明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的声明的全部错误了。◇257◇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看来托洛茨基不承认我国工业化只有经过逐渐改善农村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才能实现这个原理。

看来托洛茨基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经过某种所谓“歉收”来实现。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关于提高出厂价格、对农民课重税等等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不是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合作得以巩固，而是使这种合作瓦解；不是为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权准备条件，而是使这些条件遭到破坏，不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而是使它们分离。

现在简单谈谈农民分化的问题。大家知道，反对派对于分化的加剧大吵大叫，张皇失措。大家知道，对农村小私人资本的增长，谁也没有像反对派那样张皇失措。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形是这样：

第一、事实表明，农民中的分化在我国是以完全独特的形式进行的，就是说，农民分化不是通过“冲刷”中农，相反地，是通过大大缩小两极来加强中农的，而且像土地国有化、农民的普遍合作化、我们的税收政策等等因素也不能不给分化本身造成一定的范围和限制。

第二（这一点是主要的）、我国工业发展这个决定性的事实正在盖过并超过农村里小私人资本的增长，我国工业正在巩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阵地，它是所有一切形式的私人资本的主要解毒剂。

看来对农村里私人资本仍然大喊大叫和张皇失措的“新反对派”并没有看到这些情况。◇258◇

给反对派提一提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也许不是多余的。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大生产状况的种种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将使无产阶级的地位如此巩固起来，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应该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该怕

的是极严重的饥荒、生活贫困、粮食缺乏的情况继续太久，这种情况已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使无产阶级不能对抗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的自发势力。这是更可怕的。在粮食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危害，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四页）

反对派分子是否什么时候会了解，对农村中的分化和私人资本表现张皇失措，就是不相信我国可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另一面。

现在简单谈谈关于反对派反对党的机关和党内“制度”的斗争。

反对派反对党的机关（我党领导核心）的斗争，实际上是为了什么呢？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解除党的武装，使党无从改善国家机关，无从铲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领导国家机关。

反对派反对党内“制度”的斗争是要造成什么结果呢？是要松弛党的铁的纪律，而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思议，归根到底是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259◇

所以，党断定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非无产阶级分子向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反映，这是正确的。

同志们，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就是如此。

四　几个结论

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九一〕上说，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必然会使反对派的首领被开除出党。同志们，我必须声明，托洛茨基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是带欺诈性的。我必须声明，通过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反对派的原则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以便完全纠正这些错误。

大家知道，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决议〔九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是什么呢？不能说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要比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好些”。然而至今还没有人从通过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说：一定要把“工人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宣布托洛茨基主义是“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然而至今还没有人认为这项决议的通过必使托洛茨基反对派首领一定被开除出党。◇260◇

请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有关的一段话：

“在我们面前的现在这个‘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①。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摘自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让托洛茨基来给我们解释，小资产阶级倾向哪一点比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好些。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就是变相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难道这很难理解吗？我们说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只是把我们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所说的话说得更确切一些，难道这很难理解吗？我们根本没有宣布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只是说反对派联盟显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因此警告说，现在脱离这种倾向还不算晚，并且我们号召反对派联盟这样做。

请看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著名决议〔九三〕里关于托洛茨基主义是怎样说的：

“实质上，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按照近似‘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摘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261◇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应该说明，这两个决议基本上都是出自季诺维也夫的手笔。但是，不仅整个党没有，就连季诺维也夫个人也没有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应该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首领们开除出党。

指出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论也许不是多余的吧？加米涅夫把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请听：

“托洛茨基主义总是**孟什维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总是外表上最善良，掩饰得最严密，并且最适于欺骗恰恰具有革命情绪的那一部分工人。”（加米涅夫“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五十一页）

所有这些事实，托洛茨基并不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知道得少些。然而还没有人根据这些决议，比如说，根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开除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那样说是不老实的，是带欺诈性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基本上同意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其用意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必须和反对派的原则错误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派还没有放弃这些原则错误，而且在它的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表示，今后还打算在党章范围内为这些错误进行斗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和反对派的原则错误进行斗争是纠正这些错误的唯一手段，而纠正这些错误又是达到我们党内真正统一的唯一道路。党打垮反对派联盟，强迫它放弃派别活动，这样◇262◇就取得了为实现党内统一非有不可的起码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一收获不算小。但是这还不够。要达到完全统一，必须再前进一步，使反对派联盟放弃它的原则错误，这样来捍卫党和列宁主义不受攻击，不被修正。

这是第一个结论。

党员群众否决了反对派联盟的原则立场，斥责了反对派挑起新争

论的企图，他们说：现在不是空谈的时候，而是应该切实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少空谈，多做创造性的积极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前进！

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是：在党内斗争的过程中，在对反对派的进攻进行反击的过程中，党已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一致了。

这是第三个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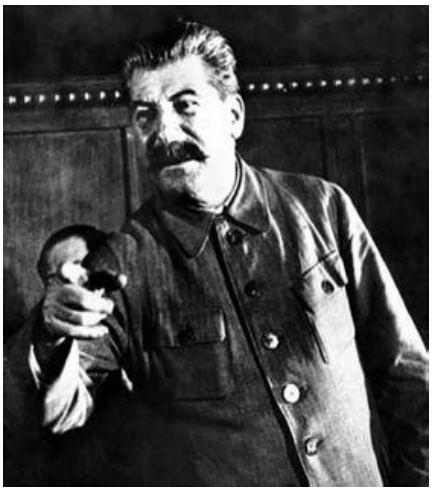
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党，就是现在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非常需要的杠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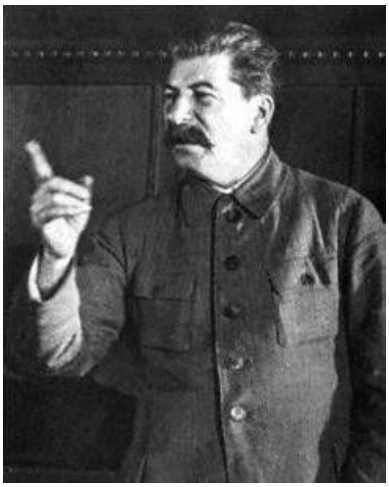
这根杠杆是我们在和反对派联盟的斗争中锻炼成的。

斗争使我们党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我希望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提纲从而使这种团结巩固下来。◇263◇

我相信代表会议一定会光荣地完成它的这个工作。（热烈鼓掌多时，全体代表起立，欢呼。）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
“真理报”第二五六号和第二五七号◇264◇





口诛笔伐新老反对派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同志们！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公式，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却有缺点了。我说因此应该用列宁的公式来代替它。列宁的公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在讨论的时候，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是季诺维也夫。因此，我不能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作较详细的说明。◇265◇

我认为季诺维也夫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即使读过，也没有读懂，否则，他就不会反对我，否则，他就会考虑到社会民主党现在正拚命抓住恩格斯的旧公式来反对列宁主义这个事实，否则，季诺维也夫就会懂得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足迹是会遭到一些“蜕化”的危险的。

请看看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九四〕中讲了些什么。他是用问答的方式来阐述个别原理的。

“问：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资料增加到为建

立社会生产所必需的数量一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①]，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为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已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问：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显然，这里讲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一条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并且充分而有余地实现了。（喊声：“不错！”“对！”）

往下看：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266◇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一）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遗产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在我们这里已经实行，并且正在充分而有余地实行。

再往下看：

“（二）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收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工厂主和铁路及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你们知道，这些措施还在我国革命的最初几年也在我们这里实行了。

再往下看：　“（三）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没收了，并且没收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笑声）

再往下看：

“（四）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园、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工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大家知道，我们走的正是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正获得许多胜利，基本上这一条已在顺利◇267◇地实现着。

再往下看：

“（五）在私有制完全废除以前，对社会的一切成员一律实行强制劳动。特别是为农业组织工业大军。”

你们知道，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用组织劳动大军的形式试走过这条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得到重大的成就。后来我们采取迂回的道路走向这个目的，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往下看：

“（六）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同志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也已经实现了。

往下看：

“（七）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进已垦土地的耕作。”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也正在实行，并且日有进展；土地的国有化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对这一点有极大的帮助。◇268◇

再往下看：

“（八）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

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正在实行，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战争和武装干涉使我们遭到破坏，我们还不能对全国的儿童都实行国家公费教育。

再往下看：

“（九）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显然，这里讲的是大规模建筑住宅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正在推进，可是基本上还没有实现，恐怕也不会很快实现，因为我们承受的遗产是破产了的工业，我们还来不及并且也不可能来得及积累充足的资金来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筑。

再往下看：

“（十）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这一条是前一条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前一条所讲的也应当适用于这一条。

再往下看：

“（十一）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进行得令人满意的。◇269◇

还有最后一条：

“（十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已经完全实现了。

同志们，这就是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国革命**已经**实现了这个纲领的十分之九。

再往下看：

“问：这种革命（即上面所说的革命。——斯大林注）**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了。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270◇

恩格斯说：具有上述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发生的。而事实说明，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即在我们的国家内，基本上**进行了**这样的革命，实现了这个革命的纲领的十分之九。

季诺维也夫可能说，我们实现了这个纲领，实现了这些条文，是犯了错误。（笑声）很可能，我们实现这些条文是犯了一点“民族狭隘性”的错误。（笑声）这是很可能的。但有一点终究是很明显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恩格斯认为在一个国家内无法实现的和不可能的事情，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在我国已经变成能够实现的和可能的事情了。

假如恩格斯还活着的话，当然，他决不会墨守旧公式，相反地，他会尽情地祝贺我们的革命说：“让一切旧公式见鬼去吧，苏联胜利的革命万岁！”（鼓掌）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阵营里的先生们却不这样想。他们死抓住恩格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斯的旧公式做掩护，以便于他们进行反对我国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当然，这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季诺维也夫竭力模仿这些先生，在这一问题上走上社会民主党人的道路，那就不好了。

我所以引用恩格斯的公式并加以详细阐述，有三点理由：

第一、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和恩格斯的极完备地极明确地代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公式对照一下，使问题极端地明确起来；

第二、揭露那些竭力引用恩格斯的旧公式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271◇反革命本质；

第三、指明列宁是解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第一个人**。

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不能够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恩格斯或马克思高出一筹。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272◇句

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这样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像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天字第一号’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最大罪过，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头应用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二页）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道路，也是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成为彻底的革命者，今后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列宁主义所以能够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屹然不动，因为它过去走的和现在还继续走的正是这条道路。离开这条道路就等于跌进机会主义的泥潭。滑出这条道路就等于做社会民主党的尾巴，季诺维也夫目前的情形正是这样。

季诺维也夫在这里说，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恩格斯旧公式的口气改得缓和些，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开始**。他援引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九五〕这都是对的。这是现在每一个苏联党校的学生都知道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件事情。说你开始革命吧，其他国家胜利的革命在最近期间就会来支持你的，而且在其他国家取得这种胜利的时候，你是可以指望胜利的，——这是一回事情。说你开始革命并推进革命吧，要知道，即使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在最近期间不能及时到来，在现在，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斗争的条件使你仍然◇273◇能够取得胜利，然后燃起其他国家的革命，——这又是一回事情。

我引用恩格斯的旧公式，并不是为了避开后来恩格斯和马克思曾经把这个极明确的极完备的公式的口气改得缓和些的事实，而是为了：

（甲）把两个相反的公式加以对比，使问题明确起来；

（乙）揭露那些竭力用恩格斯的旧公式做掩护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

（丙）指明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出，我下面的话是对的：季诺维也夫没有读过“共产主义原理”，即使读过也没有读懂，他以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恩格斯的旧公式，因而滚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几点意见

其次，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也多少有些相似的情形。我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的专政）的问题上，马克思那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把英国，大概也把美国，看做例外，因为当时英美两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当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许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即“和平的”方法获得政治统治。我说过，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的英美例外的说法或有限制的说法在当时◇274◇是正确的，在现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盛行的时候，已是不正确的和多余的了。

同志们，让我来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吧。一八七一年四月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①]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引自列宁“国家和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六页至第三八七页）

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是这样写的。

大家知道，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考茨基，都死抓住这段话，并且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定不移的方法，也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无产阶级所应该争取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怎样反应呢？他在他的“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275◇

“在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议论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来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一八七一年是很明白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但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没有**一个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先决条件，革命，甚至于人民革命，人们也认为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①]，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②]。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和我关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胜利旧公式所谈的是多少有点相似的。

当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发展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时候，马克思的有限制的说法或英美例外的◇276◇说法是有其根据的。照列宁的看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已经发展到即使不甚于也决不亚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时候，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就失去时效了。

因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绝无例外）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

因此，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马克思在一定条件下所假定的有限制的说法，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维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勾当。

列宁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教条而是看做行动的指南。

如果要求马克思预见到几十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那就荒唐了。如果对列宁在这些可能性已经出现并且极为充分地展开的时候发现了并概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这些可能性觉得诧异，那就更荒唐了。

曾经有人，大概是梁赞诺夫吧，从座中提出意见，他说马克思把英国和美国看做例外，不仅在现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就是在马克思假定这个例外时的条件下也是不正确的。我不同意梁赞诺夫的意见。我认为梁赞诺夫错了。无论如何，列宁的看法不是这样，列宁完全肯定地说，马克思给七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所作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

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关于这个问题写道：◇277◇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争论时，他曾顺便提出一个

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从这个匪帮手里赎买过来’（即从资本家匪帮，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请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意思。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就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而言，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对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但在苏维埃俄国，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自从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某些**条件已经按照半世纪前本可在英国（假如英国当时已开始和平地转到社会主义）形成的那些条件的样式而形成了，这难道不明显吗？那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一）由于农民很少（在七十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无产者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二）无产阶级在工会里具有高度组织性（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三）在政治自由长期发展中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278◇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四）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第一位已经转给德国了）——长期间惯于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英国资本家**可能和平地屈服于**[①]英国工人的思想……　马克思的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曾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

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例外）环境会**迫使**②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五页至第三一七页）

很明显，这里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梁赞诺夫。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

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列宁发现了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根据这个规律，根据不平衡的发展和尖锐化这一事实，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这个原理。托洛茨基说，列宁的这个原理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季诺维也夫也和托洛茨基一同说，从前，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比现在、比垄断资本主义◇279◇时期还要厉害，把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联系起来是不可以的。

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关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著名原理，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规律推翻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此外，托洛茨基在这里显然转到庸俗的观点上去了。他在这里把各别国家从前在**经济上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并不总是引起也不总是能够引起这些国家跃进式的发展）**跟**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混淆起来了。在帝国主义时期，各国间经济上的不均等比从前小，但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却比从前厉害得不可比拟，比从前尖锐，而且这种不平衡一定和必不可免地引起跃进式的发展，使原来工业落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后的国家在相当短促的时间内赶过先进的国家，这就不能不造成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前提。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样把两个绝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不说明也不能说明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很高。

但是我不能了解季诺维也夫，他本来是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受过一点布尔什维主义的薰陶，怎能不怕跌入超帝国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泥潭，竟断言发展的不平衡从前比现在、比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还要厉害呢？怎能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没有关系呢？难道不知道列宁正是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这个思想吗？例如下面所引的列宁的话就是讲的这个◇280◇问题：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

（一）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化并发展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了；

（二）世界已经被瓜分成各帝国主义集团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三）世界经济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市场、争夺原料、扩大原来的势力范围而进行剧烈的决死斗争的情况下发展的；

（四）这种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跃进的，它的方式是把原来跑在前面的国家挤出市场而把新兴的国家推到前面；

（五）这种发展方式所以产生，是由于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最迅速地发展技术、减低商品价格并从另一些帝国主义集团手里夺取市场；◇281◇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六）这样，周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就成为绝对必要了；

（七）这样，这种重新瓜分就只能用暴力的方法即用武力检查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实力的方式来进行了；

（八）这种情形就不能不引起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激烈的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

（九）这种情形必然使帝国主义者相互削弱而造成在个别国家内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性；

（十）在个别国家内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性，不能不给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有利的条件。

是什么情况使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尖锐化、不平衡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呢？

是两种主要的情况：

第一、帝国主义集团已把世界瓜分完毕，地球上再没有“自由的”土地了，因而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以求得经济“均势”就成为绝对必要了；

第二、技术（就广义而言）的空前巨大的发展，使一些帝国主义集团在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等斗争中易于越过和超过另一些帝国主义集团。

但是，这两种情况仅仅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才有了发展并达到了顶点。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能把世界瓜分完毕，而巨大的技术上的可能性也只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才出现。◇282◇

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解释下面的事实：从前英国在工业方面能够走在各国前面，一百多年来把各国丢在后面，可是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德国只须二十年就开始超过英国，而美国用更短的时间就越过了欧洲各国。

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武断说发展的不平衡从前比现在更厉害，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没有关系呢？

只有理论上的庸人才会把过去各工业国经济上的不均等和只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特别强烈、特别尖锐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混淆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

只有对列宁主义的完全无知才会使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极其荒谬地反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著名原理，这难道不明显吗？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加米涅夫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用意在哪里呢？如果撇开加米涅夫所讲的一些琐碎问题和他惯用的外交辞令，那末他的发言的用意在于使托洛茨基便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使托洛茨基在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一基本问题上便于反对列宁主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加米涅夫担当一种“工作”，就是要证明列宁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283◇个国家内胜利的重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似乎与俄国无关，证明列宁在讲到这种可能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俄国而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加米涅夫担当起这种可疑的“工作”就是为了给托洛茨基打扫道路，因为托洛茨基的“公式”已经被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论文驳倒，而且不会不被驳倒。

说得粗一点，加米涅夫是给托洛茨基当打扫道路的清道夫的角色（笑声）当然，看到列宁研究院院长给托洛茨基当清道夫角色是可悲的，这倒不是因为清道夫的工作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加米涅夫无疑是一个高明的人，我以为他可以从事其他更高明一点的工作。（笑声）但是，他甘愿担任这个角色，当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这是没

有办法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加米涅夫当好了这个非常奇怪的角色没有。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说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即规定我国革命和我国建设的整个路线的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原理，和俄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关系，说列宁讲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所指的不是俄国而只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真是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这简直像是对列宁同志的公开诽谤，但加米涅夫大概顾不到党对他伪造列宁学说会有怎样的看法。他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情：不惜任何代价去给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他企图怎样论证这种奇怪的武断呢？

他说，列宁同志在写了上述那篇文章以后两个星期，又发表了一篇论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的著名提纲〔九六〕，列宁在提纲中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仅限于取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284◇利，列宁说这些话的出发点，似乎是俄国革命应该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而不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所论述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很明显，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指的也就不会是俄国了。

这样，在加米涅夫看来，列宁对俄国革命规模的了解竟和左派资产阶级革命者或社会民主党人一类的改良主义者一样了。照这些人的看法，资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照这些人的看法，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停顿时期，很长的中断时期，至少是几十年的间歇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资本主义将繁荣发展，而无产阶级则苟且偷安。

这样说来，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这篇文章时，没有想，没有要，也没有力求由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立刻**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了。

你们会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是的，加米涅夫这个

论断确实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但这是不会使加米涅夫难为情的。

让我引证几个文件来说明加米涅夫在这个问题上是粗暴地伪造列宁同志的意见。

请看，早在一九〇五年，当俄国革命的规模还没有像而且不可能像后来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才形成的那样巨大的时候，列宁同志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怎样写的：

“我们将**立刻**[①]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285◇一三页）

这段话引自列宁一九〇五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

加米涅夫知道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呢？我想，列宁研究院院长是应该知道有这篇文章的。

可见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是看做无产阶级斗争和整个革命的终结，而是看做第一阶段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

但是，也许列宁后来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规模的看法吧？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文件。我指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即列宁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那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三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请看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是怎样说的：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也就是说**，为吸引农民，为**尽量吸取**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引‘**非**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奋斗，将来也要不屈不挠地为此目的而奋斗。无产阶级将**立刻**[②]利用资产阶级俄国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之下所获得的这种解放，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③]，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不是帮助富裕农民来反对农业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286◇

你们可以看出，无论在这一段或上一段引文里，无论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五年，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是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为了**立刻**转入它的第二阶段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第一阶段。

那末，应该怎样理解加米涅夫在其演说中所引的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讲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提纲呢？这个提纲是不是和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矛盾呢？当然不矛盾。相反地，这个提纲的基础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俄国革命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思想。第一、列宁在这个提纲中根本没有说过俄国革命的规模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仅限于**推翻沙皇和地主，**仅限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列宁所以在这个提纲中仅仅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他认为这个革命是**第一**阶段，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任务。第三、列宁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执行自己的任务不应从第二阶段（像托洛茨基通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公式所提的那样）而应从第一阶段**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开始**。

这和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有没有一点矛盾，哪怕是矛盾的影子呢？显然没有。

可见加米涅夫公然伪造了列宁的观点。

但是，我们用来反驳加米涅夫的证据不仅有出自列宁手笔的文件，而且有活的人，例如像托洛茨基，像我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是，甚至说来真奇怪，连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本人也都是。◇287◇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是在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大家知道，当时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

问题上曾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托洛茨基就在一九一五年那年也专门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来回答列宁的这篇文章。当时，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呢？他对列宁同志的文章怎样评价呢？他对这篇文章是怎样理解呢？是理解为列宁讲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指的不是俄国，还是另一种理解，例如，像现在我们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呢？请看托洛茨基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①]，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288◇十页）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当时对列宁的文章的理解并不像加米涅夫现在竭力要“理解”的那样，而是和列宁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党对它的理解，和我们大家对它的理解是一样的，否则，托洛茨基在和列宁的争论中就不会**拿俄国**做论据来支持自己了。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在这段引文中是反对他现在的盟友即反对加米涅夫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不起来反对加米涅夫呢？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在这里开诚布公地声明加米涅夫公然歪曲列宁呢？托洛茨基是不是以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默不作声就可以被认为是诚实的论战的榜样呢？托洛茨基不在这里起来反对加米涅夫，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牵连到这个公然诬蔑列宁的可疑的“事件”里去，——他把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让给加米涅夫去干了。

可是党，例如代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决议中这样说：

“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中，列宁同志正确地总结出了两点：（甲）可能‘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乙）可能这少数或者甚至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参看评苏汉诺夫的札◇289◇记）。**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①]，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若干有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第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无产阶级一定的支持下长期坚持下去，巩固起来，甚至在这种支持不是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式出现时也能如此。”（摘自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九七〕）

由此可见，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为代表的整个党是反对加米涅夫的，是反对他硬说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中似乎指的不是俄国的，否则代表会议就不会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著名文章是正确的了。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此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对列宁同志的文章的理解和列宁对它的理解、和托洛茨基对它的理解、和我们大家对它的理解是一样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决议草案是由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的委员会起草并**一致**通过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加米涅夫曾是**一致**通过上述决议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主席，而季诺维也夫则是这个决议的报告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赞成这个决议的各项条文呢？加米涅夫当时对列宁◇290◇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直接被引用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里）的理解和他现在竭力要“理解”的不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应该相信哪一个加米涅夫呢：相信那个担任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主席的、投票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加米涅夫呢，还是相信那个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充当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的加米涅夫？

由此可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时期的加米涅夫是反对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时期的加米涅夫的。

为什么季诺维也夫一声不响，也不打算纠正公然伪造一九一五年列宁的文章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加米涅夫呢？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维护过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决议的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什么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并不完全干净。（喊声：“不干净透啦！”）这算什么诚实的论战呢？

由此可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现在顾不到诚实的论战了。

那末，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加米涅夫没有当好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他辜负了托洛茨基的厚望。

三　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或
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现在我来谈谈季诺维也夫。如果说加米涅夫的整个发言是竭力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那末，季诺◇291◇维也夫承担的任务就是说明反对派的首领们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革命家和绝无仅有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理由”。

他引用了布哈林的一段话：在观察国内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照方法论应该撇开国外问题，接着他就把布哈林的这个论点和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里面谈到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对照了一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布哈林和基本上批准了这个提纲的中央委员会似乎都因此而忘记了我国革命的国际任务，忘记了国际革命的利益。

这些话对不对呢？同志们，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其中秘密在于季诺维也夫在方法论问题上很差，碰到三棵松树就糊涂得迷了路，并把自己的糊涂想法当做实际情况了。布哈林是说，不可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建立使我国不受武装干涉的保障的问题即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混为一谈。布哈林绝不是说，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即国际问题没有联系。他只是说，不能把第一类问题和第二类问题混淆起来。这是方法论的基本的和起码的要求。如果季诺维也夫连方法论中起码的问题都不懂，那又能怨谁呢？

我们认为我国有两种矛盾：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国内矛盾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我们说，这种矛盾我们是能够靠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我们能够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国外矛盾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斗争。我们说，这

种矛盾我们只靠本身的力量是◇292◇不能解决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必须社会主义至少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助力、手段和工具。

这些话对不对呢？让季诺维也夫去证明这是不对的吧。

季诺维也夫糟糕的是他看不出这两种矛盾的区别，荒谬绝伦地混淆这两种矛盾，把自己的糊涂想法当做“真正的”国际主义，而认为谁在观察国内问题时照方法论撇开国外问题，谁就是忘记了国际革命的利益。

这话很可笑，但是要知道，它没有说服力。

至于所谓提纲中忽略了我国革命的国际因素，那只要读一读这个提纲，就会知道季诺维也夫又弄糊涂了。请看提纲中是怎样讲的吧：

“党的出发点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第一、它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第二、它在苏联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如果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无产阶级就能够顺利地而且一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还需要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才行**。”[①]◇293◇

你们可以看出在提纲中国际因素是完全而充分地被考虑到的。

其次，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从列宁的著作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于是就荒唐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胜任的事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情。可是，同志们，这是糊涂想法！难道党什么时候说过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是可能的，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胜任的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请给我们指出来。难道党现在没有说，过去也一向没有和列宁一起说过，只有当社会主义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时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吗？难道党没有解释过几十次几百次，不可以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混淆起来吗？

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则是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保障，并且这个任务只有在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解决。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荒谬绝伦地把一个任务和另一个任务混淆起来呢？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荒谬绝伦地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混淆起来，这又能怨谁◇294◇呢？他们只要看看众所周知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就会明白，决议对这个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明白，甚至连苏联党校的学生也会感到满意。

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好几段话，其中说到外来的敌人可能摧毁我国的革命。但是，这些话和我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无关，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列宁同志说，我们还没有免除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保障，而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难道党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只凭本身的力量就能够保障我国免于武装干涉的危险吗？难道党过去和现在不是一直肯定地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才能保障我们免于武装干涉吗？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就武断说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胜任的呢？现在应该停止这种对国外问题即同世界资产阶级直接斗争问题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即战胜我国内部资本主

义成分问题有意的混淆了。

其次，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党宣言”中引出一句话：“共同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首要条件”，他把这句话和列宁同志一篇手稿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那句话对照了一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党似乎违背了这些公认的、绝对的原理，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国际条件。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党曾经低估过国际工人阶级的努力和我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国际条件的决定意义呢？共产国际如果不是这种把无产者（不仅是各先进国家的，而且是世界各国的无产者）◇295◇的努力联合起来以促进世界革命并发展我国革命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发起组织共产国际并成为共产国际的先进部队的，不是我们党又是谁呢？工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既联合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努力：又联合所有一切国家的工人的努力又是什么呢？谁能否认我们党在执行全世界工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所起的头等重要的作用呢？我国革命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支持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世界各国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以他们对我国革命的同情和反对武装干涉企图的斗争来支持我国革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不是把世界各国工人的努力联合起来使我国革命获得胜利又是什么呢？英国工人反对克逊臭名远扬的照会〔九八〕的斗争又是什么呢？苏联工人对英国煤矿工人的支持又是什么呢？同志们，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引证许多这一类尽人皆知的事实。

这哪里是忘记了我们革命的国际任务呢？

秘密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秘密在于：季诺维也夫企图用世界各国无产者共同努力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来代替我国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代替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

脚这个根本问题。

季诺维也夫现在的老师托洛茨基说：

“……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季诺维也夫现在的老师托洛茨基说：◇296◇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可见季诺维也夫是用欧洲和俄国的工人共同努力的问题来代替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的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也就是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党宣言”，企图用一个问题来代替另一个问题。

季诺维也夫所耍的关于我们党“忘记了”我国革命的国际任务的把戏，其秘密就在这里。

季诺维也夫的戏法、糊涂想法和思想混乱的秘密就在这里。

季诺维也夫居然“谦逊地”把自己头脑中这种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这种一团糟和思想混乱拿出来当做反对派联盟的“真正的”革命性和“真正的”国际主义。

同志们，这一切不是很可笑的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真想做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者，就要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竭尽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个同时是共产国际先进部队的党。可是反对派分子在破坏并诽谤我们的党。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就要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竭尽全力来支持共产国际。可是反对派分子在瓦解并破坏共产国际，在支持并指导各种各样的马斯洛夫分子和苏瓦林分子。

现在总该懂得了，同我们党，同这个共产国际的先进部队处于战争状态，是不能成为革命者和国◇297◇际主义者的。（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既对共产国际开战，也就不再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了。（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反对派分子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空谈革命、空谈国际主义的家伙。（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不是实际的革命者，而是空叫空喊的革命者，影片上的革命者。（笑声，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不是实际的革命者，而是银幕上的革命者。（笑声，鼓掌。）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一、托洛茨基的戏法或“不断革命”的问题

我现在来谈谈托洛茨基的发言。

托洛茨基声明：不断革命论跟我们所讨论的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毫无关系。

这是很奇怪的，如果不讲得更重些。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断革命论不是关于革命动力的理论吗？不断革命论首先论述我国革命的动力，这难道不对吗？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如果不是我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又是什么呢？怎么可以说不断革命论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呢？同志们，◇298◇这是不对的。这是耍花招，变戏法。这是企图藏起狐狸尾巴。这是企图隐藏自己的原形。白费气力！别想隐藏吧，反正是隐藏不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的另一个地方竭力“暗示说”，他早就不再认为不断革命论有重大意义了。而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则“示意

说”，托洛茨基现在恐怕不反对抛弃不断革命论了，也许他已经把它抛弃了。

怪事，真是怪事！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说不断革命论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这话对不对呢？如果不对，那末，加米涅夫说托洛茨基现在已不再重视不断革命论并且差不多已把它抛弃了，这话能不能相信呢？

我们来看看文件吧。我所指的首先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给奥里明斯基同志的信。这封信曾于一九二五年在报上发表过。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打算抛弃这封信上的观点，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抛弃它，因此，这封信现在还是完全有效的。这封信关于不断革命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请听吧：

“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299◇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曾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且这在一九〇五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

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文章，另一面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来，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列宁论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版，附有奥里明斯基同志的序言）◇300◇

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错了，而在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上，在不断革命问题上，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的。

固然，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

其次，这就是说，这两派，无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都应该接受不断革命论，但是事实上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有工人和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而且他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接受，而是“从一九一七年起”才开始接受的。

最后，这就是说，不断革命论“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吧，这像不像托洛茨基已经不很重视不断革命论了呢？不，不像。相反地，假如不断革命论“从一九一七年起”真的符合党的立场，那末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托洛茨基过去认为、现在还继续认为这个理论对我们全党具有决定的意义。

但是，“符合”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证明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我们

党一直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那末，这个理论怎么能够符合我们党的立场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党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后来为事势的发展所迫，不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或者是我们党本来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从一九一七年起”就不知不觉地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排挤掉了。◇301◇

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后来在他一九二二年给“一九〇五年”一书写的“序言”里给我们做了解释。托洛茨基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并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来分析对我国革命的估计，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虽然事隔十二年，但这个估计还是全部证实了。”（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

换句话说，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构成的”不断革命论，经过了十二年，在一九一七年就“全部证实了”。

但是，这个理论怎么能证实了呢？而布尔什维克呢，他们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就干起革命来了吗？难道他们的本领就只是会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工人吗？还有：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什么原则来团结工人的呢？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过理论，有过对革命的估计、对革命动力的估计吗？难道除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党就不曾有过任何别的理论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在没有前途、没有革命理论的情况下生存并发展的；我们从一九〇三年起就这样混到了一九一七年；后来，“从一九一七年起”，不知不觉地吞下了不断革命论，这才站住了脚。不容争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童话。但是，这件事怎么能在党内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地、没有波动地就过去了呢？这件事怎么能够这样简单地、无缘无故地就发生了呢？大家都知道，列宁和他的党是从不断革命论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和这个理论进行了斗

争的。

然而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在另一个文件里给我们做了解释。我指的是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给◇302◇“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所写的“说明”。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篇“说明”里有关的一段话：

“孟什维克由‘**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应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由自由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也由‘**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种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认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自愿地去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限制。不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具有极大的危险。”（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页）

这样说来，不仅孟什维主义有它的反革命方面，而且连布尔什维主义也没有摆脱“反革命特性”，而这种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具有极大的危险”。

布尔什维克后来是不是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呢？如果是摆脱了，那末是怎样摆脱的呢？

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的“说明”里给我们做了解释。

请听吧：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经过内部斗争的）思想上◇303◇的改造。”（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页）

总之，“从一九一七年起”，根据不断革命论，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改造”，因此，布尔什维克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中

解救出来，不断革命论就这样终于“全部”“证实了”，——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结论。

但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对我国革命及其动力的估计等等都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些理论和估计或者没有“全部证实”，或者完全没有“证实”，或者为了党的“改造”而让位给不断革命论，自己却销声匿迹了。

总之，从前世界上有过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从一九〇三年“起”勉勉强强“拼凑了”一个党，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他们从一九〇三年“起”摸索来摸索去，勉勉强强混到一九一七年，后来发觉托洛茨基手里捧着不断革命论，于是决定进行“改造”，而在“改造”之后，就把列宁主义即列宁的革命理论丢得干干净净，这样就使不断革命论“完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了。

同志们，这是很有趣的童话。不妨说，这是在马戏团里可以看到的精彩的戏法之一。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不是马戏团而是我们党的代表会议。要知道我们也没有依托洛茨基来当马戏演员。变这种戏法有什么用呢？

列宁同志怎样评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呢？列宁在他一篇文章里谈到这个理论，嘲笑它是“奇特的”、“漂亮的”理论。他写道：◇304◇

“阐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是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　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里解决得不正确，他重复着他的一九〇五年的‘奇特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这个漂亮的理论。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　这样“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

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可见在列宁看来，不断革命论是忽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半孟什维主义理论。

只是不明白这种半孟什维主义理论怎么能够——即使是“从一九一七年起”——“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我们党怎样评价不断革命论呢？请看众所周知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这个理论是怎样写的：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这一论断，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305◇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九九〕）

可见不断革命论就是列宁同志在他的“论我国革命”的札记中痛斥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个苏汉诺夫主义。

只是不明白这种理论怎么能够“改造”我们布尔什维克党。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示意说”，托洛茨基放弃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他从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分子的最近一封信（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引了下面一段极其含糊的话来证实这一点：

“我们认为经验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无论我们中间有谁和列宁发生分歧，真理一定在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方面。”

然而，加米涅夫对于托洛茨基随即在同一封信里所作的推翻上述

声明的声明却只字不提。这个声明是：

“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坚决反对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它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的附件）

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声明既然把第一个声明推翻了，那末，他那语意含糊、毫不负责的第一个声明◇306◇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断革命论是什么呢？就是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否定。

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加米涅夫从托洛茨基的信里摘引了第一段话，而对第二段话却只字不提，他是想迷惑并欺骗我们党，这还不明显吗？

但是，欺骗我们党可不那么容易。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同志们，你们是否注意到托洛茨基的整篇演说里堆满了摘自列宁著作的各种各样的引文？读了这些从列宁的不同文章中割裂出来的引文，还是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要意图是什么，是想靠引文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呢，还是想“抓住”列宁同志的“矛盾”？他从列宁的著作中摘录了一大堆论述武装干涉的危险只有在几个国家革命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克服的引文，看来是想藉此“揭穿”党的立场的。但是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些引文并不是反对党的立场而是拥护党的立场、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的，因为党对外来危险比重的估计和列宁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又摘录了论述没有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完全胜利**的另一大堆引文，力图加以玩弄。但是他

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有免除武装干涉的保障）和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建成社会◇307◇主义社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想懂得，他摘自列宁著作的这些引文，并不是反对党而是拥护党、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的。

托洛茨基摘录了一大堆与问题无关的各种引文，但不愿意谈到列宁那篇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主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他大概以为加米涅夫已经用自己的发言使他平安地从这篇批判他的文章里脱身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认为已经完全证实加米涅夫并没有演好他自己的角色，列宁同志的文章依然非常有力。

其次，托洛茨基又从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引了一段话，说他们对于当前政策中的农民问题没有分歧意见。但是，他忘记说，列宁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由于我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农民问题上发生分歧的问题。

其实这说明托洛茨基摘录引文变成了毫无意思地玩弄引文。

托洛茨基企图证明，在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我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和列宁的立场“符合”的。但是，怎么能够证明那无法证明的事情呢？

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〇〇〕的论点，和托洛茨基的“……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论点怎能相容呢？

其次，列宁的“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斯大林注）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一〇一〕这个论点，和托洛茨基的◇308◇“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1]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的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点怎能相容呢？

最后，列宁的“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联合农民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〇二〕这个论点，和托洛茨基的“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的论点怎能相容呢？

再看，在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立场和孟什维克奥·鲍威尔的立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奥·鲍威尔认为：“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

托洛茨基对鲍威尔比对列宁要接近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托洛茨基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托洛茨基实际上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难道不对吗？

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欧洲已不是保守的而多少是自由的，假如欧洲还真是保守的，那末我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了。他企图用这样的议论来论证他的在保守的欧洲面前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权◇309◇的论点。但是，托洛茨基在这里糊涂到了极点，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把现在的，比如意大利，或者英国，或者法国究竟算做保守的还是自由的呢？现在的美国究竟是保守的还是自由的国家呢？这样“精细地”和可笑地强调保守的欧洲和“自由的”欧洲的区别，对于我们共和国的完整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共和制的法国和民主制的美国，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期，没有像君主制的和保守的英国一样来干涉我们国家吗？

托洛茨基关于中农问题讲得特别多。他从列宁在一九〇六年时期的著作中引了一段话。列宁在这段话里预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一部分中农可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看来，托洛茨基力图藉此证明这段引文是和他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农民问题的观点“符合”的。不难了解，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把不能比较的东西拿来比较。托洛茨基惯于把中农看做“自在之物”，看做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布尔什维克对中农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

托洛茨基大概忘记了布尔什维克对基本农民群众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用的，第二个方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用的，第三个方案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用的。

在第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全体农民一道，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第二个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贫苦农民一道，中立中农，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中立中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中农放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监视之下，不信任他◇310◇们，并采用一切办法使他们不能脱出我们的手。

在第三个时期，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贫农一道，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对我国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谁混淆这三个方案，混淆这反映我国革命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不同路线，谁就丝毫也不懂得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说，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有一部分中农会投到反革命方面去，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乌发政府”〔一〇三〕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有一部分中农投到反革命方面，投到富农方面去了，而大部分中农则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并且也不会不这样。中农之为中农，正因为他们观望等待，犹豫动摇：“谁知道哪一方面会胜利呢，还是等一等好。”只是在对国内反革命取得最初几次重大胜利以后，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中农才开始确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显然，他们已经确信没有政权是不行

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强大的，和这个政权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同志说了有先见之明的话：“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至第一二五页）

中农问题就是这样。◇311◇

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形而上学地对待中农问题，把中农看做“自在之物”，因而使问题混乱不清，歪曲并伪造了列宁主义。

最后，问题决不在于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还可能同一部分中农发生矛盾和冲突。党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决不在这上面。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够克服。

托洛茨基玩弄引文，企图把这些意见分歧藏到什么角落里去。但是我已经说过，要欺骗我们党是办不到的。

那末，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要做一个辩证论者而不要做一个魔术家。可敬的反对派分子，你们向列宁同志学学辩证法，读读他的著作是会有用处的。（鼓掌，笑声。）

三、“小事”和笑话

因为在提纲里说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就责备我这个提纲起草人。托洛茨基认为这样看待革命是形而上学的。我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为什么在提纲里说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革命呢？因为这样就可以着重指出在对我国革命的估计上我们党和反对派的观点之间的全

部差别。◇312◇

这种差别在哪里呢？在于党把我国革命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种具有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斗争的独立力量的革命，而反对派却把我国革命看做未来的、尚未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赠品，看做未来的西方革命的“附属品”，看做一种没有任何独立力量的东西。只要把列宁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估计和反对派联盟的估计比较一下，就会了解这两种估计之间的全部差别。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最有主动性的力量，它组织了社会主义经济之后，接着必然去直接援助世界无产阶级，去和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相反地，反对派却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消极的力量，认为这一消极力量正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担心“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将立即丧失政权。

使用“形而上学”这个字眼是为了用它来遮掩反对派对我国革命所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的真面目，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托洛茨基说我用另一个比较确切和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公式代替了一九二四年我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所提的不确切和不正确的公式。托洛茨基似乎不满意我这样做。为什么，根据什么，——他却始终没有说。我修正了不确切的公式而代之以确切的公式，这有什么不好呢？我绝不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某个同志犯了错误，后来自己承认错误并改正了错误，我想，这对党只会有好处。托洛茨基着重指出这个事实，他究竟想说明什么呢？也许他想学习好榜样，终于想改正自己的许许多多错误吧？（鼓掌，笑声。）好吧，在这件事情上如果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帮他的忙，愿意推动他并且帮他的忙。（鼓掌，笑声。）可是看来托洛茨基是在追求另外一◇313◇个什么目的。如果这话是对的，那末我必须说，他的企图是手段拙劣的企图。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里要人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像党的多数的代表所描绘的那样坏的共产党员。他从自己的文章里引了许多段话，证

明他托洛茨基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们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并不否认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此等等。嘿，这算什么新闻！托洛茨基要是否认我们工作、我们国营工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就太不像话了。这些事实现在大家都承认，连纽约的交易所，连我国的耐普曼都承认，更不用说奥·鲍威尔了。现在无论敌人或朋友，大家都看到我们并不像资本家那样建设工业，我们在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中放进了某些和资本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新因素。

不，可敬的反对派分子，现在问题不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比反对派联盟所能设想的要严重得多。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尽管有期待无产阶级专政毁灭的内外敌人，我们仍旧要建成整个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于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小事和笑话。现在对党用些小事和笑话是搪塞不了的。现在党所要求于反对派的要大一些。

或者你们勇敢些，能够公开地老实地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就要接受党对◇314◇你们的立场所做的正确的评价：你们的立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

二者必居其一。

怎样选择，让反对派分子自己决定。（喊声：“对！”鼓掌。）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反对派首领们试图从玩弄引文转到谈论带实践性质的分歧上去。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像季诺维也夫一样，企图把这些分歧归结成几条，同时断言重要的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实践上的分歧。然而我应当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把我们的分歧所归结成的几条中没有一条

是客观的，是完全的。

你们想知道我们在实践上的分歧是什么吗？你们想知道党所要求你们的是什么吗？

请听吧：

（一）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每当占少数时，就跑到大街上，宣布党内发生危机，攻击党。对于这种行动，党再不会容忍了。（喊声：“对！”鼓掌。）

（二）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失去在我们党内获得多数的希望时，就搜罗和聚集各色各样的不满分子作为组织新党的材料。对于这种行动，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了。（鼓掌）◇315◇

（三）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诬蔑党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制度，破坏党的铁的纪律，在派别自由的旗帜下，联合各种各样为党所斥责的派别组成新党。党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四）我们知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很多困难。我们看到这些困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反对派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的任何帮助我们都会欢迎的。但是，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企图利用这些困难来使我国的情况恶化，来进攻党，来袭击党。（鼓掌）

（五）党比所有的反对派加在一起都更了解，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才是可能的。党现在和将来都要采取一切办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跑到大街上作煽动性的声言，说要马上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反对派明明知道把工资提得这样高，目前工业还负担不起，明明知道这种煽动的目的不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在于助长劳动者的落后阶层中的不满情绪，造成反党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满情绪。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喊声：“对！”鼓掌。）

（六）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今后继续破坏工农结合的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基础，宣传提高出厂价格并加重农民纳税负担的思想，企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构成”无产阶级国家**剥削**农民的关系而不是经济**合作**的关系。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七）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分子今后继续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夸大我们的困难，助长◇316◇失败情绪，鼓吹我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喊声：“对！”鼓掌。）

（八）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虽然这不单是党的事情而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事情）你们今后继续和共产国际捣乱，瓦解它的支部，破坏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这就是我们在实践上的分歧。

这就是反对派联盟的政治纲领和实践纲领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党现在所竭力反对的东西。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里叙述了这个纲领的某几条，又竭力掩藏了其他几条，然后问道：这里面哪一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呢？好一个奇怪的问题！可是我倒要问：这里面，在反对派联盟的这个纲领里面，哪一点是共产主义的呢？这里面哪一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呢？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是离开列宁主义而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这难道不明显吗？

可敬的反对派分子，你们曾经想知道党要求你们什么，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党要求你们什么了。

或者你们履行这些条件，这些同时就是我们党完全统一的条件；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末，党昨天打败了你们，明天就要开始彻底粉碎你们。（鼓掌）◇317◇

六 总 结

我们党内斗争的总结即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手头有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对于我们党内斗争的总结有某种揣测的企图，它对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前途有某种预测和某种描绘。这个文件说：

“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在四月和七月曾经表明，而且在十月还要表明，在粗暴而恶意的攻击之下，他们的观点的一致只会巩固起来，党也会明白，只有依据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观点才能摆脱目前严重的危机。”（一九二六年九月托洛茨基给反对派分子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的附件）

你们可以看出这差不多是预言。（喊声：“正是差不多。”）这差不多是纯粹马克思主义式的诚语，是整整两个月以后的事情的预见。（笑声）

当然，这个文件有点夸大。（笑声）例如这个文件说我们党目前有严重的危机。但是，谢天谢地，我们还活着而且很健康，甚至还没有觉察到什么危机。当然，某种危机是有的，但不是党的危机而是某个派别的危机，就是那个叫做反对派联盟的派别的危机。可是，绝不能把一个小派别的危机说成拥有百万党员的党的危机。◇318◇

其次，托洛茨基的文件里说，反对派联盟正在巩固而且将来要更加巩固。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些夸大。（笑声）决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反对派联盟正在瓦解，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正在脱离它，它被内部矛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正在脱离反对派联盟，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热烈鼓掌）这是偶然的吗？

最后，托洛茨基的文件里说，只有依据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观点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里也有一些夸大。（笑声）

反对派分子不会不知道，党不是在反对派联盟的观点的基础上，而是在同这些观点的斗争中，在反对这些观点的斗争中，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和团结一致的。托洛茨基文件中的夸大是明显的。

但是，同志们，如果撇开托洛茨基在他的文件里所做的这一切夸大，那末，实在说，他的预测就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全场大笑）

由此可见，结果是和托洛茨基在他的预测中给我们描绘的那个总结相反的。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季诺维也夫有一个时候夸口说，他会把耳朵贴在地上，（笑声）当他把耳朵贴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到历史的脚步声。很可能事实上真是这样。但有一点还是应当承认的，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历史的脚步声的季诺维也夫，有时却听不到某些“小事”。也许反对派确实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像历史的脚步声那样了不起的东西。但是不能不承认，反对派会听到了不起的东西，却听不到这件◇319◇“小事”：党早已不理睬反对派了，反对派已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听到。（喊声：“对！”）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反对派的耳朵大概有毛病。（笑声）

因此，我要奉劝可敬的反对派分子，治一治你们的耳朵吧！（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欢送斯大林同志。）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二六二号◇320◇

论 中 国 革 命 的 前 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在谈到本题以前，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谈几点带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

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注意这些缺点。因此，我的意见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321◇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一九〇五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这就是说，除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

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连接起来。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一九〇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软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米夫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322◇

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

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此。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上述提纲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们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要是细读这些提纲，就可能认为目前中国其实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只有北军对南军的战争，或一派军阀对另一派军阀的战争。并且有些人惯于把干涉了解为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外国军队开入中国境内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种事实，那就不是干涉。

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

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今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带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隐蔽的形式。帝国主义在现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帝国主义者喜欢把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里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描绘为纯粹的国内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连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323◇的俄国将军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俄国根本不会有严重的内战。关于中国也必须这样说。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鼓励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款项、军械、教官、“顾问”等等，这些反革命军阀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简直是不可能的。

广东军队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有思想，有热情，这鼓舞着他们为解除帝国主义的羁绊而斗争，在于他们给中国带来解放。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背后站着各国帝国主义者，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银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入境，而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中国革命也正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这一事实。

因此，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这是自己骗自己。必须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

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列宁常说：革命者很难被棍棒和拳头制服，可是，他们有时却很容易被亲善制服。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列宁说的这个真理。不管怎样，显然日、美帝国主义者倒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的意义。因此，必须把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的亲善和恭维跟下述事实严◇324◇格地区分开来：殷殷地表示亲善的帝国主义者紧紧地抓住“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上述提纲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问题在这些提纲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对！”）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就在这里。通常不是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有人估计冯玉祥军队失败后中国的局势是反动势力得势，可是后来，在今年夏天，当广东派常胜军向北推进而占领湖北时，局面就根本改观而有利于革命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325◇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

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对革命军队的过低估计是上述提纲的不可容许的缺点。

由此应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因为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依附广东派，依附这个正在摧毁中国人民公敌的力量，而他们在依附广东派时，也把腐化作风带进了军队。要使这种“同盟者”不发生坏影响，或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建立对他们的革命监督才能办到。不这样做，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迳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326◇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个意见是提纲中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问题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纲中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问题彻底阐明。米夫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

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政党。这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根本的差别。

麦克唐纳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权，但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是以保存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权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权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优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327◇

列宁说得对，既然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前，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那末现在，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个特点米夫没有估计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〇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下面三种情况有利于这条革命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将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第二、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比一九〇五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

第三、中国革命将在可能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帮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这条道路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328◇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此外，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环境来看苏维埃。苏维埃，这里说的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

的阶段，才组织得成。可以不可以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现在应该提出的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329◇问题。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规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种枢轴，使农村中的革命在其周围展开。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断言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现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

在这方面前途会怎样，可以而且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进程而定。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谈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330◇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

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东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发生坏影响，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331◇

据说在中国，人们都热烈欢迎革命军队，但是后来，在军队驻扎下来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们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是由于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时候，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们苏联革命者通常用如下的方法能够弥补这些缺点：我们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必须

使中国革命者也学会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来弥补这些缺点。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五个意见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正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在罢工时◇332◇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和法权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说："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第六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真奇怪，提纲中竟没有考虑

到这个问题。然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谭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①]。必须注意，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333◇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青年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

八　几个结论

我想就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农民问题方面指出几个结论。

无疑地，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现在甚至连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者也赞成这个要求了。显然，中国共产党应当更进一步。

其次，必须在自己面前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向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须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摆着的问题是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富于侵略性的业主的企业收归国有。接着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其余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们，我想提出的意见就是这些。

——————————————

① 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和或多或少左倾的国民党人的联盟，执行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策。后来这种政策

由于不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而被取消了，因为国民党已经离开了革命并且后来变为反对革命的中心，而共产党人则与国民党决裂，退出了国民党。——著者原注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三期
（总第七十一期）◇334◇

注　释

〔一〕　指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国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时德国国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工人开始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萨克森和绍林吉亚两州成立了工人政府，立刻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汉堡发生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德国的革命运动遭受失败，这以后，资产阶级反动在国内加紧了。——（正文第三页）。

〔二〕　指摩洛哥和叙利亚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这些战争使法国花费了十亿多法郎。——（正文第四页）。

〔三〕　指敌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八五页至第二八九页和“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四十六页至第五十三页、第五十七页至第六十二页、第六十五页至第一〇一页、第二九三页至第三一九页）。——（正文第五页）。

〔四〕　一九〇八年党的全俄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至九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巴黎举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取消派孟什维克，又反对召回派——“从左面来的取消派”。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会议坚决地谴责了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取消主义，并拟定了布尔什维克在反动时期的策略路线（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一九五页至第二〇五页，“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七五页至第一七七页）。——（正文第八页）。

〔五〕　这篇“序言”是“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的导言，是斯大林一九二六年一月为代替“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的序言而写的。该文集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正文第十一页）。

〔六〕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六十九页至第一八八页。——（正文第十一页）。

〔七〕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五八页至第四〇一页。——（正文第十一页）。

〔八〕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九十页至第一三二页。——（正文第十一页）。

〔九〕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页至第二一一页。——（正文第十一页）。

〔一〇〕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七十一页。——（正文第十三页）。

〔一一〕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〇页。——（正文第十五页）。

〔一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三页至第四六二页。——（正文第十五页）。

〔一三〕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〇七页至第三〇二页。——（正文第十五页）。

〔一四〕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页至第九十七页。——（正文第十五页）。

〔一五〕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二三页。——（正文第十六页）。

〔一六〕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〇三页至第一〇四页。——（正文第十九页）。

〔一七〕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七八页。——（正文第十九页）。

〔一八〕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七九页至第四八九页）。——（正文第十九页）。

〔一九〕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六三页。——（正文第二十八页）。

〔二〇〕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七八页至第一七九页。——（正文第三十五页）。

〔二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举行。斯大林引证的是列宁的演说“论共产党的作用”中的一段话。——（正文第三十六页）。

〔二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六页。——（正文第三十九页）。

〔二三〕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就是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九月成立。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初，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手中。托洛茨基分子在工会工作中采取赤裸裸的强迫命令的方法。一九二一年三月举行的铁路和水路运输员工第一次全俄联合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分子赶出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关，选出了工会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规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正文第五十二页）。

〔二四〕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页至第二十二页。——（正文第五十三页）。

〔二五〕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作为代表大会的决议被通过了（该决议见“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五六〇页至第五六六页）。——（正文第五十七页）。

〔二六〕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〇六页。——（正文第六十页）。

〔二七〕 见斯大林的小册子“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九二四年版第六十页。—— （正文第六十一页）。

〔二八〕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七页至第四三五页。——（正文第六十二页）。

〔二九〕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三页至第五十二页。——（正文第六十二页）。

〔三〇〕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〇、一一九页。——（正文第六十三页）。

〔三一〕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一、一一六页。——（正文第六十三页）。

〔三二〕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一八页至第一一九页。——（正文第六十三页）。

〔三三〕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六一页至第三九一页。——（正文第六十三页）。

〔三四〕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批准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规定了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问题的方针（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三页至第五十二页）。——（正文第六十四页）。

〔三五〕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四十六页。——（正文第七十一页）。

〔三六〕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正文第七十二页）。

〔三七〕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对俄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来信（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拥护者的派别攻击）的答复，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报”第二九一号上。——（正文第七十二页）。

〔三八〕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七页。——（正文第七十四页）。

〔三九〕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一三二页至第一三三页、第一三五页至第一三七页。——（正文第七十六页）。

〔四〇〕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正文第七十九页）。

〔四一〕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八页。——（正文第八十页）。

〔四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正文第八十三页）。

〔四三〕　“时代哲学”是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篇反党文章的题目。对该文的批评，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七五页至第三七八页。——（正文第八十七页）。

〔四四〕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七页。——（正文第八十七页）。

〔四五〕　指斯大林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讨论农村工作问题时发表的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

题”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十五页至第三十三页）。——（正文第八十九页）。

〔四六〕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页至第八十二页。——（正文第九十二页）。

〔四七〕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三期刊载了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本卷第十三页至第八十八页）。“布尔什维克”（双周刊）是联共（布）中央的政治理论性的杂志，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创刊。——（正文第九十四页）。

〔四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总结报告，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关于第二次组织会议的总结的报告和全会十二个委员会的报告。全会特别注意关于共产党人根据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的革命统一的任务问题。斯大林被选为全会主席团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东方委员会委员、法国委员会委员和德国委员会主席。——（正文第九十六页）。

〔四九〕 所谓“一九二三年”是指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国深刻的革命危机。——（正文第九十六页）。

〔五〇〕 “共产党人公报”是双周刊，法国共产党右翼的机关报，在巴黎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该公报出版到第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停刊。第十五期发表了法国共产党右翼的反党宣言。——（正文第九十八页）。

〔五一〕 联共（布）中央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举行。四月九日，斯大林在全会的上午会议上就“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报告发表了演说；在下午会议上做了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九二六年工作计划的报告（中央全会的决定，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九十一页至第一〇二页）。——（正文第一〇九页）。

〔五二〕 指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组织粮食收购机关开展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该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九十七页至第一〇〇页）。——（正文第一二二页）。

〔五三〕 这封信的部分原文曾刊载在斯大林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

殖民地问题”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二页至第一七三页。——（正文第一三五页）。

〔五四〕　英国总罢工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二日举行。参加罢工的有各重要工业部门和运输业部门的五百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正文第一四〇页）。

〔五五〕　指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武装政变。政变的结果，建立了使国家逐步法西斯化的皮尔苏茨基及其集团的专政制度。——（正文第一四〇页）。

〔五六〕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一〇五页。——（正文第一四五页）。

〔五七〕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得到英国总罢工的消息后，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在有各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做出决定，号召苏联全体工会会员捐出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来支援英国罢工工人，当天就给英国工联总委员会汇去了二十五万卢布。五月七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把苏联工人募集的二百万卢布汇给总委员会。五月九日，总委员会通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拒绝接受这笔捐款和苏联工人的其他任何援助。——（正文第一四五页）。

〔五八〕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的提纲（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提纲和决议”。国家出版局一九二六年版第四页至第三十九页）。——（正文第一四八页）。

〔五九〕　议会中的派别就是波兰议会（波兰资产阶级国会的下议院，波兰的主要立法机关）中的各个集团。议会全部议员在一九二六年已分离成三十多个派别，代表波兰社会各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正文第一五〇页）。

〔六〇〕　指艾伦斯特·台尔曼“论波兰共产党的策略”一文，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一二三号。——（正文第一五三页）。

〔六一〕　英俄统一委员会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在伦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英俄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及两个组织各推出委员三名组成。由于英国工联反动首领们的背叛政策，该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秋宣告结束。——（正文第一五七页）。

〔六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政治局就英国总罢工、波兰事件和中国事件而通过的决议的通报，并讨论了以下几个报告：关于改选苏维埃的总结，关于拉舍维奇等人的案件和党内统一，关于住宅建筑，关于粮食收购运动。斯大林在全会上对政治局就英国、波兰和中国的事件而通过的决议的通报，对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舍维奇等人的案件和党内统一的报告以及对其他问题发表了演说。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工作，并通过关于全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党内生活和工人状况等重大问题的几项决议。全会决定撤销季诺维也夫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全会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一四八页至第一六九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六三〕 指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加入工会国际的有西欧多数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奉行改良主义政策，在国际劳工局和国际联盟各种委员会中公开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工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敌视苏联，因此，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威信日益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姆斯特丹国际实际上已停止活动。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阿姆斯特丹国际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取消了。——（正文第一五八页）。

〔六四〕 查辛巴赫和乌捷格斯特是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工会国际的书记，该国际的右翼领袖。——（正文第一五八页）。

〔六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页。——（正文第一六〇页）。

〔六六〕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一六页。——（正文第一六〇页）。

〔六七〕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由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人领导。该集团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形成，并进行了反对党的列宁路线的斗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并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后来，被打垮的“工人反对派”的余孽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在一起。——（正文第一六三页）。

〔六八〕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是白俄孟什维克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一年二月由马尔托夫创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前在柏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巴黎出版，现在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喉舌。——（正文第一六六页）。

〔六九〕　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和苏联矿工工会的代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在柏林举行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继续开展援助为反对同盟歇业而斗争的英国矿工的运动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书”的宣言，号召坚决支援英国矿工，并认为必须迅速召开英俄统一委员会。为了使苏联矿工工会和国际矿工联合会保持相互联系并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起见，代表会议认为应当成立英苏矿工委员会。——（正文第一七〇页）。

〔七〇〕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宣言——因英国工党和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改良主义首领背叛英国工人总罢工而发表的“告全世界无产阶级书”。这个宣言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四次全会上通过的，发表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真理报”第一三〇号上。 —— （正文第一七五页）。

〔七一〕　“黑色星期五”的英雄是指英国各工会中的一些反动首领：铁路工会的汤姆斯，矿工工会的霍哲斯和运输工会的威廉斯，这些人破坏了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为援助罢工的煤矿工人而定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的罢工。破坏罢工的那一天是星期五（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所以英国工人称之为“黑色星期五”。——（正文第一八二页）。

〔七二〕“工人日报”是美国工人党（即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芝加哥出版，后来在纽约出版；最初叫做“工人报”，自一九二四年一月起改称“工人日报”。——（正文第一八三页）。

〔七三〕　“新领袖报”（周刊）是美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创刊。——（正文第一八三页）。

〔七四〕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正文第一八五页）。

〔七五〕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这一提纲是斯大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之间写成的。该提纲经政治局同意后，在十月二十六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以讨论并通过。十一月三日，这个提纲经党的第十五次全

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作为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在当天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〇九页至第二二〇页）。——（正文第一九一页）。

〔七六〕 见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九页至第三〇七页）。——（正文第一九四页）。

〔七七〕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以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民集派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部门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反对组织问题上的列宁路线，要求党内派别和集团的自由。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民集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反党集团。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集团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一起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正文第一九六页）。

〔七八〕“苏瓦林之流取消派”即托洛茨基分子鲍利斯·苏瓦林的拥护者。苏瓦林是前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由于从事反苏反共产国际的反革命宣传，于一九二六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开除出共产国际队伍。——（正文第一九六页）。

〔七九〕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等问题。代表会议批准了中央的政策，并一致通过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说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是第二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辅助队伍。代表会议做好了并完成了以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能获得胜利的思想来武装党的工作，并号召为党的统一、为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坚决斗争。——（正文第二〇六页）。

〔八〇〕 指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至九日举行的联共 （布）中央全会。——（正文第二〇七页）。

〔八一〕 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正文第二〇

〔八二〕 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内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这个决议经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并列

入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七七八页至第七八五页）。——（正文第二〇九页）。

〔八三〕　见列宁“论粮食税”中“关于俄国现时经济”一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一九页）。——（正文第二二一页）。

〔八四〕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至第三八八页。——（正文第二二二页）。

〔八五〕　“我们的言论报”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的报纸，于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二二五页）。

〔八六〕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八页。——（正文第二三六页）。

〔八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页。——（正文第二三六页）。

〔八八〕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页。——（正文第二三七页）。

〔八九〕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七页。——（正文第二五一页）。

〔九〇〕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〇三页至第二〇四页。——（正文第二五七页）。

〔九一〕　指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会讨论了捷尔任斯基逝世后补充中央委员缺额的问题，提交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政治局十月四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以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的派别活动的决定所做的报告，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十月二十六日，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对于这个提纲作了说明。——（正文第二六〇页）。

〔九二〕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三〇页至第五三三页。——（正文第二六〇页）。

〔九三〕　指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斯大林关于地方党组织对于托洛茨基的言论所做的决议的报告通过的（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

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九一三页至第九二一页，“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六页至第十页）。——（正文第二六一页）。

〔九四〕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录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页至第九十七页。——（正文第二六六页）。

〔九五〕 引自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中的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九页）。另见恩格斯于一八九四年六月二日给坡尔·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一一页）。——（正文第二七三页）。

〔九六〕 指列宁“几个提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六六页至第三六八页）。——（正文第二八四页）。

〔九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六页。——（正文第二九〇页）。

〔九八〕 指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克逊的照会，该照会以对苏联进行新的武装干涉相威胁。——（正文第二九六页）。

〔九九〕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九页。——（正文第三〇六页）。

〔一〇〇〕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正文第三〇八页）。

〔一〇一〕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正文第三〇八页）。

〔一〇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页。——（正文第三〇九页）。

〔一〇三〕 “乌发政府”是自称为“全俄临时政府”（执政内阁）的反革命组织，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乌发举行的白卫“政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外国干涉者的代表们的会议上组成；该政府存在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正文第三一一页）。

年　表

一九二六年（1—6月）

一月一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并就组织问题发言。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批准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继续任命斯大林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一月五日

斯大林把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通知在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基洛夫等人。这个决议揭发了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的派别活动。

一月八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议。

一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美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谈话。

一月十九日

斯大林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谈话。

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的问题发表几次演说。

一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写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出版单行本，并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刊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三期上。

二月五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谈话。

二月六日至八日

列宁格勒的沃洛达尔斯基、莫斯科—纳尔瓦等区党的非常代表会议选举斯大林为出席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的首席代表。

二月九日

斯大林答复波尔特涅夫、叶弗列莫夫和伊甫列夫“关于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问题的来信。

二月十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第三十三号刊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第六章“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斯大林答复乌克兰共和国波勃利涅茨区贫农委员会主席坡柯也夫“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来信。

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选为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委员。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工作。

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主席团委员及全会政治委员会、东方委员会、法国委员会的委员。

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团员，揭露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开幕词中歪曲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斯大林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及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谈话。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会议上被选为全会德国委员会主席。

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上报告德国代表团对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不满意的情形。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为纪念柯托夫斯基而写的悼词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哈尔科夫州委员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报”第四十三号上发表。

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红军建军八周年庆祝会。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出版。

三月三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上就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极左派”的思想斗争问题发表演说。

三月六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法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关于法国共产党党内情况的演说。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上发言，反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吸收“新反对派”分子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提议。

三月七日

斯大林为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十六周年而写的致全世界女工和劳动妇女的祝词在“真理报”第五十五号上发表。

三月八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就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极左派”问题发表演说。

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八月工作计划和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演说。

三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及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谈话。

三月十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斯大林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代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祝词在“真理报”第六十六号和“青年团真理报”第六十六号上发表。

四月三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斯大林为政治局“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提纲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个提纲将提交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讨论。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上述提纲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明“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提纲。

四月六日至九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四月九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午会议上就“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报告发表演说。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下午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九二六年的工作计划”的报告。

四月十二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全会上做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工作总结的报告。

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给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的积极分子做了“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

斯大林和邀请他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的斯大林工厂（莫斯科省波尔舍沃站）的代表团谈话。

四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答复克拉拉·蔡特金关于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问题的来信。

斯大林的小册子“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出版。

四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九十五号发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所签署的告一切党组织、党监察委员会以及在经济机关、合作社、贸易机关和银行等机关工作的党员书，号召为实行节约而斗争。

四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

四月三十日

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揭露季诺维也夫的派别活动。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红场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莫斯科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五日

斯大林和报刊工作者谈话。

五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上就曼努伊里斯基的文章“论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发表讲话。

曼努伊里斯基的文章刊载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共产国际”杂志第四期（总第五十三期）上。

五月八日

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团员，揭露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派别活动。

五月十一日

斯大林把英国工联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苏联工人对英国罢工矿工的金钱援助一事通知驻巴黎和柏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

五月十五日

斯大林再次写信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团员，揭露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派别活动。

五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报刊工作者谈话。

斯大林与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人员谈话。

六月一日

斯大林到达梯弗里斯。

六月二日

斯大林视察捷莫—阿夫恰里水力发电站。视察水电站后，在贵宾留言簿上用格鲁吉亚文题词：“我们的建设和参加这一建设工作的工人、技师、工程师万岁！”这个题词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东方曙光报”第一一九一号和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真理报”第一三三号上发表。

六月三日

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分裂政策和投降政策，并确定联共（布）中央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

斯大林到梯弗里斯国家歌剧院观剧。休息时，斯大林和作曲家巴兰契瓦泽谈话，谈到他的歌剧“塔马尔·茨比也利”和格鲁吉亚的歌剧音乐，指出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对格鲁吉亚作曲家的影响。

六月八日

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大会上做了“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的报告，并答谢该厂工人的欢迎。报告和答词都发表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东方曙光报”第一一九七号和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三六号上。

六月十三日

斯大林给邀请他到巴库去的巴库工人的复信发表在“巴库工人报”第一三五号上。

六月

斯大林被选为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

一九二六年（7—11 月）

七月四日

斯大林由高加索启程返莫斯科。

七月八日

斯大林祝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梯弗里斯委员会、格鲁吉亚工会委员会和梯弗里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工人真理报”第一〇〇〇号出版，祝词发表在该号“工人真理报”上。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七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就工资问题发言。

七月十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就政治局报告该局所通过的关于英国、波兰和中国事件的决议发表演说。

七月二十二日午夜一时

斯大林在工会大厦捷尔任斯基灵旁守灵。

斯大林为吊捷尔任斯基而写的悼词在“真理报”第一六六号上发表。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午会议上就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舍维奇等人案件和党内统一的报告发表演说。

十七时三十分

斯大林亲自参加把捷尔任斯基灵柩舁出工会大厦。

七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因捷尔任斯基逝世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谈话。

七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和波兰共产党代表谈话。

七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来到苏联的英国工党代表谈话。

斯大林和芬兰共产党代表谈话。

八月六日

斯大林答复印度共产党代表的来信。

八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演说。

八月十三日

斯大林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上的反党行为。

九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致电美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部。

十月八日

斯大林写信给斯列普柯夫，对他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刊载在“真理报”上的文章提出意见。

十月十一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的演说。

十月十九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扩大全会上被选为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斯大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起草“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

十月二十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指定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做关于俄国问题的报告。

十月二十三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指定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

十月二十五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斯大林起草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这个提纲将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审查。

十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四七号和“消息报”第二四七号上发表斯大林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说明“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全会批准了此项提纲，这个提纲将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审查。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十一月一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报告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的“真理报”第二五六号和第二五七号与“消息报”第二五六号和第二五七号上发表。

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做结论。结论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第二六二号和“消息报”第二六二号上发表。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答复“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不同意发表“纽约美国人报”所发表的经过歪曲的他与耶鲁大学（美国）教授哲尔·戴维斯的谈话。

十一月七日

斯大林在红场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莫斯科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十五日

斯大林的小册子“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对这一报告所做的结论）出版。

十一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他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做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状况”的报告的纲要。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会主席团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斯大林主持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会议。

十一月三十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

斯大林全集

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三萬六千元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256,000字
印數1—38,000册

書號1632

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分子今后继续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夸大我们的困难，助长失败情绪，鼓吹我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六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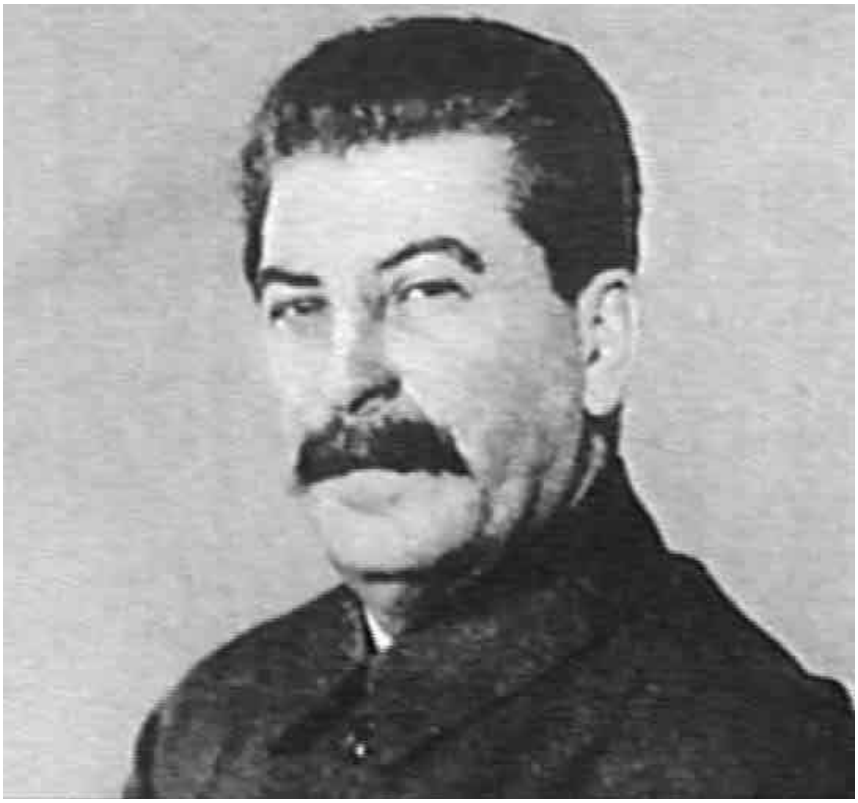
ДЕКАБРЬ 1926 – ИЮЛЬ 1927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一九五四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九卷说明 …… 1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3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3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 3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 3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 8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 10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 15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 16
二、“喘息”的因素 …… 19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 20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 21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 26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 …… 29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 30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 32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 33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 35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38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 42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 44

结论
（十二月十三日） …… 45
一 几点意见 …… 45
一、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 45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50
三、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 54
四、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 57
五、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 60
六、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 62
七、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 69
二 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72
一、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 72
二、季诺维也夫怎样“改正”列宁的话 …… 80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 83
一、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 83
二、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 91
三、我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 99
四、蜕化问题 …… 101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 102
五 结论 …… 106
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 …… 109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111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 116
给连纳的工人们 …… 119
致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 …… 120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121
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 …… 125
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 127

给申凯维奇的信 …… 135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137
给邱贡诺夫的信 …… 143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斯基）…… 145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157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 157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158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 160
四　反对派的错误 …… 161
给“真理报”（纪念创刊十五周年）…… 164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 …… 166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171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答坡克罗夫斯基）…… 191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201
一　几个小问题 …… 201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 203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
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 209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 211
五　两条路线 …… 218
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 …… 223
答坡克罗夫斯基 …… 224

时事问题简评 …… 229
一 论战争的威胁 …… 229
二 关于中国 …… 235

注释 …… 257
年表 …… 266
插图（新增）
一 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 108
二 《真理报》创刊号（1912 年 5 月 5 日）…… 165
三 中国大革命风云突变 …… 222

第 九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包括斯大林同志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著作。

这一个时期，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根据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定，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斗争和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反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急剧地尖锐化了。当时“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在对该报告所做的结论中，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和在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中，在“时事问题简评”和其他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捍卫了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是苏维埃国家基本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学说，揭穿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首领们跟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为敌的“理论”，揭穿了他们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破坏活动。

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著作发挥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确定了党在苏联受到更大的新的军事进攻威胁情况下的对外政策路线，规定了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任务。

在“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论工农政府问题”、“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等著作中，发展了列宁关于工农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学

说，阐明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政府的阶级性质。

分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人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动力和发展前途的著作在第九卷中占很大篇幅，这些著作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等。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给克谢诺丰托夫、札依采夫、申凯维奇、邱贡诺夫、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坡克罗夫斯基的书信。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

一九二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十日、
十九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二八五、第二八六、
第二九四、第二九五和第二九六各号

◇3◇①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同志们！在讲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让我先作几点说明。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们党自诞生以来，自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并探讨我们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各个阶段，那末，可以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5◇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西方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它们有没有党内矛盾，有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呢？当然有。它们有没有在党员群众面前诚恳坦白地揭露这些矛盾并竭力克服这些矛盾呢？没有，当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这些矛盾和分歧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变成空洞的粉饰太平的集会，竭力隐藏和掩饰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这除了引起思想混乱并使党在思想上贫困化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就是过去是革命的而现在是改良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能这样生活和发展的。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是衰颓的和蜕化的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空忙一阵和脱离工人群众的空洞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党过去

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原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6◇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

拿第一个时期，即“火星报”时期，亦即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来看，当时在我们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上层终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一部分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坡特列索夫）。列宁当时是孤立的。你们要知道，当时对于那些离开了列宁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发出多少叫喊和呼号！然而斗争的实践和党的历史表明，这种意见分歧是有其原则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斗争的实践当时表明：第一、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第二、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历史表明列宁是对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对的。历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宁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党。

拿下一个时期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的时期来看，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两个政纲完全不同的营垒，仍然在一个党内处于互相反对的状态，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党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们为了坚持我们革命的路线，不得不召开自己的单独的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当时何以占了上风，何以博得了党内多数的同情呢？这是因为它没有掩饰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并且用孤立孟什维克的办法来为克服这些分歧而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亦即一九〇◇7◇七年的时期，当时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所谓“召回派”，背弃了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我们党生活中的一个危急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了列宁和列宁的党。孟什维克当时大叫布尔什维克要灭亡。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灭亡，短短一年半的斗争实践表明，

列宁和列宁的党为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矛盾而斗争，是正确的。这些矛盾之被克服，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它们，而是由于揭露了它们，由于进行了有利于我党的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已恢复了几乎被沙皇反动势力击溃的党并驱逐了取消派。这时，也像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恢复并巩固了党，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揭露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

再其次，我还可以指出我党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当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几个著名领袖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动摇了，不想举行十月起义，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之克服这个矛盾，也不是由于掩饰了意见分歧，而是由于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克服这些分歧，我们就会使十月革命陷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我还可以指出此后我们党内斗争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以及其他各个时期，这些时期你们都已知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时期中，也像过去一样，我们党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8◇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结论就是：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联共（布）的规律，而不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这是不对的。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如果在小国中的小党内可以用某种方法掩饰意见分歧，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威信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那末在大国中的大党内，通过克服矛盾而发展，就是

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我想在这里引证和马克思一起领导西方无产阶级政党达数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权威的话。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德国施行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伦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三〕实际上指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伯恩施坦当时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变成改良主义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中最迫切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当时（一八八二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一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①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坏蛋没◇9◇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库”第一册第三二四页至第三二五页〔四〕）

————————————

①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政党。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在一八六九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派是拉萨尔思想的信徒。他们认为可用和平手段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过拉萨尔派。这两个政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于一八七五年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拉萨尔派则为党内机会主义派。——译者注。

在另一个地方（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说道：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同上，第三七一页）

首先必须这样来解释我们党内矛盾的存在并说明我们党是以斗争的方法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可是，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10◇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

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11◇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养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养成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开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呢？不，不能。以为能避开这些矛盾，就是欺骗自己。恩格斯说得对：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一个争论的俱乐部。相反地，无产阶级

政党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仅仅想说，对党内的意见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不能把手一挥，把眼一闭，置之不理。我仅仅想说，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而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资产阶级的◇12◇压力和影响。我仅仅想说，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现在让我从几点预先的说明进而谈到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党内反对派的几个特点。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显而易见的特点，而暂不涉及意见分歧的实质。我想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第二、反对派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第三、反对派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笑声）

先从第一个特点谈起。反对派在我们这里是作为**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作为过去受过党的谴责的种种派别的联盟而出现的，并且它不是怎样“简单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

这要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

第一、结成联盟的一切派别，不论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五〕残余或是“工人反对派”〔六〕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它们不是从产生时起就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便◇13◇是近来才开始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不用说，这个**共同**特点一定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进行反党斗争。

第二、目前这一时期是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重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切派别在某些革命问题上是和我们党有过意见分歧而且继续有意见分歧的，所以很自然，在目前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总结性质，要清算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一定会推动这一切派别结成一个联盟，结成一个反对我党基本路线的联盟。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样的反对派别联合成一个共同的营垒。

第三、一方面是我们党的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一方面是一切的反对派别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派别的分散的反党斗争成为显然无望的事情，因此，各反对派别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以便以各个集团的结合补救它们的弱点，这样，至少从表面上可以增加反对派成功的机会。

为什么领导反对派联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第一、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现有一切反对派别中最完整的机会主义派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对的〔七〕）。

第二、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笑声）

在我党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各种反对派别来反对我们党，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举出我党◇14◇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前例，这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发生的，当时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各种反党的反对派别的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我所以要举出这个前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某种原型。当时托洛茨基把取消派（坡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召回派（“前进报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党。而现在他又企图把“工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成一个反对派联盟了。

大家知道，列宁当时反对八月联盟历时三年之久。在八月联盟形成的前夜，列宁就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所以默不作声，是由于真理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是不相容的。可是实际目的愈来愈明白，甚至连最没有远见的党员都看得很清楚了。这种实际目的就是**坡特列索夫分子和前进报派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正由托洛茨基支持和组织起来…… 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集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坡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前进报派先生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派别组织的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它们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把坡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看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做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家立场的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15◇茨基和坡特列索夫及前进报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 中央全会以后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坡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报派的派别组织……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了党的合法性，而且代表一个国外集团（或代表呼声报派和前进报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召开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各页）

这就是列宁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一个反党派别联盟的批判。

对目前还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基本上也必须给以

相同的但更加严厉的批判。

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目前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出现，并且不是“简单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原因。

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第二个特点。

我已经说过，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力图以“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我认为在这里不必多举事实去证明在我们反对派的实践中经常是“革命的”词句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不一致。只要看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反对派的提纲〔八〕，就足以明了这套把戏的秘诀。我只想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别，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时期中，竭力以“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非革命的行为，不断“从左◇16◇面”批评党和党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产主义者来看，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一八年）是反对党的。大家知道，他们“从左面”批评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并认为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政策。事实上却是这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妨碍了党获得“喘息”以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帮助了当时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使帝国主义易于在苏维埃政权萌芽时就把苏维埃政权消灭。

拿“工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来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对派”也“从左面”批评党，百般“攻击”新经济政策，把列宁的要恢复工业必先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这一论点“痛骂”得“体无完肤”，“痛骂”列宁这一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农民的倾向。事实上却是这样：如果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如果不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业，而无产阶级就会丧失阶级性。此外，“工人反对派”此后向哪方面发展，

向右还是向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拿托洛茨基主义来看，它“从左面”批评我们党已有好几年了，而且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革命的”词句在这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掩盖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至于用“左的”叫喊来掩盖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的“新反对派”，我就不谈了。◇17◇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们说明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例如我国工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英国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把汤姆斯这样的叛徒溺死，把他们扔到井里去。（笑声）凡是知道我国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像汤姆斯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苏联工人中间简直是无容身之处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国工人不仅不打算把汤姆斯这帮先生们溺死，而且一再把他们选入总委员会〔九〕，同时不是平平淡淡地选举他们，而是在选举时还举行游行示威。显然，对于这样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盖机会主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目前正在产生。它们正在产生和发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英国工人正在革命战斗中受到锻炼。但是当这一点还不具备时，英国工人和苏联工人间的差别是依然会存在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如不◇18◇戴上某种“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苏联工人，那是很冒险的。

反对派联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谈谈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我已经说过，这个特点就是反对派联盟没有一定的原则，它没有原则性，它像变形虫一样地善变，因此，反对派首领们经常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把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加在他们身上等等。这的的确确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特点（“人们不了解！”）是一般机会主义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点。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的“遭遇”完全与此相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这些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在好几年内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大家知道，当时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骂伯恩施坦的派别组织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因此，人们把反对派联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一类，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反对派联盟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此。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现在谈谈意见分歧的实质。◇19◇

我想，我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几个基本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讲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很少，而报告又已拉得很长了。况且你们有了关于联共（布）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在翻译上虽然有些错误，但对我们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种正确的观念。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彻尔诺戈里亚，也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样，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国内部力量，靠苏联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条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20◇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

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末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末，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我们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都心满意足呢？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庸俗的、市侩的见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21◇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我国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整个摆在党的面前的时候，曾这样说：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〇页）

列宁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

产合作社机关网。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说到下面一点时，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那末，在我国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22◇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一〇〕）。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国建设的全部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比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于私人资本比重的减少而逐年增加，同时我国经济中的私人资本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比较起来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对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后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因此，我就不多

讲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23◇可以参看前几天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个委员的我党中央的材料。

二、“喘息”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的条件问题，关于我国开始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这一“喘息”时期的条件问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生存。必须有一个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没有武装干涉企图，必须争取到为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某些起码的国际条件。

试问，如果已经证明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证明这个危险只有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消灭，那末，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的我国目前这种“和平”发展时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已经争得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必要的外部条件的这个“喘息”或“喘息”时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面四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24◇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革命以反对本国资本家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

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地位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某一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问题。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受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

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就会被摧毁。◇25◇

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有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改善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革命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应得出结论说，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国革命

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因此，把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说成“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像我们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把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起来，乃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就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资本◇26◇主义国家内逐步造成对资本的胜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的基础。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所讨论的问题的历史。反对派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九二五年才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曾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什么要求在理论上承认一个国家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前途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来，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

这样说来，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党内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是在一九二五年才提出的。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

我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一九一五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我肯定地说，当时反驳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说，从那时起，也就是从一九一五年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在我们报刊上和我们党内就曾多次地论述过。

我们看看事实。

（甲）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一〕）上列宁的论文“论欧洲联邦◇27◇口号”。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①，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托洛茨基于同年（一九一五年）在他所领导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一二〕上反驳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28◇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可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早在一九一五年，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时候，就由列宁提出来了。

可见当时反对列宁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显然知道列宁论文所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在一个国家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可见关于“民族狭隘性”的责难，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个责难不是用来反对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用来反对列宁的。◇29◇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现在季诺维也夫也常常发出关于“民族狭隘性”的可笑的责难。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复并从而恢复托洛茨基旨在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的论点。

（乙）一九一九年。列宁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不管各国的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所以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压倒我们，我们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就必然获得胜利。可是资产阶级要这样来压倒我们是办不到的**。”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九十页）

可见列宁这篇论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共产主义胜利”而“改造社会经济”的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经济”呢？这无非是在一个国家即我们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

（丙）一九二一年。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一三〕。关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一著名的论点（见“论粮食税”）。◇30◇

（丁）一九二二年。列宁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在其“和平纲领”的“跋”中加以反驳，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没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宁进行论战。托洛茨基在这篇“跋”中说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的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了生产力的异常低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商务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显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三页）◇31◇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的“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反驳谁呢？当然不是反驳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反驳列宁同志，并且他所反驳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

（戊）一九二三年。成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说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看来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则肯定说，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32◇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经在我们党内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列宁亲自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列宁争论过并以“民族狭隘性”责难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见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同志逝世为止，这个问题并未从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见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种形式，即以掩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宁同志争辩的形式挑起来，而且托洛茨基每次都不是本着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而是以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可见托洛茨基硬说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是**公开的撒谎**。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现实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惟有在目前，惟有在近来具有特别现实的性质呢？为什么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是偶然在个别的文章中讨论过，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这个问题却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占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呢？其◇33◇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近几年来，其他国家的革命速度缓慢下来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到来了。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是否会削弱或甚至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们施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否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们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保证了和平，保证了为消灭经济破坏状态、恢复国内生产力和从事我国新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的和平时期。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把经济建设导向哪一方面，导向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导向别的方面呢？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建设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是否有根据指望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莫大注意。由此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便从增加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这一观点上每年对各种统计材料加以总结。

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以及对

于共产国际都是最迫切的问题◇34◇的三个主要原因。

反对派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是不对的。这是极糊涂的。这样论述问题只能说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实践，脱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合作社建设。现在，当我们消灭了经济破坏状态，恢复了工业，并进入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便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经济建设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细心钻研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细心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反对派呢？我已经说过，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经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而现在不得不在这里重复一遍：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托洛茨基，还在不久以前，即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曾在其人所共知的告反对派书中声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四〕）。◇35◇

把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一九二六年）和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列宁进行论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列宁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民族狭隘性”问题）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托洛茨基对于在一个国家内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依然是站在自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的。

正因为如此，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

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列宁认为在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们，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这个前途和列宁同志指出的苏联革命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几分钟以后，托洛茨基本人就开始在他的演说中和这种前途作斗争。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应当声明，不论是列宁或党都不能对托洛茨基所臆造出来的这种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托洛茨基捏造了这种前途，然后开始在自己的演说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斗争，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托洛茨基糊涂已极并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列宁说◇36◇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

能不能从列宁这一论点得出我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呢？不，不能。从这一论点只能得出下列的结论：

（甲）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胜利）；

（乙）这个胜利将不仅是苏联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丙）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匪恐怖制度代替了，白匪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当然，对列宁这个论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样地歪曲它是不行的。

“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这样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意义相同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谈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的意思是说：我国◇37◇社会主义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它（胜利）不能局限于我国范围内，它定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它在时间上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一致，那末，它无论如何也将掀起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导向世界革命胜利的强大运动。

如果指的是革命胜利的前途，则列宁所说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党内所谈的也是如此。

将这个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来就是诬蔑列宁。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第七个问题。反对派对我们说：好吧，但究竟和谁联盟好些，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和我国的农民呢？选择谁做同盟者最好呢，是世

界的无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农民呢？于是事情被描绘成这样：好像在苏联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同盟者，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它准备立即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但等着我们对此欣然同意；另一个是我国的农民，他们准备帮助苏联无产阶级，但不完全相信苏联无产阶级会接受这种帮助。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幼稚的提法。问题的这种提法，无论与我国革命的进程或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都毫无共同之处。请原谅我这样说，这样提问题的只能是贵族女学生，可惜事情并不像一些反对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我们会乐意接受两方面的帮助，假使这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话。不，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世界革命运动的速度缓慢下来，在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苏联◇38◇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一年年地巩固这个政权，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并且顺利地巩固着自己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友好联系，那末，是否有理由否认虽然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在我们国内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当然，如果不像反对派联盟那样从幻想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那末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党回答这个问题说，苏联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并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反对派却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①]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夺得政权，苏联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39◇

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和孟什维克奥托·鲍威尔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可惜一点也没有。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第八个问题。反对派说：好吧，可是谁有更多的胜利的机会呢，是苏联无产阶级呢，还是世界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成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见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第一、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欧洲要停滞“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谁也没有要托洛茨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前途出发，这个前途与我们党的前途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自己和这个臆造的前途联在一起，自己就应当对这种做法的后果负责。我想，如果指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前途，这个期限至少应该缩短一半。◇40◇

第二、托洛茨基毫无保留地决定西方无产者战胜现在执政的世界资产阶级，要比苏联无产阶级战胜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赶出国

民经济指挥所的、在经济方面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压力下退却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这样提问题恰好露了马脚。难道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异口同声地大叫时，不也是向我们说西方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要比技术不大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俄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吗？不管孟什维克怎样痛哭流涕，俄国无产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推翻了资产阶级并夺取了政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表明和没有证实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提问题吗？

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其解决办法不是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或者拿我国农民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这样的对比是把比较当儿戏。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是要由现实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来解决的。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也许西方无产者就已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反之，在西方无产者还没有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时，也许苏联无产阶级就已建成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谁有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的解决，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情况为转移的，而且只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为转移的。◇41◇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基础。

从这些基础中产生了一些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和在纯粹党内政策

方面的实际政策性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第九个问题**的题目。

（甲）党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我们正处于两个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正走向革命，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开辟接近群众的道路，加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搏斗。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惧怕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认为（或者曾经认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认为（或者曾经认为）英国罢工〔一五〕是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的标志；但当终于发现稳定是事实的时候，反对派却强词夺理说，那就该事实倒霉，那就可以跳过事实，同时他们装腔作势地提出修改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西方职工运动破裂等等耸人听闻的口号。

可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客观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离开科学的基础而站到巫术的基础上去了。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42◇

（乙）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正如列宁所说，乃是“苏维埃政权的全部”〔一六〕和我国建设胜利的全部，因此，我们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于这个结合的利益。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

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这是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态度。

（丙）我们的出发点是：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43◇

反对派虽然不公开反驳这些论点，但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所持的出发点却是：必须削弱党的统一，必须有在党内成立派别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造成建立新党的因素。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实际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的号叫，其实这正是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政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总括起来就是如此。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现在来谈谈这些意见分歧是怎样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的。

那末，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在其反党斗争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

大家知道，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为非作歹，而且在共产国际其

他支部，如德、法等国党内为非作歹。因此，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以及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的实际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呢？

（甲）**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反对派是从对党发出最严厉的责难来开◇44◇始其“工作”的。反对派说党正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派说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反对派说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①]。反对派说我们的国家“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一切不是在反对派代表的公开宣言和演说（一九二六年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中发表过，就是在反对派门徒们所散发的反对派的秘密文件中发表过。

反对派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从而为在党内组织平行的新支部、组织平行的新的党中央、成立新政党造成基础。反对派的门徒之一奥索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现有的党即我们党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须组织一个新党，即与现有的党一同存在和活动的“纯无产阶级政党”。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大家知道，奥索夫斯基公开自命为反对派的门徒，反对派对这一点一次也没有试图加以反驳。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曾经袒护奥索夫斯基而反对莫洛托夫同志。最后，大家知道，虽然党一致反对奥索夫斯基，但反对派在中央表决时却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出党。这一切都说明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

① 特米多尔是法国资产阶级第一共和国在一七九三年颁布的新历法中一个月份（七月）的名称。雅各宾党人执政后，因逐渐离开支持他们的广大阶层，而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特米多尔月九日）被大资产阶级代表推翻。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企图从法国革命中举出例子，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走向特米多尔，断言党必然会遭到与法国雅各宾党人同样的毁灭。——译者注。

结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已经表现在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上，表现在他所持的必须在我国成立一个与联共（布）平行并反对它的新党这一立场上了。

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45◇

或者是反对派在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责难的严重性，提出来仅仅是为了示威，那末，他们就是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对派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责难的严重性，那末，他们就应当采取打垮党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新党的方针，他们也真的采取了这个方针。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反对联共（布）的实际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以柯尔什先生为首的德国“极左派”，从我们的反对派对党的责难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的”结论并说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德国“极左派”的思想家柯尔什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家知道，柯尔什把我们的党叫做“富农化了的”党，而把共产国际叫做“机会主义的”组织。其次，大家知道，柯尔什因此就鼓吹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的必要性。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柯尔什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柯尔什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柯尔什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以众所周知的对党的责难的形式传授给自己门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因为党既然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党的政策既然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党既然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而我们的国家又“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那末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新的革命来反对“富农化了的”政权。此外，大家知道，德国的“极左派”，包括维丁派〔二七〕在内，曾反对开除柯尔什

的党籍，因而对柯尔什的反革命宣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46◇是，谁不知道“极左派”是拥护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呢？

（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法国的实际工作**。关于法国的反对派门徒也必须这样说。我指的是苏瓦林及其在法国一个著名杂志上活动的集团。从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对党的责难中所提供的前提出发，苏瓦林得出结论说，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是我们党的上层领导集团。苏瓦林硬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新革命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上层领导集团，首先是反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那里，在德国，是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在这里，在法国，是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新革命”。那末怎样组织这个新革命呢？没有一个适合于新革命的目标的特殊政党，能不能组织这个新革命呢？当然不能。由此便产生了建立新党的问题。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苏瓦林的言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第一、大家知道，苏瓦林及其集团是反对派的门徒，特别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对派的门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对派还计划把苏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去。诚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过失，而是他们的倒霉！

由此可见，如果不看反对派自己所描绘的外貌，而看他们在我们苏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工作过程中的表现，那末我要说，反对派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就要走到打垮我党现有干部并组织新党的地步了。◇47◇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呢？

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派反映着哪种人的情绪呢？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所谓“俄国问题”近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

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报刊极为注意的问题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能不在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中引起极度的惊惶。革命和反革命间的界限，现时就截然表现在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同志友好的态度上。目前“俄国问题”的极伟大的国际意义已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事实了。

围绕着“俄国问题”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的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奋不顾身的朋友的战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中间造成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流亡分子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我◇48◇们的反对派。

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保尔·列维说道：

“我们一向认为工人的特殊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它是与农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农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现象，俄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鲜明。我们认为利益相同的思想是一种变态的联合思想。如果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根据，如果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着的，那末这个矛盾一定会粉碎联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国已被粉碎一样…… 我们这些从旁边，从西欧观察苏联事变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前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又在俄国开始了。”（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莱比锡国民日报”）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中，对于工农利益“一致”的问题存着糊涂

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保尔·列维因我们的反对派与工农联盟思想作斗争而称赞他们，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主张在苏联复活资本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关于我们的反对派说道：

“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他们正以这种批判**进行……思想上的准备**来接受社会民主党的优良的纲领。”

往下又说：◇49◇

“反对派不仅在工人群众中间而且在工人共产党员中间培养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幼苗，这种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很容易**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果实**。”（“社会主义通报”第十七、十八两期合刊）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最近新闻报”〔一八〕关于我们的反对派写道：

“今天，反对派在破坏专政，反对派的每一种新的刊物都在发表越来越‘可怕’的言论，反对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击统治制度这方面演变，在目前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尽地把反对派当做政治上不满的广大居民阶层的喉舌来看待了。”（见“最近新闻报”第一九九〇号）

往下又写道：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触角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并在它没有发觉之前就把它消灭的那些人。苏维埃的反对派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准备时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最近新闻报”第一九八三号）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引用了这几段话，虽然这样的引证还可以举

出几十段几百段来。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50◇

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

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使得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

反对派是否愿意这样呢？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愿意怎样，而在于他们的派别斗争在客观上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派别斗争的逻辑胜过某些人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反对派的战线实际上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合而为一了。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事情却颠倒成这样：反对派由于采取派别政策而堕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营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脱离了列宁主义。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里现在只能有一种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派企图在反联共（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采取第三者的立场，这必然要以反对派被派别斗争的进程抛到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而告终。

从上述事实来看，结果也正是如此。◇51◇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我在上面说过，反对派在其反党斗争中对党发出了种种极严厉的责难。我已说过，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就要走到分裂党和组织新党的地步。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反对派在这个分裂的立场上能够维持多久呢？事实告诉我们，反对派在这个立场上才维持了几个月。事实告诉我们，到今年十月初，反对派已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有下列几种。

第一、反对派在苏联没有自己的政治军队。很可能，建立新党是一种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争论以后既已发现没有可资建立新党的人，那末很明显，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别斗争进程中，不论我们苏联的或国外的各种卑鄙龌龊分子都和反对派结成一伙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竭力称赞反对派，同他们接吻，使他们在工人眼中大丢其脸。因此，反对派应该有所选择：或者接受敌人的这种称赞和接吻，视为理所当然；或者翻然悔改，使粘附在他们身上的肮脏尾巴自动地掉下来。反对派既已退却而且承认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认了第二◇52◇条出路是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苏联国内状况要比反对派所预料的好些，而党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也要比反对派在斗争开始时所看到的高些。当然，假如国内发生了危机，假如工人日益不满，假如党表现得不够团结，那末反对派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是决不会退却的。但是，事实表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这就是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反对派退却的原因。

反对派的失败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反对派在这个文件中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放弃了派别斗争的方法，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反对派所放弃的不止于此。既然反对派在自己的“声明”中同“工人反对派”以及一切柯尔什分子和苏瓦林分子划清了界限，从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不久以前还使他们和这些派别接近的思想立场。

第二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不久以前对党发出的种种责难。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在承认以后应该着重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已不敢重复自己对党的责难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记录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记录比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种种责难，说党是机会主义，是特米多尔主义，是背弃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等等，◇53◇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好多代表向反对派提到过去的种种责难的问题，而反对派对此仍然默不作声，那就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过去对党的种种责难了。

是否可以把这种情况看做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场呢？可以而且应该。这是反对派在失败面前自觉地抬起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发出责难是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既然这种打算落了空，这些责难至少暂时要收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完全孤立。应该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票**也没有得到，因而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回想一下反对派在今年九月底向党举行进攻、举行公开的进攻时所发出的叫嚣，并把这种叫嚣和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可以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事实比较一

下，你们就会懂得反对派的失败真是“无以复加”了。

反对派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对党的责难，虽然有代表要求，他们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重复这些责难，这个事实能不能否认呢？

不，不能，因为这是事实。

反对派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什么卷起了自己的旗帜呢？

因为反对派思想旗帜的展开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着组织两个党的理论，意味着所有的卡茨分子、柯尔什分子、马斯洛夫分子、苏瓦林分子及其他卑鄙龌龊的分子的活跃，意味着我们国内一切反◇54◇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蠢动，以及俄国流亡分子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资产者对反对派的称赞和同他们的接吻。

反对派的思想旗帜害了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反对派为了不致彻底腐败起见，便不得不退却并抛掉自己的旗帜。

反对派联盟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现在我只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方面来把几个结论谈一谈。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总结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内斗争，正式肯定了党对反对派的胜利，孤立了反对派，结束了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派别混乱局面。

第二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向我们党内一切反对派别、向我们党内一切倾向作斗争的思想的基础上，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55◇

现在我们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对：全世界都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看着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胜利。可是为了在这个战线上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我们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有进行这个事业的决心，使它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杠杆。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正式地和最后地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思想武装了我们党。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坚决反击了我们党内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促进了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完全胜利。

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批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承认我们党对反对派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就可以得出第四个结论说，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为使列宁主义在整个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里获得胜利准备了若干必需的重要条件。（热烈鼓掌，全场欢呼。）

◇56◇

结　　论

（十二月十三日）

一　几点意见

一、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同志们！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请允许我对反对派那些不是歪曲事实就是捏造和诽谤的声明作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一）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问题。反对派声明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发言，是因为联共（布）

中央没有直接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违背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假如中央禁止他们发言，反对派首领们是不会决定发言的。

其次，反对派声明说，他们在这里，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是要用一切办法不使斗争尖锐化，他们只是作几点一般的“解释”：老天在上，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向党进攻；老天在上，他们丝毫没有打算◇57◇责备党和控诉党的决定。

同志们，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反对派阳奉阴违的表现。事实表明，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表明，反对派首领们在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解释”，而是向党进攻，向党袭击。

公开提出谴责党右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向党进攻，这是向党袭击。

难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决定中没有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使斗争尖锐化，会激起派别斗争吗？是指出了的。这也就是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比这再进一步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不能禁止发言。每个党员都有权向高级机关控诉党的决定。中央不能不重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可见联共（布）中央为了防止斗争更加尖锐化，防止派别斗争更加剧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对派的首领们既然都是中央委员，那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发言不能不变成对自己党的决定的控诉，对党的进攻，对党的袭击。

这样，反对派的发言，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并不是他个人的发言，而是整个反对派联盟的发言，因为他所宣读的演说词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签了名的，加米涅夫的这次发言是反对派联盟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提出的放弃派别斗争方法的“声明”发展到重新采用派别斗争方法进行反党斗争的新阶段的转折点。◇58◇

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

“声明”，又采用了派别斗争的方法。

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记下来吧。用不着粉饰。加米涅夫说得对：猫应该叫做猫。（喊声：“对！”“猪应该叫做猪！”）

（二）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一九〕于说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末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并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读过我党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记录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宁站在一道并和他一起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的。

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声，鼓掌。）

加米涅夫当时站在反对列宁、反对他的提纲、反对党内多数的立场上，并且发挥了近似护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例如在三月间发表了半护国主义性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能负丝毫责任，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托洛茨基的倒霉就在于他在这里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59◇

托洛茨基当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时，当党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斗争时，他是在哪一个党里面呢，在左派孟什维克里面呢，还是在右派孟什维克里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二〇〕呢？让托洛茨基对我们讲清这一点吧，哪怕在报刊上也好。至于他当时不是我们的党员，这是托洛茨基应该记得的事实。

（三）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出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吉万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吉万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书记之一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让托洛茨基证明不是这样的吧。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但是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则立场能有什么关系呢？分明是托洛茨基挑拨是非地暗示我和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可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连托洛茨基也在内，一致投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次投票是在穆吉万尼事件以后，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60◇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民族问题报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托洛茨基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这件小事呢？

（四）加米涅夫在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犯了“向左边开火”即向反对派开火的错误。这样说来，党反对过而且继续在反对党的革命核心。这样说来，我们的反对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散布的诽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数开火，而且不能这样做。实际上代表大会是向右派开火，向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开火，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当然，反对派喜欢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相反地认为，反对派只是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反对派。我们

知道，右的反对派常常用“左的”外衣来掩饰自己，以便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工人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右的。现在的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现在的反对派的实践和全部工作都证明他们是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工人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对派”和所有那些苏瓦林分子）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上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五）加米涅夫引证了列宁著作中说我们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那句话，于是宣称党犯了错误，说党好像断言我们已经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了。◇61◇

同志们，这是胡说。这是加米涅夫的一点小诽谤。党从未宣称过它已经打好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完全不是我们已经打好还是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只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党肯定说我们有可能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反对派却否认这一点，因而滚到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立场不稳，力图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是回避不了的。加米涅夫又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他“已先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的政策”。这样说来，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这样说来，托洛茨基还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已经独自想出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的“四月提纲”中所维护的政策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这是愚蠢而无耻的吹牛。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这种情景真值得一笑。碰到这样的事情，农民总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笑声）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让托洛茨基试出头在报刊上证明这一点吧。为什么他连一次也不尝试呢？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那末，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同志一出现

在俄国舞台上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后知者”认为必须和“先知者”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62◇实吗？列宁当时几度声明他和企图跳过农民运动、跳过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先见之明”究竟在哪里呢？

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喜欢运用捏造和诽谤。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我在报告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流亡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称赞反对派。我说过，他们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正在干破坏党的统一也就是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作了许多引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称赞反对派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反对派进行活动来策动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力图破坏我们党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从而便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事业。

为了回答这一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一样）首先引用了称赞我党和斯大林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言论，然后引用了赞成我党立场的我国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人物——路标转换派分子〔二一〕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

说到资本家，那末他们对我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资本家在美国报纸上赞扬斯大林，说他使他们有可能获得很大的承租权。而现在又百般责骂斯大林，硬说斯大林“欺骗了”他们。◇63◇一个时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了讽刺斯大林的漫画，画着斯

大林手里提着一桶水在扑灭革命的火焰。可是后来又出现了跟它相反的讽刺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只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来斯大林不是在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声。）

可见他们资本家对我党的立场也像对斯大林的立场一样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来谈一谈乌斯特里雅洛夫的问题。乌斯特里雅洛夫是什么人呢？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资产阶级专家和一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敌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阶级敌人，他们不愿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无论如何要推翻它。也有这样一种阶级敌人，他们愿在某种程度上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有一种敌人，他们竭力准备条件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跟苏维埃政权合作，反对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专政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乌斯特里雅洛夫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敌人。

加米涅夫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也许是为了表明我党蜕化了，因此乌斯特里雅洛夫也就称赞斯大林，或者称赞我们党吧？看来不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加米涅夫不敢直言不讳。那末，加米涅夫究竟为什么在这种场合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显然是为了暗示“蜕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记说，就是这位乌斯特里雅洛夫更加称赞列宁。乌斯特里雅洛夫那篇称赞列宁的文章是我们全党都知道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列宁同志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64◇“蜕化了”，或开始“蜕化”了吧？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就足以了解这种关于“蜕化”的推测是多么荒谬的了。

这样看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什么称赞列宁和我们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

加米涅夫千方百计力图回避的问题。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勾当。这一点已由引文证明了。乌斯特里雅洛夫称赞我党，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容纳了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专家的帮助和经验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以自己的派别活动去帮助他们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乌斯特里雅洛夫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不了，便抛弃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观点，力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旁边占一席之地，力图沾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至于他们之称赞党，则是因为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存在，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想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而苏维埃政权则利用他们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我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敌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而乌斯特里雅洛夫这班先生们则称赞我们党，其根源就在于此。◇65◇

我想请你们注意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四四页）

正因为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参加某种有条件的合作（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并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正因为这一点，乌斯特里雅洛夫才称赞我们党，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并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我们党则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经验和知识，以便使他们一部分人苏维埃化和被同

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苏维埃化的人则叫他们滚开。

列宁把新兴资产阶级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区别开来，容许前者存在并加以利用，而建议逮捕后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中写道：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合作社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结果，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旁边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周转发达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三页）◇66◇

关于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家，列宁就是这样说的。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则讲过下面的话：

“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人物’，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同上，第三四三页）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反对派不同意列宁吧？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逮捕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便用经济手段和他们作斗争，一步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某些乌斯特里雅洛夫之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我党，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和现存的苏维埃制度实行

某种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大家知道，并不是没有成绩的。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反对派，却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在破坏我党的统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推翻专政的勾当。◇67◇

我希望反对派最后会了解第一类称赞和第二类称赞之间的全部差别。

三、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反对派在这里说到个别中央委员的一些错误。当然，个别的错误是有过的。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纲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政纲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例如托洛茨基说，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有一个时候犯过错误。这是确实的。在我们收购机关混乱时期我的确提议过**暂时**开放一个港口来输出谷物。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至于托洛茨基的这类经中央纠正后不再坚持的错误，我可以举出数十个数百个。如果我列举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但没有坚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极严重的、不大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错误，那末我得为此做几次专题报告。但是，我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在政治论战中，应当谈的不是这类错误，而是后来发展成政纲并引起党内斗争的那种错误。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谈到的问题，恰好是这类没有发展成反对派别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错误。因为反对派谈的正是这些问题，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反对派首领们过去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吧。◇68◇也许这对他们是一个教训，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错误了。

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硬说：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即使不是几个星期，也只有几个月了。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这是最危险的错误，说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险的情绪。但是中央因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没有坚持自己这个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议准许我们的工矿企业和托拉斯把国家财产连固定资本在内抵押给私人资本家，以便获得贷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这是投降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这个计划，托洛茨基争了一下，可是后来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议把我们的工业严格地集中起来，那么狂乱地集中起来，以致必然会把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阶级抛出工厂大门。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个烦琐的、狂乱的和政治上危险的提议。托洛茨基几次向中央提到将来势必走上这条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有人喊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厂关门不可。”）是的，事情是会弄到这个地步的。可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们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吧，他们常常喜欢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说◇69◇的“发财吧”，并且围着这个“发财吧”手舞足蹈。

还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讨论乌尔卡尔特[①]的租让和这一租让的极苛刻的条件的问题。结果怎样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乌尔卡尔特租让的苛刻条件，并且坚持自己的建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中央拒绝租让乌尔卡尔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从加米涅夫的错误中举出一件事实来说吧，本来我是不想说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他令人厌烦地屡次提到布哈林的错误，提到布哈林早已纠正和消灭了的错误。我说的是加米涅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琴斯克城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喊声：“可耻！”）就是沙皇逊位后授以“即位权”的那位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加米涅夫由于这个错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受到我们党的严厉斥责。可是，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这类错误呢？当然不要，因为它们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灭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种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是为了杜绝反对派的吹毛求疵和恶意诽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为犯者所坚持而且后来发展为派别的政纲。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70◇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

————————————

① 乌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工业家，他是十月革命前在俄国拥有大量土地、森林和矿产的“俄亚联合公司”的经理。此处乌尔卡尔特即指“俄亚联合公司”。——译者注。

例如托洛茨基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错误，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党政纲。应不应该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应该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就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

又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错误就造成了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前的危机。

又如反对派联盟目前的错误则形成了派别的政纲和反党的斗争。

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需要的。

谈到党内意见分歧时能不能对这种错误绝口不谈呢？显然是不能的。

四、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硬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不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同志们，这是胡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是嫁祸于人。实际上只能说季诺维也夫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观。◇71◇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说法，其中没有一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两种说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种说法。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也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了。

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上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不容指责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二二〕、“阿拉克切也夫制度”〔二三〕。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第二、这就是说，不是像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即以**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72◇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以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信服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于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请看季诺维也夫把党的专政（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的“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时候，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在这里声明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党领导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赞许的，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如此。

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季诺维也夫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领导，而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领导。◇73◇

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现在，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船舵、方针是在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手中。”（见季诺维也夫“工农联盟和红军”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四页）

能不能否认我国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呢？不，不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原来是两个阶级管理我们国家的生活。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是否相容呢？显然是不相容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于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掌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浅显和不容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再作解释。季诺维也夫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阶级的领导。那为什么把这个专政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按照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我们就应当有两个政党的领导，以符合于两个阶级掌握“国家生活大权”的情况，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结论：不论季诺维也夫“理论”的第一种说法或第二种说法，都同样说明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74◇

五、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其次，我想谈一谈托洛茨基的几个含糊不清的声明，这些声明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想举出几件事实。

一件事实。关于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这一问题，托洛茨基装模做样地回答说：“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实本身……这件事实本身已经证明，我已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

“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是什么意思呢？列梅勒当时质问得对：“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真的，怎能把这些肮脏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笑声）对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始终没有答复。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残余放在党的门口是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在党内进行斗争之用呢，还是乾脆把它们拿去烧掉？看样子，托洛茨基把它们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否则，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入党后不久就跟党发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那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呢？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斗争。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托洛茨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全国的争论。一九◇75◇二三年，托洛茨基在党的建设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党的领导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一九二五

年至一九二六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联盟在我国革命和当前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

对于一个“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都已放在党的门口”的人来说，意见分歧不是太多了吗？

能不能说托洛茨基与党发生的这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那末，托洛茨基这个极端含糊的声明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我想只有一个目的：混淆视听，把听众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实。大家知道，从我们党的思想体系来说，从我们革命的前途来说，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问题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理论”曾经妄图而且继续妄图在我国革命动力问题上与列宁主义理论一争上下。因此，人们屡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现在（一九二六年）对其不断革命“理论”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全会上发言时是怎样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在我们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这样说来，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虽然有“缺陷”，但这个“理论”的其他方◇76◇面并没有“缺陷”，而且仍旧有效。但是，怎样把不断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分开来呢？难道不断革命“理论”不是一套完整的观点吗？难道可以把不断革命“理论”看做一只箱子，此方说，它的两角已经腐朽，而其余两角依然完整无缺吗？其次，难道在这里可以只作一个简单的毫不负责的声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不说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说出他认为不断革命“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吗？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缺陷”，他认为这个“理论”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这一切他只

字未提。因此，应当把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看做敷衍塞责的答复，看做以“缺陷”这样含糊不清、毫不负责的词句来搪塞别人的企图。

托洛茨基在这里的举止正像古时一些狡猾的巫师一样，这些巫师总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来搪塞问卜者，例如“渡河时一支大军将被击溃”。渡**什么**河，**谁的**军队将被击溃，那谁知道。（笑声）

六、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其次，我想谈谈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特殊手法。季诺维也夫这种手法的特点就是把一切时期和日子弄乱，搅做一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和公式同它们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分隔开来，把它们变为陈腐的教条，从而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基本要求。◇77◇

请看几件事实。

第一件事实。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引证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一书中的尽人皆知的一句话：“工人阶级的任务（指社会主义的胜利。——斯大林注）在民族范围内是不能完成的。”〔二四〕

其次，季诺维也夫从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摘引了下面一段话：“对我们来说，困难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大陆上的革命是必不可免的，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在广阔无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的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被镇压下去呢？”①（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俄文版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二五〕）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所说的这几段话并做出结论说：因此，**就资本主义的一切时期来说**，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都是否定的。

能不能说季诺维也夫了解了马克思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观点和基本路线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完全没有了解马克思，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从马克思这几段话中能不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78◇内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马克思的话中只能得出结论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怎么办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

季诺维也夫忘记马克思这几段话是指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而言，当时整个资本主义是在向上发展，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未伴随着像英国那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腐朽过程，当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是而且不能是瓦解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像它以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帝国主义时期那样。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来说，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不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完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过：在旧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解答是否定的，而且解答得完全正确。可是现在，在目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当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候，能说整个资本主义现时还在向上发展吗？不，不能这样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说明，在帝国主义时期，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

走下坡路的。列宁说得完全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同志关于这一点说道：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79◇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互相错综”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页）

整个向上发展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这时，世界已被各资本主义集团瓜分，资本主义跃进式的发展需要以军事冲突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各帝国主义集团间的冲突和战争，削弱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线，使它易被击破，造成在个别国家内突破这一战线的可能。在那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现时，在帝国主义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已成为可能的了。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而季诺维也夫不愿意了解的也就是这一点。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抛开马克思的**观点**，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来应用这些引文。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割断这些词句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条件的有机联系，把它们变成教条，来顶替马克思的◇80◇**观点**。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二件事实。季诺维也夫从“共产主义原理”〔二六〕（一八四七年）中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不能在某一个国家内发生”的话，把恩格斯的这些话和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苏联已经实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十二条要求的十分之九的声明加以对比，并由此做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在自己的声明中粉饰了苏联的现时条件。

说到引自恩格斯的话，需要指出，季诺维也夫在解释恩格斯这段话时所犯的错误，也和他在解释马克思的话时所犯的错误一样。显然，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资产阶级社会整个向上发展的时期，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可能胜利的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解答。把恩格斯这个适用于旧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原理机械地应用到新的资本主义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这就是歪曲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以适合于那些离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发展条件而引来的个别词句。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已经说过，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公式。可是应该了解，不能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谈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时期，即整个资本主义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相提并论。从前认为不可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下已经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了，这难道难以了解吗？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对待恩格斯，正如对待马克思一样，始终是忠于修正派的引证马克思◇81◇主义经典著作家的手法的。

至于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个结论，那他是直接歪曲了恩格斯关于工人革命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的。季诺维也夫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恩格斯在他的十二条要求中提供了一个包括消灭阶级、消灭商品生产以及消灭国家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是完全不对的。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在恩格斯的十二条要求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消灭阶级，消

灭商品经济，消灭国家，消灭各种各样的私有制。相反地，恩格斯的十二条要求是以“民主”（恩格斯当时所理解的“民主”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阶级的存在和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出发点的。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十二条要求指的是直接“侵犯私有制”（而不是完全消灭它）和“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而不是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下面是恩格斯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为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已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①]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82◇

接下去就是列举大家已经知道的十二条要求或措施（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消灭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等等的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是直接侵犯私有制、保证工人阶级生存、巩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需的**初步措施**。

结论只有一个：季诺维也夫曲解了恩格斯，把他的十二条要求说成详尽的社会主义纲领。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恩格斯所提出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的那些要求或措施，有十分之九已在我们苏联实现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呢？

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可见，忠于自己的引证手法的季诺维也夫，在说到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声明时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请看，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殊手法竟使他走到怎样的地步。

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手法使我想起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瑞典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讲的，在一九〇六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时候讲的。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表现的书呆子气描写得很可笑，我们这些代表听了，笑得全身发软。“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海陆军起义的时候。◇83◇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向你们请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坡里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坡里、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一点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海军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

无疑地，这个故事夸大了事实。但是，同样无疑地，这个故事一

针见血地说中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

第三件事实。这里谈的是引证列宁著作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为了从列宁著作中引出一大堆话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用尽了一切办法。看来季诺维也夫认为引证愈多愈好，可是他极少注意到引文说的什么，会引起什么结果。如果细读这些引文，那就不难了解，季诺维也夫从列宁著作中引证的◇84◇话，没有一句（哪怕用暗示的方式）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现在的投降主义立场的。列宁曾说过，必须认为专政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和苏联无产阶级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不知为什么没有从列宁这段主要的话中引出一个字来。

季诺维也夫引证了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里说到我们苏联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段话。但他甚至没打算用一点点心思来提出（哪怕暗示一下）这样的问题：这段话说明什么，把它引来对谁有利，对反对派联盟有利，还是对联共（布）有利。

季诺维也夫力图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从列宁著作中引来用以证明这个论点的那些话，却把自己的论点完全推翻了。例如下面就是这些引文中的一段：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下去**，直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就要**困难些**。”[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二八四页）

季诺维也夫竟没有想一想，这段话不是有利于反对派联盟而是有利于党的，因为它不是说在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说这种建设是困难的；并且这段话承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85◇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党总是说，在苏联开始革命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些，但是建成社会主义则困难些。这是不是说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否认在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相反地，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结论说，尽管有困难，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试问，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引证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用一大堆引证来把听众弄得“目瞪口呆”，把水搅浑。（笑声）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手法，确定无疑地使他陷入困境，我想这一点现在是很明白的了。

七、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

最后谈谈季诺维也夫对“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都是修正主义。试问，为什么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难道科学不是不断发展，不是用新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的吗？原来他认为“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旧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就不能不把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凡是用新经验和新公式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季诺维也夫置自己于可笑的境地，同时以为自己是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那又有什么办法呢？◇86◇

例如斯大林有没有权利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指示和基本路线，把他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一九二四年）加以改变并使之更加精确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旧公式并使之更加精确，就是修改这个公式，而照德文

的意思，修改就是修正。斯大林岂不是显然陷入了修正主义吗？

由此看来，我们有一个关于修正主义的新的季诺维也夫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在民族范围内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在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的时期，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时期，这种胜利是可能的，那末，列宁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例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或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所发生的”社会主义“变革不过是杯内风浪”〔二七〕；而恩格斯后来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改变了这种论点，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那末，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列宁根据苏联革命胜利的经验，改变了这个公式，代之以另一个公式，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由俄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完成，那末，列宁在对待恩格斯尤其在对待马克思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87◇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已经养成奋不顾身的革命创造精神，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 **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①]，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八页至第四二九页）

你们看，列宁在这里简直“修改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话，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他是陷入“修◇88◇正主义”了。

例如恩格斯和马克思确定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家知道，公社是由两个党领导的，其中没有一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列宁后来根据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说稍微发达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一个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那末，列宁在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陷入明显的“修正主义”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曾说联邦制是不可采用的国家组织形式，而在一九一七年，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他改变了、修改了这个公式，说联邦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适当的国家组织形式，那末，原来列宁在对待自己和列宁主义来说是陷入“修正主义”了。

如此等等。

这样，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应当用新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凡是使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家的个别原理和公式更加完善的都是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字眼，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字眼顶替马克思主义的观◇89◇点和方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字眼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针对季诺维也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季诺维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话的意义和作用。

二 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反对派首领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派的个别错误和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已在结论的第一部分即几点意见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让我直接来谈本题。

一、帝国主义时期个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第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你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一切相当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90◇

反对派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胜利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

什么地方呢？

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把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帝国主义以前的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反对派的这种错误产生了他们的另一种错误，即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把均衡趋势与这个规律对立起来，因而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这两个错误引起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他们把根据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所得出的公式和原理机械地应用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新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如用三言两语来说明，其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庞大的垄断联合的发展代替了通过自由竞争的发展；财政资本、“腐朽的”资本代替了旧的、“文明的”、“进步的”资本；跃进式的发展，通过各资本主义集团以军事冲突来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发展，代替了资本“和平的”扩大和向“自由”土地的伸展；因此，垂死的资本主义，整个向下没落的资本主义，代替了旧的整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这一点说道：

“让我们回想一下，以往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91◇什么呢？这就是自由竞争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联合，整个地上的世界（地球？——斯大林注）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的意义，因为当资本能够畅然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的时候，当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整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

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成长……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并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二〇〇页至第二〇一页）

他继续说道：

“现在已**不能**照过去那样在**平稳进化**[①]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资本主义的比较平静的、文明的、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财政资本**正在排挤**并且要把某一国家排挤出列强的队伍，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二〇三页）

由此就得出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基本结论：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92◇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互相错综”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页）

我们的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整个重要性。

而我们党的立场的出发点则是承认现代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

可惜，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了。但是，毫无疑义，这是说整个资本主义不是走向复兴而是走向死亡，整个资本主义不是向上发展而是向下没落。

从这个总的问题就产生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主义者在讲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时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差别在日益加大呢？

不，不是指这一点。把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那是庸人的看法。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把**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淆起来，正是这种庸人的看法。反对派正是以这个糊涂观念为出发点而得出了一个极不正确的结论：过去的发展不平衡比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厉害。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第◇93◇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这种不平衡在十九世纪比在二十世纪**更厉害**。”（见托洛茨基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季诺维也夫当时也这样断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较缓和，这是不正确的。”（见季诺维也夫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诚然，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争论以后，反对派认为必须改变阵线，因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发表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者干脆不提自己这种错误。例如托洛茨基在扩大全会上演说时说：“至于发展的速度，那末，帝国主义是**无止境地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至于季诺维也夫，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中也认为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是最明智的办法，虽然他不能不知道所争论的正是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是在增强还是在削弱的问题。但这只说明争论多少教育了反对派，对反对派不是没有益处的。

总之，不能把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为一谈。

能不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差别的减小和这些国家的日趋均

衡是在减弱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是在加大还是在缩小呢？无疑是在缩小。均衡化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无疑是在上升。均衡化的上升是不是和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相矛盾呢？不，不相矛盾。相反地，均衡化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础。只有像我们的反对派那样不懂得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人，才能把均衡化和帝国主义时◇94◇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立起来。正因为落后国家在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便尖锐起来，正因为如此，便造成了一些国家超过另一些国家并把它们从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可能**，从而为军事冲突、为削弱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突破这一战线创造前提。谁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谁就毫不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问题。

因此，均衡化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加强的条件之一。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些国家**按照通常的方式**，即按照所谓**进化**的方式，不经过跃进，不经过战争灾祸，不经过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而在经济方面赶上另一些国家，然后超过它们呢？不，不能这样说。这种不平衡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列宁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二八〕一书中也曾写过。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当平稳、相当缓慢的，一些国家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经过跃进、不一定经过世界规模的军事冲突而超过另一些国家的。现在说的不是这种不平衡。

那末，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是：一些国家跳过另一些国家，一些国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灾祸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加深和加剧起来，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削弱，个别国家的无产

阶级可能突破这条◇95◇战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

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

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是在加强和加剧起来。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冲突是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

因此，鼓吹可能和平解决这些冲突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应得出结论：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和加剧这一事实的反对派是滚到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如此。

各个帝国主义集团是在什么时候把世界瓜分完毕的呢？◇96◇

列宁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叶把世界瓜分完毕的。

事实上第一次提出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

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叶才能发现和论证**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已谈到这一点，当时我说，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列宁同志发现和论证的。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初次尝试。这次尝试

使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是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的基础的破坏。

不用说，继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必有第二次尝试，并且帝国主义阵营已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

无庸怀疑，重分世界的第二次尝试将使世界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第一次大得多。

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规律看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前途直接使社会主义可能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是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任何根据，来玩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种“理论的”把戏。◇97◇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纲领性的论文中关于这一点说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结论是：

（甲）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他们看不见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差别，或者回避对这种差别的强调。为什么他们要回避这一点呢？因为从这种差别里会得出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

（乙）反对派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不懂得或者低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决定意义。为什么他们低估这一点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呢？因为正确估计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结论。

（丙）由此产生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否认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谁就不得不对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而谁对不平衡规律的意义默不作声，谁就不能不抹杀存在于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98◇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问题就是如此。

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从实际上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是我们党的路线，它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机警地注视事变的进程，并准备在有利条件下独立地突破资本战线，夺取政权，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另一条路线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路线，他们对独立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适当性散播一种怀疑的情绪，并号召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等待“总爆发”的时机。

我们党的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加强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并发挥主动性的路线，而我们的反对派的路线则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消极等待并限制主动性的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使个别国家的无产者积极化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路线，是消极等待的路线。

列宁万分正确地写了一段和我们目前的争论有直接关系的至理名言：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99◇去了。等

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列宁的这段话是不应该忘记的。

二、季诺维也夫怎样“改正”列宁的话

我已经谈过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我想谈谈季诺维也夫怎样歪曲或者“改正”列宁那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主要论文。我指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并在我们讨论时几次引证过的那篇著名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季诺维也夫责备我对这篇论文引证得不完全；同时他力图给这篇论文作一种只能说是完全歪曲列宁的观点、完全歪曲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本路线的解释。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来，并把上次由于时间短促而被我放过的几行用着重号标出。这段话就是：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在其中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那个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100◇**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力量去反对那些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

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季诺维也夫在引证这段话时作了两点解释：第一点是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第二点是关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

我们先谈第一点解释。季诺维也夫以为既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民主共和国，那末最多只能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季诺维也夫恬不知耻地在这里做出极其含糊而又固执的暗示，说列宁在这里大概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要反驳季诺维也夫这个不大正派的暗示，只须读一下引文中谈到“**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斗争”的最后两行就够了。显然，列宁说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指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还不知道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早在一九〇五年就知道个别的苏维埃是推翻沙皇制度时期的革命政权的萌芽。但他当时还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现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在这年夏天，主要在其“国家和革命”〔二九〕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过渡社会的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形式问题。其实这也就说明列宁在上面引文中所说的不是苏维埃共和国，而是民主共和国，◇101◇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在这里的做法，正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做法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认为一般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在巴黎公社以后解释这个名词则说这种共和国应当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国。我更不必说，假如列宁在那段话里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家”等等了。

可见季诺维也夫想“改正”列宁的话的企图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谈谈季诺维也夫的第二点解释。季诺维也夫硬说列宁同志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句话不应当像平常人一般所应了解的那样去

了解，而应当有所不同，应当了解成这样：列宁在这里所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为什么，根据什么，季诺维也夫并没有说明。我得声明：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又一次企图“改正”列宁的话。上面引文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这里说的是“**组织了**”，而不是“组织着”。是否还需要证明这中间有差别呢？假如列宁指的只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那他就会说“组织着”，而不会说“组织了”，这是否还需要证明呢？可见列宁指的不单是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而且是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生产。

可见季诺维也夫想“改正”列宁的话的第二个企图也应当认为是惨败了。

季诺维也夫竭力用“不能靠仙法在两星期或两个月内建设社会主义”这类笑话来掩盖自己“改◇102◇正”列宁的话的企图。恐怕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笑话是为了“在败局中故作镇静”。季诺维也夫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打算在两星期、两个月或两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呢？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人，他为什么不指出他们来呢？他不指出他们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人。季诺维也夫需要这类捏造的笑话是为了掩盖其“改正”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工作”。

总之：

（甲）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其“论欧洲联邦口号”那篇主要论文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

（乙）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同时这一切任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用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帮助全世界无产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手段；

（丙）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截头去尾和“改正”列宁的话，使之适合于目前反对派联盟的半孟什维克的立场。然而实行这种企图时所使用的手段是拙劣的。我认为再解释是多余的了。

三　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03◇

同志们，现在让我谈谈我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一、反对派的“手腕”和列宁党的“民族改良主义”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的最大的错误是关于在一个国家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样看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列宁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一种谁也不知道的“理论”。我对这一点的了解是这样：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藉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这一点，我想在下面加以说明。现在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的“理论”的声明是一种手腕，一种设计，一种怯懦的笨拙的诡计，他打算用这种诡计来掩盖他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所作的斗争，这一斗争从一九一五年就已开始并一直继续到现在。托洛茨基的这种手法是不是老老实实的论战的表现，让同志们来判断吧！

我们党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决议是以列宁同志的纲领性的名著为出发点的。列宁在这些著作中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是可能的；就解决无产阶级◇104◇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这一专政的胜利是有保证的；我们苏联无产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在其著名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的那一段话，我刚才引证过了，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这篇论文写于一九一五年。这篇论文说，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在同一年即一九一五年发表文章反对列宁这篇论文，称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民族狭隘性”的理论。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我在报告中还从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里摘引了一段话，在那里列宁直接肯定地说，就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来说，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应该认为是有保证的。这篇著作写于一九一九年。下面就是这段引文：

“不管各国的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所以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压倒我们，我们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就必然获得胜利。可是资产阶级要这样来压倒我们是办不到的**。”[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105◇卷第九十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们可以看见，列宁在这里直接说到苏联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在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方面是可能获得胜利的。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是不同意这段引文的基本论点的。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从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著名小册子“论合作制”中摘引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你们可以看见，这段话使人们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会再有任何怀疑。

你们可以看见，这段引文列举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因素：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106◇权掌握的大生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合作社。

不久以前，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企图把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即“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页）和这段话对立起来。把这两段话互相对立起来就是曲解列宁“论合作制”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意思。难道电气化不是大生产的组成部分吗？难道在我国没有集中在无产阶级政权手里的大生产，电气化一般是可能的吗？列宁在“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合作制”这本小册子里说大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之一，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电气化，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大家知道，反对派是正进行多少公开的而多半是隐蔽的斗争，来反对摘自列宁的小册子“论合作制”的这段引文所阐明的基本论点的。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列宁主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论点就是如此。

党断定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联盟的某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如“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托洛茨基），是和列宁主义的上述论点根本矛盾的。

党肯定指出反对派联盟的这些论点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

党肯定指出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107◇的。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这里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党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在做报告时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五年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理论是“民族狭隘性”的理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为什

么呢？难道默不作声就是论战中有勇气的表现吗？

其次，我问过托洛茨基，现在还要问他：不久以前，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在众所周知的告反对派的文件中再度责备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民族狭隘性”的理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但是这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为什么呢？是否因为默不作声也是托洛茨基的一种“手腕”呢？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托洛茨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问题上仍然是站在他那反列宁主义的旧立场上的。说明托洛茨基没有勇气直接反对列宁主义，而企图藉批评事实上不存在的斯大林的“理论”来掩◇108◇盖这一斗争。

现在来谈谈另一位“耍手腕的”加米涅夫。他大概受了托洛茨基的感染，也耍起手腕来了。但他的手腕比托洛茨基耍得还要笨拙。托洛茨基企图责备斯大林一个人，而加米涅夫竟责备全党，说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大家瞧，我们党原来是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国际革命的前途。因为我们党是列宁的党，因为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完全以列宁的著名原理为依据，于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理论了。列宁是“民族改良主义者”，——加米涅夫就是拿这样愚蠢的话来对待我们的。

我们党有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呢？是的，有决议，而且有非常明确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什么时候被党通过的呢？这些决议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在我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我指的是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著名决议。这项决议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呢？是的，是列宁主义的，因为这一点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权威人士都能给我们作证，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曾做报告**维护**这项决议，加米涅夫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担任主席并在表决时**赞成**这项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设法揭发党，指出它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有矛盾有分歧呢？

党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表决时也赞成这◇109◇项决议，现在他们两人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为什么他们不把党的这个重要文件，即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显然完全是列宁主义的决议当做他们的论据呢？看来这样做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你们是否注意到整个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避开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像猫儿避开热粥一样？（笑声）为什么他们那样惧怕这个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报告并在加米涅夫的积极赞助下通过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呢？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于这项决议连提都不敢提呢？难道这项决议不是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吗？难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不是我们辩论中引起争执的基本问题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则背弃这项决议，因而也就背弃列宁主义，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现在他们惟恐被人揭穿，对于这项决议连提也不敢提了。

这项决议说些什么呢？

下面就是这项决议中的一段：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①]。”

其次：◇110◇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障。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①（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一论断（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三〇〕）

可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切地说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基本原理。

可见决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与列宁主义相反的东西，而决议中一系列的论点都是以直接否定◇111◇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

可见决议完全反映了现在重新掀起的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

你们知道，我的报告是以这个决议的指导性的原理为基础的。

你们大概还记得我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责备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违反了这项决议，背弃了这项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决议。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设法消除这种责难呢？

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秘密就在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已背弃了这项决议，并且一背弃了这项决议就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在表决时赞成了这项决议，也就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或者这项决议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背弃了这项决议，也就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

有几位发言人（里泽似乎也在内）在这里说，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相反地，是托洛茨基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了。同志们，这完全是胡说。加米涅夫◇112◇和季诺维也夫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这一事实，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直接证据。

总之：

离开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所规定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方面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是谁呢？

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国际革命前途”的是谁呢？

原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现在叫嚷我们党的“民族改良主义”，这是因为他企图藉此转移同志们对他的罪过的注意并嫁祸于人。

正因为如此，加米涅夫说到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的“手腕”乃是一种诡计，一种既丑恶又笨拙的诡计，这种诡计的用意是在以叫喊我们党的“民族改良主义”来掩盖自己背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行为。

二、我们正在苏联建立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在报告中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说过，社会◇113◇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远没有建立，还必须把它建立起来。其次，我说过，问题因此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我说过，如果用阶级语言来述说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呢？

托洛茨基在其演说中断言，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政治上战胜它。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经济上战胜它，因为在政治上它已经被战胜了。

在经济上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①]）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列宁在其著名的“论粮食税”小册子纲要〔三一〕中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114◇质”、“经济基础”所下的定义。

———————————————

① 见本卷第二十一页至第二十二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我们能否指望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这就是现时我们意见分歧的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干脆避开了这个问题，大概他认为默不作声是比较明智的。

至于我们正在建立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至少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

（甲）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是联合的大生产，我国非国有化的生产则是分散的小生产，大家知道，大生产而且是联合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占优势，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乙）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已在领导并开始控制小生产，无论城市的或乡村的小生产都是一样；

（丙）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前者对后者占有无疑的优势，并在步步前进，在生产或流通方面不断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至于促使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其他一些因素，我就不谈了。有什么理由推断说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今后不会再延续下去呢？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斯大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力求消灭阶级和国家，就是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是的，同志们，但是要知道国家是需要军队去反对国外的敌人的。”（引自速记记录。——斯大◇115◇林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话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消灭阶级和国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军队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军队（托洛茨基这样想），所以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性还没有消失以前，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同志们，这是把一切概念混淆起来了。或者在这里把国家了解为

不过是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这是荒谬的，因为国家首先是一个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工具，不言而喻，既然没有阶级，也就不会有国家。或者在这里认为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军队。这也是荒谬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是有保卫无阶级的社会免于外敌侵犯的武装人民。社会学提供不少的例子，说明人类历史上有过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用某种方法防御外敌侵犯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也将是这样，它虽然没有阶级和国家，但仍可以有防御外敌侵犯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的民兵。我认为我国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很少可能的，因为无疑地，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的消灭，——这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追求社会主义的强烈的愿望，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但是从理论上说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没有阶级和国家，却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民兵。

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党纲中也有一定的说明。党纲中是这样说的：◇116◇

“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不能不有公开的阶级性质，即完全要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①（见“联共（布）党纲”〔三二〕）

托洛茨基大概忘记了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谈到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硬说“我们**正在**日益脱离孤立的战时共产主义而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

这样说来，有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的我国国民经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济，正在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我所以讲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因为现实世界上并没有另一种世界经济。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荒谬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

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像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比方说，我们从“美孚石油公司”那里得到贷款。我们从德国资本家那里得到贷款。但我们得到贷款，不◇117◇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在这里依赖是双方面的。

这是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使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和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你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就拿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能不能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英国或美国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依赖输出和输入，它们依赖其他国家的

原料（例如美国依赖橡胶和其他原料），它们依赖销售市场以销售自己的装备和其他成品。

这是不是说既然没有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也就不能有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118◇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说到我国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他还把这种依赖性曲解为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合。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可是，难道我们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吗？当然不是！同志们，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获得胜利。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实际上我们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这样说来，我国国民经济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之下发展，因为目前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世界经济。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呢？资本家嘴里的控制不是一句空话。资本家嘴里的控制是一◇119◇种实在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控制首先就是财政上的控制。可是，难道我们的银行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们是在欧洲资本主义银行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吗？财政上的控制就是在我国设立各个资本主义大银行的分行，就是设立所谓“女儿”银行。可是，难道我国有这样的银行吗？当然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就永远不会有。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控制我们的工业，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非国有化，使我们运输业非国有化。可是，难道我们的工业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不正是作为国有化的工业而在发展吗？难道有人打算把我们国有化的企业，即使是一个企业，变为非国有化的吗？当然，我不知道在托洛茨基那里，在租让委员会里有什么打算。（笑声）不过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破坏国有化的人就不能在我国立足，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有权支配我们的市场，就是取消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知道，西方的资本家在竭力冲破对外贸易垄断的铁壁时曾不止一次碰得头破血流。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垄断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盾牌和屏障。可是，难道资本家在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这件事情上已经获得胜利了吗？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对外贸易垄断无论如何要长久存在下去，这难道不易理解吗？

最后，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使我国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使我国的法律适合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和口味。可是，难道我国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吗？难道我们的法律◇120◇不是根据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制定的吗？为什么不举出事实，即使是一个事实，来说明我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呢？让他们举举看吧。

资本家就是这样理解控制的，当然，这里是说实际的控制，而不

是空谈什么有名无实的控制。

如果说的是这种实际的资本主义控制（也只能是这种控制，因为只有蹩脚的文人才能空谈有名无实的控制），那末我应当声明：在我国没有这种控制，只要我们的无产阶级存在，只要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控制。（鼓掌）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止巩固一年或十年，而会巩固半世纪**甚至一世纪**。”（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这样说来，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实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

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二百年，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121◇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一百年，或者不到一百年。还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就已显示出它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并且优越得多。这里时间长短的不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有更发达的技术。

从那时起，技术显示了空前的进步，发展速度简直快极了。试问，托洛茨基有什么根据来推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

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

既然如此，在这里还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喊声：“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有两个。

第一、托洛茨基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驳时，已经从旧的论战基地退到新的基地了。从前反对派是从内部矛盾、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来进行反驳，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122◇托洛茨基则强调外部矛盾，强调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从前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现在他改变战线，退到另一个基地来批评党的立场，硬说我国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于是他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反对派的旧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但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绝路上去了，退却到泥坑里去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是直接公开地退却到苏汉诺夫那里去了。实质上托洛茨基的“新”论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我们没有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条件，我国国民经济因而正在变成而且定要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属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单位。

但这是“苏汉诺夫思想”，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苏汉诺夫思想”。

反对派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那里去了，滚到直接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胜利的苏汉诺夫立场上去了。

三、我们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似乎我们的反对派已不敢公然否认。我们是否和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反对派却打算表示怀疑。有些反对派分子甚至硬◇123◇说我们党低估了这个联盟的意义。其中有一位加米涅夫，竟至责备党是民族改良主义，说党以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顶替了国际革命的前途。

同志们，这是愚蠢，不可救药的愚蠢。只有疯子才会否认我国无产者和其他各国无产者的联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大意义。只有疯子才会责备我们党低估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事业。只有和全世界无产者结成联盟才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整个问题就在于如何了解这一联盟。

苏联无产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了政权，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他们的联盟。

德国无产者在一九一八年掀起了革命，这就是对世界各国无产者特别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阶级的联盟。

西欧无产者瓦解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不替反革命将军们运输武器，组织行动委员会并破坏本国资本家的后方，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西欧无产者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的这种同情和援助，我们就不能在内战中获得胜利。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派遣许多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监督我们的建设，然后向全欧洲的工人宣扬我们的建设成就，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的帮助，这就是对苏联无产者极大的援助，这就是和苏联无产者的联盟，并扼制帝国主义可能对我国实行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援助和这种扼制，我们现在就不◇124◇会有“喘息时机”，而没有“喘息时

机”，我们就不能在我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苏联无产者巩固自己的专政，消灭经济破坏状态，展开建设工作，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成绩，这就是对全世界无产者、对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对他们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大援助，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它的巩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胜利，是鼓舞全世界无产者去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消灭会引起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最黑暗最残酷的反动统治，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

我国革命的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这种互相援助和这种联盟。

这就是苏联无产者和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种种形式。

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些联盟形式。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只承认一种联盟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可惜这种形式暂时没有实现，而反对派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直接寄托于这种未来的援助上面。

反对派认为只有承认这种援助形式才能使党保有“国际革命前途”。但是我已经说过，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只能使我们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让步并终于走向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反对派提出来的这种和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唯一形式，即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125◇家援助”的形式，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是投降主义的烟幕。

加米涅夫的“国际革命前途”是投降主义的烟幕，——这就是加米涅夫勾当的归宿。

因此，加米涅夫在这里责备我们党是民族改良主义时的那种勇气只能令人惊讶罢了。

说得客气一些，革命性或国际主义向来不比人强的加米涅夫的这

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这位一向是孟什维克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孟什维克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笑声）

列宁当时有充分根据称之为十月革命的“工贼”的加米涅夫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加米涅夫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是不是国际主义者。我应当声明，苏联无产阶级用不着受十月革命的“工贼”的考核。

你想知道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程度吗？去问一问英国工人，问一问德国工人，（热烈鼓掌）问一问中国工人吧，——他们会告诉你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

四、蜕化问题

这样一来，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反对派的观点是公开否认在我国有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

但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使党走向蜕化的前途，而蜕化的前途又会导致放◇126◇弃政权并引起组织另一政党的问题。

托洛茨基装做不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样子。这是伪装。

不容置疑，假如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的革命又迟延下去，而我们这里资本的增长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增长一样，那末，从反对派的观点看来，出路只有两条：

（甲）或者是继续掌握政权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因而实行“米勒兰主义”；

（乙）或者是为了不致蜕化而放弃政权，组织一个和正式的党并列的新党。这正是我们的反对派一向追求的、实际上还在继续追求的目的。

两个党的理论，或组织新党的理论，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直接结果，是蜕化前途的直接结果。

这两条出路都是引向投降主义，引向失败主义的。

在内战时期问题是怎样的呢？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善于组织军队和抗击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我们就会失去政权。当时战争占第一位。

现在，当内战已经结束和经济建设任务占第一位的时候，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对资产阶级作越来越大的让步，就一定会蜕化，◇127◇变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尾巴。

共产党人能不能同意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而实行资产阶级政策呢？

不，不能而且不应该。

因此出路就是：放弃政权，成立新党，给复辟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投降主义是反对派联盟目前的立场的必然结果，结论就是如此。

四　反对派和党的统一问题

现在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谈谈反对派联盟和我们党的统一问题。

反对派联盟是怎样形成的呢？

党肯定地说，反对派联盟是经过“新反对派”，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而形成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暗示说不是他们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而是托洛茨基到他们这里来了。

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已谈到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决议。我已谈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128◇夫背弃了这个托洛茨基没有接受

而且不能接受的决议，他们背弃它是为了靠近托洛茨基并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这是否对呢？是的，这是对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避开问题，默不作声。

其次，我们还有我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三三〕。大家知道，这项决议是由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我在报告中说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弃了这项决议，他们在自己的特别声明中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斗争是正确的。这是否对呢？是的，这是对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否打算用什么来反对这种论断呢？没有，他们没有这样打算过。他们默不作声。

还有几件事实。加米涅夫在一九二五年论到托洛茨基主义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已成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藉以在我们党内表现出来的孔道。他的言论的全部性质、他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表明是这样的。他在反党斗争中已成为国内一切反党力量的象征。”……“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使非布尔什维主义学说所指望的那一部分党员，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也就是应当掌握党的命运的未来成员，不受这种学说的感染。因此，尽力用各种方法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不正确，说明**必须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所选择，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①]这应该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见加米涅夫“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129◇

加米涅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加米涅夫不敢重复这些话，他就是抛弃旧有立场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论到托洛茨基主义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近来的言论（“十月革命的教训”）不是别的，而是相当公开地**企图修正甚至直接取消列宁主义基础**[①]。稍过一些时候，我们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见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拥护列宁主义”文集第一二〇页）

加米涅夫在发言中声明“我们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因为他没有修正列宁的基本思想”，拿这个声明和季诺维也夫的上述一段话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在同一年即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论到托洛茨基时写道：

“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一九二五年俄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党的问题。在一九〇三年，这个问题是根据对党章第一条的态度来解决的，而在一九二五年，则是根据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的。谁说托洛茨基主义可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合法色彩’，谁就◇130◇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②]。必须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是过去的阶段，现在要建设列宁主义的党，只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才有可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真理报”）

季诺维也夫现在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复这些话呢？如果他准备重复这些话，为什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呢？如果他不能重复这些话，那末，季诺维也夫已背弃列宁主义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反对派联盟是经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转到托洛茨基主义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方面去而形成的。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的纲领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纲领，是我们党内右倾的纲领，是集合所有一切机会主义派别来组织反党斗争、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威信的纲领。加米涅夫说到我们党内的右倾是暗指中央委员会的。但这是诡计，是笨拙而又虚伪的诡计，其目的是以反党的大声责难来掩盖反对派联盟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表现我们党内右倾的是反对派联盟。我们评判反对派不是根据他们的声明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而反对派的行动则说明反对派是所有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从奥索夫斯基和“工人◇131◇反对派”到苏瓦林和马斯洛夫、柯尔什和路特·费舍等人）的集合点和策源地。如果根据加米涅夫的发言来判断，则反对派现在所追求的就是恢复派别活动，恢复党内派别自由的理论，把我们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集合起来，反对党的统一，反对党的领导干部，为建立新党而斗争。加米涅夫的发言在这一方面是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的“声明”发展到恢复反对派的分裂路线的转折点。

从党的统一来看，反对派联盟是什么呢？

反对派联盟是我们党内新党的萌芽。反对派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平行的地方委员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反对派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硬说他们已放弃了派别活动。但加米涅夫的发言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又在进行派别斗争吗？有什么保证能说反对派没有恢复他们中央的和地方的平行的组织呢？反对派为自己的基金会收集特别党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什么保证能说他们没有重新走上这条分裂的道路呢？

反对派联盟是破坏我党统一的**新党的萌芽**。

任务就在于摧毁这个联盟和消灭这个联盟。（热烈鼓掌）

同志们，当其他各国还被帝国主义统治着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仅仅一个国家，能突破资本的战线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以

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党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是连一分钟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要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根除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就必须消灭建立新党的企图。◇132◇

因此，任务就在于肃清反对派联盟和巩固我党的统一。

五 结 论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要是把讨论做一总结，那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容怀疑的总结论：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对的，它指出反对派的病症就是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这就是同志们不能不得出的总的印象和总的结论。

可见在你们面前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它满怀信心地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起来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派，它像一个腿患风湿症、腰患酸痛病、头患偏头风的衰朽的老头子，一步一拐地跟在党的后面，到处散布悲观主义，制造恶毒的流言，说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会有结果的，说在他们资产者那里什么都好，而在我们无产者这里什么都不好。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面前的两种力量。

你们应当在这二者之间有所选择。（笑声）

我不怀疑，你们是会作正确的选择的。（鼓掌）◇133◇

反对派被自己的派别活动弄得头晕目眩，竟把我们的革命看做一种毫无独立能力的东西，看做一种未来的尚未获胜的西方革命的毫无价值的附属品。

列宁同志并不是这样看我们的革命，看苏维埃共和国的。列宁同志认定苏维埃共和国是给全世界无产者照亮道路的火炬。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即世界各国无产者。——斯大林注）面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站立着。在那边是吵架、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九页）

在这把火炬周围形成了两条阵线：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线，他们力图破坏这把火炬，动摇它和扑灭它；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朋友的阵线，他们努力支持这把火炬，使它发出熊熊的光焰。

任务就在于支持这把火炬，巩固它的存在，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焰万丈，给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照亮道路。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把火炬光焰万丈，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胆颤心惊。◇134◇

我相信你们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这样的火炬在世界各地燃烧起来，使世界各国的无产者欢欣鼓舞。（鼓掌多时，经久不息。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三呼“乌拉”。）◇135◇

列宁在共产国际会议上

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信

你的信和文稿已经看过。答复迟了，请原谅。

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同意你称自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我并没有学生。你还是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吧，你有权这样做，尽管沙茨金批评了你。但是，你没有理由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的学生。这是不对的。这是多余的。

（二）我不同意你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和沙茨金进行论战时引用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写的那封私人信。何况你们所讨论的**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问题，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即“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三四〕一书出版以前就已经阐明了。更不用说，这样引用我信中的片段，在和沙茨金进行论战时对你毫无好处，徒使问题纠缠不清并把注意力转到另外一面，而可能迫使我在报上发表一个于你不利的声明（这是我不愿意做的）。

（三）我认为沙茨金基本上是对的，而你是不对的。可惜我未能看到你新写的论战略的小册子。否则，我一定会劝阻你不要出版这种包含着许多极严重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说法的粗制滥造的著作。◇137◇

（四）这当然不是说沙茨金在各方面都是对的。现在我来指出沙茨金的主要错误。这种地方就是沙茨金文章中的错误，例如他把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任务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的公式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看做几乎是相同的。沙茨金不说明这两个公式的差别并揭示其历史根源，反而把极重要的问题掩蔽起来，用丝毫不能说明什么的解释来搪塞。但搪塞不能解决问题。

沙茨金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无意中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

个公式（专政是一个阶级的统治，以及专政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领导下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对立起来。沙茨金驳斥在专政的条件下农民参与政权的思想，即两个阶级分掌政权的思想，这是对的。但他把这两个公式对立起来就不对了，因为把两者对立起来，就是不懂得这两个公式。

我也不喜欢沙茨金文章中极端自以为是的腔调：嘴上尽管说谦虚，实际上却显得自负到极点。

（五）我劝你不要在报刊上进行论战了，因为你是不对的，而沙茨金基本上是对的。最好去认真地和深入地加紧钻研列宁主义。此外，我还劝你永远抛弃那种赶制列宁主义小册子的习惯。这是要不得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次刊印◇138◇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三五〕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因为在代表会议上需要说的，别的同志都说过了，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了，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是没有必要的。可是，由于许多代表团的要求，我不得不说几句。

从管理国家来看，从领导我国整个建设工作来看，我国现状中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哪里呢？

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党善于找出正确的政策，就是说，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党的指示是切合实际的。

列宁说：

对农民的正确政策实行十年二十年，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工作，党的工作正好表明党是善于找出正确解决这个问◇139◇题的办法的。

怎样才能使党的政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正确的呢？

第一、必须使党的政策保证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联盟。

第二、必须使党的政策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

要保证结合，必须使我们一般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必须使合作社的组织，在城市里，特别

是在农村里，有步骤地日益发展起来。

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不然就会招致极严重的后果。

我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困难。困难是有的，而且很严重。但是我们正在克服困难。我们能够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必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和巩固起来，必须使我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带领着农业前进。

列宁说：在领导农村的意义上讲，每个新的工厂都会巩固工人阶级的阵地，使我们不怕任何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是他在一九二一年说的话。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的工业发展了，许多新工厂出现了。于是每个新工厂都成了无产阶级拥有的新堡垒，保证着无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群众的领导。◇140◇

可见党在这方面也是善于找出正确的政策的。

我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困难。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困难，而且正在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有人说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所有现存政权中最巩固的政权。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但是，为了战胜我们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仅仅有正确的政策是不是就够了呢？

不，不够。

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还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首先必须使党所制定的正确政策真正实行，真正完全实现。

有正确的政策，这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实行，或者实行的时候在实践中被歪曲了，那末这个政策又有什么用

处呢？在实际生活中有这种情形：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实行，或者实行得不当。现在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是不少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三六〕中指的正是这种情形，当时他说：

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做好正确挑选人材的工作并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这就是列宁在他最后一次报告中着重指出的问题。我以为在我国整◇141◇个建设工作时期中，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列宁的这个指示。要领导建设，只有正确的指示是不够的，要领导建设，还必须把那些懂得这些指示的意义和作用，能够忠诚老实地实行这些指示，并认为实行这些指示不是无谓的例行公事而是光荣的事业，是自己对党和无产阶级应尽的崇高义务的人，放在我们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的建设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列宁的正确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的口号正应当这样理解。

然而在我们这里有时却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表面上似乎是接受党和苏维埃政权高级机关的指示，实际上却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继续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某些经济的、合作社的和其他的机关的一些领导者有时把党的正确指示束之高阁，继续走熟悉的老路，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例如，根据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的决定，我们政策的当前任务是减低零售价格，可是许多合作社的和一般的商业工作人员却宁愿避开这个决定，不理这个决定，那末，这算什么呢？这不是破坏正确的政策是什么呢？要知道，工农结合的命运、工农联盟的命运、苏维埃政权的命运是决定于忠实执行正确的政策的。

列宁所指的正是这种情形，当时他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国家机器没有朝它应有的方向移动。

为什么路线和机器之间会有这种不协调呢？这是因为这个机器的结构、这个机构的组成部分并非都是质量很好的。◇142◇

正因为如此，正确挑选工作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就成为当前党和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之一了。

正因为如此，党应当密切注意，要使我们建设工作的基本工作人员是从忠实执行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这个观点挑选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问题当然不限于此。此外还必须努力提高党对群众的领导的质量，从而更顺利地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来参加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来表现自己的领导意志的。以一个不好的党为首来领导建设是不可能的。要使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就必须使它的党真正担负得起群众的最高领导者的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怎样呢？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不是形式主义的领导，不是纸上的领导，而是实际的领导。那就必须使党的领导具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有人说，如果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建设战线上取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使广大群众参加我们的建设事业，就必须正确地、灵活地、稳重地领导这些群众。应当由谁来领导群众呢？应当由党来领导群众。但是，党如果不考虑到近几年来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变化，它就不能领导群众。现在不能用老一套办法了，不能仅仅用命令和指示来领导了。这样领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简单的形式主义的领导只能引起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需求提高了，工人们对我们工作的缺点更敏感了，工人们的要求更严格了。◇143◇

这好不好呢？当然好。我们是一直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更复杂了，而领导本身也就应当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过去，有时踩了他的脚也不算什么。同志们，现在这可不行了！现在甚至对最不重要的小事情也要极其细心，因为工人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小事情积成的。

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现在的农民不是两三年以前的农民了。他

们也更敏感并且更有觉悟了。他们阅读所谓领导者的文章，讨论这些文章，仔细研究每一个领导者，并得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你们不要以为农民是愚蠢的，像某些聪明人有时候对我们所形容的那样。不，同志们，农民比城市里的许多聪明人还要聪明。他们也要求更细心地对待他们。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不能只是做做决议就算了。这也和对待工人一样，必须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耐心地仔细地进行解释，使他们了解党要做些什么，要把国家引到哪里去。今天不了解，明天再努力解释；明天不了解，后天再努力解释。现在不这样，就不会有而且不能有任何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领导。不，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党放弃领导，如果党停止领导，群众就不会尊重党了。群众自己要求领导他们，群众在寻找坚强的领导。但群众所要求的不是形式主义的领导，不是纸上的领导，而是他们所能了解的实际领导。正是为了这一点，才需要耐心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和任务、指令和指示。不可放弃领导，也不可减弱领导。相反地，应当加强领导。但是为了加强领导，必须使领导本身更灵活，必须使党对群众的要求有最高度的敏感。◇144◇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力量也就在这里。但是要使我们的政策不致悬在空中，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第二、领导群众要有灵活性，对于群众的要求要有敏感、敏感、最高度的敏感。

（全场热烈鼓掌并欢呼多时；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十三号◇145◇

给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关于日罗夫同志的文章我答复迟了，但是，答复迟总比不答复好。

我不同意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日罗夫同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文章，理由如下：

（一）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学生的文章。显然，作者没有把握住题目，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的文章只宜于登在人们藉以练习写作以便日后成为成熟的作家的学生刊物上。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指导性的杂志，人们要求它发表有关理论和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指导性的文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日罗夫同志的文章，第一、会使读者糊涂起来，第二、会损害“布尔什维克”这个指导性的杂志的声望。

（二）日罗夫同志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同等看待，这显然是错误的。说不平衡规律的内容由这两方面构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注意一下目前联共（布）党内我们和反对派的争论，那末，政治的不平衡现在对于我们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从世界的发展来看，目前政治的不平衡的最突出的表现究竟在哪里呢？在于我国已经有了◇147◇先进的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而在技术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里却存在着落后的政权，即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派是不是否认这种政治的不平衡的可能或存在呢？不，不否认。相反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在这一方面。

意见分歧是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的：能不能**在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就是说，能不能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于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

国家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由此可见，意见分歧是在经济方面。这就是我们要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的缘故。日罗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我们和反对派争论的这个特点，认为强调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就是否认这一规律的政治方面。

简言之，日罗夫同志忽略了我们和反对派争论的焦点。

至于不平衡规律的经济方面本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灾难（政治灾难也在内）的基础，就更不用说了。

（三）日罗夫同志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把不平衡规律说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单纯的“不匀称和不协调”。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上升的资本主义和垂死的下降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呢？平稳地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在腐朽、跃进、灾难状态中发展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从何而来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的胜利从前◇148◇是不可能的，现在却成了可能的呢？能否不管财政资本的统治，技术的巨大发展，均衡化的趋向，世界之划分为各个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国家的蓬勃的跃进式的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灾难，引起已被分割的世界的过期性的重新分割，使得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等等事实呢？

在这种场合日罗夫同志的立场和我们的反对派的立场有什么不同呢？他究竟为什么并根据什么去和反对派争论呢？

看来，日罗夫同志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有关社会发展**一切**阶段的社会学规律不同，是能变化而且必然要变化的。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一种形式：产生一种相应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则具有另一种形式，因而产生另一种结果。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并且应当说，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旧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平衡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是怎样变化的，这

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怎样随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受到限制或加强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凡是写有关不平衡规律专文的人都应当首先加以考虑。日罗夫同志的不幸（而不是罪过）就是他完全看不到问题的这一面。

（四）我没有提到日罗夫同志的文章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非主观性”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想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我看日罗夫同志的舌头在发痒，想说些特别的和令人惊奇的东西。◇149◇

（五）至于要给日罗夫同志的文章加的编者按语，我认为在“布尔什维克”这样重要的杂志上附有这样的编者按语是不应该的。声明编辑部“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论点”而不说明这些论点是什么，这就是对问题避而不谈，使读者莫名其妙。我认为“布尔什维克”杂志不应当写这样的按语。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150◇

给连纳的工人们

十五年前连纳工人们遭受枪杀的四月惨案是沙皇专制政府的最大的血腥罪行之一。在遥远的森林里牺牲于沙皇枪弹下的同志们的英勇斗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的。苏联工人在回顾走过的道路时可以说：波戴勃工人的每一滴血都没有白流，因为无产阶级的敌人遭到了报复，无产阶级已经战胜了他们。

现在，你们摆脱了沙皇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你们已有可能在维提姆河岸上不是为寄生虫的发财致富而是为加强世界上第一个**自己的**工人国家的威力来开采黄金了。

荣誉和光荣属于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而牺牲的人们！

亲爱的同志们，在这个追念死难同志的英勇斗争的日子里，我向你们致敬，并深信你们会坚定不移地继续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
“连纳矿工报”（波戴勃版）
第八十七号◇151◇

致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

亲爱的同志们！

“斗争报”〔三七〕在革命岗位上进行战斗工作的十周年纪念日，是斯大林格勒的工人们可以自豪的光荣的日子。

与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这些将军们作斗争，驱逐反革命分子和西方武装干涉者，战胜经济破坏状态，在新生活的和平建设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就是最近十年来斯大林格勒无产阶级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在这整个时期中，“斗争报”总是站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前列，给劳动者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谨向“斗争报”致热烈的敬礼，并祝它获得新的成就！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斗争报”（斯大林格勒版）
第二三号◇153◇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同志们！平常讲演者“总得”讲个不停，好让别人一直听下去。我想这一次稍微把方式改变一下。我只解答个别同志在条子上提出的问题。我想这样会活泼些。如果大家同意，我就开始讲了。

多数条子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今年，今年春天或秋天，我们这里会不会有战争？

我的回答是：无论今年春天还是秋天，我们这里都不会有战争。

今年在我们这里不会有战争，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根本没有。不，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今年不会有战争，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比谁都惧怕战争的后果，是因为西方工人不愿和苏联作战，而没有工人，作战就不可能，最后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政策，这种情况使敌人难以和我国作战。

〔斯大林同志用我国和西方大小国家的关系方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之后，转而谈到苏联的◇155◇东方政策问题。〕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对东方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所实行的友好政策包含着我方的某些让步，因而我们要负担若干费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任何别的政策，不仅从原则上来看，而且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都是我们所不能采取的。在原则上，我们除了友好政策以外，不能实行别的政策，这一点是由粉碎帝国主义枷锁而树立起自己威力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产生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看。大家知道，我国在东方与中国、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接壤的国境线，长达数千俄里。在这条国境线上，目前我们只驻有极少的军队，这些军队和交界国居民的关系是友好的，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实行友好政策，我们才能在保卫边疆方面减少大量开支。

但是，假定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是友好的而是敌对的，像俄国专制时代那样，那我们就不得不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团，并在远东停泊许多军舰，像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军团和相当数量的舰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年要在这些军团和舰队上花费人民好几亿卢布。这也是一种东方政策。但这是一切可能的政策中最不合算最浪费和最危险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一切可能的东方政策中我们的东方政策在原则上是最正确的，在政治效果上是最可靠的，并且是最经济的政策。

不用说这种政策在东方不仅保证了我们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而且保证了我们与◇156◇日本之间的持久和平。

〔一些人对给代表的委托书发表意见后，斯大林同志又来回答到会者新递上来的一些条子。〕

同志们！现在让我来答复同志们新递上来的条子。从这些条子上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就是英苏外交关系有没有破裂的可能的问题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成就的问题。

英国是否会撕毁一九二一年的通商条约呢？它是否会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呢？

当然，从英国方面来说，绝交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我以为这种可能很小。这种可能之所以很小，是因为这种绝交对英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更不用说，在苏联实行和平政策的情况下，绝交的责任将是英国政府目前所能担负的一切可能的严重责任中最严重的一项……

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上的基本成就是什么呢？

有人向我们说到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他们说这些缺点还没有克服。同志们，这些话都是对的。无论在工厂或我们的管理机构中都有很多缺点。假如在我们所担负的这样巨大的工作中没有这些缺点，那才奇怪呢。但问题不在于这些缺点。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已能用本身的力量来实行我国的工业化了。

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大而落后的农业国不掠夺殖民地，不掠夺其他国家，或者不从外国取得大◇157◇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就能变成工业国的。你们回想一下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史，就会知道情形确实是这样的。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内战以后也不得不费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国的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以及对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掠夺，才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

我们能否走这条“可靠的”道路呢？不，不能，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绝不容许掠夺殖民地，同时要获得大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又没有指望。

旧俄即沙皇俄国是沿着另一条道路走向工业化的，那就是借用奴役性的外债，把我国基本工业部门实行奴役性的租让。你们知道，几乎整个顿巴斯，彼得堡的大半工业，巴库的石油和许多铁路，都掌握在外国资本家的手中，更不用说电气工业了。这是牺牲苏联各族人民利益并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业化的道路。显然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作斗争，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日后自愿地套上资本主义的羁绊。

现在只有一条道路，即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节约的道路，精打细算地经营以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必需的资金的道路。不用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然而，尽管有困难，我们现在却已在解决这个任务了。

是的，同志们，在内战以后过了四年，我们就已在解决这个任务了。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基本成就也就在这里。

今年我们用在工业上的资金共有十三亿卢布。我们用这笔钱来建立新工厂，修复旧工厂，装置新机器，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我们就是这样做到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来奠定新工业的基础的。我们就◇158◇是这样做到用自己的资金建筑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厦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就。

有人说，这座大厦还有若干缺点：灰泥不好，某些地方的糊墙纸鼓起来了，某个墙角的垃圾还没有清除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难道问题就在这里吗？难道这是主要的吗？新工业大厦是不是在建筑呢？是在建筑。这所大厦是不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建筑呢？是靠自己的资金来建筑。那末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在工业化方面已获得主要的和基本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的基本成就就在这里。

有些同志喜欢把这些成就全部归功于我们的党。老实说，有些同志过分称赞我们党，原因就在这里。某些共产党员喜欢自夸自大，原因也在这里，可惜我们的同志至今还有这种毛病。当然，我们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在获得这些成就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党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真正友好的支持，那就会一钱不值。其实，我党之所以强大有力，也就在于它得到非党工人群众的支持。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一号◇159◇

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

你们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提出的质问，我认为是一种误解。理由如下：

（一）我的报告〔三八〕中所谈的不是关于俄国“专制制度”建立的问题，而是关于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建立的问题。不难了解，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虽然不能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关的。

（二）无论我的报告或提纲〔三九〕中都没有说过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为了和蒙古人及其他东方人进行斗争”（见你们的来信）。应该对这种对立的说法负责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是说，由于防御的必要，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因此，这些地方在封建主义消灭以前就建立了多民族的国家。可见，这和你们不正确地加在我身上的那种说法是不同的。

下面是从我的报告中摘录出来的一段话：

“在东欧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割据消灭的过程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俄国。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然而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能够抵御外侮◇161◇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所以在那里就建立了混合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由尚未〔四〇〕形成为民族但已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几族人民组成的。”

下面是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我的提纲中摘录出来的一

段话：

“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大体一致的地方，那里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国家的外貌，发展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英国（爱尔兰除外）、法国、意大利的情形都是如此。东欧却与此相反，由于自卫（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早于封建主义的消灭，因而也早于民族的形成。所以这些地方的民族没有发展成也不能发展成民族国家，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都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从属民族组成。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就是这样。”〔四一〕

请你们注意引文中加着重号的字。

（三）如果你们看看我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第一部分），那就不难相信：报告的题目不是关于“专制制度”建立的问题，而是关于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的问题，以及关于加速后一过程的因素的问题。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162◇

论 工 农 政 府 问 题

（答德米特利也夫）

今年一月十四日你向“布尔什维克”杂志提出有关工农政府问题的那封信已经转交中央委员会，由我答复。我因为工作太忙，答复迟了，请原谅。

（一）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地提问题：“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还是一个鼓动口号。”不能说：虽然事实上我们没有工农政府，但是我们可以把工农政府当做一个鼓动口号来谈。这样提问题，就等于说我们党可以提出些虚伪透顶的口号，这些口号事实上不能成立，党自己也不相信，但党还是把它们提出来欺骗群众。这只有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派才做得出，因为言行不一致和欺骗群众是这些垂死党派的一种主要工具。但我们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是日益上升的、从言行一致中汲取力量的党；它不欺骗群众，它对群众说的都是实话，它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对阶级力量的科学分析上，而不建立在欺骗宣传上。

问题应该这样提：**或者**是我们没有工农政府，那末就应当把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当做不需要的和◇163◇虚伪的口号予以抛弃；**或者**是事实上我们有工农政府，并且这个政府的存在适合于阶级力量的状况，那末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就是正确的和革命的口号。不是前者，就是后者。在这里必须有所选择。

（二）你称工农政府这个口号为“斯大林同志的公式”。这完全不对。事实上这个口号（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个“公式”）是列宁的口号，而不是别人的。我不过在“问题和答复”〔四二〕中重复了

这个口号。请看“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十三、十五、九十、一三三、二一〇各页，第二十三卷第九十三、五〇四两页，第二十四卷第四四八页，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四页，那里列宁称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再请看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各页，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五、一八五、四三一、四三三、四三六、五三九、五四〇各页，第二十五卷第八十二、一四六、三九〇、四〇七各页，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八二、二〇七、三四〇各页，那里列宁称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权**”。把列宁的这些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看一下，你就会知道工农政府这一口号或“公式”是列宁的口号或“公式”，而不是别人的。

（三）你的基本错误在于：

（甲）你把关于我们政府的问题与关于我们国家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乙）你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为一谈了。

不能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混淆起来，也就是说，不能把二者等量齐观。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组织，这个政权的使命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我◇164◇们的政府则是这个国家组织的**上层机构**，是它的上层领导机构。政府可能犯错误，它可能犯一些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暂时挫折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建国原则是不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这只是说上层领导机构不好，上层领导机构的政策即政府的政策不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策应当加以修改，使之**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

国家和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同一的，但是政府的范围比较狭小，政府不包括国家。它们之间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是相互依存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二者混为一谈。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关于我们国家的问题与关于我们政府的问题混淆起来，正像不能把关于无产阶级的问题与关于无产阶级的上层领导机构的问题混淆起来一样。

但是，把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淆起来是更不能容许的。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阶级性质不言而喻是无产阶级的。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的目的也是清楚的，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农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目的藉以实现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无产阶级国家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阶级等等。我们政府之所以必要，除了这一切以外，还为了规定种种**方法**和**手段**（即日常政策），没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要在我们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中完成上述各项任务是不可想像的。◇165◇

这是些什么方法和手段，归结起来，它们究竟是些什么呢？归结起来，基本上就是用以保持并巩固工人与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保持并巩固执政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种种措施。几乎无须证明，如果站在**这种**联盟之外和不顾**这种**联盟，我们的政府就会软弱无力，我们就没有可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任务。这个联盟，这个结合将存在多久？苏联政府巩固这个联盟，巩固这个结合的政策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显然，只要有阶级，只要作为阶级社会的表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的政府存在时，这个联盟就会存在，这个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同时必须注意到：

（甲）我们需要工农联盟，并不是为了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而是为了在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利益的方针下教育和改

造农民；

（乙）苏联政府实行巩固这个联盟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巩固阶级，而是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加快消灭阶级的速度。所以列宁说得完全对：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页）

无须证明，正是列宁的这个原理，而不是别的原理，才是苏联政府在其日常政策中的领导路线，在发展的现阶段，苏联政府的政策实质上正是保持并巩固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这种**联盟的政策。◇166◇**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其阶级性质的意义上，苏联政府才是**工农**政府。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否定结合的思想、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思想的道路。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认为结合是一种诡计，而不是现实的革命事业，就是认为我们施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鼓动”，而不是为了和基本农民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认为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我们的革命所能满足的，认为这些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和基本农民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不能成立的，认为孟什维克及其应声虫是正确的等等。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会懂得对这个极其重要的结合问题采取“鼓动”态度，那是毫无原则和根本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自己的“问题和答复”中说，工农政府这个口号既不是“欺骗宣传”，也不是“鼓动的”手腕，而是绝对正确的和革命的口号。

简单地说，国家和政府的阶级性质（它规定我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目的）问题是一回事，而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

需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是另一回事。这两个问题无疑是相互联系着的。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的，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国家和政府的阶级性质问题与政府的日常政策问题混淆起来。有人会说这里有矛盾，怎能把按阶级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呢？但这里的矛◇167◇盾是臆造出来的。老实说，这里的“矛盾”是和我们有些自作聪明的人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公式中硬找出来的那种矛盾一样。列宁的第一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七二页）而第二个公式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

这两个公式有没有矛盾？当然没有。既然如此，在阶级联盟的情况下，譬如说在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阶级联盟的情况下，又怎样实现**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呢？办法就是实现执政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先锋队”）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权是藉助于这个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并对后者实行**国家**领导而实现的，——这就是这两个公式的基本思想。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无产阶级对基本农民群众的**国家**领导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像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有过的那种领导呢？不是的，不是那种领导。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领导。无产阶级的**国家**领导意味着：

（甲）资产阶级已被推翻；◇168◇

（乙）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丙）无产阶级不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

（丁）无产阶级领导着基本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期的领导则意味着：

（甲）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础保留下来；

（乙）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在政权的成分中占优势；

（丙）民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掌政权；

（丁）无产阶级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他们，并准备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

由此可见，这里的差别是根本的差别。

对于工农政府问题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政府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任务，不仅不阻碍政府，反而推动它，必然推动它去实行保持并巩固工农联盟的政策，因为工农联盟是在我们农民国家中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级任务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这种政府叫做工农政府，这里会有什么矛盾呢？

列宁实行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并把我们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明显吗？

总之应该说，藉以在我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一◇169◇种颇为复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复杂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欢的，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许多同志从“最省力的原则”出发，宁愿与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列宁主义实际上怎样，就应当怎样了解它（不能把列宁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第二、历史证明，最简单和最容易的“理论”并非常常是最正确的。

（四）你在信中抱怨说：

“所有阐明这个问题的同志的罪过在于他们或者只谈政府，或者只谈国家，因此都没有给一个彻底的答复，完全忽视了这两种概念之

间应有怎样的关系。”

我承认我们的领导同志的确有这种“罪过”，特别是就下面这种情况来说：有些不很用心的“读者”，自己不想好好地钻研列宁的著作，而要求别人替他们把每一个句子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的领导同志忙于日常工作，不可能把列宁主义像一般所说的，逐条加以解释；第二、也应该给“读者”留下些东西，他们终究应该由草率地**阅读**列宁的著作转而认真地**研究**列宁主义。同时必须指出，如果“读者”不认真地研究列宁主义，那末，像你这样的怨言和“误解”是永远会发生的。

例如拿我们的国家问题来说吧。显然，我们的国家无论按其阶级性质或者按其纲领、按其基本任务、按其所作所为来说，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工人的国家，固然它还带着某种“官僚主义的病态”。请回忆一下列宁的定义：◇170◇

“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工人的国家，其特点是：第一、在国内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工人国家还带着官僚主义的病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七页至第二十八页）

恐怕只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我们某些反对派分子才会怀疑这一点。列宁屡次解释：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大家老早知道的。可是有不少“读者”，过去抱怨现在还在抱怨列宁有时称我们的国家为“工农”国家。不难了解，列宁在这种场合并不是说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更不是否定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是说明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成为必要，因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应当以巩固这种结合为目的。

请看一下“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四页，第二十五卷第五十、八十两页，第二十六卷第四十、六十七、二〇七、二一六

各页，第二十七卷第四十七页。在所有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宁都称我们的国家为“**工农**”国家。但奇怪的是有人还不明白：列宁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说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而是规定巩固结合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我们农民国家条件下的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产生的。在这种有条件有限度的意义上，**而且仅仅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说“工农”国家，列宁在其著作中的上述地方也正是这样说的。

至于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列宁对此下了一个不容有任何曲解的最确切的◇171◇定义：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带着官僚主义病态的工人国家。看来是清楚了。可是有些只会“读”字句而不愿领会其内容的“读者”仍在继续埋怨列宁在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把他们“弄糊涂了”，而“学生们”却不愿把“糊涂的东西”“弄明白”。真有点可笑……

你要问：摆脱“误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出路只有一条：研究列宁的著作不在抓住个别的片段，而在抓住本质，研究时要严肃认真，要深思熟虑，要下工夫。我看不出别的什么出路。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172◇

给 申 凯 维 奇 的 信

答复迟了，请原谅。

（一）你引用了列宁反对烧酒的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和第三十三卷〔四三〕）。列宁的话中央委员会当然是知道的。虽然如此，党中央还是同意实行烧酒买卖，因为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就已得到列宁的同意。

列宁认为，在我方作一定牺牲的条件下，清理我国对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债务，并得到巨额的借款或巨额的长期信用贷款，不是不可能的。在热那亚会议〔四四〕时期他曾这样想过。如果这种策划成功，我们当然不必实行烧酒买卖了。但是这种策划并未实现，同时我们又没有发展工业的资金，既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我们就不能指望我国工业获得较为可观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决定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命运的，——于是我们和列宁一起得出了必须实行烧酒买卖的结论。

受外国资本奴役好些呢，还是实行烧酒买卖好些，——这就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显然，我们宁可实行烧酒买卖，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而且现在继续认为：如果我们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而不得不沾染一点脏的东西，那末，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我们只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173◇

一九二四年十月我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几位中央委员反对实行烧酒买卖，然而并未指出可以获取发展工业的资金的任何来源。为了答复这一点，七位中央委员，我也在内，向中央全会提出了如下的声明：

“列宁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和同年秋天（九月）对我们每个人说过好几次：由于借外债已经绝望（热那亚会议的失败），将来必须

实行烧酒专卖，这对于筹集最低限度的基金以维持币制和工业是特别需要的。因为有几位同志引用了列宁早年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这一切。”

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实行烧酒专卖的决议。

（二）至于你希望“和我建立通讯联系”，我很欢迎，并请你把感兴趣的问题写给我。可能我答复得迟一点，但我总是要答复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

第一次刊印◇174◇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四五〕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让我代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祝贺你们。（鼓掌）

让我祝你们在组织我国工农青年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艰巨工作中获得成功。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国向来都走在我们战士的前列。我们相信青年团今后仍将站在前列，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鼓掌）

祝贺之后，现在让我来谈谈你们中间几位青年团员同志方才跟我谈起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我国工业政策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的事情。第二个是关于南京事件的问题，这当然是国外的事情。

同志们！我国工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决定我国工业今后一切步骤的基本路线，就是不断减低工业产品成本的路线，不断减低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的路线。我国工业如果想要发展，想要壮大，◇175◇想要领导农业，想要巩固并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它应该走的大道。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

决定这条路线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条路线至少是由四个基本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原因是：以高价为基础的工业不是而且不能是真正的工业，因为这样的工业必然会退化成没有而且不能有生命力的温室植物。只有不断减低商品价格的工业，只有以不断减低产品成本为基础的工业，

只有为此而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营管理的方式和方法的工业，只有这样的工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前发展，只有它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胜利。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我们不能而且没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和资本家竞争。国内市场是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只能随着我国的国内市场，这一市场的容量，群众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发展和扩大而发展和巩固起来。我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它的容量的增加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主要是由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也就是前面我说过的我国工业发展的那条基本路线来决定的。

第三个原因是：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不逐步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要保持进一步提高工人工资所必需的条件是不可能的。第一、工人本身就是工业品的消费者，因此，减低这些商品的价格对于保◇176◇持和提高实际工资不能没有重大的意义。第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就能稳定城市中主要是由工人消费的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保持和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能没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不去不断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呢？不，不能。由此可见，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逐步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之一。

最后，第四个原因是：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你们知道，农民用很贵的价钱购买工业品、纺织品、机器等。你们知道，这种情形在农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并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真要保持这种结合，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就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

但是，要使减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商品出厂价格的政策成为可能并

完全实现，必须做些什么呢？那就必须根本改善生产技术，根本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根本改善并精简全部经济机构，并且和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我们把这一切称为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我国工业已经进入这样的发展阶段，不采用新的更优良的技术，不采用新的更完善的劳动组织，不精简我们的经济机构，就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不断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这一切对我们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而且是为了在这个基础上积蓄资金，用来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我国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

于是就得出一个连环的关系：若不不断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和商品的出厂价格，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工业，若不采用新的技术、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新的简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就不能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因此，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问题乃是当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党中央不久以前关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合理化的决议〔四六〕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它规定了我们最近时期的工业政策。

有人说，合理化需要一部分工人，包括青年在内，作某些暂时的牺牲。同志们，这是对的。

我国革命的历史说明，如果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内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目前这种轻微的牺牲是绝不能和我国内战时期的那种重大牺牲相比的。你们看到，那些牺牲现时在我国已获得绰绰有余的补偿了。

目前的轻微的牺牲在最近的将来定能获得绰绰有余的补偿，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因此，我以为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

在我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向来都站在我们战士的前列。我从来没有听说青年团落在我们革命生活事件的后面。我不怀疑，现在青年团在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的问题上也一定会站在它应站的地位上。（鼓掌）

现在让我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南京事件的问题。我想，南京事件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件意外的事情。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为帝国主◇178◇义。因此，南京事件对我们来说不能是件意外的事情。

南京事件说明了什么呢？

它的政治意义在哪里呢？

南京事件说明在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发生了转折，就是从武装的和平转变为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的战争。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前，帝国主义竭力用和平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花言巧语，用“文明”和“博爱”的假面具，用国际联盟等等来掩盖它的意图。而在南京事件发生以后，帝国主义却把这些花言巧语、不干涉、国际联盟以及其他一切假面具统统抛弃了。现在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完全现出它那公开的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原形了。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老实说，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歌颂者，如彭库尔之流和布莱夏德之流，除了他们的骗人的和平主义**言词**以外，还能拿什么来对抗枪杀南京居民的**事实**呢？

国际联盟又挨了一个耳光。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枪杀另一个会员国的居民，而国际联盟本身却装聋作哑，推说此事与己无关，这一事实，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外，还有谁会认为是“正常的”呢？

这就证明我们党是正确的，它估计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开往上海就是武装进攻中国人民的前◇179◇奏曲。因为现在，除了瞎子以外，谁都看得清帝国主义所以需要在上海驻扎军队，就是为了从“言论”转到“行动”。

南京事件的意义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者敢于在南京进行冒险，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帝国主义者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把炮轰南京提到日程上来，也许是想扭转历史的车轮，扑灭各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并为恢复帝国主义大战前曾有过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而斗争。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受到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大家知道，约在十年前，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突破了资本的阵线，带给它无法医治的创伤。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战争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统治基础。

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十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阵线进攻，并且没有任何根据来推断说，他们不能完全突破这条阵线。

帝国主义者也许想一举而把这一切消灭干净，揭开历史的“新的一页”。如果他们真要这样做，那就必须承认他们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老糊涂才会以为大炮的规律胜过历史的规律，才会以为炮轰南京可以扭转历史的车轮。

帝国主义者也许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恐吓其他各国奋力争取自由的被压迫的人民，似乎对他们说：南京的故事就是给你们的教训。同志们，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恐吓政策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是◇180◇有其“根据”的。但这种政策是没有用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怀疑。当年俄国沙皇政府也曾“有效地”采用过这种政策。但其结果如何呢？你们知道，它是以沙皇制度的完全覆灭而告终的。

最后，帝国主义者也许想用炮轰南京的行动来打击中国革命的心脏，一则使中国南方的军队不能继续前进，使中国不能统一，二则使汉口的租界谈判所议定的那些条件不能实现。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许完全是这样的。为了“更便于机动”，帝国主义者不愿有一个统一的

中国而宁愿有两个中国，关于这一点，资本主义报刊已经透露好几次了。至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租界，那几乎用不着怀疑，很多帝国主义者是“不同情”在汉口拟定和批准的那些条件的。因此，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看来是想以此说明：他们宁愿将来在压力下和在炮火伴奏下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帝国主义者的音乐趣味就是如此。这种奇怪的音乐很像吃人者的音乐，看来这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难以为情……

他们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最近将来的事实就会表明。然而必须指出，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了国民党的力量，使中国革命运动又往左移动了一步。

几乎用不着怀疑，他们目前所得到的正是相反的结果。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想得到的是一种结果，而事实上所得到的是另一种结果，并且是和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181◇

这就是南京事件的结果和前途。

这就是保守阵营中的聪明人的政策。

俗语说得好，上帝注定谁死亡，他就夺去谁的理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七十二号◇182◇

给 邱 贡 诺 夫 的 信

回信太迟，请原谅。

（一）一九一二年列宁对孙中山的批判〔四七〕当然没有过时，仍旧有效。但这个批判所涉及的是旧的孙中山。要知道孙中山并非始终站在一点上。他是向前发展的，正像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一样。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列宁对孙中山很尊敬，这主要是孙中山开始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近和合作的缘故。谈到列宁和孙中山主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说孙中山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仍旧存在。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和国民党人在一个党内即国民党内合作，则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对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上的共产党人和孙中山主义者在国民党内共同工作来说，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础。

有人说，俄国有一个时期也曾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加入一个共同的党。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问题在于俄国当时在民族方面并不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它不反对自己压迫其他民族），因此，在俄国就没有把全国各种革命力量联合成一个统一◇183◇阵营的强大的民族因素，而在现时的中国，民族因素不仅存在，并且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这个因素决定着国民党内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相互关系的性质。

（二）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八〕中**没有一句话**说到“对日让步”，更没有说到“牺牲中国”来“对日让步”。这样说是不严肃的，邱贡诺夫同志。我在那个报告中仅仅说到对日本的友好关

系。从外交观点看来，友好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不愿和日本打仗，我们坚持和平政策。

（三）至于说到美国的两面政策，那末这种两面性是如此清楚明白，简直用不着解释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184◇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答杨—斯基）

你的信当然是如期收到了。回信稍迟，请原谅。

（一）列宁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〇页）政权集中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被推翻，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这就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

在革命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内都有效的党的基本战略口号，若不完完全全以列宁的这个根本论点为依据，便不能称为基本口号。

基本口号要成为正确的口号，便一定要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要规定阶级斗争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计划，要使党易于把群众引上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线，引上新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线，要使党易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编成一支为完成此项任务所必需的强大的政治军队。

在革命某一阶段中可能有失败和退却、失利和个别策略错误，但这并不是说基本战略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口号——“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185◇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而奋斗”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到了失败。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成功或失败的问题混为一谈。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党的基本口号在革命进程中虽已做到

推翻了几个旧阶级或一个旧阶级的政权，可是从这个口号中产生出来的一连串重大的革命要求却没有实现，或它们的实现竟拖了一整个时期，或它们的实现还需要求一次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没有做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可是它没有一下子做到一般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乡村里使富农陷于孤立，它拖了一个相当时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联合贫苦农民，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权而奋斗”是不正确的。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从这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和方式问题混为一谈。

因此，在估计我党的战略口号时，决不能以某一时期内革命运动的偶一成功或失败为准则，尤其不能以从这些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或方式为准则。在估计党的战略口号时，只能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在争取革命胜利、争取政权集中于新阶级手里这一战线上革◇186◇命力量的正确配置为准则。

你的错误就在于你回避了这个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或是没有懂得这个问题。

（二）你在信中写道：

“断言我们**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才联合全体农民，这是正确的吗？不，不正确。‘联合全体农民’这一口号，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一个时期**都是有效的，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是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的。”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

二月）即问题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的战略口号，跟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即问题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的战略口号，**是没有区别的**。

可见你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基本差别的。你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你大概不愿意了解一件简单的事情：战略口号的主题是革命某一阶段上的政权问题，是**哪个**阶级要被推翻和政权要转到**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几乎用不着证明，你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

你说，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我们都是实行“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可是，谁告诉过你，十月的大转变和十月革命只限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呢？你从哪里得出了这一点呢？难道可以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难道争取无产阶级◇187◇专政不是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要知道他们也是农民）能支持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并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呢？

怎么可以否认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等等法令（虽然这种法令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法令）时是和富农作**斗争**而不是和富农联合呢？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也是农民）能支持苏维埃政权没收工厂、铁路、银行等等法令，能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呢？

怎么可以断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内容**不是实行诸如此类的办法，不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呢？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同样，十月革命如果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本身也就不能巩固；十月革命既然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它也就得到了全体农民的同情。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进程中的**从生现象**，而是十月革命的**本质**或**主要**目的吗？你把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剥夺资本家等等，抛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战略口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那末决不能将无产阶级政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跟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这个无产阶级政◇188◇权的问题混为一谈，即与那成为革命第二阶段战略口号主题的问题混为一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并把中世纪一切污垢扫除净尽了。这对乡村具有最主要的和真正决定性的意义。不这样，就不能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这一点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说过了〔四九〕。不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不能巩固。

同时必须注意下述一个重要情况。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一举而成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拖了一整个时期，不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几段时间，像你来信中所说的那样，而且包括一九一九年（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乌克兰）的几段时间。我指的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那时全体农民面临地主政权复辟的危险，那时农民——正是**全体**农民——不得不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以保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使自己保有这一革命的果实。必须时刻注意到实际生活过程的这种复杂性和

多样性，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社会主义任务和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的这种“奇巧的”错综结合，才能正确了解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以及党的口号如何见诸实行的诀窍。

能不能说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不正确呢？能不能说这个口号和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口号没有区别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恰巧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即联合**贫苦**农民，反对城乡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等等口号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资产阶◇189◇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为了在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在十月革命以前准备并组织一支能推翻资产阶级、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相当的**政治大军，并且无须证明，**这样的**政治大军，我们**只有**在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口号下，才能准备并组织起来。

很明显，没有**这样**一个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实行的战略口号，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治大军，也就不会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不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跟革命第二阶段上以保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任务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避免这一切“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承认革命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口号和革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口号有根本的差别，承认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时期是联合**全体**农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则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本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承认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分析了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阶

级力量以后，我们非承认这一点不可。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下进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这个口号就被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专政◇190◇的口号所代替了。

你应该同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以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的事实，按照你的公式是无法解释的。

列宁还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里就指出了党的两个战略口号间的这种根本差别。他把党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口号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换句话说，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为民主革命而奋斗。

至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的口号，他则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同上）

换句话说，联合贫苦农民及一般半无产阶层，中立城乡小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把当时政治情况估计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跟资产阶级实际政权错综结合的局面时说道：◇191◇

“俄国时局的特点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1]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①]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页）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当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时，列宁在“农民和工人”这篇专论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②]才能推翻君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当时（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③]（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

这一点不应了解成这样：似乎我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的，并且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实现了这个口号，因为我们当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盟并和他们分掌过领导权，虽然事实上我国当时就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占多数的。可是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盲动”〔五〇〕◇192◇以后，自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破裂以后，当领导权已**完完全全**转到**一个**政党即我党（我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国家领导权的）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我们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宁回顾经历过的革命道路时写道：

“是的，**当**我们还**和全体**农民**一道**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的，是我们从一九〇五年起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中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从**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①]政权**以前很久**[②]，我们就已经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决不能停止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种破产现象**要求**（不管谁愿意与否）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挽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痛苦。结果正像我们说过的一样。革命进程已证实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和贫苦农民一道，和半无产阶级一道，和一切被剥削者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③]，因此，革命也◇193◇就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由此可见，列宁曾屡次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一个战略口号和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战略口号之间的全部差别。前一口号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后一口号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拖了一整个时期才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农民也就不能不同情我们，——这件事实，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丝毫不会动摇这个基本原理：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三）其次，你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是在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的口号下**走到十月革命的**’这一断语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依照上面说过的理由和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可以看出，这个口号只有在‘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已经成熟’（列宁）时，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产生出来。”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走上中立中农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时，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这是**完全不对**的。◇194◇

恰恰相反，中立中农的政策，不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即一九一八年以后开始的，而是在那时候**完结**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们的实践中**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宣布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道：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①]。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②]，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面对中农**采取坚固联盟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至第一二五页）

由此可见，结果是恰恰和你在来信内所说的相反，你在这里把我们**真实的**党的实践颠倒过来，把中立中农政策的**开始**和**终结**混淆起来了。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当我们还在推翻资产阶级时，当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中农总是叫苦连天并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们中立。当中农开始确信资产阶级“真”被推翻，苏维埃政权◇195◇已在巩固，富农正被抑制，红军开始在内战战线上获得胜利时，他们就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转变发生以后，才能有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党的第三个战略口号：**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坚固联盟**，向前迈进，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你怎能忘记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其次，从你的来信得出，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以及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最初时日**里，中立中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不适用的，因而是不能采纳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是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时和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以前，中农的动摇和抗拒是最厉害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必须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

你在坚持自己的错误时，说农民问题不仅对于我国，而且对于“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多少相似的”其他国家，都有重大的意义。后一意见当然是对的。可是，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提纲〔五一〕内，怎样说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对待中农的政策吧。列宁把贫苦农民，或更确切些说，“农村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称为由农业工人、半无产者或极小农和小农所组成的单独集团，然后在讲到中农是农村特别集团的问题时说道：

“所谓‘中农’在经济意义上应了解为一种小耕作者，他们依据所有权或租佃权也占有一块不大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通常使农家不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能得到某些——至少在好年成里——可以变为资本的余粮；第二、这种小的耕作者往往（例如两◇196◇三户中就有一户）要雇佣他人的劳动力……革命无产阶级不能（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开始时**）给自

己提出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任务，而应当**以中立这个阶层的任务为限**，也就是使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三页）

既然如此，怎能说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国“**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即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才能“产生”呢？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时的战略口号问题，也像中立中农问题一样，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四）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几段引文丝毫也不能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相对立，因为（甲）这几段引文所谈论的不是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号，而是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乙）它们并不是驳斥而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决不能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的时期内以政权问题为主题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197◇

（五）你说到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原来正是这篇文章“推动了”你来要我作解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阅读文章的。我也读过莫洛托夫同志的文章，而且我以为这篇文章和我在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对农民的口号所说的话〔五二〕是毫不矛盾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内不是说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基本口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是说党既然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也就获得了全体农民的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确认这件事实，并不是否认而是证实下述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产阶级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
八两期合刊◇198◇

中 国 革 命 问 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

（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199◇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

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200◇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

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201◇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说明下列事实：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们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说得很对：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像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

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202◇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203◇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204◇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国际环境不像一九一七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争）。

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维克不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都没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然而**现在**成立苏

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一九〇五年的情况是这样，一九一七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205◇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

其次：这就是说，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另一种任务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①]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206◇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摈弃了反对派的政纲是完全正确的〔五三〕。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九十号◇207◇

————————————

① 卡维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是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给“真 理 报”

（纪念创刊十五周年）

向“真理报”，向列宁遗训的体现者和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旗手，致热烈的敬礼！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真理报”第九十九号◇209◇

ПРАВДА

ЕЖЕДНЕВН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 1. Воскресенье, 22 апреля 1912 г.

ОТКРЫТА ПОДПИСКА
НА ЕЖЕДНЕВНУЮ РАБОЧУЮ ГАЗЕТУ
„ПРАВДА".

《真理报》创刊号（1912 年 5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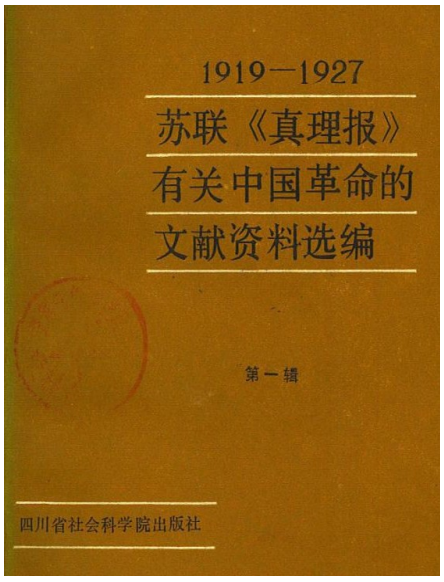
ПРАВДА

Гитлеровская Герм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празднует по

Торжество в столице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наша победа!

День победы



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答马尔秋林同志）

你写给“农村共产党人”杂志〔五四〕编辑部的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信，已由编辑部转来由我答复。我对你的信作一个简短的答复，想你不会有异议吧。

马尔秋林同志，我以为你的信是由误会引起的。理由如下：

（一）在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反对在**目前的**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你在反驳斯大林时，却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演说〔五五〕，其实这些提纲和演说只说到**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劳动人民**苏维埃，没有一句话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为什么列宁在自己的提纲或演说中都没有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因为列宁在演说或提纲中指的都是“还谈不到纯粹无产阶级运动”、“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八页）。

列宁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他指的是中亚细亚、波斯那样“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同上）。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等工业中心，有将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能不能把中◇211◇国列入那样的国家呢？显然是不能的。

显然，说到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现代中国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如果说的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大

家知道，斯大林的提纲中所指的是中国，而不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

因此，你反驳斯大林，你援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提纲，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无的放矢。

（二）你的来信里摘引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这个提纲说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同时你把这个“补充提纲”和从其中摘出的引文说成似乎是列宁写的。这是不对的，马尔秋林同志。在这里你简直弄错了。“补充提纲”是罗易[①]写的。它是作为罗易的提纲经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来“补充”列宁的提纲的（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一二二页至第一二六页）。

为什么需要“补充提纲”呢？为的是从那些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特别划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不能断言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你看一下这个“补充提纲”就会了解那里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一二二页）。

为什么要以罗易的特别提纲来“补充”列宁的提纲呢？这是因为列宁的提纲是在第二次代表大◇212◇会开幕以前，在殖民地国家代表到达以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讨论以前早就写成和发表的。可是大会专门委员会在讨论时发现有必要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从东方落后殖民地中划分出来，所以要有一个“补充提纲”。

因此，不能把列宁的演说和提纲与罗易的“补充提纲”混淆起来，同样不可忘记：谈到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时，必须注意到要成立的是**工人**和农民苏维埃，而不仅是农民苏维埃。

————————————

①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成为叛徒，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译者注。

（三）在中国要不要成立**工人**和农民苏维埃呢？要，一定要。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就直截了当地说到了这一点。这个提纲说：

“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①

全部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的包括一切的因而是最好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九〇六年夏天，在革命退潮以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提出了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列宁当时反驳他说：目前后卫队（农民）还没有赶上先锋队（无产阶级），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列宁是完全对的。为什么◇213◇呢？因为工人代表苏维埃不是工人的普通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和现存政权作斗争的机关，是起义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而且只有作为这样的机关，它们才能发展和巩固。如果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性的直接斗争的条件，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组织新的革命政权的条件，那末成立工人苏维埃就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它们就会有腐朽的危险，有变成空谈场所的危险。

列宁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说道：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不是一种什么理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说，而是事实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必须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现在建立这样的机关就是成立**起义**②机关，号召建

———————————————

① 见本卷第二〇四页。（指旧版页码）——编者注。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立这样的机关就是**号召起义**[①]。忘记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饶恕的近视和最恶劣的政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一卷第一〇三页至第一〇四页）

他又说：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结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②]，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214◇**关**[③]，才是现实的。没有这个任务，苏维埃就是空洞的玩物，势必引起群众的麻木、冷淡、失望，因为群众对决议和抗议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应该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一七页）

这样说来，在今天中国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国民党正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号召在这个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起义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是否适当呢？显然是不适当的。显然，谁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马尔秋林同志，关于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一项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决议。这项决议是列宁在场时通过的。我劝你看一看这项决议。它还是有意义的（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八〇页至第五八三页）。

（四）什么时候需要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一定要在这样的时机，就是胜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开的时候，作为**中国革命民粹派**（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盟**◇215◇的国民党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现今国民党型的国家组织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组织成为必要的时候。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罗易的“补充提纲”对**工**农苏维埃所谈到的那一段人所共知的话，正是应当这样去理解的。

这个时机是否来到了呢？

无须证明，这样的时机还没有来到。

那末现在做什么呢？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组织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现在的任务就在于此。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农村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
署名：约·斯大林◇216◇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们！可惜我今天只能谈两三个钟头的话。也许下一回我们可以举行一次时间较长的座谈。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我就在今天的谈话中来答复。如果还有补充的问题（据说是有的），我设法在下一次座谈中答复。好吧，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第一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这种论断为什么不对呢？

能不能断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封建残余呢？

为什么中国军阀既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确实下过类似这个问题中所指出的论断。我记得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217◇上的发言中，不是完全否认中国农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就是不承认封建残余在中国农村中有重大的意义。

这当然是拉狄克的一个大的错误。

假如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假如这些封建残余对中国农村没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同志们，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拉狄克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这种独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的这种**结合**。

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军阀拥有地产，同时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俄国许多地主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工矿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依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218◇

既然在一些区域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地主在经济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实权，既然迄今在一些身份里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中世纪环境中的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的势力独特地结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给中国正在发展和还要发展的农民的土地运动造成基础。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就不会有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等等问题了。

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会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国民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错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说过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同志们，这并不是一回事。◇219◇假如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问题就会归结成这样：在加入国民党的各阶级中不论哪一个阶级都不会在国民党以外有自己的政党，而国民党本身就会是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唯一的**政党。难道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就没有自己单独的政党，就没有和国民党不同而且具有自己单独的纲领、自己单独的组织的共产党吗？显然，国民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而是各有其党组织的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因此，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只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承认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这是不正确的。同志们，这是绝对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过（而且继续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容许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加入过这样的政党。我可以举个例子，即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五六〕，并且在这个联盟中舆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加入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五七〕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

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可见，马克思甚至比我们今天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参加国民党的◇220◇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一八四八年，当问题是要和革命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样做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这是**策略**问题。但马克思**在原则上**承认这种加入是容许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说武汉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就此为止，那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懂得中国革命性质的人，才会这样说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它们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结成战斗同盟，同他们一起**征服**和**压迫**其他的国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

能不能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看不出这种差别，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谈，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当然，假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结成联盟，而会叫它滚蛋。但问题正在于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正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着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要比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类型的一切**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高得多。◇221◇

甚至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以前**就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当时也要比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高出一些，因为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从而**巩固**帝国主义，

而蒋介石进行战争——无论进行得好坏——则是**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撇开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第三个问题

“你估计国民党是两种力量（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而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估计国民党是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两种估计有没有矛盾呢？**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第一、必须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实际状况所下的定义，在你们的“问题”中是转述得不对和不完全确切的。在“问题”中说“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然而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是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党内联盟的◇222◇一员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国际决议中所说的不是一般大资产阶级，而是**“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因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大资产阶级，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应当声明，我看不出国民党的这两个定义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给国民党下定义，这两个观点，不论哪一个，都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正确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说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说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也不是想说明一九二五年有哪些阶级**事实上**

加入了国民党。我说到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是把国民党当做东方被压迫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当做**应当**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来谈的。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说：“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过渡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问题”第二六四页〔五八〕）

因此，我当时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在，而是它们的**将来**。在这里我是完全对的。因为国民党之类的组织，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才能有前途，而且说到小资产阶级时主要是指**农民**而言，因为农民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共产国际所注意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其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不是从国民党的将◇223◇来，不是从它应当成为什么，而是从**现在**，从国民党内部的**实际**状况和正是哪些阶级在一九二六年**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去考察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里还可以添上一句：不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所依靠的也正是这些阶级的联盟。在我曾经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国际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同积极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各种力量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表现在国民党内和广州政府内相应的联合上”（见决议〔五九〕）。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限于论到一九二六年的**实际**状况，而且论到国民党的**将来**，所以它不能不说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联盟，不能不说在最近期间这种联盟应代之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决议接着又说：“目前运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门口，正

处在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前夜”；“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更富有革命性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把大部分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排除出去**VW”（同上）。

这也就是国民党所应当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从国民党分裂和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已在武汉开始形成，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所谈到的◇224◇就是这个联盟（见前）。

由此可见，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国民党的：

（甲）从国民党的**现在**方面，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的方面；

（乙）从国民党的**将来**方面，从国民党作为东方国家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应当成为什么的方面。

这两种说明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为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把握国民党，终于提供了一幅详尽的图画。

试问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拿英国“工党”来做例子。大家知道，英国存在着一个依靠工人和职员的工会组织的特别的工人政党。称这个党为工人政党是谁也不怀疑的。不仅在英国的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都是这样称它的。

但是能不能说这个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阶级政党呢？能不能说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两个阶级的政党呢？不，不能说。**事实上**英国工党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事实上**这个政党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政党，如果说到在这个党内谁的影响大，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影响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大，那末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党内是占优势的。◇225◇

其实，这一点也就说明英国工党**事实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附

属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却把它叫做**工人**政党。怎样来解释这个“矛盾”呢？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确定这个政党为**工人**政党的时候，通常指的不是这个政党现在的实际状况，而是工人政党的结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政党**将来**一定会变成和资产阶级世界相对立的工人的真正的阶级政党。这并不排斥**事实上**这个党暂时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这一事实，相反地，而是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

这里也没有矛盾，正像我刚才谈到国民党时所说的一切没有矛盾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加入国民党都是不适当的。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国民党和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共同参加一个革命民主政党的**两个**政党的领导下，能不能进行这种准备呢？不，不能。革命的历史说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当然，如果所说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取到手，才能发展起来。没有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没有而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因此，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共产党就◇226◇必须退出国民党，以便在自己单独领导之下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

我以为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代替目前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就像在过渡到十月革命的时期我们和社会革命党左派的那种联盟一样。

第四个问题

“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如果不是，那末今后争取民主专政的斗争的道路将是怎样的呢？

马尔丁诺夫断言不经过‘第二次’革命也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末中国的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可能成为这样的专政。如果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武汉政府就一定会成为民主专政，可是它现在还不是这种专政的机关。

为了使武汉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需要些什么呢？这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使武汉政府成为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政府，成为竭力支持这个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须使国民党以工农出身的土地运动的新领袖补充其上层领导集团，并且扩大其下层组◇227◇织，把农民协会、工会委员会和城乡其他革命组织都包括进去。

国民党现在约有五十万党员。这太少了，对于中国实在太少了。必须使国民党把数百万的革命农民和工人包括进去，从而变成千百万人的革命民主组织。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民党才有可能产生出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

马尔丁诺夫同志是否确实说过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文章，我所以没有看过，是因为我没有可能浏览我们日常的一切著述。但如果他确实说过在中国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那

末这就是一个错误。

邱贡诺夫有一次问我：“怎么样，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不兜什么圈子，通过国民党用和平方法一下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呢？”我反问他：“邱贡诺夫同志，你们中国的情形怎样，——你们那里有没有国民党右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呢？”他回答说有。我就对他说：“那就非打架不可了。”

这还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当然，在原则上可以提出中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例如列宁有一个时期就曾认为俄国革命可能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时期。但是在七月失败以后，列宁就承认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更应当认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28◇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

第二、因为没有根据认为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

最后因为：既然在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形式的苏维埃而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成功，那末有什么根据可以推想这样的过渡通过国民党就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呢？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同时向北方进攻，这不是抹杀了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线吗？”

同志们，你们向武汉政府要求得太多了。既打张作霖，又打蒋介石，又打李济深，又打杨森，那当然是很好的。但目前武汉政府的形势不允许它在所有这四条战线上同时举行进攻。武汉政府对奉军◇229◇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

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

在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这两条重要战线上同时进攻，目前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关于西攻杨森和南伐李济深，就更不用说了。

在内战时期，我们布尔什维克是较为强大的，可是我们也没有能够在所有战线上展开顺利的进攻。在目前有什么根据要求武汉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现在，当奉军和吴佩孚系军队从北方向武汉推进的时候，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冯军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吧。

夺取上海还要经过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

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这是不是比较适当呢？我想这样做是比较适当的。

因此，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抹杀”对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线，因为只要土地革命发展起来，它◇230◇反正是抹杀不了的；而土地革命正在发展，将来还要发展，——这一点现在几乎是无可怀疑的。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抹杀”，而在于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

某些同志以为现时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是革命性的基本标志。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目前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为一谈。

第六个问题

“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否可能呢？”

我认为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基马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

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的革命，因为：

（甲）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乙）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

千百万的农民在许多省份里已经夺取了土地，并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231◇这就是防止所谓基马尔式革命的可能性的解毒剂。

不能把基马尔党和武汉左派国民党相提并论，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样。土耳其并没有像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

的中心。安哥拉远不如武汉，正像基马尔党远不如左派国民党一样。

从国际地位来看，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别。在土耳其方面，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夺取了土耳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对帝国主义者说来是重要的据点。土耳其现在已经降为一个只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国家。它对于帝国主义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有决定意义的投资场所。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就中是由于旧土耳其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只在安那托里亚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是有几亿人口的民族密集的国家，是全世界极重要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在那里，在土耳其，帝国主义利用旧土耳其内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对抗，能以割取东部一些极重要的地区而满足；而在这里，在中国，帝国主义必须在民族中国的活的躯体上开刀，把它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的省份，以保持自己的旧有阵地，或者至少维持住这些阵地的一部分。

因此，在那里，在土耳其，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能以基马尔派的夭折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告终；而在这里，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232◇

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这一切差别，把基马尔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

我知道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间有些人抱着基马尔主义的思想。现在妄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在中国是不少的。其中第一个就是蒋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闻记者有意把蒋介石算做中国的基马尔。但这一切都是张皇失措的资产者的梦想和幻觉。在中国，**要就是**张作霖和张宗昌之流的中国的墨索里尼们胜利，然后又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要就是**武汉胜利。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这两个营垒之间的蒋介石及其帮手

们一定要垮台，遭到和张作霖、张宗昌同样的命运。

第七个问题

“在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立即夺取土地的口号，对于湖南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应当怎样估计呢？”

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233◇

如果武汉政府想要胜利，如果它想要建立真正的力量去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看来他们以为：假如蒋介石没有分裂出去，革命事业也许要好些。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当然，蒋介石的政变不能不使一些地区的工人遭到局部的失败。然而这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这里。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

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藉此可以把一切肮脏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但是，要使这个土地运动能够形成，就必须使它有一个概括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没收地主◇234◇土地。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呢？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于河南已经组织了工人苏维埃而有做革命运动尾巴的危险呢？”

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苏维埃呢，是**无产阶级**苏维埃，还是**非无产阶级**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列宁在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中曾经谈到在东方落后国家里成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列宁指的是中亚细亚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他指的是像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其实这也就说明列宁的提纲中没有一句话说到要在那样的国家里组织**工人**苏维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宁的提纲指的不是中国，因为对于中国不能说“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他指的是东方其他较落后的国家。

因此，这里说的是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不是列宁的提纲，而是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罗易的提纲，这个提纲说到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但这个提纲中说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过渡到无产阶级◇235◇革命时，在这些国家里应该成立工农苏维埃。

什么是工农代表苏维埃呢？工农代表苏维埃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为新的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工农代表苏维埃又是组织革命的中心。

但是只有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推翻现存政权的机关时，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时，它才能成为组织革命的中心。如果它不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它也就不能成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反对派在反对列宁主义对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看法时不愿了解这一点。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建立两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否应当推翻武汉政府呢？显然是不应当的。相反地，他们应当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为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

既然共产党现在不应当推翻武汉政府，那末现在为什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去推翻武汉政府，这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容许的；

或者是共产党人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不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不把苏维埃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那时苏维埃就会死亡，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

列宁在说到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总是警告不要这样做的。◇236◇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河南已经出现了工人苏维埃，说到共产党如果不把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便有做运动的尾巴的危险。同志们，这是无稽之谈。现在河南并没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英国报纸散布的谣言。那里有“红枪会”，那里有农民协会，而工

人代表苏维埃目前根本没有。

当然，成立工人苏维埃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困难。但问题不在于成立工人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不这样做，苏维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维埃的讽刺。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维埃，以致后来又把它们断送，变成空架子，这正是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变成以苏维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属品。

一九〇五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曾要求恢复亦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苏维埃本身都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倒转过来。列宁当时反对赫鲁斯塔廖夫说，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应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因为后卫队（农民）还没有靠近先锋队（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提出起义的口号是冒险的，是不适当的。

由此可见，第一、不可夸大苏维埃本身的作用；第二、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不能不估计到周围的情况。

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吗？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237◇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

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在中国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而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两重政权的基础和采取以苏维埃政权代替现在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方针。

我以为这样做还不到时候。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易于起领袖的作用，起领导者的作用，需要些什么呢？

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有自己

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

第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去组织革命的协会和委员会，去没收地主土地。

第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

最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在这些机关中实行进一步展开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的革命的政策。

反对派想以中国共产党脱离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办法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238◇独立性。但这是我国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说过的那种十分可疑的“独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维克当时反对列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党的领导权，**而是**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列宁当时答复得很对：这就是否认独立性，因为把独立性和领导权对立起来就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我以为反对派现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要求或暗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正是滚到一九〇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的“独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只有既在国民党党内又在国民党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

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这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九个问题

“目前能不能在中国提出成立正规红军的问题呢？”

我以为从前途来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问题实际存在，那末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239◇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

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这对于在前线尤其是在后方反对所有突然钻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都是必要的。

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防止后方和前线的溃败、防止投敌和叛变的保障。

我以为这条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适当的道路。

第十个问题

“现在，在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夺取中国企业的口号呢？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夺取在中国的外国工厂，这会不会引起同时夺取中国企业呢？”

我以为，一般说来，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中国企业主的顽强怠工、大批怠工企业的关闭和人为的失业现象，可以迫使武汉政府现在就开始把某些怠工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武汉政府的力量使这些企业开动起来，——这种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

可能武汉政府现在就要被迫**在个别场合下**实行这种预防办法去对付特别坏的和反革命的中国企业主。◇240◇

至于外国企业，要把它们收归国有则是将来的问题。把这些企业

收归国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直接宣战。但是要直接宣战，就需要有稍微不同于现在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况且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不适于解决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这种极重要的任务的。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需要有另一种环境、另一个革命阶段、另一种革命政权机关。

按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反对派的错误”
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241◇

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答坡克罗夫斯基）

我认为你今年五月二日的来信没有理由和根据要我作详细的回答，所谓逐条的回答。

其实，你这封信和杨—斯基的信比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但我还是回答你这封信，因为它包含着一些直接恢复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加米涅夫立场的成分。只是为了揭露这些恢复加米涅夫立场的成分，我才认为需要对你的来信作一个简短的答复。

（一）你在来信里说：“事实上我们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是**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党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维护的，是它对农民的旧口号，即**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

第一、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并没有力求把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分开，而是把农民看做一个整体。◇243◇

第二、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并没有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而是停留在一九〇五年列宁的小册子“两个策略”所规定的旧的立场上。

第三、照你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与苏维埃的动摇和妥协、与中农在苏维埃内部和前

线上的动摇、与他们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动摇、与他们在七月事变时（即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的妥协分子为首的苏维埃协同反革命将军一起来孤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厉害的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政策，即布尔什维克反对某些农民阶层的动摇和妥协的斗争，原来是无的放矢，绝对不需要的。

最后，照你这样说来，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原来是对的，而列宁认为这个口号已经陈旧并宣布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原来是不对的。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会明白你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绝伦的。

可是，因为你是一位很喜欢从列宁著作里引证个别词句的人，我们就来看看引文吧。

不必费多大气力就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土地关系中的**新**现象，不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的利益一致，而是贫苦农民和富裕农民的**分裂**：贫苦农民趋向于无产阶级，而富裕农民则跟着临时政府走。

请看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争论时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244◇

现在[①]把希望寄托在和农民利益的一致上，这对“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容许的。”（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〇五页）

其次：

“我们现时从一些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看出一种等待召集立宪会议去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这是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富裕农民**[②]的胜利。”（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七页）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再其次：

“可能农民将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我不仅不忘记这个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在直接而明确地规定土地纲领时我还估计到**新**现象，即雇农和贫苦农民跟富裕农民间所发生的更深的**分裂**[①]。”（见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写的“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七页）

这就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农村新环境里看出的**新颖的**和**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时期内规定党的政策时所持的出发点。

列宁根据这个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说道：◇245◇

“我们只是在这里，在本地，才知道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士兵专政的实现，而士兵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可是，这个‘专政’已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所以需要**重新审查‘旧’布尔什维主义**。”[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六页）

列宁根据同一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写道：

“**现在**谁还只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后于实际生活，因而谁就是实际上**跑到了**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谁就应该被送到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档案库（可以叫做“旧布尔什维克”档案库）里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页）

在这个基础上也就产生了**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旧口号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可以说（而你在信里正是这样说的）这是像托洛茨基那样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革命，但这种说法令人信服的程度，正像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对列宁的反驳一样。

列宁完全估计到这种反驳，所以当时他说：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可◇246◇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的**[①]部分是跟工人阶级一道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页）

加米涅夫的错误和你现在的错误就是不善于看出并着重指出小资产阶级（这里是指农民）两个部分的区别，不善于从全体农民群众中**划出**农民的贫苦的部分，并根据这一点来**规定**党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时的政策，不善于从这一点**引伸**出新口号，党的第二个战略口号，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

我们且根据列宁的著作来循序考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一口号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实际历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国时局的特点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②]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③]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页）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④]支持他们的话——才能打破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247◇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争得正义的持久的和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一八页）

————————————————

①②③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①]（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无产者和**贫苦农民**[②]专政才能打破资本家的反抗，显示政权的真正伟大的勇敢果决精神，使自己无论在军队或农民中间都能得到群众热烈的、奋不顾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六页至第三四七页）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六〇〕一书中和“新生活报”进行论战时写道：

“**或者**[③]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是你们早已不拥护的，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及的，因为它知道，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人民只耸一耸肩就把这样一个政权抛开了，而现在则会◇248◇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抛开这样一个政权。**或者**[④]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联盟，协定），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夺取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同盟半年来在俄国已试用过不下几十种的方法，但终归失败了。最后，**或者**[⑤]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⑥]，反对资产阶级，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各位先生**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

——————————————

①②③④⑤⑥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出来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九十九页至第一〇〇页）

事实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准备史中的这一切事实和事件，你都“安然地”**回避过去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为反对当时坐在苏维埃里的“富裕农民”的**动摇**和**妥协**而进行的**斗争**，你都“安然地”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一笔勾销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你都“安然地”**埋葬了**，你还以为这不是**亵渎**历史和列宁主义。

你应从这些举不胜举的引文中看到：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后所持的出发点，不是联合◇249◇全体农民，而是联合农民中的贫苦的部分；布尔什维克在走向十月革命时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而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在实行这个口号时必须反对苏维埃的动摇和妥协，反对坐在苏维埃里的某一部分农民的动摇和妥协，反对那些叫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动摇和妥协。

由此可见，没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我们当时就不能聚集一支相当强大的政治军队，以克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中立某一部分动摇的农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从而使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见我给杨—斯基的回信[①]）。

这样看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和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内对的是列宁，而不是加米涅夫。你现在却来恢复加米涅夫立场，看来未免结交了一个不大好的伙伴吧。

———————————————

① 见本卷第一九四页。（指旧版页码）——编者注。

（二）和上述一切相对立，你引证列宁的话，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全体**农民支持下取得政权的。说我们是在全体农民的**某种**支持下取得政权，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你竟忘记补说一件“小◇250◇事情”：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全体**农民只是在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限度内**才支持过我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在这里是能解决问题的。“忘记”这样重要的“小事情”，从而抹杀最重要的问题，这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容许的。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把列宁关于**全体**农民的支持的言论和同样是列宁规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党的口号**对立起来**。可是为了把列宁这种言论和前面摘自列宁著作的引文对立起来，为了有根据地用你引来的列宁关于全体农民的言论来驳倒前面所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的几段话，——为了这样做，至少必须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必须证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列宁认为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副**”产物，十月革命“**顺便地**”解决了这个任务。首先必须驳倒列宁这个原理，并证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是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你试证明这一点吧，你如果能证明，我就决意承认：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没有认为自己能承担这种过分冒险的任务，但你企图“顺便地”证明在十月革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即和平问题上，似乎**全体**农民都支持过我们。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在和平问题上，你的观点已经是庸人的观点了。其实，当时在我们这里和平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因为只有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才能指望摆脱帝国主义战争。◇251◇

你大概忘记了列宁的话：“只有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才能结束战争”，“‘打倒战争’，并不是抛弃刺刀，而是使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页和第一一九页）。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应当证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点**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证明这一点，——那时自然要得出结论说，在十月革命中，**全体**农民只是在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君主制、消灭地主所有制和地主秩序的**限度内**，才支持过我们。

第二、你应当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必**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一贯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不必**根据这个口号来一贯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不必**根据这个口号来一贯揭露某些农民阶层及其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们的动摇，便能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由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

你试证明这点吧。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都能保证自己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呢？这是因为我们已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能。

为什么我们得到了这种可能呢？这是因为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而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为什么我们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呢？这是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进行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口号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252◇作了斗争，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口号不断地和坐在苏维埃里的中农的动摇作了斗争，因为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口号下**才能克服中农的动摇，打破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并聚集一支能够为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而斗争

的政治大军。

没有这些决定十月革命命运的先决条件，我们无论在十月革命时或十月革命后，都不能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来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

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的问题是要这样来了解的。

因此，将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全体农民支持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事实跟我们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准备十月革命的事实**对立起来**，就是**一点也不懂得列宁主义**。

你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你既不懂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在十月革命进程中错综结合的事实，又不懂得从党的第二个战略口号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中产生出来的十月革命的个别要求如何得以实现的诀窍。

读到你的来信时会以为不是我们使农民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反而是“全体农民”（包括富农在内）使布尔什维克为他们服务。假使布尔什维克这样容易地“去”为非无产阶级服务，布尔什维克的事情可就糟了。

拖你后腿的正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场。

（三）你硬说斯大林看不出一九〇五年的环境和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的环境的差别。这当然是不◇253◇严肃的。我没有这样说，而且不能这样说。我在信里只是说，党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证实。这当然是对的。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宁在“农民和工人”一文中正是这样描写那种情况的：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当时（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①（见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

你不过是想吹毛求疵罢了。

（四）其次，你企图证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企图把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后**有可能和中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那段话，和他的关于**十月革命前**中农的妥协的论点对立起来。

不必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你把这两种不同现象等量齐观是绝对不科学的。十月革命前的即资产阶级执政时的中农，和无产阶级专政已巩固后的即资产阶级已被推翻和剥夺、合作制已经发展、主要生产资料已集中到无产阶级手里时的中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把这两种中农等量齐观，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不联系历史环境来观察现象而丧失一切前途。这颇与季诺维也夫混淆日子和时期、胡乱引◇254◇证他人言论的手法相似。如果这叫做“革命辩证法”，那就必须承认坡克罗夫斯基打破一切“辩证的”吹毛求疵的纪录了。

（五）其余的问题我不谈了，因为我认为在我和杨—斯基的通信中已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一九二八年第四版◇255◇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六一〕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一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257◇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对派现在的这种派别言论是否违背了他们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说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诡辩，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不仅说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说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坚持，派别活动应当抛弃和肃清，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诚心诚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已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258◇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六二〕、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①，以及布哈林日前

———————————————

① 见本卷第一九九页至二〇七页。（指旧版页码）——编者注。

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259◇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藉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260◇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布哈林藉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①]受帝国◇261◇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262◇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①]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263◇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②]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像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

① “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译者注。

② “红枪会”是中国在民国时期出现的会门组织。它最早在山东与河南地区发展起来，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各地的名称不一，对外以称“大刀会”或者“硬肚”者为多。——本书制作者注。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264◇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一九〇五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

请让我从一九一五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农民呢，分为阶层了，分化了，他们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渐渐消失了；在俄国‘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了！！那末‘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托洛茨基继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一九一五年重复说的）就不对了，那末不应当说◇265◇‘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应当说‘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涂到什么程度，从他的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也以坚决性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第二一七号）！！托洛茨基不曾想到：如果无产阶级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翻君主制，那末这将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从一九〇六年起，布尔什维克就主张要**特别**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把这个要求列入了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但是‘农民’和马尔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却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是一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个很明显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千言万语都‘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而现在关键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266◇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267◇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拿季诺维也夫做例子来说。季诺维也夫在他今年四月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计为一九二〇年时期的基马尔派的政府。但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评价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268◇

季诺维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计为基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议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说：

“必须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谁能懂得呵！托洛茨基说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诺维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马尔派的政府。由此应该做出结论：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议“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做个例子吧。◇269◇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论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维埃的提纲，罗易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提纲，以及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是说明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细亚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句话说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纲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纲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纲

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这个提纲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提纲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个提纲断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纲。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270◇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许是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们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说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现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现在则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

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面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271◇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像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272◇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

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们说：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一九〇五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难道当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维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维埃的存在并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系统。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维埃看做仅仅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条件，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顺利条件吗？

假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但是，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间没有民◇273◇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初，也曾谈到革◇274◇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一九一七年俄国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一进攻，都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275◇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维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维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以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替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八个卢布到十五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

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276◇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诀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极轻率的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简单。

从**原则上**来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出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就是由马克思主编的。◇277◇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内，把革命资产阶级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这

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是**策略**问题。但是，**在原则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六三〕中是赞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也是主张容许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

五　两条路线◇278◇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

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79◇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

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280◇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①]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四月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初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我想在最后用几句话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别言论在当前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他们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对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闻所未闻的谩骂和不能容许的斥责。

——————————————

② 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均在高加索。——译者注。

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实质上，他们要得到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281◇自由。实质上，他们要把马斯洛夫一伙人的作风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282◇

大革命风云突变

共产党人坚贞不屈

国共合作，武汉苦撑危局

蒋汪勾结，宁汉合流

给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

亲爱的同志们！

两年以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四周年的时候，我在你们那里讲过话，谈到这个大学对于各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方各被压迫国家的任务〔六四〕。

这个大学执行着自己的任务，现在正把新的战斗干部，代表七十四种民族的第四期毕业生，用列宁主义这种强大武器武装起来的同志们，送到斗争的烈火中去。

同志们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走上战斗的工作岗位，在这时，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正企图扼住中国革命的咽喉，同时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挑战，希望摧毁世界各国无产者的这个坚固而强大的堡垒。

我祝贺毕业的同志们，同时坚信你们会光荣地对无产阶级尽自己的义务，会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识贡献给东方劳动者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解放事业。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二二号◇283◇

答坡克罗夫斯基

在开始和你通信的时候，我以为是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往。现在，在接到你的第二封信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和一个妄自尊大、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真理利益的无赖通信。因此，如果我在这封简短的（也是最后的）回信中直言不讳，你可不要诧异。

一、我曾肯定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时期中，党已经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以及“**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战略口号**代替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以及“**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战略口号。

我曾肯定说，党是在实行这个新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并到达十月革命的，不实行这个口号，党就不能组成一支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的政治大军。

你坚决反驳我的这种论断，并且证明说：“党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所维护的，是它对农民的**旧**口号，即**和全体**农民联盟的口号。”（见你的第一封信）你不仅证明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纯粹加米涅夫式的概念，而且认为这个概念几乎是一个公理。

问题**原是**这样的，我们所争论的也正是**这一点**。◇285◇

现在，你看到你的固执和自负把你弄到了这么难堪的境地，于是不得不低声承认自己的错误，肯定“党在四月至十月期间的战略口号正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见你的第二封信）。

但你一低声承认自己的错误，就马上大叫大嚷地竭力把它说成是“措辞”不当的小事，并且声明：“我在上次信中说到党抛弃了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时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那种措辞，也许有不明确的地方。”（见你的第二封信）

这样一来，我们进行的是“措辞”上的争论而不是两种**原则上**不

同的概念的争论了！

客气些说：这就叫做**耍无赖**。

二、我曾肯定说，我们是在跟苏维埃中某部分农民的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情况下准备十月革命的，这种动摇和妥协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失败），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才能够顺利地跟这种动摇和妥协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只是靠这个口号才得以把动摇和妥协的中农中立起来。

你坚决反驳这一点，坚持自己的错误，认为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党是在“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下进行工作的。而你这样反驳，就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谈到布尔什维克为争取中农阶层脱离各小资产阶级政党、为孤立这些政党、为中立农民中某些动摇和妥协的阶层而斗争的那些光辉灿烂的篇幅一下删除了。

问题**原是**这样的。◇286◇

现在，你**既**不得不承认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某部分农民动摇和妥协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为这种动摇和妥协作斗争的事实。

但你一面承认这一切，一面却装出好像这和中立中农问题没有关系的样子，甚至处心积虑地责备我，说我“没有答复”中立中农的问题。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你太天真了，或者是你为了达到某种绝非科学的目的而有意识地给自己戴上一副天真的假面具。

三、我曾肯定说，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由于它顺利地贯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战略口号；如果不以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口号代替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口号，党既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能在十月革命进程中获得全体农民的支持；全体农民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限度内才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的；由于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所以全体农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

其实你是反对这一点的，因为你在第一封信中否认了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中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这一事实。

问题**原是**这样的。

现在，你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和全体农民联盟的旧战略口号确实已被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新战略口号所代替了。◇287◇

但你承认了这种真理，就立即像加米涅夫那样着手消灭痕迹，把保证获得全体农民支持的“策略”任务与保证和贫苦农民联盟的“战略”任务**对立起来**，从而像加米涅夫那样侮辱你刚才承认的关于第二个战略口号的真理，实际上你又回到了原来的加米涅夫的立场，同时却处心积虑地诬蔑我，说我似乎不承认全体农民在十月革命时给予布尔什维克一定的有条件的支持。

看来你不懂得策略任务是战略任务的一部分，不能把前者和后者等量齐观，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看来你不懂得我国**全体**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只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他们只是在十月革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亦即十月革命消灭地主所有制、地主秩序和地主秩序的政治上层建筑（君主制度）的限度内，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

看来你不知道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在苏维埃夺取政权以后，当克伦斯基向彼得堡进军的时候，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农民组成的）**拒绝**开赴前线去抵抗克伦斯基，同时宣称他们这支卫戍部队是“拥护和平并反对新战争”的，他们不是把和平了解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是了解为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正像你和其他许多政治上的庸人所了解的那样（见你的第一封信）。

看来你不知道当时彼得堡是由赤卫队员和水兵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袭击下拯救出来的。

看来你不知道我们国内战争在其初期（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

一八年春天）主要是依靠工人和水兵的力量进行的，所谓“全体农民”的支持，在当时往往只表现于他们并没有阻碍我们去直接打◇288◇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罢了。

看来你不知道实际上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们才把红军建成一支群众性的军队，那时农民已分得土地，富农力量已相当削弱，苏维埃政权已能保卫自己，并且已**有**实行“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口号的**可能**……

当然，可以写种种荒诞无稽的东西，纸张总是会忍受的，可以像加米涅夫那样转弯抹角并消灭痕迹…… 但总要有些分寸。

四、你醉心于自己笔头的“艺术”，若无其事地忘掉自己的第一封信，还硬说我不懂得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真是嫁祸于人！

什么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呢？不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新口号代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能不能设想我国会有这种转变呢？显然是不能的。

列宁为什么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作斗争，主张以新口号代替旧口号，并把这种代替和俄国革命从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联系起来呢？是不是为了使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和更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呢？显然是为了这一点。

是谁在当时反对从旧口号过渡到新口号呢？显然是加米涅夫。

是谁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否认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以新战略口号代替旧战略口号的**事**◇289◇**实**呢？显然是你这位可敬的坡克罗夫斯基。

是谁纠正了坡克罗夫斯基的这个加米涅夫式的错误呢？显然是斯大林同志。

由此可见，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

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结论：要兼有无知之徒的无赖手段和本领有限的卖艺者的自满心理，才能像你这位可敬的坡克罗夫斯基一样随意地颠倒是非。

我想，已经到了和你断绝书信往来的时候了。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290◇

时 事 问 题 简 评

一　论战争的威胁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

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场、争夺通向这些市场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间、日美之间、英法之间、意法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有时表现为无产阶级公开的革命发动（英、奥）。

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和革命的爆发（中国、印尼、北非、南美）。◇291◇

这一切矛盾的增长都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尽管稳定是事实，这次危机却较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危机无比地加深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在和繁荣，只是使这个危机加深和尖锐罢了。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新的战争，并把它看做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途

径，这是不足为奇的。军备的空前扩张，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假如没有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假如没有苏联的和平政策成为新战争煽动者的绊脚石，假如帝国主义者不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那末帝国主义者早已厮杀起来了。

我想，后一种情况，即惧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乃是暂时阻止厮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某些集团就有了一种“自然的”意图：把自己阵营里的矛盾推到后面去，暂时掩盖这些矛盾，成立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向苏联进军，以便牺牲苏联来解决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即使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也好。

首先倡导这件事情的，首先倡导成立帝国主义者的反苏统一战线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的参谋部——保守党，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意外。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292◇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到现在的中国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站在而且仍然站在人类解放运动的摧毁者的前列。苏联人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我国因英国资本家的恩赐而遭到的暴行、掠夺和军事侵犯。如果英国资本及其保守党再来领导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策源地的战争，即反苏的战争，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自己的手来作战的。它总是宁愿借别人的手来进行战争。它有时的确找到了甘愿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建成了欧洲各国的联盟来反对革命的法国。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虽然如此，它还是被赶出了苏联国境。

现在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在那里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革命。

十分明白，保守党在准备对苏战争，它已经进行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来建立大小国家的反苏“神圣同盟”。

如果在从前，在最近时期以前，保守党人的这种准备工作多少是隐蔽地进行的，那末在现今，在最近时期，他们却转而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给予苏联几次公开的打击，企图在万目睽睽之下结成臭名远扬的“神圣同盟”。◇293◇

第一次公开打击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这次袭击至少有两个目的。它要发现苏联“破坏”工作的“可怕”文件，凭藉这些文件造成普遍愤怒的气氛和反苏统一战线的基础。它要造成和北京政府的军事冲突，使苏联对中国作战。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是失败了。

第二次公开打击是袭击阿尔柯斯[①]并对苏绝交。这次打击的目的是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开始全欧洲对苏联的外交封锁，挑起一系列对苏断绝条约关系的事件。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也失败了。

第三次公开打击是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②]。保守党代理人所组织

————————————————

① 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一九二〇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该公司及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同遭英国警察的搜查和袭击。——译者注。

② 沃依柯夫（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是苏联外交家，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任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在华沙被白卫分子杀害。——译者注。

的对沃依柯夫的暗杀，照主谋者的毒计，是要起萨拉也沃暗杀事件[①]的作用，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这一次打击看来也失败了。

这些打击暂时都还没有使保守党人得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呢？

因为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愿意和苏联保持经济联系的。

因为苏联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因为英国的附属国，无论是张作霖的国家或皮尔苏茨基的国家都一样，不愿意做保守党人的无声无臭的工具以损害其本身的利益。

看来可敬的公爵们不愿了解：每个国家，即使它是最小的国家，都情愿把自己当做一个单位，力◇294◇求过自己的日子，不愿为了保守党人的漂亮眼睛而把自己的生存作孤注一掷。英国保守党人忘记了估计这一切情况。

这是不是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打击呢？不，不是这样。相反地，这只是说打击将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不能把这些打击看做偶然的事情。它们是从整个国际环境中、从英国资产阶级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位中、从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的地位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

————————————

① 萨拉也沃暗杀事件系指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也沃（波斯尼亚）被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而言，这次刺杀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爆发的表面原因。——译自“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编者注。

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同时决不可认为保守党人在某种条件下造成某种反苏的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敲起新战争威胁的警钟，提高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不倦地使群众有准备地以革命斗争的全副武装对付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组织新战争的种种企图。

任务就是要当众揭露一切“认为”新战争的威胁是“虚构”，以和平主义的谎言安慰工人并漠视资产阶级在准备新战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想使战争出乎意外地袭击工人。◇295◇

任务就是要使苏联政府今后仍然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平政策，实行保持和平关系的政策，不顾我们敌人的挑拨伎俩，不顾他们对我们威信的伤害。

敌人营垒中的挑拨者正在刺激我们，将来也要刺激我们，硬说我们的和平政策是由于我们软弱，由于我们军队软弱。这有时激怒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他们易受挑拨并要求采取“断然的”手段。这是神经脆弱。这是缺乏耐性。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受敌人愚弄。我们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保卫和平事业，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志，揭穿我们敌人的强盗意图，暴露他们是战争煽动者。

因为，假如敌人逼迫我们，确切些说，当敌人逼迫我们进行战争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把苏联的劳动群众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

至于说我们“软弱”或我们军队“软弱”，那末我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第一次犯错误。约在八年以前，当英国资产阶级对苏联实行干涉，而邱吉尔以“十四国”进军来威胁的时候，资产阶级报刊也叫嚷我们军队“软弱”，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干涉者及其同盟者是可耻地被我们胜利的军队赶出国境了。新战争挑拨者先生们不妨记住这一点。

任务就是要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非军事工业，提高我国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警惕性，锻炼他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消灭那种可惜还远没有被消灭的松弛现象。◇296◇

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的后方并清除其肮脏东西，毫不踌躇地惩办“显贵的”恐怖分子和纵火焚烧我们工厂的人，因为没有巩固的革命后方，就不可能有我国的国防。

不久以前，收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兰斯柏利、马科斯顿和布罗克韦对于枪毙俄国王公贵族中二十个恐怖分子和纵火者的抗议书。我不能把这些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看做苏联的敌人，但是他们比敌人更坏。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自称是苏联的朋友，可是又以自己的抗议帮助俄国地主和英国密探今后组织对苏联代表的暗杀。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抗议使苏联工人在其死敌面前解除武装。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不愿了解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分子是革命自卫的必要措施。

无怪乎人们说：“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种朋友，而敌人，我们自己是能对付的。”

至于枪毙二十个“显耀的”人物，那是让苏联的敌人知道，让国内外的敌人知道，苏联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它的手腕是坚强的。

既然如此，对于我们那种在新战争威胁下向党作新攻击的倒霉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对于认为在战争威胁下对党加强攻击是适合时机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它不团结在党的周围去反对外来的威胁，却认为利用苏联处境的困难来对党作新的攻击是适合时机的，这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难道反对派反对苏联在将来和帝国主义作战时获得胜利，反对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反对巩固我们的后◇297◇方吗？或者，

也许这是在新的困难面前畏缩，临阵脱逃，以喋喋不休的左的词句掩饰逃避责任的愿望吧？……

二 关于中国

现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能给走过的道路做出某种总结，并考察一下关于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的问题。

有几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必须顾到的，不顾到这些原则，既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也不可能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我们的反对派早已忘记了这些原则。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须一再提到这些原则。

我指的是这样的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第一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则。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298◇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我以为顾到这些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路线作马克思主义的检查。

我们就从这几个策略原则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

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说来，这些“领导者”不

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顾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远的冲突，◇299◇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怜的领导者领导的基本结果。

我们的反对派正是这类可怜的领导者。

反对派听说**中国**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知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便得出一个对**中国**的现成公式：打倒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万岁（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对派忘记中国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不同，它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掌握中国工业、商业和交通命脉，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加于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加于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中国革命。

大家知道，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国民革命军到达长江的时期、国民党分裂以前的时期来说，那就不能不

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容许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条件下与这个资产阶级一起行动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结果是反对派背弃了自己的旧公式，宣布了一个“新”公式：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四月）。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一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反对派知道◇300◇关税自主首先是中国资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限制中国的关税，而在于它在中国拥有从数万万中国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和商行。

反对派忘记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于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剥削者。

反对派忘记正是这种情况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记谁宣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谁就会否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给中国资产阶级去领导了。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关税自主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纲，因为甚至连张作霖和蒋介石那样的反动头子现在都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由此便产生了反对派的两重性，他们企图摆脱自己的关税自主公

式，企图悄悄地放弃这个公式，而转向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二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301◇特点。

反对派听说商人资产阶级渗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现时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资本渗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是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现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与商人资本的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已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到全中国的趋势。

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军队中的指挥人员服从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们的影响，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较著的事实。

由此反对派便放弃了自己关于封建残余和土地革命问题的旧公式，由此反对派便企图偷偷放弃◇302◇自己的旧公式并默认共产国际的立场是正确的。

这就是对反对派的第三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该顾及中国经济的民族特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式和现实间的不协调，——这就是反对派可怜的领导者的命运。而这种不协调是反对派违背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这一列宁主义著名策略原则的直接结果。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原则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认清同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的原则的任务，并且十分自觉地估计到这种斗争因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爱尔兰等）、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对第二国际的不满到处都感觉得到，并且在扩大和增长，这种不满是由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由于它不善于或不能够创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这个中心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指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必须认识清楚，**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上面**[①]。只要各◇303◇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在每个国家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要调查、研究、找出、看透、抓住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①]，——这便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一页至第七十二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一定要顾到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相反地，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违背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

这种违背也就是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倒霉的根源。

* * *

现在来说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304◇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小封建主，新旧军阀的军事官僚机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掌握中国经济生活命脉并用海陆军来巩固自己剥削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种政策是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这种政策，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但这只是说明他们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了，他们离开列宁主义是这样远，就像天地相隔一样。

中国无产阶级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者吗？

是的，有过。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305◇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

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样可靠的。他们中间有些是比较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党当时不容争辩地是人数比较众多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推向左边，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扩大了革命地区，广州军队到达了长江；有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工会、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结成了政党；成立了第一批农民组织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人渗入了军队。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

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306◇

这样，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对革命是局部的损失。但革命却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更靠近了自己。这对革命是有利的。

当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国民党是不是人数众多的组织呢？无疑地是的。它不容争辩地是一个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人数更加众多的组织。

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

当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五六千人的小党成长为有五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

工会成长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团体，约有会员三百万。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

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307◇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

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的。

这些同盟者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

现时的特征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

这一脱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领导集团的压力，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天津地区施压力，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分裂，作为容许北进的代价。

反对派怀疑在中国有封建残余存在。但是现在谁都明白，封建残余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进攻力量还要强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在中国暂时还较强大，所以革命遭◇308◇到了暂时的失败。

革命在这一次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也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标志。

但是革命却把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对于革命的好处就在这里。

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要求正确

的政策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体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苏维埃当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俄国帝国主义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309◇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

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为了

扩大革命地区，形成群众性的党，使自己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接近农民的道路。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组织，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跑进了反革命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310◇族资产阶级走了。

但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了。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

只有这种政策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不明白吗？

除了我们的反对派中的可怜的领导者以外，谁能否认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转到反革命方面，说明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忘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并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说。

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个联盟的正确性。这个联盟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能否**根据这点**就断言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种联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反对派自己当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断言这种联盟是正确的。现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脱离革命之后，怎能根据这种脱离就断言和武

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311◇是不正确的呢？

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搬弄这样的“论据”，这难道不明白吗？

难道有人断言过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永无止期的联盟吗？难道天地间有永无止期的联盟吗？反对派简直丝毫不懂得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即无产阶级要与非无产者的阶级和集团结成革命联盟的原则，这难道不明白吗？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要能战胜较强大的敌人，就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同时**一定要**最仔细地、小心地、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各国内部各种各样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利害冲突，并且利用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①。谁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没有**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真正善于应用这个真理，那他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把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上述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一样。”（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312◇十一卷第五十二页）

反对派的路线是违背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相反地，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定要顾到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 *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现在来谈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这个策略原则所涉及的是更换口号、更换口号的程序和方法问题。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政治经验深信党的口号的正确性。

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

先进集团、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经深信，譬如说，推翻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好的。然而单是这一点还不足以推翻这个政府，还不足以把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当前的口号**。为了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从最近将来的**前途**变成**当前的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还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深信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并给党以某种支持来实现这个口号。

必须把作为最近将来的**前途**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公式严格地区别开来。以巴格达齐也夫为◇313◇首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集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正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那时他们过早地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时列宁把巴格达齐也夫集团的这种企图看成是危险的冒险主义，当众斥责了它〔六五〕。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和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决心接受这个口号。因为这个集团把作为前途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个集团**冒进**，使党有脱离当时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譬如说，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汉国

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不，不应当提出。

不应当提出，因为这是危险的**冒进**，这会妨碍共产党人去接近那些还相信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而孤立起来。

不应当提出，因为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因它反对土地革命、因它反对工人阶级、因它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目中大丢其脸，信誉扫地。

我们总是说：只要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就不能采取使它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方针，必须让它先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然后才在实践上提出◇314◇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

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大丢其脸，使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获得有力的响应。

现在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

因为现在摆在农民和工人群众面前让他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导集团，那末就要拒绝满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就要放弃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那末更换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就成为群众的当前口号了。

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要求就是如此，这个原则是有关更换口号的问题，是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新的革命立场上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适时地以另一些口号代替这一些

口号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的问题。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场上的时候，单◇315◇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①]。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国十分有力地和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龌龊，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②]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共产主义派别，其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酣睡、消沉、守旧、因循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的立场上，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在这些群众走近新的立场、转到新的立场的时候，善于领导这些群众。”（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意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是德国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译者注。

和作用，他们不承认这个策略原则，他们一贯地破坏这个策略原则。◇316◇

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还没有完成的土地运动（这是列宁的看法）。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认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是适当的，否认和这种工会结成临时联盟的必要性。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国民党），“跳过”中国人民群众的落后性，于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国民党发展阶段还没有完结没有终了的条件下又提出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反对派以为既然他们了解了、认清了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彻底、动摇、不可靠，既然他们认清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每个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都不难认清这一点），那末，这就完全足以展开反国民党、反国民党政权的“坚决行动”了，就完全足以使群众、使广大工农群众“立即”支持“我们”和“我们的”“坚决行动”了。

反对派忘记了，在这里，“我们的”了解还远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群众。反对派忘记了，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去认清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317◇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奇怪的是反对派忘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状况、认识和坚决行动的决心。

我们、党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否知道必须推翻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否知道临时政府的存在和苏维埃的活动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权应当转到苏维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于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企图推翻临时政府，那时候为什么列宁斥责这个集团是冒险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广大军队群众以及苏维埃本身都还没有决心把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来接受。

因为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使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使自己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无产阶级先进集团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和觉悟是不够的；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深信这种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杂乱的联合政府，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变节和背叛，必须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线上可耻的进攻，经过各小资产阶级政党跟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米留◇318◇可夫之流的“诚实的”联合，经过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等等，才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深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前途**的苏维埃政权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政权口号。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屡犯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当时犯过的错误，他们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宁愿顺着巴格达齐也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和列宁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彼得堡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否知道立宪会议是和苏维埃政权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召开这个会议呢？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敌人布

尔什维克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尾巴主义”，落后于事变，“抑制群众”，破坏“远程射击”策略呢？当然不是的。

布尔什维克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并确信立宪会议的无用，确信它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靠近自己，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国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319◇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国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国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国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

由此就得出完全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国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国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至第四十二页）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这样应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

在中国也必须这样应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不论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国民党或苏维埃口号都一样。◇320◇

看来反对派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完全失败。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是怎样的失败，是多大的失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可能这是近乎长期的失败，像俄国一九〇五年发生过的那样，革命中断了整整十二年，然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推翻专制政体，为新的苏维埃的革命扫清道路。

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没有的。这还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败，正像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认为是彻底的失败一样。这不是完全的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

但是，恐怕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暂时还没有根据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没有根据，是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会很快联合起来，如果一般说来它有一天会联合起来的话。

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和更加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或政府能够实行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来作为统治集团的避雷针。

因为已经夺得地主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压倒在地上的。

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被击溃。◇321◇

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

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

当然，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作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我采用这种比拟仅仅是为了大略地描绘出中国革命失败的程度。

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

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322◇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是“头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叫做“远程射击”的策略。

不对，最亲爱的，完全不对！这不是“远程射击”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当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时，这就

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

当反对派宣称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抛弃了他们的公式。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称中国封建残余被夸大了，而忘记了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存在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提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当时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阵营内部的矛盾，其中一个（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而另一个（季诺维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个武汉政府。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中间开始把这种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称为“远程射击”的策略呢？◇323◇

关于苏维埃必须说，共产国际早就先于反对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谈到了中国的苏维埃这一**前途**。至于反对派在今年春天为了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当时是革命的，否则季诺维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了）而把苏维埃作为**当前口号**提出来，这就是冒险，就是乱叫乱嚷的冒进，就是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的那种冒险和那种冒进。

虽然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苏维埃口号不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冒险行为。

同样的，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宁认为是必要的和切合时宜的口号（见中央关于起义的有名的决定）〔六六〕，但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这个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冒险行为。

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可以讲他是“头一个”说到，还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说到苏维埃政权的人。这是不是说，巴格达齐也夫是对的，而列宁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论斥责为冒险主义就是不对的呢？

看来我们的反对派对巴格达齐也夫的“桂冠”总是羡慕不已。

反对派不懂得，问题并不在于“头一个”说话，从而冒进和搅乱革命事业，而在于**及时地**说话，并且要使所说的话为群众所响应而**变成行动**。

事实就是如此。◇324◇

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义，——总结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六九号
署名：约·斯大林◇325◇

注　释

〔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下列几个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关于中国问题和英国问题的报告，关于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的报告，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关于德国问题和荷兰问题的报告。全会又审查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案件、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案件、苏瓦林案件。会上成立了下列几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英国委员会、德国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斯大林被选为全会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的委员。全会在讨论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以后，斥责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是一个在政纲上滚到孟什维克立场上去的分裂主义者的联盟。全会责成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共产党内的门徒破坏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者——列宁党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一切企图。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决议附在全会决议的后面。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印成单行本，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正文第三页）。

〔二〕 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是俾斯麦政府于一八七八年在德国实施的。这个法令取缔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报刊。根据这个法令，社会主义的书籍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一八九〇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该法令才被废除。——（正文第九页）。

〔三〕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机关报，于一八七九年九月创刊，一八九〇年九月停刊，最初在苏黎世（瑞士），自一八八八年十月起移至伦敦。——（正文第九页）。

〔四〕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三五八页至第三五九页。——（正文第十页）。

〔五〕 指俄共（布）党内自称为“民主集中主义”集团的反党集团。这个集团成立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萨普龙诺夫和奥新斯基领导。“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在工业方面反对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在组织问题上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要求让派别和小集团在党内自由活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坚决地斥责了民集派。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集团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一起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正文第十三页）。

〔六〕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反党集团，由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领导。这个集团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形成，它反对党的列宁路线。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的党籍是不相容的。被击溃了的“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后来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起来，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并被粉碎了。——（正文第十三页）。

〔七〕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问题，一致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大会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内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大会的决议予以公布。——（正文第十四页）。

〔八〕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举行。“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提纲是斯大林同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而写的。十一月三日代表会议一致通过该提纲为代表会议的决议。同日该决议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一四页至第二三三页）。——（正文第十六页）。

〔九〕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被选出。——（正文第十八页）。

〔一〇〕 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页至第三十一页）。——（正文第二十三页）。

〔一一〕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创刊，一九一七年一月停刊，共出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后来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以后在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内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使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退出了编辑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曾刊载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刊载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四号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一一页）。——（正文第二十七页）。

〔一二〕 “我们的言论报”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的报纸，于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二十八页）。

〔一三〕 见列宁“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正文第三十页）。

〔一四〕 见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三四页至第二九七页）。——（正文第三十五页）。

〔一五〕 指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二日英国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的五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关于罢工的发生和失败的原因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五五页至第一六八页。——（正文第四十二页）。

〔一六〕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〇页至第三〇二页。——（正文第四十三页）。

〔一七〕 维丁派是德国共产党“极左派”之一，存在于柏林市内西北部的维丁区党组织内。“维丁反对派”的领导人和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是互相勾结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坚决地斥责了“维丁反对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别活动，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仇视德共的分子断绝一切关系，无条件地服从德共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正文第四十六页）。

〔一八〕 “最近新闻报”（日刊）是米留可夫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五十页）。

〔一九〕 见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三页至第七页）。——（正文第五十九页）。

〔二〇〕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是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于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九月五日至八日）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举行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上由列宁组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中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始终一贯的反战立场。关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见“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〇六页。——（正文第六十页）。

〔二一〕 路标转换派分子是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中间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派的信徒，该派以“路标转换”杂志得名。路标转换派思想是苏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的反映，他们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而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武装斗争，指望苏维埃制度逐渐蜕化为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路标转换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文第六十三页）。

〔二二〕 涅恰也夫主义是阴谋手段和恐怖主义的策略，以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涅恰也夫的名字得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涅恰也夫在俄国建立了一个和群众隔绝的、狭隘的阴谋组织，该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和意见完全受到压制。——（正文第七十二页）。

〔二三〕 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无限制的警察独裁制度，军阀专横和对人民实行暴力的制度，以反动政客阿拉克切也夫伯爵的名字得名。——（正文第七十二页）。

〔二四〕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七十一页。——（正文第七十八页）。

〔二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三六二页。——（正文第七十八页）。

〔二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录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页至第九十七页。——（正文第八十一页）。

〔二七〕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七卷第一〇三页。——（正文第八十七页）。

〔二八〕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一页至第五三五页。——（正文第九十五页）。

〔二九〕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三页至第四六二页。——（正文第一〇一页）。

〔三〇〕　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页至第三十一页。——（正文第一一一页）。

〔三一〕　指“‘论粮食税’小册子的计划和提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九页至第三〇七页）。——（正文第一一四页）。

〔三二〕　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上第二八一页至第二九五页。——（正文第一一七页）。

〔三三〕　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根据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党内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上第五四〇页至第五四五页）。——（正文第一二九页）。

〔三四〕　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该书包括两篇著作：“论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和“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五十二页至第六十四页，第六十九页至第一八八页）。——（正文第一三七页）。

〔三五〕　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至十五日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苏联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一月十四日的晚间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代表会议赞成联共（布）列宁中央的政策。——（正文第一三九页）。

〔三六〕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一页至第二七六页。——（正文第一四一页）。

〔三七〕　“斗争报”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察里津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自一九一七年年底起作为察里津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出版。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后，该报是斯大林格勒省和市的党组织与苏维埃组织的机关报。“斗争报”终刊号第五十八号（总第四六七〇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出版。——（正文第一五三页）。

〔三八〕　指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三页至第四十四页）。——（正文第一六一页）。

〔三九〕 指斯大林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写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提纲（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页至第二十九页）。——（正文第一六一页）。

〔四〇〕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四页。——（正文第一六二页）。

〔四一〕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页至第十六页。——（正文第一六二页）。

〔四二〕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页至第二一一页。——（正文第一六四页）。

〔四三〕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〇二页至第四〇三页和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九页至第二八〇页。——（正文第一七三页）。

〔四四〕 热那亚（意大利）国际经济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举行。参加会议的一方是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苏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了几项要求（偿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把收归国有的财产归还外国产权人等等）；如果实行这些要求，就等于把苏维埃国家变为西欧资本的殖民地。苏俄代表团拒绝了外国资本家的这些无理要求。关于热那亚会议，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八六页至第二〇〇页和第二三五页至第二三八页。——（正文第一七三页）。

〔四五〕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报告：关于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工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关于青年参加生产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济工作任务，关于青年团员参加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事业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的晚间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代表会议在其决议中向党保证：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仍然是党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的忠实助手。——（正文第一七五页）。

〔四六〕 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生产合理化问题”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真理报”第六十八号上。——（正文第一七八页）。

〔四七〕 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一四三页至第一四九页）。——（正文第一八三页）。

〔四八〕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九三页至第二九四页。——（正文第一八四页）。

〔四九〕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三四页。——（正文第一八九页）。

〔五〇〕　指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至七日在莫斯科发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在数小时内即被镇压下去。——（正文第一九二页）。

〔五一〕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页至第一四一页。——（正文第一九六页）。

〔五二〕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二五页至第三三三页。——（正文第一九八页）。

〔五三〕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讨论了一系列与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决定了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就全会议程问题和在讨论加里宁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报告时发了言。全会在讨论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国际事件（中国事件及其他）的决定的通告以后，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问题的政策，坚决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反党政纲。——（正文第二〇七页）。

〔五四〕　“农村共产党人”（双周刊）是供农村党的积极分子阅读的杂志，联共（布）中央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三〇年八月停刊。一九二七年二月以前，该杂志的主笔是莫洛托夫。——（正文第二一一页）。

〔五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二页至第一二八页和第二一五页至第二二〇页。——（正文第二一一页）。

〔五六〕　指科伦民主协会，于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立。参加协会的除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外还有工人。马克思曾被选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民主协会州委员会，并且是它的领导者之一。——（正文第二二〇页）。

〔五七〕　“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Zeitung》）于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伦出版。该报领导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主编是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部第一六五页至第一七三页。——（正文第二二〇页）。

〔五八〕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四七页。——（正文第二二三页）。

〔五九〕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关于中国状况的决议。该决议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提纲和决议”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正文第二二四页）。

〔六〇〕 “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二四八页）。

〔六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的任务、英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革命问题等等。斯大林同志五月二十四日在全会的第十次会议上做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对国际形势作了估计，拟定了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纲领，并由于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及商务关系，通过了宣言“告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告士兵和水兵书”。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首领们利用苏联国际形势的紧张，在全会上以诽谤性的抨击来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全会通过特别决议尖锐地指斥了反对派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并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派别斗争，就要把他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去。——（正文第二五七页）。

〔六二〕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书。告一切被压迫人民书”。宣言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第八十五号上。——（正文第二五九页）。

〔六三〕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〇五页至第一二四页。——（正文第二七八页）。

〔六四〕 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页至第一五二页。——（正文第二八三页）。

〔六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一页至第一八二页。——（正文第三一四页）。

〔六六〕 列宁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从地下寄给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文章和信件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它作为组织武装起义的直接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八八页至第二九四页和第二十六卷第一页至第九页）。当九月十五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列宁的来信时，斯大林同志对要求消灭这些文件的投降主义者加米涅夫给予坚决的反击，提议把列宁的来信散发给最大的党组织讨论。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在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参加之下，举行了布尔什维克

党中央委员会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武装起义的决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页）。——（正文第三二四页）。

年　　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一九二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至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十二月二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当选为全会德国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四日

斯大林和印度共产党的代表谈话。

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

十二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季米特洛夫、柯拉罗夫等人谈话。

十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和德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和德国“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莫斯科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第七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首席代表。

十二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代表和

美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就美国共产党党内状况问题发表演说。

斯大林的小册子“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出版。

十二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钢筋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

十二月三十日

斯大林写信给克谢诺丰托夫。

一九二七年

一月七日

斯大林和谢米列契耶省尤利耶夫卡村的农民代表谈土地问题。

一月八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索科里尼基区工人代表团谈话。

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

斯大林和波兰共产党代表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写信给札依采夫。

一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四次代表会议选为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委员。

二月七日至十二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二月二十二日

为纪念连纳惨案十五周年，斯大林写信给连纳金矿的工人。

为纪念斯大林格勒“斗争报”十周年，斯大林向该报致贺电。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法国委员会会议上就法国共产党策略问题发言。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的红军建军九周年庆祝大会。

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召集的纺织工业工作人员会议上就布尔什维克领导方法和进一步发展苏联纺织工业的道路问题发表演说。

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

三月一日

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

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

三月七日

斯大林写信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

三月九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法国委员会会议上讲话。

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答德米特利也夫”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上。

三月二十日

斯大林写信给申凯维奇。

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

四月二日

斯大林被莫斯科省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发表演说。

四月八日

斯大林被列宁格勒省苏维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选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四月九日

斯大林写信给邱贡诺夫。

四月十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就全会议程问题和在讨论加里宁的报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

四月十五日

斯大林的“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斯基”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八两期合刊上。

四月十六日

斯大林被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该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九十号上。

四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被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红场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人民的五一游行队伍。

五月五日

斯大林于“真理报”十五周年纪念日给该报写的祝词发表在“真理报”第九十九号上。

五月九日

斯大林写“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一文。该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农村共产党人”杂志第十期上。

五月十三日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中国革命问题。

五月二十日

斯大林写“论十月革命准备时期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答坡克

罗夫斯基”一文。该文于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发表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

五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

五月三十日

斯大林写信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四期毕业生致贺。

六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写信答坡克罗夫斯基。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斯大林写“时事问题简评”一文。该文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六九号上。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三萬五千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 236,000 字
印數 1—50,000 册

書號 1550

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组织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斯大林

（1927年5月9日）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七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0
1927
АВГУСТ - ДЕКАБРЬ

斯大林全集

第十卷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一九五四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十卷说明 …… 1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3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八月一日的演说）…… 3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3
二　关于中国 …… 8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 …… 27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 30
八月五日的演说 …… 43
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
（八月九日的演说） …… 61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 68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 68
二　斯大林同志的问题和代表们的回答 …… 95
致玛·依·乌里杨诺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 …… 104
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节录） …… 107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纲要 …… 117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 120
一 几个小问题 …… 120
二 关于反对派的“政纲”…… 124
三 列宁对争论和对一般反对派的看法 …… 127
四 反对派和“第三种势力”…… 128
五 反对派在怎样“准备”代表大会 …… 132
六 从列宁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 134
七 关于近几年来党的政策的几个最重要的总结 …… 137
八 退到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了 …… 140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144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164
致联共（布）莫斯科军区代表会议 …… 173
党和反对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
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74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 174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 176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 179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 182
五 今后怎样？…… 184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186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三日）…… 186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86

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尖锐化 …… 186
二、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 190
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 …… 194
四、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 196
五、结论 …… 199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 200
一、整个国民经济 …… 201
二、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速度 …… 206
三、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 …… 209
四、阶级。国家机关。我国文化的发展 …… 216
三 党和反对派 …… 224
一、党内状况 …… 224
二、争论的总结 …… 230
三、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 232
四、今后怎样？…… 240
四　总结 …… 243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七日）…… 245
一　关于拉柯夫斯基的发言 …… 245
二　关于加米涅夫的发言 …… 247
三　总结 …… 255
就伪造“斯大林论文”事向外国报刊代表发表的声明 …… 259

注释 …… 262
年表 …… 274
插图（新增）
一　苏维埃和美利坚工人 …… 67
二　俄罗斯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172
三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 258

第 十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包括著者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的著作。

到一九二七年末，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已经获得决定性的成就，摆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过渡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约·维·斯大林在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规定了在国民经济中扩大并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命脉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任务。约·维·斯大林论证了代表大会所赞同和通过的农业集体化方针。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关于该报告的结论中，在“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党和反对派”等演说以及其他著作中，从思想上彻底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并向党提出了从组织上完全击溃和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维埃联盟的任务，着重指出了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而不断斗争的必要性。

约·维·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等著作，阐明了标志着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了作为世界革命运动基地的苏联的意义和保卫苏联使之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必要性。

约·维·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阐明了列宁适应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而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中去的新东西。

第十卷中第一次发表了“致玛·依·乌里杨诺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的信和“‘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纲要”。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按斯大林“论反对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论文演说集）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3◇①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八月一日的演说）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同志们！我想首先谈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即对共产国际波兰支部、奥地利支部、英国支部和中国支部的攻击的问题。我想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在关于各兄弟党的问题上混淆视听，欺骗人们，可是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是是非分明，而不是反对派的胡言乱语。

关于波兰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胆宣称，既然在波兰党内有以瓦尔斯基为代表的右倾，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归咎于共产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国际现时的领导。他说，既然瓦尔斯基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他确实有过）支持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观点，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

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想举出一些事实，举出去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速记记◇5◇录中你们都知道的那些地方，我想引用捷尔任斯基同志这样一个人的话来做证明，他当时说，如果波兰党内有过右倾，那末培植这右倾的不是别人，正是季诺维也夫。

这是在所谓皮尔苏茨基暴动〔二〕时的事情，当时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委员会的委员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温什里赫、我、季诺维也夫等人，曾经为波兰共产党拟定决议。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草案，其中说到目前在波兰，当拥护皮尔苏茨基的势力和拥护波兰维托斯政府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时，共产党采取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并且**目前也不必对皮尔苏茨基进行猛力的攻击**。

我们几个人，捷尔任斯基也在内，当时表示反对，说这个指示是不正确的，它只会把波兰共产党弄糊涂。必须说明不但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支持皮尔苏茨基的政策也是不能容许的。在提出了若干反对意见之后，这个按照我们的意见修正过的指示被通过了。

我想藉此说明反对瓦尔斯基算不了什么勇敢，因为瓦尔斯基犯了错误已经受到应得的谴责；但是嫁祸于人，把自己在波兰党内培植右倾的罪过，即季诺维也夫的罪过，推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者身上，那就是犯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罪过。

你们会说这是小事情，我来谈论它是徒劳无益的。不，同志们，这并不是小事情。反对波兰党内右倾的斗争现在继续着，而且还要继续下去。季诺维也夫竟有勇气（如果说得客气些）断言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是支持右倾的。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季诺维也夫嫁祸于人，诬蔑共产国际。这◇6◇是他季诺维也夫的惯技，这根本不是他的什么新东西。但是，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每次都要揭穿他这种诬

蔑人的伎俩。

关于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硬说奥地利共产党弱，它在不久以前维也纳的发动〔三〕中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奥地利共产党弱，这是对的。但是否认它的行动正确，那就是诬蔑它了。是的，它还弱，但它所以弱，其中有一点是因为还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社会民主党瓦解并使共产主义成功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的深刻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它所以弱，是因为它年轻，是因为善于在左的词句掩护下进行右的机会主义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四〕在奥地利早已确立了统治，是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但季诺维也夫究竟要把问题说成什么样子呢？他只是暗示，却不敢明说：如果奥地利共产党弱，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显然他是想这样说的。但这是一种手段拙劣的陷害。这是诬蔑。恰恰相反，正是在季诺维也夫不当共产国际主席以后，奥地利共产党才摆脱了搅扰，它的内部生活才不再遭受胡乱的干涉，因而才获得前进和发展的可能。奥地利共产党已经最积极地参加了维也纳事变，并博得了工人群众的同情，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奥地利共产党正在日益成长，正在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吗？怎么能否认这些明显的事实呢？

对英国共产党的攻击。季诺维也夫要人们相信英国共产党没有从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五〕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它经过这次战斗以后似乎反而削弱了。这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英国共产党的比重正在日益增大。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只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从前英国◇7◇资产阶级没有认真地注意英国共产党，现在却相反，英国资产阶级疯狂地迫害它，而且不但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是总委员会〔六〕和英国工党也在组织疯狂的进攻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共产党人了。为什么以前他们或多或少容忍了英国共产党人呢？因为过去英国共产党人还弱，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小。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再容忍，为什么他们开始向英国共产党人疯狂进攻呢？因为他们害

怕共产党，认为它是一种力量，因为英国工党和总委员会的首领们害怕它，认为它是他们的掘墓人。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

我并不否认共产国际西方各支部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弱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在于：

第一、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群众行动起来并急遽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深刻的革命危机；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比共产党资格老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西欧各国的工人中间还是一种占优势的力量，共产党才出现不久，不能要求它们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

尽管这样，西方共产党还是在成长，它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在提高，其中有些已经成为、而另一些也正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但是阻碍着西方共产党的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就是现在坐在这里、坐在这个会场里的那个反对派的分裂活动。要使共产党迅速成长需要什么呢？需要共产国际◇8◇钢铁般的团结，在它的各支部内不发生分裂。可是，反对派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在德国建立了第二党，即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的党。他们正竭力在欧洲其他国家内建立同样的分裂集团。他们，我们的反对派，在德国建立了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国会党团的第二党；他们明明知道目前的分裂不能不阻碍共产党的成长，但他们还是在共产国际内制造分裂，并且现在反而喊叫西方共产党成长缓慢，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身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分子喊叫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它的领导）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的。但他们拿这一点指摘共产国际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对了。相反地，共产国际经常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从报刊上，从“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七〕上可以知道这一点，

你们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可以知道这一点。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共产国际有哪一个指示、哪一个决议会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因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指示。如果以为什么地方共产党内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就一定要归咎于共产国际，那就太荒谬了。

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我要问：德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时期为什么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呢？为什么出现布兰德勒派〔八〕呢？是谁支持布兰德勒派呢？反对派现在的首领托洛茨基曾经支持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当时加米涅夫不说布兰德勒派◇9◇的出现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他们忘记了：在革命高涨的时候共产党内一定会出现右倾和左倾，其中前者不愿抛弃过去，后者不愿考虑现在。他们忘记了没有一个革命是不发生这些倾向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我们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难道当时我们党内没有右倾和左倾吗？难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吗？同志们，你们记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犯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些错误呢？这应当归咎于谁呢？这难道可以归咎于列宁或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吗？反对派怎么能“忘记”诸如此类的事实呢？他们怎么能“忘记”在革命高涨时党内总会出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右倾和左倾呢？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既要打击左倾分子，又要打击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的高傲使我感到惊奇，你们看，他竟对西方或东方的共产党的极小的错误也不能容忍。在中国，党还很年轻，它成立还不过两年，在那里出现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你们看，这竟使托洛茨基吃

惊了。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多少年呢？这一点他忘记了吗？要知道，他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整整十四年——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为什么他给自己十四年的时间来徘徊于各种反列宁的“派别”之间，然后才靠近布尔什维克，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连四年的时间也不愿意给呢？为什么他对别人这样高傲，而对自己的徘徊却忘记了呢？为什么呢？所谓“公正”究竟在哪里呢？

◇10◇

二 关 于 中 国

现在谈谈中国问题。

我不想多谈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的错误了。我不想多谈，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而且很使人信服，这里用不着再重复了。所谓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这一点我不想多谈了。所谓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这一点也不必多谈了。关于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诸如此类的错误，你们想必已经从我们党的报刊上知道了。

现在谈谈列宁主义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问题。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处理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革命运动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里，资产阶级是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没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

回事，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触犯到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11◇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这样加以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第二国际拥护者的道路。

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与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五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也不承认一种类型的革命和另一种类型的革命之间的这种差别。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在我们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当时就没有提出也不能提出同自由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根据这一点，反对派断言在◇12◇中国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上也应当如此，在中国，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只有那些不了解并且不承认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的人才能这样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只有背弃列宁主义而滚到第二国际拥护者方面去的人才能这样说。

请看列宁关于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是怎样说的：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暂时的联盟**[①]，但不要同他们融为一体，无产阶级运动即使处在萌芽状态，也要绝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七页）……“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当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只有当这种运动的代表者不阻碍我们以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资产阶级解放**[②]运动。”（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七页）

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在俄国**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列宁却认为**在中国**可以容许这种协议和联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许列宁错了吧？也许他从革命的策略转到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吧？当然不是！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13◇别。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够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反对派不愿意了解这一点，而他们所以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的革命策略，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你们是否注意到反对派的首领们在自己的演说中如何竭力避开列宁的这些指示，害怕涉及这些指示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避开列宁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做的大家都知道的策略指示呢？他们为什么害怕这些指示呢？因为他们害怕真理，因为列宁的策略指示推翻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思想政治立场。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可是，难道会有一种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吗？难道我国革命没有过自己的发展阶段吗？拿列宁的“四月提纲”〔九〕来看就可以知道，列宁认为我国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土地运动为其主要中心；第二阶段是十月革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其主要中心。

中国革命有几个阶段呢？

依我看，应当有三个：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14◇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谁不懂得革命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如香港罢工等）。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当然是的。这一点现在恐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论述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补充提纲”中直接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外国的强暴势力始终阻碍着

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①]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记录第六〇五页）。

中国革命已经走过这个“第一步”即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走过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而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这个事实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15◇

相反地，例如土耳其（基马尔主义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转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点。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广州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什么呢？当时它们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时广州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和革命的根据地呢？当时把广州国民党当做对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援助广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的和安哥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我们的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当时和我们一起支持广州和安哥拉，给了它们一定的援助，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谁来试试驳倒这一点吧。

但是，应当怎样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呢？这是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强工农反对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应当牺牲（即使是最小限度地、即使是片刻地）自己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我以◇16◇为报告人已经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文件充分证明共产国际正是教导中国共产党这样理解统一战线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引证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发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第一、这封电报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并没有反对派方面的任何声明或表示，**就由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了**。第二、为什么反对派直到现在对这件事绝口不谈，为什么他们**过了九个月以后**才想起这封电报，为什么他们把这封电报**在九个月以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取消了的事实瞒住了党呢？因此，如果认为这封电报规定了我们领导的路线，那就是恶意诽谤。事实上这是一封个别的偶然的电报，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领导的路线。这一点（我重说一遍）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封电报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一些规定了路线并且无疑地能代表我们领导的文件所取消了。

让我来引证这些文件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电报发出后一个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

领导◇17◇**权。”**①

其次：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②，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

请看，这就是真正规定共产国际领导路线的文件。

非常奇怪，反对派首领们竟避开共产国际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文件。

如果我引证我自己的**也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或许不算是不谦虚吧。这个委员会曾起草（当然，我也参加了）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篇演说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下面就是这篇演说中的几段：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越迅速越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越有力越强大。**”

其次：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18◇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么呢？”（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〇〕）

再看第三个文件，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发出的，当时中国各城市纷纷提意见围攻共产国际，断言展开工人斗争会引起危机、失业和工厂倒闭。文件上说：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个文件是在蒋介石政变前一个半月发出的。文件上说：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19◇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

更早些，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在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政变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向它指出“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

对于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的。

反对派是不是知道这些指导性的文件呢？当然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们对这些指导性的文件绝口不谈呢？因为他们所力求的是纠纷，不是真理。

要知道有一个时期，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懂得一点儿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基本上坚持了共产国际所奉行的、列宁同志在他的提纲〔一一〕中给我们规定的◇20◇那一政策。我指的是**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全会的时候，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当时他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投到托洛茨基阵营去。我所以谈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是因为这次全会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曾经一致通过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一二〕，其中对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对广州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所做的估计，大致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做的一样，可是反对派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个估计了。我所以谈到这个决议，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当时赞成这个决议，并且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人反对它，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以及现在反对派的其他首领也不例外。

让我从这个决议中举出几段。

请看在这个决议中，**关于国民党**是怎样说的：

“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中造成了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动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一切革命民主组织首先是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其中坚分子和

中国共产党人结成了同盟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①]，这个联盟的基础就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全部军事封建生活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并建立统一的革命民主◇21◇政权的斗争中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的共同性。”（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总之，广州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你们可以看出，这几乎就是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而不是别人）所祝福过的“马尔丁诺夫主义”〔一三〕。

关于广州国民革命政府：

“**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②]已经和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民主派群众联系起来，依靠他们击溃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并进行着使广东省全部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的工作）。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先锋队的**广州政府是国内未来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③]（同上）

可见代表着四个“阶级”联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是中国未来革命民主政府的**典范**。

关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新的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展开最广泛的政治工作，组织群众性的发动去支持国民革命军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并以革命民主组织领导下的**最广大居民阶层**（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对抗帝国主义者。”[④]（同上）◇22◇

由此可见，在殖民地国家内，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

这倒很像列宁在他的关于共产党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策略的

————————————————

①②③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著名指示中告诉我们的话。不过很可惜，季诺维也夫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

“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个别阶层，最近一年来离开了国民党，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右翼中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公开反对国民党同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盟，主张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斥责了这个右翼，确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成立战斗联盟是必要的，这样就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保证了国民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①（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可见共产党人如果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退出国民党就会是严重的错误。不过很可惜，曾经赞成这个决议的季诺维也夫过了个把月就把这一点忘记了。因为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间（过了一个月）季诺维也夫就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了。◇23◇

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种倾向和关于不容许跳过革命的国民党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一方面反对右的取消主义，因为这种右的取消主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任务，而主张和一般民主民族运动毫无原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反对极左的情绪，因为这种极左的情绪力求**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而直接跳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去，**忘记了农民**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决定因素。”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你们可以看见，现在用来揭穿反对派那种跳过中国发展的国民党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阶段、低估农民运动和跳到苏维埃方面去的行为的一切证据这里都有了。真是命中要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个决议呢？

应当认为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总不会不知道这个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通过的，而且他本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为什么现在反对派的首领们却避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机关的这个决议呢？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决议绝口不谈呢？因为这个决议在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上都反对他们。因为这个决议推翻了反对派现在的全部托洛茨基立场，因为反对派的首领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国际，离开了列宁主义，现在他们害怕自己的过去，害怕自◇24◇己的影子，不得不畏缩地避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的决议。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外国帝国主义，那末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国内的敌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

第一阶段解决了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任务没有呢？没有，没有解决。它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执行去了。它只是初步推动了革命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以结束自己的行程并把这个事业交给未来。

应当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不能完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任务。它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个事业交给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难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国革命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实（虽然环境不同、情况不同）？难道大家不知道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而把这个任务交

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交给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根除封建残余的任务？因此，如果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不能完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阶段在推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并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残余之后把这个事业交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那是一◇25◇点也不奇怪的。这只会有利于中国将来的苏维埃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当革命运动的中心显然已由广州移到武汉，并且除了武汉的革命中心以外，在南京又形成了一个反革命中心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利用机会来公开地组织党、无产阶级（工会）和农民（农民协会），一般说来，公开地组织革命。

就是推动武汉国民党人向左转，转向土地革命阶段。

就是把武汉国民党变成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心，变成将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

事实表明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能够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教育广大工农群众。

当时反对派要求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这是冒险主义，这是冒进，因为立即成立苏维埃在当时就是跳过中国发展的左派国民党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武汉国民党还维持着同共产党人的联盟，还没有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丧失威信和暴露自己的面目，还没有把自己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作用全部发挥净尽。

因为在群众还没有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武汉政府不中用、有必要把它推翻的时候，提出成立苏◇26◇维埃和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就是冒进，就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失去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是断送已经

开始的事业。

反对派以为只要他们自己了解武汉国民党的不可靠、不稳固和没有充分的革命性（任何一个政治上有经验的工作者都不难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群众也了解这一切，就足以用苏维埃来代替国民党，就足以带领群众。然而这是反对派常犯的“极左的”错误，他们总把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当做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认识和了解。

反对派说得对，党应该向前迈进。这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遵守这个原理就不成其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全部真理是：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向前迈进而脱离后卫，不善于带领后卫，就是冒进，就会使群众运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前进。列宁式的领导其实就在于使先锋队善于**带领**后卫，使先锋队向前迈进而**不脱离**群众。然而为了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承认这个领导千百万群众的普通的列宁原则，他们不懂得没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单是一个党，单是一个先进的集团，是无法进行革命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要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来“干”的。◇27◇

为什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虽然深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没有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并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口号呢？

因为无论后方或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以至苏维埃本身，都还接受不了这样的口号，都还相信临时政府有革命性。

因为临时政府还没有因支持后方和前方的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

为什么列宁痛斥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提出立即推翻临时政

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的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呢？

因为巴格达齐也夫的企图是一种危险的冒进，使布尔什维克党有脱离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危险。

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的致命伤。

季诺维也夫说我谈论巴格达齐也夫主义是把现在的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混为一谈。这当然是废话。第一、我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自己就已经附带说“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做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一四〕。第二、如果断言在说明某一国家的革命中的某些派别和某些错误时完全不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拟，那就太荒谬了。难道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革命（即使这些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学习吗？这样，还要革命科学干什么呢？◇28◇

实际上，季诺维也夫否认革命科学有存在的可能。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曾经斥责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说他们是实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义”，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只要看一看列宁的“路易·勃朗主义”〔一五〕这篇文章就会明白，列宁虽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革命，但他在说明十月革命前某些活动家的错误时还是广泛地引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来做比拟。既然可以谈论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齐赫泽和策烈铁里的“路易·勃朗主义”，为什么不能谈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季诺维也夫当时为什么断言“必须用一切办法帮助”武汉国民党，使它成为反对中国卡维涅克之流的中心呢？为什么是武汉地区而不是别的什么地区成了土

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汉地区（湖南、湖北）在今年年初是土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那个没有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广州可以称为“革命根据地”（托洛茨基），而已经开始并发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汉地区倒不能算做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反对派还要求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内呢？难道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是主张同“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成立联盟吗？反对派怎么会这样“健忘”和糊涂呢？

反对派看到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时间不长就幸灾乐祸，断言共产国际没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的幸灾乐祸只是证明他们政治上的破产。反对◇29◇派大概以为在殖民地国家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应当是永久的。然而只有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想。如果在中国封建主和帝国主义现阶段比革命更有力量，如果这些敌对力量的压力使武汉国民党向右转并使中国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那也只有感染了失败主义情绪的人才会因此而幸灾乐祸。至于反对派断言共产国际没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那是反对派武库里现在大量储存的一种惯用的诽谤。

让我引证几个文件来驳斥反对派的诽谤。

第一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统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就在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①]……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30◇

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第二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31◇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

抛弃的。”①

你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预见到事变的，它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危险的信号，并警告中国共产党人说：如果国民党人不能成为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武汉国民党是会灭亡的。

加米涅夫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应当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说我们“在中国培植了卡维涅克之流”。同志们，只有存心叛党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的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时期即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登台的时候，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在其“论口号”〔一六〕一文中写道，七月的失败就是“卡维涅克之流的胜利”。孟什维克当时心怀恶意，硬说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的出现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加米涅夫是不是也以为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时期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的出现，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而不应当归咎于别的呢？加米涅夫在这方面模仿孟什维克先生们是否体面呢？（笑声）我没有想到反对派的同志们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

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失败，而且这次失败比现在中国革命的失败更为严重。孟什维克当时说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革命的策略。加米涅夫在这里是不是也想仿效孟什维克对我国革命历史的解释而向布尔什维克横加攻击呢？◇32◇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许在于列宁的政策，而不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许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不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怎么能断言某个政党的策略能够取消或转换阶级力量的对比呢？一九〇五年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当时我们遭到失败呢？难道事实不是说明，如果采取反对派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失败就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会比实际上所遭到的更快吗？对于那些忘记了革命期间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企图只用某个政党的策略来说明一切的人应该怎么说呢？对于这些人只有一句话可说：他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结论 反对派最主要的错误是：

（一）反对派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反对派看不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

（三）反对派在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背弃了列宁的策略。

（四）反对派不了解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五）反对派在先锋队（党）和后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违反了列宁的策略原则。

（六）反对派背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和第七次全会的决议。◇33◇

反对派大肆吹嘘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断言如果采取这个政策，现在中国的情形就会好些。几乎无须证明，假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它就会由于反对派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而使自己完全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获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不用说，如果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采取他们

的错误意见，采取他们的反列宁的方针，中国革命的这些成就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微乎其微。

恐怕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能怀疑这一点。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一七〕

关于英苏委员会的问题。反对派断言我们似乎是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同志们，这是不◇34◇对的。这是破产了的反对派常用的一种诽谤。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反对派也应当知道，我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上。反对派欺骗党，说我们过去或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

那末，英苏委员会究竟是什么呢？英苏委员会是我们的工会和英国的工会即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反动的工会联系的一种形式。目前我们使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化的工作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甲）从共产国际方面，通过各国的共产党支部来进行，这些支部的当前任务就是排除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政治领导；

（乙）从工会国际方面，通过工会中少数革命分子来进行，这些革命分子的当前任务就是战胜工会中反动的工人贵族；

（丙）通过英苏统一委员会来进行，这个委员会是能使工会国际及其各支部易于进行孤立工会中工人贵族的斗争的一种工具。

只要阶级和阶级社会存在，前两方面就是基本的和经常的，对于共产党人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方面只是暂时的、辅助的和非经常的，因而也就是不稳固的，不总是可靠的，有时竟是完全不可靠的。把第三方面和前两方面等量齐观，就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违背共产主义。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乱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呢？

我们同意成立英苏委员会，目的是要和英国工会组织内的工人群

众建立公开的联系。◇35◇

这是为了什么呢？

第一、为了便于建立工人的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至少是为了使工会运动的反动首领难于反对建立这种统一战线。

第二、为了便于建立工人的反对一般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特别是反对武装干涉危险的统一战线，至少是为了使工会的反动首领难于反对建立这种统一战线。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是否可以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呢？

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在反动工会中有千百万工人，而共产党人没有权利拒绝参加这些工会，拒绝找到接近群众的途径并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请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八〕一书，你们就会知道，列宁的策略要求共产党人不要拒绝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

一般说来，是否可以在工会工作方面或者在政治方面同反动工会成立暂时的协议呢？

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至于西方工会多半是反动的，这谁都知道。但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工会是**群众性的**工会。问题在于通过这些工会可以获得接近群众的机会。问题在于使这种协议不妨碍和不限制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鼓动的自由，使这种协议促进改良主义者的分化，促进暂时还跟着反动首领走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在这种条件下，同群众性的反动工会成立暂时的协议，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36◇

请看列宁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许许多多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就是那些一半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等

形形色色的过渡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自己内部没有分为发展程度不同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以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各种无产者集团、对各种工人政党和各种小业主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办法**[①]。全部问题就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五页至第五十六页）

其次：

“至于说韩德逊之流、克莱因斯之流、麦克唐纳之流、斯诺顿之流是不可救药的反动派，这是正确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权），说他们想依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方式来‘实行管理’，说他们一旦抓到政权，他们的行为必定和谢德曼之流、诺斯克之流一模一样，这也是正确的。这些都说得对。**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37◇**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的利益应该在国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相当的支持。**”[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二页）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了解也不承认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宁愿说一些“极左的”关于工会反动性的空话，而不要列宁的政策。

英苏委员会是不是妨碍了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呢？它能不能妨碍这种工作呢？不，不能。我们一向都在批评而且今后还要批评英国工人运动首领的反动性，向英国工人阶级群众揭露这些首领的变节和背叛行为。我们一向对总委员会的反动活动进行公开的无情的批评，让反对派试来推翻这一事实吧。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批评会使英国人和我们决裂而把英苏委员会搞垮。好吧，让他们决裂吧。但问题完全不在于决裂不决裂。问题在于决裂发生在什么问题上，决裂表现什么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一般战争的威胁，特别是关于武装干涉的威胁。如果英国人要决裂，工人阶级就会知道，英国工人运动的反动首领是因为**不愿意反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策划战争而决裂的。几乎用不着怀疑，在这种条件下，英国人所造成的决裂会使共产党人易于揭露总委员会，因为现在战争问题是当前的基本问题。◇38◇

可能他们不敢决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在批评自由上、在继续批评英国工人运动的反动首领的自由上已经有了保证，可以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和社会帝国主义本质。这对工人运动好不好呢？我想这并不坏。

同志们，我们对英苏委员会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关于战争问题。我首先必须驳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那个完全不正确的、与实际情形不符的声明，他们说我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似乎是属于所谓“军事反对派”的。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穷极无聊捏造出来的谣言。我手头有一本速记记录，从这本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当时是和列宁一道反对所谓“军事反对派”的。而且这里还有参加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人，他们可以证明我当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军事反对派”的。也许我没有像托洛茨基所喜欢的那样仇视地反对“军事反对派”，因为我认为：在军事反对派中间有一些是前线不可缺少的卓越的工作者，但我无疑是反对军事反对派并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这是**事实**，恐怕只有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这样不可救药的人才能反驳

这个事实。

当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必须结束志愿兵制度和游击主义，必须建◇39◇立一支真正的、正规的、有铁的纪律的工农军队，必须吸收军事专家来参加这一工作等问题。

当时主张建立正规军和铁的纪律的人曾提出一个决议草案。为这个草案辩护的有列宁、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等人。当时主张在军队中保存游击主义成分的人曾提出另外一个草案，即维·斯米尔诺夫的草案。为这个草案辩护的有维·斯米尔诺夫、萨发罗夫、伏罗希洛夫和皮达可夫等人。

下面就是我的演说中的几段话：

“这里所谈到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俄国有没有一支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半年前，我们有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是在沙皇的旧军队瓦解之后建立的一支志愿军，它组织得不好，实行集体管理，并不总是服从命令。那正是协约国开始进攻的时期。军队的成员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于这支志愿军中缺乏纪律，由于并不总是执行命令，由于军队管理上乱七八糟，我们一再遭到失败，把喀山交给了敌人，而克拉斯诺夫则从南方顺利地展开了进攻……事实说明，志愿军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我们不另外建立一支军队，一支充满纪律精神、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并且一接到命令就善于并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那我们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我必须说，那些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铁的纪◇40◇律的精神去改造这些分子，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引导他们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使他们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

规军。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一九〕

同志们，事实就是如此。

你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又是在诽谤。

其次，加米涅夫在这里断言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在这两年中，把我们从前在国际上所拥有的精神资本都挥霍完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完全不对！

加米涅夫是指的哪些居民阶层，我们是在东方和西方的哪些居民阶层中丧失或博得威信，这一点加米涅夫并没有说明。然而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正是这个问题。例如拿中国来说，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中国工农中间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资本呢？显然是不能的。不久以前，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我们还知道得很少。不久以前，苏联的威信还局限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狭小圈子里，局限◇41◇于国民党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像冯玉祥那样的活动家和广州的将军们等等的狭小圈子里。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苏联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任何政党都会羡慕的。但是，苏联的威信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所有将军等等的心目中却大大地降低了，而他们中间的好多人甚至开始反对苏联了。但这有什么奇怪，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可以要求苏联，要求苏维埃政权和我们党做到使我国**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阶层中**都有精神威信吗？除了无聊的自由派以外，谁能对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对我们来说，是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所有反动将军中间有威信好呢，还是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中间有威信好？从我们的国际地位的观点来看，从全

世界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下面两种情形哪一种具有决定意义：是**苏联在中国社会的自由派反动集团中的威信显著降低**而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呢，还是**苏联在广大居民群众中精神影响降低**而在那些反动的自由派集团中有威信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加米涅夫是大错特错了……

而在西方呢？能不能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在西方无产阶级阶层中的精神资本都挥霍完了呢？显然是不能的。例如最近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发动，英国的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德国和法国工人为了保卫苏联而举行的成千上万人的游行示威，这些都说明什么呢？这些事实是不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影响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心目中日益降低呢？当然不是！相反地，这些事实说明苏联的精神影响在西方工人中间日益增长和加强，西方工人已经开始“按照俄国方式”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42◇搏斗了。

毫无疑问，在和平主义的反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中，对苏联的敌视正在增强，特别是由于枪毙了二十个“显贵的”恐怖分子和纵火分子〔二〇〕而更增强了。但是，难道加米涅夫对反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集团的意见比对西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更为重视吗？枪毙了二十个“显贵的”分子以后，无论在我们苏联或在西方千百万工人群众中间都引起了最深切的同情，这个事实谁敢否认呢？“对他们这帮坏蛋就该这样！”——这就是工人区对于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分子所发出的喊声。

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种人，他们断言我们愈温和我们就愈好。他们这些人对我们说：“当英国和苏联断绝关系时，苏联的情况很好；当有人杀害了沃依柯夫时，苏联的情况就更好了；但是，当我们显出厉害，以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反革命分子去回答沃依柯夫的被害时，苏联的情况可就坏了，在枪毙二十个人以前，欧洲有人可怜我们，同情我们；相反地，在枪毙了二十个人以后，人们不同情了，并且开始

指摘我们，说我们不是欧洲舆论所希望的那种乖孩子了。”

对于这种反动的自由派哲学，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对于这种哲学只能说：创造这种哲学的人希望苏联软弱无力，赤手空拳，向敌人屈膝，向敌人投降。过去有过一个“血淋淋的”比利时，这幅图画有一个时期被当做商标，在香烟盒上常常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血淋淋的”苏联呢，——这样大家就都会同情它，大家就都会可怜它了。不行，同志们！这一点我们不同意。还是让所有这些自◇43◇由派和平主义的哲学家连同他们对苏联的“同情”一起滚开吧。只要我们有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同情，什么都好办了。如果真的需要使谁变成“血淋淋的”，那末，我们一定要竭力使某个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使苏联被打得头破血流并变成“血淋淋的”。

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嚷大叫，断言在布哈林的提纲中所谈的是战争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不是战争的绝对不可避免性。他断言这种说法会把党弄糊涂。我把季诺维也失的文章“未来战争的轮廓”拿来看了一遍。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所谈的是新战争的可能性。文章中有整整一章证明战争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章结尾的一句话是：“正因为如此，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说来，现在考虑一下新战争的可能性，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大笑）同志们，请注意，——“**考虑一下**”新战争的**可能性**。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有一个地方谈到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个人竟有勇气（如果说得客气些）指摘布哈林的那个谈到战争已经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提纲。

现在谈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七年以前去，因为还在大约七年以前，列宁就说过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季诺维也夫何必重弹老调，拿自

己的倒退冒充新的言论呢？

现在谈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四年以前去，因为◇44◇还在克逊最后通牒〔二一〕的时期，我们就说过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季诺维也夫昨天刚写了一篇乱七八糟的荒谬绝伦的关于战争的文章，其中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可是这个人现在竟敢对布哈林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明确的提纲进行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忘记了他昨天写的东西。原来季诺维也夫属于今天写作是为了明天就把它忘掉的那种幸福人物。（笑声）

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断言“推动”布哈林用战争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精神来写他的提纲的是契切林同志。我要问：是谁“推动”季诺维也夫现在当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时写了一篇谈论战争的**可能性**的文章呢？（笑声）

关于资本主义稳定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攻击布哈林的提纲，断言这个提纲在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离开了共产国际的立场。这当然是胡说。这只是表明季诺维也夫自己在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在世界资本主义问题上愚味无知。季诺维也夫以为既然是稳定，那就是说，革命事业垮台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灭亡的酝酿正从稳定中成熟起来。最近资本主义改进了它的技术并使之合理化，制造出大量无法销售的商品，这难这不是事实吗？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愈来愈法西斯化，它们进攻工人阶级并暂时巩固着自己的阵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从这些事实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说稳定已成了持久的呢？当然是不应该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实促使那种比上次帝国主义战争前的危机远为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趋尖锐化。◇45◇

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日益法西斯化这个事实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情况尖锐化并引起工人的革命发动（维也纳、英国）。

正是资本主义使技术合理化并生产出市场所无法消纳的大量商品这个事实促使帝国主义阵营中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尖锐化，促使新战争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条件产生出来。

在世界市场有一定限制和“势力范围”已经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极大增长使争夺市场的斗争加剧，使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这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

假如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几倍，假如它能大大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假如它因此而能大大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购买力并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那末，它就能解决这个危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正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这样做，正因为资本主义不是把它的“收入”用来增进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而是用来加紧剥削他们并向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输出资本，以便获得更多的“收入”，——正因为如此，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就引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使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某些帝国主义集团仇视苏联，组织统一战线来反对它呢？因为苏联是一个最富裕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为什么也是这些帝国主义集团要干涉中国呢？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富裕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如此等等。

新战争不可避免的基础和根源就在于此，——不管这种战争是在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爆发的还◇46◇是进攻苏联的，反正都一样。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些简单的起码的东西。

关于保卫我国问题。现在让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谈谈我们的反对派打算怎样保卫苏联的问题。

同志们！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

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末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现在，在战争威胁面前形成了两个阵营，因此也就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无条件地捍卫苏◇47◇联，另一种立场是反对苏联。在这中间必须加以选择，因为第三种立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从保卫苏联、捍卫苏联的观点来看，反对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来引证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那封大家都知道的信，让你们看看托洛茨基所保藏的、准备在反苏战争爆发时拿出来用的那种保卫“理论”和保卫口号吧。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已经引用了这封信里的一段话，但是他没有引用全段话。让我把它全部引用出来。

请看托洛茨基对失败主义和护国主义是怎样了解的：

“失败主义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旨在促使敌对阶级所掌握的‘自己的’国家遭到失败的政策。对失败主义的任何其他了解和解释都是伪造。例如，谁要是说正是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应该把那些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像垃圾一样地扫除掉，谁决不会因此就成为‘失败主义者’。恰恰相反，在这一具体条件下，他却是革命的护国主义的真正代言人，因为思想垃圾是不会产生胜利的！◇48◇

在其他阶级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极有教益的事例。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时，领导法国资产阶级的是个既没有舵又没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府的反对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缘故”），他激烈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克列孟梭并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当时法国报界有没有人称克列孟梭集团为失败主义者呢？大概是有的，因为在一切阶级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些糊涂虫和诽谤者拖在后边的。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摘自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给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信）

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提出的所谓保卫苏联的“理论”。

“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这原来是指我们党的多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和我们政府的多数。克列孟梭——这是指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团。（笑声）如果敌人到了离克列姆里宫墙约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末，这位新出现的克列孟梭，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原来就是因为敌人离克列姆里只有八十公里，所以力图首先推翻目前的多数，然后才去进行保卫。如果我们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能够做到这

一步，那末，这原来就是真正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了。◇49◇

而为了做到这一步，他，托洛茨基，即克列孟梭，“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就要力图首先“扫除”这种“垃圾”。而这种“垃圾”是指什么呢？原来是指党的多数、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和政府的多数。

看吧，原来当敌人到了离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地方时，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所要做的并不是保卫苏联，而是推翻目前党的多数。这就是他的所谓保卫！

如果这个在四个月内才勉强凑了千把张票的小小的唐·吉诃德式的集团竟向拥有百万人的党威胁说“我要扫除你”，那当然是有些可笑的。既然托洛茨基集团累得满头大汗地工作了四个月才勉强凑了千把人的签名，那就可想而知这个集团已经悲惨到了何等地步了。我想，随便一个反对派集团，只要会做工作，都能凑上几千人的签名。我再说一遍：这个小小的集团，它的首领比军队还多，（笑声）工作了整整四个月才勉强凑了千把人的签名，如果它竟向拥有百万人的党威胁说“我要扫除你”，（笑声）那是可笑的。

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怎么能“扫除”拥有百万人的党呢？反对派中间的同志们是否以为目前党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偶然的，它在党内没有根基，它在工人阶级中没有根基，它会心甘情愿地让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把它“扫除”呢？不，这个多数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年一年地在我们党的发展进程中聚集起来的，它是在斗争的烈火中、在十月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过考验的。

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在党内发动内战。请看托洛茨基就是打算在敌人离克列姆里八十◇50◇公里的时候在党内掀起内战的。真是坏到无以复加了……

可是，反对派现在的首领呢？难道他们没有受过考验吗？有一个时期他们曾在我们党内担任极重要的职位，后来却成为变节者，这难

道是偶然的吗？决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偶然的，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而托洛茨基竟想藉助那个在反对派政纲上签名的小小集团在敌人离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时候扭转我们党的历史车轮，而且据说，一部分同志在反对派政纲上签名是因为他们以为签了名就不会被拉去打仗了。（笑声）

不，最亲爱的托洛茨基，你顶好不要谈“扫除垃圾”吧。顶好不要谈吧，因为这种话是有传染性的。如果多数被你扫除垃圾的方法“传染”了，那我不知道这对反对派是否有好处。要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不是不会被这种方法“传染”而把某个人“扫除”掉的。扫除的言论并不总是称心如意和没有危险的，这种言论是会“传染”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并迫使他们把某个人“扫除”的。既然托洛茨基想用一把扫帚来对付党和党的多数，那末，党要是掉转这把扫帚来对付反对派，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现在我们知道反对派想怎样保卫苏联了。托洛茨基那种为整个反对派所拥护的关于克列孟梭的、实质上是失败主义的理论，十分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原来为了保证保卫苏联首先必须做一次克列孟梭式的实验。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一步。◇51◇

保卫苏联的第二步原来就是要宣布我们党是中派的党。我们党既对背离共产主义的左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进行斗争，又对背离共产主义的右倾（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进行斗争，这一事实却被我们无知的反对派说成中派行为。

这些怪人原来忘记了我们对两种倾向进行斗争不过是实行列宁的遗训而已，因为列宁所绝对坚持的就是要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反对派的首领们背弃了列宁主义，把列宁的遗训置诸脑后。反对派的首领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联盟即反对派联盟是背离共产主义的左

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联盟。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现在的联盟是那个尽人皆知的遭到了悲惨命运的托洛茨基八月联盟在新基础上的复活。他们不愿意了解正是这个联盟包藏着蜕化的危险。他们不愿意承认把骗子和反革命分子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之类的“极左倾分子”以及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联合在一个阵营里就是取消派八月联盟最坏的翻版。

总之，为了组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宣布我们党是中派的党，必须设法剥夺我们党在工人心目中的那种感召力。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二步。

保卫苏联的第三步原来就是要宣布我们党是不存在的，把它说成是“斯大林的派别组织”。反对派分子想用这一点说明什么呢？他们想用这一点说明没有党而只有“斯大林的派别组织”。他们想用这一点说明他们不必受党的决议的约束，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破坏这些决议。他们想◇52◇用这一点使自己便于对我们党进行斗争。固然，他们这个武器是从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二二〕和资产阶级的“舵报”〔二三〕的武库中拿来的。固然，从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那里拿武器，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但是他们哪里还管得到这一点呢？在反对派看来，只要能进行反党的斗争，一切手段都是好的。

总之，为了准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宣布党即那个任何保卫非它不可的党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三步。

保卫苏联的第四步原来就是要分裂共产国际，在德国组织一个以骗子和反革命分子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为首的新党，以便阻挠西欧无产阶级对苏联的援助。

总之，为了准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分裂共产国际。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四步。

保卫苏联的第五步原来就是要给我们党加上特米多尔倾向[①]的罪名，要分裂我们党并着手建立一个新党。因为既然我们没有党，既然只有“斯大林的派别组织”，而党员不必受它的决议的约束，既然这个派别组织是特米多尔化的（虽然，说我们党特米多尔化，那是愚蠢无知的），那末，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总之，为了组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分裂我们党并着手组织一个新党。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五步。◇53◇

你们看，这就是反对派为了保卫苏联而提出的五项最重要的措施。

反对派的这一切措施和保卫我们国家、保卫世界革命策源地是毫不相干的，这还需要证明吗？

而这些人却要我们把他们的失败主义的、半孟什维主义的文章刊登在我们党的报刊上！他们究竟把我们当做什么人呢？难道我们这里会有“从无政府主义者起到君主主义者止”的出版“自由”吗？这种“自由”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为什么我们不刊登孟什维主义的文章呢？因为“从无政府主义者起到君主主义者止”的各种反列宁主义的、反苏维埃的派别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出版“自由”的。

反对派分子坚持要刊登自己那些半孟什维主义的、失败主义的文章，究竟是想干什么呢？他们是想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打开一个小窗户，而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就会使反苏维埃分子活跃起来，就会加强反苏维埃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并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开辟一条道路。他们敲这个门，却开了另一个门。

请看唐恩先生关于反对派是怎样说的：

“尽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对派的值得赞同的纲领毫无共同之

————————————

① 所谓特米多尔倾向或特米多尔化，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是指权力从无产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种蜕化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本书制作者注

点，但他们还是会热烈欢迎反对派的这种合法化的。他们会欢迎政治斗争的合法性，会欢迎公开地自动取消专政而采取新的政治形式来为广泛的工人运动开辟活动场所。”（一九二七年七月“社会主义通报”第十三期）◇54◇

“公开地自动取消专政”，——反对派的同志们，这就是苏联的敌人所期待于你们的，这就是你们的政策所要产生的后果。

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一种是战争危险，它已经变成了战争威胁；另一种是我们党内某些环节蜕化的危险。为了准备保卫，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建立铁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保卫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巩固党的纪律，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瓦解我们党的分子。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分裂我们西方和东方兄弟党的分子。（鼓掌）我们必须制裁一切受骗子苏瓦林、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以及糊涂虫特伦支持的正在分裂我们西方兄弟党的分子。

只有这样，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战争，同时我们要竭力忍受某些物质上的牺牲，以推迟战争，赢得时间，向资本主义赎买。

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种危险就是蜕化的危险。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那里来的（指着反对派）。必须消灭这种危险。（鼓掌多时）◇55◇

八月五日的演说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对这次全会非常不老实，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又回到已经解决了的国际形势问题上去了。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第四项议程——“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违反党纪的问题”。然而，季诺维也夫避开所讨论的议程，又回到国

际形势问题上去，企图重新讨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同时，他在发言中强调反对斯大林的问题，却忘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而是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

因此，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发言中回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几个方面去，以便证明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是没有根据的。

同志们，我很抱歉，但是，我不得不就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也讲几句话。（喊声：“请讲吧！”）

第一点。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发言中不知道为什么提起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的动摇，并且说了一大堆谎话。我从来不否认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曾经有过一点动摇，这种动摇总共继续了一◇56◇两个星期，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回国之后，这种动摇就消除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我是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反对加米涅夫和他的反对派集团的。关于这一切，我已经在我们党的报刊上谈过好几次了（见“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等）。

我从来没有认为而且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我不但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错误，而且也没有掩饰过自己瞬间的动摇。但是也不能否认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自己的错误，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瞬间的动摇而去制定一个政纲、建立一个特殊集团等等。

可是，这个问题同所讨论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季诺维也夫避开所讨论的问题而重提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旧事呢？难道他忘记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月、 十月、十一月间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反列宁的斗争以及自己所提的反列宁党的特别政纲了吗？也许季诺维也夫是想用重提旧事的办法把现在所讨论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推到一边吧？不，季诺维也夫的这套把戏是变不成功的。

第二点。其次，季诺维也夫从我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即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前几个月写给他的信里引证了一段话。我不记得写这封信的

经过了。我没有这封信的存底，因此不能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是正确的。我这封信好像是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写的。但是我应当说，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绝对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引证这封信，大概是想说明我对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一般是抱着怀疑态度的。这当然是胡说。◇57◇

信里首先提到的是关于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一九二三年七月间或八月初，发动千百万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性、彻底瓦解资产阶级并提出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问题的那种深刻的革命危机在德国还没有发生。按七八月间的形势来说，在德国自然还谈不到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的问题，况且当时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还只有**少数的拥护者**。

这样的立场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时政治局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信里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力图挑逗共产党人去作过早发动时共产党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我当时主张共产党人不要受他们的挑逗。而且不仅是我，就是整个政治局也都同意这个立场。

但是，两个月以后德国的形势起了急遽的变化，革命危机尖锐化了。彭加勒向德国发动了军事进攻；德国的财政危机极端严重；德国政府内部开始瓦解，内阁经常更迭；革命浪潮开始高涨，摧毁着社会民主党；工人开始大批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共产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样，坚决地明确地主张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

大家知道，当时由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些德国同志组成的共产国际德国委员会曾经通过好几项关于直接帮助德国同志夺取政权的具体决议。

在这个时期内，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间是否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呢？不，不是的。当时关于◇58◇在德国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是有

过意见分歧的。我和布哈林肯定说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苏维埃，并建议在德国立即组织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以及一些德国同志反对组织苏维埃，认为有了工厂委员会就足以夺取政权。季诺维也夫则动摇于这二者之间。

同志们，请注意当时所说的并不是总共只有几百万无产者的中国，而是有将近一千五百万无产者的工业高度发展的德国。

当时这些意见分歧的结局是怎样的呢？结局是季诺维也夫**投到**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方面去，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被否决了。

固然，季诺维也夫后来曾经对他的这些过错表示忏悔。但是这不能抹杀如下的事实，即当时在德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季诺维也夫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一边，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站在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一边。

请看季诺维也夫后来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在关于苏维埃（德国的。——斯大林注）的问题上，我们所犯的错误是对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让了步。每次在这些问题上一让步，就一定会犯错误。工人苏维埃在当时是不能建立的，但是这却是一块试金石，可以用它来判明一种方针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让步。让步是我们的错误。同志们，问题就是如此。”（见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有德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的速记记录第七十页）◇59◇

季诺维也夫在这段话里说“我们犯了错误”。这个“我们”是谁呢？当时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我们”。其实，犯错误的只是投到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方面并站到他们的错误立场上去的季诺维也夫。

事实就是如此。

季诺维也夫最好还是不要提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吧，不要使自己在全会上丢脸吧，况且他所提出的关于德国革命的问题显然是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全会第四项议程毫无关系的。

关于中国问题。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似乎把中国和美国混为一谈了。这当然是胡说。在我的报告中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把中国和美国混为一谈的事。事实上，在我的报告中只是谈到中国人民有求得民族统一和从外国羁绊下获得民族解放的权利。我在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报刊的问题时曾经说，既然你们，帝国主义者先生们，认为（至少是在口头上）争取统一和从外国羁绊下获得解放的意大利的民族战争、美国的民族战争和德国的民族战争都是合理的，那末，中国为什么不如这些国家，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求得自己民族统一和民族解放的权利呢？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所说的话，我根本没有谈到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的问题。

在和资产阶级报刊作斗争时这样提问题是否恰当呢？显然是恰当的。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样简◇60◇单的事理，但是这只能怪他自己愚蠢，不能怪别的。

原来季诺维也夫认为把当时是革命的武汉国民党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核心的政策是不正确的。试问这有什么不正确呢？武汉国民党在今年年初是革命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当时武汉国民党不是革命的，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大喊“用一切办法支持”武汉国民党呢？如果当时武汉国民党不是革命的，为什么反对派发誓说他们是主张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内的呢？如果共产党人加入了武汉国民党并且在国民党里有了威信，而他们却不试图拉国民党同路人跟着自己走，也不试试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那末，这样的共产党人还有什么价值呢？依我说，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一钱不值的。

固然，这个试图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强大，中国革命因此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但是，难道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共产党的政策不正确吗？

一九〇五年俄国共产党人也曾经试图把当时存在的苏维埃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然而当时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利，由于沙皇制度和封建主比革命的力量强大，这个试图也没有成功。由此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说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正确呢？显然是不应该的。

其次，季诺维也夫断言列宁曾经主张在中国立即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季诺维也夫并且引证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但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简直是在把党引入迷途。◇61◇

在报刊上已经讲过好几次，但是这里还得再说一遍：在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

在报刊上已经讲过好几次，但是这里还得再说一遍：列宁在他的提纲里指的不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而且他特别附带说明，他指的是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

可以不可以把中国算做“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可以不可以在中国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而不先建立工人阶级的阶级苏维埃呢？显然是不可以的。那末，反对派为什么要引证列宁的提纲来欺骗党呢？

关于喘息时机问题。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国内战争结束时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摆脱了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建设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现在对斯大林的话吹毛求疵，硬说斯大林把这个喘息时机变成了喘息时期，说这似乎是同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战争威胁这一论点相抵触的。

不用说，这里季诺维也夫的吹毛求疵是愚蠢可笑的。在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之间已经有七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以不可以把这七年的时期叫做喘息**时期**呢？显然是可以的，而且是

应当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时期才不过一年。为什么一年的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可以叫做时期，而七年的喘息时期倒不能叫做喘息时期呢？怎么可◇62◇以用这样愚蠢可笑的吹毛求疵来麻烦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呢？

关于党专政。在我们党的报刊上已经好几次讲过季诺维也夫歪曲了列宁关于党“专政”的概念，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在我们党的报刊上已经好几次讲过列宁把党“专政”了解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说，不是党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而是党通过说服、通过政治教育来实现的领导，即不能也不愿与其他政党分掌的**一**党的领导。

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一点，他歪曲了列宁的这个概念。季诺维也夫本人也许不懂得，他歪曲列宁关于党“专政”的概念，就等于为在党内培植“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开辟道路，为给考茨基诽谤列宁似乎在实行“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做辩护开辟道路。这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好的。如果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种简单的事理，那要怪谁呢？

关于民族文化。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发表的一大通关于民族文化的谬论，应当传之后世，好使党知道季诺维也夫是反对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知道他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拥护者。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民族文化的口号就是要一切民族的劳动群众在精神上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服从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宣布了**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口号。这◇63◇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要使苏联各民族中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苏联一切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反对任何民族文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主张**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的语言、学校、出版物等等。“在苏维埃基础上”这个附带条件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所发展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化，**按其内容来说**，应当是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文化，即社会主义的文化；而按其**形式**来说，它现在和将来对于苏联一切民族都是不同的文化，即民族的文化，即因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特征不同而各有差别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大约三年前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说中已经说过了〔二四〕。我们党一直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工作，鼓励发展**民族的**苏维埃学校、**民族的**苏维埃出版物和其他文化机关，鼓励党的机关“**民族化**”、苏维埃机关“**民族化**”以及其他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他写给在各民族区域和民族共和国工作的同志们的信中，号召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这些区域和共和国的民族文化。

正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所以我们能建立起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际主义大厦。

季诺维也夫现在竟想推翻、抹杀、葬送这一切而向民族文化宣战。他把这种民族问题上的殖民主义谬论也叫做列宁主义！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64◇

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整个反对派（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虽然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但他们还是一再抓住这个问题，浪费全会的时间。他们企图把问题说成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获得胜利的论点似乎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理论”。

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这样论断是企图欺骗党。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声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二五〕，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正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时立

即出来反驳列宁，把列宁的声明称为“民族狭隘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和斯大林的“理论”究竟有什么相干呢？

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一九一五年做了托洛茨基的尾巴，宣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学说是“民族狭隘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和托洛茨基的半孟什维主义理论相反的、关于在苏联可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别决议〔二六〕，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为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避开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这个决议呢？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以此驳斥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二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获得胜利的决议〔二八〕并以此驳斥了反对派联盟及其首领托洛茨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揭露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二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试问这和斯大林的“理论”究竟有什么相干呢？

斯大林除了要求反对派承认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的这些决议是正确的以外，难道在什么时候还向反对派要求过别的什么吗？

如果反对派的首领们心地纯洁，他们为什么要避开这一切事实呢？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欺骗党吗？但是，任何人都欺骗不了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

同志们，老实说，这些问题和所讨论的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违反党纪的议程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季诺维也夫为了混淆视听和抹杀所讨论的问题，还是把它们扯了出来。

我再一次表示歉意，占了你们的时间来分析这些问题。可是我不

能不这样做，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消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欺骗党的念头。

同志们，现在就让我从“防御”转入进攻吧。

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直到现在还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

那末，为什么反对派的首领们昨天还在党的领袖之列而“忽然”就成了变节者呢？这该怎样解释呢？反对派自己喜欢用个人原因来解释这个事实，说斯大林“未加帮助”，布哈林“搞坏事情”，李可夫“未予支持”，托洛茨基“错过机会”，季诺维也夫“忽略问题”等等。但是这种廉价的“解释”甚◇66◇至连解释的影子都没有。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在党内陷于孤立并不是一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更不能说是偶然的。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背弃党的事实是有它的深刻的原因的。显然，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某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在某个问题上有很大罪过，否则，党是决不会把他们当做变节者摈弃的。这里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反对派首领们在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由于什么该当“落到这种地步”呢？

他们犯了错误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列宁主义的问题，关于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问题。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过去企图现在还是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同志们，这是反对派首领们最大的罪过，党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宽恕他们的这个罪过。他们企图从列宁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党显然是不能跟着他们走的，因此，反对派的首领们在党内陷于孤立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当中过去的列宁主义者现在结成的联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们现在的联盟就是一种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的物质表现。“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杜撰的。这个名词是列宁同志把它当做一种和列宁主义相反的东西而首先使用的。

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在哪里呢？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在于它不相信苏联无产阶级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有力量，有能力领导农民、领导基本农民群众。◇67◇

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在于它不了解，其实也就是不承认列宁关于在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在个别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思想。

过去的列宁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不是知道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些根本的缺点呢？是的，是知道的。他们昨天还到处喊叫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昨天还大喊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不能相容。但是，当他们一和党发生冲突而处于少数地位时，他们就忘记这一切而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以便共同进行反对列宁党、反对列宁党的思想体系、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了。

你们大概还记得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我们当时和所谓“新反对派”争论的是什么呢？是关于中农的作用和意义、关于基本农民群众的作用和意义、关于尽管我国技术落后无产阶级还是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领导基本农民群众等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和他们争论的也就是我们党很久以来和托洛茨基派争论的问题。你们知道，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结果对“新反对派”是很悲惨的。你们知道，由于这次争论，“新反对派”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这一基本问题上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阵营中去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当中过去的列宁主义者的所谓反对派联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新反对派”是不是知道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三十〕呢？当然是知道的。不但知道，他们自己还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有关的决议。“新反◇68◇对派”是不是知道列宁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不能相容呢？

当然是知道的。不但知道，他们还当着全党的面到处喊叫过这一点。

现在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他们今天烧毁他们昨天崇拜的东西，他们今天否定他们昨天大声号召党去做的事情，他们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虽然他们昨天还说这种企图是背叛列宁主义的，像这样的首领，党能不摈弃他们吗？显然，党必须摈弃这样的首领。

反对派极尽颠倒是非的能事，甚至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时期是孟什维克的事实。同志们，不要奇怪：反对派公然说托洛茨基从一九〇四年起就一直不是孟什维克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请教列宁吧。

请看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在十月革命前三年半关于托洛茨基是怎样说的：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老前辈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对他们是用不着谈这个人物的。但是年轻的一代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侨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给这些动摇不定的、时而从‘经济派’方面跑到‘火星派’方面、时而又跑回去的人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命超乎一切派别组织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69◇派别组织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别组织的思想。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一九〇三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①]，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一九〇七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托洛茨甚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他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①]。

这种类型的人物是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的渣滓，当时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70◇信的野心，**既**根本不愿理睬党从一九〇八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又**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二一页至第三二二页）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以后总是处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之外，时而投奔孟什维克的阵营，时而离开他们，但是从来没有归附于布尔什维克，从一九一二年起，又为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而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结成联盟，同孟什维克处在一个阵营里。

这样的“人物”没有取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以这样一个“人物”为首的反对派联盟陷于孤立并为党所抛弃，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反对派的首领们犯了错误的**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企图悄悄地取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学说。

列宁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十月革命前两年，就根据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的论点，这个事实现在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正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就在一九一五年那年在报刊上反对列宁的这个论点，宣称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①]◇71◇的牺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这个事实现在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后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个论争实际上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列宁最后的一本小册子“论合作社”〔三一〕出版时都没有停止过。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一再宣布在我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成其为秘密了。

列宁逝世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一九二五年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经过多次动摇之后承认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学说，并且同党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了界限。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当他们在反党斗争中处于少数地位而不得不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时，他们“忽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然”又转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背弃了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违背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学说。结果，托洛茨基的那种把列宁的理论说成是民族狭隘性的半孟什维主义谬论就成了反对派手中的帷幕，他们竭力用它来遮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取消列宁主义的勾当。

试问，以列宁主义精神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党认为根据上述这一切必须摈弃这些取消派分子，而◇72◇反对派首领陷于和党隔离的状态，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反对派的首领们犯了错误的**第三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党的问题，关于党的团结一致的问题，关于党的钢铁般的统一的问题。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统一的和团结一致的党，必须是没有派别组织和派别组织中央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统一的意志的党。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要求自觉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要求党员群众自觉地对待党的领导，批评党的缺点，批评党的错误。但列宁主义同时又要求全体党员在党的决议既已通过并经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之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托洛茨基主义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是一种各有派别组织中央的一些派别集团的联盟。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的无产阶级纪律是不堪忍受的。托洛茨基主义不能忍受党内的无产阶级制度。托洛茨基主义不了解，没有党的铁的纪律，就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派当中过去的列宁主义者是不是知道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些根本缺点呢？当然是知道的，不仅知道，他们还曾经到处喊叫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方针”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不能相容。反对派在他们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放弃了他们把党理解为一些集团的联盟的看法，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反对派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是破绽百出的。但这种放弃是口头上的，不是真诚的。事实上，托洛茨基分

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强迫我们党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路线的企图，而季诺维也夫◇73◇和加米涅夫却帮助他们干这种可耻的勾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他们反党的斗争中只要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就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半孟什维主义的组织大纲方面去，就跟托洛茨基分子一起把对党内无产阶级制度作斗争宣布为当前的口号。

我们党认为不能葬送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并且摈弃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同志们，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就是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背弃了列宁主义。

既然如此，列宁党摈弃了这些首领，那有什么奇怪呢？

但可惜反对派并不是仅仅堕落到这里为止。反对派继续堕落下去，简直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地步，再下去就有到党外去的危险了。

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

在这以前，还很难料到反对派（不管他们如何堕落）会在无条件保卫我们国家的问题上犹豫动摇。可是现在不但可以料到，而且可以断言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的立场是失败主义的立场。否则，如何了解托洛茨基关于在新的反苏战争发生时要做克列孟梭式的实验的那个愚蠢而荒谬的论点呢？这是反对派继续堕落的标志，对这一点难道还能怀疑吗？

在这以前，还很难料到反对派有一天会愚蠢而荒谬地责备我们党是特米多尔化的党。在一九二五年，当查鲁茨基第一次谈到我们党有特米多尔倾向时，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曾经坚决和他划清界◇74◇限。可是现在反对派却堕落到比查鲁茨基更进一步，居然责备起党特米多尔化来了。我真不懂这些断言党已经特米多尔化的人怎么还能留在我们党内。

在这以前，反对派所力图的“仅是”在共产国际的各支部内组织个别的派别集团。可是现在他们竟公开在德国组织了一个新党即反革

命的骗子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的党，来和现在的德国共产党对抗。这是直接分裂共产国际的立场。从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内成立派别集团进到分裂共产国际，这就是反对派首领们堕落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发言中并没有否认德国存在着分裂的事实。可是它，这个反共产主义的党，却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组织的，这一点只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们的反党文章和演说是由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印成单行本散发出去的。（喊声：“真可耻！”）

反对派联盟让魏奥维奇在我们报刊上发表文章替德国的这个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第二党做政治辩护，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反对派**公开**支持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支持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支部。同志们，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派别活动了。这是**公开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喊声：“对！”）

从前，反对派力求取得在我们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感到这已经不够了。现在他们走上了**直接分裂**的道路，正在苏联建立一个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新党。他们从派别活动的政策进到直接分裂的政策，进到建立新党的政策，进到“奥索夫斯基主义”〔三二〕的政策；请看我◇75◇们的反对派首领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这就是反对派沿着背离党和背离共产国际的道路、沿着在共产国际内和联共（布）党内实行分裂政策的道路继续堕落下去的主要标记。

能不能再容忍这种状况呢？显然是不能的。不论在共产国际内还是在联共（布）党内都不能容许实行分裂政策。如果我们重视党和共产国际的利益，重视党的统一和共产国际的统一的利益，就应当立即根绝这个祸害。

就是这些情况使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提出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的资格的问题。你们会问：出路在哪里呢？

反对派已经把自己驱入绝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帮助反对派脱出这种绝境。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在这里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就是党为促进党内和平而可能采取的一种方法，一种最大的让步。

第一、反对派必须毅然决然放弃关于“特米多尔化”的无稽之谈和关于克列孟梭式的实验的荒谬口号。反对派必须了解，如果有这种观点和这种倾向，那就不能在战争威胁临头时保卫我们的国家。反对派必须了解，如果有这种观点和这种倾向，那就不能继续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喊声：“对！”）

第二、反对派必须公开地、直截了当地斥责德国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的分裂主义的、反列宁主◇76◇义的集团，和这个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决不能再容忍支持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了。（喊声：“对！”）

支持共产国际内的分裂，瓦解共产国际各支部，就不能保卫苏联。

第三、反对派必须毅然决然放弃一切派别活动，放弃一切用以在联共（布）党内建立新党的手段。不论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或两小时，都不能容许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喊声：“对！”）

同志们，三个基本条件就是如此，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容许他们继续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

有人会说这是高压手段。是的，这是高压手段。高压手段在我们党的武库里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这样做是根据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即根据列宁同志起草的并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三三〕。下面就是这个决议的第六条和第七条：

第六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第七条：“为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如遇违反纪律、恢复或容许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77◇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凡是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时，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

喊声：应当立刻实行这种非常措施。

斯大林说：请等一等，同志们，不要着急。列宁起草了这个决议，并把它留给了我们，因为他知道党的铁的纪律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通过党来实现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一致的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条件就是如此，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就不能继续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派如果接受这些条件，那很好。如果不接受，那对他们就更糟了。（鼓掌）

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

（八月九日的演说）

同志们！不要把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看做党内和平。不要为错觉所迷惑。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只是暂时的休战。（喊声：“连暂时的也不是！”）这是暂时的休战，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前进了一步，但也可能不是。这一点必须永远记住。反对派继续让步也

罢，不继续让步也罢，这一点都必须记住。

对党来说，前进了一步的是，反对派在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退却。是一定程度的。但是，他们的退却是有附带条件的，这些附带条件能够为将来更尖锐的斗争打下基础。（喊声：“对！”“对，这话说得对！”）

由于业已形成的战争威胁，保卫苏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基本问题。反对派在他们的声明中肯定地说他们是主张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的，但是他们拒绝斥责托洛茨基那个关于克列孟梭的尽人皆知的公式，尽人皆知的口号。托洛茨基应当拿出勇气来，有什么就承认什么。

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体都会一致确认：一个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心里、◇79◇在事实上主张无条件地保卫我们国家的人，是不会写出像托洛茨基在一封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由奥尔忠尼启泽同志收的信里所写的那种话的。

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体都会确信：托洛茨基提出的这个关于克列孟梭的口号，关于克列孟梭的公式，只能使人怀疑托洛茨基对于保卫苏联的诚意。不仅如此，它还给人一种印象，即托洛茨基对无条件地保卫我们国家的问题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喊声：“对，完全对！”）

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全体都会深信：托洛茨基提出这个关于克列孟梭的口号，关于克列孟梭的公式，就是要以他那尽人皆知的关于更换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这一点作为保卫苏联的先决条件的。只有瞎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如果托洛茨甚缺乏勇气，缺乏起码的勇气来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末这只好怪他自己了。

既然反对派在他们的文件里不指摘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那就是说他们还想在自己手里保留一种后备武器，以便将来攻击党在保卫国家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那就是说他们在自己手里保留一定的后

备武器，以便将来使用。

正因为如此，反对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不是要和平，而是要有附带条件的暂时休战，这种附带条件将来会使斗争更加尖锐化。（喊声：“我们不需要休战，我们需要和平。”）

不，同志们，我们是需要休战的，这一点你们错了。如果要举例子的话，最好就举果戈里的奥西普为例，奥西普说：“小绳子吗？拿来吧，就是小绳子也会有用的。”我们最好也像果戈里的奥西普那样◇80◇做法。我们的物资还不够充裕，我们的力量也还不够强大，所以不能够轻视一条小绳子。即使是一条小绳子我们也不应当轻视。你们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在我们的武库里小绳子也是应当有的。

在第二个问题上，在关于特米多尔的问题上，反对派无疑是开始退却了，和以前的情形相比，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了某种退却的，在这样的退却以后，某些反对派分子、特别是反对派中的某些半孟什维克分子就不能再进行（当然，要是顾到逻辑的话）他们过去所进行的那种关于党“特米多尔式的蜕化”的荒谬宣传了。

但是反对派在做这种让步的同时却提出一个附带条件，这个附带条件将来会把任何休战和任何和平的可能性都化为乌有。他们说国内某些分子有复辟倾向，有特米多尔倾向。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什么人否认过。既然还有敌对阶级，既然阶级还没有消灭，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当然总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是关于反对派在他们的文件里以特米多尔化来攻击中央委员会因而也就是攻击党那件事情。决不能把中央委员会和党分割开来。决不能。这是荒谬的。只有那些不懂得列宁关于组织结构的起码的基本前提的反党分子，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认为可以把中央委员会（而且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党分割开来。

但是反对派在让步的同时却提出我上面说过的附带条件，这种附带条件使反对派掌握某种后备武器，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它来向党

进行新的攻击。

说中央特米多尔化当然是可笑的。说得重一些，是荒谬的。我想反对派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谬论。◇81◇但是他们需要这种谬论，像需要稻草人一样。因为如果反对派相信这件事，当然，他们就一定会直接向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宣战了，可是反对派同时硬说他们是要党内和平的。

你们看，在第二个问题上，反对派也掌握着后备武器，以便今后用来向中央进行新的攻击。同志们，无论如何这一点也是必须记住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把反对派的首领们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反正都一样，这个后备武器（关于特米多尔这个基本问题）总还是保留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党应当立即采取一切办法，一旦反对派重新拿起这个反党武器，就把他们消灭。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共产党内的分裂问题，关于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的反列宁主义的分裂集团的问题。

昨天我们委员会里有过一次奇怪的谈话。许多人发言以后，反对派分子十分勉强地、真是十分勉强地鼓起勇气说：他们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是真心诚意地服从，而是为了服从而服从），他们同意承认和这个反党集团保持组织上的联系是不容许的。我提出："组织上的联系和对这个集团的支持"都是不容许的。托洛茨基说："这一点不要，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共产国际当时决定开除他们是不正确的；我要力争把他们、把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重新接收入党。"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在这些人的脑子里连起码的党性观念都给风吹跑了！假定今天联共（布）把米雅斯尼柯夫这个你们都知道他的反党活动的人开除出党，明天托洛茨基会出来说："我不能放弃对米雅斯尼柯夫的支持，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可是我愿意遵◇83◇照你们的命令和他断绝组织上的联系。"

明天把"工人真理派"〔三四〕这个你们也都知道他们的反党活动的

集团开除出党，托洛茨基会出来声明：“我不能放弃对这个反党集团的支持，因为你们开除他们出党是不正确的。”

后天中央把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因为他是党的敌人，——这一点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托洛茨基会向我们声明，开除奥索夫斯基是不正确的，所以他不能放弃对奥索夫斯基的支持。

但是，如果党、如果共产国际详细讨论了包括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在内的一些人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的这些高级机关决定必须开除这些人，而托洛茨基竟不顾这一点，今后还是不放弃对这些被开除的人的支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呢？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党和共产国际呢？可见在托洛茨基看来，无论党或共产国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托洛茨基个人的意见。

如果不只是托洛茨基，而且其他的党员也要像托洛茨基那样干，那会怎样呢？显然，这种游击主义、这种山头主义只会使党性消灭。不会再有党了。只会有一些个别头目的个人意见。这是托洛茨基所不愿意了解的。

为什么反对派不同意放弃对马斯洛夫—路特·费舍的反共产主义集团的支持呢？为什么反对派的首领们不同意接受我们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修正呢？因为他们要在自己手里保留第三个后备武器，以便攻击共产国际。这一点也必须记住。

不管我们是不是同他们达成协议，不管他们是不是将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反正都一样，这个后◇84◇备武器总还是保留在他们的手里，以便将来用来攻击共产国际。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解散派别组织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反对派老老实实地公开说，“无条件地解散派别组织”。反对派的首领们不肯这样说。他们却说，“应消灭派别活动的因素”，但是又补充一句，“派别活动的因素是在党内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你们看，这就是第四个小小的附带条件。这也是反对派用来反对

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一个后备武器。

反对派分子既然不同意接受我们提出的方案——立即解散他们现有的派别组织即解散那个打算最近几天在这里、在莫斯科召开其非法代表会议的派别组织，那末他们想说什么呢？这就是说，他们想仍为自己保留今后在车站上举行游行示威的权利；他们说：应当怪制度，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的。这就是说，他们想仍为自己保留今后攻击党的权利；他们说：是制度迫使我们攻击党的。你们看，这就是反对派为自己留下的又一个后备武器。

这一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都必须知道并且记住。◇84◇

苏维埃工人阶级

美利坚工人运动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候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85◇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做了某种新贡献，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做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跃进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的必遭灭亡◇86◇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乙）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

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丙）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做相当长久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87◇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乙）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全部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丙）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认为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

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基本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88◇

大家知道，由于有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就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袖，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离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国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国会，消灭苏维埃：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的预备国会开会期间；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审查和考验，已经被群众看做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

去换资产阶级国◇89◇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爱尔兰、印度、中国、中欧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事件时，已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的主要的思想。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乙）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丙）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总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得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甲）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90◇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丁〉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所做的新贡献大体上就是如此，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把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

所以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更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在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还说到：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我认为这样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91◇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其他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做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说共产党监督着政府？

答：这完全要看对监督是怎么了解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监督的了解是有些特别的。我知道，许多资本主义的政府，尽管有“民主的”国会存在，却受大银行的监督。国会总想使人相信是它们在监

督政府。而事实上政府的成员却是由大财团内定的，政府的行动也是受大财团监督的。谁不知道无论在哪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内，违反大财阀的意旨，内阁是组不成的，只要这些财阀一施财政压力，部长们就抱头鼠窜地下台。和国会的假监督相反，银行对政府的监督才是真监督。

假如你们指的是这种监督，那我必须说，富豪对政府的监督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是根本不会有的，这至少因为在我们这里银行早已收归国有，而富豪已经被驱逐出苏联了。

也许代表团想问的不是监督而是党对政府的领导吧？如果代表团想问的是这个，那我要回答说：是的，在我们这里是党领导政府的。而这种领导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党得到多数的工人◇92◇和一般劳动者的信任，它有权代表这个多数来领导政府机关。

苏联的工人政党——苏联的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表现在共产党力求通过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并愿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优秀工作人员，输送到我国重要的国家工作岗位上去。而党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和农民对党都采取信任的态度。我国政权机关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员，他们，这些领导者，在我国有很高的威信，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表现在党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

第三表现在任何政权机关在制定工业和农业方面或商业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计划时，党都要给它们总的方针性的指示，确定它们在计划执行期间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向。

资产阶级的报刊对于党这样“干涉”国家事务通常总是表示“惊奇”。但是这种“惊奇”完全是假装的。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党正是这样“干涉”国家事务和领导政府的，而且在那里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领导的，这些人和大银行有着各种联系，因此，他们竭力不让人民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谁不知道在英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一个由极少数操纵领导的人◇93◇所组成的秘密内阁呢？只要回忆一下劳合-乔治关于自由党的“幕后”内阁的著名演说就够了。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别就在于：

（甲）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国家却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

（乙）资产阶级政党靠可疑的秘密内阁不让人民知道自己扮演领导角色；在苏联，共产党却不需要任何秘密内阁，它斥责秘密内阁的政策和行动，公开向全国宣布它担负着领导国家的责任。

有一个代表问：党是不是根据同样的原则领导工会？

斯大林答：基本上是的。党不能正式给工会发任何指示。但是党可以给在工会里工作的党员发指示。大家知道，在工会里，也像在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一样，是有共产党的党组的。这些共产党党组的责任就是力求在工会、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用说服的方法通过各种符合党的指示的决议。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在群众中得到莫大的信任。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要不然，在工人阶级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第三个问题：既然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是合法的，那你从哪里知道人民群众是同情共产主义的？

答：是的，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

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确信多数工人、多数劳动群众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呢？当然，这里指的是工人◇94◇和农民群众，而不是新资产阶级，不是已经被无产阶级打垮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是的，我们有可能，我们有办法知道工人和农民群众是不是同情共产党人。

就拿我国生活中几个最紧要的关头来说，看看我们有没有根据断定人民群众是真正同情共产党人的。

首先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来说，当时共产党正是以党的名义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时正是这个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当时执掌政权的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关以及一千二百万军队的指挥机关都操纵在这些政党的手里，操纵在政府的手里。共产党当时处于半公开状态。世界各国的资产者都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定垮台。协约国完完全全站在克伦斯基政府方面。但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停止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怎样呢？前方和后方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非常坚决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尽管世界各国的资产者都敌意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定灭亡，但是布尔什维克当时却成了战胜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是不是证明广大劳动群众同情布尔什维克党呢？我认为是的。

这就是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的第一次检验。

再拿下一个时期，武装干涉时期即内战时期来说，当时英国资本家占领了俄国北部——阿尔汉◇95◇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地区；美、英、日、法各国资本家抬出了高尔察克，占领了西伯利亚；法国和英国资本家捧出了邓尼金和弗兰格里，采取了占领“南俄”的步骤。

这就是协约国和俄国反革命将军们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反对我国十月革命成果的战争。这就是共产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一次最大检验的时期。

结果怎样呢？谁不知道国内战争的结果是侵略者被赶出俄国，反革命将军们被红军一一歼灭。

这就证明了，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并不是苏联的敌人们大量供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技术装备，而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成了战胜者，这是不是偶然的呢？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在我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呢？我以为是的。

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的第二次检验。

现在谈谈目前时期，谈谈战后时期，这时和平建设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经济破坏时期已经被工业恢复时期所代替，最后又被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我国全部国民经济的时期所代替。现在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检验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来确定广大劳动群众对共产党的同情程度呢？我以为是有的。

首先拿拥有将近一千万无产者的苏联工会来说，看看我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成员。共产党员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者是不是偶然的呢？当然不是偶然的。要是以为苏联工人对工会领导机关的成员漠◇96◇不关心，那就太愚蠢了。苏联工人是在三次革命的风暴中成长和培养起来的。他们学得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检验自己的领导者，如果这些领导者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把这些领导者赶走。有一个时期，普列汉诺夫是我们党内最有威望的人。然而，当工人确信普列汉诺夫已经离开无产阶级的路线时，他们就毅然决然把他孤立起来。既然这样的工人对共产党员表示完全信任，把共产党员推举到工会的负责岗位上去，这就不能不直接表明共产党在苏联工人中的力量和稳固

性是很大的。

这就是广大工人群众完全同情共产党的一次检验。

拿最近的苏维埃选举来说。在我们这里，除了那些剥削别人劳动并被剥夺了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凡是苏联的成年人，从十八岁起，不分性别和民族，都有参加苏维埃选举的权利。选民总共将近六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当然是农民。这六千万人中行使了选举权的约有百分之五十一，就是说，有三千多万人。现在请看看我们中央和地方苏维埃领导机关的成员吧。当选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能够说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很明显，决不能说是偶然的。这一事实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受到千百万农民群众的信任呢？我以为是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的又一次检验。

拿拥有将近二百万工农青年的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来说。青年团内当选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能够说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我以为决不能说是偶然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和威信的又一次检验。◇97◇

最后，拿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各民族的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男女工人、男女农民的无数代表会议、会议和代表大会等来说，西方人对于这种会议和代表会议有时加以讥笑，硬说俄国人总喜欢多说话。然而对我们来说，这种会议和代表会议无论在考察群众的情绪上或在揭发我们的错误并拟定消除这些错误的方法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错误不少，而我们并不隐瞒这些错误，我们认为揭发错误和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是改善对国家的领导的最好方法。你们只要看看在这种代表会议和会议上发言人的演说，看看这些工农出身的“普通人”的切实和诚恳的意见，看看他们的决议，你们就会知道共产党的影响有多么大，威信有多么高，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影响和威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羡慕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稳固性的又一次检验。

这就是可以用来检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的一些办法。

我就是从这里知道苏联广大工农群众是同情共产党的。

第四个问题：如果有一批非党人士组织了一个集团，他们在选举时提出他们自己的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候选人，但是同时又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那末他们能不能有自己的经费并进行积极的竞选呢？

答：我以为这个问题本身含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想像有一批人既拥护苏维埃政府，同时又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为什么呢？因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98◇因为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一批人是不可能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因为这样的一批人只能是对整个苏维埃制度深恶痛绝的人。

在苏联，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分子当然是有的。这就是耐普曼、富农、已经被打垮的剥削阶级残余等等。可是这些分子在居民中只占极少数。我想，代表团在自己所提的问题中指的不是这些分子。如果代表团指的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那我就必须说，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只能引起他们的哄笑和仇视。

对工人来说，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放弃建立新工厂和扩大旧工厂。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使我国比较薄弱的工业萎缩下去，使失业人数增加，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归根到底，这就是加强耐普曼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的势力。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走这条自杀的道路呢？显然是不能的。

对劳动农民群众来说，取消对外贺易垄断制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使农民群众贫困化。这就是恢复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期盛行的那种“自由贸易”制度，那时反革命将军和“同盟者”的联合势力曾经为所欲为地抢劫和掠夺千百

万农民。归根到底，这就是加强富农和农村中其他剥削分子的势力。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农民、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农民都已经尝够了这种制度的滋味。有什么根据可以设想农民愿意重新陷入这个圈套里去呢？劳◇99◇动农民群众是不能主张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有一个代表说：代表团提出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取消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样看的：如果在苏联不是一党垄断，不是对合法权垄断，那末就会有一整批居民因这个问题而组织起来。

斯大林说：这样，代表团又回到苏联唯一合法政党——共产党的垄断问题上去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讲到用什么办法检验千百万工农群众是否同情共产党时已经简略地答复过了。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层，如富农、耐普曼、已经被打垮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那末他们在我国已经被剥夺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权利，正像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一样。无产阶级不但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铁路、土地和矿山，还剥夺了他们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权利，因为无产阶级不愿意资产阶级恢复政权。代表团对于苏联无产阶级剥夺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工厂、土地、铁路、银行和矿山大概不会表示反对吧。（笑声）

可是我觉得代表团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到此为止，还要更进一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我以为这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或者确切些说，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有什么理由要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宽大呢？难道西方执政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表示过一点点宽大吗？难道他们不是正在把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驱入地下吗？有什么理由要求苏联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敌人宽大呢？我以为逻辑上一定是这样。凡认为可以把政治权利归还给资产阶级的人，要是他想合乎逻辑的话，就必然要更进一步提出把工厂、铁路、银行也归还给资产阶级的问题。◇100◇

有一个代表说：代表团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工人阶级和农民跟共产党不同的意见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出来。如果把问题了解为代表团关心的是把政治权利交给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问题，那就不对了。我们指的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跟共产党不同的意见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出来的问题。

另一个代表说：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工人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在工会及其他组织中表达出来。

斯大林说：很好。那末这里谈的不是恢复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问题。

目前苏联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间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呢？无疑是有的。要千百万工人、农民在一切实际问题上和各种细节上的想法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一、工人和农民之间，无论按他们的经济地位或按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在看法上也有某些差别，在教育、年龄、性格上也都有差别，血统工人和农村来的工人之间也有差别，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间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在会议上、工会中、合作社中、苏维埃选举时以及其他场合得到合法的表现。

但是，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过去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有根本差别的。在过去，工人和劳动农民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推翻地主、沙皇制度、◇101◇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集中在摧毁资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上。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同意见的争论却不是围绕着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不是围绕着摧毁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而是围绕着改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问题，改进它们的工作的问题。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

过去，围绕着以革命手段摧毁现存制度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成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内部出现几个互相竞争的政党的根据，这

是毫不奇怪的。这些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另一方面，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同意见的争论的目的已经不在于摧毁现存的苏维埃制度，而在于改进和巩固这种制度，所以这种争论不会在工人和农村劳动群众中间造成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正因为如此，仅仅一个党——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这个党的垄断，不但不会引起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反对，相反地，却被他们看做是一种必要的、合乎心愿的东西。

我们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共产党的垄断），它的这种地位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和故意假造出来的。这种地位决不可能是人为地用行政手腕等等制造出来的。我们党的垄断是在实际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起来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彻底破产而退出舞台的结果。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过去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影响在无产阶级中的传播者。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这些政党的存在是靠什么培植和支持的呢？是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随着资产◇102◇阶级的被推翻，这些政党也就必然失去存在的基础，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些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又成了什么呢？它们成了恢复资本主义和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政党。这些政党必然在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中丧失任何基础和任何影响，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共产党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之间为争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早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当俄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最初征兆出现的时候，这个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时期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发生剧烈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时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为争取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工

人阶级经历了三次革命。工人阶级在这几次革命的烈火中考验并审查了这些政党、它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用处以及它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于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当历史总结了过去的全部革命斗争，当历史在自己的天平上衡量了工人阶级内部互相斗争的各个政党的比重时，苏联工人阶级终于做了最后的选择，选中了共产党，认为它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工人阶级选中了共产党，这是什么原因呢？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时，只占极少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占了绝大多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到了十月革命前夜，整个政权机构和所有的压迫工具都操纵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手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结束战争，主张立即实现民主的和平；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却◇103◇坚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坚持继续帝国主义战争。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主张把工厂、银行、铁路收归国有；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却为克伦斯基政府而斗争，维护资产阶级对工厂、银行和铁路的所有权。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立即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却要把这个问题拖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才召开。

工人和贫农终于选中了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样迅速地垮了台，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垄断的来源，这就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

下一个时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的国内战争时期，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彻底灭亡的时期，是布尔什维克党彻底胜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促进了共产党的胜利。在十月革命时期被粉碎被打垮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残余，开始同富农的反革命暴动连接起来，同高尔察克分子和邓尼金分子联合一起，为协约国效劳，因而在工农心目中彻底葬送了自己。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帮助协约国来扼杀新的苏俄，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一切生气勃勃的、革命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动一批又一批的工农队伍去进行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反对协约国的斗争。◇104◇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胜利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完全失败，那是十分自然的。从此以后共产党成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唯一政党，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我国，共产党这个全国唯一合法政党的垄断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们提到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我已经说过，不同意见的争论现在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否则就不可能前进。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工人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推翻苏维埃制度这一原则问题，而是围绕着改进苏维埃、纠正苏维埃机关的错误等实践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一实践问题。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巩固和改进共产党。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巩固共产党的垄断。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内部造成其他政党形成的基础。

第五个问题：你能不能把你和托洛茨基之间主要的意见分歧简略地告诉我们？

答：首先我必须说明，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假如这是个人性质的意见分歧，那党连一个钟头也不会花费在这上面了，因为党是不喜欢使个别人物突出的。

这里指的大概是党内的意见分歧。我是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是

的，党内是存在着这些意见分歧的。关于这些意见分歧的性质，不久以前李可夫在莫斯科、布哈林在列宁格勒所做的报告中都已经十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报告已经发表。对于报告中所谈的意见分歧问题，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要是你们没有这些文件，我可以给你们找来。（代表们说他们有这些文件）◇105◇

有一个代表说：这些意见分歧，我们回国以后一定会有人问我们，但是，并不是全部文件我们都有。例如“八十三人的政纲”我们就没有。

斯大林说：我没有在这个“政纲”上签名，因此，我没有权利处理别人的文件。（笑声）

第六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的基本动机是取得利润。当然，相对地说，这种动机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代替了它呢？照你的意见，这种代替的效果如何，它能不能成为经常的？

答：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那是对的。说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那也是对的。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首先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绝大多数的厂长是工人，他们是由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取得工会的同意而任命的。并且任何一个厂长如果违反工人或有关的工会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其次，应当指出，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并监督着企业行政方面的活动。◇106◇

最后，应当指出，每一个工业企业都有本企业全体工人参加的工人生产会议，工人在会议上检查厂长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的工

作计划，指出错误和缺点，并且有可能通过工会、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来纠正这些缺点。

不难了解，所有这些情况根本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和企业中的各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

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这个情况，从工人当中涌现出来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组织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第二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资本家是不会把自己的收入用来增进工人阶级的福利的。他是为利润而生活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家榨取利润是为了积累追加资本，并把它输出到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去，以便榨取新的、更多的利润。资本就这样不断地从美国流入中国、印度尼西亚、南美和欧洲，从法国流入法国◇107◇殖民地，从英国流入英国殖民地。

我们这里却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不实行而且也不赞成殖民政策。我们的工业收入留在国内，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及通过减低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其中包括农民市场的容量。在我国，工业利润大约百分之十是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的。在我国，由国家支付的工人阶级保险事业费占工人货币工资的百分之十三。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我现在说不出究竟是多大一部分）用于文化需要、工厂技术教育和工人休假方面。收入的

相当大的一部分（我现在也说不出究竟是多大一部分）用来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工业收入的其余部分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修缮旧工厂，建设新工厂以及减低工业品的价格。

这些情况对于我国全部工业的巨大意义就在于：

（甲）它们促使农业和工业接近起来，使城乡之间的对立日趋缓和；

（乙）它们促使国内市场即城乡市场的容量日益扩大，从而为工业的进一步扩展造成不断扩大的基础。

第三是这个情况：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济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这些刺激和推动我国工业的力量是不是经常的因素呢？它们能不能成为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呢？是的，它们无疑是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而且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108◇

第七个问题：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合作？

这种合作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度？或者这只是一种尝试，只是为了弄清楚在哪一方面可以进行哪一种合作，而在哪一方面不可以进行？

答：你们指的大概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方面、在商业方面、也许还在外交关系方面签订暂时协定的问题。

我认为两种对立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并不排斥签订这种协定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下签订这种协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宜的。

输出和输入就是签订这种协定最适当的基础。我们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如棉花）、半制品（金属的和其他的），而资本家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我们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我们需要贷款，而

资本家需要这种贷款的优厚利息。这又是信贷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而且大家知道，苏维埃机关是最有信用的付款人。

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签订关于裁减军备以至完全取消常备军的协定，这一点我们早在热那亚会议〔三五〕上就向全世界宣布过了。这就是外交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

这些协定的限度如何呢？这些协定的限度是由两个互相竞赛和斗争的体系的对立性来规定的。在这两个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而且只有在这种范围内，签订协定才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和德国、意◇109◇大利、日本等国签订协定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协定是否只是一种试验，或者是具有比较长期的性质呢？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并且也取决于我们的对方。这取决于总的情况。战争可能把所有一切协定全都推翻。最后，这还取决于协定的条件。奴役性的条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和哈里曼签订了开采格鲁吉亚锰矿的协定。协定订为二十年。可见期限是很不短的。我们还和连纳金矿公司签订了开采西伯利亚金矿的协定。协定订为三十年，——期限是更长的。最后，我们还和日本签订了开采库页岛石油和煤矿的协定。我们希望这些协定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但这当然不仅取决于我们，并且也取决于我们的对方。

第八个问题：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差别是什么？

答：你们指的大概是苏联境内那些从前受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压迫、没有自己国家组织的民族。

基本的差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而在我们苏联，这两种东西都已经根本消灭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除了头等民族即享有特权的民族、“有国家的”民族以外，还有次等民族即“没有国家的”民族，主权不完整

的、被剥夺了某些权利首先是被剥夺了成立国家的权利的民族。而在我们苏联，情形完全不同，所有这些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的现象都消灭了。在我国，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有主权的，因为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权和国家特权都取消了。◇110◇

当然，问题不在于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发表了不少民族平等的宣言。这些宣言要是不付诸实现，那又有什么价值呢？问题在于消灭那些作为民族压迫的代表者、制造者和实行者的阶级。以前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这样的阶级。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因而也就消灭了民族压迫的可能性。正因为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们这里就把这叫做实现民族自决以至民族分离的思想。正因为我们实现了民族自决，我们才消除了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并在自愿原则上把各民族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我们实现民族政策的结果，就是苏联各民族自愿结合为一个联盟国家的表现。

几乎无须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要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还是资本家在执掌政权，而资本家是民族压迫政策的制造者和实行者。

不能不指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领导苏联最高政权机关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人的主席，而是按照加入苏联的六个加盟共和国的数目而定的六个主席，其中一个是俄罗斯人（加里宁），另一个是乌克兰人（彼得罗夫斯基），第三个是白俄罗斯人（切尔维雅柯夫），第四个是阿捷尔拜疆人（穆萨别柯夫），第五个是土尔克明人（艾塔柯夫），第六个是乌兹别克人（斐祖拉·霍札也夫）。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个鲜明表现。不用说，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111◇它多么民主，也不会采取这种措施。可是这种措施在我们看来却是由我们全部民族平等政策产生出来的一

个不言而喻的事实。

第九个问题：美国工人领袖用两种理由来为他们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做辩护：

（一）共产党人在工会内部进行派别斗争，攻击工会中非激进的负责人，以此破坏工人运动；

（二）美国共产党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他们既然对外国组织比对本国工会更忠诚，他们也就不能成为好的工会活动家。

怎样才能消除这些障碍，使美国共产党人能够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其他组织共同进行工作？

答：我以为美国工人首领为他们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做辩护的企图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任何人都还没有证明过而且也不能证明共产党人是破坏工人运动的。但是，共产党人是全世界工人运动（包括美国工人运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士，这一点却应当认为完全得到证明了。

在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时候，共产党人总是走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最先承受资本家的打击，而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这时却躲在资本家的后院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对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的这种懦怯和反动行为，怎能不加以批评呢？这种批评只会活跃和加强工人运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固然，这种批评会破坏反动的工人首领的威信。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反动的工人首领尽可以提出反批评，而不应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112◇

我认为美国工人运动如果要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工会内部就不能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我认为无论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怎样抗拒，工会内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以及对反动首领的批评等等都是会日益扩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十分需要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这种批评，以便能在各种不同的派别中间进行选择，并最后使

自己成为美国社会内部一种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

美国改良主义的首领抱怨共产党人，这只是证明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工人首领原来是些比他们美国许多资产者更坚决地反对起码民主的人。.

断言美国共产党人“遵照莫斯科命令”办事，那是完全不对的。在世界上你们找不到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会愿意违反自己的信念，违反自己的意志，不顾环境的要求，而“遵照”外来“命令”行动。如果什么地方真有这样的共产党人，那末他们是一钱不值的。

共产党人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们和无数的敌人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说美国共产党人是一些没有自己的信念而只会“遵照”外来“命令”行动的人，那是很荒谬的。

这些工人首领的断言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美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有时还和这个组织的中心机关商讨某些问题。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美国工人首领反对工人的国际中心组织吗？固然，美国工人首领没有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三六〕。但是，他们没有加入并不是因为他◇113◇们反对工人的国际中心机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一个过左的组织。（笑声）

为什么资本家可以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不应当有自己的国际组织呢？

格林和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三七〕里的伙伴是在诬蔑美国共产党人，是在奴颜婢膝地重述资本家关于“莫斯科命令”的奇谈，这还不明显吗？

有些人以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委员们就是专门坐在那里给世界各国写指示的。既然有六十多个国家加入了共产国际，那末就可以想像到共产国际委员们的状况了，他们不睡觉也不吃饭，整天整夜专门坐

在那里给这些国家写指示。（笑声）美国工人首领就是想用这种可笑的奇谈掩盖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抹杀共产党人是美国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忠实的工作者这一事实！

代表团问到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我认为这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容许美国工会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抛弃那种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工会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这些派别中间自由选择，因为美国还没有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所以那里的工人还没有可能在工会的各派别之间做最后的选择。

第十个问题：现在是否汇款到美国去支持美国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工人日报”？

如果没有，那末美国共产党人每年要缴多少党费给第三国际？

答：要是你们指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相互关系，那末我必须说明，美国共产党既然是共◇114◇产国际的一部分，那它想必是向共产国际缴纳党费的；同样，共产国际既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就应该认为它在必要时是会给美国共产党以尽可能的帮助的。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要是你们指的是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那末我必须声明，我从来不知道有过美国共产党代表向苏联共产党请求帮助的事情。你们可能认为这很奇怪，但这是一个事实，它说明美国共产党人是非常拘谨的。

但是，如果美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请求帮助，那会怎么样呢？我想苏联共产党一定会给以尽可能的帮助。要是一个共产党，而且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拒绝给一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共产党以尽可能的帮助，那末它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要说，这样的共产党是一钱不值的。

假如说，美国工人阶级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假如说，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请求这个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取

得了胜利的美国工人阶级给以尽可能的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工人阶级能不能拒绝给以这种帮助呢？我认为要是美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有所犹豫，那它是非常可耻的。

第十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些好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要求所有新党员都是无神论者这一点并不完全同意，因为现在反动的僧侣都被镇压了。今后要是宗教拥护全部科学并且不反对共产主义，那末共产党能不能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115◇

今后要是宗教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不相抵触，那末你们能不能允许党员信奉宗教？

答：这个问题有一些地方是不正确的。

第一，我不知道有过像代表团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好的共产党员”。恐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第二、我必须声明，我们的入党条件中，并没有正式规定要求每个候补党员都一定是无神论者。我们的入党条件是：承认党纲和党章，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机关的决议，缴纳党费，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有一个代表说：我常常读到这样的新闻，说党员因为信奉上帝而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说：我只能重复上面已经讲过的入党条件。其他的条件我们是没有的。

这是不是说，党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进行宣传而且将来还要进行宣传来反对宗教偏见。我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这是各人的信仰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实行了教会与国家分离。但是我们在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宣布信教自由的同时，也保留每个公民都有用说服、宣传、鼓动的方法去反对某种宗教、反对任何宗教的权利。党对宗教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并且进行反宗教的宣传来反对所有一切宗教偏见，因为党是拥护科学的，而宗教偏见是反对科学的，要知道，任何宗教都是和科

学对立的东西。在美国，不久以前把达尔文主义者判了罪〔三八〕，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党实行全力捍卫科学的政策。◇116◇

党对宗教偏见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并且要进行反对这些偏见的宣传，因为这是清除那些支持剥削阶级、劝人顺从剥削阶级的反动僧侣的影响的一种可靠手段。

党对宗教偏见的传播者、对毒害劳动群众意识的反动僧侣不能采取中立态度。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反动僧侣镇压下去了呢？是的，镇压下去了。可惜只是还没有把他们完全肃清。反宗教的宣传就是一种必能把反动僧侣彻底肃清的手段。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党员有时阻碍全力展开反宗教的宣传。如果把这样的党员开除出去，那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党的队伍里不容许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第十二个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们简略地说明共产主义所力求建立的那个未来的社会？

答：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做了一般的说明。

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简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

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117◇的人”。

如此等等。

显然，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远。

至于说到共产主义社会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国际条件，那末这是会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增长和工人阶级革命发动的增长而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决不能设想当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走向共产主义时，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会对这种情况毫不在乎，袖手旁观。更不能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会同意做普通的观众，观看某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实际上，资本家将竭尽全力来扼杀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某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走向共产主义时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求在自己国家里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汹涌热潮。

由此可见，在国际革命和国际反动势力继续发展的进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二　斯大林同志的问题和代表们的回答◇118◇

斯大林说：要是代表团不太疲劳，请允许我也向代表团提几个问题。（代表团表示同意）

第一个问题：在美国，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百分比很小，这是什么原因？

你们那里产业工人好像有一千七百万左右。（代表们说：产业工人有一千八百万到一千九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好像有三百万左右。

（代表们说：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里约有三百万有组织的工人，此外，在其他工会里还有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这样，总共有三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我个人认为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百分比是很小的。在我们苏联，全国无产者有百分之九十都组织在工会里。我想问一下代表团，你们是不是认为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数目比较少这个事实是正常的现象？**代表团不认为这个事实说明美国无产阶级是弱的，它在经济方面和资本家作斗争的工具是弱的吗？**

勃罗菲说：工会会员数目少并不是因为工会组织的策略不好，而是因为国内的一般经济条件不能促使全体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良好的经济条件降低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作斗争的必要性。当然，这些条件是会改变的，随着这些条件的改变，工会也就会成长起来，而整个工会运动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道格拉斯说：我同意上面一位发言人的解释。同时我要补充几点：第一、必须注意一个因素，就是最近美国资本家自动把工资提得很高。这种提高工资的情形在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都有过。如果把现在的实际工资和一九一一年的工资比较一下，那末现在的实际工资是高得多了。

工会运动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最初和现在都是按行业、按职业的类别组织起来的，并且工会主要◇119◇是为熟练工人建立的。这些工会有一定的领袖领导，他们代表关门的组织，专为自己的会员谋取良好的条件。他们没有扩大工会范围和把非熟练工人组织到工会里去的动因。

此外，美国工会运动不得不注意到组织得很好的资本主义，它有各种办法来阻碍全体工人组织到工会里去。比如说，一个托拉斯化的生产部门，如果在自己的某一个企业内遇到工会的极其有力的反抗，那末它甚至就采取关闭这个企业、把生产转移到自己的另一个企业中去的措施。这样，工会的反抗就被打垮了。

美国资本主义自动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同时不给工人以任何经济上的权力，不给工人为改善自己经济生活而斗争的机会。

在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资本家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中挑拨离间。非熟练工人多半是从欧洲来的或者（在最近）是黑人。资本家竭力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中挑拨离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也是根据民族来区分的。资本家经常挑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互相敌视，不管他们的劳动熟练程度如何。

美国资本主义最近十年来实行了较文明的政策，这就是建立自己的所谓公司工会。它引诱工人到它的企业里去工作，使工人关心本企业的利润等等。美国资本主义企图用纵的划分来代替横的划分，也就是用引诱工人阶级关心资本主义利益的方法来分裂工人阶级。

柯依尔说：我不从理论上而从实践上来谈这个问题。固然，情况好时最容易组织工人，但是问题◇120◇在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增减的统计数字指明：美国劳工联合会里非熟练工人正在逐渐减少，而熟练工人的数量却在增加。这样看来，美国劳工联合会想成为而且正在逐渐成为以熟练工人为主要成分的组织。

在美国，非熟练工人几乎没有被卷入工会运动。工会组织在大的工业部门里并不普遍，在这些大的工业部门里，只有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比较有组织，可是就在煤炭工业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还占百分之六十五。像炼钢、橡胶、汽车等工业部门的工人几乎完全没有按职业组织起来。可以说，工会不包括非熟练工人。

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外的一些工会组织正在努力把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组织起来。至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的态度，那末，例如其中一个领袖即五金工会主席就曾经非常露骨地声称，他不愿意吸收非熟练工人进他的工会。工会领袖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由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领袖小集团，他们每年收入一万或更多美元的巨额薪金，这个小集团别人是绝难插入的。

敦恩说：斯大林同志的问题提得不公平，在他的国家里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这因为在这里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是被压迫的阶级，资产阶级采取一切办法使工人不可能组织到工会里去。

此外，那里还有反动的领袖所领导的反动工会。在美国现有的情况下，很难使组织工会的思想在工人头脑里生根。这就是美国工会如此不发展的原因。◇120◇

斯大林问：最后这位发言的代表是不是同意上面发言的那位代表的意见，认为美国工人运动的某些首领自己就在竭力缩小工会运动呢？

敦恩说：同意。

斯大林说：我并不想委屈任何人。我只是想弄清楚美国和苏联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委屈了任何人，那就请他原谅。（代表们都笑起来）

敦恩说：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

斯大林问：美国有没有国家举办的工人保险制度？

有一个代表说：美国没有国家举办的工人保险制度。

柯依尔说：在大多数州里，凡是工人在生产中发生伤亡事故，都发给抚恤金，可是最多只按劳动能力丧失量的百分之三十来发给。大多数州里有这样的办法。劳动能力在哪个企业中丧失，抚恤金就由哪个企业隶属的私人公司支付，而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斯大林问：美国有没有国家举办的失业保险？

有一个代表说：没有。所有各州的失业保险基金只能救济八万到十万失业工人。

柯依尔说：工业上伤亡事故也就是生产中伤亡事故的保险（不是国家举办的）是有的。但是因疾病或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他们绝对享受不到保险待遇。保险基金是由工人缴费积成的。实质上全部保险基金都是由工人自己交付的，假如工人不设置这笔基金，那末他们

得到的补贴就会多一些，◇122◇可是，设置保险基金既然是工人和企业主双方同意的，所以工人得到的补贴就少一些。全部基金差不多就是这样积成的。企业主实际上只拿出极少一部分，大约只占基金的百分之十。

斯大林说：我想，如果我告诉同志们说在我们苏联每年由国家支付八亿多卢布用作工人保险费，那末你们一定很感兴趣。

还不妨告诉你们，我国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除了一般的货币工资以外，还能在劳动保险、生活改善、文化需要等等方面得到相当于工资三分之一左右的额外收入。

第二个问题：在北美合众国没有一个专门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这是什么原因？

美国资产阶级一共有两个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而美国工人却没有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同志们是不是认为没有自己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即使是像英国工党那样的政党）会削弱工人阶级对资本家作政治斗争的力量？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美国工人运动的首领格林等人都坚决反对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勃罗菲说：是的，首领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决定，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政党。但是，少数首领认为有必要建立这种政党。美国现在的客观条件是这样，上面已经说过，就是美国工会运动很薄弱，而工会运动所以薄弱，是由于工人阶级暂时还没有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的需要，因为资本家自动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保证他们过着满意的物质生活。◇123◇

斯大林说：要知道，如果一般可以说工人有保障的话，那末主要是熟练工人有保障。这里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说，没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因为工人有保障；一方面又说，组织到工会里的正是最有保障的工人，也就是熟练工人；再一方面又说，没有组织到工会里的恰好是

没有保障的工人，也就是那些非熟练的、最需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这一点我怎么也弄不懂。

勃罗菲说：是的，这里是有矛盾的，但是，美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也是矛盾的。

勃列勃纳说：虽然非熟练工人没有组织在工会里，但是他们有选举的政治权利。这样，非熟练工人如果有什么不满，就利用自己选举的政治权利来表达这种不满。另一方面，加入工会的工人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他们利用的也不是工会，而是选举的政治权利。因此，选举的政治权利就弥补了没有工会组织的缺陷。

伊斯莱尔斯说：一个基本的障碍就是制度本身，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在那里，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当选的不是获得全国大多数选票的人，甚至也不是获得某个阶级大多数选票的人。在那里，每州都有参加总统选举的选举团和一定数量的选票。要当选总统，必须获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要是有三四个政党，那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谁也不能当选，选举就必须移到国会里去进行。这就是反对建立第三党的论据。反对建立第三党的人所持的论据是：不要提出第三个候选人来，因为那样就会分散自由派政党的选票，使自由派政党的候选人不能当选。

斯大林说：然而参议员拉福列特曾经组织过第三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可见第三党如果是资产阶◇120◇级的政党，就不会分散选票，但是，它如果是工人的政党，就会分散选票了。

戴维斯说：我并不认为上面一位发言人所说的事实是基本的事实。依我看，下面的情况才是基本的事实。我可以拿我居住的城市为例。在竞选的时候，有某一个政党的代表来拜访工会组织的首领，许给他一个什么重要职位，因为要进行竞选，这个代表又交给工会组织的首领一笔款子供他使用，后来他由于担任了重要的职位而获得了一定的威信。结果就造成这样的情形：工会运动的首领自己就成了这个或那

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因此，当有人谈到建立第三党、建立工人政党的时候，这些工会运动的首领自然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这种政党。同时他们还藉口说，要是建立第三党，那就会使工会分裂。

道格拉斯说：组织在工会里的只是熟练工人，这主要是因为要加入工会的人必须有一定的钱财和一定的保障，因为会费很高，非熟练工人缴不起很高的入会费。

除此以外，非熟练工人还经常受到威胁，要是他们试图组织起来，企业主就会把他们解雇。非熟练工人只有在熟练工人积极支持下才能组织起来。但他们多半是得不到这样的支持的。这种情况就是使非熟练工人不能组织到工会里去的主要障碍之一。

工人群众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保卫自己的权利。我认为这就是非熟练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必须指出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直接选举，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任何人都可以到◇125◇选举会上，宣布自己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并参加选举。我深信，要是龚帕斯没有这个关于直接选举的论据，那末他靠非政治的纲领是控制不住工人的。他总是向工人说，如果工人想从事政治活动，那末他们可以参加现有的两个政党，在那里弄到某种职位，在那里取得威信。龚帕斯就是靠这个论据控制了工人，使他们不能产生组织工人阶级和建立工人政党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比许多资产者还反动，这是什么原因？

像波拉先生等等资产者都主张承认苏联，而美国工人运动的首领们，从龚帕斯到格林，过去曾经进行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极反动的宣传，反对承认第一个工人共和国，反对承认苏联，这是什么原因？

甚至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样反动的人物也认为可以向苏俄“致贺”，而格林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首领们却愿意比资本家更反动，这是什么原因？

请看，这是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当德皇军队向苏维埃彼得格勒进攻的时候给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贺电”：

“值此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尤其在目前德国军队深入俄国，力图阻挠其争取自由的斗争，摧毁这种斗争的一切成果，实现德国的野心并奴役俄国人民之际，我谨代表合众国人民向俄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同情。十分遗憾，合众国政府目前不能如它所希望的那样给俄国以直接援◇126◇助，虽然如此，我仍愿通过此次代表大会向俄国人民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利用一切可能来保障俄国重获完整的主权和在内政上的完全独立，并完全恢复其在欧洲及现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合众国人民衷心地同情俄国人民力求永远摆脱专制制度并成为自己命运主宰的那种愿望。”（见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五十号）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却愿意比反动的威尔逊更反动，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勃罗菲说：我不能确切地说明这些原因，但是，我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主张不承认苏俄的原因，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原因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工人有自己的特殊的哲学以及美国工人和欧洲工人之间存在着经济状况的差别。

斯大林说：但是据我所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并不反对承认法西斯分子所统治的意大利或波兰。

勃罗菲说：你举存在着法西斯政府的波兰和意大利为例，也就说明了美国不承认苏联的原因。这种对苏联的敌视态度是由于美国工会运动的首领们和本国的共产党人关系不好而产生的。

敦恩说：上面一位发言人所说的那个原因——他们既然和本国共产党人不和，他们怎么会承认苏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早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们就在进行不承认苏联的宣传了。

基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领们是反对任何类似社会主

义的东西的。在这方面资本家也怂恿他们，这些资本家有一个组织叫做“全国公民联合会”，它竭力采取各种办法煽动美国整个社◇127◇会来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这个组织反对过艾维·李的立场，因为他主张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个组织的领袖们说：自由派都开始发出这种论调，我们怎么还能维持我国工人阶级的秩序呢？“全国公民联合会”是一伙资本家的组织，这些资本家把大量资金投入这个组织，并且领导着这个组织。必须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马修·沃尔就是这个反动的联合会的副会长。

勃罗菲说：以上说的关于工会领袖反动性的一些原因还不是基本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应该看得深刻些。美国代表团到苏联来就是一部分美国工人同情苏联的最好的答复和证明。我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对苏联的意见并不是和美国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同的。美国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所以对苏联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苏联和美国相隔太远。美国工人阶级对于任何国际事务都是不关心的，而在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上美国工人阶级又受到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

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一〇号◇128◇

致玛·依·乌里杨诺娃同志

答勒·米赫里逊同志

几天前收到你寄来的米赫里逊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一信的抄本。现在简单答复如下：

（一）布略特的同志们曾经问我：“通过在我们各个自治共和国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向统一的全人类文化**过渡**，这应当怎样理解？”（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二五九页〔三九〕）我回答他们说，这种过渡应当这样理解：不是通过“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四〇〕，而是通过各民族之以符合这些民族的语言和生活的**形式**去参加**按内容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全人类文化（见“列宁主义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证了我国革命发展方面的许多事实，因为这个革命唤醒并加强了早先遭受排挤的民族及其文化。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米赫里逊同志没有了解争论的实质。

（二）米赫里逊同志对我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见上文）这几个字，对我所提的一些民族同化的过程并不等于一般民族的消灭这一论断吹毛求疵，断言斯大林的某些说法会给人以口实，把它◇129◇们说成是在民族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且他还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四一〕

首先，我想米赫里逊同志是撇开了布略特的同志们信中的那种问题提法，而这种提法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说中无论

如何是不能撇开的。布略特人指的正是通过民族文化向全人类文化过渡，而且布略特的同志们大概以为**起初**将是民族文化，**然后**才是全人类文化。斯大林在答复时反驳了这个看法，指出这种**过渡**不会是采取布略特人所设想的那种方式，而会是采取民族文化（就形式来说）和全人类文化（就内容来说）在苏联各民族中**同时**发展的方式，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各民族参加全人类文化（见“列宁主义问题”）。

其次，我想米赫里逊同志没有了解我的答复的意思。我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是指**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种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只有当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或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时才能到来。从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说中对整个问题的提法看来，这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可以断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内，即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胜利以前，我国各民族一定会消失而融合成一个有共同语言的统一民族呢？我想是不可以的。不但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甚至在这以后，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会存在很久。◇130◇

列宁说得非常对：“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

那末，对米赫里逊同志引证的列宁所说过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各民族融为一体这段话应怎样了解呢？我想不应像米赫里逊同志那样去了解这段话。因为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列宁在这段话中把各民族融为一体看做社会主义的最终任务，这个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过了“很久很久的”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内**获得胜利才能实现。

可见米赫里逊同志没有了解列宁的话。

（三）我觉得斯大林的“说法”不需要“再明确化”。我迫切地

等待着，看反对派敢不敢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的公开论战中提一提民族问题的原则方面。就怕他们不敢，因为自从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失败以后，反对派在其最近提出的“政纲”中对民族文化问题是宁可完全保持缄默的。万一反对派分子硬敢来试一下，那对党是更好的，因为党只会从这里得到好处。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

第一次刊印◇131◇

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联席会议上的演说节录）

同志们！在这里讲话的人都讲得很好，很透彻，所以我要说的也就很少了。

因为先前我不在场，魏奥维奇的演说没有全部听到，只听到末尾一段。从这一段话我听出他责备联共（布）是机会主义，而把自己看成布尔什维克，并且还要给联共（布）讲授列宁主义。

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些什么呢？很遗憾，我们党内有一些人自命为布尔什维克，其实他们和列宁主义是毫不相干的。我以为魏奥维奇就是属于这种人。这种人来给联共（布）讲授列宁主义，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我以为魏奥维奇的批评不值得回答。

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德国诗人海涅的小故事。让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吧。曾经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在报刊上攻击海涅，其中有个姓奥芬堡的，是一个毫无成就而又十分低能的文艺批评家。这位作家的主要特点是在报刊上不断地“批评”海涅，用批评来跟海涅无理取闹。而海涅呢，大概认为对这种“批评”不必理睬，也就拿定主意默不作声。这使海涅的朋友们感到惊奇，他们写信给他，说作家◇132◇奥芬堡写了很多批评文章攻击他，他却认为不必回答，这是怎么一回事。海涅只好回答了。他究竟怎样回答他的朋友们呢？他在报刊上简短地回答说：“奥芬堡这位作家，我不知道；猜想他是达林库尔一类的人，不过达林库尔我也不知道。”

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把海涅的话改动一下就可以用来回答魏奥维奇的批评把戏：“魏奥维奇这位**布尔什维克**，我们不知道；猜想他是阿里-巴巴一类的人，不过阿里-巴巴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谈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反对派最倒霉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不肯承认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没有过任何路线，任何政策。反对派有过摇摆不定，有过犹豫不决，有过反复无常，但没有过任何路线。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发生过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过任何路线。

关于参加国民党问题。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后一个月，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为什么呢？因为被蒋介石的第一次袭击（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吓倒的反对派实际上是要求附和蒋介石，想使共产党人从中国各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中退出来。

但是反对派表面上说，他们要求退出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不能够参加**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而国民党不能不算是这样的组织。可是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武汉◇133◇国民党。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了吗？这里有什么路线，哪怕是路线的影子呢？

关于苏维埃问题。在这方面，反对派也没有过确定的路线。一九二七年四月，一部分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以**推翻**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对派也要求立即组织苏维诶，然而这是为了支持武汉国民党，不是为了推翻它（季诺维也夫）。这就叫做他们的路线！并且两部分反对派，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要求组织苏维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参加

执政党。真是天晓得！要建立苏维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执政党即参加国民党，——这种蠢事是再蠢的人也想不出来的。这也叫做路线！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共产国际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而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怎样呢？他们对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过确定的意见。有时他们断言中国不能有土地革命，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封建制度；有时他们宣称中国可能有而且必须有土地革命，但是他们又不承认中国的封建残余有重大意义，这就教人不明白，既然这样，又从哪里来的土地革命呢；有时他们断言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真是天晓得！

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争论问题上的所谓“路线”就是如此。

这不是路线，而是犹豫不决，一场糊涂，完全没有路线。

这些人居然也来批评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立场！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134◇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责备我们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不来驳斥托洛茨基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我只想说南方革命运动的一切事件，如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等等，——这一切事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动的。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如果他多少有些知识的话，他是应当知道这一点的。

如果这个运动获有进展，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涨成为事实，那末，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从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可是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

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于舞台。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

关于**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同样是游移不定，没有路线的。起先反对派迷恋于英俄委员会。他们甚至武断地说，英俄委员会是“防止欧洲改良主义为害”（季诺维也夫）的手段，他们大概忘记了英俄委员会的英国那一半正是由改良主义者组成的。

后来，当反对派终于看清柏塞尔及其伙伴是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就由迷恋变为失望，以至于◇135◇绝望，并要求立即同它决裂作为推翻总委员会的手段，他们不懂得从莫斯科推翻总委员会是不可能的。从一桩蠢事转到另一桩蠢事，——这就是反对派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表现的所谓“路线”。

托洛茨基不能了解：当事情已经成熟到决裂的时候，主要问题就不是决裂本身，而是引起决裂的那个问题，决裂所表现的那种思想。已经发生的决裂表现了什么思想呢？表现了战争威胁的思想，表现了必须反对战争危险的思想。谁能否认这种思想正是现在全欧洲当前的基本问题呢？由此必须得出结论：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必须使工人群众认清总委员会的背叛行为。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有新战争威胁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首先实行决裂从而引起公愤，——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在工人群众面前揭露了总委员会在战争这一基本问题上所表现的社会帝国主义背叛的“本性”。而反对派要人相信最好是我们首先实行决裂从而引起公愤！

这也叫做他们的路线！这些糊涂虫居然也来批评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立场！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 .

在关于我们**党**即关于联共（布）的问题上，反对派更加糟糕。托

洛茨基不了解我们党。他对我们党没有正确的概念。他看待我们党就像贵族看待贱民或官僚看待下属一样。不然他就不会断言在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内，在联共（布）党内，可以由个别的人、个别的领导者“攫取”权柄，“篡夺”权柄。在一个进行过三次革命、现在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基础的、拥有百万党员的党内“攫取”权柄，——请看托洛茨基荒谬到什么地步了！◇136◇

一般说来，是否可以在一个拥有百万党员、富有革命传统的党内“攫取”权柄呢？如果可以，那末，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能够“攫取”党内的权柄，窃取党内的领导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托洛茨基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吗？托洛茨基为争夺党内领导已经跟布尔什维克斗争二十多年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他没有能够“攫取”党内的权柄呢？比起我们党内现在的一些领袖来，难道他是较为逊色的演说家吗？作为一个演说家，托洛茨基比我们党内现在的很多领袖都要高出一头，这样说不是更对吗？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技巧，尽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尽管有才干，结果还是被排斥于联共（布）这个伟大的党的领导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托洛茨基有意把原因归于：我们党（在他着来）是一群盲目跟着党中央跑的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但是，只有那些鄙视我们党并把我们党看做贱民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党。把党看做一群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是党内的没落贵族对党的看法。这表明托洛茨基已经丧失了党性的感觉，丧失了辨别的能力，看不出党不信任反对派的真正原因。

究竟为什么联共（布）完全不信任反对派呢？因为反对派妄想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改进**”列宁主义。可是不管党内的没落贵族玩弄什么阴谋诡计，党是要始终忠于列宁主义的。这就是进行过三次革命的党认为必须摈弃托洛茨基以及整个反对派的根本原因。

对一切妄想用托洛茨基主义或用任何其他机会主义来**修饰**列宁主

义的“首领”和“领导者”，党也是采取这种态度的。◇137◇

托洛茨基既然把我们党说成是一群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也就是蔑视联共（布）的党员群众。如果党也用蔑视和表示完全不信任托洛茨基的态度来作回答，那又有什赛奇怪呢？

在我们党内制度问题上，反对派也同样糟糕。托洛茨基把事情说成这样：同列宁生前建立的党内制度相比较，使整个反对派厌恶的现在的党内制度根本是另外一种东西。他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他并不反对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建立的制度，他反对的其实是现在的党内制度，在他看来，现在的党内制度和列宁所建立的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在这里说的全是谎话。

我肯定说，现在的党内制度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列宁生前建立的那个党内制度的正确表现。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正在反对在列宁生前建立的而且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列宁的党内制度。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列宁的党内制度的斗争还在列宁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托洛茨基分子现在的斗争就是他们在列宁生前已经进行的那一反对党内制度的斗争的继续。

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实行党内民主，容许对党内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同时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并取缔任何派别活动，违者开除出党。

这种党内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是在我们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列宁生前建立的。◇138◇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反对的正是这种党内制度。

我们手头有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阿里斯基等托洛茨基分子签名的“四十六人的声明”这样的文件。这个声明公开说：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所建立的党内制度已过时了，已为党所不能忍受了。

这些人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容许党内有派别集团，并取消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情。我要声明，托洛茨基当时完完全全赞同“四十六人”的立场，反对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建立的党内制度。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列宁的党内制度的由来。（托洛茨基喊道：“我没有说到第十次代表大会，你在捏造。”）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我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些证据全都保存下来了，我将要把它们分发给同志们，那个时候就会明白我们当中是谁在说谎[①]。

————————————

①“共产国际”编辑部注：十月三日，斯大林同志把他在演说中引用过的一些书面证据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的附件。这些证据是：

（一）摘自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阿里斯基等人签名的“四十六人的声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中的一段：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经过时了**。”

（二）摘自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声明（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中的一段：

“**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基本上已形成**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

为了说明这两段摘录，必须指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还开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春天）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春天）。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都是列宁主持的，而“四十六人的声明”（托洛茨基分子）和上述托洛茨基的声明所反对的那种党内制度就是在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固定下来的。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怂恿和推动反对派，一直支持这个反对列宁的制度的斗争。

我肯定说，托洛茨基现在反对我们党内制度的斗争就是我刚说过的那一反对列宁的斗争的继续。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党非法印刷所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的发言里竟没有明白地谈到非法印刷所，大概他认为不必谈到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党非法印刷所这样的“小事”。这不是一个被告的发言，而是反对派控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宣言。可是很明显，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党非法印刷所问◇139◇题完完全全揭露了托洛茨基以及反对派中拥护他的人是党性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分裂分子和瓦解分子。

实际上，托洛茨基认为反对派是对的，**因此**，他们有设立自己的非法印刷所的权利。

但是在联共（布）党内，除了托洛茨基集团以外，还有其他反对派集团如“工人反对派”、萨普龙诺夫分子等等。这些小集团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如果跟着托洛茨基走，那就应当承认这些集团每一个都有设立自己的非法印刷所的权利了。假定他们真的都设立起自己的非法印刷所来，而党不和这些◇140◇罪恶行为作斗争，那末，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容许党内一切集团的非法印刷所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容许党内存在几个拥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政纲”、自己的“路线”的中央。这样一来，列宁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央领导机关，能有这样的纪律吗？托洛茨基是否了解他维护反对派集团建立反党非法印刷所的权利就是跌进什么样的泥潭里去呢？

关于拿破仑主义问题。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十足无知。托洛茨基责备我们党的极大多数企图实行拿破仑主义，这就显出他十足无知并且对拿破仑主义的根源毫不了解。

拿破仑主义是什么呢？拿破仑主义就是一种想用暴力强迫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意志的企图。拿破仑主义就是少数人用暴力攫取党或国家的权柄以反对多数人。但是，既然拥护联共（布）中央路线的人无论在党内或苏维埃内都占极大多数，怎么能说出好像多数人力图用暴力强迫自己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样的蠢话呢？历史上哪里有过多数人用暴力强迫自己服从自己的意志的事情呢？除了疯子，谁会相信可能有这种不可设想的事情呢？

拥护联共（布）中央路线的人无论在党内或国内都占极大多数，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反对派只是一小撮人，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我们党内多数人强迫少数人即强迫反对派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这是可以设想的。从党的观点来说，这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怎么可以设想多数人强迫自己服从自己的意志，何况还是用暴力呢？这里谈得上什么拿破仑主义呢？要是说在少数人当中，即在反对派当中，◇141◇会产生强迫多数人服从他们的意志的趋向，岂不更正确吗？如果产生了这种趋向，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少数人（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要取得领导，除了对多数人施加暴力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所以，如果要谈拿破仑主义，那就让托洛茨基在他的集团里去找拿破仑的继承人吧！

现在简略谈谈蜕化和特米多尔化的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分析反对派分子有时用来反对党的那些关于蜕化和特米多尔化的愚味无知的责备。我不打算分析，因为它们不值得分析。我只想从纯粹实际观点来提出问题。

暂且假定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代表的是真正革命的政策，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那末，为什么一切蜕化的以及被驱逐出党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都聚集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周围，在那里找到藏身和庇护之所呢？

为什么被驱逐出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萧列姆和乌尔邦斯这些蜕化变节分子偏偏在托洛茨基反对派那里受到

庇护和殷勤招待呢？

为什么法国的苏瓦林和罗斯梅、苏联的奥索夫斯基和达什柯夫斯基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真正蜕化分子偏偏在托洛茨基反对派那里找到藏身之所呢？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把这些蜕化的、有真正特米多尔情绪的分子从自己的队伍里开除出去，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张臂欢迎他们，给他们以藏身和庇护之所，这种事实能说是偶然的吗？

这些事实不都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革命”词句只是词句而实际上反对派是蜕化分子的集合◇142◇点吗？

这一切不都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是蜕化和特米多尔化的巢穴和温床吗？

总之，在我们联共（布）党内有一个唯一的集团，它把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苏瓦林和奥索夫斯基这一类奸徒统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这个集团就是托洛茨基集团。

同志们，反对派的政治面貌大体上就是如此。

你们会问，结论怎样呢？

结论只有一个。反对派已经糊涂透顶，居然把自己驱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以致不得不进行选择：或者倒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这一边，或者倒向马斯洛夫、路特·费舍和反党非法印刷所叛徒那一边。

永远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徘徊是不行的。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或者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起，那就要反对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反对所有一切叛徒；或者是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那就滚到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集团那儿去，滚到一切叛徒和蜕化分子那儿去，滚到各种舍尔巴柯夫分子和其他败类那儿去。（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四十一期◇143◇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纲要

十月革命不仅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而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旧到新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革命、农奴革命、工商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情形都是如此。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推翻所有一切剥削集团。

建立所有被剥削阶级中最革命的和最有组织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和生活习惯、风俗和传统、文化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根本转变。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就在这里。

四个基本的特征：◇144◇

（一）**帝国主义的中心**（“宗主国”）。十月革命是在先进国家内从资本主义统治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我们常说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十月革命给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

从前，人们以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为榜样，继承它的传统，传播它的制度。

现在，人们以十月革命为榜样。

从前是法国。

现在是苏联。

从前，整个资产阶级所最怕的是“雅各宾党人”。

现在，资产阶级所最怕的是布尔什维克。

无产阶级只是突击力量而剥削者坐享革命果实的那个“普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二）**帝国主义的外围**。十月革命开辟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

无产阶级不解放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附属国的殖民地革命的统一战线。

安然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45◇

殖民地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中心和外围合在一起**。这样，十月革命就给世界帝国主义一个永远治不好的致命打击。帝国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是共产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思想上的胜利。

从前，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者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能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献媚等等，因为这对于资产阶级是没有危险的，而且人们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导致什么结果。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大家都已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

党人和改良主义者感到再拿马克思主义来炫耀并向马克思主义献媚对资产阶级是有危险的，而宁愿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

从此以后，共产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基地和堡垒。

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就离开了社会民主党，正像社会民主党还在更早以前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一样。◇146◇

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地坚决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站在直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不愿和本国资产阶级作战而宁愿附和它，那末，他们自然就是站在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站在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立场上。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没落。

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社会民主党没落并公开转到资产阶级阵营的时代。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十月

第一次刊印◇147◇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四二〕会议上的演说）

一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只想谈几个个别问题。

首先谈个人的问题。你们在这里都听到反对派分子多么不惜气力地使劲谩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他们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那又有什么呢，任凭他们去骂吧！

斯大林算得什么，斯大林是个小人物。拿列宁来说，谁不知道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八月联盟期间曾经对列宁进行更无赖的攻讦。例如，请听听托洛茨基的话：

“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的无◇148◇聊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一九一三年四月“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

同志们，请注意字眼，是什么样的字眼！这是托洛茨基写的，而且是写的列宁。

连列宁的一只靴子都不如的托洛茨基，对于伟大的列宁尚且如此放肆地藐视，现在对于列宁的许多学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骂，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

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如果蓄意破坏党的反对派竟恭维起保卫列宁党性原则的斯大林来，那才奇怪，那简直是一种侮辱。

现在谈谈列宁的“遗嘱”。你们都听见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过好多次，这是你们知道的。（喊声：“几十次了。”）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喊声：“对！”）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所有这些，反对派并不比我们大家知道得少，然而反对派竟敢宣称中央“隐瞒了”“遗嘱”。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在一九二四年就发生过关于列宁“遗嘱”的问题。有那么一个叫做伊斯特曼的，从前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被驱逐出党。这位先生曾经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中间鬼混过，收集了一些有关列宁“遗嘱”的传闻和谣言，后来跑到国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列宁死后”。他在这◇149◇本书里不惜笔墨，大肆诽谤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这本书的主要根据就是所谓我们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因为这位伊斯特曼有一个时期跟托洛茨基有过来往，现在抓住托洛茨基并且引用反对派的话，使托洛茨基在“遗嘱”问题上负起污蔑我们党的责任，所以我们政治局委员建议托洛茨基跟伊斯特曼划清界限。因问题十分明显，托洛茨基确实跟伊斯特曼划清了界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的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上。

让我读一下托洛茨基这篇文章中说到党和党中央是否隐瞒列宁的“遗嘱”的一段话。现在就来引证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

“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谈到中央对党‘隐瞒了’列宁在逝

世前不久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问题的书信、所谓“遗嘱”等等），**这无非是对我们党中央的污蔑**[①]。从伊斯特曼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曾经指定在报刊上发表这些带有组织内部建议性质的书信。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对的。弗拉基米尔·依里奇从患病时起就再三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建议，写信等等。所有这些书信和建议，当然总是按照指定送达，通知了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然对党的决定也总是发生了应有的影响；这些书信所以没有全部发表，那是因为写信的人没有指定在报刊上发表。弗拉基米尔·依里奇◇150◇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这种‘遗嘱’。在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遗嘱’就是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的一封内容是组织内部建议的信（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像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的本意**[②]和他所建立的党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文章“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 载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第六十八页）

看来是很清楚了吧？写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现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据什么来嚼舌根，硬说党和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呢？嚼舌根是“可以”的，但是也该知道个分寸。

有人说，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152◇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代表团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

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公布“遗嘱”的问题，那是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它，因为它是给代表大会的，并没有指定在报刊上发表。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曾经做出决定，请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准许发表这个文件。同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发表列宁的其他书信〔四三〕，在那些书信中，列宁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起义前夜所犯的错误，并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很明显，说党隐瞒这些文件，那是无耻的诬蔑。在这些文件里也包括列宁主张必须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这样的书信。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从来没有害怕过真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正在于它不害怕真理，正视真理。

反对派竭力拿列宁的“遗嘱”当王牌。但是只要读一读这个“遗嘱”就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153◇给他们当王牌。相反地，列宁的“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

列宁在“遗嘱”中斥责托洛茨基为“非布尔什维主义”，而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则说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政治上**决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为他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毛病，也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

请看“遗嘱”中有关的一段话吧：

“对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我不想再评定了。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很难说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就像很难说非布尔什维主义是托洛茨基的过错一样。”

看来是很清楚的了。

二 关于反对派的“政纲”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中央为什么没有把众所周知的反对派的“政纲”发表呢？季诺维也夫和托洛◇153◇茨基说还是因为中央和党“害怕”真理。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不仅不对，而且说党或中央害怕真理，那是愚蠢的。我们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历次联席全会的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已印了数千份发给党员。那里有反对派分子的演说，也有党路线的代表者的演说。几万几十万的党员阅读了这些记录。（喊声：“对！”）如果我们害怕真理，我们就不会分发这些文件了。其实，这些文件的好处就在于使党员能够把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的观点比较一下，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哪里是害怕真理呢？

一九二六年十月，反对派的首领们气势汹汹，正像现在一样，硬说中央害怕真理，压下了他们的“政纲”，对党隐瞒了这个“政纲”，如此等等。所以，当时他们就钻到莫斯科（请回忆一下“航空仪器”工厂）、列宁格勒（请回忆一下“普梯洛夫”工厂）等地的支部里进行活动。结果怎样呢？结果工人共产党员把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斗了一顿，并且斗得那么厉害，以致反对派的首领们不得不从斗争场上溜走了。为什么他们那时不敢继续跑到所有的支部去，查验一下我们当中是谁——是反对派分子还是中央——害怕真理？这是因为他们胆小，害怕真正的（不是臆造的）真理。

而现在怎样呢？说良心话，难道现在我们支部里没有争论吗？请你们指出哪一个支部（哪怕它里面只有一个反对派分子）最近三四个月来开过一次没有反对派讲话、没有发生争论的支部会议。最近三四个月来，反对派到处（只要他们能够进去的地方）在支部里提出自己的反提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喊声：“完全对！”）那末，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试一试到各支部去并说出他们的◇154◇观点呢？

举一个典型的事实。今年八月，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送来一份申请书，说如果中央不反对的话，他们想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中央答复（这个答复已经分发给地方组织）说，中央不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去讲话，但是他们既然是中央委员，就不能讲反对中央决议的话。结果怎样呢？结果他们又不去讲话了。（大笑）

是的，同志们，我们当中有人确实害怕真理，但并不是中央，更不是党，而是我们反对派的首领们。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不发表反对派的“政纲”呢？

首先，因为中央不愿意也没有权利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使一般派别集团合法化。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

决议中说：“政纲”的存在就是派别活动的主要标志之一。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制定了“政纲”并要求把它发表，从而破坏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如果中央发表了反对派的“政纲”，那会怎样呢？那就意味着中央同意参与反对派破坏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派别活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能这样做吗？显然，任何一个自重的中央委员会都不能采取这种派别步骤。（喊声：“对！”）

其次，就在列宁亲手起草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那个决议中还说：“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155◇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指示是明确而肯定的。如果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发表了反对派的“政纲”，那会怎样呢？能不能把这叫做是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呢？显然是不能的。相反地，这就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不但不去解散，反而根据反对派的“政纲”去帮助组织集团和派别。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能不能采取这种分裂步骤呢？显然是不能的。

最后，反对派的“政纲”中包含对党的诬蔑，这种诬蔑如果发表出来，给党和我们国家的损害是无限的。

的确，在反对派的“政纲”中说，我们党似乎准备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并偿还一切外债，因而也准备偿还军事债款。谁都知道，这是对我们党，对我们工人阶级，对我们国家的一种无耻的诬蔑。假定说，我们把这种诬蔑党和国家的“政纲”发表了，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只会引起国际资产阶级对我们施以更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做我们决不能做出的让步（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偿还军事债款等等），并以战争威胁我们。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中央委员把伪造的我们党内的情况报告给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使他们相信我们准备做最大限度的让步以至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种做法只能有一种意思：资产者先生们，

继续对布尔什维克党施以压力吧，用战争来威胁他们吧，只要你们施以压力，他们布尔什维克是一定会做出种种让步的。◇156◇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把**伪造**的我们党内的情况**报告**给帝国主义者先生们，加重我们对外政策方面的困难，——这就是反对派的“政纲”的内容。

这对谁有害呢？很明显，这对苏联无产阶级、对苏联共产党、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害。

这对谁有利呢？这对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有利。

现在我问你们：中央能不能同意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如此卑鄙龌龊的东西呢？显然是不能的。

这就是中央不得不拒绝发表反对派的“政纲”的理由。

三　列宁对争论和对一般反对派的看法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喊大叫，企图证明列宁似乎是一向主张、时刻都主张争论的，他还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和会上关于政纲的争论的事实。但是他“忘记”提起列宁认为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争论是一个错误。他“忘记”说，在列宁亲手起草的并成为我们党发展的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并没有责令进行关于“政纲”的争论，而责令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他“忘记”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是主张今后党内“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派的。他“忘记”说列宁认为把我们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是绝对不容许的。

请看，例如列宁对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争论是怎样评价的：◇157◇

“今天我已经说过这一点，当然我只能慎重地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恐怕都认为这场争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品。至于我个人，却不能不

补充一句，在我看来，这种奢侈品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容许这场争论，无疑是犯了错误。”（见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十六页〔四四〕）

再看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是怎样说的：

“团结全党，不容许党内有反对派，——这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存在！我以为党的代表大会必须做出这个结论，必须做出如下的结论：现在反对派该完蛋了，反对派的末日到了，现在我们再不能容忍反对派了！”（同上，第六十一页和第六十三页〔四五〕）

列宁对争论和对一般反对派的看法就是如此。

四 反对派和“第三种势力”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明仁斯基同志做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反党非法印刷所的部分“工作人员”所联系的那些白卫分子的报告呢？

第一、为了揭穿反对派在他们的反党传单上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谎话和诽谤。反对派硬要所有的人相信，关于跟反对派的同盟者如舍尔巴柯夫、特维尔斯柯依等人有某种联系的白卫分子的案件◇158◇是捏造的，是捏造出来侮辱反对派的。明仁斯基同志的报告引用了被捕者的口供，使人不再有任何怀疑，托洛茨基分子反党非法印刷所的部分“工作人员”跟白卫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确实有联系。让反对派试来驳倒这些事实和文件吧。

第二、为了揭穿柏林马斯洛夫的机关报（《Die Fahne des Kommunismus》即“共产主义旗帜报”）现在散布的谣言。我们刚刚收到叛徒马斯洛夫所办的专事诬蔑苏联和出卖苏联国家机密给资产阶级的

这个下流小报的最近一号。该报把被捕的白卫分子和他们在反党非法印刷所里的同盟者的口供公布出来（当然是歪曲了的）。（喊声：“真可恶！”）马斯洛夫能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材料呢？这些材料是秘密的，因为参与组织皮尔苏茨基式阴谋的那一伙白卫分子还没有全部侦悉逮捕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其他反对派分子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看过这些口供。当时曾暂时禁止他们抄录这些口供，但是显然他们还是抄录了，并且设法送给了马斯洛夫。把这些材料交给马斯洛夫去发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警告那些还没有侦悉逮捕到的白卫分子，说布尔什维克就要逮捕他们了。

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好不好呢，能不能容许呢？显然是不能容许的。

马斯洛夫机关报上的这篇文章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斯大林分裂联共（布）。白卫阴谋。苏联来信。”（喊声：“坏蛋！”）既然如此，既然马斯洛夫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帮助之下把加以歪曲了的被捕者的口供公布出来，我们怎能不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报告，用真正的事实和真正的口供来驳斥捏造的谣言呢？◇159◇

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让明仁斯基同志做一个关于事实真相的报告。

从这些口供中，从明仁斯基同志的报告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策划军事阴谋吗？当然没有。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参加这个阴谋吗？当然没有。（穆拉洛夫：“在上次全会上责备过。”）不对，穆拉洛夫，我们这里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反党非法印刷所和关于跟这个印刷所有联系的非党知识分子的两个通报。在这两个文件里，你找不出一个字一句话来证明我们责备过反对派参与军事阴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两个文件里只是断定：反对

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划军事阴谋的白卫分子有联系。我倒要请穆拉洛夫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印发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中把你所说的那个地方指出来。穆拉洛夫是指不出来的，因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

既然如此，那末，我们过去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责备反对派的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反对派实行分裂政策，建立了反党非法印刷所。

第二、为了建立这个印刷所，反对派勾结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是跟反革命阴谋分子有直接联系的。

第三、反对派既然拉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他们串通一气进行反党的秘密活动，也就不由自主◇160◇地不随己愿地被所谓“第三种势力”包围了。

反对派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任远超过对自己的党的信任。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要求释放跟非法印刷所有关的“全部被捕者”，甚至释放跟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舍尔巴柯夫、特维尔斯柯依、波里沙柯夫等人。

反对派想要有一个反党非法印刷所，为此他们求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是跟露骨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同志们，请看结成了什么样的一条连环。反对派不由自主地不随己愿地被那些竭力利用反对派的分裂活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反苏维埃分子层层包围了。

这样，列宁早在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预言（见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被证实了。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第三种势力”即资产阶级必定力图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插一脚，以便利用反对派的活动来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

有人说，有时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反对派的任何关系也钻进了苏维

埃机关，例如前线就有这种情形。这话是对的。可是，那时苏维埃机关就会逮捕他们并枪毙他们。而反对派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要求释放在破获非法印刷所时被捕的那些跟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志们，糟糕的就在这里。请看反对派的分裂活动造成了什么结果。我们的反对派分子不想一想这一切危险，不想一想他们把自己拖进去的那个深坑，反而大肆污蔑党，竭力瓦解并分裂我们的党。

有人提到正在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前弗兰格里的一个军官。反对派欢喜得◇161◇手舞足蹈，嚷嚷不休，说前弗兰格里的一个军官（反对派的同盟者即所有这些舍尔巴柯夫分子和特维尔斯柯依分子都跟他拉过关系）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但是，假如这个前弗兰格里的军官帮助苏维埃政权揭穿反革命阴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谁能否认苏维埃政权有权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以便利用他们破获反革命组织呢？

舍尔巴柯夫和特维尔斯柯依跟这个前弗兰格里的军官拉关系，并不因为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而因为他是前弗兰格里的军官，以便利用他来**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糟糕的地方。而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跟踪追迹，完全意外地发现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党非法印刷所的时候，这才知道舍尔巴柯夫之流、特维尔斯柯依之流和波里沙柯夫之流这些先生在跟反对派结成联盟时，原来已经跟反革命分子，跟柯斯特罗夫和诺维柯夫之类的前高尔察克的军官建立了联盟，——关于这一点，今天明仁斯基同志报告过了。

同志们，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糟糕的地方。

反对派的分裂活动使他们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串通一气，而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串通一气就使反对派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的包围，——可悲的真理就是如此。

五 反对派在怎样“准备”代表大会◇162◇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关于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这里大喊大叫，硬说我们用高压手段准备代表大会。真奇怪，他们除了“高压手段”竟什么也看不到。而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争论所做的决定在你们看来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不是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呢？在各支部和其他党组织中已经继续了三四个月的不断的争论是什么呢？对最近半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四个月来联席全会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一切问题上的速记记录和决定所进行的讨论又是什么呢？这一切不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不是吸引他们来讨论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准备党员群众去迎接代表大会又是什么呢？

如果各级党组织不支持反对派，这究竟该怪谁呢？显然这该怪反对派，因为他们的路线是完全破产的路线，他们的政策是勾结所有反党分子甚至叛徒马斯洛夫和苏瓦林来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大概认为应当用建立反党非法印刷所的方法，用组织反党的秘密会议的方法，用伪造我们党内的情况报告给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方法，用瓦解并分裂我们党的方法来准备代表大会。对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这种看法是十分奇怪的，大家都有同感吧。而当党采取坚决的直至开除的办法来对付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时候，反对派又嚷起什么高压手段来了。

是的，党现在采取而且以后还要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或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都不容许分裂党。如果党因为距离代表大会◇163◇开会只剩一个月而听任猖狂的分裂分子、形形色色的舍尔巴柯夫分子的同盟者破坏党，那就是党实行自杀。

列宁同志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你们知道，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提议把施略普尼柯夫从中央和党内开除出去，并不是因为施略普尼柯夫建立反党印刷所，也不是因为他勾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只是因为施略普尼柯夫竟敢在党支部里批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决定。现在把列宁的这一做法跟党现在对反对派的做法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我们对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已经纵容到什么地步了。

你们不会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起义之前，列宁曾几次提议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只是因为他们在半社会主义半资产阶级的报纸——“新生活报”〔四六〕上批评了没有公布的党的决定。而现在我们的反对派在柏林马斯洛夫的报纸上，在这个资产阶级的、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报纸上发表了多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密决定呵！我们还容忍着、无止境地容忍着这一切，因而就使反对派分裂分子得到破坏我们党的机会。你们看，反对派把我们弄到多么可耻的地步！但是，同志们，我们不能无止境地容忍下去。（喊声：“对！”鼓掌。）

有人谈到逮捕那些被开除出党的、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瓦解分子的问题。是的，我们现在逮捕他们，要是他们不停止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以后还要逮捕他们。（喊声：“对！对！”）

有人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前例。这样说是不对的。米雅斯尼柯夫集团〔四七〕是什么呢？“工人真理派”又是什么？谁不知道当时是在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直接支持下逮捕这◇164◇两个集团的党徒的？为什么三四年前可以逮捕被开除出党的瓦解分子，而现在，当某些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人直接勾结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做呢？

你们听过了明仁斯基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中说，有那么一个斯切潘诺夫（军人），是党员，是反对派的拥护者，他跟反革命分子即诺维柯夫、柯斯特罗夫等人有直接联系，这一点就是斯切潘诺夫本人

在他的供词中也不否认。你们说对这种至今还是反对派分子的家伙该怎么办呢？亲亲他还是逮捕他呢？如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这些家伙，那有什么奇怪呢？（听众喊道：“对，完全对！”鼓掌。）

列宁说过，对瓦解分子和分裂分子姑息，结果会使党遭到完全破坏。这是十分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现在是我们不再姑息反对派首领的时候了，是做出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资格的结论的时候了。（喊声：“对！”）这是起码的结论，这是为了保护党不受瓦解分子分裂活动的危害而必须采取的起码的办法。

在今年八月召开的上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有些委员责骂我，说我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太温和，说我劝阻了全会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听众喊道：“对，我们现在还要骂。”）我那时建议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采取比较温和的方针，也许是过于仁慈而犯了错误。（喊声：“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喊道：“对，为了那件腐烂‘小绳子’的事我们一直要骂！”）但是现在，同志们，这三个月来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在反对派违背了他们在八月八日的特别“声明”中所提出的取消自己的派别组织的诺言而再一次欺骗了党之后，决不◇165◇能再容许采取温和态度了。现在我们要站在那些要求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的同志们的前列。（热烈鼓掌。喊声：“对！对！”有人喊道：“应当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同志们，这一点让代表大会去决定吧。

我们要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就必须把我们所收集的有关反对派进行分裂活动的全部材料提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审理，使代表大会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通过相应的决定。

六 从列宁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在他的演说中提到最近两年来党的路线的“错误”和反对派的路线的“正确”这个有趣的问题。我本想用最近两年来反对派的路线的**破产**和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这个问题的说明来作简单的回答。但是，同志们，我太浪费你们的精力了。（喊声：“请讲吧，请讲下去！”主席：“没有反对的吗？”喊声：“请讲吧，请讲吧！”）

使反对派的政策破产的反对派的主要罪过在哪里呢？反对派的主要罪过在于他们过去和现在企图、将来还会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修饰和**代替**列宁主义。有一个时期，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维护列宁主义，使它免于托洛茨基的侵害。那时托洛茨甚还没有这样大胆。这是一种立场。可是，后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被新的困难所吓倒而投到了托洛茨基方面去，和托洛茨基共同建立了◇166◇一种比八月联盟更坏的组织：于是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这里又证实了列宁的预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错误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为列宁主义而斗争转到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的路线上去了。这已经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了。其实也正是这个缘故托洛茨基现在才更加大胆起来。

现在托洛茨基领导的这个统一联盟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一步一步地渐渐使党从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上。反对派的主要罪过就在这里。可是，党要始终做列宁的党。当然，党摈弃了反对派，愈来愈高地举起列宁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为什么党内昨天的领袖今天却成了变节者。

反对派想用个人因素，如斯大林的粗暴，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固执等等来“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多么廉价的解释呵！这是巫师说鬼话，不是解释。托洛茨基从一九〇四年起就进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一直围着孟什维克转，拚命反对列宁的党。这个时期列宁的党使托洛茨基遭到一

连串的失败。为什么呢？这也许错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那时他在国内，离国外很远，在地下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而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斗争是在国外展开的，——这和斯大林的粗暴有什么相干呢？

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二年这一时期，竟对列宁和列宁的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一九一八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一九二一年在工会问题上。这两◇167◇次攻击的结果都是托洛茨基遭到失败。为什么呢？这也许错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那时担任书记职务的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分子，——这和斯大林的粗暴又有什么相干呢？

以后，党又遭到托洛茨基一连串新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但是每一次攻击的结果都是托洛茨基遭到新的失败。

从上述一切看来，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党的斗争有极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不是很清楚吗？从上述一切看来，党现在进行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从一九〇四年以来所进行的那个斗争的继续，这不是很清楚吗？

从上述一切看来，托洛茨基分子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就是反对派整个路线的失败和破产的主要原因，这不是很清楚吗？

我们党是在革命搏斗的风暴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不是那种在和平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党。正因为如此，它富有革命传统，决不盲目崇拜自己的领袖。普列汉诺夫有一个时期是党内最有威望的人，而且他还是党的创始人，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威望根本不能和他的威望相比。尽管如此，当普列汉诺夫一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向机会主义的时候，党还是把他摈弃了。如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些并不怎么“伟大”的人物由于离开列宁主义而掉在党的后面，那又有什么

奇怪呢？

反对派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最鲜明的标志、反对派的破产和堕落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反◇168◇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反对派反对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反对派反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苏联整个工人阶级，世界各国全体先进的无产者都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个宣言，都一致鼓掌拥护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主张，可是反对派却附和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的“批评家”的叫嚣，附和“前进报”〔四八〕的诽谤家的呐喊，反对这个宣言。

我没想到反对派竟会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

七　关于近几年来党的政策的几个最重要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近两年来我们党的路线问题，来检查一下这条路线，来评价一下这条路线。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说，我们党的路线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来看事实吧，来看我们政策的四个基本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上来检查一下最近两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我指的是这样几个重大问题：农民问题，工业及其重新装备问题，和平问题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问题。

关于农民问题。两三年前我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你们知道，那时我们农村的情况是困难的。人们不是经常承认我们乡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一般农村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常常用枪来对付农村通讯员。有些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有土匪骚扰。而在格鲁吉亚这样的地方甚至还有暴动〔四九〕。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富农得势，中农团结在富农周围，贫农则分离涣散。农村生产力提◇169◇高得非常缓慢，部分耕地完全荒芜，播种面积约为战前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这种事实特别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形势。这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

表会议以前的情况。

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中农做某些让步，以期较迅速地推进农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业中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推进孤立富农的工作。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是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来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党击退了反对派的这次进攻，批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赞同活跃农村苏维埃的政策，并提出工业化的口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口号。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

党这样做获得了什么成就呢？

党获得的成就是：安定了农村，改善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贫农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使富农进一步孤立、使千百万个体农户逐渐被国营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所掌握。

安定农村是什么呢？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土匪骚扰和农民暴动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播种面积扩大到战前的规模（百分之九十五）了，农村安定了，同中农的联盟建立了，贫农或多或少组织起来了，农村苏维埃巩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提高了。◇170◇

这样，我们就创造了能够向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继续进攻并保证今后在我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这就是两年来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成就。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的政策是正确的。

关于工业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兴的国家，如果没有外援，不借外债或不掠夺其他国家和殖民地等等，就不能发展

自己的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般道路。英国过去发展工业的方法，就是几百年来榨取各国、各殖民地的脂膏，把掠夺来的财富投入本国的工业。德国最近兴盛起来，是因为它从美国借到了几十亿卢布的债款。

但是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都不能走。掠夺殖民地是我们这个政策所不容许的。借债呢，谁也不借给我们。我们唯一可走的就是列宁指示的一条道路：靠内部积累来发展自己的工业，重新装备自己的工业。反对派一直在说泄气话，说内部的积累不足以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反对派就武断地说，我国内部的积累是不足以把重新装备工业的工作向前推进的。那时反对派预言我们会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两年内把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两年来，我们投入本国工业的资金达二十多亿卢布，——这是事实。这些投资足以推进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工作和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事实。我们已经做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发展了我国的工业，我们开始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我们是靠自己的积◇171◇累推进了这个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问题上的政策的成就。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正确的。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就我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关系方面来说，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我们在这方面获得了什么成就呢？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把**和平**保卫住了，不管好歹，总算保卫住了。我们获得的成就是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尽管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敌对活动，尽管有北京〔五〇〕、伦敦〔五一〕、巴黎〔五二〕的挑衅，——尽管有这一切，我们还是没有上挑衅的当并把和平事业保卫住了。

尽管季诺维也夫等人屡次预言要有战争，**我们还是没有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歇斯底里叫嚣所无力推翻的基本事实。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

的速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知道，关于战争的预言，在我们这里有过多少次呵！季诺维也夫曾预言今年春天我们将有战争。后来他又预言今年秋天很可能爆发战争。可是现在已经快到冬天了，战争还是没有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和平政策的成就。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些成就。

最后，第四个问题——关于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的状况问题。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共产党在全世界（从中国到美国，从英国到德国）日益发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资本主义危机的因素是在增长而不◇172◇是在减弱。只有瞎子才会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我们国内政策的成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和威信正在不断增长。

最近两年来我们党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四个基本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的成就就是如此。

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表明了什么呢？除其他一切而外，它所能表明的正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政策的完全破产。

八 退到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这一切都很好。反对派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反党的。他们的行为只能叫做分裂行为。所以，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是当时情况下很自然的一条出路。这一切都是对的。

但是要知道，有过一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说应当让反对派的首领们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不必把他们驱逐出去。怎么现在又改变了呢？这种改变是因为什么呢？一般说来，这方面有没有改变呢？是的，是有改变的。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反对派首领们的原则路线和组织“方针”根本改变了。反对派的首领们（首先是托洛茨基）改变了，

变得更坏了。当然，党对待这些反对派分子的政策也应当改变了。

例如就拿关于我们党蜕化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来说吧。说我们党蜕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否◇173◇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比如说，大约三年前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是采取什么立场呢？你们知道，自由派和孟什维克，路标转换派分子〔五三〕和各种叛徒当时都硬说我们党蜕化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知道，那时他们举法国革命做例子，武断地说布尔什维克必然遭到法国雅各宾党人当时所遭到的那样的复灭。你们知道，拿法国革命（雅各宾党人的复灭）来做历史上的比拟，是各色各样孟什维克和路标转换派分子当时和现在用做反对我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我国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论据。

大约三年前托洛茨基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那时他对这种比拟是抱绝对否定态度的。请看当时他在他的小册子“新方针”（一九二四年）里是怎样写的：

“自由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拿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的复灭！）做历史上的比拟来滋养和安慰自己，这种比拟**是肤浅的、毫无根据的**。”①（“新方针”第三十三页）

真是明白而肯定！看来难以说得更确定更肯定了。对于各种路标转换派分子和孟什维克的竭力拿法国革命做历史上的比拟，托洛茨基所下的断语是否正确呢？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而现在呢？托洛茨基是否继续坚持这种立场呢？可惜没有。甚至相反。这三年来，托洛茨基已经演变到“孟什维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方面去了。现在他自己断言，拿法国革命来做历史上的比拟◇174◇不是孟什维主义的标志，而是“真正的”、“真实的”“列宁主义”的标志。你们是否读过今年七月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速记记录呢？如果读过，那就不难了解，托洛茨基现在在反党的斗争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依据的是孟什维克的理论：我们党的蜕化和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复灭情形一样。在托洛茨基看来，现在空谈“特米多尔”就是一种高雅的标志。

在蜕化这个基本问题上，从托洛茨基主义转向“孟什维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最近三年来所走的道路。

托洛茨基分子改变了。党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的政策也应当改变了。

现在来谈谈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组织问题，即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党的铁的纪律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铁的纪律是我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孟什维克首先竭力破坏我们党的铁的纪律。有一个时期，托洛茨基对我们党须有铁的纪律是了解的，是重视的。我们党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老实说，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过去还能服从我们党的决定。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曾屡次声明，不管我们党怎样，只要党责令他，他愿意“俯首听命”。也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分子那时表面上往往能对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保持忠诚老实的态度。

可是现在呢？能不能说托洛茨基分子，现在的反对派愿意服从党的决议，俯首听命等等呢？不，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说了。他们两次违背了自己提出的服从党的决议的诺言，两次欺骗了党，和资产阶◇175◇级知识分子一起建立了非法印刷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曾在这个讲台上一再宣称他们正在破坏而且以后还要破坏我们党的纪律，——既然如此，我们党内恐怕再找不出一个人敢于相信反对派的首领是愿意在党的面前俯首听命的了。现在，反对派已经转上新的轨道即转上分裂党的轨道，转上成立新党的轨道。现在，反对派分子中最流行的小册子，不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五四〕，而是托洛茨基旧时的孟什维克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九〇四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专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反对列宁

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而写的。

你们知道，托洛茨基这本旧时的小册子的实质就是否定列宁对党和党的纪律的看法。在这本小册子里，托洛茨基竟把列宁叫做“马克西米梁·列宁”，暗指列宁是蓄意建立个人独裁的马克西米梁·罗伯斯庇尔第二。托洛茨基在他的这本小册子里公然说，只有在党的决定不与那些有义务服从党的人的愿望和观点相抵触时，才应当服从党的纪律。这纯粹是孟什维克的组织原则。这本小册子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托洛茨基是把这本小册子献给孟什维克巴·阿克雪里罗得的。那上面这样写着：“献给亲爱的老师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笑声。喊声：“显然的孟什维克！”）

从对党抱忠诚老实的态度转到实行分裂党的政策，从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转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从列宁方面转到阿克雪里罗得方面，——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组织道路。

托洛茨甚分子改变了。党对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组织政策也应当改变了。◇176◇

那好吧，既然这样，就滚到“亲爱的老师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吧！滚去吧！不过要快一点，可敬的托洛茨基，因为“巴维尔·波利索维奇”已经衰老，可能很快就会死去，那时你就来不及见到“老师”了。（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真理报”第二五一号◇177◇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出席的有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美、中国、比利时、芬兰、丹麦和爱沙尼亚的代表共八十人。谈话继续了六小时。

斯大林：同志们，昨天我收到一张用德文写的没有署名的问题表。今天早晨又收到两张问题表：一张是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另一张是丹麦代表团提出的。我们先从第一张问题表谈起，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代表团提出的。然后可以谈谈其余的两张。如果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开始。（代表们表示同意）

第一个问题：苏联为什么不参加国际联盟？

答：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的原因，我们报刊上已经谈过好多次了。我可以指出其中几个原因。苏联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它不参加国际联盟，首先是因为它不愿意对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政策负责，不愿意对国际联盟所授与的以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国家为目的的“委任统治权”负责。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178◇

其次，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不愿意对国际联盟所掩饰的和崇奉的、不能不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那种扩军备战和新的军事联盟等等负责。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根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最后，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不愿意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帷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联盟就是这种帷幕，并且用它的会员国的花言巧语来掩盖帝国主义的阴谋。

在目前情况下，国际联盟是那些进行幕后勾当的帝国主义头子的“会面地方”。在国际联盟中公开**讲**的那一套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废话。而帝国主义头子们在国际联盟幕后非公开**干**的那一套才是国际联盟空谈的演说家们所虚伪掩饰的真正帝国主义勾当。

苏联不愿意充当这出反人民的喜剧中的角色和参加者，那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不容许社会民主党存在？

答：在苏联不容许社会民主党（即孟什维克）存在，其理由正和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存在一样。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国的发展条件，我国的发展历史是这样：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多或少算是一个革命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成了执政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则变成了公开的反革命的政党，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党。

你们不会不知道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战争中曾站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方面反对苏维埃政◇179◇权。现在，这个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党，企图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政党。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演变不仅是苏联的而且也是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沙皇制度存在时，我国的社会民主党或多或少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其实这也正说明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和孟什维克即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组成一个政党。当所谓民主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时，社会民主党就成为在野的或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当革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时，社会民主党就变成了公开的反革命的政党。

有一个代表问：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只在这里，在苏联才是反革命力量，还是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做反革命力量呢？

斯大林：我已经说过，在这一点上是有某些区别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力量，因为它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力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不是资本政权的在野党，就是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既反对资本主义中最反动的势力又反对工人革命运动的半执政党，或者是直接而公开地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完全的执政党。

只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成为现实以后，社会民主党才成为彻底反革命的政党，它的反革命锋芒才指向无产阶级政权。◇180◇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没有出版自由？

答：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哪一个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那末这种自由在我国是没有的，而且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它是不会有的。如果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那末我必须指出，你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有全面而广泛的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

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并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最好的印刷厂和最好的出版大厦，如果没有包括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大大小小的、公开的工人阶级组织，如果没有最广泛的集会自由，那末也就没有出版自由。

你们只要仔细看一看苏联的生活状况，考察一下工人区，就会知道，最好的印刷厂，最好的出版大厦，一幢幢的造纸厂，一幢幢出版上所必需的油墨制造厂，许多高大的会议厅，——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为工人阶级出版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完完全全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手里。这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我们这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

我们这里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出版自由，因为他们在我国所代表的是被打垮了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给一切阶级出版自由、为一切阶级谋福利的义务。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权时就公开说过：这个政权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将要镇压资产阶级，维护占苏联人口绝大多数的城乡劳动群◇181◇众的利益。

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向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呢？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不释放被监禁的孟什维克？

答：这里指的大概是那些积极的孟什维克。是的，是这样，我国那些积极的孟什维克在监禁期限未满时是不会被释放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政时，为什么不释放被监禁的布尔什维克呢？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政时，为什么列宁不得不躲入地下呢？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间，虽然当时领导政府的是有名的孟什维克，是第二国际的积极活动家，但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旗帜——伟大的列宁还是不得不躲在距离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和唐恩的“民主共和国”很远的芬兰，而列宁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报馆还是被资产阶级当局捣毁，这是什么原因呢？

显然，这都因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斗争必然使得双方采取某些高压手段。我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反革命政党。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不逮捕这个反革命政党的活动家。

不仅如此，由此还应该得出结论：在我们这里逮捕孟什维克是十月革命政策的继续。十月革命◇182◇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十月革命是把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现在世界各国多少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做得对

的。我不怀疑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看法。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究竟打倒了谁？历史表明，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打倒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当时执掌政权的正是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郭茨和李伯尔，唐恩和策烈铁里，阿布拉莫维奇和阿夫克森齐也夫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又是什么政党呢？它们是第二国际的政党。

由此可见，苏联无产阶级完成了十月革命，也就是打倒了第二国际的政党。这可能使得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感到不愉快，但是，同志们，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要想否认这个事实就太可笑了。

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可以而且必须推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权，以便使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取得胜利。

既然可以打倒他们，那末当他们公开而坚决地转向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时，为什么不可以逮捕他们呢？你们是不是以为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比起逮捕他们来是一种较轻的手段呢？

不能一方面认为十月革命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又否认它的必然结果是正确的。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十月革命是错误的，——那末，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是错误的；

或者十月革命不是错误的，——那末，逮捕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就不能认为是错误的。◇183◇

逻辑上一定是这样。

第五个问题：苏联为什么不准社会民主党新闻处的记者入境？

答：因为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特别是“前进报”，对苏联及其代表的诽谤比许多资产阶级报纸更为恶毒。

因为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如“佛斯报”〔五五〕，对苏联施行攻击都比“前进报”“客观”得多，“有礼貌”得多，这也许“很奇怪”，但是，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实。假使“前进报”的行为不比某些资产

阶级报纸更恶劣，那末它的代表可能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的代表一样，早已在苏联得到自己的位子了。

前几天，“前进报”的一个代表向我国驻柏林外交代表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提出关于“前进报”记者取得苏联入境权所必需的条件的问题。对他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当‘前进报’用事实证明自己对苏联及其代表的态度并不比‘有礼貌的’自由主义报纸如‘佛斯报’更恶劣的时候，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前进报’记者进入苏联。”

我以为这个答复是十分明白的。

第六个问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合并是否可能？

答：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立场完全不同，主张完全相反。第三国际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地，第二国际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破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184◇的一切。

两个国际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个斗争中，不是第二国际胜利，就是第三国际胜利。毫无疑问，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的必定是第三国际。

我以为二者的合并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第七个问题：对西欧的形势怎样估计？是否可以指望最近几年内发生革命事变？

答：我以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的因素正在欧洲增长着，以后还要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可以局部稳定下来，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现时还能做得到，但是它已经永远不能恢复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稳固”和“均势”了。它永远也不能恢复那种“稳固”和“均势”了。

只要举出欧洲各国以及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时常

爆发革命的火焰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革命的火焰今天在奥地利爆发，明天在英国，后天在法国或德国某个地方，以后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爆发。

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外围。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外围更加“不安宁”。新的革命事变的条件正在成熟。我以为因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五六〕而引起的一些事变，是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是工人阶级不满情绪和愤怒心情日益增长的最鲜◇185◇明的例证。

对资本主义的绞肉机说来，杀害两个工人算得什么呢？在这以前，难道不是每周每日都杀害数十数百个工人吗？但是，杀害了两个工人（萨柯和万泽第）就足以使全世界工人阶级行动起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资本主义脚下的地皮愈来愈炽热了，这说明新的革命事变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资本家能够把革命爆发的第一个浪涛推到岸边，——这个事实丝毫不能够使资本主义得到宽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会是只涌来一次的巨浪。它始终是以来潮和退潮的方式发展的。在俄国曾经这样，在欧洲也将这样。我们面临着新的革命事变。

第八个问题：俄国党内的反对派强大吗？

答：我以为他们非常弱。不仅如此，他们在我们党内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我手头有一份今天的报纸，上面登载着几天来争论的总结。数字说明：拥护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提纲的有十三万五千多名党员，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一千二百名党员，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我想以后表决的结果定会使反对派更加丢丑。我们的争论将继续到代表大会开幕。在这期间，我们要尽可能向全党征求意见。

我不知道在你们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是怎样进行争论的。我不知道在社会民主党内一般是不是进行争论。我们对待争论是很认真的。我们将向全党征求意见，你们可以看到反对派在我们党内的比重会比

刚才宣读的数字更加微不足道。很可能反对派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连一个人连◇186◇一个代表都不会有。

就拿列宁格勒的“三角”工厂或“普梯洛夫”工厂这样规模宏大的企业来说吧。“三角”工厂的工人达一万五千名。其中党员二千一百二十二名。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十九人。“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约一万一千名，党员一千七百一十八名。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二十九人。

反对派依靠哪些阶层呢？我以为反对派主要依靠非无产阶级阶层。如果问一问那些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居民，他们同情谁，那末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同情反对派。为什么呢？因为反对派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党斗争，是反对那个不能不引起某些非无产阶级阶层不满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反对派就是居民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的反映，对无产阶级专政抗拒的反映。

第九个问题：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在德国散布一种武断的说法，说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现在的领导把工人出卖给反革命，这种说法对不对？

答：应该认为是对的。应该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把苏联工人阶级完全出卖给世界各国反革命分子。

此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决定在最近把所有被赶出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招回苏联，并把工厂归还他们。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吃人肉的时候也到了。◇187◇

最后，我们还决定把所有妇女都收归国有，并对自己的亲姊妹实行强奸。（大笑。有些人大声说：“谁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看到你们在笑，可能你们有人会认为我对待问题不严肃。是的，同志们，回答这类问题是不能严肃的。我以为只能用嘲笑来回答这类问题。（热烈鼓掌）

第十个问题：你对反对派和德国的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我对反对派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态度，就像法国的著名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对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态度一样。（代表们活跃起来）

你们想必读过阿尔丰斯·都德那部描写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著名小说吧。那部小说的主人公达达兰实际上是一个平凡的“善良的”小资产者。但是他的幻想竟如此强烈，而“善意的撒谎”的才能又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他终于成了这种非凡的才能的牺牲品。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阿特拉斯山中打死了无数狮子和老虎。达达兰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猎狮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狮子，也没有看见过老虎。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登过勃朗峰。他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登山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勃朗峰，因为他至多只到过勃朗峰山麓。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开辟了一大块移民地。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188◇他为世界第一名移民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达达兰这样荒诞的想头，除了自讨没趣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知道达达兰荒诞无稽的吹牛使达达兰之流落到多么狼狈和丢丑的地步。

我以为反对派首领们在莫斯科和柏林大吹大擂，其结局必定使反对派落到同样狼狈和丢丑的地步。（大笑）

第一张表上的问题到这里我们就谈完了。

现在谈谈法国代表团所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想怎样和外国石油公司作斗争？

答：我以为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样提问题就会使人以为苏联的石油工业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进攻，并且竭力设法打倒和消灭它们。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不，不是这样的。其实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石油公司力图扼杀苏联的石油工业，而苏联的石油工业为了生存和继续发展，就不得不实行自卫。

问题在于苏联的石油工业无论在开采量方面（我们比他们开采得少）还是在和市场的联系方面（他们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比我们多得多）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工业薄弱。

苏联的石油工业怎样实行自卫呢？它是靠改进产品质量来自卫的，它首先是靠减低石油价格的办法即采用在市场上比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的办法来实行自卫的。◇189◇

有人会问：难道苏联如此富裕，竟有可能比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吗？当然，苏联工业并不比资本主义公司富裕。不但如此，资本主义公司倒是比苏联工业富裕很多倍。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富裕，问题在于苏联的石油工业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它不需要惊人的超额利润，而资本主义石油公司却非有巨大的超额利润不可。正因为苏联的石油工业不需要超额利润，所以它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产品。

说到苏联的粮食，苏联的木材等等，情形也是这样。

一般应当说，苏联的商品，特别是苏联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是作为一种减低价格从而改善消费者的生活状况的要素而出现的。苏联石油工业的力量和它用以防御资本主义石油公司侵害的手段就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石油业主，尤其是德特丁，他们所以放开嗓门叫嚣反对苏联和反对苏联的石油工业，用所谓“共产主义宣传”的时髦词句来掩饰他们的抬高石油价格和掠夺消费者的政策，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你们想怎样实行集体制？

答：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制。

我想，关于经济方面的办法问题是最引人注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措施共有三种：

一种是组织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

一种是组织农户，主要是组织贫农加入生产合作社；◇190◇

一种是通过国家的计划机关和调节机关，从销售农产品方面和供应农民以工业必需品方面来掌握农户。

几年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在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大批中介人（即私人企业主），他们把城市产品供应农民，把农民的粮食卖给工人。显然，这些中介人不是白白地“工作”的，他们从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万卢布。这是城市和乡村、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户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的时期。那时合作社和国家分配机关的作用还比较小。

从那时到现在，情况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城乡之间、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商品流转中，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可以说不仅起主要作用，而且起统治作用，甚至是垄断作用。在供应农村布匹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而在供应农业机器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而在收购棉花、甜菜等工业原料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就是说，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农民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城市商品，工人也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农产品。

第二、这就是说，由于把中介人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赶出去，工

业就有可能领导农民经济，影响◇191◇它并提高它的发展水平，使它合理化和工业化。

第三、这就是说，由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国家就可能着手有计划地发展农业，供给农业以优良的种子和肥料，规定农业的生产规模，从价格政策方面影响农业等等。

最后，这就是说，在农村中正在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为进一步限制和排挤富农，为组织劳动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社，为国家在可能范围内拨款帮助这些合作社创造有利的条件。

例如拿制糖工业用的甜菜的生产和纺织工业用的棉花的生产来说吧。这两种原料的生产规模以及它们的价格和质量，现在在我们这里不是自发地，由无组织的市场上的角逐，通过投机的中介人，通过交易所和各种资本主义营业所等等来决定的，而是有计划地，由制糖辛迪加、纺织辛迪加的一方和以甜菜种植合作社、植棉合作社为代表的数万农户的另一方订立一定的预购合同来决定的。

这里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这里出现的只是国营辛迪加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两方，没有任何交易所和中介人参加。国营辛迪加和有关的合作社组织签订合同，规定一方生产一定数量的甜菜、棉花，一方供给农民种子、贷款等等。在经济年度终结时，全部产品交给辛迪加，而农民因此可以按照预订的合同取得相当的款项。我们把这叫做预购合同制。

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它对双方有利，不用中介人，直接把农民经济和工业结合起来。这个制度是走向农民经济集体化的最正确的道路。◇192◇

不能说农业的其他部门也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可以确信地说，农业的一切部门，连粮食生产也不例外，都将逐步过渡到这条发展道路上去。这条道路是到达农业集体化的捷径。

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劳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

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还没有达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地就达到。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大笔钱，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一大笔钱，但是以后一定会积累起来。马克思说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如果不加以大力资助，不为它花上几亿几亿的经费，它是不会巩固起来的。我以为我们已经进到这样的农业发展阶段即国家开始有可能大力资助新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取得领导地位并领导着农业，——这个事实就是农民经济一定能沿着进一步集体化的道路去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第三个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打算废除货币，当时有哪些主要困难？

答：当时无论在国内发展方面还是在对外关系方面都有很多困难。如果就国内经济方面来说，可以指出三个主要困难。

第一、困难在于我们的工业遭到破坏并陷于瘫痪状态（如果武装干涉期间供给我们内战前线以弹药的军事工业不算在内）。我们的工厂有三分之二停工，运输瘫痪，货物没有或几乎没有。◇193◇

第二、农业凋敝，农户的劳动力被征调到前线。原料缺乏，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面包供应不足。当时我们每天每个工人发给半磅面包，有时只发给八分之一磅。

第三、没有或几乎没有正常的沟通城乡的苏维埃贸易机构可以把城市产品供应农村，把农产品供应城市。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还处在萌芽状态。

可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本改变了。

工业发展和强大起来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支配地位。这一

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最近两年来，我们没有外援、没有借任何外债而从自己的积累中拿出了二十多亿卢布投入工业。现在已经不能说农民根本得不到商品了。

农业提高了，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现在已经不能说工人根本得不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了。

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已经发展到在全国商品流转中占领导地位。现在已经不能说我国没有沟通城乡、沟通工农业的分配机构了。

当然，要马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还是不够的。但是要沿着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这却是完全够的。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并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新工厂。

我们需要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民以农业机器，使大多数劳动农民合作化，把个体农户组织到广大的农业集体合作社网中。◇194◇

我们需要组织一种能够像每个人估计自己的收支预算一样来估计并满足全国城乡需求的沟通城乡的分配机构。

一旦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到了，我们就可以认为不需要货币的时候到来了。

但是距离这个时候还很远。

第四个问题：“剪刀差”问题怎样？

答：如果把“剪刀差”了解为从成本方面来看的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差异，那末“剪刀差”的情形如下：

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业品出售的价格比在其他条件下所出售的价格还是贵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业还很年轻，必须保护它，使它免受外来竞争的侵袭，必须给它创造能够使它迅速发展的条件。它的迅速发展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对于乡村都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及时供给农民经济以数量充足的布匹和农业机器。这种情况造成了工

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差异而使农民经济吃一些亏。

为了消除这种对农民经济不利的情况，政府和党立意实行逐步地然而是不断地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能不能说这个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呢？我认为它是绝对切实可行的。例如大家知道，最近一年来我们已经把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减低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其次，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业组织不断地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和出厂价格。毫无疑问，这个政策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此外，我必须指出，不断◇195◇地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石，没有它，无论是我们工业经济的改进和合理化还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巩固，都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执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那里通常把各企业组成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便在国内抬高工业品价格，把这些价格变为垄断价格，藉此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为商品输出国外准备基金，使资本家可以在国外按低价出售同样的商品来达到夺取新市场的目的。

我们俄国在资产阶级制度时期也实行过这样的政策。就拿糖来说吧，当时糖在国内卖得极贵，可是在国外，例如在英国，同样的糖却卖得非常便宜，以致人们拿它来喂猪。

苏联政府实行完全相反的政策。它认为工业应当为居民服务，而不是相反。它认为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一种主要手段，没有它，工业就不能得到正常发展。至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能促使居民的需求增长，扩大国内（城乡）市场的容量，从而创造进一步扩大工业所必需的不断增大的来源，那就更不必说了。

第五个问题：苏联政府在债权方面向法国的小债权人提出了哪些条件？怎样使法国的食利者知道？

答：我们在战前债务方面的条件，已经在拉柯夫斯基的那次众所周知的谈话里发表了。我想这些条件你们必定都知道了。这些条件是以苏联同时得到贷款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在这方面坚持人所共知的原

则：你给我，我就给你。你贷款给我们，你就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战前的债款；你不给，◇196◇你就得不到。

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在原则上承认了战前债务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我们一方面保留关于取消沙皇债务的著名法令〔五七〕的效力，同时也同意根据实际协议偿付一些战前债款，只要他们因此而能够给我们所必需的而且也对法国工业有利的贷款。我们把偿付债款当做我们因取得发展我国工业的贷款而付出一笔附加利息。

有人谈到沙皇俄国的军事债务。有人谈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者向苏联提出的各种苛刻要求。但是，他们忘记了我国革命就是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与此有关的沙皇债务在原则上的否定。他们忘记了苏联不能偿付也不偿付军事债款。

此外，他们还忘记了苏联不会把国家几年来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横遭掠夺和蹂躏这笔账勾销，苏联所提的人所共知的反要求就是与这种掠夺和蹂躏有关的。

谁对这种掠夺和蹂躏负责呢？谁应当对这种行为负责呢？谁应当偿还这笔掠夺和蹂躏的账呢？帝国主义头子们总爱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置诸脑后。但是，他们应当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忘记不了的。

第六个问题：烧酒专卖和反对酗酒这两件事怎样协调？

答：我以为这两件事一般很难协调。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党知道这个矛盾，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党知道现时容许这样的矛盾存在是为害较小的。

我们实行烧酒专卖的时候，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197◇

或者是把许多最重要的工厂租给资本家，受他们盘剥，以取得必需的一定的资金来周转；

或者是实行烧酒专卖，以便用本身的力量取得发展我国工业所必需的流通资金，从而免受外国的盘剥。

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当时和列宁谈过这个问题，列宁认为

在借不到所必需的外债的情况下，只好直截了当地实行烧酒专卖这个临时的特殊办法。

我们实行烧酒专卖的时候，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般说来，当然最好是不要烧酒，因为烧酒是一种祸害。但是，那时就不得不暂时受资本家的盘剥，而为害就更大了。因此，我们宁愿少受些害。现在烧酒能提供五亿多卢布的收入。现在放弃烧酒专卖就等于放弃这笔收入，同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酗酒现象会减少，因为农民一定会开始酿造私酒并以它来毒害自己。

显然，农村文化发展方面的严重缺点在这里有一定的影响。至于立即放弃烧酒专卖会使我们的工业失掉一笔无从补偿的五亿多卢布的资金，那就更不必说了。

这是不是说将来我国仍然应该实行烧酒专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烧酒专卖作为一种临时办法实行的。因此，只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找到为进一步发展我们工业的新收入的新来源，烧酒专卖就必定被取消。毫无疑问，这样的来源是一定会找到的。

我们把烧酒酿造事业交给国家掌握，这样做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如果把烧酒交给私人掌◇198◇握，那结果就会：

第一、加强私人资本；

第二、使政府对烧酒的生产和消费无法进行应有的调节；

第三、使政府将来废除烧酒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困难。

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缩减烧酒的生产。我认为我们将来能够完全废除烧酒专卖，把酒精的生产减少到只够技术方面需要的最低限度，然后完全取消烧酒的销售。

我想，如果西欧无产者取得了政权，并给我们必要的帮助，那末，我们大概就不致于跟烧酒和其他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打交道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西欧的弟兄们暂时还不想夺取政权，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靠自己的资金来周转。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

命运。

可见对于实行烧酒专卖，我们西欧的朋友们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笑声，鼓掌。）

第七个问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判权，没有见证人，没有辩护人的审讯，秘密逮捕。因为这些办法是法国的社会舆论所难赞同的，所以很想知道实行这些办法的理由。是否打算修改或取消这些办法？

答：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肃反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惩罚机关。这个机关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成立的社会保安委员会多少有些相似。它主要是惩办奸细、阴谋分子、恐怖分子、土匪、投机奸商、伪币制造者。它是一种为保护革命利益使之免受反革命资产者及其走狗的侵害而成立的军事政治法庭之◇199◇类的组织。

这个机关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天即在各种受俄国和外国资本家资助的阴谋分子、恐怖分子和奸细的组织暴露以后成立的。

这个机关是在一连串谋害苏维埃政权活动家的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即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委员乌利茨基同志被杀害（他是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以后，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同志被杀害（他也是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以后，在列宁被刺（他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以后发展并巩固起来的。

应当承认国家政治保卫局当时百发百中地打击了革命的敌人，而且这个优点一直保持到现在。从那时起，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威胁，就成为警醒的革命卫士，就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一把出鞘的宝剑。

因此，难怪世界各国的资产者切齿痛恨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什么神话都编造出来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什么诽谤都散布出来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政治保卫局正确地捍卫着革命的利益。革命的死敌咒骂国家政治保卫局，——可见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是正确的。

工人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态度就不是这样。请到工人区走一走，问一问工人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看法。你们会知道他们是很尊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把它看做革命事业的忠实卫士。

我了解资产者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憎恨和怀疑。我了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旅行家，他们一到◇200◇苏联首先就打听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是还存在，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不足为奇的。

但是我不能了解某些工人代表，他们一到苏联就不安地问：国家政治保卫局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多不多，是不是还要惩办各种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恐怖分子和阴谋分子？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某些工人代表为什么这样关心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呢？原因在哪里呢？理由是什么呢？

有人鼓吹采取最温和的态度，建议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可是，能不能担保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后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就不再组织和资助阴谋分子、恐怖分子、破坏分子、纵火分子、爆炸分子的反革命集团呢？没有任何保障可以解除革命的敌人的武装，却要解除革命的武装，——这岂不是愚蠢行为，这岂不是对工人阶级犯罪！

不，同志们，我们不愿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巴黎公社社员对待凡尔赛派太温和了，因此，马克思当时有充分理由责备他们。他们因为自己态度温和而付出的代价是：当梯也尔攻进巴黎的时候，数万工人被凡尔赛派枪杀了。

同志们是不是认为俄国的资产者和地主不如法国的凡尔赛派残暴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们在和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的武装干涉者勾结起来占领了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时是怎样蹂躏工人的。

我决不想用这点来说明是国内形势使我们必须保存这个革命的惩

罚机关。从国内情况看来，革◇201◇命的局势已十分稳固和不可动摇，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内敌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和那些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支持他们的世界各国资本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国内敌人是世界各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革命的国内敌人的基地和后方。我们同国内敌人作战，也就是同世界各国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样的惩罚机关可以不可以。

不，同志们，我们不愿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革命需要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心惊胆寒。（热烈鼓掌）

有一个代表说：斯大林同志，请让我代表在座的代表们向你道谢，感谢你为我们解释并澄清了国外流传的关于苏联的谣言。你可以相信，我们一定会把苏联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本国的工人。

斯大林说：同志们，用不着感谢。我认为回答你们的问题和向你们做报告是我的责任。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认为向自己的阶级弟兄报告他们希望了解的一切问题是应尽的义务。我们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我们国家的活动家向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做报告，只不过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六〇号和第二六一号◇202◇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没有成功的尝试。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203◇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所以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据就在这里。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这里。

可以指出几个基本问题来说明十月革命对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世界各国无产者。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十月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变成公有财产，因而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资本家的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十月革命夺得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国会制度◇204◇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拉法格还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确地说过，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所有从前的资本家都将被剥夺选举权”〔五八〕。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可是，十月革命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月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旧制度以后，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也就是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的建设的十周年。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设战线上显着的成就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

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并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罗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理论”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政治“哲学”基础，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这一政策的基础。这种带偏见性的“理论”现在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十月革命的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发生◇205◇重大的影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无产者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同情日益增长，以及许多工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地到苏维埃国家参观，——所有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种子已经开始结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在“宗主国”内动摇了帝国主义，而且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把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内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点就是它在苏联进行的这种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视和各民族冲突为旗帜，而是以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互相信任和亲密团结为旗帜，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国际主义**。

正因为我国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所以向来被蔑视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

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206◇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境地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弃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维埃发展轨道的非欧洲民族，他们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离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开的方法，使各民族劳动群众间的民族敌视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用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法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并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各国劳动者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内联合的榜样）的存在不能不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不用说，十月革命的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以及这些民族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了这一点。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7◇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

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种子散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后方，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统治，因而也就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发生了问题。

既然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由于纠纷和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以及由于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因此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首先，这就是说，十月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受了一个永远治不好的致命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局部稳定，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把国家管理权交给法西斯主义，可◇208◇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它永远不能恢复它从前所炫耀的那种“安宁”和“信心”，那种“均势”和“稳固”了，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时而在帝国主义外围燃烧起来，使资本主义的补缀方法一概无效，使资本主义的死期日近一日。这正像有名的寓言中所说的：“尾巴拔出来，鼻子陷进去；鼻子拔出来，尾巴陷进去。”

其次，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已经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比

重、英勇精神和战斗决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统治阶级重视它们，把它们看做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从前没有一个各**全世界性的**公开的会场可以从那里表明并陈述被压迫阶级的希望和意愿，可是现在已经有这种会场了，这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未必用得着怀疑，如果这个会场被消灭，那末肆无忌惮的黑暗的反动势力就会长期笼罩着“各先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不能否认，甚至单是“布尔什维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就牵制着黑暗的反动势力而便利于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世界各国剥削者才像野兽一样地仇恨布尔什维克。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像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党人”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颤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灭亡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颤心惊、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正像从前巴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209◇的基地和学校一样，现在莫斯科是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学校。对雅各宾党人的仇恨并没有挽救封建制度免于崩溃。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必然的灭亡，——这还用怀疑吗？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时是意识上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诞生并巩固起来的。因此，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列宁主

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的胜利。

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前，**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虽然不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但是也丝毫不设法，绝对不设法使这个思想早日实现，——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当时，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的，或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210◇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再也不能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献媚，不然就会给资本主义造成相当的危险。社会民主党既然早已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结果也就不得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公然不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产儿，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必然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确实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谁不全心全意地公开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谁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谁不为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创造条件，谁就不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横着一道鸿沟。从此以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垒了。

可是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更进一步把社会民主党抛到那些**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的阵营中去了。阿德勒之流、鲍威尔之流、维尔斯之流、列维之流、龙格之流、勃鲁姆之流这些先生咒骂“苏维埃制度”而赞扬国会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说明，**为了**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各“文明”国家保存资

本主义奴隶制度，他们现在进行斗争，而且将来依然要进行斗争。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说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资**◇211◇**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五九〕。

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列宁主义必然战胜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统治的时代**已经完结了**。

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212◇

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 95 周年宣传画

十月革命的发动

致联共（布）莫斯科军区代表会议〔六〇〕

同志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祝你们在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们光荣的红军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红星报”第二六三号◇213◇

党 和 反 对 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省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六一〕上的演说）

同志们！请允许我把最近三四个星期以来在党内和党外（这应当直言不讳）展开的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争论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多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

反对派平常喜欢用数字用百分比来炫耀自己，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他们等等。现在大家都看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反对反对派、拥护党中央委员会的。

这“怪”谁呢？“怪”反对派自己！反对派时常逼迫我们进行争论。整整两年来，他们没有一天不◇214◇提出进行争论的新要求。我们遏止了这种逼迫，我们中央委员遏止了这种逼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党，正像列宁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是争论的俱乐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党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四面受着敌人包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担负着很多创造性的实践任务的政党，因此，它不能老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意见分歧上。

但是，争论的时候到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一个月，甚至前一个多月，党就按照党章说：好吧，你们愿意争论，你们要求斗争，那末就斗争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拥护党，拥护党中央，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拥护反对派，这就是总结。

反对派的吹嘘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被揭穿了。

有人会说，这个总结不能算是决定性的。有人会说，除了党，还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有人会说，在这里，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做出总结。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这一方面也做出总结了。

十一月七日我们广大国土上的所有城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阶层、红军、红海军拥护我们党，拥护政府，反对反对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吗？

反对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那一天自己落得可耻的下场，党和政府在同一天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一致的欢呼，难道这不都是证明不仅党，而且工人阶级，不仅工人阶级，而且劳动农民阶层，不仅劳动农民阶层，而且全部陆海军都全力拥护党，拥护政府，反对反对派，反对瓦解分子吗？（鼓◇215◇掌多时）

究竟你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总结呢？

同志们，这就是这一次党和反对派即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的简短总结。这一次斗争起先是在党内展开的，后来由于反对派自己的过错才越出了党的范围。

为什么反对派遭到如此可耻的失败呢？要知道，自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反对派曾经遭到如此可耻的破产。

我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将近四分之一的党员的支持。

我们知道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将近八分之一的党员的支持。

我们知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即所谓“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整个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

可是现在呢？现在反对派空前地孤立了。现在他们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恐怕连一个代表也不会有了。（鼓掌多时）

反对派所以破产，是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了党，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革命。反对派原是一小撮脱离现实生活、脱离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对派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就在这里。◇216◇

我们现在从那些使反对派和党分离的问题中举出两三个问题来考查一下。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列宁说过，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是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说：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六二〕

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认为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依靠贫农而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

可是，反对派怎样看这个问题呢？他们不仅不重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他们不仅不了解这种联盟对于我国革命发展的全部重要性，而且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破裂、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结合遭到破坏的政策。

为了不扯得太远，我可以引用反对派的主要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看法。他把农民看做我国工业的“殖民地”，看做应当尽量加以剥削的对象。◇217◇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反对派的许多主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文件，而提高工业品价格必然会使我们的工业萎缩，使富农加强，使中农破

产，使贫农受富农的奴役。

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文件是他们打算同农民决裂、同中农群众决裂的政策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反对派的“政纲”或反提纲中有没有直接而公开地谈到一些呢？没有，没有谈到。在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周密地隐藏和掩蔽起来了。相反地，在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中，你们倒可以找到几十处恭维中农、恭维贫农的地方。此外，那里面还攻击了党，说党有富农倾向。但是那里面没有、丝毫也没有直接而公开地谈到反对派的那条会使工人阶级同农民决裂而且不能不使工人阶级同农民决裂的非常有害的路线。

但是，我现在要尽力把反对派首领们周密地瞒着工农的那些东西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摆到桌面上来，使反对派今后不敢再欺骗党。我指的是伊万·尼基梯奇·斯米尔诺夫不久以前在党的罗果日—西蒙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反对派的领导者之一斯米尔诺夫是少数有勇气吐露反对派路线真情的诚实的反对派分子中的一个。你们想知道反对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上的真正“政纲”是怎样的吗？那就请读一读斯米尔诺夫的演说，研究一下这个演说，因为斯米尔诺夫的演说是反对派少有的道出我们的反对派的真正立场的全部真情的文件之一。

请看斯米尔诺夫在演说中说些什么：

“我们说，必须修改我们的国家预算，使我们的五十亿预算大部分用在工业方面，因为**同中**◇218◇**农闹翻总比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要好些**。”

这就是反对派的首领们在其“政纲”和反提纲中隐藏起来而为反对派的另一个首领斯米尔诺夫老老实实地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全部东西中的一个主要东西。

由此可见，“挽救”革命的手段原来不是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而是同中农**闹翻**。

列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六三〕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重要的不是同农民、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是同他们闹翻。

列宁说过，不只是说过，而且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反复地说过，不“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六四〕。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可以用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来代替。

列宁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我们不应该同农民一道向前迈进，而应该同他们闹翻。

党和反对派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就在这里。

反对派企图在自己的“政纲”中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于是就用恭维农民的话来掩人耳目，伪善地攻击党，说党有富农倾向。可是，斯米尔诺夫对反对派的“政纲”提出了根本的修正，扯下了反对派◇219◇首领们的假面具，向党透露了反对派的真情，即反对派的**真正**政纲的真情。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是旨在欺骗党和工人阶级的一纸空文。

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同中农闹翻的政策就是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因为中农至少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六十。正因为如此，同中农闹翻的政策就会把多数农民推入富农的怀抱。而把多数农民推入富农怀抱的政策就是加强富农，孤立贫农，削弱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使富农便于扼杀贫农。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实行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也就是在农村中掀起内战，阻碍我们以农民生产的原料（棉花、甜菜、亚麻、皮革、羊毛等等）供应我国工业，打乱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摧毁我国轻工业的基础，破坏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破坏我们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计划。

同志们，如果不看反对派在其“政纲”和反提纲中的那些空洞的声明，而看斯米尔诺夫对我们做了权威性的解释的反对派的真正政策，那末问题就是这样。

我决不是责备反对派有意造成这一切灾祸。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的愿望和意图，而在于反对派主张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所必然引起的后果。

反对派在这方面的遭遇和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里面熊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笑声）不用说，熊用一块大石头砸碎它的隐士朋友的脑袋，原来是想把隐士脸上那只讨厌的苍蝇赶走。它的愿◇220◇望是再友善不过了。然而熊的友善的愿望产生出来的远不是友善的行动，结果隐士一命呜呼。当然，反对派希望革命一帆风顺。但是，反对派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却必然使革命遭到毁灭，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到毁灭，使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遭到破坏。

反对派的“政纲”是破坏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政纲，是破坏我们整个建设工作的政纲，是破坏工业化事业的政纲。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党的问题。

列宁说，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反对派实际上却持着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不是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而是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分裂党，成立第二党。固

然，关于党的统一，反对派说了又写，写了又说，甚至不是在说而是在喊叫。但是，反对派关于党的统一的言论是一种旨在欺骗党的伪善的空话。（鼓掌）

因为反对派一方面谈论和喊叫统一，另一方面却在建立新的反列宁的党。他们不仅在建立，而且已经建成了这个党。过去曾是反对派分子的库佐夫尼柯夫、佐夫和烈诺的演说之类的真凭实据证明了这一点。◇221◇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凭据可以证明反对派成立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等等的反列宁的党已经一年多了。反对派除了虚伪地空谈统一以外，还能用什么来反驳这些事实呢？反对派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要把他们推到第二党的立场上去是办不到的。真是怪事！难道中央什么时候把反对派往这样的立场推过吗？中央一直在制止反对派滚到组织第二党的路线上去，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这两年来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历史就是我们党中央设法制止反对派的分裂行为并使反对派分子留在党内的历史。

就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对派的人所共知的“声明”的发表经过来说吧。难道这不是中央委员会想要使反对派留在党内吗？

再拿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反对派的第二次“声明”来说吧。如果这不是说明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关怀着如何使反对派留在统一的党内，那又说明什么呢？

结果怎样呢？结果反对派发表了关于统一的声明，提出了关于统一的诺言，提出了关于取消派别活动的保证，实际上却继续在建立第二党。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决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反对派。说明不应根据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而应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

列宁说，要学会不根据诺言和“政纲”，而根据行动来考查一切

集团、派别和政党。我们认为我们◇222◇必须照列宁那样做，不根据反对派编造的文件和“政纲”而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

反对派写出“政纲”和反提纲，喊叫党的统一，这是欺骗党，这是虚伪，这是空洞的**言论**。反对派建立新党，成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和无产阶级的纪律，这是反对派的**行动**，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已经建立了一个什么真正的党。不，这一点他们没有做到，而且是永远做不到的。他们做不到，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他们。反对派企图建立新党，建立第二党，其实是拿建党当儿戏，拿成立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当儿戏。被打垮的和丑态毕露的反对派现在是拿建党，拿成立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当游戏来安慰自己。（笑声，鼓掌。）

但是，同志们，游戏是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的建党游戏只能博人一笑。因为对党来说，这种游戏不过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计谋罢了。

然而，这不仅和党有关系，我国还有阶级，还有反苏维埃分子。而这些反苏维埃分子注视着反对派的游戏，向他们学习如何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我国革命。在这些分子看来，反对派的建党游戏、反对派对党的攻击、反对派的反苏维埃勾当是一种学校，是一种向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发动反革命力量的预备学校。

无怪乎各种反苏维埃分子都麕集在反对派的周围。反对派的建党游戏的危险性就在这里。正因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危险性，党对反对派的反苏维埃把戏就不能坐视不理，党就必须把它连根◇223◇铲除。

工人阶级不能不看到反对派这种反党游戏的全部危险性。在反对派看来，党是棋盘。反对派进行反党的斗争就像下棋一样。他们今天提出取消派别活动的声明，明天就唾弃自己这个声明，后天他们又提出新的声明，以便过几天再唾弃自己这个声明。这就是反对派走的棋步。他们是棋手，只不过是棋手。

工人阶级就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党。在工人阶级看来，党不是棋盘，而是解放自己的工具。在工人阶级看来，党不是棋盘，而是战胜敌人、争取新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鄙视那些把他们的党、把他们最神圣的东西变成反对派棋手用来玩弄骗人把戏的棋盘的人。因为工人阶级不能不知道，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铁的纪律，分裂我们党，实质上就是破坏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派的“政纲”是破坏我们党的政纲，是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政纲，是发动反苏维埃力量的政纲，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纲。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即我国革命的前途问题。◇224◇

反对派整个方针的特征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不相信工人阶级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本领。

我已经引证斯米尔诺夫的演说中大家都知道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说如果我们不同中农闹翻，我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遭到“灭亡”。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反对派分子高唱革命的“灭亡”的滥调。我们不是第一次在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中看到他们在困难面前叫苦连天，张皇失措，预言我国革命日暮途穷，势必破产。反对派自从自己的派别政策遭到接二连三的破产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关于我国革命的“灭亡”的叫喊，他们硬把自己集团的灭亡说成革命的“灭亡”。反对派只要处于少数地位，只要受到党的痛击，他们就跑到大街上叫喊革命的“灭亡”，利用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反对党。

还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时期，革命处在相当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因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党击败，于是叫喊起我国革命的

“灭亡”来了。但是革命没有灭亡，托洛茨基的预言终究不过是无谓的预言而已。

一九二一年，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由于取消余粮收集制，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当时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遭到一次失败，于是他又开始叫喊革命的“灭亡”。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政治局（当时列宁同志在场），托洛茨基断言“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毁灭已经为期不远了。（笑声）但是革命没有灭亡，困难被克服了，关于革命的“灭亡”的歇斯底里叫嚣终究不过是叫嚣而已。◇225◇

我不知道当时布谷鸟叫过还是没有叫过。（笑声）如果布谷鸟叫过，那就应当承认：布谷鸟叫错了。（鼓掌，笑声。）

一九二三年，因施行新经济政策而产生新困难的时期，即发生销售危机的时期，托洛茨基又像布谷鸟一样啼叫革命的“灭亡”，硬把自己的集团在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失败说成革命的失败。但是革命不顾这些啼叫，克服了当时面临的一切困难。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即随着我国工业的增长而产生新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这一次已和加米涅夫及季诺维也夫一道）又啼叫革命的“灭亡”，硬把自己的集团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失败说成革命的失败。但是革命并不打算灭亡，自封的预言家倒被摈弃在一边了，而困难也像过去每次一样被克服了，因为对布尔什维克说来，困难的存在并不是要人们叫苦和哭泣，而是要人们去克服它。（热烈鼓掌）

现在，在一九二七年末，因为在用新技术改造我国全部经济的时期中遇到一些新的困难，他们又开始啼叫革命的“灭亡”，藉以掩饰他们集团本身的真正灭亡。但是，同志们，你们都看到，革命还活着而且很健康，在灭亡的是另外一些人。

他们叫来叫去，一直叫到自己完蛋。（笑声）

反对派的“政纲”是我国革命的“灭亡”的政纲。◇226◇

五 今后怎样？

在引起我们意见分歧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我国革命前途等问题上，反对派的真正政纲就是如此。

你们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政纲证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党，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我国革命。这是那些违背了列宁主义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的政纲。

既然这样，党和工人阶级完全摈弃了反对派，那又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反对派在最近争论期间的反党斗争中遭到可耻的破产的原因。

有人问我们：今后怎样？

反对派抱怨说，他们近几天提出了一个由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签名的关于统一的声明，可是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老实说，既然反对派的虚伪声明一再被他们的分裂行动所推翻，对于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伪善声明，又能怎样答复呢？大家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像是在一九〇七年，有过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类似的声明。（听众喊道；“对！”）当时列宁把这个声明叫做“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六五〕。（笑声）我认为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伪善行为和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是毫无二致的。（听众喊道：“完全对！”）反对派两次欺骗了党。现在他们又想第三次欺骗◇227◇党。同志们，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欺骗我们受够了，他们的游戏我们看够了。（鼓掌）

今后怎样？

同志们，今后没有地方可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越出党所容许的一切范围了。决不能再同时在两个党内摇来摆去了，决不能既在原来的列宁的党（这是统一的和唯一的党）内又在新的托洛茨基的党内摇来

摆去了。必须在这两个党中间选择一个。

或者是反对派自己取消这个第二党即托洛茨基党，放弃自己的反列宁的观点，并在全党面前公开痛斥自己的错误；

或者是反对派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自己来把托洛茨基党消灭干净。（鼓掌）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或者是反对派分子采取这个必要的步骤，或者是反对派分子不这样做，那末他们就得从党内滚出去。（热烈鼓掌多时，全场欢呼，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二六九号◇228◇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六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和九日
“真理报”第二七九号和第二八二号
◇230◇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一月三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的外部状况不仅以我国内部力量为转移，而且以这种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以包围着我国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为转移，以这些国家力量的强弱、以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力量的强弱、以这些阶级的革命运动力量的强弱为转移。至于我国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那我就不讲了。

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应当从说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状况讲起。

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尖锐化

（甲）第一个问题就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情况。◇231◇

同志们，这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近两年来，即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比战前水平提高了一步。

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世界**生铁**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一九二六年已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点五，一九二七年还没有完全的材料，只有上半年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生铁产量还在继续增加。

世界**钢**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五，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六。

世界**煤**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九，一九二六年略为下降，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这显然是受了英国罢工的影响。

世界**棉花**消费量：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五。

世界五种**谷物**〔六七〕收获量：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二，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五，一九二七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三。

由此可见，世界生产的总指数是在慢慢地小步地前进，渐渐超过了战前水平。

但是同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是慢步前进，而是向前跃进，越过了战前水平，例如美国和日本◇232◇（在某些方面）就是如此。下面是关于美国的材料：加工工业的增长，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二；采掘工业的增长，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四。

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不像生产增长那么快，它常常是落后

于生产的，但是终究已经接近战前水平了。全世界的和各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就个别国家来说：美国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三，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法国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德国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八和百分之七十三点六；日本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六点九和百分之一百七十点一。

整个说来，世界贸易已经接近战前水平，而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

最后，还有第三类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工业的合理化，新工业部门的建立，托拉斯化的加强，工业卡特尔化在国际范围内的加强。我想这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指出一点，就是资本不仅在增加产量方面和贸易方面都有成绩，而且在改进生产技术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在生产合理化方面也都有成绩，而这一切又使大托拉斯进一步加强，并使势力雄厚的新的垄断性卡特尔相继成立。

同志们，这就是应该指出并且必须用以作为根据的一些事实。◇233◇

这一切是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就是持久的、巩固的呢？当然不是！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六八〕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能达到战前水平，能超过战前水平，能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但这还不是说——还远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能够持久，资本主义能够恢复它在战前的那种稳固性。恰恰相反，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

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乙）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这种增长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发展**不平衡**。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并不是彼此不相妨碍，不相倾轧，一个跟着一个地平稳均衡地前进，而是相反，各洲、各国间彼此进行着争夺市场霸权的殊死斗争，其中一些国家被排挤并衰落下去，另一些国家前进并兴盛起来。

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洲，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于是美亚两洲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欧洲的比重却日益减小。

现在列举一些数字：欧洲在一九二二年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美洲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亚洲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二点三，而在一九二五年欧洲的比重已降到百◇234◇分之五十，美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亚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十六。一方面有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国家（美国以及日本在某些方面），同时又有经济衰落的国家（英国）。一方面有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德国和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些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和印度），同时又有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国家（法国、意大利）。销售市场觊觎者的数量在增多，生产能力在增长，商品供给量在增加，而市场的规模和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础。

（丙）生产能力不断增长与市场相对固定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市场问题成为目前资本主义主要问题这一事实的根源。一般销售市场问题的尖锐化，特别是国外市场问题的尖锐化，尤其是资本输出市场问题的尖锐化，——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状。

正因为如此，工厂开工不足就成为通常的现象。加强关税壁垒只不过是火上加油。资本主义已经感到现在的市场范围和势力范围太狭窄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的企图，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结果。

大家知道，银行家们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关于贸易自由的著名宣言〔六九〕，结果遭到了破产。 国际联盟在一九二七年为达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统一”而召开的经济会议，结果也遭到了破产。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市场问题，对资本主义已经行不通了。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武力、军事冲突、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从稳定中产生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235◇

二、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甲）由于上述原因，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作为国外市场基础的势力范围的问题就成为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我已经说过，由于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确立的目前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情况已经过时了。这种分配现在不能使美国满意，因为美国不以南美洲为满足而力图侵入亚洲（首先是侵入中国）；也不能使英国满意，因为英国正在丧失它的自治领和东方许多极重要的市场；也不能使日本满意，因为英美两国在中国时常“妨碍”日本的行动；也不能使意大利和法国满意，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多瑙河沿岸各国和地中海一带有着许许多多的“争端”；尤其是不能使德国满意，因为德国到现在还没有殖民地。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力求重新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共同”趋向。用不着证明，亚洲市场和通往亚洲市场的道路成了主要的斗争场所。由此就产生了许多成为新冲突的根源的关键问题。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亚洲和通往亚洲的道路的霸权的根源的所谓太平洋问题（美、日、英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地中海沿岸优势、争夺通往东方的捷径的根源的地中海问题（英、法、意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石油问题（英、美两国的对抗）的尖锐化，因为没有石油就不

能作战，谁在石油方面占优势，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以前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张伯伦关于“调处”地中海问题的“最后”计划。我不能担保这个计◇236◇划的确实性。但张伯伦计划在报刊上出现是一种征兆，这却是不容怀疑的。这个计划规定把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从法国手中转到意大利手中，把丹吉尔交给法国而由法国付给西班牙一笔补偿费，把喀麦隆归还德国，意大利必须在巴尔干停止“胡闹”等等。

这一切都是在反苏的旗帜下进行的。大家知道，现在每进行一种卑鄙勾当都是要把苏联扯上的。可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究竟在哪里呢？这个计划的用意就在于把法国资产阶级从叙利亚排挤出去。叙利亚历来就是通往东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的门户。从叙利亚可以损害英国在苏彝士运河一带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利益。所以张伯伦显然是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情形的。不用说，这个计划在报刊上出现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个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列强”间目前关系中所包藏着的那种争端、纠纷和军事冲突的特征。

至于石油问题和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的现状，那末美国著名杂志“世界事业”〔七O〕十月号上关于这一点是说得相当清楚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间的和平与相互谅解的非常实际的威胁……美国政府对本国实业家的支持必将随着这方面需要的增长而加强。倘若英国政府把自己和英国**石油**工业视为一体，那末美国政府迟早也会把自己和美国**石油**工业视为一体。斗争一旦转到两国政府方面，就不能不使**战争危险性**极度增大。”

毫无疑问，列强之间正着手组织各种新的联盟，以便准备新的战争来争夺国外市场，争夺原料产◇237◇地，争夺通往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道路。

（乙）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对日益成熟的军事冲突是否有过“和

平调处”的企图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企图比预料的还要多。但这些企图没有、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仅如此，这些企图只不过是一种用来掩饰“列强”准备新战争的幌子，一种用来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幌子。

就拿国际联盟来说吧，根据惯于说谎的资产阶级刊物和说谎本领也并不逊色的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意见，它是和平的工具。国际联盟关于和平、关于废除军备和裁减军备的空谈究竟有什么结果呢？除了欺骗群众，除了使军备竞争更形加剧，除了使日益成熟的冲突更形尖锐之外，并没有什么良好的结果。国际联盟空谈和平与废除军备已经三年之久，所谓第二国际支持这种虚伪的空谈也已经三年之久，而“各国”仍然继续加紧武装，扩大“列强”间旧有的冲突，增加新的冲突，因而破坏和平事业，——这种事实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

三国海军裁军会议（英、美、日三国会议）〔七一〕的失败不是说明太平洋问题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不是说明“列强”既不愿意废除军备也不愿意裁减军备，又是说明什么呢？国际联盟对于防止这种危险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或者拿苏联代表团不久以前在日内瓦关于真正（而不是装模作样）废除军备问题的发言〔七二〕来说吧。李维诺夫同志提出关于完全废除军备的爽直而诚恳的宣言竟使国际联盟目瞪口呆，竟使国际联盟感到是“完全出乎意料”，——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这个事实不正说明国际联盟不是和平与废除◇238◇军备的工具，而是掩饰新的军备竞争和新战争准备的工具吗？

从日本到英国，从法国到美国，所有各国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力竭声嘶地叫喊苏联关于废除军备的建议是“不诚恳”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来检验一下苏联建议的诚恳性，不立刻切实地着手废除军备或至少是大量地裁减军备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或者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现在的“友好条约”体系即法国和南斯

拉夫的条约、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由皮尔苏茨基准备的波兰和立陶宛的“友好条约”、“罗迦诺体系”〔七三〕、“罗迦诺精神”等等来说吧，这不是准备新战争和为未来的军事冲突部署力量的体系，又是什么呢？

或者拿下面几件事实来说吧：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法、英、意、美、日等国的**军队员额**由一百八十八万八千人增加到二百二十六万二千人；在同一时期，上述各国的**军事预算**由二十三亿四千五百万金卢布增加到三十九亿四千八百万金卢布；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五个国家的**军用飞机**数量，由二千六百五十五架增加到四千三百四十架；这五个国家的巡洋舰吨数由一九二二年的七十二万四千吨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八十六万四千吨；据美国军用化学处处长福莱斯将军所发表的人所共知的声明所说，**军用化学**方面的情况如下：“一个重四百五十公斤的装有路易氏毒气的空投毒气弹，能把纽约十个街区变成无人地区，而五十架飞机投下一百吨路易氏毒气弹就能把整个纽约变成至少在一个星期内是无人地区。”

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新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又是说明什么呢？◇239◇

这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国际联盟的“和平政策”和“废除军备”政策的结果，以及社会民主党效忠资本的行为的结果。

从前扩张军备是以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的德国的存在为理由的。现在这种“理由”已因德国被解除武装而消失了。

扩张军备是由“列强”间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引起的，“罗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以为现在的“和平关系”就好像一件用细线把一些破布片缝成的破旧的衬衫。只要稍微用力把这根细线一扯，在某个地方把它扯断，这整件衬衫就会东一块，西一块，变成一些破布片。只要在阿尔巴尼

亚或立陶宛、在中国或北非的某个地方把现在的“和平关系”摇动一下，这整个“和平关系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

上次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在萨拉也沃发生的刺杀案〔七四〕就引起了战争。

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

从稳定中成长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

（甲）为了进行战争，单是扩张军备还不够，单是组织新的联盟还不够。为了进行战争，资本主◇240◇义国家还必须巩固后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预先巩固自己的后方，不预先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就不能进行严重的战争。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逐渐法西斯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统治法国的是右派集团，统治英国的是希克斯—德特丁—厄卡特集团，统治德国的是资产阶级集团，统治日本的是军阀政党，统治意大利和波兰的是法西斯政府，——这个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因此，工人阶级遭到压制，英国颁布工会法〔七五〕，法国颁布“民族武装”法〔七六〕，许多国家取消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到处向无产阶级进攻。

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遭到更厉害的压制，帝国主义军队在这些国家内日益增加，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万，其中有七十多万兵士驻扎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和“属地”内。

（乙）不难了解，各国法西斯化的政府所施行的这种残暴压制不能不引起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革命运动增长的事实，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

你们自己判断吧。**整个地球上**十九亿零五百万人口中，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住在苏联，有二亿六千四百万住在中间国家里，只有三亿六千三百万是住在那些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241◇

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中国革命还没有导致直接战胜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决定的意义。伟大的人民革命总是不会在它的发动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彻底胜利的。这样的革命总是经过来潮和退潮而成长和加强起来的。各国情形都是如此，包括俄国在内。中国情形也将是如此。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它已经把几亿被剥削被压迫者从长期的沉眠中唤醒并使他们行动起来，它已经彻底揭穿了各系军阀的反革命性，撕破了那帮效忠反革命的国民党分子的假面具，巩固了共产党在下层民众中间的威信，把整个运动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被压迫阶级千百万人民中间引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那末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层工人群众日益左倾和革命趋于活跃的明显征象。英国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维也纳工人的革命发动，法国和德国因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而举行的革命游行示威，德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运动中获得的成就，英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那种工人向左走而领袖却向右投入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怀抱的明显分化，第二国际的蜕化为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直接附属品，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间威信的日益降低，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在世界各国无产者中间影响和威信的普遍增高，苏联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中间威信的增高，“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七七〕的召开等等，——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都说◇242◇明欧洲正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

既然像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这样的事件能够成为工人阶级游行示

威的原因，那末，这无疑地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已积聚了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寻找并且将来还要寻找原因，寻找机会，寻找有时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机会，以便冲出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正处在殖民地和宗主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

从稳定中产生着新的革命高潮。

四、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甲）由此可见，世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和日益加剧的不稳定状态的一切征象已经出现了。

如果可以认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引起内部紊乱和外部关系破裂的**暂时的**战后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并接着来了一个局部稳定时期，那末，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

稳定不仅没有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夺取市场斗争的加剧，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必要，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破产，由于可能发生新战争而狂热地建立新联盟和部署力量，军备的疯狂扩张，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国家◇243◇的残暴压制，殖民地和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威信的增高，苏联实力的加强和它在欧洲工人及殖民地劳动群众中威信的增高，——这一切就是不能不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和不稳固了。

如果大约两年前可以说并且应该说欧洲革命浪潮是在退落，那末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欧洲显然正在进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殖民地和附属国更不必说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的处境已

经愈来愈不可收拾了。

（乙）资本家希望苏联俯首就范，希望苏联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苏联在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降低，他们的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了。苏联正是作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成长和发展。它在全世界工农群众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强和巩固。苏联作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瓦解世界帝国主义势力，破坏它在欧洲和殖民地各国的稳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苏联显然日益成为欧洲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旗帜。

所以为了给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扫清道路，为了加紧压迫“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制服“自己的”殖民地以巩固资本主义的后方，据资产阶级头子们看来，首先就必须制服苏联，制服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和苗圃，这个同时又是一个可供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商品的巨大市场。因此，帝国主义者中间的武装干涉趋向活跃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孤立苏联的政策，包围苏联的政策，准备条件来对苏联进行战争◇244◇的政策。

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资本主义危机增长的环境中最“受威胁”和最“受苦”的要算是英国资产阶级了，因此，它在加强武装干涉的趋向方面也就担负着发起的作用。很明显，苏联工人对英国煤矿工人的帮助和苏联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不能不是火上加油。这一切情况就决定了英国同苏联的绝交以及其他某些国家同苏联关系的恶化。

（丙）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方面两种趋向的斗争，即军事侵略的趋向（首先是英国）和维持和平关系的趋向（其他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是目前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表明和平关系的趋向的事实是：和土耳其

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缔结了保证条约，和希腊缔结了关税协定，和德国缔结了贷款协定，和阿富汗缔结了保证条约，和立陶宛缔结了保证条约，和拉脱维亚商定了缔结保证条约，和土耳其缔结了通商条约，调解了和瑞士的纠纷，和波斯缔结了中立条约，改善了和日本的关系，增进了和美意两国的经济关系。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表明军事侵略的趋向的事实是：英国就资助罢工的媒矿工人一事提出照会，苏联驻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遭到袭击，阿尔柯斯遭到袭击，英国同苏联绝交，沃依柯夫◇245◇被杀害，英国雇佣走狗在苏联境内进行恐怖活动，苏法关系因召回拉柯夫斯基问题而趋于尖锐化。

如果大约两年前可以说并且应该说当时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某种均势而“和平共居”的时期，那末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

固然，英国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企图暂时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某些国家愿意和苏联维持经济关系，苏联奉行和平政策，欧洲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帝国主义者害怕一旦对苏联开战会在自己家里爆发革命。但这并不等于英国会放弃组织反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不等于它组织不成这样的战线。虽然英国暂时还没有成功，但是战争威胁仍然存在。

因此，任务就是要估计到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推迟战争，向资本家“赎买”，并采取一切办法来保持和平关系。

我们不能忘记列宁的话，他说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推迟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资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的时候。

因此，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是我们必须担负的任务。

我国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并存。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有时债务和贷款问题成为一种障碍。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这政策是根据“你给我，◇246◇我就给你”这个公式。你贷款给我们振兴工业，你就能得到一部分战前的债款，我们把这部分债款当做贷款的附加利息。你不给，你就得不到。事实说明，我们在取得工业贷款方面有了一些成绩。这里我不仅是指德国，而且是指美国、英国。其秘密在哪里呢？就在于我国是一个输入机器装备的最大市场，而资本主义国家正需要出售这种产品。

五、结 论

总括起来说：

第一、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必然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中以英国为首的一部分国家趋向于武装干涉；资本主义世界中另一部分国家不愿意卷入对苏战争而宁愿调整同苏联的经济关系；这两种趋向之间进行着斗争，使苏联有一定的可能注意到这种矛盾来保持和平。

第二、稳定趋于瓦解；殖民地革命运动增长；欧洲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征象；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在全世界的威信日益提高；欧洲工人阶级对苏联的同情显着增长；苏联的实力日益增长，我国工人阶级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因此，党的任务是：

（一）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247◇

（甲）**为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而斗争**；

（乙）**为巩固革命工会和巩固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而斗争**；

（丙）为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间的友谊而斗争；

（丁）为加强苏联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解放运动的结合而斗争。

（二）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

（甲）为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

（乙）反对英国的武装干涉趋向，加强苏联国防力量；

（丙）奉行和平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

（丁）在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基础上扩大我国与外国间的贸易；

（戊）同那些受帝国主义统治国压迫和剥削的所谓“弱小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建立密切联系。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同志们，现在让我谈谈我国的内部状况，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和巩固等问题。◇248◇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曾经委托中央委员会从下列基本任务着眼来进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事业：

第一、使我们的政策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蒸蒸日上；

第二、使党的政策能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保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

第三、在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比重日益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比重日益减小；

第四、使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新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某些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等等都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使总的发展能保障我国的

经济独立，能保障我国不致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第五、使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巩固起来；

第六、使工人阶级和贫农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党，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执行这些任务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一、整个国民经济

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里我要举出一些主要的数字来说明报告所涉及的◇249◇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形，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增长情形。这些数字是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统计中引来的。我指的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草案。

（甲）两年来苏联全部国民经济生产的增长情形：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新的统计，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农业总产值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全部工业产值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而现在，经过了两年之后，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农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三，工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点九。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数字，预计农业产值将进一步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八，工业产值将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四。

两年来国内中介贸易额的增长情形：如果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流转额为一百（一百四十六亿一千三百万切尔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二百八十七亿七千五百万卢布），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进一步增加到上年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强（三百三十四亿四千万卢布）。

两年来我国信贷系统的发展情形：如果以我国所有信贷机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综合平衡表上的数额为一百（五十三亿四千三百万切尔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八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卢布）。毫无疑问，我们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一定◇250◇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两年来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情形：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国全部铁路货运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一，而现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六。更不必说，最近两年来我国铁路网长度已经由七万四千四百公里增加到七万六千二百公里，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三，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

两年来国家预算的增长情形：我国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总预算（统一的国家预算加上地方预算）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五十亿零二千四百万卢布），而现在，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总预算应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二（七十亿卢布以上）。两年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五。

两年来对外贸易的增长情形：我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对外贸易总额为十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即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七，而现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达到十四亿八千三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十六亿二千六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九。

对外贸易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

第一、资产阶级国家时常阻碍我国对外贸易，有时甚至实行暗中封锁；◇251◇

第二、我们不能按照资产阶级“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的公式去进行贸易。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有五千七百万卢布

的出超，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以后对外贸易达到出超的头一年。

总括起来说，两年来我国全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情形如下：苏联国民收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百五十五亿八千九百万切尔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已经达到二百零二亿五千二百万卢布，就是说，一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九，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达到二百二十五亿六千万卢布，就是说，一年内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四。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达到二百四十二亿零八百万卢布，就是说，再增加百分之七点三。

如果注意到美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国国民收入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次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七），而其他各国，例如英国和德国，国民收入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那就应当承认，和欧美资本主义大国相比，**苏联国民收入近几年来的增加速度是打破纪录的**。

结论：我国国民经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

党的任务：继续在一切生产部门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乙）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是盲目地按照单纯增加产量的方式发展的，而是遵循一定的严格规定的方向发展的。下面两个基本情况是近两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252◇

第一、我国国民经济是**在**国家**工业化的标志下**，在工业对农业的作用不断增大的标志下发展的。

第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所遵循的**方向**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生产方面和商品流转方面的**比重和领导作用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减小。

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运输业和电气化除外）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按战前价格计算，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农业的比重占百分之

六十七点六，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业的比重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农业的比重已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的比重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点二，农业的比重将要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八。

两年来作为工业基本核心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六，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两年来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大工业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四，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

至于工业的**商品**产值和它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比重，那末，两年来工业品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一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一九◇253◇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点七，而农业的商品产值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降低到百分之四十点五，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结论：我国正在变成工业国。

党的任务：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

两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和领导作用增大而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减小的数字如下：国民经济中公营部分（国营工业、合作社工业、运输业、电气化等等）的**投资**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二十六亿八千三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三十四亿五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公营部分的投资将由一九二

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增加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非公营部分的投资却一直相对地减少，只在绝对数字上略有增加，即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十七亿一千七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十八亿三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非公营部分的投资比重将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降低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公营**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一◇254◇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另一方面非公营工业的比重却逐年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全部工业产值中的百分之十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十四，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降低到百分之十二点一。

至于私人资本在**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的比重，那末，它不仅在相对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三点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二点四），而且在绝对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一亿六千九百万战前卢布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七二七年度的一亿六千五百万战前卢布）。

在国内**商品流转**方面，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也同样受到排挤。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公营部分在全部中介贸易额方面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在批发方面为百分之九十点六，在零售方面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公营部分在全部流转方面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在批发方面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四点九，在零售方面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点四；而私营部分同一时期内在全部中介贸易额方面的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减少到百分之十八点一，在批发方面由百分之九点四减少到百分之五点一，在零售方面由百分之

四十二点七减少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而且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私营部分在所有各种商业方面的比重还要继续降低。

结论：我国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正在把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到次要地位并逐步把◇255◇**它从国民经济中排挤出去。**

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出“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即在施行新经济政策后提出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我们能够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资本家并学会经商，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或者私人资本竟能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制造分裂而战胜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只有瞎子或疯子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具有另一种性质。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从商业方面转移到生产方面，转移到手工业生产方面和农业生产方面，在这些方面私人资本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必须有系统地把它从这里排挤出去。

党的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

二、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速度

（甲）占我国**全部**工业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国有化大工业产值的增加如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国有化大工业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而按照国家计划◇256◇委员会的那个大大低于实际可能性的五年计划草案，五年内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工业产值将比战前增加**一倍**。

如果拿包括大工业（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和小工业在内的我国全部工业总产值来说，那末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草案，产值平均每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二，这样，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全部工业产值比战前水平差不多将增加百分之七十。

美国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的数字，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八点二，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五点二，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二点六，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三点六。俄国平均每年增长的数字，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的十年内为百分之十点七，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八年内为百分之八点一。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和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的百分数是打破纪录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并且应该指出，美国工业，尤其是俄国战前工业，几乎都是靠外资的大量流入来发育滋长的，而我们的国有化工业却不得不依靠本身的积累。

并且应该指出，我们的国有化工业已经进入改造时期，这时重新装备旧工厂和建立新工厂对于工业产值的增加有决定的意义。

按发展速度来说，我国全部工业，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工◇257◇**业的发展。**

（乙）为什么我国大工业能有这种空前的发展速度呢？

第一、因为它是国有化的工业，它不必去追求私人资本主义集团的那种自私的反社会的利益，它有可能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发展。

第二、因为它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它有一切可能打败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第三、因为国家掌握着国有化运输业、国有化信贷业、国有化对外贸易和国家的总预算，国家有一切可能按照计划领导国有化工业，使它成为统一的工业经济，这就使国有化工业和其他工业比较起来有

很大的优越性并使它的发展速度加快许多倍。

第四、因为国有化工业是最大最强的工业，它有一切可能实行不断降低成本、减低出厂价格和减低产品价格的政策，从而扩大自己的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不断增长的泉源。

第五、因为国有化工业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由于它一贯执行减低价格的政策）能够在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和农民彼此逐渐接近的情况下发展；它和资本主义工业截然不同，因为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榨取农民脂膏的资产阶级城市和陷于破产的农村间的敌对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发展的。

最后，因为国有化工业依靠领导我国全部发展的工人阶级，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它有◇258◇可能很容易地提高技术，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而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下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最近两年来我国技术的迅速提高和新的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业、机床制造业、涡轮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等等）的迅速发展无可怀疑地说明了这一切。

我们**在**缩短工作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同时**又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条件下**所实行的生产合理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空前未有的发展速度直接地和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苏维埃生产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列宁就正确指出，我们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党的任务：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已经达到的发展速度，并在最近的

将来加快这种速度，以便创造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必需的有利条件。

三、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

（甲）农村中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产值的增加比较缓慢。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总产值（按战◇259◇前卢布计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百分之三点二，而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那个大大低于实际可能性的五年计划草案，五年内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农业产值将比战前产值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

这是勉强过得去的农业增产速度。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增长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是打破纪录的，也不能认为这种增长足以使农业和我们的国有化工业之间将来保持必要的平衡。

美国农业总产值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九点三，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一，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四。战前俄国农业产值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二到百分之三点五。

固然，我国农业产值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的五年内每年将增加百分之四点八，而且苏维埃时期农业产值增长的百分数和资本主义俄国时期的增长相比显然是增大了。但是不应当忘记，国有化工业的总产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比战前工业产值增加**一倍**，全部工业产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超过战前水平约百分之**七十**，而农业产值到那时候将仅仅超过战前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决不能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260◇

（乙）为什么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国有化工业的发展速度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分散的农业生产没有我们国有化的联合经营的大工业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首先，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分成许多零星小块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大部分暂时还受着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支配。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所以它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这些情况就使分散的农业不可能具有我们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按计划经营的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在于放慢我国一般工业特别是我们国有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吧？决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极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空想。（喊声：“对！”）国有化工业应当而且一定要加速发展。这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证。这是最后使农业本身工业化的保证。

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261◇

不这样，我国的农业就不能赶上更不能超过那些农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等国）。

在限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农户引上合作发展的轨道、使国家有计划地循着从供销上和生产上掌握农民经济的路线去影响农村等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固然都

是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但毕竟只是使农业转上集体制轨道的一些准备措施。

（丙）两年来党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做得不少。但是还远没有做到可能做到的一切。

就所谓**从外部**即从供应农业以各种必需品和销售农产品方面掌握农业来说，我们获得了以下的成绩：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现在已经估全体农户三分之一左右；消费合作社所掌握的对农村的供应量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五十点八；合作社和国家机关所掌振的农产品销售量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三。

但是，就所谓**从内部**即从农业生产方面掌握农业来说，我们是做得太少了。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的产值在全部农业产值中总共只占百分之二强，在农业商品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七强。

这当然有不少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例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善于处理这件工作，不够重视这件工作，农民保守落后，使农民转上公共耕种制轨道所必需的资金不够等等。而这方面需要的资金是很不少的。◇262◇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还没有那种使农业服从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原则所必需的基金。我想，现在我们就要有这种基金了，并且这种基金一定会日益增多。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如果不使它们转上公共耕种制的轨道，就不能真正推进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就不能使我国农业在发展速度上赶上加拿大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农村工作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重要事业上面。

我想，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机关所属的农具租赁站应当在这个事业上起极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国营农场有时帮助农民转上集体耕种制的轨道，使农民获得很大的利益。我指的是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用拖拉机帮助敖德萨区的农民，以及这些农民写信对它的帮助表示感谢。这封信不久以前刊载在“消息报”上。让我把这封信念一下：（喊声：“请吧！”）

“我们，**舍夫琴柯**村、**克拉辛**村、**加里宁**村、‘**红霞**’村和‘**旭日**’村的移民，谨向苏维埃政权致最深切的谢意，感谢它在恢复经济方面给我们很大帮助。原先我们多半是贫农，没有马匹，也没有农具，无法耕种我们所分得的土地，因此，**不得不把它租给当地的老居民富农去耕种而只取得一部分收成**。收成很坏，因为大家都知道，租户是决不会好好耕种别人的土地的。国家所发给我们的少量贷款都被我们吃光了，我们一年比一年穷了。

今年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的一位代表来到我们这里，建议用拖拉机帮我们种地来代替现金贷款。所有的移民，除了个别富农之外，都表示同意，虽然当时大家都不大相信工作会搞好。◇263◇使我们非常高兴而使富农难过的是拖拉机翻耕了全部生荒地和休耕地一连耕耘了五六遍，清除了地里的杂草，并且把所有的地全种上了良种小麦。现在富农已经不再讥笑拖拉机队的工作了。今年因为缺乏雨水，我们区里的农民差不多都没有种上冬麦，而在那些种上冬麦的地里到现在也还没有出苗。**但是在我们这些移民的地里，几百俄亩休耕地生长着一片绿油油的很美丽的小麦，这在那些最富饶的日耳曼移民区也是看不到的**。

除了播种冬麦之外，拖拉机还耕耘了预备种春麦的全部秋翻地。**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一亩土地是荒芜的或者租给别人的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贫农不是在几俄亩休耕地上种有冬麦的**。

我们自从看见拖拉机耕作之后，就再也不愿意继续贫农的小经营了，**我们决定组织用拖拉机耕作的公共农庄，在农庄里不会再有单独的农民的小块庄稼了**。我们已经和塔拉斯·舍夫琴柯国营农场订立了合同，由它负责帮我们组织用拖拉机耕作的农庄。”（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消息报”第二六七号）

农民就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要是这样的例子再多一些，那就可以大大推进农村集体化的事业了。

党的任务：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规定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当前的实际的任务，即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集体耕种制的轨道，因为这条发展道路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克服农村中资本主义成◇264◇分的最重要的手段。

* * *

整个说来，经济建设方面的总结和成绩就是这样。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们，我们在这方面还远不是一切都很好。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着商品荒的因素。这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负数。但可惜这个负数暂时还不能避免。因为我们用比发展轻工业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个事实本身就预先决定了我国在最近几年内还会有商品荒的因素。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这样做。

有些人，例如我们的反对派，他们从投机分子在商店门口排成的长队里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喊叫商品荒，同时要求实行“超工业化”政策。同志们，这当然是蠢话。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收缩重工业而去全力发展轻工业。况且不加速发展重工业，要充分发展轻工业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用增加商品输入的办法来缓和商品荒，有一个时候反对派曾经坚持这一点。但这是很愚蠢的，后来连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减少商品荒的因素，在我国条件下是完全可能办到并且是党所一向坚持的，至于这一工作我们做到怎样的程度，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想，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一切都很好的。◇265◇

其次，无论在我国工业或商业方面都还有相当多的资本家。这些分子所占的比重并不像我们某些同志有时所形容的那样小。这也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

不久以前我看过拉林同志所着的“苏联的私人资本”这本在各方面都很有趣的书。我建议同志们也看看这本书。你们从这本书上可以看到，资本家是多么狡猾和巧妙地拿工艺合作社的旗帜、拿农业合作社的旗帜、拿某些国营商业机关的旗帜来做护身符。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来限制、缩小并从国民经济范围内排除资本主义成分呢？我想，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据我所知，例如在一般手工工业方面，特别是皮革工业和纺织工业方面，就有不少新的百万富翁在盘剥着手工业者和一般小生产者。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从经济上围攻并排除这些剥削分子，使手工业者同合作社或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呢？未必用得着怀疑，这方面还远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可是这个问题对我们却有极重大的意义。

其次，在农村中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从经济上限制并孤立富农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必须严重注意我们合作

社机关的实践中在和富农进行斗争方面、特◇266◇别是在农业贷款方面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形。

再其次，工业品成本、工业品出厂价格、特别是城市商品零售价格，减低的速度非常缓慢。这也是我们经济建设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不能不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碰到了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党机关的很大的反抗。我们的同志们大概不了解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是改进我国工业、扩大市场并增强我国工业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泉源的基本杠杆之一。未必用得着怀疑，只有对这些机关在实行减低价格政策方面所表现的这种惰性和反抗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消灭这个负数。

最后，还有这样一些负数，如预算中的烧酒项目、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后备资源不足。我认为可以开始逐渐减少烧酒的酿造，开辟无线电和电影这样的收入泉源来代替烧酒的收入。真的，为什么不去掌握这些极重要的工具，为什么不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间选派干练人才去做这件事，以便顺利开展工作，使烧酒的酿造终能缩减下去呢？

至于说到对外贸易，我觉得我们经济方面现有的许多困难得不到解决是和输出不够有关的。我们是否能够增加输出呢？我认为是能够的。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去大大增加输出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

关于后备资源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有些同志有时由于欠考虑，有时由于不熟悉情况，说我们没有什么后备资源，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是有些后备资源的。我们国家的一切机关，从县和省，直到区域和中央机关，都在尽力储存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但这种后备资源还很少。这是应当◇267◇承认的。所以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后备资源，有时甚至要缩减某些日常的需要。

同志们，这就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我们必须予以注意，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消除，以便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前进。

四、阶级。国家机关。我国文化的发展

国内经济状况的问题谈完了，现在谈谈政治状况的问题。

（甲）**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和一般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数字如下：雇佣劳动者（失业者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八百二十一万五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一千零三十四万六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和季节工人在内，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五百四十四万八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七百零六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其中大工业的工人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百七十九万四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百三十八万八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一，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则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点四，比战前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在同一时期内，其他社会集团（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减少了（例如资产阶级的比重从百分之五点五减到百分之四点八）。全◇268◇部国营工业中工人的实际工资（附加工资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每月为二十五点一八莫斯科折实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每月为三十二点一四卢布，即两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点四。包括附加工资（社会保险费、文化经费、公用事业费等）在内的工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四。社会保险基金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四亿六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八亿五千二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因而使五十一万三千人有可能住休养所和疗养

院，保证四十六万失业者和七十万领抚恤金者（劳动残废者和内战残废者）领到补助金，并使患病工人在病假期间领到全部工资。

用于工人住宅建筑的费用，两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亿三千二百多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为二亿三千多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达三亿九千一百多万卢布，其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中所规定的五千万卢布。在过去三年中，工业、运输业、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合作社方面用于工人住宅建筑的费用（个人建筑的住宅费用不算）为六亿四千四百七十万卢布，连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拨款共为十亿零三千六百万卢布。这笔经费使我们在三年内建筑了面积四百五十九万四千平方公尺的住宅，使二十五万七千工人（如果把工人家属计算在内就约有九十万人）得到了住房。

失业问题。我必须指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是有出入◇269◇的。我所以引用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数字，是因为这些数字包括了在劳动介绍所登记过的真正失业者。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失业人数在两年内已由九十五万增加到一百零四万八千。其中产业工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而脑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则占百分之七十四。由此可见，我国失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过剩，至于我国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充分吸收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那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

总结：整个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着的提高。

党的任务：继续贯彻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工资的方针。

（乙）**农民**。我想，关于农民的分化问题用不着引用数字，因为我的报告已经拖得这样长，而这些数字又是大家都知道的。毫无疑问，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化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长的是两极，即贫农和富农，而中农则被冲刷。

我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农的数目因有一部分贫农上升为中农而增加起来，富农也正在增多，而贫农却日益减少。这个事实说明，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农都是农业方面的中心人物。依靠贫农，联合中农，这对我国整个建设的命运、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决定的意义。

农村物质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农民收入增加的数字如下：农民的收入在两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三十五亿四千八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增加到四十七亿九千二百◇270◇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一，而农村人口在这个时期内总共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三八。这毫无疑问地证明农村的物质生活状况是在改善。

这并不是说全国一切地区的农民都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来某些地方的收成好坏是很不一致的，而一九二四年歉收的恶果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国家还要救济一般的劳动农民，特别是贫农。国家用来救济劳动农民的款项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为三亿七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四亿二千七百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给贫农的特别救济如下：发给贫苦农户的款项共三千八百万卢布，减免贫苦农户的税款共四千四百万卢布，减免贫苦农户的保险费共九百万卢布，——总共九千一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上述几个方面给贫农的特别救济约为：三千九百万卢布，五千二百万卢布，九百万卢布，——总共约一亿卢布。

总结：基本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改善了。

党的任务：继续贯彻进一步改善基本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提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

（丙）**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与工农相反：没有根据满意苏维埃政权。他们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不满情绪是有其生活根源的。

上面我已经讲过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已经讲过我国工业的增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私人工商业者所占比重的降低，小商人的被排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既然我们的工业和◇271◇我们的商业机关在日益增长，成千上万的中小资本家也就在日益破产。这几年来有多少中小店铺倒闭了呢？有好几千个。有多少小工业主无产阶级化了呢？有好几千个。有多少职员在我们国家机关实行裁员时被解职了呢？有几百几千个。

我们工业的进展、我们商业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机关的改善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而不利于新资产阶级，不利于一般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所以这些阶层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那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因此在这种人中间就产生出反革命情绪。因此就产生出路标转换派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了新资产阶级政治市场上的时髦货色。

但如果以为所有的职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情绪，怀有埋怨和愤懑的情绪，那就错了。虽然新资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知识分子却在分化，数百数千的劳动知识分子离开路标转换派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同志们，这显然是一个应该指出的好现象。

在这方面带头的是技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既然和生产过程密切相连，也就不能不看到布尔什维克是在引导我国向前迈进，使我国情况日益改善。像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德涅泊尔水电站建筑工程、斯维尔水电站建筑工程、土尔克斯坦铁路建筑工程、伏尔加—顿河运河建筑工程以及许多新建的大工厂这类巨大的企业，不能不对技术知识分子中的许多阶层发生一定的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些阶层的命运是和它们的命运相联系的。这对他们说来不仅是饭碗问题，同时也是光荣的事业，创造◇272◇的事业，这自然使他们和工人阶级接近起来，

和苏维埃政权接近起来。

农村的劳动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村教师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们不能不欢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虽然某些知识阶层中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劳动知识分子却正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

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孤立新资产阶级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和城乡苏维埃劳动知识分子的结合。

（丁）**国家机关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关于官僚主义大家都谈得很多，因此没有必要再来多谈这个问题了。无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还是党的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只要我们这里还有国家政权存在，还有国家存在，这个任务就会始终摆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事实。

但是总要有个分寸。如果把反对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弄到毁灭国家机关的地步，弄到使国家机关威信扫地的地步，弄到企图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违背列宁主义，那就是忘记我们的机关是苏维埃机关，是世界上现有一切国家机关中最高类型的国家机关。我们国家机关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通过苏维埃把政权和千百万工农群众联系起来。就在于苏维埃是供数十万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的学校。就在于国家机关不是和千百万人民群众隔绝，而◇273◇是通过许许多多环绕着苏维埃并因而支持着政权机关的群众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团体、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等等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国家机关的弱点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里面有破坏和歪曲国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分子。为了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在一两年内是清除不了的——就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使它和群众接近，依靠新的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人材来革新它，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它，而不是把它搞垮，不是使它威信扫地。列宁说得非常对，他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

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七八〕

我不再多谈我们国家机关中的缺点了，这些缺点本来就是很明显的。我指的首先是“婆婆妈妈的拖拉作风”。我手头有一大堆说明拖拉作风的材料，这些材料揭露出某些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保险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其他机关的玩忽职守的罪行。

例如有一个农民为了求得公允地解决一件事情，一连到一个保险机关去了二十一次，可是始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还有一个农民，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他步行了六百俄里，想要在县社会救济局那里弄清一件事情，可是始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还有一个老太婆，一个五十六岁的农妇，她应人民法庭的传唤，步行了五百俄里，又坐马车走了◇274◇六百多俄里，可是她始终没有得到公允的解决。

这一类的事实多得很，用不着一一列举了。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耻辱！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最后，我要谈谈关于“被打下去的人”的一些事实。原来除了从工人中间被提拔起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被打下去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同志排挤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会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忠诚老实。

例如有一个工人，一个工具钳工，因为很有才干、为人正直而被提拔担任工厂中的某种职务。他一年又一年地工作，很忠实地工作，整顿了秩序，消除了不善经营和浪费的现象。但他这样工作却触犯了一伙打得火热的“共产党员”的利益，扰乱了他们的安宁。结果怎样呢？结果这一伙打得火热的“共产党员”就多方和他为难，因而他不得不“闪开了”。“老兄，你想显得比我们聪明些，不让我们安安稳稳过活和享受，那你就闪开吧”。

还有一个工人，也是一个工具钳工，一个螺丝车床的调整工，被

提拔担任工厂中的某种职务。他拚命地和忠实地工作，但是他这样工作却扰乱了某些人的安宁。结果怎样呢？结果那些人找到机会把这个“不安分的”同志撵走了。这个被提拔的同志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的呢？他的心情是这样：“无论派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我总是努力不辜负对我的信任。可是像这种恶作剧的提拔，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受了极大的侮辱。我希望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始终只是一个希望。无论工厂委员会、工◇275◇厂管理处还是党支部连我说话都不肯听。对于提拔，我是死心了，即使给我一大堆金子，我也决不会去干了。”（见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劳动报”〔七九〕第一二八号）

同志们，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党的任务就是对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国家机关，无情地消灭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实践中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現象。

（戊）**关于列宁的文化革命的口号。**消除官僚主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尽可以责骂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尽可以羞辱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可是，如果广大的工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可能、愿意并善于从下面用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国家机关，那末官僚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所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不仅仅在开展识字运动方面（虽然识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而首先是在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和本领方面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

一九二二年三月，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列宁在致中央的一封由莫洛托夫同志收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①。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276◇化力量。”〔八〇〕

同志们，列宁的这段话是决不能忘记的。（喊声：“对！”）

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加紧为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文化而斗争。

* * *

我国国内政治状况的总结是怎样的呢？

总结就是：**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巩固的政权。**（热烈鼓掌）

然而，苏维埃政权虽然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巩固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会羡慕的政权，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们，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我们布尔什维克不能而且不应当掩饰这些缺陷。

第一、我们还有失业现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我们应当加以克服，无论如何至少也要使它缩小到最低限度。

第二、我们在工人住宅的建筑方面有严重的缺点，我们发生了房荒，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加以克服，或者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使它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们这里不仅在一部分中等阶层中，而且在一部分工人中，甚至在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中，都存在◇277◇着某种反犹太主义的萌芽。同志们，我们必须十分无情地和这种恶劣现象作斗争。

我们还有放松反宗教斗争这样的缺陷。

最后，我们还存在着文化极其落后的情形，不仅从广义上来说是这样，而且从狭义上来说，即从起码识字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因为苏联文盲所占的百分数还是不小的。

同志们，如果我们想以较快的速度前进，我们就必须消灭诸如此类的缺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结束我的报告的这一节的时候，请让我略为谈谈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几项最值得注意的任命。我不谈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任命问题。我也不谈苏联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民委员的任命问题。我只想谈谈最典型的三项任命。你们知道，洛波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五金工人。你们知道，五金工人乌哈诺夫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代替了加米涅夫。你们也知道，还有一个五金工人柯马罗夫当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代替了季诺维也夫。所以我们两个京城的“市长”都是五金工人。（鼓掌）固然他们不是贵族出身，但他们管理京城的事务比任何一个贵族都管理得好。（鼓掌）你们会说这是一种五金化的趋向。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喊声：“正好相反，好得很！”）

但愿资本主义国家，但愿伦敦，但愿巴黎终于能赶上我们，并选出自己的五金工人来担任“市长”。（鼓掌）◇278◇

三　党和反对派

一、党内状况

同志们，我不想多谈我们党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思想上的提高，也不想列举各种数字，因为柯秀尔会把这一切向你们详细报告。

我也不想谈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以及与此有关的数字，因为柯秀尔在自己的报告中会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详细材料。

我想简单谈谈我们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工作的提高以及这些方面的领导工作质量改进的情形。同志们，有一个时候，大约两三年前，有一部分同志，好像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笑声，喊声：“好像是？”）曾经责备我们省委员会、区域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

硬说各级党组织不内行，不该干涉我国的经济事务。是的，有过这样一个时候，但现在未必有人再敢这样责备党组织了。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已经熟悉经济的领导工作，党组织已经站在经济建设的前列，而不是做它的尾巴，——这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只有瞎子或疯子才会否认。我们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我们党在有计划地领导我国经济建设方面，无论在地方或在中央，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279◇

有些人以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同志们，这是一件必须指出的特殊的重要的事情。人们有时援引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机关，彷佛那些机关也是有计划地领导国民经济的。不，同志们，它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有计划地领导，必须具备另一种工业体系，即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至少必须具备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国有化的土地、同农村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等等。

固然，它们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是有**原则性的**差别的。

所以我说，单从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问题这一简单事实，也可以看出我们计划领导工作的质量的提高。

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党的党内民主的发扬。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在我们这里，党内民主——真正的党内民主，党员群众积极性的真正高涨——正在日益增长和发展。有些人在空谈民主。但是，究竟什么是党内民主呢？究竟是谁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寥寥无几的脱离

革命的知识分子有漫无止境地夸夸其谈和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等等的自由，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是破◇280◇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区区少数人的民主。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方面各种问题的自由，了解为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吸引他们来参加党的领导，了解为发挥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有的，这种民主我们是需要的，并且我们会不顾一切地来不断发扬它。（鼓掌）

同志们，我也不想多谈我们的集体领导随着党内民主的发扬而逐步增强的情形。就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说吧。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包括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同志的领导中心，定期集会并解决我国建设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未曾有过的一个最民主的和集体行动的中心。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解决我们工作中各项最重要问题的责任日益从狭小的上层手里转到这个和一切建设部门以及我们辽阔国土上的所有地区保持着极密切联系的广大的中心手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党员干部增加的情形。毫无疑问，最近几年来，我们党内除了老干部，又不断增添了许多主要是工人出身的新干部。从前我们的干部以数百数千计算，可是现在他们却以数万计算了。我想，如果从最下层组织即从车间和工作小组算起，直到最高机关为止，那末现在我们全国的党员干部已经不下十万人了，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这是我们党的极大的发展。这是我们干部数量的极大的增长，是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经验的增加，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文化的提高。

最后，还有一个虽然不必多谈但是应该指出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党在我国非党工人和一般劳动◇281◇群众中、在全世界工人和一般被压迫阶级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的问题。未必用得着怀疑，我们党已成为全世界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旗帜，而布尔什维克这一称号已成为工人

阶级中优秀人物的光荣称号。同志们，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同志们，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缺点。不，缺点是有的，并且是严重的。让我来略为谈谈这些缺点吧。

例如拿党组织对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工作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不，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这里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往往有人可以说是用私人情面、用家庭方式来处理问题。比如说，某个组织的上层领导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搞坏了工作。但伊万·费多罗维奇却不愿意批评他，不愿意揭露他的错误，不愿意纠正他的错误。他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不愿意“树敌”。犯了错误，搞坏了工作，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中间谁不犯错误呢？今天我原谅他伊万·费多罗维奇，明天他就会原谅我伊万·伊万诺维奇。因为怎么能担保我自己也不犯错误呢？客客气气，舒舒服服。既和气，又友好。人家不是说放任错误就是败坏我们的伟大事业吗？不要紧！也许侥幸能凑合过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某些负责工作人员的通常论调。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复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282◇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喊声：“对！”鼓掌。）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八一〕。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如果不肃清我们当中在处理我国建设事业各种极重要问题时的这种庸俗习气，这种讲私人情面的作风，那我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们就一定会灭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拒绝诚恳坦白地进行自我批评，拒绝诚恳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我们就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堵塞改进我们事业的道路，堵塞保证我们事业获得新成就的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要知道，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样样向上的。不，同志们，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

只要还有阶级，我们就永远不能说：好，谢天谢地，现在算是万事大吉了。同志们，这种情形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283◇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喊声：“对！”鼓掌。）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不以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态度坦白地诚恳地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我们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是要前进的。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把诚恳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当做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然就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发展。

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而且只要有一点成绩，就忘记缺点，心满意足，自高自大起来。有了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再有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错误依然如故，缺点也还照样存在，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于是党就害起病来了。

第二个缺点就是把行政方法搬到党内来，用行政方法代替党内有决定意义的说服方法。这个缺点的危险性并不亚于第一个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造成一种危险，使我们那些具有自动精神的党组织变成空洞无谓的文牍主义的机关。既然我们有不下于六万个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分布在各种经济机关、合作社和国家机关里，并在那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就应当承认，其中一部分人在同这些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时有时自己也传染上官僚主义，并且把它带到党组织里来。同志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只要还有国家，这种现象总会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正因为这◇284◇种现象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根源，所以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同这种缺点进行斗争，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解决我们党的领导方面的种种问题，不断地发扬党内民主，不容许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用行政方法代替说服方法。

第三个缺点就是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希望顺水行舟，平安无事，不问前途，不顾将来，只求周围一片节庆气氛，只求我们每天都举行庆祝大会，到处都听到掌声，使我们每个人都能轮流选入各种名誉主席团。（笑声，鼓掌。）

这种只希望到处看到节日气氛的心理，这种只醉心于装饰门面、醉心于庆祝各色各样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纪念节日的心理，这种只愿意随波逐流、不管我们会被冲到哪里去的心理，（笑声，鼓掌。）——这一切就构成我们党的实践中的第三个缺点的实质，构成我们党的生活中我们各种缺点的基础。

你们看见过这样的船夫吗？他们老老实实地划船，划得汗流满面，但是不知道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我在叶尼塞河上看见过这样的船夫。这是一些诚实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波浪会把他们冲到使他们遭到灭亡的危险的礁石上去。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老老实实地双手不停地划船，随波逐流，至于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他们不仅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没有前途的工作，没有舵没有帆的工作，——这就是只想随波逐流的心理所造成的后果。◇285◇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们身上渐渐发霉，接着他们就变得暮气沉沉，随后他们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们就变成十足的庸人。这就是真正蜕化的道路。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党的实践和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些缺点，关于这些缺点，我向你们说了一些不大中听的话。

现在让我来谈谈关于争论和关于我们的所谓反对派的问题。

二、争论的总结

党内的争论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人们有时说：你们干吗大肆争论，谁需要这种争论呢？家丑不可外扬，争论问题在内部解决不是更好吗？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争论有时是绝对必要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全部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争论。如果争论是在同志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党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是批评党内的缺点，因而能够改进我们的事业并武装工人阶级，那末这样的争论是必需而且是有益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争论，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要改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是要败坏它，不是要巩固党而是要瓦解它并破坏它的威信。这样的争论通常不会使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而会使它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样的争论我们是不需要的。（喊声：“对！”鼓掌。）◇286◇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大约三个月，即在中央还没有制定提纲，还没有公布提纲时，反对派要求展开全国范围的争论，企图强迫我们进行一种必然有利于我们的敌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于我们党

的敌人的争论。正因为如此，中央才打破了反对派的这种计谋。正因为中央打破了反对派的这种计谋，我们才能把争论引上正轨，使争论能够以中央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作为基础。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整个争论是有好处的。

同志们，至于说家丑外扬，那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害怕在全党面前公开批评自己和自己的错误。其实，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也正在于它不怕批评，并通过批评自己的缺点来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因此，这次争论是我们党强大有力的标志。不应当忘记，在任何一个大的政党内，特别是在像我们党这样一个执掌政权而又包含着一部分农民和职员的政党内，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出现一些对党的实践问题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分子，他们惯于闭着眼睛进行表决，惯于随波逐流。这类分子的大量存在是一种祸害，我们必须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这类分子是我们党内的泥潭。

争论就是向这个泥潭申诉。反对派分子向它申诉是要从它中间拉出一部分人。而反对派分子确实从它中间拉出了最坏的一部分人。党向它申诉是要从它中间拉出最好的一部分人，吸引这一部分人来积极参加党的生活。结果，这泥潭虽然本身惰性很大，也不得不自行抉择。并且它在这些申诉之后确实自行抉择了，它的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投向反对派，另一部分人投向党，于是泥潭也就不成其为◇287◇泥潭了。这在我们党的发展的总平衡表上是一个正数。这次争论的结果，我们党内的泥潭缩小了，它不是已经完全不存在就是快要不存在了。这就是争论的好处。

争论的总结怎样呢？总结是大家都知道的。到昨天为止，拥护党的同志有七十二万四千人，而拥护反对派的只有四千多人。你们看，这就是总结。我们的反对派曾经大肆叫嚣，说中央委员会脱离了党，党脱离了阶级，说什么美哉，妙哉，要是嘴里长出蘑菇来，那末一定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反对派。但是，既然嘴里长不出蘑菇来，

于是拥护反对派的人甚至连百分之一也不到。总结就是这样。

为什么全党以及跟它一起的工人阶级能这样急遽地把反对派孤立起来呢？要知道，领导反对派的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善于给自己作广告的人物，（喊声：“对！”）不谦逊的人物，（鼓掌）善于自吹自擂的人物。

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原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脱离革命、脱离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集团。（喊声：“对！”鼓掌。）

刚才我谈到我们工作上的一些成绩，谈到我们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整个经济方面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成绩。但是反对派对这些成绩不感兴趣。他们不是看不见这些成绩，就是不愿意看见这些成绩。他们所以不愿意看见这些成绩，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愚昧无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这帮脱离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相当顽固。◇288◇

三、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你们要问，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些分歧发生在哪些问题上？

同志们，分歧发生在一切问题上。（喊声：“对！”）

不久以前，我看到莫斯科一位非党工人（他就要入党，也许已经入党了）的申请书。请看他是怎样说明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的：

“从前我们寻找党和反对派意见分歧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反对派和党意见相同的地方了。（笑声，鼓掌。）反对派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反对党的，所以我要是一个拥护反对派的人，那我就不会申请入党了。”（笑声，鼓掌。）（见“消息报”第二六四号）

你们看，工人有时是多么善于中肯而简洁地说明问题呵。我认为这一段话最中肯最正确地说明了反对派对党、对党的思想、对党的纲

领和党的策略的态度。

正因为反对派在一切问题上都和党发生分歧，所以反对派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的集团。凡是成立新党所必需的一切，反对派都已经具备了。只是缺乏一件“小小的东西”，缺乏搞这一手的那么一点力量。（笑声，鼓掌。）

我可以举出党和反对派之间发生分歧的七个基本问题：◇289◇

第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不再援引反对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和声明了。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重复。大家都很清楚，反对派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反对派既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也就直接和公开地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

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方针对他们现在的领导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拒绝参加十月起义，就是从这种方针出发的。当时他们公开说，我们举行起义就是自取灭亡，必须等待立宪会议，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并且不会很快成熟。托洛茨基参加起义也是从这种方针出发的。因为他当时曾经公开说，如果在最近的将来没有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及时援助，而以为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是愚蠢的。

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列宁和党，——这三方面当时是怎样去参加起义的呢？同志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谈几句的。

你们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在棍子的威胁下参加起义的。当时列宁用棍子赶着他们，用开除党籍威吓他们，（笑声，鼓掌。）他们才不得不拖着腿走去参加起义。（笑声，鼓掌。）

托洛茨基是自愿参加起义的。但他不是简简单单地参加的，而是有小小的附带条件的，这个小小的附带条件当时就已经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接近了。有意思的是托洛茨基恰巧在十月革命前夜即

一九一七年六月居然在彼得格勒再版他的旧作“和平纲领”，好像故意要藉此说明他是在自己◇290◇的旗帜下参加起义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究竟说些什么呢？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和列宁争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认为列宁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并且断言政权固然必须夺取，但是，假如没有胜利的西欧工人的及时援助，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而谁要是不相信托洛茨基的批评，谁就是犯了民族狭隘性的毛病。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本小册子里的一段话：

“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一国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同志们，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小小的附带条件，这个小小的附带条件在许多方面向我们说明托洛茨基现在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的根源和基础。

而列宁是怎样参加起义的呢？党是怎样参加起义的呢？也是有小小的附带条件的吗？不，列宁和他的党参加起义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下面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在国外发表的一篇有名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的一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战◇291◇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摩擦，

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〇三五页〔八二〕）

你们可以看到这完全是另一种方针。托洛茨基参加起义是有一种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接近的小小的附带条件的，他断言如果外来的援助不及时，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列宁却相反，他参加起义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他肯定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成为帮助其他各国无产者挣脱资产阶级枷锁的**基地**。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参加十月起义的情形。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十年一个鼻孔出气的原因。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对话方式来说明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双方在成立反对派联盟时的会谈情形。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说：“亲爱的同志，你看，我们归根到底还是对的，我们曾经◇292◇说过不应当举行十月起义，应当等待立宪会议，如此等等。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国家在蜕化，政权在蜕化，我们在走向灭亡，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本来是不应当举行起义的。你却自愿地参加了起义。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托洛茨基回答他们说：“不，亲爱的同事，你们这样说我是不公道的。起义我是参加了的，但我究竟是怎样参加的，你们却忘记说了。要知道我参加起义并不是干脆的，而是有附带条件的。（大笑）既然现在已经很清楚，外来的援助已经无从期待，那末我们显然是在走向灭亡，这一点我当时在‘和平纲领’中就已经预先说过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想必是这样。我们忘记了小小的附带条件。现在清楚了，我们的联盟是有思想基础的。”（大笑，鼓

掌。）

反对派否认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方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种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投降主义。向谁投降呢？显然是向我国的资本主义分子投降。此外还向谁投降呢？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投降。而那些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姿态又到哪里去了呢？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鼓掌）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国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笑声）然而反对派在他们每次的声明中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293◇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但是反对派却坚持自己的说法。

同志们，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托洛茨基那个尽人皆知的关于克列孟梭的论点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既然政权已经蜕化或正在蜕化，那它还值得爱惜、值得保护、值得捍卫吗？显然是不值得的。如果便于“取消”这种政权的有利形势到来，比方说，如果敌人已经进到离莫斯科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显然就应当利用形势来扫除这种政权，建立起克列孟梭式的即托洛茨基式的新政权。

显然，这种“方针”丝毫没有列宁主义的气息。这是十足的孟什维主义。反对派已经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了。

第三、关于工人阶级同中农联盟的问题。反对派一直隐藏着自己对这种联盟思想的反对态度。他们的政纲，他们的反提纲所以值得注意，主要还不在于其中已经谈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力图对工人阶级隐瞒的东西。但是毕竟出来一位伊·尼·斯米尔诺夫（他也是反对派

的首领之一），他鼓起勇气道出反对派的真情，把反对派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们是在“走向灭亡”，如果要想“得救”，就必须同中农闹翻。这话虽然不够聪明，但是说得很明白。

在这里，反对派终于在大家面前露出了他们的孟什维克马脚。

第四、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的问题。既然否认在我国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既然否认无◇294◇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既然否认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必要，那末我国革命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显然什么也没有了，简直什么也没有了。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已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农民现在再不需要干什么革命了，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土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已经可以离开，可以让位给其他阶级了。

你们看，如果把反对派的观点追究到底，那末反对派的方针就是这样。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投降主义的全部根源。无怪乎崩得派投降主义者阿布拉莫维奇要夸奖反对派。

第五、关于领导殖民地革命的列宁方针的问题。列宁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策和殖民地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区别。从这种区别出发，列宁早在大战时期就已经说过，保卫祖国的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共产主义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反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的被压迫国家来说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正义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在一定阶段和在一定期间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甚至结成联盟，只要它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只要它不妨碍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贫农。

反对派在这方面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彻底背离了列宁的这个方针，

而滚到第二国际的立场上去，◇295◇第二国际认为不应当援助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的一切不幸，原因也就在这里。

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

第六、关于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反对派在这方面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在逐步争取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问题上背离了列宁的策略。要把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不能仅仅靠党的政策正确。党的政策正确是一件大事情，但是这还远不是一切。为了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就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共产主义的政策正确。而为了使群众确信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就需要党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把群众引导到自己的立场上，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使千百万群众确信党的政策正确。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问题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然而我们当时并没有号召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去举行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起义。为什么？因为当时群众还不可能确信我们的绝对正确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丢尽脸皮的时候，只有当群众开始确信我们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引导群众举行了起义。正因为我们适时地引导群众举行了起义，我们那时才获得了胜利。

这就是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源。列宁所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实就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国家里◇296◇感染了社会民主党妥协主义偏见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的经验认识共产党人的政策正确，并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反对派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完全否定这个策略。有一个时候反对派曾经愚味无知地醉心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非常欢迎和英国总委员会达

成协议，认为这种协议是“和平的极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武装干涉的极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欧洲改良主义为害”的极重要手段之一（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是，反对派在依靠柏塞尔之流和希克斯之流“防止”改良主义“为害”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后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了。

同志们，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它表明反对派完全离开了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

第七、关于列宁式的党性、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列宁式的统一的问题。反对派在这方面完全背离列宁的组织方针，而走上建立第二党的道路，走上建立新国际的道路。

你们看，这就是说明反对派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滚到了孟什维主义方面去的七个基本问题。

能不能认为反对派的这些孟什维主义观点可以和我们党的思想、和我们党的纲领、和我们党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和列宁主义的组织方针相容呢？

绝对不能，一分钟也不能！

你们会说：在我们这里怎么会产生出这样的反对派呢？他们的社会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反对派的社会根源就在于城市小资产者阶层在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日益破产，在于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专政◇297◇的制度表示不满，在于这些阶层力图改变这个制度，力图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精神来“改善”这个制度。

前面我已经讲过，由于我们的前进，由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的增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就日益破产和没落。反对派反映了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革命制度的怨恨和不满。

这就是反对派的社会根源。

四、今后怎样？

今后怎样对待反对派呢？

在讲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向你们谈谈加米涅夫在一九一〇年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的经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且它能给我们一种线索来正确处理所提出的问题。一九一〇年，我们中央在国外举行了一次全会。全会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特别是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当时我们和孟什维克处在同一个党内，自称为一个派别）。全会违背列宁的意见，反对列宁的意见而主张和孟什维克调和，也就是主张和托洛茨基调和。列宁当时处于少数地位。可是加米涅夫怎样呢？他却去和托洛茨基实行合作。不过他进行这种合作，列宁是知道的并且也是同意的，因为列宁想用实际经验向加米涅夫证明，和托洛茨基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有害的和不能◇298◇容许的。

请听加米涅夫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一九一〇年我们一派中的多数人曾经试图和托洛茨基同志妥协并取得协议。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激烈地反对这种企图，好像是为了我坚持试图和托洛茨基取得协议而‘处罚’我，他坚持由中央委员会派我做代表去参加托洛茨基同志那个报纸的编辑部。到一九一〇年秋，即在这个编辑部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确信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反对我那种‘调和’路线的态度是正确的，因此，经他同意我就退出了托洛茨基同志那个机关报的编辑部。关于我们当时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裂，党中央机关报发表了几篇尖锐的文章加以说明。就在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建议我写一本小册子来总结一下我们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对我说：‘你已经尝试过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集团中的最左翼（托

洛茨基派）取得协议，你已经确信不可能取得协议，所以你应当写一本总结性的小册子。’自然，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特别坚持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当时被我们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方面……全部说清楚。”（加米涅夫为他的小册子“两个党”所写的序言）

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果呢？请听下去吧：

“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尝试（我敢说我是诚心诚意做这次尝试的，单是我那些现在被托洛茨基利用的书信和私人谈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证明，采取调和态度势必滚到拥护取消派的立◇299◇场上去，坚决站到取消派方面去。”（加米涅夫“两个党”）

再往下听吧：

“呵，如果‘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党内一种情绪而获得了胜利，那对取消派、召回派以及一切反党派别来说，该多么称心如意。”（同上）

同志们，你们看，这就是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喊声：“可以引为教训的尝试！”）关于这次尝试的结果，加米涅夫已经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那本名叫“两个党”的专门小册子里叙述过了。我不怀疑这本小册子当时对所有还幻想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同志们是有很大益处的。

可是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加米涅夫是否会再写一本也叫做“两个党”的小册子来谈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尝试呢？（哈哈大笑，鼓掌。）这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当然我不能向加米涅夫担保，托洛茨基现在就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利用他的书信和亲密的谈话来反对他了。（大笑）但是这也用不着怕。无论如何，这里必须有所选择：或者是惧怕托洛茨基利用加米涅夫的信件并泄露他和托洛茨基的秘密谈话，那末就有出党的危险，或者是抛弃任何惧怕心理而留在党内。同志们，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不这样，就得那样。

据说反对派打算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声明，表明他们现在服从并且将来也会服从党的一切决定，（喊声：“又想来一九二六年十月的那一套吗？”）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喊声：“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两次了！”）并且要坚持他们不肯放弃的观点，（喊声：“呵！”“不行，最好还是由我们亲自动◇300◇手来解散他们吧！”）在党章范围内坚持。（喊声：“又有小小的附带条件。”“我们的党章范围不是橡皮做的。”）

同志们，我想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喊声：“对！”鼓掌多时。）同志们，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某种声明的尝试，（鼓掌）这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那两次声明的尝试。（喊声：“对！”）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呢？我虽然不打算写“两个党”这样的小册子，可是我敢说这种尝试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喊声：“对！”）结果是使党受了两次骗，结果是使党的纪律削弱了。试问反对派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来要求我们，要求伟大的党的代表大会，要求列宁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这种尝试之后还相信他们的话呢？（喊声：“那太愚蠢了。”“谁相信，谁就倒霉！”）

据说他们还要提出恢复被开除的人的党籍问题。（喊声：“不行！”“让他们滚到孟什维克的泥潭里去吧！”）同志们，我想，这一套也是行不通的。（鼓掌多时）

为什么党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呢？因为他们是反党的反对派的全部活动的组织者，（喊声：“对！”）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党的法律，因为他们妄自尊大，以为谁也不敢触犯他们，因为他们想在党内给自己造成一种贵族地位。

可是，难道我们愿意党内存在享受特权的贵族和没有这种特权的农民吗？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贵族等级根本铲除之后，现在又要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等级吗？（鼓掌）

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呢？因

为我们不愿意党内有贵族存在。◇301◇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法律，并且全体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如果反对派希望留在党内，那他们就必须无附带条件地毫不含糊地服从党的意志、党的法律、党的指示。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让他们到他们认为比较自由的地方去吧。(喊声：“对！”鼓掌。)我们不愿意而且决不会为反对派制定一些优待他们的新法律。(鼓掌)

有人问到条件。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必须完完全全解除武装。（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放弃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呼喊声：“对！” 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痛斥他们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经成为反党罪行的错误。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支部交出来，使党能够把它们全部解散。（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或者是这样做，或者是叫他们出党。如果他们不肯出去，就把他们赶出去。（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同志们，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是这样。

四　总　结◇302◇

同志们，现在我要结束我的报告了。

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总结是怎样的呢？总结如下：

（一）虽然有极大的困难，虽然有“列强”资产阶级的挑衅性的攻击，我们还是和周围各国维持了和平关系；

（二）虽然障碍重重，虽然被收买的销路很广的资产阶级报刊百般污蔑，我们还是巩固了苏联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三）我们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各洲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

（四）我们党帮助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加强了它们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五）我们尽力做到了一个党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发展和加速世界革命运动；

（六）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使它的发展达到了打破纪录的速度，并且确立了它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七）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

（八）我们依靠贫农巩固了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

（九）虽然存在着敌对的国际包围，我们还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世界各国的工人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

（十）我们巩固了党，捍卫了列宁主义，彻底粉碎了反对派。

◇303◇

总结就是这样。

结论怎样呢？结论只有一个：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喊声：“对！”鼓掌。）

由此可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一定能达到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能达到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胜利。（鼓掌多时）

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道路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是从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

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像过去一样地克服困难，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钢铁般的列宁的党把我们锻炼出来为的是要和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而不是叫苦和哭泣。

正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一定会胜利。

同志们！向着我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向着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致敬。高唱“国际歌”。）◇304◇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七日）

同志们！在许多代表发言之后，我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了。关于叶甫多基莫夫和穆拉洛夫两人的发言，我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因为他们的发言没有提供可讲的材料。关于他们的发言只能说一句话：愿上天宽恕他们的罪过，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胡说些什么。（笑声，鼓掌。）我想谈谈拉柯夫斯基的发言，特别是要谈谈加米涅夫的发言，因为加米涅夫的发言是反对派分子所有一切发言中最虚伪最荒谬的。（喊声：“对！”）.

一 关于拉柯夫斯基的发言

（甲）**关于对外政策**。我认为拉柯夫斯基在这里提到战争和对外政策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大家知道，拉柯夫斯基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关于战争问题说过许多蠢话。他来这里发言，大概是想纠正自己那番蠢话。但是结果却显得更蠢。（笑声）我认为拉柯夫斯基还是不谈对外政策为妙。

（乙）**关于左和右**。拉柯夫斯基断言反对派是我们党的左派。同志们，这真是可笑之至。这种说◇305◇法显然只是为了使政治破产分子聊以自慰。事实证明反对派是我们党内的孟什维克派，反对派已经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反对派客观上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

这一切都是已经证明并且一再证明了的。试问怎么能说反对派是左派呢？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第三种势力”的工具即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的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联共（布）党内的右派即孟什维克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拉柯夫斯基显然已经糊涂透顶，甚至左右都分不清了。你们大概记得果戈里小说中那个绥里方的话：“阿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

（丙）**关于反对派的援助**。拉柯夫斯基声称，要是帝国主义者侵犯我国的话，反对派是决心援助党的。你看多么慈悲呵！他们这个勉强只占我们党内人数千分之五的小小集团竟大发慈悲地许诺在帝国主义者侵犯我国的时候来援助我们。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援助，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的援助！我们请求于你们的只有一件事：不要妨碍我们，不要再妨碍我们！其余的一切，我们自己都会办到，你们尽管放心好了。（喊声：“对！”鼓掌。）

（丁）关于“信号员”。其次，拉柯夫斯基声称，反对派是在向我们发出信号，预告危险，预告困难，预告我国的“灭亡”。这真是些“信号员”，他们在自己面临灭亡、真正需要人家救命的时候，还要把党从“灭亡”中救出来！自己几乎都站不住脚，还硬要去救别人！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笑声）

假定有一只小船在海面上飘摇不定，眼看就要沉下去，同时又有一艘雄伟的大轮船在那里乘风◇306◇破浪，稳稳地向前行驶。如果这只小船竟要去救那艘大轮船，那你们会说什么呢？（笑声）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的反对派“信号员”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他们向我们发出信号，预告危险、困难、“灭亡”以及什么什么等等，自己却一直往下沉，并且没有觉察出自己已经要沉到底了。

反对派分子把自己说成“信号员”，是妄想藉此取得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试问他们有什么理由呢？暂且不谈领导党、

工人阶级和国家，反对派分子难道用事实证明过他们一般地能领导什么吗？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帮人为首的反对派领导自己那个集团已有两年之久，并且反对派首领们把这个集团领导到了彻底破产的地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反对派在这两年中引导自己的集团从失败走向失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不是说明反对派首领庸碌无能，不是说明他们的领导只会招致失败而不会导向胜利，又是说明什么呢？既然反对派首领们在小事情上也庸碌无能，那还有什么理由设想他们在大事情上有本领呢？对于那些领导一个小集团也遭到破产的人物，谁都不敢委托他们去做像领导党、工人阶级和国家这样的大事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我们的“信号员”所不愿意了解的道理。

二　关于加米涅夫的发言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的发言。这个发言是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所做的一切发言◇307◇中最荒谬、最虚伪、最狡诈和最骗人的发言。（喊声：“对！”鼓掌。）

（甲）一种本性，两副面孔。加米涅夫在自己的发言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掩盖痕迹。党的代表们在这里说明了我们党的成就、我国建设的成绩和我们工作的改进情形等等。其次，他们说明了反对派分子的孟什维主义罪恶，说明了反对派分子由于否认我国有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否认苏联有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由于否认工人阶级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的适当性，由于散布关于特米多尔的诬蔑谣言等等而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了的事实。最后，他们说明了反对派的这种观点是和党籍不相容的，反对派如果想留在党内就必须放弃这种孟什维主义的观点。

结果怎样呢？结果加米涅夫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只好避开这

些问题，掩盖痕迹，混过关去。人家问他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政策以及我国建设等极重要的问题，他却避开这些问题，好像这和他无关。能不能认为加米涅夫的这种行为是严肃地对待问题呢？如何解释反对派的这种行为呢？只能有一种解释：想欺骗党，麻痹党的警惕性，叫我们党再上一次当。

反对派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另一副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当党逼迫他们要他们放弃派别活动和分裂政策时，他们就对党摆出自己那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而当他们向非无产阶级势力、向“街头”控诉党和苏维埃政权时，他们就摆出自己那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你们可以看到，现在他们是在用自己那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对待我们，想再一次欺骗党。正因为如此，加米涅夫也就竭力掩盖痕迹，避开那些我们有意见分歧的极重要的问题。难道我们能够再容忍这◇308◇种两重性，这种两面性吗？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对派愿意认真地和党谈话，那他们就必须抛弃假面具；或者是他们打算仍然保留两副面孔，那他们就只好到党外去。（喊声：“对！”）

（乙）**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加米涅夫断言，我们党的传统，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并不会要求党员放弃某些与我们党的思想和我们的纲领不能相容的观点。这话对吗？当然不对。同志们，这不但不对，而且是在撒谎！

我们大家，包括加米涅夫在内，曾经把米雅斯尼柯夫和米雅斯尼柯夫分子开除出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为什么开除他们呢？就因为他们的孟什维主义观点和党的观点不能相容。

我们大家，包括加米涅夫在内，曾经把一部分“工人反对派”开除出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究竟为什么开除他们呢？就因为他们的孟什维主义观点和我们党的观点不能相容。

为什么把奥索夫斯基和达什柯夫斯基开除出党呢？为什么把马斯

洛夫、路特·费舍、卡茨等开除出共产国际呢？就因为他们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和联共（布）的思想不能相容。

如果我们党认为在我们组织内可以容许反列宁主义的分子存在，那末它就不成其为列宁党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孟什维克也领到我们党里来呢？对于那些虽然在我们党内但已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并且宣传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人又该如何呢？列宁的党和这些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加米涅夫诬蔑我们党，背弃我们党的传统，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硬说可以容忍那些信奉◇309◇和鼓吹孟什维主义观点的人留在我们党内。正因为加米涅夫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全体反对派糟蹋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党才提出要反对派放弃他们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丙）**反对派的假原则性**。加米涅夫硬说他本人和其他反对派分子难于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已经惯于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反对派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那末反对派就失掉原则性了。这样说来，好像反对派的首领们倒是些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了。同志们，这话对吗？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真是这样重视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信念吗？同志们，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只要看看反对派联盟形成的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笑声）实际情形完全相反。历史说明，事实说明，谁也没有像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们那样轻易地从一种原则跳到另一种原则，那样轻易地随便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为什么现在当党的利益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却不肯这样做呢？

让我从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中举几个例子吧。

大家知道，列宁为了集合党的力量，曾经于一九一二年在布拉格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大家知道，这次代表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界限，把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

大家知道，也是在一九二一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八月联盟举行了孟什维克会议。其次，大家知道，这次会议曾经向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宣战，并号召工人组织去消灭列宁的党。托洛茨基八月联◇310◇盟的会议当时给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加了些什么罪名呢？它把一切滔天大罪都加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头上。它给代表会议加了篡夺权力、闹宗派、在党内策动“政变”以及其他许多鬼才知道的什么罪名。

请看当时八月联盟会议在它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声明中是怎样评论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的：

“本会议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指一九一二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斯大林注）是**一些**完全有意把党引向分裂的**分子公然企图篡夺党的旗帜**，本会议对于某些党组织和某些同志做了这种**骗局**的牺牲品并因而帮助了**列宁宗派的**分裂和篡夺政策这一点，深表惋惜。本会议确信俄国国内和国外的一切党组织必将抗议**所举行的政变，不会承认**代表会议所选出的中央机关，并且会竭力通过召集真正的全党代表会议来促进党内统一的恢复。”（摘自载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前进报”上的八月联盟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声明）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什么罪名都有：又是列宁宗派，又是篡夺，又是党内“政变”。

可是后来怎样呢？过了几年，托洛茨基却放弃了自己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观点。不仅放弃，而且**匍匐**着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加入党而成为党的积极的一员了。（笑声）

既然如此，那末，有什么根据可以断定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不会再一次放弃自己那些关于我们党内的特米多尔倾向以及篡夺等等的观点呢？◇311◇

再举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底出版了一本名叫“十月革命

的教训”的小册子。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算做我们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派。大家知道，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我们党内曾引起一场争论。可是后来怎样呢？总共不到一年光景，托洛茨基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宣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我们党内的右派，而是我们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

再举一个例子，从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历史中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写过一大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册子。大家知道，还在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与全党一起宣布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不能相容。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全党一起，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可是后来怎样呢？此后不到一年，他们就抛弃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并宣称托洛茨基集团是我们党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和革命的集团。（喊声：“这是彼此大赦！”）

同志们！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事实如果要举，还可以举出很多。可见加米涅夫在这里向我们宣扬的反对派首领们的高度原则性只是一种和实际情形完全不符的鬼话，这还不明显吗？

我们党内谁也没有本领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轻易地随便地抛弃自己的原◇312◇则，这还不明显吗？（笑声）

试问：有什么根据可以断定曾经多次放弃自己的原则和观点的反对派首领们不会再放弃一次呢？

我们要求反对派放弃他们那种孟什维主义观点，这对反对派首领们来说，并不像加米涅夫所竭力形容的那样难于接受，这还不明显吗？（笑声）既然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放弃自己的观点，那末他们为什么不能再放弃一次呢？（笑声）

（丁）**或者是党，或者是反对派**。加米涅夫断言，不能要求反对派分子放弃他们某些已经和党的思想和纲领不能相容的观点。我已经

说过，只要看看反对派联盟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加米涅夫的这种断言多么不严肃。就暂且假定加米涅夫的话是对的吧，那末又怎样呢？难道我们的党能放弃自己的观点、信念和原则吗？能要求我们党放弃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原则吗？党已经抱定一种确定不移的信念，认为反对派必须放弃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否则他们就得滚出党去。如果不能要求反对派放弃自己的信念，那末，为什么能要求党放弃自己关于反对派的观点和信念呢？照加米涅夫的说法，反对派不能放弃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而党应当放弃自己如下的观点：反对派如果不放弃他们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不能留在我们党内。这是什么逻辑呢？（笑声，鼓掌。）

加米涅夫硬说反对派分子是能始终坚持自己信念的刚毅人物。我却不大相信反对派首领们的刚毅和坚持原则的精神。我尤其不大相信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这种人的刚毅精神，（笑声）他们昨天◇313◇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喊声：“他们已经玩惯了跳背戏！”）就暂且假定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们还有几分刚毅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吧，那末，又有什么根据可以断定党的刚毅和坚持原则的精神比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托洛茨基这种人差呢？有什么根据可以断定党放弃自己关于反对派、关于反对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与党的思想和纲领不能相容的信念，竟会比那些经常更换自己的观点像更换手套一样的反对派首领们放弃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呢？（笑声）

可见加米涅夫是在要求党放弃自己的关于反对派及其孟什维主义错误的观点，这还不明显吗？加米涅夫不是做得太过分吗？他不愿意承认这样过分是危险的吗？

问题是这样：或者是党，或者是反对派。或者是反对派放弃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或者是他们不这样做，那末他们在党内就连影子也不会留下。（喊声：“对！”鼓掌。）

（戊）**反对派背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加米涅夫硬说，布尔

什维主义的传统并不要求党员放弃他们的观点。各位发言人已经完全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加米涅夫完全是在撒谎。

这里有一个问题：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是否容许反对派为所欲为并继续为所欲为呢？反对派成立了派别组织，并把它变成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党。可是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竟容许什么人干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呢？既然在党内制造分裂和在党内成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党，那怎么还能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呢？

其次，反对派建立了非法印刷所，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而这些知识分子又是和露骨的◇314◇白卫分子相勾结的。试问：既然干了这种近于公然背叛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成体统的事情，那怎么还能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呢？

最后，反对派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游行示威向“街头”控诉，向非无产阶级分子控诉。既然向“街头”控诉自己的党和自己的苏维埃政权，那怎么还能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呢？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容许这种近于公然反革命的不成体统的事情呢？

加米涅夫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是要掩饰他自己为了他那个反布尔什维主义集团的利益而背弃这种传统的事实，这还不明显吗？

反对派向“街头”控诉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因为反对派是一个人数极少的集团。但这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如果反对派的力量稍微大一些，那又会怎样呢？那时向“街头”控诉就会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叛乱，这还不明显吗？反对派的这种企图实质上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九一八年的那种尽人皆知的企图毫无区别，这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喊声：“对！”）照理说，为了对付这种企图，我们本来应当在十一月七日那天把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全都逮捕起来。（喊声：“对！”鼓掌多时。）我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可怜他们，对他们表示宽大，想给他们一个悔悟的机会。可是

他们把我们的宽大看成软弱。

加米涅夫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议论只是一种骗人的空话，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反对派背弃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事实，这还不明显吗？◇315◇

（己）**关于假统一和真统一**。加米涅夫在这里高唱统一。他简直婉转动听地唱着，请求党帮忙，“无论如何”要促成统一。你们知道吗，他们这帮反对派首领是反对两党并存的政策的。你们知道吗，他们“无论如何”是拥护党的统一的。可是我们却非常清楚，正当加米涅夫在这里高唱党的统一的时候，他的那些同伙却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通过决议，说反对派关于统一的声明只是一种手腕，目的是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和继续实行自己的分裂政策。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在列宁党的代表大会上高唱党的统一。另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又在秘密从事分裂党、成立第二党和破坏党的统一的勾当。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无论如何”要统一。难道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罪恶的骗人把戏的时候吗？

加米涅夫谈统一。究竟是同谁统一呢？是同党统一呢，还是同舍尔巴柯夫统一？难道现在还不了解决不能把列宁主义者同舍尔巴柯夫先生们联合在一个统一的党内吗？

加米涅夫谈统一。究竟是同谁统一呢？是同马斯洛夫和苏瓦林统一呢，还是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统一？难道现在还不了解既然同马斯洛夫之流和苏瓦林之流统一，就谈不上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统一吗？难道现在还不了解不可能把列宁主义的观点同反对派孟什维主义的观点统一起来吗？要把列宁同阿布拉莫维奇统一起来吗？同志们，不行！现在是抛弃这种骗人把戏的时候了。

所以我认为加米涅夫关于“无论如何”要统一的议论是一种企图欺骗党的虚伪把戏。

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统一，而不是玩统一的把戏。我们党内有没有真正的列宁式的统一呢？是有的。既然我们的党员有百分之九十

九拥护党而反对反对派，那末这就是我们党内前所未有的真◇316◇正的无产阶级的统一。你们看，这就是没有一个反对派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鼓掌）这不是我们列宁党的统一又是什么呢？这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式的统一。

（庚）**“反对派的末日到了！”**党为了使反对派走上列宁的道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党为了使反对派悔悟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已经做得仁至义尽。党曾经向反对派建议，要他们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在全党面前放弃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党曾经向反向派建议，要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痛斥这些错误，以便永远摆脱这些错误。党曾经向反对派建议，要他们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要完全自行解除武装。

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党的目的是肃清反对派以便转入建设性的工作。党的目的是最终地消灭反对派以便有可能集中精力从事我国伟大的建设事业。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过：“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存在……现在反对派该完蛋了，反对派的末日到了，现在我们再不能容忍反对派了！”〔八三〕

党希望列宁的这个口号终于能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实现。（鼓掌多时）

反对派如果自己解除武装，那很好。他们如果不愿意自己解除武装，那我们就自己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喊声：“对！”鼓掌。）◇317◇

三　总 结

从加米涅夫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反对派是不打算完全自己解除武装的。反对派十二月三日的声明也说明了这一点。看来反对派是宁可到党外去的。好吧，那就让他们到党外去吧。他们宁可到党外去，他们自绝于党，这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奇怪。如果看看我们党的历史，那就可以明白，在我们党的每次严重转折关头，

总有一部分老的首领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车子上摔下去而让位给新起的人物。同志们，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鼓掌)

就拿一九〇三年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来说吧。这是党从同自由派成立协定转到对自由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的时期，是从准备对沙皇制度作斗争转到对它进行公开斗争以求完全粉碎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时期。当时领导我们党的有六个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列宁、阿克雪里罗得和坡特列索夫。这次转折决定了这六个人中间的五个人的命运。他们都从车子上摔下去了。剩下的只有列宁一个人。（鼓掌）结果，党的几位老的首领、党的几位创始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加上两个年轻的首领（马尔托夫和坡特列索夫）都是反对一个也是年轻的首领列宁◇318◇的。你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如何痛哭流涕，叫喊什么党一定要灭亡，党一定站不住脚，说什么没有这些老的首领就什么也办不成了。可是哭泣和抱怨终于化为乌有，事实仍然是事实。事实是这样：正因为这五个人离开了党，党才走上了大道。现在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很明白，如果不是列宁对这五个人进行坚决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五个人清除出去，那我们党就不能团结成为能够引导无产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喊声：“对！”）

再拿后一个时期即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这个时期来说吧。这是我们党从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采取迂回的斗争方法，转到利用从保险基金会起到杜马讲坛止的所有一切合法机会的时期。这是我们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遭到失败后实行退却的时期。这个转折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新的斗争方法，以便聚集力量再去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这个转折决定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命运。阿列克辛斯基从车子上摔下去了，他有一个时候曾经是个很不坏的布尔什维

克。波格丹诺夫也摔下去了，他曾经是我们党内最重要的首领之一。罗日柯夫也摔下去了，他曾经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当时关于党一定要灭亡的哭泣和嚎叫，大概也不比一九〇三年少。可是哭泣终于化为乌有，事实仍然是事实。事实说明，如果我们党当时不把动摇分子和妨碍革命事业的分子清除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新的斗争条件下走上大道。当时列宁所力求的是什么呢？只有一点，就是使党尽快地摆脱那些不坚定的和叫苦的分子，免得他们妨碍党。（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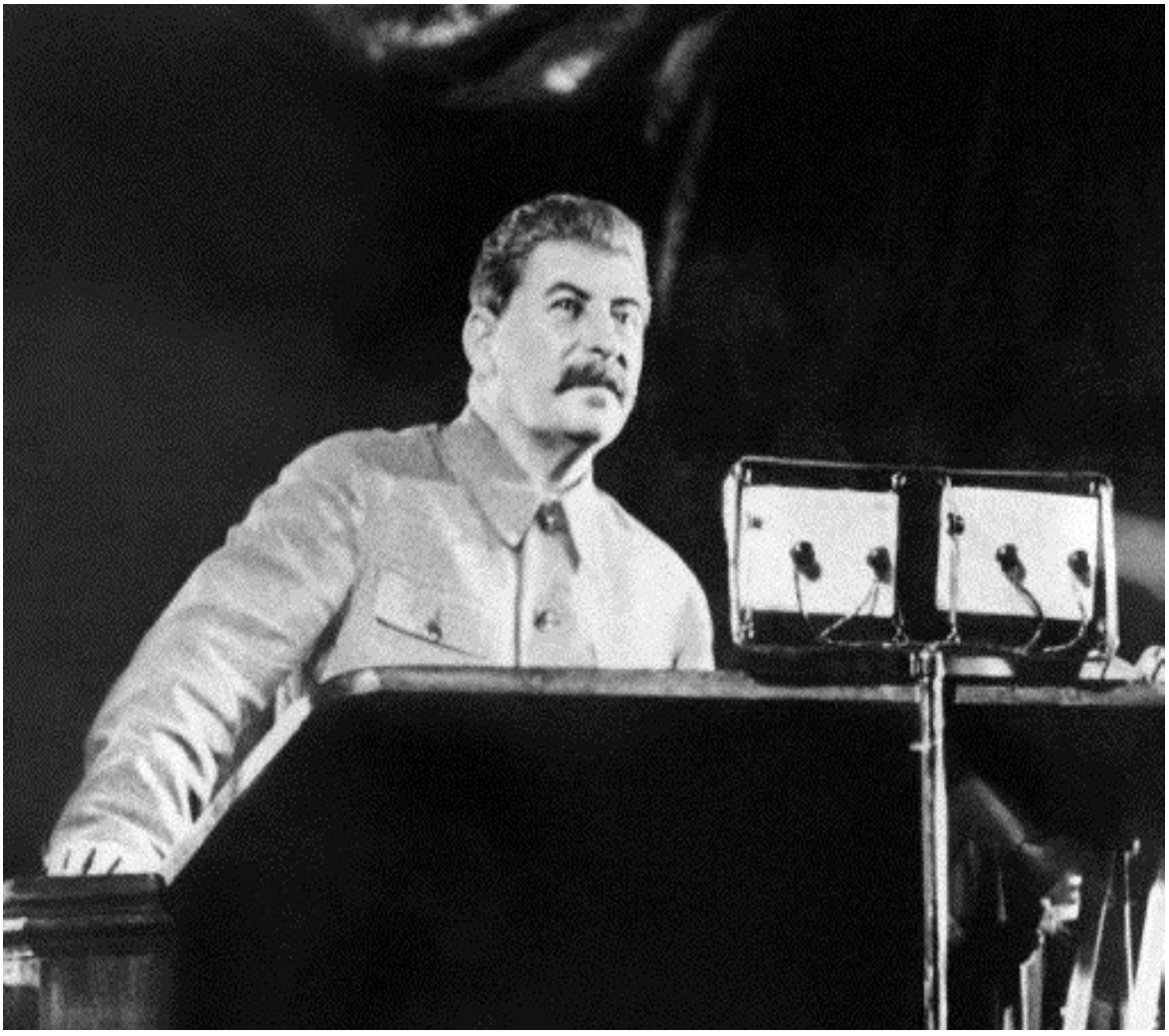
同志们，我们党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319◇

我们党是一个活的机体。和其他任何机体一样，党内也在新陈代谢：旧的、腐朽着的东西衰亡下去，（鼓掌）新的、成长着的东西生长和发展起来。（鼓掌）上上下下都有人衰亡下去，上上下下都有新的人成长起来，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今后它也将这样发展。

我国革命的目前时期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处于从恢复工业和农业转到改造全部国民经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全部国民经济的时期，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不只是一种远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的事业，一种需要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最严重困难的事业。

你们知道，这个转折决定了我们那些被新的困难吓倒并企图把党拉到投降主义的道路上的反对派首领们的命运。如果现在某些不愿意稳稳地坐在车子上的首领从车子上摔下去，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只会使党摆脱那些妨害和阻碍党前进的分子。看来他们是真正想离开我们党的车子的。好吧，既然老首领中有些变成废物的人要从车子上摔下去，那末就让他们下去吧！（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致敬。）◇320◇

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就伪造“斯大林论文”事向外国报刊代表发表的声明

为了答复外国报刊（美联社、沃尔弗通讯社、“新自由报”〔八四〕等）驻莫斯科代表就伪造“斯大林论文”事提出的询问，我认为必须发表如下的声明：

“纽约美国人报”〔八五〕、环球通讯社或英美新闻社的伪造家散布各种谣言，例如他们伪造了关于苏联“空军”、关于苏维埃政权同“正教教会”“和解”、关于“归还”资本家在苏联的“石油占有权”等纯属虚构的“斯大林论文”，对这些伪造家现在未必有驳斥的必要，其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这些先生在报刊上自己就揭露自己是专靠卖假货为生的职业伪造家。只要看看这些先生最近几天在报刊上登载的企图替自己的骗局“辩护”的那种“解释”，就会明白我们在这里不是和报刊代表打交道，而是和耍笔杆的强盗打交道。

虽然如此，对于报刊代表所提出的询问，我还是准备发表如下的声明：

（甲）我从来没有见过所谓访问我的什么“赫尔曼·戈特弗莱”或外国报刊的其他什么代表；◇321◇

（乙）最近一年来，我既没有和这些先生也没有和外国报刊的其他任何代表进行过任何谈话；

（丙）我既没有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内也没有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上发表过任何关于“归还”资本家在苏联的“石油占有权”、关于“正教教会”或关于苏联“空军”的演说；

（丁）我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这类的“论文”或“短文”。

“纽约美国人报”、环球通讯社和英美新闻社的先生们欺骗读者，硬说当时莫斯科方面对这些伪造的“斯大林论文”并没有否认。关于苏联“空军”和关于同“正教教会”“和解”这两篇伪造的“论文”，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才知道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立即揭穿这两篇论文是伪造的，并把这件事通知美联社驻莫斯科代表烈兹韦克先生。烈兹韦克先生立刻根据这个通知在十二月一日给美联社发出如下的电报：

“今天，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人向我声明，说此间正严重考虑在纽约控告‘纽约美国人报’和整个赫斯特系报纸以制止散布署名斯大林的论文这一问题。当局对十一月六日‘纽约美国人报’上登载的题为‘利用教会来支持苏维埃’的、似乎是斯大林在莫斯科主席团会议上的秘密报告的那篇短文提出特别强硬的抗议。外交人民委员部指出这些论文纯属伪造。烈兹韦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这封电报在美国发表了没有呢？如果没有，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公布了烈兹韦克先生的电报就会使美国籍的匈牙利人或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柯尔德先生的收入来源断绝呢？◇322◇

“纽约美国人报”已不是第一次企图靠无中生有地编造斯大林的“谈话”和“论文”来赚钱了。据我所知，例如一九二七年六月“纽约美国人报”就公布过伪造的“斯大林的谈话”，说斯大林和一个什么谢西尔·温彻斯特谈了关于“和英国绝交”、放弃“世界革命”和搜查阿尔柯斯[①]等问题。当时阿尔古斯剪报社为这件事写信请我证实这个“谈话”，并要我做他们的顾客。我当时毫不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于是我马上给纽约“工人日报”〔八六〕发出如下的辟谣声明：

“敬爱的同志们！阿尔古斯剪报社把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纽约美国人报’登载的所谓我和一个什么谢西尔·温彻斯特的谈话的剪

————————————————

① 见本卷注释〔五一〕。——译者注

报寄给我。兹特声明，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谢西尔·温彻斯特，我既没有和他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进行过任何谈话，并且我和‘纽约美国人报’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阿尔古斯剪报社不是骗子的组织，那末应当认为它上了那些同‘纽约美国人报’有关系的骗子和讹诈者的当了。约·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虽然如此，柯尔德先生的组织里的伪造家们还在继续玩弄他们的骗局……

这种骗局的用意在哪里呢？柯尔德及其同伙想用这种骗局达到什么目的呢？也许是为了耸人听闻吧？不，不仅是为了耸人听闻，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提出完全废除军备的宣言所获得的效果。

他们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当然达不到！骗局终归是要被揭穿的（它已经被揭穿了），而事实仍旧是事实。事实就是：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奉行真正和平政策的国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诚意地提出◇323◇真正废除军备问题的国家。

资本的代理人在反对苏联的和平政策时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可疑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耍笔杆的强盗。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对废除军备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具有怎样的道义威力和原则力量。

约·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〇号◇324◇

注　释

〔一〕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国际形势、关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经济方面的指示、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关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等问题。斯大林在八月一日全会会议上发表了“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八月二日全会选举斯大林为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全会指出了对苏联的新的军事进攻威胁日益加剧，斥责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失败主义立场，提出了全力加强苏联国防的任务。全会做出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经济方面的指示，肯定了反对派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投降路线的完全破产。在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决议中，全会拟定了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计划。在讨论奥尔忠尼启泽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报告时，斯大林在八月五日全会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八月六日全会选斯大林为关于奥尔忠尼启泽报告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全会揭发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首领们的罪恶活动，提出了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资格的问题。只是在这以后，反对派的首领们在八月八日才向全会提出“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们口是心非地谴责了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派别活动。斯大林在八月九日全会会议上就反对派的“声明”发表了演说。全会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责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首领们立即解散派别组织，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维护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三九页至第二七四页）——（正文第三页）

〔二〕 指一九二六年五月波兰皮尔苏茨基的武装政变。政变的结果，建立了使国家法西斯化的皮尔苏茨基及其集团的专政制度。(关于皮尔苏茨基政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五〇页至第一五三页)——（正文第六页）

〔三〕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维也纳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发动的原因是维也纳资产阶级法庭把屠杀数名工人的一帮法西斯分子宣判无罪。自发的发动后来转变为与军警进行巷战的起义。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行为，起义被镇压下去。——（正文第七页）

〔四〕 指一九一六年产生的以弗·阿德勒和奥·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翼”。在革命词句掩饰下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实际上是反对工人利益的，因此，是社会民主党中最危险的一部分。——（正文第七页）

〔五〕 英国总罢工和矿工罢工是由于企业主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引起的。为了回答矿主因矿工不同意减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而宣布的同盟歇业，矿工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宣布罢工。为了表示声援矿工，五月三日开始了总罢工，参加这次总罢工的有最重要的工业和运输业部门的几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五月十二日在工人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首领们出卖了罢工的工人，宣布总罢工结束，但矿工的斗争仍然继续下去。只是由于政府和企业主使用高压手段、由于物质生活状况极端困难，矿工才不得不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停止罢工并同意矿主的条件。（关于英国的总罢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四〇页至第一四九页）——（正文第七页）

〔六〕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一九二一年选出。——（正文第八页）

〔七〕 “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该杂志从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以俄文、法文、 德文、英文及其他文字出版。因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该杂志随即停刊。——（正文第九页）

〔八〕 布兰德勒派是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是以布兰德勒得名的。布兰德勒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是右派集团的首领。布兰德勒派的投降政策以及他们同社会民主党上层的合作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中遭到失败。一九二九年，布兰德勒因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正文第九页）

〔九〕 见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页至第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十七页至第二十二页）。——（正文第十四页）

〔一〇〕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三三〇页、第三三二页。——（正文第十九页）

〔一一〕 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二页至第二一八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九〇页至第七九五页）。——（正文第二十页）

〔一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东方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全会会议上通过（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提纲和决议”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一三一页至第一三六页）。——（正文第二十一页）

〔一三〕 马尔丁诺夫（从前是孟什维克，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接收入党）在他论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发展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可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维埃联盟企图把马尔丁诺夫提出这个错误论点的责任推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身上。——（正文第二十二页）

〔一四〕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三二二页。——（正文第二十八页）

〔一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十五页至第十八页。——（正文第二十九页）

〔一六〕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六四页至第一七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十六页至第八十二页。——（正文第三十二页）

〔一七〕 英苏统一委员会或英俄统一委员会（大不列颠和苏联工会运动的联合协商委员会）是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于伦敦召开的英俄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倡议而成立的。参加委员会的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代表。一九二七年秋，由于英国工联反动首领的背叛政策，这个委员会就不再存在了。（关于英俄委员会，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一六五页至第一七二页、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正文第三十四页）

〔一八〕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页至第九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六八九页至第七七八页。——(正文第三十六页)

〔一九〕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四九页至第二五〇页。——（正文第四十一页）

〔二〇〕 指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的判决枪毙了外国特务机关派到苏联进行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的二十个保皇派白卫分子一事。被枪决的罪犯中有过去的俄国公爵和贵族、大地主、大工业家、大商人和沙皇近卫军军官。——（正文第四十三页）

〔二一〕 克逊最后通牒是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克适向苏联提出的以新的武装干涉威胁为内容的照会。——（正文第四十五页）

〔二二〕 “社会主义通报”是白俄孟什维克的杂志，于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德国出版，后来在法国和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是反动的白俄的喉舌。——（正文第五十三页）

〔二三〕 “舵报”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五十三页）

〔二四〕 见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页至第一五二页）。——（正文第六十四页）

〔二五〕 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〇四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二六〕 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十三页至第五十二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二七〕 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页至第八十二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二八〕 指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〇九页至第二二〇页）。——（正文第六十五页）

〔二九〕 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提纲和决议”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六十页至第七十页）。——（正文第六十六页）

〔三〇〕 指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纲、决议和决定”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六页）。——（正文第六十八页）

〔三一〕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七页至第四三五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〇〇四页至第一〇一〇页。——（正文第七十二页）

〔三二〕 “奥索夫斯基主义”是一种企图论证苏联应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反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的创造者托洛茨基分子奥索夫斯基于一九二六年八月被开除出联共（布）。——（正文第七十五页）

〔三三〕 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二七页至第五三〇页）。——（正文第七十七页）

〔三四〕 “工人真理派”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秘密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被开除出俄共（布）。——（正文第八十三页）

〔三五〕 热那亚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热那亚（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参加会议的一方是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苏俄。在会议开幕时，苏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复兴欧洲的计划，并提出了普遍裁减军备的方案。但苏俄代表团的提案被否决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向苏俄代表团提出几项要求（偿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款，把收归国有的财产归还外国产权人等等）；实行这些要求，就等于把苏维埃国家变成西欧资本的殖民地。苏俄代表团拒绝了外国资本家的这些无理要求。——（正文第一〇九页）

〔三六〕 指一九一九年七月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改良主义工会国际联合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奉行改良主义政策，公开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敌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姆斯特丹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才被正式取消。——（正文第一一三页）

〔三七〕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一部分工会的联合会，于一八八一年成立。联合会的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在美国工会运动中的走狗，他们在世界工人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正文第一一四页）

〔三八〕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田纳西州（美国）发生了一件十分有名的审判案。教员约翰·斯柯普斯因为在专科学校里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受审判，美国的极端反动主义者判决他违犯州法并科以罚金。——（正文第一一六页）

〔三九〕 见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九页）。——（正文第一二九页）

〔四〇〕 见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页）。——（正文第一二九页）

〔四一〕 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五页）。——（正文第一三〇页）

〔四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全会讨论并批准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议程的两个问题（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提纲草案；全会批准了报告人名单，通过了关于争论的决定，并决定公布将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以便在党的会议上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首领们攻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宣言，特别是攻击其中关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一项，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专门决定，认为中央政治局提议发表宣言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本身都是正确的。全会听取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所做的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八月（一九二七年）联席全会之后进行派别活动的报告。在十月二十三日全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全会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欺骗党并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决定取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并决定把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首领的分裂活动的全部材料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全会的决议和决定，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二七五页至第三一一页）——（正文第一四八页）

〔四三〕 见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二十六卷第一八五页至第一八八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五六页至第一五九页）和“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九二页至第一九六页）。——（正文第一五二页）

〔四四〕 见列宁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所做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五二页）。——（正文第一五八页）

〔四五〕 见列宁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所做的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七〇页、第一七七页）。——（正文第一五八页）

〔四六〕 “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创刊，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正文第一六四页）

〔四七〕 米雅斯尼柯夫集团是秘密的反革命集团，自称为“工人集团”。该集团是被开除出俄共（布）的米雅斯尼柯夫等人于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组成的，参加的人数不多。同年该集团即被消灭。——（正文第一六四页）

〔四八〕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于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三三年出版。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前进报”是反苏宣传的中心之一。——（正文第一六九页）

〔四九〕 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格鲁吉亚发生的反革命暴动，这次暴动是被击溃的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残余分子和饶尔丹尼亚的孟什维克流亡“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二国际首领的指示和资助下组织的。在格鲁吉亚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积极协助下，暴动于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就被平息。——（正文第一六九页）

〔五〇〕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国军警对北京苏联大使館的武装袭击，这次武装袭击是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策动下进行的，目的在于造成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冲突。——（正文第一七二页）

〔五一〕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英国警察对伦敦苏联商务代表处和阿尔柯斯（苏联对英贸易公司）的袭击，这次袭击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组织的。——（正文第一七二页）

〔五二〕 指一九二七年秋法国的反苏运动。策动这次反苏运动的法国政府赞助各种反苏活动，攻击驻巴黎的苏联官方代表和机关，并对英国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表示同情。——（正文第一七二页）

〔五三〕 路标转换派分子是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国外的俄国白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派的代表。路标转换派是由出版“路标转换”杂志的尼·乌斯特里雅洛夫、尤·克柳奇尼柯夫等人的集团领导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反映了那些指望苏维埃制度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逐渐蜕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苏俄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关于路标转换派分子，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五六页至第二五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九五二页至第九五三页和“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四一页至第三四二页，中文版第九卷第六十四页至第六十八页）——正文第一七四页）

〔五四〕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页至第三九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四七页至第五六六页。——(正文第一七六页)

〔五五〕 “佛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于一七〇四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一八四页）

〔五六〕 萨柯和万泽第是移居美国的意大利工人。萨柯和万泽第被诬告杀人抢劫，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在布罗克吞（马萨诸塞州）被捕，一九二一年被美国反动法庭判处死刑。为了表示抗议这种判决，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群众大会和罢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萨柯和万泽第被处死刑。——（正文第一八五页）

〔五七〕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沙皇政府的外债的法令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通过。——（正文第一九七页）

〔五八〕 见坡尔·拉法格“革命后的第一天”（见“拉法格文集”一九二五年版第一卷第三二九页至第三三〇页）。——（正文第二〇五页）

〔五九〕 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二五页）。——（正文第二一二页），

〔六〇〕 联共（布）莫斯科军区第七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斯大林的贺电是在代表会议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会议上宣读的。——（正文第二一三页）

〔六一〕 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举行。代表会议听取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讨论了根据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计划而制定的关于莫斯科省经济建

设计划、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在代表会议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代表会议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及其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定。代表会议选举斯大林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正文第二一四页）

〔六二〕 见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正文第二一七页）

〔六三〕 见列宁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页）。——（正文第二一九页）

〔六四〕 见列宁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二一五页）。——（正文第二一九页）

〔六五〕 见列宁“彼得堡的选举和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二卷第十七页至第二十七页）。——（正文第二二七页）

〔六六〕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听取了代表大会处理反对派问题委员会的报告，选出了党的中央机关。斯大林于十二月三日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十二月七日做了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十二月十二日，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代表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钱和组织路线，并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巩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继续用同样速度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并加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做出了关于争取农业集体化的方法的指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农业集体化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代表大会拟定了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在旨在消灭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关于反对派的决议中确定，党与反对派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并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代表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关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所有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党。（关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四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二一页至第三七一页）——（正文第二二九页）

〔六七〕　指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和玉蜀黍五种谷物。——（正文第二三二页）

〔六八〕　见斯大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六一页至第三五二页）。——（正文第二三四页）

〔六九〕　指美英及其他国家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业家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发表的宣言。该宣言要求废除欧洲各国所施行的关税限制，实质上这是英美财政资本企图在欧洲确立自己的霸权。——（正文第二三五页）

〔七〇〕　“世界事业”（《workrs work》）是代表美国大资产阶级当权集团的观点的杂志，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加尔顿城（纽约州）出版。——（正文第二三七页）

〔七一〕　三国海军裁军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在日内瓦（瑞士）举行。——（正文第二三八页）

〔七二〕　国际联盟废除军备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日内瓦开幕。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宣言，建议实现普遍的完全废除军备的纲领。苏联所提的废除军备的方案被否决。——（正文第二三八页）

〔七三〕　“罗迦诺体系”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罗迦诺（瑞士）会议上所缔结的条约和协定的体系，其目的是要巩固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欧洲战后秩序，并利用德国来反对苏联。（关于罗迦诺会议，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七一页、第二七三页至第二七四页）——（正文第二三九页）

〔七四〕 指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也沃（波斯尼亚）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而言，这次刺杀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导火线。——（正文第二四〇页）

〔七五〕 一九二七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的工会法鼓励工贼行为，限制工会为政治目的进行募捐，禁止公务人员加入属于工联代表大会和拥护工党的各工会组织。该工会法规定政府有权宣布任何罢工为非法。——（正文第二四一页）

〔七六〕 一九二七年三月法国下院通过的“民族武装”法是改组法国帝国主义军事机构和准备新战争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该法令规定：使全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军事化，在战争爆发时动员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全体居民，使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军事化，取消罢工权，扩充基干部队并利用它去镇压法国无产阶级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发动。——（正文第二四一页）

〔七七〕 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由来苏联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庆祝典礼的许多外国工人代表团发起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九百四十七名代表。大会参加者听取了关于苏联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总结的报告以及关于保卫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使之免于战争危险的报告。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在末尾向全世界劳动者号召：“用一切手段，用一切方式来进行斗争，保卫并维护劳动者的祖国、和平的支柱、解放的策源地、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正文第二四二页）

〔七八〕 见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一页）。——（正文第二七四页）

〔七九〕 “劳动报”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关报（日刊），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创刊。——（正文第二七六页）

〔八〇〕 见列宁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信中谈到将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政治报告纲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页至第二二四页）。——（正文第二七七页）

〔八一〕 见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卷上第二一五页）。——（正文第二八三页）

〔八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六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〇三五页。——（正文第二九二页）

〔八三〕 见列宁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七七页）。——（正文第三一七页）

〔八四〕 “新自由报”（《Seue Freie Presse»）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于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在维也纳出版。（正文第三二一页）

〔八五〕 “纽约美国人报”（《New York American》）是美国反动分子赫斯特系的报纸，于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纽约出版。该报在最后几年的立场是亲法西斯的。——（正文第三二一页）

〔八六〕 “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是美国工人党（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从一九二二年起以“工人报”为名在芝加哥每周出版一次，从一九二四年起改为“工人日报”。从一九二七年起该报在纽约出版。——（正文第三二三页）

年　表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八月一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发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

八月二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被选为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八月五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就奥尔忠尼启泽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报告发表演说。

八月六日至九日

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八月九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发表“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的演说。

八月十一日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八月联席全会的决议的报告时，斯大林出席会议。

九月四日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国际青年节十三周年青年游行示威大会。

九月九日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

九月十六日

斯大林写信给玛·依·乌里杨诺娃。

斯大林和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谈话。

九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的演说。

九月三十日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部分委员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台尔曼谈话。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十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发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斯大林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报告人。

十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国营航空工业工厂工人代表团谈话。

十月

斯大林写“‘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纲要”。

十一月三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第八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代表。

十一月五日

斯大林和来苏联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外国工人代表团谈话。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致贺词。

十一月六日至七日

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一文在“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上发表。

十一月七日

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在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中央理事会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和总结苏联航空建设成就而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致贺词。

十一月十日

斯大林出席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十一月十六日

斯大林和一部分军事工作者——联共（布）莫斯科军区第七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谈话。

十一月十八日

斯大林致联共（布）莫斯科军区第七次代表会议的贺电在“红星报”第二六三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九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发表“党和反对派”的演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月三日

斯大林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十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被选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书面答复外国报刊驻莫斯科代表就伪造“斯大林论文”事提出的询问。

十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参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十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参加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工作。

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选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批准斯大林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斯大林全集

第十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三萬五千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235,000字
印數1—45,000册

書號1727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七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一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1
1928 – март 1929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一卷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五五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十一卷说明 …… 1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二八年（上）

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简要记录）…… 3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9

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贺电 …… 16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
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 17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 22

一　关于自我批评 …… 22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 29

三　沙赫特事件 …… 38

四　总结 …… 45

致科斯特罗马工人的贺电 …… 47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 48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 48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 51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 53
给“青年团真理报”
（纪念创刊三周年） …… 57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纪念成立十周年） …… 58
在粮食战线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谈话节录） …… 59
给共产主义科学院党组织组员的信 …… 70
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
（答斯·同志） …… 73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答弗鲁姆金）（关于弗鲁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 …… 84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 92

一九二八年（下）

联共（布）中央全会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100
论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说） …… 100
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说）…… 110
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说节录）…… 131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38
一 共产国际的问题 …… 138
一、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 …… 138
二、 共产国际纲领 …… 141

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143
一、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问题 …… 143
二、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 …… 149
结论 …… 151
给列宁格勒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 …… 152
给古比雪夫同志的信 …… 153
悼念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 …… 154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155
答什·同志 …… 167
致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的贺电）…… 170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周年 …… 172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173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 173
二　谷物问题 …… 181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 188
给斯摩棱斯克省“线轴”工厂的工人和
雅尔采沃工厂的工人 …… 204
给“红色工会国际”工厂的工人（别日察市）…… 205
纪念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十周年 …… 207
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208
一　资本主义稳定问题 …… 209
二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 …… 211

三 德国共产党问题 …… 213
四 德共党内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分子 …… 216
五 关于秘密信和公开信的草案 …… 218
答库什特谢夫 …… 220

一九二九年（1-3）

堕落到极点了 …… 222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简要记录）…… 226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 231
给“红三角”工厂的男女工人 …… 234
致普罗斯库罗夫城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贺电 …… 235
给“农业报”的祝词 …… 236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237
一 “民族”概念 …… 237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 239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 243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 248

注释 …… 253
年表 …… 263
插图（新增）
一 苏联红军军旗军徽 …… 21
二 列宁著《青年团的任务》…… 171
三 咱们工人有力量 …… 206

第十一卷说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著作。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依据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获得的成就，为引导劳动农民群众从个体经济的道路转到集体农庄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党始终如一地执行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为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准备了一切必要条件。

自从党转为向富农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右倾投降主义敌对集团就抛弃了假面具，公开反对党的政策。

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一信中，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等演说中，在“堕落到极点了”一文和其他著作中，约·维·斯大林揭露了右倾的富农反革命本质，揭穿了右倾投降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反苏维埃秘密组织的破坏活动，指出了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时集中了火力反对右倾。

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在“在粮食战线上”的谈话中，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的演说中，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在“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的讲话中，在“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一文和其他著作中，约·维·斯大林确定了解决谷物问题、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巩固城乡结合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在这些著作中，约·维·斯大林论证了迅速发展工业——社会主义和国防的

基础的必要性，提出了造就工人阶级出身的、能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新干部的任务。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了迫切需要全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教育干部的方法，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一次发表的著作“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在这篇著作中，约·维·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第一次在苏联形成的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的原理，指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之间的原则差别，着重指出了社会主义民族的团结性和生命力。

编入第十一卷的还有约·维·斯大林的著名演说“论红军的三个特点”。这篇演说指出了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泉源，规定了进一步巩固红军的办法。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的报告和“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两篇演说论述了国际革命运动问题和各兄弟共产党的任务。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意义。约·维·斯大林说明了苏维埃国家的新经济政策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

第十一卷中第一次发表了约·维·斯大林的下列十四篇著作：“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给古比雪夫同志的信”、“答什·同志”、“答库什特谢夫”、“堕落到极点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致普罗斯库罗夫城的贺电”、“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二八年至

一九二九年三月

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二〕）（简要记录）

我被派到你们西伯利亚来一个短时期。我的任务是帮助你们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同时和你们讨论关于农业发展前途以及在你们边区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的问题。

你们一定知道，从我国粮食平衡表上可以看出，我们今年缺粮一亿多普特。因此，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加强各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以便补足我们粮食平衡表上的这个缺额。消灭缺额首先要靠丰收地区，所以这些地区不仅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你们当然知道，如果缺额不消灭，它会造成什么结果。它会使我们的城市和工业中心以及我们的红军陷于困难的境地，使它们的供应状况恶化，使它们遭受饥饿的威胁。显然，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

对于这一点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来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呢？我在你们边区各地走了一趟，这使我有可能相信，你们这里的人没有真正关心如何帮助我们国家摆脱粮食危机。你们的收成很好，可以说是空前的。今年你们的余粮比哪一年都多，而粮食收购计划却没有完◇3◇[①]成。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你们说，粮食收购计划太紧，完成不了。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是从哪里说起呢？今年你们的收成的确是空前的，难道不是事实？今年西伯利亚的粮食收购计划和去年几乎一样，难道不是事实？为什么你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 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们认为计划完成不了？请看看富农吧：他们的谷仓和木棚里堆满了粮食，由于保存的地方不够，连草棚下也堆了粮食；除了种子、口粮和牲畜饲料以外，每户富农还有五六万普特的余粮；而你们却说粮食收购计划完成不了。你们这种悲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们说，富农不愿意拿出粮食来，他们在等待粮价提高，他们宁愿进行疯狂的投机。这是事实。但是富农不单是等待粮价提高，而且要求把粮价提高到比国家价格高两倍。你们认为可以满足富农的要求吗？贫农和很大一部分中农已经按照国家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了。能不能让国家付给富农的粮价比付给贫农和中农的高两倍呢？只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会懂得满足富农的要求是绝对不容许的。

既然富农在粮价上进行疯狂的投机，为什么你们不惩办他们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有对付投机的法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吗？根据这条法律，投机犯应当送交法庭判罪，商品由国家没收。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条法律来对付粮食投机分子呢？难道你们怕扰乱富农老爷的安宁吗？！

你们说，对富农使用第一百零七条是一种非常措施，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只会使农村情况恶◇4◇化。查古明尼同志特别坚持这一点。就算是一种非常措施吧，那又有什么呢？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使用第一百零七条产生了很好的结果，把劳动农民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并且改善了农村的情况，而在你们西伯利亚，使用这条法律似乎一定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并使情况恶化呢？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你们说，你们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还没有准备好做这种工作。但是，为什么其他地区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已经准备好并且工作得十分顺利，而在你们这里，这些机关却还没有准备好对投机分子使用第一百零七条呢？这是谁的过错？看来，这是你们党组织的过错，你们党组织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没有设法使我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几

乎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我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富农的住宅干净些，吃得好些。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些先生还没有被清洗掉，还没有由另外一些诚实的工作人员来代替。

我建议：

（甲）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

（乙）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按低廉的国家价格或者用长期信贷的方式分配给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5◇

至于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那末应该把所有不中用的一律撤职，而以忠诚老实的苏维埃人代替他们。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措施将产生很好的结果，你们将不仅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采取这些措施只能使今年的情况好转，但不能保证富农明年对于粮食收购不再怠工。不仅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富农存在，对于粮食收购的怠工就一定会存在。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有比较稳固的基础，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什么措施呢？我指的就是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

你们大家都知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能够采用拖拉机和机器的大农场。这种农场比地主和富农的农场能出产更多的商品。应当注意，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工业正在发展，并且将一年比一年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因此，粮食的需求将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说，粮食收购计划将扩大。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工业任凭富农摆布。因此，必须在最近三四年内做到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粮食缴纳者至少能够供给国家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这样做就能把富农排

挤到后面去，并能给比较正常地供应工人和红军粮食的工作打下基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惜人力和物力，大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也不够。我们的国家不能只看到今天。我们还应当想到明天，想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6◇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粮食问题是农业问题的一部分，而农业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勉勉强强供应工人阶级和红军粮食，有了我刚才所说的农业局部集体化就够了，但是要做到下面两点，单靠农业局部集体化却是完全不够的：

（甲）建立一个能充分供应全国粮食并能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粮食后备的牢固基础；

（乙）使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中，在农业方面获得胜利。

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能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呢？不，不能。

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所以，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工业社会主义化是完全不够的。为此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

第二、这就是说，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7◇

第三、这就是说，铲除一切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根源并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第四、这就是说，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以便不仅以粮食而且以其他各种食品不断地大量供应全国，并且保证国家有必要的粮食后备。

第五、这就是说，为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建立统一的和牢固的社会主义基础。

最后，这就是说，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这就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

这就是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任务是不简单的，是艰难的，但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困难的存在就是要人去克服它和战胜它。

应该知道，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采用机器和提供最多的商品的大规模农业经济。建立大规模农业经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批农民破产而建立对劳动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大田庄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农民不会遭到破产、劳动也不会受到剥削的道路。我们党选择了建立大规模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后来又在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就向党提出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任务，认为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在农业中获得胜利的决定◇8◇性的方法。

列宁指示说：

（甲）“商品生产下的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所受的贫困和压迫”（“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一页）；

（乙）“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

卷第四六五页）；

（丙）“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迫使我们进入的绝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

列宁又指示说：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任何有助于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们有千百万零散的、分布在穷乡僻壤的个体农户…… 只有当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是必要而可能的这一点**在实践中**和**在**农民亲身**经验中得到证明**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利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9◇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列宁的指示就是这样。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二〕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决定：

“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三〕

同志们，关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问题就是如此。

我们的责任就是执行这些指示。

第一次刊印◇10◇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大约一个半月以前，即一九二七年底，我们的粮食收购发生了极严重的危机。一九二六年底，我们已经收购到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可是一九二七年底，收购的粮食才勉强达到三亿普特。可见拿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六年底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这个缺额也就是粮食收购危机在数字上的大略表现。

粮食收购危机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如何呢？

首先，这意味着工人区的供应发生危机，这些地区的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第二、这意味着红军的供应发生危机，红军战士中产生不满情绪。

第三、这意味着产麻区和产棉区的供应发生危机，这些地区出现投机的粮价，麻农和棉农改种粮食，因而棉、麻生产缩小，纺织工业的有关部门也随之缩小。

第四、这意味着国家手中缺乏粮食后备，既不能满足国内需要（逢歉收时），也不能满足为输入设备和农业机器所必需的出口的需要。◇11◇

最后，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价格政策遭受破坏，稳定粮价的政策遭受破坏，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遭受破坏。

为了摆脱这些困难，应当弥补亏空，消灭收购方面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的缺额。要消灭这个缺额，应当使党和政府的一切杠杆都动起来，打破各组织中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从上到下把党的优秀力量都投到收购战线上去，无论如何要充分利用泥泞时期以前有限的时间来提

高收购量。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联共（布）中央发出了头两个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指示（第一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第二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但是因为这两个指示没有发生效力，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又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发出了第三个指示，这个指示不论按语气或要求来说都是空前严厉的。指示的结尾指出，如果党组织的领导者在最短期间不能彻底扭转粮食收购方面的状况，那就要给予他们处分了。当然，这种处分只能在非常情况下采用，况且，党组织的书记们做工作并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是为了革命。可是，鉴于上述非常情况，中央认为采取这一步骤是适当的。

在引起粮食收购危机的若干原因中必须指出下列几点：

第一、农村正在发展和富裕起来。首先是富农已经发展和富裕起来了。三年的丰收不是没有作用的。今年的余粮不比去年少，正如今年国内工业品不比去年少而比去年多一样。可是农村富裕阶层今年已经有可能依靠原料作物、肉类产品等等来周转，而把粮食囤积起来以抬高粮价。固然，富农◇12◇不能算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但他们是农村中的经济权威，他们和以高价收买粮食的城市投机分子勾结在一起，如果不遇到我们收购机关的反对，他们就有可能在抬高粮价的问题上，在破坏苏维埃价格政策的问题上使中农跟着他们走。

第二、我们的收购机关没有担负起自己的任务。它们滥用加价和各种“合法”增价的办法，它们不去制止投机活动，而是彼此之间进行疯狂的竞争，破坏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抬高粮价，从而不自觉地帮助了投机分子和富农破坏苏维埃的价格政策和恶化市场，使收购量降低。固然，党可以加以干涉，把这些缺点消灭掉。但是党陶醉于去年收购工作的成绩，同时又忙于争论〔四〕，竟放过了这些缺点，以为一切缺点都会自行消灭。而且有许多党组织形式主义地对待收购工作，好像这个工作和它们无关，它们忘记了，对收购工作中的缺点，以及

对一切经济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工作中的缺点，要向工人阶级负责的首先是党。

第三、我们的农村工作路线在许多地区被歪曲了。党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个基本口号往往执行得不正确。各级党组织已经学会了和中农结成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巨大的成绩，但是它们还远不是在一切地方都把贫农工作做好了。至于同富农和富农危险作斗争，那末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方面还远没有做到它们应该做的一切。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最近在我们的各种组织中，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13◇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显然，在农村中有这种“共产党员”是不能改进我们的农村工作、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以及把贫农团结在党的周围的。

其次，在一月份以前，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于非谷类农作物、畜牧业和零活等收入增加而比去年大为提高，但是商品的供应总值有一定的减少（虽然运往农村的工业品数量已经增加），也就是说，商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提高。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如工业品运往农村迟缓、只依靠农业税、不善于吸取农村游资等等，就给粮食收购危机造成了条件。

不言而喻，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地方党组织。

为了消除危机，首先必须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并且告诉它们，收购工作是全党的事情。

第二、必须用打击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办法来制止投机活动和健全市场，为此可以使用那些禁止在日用品方面进行投机的苏维埃

法律。

第三、必须吸收农村游资，为此可以利用关于捐献、发行农民公债和禁止酿造私酒的法律。

第四、必须使我们的收购机关受党组织的监督，制止这些机关互相竞争，责成它们执行苏维埃价格政策。

最后，必须使党的路线在农村实际工作中不再被歪曲，把对富农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当做工作重点，责成我们的党组织“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14◇议）〔五〕。

从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知道，党在加强收购工作的斗争中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并且在全国展开了相应的运动。

在其他的条件和其他的情况下，党是会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的，例如把几千万普特粮食抛到市场上，去制服不肯拿粮食上市的农村富裕阶层。但是要这样做，国家就必须掌握足够的粮食后备，或者拥有用于从国外输入几千万普特粮食的大量外汇后备。但是，大家知道，国家并没有这些后备。正因为没有这些后备，所以党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反映在中央的指示里，表现在展开了的收购运动中，但是其中大部分只在目前收购年度有效。

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如此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谣言，必须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国家有权、有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调节商业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流转和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没有这个条件，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单纯恢复，这一点是大谈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造谣者所不愿意了解的。

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和展开了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使党取得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收购速度已经确定而

普遍地提高。一月份的收购量比十二月份增加了一倍。二月份的收购速度又有所提高。收购运动对于我们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组织，◇15◇都是一次检查，它使这些组织容易清除蜕化分子和提拔新的革命的工作人员。我们正在揭露收购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并在收购运动的进程中制定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农村中党的工作正在改进并日有起色，歪曲党的路线的现象正在消灭。农村中富农的影响正在削弱，贫农工作日趋活跃，农村中苏维埃的社会力量正在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基本农民群众（包括中农）中的威信正在提高。

我们显然正在摆脱粮食收购危机。

但是，除了上述成绩以外，在执行党的指示的实践中还有许多歪曲和过火行为，如果不消灭就会造成新的困难。这些歪曲和过火行为就是某些地区企图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强行摊派农业公债，建立类似巡查队的组织以及任意捕人、非法没收余粮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坚决消灭。

除了进一步加强各机关的工作使粮食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以外，中央并责成党和苏维埃的一切地方组织立即进行春季播种运动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扩大春季播种面积。

针对着个别富农投机分子缩小播种面积的煽动，应当在集体农庄的特别支持之下展开扩大农村贫农阶层和中农的播种面积的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有组织的运动。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建议：

（一）毫不放松地继续加强粮食收购运动，无论如何要完成本年度粮食收购计划。

（二）加紧和一切直接或间接提高公议价格的方式作斗争。◇16◇

（三）坚决消除国家收购机关和合作社收购机关之间的竞争，切实保证收购机关在同投机倒把抬高粮价的包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四）继续对大批商品粮食的真正持有者——富农施加压力，在施加压力时必须完全依照苏维埃法律（例如对两千普特或更多商品粮食的持有者中的个别顽固的坏分子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乌克兰法律中的相当条款），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去侵犯中农。

（五）从依法没收的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余粮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用长期信贷的方式交给贫农作为种子之用，必要时可以作为消费之用。

（六）坚决取缔在加强粮食收购的运动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和歪曲行为，这种行为在个别情况下已经发展为采用征收余粮的方法，如按户摊派粮食、在个别地区的交界地方设巡查队等等。

（七）在收取农民拖欠国家的款项（农业税、保险费、贷款等方面的尾欠）时，对农村富裕阶层特别是对富农应当继续施加压力，而对贫农，必要时也对力量单薄的中农，则采取减轻或优待的办法。

（八）在捐献方面，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实行较农业税为高的累进率。保证农村贫苦阶层免除捐献，力量单薄的中农和红军家属则减少捐献。在各地开展捐献运动的时候，要发挥社会的自动精神，广泛吸收贫农、青年团、妇女代表和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这一工作。捐献的款项应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不得用作机关经费，用款的项目、支出预算等等必须经农民大会具体讨论和批准，款项的使◇17◇用应该受广大公众的监督。

（九）坚决取缔用行政手段摊派农民公债的行为（用公债券偿付粮款，按户强行摊派公债等等），要特别注意向农民解释农民公债对他们的一切好处，并且利用农村中社会团体的影响和力量在农村富裕阶层中推销农民公债。

（十）要重视满足粮食收购区对工业品的需求。取缔已经出现的粮食和工业品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在供应

奇缺的商品方面，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只要他们出售粮食，就可以用优待合作社社员的办法优待他们。

（十一）继续在收购运动的进程中检查并坚决清洗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组织，把异己分子和混进来的分子驱逐出去，以坚定的党员和经过审查的非党工作人员代替他们。

约·斯大林

（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18◇

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贺电

向在伟大的战斗中捍卫了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红军致敬！

光荣属于为无产阶级事业而牺牲的战士们！

光荣属于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战士们！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红星报”第四十六号◇19◇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
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红海军战士、我们的红空军战士、我们的准备入伍的青年——苏联的武装工人致敬。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它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红军，这支红军在极伟大的战斗中捍卫并且捍卫住了工农的自由。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光荣地走过了对我国工农的内外敌人进行极残酷的战斗的艰苦道路，是红军已经成为一支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颤心惊而使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者欢欣鼓舞的极强大的战斗的革命力量。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走过了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漫长道路，终于争到了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纪念日的权利。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力量何在呢？产生这种力量的泉源何在呢？◇20◇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古今所有一切军队根本不同的特点何在呢？

成为我们红军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特点何在呢？

我们红军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解放了的工农的军队，它是十月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到现在为止，一切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不管它们的成分怎样，都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军队。这种军队过去是现在还是维

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军队。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军队在那里镇压工人，充当统治者的支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和这种军队不同，我们红军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工农政权的工具，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我们的军队是解放劳动人民的军队。

同志们，在过去以及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都是怕军队的，在人民和军队之间有一道把军队和人民隔开的鸿沟，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而在我国又是怎样呢？在我国恰恰相反，人民和军队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像我国人民这样爱护和关怀军队。在◇21◇我国，军队受到热爱、尊敬和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替统治者效劳，而是替那些以前当奴隶、现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工农服务的。

我们红军的力量的泉源就在这里。

人民热爱自己的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样的军队一定会有极巩固的后方，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一支没有巩固的后方的军队算得什么呢？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军队，装备最好的军队，往往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来自后方、来自劳动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而土崩瓦解、化为乌有。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唯一得到工农同情和支援的军队。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坚固性就在这里。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所有其他一切军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这里。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使它和工农的这种兄弟般亲密的关系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红军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兄弟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军队。

过去军队受到的通常是大国主义的教育，侵略主义的教育，必须征服弱小民族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旧式的军队，资本主义的军队，同时也就是实行民族压迫、实行殖民地压迫的军队。这也就是旧军队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的军队是和实行殖民地压迫的军队根本不同的。我们军队的全部实质，◇22◇我们军队的全部制度，是建筑在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是建筑在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保卫苏联各加盟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第二个主要泉源。这就是我们军队在紧急关头能获得我们广大国土上各民族千百万群众最大的支援的保证。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最后，谈谈红军的第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我们军队中培养和巩固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了我们红军全军的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通常是以仇视别国人民、仇视其他国家、仇视别国工农的精神教育军队的。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军队变成驯服的兽群，供国家间、列强间发生军事冲突时驱使。一切资本主义军队力量薄弱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们的军队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红军的力量在于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国际主义的教育，受着尊重别国人民的教育，

受着热爱和尊敬世界各国工人的教育，受着保卫并巩固各国间的和平的教育。正因为我们的军队受的是国际主义的教育，是世界各国工人利益一致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军队是世界各国工人的军队。

如果各国资产者胆敢侵犯我国，那末他们就会认识到上述这一点就是我国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因为那时他们就会看见，我们的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红军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从上海到纽◇23◇约，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到处都有无数的朋友和同盟者。

同志们，这就是贯串在我们军队的全部精神中并成为我们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军队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军队所以强大有力，就是由于它具备这三个特点。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的军队不是由锡制的兵组成的，而是由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和为了什么而战的觉悟分子组成的。

同志们，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红军有一切理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我们的红军万岁！

红军战士万岁！

红军指挥员万岁！

产生了红军、使它获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光荣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热烈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五十号◇24◇

苏联红军军旗军徽

接受检阅的步兵方阵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前线

红军早期的骑兵和坦克兵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①]）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六〕具有一个和最近两年来举行的各次全会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次全会纯粹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

排在议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事件〔七〕问题，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问题。你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如此，全会上的讨论还是完全实事求是的，而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25◇

这是因为全会上已经没有反对派了。这是因为人们都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问题，不耍派别手腕，不进行派别煽动。这是因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只是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才有可能认真地和切实地处理实际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发展阶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说，无比有利的方面。

一　关于自我批评

① 在这篇报告中补入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几段文字。——编者注

全会工作的特点，全会讨论和全会决议的特点是：全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全会的每一个问题上，在每一次发言中，都对我们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的组织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我们缺点的批评，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一般地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人们有这种情绪，既然人们远不是热情地对待◇26◇自我批评，那末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末，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除了我们以外，再不会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我批评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有力地贯彻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

内形成了一种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新情况。

这种新情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或者几乎再也没有反对派了。表现在我们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个胜利本身对党非常有利）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胜利本身包含着特别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和高枕无忧的情绪。而高枕无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27◇我们已经停止前进。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从那时起，自我批评的浪潮就日益高涨，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嘿，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事情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群众和领袖的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从历史上形成了一批威信越来越高的

领导者，他们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28◇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向前迈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有时人们把群众和领袖的问题同提拔的问题混为一谈。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提拔新的领袖一事值得党的严重注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保存已经提拔起来而且极有威信的领袖，并在他们和群众之间建立经常的牢不可破的联系。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生动锐敏的精神上的监督力量；极有威信的领袖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力量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的作用，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欢迎“真理报”创办“工农检查院专页”〔八〕来经常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批评必须力求严肃深刻，不应该限于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当欢迎“青年团真理报”〔九〕发起◇29◇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展开猛

烈而热情的攻击。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仔细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揍”，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30◇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不言而喻，这里指的不是“任何”批评。反革命分子的批评也是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摧残我们的工业，瓦解我们党的工作。显然，我们指的不是这样的批评。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批评，而是那种来自苏维埃人的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

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我们期待于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末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培养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仅沙赫特事件，而且一九二七年底的收购危机，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维埃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组织草拟并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当然，我们的煤矿工业总还是上升的，因为苏维埃经济制度富有生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不用脑子而且有了错误，尽管专家们进行破坏活动，它还是占了上风。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炸毁锅炉，毁坏涡轮等等。而我们却若无其事地坐着。“突然”，好似晴天霹雳，——沙赫特事件发生了。◇31◇

同志们，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极不正常。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种情况是：一二十个领导同志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注意和发现缺点。这里一定会忽略一些缺点，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发现。另一种情况是：千百万工人和一二十个领导同志一起来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露我们的错误，

投入共同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进工作的途径。这里就更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保证及时发现不良现象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来注意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缺点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我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最后，谈一谈和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以及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32◇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一〇〕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本领呢？显然不能。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和才能，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么呢？这首先需要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工人利用机会来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来改进并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领导国家、领导经济和领导工业的事业。而这就不会不提高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

化水平。

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33◇

我国文化革命问题的迫切性也就在于此。固然，苏联工人阶级在其统治的十年内，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资本家在几百年内所获得的要大得多。但是，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促进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

根据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结论说：自我批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并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个根据，证明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使我们把自我批评口号作为当前口号的根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是毫不奇怪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吧。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十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十二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的

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点。本年度的存粮比上◇34◇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了些。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一九二七年底，我们缺粮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末，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量供应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加紧发展工业，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价应当逐渐下降，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迅速发◇35◇展。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而且最近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接受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二千五百

万个体农户。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第一、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第二、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类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才提出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36◇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它不仅应当包括个别集团或小集团，而且应当包括整个村子。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不能上升为富农，而下降为贫农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像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

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上年度也是有的。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这一年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粮价的可能了；

第二、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抬高粮价，使物价高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粮价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因此，农村富农分◇37◇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像富农和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那末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既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一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

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末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和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38◇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松懈涣散，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抬高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干预这件事情以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和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当然是无意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39◇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一百零七条法律。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的进行是正常的，所以没有理由使用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一九二八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诡计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很正常，那末第一百零七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掉起花枪”来，那末第一百零七条就会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以为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要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些人以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40◇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结

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一月到三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二亿七千多万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一〕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的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鼓吹也不能鼓吹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41◇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界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笑声，鼓掌。）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

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一百零七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能摆脱收购危机）所获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把收购运动最大的成绩淹没在歪曲我们路线的个别现象的一勺水里，其实这些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42◇最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党干预了收购运动，并打击了富农和投机分子。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和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是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已经能够把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和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一百零七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一九二一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

（当然是有一定的附带条件的）。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甫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甫及其领导者的愤懑。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笑声）在这以前，好像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43◇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大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些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个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措施的决心如何，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惊异，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

料基地。假如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44◇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和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谈沙赫特事件吧。

三 沙赫特事件

沙赫特事件的阶级背景怎样？沙赫特事件的根源何在？这个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他们一般都说：我们在这里打瞌睡打得太厉害了，疏忽大◇45◇意了；如果我们不打瞌睡，那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任何沙赫特事件的。这里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不了解问

题的实质。

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说明：沙赫特事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

其次，事实说明：这些结成秘密集团的专家，是从现在流亡国外的旧主人那里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那里取得经费来进行暗害活动的。

最后，事实说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集团是遵照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破坏我国工业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我国工业的经济干涉。有一个时期发生了军事政治干涉，这种干涉被我们用胜利的国内战争粉碎了。现在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干涉的尝试；要粉碎它，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国内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粉碎它，而且我们正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粉碎它。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企图没有实现。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46◇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

进；

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执行解放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对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47◇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和日本瓜分满洲，我们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说，有人要求我们“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并且同意偿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同意这样做吧？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正因为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不管这是沙赫特事件还是其他类似的什么事件，反正都是一样。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当时国际资本能够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呢？因为在我们国内有整批整批的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他们时刻准备着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军官和将军能不能发动严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果没有这批白卫军官和将军的帮助，国际资本能不能发动严重的干涉呢？我认为不能。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把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那就不会发生干涉了。这当然是不对的。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白卫将军的释放，在◇48◇国内战争的发展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干涉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苏维埃政权和国际资本及其俄国走狗将军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从前的矿主，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国际资本会来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事件呢？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我国一批把苏维埃政权恨入骨髓的资产阶级专家，国际资本能不能对我国发动像沙赫特事件这样的经济干涉呢？显然不能。一般说来，我国有没有这样一些决心进行经济干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呢？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很多。但是，我国有数目不大的比军事干涉时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干涉的基础。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阶级背景。

现在来谈一谈从沙赫特事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谈谈沙赫特事件提供给我们的四个实际结论。

列宁说过，挑选人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沙赫特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选得不好，而且使这些

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提到第三十三号命令，特别是随这个命令颁布的“标准条例”〔一二〕。这个标准条例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技术厂长，正厂长的权限只是调解纠纷、“代表”本厂、弹弹三弦琴而已。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经济◇49◇干部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这个命令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干部，我们还不会管理工业，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技术厂长。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变成了桎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有经验的、能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真正领导者的经济干部。正因为如此，现在已经到了废除过时的标准条例而代之以新条例的时候了。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的愿望，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可是为了改变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充分权力的管理者，就必须废除旧的标准条例，拿新的来代替它。否则，我们就会有毁坏我们的人材的危险。

难道我们那些堕落的经济工作人员本来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要坏吗？为什么这一类的同志堕落腐化起来，在生活上和资产阶级专家打成一片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挑选经济工作人员的条件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同志们，必须消灭这种现象。

沙赫特事件提供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50◇有把我们的红色专家培养好。这个结论是一定要得出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

本上的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难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吗？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即使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专家我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专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必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验上、在和生产的联系上都是很强的。

那些没有见过矿井也不愿意下矿井的年轻专家，那些没有见过工厂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弄脏自己的年轻专家，是永远不能战胜旧的、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但是仇视我们事业的专家的。因此，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不仅旧的专家，不仅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就连工人也往往很不欢迎这种年轻专家。但是为了不再使年轻专家遭到这种意外，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育，并且必须这样改变：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最初几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个结论是关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的问题。从沙赫特事件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坏。坏得不像话，同志们。事实证明：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地下六小时工作制并不经常遵守，劳动保护条例遭到践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会默不作声，党组织也不设法消灭这种不像话的现象。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过顿巴斯，他下到矿井里去，向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对工作条件有发牢骚的必要。这位同志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的生活怎样？”◇51◇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没有什么，生活不错。”这位同志说：“我要到莫斯科去，你们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中央？”矿工们回答他说：“你到那里就说我们的生活不错。”这位同志对矿工们说：“同志们，听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俄国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我们对谁都一样，不管对外国人或者对自己人我们都只说实话。”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矿工的面貌。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

我们已经积累在工人心中的精神资本的宝藏也正是在这里。这是十月革命的极伟大的遗产，而我们竟像败家子那样无耻地、罪恶地糟蹋这种无价之宝的精神资本，真是痛心！同志们，长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资本，任意糟蹋这种资本是不行的。已经到了消灭这种现象的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于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沙赫特事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工业的或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写决议，发指示，但是谁也不想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示执行得怎样了？是确实执行了还是束之高阁了？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52◇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就拿纯粹党方面的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来说吧。我们通常都是叫州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书记到中央来报告工作，以便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做了报告，也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中央就指摘他们，通过老一套的决议，指示说，要深入工作，要展开工作，要强调这点那点，要着重注意这点那点等等。书记们带着这种决议回到各地。以后又叫他们来，同样又是深入、展开等等一套。我不是说，所有这一套没有一点好处。不，同志们，从教育和督促各级组织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必须拿另一种方法来补充，

那就是把我们党和苏维埃上层人员派去做地方工作。（喊声：“这是好事情！”）我说的是派我们的领导同志暂时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挥员而是去做听从地方组织指挥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个办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实实地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它可以改进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末你们可以确信，这将是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这将是丰富我们可敬的领导者的经验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成了一种制度（而这是必须成为制度的），那末你们可以确信，我们这里拟定的法律，我们制定的指示，就会比目前的要切合实际和正确得多了。◇53◇

同志们，关于沙赫特事件的问题就是如此。

四　总　　结

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

我们有过收购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已经消除了。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我们又有沙赫特事件，但是这种事件已在处理而且无疑一定会处理好。沙赫特事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

不用说，无论从内部来的或外部来的诸如此类的进攻，是可能重演而且大概会重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

同志们，如果我们警惕起来，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打败我们的敌人，正像我们现在和过去打败了他们一样。（热烈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九十号◇54◇

致科斯特罗马工人的贺电

在五一节，在我们党的创始人列宁的纪念像于科斯特罗马揭幕的日子，谨向科斯特罗马的工人致兄弟的敬礼！

科斯特罗马工人万岁！

五一万岁！

列宁永远活在工人阶级的心里！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载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
“北方真理报”（科斯特罗马）
第一〇二号◇55◇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三〕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同志们！通常在代表大会上总是谈成绩。毫无疑问，我们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些成绩并不小，而且也用不着把它们隐瞒起来。但是，同志们，我们这里最近谈成绩谈得这样多，有时谈得这样腻，以致使人再也不想重复了。因此，请允许我打破惯例，不向你们谈成绩，而略为谈谈我们的缺点以及因为这些缺点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我指的是有关我们国内建设问题的任务。

这些任务涉及三个问题：我们政治工作路线的问题，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以及培养我们新的经济建设干部的问题。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56◇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目前的特点是：我们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建设已经五年了。我所说的和平发展的条件不仅是指我们没有和国外敌人作战，而且也是指国内没有内战的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国建设的和平发展的条件。

你们知道，我们和全世界的资本家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赢得这些和平发展的条件。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赢得这些条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极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任何胜利，其中也包括这个胜利，还有它不利的一面。和平建设的条件对我们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条

件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身上和他们的心理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这五年内，我们就像沿着轨道一样平稳地前进着。因此，我们许多工作人员就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们就好像坐在特别快车上，不用换车，沿着轨道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理论，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由此就产生了某种懈怠、沉睡的倾向。这种沉睡的心理，这种任工作“自流”的心理，也就构成和平发展时期不利的一面。

这种情绪的危险性何在呢？就在于这种情绪会蒙蔽工人阶级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敌人，用夸大敌人的弱点的话来麻痹工人阶级，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决不能安慰自己说，我们的党有一百万党员，青年团有二百万团员，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因此就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57◇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

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同志们，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是最危险的事情。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就是成了“意外”的牺牲品，成了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的牺牲品。而张皇失措的结果就是瓦解、失败和灭亡。

我可以给你们举出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军队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当时小部队往往把大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兵团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一九二〇年，不下五千人的三个骑兵师被一个步兵营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这仅仅是因为骑兵师陷于突然

受敌的境地，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它们不了解敌人，其实敌人的数量非常少，如果这几个师没有处于沉睡的状态，后来也没有陷于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那末一下子就能把敌人打垮。

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青年团，我们的工会以及我们的一般力量也必须这样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企图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本年度冬季我们收购方面的困难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58◇

沙赫特事件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许许多多事实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你们都知道，所以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决不能绝口不提工人阶级的这些敌人。轻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的力量就是犯罪。特别是现在，在我国和平发展时期，当破坏工人阶级战斗准备的沉睡论和“自流”论有某种有利地盘的时候，就更不能绝口不提这一切了。

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的重大教育意义就是：它们惊醒了我们所有的组织，打破了“自流”论，再一次有力地指出了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敌人存在着，他们并没有打瞌睡，所以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警惕性、革命性和战斗准备去反对这些敌人。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党的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就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

不能不指出，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特别是“青年团真理报”，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这一任务了。你们知道，在发言人的讲话中以及在“青年团真理报”的文章里，都指出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这很好。不过还必须使大家不要把这一任务看做临时的、瞬

息即逝的任务，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59◇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任务，关于对我们的缺点组织群众性的批评的任务，关于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的任务。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人们说到官僚主义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非党的旧官吏，这些人在我们的讽刺画中通常被画成是戴眼镜的。（笑声）同志们，这是不完全对的。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末反官僚主义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是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就拿我们党组织来说吧。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斯摩棱斯克事件、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等等。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60◇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激起党员群众对这些腐化分子的愤恨并且让他们有可能把这些分子撵出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或者拿青年团来说。你们当然不会否认，在青年团的某些组织里有些彻头彻尾的腐化分子，向这些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暂且不谈腐化分子。我们就拿最近的事实来说，青年团内存在着以个人为对象的无原则的小集团斗争，弄得团内乌烟瘴气。为什么在青年团里“柯萨列夫之流”和“索波列夫之流”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去找呢？（鼓掌）这个事实不是说明青年团上层机构的某些环节正处在官僚主义的僵化过程中，又是说明什么呢？

而工会呢？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

最后，谈谈我们的经济组织。谁会否认我们的经济机关有官僚主义的毛病呢？就拿沙赫特事件来说吧。难道沙赫特事件不是表明了我们的经济机关不是在迈步前进，而是在蹒跚爬行吗？

怎样才能肃清所有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呢？◇61◇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来批评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批评它们的缺点和错误。

我知道，激起劳动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病态，有时会触犯我们某些过去有过功劳而现在害了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可是这难道就能阻止我们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吗？我认为不能而且不应当。这些同志过去有功劳，应该向他们弯腰鞠躬，他们现在犯了错误，有了官僚主义，可以把他们痛打一顿。（笑声，鼓掌。）不这样

又怎么办呢？既然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有人提到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检查院、来自我们党中央等等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这还非常不够。而且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掀起极广泛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浪潮来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以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争并根绝官僚主义。

如果以为只有领导者才有建设的经验，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建设我国工业的千百万工人群众每天都在积累丰富的建设经验，对我们来说，这种经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领导者的经验。我们所以需要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就是为了不使千百万群众的这种经验白白地丧失，为了考虑到这种经验并加以采用。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展开无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在制◇62◇定消灭我们缺点的实际决定中考虑到这种批评**。

不能说青年团特别是“青年团真理报”没有考虑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这里的缺点是：这个任务往往执行得不彻底。而要彻底执行这个任务，不仅必须考虑到批评，而且必须考虑到批评的效果，考虑到批评后所实行的改进。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第三个任务是关于培养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问题。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伟大的任务。在农业方面，我们必须为联合的公共大经济打下基础。从莫洛托夫同志今天的公告〔一四〕中你们一定会知道，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为集体经济和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谷物农场的极艰巨的

任务。不解决这些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地迅速地前进。

苏维埃政权在工业方面所依靠的是最巨大最集中的生产，而在农业方面所依靠的却是最分散最细小的农民经济；小农经济是半商品经济，虽然它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的标准，但是它所提供的商品粮食比战前少得多。将来在粮食收购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切实地在农业方面组织公共的大生产。但是要建立大经济，就必须懂得农业科学。而要懂得，◇63◇就必须学习。在我们这里懂得农业科学的人简直少得不像话。因此，任务就是要造就新的、年轻的新公共农业建设干部。

在工业方面，我们的情况好得多。但是这里新的建设干部的缺乏也阻碍着我们前进。只要回忆一下沙赫特事件，就能了解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是多么迫切。当然，我们有旧的工业建设专家。但是，第一、这种专家在我们这里很少；第二、他们不是全都愿意建设新工业；第三、他们中间许多人不了解新的建设任务；第四、他们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老了，快要不中用了。因此，要把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工人阶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中加速造就新的专家干部。

我国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工业方面愿意参加建设和领导建设的人有的是，会建设和会领导的人却少得不像话。相反地，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无知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

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同志们，应当了解现在的斗争条件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可以用冲击的方法，◇64◇可以凭勇敢和大胆，可以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阵地。现在，在和平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需要勇敢和大胆。但是单凭勇敢和大胆是成不了大事的。现在要打垮敌人，必须善于建设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必须抛掉对待商业的高傲的老爷式的态度。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一些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65◇就是现在的任务。

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热烈鼓掌。高喊：“乌拉！”“好呵！”全场起立。）

载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一一三号◇66◇

给“青年团真理报”

（纪念创刊三周年）

向我国工农青年的战斗机关报“青年团真理报”致亲切的敬礼！

祝“青年团真理报”在以对工人阶级的敌人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以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完全胜利的精神教育青年这一艰巨战线上获得成就！

希望“青年团真理报”成为警钟，唤醒沉睡的人，鼓舞疲倦的人，推动落后的人，抨击我们各机关的官僚主义，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宣扬我们建设中的成就，从而有助于培养新的人材、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能够接替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新的男女青年一代！

我们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者之间没有隔阂。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我们的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走在一起，在一条战线上，在一个行列中反对国内和国外的敌人。

任务就是要保持和巩固这种团结。

希望“青年团真理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团结一致这一思想的始终不倦◇67◇的宣扬者！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载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青年团真理报”第一二二号◇68◇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纪念成立十周年）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一五〕成立以来已经十年了，这是党在为培养列宁式的新干部而斗争的战线上的极大成就。

十年来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给党供献了成千上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年工作者，他们接替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

大学在成立以来的十年内，完全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没有辱没自己的创始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

教会工人党员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方法，并把这种科学方法正确地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这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执行的任务。

值此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十周年之际，特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以前和现在的学生致敬！◇69◇

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第十周年的毕业生，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队伍致敬！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真理报”第一二二号◇70◇

在粮食战线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

问：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何在？既然有这些困难，那末对于我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来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答：初看起来，会觉得我国粮食困难是偶然的，只是由于计划得不好，只是由于经济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错误。

可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困难的原因在这里要深刻得多。计划得不好和经济平衡工作中有错误在这里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轻视计划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错误的。可是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一切的发展阶段，那就更加错误了。

不应当忘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除了那些受我们计划控制的成分以外，还有另一些暂时不受计划控制的成分，最后，还有敌视我们的阶级，而这些阶级是不能单单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71◇来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简单的偶然现象，归结为计划工作的错误等等。

那末，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何在呢？

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商品粮食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

工业在发展。工人数量在增加。城市在发展。最后，需要商品粮食的各种经济作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的产区也在扩大。所有这些情形使粮食需要量，商品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而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慢得要命。

不能说我们本年度收购来的由国家支配的粮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们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遇到了粮食困难。

请看几个数字吧。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四亿三千四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二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五亿九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五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四亿四千三百万普特。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五亿七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二千七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五亿四千九百万普特。

换句话说，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收购来供国内需要的粮食比去年多一亿普特，比前年多二亿三千万普特。但是我们本年度在粮食战线上还是发生了困难。◇72◇

我在一个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些困难被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利用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富农的反苏维埃发动。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商品粮食产量增长得慢的原因问题，指的是虽然我国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国商品粮食产量还是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的问题。

的确，我国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

的，这是事实。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就是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战前我国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而现在我国却有二千四百万到二千五百万农户，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说明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

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生产的商品粮食最多。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73◇

例如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占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换句话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相对地比战前地主经济生产的多。而中小农户呢？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只等于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可见这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战前时期和现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粮食生产构成的情形。这些数字是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涅姆契诺夫同志提供的。涅姆契诺夫同志在说明书里附带声明说，这些数字不能说完全精确，只能使人做一种大约的估计。但是从一般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特别是从商品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这些数字已经完全足以使我们明白战前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差别了。

	粮食总产量		商品粮食（农村外的）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商品率
战 前：					
（一）地主	600	12.0	281.6	21.6	47.0
（二）富农	1,900	38.0	650.0	50.0	34.0
（三）中农和贫农	2,500	50.0	369.0	28.4	14.7
总 计	5,000	100	1,300.6	100	26.0
战后（1926—1927年度）：					
（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80.0	1.7	37.8	6.0	47.2
（二）富农	617.0	13.0	126.0	20.0	20.0
（三）中农和贫农	4,052.0	85.3	466.2	74.0	11.2
总 计	4,749.0	100	630.0	100	13.3

◇74◇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这就是说，小农中农在完全摆脱了地主压迫并在基本上摧毁了富农势力之后，有可能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了。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基本农民群众从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处首先表现在这里。

第二、它说明我国商品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说明在地主经济（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三分之二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一

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虽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们现在所持有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做简单的偶然现象。

毫无疑问，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机关承担了不必要的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结果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存粮。可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并不在于这种情况，而在于我国农业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时商◇75◇品粮食需要量却增长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有人说，富农“并不”比城市资本家“坏”，富农一点也不比城市耐普曼危险，因此，我们现在不必“怕”富农，——这种说法是自由派的空话，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警惕性的。不应当忘记，在工业方面我们能用产品占工业品总产量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去和城市小资本家对立，而在农村生产方面我们能用来和富农大生产对立的，却不过是尚未巩固而粮食产量等于富农经济粮食产量八分之一的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了解富农大经济在农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农在农村中的比重较小资本家在城市工业中的比重大过百倍，那就是发了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76◇

（一）首先，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

列宁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从那时起，我们党内就没有停止过宣传集体农庄的思想。可是，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广泛的响应。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发展已经给农民情绪的有利于集体农庄的转变准备了条件，而许多集体农庄现在每俄亩已能出产粮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实，又使贫农和下中农很想参加集体农庄。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国家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资助集体农庄运动。大家知道，今年国家用于帮助集体农庄的款项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余万卢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它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认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一九二七年集体农庄的粮食总产量不下五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体农庄的巨浪和原有集体农庄的扩大，一定会使今年年底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任务在于保持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发展速度，扩大集体农庄，取消那些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集体农庄，并建立一种制度，使集体农庄把全部商品粮食交给◇77◇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否则国家就停止给以补助金和贷款。我认为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集体农庄那里得到将近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

（二）其次，出路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现有的国营农场一九二七年粮食总产量不下四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为百分之六十五。毫无疑问，在国家一定的支持下，国营农场是会大大提高粮食产量的。

但是任务并不以此为限。苏维埃政权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没有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每个农场占地一万至三万俄亩），这些农场五六年后大约能生产一亿普特商品粮食。这种国营农场已经着手建立。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决定。我认为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新旧国营农场那里得到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78◇

（三）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经济。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组织的轨道。这是一项老任务，早在一九二一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地宣布过。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六〕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这项任务。现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使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更明显了。因此，应当坚决完成这项任务，

就像坚决完成上述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两项任务一样。

所有的材料都说明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几年以内大约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现在我国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说，我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肥料、精选种子和小型机器等等供给农民经济。实行预购，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供给它们种子等等，同时从它们那里取得相当数量的粮食，这种方法是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最好方法。我认为只要在这方面认真工作，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中小个体农民经济那里至少多得一亿普特商品粮食。

总之，只要完成这一切任务，那末三四年后，我们国家就可以多掌握二亿五千万到三亿普特商品粮食，就比较能够按国内外的需要适当地机动调度了。

摆脱粮食战线上的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大体上就是如此。

把这些主要措施和当前在改进农村商品供应计划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并使我们的商业机关不◇79◇再承担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还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采取减缓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因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使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暂时超过了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不，不应当。无论如何不应当！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因为工业发展中的每个前进步骤，每个新工厂，照列宁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在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阵地的“新堡垒”。相反地，我们应当保持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应当一有可能就加快这种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农村而从农村取得更多的粮食，以便供给农业首先是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机器，以便使农业工业化并使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提

高。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我们在这里的出发点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导性的原理〔一七〕，这些原理是我们全党绝对必须遵循的。请听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80◇

还有：

“我们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约。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

列宁的这些指示是不能忘记的。

采取上述措施对工农联盟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只会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

的确，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速发展起来；如果由于得到直接帮助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起来，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来越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果国家又多得机动调度所必需的几亿普特商品粮食；如果由于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富农被制服和逐渐被战胜，——那末工农联盟内的工农矛盾因而就会日益消失，在粮食收购方面就没有必要再采取非常措施，广大农民群众就会日益转向集体经济形式，为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就会日益具有群众性和组织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采取这些措施只会有利于工农联盟，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只是应当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甲）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乙）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丙）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无论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不能叫做列宁主义。◇81◇

怎样把工农联盟思想和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著名原理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矛盾呢？这里只在表面上看来是有矛盾的。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八〕中认定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而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再三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很明显，列宁无论如何也没有认为这里有任何矛盾。

应当怎样了解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原理呢？这是不是说农民是由资本家组成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特别阶级，它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和无产阶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第二、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培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

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工农联盟的事业是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呢？不，不是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能认为是和全体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不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同富农作斗争，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实现的。不把贫农当做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组织起来，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目前◇82◇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只有在列宁所提出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

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一有名的口号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实行了这个口号，才能引导基本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由此可见，列宁这两个公式之间的矛盾只是虚假的、表面的。其实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
“真理报”第一二七号◇83◇

给共产主义科学院党建组组员的信

今天收到斯列普柯夫论自我批评的提纲。这个提纲原来是在你们组内讨论过的。你们组的组员曾对我说，把这个提纲作为文件来散发，目的不是批评中央的路线，而是论证中央的路线。

否认党员有批评中央的路线的权利是不对的。不但如此，我认为你们组的组员甚至有权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提出自己特别的提纲来和中央的立场相对立。但是，斯列普柯夫的提纲所追求的目的显然不是批评中央的路线或者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和中央的路线相对立，而是解释和论证中央的立场。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斯列普柯夫的提纲才在莫斯科党组织内得到了某些传播。

虽然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来说明：

（甲）斯列普柯夫的提纲和中央在自我批评口号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相符合的。

（乙）这个提纲“修正”、“补充”中央的立场，当然也就使中央的立场变质，这正合乎我们机关和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分子的心意。

（一）首先，斯列普柯夫的提纲所采取的方针是不正确的。斯列普柯夫的提纲仅仅在外表上像是一个论自我批评口号的提纲。实际上，这是一个论自我批评口号的**危险性**的提纲。不用说，任何革命◇84◇口号都有在实践中被歪曲的某种可能性。自我批评口号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当做问题的中心，当做论自我批评的提纲的基础提出来，那就是本末倒置，就是破坏自我批评的革命作用，就是帮助那些鉴于自我批评有“危险性”而竭力对自我批评采取应付态度的官僚主义分子。我不怀疑，我们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的官僚主

义分子读了斯列普柯夫的提纲是不会不感到满意的。

这样的方针同中央在自我批评问题上的方针，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关于沙赫特事件的决议，同中央六月间关于自我批评问题的公告〔一九〕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我认为没有。

（二）斯列普柯夫的提纲按内容来说也是不正确的。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是使自我批评成为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

不同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能够前进吗？

不能！

不同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能够组织群众的监督、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吸引千百万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吗？

不能！

不实现自我批评口号能够打击、削弱、揭发官僚主义吗？

不能！◇85◇

在论述自我批评口号的提纲中，对官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因素、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这个问题能够不加阐明吗？

显然不能。

既然如此，为什么斯列普柯夫在自己的提纲中竟以沉默来回避这个迫切的问题呢？在以论证中央的立场为目的的论自我批评的提纲中，怎么能把自我批评的极重要的任务，把反官僚主义斗争忘了呢？然而事实是：在斯列普柯夫的提纲中没有一个字（真的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到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分子，提到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病态。

这种对待反官僚主义斗争这一极重要问题的非常轻率的态度，同中央在自我批评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关于沙赫特事件的决议、中央六月间关于自我批评的公告等

等党的文件能不能相容呢？

我认为不能。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青年团真理报”第九十号◇86◇

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①

（答斯·同志）

斯·同志！

你说列宁在他那篇论皮梯利姆·索罗金的著名论文〔二〇〕中所提出的“要善于和中农成立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固地依靠贫农”这一口号，似乎是“贫农委员会时期”的口号，是“所谓中立中农时期末期”的口号。**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

贫农委员会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我们在农村中的力量已经超过富农，中农已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正是由于这种转变，中央决定取消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改选乡、村苏维埃，把贫农委员会融化在新选出的苏维埃中，也就是说取消贫农委员会。大家知道，这个决议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我指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改选乡、村苏维埃以及把贫农委员会融化在苏维埃中的决议。◇87◇

而列宁在其中宣布了和中农成立协议的口号来代替中立中农的口号的那篇论文“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上述决议**以后**几乎过了两个星期发表的。列宁在这篇论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采取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是因为中农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

① 本文略有删节。——斯大林

请看列宁的话吧：

“我们在农村中的任务就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稳固地依靠半无产者，依靠‘贫农’。但是中农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仍然动摇，将来还会动摇：感化动摇分子的任务与打倒剥削者和战胜积极敌人的任务是**不同**的。要善于和中农成立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固地依靠贫农，——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会转到我们方面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页）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口号不是属于**旧**时期即贫农委员会和中立中农时期的口号，而是属于**新**时期即和中农成立协议时期的口号。所以，这个口号反映的不是旧时期的**末期**，而是新时期的◇88◇**初期**。

可是，你对列宁的口号所下的断语不仅表面上不对，不仅所谓日期不对，而且实质上也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和中农成立协议的口号，是作为新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上用全党名义宣布的。大家知道，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是确定我们和中农建立巩固联盟这一政策的原则的代表大会。大家知道，我们的党纲，联共（布）党纲也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大家知道，在这个党纲中有几条专门规定党对农村各个集团即对贫农、中农、富农的态度。联共（布）党纲中的这些条文关于农村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党对他们的态度是怎样规定的呢？请看：

“俄国共产党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在农村中建立党支部、贫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农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就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反抗行为**。

俄国共产党对中农的政策，就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所提出的任务就是使中农离开富农，关心中农的需要从而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感化的办法而决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中农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89◇**和中农成立实际协议**，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要向中农让步。”[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三五一页〔二一〕）

你试找找党纲的这些条文和列宁的口号的差别，哪怕是最小的差别，哪怕是字句上的差别！你是找不出这种差别的，因为天下根本就没有这种差别。而且毫无疑问，列宁的口号不仅和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农问题的决议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这些决议的最精确最恰当的表述。要知道，事实是这样：联共（布）党纲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专门讨论了中农问题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而列宁宣布和中农成立协议的口号的那篇反对皮梯利姆·索罗金的论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四个月在报上发表的。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完完全全确认了**列宁在他那篇反对皮梯利姆·索罗金的论文中所宣布的口号，认为这是**目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党在农村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口号，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列宁口号的妙处在哪里呢？

列宁口号的妙处就在于它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三**

---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位一体的任务，这个任务用一个简短的公式表达出来就是：（甲）依靠贫农，（乙）和中农成立**协议**，（丙）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你试从这个公式中只拿一部分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基础，而忘了其余两部分，你就一定会陷入◇90◇绝境。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不依靠贫农，不进行对富农的斗争，能不能和中农成立真正的巩固的协议呢？

不能。

在目前发展条件下，不依靠贫农，不和中农成立协议，能不能顺利地进行对富农的斗争呢？

不能。

怎样才能把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最恰当地用一个概括的口号表达出来呢？我认为列宁的口号就是这个任务的最恰当的表述。必须承认，谁也不能比列宁说得更恰当了……

为什么**正是在现在**，正是**在**农村工作的**目前条件下**，必须强调列宁口号的适当呢？

因为正是在现在，个别同志有一种趋向，要把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分成几部分，把它们彼此分隔开来。我们今年一二月间粮食收购运动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必须和中农成立协议，这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知道的。但怎样成立这个协议，就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放弃对富农的斗争或用放松这个斗争的办法来和中农成立协议，说什么进行对富农的斗争会吓跑一部分中农，即富裕中农。

另外有些人则想用放弃组织贫农的工作或用放松这个工作的办法来和中农成立协议，说什么组织贫农会使贫农独树一帜，而独树一帜会把中农从我们方面吓跑。◇91◇

由于发生了这些离开正确路线的偏向，结果就忘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只有坚决进行对富农的斗争并加

强对贫农的工作，才能和中农成立巩固的协议，否则中农就会认为富农有力量而倒向富农。

请回忆一下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吧：

“必须确定对那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立场**[①]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三〇〇页〔二二〕）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离开正确路线的偏向，其危险性并不亚于上述偏向。有时候，人们也进行对富农的斗争，可是进行得那么笨拙，那么粗率，以致打击了中农和贫农。结果，富农仍旧安然无恙，而和中农的联盟却发生了裂痕，一部分贫农暂时落入了阴谋破坏苏维埃政策的富农的魔掌。

也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企图把对富农的斗争变为剥夺富农，把粮食收购工作变为余粮收集制，忘◇92◇记了在我们目前条件下剥夺富农是愚蠢的，余粮收集制并不是意味着和中农联盟，而是意味着和中农斗争。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离开党的路线的偏向呢？

因为不了解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三重任务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任务。因为不了解**决不能**把对富农斗争的任务同和中农协议的任务**分开，决不能**把这两个任务同使贫农成为党在农村中的支柱的任务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分开[①]。◇93◇

为了在我们目前农村工作的过程中不使这些任务彼此分隔开来，必须做些什么呢？

为此至少必须提出一个指导性的口号，这个口号要把所有这些任务概括为一个总的公式，因而不容许把它们彼此分隔开来。

在我们党的武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公式，这样一个口号呢？

是的，是有的。列宁提出的“要善于和中农成立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固地依靠贫农”这一口号，就是这样的公式。

因此，我认为这个口号是最适宜的、能包括一切的口号，**正是在**

——————————————

① 由此可见，离开正确路线的偏向会给工农联盟事业造成两种危险：一种危险是有些人想把临时的非常措施，比如说粮食收购方面的措施，变为党的经常的或长期的方针；另一种危险是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措施的机会来放纵富农，来宣布贸易完全自由，使贸易不受国家机关的调节。因此，要保证正确的路线，就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我还要乘这个机会指出，我们的报刊不是一直都遵守这个规则，而是有时表现出某种片面性。比如说，揭露那些想把粮食收购方面的临时性的非常措施变为我们政策的经常方针、从而给工农结合造成了威胁的人，那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对的是，与此同时，没有充分注意和没有尽量揭露那些从另一方面威胁工农结合的人，没有揭露那些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要求放松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要求规定贸易完全自由使之不受国家调节、从而破坏工农结合的人。不揭露这种人，那是不好的，那是片面的。

还有，揭露那些认为——比如说——不可能和不宜于提高现阶段仍是农业基础的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人，那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对的是，与此同时，没有揭露那些轻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不懂得现在还要在实践中拿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任务来补充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的人。不揭露这种人，那是片面的。

要保证正确的路线，就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抛弃任何片面性。——斯大林

现在，正是在农村工作的目前条件下，必须把这一口号提到第一位。

你认为列宁的口号是“反对派的”口号，并且你在来信中问：“为什么……这个反对派的口号竟能于一九二八年五一前夕登载在‘真理报’上……为什么这个口号竟出现在联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上，这只是排版错误，还是在中农问题上和反对派妥协了？”

不用说，话说得很厉害！可是，斯·同志，你还是在“转弯地方”小心一点，否则你在气头上会做出结论说要禁止刊印我们的党纲，因为它完全确认了列宁的口号（这是事实！）并且它基本上是由列宁（决不是反对派！）起草，而为我们党（也不是反对派！）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请多尊重我们党纲上关于农村各个社会集团的那些著名条文吧！请多尊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农问题的决议吧！……◇94◇

至于你说“在中农问题上和反对派妥协了”，我认为这句话简直不值一驳：这句话大概是你冒火的时候说出来的。

使你莫名其妙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列宁的口号中和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联共（布）党纲中所说的都是和中农成立协议，而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的却是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你大概认为这里有什么类似矛盾的东西。也许你甚至喜欢这样设想：和中农协议的政策好像是离开了和中农联盟的政策。这是不对的，斯·同志。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那些认得口号的字句而不懂得口号的意思的人才会这样想。只有那些不知道和中农建立联盟，和中农成立协议这个口号的历史的人才会这样想。会这样想的只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列宁是自己离开了自己，因为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要采取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而他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另一个演说中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却又说我们现在需要实行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列宁和党（以第八次代表大会为代

表）并不认为“协议”和“联盟”这两个概念有**任何差别**。原来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切演说中，处处在“联盟”和“协议”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上**等号**。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也是如此，这个决议在“协议”和“联盟”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上**等号**。正因为列宁和党认为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和一时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切根据把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95◇称为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或者反过来，把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称为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只要读一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和同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农问题的决议，就可以深信这一点了。

请看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

“因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因为问题困难，所以原定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还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度过艰苦斗争的岁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已经表明一定会完全胜利。可是我们在我们的行政实践中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关，纠正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成立同盟**、**成立联盟**、**成立协议**[①]的路线。”（“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二十页〔二三〕）

可见列宁并没有把“协议”和“联盟”看做是有差别的。◇96◇

再请看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中的一段话：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成立**协议**是无痛苦地过渡到消灭任何剥削的条件之一。

因为农业技术比工业落后（甚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如此，俄国更不用说了），所以经济根柢比较牢固的中农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还会支持相当长的时期。因此，农村中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党的工作人员的策略应当估计到和中农**长期合作**……

……这样，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实行完全正确的政策，就能保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成立**联盟和协议**……

……工农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今后在执行中也应当贯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两者同中农成立**协议的精神**。”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三七〇页至第三七二页〔二四〕）

可见这个决议也没有把“协议”和“联盟”看做是有差别的。

不妨再指出一点，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要和中农建立“巩固◇97◇的联盟”。但这是不是说，决议因此就**离开了**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决议在“协议”、“合作”的概念和“巩固的联盟”的概念之间划上等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和中农成立“协议”，就不能和中农建立“联盟”，而不和中农成立“长期的”协议与合作，和中农的联盟就不能是“巩固的”。

事实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列宁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离开了**列宁关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声明，**或者**必须抛弃这种不严肃的假设，

————————————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承认列宁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没有把“协议”和“巩固的联盟”这两个概念看做是有**任何**差别的。

总之，谁不愿意成为空洞的咬文嚼字习气的牺牲者，谁愿意领会列宁的口号，即依靠贫农、和中农成立协议、进行对富农的斗争这一口号的意思，谁就不能不了解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就是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

你的错误就在于你没有懂得反对派的欺骗手腕，受了他们的挑拨，落入了敌人给你布置好的圈套。反对派骗子在那里大叫大嚷，硬说他们拥护列宁的关于和中农成立协议的口号，同时又做出挑拨性的暗示，说和中农成立“协议”是一回事，而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是另一回事。他们这样做是想一举两得：第一、掩盖自己在中农问题上的真正立场，即不是要和中农成立协议，而是要“同中农**闹翻**”（见我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二五〕上引证过的反对派分子斯米尔诺夫那篇大家◇98◇知道的演说）；第二、用“协议”和“联盟”间的**虚构的**差别来俘虏布尔什维克中的头脑简单的人，把他们完全弄糊涂，推着他们离开列宁。

而我们某些同志又是怎样对待这一点的呢？他们不仅没有摘下反对派骗子的假面具，不仅没有揭露这些人对党掩盖自己真正立场的欺骗行为，反而上了圈套，落入陷阱，让别人推着他们离开列宁。反对派大谈列宁的口号，反对派分子装扮成列宁口号的拥护者，因此，我应当和这个口号划清界限，使人们不致把我和反对派混在一起，否则人们会责备我“和反对派妥协”，——这些同志的逻辑就是如此！

这还不是反对派欺骗手腕的唯一例子。例如拿自我批评口号来说吧。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党的行动的基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是布尔什维克的培养干部的方法的灵魂。反对派大叫大嚷，硬说自我批评口号是他们反对派想出来的，硬说党从他们那里抄袭了这个口号，因而向他们投降了。反对派这样做至少

是想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隐瞒并欺骗工人阶级，不让他们知道，在以**破坏**党性为目的的反对派的自我批评和以**加强**党性为目的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第二、使某些头脑简单的人上圈套，迫使他们和党的自我批评口号划清界限。

而我们某些同志又是怎样对待这一点的呢？他们不仅没有摘下反对派骗子的假面具，不仅没有坚持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口号，反而落入陷阱，离开自我批评口号，听凭反对派愚弄，并且……向◇99◇他们投降，同时又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和反对派划清界限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听凭任何人愚弄，尤其不能把反对派分子对于我们的评论作为自己工作中的指南。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既摈弃反对派的欺骗手腕，又消除我们某些受了反对派分子挑拨的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请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话：“一心循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让人家随便怎样去说吧！”〔二六〕

写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载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真理报”第一五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100◇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答弗鲁姆金）

（关于弗鲁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

弗鲁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就来逐点分析一下。

一、首先，弗鲁姆金对苏联国际环境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党内有一种公认的见解，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苏联对各国工人阶级影响的扩大，也就是说，日益强大的苏联对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危险是苏联和包围苏联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增长的原因，是各资本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原因。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正是这样理解问题的，在这次代表大会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说：“包围苏联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和因胜利发展而破坏着世界资本主义基础的苏联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这一幻想的破灭**，以及苏联在国际上的革命影响的**加强**，是这种尖锐化的最主要的因素。”①〔二七〕 ◇101◇

大家知道，党的这种观点不是随便地、偶然地确定的，而是在和反对派进行激烈斗争中确定的；反对派曾经公开断言，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因为苏联**削弱了**，而苏联的削弱是因为苏联正在**蜕化**。

但是弗鲁姆金根本不同意党的这种观点。相反地，弗鲁姆金硬说：“资本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是我国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削弱**。”

一种是弗鲁姆金的估计，一种是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估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计，这两种相反的估计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二、弗鲁姆金对苏联内部状况的估计更不正确。读了弗鲁姆金的信就会以为苏维埃政权已经到了末日，国家已经濒于绝境，苏联的灭亡即使不是几天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这里只少说了一句：“布谷鸟已经叫过了。”

我们已经从反对派分子嘴里听惯了知识分子式的关于苏联“灭亡”的哀鸣。但是弗鲁姆金学反对派的样子是相称的吗？

当然，低估我们困难的意义是不对的。但是，夸大它们的意义，惊惶不安，张皇失措，那就更不对了。毫无疑问，富农是痛恨苏维埃政权的：如果要求富农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友好态度，那就奇怪了。毫无疑问，富农在一部分贫农和中农中间是有影响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做出结论，说大多数◇102◇贫农和中农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绪，说“这种情绪已经开始渗入**工人中心**”，那就是失掉理智，张皇失措。难怪常言道：“疑心生暗鬼。”

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目前这样的困难，而是更加严重的困难，比如说，是那种使各式各样的动摇都有广阔的“活动场所”的战争，那末可以设想弗鲁姆金将会怎样。

三、弗鲁姆金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农村采取的新的政治方针**加剧了**我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里大概指的是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改进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弗鲁姆金认为这些措施是使我们的状况“恶化”的**有害**措施。

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是**不正确的**，因为全会决定：

（甲）“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是**和**整个国内外形势要求无产阶级国家**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形成的困难**有关的，是**和计划经济领导上的错误**有关的”；

（乙）“市场关系（一方面是农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

面是工业品的供应）不协调情况的**加剧**，是由于农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由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收入的增加**”（而不是由于党的措施。——斯大林注）；

（丙）“困难的**加深**和**加重**是由于农村**富农**和**投机分子**竭力利用这些困难，抬高粮价，破坏苏维埃价格政策”[①]（而不是由于党的措施。——斯大林注）。

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是**不正确的**，因为全会在关于粮食收购◇103◇工作的决议中说：“部分地具有**非常**性质的上述**党的措施**在加强粮食收购工作方面**保证了极大的胜利**。”[②]〔二八〕

这样说来，弗鲁姆金是**正确的**，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是**不正确的**！

归根到底，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是弗鲁姆金还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呢？

我们来看事实吧。

今年一月初我们的情况怎样呢？和去年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

当时收购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是自流的，党没有采取任何非常措施，没有积极干预收购工作。

听其自流和不施任何压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

如果党听从弗鲁姆金的劝告，当时不去干预这件事，如果不**在**春季**以前**，不**在春季播种以前**消灭这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的缺额，那末我们现在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工人挨饿，工业中心闹饥荒，我们的建设中断，红军挨饿。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党能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干预这件事情呢？显然，党不能不这样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及时**干预粮食收购工作，我国整个国民◇104◇经济现在就会发生极严重的危机。

结论只有一个：弗鲁姆金**反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决议并要求**修改**决议，是**完全不正确的**。

四、弗鲁姆金说：“应当**回到**党的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用不着回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因为党完完全全站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立场上。但是，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要把全部走过的道路**一笔勾销**，要**后退**而不要前进吗？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说，为了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二九〕。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到这一点，根据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提到这一点。既然如此，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能有一个意思：抛弃“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的政策。

由此可见，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就是要**抛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说：“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三〇〕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到这一点，根据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提到这一点。只是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才能提到这一点，因为当时除了发展中小个体农民经济这一旧的、对我们绝对必要的任务以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105◇发展**集体农庄**这种大规模商品经济的新的**实际**任务。

既然如此：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能有一个意思：抛弃发展集体农庄这一新的**实际**任务。其

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弗鲁姆金拿“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这一**玄妙**任务来代替发展集体经济的**实际**任务。

由此可见，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就是要**抛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中说：“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支持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生产**合作形式（农业公社、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生产协作社、合作工厂等等）和**那些应该提到更高阶段的国营农场**。”①〔三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到这一点，根据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提到这一点。只是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才能提到这一点，因为当时除了发展中小个体农民经济和发展集体农庄这两个任务以外，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实际**任务，即发展**国营农场**这种出产商品最多的单位的任务。

既然如此，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能有一个意思：抛弃“把国营农场提到更高阶段”的政策。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弗鲁姆金拿“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的**消极**任务来代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发展国营农场的**积极**任务，虽◇106◇然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在这里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超突击”的任务，因为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对待**建立新的国营农场的问题。

这又一次证明，弗鲁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就是要**抛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既然如此，弗鲁姆金所谓中央委员会“离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说法还有什么价值呢？弗鲁姆金的这封信完全是企图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一系列最重要问题的决议都**化为乌有**，而这个企图又掩饰得很不高明，——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弗鲁姆金硬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决议是“**不彻底的、模棱两可的**”，难道不就是这个缘故吗？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而由于弗鲁姆金的立场的某种“不彻底性”，在他的眼中真的成了“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

弗鲁姆金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面前只看到**一个**任务，即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他认为我们对农业的态度基本上就**限于**这一点。

他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我们提出的**新东西**，他不了解现在不能仅仅**限于**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而必须拿两个新的**实际**任务即发展国营农场的任务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任务去**补充**这一任务。

弗鲁姆金不了解，如果不把前一个任务和后两个任务结合起来，那末无论在供给国家商品粮食方面，或者在以社会主义原则组织整个国民经济方面，我们都不能找到出路。◇107◇

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把重心移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上去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现阶段的重心仍然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但是，这是说仅仅这一个任务**现在已经不够了**。这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在实践中**拿发展集体农庄和发展国营农场两个新任务去**补充**这个任务的时候了。

五、弗鲁姆金认为“宣布富农为非法引起了对全体农民的不法行为”，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说富农已经被宣布为“非法”是不对的。

第二、如果弗鲁姆金的这些话有什么意思，那末这只能是弗鲁姆金要求党恢复富农的“公民权”，恢复富农的政治权利（如参加苏维埃选举的权利等等）。

弗鲁姆金是不是认为取消对富农的一些限制是有利于党和苏维埃

政权的呢？怎么能使弗鲁姆金的这种“思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的决议一致起来呢？

弗鲁姆金是不是认为放松对富农的斗争会巩固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呢？弗鲁姆金是不是会想到恢复富农的权利只能便于富农挑拨中农离开我们呢？

既然如此，弗鲁姆金关于和中农联盟的这种说法还有什么价值呢？

否认我们某些农村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于我们某些工作人员不善于同富农作斗争，原定对富农的打击有时落到了中农甚至贫农头上，否认这个事实是更加不对的。毫无疑问，必须对这些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展开最坚决的斗争。但是，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就做出结论说，必◇108◇须放松对富农的斗争，取消对富农的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呢？

六、弗鲁姆金断定说，不能像我们某些地方工作人员有时候做的那样，用剥夺富农的办法去同富农作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以为他这样就是说出了什么新东西，那就错了。如果像弗鲁姆金那样责备莫洛托夫同志或库比雅克同志有这种歪曲行为，并且断定说党没有同这类歪曲行为作斗争，那是极不公道的，而且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粗暴行为。

七、弗鲁姆金断定说，应当开放集市，开放粮食市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以为他这样就是说出了什么新东西，那就错了。第一、党从来没有主张封闭集市。第二、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因为某些地区封闭了集市，中央曾经立即指示地方组织立刻开放集市并制止这类歪曲行为。大家知道，中央的这个决定早在五月底（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弗鲁姆金的信出现之前两个星期就发到了各地。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呢？

八、弗鲁姆金断定说，应当提高粮价并对酿造私酒加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以为弗鲁姆金这样就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那又奇怪了。同酿造私酒作斗争，我们从今年一月起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应当加强，而且一定会加强，虽然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农村对这一点会表示不满。至于提高粮价，那末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早在今年二月，也就是在弗鲁姆金的信出现之前四个月，我们政治局就预定在新的收购年度开始时提高粮价。再说一次：在提高价格的问题上何必“多此一举”呢？

九、初看起来，会以为弗鲁姆金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中农联盟的事业。但这不过是幌子罢◇109◇了。实际上，弗鲁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的**限制**的申请书。谁想巩固和中农联盟的事业，谁就不能要求放松对富农的斗争。

保证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是我们党的极重要的任务。但是，要保证这样的联盟，就必须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使贫农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最后，我们还必须有决心并善于和中农成立长期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能巩固和中农的联盟，能巩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的阵地。

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不应当是放松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中农成立**协议**”，“和中农**长期合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成立**联盟和协议**”（见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三二〕。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一次刊印◇110◇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三三〕。至于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它在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开始成为工人运动中一个特别的革命派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大家知道，列宁早在一九〇四年春天，当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是一个独立政党，而是和孟什维克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号召全党“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列宁当时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这样写道：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斯大林注）看见我们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书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些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①，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被工人运动的发展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111◇是稍微有些像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因此，有些同志是完全不对的，他们认为自我批评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象，是一种时髦的东西，它很快就要过时，正像一切时髦的东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西通常都要过时一样。实际上，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种武器。

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

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列宁估计到布尔什维克取◇112◇得政权后的情况的这些特点，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间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检验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①]，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严肃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对**阶级**以至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页）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得万分正确，他说：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②]。而我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页）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113◇

为什么自我批评口号正是在现在，正是在目前的历史时刻，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因为现在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现在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而对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破坏活动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沙赫特事件和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付收购工作的手腕”的教训，以及我们计划方面的错误，对于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不留痕迹地过去。

如果我们想要巩固革命并全副武装地迎接敌人，那就必须**尽快克服**沙赫特事件和粮食收购困难所揭露出来的我们的错误和弱点。

如果我们不想被各种“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弄得措手不及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那就必须**尽快揭露**我们的那些**还没有被揭露**但无疑是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拖延迟缓在这里就等于帮助我们的敌人，加深我们的弱点和错误。但是，如果不开展自我批评，不加强自我批评，不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来揭发并消灭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关于沙赫特事件的决议中说：◇114◇

“保证顺利地实现上述各种措施的**最主要的条件**，应当是**切实贯**

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自我批评的口号。”①〔三四〕

但是要开展自我批评，首先必须克服摆在党面前的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群众文化的落后、无产阶级先锋队文化力量的不足、我们的因循守旧、我们“共产党员的骄夸”等等。然而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这里指的是我们党组织、国家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里有官僚主义分子。这里指的是靠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过日子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害怕群众的批评和群众的监督像害怕火一样，他们妨碍我们开展自我批评，妨碍我们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决不能把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看做仅仅是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我们组织的影响的表现。列宁说得对：

“……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像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它了，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六七页）

如果我们真正想开展自我批评并治愈我们建设事业中的脓疮，那就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反对我们◇115◇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应当更坚决地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作为消除官僚主义的主要药剂。

列宁说得对：

“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下层群众来参加**”……因为“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③（“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九八页）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光来胡扯乱谈。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116◇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加强自我批评的运动我们才开始了几个月。我们还没有给这个运动做初步总结所必需的材料。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个运动已经开始产生良好的结果。

不能否认，自我批评的浪潮已经开始增长并扩大，日益扩展到工

人阶级的更广大的阶层并把他们卷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要拿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已经活跃起来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固然，还有人企图把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的有根据的和审查过的指示束之高阁，我们必◇117◇须对这种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企图的目的是要打消工人对自我批评的热情。但是，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类的官僚主义企图，将被日益增长的自我批评浪潮冲得干干净净。

也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已经开始振作起来，更加警惕起来，开始更严肃地对待领导经济工作的问题，而我们党、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一切组织的干部对群众的要求也更加敏感，更加关心了。

固然，不能认为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里已经充分实行党内民主和一般的工人民主。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项工作将随着运动的继续展开而向前推进。

同样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报刊更加活跃和有生气了，而我们的报刊工作者的队伍，如工农通讯员组织，已经开始成为一支极重要的政治力量。

固然，我们的报刊有时还限于表面，还没有学会从零碎的批评意见转到较深刻的批评，从深刻的批评进而概括批评的效果，进而报道我们的建设方面因批评而获得的**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项工作将在运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向前推进。

然而，除了这些优点以外，还必须指出我们运动中的一些缺点。这里指的是现在在运动初期就已经发生的歪曲自我批评口号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立刻予以反对，就会造成把自我批评庸俗化的危险。

（一）首先必须指出：有些报刊表现出一种趋向，把运动从切实批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转◇118◇到以广告式的叫喊来反对**个人生活中**的极端现象。这也许令人难以相信，但可惜这是事实。

例如拿伊尔库茨克州委员会和州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权力报”（第一二八号）来说。你们会看到报上整版登满了广告式的“口号”：“性生活的放纵是资产阶级的习气”，“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了房子又要牛”，“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枪”，如此等等。试问，这些只有“交易所报”〔三五〕才做得出的“批评的”叫喊和旨在改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可能，这些广告式的短文的作者是共产党员。他可能对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深恶痛绝。但是，他在这里离开了正确的道路，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说的**不是我们**阶级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其次必须指出：甚至那些一般说来还不是不善于正确地进行批评的报刊，有时也犯了**为批评**而批评的错误，把批评变成一种**耸动视听**的竞技。例如拿“青年团真理报”来说。大家都知道“青年团真理报”在开展自我批评方面的功绩。但是，请你们看看该报最近几号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者的“批评”，看看那一连串以此为题材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讽刺画。试问，谁需要这种“批评”？它除了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以外，还能给我们什么呢？当然，如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散布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博得庸人一笑，那末要这种“批评”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进行自我批评需要各种武器，其中也包括“轻骑队”。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轻骑队应当成为**轻举妄动的**骑兵队吗？◇119◇

（三）最后必须指出：我们许多组织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自我批评变成对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攻击**，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威信扫地**。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的某些地方组织向我们**优秀的**经济工作人员发动直接**攻击**，这是事实；而他们的全部罪状是他们没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否则应如何理解这些地方组织关于撤销这些经济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决定，这些没有丝毫约束力但分明是想破坏他们的

威信的决定呢？否则应如何理解只管自己批评而不让经济工作人员答复批评呢？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里开始把“舍米雅卡审判”[①]冒充为自我批评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末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都是对的。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要求经济工作人员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吗？难道世界上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的人吗？培养经济工作干部需要很多年，我们应当以最爱护最关心的态度对待经济工作人员，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攻击经济工作干部，而是为了加强和提高他们，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不要把它变成玩弄“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枪”等等题目的广告式的把戏的工具。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制造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厨房。◇120◇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攻击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的工具。

而主要的是：不要用**上面**的“批评的”叫喊代替**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让工人阶级群众投入这个运动，并在纠正我们的缺点方面，在改进我们的建设方面表现出他们的创造主动性。

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四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121◇

————————————

① “舍米雅卡审判”是俄国古代讽刺小说，描写审判官舍米雅卡误以为被告会给他贿赂，做出偏袒被告的荒谬判决。后来“舍米雅卡审判”成了不公正审判的通称。——译者注

联共（布）中央全会〔三六〕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123◇

论共产国际纲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说）

同志们，首先应当讨论一下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三七〕的**篇幅**问题。

有人说纲领草案太长太累赘，要求把它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要求在纲领中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公式，并以此为限，就把这些公式叫做纲领。

我认为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把纲领缩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那些人没有了解摆在纲领草案起草人面前的任务。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纲领不能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党的纲领，或者，比如说，只是几个“文明”国家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必须包括世界各国共产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既要包括白种人又要包括黑种人。这就是纲领草案基本的和最突出的特点。但是把纲领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怎么能包括共产国际东方和西方所有支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工作路线呢？请同志们试试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任务吧。因此，我认为把纲领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就等于把纲领变为一张对共产国际各支部毫无用处的空洞的抽象公式表。

在纲领起草人面前摆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包括世界各国共产

党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另一◇125◇方面又要做到使纲领的各项条文不致成为空洞的公式，而能给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各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提供实际的指导原则。你们一定会同意，在一个简短的纲领草案中要解决这个双重的任务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最可笑的是那些建议把纲领缩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同志竟又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有把现在的纲领草案加长一倍甚至两倍的趋向。的确，如果在纲领草案中对工会、合作社、文化、欧洲的少数民族等等问题都加以详细的论述，那末纲领就决不可能缩短，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现在的纲领草案就不得不加长一倍甚至两倍了。

关于另外一些同志也应当这样说，他们或者要求纲领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具体指示，或者要求纲领解释所有一切，以至解释它的各项条文。第一、不能说纲领只应当是指示，或者主要是指示。这是不对的。决不能对纲领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这种要求就会把纲领的篇幅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第二、纲领不可能解释所有一切，以至解释它的各项宣言性的或理论性的条文。起这种作用的是对纲领的说明。决不能把纲领和说明混为一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纲领的结构和**纲领草案中各章的**排列次序**问题。

有些同志要求把关于运动的最终目的即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移到纲领的最后去。我认为这种要求也是没有根据的。在纲领草案中，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章和关于过渡时期的一章之间列有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章。这样排列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完全正确。如果不首先说◇126◇明纲领所提出的要**过渡**到那里去的那种经济制度，即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无从谈到过渡时期。人们在谈论过渡时期，在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制度。但是向哪里过渡，究竟过渡到哪一种制度去，这就是在论述过渡时期以前首先应该说明的问题。纲领必须使人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谈了资本主义危机接着就谈过渡时期，而不首先说明应当过渡到哪一种

制度去，这就会把读者弄糊涂，并且违反了教育学的起码要求，这种要求同时也是制定纲领的要求。纲领应当帮助读者从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而不是给读者添麻烦。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不应当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列入纲领草案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第二章。他们认为他们这样提是提的纲领的结构问题。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从第二章中删去，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原因这个基本问题上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纲领的结构，而在于对局部稳定时期政治形势的估计，在于对作为这次稳定因素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作用的估计。这些同志不会不知道，我们在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一章中不能没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因为不把作为稳定最主要因素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加以说明，就无法解释这种稳定本身。否则，也就必须从这一章中删去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而把这一段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都放到关于党的一章中去。但是，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都从论述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一章中删去，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取消对资本主义稳定加以解释的任何可能性。显然，我们不能◇127◇这样做。

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能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呢？我认为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及其市场关系和对这种市场关系的利用，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对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都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有些同志否认这个原理。但是否认这个原理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认为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在我国城乡之间、工业

和小生产之间就立刻有了百分之百现成的分配和供应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不要市场、不要商品流转、不要货币经济而立即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可能。只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能了解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这就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当走上剥夺中小资产阶级的道路，肩负起替千百万人工造成的新的失业者安排工作和保证生活资料的非常沉重的担子。只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能了解无产阶级专政采取这种政策是多么不明智和愚蠢。新经济政策的好处之一也就在于它使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诸如此类的困难。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能不能也这样说呢？能不能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经的阶段呢？◇128◇不，不能这样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采用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组织产品分配以保证对前线革命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显然，假如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不会有战时共产主义。因此不能断定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必经的发展阶段。

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有些同志倾向于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三八〕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固然，这个政策曾经被武装干涉暂时打断，只是过了三年，在战争和武装干涉消灭以后，才得以重新实行。但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重新实行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宣

布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这种情况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应当从哪里开始自己的建设工作，应当把建设工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当然，这只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

人们有时把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混淆起来，把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无疑是一种国内战争的形式。但是，如果说我国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那就不对了。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不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129◇则而进行国内战争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一九一八年初，在武装干涉以前，我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避免武装干涉，也就是说，不能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苏联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日益壮大、共产国际已经加强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有而且不应当有孤立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决不能把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尖锐化的危机、苏联的存在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因素撇开不谈。（喊声：“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却是孤立的。”）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三九〕，而现在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只要回顾一下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四〇〕（当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曾经准备直接援助德国革命），就会了解某些同志的论据完全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喊声：“德国革命是孤立的，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是隔绝的。”）你把地理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孤立混淆起来了。当然，地理上的距离是起作用的。但是终究不能把它和政治上的孤立混为一谈。

拿干涉者本国的工人来说，你们是不是认为在发生干涉的时候，比如说在干涉德国革命的时候，他们会默不作声，不打击干涉者的后方呢？

拿苏联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来说，你们是不是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对干涉者的胡作非为置之不理呢？

要损伤干涉者，完全不一定要和革命的国家有地理上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干涉者本国要害的地方打他们一下，使干涉者感觉到危险并认识到无产阶级团结的实际力量就够了。假定说，我◇130◇们在列宁格勒地区使资产阶级的英国吃了亏，使它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是否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说，英国必定要在列宁格勒报复我们呢？不，不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报复我们，比如说，在巴士姆、敖德萨、巴库或者海参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和支援某一国家（比如说欧洲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形式也必须这样说。

虽然不能认为武装干涉因而也不能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各国**必然的**现象，但是总可以而且必须认为这多少是或然的现象。因此，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论据，而同意他们的结论，也就是说在纲领草案中可以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下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公式，改为关于武装干涉和战时共产主义或多或少有实现的**或然性**的公式。

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我不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修改关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公式，并要求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天就宣布**全部**土地国有化。

我也不同意另外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我认为最好像纲领草案那样，说将来要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另外再加上保障中小农民有土地使用权这样一句话。

有些同志认为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愈容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愈困难，因为在那里土地私有制的传统也就愈深，所以同这种传统作斗争也就愈困难。◇131◇

你们读一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土地问

题的提纲〔四一〕，你们就会了解这些同志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这个提纲中，列宁直截了当地警告说不要在这方面采取轻率和鲁莽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而对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些国家中，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在农民的头脑中还不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俄国，农民有一个时候甚至说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早在一九〇六年，当他预计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到来的时候，就在我国提出了在保障中小农民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并且认为农民一定会明白并同意这种措施。

难道不值得注意：也正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警告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共产党不要立即提出**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因为这些国家渗透了私有观念的农民不能马上领会这个口号。我们能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差别，不注意列宁的指示呢？显然不能。

关于纲领草案的**内容**问题。原来有些同志认为纲领草案就内容来说不完全是国际性的，因为照他们说来，它带有“过多的俄国的”性质。我在这里没有听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但是在共产国际周围某些人中原来是有这种反对意见的。

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何在呢？

也许是因为纲领草案中有专门论述苏联的一章？但是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国革命按**性质**来说是一国的革命，仅仅是一国的革命，而主要不是国际的革命吗？如果是这样，那末为什么我们把我◇132◇国革命叫做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世界各国革命发展的**杠杆**、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呢？

我们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例如我们的反对派分子，他们认为苏联革命完全是或主要是一国的革命。他们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奇怪的是，原来共产国际周围也有人准备步反对派分子的

后尘。

也许我国革命按**类型**来说是一国的革命，而且仅仅是一国的革命？但是，我国革命是苏维埃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苏维埃形式或多或少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无怪乎列宁说，苏联革命在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苏维埃的纪元。由此难道不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革命不仅在它的性质上而且在革命类型上也主要是国际的革命，是给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基本轮廓的革命吗？

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国际性质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群众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列宁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尽一切可能使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并取得胜利，他说这句话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至少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和工具。

同样毫无疑问，不仅苏联革命对各国无产者负有义务并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各国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也负有一些相当重大的义务。这些义务就是：支援苏联无产阶级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反对旨在扼杀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鼓吹帝国主义军队在进攻苏联的时候直接转到苏◇133◇联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由此难道不应当得出结论说，苏联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苏联革命的胜利就是全世界革命的胜利吗？

既然如此，难道还能把苏联革命说成仅仅是一国的、孤立的、和全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联系的革命吗？

反过来说，既然如此，如果不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难道还能理解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任何事件吗？

如果论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纲领**对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对各国无产者的**义务**、**各国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义务**等基本问题**避而不谈**，那末这个纲领还

有什么价值呢？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带有“俄国性质”这种反对意见会给人一种印象，说得客气一些……一种不好的、令人不愉快的印象。

现在来谈谈个别的意见。

有些同志建议把纲领草案第五十五页上关于“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农村劳动阶层的一句话加以修改，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这句话显然是一种误解，也许是校对上的错误，应当加以修改。

但是，这些同志建议把列宁所下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定义都加进纲领草案中去，（笑声）这就完全不对了。在第五十二页上有如下一个基本上是从列宁那里引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134◇定义：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对国外资本主义敌人、对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对在还没有消灭的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四二〕

纲领草案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专政的定义，这些定义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不同阶段上的这些或那些任务而规定的。我想这已经很够了。（喊声：“漏掉了列宁的一个定义。”）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篇幅很多。如果把所有的都加进纲领草案中去，那末它的篇幅恐怕至少要增加两倍。

有些同志对中立中农这一论点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夺取政权的前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共产党至多只能指望中农中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共产党才能指望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显然，我们在制定纲领草案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列宁的这个指示，更不用说，这个

指示完全符合我国革命的经验。

有些同志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断言纲领草案没有考虑到革命运动的民族因素，那是没有根据的。殖民地问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纲领草案中已经相当突出地说到了帝国◇135◇主义的压迫、殖民地所受的压迫、民族自决、民族和殖民地的分离权等等。

如果这些同志指的是中欧的少数民族，那末在纲领草案中是可以提到这一点的，但是我反对在纲领草案中对中欧的民族问题做专门的论述。

最后谈谈某些同志对于波兰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第二种类型的国家的意见。这些同志认为把国家分成三种类型，分成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的国家（波兰、二月革命前的俄国等等）和殖民地国家是不正确的。他们断定说，波兰应当列入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国家只能有两种类型，即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除了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在革命胜利后立刻就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外，还有一些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有封建残余、有特殊的反封建类型的土地问题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在革命爆发的时候一定会起重大的作用，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而且一定要经过某些过渡阶段，比如说，经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阶段。

我们这里也有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说，农民起不了重大的作用，当前的口号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你们知道，列宁曾经坚决和这个口号划清界限，反对低估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作用和比重。当时我们有些人认为沙皇制度推翻以后，无产阶级立刻就会取得统治地位。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实际情况是：

二月革命以后，舞台上立刻出现了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136◇众，他们使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占了优势。本来微不足道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突然”变成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最初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当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属于这样的国家，它们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将要相当迅速地经过某些过渡阶段。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些同志否认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有三种类型是不对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是第二种类型。

同志们，我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问题的意见就是如此。

至于纲领草案的文字或个别地方的措词，那我不能断定说纲领草案在这方面是尽善尽美的。应当认为在这方面还必须加以改善，必须表达得更确切，也许在文字上还要更简练等等。但这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四三〕纲领起草委员会的事情。◇137◇

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说）

同志们！在谈到我们粮食战线上的困难这个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谈谈在全会讨论中出现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泉源**，关于保证目前工业化速度的途径这个一般性的问题。

奥新斯基以及后来索柯里尼柯夫都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有两个滋养我国工业的主要泉源：第一个是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通常主要是靠掠夺其他国家，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或者靠借多少带有奴役性的巨额外债。

你们知道，英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从各个殖民地，从世界各洲搜刮资本，这样就给本国工业提供了追加投资。这是英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场”的原因之一。

你们也知道，德国能使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也就是靠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取得的五十亿法郎的赔款。◇138◇

我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不能而且不应当掠夺殖民地，它根本不能而且不应当掠夺其他国家。所以，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借而且不愿意借奴役性的外债。因此，这条路对我们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靠**内部**积累来发展工业，使国家工业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国工业、运输业等通常都是靠外债来发展的。不论拿建立新工厂或者改建旧工厂来说，不论拿建筑新铁路或者建立大发电站来说，这样的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依靠外债的。但是，这些外债都是奴役性的。

在苏维埃制度下，我们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正在建筑的长达一千四百俄里的土尔克斯坦铁路需要好几亿卢布。我们正在建设的德涅泊水电站也需要好几亿。在这里我们借过什么奴役性的外债吗？没有，没有借过。这一切都是靠我们内部的积累来进行的。

但是，这种积累的主要泉源何在呢？这就是我已经说过的两个泉源：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

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

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

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139◇“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

不用说，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抹杀这个事实，如果我们闭眼不看当前的情况，即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可惜**暂时**不能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那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呢？因为有些同志看来还不了解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的论点是：农民购买商品付的钱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农民出卖农产品得的钱少了（这也是确实的）。他们究竟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调整粮价，要求**立刻**消除这种“剪刀差”，消除这种少得多付的现象。但是，比如说要在今年或明年就消除“剪刀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阻碍国家工业化，也阻碍农业的工业化，破坏我们还不巩固的年轻工业，因而也就是打击整个国民经济。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显然不能。应不应当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消除所有这些少得多付的现象呢？是的，无疑是应当消除的。我们能不能立刻就消除这些现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国工业，因而也不致削弱我们的国民经济呢？不，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什么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逐渐缩小这种“剪刀差”，使它一年一年地接近起来，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业技术，这样就一定会使粮食生产的成本降低，从◇140◇而在几年以后完全取消对农民的这种额外税。

农民能不能忍受这种负担呢？当然能，因为：第一、这种负担将

一年一年地减轻，第二、这种额外税不是在农民群众注定要遭受贫困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征收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征收的，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而且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缴纳的。

关于我国目前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泉源问题就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中农结合**的问题，关于这一结合的目的和方法的问题。

在某些同志看来，城乡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只限于**纺织品方面，**只限于**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方面。这对不对呢？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当然，在纺织品方面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在新的情况下就是从这方面开始和农民建立结合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说，在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就是问题的全部，在满足农民个人需要方面的结合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经济联盟的全部或主要基础，这就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其实，城乡的结合，不仅表现在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方面，不仅表现在纺织品方面，而且表现在满足农民这个农产品**生产者**的**经济**需要方面。

我们不仅供给农民花布，我们还供给他们各种机器、种子、铁犁、肥料等等，这些东西在提高农民经济和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具有极大的意义。

因此，结合的基础不仅是纺织品，而且是金属制品。否则，和农民的结合是不巩固的。◇141◇

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纺织品方面的结合主要关系到农民的个人需要，没有触及或较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主要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能改善农民经济，使它机械化，使它赢利更多，并为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成公共大经济打下基础。

如果以为结合的目的是要保存阶级，比如说保存农民阶级，那就

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结合的目的完全不在这里。结合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和我国全部发展事业的领导者——工人阶级接近，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工农联盟，**以集体主义精神**逐渐**改造**农民，**改造**他们的心理，**改造**他们的生产，从而为消灭阶级准备条件。

结合的目的不是要保存阶级，而是要消灭阶级。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所以一般说来，它不可能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和消灭阶级；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恰恰相反，它首先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关系到农民经济的机械化和集体化，正因为如此，它一定能逐渐改造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其中包括农民阶级。

一般说来，怎样才能改造农民，改造他们的心理，改造他们的生产，使之接近工人阶级的心理并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呢？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首先需要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集体主义的宣传。

第二、需要发展合作社运动，需要由我们的供销合作社日益广泛地掌握千百万农户。毫无疑问，◇142◇不广泛地发展我们的合作社，农民对集体农庄运动就不会有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种转变，因为在我国的情况下，发展供销合作社就是为农民过渡到集体制做准备。

但是，所有这些对改造农民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改造农民的主要力量是新的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农民集体劳动和国家电气化。

有人在这里引证列宁的话，引证列宁著作中关于和农民经济结合的一段著名的话。但是片断地援引列宁的话而不愿意完整地援引他的话，这就是曲解列宁。列宁完全了解，在纺织品方面和农民结合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并不以此为限，因为他还坚决主张在金属制品方面和农民结合，在供给农民机器方面，在实现国家电气化方面，也就是说，在有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经济**的一切方面和农民结

合。

例如，不妨听一听列宁的下面一段话：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物质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和小农有关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页）

问题很清楚：如果纺织品方面的结合不以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来补充，那末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不能巩固和持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就不能巩固和持久，这种结合就不能达到逐渐改造◇143◇农民，使农民接近工人阶级，使农民走上集体制轨道的目的。

这就是列宁同志对结合的看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

首先必须肯定，我们党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像某些同志有时断定的那样，而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前，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当我们第一次获得可能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我可以引证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伊里奇的著名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小册子阐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党在武装干涉结束以后施行这个政策时把它叫做新经济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曾被武装干涉打断，只是在武装干涉结束以后，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我们才有了可能来实行它；而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比较起来确实是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引证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大家知道的决议，那里清清楚楚地说，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早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前就阐明了。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这个决议中说：

“所谓新经济政策，它的基本原则**早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第一个喘**

息时机[①]就已经确切地规定了，它是以对苏维埃俄国经济力量的精确估计为基础的。这一政策曾被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等反革命势力对工农国家的联合进攻打断，只是到一九二一年初，在军事上消◇144◇灭了反革命企图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汇编”第十六页〔四四〕）

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某些同志硬说，只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以后，党才意识到必须在市场和货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即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错误。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

其次得出的结论是：新经济政策预计到社会主义要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实行胜利的和有步骤的进攻。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既然施行了新经济政策，那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不断地“扩大”新经济政策，放弃阵地，像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初期那样一步一步退却。托洛茨基的下面这个论断也是以这种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理解为基础的。他断定说，党在农村中容许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就是“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离开了列宁的立场。不妨听一听托洛茨基的话：

“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最近措施——容许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力，——所有这些我们称为在农村中**扩大**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然而能不能**不**在农村中**扩大**新经济政策呢？不能，因为不这样农民经济就会衰退，市场就会缩小，工业就会停顿。”（托洛茨基“八年”第十六页至第十七页）◇145◇

可见，如果固执地坚持不正确的想法，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而且仅仅是退却，那就会说出多么糊涂的话来。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能不能断言党在农村中容许雇佣劳动和租佃土地就是“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离开了”列宁的立场等等呢？当然不能！坚持这种谬论的人同列宁和列宁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可以在这里引证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给奥新斯基的一封著名的信，列宁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在农村中实行雇佣劳动和租佃土地。这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快要结束时的事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广泛地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和新经济政策及其后果问题。

这封信给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供了决议草案，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关于在农业方面实行雇佣劳动和租佃土地的条件问题，党代表大会建议有关部门的一切工作人员不要用不必要的手续去限制这两种现象，而只限于执行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研究一下究竟用什么样的实际措施可以最适当地限制这方面的极端现象和有害的夸张。”（见“列宁文集”第四卷第三九六页〔四五〕）

你们可以看出，关于在农村中实行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就是“扩大”新经济政策、“离开”列宁的立场等等的说法是多么愚蠢和无聊。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呢？

因为那些空谈“扩大”新经济政策的人想利用这种谬论来为他们在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面前的退◇146◇却辩护。

因为在我们党内和党的周围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认为“扩大”新经济政策就是“拯救”工农结合，他们看到非常措施已经取消，就要求取消对富农的限制，要求解除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束缚……以利于结合。

因为必须用全部力量，用一切手段来保证党不受这种反无产阶级情绪的影响。

为了不说得太远，我引证一个同志的信来谈谈，这个同志是“贫

农报”〔四六〕的工作人员奥西普·切尔诺夫。他在信上要求实行一系列的措施以宽容富农，这些措施不是别的，而是真正地、不加掩饰地“扩大”新经济政策。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这位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奥西普·切尔诺夫同志在农民问题上竟糊涂到这种地步，以致很难把他和农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区别开来。他认为我们在粮食战线上发生困难的原因在哪里呢？他说：“第一个原因无疑是累进所得税制…… 第二个原因是选举细则有法律上的变更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什么人算是富农。”

为了排除这些困难，应当做些什么呢？他说：“首先必须**废除累进所得税制**即目前实行的这种税制，而改用土地税制，并对耕畜和大农具收轻微的税……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措施，就是**修改选举细则**，把剥削性的富农经济的界限划分得更明确些。”

这才是“扩大”新经济政策。可见托洛茨基的种子并没有白撒。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理解产生了“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谬论，而“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谬论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意见、论文、书信和建◇147◇议，要求给富农自由，解除对富农的限制，并使他们有可能自由发财。

在这方面，在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方面，我还要指出一个事实。我指的是一个同志所说的话：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粮食收购进程中只有很小的意义，阶级斗争对于我们粮食收购的困难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稍微重大的意义。

同志们，我必须说，我决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存在。难道新经济政策把无产阶级专政废除了吗？当然没有！相反地，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表现和工具。而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吗？（喊声：“对！”）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说，在粮食收购时期富农起来反对苏维埃政策以及在粮食收购运动中苏维埃政权对富农和投机分子采

取对策并举行进攻等如此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中，阶级斗争只有很小的意义呢？

在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对苏维埃政策的严重进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在农村中难道不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吗？

列宁提出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口号是目前条件下我们农村工作的基本口号，这难道不对吗？这个口号不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反映又是什么呢？

当然，决不能把我们的政策看做挑起阶级斗争的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挑起阶级斗争会导致内◇148◇战。因为既然我们掌握着政权，既然我们巩固了这个政权并且把一切经济命脉集中在工人阶级手里，我们就不希望阶级斗争采取内战的形式。但是这决不是说，阶级斗争因而被取消了，阶级斗争就不会尖锐化了。这更不是说，阶级斗争好像不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力量了。不，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时常说，我们在商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把成千上万的中小商人从商业中排挤出去。能不能认为这些被排挤出流转领域的商人会默不作声地坐着而不企图组织反抗呢？显然不能。

我们时常说，我们在工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我们向社会主义迈进，也许我们自己觉察不到就把成千上万的中小工业资本家排挤出去并使他们破产。能不能认为这些破产的人会默不作声地坐着而不企图组织反抗呢？当然不能。

我们时常说，必须在农村中限制富农的剥削意图，必须向富农征收重税，必须限制租佃的权利，不让富农享有参加苏维埃选举的权利，如此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压制并逐渐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有时把他们弄到破产的地步。能不能设想富农会因此感

谢我们，并且不会企图组织一部分贫农或中农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当然不能。

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149◇锐，而日益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将执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瓦解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政策以及镇压剥削分子反抗的政策，为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为我们的前进让开道路，然后我们再向前迈进，而敌人再向后退却，最后，“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

这就是不能用阶级斗争只有次要作用的说法来麻痹工人阶级的原因。

第四个问题是对付富农和投机分子的**非常措施**问题。

决不能把非常措施看做一种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一定的、非常的情况下，当我们没有其他措施可以机动运用的时候，非常措施是必要的和适当的。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当我们有了其他灵活的措施可以在市场上机动运用的时候，非常措施就成为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了。

认为非常措施在任何◇150◇情况下都是不好的那些人是不对的。对这种人必须进行不断的斗争。但是，认为非常措施永远都是必要和适当的那些人也是不对的。对这种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措施是不是一种错误呢？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不是一种错误，相反地，非常措施救了我们国家，使整个经济没有发生危机。是什么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措施呢？就是去年年底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泥泞时期以前补足这个缺额，并使粮食收购工作的速度正常起来。在我们没有一亿普特左右的粮食后备可以待机投入市场来降低粮价的情况下，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外汇后备可以从国外输入大批粮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不采取非常措施吗？显然不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补足这个缺额那会怎样呢？那末现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发生极严重的危机，城市就会闹饥荒，军队就会挨饿。

如果我们有一亿普特左右的粮食后备，以便待机投入市场降低粮价，制服富农，那我们当然就不会采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这种后备。

如果我们那时有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卢布的外汇后备，以便从国外输入粮食，那我们也许就不会采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这种后备。

这是不是说，我们今后还应当没有后备而再度求助于非常措施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我们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积蓄后备并排除采取任何非常措施的必要性。那些想把非常措施变为我们党的经常方针或长期方针的人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是在玩火，是在给工农结合制造◇151◇威胁。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永远不再采取非常措施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根据断定说，要求采取非常措施的非常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做这样的断定就是巫师说鬼话。

列宁论证了新经济政策，但是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情况下，甚至贫农委员会的办法也不能发誓不采用。我们更不能发誓永远不采取非常措施，因为这些非常措施还不能和贫农委员会这种对付富农的激烈办法相提并论。

在这里回忆一下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一件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也许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提纲中企图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一劳永逸地”抛弃以贫农委员会的办法来对付富农的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提纲中写道：“实行不要这个阶层（富农和富裕农民）并以一九一八年贫农委员会的办法对这个阶层进行粗暴的经济以外的压制这一政策，是极为有害的错误。”（第二节）

大家知道，列宁是用下面的一段话来回答他的：

“第二节的第二句话（反对“贫农委员会的办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比如说，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农委员会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应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比如这样说：由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度重要，**目前**[①]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152◇够怎样保护贫农，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是必须研究的，也是必须要人们在实践中去研究的，而一般的谈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见“列宁文集”第四卷第三九一页〔四七〕）

显然，必须辩证地来看非常措施，因为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同志们，在讨论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就是如此。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谷物**问题**以及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问题。

我认为许多同志犯的错误就是把我们在粮食战线上发生困难的种种原因搅在一起，把临时性的、暂时的（特殊的）原因和长期性的、基本的原因混淆起来了。粮食困难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长期性的、基本的原因，这种原因要好多年才能消除；另一种是特殊的、暂时的原因，这种原因只要采取并实行一些必要的措施就可以立刻消除。把所有这些原因搅在一起，就是把整个问题弄得糊里糊涂。

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主要意义和主要作用何在呢？就在于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全面地提出了粮食问题，粮食生产问题，整个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生产问题。

一般说来，我们的谷物问题是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呢？无疑是的。只有瞎子才会怀疑谷物问题是苏维埃社会目前极突出的问题。我们不能像茨冈人那样过日子，没有粮食后备，没有一定的后备以防歉收，没有后备以调节市场，没有后备以供战时之用，也没有某些后备以供输出。连一个经济十分◇153◇贫困的小农也不能没有后备，不能没有一些存粮。一个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国不能没有对内和对外所必需的粮食后备，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假如我们乌克兰的秋播作物没有遭灾，而我们“凑合”度过了这个粮食收购年度，能不能认为这对我们已经够了呢？不，不能。往后我们不能再“凑合”过日子。如果想守住苏维埃政权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阵地，我们就必须拥有一定限度的后备。

第一、我们不能保证不受到军事进攻。你们是否认为没有任何粮食后备来供应军队也可以保卫国家呢？有些同志的发言完全正确，他们说，现在的农民已经不是六年前的农民了，那时他们怕土地落入地主手中。现在的农民已经把地主忘了。现在他们要求有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我们能不能在敌人进攻的时候，一面在前线同外来的敌人作

战，一面为了很快地获得粮食来供应军队而又在后方同农夫作战呢？不，不能而且不应当。要保卫国家，我们就必须有一定的存粮来供应军队，即使只有够最初六个月用的存粮也好。需要这六个月的喘息时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使农民清醒过来，体会到战争的危险，了解事变的真相，并为保卫国家的共同事业而动员起来。如果我们满足于“凑合”过日子，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供战时之用的任何后备。

第二、我们不能保证粮食市场上不发生混乱。为了干预粮食市场，为了执行我们的价格政策，我们绝对需要有一定的后备。因为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每次都采取非常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每次都沿着悬崖走，而以有可能“凑合”度过收购年度为满足，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后备。◇154◇

第三、我们不能保证不发生歉收。为了在歉收时供应灾区，即使是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的供应，我们绝对需要有一定的粮食后备。但是，如果我们不增加商品粮食的生产，不坚决彻底地抛弃不存粮食的旧习惯，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后备。

最后，我们绝对需要有出口的粮食后备。我们需要输入工业设备。我们需要输入农业机器、拖拉机和这些机器的零件。可是不输出粮食，不靠输出粮食来积蓄一定的外汇后备，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战前，每年输出五亿至六亿普特的粮食。能够输出这么多粮食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吃饱。这是事实。但是应该了解，我们战前的商品粮食总归比现在多**一倍**。正因为我们现在的商品粮食少了一半，所以现在才没有粮食出口了。而没有粮食出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失去了那种过去藉以输入、现在也必须藉以输入工业设备、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泉源。我们能不能不积蓄出口的粮食后备，继续这样过日子呢？不，不能。

可见我们粮食后备方面的情况是如何没有保障和不稳定。

更不用说，我们不仅在这四方面都没有粮食后备，而且我们也缺

少平稳地从一个收购年度进入另一个收购年度、并在青黄不接的六七月间不间断地供应城市所必需的一定限度的存粮。

既然如此，还能否认谷物问题的迫切性和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严重性吗？

但是由于粮食方面的困难，我们也发生了政治性的困难。同志们，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里有一部分农民，即一部分贫农和一部分中农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给结合◇155◇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当然，像弗鲁姆金在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说我们的结合已经破裂，这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结合破裂是严重的问题。结合破裂等于内战的开始，甚至等于内战。不应当拿“可怕的”字眼来吓唬自己。不应当张皇失措。这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结合破裂等于农民和苏维埃政权破裂。但是，如果农民真的已经和**农民粮食的主要收购者**苏维埃政权破裂，那末他们就不会给你们扩大播种面积了。可是我们看到，今年**所有**产粮区的春季播种面积**毫无例外地**都扩大了。这叫什么结合破裂呢？难道可以像弗鲁姆金那样把这种情况说成农民经济“没有前途”吗？这叫什么“没有前途”呢？

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的**根源**，如果是指困难的**长期性的、基本的**原因，而不是指临时性的、暂时的原因，那末**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的根源就是农业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日益分散，赢利愈来愈少，出产的商品愈来愈少，这是事实。革命前我国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农户，而现在则有二千四百万至二千五百万，并且这种分散过程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

我们现在的播种面积比战前只少一点，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总共只少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事实。然而糟糕的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商品**粮食的生产却比战前少了**一半**，也就是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156◇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小经济比大经济赢利少、出产的商品少并且不如大经济稳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小生产不如大生产有利这个著名原理，在农业上也是完全适用的。因此，在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上，小农经济比大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就要少得多。

出路何在呢？

正如政治局决议中所说的，我们的出路有三条。

一、出路在于：尽量提高中小农民经济的生产率，用铁犁代替木犁，供给小型和中型机器，供给肥料，供给种子，给以农学方面的帮助，使农民合作化，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预购合同，贷给它们优良种子，从而保证集体农贷的发放，并通过农具租赁站租给它们大型机器。

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断言小农经济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所以也就不值得再去帮助它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还不小。只是应当善于帮助它实现这种可能性。

“红色报”〔四八〕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它断言使个体农户在供销方面合作化的政策已经证明是不正确的。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在供销方面合作化的政策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它为农民转向集体农庄运动打下了实际的基础。毫无疑问，不发展供销合作社，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态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帮助了我们向前推进集体农庄的建设。

二、其次，出路在于：帮助贫农和中农把他们分散的小经济逐步联合为建立在新的技术和集体劳◇157◇动的基础上的利益更大、出产商品更多的大规模集体经济。我指的是把小经济联合为公共大经济的一切形式，从简单的协作社到劳动组合，它们的商品率和生产率比分散的小经济要高出很多。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有些同志提倡集体农庄，同时责备我们为小农经济“辩护”，这

是不对的。他们大概认为对个体农民经济的态度应当是斗争和消灭，而不应当是帮助和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个体农民经济根本不需要“辩护”。它的赢利少，这是事实。但这还不是说它是完全无利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列宁的由集体农庄经常帮助和支持个体农民经济的立场，而采取了斗争和消灭个体农民经济的观点，那我们就是破坏了结合。

有些同志赞扬集体农庄，同时把个体农民经济宣布为“可诅咒的东西”，这就更不对了。这里已经含有同农民经济直接开火的味道。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农民经济是“可诅咒的东西”，那末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又怎样解释呢？工人阶级和“可诅咒的东西”联盟，——难道世界上会有这样离奇古怪的事情吗？既然宣传结合，怎么同时又能说出这种话呢？人们常常提到列宁所说的我们必须逐渐从农民的瘦马跨上工业的钢马那句话。这是很好的。但是，难道是这样从一匹马跨上另一匹马吗？还没有建立起密布的集体农庄网这样广泛而强大的基础，就宣布农民经济是“可诅咒的东西”，这岂不是弄得没有任何马，没有任何基础了吗？（喊声：“对呀，对呀！”）这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经济**对立起来**。但我们不是要把这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立起◇158◇来，而是要使它们互相**结合**，使集体农庄在这种结合中帮助个体农民，帮助他们逐渐走上集体制的轨道。是的，我们要使农民不把集体农庄看做自己的敌人，而把它看做自己的朋友，看做正在帮助他们而且一定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朋友。（喊声：“对！”）既然这是对的，那就不应当说为个体农民经济“辩护”，也不应当说农民经济对我们说来是“可诅咒的东西”。

应当这样说：小农经济和大规模集体经济比较起来利益较小，甚至最小，但是它还不是没有一定的相当大的利益的。而你们的结论是：小农经济根本是无利的，也许甚至是有害的。

列宁对于小农经济不是这样看的。他在“论粮食税”那篇演说中对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如果农民经济能发展下去，那就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四页）

由此可见，个体农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利益的。

一种情况是：高级的经济形式即大经济对低级的经济形式作斗争，使它遭受破坏并把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则是：高级的经济形式不是破坏低级的经济形式，而是帮助它提高，帮助它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苏维埃制度下的情况就是这样。

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经济的相互关系是这样说的：◇159◇

“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法律。——斯大林注），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对周围的中农给予最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在这种**给予实际帮助**的基础上，**和中农的协议才能实现**[①]。只有这样才能够并且一定会取得中农的信任。”（“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五页）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当帮助的农民经济正是个体农民经济。

最后，再引证列宁的一段话：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可见列宁对于集体农庄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意义的评价是很高的。

有些同志在他们的长篇演说中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个体农民经济的问题上，而对于我们党的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即发展集体农庄的任务却只字不提，真的只字不提，这是非常奇怪的。

三、最后，出路在于：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因为它们是赢利最◇160◇多、出产商品最多的经济单位。

这就是三个基本任务，完成了这些任务，我们就能解决谷物问题，从而铲除我们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第一个任务，即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虽然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对解决谷物问题来说**已经不够了**。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要在实践中拿发展集体农庄和发展国营农场这两个新任务去**补充**第一个任务。

不把这些任务结合起来，不在这三方面进行顽强的工作，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也就是说，既不能供应国家商品粮食，也不能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

列宁对于这一点是怎样看的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家知道的文件可以证明，政治局提请全会审核的决议和列宁在这个文件中所拟定的发展农业的实际计划是完全一致的。我指的是列宁亲自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这个指令是一九二一年五月颁布的。列宁在这个文件中分析了三类实际问题：第一类是关于商品流转和工业的问题，第二类是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第三类是关于各种经济会议〔四九〕和

各区域经济调整会议的问题。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农业说了些什么呢？下面就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中的一段：

“第二类问题。发展农业：（甲）农民经济，（乙）国营农场，（丙）农业公社，（丁）劳动组合，◇161◇（戊）协作社，（己）其他形式的公共经济。”（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六八页）

你们可以看出，政治局关于解决粮食问题和整个农业问题的决议的实际结论是和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中所陈述的计划完全一致的。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这个能够移山倒海的巨人，每当听到关于建立起一两个集体农庄或者给某个国营农场派去拖拉机的消息的时候，总流露出纯粹是少年的喜悦。例如他在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报纸上登出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消息，报道了贵会会员在唐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和在敖德萨省米梯诺车站附近各国营农场工作的情况，以及顿巴斯一批矿工的工作情况…… 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最卓越的农场以模范的称号，并给予它们为顺利开展工作所必需的特别的和异常的帮助。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深深致谢，并请你们记住，你们帮助我们用拖拉机耕地对我们是特别适时和重要的。我有机会在你们准备组织二百个农业公社的时候向你们致贺，感到特别满意。”（“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四页）

列宁又在给美国“苏俄之友协会”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我刚才特地向皮尔姆省执行委员会询问并查对了我们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以哈罗德·威尔为首的贵会会员率领皮尔姆

省拖拉机队**在‘托依基诺’国营农场**[①]工作情况的非◇162◇常可喜的消息…… 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这个国营农场以模范的称号，并在建筑工程方面以及供给汽油、金属和建立修理厂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给予特别的和异常的帮助。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深深致谢，并请你们记住，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种帮助能像你们给予我们的帮助那样适时，那样重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三页）

可见列宁听到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展的每一个小消息都是非常高兴的。

让那些想欺骗历史并认为在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人以此作为教训吧！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我认为粮食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不会没有作用。我们党是在克服困难和克服各种危机中取得教训而向前迈进的。我认为目前的困难会锻炼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并促使他们切实地去解决粮食问题。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等于扫除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163◇

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说节录）

有些同志在他们关于国营农场的发言中又回到昨天讨论粮食收购问题时发生的争论上去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回头谈谈昨天的争论。

我们昨天所争论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城乡间的“剪刀差”问题。是谈到农民购买工业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钱，而出卖农产品仍然要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少得一些钱。是谈到这些多付少得的钱就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类似“贡税”的超额税，即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额外税；我们一定要取消这种额外税，但是，如果我们不想破坏我国工业，不想减低为整个国家从事生产并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向社会主义的我国工业的一定发展速度，那末我们是不能**立刻**取消这种额外税的。

有人不喜欢听这种话。看来，这些同志怕承认真相。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口味问题。有些人认为在中央全会上不应当说出全部真相。而我认为我们在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必须说出全部真相。不应当忘记，决不能把中央全会看做群众大会。当然，“超额税”、“额外税”这些字眼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它们很刺耳。但是，第一、问题不在于字眼；第二、这些字眼完全符合现实；第三、用这些令人不◇164◇愉快的字眼正是为了使人感到刺耳，正是为了促使布尔什维克极认真地来**取消**这种“超额税”，来**消灭**“剪刀差”。

怎样才能消灭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呢？那就要不断地使我们的工业合理化并降低工业品价格；不断地提高农业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步地降低农产品成本；不断地使我们的商业机关和收购机关合理化，如此等等。

当然，这一切不是在一两年内就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摆脱各种各样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和讨厌的现象，那我们就一定要在几年内做到这一切。

昨天有一部分同志把消灭“剪刀差”的方针歪曲成**立刻**消灭“剪刀差”，并且实质上是要求**调整**农产品的**价格**。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表示反对，指出这个要求**在目前**是违反国家工业化的利益的，因而也是违反我们国家的利益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昨天所争论的。

今天这些同志承认他们已经放弃调整价格的政策。那好极了。可见昨天的批评对这些同志不是没有作用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我在自己的演说中曾经指出：一部分同志在他们的发言中谈到与粮食收购有关的发展农业的办法时，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样重要的措施竟只字不提，这是一种反常的和奇怪的现象。怎么能把在农业方面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样重◇165◇要的任务“忘掉”呢？难道不知道，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在目前虽然很重要，但是已经**不够**了，如果我们在实践中**不拿**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新任务去**补充**这个任务，那末我们就**不能解决**谷物业问题，并且无论在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也包括农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或者在保证国家有一定的商品粮食后备方面，我们都**不能摆脱**困难。

既然如此，怎么能把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忘掉”和撇开不谈呢？

现在来谈谈大规模国营农场的问题。有些同志断言美国北部没有大规模的谷物农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在美国北部和美国南部都有这样的农场。我可以引证屠莱柯夫教授这样一位见证人的话，他曾经在“伏尔加下游”杂志〔五〇〕第九期上发表过考察美国农业的结果。

让我来引证屠莱柯夫文章中的几段话：

“在蒙大拿有一个小麦农场，属于‘坎伯尔农业公司’。该农场面积九万五千英亩，约合三万二千俄亩。农场的土地是一整块，为了便于耕作而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独立农庄，每一部分由一个人掌管，而整个农场则由该公司经理托马斯·坎伯尔一人掌管。

根据报上的消息（当然是来自该农场的消息），今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约占该农场总面积的一半，预计可收小麦约四十一万蒲式尔（约八十万普特），燕麦二万蒲式尔，亚麻子七万蒲式尔。该企业的总收入预计为五十万美元。

在这个农场中，马和骡子几乎全被拖拉机、卡车和汽车代替了。耕地、播种以及全部田间工◇166◇作，特别是收割庄稼，都是日夜进行的；而且夜间，机器在探照灯照耀下在田里工作。大块播种面积使机器能一直走很远而不必转弯。例如，如果庄稼情况许可，二十四英尺宽的收割脱谷机可以一直走二十英里，合三十俄里多些。以前做这种工作需要四十匹马和四十个男工。一台拖拉机可以同时拖四个割捆机，它们一趟能把宽四十英尺、长二十八英里（约等于四十二俄里）一块土地上的庄稼捆好。在收割的时候，如果庄稼还不够干，还不能同时打谷，那就使用割捆机。这时就要把割捆机上的捆束装置卸下，用特殊的传送带把割下的庄稼排列成行。庄稼这样铺开以后，经过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就干了，和庄稼同时割下的杂草的种子就落在地上。然后使用收割脱谷机，把机上的割刀取下，换上自动运送机，这种自动运送机把晒干的庄稼从地上直接送到脱谷机的圆筒里去。这时在机器上工作的只有一个拖拉机手和一个管脱谷机的人。在机器上再也没有别人了。谷物从脱谷机直接倒入载重六吨的四轮车厢，然后，由每次拖十个车厢的拖拉机运到粮食仓库。消息中说，这样工作，每天能脱谷一万六千到二万蒲式尔。”（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伏尔加下游”杂志第九期第三十八页至第三十九页）

这就是关于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大规模的小麦农场的描述。在美国北部和美国南部都有这种大农场。

有些同志在这里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这种大农场的条件并不总是有利，或者不完全有利，因此，这种农场有时就分成一些规模较小的、占地一千至五千俄亩的单位。这是完全对的。◇167◇

根据这一点，这些同志就认为大规模的谷物农场在苏维埃的条件下也是没有前途的。这就完全不对了。

看来，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看不见资本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在条件上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因而也就有

绝对地租，这就使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给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苏维埃制度下，既没有土地私有制，也没有绝对地租，这就不能不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因而也就不能不促使大规模的农业在技术方面和其他各方面不断进步。

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或者至少是使资本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它们就不能维持和存在。这种情况不能不使生产成本提高，因而在发展大规模谷物农场的道路上造成极为严重的障碍。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自己的发展根本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或平均利润，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暂时没有任何利润也可以）。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绝对地租，就给大规模谷物农场的发展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的谷物农场无论在信贷上或税收上都没有优待，而在旨在全力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待。

在苏维埃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条件，都为促进国营农场这种大规模谷物农场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必要的极为有利的环境。◇168◇

最后，谈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巩固结合并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据点的问题。我们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仅是为了保证实现我们将来的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我们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且是为了**现在就**在农村中建立为巩固结合并保证工人阶级在结合中的领导作用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据点。我们能不能现在就指望建立并发展这种据点呢？我不怀疑我们能够而且应当指望这一点。据粮食总社〔五一〕说，它跟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和协作社订立了合同，根据合同它能从它们那里大约得到四千万至五千万普特粮食。至于国营农场，材料说明：我们的新旧国营农场今年大约也能提供两

千五百万至三千万普特商品粮食。

如果再加上农业合作社按照预购合同应当从个体农户那里取得的三千万至三千五百万普特粮食，那末我们就完全有把握得到一亿普特以上的粮食，这些粮食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可以用来作为一定的后备。这多少总算是一点东西。

这就是我们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据点的**初步成绩**。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农村中无力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它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无止境地退却，不断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在农村中并不像那些肤浅的观察家所想像的那样软弱无力。这种悲伤的哲学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阶级在农村中有许多**经济**据点，即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供销合作社，依靠它们，工人阶级就能够加强和农村的结合，孤立富◇169◇农并保证自己的领导。最后，工人阶级在农村中还有许多**政治**据点，即苏维埃、有组织的贫农等等，依靠他们，工人阶级就能够巩固自己在农村中的阵地。

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依靠这些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掌握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政治经济命脉等等），就能够满怀信心地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逐步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

同时应当特别注意贫农工作。必须承认这个规律：我们对贫农的工作做得愈好，愈有成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威信就愈高；相反地，我们对贫农的工作做得愈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也就愈低。

我们常常谈到和中农联盟。但是要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巩固这种联盟，就必须同富农即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加强贫农工作，不发动贫农反对富农，不经常帮助贫农，能

不能同富农进行胜利的斗争呢？显然不能！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如果我们对贫农的工作做得不好，如果贫农还没有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末富农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中农就会倒向富农一边。相反地，如果我们对贫农的工作做得好，如果贫农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末富农就会感到自己被包围了，中农就会倒向工人阶级一边。

因此，我认为加强贫农工作，经常帮助贫农，并使贫农成为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有组织的支柱，是我们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70◇

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研究了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关于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提出的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

第二类是关于我们苏联建设事业中农业方面的问题（粮食问题和粮食收购问题）以及保证我国工业有技术知识分子，有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

我们就从第一类问题谈起吧。

一　共产国际的问题

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

目前摆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171◇

如果看一看第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经过的这个阶段，那末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帝国主义阵营中已经成熟的那些矛盾。

这是些什么矛盾呢？

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这里还很少说英美矛盾是主要矛盾。当时甚至都谈英美同盟。但是大家更喜欢谈的是英法之间、美日之间、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目前这一时期和那个时期之间的差别是：在资本家阵营现有的各种矛盾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

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不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和对于战争都有决定意义的石油问题，或者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极大意义的商品销售市场问题（因为生产商品而没有可靠的销路是不行的）；不论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极突出的特征的资本输出的市场问题，或者是通往销售市场或原料市场的道路问题，——所有这些主要问题都归结为英美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基本问题。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国家不管插足到什么地方，到中国还是到殖民地，到南美洲还是到非洲，到处都要碰到英国早先已经巩固下来的阵地这些巨大的障碍。

当然，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其他矛盾，如美日之间、英法之间、法意之间、德法之间等等的矛盾并不是因此就消除了。这只是说，这些矛盾同没落的资本主义英国和上升的资本主义美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有某种联系的。

这个主要矛盾蕴藏着什么呢？很可能蕴藏着战争。当两个巨人碰着的时候，当他们感到地球太◇172◇挤的时候，他们就很想比一比力量，用战争来解决世界霸权问题的争端。

这是必须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矛盾。但它只是现在才尖锐化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还不像一年前和现在这样猛烈发展，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还不像一年前和现在这样受到强烈的震动。不仅如此，在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印度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也还不像现在这样蓬勃展开。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

这个矛盾的增长蕴藏着什么呢？蕴藏着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这种情况也是应当注意的。

最后，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在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两个世界之间，两个对立的世界之间，苏维埃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可以说形成了某种固然是不稳固的但多少是持久的均势，而现在我们有一切根据断定说，这种均势快要告终了。

不用说，这个矛盾的增长不能不蕴藏着军事干涉的危险。

可以设想，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会考虑到这种情况。

这样看来，所有这些矛盾必然会引起一个基本的危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的危险。◇173◇

因此，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的危险是当前的基本问题。

目前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和平”的宣传、“制止”战争的叫嚷、“废除军备”的空谈等等，就是麻醉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脱离反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最流行的形式。

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

有些天真的人认为，既然有了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谁要得到真理，谁就应该反过来说：正因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甚嚣尘上，所以一定会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

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但是，要准备新战争，单靠和平主义是不够的，即使这种和平主义有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强大力量的支持。要准备新战争，还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镇压帝国主义中心的群众。不巩固帝国主义的后方，帝

国主义就不能作战。不镇压工人，就不能巩固帝国主义的后方。法西斯主义也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了。◇174◇

一方面，通过社会民主党鼓吹和平主义，以便更顺利地准备新战争；另一方面，采取法西斯手段镇压后方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以便在将来更顺利地进行战争和干涉，——准备新战争的途径就是如此。

因此，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

第一、要在各方面，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要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以便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第二、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或者在战争发生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消灭法西斯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解放被奴役的殖民地，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这就是摆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基本问题和任务。

只要看一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就不难相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和任务了。

二、共产国际纲领

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

共产国际纲领最重大的意义是：它科学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任务，指出了解决这些任◇175◇务的基本途径，因而使共产国际各支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法，没有这种明确的目标和方法，要满怀信心地前进是不可能的。

现在略为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所提出的共产

国际纲领草案的特点。至少可以指出七个特点：

（一）这个草案不是为某些个别国家的共产党而是为所有一切共产党提供纲领的，它把所有一切共产党共同的和基本的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因此，它有原则性和理论性。

（二）以前通常都是为“文明”民族提供纲领的。这个纲领草案与此不同，它照顾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照顾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照顾到宗主国和殖民地。因此，它有无所不包的性质，有深刻的国际性。

（三）草案的出发点不是世界上某一国家的或某一洲的某种资本主义，而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且它把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立起来。因此，它不同于以前所有的一切纲领。

（四）草案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做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结论，指出了形成两个平行的吸引中心——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和世界社会主义中心的前途。

（五）代替欧洲联邦口号，草案提出了已经脱离和正在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各先进国和殖民地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口号，这个联邦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176◇

（六）草案着重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和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社会民主党，它认为工人阶级中的其他一切派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公会社会主义〔五二〕等等）实际上都是变相的社会民主主义。

（七）草案把巩固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到首位，认为这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以后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

中央全会基本上同意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并责成对草案有个别修正意见的同志把这些意见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

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谈我们国内建设的问题吧。

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一、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问题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历史材料。

去年年底我们的情况怎样呢？你们从党的文件中已经知道，去年年底和前年年底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我不来详细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在报刊上公布的一些◇177◇党的文件中已经说明了。现在对我们重要的是当时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而且当时离泥泞时期只有两三个月。因此，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或者弥补亏空并规定今后粮食收购的正常速度，或者使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严重危机。

要弥补亏空必须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必须打击那些抬高粮价、使国家遭受饥饿威胁的富农和投机分子。其次，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商品运到产粮区去。最后，必须发动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扭转我们整个粮食收购工作的现状，根除实践中的自流现象。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已经生效，到三月底为止，我们收购了两亿七千五百万普特粮食。我们不仅弥补了亏空，不仅防止了整个经济发生危机，不仅赶上了上年度的粮食收购速度，而且，如果在后来的几个月内（四月、五月、六月）保持比较正常的收购速度，我们还有一切可能无痛苦地摆脱收购危机。

但是由于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秋播作物遭灾，整个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不能供应粮食，这就使共和国丧失了两三千万普特粮食。这种情况加上我们在粮食方面的超支，使我们不得不加强其他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因而触动了农民的防荒粮，这就不能不使情况恶化起来。

我们从一月到三月收购了将近三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四月到六月我们连一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状况恶化，给结合造成了威胁。◇178◇

这是不是结合破裂呢？不，这不是破裂。也许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吧？不，这不是小事。这是对工农结合的威胁。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党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够镇静和坚定，不能清醒地、毫不夸大地估计当时的情况。

后来收成看好，非常措施部分取消，这才使情况安定，形势好转。

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实质是什么？这些困难的根源在哪里？现在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几乎和战前一样（只少百分之五），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现在我们出产的粮食也几乎和战前一样（约五十亿普特，只少两三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尽管如此，我们出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分散的。战前我们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户，现在至少有两千四百万农户，而且农户和农田的分散还有继续下去的趋势。小农经济是什么呢？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然而，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正在全力成长，建设正在日益发展，对商品粮食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的演说中说道：

“如果农民经济能发展下去，那就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179◇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

看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四页）

原来，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

出路何在呢？

第一、出路在于提高中小农民经济，用一切方法帮助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生产率。用铁犁代替木犁，供给纯种种子，供给肥料和小型机器，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预购合同），把个体农户吸收到广大的合作社网中来，——任务就是如此。农业合作社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供给农民种子，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保证农民及时向国家交粮，发给农民奖金（即在公议价格上补加一点）以奖励及时交粮，并在国家和农民间建立稳固的相互关系。经验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显著效果的。

有些人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不值得去支持它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人和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

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就是整个农业的始末。这也是不对的。而且这种人公然违反列宁主义的原理。

我们既不需要个体农民经济的诅咒者，也不需要它的歌颂者。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使个体农民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同时善于把个体经济逐渐引上集体制轨道的清醒的政治家。◇180◇

第二、出路在于把孤立的中小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完全自愿联合的、在新技术基础上即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和协作社。

集体农庄比小经济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集体农庄是大经济，因而有可能利用科学和技术的一切成就；在于集体农庄更能赢利，更为稳固，有更高的生产率，能出产更多的商品。不应当忘记：集体农庄的产品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而且每一俄亩的收获量有时达到二百普特或二百普特以上。

最后，出路在于改进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

场。应当记住：国营农场是出产商品最多的经济单位。我们有些国营农场的产品的商品率不下于百分之六十。

任务在于把这三个任务正确地结合起来并加强这三方面的工作。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完成第一个任务，即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它依然是我们农业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对解决整个总的任务来说已经不够了。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要拿发展集体农庄和改进国营农场这两个新的实际任务去补充第一个任务。

除了这些基本原因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临时性的原因，使得我们的收购困难变成了收购危机。这是些什么原因呢？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了这样几个原因：

（甲）由于连年丰收，农村收入增加，特别是农村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工业品供应的增长，于是市场的平衡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181◇

（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因而减弱了对于出售余粮的刺激；但是，党在今年春季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的利益；

（丙）计划领导方面有错误，主要表现在商品运送不及时，对农村有产阶层收税低，粮食消费不得当；

（丁）收购机关、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有缺点（没有统一战线，缺乏积极性，听其自流）；

（戊）破坏革命法制，实行强迫命令，挨户巡视，封闭一部分地方市场等等；

（己）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富农、投机分子）利用这一切缺点来破坏粮食收购工作并使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一般性的原因需要好多年才能消除，而特殊的、临时性的原因完全可以立刻消除，以防止可能重新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

要消除这些特殊的原因必须做些什么呢？

为此必须：

（甲）立刻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

（乙）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同时保证由国家灵活地调节商业；

（丙）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谷物种类，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182◇

（丁）对粮食收购区组织合理的商品运送；

（戊）合理地组织粮食供应工作，不准超支；

（己）一定要建立国家的粮食后备。

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老老实实地有步骤地实行这些措施，那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使在即将开始的粮食收购运动中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

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注视这些措施的切实执行。

由于粮食方面的困难，我们面前就出现了结合问题，工农联盟今后的命运问题，以及巩固这个联盟的方法问题。有人说，我们已经没有结合了，破裂已经代替了结合。这当然是只有张皇失措的分子才说得出的蠢话。如果没有结合，农民就会对明天丧失信心，只顾自己，不再相信农民粮食的主要收购者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性，就会开始缩小播种面积，至少不敢扩大播种面积，生怕又来挨户巡视、搜查等等，并且拿走他们的粮食。

然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所有的地区都扩大了春季播种面积。主要产粮区的农民已经把春季播种面积扩大百分之二到十五甚至二十，这是事实。农民并不相信非常措施是永久性的，他们有一切根据预计粮价会提高，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算什么结合破裂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没有或者不曾有过对结合的威胁。但是从这里做出结合破裂的结论，那就是失掉理智，做了自发势力的奴隶。◇183◇

有些同志认为，要巩固结合，就必须把重心从重工业移到轻工业（纺织工业），以为纺织工业就是基本的和唯一的“结合的”工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

当然，纺织工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商品流转是有莫大意义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纺织品是结合的唯一的基础，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不仅靠农民个人消费所必需的花布，而且靠农民这个粮食生产者所必需的金属制品、种子、肥料和各种农业机器。更不必说，没有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纺织工业本身就不能发展和存在。

我们需要结合并不是为了保存阶级和使阶级永久存在。我们需要结合是为了使农民接近工人阶级，改造农民，改造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以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他们，从而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取消阶级，消灭阶级。谁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向后看不向前看的“农民哲学家”。

究竟怎样改造农民呢？首先和主要的是：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他们。

列宁关于这一点说道：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物质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和小农有关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184◇（“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页）

问题很清楚：谁认为只靠纺织品就能保证结合，而忘记了那些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民经济的金属制品和机器，谁就是要使阶级永久存在，谁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是“农民哲学家”。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这样说：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真正地牢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有时人们说，要保证结合，我们只有一种后备，就是向农民让步。从这一点出发，有时就创造出不断让步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能够用不断让步的办法加强自己。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样的理论只能使整个事业毁灭。这是绝望的理论。

要巩固结合，除了让步这种后备以外，还必须有一系列其他的后备，如农村中的经济据点（发展了的合作社、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政治据点（加强了的贫农工作、有保证的贫农的支持）。

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如果我们没有贫农的支持，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软弱无力，那末中◇185◇农就会倒向富农一边。反之，如果贫农的支持有了保证，那末可以确有把握地说，中农就会倒向苏维埃政权一边。因此，有系统地进行贫农工作，保证贫农得到种子和廉价的粮食，就是党的当前任务。

二、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保证我国工业有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

这里谈的是我们工业方面的困难，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出来的困难。

从改进工业的观点来看，沙赫特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沙赫特事

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国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那些不按苏维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产党员而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专家。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后还将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非党专家，非党技术人员。我们决不要求他们立刻抛弃或立刻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既然他们自愿地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那他们就要老老实实地合作。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问题在于以新的◇186◇一代年轻专家来替换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党认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应当加速造就新的一代专家，并且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从劳动人民中造就这种人材。这也就是说，要造就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事实表明，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不起这个重要的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推断，消极保守、自行其是、并且很少和生产联系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最近的将来担负得起这个任务。因此，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使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三个机关分担加速培养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作。党认为这是能够保证这一重要工作有必要的速度的最适当的办法。因此，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

当然这不是说，加速培养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干部的任务只限于把那些高等技术学校移交出去。毫无疑问，物质上给学生以保证，在这里应当起极重要的作用。因此，苏维埃政权决定培养新干部的费用按其比重来说应相当于工业的基本建设费，并决定每年补拨这方面的经

费四千多万卢布。

三 结 论

同志们，应当承认，我们总是从我们的困难和错误中学习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情形是这样：历史是用困难，用这种或那种危机，用我们的这种或那种错误来教育我们并锻炼我们党的。◇187◇

一九一八年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当时由于东方战线的困难，由于同高尔察克斗争的失利，我们终于懂得了建立正规步兵的必要性，并且真的把它建立起来了。

一九一九年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当时由于邓尼金战线上的困难，由于马蒙托夫袭击我军后方，我们终于懂得了建立强大的正规骑兵的必要性，并且真的把它建立起来了。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形大体上也是这样。粮食困难对我们不会没有作用。这些困难会推动布尔什维克，促使他们切实地着手发展农业，特别是发展谷物业。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布尔什维克未必会认真地着手解决谷物问题。

关于沙赫特事件以及和它有关的困难也必须这样说。沙赫特事件的教训对我们党不会而且不可能没有作用。我认为这些教训会促使我们尖锐地提出关于造就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服务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在解决造就新的技术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上已经采取了第一个重大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不会是最后一个步骤。（热烈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第一六二号◇188◇

给列宁格勒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五三〕

巩固苏维埃国家国防的事业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

列宁格勒无产者曾经站在国内战争的战斗的前列。

列宁格勒无产者现在也应该在保卫苏联抵御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准备工作中做出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的榜样。

我不怀疑，列宁格勒无产者的群众性组织列宁格勒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一定能履行它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义务。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
“红色报”（列宁格勒）
第一六三号◇189◇

给古比雪夫同志的信

古比雪夫同志，你好！

库帕今天来了。明天将和他谈话。看看他对美国人的计划说些什么。

库帕关于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第六封报告信我已经读过。当然也要听听另一方面的意见。我仍然觉得（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库帕是对的**，而文特尔是不对的。库帕的围堰式样（文特尔反对这种式样）是唯一合适的式样，这一公认的事实就已说明一定要倾听库帕的意见。最好有关方面讨论一下库帕的第六封信并且**基本上**采纳他的意见。

你的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

察里津拖拉机制造厂和彼得堡拖拉机修理厂的情况怎样？有成功的希望吗？

握手。

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190◇

悼念伊·伊·斯克沃尔佐夫
-斯切潘诺夫同志

死神从我们的队伍中夺去了一位刚毅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

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战斗了几十年，经受了职业革命家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成千上万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最老的、最有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作家之一，知道他是十月革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还知道他是为党的列宁式的统一和钢铁般的团结而斗争的最忠诚的战士。

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把自己光辉而勤劳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事业。

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永远活在工人阶级的心里。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真理报”第二三五号◇191◇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
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首先必须撇开小事情，撇开个人因素等等，以便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右倾问题。

在我们党内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这种危险的客观条件，怎样对这种危险作斗争，——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不撇开蒙蔽这个问题并妨碍我们了解问题实质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决这个右倾问题。

查波里斯基认为右倾问题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他硬说，这里全部问题不在于右倾，而在于意气斗争、个人倾轧等等。姑且假定这里也和在任何斗争中一样，意气斗争和个人倾轧有几分作用。可是拿意气斗争来解释一切，看不见隐藏在意气斗争后面的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像莫斯科组织这样一个毫无疑问是老练而团结一致的大组织，是不会因为几个爱闹意气的人或◇192◇爱倾轧的人的积极活动而弄得上上下下都震动起来的。不，同志们，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怪事。更不用说，莫斯科组织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这样轻视的。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意气斗争或个人倾轧毫不相干的原因。

弗仑托夫虽然承认有右倾危险存在，但是不认为这种危险值得严肃的实事求是的人去认真过问，这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右倾问题是空谈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的研究对象。我完全了解弗仑托夫，他埋头于日常的实际工作，以致没有工夫来考虑我们的发

展前途。但是，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的狭隘的、事务性的实际主义变为我们建设工作的教条。健康的事务主义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把自己的工作服从党的基本路线，那它就变成坏东西了。可是不难明白：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

有些同志在讨论右倾问题时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这也是不对的。他们说，请给我们指出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请说出他们的姓名，好让我们来惩办他们。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人当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这里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产生党内右倾危险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可以把人清除，但这还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把我们党内右倾危险的根柢铲除了。所以人的问题虽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没有决定的意义。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初在敖德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的军◇193◇队已经把邓尼金军队赶出乌克兰，正在敖德萨一带消灭邓尼金军队的残部。那时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怒气冲冲地在敖德萨搜寻协约国，他们相信只要一拿获协约国，战争就会结束。（大笑）可以设想，红军战士当时在敖德萨能够拿获协约国的某个代表。但是协约国问题当然不会因而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敖德萨虽然是邓尼金军队的最后一块地盘，但是协约国的根柢不在敖德萨，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中。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在右倾问题上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而忘记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条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阐明离开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产生的条件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

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194◇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大大加强。而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

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除资◇195◇本主义的根柢。这些根柢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在世界上可惜还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末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迅速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196◇除资本主

义的根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只有电气才是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否则国家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的。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一定会使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转到大工业经济。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根柢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能够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并在我国达到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197◇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把农民的乡村引导到底，就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包括农业在内**[①]的全国经济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

列宁的这一句话和他的另一句话即“新经济政策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①]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这两句话是完全相符的。列宁决不是说新经济政策给予我们现成的社会主义。列宁只是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正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列宁才主张实现国家电气化，主张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在我国最后胜利的条件。

可是要在一两年内实现这个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使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工业，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为农业建立起新的技术基础，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多年紧张的建设工作。当这一点还没有做到的时候（而这一点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在这里，小生产经常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这里，资本主义恢复的◇198◇危险还是存在。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来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经常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散漫性、个人主义、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复发的现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从而把某种犹豫心理、某种动摇情绪散播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我们党的队伍里各种动摇和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其根源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基础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我们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问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199◇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党正在特米多尔化的胡说来安慰自己。

列宁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根据列宁这句话，“左”倾就做出不正确的结论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对农民是毫无办法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已经过时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胜利了的革命的及时援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垮台或蜕化；如果不采纳那种幻想的、不惜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的超工业化计划，那就必须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经毁灭了。

由此就有“左”倾政策中的冒险主义。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跃。

毫无疑问，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

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

从对这两种倾向顺利进行斗争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左”倾危险现在在党看来比右倾危险更为明显。我们对“左”倾已经进行了几年紧张的斗争，这个情况对于党当然不会没有作用。很明显，在对“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几年中，党学会了许多东西，要用“左的”词句来欺骗党已经不是容易的了。◇200◇

至于右倾危险，它过去就已经存在，现在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强（和上年度收购危机有关）而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了；我认为这种危险在我们党内某一部分党员看来还不十分明显。因此任务就是：除了丝毫不放松对“左”倾危险即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斗争以外，还要着重反右倾的斗争，并竭力设法使右倾危险在党看来也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一样明显。

右倾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们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有联系，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也就在于右倾的存在使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复杂化，并阻碍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正因为右倾危险阻碍我们进行克服困难的斗争，所以克服右倾危险的问题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现在稍微谈谈我们的困难的性质。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困难决不能认为是停滞或衰落中的困难。有经济衰落或经济停滞中的困难，在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人们就竭力使经济停滞现象的害处减轻一些，或者使经济衰落的程度减轻一些。我们的困难和这种困难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是**高涨**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当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业**提高**百分之几，把播种

面积**扩大**百分之几，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为我们的困难是高涨中的困难，而不是衰落或停滞中的困难，所以这种困难对于党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但是困难终究是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有刚毅性和坚韧性，而刚毅性和坚韧性又不是每个人都充分具备的，也许因为有人觉得累了，疲劳了，或者因为有人宁愿过比较安静的、没有斗争和波折的生活，——所以，这里就发生犹豫和动摇，转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说什么要◇201◇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宽容资本主义分子，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否认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静的日常工作范围的事物。

可是，我们不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就不能前进。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倾危险，首先必须克服右倾，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对右倾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不是口头上的纸上的斗争。我们党内有些人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也就不反对宣布对右倾危险作斗争，好像神甫有时念着“阿勒卢亚，阿勒卢亚”一样，可是不采取（决不采取）任何实际办法来为反右倾斗争奠定巩固的基础，并在事实上克服这种右倾。这样的派别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对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调和的**派别。不难了解：对这种调和派的斗争就是对右倾，对右倾危险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关于右倾分子的问题无疑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它没有决定的意义。在上年度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党的下层组织里碰到右倾危险分子，当时在乡里和村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反对党的政策，弄到和富农分子结合起来的地步。你们知道，这种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经被清除出党，这一点已经在今年二月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别提到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党内再没有这种分子，那就不对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县的和省的党组织，并好好地观察一下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那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找到右倾危险分子以及◇202◇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好些工作人员所寄来的“信”、“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倾趋向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你们知道，在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提到了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关于中央委员的问题，那就必须承认，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而在政治局内又是怎样呢？在政治局内有没有什么倾向呢？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

在莫斯科组织里或它的上层机关莫斯科委员会内是不是有过犹豫和动摇呢？是的，是有过的。如果现在硬说那里没有发生过犹豫和动摇，那是愚蠢的。彭柯夫的诚恳坦白的发言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彭柯夫在莫斯科组织和莫斯科委员会里并不是居于末位的人。你们已经听见，他坦白地公开地承认了他在我们党的政策的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莫斯科委员会都发生过动摇。不，不是这个意思。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这样的文件，就毫无疑问地证明莫斯科委员会已经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员的动摇。我不怀疑，莫斯科委员会的领◇203◇导核心是一定能彻底纠正这种情况的。

各区组织干涉了这件事，提出了必须铲除莫斯科组织里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此表示不满。我不知道这种不满

能有什么理由。莫斯科组织里各区积极分子会议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要求铲除错误和动摇，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吗？自我批评可以提高党的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下层群众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各区积极分子会议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或危险呢？

中央干涉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对呢？我认为中央是做得对的。别尔津认为中央提出撤换一个为区组织所反对的区领导人的问题是做得太严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我请别尔津回想一下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些中央委员在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按照列宁的提议对这些人进行了处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土尔克斯坦，另一个人几乎被取消了中央委员资格。

列宁当时这样处理是不是对呢？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当时中央的情形并不像现在这样。当时有一半中央委员是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稳固的。现在中央这样处理是宽大得无可比拟了。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们想比列宁慈善些？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在中央的情形已经比当时稳固了，所以中央现在已经有可能处理得比较宽大。

萨哈罗夫硬说中央干涉得太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对，是因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实◇204◇是从今年二月就开始的。萨哈罗夫如果愿意，是可只确信这一点的。固然，中央的干涉并没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这一点去责备中央，那就奇怪了。

结论：

（一）右倾危险是我们党内的严重危险，因为它是生根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

（二）右倾危险因有各种困难而加深，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这些困难；

（三）在莫斯科组织里有过犹豫和动摇，有过不稳固的因素；

（四）莫斯科委员会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区积极分子会议的帮助下已经采取一切办法去铲除这种动摇；

（五）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一定能克服已经发现的错误；

（六）任务就在于消除内部斗争，使莫斯科组织团结一致，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进行支部的改选。（鼓掌）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二四七号◇205◇

答什·同志

什·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必须说，我决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一）从列宁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我们还是一个小农国家，我国就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你说列宁的这种看法“不能应用于苏联目前的时期”。试问，为什么呢？难道我们不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吗？

当然，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正在发展，集体的经济形式开始在农村中培植起来，所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在减少。这是事实。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是小农国家了呢？这是不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形式已经发展到不能再把苏联看做小农国家了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怎么能反驳这一明显的事实呢？

（二）你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从你对右倾和‘左’倾的意见中，人们会以为我们同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只是在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上有分歧。至于农民问题，你在评论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时只◇206◇是稍微提了一下。这一点使人们对你的演说产生了很不好的解释。”

人们对我的演说[①]完全可能进行不同的解释。这是口味问题。但是你信中的意思和事实不符，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右倾在我国“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

———————————————

① 见本卷第一九二页至第二〇五页。（此为旧版页次）——编者注

资本主义让步”。我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你当然会了解，这里说的不单单是工业化的速度。

关于右倾还需要说些什么才能使你满意呢？

关于“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我在演说中直截了当地说，它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否认工农联盟的思想，并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我在演说中说（如果你读过这篇演说）：“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你当然会了解，这里说的不单单是工业化的速度。

我认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关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主要的东西在这里都已经说到了。

当然，在我的演说中关于“左”倾谈得比右倾少。但这是因为我的演说的题目是关于右倾的问◇207◇题，这一点我在演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而且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议程的。虽然如此，有一点还是不能否认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以及和右倾的一切主要差别，在我的演说中都已经说到了。

在论右倾的演说中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需要说些什么才能使你满意呢？

（三）我声明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又没有“左”倾，也没有对这两者的调和态度，你对我的声明表示不满。我做这种声明是否有根据呢？是的，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政治局通过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党员书的时候，政治局全体到会委员没有一个人投票反对**。这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认为是好的。**在说明一九二八年十月政治局的特征的时候**能不能撇开这个事实呢？显然不能。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208◇

致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的贺电）

值此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纪念日，谨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致敬！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是现在还是我国革命的年轻后备军。工农年轻一代的千百万优秀代表在青年团的队伍里受到了教育，经过了革命的锻炼，并进入了我们的党，我们的苏维埃，我们的工会，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文化机关，来接替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

青年团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是因为它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它善于在自己的活动中把一般的学习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学习和日常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它善于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男女工人和男女农民的年轻一代，它善于使老年列宁主义者和青年列宁主义者、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取得相互了解，它善于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青年团才能高举列宁的旗帜。

希望青年团今后还能负起自己对我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209◇

向我们党的二百万后备军，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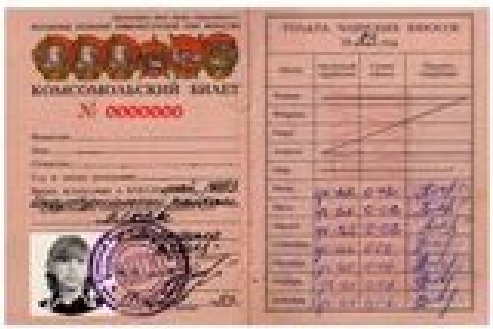
青年团的一代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五二号◇210◇

列宁著《青年团的任务》

女共青团员　　在共产主义旗帜下　（171）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周年〔五四〕

向女工和城乡全体劳动妇女致兄弟的敬礼！

祝她们在争取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愚昧和没有文化等现象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全体劳动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为消灭资本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二六七号◇211◇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五五〕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要讲的是政治局提纲中所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工业化以及在保证以尽快的速度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条件下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的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国内政策方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提高并改造农业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目前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右倾的问题。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212◇

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这个原理是我们提纲的出发点。

迅速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而事实也是这样，最近三年来，在改造时期中，我们的控制数字的特点是：这些数字的制定和实现都是很紧的。无论是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或者是翻一翻我们的预算草案，或者是和我们党内的同

志（无论是在党组织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领导我们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和合作社建设的同志）谈一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迅速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

当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分析一下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的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条件。◇213◇

外部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除了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以外，我们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你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技术不仅是在前进，而且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超过了旧式的工业技术。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

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

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

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这种落后是历来就有的，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214◇留给我们的。这种落后，无论是在从前，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或是在后来，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人们都觉得是一种祸害。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旧的阶级，无论是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而且这些阶级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并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

如果以为我国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取得了政权并担负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对一切负责而且应当对一切负责，既对好的负责也对坏的负责。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

不断地使我国工业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在使我国工业迅速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或突如其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早◇215◇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在他的“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一书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严厉方式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向前猛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问题。

这段话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写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政权，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还没有广泛发展的包括千百万农民的合作社网，还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根本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一些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大体上这样变动一下：

“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政治**方面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这还不够。我们应当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运输业、信用系统等等，利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以便**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像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像德国那样◇216◇大，那末迅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比较缓

慢的速度发展工业，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们。而那时我们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了。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德国的，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还远没有赶上德国。

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末迅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加入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做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

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的**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促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内部◇217◇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像大海中的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孤岛。

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

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末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

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事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比起改造联合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来，改造分散的零星的农业当然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工作。但是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把它解决。而解决这个任务非在迅速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不可。

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218◇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只有电气才是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

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包括农业在内**[①]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

这个演说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所谓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时发表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说：这段话◇219◇里所说的原理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试问，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当然是事实。我们现在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拥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集体农庄，我们拥有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我们拥有稠密的发达的合作社网，我们拥有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我们现在采用预购的方法作为结合的新形式，我们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杠杆来逐步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间所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纲要中也说过同样的但是更加尖锐的话：

“**如果**经过一二十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220◇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对于“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解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农民表示爱抚，并把这看做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方针，因为靠爱抚是做不出大事来的；问题在于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因为这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迅速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

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使我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定得很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问：提纲中什么地方，提纲中哪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呢？（喊声：“是呀，什么地方谈到了这一点呢？”）提纲中规定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基本投资额就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把提纲叫做控制数字提纲。同志们，好像是这样的吧？（喊声：“是的。”）那末，在这个提纲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十六亿五千万卢布。换句话说，◇221◇我们本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度多三亿三千万卢布。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保持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还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工业投资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说，使工业中的基本建设工程

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了。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的主要点就在这里。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们只是对控制数字提纲的细节乱加批评，而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看见。

二 谷物问题

我在上面所讲的是提纲中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基本问题——谷物问题。提纲的特点是：它着重地提到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问题。提纲的这种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早在七月全会上就已经说过，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过分**落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弱点。

有人一讲到我们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就抱怨这种情况，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农业一向落后于工业，并且将来还会落后于工业。在我国工业高度集中而农业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联合的工业要比分散的农业发展得快。由此也就产生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此，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还不能作为提出谷物问题的理由。◇222◇

只有当农业的一般落后于工业变为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时候，才出现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业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区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务不在于把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谷物业的发展水平（这样会使一切混乱起来，会使发展变成倒退），而在于使谷物业的发展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把谷物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迅速前进的水平。

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谷物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乡村之间的分裂就

不可避免。

同志们，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谷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谷物业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鲁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今天已经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了。他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他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在报刊上谈到退化，但是我们在党内不应当掩盖，这种落后等于退化。”

弗鲁姆金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我们政治局委员完全不同意这个论断，而政治局的提纲和这种对谷物业状况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

那末，退化是什么？它在农业中应当表现于什么地方？显然，它应当表现于农业的后退和下降，◇223◇表现于从新的经营方式倒退到旧的中世纪的经营方式。它应当表现于农民比如说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休耕制，由使用铁犁和机器改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选种子和纯种种子改为使用非精选种子和不良种子，由现代的农业文化改为低级的农业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吗？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户农民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种子改为使用纯种种子，由使用木犁改为使用铁犁和机器，由低级的农业文化改为高级的农业文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这算什么退化呢？

弗鲁姆金总是喜欢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员的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可能，他这次将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只字，以便证明布哈林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布哈林远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

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鲁姆金做的是什么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这一抽象问题说成农业退化的**事实**了。这就是他所谓对谷物业状况的分析！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农业退化了，那还了得！这样的政权应该赶走，不应该支持。如果这个政权真的使农业退化了，那末工人们早就把它赶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专家向我们叫嚷退化，他们甚至睡觉都梦见农业退化。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向我们叫嚷过退化。我没有料到弗鲁姆金也会走上这条可疑的道路。◇224◇

弗鲁姆金关于退化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是今年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小了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灾，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今夏又遭了旱灾。假如没有这些完全能左右农业的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谷物播种面积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万俄亩。

其次，他的断言的根据是我们今年的谷物总产量仅仅比去年稍微多一点（多七千万普特），而小麦和黑麦比去年少了两亿普特左右。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切情况呢？这也是因为遭了旱灾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灾。如果没有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比去年多三亿普特左右。怎么能把旱灾、霜灾等等对某些地区的收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不谈呢？

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扩大播种面积百分之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增加谷物总产量约百分之十。毫无疑问，我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灾或旱灾，发生局部的歉收；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使谷物总产量比我们计划的数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总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是不是说农业“正在退化”，而这种“退化”应归咎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刺

激，我们“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呢？

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过这种错误，硬说“下雨”对农业没有作用。李可夫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下驳斥了他。现在弗鲁姆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对农业起决定作用的气候条件，力图把一◇225◇切都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

要提高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呢？

必须采取的途径或方法有三个：

（甲）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

（乙）继续发展集体农庄；

（丙）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

关于这些，早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就已经说过了。提纲把七月全会上说过的重复了一遍，但是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提出了这方面一定的投资数字。弗鲁姆金在这里又找到藉口来吹毛求疵了。他认为，既然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末这无非是表明他的观点胜利了。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当然，如果从某些农业形式的比重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个体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乎多五倍。但是，如果从经济类型，从哪一种经济形式最接近我们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一位，因为和个体农民经济比较起来，它们是农业的高级类型。这两种看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采用的，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这三方面进行，使农业首先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在实际上提高呢？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使他们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226◇题。应当抛弃关于**一般**农业的泛

论和空谈，而转为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制定提高谷物业的**实际**措施。已经到了从言论转为行动并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要研究**怎样**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怎样**改进并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怎样**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良种牲畜方面帮助农民，**怎样**通过农具租赁站用机器和其他农具帮助农民，**怎样**扩大并改进预购的工作和一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喊声：“这是实际主义。”）这种实际主义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有把解决谷物问题这一极重要的工作淹没在关于一般农业的空谈中的危险。

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我们的主要产粮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做一些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具体报告。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听到安得列也夫同志关于解决北高加索谷物问题的方法的报告。我想，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听取乌克兰、中央黑土地带、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类似的报告。为了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谷物问题方面来，并使我们党的干部转上具体地提出和谷物问题有关的问题的轨道，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第二、必须使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其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把他们搅在一起，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现在总该是消灭这些所谓错误的时候了。例如拿个别税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的政治局的决议和有关的法令规定，个别税的征收面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就是说，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征收。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有◇227◇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现在还不到结束这种罪行的时候吗？

可是我们亲爱的“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诸如此类的恶劣现象的具体办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议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改为“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富农”或“最上层的一部分富农”。好像这些并

不是一个意思！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百分之五。已经证实：按照法令应该缴纳个别税的农户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已经证实：在实践中许多地区违反了这个法令。而“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这些现象的具体办法，却在字眼上进行无谓的批评，不愿意了解这样做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十足的书呆子！（喊声：“有人提议向所有的富农征收个别税。”）那末，这就是说应当要求废除只向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农户征收个别税的法令。可是，我倒没有听到有谁要求废除关于个别税的法令。有人说，随意扩大个别税征收面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地方预算。但是，补充地方预算是不能用违反法令、违反党的指示的方法的。我们党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苏维埃政权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如果地方预算的经费不够，就应该提出地方预算的问题，而不应该违反法令，不应该取消党的指示。

其次，必须继续加强对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刺激。毫无疑问，粮价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实际执行，用预购的方式给予贫农、中农农户的实际帮助等等，将大大地增进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弗鲁姆金认为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这种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这当然是胡说。如果真是这样，那◇228◇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终究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末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农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费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别是能够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具有生产性的商品（机器、

肥料等等）。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们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还远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不会很快消除。我们党内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现象。可惜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第一、是和工农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长有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虽然逐年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业改造时期有联系的。

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不这样做，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业改造，尤其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钱投入新企业的建设，城市和新的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而这些新企业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不难了解，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助于消除商品缺乏现象的。◇229◇

这是不是说，在商品缺乏的现象面前我们只好束手待毙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具体办法来减少商品缺乏的现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立即应当做到的。为此必须竭力加强那些和提高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沃龙涅什选种筒制造厂以及其他等等）。其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加强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绒、玻璃、钉子等等）有关的工业部门。如此等等……

库比雅克说，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看来，本年度用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库比雅克大概没有把我们本年度用预购的方式给农民的约三亿卢布的贷款（比上年度几乎多一亿卢布）计算在内。如果估计到这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能不估计到的），那末可以看出，我们本年度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多。至于新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资金将近三亿卢布（比上年度多一亿五千万卢布左右）。

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的方法。不能把这些东

西看做仅仅是扩大我们商品粮食资源的手段。它们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的新形式**。

关于预购的方法我们已经讲得很多，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谁都明白，普遍采用预购的方法会使个体农户所做的努力容易联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固定起来，从而使城乡结合巩固起来。

我希望你们注意集体农庄，特别是注意国营农场，把它们看做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促进农业改造的杠杆，是在农民的头脑中引起革命并帮助他们摆脱因循习气，摆脱守旧思想的杠杆。拖拉机、大◇230◇型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队在我们产粮区出现，对于周围的农民经济不会没有作用。用种子、机器、拖拉机帮助周围的农民，无疑会被农民评价为并且看做是竭力引导他们走上农业大大提高的康庄大道的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威力的标志。这个情况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现在大概也还估计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解决谷物问题和巩固新的结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解决谷物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现在来谈谈我们提纲中的第三个基本问题——关于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问题。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在我国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我们党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这里指的主要是右倾。右倾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是使我们的政策迁就“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要求。◇231◇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像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

右倾的趋向主要潜伏在什么地方呢？潜伏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也潜伏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农村下层环节中。

我们党员中间有没有表现右倾的人呢？无疑是有的。李可夫举出反对建设德涅泊水电站的沙屠诺夫斯基为例。毫无疑问，沙屠诺夫斯基犯了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我还是认为沙屠诺夫斯基不能作为典型来说明右倾的特征，说明右倾的面目。我认为在这方面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笑声）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及在这里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他的第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现在把这两封信分析一下。我们先看一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论点”。

（一）**“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这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末我们的结合就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要知道，从六月（信是在六月写的）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谁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存在并日益巩固。弗鲁姆金写这种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吓党，使党向右倾让步。

（二）**“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今年春季我们已经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末所有◇232◇

主要产粮区的中农就不会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我国春季播种是在四五月间进行的。而弗鲁姆金的信是在六月写的。在我国，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是粮食的主要收购者呢？是国家以及和国家相联系的合作社。很明显，如果中农群众苦于经济上没有前途，如果他们处于和苏维埃政权“破裂”的状态，那他们就不会按照国家这个粮食主要收购者的愿望去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弗鲁姆金的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弗鲁姆金在这里也竭力想以没有前途这种“恐怖”景象来恐吓党，使党向他弗鲁姆金的观点让步。

（三）“**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在这里讲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无庸置疑的。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弃“加紧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弗鲁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来否认党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进的一步，而否认这前进的一步就是把党拉向后退。中央七月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全会在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这一决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的表现”。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告诉弗鲁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指的弗鲁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四）“**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我们从来就是尽力和尽可能地给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以最大限度的帮助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和第十四次代表◇233◇大会比较起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新东西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弗鲁姆金嘴里说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实质上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这一党的

任务敷衍推诿。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反对展开从集体农庄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

（五）“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进行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这一工作。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笔用于这个事业的后备资金，那末我们在这方面所应拿出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是用来引起人们的“恐怖”，并以此掩饰自己不愿意稍微认真地发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在这里反对从国营农场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的所有这些论点汇集起来，就会得到说明右倾的一个总的概念。

现在来看一看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第一封信里说中农经济没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则说农业“退化”。第一封信里说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即放松对富农的进攻，而第二封信里则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第一封信里关于工业只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则发挥了少向工业建设投资的“新”理论。但是，这两封信有两点是一致的，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鲁姆金在两封信里都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显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234◇

关于“退化”的理论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那些一味叫喊苏维埃政权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专家捏造的。弗鲁姆金让那些栖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周围的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吓倒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企图恐吓党，想使党对右倾让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讲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复了。讲我们来看看其余两点：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的基本投资。

关于富农经济。弗鲁姆金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而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纵农村资本主义，给它自由，让它发展。这恰恰是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老口号：“让他做吧，让他走吧”，就是说，不要妨碍资产阶级干自己的事，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自由行动。

这个口号是法国的老自由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束缚资产阶级而不让它发展的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这样说来，我们现在应当从**社会主义的**口号——“要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见控制数字提纲），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不要束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难道我们想由布尔什维克变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吗？弗鲁姆金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和党的路线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弗鲁姆金：“斯大林同志，请把其他几点也读出来。”）我把这一点全读出来：“我们也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怎么，可敬的弗鲁姆金，难道你以为下半句话会使情况变好而不会变坏吗？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剥削◇235◇作斗争这个口号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方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并且把我们力求消灭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和我们当时因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灭的非奴役性的、所谓“进步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但是那时我们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现在，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持的方针是而且不能不是消灭一切剥削方式，其中包括“进步的”剥削方式。你怎么能要我们从正在发展并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向后转，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上去呢？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其次，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要求封建政权不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时候，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给资产阶级政权。当时他们是对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权。因此，如果推论下去，那就应当说：让富农参加政权。因为终究必须了解这一点：剥夺富农的政权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缚富农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读了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三种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给七亿五千万卢布，而财政人民委员部只同意给六亿五千万卢布。我们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决定的呢？党中央决定给八亿卢布，也就是说，比财政人民◇236◇委员部提出的整整多一亿五千万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得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财政人民委员部吝啬，它也不能不吝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弗鲁姆金所以坚持只给六亿五千万卢布，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以新创的“可能”论为根据的。他在第二封信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断言：**如果我们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六亿五千万卢布，那就必定会使我们的经济事业恶化**。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弗鲁姆金反对保持现在工业发展的速度，看来，他不了解降低这个速度才真的会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第二封信里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基本建设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论，你们就会看到右倾的面目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右倾，右倾是什么样子吗？读一读弗鲁姆金的两封信，研究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

关于右倾面目的问题就是如此。

但是，提纲不仅谈到右倾，还谈到所谓“左”倾。什么是“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真有所谓“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有像我们提纲中所说的反中农趋向，超工业化趋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七月全会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指的是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著名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谈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那些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237◇后退的人（这是右派），也反对那些要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趋向）。

很明显，我们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因素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趋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争论的时候，好像将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对我们的政纲。（喊声：“有一万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对的党员有一万，那末因为没有到会而根本没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该有两万了。这就是那些没有退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应当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后来脱离托洛茨基组织回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大概也不反对在党员中间散布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有些抬头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你们就会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来说明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存在。

这是很明显的：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自发势力向我们党侵袭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不会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趋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干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一回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就是右派，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词

句掩饰起来的右派。◇238◇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末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末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另一些人叫做“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那末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末，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德涅泊水电站”**，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德涅泊水电站”**，（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239◇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可是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成立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趋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没有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极左派，不愿意和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

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没有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

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人叫做“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240◇把“左派共产主义者”叫做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做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趋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反列宁主义的联盟，公开而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没有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

不能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类似沙屠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派性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它们摇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241◇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

不能把中派主义看做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的、相对立的。

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没有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

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

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242◇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

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喊声：“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

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

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243◇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末，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倾向这个概念的。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

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没有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我们党内的“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唯一的**左派（没有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喊声：“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244◇些分子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

党内具有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其次，提纲中说，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最好回忆一下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是从何着手的呢？也许是从组织处理着手的吧？当然不是！我们是从思想斗争着手的。这个斗争从一九一八年进行到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四年，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做出决议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托洛茨基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可见我们“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为什么我们容许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呢？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和党有分歧，对中央的决议还是服从的，对党还是忠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处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派别，成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央，把自己的派别组织变为新的党并开始号召人们举行反苏维埃游行以后。◇245◇

我认为我们同右倾作斗争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做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形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

斗争的主要方法。这个结论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员中间有着相反的趋向：同右倾作斗争不从思想斗争着手，而从组织处理着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们指出十个二十个右倾的人吧，我们一转眼就会把他们粉碎，这样就铲除了右倾。同志们，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和危险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绪东飘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必须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说我们排斥任何组织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说，组织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如果右倾分子没有破坏党的决议，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们赶出这些或那些领导组织和领导机关。（喊声：“莫斯科的实际情况呢？”）

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那里有过对右倾情绪的不正确的态度。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趋向。但是我不能说，莫斯科委员会中有过右倾。（喊声：“组织斗争不是有过吗？”）

组织斗争是有过的，虽然占着从属地位。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246◇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笑声）（喊声：“难道我们宣布过改选书记吗？”）谁也没有禁止过改选书记。中央的六月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能保证下层组织有撤换任何书记和任何委员会的权利，那末开展自我批评就会成为空谈。你能用什么话来反对这样的宣言呢？（喊声：“在党代表会议以前吗？”）是的，即使在党代表会议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脸上流露出卜者[①]的笑容。同志们，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尽快撤销某些表现右倾的人的职务。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撤销职务比进行广泛而周密考虑的关于右倾、右倾危险以及反右倾斗争的解

———————————————

① 卜者，即占卜的人。——本书制作者注

释运动要容易。但是不能认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组织广泛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解释运动，不要吝惜时间，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对右倾就愈不利。所以，我认为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反右倾斗争的中心环节。

至于说到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对于乌格兰诺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结论时所说的话还能做些什么补充。他坦白地声明：

“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一九二一年我在列宁格勒和季诺维也夫作战的情形，就会知道当时‘激战’的规模比现在大些。当时我们战胜了，因为我们是对的。现在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错了。这对我们是会有益的。”

可见乌格兰诺夫现在进行了斗争，如同他当时进行过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一样。但是他最近◇247◇进行斗争究竟是反对谁呢？看来是反对中央的政策。还能是反对谁呢？这个斗争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进行呢？显然是在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基础上。

因此，提纲完全正确地强调必须反对对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各种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提纲中指出，我们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倾危险在目前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斗争，并且是集中火力的斗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骨干。不能说，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最近也进行得同样激烈。这种斗争所以没有进行得特别激烈，是因为右倾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形成和定形的时期，它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加强（与我们的粮食收购困难有关）而正在加强和增长起来。所以主要的打击应当对准右倾。

同志们，我在结束讲话之前还想指出一个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政治局委员向你们提出了控制数字提纲。我在演说中维护了这个提纲，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谈对这个提纲可能提出的个别修正。但是，这个提纲基本上是正确的，能保证我们正确执行列宁的路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应当向你们声明，这个提纲是我们在政治局内一致通过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意义，因为一切对我们党不怀好意的人、反对我们党的人以及我们党的敌人不时在我们队伍里散布谣言。我指的谣言是：似乎我们政治局内有右倾、“左”倾、调和态度◇248◇以及鬼才晓得的其他什么东西。就让这个提纲作为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证明吧。

我希望这次全会同样一致地通过这个提纲作为基础。（鼓掌）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249◇

给斯摩棱斯克省“线轴”工厂的工人和雅尔采沃工厂的工人〔五六〕

祝贺你们在组织更好地进行苏维埃选举运动的竞赛方面的创举。

工人阶级专政的机关——苏维埃的选举应当是工人自己切身的事情。

你们参加选举运动不能只限于以应有的态度，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在本市进行选举，进行市苏维埃选举。

更困难的但是同样必要的任务是直接参加农村中的选举运动。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将大大取决于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雇农、贫农如何参加运动和影响运动的进程，引导中农和排挤富农，从而保证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因此，你们所倡导的发动工人广泛参加选举运动的挑战大会将有很大的意义。

祝你们成功。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七四号 ◇250◇

给“红色工会国际”工厂的工人

（别日察市）

向“红色工会国际”工厂的工人致兄弟的敬礼。祝贺你们接受了“线轴”工厂和雅尔采沃工厂工人的挑战。祝你们在进行苏维埃改选运动中获得成功。请原谅我不能到你们的工厂去。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七八号◇251◇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巩固工农联盟

咱们工人有力量

355. Иванов В.
Строить быстро, дешево, хорошо! 1950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纪念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十周年

值此伏龙芝军事学院十周年纪念日，谨向伏龙芝军事学院致衷心的祝贺。

祝它成功和进一步繁荣。

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真理报”第二八六号◇252◇

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在这里说明了联共（布）代表团的看法，因此，我要说的只有几句话。我想谈一谈，而且是简单地谈一谈在讨论过程中发现的三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稳定问题，在稳定日趋动摇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及德国共产党问题。

很抱歉，我必须肯定说，在所有这三个问题上，洪别尔-德罗和谢拉两人都滚到怯懦的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去了。固然，洪别尔-德罗现在只就形式上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但我指的是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讨论德国共产党内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带原则性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少数人在这次会议上所持的立场的思想基础。因此，对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所发表的这篇带原则性的演说不能避而不谈。◇253◇

我说洪别尔-德罗和谢拉滚到怯懦的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除了公开的机会主义以外，还有隐蔽的、害怕暴露自己真面目的机会主义。这也就是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机会主义。调和主义就是怯懦的机会主义。再说一遍，很抱歉，我必须肯定说，我们这两位同志滚到怯懦的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去了。

让我用一些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一 资本主义稳定问题

共产国际认为，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动摇的和腐朽的稳定，这种稳定在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将愈来愈动摇。

这同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合理化正在发展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毫不矛盾。而且稳定的内在的腐朽性和软弱性正是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增长起来的。

而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演说中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完全否定稳定的动摇性和不巩固性。他在自己的演说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实际上斥责了关于稳定是腐朽的动摇的等等一般性的含糊的说法。”他直截了当地宣称：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论述第三个时期的著名条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稳定的动摇性。能不能认为洪别尔-德罗的这种论断是◇254◇正确的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断定的正好和洪别尔-德罗在他的演说中所说的完全相反。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论述第三个时期的那段话中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时期（即第三个时期。——斯大林注）必然会经过资本主义稳定本身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①]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五七〕

请注意：“稳定的进一步动摇……”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稳定现在已经动摇和不巩固了，它在第三个时期的条件下将更加动摇。而洪别尔-德罗竟敢嘲笑所有那些宣称稳定具有动摇性和腐朽性的人，所有那些宣称目前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在冲毁并瓦解资本主义稳定的人，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洪别尔-德罗嘲笑的是谁呢？显然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此可见，洪别尔-德罗实际上是打着捍卫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幌子来**修正**这些决议，因而堕落到以机会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稳定的地步。

从形式方面看，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分析问题的实质。如果目前的稳定不能说是动摇的、腐朽的或不巩固的，那末它究竟是怎样的呢？那就只有承认它是巩固的，至少是正在加强的。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正在加强的资本主义的稳定，那末所谓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尖锐化和加深又作何解释呢？在这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255◇危机的加深，这不是很明显吗？洪别尔-德罗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这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列宁说过，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某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腐朽**。列宁的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如果正确，那末资本主义的稳定就不能不是腐朽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最后，略为谈谈几个大家知道的事实。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拚命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疯狂地扩充军备，缔结新的军事同盟，公然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两个巨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它们竭力把其他一切国家拉进自己的控制范围。

最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有苏联存在，苏联各方面的建设，无论经济方面或政治、文化方面，都在发展并获得很大的成就；单是苏联的存在（更不用说它的发展）就在动摇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怎么能断言

资本主义的稳定不是动摇的和腐朽的，不是逐年逐日被事物进程本身动摇着呢？

洪别尔-德罗以及谢拉是否会想到他们滚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呢？◇256◇

洪别尔-德罗和谢拉的其他错误都是和这个错误有联系的。

二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

洪别尔-德罗对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斗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从洪别尔-德罗在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演说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自发搏斗，基本上只带有防御的性质，共产党只应当在现有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领导这一斗争。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样断言就是做了事变的尾巴。洪别尔-德罗忘记了，目前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在稳定**日趋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带有遭遇战的性质，带有向资本家反攻和正面进攻的性质。洪别尔-德罗没有看到最近时期工人阶级斗争中任何新的东西。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事实，如洛兹的总罢工，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罢工，德国在反对以同盟歇业对付五金工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大动员，以及其他等等。

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预告了什么呢？说明并预告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运动新的革命高潮的前提正在增长。这也就是洪别尔-德罗和谢拉没有看到和没有注意到的新东西，也就是那些惯于向后看而不向前看的同志们永远不会注意到的新东西。◇257◇

向后看而不向前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做事变的尾巴，看不见事变中的新东西，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这就是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时期也就是在这

个问题上碰了钉子。因此，谁不愿意重复一九二三年的错误，谁就应当唤醒共产党员并号召他们前进，谁就应当准备群众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谁就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共产党不致成为事变的尾巴，使工人阶级不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

非常奇怪，洪别尔-德罗和谢拉竟把这一点忘记了。

在鲁尔斗争的时期，德国共产党人肯定了一件大家知道的事实：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比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更加革命。洪别尔-德罗因此大怒，硬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真奇怪！为什么不可能有？在鲁尔约有一百万工人。其中组织在工会里的约有二十万。领导工会的是那些和资本家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主义改良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比组织起来的工人更加革命，那有什么奇怪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俄国革命运动史中的一些更加“奇怪的”事实。我们的群众往往比自己的（某些）共产党员领袖更加革命。俄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列宁说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还要**向群众学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值得奇怪的不是这些事实，而是洪别尔-德罗不懂得革命实践中这些简单的道理。

关于谢拉也必须这样说。他不赞成德国共产党人在为组织那些遭到同盟歇业袭击的五金工人而◇258◇进行的斗争中越出现有工会的范围，打破这个范围。他认为这就是违反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五八〕。他硬说，工会国际指示共产党人只在工会内进行工作。同志们，这是胡说！工会国际根本没有做过这一类指示。这样说，就是一定要共产党去扮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消极观望者的角色。这样说，就是埋葬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思想。

德国共产党人的功绩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让“工会范围”的胡说把自己吓倒，他们越出了这个范围，违反工会官僚主义分子的意志而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德国共产党人的功绩正是在

于他们寻找并摸索到了争取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新形式。可能他们同时也犯了一些非本质的错误。但是搞新的工作是决不会不犯错误的。既然只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末我们就应当在这些工会中进行工作，但是由此完全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把群众工作**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我们必须做这些工会的规范和要求的奴隶。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参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工人阶级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末能不能断言，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可以不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现有工会的改良主义范围呢？显然，不陷入机会主义，就不能这样断言。因此，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违反那些卖身于资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德国也会这样。◇259◇

三　德国共产党问题

德国共产党要不要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内部有铁的纪律的政党而存在，——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不仅是关于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的问题，而且是关于德国共产党本身存亡的问题。德国共产党存在着。但是同时在德国共产党内还存在着从内部瓦解党并威胁党的生存的两种力量。第一、这是右派，它在共产党内组织了一个有自己的中央和自己的报刊的新的反列宁主义政党，并且天天在破坏党的纪律。第二、这是调和派，它以自己的动摇来加强右派。

我不想来证明右派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拚命反对共产国际。这是早已证实了的。我也不想来证明调和派破坏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不断同右倾分子作斗争的著名决议。这也是早已证实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再容忍德国共产党内的这种情况了。问题是：当右倾分子

正在散播社会民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且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候，继续容忍这种“秩序”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

现在所造成的情况，和联共（布）在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后一阶段（当时党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把托洛茨基分子逐出自己的队伍）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坏。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可是洪别尔-德罗和谢拉没有看到，或者假装没有看到。这就是说，他们甘愿支持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甚至◇260◇不惜以德国共产党的完全瓦解为代价。

洪别尔-德罗和谢拉在反对开除右倾分子的时候，引证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这个决议规定必须用思想斗争方式克服右倾。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把共产党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局限于思想斗争的方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关于布哈林的报告的决议中，讲到对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进行思想斗争的办法时说：

“这不仅不排除**全力加强党内铁的纪律**，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下级机关**以及党的其他组织（国会党团、工会党组、报刊等等）**无条件服从党的中央**，而且是以此为前提的。”①〔五九〕

非常奇怪，洪别尔-德罗和谢拉忘记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这一论点。非常奇怪，所有的调和分子，无论承认自己是调和分子的人或者不承认这个称号的人，在引证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总是忘记共产国际的这一重要论点。

我们在德国共产党内所看到的不是全力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而是右倾分子以及一些调和分子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纪律，对于这种令人愤怒的事实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们在德国共产党内所看到的不是下级机关、工会党组和党的某些报刊无条件服从党的中央，而是右倾分子以及一些调和分子最粗暴地违反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这一要求，对于这种令人◇261◇愤怒的事实该怎么办呢？

能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呢？

你们都知道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六〇〕我说的就是那二十一个条件。其中第一条说：“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刊物以及党的一切出版机关必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①，不论整个党在目前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你们知道，右派有两个报刊。你们知道，这些报刊对于任何服从德共中央的话连听都不愿意听。试问，能不能再容忍这种恶劣现象呢？

二十一个条件的第十二条说，党必须“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党内必须“**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②。你们知道，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除了自己的、派别组织的纪律以外，既不愿意承认铁的纪律，也不愿意承认其他任何纪律。试问，能不能再容忍这种恶劣现象呢？

也许你们会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那些条件对右倾分子没有约束力吧？

洪别尔-德罗和谢拉在这里大叫大嚷，捏造说有人破坏共产国际决议。现在我们看到右倾分子就是共产国际基本原则的真正的（而不是臆造的）破坏者。为什么他们默不作声呢？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用口头上捍卫共产国际决议的形式来捍卫右倾分子并修正这些决议吗？

谢拉的声明是特别有趣的。他赌咒发誓，说他反对右倾分子，反对调和分子等等。但是他由此做◇262◇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你们以为是同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作斗争吗？一点也不是！他由此做出极端奇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怪的结论说，他认为必须改组现在的德共中央政治局。

请你们想一想吧：德共中央政治局对右倾危险和调和分子的动摇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谢拉主张对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进行斗争；**因此**，谢拉提议不要触犯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而要放松对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斗争并以调和主义的精神更换德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就叫做“结论”！

请谢拉原谅我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像那些企图颠倒黑白的乡下辩护士的立场。这也就叫做替机会主义分子做辩护士的辩护。

谢拉提议改组德共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说，撤换一些人，用另外一些人去代替他们。为什么谢拉不直率地公开地说出用谁去代替。（谢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要谁去，就用谁去代替。”）但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本没有提议为调和分子辩护。恰恰相反，大会责成我们不断地向调和主义进行斗争。正因为调和分子没有负起这个责任，所以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通过了一个关于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著名决议。谢拉想充当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唯一解释人的角色。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谢拉的这种奢望是有根据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我看谢拉是不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十月六日的决议的，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有一个：洪别尔-德罗和谢拉在德国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替右倾分子◇263◇做怯懦的辩护士的辩护而反对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四　德共党内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分子

今天我从几个人的发言中知道，德国某些调和分子为了给自己辩

护，引证了我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上的演说[①]中关于同右倾分子斗争的方法问题的话。大家知道，我在演说（已经发表）中断定说，**在**联共（布）党内对右倾危险展开斗争的**现阶段**，思想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方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个别情况下采用组织处理。我这个论点的根据是：联共（布）党内的右派还没有定形，还不是一个集团或派别组织，还没有一次违反过或不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我在演说中断定说，如果右倾分子转上派别斗争的立场并且开始破坏联共（布）中央的决议，那末我们就要像一九二七年对付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对付他们。看来是很清楚了。而**德国**右倾分子**已经转而采取**派别斗争的手段并且一贯破坏德共中央的决议，**德国**调和分子还没有，看来也不想和右倾的**派别组织**断绝关系，那末引证我的演说，把它当做对**德国**右倾分子有利的论据，当做对**德国**调和分子有利的论据，岂不是愚蠢吗？我认为不能想像再有比这种引证更愚蠢的事了。只有违反逻辑的人才不能明白联共（布）党内右倾分◇264◇子的情况和德共党内右倾分子的情况之间的全部深刻的差别。

事实上，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分子还不是一种派别组织，他们无疑是忠顺地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的。相反地，德国的右倾分子已经形成了以自己的中央为首的派别组织，并且一贯践踏德共中央的决议。**现阶段**对右倾分子斗争的方法在这两个党内是不能一样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在我们苏联没有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能培养和刺激联共（布）党内右倾危险的有组织的严重的力量。相反地，在德国，在共产党的旁边存在着更强大的和组织得相当巩固的社会民主党，它培养德国共产党的右倾并使右倾在客观上变为它的代理人。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苏联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吗？

——————————————

① 见本卷第二一二页至第二四九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的党是在同孟什维克进行极残酷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并且这种斗争有好几年采取了同他们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的形式。不要忘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是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左翼推翻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无论哪里，无论哪一国的共产党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传统都不像联共（布）那样深。只要回忆一下莫斯科组织特别是莫斯科委员会发生过某种程度的调和主义的动摇，只要回忆一下莫斯科的工人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一下子就纠正了莫斯科委员会的路线，——只要回忆一下这些情况，就会明白在我们党内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传统是多么深。

关于德国共产党能不能也这样说呢？很可惜，不能这样说，这一点你们大概是会同意的。而且我◇265◇们不能否认，德国共产党还远没有摆脱那些培养德共党内右倾危险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

德国的条件和苏联的条件就是如此。这些条件说明，不同的条件决定了联共（布）党内和德共党内对右倾危险进行斗争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

只有失去了马克思主义者起码的敏感的人才不能明白这种简单的道理。

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六一〕起草委员会上，有些同志建议把决议的基本原理也应用到共产国际其他的支部中去，其中包括德国支部。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声明德共党内对右倾危险进行斗争的条件和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五 关于秘密信和公开信的草案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我要说两句话。谢拉认为这些草案带有地方决议的性质。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

在公开信的草案中没有分析产生右倾危险的政治情况。

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分析。需要重复一遍吗？我认为不必重复。本来我们可以只限于写一个简短的决议，说明右倾分子一贯破坏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因而应该被开除，说明调和分子不同右派作斗争，因而应该受到极严重的警告。

但是我们这个决议写得并不简短，这是为了向工人解释右倾的实质，向他们揭露布兰德勒之流◇266◇和塔尔盖麦之流的真面目，向他们指出这两种人过去是怎样的人，现在又是怎样的人，说明共产国际怎样长期宽容了他们，希望把他们纠正过来，说明共产党员怎样在自己的队伍里长期容忍了他们，并说明为什么现在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人留在共产国际中了。

正因为如此，决议草案的篇幅比最初所能预料的要大些。

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已经说过，联共（布）代表团同意这些决议草案。我只能重复一遍莫洛托夫同志的声明。

载于一九二八年“布尔什维克”杂志
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期合刊◇267◇

答库什特谢夫

库什特谢夫同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

你的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实际上它经不起任何的批判。不难了解，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并不是要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有怎样一种政权，也不是要说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实行国家电气化，就等于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

列宁讲这句话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不过是要说明：要走向共产主义，单靠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要走向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必须使国家电气化，**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规模的生产**；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列宁的这句名言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通过电气化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并取消了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或者，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阶级、国家等等存在？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们有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共和国叫做社◇268◇会主义共和国呢？当然有。这是从什么样的观点来看的呢？这是从我们**决心**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等等的观点来看的。

库什特谢夫同志，也许你同意听听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吧？如果同意，就请听吧：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

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二页）

看来已经清楚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269◇

堕落到极点了

最近托洛茨基秘密组织的全部活动，迫使党和苏维埃政权对托洛茨基派采取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原则上不同的**态度，因此，必须十分明确地提出关于托洛茨基秘密组织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托洛茨基派在街头的公开发动，是托洛茨基组织表示**它不仅破坏党的原则，而且也破坏苏维埃制度**的转折点。

在这次发动以前，已经有过多次反党、反苏维埃的行动：强占国家房屋（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开会，设立秘密印刷所等等。但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对托洛茨基组织所采取的办法，证明党的领导还是希望争取托洛茨基分子改过自新，争取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的原则上来。从一九二三年的争论开始，党在几年中耐心地执行了这条路线——主要是**思想斗争**的路线。甚至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谈的也正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托洛茨基组织，虽然托洛茨基派“已经从策略性的分歧转到**纲领**性的分歧，修正列宁的观点，滚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六二〕。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年，表明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派中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党◇270◇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一九二八年内，托洛茨基派从反党的秘密集团完全变成了反苏维埃的秘密组织。**这就是迫使苏维埃政权机关在一九二八年内对这一反苏维埃秘密组织的积极分子采取镇压手段的**新情况**。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关不能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有反苏维埃的秘密组织存在，虽然这个组织的人数极少，但是它毕竟拥有自己的印刷所和自己的委员会，企图组织反苏维埃的罢工，居然准备

自己的拥护者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内战。托洛茨基派正是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从前是党内的派别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反苏维埃的秘密组织了。

很明显，国内一切反苏维埃分子、孟什维克都同情托洛茨基派，现在都聚集在托洛茨基派的周围。

托洛茨基派反对联共（布）的斗争是有它的逻辑的，这个逻辑把托洛茨基派引到反苏维埃的阵营里去了。托洛茨基首先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建议他的同伙要打击联共（布）的领导而不要把自己和苏联对立起来。但是这种斗争的逻辑给托洛茨基造成的结果是：他对联共（布）的领导的打击，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的打击，必不可免地转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对苏联、对我们整个苏维埃社会的打击了。

托洛茨基分子企图用一切办法破坏领导国家的党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那封寄到国外的不仅在叛徒马斯洛夫的报刊上而且在白卫◇271◇分子的报刊（“舵报”〔六三〕等）上登载的指示信中，发表了一个诬蔑性的反苏维埃声明，说苏联现存的制度是“克伦斯基统治的另一面”，他号召组织罢工和破坏集体合同运动，并在实际上准备他的干部迎接可能发生的新内战。

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公开说，在准备内战这件事上，不应当“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受任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束缚”。

托洛茨基派在秘密报刊和外国叛徒的报刊上，并通过这些报刊在国外白卫分子的报刊上散播的诽谤红军及其领导者的谰言，证明托洛茨基派不惜公开唆使国际资产阶级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红军及其领导者们在这些文件中被说成是未来的拿破仑政变的军队。同时，托洛茨基组织一方面到处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企图分裂共产国际的支部，瓦解共产国际的队伍，另一方面唆使本来就敌视苏维埃国家的分子反

对苏联。

托洛茨基派著作中的革命词句已经掩盖不住托洛茨基派口号的反革命本质。由于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向党提出警告说，连“白卫分子都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党人，甚至装得比共产党人‘更左’，只求削弱并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列宁当时就举例说明孟什维克怎样利用俄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以便实际上鼓舞并支援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而在叛乱失败的时候则表示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只不过要做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六四〕。托洛茨基派的秘密组织已经充分证明：它是这样一种伪装的组织，这种组织目◇272◇前正在把一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现在托洛茨基组织实际上扮演着当时孟什维克党在苏联所扮演的反对苏维埃制度的那个角色。

托洛茨基组织的**破坏**活动使苏维埃政权机关必须对这个反苏维埃组织进行无情的斗争。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近采取了一些消灭这个反苏维埃组织的措施（逮捕和放逐）。

看来还远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清楚地了解到，在过去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现在联共（布）党外的托洛茨基反苏维埃秘密组织之间**已经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已经是了解并领会这个很明显的真理的时候了。因此，个别党员有时表现出来的对托洛茨基秘密组织的积极分子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全体党员必须领会这一点。而且必须向全国，向广大工农阶层说明：托洛茨基非法组织是反苏维埃的组织，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

让那些站在半路上的托洛茨基分子也考虑一下他们的首领和托洛茨基反苏维埃秘密组织的活动所造成的这种新情况吧。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跟着托洛茨基反苏维埃秘密组织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同托洛茨基派的反苏维埃秘密组织

完全断绝关系，完全拒绝给这个组织以任何援助。

第一次刊印◇273◇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简要记录）

同志们！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过去党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集团存在，因为布哈林分子对党严密地隐瞒了这种集团存在的事实。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了。

从这个集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有自己的、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第一、它违反党的现行政策，要求降低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硬说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会“招致灭亡”。第二、它也违反党的政策，要求收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不起也不能起重大作用。第三、它也违反党的政策，要求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并放弃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断言国家的调节作用使贸易不可能发展。

换句话说，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它不主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而主张让它自由发展。◇274◇

同时，布哈林集团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反对向富农征收“过高的”税，放肆地责备党，说党采取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布哈林所以需要这种可笑的责备是为了保护富农，把劳动农民和富农搅在一起，混为一谈。

布哈林集团要求党按照它的政纲的精神根本改变党的政策。它并且声明：如果党的政策不改变，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就要

辞职。

这次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弄清楚的事实就是如此。

此外还弄清楚了：布哈林受这个集团的委托，曾经和加米涅夫进行幕后谈判，以便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来反对党和党中央。看来，布哈林分子并不指望他们的政纲会在我们党中央取得胜利，所以认为必须背着党中央来组织这种联盟。

过去我们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一次爆发是在中央七月全会（一九二八年）以前。当时的意见分歧也是发生在这些问题上：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关于私人贸易的完全自由，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但是，当时全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通过了共同的一致的决议。当时我们都认为布哈林及其拥护者抛弃了自己的错误，意见分歧也因共同决议的通过而消除了。大家知道的由政治局全体委员签字的关于政治局内部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声明（一九二八年七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次爆发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以前。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显◇275◇然表明，政治局内并不是一切都很好，至少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打算修改或“订正”中央的路线。在我们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看来，丝毫不容怀疑，“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的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鲁姆金那封信的意见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这里还要加上关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辞职问题。原来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那时来到控制数字决议起草委员会，声明说他们要辞职。但是在控制数字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全部意见分歧都这样或那样地解决了：保持了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继续展开获得了同意，保持了向富农征收的最高税额，也保持了国

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说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可笑责备在全体委员大笑声中遭到了否定，三人的辞职声明收回了。结果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共同决议。结果是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大家知道的决议：政治局全体委员无论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或全会外都要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保留了自己和党不一致的特殊看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实际上会真正拒绝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加米涅夫的档案中有一种“记录”，从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持有自己的政纲、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反对党的特殊集团，——这一切当时我们能不能知道呢？

显然不能知道。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意见分歧是存在的，而且分歧是严重的。看来弗鲁姆金的桂冠使布哈林睡不◇276◇着觉。列宁早在一九一六年写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就万分正确地说过，布哈林“在政治上极不坚定”〔六五〕。现在这种不坚定性已经由布哈林传染给他的集团的成员了。

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确信宽容和放纵富农是解决我们粮食困难和其他一切困难的手段。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宽容富农，不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给他们自由等等，那末困难就会消除，国家政治状况就会好转。不用说，布哈林分子的这种确信富农能起拯救作用的幼稚看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简直不值得批评。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他们不了解不论怎样放纵富农都不能减轻我们的粮食困难，因为在规定收购价格和由国家机关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下，富农反正不会

自愿交出粮食，而我们如果不愿意破坏苏维埃制度，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这些粗浅的道理。至于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那就不用说了。

同志们会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出路何在呢？由于布哈林集团的出现，必须采取什么对策呢？关于摆脱现状的出路，大多数同志都已经发表意见。大多数同志要求会议表现出果断的精神，坚决拒绝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李可夫已经收回自己的辞职声明）。大多数同志要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277◇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斥责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要求会议斥责布哈林及其集团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我完全同意这些建议。

布哈林分子不同意这样的决定。他们不顾党章，要求保证他们有派别集团的自由。他们不顾党的切身利益，要求保证他们有违反党和中央决议的自由。试问，有什么根据呢？

照他们说来，如果普通党员不执行中央的决议，那就应当按照党的法规予以极严厉的处分；如果所谓领袖，比如说，政治局委员违反中央的决议，那就不仅不能处分他们，而且简直不能批评他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把批评看做“恶意攻击”的。

显然，党不能采取这种荒谬的观点。如果我们对领袖们宣布一种党的法规，对党内的“平民”宣布另一种党的法规，那末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党，没有什么党的纪律了。

他们控诉“恶意攻击”。但是这种控诉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布哈林有权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之类的荒谬的反党文章，那末党员就更有权批评这种文章。既然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自以为有权违反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在委托给他们的岗位上工作，那末党员就更有权

批评他们的这种行为。如果把这叫做“恶意攻击”，那末让他们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是怎样了解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等等口号的。

有人说，如果列宁来处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一定会比现在中央处理得宽大些。这是完全不对的。现在的情形是这样：两位政治局委员经常违反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留在党交给他们的岗位◇278◇上，而党中央不但没有处分他们，反而劝了他们两个月，劝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列宁在这种场合是怎样处理的，请回想一下吧。难道不记得列宁同志因托姆斯基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把他赶到土尔克斯坦去了吗？

托姆斯基：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好意，一部分也是你的好意促成的。

斯大林：如果你想说可以叫列宁相信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那末这只能令人发笑……　请回想一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关于施略普尼柯夫的事。列宁因为施略普尼柯夫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党支部中批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某一决议草案，就建议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现在粗暴地违反中央的决议并公然制定反党的机会主义新政纲的罪行，要比上述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过错恶劣得多，这一点谁能否认呢？可是中央委员会不但没有要求把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逐出中央委员会或派到什么土尔克斯坦去，反而只是试图说服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当然，同时也揭穿他们非党的、有时简直是反党的立场。你们还要怎样宽大呢？

我们大多数中央委员对布哈林分子过于自由主义和宽容了，也许我们这样做无意中鼓励了他们反党的派别“工作”，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

还不到结束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吗？

我提议接受这次会上大多数人的建议，并转入下面的问题。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但是迟写总比不写好。

（一）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在文艺界党的（共产党的）某个小组里还可以应用。在这种小组里可能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在文艺发展的现阶段，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以至反苏维埃的和完全反革命的流派的文艺界，那就是把一切概念都颠倒了。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

（二）综上所述，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不能认为“郭洛万诺夫主义”〔六六〕是“右倾”危险或“左倾”危险，因为它是在党派范围以外的。“郭洛万诺夫主义”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当然，不应该由此得◇280◇出结论说：郭洛万诺夫本人不能改好，他不能摆脱自己的错误，甚至当他决心抛弃自己错误的时候也要追究他和攻击他，这样来迫使他出走国外。

又如布尔加柯夫的“逃亡”，同样不能认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的表现。“逃亡”是企图引起人们对某些反苏维埃流亡者阶层怜悯（甚至同情）的表现，也就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做辩

护或半辩护的表现。像现在这个样子的“逃亡”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

但是我决不会反对上演“逃亡”，只要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八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描写出苏联国内战争的内部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穆之流和各种各样的编制以外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们如何“诚实”），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剥削的“诚实”拥护者赶走是体现了工农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三）为什么常常上演布尔加柯夫的剧本呢？大概因为**我们自己的**适于上演的剧本不够。闹剧本荒的时候，甚至“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算好剧本了。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而竞赛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的情况下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成和定形。◇281◇

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

当然，作者对这种显示是一点也“没有过错”的。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四）确实，斯维捷尔斯基同志常常搞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来。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剧目委员会在其工作中犯的错误

并不比他少，虽然是另一方面的错误。请回忆一下“火红的岛”、“平等者的阴谋”以及其他类似的低级作品吧，这些作品不知为什么很乐意地让真正资产阶级的室内剧院上演了。

（五）关于“自由主义”的“谣言”，是好是不去谈它，——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事，让莫斯科的商人太太们去搞吧。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第一次刊印◇282◇

给“红三角”工厂的男女工人

敬爱的“红三角”工厂的男女工人同志们！值此“红三角”工厂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之际，请接受我亲切的祝贺。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你们的兄弟姊妹们要工作十、十二、十四小时。而我们工农国家的男女工人从此每天只工作七小时了。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工人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最前列！

让我们的旗帜——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旗帜！

请原谅我不能到你们那里去参加你们的庆祝会。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
第二十八号◇283◇

致普罗斯库罗夫城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贺电〔六七〕

向红色骑兵师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致兄弟的敬礼。祝你们工作成功并战胜工农的敌人。

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284◇

给“农业报”的祝词

向“农业报”〔六八〕致敬并致良好的愿望！祝它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阐明农业的发展问题方面获得成就。

希望它能成为引导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事业前进的积极工作者—建设者的组织中心。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农业报”创刊号◇285◇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这些信和我最近几个月来收到的其他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许多信是相似的。然而我决定只回答你们，因为你们把问题提得更露骨，从而可以帮助把问题弄明白。固然，你们在自己的信中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不正确的解答，但这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谈。

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一　“民族”概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有了自己的民族理论。依据这个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大家知道，这个理论已经是我们党内所公认的了。◇286◇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认为这个理论不够完备。因此，你们建议给民族的四个特征加上第五个特征，这就是：具有自己的单独的民族国家。你们认为没有这第五个特征，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

我认为你们所提出的、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

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

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

不仅如此，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认定：

（甲）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以后才成为民族，而在这以前他们不是民族；

（乙）挪威人在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

（丙）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不是民族，他们只是在中央拉达和斯柯罗帕茨基统领统治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分离出来以后才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把自己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又不再是民族了。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287◇

显然，使人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的公式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公式。

在实践上——政治上，你们的公式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到替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压迫做辩护，这种压迫的体现者根本不承认那些没有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给了他们压迫这些民族的权利。

更不必说，你们的公式会引导到替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做辩护，这些人硬说各苏维埃民族在把自己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就不再是民族了。

关于“补充”和“修改”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问题就是如此。

剩下的只有一个出路：承认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你们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你们把现有一切民族都搅在一起，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

你们断定说：民族还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在封建主义◇288◇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那末民族怎么能产生和存在呢？和你们的错误论断相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

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

说到这里，应该指出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所讲的那些出色的话。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从氏族联系的发展中推论出民族联系和民族统一的产生；列宁在和他论战的时候说道：

“这样说来，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取材于一些用作小学教材的童话。

按这个启蒙课本的原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这不过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对俄国历史的进◇289◇程也没有任何概念。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方的联合上：地主和教堂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军队（地方诸侯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特殊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中（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一卷第一三七页至第一三八页）

所谓“现代”民族产生的情形就是如此。

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为了“民族统一”而鼓吹民族内部的阶级和平；掠夺异民族的领土来扩大本民族的领土；不信任和仇视异民族；压迫少数民族；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内容。◇290◇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北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在我国无产阶级

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前的俄罗斯、乌克兰、鞑靼、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俄国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

显然，这种民族的命运是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民族势必退出舞台。

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中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六九〕，这里指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

关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情形就是如此。

但是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这就是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这种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推翻以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

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民族内部结成联盟；为了各个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而消灭民族压迫的残余；为了建立各族人民间的友谊和确立国际主义而消灭民族◇291◇主义的残余；在反对侵略和侵略战争的政策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

这些新式民族是由于资本主义被消灭而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通过以社会主义精神根本改造旧式民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现在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俄罗斯民族、乌克

兰民族、白俄罗斯民族、鞑靼民族、巴什基尔民族、乌兹别克民族、哈萨克民族、阿捷尔拜疆民族、格鲁吉亚民族、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不论按阶级成分和精神面貌说来，或者按社会政治的利益和趋向说来，都和旧俄境内各个相当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根本不同。

这就是历史所知道的两种民族类型。

你们不同意把民族的命运（这里是指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你们不同意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也将消灭的论点。可是，如果不把这些民族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究竟又能把它和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呢？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也势必消失，这难道很难理解吗？难道你们认为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在苏维埃制度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能存在和发展吗？这怎么行……

你们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民族的消灭就等于所有民族的消灭，任何民族的消灭。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团结性◇292◇和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资产阶级民族，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的错误就在于：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你们看不见其他的民族，因而你们忽视了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废墟上产生的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整个时代。

问题就在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并不就是所有民族的消灭，而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民族比任何资产阶级民族都团结得多，因为它们没有那些腐蚀资产阶级民族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且它们的全民性远远超过了任何资产阶级民族。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认定不仅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而且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的消失、民族的融合以及统一的共同的语言的形成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你们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即把“民族压迫的消灭”和“民族差别的消灭”混淆起来了，把“民族国家壁垒的消灭”和“民族的消亡”、“民族的融合”混淆起来了。

不能不指出，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在我们这◇293◇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压迫早已消灭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民族差别已经消失了，我国各民族已经消灭了。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国家壁垒如边防、税关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各个民族已经融合起来了，各种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了，这些民族语言已经被我们一切民族的某种共同语言代替了。

你们不满意我在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一九二五年）〔七〇〕，因为在那次演说中我否认了下面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例如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候，各种民族语言将要消亡，各个民族将要融合起来，而且将要出现一种共同语言来代替各种民族语言。

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一个著名论点是矛盾的，这个论点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

其次，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另一个论点也是矛盾的，这个论点是：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将开始消亡；在这个胜利以后，各种民族语言将开始被一种共同语言所代替。

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严重的错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搅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不应该忘记：这些各不相同◇294◇的现象反映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不仅在时间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互不相同的。

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当然不是被某种“天生的”民族恶感推动着和支持着的，而是被帝国主义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这些民族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推动着和支持着的。毫无疑问，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这种野心和这种恐惧也将存在，——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也将存在。能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消灭就是大多数国家内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消灭呢？显然不能。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虽然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帝国主义，但是仍然没有创造而且不能创造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所必需的条件。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消灭**一切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消灭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视，把各个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联合起来，从而创造为一切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实际条件。

这就是这两个时期的根本区别。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混为一谈，搅在一起，

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请看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吧。在这个演说中说：◇295◇

“人们（例如考茨基）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理论。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遗忘了的民族和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七一〕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是反对考茨基这一类的人的，因为他（即考茨基）对于民族问题始终是门外汉，他不了解民族发展的诀窍，不理解民族稳定性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远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前，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民族融合就已经是可能的，他奴颜婢膝地赞扬日耳曼人在捷克的同化“工作”，轻率地断定捷克人差不多已被日耳曼化了，捷克人作为一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其次，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在演说中所指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而仅仅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并且我当时认定（现在继续认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没有提供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需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而现在被苏维埃革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

最后，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忽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因而不了解斯◇296◇大林演说的含义，结果就陷入了你们自己的错误的迷宫。

现在来看一看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各个民族

消亡和融合的几个论点。

请看从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知为什么在你们的信中没有全部引证出来：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必然的融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五页至第一三六页）

请看列宁的另一个论点，这也是你们没有全部引证出来的。

“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297◇

应当指出，这段引文是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摘引来的，这本书是在一九二〇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以后**出版的。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

其次，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认为把民族差别消亡的过程

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时期的企图是“可笑的幻想”。

此外，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发表的演说中否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可能性是绝对正确的，而你们坚持一种和斯大林的论点完全相反的意见是绝对错误的。

最后，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把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混淆起来是不了解列宁，歪曲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路线，因此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背离列宁主义的道路。

如果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可以用所谓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那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298◇

你们当然知道，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所有同化主义者中最残酷的一种）蹂躏和摧残巴尔干各民族达几百年，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国的俄罗斯化主义者和普鲁士德国的日耳曼化主义者，其残酷几乎不亚于土耳其同化主义者，他们摧残和蹂躏波兰民族有一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摧残、蹂躏和戕害阿尔明尼亚民族和格鲁吉亚民族达几百年一样，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

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以便从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民族发展的观点来正确地预见事变可能的进程。

如果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相反地，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

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299◇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你们的错误之一在于：你们不是把民族问题看做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从属于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看做某种独

立自在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不变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质的东西。因此，你们看不见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具有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300◇

这一点在逻辑上也就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你们如此轻率地把革命发展的各不相同的时期混为一谈，搅在一起，不懂得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会引起民族问题的性质和任务的相应的变化，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要随之而改变，因此，不能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和革命发展某一时期相联系的政策同这个时期硬行分开，而随便搬到另一个时期。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出发点始终是下面这个原理：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各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因此，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就随之而改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历史在俄国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俄国民主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党认为：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封建残余并实现国家完全民主化，就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

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名论文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

“……我肯定地说：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一般地还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做例子。”（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二十三页）◇301◇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在这个小册子中也写道：

“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七二〕

在后一个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个帝国主义联盟间的长期战争摧毁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威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达到了极点，殖民地和附属国也随同“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加入了解放运动，民族问题转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开始变为实际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成了当前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前一时期的政策，他们认为必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党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帝国主义军队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境内驱逐出去并保证殖民地和附属国有分离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消除民族仇视和民族主义并巩固各族人民间的国际联系，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在这个基础上树立各族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下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最好办法。

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如此。◇302◇

这个时期还远没有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它才刚刚开始，可是毫无疑问，它将表现出自己的决定作用……

应当单独提出我国革命发展的目前时期和党的当前政策的问题。

应该指出：我国暂时还是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的**国家。而且它实际上已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一**

切国家内的胜利，暂时还是很远的事。

其次，应该指出：我们既然推翻了早已摈弃自己的旧民主主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就附带地解决了“国家完全民主化”的任务，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和实现了我国各民族的权利平等。

大家知道，这些办法是消灭民族主义和民族仇视、确立各族人民互相信任的最好的方法。

最后，应该指出：民族压迫的消灭已经导致我国先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它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我国各族人民友好的民族间的联系的巩固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合作的建立。

必须记住：这些复兴起来的民族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旧式民族的废墟上产生的、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

因此，党认为必须帮助我国各个已经复兴的民族完全站立起来，振兴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剧院和其他文化机关，使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国家的、经济的机关◇303◇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培养本民族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制裁所有那些企图阻挠党的这种政策的分子（固然人数不多）。

这就是说，党支持而且将来也要支持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党将鼓励巩固我国各个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的事业，党将保护和捍卫这个事业而反对所有一切反列宁主义的分子。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不赞成我们党的这种政策。第一、这是因为你们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和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混淆起来，不懂得我们新式苏维埃民族的民族文化按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第二、这是因为——请原谅我不客气——你们在列宁主义问题方面很蹩脚，并且对民族问题了解很差。

请你们至少注意一下下面这个粗浅的道理。我们都在讲我国有进

行文化革命的必要。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不是夸夸其谈，那末在这方面至少必须实现第一个步骤：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显然，不这样做，我国任何的文化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所谓文化革命了。而且不这样做，我国就既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真正高涨，也不会有可靠的国防。

但是，既然我国文盲的比例还很高，我国许多民族中文盲竟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那末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304◇

为此必须在全国建立稠密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网，供给精通本民族语言的教师干部。

为此必须使所有的管理机关，从党的和工会的机关到国家的和经济的机关都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

为此必须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报刊、剧院、电影院和其他文化机关。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

既然如此，我认为就不怎么难以了解：列宁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除了我国现行政策以外，不能实行任何别的政策，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继续做列宁主义者的话。

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就在这里结束。

我想，我已经答复了你们所有的问题和疑问。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305◇

注　释

〔一〕 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六日巡视西伯利亚的时候访问了边区的主要产粮区。约·维·斯大林参加了联共（布）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联共（布）各州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以及巴尔纳乌尔、比依斯克、鲁勃佐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等州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这些会议都有苏维埃代表和收购机关代表参加。由于约·维·斯大林所实行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措施，西伯利亚的党组织保证了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正文第三页）

〔二〕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听取了代表大会处理反对派问题委员会的报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约·维·斯大林于十二月三日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十二月七日做了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十二月十二日，代表大会把约·维·斯大林选入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代表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巩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继续用同样速度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并加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做出了关于争取农业集体化的方法的指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农业集体化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代表大会在旨在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关于反对派的决议中确定，党与反对派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并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代表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关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

出党的决定，并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所有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党。（关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四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三页至第三七一页）——（正文第十页）

〔三〕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页。——（正文第十页）

〔四〕 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迫使党进行的争论。一九二七年十月，即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关于此次争论，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七八页。——（正文第十三页）

〔五〕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六二页。——（正文第十五页）

〔六〕 有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十一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本年度粮食收购工作和组织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粮食收购运动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消除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的缺点的实际措施的报告以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九二八年工作计划。约·维·斯大林在四月十日的全会会议上就政治局委员会的报告发表意见，并被选入关于沙赫特事件和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的决议最后修订委员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以及其他领导工作人员每年出差到各地的特别决定，以便加紧克服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并在实践中改善中央机关的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七二页至第三九〇页）——（正文第二十五页）

〔七〕 指顿巴斯的沙赫特区及其他区内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该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初被破获。关于沙赫特事件，见本卷第三十一页和第四十五页至第五十四页，并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正文第二十五页）

〔八〕 “工农检查院专页”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真理报”上定期刊出。“工农检查院专页”的目的是吸引广大劳

动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正文第二十九页）

〔九〕 “青年团真理报”（日刊）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创刊。——（正文第二十九页）

〔一〇〕 弗·伊·列宁“关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纲要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页至第二二四页）。——（正文第三十三页）

〔一一〕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规定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是弗·伊·列宁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七五页至第一九六页。关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六页至第三一一页）。——（正文第四十一页）

〔一二〕 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三十三号“关于组织工业企业管理”的指令及其附件“关于金属工业和电器工业中技术厂长的权利和义务总则”。——（正文第四十九页）

〔一三〕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和前途以及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因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而产生的青年的劳动和教育问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童工作以及其他问题。五月十六日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说。——（正文第五十六页）

〔一四〕 指联共（布）中央给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各中央局、联共（布）各边区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各省委员会、各州委员会和各县委员会的“争取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的公告。这个公告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维·米·莫洛托夫签署，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一二号上发表。——（正文第六十三页）

〔一五〕 一九一八年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发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附设宣传鼓动短期训练班，一九一九年一月该训练班改名为苏维埃工作学校。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

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改组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庆祝成立十周年。——（正文第六十九页）

〔一六〕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代表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文化，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代表大会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页至第一三七页。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五页至第三六九页）——（正文第七十九页）

〔一七〕 指弗·伊·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〇页至第三九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八一页至第九九四页）。——（正文第八十页）

〔一八〕 指弗·伊·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五四页至第四七二页）。——（正文第八十二页）

〔一九〕 指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真理报”第一二八号上的联共（布）中央“告全体党员，告全体工人书”（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八〇七页至第八〇九页）。——（正文第八十五页）

〔二〇〕 弗·伊·列宁的“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页）。——（正文第八十七页）

〔二一〕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二五页。——（正文第九十页）

〔二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三页，“列宁文选”两

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五五二页。——（正文第九十二页）

〔二三〕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九页。——（正文第九十六页）

〔二四〕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四七页、第四四八页、第四五〇页。——（正文第九十七页）

〔二五〕 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约·维·斯大林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反对派”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卷第二一四页至第二二八页）。——（正文第九十八页）

〔二六〕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引自但丁的“神曲”作为座右铭的一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三一页）。——（正文第一〇〇页）

〔二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五页。——（正文第一〇一页）

〔二八〕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七二页至第三八〇页。——（正文第一〇四页）

〔二九〕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二页。——（正文第一〇五页）

〔三〇〕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页。——（正文第一〇五页）

〔三一〕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四二页。——（正文第一〇六页）

〔三二〕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四七页、第四四八页。——（正文第一一〇页）

〔三三〕 卡·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七页）。——（正文第一一一页）

〔三四〕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〇页。——（正文第一一五页）

〔三五〕 “交易所报”（“交易所新闻”）是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报纸，于一八八〇年在彼得堡创刊。这个报纸的名字已经成为一切无原则的和下贱的行为的通称。一九一七年十月底该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

——（正文第一一九页）

〔三六〕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全会通过了关于下列问题的决议：关于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问题，关于建立新的国务农场（谷物农场）问题，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问题。约·维·斯大林在七月五日、九日和十一日的全会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这些演说都刊载于本卷。（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一页至第四〇四页）——（正文第一二三页）

〔三七〕 一九二八年七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所讨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七月）上成立的纲领起草委员会制定的。约·维·斯大林参加了该委员会并领导了纲领草案的制定工作。草案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所通过，并得到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赞同，这一草案成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所批准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基础。关于纲领草案，见本卷第一七五页至第一七七页。——（正文第一二五页）

〔三八〕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页至第二四六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七二页至第四〇六页。——（正文第一二九页）

〔三九〕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匈牙利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从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就处在艰难的环境中。国家既遭遇严重的财政和粮食危机，又同国内反革命和对苏维埃匈牙利组织经济封锁与军事干涉的协约国进行斗争。参加匈牙利共和国政府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后方和前线进行背叛的破坏活动，同协约国的代理人勾结起来阴谋颠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九年八月，匈牙利革命被国内反革命和干涉者的联合势力镇压下去了。——（正文第一三〇页）

〔四〇〕 指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国深刻的革命危机。由于革命运动的强大，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汉堡发生了工人武装起义。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遭到了失败。——（正文第一三〇页）

〔四一〕 弗·伊·列宁的“土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页至第一四一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七九页至第七八九页）。——（正文第一三二页）

〔四二〕 见“共产国际纲领　草案”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五十二页。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七十五页至第七十六页和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一一页。——（正文第一三五页）

〔四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的总结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讨论了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办法、共产国际纲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苏联的经济状况和联共（布）党内的状况，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代表大会指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代表大会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条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任务。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状况和联共（布）党内状况的决议中，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对于巩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意义，并号召全世界劳动者保卫苏联。约·维·斯大林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纲领委员会以及草拟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的政治委员会。——（正文第一三七页）

〔四四〕 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汇编”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二二五页。——（正文第一四五页）

〔四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九三页。——（正文第一四六页）

〔四六〕 “贫农报”（日刊）是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一四七页）

〔四七〕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二页。——（正文第一五三页）

〔四八〕 “红色报”（日刊）是列宁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的。——（正文第一五七页）

〔四九〕 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附设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地方经济会议。——（正文第一六一页）

〔五〇〕 “伏尔加下游”杂志（月刊）是伏尔加下游区域计划委员会和萨拉托夫省计划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在萨拉托夫创办的，从一九二六年起改由萨

拉托夫省和边区计划委员会出版。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由边区计划委员会在斯大林格勒出版。——（正文第一六六页）

〔五一〕 粮食总社即谷物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和销售农业合作社的全俄中央联合社，于一九二六年成立，一九三一年撤销。——（正文第一六九页）

〔五二〕 公会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内部极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二十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公会社会主义否认国家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把工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联合到民族工业公会联盟中去，把公会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工业管理机关。公会社会主义否认革命的斗争方法，使工人阶级陷于瘫痪状态并完全顺从资产阶级。——（正文第一七七页）

〔五三〕 这封信是约·维·斯大林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苏联举行的“国防周”写的。——（正文第一八九页）

〔五四〕 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目的在于组织女工和农妇的政治教育工作，吸引她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一千一百四十七名代表。十一月十九日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关于代表大会及其意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六〇页至第一六二页和“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四九页至第三五一页）——（正文第二一一页）

〔五五〕 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全会审查了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并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问题，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讨论了联共（布）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提高农业的措施的报告。约·维·斯大林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会会议上就议程的第一个问题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十一月二十日，约·维·斯大林被全会选入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决议修订委员会。（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〇五页至第四二八页）——（正文第二一二页）

〔五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斯摩棱斯克“线轴”缝纫工厂举行了为更好地进行苏维埃选举而组织全省竞赛的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工人通

过了保证全体工人和家属都参加苏维埃选举以及组织选举前挑战大会的决议，并向雅尔采沃纺织工厂和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加路格等省其他工厂的工人发出了挑战书。工人写信给约·维·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宁，说他们已经把约·维·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宁选为选举前挑战大会的名誉主席，并请求对组织更好地进行苏维埃选举的竞赛问题给予指示。——（正文第二五〇页）

〔五七〕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六册。提纲、决议、决定、宣言汇编”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五十七页。——（正文第二五五页）

〔五八〕 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国际工会运动的总结和当前的任务；工会运动中的青年工人问题；组织问题；对法西斯主义和黄色工会斗争的方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工会运动等。代表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稳定日趋动摇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正在增长和尖锐化，工会国际的全部活动都应当是为了争取群众并领导他们对资本进行斗争。代表大会指出，工会国际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改良主义的工会，不顾改良主义首领的反抗而去领导罢工。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革命的工会应当进行把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的经常工作。——（正文第二五九页）

〔五九〕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六册。提纲、决议、决定、宣言汇编”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八十页。——（正文第二六一页）

〔六〇〕 指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经专门委员会讨论后提交大会审查的这个决议的提纲是弗·伊·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一页至第一八七页）。——（正文第二六二页）

〔六一〕 指“关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该决议在约·维·斯大林领导下由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起草委员会拟定，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全会会议上通过。全会在决议的结论部分指出了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性并规定了对联共（布）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危险进行斗争的方法（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一九页至第四二〇页）。——（正文第二六六页）

〔六二〕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反对派”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

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六八页至第三七〇页。——（正文第二七〇页）

〔六三〕 “舵报”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二七二页）

〔六四〕 弗·伊·列宁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八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二页）。——（正文第二七二页）

〔六五〕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一六八页。——（正文第二七七页）

〔六六〕 “郭洛万诺夫主义”表现于某一部分戏剧工作者企图把旧的资产阶级的习气和工作方法搬到苏维埃剧院里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大剧院以乐队指挥郭洛万诺夫为首的一批演员反对革新，反对创造适合广大劳动者阶层增长了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新剧目。这一批人和剧院全体工作人员对立起来，并拒绝提拔青年演员。党所采取的改革苏维埃剧院工作的措施保证克服了“郭洛万诺夫主义”。——（正文第二八〇页）

〔六七〕 约·维·斯大林致普罗斯库罗夫城红色骑兵师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贺电，是为庆祝红军建军十一周年而发出的。——（正文第二八四页）

〔六八〕 “农业报”（日刊）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后来改为“社会主义农业报”。——（正文第二八五页）

〔六九〕 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〇〇页、第三〇七页。——（正文第二九一页）

〔七〇〕 约·维·斯大林的“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页至第一五二页）。——（正文第二九四页）

〔七一〕 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页至第一三九页。——（正文第二九六页）

〔七二〕 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〇七页至第三〇八页。——（正文第三〇二页）

年　表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二八年

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和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委员会书记谢·米·基洛夫谈话。

一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特维尔棉纺织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谈生产合理化问题。

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与布良斯克省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代表谈工业工作和集体合同问题。

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与农业合作总社、粮食总社、粮食公司和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谈话。

一月十五日

因西伯利亚边区的粮食收购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约·维·斯大林赴西伯利亚。

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市出席联共（布）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常务局会议，这个会议有收购机关的代表参加。

一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巴尔纳乌尔市召开有比依斯克州和鲁勃佐夫斯克州党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共（布）巴尔纳乌尔州组织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完成粮食收购计划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鲁勃佐夫斯克州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就该州粮食收购进程问题发言。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鄂木斯克州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上参加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讨论。

二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从西伯利亚回莫斯科。

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工作。

二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和联共（布）下城省委书记安·亚·日丹诺夫谈话。

二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给联共（布）各级组织的信——“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贺电在“红星报”第四十六号上发表。

二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论红军的三个特点”的演说。

二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红军建军十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的进行队伍。

约·维·斯大林参观了革命俄罗斯艺术家协会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展览会。

三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与“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谈话。

约·维·斯大林和联共（布）鄂木斯克州委员会书记谈粮食收购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与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员会和省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谈区域划分问题。

四月六日至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

工作。

四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消除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的缺点的实际措施的报告发表演说。约·维·斯大林被全会选入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最后修订委员会。

四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的报告。

四月三十日

为庆祝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科斯特罗马市弗·伊·列宁纪念像揭幕，约·维·斯大林向科斯特罗马工人致贺电。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代表团。

约·维·斯大林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局长谈金属工业的改造问题。

五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五月二十六日

为纪念“青年团真理报”创刊三周年，约·维·斯大林向该报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青年团真理报”第一二二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十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二二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约·维·斯大林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雅·米·斯维尔德洛

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谈粮食战线上的情况。

五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联共（布）土拉、斯摩棱斯克、雅罗斯拉夫里和弗拉基米尔等省省委书记。

六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共产主义科学院党建组组员评论斯列普柯夫论自我批评的提纲。

六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列宁和联合中农问题（答斯·同志）”一文。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报”第一五二号上发表。

六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写“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关于弗鲁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

六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在“真理报”第一四六号上发表。

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七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发表“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演说。

七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发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

七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发表“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的演说。

七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为“国防周”写的“给列宁格勒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的信在列宁格勒“红色报”第一六三号上发表。

七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约·维·斯大林参加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联共（布）代表团的会议并被选入代表团核心小组。

七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入共产国际纲领起草委员会。

七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入草拟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的政治委员会。

八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瓦·弗·古比雪夫。

九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九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会议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十月九日

“真理报”第二三五号发表约·维·斯大林写的“悼念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同志”的悼词。

十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葬礼。

十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

十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答什·同志”。

约·维·斯大林接见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十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致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发表。

十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大学生中央常务局的代表。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周年”的祝词在“真理报”第二六七号上发表。

十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

十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被选入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决议修订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斯摩棱斯克省“线轴”工厂和雅尔采沃工厂的工人组织更好地进行苏维埃选举运动的竞赛写给他们的信在“真理报”第二七四号上发表。

十一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联共（布）莫斯科市组织的区委书记。

十一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人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为庆祝别日察市“红色工会国际”工厂的工人进行苏维埃选举运动，约·维·斯大林向他们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发表。

十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工农通讯员代表团谈话。

十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伏龙芝军事学院成立十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八六号上发表。

十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消息报”工作人员谈话。

十二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和科米区域的领导工作人员谈区域划分问题。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答库什特谢夫”。

一九二九年

一月底和二月初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发表“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演说。

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为庆祝“红三角”工厂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约·维·斯大林向该厂男女工人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二十八号上发表。

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和乌克兰作家代表团谈话。

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电贺普罗斯库罗夫城第一红色哥萨克团的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庆祝红军建军十一周年。

三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庆贺“农业报”创刊的祝词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域委员会委员。

三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三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联合举行的祝贺米·伊·加里宁就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一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京1796・635×927耗1/16・21印張・6插頁・227,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1—44,000　定價：(4)3.00元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这些根柢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八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2

АПРЕЛЬ 1929 – ИЮНЬ 1930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九五五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十二卷说明 …… 1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3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4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 9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 15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 21
一、阶级斗争问题 …… 21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 26
三、农民问题 …… 30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 32
五、所谓“贡税”问题 …… 36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 42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 50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 59
九、播种面积问题 …… 61
十、粮食收购问题 …… 63
十一、外汇后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 68
五　党的领导问题 …… 70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 70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 72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 75
六 结论 …… 77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 79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抄致中央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分局
书记柯洛齐洛夫同志） …… 82
祝贺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十周年 …… 85
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志上的题词 …… 86
大转变的一年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 88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 88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 90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 92
结论 …… 99
给特别远东军“警钟报”编辑部 …… 101
必要的修正 …… 102
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 …… 104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05
一 “平衡”论 …… 106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 108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 110
四 城市和乡村 …… 114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 118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 121
七 结论 …… 124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 126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 130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 …… 134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 134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 135
胜利冲昏头脑
（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140
给别泽缅斯基同志的信 …… 146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 147
给工业学院第一期毕业生 …… 166
答姆·拉法伊尔同志（列宁格勒，省工会委员会）
（抄致联共（布）省委员会书记基洛夫同志）…… 167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 …… 169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 …… 17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171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71
一、世界经济危机 …… 172
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 …… 179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 183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 188
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188
二、工业化的成就 …… 190
三、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地位及其增长速度 …… 192
四、农业和谷物问题 …… 198
五、农民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与国营农场和
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速度 …… 202
六、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 …… 210
七、增长中的困难，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 …… 216

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227
九、当前的任务 …… 232
（甲）一般任务 …… 232
（乙）工业方面的任务 …… 237
（丙）农业方面的任务 …… 238
（丁）运输方面的任务 …… 240
三 党 …… 241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问题 …… 244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 …… 251

注释 …… 267
年表（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 277
插图（新增）
一 斯大林和海军官兵在一起 …… 87
二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 139
三 列宁主义万岁！…… 266

第十二卷说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的著作。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社会主义全线总进攻，动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斗争，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在政策上实行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党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把千百万个体农户引上集体农庄的道路，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卷第一次全文发表了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一九二九年）上的演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约·维·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分析了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加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约·维·斯大林指出了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动摇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高潮的因素的增长，论证了加紧反对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必要性。

约·维·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集团的反党派别活动，揭穿了他们的两面派手法，揭穿了他们为组织反党联盟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的幕后谈判。

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危险；揭穿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是列宁主义的敌人，是富农的代理人；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本质。约·维·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中

发展了列宁关于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剥削阶级的原理。约·维·斯大林指出：右倾投降主义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和布哈林在国家理论问题上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相联系的。

约·维·斯大林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一文中，约·维·斯大林确定了社会主义竞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是劳动者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约·维·斯大林把一九二九年评定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工业和农业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一年。约·维·斯大林在谈到集体农庄运动的成绩时指出：基本农民群众——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由于个体农民经济转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内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根源已在消灭。

约·维·斯大林依据弗·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制定了农业集体化理论，指出了实现这个理论的具体道路。

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约·维·斯大林揭穿了资产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指出了农业中的大规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约·维·斯大林确定了集体农庄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论证了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向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转变。

在“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其他著作中，约·维·斯大林揭穿了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路线的“左”倾歪曲行为，规定了纠正这些歪曲行为的办法，指出了农业劳动组合是现阶段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环节。

本卷刊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

报告”。约·维·斯大林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的尖锐化。约·维·斯大林在说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确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约·维·斯大林指出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日益高涨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确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实质和任务。约·维·斯大林在动员党去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各种倾向时指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

本卷第一次发表了约·维·斯大林给费里克斯·康、阿·马·高尔基、别泽缅斯基同志和拉法伊尔同志的信。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

一九三〇年六月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①]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说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乌格兰诺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说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间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都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3◇[②]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党尊敬他。

————————————

① 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编者注

②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 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其次，决不能把私人友谊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常言道，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友谊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到布哈林反对派某些同志的演说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暗示和隐约的责备。看来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双关语来掩盖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政治基础。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托姆斯基的演说。他的演说是企图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问题的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的演说。但是，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发表的演说中说，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如果说我们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4◇那末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线的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这样说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们组织派别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在那里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则性的分歧，说必须彻底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

结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末，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

难道能够设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二月九日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宣言中厚颜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诬蔑，责备党（甲）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乙）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丙）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5◇

也许这些宣言已经不复存在于世了？也许这些宣言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也许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经同意收回这些无疑是错误的和反党的宣言了？那就让他们公开老实地告诉我们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这样做。不但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销他们的宣言，他们声称将继续坚持他们在这些宣言中所陈述的观点。

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

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无稽之谈。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斗争吗？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谬的话呢？

不是的，同志们，李可夫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这话是不大对头的。不管怎样，如果看看刚才所说的布哈林集团在宣言和行动方面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6◇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贯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屡次决议，在党内实行怠工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如果我们确实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那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竭力实行的这种瓦解性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实行辞职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变党的政策，拒绝担任委托给他们的职务。大家知道，当时他们实行辞职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我们党中央实行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的辞职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根据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主张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另一条路线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布哈林反对派一方面宣称总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实行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丝毫不合逻辑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们的路线是两条，那末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政治局中的三人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认为在政治局通过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7◇一部分同志在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竟放弃了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有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反对派的同志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二月七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给布哈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自己所陷入的绝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下面就是大多数中央委员在今年**二月七日**提出的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承认，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一月三十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8◇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演说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

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有人谈到党的统一，谈到政治局内的集体工作。但是，谁想达到真正的统一并重视工作的集体性，谁就应当接受这个和解方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为什么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末天地间既不会有二月九日的三人团宣言，也不会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中央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同志们，如果看看上面所说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说的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见实际上我们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9◇

李可夫在他的演说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这是说谎。他想以此掩饰他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以便暗中破坏党的路线。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于抹杀意见分歧，掩盖党内的真实情况，掩饰自己的立场，使党不能把问题完全弄清楚。

机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用路线一致的空谈做掩护，而在实际上执行它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李可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中就是采取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不妨听一听列宁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一般机会主义者所做的评定。这个评定对我们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

因为它对李可夫完全适用。

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现代一切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黄颔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改、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七三页）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10◇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和什么有关的呢？

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

问题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带有偶然性。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11◇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

布哈林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请你们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们国内发生新的阶级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说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和红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颤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事件〔二〕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经济工作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12◇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

沙赫特事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表明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正在组织而且以后还会组织暗害活动，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党组织忽略了我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并加强我们组织的阶级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口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就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和镇压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工作向前推进。暗害活动不仅在煤矿区，而且在金属生产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在金铂工业等等方面，都曾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这是事实。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

其次，由于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由于富农进行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我们着重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富农进攻、对富农和富裕分子使用强迫手段收购粮食的问题。

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什么呢？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作斗争。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提出了检查和改善我们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一般◇13◇收购机关的口号。

再其次，由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新任务，就产生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等等口号。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彻底活跃这些组织，并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因素。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的口号。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以为不砥砺党本身就可以巩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就可以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恶习，那就可笑了。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分子不仅生活在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而且生活在党组织里。既然党是所有这些组织的领导力量，那末很明显，清党是彻底活跃和改善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就提出了清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一条叫做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须首先提高和加强经济、苏维埃、工会、党以及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14◇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经继续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

么富农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还比较软弱，没有可能认真安排自己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经过连年丰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已经积蓄了必要的资本，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

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

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15◇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组织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

我们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没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坚牢，那就更可笑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着，动摇着。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军备的扩充，美英之间对抗的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

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

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16◇

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准备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并动员力量去解决这些任务。所以它可以有充分准备地应付事变。所以它不怕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因为它对克服困难已经有了准备。

布哈林集团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些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总是表现张皇失措，他们总是准备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却，放弃阵地。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大笑）

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同在困难面前张皇退却的第二种渔夫的方针和行动一模一样，这还用◇17◇得着证明吗？

我们说，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党，加紧同掩护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加紧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作斗争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布哈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加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要实现这些任务，非根本改变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托姆斯基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国民经济的改造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这些机关里的腐化分子、异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李可夫进行“恶意攻击”。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脐以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新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18◇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事变的尾巴，在困难面前低头。

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说过，布哈林看不见和不了解新的革命高潮的日益增长的条件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共产党、制止调和态度并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新任务。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完全证实了这种情况。

这方面的意见分歧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呢？

是从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三〕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开始的。通常，提纲都是预先经过联共（布）代表团审查的。可是这一次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于是由布哈林签署的提纲在送交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但是提纲中的许多条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大约二十处的修正。

这种情况使布哈林的处境有些尴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既然提纲不能令人满意，联共（布）代表团能够不提出修正吗？结果弄成了这样：联共（布）代表团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新提纲，各国代表团就把它◇19◇和布哈林签署的原来的提纲对立起来。很明显，如果布哈林不急于把自己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处境了。

我想指出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所提出的四个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照布哈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很明显，对所谓第三个时期，即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做这样的估计是联共（布）代表团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为保留对第三个时期的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得到藉口，说我们采取了所谓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观点，即希

法亭的观点，即我们共产党人所不能采取的观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提出了修正，从修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

同志们，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具有决定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着还是在巩固着，——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联共（布）代表团所提出而后来为代表大会所采纳的修正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以第二种前途即以新的革命高潮◇20◇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前途为依据的明确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在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当我们向右倾宣战的时候，右倾分子总是装扮成调和分子，使党陷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防止右倾分子玩弄这种手腕，必须提出坚决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

因此，联共（布）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21◇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因此，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第六次代表大会采纳了。

我们能不能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呢？显然不能。古时候有人关于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关于布哈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和所谓维托尔夫和台尔曼事件有关的。维托尔夫是汉堡党组织的前任书记，被控盗用党的经费，因此被开除出党。虽然台尔曼同志和维托尔夫的罪行毫无关系，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分子竟利用维托尔夫接近台尔曼同志这一点，把维托尔夫事件变成了台尔曼事件，并开始来推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大概已经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调和分子爱维尔特和黑尔哈特当时竟能暂时把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对台尔曼同志。结果怎样呢？他们解除了台尔曼的领导职务，诬告他营私舞弊，并且没有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应的”决议。

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和调

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不但没有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实际上反而极粗暴地违反了这个指示，和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进◇22◇行斗争，和台尔曼同志进行斗争，以便在德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掩护**右倾并**巩固**调和派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不去掉转船舵，扭转局势，不但不去恢复被违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的效力，叫调和分子守规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人所共知的信里建议**批准**调和分子的篡夺行为，把德国共产党交给调和分子，再一次在报刊上诬蔑台尔曼同志，再一次宣布台尔曼同志有过错。这就叫做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吗？

中央讨论了布哈林的建议并把它否决了。这当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并不是要人们去违反它，而是要人们去执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宣布斗争，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在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调和分子爱维尔特和黑尔哈特却想推翻这个决议，那末布哈林的职责就是叫调和分子守规矩，而不是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让给他们。这是布哈林的过错，因为他“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三阶段是和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问题，和粉碎布兰德勒与塔尔盖麦的派别组织并把这个派别组织的首领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关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是：他们总是避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这是决定德国共产党的命运的问题。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总是阻挠这件事，一贯避不参加有关机关的会议。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既在共产国际面前又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面前都不失为“洁白君子”。为了以◇23◇后可以说：“把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开除出共产党的并不是我们布哈林派，而是他们大多数中央委员。”这就叫

做和右倾危险作斗争！

最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四〕前提出的要求有关的。他当时要求从德国召回奈依曼，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演说中批评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布哈林的要求是对的。布哈林答应提出控诉奈依曼和台尔曼的文件。可是他什么文件也没有提出来。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说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而这篇演说正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评定为机会主义演说的。布哈林把洪别尔－德罗的演说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并把它推荐为控诉台尔曼的材料，想证实他要求召回奈依曼和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是正确的。实际上他却以此证明了他是赞同洪别尔－德罗的，而洪别尔－德罗的立场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做机会主义立场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几点主要的意见分歧。

布哈林认为，我们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消除德国共产党内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传统，把布兰德勒分子和塔尔盖麦分子开除出党，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毁灭”共产国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强调◇24◇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因为党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巩固起来的。

由此可见，这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之间单纯看法上的细微的差别，而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我说过布哈林集团患了盲目症，看不见这些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我说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布哈林反对派的张皇失措，害怕困难，准备向困难低头。

决不能说布哈林派的这些错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反，这些错误是和已经过去的那个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当时的建设是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流地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变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和旧时期即恢复时期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25◇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重新部署我们的力量，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惶不安。

一、阶级斗争问题

布哈林集团的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就是布哈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那段人所共知的话。但是在这里引证这段话时有一些遗漏。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证出来。同志们，为了说明布哈林已经远远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

请听吧：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26◇**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①

有些同志在引证布哈林书中的这段话时不知为什么把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遗漏了。罗季特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利用这一点在这里从座位上叫喊起来，说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这整段引文的要点正是在于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末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富农，而且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大笑）

这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罗季特：布哈林说的是“异类”。

斯大林：布哈林说的不是“异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所以，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异类。布哈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但还是会长入社会主义的。

请看布哈林的理论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说出了多么愚蠢的话。◇27◇

不，同志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季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预定要有的。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季特：问题就在这里。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说来，资本家会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罗季特，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呢？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末，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末，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罗季特：问题就在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预定要有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我看罗季特已经发誓要为布哈林效劳了。但是他的效劳像熊的效劳一样，因为他本来◇28◇想救布哈林，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①]（哈哈

——————————————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

布伦坦诺或悉尼·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是，一个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同时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演说中企图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他硬说列宁所说的和布哈林所说的**一样**：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列宁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诬蔑。

下面是列宁这段话的原文：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29◇三卷第四四四页）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这里只说到我们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认为耐普曼有长入社会

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这样解释列宁的这段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现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容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而列宁的这段话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

在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专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30◇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像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页）

关于消灭阶级，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由此可见，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五〕的理论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值得多谈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说出了——不仅说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错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当这个理论搁着不用的时候，还可以不去理它：在各种各样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蠢话！直到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处置的。可是最近情况变了。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已经开始鼓舞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具有现实的性质了。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搁着不用的了。现在布哈林的这个奇◇31◇怪理论妄图成为我们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忽视这个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粉碎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使我们的党员同志便于和右倾作斗争。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布哈林从他的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分子比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不，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并且，说资本主义分子比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是不对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毁灭了。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

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32◇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企图用各种偶然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苏维埃机关“不中用”，地方同志执行政策“不谨慎”，“缺乏”灵活性，“过火行为”等等。

请看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财并钻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刺杀农村通讯员，——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对的，因为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是暴动。——斯大林注）。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十分明显，**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①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这样说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在机关方面，是在我们的下层组织中用还是不中用，软弱还是强有力。◇33◇

这样说来，例如沙赫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增长，而是由于我们的机关不中用。

这样说来，在沙赫特区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以前，我们的机关是好的，而后来在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机关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毫不中用的了。

这样说来，在去年以前，当粮食收购工作还在自流地进行，我国阶级斗争还没有特别尖锐化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组织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从去年起，当富农的反抗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突然就变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这不是解释，而是嘲弄解释；这不是科学，而是巫师说鬼话。

这种尖锐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如列宁所说的和他们做一次最后决战，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34◇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卫护自己的生存。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

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反抗的加紧和资本家比重的增长混同起来了。这样混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反抗决不是意味着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

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末党的政策应当怎样呢？

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35◇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见解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三、农民问题

布哈林的第三个错误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大家知道，农民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的条件下，农民是由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即由贫农、中农和富农组成的。很明显，我们对这些集团的态度不能是一样的。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社会集团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叫做农村的灰色斑点。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在这里演说时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布哈林在这里说：我国的中农难道像中农吗？◇36◇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工农联盟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不但不

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给这个旨在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反对农村中农民资本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联盟提供了根据。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指明工农联盟只有建立在和农民本身所分泌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这种情况表明了布哈林的毫无疑义的右倾，这种右倾和“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相反，“左”倾除了贫农和富农以外看不见农村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37◇

在和农民联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和中农群众建立**巩固**联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用不着证明，这两种立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协议是可以随便了解的。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这种协议只有当它拥护工人阶级专政而且成为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原则上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工人阶级和农民成立协议的公式，当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工人阶级专政的一切敌人所主张的公式。”（“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八二页）

其次：

列宁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并领导着政权。它领导

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适应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陷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敌人的小资产者的营垒，即陷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营垒。”（“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38◇二卷第三九六页）

这就是列宁对于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即和中农联盟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集团在中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中农的两重性，看不见中农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两重地位。列宁说，“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这就使他和工人阶级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这就使他和富农接近。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列宁说：“农民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他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倾向于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页）

因此，和中农的联盟只有当它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有当它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并促进消灭阶级的时候，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集团忘记了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布哈林的第四个错误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布哈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39◇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

序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记住了。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方面，那就错了。布哈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比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在我国市场上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自由玩弄价格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降低产品成本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以便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方面中的一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会受到“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大的错误。而且这种危险现在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里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贸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适当的。

从右边来的危险，即从那些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从而开辟私人贸易◇40◇完全自由的纪元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要现实得多。毫无疑问，这种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危险现在要现实得多。

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号叫，

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的号叫（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号叫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见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这第二种真正现实的危险，这个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他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议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即提高粮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条件，他想逐渐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

姑且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的劝告。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在秋天，在收购初期提高了粮价。但是由于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各种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不能和投机分子竞争，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一千万普特左右，而我们却要收买几亿普特，所以粮食持有者还是会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这样，到了春天，当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粮价。而在春天提高粮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了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在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供消费，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按照比较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是否就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果即◇41◇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

由此可见，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且没有保证可以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

第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以后还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

第二、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在城市里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粮食零售价格，因而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因为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损害工人利益，我们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是，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因为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就会违反工业化的利益，使资金从城市流入农村。

结果我们就必须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而是在**提高**粮价和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来拉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

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42◇

这会有利于谁呢？

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是买不起昂贵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

这也是结合，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同城乡富有阶层的结合。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么混乱，他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贴，——这一点就从他对城乡之间、国家和农民之间新的商品流转形式问题所表现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中也看得出来。他看见国家成了农民的商品供应者，农民正在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就表示愤怒，大肆反对。他认为这是违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规章，几

乎是破坏新经济政策。试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

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农民已经**变成**国营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亚麻的供应者，而国营工业已经**变成**这些农业部门◇43◇的城市商品、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供应者，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预购的方法在这里是建立城乡之间这些新的商品流转形式的基本方法。难道预购的方法是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抵触的吗？

由于采用这种预购的方法，农民不仅在棉花、甜菜、亚麻方面，而且在粮食方面**正在成为**国家的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转，而按照预先就货物的价格和质量订立的合同（预购合同）进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做商品流转呢？

城乡之间按照预购的方法进行商品流转的这些新的群众性的形式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式是我们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布哈林竟不会了解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谓“贡税”问题

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税”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44◇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一九二九年二月）关

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

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是否需要采取这种“流入”的办法呢？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于是，由于“剪刀差”而形成的这种超额税就成了“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不是贡税，而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这是不是说，征收这种额外税我们就是剥削农民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苏维埃政权的本质不容许国家对农民有任何剥削。我们许多同志在七月全会〔六〕的发言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苏维埃制◇45◇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因为劳动农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是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就排斥了任何剥削农民的可能性。

农民是否担负得起这种额外税呢？是的，担负得起的。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

第二、因为农民有自己的个人经济，个人经济的收入使农民能够缴纳额外税；对于工人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人没有个人经济，虽然

如此，工人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工业化事业。

第三、因为额外税的数量是逐年减少的。

我们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本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本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

关于“剪刀差”问题，关于“流入”问题，关于“超额税”问题，关于在上述文件中被称为“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企图挑剔“贡税”这个字眼，并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是布哈林分子极粗暴地诬蔑我们党的卑鄙企图。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他们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胡说是彻底破产了。◇46◇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认“剪刀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

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

不管怎样，我可以引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许多演说，在那些演说中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是承认“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提法。

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流入”的观点，还坚持在目前

保留“剪刀差”的观点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贡税”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大笑）

斯大林：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这样看来，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

很好。那末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吵嚷呢？因为他们认为“贡税”这个**字眼**或“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不通用的，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字眼**吗？◇47◇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贡税”这个**字眼**。

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例如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同志们，这会使一些没有读过列宁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这是事实。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税”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税”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就得到了公认，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那末，亲爱的同志们，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例如你们就拿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九一八年五月）来读一读下面一段话：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再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

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末以后减少这种‘贡税’，比如说减到一◇48◇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五页）

看来已经清楚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宣称列宁同志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呢？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试试看！

喊声：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用过“贡税”这个概念。

斯大林：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呢？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税”，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

有些爱挑剔的人会以为“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贡税”这个字眼是列宁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经过检查证明，这些爱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你们就拿列宁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确地说是小册子）“论粮食税”（一九二一年四月）来读一读其中的第三二四页（“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四页）。[①]你们可以看到，刚才引证的关于“贡税”那一段话，列宁同志在那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你们再拿列宁同志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四八页）[②]一文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也说到“我们因为在组织全民统计和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方面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一页至第三一二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二页。——译者注

落后而付出的贡税（已不加引号）”。

由此可见，“贡税”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文章中决不是偶然的东西。列宁同志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49◇强调“贡税”的暂时性，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付出的这种“贡税”。

由此可见，在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说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伙的，和列宁同志一伙的。

布哈林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容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贡税”这个字眼。他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季特等等一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那末布哈林的气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与其说像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像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同志，那末应当承认，“贡税”这个字眼在他们中间早已得到了公认，而不大熟悉列宁著作的布哈林在这里是说错了。

但是“贡税”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税”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富农的政策的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号叫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没有看见过责备党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第二个例子。这种反党武器◇50◇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那末是从哪里拿来的呢？是从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当立宪民主党人想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对于“贡税”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人民公敌的尾巴。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最后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

过去我们**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而现在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以外，我们还必须尽力供应那些对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51◇

当问题是**恢复**农业、使农民经营过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于旧的结合形式。可是现在，当问题是**改造**农业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需要帮助农民在新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

其次，这就是说，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我们正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而且已经重新装备了一部分，为工业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给工业供给了新的优良机器和新的优秀干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厂，我们正在改造和扩建旧工厂，我们正在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

城市正在发展，新的工业区正在增多，旧的工业区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长。而农业仍然使用着旧式农具，使用着古老陈旧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现在已经不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旧技术，采用着旧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

例如我国在革命前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户，而现在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农户，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说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说明什么呢？而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

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52◇

要避免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就必须开始认真地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而要重新装备农业，就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必须有步骤地把预购这种群众性的形式应用到农业的一切主要部门中去，必须扩大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并使劳动集体化的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一句话，必须逐步地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开个体贫农中农经济。不，不是这个意思。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帮助还没有联合为集体农庄的个体贫农中农经济。

但这是说，单靠个体农民经济**已经**不够了。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以全力发展集体经济形式和国营

农场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

因此，必须在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和公共的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真正发展农业。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摆脱破产和贫困。◇53◇

最后，这是说，必须全力发展我国工业——我国农业生产在改造方面所赖以滋养的主要泉源，必须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

无须证明，不通过广泛订立预购合同来把基本农民群众引向集体经营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供给农业，就不能发展集体农庄，就不能发展机器拖拉机站。

但是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

结合的新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这样。

布哈林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承认，其目的是要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其实布哈林是反对结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发点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这一改造农业生产的杠杆，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农产品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由此就产生了他对集体农庄的不信任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演说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会前提出的提纲中都表现了这种态度。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收购粮食时所采取的一切对付富农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态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现在还不能了解，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

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54◇的粮食的。

这一点现在已经由我们两年来收购工作的经验证明了。

如果商品粮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不要用非常措施惊扰富农，要从国外输入粮食。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提议从国外输入五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就是说，用大约一亿卢布的外汇输入粮食。如果外汇需要用来输入工业设备，那又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应当尽先从国外输入粮食。这显然是要把输入工业设备的事情放在后面。

这样说来，解决谷物问题和改造农业的基础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而是通过自由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来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在内）。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方案。

党的方案：

一、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二、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三、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四、至于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那末必须承认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的临时的非常措施，作为击破富农反抗和从富农手里取得最大限度余粮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余粮是◇55◇避免输入粮食和保存外汇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五、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便易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六、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能改造农业。

结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布哈林的方案：

一、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和抬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二、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纲，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上的演说）。

三、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受到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赞助。

四、缺粮时就输入约值一亿卢布的粮食。◇56◇

五、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减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

结论：**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们的意见分歧就是这样。

有时人们问：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

有人武断地说，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做迟了两年。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不了解苏联经济情况的“左的”空喊家才会这样说。

在这件事情上做迟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预见到建立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那末我们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还在那时，在十月革命时期，党就已经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并且可以看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过的我们的党纲。那里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但是单靠我们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还不足以实现和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可见这里说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57◇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为了实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的计划，首先必须使党员**群众**在这方面支持党的领导上层。大家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必须说服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相信领导上层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第一。

其次，为此必须在农民中间造成拥护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必须使农民不害怕集体农庄，使他们根据经验相信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优越，而自行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一件需要相当时间的严重事情。这是第二。

再其次，为此必须使国家有一笔为资助集体农庄建设、为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经费。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情是需要几亿几亿卢布的。这是第三。

最后，为此必须使工业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以便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这是第四。

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这样断言。

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

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的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58◇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单靠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具备为立刻**实现**和**贯彻**我们的口号所必需的条件。

比如说在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党员**群众**对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是已经有了准备呢？不，他们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党员群众向结合的新形式方面的严重转变是从粮食收购方面发生第一批严重困难的时候才开始的。由于发生了这些困难，党员群众才感觉到加速建立结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必要性，并在这方面坚决支持自己的中央。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拥护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严重运动呢？不，没有。谁都知道，在两三年以前，农民敌视国营农场，而把集体农庄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康姆尼”。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看做农民经济获得种子、良种牲畜、机器、拖拉机等等帮助的来源。现在只要供给机器和拖拉机，集体农庄事业就会加速前进。

一些相当大的农民阶层中的这种转变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59◇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不容怀疑，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拥护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所表现的那种参加集体农庄的渴望。

现有的办得很好的集体农庄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农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经济即集体经济是可以改进农业的。

现有的设备完善的国营农场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它们帮助农民改善了经济。至于你们都熟知的其他事实，我就不谈了。你们看，这又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其次，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可能大量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这方面拨出几亿卢布呢？不，不能这样断言。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甚至缺少资金去发展最低限度的工业，而没有这些工业就根本不能实现任何工业化，更不用说改造农业了。我们当时能不能从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工业中抽出这些资金，把它交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显然不能。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资金。

最后，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在工业方面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来加紧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等等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当时的任务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业基础**以便**将来**供给农业以机器和拖拉机。当时我们也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建立这个基础的。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发展农业的工业基础。至少这个基础在我国正在加速建立起来。◇60◇

由此可见，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国造成了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条件。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做迟了。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右倾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

有人说：布哈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他那套理论并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在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出现在他身上决不是偶然的。不，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这些错误是从他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从他的理论缺陷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人援引列宁同志评论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让我们来读读这封信吧：

列宁说：“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间，关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我想说几句话。据我看，他们是最出色的人材（在最年轻的人材中间），关于他们必须注意下面一点：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61◇和最大的理论家，他还理应被看做全党所喜爱的人，但是**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因为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①]（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四册第六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十六页）

总之，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经院哲学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的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的理论面目所做的评定。

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需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需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领会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末他就会谦虚一点，这对党是只会有好处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谦虚。糟糕的是他不仅不知道谦虚，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首先是在国家问题上，竟教训起我们的导师列宁来了。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说到这里，让我援引一下一九一六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发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论争论。这对我们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训列宁的那种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国际”杂志〔七〕上登载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Nota Bene的论文，◇62◇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同志的。布哈林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

“……社会民主党是群众的教师，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群众的教师，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批评布哈林的这种观

点说：

“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但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像Nota 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63◇了——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消亡’，逐渐‘泯灭’……”

“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观念的根蒂’一语是十分糊涂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观念’和对国家观念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五页至第一五六页）

看来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滚入了什么样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斯腾：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布哈林虽然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是已经着手阐述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不，现在说的不是这个，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内。

斯腾：列宁当时只谈到利用国家的问题，在对布哈林的批评中丝毫没有谈到“炸毁”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布哈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的态度。◇64◇

你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国家。

布哈林在他登载于“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观点。

布哈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如果真正想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就非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这是第一。

第二、说列宁同志当时在他的批评中没有提到“炸毁”、“取消”一般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对的。从我所摘引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提到了这种理论，而且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和**利用**新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来和它对立。

最后，决不能把“炸毁”和“取消”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打破”、“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取消”一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我在这里不妨引证列宁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底或一九一七年初（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65◇

（甲）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时候，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消亡”和“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乙）照列宁的说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请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对于国家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下面是信中最重要的一段话的全文：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按这几个字的文法意义来说，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的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施行，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来以暴力镇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说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国家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而一到有可能来谈自由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因◇66◇此，我们建议到处都把**国家**（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一字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极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最精彩和最激烈的所谓‘**反**

对国家’的一段话了。

（一）‘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

（二）‘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究竟是什么呢？显然是从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式！）

（三）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 直译为指着鼻子说）得很够了。（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替他们那些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惭愧；但他们认为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当然是正确地认为，这种错误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严重。请注意这点！！）

（四）‘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施行’，国家就会‘自行瓦解（“消散”）（请注意）和消失’……（请和后来的“消亡”对照一下）……

（五）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一种‘暂时机关’……（当然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六）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Niederhaltung一字原意不是镇压，而是制止复辟，制服）无产阶级的敌人。◇67◇

（七）到有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八）‘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建议‘到处’（在纲领中）都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见，不仅机会主义者，而且考茨基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污辱了。

机会主义者对这八项极丰富的思想一项也不懂！！

他们只看见目前的实际需要：利用政治斗争，利用现代国家来训练和教育无产阶级，来‘夺取让步’。这是对的（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但这还只是百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用算术来表示的话。

考茨基在他的宣传作品和一般政论作品中完全抹杀了（或者忘记

了？或者不懂得？）第一、二、五、六、七、八等项和马克思的《Zerbrechen》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和潘涅库克辩论的时候〔见下面第四十五页至第四十七页〕，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主张：（甲）**现在**利用国家；（乙）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利用国家，——这是对实际工作立刻就有最重要意义的两项。（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项！）

我们和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持有下面这些更深刻、‘更恒久的’真理：（子）国家◇68◇是‘暂时’性的；（丑）现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寅）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带有国家性质；（卯）国家和自由是相矛盾的；（辰）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公团’是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纲领用语）；（巳）‘粉碎’（Zerbrechen）官僚军事机器。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正式纲领和考茨基却**间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日常鼓动中不谈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伙的背叛行为。

一九一六年八月曾向布哈林写过：‘让你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再说吧。’可是，他还**没有让**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就又署名《Nota Bene》爬到刊物上发表文章了，结果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但实际上，布哈林是比考茨基接近真理的。”〔八〕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争论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已经是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列宁前进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列宁主义者才会这样想。布哈林原来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反而硬说：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列宁；不是他跟随了或者应当跟随列宁走，相反地，倒是列宁不

得不跟随布哈林走。

同志们，你们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吗？那末，请再往下听吧。一九一六年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着缄默），**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在“法权革命”文集上发表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九〕编辑部（即列宁）所未予发表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69◇论”一文。布哈林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公然声称：在这次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同志们，这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请听这个注释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关于‘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①。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②，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70◇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布哈林就是这样议论列宁的。

你们看，这就是没有学成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的标本！

很可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真的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却另有想法。他认定：从今以后，应当被看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列宁主义者。而现在看来，列宁和我们（他的学生）都是布哈林主义者。同志们，真是有点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这种狂妄自大，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以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释中不过是偶而失言，他说了蠢话，后来就忘了。但这种想法原来是不对的。布哈林说这些话原来是十分认真的。这就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哈林在这个注释中所做的关于列宁**错误**而布哈林**正确**的声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击列宁后过了两年，又在马列茨基所写的布哈林传略中发表了，而布哈林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抗议马列茨基的这种……大胆行为。很明显，布哈林反对列宁的言行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这样说来，对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提倡者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71◇

同志们，布哈林的理论偏见和理论野心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这个人在这里演说时却还有勇气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某种东西腐朽了”，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就是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现在犯了（过去也犯过）许多极严重的错误，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

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演说。布哈林曾经企图给右倾提供理论根据，而李可夫在他的演说中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建议的基础，拿我国农业方面的困难的“可怕景象”来吓唬我们。这并不是说，李可夫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不，他是涉及理论问题的。可是，他涉及理论问题的时候，至少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李可夫在他那个被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的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中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在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可夫在这里演说时仍然为这个观点辩护。◇72◇

苏维埃国家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话对不对呢？不，不对。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的**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五年计划如果忘记了这个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年胡说了。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一般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可是，李可夫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错误。

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或者不愿意了解集体农庄和任何个体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在内）在商品流转方面的差别。李可夫断言，从粮食市场上的商品流转方面看来，从取得粮食方面看来，他认为集体农庄和粮食私有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向集体农庄，向粮食私有者还是向阿根廷的某个粮商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重复人所共知的弗鲁姆金的论调，弗鲁姆金有一个时候曾经断言，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无论向什么人买粮食，向私有者还是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

这是用伪装形式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辩护、辩解和辩白。虽然这种辩护是从商品流◇73◇转的观点上进行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真相，这终究是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做辩护。如果从商品流转方面看来集体经济形式和非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没有差别，那末是否还值得去发展集体农庄，是否还值得给它们优待，是否还值得去执行战胜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一困难任务呢？显然，李可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错误。

这些不过是顺便提一提。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在演说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定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平行的计划，即发展农业的两年计划。他以农业方面的困难作为提出这个平行的两年计划的根据。他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否则农业就会停滞不前。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似乎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农业的两年计划是为了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呢？不，不能。我们对李可夫说过：如果你在农业方面不满意五年计划，如果你认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拨款不够，那就请你直率地说出你的

补充建议，说出你的追加投资额，我们同意把农业方面的这些追加投资额加进五年计划。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没有任何关于农业追加投资的补充建议。试问，究竟为什么需要平行的农业两年计划呢？

其次，我们对他说过：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有年度计划，这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你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那些具体的补充建议加进头两年的年度计划，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建议的话。结◇74◇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不想提出这种具体的追加拨款的计划。

于是我们明白了：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是想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想破坏五年计划的威信。为了安慰“心灵”，为了装饰门面，就需要五年计划；为了行动，为了进行实际工作，就需要两年计划，——这就是李可夫的战略。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是为了以后在五年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拿两年计划来和五年计划对立，改编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迁就两年计划，削减工业拨款。

就是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否决了李可夫关于平行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九、播种面积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吓唬党，断言苏联的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他向党暗示，播种面积的缩小应当归咎于党的政策。他没有公开说我们的农业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演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某种类似退化的现象。

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样说对不对呢？不，不对。李可夫在这里利用的是全国播种面积的平均数。但是使用平均数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区统计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方法。

也许李可夫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

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75◇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的方法而忽视按地区统计的材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真奇怪，李可夫现在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如果按地区观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增加，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减（主要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国有什么地方，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播种面积在**不断**缩小。

的确，在遭受霜灾或旱灾的地区，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播种面积最近有缩小的现象……

喊声：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里赫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七。

斯大林：我指的是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其他没有受到不良气候条件影响的地区，例如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里亚，播种面积是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而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小呢？实际上，不能武断地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苏联的东部或中部是另一种。同志们，这是胡说八道。很明显，气候条件在这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是的，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许应当“归咎于”党的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实行一种能使农村所有的社会集团（包括富农在内）都满意的政策吗？而且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76◇的政策，那末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如果由于我们实行了列宁的旨在限制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富农开始部分地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这又有什么特别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

也许这个政策不正确，——那末请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说。自命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因为富农部分地缩小播种面积而惊惶起来，硬说这是一般播种面积的缩小，忘记了除富农以外还有贫农和中农，他们的播种面积正在扩大，忘记了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播种面积正在加速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

最后，在李可夫的演说中，关于播种面积问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李可夫在这里抱怨说，在某些地方，即在集体农庄最发展的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开始缩小了。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末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增多就必然会引起贫农和中农个人耕地的缩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你想要怎样呢？

现在集体农庄有二百多万公顷土地。到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集体农庄将要有二千五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集体农庄的耕地靠吸收谁的耕地来扩大呢？靠吸收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样呢？否则又怎样把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呢？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耕地将要靠吸收个人耕地增加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真奇怪，有人竟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77◇

一〇、粮食收购问题

关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有人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荒唐话。但是，他们把我们在粮食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忽略过去了。

他们首先忘记了今年我们收获的黑麦和小麦（我说的是总收获量）大约比去年少五亿至六亿普特。这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粮食收购吗？当然不能不影响到。

也许这应当归咎于中央的政策吧？不，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严重歉收（霜灾和旱灾）和北高加索、

中央黑土区、西北区发生部分歉收的缘故。

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二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收购了二千六百万至二千七百万普特。

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在中央黑土区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东部某些地区内，粮食收购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能补足当然也没有补足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区少购的数字。

不应当忘记，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收购的粮食约为全苏联收购的全部粮食的一半。◇78◇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这个情况忽略过去了。

最后，还有第二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李可夫回避了这个情况。但是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区、红军和技术作物区的用粮，我们每年大约需要五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三亿至三亿五千万普特。其余的一亿五千万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

最近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自流的方法从前有成效，而现在已经不够了呢？发生的变化是：近几年来富农和富裕分子成长起来了，几年的丰收对他们发生了作用，他们在经济上巩固了，积蓄了一些资本，因此，他们现在能够在市场上玩

弄手腕，把余粮囤积起来等待高价，而依靠其他农产品来周转。

决不能把粮食看做普通商品。粮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买的。粮食和棉花不同，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它是人人都买而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种商品。富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并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粮食持有者。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79◇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我们从富农手里取得这些余粮，不仅有助于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能打破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阶级的手段。

要取得这些余粮，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有害和危险的自流心理。必须**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必须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组织他们共同支持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按照捐献原则实行的粮食收购方法，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发动农村劳动阶层反对富农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经验表明，这个方法能使我们获得良好的结果。经验表明，这些良好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取得了农村富裕阶层的余粮，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粮食供应；第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动了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在政治上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为我们在农村中的一支强大的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然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粮食收购方法的重要结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结果。

固然，这种方法有时候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于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号叫。但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呢？为什么在城市里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机分子，把他们放逐到土鲁汉斯克边区去，而对于那些进行粮食投机活动、企图扼杀苏维埃

政权并盘剥贫农的富农，就不能用社会强制的方法，按照贫农和中农卖给我们收购机关粮食的价格去收购他们的余粮呢？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呢？◇80◇难道我们党曾经表示过**在原则上**反对对投机分子和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吗？难道我们没有对付投机分子的法律吗？

看来，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张**在原则上**反对对富农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甚至主张恢复贫农委员会政策——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那末对富农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么呢？这和贫农委员会政策比较起来，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

他们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希望说服阶级敌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余粮自愿卖给我们。他们希望那些已经成长起来、进行着投机活动并且有可能依靠其他农产品来玩弄手腕而把余粮藏起来的富农按照我们的收购价格自愿把自己的余粮卖给我们。他们不是疯了吗？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知道什么是阶级，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富农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呢？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口里衔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你们试试说服这样的人吧。◇81◇

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方法的好处其实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动贫农和中农阶层去反对富农，它能够帮助我们击破富农的反抗，强迫他们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机关。

目前在布哈林集团中最时髦的字眼就是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

行为”。这个字眼在他们那里是最畅销的货物，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他们想掩盖自己的路线时，他们通常总是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我们反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触及中农的过火行为。接着他们就叙述这些过火行为的“可怕景象”，宣读“农民”的来信，宣读马尔柯夫一类同志的张皇失措的信，然后就做出结论：必须取消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政策。

请看：**因为**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有过火行为，**所以就必须取消这个正确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藉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当然，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我们大家都反对对富农的打击触及中农。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用布哈林集团所热心使用的那套关于过火行为的废话来取消我们党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我们党的革命政策。不，他们这套把戏◇82◇是骗不了人的。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就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措施来说吧。毫无疑问，这个措施是我们党最近所实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谁不知道，我们实行这个实质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时常常发生许多过火行为，有时是最可恶的过火行为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对派的拥护者是不是知道，他们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做王牌，是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呢？

一一、外汇后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最后，略为谈谈粮食输入和外汇后备问题。我已经说过，李可夫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屡次提出从国外输入粮食的问题。李可夫起初说必须输入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粮食。这大约需要两亿卢布的外汇。后来他提出输入五千万普特，即价值一亿卢布外汇的粮食的问题。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认定对富农施加压力，取得他们握有的大批余粮，要比花费准备用来输入我国工业设备的外汇好些。

现在李可夫改变了战线。现在他硬说资本家要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似乎不想接受。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资本家愿意贷给我们粮食。同时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这◇83◇里有这样的人，或者由于任性，或者由于其他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贷给我们的粮食。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

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已经有半年了。他们找我国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阿根廷的商务代表，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的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他们要达到的与其说是想以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不如说是想探知我们的情况是否真的困难，我们的财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经枯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否稳固，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我国的财政力量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说，我们已经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即使不是几星期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说，这话不对，苏维埃政权很稳固，

它有财政力量和足够的粮食。

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拒绝南森之类的各种慈善家关于以信贷方式输入苏联一百万美元粮食的建议。◇84◇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对巴黎、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关于贷给我们少量粮食的建议给了否定的回答。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

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一切敌人表明，我们稳固地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

这样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国内部发现了取得粮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确，还因为我们既然避免了输入粮食，既然抛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彻底粉碎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的胡说。

前几天，我们和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初步谈判。他们答应给我们五亿贷款，并且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得到苏联的定货，的确认为给我们这笔贷款是必要的。

前几天，英国保守党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苏联的工业定货，也认为确认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必需的，给我们贷款是适当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85◇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似乎因为任性而拒绝接受以想像中的长期信贷方式贷给我们的想像中的粮食。问题在于要识破我们敌人的面目，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表现出为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所必需的刚毅性。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拒绝输入粮食的原因。

由此可见，粮食输入问题并不像李可夫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粮食输入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五 党的领导问题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我们在理论方面以及在我们党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对内政策方面发生意见分歧的一切主要问题。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说我们有**一致的**路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布哈林集团中有想像不到的糊涂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二条路线在党内的势力很小，于是总想用某种方法伪装起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还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条同党的路线**不同的**路线，是一条几乎在我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右**倾的路线。◇86◇

现在来谈谈党的领导问题。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布哈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全会的争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团是新反对派。这个集团的反党活动在于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

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使另一条路线即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说三人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真相。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

这就从他们现在企图利用阿札里亚骚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达到他们的派别目的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所谓阿札里亚“暴动”同喀琅施塔得暴动那样的暴动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我认为，和这种暴动比较起来，所谓阿札里亚“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是否有过托洛茨基分子或季◇87◇诺维也夫分子企图利用这种严重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来反对中央、反对党的事情呢？同志们，应该承认，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反地，在发生这种严重暴动的时期，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反对派集团都曾经帮助党来镇压暴动，不敢利用暴动来反对党。

而现在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做的呢？你们已经有机会看到，他们企图最卑鄙最无耻地利用这个极小的阿札里亚“暴动”来反对党。这不是极端严重的由派别活动造成的头昏眼花和吹毛求疵，又是什么呢？

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不发生骚动事件。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一切阶级，使富人和穷人，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感到满意的政策。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布哈林集团中的这些同志不是疯了吗？

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些和国内外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做到在我们国内没有不满分子，在和敌视我们的国家接壤的某些边疆地区不会偶而发生骚动事件呢？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竭尽全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我国不满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谁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派别性的吹毛求疵有时能把人弄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88◇

李可夫在这里断言，布哈林对我们党中央来说是最“无可责难”和最“忠顺”的党员之一。

请允许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们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话。我们需要事实。李可夫却拿不出事实来。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个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的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幕后谈判，即进行关于组织派别联盟、改变中央政策、更换政治局委员、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反对中央的谈判来说吧。试问，布哈林对自己中央的“忠顺”和“无可责难”究竟在哪里呢？

相反地，这不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完全**违反对自己的中央、对自己的党的忠顺态度吗？如果这叫做对中央的忠顺态度，那末什么叫做对自己的中央的背叛行为呢？

布哈林爱说忠顺，爱说老实，但是为什么他不想看看自己，问问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幕后谈判反对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实地违反了忠顺于自己的中央的起码要求呢？

布哈林在这里说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并且要我们相信，是中央

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违反了集体领导的要求。

当然，我们的全会对一切都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假仁假义的话。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耻的人才敢于在全会上这样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

事实上，既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驾上国家的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请求布哈林集团在这项艰◇89◇难的事业中帮帮忙，而布哈林集团不但不帮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把棍子投到车轮下，以辞职相威胁，并和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对我们党中央，那末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体领导呢？

除了伪君子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党联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愿意而且不会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中实行集体领导呢？

除了瞎子以外，还有谁能看不见，布哈林总是空谈中央的集体领导，指摘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为了以此掩盖自己的叛变立场呢？

应当指出，布哈林违反忠顺于党中央的起码要求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起码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后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跑到我们党的敌人那里，和他们进行幕后谈判，企图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和中央。当时他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些什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一〇〕。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算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　然而最奇怪的是：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和他们串通一气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却继续叫喊（也像现在这样）必须实行集体领导。

此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我们党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并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支持时竟号召全体党员表示不信任党中央、拒绝◇90◇

服从党中央并提出我们党内的分裂问题。这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中央已经通过必须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条件的决议以后的事情。

布哈林的忠顺和集体领导就是这样。

李可夫在这里说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同时他指出他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主张集体工作，这样也就是暗指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反对集体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没有举出一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话。

为了揭穿李可夫的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举出几个事实，几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

第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也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黄金是根据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决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后向美国输出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我们有一个非经中央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被违反了。究竟是谁准许输出黄金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准许输出黄金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和美国一家私营大银行谈判的问题。这家银行的财产在十月革命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它要求赔偿损失。中央已经得悉，我们国家银行的代表正在和这家银行谈判赔偿它的损失的条件。◇91◇

你们知道，赔偿私人损失问题是同我国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谈判是得到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准许进行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后来，中央得悉这个谈判之后，决定停止谈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谁批准这个谈判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谈判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器的问题。事情是这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一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代理人）决定**减少**对中农的农业机器供应，**增加**对农村上层阶层即富农的机器供应。请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反党反苏维埃的决议原文：

“在哈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边区和下伏尔加边区、伏尔加中游区和乌拉尔区，本条指出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销售百分数，对农村上层阶层**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对中农阶层**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请看：在党加紧向富农进攻并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阶级的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却通过了关于**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额和**提高**对农村上层阶层的供应额的决议。

这就叫做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92◇

后来，中央知道了这件怪事之后，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的决议。但是，是谁批准这个反苏维埃决议的呢？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决议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看来，这些例子尽够说明李可夫和他的代理人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了。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布哈林说，被我们党的组织“恶意攻击”（用他的话说）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公民死刑”[①]。他说，党在报刊和会议上批评三

① 一种侮辱性的假死刑。——译者注

个政治局委员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错误，是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们这三个政治局委员却“不得不”默不作声。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一种自由主义化的共产党员的谎话。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末党没有权利揭露这些错误，党应该停止反右倾的斗争，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错误。

布哈林对我们的要求岂不是太多了吗？他是否以为党是为他而存在，不是他为党而存在呢？当全党都动员起来反对右倾并向困难进行坚决攻击的时候，谁强迫他默不作声，静坐不动呢？为什么他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不出来进行坚决斗争去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决定采取这个并不怎么困难的步骤，党是会欢迎他们的，这一点难道有谁◇93◇会怀疑吗？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决定采取这个他们终究必须采取的步骤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摆在党和党的总路线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参加反右倾的斗争，这究竟应该怪谁呢？关于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话，是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想强迫党默不作声并停止反右倾斗争的一种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这不是很明显吗？

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做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

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胜利呢？

既然如此，那末所谓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可怜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不，同志们，布哈林分子用自由主义者的所谓“公民死刑”的废话是吓不倒党的。党要求他们和我们党的全体中央委员站在一个行列中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党要求布哈林集◇94◇团这样做，是为了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击破阶级敌人的反抗并彻底克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

或者布哈林分子执行党的这个要求，那末党就会欢迎他们；或者他们不这样做，那末就让他们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结 论

现在我来做结论。

我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一）首先应该斥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应该斥责这个集团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演说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和党的路线不相容而和右倾的立场完全相符合的。

（二）应该斥责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团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集团不忠顺和进行派别活动的最明显的表现。

（三）应该斥责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实行的辞职政策，认定这是粗暴地违反了党纪的起码要求的。

（四）应该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有不服从中央决议的丝毫企图，中央将不得不取消他们的政治局委员

的资格。◇95◇

（五）应该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

（六）应该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

（七）应该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漏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

（八）应该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一二〕的代表，这个决议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

在我看来，出路就是这样。

有些同志坚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

全文第一次刊印◇96◇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几乎用不着怀疑，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在目前我国建设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各个不同角落的整个整个工厂的竞赛，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竞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的竞赛，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互相呼应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

劳动群众的强大的生产高潮开始了。

甚至最顽固的怀疑论者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

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参加这样一种使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事，表现自己的天才的工作。天才在人民中间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资本主义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只是现在，才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创造了表现进取心、竞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可◇97◇能……”因为“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一三〕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竞赛问题发出专门的告工人和劳动者书就是以列宁的这些论点为根据的。

有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认为竞赛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例行的时髦花样，既然是时髦花样，就一定会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这

些官僚主义的“同志”当然是错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另外一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被竞赛的巨浪吓倒了，他们企图给竞赛制造一个人为的框子，把竞赛加以限制，把竞赛事业“集中”起来，缩小它的规模，从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群众的**主动性**。不用说，官僚主义者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无论如何，党是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企图的。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应该作为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而被丢在道旁。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98◇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后备力量去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在于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活力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场所，发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并把这些后备力量投入天平盘去同我们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不用说，竞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什么类似这种群众热情的东西。

近来我们的报刊上关于竞赛的文章和报道越来越多了。人们说到竞赛的哲学、竞赛的根源、竞赛的可能结果等等。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比较连贯地描写**群众自己如何**进行竞赛，千百万工人群众在实行竞赛和签订合同时的**体验如何**，工人群众怎样把竞赛事业看做**自己的切身事业**。可是，◇99◇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正是竞赛的极重要的一面。

我认为叶·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是根据竞赛的**实际**材料来连贯地叙述竞赛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事情的初次尝试。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它朴素而真实地叙述了构成社会主义竞赛内部动力的那些伟大劳动高潮的深刻过程。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一四号
署名：约·斯大林◇100◇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抄致中央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
分局书记柯洛齐洛夫同志）

康同志！

鲁索娃同志对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群众的竞赛”）的短评收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是这样：

（一）鲁索娃同志的评论给人一种过于片面和偏颇的印象。我可以假定天地间没有纺纱女工巴尔季娜，在查里雅吉耶也没有纱厂。我也可以假定查里雅吉耶工厂“每周打扫一次”。可以认为，米库林娜同志也许因为受了某个讲述者的蒙蔽而写了一些很不确实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好的和不可原谅的。但是难道问题在这里吗？难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是由个别细节而不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吗？当代名作家萧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101◇

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传播了**竞赛的思想，以竞赛的精神**感染了**读者。最重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个别细节上的错误。

（二）也许因为我给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批评家们就对这本小册子抱了过高的、异乎寻常的希望，可是现在他们失望了，因此就决定惩罚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但这是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当然不是科学著作。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是一本描述群众竞赛情形，描述竞赛实际情况的**故事**。仅仅如此而

已。如果我的序言给她这本实质上很平常的小册子造成了过高的评价，那末这不是米库林娜同志的过错。决不能因此以禁止出售这本小册子来惩罚小册子的作者以及它的读者。禁止出售的只能是非苏维埃倾向的作品，反党反无产阶级的作品。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里没有任何反党的和非苏维埃的东西。

（三）鲁索娃同志对于米库林娜同志“蒙蔽斯大林同志”这一点特别愤慨。不能不珍视鲁索娃同志在这件事情上对斯大林同志所表示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

第一、“蒙蔽斯大林同志”并不那么容易。

第二、我一点也不因为给一个在文坛上**无名的**人的一本**平凡的**小册子写序言而后悔，因为我认为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虽然有个别的也许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一定会使工人群众得到很大益处。

第三、我坚决反对只给文坛“要人”、文坛“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册子和书写序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这种推崇本来已经被捧得很高的文坛“要人”的**老爷**习惯，由于这些“要人”的“伟◇102◇大”，我们的年轻的、不出名的、被大家遗忘了的文学力量正在呻吟叫苦。

在我们国家里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竭尽全力要从下面冲上来，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入我们建设事业的总宝库。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坛“名人”的自负、我们某些组织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以及同辈的嫉妒（它还没有转为竞赛）压抑下去。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我所以给一个在文坛上**无名的**作者的一本**平凡的**小册子写序言，就是企图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迈进一步。我今后也只给年轻力量中间普通的、无名的作者的普通的、不引人注意的小册子写序言。也许某些崇拜名位的人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根本就不喜欢崇拜名位的人……

（四）我认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同志们应当把米库林娜同志叫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为了她所犯的错误“揪她的耳朵”。我决不反对为了米库林娜同志的错误在报刊上好好地责骂她一顿。但是，我坚决反对把这个无疑是有才能的作家推下深渊，让她埋没。

至于禁止出售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我认为对这个粗暴的意见应该“不予处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 ◇103◇

祝贺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十周年

值此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十周年之际，谨向在国内战争的战斗中受过考验的、正在胜利地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并积极参加乌克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热烈的祝贺。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于莫斯科

载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五七号 ◇104◇

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志上的题词

到过“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出席了文娱晚会。

一般的印象是：一些杰出的人，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准备献出一切的又勇敢又有文化的同志。

和这样的同志相处是愉快的。在这样的战士的队伍里和敌人斗争是愉快的。有这样的同志是能够战胜整个剥削者和压迫者世界的。

“红色乌克兰号”的朋友们，祝你们成功！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红色黑海水兵报”（塞瓦斯托坡里）第二六〇号◇105◇

斯大林和海军官兵在一起

大转变的一年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在于它已经使我们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建（改造）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取得了许多决定性的**胜利**。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

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过：

“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页）

过去一年的总结毫无疑问地说明，党在自己的工作中胜利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极重要的指示。

*　　*　　*　　◇106◇

如果拿过去一年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总结来看，那末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进攻的**胜利**，我们过去一年的**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几乎用不着怀疑，最近一年来我国建设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发挥了**创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这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一个主要**成就**。

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的发挥和劳动高潮的掀起是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促成的：

（甲）通过**自我批评**反对束缚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乙）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旷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分子；

（丙）通过实行**不断生产制**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结果，我们在劳动战线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们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呈现出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在劳动中的互相呼应。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107◇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四页）

根据这一点，列宁认为：

“我们必须充满劳动热情、劳动意志和顽强精神，因为现在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地挽救工人和农民，挽救国民经济。”（“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七四页）

这就是列宁在党面前提出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

道路上的困难。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这样。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党的第二个成就是和党的第一个成就密切地联系着的。党的第二个成就就是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基本上顺利解决了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加快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并创造了把我国变为**金属**国家的前提。◇108◇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二个主要**成就**。

轻工业问题是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比较困难、更加重要的是重工业问题。

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

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就不能实行任何工业化。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

世界各国的资本家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造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

过去一年的总结在这方面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过去一年的总结的意义在于它彻底粉碎了资本家老爷们的如意算盘。

过去的一年表明，尽管苏联受到公开的和隐蔽的财政封锁，可是我们并没有去受资本家盘剥，而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解决了资金积累问题，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这一点现在连工人阶级的死敌也不能否认了。

第一、既然去年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十六亿多卢布，其中约有十三亿卢布投入了重工业，而今年◇109◇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三十四亿多卢布，其中有二十五亿多卢布将投入重工业；第二、既然去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业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们正在加快步伐沿着发展我国重工业的路线前进，超过旧速度，把我们“历来的”落后性扔在后面，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既然如此，那末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在过去一年已经超额完成，被资产阶级论客看做“无法实现的梦想”的、使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胆颤心惊的五年计划**最高**方案实际上变成了五年计划**最低**方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列宁说：“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

请看，列宁是多么尖锐地提出资金积累问题和党在建设重工业方面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110◇

这当然不是说工业不会再有严重的困难了。建成重工业的任务不仅会遇到资金积累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就是：

（甲）**吸收**成千上万的拥护苏维埃的技师和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的问题；

（乙）**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家的问题。

如果说资金积累问题可以认为基本上已经解决了，那末干部问题却还待解决。而在目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干部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列宁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页至第二二四页）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文化力量”问题，是一般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和工业管理的干部问题。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尽管在资金积累方面取得了对重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极大成就，但是只要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建成重工业的问题就不能认为已经完全解决了。

因此，党的任务是：切实地解决干部问题，无论如何要攻下这个堡垒。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二个成就就是这样。◇111◇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最后，谈谈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三个成就，这个成就是和前两个成就有机地联系着的。这里指的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

这里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

有利于一小撮富翁资本家，而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破产和忍受贫困的痛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则排挤富翁资本家，按新方式重新武装中农和贫农，用新工具，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来武装中农和贫农，使他们摆脱贫困和富农的盘剥，走上协作的集体耕种制的广阔道路。

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农民中间组织了这种**根本转变**，并引导了广大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跟着我们前进，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难于置信的困难，尽管各色各样的黑暗势力，从富农和神甫到庸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进行了疯狂的反抗。

请看几个数字。◇112◇

一九二八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是六百多万公担（三千六百多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三百五十万公担（两千多万普特）。

一九二九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八百万公担（约四千七百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一千三百万公担（约七千八百万普特）。

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照控制数字规定大概达到三百二十八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一千八百万公担（约一亿一千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必将达到一千五百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四千九百万公担左右（约三亿普特）。

换句话说，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谷物产量将要达到四亿多普特，即占**整个**农业商品谷物产量（农村外的流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

很明显，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

着伟大的前途，它将显示出发展的奇迹。

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至少应当指出以下几点。◇113◇

首先，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执行了列宁的教育群众的政策，通过发展合作社运动逐步地引导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农庄。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从两方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超过运动而用命令手段发展集体农庄的人（“左的”清谈家），另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把党拉向后退而做运动尾巴的人（右倾糊涂虫）。党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政策，就不能把集体农庄运动变为农民自己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公共耕种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公共耕种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页）

如果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那末这是因为党切实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策略指示。

其次，在农业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对新农具、对新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保存旧式耕作方法就没有出路，并且估计到这一切之后及时地给了农民许多帮助：成立农具租赁站、拖拉机队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公共耕种制，建◇114◇立集体农庄，用国营农场的力量从各方面帮助农民经济。

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权，苏维埃政权，

它用事实证明了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给予劳动农民群众以系统的长期的**生产上的**帮助。

历来苦于缺乏农具的劳动农民群众不会不热烈欢迎这种帮助，走上集体农庄运动的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从今以后，工人的旧口号“面向农村”大概要用集体农民的新口号“面向城市”来补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最后，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我国先进工人担任了这项工作。我指的是成十成百地散布在我国各主要地区的工人工作队。必须承认，在一切现有的和可能有的集体农庄运动宣传员中，工人宣传员对于农民群众是最好的宣传员。工人已经说服了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大经济比个体小经济优越，并且现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是显示出这种优越性的明显的例证，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成就在我看来是近几年来一切成就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

“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否认建立面积四万到五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是可能的和适当的那种意见，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实践推翻了“科学”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不仅实践应当向“科◇115◇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差别。

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担负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这就不能不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

润，或者至少是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资本家就没有兴趣去建立谷物农场。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谷物农场无论在信贷上或税收上都没有特别的优待，而在旨在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待。

最可敬的“科学”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的断言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他们断定说：◇116◇

（甲）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

（乙）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

（丙）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合作社；

（丁）发展集体农庄和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会使国家没有粮食。

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陈词滥调都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

第一、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乡、整区加入的。

第二、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农结合，给了工农结合以新的、生产的基础。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基本农民群众还有什么严重的不满，那就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农庄政策，而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供应农民机器和拖拉机方面赶不上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

第三、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的争论，是只配爱恒瓦里德和斯列普柯夫一类年轻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的烦琐争论。

很明显，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就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117◇

第四、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现在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中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

托洛茨基主义的所谓工人阶级没有本领领导基本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孟什维克“观点”正在破产，正在被粉碎。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中农转到集体农庄方面来了。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工业和农业的五年计划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年计划，那些不相信我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是没有权利庆贺我们的五年计划的。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做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118◇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破灭。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资本主义分子拼命企图发动旧世界一切力量来反对举行进攻的社会主义，因而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资产阶级是不愿意“长入”社会主义的。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的走狗，形形色色的司徒卢威分子和盖森分子、米留可夫分子和克伦斯基分子、唐恩分子和阿布拉莫维奇分子最近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出了恶毒的狂吠。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消失，这可不是开玩笑。

阶级敌人的这种发狂的憎恨和资产阶级走狗的这种恶毒的狂吠，除了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困难的战线上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列宁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农民引上集体农庄建设轨道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列宁说：“只有我们真正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119◇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

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末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给予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〇页）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在技术上重新武装中农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中农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也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到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上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五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幻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

这就是中农转到“康姆尼”方面来的原因。

党的第三个成就就是这样。

党在过去一年的几个主要成就就是这样。

结　论◇120◇

我们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把我们历来的“俄罗西的”落后性扔在后面。

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

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

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九号
署名：约·斯大林◇121◇

给特别远东军“警钟报”〔一四〕编辑部

谨向捍卫十月革命的权利和利益、防止中国地主和资本家侵犯的特别远东军的战士和指挥员致兄弟的敬礼！

要机警地注视中国反革命分子的每一行动，要以歼灭性的打击回答打击，从而帮助我们的中国弟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打碎束缚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

要记住，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苏联千百万劳动者都怀着爱戴的心情想念着你们，和你们一起庆祝伟大的国庆，和你们一起为特别远东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十月革命万岁！

特别远东军万岁！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九号◇122◇

必要的修正

十二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二九六号）登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能不能没有混乱思想？**”（“党的建设”栏）这篇文章批评了“青年团真理报”〔一五〕上的“**列宁主义概论**”一文中论述革命突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最有利条件问题的一个原理。

作者从被批评的文章中引了下面一句话：“列宁主义教导说，革命首先在成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一环**的地方开始。”接着，作者在这句话和引自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的下面一句话之间划上**等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然后，作者又引证列宁对布哈林书中上面这句话的批评意见，于是得出结论说，“青年团真理报”上的“**列宁主义概论**”一文犯了类似布哈林所犯的错误。

在我看来，“**能不能没有混乱思想？**”一文的作者犯了错误。无论如何不能在“帝国主义链条首先在其最薄弱的地方被冲破”的论点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链条首先在国民经济体系最薄弱的地方被冲破”的论点之间划上**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前者说的是**应当被冲破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即帝国主义力量的薄弱；而后者，布哈林所说的是**必须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薄弱，即**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薄弱。这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不仅如此，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论点。◇123◇

照布哈林说来，帝国主义战线首先在国民经济体系最薄弱的地方被冲破。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对的，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首先在中非洲某个地方开始，而不是在俄国开始。“**列宁主义概论**”一文所谈的是一种和布哈林的论点**完全相反的**论点，就是说，帝国主义

链条首先在其（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冲破。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帝国主义链条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被冲破，是因为它（链条）当时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最薄弱**。不然它就不会被冲破。不然孟什维克反对列宁主义就会是正确的了。

帝国主义链条在一个国家里表现薄弱是决定于什么呢？决定于这个国家有一定限度的工业发展和文化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性。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能够跟着无产阶级坚决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严重的同盟者（例如农民）。总之，决定于使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必然陷于孤立和必然被推翻的几个条件的配合。

“能不能没有混乱思想？”一文的作者显然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同起来了。

的确，能不能没有混乱思想？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八号
署名：约·斯·◇124◇

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

我把你们的祝贺看做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做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的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致

深切的敬意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三〇二号◇125◇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马克思主义者
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一六〕上的演说）

同志们！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普遍注意的主要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的蓬勃发展。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特点是：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只有个别贫农集团加入集体农庄，现在中农也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劳动农民个别集团和个别阶层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126◇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现在让我从这些被称为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中拿出几个来批判一下，并通过对我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来揭示出这些偏见的荒诞性。◇127◇

一 “平衡”论

你们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员中间还流行着一种所谓我国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平衡”论。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右倾营垒中的许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我们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们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说来，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

明理论的编造者认为，这两条平行线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们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

可是，这种理论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报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说它已经受到我们理论家的严重反击，更不用说致命的反击了。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不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思想落后，又是由于什◇128◇么呢？

其实，只要从马克思主义宝库中取出再生产理论来和各种成分平衡论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论打得粉碎。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逐年实行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逐年扩大的再生产就不能实行积累。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它有自己的积累，并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的大工业并没有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相反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能不能说我国小农经济是按照扩大再生产原则发展的呢？不，不能这样说。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的。如果农业基础是这样一种既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又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那末能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

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但是怎样使农业成为大农业呢？◇129◇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用在农业中培植资本主义的方法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结果是使农民贫困，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摈弃了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和苏维埃经济不相容的。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果是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大规模集体经济，这种经济有可能向前发展，因为它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因此，问题就是这样：或者走第一条道路，或者走第二条道路；或者向资本主义**后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论就是企图指出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它指望着第三条（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只要拿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各种成分“平衡”论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论打得粉碎。

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不这样做呢？谁需要使这种可笑的“平衡”论在我们报刊上流行，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束之高阁呢？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种偏见，即第二种资产阶级类型的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130◇事业“自流”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右倾营垒中的同志们竭力鼓吹这

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编造者的论断大致如下：我们这里有过资本主义，当时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而农村是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这样**，为什么在苏维埃经济制度下不能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农村，小农经济不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自发地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呢？这种理论的编造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农村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农村本来就能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我们何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我们何必争吵呢？

你们看，这又是一种从客观上说来目的在于给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一种新武器来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而我们的理论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痛斥这种引起我们集体农庄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奇怪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为如此，工业对农业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个因素是否就能使小农的农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13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当然，小农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列宁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说得万分正确，他说：“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①]是完全相反的〔一七〕。正是由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于这个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八〕（列宁）。

能不能说农民小商品经济基本上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同一类型的呢？很明显，如果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列宁就不会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一九〕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是一种腐朽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132◇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轨范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

奇怪的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我们土地问题理论家应有的反击。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三种偏见，即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著名原理，认为这个原理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鼓吹这种理论的大卫和赫茨之类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企图“依据”的事实是：小农吃得苦，耐得劳，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固性。

不难了解，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不难了解，这

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一个目的：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因为这种理论有这样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就把这种理论击破了。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反对这种理论的新论据，而我们的理论家却令人奇怪地不愿意利用或不会利用这种新武器去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我所指的◇133◇实践是：我国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国有化，这就使小农摆脱了对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因而使他们易于从小农经济转向**大规模的**集体经济。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还会把西欧的小农束缚在他们的小商品经济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们私有的一小块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们为了买一小块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他们买到以后，自然就不愿离开它，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的个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

能不能说这个因素在我们这里，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还同样继续发生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们这里的农民也就没有西方农民的那种对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小农经济易于转上集体农庄的轨道。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村的**大**经济，农村的集体农庄能够很容易地显示出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消灭了绝对地租、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实行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土地法的伟大革命意义。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新论据去反对那些说小农经济在反对大经济的斗争中表现出稳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34◇

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不充分地利用这个新论据去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呢？

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根据之一，就是“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的名著“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论前提，这些著作是最丰富的理论思想宝库。我指的是关于一般地租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绝对地租的理论。现在很明显，这些著作的理论原理已经在我们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查杨诺夫一类的“苏维埃的”经济学家的反科学理论应当在我们报刊上自由流行，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的天才著作就不应当广泛宣传并提到首位，倒应当束之高阁呢？

你们大概记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你们当然记得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小农引上协作经济道路，引上集体经济道路的问题。让我从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中引证有关的一段话吧：

“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生活得好些，使他们易于转到协作社，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定这样做，那我们就设法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①〔二〇〕 ◇135◇

你们看，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的问题。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一小地”土地，他们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就是这样。当然，在这里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近来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还没有打算把我国农民情况和西方农民情况之间的这种差别相当清楚地揭示出来。但是，这样的工作不仅对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而且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会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将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在没有这种基础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无关重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一年”[①]）中发挥了几个人所共知的证明农业中的大◇136◇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论据，在那里我指的是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无须证明，所有这些论据也完全适用于集体农庄这种大经济单位。我说的不仅是那些有机器拖拉机基础的发达的集体农庄，而且是那些代表集体农庄建设中所谓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依靠农民的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所建立的那些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初级集体农庄。

例如拿前顿河区霍泊尔区的集体农庄来说吧。从表面上看，这些集体农庄在技术方面似乎和小农经济没有区别（机器很少，拖拉机很少）。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为什么会有这种“冲昏头脑”的效果呢？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

————————————————

① 见本卷第一〇六页至第一二一页。——编者注

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开垦在单干条件下难以开垦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里。因为已经有可能使用荒原、零星小块土地和地界等等。

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你们知道，过去俄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就是土地问题。你们知道，土地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现象。当时许多人认为缺地现象是绝对的，就是说，俄国再没有适于耕种的闲地了。而实际情形怎样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苏联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几千万公顷的闲地，但是农民用他们可怜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开垦这些土地的。正因为农民过去无法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们就趋向于耕种“熟地”，耕种属于地主的土地，耕种适于◇137◇在单干条件下用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种的土地。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无怪乎我们的以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谷物托拉斯现在有可能使用约两千万公顷的闲地，这些土地是农民没有耕种过的，而且是以单干的方式用小农的农具所不能耕种的。

各个阶段（不论是最初阶段或是用拖拉机装备起来的更发展的阶段）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这就是农民过渡到集体劳动之后播种面积大大扩大的秘密所在。这就是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农民经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不用说，当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拖拉机队去帮助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初级集体农庄的时候，当集体农庄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集体农庄对个体农民经济的优越性就更加不容争辩了。

四　城市和乡村

关于所谓“剪刀差”问题，存在着一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培

植的偏见，对这种偏见也像对其他一切不幸还流行在苏联报刊上的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应该宣布无情的战争。我指的是一种认为十月革命给予农民的东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认为十月革命其实什么也没有给予农民的理论。

这种偏见有一个时候曾被一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报刊上宣扬过。固然，这位“苏维◇138◇埃的”经济学家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喊声：“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格罗曼。但是，这种理论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拥护，并被利用来反对党。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说，这种理论目前在“苏维埃的”舆论界已经不流行了。

同志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牵涉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它牵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理论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说农民从十月革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否正确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我手里有著名统计学家涅姆契诺夫同志的著名统计表，这个统计表在我的“在粮食战线上”〔二一〕一文中发表过。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不下六亿普特。所以，**地主**当时是六亿普特粮食的持有者。

根据这个统计表，**富农**当时“生产”的粮食是十九亿普特。这是富农当时所拥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

根据同一个统计表，**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是二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旧的农村，十月革命前的农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后农村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个统计表的数字。例如拿一九二七年来说吧。**地主**在这一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很明显，他们一点也没有生产，而且也不能生产，因为地主已经被十月革命消灭了。你们一定懂得，这必然大大改善农民的状况，因为农

民摆脱了地主的羁绊。◇139◇这当然是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处。

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十九亿普特，而是六亿普特。可见富农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们一定懂得，这不能不改善贫农和中农的状况。

而**贫农和中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二十五亿普特，而是四十亿普特。可见贫农和中农在十月革命后所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说明贫农和中农从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处的事实。

这就是十月革命给予贫农和中农的东西。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任何东西呢？

但是，同志们，还不止此。十月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土地的买卖，实行了土地国有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农民要生产粮食，完全用不着购买土地了。从前，他们为了购买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只要买到土地，情愿借债，情愿遭受盘剥。购买土地的费用当然加在粮食生产的成本上。现在农民用不着这样做了。现在农民不必购买土地就能生产粮食。因此，农民用来购买土地的几亿卢布，现在都留在农民的荷包里了。这是什么，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呢？显然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其次，直到最近，农民还不得不以单干方式使用旧式农具耕种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旧式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生产工具单干，不能为生活得好些，不能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发展自己的◇140◇文化、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提供必要的好处。现在，在大力开展集体农庄运动以后，农民已经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同邻居的劳动联合起来，联合为集体农庄，开垦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机器和拖拉机，从而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甚至两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联合为集体农庄，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用同样

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东西。因此，这就是说，粮食生产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后，这就是说，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出卖粮食得到的钱会比以前多得多。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好处呢？

说这种荒唐话的人显然是在诬蔑党，诬蔑苏维埃政权，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剪刀差"问题，消灭"剪刀差"问题，现在应当有新的提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对立将加速消除。

同志们，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有极大的意义。它改变着农民的心理，使他们面向城市。它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创造了基础。它为用集体农民的"面向城市"的口号补充党的"面向农村"的口号创造了基础。

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现在农民从城市得到了机器、拖拉机、农艺师、组织者以及为反◇141◇对和战胜富农所需要的直接帮助。极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强盗的旧式农民退到后面去了。代替他们的是对城市抱着希望，希望从城市得到**生产上的**实际帮助的新式农民，即集体农民。生怕下降为贫农而只想悄悄地（会剥夺选举权呵！）上升到富农地位的旧式农民，已经由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体农庄，摆脱贫困和愚昧而走上经济和文化高涨的广阔道路的新式农民所代替了。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变化的。

同志们，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竟没有采取一切办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图诬蔑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长的集体农

庄运动的资产阶级理论。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有一个人在这里发言时侮辱集体农庄。他断言集体农庄这种经济组织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对集体农庄做这样的估计是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估计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经济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很明显，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决定的。否则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经济类型呢？但是，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142◇级吗？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吗？难道集体农庄不是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实行基本生产工具公有化吗？有什么根据断言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呢？

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矛盾的。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个人主义残余甚至富农思想残余的，这些残余还没有消失，但是过一个时候，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说来，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内，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基本上是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在我国条件下，集体农庄（我说的是集体农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农庄）是在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中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认吗？

有些同志企图侮辱集体农庄而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一九二三年我们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列宁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他当时关于合作社，关于合作社企业是怎样说的呢？请看列宁的“论合作制”一书中的一段话吧：

“在我们的现存制度下，合作社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①]，如果它们是建筑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土地◇143◇和生产资料上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可见列宁并不是把合作社企业孤立起来观察，而是把它们和我们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观察，注意到合作社企业是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的国家里，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经营的；列宁这样观察合作社企业之后，就断定说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

列宁关于一般合作社企业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目前的集体农庄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你们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侮辱集体农庄，就是犯了极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

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他的另一个错误——关于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这位发言人把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说得有声有色，使人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并无不同之处**。甚至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一个人犯了这种错误。空谈阶级斗争，叫嚷集体农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庄内的阶级斗争，是目前我们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征。在这种叫嚷中最可笑的是这些叫嚷者在没有或几乎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看见了”阶级斗争，而在有阶级斗争并且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却看不见阶级斗争。◇144◇

集体农庄内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体农庄内还保存着个人主义心理甚至富农心理的残余，既然集体农庄内还存在着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那末集体农庄内就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因素。能不能说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们的“左的”清谈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个差别。

集体农庄**外**的，集体农庄成立**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同**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用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盘剥**贫农的富农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说，富农已经被击溃并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其次，这就是说，贫农和中农已经在基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联合为集体农庄。最后，这就是说，这是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斗争，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残余和富农思想残余，企图利用集体农庄内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图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残余和这些不平等现象从集体农庄中铲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集体农庄机械化实现得愈快，集体农庄拖拉机化实现得愈快，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愈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集体农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145◇杆的

极大的意义。集体农庄的伟大意义，正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宁说得对：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物质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和小农有关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页）

集体农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经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我们的“左的”清谈家把所有这些都忘记了。

我们的这位发言人也把这一点忘记了。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最后谈谈国内阶级变动和社会主义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

我们党最近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点就是：

（甲）我们党、我们苏维埃政权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全线进攻；◇146◇

（乙）大家知道，这个进攻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非常显著的**良好**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实行并且还在继续实行我们整个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的。大家知道，这个政策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政策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以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宣布了。大家都记得列宁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的著名的信〔二二〕（一九二二年），列宁在那封信里再一次说到必须实行这个政策的问题。最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我们都是实行这个政策的。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它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向富农举行这样的进攻呢？当时我们能不能指望这样的进攻获得胜利呢？不，不能。这样做就是最危险的冒险主义。这样做就是最危险地以进攻为儿戏。因为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失败，既然失败了，就会使富农的阵地巩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还没有能够据以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的据点，即广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网。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社会主义生产**代替**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147◇的。向富农进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能把它和反富农的高调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拼命强迫党采取的同富农扭打的政策混为一谈。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击破富农并消灭富农阶级。离开这些目的，进攻就是高调，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随便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所说的真正的进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举行这样的进攻而指望获得胜利呢？不，不能。

的确，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

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当时能不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和商品粮食**代替**富农的生产和商品粮食呢？显然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加强富农的阵地而得不到粮食。正因为如此，当时尽管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冒险主义高调，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于四亿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经济的总产量少两亿普特）。其次，大家知道，◇148◇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些）。最后，大家知道，一九三〇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总产量将不下于九亿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总产量多），而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将不下于四亿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得多）。

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国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动。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向富农举行的坚决进攻现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如果说的是真正的坚决进攻，而不限于空洞的反富农高调，那就应当这样向富农进攻。

这就是我们近来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

的政策的原因。

那末，对于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怎样办呢？是否可以容许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呢？——各地的人们问。真是可笑的问题！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转为向富农坚决进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那时不容许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现在呢？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149◇的。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

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七 结 论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工作决不能忽略的六个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这些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能根除一切资产阶级理论，而这些理论有时——真叫我们丢脸——竟被我们的党员同志传播着，引起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的思想混乱。早就应该铲除这些理论，抛弃这些理论了。因为只有和诸如此类的理论作无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思想才能成长和巩固起来。

最后，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们使过渡时期经济中的旧问题有了新面貌。

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须揭露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些人的错误。事实上，列宁还在开◇150◇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准备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

必须揭露认为需要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那些人的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城乡之间的任何一种联系。我们需要的是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那种联系。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还必须提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问题。必须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格式问题。中央统计局在一九二六年当做国民经济平衡表公布的东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数字游戏。巴札罗夫和格罗曼对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的见解也是不合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格式制定出来，如果他们一般说来愿意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员根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新的提法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那就很好了。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三〇九号◇151◇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请不要骂我。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替我辩护，但可以说明一些情况。

（一）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自我批评，机关的停滞和腐朽，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人阶级创造主动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在这一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也为我们的前进，为劳动者建设力量的发挥，为竞赛的展开，为突击队等等提供了材料（和推动力）。好处是会抵销和**盖过**坏处的。

可能我们的报刊过分强调了我们的缺点，有时候甚至（无意地）宣扬了这些缺点。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这当然不好。因此，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和我们的缺点相平衡（依我说，要用成绩来盖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我们一定立即弥补这个缺陷。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

（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青年。有垂头丧气的，疲倦懈怠的，悲观失望的（例如捷宁）。也有朝气◇152◇勃勃的，活泼愉快的，意志坚强和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现在，当我们割断生活中的旧联系而建立新联系的时候，当我们破坏走惯了的道路而铺设没有走惯的新道路的时候，当从前过着富裕生活的整批整批居民脱出轨道，离开队列，给从前受压制、受折磨的千百万人让开道路的时候，青年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同情我们的群众，他们中间不可能没有分化和分裂。第一、在青年中间有富家子弟。第二、即使拿我们自己的（按社会地位）青

年来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意志、力量、毅力和理解力，都能把大规模破坏旧事物和急速建设新事物的景象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也是**合乎愿望的**景象，并且是和那种应当让人能够“休息”和“享福”的“四海升平”的天堂般的安乐生活很少相像的景象。显然，在这种“令人头昏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没有疲倦懈怠的人，神经过度紧张的人，未老先衰的人，悲观失望的人，脱逃的人以及投到敌人阵营里去的人。这是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消耗”。

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的战斗的青年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数众多的新的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三）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采取有组织地从思想上（以及从其他一切方面）影响的办法竭力减少灰心者、叫苦者、怀疑者等等的人数。相反地，我们的党、我们的文化组织、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苏维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这种影响并取得重大成果。因此，我们（我们的朋友）完全接受你的建议：◇153◇

（甲）创办“国外”杂志〔二三〕；

（乙）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吸收阿·托尔斯泰和其他文学家参加这个工作。

不过必须附加一句：这些事情一件也不能交给拉狄克或他的某个朋友去领导。问题不在于拉狄克的善良心愿或诚恳态度。问题在于派别斗争的逻辑，他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斗争（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会推动他们进行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并且不仅我们党的历史）教导说，事物的逻辑比人的心愿的逻辑更有力量。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领导，而吸收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做撰稿人，那就会更正确些。这样做会更正确些。

（四）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关于创办专门杂志“关于战争”的问题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没有出版这种杂志的理由。我们认为比较适当的是在现有的**政治**杂志上论述战争问题（我说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况且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策**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策的表现。

至于描写战争的小说，那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的“恐怖”、引起对**一切**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的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读者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小说。此外，要知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满了这种恐怖。◇154◇

在我看来，打算反对战争“恐怖”的沃龙斯基的立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没有多大区别。

（五）你说得完全正确，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报刊上，在反宗教宣传问题上极为混乱。有时竟说出了有利于敌人的令人惊奇的蠢话。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多极了。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做反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商谈你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下次写信告诉你。

（六）我不能满足加米古洛夫的请求。没有时间！此外，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

就此搁笔。

紧紧握手并祝你健康。

谢谢你的问候。

约·斯大林

听说你需要一位俄国医生。是真的吗？想要哪一位？请来信告知，

一定派去。

约·斯·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155◇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红星报”〔二四〕第十六号刊载的“消灭富农阶级”一文一般说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两个地方说得不确切。我认为必须予以纠正。

一、该文说：

“在恢复时期，我们实行了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从改造时期开始，我们就从限制的政策过渡到排挤他们的政策了。”

这种论断是不对的。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政策。这是同一个政策。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不能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排挤富农**阶级**看成一样。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排挤和战胜那些受不住税收压力、受不住苏维埃政权的种种限制办法的富农**个别队伍**。很明显，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不能不导致排挤富农个别队伍。因此，排挤富农个别队伍不能不看做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在恢复时期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且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156◇月）以后的时期，在我们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九年四月）时期，以及在这次代表会议以后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我们也都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从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

如果看一看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例如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二五〕）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见“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的决议〔二六〕）这个

期间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出，“限制富农剥削趋向”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增长”的论点总是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论点**同时并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党**没有**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即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分开**。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完全是站在“限制农业资产阶级的剥削趋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二七〕）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采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同上）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坚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二八〕）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向富农进攻”即“进一步地、更有步骤和更坚决地限制富农和私商”（同上）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更坚决地从经济上排挤”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二九〕）这一政策的基础上。◇157◇

因此，（甲）该文作者把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说成两个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事实说明，这里只有一个限制资本主义的总的政策，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是这个政策的组成部分和结果。

因此，（乙）该文作者断言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只是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才开始的，这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无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即在恢复时期，还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在改造时期，排挤都是有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只是用新的补充办法加强了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因此，对富农个别队伍的排挤也就必然加强了。

二、该文说：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完全是从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中产生

出来的，它是后一政策在新阶段上的继续。”

这种论断是不确切的，因而也是不对的。当然，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以前限制即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整个时期准备好的。但这还不是说，它和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没有**根本**区别，它似乎是限制政策的**继续**。像我们的作者那样说，就是否认从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农村发展中所发生的**转变**。那样说，就是否认这个时期内我们在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上实行了**转变**的事实。那样说，就是给我们党内的右倾分子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护符，因为右倾分子现在正抓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反对党的**新**政策，就像过去弗鲁姆金抓住第十四次代表大◇158◇会的决议来反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一样。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加强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的出发点是：虽然对富农实行了这种限制，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在相当时期内还是**要继续存在**的。**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土地租佃法，虽然明明知道大多数租佃者都是富农。**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农村雇佣劳动法，要求切实执行这个法律。**根据这一点**，再次宣布了不准剥夺富农财产。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是否同**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抵触呢？当然**不**抵触。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是否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抵触呢？当然**是**抵触的！因此，现在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就不得不把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搁在一边，而全盘集体化的范围不是逐日扩大而是逐时扩大的。况且，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已经被全盘集体化地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程本身搁在一边了。

既然如此，能不能断言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继续**呢？显然不能。

该文作者忘记了：如果把生产工具和土地自由使用权**保留**在富农阶级手里，如果在我们的实践中**保存**农村雇佣劳动法和土地租佃法并

禁止剥夺富农财产，那末用税收和其他任何限制办法都是不能排挤富农阶级的。作者忘记了：在实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时只能指望排挤富农的个别队伍；这和在相当时期内**保存**富农阶级并不抵触，相反地，倒是预计到这一点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单靠限◇159◇制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的政策是不够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必须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这个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等）。

这就是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否则关于排挤富农阶级的谈论就只能是合乎右倾分子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无谓空谈。否则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农村集体化，更谈不到全盘集体化了。我们农村中的那些正在粉碎富农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看来我们的某些同志还不了解这一点。

因此，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

载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红星报”第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160◇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三〇〕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一、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提纲〔三一〕中说苏维埃俄国有两个主要阶级。

现在我们说要把富农和新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消灭。

这是不是说我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了第三个阶级？

二、你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怎样了解这个"抛开"，又怎样抛法？

三、随着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应当怎样改变现在决定着无产阶级和农民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口号，"要善于和中农成立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固地依靠贫农"（列宁）〔三二〕？ ◇161◇

四、必须采取哪些方法才能消灭富农阶级？

五、同时实行两个口号，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实行限制和排挤富农的口号，是否会引起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的富农自我消灭（糟蹋财产和生产资料）？

六、我国富农阶级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革命浪潮的高涨，对"喘息时机"的长短会有什么影响？

七、你对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高潮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可能性怎样估计？

八、整个整个车间的工人决定入党，从党和工人阶级今后的相互关系来看，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新动态应当怎样估计？

九、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扩大农村党组织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在扩大的范围和接收各阶层集体农庄庄员入党方面，我们的政策应当怎样？

十、你对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极重要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的看法怎样？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第一个问题。列宁说过有两个**主要**阶级。但是，他当然知道存在着第三个阶级即资本主义阶级◇162◇（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当然不是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才“形成”阶级的。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是一个**次要的**阶级。新经济政策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曾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这个阶级的发展。但是，新经济政策更多地帮助了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党转入全线进攻，就把问题急剧地转到了打垮并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方面。

为了说得确切起见，必须指出，党并没有指示把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扩大到城市新资产阶级方面去。应该看到耐普曼和富农之间的差别：耐普曼基本上早就被剥夺了**生产**基础，所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占多少重要的地位；而富农直到最近在农村中还占重要的经济地位，我们**只是现在**才剥夺他们的**生产**基础。

我认为我们的某些组织忘记了这个差别，它们企图用消灭城市资产阶级的口号来“补充”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所以犯了错误。

第二个问题。我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演说时所讲的那句尽人皆知的话应当这样了解：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

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

第三个问题。很明显，随着苏联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化，富农阶级将会消灭，——因此，伊里奇的公式的这一部分就不适用了。至于集体农庄里的中农和贫农，那末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和拖拉机◇163◇化，他们将融合为集体化农村的工作人员的统一的队伍。因此，将来在我们的口号中就不会再有“中农”和“贫农”的概念了。

第四个问题。消灭富农阶级的主要方法是普遍集体化。其余一切办法都必须适应这个主要方法。凡是和这个方法抵触或者会减弱它的作用的都必须抛弃。

第五个问题。决不能把“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和“限制富农”的口号说成两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口号。从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时起，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就成了**主要**口号，而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限制富农的口号就从独立的口号变成了**补助**口号，变成了主要口号的**辅助**口号，变成了使这些地区易于为过渡到主要口号准备条件的口号。可见在目前新的情况下，“限制富农”的口号所占的地位同它一年前和更早以前所占的地位比较起来已经根本改变了。

应该指出，可惜我们的某些报刊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

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一部分富农预料到要被剥夺财产而实行“自我消灭”，“糟蹋财产和生产资料”，这是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必须反对这种行为。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准许把剥夺富农财产不当做集体化工作的一部分，而当做在集体化以前和离开集体化而进行的独立工作来做。准许这样做，就是拿**分配**所没收的富农财产使个别农民个人致富的政策来代替把这些财产变为集体农庄**公有**的政策。这种代替是后退一步，而不是前进一步。反对

富农“糟蹋”财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强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的集体化工作。◇164◇

第六个问题。你们所列举的手段和条件**能**大大缩短“喘息”时期。但是，它们无疑地**一定**会加强和增多我们的防卫手段。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内的矛盾的增长，取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向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第八个问题。整个整个车间甚至整个整个工厂的工人希望入党，这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革命热情大大提高的标志，是党的政策正确的标志，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热烈拥护这个政策的标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接收一切希望入党的人入党。在车间和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有暗害分子。因此，党应该继续采用**个别**对待每个希望入党的人和**个别**接收入党这一经过考验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第九个问题。不言而喻，集体农庄中党的队伍将比较迅速地发展。最好是集体农庄运动中一切在反富农斗争中锻炼得最坚强的分子，特别是雇农和贫农分子，都能在党的队伍里得到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这里当然应该特别坚决地实行个别对待和个别接收入党的方法。

第十个问题。在我看来，在经济学家的争论中有很多烦琐的和臆造的东西。如果剥去争论的外◇165◇壳，那末争论双方的主要错误如下：

（甲）任何一方都未能很好地运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既反对“鲁宾主义”，又反对“机械主义”；〔三三〕

（乙）双方都离开了苏联经济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基本问题而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因而把两年的工作消耗在抽象的题目上，这当然是合乎我们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载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
“真理报”第四十号◇166◇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列宁和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

学生们在上课、讨论

胜利冲昏头脑

（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胜利。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确实是伟大的。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日，苏联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说，截至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以上。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体农庄**已经**收藏了春播用的种子三千六百多万公担，等于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合二亿二千万普特，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在粮食收购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单是集体农庄方面就收藏了二亿二千万普特种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可以认为已经有保障了**。

无须证明，这些胜利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对于作为我国领导力量的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本身都有极大的意义。姑且不说直接的实际结果，这些胜利对于党本身的内部生活，对于我们党的教◇167◇育也是有巨大意义的。这些胜利鼓起了我们党的勇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些胜利用相信我们的事业必胜的信念武装了工人阶级。这些胜利把千百万新的后备力量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

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

但是，胜利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特别当它是比较“容易地”，所谓“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时候。这样的胜利有时使人产生自负和骄傲的心理：“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些

胜利往往使人陶醉，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这样也就不会关心**巩固**既得的胜利和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巩固既得的胜利呢，我们就这样也能“一下子”跑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

因此，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斗争，把它从党内消除出去。

不能说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什么广泛的散布。但是，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毕竟是有的，而且没有根据可以断定说这种情绪不会加强起来。如果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得到公认，那末毫无疑问，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大大削弱，这个运动被破坏的危险就会成为现实。

因此，我们报刊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揭穿诸如此类的反列宁主义的情绪。

举几个事实来说。◇168◇

一、我们的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政策”一下子就会破坏集体化思想。在规定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和方法的时候，应当周密地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

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我们的产粮区走在一切地区的前面。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这些地区我们有最多的已经巩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

农庄。通过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民已经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相信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力量和意义。

第二、因为这些地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有两年反富农斗争的经验，这不能不有助于集体农庄运动。

最后，因为这些地区最近几年来从工业中心得到了大批优秀干部。

能不能说其他地区，例如消费地区（如我国北方各区）或者还落后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如土尔克斯坦），也具备了这些特别有利的条件呢？

不，不能这样说。

很明显，和自愿原则一样，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是健康的集体农庄◇169◇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有时又是怎样呢？能不能说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没有在某些地区遭到破坏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例如大家知道，在北方某些消费地区，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产粮区要少些，但是人们往往竭力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发展集体农庄的纸上决议，用组织实际上还不存在但是已经有一大堆吹牛的决议说得它好像“存在”的纸上集体农庄，来**代替**组织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

或者拿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来说，那里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北方消费地区还少。大家知道，在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已经有人企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各先进地区。

在这种普利施别也夫下士[①]的“政策”同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事业中以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为依据的政策之间能有什么共

——————————————

① 指俄国作家契诃夫所写的短篇故事“普利施别也夫下士”中的主人公。他骄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译者注

同之处呢？很明显，它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谁需要这种歪曲，这种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这种对农民的可耻的威胁呢？除了我们的敌人，谁也不需要！

这种歪曲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加强我们的敌人而破坏集体农庄运动的思想。

以“左派”自居的制造这种歪曲的人事实上是在帮助右倾机会主义，这不是很明显吗？◇170◇

二、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然后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是否可以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体系中已经找出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呢？是的，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

这个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也许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生产资料还没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

也许是**农业公社**吧？不，不是公社。公社在目前还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个别现象。把这种不仅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的农业公社作为**主要**形式，条件还没有成熟。

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

在**农业劳动组合**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谷物业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他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在农业劳动组合中**不实行公有化**的是：宅旁园地（小菜园、小果园）、住宅、一部分产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等。

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因为它是解决谷物问题的最适当的形式。而谷物问题又是**整个农业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因为不解决谷物问题就不能解决畜牧业（小牲畜和大牲畜）问题，也不能解决给工业提供主要原料的技术作物和特种作物问题。正因为如此，农

业劳动组合在目前时期◇171◇是集体农庄运动体系中的基本环节。

集体农庄“标准章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最后定本今天公布了①。

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切实研究这个章程并彻底实行这个章程。

党在目前时期的方针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党的这个方针在实行时没有遭到破坏和歪曲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大家知道，在苏联某些地区，争取集体农庄存在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有人企图跳出劳动组合的范围，一下子跳到农业公社。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他们已经在使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有化”，而这种“公有化”也就变成了纸上的官僚主义的命令，因为现在还没有使这种公有化成为必要的条件。他们这样做，仿佛谷物问题在集体农庄中已经解决，它是已经过时的阶段，目前时期的基本任务不是解决谷物问题，而是解决畜牧业和养禽业问题。试问，谁需要这种把集体农庄运动的各种形式搅成一团的鲁莽“工作”呢？谁需要这种愚蠢的对事业有害的急躁冒进呢？当谷物问题还**没有解决**，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形式还**没有巩固**的时候，拿住宅、全部产乳牲畜、全部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来戏弄集体农民，——这样的“政策”只能合乎我们的死敌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这难道◇172◇还不明显吗？

在这种热心的“公有化者”当中，有一位竟向劳动组合下命令，责令“三天之内把每个农户的家禽总数统计出来”，设置专门的“指挥员”来指挥统计和监督工作，“占领劳动组合中的制高点”，“指挥社会主义战斗，不得离开岗位”，而——当然的事——把整个劳动组合紧握在拳里。

——————————————

①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真理报”。

这是什么呢，是领导集体农庄的政策还是**瓦解**集体农庄和**破坏**集体农庄**威信**的政策呢？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着手**组织劳动组合的所谓“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把钟拆下，——这该是多么革命呵！

在我们队伍里怎么能产生这种“公有化”方面的鲁莽儿戏，这种想跳过自身的可笑企图，这种目的在于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阶级敌人的企图呢？

它们只有在我们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容易地”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我们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为了纠正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工作路线，**必须消除这种情绪**。◇173◇

这就是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载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真理报”第六十号
署名：约·斯大林◇174◇

给别泽缅斯基同志的信

别泽缅斯基同志！

信写迟了。

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但是由于你的坚决的请求，我可以把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你。

“射击”和“我们生活的一天”我都读过了。这两部作品中既没有任何“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反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射击”，可以认为是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艺术的范例。

固然，这两部作品中有些青年团先锋主义的残余。没有经验的读者读了这两部作品，甚至会以为不是党在改正青年的错误，而是相反。但是，构成这两部作品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的并不是这个缺点。它们的基本思想在于尖锐地提出了我们机关的缺点问题，并且深信这些缺点能够改正。不论是“射击”或是“我们生活的一天”，其中主要的东西就在这里。它们的主要价值也就在这里。这个价值◇175◇大大地盖过了而且深深地掩没了它们那些很小的、在我看来是正在消失的缺点。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第一次刊印◇176◇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大家从报上知道，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①]一文和中央的“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三四〕的著名决议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很多反应。因此，近来我收到了庄员同志们的许多来信，要求答复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来我应当以私人通信方式答复来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半数以上的来信没有写明寄信人的地址（忘记写地址了）。可是，信中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意义。此外，当然我也不能不答复那些忘记写明自己地址的同志。因此，我不得不从来信中挑出一切必要的问题，公开地即在报刊上答复庄员同志们的来信。加上中央对此已有直接的决定，所以我就更乐意这样做了。

第一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于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在于在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了暴力。在于忘记了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和中农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在和中◇177◇农联盟的基础上。在于忘记了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贫农联合中农去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富农。

当和中农结成统一战线向富农进攻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可是，当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不知不觉地从进攻富农的道路滚到反对中农的道路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对中农采用暴力，褫夺中农的选举权，像剥夺富农那样剥夺中农财产的时候，进攻就被歪曲，和中农的统一战线就被破坏，富农当然也就

———————————————

① 见本卷第一六七页至第一七四页。——编者注

得到了企图恢复元气的机会。

他们忘记了：在和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时，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对待作为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时，暴力就是不可容许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他们忘记了：在解决军事性质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任务而且是联合中农来进行的建设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就是不适用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

请看列宁关于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所说的话：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 要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那是再愚蠢不过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页、第一八八页）◇178◇

其次：

“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答：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

（一）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关于自愿

原则的规定。

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公共的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列宁主义教导说，只有向农民**指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好，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有利，集体农庄能使农民，使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和困苦的时候，才能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列宁主义教导说，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就不能巩固。列宁主义教导说，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179◇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当遵守这个基本规则的时候，集体农庄运动就节节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竟开始忽视这个规则，开始表现出过分的急躁，并且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开始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无怪乎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迅速出现的集体农庄，像它迅速出现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而一部分昨天还很信任集体农庄的农民现在开始躲避集体农庄了。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一个和主要的错误。

请看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过渡到**公共**耕种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但是，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公共耕种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强迫手段，那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反法律，这是我们正在竭力纠正而且一定要纠正的现象。”[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七页）

其次：◇180◇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任何有助于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们有千百万零散的、分布在穷乡僻壤的个体农户…… 只有当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是必要而可能的这一点**在实践中**和**在**农民亲身**经验中得到证明**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利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最后，再看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

“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各种协作社以及中农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的时候采取**任何强迫手段**。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那些擅敢利用不仅是直接的而且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极严厉的处分，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作。”②（“列宁全集”第四◇181◇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四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党是会十分严格地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的。

（二）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地区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忘记了这些地区中间有先进的、中等的和落后的。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不相同的地区**不能是一样的**。

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八页）。

其次，列宁说：

“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就愚蠢万分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八页）

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员，要他们◇182◇

“**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他们的共和国的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特殊情况；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改变它的形式以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五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党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决议（见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报”〔三五〕）中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成三类，其中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余地区可以把集体化的完成延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莫斯科省因为拼命追求集体化的虚夸数字，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省拥有不下三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黑土区因为不愿意“落后于他人”，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区拥有不下两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一年底）。而南高加索人和土尔克斯坦人因为热心于“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地区，竟采取了在“最短期间”完成集体化的方针，虽然他们拥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三年底）。

很明显，在这种匆忙的集体化“速度”之下，那些对集体农庄运动准备较差的地区因为热心于◇183◇“超过”准备较好的地区，就不得不施行强烈的行政压力，企图用自己的行政热情来弥补集体农庄运动快速度发展所缺少的因素。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在这些地区造成了混乱，后来不得不由中央加以干涉来消除这种混乱。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二个错误。

（三）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违背了列宁的原则：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把他们引导到我们的口号下面，并帮助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来相信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公共耕种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公共耕种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

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页）◇184◇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著名决议（见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报”）中认为：

（甲）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

（乙）因此必须制定作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标准章程；

（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决不能容许从上面“命令”集体农庄运动和“把集体化当做儿戏”。

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决不能容许跳过农业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决不能用“命令”集体农庄和“把集体农庄当做儿戏”来代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

看来是很明白了。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这些同志不去组织建立农业劳动组合的群众运动，却使个体农民径直“转上”公社章程。不去巩固运动的劳动组合形式，却用强迫手段使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和住宅“公有化”。

列宁主义者所不容有的这种急躁情绪的后果现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稳固的公社通常当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许多农业劳动组合却放弃了。固然，“好的”决议留下来了。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三个错误。◇185◇

第三个问题：怎么会产生这些错误，党应当怎样纠正这些错误？

答：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迅速取得胜利而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生的。胜利有时能冲昏人的头脑。胜利往往使人产生过分的自负和骄傲。这特别容易发生在执政党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比的力量和威望的党。列宁所激烈反对的那种共产党员骄夸的事实，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相信法令、决议和命令万能的心理，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某些角落变成党的个别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险，在这里是很现实的。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省委工作人员和个别中央委员。

列宁说：“共产党员的骄夸，就是说，侧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产党员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自己的一切任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对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路线的歪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让这些错误和歪曲行为今后仍然继续下去，如果不把它们迅速而彻底地消灭，那末它们的危险在哪里呢？

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这些错误会直接使我们去破坏集体农庄运动，和中农闹翻，使贫农队伍瓦解，使我们的队伍混乱，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削弱，使富农恢复起来。

简单地说，这些错误有一种趋向，要把我们从巩固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的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推上同这些群众决裂的道路，推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186◇

这种危险在二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的一部分迷惑于过去的胜利的同志和列宁的路线背道而驰。党中央注意到这种危险，立即干预这件事，委托斯大林在专论集体农庄运动的文章中给那些轻举妄动的同志们以警告。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这当然是胡说。我们中央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所采取的深入探查的办法。

而当错误的深度和范围已经查明的时候，中央就立即以自己的威望的全部力量来打击错误，公布了它的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决议。

要使狂奔疾驰的人悬崖勒马转上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为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因为它善于克服更大的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整个整个的队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驰，及时转上正确的道路并在行进中整编自己的队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党所以称为列宁党，就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机智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要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并在自己身上找到在最短期间消灭这些错误的力量。因为陶醉于不久以前的胜利而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而坚决地纠正错误——这就是主要的困难。只要克服了这个困难，只要抛弃了夸大的计划数字和文牍官僚主义的追求最高数字的做法，只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上，就能使错误彻底消灭。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党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个危险的困难。◇187◇

列宁说："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能忘记的。

第四个问题：反对歪曲党的路线是不是后退，是不是退却？

答：当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继续犯错误和继续进行歪曲当做进攻，而把和错误作斗争当做退却的人，才会说这是退却。用堆积错误和再三歪曲来实行进攻，——不用说，这是很好的"进攻"……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们提出了农业劳动组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制定了相应的标准章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工作的指南。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提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生产结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作为目前时期我们在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口号。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还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就规定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一定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几类并为每◇188◇一类地区规定了特殊的速度。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这怎能说是党的“退却”呢？

我们要使那些犯了错误和有歪曲行为的人从他们的错误中退出来。我们要使鲁莽的人从他们的鲁莽行为中退到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向我们的阶级敌人实行**真正的**进攻。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后退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我们要实行**正确的**进攻，而不要把进攻当做鲁莽的儿戏。

只有怪人和“左”倾过火分子才会把党的这个立场看做退却，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种妄谈退却的人至少不懂得两件事情。

（甲）他们不知道进攻规律。他们不懂得**不巩固**既得阵地的进攻是必遭失败的进攻。

比如在军事方面，进攻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胜利的进攻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是一味前进，而是同时努力**巩固**既得的阵地，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使**后方机关**跟上来**，**把**后备队**调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保证自己免遭意外，消灭任何一次进攻都不能避免的个别地方被突破的现象，从而准备彻底消灭敌人。一九二〇年波兰军队的错误，如果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

忽视了这个规则。这也就是他们一口气打到基辅，然后又不得不同样地一口气退到华沙的原因之一。一九二〇年苏维埃军队的错误，如果也是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进攻华沙时重犯了波兰军队的错误。◇189◇

关于阶级斗争战线上的进攻规律也必须这样说。**不巩固**既得的阵地，**不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不给前线保证**后备队**，不使**后方机关**跟上来等等，就不能实行顺利的进攻以消灭阶级敌人。

全部问题在于鲁莽的人不懂得进攻规律。全部问题在于党懂得这些规律并实现这些规律。

（乙）他们不懂得进攻的阶级本质。他们大叫进攻。但是向**哪个**阶级进攻，联合**哪个**阶级去进攻？我们是联合中农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因为只有这种进攻才能使我们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这种进攻因为党的个别队伍陶醉于胜利而开始离开正确的道路，把自己的锋芒转向我们的同盟者，转向中农，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需要的是**任何一种**进攻，而不是联合一定阶级去反对一定阶级的进攻吗？要知道唐·吉诃德也以为他向风车冲锋就是向敌人进攻。可是大家知道，他在这种所谓进攻中曾碰得头破血流。

大概唐·吉诃德的桂冠使我们的“左”倾过火分子睡不着觉吧。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右倾危险还是“左”倾危险？

答：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种说法同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决议中关于“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障碍的著名论点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因为“左”倾过火分子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错误是一种为右倾在党内的加强和巩固造成有利环境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把党的路线歪曲了，因而便利了破坏党的威

信的活动，也就便利了右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190◇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是右倾分子藉以掀起反党斗争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左”倾过火分子，是他们的错误和歪曲行为给右倾分子造成的。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左”倾过火分子在客观上是右倾分子的同盟者。

“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主义之间的特殊联系就是这样。

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事实：某些“左”倾分子时常说要和右倾分子结成同盟。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种特殊现象：一部分“左”倾分子昨天还在“实行”高呼乌拉的进攻并企图在短短两三个星期内使苏联全国集体化，而今天却消极起来，心灰意懒，把斗争地盘安然让给右倾分子，从而实行在富农面前真正退却（没有引号！）的路线。

目前时期的特点，就在于和“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作斗争是我们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个问题：怎样估计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

答：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说明最近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巩固的集体农庄，目前不坚定的分子正在离开这些集体农庄。这就是说，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将要消失，巩固的集体农庄将要继续存在和更加巩固。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某些同志因此而悲观失望，张皇失措，拼命抓住夸大的集体化百分数。另外一些人则幸灾乐祸，预言集体农庄运动必定“失败”。这两种人都大错特错了。这两种人都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集体农庄运动实质的了解。◇191◇

退出集体农庄的首先是那些所谓死魂灵。这甚至不是退出，而是暴露了空架子。我们是不是需要死魂灵呢？当然不需要。我认为北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解散有死魂灵的集体农庄而组织真正有生命的和真正稳固的集体农庄是做得完全正确的。这种做法对集体农庄运动是只有好处的。

其次，退出的是那些公开敌视我们事业的异己分子。很明显，这种分子被驱逐得愈快，对集体农庄运动就愈好。

最后，退出的是那些动摇分子，这种人既不能叫做异己分子，也不能叫做死魂灵。这是**今天**我们还没有能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确，但**明天**我们一定能说服他们的那些农民。这种农民的退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个严重损失，虽然这个损失是暂时的。因此，争取集体农庄的动摇分子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不仅仅是一种坏现象。由此可见，既然这种退出使集体农庄清除了死魂灵和公开异己分子，那末它也就是使集体农庄健全和巩固的一种有益过程。

一个月以前，有人认为产粮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指的是真正的和比较稳固的集体农庄，那末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的。如果在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以后产粮区的集体化能保持百分之四十（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极大成绩。我是拿产粮区的平均数字来说的，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个别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产粮区的集体化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说，到一九三〇年春季我们就完成了◇192◇原定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

谁敢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这个**历史性**成就的**决定**意义呢？

第七个问题：动摇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不是做得对？

答：不，他们做得不对。他们退出集体农庄是违反自己切身利益的，因为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他们退出集体农庄就是把自己置于更坏的境地，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苏维埃政权给予集体农庄的那些优待和好处。集体农庄中的错误和歪曲行为不能成为退出的理由。应当留在集体农庄里用共同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既然苏维埃政权将用全部力量和这些错误作斗争，那末这些错误就更容易纠正了。

列宁说：

“商品生产下的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所受的贫困和压迫。”（“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一页）

列宁说：

“靠小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页）

列宁说：

“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页）◇193◇

列宁说：

“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迫使我们进入的绝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

列宁说：

“必须过渡到模范大农庄中的共同耕种制”，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所处的那种经济破坏状态，那种简直是绝望的状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页）。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唯一**手段。

很明显，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得不对的。

列宁说：

“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活动中当然可以知道，我们对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协作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并逐渐促进这种转变的一般组织赋予多么**巨大的意义**。”[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说：◇194◇

“苏维埃政权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予它们以直接**优先权**。”[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八六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将给集体农庄以个体农户所享受不到的优待和优先权。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在分配土地方面，在供应机器、拖拉机、种子等等方面，在减轻赋税方面，在发放贷款方面，将给集体农庄以优待。

为什么苏维埃政权给集体农庄以优待和优先权呢？

因为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手段。

因为优先帮助集体农庄是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最切实的方式。

前几天，苏维埃政权决定对集体农庄的全部公有化的耕畜（马、犍牛等等），对集体农庄集体所有的和庄员个人所有的全部奶牛、猪、羊和家禽**免**税**两年**。

此外，苏维埃政权决定把庄员偿付贷款的期限**延**至年底，并把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四月一日以前被判处的全部罚款和法律处分**取消**。

最后，苏维埃政权决定在本年度必须给集体农庄五亿卢布的贷款。◇195◇

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退潮时能够站稳脚根，在反对集体农庄的敌人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保住了集体农庄并擎住了集体农庄运动的伟大旗帜的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我们集体农庄的基本核心，而且将要巩固和办好我们的集体农庄，把千百万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贫农和中农庄员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集体农庄的骨干，并且完全配称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英雄的集体农民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得不到**这些优待的。

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错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只有回到集体农庄里来才能保证自己得到这些优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八个问题：对公社怎么办，是不是应当把它们解散？

答：不，不应当而且用不着把它们解散。我说的是真正的公社，而不是纸上的公社。在苏联产粮区有许多值得奖励和支持的优秀公社。我指的是那些经受多年考验，受过斗争锻炼，完全证实了自己有存在价值的老公社。不应当把它们解散，但是应当把它们改造成劳动组合。

建立和管理公社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只有具备了有经验的干部和受过锻炼的领导者，巨大而稳固的公社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匆忙地从劳动组合章程转到公社章程，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所以对待这件事情要特别郑重，丝毫不能急躁，劳动组合是一件比较容易办的事情，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以劳动组合是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最普遍的形式。只有随着农业◇196◇劳动组合的加强和巩固，才能造成农民转向公社方面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但这不会是很快的事情。所以作为高级形式的公社只有在将来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

第九个问题：对富农怎么办？

答：前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中农的问题。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因此，我们对中农的政策应该是友好的。富农则是另一回事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

请看列宁关于富农所说的话：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

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在人民中间毕竟占少数……　这些吸血者在战争期间靠人民的贫困发了财，他们抬高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积蓄了成千累万的金钱。这些蜘蛛靠因战争而破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长肥了。这些水蛭吸了劳动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吸血鬼过去和现在都把地主的土地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再三盘剥贫苦农民。”（“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三十九页）

我们在实行限制这群吸血者、蜘蛛和吸血鬼的剥削趋向的政策时是容忍了他们的。我们所以容忍了他们，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富农经济，代替富农生产。现在我们有可能用我们集体农庄◇197◇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来代替他们的经济，而且绰绰有余了。现在用不着再容忍这些蜘蛛和吸血者了。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第十个问题：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什么？

答：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为播种而斗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播种面积而斗争，为正确组织播种而斗争。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适应于播种任务。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组织播种的工作。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及其非党积极分子的稳固性，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及其布尔什维克核心的才能，将不是在响亮的决议和堂皇的祝词中受到检验，而是在正确组织播种这一实际工作中受到检验。

但是要光荣地实现这个实际任务，必须把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建设的**经济**问题方面去，转到**集体农庄内部**建设的

问题方面去。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所注意的中心问题还是追求集体化的高的数字，而且人们不愿意看见真正集体化和纸上集体化之间的差别。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数字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巩固**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在组织上趋于**完善**，**组织**集体农庄中的实际工作。◇198◇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还集中于组织大集体农庄，组织所谓“大型农场”，而这些“大型农场”往往变成在农村中没有经济根基的笨重的纸上机关。于是，表面工作吞没了实际工作。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表面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应该着重于农村集体农庄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当这项工作有了相当成绩的时候，“大型农场”自然就会出现。

直到最近，还很少注意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可是在中农中间有许多出色的管理人材，他们能够成为集体农庄建设中极好的经济工作人员。现在应该消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缺点。现在的任务就是吸收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

直到最近，还没有充分注意农村中的妇女工作。过去一段时期表明，农村中的妇女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现在应该坚定不移地消除这个缺点。

直到最近，某些地区的共产党员还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切任务。因此，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吸收非党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负责工作，没有充分注意提拔非党分子担任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没有充分注意在集体农庄中组织广大的非党积极分子。我们党的历史证明，集体农庄建设的过去一段时期再一次表明，这种方针是根本不正确的。如果共产党员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一堵墙同非党分子隔开，他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共产党员在争取实现社会

主义的战斗中能够得到光荣，共产主义的敌人能够被击溃，其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员善于吸收非党优秀分子参加工作，他们善于在非党的广大阶层中间吸取力量，他们善于把广大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党的周围。◇199◇现在应该坚决不移地消除我们对非党分子的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纠正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彻底消除这些缺点，——这也就是把集体农庄的**经济**工作纳入正轨。

总之：

（一）正确地组织播种，——这就是任务。

（二）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农庄运动的经济问题上，——这就是解决这一任务所必需的手段。

载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真理报”第九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200◇

给工业学院第一期毕业生

培养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者出身的、能够在社会政治方面和生产技术方面领导企业的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干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不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使苏联由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由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变为电气化和金属的国家，变为机器和拖拉机的国家。

工业学院是我国培养这种干部的最重要的熔炉之一。

工业学院第一期毕业生是工业学院向我们敌人的营垒、向生产保守和技术落后的营垒射出的第一箭。

希望今天离开学院校门的新的工业领导者在实践中，在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建设速度方面，表现出发挥劳动热情和进行真正革命工作的榜样。

谨向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培养新的、有技术知识素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的工业学院的第◇201◇一期毕业生致敬。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载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一五号◇202◇

答姆·拉法伊尔同志

（列宁格勒，省工会委员会）

（抄致联共（布）省委员会书记基洛夫同志）

拉法伊尔同志！

因为时间不够，所以简单答复如下：

（一）今年三月中央反对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同布列斯特时期或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似的地方。那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政策上的转变。现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没有任何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制止了轻举妄动的同志，——仅此而已。因此，你的建立在类比上（虽然不完全如此）的一切推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集体农庄运动问题方面的政策上的转变（由于中农群众转向集体农庄）在我们这里确实有过，但不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而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政策上的这个转变的基础还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奠定的（见“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我已经说过，这个转变具有纯粹实践的性质是在一九二九年底。你一定知道，中央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著名决议中对新政策做了明文规定，并规定了苏联各种不同地区的集体农庄运动的速◇203◇度。事实证明，中央这个决议的每项条文都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在这里是不是有某种落后于运动进程的现象呢？我认为，既然这里指的是理论上的预见和制定相应的政治方针，那末这里是没有任何落后现象的。

不少党的队伍和个别中央委员在他们的实际政策中是不是有落后的现象呢？无疑是有的。不然在我们这里，无论在党内或中央内部，就不会有维护总路线和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了。

（三）执政党是否可能立即抓住生活中发生的新过程，同时立即把它们反映到自己的实际政策中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先有事实，然后事实反映在党的最先进的分子的意识中，只有在这以后，党员群众的头脑里才开始意识到新过程。你记得黑格尔的“米涅尔娃的猫头鹰只在夜间飞出来”这句话吗？换句话说：意识多少落后于事实。

在这方面，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政策上的转变同布列斯特时期和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转变之间的差别是：党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比在布列斯特时期和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更快地意识到客观现实中的新过程。这是因为党在这个期间进步了，它的干部变得更加敏感了。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204◇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

谨向农业机器制造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核心的全体人员祝贺胜利。你们的胜利是伟大的，因为单是你们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按最高计划每年就应当生产价值一亿一千五百万卢布的农业机器，而战前所有的九百个农业机器制造厂每年总共只生产价值七千万卢布的农业机器。

祝你们在完成这个计划方面获得成就。

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一六五号◇205◇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

谨向荣膺红旗勋章的苏联第一个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和领导人员致敬并祝贺胜利。你们每年应交给国家的五万台拖拉机，就是炸毁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并为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开辟道路的五万发炮弹。

祝你们在完成你们的计划方面获得成就。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

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六六号◇20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三六〕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自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两年半了。时间看来并不很长。但是，在这期间世界各民族和各国的生活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特征，那末可以称它为**转变**时期。不仅对我们苏联，而且对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个转变时期。但是，在这两个转变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对苏联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转向新的更大的经济**高涨**；而对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转变则意味着转向经济**衰落**。在我们苏联这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都是**日益高涨**。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经济**危机**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都是**日益增长**。

简括说来，目前形势的面貌就是这样。◇207◇

请回忆一下两年半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当时，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贸易都在增长，几乎所有农业国的原料和粮食的生产都在增长。当时，美国是最兴旺的资本主义国家，红极一时，人们高唱“繁荣”的胜利歌，拜倒在金元面前，赞美新技术，颂扬资本主义合理化。宣告资本主义“恢复健康”和资本主义稳定的坚不可摧的纪元到来。“普遍”叫嚣苏维埃国家“必定灭亡”，苏联“必定崩溃”。

昨天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工业国都发生了经济危机。现在，所有农业国都发生了农业危机。不是“繁荣”，而是群众的贫困和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不是农业高涨，而是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破产。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万能的幻想已在破灭。颂扬金元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胜利歌声愈来愈微弱了。关于资本主义犯“错误”的悲观的号叫愈来愈高了。而关于苏联“必定灭亡”的“普遍”叫嚣则代以必须惩治“这个国家”的“普遍”的狠毒的切齿声，因为这个国家在四周都发生危机的时候竟敢发展自己的经济。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在两三年前所说过的那样。

布尔什维克说过，在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技◇208◇术的发展，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发展，必不可免地会引起剧烈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报刊曾经嘲笑布尔什维克的“奇特预言”。右倾分子曾经表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预言，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空谈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实际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所说过的那样。

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具体材料。

一、世界经济危机

（甲）在研究这次危机的时候，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下列一些事实：

一、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量超过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这就是说，纺织品、燃料、工厂制品和食品的生产量超过基本消费者即人民群众能用现钱购买的数量，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

众的购买力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所以资本家为保持高昂的价格就把“多余”商品如纺织品、粮食等等堆积在仓库里甚或销毁，同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于是人民群众就因为商品生产过多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

二、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它所以是世界危机，不仅因为它遍及世界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工业**国，甚至不断把德国数十亿马克赔款注入自己机体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一定程◇209◇度的萧条，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种萧条一定会转为危机。它所以是世界危机，还因为**工业**危机是和**农业**危机同时发生的，而农业危机现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主要**农业**国的各种原料和粮食的生产方面了。

三、目前的世界危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它带有**普遍**性，但它袭击各国的时间和程度各不相同。工业危机最先开始于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去年它在那一带延续了整整一年。农业危机开始的明显的征象早在一九二八年底就在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显露出来了。在这整个时期美国的工业是上升的。到一九二九年中，美国的工业生产几乎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只是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才开始转变，接着就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工业生产危机，把美国抛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接着加拿大和日本发生了工业危机。随后中国和各殖民地国家也发生了破产和危机，在这些国家里，危机因银价下跌而日益加深，生产过剩的危机同已经被封建剥削和繁重捐税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经济的破坏交织在一起。至于西欧方面，那只是在本年初才开始发生危机，而且各国的程度也不一样，法国的工业生产在这个时期竟还有继续增长的表现。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地叙述一些证明危机存在的数字。关于危机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人争辩了。所以，我只引证一下德国“商情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个不大的但具有代表性的统计表。这个统计表表现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波兰以及苏联等国采矿工业和大型

加工工业的各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形。这个统计表从一九二七年算起，而以一九二八年的生产水平为一百。◇210◇

这个统计表如下：

年份 / 国别	苏联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波兰
1927年	82.4	95.5	105.5	100.1	86.6	88.5
1928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9年	123.5	106.3	107.9	101.8	109.4	99.8
1930年（第1季度）	171.4	95.5	107.4	93.4	113.1	84.6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首先，它说明美国、德国和波兰的大工业生产经受着**极明显的危机**，其中**美国**的生产水平经过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涨**以后，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百分之十点八，降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德国**的生产水平经过三年的**停滞**以后，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八点四，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六点七的程度；**波兰**在去年发生**危机**以后，生产水平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五点二，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三点九的程度。

第二、它说明**英国**已经有三年在老地方踏步不前，停留在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上下，经受着沉重的经济**停滞**，而且它的生产水平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已经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五，因而进入了◇211◇**危机**的初期阶段。

第三、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只有法国的大工业稍有**增长**，增长的百分数在一九二八年是十三点四，一九二九年是九点四，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仅仅比一九二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七，可见这里的增长曲线是逐年**下降**的。

最后，它说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苏联的大工业一直在**蓬勃发展**，而且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水平超过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

一倍以上，增长的百分数从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六提高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可见这里的增长曲线是逐年上升的。

有人会说，截至本年第一季度完结时的情况固然是这样，但本年第二季度的情况可能好转。然而第二季度的材料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测。相反地，这些材料说明第二季度的情况更加恶化。这些材料说明纽约交易所的股票更加下跌，美国的破产浪潮更加汹涌；说明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南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各国的生产日益缩减，工人的工资更加降低，失业人数日益增加；说明法国有许多工业部门已经进入停滞时期，这种停滞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下就是危机开始的征象。失业者现在美国有六百多万，德国约有五百万，英国有二百多万，意大利、南美和日本各有一百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各有五十万。更不用说，使千百万农场主和劳动农民陷于破产的农业危机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了。农业的生产过剩危机达到了这种地步：为了保持高昂的价格和资产◇212◇阶级的利润，巴西有两百万袋咖啡抛到海里，美国把玉蜀黍当煤炭烧，德国拿几百万普特黑麦喂猪，对于棉花和小麦则采取一切办法缩减播种面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一般情况。

（乙）现在，当世界经济危机扩大它的破坏作用，使整个整个的中小资本家阶层沉入水底，使整批整批的工人贵族和农场主陷于破产，使千百万工人群众挨饿的时候，大家都要问：危机的原因在哪里？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样和危机作斗争？怎样消灭危机？于是就有人编造了各种各样关于危机的“理论”。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整批整批“缓和”、“预防”和“消灭”危机的方案。资产阶级的在野党攻击资产阶级政府，说它们“没有采取一切办法”来预防危机。“民主党人”谴责“共和党人”，“共和党人”谴责“民主党人”，而双方又一致

谴责胡佛集团及其“联邦准备银行体系”〔三七〕未能“制止”危机。甚至有这样的聪明人，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诡计”。我指的就是有名的“工业家”列赫别尔格，老实说，他不大像一个工业家，倒很像著作家中的“工业家”或工业家中的“著作家”。（笑声）

很明显，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案都是和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危机面前完全破产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把他们前辈有时还表现过的那点起码的生活敏感都丧失无遗了。这些先生们忘记了，不能把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这些先生们忘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先生们忘记了，危机是随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213◇一百多年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在这个时期内，各种类型和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府，各种等级和各种才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毫无例外地都曾经试图用自己的力量“预防”和“消灭”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所以失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既然如此，那末现今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同样遭受失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措施实际上不是使危机缓和，不是使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状况改善，而是使破产现象日益厉害，使失业浪潮更加汹涌，使较弱的资本主义联合被较强的资本主义联合吞并，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资本家竭力保持在**最低限度**范围内。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

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走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能力的道路。但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千百万工农群众（归根到底他们是基本购买者）的购买力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由此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由此就产生了或长或短的周期性的人所共知的后果：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失业增长，工资降低，从而生产◇214◇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

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不用于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一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是这样。

但是在说明**目前的**危机的特征时还不能以此为限。不能把目前的危机看做过去的危机的简单重复。目前的危机是在某些新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必须弄清这些条件，才能看到危机的全貌。目前的危机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更加复杂和深刻。不弄清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对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这些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这些特殊情况归结为以下几件突出的事实：

一、危机特别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打击了资本主义的堡垒，即打击了集中着世界各国生产和消费量不下半数的美国。显然，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危机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展，不能不使危机尖锐化，并给世界资本主义造成许多额外困难。◇215◇

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因而使

困难加重，并且注定了经营积极性必然普遍低落。更不用说，工业危机将使农业危机更为严重，而农业危机又将使工业危机拖延下去，结果就不能不使整个经济危机深刻化。

三、现在的资本主义和从前的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尽管生产过剩，各种资本主义联合也必然要竭力设法保持商品的垄断高价。显然，这种情况使商品基本消费者人民群众因危机而特别痛苦，使他们遭到破产，因而不能不使危机拖延下去，不能不阻碍危机的消除。

四、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大战及其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日益繁荣，它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而且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示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基础。

其次，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和苏联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威信扫地；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216◇

再其次，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都出现并成长了本国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它们在市场上有成效地和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而使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

最后，这意味着：战争给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就是**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和已经由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些情况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给资本主义造

成许多困难，而在危机期间还必然会使情况更加复杂。

这就是使世界经济危机加深并尖锐化的各种情况。

必须承认，目前的经济危机是至今一切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危机。

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

世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尖锐化。

（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原料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现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旧的划分感到不满。他们看到力量对比起了变化，必须与此相适应地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势力范围等等。这些矛盾中主要的是美英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成品输出方面或是资本输出方面，斗争主要是在美英之间进行的。只要拿起任何一份经济方面的报纸，任何一份关于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文件看一下，就会相◇217◇信这一点。斗争的主要场所是南美、中国以及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自治领。这个斗争中的优势——而且是肯定的优势——是在美国方面。

除了这个主要的矛盾，还有许多非主要的但相当重要的矛盾，如美日之间、德法之间、法意之间、英法之间的矛盾等等。

毫无疑问，由于危机的日益发展，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一定会逐月逐日地激烈起来。

斗争的手段是：关税政策，廉价商品，低息贷款，重新部署力量和建立新的军事政治联盟，扩充军备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发动战争。

我讲过，危机已经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但是有一个部门没有被

危机波及。这个部门就是军事工业。尽管有危机存在，但是它还一直在发展。各资产阶级国家在疯狂地扩充军备和重整军备。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闲谈，而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唯一手段。

十分明显，在这种环境中，所谓的和平主义已奄奄一息，国际联盟正活活腐烂，“裁军方案”已堕入深渊，而海军裁军会议则变成革新和扩充海军的会议。

这就是说，战争危险将加速增长起来。

让社会民主党人去空谈和平主义，空谈和平，空谈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等等吧。社会民主党在德◇218◇国和英国执政的经验表明，和平主义不过是他们掩蔽准备新战争所必需的假面具而已。

（乙）**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将尖锐化。我所指的战败国主要是德国。毫无疑问，由于危机的爆发和市场问题的尖锐化，对德国的压迫将更加厉害，因为德国不仅是一个债务国，而且是一个极大的输出国。可以把战胜国和德国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描绘成一座金字塔，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摆着老爷架子坐在塔顶上，手里拿着写着“付款！”字样的杨格计划〔三八〕，德国被压在下面，已经筋疲力尽，但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执行偿付千百亿赔款的命令。你们想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罗迦诺精神”〔三九〕。如果以为这种情况对世界资本主义毫无影响，那就是丝毫不懂实际生活。如果以为德国资产阶级能在最近十年内付出二百亿马克，而身受“自己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会让德国资产阶级从他们身上榨取这二百亿马克而不发生激烈的战斗和震动，那就是发了疯。让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去假装相信会有这种奇迹吧。我们布尔什维克是不相信奇迹的。

（丙）**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经济危机的日益增长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作为主要销

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确，这种压迫已经达到极点。欧洲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和“自己的”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北非洲的殖民地正处于战争状态。“独立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被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集团执行着帝国主义阵营中自己主子的意志，彼此混战，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219◇

应当认为，诋毁俄国驻华使馆人员是破坏中国“和平和安宁”的罪魁的骗人胡说已经彻底破产了。无论在中国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没有俄国的使馆了；可是那里却有英国、日本、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使馆。无论在中国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没有俄国的使馆了；可是在彼此混战的中国军阀那里却有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军事顾问。那里早已没有俄国使馆了；可是那里却有英国、美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大炮、步枪、飞机、坦克和毒气。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看到的不是“和平和安宁”，而是受欧美“文明”国家资助和指使的最疯狂最带破坏性的军阀战争。我们看到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文明传播”工作的一幅十分耐人寻味的图画。只是不明白，这究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关系？

如果以为帝国主义者这样横行无忌不会受到惩罚，那就太可笑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来回答了他们。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中国从彻底破产和贫困中拯救出来，那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非洲等等，那末这些国家的有时带有民族解放战争形式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资产者老爷们打算把这些国家淹没在血泊里，依靠警察的刺刀，求助于甘地一类的人物。毫无疑问，警察的刺刀是一个靠不住的支柱。以前沙皇政府也曾经竭力依靠警察的刺刀，但是结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柱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末沙皇政府

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是结果也不过得到了狼狈的下场◇220◇而已。

（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并尖锐化。危机已经使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变本加厉。危机已经激起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新浪潮，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失业人数增多，使失业常备军扩大，使工资降低。这些情况当然使形势革命化，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推动工人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

因此，工人群众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幻想正在破灭和消失。自从有了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经验（破坏罢工、组织同盟歇业并枪杀工人），关于“生产民主”、“工业和平”、斗争的“和平方法”一类骗人的诺言，在工人听来已分明是一种恶意的嘲弄了。现在还能找到很多工人相信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欺骗宣传吗？有名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的工人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危险）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工人游行示威（抗议失业）〔四〇〕，都表明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抛弃了社会法西斯分子。经济危机将使工人中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幻想受到一次新的打击。在因经济危机而陷于破产和贫困之后，工人中间还相信“每个工人”有可能通过参加“民主化的”股份公司发财致富的人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用说，危机将给一切诸如此类的幻想以致命的打击。

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就是表示他们转向共产主义。实际情形也确实是这样。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的成就，有共产党员参加和领导的罢工浪潮，经济罢工转为共产党员所组织的政治抗议，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极热烈◇221◇的响应，——这一切都表明，工人群众认定共产党是能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唯一政党，是值得工人信赖的唯一政党，是可以而且值得跟着它去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唯一政党。这就是群众向共产主义方面的转变。这就是使我们各兄弟共产党变成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的保证。只是共产党员必须善于估计形势

和恰当地利用形势。各国共产党向资本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粉碎了所有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而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因而证明他们是站在正确道路上的。必须使他们永远坚定地站在这条道路上。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指望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并顺利地准备无产阶级迎接即将来临的阶级战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指望进一步扩大共产国际的影响，提高共产国际的威信。

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

说明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说明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

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

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222◇

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甲）上面我已经谈过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但除了这些矛盾以外，还有一种矛盾。我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诚然，不能把这种矛盾看做**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它瓦

解和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并且使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它是革命的堡垒，单是它的存在就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它阻碍组织新战争，阻碍重新瓜分世界，阻碍资本家去支配它的广大的国内市场，而这个市场特别在现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资本家尤其感到需要的。

由此就产生一种冒险袭击苏联和进行武装干涉的趋势，这种趋势一定会随经济危机的扩大而加强起来。

目前这种趋势的最明显的代表者是现今的资产阶级法国，它是博爱的“泛欧”计划〔四一〕的故乡，凯洛格公约〔四二〕的“摇篮”，世界一切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223◇

但是，进行武装干涉是吉凶难测的。这一点资产阶级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想，如果武装干涉进行得顺利，结局是苏联失败，那就好了。但是，如果结局是资本家失败，那怎么办呢？要知道，已经有过一次武装干涉遭到破产了。既然在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时进行的第一次武装干涉遭到破产，那末怎能保证第二次武装干涉不会同样遭到破产呢？大家都看到，现在布尔什维克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在国防准备上都强大得多了。而且又怎样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呢？他们不让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他们一定会反对武装干涉，并且一旦发生武装干涉，他们会打击资本家的后方。对苏联加强贸易联系岂不是更好吗？况且这连布尔什维克也并不反对。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和苏联继续维持和平关系的趋势。

这样，我们就看到两种因素和两种相反的趋势：

一、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这些都

是威胁苏联国际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保守党内阁和苏联绝交，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对苏联实行财政封锁，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权派对苏联进行“讨伐”，外国间谍组织我国专家进行暗害活动，组织如“连纳金矿”〔四三〕的某些职员所干的爆炸和放火等事件，谋害苏联使节（波兰），故意阻挠我国货物的出口（美国、波兰）等等。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这些都是巩固苏联国际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结◇224◇果是：中东铁路冲突事件顺利解决，和大不列颠恢复邦交，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加强等等。

苏联的外部状况是由这些因素的斗争决定的。

（乙）有人说，妨碍改善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联系的绊脚石是债款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讨债的理由，而是侵略分子鼓吹武装干涉的藉口。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而有充分根据的。在给予我们贷款的条件下，我们同意偿付一小部分战前债款，把它当做贷款的附加利息。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偿付债款。向我们多要一些吗？有什么理由？借用这些债款的是已经被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苏联政府是不能对沙皇政府的债务负责的，这难道还不知道吗？有人谈到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但是，“盟国”老爷们是根据什么国际法把贝萨拉比亚从苏联手中夺去，把它交给罗马尼亚的贵族去奴役呢？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和政府是根据什么国际义务进攻苏联，干涉苏联，掠夺苏联整整三年之久，致使苏联人民遭到惨重损失呢？如果这叫做国际法和国际义务，那末什么才叫做掠夺呢？（笑声，鼓掌。）“盟国”老爷们既然干出这种掠夺勾当，也就没有权利援引国际法和国际义务，这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有人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妨碍建立“正常”关系。

资产者老爷们为了防止宣传的有害影响，往往用“边防线”和“铁丝网”来把自己隔开，把看守“铁丝网”的光荣差使开恩交给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国。据说德国因为人家似乎不愿意委托它看守“边防线”和“铁丝网”而嫉妒。显然用不着证明，关于宣传的滥调并不是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理由，而是鼓吹武装干涉的藉口。既然◇225◇本国具有适于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生长的土壤，那末一个人要是不愿意成为可笑的人，又怎能把自己和这种思想“隔开”呢？沙皇政府也曾经企图把自己和布尔什维主义“隔开”，但是大家知道，没有能“隔开”。所以没有能隔开，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到处都在生长，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看来，除了中国、印度和印度支那以外再没有别的国家被更严地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隔开”了。结果怎样呢？不管有怎样的“边防线”，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在那里生长着，并且会继续生长，因为那里显然存在着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条件。这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资本家老爷们能设法把自己和经济危机、群众的贫困、失业现象、低微工资以及对劳动者的剥削“隔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他们那里也就不会有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了。但是，问题正在于一切坏分子都力图藉口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来为自己的软弱或无能辩护。

其次，有人说，绊脚石是我们的苏维埃制度、集体化、反富农斗争、反宗教宣传、对“学者”中的暗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别谢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资本奴仆的被驱逐。这未免太滑稽可笑了。原来他们不喜欢苏维埃制度。但是我们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呀。（笑声，鼓掌。）我们不喜欢的是他们那里有数千万失业者被逼得挨饿受穷，而一小撮资本家却占有亿万财富。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不干涉他国内政，那末也就不值得再提这个问题了，这不是很明显吗？集体化、反富农斗争、和暗害分子作斗争、反宗教宣传等等，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苏联工农不可剥夺的

权利。苏联宪法是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最彻底执行的。因此很明显，谁不愿意尊重我◇226◇国宪法，谁就可以走开，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至于别谢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那我们今后也仍然要把这种人当做对革命有害无益的废品抛掉的。让那些特别同情废物的人去抬举他们吧。（笑声）我们革命的磨盘磨得很好。它把一切有用的东西取出来交给苏维埃，而把废物抛掉。据说在法国巴黎的资产者中间，这种废品大有销路。好吧，那就让他们尽量输入吧。不错，这会使法国贸易平衡表进口项多少加重一点，而这是资产者老爷们始终反对的。但是这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我们还是不要去干涉法国内政吧。（笑声，鼓掌。）

妨碍苏联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这种“障碍”是臆造的“障碍”，是用来作为进行反苏宣传的藉口的。

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关系改善了，签订了许多有关贸易、技术援助等等的协定。其次，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苏联参加了凯洛格公约，依照凯洛格公约精神和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了世所共知的议定书，和土耳其签订了延长友好中立条约有效期限的议定书。最后，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尽管战争挑拨者屡次挑衅和冒险袭击，我们还是保住了和平，没有让敌人把我们卷入冲突。今后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任何人。（鼓掌）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这样。◇227◇

任务在于今后仍然要用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无比坚强的精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谈谈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与此相反，我国内部却呈现着国民经济**日益高涨**、失业人数**日渐减少**的景象。大工业成长起来了并加快了自己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巩固了。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大地扩大了。农业中的新力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成长起来了。两年前我国发生过谷物生产危机，当时的粮食收购主要是依靠个体经济，现在重心已经转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谷物危机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基本农民群众完全转到集体农庄方面了。富农的反抗被打破了。苏联的内部状况更加巩固了。

这就是目前苏联内部状况的一般情况。

现在让我们看看具体材料。

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甲）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包括林业、渔业等等在内的◇228◇**全部农业**总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为一百二十三亿七千万卢布，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六，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一，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农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可见整个农业的产值虽然增长较慢，但是在不断增长。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包括面粉工业在内的**全部**大小**工业**的总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为八十

六亿四千一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点五，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可见整个工业是在空前迅速地增长。

（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国全部**铁路货物周转量**为八百一十七亿吨公里，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点四，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至于新铁路的建设方面，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即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算起，铁路网长度已◇229◇经由七万六千公里增加到八万公里，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点七。

（丙）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内**中介贸易额**为一百（三百一十亿卢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流转额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点四，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流转额将为百分之二百零二，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一倍。

（丁）如果以我国所有**信贷机关**一九二七年截至九月三十日的**综合平衡表**上的数额为一百（九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而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点一，即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一倍。

（戊）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家总预算**为一百（六十三亿七千一百万卢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国家预算

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点七，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四点四，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预算增加一倍（一百二十六亿零五百万卢布）。

（己）我国**对外贸易额**（进出口）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庚）总括起来说，全部**国民收入**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增长的情形如下（按一九二六—一九二◇230◇七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民收入为二百三十一亿二千七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二百五十三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九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百八十五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国民收入，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应不低于三百四十亿卢布，即在一年内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可见在报告所涉及的三年内，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

如果注意到美国、英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就应当承认，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真正是**超记录的**。

二、工业化的成就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方向即遵循工业化的方向，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在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的比重增大的标志下，在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标志下

进行的。

（甲）从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来看，整个工业和整个农业的对比关系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变动情形如下：在战前，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农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农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农业的比重为百◇231◇分之五十一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工业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三，农业的比重则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七。

这就是说，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鼓掌）

（乙）从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商品**产值中的比重来看，工业所占的优势更加鲜明。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业的商品产值在国民经济的商品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商品产值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二，农业为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农业为百分之二十七点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工业将为百分之七十六，农业将为百分之二十四。

农业的情况所以特别不利，其原因之一就是农业带着小农和商品率很低的性质。同时很明显，这种情况必将随农业规模的扩大（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随农业商品率的提高而发生相当的变化。

（丙）但是，一般的工业发展情况还不能使人看到工业化速度的全貌。为了看到全貌，还必须弄清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对比关系的变动情形。因此，应当认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不断增大是工业化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232◇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全部**工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七，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三，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将为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业，而**只是**拿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包括工业一切基本部门的工业来看，那末，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日用品的生产的对比关系的情况就更好：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生产与日用品生产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七比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四点六比百分之五十五点四；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八比百分之五十二。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是在巩固和发展本国重工业的标志下进行的。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发展了并继续扩展着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我国的重工业。

三、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地位及其增长速度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进行的。但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工业化。我们需要的工业化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工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233◇的优势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营**部分，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

下面就是关于各个部分的基本投资和总产值增长情形的一些材料。

（甲）如果拿工业中各个部分的**基本投资**的增长情形来看，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营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资为十二亿七千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六亿一千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十亿四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四十二亿七千五百万卢布；**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资为六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六千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五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五千一百万卢布。

第一、这就是说，工业中公营部分的基本投资在这期间**增加了两倍**以上（即增加到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这就是说，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投资在这期间**减少了五分之一**（即减少到百分之八十一）。

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是依靠原有资本维持的，并且正在走向灭亡。

（乙）如果拿工业中各个部分的**总产值**的增长情形来看，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营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一百一十九亿九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234◇一百五十三亿八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百八十九亿零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二百四十七亿四千万卢布；**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四十亿四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三十七亿零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三十三亿八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三十三亿一千万卢布。

第一、这就是说，工业中公营部分的总产值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六点二）。

第二、这就是说，工业中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几乎**减少了五分之一**（即减少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业的产值，而只是拿**大**工业（即标准工业）的产值并按公营和私营两部分来观察，那末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的对比关系如下：公营部分在全国大工业的产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八点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三；私营部分在全国大工业的产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二点三，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零点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零点七。

由此可见，大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经走向灭亡。

很明显，“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在工业方面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成分◇235◇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取得胜利而解决了，彻底而确定不移地解决了。（鼓掌）

（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国营**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发展速度**的材料。如果以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这种工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总产值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八点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点八。

这就是说，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包括工业一切基本部门和全部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不能不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工业都不曾有过这样飞快的发展速度。

这种情况也就使我们有根据说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丁）某些同志对于“**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个口号抱着怀疑态

度。就在最近，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四四〕批准的五年计划是幻想。更不必说资产阶级论客了，他们一听到“五年计划”四个字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如果我们从五年计划在头两年的实行情况来看，那末实际情形怎样呢？五年计划最高方案执行情况的检查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它不仅说明我们能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而且还说明我们许多工业部门能在三年内甚至在两年半内完成五年计划。在机会主义◇236◇营垒中的怀疑分子看来，这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个事实是愚蠢的和可笑的。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石油工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出产价值九亿七千七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已经能够出产价值八亿零九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可见我们在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石油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在**泥炭工业**方面，按照五年计划规定，我们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得到价值一亿二千二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一亿一千五百万卢布以上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六。可见我们在两年半内，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泥炭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普通机器制造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二十亿五千八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十四亿五千八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可见我们在两年半至三年内就可以完成普通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农业机器制造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六亿一千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

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四亿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237◇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见我们在三年内，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农业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电器工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八亿九千六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五亿零三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可见我们在三年内就可以完成电器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空前发展速度就是这样。

我们正加速前进，将要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产量方面已经赶上了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说我国工业已经达到了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不，还远不能这样说。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混为一谈。我们有许多人竟把它们混淆起来，认为既然我们达到了空前的工业发展速度，那末我们也就已经达到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是根本不对的。

例如拿我国发展速度很高的电力生产来说吧。在电力生产方面，我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差不多使发电量增加到百分之六百，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发电量只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国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速度简直是空前的，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但是，如果拿这些国家电力生产◇238◇的发展水平（例如一九二九年的）来和苏联的发展水平比较一下，那末苏联的情况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苏联电力生产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但是，它在一九二九年的发电量只有六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千瓦时，而美国却有一千二百六十亿千瓦时，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亿二千八百万

千瓦时，德国有三百三十亿千瓦时，意大利有一百零八亿五千万千瓦时。

可见差别是很大很大的。

这样看来，就发展水平来说，我们比所有这些国家都落后。

例如再拿我国生铁的产量来说吧。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生铁产量为一百（二百九十万吨），那末我国生铁产量在三年内，即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万吨）。可见发展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从我国生铁生产的发展水平来看，并把苏联的生铁产量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比较一下，那末情况就很难令人满意。首先，我们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达到并超过战前生铁生产的水平。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如果不进一步加快冶金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至于我国和西方各国生铁工业的发展水平，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国的生铁产量为四千二百三十万吨，德国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万吨，英国为七百七十万吨，而苏联的生铁产量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终结时却总共只有五百五十万吨。◇239◇

可见差别是不小的。

这样看来，就生铁生产的发展水平来说，我们比所有这些国家都落后。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这一切说明：

（一）**不能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

（二）我国工业在发展水平方面远远**落后**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三）只有**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四）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鼓掌）

四、农业和谷物问题

上面我谈的是包括林业和渔业等等在内的整个农业的情况，没有把农业划分为几个主要部门来谈。如果从整个农业中抽出几个主要部门，例如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来看，那末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

（甲）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谷物播种**面积为一百，那末各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如下：一◇240◇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四点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二，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播种面积将达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一。

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缩减的事实。这种缩减并不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营垒中的那些无知之徒胡说的那样是由于谷物业的退化，而是由于七百七十万公顷的秋播作物（占苏联秋播作物的百分之二十）的遭灾。

其次，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谷物**总**产值为一百，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标准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九十点八，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四；而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达百分之一百一十。

这里同样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八年的谷物总产值的减少，这是因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秋播作物的遭灾。

至于说到谷物总产值中的**商品**部分（农村外的流转），那末情况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如果以一九一三年谷物产值中的商品部分为一百，

那末一九二七年的商品产值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五十八，而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至少将为百分之七十三。

由此可见，就谷物播种面积和总产值来说，我们只是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才达到并稍微超过战前◇241◇标准。

其次，由此可见，就谷物中的**商品**产值来说，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战前标准，而且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比这个标准差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这就是在一九二八年显得特别尖锐的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

这也就是谷物问题的根源。

（乙）**畜牧业**方面的情形大致也是这样，但具有更令人不安的征兆。

如果以一九一六年各种牲畜的头数各为一百，那末各年度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马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三，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三，猪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一九二八年，马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六，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五，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猪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一；一九二九年，马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九，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六，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八，猪为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马为一九一六年标准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牛为百分之八十九点一，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一，猪为百分之六十点一。

可见如果注意到最近一年的材料，那就可以看到畜牧业已经开始缩小的明显征象。

从畜牧业特别是肉类和脂油的**商品出产率**来看，情形更令人不安。如果以各年度的肉类和脂油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肉类和脂油的商品出产率如下：一九二六年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一九二七年◇242◇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九，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三十点四，一九二九年为百

分之二十九点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规模狭小而商品率低的畜牧业经济已经呈现出不稳固和经济上不可靠的明显征象。

这就是说，畜牧业在最近一年不是超过一九一六年的标准，而是有离开这个标准下降的明显征象。

这样一来，随着我们基本上已经在顺利解决的谷物问题之后，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肉类问题，其紧张性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亟待解决。

（丙）供给我国轻工业以原料的**技术**作物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情景。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技术作物**播种面积**为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一，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四，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一点四，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百一十七；**亚麻**，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九，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甜菜**，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六，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二，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八，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油料作物**，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九点四，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二百三十点九，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二百一十九点七，一九三〇年将不低于百分之二百六十。◇243◇

技术作物**总产值**方面的情形大体上也同样良好。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五，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八十二点八；**亚麻**，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六，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三；**甜菜**，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点四；**油料**

作物，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一点九，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九点八，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二百二十。

由此可见，如果不把一九二九年遭受螟虫灾害的甜菜收获量计算在内，那末技术作物业方面的情形是比较良好的。

然而，就是在这里，在技术作物业方面，由于小经济占优势，将来可能发生而且大概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动摇和不稳固，就像受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影响最少的亚麻和油料作物在上述数字中所反映的那种动摇和不稳固一样。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下列几个农业问题：

（一）如何保证技术作物区有足够的廉价粮食来稳定技术作物的生产状况；

（二）如何保证畜牧区有足够的廉价谷物和饲料来发展畜牧业并解决肉类问题；◇244◇

（三）如何彻底解决当前农业中的主要问题——谷物问题。

可见谷物问题是农业系统中的基本环节，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

可见解决谷物问题是解决农业的其他许多问题的首要任务。

但是，解决谷物问题，从而把农业引上蓬勃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要根本消灭农业的落后状态，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装备农业，供给它新的科学工作干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商品率。没有这些条件就休想解决谷物问题。

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实现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小农经济无力采用和掌握新技术，无力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力充分增加农业的商品率。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扩大**农业**规模**，建立以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农庄。

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它只能够而

且只应该建立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社会主义**型的大农庄。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是这样的农庄。

由此就产生了建立国营农场和把个体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大农庄的任务，这是解决一般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的**唯一**道路。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发生严重的粮食困难以后，党在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必须指出，我们党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还没有发生严重的粮食困难的时候，就已经◇245◇把这个根本问题作为实践任务提到日程上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人所共知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

“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四五〕

再援引一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有关的一段话也许不是多余的，这段话同样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根据集体化原则消灭农业落后状态的问题。请看报告中是怎样说的：

“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协作的集体的播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四六〕

五、农民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速度

农民向集体化方面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开始的。这个转变也不能一

下子开始。固然，党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集体化的口号。但是要使农民大批转向社会主义，仅仅宣布口号还不够。◇246◇要达到这个转变，至少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农民群众自己相信党所宣布的口号是正确的，并且当做自己的口号来接受它。所以，这个转变是逐渐准备起来的。

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我国发展的整个进程，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个进程，首先是供给农业各种机器和拖拉机的工业的发展。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对富农坚决斗争的政策，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以新方式进行的、使富农经济受到贫农和中农群众监督的粮食收购工作的进程。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使个体农民习惯于集体经营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集体农庄网的建立，农民从那里检验了集体经济形式对个体经济的优越性。最后，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分布于全苏联的、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网的建立，农民从这里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优越性。

如果把我们的国营农场只看做粮食泉源，那就错了。其实，国营农场和它的新技术，它对周围农民的帮助，它的空前的经营规模，是促使农民群众转变并推动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领导力量。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的、在我国生活中开辟了一个大转变时期的有千百万贫农和中农参加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并领导这个运动，中央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中央采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建立和资助国营农场；建立和资助集体农庄；以及组织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生产，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等等把这些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

（甲）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要在三四年内建立一批**新国营农**◇247◇**场**，要它们在这一期限终结时至少能出产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后来这个决定经中央全会批准了。当

时就成立了谷物托拉斯来负责执行这个决定。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巩固**原有国营农场**并扩大其播种面积的决定。当时成立了国营农场管理总局来负责实施这个决定。

不能不指出，这些决定曾经遭到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当时有人说，投入国营农场的钱是“白扔了的”钱。同时，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所支持的“学者们”也批评说，建立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是办不到的和荒谬的。但是，中央不顾一切仍然执行了自己的路线，并把它贯彻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资助国营农场拨出了六千五百七十万卢布（周转性短期贷款除外）。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拨出了一亿八千五百八十万卢布。最后，本年度拨出了八亿五千六百二十万卢布。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交给国营农场使用的拖拉机有一万八千台，共计三十五万匹马力。

这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谷物托拉斯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五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一百零六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四百五十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九百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即在五年计划期末，将达一千四百万公顷。**国营农场管理总局**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四十三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十六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一百八十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二百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二百五十万公顷。**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248◇年度为十七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二十八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五十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七十二万公顷。**糖业总局**的播种面积（谷物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七十八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十二万公顷，一九三〇—一

九三一年度将达八十六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九十八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九十九万公顷。

第一、这就是说，到五年计划期末，仅仅谷物托拉斯的谷物播种面积就将**等于**全阿根廷现有的谷物播种面积。（鼓掌）

第二、这就是说，到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总和，要比全加拿大现有的谷物播种面积**多**一百万公顷。（鼓掌）

至于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和**商品**谷物产量，那末各年度的变动情形如下：全国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九百五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六百四十万公担；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千二百八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七百九十万公担；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达二千八百二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将为一千八百万公担（一亿零八百万普特）；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七千一百七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将为六千一百万公担（三亿七千万普特），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党建立国营农场的政策已经取得的和预期的成果。

◇249◇

按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新国营农场的决定，我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应当从新建的国营农场至少取得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但实际上我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单是从新建的国营农场就能取得二亿普特以上。结果超额完成计划一倍。

原来那些嘲笑过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的人是把他们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顿。

按照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各系统的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应为五百万公顷。但实际上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今年已达三百八十万公顷，而明年即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度将达八百万公顷。

这就是说，我们将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国营农场建设的五年

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应为五千四百三十万公担。但实际上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今年已达二千八百二十万公担，而明年将达七千一百七十万公担。

这就是说，在谷物总产量方面，我们将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现在让那些资产阶级论客及其机会主义应声虫们去胡说什么不能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国营农场建设的五年计划吧。

（乙）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情况就更好。

早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就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如下决定：◇250◇

“坚定不移地实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这种集体经济是建筑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它无论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从保证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方面来说，都是高级形式的谷物经济。”（见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会“关于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四七〕

后来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专门决议〔四八〕都肯定了这个决议。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农民开始根本转向集体农庄，大批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专门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

（一）确认**农民已经大批转向**集体农庄，并且有可能在一九三〇年春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

（二）确认**以集体农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其

他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宣布必须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三）预计按公有化原则耕种的播种面积在一九三〇年春就将**大大超过三千万公顷**；

（四）把苏联分为三类地区，并规定**每类地区**基本上完成集体化的**大致期限**；

（五）**改变土地规划方法**以利于集体农庄，并改变资助农业的方式，规定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251◇度至少给集体农庄五亿卢布贷款；

（六）确定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劳动组合形式**为当前**集体农庄制度的基本环节**；

（七）驳斥了党内那些藉口机器和拖拉机不够而企图阻挠集体农庄运动的机会主义分子；

（八）最后，警告党的工作人员要防止集体农庄运动中可能发生的过火行为，避免用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来建立集体农庄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会造成以集体化儿戏代替真正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威胁。

应当指出，中央的这个决议受到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极端敌视。有些人议论纷纷，说中央陷入幻想，说中央把人民的金钱“滥花”在“不存在的”集体农庄上去。右派分子洋洋得意，预言我们“必定”失败。但是，中央不顾一切，既不顾右派的庸俗嗤笑，也不顾“左”倾分子的急躁和狂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自己的路线，并把它贯彻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资助集体农庄拨出了七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拨出了一亿七千万卢布，本年度则拨出了四亿七千三百万卢布。此外，又拨出了六千五百万卢布作为集体化基金。规定了优待集体农庄的办法，结果使集体农庄的财力增加了二亿卢布。

把剥夺富农的价值四亿多卢布的产业交给了集体农庄。交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拖拉机不下三万台（共计四十多万匹马力），此外，还有拖拉机管理总局的七千台拖拉机为集体农庄服务，国营农场系统也用拖拉机帮助集体农庄。今年贷给和帮助集体农庄的种子有一千万公担（六千一百万普特）谷物。最后，在建立机器◇252◇马匹站方面也给了集体农庄直接的组织上的帮助，这种机器马匹站已经有七千处以上，使用的马不下一百三十万匹。

这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一九二七年为八十万公顷，一九二八年为一百四十万公顷，一九二九年为四百三十万公顷，一九三〇年包括春季播种面积和秋季播种面积至少为三千六百万公顷。

第一、这就是说，三年来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增加到四十倍以上。（鼓掌）

第二、这就是说，现在我国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相当于**法意两国播种面积的总和。（鼓掌）

至于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及其**商品**部分，那末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集体农庄出产了四百九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二百万公担；一九二八年出产了八百四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三百六十万公担；一九二九年出产了二千九百一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一千二百七十万公担；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出产二亿五千六百万公担（十五亿五千万普特），其中商品部分至少将为八千二百万公担（五亿多普特）。

必须承认，在一般说来发展速度相当快的我国工业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未曾有过像集体农庄建设的这样空前的发展速度。

所有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

首先，它们说明，三年来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增加到五十倍以上，其中商品部分增加到四十倍◇253◇以上。

第二、它们说明，我们今年有可能从集体农庄方面取得占全国商品谷物产量**一半以上**的商品谷物。

第三、它们说明，今后决定农业及其基本问题的命运的不再是个体农民经济，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第四、它们说明，我国消灭富农阶级的过程正在极其迅速地进行。

最后，它们说明，国内已经发生的经济变动使我们有充分根据肯定说，我们使农村走上了新的道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顺利进行。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决议中规定，到一九三〇年春按公有化原则耕种的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应为三千万公顷。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千六百万公顷。结果超额完成了中央的计划。

原来那些嘲笑过中央的决定的人是把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顿。无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或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都没有给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空谈家帮了什么忙。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应为二千零六十万公顷。而实际上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今年已达三千六百万公顷。

这就是说，我们在两年内就已经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五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以上。（鼓掌）◇254◇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应为一亿九千零五十万公担。而实际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今年就将达二亿五千六百万公担。

这就是说，我们在两年内就将超额完成集体农庄谷物产量五年计划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计划两年完成！（鼓掌）

现在让那些机会主义的长舌妇去胡说什么不能在两年内完成并且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五年计划吧。

六、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

由此可见，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社会主义部分蒸蒸日上的发展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从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已经为根本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呢？怎样奠定的呢？

第一、因为社会主义部分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城乡剥削成分的缩减，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下降。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必然因剥削阶级收入的减少而增加。

第二、因为在公营（社会主义）部分增长的条件下，先前用于供养剥削阶级及其奴仆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今后必将留在生产内部，用于扩大生产、建设新工厂、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就是说，工◇255◇人阶级的人数和力量必将增加，而失业现象必将减少以至消失。

最后，因为公营部分的增长既然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也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工人和农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是说，国内市场的发展将要超过工业的发展，并推动工业向前发展，使它不断扩大。

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使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不断改善。

（甲）首先谈谈工人阶级**人数增多**和**失业人数减少**的问题。

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失业者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一千零九十九万人，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一千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千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至少为一千三百一十二万九

千人。其中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和季节工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七百零六万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七百四十万四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人。其中大工业的工人（职员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百四十三万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二百六十三万二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百八十五万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三百零二万九千人。

这就是说，我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三年来雇佣劳动者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五，体力劳动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产业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二。◇256◇

现在谈谈**失业**问题。应当说，在这方面无论劳动人民委员部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都搞得非常混乱。

一方面，根据这两个机关的材料看来，我国约有一百万失业者，其中具有起码的熟练程度劳动者占百分之十四点三，而百分之七十三左右是所谓脑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并且后者中绝大多数是和工业生产没有发生过关系的妇女和少年。

另一方面，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我们又异常缺乏熟练的劳动力，劳动介绍所只能满足我们各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因而我们不得不急速地、匆忙地训练毫不熟练的人，把他们培养成熟练工人，以满足我们各企业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需求。

请试试弄清这笔糊涂账吧。不过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这些失业者既不是我国工业的失业**后备**军，更不是我国工业的失业**常备**军。结果怎样呢？甚至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看来，最近失业人数也已经比去年**减少**七十多万人。这就是说，截至本年四月三十日止，失业人数已减少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这就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部分增长的又一成果。

（乙）如果从国民收入按阶级分配的情形来看，那末成果就要显

得更加惊人。国民收入按阶级分配的问题，对于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说来，是一个根本问题。无怪乎德国、英国、美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把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以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时常发表一些这方面的◇257◇“完全客观的”调查资料。

根据全德统计局的材料，一九二九年德国国民收入中工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资产阶级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根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材料，一九二三年美国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强，资本家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五强。最后，根据经济学家鲍莱和斯坦姆的材料，一九二四年英国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收入的比重稍低于百分之五十，资本家收入的比重稍高于百分之五十。

当然，不能相信这些调查的结论。所以不能相信，是因为在这些调查材料中除了纯经济方面的错误以外，还有另一种错误，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隐瞒资本家的收入，把它说少一些，另一方面夸大工人阶级的收入，把它说多一些，并且把那些领取高薪的官吏也算在工人里面。至于这些调查资料往往不把农场主和一般农业资本家的收入计算进去，那就更不用说了。

瓦尔加同志对这些材料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原来工人和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德国为百分之五十五，在美国为百分之五十四，在英国为百分之四十五，资本家收入的比重在德国为百分之四十五，在美国为百分之四十六，在英国为百分之五十五。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苏联的情况又怎样呢？◇258◇

请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

（甲）我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农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其中城

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其中城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七十七点一（其中城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乙）**富农和城市资本家**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八点一，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六点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八。

（丙）**手工业者**（其中大部分是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六点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五点四，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四点四。

（丁）**国家部分**（其收入就是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收入）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八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十，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十五点二。

（戊）最后，所谓**其他方面**（指抚恤金）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一点五。

由此可见，**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剥削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约为**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而在我们这里，**在苏联，剥削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不超过百分之二**。◇259◇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惊人事实：据美国资产阶级著作家**邓尼**说，美国在一九二二年，“私有者的百分之一掌握了全部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五十九”，而英国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度，也是据**邓尼**说，“全部私有者中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占有了全部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见邓尼“美国在征服不列颠”）。

在我们苏联，在苏维埃国家里能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显然不能。苏联早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私有者”。

可是，既然苏联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只有将近百分之二的

国民收入落入剥削阶级手中，那末其余大量的国民收入到哪里去了呢？

很明显，这部分收入是留在工人和劳动农民手中。

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它在千百万工农群众中的威信的泉源就在这里。

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福利不断增进的基础就在这里。

（己）根据这些决定性的事实，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什么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提高，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预算不断增加，对贫农和中农的帮助不断加强，用于建筑工人住宅、改善工人生活、妇婴保健工作的经费不断增多，因此，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减低而苏联人口不断增加。

例如大家知道，工人的**实际工资**（社会保险费和从利润中拨做改善工人生活的基金也计算在内）已经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最近三年来，仅仅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预算一项，就从一九◇260◇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九亿八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十四亿卢布。最近三年来（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妇婴保健工作的经费为四亿九千四百万卢布。学前教育（幼儿园、露天幼儿园等）经费在同一时期为二亿零四百万卢布。工人住宅的建筑经费为十八亿八千万卢布。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大大增加实际工资所必需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再不能把实际工资提得更高了。如果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应当归咎于我们一般供应机关的官僚主义，首先和特别是消费合作社的官僚主义。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国内商业中的公营部分在批发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在零售方面占百分之八十九以上。这就是说，合作社不断排挤私营部分而成为商业方面的垄断者。这当然很好。但不好的是，这种垄断在若干情形下是对于消费者有害的。原来合作社虽然在商业方面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它们宁愿供应工人以“收入”较多即利润优厚的商品（服饰品

等等），不去供应工人以“收入”较少而为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农产品）。因此，工人需要的农产品约有百分之二十五不得不多花钱到私人市场去买。更不必说，合作社机关最关心的是平衡表，因此即使中央领导机关发下极严厉的指令，但它们还是迟迟不减低零售价格。可见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像社会主义经济，而像一种沾染了某种耐普曼习气的特殊经济。既然合作社不执行认真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任务，试问，谁需要这样的合作社，它的垄断对工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虽然如此，在我国，实际工资还是逐年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我国制度、国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和工◇261◇资方面的整个方针是有可能抵销和弥补合作社所造成的种种缺陷的。

此外，如果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如提高公共饮食业的作用、减低工人住宅费用、设立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巨额助学金、举办文化服务等等，那就可以大胆地说，工人工资增加的百分数比我们某些机关的统计数字要大得多。

把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再加上八十三万多产业工人（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三点五）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一百五十多万产业工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三点四）改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再加上为工人广泛设立的休养所、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最近三年来有一百七十多万工人在这里休养过），——所有这一切都为工人阶级造成了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使我们有可能培养出身强力壮、愉快活泼、能把苏维埃国家的威力提到应有的高度、并能挺身保卫它使它不受敌人侵犯的新的一代工人。（鼓掌）

至于对农民的帮助，无论是对个体农民或对集体农民的帮助（包括对贫农的帮助），最近三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在信贷和国家预算方面至少拨出了四十亿卢布。大家知道，在这三年内，仅仅种子帮助一项，拨给农民的谷物就不下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

无怪乎我国工人和农民一般都生活得不坏，一般人口死亡率比战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儿童死亡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我国人口**每年增加**约三百万人。（鼓掌）

至于工人和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那末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些成绩的。但是这些成绩很小，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满意。如果不算各种工人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图书馆和今年有一千零五十万人参加的◇262◇识字班，那末文化教育事业的情况如下：本年度初等学校学生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万八千人，中等学校学生有一百九十四万五千人，工业技术学校、交通学校、农业学校和普通生产技术训练班学生有三十三万三千一百人，中等专业学校和同等程度的职业学校学生有二十三万八千七百人，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学生有十九万零四百人。这一切就使苏联识字人数的百分数能够由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六。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过渡到初等普遍义务教育。我所以说这是“主要问题”，是因为这种过渡是文化革命方面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而向这方面过渡的时机早已成熟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具有在苏联各个地区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一切必要条件。

在过去，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约”，以“挽救和恢复重工业”（列宁）。但是，最近我们已经恢复了重工业，并且正在把它向前推进。因此，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当着手彻底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时候了。

我认为，如果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个肯定的、十分坚决的决定，那是完全正确的。（鼓掌）

七、增长中的困难，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

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的成就。我已经讲过在工业

方面、农业方面以及在按社会◇263◇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方面的成就。最后，我还讲过在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成就。

但是，如果以为这些成就是我们“轻而易举、平平稳稳”取得的，是所谓自流产生的，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聚精会神，不经过斗争和震动，那就错了。这样的成就是不会自流产生的。事实上，这些成就是我们在和困难作坚决的斗争中，在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严重而长期的斗争中取得的。

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困难。但不是人人都了解这些困难的性质。然而困难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是有极重大意义的。

我们的困难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困难的后面隐藏着哪些敌对力量，我们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甲）在说明我们的困难时，至少应当注意到下面一些情况。

首先，必须估计到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改造**时期的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些困难和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的困难根本不同。恢复时期的问题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工厂和在农业原有基础上帮助农业，而目前的问题是要根本改建，改造工业和农业，改变它们的技术基础，用现代技术去装备它们。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改建国民经济的整个技术基础。这就需要大量增加国民经济的投资，需要有能掌握新技术并且能推进新技术的较有经验的新干部。

第二、应当注意到，在我国改造国民经济不仅限于改建它的技术基础，同时还要改变社会经济关系。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农业。在已经联合起来并实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方面，技术改造基本上已经◇264◇具备现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改造的任务就是加紧排挤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农业方面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改造农业的技术基础当然也是追求同样的目的。但是我国农业的特点是：小农经济仍占优势，小经济不可能采用新技术，因此，不同时改变旧的社会

经济结构，不把个体小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不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就**不可能**改建农业的技术基础。

显然，这些情况不能不使我们的困难复杂化，不能不使我们克服这些困难的工作复杂化。

第三、应当注意到，我们在国民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既然是要割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并打倒旧世界的一切势力，也就不能不引起这些势力的拼命反抗。大家知道，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我国工业各部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进行的恶毒的暗害活动，在农村中**富农**反对集体经济形式的凶暴斗争，机关中那些充当阶级敌人代理人的**官僚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的怠工行为——这就是我国的垂死阶级现时的主要反抗形式。很明显，这些情况是不能有助于我们改造国民经济的工作的。

第四、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垂死阶级的反抗并不是脱离外界而孤立进行的，而是受资本主义包围支持的。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行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帝国主义世界不愿意让苏◇265◇联站稳脚跟并有可能赶上以至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们就援助苏联内部的旧势力。很明显，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助于我们的改造工作。

但是要全面说明我们的困难，还必须注意一种情况。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困难的特殊性。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现在正经受着危

机即经济衰落。在英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滞**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经有好几年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滞，而是我国力量的**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国经济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顷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在我国当人们谈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困难不是因细小和偶然的“毛病”而引起的困难，而是阶级斗争引起的困难。◇266◇

第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困难后面隐藏着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困难由于我国的垂死阶级拼命反抗，由于这些阶级得到外援，由于我们自己的机关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党员缺乏信心和因循守旧而复杂起来。

第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打退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镇压他们的反抗，从而为迅速前进扫清道路。

最后，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所以困难的性质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镇压阶级敌人所必要的**可能性**。

但是要利用这些**可能性**并把它们变成**现实**，要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和克服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向资本主义分子的**全线进攻**，并且孤立我们自己队伍里的阻碍进攻、张皇失措、在党内散布不相信胜利的思想的机会主义分子。（鼓掌）

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总之，**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这就是我们在开展**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时所面临的任务。◇267◇

党正是这样了解自己的使命的，它组织了向我国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

（乙）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一般是否可以举行进攻并且是全线进攻呢？

有些人以为进攻是和新经济政策抵触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退却，退却既然终止，新经济政策就应当废除。这当然是蠢话。这种蠢话或者是来自根本不懂列宁主义、竟想“一下子”“废除”新经济政策的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是来自同样根本不懂列宁主义、竟想以“新经济政策有被废除的危险”的胡说来作为拒绝进攻的藉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如果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列宁就不会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当我们最彻底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退却终止了”。列宁在谈到退却终止的时候不是同时又声明我们打算“认真而长期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吗？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什么新经济政策和进攻抵触的胡说是多么荒谬了。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分子。我们转入全线进

攻时还不废除新经济政策，因为私营商业和资本主义分子还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转还存在；但是，我们确实正在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开展它的下一阶段即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268◇

请看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所说的话：

“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实行改编、调整、改组，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把这一切行动进行得有条不紊，就应当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不是三思而是百思而后行。”（“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页）

看来是很清楚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转入进攻的时候是否已经到了呢？进攻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呢？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在一九二二年说过，必须：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四三页）

但是这里还是这个问题：这样加速前进、加快我国发展速度的时候是否已经到了呢？我们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转入决定性的全线进攻，时机选择得是否正确呢？

党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

是的，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269◇

是的，转入全线进攻的时机，党是选择得正确的。

工人阶级积极性的不断增长和党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空前提高说明了这一点。

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增长和这些群众向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根本转变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工业发展方面以及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不仅有可能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而且还能够超过富农生产几倍，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谷物问题并贮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后备，把生产商品谷物的重心从个体生产方面转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方面，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切都证明，转入全线进攻和宣布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的时机，党是选择得正确的。

如果我们听从了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如果放弃了进攻，减缓了工业的发展速度，延迟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并以个体农民经济为基础，那会怎样呢？

我们就一定会破坏我国工业，断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落得没有粮食而为富农的横行扫清道路。我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如果我们听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话，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展开进攻，那会怎◇270◇样呢？

我们就一定会在这次进攻中遭到失败，暴露出自己的软弱，加强富农和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的阵地，把中农推入富农的怀抱，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落得没有粮食。我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结果都是一样。

无怪乎我国的工人说：“向‘左边’走，却到了右边。”（鼓掌）

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进攻中主要的是高压手段，如果不强化高压手段，那就没有进攻。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这当然是不对的。

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但它是辅助的，不是主要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进攻中主要的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加快从经济上排挤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速度，动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动员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你们尽可以逮捕并流放几万几十万富农，但如果你们不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速建立新的经济形式，用新的经济形式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破坏并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经济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那末富农终究还会复活和生长起来的。

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进攻就是一味前进，不必做相当的准备，不必在进攻进程中重新部署力量，不必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不必利用后备力量来扩大胜利，如果出现了某些现象，例如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那就是说“革命退潮”了，运动低落了，进攻中止了。◇271◇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这当然是不对的。

第一、任何一次进攻，即使是最顺利的进攻，也不免在战线的个别地段稍被突破和略为冒进。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说进攻中止了或进攻失败了，那就是不懂进攻的实质。

第二、过去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顺利的**进攻可以不必在进攻进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可以不必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可以不必利用后备力量来扩大胜利并把进攻进行到底。如果一味前进，就是说不遵守这些条件，进攻就必然遭到挫折和失败。一味前进就是置进攻于死地。我们国内战争的丰富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革命退潮”通常是在运动**低落**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在运动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包括工

业建设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我国全部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我国革命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怎能把这两者加以类比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丙）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动员群众提高阶级警惕性和革命积极性去反对我国的资本主义分子；动员群众发挥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去反对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埋没了蕴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组织群众竞赛和掀起群众劳动高潮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272◇

其次，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改造工会、合作社、苏维埃以及其他各种群众组织的全部实际工作以适应改造时期的需要；在这些组织里建立由最积极最革命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核心，排挤和孤立机会主义分子、工联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驱逐这些组织中的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从下面提拔新的工作人员。

再其次，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尽量动员资金投入我们的工业，投入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调派优秀党员去开展这一切工作。

最后，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动员党本身去组织进攻的全部工作；巩固和砥砺党组织，驱逐官僚主义分子和蜕化分子出党；孤立和排挤脱离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分子，把真正的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

这就是目前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基础。

党是怎样实现了这个进攻计划的呢？

你们知道，党最彻底地实现了这个计划。

首先，党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批评**，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建设工作的缺点上，集中在我们各组织和各机关的缺点上。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布必须加强自我批评。一方面，揭露出党的个

别环节缺乏革命嗅觉的沙赫特事件和各工业部门中的暗害活动，另一方面，反富农的斗争和我们农村组织中所暴露的缺点，这一切进一步推动了自我批评的开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273◇的公告〔四九〕中最终地确定了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号召党和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不顾情面地”展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党摈弃了来自敌对营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削弱苏维埃政权力量的托洛茨基主义“批评”，宣布自我批评的任务就是无情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大家知道，党的号召得到了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极热烈的响应。

其次，党组织了广泛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提出了把异己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从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的口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关于提拔工人参加国家机关和吸收广大工人监督苏维埃机关（工厂自愿辅助运动）的著名决议〔五〇〕就是这个运动的继续。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激起了工人群众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加深了，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党，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通过决议要求入党。最后，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我们的组织清除了许多保守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摆脱了旧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其次，党在各工厂组织了广泛的社会主义**竞赛**，掀起了群众性的**劳动高潮**。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竞赛的号召把这件事情引上了轨道。突击队正在把它向前推进。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它所领导的青年工人，使竞赛和突击运动不断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革命青年在这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现在已经毋庸怀疑，各工厂的社会主义竞赛，几十万工人的相互报告在竞赛方◇274◇面所获得的成绩，**突击运动**的广泛开展，即使不是目前我国建设事业中的最重要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群众心理上和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根本改变了我们工厂的面貌。不久以前，在我们这里还有人说什么竞赛和突击运动是“臆造”的，“没有根据”的。现在这些“聪明”人甚至不值一笑了，他们简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聪明人”。现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已经争得的和已经巩固的事情。我国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已经有两百多万，而参加突击队的工人也不下一百万，这都是事实。

竞赛中最突出的地方是：竞赛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使过去被认为是可耻而沉重的负担的劳动变为**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收地租，靠利息生活，不从事劳动，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情。相反地，在我们苏联，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能够成为备受千百万劳动者尊敬的劳动英雄，突击英雄。

竞赛中应当认为同样突出的一个事实是：竞赛在农村中也开始展开了，它已经把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席卷进去了。无数的事实都表现出千百万国营农场工作人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真正劳动热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两年前谁能想到竞赛和突击运动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呢？◇275◇

再其次，党动员了国家的财力来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供给国营农场许多优秀的组织者，派出两万五千名先进工人去帮助集体农庄，提拔了集体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担任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开办了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训练班，从而为培养坚定而有经验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干部奠定了基础。

最后，党按战斗规范整编了自己的队伍，重新武装了报刊，组织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当头击溃了右倾分子，孤立了调和分子，从而保证了为顺利进攻所必需的党的队伍在列

宁路线基础上的统一，而且正确地领导了进攻，制止了右派营垒中的渐进论者以及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左”倾过火分子，并把他们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这些就是党为进行全线进攻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大家都知道，这场进攻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获得了胜利。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克服我国国民经济改造时期的许许多多困难。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胜利地克服我国建设中的最大困难——使基本农民群众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困难。

外国人有时探听苏联的内部状况。但是，苏联的内部状况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请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吧，看看这些国家里危机和失业的增长，看看这些国家里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看看这些国家里的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试问这些国家的内部状况怎能和苏联的内部状况相比呢？◇276◇

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稳固的政权。（鼓掌）

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苏联内部状况的面貌。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状况的面貌。

于是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两种状况加以对照和比较，那末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报刊，从明显的资本主义报刊到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报刊，都在异口同声地叫喊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苏联的“灭亡”，苏联“财政经济的破产”等等。

那末，在分析了我们苏联的状况和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让我们举出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主要事实吧。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经济**危机**和生产**衰落**。

在我们苏联这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都是经济**高涨**和生产**发展**。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工人的工资日益**减少**，失业人数日益**增多**。

在我们苏联这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工人的工资日益**增加**，失业人数日益**减少**。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罢工和游行示威日益**增多**，以致**丧失了**千百万个工作日。◇277◇

在我们苏联这里，没有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不断**高涨**，给我国**增加了**千百万个额外工作日。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内部状况**尖锐化**，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日益**增长**。

在我们苏联这里，内部状况**稳固**，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民族问题**尖锐化**，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增长**并转变为**民族战争**。

在我们苏联这里，民族友爱的基础日益**巩固**，民族**和睦**有保障，千百万苏联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人们**张皇失措**，情况日益**恶化**。

在我们苏联这里，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情况日益**改善**。

有人在空谈什么苏联的“灭亡”，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等等。要是说那些如此“突然地”落入经济危机漩涡而至今还未能爬出衰落泥沼的人必然灭亡，岂不更正确吗？

为什么他们资本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而我们苏联却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呢？

有人说，国民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资本的多寡。这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和苏联呈现高涨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多，他们的资本少吗？不，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苏联的资本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得多。如果这里问题**决定于**积累的情况，那末我们就应当发生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278◇却应当呈现高涨了。

有人说，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取决于经济工作干部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才能。这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和苏联呈现高涨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干部少，我们的技术干部多吗？不，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在技术上有经验的干部比我们苏联多得多。我们从来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学生，而首先和主要是美国人的学生。不，这里问题并不决定于技术干部的多寡，虽然干部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许问题的答案是我国的文化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吧？也不是。谁都知道，我国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比美国、英国和德国低。不，问题不在于人民的文化水平，虽然文化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莫大的意义。

也许这里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个人才干吧？也不是。危机是随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既然如此，胡佛及其集团也遭到失败又有什么奇怪呢？不，这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279◇

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苏联虽然文化落后，资本不足，缺少技术熟练的经济工作干部，但它却处在经济日益**高涨**的状态，并且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充足，技术干部很多，文化水平比较高，但是，他们却处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状态，并且在经济发展方面**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制度**和资本家的经济**制度不同**。

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合理**。

原因在于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

什么是苏维埃经济制度呢？

苏维埃经济制度就是：

（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

（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

（三）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280◇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

（五）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然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

（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人民做工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

（一）国家政权属于资本家；

（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剥削者手里；

（三）生产所服从的不是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原则，而是保证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原则；

（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而是为了保证剥削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五）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生产迅速**发展**是以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因而不免要受到千百万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阻碍，因为千百万劳动群众不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甚至是最低最低限度的需求，这种情况必然为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失业的增长和群众的贫困造成条件；◇281◇

（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被剥削者，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做工的。

这就是**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的地方。

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比**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优越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苏联这里经济日益高涨，而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苏联这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而相反地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从来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并且总是落在生产后面，往往使生产陷入危机。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在危机期间以销毁“剩余”商品和焚毁“多余”农产品来保持高昂价格、保证高额利润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而在我们苏联这里，人们会把犯这种罪行的罪人送到疯人院里去。（鼓掌）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家那里，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组织革命斗争反对现存资本主义政权，而在我们苏联这里，千百万工人和农

民在展开伟大的劳动竞赛，决心挺身捍卫苏维埃政权。

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内部状况坚固稳定，而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状况则动荡不定。

必须承认，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282◇

最近几年是检验和在实践中考验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即苏维埃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期。这几年来，说苏维埃制度“灭亡”和“破产”的预言真是太多了。关于资本主义“繁荣”的谈论和赞颂则更多。结果怎样呢？这几年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而苏维埃经济制度则具有许多**优点**，这些优点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全民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不敢梦想的。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俄共（布）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

“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这是已经达到的。资本家要抹杀、隐瞒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应当承认，列宁提出的任务我们党正在胜利地完成。

九、当前的任务

（甲） 一般任务

（一）首先是**苏联全国工业的正确分布**问题。不管我们怎样发展国民经济，都不能撇开工业这一◇283◇国民经济领导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工业和我国国民经济基本上都是依靠乌克兰煤矿钢铁基地。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基地，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乌克兰燃料钢铁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基地。

但是，只有这一个基地，今后是否能满足苏联南部、中部、北部、东北部、远东和土尔克斯坦各地区的需要呢？一切材料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情况是：这个基地对于我们已经不够了。新情况是：今后在大力发展这个基地的同时还要立即开始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应该成为这个基地的是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工厂，就是说，要把库兹涅茨克的炼焦煤和乌拉尔的铁矿结合起来。（鼓掌）由于正在下新城建设汽车制造厂，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设机器制造厂，在萨拉托夫和诺沃西比尔斯克建设联合收割机制造厂；由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有色金属工业不断发展，需要在东部建立许多修理厂和许多基本冶金工厂；最后，由于决定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和土尔克斯坦建设纺织厂，——由于这一切，就绝对需要立即着手在乌拉尔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关于乌拉尔钢铁工业托拉斯的决议〔五一〕中所提出的主张正是这样。

（二）其次是**苏联全国农业各基本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即**我国各地区按农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实行专业化**的问题。很明显，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要严格实行专业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小经济是不稳固的经济，它没有必需的后备，因而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以◇284◇便在一些作物遭灾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同样很明显，不保证国家掌握一定的粮食后备，也不可能实行专业化。现在，当我们已经过渡到大经济并且保证国家掌握了粮食后

备的时候，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向自己提出按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正确实行专业化的任务。而这件事情的起点就是彻底解决谷物问题。我说这是“起点”，因为不解决谷物问题，不在畜牧区、产棉区、甜菜区、亚麻区和烟草区设立大批粮仓，就不能向前推进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就不能保证我国各地区按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实行专业化。

任务在于利用已经发掘出的可能性并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三）其次是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干部**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是一部分和从前的企业主有联系的并且受到外国方面怂恿的专家领导了暗害活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因素是我们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缺乏革命警惕性，常常在精神上做了暗害分子的俘虏。然而，在我们面前摆着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它需要大批能够掌握新技术的新干部。因此，干部问题就真正成为我们十分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采取下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坚决和暗害分子作斗争；

2. 尽量关心和照顾已经和暗害分子划清界限的绝大多数专家和技术人员（我指的不是乌斯特里◇285◇雅洛夫一类高谈阔论和装模作样的人，而是那些老老实实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的真正的科学工作者）；

3. 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

4. 派遣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并一般地吸取技术经验；

5. 把技术学校移交给各有关经济机关，以便最快地培养出足够的工农出身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任务在于展开实现这些措施的工作。

（四）**反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埋没了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它力图打消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用文牍主义束缚它，结果使党的每一新的创

举都变成琐碎无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反对**检查执行情况**，企图把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空文。有危险的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们机关留用的那些旧官僚主义分子，而是——特别是——那些新官僚主义分子，即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也决不是扮演末等角色。我指的是那些把文牍主义的命令和“指令”奉为偶像的“共产党员”，他们力图用这样的命令和“指令”来代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

任务在于击破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的“风俗”和“习惯”，为利用我国制度的后备力量，为发挥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扫清道路。◇286◇

这个任务是不轻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我们国家，那就无论如何应该解决它。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党进行着四方面的工作：开展**自我批评**，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清洗**机关以及从下面**提拔**工人阶级中的忠诚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作。

任务在于竭尽全力来执行这一切措施。

（五）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的任务，就不仅不能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连自己的独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党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中建立**同志的劳动纪律**以及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这一切都是在已改进的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实行的。

任务在于继续开展实现这些措施的群众运动。

（六）**供应**问题。这里包括**充分供应**城乡劳动者必需品的问题、使**合作社机关**适应工农需要的问题、不断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的问题以及**减低**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问题。关于消费合作社的缺点，我已经讲过了。必须消灭这些缺点并力求实现**减低价格的政策**。至于商品缺乏（“商品荒”）的现象，那末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扩大轻工业的原料基地和发展城市日用品的生产了。粮食供应可以说已有◇287◇保证。比较困难的是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的供应。很可惜，这个困难在几个月内是不能消灭的。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年以后，首先是由于有了为克服这个困难而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我们将有可能充分保证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的供应。当我们已经拥有粮食后备和纺织品、大量建筑着的工人住宅、廉价的公用事业服务的时候，再掌握这些产品的供应，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掌握决定工人预算和工人实际工资的一切基本因素。这就是说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提高得到完全可靠的保证。

任务在于使我们的各组织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七）**信贷**和**货币流通**问题。合理地组织信贷事业和正确地调度后备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党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下列两方面的措施：把全部短期信贷业务集中于国家银行，在公营部分中实行非现金结算。这样，第一、国家银行就变成计算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国性机关；第二、有大量货币从流通中抽出。毫无疑义，这些措施一定会促使（而且已经在促使）全部信贷事业走上正轨，促使我们的切尔文得到巩固。

（八）**后备**问题。一般国家，特别是我国，没有后备是不行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现在用不着再重复了。我们在粮食、商品和外汇方面是有一些后备的。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段时期内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些后备的良好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些”后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更丰富的后备。◇288◇

因此，任务在于积蓄后备。

（乙）工业方面的任务

（一）主要问题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要知道，我国的生铁产量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达到并超过战前标准。这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要消除这个威胁，就必须加速发展钢铁工业。到五年计划期末，我们需要的生铁不是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千万吨，而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吨。如果我们愿意真正开展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我们就无论如何应当完成这个任务。

布尔什维克应当表明他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抛开**轻**工业。不，不是这个意思。直到目前为止，为了恢复重工业，我们曾经在各方面节约，包括在轻工业方面节约。但是，重工业我们已经恢复了。只是需要使它继续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轻工业并使它加速向前发展。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现象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有可能同时加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棉花、亚麻和甜菜的播种计划今年已经超额完成，罗布麻和人造丝问题已经解决，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有可能真正地向前推进轻工业了。

（二）**实行合理化、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我们的许多企业在实行合理化方面有不少缺点，降低成本的计划完不成，产品质量低劣，这些情况不能再容忍了。这些缺点和缺陷压着我国整个◇289◇国民经济，使它不能向前进展。已经是而且早就是洗去这种可耻污点的时候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表明他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三）**一长制**问题。破坏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的现象也使人不能容忍了。工人时常埋怨说：“工厂里没有人作主”，“工作中没有秩序”。我们不能再容忍我们的企业由生产有机体变成议会。归根到底我们的

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应当了解，不保证实行一长制，不建立工作过程中的严格的责任制，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工业的各项任务。

（丙）农业方面的任务

（一）**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问题。现在，当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谷物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着手同时解决当前迫切的畜牧业问题和技术作物业问题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我们应当走解决谷物问题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说，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是我们政策的据点）逐步改造目前的小农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的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养牛托拉斯”、“养羊托拉斯”、“养猪托拉斯”、“牛油牛奶托拉斯”加上畜牧业集体农庄；现有的技术作物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些就是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起点。

（二）**继续展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几乎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整个农村建设中的**首要**问题。现在连瞎子都能看见，农民从旧到新，从遭受富农奴役到享受集体农庄◇290◇自由生活的巨大的根本的转变已经实现了。旧的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富农阶级注定要灭亡，并且一定会被消灭。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集体农庄的道路。而集体农庄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没有体验过的道路。农民群众亲自用各种方式体验过和检验过这条道路。他们体验到并认定这条道路是使农民摆脱富农奴役、摆脱贫困、摆脱愚昧的新办法。这就是我们取得成就的基础。

农村中的新运动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走在前面的将是国营农场，它们是改造农村旧经济结构的中坚。跟在它们后面的将是大批集体农庄，它们是农村新运动的据点。这两个系统协同工作，就给苏联各地区的完全集体化创造了条件。

集体农庄运动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它已经从**农民本身**中间

提拔了集体农庄事业的几千个**组织者**和几万个**鼓动者**。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这些老练的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有集体农庄的农民，集体农庄事业的几万个农民组织者和鼓动者将要自己举着集体化旗帜前进。而农民鼓动者是集体农庄运动出色的鼓动者，因为他们能找到为其余农民群众明白易懂而又能够接受的道理来说明集体农庄的好处，而这些道理是我们这些老练的布尔什维克连想都想不到的。

有人发出必须放弃全盘集体化政策的论调。听说连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思想”的拥护者。但是，只有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全盘集体化的方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没有它，就不可能完成苏联各地区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如果不背叛共产主义，不出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那又怎么能放弃这个方法呢？◇291◇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一切都会“顺利地”和“正常地”进行。集体农庄内部的动摇还是会发生的。来潮和退潮还是会发生的。但这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引起集体农庄运动建设者的惊惶。这更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的严重阻碍。集体农庄运动无疑是健全的运动，它一定能不顾一切，不顾个别阻碍和困难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任务在于准备力量并做好工作来进一步开展集体农庄运动。

（三）**使机关**尽量**接近区**和**村**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区域划分**，我们就不能展开改造农业和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工作。扩大乡而把它们改为区，取消州而把它们改为较小的单位（专区），最后，成立省作为中央的直接据点，——这就是区域划分的概况。区域划分的目的是使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接近区和村，以便有可能及时解决农业的一些迫切问题，即发展农业，改造农业等问题，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划分给了我们整个建设事业很大的好处。

但是，使机关实际接近并且真正接近区和村所应做的一切，是否都做到了呢？没有，没有都做到。现在集体农庄建设的重心已经转到区级组织方面。集体农庄建设和农村的其他一切经济工作，包括合作社方面、苏维埃方面、信贷方面、收购方面的一切经济工作都集中到区级组织。为了展开这一繁杂工作，供给区级组织所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是否已经够了呢？毫无疑问，供给区级组织的工作人员是非常不够的。出路何在呢？为了改正这个缺点，保证我们各个工作部门的区级组织◇292◇都有足够的必要的工作人员，需要做些什么呢？为此至少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一）撤销专区，（鼓掌）因为它已经变成省和区之间的一道不必要的隔板，拿空出来的专区级工作人员来加强区级组织；

（二）使区级组织直接和省（边区委员会、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这样就会彻底完成区域划分的工作，彻底完成使机关接近区和村的工作。

大家听到将要撤销专区都鼓掌欢迎。当然，专区是应当取消的。但是，如果以为这样我们就有权痛骂专区，像有些同志在“真理报”上所做的那样，那就错了。不应当忘记，专区曾经担负过巨大的工作，起过很大的历史作用。（鼓掌）

同样我认为，在撤销专区这件事上过分急躁也是错误的。中央已经通过撤销专区的决定〔五二〕。但中央决没有认为这件事应当立刻进行。很明显，在撤销专区以前，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丁）运输方面的任务

最后是**运输**问题。运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是用不着多说的。运输不仅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大家都知道，它对国防也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尽管运输具有重大意义，可是运输业，运输业的改造还是落后于一般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使运输变成国民经济中可能阻碍我们前进的“薄弱环节”的危险，这还用得着证明吗？难道还不是结束这种情况的时候了吗？◇293◇

情形特别糟的是内河运输。实际情况是：伏尔加河航务局的运输量刚刚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而德涅泊河航务局的运输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和四十——这就是内河运输所能记入自己的“成绩”表的一切。不用说，这是很大的“成绩”！难道还不是洗去这种耻辱的时候了吗？（喊声：“是时候了！”）

归根到底，任务在于用布尔什维克精神从事运输事业并把它向前推进。

*　　*　　*

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这样。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继续**开展对资本主义分子的全线进攻并**把它进行到底**。

目前我们政策的中心和基础就在这里。（鼓掌）

三　党

现在来谈谈党的问题。

上面我已经谈过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的地方。谈过我国的制度在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中给我们提供的巨大可能性。谈过如果没有这些可能性，如果没有利用这些可◇294◇能性，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所获得的那些成就。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呢？党是否埋没了这些可能性，因而妨碍了工人阶级彻底发挥自己的全部革命力量呢？党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来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呢？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可以不必为工业化的速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等等操心，反正胜利的到来会所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愚蠢的。这样说，就是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否认党对这个建设事业所负的责任。列宁决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只说过，“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五三〕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摈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改建（改造）国民经济并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在我国制度内不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分裂的基础，因此可以不必为制定对待农村各社会集团的正确政策操心，反正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而工农联盟会所◇295◇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对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且还是执政党的政策）是决定工农联盟命运的基本因素的人，才会这样说。列宁决没有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没有分裂的危险。列宁说过，“在我国社会制度内**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但是，“**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末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列宁认为：

“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留心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五四〕

可见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内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由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由此可见，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党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或者不会◇296◇正确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因此得到的会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但是这里还是这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和**优越性**呢？党是否尽了一切力量来**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从而保证我国建设事业获得最大胜利呢？

换句话说，党和党中央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是否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呢？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为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党和党中央为实现这些条件做了些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问题

（甲）党在目前的基本方针，就是由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的**个别地段**上的进攻**转入**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全线**进攻。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工业化**代表大会。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是**集体化**代表大会。◇297◇

这些都是给**总**进攻做准备。

和过去各个阶段不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面临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全线总**进攻的时期，是加紧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

简略地说，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这样。

这条路线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事实说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鼓掌）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所获得的胜利和成就证明了这一点。过去这个时期党在城乡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实行不正确政策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总路线才能使我们获得这样的胜利。

我们的阶级敌人，资本家和他们的报刊，教皇和形形色色的主教，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布拉莫维奇及唐恩一类的“俄国”孟什维克近来对我们党的政策所发出的疯狂号叫证明了这一点。资本家和他们的奴仆咒骂我们党，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鼓掌）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托洛茨基

分子营垒中的先生们曾经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蜕化”，什么“特米多尔”，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必然胜利”等等。而事实上结果怎◇298◇样呢？结果是托洛茨基主义瓦解了，完蛋了。大家知道，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了，并在他们的代表人物的许多声明中承认党是正确的，自认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另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则确实蜕化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事实上成了为资产阶级报刊搜集联共（布）情报的人员。而本该“蜕化”（或者“已经蜕化”）的苏维埃政权却依然健在并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胜利地给我国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小资产阶级应声虫以致命打击。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右倾分子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曾经胡说和叫喊党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苏联“必遭灾祸”，必须把国家从党和党的领导手里“拯救出来”等等。而事实上结果怎样呢？事实上结果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本想“拯救”国家但后来承认自己的看法错误的右倾分子集团现在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日益提高，千百万劳动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积极拥护，以及工人和集体农民所发挥的那种巨大的使我国的敌人和朋友都感到惊异的空前未有的劳动热情证明了这一点。至于那些标志着对党的信任加深的事实，如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申请入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员人数增加了六十多万，单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二十万人入党，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不是表明千百万劳动群众认识到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决心拥护它，又是表明什么呢？

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党的总路线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那就不会有这些事实。◇299◇

（乙）但是，党不能仅限于制定总路线。它还应该天天检查总路线的实际执行情况。它应该领导总路线的实现，在工作进程中修订已

通过的经济建设计划，使它日趋完善，纠正和防止错误。

我们党中央是怎样完成这项工作的呢？

中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加快速度和缩短期限方面修改五年计划并使它更加精确，检查各经济组织执行规定任务的情况。

下面举出中央根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决议。

在钢铁工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一千万吨；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生铁产量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

在拖拉机制造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拖拉机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五万五千台；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任务太轻，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拖拉机产量提高到十七万台。

汽车制造业的情形也是这样。五年计划原定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生产十万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而中央则决定增加到二十万辆。

有色金属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情形也一样。有色金属工业的产量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也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

至于**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就更不用说了。它根本没有被列入五年计划，而它的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至少要达到四万台。◇300◇

在国营农场建设方面：五年计划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播种面积扩大到五百万公顷；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到五年计划期末应达到一千八百万公顷。

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五年计划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播种面积扩大到两千万公顷；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显然太低（这个定额今年就已经超过了），认为到五年计划期末苏联农业集体化基本上应告结束，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到那时应当占苏联目前个体农户耕种的

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九。（鼓掌）

如此等等。

一般说来，中央就是这样领导党的总路线的执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工作的。

有人会说，中央把五年计划初定数字改动得这样厉害，这是在破坏计划工作的原则并损害计划机关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说。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五年计划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五年计划也和任何计划一样，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计划，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根据计划执行的经验来修订它，使它精确、完善。任何五年计划都不能估计到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一切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在工作进程中，在各工厂、各集体农庄、各国营农场、各区等等实现计划的进程中才能发掘出来。只有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认为编制计划是计划工作的**结束**。编制计划不过是**计划工作的开始**。真正的计划领导只是在计划编制以后，在进行了实地检验以后，在实现计划、修订计划和使计划精确的过程中才展开。◇301◇

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共和国各计划机关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根据实际经验修订和改善五年计划。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十年计划〔五五〕的时候，关于计划工作和计划领导的原则列宁这样说过：

“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纲领，否则它就不能是党的纲领。它应当用党的第二个纲领即用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我们应当采取一个相当的计划；当然，这只会是一个大致的计划。党的这个纲领不是那样不可改变，像我们的真正党纲一样只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修改。不，这个纲领每天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镇中都会加

以改进、充实、完善和变更…… 各地在注意科学和实践的经验的同时，应当不断地努力争取比原定期限更早地完成计划，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全靠我们自己。让我们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车修理厂、每一方面都改善经营管理，这样我们就一定会缩短期限。而且我们也正在缩短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二页、第四八三页、第四七九页）

可见中央变更和修改五年计划、缩短期限和提高建设速度是沿着列宁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中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五年计划完成期限依据的是哪些可能性呢？依据的是蕴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只有在工作进程中才能发掘出来的那些潜力，依据的是改造时期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302◇中央认为，**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生产的条件下**，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技术基础可以发掘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梦想不到的那些加快速度的可能性。

只有这些情况才能解释下面的事实：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而它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又要比本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仅仅这个增加额**就等于战前**全部**大工业的产值。

只有这些情况才能解释下面的事实：国营农场的建设在三年内就会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集体农庄的建设在两年内就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有这样一种理论，按照它的说法，只在恢复时期才可以有高速度发展，一进入改造时期，建设速度就应当逐年急剧减低。这个理论叫做“递减曲线”论。这种理论是为我们的落后辩护的理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种蓄意让我国永远保持落后状态的资产阶级理论。在过去或现在和我们党有关系的人们之中，

坚持和鼓吹这种理论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是超工业化主义者。但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只有在讲到**恢复**时期末期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托洛茨基分子确实曾经发挥过超工业化的幻想。至于**改造**时期，**托洛茨基分子在建设速度方面却是最极端的最低速度派和最卑鄙无耻的投降派**。（笑声，鼓掌。）

托洛茨基分子在他们的政纲和宣言中并没有提出有关速度的数字材料，只是一般地空谈速度。◇303◇但是有一个文件，其中托洛茨基分子用数字表达了他们对国营工业发展速度的看法。我指的是那份根据托洛茨基主义原则所写的国营工业“固定资本恢复问题特别会议”的报告书。简略分析一下这个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写成的文件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完全反映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图。

这个文件提议，**投入**国营工业的资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四亿九千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三亿二千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十亿六千万卢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价格计算）。

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就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实际上我们投入国营工业的资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十亿六千五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三亿零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八亿一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四十七亿七千五百万卢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价格计算）。

布尔什维克的**上升**曲线就是这样。

根据这个文件，国营工业的**产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应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304◇

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就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上国营工业的产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布尔什维克的**上升**曲线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他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专门为这个投降主义的递减曲线论辩护。他在那本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战前扩大工业基本上是靠建立新工厂”，而“目前扩大工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利用旧工厂和充分利用原有设备”，那末，“**随着恢复过程的终结**，增长率自然会**大大减低**”，并且他提议“在最近几年内，把工业的增长率提高到不仅超过战前增长率百分之六的一倍，而且超过两倍，也许还要多”。

总之，工业每年增长三个百分之六。这究竟等于多少呢？每年总共增长百分之十八。因此，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国营工业的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是**改造时期**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的最高限度，应当作为理想来追求。现在把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浅薄的小聪明和我们最近三年来产值的实际增长（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三十二）比较一下，把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投降主义哲学和国家计◇305◇划委员会拟定的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的控制数字（增加百分之四十七，超过**恢复**时期产值增加的**最高**速度）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论的全部反动性，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分子对**改造**时期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多么不相信。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叫喊工业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布尔什维克发展速度“过快”。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和我们的右倾分子是区分不开的**。

很明显，不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递减曲线”论，我们就既不能展开真正的计划工作，也不能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建设期限。为了领导实现党的总路线，为了修订和改进五年建设计划，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和防止建设中的错误，首先要击破和消灭反动的“递减曲线”论。

中央正是像上面我所说的那样做的。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

也许有人会以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实现党的总路线的工作，在我们党内是平平稳稳进行的，没有斗争，也没有紧张活动。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工作是在同党内种种困难作斗争中，是在同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问题方面脱离列宁主义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中进行的。我们党不是生存和活动在真空中。它是生存和活动在实际生活当中，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我们的环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构成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306◇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如果以为这些阶级的反抗不会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某种反映，那是可笑的。而这种反抗也确实在党内有了反映。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

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

因此，同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为什么右倾是现在党内的主要危险呢？因为它反映着富农危险，而富农危险在目前，在展开大规模进攻和根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是国内的主要危险。

要克服右倾，消灭“左”倾，为全党最紧密地团结在列宁路线的周围扫清道路，中央必须做些什么呢？

（甲）首先必须肃清党内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肃清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遗毒。作为一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集团早已被我们击溃和抛弃了。现在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个竭力向资产阶级报告我党情况◇307◇的反无产阶级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集团。但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残余，托洛茨基主义的遗毒还没有完全从党内清除出去。所以，必须首先肃清这些遗毒。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最近期间胜利的世界革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就应该向资产阶级投降，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扫清道路。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资产阶级观点。

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发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发挥劳动热情，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参加群众性的突击运动，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大规模进攻呢？显然不能。如果认为干过三次革命的我国工人阶级发挥

劳动热情和参加群众性的突击运动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土壤施肥，那就愚蠢了。我国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你们打消工人阶级对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信心，也就是摧毁竞赛、劳动高潮、突击运动的一切基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发动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开展竞赛并组织大规模进攻，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无力领导农民从个体农民经济转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如果最◇308◇近期间世界革命的胜利不能及时到来援助工人阶级，农民就会恢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有力量有可能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

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集体农庄运动，组织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消灭富农阶级呢？显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组织农民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并消灭富农阶级，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可能引导劳动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理论。

最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党内有铁的纪律的必要，认为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认为有成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必要。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联共（布）不应当是统一和团结的战斗的党，而应当是一些各有自己的中央、自己的纪律、自己的报刊等等的集团和派别的集合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宣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有组织政治集团的自由，那末国内也就应当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

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的改进”的词句做掩蔽来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知识分子集团间的派别争吵的自由并不是党内民主；而党所开展的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党员群众的高度积极性才是实际的、真正的党内民主的表现，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不能了解的。◇309◇

对党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保证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斗争所必要的钢铁般的统一呢？显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保证党的钢铁般的统一和无产阶级的纪律，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理论。

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了正在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地位，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力图“马上”跳到社会主义，以免遭到破产（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歇斯底里**），如果这样做不可能，就对资本主义做任何让步（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投降主义**）。

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这种两重性，所以它好像“猛烈”攻击右倾分子，而结果总是和他们这些不带假面具的投降主义者结成**联盟**。

而党内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发生过的“左的”过火行为又是什么呢？这种过火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企图（固然是不自觉的）在实践中在我国恢复托洛茨基主义传统，恢复托洛茨基主义对中农的态度。这种过火行为的产生是由于在政策上犯了列宁所说的“过分采用行政手段”的错误。这就是说，我们某些同志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成就所陶醉，竟不以建设者的态度，而主要是以行政人员的态度去对待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因而犯了一系列极严重的错误。◇310◇

我们党内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不该制止“左”倾过火分子。

他们认为不该得罪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该反对他们的陶醉情绪，即使这种情绪造成了错误。同志们，这是胡说。只有那些硬要随波逐流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些人永远也不能领会列宁路线：在环境要求的时候，在党的利益要求的时候，要逆流而进。他们是尾巴主义者，不是列宁主义者。党所以能使我们整批整批的同志转上正确的道路，党所以能纠正错误并获得成就，就是因为它为实现总路线能毅然决然地逆流而进。这也就是实践中的列宁主义，领导中的列宁主义。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克服“左的”过火行为，我们就不能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取得现在所有的那些成就。

和托洛茨基主义残余及其在实践中的遗毒进行斗争的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过去是或者现在还是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关于右倾分子，不能说他们不承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他们是承认的，这就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右倾分子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表面上承认在一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大力发展工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他们不愿意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分子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311◇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分子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奇迹历史上不曾有过，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

关于右倾分子，也不能说他们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不，他们是承认的，这也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表面上承认，同时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手段和“大道”。他们不愿意承认，不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就不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村。他们认为农村能够悄悄地、自流地转上社会主义轨道，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只要通过供销合作社就行了，因为他们相信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解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解除羁绊”。但是，富农是不能长入社会主义的，而“解放”市场就等于武装富农阶级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

正因为如此，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的斗鸡式的斗争通常是以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组织**联盟**的幕后谈判而告终的。◇312◇

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罪过在于它**脱离**列宁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滚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去了。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会使工人阶级完全解除武装，使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武装起来，并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机会增多。

右倾分子不主张成立另外一个政党，这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又一个不同的地方。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党投降了。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右倾主义已经被埋葬，那就愚蠢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不是拿这种情况来衡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正因为右倾反映着垂死阶级主要分子的反抗，所以

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这就是党认为必须同右倾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的原因。

毫无疑问，如果不同右倾作坚决斗争，不孤立右倾的领导分子，我们就不能动员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动员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力量去展开社会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恢复我们的重工业，消灭富农阶级。

党内的“左”倾和右倾的情形就是这样。

任务在于今后还要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不调和的斗争，既反对代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左”倾，又反对代表**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倾。◇313◇

任务在于今后还要继续和党内那些不懂或假装不懂必须坚决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调和**分子作**不调和**斗争。

（乙）如果我们不谈谈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倾向，那末我们就不能看出党内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的全貌。我指的第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第二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不像“左”倾或右倾那样明显和顽固。可以把它们叫做爬行的倾向。但这还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不，它们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所以不容怀疑，是因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普遍气氛，不能不使在党内有着反映的民族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尖锐起来。因此必须揭穿和暴露这两种倾向的真面目。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什么呢？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

这类倾向分子在这方面所持的出发点是：既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各民族应该融合成一体，而它们的民族语言则应该变成统一的

共同语言，那末现在已经是消灭民族差别和放弃支持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他们还引证列宁的话，不正确地引用列宁的话，有时简直是歪曲和诬蔑列宁。◇314◇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民族的利益必将融合成一个整体，——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同崩得分子争论时说过，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消灭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压迫和民族壁垒是会消灭的，——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废除照顾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特点的政策转而采取同化政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第一、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315◇

忘记了列宁的这个基本指示，怎么还能引证列宁的话呢？

不错，有一位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叛徒和改良主义者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考茨基先生武断地说过和列宁教导我们的完全相反的话。他反对列宁的意见，断言如果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奥联邦获得胜利，那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德语并使捷克人**德意志化**，因为“单是挣脱了束缚的交换的力量，单是德意志人所带去的现代文化的力量，就能不用任何强制的德意志化而**使落后的捷克小资产者、农民和无产者变成德意志人，因为他们这种没落的民族已经不能给予他们任何东西**”（见“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序言）。

显然，这种“观念”是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吻合的。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民族大学的讲话〔五六〕中就曾经驳斥过考茨基的这种看法。但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对于我们愿意彻底做国际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难道还能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谁对呢，是考茨基还是列宁？

如果是考茨基对，那末为什么像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样比较落后的民族，虽然和大俄罗斯人的关系要比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并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作为独立的民族复兴和发展起来了呢？为什么像土尔克明人、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用说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等等）这样的民族，虽然他◇316◇们落后，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复兴和发展成独立的民族了呢？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魔掌，这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主张在**一个**国家内即在苏联一国内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实质上是力图恢复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即**大俄罗斯**语言的**特权**，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哪里是国际主义呢？

第二、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消灭民族压迫和把各民族的利益融合

成一个整体就等于消灭民族差别。我们消灭了民族压迫。我们消灭了民族特权并确立了民族平等权利。我们消除了苏联各民族间旧意义上的国界，即界碑和关税壁垒。我们确立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但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把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消灭了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还存在，那末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的要求就是一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反动要求，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们的倾向分子是否了解，现在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这就是使苏联各族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可能使用**本族**语言受教育，使他们不可能有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机关，使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我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反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魔掌，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对苏联**各**族人民，无论是大俄罗斯人或非大俄罗斯人都同样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文化革命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317◇

第三、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恰恰相反，列宁向来主张**帮助**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列宁而不是在别的什么人的领导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拟定并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党的任务在于：**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人民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于这些民族的民族生活习惯条件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乙）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的、并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和政权机关；（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丁）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

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五七〕

列宁完完全全拥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口号，就是否认苏联境内非大俄罗斯各族人民发展文化的必要性，否认各该族人民受普遍义务教育的必要性，而让各该族人民去受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奴役，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确实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反动的口号。但是难道还能有别的看法吗？

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318◇是用民族主义的毒素来毒化群众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

如果不背离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呢？

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时，打击的是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内容**，而不是它的民族形式，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看做是一种**无民族性的**即没有某种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愚蠢了。崩得分子有一个时候确实曾经把这种荒谬见解硬加在列宁身上。但从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列宁严厉地抗议过这种诬蔑，断然和这种荒谬见解划清了界限。难道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真的要步崩得分子的后尘吗？

既如上述，我们的倾向分子的论据还剩下什么呢？

除了玩弄国际主义旗帜和诬蔑列宁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倾向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就是民族文化瓦解和消灭的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情形恰恰

相反。事实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各民族本身并不是普通的“现代”民族，而是**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民族文化按内容说也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社会**◇319◇**主义**文化。

看来他们不懂得，随着使用本族语言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施行和巩固，民族文化必将**更加有力地**发展起来。他们不懂得，只有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使各落后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们不懂得，列宁的**帮助**和**支持**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基础正在于此。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又主张在目前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繁荣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是**为了**当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们能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文化，——列宁关于民族文化问题的提法的辩证性正在于此。

有人会说，这样提问题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在国家问题上难道不也是有这样的“矛盾”吗？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320◇证法。

或者拿列宁关于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提法来说吧。列宁有时把民族自决这一论题表述为一个简单公式：“为联合而分离”。

你们想一想吧：为联合而分离。简直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这个“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生活中的真理，这个真理使布尔什维克能够攻克民族问题方面最难攻下的堡垒。

关于民族文化的公式也必须这样说：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消亡并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条件。

谁不懂得我国过渡时期的这种特殊性和“矛盾性”，谁不懂得历史过程的这种辩证法，谁就根本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倾向分子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情形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这种倾向反映着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中的垂死阶级想恢复自己已经丧失的种种特权的意图。

由此就产生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险，这是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什么呢？◇321◇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反映了过去被压迫民族中的垂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玫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它们想单独成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企图。

这种倾向的危险在于它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削弱苏联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帮助干涉者。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就是这样。

党的任务在于：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保证对苏联各族劳动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所必需的条件。

我们党内的各种倾向，即在一般政策方面的“左”倾和右倾和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两种倾向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党内的状况就是这样。

现在，当党在争取实现总路线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当我们党的列宁路线在全线奏捷的时候，许多人有忘掉各种倾向分子在我们的工作中给我们所造成的那些困难的倾向。不仅如此，某些有庸俗看法的同志直到现在还认为本来可以不必和各种倾向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些同志是极其错误的。只要回顾一下，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所干的那些勾当，只要回想一下过去这个◇322◇时期和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历史，就会了解党内这种庸俗看法是多么空虚和无聊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制裁各种倾向分子，没有在公开斗争中击溃他们，我们就不会获得现在我们党理应引以自豪的那些胜利。

我们党在反对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炼成了自己队伍的**列宁主义的统一**。现在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全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现在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和**团结**；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少有的一次代表大会，这里不再有能够拿出自己的特殊路线来对抗党的总路线的定形的和团结的反对派。

为什么党能取得这种决定性的成就呢？

党所以取得这种成就，是因为它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始终执行着**原则性的**政策，从来没有堕落到暗中拉拢和玩弄外交欺骗手腕的地步。

列宁说过，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所以能在反对

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忠实地一贯地遵守了列宁的这个遗训。（鼓掌）

*　　*　　*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总的结论是什么呢？◇323◇

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成就。我们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高举伟大的列宁旗帜。如果我们想要胜利，那我们今后还应当高举列宁的旗帜，保持它的纯洁无瑕。（鼓掌）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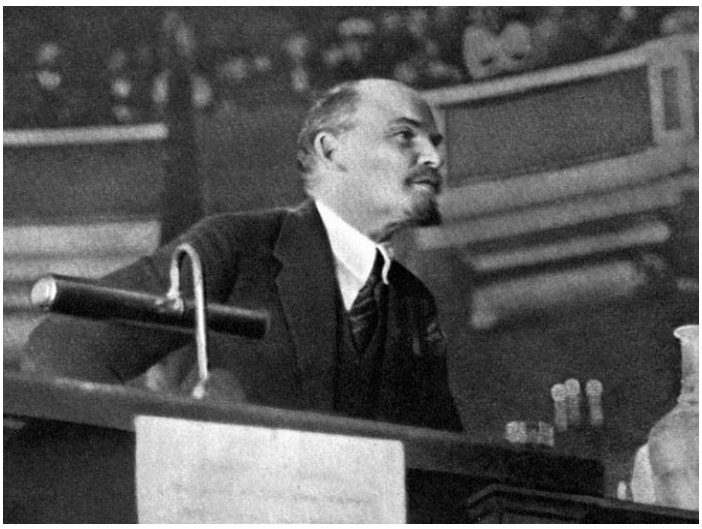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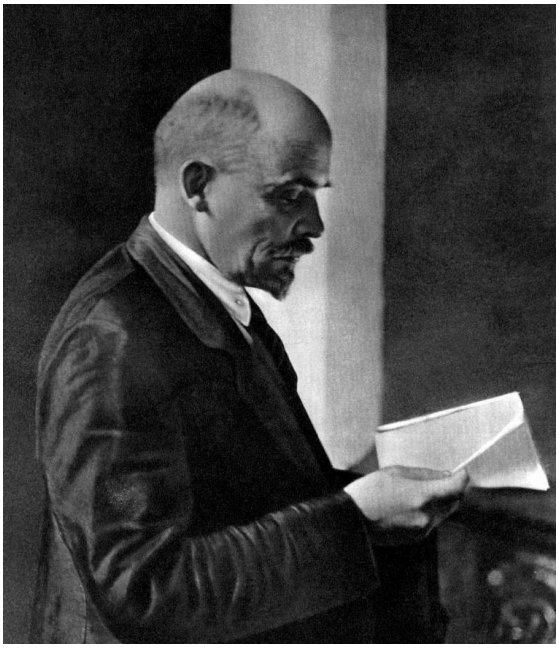
我们举着这面旗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必将获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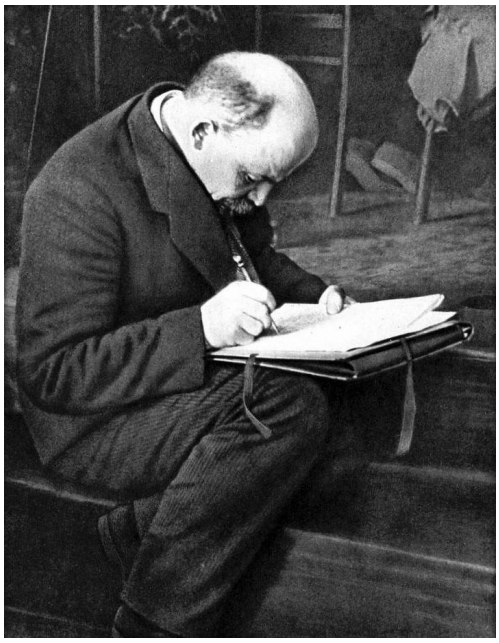
列宁主义万岁！（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全场欢呼。）

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一七七号◇323◇



列宁主义万岁！ （266）





注　释

〔一〕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举行。全会研究了下列问题：（一）关于党内事务；（二）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三）关于清党。全会批准了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并在特别决议中斥责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活动。全会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等提纲，并决定把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审查。全会还决定把基本上同意的关于清洗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审查。约·维·斯大林在四月二十二日全会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二九页至第四四七页）——（正文第三页）

〔二〕 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及其他区内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正文第十二页）

〔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的总结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讨论了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办法、共产国际纲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苏联的经济状况和联共（布）党内的状况，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代表大会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条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任务，并动员各国共产党加紧同右倾这个主要危险以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对于巩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意义，并号召全世界劳动者保卫苏联。约·维·斯大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纲领委员会委员以及草拟国际

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的政治委员会委员。——（正文第十九页）

〔四〕 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举行的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正文第二十四页）

〔五〕 讲坛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之一，主要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于德国，后来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广泛流行。这个流派的代表们，即在大学讲坛上发表言论（因此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教授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正在发展的革命工人运动，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鼓吹阶级调和。讲坛社会主义者否认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和剥削性，硬说资产阶级国家能够用社会改良的办怯使资本主义完善起来。恩格斯关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曾经写道：“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从来没有提高到倾向于博爱的庸俗经济学家的水平，而现在他们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辩护者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二十七卷第四九九页）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鼓吹过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思想。俄国的孟什维克、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和现代右翼社会党人力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鼓吹资本主义和平地、逐渐地长入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滚到讲坛社会主义方面去了。——（正文第三十一页）

〔六〕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正文第四十五页）

〔七〕“青年国际”（《Jugend Internationale 》）杂志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苏黎世出版。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该杂志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出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曾以“青年共产国际”的名称出版）。——（正文第六十二页）

〔八〕 见“列宁文集”第十四卷第二五〇页至第二五九页。——（正文第六十九页）

〔九〕 “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弗·伊·列宁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出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和十二月两期。——（正文第六十九页）

〔一〇〕 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一八年），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

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一起在党内进行了反对列宁的激烈斗争，要求继续战争，其目的是要把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置于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之下。一九三八年，在反苏维埃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审判案中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一起策划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秘密的反革命阴谋，其目的是要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和杀害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成立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政府。——（正文第九十页）

〔一一〕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正文第九十二页）

〔一二〕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等问题。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代表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通过了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执行的“最高”方案。代表会议斥责了右倾，指出它是完全拒绝党的列宁政策的表现，是直接转到富农立场上去，并号召党给予这个时期的主要危险右倾以及对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的调和情绪以歼灭性打击。代表会议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和约·维·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本卷第三页至第九十六页）的传达报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告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书。（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四八页至第四九九页）——（正文第九十六页）

〔一三〕 弗·伊·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六七页、第三六八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〇五页、第三〇六页）。——（正文第九十八页）

〔一四〕 特别远东军是一九二九年八月当中国反革命将军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挑起中东铁路事件时建立的。“警钟报”是特别远东军政治部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九年创刊。——（正文第一二二页）

〔一五〕 “青年团真理报”（日刊）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创刊。“列宁主义概论”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青年团真理报”第二八二号上。——（正文第一二三页）

〔一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举行。参加代表会议的有科学研究机关的代表，农业高等学校和经济高等学校的代表，杂志和报纸编辑部的代表。出席的代表共有三百零二人。约·维·斯大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代表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正文第一二六页）

〔一七〕 见“列宁文集”第十一卷第三六八页。——（正文第一三二页）

〔一八〕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六九二页。——（正文第一三二页）

〔一九〕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正文第一三二页）

〔二〇〕 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九二二年俄文版第六十六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部第四五六页）。——（正文第一三五页）

〔二一〕 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一卷第七十一页至第八十三页。——（正文第一三九页）

〔二二〕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一页至第二一五页。——（正文第一四七页）

〔二三〕 “国外”杂志由马·高尔基主编，于一九三〇年创刊，一九三二年改组为杂志式的报纸，一九三八年停刊。——（正文第一五四页）

〔二四〕 “红星报”是军事政治性的日报，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创刊。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起是苏联武装力量部的中央机关报。——（正文第一五六页）

〔二五〕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页至第八十二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二六〕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五五页至第四六九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二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〇页至第三六八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二八〕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三〇页至第三四九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二九〕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三页至第三二一页。——（正文第一五七页）

〔三〇〕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就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正文第一六一页）

〔三一〕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三一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八三页。——（正文第一六一页）

〔三二〕　弗·伊·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页）。——（正文第一六一页）

〔三三〕　“鲁宾主义”和“机械主义”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派别。孟什维克鲁宾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修正马克思的学说，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暗害式地转移经济学家对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注意力，使他们陷于烦琐的争论和抽象的议论。“机械主义”是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从庸俗的机械主义立场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即否定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均衡论。右倾分子的理论家布哈林是机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机械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在历史上的暂时性，并把资本主义的规律性搬用到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正文第一六六页）

〔三四〕　这里所指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真理报”第七十三号上（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四八页至第五五一页）。——（正文第一七七页）

〔三五〕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四四页至第五四七页。——（正文第一八三页）

〔三六〕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

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和发展农业的报告以及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建议中央今后继续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速度，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坚定不移地在全线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进攻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代表大会指出了农业发展中的转变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由于这个转变，集体农民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坚固的支柱。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并巩固苏联的国防力量。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并在苏联东部建立新的强大的煤矿钢铁基地、关于改造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吸引全体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指示。代表大会彻底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它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并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党的党籍不能相容。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执行列宁的保证广泛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民族政策。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约·维·斯大林于六月二十七日在代表大会上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七月二日做了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关于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一页至第四一四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五三页至第六一六页）——（正文第二〇七页）

〔三七〕 联邦准备银行体系是美国的银行组织，于一九一三年成立。设立在全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十二家联邦准备银行统一和控制了美国各银行的全部活动，是垄断资本的工具。联邦准备银行体系由联邦准备局（一九三三年改称联邦准备银行经理会议）领导。联邦准备局由美国总统任命，完全掌握在财政寡头手中。为美国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美国的金融界和政府当局曾把联邦准备银行体系看做保障国内经济免遭危机的手段。胡佛总统企图利用联邦准备银行体系来制止一九二九年爆发的危机，结果完全失败了。——（正文第二一三页）

〔三八〕 杨格计划是向德国索取赔款的计划，是以该计划的制定者美国银行家杨格得名的。这个计划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由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美国和德国专家委员会通过，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在海牙会议上被最后批准。这个计划规定德国赔款总额为一千一百三十九亿马克（折成外汇计算），应在五十九年内付清。赔款方面的一切清算事宜由美国所操纵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手。成立这个银行是杨格计划的一项主要条款，是美国垄断资本控制欧洲各国的贸易和货币流通的手段。按照杨格计划，德国工业免除偿付赔款，赔款的全部重担都压在劳动者的身上。杨格计划为更迅速地恢复德国军事工业的潜力创造了条件，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为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力求达到的。——（正文第二一九页）

〔三九〕 指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举行的罗迦诺（瑞士）会议上所缔结的条约和协定。旨在巩固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欧洲战后秩序的罗迦诺协定，使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并引向准备新的战争。（关于罗迦诺会议，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七一页至第二七七页）——（正文第二一九页）

〔四〇〕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十五周年）的抗议战争挑拨者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以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抗议迅速增长的失业现象（由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游行示威，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波兰和欧美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和工业中心都曾举行。抗议运动完全是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正文第二二一页）

〔四一〕 “泛欧”计划是建立欧洲各国反苏联盟的计划，是由法国外交部长布利安于一九三〇年五月提出的。按照这个计划，结成“联邦”的欧洲应该是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而“联邦”的执行机关“欧洲委员会”应该是准备进攻苏联的司令部。此外，布利安计划打算确立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导权，因而遭到了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反对。“泛欧”计划因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没有实现。——（正文第二二三页）

〔四二〕 指美国、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波兰、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不列颠各自治领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它们没有邀请苏联参加缔结凯洛格公约的谈判，其目的是要把苏联排出于公约的规定推行所及的国家范围以外，按照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必须拒绝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公约的发起人（法、美、英三国）以“普遍和平”

的蛊惑词句为掩饰，打算把公约变成孤立和反对苏联的工具。苏联政府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的声明中揭穿了公约的真正目的。美、英、法三国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声明邀请苏联签订公约。苏联政府加入了凯洛格公约，它是首先批准这个公约的政府之一，并向邻国提议缔结关于立即执行公约所定义务的协定。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莫斯科签订了这样的协定，后来土耳其和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正文第二二三页）

〔四三〕 “连纳金矿”是英国的股份公司，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苏联承租西伯利亚的金、铜、铁等等矿产地进行开采和经营。按照租借合同的条件，“连纳金矿”公司应当建设一些新的采矿工业企业和改造承租的厂矿。由于该股份公司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使承租的厂矿和其他企业遭到破坏，苏联政府取消了租约，并且把该公司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和暗害活动的工作人员交付法庭审判。——（正文第二二四页）

〔四四〕 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苏联政府的报告、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社建设的问题。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和通过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代表大会同意苏联政府的总结报告，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拟定了发展农业和农村合作社建设的途径，选出了新的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正文第二三六页）

〔四五〕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页。——（正文第二四六页）

〔四六〕 约·维·斯大林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卷第二六一页）。——（正文第二四六页）

〔四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三页。——（正文第二五一页）

〔四八〕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举行，讨论了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任务、关于乌克兰的农业和关于农村工作、关于成立苏联全联盟的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央七月全会（一九二八年）的培养技术干部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等问题。全会认为宣传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宣传对右倾机

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的观点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并决定取消布哈林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全会指出苏联已进入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并拟定了许多有助于巩固集体农庄和广泛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具体措施。（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〇〇页至第五四三页）——（正文第二五一页）

〔四九〕 指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真理报”第一二八号上的联共（布）中央关于开展自我批评“告全体党员，告全体工人书”。（并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八〇七页至第八〇九页）——（正文第二七四页）

〔五〇〕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提拔工人参加苏维埃机关和吸收广大工人自下监督苏维埃机关（关于工厂自愿辅助运动）”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七十四号上。——（正文第二七四页）

〔五一〕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关于乌拉尔钢铁工业托拉斯的工作”的决议。该决议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五号上。——（正文第二八四页）

〔五二〕 联共（布）中央“关于撤销专区”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九四号上。——（正文第二九三页）

〔五三〕 弗·伊·列宁“关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纲要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页至第二二四页）。——（正文第二九五页）

〔五四〕 弗·伊·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四四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〇一九页）。——（正文第二九六页）

〔五五〕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举行。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把电气化计划评定为“伟大的经济创举的第一步”。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给弗·伊·列宁的信中关于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写道：“最近三天我有机会读完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汇编……　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书。一个不带引

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五十页）。——（正文第三〇二页）

〔五六〕 指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所做的“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页至第一四〇页）。——（正文第三一六页）

〔五七〕 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五九页。——（正文第三一八页）

年　表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九二九年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四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四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起草委员会。

四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和顿巴斯矿工代表团谈话。

五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美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关于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的演说。

五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一文（米库林娜“群

众的竞赛”一书序言）。这篇文章在五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第一一四号上发表。

五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关于美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演说。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五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委员。

六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与森林工业工作人员代表团谈话。

七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费里克斯·康同志。

七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电贺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十周年。贺电在七月十二日“真理报”第一五七号上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检阅黑海舰队战舰队的演习。

七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访问了“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出席了红海军战士的文娱晚会，并在巡洋舰舰志上题词。

十月三十日

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二周年，约·维·斯大林向特别远东军致贺电。贺电在十一月七日“警钟报”第五十二号和“真理报”第二五九号上发表。

十一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写“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这篇文章在十一月七日“真理报”第二五九号上发表。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二周年庆祝

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一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揭露布哈林反对派首领们的派别活动。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中央全会选入最后修订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和起草关于布哈林右倾集团的决议的委员会。

十一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中央全会选入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决议修订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苏联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的“必要的修正”一文在“真理报”第二九八号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答谢祝贺他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该信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第三〇二号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演说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三〇九号上发表。

一九三〇年

一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从白卫分子手中解放十周年给斯大林格勒工人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号上发表。

一月五日

联共（布）中央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

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在一月六日“真理报”第六号上发表。

一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阿·马·高尔基。

一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在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二十一号和“红星报”第十八号上发表。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弗·伊·列宁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写“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一文。这篇文章在二月十日“真理报”第四十号上发表。

二月十三日

根据许多组织、工人大会、农民大会以及红军士兵大会的请求，授予约·维·斯大林第二枚红旗勋章，表彰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巨大功勋。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约·维·斯大林以勋章的决议在二月二十三日“真理报”第五十三号上发表。

二月二十二日

为庆祝第一骑兵集团军建立十周年，约·维·斯大林向该集团军致贺电。贺电在二月二十三日“真理报”第五十三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答复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来信，祝他们顺利完成为红军生产武器的计划。复信在三月二日“伊热夫斯克真理报”第五十一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为纪念红军建军十二周年和第一骑兵集团军建立十周年而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大会。

三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在“真理报”第六十号上发表。

不迟于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起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在三月十五日“真理报”第七十三号上发表。

三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别泽缅斯基同志的来信。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在“真理报”第九十二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一日

为祝贺列宁格勒斯大林金属工厂提前出产苏联第一台大型涡轮，约·维·斯大林向该厂工人致贺电。贺电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一一二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向工业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致贺电。贺电在四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一五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筑工程竣工和开始通车给该铁路建设者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一五号上发表。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于特别骑兵旅建立十周年纪念日给该旅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二七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被党的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和巴乌曼区代表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和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姆·拉法伊尔同志的来信。

六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全体人员提前完成建厂工作。贺电在六月十七日“真理报”第一六五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答复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卡涅夫区集体农庄庄员的贺信。复信在六月十八日“红旗报”（克拉斯诺达尔）第一三七号和六月十九日“真理报”第一六七号上发表。

六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提前完成建厂工作和苏联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开工。贺电在六月十八日“真理报”第一六六号上发表。

六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批准了政治局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并批准约·维·斯大林为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第一项议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报告人。

六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69・635×927耗1/16・22印張・6插頁・24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7,000　　定價：(4)3.10元

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党尊敬他。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十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三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3

ИЮЛЬ 1930—ЯНВАРЬ 1934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三卷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五六年·北京

斯 大 林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凡　例

一、本全集第一至十三卷的卷次、分篇等与俄文版相同，第十四卷及之后各卷的卷次、分篇等由本电子书制作者编辑排定。

二、本全集的注释，一为著者注、译者注和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附在当页正文的底部；二为俄文版编者注，用六角注码（〔一〕、〔二〕、〔三〕……）标明，附在全书正文之后。

三、正文中的俄文版编者注注码，如有下划线者（〔一〕、〔二〕、〔三〕……），为重要编者注，点击可直接转至全书“注释”的相应页面，阅读后点击注释条目末尾的“正文”，可回原读页面；一般编者注则未设置链接。

四、正文中的灰色夹注符号（◇1◇、◇12◇、◇123◇……），为该处之前文字在繁体竖排版《斯大林全集》第一至十三卷或其他中文版斯大林著作中的页次，便于读者引用时注明。

五、正文中著者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六、点击左侧书签中分年（月）目录前的展开符号，可显示该年（月）的全部篇目，点击篇名可转至该文的首页。

七、本书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文中在旧历日期之后用括号注明另一数字者，则为公历日期。

八、本书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hqxsk@163.com

目　录

第十三卷说明 …… 1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〇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的结论
（1930 年 7 月 2 日）…… 3
给沙屠诺夫斯基同志的信 …… 14
给契·同志的信 …… 16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
（摘自原信） …… 19

一九三一年

论反犹太主义
（答美国犹太电讯社问） …… 23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
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 24
给艾特琴同志的信 …… 34
致阿捷尔拜疆石油联合厂和
格罗兹内石油联合厂工作人员的贺电 …… 36
致电器工厂 …… 37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38

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
各机器拖拉机站 …… 39
致谷物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各国营谷物农场 …… 42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 43
一 劳动力 …… 43
二 工人的工资 …… 45
三 劳动组织 …… 48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 51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 54
六 关于经济核算 …… 57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 59
致“阿模”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 …… 62
致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建筑工程的工人和
行政技术人员 …… 63
给“技术报” …… 64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 65
下新城。汽车制造厂 …… 78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79

一九三二年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建筑工程处处长和
汽车制造厂厂长 …… 93
致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建筑工程处处长和
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厂长 …… 94

答奥列赫诺维奇和阿利斯托夫
（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95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101
给“美联社”代表理查逊先生的回信 …… 102
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 …… 103
答拉尔夫·瓦·巴尔涅斯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104
库兹涅茨克。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 106
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贺电 …… 107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贺电 …… 108
致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建设者 …… 109
致列宁格勒的贺电 …… 110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 111
坎伯尔先生在胡诌 …… 113
附：和坎伯尔先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114
纪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十五周年 …… 121

一九三三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12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122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 122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 130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35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41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47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51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154
八 总结 …… 157
关于农村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说）…… 161
给“女工”杂志 …… 174
给伊·恩·巴让诺夫同志的信 …… 175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176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176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
生活富裕的人 …… 182
三 几点意见 …… 185
庆祝红军建军十五周年贺电
（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191
给巴尔涅斯先生的回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192
致谢·米·布琼尼同志 …… 193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简要记录）…… 194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十五周年贺电 …… 203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4

一九三四年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20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208
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 …… 209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 …… 213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 219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 …… 224
一、工业的高涨 …… 226
二、农业的高涨 …… 232
三、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 242
四、商品流转的高涨和运输业 …… 247
三　党 …… 251
一、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 252
二、组织领导问题 …… 263
致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沙波什尼柯夫同志和政治工作助理沙金柯同志 …… 274
代替结论的话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275

注释 …… 276
年表（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 289
插图（新增）
一　为农业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 …… 41
二　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 …… 112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 …… 160
四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 190

第十三卷说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包括约·维·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的著作。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政策，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苏联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约·维·斯大林揭穿了右倾机会主义者首领们的两面派行为。约·维·斯大林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指出了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约·维·斯大林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语言会消亡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理论，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各民族语言才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的纲领性原理。

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和“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中，约·维·斯大林论证了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改造时期的决定性意义，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的口号。约·维·斯大林阐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规定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新方法。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所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具有极重大的国际意义。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被世界经济危机所震撼的时期取得的五年计划的成绩，表明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无可争辩地优越于垂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约·维·斯大林在说到保证五年计划胜利的基本力量时，首先指出了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和忘我精神、热情和创造性，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

约·维·斯大林根据五年计划的总结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指出了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贪图私利者和盗窃分子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全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和“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论述了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问题和党的农村工作的任务。约·维·斯大林在揭穿农村中隐蔽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时号召党组织加强警惕性。约·维·斯大林在总结集体农庄建设时提出了如下的口号：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约·维·斯大林的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和“答奥列赫诺维奇和阿利斯托夫”等著作论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问题。约·维·斯大林揭穿了我们党的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和其他一切伪造者，号召把党史的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并着重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在和各色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约·维·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评定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约·维·斯大林在给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中，指出杰米杨·别德内依的某些诗体小品文充满了反爱国主义的倾向，而且公然违反了列宁主义。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俄罗斯工人阶级给人类做出了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这使俄罗斯工人心里产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约·维·斯大林号召苏联作家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

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约·维·斯大林从理论上阐述了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约·维·斯大林在回答艾·路德维希的问题时说，他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工人阶级，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

约·维·斯大林在和外国活动家的几次谈话中，说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论证了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建立事务联系的可能性。

在“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约·维·斯大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指出了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国内所发生的根本改变，指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证明党的总路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约·维·斯大林着重指出，党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应归功于党在自己的工作中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可战胜的学说为指针。约·维·斯大林拟定了党今后在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方面以及在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工作纲领。约·维·斯大林提出了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肃清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任务。

约·维·斯大林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产生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变动情况，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不会导致工业的新高涨和新繁荣的特种萧条。约·维·斯大林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状况的尖锐化以及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尖锐化，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约·维·斯大林揭露了战争挑拨者的计划，科学地预见到今后事变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反苏战争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将是最危险的战争，苏联各族人民将为保卫革命果实而进行殊死战斗，战争将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败，使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爆发革命，使这些国家的资产

阶级地主政府垮台。约·维·斯大林规定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维护和平的政策。约·维·斯大林警告必须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力量，随时准备捍卫苏维埃国家以防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犯。

第十三卷中第一次发表了约·维·斯大林给沙屠诺夫斯基同志、契·同志、杰米杨·别德内依、艾特琴同志、伊·恩·巴让诺夫同志的信，约·维·斯大林答拉尔夫·瓦·巴尔涅斯问、给巴尔涅斯先生的回信以及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

一九三四年一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

同志们！在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在我们的代表大会反驳了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发言以后，我在结论中要说的话就很少了。

我在报告中说过，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少有的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没有一个能提出自己的路线来和党的路线对立的比较定形的反对派了。你们看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定形的反对派，而且甚至找不到一个小集团或个别同志认为自己有理由走到讲台上来说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

很明显，我们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且它的正确性是如此明显和不容争辩，以致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发言中毫不犹豫地着重指出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性。

既然如此，当然就没有必要来阐述已经在报告中发挥过的那些原理的正确性了。所以没有这样◇3◇[①]的必要，是因为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很明显，不需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来为它辩护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做结论，因为我认为对同志们递到代表大会主席团来的一些条子简单地答复一下，然后对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发言说几句话，并不是多余的。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全集》1953 年中文版（繁体竖排版）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大部分条子所涉及的都是一些次要问题：为什么在报告中没有提到饲马业问题，——能不能在结论中提到这个问题；（笑声）为什么在报告中没有提到住宅建设问题，——能不能在结论中谈一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报告中完全没有谈到农业电气化问题，——能不能在结论中谈一谈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应当告诉所有这些同志，我在报告中不能把国民经济中的一切问题都谈到。我不仅不能，而且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没有权利侵入古比雪夫同志和雅柯夫列夫同志的报告的范围，他们应该向你们报告工业和农业的具体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央的报告把一切问题都谈到，那末做工业、农业等报告的人在报告中应该谈些什么呢？（喊声：“对！”）

其中，关于那张提到农业电气化的条子我应当指出，写这张条子的人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他断定说我们已经“逼近”农业电气化了，说农业人民委员部不让这一事业发展，说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这样等等。同志们，这都是不对的。不能说我们“逼近”农业电气化了。如果我们确实逼近了农业电气化，那末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个至十五个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区域了。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关于农业电气化问题，现在能够说的只是：我们的电气化事业正◇4◇处在试验性的研究阶段。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这样，他鼓励在农业电气化方面做试验工作。有些同志认为拖拉机已经过时了，现在是由拖拉机转到农业电气化的时候了。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必须使这些同志抑制一下。农业人民委员部正是这样对待这些同志的。因此，不能认为写这张条子的人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不满是有根据的。

第二类条子涉及的是民族问题。其中有一张条子我认为最有趣，它把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民族语言问题的解释和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民族大学的演说〔二〕中的解释做了比较，认为里面

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加以说明。这张条子上写道：“那时你反对社会主义时期（**在一个国家内**）各民族语言会消亡而形成一种共同语言的理论（**考茨基**的理论），但是现在你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却说共产党人主张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语言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这里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认为这里既没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我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说中反对过考茨基的民族沙文主义理论，照这个理论的说法，如果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奥联邦获得胜利，那就一定会使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有共同的**德意志**语言的共同的**德意志**民族，并使捷克人**德意志**化。我当时援引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后我国生活中的一些推翻了这个理论的事实来反对这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理论。我现在还是反对这个理论，这一点从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所以反对，是因为各民族，比如说苏联各民族，会融合为一个有共同的**大俄罗斯**语言的◇5◇共同的**大俄罗斯**民族的理论是民族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它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矛盾的，这个原理认为，民族差别在最近时期内不会消失，这些差别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还一定会存在很久。

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更远的前途，那末我向来都是坚持而且现在还是坚持列宁的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言，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言，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肯定地说过了。

这里究竟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究竟有什么需要加以说明的呢？

看来写这张条子的人至少有两件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

首先，他们没有弄清楚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但是各民族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发展和繁荣起来。事实上，我们是否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通常叫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它在一九一八年叫做过渡时期，那时列宁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三〕中第一次阐述了这个时期及其经济生活中的五种成分。它在目前，在一九三〇年也叫做过渡时期，这时这些经济成分中有几种已经衰老，快要灭亡了，而其中有一种，即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新成分，却在空前迅速地增长和发展起来。能不能说这两个过渡时期完全相同，它们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呢？显然不能。◇6◇

一九一八年我们在国民经济方面的情形怎样呢？工业遭到破坏，只能制造打火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增长。

现在我们的情形怎样呢？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恢复，并且正在进行改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体系有了充分的发展，单是它们的春季播种面积就占苏联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正在灭亡，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灭亡。

那时也是过渡时期，现在也是过渡时期。但它们毕竟是彼此根本不同的，是有天壤之别的。毕竟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已经踏上消灭最后一个严重的资本主义阶级即富农阶级的门槛。很明显，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很明显，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成分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杠杆。虽然如此，可是各民族语言不仅没有消亡，没有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恰恰相反，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语言正在发展和繁荣起来。显然，认为在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在**一个**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期，**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语言会消亡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第二、写这张条子的人没有弄清楚，民族语言的消亡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问题。写这张条子的人不懂得，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不◇7◇能混为一谈。列宁说，民族差别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还会存在很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和苏联若干民族有关的一种情况。在苏联版图内有乌克兰，而在其他国家版图内还有另外的乌克兰。在苏联版图内有白俄罗斯，而在其他国家版图内还有另外的白俄罗斯。你们是不是认为乌克兰语言和白俄罗斯语言问题可以不考虑这些特殊条件而得到解决呢？

其次，再拿分布在苏联南部边境从阿捷尔拜疆到哈萨克斯坦和布里亚特—蒙古的各民族来说吧。所有这些民族的情况也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一样。显然，这里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民族发展的特殊条件。

所有这一类同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不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苏联范围内得到解决，这不是很明显吗？

同志们，关于一般民族问题以及上面所说的那张关于民族问题的条子，要说明的就是如此。

现在让我来谈谈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发言。

代表大会对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也许是捶胸顿足反省悔过吧？当然不是！我们党，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决不会要求党员去做这一类可以使他们受到侮辱的事情。代表大会对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要求有三件事情：

第一、要求他们知道，党的路线和他们过去所维护的路线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他们过去所坚持的◇8◇路线客观上不是引向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引向资本主义的胜利；（喊声：“对！”）

第二、要求他们斥责这条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并且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和它划清界限；（喊声：“对！”）

第三、要求他们和我们步调一致，和我们一道同所有一切右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喊声：“对！”热烈鼓掌。）

代表大会对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的要求就是这些。

在这些要求里，有没有什么使他们这些愿意继续做布尔什维克的人受到侮辱的东西呢？

显然，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侮辱的东西。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革命者，每个自重的党员都会明白，如果他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承认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那末他只会提高威信，得到党的重视。

因此，我认为托姆斯基所说的有人想把他送到戈壁沙漠去强迫他吃野蜂蜜和蝗虫的话简直是粗俗的滑稽戏里的无聊笑话，和革命者的人格问题毫不相干。（笑声，鼓掌。）

有人会问，为什么代表大会重新向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提出这些要求呢？

这些要求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中央全会〔四〕上已经向他们提出过一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当时接受了这些要求，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并放弃了自己的路线，承认党的路线正确并答应和党一起同右倾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些事情都有过。那末，问题◇9◇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过去没有履行而且现在也不履行他们在七个月以前所承担的义务。（喊声：“对！”）乌格拉诺夫在他的发言中说得完全正确，他说他们没有履行他们向中央十一月全会所承担的义务。

这就是现在他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不到信任的原因。

因此，代表大会重新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在这里埋怨代表大会不信任他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谁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谁就不能指望得到信任。

他们这些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是否有过可能和机会来履行自己的诺言，勾销过去的一切呢？当然是有过的。但是在这七个月里，他们在利用这些可能和机会方面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不久以前，李可夫曾经参加乌拉尔代表会议〔五〕。可见他有过好机会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事实怎样呢？他不但不公开地和坚决地抛弃自己的动摇的立场，反而在那里“掉花枪”，耍手腕。当然，乌拉尔代表会议不能不向他反击。

现在请把李可夫在乌拉尔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比较一下。其中有极大的差别。在那里，他“掉花枪”，耍手腕，向乌拉尔代表会议开火。在这里，他打算公开地和大声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打算和右倾反对派决裂，并且答应拥护党同各种倾向作斗争。这种变化是从哪◇10◇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看来这是因为在党内对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形成了一种具有压力的局面。难怪代表大会因此产生了一个明确的印象：不把这些人压一下，就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大笑，鼓掌多时。）

乌格拉诺夫是否有过可能来履行他对中央十一月全会所作的诺言呢？是的，是有过的。我指的是“莫斯科电工”工厂非党员大会，不久以前他在那个会上讲过话。事实怎样呢？他不但不以布尔什维克应有的态度发言，反而在那里痛骂党的路线。当然，他因此受到了工厂支部方面应有的反击。

现在请把他那次的发言和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声明比较一下。其中有极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也是因为在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周围形成了一种具有压力的局面。难怪代表大

会由此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不把这些人压一下，就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大笑，鼓掌。）

或者再拿托姆斯基来说吧。不久以前他曾在梯弗里斯参加南高加索代表会议〔六〕。可见他有过赎罪的机会。事实怎样呢？他在那里发言时讲到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合作社、文化革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是主要的问题，即关于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机会主义活动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就叫做履行对党承担的义务！他想欺骗党，可是他不知道千百万只眼睛在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要欺骗任何一个人都是办不到的。

现在请把他在梯弗里斯的发言和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公开地承认他在领导全苏工会◇11◇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中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发言比较一下。其中有极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也是因为在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周围形成了一种具有压力的局面。难怪代表大会要把这些同志好好地压一下，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鼓掌，全场大笑。）

这就是代表大会对这些同志还抱着不信任态度的原因。

为什么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会有这种非常奇怪的行为呢？

为什么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没有外界的压力他们就一次也不想自愿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呢？

这至少是由于两种情况：

第一、他们还没有完全相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还在暗中继续进行某种派别活动，他们等着候着，等到一有适当的机会，就重新公开地出来反对党。他们召集自己派别组织的会议，讨论党的问题的时候，总是这样盘算：让我们等到春天，春天也许党在播种工作方面会遭到失败，那时我们就来狠狠地打击它。可是，春天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好处，因为播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是他们又这样盘算：让我们等到秋天，秋天也许党在粮食收购方面会遭到失败，那时我们就来

打击中央。可是，他们又上了秋天的当，他们又等了一场空。因为每年都有春天和秋天，于是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就继续等候着，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春天，就是寄托在秋天。（全场哈哈大笑）

很明显，他们既然老是从这一季等到那一季，等待适当的时机来打击党，当然也就不能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了。◇12◇

最后，**第二个原因**。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不了解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不相信这种速度，并且根本不接受超出逐渐发展的范围，超出自流范围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那些和改造时期有关的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由于这种尖锐化而引起的结果，都使他们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产生畏缩恐惧的心理。因此，很明显，他们躲避和我们党的最尖锐的口号有关的一切事物。

他们染上了契诃夫小说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腊文教员，“套中人”别里柯夫的那种毛病。你们记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吗？大家知道，这位主人公不管天气冷热，出门总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带着雨伞。有人问别里柯夫说：“请问，为什么你在这样热的七月天还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呢？”别里柯夫回答说：“以防万一，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要是突然冷起来，那怎么办呢？”（大笑，鼓掌。）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人家开办了一个新食堂，别里柯夫立刻就恐惧起来：“当然，有个食堂也许是好的，可是要当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人家组织了一个戏剧组，成立了一个阅览室，别里柯夫又恐惧起来：“戏剧组，新阅览室，要这些东西干吗？当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大笑）

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是这样。你们记得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接办的事情吗？当时我们不过想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来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们

却遭到右倾分子的拚命反抗。“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要这◇13◇样？等一等不是更好吗？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所有的高等技术学校都已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了。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来说吧。你们记得右倾反对派的首领们因为这件事向我们发的神经病吗？“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为什么要这样？对富农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不是更好吗？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已经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了，和这个政策比较起来，对富农采取的非常措施简直是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来说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要它们干吗？我们何必着急呢？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弄出什么事情来。”

如此等等。

这种害怕新事物、不会用新方式来处理新问题的毛病，这种“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的恐惧，——就是套中人的这些特征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真正和党打成一片。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上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立刻就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还没有完全从洞里爬出来，他们立刻就吓得往后退，胆颤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临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哈哈大笑）

我们叫他们安心，竭力开导他们，说这里没有任何危险，说这不过是一只蟑螂，用不着害怕。但◇14◇是哪里有用！他们还是继续大喊大叫：“这怎么会是蟑螂？这不是蟑螂，是一千只猛兽！这不是

蟑螂，这是深渊，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于是就“手忙脚乱起来”……布哈林为此写了一个提纲送到中央，硬说中央的政策已经使国家濒于灭亡，硬说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灭亡，如果不是立刻灭亡，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要灭亡。李可夫同意布哈林的提纲，不过附带声明说他和布哈林有极严重的分歧，分歧的地方是：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不是过一个月，而是过一个月零两天。（大笑）托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不过有一点他是反对的，这就是他们不应该写出提纲，不应该留下日后不免要对它负责的字据：“我对你们说过多少遍，你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不要留下字据，不要留下痕迹。”（全场哈哈大笑，鼓掌多时。）

诚然，经过一年以后，当每个傻瓜都已经明白蟑螂的危险连一个鸡蛋壳都抵不上的时候，右倾分子已开始恢复神志，壮起胆子，甚至不辞吹牛，说他们不怕任何蟑螂，何况这是一只有气无力、半死不活的蟑螂。（笑声，鼓掌。）但这是一年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却不得不和这些爱找麻烦的人费力周旋……

同志们，就是这些情况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靠近党的领导核心并和它彻底打成一片。

这究竟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只有一个办法：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武装起来，和我们党中央一起为争取布尔什维克的发◇15◇展速度而斗争，为反对右倾而斗争。

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如果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很好。如果做不到，那就让他们去埋怨自己吧。（全场鼓掌多时。欢呼。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三日
“真理报”第一八一号◇16◇

给沙屠诺夫斯基同志的信

沙屠诺夫斯基同志！

你的第一封信（关于李卜克内西的）记不得了。第二封信（关于批评的）我已看过。当然，批评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进行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批评要有益处。可惜你的批评不能认为是有益处的。现在来逐点谈谈你的批评：

（一）说在革命前购买土地的**只有**富农，这是不对的。事实上当时购买土地的既有富农，也有**中农**。如果把购买土地的农户按社会成分加以划分，那末中农所占的户数要比富农多；如果从购买土地的数量来看，那末富农占优势。我在演说〔七〕中所指的当然是中农。

（二）鲁莽者退到列宁主义立场这句话是鲁莽者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的另一种说法。我认为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你对这一点的“批评”意见简直是可笑的。

（三）关于拿黑麦喂猪一事，你说的也不对。我说的不是黑麦也适于喂猪。我说的是黑麦**生产过剩的危机**〔八〕使扩大黑麦播种面积无利可图，使资本家（为了维持价格）用特别的化学方法把黑麦弄坏，让它只适于喂猪（这种黑麦是不适于人吃的）。你怎么能忽略这件“小事”呢？◇17◇

（四）你说资本主义的**腐朽**似乎排斥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说法更加不对。你只要读一读伊里奇的“帝国主义”〔九〕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国家内的**腐朽**不是排斥资本主义在其他部门和其他国家内的**增长**，而是给它造成前提。你怎么能不注意列宁著作中的这件“小事”呢？请批评吧，但是请用列宁的观点批评，而且仅仅用这种观点来批评，如果你想使你的批评收到效果的话。

（五）你认为我国是“殖民地国家类型”的国家，这也是不对的。殖民地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而我国是资本主义**以后**的国家。前者还没有发展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后者已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这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类型。批评家同志，怎么能忘掉这件“小事”呢？

（六）斯大林认为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在技术方面应当比老的更有经验〔一〇〕，你对这一点感到惊异。试问，为什么？老的经济工作干部是在我国恢复时期，即在充分利用技术落后因而不能提供很多技术经验的旧工厂时期成长起来的，这难道不对吗？在采用现代新技术的改造时期，老的经济工作干部必须重新学习，有时要让位于技术上更有训练的新干部，这难道不对吗？在充分利用旧工厂和使旧工厂开工时期成长起来的老的经济工作干部，不仅在新技术面前，而且在我国新的发展速度面前,常常显得简直束手无策，难道你要否认这一点吗？

（七）你信中其他几个比较琐碎的、没有意义的、但也同样错误的地方我就不谈了。

（八）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 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18◇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八月

给契·同志的信

契·同志！

你的来信充满了误解。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的是“工业化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业化方法，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方法“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是使内部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解决这些矛盾”〔一一〕。可见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首先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可见这里说的是**结合内部**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所谈到的。

可是你忘记了这一切，而谈论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即结合范围以外的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

可见你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你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之间的矛盾同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了。◇20◇

明白吗？我想是明白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

契·同志！

一、在你的第一封信中，你**玩弄**“矛盾”这个字眼，把结合外部

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同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混为一谈**。如果你当真要把党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的基本问题弄明白，你就不会玩弄这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容许的把戏了。托洛茨基分子曾经对我们说：

（甲）如果没有胜利的世界革命的及时援助，你们就**解决不了**中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农和工人阶级一定会破裂，结合也就会毁灭；

（乙）如果没有胜利的世界革命的及时援助，你们就**战胜不了**资本主义分子，你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特米多尔[①]也就不可避免。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遭到了失败。但是,你不愿意仔细研究我们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争论。因此，我在回信中不得不揭穿你玩弄“矛盾”这个字眼的把戏，并提醒你不能把两种◇21◇不同的矛盾混为一谈。

而你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

二、你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外交式地”回避问题，从玩弄“矛盾”这个字眼转到玩弄“**内部**矛盾”这个字眼，把结合内部的矛盾同国家内部的矛盾，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混为一谈。这就是说，你“不知不觉地”重犯了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形式。不瞒你说，把两种不同的矛盾混为一谈和“外交式地”抹杀问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思想的最大特点。我本来没有想到你会染上这种毛病。现在却不得不这样想了。

因为不知道你还要玩弄什么把戏，而我的日常工作又忙得不可开

———————————————

① 所谓特米多尔倾向或特米多尔化，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是指权力从无产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种蜕化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本书制作者注

交，没有工夫来玩把戏，所以，契·同志，让我和你告别吧。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22◇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

（摘自原信）

你十二月八日的信收到了。看来你需要我的答复。那末好吧。

首先谈谈你的一些琐碎的词句和暗示。假如这些不漂亮的“小东西”是一种偶然的因素，那倒可以不去管它。但是这些“小东西”是那么多，那么猛烈地“喷涌出来”，以致决定了你整封信的音调。大家知道，音调是构成乐曲的。

你把中央的决议看做“绞索”，看做“我的（即你的）毁灭的时刻到了”的标志。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一个共产党员不去领会中央决议的实质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蔑视这个决议，把它看做“绞索”，这叫什么共产党员呢？……

在该称赞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称赞过你。当我们党内的个别集团和同志攻击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保护过你（其实是有些勉强的！）。当不少诗人和作家犯了个别错误的时候，中央纠正了他们。这一切你都认为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中央不得不批评你的错误的时候，你就突然嗤之以鼻，叫起“绞索”来了。有什么根据呢？也许中央没有权利批评你的错误？也许中央的决议对你没有◇22◇约束力？也许你的诗超乎一切批评之上？你没有发觉你已经染上某种令人不快的所谓“自高自大”的毛病吗？杰米杨同志，放谦虚一些吧……

你的错误的实质在哪里呢？你的错误的实质就在于：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你最初运用得很准确很巧妙的这个必要的和应该的批评使你过分迷醉了，而你一旦迷醉之后，这种批评就在你的作品中开始发展为对苏联的**诽谤**，对苏联过去和对苏联现在的**诽谤**。你的“从热

炕上爬下来吧”和“不讲情面”就是如此。你的“比里尔瓦”就是如此，这本书我已经遵照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在今天读过了。

你说莫洛托夫同志称赞过“从热炕上爬下来吧”这篇小品文。很可能是这样。我对这篇小品文的称赞也许不下于莫洛托夫同志，因为在这篇小品文里（正如在其他小品文里一样）有许多击中要害的精采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也还有一匙焦油，它弄脏了整幅图画，把它变成了十足的“比里尔瓦”。问题就在这里，构成这些小品文的乐曲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自己来判断吧。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移到俄国来了。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苏联，把它看做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策源地，承认它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都一致向苏联工人阶级，首先向苏联工人的先锋队——**俄罗斯**工人阶级欢呼，把它当做自己公认的领袖，因为它实行着其他各国无产者曾经梦想实行的最革命最积极的政策。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领导者都如饥如渴地研究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最有教益的历史，研究这个阶级的过去，研究俄◇24◇罗斯的过去，他们知道除了反动的俄罗斯以外，还有过革命的俄罗斯，有过拉吉舍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里雅鲍夫和乌里杨诺夫、哈尔土林和阿列克谢也夫这样一些人的俄罗斯。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工人心里产生（不能不产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

而你呢？你不去理解革命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反而跑到什么洼地里，在摘自卡拉姆津著作的非常乏味的引文和引自“家训”的同样乏味的格言之间纠缠不清，并向全世界宣布：过去的俄罗斯是装满了丑恶和颓废的瓶子；现在的俄罗斯是十足的“比里尔瓦”；“懒惰”和渴望“坐在热炕上”几乎是一切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因此也是完成过十

月革命的、当然仍旧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点。这就是你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不是的，可敬的杰米杨同志，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对苏联无产阶级的**侮辱**，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侮辱**。

既然如此,你还想叫中央默不作声！你把我们的中央看成什么了？

你还想叫我因为你原来对我有“历史上的好感”而默不作声！你是多么幼稚，多么不了解布尔什维克……

也许你这位“有学问的人”不会拒绝听听下面这段列宁的话吧：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丝毫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以便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25◇的劳动群众）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美丽的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因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神甫和地主而感到自豪。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大俄罗斯人（沙皇专制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吐露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够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逢迎献媚的

极端奴才相。”（见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一二〕）

请看列宁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关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是说得**多么**好。

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

“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心）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26◇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同上）〔一三〕

这就是列宁的明白而大胆的“纲领”。

这个“纲领”对于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自己的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这个“纲领”对于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自己的人民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联系的列列维奇之流的蜕化分子是不可理解的，是不自然的。

能不能把列宁的这个革命的“纲领”和你最近的几篇小品文中所表现的那种不健康的趋向调和起来呢？

可惜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事情就是这样，你所不愿意了解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此，**无论如何**你必须回到原来的列宁的道路上来。

主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张皇失措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无谓哀鸣，惊慌地说人家要把杰米杨“孤立”起来，说“再不发表”杰米杨的作品了等等。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27◇

论反犹太主义

（答美国犹太电讯社问）

兹答复贵社的问题。

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是人吃人时代特有的仇视人类的习气的残余。种族沙文主义的极端形式反犹太主义是人吃人恶习的最危险的残余。

反犹太主义对剥削者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资本主义躲开劳动者打击的避雷针。反犹太主义对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使劳动者离开正路而走入丛莽密林的歧途。因此，作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势不两立的死敌。

在苏联，反犹太主义是作为一种极端敌视苏维埃制度的现象而受到法律极严厉的追究的。依照苏联法律，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应判处死刑。

约·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

第一次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三二九号◇28◇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
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一四〕上的演说）

同志们！你们代表会议的工作快要结束了。现在你们就要通过决议了。我相信这些决议是会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中（这些决议我知道得不多），你们赞成一九三一年的工业控制数字并且保证完成这些控制数字。

布尔什维克的话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是习惯于履行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的。可是保证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保证使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不仅如此，你们做这样的保证还意味着你们不只是要四年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这是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决议），——**这就是说，你们要在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

代表会议提出诺言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过“沉痛的经验”。我们知道，诺言并不总是履行的。一九三〇年初也曾提出过这种完成年度计划的诺◇29◇言。当时必须使我们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诺言并没有完全履行。事实上，一九三〇年工业产值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们要问一问：今年会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工业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现在提出诺言在一九三一年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么保证能履行这个诺言呢？

为了完成控制数字，为了使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为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是在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

划，需要什么呢？

为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际的或者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客观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去年我们有没有完成全部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是：去年三月和四月工业产值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试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全年计划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件事呢？缺乏什么呢？**缺乏利用现有可能性的本领。缺乏正确领导工厂和矿井的本领**。

我们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即完成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具备第二个条件，即领导生产的本领。正因为缺乏领导企业的本领，所以计划没有完成。我们没有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30◇

当然，**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值在一九三〇年都没有**增长**，而且现在也没有**增长**。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都发生了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本来能够增长得更多。我们具有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观的”条件。

那末，有什么保证能使今年不再重复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计划全部完成，使现有的可能性被我们充分地利用，使你们的诺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为纸上空文呢？

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我们有没有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有的，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要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国内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就拿乌拉尔来说吧，它是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出来的富源总汇。矿石、煤炭、石油、粮食——在乌拉尔哪一样没有呢！我们国内什么都有，也许只是橡胶没有。但是再过一两年，连橡胶我们也会有的。在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们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国，自然富源甚◇31◇至是绰绰有余的。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权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有时不免发生一些争执。例如去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斗争，而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基地。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受到这样的拥护呢？是的，是受到的。你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政权。我不准备举出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突击运动的发展、为生产财务响应计划而斗争的运动等等事实。这一切显然表明千百万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事实是大家知道的。

为了完成并超额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种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我们的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因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

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我们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优越◇32◇于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我们的优越性在于我们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没有而且不会有几百万失业者，我们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如此，我们是工业积聚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最优良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工业，从而保证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未有的积累速度。我们过去的弱点在于我们的工业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

不久，也许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就是大经济形式）今年出产的商品谷物已经占我国全部商品谷物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的制度，苏维埃制度，使我们有了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迅速前进的可能性。

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党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33◇政策使我们获得重大的胜利。这一点现在

不仅工人阶级的朋友，就连工人阶级的敌人也都承认。请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绅士们——美国的菲诗、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彭加勒怎样向我们党暴跳狂吠呵。他们为什么暴跳狂吠呢？就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

同志们，这就是使我们容易实现一九三一年控制数字、帮助我们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在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计划的一切客观的可能性。

可见完成计划的第一个条件即“客观的”可能性我们是具备的。

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条件即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呢？

换句话说，我们对工厂和矿井有没有正确的经济领导呢？

这里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公开坦白地说出这一点。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34◇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

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末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发出警报，说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事件〔一五〕就是第一次严重的警报。沙赫特事件表明：党组织和工会缺乏革命警惕性。这一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技术方面落后得不象话；某些旧工程师和技师因为在工作上无人监督，就比较容易滚到暗害活动的道路上去，况且国外敌人还不断用种种“建议”来缠住他们。

第二次警报就是“工业党”审判案〔一六〕。◇35◇

当然，暗害活动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敌人是要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暗害活动如此猖獗。

暗害活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规模呢？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经济领导问题，如果我们老早就开始研究业务，掌握技术，如果我们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预经济领导，那末暗害分子就不能干出这样多的暗害勾当来。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

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人们时常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长制呢？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技术，我们就没有而且不会有一长制。只要在我们中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没有足够的精通技术、经济和财务问题的人材，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一长制。如果你们不掌握工厂和矿井的技术、经济和财务，那末随便你们写多少决议，随便你们怎样宣誓，也都无济于事，也都不会有一长制。

因此，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而一长制也才能实行。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科学、技术经验、知识，——这些东西都是可◇36◇以得到的。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握技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有了热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战胜一切。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一七〕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

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和第一种义务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义务看得更高。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是由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努力，而且是由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早就被粉碎了。有人说，我国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但是这使我们担负了极重大的义务。国际无产阶级为什么支持我们呢？我们凭什么配受这种支持呢？因为我们最先投入了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我们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权，我们最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一旦成功，就会翻转整个世界，解放整个工人阶级。可是要怎样才能成功呢？要消灭我国的落后状况，展开布尔什维克的高度的建设速度。我们应当这样

向前迈进，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可以望着◇38◇我们说：看呵，这就是我们的先锋队，这就是我们的突击队，这就是我们的工人政权，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让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资本家，让我们来推进世界革命事业吧。我们是否应当实现世界工人阶级的希望呢？我们是否应当履行我们对他们所负的义务呢？是的，是应当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丢尽脸的话。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和国际的义务。

你们看，就是这些义务要求我们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年来在领导经济方面什么也没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们使工业产值比战前增长了一倍。我们创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真正努力掌握生产、生产的技术、生产的财务和经济，那我们会做得更多。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竟不愿意研究技术，不愿意掌握技术，——这是笑话，这就不成其为经济工作人员了。◇39◇

有人说，掌握技术是困难的。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

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只要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载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
“真理报”第三十五号◇40◇

给艾特琴同志的信

艾特琴同志！

你的小册子我没有能够读完（没有时间！），但是简单地答复一下你的四个问题是可以的。

（一）**关于“党内矛盾”**。无产阶级政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这一原理从恩格斯时代起就已经成为公理了。公开的或隐蔽的意见分歧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这和奥索夫斯基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奥索夫斯基错误地把我们党看做两个对抗阶级的联盟，看做这两个阶级的代表，而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事实上却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代表。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的共产党。

（二）**关于列宁主义**。不容置疑，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派别（不带引号的）。在工人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从封建保皇派（如“俄罗斯人民同盟”）和公开的资本主义派（如立宪民主党人）到隐蔽的资产阶级派（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极左派。其中列宁主义是最左的和唯一彻底的革命派别。

（三）**关于“左”倾和右倾的根源**。它们的根源是相同的，就是说，它们都反映着我们的异己阶◇41◇级的压力。它们对党进行斗争的形式和手段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即“左”倾和右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

（四）**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不明

白为什么康托尔同志不同意你的意见。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42◇

致阿捷尔拜疆石油联合厂和格罗兹内石油联合厂工作人员的贺电

祝贺阿捷尔拜疆石油联合厂和格罗兹内石油联合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两年半完成五年计划。同志们，祝贺你们的胜利！

粉碎了资本主义锁链而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的苏联工人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约·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
“真理报”第九十号◇43◇

致 电 器 工 厂

向两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的电器工厂全体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致热烈的敬礼。

前进，继续向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
“真理报”第九十二号◇44◇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祝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工人和领导人员获得第一个重大胜利〔一八〕。

同志们，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一三六号◇45◇

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局
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各机器拖拉机站

值此提前完成一千八百万公顷播种计划之际，谨向机器拖拉机站的男女工人、技师、专家和全体领导人员致兄弟的敬礼。

同志们，祝贺你们的胜利！

去年由机器拖拉机站播种的集体农庄土地约为二百万公顷。今年则在一千八百万公顷以上。去年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集体农庄为二千三百四十七个。今年则为四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个。这就是我国农民经济所走过的从木犁到拖拉机的道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工人阶级正坚定不移地和满怀信心地推进在技术上重新装备自己的同盟者劳动农民的事业！

我们希望机器拖拉机站不要满足于既得的成绩，而要通过响应计划把原定的（已经完成的）一千八百万公顷的播种计划**扩大**到二千万公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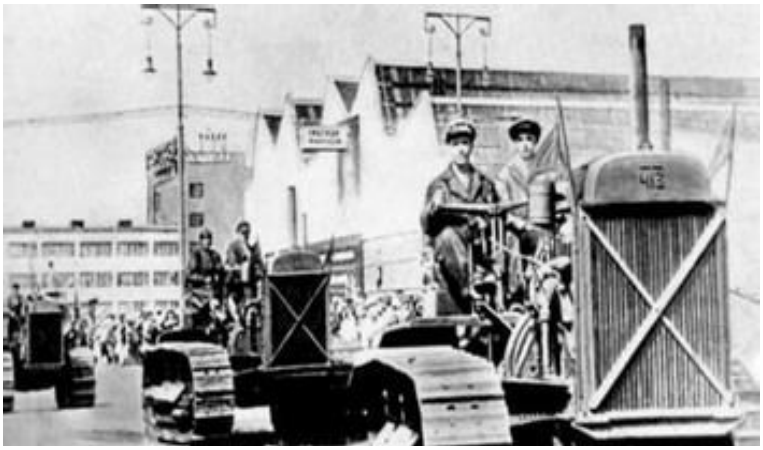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机器拖拉机站不要停留在这一点上，而要满怀信心地去迎接自己当前的新任务，以便◇46◇翻好五百万公顷左右的**休闲地**，顺利进行**收割**运动，翻耕一千五百万公顷左右的**秋翻地**，使**秋季播种**面积达到八百万公顷，成立**一千个新的**机器拖拉机站，从而为明年替绝大多数集体农庄服务打下基础。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正从小农经济的和农业技术落后的国家变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和农业技术先进的国家！

同志们，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四五号◇47◇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为农业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 （41）

拖拉机在农田作业

卫国战争时拖拉机厂生产的坦克

致谷物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各国营谷物农场

向苏联新型农业的主导力量，新的技术和新的农业组织方法的社会主义旗手——**国营谷物农场系统**，它的男女工人、技师和专家，它的领导者和指导员——致兄弟的敬礼！

不要满足于完成播种计划，——你们能够而且应当**超额完成**计划，因为你们具有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

要使你们在西伯利亚特别是在远东的**落后队伍**赶上来，要用各种办法**帮助集体农庄**，要展开**收割**的准备工作（这是国营谷物农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争取**新的成就**。

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一四七号◇48◇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
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一九〕上的演说）

同志们！从会议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各工业部门执行计划的情形是十分参差不齐的。在过去五个月内，有些工业部门的产值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些工业部门至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后，有个别工业部门增长得非常少，只增长了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甚至比这还少。属于最后一类的有煤矿工业和钢铁工业。可见情形是参差不齐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呢？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某些工业部门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煤矿工业和钢铁工业增长得更少，落在其他部门后面呢？

原因在于近来工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要求采取新的领导方法的新环境，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去改变工作方法，仍然按照旧方式工作。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要求按照新方式来工作，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了解这一点，不懂得现在必须按照新方式来领导。◇49◇

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

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新条件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新条件至少有六个。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条件。

一　劳动力

首先要谈的是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问题。从前通常是工人自动跑到工厂里来，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有某种自流现象。这种自流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有失业人口，有农村中的分化，有贫困，有驱使人们从农村跑进城市的饥饿的威胁。你们还记得“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这句话吧？当时是什么东西迫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呢？是饥饿的威胁，是失业，是因为当时农民觉得农村是他们的后母，农民总想逃开它，随便逃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点工作就行。

不久以前我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情形还完全是这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现在的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正因为环境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在这个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第一、我们消灭了失业，因而也就消灭了压迫“劳动市◇50◇场”的力量。第二、我们根本打破了农村中的分化，因而也就消除了驱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的普遍的贫困。最后，我们供给了农村数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打垮了富农，组织了集体农庄，使农民有了像人一样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现在已经不能把农村叫做农民的后母了。正因为再不能把农村叫做后母，所以农民就留在农村安居乐业，而我们就再也没有“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的现象，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可见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新的环境和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新条件。

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再不能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这就是说，应当由自流“政策”转到**有组织地**给工业招收工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经济组织同集体农庄和庄员订立合同。你们知道，某些经济组织和集体农庄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办法，而且经验表明，订立合同的办法无论对集体农庄或工业企业都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使最繁重的劳动过程**机械化**，并且大力开展这一工作（在森林工业、建筑业、煤矿工业、装卸工作、运输业、钢铁工业等方面）。这当然不是说，应该抛弃手工劳动。恰恰相反，手工劳动还会长期地在生产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这只是说，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能维持新的生产规模。

我们还有不少的经济工作人员既“不相信”机械化，也“不相信”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这就是◇51◇那些不了解新环境，不愿意按照新方式工作，而怀念着劳动力“自流”到企业里来的“旧日黄金时代”的经济工作人员。不用说，这种经济工作人员是和新环境向我们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相去万里的。看来他们以为劳动力的困难是偶然的现象，以为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会按所谓自流方式自行消灭。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劳动力的困难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这种困难才会消灭。

总之，**采用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组织地招收工人，使劳动机械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

二　工人的工资

我刚才已经谈过有组织地给我们各企业招收工人的问题。但是招收工人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要保证我们各企业有劳动力，必须把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使企业中的工人成员相当地固定下来。几乎用不着证明，没有相当精通生产技术并熟悉新式机器的固定的工人成员，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完成生产计划。没有这种固定的工人成员，就得每次都来重新训练工人，花一半时间去训练他们，而不是去进◇52◇行生

产。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工人成员是相当固定的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的企业中还有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而且许多企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在增长和加强起来。无论如何，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在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

从前，在工业恢复时期，我们的技术设备还不复杂，生产规模还不很大，还可以勉强“容忍”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大规模的改造时期，生产规模扩大了，技术设备极端复杂了，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也就成了生产的祸害，足以使我们的企业解体。现在“容忍”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就是瓦解我国工业，消除完成生产计划的可能，破坏改进产品质量的可能。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工资规定得不合理，工资等级制规定得不合理，工资方面有“左的”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企业制定的工资率几乎把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抹杀了。平均主义使非熟练工人不想成为熟练工人，因而丧失了上进的前途，于是他就觉得自己是工厂里的“游客”，只是暂时在这里工作，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平均主义使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以求最后找到一个能够真正重视熟练劳动的企业。

由此就产生了“普遍的”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的现象，产生了劳动力流动的现象。◇53◇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

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

在每个工业部门中，在每个企业中，在每个车间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较熟练的工人。我们如果真想保证企业中有固定的工人成员，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地把这一部分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他们，这一部分主要的工人，就是生产的基本环节。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固定在车间中，就意味着把全体工人固定下来，根本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呢？只有提升他们，只有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只有在规定工资时充分地照顾到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54◇

而提升他们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这对非熟练工人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这就是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熟练工人。但是要造就熟练的工人干部，就必须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前进和上升。我们愈是大胆地这样做就愈好，因为这是消灭劳动力流动现象的基本手段。在这件事上节约，就是犯罪，就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

但是这还不够。

要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还必须进一步改善工人的供应和居住条件。不能否认，近几年来我们在住宅建设和对工人的供应方面做了不

少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能满足工人迅速增长的需要。决不能藉口从前住宅比现在少，因此就可以安于既得的成绩。也不能藉口从前工人的供应比现在坏得多，因此就可以满足于现状。只有那些腐朽透顶的人才会藉口过去来安慰自己。不应当以过去为出发点，而应当以现在工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出发点。必须了解，我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现在的工人，我们苏联的工人，希望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既要满足粮食供应方面的需要，又要满足住宅方面的需要，还要满足文化及其他一切方面的需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保证他们的这些条件的义务。固然，我国工人没有失业的痛苦，他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自己事业的主人。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要求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我们也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要忘记，◇55◇现在我们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们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工作，进行竞赛，开展突击运动。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因此，工人在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时，自然也要求苏维埃政权履行它的义务，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

总之，**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消灭平均主义，合理地规定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条件。

三 劳动组织

上面我已经谈过必须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必须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但是把工人固定下来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单单消灭流动现象

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工人创造适当的劳动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效地工作，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因此，必须把企业中的劳动组织得能使生产率一月高于一月，一季高于一季。

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现行劳动组织符合于现代生产的要求呢？可惜不能这样说。无论如何，我◇56◇们还有一些企业，那里的劳动组织得很糟糕，那里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协调，而是毫无秩序，乱七八糟；那里盛行的不是对工作负责的现象，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无人负责是什么意思呢？无人负责就是对所担任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对机器、机床、工具不负责任。显然，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你们知道，无人负责现象在铁路运输方面引起了什么结果。无人负责现象在工业中也正引起同样的结果。我们在铁路运输方面已经消灭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提高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工业方面也应当这样做，以求把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和无人负责现象、每个工作人员对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相处得很好。从前，这种不合理的劳动组织还可以勉强“过得去”。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完全改变了。在目前生产规模如此宏大并且已经有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情况下，无人负责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这种祸害会威胁到我们各企业在生产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一切成绩。

为什么无人负责现象能在我们某些企业中生根呢？它是作为连续生产制的不合法的伴侣出现在企业中的。如果说连续生产制一定会引起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那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组织得合理，如果规定每个人对一定的工作负责，如果指定一定的工人使用一定的机器和机床，如果轮换的班次组织得合理，各班的质量和熟练程度彼此不相上下，那末连续生产制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工作质量，

根除无人负责现象。例如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现在那里正在实行连续生产◇57◇制，但是无人负责现象已经没有了。能不能说我们工业企业中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情形也一样良好呢？可惜不能这样说。问题在于我们某些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没有适当地组织质量和熟练程度大体相等的轮换班次，没有规定每个人对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负责。结果就使连续生产制自流而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我们某些企业中有了纸上的口头的连续生产制以及非纸上的实在的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无怪乎工人说：“我们本来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工作，但是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负责，那末谁会重视我们呢？”

由此可见，我们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因为实行得太仓卒了，就曲解了连续生产制，使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

要消灭这种情形并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有两条出路：或者照铁路运输方面所做的那样，改变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条件，使连续生产制不致变成无人负责现象。或者在现在还没有具备做这种试验的有利条件的地方，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抛掉纸上的连续生产制，暂时改为六日生产制，并准备条件，以便将来在必要时可以再来实行真正的非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再来实行没有无人负责现象的连续生产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58◇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在某些企业中，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也就被曲解到了极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试问谁需要这样的连续生产制呢？谁敢说保存这种纸上的被

曲解了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合理组织劳动的利益，高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益，高于真正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呢？我们把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埋葬得愈快，我们实现合理的劳动组织也就会愈快，这不是很明显吗？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痛骂一顿，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说，就可以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据我所知，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只限于动辄在大会上把无人负责现象痛骂一顿，大概以为说过这些话以后，无人负责现象就会自行消灭，就会所谓自流地消灭。如果他们认为靠演说和痛骂就可以从实践中铲除无人负责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同志们，无人负责现象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而且应当去消灭无人负责现象，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大家要对一切负责，也要对无人负责现象负责。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员不是从事于演说和痛骂，而是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矿井或工厂，研究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和“小事”，把那里的无人负责现象真正消灭，然后把这个企业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去，那就要好得多。那就不知道要好多少。这才是真正为反对无人负责现象而斗争，为合理的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组织而斗争，为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而斗争。

总之，**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改善劳动组织，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59◇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条件。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一般工业指挥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形也改变了。

从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我国全部工业的主要来源是乌克兰的煤

矿钢铁基地。乌克兰把金属供给我国所有的工业区，无论是南方，或者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又把煤炭供给我们苏联的基本企业。这里我不谈乌拉尔，因为乌拉尔在这方面所占的比重和顿巴斯比较起来要小得多。这样，我们在当时有三个培养工业指挥人员的主要基地：南方、莫斯科区、列宁格勒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我国当时仅有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勉强过得去。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我们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单靠乌克兰煤矿钢铁基地已经不能对付了。你们知道，虽然乌克兰的煤炭和金属产量日益增长，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你们知道，我们因此不得不在东方建立新的煤矿钢铁基地，即乌拉尔—库兹巴斯。你们知道，我们建立这个基地不是没有成绩的。但是这还不够。其次，我们需要◇60◇在西伯利亚建立冶金业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在建立了。此外，我们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尔克斯坦建立新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最后，我们需要展开极广泛的铁路建设。这是苏联全国利益——各边疆共和国利益和中央地区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从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现在已经不够用了。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经不够了，必须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那我们现在就应当保证自己有比原来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

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苏维埃政权注意到这种情况，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打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高等学校的大门。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万名工农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学习。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是公子哥儿独占的场所，而现在在苏维埃制度下，工农青年却是高等学校里的统治力量了。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能从我们的高等学校得到几千名新的技师和工程师，我国工业的新的指挥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将不仅是由读过高等学校的人所组成的，而且是由我们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的。竞赛的发起人，突击队的领导者，劳动高潮的实际鼓舞者，各部分建设工作的组织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和读过高等学校的同志一起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核心，组成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排挤这些来自“下层”的有创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且要不惜金钱来为他们造成适当的环境。

在这些同志中间有不少是非党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应当特别关心他们这些非党员同志，应当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真正相信党是重视有能力和有本事的工作人员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拔党员同志去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往往排挤那些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员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的党员提到首位。不用说，再没有比这种所谓

“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把党变成闭关自守的帮会。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62◇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相互检查”的气氛（列宁）。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总之，**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四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条件。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关于对待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要有另一种提法。

两年以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动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东西。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的。但这里所说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活动是由什么造成的，是由什么培植起来的呢？是由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由于苏维埃政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政策，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行反抗，◇63◇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化，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有困难。如果说从事战斗的暗害分子的积极性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阴谋以及我们国内的粮食困难所支持的，那末另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向积极的暗害分子方面的动摇就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孟什

维克空谈家的时髦论调而加强起来的。这些空谈家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苏维埃政权反正是在蜕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的”，“布尔什维克正以自己的政策促成武装干涉”等等。此外，既然连右倾分子中间的某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抵挡不住这种“时疫”而在当时离开了党，那末从来没有闻过布尔什维主义气味的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也蒙上帝保佑而表现动摇不定，就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

一两年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完全是那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击溃了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正在顺利地消灭他们。当然，这不会使旧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很可能他们还对自己的已被击溃的朋友表示同情。但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动摇者，在自己的积极活动的朋友遭到无可挽救的惨败以后，还甘愿和这些朋友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64◇

其次，我们克服了粮食困难，不仅克服了粮食困难，而且还向国外输出粮食，其数量之多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于是动摇分子的这一“论据”也就破产了。

再其次，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获得了确定不移的胜利。

于是旧知识分子“武库”中最主要的东西也就完蛋了。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武装干涉的希望，那就必须承认，这种希望已经成了——至少暂时成了——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的确，人们答应实行武装干涉已经有六年了，可是武装干涉一次也没有尝试过。现在必须承认，我们的高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更不必说，

积极的暗害分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行为本身就应当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暗害活动的思想破产了。

当然，这些新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国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新的环境在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合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暗害分子了。不，不是这个意思。暗害分子是有的，而且只要我国还有阶级，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分子还是会有的。这只是说，既然从前这样或那样同情过暗害分子的很大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现在已经◇65◇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那末剩下的积极的暗害分子就为数不多了，他们已经陷于孤立，而且不得不暂时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条件下还继续实行旧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合辩证法的。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们这里，“反专家主义”向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被看做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的。

总之，**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五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条件。

六　关于经济核算

如果我不谈到另一个新条件，那还不能算全面。这里指的是为工业、为国民经济积累资金的来源◇66◇问题，是加快这种积累的速度问题。

从积累方面来看,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的和特别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旧的积累来源已开始不能保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真想保持并加快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化速度，就必须找到新的积累来源并扩大旧的积累来源。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想把自己的工业提到更高水平的新兴国家都必须得到外来的援助，即长期的信贷或借款。西方各国的资本家有鉴于此，就完全拒绝给我国信贷和借款，以为没有信贷和借款，我国的工业化就一定会破产。可是资本家们想错了。他们没有估计到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有某些特别的积累来源足以恢复和继续发展工业。的确，我们不仅恢复了工业，不仅恢复了农业和运输业，而且已经把改造重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巨大工作引上了轨道。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是花了几百亿卢布的。这几百亿卢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从轻工业方面，从农业方面，从预算上的积累方面得来的。我们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过去，旧的积累来源足够用来改造工业和运输业，而现在，旧的积累来源显然已开始不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改造旧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建立技术装备优良的新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各产粮区、畜牧区和原料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建立新的铁路网。当然，旧的积累来源是不能保证这一巨大工作的完成的。◇67◇

不仅如此，还必须指出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由于不善经营，经济核算的原则已经被破坏无余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节约制度”、“缩减非生产开支”、“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显然，他们指靠的是国家银行“反正会拨给我们必要的款项”。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成本已开始提高了。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可是他们却把成本提高了。而降低成本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在工业内部积累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卢布。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成本就等于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损失几亿卢布。

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结论：已经不能单靠轻工业，单靠预算上的积累，单靠农业方面的收入了。轻工业是一个极丰富的积累来源，而且它现在也有继续发展的一切可能，但这个来源不是无穷的。农业也是一个丰富的积累来源，但是在目前农业改造时期，它本身还需要国家的资助。至于预算上的积累，你们自己知道，这种积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是无穷的。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工业。因此，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它的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因此，除了加强和扩大旧的积累来源外，同时还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

出路就在这里。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内部的资源，在我们的一切企业中◇68◇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到达出路的途径。

总之，**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

这些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工业造成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

由此可见：

（甲）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要保证工业有劳动力，就必须有组织地招收工人，必须使劳动机械化。如果以为我们不必实行机械化就可以保持今天的建设速度和生产规模，那就等于希望用匙子舀尽海水。

（乙）其次，不能再容忍工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法规定工资，使企业中的工人成员相当地固定下来。

（丙）其次，不能再容忍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式组织劳动，◇69◇必须适当地配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对工作、对机器、对机床、对工作质量负责。

（丁）其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我们从资产阶级俄国继承下来的为数极少的旧工程技术人员了。要提高现有的速度和生产规模，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戊）其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所有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都看成是一样的了。要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尽量关心那些确定不移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

（己）最后，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旧的积累来源了。要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新的积累来源，消除不善经营的现象，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为了按新方式进行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了解新的环境，具体地研究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根据新环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需要使他们不限于纸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话和口号，而要精通业务，了解工作的细节，熟悉“小事”，因为现在大事是由“小事”积成的。◇70◇

其次，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有时包括一二百个企业的那些庞大的公司立刻划小，分为几个公司。一个公司的主席要和一百个或一百个以上的工厂打交道，当然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工厂，了解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情况。他既然不了解工厂，当然就不能领导它们。因此，要使公司的主席有可能真正地研究工厂的情况并领导工厂，就必须使他们摆脱过多的工厂，必须把一个公司分为几个公司，使公司接近工厂。

其次，需要把我们的公司由委员会管理制改为一长管理制。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委员会里有十个至十五个人坐在那里写写公文，讨论讨论问题。同志们，继续实行这样的管理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停止纸上的“领导”而去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让公司的主席和几个副主席留下来领导公司。这对于管理公司完全够了。其余的委员最好派到下面去，派到工厂去。这无论对于他们或对于工作都要有益得多。

其次，需要使公司的主席和副主席更经常地巡视各工厂，花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工作，更好地熟悉工厂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教导现场

的工作人员，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如果以为现在可以远离工厂坐在办公室内，从办公厅来进行领导，那就错了。要领导工厂，就必须更经常地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接触，必须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后，略微谈谈我们一九三一年的生产计划。在党的周围有一些庸人，他们硬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完成的。这就像谢德林小说中的“绝顶聪明的鲃鱼”①一样，它总是在自己周围散◇71◇布一种“愚蠢的空气”。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是现实的呢？绝对是现实的！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我们具备实现这一计划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这一计划的完成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极丰富的可能性的本领和愿望。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许多企业和工业部门已经**超额完成了**计划呢？这说明其他的企业和工业部门也能够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

如果以为生产计划是一张开列着数字和任务的一览表，那是愚蠢的。事实上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生产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我们有千百万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者。我们的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有活的人，有我们大家，我们的劳动意志，我们按新方式工作的决心，我们完成计划的决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呢？是的，是有的。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是可能实现而且应该实现的。（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
“真理报”第一八三号◇72◇

————————————

① “绝顶聪明的鲃鱼”是俄国著名作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一篇寓言故事，描写一条鲃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而不敢出外，整天躲在仅能容身的洞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它自以为绝顶聪明，可是大家却认为它是傻瓜。——译者注

致“阿模”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二〇〕

联共（布）中央非常满意地看到“阿模”工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的胜利。从前在这里，俄国资本家只能建立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并采用野蛮剥削方法的汽车修理厂，而现在你们建立了年产二万五千辆载重汽车并采用现代技术一切成就的雄伟的大型工厂。你们的胜利就是我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联共（布）中央坚信，在这第一个巨大的胜利之后，你们一定会获得其他的胜利：掌握工厂的新技术，坚持不懈地完成生产计划，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产品质量。

向苏联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阿模”工厂的全体建设者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
“真理报”第二七一号◇73◇

致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建筑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

我国劳动人民、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和党都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进程。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建筑工程是乌克兰农业集体化的钢铁支柱，它的建设者是引导千百万乌克兰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加入拖拉机制造厂行列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史上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的榜样。联共（布）中央相信，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能克服新的生产中的困难，运用斯大林格勒制造厂的经验，完成一九三二年的战斗计划。

向苏联第二个大型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者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
“真理报”第二七一号◇74◇

给“技术报”〔二一〕

祝贺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技术报纸出版。

“技术报”应当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掌握技术方面的有力武器。“技术报”应当帮助党从工人阶级中造就出几十万新的技师和工程师——为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而奋斗的战士。

祝“技术报”在各方面获得成就！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真理报”第二八〇号◇75◇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敬爱的同志们！

我坚决抗议把斯卢茨基那篇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二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

斯卢茨基硬说，列宁（布尔什维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战前一般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即对暗藏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以及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的危险估计不足。换句话说，照斯卢茨基说来，列宁（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对机会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对中派主义估计不足实质上就是拒绝对机会主义进行大力的斗争。这样说来，列宁在战前时期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或者直到这次大战结束时，才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斯卢茨基在他的论文中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你们不但不去痛斥这个新出现的“历史学家”的诽谤和捏造行为，反而去和他进行讨论，供给他讲坛。我不能不抗议把斯卢茨基的论文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在你们的杂志上，因为决不能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把列宁**是否**对中派主义这种机◇76◇会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原则斗争，列宁**过去是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变成讨论的对象。

你们在十月二十日送给中央的“编辑部声明”中承认，编辑部把斯卢茨基的论文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出来是犯了错误。这当然很好，虽然编辑部的声明出现得很晚。但是，你们在声明中又犯了一个新的

错误，因为你们宣称：“编辑部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进一步探讨一切有关布尔什维克和战前第二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政治上是非常迫切的和必要的。”这就是说，你们又打算把人们拉来讨论那些本来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的问题。这就是说，你们又想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由公理变成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

大家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对各色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对西方的中派主义（考茨基）以及对我国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等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连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敌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这是公理。而你们却把我们往后拉，企图把公理变成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也许是由于不知道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也许是由于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想使斯卢茨基之流和托洛茨基的其他门徒不能说人家堵住他们的嘴吧？多么奇怪的一种靠牺牲布尔什维主义的切身利益而实行的自由主义……

编辑部认为斯卢茨基的论文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讨论研究呢？

（一）斯卢茨基硬说，列宁（布尔什维克）没有实行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分裂的路线。你们想讨论斯卢茨基的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论点。但是这◇77◇里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简直是在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诽谤应该加以痛斥，而不应该把它变成讨论的对象。

每个布尔什维克，如果他真的是布尔什维克，都知道还在大战以前很久，大约从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当俄国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出现左派的时候，列宁就一方面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实行了决裂、分裂的路线。

每个布尔什维克都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布尔什维克当时（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就已经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队伍中博得了“分裂派”和“捣乱派”的光荣称号。但是既然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一个组织上没有形成、思想上没有锻炼、甚至怕说“决裂”和“分裂”两个字眼的软弱无力的集团，那末，列宁能有什么办法，布尔什维克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要求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去替左派在西方政党内制造分裂吧。

况且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软弱不仅仅是战前时期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大家知道，在战后时期左派仍然保留了这个缺点。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大战开始两年多以后发表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①]这篇著名论文中对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做了一个估计，在那篇论文里列宁批判◇78◇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极严重的政治错误，说到了**“德国所有左派分子的软弱性，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在那篇论文里列宁说到了**“尤尼乌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德国那些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包围’，这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二三〕。

当时在第二国际所有的派别中，俄国布尔什维克按组织经验和思想锻炼来说是唯一能够采取重大措施去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直接实行决裂、分裂的派别。如果斯卢茨基之流即使不是企图证明而只是企图假定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用全部力量去和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唐恩）实行分裂，把中派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其他八月联盟分子）驱逐出去，那末关于列宁的布尔什维主

————————————

① 尤尼乌斯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罗莎·卢森堡。——译者注

义立场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还可以进行争论。但是问题就在于斯卢茨基之流对这种荒谬的假定连提都不敢提一下。所以不敢，是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各色机会主义者实行坚决分裂政策（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对这种假定的有力的驳斥。所以不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马上就会受到痛斥。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时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及中派主义者实行决裂的路线、分裂的路线，他们能不能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很久的时候（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就同本国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调和主义者实行分裂呢？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政策是西方左派所应采取的政策的榜样，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俄国布尔什维克◇79◇竭力推动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去同本国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实行决裂，实行分裂，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至于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效法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地步，那就不是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过错了。

（二）斯卢茨基责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说他们只是在严重的附带条件下才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说派别性的考虑妨碍了他们彻底支持左派。你们想通过讨论来反对这种骗人的毫无根据的责备。但是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在这里耍手腕，力图用没有根据的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责备来掩饰德国左派立场上的真正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德国左派常常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动摇不定，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愿意背叛**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革命，那末他们在支持德国左派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出一些严重的附带条件，不能**不**严厉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骗人的手腕应该加以痛斥，而不应该把它变成讨论的对象。

是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一定的严重的附带条件下才支持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批评了他们的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但是，因此就应该称赞布尔什维克，而不应该责备他们。

有人怀疑这一点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最明显的历史事实。

（甲）一九〇三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员资格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布◇80◇尔什维克想用自己的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来造成一种组织上的屏障，防止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来。当时因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所以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来的危险是非常现实的。俄国孟什维克坚持相反的立场，主张给非无产阶级分子大开入党之门。由于俄国革命的各个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有重要的意义，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决定干预这件事。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即当时左派的首领，也干预了这件事。结果怎样呢？他们两人都表示赞成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责备布尔什维克有极端集中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趋向。后来孟什维克就抓住了这种卑鄙的市侩式的论调，并且把它散布于全世界。

（乙）一九〇五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布尔什维克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思想。布尔什维克断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便在保证得到农村贫农支持的情形下立刻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孟什维克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他们宁愿采取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而反对工农联盟的政策，他们竟宣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相矛盾的反动的布朗基主义的方案。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是怎样对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彻头彻尾充满了孟什维克的否认工农联盟

政策的精神的不断革命方案（对马克思的革命方案的畸形的曲解），并拿这个方案来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劳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方案相对立。后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这◇81◇个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并且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

（丙）战前时期在第二国际各党内出现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殖民地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问题，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法问题，推翻帝国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了扩大无产阶级革命和包围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政策，发挥了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结成统一战线的方案。因此，各国的机会主义者，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立刻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当做疯狗来攻击。当时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什么立场呢？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民族自决原则（直到实行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为止的原则），反对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解放运动有重大革命意义的论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有可能结成统一战线的论点，并拿所有这些极端轻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半孟什维主义的糊涂思想来和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相对立。大家知道，后来托洛茨基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糊涂思想，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

这就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所犯的一些尽人皆知的错误。

至于德国左派所犯的在列宁的有关论文中受到严厉批评的其他错误，我就不用说了。

他们在估计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政策时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也不用说了。

从战前历史中举出的德国左派所犯的这些错误，不是说明左派社

会民主党人虽然有其左派性，◇82◇但还没有解下孟什维主义的行囊，又是说明什么呢？

当然，德国左派不仅有过严重的错误。他们也还有过重大的革命的事迹。我指的是他们在内政问题例如选举斗争问题上，在国会斗争和国会外斗争问题上，在总罢工、战争、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问题上的许多功绩和革命言论。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才把他们当左派看待，支持他们，推动他们前进。但是，这并没有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一个事实：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有过许多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他们还没有抛弃孟什维主义的货色，因此就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极严厉的批评。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愿意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背叛革命的利益，背叛共产主义，那末，他们在支持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能不能**不提出严重的附带条件，不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呢？

斯卢茨基本来应该（假如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话）因此称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反而以此责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彻底暴露了他是一个半孟什维克，是一个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不是很明显吗？

斯卢茨基竟设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估计西方的左派时是以自己派别性的考虑为出发点的，这就是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自己派别组织的利益而牺牲了伟大的国际革命事业。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设想是再卑鄙再无耻不过了。所以再卑鄙不过，是因为连孟什维克中的那些狂妄的卑鄙小人◇83◇现在也开始了解，俄国革命并不是俄国人的私事，恰恰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所以再无耻不过，是因为连第二国际中的那些职业诽谤家现在也开始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始终一贯的和革命到底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

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把俄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国会斗争和国会外斗争问题、总罢工问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帝国主义问题、民族自决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问题、援助这种运动的政策问题等等提到了第一位。他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检验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坚定性的试金石。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吗？是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他们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策略是服从于世界革命的任务的。他们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才能够真正检验第二国际各派别的革命性。试问，这里究竟有什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性”呢？这究竟和“派别性的”考虑有何相干呢？

还在一九〇二年，列宁就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写道：“**历史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二四〕。自从“做什么？”一书出版以来已经有三十年了。谁也不敢否认，这一时期的◇84◇事变灿烂地证实了列宁的话。从这里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枢纽，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吗？

只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才能够真正检验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性，这不是很明显吗？

把这些问题看做“派别性的”问题的人彻底暴露了他们是卑鄙小人和蜕化分子，这不是很明显吗？

（三）斯卢茨基硬说，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正式文件来证明列

宁（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把这种官腔当做无可反驳的论据，来证明所谓列宁（布尔什维克）对第二国际中的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的说法。你们想通过讨论来反对这种无稽之谈，反对这种骗人的狡猾手段。但是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力图用关于文件的废话来掩饰他的所谓立场的贫乏和虚伪，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卢茨基认为党的现有的文件还不够。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第二国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方面的那些尽人皆知的文件还不足以十分明显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斗争中的革命的不调和性吗？斯卢茨基究竟看过这些文件没有？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一堆其他的文件，比如说布尔什维克的又一次论述必须消灭中派主义的决议。这是不是说，仅仅有了纸上的文件就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85◇真正革命性和真正不调和性呢？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历史上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愿意签署任何革命的决议，以便应付那些讨厌的批评家。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实行了**这些决议。其次，历史上还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口沫飞溅地要求**其他**各国的工人政党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在自己党内或自己国内**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教导我们检验革命政党、派别和首领时不要根据他们的宣言和决议，而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就是这个缘故吗？

如果斯卢茨基真想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不调和性，那末他用来作为他的论文的**基础**的就不应该是个别文件和两三封私人信件，而应该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历史、行动**的检验，这不是很

明显吗？难道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曾有过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对所有这些派别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吗？难道这些派别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同西方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没有联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也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左派集团一样没有把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击溃吗？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呢？为什么斯卢茨基忽视了这些对评定布尔什维克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运用根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行动来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最可靠的方法呢？为什么他宁愿采取在偶然检到的一些纸片中翻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方法呢？◇86◇

这是因为采取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立刻就会根本推翻斯卢茨基的整个立场。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表明布尔什维克是世界上彻底击溃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的**唯一的**革命组织。

这是因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为和真正的历史为根据，就会表明斯卢茨基的老师托洛茨基分子是在俄国培植了中派主义并为此成立了八月联盟这个专门组织作为中派主义策源地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集团。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完全揭穿斯卢茨基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他企图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种诬蔑性的责备来掩盖战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主义。

编辑同志们，关于斯卢茨基和他的文章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编辑部容许和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进行讨论是犯了错误。

什么东西竟能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不正确的道路呢？

我认为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道路的是目前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

间相当流行的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它固然犯了错误，干了不少蠢事，有时甚至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但总还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由此就产生了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87◇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看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谁供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提出了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布尔什维克必然蜕化的论点等等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苏联一切反苏维埃集团在企图论证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必然性的时候，总是援引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蜕化、关于资本主义一定会恢复的尽人皆知的论点，这个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是谁供给了苏联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策略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进行了公开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试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游行示威。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维埃发动鼓舞了资产阶级，放纵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暗害活动，这是事实。

是谁供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组织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进行了建立秘密的反苏维埃组织的尝试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非法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维埃的秘密勾当促进了苏联各个反苏维埃集团在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88◇

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因为如此，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的托

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

正因为如此，某些“著作家”和“历史学家”企图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废物偷运到我们文坛上来的行为应当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反击。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容许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进行文字上的讨论。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中的“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目前力图从两方面进行走私的勾当。

第一、他们力图证明列宁在战前时期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于是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去推测：列宁在当时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只是在战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进行“改造”以后，才成为真正的革命家。斯卢茨基可以算是这一类私贩的典型代表。

从上面我们看到，斯卢茨基及其同伙是不值得我们长久和他们周旋的。

第二、他们力图证明列宁在战前时期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于是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去推测：列宁在当时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战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进行“改造”以后，才懂得这一转变的必要性。“联共（布）历史读本”的作者沃洛谢维奇可以算是这一类私贩的典型代表。◇89◇

固然，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二五〕。固然，这类事实和文件可以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很多很多。但是，列宁生平活动的事实和沃洛谢维奇之流有何相干呢？沃洛谢维奇之流写文章，是为了涂上一层布尔什维克的颜色来偷运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私货，来诽谤布尔什

维克，来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

由此可见，沃洛谢维奇之流和斯卢茨基之流是一路货色。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们所走的“道路和歧途”。

你们自己知道，把论坛供给这一类“历史学家”以便利他们的走私勾当，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应做的事情。

据我看来，编辑部的任务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加强注意去反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和其他一切伪造者，经常揭穿他们的假面具。

这样做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连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我指的是不带引号的历史学家，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也不免犯了替斯卢茨基之流和沃洛谢维奇之流助长声势的错误。可惜这里连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例外，他所著的关于联共（布）历史的书籍虽然有它的优点，但是也◇90◇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六期（总第一三期）◇91◇

下新城。汽车制造厂

值此建厂工作胜利完成之际，谨向参加建厂工作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致热烈的敬礼。

同志们，祝贺你们的胜利！

希望你们在大型工厂的安装、调整和开工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成就。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并光荣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约·斯大林

维·莫洛托夫

载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
“真理报”第三〇五号◇92◇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路德维希：承蒙你接见，我非常感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卓越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业。我觉得我很会鉴别人，可是我一点也不懂得社会经济条件。

斯大林：你太谦虚了。

路德维希：不，的确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今天我在这里，在克列姆里宫看见了彼得大帝的某些遗物，因而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

斯大林：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

路德维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93◇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我在提高工人阶级和巩固这

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骤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末我认为我的一生是没有目的的。可见你的比拟是不恰当的。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二六〕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94◇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路德维希：在我们面前这张桌子的周围有十六把椅子。在国外，

人们一方面听说苏联是个一切事情都必须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听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个人决定的。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

斯大林：不，个人不能决定。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七十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专家、我们优秀的合作社专家、我们优秀的供应专家、我们优秀的军事家、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熟悉国营农场的人、我们优◇95◇秀的熟悉集体农庄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人。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做决定，那末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个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重视这些改正，所以我们做出的决定是相当正确的。

路德维希：你做过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你曾经秘密运送过武器、书报等等。你不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借用你的经验，用同样的方法来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吗？

斯大林：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

路德维希：你们的政权在和敌人斗争时所以严厉无情，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斯大林：不，主要原因不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最初他们对自己的敌人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孟什维克继续合法存在，并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革命党人同样继续

合法存在，并有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当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列宁格勒举行反革命进攻而落入我们手中的时候，按战时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把他当俘虏押起来，而且应该把他枪毙。但是，我们因为他说了“真心话”而把他释放了。结果怎样呢？不久就弄清楚了：这种温和态度只会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敌人采取这种温和态度是犯了错误。如果我们以后再犯这个错误，我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罪，我们就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不◇96◇久就完全弄清楚了。很快就弄清楚了：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愈温和，这些敌人的反抗就愈厉害。不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郭茨等人和右派孟什维克就在列宁格勒组织了士官生的反革命发动，由于这次发动，我们的许多革命水兵牺牲了。就是那位因为说了“真心话”而被我们释放的克拉斯诺夫组织了白卫哥萨克。他和马蒙托夫联合起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两年武装斗争。不久就弄明白了：这些白卫将军的后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的代理人。于是我们相信，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是多么错误。我们从经验中懂得了只有对这些敌人采取最无情的镇压政策，才能战胜他们。

路德维希：我觉得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对苏维埃政权有恐惧、害怕的心理，而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在一定程度内是建筑在这种恐惧心理上的。我很想知道，在你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而必须引起恐惧的时候，你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要知道，在你和你的同志、你的朋友交往的时候，你采取的完全是另外的手段，不是引起恐惧的手段，而对居民却要引起他们的恐惧。

斯大林：你错了。然而，你的错误也是许多人的错误。难道你以为用恫吓、恐吓的手段能够保持政权十四年之久并始终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是最善于恫吓的。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老经验。欧洲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帮助了沙皇制度，教导它去恐吓人民。尽管有这种经

验，尽管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帮助，恐吓政策还是使沙皇制度◇97◇覆灭了。

路德维希：可是要知道，罗曼诺夫皇朝却支持了三百年。

斯大林：是的，可是在这三百年中间有过多少次起义和暴动：斯杰潘·拉辛的起义，叶梅连·普加乔夫的起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更不必说，现在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条件和旧时的条件是根本不同了，那时候群众的愚昧无知、没有文化、驯服和政治上的闭塞使当时的“统治者”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执掌政权。

至于苏联人民，至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温顺、驯服和畏缩。欧洲有很多人用旧眼光来看苏联人，以为生活在俄国的人第一、是驯服的，第二、是懒惰的。这是过时的和根本不正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从俄国地主开始跑到巴黎，在那里挥霍掠夺来的金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的时候起在欧洲形成的。这的确是些意志薄弱和毫无用处的人。由此就得出了“俄国人懒惰”的结论。但是这同过去和现在都靠自己劳动来谋得生活资料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毫不相干。认为在短时期内进行了三次革命、摧毁了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现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是驯服的和懒惰的，那就太奇怪了。

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一个人专政。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98◇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远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路德维希：完全忘记了吗？

斯大林：有时也想起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想起他。

路德维希：是所有的人都怀着憎恶的心情吗？

斯大林：说到我们的工人，他们是怀着憎恶、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居民确实是害怕苏维埃政权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我指的是正在被消灭的垂死阶级的残余，首先是不大的一部分农民，即富农。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对这些集团实行恐吓政策，这种政策确实是存在的。大家知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这里不仅限于恐吓，而且更进一步，要消灭这个资产阶级阶层。

但是如果拿苏联劳动居民来说，拿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说，那末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他们所以支持苏维埃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苏维埃政权所以巩固的基础就在这里，而不在于所谓恐吓政策。

路德维希：我很感谢你这个回答。请原谅我再向你提出一个会使你感到奇怪的问题。在你的生平历史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99◇“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做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像斯杰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

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路德维希：请允许我对你的生平历史提几个问题。当我在马萨利克那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从六岁起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是什么和在什么时候使你成了社会主义者的？

斯大林：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

路德维希：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100◇

斯大林：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而当时我读书的正教教会中学就不同了。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教会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路德维希：可是难道你不承认耶稣教徒有好的品质吗？

斯大林：是的，为了实现丑恶的目的，他们在工作中是有一贯性和顽强性的。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监视、间谍活动、刺探情况和侮辱人，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例如在宿舍中的监视：九点钟铃响喝茶，我们都到食堂去，而当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发觉我们所有装东西的箱子在这段时间内都已经搜查过、翻过了……　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

路德维希：我看到在苏联对美国的一切特别尊重，甚至可以说是

崇拜美国的一切，也就是说，崇拜金元国家，崇拜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你们工人阶级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不仅对拖拉机和汽车，而且对一般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斯大林：你太夸大了。我们对美国的一切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尊重。但是，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中间有许多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健康的人，在对待工作和事业的整个态度上健康的人。这种求实精神和这种朴实作风我们是赞成的。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而对欧洲的老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因◇101◇为那里还存在着封建贵族的老爷习气。

路德维希：你讲得很正确，甚至你自己也不会怀疑的。

斯大林：谁知道，也许是怀疑的。

虽然封建制度作为社会制度在欧洲早已被打破了，但是它的相当多的残余在生活和习惯中还继续存在。封建环境还继续产生技师、专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把老爷习气带到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学中去。封建传统还没有被彻底打破。

对美国就不能这样说了，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而在欧洲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既然说到我们对某一个民族的好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某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好感，那末当然应该说到我们对德国人的好感。我们对美国人的感情是不能和这种好感相比的！

路德维希：为什么恰恰是对德意志民族呢？

斯大林：至少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给世界贡献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物。只要指出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了。

路德维希：近来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一种严重的顾虑，生怕苏联和德国传统的友好政策会◇102◇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种顾虑是由于苏联和波兰的谈判而引起的。如果这次谈判的结果，苏联承认波兰现在的疆界成了事实，那末就会使全体德国人民大失所望，因为德国人民直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是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是不打算承认它的。

斯大林：我知道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某种不满和忧虑，生怕苏联在和波兰的谈判中或者在和波兰签订的什么条约中会采取一种意味着苏联承认和保证波兰的领土和疆界的措施。

据我看来，这种顾虑是错误的。我们一向声明我们愿意和任何国家缔结互不侵犯公约。我们已经和许多国家缔结了这种公约。我们公开声明我们也愿意和波兰签订同样的公约。既然我们声明我们愿意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公约，那末我们这样做就不是为了讲空话，而是为了真正签订这种公约。我们可以说是特种的政治家。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今天答应或者声明一件事，到第二天不是忘记了，就是否认他们声明过的东西，而且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在国外做的事情，国内必然会知道，全体工人和农民必然会知道。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那末我们就会丧失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波兰人声明他们愿意和我们举行关于缔结互不侵犯公约的谈判时，我们自然表示同意并着手进行谈判。

在德国人看来，可能发生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呢？是对德国人的关系的改变，关系的恶化吗？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正如波兰人一样，应当在公约中声明我们将不采取暴力和侵略来改变波兰和苏联的疆界或者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正如我们向波兰人许下这种诺言一样，他们也向我们许下这种◇103◇诺言。我们两国不打算进行战争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或疆界的完整，没有这一点就不能缔结公约。没有这一点就谈

不到什么公约。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就是这样。

这是不是承认凡尔赛体系〔二七〕呢？不是的。或者这也许是保证疆界吧？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做波兰疆界的保证人，正如波兰没有做过而且也不会做我们疆界的保证人一样。我们对德国的友好关系仍然和以前一样。这是我坚决相信的。

因此，你所说的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种顾虑是由某些波兰人和法国人所散布的谣言引起的。如果公约由波兰签了字，当我们把它公布出来的时候，这种顾虑是会消失的。大家将会看到，这个公约并不包含任何反对德国的东西。

路德维希：我非常感谢你这个声明。请允许我向你提出下面的问题：你谈到“平均主义”而且这个名词对普遍的平等来说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要知道，普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斯大林：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

马克思主义只是说：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的第一需要，变成为社会谋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们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104◇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每个人一方面按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领取劳动报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的人具有而且将来也会有不同的需要。社会主义从来不否认人们在口味上、在需要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对施蒂纳平均主义趋向的批判〔二八〕，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对一八七五年“哥达纲领”的批判〔二九〕，只要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们对平均主义

的抨击是多么尖锐。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幼稚地设想，似乎俄国布尔什维克想把一切财富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平均分配。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就是这样设想的。像克伦威尔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那样的人就是这样设想共产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这种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路德维希：你抽纸烟了。斯大林先生，你那只传奇似的烟斗在哪里呢？你曾经说过，言论和传奇是会消失的，而事迹却会存在。但是请你相信，国外千百万不知道你的某些言论和行动的人都知道你的传奇似的烟斗。

斯大林：我把烟斗忘在家里了。

路德维希：我现在向你提一个可能使你感到十分惊奇的问题。◇105◇

斯大林：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早就忘记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们在德国也是这样。

斯大林：是的，你们在德国很快就会不再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受到迫害。你参加过战斗，你的许多亲密的朋友都死了，而你还活着。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你相信命运吗？

斯大林：不，不相信。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相信“命运”的。命运这个概念，即“希克查尔”[①]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偏见，就是胡说，就是古希腊人的神话这一类东西的残余，古希腊人认为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命运。

路德维希：那末，你没有死这件事是不是偶然的呢？

———————————————

① “希克查尔”系德文《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的译音，作命运解。——译者注

斯大林：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两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我没有死。但是，这完全不影响另外一个人会代替我的职位，因为总有一个人必须担任这个职务。“命运”是一种不合乎规律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是不相信神秘主义的。当然，我避开了危险是有原因的。但是当时也可能发生一些会引起完全相反的结果的其他偶然事件和其他原因。这和所谓命运是毫不相干的。

路德维希：列宁在国外侨居过多年。你在国外住的时间却很短。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你的缺陷？你认为给革命带来更多利益的是那些侨居国外并且有可能认真研究欧洲，但是和人民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呢，还是那些在俄国工作并且了解人民情绪，但是不大知道欧洲的革命者？◇106◇

斯大林：在做这种比较时应当把列宁除外。虽然列宁住在国外很久，但是留在俄国的同志中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和俄国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工人运动有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三〇〕，我总是看见他那里有一大堆俄国实际工作者寄来的信件，列宁总是比那些留在俄国的同志更熟悉俄国情况。他始终认为居住国外对自己是一种负担。

在我们党内和党的领导人员中，留在俄国而没有到过国外的同志当然比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多得多，他们当然有可能比在国外侨居过的人给革命带来更多的利益。要知道，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

至于认识欧洲，研究欧洲，那末那些想研究欧洲的人住在欧洲当然有更多的机会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间没有长期居住国外的人是有某种损失的。可是居住国外对研究欧洲的经济、技术、工人运动干部、各种文学著作或科学著作完全没有决定的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住在欧洲当然更容易研究欧洲。但是，没有在欧

洲住过的那些人所受到的损失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相反地，我知道有许多同志，他们在国外住了二十年，住在沙洛顿堡或拉丁区的某个地方，在咖啡馆里坐了好多年，喝喝啤酒，却始终没有能够研究欧洲，也没有了解欧洲。

路德维希：*你是不是认为德国这个民族对秩序的爱更甚于对自由的爱呢？*

斯大林：在德国，有一个时候人们确实非常尊重法律。一九〇七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两三个月，◇107◇当时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常常嘲笑某些德国朋友这样尊重法律。例如流传过这样的笑话：柏林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规定在某日某时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凡城郊各组织的人员都必须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某郊区一个二百人的小组虽然按时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城市，但是没有来得及参加游行，因为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站了两小时，不敢离开月台：在出口处没有收票的检票员，车票没有人可交。人们开玩笑说，需要有一个俄国同志来给德国人指出一条简单的出路：走出月台，不要交票……

可是，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类似的情形吗？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人尊重法律吗？难道那些本来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更维护资产阶级法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己不是在破坏法律，不是在捣毁工人俱乐部，不是在肆无忌惮地杀害工人吗？

更不用说工人了，我以为他们早已不再尊重资产阶级法律了。

是的，近来德国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路德维希：*在什么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完完全全团结起来？为什么共产党人说，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团结才有可能？*

斯大林：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周围的这种团结可以最容易地实现。但是，这种团结还在革命前无疑就会基本上实现。

路德维希：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一种刺激还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在不同的条件下，功名心的作用是不同的。依据条件为转移，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108◇物的活动可能是一种刺激，也可能是一种障碍。它多半是一种障碍。

路德维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月革命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斯大林：十月革命既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完成。法国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

载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八期◇109◇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
建筑工程处处长和汽车制造厂厂长

值此大型汽车制造厂建厂工作完成和工厂开工之际，谨向工厂的男女工人、行政政治领导人员和技术领导人员致敬！

向在汽车制造厂建筑工程中肩负建厂工作主要重担的男女突击队员致热烈的祝贺！

向在工厂的建筑、安装和开工方面帮助苏联工人阶级的外国工人、技师和工程师表示感谢！

同志们，祝贺你们的胜利！

我们希望汽车制造厂能够迅速地完全克服掌握和展开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克服执行生产计划中的困难。

我们希望汽车制造厂能够在最短期间供给国家几千几万辆汽车，我国国民经济需要这些汽车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110◇

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真理报”第二号◇111◇

致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建筑工程处处长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厂长

向工厂的男女工人和全体领导人员致敬！

向胜利地完成建厂工作和工厂开工任务的积极分子首先是男女突击队员致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国家需要联合收割机不亚于需要拖拉机和汽车。我相信你们在全部完成工厂的生产计划方面一定能获得成就。

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

载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
“真理报”第五号◇112◇

答奥列赫诺维奇和阿利斯托夫

（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致奥列赫诺维奇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因为工作太忙，回信写迟了。

奥列赫诺维奇同志，我决不能同意你的意见。理由如下：

一、说“托洛茨基主义**从来**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这是不对的。既然托洛茨基分子在组织上同孟什维主义断绝了（虽然是暂时地）关系，收起了（虽然是暂时地）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而被接收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来，并服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那末托洛茨基主义无疑地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

广义地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保持着自己派别特性的一个**部分**；**狭**义地说，托洛茨基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即联共（布）党内一个多少有组织的、争取在党内扩大影响的**派别**。如果否认联共（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议中所记载的说明托洛◇113◇茨基分子是联共（布）的一个派别的尽人皆知的事实，那就可笑了。

联共（布）不是不容许派别的存在而且不能同意它们的合法化吗？是的，不容许而且不能同意它们的合法化。但这并不是说托洛茨基分子事实上就不是一个派别了。正因为托洛茨基分子事实上有自己的派别，他们曾经为这个派别的合法化而进行斗争，——正因为这个原因

（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他们后来终于被开除出党了。

你企图玩弄手腕，竭力把**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分开，认为适用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东西不能适用于托洛茨基分子。换句话说，你想说托洛茨基主义从来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曾经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奥列赫诺维奇同志，这是故弄玄虚和自己欺骗自己！托洛茨基主义没有托洛茨基主义的传播者，即没有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存在，同样，托洛茨基分子没有托洛茨基主义（尽管是隐蔽的和不露声色的，但毕竟是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存在，就不成其为托洛茨基分子了。

当托洛茨基分子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时，他们的特点何在呢？特点就在于托洛茨基分子“不断地”动摇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同时这种动摇在党和共产国际的每个转折关头都达到顶点，并爆发为反党的派别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虽然留在党内并服从党的决议，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虽然时常动摇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但他们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孟什维克。当托洛茨基分子留在我们党内的时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这种动摇◇114◇也就是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党内斗争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分子这种动摇本身的基础是下面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分子虽然收起了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因而加入了党，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这种观点，因此，这种观点本身在党和共产国际的每个转折关头都特别有力地暴露出来了。

你大概是不会同意对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这种解释的。那末你一定会得出两个**不正确的**结论中的一个。**或者**你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加入党的时候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种假设下，托洛茨基分子不断进行反党的党内斗争就成了不可理解和不能解释的事情，而这种党内斗争是充满了托洛茨基分子留在我们党内的整个时期的。**或者**

你一定会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派别”。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和列宁的党如果把**孟什维克**吸收到共产党来，哪怕只是一分钟，也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二、说托洛茨基主义“**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派别，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变相的代理人”，这是不对的。同样，你企图把“党对托洛茨基主义，对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态度”和“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分开**，这也是不正确的。

第一、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你犯了错误，犯了故弄玄虚的错误，你人为地把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分割开来，反过来又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割开来。我们党的历史说明，既然我◇115◇们党内有某一部分人容许这种分割，那末这种分割总是**完全**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它依托洛茨基主义易于在攻击党的时候把尾巴藏在水里。我可以低声地告诉你，你是在竭力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私贩效劳，因为你把人为地分割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和托洛茨基分子问题的方法用到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来了。

第二、你犯了这个错误，就必然要犯**另一个**由此而产生的错误，即认为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看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列宁主义者之间进行**党内**斗争的历史事实根本不符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托洛茨基分子留在党内的整个时期党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应该怎样解释呢？你是否认为这是无原则的纠纷，而不是原则性的斗争呢？

由此可见，你对我的“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的“修正”是荒谬的。

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分子加入我们党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派别，在托洛茨基分子加入我们党以后，它暂时成了共产

主义的一个派别，而在托洛茨基分子被驱逐出我们党以后，它又成为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派别了。“狗又回去吃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了”。

因此：

（甲）不能断言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看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因为这种说法是同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根本矛盾的；◇116◇

（乙）不能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派别”，因为这种说法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盟的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单一的**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同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丙）不能人为地把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和托洛茨基分子问题分割开来，因为这样做就会有不自觉地变成托洛茨基主义阴谋的工具的危险。

究竟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还有一条：同意托洛茨基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是动摇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一个派别。

约·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致阿利斯托夫同志

阿利斯托夫同志，你误会了。

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三一〕（一九二四年）一文和“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一九三一年）之间是

没有矛盾的。这两个文件提到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你却认为这是“矛盾”。但这真是没有“矛盾”的。◇117◇

在“十月革命”一文中说到，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的不是罗莎·卢森堡，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完全符合的。正是帕尔乌斯在一九〇五年来到俄国，专门编了一份报纸来**积极**拥护“不断”革命论和**反对**列宁的“观念”，正是帕尔乌斯，而后来是托洛茨基跟随着帕尔乌斯并和他一起，——正是这两个人在当时猛烈攻击列宁的革命方案，用“不断”革命论来和它对立。至于罗莎·卢森堡，她当时是躲在幕后，不在这方面和列宁进行积极的斗争，显然她宁愿暂时不卷进斗争。

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对拉狄克进行论战时所以把问题集中在帕尔乌斯身上，是因为拉狄克在谈到一九〇五年和“不断”革命论时故意不提帕尔乌斯。而他所以不提帕尔乌斯，是因为一九〇五年后帕尔乌斯成了令人反感的人物，做了百万富翁，已经变为德国帝国主义者的直接代理人。于是拉狄克不愿意把“不断”革命论和帕尔乌斯这个令人反感的名字连在一起，他想逃避历史。而我却戳穿了拉狄克，打破了他的诡计，恢复了历史真相并给予了帕尔乌斯应有的评价。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的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那末信上所说的已经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编造**的。而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也是符合的。**编造**“不断”革命论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不断”革命论并积极地为捍卫这个理论而**反对**列宁的不是罗莎·卢森堡，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118◇

后来，罗莎·卢森堡也开始积极地反对列宁的革命方案。但这已

经是一九〇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约·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载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119◇

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电报带来了日产铸铁一千吨以上（折合制钢铁计算，则日产一千二百吨左右）的苏联第一座大型高炉结束试炉时期和开工生产的消息。

祝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胜利完成工厂计划的第一部分！

祝贺你们掌握了欧洲第一座独一无二的大型高炉的技术！

向在冬季阴冷天气的条件下以战斗精神克服了高炉的试炉和开工生产中的困难，并决心承担建厂工作中主要重担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的男女突击队员致敬！

我相信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人们同样能够胜利地完成一九三二年计划的主要部分，再建立三座高炉、一座平炉和一个压延车间，从而光荣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八十九号◇120◇

给“美联社”代表理查逊先生的回信〔三二〕

理查逊先生：

资产阶级报纸散布我患病的谣言，这并不是第一次。显然，有人希望我病得很重并且很久，甚至更坏些。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能使这些先生们高兴的消息，也许这是不十分礼貌的。不管这多么令人不快，但事实是不能违拗的：我十分健康。至于宗杰克先生，他可能是因为给别的同志治病而被邀请到苏联来的。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真理报”第九十三号◇121◇

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

控诉局〔三三〕的工作在争取消除我们的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以及共青团机关的缺点方面，在改善我们的管理机关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

列宁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也一定会灭亡。这就是说，同我们机关中的因循习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坚决的和有系统的斗争，是我们党、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控诉局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实现列宁关于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的遗训的重要手段之一。

控诉局在这方面有着无可争辩的巨大成绩。任务就是要巩固已得的成就，并在这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毫无疑问，控诉局把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中全部是积极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吸引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事业，并倾听党员和非党员劳动者的呼声，是会取得这些决定性的胜利的。

我们希望对控诉局的工作进行五日检查运动会成为按照我们的导师列宁所指示的道路来进一步◇122◇开展控诉局工作的推动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
“真理报”第九十七号◇123◇

答拉尔夫·瓦·巴尔涅斯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一、**问**：目前美国某些人士中正在热烈讨论是否可能派一个有专家随行的非正式的美国商务代表到莫斯科来促进建立美国和苏联之间更密切的贸易联系。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

斯大林：一般说来，苏联是很愿意接待和它有正常关系的其他国家的商务代表和专家的。至于对美国的这种倡议，我想苏联政府是会欢迎的。

二、**问**：如果大西洋彼岸所存在的某些阻挠苏美进行大量贸易的障碍得以消除，那末，苏联能向美国定货的大概数量将是多少？

斯大林：要不冒犯错误的危险而预先说出数字是有困难的。无论如何，苏联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美国工业的巨大能力提供了使定货数量增加若干倍的一切根据。

三、**问**：美国某些负责人士中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印象：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最近七个月来对远东事件的反应显示出显著的相同之处，因此一般说来，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之间的分歧比以前小了。

你对这一点的意见如何？◇124◇

斯大林：不可能说出什么肯定的意见，因为很遗憾，美国远东政策的实质很难捉摸。至于苏联，那末它对日本、对中国的东北以至对整个中国，现在奉行而且将来也会奉行坚决的保卫和平的政策。

四、**问**：我们两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也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两国都占有广大的领土，两国的领土上都没有像关税壁垒这样的阻挠贸易的障碍。在苏联和美国，不良传统对经济活动的阻挠当然比在其

他头等强国要少。苏联工业化的过程比其他西欧强国更像美国工业化的过程。我在前一个问题中已经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政策上的分歧不像原来所预料的那样大。最后，尽管有一切显著的区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无疑是存在着深厚的同情的。由于这些事实，能不能在两国人民的头脑中造成一种信念，认为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发生呢？

斯大林：使两国人民相信互相残杀的危害和罪恶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很遗憾，和平和战争的问题并不总是由人民来决定的。我不怀疑，美国的人民群众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并不愿意同苏联人民作战。但是这并没有阻碍美国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同日本、英国、法国一道）进攻苏联，并对苏联继续实行军事干涉直到一九一九年。至于苏联，那末几乎用不着证明，无论苏联人民或者苏联政府都希望“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

五、**问**：在美国，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真正性质流传着互相矛盾的消息。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末这段时期内，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将比以前得到更大的满足，这是真的吗？换◇125◇句话说，轻工业真的将比以前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吗？

斯大林：是的，轻工业的发展规模将比以前大得多。

第一次刊印◇126◇

库兹涅茨克。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

向在第一号高炉上获得了高度生铁熔炼量并在掌握最新技术方面表现了布尔什维克速度的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的男女突击队员、技术人员和全体领导人员致敬。

我相信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的全体人员一定会进一步扩展已得的成绩，保证在第二号高炉上获得不小的成绩，在最近几个月内使平炉和压延车间投入生产，在今年内建成第三号和第四号高炉并使之开工生产。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一四二号◇127◇

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三四〕的贺电

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士，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男女代表致敬！

祝你们在对千百万工农青年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事业中获得成就！

你们要高举列宁的国际主义旗帜，要为和平和各族人民间的友谊而斗争，要巩固我国的国防以防止资本主义的侵犯，要摧毁奴役和剥削的旧世界，要建设并巩固被解放了的劳动和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要学习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把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布尔什维克建设者的顽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要不愧为我们的母亲——苏联共产党的优秀儿女！

共青团的一代万岁！

约·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

载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
“真理报”第一八八号◇128◇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贺电〔三五〕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我衷心地祝贺你并紧紧握你的手。愿你长寿和健康地工作，使全体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颤心惊。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六六号◇129◇

致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建设者

很抱歉，我不能实现你们邀请我参加德涅泊水电站发电典礼的要求，因为工作条件使我不可能离开莫斯科。

值此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工程胜利完工之际，谨向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全体工人和领导人员致热烈的敬礼和祝贺。

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的突击队员，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英雄，我紧紧握你们的手。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真理报”第二八一号◇130◇

致列宁格勒的贺电

值此苏维埃政权诞生十五周年之际，谨向苏维埃政权的摇篮——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格勒致敬！

第一个举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十月起义旗帜、粉碎资本家政权并建立工农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格勒工人万岁！

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三〇九号◇131◇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向对于我的亲密的朋友和同志娜捷施达·谢尔盖叶芙娜·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①]的逝世表示哀悼的机关、团体、同志和个人致衷心的谢意。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三一八号◇132◇

———————————————

① 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于1932年11月9日去世。——本书制作者注

娜·谢·阿利路也娃

丈夫与妻子

母与子

坎伯尔先生在胡诌

不久以前，在美国出现了一本曾经到过苏联的著名农业家坎伯尔先生的题为“俄国是市场还是威胁？”的英文书。在这本书中，坎伯尔先生叙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谈话”。这个“谈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一句话不是谎言，不是耸人听闻的歪曲，其目的是为了给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做广告。

为了揭穿这些谎言，我认为说几句话并不是多余的。

坎伯尔先生显然是在幻想，他说，和斯大林的谈话从下午一时开始，“入夜后还继续了很久，一直到黎明”。事实上，谈话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坎伯尔先生的幻想真是美国式的幻想。

坎伯尔先生在胡诌，他硬说斯大林“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事实上，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坎伯尔先生不会不知道，斯大林是不需要坎伯尔这一类“朋友”的。

坎伯尔先生又在胡诌，他说，我把谈话记录寄给他的时候似乎加上了附言：“请你保存这本备忘录，它有一天会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事实上，记录是由翻译员雅罗茨基寄给坎伯尔先生的，并◇133◇没有加上任何附言。坎伯尔先生想在斯大林身上进行投机的这种愿望显然使他大出其丑了。

坎伯尔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在胡诌，他把下面的话硬加在斯大林身上：“当托洛茨基留在党内的时候，的确有人企图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这是托洛茨基和他（即斯大林）决裂的第一个原因；托洛茨基信仰世界共产主义，而他——斯大林想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本国。”这种颠倒黑白的毫无意义的谎言，只有投奔到考茨基之流和维尔斯之流的营垒中去的人才会相信。事实上，和坎伯尔的谈话丝毫没有涉及

托洛茨基的问题，甚至在谈话时根本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

如此等等……

坎伯尔先生在自己的书中提到了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记录在自己的书中发表出来。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发表了这个记录就会打乱坎伯尔先生想拿关于和斯大林的“谈话”的耸人听闻的谎言在美国小市民面前给自己的书做广告的计划呢？

我认为对信口开河的坎伯尔先生最好的惩罚就是把坎伯尔先生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原文公布出来。这是揭穿谎言和恢复真相的最可靠的手段。

约·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和坎伯尔先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互相问好后，**坎伯尔**先生说明了他的访问斯大林同志的愿望，并指出，虽然他以私人身分来到苏联，但是在离开美国之前他见了柯立芝，也见了新当选的总统胡佛，并且在访问俄国的问题上得到了他们的完全赞同。他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成为世界之谜的国家的令人惊奇的积极性。使他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农业建设计划。他知道，对于俄国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看法，但是他，比如说，就亲自在克列姆里宫看到了在保存文物古迹方面和一般在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使他特别感到惊奇的是对男女工人的关怀。使他感到有趣的巧合是：在离开美国之前他曾应邀进见总统，并且见了柯立芝的儿子和夫人，而昨天他却做了苏联主席加里宁的客人，加里宁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到农业和工业的建设计划以及我们对发展文化生活的关怀，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们还做得很少。在实现改造农业的计划方面我们做得更少。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国家过去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这种落后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俄国过去的活动家和现在的活动家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旧的活动家把国家的落后看做国家的◇135◇优点，认为它是“民族的特点”、“民族的骄傲”，而新的人，苏维埃人把这种落后看做必须根除的祸害而和它进行斗争。我们胜利的保证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免不了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批评，我们不怕正视困难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接受正确的批评并欢迎批评。我们注视着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我们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方面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做他们的学生。

在国家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它的热潮。现在我们俄国有建设的热潮。这就是俄国目前的主要特点。这说明我们现在经历着建设的狂热，就像美国在内战〔三六〕后所经历的时期一样。这就是同美国在技术、工业和商业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性。我不知道，为了保证和美国工业的联系还必须做些什么。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既然确定这种联系对苏联和美国都是有利的，那末，现在是什么东西阻碍着这种接近的实现呢？

坎伯尔先生：我深信美国和俄国就它们的幅员、资源和独立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斯大林先生援引内战时期是正确的。内战以后有过非常的发展。美国人民很注意俄国。我深信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在世界关系上不能不成为一个巨大的因素。俄国政府的领导人员有极大的可能来完成伟大的事业。为此唯一需要的是：持有明确的判断力并且永远表现公正。

我认为正常的事务联系是有益的，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但是我和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现在是以私人身分谈话的。既然你问我是什么东西阻碍着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十分坦◇136◇白而大胆地、对斯大林先生表示应有的尊敬而毫不失礼地来回答。他是一个思考事物非常客观的人，这就使我能够像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为了双方国家的利益而必须十分信托地进行交谈那样来进行我们的谈话。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那我们每个人都极愿意到这里来根据信用原则或其他原则进行贸易，像在各地所进行的那样。美国公司在进行贸易和提供长期信贷方面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我们华盛顿政府没有承认你们的政府。

但是，这方面的主要原因不单是承认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认为（可能就是这样）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政府驻我国的代表一直在企图散布不满情绪和传播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在我国，我们有一种“门罗主义”，它意味着我们不愿意干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也不愿意任何一个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或其他国家来干涉我们自己的事情。

俄国是一个这样巨大的国家，它能够独立完成它的全体人民决定要做的一切。俄国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俄国人终究能够独立开发自己的资源。

我们感到愉快的是，我们在许多方面是俄国人民的理想，我认为我们对于俄国人民会有很大的益处，特别是在节省时间方面。既然我们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而且除俄国以外许多国家都在仿效我们的方法，那末像建立国营农场这样的措施就意味着贸易联系的加强，而建立在某种公平基础上的外交承认终究会随着贸易联系到来的。对于国家以及对于个别的人来说，唯一的道路就是直率◇137◇而毫不失礼地发表意见，这样，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刻就会非常迅速地到来。我

们愈有教养，我们就愈深信我们用理智能够比用其他手段得到更多的东西。伟大的人民能够在发生意见分歧时不使关系尖锐化，伟大的人物能够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协商。不管他们最初的出发点彼此相距多远，他们会彼此接近，比如在中途就接近起来，——他们谈判的结果通常是达成一定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我知道目前外交承认对美国来说是很难办到的。美国的报刊对苏联政府的代表骂得这样多，这样经常，以致很难有急剧的转变。我个人并不认为外交承认在目前有决定的意义。重要的是在互利基础上发展贸易联系。贸易联系需要正常化，如果在这方面建立了一定的法律基础，那末这就是走向外交承认道路上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步骤。当双方了解到建立外交关系有利的时候，外交承认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主要的基础是贸易联系和这种联系的正常化，而贸易联系的正常化必然会使一定的法律规范建立起来。

当然，我国的自然资源是丰富而多样的。它比已经正式知道的更多样和更丰富，我们的勘探队经常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上发现新的资源。但这不过是我国潜在力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国农民和工人现在已经摆脱了过去对地主和资本家的负担。过去地主和资本家白白浪费的东西现在留在国内并在国内增加全国的购买力了。需求量增长到这样：我国工业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是仍然落后于需求量。无论个人的消费或者生产的消费，其需求量都是巨大的。这就是我国无限潜在力的第二方面。◇138◇

这两方面为我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国家的贸易联系和工业联系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些国家之间正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哪一个国家可以帮助我国开发这些资源和潜在力的问题进行复杂的斗争。可惜美国还远远地站在这个斗争之外。

德国人到处叫嚷，说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不稳定，因此不应该给苏

联的经济机关大量信贷。同时，他们却企图垄断对苏联的贸易联系，并给苏联信贷。

大家知道，有一个英国实业家集团也在进行激烈的反苏运动。同时，正是这个集团以及马肯那集团却企图给苏联信贷。从报刊上已经知道，英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代表团将于二月间到苏联来。他们打算向苏联政府提出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立贸易联系的方案并借款给苏联政府。

为什么德国和英国的实业家会有这种两面性呢？因为他们想把对苏联的贸易联系垄断在自己手中，吓倒美国并把它推到旁边去。

然而，我很清楚，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多的理由同苏联建立广泛的事务联系。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既有丰富的技术又有雄厚的资本，而且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亲切而殷勤地接待我们的商务人员。

至于说到宣传，我必须最坚决地声明，苏联政府的任何一个代表都没有权利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他驻在国的内政。在这方面我们对驻美国的苏联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发出过最坚决和最严厉的指示。我相信布朗及其工作人员同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毫无关系。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谁违反了关◇139◇于不干涉的坚决指示，他就立刻会被召回国并受到处分。当然，对于我们不知道的和不受我们管辖的人的行动，我们是不能负责的。但是对于在我们国外机关服务的人员，我们能够负责并且能够提出关于不干涉的最大保证。

坎伯尔先生：我可以把这一点转告胡佛先生吗？

斯大林同志：当然可以。

坎伯尔先生：我们不知道那些散布不满情绪的是什么人。但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警察发现过他们并且发现过他们的刊物。我认识布朗，我相信他是一位诚实地进行工作的正直而坦白的先生。但那种人是有的。

斯大林同志：也许在美国进行拥护苏维埃宣传的是美国共产党员。

但这个党在美国是合法的，它合法地参加总统选举，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十分明显，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干涉你们的内政。

坎伯尔先生：我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还有。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实业家会问我，和苏联进行贸易是否没有危险。机器制造公司将特别关心提供长期信贷的可能性问题。我可以肯定地答复他们吗？我可以得到关于苏联政府现在为保证信贷协定而采取的措施方面的消息吗？是否有用于这一目的的特别税或其他一定的来源呢？

斯大林同志：我不想夸耀自己的国家。但是，问题既然提出来了，我就必须作以下的说明：苏联政府或苏联经济机关无论对短期信贷或长期信贷没有一次不是按时如数偿还的。可以在德国打听到◇140◇我们是怎样偿还德国人三亿信贷的。我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偿还债款的钱呢？坎伯尔先生知道，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国的农业、工业、商业、森林、石油、黄金和白金等等就是偿还债款的来源。偿还债款的保证也就在这里。我不希望坎伯尔先生凭这些话就相信我。他至少可以在德国证实我的话。他会发现我们一次也没有拖欠过债款，虽然我们有时事实上不得不支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这种空前的高利。

至于特别的保证，那我认为对于苏联是没有必要认真谈到这一点的。

坎伯尔先生：当然没有必要。

斯大林同志：如果我告诉你，极端信托地告诉你，英国银行家集团即巴尔福、肯斯来集团建议给我们借款（不是信贷，而是借款），这也许不是多余的。

坎伯尔先生：我可以把这一点转告胡佛吗？

斯大林同志：当然可以，但是不要在报刊上发表。这个银行家集团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据他们计算，我们欠英国的债款约为四亿英镑。他们建议把这笔债款按原款的百分之二十五计算，转为长期借款。这就是说，不是四

亿英镑，而是一亿英镑。

同时还建议再给我们一亿英镑的借款。

这样，我们所欠的债款是二亿英镑，在几十年内分期偿还。交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给英国机器制◇141◇造业以优先权。这并不是说将来我们必须把定货单只交给英国，但是我们必须给英国以优先权。

坎伯尔先生说他对这次谈话表示感谢，并说，斯大林同志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公正、博学和坦白的人。他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斯大林同志谈话，并认为这次谈话是有历史意义的。

斯大林同志说他对坎伯尔先生的谈话表示感谢。

载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十二期◇142◇

纪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十五周年

向诚实而勇敢地履行自己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义务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和战士们致敬！

祝他们在肃清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复杂工作中获得成就！

工人阶级手中出鞘的宝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真理报”第三五〇号◇14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三七〕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和十七日
“真理报”第十号和第十七号◇14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同志们！当五年计划出现的时候，人们未必预料到五年计划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相反地，当时许多人认为五年计划是苏联的私事，固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毕竟是苏联一国的私事。

可是历史表明了，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历史表明了，五年计划不是苏联的私事，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情。

还在五年计划出现以前很久的时候，当我们正在结束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斗争而过渡到经济建设轨道的时期，列宁就已经说过：我们的经济建设有深刻的国际意义；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各样的阶层中遇到深刻的反应，并把人们分成两个营垒，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拥护者的营垒，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者的营垒。◇147◇

列宁在当时说：

“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这是已经达到的…… 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以缓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断的上升和前进去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列宁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结束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战争，我们正在由反对资本主义的军事斗争过渡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

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每一步骤，每一年，每一季，都灿烂地证实了列宁同志这些话的正确性。

但是最灿烂地证实列宁这些话的正确性的是我们的五年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产生，这一计划的发展，这一计划的实现。的确，在我国经济建设道路上，大概任何一个步骤都不像五年计划及其发展和实现问题那样在欧洲、美洲、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阶层中遇到如此深刻的反应。

最初，五年计划在资产阶级及其报刊方面遇到的是嘲笑。“幻想”、“梦呓”、“乌托邦”，——这就是他们当时给我们五年计划的称呼。◇148◇

后来，当他们开始看见五年计划的实现产生出实际结果的时候，他们就敲起警钟，硬说五年计划威胁到资本主义各国的生存，硬说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使欧洲市场商品充斥，将使倾销政策加强，将使失业现象加深。

后来，当这套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把戏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的时候，各种公司、报刊、团体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就接连不断地到苏联来游历，想亲眼看看苏联究竟在搞些什么。这里我不是说工人代表团，他们从五年计划最初出现的时候起就表示钦佩苏维埃政权的创举和成功，就表示决心拥护苏联工人阶级。

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社会舆论、资产阶级报刊、各种资产阶级团体等等就开始发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说五年计划已经完全破产，布尔什维克已经濒于灭亡。相反地，另一些人说：布尔什维克虽然是些坏人，但他们的五年计划还是有办法的，他们大概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里引证各种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也许不是多余的。

例如就拿美国的“纽约时报”〔三八〕来说吧。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写道：

“五年工业计划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观念的目的，并且‘不管代价如何’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如莫斯科所往往傲然自夸的那样。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计划。这是投机的把戏。”

这样说来，五年计划甚至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投机把戏。

又如英国资产阶级的“每日电讯报”〔三九〕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的评论：◇149◇

“如果把五年计划看做‘计划经济’的试金石，那末我们就应当说它已经完全破产了。”

“纽约时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集体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已经使俄国濒于饥荒。”

波兰资产阶级的“波兰报”〔四〇〕一九三二年夏季的评论：

“实际情况表明，苏维埃政府及其农村集体化政策似已陷入绝境。”

英国资产阶级的“金融时报”〔四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斯大林和他的党由于实行自己的政策，已经面临五年计划体系破产和五年计划所应实现的一切任务都遭到失败的局面。”

意大利“政治”杂志〔四二〕的评论：

“如果以为一亿六千万人民四年来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制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四年来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超人的努力没有做出一点事情来，那就荒谬了。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事情……可是，灾祸仍然存在，这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朋友和敌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左倾反对派分子和右倾反对派分子都确信无疑的。”

最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当代历史”杂志〔四三〕的评论：

“所以，我们考察俄国现状后得出结论说：五年计划按它所宣布的目的来说，尤其是按它的基本的社会原则来说，都已遭到失败。”◇150◇

这就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

对于这些评论的作者大概不值得加以批评吧。我想是不值得的。所以不值得，是因为这些“死硬的”人物是属于中世纪时期的化石一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事实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我们这里怎样实现五年计划，他们反正是要固执己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同一个资产阶级营垒的其他报刊的评论吧。

请看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报纸“时报”〔四四〕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评论：

“苏联不依靠外国资本而实现工业化，就是赢了第一局。”

这个“时报”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发表评论：

“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而资本主义制度却只能缓步前进……　法国因为地产分散于无数小私有者之间，农业机械化是无法实行的；但是苏维埃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农业工业化了……　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比赛中成了胜利者。”

英国资产阶级的“圆桌”杂志〔四五〕的评论：

“五年计划的成绩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莫斯科的‘阿模’汽车制造厂、下新城的汽车制造厂、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的巨大的钢铁厂、正在变成苏联的鲁尔的乌拉尔的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化学工厂,——所有这些成绩以及全国工业方面的其他成绩都证明苏联工业好像灌溉得很好的植物一样，不管有什么困◇151◇难，还是在日益增长，日益巩固…… 五年计划为苏联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非常有力地加强了苏联的实力。”

英国资产阶级的“金融时报”的评论：

“机器制造工业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他们在报刊上和在演说中称赞这些成绩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要忘记，从前俄国所出产的只是一些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机器和工具输入额的绝对数字也还在增加；但是，进口机器与苏联国产机器的比例数却在不断缩小。现在苏联制造着本国冶金工业和电器工业所必需的一切设备。它已经创立了本国的汽车工业。它创立了制造一切工具和仪器（从最精确的小仪器直到最重型的压力机）的工业。在农业机器方面，苏联已经不依赖国外输入了。同时，苏联政府正在设法使五年计划四年实现的事业不致因煤铁出产迟误而受到阻碍。毫无疑问，新建的大型工厂是能够保证重工业产值的巨大增长的。”

奥国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四六〕一九三二年初的评论：

“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以咒骂的，可是必须了解它。五年计划是一个新的庞然大物，必须加以注意，至少必须从经济上加以注意。”

英国资本家，“自治领联合银行”总经理基勃逊·札尔维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评论：

“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肯定地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152◇人主义者…… 俄国正在前进，而我

们这里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厂停闭，约有三百万失业者完全无法找到工作。人们嘲笑过五年计划，预言它必遭失败。但是你们可以相信，在五年计划条件下所达到的实际结果已经超过原来的规定……　在我所游历过的一切工业城市中都有新区域出现，这些新区域是按照一定计划建成的，有点缀着树木和街心公园的宽广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学校，有医院，有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许多替做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的托儿所和儿童之家……　不要轻视俄国人的计划，不要错误地希望苏联政府会遭受失败……　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　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俄国全体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

美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杂志〔四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五年计划在四年内获得了真正**卓绝的成绩**。苏联用战时的强度从事于创造新生活基础的建设任务。**国家的面貌简直改变得不可认识了**……　莫斯科就是这样，那里有成百条新铺的柏油路、新的街心公园、新的建筑物，附近有新建设的市镇，城郊有林立的新工厂。其他较小的城市也是这样。在草原和沙漠地带也出现了新的城市，不是几个而是五十个以上的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自五万至二十五万不等。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来产生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或几个新建起来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的中心。几百个新的区域电站以及许多像德涅泊水电站一类◇153◇的大型电站正在逐渐实现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　苏联大量生产了无数种过去俄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优质钢、合成橡胶、滚珠轴承、大型发动机、具有五万瓦发电能力的涡轮、电话设备、采矿工业用的电机、飞机、汽车、自行车以及几百种新式机器……　在俄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开采铝、镁、磷灰石、碘、炭酸钾以及其他许多贵重矿物。**苏联平原上的指路标已经不是教堂的十字架和圆顶，**

而是谷仓和秣草保藏室。在集体农庄里建筑着房屋、牲畜栏和猪圈。电气已经深入农村，无线电和报纸已经普及农村。工人正在学习使用最新的机器。青年农民在生产方面使用着农业机器，这种机器比美国任何时候所见过的都更巨大，更复杂。**俄国已开始‘用机器来思想’了**。俄国正在迅速地由木材的时代进到铁、钢、混凝土和电动机的时代。”

英国“左派”改良主义的“前进”杂志〔四八〕一九三二年九月的评论：

“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电影院、新的俱乐部、新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新的建筑物。其中有许多已经竣工，其余的还在建筑中。要把最近两年来已经完成的工作和还在进行的工作都向英国读者一一叙述出来是很困难的。要相信这一切，就得亲眼去看看。我们在战时所达到的成绩和苏联现在所做的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承认说：即使在美国西部各州最紧张最热烈的建设时期，也丝毫不曾有过像苏联目前的这种狂热的创造积极性。苏联最近两年来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很难想像再过十◇154◇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请你们抛弃那些顽固地荒谬地诽谤苏联的英国报纸所叙述的妄诞可怕的故事吧。请你们抛弃那些戴着中等阶级的眼镜小视苏联，但是毫不了解苏联情况的浅学的知识分子所散布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和感想吧…… 苏联正在健全的基础上建设着新社会。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怕危险，就必须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毅力热情地工作，就必须克服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大国内劳力建设社会主义时必然会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可是，我在两年内两次游历苏联后得到了一个印象：苏联在稳步前进，在计划着、创造着和建设着，而且规模极大，分明是向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集团的营垒中所发生的意见分歧和分裂，其中有

一些集团主张消灭似乎五年计划已经破产的苏联，而另一些集团显然主张和苏联实行贸易合作，大概是指望从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取得一些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五年计划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问题的态度是一个应当单独提出的问题。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工人代表团到苏联来参观，这里我们只要引证一个工人代表团，例如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评论就够了。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这个评论足以代表所有一切工人代表团的评论，无论是指英国代表团或法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或美国代表团或其他各国代表团都一样。这个评论原文如下：

“我们在旅行时所看见的伟大建设使我们不胜钦佩。无论在莫斯科或在马凯叶夫卡、戈尔◇155◇洛夫卡、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在多么热情地工作。所有的机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厂里都很清洁，空气新鲜，光线充足。我们看到在苏联是怎样给予工人医疗卫生帮助的。工人住宅建筑在工厂附近。工人区设有学校和托儿所；儿童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可以看到旧工厂和新工厂、旧住宅和新住宅之间的差别。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着新社会的劳动者的巨大力量。我们看到了苏联巨大的文化高涨，而其他国家却各方面笼罩着衰败现象，笼罩着失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劳动者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多么可怕的困难。因此，我们更加了解他们在向我们指出自己的胜利时所具有的那种自豪心。我们深信他们一定能克服一切障碍。”

这就是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我们只进行了两三年的建设工作，我们只显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就，全世界就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营垒的人向我们狂吠不已，另一个营垒的人却因五年计划的成就而惊讶万分；更不必说，全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日益加强的营垒，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营垒，他们因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决心支持苏联工人阶级而使全世界资产阶级胆颤心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五年计划的各种成就和成果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各国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它们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资产阶级◇156◇就想从五年计划的失败中取得新论据去反对革命，相反地，无产阶级却力求从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取得而且实际上已经取得新论据去拥护革命，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

五年计划的成就正在动员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毫无疑问，五年计划的国际革命意义真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内容，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五年计划的总结，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实现的总结。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问题的实质。

什么是五年计划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具有落后的往往是中世纪的技术的国家引上现代新技术的轨道。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苏联由一个任凭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157◇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把苏联变为工业国家的同时彻底排挤资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战线，建立起在苏联消灭

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分散的小农业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并以此消灭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可能性。

最后，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从而能够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军事干涉的企图，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武装侵犯的企图。

五年计划的这个基本任务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以什么理由为根据的呢？

其理由就是必须消灭那种使苏联处于难堪的地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必须在我国创造一种使我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

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

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158◇

其理由就是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

列宁说：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严厉方式提

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向前猛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列宁说：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 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党制定五年计划和规定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时所持的理由就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的。◇159◇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但是要实现这种宏伟的计划，决不能茫无头绪，乱抓一把。要实现这种计划，首先必须找出计划的基本环节，因为只有找出并抓住基本环节，才能把计划的其他一切环节拉出来。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因此，必须把恢复重工业当做实现五年计划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列宁的指示：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不挽救重

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

但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开始时我们这样一个落后而不富裕的国家里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重工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必要数量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材，否则就根本不能恢复重工业。党是否知道这一点并且考虑到这一点呢？是的，是知道◇160◇的。不仅知道，并且大声疾呼地宣布了这一点。党知道英国、德国、美国的重工业是怎样建成的。它知道这些国家的重工业或者是靠巨额借款，或者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或者是靠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建成的。党知道这些道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那末，它所指靠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所指靠的是我国本身的力量。它所指靠的是：我们既有苏维埃政权，又以土地、工业、运输业、银行和商业的国有化为依据，所以能够厉行节约以积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充足的资金。党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的牺牲，如果我们真想达到目的，我们就应该公开和自觉地忍受这种牺牲。党指靠用我国内部的力量实现这个任务，而不要外来的奴役性的信贷和借款。

关于这一点，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我们应常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

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161◇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九页）

从穷苦的庄稼汉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的马上，——这就是党在制定五年计划和努力实现五年计划的时候所追求的目的。

厉行节约，积累为供给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这就是我们要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计划所必须走的道路。

是大胆的任务吗？是困难的道路吗？可是，我们党所以叫做列宁的党，就因为它没有权利害怕困难。

不仅如此，党十分相信五年计划能够实现，十分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它认为可以提出任务，不在五年内，如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那样，而在四年内，确切地说，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如果把特别季度算进去的话）完成这件困难的事业。

由此就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个有名的口号。

结果怎样呢？

后来事实表明了：党是对的。◇162◇

事实表明了：如果党没有这种勇气，如果它不是这样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它就不能取得我们现在有权引以自豪的胜利。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实现的总结问题。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取得了胜利呢？

是的，取得了胜利。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超过了我们所预期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党内那些最急躁的人所预期的程度。现在连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了。我们的朋友当然更不会否认这一点。

从前我们没有钢铁工业，即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机床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巨大的现代化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真正的巨大的现代农业机器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63◇

从前我们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在石油制品和煤炭的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只在乌克兰有一个煤碳钢铁基地，而且我们经营这个基地是很吃力的。现在我们不仅发展了这个基地，而且在东部建立了我国所引以自豪的新的煤碳钢铁基地。

从前我们只在我国北部有一个纺织工业基地。现在我们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西部很快就会有两个新的纺织工业基地。

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新的巨大的工业部门，而且给这些部门建立了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的规模和范围。

这一切就使资本主义分子最终地和永远地被排挤出工业范围以外，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唯一的工业形式。

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

这一切就使我们能够在五年计划第四年度末把原定在五年内完成的总的工业生产大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使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两倍**以上，超过一九二八年水平**一倍**以上。至于重工业生◇164◇产大纲，那末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八。

固然，我们总的五年计划大纲还有百分之六没有完成。但这是因为邻国拒绝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和远东方面发生了纠纷〔四九〕，我们为了加强国防，不得不立刻改组一批工厂来制造现代化国防武器。因为这种改组需要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所以这些工厂停止生产达四个月之久，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五年计划总的生产大纲在一九三二年的完成。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弥补了国防力量方面的缺陷。可是这样做不能不使五年计划生产大纲的完成受到不良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偶然的情况，我们就不仅已经完成，而且一定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总的生产数字。

最后，这一切就使苏联由国防准备不足的弱国变成了国防力量雄厚的强国，变成了能够随时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大量制造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供给自己的军队去抵御外侮的国家。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大体上就是如此。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报刊关于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遭到“破产”的废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遭受着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增长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统计吧。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165◇一时期内**降低**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国**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国**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一九二八年水平**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英国**降低**到百分之八十，德国**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波兰**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四。

这些统计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和苏联工业体系竞赛时经不起考验，苏联工业体系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优越。

有人对我们说：建成了许多新工厂，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放弃工业化政策，放弃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的政策，或者至少把这件事情放到末位，而多生产一些布匹、鞋子、衣服和其他各种日用品，那就好得多了。

日用品的确生产得不够用，因而造成了相当的困难。但是必须知道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把工业化任务放在末位的政策会使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内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的十五亿卢布外汇中拿出一半来输入棉花、皮革、羊毛和橡胶等等。那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布匹、鞋子和衣服。可是那时我们就会没有拖拉机工业，也没有汽车工业，就会没有比较巨大的钢铁工业，就会没有金属来制造机器，因而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那时我们就不可能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供给农业，因而就会挨饿。

那时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国内资本主义分子，因而就会大大增加资

本主义复辟的机会。◇166◇

那时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都可以蹂躏它。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就会是军事干涉，就会是战争而不是互不侵犯公约，这种战争是危险的致命的战争，是流血的实力悬殊的战争，因为在这个战争中我们在拥有一切现代化进攻武器的敌人面前几乎是手无寸铁的。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很明显，自重的政府，自重的党是不能采取这种会招致灭亡的观点的。

正因为党摈斥了这种反革命的立场，党在工业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事业中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党仿佛是鞭策了国家，督促它向前奔驰。

党实行这种最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做得正确呢？

是的，是绝对正确的。

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赶快用新技术来重新武装自己，终于走上康庄大道。◇167◇

其次，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最后，党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国防的弱点。时局的条件，资

本主义国家军备的扩充，废除军备主张的失败，国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仇视，——这一切都迫使党迅速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国家独立的基础。

可是，党是否有实现最高速度政策的实际可能呢？是的，是有的。它所以有这种可能，不仅是因为它及时推动我国迅速前进，而且首先是因为它在大规模的新建设事业中能够依靠旧工厂或革新过的工厂，这些工厂已经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所掌握，因而提供了实现最高发展速度的可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新建设的迅速高涨、大规模建设的热潮、新建筑工程中的英雄和突击队员、汹涌的发展速度的实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能不能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必须实行完全相同的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呢？

不，不能这样说。

第一、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即为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建立现代新技术基础的任务。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呢？很明显，现在已经不◇168◇需要这样做了。

第二、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我们**已经**把国防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呢？很明显，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

最后，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我们已经建成几十几百个新的、拥有复杂的新技术的大工厂和联合厂。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总产值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已经不是那些技术已被掌握的旧工厂，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而是那些技术还没有被掌握而必须掌握的新工厂。但是掌握新企业和新技术要比利用那些技术已被掌握的旧工厂或革新过的工厂困难得多。这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提高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熟练程度，来获得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新技能。既然如此，那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初两三年内，即使我们想要实行，也不能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这不是很明显吗？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至少必须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这样的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梦想不到的。不仅这样的速度，就连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也是它们现在梦想不到的。这也就是它们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色。具有苏维埃经济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况。在我国经济制度下，我们完全可能而且必须使产值每年**至少**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169◇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掀起了进行**新建设**的热情和热潮，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这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现在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要有掌握新工厂新技术的热情和热潮，还要认真提高劳动生产率，认真降低成本。

现在主要点就在这里。

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大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无论在建设方面或者在工业产值的增长方面都开始新的迅速的跑步。

最后，略为谈谈发展速度和产值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问题。我们的工业家对这个问题很少研究。但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什么是产值增长的百分数呢？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复时期来说吧。当时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七十七亿卢布。当时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按绝对数字说就是增加三十多亿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四千五百万卢布。再拿一九二八年来说。一九二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六，按百分数说等于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强。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一百五十五亿卢布。全年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三十二亿八千万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一亿二千六百万卢布，即几乎比一九二五年（该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多两倍。最后，拿一九三一年来说。一九三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即等于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三百零八亿卢布。该年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五十六亿多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二亿五千万卢布以上，即比一九二五年（该年增长百分之◇170◇六十六）多五倍，比一九二八年（该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强）多一倍。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研究产值增长速度时不能只限于考察增长的总的百分数，还必须知道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和全年产值增长的总数。例如我们决定使一九三三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即等于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但这并不是说这一年产值增长的绝对数字也会等于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产值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三十多亿，每增长百分之一等于增加四千五百万卢布。毫无疑问，一九三三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的绝对数字将不下五十亿卢布，即几乎比一九二五年多一倍，而每增长百分之一至少也将等于三亿二千万至三亿四千万卢布，即比一九二五年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数字至少多六倍。

同志们，如果具体考察增长的速度和百分数问题，那末情况就是如此。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问题。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是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党实行集体化是以什么为出发点的呢？

党的出发点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171◇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

党的出发点是：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列宁说：

“靠小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页）

列宁说：

“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灭亡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页）

列宁说：

“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迫使我们进入的绝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

列宁说：

“必须过渡到模范大农庄中的共同耕种制；不这样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所处的那种经济破坏状态，那种简直是绝望的状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页）

列宁根据这一点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172◇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

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大纲，在农业方面实行五年计划大纲就是以列宁的这些原理为出发点的。

因此，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无法利用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农户联合为用一切现代最先进的农具武装起来的大规模集体农庄，并在所有的闲地上建立国营模范农场，即国营农场。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小农国家变为拥有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并能提供最高商品率的大规模农业的国家。

党在农业方面四年实现五年计划大纲时获得了什么成绩呢？党实现了这个大纲还是遭到了失败呢？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它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组织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谷物农场和国营畜场，同时在四年内把播种面积扩大了二千一百万公顷。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就是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两倍**。◇173◇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它现在每年已能收购十二亿至十四亿普特商品谷物，而在个体农民经济占优势时期每年只能收购五亿至六亿普特商品粮食。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富农阶级虽然还没有彻底消灭，但是已被击溃，劳动农民摆脱了富农的奴役和剥削，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即集体经济的基础。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苏联已经由小农经济的国家改造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的国家。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大体上就是如此。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报刊关于集

体化遭到“失败”，关于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遭到“破产”的废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遭受着严重的农业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统计吧。

各主要产粮国家的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美国的棉花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十五，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甜菜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亚麻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农业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亿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五十亿美元。美国谷物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亿九千一百万美元。美国棉花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亿八千九百万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亿九千七百◇174◇万美元。

所有这些事实不是说明了苏维埃农业体系比资本主义农业体系优越吗？这些事实不是说明了集体农庄是比个体农户和资本主义农场更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吗？

有人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十分能够赢利的，说它们耗费资金很多，说保留这种企业是毫无理由的，说最好把它们解散，只把其中能够赢利的保留下来。但是只有丝毫不懂国民经济问题，丝毫不懂经济问题的人才会这样说。几年以前，纺织企业大半是不能赢利的。当时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建议我们关闭这些企业。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我们就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在国家面前，在工人阶级面前犯下极大的罪行，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破坏我们的已在上升的工业。我们当时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等了一年多，结果使全部纺织工业变成了能够赢利的工业。而我们的高尔基城的汽车制造厂呢？它暂时也是不能赢利的。难道也要下令把它关闭吗？又如我们的暂时也不能赢利的钢铁

工业呢？同志们，难道也要把它关闭吗？如果这样来看赢利问题，那末我们就只应当尽量发展某些赢利最多的工业部门，如糖果工业、面粉工业、化妆品工业、针织工业和儿童玩具工业等等。我当然不反对发展这些工业部门。恰恰相反，这些工业部门必须加以发展，因为它们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们没有重工业来供给设备和燃料就不能发展。第二、它们不能成为工业化的基础。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175◇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应该用在工业方面，而且尤其应该用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你们只要想一想：我们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农场，就是说，建立了完全新的大企业，这种企业对于农业的意义和大工厂对于工业的意义一样重大。请你们指出一个国家来，它能够在三年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大企业就算不是二十万零五千个，而只是二万五千个吧。你们是指不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是没有而且不曾有过的。我们在农业方面却建立了二十万零五千个新企业。可是世界上竟有一些人要求这些企业立刻能够赢利，如果不能立刻赢利，那就把它们破坏，把它们解散。赫罗斯特拉特[①]的桂冠使这些非常奇怪的人睡不着觉，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说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能赢利时绝对不是想说它们一概不能赢利。绝对不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高度赢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个集体农庄和几十处国营农场是十分能够赢利的。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我们党的骄傲，是苏

———————————————

① 赫罗斯特拉特，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年轻人，为了扬名，竟焚毁了爱非斯城的阿尔蒂密斯神殿。喻指不择手段追逐名声的人。——本书制作者注

维埃政权的骄傲。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当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间有旧的，有新的，也有十分年轻的。这是些还很幼弱，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经济机体。它们在自己的组织建设中所处的时期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工厂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所处的时期。显然，其中大多数还不能赢利。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经过两三年就一定能够赢利，正如我们的工厂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就能赢利一样。如果根据它们目前还不是一概都能赢利而拒绝给以帮助和支持，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犯下极大的罪◇176◇行。只有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提出不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

党在农业方面实现五年计划时加速进行了集体化。党实行加快集体化速度的政策是否做得正确呢？是的，是绝对正确的，虽然在这方面不免有过一些急躁行动。党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和铲除富农巢穴的政策时决不能半途而废，它应当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这是第一。

第二、党一方面拥有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另一方面利用我国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的条件，所以有一切可能来加速进行农业集体化。党在这方面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因为它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集体化大纲两倍。

这是不是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应当实行加快集体化速度的政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苏联各主要地区的集体化。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所做到的已经超过我们所预期的程度。我们不仅基本上完成了集体化，而且已经使绝大多数农民意识到集体农庄是最适当的经济形式。同志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急急忙忙地来迅速进行集体化呢？显然不需要。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加快集体化速度的问题，尤其不是要不要有集体农庄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早已完全解决了。集体农庄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走向旧的个体经济的道路已经完全截断了。现在的任

务是要在**组织上**巩固集体农庄，把暗害分子从集体农庄中驱逐出去，挑选受过审查的真正的◇177◇布尔什维克干部来供给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

现在主要点就在这里。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形就是如此。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上面我讲到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讲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高涨的情形。从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看来，这些成就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从根本改善劳动者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看来，我们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的主要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主要结果是**消灭了失业现象**，消除了工人中不相信明天的心理。

第二个主要结果是几乎全体贫农都参加了集体农庄建设，在这个基础上打破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贫农的过程，**因而消灭了农村中的贫困现象**。

同志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所梦想不到的。

我们苏联的工人早已忘记失业现象了。大约三年前我们还有将近一百五十万失业者。我们消灭失业现象已经有两年了。在这段时间内工人已经忘记了失业现象，忘记了失业的痛苦，忘记了失业的◇178◇惨状。请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惨状吧。在这些国家里现在至少有三四千万失业者。这是些什么人呢？通常都说这是些“走投无路的人”。

他们每天都在设法获得工作，寻找工作，几乎任何工作条件都愿

意接受，可是谁也不收容他们，因为他们是“多余的”人。与此同时，却有大批商品和产品被那些命运的宠儿，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任意消耗。

不给失业者饭吃，因为他们无饭钱可付；不给他们屋子住，因为他们无房钱可付。他们靠什么生活，在哪里居住呢？他们的生活靠老爷餐桌上抛下来的一点点施舍，靠在垃圾箱里寻找腐烂的残余食品。他们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而且大多数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树皮匆忙搭成的小屋里。不仅如此，不仅失业者遭受失业的痛苦，而且在业工人也遭受失业的痛苦。他们所以遭受失业的痛苦，是因为大批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不稳固，使他们产生了不相信明天的心理。今天他们还在企业里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明天醒来时是否已被解雇。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使苏联工人摆脱了失业的惨状。

关于农民也必须这样说。他们也已经忘记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贫农的情形，忘记了富农剥削贫农的情形，忘记了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贫农破产而沦为乞丐的情形。三四年前我国贫农至少占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将近二千万人。而在更早的时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贫农至少占农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什么是贫农呢？这就是通常在经营农业时或者缺乏种子，或者缺乏耕马，或者缺乏农◇179◇具，或者缺乏所有这一切东西的人。贫农就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通常受富农盘剥，而在旧俄时代既受富农盘剥又受地主盘剥的人。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二百多万贫农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去谋生，受富农雇用，而在更早的时候，受富农和地主雇用。每年跑到工厂门口来补充失业者队伍的贫农更多。当时不仅贫农处于这种恶劣的境况，而且中农也大半和贫农一样遭受贫穷和困苦。所有这一切情况农民已经忘记了。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结果，给了贫农和下中农什么呢？它打败和击溃了富农阶级，使贫农和一大半中农摆脱了富农的盘剥。它把贫农和一大半中农吸引到集体农庄里来，并为他们造成了稳固的地位，从而消灭了农民分化为剥削者（富农）和被剥削者（贫农）的可能，消灭了农村中的贫困。它把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下中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从而消灭了农民破产和贫困的过程。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几百万农民每年离乡背井跑到远方去谋生的现象了。现在要吸引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庄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必须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而且还要送给庄员免费的火车票。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陷于破产，站在工厂门口哀求工作的现象了。这种事情过去是有的，但它早已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拥有拖拉机、农业机器、种子储备和存粮等等的集体农庄的庄员。

这就是五年计划给予贫农和下中农的东西。

这就是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主要成绩的实质。◇180◇

由于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获得了这些主要成绩，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实：

（甲）大工业的工人和职员人数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一倍**，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七；

（乙）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工农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亿卢布，即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丙）大工业的工人和职员每年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十八；

（丁）社会保险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为四十一亿二千万卢布，而一九二八年为十亿五千万卢布），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戊）公共饮食业迅速发展，它供应各个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百分

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五倍。

当然，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满足工农的物质需要。我们在最近几年内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已经做到使我国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逐年改善。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也许还有资产阶级报刊的某些代表，包括资产阶级报刊驻莫斯科的一部分通讯员，才会怀疑这一点，而他们对于国民经济和劳动者状况的了解未必胜过阿比西尼亚国王对于高等数学的了解。

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181◇

请看官方统计吧。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了。在美国，据官方统计，单是加工工业中的在业工人人数就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万人；而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统计，美国全部工业中的失业人数在一九三二年末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万人。在英国，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万人。在德国，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万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而且官方统计照例都要缩小失业工人的数字，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是在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之间。

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据官方统计，美国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二八年水平降低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在同一时期内降低百分之十五，德国甚至降低百分之五十。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统计，美国工人由于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工资降低而受到的损失在三百五十亿美元以上。

英国和德国本来就很少的工人保险基金大大缩减了。美国和法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失业保险形式，因此，无家可归的工人和无人照料的儿童人数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美国。

资本主义各国农民群众的状况也不见得好些，那里的农业危机根

本破坏了农民经济，使数千百万破产的农民沦为乞丐。

五年计划在改善苏联劳动者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182◇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额增长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问题。

工业和农业产量的巨大增长，工业和农业方面作为商品的剩余产品量的增长，以及工农需要的增长，——这一切不能不使而且确实已使城乡间的商品流转活跃和扩大起来。

城乡间的生产结合是结合的基本形式。可是单靠生产结合还不够。必须用商品方面的结合来补充生产结合，使城乡联系成为巩固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只有通过苏维埃商业的扩展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以为单单通过某一条孔道，例如通过合作社，就可以扩展苏维埃商业，那是不正确的。要扩展苏维埃商业，就必须利用所有的孔道：合作社网、国营商业网、集体农庄商业。

有些同志以为扩展苏维埃商业，特别是扩展集体农庄商业，就是回到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这是完全不对的。

苏维埃商业，包括集体农庄商业在内，是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根本不同的。

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我们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容许私人商品流转，容许私商、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活动”。

这是一种多少还自由的、只是由国家调节作用来加以限制的商业。当时在国内商品流转方面，私◇183◇人资本主义部分还占相当大的地位。更不必说，我们当时既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工业，又没有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按计划工作并供给国家以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品后备。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第一、决不能把苏维埃商业和虽然受国家调节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相提并论。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容许私人资本主义部分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而苏维埃商业却以不许资本主义活跃，不许私人资本主义部分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为出发点。什么是苏维埃商业呢？苏维埃商业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是没有大小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这是特种商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制度发展条件下才实行的商业。

第二、我们现在有相当发展的国营工业和完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系统，它们供给国家以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品后备来扩展苏维埃商业。这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条件下所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第三、我们在最近时期已经把私商、私贩和各种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转范围。当然，这绝对不是说私商和投机分子已经不会利用他们最方便的场所，即利用集体农庄商业，按隔代遗传律重新出现于商品流转中了。况且，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有时也愿意进行当然不会使他们增光的投机活动。可是，我们有苏维埃政权不久以前颁布的关于取缔投机活动和惩办投机分子办法的法律〔五〇〕来反对这种恶劣现象。你们当然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很温和的。你们当然懂得，这样的法律是在新经济政策第◇184◇一阶段的条件下所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既然如此，那末说什么回到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就是丝毫不懂得，简直是丝毫不懂得我们的苏维埃经济。

有人对我们说：没有健全的货币经济和健全的通货，就不可能扩展商业，即使这种商业是苏维埃商业；首先必须医治货币经济和我们苏联通货，因为我们苏联通货是没有丝毫价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认为这些可敬的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

济学的了解并不胜过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对于反宗教宣传的了解。怎么能硬说我们苏联通货没有丝毫价值呢？我们用这种通货建筑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德涅泊水电站、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高尔基城汽车制造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以及几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几千处国营农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些先生们莫非认为这一切企业都是由麦秸或泥土建成而不是由具有一定价值的实际材料建成的吗？如果估计到在我国商品流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有组织的市场而不是只有从属作用的无组织的市场，那末苏联通货的稳定性是由什么来保证的呢？当然不仅仅是由黄金储备来保证的。苏联通货的稳定性首先是由国家所掌握的、按照固定价格投入商品流转中的大量商品来保证的。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苏联所独有的这种保证要比任何黄金储备更能切实地保证通货的稳定性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是否终究会懂得，他们已经完全被那种把黄金储备当做通货稳定性的“唯一”保证的理论弄糊涂了呢？◇185◇

关于和扩展苏维埃商业有关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五年计划的实现，我们在扩展苏维埃商业方面获得了什么成绩呢？

在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有如下的成绩：

（甲）轻工业产值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

（乙）合作社营和国营商业的零售商品流转额按一九三二年价格计算为三百九十六亿卢布，就是说，零售商业的商品额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丙）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网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十五万八千处大小商店；

（丁）集体农庄商业日益发展，个别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农产品收购量日益增加。

事实就是如此。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商品流转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危机使商业急剧缩减，使企业大批关闭，使中小商人破产，使大商号倒闭，使商业企业的大批商品因劳动群众的购买力不断降低而卖不出去。

五年计划在发展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186◇

五年计划在工业、农业和商业方面实现的结果，我们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驱除了资本主义分子，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

这种情形对资本主义分子应当产生什么结果，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什么结果呢？

结果是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

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就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

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和他们的阶级已经多次实行过这种进攻，但是他们被击溃、被打散了。因此，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

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于是他们就暗中活动，竭力进行危害勾当。他们放火焚烧仓库，破坏机器，组织怠工。他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组织暗害活动，而且其中有些人，包括某些大学教授，在疯狂地进行暗害活动时竟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牲畜中间散播瘟疫和炭疽热，在马匹中间◇187◇散播脑膜炎等等。

但是主要点还不在这里。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国家财产、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勾当。在工厂里进行盗窃侵吞，在铁路货运中进行盗窃侵吞，在仓库和商业企业里进行盗窃侵吞,特别是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进行盗窃侵吞,——这就是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形式。他们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意识到公有制是苏维埃经济的基础，要危害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动摇这个基础。于是他们就真的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

为了组织侵吞的勾当，他们就利用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那些集体农庄庄员的私有习惯和残余。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人们的意识的发展是落后于人们的实际地位的。按地位来说，庄员已经不是个体农民，而是集体农民了，但他们的意识暂时还是旧的私有者的意识。因此，剥削阶级出身的那些从前的人物就利用庄员的私有习惯，来组织侵吞公产的勾当并以此动摇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即公有制。

我们许多同志竟宽容这种现象，不懂得这种大规模盗窃侵吞的事实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好像瞎子一样，对这些事实熟视无睹，以为“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正如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一样，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如果说资本家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当时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末我们共产党员就更加应当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188◇产（不管是国家财产或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

产），放过这种反革命的胡作非为，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我们苏维埃政府不久以前公布关于保护公有制的法律〔五一〕，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个法律是目前革命法制的基础。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首要职责就是必须极严格地执行这个法律。

有人说，目前的革命法制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毫无区别，目前的革命法制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恢复。这是完全不对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锋芒主要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指向“非法的”没收和捐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在私有主、个体农民和资本家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的条件下保障了他们财产的安全。而目前的革命法制就完全不同了。目前的革命法制的锋芒并不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早已不存在了，而是指向公共经济中的盗贼和暗害分子，指向流氓和侵吞公共财产的人。由此可见，目前的革命法制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公有制，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情。

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这就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189◇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

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五年计划实现的结果，我们已经完全把敌对阶级的最后残余从他们的生产阵地上赶出去了，我们击溃了富农阶级并准备好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基础。这就是五年计划在和资产阶级的最后队伍进行斗争方面的总结。但是这还不够。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从前的人物从我们自己的企业和机关中赶出去，使他们永远不能为害。

决不能说这些从前的人物用暗害和盗窃手段就能使苏联的现状有所改变。他们要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是太软弱无力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同志不用革命警惕性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从实践中抛弃那种宽容盗窃侵吞公共财产的事实的庸俗态度，那末从前的人物就能干出不少的危害行为来。

必须注意到，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190◇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这当然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迅速肃清这些分子而避免特别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一切。

正因为如此，革命警惕性是布尔什维克现在特别需要的品质。

八 总 结

五年计划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在改善劳动者生活和发展商品流转方面、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展开反对垂死阶级的残余及遗毒的阶级斗

争方面完成的基本总结就是如此。

苏维埃政权在最近四年来所获得的成就和成果就是如此。

如果根据这些成就而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那就错了。当然，我们这里还不是一切都很好的。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有不善经营和杂乱无章的现象。可惜我现在不能谈到这些缺点和错误，因为委托我做的总结报告范围不容许我来说明这些问题。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虽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而且我们谁也不否认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可是，我们取得了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钦佩的重大成就，取得了真正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虽然有各种错误和缺点，可是党终究在四年完成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在这里能◇191◇够起主要作用而且真的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

保证我们不顾一切地取得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呢？

首先是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和忘我精神、热情和创造性，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就不能前进一步。

其次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它们号召群众前进，在走向目的的道路上克服了一切困难。

最后是苏维埃经济制度特有的优点和优越性，它包含着克服困难所必需的巨大的可能性。

这就是保证苏联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三个基本力量。

总结：

一、五年计划的总结推翻了资产阶级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关于五年计划是幻想、梦呓、不能实现的梦想的论断。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五年计划已经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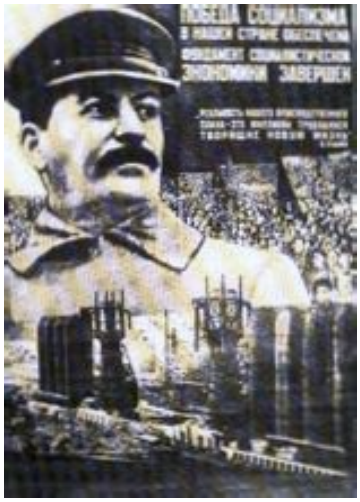
二、五年计划的总结打破了资产阶级关于工人阶级只会破坏旧制度，不会建设新制度的著名的“信条”。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工人阶级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三、五年计划的总结打破了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192◇

四、五年计划的总结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其他一切经济制度都不稳固、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困难面前经受考验的论断。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没有力量的和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衰颓，它应当让位给另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制度，即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苏维埃经济制度是不怕危机而能克服资本主义所不能解决的种种困难的唯一的经济制度。

五、最后，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只要共产党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不怕困难，那末它就是不可战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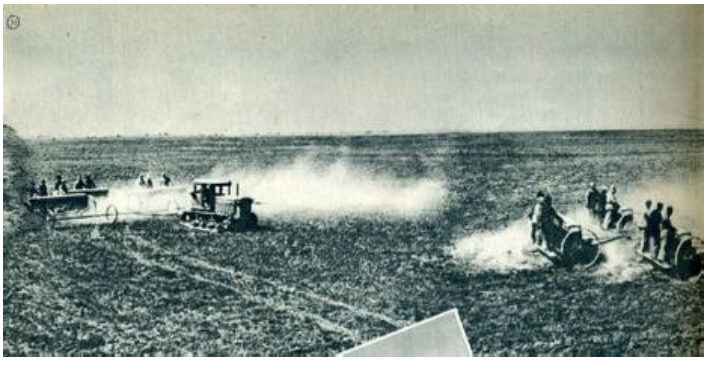
（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全场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193◇



正在建设中的第聂伯和水电站　1931年

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企业一期工程　193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　（160）



关 于 农 村 工 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各位发言同志已经把党的农村工作状况，工作的缺点和优点，特别是工作的缺点正确地描述出来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农村工作缺点方面的最主要的东西说出来，还没有把这些缺点的根子挖出来。而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请允许我对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发表意见，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毫不掩饰的精神来发表意见。

在去年，在一九三二年，我们农村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

主要缺点是我们去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前年，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难。

决不能说这是由于收成不好，因为我们去年的收成不仅不比前年坏，而且比前年好。谁也不能否认，一九三二年粮食总收获量比一九三一年多，一九三一年苏联东北五个主要地区的旱灾使国家的粮食数量大大减少了。当然，我们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为库班和捷列克以及乌克兰某些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利而受到了某些损失。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损失比起一九三一年由于东北地区发生旱灾而造成的损失来还不到一半。所以，我国一九三二年的粮食比一九三一年多。尽管如此，我们一九三二◇194◇年的粮食收购工作还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缺点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

（一）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没有能够估计到农村中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正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这种新环境，所以他们就没有能

够改用新的工作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在还没有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的时候，在还没有两种粮价即国家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时候，农村中的环境是一回事。自从宣布了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农村中的环境就不免急剧改变了，因为宣布建立集体农庄商业就是使高于国家价格的市场粮食价格合法化。用不着证明，这种情况不免使农民在把粮食交给国家的时候产生一种吝啬的心理。农民这样盘算："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已经宣布实行了，市场价格已经合法化了，我把同样数量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就应当把粮食留下来，少交一点给国家，多留一点给集体农庄商业，以便卖出同样数量的粮食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这本来是最简单而自然的逻辑！

然而糟糕的是，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至少是其中许多人，竟不懂得这个简单而自然的道理。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不致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共产党员本来应该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即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就竭力加强和督促粮食收购工作。这是环境所要求的。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怎样做的◇195◇呢？他们不去督促粮食收购工作，反而督促集体农庄建立各种储备，这样就使粮食交纳者在履行其对国家的义务时更加吝啬起来。他们既然不了解新环境，他们就不担心农民在交纳粮食方面的吝啬心理会阻碍粮食收购工作，而担心农民会想不到留下一些粮食以便后来运到集体农庄商业系统的市场上去，担心农民也许会把自己的全部粮食交给国家仓库。

换句话说，我们的农村共产党员，至少是其中大多数人，只了解集体农庄商业的**积极的**一面，只懂得和领会集体农庄商业的**积极的**一面，但是完全不懂得和没有领会集体农庄商业的**消极的**一面，——他们不懂得，如果他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是从收割庄稼的最初几天起就竭力督促粮食收购运动，那末集体农庄商业的消极的一面会使国家大受

其害。

不仅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犯了这种错误，而且国营农场的场长也犯了这种错误，他们罪恶地把应该交给国家的粮食留下来按较高的价格卖给旁人。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其关于发展集体农庄商业的著名决议〔五二〕中是否估计到了由于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这种新环境呢？是的，是估计到了的。在这个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全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和收集种子以后，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在这个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结束粮食收购工作和种子储藏工作以后，大约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时候，——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好像是用他们的这个决议来警告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关心各种储备和储存而模◇196◇糊了自己的视线，不要离开主要任务，要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展粮食收购工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工作，因为第一个任务是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第二个任务是储藏种子，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开始实行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

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错误也许在于他们没有十分坚决地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大声疾呼地预告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商业所包含的危险。但是，他们预告过这种危险，而且预告得十分清楚，这是毫无疑问的。必须承认，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对区级工作人员，而且对某些省级工作人员的列宁主义锻炼和远见是估计得高了一点。

也许本来就不应该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吧？尤其是因为集体农庄商业不仅有积极的方面，而且还有某些消极的方面，所以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也许是一个错误吧？

不，这不是一个错误。任何一个革命措施，如果执行得不正确，

就不能保证没有某些消极的方面。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也是如此。集体农庄商业无论对于农村或城市，无论对于工人阶级或农民，都是需要的和有利的。正因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须加以实行。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时所考虑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所考虑的是扩大城乡间商品流转的基础，改进供应工人以农产品和供应农民以工业品的工作。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是不够的。这些商品流转的孔道必须用新的孔道即集体农庄商业来补充。我们建立集体农庄商业，也就是补充了这些孔道。◇197◇

其次，他们所考虑的是通过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使庄员得到一种额外收入的来源，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

最后，他们所考虑的是通过集体农庄商业的建立来进一步推动农民去改造集体农庄在播种和收割方面的工作。

你们知道，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所考虑的这一切都被近来集体农庄生活中的事实完全证实了。集体农庄巩固的过程正在加强，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已经停止，个体农民更加想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力求在接受新庄员时进行更严格的选择，——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证明集体农庄商业不仅没有削弱集体农庄的地位，反而使它加强和巩固了。

由此可见，我们的农村工作所以有缺点，并不是因为建立了集体农庄商业，而是因为集体农庄商业有时经营得不正确，因为没有能够估计到新环境，没有能够改编自己的队伍来适应由于宣布实行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环境。

（二）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不仅是这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农村工作条件由于集体农庄在主要产粮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发生的变化。集体农庄经济形

式在我国产粮区已经成为统治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个情况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责任，这一点却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许多人认为既然集体化在某个地区，在某个区域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那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办好，我们可以把事情交◇198◇给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以为集体化自己会解决一切，自己会提高农业。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过渡到集体经济这一占优势的经济形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农业的关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提高农业方面的领导作用。现在放任自流对农业发展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现在放任自流会葬送一切。当个体农民还在农村中占优势的时候，党对农业发展事业的干预可以只限于个别的帮助、劝告或警告。当时个体农民必须亲自照料自己的经济，因为这个经济只是他个人的经济，他不能把经营这个经济的责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人可以指靠。当时个体农民如果不愿意挨饿，不愿意饿死，就得亲自照料播种和收割，照料农业劳动的全部过程。一旦转入集体经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集体农庄不是个体经济。集体农庄庄员现在这样说："集体农庄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体农庄是我的，但同时又是伊万、菲力普、米哈伊尔和其他庄员的，集体农庄是大家的。"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集体农庄庄员现在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庄员身上，可以指靠其他庄员，因为他知道集体农庄是不会使他挨饿的。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经营经济的责任的重心已经由个别农民身上移到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集体农庄的领导核心身上了。现在农民并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体农庄领导机关，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要求自己，不如说是要求集体农庄领导机关来关怀经济和进行◇199◇合理的经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

就是说，党现在已经不能只限于对农业发展过程进行个别的干预了。它现在应当亲自担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亲自担负起工作的责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在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经济。

但是还不止此。集体农庄是大经济，而大经济没有计划是不能经营的。包括几百农户，有时甚至包括几千农户的大农庄，只有通过计划指导才能经营。否则它就会垮台，就会瓦解。你们看，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下的另一个新条件，这个条件和经营个体小经济的条件是根本不同的。能不能把经营这种经济的事情交给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呢？当然不能。要经营这种经济，就必须保证集体农庄有必要数量的具有基本知识、能够计划经济并且善于有组织地经营经济的人材。很明显，没有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经常干预，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经常帮助，要办好这种经济是不可能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集体农庄制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农业的关怀和责任。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党如果愿意领导集体农庄运动，就应当熟悉集体农庄生活和集体农庄领导中的一切详情细节。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党不应当减少，而应当增加它和集体农庄的联系，它应当知道集体农庄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便及时帮助集体农庄，并预防那些威胁集体农庄的危险。

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许多区组织和省组织同集体农庄生活脱节，◇200◇同集体农庄的需求脱节。人们在办公室里坐着，洋洋得意地耍笔杆，却不知道集体农庄是在官僚主义的办公室外面发展着的。同集体农庄生活的脱节有时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某些边区组织的委员不是从有关的区组织那里，而是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那里知道本边区集体农庄的情况的。同志们，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由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农庄本来应该使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加强起来。但是实际上这一过渡往往使共产党

员以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自夸而高枕无忧，把事情交给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任其自流。对集体农庄经济实行计划指导的问题本来应该使共产党员在集体农庄里的领导作用加强起来。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员往往袖手旁观，而让从前的白卫军官，从前的佩特留拉分子和工农的一般敌人去把持集体农庄。

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此。

（三）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断定：既然有了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那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办好，集体农庄的正确经营、集体农庄经济的正确计划、集体农庄的成为模范社会主义农庄都已经有了保障。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就组织结构来说还很幼弱，无论在供给集体农庄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方面，或是在集体农庄事务的日常领导方面，都还需要党的大力帮助。但是这还不能概括一切，甚至还不是主要之点。这里的主要缺点在于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本身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计过高。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201◇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正如苏维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样。无论集体农庄或苏维埃都是我们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工人阶级的最伟大的成果。但集体农庄和苏维埃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不错，它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但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内容**为转移。

我们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实：工兵代表苏维埃曾经在一定时期内帮助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在我们苏联，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就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苏维埃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所以当

时苏维埃掩护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德国在一九一八年末也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苏维埃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所以当时苏维埃掩护反革命来反对革命。可见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虽然这种形式是极大的革命成果。问题首先在于苏维埃的工作内容，问题在于苏维埃的工作性质，问题在于苏维埃究竟是由**谁**领导的，——是由革命者领导的还是由反革命分子领导的。正因为如此，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表示反对苏维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五三〕时期，俄国反革命头子米留可夫就曾经表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这就是俄国反革命分子米留可夫当时所提出的口号。反革命分子懂得：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苏维埃由谁领导。◇202◇

关于集体农庄也必须这样就。如果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由真正的革命者，由布尔什维克，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那末它就能显示出经济建设的奇迹。相反地，如果集体农庄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佩特留拉的军官和其他白卫分子、从前的邓尼金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所把持，那末它在一定时期内就能变成各种反革命活动的掩蔽所。同时还要注意到，集体农庄这一组织形式不仅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钻进来，而且在初期甚至会给反革命分子某些方便来暂时利用集体农庄。当农民还在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他们是分散而彼此隔绝的，因此，反苏维埃分子在农民中间的反革命阴谋还不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而在农民过渡到集体农庄经济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农民已经有了现成的群众组织形式，即集体农庄。因此，反苏维埃分子钻进集体农庄和进行反苏维埃活动也就能够产生大得多的效果。想必反苏维埃分子是估计到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自己竭力设法建立一种类似集体农庄的组织，利用这些组织作为他们的秘密组织的合法掩蔽所。大家也知道，反苏维埃分子在他们并没有被揭穿，还没有被击溃的那些地区，

总是乐意加入集体农庄，甚至赞美集体农庄，以便在集体农庄内部建立反革命工作的巢穴。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一部分反苏维埃分子自己表示拥护集体农庄，但是以不要共产党员参加集体农庄为条件。“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集体农庄”，这就是反苏维埃分子现在所拟定的口号。可见问题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和苏维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根据他们的阶级本能已经开始了解到这一点了。

可惜我们有些共产党员还不了解这一点。

正因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不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现在伪装得很巧妙的反苏维埃分子就在某些集体农庄里把持一切，在那里组织暗害和怠工。

（四）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于改变反富农斗争的战线，不了解阶级敌人的面目近来已经改变，不了解农村中阶级敌人的策略已经改变，不了解因此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策略以取得胜利。敌人已经了解这种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了解农村新制度的力量和威势，因此，他们就改编了自己的队伍，改变了自己的策略，由对集体农庄的正面进攻转为暗中破坏。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没有看清新环境，继续在已经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找敌人，继续采取和富农进行简单斗争的旧策略，其实这个策略早已过时了。

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人们寻找我们在宣传画上所看见的那种富农。可是地面上早已没有这种富农了。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204◇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员、秘书等职务。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粮食收购工作”。他们“拥护”粮食收购工作。他们“只是”进行煽动，要求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建立超过实际需要两倍的后备，要求集体农庄设置超过实际需要两倍的保险基金，要求集体农庄按每个工作人员每天六磅至十磅的标准发粮食给公共食堂等等。显然，在建立这种“储备”和发给公共食堂这些粮食以后，在经过这一番狡诈的煽动以后，集体农庄的经济力量必定受到损害，而粮食收购工作也就没有进行的余地了。

要识破这种狡猾的敌人而不受他们的煽动，就必须具有革命警惕性，就必须具有摘下敌人的假面具而向集体农庄庄员指明敌人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本领。可是，我们农村中具有这种品质的共产党员多不多呢？共产党员往往不仅没有揭穿这种阶级敌人，反而自己受了他们的狡诈的煽动，做了他们的尾巴。

我们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见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因此可以让“中立的”集体农庄存在，这种“中立的”集体农庄既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也◇205◇不是反苏维埃的，但是它们一定会按所谓自发方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富

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谓自发的发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去，那末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至于“中立的”集体农庄，那末天地间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集体农庄。“中立的”集体农庄是长着眼睛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的幻想。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目前所发生的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中立的”集体农庄决没有存在的余地；在这种环境中，集体农庄**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或者是**反苏维埃的。如果某些集体农庄不是由我们领导的，那就是说，它们是由反苏维埃分子领导的。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五）最后，我们的农村工作产生缺点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对共产党员在集体农庄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责任，对共产党员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作用和责任估计不足。在谈到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时，共产党员通常都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硬说一切都是农民的过失。这是完全不对的，是绝对不公平的。这和农民毫不相干。如果说到责任和过失，那末责任完全要由共产党员来负，全部过失都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过失。

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苏维埃政权这样强大而有威信的政权。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共产党这样强大而有威信的政党。谁也没有阻碍而且不能阻碍我们按照集体农庄利益的要求、按照国家利益的要求来进行集体农庄事业。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按照列宁主义的要求来从◇206◇事集体农庄事业，如果我们往往犯许多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例如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错误，那末这是我们的过失，而且仅仅是我们的过失。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的消极方面，犯了许多极严重的错误。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许多党组织和集体农庄脱节，高枕而卧，屈服于自发势力。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许多同志仍然对集体农庄这一群众组织形式估计过高，不懂得问题与其说在于形式本身，不如说在于亲自负起集体农庄的领导责任，并把反苏维埃分子从集体农庄领导机关中驱逐出去。

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新环境，没有了解进行暗中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

试问，这和农民有何相干？

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集体农庄都在不断发展，日益繁荣，切实执行国家的任务，在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巩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这样一些集体农庄，它们和上述集体农庄为邻，它们虽然有着和上述集体农庄相同的收成和相同的客观条件，但是它们却日益衰弱和瓦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第一种集体农庄是由真正的共产党员领导的，而第二种集体农庄是由“废物”领导的，这些“废物”固然口袋里也有党证，但终究是些“废物”。

试问，这和农民有何相干？◇207◇

由于对共产党员的作用和责任估计不足，人们往往不是到应当寻找的地方去寻找我们的农村工作产生缺点的原因，因此，缺点仍然没有消除。

不应该在农民中间寻找粮食收购工作发生困难的原因，而应该在我们自己中间，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间去寻找。因为**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拥有国家的资财，**我们**负有领导集体农庄的使命，**我们**应当对农村工作负完全责任。

我们农村工作的缺点所由产生的各种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也许有人以为我所描写的情形未免太糟了，以为我们的农村工作尽是缺点。这当然是不对的。实际上，除了这些缺点以外，我们的农村工作还有许多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成绩。可是，我在开始演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我的任务并不是叙述我们的成绩，我只是准备讲一讲我

们农村工作的缺点。

这些缺点是否可以纠正呢？是的，是绝对可以纠正的。我们是否在最近就能够纠正这些缺点呢？是的，是绝对能够纠正的。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我认为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就是可以用来在最短期间消除这些缺点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热烈鼓掌，经久不息。）◇208◇

给“女工”杂志〔五四〕

值此“女工”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日，谨向“女工”杂志致热烈的祝贺。祝它在以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精神、以实现我们的导师——列宁的伟大遗训的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事业中获得成就。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十五号◇209◇

给伊·恩·巴让诺夫同志的信

敬爱的伊·恩·巴让诺夫同志！

你那封关于把你的第二枚勋章转送给我以奖励我的工作的信收到了。

我很感谢你的亲切的言词和同志的礼物。我知道你为了我而使自己失去了什么，我珍视你的感情。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第二枚勋章。我所以不能而且不应当接受，不仅因为这枚勋章只能属于你，只有你才受之无愧，而且因为我已经受到同志们充分的关心和尊敬。所以，我没有权利掠夺你的东西。

勋章不是为那些已经著名的人物而设的，主要是为那些不大著名的但是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英雄人物而设的。

此外，应当告诉你，我已经有了两枚勋章。我肯定地对你说，这已经是超过需要了。

答复迟了，请见谅。　　致◇210◇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附言：兹将勋章奉还原主。

约·斯大林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第一次刊印◇211◇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五五〕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体农庄男女庄员同志们！我本来不打算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我所以不打算讲话，是因为在我以前讲话的几位同志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好，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还用得着我来讲话呢？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鼓掌多时）我就只好遵命了。

现在我就个别的几个问题说几句话。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一个问题：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集体农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你们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对于集体农庄是否站在正确的道路上◇212◇这一点大概是不会怀疑的。因此，这个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像你们这样想法。有不少的农民，其中也有庄员，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是否正确。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的确，人们数百年来过着旧的生活，走着旧的道路，在富农和地主跟前低头做人，在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跟前低头做人。不能说这条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得到过农民的赞同。可是，这条旧道路总是一条已经走熟了走惯了的道路，而且谁也没有实地证明可以过另外一种生

活，过较好的生活。何况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里，人们仍然过着旧的生活…… 而布尔什维克却像疾风骤雨一般，突然冲进这个旧的泥潭似的生活里来说：是抛弃旧道路的时候了，是开始过新生活，过集体农庄生活的时候了，是开始不过资产阶级国家里大家所过的那种生活，而过新生活，过劳动组合生活的时候了。而这种新生活是怎样一种生活呢，有谁知道。恐怕它比旧生活更坏吧。至少新道路是一条没有走惯的道路，是一条没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条还没有完全熟悉的道路。留在旧道路上不是好些吗？等一等再转上新的集体农庄的道路不是好些吗？冒险是不是值得呢？

这就是现在一部分劳动农民所怀抱的疑问。

我们是否应该消除这些疑问呢？我们是否应该公开提出这些疑问，指出这些疑问有什么价值呢？显然是应该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不能说是一个无谓的问题。◇213◇

那末，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这种看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群众性的集体农庄建设在我们这里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个过渡的标志是富农被击溃，千百万贫农和中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为了开始这种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建设的过渡，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一般说来，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

首先，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它曾经帮助而且正在继续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

第二、必须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剥夺他们的工厂和土地，并宣布工厂和土地为人民的财产。

第三、必须压制富农，剥夺他们的机器和拖拉机。

第四、必须宣布只有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才能使用机器和拖拉机。

最后，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设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

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谈不到三年前开始的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

所以，要过渡到集体农庄道路，首先必须进行十月革命，推翻资本家和地主，剥夺他们的土地和工厂，创立新工业。

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从十月革命就开始的。这个运动所以直到三年前才蓬蓬勃勃◇214◇地开展起来，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经济果实直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我们直到那个时候才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

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不少次革命。它们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片面的革命。一种剥削劳动者的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代替了，但是剥削本身仍然存在。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被另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代替了，但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的目的才是消灭**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

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奴隶制度下，“法律”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许农奴主出卖农奴。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资本家和地主，用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农奴主和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只有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只有我们的十月革命才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用一些剥削者代替另一些剥削者，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

种剥削形式，而是根绝任何剥削，根绝所有一切剥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压迫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鼓掌多时）◇215◇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是农民向新的集体农庄道路过渡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

农民支持十月革命是不是做得对呢？是的，他们是做得对的。他们所以做得对，是因为十月革命帮助他们摆脱了地主和资本家，高利贷者和富农，商人和投机分子。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赶走压迫者，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最终摆脱旧时的羁绊，仅仅击溃剥削者是不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还要建立新生活，建立一种使劳动农民能够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而且能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上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农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体农庄制度。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

旧制度和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在旧制度下，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它帮助富豪反对劳动农民。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政府是工农的，它帮助工人和农民反对所有一切富豪。旧制度导向资本主义。新制度导向社会主义。◇216◇

可见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有些人以为可以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有些还不完全相信集体农庄

道路的正确性而摇摆不定的同志特别喜欢搬出这条谁也不知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想要我们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他们想要我们“只”容许富农和其他小资本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请你们问一问农民：他们是不是愿意恢复富农盘剥，回到资本主义去，取消苏维埃政权而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呢？你们只要问一问农民，就会知道大多数劳动农民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哪一条道路。

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

劳动农民摈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了集体农庄建设道路是做得对的。◇217◇

有人说，集体农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它又是一条困难的道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困难是有的。美好的生活不花代价是得不到的。可是问题在于：主要的困难已经度过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无论如何，同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比较起来，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发言人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称赞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工人。他们说，他们工人有成绩，而你们庄员的成绩却少得多了。我觉得你们的发言人在演说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同志的羡妒：如果我们集体农民有像你们列宁格勒、

莫斯科、顿巴斯和哈尔科夫工人那样的成绩，那该多好呵……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用了多大的代价才换得这些成绩，他们经过怎样的艰难困苦才终于取得这些成绩吗？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当时常常整个整个星期不发给工人一块面包，更不必说肉类和其他食品了。当时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能够领到八分之一磅黑面包，还掺着一半粗渣，就算是好日子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继续了几个月或半年，而是继续了整整两年。但是工人忍耐着，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他们知道好时光一定会到来，他们一定会取得重大的成就。结果怎样呢？你们看见，工人没有想错。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艰难困苦和工人受过的艰难困苦比较一下，就会看出你们的艰难困苦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

怎样才能推进集体农庄运动和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呢？

首先，集体农庄必须拥有十分固定而适于耕种的土地。你们是否有这种土地呢？是的，是有的。◇218◇大家知道，所有的好地都交给集体农庄，而且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了。所以，集体农庄庄员可以尽力耕种和改良这些土地，不必害怕这些土地会落到别人手里。

其次，集体农庄庄员必须能够使用拖拉机和机器。你们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拖拉机制造厂和农业机器制造厂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集体农庄生产的，它们供给集体农庄以一切现代工具。

最后，政府必须以人材和拨款来全力帮助集体农民，而不让敌对阶级余孽破坏集体农庄。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政府呢？是的，是有的。这个政府就叫工农苏维埃政府。请你们指出来给我看看，还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帮助资本家和地主，不是帮助富农和其他富豪，而是帮助劳动农民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才有这样的政府，它竭力保护工人和集体农民，保护城

乡一切劳动者，反对一切富豪和剥削者。（鼓掌多时）

所以，你们有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和完全摆脱旧时羁绊的一切条件。

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诚实地劳动，按劳动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你们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庄，把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驱逐出去。

你们大概会同意我的意见：克服这些困难，就是说，诚实地劳动和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是并不怎样困难的。何况你们现在不是为富豪工作，不是为剥削者工作，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219◇工作。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劳动农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新道路上，在集体农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想在最近两三年内取得什么成绩呢？

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是一件无可争辩的好事。可是，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将来能取得什么成绩，而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农民走上了集体农庄道路。这是很好的。可是，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沿着集体农庄道路前进取得了什么显著的成绩呢？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贫农群众因加入集体农庄并在集体农庄里使用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农具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农群众现在在集体农庄里成了中农，成了

生活有保障的人。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打破了农民分化为贫农和富农的过程，击溃了富农，帮助贫农在集体农庄里成了自◇220◇己的劳动的主人，成了中农。

四年以前，在集体农庄建设展开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富农日益富裕，日益上升，而贫农则日益贫困和破产，遭受富农的盘剥。当时中农常常向富农的地位爬，但是每一次都跌下来补充贫农的队伍而使富农称快。不难猜想，在这一片混乱中占便宜的只有富农，也许还有几个富裕农民。当时农村里每一百户中有四五户富农，八户或十户富裕农民，四十五户到五十户中农，三十五户贫农。所以，受富农盘剥的贫农至少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我还没有算中农中半数以上的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按生活状况来说同贫农很少区别，他们也是直接依赖于富农的。

我们展开集体农庄建设的结果，消灭了这种混乱和不公平现象，打破了富农盘剥，把所有这些贫农群众都吸收到集体农庄里来，在集体农庄里给了他们有保障的生活，把他们提高到中农的水平，使他们能够使用集体农庄的土地，享受对集体农庄的优待，使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不下二千万农民人口，不下二千万贫农摆脱了贫困和破产，摆脱了富农盘剥，因加入集体农庄而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们，这是很大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的。

这就是集体农庄建设的实际的明显的结果，是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的结果。

但这还只是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绩。◇221◇

如果以为我们应当停留在这第一步上，停留在这第一个成绩上，

那就不正确了。不，同志们，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成绩上。要继续推进并彻底巩固集体农庄，我们必须走**第二**步，我们必须取得**新的**成绩。这第二步是什么呢？这第二步就是要把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这第二步就是要**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是的，同志们，成为生活富裕的人。（鼓掌多时）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依靠集体农庄把贫农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现在必须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鼓掌多时）

我们现在有达到我们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我们的机器和拖拉机现在利用得还不好。我们的土地耕种得还不大好。我们只要改造机器和拖拉机的使用，只要改进土地的耕种，就能做到使我们的产量增加一两倍。而这就完全足以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劳动者了。

从前，富裕农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要成为富裕农民，就必须欺负自己的邻人，就必须剥削他们，和他们做买卖时高价卖出，低价买进，雇佣几个雇农，竭力剥削他们，积累一点小资本，稳固以后就爬上富农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在个体经济下，富裕农民就引起贫农和中农的不信任和仇恨。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条件也不同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完全不◇222◇需要欺负或剥削自己的邻人。而且现在要剥削什么人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这里不再有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机器和拖拉机都属于国家，而拥有资本的人在集体农庄里面已经不时髦了。曾经时髦过，但是这种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体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实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别人劳动，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末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鼓掌多时）◇223◇

三　几点意见

现在让我谈谈几点意见。

首先谈谈我们的农村**党员**。你们中间有党员，可是非党员更多。参加这次大会的非党员比党员多，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正是首先需要吸收非党员参加我们的事业。有些共产党员是用布尔什维克态度来对待非党庄员的。可是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摆党员架子，不许非党员接近他。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能争取到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党的信

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党员不要和非党员隔绝，不要把自己关在党的圈子里，不要摆党员架子，而要倾听非党员的呼声，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要向非党员学习。

不要忘记，党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记住，所有的党员自己有一个时候都曾经是非党员。今天他不是党员，明天他就会成为党员。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自傲的呢？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在党内工作了二三十年。可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时候也曾经是非党员。假如在二三十年以前，当时的党员鄙视我们，不许我们接近党，那我们会怎样呢？也许我们还会有好几年和党疏◇224◇远。可是，同志们，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会场愉快活跃，鼓掌多时。）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现在有时瞧不起非党员的一些年轻党员应当记住这一切，应当记住：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

现在稍微谈谈**妇女**，谈谈**女庄员**。同志们，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轻视妇女，甚至讥笑妇女。可是，同志们，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妇女占人口的一半。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运动已经把许多卓越的能干的妇女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次大会，看一看大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出妇女早已由落后者上升为先进者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集体农庄中的妇女前进，运用这支力量。

固然，苏维埃政权在不久以前和女庄员发生过一点小误会。我指的是奶牛问题。可是现在奶牛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于是误会也就消释了。（鼓掌多时）我们已经做到使大多数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再过一两年，你们就找不到一个自己没有奶牛的庄员了。我们布尔什维克

一定设法使我国所有的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鼓掌多时）

至于女庄员自己，她们应当记住集体农庄对于妇女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记住她们只有在集体农庄里面才有可能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没有集体农庄，就没有平等，在集体农庄里面，就有平等权利。请女庄员同志们记住这一点，请她们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集体农庄制度。（鼓掌多时）◇225◇

现在对于集体农庄中的**男女共青团员**说几句话。同志们，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农民中间有不少老年人背着旧包袱，带着旧习惯，怀念着旧生活。当然，他们不是时常都跟得上党，跟得上苏维埃政权的。我们的青年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背上旧包袱，所以他们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正因为青年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所以他们负有引导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前进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识。但是，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没有知识，明天就会有了。因此，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男女共青团员同志们，学习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动摇分子前进吧！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你们就一定会成功。（鼓掌）

现在稍微谈谈**个体农民**。这里很少有人说到个体农民。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个体农民了。不，不是这样一回事。个体农民还存在，决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因为他们是我们明天的集体农庄庄员。我知道有一部分个体农民已经完全堕落，跑去做投机买卖了。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庄员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时选择得很严格，有时根本就不接受他们。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容有异议的。但是另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个体农民，他们没有去做投机买卖，而以诚实的劳动取得自己的面包。这些个体农民也许并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但是他们还没有加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在庄员中间有一种憎恨个体农民的心理。

当然，也应当了解庄员，处在庄员的地位来想一想。他们近几年来受到了个体农民不少的侮辱和◇226◇讥笑。但是，侮辱和讥笑在这里不应当有重大的意义。不能忘掉侮辱而把自己的感情置于集体农庄事业的利益之上的领导者是一个不好的领导者。如果你们想做领导者，你们就应当善于忘掉个别个体农民给你们的侮辱。两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个寡居农妇从伏尔加寄来的信。她抱怨人家不愿意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要求我帮助她。我当时写信去问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给我回信说，他们不能够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因为她侮辱过集体农庄大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一次农民大会上，庄员号召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这个寡妇听了号召之后就提起裙子说：给你们，把集体农庄拿去吧！（全场活跃，笑声。）

毫无疑问，这个寡妇做得不对，侮辱了大会。可是，既然她经过一年以后真诚悔过并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还拒绝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呢？我认为不能拒绝。我就把这个意见写给集体农庄了。他们接受了这个寡妇加入集体农庄。结果怎样呢？原来她现在在集体农庄的工作队伍里不是站在后面，而是站在前列。（鼓掌）

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领导者如果想成为真正的领导者，那末当事业的利益需要他忘掉侮辱的时候，他就必须善于忘掉侮辱。

关于一般个体农民也必须这样说。我不反对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要加以选择。可是，我反对不加选择地堵死一切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道路。这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集体农庄庄员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经是个体农民。

最后，稍微谈谈**别金楚克区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封来信**〔五六〕。这封信已经在报上发表，你们大概都◇227◇读过了。这封信确实是很好的。它证明在我们的庄员中间有不少有经验有觉悟的集体农庄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但是信里有一个不正确的

地方，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原来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把他们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看做平凡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把那些往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和领袖们的劳动看做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呢？不，同志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们是由于谦虚而犯了这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因此就不算错误。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的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大概把这一点忘记了。一个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夸耀自己的功绩，这是不好的。结果会造成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看不到自己的“平凡的”“不显著的”劳动实际上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那就更坏了。我希望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接受我对他们那封信提出的这个小小的修正。

同志们，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经久不息的鼓掌，转为欢呼。全场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高呼“乌拉”。会场中高呼：“斯大林◇228◇同志万岁，乌拉！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万岁！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载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三号◇229◇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190）

庆祝红军建军十五周年贺电

（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向工农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致敬！

在列宁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红军在国内战争的伟大战斗中把干涉者赶出了苏联，捍卫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给自己增添了不朽的光荣。

红军现在是和平和工农和平劳动的堡垒，是苏联边境的警觉的守卫者。

我国工人胜利地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正以新式的国防武器武装红军。同志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会完善地掌握这些武器，在敌人企图侵犯祖国的时候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更高地举起列宁的旗帜，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旗帜！

英勇的红军，红军的领导者，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三号◇230◇

给巴尔涅斯先生的回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敬爱的巴尔涅斯先生！

你为侨居苏联的美国公民的安全担心，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苏联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国家里，民族仇视的表现，或者把外国人当做外国人看待的不友好态度，是要受到法律惩办的。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分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对于在苏联的外国专家，其中包括美国专家，尤其是这样，在我看来，他们的工作是值得感谢的。

至于“大都会—维克斯电器有限公司”〔五七〕的几个英国人，他们受到审讯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而是因为侦查机关证实他们违反了苏联的法律。难道俄国人不同样受到审讯吗？我不知道这个案件对美国公民能有什么关系。

愿意效劳的　**约·斯大林**

第一次刊印◇231◇

致谢·米·布琼尼同志

值此布琼尼同志五十寿辰之际，谨向国内战争中的战友，光荣的红色骑兵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革命农民中最有天才的被提升为红军领导者的布琼尼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敬礼！

亲爱的谢明·米哈依洛维奇，紧紧握你的手。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一五号◇232◇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简要记录）

斯大林：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

罗宾斯：能够有机会拜访你，我认为是很大的荣幸。

斯大林：这没有什么特别。你过甚其词了。

罗宾斯（笑）：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我在俄国各地到处都发现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两个名字连在一起。

斯大林：这也是过甚其词。我怎么能和列宁相比呢。

罗宾斯（笑）：说苏俄政府——人民委员会在这整个时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政府，这也是过甚其词吗？

斯大林：这大概不是过甚其词。

罗宾斯：引人注意的和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向反动的方向走，列宁所创立的这个政府是强有力的。它反对一切敌对的路线。

斯大林：这是对的。◇233◇

罗宾斯：在看五一游行的时候，我特别明显而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十五年来的发展，因为我看过一九一八年和现在一九三三年两次五一游行。

斯大林：最近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十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罗宾斯：对于国家生活来说，对于苏维埃俄国在这期间达到这样巨大的进步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斯大林：我们本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罗宾斯：把两次游行的基本动机、基本方针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九一八年的游行是对外的，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革命的号召。现在的动机不同了。现在男子、妇女和青年参加游行是为了说明：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保卫的国家。

斯大林：那时的游行是鼓动性的，而现在的游行是总结性的。

罗宾斯：你大概知道，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两国之间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力求消除美国当政人士现有的敌对态度。

斯大林：我是在一九一八年从列宁的谈话中，以及后来根据一些事实知道这一点的。我知道这一点。

罗宾斯：我完全是以一个公民的私人身分到这里来的，并且代表我个人说话。我到这里来的主◇234◇要目的是要弄清楚两国关系的前途，弄清楚俄国工人的工作本领和创造发明能力方面的一些真正事实。反苏宣传说，俄国工人懒惰，俄国工人不会工作，机器到他们手里就完了，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对于这种宣传，我不仅要用言语而且要用手头已经掌握的事实来加以驳斥。

与此相联，使我感到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业状况的问题。有些人硬说工业化破坏了农业，农民停止了播种，停止了收割庄稼。每年都有人断定说，俄国今年一定要饿死。我想知道一些农业方面的事实，以便驳斥这些论断。我希望看到今年第一次种上新作物的田地。我对苏联主要谷物的发展情况特别感到兴趣。

我感到兴趣的第三个问题是国民教育问题，是儿童和青年的发展，是他们的教育。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国民教育，即所谓创作天才和发明才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美国有两种类型的创造，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创造，另一种是广泛的生活中的创造，即创造精神在生活中的表现。我感到兴趣的是儿童在怎样发展，青年在怎样发展。我希望实际看一看他们在怎样学习，他们在怎样受教育和怎样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已经得到了一些宝贵的材料，并希望以后能得到一些补充材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农业的发展问题，我希望在旅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时候和从那里到罗斯托夫、哈尔科夫的往返途中能够看到真正的事实。我希望参观一下集体农庄，并且看一看古代的农耕地交错现象是怎样消灭的，大农业是怎样发展的。

斯大林：你需要我的意见吗？◇235◇

罗宾斯：是的，我想知道你的意见。

斯大林：关于苏联工人似乎不会使用机器并破坏机器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对这一点必须说明：我国没有像西欧和美国所有的那种现象，在那里，工人因为机器夺去了他们的面包而有意识地破坏机器。我们的工人不这样对待机器，因为我们是在没有失业的情况下大量采用机器的，因为机器在我国并不是像在你们国家那样夺去工人的面包，而是减轻他们的劳动。至于工人工作不熟练，缺少文化，那末这是事实，我国有文化的工人很少，而且他们不像欧洲或美国的工人那样善于使用机器。不过这是我们的暂时现象。例如，如果研究一下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哪里的工人学会掌握新技术更快些，是欧洲的工人，是美国的工人，还是五年来俄国的工人，那末我认为是俄国的工人学会得更快些，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西方的技术当然是发达的，但是在那里掌握轮式拖拉机的制造却花了好几年时间。我们掌握这种事业就快些。例如在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在不过十二个月至十四个月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拖拉机的制造。现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仅完成设计能力，不仅一天制造一百四十四台拖拉机，而且有时候制造一百六十台，也就是说，超过了设计能力。我是拿这个做例子的。我国的拖拉机工业是新的工业，这种工业从前是没有的。航空工业也是新的精细的事业，也很快就被掌握了。从掌握的速度来看，汽车工业

的情况也相似。机床制造业也是这样。

在我看来，这样迅速地掌握了机器的制造并不是因为俄国工人有特别的才能，而是因为生产事◇236◇业，比如说，飞机、飞机发动机、拖拉机、汽车、机床等的制造，在我国不是被看做私人的事业，而是被看做国家的事业。在西方，工人进行生产是为了领取工资，而把其他一切都搁在一边。在我们这里，生产被看做公共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被看做光荣的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样迅速地掌握了新技术的原因。

我总认为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说某个民族的工人似乎没有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如果从种族观点来看问题，那末在美国，比如说，黑人被认为是“下等人”，但是他们掌握技术并不比白种人差。任何民族的工人掌握技术的问题都不是生物学问题，也不是遗传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今天掌握不了，明天就能学会并能掌握。不论什么人，连布西门人也在内，只要帮助他，就能掌握技术。

罗宾斯：还需要有掌握技术的志向和愿望。

斯大林：当然。俄国工人的志向和愿望是绰绰有余的。他们认为掌握新技术是光荣的事情。

罗宾斯：这一点我在你们的工厂里已经感觉到了，我在那里看到了由于社会主义竞赛而产生的新的热情和新的志向，这决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因为工人期待于自己的工作的是某种比金钱所能给予的更好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这是对的。这是光荣的事情。

罗宾斯：我要把那些表明工人发明和工人创造性建议增加情况的图表带回美国，这些发明和建议改造了生产，给生产节约了大量资金。我看到了许多工人发明家的照片，他们在改进生产和节约资◇237◇金方面给了苏联很大的贡献。

斯大林：这样的工人在我国出现得相当多，这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罗宾斯：我到过你们莫斯科所有的大工厂——“阿模”汽车制造

厂、滚珠轴承工厂、“铣刀”工厂以及其他工厂，我到处都看到提高工人发明的组织。这许多工厂里的工具车间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这些工具车间为自己的工厂制造极贵重的工具，这些车间的工人尽自己的全部能力紧张地工作，表现出他们的全部创造主动性，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斯大林：尽管如此，我们也有许多缺点。我们的熟练工人很少。可是我们需要有很多这样的工人。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很少。技术人员的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仍然跟不上需要。美国人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这是应当承认的。他们比别人更好更勇敢地帮助了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他们。

罗宾斯：我在你们的企业中看到了一种国际主义，它给了我很强烈的印象。你们工厂的领导方面愿意采用任何国家——法国、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的技术成就，而对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偏见。我觉得正是这种国际主义会使你们有可能把其他国家的机器的一切优点集中到一种机器上，而制造出更完美的机器。

斯大林：会这样的。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工业化似乎破坏了农业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工业化没有破坏而是挽救了我国的农业，挽救了农民。我国在几年以前还存在着非常分散的细小的和极细◇238◇小的农民经济。由于土地日益分散，农民的份地小到简直没有地方放一只鸡。如果再加上木犁和瘦马这一类不仅不能开垦生荒地，甚至连普通不很松的土地都耕不了的原始农具，你就可以想像到农业衰落的情景了。三四年前，我们苏联大约有七百万部木犁。农民只有两条道路：或者躺下等死，或者转而采用使用土地的新形式，采用机器耕地的方法。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及时向农民发出的号召，把自己的小块土地联合为大块土地、使用政府的拖拉机来耕种这些土地、使用政府的收割机和脱谷机来收割庄稼和打粮食的号召得到了农民极其

热烈的响应。很明显，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府的建议，开始把自己的小块土地联合为大块土地，使用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从而走上了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的广阔道路，走上了根本改进农业的新道路。

由此可见，实行工业化的结果，农民得到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工业化挽救了农民，挽救了农业。

整个村子的小农户联合为大农庄的过程我们就叫做集体化，而联合起来的大农庄本身则叫做集体农庄。我国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是国有的，这大大有助于集体化。土地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我国也就没有土地买卖，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

我不是想以此说明，所有这一切，即集体化和其他等等，在我们这里进行得都很顺利。困难当然是有的，而且并不少。集体化像任何一件大的新事业一样，不仅有朋友，而且也有敌人。虽然如此，拥护集体化的农民还是占绝大多数，而集体化的敌人却愈来愈少了。

罗宾斯：任何一种前进都需要相当的代价，这一点我们是注意到并且估计到了的。◇239◇

斯大林：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而且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丝毫不容置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承认了农业集体化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事实，而大多数农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所以这是已经赢得的成果。现在我国农业中的主要形式是集体农庄。如果拿播种或收割的数字来看，拿粮食生产的数字来看，目前个体农民的谷物收获量只不过占谷物总收获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余部分都是集体农庄生产的。

罗宾斯：我关心一个问题：是不是去年的收割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现在的播种运动进行得令人满意，而去年的收割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

斯大林：去年的收割工作不如前年那样令人满意。

罗宾斯：我读过你的演说词，根据这个演说词，我想今年的收割工作一定会比较顺利。

斯大林：很可能，今年的收割工作会好得多。

罗宾斯：你们能把农业工业化，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你对这个极大的成就的估价是不会比我低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都遭受着深刻的危机并需要工业化。各资本主义国家总算还能够解决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苏联的巨大成就，是它已经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且正在胜利地解决这个任务。

斯大林：是的，这是事实。

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和缺点就是如此。◇240◇

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关于儿童和一般青年的教育问题。我们的青年是好的，是朝气勃勃的。我们的国家不同于其他一切国家，它不惜金钱来很好地抚育儿童，来很好地教育青年。

罗宾斯：美国有人认为你们用一种固定的界限来限制儿童的发展，而这些界限使得儿童没有发展创造精神的自由，没有发展智力的自由。你不认为发展创造精神的自由和表现一个人内在的东西的自由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吗？

斯大林：第一点，关于限制的说法是不对的。第二点是对的。毫无疑问，在闭塞和狭隘限制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的自由，也没有对主动精神的鼓励，儿童是不能发展自己的才能的。至于青年，已经给他们打开了一切道路，青年在我们这里可以自由地深造。

在我们这里，不打儿童，很少处罚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己选择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让他们能够走上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像我们苏联这样关心儿童，关心儿童的教育和发展。

罗宾斯：能不能认为，新一代的人摆脱了贫困的压迫，摆脱了经济条件的恐怖，结果必然会造成创造力的新繁荣，造成新艺术的繁荣，

造成从前受这一切桎梏所束缚的文化和艺术的新高涨呢？

斯大林：这无疑是对的。

罗宾斯：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也不特别多，但是我希望美国参加、有可能参加苏维埃俄国这里所进行的发展事业，希望美国人通过承认、通过提供信贷、通过建立两国之间的正常的相互关系（比如在远东的相互关系）来获得这种可能，希望你们这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得到保障，◇241◇希望这种伟大事业能够胜利完成。

斯大林（微笑）：谢谢你的好意。

罗宾斯：参议员波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在美国国家领导者中间是苏联最坚决的朋友，是争取承认苏联的战士。

斯大林：这是对的，他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这件事是很关心的。但是很遗憾，目前他还没有取得成就。

罗宾斯：我相信，一切实际事实现在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所起的作用，比最近十五年来任何时候所起的作用都有力得多。

斯大林：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在从中阻挠，依我看来，英国在从中阻挠。（笑）

罗宾斯：无疑是这样的。但是情况毕竟迫使我们首先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并且我们本身的利益和其他国家推动我们去做的事情之间的冲突，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推动美国去建立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关心美国出口事业的发展。直到现在还没有被谁真正利用过的具有很大容量的唯一大市场就是俄国市场。美国的实业家如果愿意，就会提供长期信贷。他们关心远东的安宁，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像和苏联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那样能促进这种安宁。在这方面，李维诺夫先生在日内瓦所做的关于侵略国定义问题的声明，是同曾经在和平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布利安—凯洛格公约的方针完全符合的。美国所关心的是全世界相互间的经济关系的稳定，我们很清楚地懂得，只要苏联还

处在整个◇242◇经济体系之外，就不能有相互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

斯大林：这一切都是对的。

罗宾斯：我过去是而且始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乐观主义者。还在十五年以前，我就信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当时人们把他们说成是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其中也把列宁看做是德国的代理人。但是，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列宁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伟大的领袖。

我希望我所得到的第一手的消息也许能促进我所说过的两国之间亲密合作的那个计划的实现。

斯大林（含笑）：但愿如此。

罗宾斯（笑）：如果你按美国人的说法，你就会说，“但愿我的胳膊有更大的力量”。说这句话的人不相信他的胳膊有很大的力量。

斯大林：就算这样吧。

罗宾斯：我认为参加创造新世界，参加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再高尚再伟大不过了。参加创造和建设新世界这件事实不仅在现在，而且从今后几千年看来，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斯大林：这个事业毕竟是很困难的。（笑）

罗宾斯（笑）：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斯大林：谢谢你，你过了十五年还记得苏联，并且来访问它。

（两人同笑，罗宾斯鞠躬告别。）

第一次刊印◇243◇

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十五周年贺电

值此列宁工农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谨向我们光荣的革命青年的组织者——列宁工农共产主义青年团致亲切的敬礼！

祝共青团在以列宁主义精神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中，在以对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精神、以全力加强世界一切不同语言和不同种族的劳动者之间的国际兄弟联系的精神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中获得成就。

共青团的男女突击队员在新建工厂、矿井、铁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时期中给自己增添了光荣。我们希望，共青团的男女突击队员在掌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新技术方面，在加强我国国防力量方面，在巩固我国陆军、海军和空军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无畏精神和首倡精神。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成立以来的十五年内，勇敢地举着列宁的伟大旗帜前进，胜利地把千百万男女青年工人和男女青年农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希望，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继续高举◇244◇列宁的旗帜，光荣地举到我们伟大斗争的胜利的终点，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万岁！

约·斯大林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载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二九九号◇245◇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杜兰特：你是不是同意通过“纽约时报”向美国人民讲几句话？

斯大林：不，加里宁已经做过了〔五八〕，我不能侵犯他的特权。

如果说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那末我对恢复邦交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当然是满意的，因为从政治上来说，它增加了维护和平的可能，从经济上来说，它消除了偶然因素，使我们两国有可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讨论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最后，它为互相合作开辟了道路。

杜兰特：在你看来，苏美贸易额可能达到多少？

斯大林：李维诺夫在伦敦经济会议〔五九〕上所讲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准备定购大批货物，支付货款。但是，我们需要有利的信用条件，而且我们必须有能够偿还贷款的把握。我们不能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按期付款的把握是不愿意定货的。

大家都奇怪，我们还在支付，而且能够支付。我知道现在通常都不偿还贷款了。但是我们在偿还贷款。其他国家都停止支付了，但是苏联没有这样做，而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能◇246◇够支付，我们拿不出什么来支付，但是我们向他们表明了我们是能够支付的，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杜兰特：苏联开采黄金的情况怎样？

斯大林：我们有很多产金区，它们在迅速发展。我们的产量已经超过沙皇时代一倍，现在一年的产值在一亿卢布以上。特别是在最近

两年，我们改进了勘探工作方法，发现了巨量储藏。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年轻，不仅炼金工业，就连钢铁工业和炼铜工业，整个冶金工业都还年轻，我们年轻的工业暂时还没有力量给炼金工业以应有的帮助。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是产量还不高。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采金用的洗矿机和其他机器，我们就能在短时期内使采金量增加三倍。

杜兰特：苏联在国外的债务总额是多少？

斯大林：四亿五千万卢布多一点。我们在最近几年偿还了很大的数目，两年以前，我们的债务是十四亿。所有这些债务我们已经在偿还，到一九三四年末或一九三五年初将按期分批偿清。

杜兰特：假定说，对苏联的支付决心已经不必怀疑，但是苏联的支付能力怎样呢？

斯大林：在我国，前者和后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我们不借不能偿还的债务。请看一看我们和德国的经济关系。德国曾经宣布缓期偿还它的大部分外债，我们也可以援引德国的先例，用完全相同的办法对待德国。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依赖德国的工业了。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我们所需要的设备。◇247◇

杜兰特：你对美国的看法怎样？我听说你和布里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你对他的看法怎样？你是不是还像三年前一样，认为我们的危机（如同你当时对我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

斯大林：布里特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时常听列宁讲到他，列宁也是喜欢他的。我喜欢他的是：他讲话不像一般外交家，他是一个直爽的人，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一般说来，他在这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从各方面看来，罗斯福是一位果断而刚毅的政治家。有一种叫做唯我论的哲学体系，它的内容是：一个人不相信外界的存在，只相信我自己。很久以来就表明美国政府信奉这种哲学体系，不相信苏联的存在。但是，罗斯福显然不是这种古怪理论的信奉者。他是一个现实

主义者，他知道现实就是他所看到的东西。

至于经济危机，它确实不是最后一次危机。当然，危机震撼了一切事业，但是近来似乎情况开始好转。可能经济衰落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我不认为能够达到一九二九年的高涨，但是最近期间由危机过渡到萧条，到少许复苏（固然有某些上下起伏），不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简直是肯定的。

杜兰特：对日本怎样呢？

斯大林：我们希望和日本有良好的关系，但是遗憾得很，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如果明智的政策在日本占了上风，我们两国就能友好相处。但是，我们担心好战分子会把明智的政策排斥到后面去。这就是真正的危险，对这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任何一国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险◇248◇而不作自卫准备，那末它的人民是不会尊重它的。我认为从日本方面来说，如果它进攻苏联，那是不明智的。它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好，它有薄弱的地方——朝鲜、满洲和中国，而且它未必能够指望在这个冒险行动中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可惜优秀的军事专家不一定是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一定能够把武器的力量和经济规律的力量区别开来。

杜兰特：对英国怎样呢？

斯大林：我认为和英国的贸易协定将会签订，经济关系将会发展，因为保守党应该懂得，他们阻碍同苏联的贸易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我怀疑在目前条件下，两国在贸易方面是否能够得到像预料那样大的利益。

杜兰特：你对意大利所提出的关于改革国际联盟的问题的态度如何？

斯大林：我们没有接到意大利关于这方面的任何建议，虽然我们的代表和意大利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杜兰特：你对国际联盟是不是任何时候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

斯大林：不，不是任何时候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这样。你大概不十分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国际联盟才能够成为制止或阻碍军事行动发生的一种因素。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国际联盟能够起微小的作用，哪怕只是使战争受到一点阻难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平事业，那末我们也就不反对国际联盟。是的，如果历史事变的进程将是这样，那末尽管◇249◇国际联盟有很大的缺点，我们也不会不支持它。

杜兰特：什么是目前苏联对内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扩大城乡间的商品流转，加强各种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怎样容易，可是比我们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要容易些，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工业问题解决了。农业问题，即农民集体化这个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现在必须解决商品流转和运输问题。

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
“真理报”第四号◇250◇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六〇〕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自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三年多了。时间并不很长。但是，这个时期的内容比其他任何时期都丰富。我认为在最近十年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像这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多的事件。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现在人们所争论的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能够摆脱危机呢，还是没有出路；如果有出路，那该怎么办？◇251◇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六一〕，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无怪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已奄奄一息，而废除军备的趋势正在被扩充军备和补充军备的趋势所公开而直接地代替。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并且不能说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成就。

目前国际形势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主要材料。

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

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所有的经济危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延续得最久，◇252◇拖得最长。从前的危机一两年就过去了，而目前的危机已经延续到第五个年头，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年比一年衰落，并把它往年积累的脂膏消耗殆尽。无怪乎这次危机是所有一切危机中最严重的危机。

现在的工业危机为什么会空前持久呢？

首先，因为工业危机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

第二、因为工业危机和席卷了所有一切农业国和半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结果不能不使工业危机复杂和加深。

第三、因为农业危机在这期间加剧了，笼罩了所有一切农业部门（包括畜牧业在内），使农业退化，退到由机器改为手工劳动，退到用马匹代替拖拉机，退到大大减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有时甚至完全不

用，结果使工业危机更加持久。

第四、因为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的卡特尔竭力保持高昂的商品价格，结果使危机特别严重，使积存商品的销售受到阻碍。

最后，这是主要的，因为这次工业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时候，不论在各主要国家里，或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在战前和十月革命前有过的那种力量和巩固性；这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承受了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企业经常开◇253◇工不足的现象和千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再也无力摆脱它们。

这就是决定目前的工业危机十分持久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也说明危机为什么不仅限于生产和商业范围，而且也扩展到信用系统、外汇和债务范围等等，打破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社会集团之间原有的传统关系。

商品跌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垄断的卡特尔如何反抗，商品价格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势不断下跌，并且最先跌价和跌得最厉害的是那些没有组织的商品所有者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商品，而那些有组织的商品所有者即联合为卡特尔的资本家的商品价格却跌得比较慢和比较少。价格下跌使债务人（工业家、手工业者、农民等）难以支持，相反地，却使债权人处于闻所未闻的特权地位。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许多公司和一些企业主遭到大破产。在最近三年中，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有几万个股份公司因此倒闭了。股份公司破产之后，就出现了通货贬值，这稍微减轻了债务人的困难。通货贬值之后，国家就把停止支付外债和内债合法化了。像德国的达姆斯塔德银行和德勒斯顿银行、奥国的信用机关银行这样一些银行的破产，像瑞典的克莱格尔康采恩、美国的殷苏尔康采恩这样一些康采恩的破产，都是大家知道的。

很明显，跟随着动摇了信用系统的基础的这些现象而来的一定是

而且实际上已经是信用和外债的停止支付、盟国之间的债务的停止支付、资本的停止输出、对外贸易的更加缩减、商品出口的更加减少、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加剧、各国之间的商业战争以及倾销政策。是的，同志们，倾销政策。◇254◇我说的不是欧洲和美国高贵的国会中某些高贵的议员不久以前还力竭声嘶地大叫大嚷的那种臆造的苏维埃倾销政策。我说的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现在都在实行而这些勇敢的高贵的议员对之谨慎地保持沉默的那种真正的倾销政策。

同样很明显，这些伴随着工业危机而在生产范围之外爆发的破坏现象，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工业危机的进程，使它加深和复杂起来。

这就是工业危机变动的一般情况。

现在看一看官方材料中说明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危机变动的一些数字。

工业总产值（以1929年为100）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苏 联	100	129.7	161.9	184.7	201.6
美 国	100	80.7	68.1	53.8	64.9
英 国	100	92.4	83.8	83.8	86.1
德 国	100	88.3	71.5	59.8	66.8
法 国	100	100.7	89.2	69.1	77.4

显然，这个统计表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255◇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是在逐年下降，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有些恢复，但是还远没有达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而苏联的工业却在逐年增长，不断高涨。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一九三三年末的产值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苏联工业的产值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鼓掌）

根据这个统计表来看，也许会以为在四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的情况最好。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如果拿这些国家的工业和战前水平比较一下，那末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工业总产值（以战前水平为100）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苏 联	100	194.3	252.1	314.7	359	391.9
美 国	100	170.2	137.3	115.9	91.4	110.2
英 国	100	99.1	91.5	83	82.5	85.2
德 国	100	113	99.8	81	67.6	75.4
法 国	100	139	140	124	96.1	107.6

◇256◇

由此可见，英国和德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美国和法国稍微超过了战前水平，而苏联的工业产值在这个时期比战前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以上。（鼓掌）

从这两个统计表中还应该得出一个结论。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从一九三〇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是在下降，一九三二年降到最低点，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有些恢复和上升。如果拿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月份的统计材料来看，那就更能证实这个结论，因为这些统计材料说明，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值虽然在一九三三年间起伏不定，可是并没有表现出有降低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所达到的最低点的趋势。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看来已经度过了最低点，在一九三三年内没有再回到这个最低点。

有些人喜欢说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军事通货膨胀这一类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毫无疑问，军事通货膨胀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正确，因为在日本，这种人为因素是引起某些工业部门

（主要是军事工业部门）稍微复苏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但是，如果用军事通货膨胀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严重的错误。这种解释所以不正确，至少是因为我所说明的工业中的某些进展不是在个别的和偶然的区域内看得到，而是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内（其中包括通货稳定的国家）都看得到。显然，除了军事通货膨胀以外，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力量在这里也起着作用。◇257◇

资本主义通过增加工人劳动强度来加紧剥削工人，实行把农民的劳动产品即粮食和一部分原料的价格压得极低的政策，把殖民地和经济力量薄弱国家的农民的劳动产品（主要是原料，其次是粮食）的价格压得更低。资本主义用这些方法来**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殖民地和经济力量薄弱国家的农民**而稍微改善了工业状况。

这是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是从危机过渡到普通的萧条，从而会引起工业的新的高涨和繁荣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高涨即将到来。而且，根据一切情况看来，至少在最近这种材料是不会有的。所以不会有，是因为不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有稍微重大的发展的一切不利条件还继续发生作用。这些不利条件就是：这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情况即资本主义总危机还在延续，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大批失业现象经常存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固定资本还没有那种通常可以预示高涨到来的稍微重大的更新趋势，以及其他等等。

显然，现在的情况是从工业的最低点，从最深刻的工业危机过渡到萧条，但不是过渡到普通的萧条，而是过渡到特种的萧条，它不会导致工业的新的高涨和繁荣，但也不会使工业回到最低点。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

持久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状况的空前尖锐化。◇258◇

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加剧、自由贸易最后一点残余的消灭、禁止进口的关税、商业战争、外汇战争、倾销政策以及其他许多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类似措施使各国之间的关系极端尖锐化，给军事冲突造成了条件，把战争这个利于更强的国家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手段提到日程上来了。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争夺太平洋斗争的加强和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海上军备的扩充就是这种尖锐化的结果。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使欧洲各国的军备更加扩充。

无怪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现在正苟延残喘，而废除军备的空谈正在被扩充军备和补充军备的“认真的”言论所代替。

现在又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战争和复仇的政党是最出风头的。

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状况也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而更加尖锐化。四年的工业危机已经把工人阶级弄得精疲力尽，痛苦不堪。四年的农业危机不仅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农民阶层完全破产，而且特别使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农民阶层完全破产。不管在统计方面耍什么花招来故意缩小失业人数，但是根据资产阶级机关的官方材料，失业人数在英国仍达三百万，在德国仍达五百万，在美国仍达一千万，更不用说欧洲其他国家了。如果再加上人数超过一千万的半失业者，再加上千百万◇259◇破产的农民群众，那就可以看到劳动群众的贫困和痛苦的大概情景了。人民群众虽然还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冲击的地步，但是冲击的思想已经在群众意识中成熟起来，这是几乎用不着怀疑的。西班牙革命推翻了法西斯制度，中国的苏区正在扩大，而中国

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阻止不住这种扩大，这些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就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什么正在竭力设法把能够被工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压迫者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一点残余消灭，或使之化为乌有，把共产党逼入地下，并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专政。

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对内政策方面把镇压工人阶级和实行恐怖手段作为巩固未来战场的后方的必要手段，——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政治家目前所特别关心的。

无怪乎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法西斯主义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经过最精密的检查，也不能在它里面发现一点点社会主义的成分。

因此，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做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因而不得◇260◇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

情况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作为摆脱现状的出路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当然，没有根据可以推断说，战争能给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不顾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教训，还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抓住战争，那就是说，他们已

经糊涂透顶，已经走入绝境，准备急速地跳进深渊。

因此，不妨简略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正在制定的那些发动战争的计划。

有一些人认为应当对某一个强国发动战争。他们想把这个国家打得一败涂地，靠牺牲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假定说，他们发动了这样的战争。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人们也曾经想消灭一个强国——德国，靠掠夺它来发财致富。可是结果怎样呢？他们并没有把德国消灭，却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的强烈仇恨，并为复仇思想造成了肥沃土壤，以致他们直到现在还不能，而且大概也不是很快就能把他们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事情处理好。他们所得到的却是资本主义在俄国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及——当然的事——苏联的成立。有什么可以保证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会使他们得到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更好的”结果呢？做相反的推断不是更正确吗？◇261◇

另一些人认为应当对某一个军事方面软弱而市场广大的国家发动战争，例如对中国发动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一个需要由强国去占领的“无组织的地区”。他们显然想完全瓜分中国，靠牺牲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假定说，他们发动了这样的战争。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纪初叶，人们对意大利和德国的看法正像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一样，就是说，他们认为意大利和德国是“无组织的地区”，而不是国家，并对它们进行了奴役。可是由此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大家知道，结果是德国和意大利都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战争，都统一成了独立的国家。结果是这两国人民对奴役者的仇恨心理加强了，其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也不会很快就消除。试问，有什么可以保证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战争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呢？

还有些人认为应当发动“优等种族”，比如说日耳曼“种族”，对“劣等种族”，首先是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认为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给予摆脱现状的出路，因为“优等种族”负有扶植“劣等种族”和统治它们的使命。假定说，他们把这个同科学有天壤之别的奇怪理论变成了实践。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古罗马帝国对现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祖先的看法正像现在“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对斯拉夫种族的看法一样。大家知道，古罗马帝国把德国人和法国人鄙视为“劣等种族”，“野蛮人”，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服从“优等种族”，服从“大罗马帝国”。在我们内部可以说说，古罗马帝国这样做还◇262◇有一些理由，而现在的“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就不然了。（掌声如雷）结果怎样呢？结果是非罗马人，即所有的“野蛮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把罗马帝国推翻了。试问，有什么可以保证现在的“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的野心不会遭到同样悲惨的结局呢？有什么可以保证柏林的那些舞弄文墨的法西斯政治家会比罗马帝国的老练的征服者更幸运呢？做相反的推断不是更正确吗？

最后，还有些人认为应当对苏联发动战争。他们想击溃苏联，瓜分它的领土，靠掠夺它来发财致富。如果以为只是某些日本军人有这种想法，那就错了。我们知道，欧洲某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也在制定这样的计划。假定说，这些先生们由言论转入了行动。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几乎用不着怀疑，这种战争对资产阶级将是最危险的战争。所以将是最危险的战争，不仅因为苏联各族人民将为保卫革命果实进行殊死战斗，还因为战争不仅将在前线进行，而且将在敌人的后方进行。资产阶级用不着怀疑，苏联工人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无数朋友一定会从后方竭力打击本国的压迫者，因为他们向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挑起了罪恶的战争。如果资产阶级先生们在这场战争的第二天便失去了几

个和他们亲近的、现在“靠上帝保佑”得以平安统治着国家的政府，那就请他们不要埋怨我们。（掌声如雷）

你们大概还记得，这样的反苏战争在十五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大家知道，人人尊敬的邱吉尔当时给那次战争冠上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十四国进军”。你们当然记得，那次战争把我国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了挺身抵御外敌以保卫自己工农祖国的英勇战士的统一营垒。那次战争的结果你们是知道◇263◇的。结果是把武装干涉者从我国赶出去了，并在欧洲成立了许多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六二〕。几乎用不着怀疑，第二次反苏战争一定会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败，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爆发革命，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垮台。

头脑糊涂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军事计划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他们既不聪明，也不勇敢。（鼓掌）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选择了战争的道路，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四年的危机和失业弄得痛苦不堪的工人阶级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是说，革命危机正在成熟并将日益成熟。资产阶级陷入自己的战争圈套愈深，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愈频繁，革命危机就成熟得愈快。

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有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的死亡已经预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他们只要等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起草胜利的决议就行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它是需要准备和争取的。而能够准备和争取它的，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时候，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根本动摇了，而革命的胜利还是没有到来，

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那就愚蠢了。

说到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六三〕上讲的一段关于革命危机的至理◇264◇名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普遍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说法把这个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不安宁’；另一种是革命家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资产阶级现在像一只狂妄无耻的失去理性的野兽，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自己的死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证明’资产阶级绝对没有任何可能用某些微小的让步来麻醉某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来镇压某一部分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某种运动或起义。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那就是空洞的学究主义，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遭受着最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必须用革命政党的实践来‘证明’这些革命政党具有充分的觉悟性、组织性、与被剥削群众的联系、果断精神和才能，足以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顺利的革命，进行胜利的革命。”（“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〇二页至第二〇三页）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很容易理解，在这种战云密布的险恶情势下，苏联执行自己的和平政策是多么困难。

在这种战争前的狂热已经笼罩着许多国家的情况下，苏联在这些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和平立场上，反对战争威胁，维护和平，欢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维护和平的国家，揭穿那些准◇265◇备战争和挑拨战争的人并摘下他们的假面具。

苏联在这个困难而复杂的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指靠什么呢？

（甲）指靠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乙）指靠深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的道义上的支持。

（丙）指靠那些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审慎态度。

（丁）最后，指靠我们的决心抵御外来袭击以保卫祖国的光荣军队。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我们争取同邻国缔结互不侵犯公约和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是有成绩的。大家知道，我们不仅同我们西方和南方的大多数邻国（其中包括芬兰和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公约，而且同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缔结了互不侵犯公约，我们还同这些邻国（包括小协约国〔六四〕在内）订立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苏联和土耳其的友谊，改善了苏联和意大利的关系并达到了确实令人满意的地步，改善了和法国、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关系，恢复了和美国、中国的关系等等。

从反映苏联和平政策的成就的许多事实中应当指出两件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一）首先，我指的是近来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以及苏联和法国的关系的好转。大家知道，从前我国和波兰的关系是不大好的。在波兰，有人杀害过我国的代表。波兰曾经以西方各国的反苏壁垒自◇266◇居。所有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打算在武装侵犯苏联时利用波兰来做前锋。苏联和法国的关系也不见得好些。只要回忆一下在莫斯科审判拉姆津暗害集团时的一些事实，就可以想起当时苏联和法国的相互关系了。而现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已开始逐渐消失。它正在被另一种关系，即只能说是彼此接近的关系所代替。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同这些国家订立了互不侵犯公约，虽然这些公约本身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问题首先在于互相猜疑的空气已开始消散。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走向接近的过程看做十分稳固的、能够保证最后成功的现象。突然事变和政策上的曲折变化，例如在反苏情绪仍然强烈的波兰，还远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但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好转，不管它将来的结果如何，作为促进和平事业的因素来说，总是一件值得指出并加以推进的事实。

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它是由什么促成的呢？

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实力和威力的增长。

在我们这个时代，通常是不尊重弱者，只尊重强者的。

其次是由于德国的政策有某些改变，这些改变反映出德国复仇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的增长。

有些德国政治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苏联现在采取了指靠法国和波兰的方针，说苏联已经由凡尔赛条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说这种变化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267◇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像人们所臆造的那样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受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是不会赞美凡尔赛条约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世界由于这个条约而被卷入新战争的漩涡。关于臆造苏联改变了方针的问题也应当这样说。我们并没有指靠过德国，正像我们现在并没有指靠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指靠苏联自己，而且仅仅指靠苏联自己。（热烈鼓掌）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我们和某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末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德国的政策改变了。问题在于还在目前的德国政治家上台执政以前，特别是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德国

就已经展开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即旧政策和“新”政策之间的斗争：旧政策反映在苏联和德国订立的一些大家知道的条约中，而“新”政策基本上和一度占领过乌克兰、进攻过列宁格勒并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变成了这一进攻的桥头堡的德皇的政策相似，并且“新”政策显然占了上风。拥护“新”政策的人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拥护旧政策的人却处在不得志的地位，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胡根堡在伦敦发表的尽人皆知的言论也不是偶然的，德国执政党对外政策的领导者罗森堡发表的同样尽人皆知的声明也不是偶然的。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二）其次，我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正常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这件事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问题不仅在于这件事增加了维护和平事业的机会，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打下了相互合作的基础。问题在于这件事在新旧两个时期之间立下了界标：在◇268◇旧时期中，各国把美国当做一切反苏趋向的堡垒，而在新时期中，这座堡垒已经自愿拆除以适应两国双方的利益。

这就是反映苏联和平政策的成就的两个主要事实。

但是，如果以为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一切都很顺利，那就不正确了。不，我们还远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英国所使用的压力：对我国出口货实行禁运，企图干涉我国内政，以此摸我们的底，试探我们的抵抗能力。固然，这种企图毫无结果，禁运后来也取消了，但是这些袭击行动所留下的不快之感，至今还在有关英苏关系的一切方面（包括贸易协定的谈判在内）都令人感觉得到。而这些对苏联的袭击行动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家知道，有一部分英国保守党人不进行这种袭击就不能过日子。正因为这些袭击行动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应当估计到他们今后还会袭击苏联，制造种种威胁，使苏联受到损害等等。

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苏联和日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大加改善的必要。日本拒绝签订它和苏联同样需要的互不侵犯公约，这就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不很好。关于中东铁路谈判的中断（这是不能归咎于苏联的），以及关于日本的代理人在中东铁路上所干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非法逮捕中东铁路上的苏联职员等等，也应当这样说。至于日本有一部分军人在另一部分军人明目张胆的赞同下在报刊上公开鼓吹必须和苏联作战并侵占沿海区，而日本政府不但不叫这些战争挑拨◇269◇者守规矩，反而装成和这件事无关的样子，那就更不用说了。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造成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应当同时采取一切措施保卫我们的国家以防备突然事变，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国家以抵御侵犯。（热烈鼓掌）

由此可见，除了我们的和平政策的成就以外，我们还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苏联的外部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我们主张和平并捍卫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怕威胁，我们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热烈鼓掌）谁愿意和平并力求和我们建立事务联系，谁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支持。而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毁灭性的回击，使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联的菜园子里来。（掌声如雷）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这样。（掌声如雷）

任务在于今后仍然要十分坚决而彻底地执行这个政策。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270◇

现在谈谈苏联的内部状况问题。

从苏联的内部状况来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无论在国民经济方面或在文化方面都呈现着日益扩展的高涨景象。

这个高涨不仅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力量积累。这个高涨的特色是它使苏联的结构发生了原则性的变化，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创立了各种新的生产部门：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化学工业，发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联合收割机制造业，大型涡轮和发电机、优质钢、铁合金、合成橡胶、氮、人造纤维的生产等等部门。（鼓掌多时）

在这个时期内，几千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工业企业建成并开工生产了。像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波布里克动力化学联合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器制造厂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建成了。几千个旧企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和各边疆地区，例如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271◇索、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布里亚特—蒙古、鞑靼、巴什基里亚、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伯利亚西部、远东等地方，建成了许多新企业，创立了许多工业基地。

成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多处国营农场，并为它们建立

了新的区中心和工业区。

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出现了居民众多的新的大城市。旧的城市和工业区也大大发展了。

把库兹涅茨克的炼焦煤和乌拉尔的铁矿石结合起来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厂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于是我国东部新的钢铁基地可以说已经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乌拉尔山脉西面和南面的斜面区，即在乌拉尔区、巴什基里亚和哈萨克斯坦一带，新的强大的石油基地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显然，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六百多亿卢布巨额基本投资并没有白投，它已经开始产生果实了。

由于这些成绩，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亿卢布，而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在同一时期内都锐减了。

很明显，所有这些成绩和这个高涨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苏联内部状况更加巩固起来。

在一个技术落后、文化落后的幅员广阔的国家里怎么会在短短三四年内发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呢？这不是怪事吗？如果这种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和个体小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那才真是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国的这种发展是在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产生的，那就不能说是怪事了。◇272◇

很明显，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在数千万人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比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体系占优势的基础上，这种雄伟的高涨才能扩展起来。

因此，毫不奇怪，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苏联的经济和文化的蓬勃高涨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成分的消灭和个体农民经济的被排挤到后面去。事实是：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比重在工业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九，在农业方面，如果按谷物播种面积来说，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五，

而个体农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只不过百分之十五点五。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在苏联已经被消灭，而个体农民经济在农村中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指出，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一）宗法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二）小商品生产（大多数是出卖粮食的农民），（三）私人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六五〕。列宁认为，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我们现在可以说，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不存在了，第二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领导力量。（热烈鼓掌多时）

总结就是这样。

这个总结就是苏联内部状况稳固的基础，就是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前方阵地和后方阵地坚固的基础。◇273◇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联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各个问题的具体材料。

一、工业的高涨

在我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发展最快的是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即从一九三〇年起，我国工业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六，而和战前水平相比则几乎增加了三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一点九。

这就是说，我国工业化是开足马力进行的。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中占了首要地位。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一、工业（小工业除外）	42.1	54.5	61.6	66.7	70.7	70.4
二、农业	57.9	45.5	38.4	33.3	29.3	29.6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这就是说，我国已经稳固地最终成为工业国了。◇274◇

工业发展总额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在工业化事业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材料表明，这一项的比重在工业总额中占了主要地位。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大工业两类主要部门产值的比重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总产值（单位10亿卢布）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全部大工业	21	27.5	33.9	38.5	41.9
其中：					
（甲类）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10.2	14.5	18.8	22	24.3
（乙类）消费品	10.8	13	15.1	16.5	17.6
比重（百分比）					
（甲类）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48.5	52.6	55.4	57	58
（乙类）消费品	51.5	47.4	44.6	43	4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显然，这个统计表是用不着解释的。◇275◇

在我们这个技术还年轻的国家里，工业负有特别的任务。它不仅应当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自己，不仅应当改造包括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森林工业在内的一切工业部门，它还应当改造各种运输业和一切农业部门。可是只有当机器制造业这个改造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在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时候，工业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材料表明，我国的机器制造业在工业总额中已经起主导作用了。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各个工业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

	苏联			
	1913年	1929年	1932年	1933年
煤矿工业	2.9	2.1	1.7	2
炼焦工业	0.8	0.4	0.5	0.6
采油工业	1.9	1.8	1.5	1.4
炼油工业	2.3	2.5	2.9	2.6
钢铁工业	未详	4.5	3.7	4◇276◇
有色金属工业	未详	1.5	1.3	1.2
机器制造工业	11	14.8	25	26.1
基本化学工业	0.8	0.6	0.8	0.9
棉纺织工业	18.3	15.2	7.6	7.3
毛纺织工业	3.1	3.1	1.9	1.8

这就是说，我国工业是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着，而改造的钥匙——机器制造业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只是必须善于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按社会部分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大工业总产值按社会部分分配表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总 产 值（单位百万卢布）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全部产值	21、025	27、477	33、903	38、464	41、968
其中：					◇277◇
一、公营工业	20、891	27、402	未详	38、436	41、940
其中：					
（甲）国营工业	19、143	24、989	未详	35、587	38、932
（乙）合作社营工业	1、748	2、413	未详	2、849	3、008
二、私营工业	134	75	未详	28	28
	百 分 比				
全部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					
一、公营工业	99.4	99.7	未详	99.93	99.93
其中：					
（甲）国营工业	91.1	90.9	未详	92.52	92.76
（乙）合作社营工业	8.3	8.8	未详	7.41	7.17
二、私营工业	0.6	0.3	未详	0.07	0.07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经消灭，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工业中唯一的垄断的体系。（鼓掌）

但是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中，最重要的成绩要算是工业在这期间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新的工业人材和新的工业领导者，大批新的工程师和技师，几十万掌握了新技术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前进的年轻的熟练工人。毫无疑问，没有这些人材，工业就不会有它现在有◇278◇权引以自豪的这些成就。材料说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厂艺徒学校培养出来参加工业生产的大约有八十万比较熟练的工人，高等技术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十八万多工程师和技师。如果说干部问题确实是我国发展

中最严重的问题，那就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业已经开始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国工业的主要成绩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以为工业只有成绩，那就不正确了。不，它也有缺点。其中主要的是：

（甲）**钢铁工业**仍然落后；

（乙）**有色金属工业**没有整顿好；

（丙）对于发展**地方煤矿**采掘事业（莫斯科附近地区、高加索、乌拉尔、卡拉干达、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远东、北方边区等地）在全国燃料总平衡表中的极重大的意义估计不足；

（丁）对于在乌拉尔、巴什基里亚和恩巴等三个地区建立新的**石油基地**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

（戊）对于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方面以及在森林工业方面扩大**日用**品的生产缺乏认真的关心；

（己）对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

（庚）对于改造**产品质量**问题采取了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态度；

（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实行**经济核算**方面仍然落后；

（壬）劳动和工资组织得不好的现象、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现象还没◇279◇有消灭；

（癸）包括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内的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机关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还远没有消灭。

这些缺点绝对需要迅速消除，这是几乎用不着再解释的。

大家知道，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它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内也没有完成计划。如果今后还继续落后，那末它们就会成为工业发展的障碍和工业

完不成计划的原因。至于建立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的新基地，那末不难理解，我们不完成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就会使工业和运输业搁浅。关于日用品和发展地方工业问题，以及关于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实行经济核算等问题，也是用不着解释的。至于劳动和工资组织得不好的现象以及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那末顿巴斯的事例以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各企业的事例都已证明，这个危险的病症潜伏在一切工业部门中，阻碍着它们的发展。如果不把这个病症除掉，那末工业就会瘫痪。

当前的任务是：

（一）保持机器制造业目前在工业系统中的主导作用。

（二）消灭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

（三）整顿有色金属工业。

（四）大力发展一切已经查明的地区的地方煤矿采掘事业，建立新的采煤区（例如在远东的布列◇280◇雅区），并把库兹巴斯变成第二个顿巴斯。（鼓掌多时）

（五）认真地着手建立乌拉尔山脉西面和南面斜面区的石油基地。

（六）扩大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日用品生产。

（七）发展地方苏维埃工业，使它能够在日用品生产方面发挥主动性，并尽可能给以原料和资金的帮助。

（八）改进产品质量，停止出产非成套的产品，不顾情面地惩罚一切违反或忽视苏维埃政权关于产品质量和生产成套产品的法律的同志。

（九）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

（一〇）消灭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一一）消灭各经济人民委员部一切环节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经常检查下级机关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二、农业的高涨

农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主要部门的高涨速度比工业慢许多倍，但比个体经济占优势的时期还是快些。而在畜牧业部门我们甚至有过相反的过程，即牲畜头数减少了，只是到了一九三三年，而且只是在养猪业一个部门才出现了高涨的标志。◇281◇

显然，把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有很大的困难，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建立许多大规模的谷物农场和养畜场是困难的事情，并且一般说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把它引上集体农庄新轨道的改组时期需要许多时间和大量经费，——这一切因素必然预先决定了农业高涨的速度是缓慢的，牲畜头数的下降是比较长期的。

实际上，对农业来说，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

如果拿各种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来看，然后再单独拿技术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来看，那末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发展的情形如下。

苏联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全部播种面积	105.0	118.0	127.2	136.3	134.4	129.7
其中：						
（甲）谷物	94.4	96.0	101.8	104.4	99.7	101.5
（乙）技术作物	4.5	8.8	10.5	14.0	14.9	12.0
（丙）蔬菜瓜类作物	3.8	7.6	8.0	9.1	9.2	8.6
（丁）饲料作物	2.1	5.0	6.5	8.8	10.6	7.3

◇282◇

苏联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棉花	0.69	1.06	1.58	2.14	2.17	2.05
纤维用亚麻	1.02	1.63	1.75	2.39	2.51	2.4
甜菜	0.65	0.77	1.04	1.39	1.54	1.21
油料作物	2	5.2	5.22	7.55	7.98	5.79

这两个统计表反映出农业中的两条基本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在农业改组达到高潮的时期，当数万个集体农庄相继成立的时候，当这些集体农庄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而把空出来的土地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竭力扩大播种面积。

第二条路线是停止一味扩大播种面积，由一味扩大播种面积转为改进土地的耕作，实行正确的轮作制和休闲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实际需要时暂时缩小现有的播种面积。

大家知道，第二条路线，即农业中唯一正确的路线是在一九三二年宣布的，当时农业的改组时期接近结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成了农业高涨的一个基本问题。

但是不能把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看做农业发展情形的十分完备的指标。有时候，播种面积增加了，而产量却没有增加，或者甚至减少了，这是因为土地耕作粗糙了，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因◇283◇此，必须拿总产量的统计材料去补充播种面积的统计材料。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总产量（单位百万公担）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谷物	801	717.4	835.4	694.8	698.7	898
棉花（籽棉）	7.4	8.6	11.1	12.9	12.7	13.2
亚麻（纤维）	3.3	3.6	4.4	5.5	5	5.6
甜菜	109	62.5	140.2	120.5	65.6	90
油料作物	21.5	35.8	36.2	51	45.5	46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农业改组达到最高潮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谷物减产最厉害的年份。

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由于亚麻区和产棉区的农业改组速度比较缓慢，亚麻和棉花产量几乎完全没有下降，相当平稳地一直上升，保持着高度发展水平。

再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油料作物产量只受到少许波动，和战前比较仍然保持着高度◇284◇发展水平；而甜菜由于甜菜区的农业改组速度最快，并且进入改组时期最晚，在改组的最后一年，即在一九三二年，产量下降得最厉害，降到了战前水平以下。

最后，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组时期结束后的第一年，是谷物和技术作物发展中转变的一年。

这就是说，首先是谷物，其次是技术作物，今后将坚定不移地稳步走向强大的高涨。

改组时期令人最头疼的是农业中的畜牧业部门。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牲畜头数（单位百万头）

	1916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甲）马	35.1	34	30.2	26.2	19.6	16.6
（乙）牛	58.9	68.1	52.5	47.9	40.7	38.6
（丙）绵羊和山羊	115.2	147.2	108.8	77.7	52.1	50.6
（丁）猪	20.3	20.9	13.6	14.4	11.6	12.2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牲畜头数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增加，而和战前水平比较还在继续下降。显然，一方面，农业的畜牧部门中充满了大富农分子，另一方面，富农乘改组期间的◇285◇有利时机加紧煽动农民屠宰牲畜，这两个事实都在这个统计表中反映出来了。

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牲畜头数的下降从改组的第一

年（一九三〇年）起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而且下降的程度在头三年最大，到一九三三年即改组时期结束后的第一年，当谷物业已经走上高涨道路的时候，牲畜头数的下降达到最低限度。

最后，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养猪业方面已经开相反的过程，在一九三三年已经出现趋向高涨的标志。

这就是说，一九三四年应当成为而且能够成为整个畜牧业转向高涨的一年。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农户集体化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集 体 化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集体农庄数（单位一千）	57	85.9	211.1	211.05	224.5
集体农庄内户数（单位百万）	1	6	13	14.9	15.2
农户集体化百分数	3.9	23.6	52.7	61.5	65

按各个部分来看，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又是怎样的呢？◇286◇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各部分的谷物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对 1933 年的播种面积的百分数
一、国营农场	1.5	2.9	8.1	9.3	10.8	10.6
二、集体农庄	3.4	29.7	61	69.1	75	73.9
三、个体农民	91.1	69.2	35.3	21.3	15.7	15.5
苏联全国谷物播种面积	96	101.8	104.4	99.7	101.5	100

这两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农业改组时期，即集体农庄及其庄员人数急速增加的时期已经结束，还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经结束。

因此，今后集体化的过程将是集体农庄逐渐吸收和改造个体农户残余的过程。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永远地取得了胜利。（热烈鼓掌多时）

其次，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共占有苏联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五。◇287◇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起成了决定整个农业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命运的力量。

其次，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占全国农户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的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有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九，而其余占全国农民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的个体农户只占有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此外，集体农庄在一九三三年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十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一亿三千万普特左右，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七亿八千万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一亿二千万普特。如果注意到上面这个事实，那就十分清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的作用完全改变了，集体农庄在这期间变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而个体农民变成了不得不服从和适应集体农庄制度的次要力量。

必须承认，劳动农民，我们苏联的农民，已经最终地永远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来了。（鼓掌多时）

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派的长舌妇们去胡说什么农民天生就是反革命的，农民负有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使命，农民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在苏联

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吧。事实证明，这些先生们是在诬蔑苏联，诬蔑苏联的农民。事实证明，我们苏联的农民已经最终地离开资本主义的岸边而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事实证明，我们在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层建筑，这件事无疑要比建◇288◇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容易得多。

但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它们的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增长上，而且在它们的拖拉机数量的增加上，在它们的机械化程度的增长上也反映出来了。毫无疑问，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这方面是有长足进步的。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农业中的拖拉机数量（折旧数量除外）

	台　数（单位千台）					马　力（单位千匹）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拖拉机总数	34.9	72.1	125.3	148.5	204.1	391.4	1003.5	1850	2225	3100
其中：										
（甲）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	2.4	31.1	63.3	74.8	122.3	23.9	372.5	848	1077	1782
（一）各系统国营农场的拖拉机	9.7	27.7	51.5	64	81.8	123.4	483.1	892	1043	1318

可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有二十万零四千台拖拉机，三百一十万匹马力。这个力量显然是不小的，它能够铲除农村中资本主义的一切根子。这个力量超过了列宁当年作为远景说过的拖拉机数量〔六六〕的一倍。

至于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国营农场的农业机器数量，请看下面的统计表。◇289◇

属于机器拖拉机站的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联合收割机（单位千台）	七台	0.1	2.2	11.5
发动机和锅驼机（单位千台）	0.1	4.9	6.2	17.6
复式和半复式脱谷机（单位千台）	2.9	27.8	37	50
脱谷用的电力装置	168	268	551	1283
机器拖拉机站的修理厂数	104	770	1220	1933
载重汽车（单位千台）	0.2	1	6	13.5
轻便汽车（单位一辆）	17	191	245	2800

属于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国营农场的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联合收割机（单位千台）	1.7	6.3	11.9	13.5
发动机和锅驼机（单位千台）	0.3	0.7	1.2	2.6
复式和半复式脱谷机（单位千台）	1.4	4.2	7.1	8◇290◇
脱谷用的电力装置	42	112	164	222
修理厂 （甲）大修厂 （乙）中修厂 （丙）小修厂	 72 75 205	 133 160 310	 208 215 578	 302 476 1122
载重汽车（单位千台）	2.1	3.7	6.2	10.9
轻便汽车（单位一辆）	118	385	625	1890

我想这些统计材料是用不着解释的。

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成立政治部，供给农业以熟练的工作人员，对农业的高涨也有不小的意义。现在大家都承认，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改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大家知道，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增强农业干部而派往农村的共产党员有二万三千多名，其中担任农业工作的有三千多人，担任国营农场工作的有两千多人，担任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万三千多人，担任国营农场政治部工作的有五千多人。

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人材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派到农业中去的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有十一万一千多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单是农业人民委员部一个系统培养出来和派出去的拖拉机手、联合收◇291◇割机正副司机和汽车司机就有一百九十万人以上。

在同一时期内训练出来和重新受过训练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田间工作队长、畜牧队长和会计员共有一百六十万人以上。当然，这对我国农业来说是不够的。不过总算是有了一些。

可见国家已经造成一切条件，使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机关易于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

能不能说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条件呢？

可惜不能这样说。

首先，这两个人民委员部所犯的以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态度处理事情的毛病比其他人民委员部都更严重。它们只是决定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检查执行情况，叫违反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命令的人守规矩，而把忠诚老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加以提拔。

本来，拖拉机和机器既然这样多，各农业机关就应该好好保管这些贵重机器，及时加以修理，比较合理地使用它们。但是，各农业机关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机和机器的保管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修理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各农业机关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了解，主要的修理工作是小修和中修，而不是大修。至于拖拉机和机器的使用，那末这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更是十分明显和尽人皆知的，因而是用不着证明的。◇292◇

农业的当前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正确的轮作制，扩大全休闲地，改进一切农业部门的选种工作。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可惜目前还做得很少。谷物和棉花的选种工作很混乱，还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整顿好。

提高技术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供给技术作物以肥料。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目前还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但是农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机关不善于收集，而收集以后又不关心把肥料及时送到各地去合理地使用。

关于国营农场，应当说它们现在还担负不起自己的任务。我决不是轻视我们国营农场的巨大的革命化作用。但是，如果把国家投入国营农场的大量资金和国营农场现有的实际工作效果对照一下，那就可以看到一种对国营农场很不体面的极不相称的现象。产生这种不相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国营谷物农场的规模过于庞大，场长管理不了庞大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本身太专业化，没有轮作制和休闲地，自己没有畜牧业部分。显然，必须缩小国营农场的规模并消除它们的过分专业化。也许有人以为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它解决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是由一些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毫无关系的人主动提出并加以解决的。

最后，谈谈畜牧业问题。关于畜牧业的严重情况我已经报告过了。也许有人以为我们的农业机关正在竭力设法消除畜牧业的危机，以为它们正在敲起警钟，动员工作人员去着手解决畜牧业问题。可惜过去和现在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农业机关对畜牧业的严重情况不但没有敲起警钟，反◇293◇而竭力掩蔽问题，有时甚至在报告中企图对全国舆论隐瞒畜牧业的真实情况。这种行为是布尔什维克所完全不应有的。既然如此，那末希望农业机关能把畜牧业引上大道并提到应有的高度就等于希望在沙滩上盖房子。我们全党，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党员和非党员，应当把畜牧业担当起来，要知道畜牧业问题在目前是一个首要问题，正如已经胜利解决了的谷物问题是我们昨天的首要问题一样。用不着证明，曾经在走向目标的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克服了严重障碍的苏维埃人也一定能够克服这个障碍。（掌声如雷）

必须消除的缺点和必须在最近解决的任务，简略而极不完全地列

举出来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任务还不能概括一切。在农业方面还有其他一些任务，关于这些任务也应该讲几句。

首先，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工业区和农业区的那种旧的分法已经过时了。我国不再有供给工业区以粮食、肉类、蔬菜的纯粹农业区，同样也不再有能够指靠从外面，从其他地区得到一切必需的农产品的纯粹工业区。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所有的地区都要成为或大或小的工业区，而且愈往前去，它们也就愈会成为工业区。这就是说，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和其他从前的农业区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大批农产品运往别处，运往工业中心，因为现在它们必须供给本地日益增多的城市和工人了。由此可见，每个地区如果不愿意陷入困难的境地，那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出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出产粮食和肉类。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做了。◇294◇

任务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

其次，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消费区和生产区的那种大家知道的分法也开始失去它的绝对性质了。像莫斯科省和高尔基省这样的“消费”区今年也交给国家八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谓消费地带约有五百万公顷灌木丛生的荒地。大家知道，这一带的气候并不坏，雨水不少，没有旱灾。如果清除这些土地上的灌木并采取一些组织措施，那就会有一个广大的谷物区，这个谷物区在当地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很高的情况下，每年所能提供的商品谷物不会少于伏尔加河下游区或伏尔加河中游区现在供给的数量。这会给北部各工业中心很大的帮助。

显然，任务在于要在消费地带各地区建立广大的谷物产地。

最后，谈谈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防旱问题。在伏尔加河东岸各地区营造森林和防护林带是有巨大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工作已在进

行，不过不能说进行得十分紧张。至于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灌溉事业，这从防旱方面看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容许把它长期搁置不办。固然，这件事情由于某些外部情况吸引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受到一些阻碍。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理由把这件事情继续搁置下去了。我们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个不受天气变化影响而能每年提供两亿普特左右商品谷物的巨大的、完全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如果考虑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国际关系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那就可以知道，这是十分必要的。

任务在于着手组织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灌溉事业的重大工作。（鼓掌）◇295◇

三、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我国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我国工业和农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发展情形以及它们目前的情况。

总结起来，我们的成绩如下：

（甲）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的主要部门方面，生产都有强大的高涨。

（乙）在这种高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农业方面都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体系，资本主义成分已被排挤出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丙）绝大多数个体农民完全脱离了小商品个体经济，他们已联合成为以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农庄，集体经济完全战胜了小商品个体经济。

（丁）集体农庄靠吸收个体农户而更加扩大，因此，个体农户的数量逐月下降，实际上变成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辅助力量。

很明显，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剥削者的胜利不能不使劳动者的

物质生活状况及其全部日常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寄生阶级的消灭使人剥削人的现象消失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不再受到剥削。从前剥削者由人◇296◇民劳动中榨取的那种收入，现在已完全留在劳动者手里，其中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吸收新的劳动队伍参加生产，一部分则用来直接提高工农的收入。

工人阶级的灾难——失业现象消失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有千百万失业者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忍受着贫困和痛苦，在我们这里却再也没有找不到工作和领不着工资的工人了。

随着富农盘剥的消失，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也消失了。现在，任何一个农民，不管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愿意诚实地工作，不偷懒，不游荡，不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就有可能过人的生活。

剥削的消灭，城市中失业现象的消灭，是村中贫困现象的消灭，——这就是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绩，这种成绩是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我国各大城市和各工业中心的面貌改变了。资产阶级国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标志就是贫民窟，即城郊的所谓工人住宅区，那里拥挤着黑暗、潮湿、破落不堪的住所，其中大部分是地窖，栖身在这些住所里的照例是一些穷人，他们生活在污垢之中，诅咒自己的命运。在苏联，实行革命的结果，这些贫民窟已经绝迹了。它们已经被新建的很好的光线充足的工人住宅区代替了，并且这些工人住宅区往往比城市中心还漂亮。

农村的面貌改变得更大。在旧农村里，教堂盖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巡官、神甫和富农的漂亮房子盖在前面，农民的破烂茅屋都在后面。这样的旧农村现在开始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新农村。在新农◇297◇村里，有公共经营用的建筑物，有俱乐部、无线电、电影院、学校、图书馆和托儿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谷机和汽车。富

农剥削者、高利贷吸血鬼、投机商人、巡官老爷这班旧时的有名人物都绝迹了。现在的有名人物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学校和俱乐部的领导人，拖拉机队和联合收割机队的队长，田间工作队和畜牧队的队长，集体农庄田地上优秀的男女突击队员。

城乡间的对立正在消失。城市在农民的心目中不再是剥削他们的中心。城乡间的经济结合和文化结合的纽带正日益巩固。现在农村从城市和城市工业方面得到拖拉机、农业机器、汽车、人材和资金的帮助。同时，农村本身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业，如机器拖拉机站、修理厂、集体农庄的各种工业企业、小型电站等等。城乡间的文化鸿沟正在填平。

这就是劳动者在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主要成绩。

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如下的情况：

（一）国民收入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亿卢布，并且，因为资本主义分子（其中包括承租企业家）在国民收入中取得的份额现在已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所以几乎全部国民收入是在工人、职员、劳动农民、合作社和国家之间分配的。

（二）苏联的人口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亿六千零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末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

（三）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298◇十八万三千人，其中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在这一时期内由九百四十八万九千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万七千人，大工业工人（包括运输业工人）的人数由五百零七万九千人增加到六百八十八万二千人，农业工人的人数由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一万九千人，商业方面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由八十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人。

（四）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亿九千

七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亿八千万卢布。

（五）工业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资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九卢布。

（六）工人和职员的社会保险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亿一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亿一千万卢布。

（七）全部地面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

（八）国家为帮助农民而设立了二千八百六十处机器拖拉机站，投资二十亿卢布。

（九）国家为帮助农民而发放给集体农庄十六亿卢布的贷款。

（一〇）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为帮助农民而贷给他们二亿六千二百万普特谷物做种子和供食用。

（一一）国家为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而给予他们税收和保险方面的优待共三亿七千万卢布。◇299◇

至于我国的文化发展，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如下的情况：

（一）全苏联实行了初等普遍义务教育，识字人数由一九三〇年末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二）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万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九千人，其中受**初等**教育的学生由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七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一十六万三千人，受**中等**教育的学生由二百四十五万三千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七万四千人，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由二十万七千人增加到四十九万一千人。

（三）受学前教育的儿童人数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万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万七千人。

（四）普通的和专门的高等学校的数目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五）科学研究机关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六）俱乐部一类机构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三万二千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万四千个。

（七）电影院、俱乐部的电影放映站和电影放映队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万九千二百个。

（八）报纸一期的发行数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万份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万份。◇300◇

也许不妨指出，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中，工人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一点四，劳动农民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六点五；而在德国，比如说，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工人的比重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学年度仅为百分之三点二，小农的比重仅为百分之二点四。

必须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实和农村文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这就是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社会组织工作方面的积极性的提高。例如大家知道，现在女庄员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约有六千人，担任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有六万多人，担任生产队长的有两万八千人，担任小组长的有十万人，担任集体农庄商品养畜场主任的有九千人，担任拖拉机手的有七千人。

不用说，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但就是这很少的一些材料也足以有力地说明农村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志们，这个情况是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有巨大意义，是因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这一支劳动大军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欢迎劳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欢迎她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认为这是我国文化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鼓掌多时）

最后，还必须指出一件事实，但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实。我指的是教育系和医科在我们这里至今还受人轻视这个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这是一个近乎违反国家利益的大缺点。一定要消除这个缺点。而且愈

快愈好。◇301◇

四、商品流转的高涨和运输业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情况：

（甲）包括日用品在内的工业品的产量增加了；

（乙）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

（丙）城乡劳动群众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要和需求增加了。

为了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并保证全体消费者群众都能得到必需的商品和产品，还需要什么呢？

有些同志认为具备这些条件就足以使全国的经济生活十分活跃。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假定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可是如果商品到不了消费者的手中，那末经济生活不但不会十分活跃，反而会混乱不堪和完全解体。终究必须懂得，商品归根到底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消费而生产的。我们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不少的商品和产品，可是它们不但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反而好多年来一直徘徊在所谓商品运销网的官僚主义的曲折道路上，不能和消费者见面。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就失去了扩大生产的任何刺激，商品运销网堆满了货物，而工人和农民却得不到商品和产品。结果，尽管有商品和产品，而全国的经济生活还是陷于混乱。要使全国经济生活十分活跃，要刺激工业和农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产量，那就还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城市和乡村间、全国各地区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扩展的**商品流转**。必须使全国各地布满批发站和大小商店。必须使商品源源不断◇302◇地从生产场所经过这些批发站、大小商店的孔道流到消费者手中。必须使国营商业网、合作社营商业网、地方工业、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都被吸引来参加这一事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展的**苏维埃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

没有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

由此可见，扩展苏维埃商业是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继续前进。

虽然这个真理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还是不得不克服许多横在扩展苏维埃商业道路上的障碍，简单说来，这些障碍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完全不懂苏维埃商业的必要性和意义的结果。

首先，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商业，而且对于苏维埃商业，还抱着一种高傲的鄙视的态度。这些所谓共产党员把苏维埃商业看做次要的毫无价值的事情，把商业工作人员看做没有出息的人。显然，这些人不了解，他们对苏维埃商业的这种高傲态度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是狂妄自大但一无所有的没落贵族的观点。（鼓掌）这些人不了解，苏维埃商业是我们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而商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售货员，只要他们诚实地工作，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的执行者。（鼓掌）很明显，党必须把这些所谓共产党员稍微打击一下，把他们的贵族偏见抛到污水坑里去。（鼓掌多时）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克服另一种偏见。这里指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中间流行的“左派”清谈，说什么苏维埃商业似乎已经成为过时的阶段，说我们必须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说货币很快就◇303◇要取消，因为货币似乎已经变成简单的计算符号，说既然很快就要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那就用不着发展商业了。应当指出，这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分子竭力破坏苏维埃商业扩展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清谈不但流行在一部分“红色教授”中间，而且也流行在某些商业工作人员中间。这些连最简单的苏维埃商业都不能办好的人竟妄谈他们有决心办好更复杂更困难的直接的产品交换，这当然是滑稽可笑的。不过，唐·吉诃德之流所以叫做唐·吉诃德，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嗅觉。这些和马克思主义相去万里的人显然不懂得，货币在

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他们不懂得，虽然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但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利益，以便全力扩展苏维埃商业，从而为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准备条件。他们不懂得，产品交换只有在苏维埃商业办得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代替苏维埃商业，而办得尽善尽美的苏维埃商业现在我们根本没有，并且也不会很快就有。很明显，党在竭力设法扩展苏维埃商业的时候，认为必须把这些“左派”畸形儿打击一下，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清谈被风刮走。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克服商业工作人员机械他分配商品的不良习惯，消灭忽视商品种类和消费者要求的态度，消除机械地调拨货物的现象和商业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许多省批发站和区联合批发站，设立了几万个新的大小商店。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消除合作社在市场上的垄断状况，因此，我们责成各人民委员部建立销售◇304◇本单位产品的商业，责成供给人民委员部广泛发展经营农产品的商业，结果是一方面以竞赛的办法改善了合作社营商业，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上的物价，健全了市场。

我们广泛设立了廉价食堂（“公共食堂”），在工厂中成立了工人供应部，停止供应那些和工厂没有关系的人，单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一个系统就停止供应了不下五十万个和该部没有关系的人。

我们成立了统一集中的短期信用银行，即国家银行和分设在各地的二千二百个能够资助商业活动的分行。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了如下的成绩：

（甲）大小商店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万四千六百六十二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十七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个；

（乙）新设立了一千零十一个省批发站和八百六十四个区联合批

发站；

（丙）新设立了一千六百个工人供应部；

（丁）设有营业性的粮食商店的城市现在增加到三百三十个；

（戊）公共食堂现在发展到可以供应一千九百八十万人；

（己）包括公共食堂在内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的商品流转额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八十九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百九十亿卢布。

如果以为苏维埃商业的这种发展足以满足我国经济的需要，那就错了。恰恰相反，现在比任何时◇304◇候都更明显，目前的商品流转状况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任务在于继续扩展苏维埃商业，吸引地方工业参加这个事业，扩大集体农民的商业，力求在发展苏维埃商业方面取得新的决定性的成就。

但是必须指出，问题不能只限于扩展苏维埃商业。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商品流转的发展，有赖于苏维埃商业的发展，而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又有赖于我国铁路、水路和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商品，也有扩大商品流转的充分可能，但是运输业跟不上商品流转的发展，不能运送货物。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经常发生的。因此，运输业现在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国整个经济，首先是我国的商品流转，会受到它的阻碍，而且大概已经开始受到它的阻碍了。

固然，铁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吨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七百二十亿吨公里。但是这还不够，这对于我们，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太少了。

水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由一九三〇年的四百五十大亿吨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九亿吨公里。但是这还不够，这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太少了。

更不用说汽车运输业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的数量由一九一三年的八千八百辆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末的十一万七千八百辆。

这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来说简直少得不好意思提到。

毫无疑问，如果运输机关没有犯大家知道的所谓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毛病，那末所有这些运输业的工作就会好得多。因此，除了必须以人材和资金帮助运输业以外，任务还在于根除运输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工作态度，使它们成为效率更高的机关。◇306◇

同志们！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工业的基本问题，现在工业稳固地站住了脚。我们也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公开地说，现在农业也稳固地站住了脚。但是，如果我们的商品流转开始跛足，而运输业又成了我们的绊脚石，那末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成绩。因此，扩大商品流转和彻底改进运输业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就不能前进。

三 党

现在谈谈党的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旗帜下，在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残余被肃清的旗帜下举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现在在国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院里混日子。

右倾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早已抛弃自己的观点，现在正竭力设法向党赎罪。

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们不是和主张武装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结在一起，就是低头认罪了。◇307◇

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大多数参加者不得不承认党的路线正确而向党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六七〕上还不得不证明党的路线正确，还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也还不得不把这些集团的最后一批信徒彻底击溃，而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掌声如雷）

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显然，所有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计划的胜利，把各种各样的反列宁主义集团打得一败涂地，打得粉碎了。

必须承认，党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一、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但这是不是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继续进攻已经成为多余的呢？◇308◇

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是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党内再不会出现任何倾向，因此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都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流露出来。决不能把党看做一种和周围的人们隔绝的组织。党是在围绕着它的人们中间生存和活动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往往从

外界渗入党内，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滋长这种情绪的土壤在我国也无疑是有的，这至少是因为我国城市和农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就是这种情绪的培养基。

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六八〕说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克服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克服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恢复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很明显，这些残余不能不是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在我们个别党员的头脑中活跃起来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党员的理论水平不很高，党机关的思想工作薄弱，我们◇309◇党的工作人员担负的纯粹实际工作过重而使他们不可能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你们就会了解，个别党员头脑中对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的糊涂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种糊涂观念往往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并有助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活跃起来。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进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举出列宁主义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在某些党员中间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说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当然，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谁不知道，这个明白浅显的列宁主义论点的宣布竟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引起了不少的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呢？我们走向无阶级社会，这个论点是当做口号提出的，而他们却了解为自发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这样想：既然说是无阶级社会，那就是说，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因为国家反正在最近必然会消亡。于是他们就欣喜若狂，等待着很快就会没有任何阶级，就是说，不会再有阶级斗争，就是说，不必再操心和担忧，就是说，可以放下武◇310◇器，高枕而卧，等待无阶级社会的降临。（全场大笑）

毫无疑问，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按照这种观点看来，旧东西必然会自流地成长为新东西，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还完全能够活跃起来，它还远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末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

其次，拿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吧。现在大家都承认，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甲）劳动组合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乙）劳动组合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在不久以前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说，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组员不同，他们没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园地。这就是说，在公社中，与其说是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不如说是为了达到

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311◇个或几十个。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开始按劳动日计工，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目前的农业公社是在技术不很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实行了平均主义，很少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因此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庄员看见从农场方面领取肉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当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会这样。如果人为地加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那就是犯罪。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312◇们的敌人。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关于劳动组合和公社的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而且几乎是很浅显的。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组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末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313◇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

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六九〕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314◇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要求平等的实际内容就是要求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七〇〕

列宁也这样说：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

三二九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资产阶级作家们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描绘成过去沙皇时代的兵营，那里一切都服从平均主义“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对资产阶级作家们的无知和愚蠢负责的。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糊涂观点和对农业公社的平均主义趋向的迷恋是同我们“左派”糊涂虫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模一样的。“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各按自己的职业◇315◇工作，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

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残余还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些“左派的”观点在党内获得了胜利，党就会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党，而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一口号来说吧。这个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它更和工人有关，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本主义，在好几年中建设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这个很明白而且实在很浅显的口号在一部分党员中间竟引起了许多疑虑、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他们说，这个口号不是回到“发财吧”那个被党摈弃的旧口号去了吗？他们接着说，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末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工作

中究竟依靠谁呢？没有穷人我们究竟将怎样工作呢？

也许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存在着这种幼稚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却是无疑的不可忽视的事实。◇316◇

看来，这些人不了解“发财吧”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两个口号之间隔着一道鸿沟。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发财吧”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当资本主义部分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当富农还有力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集体农庄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提出的，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当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时候提出的。更不用说，“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下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出的。

“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是号召用加强集体农庄经济实力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者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这不是很明显吗？（呼喊声：“对！”）

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不是很明显吗？（呼喊声：“对！”）

至于说没有穷人似乎就不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甚至不好意思◇317◇说出口的蠢话。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

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贫穷和富裕的这种糊涂观点是我们“左派”糊涂虫观点的反映。“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而把集体农庄看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残余还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一类糊涂观点在我们党内获得了胜利，集体农庄就不会有它们在最近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就会在最短期间瓦解。◇318◇

再如拿**民族问题**来说吧。在这里，在民族问题方面，也和在其他问题方面一样，有一部分党员持有一种能造成相当危险的糊涂观点。我说过资本主义残余的生命力。应当指出，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伪装起来。很多人认为斯克雷普尼克的堕落变节是个别的例外事件。这是不对的。斯克雷普尼克

和他的集团在乌克兰的堕落变节并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国里，个别同志也有这种错误。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目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如果你们想打击这两种倾向，那就首先应当打击这个根源，打击那些离开国际主义的人，不管他们倾向于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倾向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热烈鼓掌）

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鼓掌多时）

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在不久以前还不是主要危险，但是当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而让◇319◇它发展到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成了主要危险。解决什么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的问题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争论，而是靠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靠研究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关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倾和“左”倾**也必须这样说。在这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个别党员有不少糊涂观点。他们在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时候往往丢开了“左”倾，减弱了反“左”倾的斗争，认为它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这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这是对“左”倾让步，党员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所以不容许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最近“左派”已经完全滚到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实质上已经和右

派毫无区别了。

我们一向都说，“左派”就是右派，不过用左的词句掩饰了右的实质。现在“左派”自己证实了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报”来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们在那些公报里要求什么，写些什么呢？他们“左的”纲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求：**解散国营农场**，因为国营农场不能赢利；**解散大部分集体农庄**，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有名无实；**放弃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恢复租让政策，把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租出去**，因为这些企业不能赢利。

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义者的纲领，这就是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和极右派的纲领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毫无区别。由此可见，“左派”为了和右派结成联盟进行共同的反党斗争，公开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纲领。◇320◇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左派”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呢？说这种蠢话的人是在帮助列宁主义的死敌，这不是很明显吗？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倾向还是民族问题上的倾向，人们意识中和我们的个别党员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几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部分党员有模糊观点、糊涂观念，甚至有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要知道，可以拿来证明个别党员有糊涂观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呢？

显然不能。

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一）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二）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三）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四）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

（五）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六）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

◇321◇

二、组织领导问题

我讲过了我们的成就，讲过了党的路线无论在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或在克服党内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也讲过了我们的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切地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成就和胜利。我们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各种缺陷。在我们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任务。但这无疑是说明大部分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已经胜利解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它实际上是怎样获得的，经过什么斗争，经过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才会这样想。事实上这些成就和胜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到来，它通常是由人们争取来的。好的拥护党的总路线的决议和宣言，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因为它们只表示争取胜利的愿望，

而不是胜利本身。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材，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322◇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事实上，胜利是通过不断和执行党的路线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行残酷的斗争，通过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去克服困难，通过组织克服困难的斗争，通过撤换不中用的工作人员，挑选能够和困难作斗争的优秀工作人员而达到和取得的。

这是些什么困难，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困难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困难，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困难。这些困难藏在我们自己身上，藏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身上，藏在我们的组织里面，藏在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的机关里面。

应当了解，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为他们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现在一切事情或者几乎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藉口所谓客观条件是没有理由的。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323◇

我们的党有二百多万党员和候补党员。我们的共青团有四百多万团员和候补团员。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工农通讯员。我们的国防航空

化学建设协会有一千二百多万会员。工会有一千七百万以上的会员。我们获得成就应该归功于这些组织。如果尽管有这些有助于获得成就的组织和可能性，而我们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还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归咎于我们的组织工作，归咎于我们的组织领导不好。

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了实际的具体领导，各组织实行职能管理制而缺乏个人负责制，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害怕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难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为用决议和决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早就善于在口头上表示忠实于党和政府的决议，而在实际上把这些决议束之高阁。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

要战胜这些困难并获得成就，必须组织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必须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个斗争，必须动员党本身，必须清除党和经济组织中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蜕化的分子。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需要组织下列工作：◇324◇

（一）开展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二）动员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去和困难作斗争；

（三）动员工农群众为实现党和政府的口号和决议而斗争；

（四）在劳动者中间开展竞赛和突击运动；

（五）广泛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使党和苏维

埃的领导接近农村；

（六）缩小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和托拉斯的规模，使经济领导接近企业；

（七）消除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消灭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八）取消“职能管理制”，加强个人负责制，采取废除委员会制的方针；

（九）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方针以进一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一〇）把熟练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调到更接近生产的地方；

（一一）揭发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把他们从管理机关驱逐出去；

（一二）把违反党和政府的决议的人、敷衍欺骗的人、爱说废话的人撤职，任用新人，即任用能保证具体领导所担负的工作并能保证加强党和苏维埃纪律的认真办事的人；

（一三）清洗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精简人员；

（一四）最后，把不可靠的和蜕化的人清洗出党。◇325◇

党为克服困难，为把我们组织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以保证党的路线的实现而必须采取的办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进行组织工作的。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

关于挑选人材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我想说几句话。

除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撤职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以外，我们还有两种工作人员阻挠着我们的工作，妨碍着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前进。

一种工作人员是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经成为要人的人，

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因而破坏党和国家纪律的基础。他们违反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是指靠什么呢？他们指靠苏维埃政权会因为他们过去有功而不去触犯他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可以违反领导机关的决议而不受惩罚。对这种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必须毫不犹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功劳。（呼喊声：“对！”）必须把他们降职并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呼喊声：“对！”）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打掉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要人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一些。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加强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呼喊声：“对！”鼓掌。）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326◇（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不会做领导工作，不会组织什么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327◇有路线，他回答说：“路线吗……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没有爱说废话的人的位置的。（呼喊声：“对！”鼓掌。）

关于中央如何指导了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中挑选人材的工作，如何设法加强了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已经简略地报告过了。在进行代表大会第三项议程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同志会更详细地向你们报告。

关于今后如何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想说几句话。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有决定的意义。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在执行呢，还是被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搁置起来了？这些决议是在正确地执行◇328◇呢，

还是被歪曲了？机关是在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工作呢，还是在空忙一阵？——这一切只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才能及时地知道。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缺点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于对执行情况缺乏正确的检查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如果对执行情况有这样的检查，缺点和缺陷是一定能够防止的。

但是，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要达到目的，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第二、在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各个环节中领导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的必须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组织的领导者自己。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对于各中央领导机关有极大的意义。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几年以前，当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比较简单，还不大令人满意，还可以指望有可能**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的时候，工农检查院是胜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扩大并更加复杂了，已经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检查**经济工作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应当改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检查，而是对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不以检查所有一切为目的，而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监督工作，集中于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苏维埃◇329◇监察委员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机关支配的代表。为了使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在必要时处分任何负责工作人员，必须使它的委员候选人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加强苏维埃监督

工作和苏维埃纪律。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防止党内分裂而成立的。你们知道，有一个时候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过分裂的危险。你们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组织防止了分裂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有分裂的危险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检查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党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组织支配的代表。很明显，这样一个负责的组织应当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使这个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处分任何一个犯错误的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必须使它的委员只有党的最高机关即党的代表大会才能选举和撤换。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完全能够保证对党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加强党的纪律。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一）今后也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330◇

（二）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三）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实现。

* * *

同志们，我就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从这个总结报告中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现在大家都已经承认，我们的成就是伟大的不平常的。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转上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轨道。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产生了自豪感，并加强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这当然很好。但是成就有时也有它阴暗的一面。成就有时也能产

生某些危险，如果让这些危险发展下去，它们就会葬送全部事业。例如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我们某些同志会因这些成就而冲昏头脑。大家知道，这种情形我们是有过的。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我们某些同志为这些成就所陶醉而骄傲自满到极点，开始用一些吹嘘的话来安慰自己，说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徒步过海”，“我们一拳就能把敌人打倒”等等。同志们，这种危险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种情绪是再危险不过的，因为它能解除党的武装，瓦解党的队伍。如果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占了上风，我们的一切成就就会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当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胜利完成了。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事业没有就此结束，而且也不◇331◇能就此结束。前面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必须完成而且必须胜利完成的。你们知道，计划是在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就是说，将来还会有困难，将来还要和困难作斗争。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将要向你们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你们从他们的报告中就会知道，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还要克服怎样巨大的困难。这就是说，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所以获得成就，是因为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路线，并善于组织群众去实现这条路线。不用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取得的和有权引以自豪的那些成就。但是有正确的路线而又善于实现它，这在执政党生活中是极少有的。

请你们看看周围的国家吧：你们能找到很多有正确的路线并实现这条路线的执政党吗？老实说，这样的党现在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党都过着没有前途的生活，都在危机的混乱状态中挣扎，看不见爬出泥潭的道路。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

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332◇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已经被消灭了。有人说，它似乎被一种叫做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消灭了。这当然是胡说。只有不知道历史的人才会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消灭工人阶级。而消灭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于舞台以来，到今天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有几十个几百个资产阶级政府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样呢？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下台，而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热烈鼓掌）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正是在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彻底消灭的那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热烈鼓掌）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国家，而在其他一切国家内（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危机和失业已经笼罩了四年，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不，同志们，这不是偶然的。（鼓掌多时）

是的，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种种成就，就因为我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进行工作和斗争的。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鼓掌）

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有久经战斗考验的列宁的党。其次，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有千百万劳动农民群众的支持。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还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支持它、帮助它。苏联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的共和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毫无疑问，苏联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就◇333◇不能掌

握住政权，就不能保证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因而就不会有它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苏联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间的国际联系，苏联工人和世界各国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和威力的基石之一。西方的工人说，苏联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这就是说，全世界无产阶级今后也准备尽一切力量和可能来支持苏联工人阶级。但是这就把一些重大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了。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自己的工作来证明我们没有辱没全世界无产者的突击队这一光荣称号。这使我们有责任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奋斗，争取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胜利。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忠实于世界各国无产者兄弟联盟的事业**。（鼓掌）

结论就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可战胜的伟大旗帜万岁！（全场热烈鼓掌多时。全体向斯大林同志欢呼致敬。高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后，再次更热烈地欢呼。高呼：“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党中央万岁！”）

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十七号◇334◇

致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沙波什尼柯夫同志和政治工作助理沙金柯同志

值此荣膺红旗勋章的军事学院成立十五周年和获得列宁勋章之际，谨向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和领导者致贺。

希望军事学院在培养造诣高深的布尔什维克指挥员——军事专家这一保卫祖国所必需的事业中获得完全成功。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八号◇335◇

代 替 结 论 的 话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代表大会[①]上的讨论表明，我们党的领导者们的观点可以说在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你们知道，对于总结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就表明，我们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异乎寻常的。（鼓掌）既然如此，试问还有没有做结论的必要呢？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请允许我不做结论。（热烈欢呼，全体起立，高呼“乌拉！”；共同高呼：“斯大林万岁！”全体高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后，再次欢呼。高喊：“乌拉！”“斯大林万岁！”“中央万岁！”）

载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真理报”第三十一号◇336◇

——————————————

① 指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本书制作者注

注　释

〔一〕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和发展农业的报告以及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建议中央今后继续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速度，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坚定不移地在全线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进攻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代表大会指出了农业发展中的转变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由于这个转变，集体农民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坚固的支柱。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并巩固苏联的国防力量。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并在苏联东部建立新的强大的煤矿钢铁基地、关于改造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吸引全体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指示。代表大会彻底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它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并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党的党籍不能相容。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斗争来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态度，坚决执行列宁的保证广泛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民族政策。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约·维·斯大林于六月二十七日在代表大会上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二〇七页至第三二四页），并于七月二日做了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关于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一页至第四一四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五三页至第六一六页）——（正文第三页）

〔二〕约·维·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页至第一五二页）。——（正文第五页）

〔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一页至第三一九页。——（正文第六页）

〔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举行，讨论了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以及其他问题。全会研究了右倾分子集团的问题，认为宣传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宣传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的观点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决定取消布哈林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其他参加右倾反对派的人提出警告。（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〇〇页至第五四三页）——（正文第九页）

〔五〕联共（布）乌拉尔省第十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至十三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代表会议完全赞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代表会议揭穿了李可夫的右倾机会主义手腕，着重指出了右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革命背叛作用，并在自己的决议中号召乌拉尔党组织同右倾投降主义者攻击党的路线和党的列宁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正文第十页）

〔六〕指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至十二日在梯弗里斯举行的南高加索（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组织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实际工作。——（正文第十一页）

〔七〕约·维·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页至第一五一页）。——（正文第十七页）

〔八〕约·维·斯大林向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二一三页）。——（正文第十七页）

〔九〕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〇三二页）。——（正文第十八页）

〔一〇〕约·维·斯大林向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二六四页）。——（正文第十八页）

〔一一〕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卷第二五五页。——（正文第二十页）

〔一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五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九七页。——（正文第二十六页）

〔一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七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九九页。——（正文第二十七页）

〔一四〕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共七百二十八人。代表会议的代表有工业公司的代表、工厂厂长、工程处处长、工程师、工长和优秀的工人突击队员、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领导者。代表会议听取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一九三一年度控制数字和经济组织的任务”的报告。二月三日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经济计划的基本前提和执行情况”的演说。二月四日约·维·斯大林在代表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代表会议遵循约·维·斯大林的指示，拟定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年度即第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实际措施。代表会议着重指出，经济工作人员的基本任务是：掌握技术，提高领导生产的质量，贯彻一长制，实行经济核算，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降低成本和改进产品质量。代表会议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出致敬电。——（正文第二十九页）

〔一五〕指顿巴斯的沙赫特区及其他区内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初被破获。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七月五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审理了沙赫特案件。（关于沙赫特事件，见“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一卷第三十一页和第四十五页至第五十四页，并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正文第三十五页）

〔一六〕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

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正文第三十五页）

〔一七〕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见“涅克拉索夫选集”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二三页）。——（正文第三十七页）

〔一八〕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的建设者在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中报告马格尼特纳亚山铁矿已开工生产。——（正文第四十五页）

〔一九〕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经济组织的代表以及苏联供给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约·维·斯大林出席了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会议，并于六月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做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参加这次会议工作的有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安得列也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米高扬、尼·米·什维尔尼克、米·伊·加里宁、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和瓦·弗·古比雪夫。——（正文第四十九页）

〔二〇〕这个贺电是约·维·斯大林为祝贺大型工厂——莫斯科“阿模”汽车制造厂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开工而写的。在工厂开工之日，该厂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全体大会根据工人的请求决定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该厂，此后该厂即称为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正文第七十三页）

〔二一〕“技术报”（三日刊）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出版。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前，该报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后改为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约·维·斯大林的这个贺电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技术报”创刊号上。——（正文第七十五页）

〔二二〕“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杂志。该杂志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由党史委员会（十月革命史和俄共（布）历史委员会，后改称联共（布）中央十月革命史和联共（布）历史研究部）出版，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由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该杂志停刊一年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

四一年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正文第七十六页）

〔二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五页、第三〇四页。——（正文第七十九页）

〔二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九九页至第二〇〇页。——（正文第八十四页）

〔二五〕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一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六八八页）。——（正文第九十页）

〔二六〕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九四一年俄文版。——（正文第九十四页）

〔二七〕凡尔赛体系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击溃了德国及其盟国以后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各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凡尔赛和约以及许多与该和约有关的包括确定欧洲各国新疆界在内的其他条约。——（正文第一〇四页）

〔二八〕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第一部分“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近代德国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四卷第一页至第四四二页）。——（正文第一〇五页）

〔二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十一页至第四十三页。——（正文第一〇五页）

〔三〇〕指约·维·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上、在伦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期间以及在国外（克拉柯夫、维也纳）期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和弗·伊·列宁的会见。——（正文第一〇七页）

〔三一〕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五八页至第四〇一页。——（正文第一一七页）

〔三二〕“美联社”代表理查逊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给约·维·斯大林的信中，要求答复外国报刊所散布的关于柏林医师宗杰克应邀到莫斯科为约·维·斯大林治病的消息是否确实。——（正文第二二页）

〔三三〕控诉局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成立，直属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一九二〇年改组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条例规定了中央控诉申诉局的任务和工作内容：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条例规定了中央控诉局地方分局的任务和工作内容，这两项条例都是经国家监察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签署颁布的。中央控诉局和地方控诉局自成立之日起，在检查和审理劳动人民的控诉和申诉并吸引广大工农积极分子参加这一事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自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控诉申诉局并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系统，而自一九四〇年九月起，控诉申诉局是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后改称苏联国家监察部）的一个局。

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决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至十四日对控诉局的工作进行了全苏五日检查运动，约·维·斯大林“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一文就是为这个运动写的。——（正文第二三页）

〔三四〕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至八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五年计划的完成年度即第四年度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等等）；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发展以及共青团和少先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状况。约·维·斯大林的贺电是在七月八日代表会议闭幕会上宣读的。——（正文第一二八页）

〔三五〕“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贺电”是为庆祝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参加文学和革命活动四十周年而写的。——（正文第一二九页）

〔三六〕指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部诸州和北部诸州的内战。——（正文第一三六页）

〔三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举行，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即一九三三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做了报告）；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的目的和任务；党内问题。约·维·斯大林在一月七日的全会会议上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在一月十一日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全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的意义，认为这

是现代历史中最卓越的事实。全会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新建设口号应该拿掌握工业中的新企业和从组织上巩固农业中的新企业的口号来补充。全会建议所有的经济组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彻底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任务。为了在政治上巩固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提高它们在农村中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改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党组织的工作，全会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成立政治部的决议。全会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在一九三三年内实行清党并在清党期间停止接收新党员入党的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一七页至第七四二页）——（正文第一四五页）

〔三八〕“纽约时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日刊）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权威刊物，同所谓民主党有联系，于一八五一年在纽约创刊。——（正文第一四九页）

〔三九〕“每日电讯报”（《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日刊）是和保守党领导接近的英国反动报纸，于一八五五年在伦敦创刊。该报自一九三七年和“晨邮报”合并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正文第一四九页）

〔四〇〕“波兰报”（《ＧａｚｅｔａＰｏｌｓｋａ》）是波兰资产阶级的报纸，是皮尔苏茨基法西斯集团的喉舌，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在华沙出版。——（正文第一五〇页）

〔四一〕“金融时报”（《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日刊）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伦敦西蒂工业集团和财政集团的刊物，于一八八八年在伦敦创刊。——（正文第一五〇页）

〔四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ａ》）是反映意大利大资产阶级观点的意大利社会政治杂志，于一九一八年在罗马创刊。——（正文第一五〇页）

〔四三〕“当代历史”（《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是宣传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美国国务院（外交部）侵略性对外政策方针的思想家的观点的杂志。该杂志于一九一四年在纽约创刊。——（正文第一五〇页）

〔四四〕 “时报”（《ＬｅＴｅｍｐｓ》）（日刊）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一九三一年起属于重工业组合，于一八六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一五一页）

〔四五〕“圆桌”（《Ｔｈｅ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是论述不列颠帝国殖民政策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英国资产阶级杂志。该杂志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最保守的集团的观点，于一九一〇年在伦敦创刊。——（正文第一五一页）

〔四六〕“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Ｐｒｅｓｓｅ》）是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银行集团的观点的奥国资产阶级报纸，于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三九年在维也纳出版。——（正文第一五二页）

〔四七〕“民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是美国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和文艺杂志，它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该杂志于一八六五年在纽约创刊。——（正文第一五三页）

〔四八〕“前进”（《Ｆｏｒｗａｒｄ》）（周刊）是“左派”改良主义分子的工联主义杂志，于一九〇六年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创刊。——（正文第一五四页）

〔四九〕一九三一年末，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在中国和远东建立自己的统治，不经宣战就把军队开入东北地区。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日本军队集结在苏联边境，并动员白卫间谍匪徒进行反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了进攻苏联的适当阵地，其目的是侵占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正文第一六五页）

〔五〇〕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关于对投机活动进行斗争”的决议。该决议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真理报”第二三三号上。——（正文第一八四页）

〔五一〕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通过的“关于保护国家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巩固公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议。在约·维·斯大林起草的这个决议中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认为：公有制（国家所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侵害公有制的人应当被看做人民公敌，因此，对盗窃公共财产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首要任务。”该决议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真理报”第二一八号上。——（正文第一八九页）

〔五二〕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关于一九三二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的决议发表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真理报”第一二五号上。——（正文第一九六页）

〔五三〕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外国代表有联系的白卫分子。——（正文第二〇二页）

〔五四〕“女工”是“真理报”社出版的杂志，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正文第二〇九页）

〔五五〕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十三人。约·维·斯大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把约·维·斯大林选入名誉主席团，并代表千百万集体农民向斯大林致敬。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巩固集体农庄和春季播种任务的问题。约·维·斯大林在二月十九日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发表了演说。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米·伊·加里宁、克·叶·伏罗希洛夫、谢·米·布琼尼等也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代表大会在告苏联全体集体农民书中号召把集体农庄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开展争取丰产、争取模范地准备和进行春季播种的全苏社会主义竞赛。——（正文第二一二页）

〔五六〕指中伏尔加边区（现古比雪夫省）别金楚克区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给约·维·斯大林的信。该信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十八号上。——（正文第二二七页）

〔五七〕“大都会—维克斯电器有限公司”是和苏联订有在技术上援助苏联电器工业企业合同的英国电器公司。一九三三年三月“大都会—维克斯电器有限公司”莫斯科办事处的职员，六名英国人因在苏联大型电站进行破坏活动的案件而被交付法庭审判。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进行的侦查和审判确定：被捕的“大都会—维克斯电器有限公司”职员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在一小撮犯罪分子的帮助下在苏联大型电站组织损坏设备、制造事故和进行破坏勾当，以图破坏苏联工业威力和削弱苏维埃国家。——（正文第二三一页）

〔五八〕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米·伊·加里宁因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苏联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对美国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正文第二四六页）

〔五九〕世界经济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在伦敦举行。会议的发起人——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把会议当做消除经济危机和使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救命手段。会议本来应当讨论稳定币制、组织生产和

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和平等问题。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表示了苏联对促进和平事业和加强事务联系的始终不渝的愿望，建议缔结经济上互不侵犯的公约，并声明苏联准备在取得长期贷款和为苏联的出口创造正常条件的基础上向外国定货十亿美元。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没有得到会议的支持。会议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完全没有能力找到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暴露出各资本主义国家间，首先是英国和美国间以及德国和它的债权国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在毫无结果的讨论以后，会议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失败地结束了。——（正文第二四六页）

〔六〇〕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关于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的报告。代表大会根据约·维·斯大林所做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通过了决议，在决议中完全批准联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并责成各级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以约·维·斯大林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原理和任务为指针。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肯定了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胜利。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代表大会根据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的决议，批准了完成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更迅速地提高工农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宏伟纲领。代表大会着重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代表大会根据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苏维埃的建设）的决议。代表大会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门中的工作质量，首先是提高组织上的实际领导质量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代表大会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〇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

七四四页至第七八七页）——（正文第二五一页）

〔六一〕一九三一年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农民推翻了一九二三年建立的普利莫·德·利维拉将军的军事法西斯专政，废除了君主制。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西班牙宣告成立共和国，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和组织上的涣散，由于社会党领导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叛变，政权被资产阶级和地主夺主，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和社会党人代表的联合政府。尽管联合政府企图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但工人和农民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在继续进行。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土里亚矿工的总罢工和武装斗争是这个时期革命运动的最高点。——（正文第二五二页）

〔六二〕“行动委员会”是英国、法国以及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参加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组织。“行动委员会”是在“不许侵犯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建立起来的。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工人举行了罢工和游行示威，拒绝装卸军用品，以期打破武装干涉。“行动委员会”于一九二〇年在英国散布最广。——（正文第二六四页）

〔六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举行。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以后各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二百多人，代表着三十七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召开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都是由弗·伊·列宁领导的。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以及其他报告和演说。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被俄共（布）代表团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组织原则、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正文第二六四页）

〔六四〕小协约国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同盟。小协约国处在法国的影响之下，并且几乎到它存在的最后时刻都具有反苏同盟的性质。加入小协约国的各国资产阶级地主当权集团把小协约国看做巩固他们根据凡尔赛和约取得的领土的工具，看做反对中欧革命的工具。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威胁和苏联国际威信的增长，使加入小协约国的国家改变了对苏联的立场。一九三三年，加入小协约国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同苏联订立了以苏联提案为基础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正文第二六六页）

〔六五〕弗·伊·列宁“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九页至第三一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七页）。——（正文第二七三页）

〔六六〕弗·伊·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〇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五五九页）。——（正文第二八九页）

〔六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约·维·斯大林于十二月三日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十二月七日做了关于这一报告的结论。代表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巩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继续用同样速度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代表大会在关于反对派的决议中确定，党与反对派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并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代表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过的关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所有的积极分子和整个“民主集中主义”集团开除出党。（关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四页。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见“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三页至第三七一页）——（正文第三〇八页）

〔六八〕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约·维·斯大林领导了这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讨论了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关于一九三一年度工业发展的总结和一九三二年度的任务的报告，并讨论了维·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示的报告。代表会议指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及保证苏联经济独立的决议已经极为顺利地实现了。代表会议批准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一九三二年度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计划。代表会议在关于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任务就是要在最新的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共代表大

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六七九页至第六九九页）——（正文第三〇九页）

〔六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十七页。——（正文第三一四页）

〔七〇〕见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一〇一页。——（正文第三一五页）

年　表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〇年

七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七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狄纳莫”体育场举行的庆祝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体育大会。

七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选入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和发展农业的报告的决议最后修订委员会。

七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七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中央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被批准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八月十四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关于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决议。

八月

约·维·斯大林答复沙屠诺夫斯基同志的来信。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三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三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十二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契·同志的来信。

十二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同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联共（布）支部委员会的委员谈哲学战线上的情况和在哲学方面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任务以及阐述列宁理论遗产的必要性。

十二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杰米杨·别德内依的来信。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

约·维·斯大林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批准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一年

一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苏联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

一月五日至六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铁路运输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的工作。

一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被列宁格勒大企业工人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名誉委员。

一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美国犹太电讯社关于苏联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询问。

一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代表大会把约·维·斯大林选入名誉主席团。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弗·伊·列宁逝世七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首都大企业工人大会上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名誉委员。

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

二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全苏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二月二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艾特琴同志的来信。

三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月八日至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委员。

三月三十一日

为祝贺阿捷尔拜疆石油联合厂和格罗兹内石油联合厂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在两年半内完成开采石油的五年计划，约·维·斯大林向他们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真理报”第九十号上发表。

四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莫斯科电器工厂在两年半内完成五年计划给该厂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九十二号上发表。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七日、十四日、
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和六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和发展莫斯科市政建设的决议的起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五月十一日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煤矿工业工作人员会议。

五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竣工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铁矿投入生产给该建筑工程的工人和领导人员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三六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人、专家和领导人员提前完成播种计划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四五号上发表。

五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国营谷物农场的工人、专家和领导人员完成播种计划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四七号上发表。

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经济工作人员会议的工作。

六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

七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在有合作社工作人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改进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和改进对大工业中心劳动者的供应问题发表演说。

十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莫斯科“阿模”工厂全体人员完成苏联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建厂工作的贺电，和祝贺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全体人员提前完成建厂工作的贺电都在“真理报”第二七一号上发表。

十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技术报”创刊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八〇号和“技术报”创刊号上发表。

十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拜访阿·马·高尔基。高尔基朗诵自己的作品——童话诗“少女和死神”。

十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格·康·奥尔尼启泽和拉·莫·卡冈诺维奇在克列姆里宫接见乘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前“阿模”汽车制造厂）制造的第一批载重汽车和公共汽车来到的该厂突击队员。

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月底

约·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九期至第二十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总第一一三期）上发表。

十一月三日

为祝贺下新城汽车制造厂建厂工作胜利完成，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向该厂建设者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真理报”第三〇五号上发表。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四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四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为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示”的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接见莫斯科一部分作家并和他们谈文学问题。

十二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谈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苏联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开工生产给该厂全体人员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号上发表。

一月四日

为祝贺萨拉托夫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建厂工作完成和工厂开工生产，约·维·斯大林向该厂工人和领导人员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真理报”第五号上发表。

一月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答复奥列赫诺维奇。复信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上发表。

一月二十一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示”的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决议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通过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由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准。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列宁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答复阿利斯托夫。复信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上发表。

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和市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被选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

一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委员会和市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被选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二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二月十日至四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日用品生产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

为祝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建筑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术人员使苏联和欧洲第一座大型高炉投入生产并掌握高炉技术，约·维·斯大林向他们致贺电。贺电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真理报”第八十九号上发表。

四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的“论控诉局的意义和任务”一文在“真理报”第九十七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全苏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代表大会把约·维·斯大林选入名誉主席团。

四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灌溉委员会。

四月二十四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倡议通过的关于改组文艺组织和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议在“真理报”第一一四号上发表。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同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在克列姆里宫接见五一庆祝典礼的参加者。

五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拉尔夫·瓦·巴尔涅斯的问题。

五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参加中央机关关于日用品生产的决议的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

五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关于抗旱和灌溉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决议在“真理报”第一四一号上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的男女突击队员、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员获得高度生铁熔炼量并在掌握最初技术方面达到布尔什维克速度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四二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体育工作者的队伍。

七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向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致贺电。

贺电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真理报”第一八八号上发表。

八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起草的、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八月七日通过的“关于保护国家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巩固公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法律在“真理报”第二一八号上发表。

九月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庆祝国际青年节十八周年劳动青年游行示威大会。

九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阿·马·高尔基参加文学和革命活动四十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六六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阿·马·高尔基参加文学和革命活动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工作。

十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在阿·马·高尔基寓所和一部分学者谈成立全国实验医学研究所的问题。

十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胜利竣工和提前发电给该建筑工程的工人和领导人员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八一号上发表。

十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祝贺北极探险队队员乘驶“锡比利雅柯夫号”破冰船完成了北冰洋直达航行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八五号上发表。

十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阿·马·高尔基寓所和一部分作家谈话。约·维·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称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约·维·斯大林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十五周年纪念日给列宁格勒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三〇九号上发表。

十一月九日晚间

约·维·斯大林的妻子和亲密的朋友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逝世。

十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护送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的灵柩到新杰维契墓地。

十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在“真理报”第三一八号上发表的信中感谢对娜·谢·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的逝世表示哀悼的机关、团体、同志和个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写完“坎伯尔先生在胡诌”一文。这篇文章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十二期上发表。

十二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为祝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十五周年给该局工作人员和战士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三五〇号上发表。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工作。

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

一月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根据约·维·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成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以及派遣一万七千名党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的决议。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弗·伊·列宁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苏联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

一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女工”杂志创刊十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十五号上发表。

二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会议上发表关于共青团在春季播种时期的实际工作任务的演说。

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二月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写信给伊·恩·巴让诺夫同志。

二月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红军建军十五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五十三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红军建军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三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大剧院联合举行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三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答复巴尔涅斯先生的来信。

三月三十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给参加援救“马留金号”破冰船的人员的贺电在“真理报”第八十八号上发表。

四月十七日

为祝贺“克拉辛号”破冰船探险队队员胜利完成冰上航行并提前完成政府所委托的援助在新地岛过冬的人和当地居民的任务，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和阿·伊·米高扬向他们致贺电。贺电在“真理报”第一〇六号上发表。

四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祝贺谢·米·布琼尼五十寿辰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一一五号上发表。

五月一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五一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五月二日

约·维·斯大林同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在克列姆里宫接见五一庆祝典礼的参加者。

五月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罗宾斯上校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举行的全苏音乐家第一次演奏比赛会的闭幕式。

五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同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在克列姆里宫接见全苏音乐家第一次演奏比赛会的青年获奖者。

六月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体育工作者的队伍。

六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克拉拉·蔡特金的葬礼。

六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同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和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参观了“工农红军十五年”的美术展览会。

七月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重工业组织问题委员会的会议。

七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到达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谢·米·基洛夫乘“阿诺兴号”轮船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基洛夫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做了一次航行，并巡视该运河的水土结构，参观索罗克港、牟尔曼斯克港和北极湾。

七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基洛夫在索罗克港地区迎接完成了从波罗的海到白海的运河航程的北方舰队战舰队。

约·维·斯大林在红海军战士大会上发表关于北方舰队的任务的演说。会

后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基洛夫参观了“乌里茨基号”水雷艇和某号潜水艇。

七月二十二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基洛夫到达牟尔曼斯克，视察牟尔曼斯克港和北极湾。

七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视察列宁格勒港。同日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前往莫斯科。

八月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飞机设计师谈新型水上飞机。

八月八日

约·维·斯大林和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谈话，并对掌握轻便汽车的生产做了指示。

八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宫接见莫斯科苏维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他们谈莫斯科道路建筑的改进问题、莫斯科的河岸问题和建设中的劳动组织问题。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克·叶·伏罗希洛夫乘“克拉拉·蔡特金号”轮船做了一次从高尔基城到斯大林格勒的航行。

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和谢·米·布琼尼参观罗斯托夫省萨尔斯克草原的谢·米·布琼尼养马场。

十月三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祝贺“苏联号”高层汽球的全体人员在征服和研究同温度方面完成了政府所委托的任务。贺词在“真理报”第二七三号上发表。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祝贺沿莫斯科——卡拉库姆——莫斯科路线的汽车越野赛参加者。贺电在“真理报”第二七三号上发表。

十月十七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祝贺苏联水底技术工作人员——特种水底工作队队员胜利地把“萨德柯号”破冰船从北极地带的海底打捞起来。贺词在“真理报”第二八七号上发表。

十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庆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应成立十五周年的贺电在“真理报”第二九九号上发表。

十一月六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苏维埃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六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七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红场举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六周年庆祝典礼，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首都劳动者的游行队伍。

十一月九日

约·维·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日本共产党领导者片山潜的葬礼。

十一月二十日

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米·伊·加里宁和拉·莫·卡冈诺维奇接见敖德萨省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团，和他们谈集体农庄工作问题。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约·维·斯大林和一部分设计苏维埃宫图样的建筑师谈话。

十二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和拉·莫·卡冈诺维奇接见德涅泊彼得罗夫斯克省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团，和他们谈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和农村工业品供应问题。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中央航空流体动力学院成立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

约·维·斯大林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谈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苏联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开幕式。

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前

约·维·斯大林审查并校阅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向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报告提纲。提纲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三五九号上发表。

一九三四年

一月十八日

约·维·斯大林为庆祝荣膺红旗勋章的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成立十五周年和获得列宁勋章给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和领导者的贺电在“真理报”第十八号上发表。

一月二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大剧院举行的弗·伊·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三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五次代表会议和列宁格勒市第二次代表会议的联席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月二十四日

约·维·斯大林被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四次代表会议和莫斯科市第三次代表会议的联席会议选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

约·维·斯大林主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一月二十六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月三十一日

约·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代替结论的话”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出席在红场举行的首都劳动者庆祝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游行示威大会。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三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635×927公厘1/16・印張23$\frac{1}{2}$・插頁6・字數260,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7,000　　定價(5)3.20元
統一書號1001・283

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十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四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4
1934 – 1940

斯大林全集

第十四卷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

二〇一五年·中国

斯 大 林

凡　例

1. 本卷正文译文均取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正文中的夹注符号（◇1◇、◇12◇、◇123◇ ……），即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文集》中的页码，便于引用时注明。

2. 正文中的注释号（①、②、③ ……），系《斯大林文集》编者注、译者注及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放在当页末。

3. 点击页面左侧书签中的目录和年份的展开符号，有各篇的链接，可直接转至相应页面。

4. 正文中斯大林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5. 本卷中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

目　　录

第十四卷说明 …… 1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四年

给新乌达村集体农庄青年学校少年先锋队员和
小学生们的信 …… 3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 4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 年 7 月 23 日）…… 11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 27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 30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1934 年 12 月 26 日） …… 33

一九三五年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 37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
的讲话（摘录）（1935 年 2 月） …… 38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五一”阅兵参加者时
的讲话（报道）…… 40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1935 年 5 月 4 日） …… 41

在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1935 年 5 月 14 日）…… 47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铁路运输工作者时
的讲话（报道）…… 49
致巴黎《人道报》加香、多列士、古久里 …… 52
致著名科学家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志 …… 53
附录：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 …… 53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种植甜菜的
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1935 年 11 月 10 日） …… 55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1 月 17 日） …… 59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 59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 63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 67
4. 最近的任务 …… 70
5. 简单的几句话 …… 71
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2 月 1 日） …… 73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
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2 月 4 日）…… 79

一九三六年

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
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 年 3 月 1 日） …… 81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
别利亚科夫时的讲话（报道）…… 91
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何塞·迪亚斯的电报 …… 93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94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 94
二　1924－1936 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 95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 101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 105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 111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 120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
的报告（1936 年 12 月 5 日） …… 122
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 …… 126

一九三七年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
两面派的办法（1937 年 3 月 3-5 日在
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 129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 130
二　资本主义包围 …… 132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 134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 139
五　我们的任务 …… 141
结束语 …… 151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给
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 165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冶金工业和
煤炭工业领导工作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
的讲话（1937 年 10 月 29 日） …… 169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
的演说（1937 年 12 月 11 日于大剧院） …… 171

一九三八年

给伊万诺夫同志的复信（1938 年 2 月 12 日） …… 177
附录：伊万诺夫给斯大林的信 …… 182
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
出版社的信（1938 年 2 月 16 日） …… 185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
的讲话（1938 年 5 月 17 日） …… 186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年 9 月） …… 189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英雄的“祖国号”飞机机组时
的讲话（报道） …… 219

一九三九年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
的总结报告（1939 年 3 月 10 日） …… 221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 221
1．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
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 222
2．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 225
3．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 230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 232
1．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 233
2．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 243
3．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 247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 250
1．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
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 250
2．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 252
3．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 255
4．几个理论问题 …… 258

一九四〇年

（注：《斯大林文集》未收录一九四〇年的著作。）

附 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36 年）…… 271
年 表（1934 年至 1941 年 5 月） …… 293
插 图
一 斯大林接见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 …… 58
二 苏联 1936 年宪法中文译本 …… 125
三 斯大林的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证书 …… 270

第 十 四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四卷是根据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一九四六年的《斯大林全集》“出版说明”编辑的。

该“出版说明”确定：“第十四卷包括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的著作，这些著作是论述苏联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斗争、苏联新宪法的制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环境中争取和平的斗争。”

但此卷及原计划出版的以后各卷，均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而未能问世。近年来，俄罗斯一些民间团体陆续编印了不同版本的第十四卷和其它各卷，然而目前未见有中文译本。

因此，我们编纂的从本卷开始的《斯大林全集》各卷，只能以国内现有的斯大林著作中译文为依据。

本卷正文的中译文，即取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和编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部分。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四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邮箱地址　hqxsk@163.com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

给新乌达村集体农庄青年学校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的信[①]

新乌达村（东西伯利亚边疆区）集体农庄青年学校的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沙特汉诺夫、巴图罗娃、格奥尔格诺娃、丹尼洛夫、道尔日耶夫**等同志；

回信迟了，请原谅。你们的祝贺使我很感动，祝你们身体健康，并在学习和社会工作方面获得成就。希望你们顺利地完成学业，成为我们国家需要的有干劲、有学问的工作人员。

我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送给你们一份小小的礼物，一部无线电装置，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我想，你们的无线电广播站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代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向你们致敬。祝你们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年版第328页◇1◇[②]

————————————

① 新乌达村是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斯大林于1903年秋—1904年1月被流放在这里。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适逢斯大林从这个流放地逃出的三十周年，该村的少年儿童写信给斯大林表示祝贺。本篇是斯大林给他们的回信。——编者注

② 此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文集》中的页码，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①]

现在我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②]一文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我认为必须把下述几点意见附在这篇文章之前。

阿多拉茨基同志建议在最近一期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布尔什维克》上，刊载1890年在国外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文《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假设有人建议把这篇文章刊载在恩格斯的文集中，或者刊载在一本历史杂志上，那我认为是十分正常的。但是，现在是建议我们把它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在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那一期上，可见，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2◇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因此，我认为在最近一期《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不适宜的。

————————————

① 本篇是斯大林1934年7月19日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编者注

②《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由德文译成俄文连载于1890年2月和8月《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和第2集。这一著作当时还用德文、英文、法文，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该文中译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编者注

这些缺点是什么呢？

1.恩格斯在说明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并对这种卑鄙龌龊的政策进行应有的抨击时，他用来解释这种政策之所以产生的，主要不是俄国军事封建商人上层对出海口、海港，对扩大对外贸易和占领战略据点的“需要”，而是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是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外国冒险家，这帮人不知为什么处处走运，事事走运，这帮人使人惊讶地克服了达到自己冒险目的的所有一切障碍，以惊人的狡诈欺骗了欧洲所有的统治者,终于使俄国成了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恩格斯这样来说明问题，可能使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但可惜这竟是事实。

下面就是恩格斯文中相应的地方。

恩格斯说：“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在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①]。它的创始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3◇

“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②]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

① 卡·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1814—1835年先后任俄国驻巴黎公使和大使，1335—1839年任驻伦敦大使。卡·瓦·涅谢尔罗迭，伯爵，1816—185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赫·安·利文，公爵，1810—1812年任俄国驻柏林公使，1812—1831年任驻伦敦大使。——编者注

② 亚·米·哥尔查科夫，公爵，1854—1856年任俄国驻维也纳大使，1856—1882年任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1875—1882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82—1895年任外交大臣。——编者注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瓦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①]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②]（见上述恩格斯的文章）

可以认为，在俄国历史上，在俄国的外交史上，外交界就是一切，而沙皇、封建主、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则是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不足道的。

可以认为，假设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不是象涅谢尔罗迭或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冒险家，而是象哥尔查科夫等人那样的俄国冒险家,那么，俄国的对外政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这一点我不来谈了。尽人皆知，侵略政策也是——不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他虽然并不是◇4◇出身于皇室，但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却成功地运用了阴谋、欺骗、背信弃义、阿谀奉承、残暴行为、收买、暗杀和纵火。

显然，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

① 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亚克萨尔特河即锡尔河。——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6—17 页。——编者注

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

2.恩格斯在说明欧洲局势和揭示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前景时写道：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①

“……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②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5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3页。——编者注

“欧洲正好象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5◇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①

“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②（同上）

不能不指出，在这些说明欧洲局势和列举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的话里，忽略了一个后来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即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当时就已有极大意义的因素；忽略了作为后来的世界大战的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矛盾，这些矛盾当时就已有重大意义，后来对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几乎是决定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忽略是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

从这个缺点产生了其余缺点。现在不妨指出其中的下列几点：

(一)**过高地估计了**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在促使世界大战日益逼近这方面的作用。诚然，恩格斯起初把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当作大战的因素放在首位，但后来，他把这个因素放到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意图放到首位，断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这当然是夸大了。

(二)**过高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俄国的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议会）在防止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恩格◇6◇斯断言，俄国沙皇政府的覆灭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夸大了。设有“国民议会”的俄国新的资产阶级制度不可能防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6页。——编者注

止大战，至少是因为大战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这方面。问题在于，自从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作用就开始显著地下降，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起着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的后备军的作用。

(三)过高估计了沙皇政权的作用，认为它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恩格斯语）。俄国沙皇政权是全欧洲（以及亚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要说它是这个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是使人怀疑的。

必须指出，恩格斯的文章的这些缺点，不仅有“历史价值”，它们还有，或者说应当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其实：如果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斗争被忽略了，不被看作是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因素，如果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也被忽略了，如果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大战的因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当作大战的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么，比如说，资产阶级德国同沙皇俄国的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人民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或者几乎是解放的战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未必可以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14 年 8 月 4 日决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并宣布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免受“俄国野蛮行为”的侵害等口号的堕落行为，就可以得到开脱。◇7◇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日益逼近的大战的前景时直接说，“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①]，“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②]！

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那就不可能有产生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余地，不可能有产生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余地。

恩格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如此。

看来，恩格斯对于当时（1890—1891 年）已缔结好了的矛头针对德奥联盟的法俄同盟，甚感不安。因此，他的目的是要在自己的文章中攻击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它失去欧洲的首先是英国的舆论的任何信任，但是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忽略了许多其他的极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造成了文章的片面性。

既然如此，是否还值得把恩格斯的文章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作为指导性的文章，或者至少是作为极有教益的文章呢？因为很明显，把它刊载在《布尔什维克》上就是默然给它作这样一种推荐。

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约·斯大林

1934 年 7 月 19 日

译自 1941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
第 9 期第 1—5 页◇8◇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85—186 页。——编者注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 年 7 月 23 日）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一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您，是想详细地问一问，您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象您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您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您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9◇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各种各样的行政机构。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您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您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消灭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失业工人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您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10◇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您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您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您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您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

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您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您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11◇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您所说的

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您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使人的集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12◇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

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您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13◇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那种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您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您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

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14◇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滑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

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15◇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您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您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您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您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您非常低估政权问越,您根本没有想到它。要◇16◇

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您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17◇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

阶级的利益的摆脱绝境的出路。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您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您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动上，面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动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18◇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您从正确的断定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您正确地断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您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

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您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您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您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事实。◇19◇

威尔斯：不过请您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动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您回忆一下17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您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 1789 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20◇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您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

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做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您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21◇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即革命阶级。其次,必领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党。您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您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 17 世纪的英国，在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现在让我来回答您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22◇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您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您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您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 1830 年到 1870 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 18 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您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您不认为宪章运动在 19 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吗？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销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23◇谓“衰败城镇”[①]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您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24◇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

① “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紀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这种特权后被取消。——编者注

威尔斯：我很感谢您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您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您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您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1920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

斯大林：您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您，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而且（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25◇联是广泛地运用的。

如果您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您和我的谈话。

康·乌曼斯基记录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0版
第599—613页◇26◇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瓦纳格小组[①]没有完成任务，甚至对任务本身也不理解。这个小组编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不是**苏联**历史提纲,也就是说,编的是罗斯历史提纲，而没有包括加入苏联的各民族的历史（没有照顾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各民族、中亚细亚和远东各民族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等等的历史材料）。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协同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一起实行兼并和殖民主义的作用（“沙皇政府是各民族的监狱”）。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起到19世纪50年代和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沙皇政府是国际宪兵”）。

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时期（当时农民还没有成为农奴），把专制的国家制度和封建制度〈当时俄罗斯还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半国家）混淆在一起。◇27◇

提纲中把反动和反革命，把“一般”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概念混淆在一起。

提纲中没有指出被沙皇政府所征服的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根源，因而把这些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

——————————————

① 1934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苏联学校中历史教学的决定》中批准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名单，其中《苏联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成员是：尼·尼·瓦纳格教授（组长）、波·德·格列科夫教授、安·米·潘克拉托娃教授、谢·安·皮翁特科夫斯基教授。——编者注

十月革命的理由，没有得到说明，同样，建立苏联的理由也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充满了各种陈腐的老一套的提法，如“尼古拉一世的警察恐怖”、“拉辛之乱”和“普加乔夫之乱”、“19 世纪 70 年代地主反革命的进攻”、“产业革命的最初步骤”、“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同 1905—1907 年的革命作斗争的最初步骤”等等。提纲的编撰者盲目地照抄各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陈腐的和完全不科学的提法，忘记了他们应该教给我们的青年以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提法。

提纲没有反映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提纲的编撰者显然忘记了，俄国革命家认为自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大师的学生和追随者。

提纲没有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源和作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后备军的沙皇政府在这个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没有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的依赖，因此，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世界大战前夜整个欧洲存在着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也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的衰落，因此，从世界◇28◇史的角度来看，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体现者和使工农摆脱资本主义的机关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

诸如此类等等。

一般的应该说，提纲编撰得极其粗糙，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理上也是不太通的。

至于提纲的体裁不够恰当,玩弄“字眼”,例如把伪德米特里叫作“被人称作的”德米特里，又如“18 世纪老封建主的胜利”（但是，

不知道“新的”封建主在哪里，他们的表现怎样，如果在这个时期他们是存在的话〉等等，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上述几点的精神根本改编提纲，同时应该估计到，这里说的是编撰**教科书**,因而应该斟酌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提法，而不是登在杂志上的不负责的文章,可以毫无责任感地随便乱讲一通。

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又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

约·斯大林

安·日丹诺夫

谢·基洛夫

1934 年 8 月 8 日

译自 1936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63—64 页◇29◇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由于近代史的本身内容最丰富，事件太多，同时由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近代史中（如果是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最主要的是法国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确立，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近代史教科书从法国革命那章开始就比较好。为了要和以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可以在前面写一篇不长的引言，简要地叙述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主要事件，而把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详细叙述，放到中世纪史教科书的末尾去。

因此我们建议，把第一部分（共 6 章）即整个第一篇从提纲中删去，代之以简要的引言。

我们认为，提纲的主要缺点是，对法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深刻差别和对立，强调得不够突出。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应该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阐明法国的（以及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但又给他们套上新的锁链——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锁链，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粉碎了一切锁链，并且把人民从一切形式的剥削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是贯穿近代史的一条红线。

所以，不容许把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作“大”革命，而应该把它称◇30◇为和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

同样，也不能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把它称为和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

因此，应该改编近代史教科书的提纲，同时要选择相应的提法和术语。

我们认为,提纲中把近代史分为两部分是没有理由和没有根据的,是按照某种不可理解的标志划分的,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

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

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时期。

第三部分——从1918年末（战争结束的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和加紧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时期，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后残余根除的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胜利和高涨、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胜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胜利的时期。我们认为提纲的编撰者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是一个大错误。应该纠正这个错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针对这点，必须将材料、篇章进行改编和重新分配。◇31◇

最好是把提纲中那些陈腐的老一套的说法，如“旧制度”、“新制度”等删去。旧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前的制度”比较好，或者代之以“封建专制制度”就更好，而“新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这样的变更，所谓“新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同成为人类社会制度更高类型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比较，就显得是旧制度了。

最好把提纲中过多的“时代”也删去。“执政府时代”、“拿破仑时代”、“督政府时代”——时代不是太多了吗？

我们认为，提纲中谈殖民地问题的篇幅太少，也是不对的。对乔治·桑·施本格勒、吉卜林这样一些人注意的相当多，而对殖民地问题和譬如说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状况，注意的却少了。

同样，最好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这种提法改为“德意志和意大利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否则，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是指象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一些以前分裂的国家争取重新统一，而是指把这两个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说来，我们的意见是，近代史提纲比苏联历史提纲编得较有条理，但是在这个提纲中混乱的地方仍然相当多。

约·斯大林

谢·基洛夫

安·日丹诺夫

1934 年 8 月 9 日

译自 1936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第 3 期第 65—66 页◇32◇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1934 年 12 月 26 日）

一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曾经经历过技术人才缺少的时期。我们曾经面临过这样的抉择：或者是先在技术学校中训练人才，而在学校还没有培养出技术干部时，把生产和大量使用机器推迟 10 年；或者是立即开始制造机器，在国民经济中大量使用机器，以便在生产和使用机器的过程中训练技术人才，培养干部。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由于缺少受过技术训练和善于使用机器的人才，因此在走这条道路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笔费用和额外开支，但是我们公开而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诚然，在这段时期内,损坏了不少机器,但是我们却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造就了经济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干部。在 3—4 年中，我们不但在各种机器(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等等）的制造方面,而且在大量使用机器方面,都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在欧洲要花几十年才能办到的事，我们却在 3—4 年内就大致上和基本上完成了。这就绰绰有余地抵偿了这些费用和额外开支、机器的损坏和其他损失等。这就是我国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我国的钢铁工业办得没有成绩，没有发展起来，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成就。

◇33◇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钢铁工业已获得了巨大成就。是的，我们已取得了胜利。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成就而骄傲起来。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忘记缺点，忘记今后的任务，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指出冶金工作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并向他们提出了希望。

斯大林同志说：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钢产量都超过生铁产量。有些国家的钢产量超过生铁产量25—30%。在我国却相反，钢产量低于生铁产量。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呢？要知道现在已不能把我国看作是一个“木材的”国家，一个没有废铁的国家等等。现在我国已是一个金属的国家了。难道现在还不是消灭生铁和钢生产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吗？

斯大林同志要冶金工作者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各冶金工厂平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在熟悉和掌握技术方面存在的落后现象。

斯大林同志说：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党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①]的口号。很多人机械地去理解这个口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机器，似乎就做到了这个口号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不正确的。技术是不能脱离使用技术的人的。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只有这样来理解这个口号才是正确的。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技术，那就应该公开说，目前最主要的是掌握技术的人才。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过去片面地强调技术，强调机器，那么现在就应该强调掌握技术的人◇34◇才。这是我们关于技术的口号所要求的，应该爱护每一个有才能的、懂得技术的工作人员，应该爱护他，培养他。应该象园丁培植心爱的果树那样，关切地和细心地培养人才。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看到前途，及时地提拔他们，如果一个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就应当及时地调换别的工作，而不要等到他最后失败时才调动。关切地培养人才，评定人才，在生产中正确地配备人力，组织人力，实行能巩固决定性的生产环节

———————————————

① 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75页。——编者注

并推动人们去达到更高的熟练程度的工资制，这就是我们为培养人数众多的生产技术干部大军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对各工厂厂长说：你们那里并不是一切都能令人满意的。在炼铁方面，你们已经多少培养和配备了一些有经验的技术人才，但是在冶金工业的其他环节上你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钢和钢材的生产才落后于生铁的生产。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最终消灭这个缺点。请注意，除了生铁以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钢和钢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192—194 页

二[①]

斯大林同志说：◇35◇

——巴尔金同志，您说得不对。您说的工作，光靠党是不能完成的。同党一起参加这个工作的，也有象您这样的非党人士和老专家。光靠党是不能在 1917 年 10 月完成革命的。当时参加革命的党员一共才 13 万人。

党的功绩是什么呢？这就是党能够组织群众，能够使大家都来工作，能够作出正确的工作指示。要是你们记得过去关于生铁生产的讨论，如你们大概会知道当时曾经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铁决不可能超出 1000 万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铁必须达到 1700 万吨。

党能够权衡轻重，适当地引导工作，使之达到一定的，当时可能

———————————————

① 以下摘自苏联科学院院士、冶金学家伊·巴·巴尔金所写的《远大的目光》一文。巴尔金在这篇文章里回忆说，接见中，当他发言强调指出钢铁战线的胜利只有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时，斯大林接着讲了这一段话。——编者注

达到的水平：1000 万吨。为了使工业达到这个水平，当时除了机器以外，还必须培养和得到能利用这些机器进行工作的相应的干部。

你们知道，过去我国的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是怎样一个状况。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两者都有了。当时必须选择：或者是首先训练出使用这些机器的人才，然后才大量生产机器；或者是马上就大量生产机器，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运用机器的过程中学会使用机器。第一条道路太遥远了。第二条道路比较近一些，能使我们在培养千部方面赢得时间，虽然也要求付出一定的牺牲。我们走上了第二条道路。我们没有错，因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就在短时期内造就了大批干部、拖拉机手和飞行员。这样，我们在培养大批的干部方面就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时间。

同志们，培养干部是件大事情。你们是怎样培养炼铁工人、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志们在下面的发言中谈谈钢铁工业中的干部情况，谈谈培养熟练◇36◇工人和专家的情况。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不是一个冶金工作者，但是，我知道，在各个国家中，钢的生产比生铁的生产多 25%。而我国则恰好相反，钢落后于生铁。我希望听到同志们谈谈每个工厂和整个钢铁工业究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才能消灭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我知道，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可以通过建造新平炉的办法来消灭。平炉我们正在建造，今后还要继续建造。但是，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大概也可以通过扩大平炉生产能力的办法来消灭，这一点，从你们关于冶金工厂工作的资料中可以看得出。有些工厂工作得好，有些工作得差。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不能够使所有的工厂都工作得好呢？是什么东西在起阻碍作用呢？我想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译自 1935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值此苏联电影业光荣的十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我特向苏联电影工作者致以敬礼，并致最良好的祝愿。

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

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获得新的成就，拍摄出新的影片，它们要像影片《恰巴耶夫》[①]那样歌颂为苏联工农政权而斗争的伟大历史事件，动员人们去完成新的任务，使人们既想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又想到其中的困难。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让你们的大师勇敢地深入到电影这一“最重要”(列宁语)和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的新领域中去。

約·斯大林

译自1935年1月11日《真理报》

————————————

① 该影片中文译名为《夏伯阳》。——本书制作者注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的讲话(摘录)[①]

（1935 年 2 月）

如果你们想巩固劳动组合，如果你们想有一个包括千百万农户，而不是几户或几百户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如果你们想达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就应当在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共同利益之外，务必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

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公顷，这就是一点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奶牛，另一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母猪。总之，你们想卡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先进人物。我理解你们是很关心集体农庄制度，很关心集体农庄经济的。但是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和你们一样吗？你◇39◇们在集体农庄中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想的不大一样。应不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应当考虑的。

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极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

———————————————

①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35 年 2 月 11—17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大会于 2 月 14 日选出了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斯大林的这篇讲话全文未见发表，这里摘录的是苏联《真理报》1935 年 3 月 13 日的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引用的部分。——编者注

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就不能承担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承认集体农庄的农户应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的。倒不如立足于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也要有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而你们也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日常生活的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译自1935年3月13日《真理报》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五一”阅兵参加者时的讲话

（报道）

斯大林同志在招待会结束时向与会者们讲话。他通过他们向工农红军各兵种的战士们和指挥员们致敬。他说到他们是“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不是党员也可以成为布尔什维克。成千上万的非党同志——勇敢而有能力和才干的同志,在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之所以没有入党，许多人是因为太年轻，其他人则是因为自认为修养不够，因为他们非常看重和珍惜党员这个称号。

斯大林同志举杯，祝为劳动人民事业服务的无畏的潜水艇员们、百发百中的炮兵们、勇敢的坦克兵们、坚毅的飞行员和轰炸机飞行员们、质朴的勇敢的骑兵们、英勇的使胜利得以巩固的步兵们健康。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情以外，没有别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高呼，为了勇敢的、有能力和才干的、英勇的布尔什维克们，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健康，干杯！

译自 1935 年 5 月 4 日《真理报》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5 年 5 月 4 日）

同志们！不可否认，我们近来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就过多地谈论起领导人的功绩，领袖们的功绩来了。人们把所有一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他们。这当然是不对的，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领袖。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就干部问题，就我们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们红军的干部问题讲几句话。

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象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这样摆着：**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42◇

我国当时处在技术极其缺乏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应工业。没有机器供应农业。没有机器供应运输业。没有国家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而只有一些创立这种基础的前提。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使这个工业在技术上不仅能够改造工业，而且

能够改造农业并改造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那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术的困难。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一事业中也正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的。

当然，在这样巨大而困难的事业中，决不能期望获得接连不断的和迅速的成功。在这种事业中，只有经过几年以后，才会看到成就。因此必须用坚强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顽强的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许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动摇和犹豫。

大家知道，我们正是这样进行这一事业的。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够的顽强精神、耐心和坚定性。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开头遇到一些困难，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人既然有记性，在总结我们的工作时就会在无意中想起过去的事情来。我们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难并叫党退却的。他们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工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国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业，而且是头等的工业，这是危险的幻想。"

当然，我们当时也可以把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花在建立我国◇43◇工业上的30亿外汇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计划"，我们就不会有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我们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就会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

显然，当时必须在两个计划中间选择一个：一个是退却的计划，

是要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而且不能不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且你们知道，是已经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了胜利的计划。

我们选择了进攻的计划，循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而撇开了那些同志，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却根本不愿看见我国最近的将来，不愿看见我国社会主义的将来。

可是，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抵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这些人显然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气概的人。他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不是用困难和威胁所能吓倒的。他们忘记了，把我们锻炼成钢的是在斗争中不知道和不承认恐惧为何物的伟大的列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他们忘记了，敌人愈是发疯，党内的反对者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狂，布尔什维克就愈加奋发地进行新的斗争，愈加急速地向前迈进。

当然，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过离开列宁的道路。而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站稳脚跟以后，扫除路上的种种障碍，更加急速地前进◇44◇了。固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

是的，同志们，我们是充满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着使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现在这条道路可以认为是已经走过来了。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头等的工业，强大的机械化的农业，日益发展的和蒸蒸日上的运输业，有组织的和装备精良的红军。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

可是，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

进入了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有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运输业、军队，我们有技术来装备所有这一切部门，但是缺乏具有足够的必要的经验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45◇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能说我们的人都已经充分了解到和认识到这个新口号的伟大意义了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否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不会有人时常用一种岂有此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作者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作者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

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作者，重视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 30 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來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 30 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 30 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46◇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太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的冷淡态度以及不会重视人才，就是上述这个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对人的奇怪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让我举杯祝贺我们的红军高等院校毕业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你们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国防事业中获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已经在高等学校毕业了，你们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学校还只是一个预备阶段。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47◇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它就将是无敌的。

同志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25—530页◇48◇

在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1935 年 5 月 14 日）

在座的同志们（斯大林同志指了指大厅和主席台）使得我要作两点更正。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莫斯科地下铁道的胜利建成，党和政府奖给一批人以列宁勋章，奖给另一批人以红星勋章，奖给第三批人以劳动红旗勋章，奖给第四批人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

但是这里就产生了问题：对其余的人该怎么办呢？对那些工作得并不亚于受奖的人，和受奖的人同样地贡献了自己的劳动、才能和力量的同志该怎么办呢？你们中间一些人似乎感到高兴，而另一些人却感到困惑。该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

因此，我们想在全体诚挚的人们面前纠正一下党和政府的这个过错。我不爱作长篇演说，因此，请允许我宣读一下更正内容。

第一个更正：由于建设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工作胜利完成，特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宣布嘉奖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男女突击队员、全体工程师、技师和男女工人。

今天就应当实行这个更正，现在我们宣布嘉奖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全体工作人员。（鼓掌）你们不要向我鼓掌，这是全体同志的决定。◇49◇

第二个更正，我就直接读吧：由于共青团莫斯科组织在动员光荣的男女共青团员成功地建设莫斯科地下铁道方面建树了特殊功绩，特奖以列宁勋章。

这一个更正也应当在今天就实行，并在明天公布出来。同志们，这也许还不够，但是更好的办法我们想不出来。如果还可以做些什么，就请你们提醒一下。

你们以为怎样这两条更正够了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 年版第 320—323 页◇50◇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招待铁路运输工作者时的讲话①

（报道）

斯大林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开始讲话。

他讲到铁路运输对于像我们苏维埃国家这种领土广大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面积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其中包括英国连同其殖民地（自治领除外）；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铁路运输把我国各大区域联结成为一个国家整体，那么我们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可思议的。他说，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铁路运输把工业基地和工业中心同供给它们原料和粮食的农业州区联结和粘合成为一个经济整体，那么这样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英国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头等的海洋运输把它的大量领土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是不可思议的。同样，苏联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头等的铁路运输把它的许许多多州区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也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同志说，苏联铁◇51◇路运输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

他讲到每一个从事运输工作的人的伟大荣誉，讲到那些理解运输的意义而把自己的劳动奉献给祖国的工作人员。为了实现铁路运输的决定性的无所不包的作用，首先需要各部门互相协调，并且按照严格

————————————

① 1935 年 7 月 25—29 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委托，召开了铁路运输工作者会议。会议结束的次日，1935 年 7 月 30 日晚，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会议的参加者。——编者注

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运输纪律。

斯大林同志说，铁路工作人员的职位有大有小，可是在运输业中没有不需要的人，或不重要的人。从最大的领导人到“小小的”工作人员，一直到扳道工，到给油工，到清扫工，都是伟大的，重要的，因为运输业是一条传送带，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颗螺丝钉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斯大林同志说，铁路工作人员同志们，当你们懂得了这一点，而在运输业总机器的各个部分和所有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协调的关系时，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也就有了。

斯大林同志讲到运输业的成就和运输工作中需要借助勇敢而坚决的自我批评予以揭露的缺点。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个真理是这样简单明了，犹如泉水般的洁净和透明。他讲到列宁一向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这就是要象革命者应当做的那样，公开地、诚恳地、彻底地进行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溃疡，不害怕批评，反而欢迎批评，不粉饰缺点，倾听所有工作人员的呼声，不仅要教育工作人员，而且要向工作人员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我们就能揭露和消除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就能前进。我们取得进步的秘密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运输业的成就是明显的，我们不打算把它隐藏起来。我们不需要那种虚伪的谦逊。你们的成绩不小。你们已把日装车量从56000车提高到73000车，这从运输业进步的角度看是不少的。但是，同志们，从国家需要的角度看，这还是不够◇52◇的。应当争取使日装车量达到75000—80000车。

请允许我举杯祝贺你们的成就，你们的成就是明显的，因此你们理应受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同志式的称赞。请允许我举杯祝你们得到你们尚未取得但定将取得的成绩，祝你们大家，从扳道工到人民委员，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提高已在走上坡路、但还有些摇摆的运

输业，祝运输业成为工作精确、运行完好、象优等钟表机械一样准确的传送带！同志们，为你们大家，为你们的人民委员，干杯！

译自1935年8月2日《真理报》

致巴黎《人道报》
加香、多列士、古久里

抄送：莫斯科《真理报》

昂利·**巴比塞**[①]同志不幸逝世，谨同你们一起表示哀悼。昂利·**巴比塞**同志是我们的朋友，法国工人阶级的朋友，法国人民可尊敬的儿子，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朋友，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愿他的一生，他的斗争，他的愿望和憧憬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青年一代在争取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斗争中的榜样。

约·斯大林

译自1935年9月3日《真理报》

——————————————

① 昂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主持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大会和国际反战同盟大会。著有人物传记《列宁和他的家人》、《斯大林传》等。1935年，巴比塞在访问苏联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病逝。——本书制作者注

致著名科学家
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同志①

您的来信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请接受我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并继续为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握您的手。

约·斯大林

译自1935年9月17日《真理报》

————————

附　录

齐奥尔科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信

全体劳动者最英明的领袖和朋友，**斯大林**同志：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推动人类进步，那怕是稍微推动一些也好。但是在革命以前，我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

① 康·爱·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苏联著名科学家，宇宙航行学的先驱，1935年9月19日病逝。他在弥留之际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本篇是斯大林收到信后给他的电报。——编者注

只有十月革命才使一个自学者的劳动得到承认；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列**◇55◇**宁—斯大林**的党才给了我实际的帮助。我感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护，这给了我这个病人以继续工作的力量。可是，现在疾病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已经开始的工作。

现在我把自己有关航空、火箭航行以及星际交通方面的全部劳动成果交给人类文化进步的真正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这些劳动成果。

全心全意忠实于您。

致以最后的真挚的敬礼。

永远属于您的

康·齐奥尔科夫斯基

1935 年 9 月 13 日

译自 1935 年 9 月 17 日《真理报》

◇56◇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种植甜菜的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

（1935 年 11 月 10 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新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个新生活我们叫作集体农庄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我们听到了一些纯扑的劳动者的朴素的发言，她们讲述了她们为了在竞赛中获得成就是怎样进行斗争和克服困难的。我们听了一些不平常的妇女的讲话，我要说，这些妇女是劳动英雄，因为只有劳动英雄才能获得她们所取得的那种成就。过去我国没有这样的妇女。我已经 56 岁,阅历不少，也见过很多男女劳动者，但是这样的妇女我没有见过。这是一批完全新的人。只有自由的劳动，只有集体农庄的劳动，才能在农村中产生这样的女劳动英雄。

在旧时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妇女。

不妨想一下，在从前，在旧时代里，妇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当一个妇女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她就被看作劳动者中所谓最下等的人。她为父亲一刻不停地工作，但父亲骂她时还要说：“你是我养活的。”在她出嫁以后，又得为丈夫工作，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而丈夫在骂她时也是这样说：“你是我养活的。”农村妇女曾经是劳动者中最下等的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农妇中是不可能出现劳动英雄的。当时，对妇女来说，劳动是一件可诅咒的◇57◇事情，她们要千方百计地逃避它。

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便劳动成为光荣的事情，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在农村中产生出真正的女英雄。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消灭不

平等的现象，才能使妇女翻身。这一点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集体农庄采用了劳动日制。劳动日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在劳动日面前人人平等，男人也好，妇女也好。谁做的劳动日多，谁挣的也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父亲或是丈夫，都不能责骂妇女，说她是靠他养活的。现在，妇女只要参加劳动就有劳动日，她自己是主人。我记得，我在集体农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和几个妇女同志谈了一次话。有一个来自北方边疆区的妇女同志说：

“大约两年以前，任何一个求婚的人都不愿意瞧一瞧我的院子。我是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现在我有500个劳动日。现在怎样呢？求婚的人多得不得了，他们都说想和我结婚。而我呢，还得考虑考虑，我要自己挑选一个未婚夫。”

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制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并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人。现在，妇女在做姑娘时不是为父亲工作，出嫁以后也不是为丈夫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工作。这就是农妇的解放，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这种制度使劳动妇女和所有劳动的男子一律平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一些出色的妇女。因此，我把今天的会见不简单地看成是先进人物和政府成员们的普通会见，而看作是一个检阅解放了的妇女劳动的成就和能力的节日。我认为政府应当表扬到这里来向政府报告她们的成就的女劳动英雄。

怎样庆祝今天呢？我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58◇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米高扬等同志在这里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请求政府授予我们的女劳动英雄以列宁勋章，授予小组长以列宁勋章，而授予一般突击队员以劳动红旗勋章。当然，应该特别表扬玛丽亚·杰姆钦科同志。

伏罗希洛夫：她真行。

莫洛托夫：她是主要人物。

斯大林：我认为对这整个事情的倡导人玛丽亚·杰姆钦科，除了

授予她以列宁勋章外，还应当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嘉奖，并授予她的小组的女庄员们以劳动红旗勋章。

喊声：她们都在这里，只有一个没有来。她病了。

斯大林：生病的也要奖励。我们想这样来庆祝今天这个日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201—203 页◇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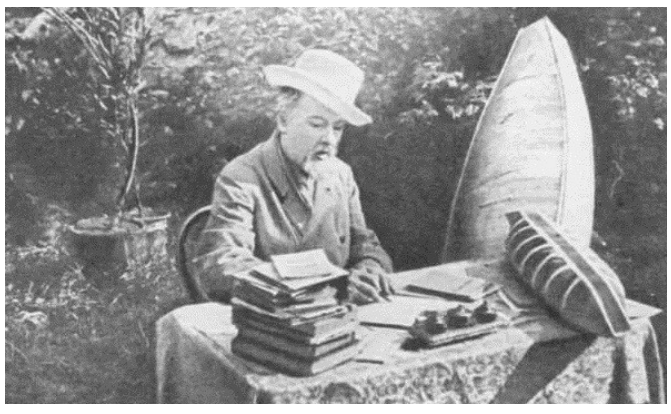
接见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

列宁勋章

劳动英雄勋章

劳动红旗勋章

斯大林和工人群众在一起



宇宙航行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①]上的讲话

（1935 年 11 月 17 日）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同志们！关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说得很多，而且说得很好，因此我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既然你们把我叫到讲台上来了，我总得说几句话。

不能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男女工人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定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运动。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阶段，为什么是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60◇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

————————————

① 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于 1935 年 11 月 14—17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3000 名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编者注

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汉诺夫、布瑟金、斯梅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殊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打破现有的设计能力，打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旧的技术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61◇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

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绝对不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他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62◇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工程师和技师即脑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

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了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还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工作严格认真的榜样，善于在工作中珍惜时间的因素，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63◇的那种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正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会增加 10 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同志们，这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

当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着手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时，他们是不是想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这种伟大意义呢？当然没有。他们当时所关心的，是力求使企业消除完不成计划的现象并超额完成经济计划。但他们在力求达到这一目的时，必须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然而，如果以为这个情况会多多少少降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那就可笑了。

关于1905年第一次在我国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为了防御沙皇政府的进攻，防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但是，这个情况丝毫也不与◇64◇下述这件毫无疑义的事实相矛盾，即列宁格勒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1905年开始的争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运动，归根到底导致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现在我们站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摇篮边，站在这个运动的泉源旁。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须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须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诽谤他的工人。至于布瑟金，那么大家知道，他由于自

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干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要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65◇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瑟金和斯梅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个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不是，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做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困惑。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象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66◇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象样，不愉快，那么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美好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67◇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

意义的，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饿受冻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那就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么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一倍的样子。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头等的技术，头等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么这些技◇68◇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

备，但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习了这种新技术，产生了新干部。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就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象大水决堤一样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眼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把力量积蓄起来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状况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69◇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一切都从落后出发，最后，竟到了欣赏落后的地步。但是，既然这种落后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把它奉为圣像，奉为偶像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5倍、10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吗？同志们，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做过吧？难道我们是以我国男女工人的永远落后为出发点吗？我们好象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70◇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楮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么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

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另外有些人说：技术定额是需要的，可是现在就应该把它提高到斯达汉诺夫们、布瑟金们、维诺格拉多娃们以及其他人所达到的高度。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定额在目前这个时候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比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的技术素养差些的男女工人，就会完不成这种定额。我们现在需要的技术定额，应当是一种介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例如就拿玛丽亚·杰姆钦科来说吧。大家知道，她是著名的甜菜500公担丰产模范。她达到了每公顷500公担或500公担以上甜菜的产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绩当作譬如说乌克兰全部◇71◇甜菜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呢？不可以。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玛丽亚·杰姆钦科每公顷收获了500公担或500公担以上的甜菜，而今年每公顷甜菜的平均产量，例如在乌克兰，却只有130—132公担。可见，这里的差别是不小的。是不是可以把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规定为每公顷400公担或300公担呢？所有的内行人都说，暂时还不能这样。显然，1936年全乌克兰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必须规定为每公顷200—250公担。而这个定额也是不低的，因为完成这个定额，就能使我们获得比1935年多一倍的糖。工业也是如此。斯达汉诺夫大概已超过现行技术定额10倍，甚至10倍以上。如果把他所达到的这种成绩宣布为全体风镐采煤工人的新技术定额，那就不合理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规定一个介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同志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现行技术定额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些定额已经落后而变成阻碍我国工业的东西了，所以，

为了不致阻碍我国工业，必须用新的较高的技术定额来代替它们。既然有了新的人才，到了新的时期，也就应当有新的技术定额。

4. 最近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我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

为了突出重点，我们把它归结为两个最近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它扩大和深入到苏联各州各区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所有墨守成规、◇72◇不愿前进、一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的分子。为了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全力推广到我国各地，单靠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身，当然是不够的。一定要我们的党组织也参与这件事，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运动进行到底。顿涅茨克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显然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莫斯科州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其他各州的情形怎样呢？其他各州大概还正在“动起来”例如，关于乌拉尔就没有听到或者很少听到有什么动静，虽然大家都知道乌拉尔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在西伯利亚西部和库兹巴斯也是如此，那里的人大概也还没来得及“动起来”呢。然而，不容置疑，我们的党组织一定会担负起这件工作，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顽固的保守分子的问题，那就比较复杂一些了。首先必须进行说服，用同志的态度来耐心说服工业方面的这些保守分子，使他们相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进步性和用斯达汉诺夫精神改造工作的必要性。如果说服不了，那就只得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例如拿交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不久以前，在这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有一些教授、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其中也有共产党员,硬说每小时 13—14 公里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到了

极限，如果不想违反“运营科学”，就不能超过这个极限。这是颇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口头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观点，并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发出种种指示，而且他们本来就是铁路运营人员中的“权威”。我们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根据铁路事业方面许多实际工作人员的建议，也奉劝过这些有威信的教授说，13—14 公里的速度，决不能当作极限，在工作纽织得当时，是可以超过这个限度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改变◇73◇态度，反而拚命反对铁路事业方面的先进分子，加紧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当然，我们只好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轻轻打击一下，并客客气气地请他们离开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是每小时 18—19 公里了。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里，如有绝对必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只有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不停止妨碍和阻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行为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帮助另外一种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改造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领导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些人并不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他们是同情这个运动的，但他们还不会改造他们的工作，还不会领导这个运动。同志们，我应当说，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在我国是不少的。而只要我们帮助这些同志，这些同志在我国是一定会更加多起来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切实执行这些任务，那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会非常猛烈地开展起来，就会普及到我国各州各区去，而向我们显示出新成就的奇迹来。

5. 简单的几句话

关于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还要说几句话。列宁教

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74◇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我决不否认，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这里，在会上，向我们政府领导人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政府领导人，也向你们，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同志们，谢谢你们的指教，非常感谢！

最后，关于应当如何纪念这次会议的问题，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我们主席团这里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必须给这次政府领导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领导者的会议留下某种纪念。最后我们决定，呈请授予你们中间 100—120 人以最高的奖赏。

喊声：对。

斯大林：同志们，既然你们赞成，那我们就这样办吧。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 11 版
第 531—544 页◇75◇

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2 月 1 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们在收割战线上取得的成绩。你们的成绩是不小的。我们全国联合收割机的收割量在一年中平均增加了一倍，这个成绩不小。尤其是在我国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还很少的条件下，这个成绩就更为重要了。我国历来就缺乏有技术素养的干部，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技术干部，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既然我们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把昨天的农民子女培养成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定额的优秀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那就是说，我们培养技术干部的事业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是的，同志们，你们的成绩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你们完全应该受到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祝贺。

现在让我来谈本题。

我们这里常有人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谷物问题。如果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这当然是对的。今年我们收获了 55 亿普特以上的谷物。这些谷物足够充分供应居民食用和留足为应付一切意外情况所必需的储备。这在今天来说，当然并不算坏。但是我们不能只顾今天。我们还应当为明天，为最近的将来着想。如果从明天着眼，那么，已经得到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最近的◇76◇将来，比方说，再过三四年，我们需要多少谷物呢？我们需要不少于 70—80 亿普特的谷物。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可见，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使我们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使我们在这个期限以内，做好充分的准备，

去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在革命以前，我国年产谷物约40—50亿普特。这些粮食够不够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大家都以为是够的，因为每年都有约4—5亿普特的谷物往国外输出。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以便在最近的将来，在三四年以后，就把粮食的年产量提高到70—80亿普特。可见，这个差额是不小的。一个是40—50亿普特，一个是70—80亿普特。

这个差额从哪里来的呢？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增长呢？

这是因为我国已经不是过去，革命前的那个国家了。

首先，因为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工业和域市比过去至少扩大了一倍。现在我们的城市，城市居民，工业和在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比过去至少多了一倍。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从农村中抽出了数百万劳动者到城市去当工人和职员，现在他们和其他工人一道推进我国工业。这就是说，过去在农村中生产粮食的数百万劳动者，现在自己不仅不生产粮食，反而需要从农村给他们运来粮食。我国的城市还要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还要增加。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过去我们的经济作物比现在少。现在我们生产的棉花就比过去多一倍。至于亚麻、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比过去要多得多。由此产生什么结果呢？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从事经济作物◇77◇生产的人不能充分地从事粮食生产。可见，必须为生产经济作物的人储存大量谷物，这样才可能使棉花、亚麻、甜菜、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日益扩大。如果我们想推进我国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就必须日益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第二个原因。

其次，我已经说过,过去我国年产40—50亿普特谷物。当时沙皇

的大臣常说：“自己吃不饱，但粮食还得要输出。”吃不饱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当然不是沙皇的大臣。吃不饱的人是2000—3000万农村贫民，他们真正过着忍饥挨饿的坐活，这样，沙皇的大臣才有可能把粮食往国外输出。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完全不同了。苏联政府是不会让居民挨饿的。我们这里消灭贫穷、失业和饥饿，已有两三年了，我们已经稳步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你们会问，2000—3000万挨饿的贫苦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进集体农庄去了，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正在胜利地建设自己的富裕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现在需要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来供应劳动农民食用，因为昨天的贫农，今天已是集体农庄里安居乐业的集体农庄庄员了，他们应该要有足够的粮食来建设自己的富裕生活。你们知道，他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而将来还会更多。

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样。

其次，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们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而这◇78◇样一来，要养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

这就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谈到了人和人对粮食的需求的增长。但是人的食品不仅限于粮食，他们还需要肉类、油脂。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增加，人口的普遍增加和富裕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使对肉类和油脂的需求增长起来。因此必须有组织得很好的畜牧业，喂养大量的大小牲畜，这样才有可能满足居民对肉类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一切都很明白。但是，如果没有饲养牲畜的大量谷物储存，要发展畜牧业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不断增长和不断发展的谷物业才能为畜牧

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这就是我国对谷物的需求大大增长的又一个原因。

同志们，这些就是使我国面貌发生根本改变的原因，就是我们提出在最近的将来把谷物年产量提高到 70—80 亿普特的迫切任务的原因。

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是的，我们能够完成，这是无可怀疑的。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些什么要求呢？

首先，要求我们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不是小经济而是大经济。为什么一定要大经济呢？因为只有大经济才能运用现代化技术，只有大经济才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知识，只有大经济才能得当地使用肥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个体小经济是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大经济是通过一小群土地占有者发财致富和多数农民破产而形成的。在那里，破产农民的土地通常都转到富裕的土地占有者手里，而农民自己为了不致饿死，就去给这些土地占有者当奴仆。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道路，是造成破产◇79◇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我们走上了在农业中建立大经济的另外一条道路。我们走上了把小农户联合成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的道路，这样就可以用集体劳动来耕地并利用大经济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可能性。这就是集体农庄的道路。现在我们这里大经济的集体农庄形式是不是我国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呢？是的。现在我们的集体农庄大约联合了全体农民的 90%。可见，农业中的大经济，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集体农庄经济，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

第二，要求集体农庄即我国的大经济要有足够的好地。我国的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土地呢？是有的。你们知道，沙皇、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已经交给集体农庄了。你们知道，这些土地已经永远归集体农庄使用了。可见，集体农庄有足够的好地来大力发展谷物生产。

第三，集体农庄要有充分的技术装备，拖拉机、农业机器、联合收割机。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单靠手工劳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见，要有丰富的技术装备，集体农庄才能发展谷物生产。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技术装备呢？是有的，而且这种技术装备还会愈来愈多。

最后，集体农庄要有会应用技术、掌握技术和精通技术的人才、干部。集体农庄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干部呢？是有的。当然，还不多，但是毕竟有了。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是优秀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他们只是集体农庄所拥有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大军的一小部分，这就证明，这样的干部在集体农庄里已经产生了。当然，象他们这样的干部数目还不多，同志们，我们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无可怀疑，我们这些干部数目的增长将不是以年月◇80◇计而是以日时计的。

由此可见，我们要在最近的将来使谷物年产量达到 70—80 亿普特所必需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上面所谈的迫切任务是绝对可以完成的。现在，主要的是要抓干部问题，要训练干部，帮助技术落后的人掌握技术，不断地培养能够掌握技术并推动技木向前发展的人才。同志们，目前主要的一点就在这里。

对于联合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手应当特别注意，你们知道，谷物业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收割。收割工作是有季节性的，它不容许拖延。及时收割就是成功，收割晚了就是失败。联合收割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及时收割庄稼。同志们，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但是，联合收割机的作用还不限于这一点。它的作用还在于它能使我们避免巨大的损失。你们知道，用摇臂收割机收割会便谷物遭受巨大的損失。先割下来，再捆起来，再垛起来，然后才把庄稼运到脱粒机场地，——这一切过程都有损失。谁都承认，用这种方法收割，我们损失的庄稼约为 20—25%。联合收割机的巨大作用就在于它能把这些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内行的人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用摇臂收割机收割,比用联合收割机收割每公顷要少收 10 普特。拿 1 亿公顷谷物播种面积来说（大家知道，我们的实际播种面积要多得多），用摇臂收割机收割要损失 10 亿普特的谷物。如果我们在这 1 亿公顷的面积上用联合收割机收割，而联合收割机工作得不坏，那就会多收整整 10 亿普特谷物。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数目是不小的。

这就是联合收割机和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的人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农业方面采用联合收割机，培养大批男◇81◇女联合收割机手这种干部，是首要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我在结束讲话时想提出一个希望，希望我们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的人数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希望他们学习联合收割机的技术，并把它教给自己的同志，最后，希望他们成为我国农业方面的真正胜利者。

同志们！还有两句话。我们主席团经过商谈，认为应当呈请授予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以最高的奖赏——勋章，以表扬他们出色的工作。同志们，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天内就办理这件事情。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219—225 页◇82◇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

（1935 年 12 月 4 日）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委托我向你们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主席团准备呈请授予这次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以最高奖赏——勋章，表扬他们出色的工作。

第二，政府决定赠给每个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集体农庄一辆载重汽车，并且赠给这次会议的每个参加者一台留声机、一些唱片和一只表：给男同志怀表，给女同志手表。

大家都对我说，我应当讲几句话，

还要说什么呢？什么都说过了。

显然，你们那里的棉花生产一定会顺利进行，这一点从我们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了。你们那里，集体农庄正在日益发展，人们都有工作的愿望，机器我们会供给的，肥料你们也能得到，各种必要的帮助我们都会给的，这一点，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了。因此，你们那里的棉花生产一定会顺利进行，生活一定会日益丰裕。

但是，同志们，有一件东西，却比棉花更加珍贵，这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这次会议，你们的发言和你们的工作，都说明我们伟大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巩固。同志们，这是十分◇83◇重要和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情。在过去，沙皇、资本家和地主掌握我国政权。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使俄罗斯民族一个民族成为统治的民族，而所有其他民族成为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这是野蛮的弱肉强食的

政策。1917 年 10 月，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当时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父亲和培育者伟大的列宁说，从今以后不应当再有统治的民族和被统治的民族，各民族都应当是平等和自由的。从而，他就埋葬了旧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宣布了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友谊的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政策。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 18 年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政策的良好成果。这次会议就清楚地证明：过去苏联各族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早已不存在了，互不信任已经由互相完全信任来代替，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发展和巩固。同志们，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所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因为只要这种友谊存在，我国各族人民就会是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只要这种友谊存在并永远保持下去，那么，任何人，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敌人，都吓不倒我们。同志们，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译自《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的讲话。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先进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47 年版第 13—15 页◇84◇

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

（1936 年 3 月 1 日）

霍华德：您认为，日本最近所发生的事变[①]，对远东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大林：现在还难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太少。情况不够清楚。

霍华德：如果日本决定真要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

斯大林：如果日本决定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侵犯它的独立，我们就要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李维诺夫的助手斯托莫尼亚科夫，不久以前已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作了这种声明，指出了自 1921 年以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忠实的友好关系。我们在 1921 年帮助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将给它同样的帮助。

霍华德：这样说来，日本占领乌兰巴托的企图，是不是会引起苏联的正面行动？

斯大林：是的，会引起的。◇85◇

霍华德：最近几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地区，日本人是否有某些会被苏联看作侵略的行动？

斯大林：日本人似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附近继续集结军队，可是，暂时还看不出有某种引起边界冲突的新企图。

———————————————

① 1935 年 2 月 26 日日本一批“皇道派”法西斯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通称二二六事件。——编者注

霍华德：苏联担心德国和波兰对苏联有侵略意图，并担心它们准备实行军事合作来促进这一意图的实现。但是同时，波兰声明它不愿意让任何外国军队利用它的领土作为反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的基地。苏联是怎样设想德国方面的进攻的呢？德军会从哪些阵地出发，沿什么方向行动呢？

斯大林：历史告诉我们，当任何国家要同其他甚至不接壤的国家作战的时候，它就着手寻找可以到达它所要进攻的那个国家边境的边界。侵略国通常总是找得到这种边界的。它或者借助武力来找到这些边界，如1914年德国侵入比利时以袭击法国那样；它或者采取“假道”的办法，如1918年德国对拉脱维亚所作的那样，当时它企图经过拉脱维亚进攻列宁格勒。我不知道德国究竟能用哪些边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想，愿意给德国“假道”的人是可以找到的。

霍华德：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您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斯大林：这是不能预言的。战争可能突然地发生。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阵地正在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他们掌握着象国际联盟这样一些工具。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长处。他们的力量，是在于他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来进行他们的反战活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是◇86◇愿意战争的。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短处。但是，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下决心从事战争冒险，作绝望的挣扎。

法苏互助条约已由法国众议院批准，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事业的最新胜利之一。这一条约对于敌视和平的人们是一种障碍。

霍华德：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它会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首先爆发呢？战争的乌云在哪里最浓厚呢？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呢？

斯大林：我以为有两个战争危险的策源地。第一个策源地在远东，在日本地区。我是根据日本军人屡次发出威胁其他国家的言论而这样说的。第二个策源地在德国地区。很难说哪一个策源地威胁最大，可是两个都存在着，都活动着。同这两个基本的战争危险策源地比较起来，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不过是枝节事件。现在表现得最积极的是远东的战争危险策源地。但这个危险中心，也可能移到欧洲来。不久以前，希特勒先生和法国一家报纸记者的谈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希特勒似乎想讲些爱好和平的话，可是他在“爱好和平”的言论当中夹了这么多的威胁法国和苏联的话，结果所谓“爱好和平”就一点也没有了。您看，就是当希特勒先生想谈和平的时候，也离不开威胁。这就是征兆。

霍华德：在您看来，目前战争危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斯大林：是资本主义。

霍华德：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哪些现象呢？

斯大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掠夺现象。

您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发生的。它是由于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现在也是这么回事。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87◇为，他们在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原料产地、市场等等时，分得少了，于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想再重分一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了一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方法的制度了。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这样说，实质上却是这样的。

霍华德：您是否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根据担心苏联会决定用暴力强迫其他民族接受苏联的政治理论呢？

斯大林：这一类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您以为苏联人要亲自、甚至是用暴力去改变周围国家的面貌，那您就大错特错了。苏联人当然愿意周围国家的面貌能够改变，但这是周围国家自己的事情。如果周围国家真正很稳固，我看不出这些国家会觉得苏联人的思想是危险的东西。

霍华德：您这种声明是否就是说，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它进行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呢？

斯大林：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类计划和意图。

霍华德：斯大林先生，我觉得，世界上却久已造成另外一种印象了。

斯大林：这是出于误会。

霍华德：悲剧的误会吗？

斯大林：不，喜剧的。或者可以说是悲喜剧的误会。

不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发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发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來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例如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于是就进行了革命，而现在我们在建设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但硬说我们要在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要干预它们的◇88◇生活，那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杜撰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的主张。

霍华德：在苏联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罗斯福总统和李维诺夫先生曾经就宣传问题交换过同样的照会。李维诺夫先生给罗斯福总统的信的第4条说，苏联政府负有以下的义务：“任何组织或集团，凡以颠覆或准备颠覆，或使用暴力变更整个美国或其任何一部分、任何领土或领地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为目的者，均不许其在本国境内成立或居留，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组织或集团或其代表或负责人员在本国境内进行活动。”斯大林先生，我请您解释一下，如果履行这条义务和苏联的愿望不合，或不在苏联权力以内，李维诺夫先生为什么要在这封信上签名呢？

斯大林：履行您所引证的这条义务，是我们权力以内的事，我们履行了并且今后将继续履行这条义务。

根据我们的宪法，政治侨民在我国境内有居留权。我们给他们避

难权，正如美国给政治侨民避难权一样。很明显，李维诺夫在那封信上签名，是从双方都必须履行信中所载明的这项义务出发的。霍华德先生，如果在美国境内有俄国白卫分子流亡者在进行反对苏联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宣传，而这些流亡者却得到美国公民物质上的帮助，有时并且成为恐怖团体，您是否认为这同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相抵触呢？显然，这些流亡者享受着在美国也有的避难权。至于我们方面，我们是从来不容许在我国境内有任何恐怖分子存在的，不管他的罪恶行为是反对什么人。看来，对避难权的解释，在美国要比在我国广一些。好吧，我们不抱奢望。

或许您会不同意我，说我们对于这些来到我国境内的政治侨民表示同情。但是，难道没有美国公民同情宣传拥护资本主义、反对苏联的白卫分子流亡者吗？那么，这里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89◇呢？问题就在于不应当帮助他们，不应当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的活动，问题就在于两国负责人员不应当干预别国的内部生活。我们的负责人员忠实地履行了这项义务。他们之中如果有谁犯了过错，就对我们说吧。如果走得太远，要求从美国驱逐出所有白卫分子流亡者，那就是侵犯了美国和苏联都宣布了的避难权。这里应当承认，在提出要求和反要求时是有一定的合理界限的。李维诺夫并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国家代表的资格在他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字的；罗斯福总统的签字，同样也是如此。他们的协定，是两个国家的协定。不论是李维诺夫，还是罗斯福总统，他们作为两国代表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时，都考虑到本国代理人的活动，这些代理人不应当而且将不去干涉对方的内政。这个协定不能触犯两国所宣布的避难权。应当在这个范围内解释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两个国家的代表的协定。

霍华德：但是，美国代表白劳德和达西不是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吗？

斯大林：老实说，我不记得白劳德和达西两位同志的发言，甚至

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也许他们说过这类话。但是，美国共产党并不是苏联人创立的，它是美国人创立的。它在美国是合法存在的，它在选举时有自己的候选人，包括在总统选举时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如果白劳德和达西两位同志在莫斯科只作过一次演讲，那么，他们在美国本国，这类讲演已作过几百次，而且甚至讲得更激烈些。须知美国共产党是可以自由宣传他们的思想的。认为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应当由苏联政府负责，那是完全不正确的。

霍华德：是的，但是现在谈的是，美国共产党人在苏联境内活◇90◇动是违反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第四条的。

斯大林：什么是共产党的活动，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共产党的活动通常就在于组织工人群众、组织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罢工等等。很明显，美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在苏联境内进行这一切事情的。在我们苏联没有美国工人。

霍华德：我是否可以把您的声明理解为对相互义务可以找到这样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我们两国间良好关系得以保障并持续下去呢？

斯大林：是的，绝对可以的。

霍华德：您承认，共产主义社会在苏联还没有建成。建成了国家社会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都说它们也获得了类似这样的成绩。破坏个人自由，以及使人民忍受其他种种贫困以利于国家，是不是所有上述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呢？

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许多人把这个名词理解成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富的一部分，有时是很大的一部分，转入国家手中或受国家监督，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厂及土地的所有权却留在私人手里。许多人就是这样来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时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名词掩饰下，为了准备战争或进行战争，把一部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管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社

会，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工具的私有制已被取消，而代之以公有制。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91◇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无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也好，无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也好，和这种社会毫无共同之点。首先是因为工厂、土地、银行、运输业等等方面的私有制，在上述两个国家里都没有受到触动，所以，德国及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依然完全存在。

是的，您说得对，我们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建成这种社会是并不那么容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您大概是知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某些财产上的不平等。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失业，已经没有剥削，已经没有民族压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有劳动的义务，虽然人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因此还存在着工资，而且工资是不相等的，有差别的。只有将来创立了这样一神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由社会方面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而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

您说，为了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牺牲过个人的自由，忍受过贫困。在您的问题里面透露出一种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认个人自由的。这是不正确的。当然，要建立某种新东西，就必须自己节约一些，积蓄资金，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向别人借贷。如果您要建造一座新房屋，您就要积蓄金钱，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否则，房屋是建筑不起来的。说到建立人类的整个新社会，那就更要这样了。我们曾不得不暂时节约某些消费，积蓄相当◇92◇的资金和集中力量。

我们正是这样办了的，所以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我们建成这一种社会，并不是为了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使个人真正感觉到他是自由的。我们建成这种社会，是为了真正的个人自由，为了不带引号的自由。我很难设想，一个饿着肚子、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人，会有什么“个人自由”。只有在消灭了剥削的地方，在没有人压迫人的地方，在没有失业和贫穷的地方，在人们不担心第二天会失去工作、住宅和饭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能够有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个人自由和其他任何自由。

霍华德：*您是否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是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的呢？*

斯大林：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然而这一个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苏维埃制度不会转变为美国的民主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地共处的。

霍华德：*苏联正在起草新宪法，这个宪法要规定新的选举制度。既然将来在选举中仍旧同以前一样只有一个政党活动，那么这种新制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情形呢？*

斯大林：我们大概要在今年年底通过我们的新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并且应当很快就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已经宣布过，依照新宪法，我们将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您感到不安的是，将来在选举中只有一个政党活动。您看不出，在这些条件之下会有怎样的竞选。很明显，将来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将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各种非党的社会团◇93◇体。这种团体我们有好几百个。我们没有彼此对立的政党，正象我们没有彼此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和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一样。我们的社会，仅仅由城乡自由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这些阶层中的每一阶层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经过现存的很多社会团体反映这种利益。可是既然没有阶级，既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别，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没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

在民族“社会主义”下，也只存在着一个政党。但是这种法西斯的一党制是行不通的。问题在于德国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依然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总是要爆发出来，其中也包括在代表对立阶级的政党的斗争方面爆发出来，正如它在西班牙已经爆发出来一样。意大利也只有一个法西斯党，但是也因为上述原因，在意大利也行不通。

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普遍的呢？因为全体公民，除了被法庭判决剥夺选举权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平等的呢？因为财产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还部分地存在），种族和民族的不同，都不会造成任何特权或带来什么损害。妇女将和男子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的选举将是真正平等的。

为什么要无记名呢？因为我们要使苏联公民完全自由地选出他们所要选的人，选出他们托付来保障他们利益的人。

为什么要直接选举呢？因为在当地直接选举一切代表机关，直至最高机关，能够更好地保障我们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劳动◇94◇者的利益。

您认为不会有竞选。可是竞选一定会有，而且我预料会很热烈。我们有不少机关工作做得不好。有时某个地方政权机关，不善于满足城乡劳动者各方面的与日俱增的需求。你有没有建立好的学校呢？你有没有改善居住条件呢？你是不是一个官僚呢？你有没有帮助我们，使得我们的劳动功效更大，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文明呢？这将是一种标准，千万选民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候选人，抛开不适当的候选人，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中取消，提出最优秀的人来充当候选人。是的，竞

选将是热烈的，它将围绕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主要是实际的、对于人民有头等意义的问题来进行。我们新的选举制度，将对一切机关和团体起督促作用，促使它们改善自己的工作。苏联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我认为，我们苏联新宪法，将是世界上一切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

康·乌曼斯基记录

译自1936年3月5日《真理报》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别利亚科夫时的讲话①

（报道）

斯大林同志谈到了苏联英雄特有的品质，谈到了我们的飞行员，他们普通而平凡，但从他们中将会涌现出英雄。勇敢和无畏是苏联英雄不可缺少的品质。而飞行员正是意志坚定、性格刚强和甘冒生命危险这些特点的集中体现。

但是，斯大林同志说，勇敢和无畏只是英雄主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要有本领。常言道，凭勇敢可以攻下城市。然而，只有把勇敢、无畏、甘冒生命危险的决心同优异的知识结合起来，这一点才能实现。斯大林同志指出："安特—25"型飞机全体机组人员——契卡洛夫同志、拜杜科夫同志和别利亚科夫同志——把高度勇敢和无畏的精神同运用最新技术成就的知识和本领非常成功地结合起来了。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不时被全场热烈的欢呼声所打断，他在讲话结束时提议：◇96◇

为苏联英雄契卡洛夫、拜杜科夫、别利亚科夫，为在座的苏联英雄格罗莫夫、沃多皮亚诺夫、斯列普尼奥夫，为那些普通飞行员和优

——————————————

① 苏联飞行员瓦·巴·契卡洛夫、格·菲·拜杜科夫、亚·瓦·别利亚科夫于1936年7月20—22日完成了莫斯科—堪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乌德岛(现名契卡洛夫岛)的不着陆飞行，7月24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次招待会是为了表彰他们的飞行成就于1936年8月13日举行的。——编者注

秀飞行员——现在还不知谁是普通飞行员，谁是优秀飞行员，这将在实际中证明，为科基纳基——他这次意外地没当上苏联英雄，但是我向他预告，他会当上的——干杯！

译自1936年8月14日《真理报》

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何塞·迪亚斯的电报

马德里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何塞·迪亚斯同志

苏联劳动人民给予西班牙革命群众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知道，使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全体先进和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约·斯大林

译自1936年10月16日《真理报》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同志们！

大家知道，提出宪法草案来给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委员会，是根据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成立的。这个决议在 1935 年 2 月 6 日通过，决议说：

“1.按以下方针修改苏联宪法：

（一）使选举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选举来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来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来代替记名的选举；

（二）更准确地规定宪法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宪法适合苏联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建立，富农已被粉碎，集体农庄制度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苏联社会的基础，等等）。

2.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宪法委员会，委托宪法委员会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原则起草宪法的修改草案，然后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3.苏联苏维埃政权机关下届选举，应根据新选举制举行。”

这是 1935 年 2 月 6 日的事。在通过这个决议的第二天，即 1935

年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为◇99◇执行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责成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

这就是宪法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正式依据和苏联最高机关的指示。

因此，宪法委员会修改1924年通过的规行宪法，应当估计到从1924年到现在苏联生活中取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进展。

二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在1924—1936年这一时期内，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哪些变化须要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出来呢？

这些变化的实质何在呢？

我们在1924年的情形怎样呢？

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尽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造成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当时的任务是要在这一竞赛过程中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完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

当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状况很不好。固然，它在慢慢恢复起来，可是生产量远未达到战前水平，它建立在落后的贫乏的旧技术的基础上。当然，它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我国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约占80%。可是，资本主义成分在◇100◇工业中占的比重，毕竟还不少于20%。

当时，我国的农业更不成样子。固然，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可是，农业资本家阶级，即富农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整个说来，农业好象是无数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汪洋大海，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老实说，它们当时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薄弱，而富农却还有力量。我们当时还没有说消灭富农，而是说限制富农。

国内商品流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只占约 50—60%，而其余的地盘还被商人、投机者和其他私人占据着。

1924 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 1936 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当时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

首先来看我国的工业。我国工业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力量薄弱和技术设备不好的工业了。恰巧相反，它现在建立在丰富的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十分发达的重工业以及更发达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而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工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 6 倍多这一事实，是不能看作一件小事的。◇101◇

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

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2—3%。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有了316000台拖拉机，共570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40多万台拖拉机，共758万马力。

至于国内商品流转，商人和投机者已经被我们从这方面完全驱逐出去了。现在全部商品流转都已掌握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手中。新的苏维埃的商业，没有投机者参加的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已经产生而且发展了。

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而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由于苏联国民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一切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不会有危机和失业，不会有贫困和破产，而公民们有一切可能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

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我国**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就是如此。

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102◇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

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譬如说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例如拿苏联工人阶级来说。人们往往照旧叫它无产阶级。但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就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級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把我国工人阶级叫作无产阶级吗？当然不可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粉碎资本家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消灭。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解放自己的这些条件◇103◇吗？绝对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完全新的阶级，已经变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立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引导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联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来谈农民问题。人们通常都说，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它的成员好象一盘散沙，分布在全国的地面上，各人单独地在自己的小经济范围内用落后的技术埋头种地，他们是私有制的奴隶，是遭到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贷者等等肆意的剥削的。的确，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就其基本群众来说，正是这样的阶级。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农民，苏联农民，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与这样的农民相像的呢？当然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农民在我国已经没有了。我们苏

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其次，我们苏联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农庄农民，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财产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和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最后，我国农民的经济基础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苏联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那种旧的顽固的知识分子，那◇104◇种企图使自己超脱各阶级，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血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首先，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势必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势必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关于苏联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形，如果不说一说还有一方面的变化，那是不完全的。我指的是苏联**民族**相互关系的方面。大家知道，苏联约有 60 个民族和民族集团。苏维埃国家是多民族的国◇105◇家。因此很明显，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不能不具有头等的意义。

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 1922 年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它是根据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成的。1924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苏联第一个宪法。那时，各族人民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离心力还继续发生作用。当时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的基础上调整各族人民的兄弟合作关系，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看到这项事业的困难。它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它看到了旧奥匈帝国瓦解的经验，但它毕竟进行了创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因为它知道，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能够经得住所有一切考验。

从那时起，已经有 14 年了。为了审查这一实验，这样一个时期已经足够长了。结果怎样呢？过去这一时期，毫无疑义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是完全成功了。这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

为什么会有这个胜利呢？

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

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106◇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

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完全形成的、经住了一切考验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各民族相互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苏联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的总结。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苏联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什么反映呢？

换句话说，提交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宪法委员会受委托修改1924年宪法的条文。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宪法的新条文，即苏联新宪法草案。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草案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现在已经获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107◇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反映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呢？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以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为基础呢？完全应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了的东西。

可是，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式作为通行的原则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虽然它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能以现在还没有、还应当争取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基础呢？当然不能，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苏联还没有实现而应当在将来实现的东西。如果不愿意使宪法变成纲领或关于将来的成就的宣言，那就不能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在当前历史时期的范围。

这样，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通常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这一信念为出发点的。这些宪法的主要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存在；在社会的一个极端是多数劳动者受冻挨饿，而在另一个极端是少数不劳而获的人奢侈挥霍；以及其他等等。各资产阶级国家的◇108◇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这种准则为依据的。它们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

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有得到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新宪法草案就是以社会主义的这些准则为依据的。它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二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社会是由彼此对抗的阶级，即占有财富的阶级和没有财富的阶级组成的；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都应当属于资产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有产阶级愿望并有利于有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是：社会上已经不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劳动者愿望并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三个特点。◇109◇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各民族和种族彼此不能平等；有享受完备权利的民族，也有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此外,还有第三种民族或种族，例如殖民地的民族或种族，他们享受的权利要比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还要少。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宪法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宪法，即统治民族的宪法。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权利平等。它的出发点是，各民族和种族在肤色或语言、在文化水平或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任何区别，都不能成为替民族不平等现象辩护的根据。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四个特点。

新宪法草案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宪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宪法直接否认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实上把它们化为乌有。另一类宪法很乐意地接受、甚至标榜民主原则，但同时加上许多附带条件和限制，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残缺不全。它们说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期限、教育程度以至财产资格来加以限制。它们说公民有平等权利，但同时又加上附带条件，说这不涉及妇女，或只涉及一部分妇女。如此等等。

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类附带条件和限制。它根本不分什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所有公民都是积极的。它不承认男性和女性、“定居者”和“暂居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有权利上的差别，认为所有公民◇110◇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每个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不是财产状况，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别，不是职位,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劳动。

最后，新宪法草案还有一个特点。资产阶级的宪法通常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不注意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实现这些权利的可能，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它们空谈公民平等，可是忘记了，既然资本家和地主在社会上有财富和政治势力，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财富和政治势力，既然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农民是被剥削者，

那么厂主同工人、地主同农民，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它们空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可是忘记了，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适当的集会场所、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那么这些自由对于工人阶级就会变成空话。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仅仅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仅仅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证劳动权。它不仅仅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因此，很明显，新宪法草案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常的”“公认的”一般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各个基本特点。

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进展和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上的反映。◇111◇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现在来说一说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怎样对待宪法草案的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外国报刊反映各资产阶级国家里各阶层居民的舆论，所以我们不能不来说一说这些报刊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从外国报刊对我国宪法草案的最初反应看，它们有一种不理睬这个草案的倾向。这里我指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报刊。这种批评家认为最好是干脆不理睬宪法草案，似乎天地间根本没有过、根本就没有这

个宪法草案。也许有人说，不理睬不是批评。但这是不对的。不理睬作为一种特别的藐视办法，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毕竟是一种批评方式。可是，他们采取隐瞒手段，并没有发生效果。最后，他们不得不打开闷葫芦，告诉世界说，真痛心，苏联宪法草案毕竟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蛊惑人心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还有舆论，有读者，有活人，他们想知道事实的真相，要长期硬是欺骗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的。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第二种批评家承认宪法草案确实存在于天地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它事实上不是宪法草案，而是一纸空文，是用来玩弄某种手腕和欺骗人们的空洞诺言。同时他们又说，而且苏联也不能拟出较好的草案，因为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苏联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宪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批评家的典型代表，说来奇◇112◇怪，就是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该杂志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诺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①]。它毫不犹豫地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这种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俄国伟大作家谢德林在他的一篇寓言故事[②]中，描写了一个刚愎

———————————————

① “波将金的村落”是指装饰门面借以骗人的东西。格·亚·波将金是沙皇俄国的将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1783 年策划把克里木并入俄罗斯，因此被授予塔夫利达公爵的封号。据传说，1787 年他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为了向女皇显示新兼并的克里木的繁荣，在沿途搭起了许多假的居民点、粮仓、堡垒等建筑物。——编者注

② 指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位励精图治的长官怎样因为热心害得上司发愁的故事》。——编者注

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的官僚的典型。这个官僚在他“管辖的”地區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著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他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

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苏联象灯塔一样屹立着已经有19年了，它用解放的精神感染全世界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气得发狂。而它，这个苏联,却不仅存◇113◇在，而且日益成长，不仅日益成长，而且日益繁荣，不仅日益繁架，而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制定了使各被压迫阶级精神焕发、满怀新希望的草案。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又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

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我可不知道，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来说，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

至于说苏联宪法好象是空洞的诺言，好象是“波将金的村落”等等，那我就要援引一系列确定不移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在1917年，苏联各族人民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从前属于地主、官府和寺院的15000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民，而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不在内。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阶级，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工厂、铁路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宣布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财产,派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领导这些企业。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114◇

其次，苏维埃政权按社会主义的新原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了工业和农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现在苏联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50%，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6倍，而国民收入则比战前增加了3倍。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最后，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不是诺言，而是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把已经取得积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关于“波将金的村落”的废话，如果不是为了对人民隐瞒苏联真相，使人民陷入迷途，欺骗人民，试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就是如此。而事实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是改变不了的。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也许会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可是，那时就可以用俄国一句著名的谚语来回答他们：“傻子是不讲道理的。”

第三种批评家不反对承认宪法草案有相当多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是一种好现象，但看来很怀疑草案中许多条文能够实现，因为

他们确信这些条文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纸上空文。如果说得客气一点，这就是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各国都有的。

应当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当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杯疑论者就说过：布尔什维克也许不是坏人，但掌握政权这件事他们是办不好的，他们一定会失败。可是事实上◇115◇失败了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怀疑论者。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种怀疑论者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当然是不坏的东西，但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又加上外国人，大概会战胜这个政权的。可是事实上怀疑论者就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

在苏维埃政权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怀疑论者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能实现，五年计划的事布尔什维克大概是搞不成的。但事实又证明怀疑论者倒霉：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了。

关于新宪法草案以及怀疑论者对这一草案的批评也是这样。草案一公布，这种批评家就又跑出来发表他们那一套悲观的怀疑论，说宪法中有些条文未必能实现。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现在这一次，也会象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了那样遭到失败。

第四种批评家攻击新宪法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向右转”，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消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们用各种腔调说:“布尔什维克向右转了，这是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某些波兰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

对于这些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如果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这一点，竟被他们解释成不是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削弱这个专政，甚至放弃这个专政，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一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专政呢？如果用立法程序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固定下来，用立法程序把工业化、集体化和民主

化的成就固定下来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竟是“向右转”，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究竟知道不知道，左和右的◇116◇区别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些老爷在批评宪法草案时头脑完全混乱了；既然他们头脑混乱了，就把左右都弄错了。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甩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啊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

最后，还有一种批评家。如果上面那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恰巧相反，这一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现状，没有触动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政党自由，而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一种批评家认为在苏联没有政党自由，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标志。

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说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117◇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

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它对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保护得不坏，这大概不能有任何怀疑吧。

人们谈论民主，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劳动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批评就是如此。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现在，我们来谈公民们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大家知道，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相当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苏联报刊上公布了。因为这些修改意见的内容很不相同，价值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改意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说的不是宪法问题，而是◇118◇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问题。关于保险事业的个别问题，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工业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财政的问题，——这就是第一类修改意见提到的问题。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人，大概没有弄懂宪法问题和日常立法问题的区别。正因为如

此，他们竭力要把尽可能多的法律塞到宪法里去，简直要把宪法变成一部法律汇编。可是，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既然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交到我国将来的立法机关去。

应当归入第二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企图把历史资料的成分，或者关于苏维埃政权现在还没有取得而将来应当取得的成就的宣言成分，载入宪法。要在宪法内指出党、工人阶級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多年来在为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克服了哪些困难，要在宪法内说明苏维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这一类修改意见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应当不采纳。宪法是把已经取得、已有保障的成果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曲解宪法的这一基本性质，我们就不应当使宪法通篇都是关于以往历史的资料，或关于苏联劳动群众将来成就的宣言。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和其他文件去说。

最后，应当归入第三类的是和宪法草案有直接关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这一类修改意见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文字上修改性质的。因此，可以把它们交给本届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我想代表大会◇119◇一定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委托它来最后审定新宪法全文的。至于第三类修改意见中其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比较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必须在这里说一说。

(1)首先谈一谈对宪法草案第 1 条的修改意见。共有四个修改意见。第一个意见主张用“劳动者国家”几字来代替“工农国家”。另一个意见主张把“工农国家”改为“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

第三个意见主张用“苏联境内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国家”来代替“工农国家”。第四个意见主张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

是否应当采纳这些修改意见呢？我认为不应当。

宪法草案第1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1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1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

这种情形会不会损害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呢？一点也不会！宪法草案第1条所说的并不是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而是这个社会的阶级成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其中包括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主要在宪法草案第十、第十一两章内说明了。从这两章内◇120◇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关于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会受损害，是根本谈不到的。

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也是这样。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已经写明，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民族的自由联盟。是不是需要在说明苏联社会阶级成分而不是说明苏联社会民族成分的宪法草案第1条里，重复这一公式呢？显然不需要。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的权利，在宪法草案第二、第十和第十一章内都已说明。从这几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

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损害。

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用“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同样是不正确的。第一，在农民中，除了集体农庄庄员，还有一百多万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农户。怎样处理他们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是不是想把他们去掉不算呢？如果这样，那就不合理了。第二，虽然大多数农民已经经营集体农庄经济，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个人经济，个人的园地等等了。第三，如果这样，那就也要用“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来代替“工”字了，但是，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议这样做。最后，难道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吗？如果他们还没有消失，那是不是应当把他们的固定名称从词典中删去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大概不是指现在的社会，而是指将来的社会，指将来已经没有阶级，而工人和农民都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社会。所以，他们显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制定宪法时，不应当从将来出发，而应从现在、从已有的事实出发。◇121◇宪法不可以、而且不应当跑到前面去。

(2) 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十七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把宪法草案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第十七条全部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是不正确的，因此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愿联盟。如果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一条从宪法上删去，那就违反了这个联盟的自愿性质。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做法吗？我认为不可以而且不应当同意这样做。有人说，在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的，所以第十七条没有实际意义。说在我们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这当然是对的。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当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同样，在苏联也没有哪一个加盟共和国会愿意压迫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应当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的一条从苏联宪法上删去。

(3) 再其次，有人提议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另外加上一条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可以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提议可以采纳吗？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个提议，不仅从内容来说不正确，而且从它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正确的。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不能以该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成熟程度为理由；同样，把某个共和国保留为自治共和国，也不能以该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为理由。如果这样，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鞑靼共和国还是自治共和国，而哈萨克共和国却成了加盟共和国，但这还不是说，从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哈萨克共和国高于鞑靼共和国。实际情形恰巧相反。例如，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从文化和经济方面来看，前者高于后者，但前者还是自治共和国。

究竟要具备哪些标志才有根据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呢？

这种标志有三个。

第一，这个共和国必须在边疆，而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加盟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一定要这个成了加盟共和国的共和国有可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只有同某一外国交界，即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的共和国。当然，我们没有哪一个共和国会在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可是，既然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必须使这个权利不致变成毫无意思的纸上空文。例如拿巴什基尔共和国或鞑靼共和国来说吧。假定这两个自治共和国改成了加盟共和国,试问，它们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四周都被苏联的共和国和州环绕着，老实说，它们就是要想退出苏联也无处可退。因此，把这些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是不正确的。

第二，这个民族在用它的名称命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人口中，必须是比较聚居而占多数的。例如拿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来说吧。它虽然是边疆共和国，但克里木鞑靼人在该自治共和国内并不占多数，反而是占少数。所以，如果把克里木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那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

第三，这个共和国按人口数量来说，必须不是一个很小的共和国，它的人口至少要在一百万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为人口◇123◇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 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 23、24、25、26、27、28、29 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 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 33 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124◇两院是不平等的。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比第一院有更多的权利，而且第二院照例不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往往是用上面指定议员的方式成立的。毫无疑问，如果两院平等，第二院也象第一院那样用民主方式成立，就不会有这种坏处。

(6) 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要求两院代表名额相等。我认为这个提议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来，这个提议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它强调两院的平等。

(7) 再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说民族院代表也应当象联盟院代表一样由直接选举产生。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可以采纳的。固然，这会在选举方面造成某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这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一定会提高民族院的威信。

(8) 再其次，是对第 40 条的补充，说应当赋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颁布临时立法文件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终究必须铲除不由某一个机关而由许多机关立法的情形了。这种情形同法律稳定性的原则相抵触。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

(9) 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 48 条的补充，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而由全国人民选举。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根据我国的宪法制度，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地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个人总统。苏联的总统是集体的，这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内。这个主席团不是由全国人民，而是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并应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历史经

验表明，建立最高机关的这种办法，◇125◇是最民主的，能够保障国家免于各种意外事故。

(10) 再其次，是对同一条，即第48条的修改意见。主张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增加到11人，使每个加盟共和国有一个副主席[①]。我认为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因为这会改善我们的事业，而且只会巩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威信。

(11) 再其次，是对第77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苏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我认为这个意见也应当采纳，因为把我国国防工业特别分出来，给它正式建立一个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觉得这只会改善我国的国防事业。

(12) 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124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根据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方针来修改这条宪法。我认为这个意见应当否定，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

(13)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我说的是对宪法草案第135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剥夺神职人员、过去的白卫分子、所有从前的显赫人物和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或者，无论如何应当限制这种人的选举权，只给他们选举权而不给他们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意见也应当否定。苏维埃政权从前剥夺不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选举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有一定期限的。有一个时候，这些人进行反对人民的公开战争，反抗苏维埃法律。关于剥夺他们选举权的苏维埃法律，是苏维埃政权对他们这种反抗的回答。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们已经把剥削阶级消灭，而苏维埃政权已经◇126◇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

① 这里指的11个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编者注

修改这种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呢？我认为已经到了。有人说这有危险，因为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某些过去的白卫分子、富农、神父等等，会钻进国家最高机关里来。但这里究竟有什么可怕呢？你怕狼，那你就不要到树林里去。第一，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卫分子或神父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第二，如果在某些地方人民竟会选举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那就证明我们的鼓动工作做得太坏，我们就理应受到这种耻辱；如果我们的鼓动工作真是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进行的，那人民就决不会容许这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混进自己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说，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叫苦，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等待用行政命令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7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

请看列宁在1919年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是怎样说的。让我来读一下：

“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是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剥削者，只是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127◇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

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①]的普遍选举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94页）[②]

看来是很清楚了。

对苏联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就是如此。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从进行了差不多5个月的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可以预料宪法草案是一定会被这次代表大会批准的。

再过几天，苏联就会有以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宪法了。

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几乎是用记录的体裁，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说明苏联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事实，和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在苏联胜利的事实。

这个文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诚实的人过去和现在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在苏联实现了。

这个文件证明，在苏联已经实现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里也完全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

现在，法西斯主义浊流污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128◇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苏联新宪法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苏联新宪法对

————————————————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8页。——编者注

于所有目前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

苏联新宪法对于苏联各族人民有更大的意义。苏联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而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却是他们斗争的总结，是他们在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战线上胜利的总结。走过了艰难和斗争的道路，现在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了斗争，他们是怎样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的大量鲜血没有白流，而是产生了应有的结果，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这就会在精神上武装我国工人阶级，我国农民，我国劳动知识分子。这就会推动他们前进，激发他们的理所当然的自豪感。这就会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员他们去进行新的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新胜利。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45—573页◇129◇

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的报告①

（1936 年 12 月 5 日）

同志们！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已经结束。由于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宪法最终稿的草案已经产生。这个草案已经分发给了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所以，全体代表已经了解这个草案了。

从草案可以看出，审定委员会一共作了 43 处修改。这些修改涉及宪法草案里的 32 条，对它们作了这样那样的改动，草案里的其余 114 条没有改动。

可以认为，43 处修改中，有六七处是多少带有实质性的修改。

这是些什么修改呢？

第一，是对第 8 条的修改。宪法草案中这一条的条文是：

“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固定给集体农庄无限期地使用，即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

本条新的条文改为：

“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固定给集体农庄**无代价**和无限期地使用，即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130◇

我认为，这一处修改很清楚，用不着解释。

第二处修改涉及宪法草案第 10 条。这一条旧的条文是：

“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用具和日常用品以及个人消费品和舒适品的个人所有，都受法律的保护。”

———————————————

① 斯大林是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第10条新的条文是：

“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用具和日常用品、个人消费品和舒适品的**个人所有权**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都受法律的保护。”

这一处修改很清楚，我觉得用不着作特别的解释。

第三处修改涉及第35条。本条旧的条文是：

“民族院由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自治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推举的代表组成；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推举10名，每一个自治共和国推举5名，每一个自治州推举2名。”

本条新条文是：

“民族院**由苏联公民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依下列名额选举：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选举代表25名，每一个自治共和国选举代表11名，每一个自治州选举代表5名，每一个民族专区选举代表1名。**”

这样，在本条中，两院无论从它们的代表名额，还是从它们产生的民主性质来说，都完全保持了平等。

第四处修改涉及第40条。本条旧的条文是，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秘书签字后公布。”

本条新的条文是：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31◇和秘书签字后，用**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公布。”

这一处修改很好懂，我看也用不着解释。

这样，法律将用11种文字公布。

第五处修改涉及第48条，按照旧的条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为4人，而按照新的条文，副主席依照加盟共和国的数目为11人。

第六处條改涉及第77条。这个修改是：除现有的各个全苏人民

委员部外，再成立一个新的人民委员部，即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这个修改也用不着解释。

最后，第七处修改，涉及第 49 条第 11 款。旧的条文是：

“主席团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的情况，宣布战争状态。”

新条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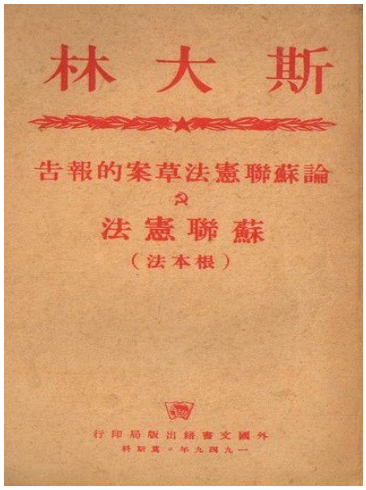
“主席团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情况**，宣布战争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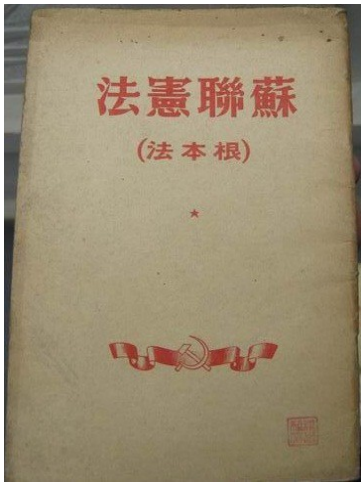
至于其余的修改，它们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纯粹文字上的修改，我认为用不着再作专门的分析。

总的结论：从苏联宪法的起草到最后润色，全民讨论无疑带來巨大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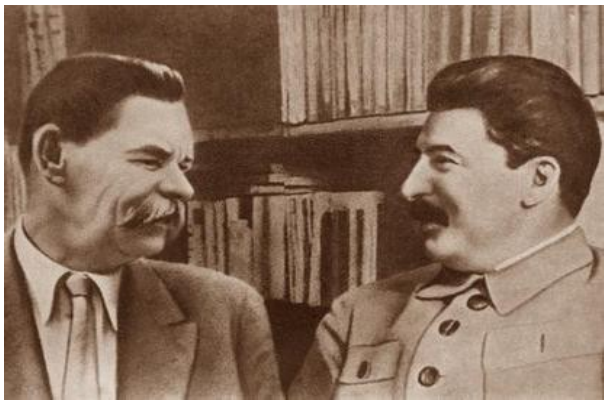
译自 1936 年 12 月 6 日《真理报》

参加讨论苏联宪法草案





苏联 1936 年宪法中文译本



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

斯大林和基洛夫在一起

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①]

卡瓦列罗同志：

我们的全权代表罗森贝格同志向我们转达了您的友好致意。他还告诉我们，您一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请允许我们对您的致意表示兄弟的感谢并向您表明，我们和您一样确信西班牙人民一定会胜利。

我们一贯认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西班牙政府是我们的义务，因为西班牙政府领导着全体劳动者、所有西班牙民主力量进行反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走狗——法西斯军事匪帮的斗争。

西班牙革命正为自己开辟一条和俄国走过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不相同的道路。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前提条件所决定的，是由不同于俄国革命所遇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比起俄国来，议会道路在西班牙很可能成为革命发展的更加有效的手段。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国内战争的经◇133◇验，如果适当地应用于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对西班牙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从这点出发，我们根据罗森贝格同志及时转达的您的一再请求，同意派一些军事工作人员由您使用。这些工作人员已得到我们的指示：他们应照您的通知去帮助西班牙的军事长官，向他们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

————————————

① 弗·拉尔戈·卡瓦列罗，1913—1937年任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1932—1935年任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1936年3月—1337年5月任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和陆军部长。据《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36—1939）》一书说，该书引用的这封信系录自苏联国家档案。——编者注

他们已受到断然的告诫：在充分意识到现在西班牙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充满着团结情谊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苏联工作人员在西班牙是外国人，只有在严格遵守顾问的工作范围，并且仅仅是顾问的工作范围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

我们认为，您会这样来使用我们的军人同志的。

我们请求您友好地通知我们，您交给我们的军人同志的任务，他们完成得如何，因为很自然，只有您方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他们继续留在西班牙工作才是适宜的。

我们也请求您直率地告诉我们您对罗森贝格的意见：西班牙政府对他是否满意，要不要派别的代表去替换他。

我们提出四项友好的建议供您考虑:

（1）应该注意农民，他们在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是举足轻重的，希望能颁布适应农民利益的土地和税收法令。还应该吸引农民参加军队，或在法西斯军队的后方组织农民游击队。颁布对农民有利的法令可以使这一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2）应该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要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并尽可能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分子。

（3）不应该把共和党的领导人推开，相反地，应该争取他们，◇134◇亲近他们,使他们和政府齐心协力。特别需要保证阿萨尼亚[①]及其集团对政府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不再摇摆。之所以需要这样，是为了避免西班牙的敌人把共和国看作共产主义的共和国，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对共和西班牙最危险的公开干涉。

————————————————

① 曼·阿萨尼亚，1931—1933 年先后任西班牙共和国陆军部长和总理，1934 年 4 月领导左翼共和党，1936 年 2 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任政府总理，1936 年 5 月—1939 年任共和国总统。——编者注

（4）可以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在报刊上声明，西班牙政府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在西班牙的外国人，即那些不支持叛乱分子的国家的公民的财产和合法利益。　　顺致

兄弟般的敬礼

斯大林

莫洛托夫

伏罗希洛夫

1930 年 12 月 21 日

译自《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1936—1939）》
1968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419—420 页◇135◇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1937 年 3 月 3—5 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①]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同志们！

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这里遇到的是下面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136◇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这就是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自然而然得出的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

① 这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于 1937 年 2 月 23 日—3 月 5 日举行，讨论了党组织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的任务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并决定把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开除出党。——编者注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我们的领导同志，具有同各种反党反苏维埃的派别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却表现得如此幼稚和盲目，不善于看清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不善于识别披着羊皮的豺狼，不善于扯下敌人的假面具，这是什么原因呢？

能不能断言，在苏联境内活动的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对我们说来可能是什么意外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不，不能这样断言。最近10年来，从沙赫特事件时期起，有正式文件记载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暗害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能不能断言，我们最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暗害、间谍或恐怖活动，没有发出过什么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这样的信号是发出过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它。

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就是第一个严重警告，说明人民的敌人将玩弄两面手法，他们在玩弄两面手法时将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伪装成党员，以便骗取信任和打入我们的组织。

“列宁格勒总部”审判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也一样，对于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又提供了新的根据。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审判案，扩大了前几次审判案◇137◇的教训，非常清楚地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把一切敌对的资产阶级分子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变成了德国警察暗探局进行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的代理人，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

洞察力则是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 1935 年 1 月 18 日发出的关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秘密信中，曾坚决地警告过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温厚宽容和庸俗的粗心大意。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温厚宽容，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这种右倾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并且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厚宽容，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要抓住‘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 1936 年 7 月 29 日发出的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中，再一次号召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谋、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138◇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这就是说，信号和警告都曾经发出过。

这些信号和警告号召什么呢？

它们号召克服党的组织工作的弱点，把党变成任何一个两面派分子都钻不进去的坚固堡垒。

它们号召克服掉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的态度，坚决扭转过来，大力加强这一工作，加强政治警惕性。

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我们的同志对信号和警告接受得太迟钝了。

审查和换发党证运动中尽人皆知的全部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警告和信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党的同志，尽管他们具有同反苏维埃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尽管发出过一系列的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可是对于人民的敌人的暗害、间谍和破坏活动仍然表现得政治上眼光短浅，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同志变得比以前坏了，变得觉悟性和纪律性都比以前差了呢？不，当然不是！

是不是他们开始蜕化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假定都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粗心疏忽、麻痹大意、温厚宽容、盲目无知，是从哪里来的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巨大成绩，简直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的一些很重要◇139◇的事实。他们忘记了苏联的国际坏境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看不见同以党证作掩护并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现在一些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直接有关的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二

资本主义包围

我们党的同志忘记的或者简直看不见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六分之五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地。他们忘记了，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这里有人常谈资本主义包围，但是不愿想一想资本主义包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资本主义包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境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

我们的同志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例如拿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幼稚的人可能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在这些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离睦邻关系远得很。事实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国家互相派遣自己的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有时甚至派遣杀人凶手到彼此的后方，给他们的任务是混进这些国家的机关和企◇140◇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网，“必要时”破坏这些国家的后方，以便削弱这些国家和破坏它们的实力。现在的情况是如此。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就以拿破仑第一时代的欧洲国家为例。法国当时布满了从俄国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英国人的阵营派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英国、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和俄国在各自的后方，也有为数不少的来自法国阵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英国间谍曾两次谋刺拿破仑，几次策动法国旺代省的农民反对拿破仑政府。而拿破仑政府是怎样一个政府呢？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扑灭了法国革命，而仅仅保存了那些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不用说，拿破仑政府对自己的邻邦是以牙还牙的，同样采用了派遣自己的破坏分子的办法。过去，在 130 年以前，情况是

如此。现在，在拿破仑第一之后过了130年，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德国也布满了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

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试问，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应当比它们对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更温和，更友好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少些呢？你们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些吗？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141◇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党的同志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由于忘记了，所以就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正因为如此，日德警察暗探局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对于我们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其次，我们党的同志在同托洛茨基代理人进行斗争时，看不见和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

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 8 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活动的。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142◇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 7—8 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冶派别。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1936 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正是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回想一下，在 1936 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政纲。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

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在 I937 年的审判案中，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不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政纲。他们承认他们有一定的政纲，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供认了并陈述了这个政纲。可是他们陈述这个政纲，不是为了号召工人阶◇143◇级，号召人民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纲，而是为了咒骂它是反人民和反无产阶级的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消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恢复剥削制度，为加速反苏战争爆发而同德日法西斯势力结成联盟，为发动战争和反对和平政策而斗争，分割苏联的领土，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而把滨海地区割让给日本人，准备使苏联在敌国侵犯时遭到军事失败，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采用的手段即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对苏维埃政权领导者分别实行恐怖手段，替日德法西斯势力进行间谍活动，——这就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所陈述的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显然，托洛茨基分子不能不向人民、向工人阶级隐瞒这样的政纲。他们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甚至向总共只有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这个政纲。当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召集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会议来传达这个政纲的性质时，托洛茨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即使把这个政纲的真正性质只告诉极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引起分裂。

这些“政治活动家”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而且向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纲，——这就是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

但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能叫作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144◇

这就是最近 7—8 年来托洛茨基主义演变的无可争辩的结果。

这就是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区别。

我们党的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这个深刻的区别。他们看不见，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了，托洛茨基分子早已变成了拦路抢劫的强盗，只要能向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政权捣乱，他们可以采用任何卑鄙手段，干出一切下流勾当，直到搞间谍活动和直接背叛自己的祖国。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这一点，因此就不善于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法更加坚决地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近几年来的下流勾当，对我们党的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还有，最后，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在其中起着相当积极作用的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第一，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他们大部分是过去的企业主、过去替旧主人服务的经理、过去的老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单单是在政治上公开同我们为敌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我们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些老爷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就是沙赫特分子自己，也并不隐瞒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态度。对于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这样说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

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么，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145◇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你们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

第二，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多少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这样的知识，不得不向他们学习。这种情况给了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以极大的优越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毫无阻碍地进行暗害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在技术上**欺骗我们的人，现在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就不同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在技术上并不比我们的人有任何优越的地方。相反地，我们的人在技术上比现在的暗害分子，比托洛茨基分子受过较高的训练。从沙赫特事件到今天，我们这里成长了几万名真正受过技术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可以举出几千几万名在技术上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来。同他们比起来，所有这些皮达可夫们和利夫希茨们、舍斯托夫们和博古斯拉夫斯基们、穆拉洛夫们和德罗布尼斯们，都是一群夸夸其谈的人，从技术素养来看不过是一些初学之辈。既然如此，现代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在于有党证。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给了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给他们打开了混进我们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门径。他们的优越条件就在于，他们有党证，伪装作苏维埃政权的朋友，**在政治上**欺骗我们的人，滥用信任，偷偷地进行暗害活动，把我们的国家的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敌人。这种“优越条件”就其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来说是可疑的，但是总算是“优越条件”。这种“优越条件”的确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托洛茨基的暗害分子，由于是有党证的人，有混进我们机关和组织的一切岗位的门径，所以就成了外国谍报机关的至宝。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不了解旧的暗◇146◇害分子和新的暗害分子之间、沙赫特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全部区别，由于看不见这一点，也就不能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

新的方法同新的暗害分子作斗争。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这就是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忘记了或看不见的我们国内外环境中的一些基本事实。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近几年来发生的暗害和破坏活动的事件感到意外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人看不见这一切，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这一切呢？

所有这些健忘、盲目、麻痹大意、温厚宽容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不是我们的人在工作中的先天缺陷呢？

不，这不是先天缺陷。这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的人作一些努力，就能迅速加以克服。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近几年来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他们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由于陶醉于这一切事情，就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把其余的都丢掉了。

问题在于，他们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就以为这个工作包括了一切，而对于象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同暗害活动斗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根本不注意了，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事情。◇147◇

胜利和成绩，当然是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胜利的确是巨大的。然而，胜利也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大的胜利和大的成绩，往往使政治经验少的人产生麻痹大意、温厚宽容、自满、过分自信、自高自大和浮夸的毛病。你们不能否认，近几

年来，浮夸分子在我们这里多得数不胜数。用不着奇怪，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而重要的胜利的情况下，会产生浮夸情绪、夸耀我们的成就的情绪，会产生低估我们敌人力量的情绪、高估自己力量的情绪，由于这一切，就出现了政治上的盲目。

在这里，对于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我应当讲几句话。

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我们凭经验是知道的。我们同这种危险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应当说，不是没有成绩的。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往往使不坚定的人产生灰心丧气、不相信自己力量的情绪、悲观主义的情绪。相反地，哪里克服了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那里的人们就会在这个斗争中受到锻炼，从斗争中成长为真正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的性质。这就是克服困难的结果。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是的，是的，同志们，是因胜利和成绩而产生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于，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麻痹大意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祝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

在这种令人昏眩的自高自大和自满的气氛里，在这种大肆夸◇148◇耀和自吹自擂的气氛里，人们往往忘记了对我国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一些重大事实，人们开始看不见象资本主义包围、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因我们的胜利而产生的危险等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事实，这是毫不奇怪的。资本主义包围？这是胡说八道！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所谓资本主义包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全是区区小事！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这一切小事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党章，党的机关的选举制，党的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

这一切是不是需要呢？既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改善，这些小事是不是值得过问呢？这全是区区小事！计划我们正在超额完成，我们的党并不坏，党中央也不坏，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些古怪的人坐在莫斯科那里，坐在党中央那里，凭空想出来一些什么问题，谈论什么暗害活动，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某些没有经验的同志，由于昏头昏脑地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竟多么容易而“简单地”得了政治盲目病。

因胜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就在于此。

我们党的同志因陶醉于经济胜利，忘记了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内外的事实，看不见包围着我国的一系列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麻痹大意、健忘、温厚宽容和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们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缺点的根源就在于此。◇149◇

五
我 们 的 任 务

怎样消灭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呢？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必须实行以下办法：

（1）首先必须把纠缠于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的“日常事务”的我们党的同志的注意力，转到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去。

（2）必须把我们党的政治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把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和布尔什维克锻炼作为首要任务。

（3）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经济胜利的意义不容争辩地是极其伟大的，我们今后仍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取得这种胜利，但是，

经济胜利毕竟不能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事业。

必须说明，因经济胜利而产生的、表现为自满、麻痹大意、政治嗅觉迟钝的阴暗面，只有把经济胜利同党的建设和我们党展开的政治工作的胜利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掉。

必须说明，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

（4）必须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是决定苏联国际环境的基本事实。

要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150◇要记住这一点，并同那些低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的意义以及低估暗害活动的力量和意义的同志们作斗争。

要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任何经济胜利，不管这些胜利是多么伟大，都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以及从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

要采取必要的办法，使我们的同志，党的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有可能认识外国谍报机关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实行方法和技术。

（5）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托洛茨基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早已不再为任何一种同工人阶级利益相容的思想服务，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

必须说明，在反对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现在需要的不是旧方法，不是辩论的方法，而是新方法，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

（6）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现时的暗害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是有区别的。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利用我们的

人的技术落后，靠技术欺骗了我们的人，而现时的暗害分子则持有党证，利用我们的人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靠对他们这些党员在政治上的信任，来欺骗我们的人。

必须以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精通布尔什维主义和铲除在政治上轻信态度的新口号，以完全适合目前时期的新口号，来补充适合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不能在十来年前，在沙赫特事件时期，一◇151◇下子提出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掌握技术，第二个口号是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吗？不，不能。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这样办事。在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总是要提出一个基本口号作为中心环节，以便抓住这个环节，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列宁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链条中的基本环节，紧紧抓住和拖出这个环节，以便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向前迈进。革命运动的历史表明，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在沙赫特事件时期，我们的人的弱点就是技术落后。当时我们的弱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至于我们对当时的暗害分子的政治态度，那是完全鲜明的，即布尔什维克对政治异已分子的态度。我们提出了掌握技术的口号并且在前一个时期培养了几万个以至几十万个有技术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从而消灭了我们这种技术上的弱点。而现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有了在技术上有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现在充当暗害分子的已经不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不是比我们的人有任何技术上的优越条件的人，而是持有党证并享受党员一切权利的人。现在我们的人的弱点，不是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政治上的麻痹大意，是对偶然取得党证的人的盲目信任，是缺少对人的审查——不是根据政治宣言而是根据工作结果来审查。现在对我们说来，关键问题不是克服我们干部在技术上的落后，因为这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而是克服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对偶然取得党证的暗害分子在政治上的轻信态度。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时期为干部而斗争的关键问题和目前时期的关键问题的根本区别。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在十来年前一下子就提出两个口号，既提出掌握技术的口号又提出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的◇152◇口号。

正因为如此，现在必须以精通布尔什维主义、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和消灭我们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的新口号，来补充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7）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必须记住这一切，并经常保持警戒。

（8）必须粉碎和抛弃另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凡是不经常进行暗害活动而且有时还在工作中表现出一些成绩的人，似乎不可能是暗害分子。

这种怪论暴露出制造这种理论的人是幼稚的。任何一个暗害◇153◇分子，如果不想在最短期内被揭发出来，就不会时刻都进行暗害活动。相反地，真正的暗害分子，一定要在工作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因为这是保存他这个暗害分子、骗取信任并继续进行暗害活动的唯一方法。

我想，这个问题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9）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三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经常完成经济计划，似乎就能使暗害活动及其结果化为乌有。

这类理论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工作人员的本位主义自尊心感到满足，使他们安心，并削弱他们对暗害活动的斗争。“经常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证明了我们的一切经济计划都定得太低，因为这些计划没有估计到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蕴藏的巨大的后备和潜力。

第二，各人民委员部总的来说完成了经济计划，并不等于某些很重要的部门也完成了计划。相反地，事实表明，许多人民委员部虽然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年度经济计划，可是并没有经常完成国民经济中某些很重要的部门的计划。

第三，毫无疑问，如果暗害分子没有被揭发出来和驱逐出去，那么经济计划的完成就会坏得多，这一点是眼光短浅的制造上述理论的人应该记住的。

第四，暗害分子通常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时期进行自己主要的暗害活动的。姑且假定我们被“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的理论弄得昏昏欲睡而不去触动暗害分子，制造这一腐朽理论的人是否设想过，如果我们让暗害分子以“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理论作护身符而留在我们国民经济内部，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么大的危害。◇154◇

“经常完成经济计划”的理论是有利于暗害分子的理论，这难道

还不明显吗？

（10）必须粉碎和抛弃第四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似乎是消灭暗害活动的基本手段。

杜撰出这种理论，是为了在侈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情况下，使暗害分子免受打击。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非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滥用我们一些在政治上麻痹大意的同志的信任，经常欺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捣他们的鬼，人为地制造一系列影响他们顺利工作的障碍，最终使他们的工作垮了台。例如，在顿巴斯，既然暗害分子在基本建设方面进行破坏，使速度落后的采煤准备工作同所有其他工作脱了节，那么单是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干出什么来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需要我们给以实际帮助，去反对暗害分子各色各样的阴谋诡计，以便把事业推向前进，并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暗害活动作斗争，为消灭暗害活动而斗争，制止暗害活动，是使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广泛展开的必要条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想，这个问题也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11）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五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似乎他们用尽自己最后的一批干部了。

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幼稚的人才能杜撰出这种理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自己的后备力量的。这些后备力量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这些后备力量就是国外◇155◇许多与苏联为敌的集团和组织。

以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第四国际为例，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这个间谍国际将给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和暗害活动派遣干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或者，再以挪

威骗子舍夫洛集团为例，这个集团曾给间谍头子托洛茨基以栖身之所并帮助他向苏联捣乱。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谁能否认这个反革命集团今后仍将为托洛茨基间谍和暗害分子效劳呢？

或者，再以和舍夫洛一样的法国骗子苏瓦林集团为例。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难道能否认这个骗子集团同样将帮助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其反苏的间谍暗害活动吗？

所有这些德国老爷们，这些向法西斯分子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形形色色的路特·费舍之流、马斯洛夫之流、乌尔班斯之流，不是托洛茨基的间谍暗害活动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或者，再以著名的骗子伊斯门为首的一伙美国作家为例，所有这些要笔杆的匪徒都是靠污蔑苏联工人阶级为生的，他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总之，说托洛茨基分子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批干部，这种腐朽的理论是应该抛弃的。

最后，还必须粉碎和抛弃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数很多，而暗害分子人数很少，因为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几千万人，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不必注意这一小撮暗害分子。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杜撰出这种极端荒谬的理论，是为了安◇156◇慰我们某些由于不善于同暗害活动作斗争而在工作中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了麻痹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安心睡觉。

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几千万，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暗害分子不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修建第聂伯河国家建筑工程，需要有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的司令部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几十个以至几百个。

因此，不能以我们人数很多而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人数很少來安慰自己。

必须做到在我们的队伍中根本没有托洛茨基暗害分子，

关于如何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消灭我们一切组织（无论是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还是行政组织和党组织）共同存在的缺点的问题，情况就是如此。

消灭这些缺点所必需的办法，就是这些。

至于专门党组织及其工作中的缺点，那么在交给你们审阅的决议草案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谈到消灭这些缺点的办法了。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只想略微谈一谈我们党的干部的政治训练和提高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善于把我们党自下而上的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加以训练并且在政治上加以锻炼，从而使他们能够◇157◇在国内外环境中毫无围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善于把他们造就成完全成熟的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那么我们就解决了我们一切任务的十分之九。

我们党的领导成分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党的成分，如果指党的领导人员，大约有 3000—4000 个高级领导者。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将领一级。

其次，有 3—4 万个中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军官一级。

再其次，有 10—15 万个党的下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士官一级。

提高这些指挥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锻炼，以那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这些干部，从而扩大领导干部的队伍，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要办到这一点，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必须建议我们党的领导者，从支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圮，要在一定期间内为自已挑选两个人，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也许有人会说，到哪里去找呢，每个书记都要有两个副手，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适当的工作人员。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能干的人，有才能的人，我们这里成千上万。只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呆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而开始腐朽起来。要找就会找到。

其次，为了使支部书记得到党的训练和进修，必须在每个州的中心设立以 4 个月为一期的**“党的训练班”**。应当派所有基层党组织（支部〉的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并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基层党组织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158◇

再其次，为了使该组织第一书记得到政治上的进修，必须在苏联各地，例如在 10 个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立以 8 个月为一期的**“列宁主义训练班”**。应当派区和专区的党组织第一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区和专区的组织中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再其次，为了使市组织书记得到思想上的进修和政治上的提高，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党史和党的政策研究班”**。应当派市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训练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市组织内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最后，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

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

同志们，我的话就要结束了。

这样，我们叙述了我们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既有我们一切组织，即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党组织共同的缺点，也有只是我们专门党组织所特有的缺点。这些缺点正被工人阶级的敌人利用来进行其破坏、暗害、间谍和暗杀的活动。

其次，我们指出了一些基本办法，它们是消灭这些缺点，使外国谍报机关的托洛茨基法西斯代理人的破坏、暗害、间谍和恐怖的袭击无能为害所必须采取的。

试问，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一切办法呢？我们是不是有一切必要的可能性做到这一点呢？◇159◇

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的。我们所以能够，是因为我们拥有为实现这些办法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消灭自己的麻痹大意、自己的温厚宽容、自己的政治近视的决心。

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举起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难道我们就不能搞掉这种可笑的和荒谬的毛病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一定能搞掉这种毛病，当然，如果我们真想搞掉的话。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搞掉它，而是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真正地搞掉它。

当我们搞掉了这种荒谬的毛病时，我们便能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国内外的任何敌人，我们不怕他们的袭击，因为正象我们现在粉碎他们那样，正象我们过去粉碎了他们那样，我们将来也一定会粉碎他们。

结 束 语

同志们！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讨论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明确的认识，了解了任务，并且有决心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讨论情况也表明，对于我们在组织和政治的实践中的某些具体何题，我们还没有充分明确的了解。我算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共有 7 个。◇160◇

请让我对这些问题讲几句话。

（1）应当认为，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低估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以便使经济上的胜利与党的政治工作上的胜利结合起来，齐头并进。

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呢？怎样实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从讨论中可以看到，有些同志喜欢从这里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以为现在似乎应当根本摆脱经济工作。至少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也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当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胜利而离开了政治时，这是一个极端，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要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而想离开经济工作，那么这是另一个极端，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前者小。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为了便于研究起见，人们通常在方法上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但是，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仅仅在方法上人为地加以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

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

决议草案中专门有一条，谈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并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这一条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摆脱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仅仅是再不容许以我们党组织去实际代替经济◇161◇机关（其中特别是农业机关），并使它们陷于无专人负责的境地。因此，必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经常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经济。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给农业机关以优秀人才，必须给这些机关配备有能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新的优秀工作人员。只有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才能指望党组织完全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显然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党组织就不得不在今后一定的短时期内，直接从事农业工作及其一切细节，如耕地、播种、收获等等。

（2）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等等，我要讲两句话。我想，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早已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了一伙职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显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和铲除这些老爷们，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在实际上实现粉碎和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连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偶尔在

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些说法至少在这次全会上是有人提出过的。能不能认为这样解释决议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正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个别对◇162◇待，分别处理。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

在我们负责同志中间，有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们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胜过我们一些可尊敬的、未曾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同志。现在要摈斥这样的同志，那是愚蠢的。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思想上一向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当他们一看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就立刻断绝了这种联系。他们没有马上断绝同个别托洛茨基分子的个人朋友联系，而迟了一些，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要把这些同志列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伙，那是愚蠢的。

（3）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正确地分配他们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业务变成事务主义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政治变成独一无二的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们的业务能力。

能不能说我们党的同志实行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呢？可惜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说完全。问题在

于，这个经过考验的准则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被破坏◇163◇了，而且是被非常粗暴地破坏了。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显然可以看出，这不是由负责工作人员组成的领导集团，而是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其成员都力求和平相处，互不得罪，家丑不外杨，互相吹捧，并且时常向中央送交空洞而令人作呕的胜利报告。

不难理解，在这种小家族环境里，既不能有批评工作缺点的余地，也不能有工作领导者自我批评的余地。

显然，这种小家族环境会为培养阿谀者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阿谀者毫无自尊心，因而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就拿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的例子来说。前者是哈萨克斯坦的边疆区党组织的书记，后者是雅罗斯拉夫尔州党组织的书记。这两个人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名列最末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是怎样挑选工作人员呢？前者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阿塞拜疆和乌拉尔带了30—40个“自己的”人到哈萨克斯坦，并把他们安置在哈萨克斯坦的负责岗位上。后者也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顿巴斯带了10多个“自己的”人到雅罗斯拉夫尔，并把他们也安置在负责岗位上。可见，米尔左扬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瓦伊诺夫也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难道不能按照人所共知的布尔什维克挑选和配备人员的准则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工作人员吗？当然是能够的。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挑选工作人员的准则，这种准则排除了庸俗的市侩态度的可能性，排除了根据小家族和小团体的标志挑选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此外，他们在挑选对个人忠实◇164◇的人们做工作人员时，显然是想给自己造成无论对当地人以及对党中央都带有某种独立性的环境。假定米尔左扬

和瓦伊诺夫由于某种情况而从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调到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尾巴”呢？难道他们又得把自己的“尾巴”带到新的工作地方去吗？

请看，违背布尔什维克正确挑选和分配工作人员的准则竟达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4）审查工作人员，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审查工作人员，这就是说，不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保证和宣言，而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来审查他们。

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就是说，不仅是在办公室，不仅是根据形式上的工作报告来检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的地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

一般讲来，是否需要这样的审查和检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了解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自上而下地审查工作人员，即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结果来审查被领导者。这是不对的。自上而下的审查固然是需要的，这是审查工作人员及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自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全部审查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审查，自下而上的审查，即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领导者的错误，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是审查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165◇

党员群众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方法就是听取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以及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机关。正如我们党章所要求的，在党内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要无条件地按选举手续产生，

要保证提出和撤消候选人的权利，实行无记名投票，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必须实行，以便于党员群众审查和监督党的领导者。

非党群众是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上审查自己的经济领导者、工会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方法就是在会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最后，人民是在选举苏联政权机关时，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来审查自己的国家领导者。

任务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审查和自下而上的审查结合起来。

（5）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训练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

列宁曾经教导说，诚恳地揭发党的错误，研究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必要的办法，是正确训练和教育党的干部，正确训练和教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列宁说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166◇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象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订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能说我们许多同志都乐意这样做，但是布尔什维克，如果真正愿意做布尔什维克，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订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编者注

确的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原理是正确的。

例如，拿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错误来说。你们大概记得1930年，当时我们的党员同志想在短短3—4个月内解决把农民转到集体农庄建设上来这个极复杂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制止这些着了迷的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当时的错误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忘记了不能凭借行政压力使农民转到集体农庄道路上来，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不是需要几个月而是需要几年细心的和深思熟虑的工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关于胜利冲昏头脑和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不要忽视现实情说而跑得太远的指示曾遭到激烈的对抗，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央顶住逆流，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正确的道路。结果怎样呢？现在谁都明白了，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几万个从事集体农庄建设和集体农庄领导的农民出身的出色的干部。这些干部从1930年的错误中得◇167◇到了训练和教育。但是，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另外一个是工业建设方面的例子。我指的是我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工业干部技术落后的全部危险性,我们容忍这种落后现象,想依靠怀有敌对情绪的专家来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因而必然使我们的经济干部充当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不好的政治委员。你们大概记得，当时我们的经济干部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多么勉强地接受“掌握技术”这个口号。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掌

握技术”这个口号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万和几十万个掌握了技术和推动我们工业前进的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干部。但是，如果党当时在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的经济工作人员的顽固态度面前屈服了，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有些同志说：公开说出自己的错误是不妥当的，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被我们的敌人看作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并且会被他们利用。同志们，这是无关紧要的，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地，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和诚恳改正这些错误，只能加强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国家的力量和实力。而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我们在一起，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些同志说：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其结果并不能训练和巩固我们的干部，反而会削弱和瓦解他们；我们应当体谅和爱护自己的干部,我们应当体谅他们的面子和心情。为此他们提议掩饰我们◇168◇同志的错误，减弱批评的力量，最好是别管这些错误。这样的方针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首先对于他们想“体谅”和“爱护”的干部是危险的。用掩饰干部错误的办法来体谅和爱护干部，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本人。如果我们不把1930年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同志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工业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自己的工业干部。谁想用掩饰错误的方法来体谅我们干部的面子，谁就会既毁掉干部也毁掉干部的面子，因为谁掩饰他们的错误，谁就会使他们容易再犯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应当认为会使这些干部完全垮台，损害他们的“面子”和“心情”。

（6）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正确领导是什么意思呢？◇169◇

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写指示。

正确领导，这就是说：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

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

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上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我们的眼界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地，群众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下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他们的眼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是正确的。

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这个原理是正确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了改善顿巴斯的状况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措施草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曾经三次把草案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曾经三次收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草案。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工人、普通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应当承认，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启示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顿巴斯采煤办法的著名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认为中央和人民委员◇170◇会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是卓越的，而这个决议正是由基层的普通人启示我们作出的。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古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古拉延科是什么人呢？尼古拉延科是一个普通党员。她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整整一年中，她一直发出警告，说基辅党组织的情况不好，她揭发了小家族习气，对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批评的现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专横行为。她被赶走了，就象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后来，有人为了摆脱她，竟把她抓起来并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的组织，无论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获得真理。只是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干涉，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扣。事情经过审查后，查清了什么呢？查清了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尼古拉延科究竟是什么人呢？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的书记，她甚至不是哪一个支部的书记，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党员。

由此可见，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

由此可见，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

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171◇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接触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雄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可能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7）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对开除党员党籍或恢复被开除党员党籍问题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冷漠的官僚主义态度。问题在于，我们党的一些◇172◇领导者犯了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的毛病。不但如此，他们不考察党员，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不是分别对待党员、党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他们在评定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不是分别对待，所以他们通常是随便乱搞，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打击他们，成千成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力求考虑几万人，不关心“个人”、个别党员，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自慰地说，我们党有200万党员，开除几万个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由于对人，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在一部分党员中间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便灵巧地抓住了这些心怀怨恨的同志，巧妙地把他们拖入托洛茨基暗害活动的泥坑。

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把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人，加上所有弃权的人，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人的5%，而不是援例加上0.5%，就是

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么，这◇173◇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赴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述有一种情况，在这12000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么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我们党的周围仍然有一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些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人，这就给托洛茨基分子造成这样一些后备力量。

大多数党员被开除党籍都是由于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呢？原来有人认为，如果党员不**精通**党纲，那就是消极，就应当开除。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咬文嚼字地解释我们的党章。要精通党纲，就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考验而且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员中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精通了我们的党纲，已经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和经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就只有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有学问的人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呢？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请注意，在列宁的公式中并没有说**精通**党纲，而是说**承认**党纲。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用不着证明，在这方面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我们党的那些妄谈什么精通党纲的同志。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174◇几千个党员学习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学习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

还没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要端正我们关于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问题的政策，就必须取消现在关于消极问题的愚蠢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错误。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的东西。一个工人、一个党员只要稍微犯了一点过错，开党的会议迟到了一两次，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缴纳党费，就立刻被驱逐出党。

人们不注意他的过错的程度，不到会的原因，没有缴纳党费的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不难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冷漠的政策，许多杰出的骨干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了党外。在开除党员之前给以劝告，如果这无效，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如果这仍然无效，再给以改正错误的期限，或者万不得已时，再把他转为预备党员，而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当然，是能这样做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的命运。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们，是消灭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

译自《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54 年版◇175◇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三个主要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在事件分期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

要避免这些缺点，作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意见。

应当在教科书的每一章（或篇）之前，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一简要的历史的说明。否则，联共（布）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不过是对往事的一种肤浅的莫名其妙的叙述。

第二，不仅应当叙述那些能表明苏联在资本主义时期在党和工人阶级中曾经存在大量派别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一）在革命前的俄国，既存在一些新的、从资本主义观点看来是现代的阶级，也存在一些旧的、资本主义前的阶级；（二）国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三）工人阶级的成分复杂，ˆ这是党内和工人阶级内便于存在大量派别的条件。否则，大量派别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第三，不仅应当用简单叙述的口吻来说明各种派别激烈斗争◇176◇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派别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及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

下，党内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派别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在这方面倒可以使用1882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①]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杜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

最后，应当把联共（布）历史中的事件的分期工作做得有条理些。

我想，下列提纲或类似下列的提纲可以作为基础。

提纲

一

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

（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建立起到1900—1901年最初几号《火星报》出现止。）◇177◇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

（1901—1904年）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372页。——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00页。——编者注

三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1904—1907 年）

四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

（1908—1912 年）

五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1912－1914 年）

六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第二次革命(二月革命)时期。

（1914 年—1917 年 3 月〉

七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17 年 4 月—1918 年）

八

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 年）◇178◇

九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1—1925 年）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 年）

十一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1930—1934 年）

十二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1935—1937年）

约·斯大林

译自1937年5月《布尔什维克》
第9期第8—10页◇179◇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领导工作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的讲话

（1937 年 10 月 29 日）

同志们，我举杯的意思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通常总是为领导者、首长、领袖和人民委员的健康举杯。这当然不坏。但是除了高级领导者，还有中级和下级领导者。他们，这些下级和中级领导者，在我国有几万人。他们都是谦逊的人，他们并不出头露面，几乎是默默无闻。但是，如果漠视他们，那就是盲目无知，因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些人。就是说，我们的经济领导的命运也取决于他们。

为我们中级和下级经济工作领导者的健康干杯！

关于领导者，一般地应该说，可惜他们并不总是懂得，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历史把他们提到了怎样的高度。他们并不总是懂得，在我国条件下做一个经济工作领导者，就意味着受到极大的光荣和无上的尊敬，就意味着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莫大信任。从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工作领导者，所有的厂长、经理、车间主任、工头，都是资本家老板的走狗。人民把他们当作敌人一样地痛◇180◇恨，因为人民认为，他们领导经济是为了老板的利益，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相反，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经济工作领导者有一切理由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因为他们管理经济并不是为了一小撮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条件下经济工作者的称号是一个崇高的称号，在苏维埃条件下做一

个领导者就意味着受到无上的光荣和得到人民的信任。同志们，人民对经济工作者的信任是一件大事情。领导者可以上台下台，而人民还是人民。只有人民是永存的。其他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应该善于珍视人民的信任。

为那些懂得并意识到自己的崇高作用而不容许任何人玷污和侮辱苏维埃经济工作领导者这个崇高称号的我国经济工作者的健康干杯！

同志们！在座的有国民经济新事业的先驱者，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战士。为这些新事业的先驱者和战士的健康干杯！为斯达汉诺夫、久卡诺夫、伊左托夫、里亚博沙普卡及其他同志的健康干杯！

最后，为冶金工业中的高炉工作的新老战士的健康干杯，首先为高炉工人科罗博夫同志的健康，为老科罗博夫，为他的儿子，为高炉工人科罗博夫全家，为科罗博夫全家不落后于新的工作方法干杯！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226—227 页◇181◇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37 年 12 月 11 日于大剧院）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打算讲话。但是，我们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说是硬把我拖到这个会场里来。他说，请你作一个好的演说吧。讲些什么呢，究竟讲些什么样的话呢？凡是在选举以前需要讲的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领导同志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格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许多负责同志的演说中讲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讲过了。对这些演说还能补充些什么呢？据说，有人要求对选举运动的某些问题进行解释。解释什么呢，对哪些问题进行解释呢？所有一切需要解释的东西都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共青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①]、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著名宣言中解释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解释过了。对这些解释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当然，可以发表一通什么都谈到而又什么都没有谈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演说。这样的演说也许能使听众开一开心。据说，这样的演说家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有，而且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182◇也有。但是，第一，我不是这样的演说家。第二，现在，当我们所有的人、布尔什维克，正如常言所说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是否值得来寻开心呢。我想是不值得的。

————————————

①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是苏联的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存在于 1927—1948 年，其宗旨是促进苏联防御能力的增强，在居民中普及军事知识和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编者注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作不出好的演说来。

可是，既然我已经走到讲台上来了，当然多少总得讲一点。

首先，我想感谢选民们，感谢选民们的信任。

我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苏联首都的斯大林选区选举委员会把我登记为代表候选人。同志们，这是很大的信任。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身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感谢你们对我本人，即对这个党的代表的信任。

我懂得这种信任意味着什么。这种信任自然会给我又增加一些新的义务，因而也就是又增加新的责任。好吧，我们布尔什锥克是不会推卸责任的。我很高兴地来承担这个责任。

同志们，我想从自己方面向你们提出保证，你们可以大胆地信赖斯大林同志。你们可以指望斯大林同志一定能够完成自己对人民的职责，对工人阶级的职责，对农民的职责，对知识分子的职责。

其次，同志们，我想向你们祝贺即将到来的全民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同志们，当前的选举不仅仅是选举而已。这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全民节日。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没有其他这样的先例。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选举将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虽然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相比，我们所进行的普遍选举将是最自由的选举，最民主的选举。◇183◇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民主国家里，也举行普遍选举。但是，那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选举的呢？是在阶级冲突的情况下，在阶级敌对的情况下，在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和其他资本主义豺狼压迫选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选举即使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也不能叫作完全自由和完全民主的选举。

相反，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里，选举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种情

况下进行的。在我们这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因而也不存在有产阶级对贫苦阶级的压迫。在我们这里，选举是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他们互相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可以说，是在互相友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没贫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剥削，根本没有什么人为了歪曲民意而去压制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全世界唯一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基础上，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单单正在建设、而且已经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这种自由的和真正民主的选举。十来年以前也许还可以争论我们这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了。现在，这已经是事实问题，是现实生活的问题，是贯穿在人民全部生活中的习惯问题了。我们的工厂是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的田野上，庄稼人是在没有地主、没有富农的情况下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生活。◇184◇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我们的新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选举。

既然这样，怎能不向你们祝贺这个全民胜利的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呢！

同志们，其次，我想给你们一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如果看一下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那里的代表和选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相当奇怪的关系。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代表们向选民百般讨好，阿谀奉承，发誓赌咒要忠诚不渝，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看来，代表是完全从属于选民的。但是只要选举一结束，

候选人一变成代表，这种关系就根本改变了。代表不再从属于选民，他们完全独立了。在四五年内，即在下次选举以前，代表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从属于人民，并不从属于自己的选民。他可以从一个营垒转入另一个营垒，他可以从正路转入邪路，他甚至可以卷入一些不那么体面的勾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花招，——他是独立的。

能认为这样的关系是正常的吗？同志们，绝对不能。我们的宪法估计到了这一点，它制定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代表开始要滑头，如果他们离开正路，如果他们忘记自己应当从属于人民，从属于选民，那么选民就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

同志们，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代表应当知道，他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派到最高苏维埃的使者，他应该遵循人民给他的委托书所指出的那条路线。如果他离开了正路，选民就有权要求重新选举，就有权使离开正路的代表落选。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我的劝告，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选民◇185◇的这个权利，即在任期未满前撤回代表的权利，要你们监督和检查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想离开正路，就把他们轰走，要求重新选举。政府一定要进行新的选举。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这项法律，并在必要时运用这项法律。

最后，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还有一个劝告。拿一切可以提出的要求中的最起码的要求来说，一般应当向自己的代表提出些什么要求呢？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

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计、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我们能否说，所有的代表候选人恰恰都是这样的活动家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家。有一种人，说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勇士还是懦夫，是彻底拥护人民的还是拥护人民的敌人的。是有这样的人的，是有这样的活动家的。在我们这里，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这样的人。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丑儿家家有。俄国伟大的作家果戈理曾经一针见血地谈到这种不确定的人，这种与其说是政治活动家不如说是政治庸人的人，这种不确定的、不定型的◇186◇人。果戈理说：“这种不确定的、不三不四的人，使你弄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既不象人，又不象鬼。”[①]关于这种不确定的人和活动家，在我们民间也一有相当确切的说法：“这样的人实在是非驴非马”，“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

我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在代表候选人（当然我对他们很抱歉）中间和我们的活动家中间，没有那种多半是政治庸人的人，没有那种在性格和面貌上很象民间所说的“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的人。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经常地影响自己的代表，提醒他们，要他们以伟大的列宁为典范，要处处效法列宁。

选民的职能并不因选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的职能在该届最高苏维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一直都有效。我已经谈过关于代表离开正路

——————————————

① 斯大林这里引用的是尼·瓦·果戈理在小说《死魂灵》中形容地主马尼洛夫的话。——编者注

时选民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的法律。因此，选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在于，始终要监督自己的代表，提醒自己的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提醒自己的代表要做象伟大的列宁那样的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第二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给自己的选民的劝告。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3年版第3—9页◇187◇

给伊万诺夫同志的复信

（1938 年 2 月 12 日）

致伊万·菲力波维奇·伊万诺夫同志

伊万诺夫同志，你当然是对的，而你思想上的敌对者，即乌罗任科同志和卡捷尔科夫同志则是不对的。

理由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这里是指在我国——胜利的问题，无疑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我国内部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内部**关系的问题。我国工人阶级能不能克服同我国农民的矛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和进行合作呢？我国工人阶级在同我国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能不能粉碎我国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土地、工厂、矿山等等，并用自己的力量建成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宁教导说：**“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①]因此，我们能够而且◇188◇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间谍和代理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老爷们都否认这种可能性，认为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682 页。——编者注

家没有预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在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班老爷们用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虚伪借口来掩饰他们的退却行为，实质上是想使我国开倒车，倒退到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去。我们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这班老爷们发生了争论。我国继续发展的进程表明，党是对的，而托洛茨基之流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内，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其他国家内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却已经消灭了本国资产阶级，同我国农民建立了兄弟般的合作，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

伊万诺夫同志，我认为你同乌罗任科同志和卡捷尔科夫同志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并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即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国工人阶级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对外**关系即**国际**关系的问题。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已有免除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免除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完全保障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换句话说，当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国内获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还继续存在的时候，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我◇189◇国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是已经免除了武装进攻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胜利呢？

这就是同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主义教导说，就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

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见联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①]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是解决社会主义在一国内最终胜利这一任务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应当袖手坐待外来的援助。恰恰相反，应当把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同我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结合起來，这就是加强我国国防，加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反击武装进攻和粉碎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行动。

请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來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122 页）[②]

其次又说：◇190◇

“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7 卷第 117 页）[③]

列宁的话说得尖锐而有力，但中肯而真实，一点也不夸张。

根据这些前提，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道：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行动，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行动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行动，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国

————————————————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分册第 44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28—129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33 卷第 121 页。——编者注

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主义问题》1937 年俄文版第 143 页）①

如果闭眼不看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而认为我们的外部敌人如法西斯分子并不企图一有机会就向苏联实行武装进攻，那才真是可笑而愚蠢的。只有妄自吹嘘的人或者是蓄意麻痹人民意志的暗藏敌人才能这样认为。如果否认武装干涉者在武装干涉稍微得逞时就会企图在他们的占领区内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产阶级制度，那同样也是可笑的。难道邓尼金或高尔察克没有在他们的占领区内恢复过资产阶级制度吗？法西斯分子在哪一方面会比邓尼金或高尔察克更好一些呢？只有糊涂虫或蓄意用吹嘘来掩盖其敌对行为和力图松懈人民意志的暗藏敌人，才能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否认有武装干涉和复辟行动的危险。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而没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完全保障的话，那么，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内的胜◇191◇利是最终的胜利呢？显然是不能的。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就是如此。可见，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我国的**内部**关系问题，即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我国的**外部**关系问题，即完全保障我国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假如我国是在一个孤岛上，假如在它的周围没有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胜利是最终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许多国

——————————————

①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437 页。——编者注

家组成的体系里”，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都对社会主义国家抱着敌对态度，并在制造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所以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二个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还必须在今后加以解决。而且，对于第二个问题还不能够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即不能够只靠我国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只有把国际无产阶级的重大努力和我们全体苏联人民的更大努力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应当加强和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各国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系；应当在我国遭受武装进攻时，组织资产阶级各国的工人阶级给我国工人阶级以政治上的援助，正如组织我国工人阶级给资产阶级各国工人阶级以各种援助一样；应当全力加强和巩固我国的红军、红海军、红空军和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应当使我国全体人民在武装侵犯的危险面前保持戒备状态，这样，任何“意外”和我国外部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192◇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乌罗任科同志持有另一种不完全是列宁主义的观点。原来他武断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且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毫无疑问，乌罗任科同志是根本错误的。乌罗任科同志所以有这种武断看法，只能是由于他不了解周围的实际情况和懂得列宁主义的起码原理，或者由于这位妄自尊大的年轻官员的空洞吹嘘。如果我们确实“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强大的红军、红海军、红空军和强大的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是不是还需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系呢？把用于加强红军的几十亿经费用到别的方面，而把红军减少到最小数目，甚至全部解散，岂不更好吗？象乌罗任科同志这样的人，即便主观上对我们的事业是忠诚的，但是客观上对我们的事业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有意或无意地（反正都是一样！）用吹嘘来麻痹我国人民，松懈工人和农民的

意志，帮助敌人使我们在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情况下措手不及。

伊万诺夫同志，至于说你“被撤销了宣传员的工作并提出了能不能留在共青团内的问题”，那么对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如果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州委中真有人想模仿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①]，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一定要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在我国，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一类的人物是没有人喜欢的。

现在你可以判断一下，《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在论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的某些地方是不是已经过时。我自己倒很愿意让这些地方过时，很愿意在世界上再也没有资本主义包围、◇193◇武装侵犯的危险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等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但是很遗憾，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仍然存在着。

约·斯大林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
1938 年版第 328—334 页

————————

附　录

伊万诺夫给斯大林的信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恳求您给我解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在我们地方上，以及在共青团州委会里，人们对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最终胜利有两种理解，也就是说，把第一种矛盾和第二种矛盾混淆起来了。

————————————

① 指短篇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主人公。他骄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气的东西。——编者注

在您的著作中，谈到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时，说的是两种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显然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社会主义在国内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想得到解答的是关于第二种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您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意味着外部矛盾的解决，并且具有免除武装干涉、从而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而这种矛盾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努力才能解决。

是的，列宁同志也曾教导我们说："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胜利。"①

我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州委会专职宣传员的课堂讨论会上根据您的著作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但是州委会的工作人员乌罗任科（州委第一书记）和卡捷尔科夫（宣传工作指导员）认为我的发言是托洛茨基式的攻击。◇194◇

于是我就把从您的著作中引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念给他们听，但是乌罗任科建议我把三卷本合起来，并且说，"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说的话，而我们现在已经是1938年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因此我们现在决不应当再想到武装干涉和复辟的问题"；他又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且有了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保障"。于是，他们就把我当作托洛茨基主义的帮凶，撤销了我的宣传员的工作并提出了能不能留在共青团内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或者暂时还没有取得？也许，由于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而我还没有找到当前有关这个问题的补充材料。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6页。——编者注

我同样认为乌罗任科的说法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说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已经有点过时了。州委会的工作人员把我当作托洛茨基分子的做法是不是正确。这对我是很大的委屈和侮辱。

斯大林同志，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请给我一个答复，我的地址是：库尔斯克州曼图罗沃区第一扎谢姆斯克村苏维埃伊万·菲力波维奇·伊万诺夫。

伊·伊万诺夫

1938年1月18日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青年》1938年版
第353—354页◇195◇

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信[①]

（1938 年 2 月 16 日）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约·斯大林

译自 1953 年 11 月《历史问题》
第 11 期第 21 页◇196◇

————————————

① 这封信摘自苏联《历史问题》杂志 1953 年第 11 期刊登的彼·尼·波斯别洛夫《苏联共产党的五十年》一文。——编者注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 年 5 月 17 日）

同志们！

让我举杯祝贺科学，祝贺科学繁荣，祝贺科学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贺不与人民隔绝、不远离人民、而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把一切成果都贡献给人民的那种科学日益繁荣，这种科学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

祝贺科学繁荣，这种科学不让自己的负有盛名的老领导者满足于献身科学和作为科学垄断家而故步自封，这种科学懂得老年科学工作者和青年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作用和无穷力量，它心甘情愿地、非常乐意地给我国青年打开一切科学的大门，使他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它承认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

祝贺科学繁荣，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做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197◇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象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请回想一下 1917 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

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科学勇士的典范，他大胆地进行斗争反对陈旧了的科学，并为新科学开拓道路。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在座的斯达汉诺夫同志和帕帕宁同志，就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没有学位，他们是本行业务的实践家。但是，谁不知道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业方面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曾把科学界和技术界著名人物所规定的现行定额当作陈腐定额加以推翻，而采用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和技术要求的新定额呢？谁不知道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在漂流的冰块上从事自己的实际工作时，没费特别工夫，就顺便把关于北极地带的旧观念作为陈腐观念加以推翻，而确立了适合于真正的科学要求的新观念呢？谁能否认斯达汉诺夫和帕帕宁是科学革新者，◇198◇是我们先进的科学界的人物呢？

你们看，在科学中竟有这样的“奇迹”。

我刚才讲的是科学。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我所说的科学叫作**先进的**科学。

祝我们先进的科学繁荣！

祝先进科学的工作者身体健康！

祝列宁永垂不朽，列宁主义万古长青！

祝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们身体健康！

祝帕帕宁和帕帕宁探险家们身体健康！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版第 228—230 页◇199◇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8 年 9 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屏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200◇版跋》）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屏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①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 ”一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备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201◇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编者注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2）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细胞。——约·斯大林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同上，第 484 页）[①]◇202◇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4 卷第 23 页）[②]。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54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419—420 页。——编者注

（3）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圆圈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沿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同上，第23页）①

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203◇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编者注

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约·斯大林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约·斯大林注）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同上，第 527—528 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 528 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204◇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 45—46 页）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87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487—488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84 页。——编者注

（4）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①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②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205◇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编者注

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现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206◇

在19世纪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

微不足道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的政策。◇207◇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

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208◇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编者注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同上，第 332 页）①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 302 页）②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3 卷第 266—267 页）③

其次：◇209◇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 119—120 页）④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 288 页）⑤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 125 页）⑥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3 卷第 384 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82 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146—147 页。——编者注

⑤ 同上，第 361 页。——编者注

⑥ 同上，第 153 页。——编者注

（3）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二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210◇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①]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②]

———————————

① 指海王星。——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信徒堕入信仰主义（一种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理论），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说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说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規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了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了一种◇211◇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212◇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

① 原文为“ у ч р е ж д е н и 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主义者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213◇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214◇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215◇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

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216◇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 3 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

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18倍，比苏联高25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出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217◇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示的是人们同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一个人群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

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218◇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向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的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來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5 卷第 429 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219◇就怎样。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2 页。——编者注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各种生产方式在许多世纪过程中依次更迭的历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那些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220◇**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

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221◇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藏、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二十卷——本书制作者）。——编者注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用于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铁匠的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体系，出现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222◇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來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公社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作防御猛兽的工具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

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没有畜牧业、也没有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公社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223◇杀但是可以买卖的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园艺业、酿酒业和制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工作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和劳动没有利害关系、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农奴和劳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是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交给封建主所必需的。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

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已经没有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224◇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有文化、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成品，停止生产，被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225◇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约·斯大林注

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卡·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①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226◇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②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同上，第364页）③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④

（4）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09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232页。——编者注

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227◇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向金属工具过渡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在封建制度时期，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行会小作坊之外，开始建设大的工场手工业企业，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王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化机械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巨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228◇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的日常实践的狭隘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通过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实现的。在一定时期以前，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在一定时期以前，只是在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以前。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229◇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 年俄文版第 52 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 50 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603 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 1859 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 卷第 272 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 2 卷第 256 页。——编者注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230◇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74—602页◇231◇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英雄的“祖国号”飞机机组时的讲话①

（报 道）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妇女在生产、文化、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在像航空事业这样的极其困难、妇女似乎无法进入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环境中，苏联妇女在所有这些活动领域里已经和男子并驾齐驱，并且在许多场合还超过了男子。

斯大林同志接着提醒大家要十分珍重我们所有的东西中最宝贵的东西，即人的生命，特别是我们勇敢的，有时勇敢得过度的英雄飞行员们的生命。对我们来说，这些生命比任何记录更宝贵，不管这些记录如何伟大，如何轰动。因此，为保护我们的英雄们的生命，为保护他们的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党和政府将极端严格地对待飞行员们要求准许他们作危险的创记录飞行的申请，只在很少的◇232◇特殊场合才批准这种飞行。

在表彰北方征服者们的英勇业绩时，斯大林同志向伊·德·帕帕宁和极地飞行员的友好大家庭祝贺。

————————————

① 苏联女飞行员瓦·捷·格里佐杜博娃、波·杰·奥西片科和玛·米·拉斯科娃于1933年9月21日驾驶“祖国号”飞机从莫斯科向远东飞行。她们连续飞行了26小时29分，飞行距离按航线为6450公里，按直线为5947公里。飞行23小时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苏联政府和沿线军民采取了积极营救措施，最终于10月4日在共青城地区的大森林里发现了她们。她们返回莫斯科后，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于1938年10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为她们举行了招待会。——编者注

斯大林同志向成功地在大森林里找到了“祖国号”机组、并立即援救了她们的萨哈罗夫、布尔拉科夫、罗曼诺夫、杰尔昆斯基、吉洪诺夫等同志表示祝贺，建议为这些普通的苏联飞行员——我们光荣的苏维埃航空事业的支柱和希望干杯。

译自1933年10月28日《真理报》

◇233◇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①]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1939 年 3 月 10 日）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同志们！自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五年了。你们看，这个时期是不短的。在这个时期内，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各个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在这个时期内国际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我国国内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时期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发生极严重震荡的时期。在经济方面，这些年是萧条的年份，而后来从 1937 年下半年起，则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年份，是美国、英◇234◇国、法国工业重新衰落的年份，因而也是产生新的经济困难的年份。在政治方面，这些年是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年份。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次战争是在从上海到直布罗陀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它席卷了 5 亿多人口。欧洲、非洲、亚洲的地图

———————————————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 1339 年 3 月 10—21 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选举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和选举党中央机关。——编者注

正在被用强力改画着。战后的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

相反，对苏联来说，这些年却是它壮大和繁荣的年份，是它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的年份，是它的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的年份，是它为维护全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年份。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国际环境中的变化的具体材料。

1. 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1933年底。此后，危机转为萧条，继而工业开始有些复苏，有些上升。可是，工业的这种复苏没有象通常复苏时期那样转为繁荣。相反，从1937年下半年起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入的是美国，随后是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样，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来得及从不久以前的经济危机打击之下复原，就又面临了新的经济危机。

这种情况自然使失业现象更为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人数，本来已经从1933年的3000万人减少到1937年的1400万人，现在由于新的危机又增加到1800万人。

新危机的特点在于，它同上次危机大不相同，不是比上次更◇235◇好，而是比上次更坏。

首先，新危机并不象1929年发生的危机那样开始于工业繁荣之后，而是开始于萧条和少许复苏之后，但是这种少许复苏没有转为繁荣。这就表明，目前的危机将比上次危机更为沉重，更难于克服。

其次，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在和平时期爆发的，而是在第二次帝国

主义大战已经打了起来的时期爆发的。这时，日本同中国作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它破坏着极为广大的中国市场，使其他各国商品几乎无法染指；这时，意大利和德国已经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并为此消耗了自己的原料储备和外汇储备；这时，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都开始按战时方式进行改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按通常方式摆脱目前危机的资源，将比上次危机时期少得多。

最后，和上次危机不同，目前的危机不是普遍的危机，它暂时主要只是席卷了还没有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几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至于象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已经按战时方式改造了本国经济的侵略国，由于它们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还没有陷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过它们正在接近这种危机。这就是说，当经济实力雄厚的非侵略国开始摆脱危机阶段的时候，各侵略国就一定会由于在战争狂热中耗尽了自己的黄金储备和原料储备，而进入最剧烈的危机阶段。

只要列举资本主义各国现存的有形黄金储备的统计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着出这一点。◇236◇

资本主义各国的有形黄金储备

（单位：百万旧美元）

	1936 年底	1938 年 9 月
总　共	12980	14301
美　国	6649	8126
英　国	2029	2396
法　国	1769	1435
荷　兰	289	595
比利时	373	318
瑞　士	387	407
德　国	16	17
意大利	123	124
日　本	273	97

从上表可以看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还没有瑞士一国的储备多。

下列一些数字足以说明最近五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危机的情况和苏联工业高涨的情况。

以 1929 年为标准的工业总产值百分比

（1929 年==100）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美　国	66.4	75.6	88.1	92.2	72.0
英　国	98.8	105.8	115.9	123.7	112.0
法　国	71.0	67.4	79.3	82.8	70.0
意大利	80.0	93.8	87.5	99.6	96.0
德　国	79.8	94.0	106.3	117.2	125.0
日　本	128.7	141.8	151.1	170.8	165.0
苏　联	238.3	293.4	382.3	424.0	477.0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的国家，它的工◇237◇业一直在上升。

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并且正在发展。

再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德国更早地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下降时期在 1938 年已经开始了。

最后，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意大利和日本较迟地按战时方式改造本国经济的德国，工业暂时还处在稍许向上发展的状态，固然发展得不多，但总算是向上发展，——这同日本和意大利不久以前的情况很相似。

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德国工业一定也会走上日本和意大利已经走上的那条下坡路。因为，把国家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

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使工业朝着片面的军事方向发展，极力扩大同居民需要无关的战争必需品的生产，极力缩减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特别是缩减其市场投放量，因而就是缩减居民的消费，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危机发展的具体情况。

显然，这种不顺利的经济情况不能不造成列强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上次危机已经搞乱了全局，使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尖锐化了。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一切都反映出列强之间斗争的尖锐程度。新的经济危机一定会使，而且确实正在使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市场竞争，不是商业战争，不是倾销政策了。这些斗争手段早已被认为不够用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割殖民地。◇238◇

日本开始为它的侵略行为辩护，说什么在缔结九国公约时，它少分了东西，没有让它靠损害中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而英国和法国却占有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回想起，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的分赃中，它少分了东西，它应当靠缩小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得到补偿。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凡尔赛和约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德国附和了日本和意大利，要求扩大自己在欧洲的领土，索还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被战胜国夺去的殖民地。

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三个侵略国的同盟。

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2. 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现在我列举一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一些激起了新的帝国主

义大战的最重要事件。1935 年，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占领了它。1936 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且德国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则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又于 1937 年侵入华北和华中，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并开始把外国竞争者从占领区排挤出去。1938 年初，德国侵占了奥地利，而在 1938 年秋，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8 年底，日本侵占了广州，而在 1939 年初又侵占了海南岛。

这样，悄悄地降临到各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就席卷了 5 亿多人口，战事蔓延在广阔的土地上，从天津、上海和广州，经过阿比西尼亚，一直到直布罗陀。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战胜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239◇国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制度，即战后和平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基础在远东是九国公约，在欧洲是凡尔赛条约以及一系列其他条约。国际联盟的使命是，在这个制度范围内，以各国统一战线为基础，以集体保护各国安全为基础来调整各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三个侵略国以及它们所发动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彻底推翻了这个战后的和平制度的体系。日本撕毁了九国公约，德国和意大利撕毁了凡尔赛条约。为了便于自由行动，这三个国家都退出了国际联盟。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我们的时代，要想不顾各种条约，不顾社会舆论，一下子就挣脱锁链而直接奔向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法西斯头子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法西斯头子在奔向战争以前，决定用某种手法来炮制舆论，就是说要迷惑舆论，欺骗舆论。是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利益吗？得了吧，这算什么同盟！“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轴心”即某种关于轴的几何学公式而已。

是德、意、日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美，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吗？没有的事！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即对几何学的一点小小的爱好罢了。

是反对英国、法国、美国利益的战争么？胡扯！“我们”进行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而不是反对这些国家的战争。如果不信，就请读一读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240◇

侵略者老爷们就是想这样来炮制舆论的，虽然显而易见这是一套无法掩饰真相的笨拙把戏，因为要想在蒙古的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的群山间，在西属摩洛哥的丛林里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是可笑的。

但是，战争是铁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因为用任何“轴心”、“三角”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都掩盖不了如下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意大利侵占了阿比西尼亚，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了西班牙，——这一切都是违反非侵略国的利益的。战争始终是战争，侵略者的军事同盟始终是军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终是侵略者。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特点在于，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大战。侵略国进行着战争，百般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于是，我们看到，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地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

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

应当怎样解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这种片面的奇怪的性质呢？

拥有巨大能力的非侵略国怎么会这样轻易地、不加抵抗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和义务而去讨好侵略者呢？

是不是由于非侵略国力量薄弱呢？当然不是！非侵略的民主国家

加在一起，无论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无疑都比法西斯国家强大。◇241◇

既然如此，究竟为什么这些国家一再地向侵略者让步呢？

比如说，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来解释，因为非侵略国一旦加入战争，战争又会成为世界性的，那时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知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人战使革命在最大的国家之一取得了胜利。他们害怕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会使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

但是现在，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

从表面上也许可以这样来说明不干涉政策：“让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防御侵略者吧，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既要同侵略者做生意，也要同他们的牺牲者做生意。”但是事实上，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比如不妨碍德国陷入欧洲事务和纠缠于对苏战争，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疲惫不堪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筋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真是价廉物美啊！

就拿日本为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开始侵入华北以前，法国和英国的一切有权威的报纸都大声叫嚷说，中国力量薄弱，无力抵抗，日本及其军队在两三个月内就能征服中国。然后,欧美的政◇242◇治

家就开始等待和观望。后来，当日本展开军事行动时，他们就向日本让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心脏上海，让出了华南的英国垄断势力的基地广州，让出了海南岛，让日本包围香港。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很像在鼓励侵略者说；你继续往战争里陷吧，将来我们再看着办。

或者，拿德国为例。他们不顾维护奥地利独立的义务，而把奥地利让给了德国；他们违背所有一切义务而让出了苏台德区，使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听天由命的地步，然后就在报刊上大肆造谣说，“俄国军队软弱无力”，“俄国空军瓦解了”，苏联内部发生了“骚动”，从而推动德国人继续东进，约许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利品，并且说：你们只要同布尔什维克开战，以后的一切都会很顺当的。必须承认，这也很象是在推动侵略者，鼓励侵略者。

英法和北美的报刊就苏维埃乌克兰问题发出的叫嚣很值得注意。这些报界人士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德国人正在向苏维埃乌克兰进军，德国人现在已经控制了约有 70 万人口的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人至迟在本年春季就会把拥有 3000 多万人口的苏维埃乌克兰并入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看起来，这种可疑的叫嚣的目的，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毒化气氛，挑拨我们同德国发生无缘无故的冲突。

当然在德国完全可能有一些疯子梦想把苏维埃乌克兰这头大象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这只小甲虫那里去。如果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狂妄分子，那么可以肯定地讲，在我国就一定能够为这些疯子找到必要数量的拘束衣。但是，如果撇开疯子而转向正常的人，那么一本正经地谈论把苏维埃乌克兰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去，岂不显然是可笑和愚蠢的么？只要设想一下,一只小甲◇243◇虫跑到一头大象跟前，两只手往腰里一插，对它说道：“唉，你呀，你呀，我的小兄弟，我是多么可怜你呀……你生活在这里，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法西斯头子,——这算什么生活呀…… 我看到你时不能不对你说，除非合并到我这里来，否则你是没有救的……好吧，

就这样办吧，我允许你把你那块小小的领土合并到我这块广阔无垠的领土上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有些政治家和报界人士对“进军苏维埃乌克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开始亲自揭露不干涉政策的真实内幕。他们公开地讲，并且白纸黑字地写道，德国人太使他们“失望了”，因为看吧，德国人非但没有继续东进去反对苏联，却转过头来向西方索取殖民地。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区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人负责对苏开战的价钱，而现在德国人拒绝兑现，并且叫他们滚远一些。

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

这就是现时盛行的不干涉政策的真面目。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形势。

3. 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战争在各国关系中造成了新的局面。它给这些关系带来了惊慌和怀疑的气氛。战争破坏了战后和平制度的基础，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和◇244◇平主义和裁军方案已经被埋葬了。代替它们的是武装的狂热。所有的大小国家，其中首先包括实行不干涉政策的国家，都开始武装起来了。所谓慕尼黑会议对侵略者所作的让步和慕尼黑协定似乎开辟了“绥靖”新纪元的甜言蜜语，现在谁也不再相信了。连参加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和法国本身也不相信这些甜言蜜语了，它们加强自己的武装并不亚于其他国家。

显然，苏联不能无视这些严重的事变。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个战争，甚至是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的一个很小的战争，无疑都是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种危险。至于已经席卷了亚洲、非洲、欧洲5亿多人口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则是更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国一方面始终不渝地执行维护和平的政策，同时又极力加强了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

同时，苏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还决定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1934年底，我国加入了同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虽然软弱，但它总还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场所，作为一种虽然软弱但可以阻碍发动战争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这样不安的时刻，甚至象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加以忽略。1935年5月，法国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来对付侵略者可能的进攻。与此同时，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类似的条约。1936年3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互助条约。1937年8月，苏联同中华民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在这些困难的国际条件下执行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坚持维护和平的事业。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很明确的：

1.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245◇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

2.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亲近的睦邻关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

3.我们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4.我们不怕侵略者的威胁，我们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

坏苏联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战争挑拨者的打击。

这就是苏联的对外政策。

苏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所依靠的是：

1.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我们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4.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自己的和平政策；

6.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各国劳动者在道义上的支援；

7.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那些国家的明智态度。

* * *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的政策；

2.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

3.大力加强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量；

4.加强同那些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各国劳动者的国际友谊联系。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现在来谈谈我国的国内形势。

从苏联的国内形势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呈现出一幅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高涨、文化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治力量进一步巩固的图景。

应当认为，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成果是在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的改造。我国已经不再有，

或者几乎不再有使用落后技术装备的旧工厂和使用古老农具的旧农户了。目前，我们工农业的基础是现代的新技术装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农业的新技术装备程度来看，我国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的国家，因为在其他国家里，旧设备成了生产的累赘，阻碍着新技术装备的采用。

应当认为，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成一条共同的劳动战线，加强了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加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充分民主化，就是新宪法的制定。谁也不敢否认，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工作，我国国内形势十分稳定，国家政权异◇247◇常巩固，使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感到羡慕。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我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具体材料。

1. 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一）**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工业的进展呈现出一幅不断高涨的图景。这种高涨不仅反映出一般产值的增长，而且首先反映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是私营工业的灭亡。

请看下列统计表：

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全部都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的增长。

其次，从下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体系是苏联工业的唯一体系。

最后，从下表可以看出，私营工业的最终灭亡，现在是连瞎子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了。

1934—1938年间苏联工业的增长情况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与上年相较的百分比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单位：百万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											
总产值	42030	50477	62137	80929	90166	100375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8
其中：												
1.社会主义工业	42002	50443	62114	80898	90138	100349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9
2.私营工业	28	34	23	31	28	26	121.4	67.6	134.8	90.3	92.9	92.9
	百分比											
总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												
1.社会主义工业	99.93	99.93	99.96	99.96	99.97	99.97						
2.私营工业	0.07	0.07	0.04	0.04	0.03	0.03						

不能认为私营工业的灭亡是偶然的。它所以灭亡，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制度。它所以灭亡，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以现代新技术装备为基础重新装备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业生产采用新技术装备的规模来看，我国的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这是事实。

如果按照同战前水平相比的百分数，把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248◇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相比较，那么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1913—1938 年苏联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情况

	1913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苏　联	100.0	380.5	457.0	562.6	732.7	816.4	908.8
美　国	100.0	108.7	112.9	128.6	149.8	156.9	120.0
英　国	100.0	87.0	97.1	104.0	114.2	121.9	113.3
德　国	100.0	75.4	90.4	105.9	118.1	129.3	131.6
法　国	100.0	107.0	99.0	94.0	98.0	101.0	93.2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同战前水平相比，增长了 8 倍多，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却仍然围绕战前水平踏步不前，只超过这一水平 20—30%。

这就是说，在增长速度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在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一方面落后呢？我们在经济方面，即在我国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水平方面仍然是落后的。我们在 1938 年生产了约 1500 万吨生铁，而英国生产了 700 万吨。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是，如果把这些生铁的吨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3 年每人可以分得 145 公斤生铁，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87 公斤。又如，英国在 1938 年生产了 1080 万吨钢和约 290 亿度电（电力生产），而苏联生产了 1800 万吨钢和 390 多亿度电。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250◇是，如果把所有这些吨数和度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8 年每人可以分得 226 公斤钢和 620 度电，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107 公斤钢和 233 度电。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几倍，因而需要量也比英国多：苏联有17000万人口，而英国还不到4600万。一国工业的经济实力并不表现在不计人口多少的工业总产量上，而是表现在直接按人口平均消费量计算的工业产量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量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雄厚，相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越少，这个国家及其工业的经济实力就越薄弱。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国家对消费品的需要量也越多，因而这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也应当越多。

就拿生铁的产量为例。英国在1938年的生铁产量是700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生铁产量，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2500万吨。德国在1938年总共生产了1800万吨生铁，要在经济上超过德国，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4000—4500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这里指的不是1938年这个危机年度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只生产了1880万吨生铁，而是指1929年美国工业高涨时期的水平，这一年美国生产了约4300万吨生铁），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5000—6000万吨。

关于钢和钢材的生产，关于机器制造业等等，也必须**这样**说，因为，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也和其他部门一样，归根到底都决定于生铁的生产。

我们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251◇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

要想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有些什么呢？为此首先要有强烈的不可遏止的进取心，要有不惜牺牲的决心，要有用大

量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全力扩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决心。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其次，为此还需要有高度的工业生产技术和高度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最后，为此还需要时间。是的，同志们，需要时间。要建设新的工厂。要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为此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是拿生铁及其产量为例吧。在生铁的产量方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呢？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建议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终结时的生铁产量规定为6000万吨。这就是说，他们认为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可以达到1000万吨。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而且，这些同志不仅仅在生铁产量方面沉溺于幻想。例如，他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苏联人口每年的增长额应当是300—400万，甚至更多。这也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可是，如果撇开幻想家而从现实出发，那就可以根据生铁生产技术的现状，把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规定为200—250万吨，这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史以及我国的工业史都表明，这样的年增长额是紧张的，然而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所以，要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时间，而◇252◇且需要不少的时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技术越完善，我们也就能越快地实现这一极重要的经济任务，也就能使完成这一任务的期限更为缩短。

（二）**农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和工业一样沿着高涨的路线发展。这种高涨不仅表现在农产品的增长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增长和巩固，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灭亡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从1933年的7500万公顷增长到1938年的9200万公顷；而个体农户的谷物播种面积在这个期间则从1570万公

顷缩减到60万公顷，即缩减到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0.6%。至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我就不去谈了，在这方面，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经缩小到零。此外，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有1880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5%，而从事渔业和其他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说，集体农业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动同革命前播种面积的规模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

	单位：百万公顷						1938年对1913年的百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全部播种面积……	105.0	131.5	132.8	133.8	135.3	136.9	130.4
其中：							
（1）谷物……	94.4	104.7	103.4	102.4	104.4	102.4	108.5
（2）经济作物…	4.5	10.7	10.6	10.8	11.2	11.0	244.4
（3）瓜菜……	3.8	8.8	9.9	9.8	9.0	9.4	247.4
（4）饲料……	2.1	7.1	8.6	10.6	10.6	14.1	671.4

◇253◇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都增加了，首先是饲料、经济作物和瓜菜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

这就是说，我国农业日益成为技术程度和产品率更高的农业，而正确的轮作制的采用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至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装备究竟增长了多少，这可以从下面几个统计表中得到答复：

（1）苏联农业中的拖拉机总数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一）拖拉机的数量（单位：千台）						
全部拖拉机……	210.9	276.4	360.3	422.7	454.5	483.5	229.3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拖拉机…	123.2	177.3	254.7	328.5	365.8	394.0	319.8
（二）国营农场和辅助农业企业中的拖拉机……	83.2	95.5	102.1	88.5	84.5	85.0	102.2
	（二）曳引力（单位：千马力）						
全部拖拉机……	3209.2	4462.8	6184.0	7672.4	8385.0	9256.2	288.4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拖拉机…	1758.1	2753.9	4281.6	5856.0	6679.2	7437.0	423.0
（二）国营农场和辅助农业企业中的拖拉机……	1401.7	1669.5	1861.4	1730.7	1647.5	1751.8	125.0

◇254◇

（2）苏联农业中的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总数
（单位：千部。按年底数字计算）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联合收割机……	25.4	32.3	50.3	87.8	128.8	153.5	604.3
内燃机和锅驼机……	48.0	60.9	69.1	72.4	77.9	83.8	174.6
复式和半复式脱粒机…	120.3	121.9	120.1	123.7	126.1	130.8	108.7
载重汽车……	26.6	40.3	63.7	96.2	144.5	195.8	736.1
轻便汽车（单位：辆）…	3991	5533	7555	7630	8156	9594	240.4

除了这些数字外，如果再注意到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机器

拖拉机站的数目从1934年的2900个增加到1938年的6350个的事实，那么根据所有这些统计数字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国农业在现代新技术装备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因此，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相比，我国的农业不仅是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因而商品率也最高的农业，而且是现代技术装备最充足的农业。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谷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情况同革命前的情况比较一下，那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

	单位：百万公担						1938年对1913年的百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谷物……	801.0	894.0	901.0	827.3	1202.9	949.9	118.6
棉花（籽棉）……	7.4	11.8	17.2	23.9	25.8	26.9	363.5
亚麻（纤维）……	3.3	5.3	5.5	5.8	5.7	5.46	165.5
甜菜……	109.0	113.6	162.1	168.3	218.6	166.8	153.0
油料作物……	21.5	36.9	42.7	42.3	51.1	46.6	216.7

◇255◇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1936年和1938年在东部和东南部各区发生了旱灾，尽管1913年是空前的丰收年，但是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的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与1913年的水平相比，却一直不断在增长。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生产的商品率问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据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在战前，从50亿普特的谷物总产量中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粮只有13亿普特左右，就是说当时谷物生产的商品率为26%。涅姆钦诺夫同志又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率，例如在1926—1927年，约占总产量的47%,而个体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只有12%左右。如果更谨慎地

对待这个问题，把 1938 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商品率算作总产量的 40%，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谷物业在这一年中能够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将近 23 亿普特的商品谷物，即比战前的谷物生产多提供了 10 亿普特的商品谷物。

可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高度商品率，是它们的最重要的特点，这对国家的供应具有莫大的意义。

我国所以能够这样容易而迅速地解决了谷物问题，解决了以足够的商品谷物供应这个庞大的国家的问题，其秘密就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具有这样的特点。

应当指出，最近三年来，我们每年收购的谷物都不下 16 亿普特，有时候，例如在 1937 年，还增加到 18 亿普特。如果再加上每年采购的约 2 亿普特谷物以及通过集体农庄贸易得到的几亿普特谷物，那我们就可以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粮的总数。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三年来，商品谷物的基地已经从过◇256◇去被认为是我国谷仓的乌克兰移到了我国北部和东部，即移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家知道，最近两三年来，乌克兰收购的谷物每年只有 4 亿普特左右，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几年中每年收购的商品谷物则有 11—12 亿普特。

这就是谷物生产方面的情况。

至于畜牧业，那么在这个最落后的农业部门中，近几年来也有重大的进展。固然，在马匹总数和养羊业方面，我们还落后于革命前的水平，但是在牛和养猪业方面，我们却已经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苏联的牲畜总数（单位：百万头）

	按每年7月的数字计算							1938年对1916年（据调查）的百分比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916年（据调查数字）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马……	35.8	16.6	15.7	15.9	16.6	16.7	17.5	48.9	105.4
牛……	60.6	38.4	42.4	49.2	56.7	57.0	63.2	104.3	164.6
绵羊和山羊	121.2	50.2	51.9	61.1	73.7	81.3	102.5	84.6	204.2
猪……	20.9	12.1	17.4	22.5	30.5	22.8	30.6	146.4	252.9

毫无疑问，养马业和养羊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在最短期间就会消除。

（三）**商品流转和运输**。随着工农业的高涨，我国的商品流转额也增长了。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网扩大了25%。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178%，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增长了112%。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257◇

商 品 流 转 额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网（商店和货摊）——按年底数字计算……	285355	286236	268713	289473	327361	356910	125.1
2.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包括公共饮食业）——单位：百万卢布……	49789.2	61814.7	81712.1	106760.9	125943.2	138574.3	278.3
3. 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单位：百万卢布……	11500.0	14000.0	14500.0	15607.2	17799.7	24399.2	212.2
4. 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各州设立的商品批发站——按年底数字计算……	718	836	1141	1798	1912	1994	277.7

显然，如果运输业的转运额没有一定的增长，国家的商品流转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发展。的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各类运输的转运额，特别是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转运额都增长了。水路运输的转运额也增长了，但是很不稳定，而1938年的水路运输的转运额可惜竟比上一年还有所降低。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

货　运　额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铁路（单位：10亿吨公里）……	169.5	205.7	258.1	323.4	354.8	369.1	217.7
河运和海运（单位：10亿吨公里）……	50.2	56.5	68.3	72.3	70.1	66.0	131.5
民用航空运输（单位：百万吨公里）……	3.1	6.4	9.8	21.9	24.9	31.7	1022.6

毫无疑间，1938年水路运输方面的某些落后状况，将在1939年消除。◇258◇

2. 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工农业的继续不断高涨不能不引起，而且也确实引起了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剥削现象的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巩固，失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城乡贫困的消失，工业的大规模扩展和工人人数的不断增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的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对集体农庄供应大量头等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所有这一切都为进一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状况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工

人和农民物质状况的改善，自然又使构成我国重大力量并为工人和农民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那些离开农村而在饥饿的恐怖之下过活的、无工可做和无家可归的农民想点办法，把他们安插到工业部门和发点慈悲为他们找点工作了。这样的农民在我国早已没有了。这当然很好，因为这证明我们的农村是富裕的。现在的问题只能是请集体农庄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年为我们日益增长的工业输送哪怕是150万左右的青年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富裕起来的集体农庄应当注意到，如果没有它们的这种支援，我国的工业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果工业得不到扩展，我们就不能满足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集体农庄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大量技术装备能够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一投入到工业中去，就能够给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

总起来说，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在改善工人和农民的◇259◇物质状况方面有如下一些标志；

1.国民收入从1933年的485亿卢布增加到1938年的1050亿卢布；

2.工人和职员人数从1933年的2200多万人增加到1938年的2800万人；

3.工人和职员的全年工资总额已经从3495300万卢布增加到9642500万卢布；

4.工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1933年的1513卢布提高到1938年的3447卢布；

5.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从1933年的566190万卢布增长到1937年的1418010万卢布；

6.谷物区内发给集体农庄每个农户的谷物平均数，从1933年的61普特提高到1937年的144普特,而且种子、种子储备、公共牲畜的

饲料储备、交售的谷物、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都没有计算在内；

7. 国家对社会文化设施的预算拨款，从 1933 年的 583990 万卢布增长到 1938 年的 3520250 万卢布。

至于人民的文化状况，它也随着人民的物质状况的提高而提高了。从人民文化发展方面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真正是文化革命的时期。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实现，各级学校和学生数目的增如，高等学校毕业的专家数目的增加，新的苏维埃知识界的形成和巩固，——这就是人民文化高涨的一般情况。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数字：◇260◇

（1）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标　　志	计算单位	1933—1934 年　度	1938—1939 年　度	1938—1939 年度对 1933—1934 年度的　百　分　比
各级学校的学生总数……	千人	23814	33965.4	142.6
其中：				
初等教育……	千人	17873.5	21288.4	119.1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	千人	5482.2	12076.0	220.3
高等教育……	千人	458.3	601.0	131.1
在苏联参加学习的人数（包括各种学习方式）…	千人	—	47442.1	—
群众图书馆数目……	千所	40.3	70.0	173.7
群众图书馆的藏书量……	百万册	86.0	126.6	147.2
俱乐部数目……	千所	61.1	95.6	156.5
剧院数目……	座	587	790	134.6
电影放映站数目（窄片放映站除外）……	个	27467	30461	110.9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498	15202	增加 30 倍
农村中的电影放映站数目（窄片放映站除外）……	个	17470	18991	108.7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24	6670	增加 277 倍
报纸的年发行量……	百万份	4984.6	7092.4	142.3

（2）1933—1938年间苏联新建学校数

年份	学校数		
	在城市和市镇	在农村	总计
1933……	326	3261	3587
1934……	577	3488	4065
1935……	533	2829	3362
1936……	1505	4206	5711
1937……	730	1323	2053
1938……	583	1246	1829
1933—1938年的总数	4254	16353	20007

(3)1933—1938年间从高等学校毕业青年专家人数

（单位：千人）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全苏联总数（不包括军事专家）	34.6	49.2	83.7	97.6	104.8	106.7
1. 工业和建筑工程师……	6.1	14.9	29.6	29.2	27.6	25.2
2. 运输和邮电工程师……	1.8	4.0	7.6	6.6	7.0	6.1
3. 农业机械化工程师、农艺师、兽医和畜牧学家……	4.8	6.3	8.8	10.4	11.3	10.6
4.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5	2.5	5.0	6.4	5.0	5.7
5. 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员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中包括艺术工作者……	10.5	7.9	12.5	21.6	31.7	35.7
6. 医生、药剂师和体育工作者……	4.6	2.5	7.5	9.2	12.3	13.6
7. 其他专业……	4.3	11.1	12.7	14.2	9.9	9.8

◇262◇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巨大的文化工作，在我国便产生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工人阶级、农民和苏联职员，他们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没有身受剥削的桎梏，仇恨剥削者并决心忠诚地为苏联各族人民服务。

我认为，这个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产生，是我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3. 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稳定，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确立，工业和农业的高涨，劳动者物质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的增长，——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实现的这一切不能不使苏维埃制度进一步巩固起来。

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状况动荡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在这一基础上又产生了1936 年 11 月通过的苏联宪法以及国家最高机关选举的充分民主化。◇263◇

至于谈到国家最高机关的选举，那就要指出，它光辉地体现了构成我国国内形势特点的苏联社会的一致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大家知道，在 1937 年 12 月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联盟的票的几乎有 9000 万选民,即占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 98.6%，而在 1938 年 6 月选举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

人士联盟的票的有9200万选民，即占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99.4%。

这就是苏维埃制度所以巩固的基础，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具有的取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

这还说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军队的后方和前方由于彼此一致和内部统一，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巩固，这一点是国外那些爱搞军事冲突的人应当记住的。

国外有些报界人士胡说什么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洗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值得加以耻笑。把暗害分子和敌对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怎么会动摇和瓦解苏维埃制度呢？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这一小撮人不懂得摆脱了资本锁链的最普通的苏联公民都比任何一个带着资本主义奴隶制枷锁的身居高位的外国官老爷高明得多，——谁需要这帮可鄙的卖身投靠的奴才呢？他们对人民能有什么价值呢？他们能“瓦解”谁呢？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264◇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如果听信这些胡言乱语的外国人，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让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逍遥法外，不去打扰他们的暗害、凶杀

和间谍活动，苏维埃组织就会巩固得多和稳定得多了。这些老爷们如此厚颜无耻地为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辩护，岂不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吗？

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就一定会使而且确实已经使这些组织进一步巩固了，这样讲岂不是更正确吗？例如，哈桑湖事件不是恰好说明了把间谍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巩固这些组织的最可靠的手段吗？

* * *

党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继续发展我们的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以便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能在最近10—15年之内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

2.继续发展我们的农业和畜牧业，以便在最近的3—4年内使谷物的年产量达到80亿普特，使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达到12—13公担，使经济作物的产量平均增加30—35%，使羊和猪的头数增加一倍，牛的头数增加40%，马的头数增加35%。

3.继续改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265◇

4.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彻底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巩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巩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爱合作，极力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和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

5.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必须记住外国谍报机关将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派到我国来，必须记住这一点并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的侦察机关，不断地帮助它粉碎和铲除人民的敌人。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从政治路线和日常实际工作方面看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胜利的时期。

社会主义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确立，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工农业改造的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提前完成，谷物的年产量达到70亿普特的水平，贫困和失业的消灭，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绩。这些成绩表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瓜分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266◇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党粉碎了人民公敌并肃清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后，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上更加一致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表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党内生活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材料。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调整党的成分，排除不可靠分子，选拔优秀分子；另一方面是，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代表1874488个党员。如果把这个数目同前一次即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数目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增加了60万个新党员。党不能不感到，在1930—1933年的条件下，这样大批的人涌入党内，是不健康地和不恰当地扩大了党员数量。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不合格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党不能不知道，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而且首先在于党员的质量。于是就提出了调整党的成分的问题。当时决定把1933年就开始的清洗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工作确实一直继续到1935年5月。其次，当时决定停止接收新党◇267◇员，在1936年9月以前，确实一直没有接收新党员，直到1936年11月1日，才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其次，基洛夫同志惨遭凶杀的事件证明党内有不少可疑分子，于是当时决定审查和换发党证，这两项工作直到1936年8月底才结束。只是在此以后，党才开始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才肃清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合格的、消极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而选拔了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一次即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共代表将近160万个党员，就是说，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少了27万个党员。但这一点坏处也没有。相反，这是在好转，因为党是靠清除本身的坏东西而巩固的。现在我

们的党在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在质量上却更好了。

这是很大的成绩。

至于改善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使它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那么党认为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是使党的机关易于領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的最好办法。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不仅在人民委员部方面实行了，而且在行政区域的组织方面，即在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等等方面也实行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7 个加盟共和国，而是 11 个加盟共和国，不是 14 个苏联人民委员部，而是 34 个苏联人民委员部，不是 70 个边疆区和州，而是 110 个边疆区和州，不是 2559 个市区和乡区，而是 3815 个市区和乡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在在党的领导机关系统中总共有以联共（布）中央为◇268◇首的 11 个中央委员会，6 个边疆区委员会，104 个州委员会，30 个专区委员会，212 个市委员会，336 个市区委员会，3479 个乡区委员会，113060 个基层党组织。

决不能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工作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它无论在改善日常领导工作方面，或者在使领导本身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还不去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提拔成千上万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2. 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调整党的成分，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这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进一步巩固党及其领导的唯一办法。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实行的另一种巩固党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改善挑选干

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269◇空文的危险。

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正确地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人才、正确配备干部以及按照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的问题。

正确地挑选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还不是说要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从那里发出各种指令来。这也不是说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毫无道理地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调来调去，进行无休止的“改组”。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成长着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

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政治路线的要求，因为进行这种配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路线。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270◇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在巩固党的领导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它在挑选干部时，正是自下而上地、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个把年老工作者和年轻工作者配合起来的方针。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 50 多万个年轻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靠近党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的领导职务，其中有 20%以上是妇女。◇271◇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地挑选干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来，并把它提到应有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

为此就要取消把考察、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各科的作法，而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

联共（布）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的相应的干部部，就应当是这样的部门。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和合作社组织、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272◇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

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中毫无困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273◇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

发展规律的科学。

关于改进宣传工作和改进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办法问题，联共（布）中央曾经多次讨论过，参加讨论的还有各州党组织中的宣传员。当时注意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9月出版的事实。当时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联共（布）中央这些工作的结果曾经公布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①]这一著名的决议中。

联共（布）中央根据这个决议，并注意到1937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论党的工作缺点》的著名决议，规定了如下一些主要办法来消除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缺点，并改善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

1.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

2.认为迷恋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274◇

3.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

4.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

5.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

6.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

————————————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

毫无疑问，这些已经在实行但还没有充分实行的办法，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

4.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275◇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

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 1937—1938 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276◇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

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277◇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②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一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278◇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像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 45—55 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1917年8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279◇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把资产阶级赶下台，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完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280◇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①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281◇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282◇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其成分或状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

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283◇经济体系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284◇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

斗争。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　　*　　*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285◇

1.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察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

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 * *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我把我们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经历的道路作了一番概括的叙述。党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我们有过缺点和错误。党和党中央并没有隐瞒这些缺点和错误，而是努力加以纠正。我们也有重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绩，但是这些成功和成绩决不应该冲昏我们的头脑。

主要的总结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事业的正确性。这就是主要的总结，因为它加强了确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确信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人民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商人和富农是活不下去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人民没有剥削者是能够很好地活下去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工人阶级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旧制度以后，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我国工人阶级却◇286◇用事实证明，它不仅完全有能力破坏旧的制度，还完全有能力建立起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是既没有危机又没有失业的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农民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集体农庄农民却用事实证明，农民是能够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的走狗们所特别力求达到的，主要是想打消工人阶级对本身力量的信心，打消它对自己能够而且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从而使资本主义奴隶制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产

阶级知道，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推翻、还继续存在着，这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优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的信心。不能说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毫无成效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毒化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使他们犹疑不决和缺乏信心。假如我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它的斗争和胜利，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坚定它对本身力量的信心、获得胜利的信心，那么我们的党就可以说，它的工作没有白做。可以用不着怀疑，情形一定会是这样。

我们战无不胜的工人阶级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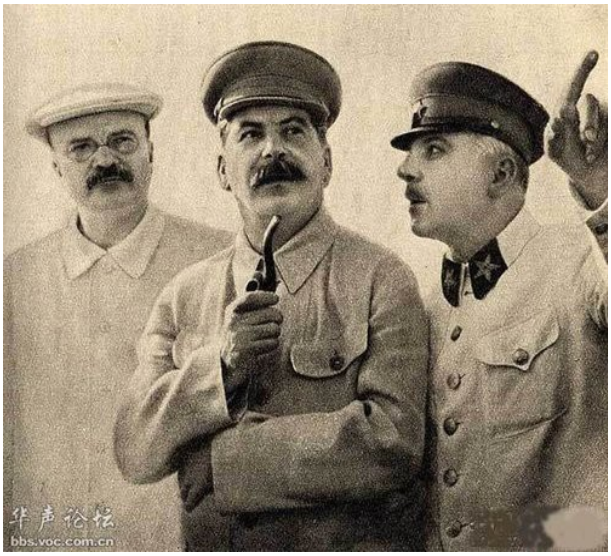
我们战无不胜的集体农庄农民万岁！

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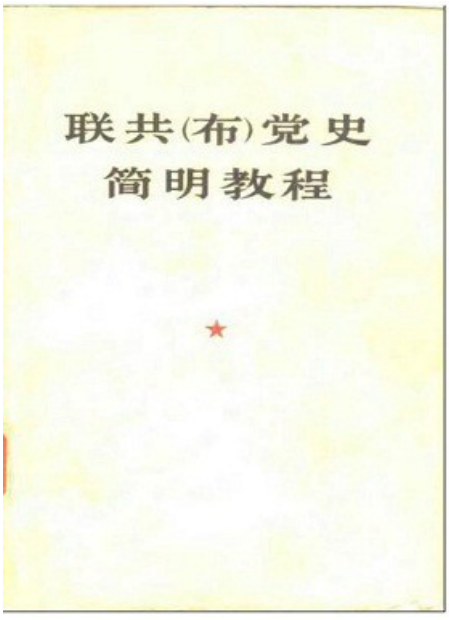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1952 年
第 11 版第 603—651 页◇287◇



斯大林在现场视察

作报告的斯大林

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证书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附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1936年）

（1936年非常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社会结构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苏联的政治基础，是由于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三条　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

第四条　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由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废除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而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

第五条　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的财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各个集体农庄的和各个合作社的财产）。

第六条　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和空中运输、银行、邮电、国家所建立的大型农业企业（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等等），城市和工业区的公用企业和主要住宅，都是国家的财产，即全民的财产。

第七条　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公有企业及其牲畜和工具，集体农庄与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公有建筑物，都是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

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规定，除从集体

农庄的公有经济中获得主要收入外，还可以拥有小块园地，供个人使用；并拥有此园地上的副业、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作为个人财产。

第八条　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归该集体农庄无代价和无限期地使用，即永久使用。

第九条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苏联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同时，法律容许自力经营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经济。

第十条　公民的劳动收入和储蓄、住宅和家庭副业、家常用具和必需品、个人消费品和舒适设备品的个人所有权，以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都受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　苏联的经济生活由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决定并受其指导，以便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巩固苏联的独立和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

第十二条　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劳动是苏联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光荣的事情。

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第二章　国家结构

第十三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下列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其中有：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十四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行使下列职权：

1．在国际关系中代表苏联、缔结、批准和废除苏联同其他国家间的条约，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同外国相互关系的一般准则；

2．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3．接受新共和国加入苏联；

4．监督对苏联宪法的遵守，并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宪法符合于苏联宪法；

5．批准各加盟共和国间疆界的变更；

6．批准各加盟共和国内成立新自治共和国和新自治省；

7．组织苏联国防，领导苏联的一切武装力量，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军队编制的指导原则；

8．根据国家垄断原则进行对外贸易；

9．保卫国家安全；

10．制订苏联国民经济计划；

11．批准苏联统一的国家预算，规定列入全联盟、各共和国和各地方的预算的税收和其他各项收入；

12．管理全联盟所属的银行，工业和农业的机关、企业以及商业企业；对联盟兼共和国所属的工业和建设事业实行总的领导；

13．管理有全联盟意义的运输和邮电；

14．领导金融和信用系统；

15．组织国家保险；

16．借款和贷款；

17．规定使用土地和使用矿藏、森林、水流的基本原则；

18．规定教育和保健事业的基本原则；

19．组织国民经济统一统计的制度；

20．制订劳动立法基础；

21．制订关于法院组织和诉讼程序的立法基础、民事和刑事的立法基础；

22．制订关于苏联国籍的法律、制订关于外国人权利的法律；

23．制订婚姻和家庭立法基础；

24．颁布全联盟的大赦令。

第十五条　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都加以保护。

第十六条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

第十七条　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第十八条　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非经本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

第十八条　（a）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

第十八条　（b）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

第十九条　苏联法律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条　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同全联盟的法律发生抵触的时候，

以全联盟的法律为准。

第二十一条　对苏联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

各加盟共和国的公民都是苏联公民。

第二十二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下列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达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迪诺——巴耳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耳梅次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累利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北奥谢梯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切切诺——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包括下列各自治省：阿迪盖自治省，戈尔诺——阿尔泰自治省、犹太自治省，卡腊查耶沃——切尔克斯自治省，图瓦自治省，哈卡斯自治省。

*第二十三条　原条文已撤销。[1]

第二十四条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纳希契凡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省。

第二十五条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阿札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南奥谢梯亚自治省。

第二十六条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第二十七条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戈尔诺——巴达克山自治省。

第二十八条　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的省、边区等行政区域设置

的问题，应归各加盟共和国处理。

*第二十九条 原条文已撤销。

第三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三十条 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第三十一条 本宪法第十四条所赋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切职权，依照本宪法规定，不属于对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各部权限以内的，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

第三十二条 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

第三十三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

第三十四条 联盟苏维埃由苏联公民按选区选举，每三十万人为一选区，选举代表一人。

第三十五条 民族苏维埃由苏联公民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省和民族州依下列名额选举：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选举代表二十五人，每一个自治共和国选举代表十一人，每一个自治省选举代表五人，每一个民族州选举代表一人。

第三十六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每届任期四年。

第三十七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即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享有平等权利。

第三十八条 联邦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享有同等的立法提案权。

第三十九条 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各以过半数票通过后，即被认为批准。

第四十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秘书签字后，用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公布。

第四十一条　联邦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的会议同时开幕和闭幕。

第四十二条　联盟苏维埃选出联盟苏维埃主席一人和副主席四人。

第四十三条　民族苏维埃选出民族苏维埃主席一人和副主席四人。

第四十四条　联盟苏维埃主席和民族苏维埃主席主持各该院会议并掌握内部活动程序。

第四十五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由联盟苏维埃主席和民族苏维埃主席轮流主持。

第四十六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每年举行两次，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集。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自己认为必要时或者根据某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要求，可以召集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

第四十七条　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问题交由两院同数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解决。如果协商委员会不能通过一致决议或者通过的决议不能使某一院满意时，问题提交两院重新审议。如果两院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即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并且确定举行新选举。

第四十八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其组成人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十五人，即每一加盟共和国一人，主席团秘书一人，委员十六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自己的全部工作。

第四十九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

1．召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

2．颁布法令；

3．解释苏联现行法律；

4．根据苏联宪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并且确定举行新选举；

5．由自己倡议或者根据某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举行全民投

票，（全民公决）；

6．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同法律发生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7．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提名，任免苏联的各部部长，但事后必须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

8．制定苏联的勋章和奖章，规定苏联的荣誉称号；

9．颁发苏联的勋章和奖章，授予苏联的荣誉称号；

10．行使特赦权；

11．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和其他专门衔级；

12．任免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人员；

13．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如果遇到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御侵略的条约义务时，宣布战争状态；

14．宣布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令；

15．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

16．任免苏联驻外全权代表；

17．接受外国驻苏联外交代表呈递的国书和卸任状；

18．为了保障苏联国防或者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宣布苏联个别地方或全境的戒严。

第五十条　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各选出资格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院代表的资格。

两院根据各自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代表资格或者宣布个别代表当选无效。

第五十一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必要的时候，对于任何问题可以组织调查委员会或者监察委员会。

一切机关和公职人员都有义务执行这些委员会的要求，并且向它们提供必要的材料和文件。

第五十二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非经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非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不受审判或者逮捕。

第五十三条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任期届满或者经先期解散以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继续行使职权到下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选出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止。

第五十四条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任期届满或者先期解散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必须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任期届满或者解散后的两个月以内举行新选举。

第五十五条　新选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在选举完成后的三个月以内由上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集。

第五十六条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组织苏联政府，即苏联部长会议。

第四章　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五十七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第五十八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由加盟共和国的公民选举，每届任期四年。

代表名额由加盟共和国宪法规定。

第五十九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是加盟共和国唯一的立法机关。

第六十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行使下列职权：

1．依照苏联宪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通过和修改本加盟共和国的宪法；

2．批准本加盟共和国所属自治共和国的宪法和决定所属自治共和国的疆界；

3．批准本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成立经济行政区；

4．对于本加盟共和国审判机关所判处刑罚的公民，有行使大赦和特赦的权限；

5．决定本加盟共和国的外交代表问题；

6．规定本加盟共和国军队的编制。

第六十一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出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其组成人员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副主席若干人，主席团秘书一人、委员若干人。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权由加盟共和国宪法规定。

第六十二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出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若干人，负责主特会议。

第六十三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组织本加盟共和国政府，即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

第五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管理机关

第六十四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是苏联部长会议。

第六十五条　苏联部长会议对苏联最高苏维埃负责并对它报告工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对它报告工作。

第六十六条　苏联部长会议根据并且为了执行现行法律，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检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

第六十七条　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决议和命令，在苏联全境都必须执行。

第六十八条　苏联部长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1．统一并指导全联盟的各部、联盟兼共和国的各部和部长会议

所属其他各机关的工作；通过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实现对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2．采取措施，以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巩固信用——货币制度；

3．采取措施，以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并保障公民权利；

4．在外交方面实行总的领导；

5．规定每年征集服役的公民人数，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一般建议；

6．按照需要，设立直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关于经济、文化和国防等建设的专门委员会和总管理局。

第六十九条　苏联部长会议对于联盟权限内的各种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有权停止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和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并有权撤销苏联各部部长的命令和指示。

第七十条　苏联部长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组织。其组成人员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若干人，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若干人，

苏联各部部长，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自动化和机器制造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防技术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造船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化学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筑事业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粮食制品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系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中央统计局局长，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主席。

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都是苏联部长会议的成员。

第七十一条　苏联政府或苏联各部部长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向它提出的质询，必须在三天以内在有关院经以口头或书面答复。

第七十二条　苏联各部部长分别领导苏联权限以内各该部门的国家管理工作。

第七十三条　苏联各部部长在各该部的权限内，根据并且为了执行现行法律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得发布命令和指示，并且检查这些命令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第七十四条　苏联既有全联盟的部，也有联盟兼共和国的部。

第七十五条　全联盟的部在苏联全境内直接或者通过它所任命的机关领导各该部所属的国家管理工作。

第七十六条　联盟兼共和国的部通常是通过加盟共和国同名称的部领导各该部所属的国家管理工作，而其直接管理的企业，只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注册的为限。

*第七十七条　全联盟的部是下列各部：

对外贸易部，

海上运输部，

交通部，

中型机器制造部，

运输机器建造部，

电站建筑部。

*第七十八条　联盟兼共和国的部是下列各部：

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

地质和矿藏保护部，

卫生部，

外交部，

文化部，

国防部，

邮电部，

农业部，

财政部。

第六章　加盟共和国国家管理机关

第七十九条　加盟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

第八十条　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对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负责并对它报告工作；在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对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对它报告工作。

第八十一条　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根据并且为了执行苏联和本加盟共和国的现行法律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得发布决议和命令，并且检查这些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

第八十二条　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有权停止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的执行，并有权撤销边区、省和自治省劳动者代表苏维

埃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以及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

第八十三条 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由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组织，其组成人员是：

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部长会议副主席若干人，

各部部长，

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依照加盟共和国宪法组织的部长会议所属各种国家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主管机关的领导人。

第八十四条 加盟共和国各部部长分别领导加盟共和国权限以内各该部门的国家管理工作。

第八十五条 加盟共和国各部部长在各该部的权限内，根据并且为了执行苏联和本加盟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苏联部长会议和本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苏联联盟兼共和国的各部的命令和指示，得发布命令和指示。

第八十六条 加盟共和国既有联盟兼共和国的部，也有共和国的部。

第八十七条 联盟兼共和国的各部，分别领导各该部所属的国家管理工作，除接受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领导外，并接受苏联相当的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的领导。

第八十八条 共和国的各部，分别领导各该部所属的国家管理工作，直接受本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领导。

第八十八条 （a）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领导其所属各经济部门的活动时，直接受本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领导。

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自己的权限内，根据并且为了执行苏联和本加盟共和国的法律，苏联部长会议和本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和命令，得发布决议和命令。

第七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八十九条　自治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第九十条　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由本共和国公民依照本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代表名额选举，第届任期四年。

第九十一条　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唯一的立法机关。

第九十二条　每一自治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定的并与加盟共和国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

第九十三条　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依照本自治共和国宪法选举本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并组织本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

第八章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九十四条　边区、省、自治省、州、区、市、村（又称为斯坦尼茨，捷列夫尼，胡图尔，基什拉克，阿乌尔）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九十五条　边区、省、自治省、州、区、市、村（又称为斯坦尼茨，捷列夫尼，胡图尔，基什拉克，阿乌尔）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由本边区、省、自治省、州、区、市、村的劳动者选举，每届任期两年。

第九十六条　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由各该加盟共和国宪法规定。

第九十七条　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领导所属管理机关的工作，保证国家秩序的维持、法律的遵守和公民权利的保护，领导地方的经济建

设和文化建设，规定地方的预算。

第九十八条　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联盟法律和加盟共和国法律所赋予的权限内，得通过决定和发布命令。

第九十九条　边区、省、自治省、州、区、市、村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是由各该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是：主席，副主席若干人，秘书、委员若干人。

第一百条　村镇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依照加盟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由该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出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各一人组成。

第一百零一条　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直接向选举它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和上一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机关报告工作。

第九章　法院和检察院

第一百零二条　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边区法院和省法院、自治共和国法院和自治省法院、州法院、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设立的苏联专门法院、人民法院，行使苏联的审判权。

第一百零三条　各级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情况外，一律在人民陪审员参加下进行。

第一百零四条　苏联最高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苏联最高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负责监督联盟和加盟共和国所有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一百零五条　苏联最高法院和苏联专门法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每届任期五年。

苏联最高法院审判成员中应包括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

第一百零六条　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由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每届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七条　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由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每届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八条　边区法院、省法院、自治省法院、州法院分别由边区、省、自治省、州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每届任期五年。

第一百零九条　区（市）人民法院的人民审判员由本区（市）公民按照普遍、直接、平等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每届任期五年。

区（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由他的工作或居住地点的职工和农民大会选举，陪审员是军人时，由军队选举，每届任期二年。

第一百一十条　诉讼用本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省的语言进行，保证不通晓这种语言的当事人通过翻译完全了解案件材料并且有权用他本民族的语言在法庭上发言。

第一百一十一条　苏联各级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并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审判员独立，只服从法律。

第一百一十三条　苏联总检察长对于所有的部和这些部所属的机关以及每一个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严格遵守法律，行使最检察权。

第一百一十四条　苏联总检察长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任期七年。

第一百一十五条　各共和国、边区、省的检察长和自治共和国、自治省的检察长由苏联总检察长任命，任期五年。

第一百一十六条　州、区和市的检察长由加盟共和国检察长提请苏联总检察长批准任命，任期五年。

第一百一十七条　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涉，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

第十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百一十八条 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有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报酬的权利。

劳动的权利的保证是：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苏维埃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消除，失业现象的消灭。

*第一百一十九条 苏联公民有休息的权利。

休息权利的保证是：规定工人和职员每日工作时间为七小时，对某些劳动条件困难的职业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六小时，在劳动条件特别困难的车间中每日工作时间缩减为四小时，规定工人和职员每年都有照付工资的休假；广泛设立疗养院、休养所和俱乐部供劳动者享用。

第一百二十条 苏联公民在年老、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享受物质保证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保证是：广泛发展由国家出资为工人和职员举办的社会保险事业；实行劳动者免费医疗；广泛设立疗养所供劳动者享用。

第一百二十一条 苏联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保证是：在教育和生活、生产相联系的基础上实行八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发展中等一般技术教育，各种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和高等教育，尽力发展夜校和函授学校，对各种教育都实行免费的国家的助学金制度；各地学校用当地语言讲课；在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对劳动者进行免费的生产教育、工艺教育 农艺教育。

第一百二十二条 苏联妇女在经济的、国家的、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妇女的这些权利可能实现的保证是：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获得劳动、劳动报酬、休息、社会保险和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利益；国家补助多子女的母亲和单身母亲；妇女在产前产后有保

留原工资的休假；广泛设立助产院、托儿所和幼儿园。

第一百二十三条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的、国家的、文化的社会——政治的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这是确定不移的法律。

因种族或者民族的关系，而对公民的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反之，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民特权以及凡宣传种族或者民族的特殊化或者仇恨和歧视等行为，都受法律制裁。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为了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一切公民都享有举行宗教仪式或者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为了适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

（1）言论自由；

（2）出版自由；

（3）集会自由；

（4）游行和示威自由。

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证是：印刷厂、纸张、公共场所、街道、邮电和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都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组织和团体享用。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为了适合劳动者的利益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组织上的自动性和政治上的积极性起见，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成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体育和国防的组织，文化、技术和科学等团体；而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自愿结成的先锋队，是劳动者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第一百二十七条　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民的住宅不可侵犯和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二十九条 苏联对于凡因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进行科学活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有遭受迫害危险的外国公民，均给以避难的权利。

第一百三十条 苏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遵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诚恳地履行社会义务，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

第一百三十一条 苏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它是苏维埃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祖国富强的源泉、全体劳动者富裕文明生活的源泉。

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就是人民的公敌。

第一百三十二条 普遍兵役义务是国家的法律。

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兵役是苏联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一百三十三条 保卫祖国是苏联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凡违背誓词，投奔敌方，损害国家武装力量，做外国间谍，都是背叛祖国、罪大恶极的行为，应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第十一章 选举制度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即苏联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边区和省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自治省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州、区、市、村（又称为斯坦尼茨，捷列夫尼，胡图尔，基什拉克，阿乌尔）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都由选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

第一百三十五条 代表的选举是普遍的，苏联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序，不问居住期限、社

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有参加代表的选举的权利；但是依法定程序宣告为患精神病的人除外。

每一个年满23岁的苏联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可以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第一百三十六条　代表的选举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投票权，一切公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

第一百三十七条　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一百三十八条　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兵役的公民有同所有其他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代表的选举是直接的，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村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都由公民直接选举。

第一百四十条　代表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第一百四十一条　候选人按选区提出。

提出候选人的权利属于下列各劳动者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共产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文化团体。

第一百四十二条　每一个代表必须向选民报告本人的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并且根据选民的多数决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随时撤换代表。

第十二章　国徽、国旗、首都

第一百四十三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徽形式如下：镰刀和铁锤绘于下面有阳光照耀、周围有麦穗环绕地球上，麦穗上有各加盟共和国文字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国徽顶端绘有五角星一枚。

第一百四十四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旗，是用红色材料制成的，上角接近旗杆的地方绘有金黄色的镰刀和铁锤，镰刀和铁锤的上面绘有带金黄色的红色五角星一攻。国旗宽度和长度是一与二之比。

第一百四十五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是莫斯科。

第十三章 本宪法修改程序

第一百四十六条 苏联宪法只有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各以2/3以上的人数通过的决定，才可以修改。

————————————

[1] 注*的各条均系按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的修改或补充译出。

年 表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九三四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联共（布）党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被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入审查及补充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的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纲，以及最后编审卡冈诺维奇作的“组织问题(党和苏维埃的建设)”报告提纲的两个委员会。

二月十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选举斯大林为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并批准斯大林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六月四日

斯大林在波克罗夫斯基—斯特列施聂夫和赫莱勃尼柯夫各区视察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建设。

六月十九日

斯大林出席在红场举行的庆祝契留斯金探险队队员返回莫斯科的群众大会、检阅和游行。

六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和党政首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苏联英雄——契留斯金探险队队员和飞行员们。

七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演说关于重建莫斯科城总计划的问题。

八月八日

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撰写《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大纲的补充意见》。

八月九日

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撰写《关于〈近代史〉教科书大纲的补充意见》。

十二月二日

基洛夫惨遭凶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莅临列宁格勒。

十二月四日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由列宁格勒护送基洛夫灵柩回莫斯科。

十二月六日

斯大林在红场参加基洛夫的葬礼。

十二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钢铁工人会议上就发展钢铁工业的任务发表演说。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参加第十六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

斯大林参加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斯大林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苏维埃委员。

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第七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被选为苏联宪法修正委员会主席。

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斯大林参加第二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领导农业劳动组合模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四月一日至四日

斯大林参加铁路运输工作者会议。

五月四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红军学院的毕业生发表演说。

五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庆祝莫斯科地下铁道通车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七月七日

斯大林主持宪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大会选举斯大林为编纂小组委员会和宪法一般问题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

斯大林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选举斯大林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七月三十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铁道运输工作者时发表演说。

十一月十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种植甜菜的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时发表演说。

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次全苏联工业和运输业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

十一月十七日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说。

十二月一日

斯大林在苏联先进男女联合机驾驶员和党政首长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十二月四日

斯大林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尼斯坦先进男女集体农民和党政首长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十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卡查赫斯坦以及卡拉—卡尔帕克先进男女集体农民和党政首长的会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斯大林参加谷物丰收的先进者、拖拉机驾驶员及打谷机司机和党政首长的会议。

一九三六年

一月四日

斯大林与党政首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采金工业、有色金属、轻金属和稀有金属工业的工作者。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二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畜牧业先进者和党政首长的会议。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斯大林参加种植亚麻和大麻的先进者和党政首长的会议。

四日十一日至二十一日

斯大林参加第十次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五月十五日

斯大林主持宪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六月一日至四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全体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

六月十一日

斯大林出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报告苏联宪法草案。

六月十一日

斯大林在红场参加高尔基的葬礼。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

斯大林参加苏联第八次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报告苏联宪法草案。

十二月一日

苏联第八次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制定苏联宪法最后条文编审委员会主席。

十二月三日

斯大林主持编审委员会会议。

十二月五日

斯大林在苏联第八次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报告编审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

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斯大林参加第十七次全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斯大林被选入制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最后条文编审委员会。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三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五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作了《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的报告。

四月

斯大林写了“关于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一信给该书的编者。

五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和党政首长与飞行员契卡洛夫和巴俄陀柯夫共同讨论关于莫斯科—北极—美国间的不着陆飞行的计划。

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参加党政首长与纺织工业工作者的会议。

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九日

斯大林在全国各地的竞选大会上被提名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一名候选人。

十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参加钢铁工业领导工作者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会议。

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钢铁工业和煤矿工业的领导工作者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并发表演说。

十二月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

十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被选为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并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大会。

五月十七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第一次全苏联高等学校工作者会议的参加者，并发表演说。

九月九日至十九日

《真理报》刊登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

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十月一日

由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斯大林领导宣传员会议。

十月四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钢铁工厂领导工作者举行会议，并对技师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发表演说。

一九三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三月十日至二十一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大会将斯大林选入对莫洛托夫作的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及日丹诺夫作的修正联共（布）党章两个报告提纲的修改补充审查委员会。

三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联共（布）党纲修正委员会主席。

三月二十一日

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三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书记及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

十二月二十日

当斯大林六秩寿辰时，由于他在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创立苏维埃国家、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杜会以及加强苏联各民族友好事业上的卓越劳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奖给斯大林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十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被选为全苏联列宁农业科举院荣誉院士。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被选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

一九四〇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六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二日

斯大林与党政首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参加“塞道夫号”破冰船英勇航行的船员们。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四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

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八月一日至七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

八月十日

斯大林与党政首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比萨拉比亚和布柯维那北部各民族的代表，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国会与爱沙尼亚国家杜马的全权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一年
（六月前）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十七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领导全苏联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会议。

五日五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军官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

五月六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斯大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据苏联出版的《斯大林年谱》原文
个别文字标点经校订

本卷正文译文均取自《斯大林文集》

斯 大 林 文 集

SIDALIN WENJI

（1934 -1952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491,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1·1240 定价4.55元

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
为劳动人民事业服务
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
和人民操心的事情以外，没有别
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八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五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5
1938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五卷

一九三八年

二〇一五年·中国

斯 大 林

凡　例

1．本卷正文中的夹注符号（◇1◇、◇12◇、◇123◇ ……），为之前文字在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页码，便于引用时注明。

2．正文中的注释号（①、②、③ ……），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者注、译者注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译者注及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放在当页末。

3．点击页面左侧书签中的目录和章节的展开符号，有各章、各节的链接，可直接转至相应页面。

4．正文中斯大林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5．本卷中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

目　　录

第十五卷说明 …… 1

一九三八年

代 序 言（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 年 10 月 1 日）（节选） …… 3—3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 35—444
导　言 …… 35—36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
（1883—1901 年） …… 37—63
一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 37
二　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及其
“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 43
三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
斗争协会” …… 52
四　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 …… 55
五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 59
简短的结论 …… 62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1901－1904年） …… 64－94

一 1901－1904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 64

二 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 68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党章的通过和统一的党的成立。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 78

四 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 84

简短的结论 …… 94

第三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1904－1907年） …… 95－141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的罢工。1905年1月9日工人在冬宫前举行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遭到枪杀。革命的开始 …… 95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 …… 100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 104

四　革命的进一步高涨。1905 年 10 月的全俄政治罢工。
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
的出现 …… 121
五　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革命的退却。
第一届国家杜马。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 125
六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开。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
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 133
简短的结论 …… 140

第四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8－1912 年） …… 142－199
一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
颓废情绪。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
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
主义分子而捍卫马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 142
二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152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
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 182
四　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反党的八月联盟 …… 187
五　1912 年召开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
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191
简短的结论 …… 197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1912－1914年） …… 200－216
一 1912－1914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 200
二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 205
三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增长。帝国主义战争前夜 …… 213
简短的结论 …… 216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1914年－1917年3月） …… 217－240
一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和起因 …… 217
二 第二国际各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第二国际瓦解为各个社会沙文主义党 …… 221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 225
四 沙皇军队在前线的失败。经济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 232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覆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234
简短的结论 …… 240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17年4月－1918年） …… 241－291
一 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走出地下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 …… 241

二　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四月
代表会议 …… 248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
进攻的失利。工人和士兵七月游行示威的被镇压 …… 253
四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
第六次代表大会 …… 257
五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阴谋。阴谋被粉碎。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 262
六　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 267
七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布列斯特和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 279
八　列宁关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贫农
委员会和制裁富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
叛乱及其被镇压。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 286
简短的结论 …… 290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020 年） …… 292－315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 292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 297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高尔察克
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
三个月的喘息时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 303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波兰计划的失败。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 308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 311
简短的结论 …… 315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 年） …… 316－350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 316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 320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 328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 334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 341
简短的结论 …… 350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029 年) …… 351－374

一　社会主主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 351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 359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 366

简短的结论 …… 374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 年） …… 375－409

一　1930－1934 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两个战争策源地 …… 375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 379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390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 403
简短的结论 …… 409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1935—1937年） …… 410—433
一 1935—1937年间的国际形势。经济危机的暂时缓和。新的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 410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 415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 422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 427

结 束 语 …… 434—444

插图
一 斯大林在演说 …… 34
二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 199
三 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态势图 …… 270
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278
五 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成就 …… 358
六 广大农民踊跃加入集体农庄 …… 389
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433

第 十 五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五卷是根据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一九四六年的《斯大林全集》“出版说明”编辑的。

该“出版说明”确定：“第十五卷的内容是约·维·斯大林著的、在一九三八年以单行本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此卷后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而未出版。

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

本卷正文的中译文，取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斯大林于 1938 年 10 月 1 日在宣传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节选），作为本卷的“代序言”。

《斯大林全集》第十五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邮箱地址 hqxsk@163.com

一 九 三 八 年

代　序　言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①]

（1938年10月1日）（节选）

一、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提纲[②]

在我们党内有什么样的阶段呢？我认为，我们党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三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想称为：“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或是按照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开头的四章叙述了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要谈论某些事情的一切细节，问题在于在四章中对所叙述的一切事情要围绕主要的轴心，围绕着从1900年到1912年，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的一个阶段，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的阶段。应该这样去安排材料。

由此可以看清楚，为什么简明教程把重要的注意力转向列宁的这样一些书，如《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好这四种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切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准备从政治团体组成独立政党的东西。由此拟订开头四章的计划。与这个计划比较，所有批评意见，如某段对民族问题的

———————————————

① 这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传员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稿，系近年解密的原苏联历史档案。——本书制作者注

② 小标题为本书制作者所加。——本书制作者注

某些细节没有谈到，某段关于莫斯科谈得太少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是尘土。主要的问题在于，要让开头的四章指出一切本质的东西，并能说明布尔什维克为建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斗争的特点。这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以下三章：第五章，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到第四章结尾和第五、第六和第七章。①

这个阶段，或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党成立了而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着，它在为开辟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而斗争着。我想为这个阶段加上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

所有的缺陷，如哪一点没有谈到，哪一点没有强调，——这一切都是琐碎小事，与说明党的两个阶段特点的那些主要事实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事实及引证应围绕这些重点。因此，一切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意见，都偏离了摆在简明教程面前的任务，即搜集事实并集中思想，使它们像聚光灯那样照耀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第三阶段——剩下的五章：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结束语。可以给这个阶段加上这样的标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是的，布尔什维克在执政。

这就是作者在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所遵循的提纲。

——————————————

① 原文如此。按本意应是：“第二阶段包括第四章的结尾，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和第五、第六、第七章”。——编译者注

二、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宗旨

所以，出版这本教科书时，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这是唯一一部经中央委员会核准的、手续完备的、具有中央委员会签证的、统一的教科书，这是统一的指导，希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对它要有信心，这不是波波夫，这也不是因古洛夫[①]，而是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在于，要去消除近年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脱节的现象。你们要知道，我这里有一份为党的教育小组准备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学习计划，你们看，共有十一个专题。大概，大纲你们是知道的。第一个专题——讲座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二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第二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到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第三个时期——从俄国革命开始，等等；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形成和发展；列宁与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和继承人。

这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列宁奠定了基础。其余的一切谈的是列宁关于斯大林的书写了些什么[②]，与斯大

————————————————

① 波波夫、因古洛夫均为苏联当时的党史研究学者。——本书制作者注

② 原文如此。其本意应为：“关于列宁，斯大林的书中写了些什么”。——编译者注

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那些标题丝毫不差，完全相同。这本书叙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新的、特殊的贡献。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假如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极重要的部分带来任何新的贡献，我们就不会有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我不想说，斯大林在书中对一切都谈得非常详细。如果仔细地去读，不是2至3遍，而是10遍，15遍地读列宁全集，那末在那里可以发现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多得不可比拟的新思想、新方针、金刚石。但不管怎样，斯大林的书是试图叙述列宁带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主要的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或多或少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研究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就足够了。绝对没有的事。在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相比较的过程中叙述列宁提出的新东西是一回事，提出怎样研究列宁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当学习恩格斯的著作。列宁一向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他是正确的。当然，这不单是他谦虚，而是历史事实。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学习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或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其他政论著作，还要学习像《资本论》这类的主要著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认为，什么《资本论》？在苏联资本主义早已经完蛋了，是否还有必要花精力去研读《资本论》这部书。同志们，这是错误的。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有，并有论证。

凡是想研究列宁主义和想研究列宁的人，都应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西。列宁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的思想是因为，他肩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任。新的思想是好的，但是要知道，新思想所负的责任也是好的，这是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一切都是这样一回事，同志们，不了解它们是不可能弄懂列宁主义的。而在我们的一些大纲中，大概地说，出现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现象。

因此，《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在于，要消除这种分离现象并把马克思提出的东西与列宁提出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第四章要完成这项任务，整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要完成这项任务。把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联系起来。史册所谈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个别草稿，如分散的、顺便说出的想法或是在来往书信中某处顺便说出的论点，这些思想怎样被列宁抓住并进一步发展了，而又用新的观点提出论证。这一切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尽可能地都提到了。

因此，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就在于堵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出现的缺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基础提出的东西与列宁继承发展了的东西之间的缺口。因此，要更好地、科学而更准确地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使作为列宁主义基础的旧东西与作为这些基础的继承和发展的新东西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第三个任务在于，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的历史时期中的作用。因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以讲授的方法在人所共知的前提基础上概括某些思想；但也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在并非杜撰而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从而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史数十年的时期内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就是说，第三个任务就在于要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授变得简捷，当然要简捷，不是按叙述某些前提和思想的演讲叙述方式进行教

授，而是要在联共（布）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第二种方法——不是演讲的方法，而是历史的方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你们是与事实打交道，你们能够查验大量的文献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判断列宁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当历史向我们提出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时，而它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这是一所学校，这是很大的考验。假如在几十年的时期内理论证明自身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它是有某些价值的。这就是第三个任务。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个任务在于，要在这本不太厚的书中证明、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表明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和意义。理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旧规律不够时去发现新规律的指南。这是很好的事情，请你们确实相信。而且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认真地去学习。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有很多人认为，理论——是很困难的事情，怎样才能掌握它呢？不对的。理论同一切知识一样——是完全可以获得的东西，要有掌握它的愿望，最主要的是，不要头一回遇到障碍就退却，不要躲避障碍，而要迎着它，克服它，而在不能迎着上的地方，就用迂回的办法来克服，那么理论也就为你们掌握了。

这样，要用历史事实来指明我们党的发展，指出理论的力量和意义。我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尤其令人信服地谈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们要想一想，假如列宁和列宁周围的那些人，他们人不多，假如他们在 1917 年 4 月没有提出从民主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方针[①]，党就会迷失方向，在黑暗中徘徊。我还清楚地记

得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情况，——在黑暗中徘徊。结果列宁回来了，提出了新的方针，于是大家开始明确了：党把事业推向何处去，党知道它的目的何在？这不，我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讲清楚了。假如说没有四月提纲，没有党的这一新方针，没有新方针，革命就会遭到失败，我敢保证，苏维埃就会变成附属品，变成预备国会，围着这个不幸的民主共和国转，并会失去很多东西。你们瞧瞧，理论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善于发现新规律，假如新的规律不能很快被发现，那就提出路线，给个引导事业向何处去、确定打击目标为谁的照明灯。

或者，譬如，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吧，沙皇已被打倒了，克伦斯基及李沃夫雷总理也在摇摇欲坠。而下一步事业将向何处去，没人知道。大家都说，俄国还不发达，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好想的，这里哪有什么社会主义，上帝保佑，就维持民主共和国的状态吧。人们是这样说的，社会舆论也是这样的。你们想象一下，党也是这样指示方向的，俄国在政治方面不发达，文明程度也不高，——这儿哪有什么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有人曾这样说：你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上帝给你们的那些自由，暂时设法抓住并保持住。这也是普遍的风气。而伊里奇却闯进了这个泥潭并说：“不，不对。俄国已经成熟到了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他也正在证实这一点。如果没有列宁的这个小组及其着手这项事业的学生们从理论上提出根据，并不顾

——————————————

① 指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堡后，于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说，即所谓“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编译者注

大家的反对，开始努力向前奋斗，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理论，先进理论给你们带来的力量和意义！中央委员会就是想以简明教程来向我们的干部证明，理论的力量是伟大的和无法估价的，证明没有它，没有理论，党势必有时在经验主义的黑暗中徘徊：今天指示你向这个角落走，向那边瞎闯，明天指示你向另一个角落走，像一条瞎眼的小狗向那边瞎闯，明天从背后把你拽回来，往回走，这就是你的领导！这算什么领导？要领导就应当了解情况，要有预见，而为了善于预见，就要掌握理论，也就是说要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理论。

或者，譬如拿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怜的人——民粹派，当他们想把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活动的基础和支柱力量时，他们为什么会受挫？他们受挫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构成了大多数。为什么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或是如他们所说的无产者时忸怩作态？因为无产者人数很少，要手持蜡烛去寻找无产者。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解体，与农民相联系的那种生产形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有理论才能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社会上数量不多的少数无产阶级。抓住什么阶级作为依靠力量，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党的命运。民粹派的失败即在于此。

或者，譬如，他们希望在俄国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从农村，从村社开始，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发展最简单、最起码的规律，不懂得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在起领导作用，不懂得社会中的领导力量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不懂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要从城市开始。他们说，城市是毫无希望的事情，说城市——是又脏又乱的地方。而农村——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是村社。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决定着农村的命运。

这就给你们指出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民粹派——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另一种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掌握了理论、懂得历史发展规律，推行一条能取得成绩的正确路线。那就是说，第四个任务：要在这本最简明的教程中证明理论的力量和意义，以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尤其要去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牢记住。这不是什么困难和大不了的事情。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可以十分容易、心安理得地去掌握它。不要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顶聪明。他们也是如你们一样的非常普通的人，懂得的东西比你们还少，读的书也比你们少。现在给了你们非常丰富的书，在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们当时弄不到书，我们也见不到书。我记得，在 1898 年梯弗里斯，为了租《资本论》第一卷来阅读，我们，这些穷光蛋，每人 5 戈比，将近 100 人，凑够了 25 卢布，将《资本论》租来看了两星期并把它抄下。而你们现在手头上有各种书。权力是你们的，出版是你们的，所有的书也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会很容易地就掌握理论。好吧，而如果不想去掌握——那是你们的事。

第五点，中央委员会出版简明教程，任务是为了使我们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们的领导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避免简单化，避免对某些原理的庸俗化，避免低级趣味。

例如，常常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描写成仅仅是护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要进攻，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他们反对战争”。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归结为这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不对，不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懂得各种战争之间的区别并完全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开始进攻。我们还记得列宁在《论欧洲联邦》[①]的著名

——————————————

① 原文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编译者注

文章中所说的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了政权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之后，形势将迫使其对其余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征讨,以便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应当对布尔什维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切精微处、一切细微差别、方针说明清楚,说明布尔什维克不单纯是为和平而伤感的和平主义者，仅在有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的。这不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形势比较合适，如果条件有利，布尔什维克也将主动进攻,他们将主动开始攻击。他们完全不反对进攻，不是反对任何的战争。我们现在大声呼吁防御——这是面纱，面纱。所有的国家都在掩饰。“与狼生活在一起，就不得不学狼嗥”。（笑声）敞开心扉地坦白是十分愚蠢的。人家会说，你们是大傻瓜。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有点儿被庸俗化了。有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已经夺取政权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没有考虑另一面，即社会主义很快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不仅教导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落后，一些国家刚开始起跑，但列宁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一些国家落后，另一些在起跑，一些在作战，另一些在搔痒，同时进行打击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与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相对立。可不知什么原因，这第二句话人们通常避而不谈。什么是发展不平衡？如果说所有国家都平衡发展的话，可以说，进行打击时所有的国家也都同时成熟，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说，同时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列宁曾说过：“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天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了，明天另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落在后面的其余国家逐一在赶过去，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在发展，一些国家落后了，另一些又跑到了前面。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国家

社会主义成熟的程度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可能同时取得胜利。这是傻话。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方面人们避而不谈，而仅谈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这没有充分地表达列宁的观点。应当对这一点说清楚。一些问题在普及的过程中被简单化了。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教科书、政治常识、各种文选中简单化导致了庸俗化、低级趣味。

或者，譬如，关于抵制杜马的问题。所有的教科书都对读者避而不谈在抵制第一届杜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结果在这里进行了掩饰，而这有什么好掩饰的？抵制还处在妊娠中的布里根杜马，抵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埋葬了它，在全俄罢工的情况下没有让布里根杜马诞生。

而后来的维特杜马，莫斯科 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召集的杜马，我们也对它进行丁抵制；在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决定抵制。所有的教科书都隐瞒这件事是不对的。列宁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错误不大，可以很快纠正这个错误，也很快地纠正了，但这总归是个错误。

而你们是怎么想的，历史可以修改吗？历史应当是与事实相符的，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丝毫不能增补。我们这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评论 500 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这怎么可能呢？

在圣弗拉基米尔[①]时代宗教起过积极作用，当时是多神教，而接受基督教还是后来的步骤。现在我们的哲人身处 20 世纪，他们从新

———————————————

① 圣弗拉基米尔，即弗拉基米尔（960－1015），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980－1015）。他在基辅确立了统治地位后，立即将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众多神祇的偶像树立起来，顶礼膜拜，企图以此加强和巩固罗斯国家的统一。——编译者注

形势的观点出发，说弗拉基米尔是下流的东西，多神教徒是下流的东西，而宗教也是下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辩证地评价所发生的事件。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时间、地点。

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历史既不能往好改，也不能往坏改，根本不能有丝毫的增补，它是怎么发展的，就应当怎么叙述，不能有丝毫增补。比如在抵制第一届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并应该去纠正，这要不容争辩地去纠正。

或者，譬如，有人把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庸俗化了，他们说什么，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基础，上层建筑算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它的作用是不值一提的，他们把这庸俗化了并陷进了低级趣味的泥潭。而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对此作了强调。列宁是专门深入研究先进思想作用问题、并发展了社会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组织人们、动员并引导他们将旧社会改造成为新社会。新思想是在经济方针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新思想，对行为的改造、对革命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新的思想如同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必须的，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这被庸俗化了。在这被简单化后，社会理论的积极作用变得模糊不请了，人们滑到了经济唯物主的或者低级趣味的唯物主义路线上去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丝毫共同之处，——这是简明教程的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要清洗脑筋，以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袭，使其不被低级趣味化。

于是，第六个任务是提供这种统一的教科书或是统一的教程，要使书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或多或少地集中起来，因为这将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宣传质量。

对我们，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十分清楚，宣传质量大家不很关心，

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数量上，希望网点能多些，希望小组多一些，办公室大一些，想炫耀一下：瞧我们这里小组有好几千了，而你们那里有多少？没那么多，就是说，你们的事情没有办好。完全有可能，哪儿少，哪儿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这样一来，出版这本简明教程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从数量强度转向广度，转向质量，转向提高宣传质量。中央委员会出版这本简明教程，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宗旨。

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理论问题上。你们这些宣传员坐在这里，当然，你们感觉到，在学习时或是在学这本教程时，好钻研的人会来向你们请教许多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们没有谈这些问题。你们会说，因为在教程中没有叙说这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那样一些问题？你们会说，当然，有这些问题。在课堂讨论中，在小组里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向你们请教。你们不但不把问题提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避开这些问题。你们愿意躲起来，而我尽量设法把你们拽出水面来。（笑声）

以恩格斯为例子。在简明教程中是这样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及社会政治、社会意识的发展。讲述这一点不受任何时期的限制。而有人就会来问你们：“对不起，恩格斯不是那样说的，而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

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

宣传员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这一点对还是不对？我认为，这不对。在任何条件下社会形态往往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往往如此。恩格斯引证了群婚，引证了母权制。但母权制本身也是繁衍来的（正如现在大量的材料对此所作的阐释一样），即在当时，男子去打猎，而打猎不是获得食物的经常性源泉，妇女从事原始的农业，栽种作物，从鸟巢里取蛋，取鸟雏，驯养禽类。当男子打死扁角鹿后，把活着的鹿的幼子留下，妇女们将这些鹿的幼子拿去驯养，这样，妇女就成了奠定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基础的第一个群体——即简单地驯养禽类和动物。她们（妇女们）或多或少地有了些经常的食物储备。事实说明了什么？男子打猎归来，什么也没有猎获到，向女人乞讨：“给点吃的吧！”——“没有什么吃的，再回去，去打猎”。而男子便坐下来像小孩子一样地哭泣，因为是野人，不太像人，他们央求，哭泣，要吃的。这就是母权制所建立的基础。

在从原始的农业转向畜牧的生活方式之后，妇权（母权制）也就失去了意义，家庭也变化了。

恩格斯试图把家庭形式和生产形式作为两种起同等作用的因素相提并论，存在着推翻这种试图的事实。马克思从来不赞同这种观点，从来不。顺便提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作过任何一点儿暗示，无论是注释中还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他们是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家庭》的呢？伊里奇在其《人民之友》一书中说“大概这属于非常远古的时期，人和猿猴还不能区别开的时候”。别尔托夫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们

———————————————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6。——编译者注

怎么，你们在挖苦我们？”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也挖苦过我们——他说，“你们说什么？时而是生产方式决定，时而是家庭决定？你要明白，忽而这个，忽而那个，将会有什么结果”。普列汉诺夫也不承认，并说这应当从下述观点来理解，即从这属于什么时期，也就是说从属于那个当时连人与猿猴都不能区别开来的时期来理解。试问，难道我们在研究猿猴，而不是在研究人？这种理论是属于猿猴还是属于人类社会？如果理论是属于类人猿时期的，那么就给猿人留下吧。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在其中处处都是基本因素。

血缘氏族，氏族公社。什么是血缘氏族？对它是如何定义的？就拿家庭为例来说：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是贫穷的，食品缺乏，而人在繁衍，家庭就要分成若干个单位，一批人就应当从家庭中分出来。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上，还行吗？不，当然不行。生产资料不允许一家的人太多。于是就产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萌芽。结果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血缘氏族，而是那种辅助力量，即生产工具状况，生产工具状况为在该领域内拥有达到一定范围的大的氏族公社提供了可能，而后来当它无法维持大的公社生活时，这些公社就解体了，由两个分成了四个，血缘氏族就渐渐消失了。

依我看来，这是冒险的事，它不完全符合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儿所学的东西，应当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起同等作用的两种基本因素：家庭和生产方式，只有一种形式，即生产方式，它决定了社会形态、家庭形态和婚姻形态。

我不知道，难道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问过吗？没有问过是不可能的！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处都写着：“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而在这里“在一定历史时代和某个国家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或是“直

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这是什么样的胡说八道？这不对。如果要我提建议，那么我建议你们，如果人们向你们请教的话，他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在简明教程中说的是一回事，这里说的又是另一回事”。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不对。我们的理论家不是那样处理的。例如，以米丁[①]同志为例。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第 2 卷。米京同志，他在这里吧？

喊声：在这里。

斯大林：他引用了这句引文，但很巧妙，巧妙地引用（笑声）。他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样的引文：“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这些。什么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没有说明并对读者暗示，这反正都一样，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余的一切他都撇开了。为什么？不适用的——（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他都撇开了。依我看来，这里不必使用巧妙的办法，也没有必要断章取义，虽说这引文是恩格斯于 1884 年提出的，当时马克思已不在人世——最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诚实地说：“依我们之见，这是对的”，或是说，“依我们之见，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钻研的人会向你们提出来的，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不管怎样都要明确地回答——或是，或不是。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的问题。经常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国家就要消亡。为什么它不消亡？该消亡了，20 年都过去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而你们还不想消亡（笑声）。

————————————

① 米丁（1901－1987）．苏联哲学家，1939 年起为院士。——编译者注

真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消亡？这个问题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我给你们读一读恩格斯的某些原理，而且不仅是恩格斯一人，而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那种论点，我所读的也是很多人所遵循的论点。

这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这里国家为什么不消亡，它什么时候最后消亡。你们熟悉关于国家的理论。你们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抗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工具，国家是秩序、是保障，是多数服从少数。如果阶级和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也得存在。当敌对的阶级消亡了，国家就该消亡了。这是你们所熟知的普遍原理。

以此为根据，恩格斯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国家形式上是社会代表，而实际上仍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在粉碎资产阶级和出现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国家第一次能够在实际上代表社会说话。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这将是这个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到那时，国家政权对这方面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国家就逐渐自行消

————————————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 页，人民出版社，1972。——编译者注

亡。到那时，对物的分配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取代政府对人的统治。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逐渐自行消亡的。这就是说，当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在整个历史上取得所有权时，它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这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

这也将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在这以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我们在1918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行动。但为什么国家还不消亡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是，例如，有这样一句话：“国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个祸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又能是什么？），它以继承的方法传给了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像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刻消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一直到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后才能抛弃国家组织这个废物”①。

对这个问题人们是如何看待呢？这一切是否都正确？资产阶级被推翻了，它的政权被摧毁了，按照我们的理论被打碎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政权不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旧的国家机器被毁坏了，旧的国家机器由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取代。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在此之后它的作用开始失去效力，逐渐消亡。这正确吗？据我看，这是正确的，但仅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假如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的国家，至少是在大部分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假如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周

——————————————

① 该引文出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文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人民出版杜，1994。——本书制作者注

围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那时，大概国家政权就不需要了，它应该消亡。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那时该怎么办？这一理论对这种情况是否适用？不适用。20 年来我们的全部实践，我们的全部工作——它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毫无疑问，——这一点正得到证实。须知理论是怎样发展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怎样产生？在实践中，或是在实验室，或是在群众的实践中。社会也是实验室。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实践常常发出信号说，某种理论不完全适用，说这种理论是有害的，像巴巴宁[①]报告所说的那样，有关北极的理论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请作些修改。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理论与实践要相联系。理论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斗争过程中的实践又在不断得出理论应该注意的新的经验。

在 1905 年以及后来 1917 年 2 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我国出现之前，经验证明，民主共和国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法国、德国等国革命基础上产生的，那里的民主制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但是革命运动,即实践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代表苏维埃。当然，彼得格勒的工人，当他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在按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理论进行大变革。他们不过是想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帮助下实行自卫以抵抗沙皇。1917 年 2 月，当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后，其倡议者也没有料到，能由此搞出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过是想有个可依靠的特殊据点，以便打击敌人。但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组织，而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支撑点。这就是实践，这就是革命运动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如何指导

——————————————

① 巴巴宁（1894－1986），苏联第一个漂流站——-“北极”第一研究站的站长，苏联英雄（1937、1940），第一、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编译者注

着这个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来，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或者他们不顾外部条件地去发动革命——是实验室式的。这样说吧，这是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在科学中存在，使一种现象与周围现存的一切相脱离：离开空气，离开水等等，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来研究它，以便研究这一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因素，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国际因素，按照这种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可以完全正确地阐述，国家不是从外部带来的，而是在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在存在阶级社会的地方从内部产生的。而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规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即如果国家政权，或是有政治权力的该国家，没有摆脱国际因素怎么办，因为被罩在玻璃罩里、不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的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假如在按实验室的方式研究了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之后，我们就提出对事情产生影响的国际因素问题，那么，情况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会得出另外一些结论。

他们用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能的，因此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我对国际形势不感兴趣，有包围或是没有包围，这与我无关。作为学者，我研究国家政权，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如果阶级社会没有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有政权。我作为学者，不准备去考虑国际上的包围），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它不是始终适用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随便丢开什么都可以，而在现实中你不能丢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包围着你。我想对这种形式的不完备性加以解释。或是这样，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如果所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那么这将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而且他们当时不容许无产阶级政权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历史经验和形势都表明，应当容许有这样一种意外情况，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所有国家而

是仅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且它没有被击溃，相反,获得了巩固，存在着，并想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提出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个政权本身也存在着，它在巩固，在加强，社会主义在建设着等等，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局限于对问题的现有提法，而应该继续前进，可以说，应对问题做出另一种提法：如果无产阶级政权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国家它还未获胜利，那该怎么办？而在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周围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又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消亡还是不消亡？如果这样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大概会说：“不消亡，不应该消亡”。但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于是他们自己可能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而历史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存在了 20 年。

尽管马克思写完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巴黎执政两个月的一本书[①]，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并看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存在了 20 年，那他就会写出非常有价值的新书，会找到我们没有见到的、而他也是很晚才发现的新真理。

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提法。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实验室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我们应予以尊重。

以实验室的方式来研究政权内部发展规律的方法是正确的，是非常好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在弄清某些问题时，是比较好的方法，而当你转入实际生活时，这里实验室不能避开任何现象，既避不开空气，也避不开气候。你们并没有罩在玻璃罩

① 指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编译者注

中。这里既有周围各国人民,也有周围的各个国家，应该考虑到他们。

假设说，如果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存在，它也就应该在其他国家存在。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即政权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要在所有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从而可以这样说，国家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然后它自行消失。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问题的提法是，现在的情况不同。如果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也不是在大部分的国家，而是仅在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而除了这个政权之外，形成了憎恨社会主义国家、并找机会进行破坏的资本主义的包围，那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是消亡呢，还是不消亡？这里应当回答说，不消亡。即使各地将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那样快消亡。真的，假如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我们这里都发生了革命，那时我们就不需要常备军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什么叫常备军？它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我们将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对军队提供补给，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动用国内的一切资金来进行防御。这就是国家所创造的一切要素。

我想，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它经历了两个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它还是阶级的政权时，它与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一致的，因为其目的就是镇压反抗。但是也有不同之点，即以往的一切国家政权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镇压，而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劳动居民对不劳动的剥削阶级的少数人进行镇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国家不仅仅是进行镇压,如果拿1918、1919、1920、1925、1930、1934这些年代来说，在消灭敌对阶级之前,国家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职能，捍卫职能，保护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还有第三个职能即接管公有化的生产资料，调整自身的生产，进行

有组织的经济援助）。而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国家政权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少数人利益的政权，它们也有保卫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在进行自卫以免外部敌人侵犯之时，它们同时也行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

在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政权。它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职能，在这方面它和其他所有的阶级政权是一样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镇压之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所有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它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镇压剥削者，而不是镇压被剥削者，——这是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经济组织的职能。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组织任务。第三个职能是保卫生命、财产和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就这三种职能。这是第一阶段——在消灭了阶级，政权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我不想说，现在是阶级政权，说这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不是白白地使用劳动人民苏维埃这个称呼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镇压的职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阶级已被消灭，也就是说构成阶级政权典型特点的这种镇压的职能在消失。也就是说，这种职能残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在这里其职能已不是要对付什么阶级的反抗，而是要去对付个别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反抗，只要有惩罚机关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军队来对付，有些规模不大的惩罚机关就足够了，这些惩罚机关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镇压一些个别人。就是说，镇压的职能在我们政权内部，它的确是已无必要了，但是经济领导的职能却相当大地增长了。这里也不需要镇压。这里需要有组织的工作，任何镇压都不需要，经济领导也不需要任何的部队，甚至连惩罚机构也不需要，镇压职能也就失去意义，但破坏分子中有人受惩罚被擒获，这种情况除外。

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恩格斯说：“政权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那么，好吧，阶级在内部消灭了，而在外面却留了下来。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而那里有还想与我们作战的资本家，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阶级还没有被消灭。

我想以恩格斯的先决条件作为依据。既然没有敌对的阶级了，就不需要国家政权了，这是在国家内部，而假如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敌对的阶级呢？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国家政权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把恩格斯的属于内部阶级制度的观点挪到国际领域去，那就会发现，在那里阶级没有被消灭，我们没有脱离开世界，剥削者依旧在那里逞威作福，而我们这里是劳动人民，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大概，政权还是需要的。

只要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敌对状态的阶级还存在，也就需要这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及国家领土的职能就要不断发展，目的是，譬如说，镇压某些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及他们的残余，不需要军队，——这是第一种职能的事，镇压的职能，这种职能逐渐在消亡，我也许会说，它已经消亡。

就经济领导的第二种职能来看，进行管理，甚至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机关，而要履行第三种职能——防御的职能，保卫受到致命威胁的生命、财产及我们国家的领土，这里非要有军队来履行这种职能不可。

什么是军队？这里说的可不是民警机关，有人报警，工人来厂，拿起步枪，去进行战斗，这不会有结果的。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国家一定要有高技能的军队。问题不在于，拿起步枪就可以结束一切，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空军，多种多样的空军，各兵种部队，

需要有炮兵，有炮兵的各兵种，需要坦克，需要化学武器和反化学武器，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人材不是很快就能训练出来的，这里需要经验，需要常备军。在民警制度的基础上，在民兵制度的基础上，不能组织任何的防御，不能组织任何对生命、对国家领土的保卫。一定要有常备的、训练有素的、具有高技能的、在各个方面造诣很深的军队。这种军队将要有第一流的空军、化学、坦克、炮兵、工程师、技术员，因为这里是技术决定着一切。

而如果有军队，那么，军队的存在就需要经费来供养军队，就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需要国家机关，需要官员，但不是那样的官员，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选举中产生的，今天选出了，明天又赶走了。需要那种非常有经验的官员，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一点，对军队的任何供给，军队的任何防御都是不可能的。这里也需要普通的工作人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既然军队将存在，国家、国家机关、政权机关也将存在，它要粉碎敌人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击。既然有军队，那么，也要有侦察机关，有反侦察机关，就是说，国内的肃反机关也得加强，因为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是在睡大觉，他们时常暗中向我们派新的人员来摸情况，看看在我们这里可干些什么事，能不能炸毁些什么，毁坏些什么。就是在党内也有这样一些人，是有的，是有的，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为了暗派人员，收买和贿赂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已肃清了一切。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人就将继续存在。这就是同家政权机关存在的依据。因此，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何苦你们坐着 20 年而不想消亡呢？”你们对他们说：“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社会主义在各国都取得了胜利的话，我们早就消亡了，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只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周围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军队，为了军队需要有国家机关，需要国家政权，它不能消亡，相反，我们还要加

强它”，非得要给这样的回答。这一点你们同意或是不同意，而如果要按照马克思或是恩格斯对此所做出的那种回答行事，我们早就应该关门了（笑声）。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想停业（笑声）……而相反，想要继续生活下去，击退敌人，甚至粉碎他们，那么国家政权一定要存在，并一定要加强，无可争辩地应当加强。

有求知精神的人在小组里和在课堂讨论中还会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有求知精神的人你们那里是否很多，我不知道，但在你们那里大概总会有的。例如，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生产资料，一会儿生产力，一会儿生产方式，一会儿又是生产工具？请你告诉我，在你们那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接生活的生产，直接生活的再生产，这是怎么定义的，请明确的告诉我们，能不能将这些术语条理化？”混乱不堪的情况，往往使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混淆在一起，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混淆在一起，总的来说，这里是一团糟。因而旧时代敌人嘲笑我们说：“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你们自己都谁也没有搞清楚，分不清哪儿是主要的，哪儿不是主要的”。因此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想对一些术语做出某种精确的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应当做出规定。例如，米丁同志引证马克思的话。依我看来，要善于引证马克思的话。比如，米丁在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书中说，“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工人阶级是生产工具之一。马克思在 40 年代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后来在《资本论》中他抛弃了这个结论，对它作了更为准确、更为清楚的表述，在书中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另一种态度。总之，应该指出，在《资本论》写成之前，马克思更喜欢谈物质的，使其与精神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战，为争取它的胜利而

战，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某些因素下定义时就不是很规范。他想为那条被称为生产资料的总航线开路，也就是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他围绕这个问题而奋斗，而存在的构成要素，特别是生产的组成要素，他不是始终都能做出确切定义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任务。50 年代以后,当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获得了活动舞台，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他对个别术语的定义就比较准确、比较规范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2 卷中所下的这些定义就清楚了。如果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当然，就应当使用最好的术语，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劳动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在《资本论》中，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劳动手段，也就是生产工具，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们用来加工改造劳动对象——自然界的原材料——水、矿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所使用的那些东西，他没有把人归入生产工具一类，要不然，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无产阶级成为生产工具中的一种的话，那么结果将是，现在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工具便构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在革命时势必要把这些劳动工具（无产阶级）变为社会公有的，这是十分荒唐的；在《资本论》中及在《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从对社会物质生活作一般性的界定转向了对生产组成要素的界定，因此，我们只能在《资本论》中看到他的准确清楚的表述，就应当使用这种表述。他说，假如把劳动手段，也就是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也就是人进行改造的一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石，——这一切将构成生产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包括机器、一切仪器设备、土地、森林、江湖河海、矿藏、原料、交通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概念包括机器、所有的设备、土地、森林、水源、矿藏、原料、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一起构成了生产资料，即应当综合的那些东西。

生产力——这一概念——这是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那么，这里也应当说说“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工人阶级是最宝贵的工具”。应当说，工人阶级在所有的生产力中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要不然，工人阶级作为生产工具势必也要变为社会公有，势必会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这也是错误的。

就是说，生产力——这是生产工具加上使生产资料运转起来的人。劳动手段，换言之，生产工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篇第二点里有。你们打开《资本论》的第2卷——那里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是分开的。他说，有生产资料，有工人，假如把它们割裂开来，无论是工人，还是生产资料——它们都不能代表任何的生产力。

我讲这一点是鉴于在一些教科书中在这方面存在着十分紊乱的现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拿起它来阅读就恶心，完全是杂乱无章，应该增强明确性。

有时说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问题，假如拿我们的宪法来看看，那里也是这样的说法。有人可能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是生产资料，这里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是为了通俗化。通常，假如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为例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料主要理解为建筑物、原料等等，而把生产工具撇开了。为了使宪法明白易懂，为了能使它不引起任何的非难，将生产资料列入了，从学术方面来看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做是为了通俗化。我本人也不鼓励这种事情，但是这是由大家所希望的通俗化造成的。在联共（布）党史中经常有某些重复，这是容许的，是为了不引起误解。而从理论和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容许的，因为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

还有,在结束语中还会产生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你们杜撰的，过去说的所有原理都是正确的，而在这里竟然要篡改它们。却说什么,这叫做用新的经验来丰富理论。

在制定某些方针之前，为了不至发生变化，你们此前要从事丰富的工作。而很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学习得太仔细了，说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他们想。由于情况的变化，新问题的产生，这些原理和结论可能会改变的。

这不，关于国家问题。恩格斯推测，社会主义将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关于三个要素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而结果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周边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说，这是新情况，不得不改变对国家及其消亡问题的看法。有人可能会想，我们决定要做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人还都认为，理论和结论应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将其背熟并静静地坐等，不会不成功的。而现在看来，原来并不是一切都那样永恒不变，并不是一切都是完美的，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比较自由主义的态度看待个别原理和结论的，这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进行了叙述。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吧，这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好著作，也是较好的著作之一。依我看来，恩格斯虽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熟悉宣言的原则。马克思比恩格斯花了更多的精力。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这是赞美诗，我说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上杰作。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称这本书是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 40-60 年代的国际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实践纲领也是萌芽中的国际[①]的理论和实践纲领。这本小册子出版 25 年后，各种语言的版本几乎都有，而且出了好几版，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小册子中最

——————————————

① 即 1864 年 9 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国际成立后，通常被称为第一国际。——编译者注

普及的一种。在这本小册子出版25年后，马克思考虑到(18)48年的革命经验及后来的公社，他认为，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已过时了，他认为，如果他不得个重新写的话，他会按另一种方法写这本书。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完全不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个别原理和得出的个别结论是一劳永逸的。他们作为懂科学的人和作为真正的辩证法学家懂得，一切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而且个别的原理和结论会由于发展的进程而不适用了，也就是说，要求提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原理。

瞧瞧，在1872年德文版的前言中他们写了什么：“最近25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总体说来直到现在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的地方应该作某些修改。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正如在宣言中所说的，要以当时当地的条件为转移。因此，绝不应该认为，在第二章的末尾所附加的革命措施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这一点现在势必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发展，其根据是，由于最近25年来，大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发展，由于二月革命的实践经验，及后来规模更大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在那里首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这一点现在在某些地方已过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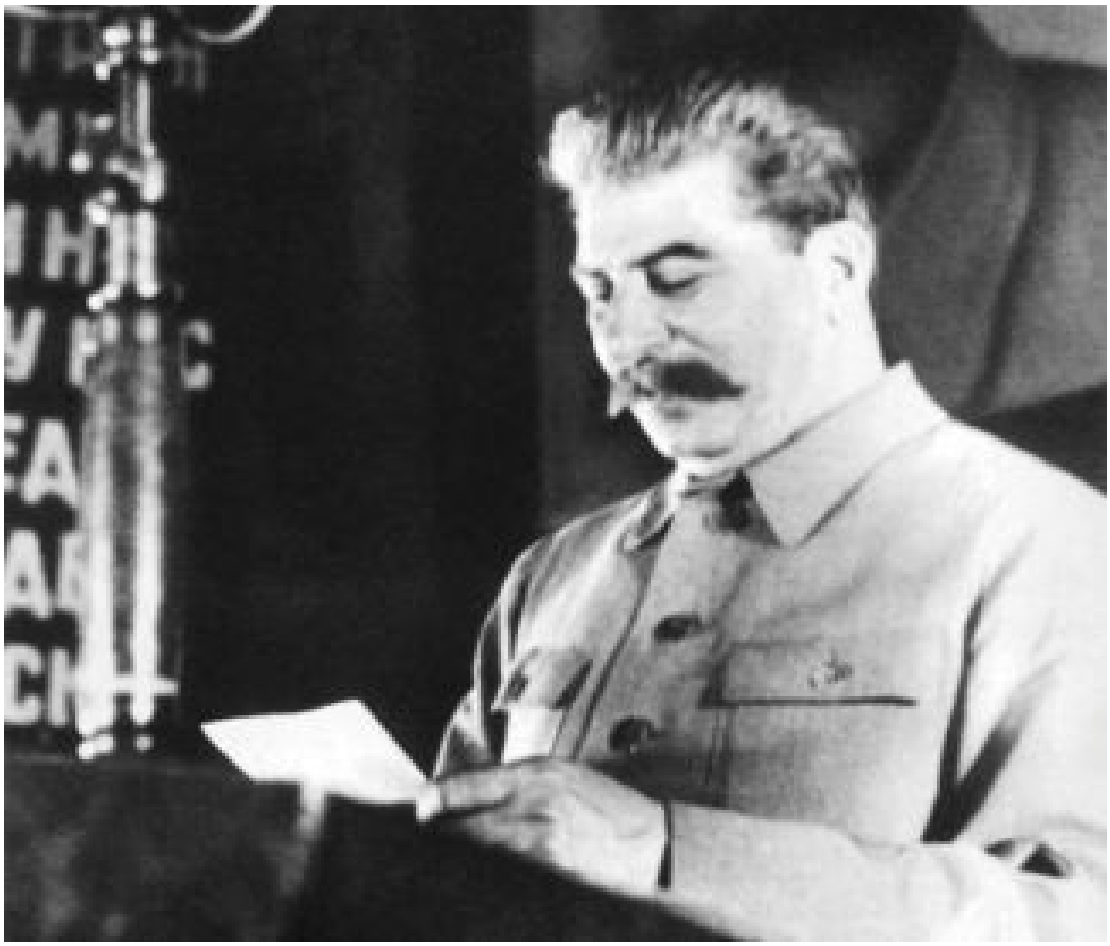
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他对我们20年的革命经验会谈些什么呢？“这一纲领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现在他对这一切评价说，这个基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说不应该简单地掌握政权，而应该打碎旧的机器并建立新的机器，公社尤其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为自身的目的服务，需要摧毁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接着：“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文献的评论对现时来说还不全面，刚为它只写到1848年，这方面的评语也是这样…… 尽管对现存的一些评语已过时，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完全改变了，而且事件的发展使得已出现的共产党的大多数都被彻底消灭了。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历史性文献，而且我们不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其中的任何地方，以后的各版中将有一版出版时可能将附有增补遗漏的前言。而目前版本的出现使我们感到突然，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对这项工作进行改变”。

你们瞧，一切都在变化，也可能会变化．假如有人问：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什么永久性的东西？今天是一回事,而明天又是另一回事，怎么生活？应该这样去解释：如果你们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应该懂得，理论基础是没有变化的,而个别的原理可以改变，就是说,应当动脑筋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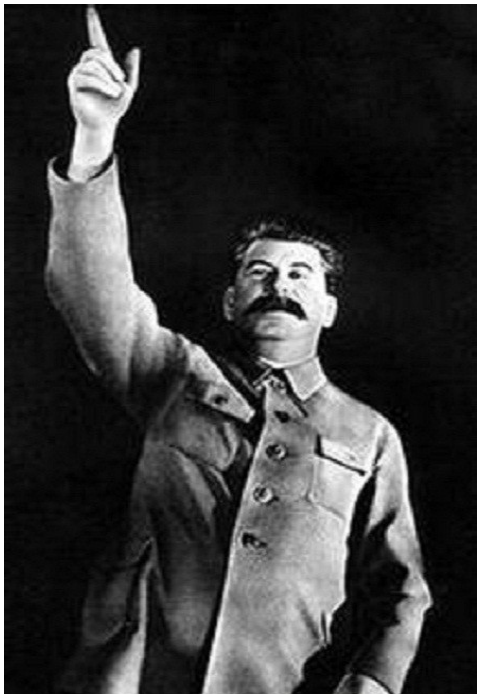
好，我就指出这四个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你们也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我尽力设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回答。

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
第612-614、614-644页



（34）

斯大林在演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导　言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经历了漫长而光荣的途程，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出现的人数不多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发展为现在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联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国工人运动基础上，由那些同工人运动相联系并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成长起来的。联共(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指针。联共(布)的领袖们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即同社会革命党(更早是同他们的前辈——民粹派)、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即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和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做原则性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联共(布)是在同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即地主、资本家、富农、暗害分子和特务作革命斗争中，在同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一切雇佣走狗作革命斗争中，得到巩固和锻炼的。

联共(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即 1905 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 年 2 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 1917 年 10 月的社会主义革命◇1◇[①]的历史。

联共(布)的历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的历史，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是在我国建成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是用我国工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丰富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掌握布尔什维主义**，能提高政治警惕性。

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英勇历史，就是用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自己，用革命动力的知识武装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能增强信心，确信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事业必将最后胜利，确信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

本书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叙述。◇2◇

————————————

① 此夹注符号为之前文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七五年中文版中的页码，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

（1883－1901 年）

一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国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的工厂还很少。地主贵族的农奴制经济占着主要地位。工业在农奴制度下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强制性的农奴劳动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要求消灭农奴制度。沙皇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遭到军事失败而削弱，又慑于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不得不于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度。

但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地主还是继续压迫农民。地主对农民进行掠夺，在“解放”农民时剥夺了、割去了农民先前享有的一大部分土地。农民就把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农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被迫向地主交付将近二十亿卢布的赎金。

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农民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租佃地主的土地。农民除向地主交纳货币租金外，还往往被迫用自己的农具和马匹去替地主白白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就叫作“工役”或◇3◇“劳役”。农民往往不得不把自己收成的一半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地主。这就叫作 “对分制”。

可见,当时情形几乎完全同农奴制度存在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民已有了人身自由，不能再被当作物品来买卖了。

地主用各种掠夺方法(地租、罚款)，把落后的农民经济的脂膏榨

取净尽。大多数农民因受地主的压迫，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极端落后，时常发生歉收和饥荒。

农奴制经济的残余、苛重的赋税和付给地主的大量赎金(这些往往超过农民经济的收入)，引起农民群众破产和贫困，迫使农民离乡背并出外谋生。农民进入工厂。厂主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一大群警察局长、巡官、宪兵、警察和乡丁骑在工农头上，他们保护沙皇、资本家和地主，反对劳动群众，反对被剥削者。肉刑一直存在到1903年。虽然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但农民由于极小的过失，由于没有交纳赋税，仍然遭受鞭笞。工人常受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特别是在工人忍受不了厂主的虐待而停工即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在沙俄时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沙皇专制制度是人民的死敌。

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沙俄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完全没有权利，经常受到各种侮辱和欺凌。沙皇政府唆使俄罗斯居民把各民族地区的土著民族看作下等种族，正式把他们叫作“异族”，培植鄙视和仇视他们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纠纷，怂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组织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在南高加索挑拨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互相残杀。

在各民族地区，一切或几乎一切国家职务都由俄罗斯官吏充任。各个机关和法庭的一切事务都采用俄语。禁止用民族语文出版书报，学校里禁止用本民族语文教课。沙皇政府力图扼杀民族◇4◇文化的任何表现，对一切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强迫“俄罗斯化”的政策，沙皇制度是残害非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和掌刑人。

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还受农奴制残余的阻碍，但已发展得相当迅速了。在 1865—1890 年这二十五年内，单是大工厂和铁路的工人，就由七十万零六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了。到九十年代末，大工厂、矿业和铁路的工人，单以欧俄五十省来说，就已增加到二百二十万零七千人，而以全俄来说，则已增加到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人。

这已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就其在大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团结性来说，还是就其战斗的革命的品质来说，它同农奴制时代的工厂工人、同小手工业和其他一切工业的工人根本不同。

九十年代的工业高涨，首先跟加紧修筑铁路分不开。十年内(1890—1900 年)一共修筑了二万一千多俄里新铁路。铁路需要大量的金属(制造路轨、机车和车辆),需要愈来愈多的煤炭、石油等燃料，这就引起了冶金工业和燃料工业的发展。

在革命前的俄国，也如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业高涨年代总是跟工业危机和工业停滞年代交替着，因而使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打击，使数十万工人陷于失业和贫困。

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在农奴制度废除后有很迅速的发展，但俄国经济发展程度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从事农业。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有名的著作中，引用了1897 年全国人口调查册中的重要数字，指明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六分之五，而从事大小工业、商业、铁路和水路运输业、建筑业、森林采伐等等的人口总共只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左右。◇5◇

由此可见，俄国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小资产阶级国家，即小私有的、生产率很低的个体农民经济还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资本主义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发展起来。农民这一在革命前的俄国人数最多的阶级，日益瓦解，日益分化。在农村里，一方面从最富裕的农民中间产生出富农上层，即农村资产阶级；另一方面，

又有许许多多农民陷于破产，贫苦农民即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数，逐渐增加起来。中农人数一年比一年减少。

1903 年，俄国约有一千万农户。据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计算,这个户数中至少有三百五十万是**无耕马的**农民。这些贫苦户通常只种很小一块土地，其余的土地租给富农，而自己出外谋生。贫苦农民按其地位说来，跟无产阶级非常接近。列宁称他们为农村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万户富农(总农户数是一千万)，占有全部农民耕地的半数。这个农民资产阶级靠盘剥贫农和中农，靠剥削长工和短工的劳动而发财致富，变成农业资本家。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开始觉醒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了。沙俄时代的工人生活非常困苦。在八十年代，工厂里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个半小时，纺织工业中甚至长达十四以至十五小时。对女工童工劳动的剥削采用得很广。童工劳动时间虽与成年工人相等，但所领的工资也如女工一样，要比成年男工少得多。工资非常低。大部分工人每月只能领得七八个卢布。就是金属加工厂和铸造厂里工资最高的工人，每月至多也只能领得三十五个卢布。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结果造成工人大量的残废和死亡。根本没有什么工人保险，看病完全自费。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工人集体宿舍一间矮小的黑屋子，要住十至十二个工人。厂主时常克扣工人的工资，强迫工人在◇6◇厂主开设的店铺高价购买食品，并用罚款的办法掠夺工人。

工人们开始商量，共同向厂主提出要求，以改善他们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他们撂下工作——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是由于罚款过高、发工资时实行蒙骗、降低计件工资标准等引起的。

在最初举行的罢工中，工人常因忍无可忍而毁坏机器，打破厂房玻璃，捣毁厂主的店铺和办事处。

先进工人开始明白，要同资本家顺利地进行斗争,必须组织起来。工人协会相继出现了。

1875 年，在敖德萨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个最初的工人组织存在了八九个月，后来就被沙皇政府破坏了。

1878 年，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木工哈尔土林和钳工奥勃诺尔斯基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协会纲领说，协会的任务与西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相同。协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它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奥勃诺尔斯基曾在国外住过一些时候，他在那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活动有所了解。这一点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上有了反映。协会认为自己的当前任务是为人民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权利等等)。当前要求中还包括限定工作日。

协会有会员二百人，还有同样数目的同情者。协会开始参加工人的罢工，领导工人的罢工。这个工人协会也被沙皇政府破坏了。

然而，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席卷了愈来愈多的地区。八十年代发生过很多次罢工。五年 (1881—1886 年)间发生的罢工至少有四十八次，共有八万工人参加。◇7◇

1885 年奥列哈沃－祖也沃的莫罗佐夫工厂的大罢工，在革命运动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当时这个厂大约有八千工人。劳动条件一天比一天坏。从 1882 年至 1884 年，工资减过五次，1884 年那次一下就把计件工资标准减了四分之一,即减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厂主莫罗佐夫还用各种罚款剥削工人。罢工后的审判表明，工人每挣一卢布工资。厂主就用罚款

从中扣去三十至五十戈比。工人忍受不了这种掠夺，于1885年1月宣布了罢工。这次罢工是事先准备好的。领导罢工的是先进工人彼得·莫伊先科，他先前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有革命工作的经验。在罢工前夜，莫伊先科同其他一些最觉悟的织布工人一起拟定了向厂主提出的许多要求，这些要求并经工人秘密会议通过。首先工人们要求停止抢劫式的罚款。

这次罢工被武力镇压下去了。六百多工人被捕，其中几十人被交付法庭审判。

1885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些工厂也举行过同样的罢工。

第二年，沙皇政府慑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被迫颁布了罚款法，规定所罚的款项不得落入厂主的私囊，而必须用于工人自己的需要。

根据莫罗佐夫厂和其他厂的罢工经验，工人们懂得了：通过有组织的斗争，他们可以争得很多的东西。工人运动中开始涌现出了许多坚决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能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同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始在俄国建立起来。◇8◇

二　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以前，民粹派在俄国进行过革命工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于1883年，这就是“劳动解放社”。它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因进行革命活动受沙皇迫害、被迫逃亡国外、侨居日内瓦时所组织的。

普列汉诺夫先前本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在国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同民粹主义决裂而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它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其他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后秘密散布到俄国国内。格·瓦·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以及该社的其他参加者，还写过许多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空想主义者)的臆造，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定将崩溃，正如农奴制度已经崩溃一样；资本主义造成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他们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摆脱剥削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要认识本身的力量，认识本身◇9◇的阶级利益,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坚决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

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这个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摆脱资本政权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公有制，不是用和平手段可以达到的；要达到这一步，工人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以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起新社会即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工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革命的阶级，因而也是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把一切不满意资本主义的势力集合到自己周围，引导他们去冲击资本主义。但要战胜旧世界和建立无阶级的新社会，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共产党的工人政党。

正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进行了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工作。

当“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用俄文出版刊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时候，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运动开拓道路。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在先进工人和怀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民粹主义现点。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成了能够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强大先进力量。但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俄国民粹派错误地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民粹派不熟悉工人阶级。他们不了解，不和工人阶级联盟，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单是农民不可能战胜沙皇制度和地主。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10◇是社会上最革命

最先进的阶级。

起初，民粹派企图发动农民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为着这一目的，革命的知识青年就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到民间去”。由此产生了“民粹派”这一名称。但农民并没有跟他们走，因为他们对农民也并不真正熟悉，并不真正了解。大多数民粹派分子被警察逮捕了。于是民粹派决定不要人民，单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党”准备行刺沙皇。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民获得丝毫益处。刺杀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不能消灭地主阶级。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代之而起。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更坏了。

民粹派采取这种刺杀个别人物、实行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来反对沙皇制度，是错误的、对革命有害的。个人恐怖政策，是从民粹派所谓“英雄”是积极的而“群氓”是消极的，“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这一谬论出发的。这一谬论认为，只有个别杰出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众、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们轻蔑地称呼的“群氓”，不会自觉地有组织地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拒绝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影响最大的革命家之一斯切潘·哈尔土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完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刺杀压迫者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这种对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同压迫者阶级作斗争的注意力。他们阻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11◇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

虽然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已被沙皇政府破坏，但民粹主义观点在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仍然保持了很久。民粹派的残余拼命抵抗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阻挠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因此，只有同民粹主义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俄国成长壮大起来。

“劳动解放社”开展了反对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斗争，指出民粹派的学说和民粹派的斗争方式对工人运动极为有害。

普列汉诺夫在反民粹派的著作中指出，虽然民粹派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民粹派的观点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普列汉诺夫第一个给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对民粹派观点给以一针见血的打击，同时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受到普列汉诺夫致命打击的是民粹派的哪些基本错误观点呢？

第一，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种“偶然”现象，资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发展起来，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成长和发展起来。

第二，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民粹派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持着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是些完全落后的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创造历史的不是阶级，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12◇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

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作斗争和揭露他们的时候，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靠这些著作进行学习和得到培养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

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扫清了基地。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他在1895年出版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指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4 卷第 347 页)[①]。

普列汉诺夫在反民粹派的著作中证明说,像民粹派那样提出问题,即问资本主义应否在俄国发展，是很荒谬的。普列汉诺夫用事实证明说，问题在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离开这条道路。

革命者的任务不是**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革命者的任务是要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强大革命力量即工人阶级，发展它的阶级意识，把它组织起来，帮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政党。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二个基本错误观点，即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能起先进作用的观点，也批倒了。民粹派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历史上的不幸”,撰文指摘“无产阶级化是一种病害”。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它完全适用于俄国。他证明说，虽然农民在人数上占优势，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较少，革命者却正是应当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寄托于它的增长。◇13◇

为什么正是应当寄托于无产阶级呢?

因为无产阶级虽然现在人数很少，但它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即大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本书译者注中提到的书均指中文版本>。——译者注

因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一年年**增长着**，在政治上**发展着**，由于大生产中的劳动条件而容易组织起来，由于自己的无产者地位而最有革命性，因为它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锁链。

农民却不是这样。

农民(这里是指个体农民。——编者注)虽然人数众多，但它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是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农民这个阶级不仅不增长，反而一年年**分化**为资产阶级(富农)和贫农(无产者、半无产者)。除此而外，他们由于本身分散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容易组织起来，他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乐于投入革命运动。

民粹派认为俄国到达社会主义不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会通过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然而公社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萌芽，因为在公社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富农，即剥削贫农、雇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的“土豪”。当时有名无实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和间或实行过的按人口重分土地的办法，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享用土地的是公社里拥有耕畜、农具和种籽的社员，即富裕的中农和富农。无耕马的农民、贫农和一般力量单薄的农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富农，自己去受人雇用，去当雇农。农民公社事实上是掩饰富农的豪强的一种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按连环保原则向农民征税的一种便利的工具。因此，沙皇政府没有触动过农民公社。把这样的公社当作社会主义的萌芽或基础是很可笑的。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三个基本错误观点，即认为“英雄”、杰◇14◇出人物及其思想在社会发展中起头等重要作用而群众、“群氓”、人民、阶级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观点，也批倒了。普列汉诺夫斥责民粹派为**唯心主义**，他证明说，真理不在唯心主义方面，而在马

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面。

普列汉诺夫发挥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证明，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是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相互关系的变更，是各个阶级为着自己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不是思想决定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么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反之，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正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反映先进阶级的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人物。

对于民粹派所谓群众是群氓、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并把群氓变为人民的论断，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也就是说，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动历史前进。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理解应当如何改善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以至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一意孤行，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民粹派就是这种倒霉的英雄。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对民粹派的斗争，大大地消除了民粹派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还远未完成。这个任务，即彻底打垮民粹主义,打垮这个马克思主义敌人的◇15◇任务，落到列宁的肩上了。

自从“民意党”被破坏以后，大多数民粹派分子很快就放弃了反

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而主张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民粹派已变成富农利益的代表者了。

“劳动解放社”先后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第一个草案在1884年，第二个草案在1887年)。这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建党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的错误。在它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中，还有民粹派观点的残余，还包含有个人恐怖的策略。其次，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能够而且应当引导农民前进,并且只有同农民联盟，才能战胜沙皇制度。再次，普列汉诺夫把自由资产阶级看作是能够给革命以援助——虽然是不可靠的援助——的力量;至于农民，那他在某些著作中却完全忽略了。例如他说：

“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没有其他可为我国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119页）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错误观点，就是他后来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的萌芽。

无论“劳动解放社”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还没有在实践上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民主党纲领原理在俄国产生和巩固起来的时期。在1884—1894年这十年中，社会民主党还只是以个别人数不多的团体和小组的形式存在，它们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联系，或是很少联系。当时社会民主党好像一个还没有诞生但已在母亲胎胞里发育着的婴儿，如列宁所说，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①]。◇16◇

列宁指出：“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6页。——译者注

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①]。

在俄国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并把“劳动解放社”的错误纠正过来的任务，只得由列宁来解决了。◇17◇

①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5页。——译者注

三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布尔什维克主义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生于辛比尔斯克市(现为乌里杨诺夫斯克市)。1887年，列宁进了喀山大学，但不久就因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被捕并被开除学籍。列宁在喀山加入了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自从列宁迁居萨马拉后，很快就以列宁为中心成立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惊服了。

1893年底，列宁迁居彼得堡。列宁最初发表的几次言论，已经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于非常深知马克思的学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对工人事业的胜利有坚定强烈的信心，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列宁成了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者。

列宁受到了他所指导的那些小组的先进工人的热烈爱戴。

工人巴布什金回忆列宁给工人小组讲课的情形时说：“我们听的课生动有趣．大家听了都非常满意。经常赞叹我们讲师的智慧。”

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当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作了准备。◇17◇

列宁向“斗争协会”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从政治上加以领导的任务。列宁提出，要从专门在宣传小组的少数先进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到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进行迫切的政治**鼓动**。这个向群众性鼓动的转变，对于俄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工业正值高涨时期。工人数量增加了。工人运动加强了。据不完全的统计，1895—1899 年的罢工工人数目不下于二十二万一千。工人运动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力量。现实生活本身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作斗争时所捍卫的观点，即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能起先进的作用。

在列宁领导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进行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从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哪个工厂一罢工，“斗争协会”因为通过自己小组成员而很熟悉各企业的情形，立刻就能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这些传单揭露厂主虐待工人的情形，说明工人应当怎样为本身的利益斗争，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的病害如工人生活困苦、工人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极其繁重的劳动、工人毫无权利等等，都揭露无遗。同时这些传单又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1894 年底，列宁在工人巴布什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给彼得堡的谢勉尼柯夫工厂罢工工人的号召书。1895 年秋，列宁写了声援托伦顿厂男女罢工工人的传单。这个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了亿万的利润。这里的工作日长达十四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不过挣七卢布左右。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18◇号召书。每一份传单都有力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工人看到，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1896 年夏，在“斗争协会”领导下举行了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基本的要求是缩短工作日。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于 1897 年 6 月 2 日颁布法令，把工作日限定为十一小时半。

在法令颁布以前，工作日根本是不限定的。

1895 年 12 月，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但列宁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来帮助“斗争协会”，从监狱里寄出他写的小册子和传单。列宁在监狱里写了小册子《谈谈罢工》和揭露沙皇政府的专横暴戾的传单《告沙皇政府》。列宁在监狱里还写了党纲草案(用牛奶写在一本医书的字行中间)。

由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强有力的推动，俄国其它城市与地区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九十年代中期，南高加索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组织。1894 年，莫斯科成立了“工人协会”。九十年代末，西伯利亚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在九十年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雅罗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罗马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这些团体统一成了“社会民主党北方协会”。九十年代后半期，顿河岸罗斯托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基辅，尼古拉也夫、土拉、萨马拉、喀山，奥列哈沃－祖也沃等城市都相继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团体和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如列宁所说，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不容忽视的**萌芽**。

列宁后来就是根据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革命经验来进行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工作的。

自从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被捕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分大大改变了。新的人物出头露面，他们自称为“青年人”，而把列宁和他的战友称为“老头子”。他们开始实行错误的政治路◇19◇线。他们说，必须叫工人只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政治斗争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自由资产阶级。

这些人就被称为“经济派”。

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妥协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集团。◇20◇

四　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对民粹主义那一套观点已经给了一大打击，但民粹派观点在九十年代初期还博得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同情。有一部分青年继续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认为将来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民粹派的残余竭力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竭力诽谤他们。当时必须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建立社会民主党创造条件。

这个任务由列宁完成了。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 年)一书中，彻底揭穿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实际上早已放弃了任何反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主张同沙皇政府和解。列宁谈到当时的民粹派时写道：“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20◇第 1 卷第 161 页)①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闭眼不看农村贫民的生活状况、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和富农对贫农的剥削，而一味赞美富农经济的发展。他们事实上代表富农的利益。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38 页。 ——译者注

同时，民粹派又在他们的杂志上拼命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故意颠倒是非，歪曲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硬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希望农村破产，是想“让每个农夫到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熬煎”。列宁在揭露民粹派这种荒谬批评时指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而在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真实发展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要增加起来。但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列宁指出，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的压迫、消灭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并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这一思想。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许多著作中，批判了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派别民意党人所运用，后来又由民粹派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所运用的那些政治斗争手段，特别是个人恐怖的策略。列宁认为这种策略是对革命运动有害的，因为这种策略用单个英雄人物的斗争来代替群众的斗争。这种策略意味着不相信人民革命运动。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列宁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接着列宁又指出，正是俄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和世界各国无产◇21◇阶级一道，循着公开的政治斗争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列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确定了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革命力量，确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和他的拥护者所进行的斗争，还在九十年代就从思想上把民粹主义彻底粉碎了。

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有巨大的意义。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一个大的社会运动通常总有一些暂时的“同路人”混入。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的“同路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广泛传播。于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常在合法的即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同民粹主义进行斗争，但他们是想利用这个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旗帜来使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学说中最主要的东西，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最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竭力赞美资产阶级，并号召大家“承认我们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不是去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列宁认为在反民粹派的斗争中可以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协议，利用他们去反对民粹派。例如共同出版过一本反民粹派的文集。但列宁同时又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他们那种自由资产阶级的本性。

后来，这些“同路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党员，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成了彻头彻尾的白卫分子。

除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处的“斗争协会”外，在俄国西部各◇22◇民族边区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出现。九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从波兰民族主义的党里分化出来，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九十年代末，有几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立起来。1897 年 10 月，在俄国西部省份成立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联盟(简称崩得)。

1898 年，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几个城市的“斗争协会”和崩得，作了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尝

试。为了这一目的，它们于1898年 3 月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九名代表。列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了。用大会名义发表的《宣言》，有许多地方还不能令人满意。《宣言》回避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回避了无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和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

大会在决议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完成了这个正式手续，起了很大的革命宣传作用。

虽然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举行过了，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次大会没有把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组织统一起来，没有在组织上把它们联成一体。各地方组织的工作还没有统一的路线，没有党纲和党章，没有中央统一的领导。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各地方组织中思想上的涣散开始增长起来，结果就给“经济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在工人运动中的加强造成了良好的条件。

只是靠了列宁和他创办的《火星报》多年紧张的工作，才战胜◇23◇了这种涣散现象，克服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五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列宁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住在舒申斯克村，是因“斗争协会”案在彼得堡监禁很久以后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那里去的。

但列宁就是在流放中也还在进行革命工作。列宁在流放中写完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在那里他还写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有名的小册子。

列宁虽然脱离了直接的实际的革命工作。但他仍然设法同实际工作者保持着联系，从流放地跟他们通信，向他们了解情况，给他们出主意。当时列宁特别关心“经济派”问题。他比谁都明白，“经济主义”是妥协主义、机会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就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受到破坏，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失败。

所以“经济派”刚一露头，列宁就给以迎头痛击。

“经济派”硬说，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应当让自由资产阶级去搞，工人应当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列宁认为“经济派”这样宣传，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政党，就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

1899 年，一部分“经济派”分子(普罗科波维奇、库斯柯娃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他们公开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放弃工◇24◇

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要求，“经济派”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而工人只要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

列宁一读到这个机会主义文件，就把附近的政治犯即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经过商议，以列宁为首的十七个同志提出了一个揭露 “经济派”观点的激烈抗议书。

这个由列宁起草的抗议书在全俄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中间传播开来，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发展。

俄国“经济派”所宣传的观点，也就是外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伯恩施坦派即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信徒们所宣传的观点。

因此，列宁对“经济派”作斗争，同时也就是对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

为反对“经济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而进行的斗争，基本上是列宁创办的秘密报纸 《火星报》进行的。

1900 年初，列宁和“斗争协会”的其他一些会员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了俄罗斯。列宁立意创办一个大型的全俄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当时在俄国已有许多规模很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组织，但它们还没有联成一体。当时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①]，所以创办全俄秘密报纸，是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联成一体，为建立真正的政党作好准备。

但由于警察的迫害，这样的报纸不能在沙俄境内出版。否则，过不了一两月就会被沙皇密探发觉而被捣毁。因此列宁决定把它◇25◇拿到国外出版。报纸在国外用最薄最结实的纸张刊印，再秘密转寄到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43 页。——译者注

俄国。有几号《火星报》在俄国境内由巴库、基什涅夫，西伯利亚的秘密印刷所进行了翻印。

1900 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国外去同“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磋商全俄政治报纸的出版问题。这个想法，列宁在流放中就已十分周详地考虑过。列宁从流放地回来的途中,曾为这个问题在乌发、普斯科夫、莫斯科、彼得堡等好几个地方开过会。每到一处，他都和同志们约定秘密通信的密码、寄送出版物的地址等等，并同他们讨论了将来斗争的计划。

沙皇政府感觉到，列宁是它最危险的敌人。沙皇的暗探，一个叫祖巴托夫的宪兵，在秘密的呈报中说，“现时在革命中再没有比乌里杨诺夫更重要的人物了”，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把列宁刺死。

列宁到国外后，同“劳动解放社”，也就是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查苏利奇，商定了共同出版《火星报》。整个出版计划，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拟定的。

1900 年 12 月，《火星报》创刊号在国外出版了。报头下面载有一句名言(题词)：“**星火可以燎原**。”这是十二月党人[①]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赋诗回答诗人普希金的致意时所用的一个句子。果然，列宁点燃的“火星”，后来燃成了燎原的革命烈火，把地主贵族的沙皇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烧成了灰烬。

————————————

①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 1825 年 12 月起义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而得名。——译者注

简 短 的 结 论

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工党，首先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那些有害于革命事业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26◇

只有从思想上彻底批倒民粹派观点，才能为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扫清基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列宁在九十年代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彻底打垮了民粹主义。

1883 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在八十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已走上有组织的斗争的道路，走上有组织的罢工这种群众性发动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还只从事于宣传，不了解必须转到工人阶级中去进行群众鼓动，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在实践中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没有领导工人运动。

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 年）在工人中进行了群众鼓动，领导了群众罢工，因而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转到在工人中进行群众鼓动，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阶段。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萌芽。继彼得堡“斗争协会”之后，各大工业中心和各个边沿地区都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

1898 年进行了第一次（虽然没有成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尝试，即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因为既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也没有造成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起来、联成一体而成为一个党，列宁提出并且实现了创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全俄报◇27◇纸《火星报》的计划。

“经济派”是这个时期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要敌人。他们否认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党，赞成各个团体保持零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列宁和他创办的《火星报》就是对准他们开火的。

《火星报》最初几号的出版(1900－1901 年)，意味着转向一个新的时期，即把一些零散的团体和小组真正组成为一个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期。◇28◇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

(1901－1904 年)

一 1901－1904 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十九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国。在危机年代 (1900—1903 年)倒闭的大小企业将近三千家。有十万多工人被解雇。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大降低。工人先前通过顽强的经济罢工从资本家那里争得的一点让步，又被资本家夺回去了。

工业危机和失业并没能阻止和削弱工人运动。恰巧相反，工人的斗争愈来愈带有革命的性质了。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最后，工人又转到游行示威，提出关于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

1901 年，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与军队间的流血冲突。工人们只能用石头和铁块去反抗武装的沙皇军队。工人们的顽强抵抗被击破了。接着就是残酷的镇压：约有八百个工人被捕，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服苦役。但英勇的“奥布霍夫防卫战”对俄国工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同情的浪潮。◇29◇

1902 年 3 月，巴土姆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些行动都是社会民主党巴土姆委员会组织的。巴土姆的游行示威激发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农群众。

同年，在顿河岸罗斯托夫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开始是铁路工

人，接着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参加进来。罢工激发了全市工人。在城外开了几天的群众大会，到会工人达三万之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宣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一些人发表了演说。警察和哥萨克无法驱散这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会。有几个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送葬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示威。沙皇政府只是从邻近城市调来大批军队，才把这次罢工镇压下去。罗斯托夫工人的斗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1903 年的罢工规模更大。这一年，在南俄各地，包括整个南高加索(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和乌克兰各大城市(敖德萨、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发生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罢工更持久更有组织了。同过去工人阶级的发动不同，现在工人的政治斗争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领导的。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奋起同沙皇政权作革命斗争了。

工人运动对农民发生了影响。1902 年春夏两季，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和伏尔加河流域，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了。农民烧毁地主的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杀死他们痛恨的地方官和地主。政府派遣了军队来镇压起义的农民，向他们开枪射击，成百地逮捕他们，把许多领导者和组织者关进监狱，但革命的农民运动仍有增无减。

工农的革命发动表明俄国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了。

学生的反政府运动也在工人革命斗争影响下加强起来。政府为对付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课封闭了学校，把成百的学生关进监狱，最后还想出了把不肯屈服的学生送去当兵的办法。对此，全国◇30◇各大学学生于 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这个冬天举行全国总罢课。参加这次罢课的达三万人。

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使自由派资产者和那些把持着所谓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地“抗议”沙皇政府采取“极端行动”迫害他们在大学念书的子弟。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派分子的据点是地方自治局。所谓地方自治局，就是专管有关农村居民的纯粹地方性事宜(修筑道路，建造医院和学校)的地方管理机关。自由派地主在地方自治局里占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同自由派资产者有密切的联系，差不多同他们融为一体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已开始从半农奴制经济过渡到更为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部分自由派当然是拥护沙皇政府的，但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担心正是这种“极端行动”会使革命运动加强起来。他们害怕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但更害怕革命。自由派抗议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是想一举两得：第一，“开导”沙皇；第二，给自己戴上对沙皇制度“大为不满”的假面具，以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离开革命，从而削弱革命。

当然，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对于沙皇制度的生存没有任何危险，但它毕竟表明沙皇制度的“永恒”基础情况不妙。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导致1902年成立了资产阶级的“解放社”，它就是后来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沙皇政府眼见工农运动的洪流在全国日益汹涌澎湃，就拼命来制止革命运动。对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愈来愈多地采用武力，枪弹和皮鞭已成为沙皇政府回答工农发动的通常手段，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31◇

沙皇政府除加紧施行高压手段外，还企图用其他一些较为“灵活的”不带高压性的办法来引诱工人离开革命运动。曾经尝试建立一种受宪兵和警察监护的冒牌工人组织。这种组织当时被叫作“警察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以建立这些警察的工人组织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而得名)。沙皇的保安局通过自己的奸细力图欺骗工人，说沙皇政府自愿帮助工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祖巴托夫分子向工人说：“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还何必搞什么政治，何必干什

么革命呢。”祖巴托夫分子在几个城市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04年，加邦神父按照祖巴托夫组织的样式，为着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名为“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的组织。

但沙皇的保安局控制工人运动的尝试没有得逞。沙皇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对付不了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把这种警察组织一扫而光。

二 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虽然1898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没有人去恢复它。不仅如此，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了。

如果说1884—1894年是战胜民粹主义，为建立社会民主党而从思想上进行准备的时期，1894—1898 年是试图(虽然没有成◇32◇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成社会民主党的时期，那末1898年以后的时期，就是党内思想上组织上混乱状态更加厉害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增加了革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了。于是知识分子中的大批革命青年涌进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在理论上很孱弱，在组织和政治上没有经验，只是从当时充满出版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作品中获得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的、大部分是不正确的概念。这种情况，就使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理论和政治水平降低，使其中掺进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情绪，使思想上的混乱、政治上的动摇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起来。

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显然逼近，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当时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各个地方委员会、团体和小组的情况非常不好，它们的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非常厉害，使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成了极其困难的任务。

其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建党工作必须在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烈火中进行，沙皇政府经常把一些组织中的优秀工作人员抓走，把他们送去流放、关进监狱和判处服苦役。其所以困难，还因为很大一部分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除了本地那种细小的实际工作外，什么事情也不愿过问，不懂得党内缺乏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的害处，习惯于党的涣散状态，习惯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并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政党也可以过得去。

要建立集中的政党，就必须克服各个地方机关的这种落后性、守旧心理和狭隘的实际主义。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时党内还有很大一批人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在俄国有《工人思想报》，在国外有《工人事业》杂志），他们◇33◇从理论上为党内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辩护，甚至往往赞美这种状况．认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个不必要的和臆想出来的任务。

这些人就是 “经济派”和他们的信徒。

要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击败“经济派”。

于是列宁就来执行这些任务和进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

关于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应该从何着手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要建立党必须从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认为召开代表大会就能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起来，把党建立成功。列宁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首先必须把党的目的和任务问题弄清楚；必须知道我们所想建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党；必须在思想上同“经济派”划清界限；必须如实地公开地告诉党，在关于党的目的和任务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即“经济派”的意见和革命社会民主派的意见；必须在报刊上广泛地宣传革命社会民主派的观点，正如“经济派”在他们的机关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样；

必须让各个地方组织有在这两派之间作自觉选择的机会。只有做了这番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

列宁直截了当地说：

“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78页)[①]

因此列宁认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应从创办一个为革命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行宣传鼓动的战斗的全俄政治报着手，创办这样的报纸应是建党工作的第一步。◇34◇

列宁在《从何着手？》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拟定了一个具体的建党计划(后来在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又加以发挥)。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②]，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不断向深广发展的纲。……没有报纸就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广大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110页)[③]

列宁认为，这样的报纸不仅会成为从思想上把党凝为一体的工具，而且会成为从组织上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工具。这个报纸的代办员和通讯员网既然代表了各个地方组织，就会成为一个骨架而使党能够围绕着它在组织上集中起来。列宁说：因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④]。

————————————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34页。——译者注

② 指建党。——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6-7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8页。——译者注

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这种代办员网将成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精密而细致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35◇(《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112页)[①]

《火星报》就应当成为这样的报纸。

而《火星报》也确实成了这样的全俄政治报，确实为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凝为一体作好了准备。

讲到党本身的结构和成分时，列宁认为党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人数不多、经常进行工作、作为骨干的领导工作人员，这里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即摆脱了其他任何职业而专搞党的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具有最必要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并且善于同沙皇警察作斗争，善于避开警察的耳目；(二)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人数众多并且受到千百万劳动者同情和拥护的党员群众。

列宁写道：“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3)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

——————————————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9页。——译者注

就会**越多**。”(同上，第456页)[①]

讲到当时应当建立的党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党的目的和任务时，列宁认为党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应当是领导工人运动、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力量。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最近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先推翻沙皇制度，所◇36◇以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阶级，发动全体人民去同沙皇制度斗争，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并推翻沙皇制度，为走向社会主义扫除第一个大障碍。

列宁说：“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2页)[②]

又说：

“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座强有力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子弹，杀害我们的优秀战士。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统一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也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33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45页。——译者注

碎’”(同上，第59页)[①]

这就是列宁在沙皇专制的俄国条件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

“经济派”马上就来向列宁的计划开火了。

“经济派”认为反对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是所有阶级的事◇37◇情，首先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所以这个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无关紧要，因为工人主要是关心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主要是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的和当前的任务不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不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是组织“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并且他们所谓同政府作经济斗争，就是要求改善工厂立法。“经济派”硬说用这样的方式就能“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经济派”已经不敢公开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政党了。但他们认为党不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应去干预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尤其不应去领导它，而应跟着它走，研究它，从中吸取教训。

其次，“经济派”认为：自觉成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组织和指导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意识的水平，相反地应该去适应并降低到工人阶级中等阶层以至更落后的阶层的水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而应该等待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自己锻炼出社会主义意识。

讲到列宁提出的建党组织计划时，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等于是在强制自发运动。

列宁在《火星报》上，特别是在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给了“经济派”的这种机会主义哲学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了它。

(一)列宁指出，引诱工人阶级脱离反对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1—212页。——译者注

把它的任务局限于反对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而毫不损伤厂主和政府，就是使工人永远陷于奴隶地位。工人对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是争取改善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条件的工联主义斗争，但工人斗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改善自己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且是要根本消灭那迫使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和遭受◇38◇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工人运动道路上还站着沙皇制度这只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时，工人就无法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无法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党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是扫除沙皇制度,以便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列宁指出，赞美工人运动的自发过程而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把党的作用归结为充当事变的登记者，这就是宣传“尾巴主义”，主张把党变成自发过程的尾巴，变成运动的消极力量，即只能观望自发过程和指靠自流趋势的力量。进行这种宣传，就是企图消灭党，也就是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政党的地位，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而当工人阶级面前站着这样的敌人，如拥有各种斗争手段的沙皇制度，以及按现代方式组织起来、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来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资产阶级的时候，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就等于背叛工人阶级。

(三)列宁指出，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降低自觉性的作用，即降低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那就是：第一，侮辱向往自觉性象向往光明一样的工人；第二，使党蔑视理论，亦即使党蔑视其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的武器；第三，完全彻底地滚进机会主义泥潭。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0页)①

(四)列宁指出，“经济派”硬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能从工人阶级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卷第241—242页。——译者注

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这是欺骗工人阶级，因为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自发运动中，而是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派”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就是替资产阶级◇39◇思想体系清扫道路，使其容易灌输和注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因而就是葬送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帮助资产阶级。

列宁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90页）[①]

又说：

“**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同上，第391—392页）[②]

（五）列宁把“经济派”所有这些错误总结起来得出结论说：“经济派”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能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而是想要建立一个打算保存资本主义统治的、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因此“经济派”是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者。

（六）最后，列宁指出，“经济主义”不是在俄国偶然产生的现象，“经济派”是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其同盟者，即拥护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者。当时在西方，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派愈来愈得势，他们打着“自由批评”马克思的旗号，要求“修正”即修改马克思学说（由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56页。——译者注

此就有“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要求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俄国“经济派”推行的同样也是这种放弃革命斗争、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以上就是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理论原理。

◇40◇

由于《怎么办？》一书的传播,在它出版一年后(它是1902年3月出版的)，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经济主义”的思想立场给人留下的已只是不愉快的回忆，而“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心目中已经臭了。

这就是说，已经从思想上把“经济主义”彻底粉碎了，把机会主义即尾巴主义、自流主义的思想体系彻底粉碎了。

但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意义还不限于此。

《怎么办？》一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列宁在这部有名的著作中：

(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彻底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首先在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二)把理论、自觉性和党的意义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指出它们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力量和领导力量；

(三)光辉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四)英明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的基础。

《火星报》既拥有这样的理论财富，就能够为实现列宁的建党计划、聚集全党力量、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经济派”、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而开展一个广泛的运动，并且确实开展起来了这样一个运动。

《火星报》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纲草案。大家知道，工人党的纲领是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目的和斗争任务的简要而科学的说明。党纲既要规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也要规定党在实现最终目的的道路上所应争取的种种要求。因此，制定党纲草案不能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41◇

拟制党纲草案时，在《火星报》编辑部内，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编委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与争论几乎导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完全决裂。但决裂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由于列宁的坚持，终于在党纲草案中加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重要的条文，并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党纲的土地问题部分，全部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当时已经主张土地国有，不过他认为在斗争第一阶段上必须提出一个要求：把“割地”即地主在“解放”农民时割去的那一部分农民土地归还给农民。普列汉诺夫反对土地国有。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党纲问题上的争论，部分地决定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党章的通过和统一的党的成立。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这样，列宁原则的胜利以及《火星报》为实现列宁组织计划所取得的成功，准备好了建立党或如当时所说建立真正的党所必需的一切基本条件。《火星报》的方针已在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获得了胜利。现在已经可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了。

1903 年 7 月 17 日(7 月 30 日)[①]，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外秘密举行的。大会最初几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后因比利时警察要求大会代表离开比境，◇42◇于是大会移到伦敦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十三名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组织。每个委员会有权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但有些委员会只派了一名代表。所以四十三名代表一共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6 卷第 164 页)[②]。

大会成分不是清一色的。大会上没有露骨的“经济派”代表出席，因为他们已经遭到失败。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巧妙地改头换面了，以致能派出几个代表混进代表大会。此外，崩得的代表也只是口头上与“经济派”有所不同，实际上他们是拥护“经济派”的。

———————————————

① 本书中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95 页。——译者注

所以出席大会的不仅有《火星报》的拥护者，而且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火星报》的拥护者有三十三人，即占大多数。然而并非所有自命为火星派的人都是真正的列宁火星派。大会代表分成了几个集团。列宁的拥护者，即坚定的火星派，共有二十四票。有九个火星派分子是拥护马尔托夫的，他们是不稳定的火星派。有一部分代表动摇于《火星报》和《火星报》反对者之间，他们在大会上共有十票，这就是中派。公开的《火星报》反对者共有八票(三个“经济派”分子和五个崩得分子)。只要火星派内部一发生分裂，《火星报》的敌人就能占得上风。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上的情形是异常复杂的。列宁费了很大力量，才保证《火星报》在大会上获得了胜利。

大会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党的纲领。讨论纲领时引起大会上机会主义分子反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机会主义者在纲领的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不赞成大会上革命分子的意见。◇43◇但他们决定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开火，理由是说国外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因此也就可以不把这一条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机会主义者还反对把农民问题上的要求写进党纲。这些人根本就不想革命，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采取歧视态度，对之表示厌恶。

崩得分子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民族自决权。列宁总是教导说，工人阶级必须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在纲领上规定这个要求，就等于主张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助长民族压迫。

列宁对这一切反对意见都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纲领。

这个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部分。最高纲领说的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说的是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所应实现的当前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中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农民土地(“割地”)归还给农民。

后来，布尔什维克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代替了归还“割地”的要求。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一直存在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时，我们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通过了新的纲领。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之后，就来讨论党章草案。大会既已通过了党纲，为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就要通过党章，以便彻底消除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消除组织涣散和党内缺乏坚强纪律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党纲的通过还比较顺利，那末党章问题却在大会◇44◇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尖锐的意见分歧，是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即党员资格这一条的条文时展开的。什么人可以当党员，党的成分应是怎样的，党在组织方面应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还是一种不定形的东西，这就是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产生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条文互相对立：一个是由列宁提出而为普列汉诺夫和坚定的火星派支持的条文；另一个是由马尔托夫提出而为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不稳定的火星派、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会上所有一切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支持的条文。

列宁的条文是说：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条文虽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却不承认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的条件，竟认为党员也可能不是党的一个组织中的一员。

列宁把党看作是**有组织的**部队，其中各个成员并不是自行列名入

党，而是由党的一个组织接收入党，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党的纪律；而马尔托夫却把党看作是一种组织上**不定形**的东西，其中各个成员都是自行列名入党，他们既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此也就不必服从党的纪律。

由此可见，马尔托夫的条文与列宁的条文不同，它为那些不稳定的非无产者分子大开入党之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些暂时同情革命的人有时甚至也能给党不大的帮助。但这些人决不会加入组织，不会服从党的纪律，不会执行党的委托，不会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分子却主张承认这样的人为党员，主张给予他们影响党内事务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甚至主张让每个罢工者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虽然参加罢工的也有非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45◇

因此，马尔托夫派所想有的并不是列宁和列宁派在大会上所力争的那种一元化的、战斗性的、组织严密的党，而是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党，这样一个党单只因为它成分复杂和不可能有坚强纪律，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战斗性的党。

不稳定的火星派脱离坚定的火星派而同中派结成联盟，再加上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同他们联合，就使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占得了优势。大会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

从火星派因为党章第一条而发生分裂以后，大会上的斗争更加剧烈了。大会已临近结束，即将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了。可是，在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以前出了几件事，使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由于党章的关系，大会讨论到了崩得问题。崩得想在党内获得一种特殊地位。它要求承认它是俄国犹太工人的唯一代表。接受崩得这一要求，就等于在党组织里把工人分成不同的民族类别而放弃工人阶

级统一的阶级的地区组织。大会否决了崩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主义。于是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接着，两个“经济派”分子也退出了大会，因为大会拒绝承认他们那个国外联合会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派的变化。

对于党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列宁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列宁认为必须把坚定彻底的革命者选进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派却竭力想使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大会多数在这个同题上赞成列宁的意见。选进中央委员会的都是拥护列宁的人。

根据列宁的提议，选进《火星报》编辑部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46◇和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大会上要求把《火星报》原先六个编委都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拥护马尔托夫的分子。大会以多数否决了这个提议。列宁提出的三人小组当选了。于是马尔托夫声明，他不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这样，大会通过对党中央机关问题的表决确定了马尔托夫派的失败和列宁派的胜利。

从这时起，拥护列宁的人因在大会选举时获得多数票，就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的人因为获得少数票，就被称为孟什维克[①]。

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一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大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主义”，即对于公开的机会主义的胜利；

(二)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建好了统一的党的骨架；

(三)大会揭示出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把党一分为二，即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坚持革命社会

————————————————

① 布尔什维克是俄语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孟什维克也是俄语音译，意即少数派。——译者注

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后者则滚进了组织涣散的泥潭，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四)大会表明，旧的机会主义者“经济派”虽已被党击溃，新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又在党内代之而起；

(五)大会在组织问题上没能胜任，表现过动摇，有时甚至让孟什维克占了优势，虽然大会到结束时已有所改正，但它毕竟不仅没能揭穿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使他们在党内陷于孤立，甚至没能向党提出这样的任务。

后一情况，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在代表◇47◇大会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尖锐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更加尖锐了。孟什维克竭力破坏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夺取党的中央机关。孟什维克要求让他们的代表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而且他们的人数要在编辑部里占多数，在中央委员会里同布尔什维克相等。由于这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本抵触，布尔什维克拒绝了孟什维克的要求。于是孟什维克就瞒着党暗中成立了他们以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反党派别组织，并如马尔托夫所说，“发动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他们所采取的反党斗争手段，就是“破坏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阻挠一切”(列宁语)[①]。他们盘踞在十分之九是由那些脱离了俄国实际工作的旅外知识分子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里，从那里向党、向列宁和列宁派开火射击。

普列汉诺夫给孟什维克帮了大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本来是同列宁一道走的。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被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要挟吓倒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同孟什维克“和解”。把普列汉诺夫拉到孟什维克方面去的，是他过去那些机会主义错误的货色。普列汉诺夫本人很快就从一个主◇48◇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变成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要求把代表大会否决了的所有原来的孟什维克编委都加进《火星报》编辑部。列宁当然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是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在党中央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352页。——译者注

委员会里站定脚跟，从这个阵地上去打击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违反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一人把先前的孟什维克编委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这时起，即从《火星报》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并经过《火星报》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从这时起，党内开始有了**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的叫法，前者是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而后者是指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

自从《火星报》转入孟什维克手里，它就成了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成了宣传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首先是宣传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机关报。孟什维克同“经济派”和崩得分子结合起来后，就在《火星报》上，如他们所说，开始向列宁主义大举进攻。普列汉诺夫没能坚持调和立场，不久也加入了这种进攻。按事物的逻辑，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就必然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在新《火星报》上出现了雪片似的声明和论文，说党不应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说党内必须容许自由的团体和个人存在，他们不必服从党机关的决议；说必须让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以及“每个罢工者”和“每个示威者”都有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权利；说要求党员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态度；说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就是“硬性压制”党员意志；说要求全体党员，无论领导人或普通党员，都同样服从党的纪律，就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度”；说“我们”在党内不是需要集中制，而是需要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使各个人和各个党组织都有权不执行党的决议。◇49◇

这是放肆宣传组织上的松懈，宣传破坏党性和党的纪律，赞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为不守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

孟什维克显然是在拖党后退，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退到组织涣

散状态上去，退到小组习气上去，退到手工业方式上去。

必须给予孟什维克一个坚决的回击。

于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有名的著作(1904 年 5 月出版)中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回击。

以下就是列宁在这本书里所发挥而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基础的基本组织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的一支部队。但工人阶级有很多部队，所以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党。党与工人阶级其他部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而不是普通的部队，它以社会生活的知识、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知识、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为武装，所以它善于引导工人阶级，善于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决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就像不能把部分和整体混淆起来、不能让每个罢工者都能自行宣布为党员一样，因为谁要是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谁就会把党的觉悟水平降低到“每个罢工者”的水平，谁就会把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部队的这种作用取消掉。党的任务不是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每个罢工者”的水平，而是把工人群众、把“每个罢工者”**提高**到党的水平。

列宁写道：“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50◇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①]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

———————————————

①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多愁善感、痴心妄想的性格。这里，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译者注

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5卷第205—206页）①

（二）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有为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员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如果党不是本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不是一个**组织体系**，而是一些自行宣布为党员，但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没有组织起来**、亦即不必服从党的决议的人所构成的简单的总和，那它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志，永远不能实现自己党员行动上的统一，因而就会无法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党只有当它所有的党员都组织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它引向一个目标。

孟什维克提出反驳，说这样一来，许多知识分子，譬如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生等等，就会留在党外，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党的某个组织，这或是因为他们经受不起党的纪律，或是因为他们如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觉得“加入某个地方组织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孟什维克的这种反驳正好打了孟什维克自己，因为党并不需要经受不起党的纪律和害怕加入党的组织的◇51◇党员。工人并不害怕纪律和组织，所以他们一决定来做党员，就乐意加入组织。只有怀着个人主义心理的知识分子才害怕纪律和组织，因此他们确实是会留在党外的。但这正是一种好现象，因为这样一来，党就能避免不稳定分子涌进党内来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即在资产阶级民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7—458页。——译者注

主革命开始高涨的时期，是特别厉害的。

列宁写道,“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末……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6 卷第 203 页)①

又说：

“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同上，第 212 页)②

又说：

“……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学生先生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急于要承认他们是党员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同上，第 307 页)③◇52◇

(三)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党既是本阶级中以先进理论、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为武装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最高组织形式，就完全能够领导、而且也应该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余一切组织。孟什维克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54—455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466 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 484 页。——译者注

结果就会削弱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亦即削弱无产阶级并解除它的武装，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8页)[①]。

(四)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联系的体现**。党若不与非党群众发生联系，不扩大这种联系，不巩固这种联系，那末，无论它是怎样优秀的先进部队，无论它组织得怎样好，也是不能生存和得到发展的。党如果闭关自守而与群众隔绝，丧失或哪怕是削弱同本阶级的联系，那它一定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不可避免要陷于灭亡。党要想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得到发展，就应当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获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的信任。

列宁说：“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08页)[②]

(五)党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就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需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需要有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的统一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的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就不能实现领导本阶级的任务。

当然，由于党在沙皇专制制度条件下处于秘密存在的地位，党◇53◇的组织当时不可能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基础上，因此党不得不具有极秘密的性质。但列宁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立刻就会消失，那时党就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而党的组织就会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原则上，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0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60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91页)①

列宁责备孟什维克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不容许党的权力和党的纪律加在他们头上，列宁写道：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同上，第310页)②

(六)党要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就应当在实践上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即全体党员，无论是领导人或普通党员，都必须同样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内不应有什么不必服从纪律的“上等人”◇54◇和必须服从纪律的“平凡人”之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保持党的完整和党的队伍的统一。

列宁写道：“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根本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这最好是用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一语来说明。这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高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的‘上等人物’。……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总觉得**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都好

———————————————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译者注

象是**农奴制**。”(《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82页)[①]

又说：

“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同上，第 312 页)[②]

列宁总结对于意见分歧的分析、指出孟什维克的立场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时，认为孟什维主义的基本罪过之一就是低估了党组织的意义，不承认党组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武器。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组织**对于革命的胜利没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看法，认为单靠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还不足以获得胜利，——为要获得胜利，还必须用无产阶级“**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思想上的统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55◇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8页)[③]

———————————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48－34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10页。——译者注

列宁就是用这样一段预言来结束他这本书的。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有名的著作中所发挥的基本的组织原理，就是如此。

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反对小组习气而捍卫了党性，反对捣乱派而捍卫了党，粉碎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但这本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列宁在这本书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关于党的学说**，确定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武器**，没有这个武器，就无法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由于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在党的工作者中间的传播，大多数地方组织团结到了列宁的周围。

可是，各地方组织愈是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孟什维克首领们的行为也愈加狠毒。

1904 年夏，孟什维克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帮助和两个变质的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和诺斯科夫的叛变而夺得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当时看得很清楚，孟什维克是力图造成分裂的。布尔什维克失去《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之后，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必须创办◇56◇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报纸。必须筹备新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便建立新的党中央和清算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

于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就来执行这一任务。

布尔什维克积极准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4 年 8 月,在瑞士境内由列宁领导举行了有二十二名布尔什维克出席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党书》，它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

在三个区域(南方区域、高加索区域、北方区域)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上选出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它负责进行了实际

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05年1月4日，布尔什维克主办的《前进报》创刊号出版了。这样，在党内就形成了两个彼此独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

简 短 的 结 论

在1901—1904年时期，在革命工人运动增长的基础上，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在反对“经济派”的原则的、顽强的斗争中，列宁的《火星报》的革命路线获得了胜利，克服了思想上的涣散和“手工业方式”。

《火星报》把零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联成一体，并为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在 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火星派方针的最终胜利进行的斗争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集团，即布尔什维克集团和孟什维克集团。◇57◇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是在组织问题上展开的。

孟什维克同“经济派”接近起来，并在党内代替了他们的地位。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暂时还只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孟什维克反对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革命的党，而主张建立涣散的、无组织的、尾巴主义的党。他们在党内推行分裂路线。他们在普列汉诺夫帮助下夺得了《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并利用这两个中央机关去实现他们的分裂主义的目的。

布尔什维克眼看孟什维克要造成分裂，就采取措施来约束分裂派，动员各个地方组织准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前进报》。

这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在日俄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已表现为两个彼此独立的政治派别。◇58◇

第三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1904—1907 年)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的罢工。1905 年 1 月 9 日工人在冬宫前举行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遭到枪杀。革命的开始

从十九世纪末起，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称霸太平洋和瓜分中国开始加紧进行争夺。沙俄也参加了争夺。1900 年，沙皇军队伙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修筑了中东铁路，并调兵守卫该路。北满被沙俄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的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当时日本已迅速地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侵略亚洲大陆，首先是从中国下手。日本也如沙俄一样力图把朝鲜和满洲据为已有。日本当时已梦想占领库叶岛和远东地区。英国害怕沙俄势力在远东加强，所以暗中支持日本。日俄战争逼近了。寻找新◇59◇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地主阶层，推动沙俄政府去进行这场战争。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先开始了战争。日本在俄国境内设置了周密的间谍网，它知道对方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准备。1904 年 1 月,日本

不宣而战，向俄军要塞旅顺口发动突然袭击，重创了旅顺口的俄国舰队。

日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沙皇政府本来指望这次战争能帮助它稳定政局、阻止革命。但是它失算了。战争更加动摇了沙皇制度。

装备恶劣、训练不良、由一些庸碌无能和贪污腐败的将军所指挥的俄国军队屡战屡败。

资本家、官吏和将军们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盗窃之风盛行一时。军队的供给很坏。正当缺乏炮弹的时候，军队却收到一车厢一车厢的神像，好象是在嘲笑他们一样。士兵们痛心地说：“日本人用炮弹打我们，我们却用神像打他们。”专车不去运输伤员，却去运输沙皇将军抢来的财物。

日军包围了旅顺口要塞，接着就把它占领了。沙皇军队遭到多次失败之后，在沈阳城下被击溃。沙皇三十万大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和被俘的人数达十二万。接着，沙皇从波罗的海派往旅顺口解围的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彻底击溃而覆没。对马之败是一次灭顶之灾：沙皇派去的二十艘军舰中，十三艘被击沉击毁，四艘被俘。战争结果是沙俄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可耻的和约。日本占领了朝鲜，从俄国手中夺得了旅顺口和半个库页岛。

人民群众不要这场战争，并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俄国的害处。由于沙俄落后，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这场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60◇

孟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即主张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此相反，认为沙皇政府在这场掠夺战争中失败有好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加强革命力量。

沙皇军队的失败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了沙皇制度的腐朽。人民群众对沙皇制度的憎恨与日俱增了。列宁写道，“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

沙皇想用战争扼杀革命，但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

沙俄的资本主义压迫，因有沙皇制度的压迫而强化。工人不仅感到资本主义剥削和苦役劳动的痛苦，而且感到全体人民没有权利的痛苦。因此，觉悟的工人力求领导城乡一切民主分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农民因没有土地，因受许多农奴制残余的束缚而喘不过气来，他们遭受着地主和富农的盘剥。沙俄境内各族人民受到本民族地主资本家和俄罗斯地主资本家的双重压迫。1900—1903 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加重了劳动群众的苦难，而战争又使苦难更加深重。战争的失败加深了群众对沙皇制度的憎恨。人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由此可见，引起革命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

1904 年 12 月，在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组织得很好的巴库工人大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胜利，工人和石油业主订立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库罢工成了南高加索和俄国许多地区革命高涨的开端。

“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斯大林)

这次罢工好象是预示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雷前闪电。

1905 年 1 月 9 日(22 日)的彼得堡事件，就是革命风暴的开始。

◇61◇

1905 年 1 月 3 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现为基洛夫工厂)开始举行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厂里解雇了四名工人。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迅速扩大,彼得堡其他工厂也相继加入。这次罢工变成总罢工了。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沙皇政府决定一开始就把运动镇压下去。

早在 1904 年,即普梯洛夫工厂罢工以前，警察局已通过奸细加邦

神父在工人中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这个组织在彼得堡各区都设有自己的分会。当罢工开始时，加邦神父在他这个组织的会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计划：让全体工人在1月9日集合起来，举着教堂旗幡和沙皇画像，和平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他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加邦是为沙皇的保安局效劳：挑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这个警察计划却反过来对着沙皇政府了。

请愿书在工人的集会上讨论过，并作了一些修改。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些集会上讲了话，不过他们没有明说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的影响，在请愿书上加进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工人结社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停止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要求。

布尔什维克在这些会上发言时向工人指明，自由不是用向沙皇请愿的方法获得的，而是靠拿起武器去争取。布尔什维克警告工人会遭到枪击。但他们阻止不住往冬宫请愿的游行。很大一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们。强有力的运动席卷了群众。

彼得堡工人在请愿书上写道：“我们，彼得堡市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当牛做马，遭受着欺凌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62◇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困苦、无权和愚昧的深渊，暴政专横压制着我们……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的可怕时刻……”

1905年1月9日清晨，工人们前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宫。工人们带着全家——妻子、孩子和老人——去见沙皇，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歌。上街的队伍总共有十四万多人。

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他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

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打死，有两千多工人被打伤。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布尔什维克是和工人们同去了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当时就在染遍工人鲜血的街头向工人解释，谁是这一残酷暴行的祸首，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1月9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工人在1月9日得到了血的教训。工人对沙皇的信念在这天被枪毙了。他们懂得了，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1月9日傍晚，各工人区开始构筑街垒。工人们说：“沙皇揍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揍他！”

沙皇制造血腥暴行的可怕消息传遍了全国。全体工人阶级、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议沙皇的暴行，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现在已是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街了。在1月间．罢工人数达到很大的数字……四十四万。一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工人运动上升到了极大的高度。

革命在俄国开始了。◇63◇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

1月9日以后，工人的革命斗争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工人群众开始由经济罢工和支持性罢工转到政治罢工，转到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转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巴库这些集中了大量工人的大城市里，罢工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有组织。五金工人走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前列。先进工人队伍用自己的罢工振奋了觉悟较低的阶层，发动了整个工人阶级去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迅速增长了。

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在华沙，示威群众受到枪击而死伤者达数百人。华沙工人响应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以示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在5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全俄各地参加五月罢工的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巴库、洛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都卷入了总罢工。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同沙皇军队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多。敖德萨、华沙、里加、洛兹和其他许多城市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在波兰的大工业中心洛兹市，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洛兹工人在市区的街道上构筑了几十座街垒。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三天巷战（1905年6月22－24日）。在这里，武装发动与总罢工汇合起来了。列宁认为这些战斗是俄国工人的第一次武装发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的罢工是夏季罢工中特别出色的一次。这次罢工从1905年5月底开始一直坚持到8月初，几乎持续了两个半月。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七万，其中许多是妇女。◇64◇

这次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的。在城外的塔尔卡河畔，

差不多每天都有几千工人举行集会。工人在这些大会上讨论了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会上常有布尔什维克出来发言。为了镇压罢工，沙皇当局命令军队驱散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几十个工人被打死，数百个工人受伤。城内宣布了戒严。但工人还是继续坚持，拒绝复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忍饥挨饿，但不屈服。只是到了极端疲惫的时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罢工锻炼了工人。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勇敢、坚定、沉着和团结的榜样。在这次罢工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受到了真正的政治教育。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在这次罢工期间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工人的政治罢工震撼了全国。农村也跟着城市发动起来了。从春天起就开始了农民的骚动。一群一群的农民起来造地主的反，捣毁地主的田庄、糖厂和酒厂，焚烧地主的楼房和庄院。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地主的林木，要求把地主土地转交给人民。农民把地主的粮食和其他食品夺来分给饥民。地主们惊惶万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调遣士兵和哥萨克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队开枪射击农民，逮捕“祸首”，拷打和折磨他们。但农民并不停止斗争。

在俄国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高加索(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农民运动不断扩大。

社会民主党人深入农村。党中央发出了告农民书：《农民们，请听我们说》。特维尔、萨拉托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果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和其他许多省份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发表了告农民书。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村中开大会，成立农民小组，建立农民委员会。1905 年夏天，许多地方发生了社会民主党人组织◇65◇的农业工人罢工。

但这还只是农民斗争的开始。农民运动只扩展到八十五个县，即约近沙俄欧洲部分总县数的七分之一。

工人和农民的运动以及俄国军队在日俄战争中的多次失败，对军队发生了影响。沙皇制度的这个支柱动摇了。

1905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爆发了起义。该舰当时停泊在离正在举行工人总罢工的敖德萨不远的地方。起义的水兵惩治了他们切齿痛恨的军官，把装甲舰开到了敖德萨。“波将金”号装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列宁对这次起义极为重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这一运动，使其能与工农群众和地方驻军的运动汇合起来。

沙皇派了一批军舰来镇压“波将金”号，但这些军舰上的水兵拒绝对自己的起义同伴射击。革命的红旗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上飘扬了好几天。但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还不像后来在1917年那样是领导运动的唯一政党。当时在“波将金”号上有许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虽然有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起义，但起义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和有充分经验的领导。一部分水兵在决定关头动摇了。黑海舰队中的其他军舰没有来响应这艘起义的装甲舰。革命的装甲舰因为缺乏煤炭和粮食，不得不开到罗马尼亚岸边，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

“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起义最后失败了。后来落到沙皇政府手里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审判，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服苦役。但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陆海军中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发动，是沙皇军队的很大一支部队第一次转到革命方面来。这次起义使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士兵群众和水兵群众自己更加认识、更加了解了陆海军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与人民联合的思想。◇66◇

工人向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转变，农民运动的加强，人民与军警的武装冲突，以及黑海舰队中的起义，——这一切说明人民武装起义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形使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认真行动

起来。它害怕革命，同时又用革命恐吓沙皇。它是想勾结沙皇反对革命，要沙皇“为人民”实行小小的改良以便“稳定”人心，分裂革命力量，借以防止“革命惨象”。自由派地主们说：“必须割点土地给农民，不然他们就会割死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准备同沙皇分掌政权。列宁在当时谈到工人阶级的策略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时写道：“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

沙皇政府继续用残暴手段镇压工农，但它不能不明白，单用高压手段是对付不了革命的。因此，除高压手段外，它还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政策。一方面，它通过自己的奸细唆使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摧残，制造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挑拨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另方面，它又答应召集缙绅会议[①]或国家杜马[②]之类的“代议机构”，并委托大臣布里根拟定一种不让杜马拥有立法权的杜马法案。所有这些办法的采用，都是为了分裂革命力量，使人民中间的温和阶层脱离革命。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布里根杜马，决心拆穿这套嘲弄人民代表机关的把戏。

反之，孟什维克决定不拆杜马的台，而且认为必须去参加。◇67◇

————————————

① 缙绅会议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俄国的中央等级代表机关。——译者注

② 国家杜马是沙皇俄国于1906-1917年按反民主选举法产生的代议机关。——译者注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革命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发动起来了。革命引起的国内政治生活中的转变推动它们离开了旧日的习惯了的地位，迫使它们变更自己的部署来适应新的环境。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在努力制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动路线，自己对其他阶级的态度，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定出一种在它看来很不寻常的新策略，即答应召集布里根杜马这种所谓的“代议机构”。

社会民主党也必须定出自己的策略。其所以必须这样作，是因为革命在不断高涨，是因为无产阶级面前摆着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组织武装起义问题，推翻沙皇政府问题，建立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问题，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等等。社会民主党必须定出一个统一而周密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但是由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和分裂行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分裂成为两个派别。虽然当时的分裂还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分裂，虽然这两个派别形式上还不是两个不同的党，但事实上它们却很像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报纸。

孟什维克除了他们和党内的多数在组织上的旧分歧之外，还加上了策略问题上的新分歧，这就使分裂更加深了。

由于没有统一的党，也就没有统一的党的策略。

如果立刻召开党的第三次例行的代表大会，由它来制定统一◇68◇的策略，并责成少数忠实地执行大会决议，服从大会多数的决

议，那也许是摆脱当时状况的出路。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孟什维克建议的正是这样的出路。但孟什维克根本就不愿听人提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认为使党继续缺乏党所批准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策略是一种罪恶，决定自己担负起发起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责任。

所有的党组织，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的或孟什维克的，都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决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把自己的代表大会叫做代表会议，因为他们的代表人数很少；但实际上这是个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的决议是全体孟什维克必须执行的。

1905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二十四名代表，代表着二十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所有大的党组织，都派有代表参加。

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是“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然后就转到下一个议题，即制定党的策略的问题。

与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

“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①]——这就是列宁对当时情况的评论。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实际上都同样是策略问题，但双方就这些问题却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各自通过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许多决议表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之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极深的分歧。

以下就是这些分歧的要点。◇69◇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路线。大会认为，虽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虽然它在目前不能越出资本主义所容许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580 页。——译者注

的范围，但愿意这个革命完全胜利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革命的胜利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得到提高，获得政治上领导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本领，并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农民才会支持无产阶级这种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策略，因为没有革命的完全胜利，农民就不能推翻地主而获得地主的土地。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自由资产阶级不愿意这个革命完全胜利，因为它需要沙皇政权这个皮鞭来对付它最害怕的工人和农民，所以它会努力保存沙皇政权，只是把沙皇政权的权力稍微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资产阶级将力图在君主立宪制度基础上用同沙皇妥协的办法来结束革命。

只有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只有身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保证同农民的联盟，只有使自由资产阶级陷于孤立，只有由社会民主党来积极参加组织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义，只有因起义胜利而成立能够根除反革命势力并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临时革命政府，只有社会民主党不拒绝在顺利条件下参加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在这一切条件下，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策略路线。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所以只有自由资产阶级才能做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而应与自由资产阶级接近。这里主要的是不要用自己的革命性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不要给由资产阶级以退出革命的借口，因为自由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就会削弱下去。

也许起义会获得胜利，但社会民主党在起义胜利后却应当靠◇70◇边，以免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也许起义的结果会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但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去参加，因为这个政府不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而主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并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会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从而破坏革命。

从革命的前途着想，最好是召集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之类的代议机构，工人阶级可以从外面对它施加压力，以便把它变成立宪会议，或推动它去召开立宪会议。

无产阶级有它特殊的、纯粹工人的利益，它应该管的正是这种利益，而不应妄想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为这个革命是一般政治的革命，所以它关系到一切阶级而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

简单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的两种策略，就是如此。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对孟什维克的策略提出了经典性的批评，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作了英明的论证。

这本书出版于1905年 7 月，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会两个月之后。照书名来看，也许会觉得列宁在这本书中只讲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并且只讲到俄国孟什维克。实际上，他批评孟什维克的策略，也就是揭露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在论证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策略并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时，同时也就规定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基础。

以下就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一)始终贯彻于列宁这本书中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71◇

列宁承认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正如他说的那样，这个革命“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①]。但他认为这个革命不是上层的革命，而是能把全体人民、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发动起来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8 页。——译者注

的人民革命。因此列宁认为，孟什维克企图缩小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降低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作用，使无产阶级避开这个革命，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8页)①

列宁又说："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同上，第104页)②

列宁预料到革命可能有两种结局：

(1) 或者结局是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是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民主共和国；

(2) 或者是力量不够，结局就会是沙皇同资产阶级靠牺牲人民利益做成交易，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甚至多半是一种嘲弄宪法的把戏。

无产阶级愿意达到最好的结局，即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但这种结局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领导者时才能实现。

列宁写道："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72◇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32页)③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能**避免替资产阶级当助手的命运，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根据列宁的看法,这种可能有如下述：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01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13页。——译者注

第一，“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同上，第75页)[①]。

第二，无产阶级有其不依赖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使它能够团结成为“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同上)[②]。

第三，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革命彻底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同上，57页)[③]。

列宁写道；“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枝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73◇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3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同上，第541页。——译者注

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7—58页）[①]。

列宁接着说：“因此，无产阶级也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资产阶级会退出的愚蠢意见。”（同上，第94页）[②]。

为要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要无产阶级有一个愿意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这是进行领导这个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领袖没有被率领者，就不成其为领袖。列宁认为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

第二，就是要把同无产所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竭力想由自己充当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的那个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这也是进行领导的这个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这种思想根本不容◇74◇有两个革命领导者存在。列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列宁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65页）[③]。

又说：

“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1—54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8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51－552页。——译者注

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的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同上，第94页)[①]。

列宁分析了孟什维克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布尔什维克这样一种策略“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种意见，并给这种意见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叛卖革命的策略”，是“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②]。列宁当时写道：◇75◇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最，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的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95－96页)[③]。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9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同上，第590－591页。——译者注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这一基本策略原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领导作用)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如此。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问题的新方针，它与马克思主义武库中过去存在过的策略方针根本不同。从前，例如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不管有意无意，总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认为这样的情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说，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尽可能坚持自己最近的阶级要求，并应当有它自己的政党。现在，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按照列宁的方针，情形已经改变成这样，就是无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被排除于革命领导之外，而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

有人说普列汉诺夫“也曾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一种误会。普列汉诺夫向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献过媚眼，而且不嫌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这是事实,但在实际上他是反对这个思想的实◇76◇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这一政策的条件下，在**孤立**自由资产阶级这一政策的条件，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实际上，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方针是孟什维克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

(二)列宁认为胜利的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得民主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宁同孟什维克相反，他认为“一般民主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一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并认为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

直接领导起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75页)[①]。

为要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并使起义本身成为全民的起义，列宁认为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口号，必须向群众发出这样一种号召，实现这种口号和号召能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组织他们去举行起义而瓦解沙皇制度的政权机构。列宁认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的口号，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就是为维护这些决议而写的。

他认为这样的口号就是：

(1) 采用“群众政治罢工……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同上，第75页)[②]；

(2) 组织“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同上，第47页)[③]；◇77◇

(3) “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以便用革命的方法“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88页)[④]；

(4) 武装工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在城市中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在农村中实现民主改革的策略，就是说做到既不顾政府，也不顾法律，而是藐视政府和法制，打破现行法律，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自动建立新秩序。这是一种新的策略手段，采用这种手段就能使沙皇制度的政权机构瘫痪，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也就成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63—56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29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581页。——译者注

长起来了城市中的革命罢工委员会和农村中的革命农民委员会。后来前者发展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后者发展成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第二，就是采用**群众性政治罢工**，采用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后来在革命进程中对群众起了极大的革命动员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手中一种新的很重要的武器，是从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未曾有过而后来得到了大家公认的武器。

列宁认为人民起义胜利的结果，应是沙皇政府被临时革命政府所取代。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成果，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列宁认为不实现这些任务就无法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但要实现这些任务和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政府，而应该是获得了胜利的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专政的政府，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列宁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①]这一◇78◇著名原理得出结论说，临时革命政府要想保证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就不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列宁写道，“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页。——译者注

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就先后次序而言的最后，不是就重要性而占的最后——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62—63页）[①]。◇79◇

至于社会民主党应怎样对待临时革命政府以及社会民主党可否参加这个政府，那末列宁完全坚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说：

“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37页）[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7—54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17—518页。——译者注

孟什维克反驳说，临时政府毕竟是资产阶级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重犯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就不能去参加这样的政府。列宁批驳这种意见时指出，孟什维克在这里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情，暴露出他们没有能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问题：当时在法国，说的是社会党人在国内**缺乏**革命形势的时候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社会党人不应该参加这样的政府；而现在在俄国，说的是社会党人在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参加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去参加并且在顺利条件下**应该**去参加这样的政府，以便不仅“从下面”、从外面，而且“从上面”、从政府内部去打击反革命。

（三）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80◇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列宁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要求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并不是为了在革命战胜沙皇制度以后就把革命**结束**，而是为了尽量**延长**革命状态，彻底消灭反革命残余，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并在这个时候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得到启发，组织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然后就开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讲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规模、讲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应使这个革命具有什么样的规模时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

(指孟什维克。——编者注)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96页)①

还说：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种策略◇81◇手段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过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105页)②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出版两个月后，又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解释道：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同上，第186页)③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问题上一个新的指导思想，这是认为到资产阶级革命终结时就要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确定这个新思想的时候，列宁所依据的是：第一，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著名原理；第二，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91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602 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 643 页。——译者注

“德国的全部同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①]但马克思的这些英明思想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发挥，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又用各种办法把它们埋藏起来，不再提起。于是一个任务落到了列宁肩上，就是要让马克思的这些被遗忘的原理重见天日，把它们完全恢复过来。但列宁恢复马克思的这些原理时，并没有局限于——并且也不能局限于——把它们简单地重复一遍，而是加以◇82◇发展，加工成一个严整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其中加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新的成分，即无产阶级与城乡半无产者分子**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一原理。

这个思想粉碎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策略立场，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漫长的**间歇**时期，一个长达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久的“平静”时期，那时无产阶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将“合法地”牟取暴刺，直到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

这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者，有居民中的半无产者即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为**同盟者**。

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同其他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

这个理论推翻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流行理论，这种流行理论否认城乡半无产者群众的革命潜力，认为“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没有其他可为我国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靠的社会力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译者注

量”（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典型）[①]。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将**单独**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将在**没有**同盟者的情况下去反对**一切**◇83◇非无产者阶级和阶层。他们不愿意估计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仅剥削着无产阶级，而且剥削着千百万城乡半无产者阶层；这些阶层备受资本主义压迫，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且有等到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的经济继续发展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条件才算成熟。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彻底推翻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反无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当时在列宁这个理论中还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直接结论。但这个理论已包含有一切或几乎一切早晚作出这种结论所必需的主要成分。

大家知道，列宁在 1915 年，即过了十年，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以上就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列宁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从思想上粉碎了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了俄国工人阶级去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进行新的冲击；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

但列宁这部著作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就在于它用新的革命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奠定

———————————————

① 见《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第 3 卷第 119 页。——译者注

了基础，而我国无产阶级在 1917 年正是依靠这一策略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84◇

四　革命的进一步高涨。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

1905年秋，革命运动已遍及全国各地。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

9月19日,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的罢工。罢工浪潮扩展到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市，印刷工人罢工得到了其他产业部门工人的支援而变成了政治总罢工。

10月初，莫斯科－喀山铁路线开始罢工。过了一天,整个莫斯科铁路枢纽站都罢工了。罢工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所有的铁路线。邮政局和电报局停止了工作。全俄各城市工人纷纷举行有成千成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决定停止工作。一个个工厂，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地区，都相继卷入罢工。小职员、学生、知识分子（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也加入了罢工工人的洪流。

十月政治罢工发展成了全俄罢工，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地区，直至最边远的地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工人,直至最落后阶层的工人。参加这次政治总罢工的，仅仅产业工人就约有一百万，人数相当多的铁路工人和邮电职员等等还未计算在内。国内全部生活陷于停顿。政府已经瘫痪了。

工人阶级领导了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口号产生了应有的结果。

十月总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迫使吓得要死的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答应为人民施

行“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85◇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吸收各阶级的居民来参加选举。

这样，布里根的谘议性杜马被革命力量扫除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 10 月 17 日宣言终究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是沙皇的诡计，是沙皇为了麻痹轻信者、赢得时间、聚集力量、然后打击革命所需要的一种喘息时机。沙皇政府口头上答应给予自由，实际上一点切实的东西也没有给。除了许诺之外，工人农民还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东西。10 月 21 日实行了很小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而不是群众期待的政治大赦。同时，政府为了拆散人民力量，组织过许多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使成千累万的人牺牲了生命；而为了摧残革命势力，还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团体：“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同盟”。在这两个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一些反动的地主、商人、神父和半刑事犯的流氓，所以人民称之为“黑帮”。黑帮分子在警察协助下，公开殴打和杀害先进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焚烧和射击群众大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沙皇宣言产生的结果看来就是如此。

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评论沙皇宣言的歌谣：

“沙皇心发颤，颁布一宣言；

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10 月 17 日宣言是一个骗局。他们斥责政府在颁布宣言后的所作所为是挑衅。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拿起武器，准备武装起义。

工人更加努力地成立战斗队了。他们已经明白，政治总罢工争得的 10 月 17 日的第一个胜利，要求他们继续努力、继续斗争，去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在评价 10 月 17 日宣言时，说它是力量对比暂时处于某种◇86◇均势的瞬间，就是说，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迫使沙皇发表了宣言，但还无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已不能**单用旧的手段维持统治，所以不得不在口头上**许诺**“公民自由”和“立法”杜马。

在十月政治罢工那些疾风暴雨的日子里,在同沙皇斗争的烈火中，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创造了新的强大的武器——工人代表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各工厂代表组成的会议，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组织。1905 年初次产生的苏维埃，是 1917 年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苏维埃是表现人民创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纯粹是各革命阶层居民打破沙皇政府的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而创立起来的。它是人民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主动性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看作革命政权的萌芽。他们认为苏维埃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功。

孟什维克不认为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也不认为它是起义机关。他们把苏维埃看作地方自治机关，如民主产生的城市自治机关之类。

1905 年 10 月 13 日（26 日），彼得堡所有的工厂进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当天夜间就举行了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继彼得堡之后，莫斯科也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革命中心的苏维埃，是沙皇帝国首都的苏维埃，本应该在 1905 年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孟什维克的拙劣的领导，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大家知道，当时列宁还不在彼得堡，还在国外。孟什维克趁列宁不在，钻进了彼得堡苏维埃，并夺得了领导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赫卢斯塔列夫、托洛茨基、帕尔乌斯等孟什维克分子能扭转彼得堡苏维埃的方向去反对起义的政策，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不是◇87◇设法使士兵同苏

维埃接近并使两者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反而要求把士兵撤出彼得堡。苏维埃不是把工人武装起来，使他们作好起义准备，而是裹足不前，反对准备起义。

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中完全起着不同的作用。莫斯科苏维埃从成立时起就执行了彻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成了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1905年10—12月期间，许多大城市和几乎所有的工人中心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还作了组织陆海军士兵代表苏维埃并把它们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统一起来的尝试。有些地方还成立过工农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它们往往是自发产生，没有定型，成分上不固定，但它们的行动却象一个政权机关。苏维埃用夺取手段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号召人民拒绝向沙皇政府纳税。在个别场合，它们还没收沙皇政府的资金来满足革命的需要。

五　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革命的退却。第一届国家杜马。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1905 年 10 月和 11 月，群众革命斗争继续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

1905 年秋，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规模很大。农民运动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萨拉托夫、唐波夫、切尔尼果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和其他一些省份发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但农民◇88◇群众冲击的力量还是不足。农民运动还缺乏组织和领导。

在许多城市，如梯弗里斯、海参崴、塔什干、撒马尔汗、库尔斯克、苏胡姆、华沙、基辅、里加等，士兵中的骚动也更厉害了。在喀琅施塔得，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水兵中，都爆发了起义（1905 年 11 月）。但这些起义由于彼此分散，都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一些部队和军舰的起义，往往是由军官的虐待和伙食的恶劣（如所谓“豌豆暴动”）等造成的。许多起义的水兵和士兵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必须推翻沙皇政府，必须坚决把武装斗争继续下去。起义的水兵和士兵太和气、太慈善，他们常常错误地把起义开始时逮捕的军官放掉，听了长官的诺言和劝告就平息下来。

革命已经发展到马上要举行武装起义了。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和地主，向群众说明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布尔什维克不停地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和水兵中进行了革命工作，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军事组织。在许多城市中组织了工人战斗队，在战斗队员中进行了武器使用的训练。组织了在国外购置枪械并把它们秘密

运回俄国的工作。参加组织枪械运输工作的有党内著名的工作人员。

1905 年 11 月，列宁回到了俄国。在这些日子里，列宁避开沙皇的宪兵和特务，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对党的日常工作的指示。

在这期间，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进行了大量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露并狠批了孟什维克，指出他们是反对革命、反对武装起义。他坚决地准备工人去迎接同专制制度的决战。在沙皇宣言发表那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群众大会上向工人说道：

“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了这点，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也还是武装。”◇89◇

1905 年 12 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还同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单独的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了。在此以前，他们互相用书信或通过其他同志来保持联系。

从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必须指出的有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恢复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党的党的统一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抵制第一届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的问题。

由于此时莫斯科已经开始武装起义，代表会议按照列宁的意见赶忙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而代表们也就回到各地亲自参加起义去了。

但沙皇政府也没有睡觉。它也在作决战的准备。沙皇政府同日本媾和减轻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就转而对工人和农民实行进攻。沙皇政府在农民起义的许多省份宣布戒严，颁布了“就地正法”、“格杀勿论”的残暴命令，并下令逮捕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驱散工人代表苏维埃。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和受他们领导并与广大工人群众紧相联系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立刻准备武装起义。12

月 5 日（18 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苏维埃提议宣布政治总罢工，并在斗争进程中把它转变为起义。这个决议在许多工人群众大会上得到了拥护。莫斯科苏维埃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意志，一致决定开始政治总罢工。

莫斯科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已有自己的战斗组织，约有一千个战斗队员，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莫斯科许多工厂也有战斗队。起义者方面总共约有两千战斗队员。工人指望卫戍部队保持中立，指望把一部分卫戍部队分化和争取过来。

12 月 7 日（20 日），莫斯科开始了政治罢工。但这次罢工没能◇90◇扩展到全国，它在彼得堡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减少了起义胜利的机会。尼古拉铁路（现为十月铁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条线路上的运行没有中断，所以政府能够把近卫团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来镇压起义。

在莫斯科本市，卫戍部队已经动摇了。工人开始起义时多少还指望得到它们的支援。但革命者错过了时机，结果沙皇政府把卫戍部队的骚动镇压下去了。

12 月 9 日（22 日），莫斯科出现了第一批街垒。接着莫斯科许多街道都筑满了街垒。沙皇政府出动了火炮。它调来了超过起义者数倍的兵力。几千武装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沙皇政府只是从彼得堡、特维尔和西部边区调来了几个团，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各地的起义领导机关在战斗开始前夜不是已被破获，便是已被隔绝。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被破获了。武装发动变成了彼此没有联系的各个区的起义。各区失去了领导它们的中心，又没有全市共同的斗争计划，所以主要是局限于防御。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这是莫斯科起义力量薄弱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

起义在莫斯科的红色勃列斯尼亚区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激烈。红色勃列斯尼亚区是起义的主要堡垒和中心。这里集中了布尔什维克所领

导的精锐的战斗队。但是红色勃列斯尼亚区遭到了火与剑的镇压，淹没在血泊和炮击后的烈火之中了。莫斯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不仅在莫斯科发生过。革命的起义还席卷了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莫托维里哈（现为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莫沃、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过武装起义。

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也奋起进行了武装斗争。格鲁吉亚起◇91◇义几乎席卷全境。在乌克兰的顿巴斯一带，即在戈尔洛夫卡、亚力山大罗夫斯克、鲁干斯克（现为伏罗希洛夫格勒），起义的规模很大。在拉脱维亚，斗争进行得很顽强。在芬兰,工人成立了赤卫队，并举行了起义。

但所有这些起义，也如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用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镇压下去了。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十二月武装起义作了不同的评价。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武装起义以后对党提出责备，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孟什维克硬说起义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事情，说在革命中不用起义也可以，说不用武装起义而用和平斗争手段就可以取得胜利。

布尔什维克斥责这种评价是叛卖性的评价。他们认为莫斯科武装起义的经验恰巧证明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种责备时说道：

“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50页）①

1905年十二月起义是革命的最高点。在12 月，沙皇专制政府打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666页。——译者注

败了起义。从十二月起义失败时起，便开始了革命逐渐退却的转变。革命由高涨转为逐渐低落。

沙皇政府急忙利用这次失败来彻底粉碎革命。沙皇的刽子手和狱吏展开了他们血腥的工作。讨伐队在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横行无忌。◇92◇

但是革命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工人和革命农民是缓缓退却的，是且战且退的。更多的工人阶层加入了斗争。1906 年有一百多万工人参加罢工。1907 年参加罢工的有七十四万。农民运动在 1906 年上半年席卷了沙俄一半左右的县份，下半年运动所及的县份仍占总县份数的五分之一。陆海军中的骚动仍在继续。

沙皇政府在同革命的斗争中并不是只采用高压手段。它用高压手段获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就决定用另一种手段来给革命以新的打击，即召开新的所谓“立法”的杜马。它打算用召开这种杜马的办法来引诱农民离开革命，从而断送革命。1905 年 12 月，沙皇政府颁布了法令，要召开新的所谓“立法”的杜马，以表示与布尔什维克用抵制手段扫除了的那个旧的“谘议性”的布里根杜马有所不同。沙皇的选举法当然是反民主的。选举不是普遍的。半数以上的居民，例如妇女和二百多万工人，被根本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选民被分成四个选民团，即当时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选举实际上不是无记名的。选举法保证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在杜马中比之千百万工农占有极大的优势。

沙皇想利用杜马来引诱群众脱离革命。当时很大一部分农民还相信经过杜马可以获得土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欺骗工农，说什么不经过起义、不经过革命就可以得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为了同这种对人民的欺骗作斗争，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宣布并实行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

工人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时，再次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把无产阶级政党统一起来。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关于统一问题的著名决议，支持工人的这一要求，并向孟什维克提◇93◇议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实行统一。

列宁是主张统一的，但他所主张的是不会是革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的统一。调和派（波格丹诺夫、克拉辛等人）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并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他们给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列宁竭力反对调和派，要求布尔什维克带着自己的纲领去参加代表大会，好让工人们明白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以及统一是在什么基础上实行的。布尔什维克制定了这样的纲领．并把它交给党员们讨论。

1906 年 4 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召开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百一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此外，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三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因为在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破坏，没有能都派代表出席。除此之外，孟什维克在 1905 年的“自由日子”里接纳了大批同革命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足以说明，就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当时梯弗里斯的产业工人很少）所选派的大会代表竟与无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彼得堡组织所选派的代表人数相等。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了多散，虽然是不大的多数。

大会成分既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主义的性质。

这次大会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仍然是各自保持原有的观点，各有自己独立的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对目前◇94◇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

虽然孟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占了多数，但他们为了不使工人疏远自己，仍不得不接受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党章第一条即党员资格这一条的条文。

在土地问题上，列宁维护土地**国有**的主张。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只有在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在这种场合下实行土地国有，能使无产阶级容易联合农村贫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要求无偿地夺取（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而转交给农民。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在号召农民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的革命。

孟什维克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们坚持土地**地方公有**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地主土地不是交给农民公社支配，甚至也不是交给它们使用，而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局）支配。农民必须按各人的力量租佃这种土地。

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是一个妥协主义的因而是对革命有害的纲领。它不能动员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它不是要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孟什维克的纲领是要革命半途而废。孟什维克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孟什维克的纲领。

在讨论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国家杜马这两项决议案时，孟什维克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反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本性。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斯大林同志回答孟什维克时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

——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①]

◇95◇

至于讲到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案中竭力替它吹嘘，说它是解决革命问题，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的最好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则相反，认为杜马是沙皇制度的一种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是掩盖沙皇制度腐朽机体的一块屏风，一旦沙皇制度感到它碍事时，立刻就会把它抛弃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三名布尔什维克和六名孟什维克。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是孟什维克。

很清楚，党内斗争将继续下击。

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在那些形式上统一的地方组织里，往往由两个报告人来介绍代表大会的情况，一个代表布尔什维克，一个代表孟什维克。对两条路线讨论的结果，各地方组织中的大多数党员，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实际生活愈来愈证明布尔什维克正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孟什维克的中央，愈来愈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出自己完全没有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能力。1906 年夏秋两季，群众革命斗争重新加强起来。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阿波尔格，水兵举行了起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加剧了。而孟什维克的中央提出的却是机会主义的口号，群众并没有跟这些口号走。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220 页。——译者注

六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沙皇政府觉得第一届国家杜马不够驯服，就在1906年夏天把它解散了。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讨◇96◇伐队的迫害活动，并宣布要在最短时期内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沙皇政府公然骄横起来。它看见革命在走向低落，已经不害怕革命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决定参加还是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问题。当讲到抵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通常是指积极的抵制，而不是指简单地和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布尔什维克认为，积极的抵制是提醒人民防止沙皇把他们由革命道路引上沙皇“宪制”道路的一种革命手段，是打破沙皇这种阴谋并组织人民去重新进攻沙皇制度的一种手段。

对布里根杜马实行抵制的经验，证明抵制“是由事变完全证实了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27页）[①]。这次抵制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提醒人民防范了沙皇宪制道路的危险，而且在杜马还没有产生以前就把它搞垮了。这次抵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向上高涨**的时候实行的，并且是依靠着这种高涨实行的，而不是在革命低落的时候实行的，因为搞垮杜马只有在革命**高涨**条件下才能做到。

抵制维特杜马，即抵制第一届杜马，是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沙皇已经获得胜利的时候，即在可以认为革命是在走向低落的时候实行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4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指沙皇的胜利。——编者注）是决定性的胜利。1906 年夏天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是 1905 年十二月起义的继续。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是争取集中和联合这些起义的口号。”（《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2 卷第 20 页）①

对维特杜马的抵制虽然也大大破坏了这届杜马的威信，并削◇97◇弱了一部分人民对杜马的信任，却未能把杜马搞垮。其之所以未能把它搞垮，是因为这次抵制，如现在清楚地看到的，是在革命低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实行的。因此，1906 年对第一届杜马进行的抵制没有成功。对于这一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写道：

“1905 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1906 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关于个别人所说的话，作相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的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并且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5 卷第 182－183 页）②

讲到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时候，列宁认为由于形势改变和革命低落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0 卷第 26 页）③。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15 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92 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123 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在杜马内部是有可能实行的。”（同上，第29页）①

由此可见，不仅要善于在革命高涨时坚决进攻，在最前列进攻，而且要善于在已经没有高涨形势时正确地退却，在最后面退◇98◇却，要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形势来改变策略，不要乱糟糟地退却，而要有组织地、镇静地、毫不慌张地退却，以求利用最小一点可能来使干部免遭敌人的打击，重新组织队伍，积蓄力量，为重新向敌人进攻作好准备。

布尔什维克决定参加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了。

但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并不是要像孟什维克那样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进行同杜马分不开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杜马讲坛来宣传革命。

反之，孟什维克的中央却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在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看作能够约束沙皇政府的立法机关。

大多数党组织都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所采取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

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内）共有十五万党员。这次大会共有三百三十六名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有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有九十七名。其余的人代表着各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即波兰、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崩得，这些组织是由上次代表大会接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托洛茨基企图在会上结成自己的单独的中派小集团，即半孟什维克的小集团，可是谁也没有跟他走。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7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拥护，在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多数。

会上引起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已进行过斗争。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黑帮、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作出了布尔什◇99◇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对这些政党所应采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并通过决议要同“俄罗斯人民同盟”、保皇派、贵族联合会等黑帮政党，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工商党和“和平革新”党作无情的斗争。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明显的反革命政党。

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主张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揭露性的斗争。大会要求揭露立宪民主党虚伪骗人的“民主主义”立场，要求对自由资产阶级妄想领导农民运动的企图进行斗争。

对于所谓民粹派的或劳动派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大会主张揭露他们冒充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同时，大会认为可以同这些政党达成个别的协议，以便共同进行和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这些政党当时还是民主派政党，还代表着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就已提出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的计划是要召开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代表大会，由这个“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既像是“非党的党”，又像是“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无纲领的工人党。列宁揭穿了孟什维克这种极有害的企图，指出他们是想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融化到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大会严厉地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工人代表大会”口号。

在大会工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工会问题。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即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大会否决了孟什维克的提案,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会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党应力求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工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100◇胜利。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沾沾自喜,安于既得的胜利。这不是列宁对他们的教诲。布尔什维克知道,同孟什维克的斗争还在前头。

斯大林同志在1907年发表的《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作了如下的评价:

“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全俄国的先进工人事实上联合成一个全俄国的统一的党,——这就是伦敦代表大会的意义,这就是它的一般性质。”

斯大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举出了说明代表大会**成分**的具体材料。原来,布尔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是从大工业地区(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选出的,而孟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则是从手工业工人和半无产者占优势的小生产地区,以及几个纯粹的农民地区选出的。

斯大林同志对代表大会的情况作出总结说:“很明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数字就是这样说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1935年俄文版第XI页和第XII页)①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0页和第52页。——译者注

沙皇解散第一届杜马后，本想得到一个更为驯服的第二届杜马。但第二届杜马使沙皇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沙皇决定把这届杜马也解散，并按更坏的选举法召开第三届杜马，希望这届杜马会更◇101◇驯服。

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沙皇政府举行了所谓六三政变。1907 年 6 月 3 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共有六十五名代表，都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新的选举法颁布了。工农权利被进一步削减。沙皇政府继续实行进攻。

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对工农大肆进行血腥镇压。成千累万的革命工人和农民惨遭讨伐队枪毙或绞杀。革命者在沙皇刑讯室里受尽各种刑罚和折磨。工人组织，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受到特别残酷的迫害。沙皇的密探拼命搜寻当时匿居芬兰的列宁。他们想摧残革命领袖。1907 年 12 月，列宁冒了很大的危险才逃出毒手，再度流亡国外。

艰苦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到来了。

这样，第一次俄国革命最后是失败了。

造成失败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当时在革命中还没有工农反沙皇制度的巩固的联盟。农民虽然奋起进行了反地主的斗争，并同工人结成了联盟去反对地主，但他们还不了解不推翻沙皇就不可能推翻地主，还不了解沙皇同地主是一鼻孔出气的，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民还信任沙皇，还对沙皇的国家杜马寄托着希望。由此，有许多农民不愿同工人结成联盟去推翻沙皇制度。当时农民相信妥协主义的社会革命党胜过相信真正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缺乏组织。列宁指出：

“……农民的行动过于散漫、无组织和没有充分采取攻势，而这也就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9 卷第 354 页）[①]◇102◇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255 页。——译者注

（二）相当一部分农民不愿同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的这种心理，也影响到军队的行动，因为军队大多数是由身穿军服的农民子弟组成的。虽然沙皇军队个别部队中也发生过骚动和起义，但大多数士兵还是帮助了沙皇镇压工人的罢工和起义。

（三）工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一致。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在1905年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斗争。较为落后的阶层，即工业最不发达省份里那些住在农村的工人，却发动得比较迟缓。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踊跃是在1906年，但这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四）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进的基本的力量，但工人阶级党的队伍还没有必要的统一和团结。工人阶级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了两个集团，即布尔什维克集团和孟什维克集团。布尔什维克执行彻底的革命路线，号召工人推翻沙皇制度。孟什维克却以其妥协主义的策略阻碍了革命，使相当一部分工人迷失了方向，分裂了工人阶级。因此，工人在革命中的行动并非始终都是协调一致，而工人阶级既然还没有自己队伍的统一，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

（五）西欧帝国主义者帮助了沙皇专制政府镇压了1905年革命。外国资本家害怕丧失他们在俄国的投资和巨额收入。此外，他们还担心一旦俄国革命胜利，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起来革命。用此，西欧帝国主义者就来帮助刽子手沙皇。法国银行家贷给沙皇一笔巨款来镇压革命。德国皇帝使数万大军作好准备,想用武装干涉来援助俄国沙皇。

（六）1905年9月缔结的日俄和约给沙皇帮了大忙。战争的失败和革命的迅猛发展，迫使沙皇匆忙签订了和约。战争的失败削弱了沙皇制度，而和约的缔结巩固了沙皇的地位。◇103◇

简 短 的 结 论

俄国第一次革命是我国发展中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利用了沙皇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失败而实力削弱这一点，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并接二连三取得了沙皇的让步，而走向高涨，从10月的政治总罢工发展为 12月的武装起义。在第二个时期，沙皇与日本媾和后恢复了元气，利用自由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利用农民的动摇，把维特杜马投给他们作为施舍，并转而向工人阶级、向革命发起进攻。

在不过是三年的革命时期（1905—1907年），工人阶级和农民受到了他们在三十年平常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不能受到的丰富的政治教育。革命时期的几年，使得和平发展条件下几十年也无法使人看清楚的事情看清楚了。

革命揭示出：沙皇制度是人民的死敌，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能使它伸直的驼背。

革命表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想同人民联盟而想同沙皇联盟；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力量，同它妥协就等于背叛人民。

革命表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排除立宪民主党自由资产阶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消灭地主，把革命进行到底，扫清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最后，革命表明：劳动农民虽然动摇，但毕竟是能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唯一的重大力量。

在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条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着。布尔什维克采取扩展革命的方针，主张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孤立立宪民主党资产阶

级，同农民联盟，成立由工农代表组成的临时革命政◇104◇府，使革命达到胜利的结局。反之，孟什维克采取收缩革命的方针。他们所主张的是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而不是用起义推翻沙皇制度，是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是同农民联盟，是召开国家杜马，把它作为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而不是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于是孟什维克滚进了妥协主义泥潭，成了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事实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只有布尔什维克是党内和国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可以理解，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意见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已分裂成了两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丝毫没有改变党内的实际状况，只是把党的形式上的统一保持下来并把它稍微巩固了一下。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朝着党的实际上的统一前进了一步，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进行的。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运动时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路线，赞同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于是大会再次证实了已由俄国第一次革命全部进程证实了的事情。

革命表明：布尔什维克善于在形势要求进攻时就去进攻；他们学会了在最前列进攻和引导人民进行冲击。但除此而外，革命还表明：布尔什维克也善于在形势不利、革命走向低落时有秩序地退却；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毫不慌张、毫不忙乱地退却，以求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在根据新的形势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后再去向敌人进攻。

不善于正确地进攻，就不能战胜敌人。

不善于正确地退却，毫不慌张、毫不慌乱地退却，就不能在遭受失败时避免覆灭。◇105◇

第四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8－1912 年)

一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颓废情绪。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主义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1907 年 6 月 3 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于是这天在历史上就称为六三政变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即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从而违背了它自己在 1905 年 10 月 17 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上说，沙皇政府必须经过杜马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令。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被送去服苦役和终身流放。

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而使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好几成。◇106◇

第三届杜马其成分是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在总共四百四十二个杜马代表席位中，右派(黑帮)占一百七十一席，十月党人和同他们相近的团体占一百一十三席，立宪民主党人和同他们相近的团体一百零一席，劳动派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十八席。

右派(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在杜马开会时坐在右边议席上)所代表的是工农最凶恶的敌人，即黑帮农奴制地主（他们常常在镇压农民运动时鞭笞和枪杀大批农民,他们是蹂躏犹太人、殴打示威工人、在革命期间野蛮地焚烧群众集会场所的组织者)。右派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拥护沙皇的无限权力，反对 1905 年 10 月 17 日颁布的沙皇宣言。

在杜马里同右派接近的是十月党，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是大工业资本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地主的利益(1905 年革命开始时，立宪民主党人中很大一部分大地主转到了十月党人方面)。十月党人同右派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承认——也只是口头上承认——10 月 17 日宣言、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立宪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占的议席，要比它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所占的少，因为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地主的票已转到十月党人方面去了。

第三届杜马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即所谓劳动派。劳动派在杜马中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民主派（布尔什维克）之间。列宁指出，虽然劳动派在杜马中个分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代表着农民群众。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民主派之间，这是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必然产生的结果。列宁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即工人民主派提出了一个任务：“……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107◇(《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5 卷第 486 页)①

在 1905 年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以后，立宪民主党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38 页。——译者注

人愈来愈暴露出他们是一种反革命的力量。他们愈来愈抛弃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表现为十足的保皇派，沙皇制度的维护者。1909年，一群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著作家出版了一部《路标》文集，立宪民主党人在这部文集中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镇压了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向沙皇的皮鞭绞架政府匍匐跪拜，直言不讳地写道：应该“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即自由资产阶级)挡开人民的凶焰”。

沙皇政府在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和镇压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之后，就来大力摧毁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苦役牢房、大狱和流放地关满了革命者。革命者在监狱里遭到毒打，受尽各种刑罚和折磨。黑帮的恐怖猖獗到极点。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几千个革命者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绞架叫做“斯托雷平的领带”。

沙皇政府在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时候，不可能局限于高压手段，局限于讨伐队、枪毙，监禁和苦役。沙皇政府眼看农轻信“沙皇老爹”的心理消失下去而惶恐不安，于是它就大耍手腕，打算培植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

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颁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公社而另立农庄。根据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公社土地使用制可以破坏。每个农民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可以退出公社。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而他们从前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公社必须给每个退社农民分地,分的地必须在一个地◇108◇方(所谓独立农庄，独立田庄)。

富裕的农民——富农现在有了可能用贱价向力量单薄的农民收买土地。在该法令颁布后的几年间，有一百多万力量单薄的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富农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数目靠掠夺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土地而增加起来。有时它们简直成了十足的大地产，在那里

广泛采用雇佣劳动，即雇农劳动。政府强迫农民把公社中最好的土地分给富农庄主。

如果说从前在“解放”农民时掠夺农民土地的是地主，那么现在掠夺公社土地的便是富农，他们得到最好的地段，用贱价向贫农收买份地。

沙皇政府给富农发放大量贷款来收买土地和成立独立农庄。斯托雷平想把富农变成小地主，变成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士。

在九年(1906--1915 年)内退出公社的农户，总共在二百万户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使少地的农民和农村贫民的状况更恶化了。农民中的分化加剧。农民开始同富农庄主发生冲突。

同时农民已经开始理解，只要存在着沙皇政府和地主与立宪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他们就无法得到地主的土地。

起初，在另立独立农庄的现象盛行时期(1907－1909 年)，农民运动有过低落，但是不久，到 1910—1911 年间以及较晚的时候，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庄主的运动就在公社社员同庄主发生冲突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了。

工业方面的革命以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集中的情况，即工业规模扩大和集中于愈来愈大的资本家集团手中的情况,大大加剧了。还在 1905 年革命以前，资本家已开始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以图在国内提高商品价格，把赚来的超额利润用作鼓励商品输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输出到国外市场去贱价销售，夺取国外市◇109◇场。资本家的这种同盟，这种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就叫做托拉斯和辛迪加。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了。大银行数目也日渐增加,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工业经过几年停滞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煤炭、金属和石油的产

量提高了，纺织品和食糖的生产增长了。粮食的出口大大增加了。

虽然俄国当时在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化学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世纪内，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贫穷和半野蛮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①

俄国经济落后的直接结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赖于西欧资本主义。

这表现于俄国国民经济中如煤炭、石油、电器工业和冶金业等最重要的部门都操在外资手中，沙俄所用的机器和设备几乎全部要从国外输入。

这表现于重利盘剥的外债，沙皇政府每年要从人民身上榨取◇110◇几万万卢布来交付外债的利息。

这表现于与“盟国”缔结的许多秘密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政府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提供几百万俄国士兵到帝国主义战线上去支援“盟国”，以保证英法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宪兵和警察，沙皇奸细和黑帮分子，用盗匪手段袭击工人阶级的现象特别流行。当时用高压手段来迫害工人的不仅有沙皇的鹰犬。工厂主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他们在工业停滞和失业人数增加的年代特别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工厂主宣布大批开除工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87页。——译者注

人(同盟歇业)，把积极参加罢工的觉悟工人列入“黑名册”。凡加入了本工业部门厂主同盟的企业，都拒绝雇用列入这种“黑名册”或“黑名单”的工人。计件工资标准在1908年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普遍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抢劫式的罚款制度又盛行起来了。

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这种蜕化和颓废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厉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党了。其中一部分跑进了公开与革命为敌的阵营、另一部分则盘踞在保全下来的工人阶级合法团体中，竭力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拼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威信。同路人离开革命竭力去迁就反动势力，想同沙皇制度和睦相处。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的失败，把那些贪生怕死和钻营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它当走狗，即替它当奸细。沙皇的保安局派遣到工人组织和党组织中去充当内奸的许多无耻叛徒，在内部进行特务活动，出卖革命者。

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他们“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讥笑革命，赞美叛卖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111◇

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加剧了，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用冒牌“科学”论据作掩饰的宗教流派。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已成时髦。

这班老爷虽然牌号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引诱群众离开革命。

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也浸染了颓废情绪和怀疑心理，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稳过。其中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1905年归附布尔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两人都是孟什维克)一类的著作家。他们从两方面同时展开“批评”,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

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批评与一般批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批评不是采取公开的直率的方式,而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为幌子，采用了暧昧的骗人的手法。他们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摆脱某些基本原理的束缚。实际上，他们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在竭力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口头上伪善地否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并继续用两面派手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伪善的批评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欺骗党内普通工作人员，而且确实能把他们引入迷途。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批评愈伪善,它对党也就愈危险，因为它同反动势力对党对革命的总进攻会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一部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鼓吹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即所谓“寻神派”和“造神派”)。

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须给予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化变节分子以应有的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彻底揭穿，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本来可以期望普列汉诺夫和他那些自命为“著名马克思主义◇112◇理论家”的孟什维克朋友们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的。但他们却宁愿撰写几篇无足轻重的批评性小品文来敷衍一下，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在他那本 1909 年出版的有名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完成的。

列宁在该书中写道：“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第一本是 1908 年在圣被得堡出版的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 ？应当说是：反对>[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

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札罗夫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勇敢的战士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着‘现代认识论’，引证着‘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1页)②

当卢那察尔斯基为他那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朋友们辩护，说“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的时候，列宁回答道：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生义》一书。——编者注)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113◇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2页）③

但事实上列宁这本书远远超出了这个谦虚的任务的范围。实际上，列宁这本书不仅对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巴札罗夫、瓦连廷诺夫及其哲学老师阿芬那留斯和马赫进行了批评，批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企图用精巧圆滑的唯心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时，列宁这本书还捍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从恩格斯逝世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问世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科学方面、首先在

——————————————

① 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1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4页。——译者注

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最重大的和最主要的成果。

列宁在他这本书中狠狠地批评了俄国经验批判主义及其外国老师们之后，对哲学上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做出了如下几个批判性的结论：

(一)“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70页)①

(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走向唯心主义”(同上，第291页)②

(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的网里去了”(同上，第282页)③

(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繁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114◇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同上，第292页）④

(五)“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即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分子。——编者注)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同上)⑤

(六)“哲学唯心主义是……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同上,第304页)⑥

为了评价列宁这本书在我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为了了解列宁在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节分子时捍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0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53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365页。——译者注

⑤ 同上。——译者注

⑥ 同上，第715页。——译者注

卫了多么巨大的理论财富，必须哪怕是简略地介绍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其所以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而了解这个基础，就是说,掌握这个基础，是我们党的每个积极活动家应尽的义务。

那么：

(一)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呢？

(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二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115◇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译者注

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116◇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①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译者注

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117◇

(2)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细胞。——编者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484页)①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上，第23页)②

(3)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9-420页。——译者注

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118◇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动力，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3页）①

恩格斯所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湿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119◇物理学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译者注

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编者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527--528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528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过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45—46页)③

(4)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7-48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81页，——译者注

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 《哲学笔记》俄文版第 263 页)[①]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3 卷第 301 页)[②]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78 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12 页。——译者注

进了一步。◇121◇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现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极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122◇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 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123◇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而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现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 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 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③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译者注

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124◇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2页)①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302页)②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5－267页)③

其次：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119－120页)④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288页)⑤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125页)⑥

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相信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4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82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146—147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361页。——译者注

⑥ 同上，第153页。——译者注

“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却与此相◇125◇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倒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 1 卷第 330 页）①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126◇信徒堕入信仰主义，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即我们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1-222 页

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为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127◇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128◇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

① 原文为“ у ч р е ж д е н и 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派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129◇**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译者注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130◇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译者注

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直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选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同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同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131◇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

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132◇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

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十八倍，比苏联高二十五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农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133◇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

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134◇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利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译者注

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135◇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供，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

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136◇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

————————————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译者注

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渡过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37◇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选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不知道畜牧业、也不

知道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同和各部落之同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138◇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种菜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并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得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更有文化、更加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139◇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

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140◇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编者注

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①]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 页)[②]◇141◇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③]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④]

(4) 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09页。——译者注

④ 同上，见232页。——译者注

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142◇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

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143◇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编者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

———————————————

① 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话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 年◇144◇俄文版第 52 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 50 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603 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 1859 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272 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6 页。——译者注

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145◇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由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此就可看出，列宁打退修正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节分子的谋害尝试而为党捍卫了多么巨大的理论财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现对我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译者注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党组织在反动年代进行工作，要比过去革命开展时期困难得◇146◇多。党员人数锐减。党内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因害怕沙皇政府迫害而离开了党。

列宁指出，革命政党在这样的时候应当补习一下。在革命高涨时期，它们学习了怎样进攻；在反动时期，它们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地退却，怎样转入地下，怎样保存和巩固秘密党，怎样利用合法的机会，利用各种合法组织特别是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

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而仓皇退却，他们可耻地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想要取消、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因此这样的孟什维克就被称为**取消派**。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同，他们深信最近几年革命会有新的高涨，认为党必须使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这个新高涨。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农民还没有获得地主土地，工人还没有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人民深恶痛绝的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推翻，而且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现在又把人民在1905年从它手里争得的一点点政治自由毁灭掉了。所以，产生1905年革命的种种原因仍然有效。因此，布尔什维克确信革命运动定会重新高涨，并为迎接它进行着准备，聚集着工人阶级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确信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还因为1905年革命使工人阶级学会了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资本实行进攻的反动年代,工人决不会忘记他们在1905年所得到的这些教

训。列宁当时引证了工人的来信，信上讲到厂主又在虐待和侮辱工人时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 年又会到来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治目标，仍然同 1905 年一样，是要推翻沙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个目标，继续向群众提出那◇147◇几个基本的革命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可是，党已不能采取 1905 年革命高涨时期那样的**策略**了。例如，党决不能在最近时期号召群众举行政治总罢工或武装起义，因为这时革命运动已经低落，工人阶级已非常疲惫，反动阶级已大大加强，党不能不考虑到新的形势。进攻的策略必须转变为防御的策略，即聚集力量的策略，使干部转入地下，在地下进行党的工作的策略，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人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策略。

而布尔什维克也就巧妙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列宁写道：“我们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作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2 卷第 126 页）[①]

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进行着斗争。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又认为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借口来维持和保存党同群众的联系，借以加强党的力量。

“这是我们党从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采取迂回的斗争方法，转到利用从保险基金会起到杜马讲坛止的所有一切合法机会的时期。这是我们在 1905 年革命中遭到失败后实行退却的时期。这个转变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新的斗争方法，以便聚集力量再去对沙皇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422 页。——译者注

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斯大林语，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5 年俄文版第 366-367 页)[①]

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可以说是地下党组织的掩护物和联系群◇148◇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疾病救济会、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民众文化馆等。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并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由于保存了秘密的党组织,并且通过它领导了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工作，也就保证了党能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即准备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

布尔什维克在执行革命路线的时候，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反对党内两种机会主义：既反对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又反对暗中反党的所谓**召回派**。

自从取消派这一机会主义派别开始出现时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同它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列宁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1908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列宁提议斥责了取消主义，即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孟什维克)企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性”(《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 1 册第 128 页)[②]。

会议号召全党所有的组织坚决反对取消派的企图。

可是，孟什维克没有服从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却日益滑到背叛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319 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246 页。——译者注

革命而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的取消主义的道路上去。孟什维克日益公开地抛弃无产阶级党的革命纲领，抛弃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孟什维克想以抛弃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换取沙皇政府准许公开的合法的冒牌“工人”◇149◇政党存在。孟什维克决定同斯托雷平制度妥协，迁就斯托雷平制度。所以取消派又被称为“斯托雷平工党”。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同革命的公开敌人，即由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等人领导并获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分子帮助的取消派进行斗争，同时又同暗藏的取消派，即用“左的”词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面目的召回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所谓召回派，是指一部分先前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要求召回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主张根本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

1908 年，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由此就有“召回派”这一名称。召回派组织了自己单独的团体(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和布勃诺夫等人)，来开始进行反对列宁和列宁路线的斗争。召回派坚决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这样，他们就使工人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召回派使党脱离工人阶级，使党失去同非党群众的联系，想在地下组织里闭关自守，并使地下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物的可能而受到打击。召回派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里和通过国家杜马可以影响农民，可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用欺骗手段引诱农民的政策。召回派阻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所以，召回派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并且在实际上放弃了对广大非党群众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弃了革命工作。

1909 年为讨论召回派的行为而召集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和召回派毫无共

同之处，并把召回派从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开除出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遇到困难的时刻，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150◇

四　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党的八月联盟

当布尔什维克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坚定路线的时候，托洛茨基却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正是在这些年代，列宁称他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奥地利)组织了一个著作家集团，创办了一个“非派别性的”而其实是孟什维克派的报纸。关于托洛茨基，列宁当时这样写道；“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绝的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②]

后来，在1912年，托洛茨基组织了八月联盟，即所有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派别所结成的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盟。取消派和召回派也在这个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中联合起来了，这就证明他们是一路货。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取消主义立场。可是，托洛茨基却用中派主义，即用调和主义把自己的取消主义掩盖起来，硬说他是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他想使他们双方达到和解。列宁谈到这一点时说道。托洛茨基比公开的取消派更卑鄙、更有害，因为他欺骗工人说他是站在“派别之外”，其实他是完全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培植中派主义的主要集团。

斯大林同志写道：“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

————————————

① 犹大什克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卑称，这里列宁借用它来称呼托洛茨基叛徒。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 411 页。——译者注

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151◇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的、相对立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9版第379页)①

在这个时期，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事实上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因为他们常常帮助他反对列宁。1910年1月,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的帮助下，**违反列宁意旨**而召集了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因有许多布尔什维克被捕而发生了变化,所以动摇分子有可能通过反列宁的决议。例如这次全会竟决定停办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并拨款帮助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加米涅夫参加了托洛茨基报纸的编辑部,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力图把托洛茨基的报纸变成中央机关报。

只是由于列宁的坚持，中央一月全会才通过了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决议。但就在这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坚持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不把取消派明确点出来。

结果正如列宁所预见和警告的那样：只有布尔什维克才遵照中央全会的决议停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而孟什维克则继续出版他们那一派的取消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上发表了一篇专文，这篇文章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帮凶们的行为，指出必须消除由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的叛卖行为而在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中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该文还提出了后来由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实现了的迫切任务，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俄国出版合法的党报和成立党的秘密的实际中心。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是根据完全拥护列宁主张的巴库委员会的决议写◇152◇成的。

为了同从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起到召回派和造神派止完全由反党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2页。——译者注

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反党八月联盟相对抗，主张保存和巩固无产阶级秘密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护党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及其孟什维克护党派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坚持孟什维克立场。却坚决同八月联盟和取消派划清界限，并力求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提议，同普列汉诺夫成立了共同反对反党分子的暂时联盟，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盟对党有利，而对取消派却有致命的危险。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这个联盟。他当时在流放地。斯大林同志从流放地写信给列宁说：

“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真正符合俄国国内工作的利益，即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分子团结起来的利益。(二)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能在孟克[①]工人和取消派之间挖掘一道鸿沟，驱散并歼灭取消派，使合法组织赶快从取消派的挟持之下解放出来。”(《列宁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529—550页)[②]

由于把地下工作和合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终于成了公开的工人组织中的重大力量。例如，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四个合法的代表大会，即民众大学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工厂医生代表大会和禁酒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团中就起过重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合法的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获得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例如，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团在民◇153◇众大学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揭露了沙皇制度摧残一切文化活动的政策，并指出，不消灭沙皇制度，俄国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高涨。工人代表团在工

———————————————

① 孟克是孟什维克的简称。——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93页。——编者注

厂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讲述了工人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并得出结论说，不推翻沙皇制度，就不可能真正举办工厂医疗事业。

布尔什维克把取消派从那些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中逐渐排挤出去。由于同普列汉诺夫护党派成立统一战线这种特殊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夺得了许多工人孟什维克组织（如在维波尔格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等处）。

在这个困难时期，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的工作做出了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典范。

五　1912年召开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以及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全体布尔什维克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使他们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所以绝对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必须铲除党内那些分裂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派别，而且还因为必须把聚集工人阶级力量的工作进行到底，必须准备工人阶级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

可是。要实现过个任务，首先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分子即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现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谁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继续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内是绝对不可能了。由于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叛卖行为，由于他们企图取消无产阶级政党而组织一个改◇154◇良主义新党，布尔什维克同他们的决裂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当布尔什维克还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里时，他们对孟什维克的行为总要担负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可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如果不愿背叛党和工人阶级，就绝对不能再替孟什维克的公开叛卖行为担负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在一个党的范围内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就变成了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背叛。

因此，必须把同孟什维克的实际上的决裂贯彻到底，直到在组织上同他们正式决裂，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只有这样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阶级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被孟什维克破坏了的党的真正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建立起来。

这个任务应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召开的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来完成。但这个任务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同孟什维克正式决裂，使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还摆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仅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而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而且首先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后建立一个新的党，即建立一个与通常那种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清除了机会主义分子的、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的**新型**的党。

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所有一切孟什维克，不分色彩，从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起，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始终不渝地使用着他们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武库中搬来的武器。他们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象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他们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是一种新的、不寻常的、异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当时西方各国社会民◇155◇主党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有机会主义分子；既有革命的朋友,也有革命的敌人；既有拥护党性的人，也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逐渐同后者调和，前者在实际上逐渐向后者屈服。为什么要同机会主义分子，同革命叛徒调和呢？——布尔什维克问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内和平”，为了“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布尔什维克。同谁统一呢，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吗？是的，是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很明显，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党，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看见，从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开始由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蜕化成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其中每一个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都已由领导力量变成了自己议会党团的附属品。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这样的党对无产阶级不会有好处，这样的党决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党，而是

另一种党，即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它对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不调和态度和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态度，它团结紧密而坚如磐石；它是主张社会革命的党，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布尔什维克想在俄国建立的正是这样的新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当时正是在建立和准备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各色各样唯心主义者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作斗争的全部历史，就是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历史。布尔什维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可供一切想要建立真正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人们效法的党。布尔什维克从旧《火星报》时期起就在准备建立这样的党了。他们坚持到底、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地准备着。在这一准备上起了基本和决定作用◇156◇的，是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治集团是象布尔什维克集团这样经过认真准备才形成为一个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党是一件完全准备好了的、完全成熟了的事情。

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以驱逐孟什维克和宣告新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形成的手续来完成这件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

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于 1912 年 1 月在布拉格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具有全党代表大会的意义。

会议的通报报道了原被破坏的党中央机关已经恢复、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的消息，指出反动年代是党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为一定

的组织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受到种种迫害，尽管受到来自外部的沉重打击，尽管经历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和动摇，无产阶级的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组织。

会议的通报说："保全下来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纲领和革命传统，而且还有它的组织。迫害手段虽能破坏和削弱这个组织，但是任何迫害都不能把它彻底消灭。"①

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征兆和党的工作活跃起◇157◇来的事实。

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之后确认："在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在为巩固当地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和小组积极进行工作。"②

会议指出，各地都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把秘密工作同党在各种合法工人社团中的合法工作结合起来。

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两同志是缺席选进中央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地。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加里宁同志。

当时成立了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斯大林同志负责主持。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除斯大林同志外，还有雅·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潘达梁、谢·奥尔忠尼启泽和米·加里宁等同志。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一个总结，并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就正式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独立存在。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4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384 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既已在思想上打垮了孟什维克，把他们驱逐出党，就给自己保存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旧有的党旗。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到 1918 年都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括号标明：“布尔什维克”。

1912 年初，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结果时写道：

“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和它的中央◇158◇委员会恢复起来了。我想您会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高兴的。”(《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9 卷第 19 页)①

斯大林同志在评价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时说道：“这次代表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界限，把全同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 361—362 页)②

从孟什维克被驱逐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变得更坚强更有力了。**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这就是与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之一。第二国际各国党口头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实际上却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留在自己队伍中间，让他们瓦解、断送第二国际。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从无产阶级党身上不断清除机会主义的污泥浊水，结果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的党，即后来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如果在无产阶级党队伍里留下了机会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党就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1 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310 页。——译者注

不可能走上康庄大道并引导无产阶级前进，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成为国内战争的胜利者，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布拉格代表会议在它的决议中提出了如下的最低纲领作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政治口号：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这些革命口号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

在这些口号下，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在 1912—1914 年重新高涨起来。

简 短 的 结 论

1908—1912 年,是革命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在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运动低落和群众感到疲惫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从直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转到用迂回方法进行这一斗争。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艰苦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保持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甚至极小的合法机会(从保险基金会和工会起到杜马讲坛止)。布尔什维克始终不懈地聚集着力量去迎接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在革命遭到失败、反政府派别分崩离析、脱离了党的知识分子(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对革命失望并对党的理论基础加紧进行修正主义袭击的艰苦环境中，布尔什维克表明，党内只有它这支力量没有卷起党的旗帜，而仍然忠于党的纲领，并打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者”的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锻炼和对革命前途的明确认识，帮助了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核心来捍卫党和党的革命原则。列宁这样评论布尔什维克：“难怪人们把我们叫作坚如磐石的人。”①

孟什维克在这个时期愈来愈离开革命。他们演变成为取消派，要求取消、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他们愈来愈公开地抛弃党的纲领，抛弃党的革命任务和口号,企图自己另组织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即工人所称的“斯托雷平工党”。托洛茨基支持取消派，◇160◇但他假装维护“党的统一”，实际上是同取消派统一。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时必须采取新的迂回的斗争方法去反对沙皇制度，却要求党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要求党召回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422 页。——译者注

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召回派促使党脱离群众，阻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召回派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其实他们也和取消派一样拒绝进行革命斗争。

取消派和召回派结合成为一个反对列宁的总联盟，即由托洛茨基组织起来的八月联盟。

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八月联盟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成功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秘密党。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的代表会议(1912 年 1 月)。这次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正式形成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机会主义分子即孟什维克从无产阶级党里清除出去，对于党和革命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决定的意义。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把背叛工人事业的妥协派即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无产阶级党在 1917 年就不可能发动群众去夺取无产阶级专政。◇161◇

年轻时的列宁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马克思主义小组中的斯大林（后中）

斯大林在 1912 年

列宁在共产国际会议上

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1912－1914 年)

一 1912－1914 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得势并不长久。一个除了皮鞭和绞架而外不愿给人民任何东西的政府，本来是不可能稳固的。高压手段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再也不能恐吓人民了。工人在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所产生的疲倦心理开始消失。工人又重新奋起斗争了。布尔什维克断定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的预见已被证实。1911 年，罢工人数已超过十万,而在过去几年内每年罢工人数却不过五六万。1912 年 1 月举行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已指出工人运动开始活跃的事实。但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是在 1912 年 4－5 月间由于连纳工人惨遭枪杀而爆发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时候开始的。

1912 年 4 月 4 日，在西伯利亚连纳金矿举行罢工时，沙皇的宪兵队长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工人五百多。听说一群手无寸铁、和平前去同资方进行谈判的连纳矿工遭到枪杀，全国都沸腾起来了。沙皇专制政府干下这次新的血腥暴行，是为了摧毁矿工的经济罢工，以讨好连纳金矿老板英国资本家。英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俄国股东靠极无耻地剥削工人，从连纳金矿每年取得七百多万卢布的骇人听闻的利润。他们付给工人极低的工资，供给工人不能食用的、腐◇162◇烂变质的食品。连纳金矿的六千矿工不堪忍受这种欺压与凌辱而举行了罢工。

连纳枪杀事件发生后，无产阶级在彼得堡、莫斯科以及所有工业中心和工业地区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集会以示抗议。

有几个企业的工人在共同通过的决议上写道：“我们万分震惊，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抗议，都不能表达我们每个人的沸腾心情于万一。对于我们，无论眼泪或抗议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

当沙皇大臣马卡罗夫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国家杜马中对连纳枪杀事件提出的质询而蛮横声言，说“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的时候，工人更加怒不可遏了。参加抗议血腥屠杀连纳工人的政治罢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十万。

连纳事件象飓风一样冲破了斯托雷平制度所造成的“沉静”气氛。

斯大林同志1912年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明星报》上谈到这点时写道：

“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①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企图埋葬革命，这是枉费心机。连纳事件表明革命力量仍然活着，工人阶级中积聚了巨大的革命能量。1912年的五一罢工大约有四十万工人参加，罢工带有鲜明的政治◇163◇性质，它提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即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这三大口号是要把广大的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民和士兵都团结起来，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的冲击。

列宁在《革命的高涨》一文中写道：“全俄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罢工相连的游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的革命演说，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5卷第533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32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 88 页。——译者注

取消派被工人的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竟出来反对罢工斗争，称它为“罢工狂”。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斯基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要求“权利”(要求取消对结社、罢工等的限制)的“请愿书”上签名，以便把它递交国家杜马。但取消派只征集到一千三百人签名，而团结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工人却有几十万。

工人阶级是循着布尔什维克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当时国内的经济情况有如下述。

还在1910年，工业停滞已由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的活跃和扩大所代替。生铁冶炼量在1910年为一亿八千六百万普特，1912年为二亿五千六百万普特，而到1913年已增至二亿八千三百万普特。煤炭开采量在1910年为十五亿二千二百万普特，而1913年已达到二十二亿一千四百万普特。

在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的同时，无产阶级也迅速增长起来。当时工业发展的特点，就是生产进一步集中于大企业和最大企业。1901年，在有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七，而1910年在这种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已达工人◇164◇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即占全体工人一半以上。工业集中的这种速度是空前的。甚至在北美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当时在大企业中做工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左右。

无产阶级的增长和集中于大企业，是在存在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就使俄国工人阶级变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力量。企业中对工人实行的野蛮剥削方式，再加上沙皇鹰犬横行这种不堪忍受的警察制度，就使每次重大的罢工都具有政治性质。同时，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群众罢工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力量。

走在工人革命运动前头的是英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继彼得堡之后是波罗的海沿岸边区、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然后是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南部地区。1913 年，运动已扩展到西部边区、波兰和高加索。1912 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七十二万五千，而据其他比较完备的统计在百万以上；1913 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八十六万一千，而据比较完备的统计是一百二十七万二千。1914 年上半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

这样，1912－1914 年间革命的高涨，即罢工运动的规模，已使全国接近于 1905 年革命开始时的局势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具有**全民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反对专制制度。罢工斗争得到了绝大多数劳动居民的同情。工厂主用同盟歇业来报复工人的罢工。1910 年，莫斯科省资本家解雇了五万纺织工人。1914 年 3 月,彼得堡在一天内就有七万工人被解雇。其他企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用群众性募捐，有时则用支持性罢工来支援举行罢工的和受到同盟歇业打击的同志。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群众性的罢工唤起了农民群众，把他们也卷进了斗争。农民再次挺身起来反对地主，捣毁地主的庄园和富农的独立农庄。在 1910－1914 年间，总共发生了一万三千多次农◇165◇民运动。

军队中的革命运动也开始了。1912 年在土尔克斯坦驻军中发生了武装暴动，在波罗的海舰队和塞瓦斯托波尔酝酿着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表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为了局部的要求，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把人民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俄国在走向新的革命。

列宁为了更接近俄国，于 1912 年夏从巴黎迁到加里西亚(原属奥地利)。在这里由列宁主持开过两次中央委员和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

一次是1912年底在克拉科夫举行，另一次是1913年秋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罗宁诺镇举行。这两次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关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的决议：关于革命高潮，关于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巩固秘密组织，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党的报刊，关于保险运动。

二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用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的强大武器。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奥里明斯基和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随着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而诞生。1912 年 4 月 22 日(5 月 5 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了。这是工人的真正的节日。为了纪念《真理报》的诞生，决定 5 月 5 日为工人出版节。

还在《真理报》创办以前，已出版了专供先进工人阅读的布尔什维克周报《明星报》。《明星报》在连纳事件时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登载过列宁和斯大林动员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许多战斗性政论文章。但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周报已不能满足布尔什维克◇166◇党的需要了。必须出版一种供最广大的工人阶层阅读的群众性的政治日报。《真理报》就是这样的报纸。

在这个时期，《真理报》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真理报》争取了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站到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来。《真理报》经常受到警察迫害，遭到罚款，为登载书报检查机关所不喜欢的文章和通讯而被没收，它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存在，完全是靠了数以万计的先进工人的积极支持。《真理报》能够交付巨额罚款，完全是靠了工人的踊跃捐献。被没收的每一号《真理报》，往往仍有相当多的份数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因为先进工人半夜就来到印刷厂，把一捆一捆的报纸取走。

沙皇政府在两年半内把《真理报》查封过八次，但《真理报》每次都在工人援助下又用一种新的类似的名称,如《拥护真理报》,《真

理之路报》、《劳动的真理》等等，重新出版。

当时《真理报》每天平均销售四万份，而孟什维克的日报《光线报》每天印数不超过一万五六千份。

工人认为《真理报》是工人自己的报纸，对它非常信任，敏感地注视着它发表的意见。每份《真理报》都是辗转传阅，给几十个读者看，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真理报》上都讲些什么呢?

每一号《真理报》都刊载有几十篇工人通讯，叙述工人的生活情况、他们所过受的残酷剥削、资本家及其管事和工头们对工人的种种压迫和侮辱。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揭露。《真理报》的简讯常常报导饥饿的失业工人因找工作无望而自杀的消息。

《真理报》经常反映各个工厂和各个工业部门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叙述工人怎样为 自己的要求进行斗争。几乎每一号都载有各◇167◇个企业罢工的消息。每当发生了大规模的持久的罢工，《真理报》就组织其他企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募捐援助罢工者。募得的罢工基金有时达几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因为要知道，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七八十个戈比。这种做法培养了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使他们意识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当听到发生了政治事件，每当听到胜利或失败的消息，工人都要把信件、贺词或抗议书等寄给《真理报》。《真理报》在自己的文章中，用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观点阐明工人运动的任务。一个合法的报纸是不可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它只能暗示。但觉悟的工人能够很好地领会，并把暗示的意思解释给群众。例如，当《真理报》说到“1905 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时，工人们就懂得这是指布尔什维克的几个革命口号，即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夜组织了先进工人。它揭露了孟

什维克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徒立场。《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选举坚持“1905年的不折不扣的要求”的人，即选举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先在工人大会上选出初级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然后复选代表参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选举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的候选名单，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了使预定的候选人不致遭到被捕的危险，这种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真理报》帮助了组织无产阶级的发动。当1914年春彼得堡大规模举行同盟歇业，以致不宜宣布群众性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开群众大会，上街游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这样讲。但觉悟的工人一读列宁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这一不惹人注意的标题所写的一篇文章，◇168◇就懂得了号召的意思，因为文章上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的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罢工，意思就是号召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革命活动就是这样同通过《真理报》对工人群众进行的合法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的。

《真理报》不仅报道了工人的生活、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同时《真理报》还系统说明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饥饿痛苦、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斯托雷平“改革”后农民的好地被富农庄主攫为己有的情况。《真理报》使觉悟工人看到,农村中积蓄了大量的易燃物。《真理报》教导无产阶级说，1905年革命的任务并没有解决，新的革命即将到来。《真理报》教导说，无产阶级在这第二次革命中应当成为人民的真正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将有革命的农民这样强有力的同盟者。

孟什维克竭力想使无产阶级抛弃革命念头。他们劝告工人说：你们别去考虑什么人民，什么农民的饥饿痛苦，什么黑帮农奴制地主的统治，你们应当一心争取“结社自由”。向沙皇政府呈递这样的“请

愿书”。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解释说：孟什维克这种放弃革命和放弃同农民联合的宣传，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只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就一定能战胜沙皇制度；象孟什维克这种恶劣的牧师，应当作为革命的敌人一脚踢开。

《真理报》在“农民生活”栏内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从1913年的通讯中举出几篇作例子。

来自萨马拉的一篇标题为《一个土地案件》的通讯说：布古尔玛县诺沃哈兹布拉特利村有四十五个农民被控，罪名是说，在把公社土地划给独立田庄主时，他们反抗过土地丈量官。很大一部分被控农民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普斯科夫省的一篇简讯说：“普西茨村(札瓦利耶车站附近)农民对乡丁实行了武装反抗。有人受伤。冲突的原因是土地纠纷◇169◇乡丁已往普西茨村集结，副省长和检察长已前往视察。”

乌发省的通讯说农民在出卖份地，说饥荒和退社的法令加速了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例如波利索夫卡村有二十七户农民，共有有五百四十三俄亩耕地。饥荒发生时，有五户永远变卖了三十一俄亩土地，每俄亩卖价是二十五至三十三卢布，但土地实际价值比这贵两倍。村里还有七户抵押了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每俄亩押了十八至二十卢布，期限六年,年息百分之十二。如果注意到居民贫困和利率极高的情况，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中有一半要落到高利贷者手中，因为债户当中未必有一半在六年内能够偿清这样大的一笔数目。

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清楚地向工人和农民指明有多大一笔地产握在地主寄生虫手中。仅仅三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约七千万俄亩，而一千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样多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二千三百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在内，每户平均不过七俄亩，而且其中五百万力量单薄的农户，即全体农户的半数，每户不过一二俄亩。这些事实清楚地表

明，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根源在于存在着地主的大地产即农奴制的残余，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这种残余。

《真理报》经过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深入到农村中去，唤起先进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在创办《真理报》时期，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杜马党团、报刊、保险基金会和工会等合法组织形式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过来。为了把取消派从工人阶级的合法组织中驱逐出去，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斗争由于有《真理报》的努力而胜利完成了。

《真理报》是为保护党性、为重建群众性工人革命政党而斗争◇170◇的核心。《真理报》把合法组织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基地周围，把工人运动指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即准备革命。

《真理报》拥有大量的工人通讯员。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但《真理报》不仅通过来信来稿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来到编辑部。《真理报》编辑部担负了很大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到这里来接头。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报都往这里送。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都从这里转发。

由于布尔什维克为重建群众性革命工人政党同取消派进行了两年半顽强的斗争，到 1914 年夏天，俄国积极的工人已有五分之四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派”的策略。举一件事就可以说明。1914 年捐款支持工人报纸的七千个工人团体中，有五千六百个团体捐给布尔什维克党报刊，面捐给孟什维克报刊的只有一千四百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有钱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资金的一半以上。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了一整代革命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一代人后来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真理报》受到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拥护。革命高涨年代(1912—1814年)给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采取的任何迫害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毁。

“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斯大林)①

党的另一个全俄合法机关，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171◇克党团。

1912年，政府宣布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我们党对于参加这次选举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和《真理报》是全俄范围的两大合法据点，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通过这两个据点在群众中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带着自己的口号独立参加杜马选举，并对各个政府党和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同时给以打击。布尔什维克进行这次选举运动的口号是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

第四届杜马选举在1912年秋天举行。10月初，政府因对彼得堡选举进程不满意，企图侵犯许多大厂工人的选举权。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号召各大企业的工人罢工一天作为回答。政府陷入困境只好让步，于是工人在选举大会上有了可能选举他们愿意选举的人。绝大多数工人在表决时都赞成斯大林同志所拟定的给初选代表和杜马代表的《委托书》。《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提到了1905年没有解决的任务。

《委托书》上说：“……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 这一运动的先锋，也象1905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104页。——译者注

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①

《委托书》上说，必将到来的人民发动必定是采取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形式，既要反对沙皇政府，又要反对同沙皇制度谋求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172◇

列宁对号召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这个《委托书》极为重视。工人们纷纷通过决议来响应这一号召。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巴达也夫同志由彼得堡工人选进了杜马。

工人选举杜马代表是同其他居民阶层分开进行的(即所谓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九名代表中，六名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沙果夫和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奸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至少拥有工人阶级人数五分之四的各大工业中心选出的。但几十个取消派不是工人选出的，即不是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因此在杜马里是七名取消派对六名布尔什维克。起初，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杜马里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取消派阻碍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后，于 1913 年 10 月遵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指示退出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常在杜马里发表揭露专制制度的革命演说，并就工人遭到迫害和遭到资本家残酷剥削的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

他们在杜马里还就土地问题发表演说，号召农民同农奴制地主作斗争，揭露立宪民主党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布尔什维克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没有被黑帮杜马通过，但它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2 卷 245－246 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同党中央、同列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从列宁那里得到指示。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时直接领导过这个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没有局限于在杜马内部进行工作，他们还在◇173◇杜马外开展了大量活动。他们时常巡视各个工厂，到全国各工人中心去作报告，召集秘密会议来解释党的决议,成立新的党组织。代表们巧妙地把合法活动同秘密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

三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增长。帝国主义战争前夜

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范例。它建立地下组织。它印发秘密传单。它在群众中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同时，它还愈来愈多地夺得工人阶级的各种合法组织。党竭力争取工会、民众文化馆、夜大学、俱乐部和保险机关。这些合法组织向来是取消派分子的藏身处所。布尔什维克为把这些合法团体变成我们党的据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巧妙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终于把两大首都的大多数工会组织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布尔什维克在1913年选举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时获得了特别辉煌的胜利：在二三千五金工人的大会上，只有一百五十人投取消派的票。

像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样一个合法组织，它的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孟什维克在杜马中有七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只有六名代表，但孟什维克的七人小组主要是来自非工人地区，所代表的还不到工人阶级的五分之一，面布尔什维克的六人小组则是来自国内各个主要工业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代表者全国工人阶级五分之四以上。工人认为自己的代表是六人小组(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等)，而不是七人小组。◇174◇

布尔什维克所以能争取到各种合法组织，是因为他们不管沙皇政府怎样野蛮迫害，不管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怎样造谣中伤，始终保持了秘密的党和自己队伍的坚强的纪律，坚定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工人运动的敌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这样，布尔什维克就在合法组织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孟什维克在这些组织中遭到了全面的失败。无论在杜马讲坛进行鼓动方面，还是在工人报刊和其他合法组织中，孟什维克都被排挤到后而去了。卷入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确定不移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而抛弃了孟什维克。

此外，孟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也遭到了破产。俄国各边沿地区发生的革命运动，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民族问题纲领。但孟什维克除了崩得提出的那个谁也不会满意的“文化自治”外，提不出任何纲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斯大林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以及列宁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阐述了这个纲领。

毫不奇怪，在孟什维主义遭到这样的失败之后，八月联盟便摇摇欲坠了。这个由各色各样分子组成的联盟，经不起布尔什维克一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为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成立的八月联盟，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打垮了。首先退出联盟的是前进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接着退出的是拉脱维亚人，然后剩下的人也散了伙。

取消派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中遭到失败后，就向第二国际求援。于是第二国际就来援助他们。第二国际借口要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好”，借口建立“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批评取消派的妥协主义政策。但布尔什维克决不调和：他们拒绝服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决议，寸步也不让。◇175◇

布尔什维克克在合法组织中获得胜利，不是也不可能是偶然的。其所以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的纲领和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其所以不是偶然的，还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反映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革命工人运动一天天扩展，席卷了一批批新的城市和地区。1914

年到来后，工人的罢工不仅没有逐渐平静下去。反而更加强烈地开展起来。罢工更加顽强持久，卷入罢工的工人也日益增多。1月9日有二十五万工人举行罢工，其中彼得堡有十四万。5月1日罢工人数超过了五十万。其中彼得堡有二十五万多。工人在这些罢工中表现得非常坚定。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列斯涅尔工厂的罢工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彼得堡许多企业大批工人中毒的事件，激起了十一万五千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又转为游行示威。运动继续发展着。1914年上半年（包括7月初），罢工的工人共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人。

5月间，巴库石油工业工人举行总罢工，引起了俄国全体无产阶级的密切注意。罢工进行得很有组织。6月20日,巴库有两万工人游行示威。警察用残酷手段对付巴库工人。为了抗议警察暴行并声援巴库工人，莫斯科开始举行罢工，接着罢工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

7月3日，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为响应巴库罢工而举行了群众大会。警察向工人开枪。彼得堡无产阶级义愤填膺。7月4日，彼得堡九万工人响应党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举行罢工以示抗议，7月7日罢工人数是十三万，7月8日达到了十五万，7月11日达到了二十万。

各个工厂都卷入了风潮，到处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事情发展到构筑街垒。巴库和洛兹也构筑了街垒。在许多地方,◇176◇警察向工人开枪。政府采取了“非常”手段来镇压运动，首都变成了军营，《真理报》被查封。

但这时出现了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新因素，结果把事变进程改变了。正当彼得堡七月革命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总统彭加勒来到彼得堡，同沙皇谈判当前战争开始的问题。过了几天，德国就向俄国宣战了。沙皇政府利用战争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镇压工人运动。革命的高涨因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而沙皇政府正是想从这次战争中找到摆脱革命的出路。

简 短 的 结 论

在革命新高涨年代（1912—1914 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并在布尔什维克口号下把它引向新的革命，党巧妙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党摧毁了取消派及其朋友托洛茨基派和召回派的反抗，因而掌握了各种形式的合法运动，并把合法组织变成了自己革命工作的据点。

党在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作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广泛地利用了杜马讲坛来进行革命鼓动，并创办了出色的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因而造就了新一代的革命工人，即真理派。这个工人阶层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始终忠于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他们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时期的核心。

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是一种前卫战斗，它被帝国主义战争打断了（但三年后它又恢复起来，把沙皇制度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高举着飘扬招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这一艰苦的阶段。◇177◇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

(1914 年—1917 年 3 月)

一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和起因

1914 年 7 月 14 日(27 日),沙皇政府宣布总动员。7 月 19 日(8 月 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

俄国加入战争了。

在战争开始以前很久,列宁、布尔什维克早已预见到战争不可避免。列宁在几次社会党人国际代表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提议确定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时所应采取的革命行动路线。

列宁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抢劫他国领土,侵占和掠夺殖民地,夺取新的市场,这些已经不止一次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原因。战争也如剥削工人阶级一样,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种自然和当然的事情。

尤其是当资本主义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全发展到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即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候,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资本家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和银行已在资本主义各国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金融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宰,金融资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侵占新的殖民地,需要新的资本输出场所,需要新的原料产地。◇178◇

但到十九世纪末,地球上的全部领土都已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完毕。加以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极不平衡和跳跃式的:从

前居第一位的国家现在工业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国家却迅速地跳跃前进，赶上并超过它们。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

1914 年的战争就是重新分割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已久的。发动这次战争的祸首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特别努力准备了这次战争的，一方面是德国和奥地利，另一方面是英法和依赖于它们的俄国。1907 年成立了三国协定(或称协约)，即英法俄三国联盟。组成另一帝国主义联盟的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但意大利在 1914 年战争开始时退出了这个联盟，随后便加入了协约国。支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德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是要从英法两国手中夺取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德国建筑了巴格达铁路，威胁到英国在近东的统治。英国害怕德国海上军备的增长。

沙俄力图分割土耳其，想要侵占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峡(例如达达尼尔海峡)，想要夺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还打算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

英国力图通过战争打败它的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因为战前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排挤英国商品。此外，英国还打算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并在埃及站稳脚跟。

法国资本家力图从德国手中夺取盛产煤铁的萨尔矿区，以及在 1870－1871 年战争时德国从法国手中占去的亚尔萨斯－洛林区。◇179◇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的最大矛盾引起的。

这次重新分割世界的掠夺战争牵连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后来日本、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被卷进去。

战争成为世界性的了。

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背着本国人民极端秘密地准备的。当战争爆发时，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竭力证明，不是它侵犯了邻国，而是邻国侵犯了它。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战争的真正目的，隐瞒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说，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事业。他们不仅没有起来反对战争，反而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去挑动各交战国工农互相残杀。

俄国不是偶然站到英法协约国方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必须注意到，在 1914 年以前，俄国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主要是英法比三国即协约国资本手里。俄国最重要的冶金工厂由法国资本家把持着。整个说来，冶金业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外国资本。煤炭工业的情形、顿巴斯的情形，也是如此。石油开采约有一半是在英法资本手里。很大一部分俄国工业利润流进了外国银行，主要是英法两国银行。所有这些情况，再加上沙皇向英法两国借的几十亿债款使沙皇政府紧紧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把俄国变成了这些国家的纳贡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

俄国资产阶级指望开始战争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状况：获得新的市场，从军事定货和军需供给中赚得暴利，利用战争局势顺便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180◇

沙俄参加战争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俄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工厂多半是些设备破旧的老厂。农业由于存在着半农奴制地产和大批贫困破产的农民，不能成为进行长期战争的巩固的经济基础。

沙皇主要是依靠农奴制地主、黑帮大地主同大资本家结成联盟，

操纵着俄国和国家杜马，他们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满心希望沙皇专制政府成为一个铁拳头。一方面保证它夺得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土,另一方面把工农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反政府派自居，却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从战争一开始就在社会主义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他们鼓吹必须保卫，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抵抗“普鲁士野蛮人”，他们支持“国内和平”政策，这样，他们就是帮助俄国沙皇政府进行战争，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国皇帝政府进行战争反对“俄罗斯野蛮人”一样。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忠于革命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地主资本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党从战争一开始就认定：发动这次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地主资本家去侵占别国领土，掠夺别国人民，因此工人必须坚决向这次战争宣战。

工人阶级支持布尔什维克党。

固然，战争开始时笼罩着知识分子和富农阶层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狂热，也熏染了一小部分工人。但这主要是流氓式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中的分子，以及一部分同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他们当然没有反映而且也不可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情绪。正◇181◇是这些分子参加了沙皇政府在战争开始时组织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游行。

二　第二国际各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第二国际瓦解为各个社会沙文主义党

列宁不止一次提醒过，要注意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领袖们的不坚定性。他始终强调说，第二国际领袖们只是口头上反对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投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就会成为战争的拥护者。战争一开始就证实了列宁的预言。

1910 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说社会党人应当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1912 年巴尔干战争时，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发表声明，说各国工人认为，为资本家增加利润而互相残杀是种罪恶。在口头上，在决议上，就是这样讲的。

而当帝国主义战争轰隆一声爆发，必须实现这些决议的时候，第二国际领袖们却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变节者,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战争的拥护者。

1914 年 8 月 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法英比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国际已不存在了。它事实上已瓦解为各个互相进行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党。

各国社会党领袖背叛无产阶级而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帮助帝国主义政府愚弄工人阶◇182◇级，用民族主义毒药毒害工人阶级。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挑动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挑动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去反对德国工人。第二国际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国际主义立场，逆潮流而进，虽然不是十分坚定,不是完全明确，但毕竟是逆潮流而进的。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毫不犹豫地立刻举起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列宁在1914年秋拟定的关于战争的提纲中指出,第二国际的瓦解不是偶然的。第二国际是被机会主义者断送的，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还在很早以前就已预告过必须反对这些机会主义者。

第二国际各党在战前就传染上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公开鼓吹放弃革命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国际不愿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主张同机会主义和睦相处，让它巩固起来。第二国际既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政策，于是自己也成了机会主义的了。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靠着它从殖民地、从剥削落后国家获得的利润，用较高的工资和其他的小恩小惠来不断地收买熟练工人上层，即所谓工人贵族。从这个工人阶层中产生了不少工会和合作社的领导者、地方议会和国会的议员、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战争时，这些人害怕失掉自己的地位，于是就成了革命的敌人，成了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最狂热的维护者。

机会主义者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社会沙文主义者包括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鼓吹工人在国内要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和平**，在国外要同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战争。他们向群众隐瞒战争的真正祸首，说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不是造成战争的祸首。许多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本国◇183◇帝国主义政府中的部长。

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所谓中派，对于无产阶级事业也是同样危险的。中派分子考茨基、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人，极力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洗刷、辩护。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起背叛无产阶级，只不过用了一些专门欺骗工人阶级的“左的”反战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罢了。事实上中派是支持战争的，因为中派提议在表决用于战争的拨款时不投票反对而只限于弃权，就等于是支持战争。他

们也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要求在战争期间放弃阶级斗争，以免妨碍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中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战争和社会主义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是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

列宁从战争爆发时起，就开始聚集力量，准备建立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1914年11月的反战宣言[①]中，就已提出了成立第三国际来代替已经遭到可耻破产的第二国际这一任务。

1915年2月，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李维诺夫同志受列宁委托作了发言。李维诺夫要求比法两国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桑巴、盖得)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并完全同帝国主义者决裂，放弃同他们合作。他要求所有社会党人都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作坚决的斗争，并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但李维诺夫的呼声在这个会上没有得到响应。

1915年9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称这次会议是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第一步”[②]。列宁在这次会上组织了一个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但在这个齐美尔◇184◇瓦尔得左派中，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贯彻到底的反战立场。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用德文出版了《先驱》杂志，上面刊载过列宁的文章。

1916年，在瑞士的昆塔尔村召开了国际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这时差不多在所有国家中都已有一批国际主义者分离出来，国际主义分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已经更加明显了。而主要的是，这时群众自己已因受战争和战

——————————————

① 指《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68－57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367页。——译者注

争灾难的影响而左倾了。昆塔尔宣言的拟定是会上互相斗争的各个集团妥协的结果。它和齐美尔瓦尔得宣言相比前进了一步。

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终究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的过程，后来正是这些分子组成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列宁批评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不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错误，同时又帮助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布尔什维克不是那种只是感叹和平和局限于宣传和平的和平主义者(和平派)，像大多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布尔什维克主张用积极的革命斗争来争取和平,直到推翻好战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把和平事业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消灭战争，取◇185◇得公正的和平，即取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最可靠的手段。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背弃革命的行为和在战争时期保持“国内和平”的叛卖性口号，而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说，劳动群众，包括武装的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如果想摆脱战争而赢得公正的和平，就应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并推翻他们的政权。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保护资产阶级祖国的政策,而提出“**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政策。这就是说，必须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军队中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支持前线士兵联欢，组织工农的反战革命发动，并把这种发动转变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起义。

布尔什维克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对人民害处最少的是沙皇政府在军事上失败，因为这种失败有助于人民战胜沙皇制度，有助于工人阶级顺利地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列宁认为不仅俄国革命者，而且**一切**交战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都应实行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失败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们只是反对掠夺性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认为战争有两种：

(一)**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性的战争，其目的或者是保卫人民抵御外来的侵犯和奴役人民的企图，或者是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或者是把殖民地和附属国从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其目的是掠夺和奴役别的国家和别国人民。

布尔什维克拥护前一种战争。至于后一种战争，布尔什维克以为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举行革命和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186◇

列宁在战争时期所写的理论著作，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都有巨大的意义。1916 年春，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它已由“进步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寄生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自行死亡，不是说资本主义会自己连根烂掉。列宁始终教导说，不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列宁在这本书中肯定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之后，同时说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因素日益成熟。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对帝国主义愤恨因素日益增长，反帝解放战争的因素日益增加。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37 页。——译者注

义的矛盾特别尖锐；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争夺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使得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列宁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使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

列宁根据这一切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某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战线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187◇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写的两篇不同的文章中，把这个英明的结论表述如下：

(一)“经济政治发展的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摘自 1915 年 8 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232--233 页)[①]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09 页。——译者注

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摘自1916年秋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25页)[①]◇188◇

这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单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关于社会主义胜利条件、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前途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就已规定了的。

这个理论同**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主义将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卓越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论据，改变了这种已经过时的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用新的理论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向各个国家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冲击本国的资产阶级，教导他们利用战争环境去组织这样的冲击，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一理论和策略在俄国进行了他们的实际工作。

在战争开始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3页。——译者注

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和沙果夫不顾警察的残酷迫害，巡视了许多地方组织，在那里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革命态度问题的报告。1914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开会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开到第三天，全体代表都被捕了。法庭判决剥夺所有这些代表的权利，判处他们在西伯利亚东部终身流放。沙◇189◇皇政府给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定的是“叛国”罪。

在法庭上揭示出来的杜马代表的活动情况，使我们党感到光荣。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沙皇法庭上表现得很英勇，他们把沙皇法庭变成了揭露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讲坛。

当时为此案受到审讯的加米涅夫却是另一种表现。他由于胆怯成性，一遇到危险就背弃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声明他在战争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不合，并为证明这点请求法庭把孟什维克约尔丹斯基传来作证。

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反对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反对孟什维克想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资产阶级切身需要在大众面前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全民的战争。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全俄组织 —— 地方自治局联合会和市政公所联合会，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事务。同时，它还想使工人也服从它的领导和影响。资产阶级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工人小组”。孟什维克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想法。把工人代表拉进这些军事工业委员会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有些工人当了代表，就会到工人群众中间进行鼓动，说必须在炮弹厂、大炮厂、枪械厂、子弹厂以及其他进行国防生产的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切为了战争，一切用于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是说：“不顾一切地靠军事订货和侵占别国领土发财吧。”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玩弄的这种冒牌爱国主义勾当，他们帮助资本家拼命鼓动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的“工人小

组”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花招。他们主张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选种抵制。但一部分工人仍然在著名的孟什维克格沃兹迭夫和奸细阿布罗西莫夫领导下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当工人代表在1915年9月集合起来进行军事工业委员会“工◇190◇人小组”决选时，才发现大多数代表都反对参加“32人小组”。大多数工人代表通过了强烈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说明工人的任务是为和平、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中也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向士兵和水兵群众说明谁是造成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惨祸和人民苦难的罪人，说明革命是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中，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建立了支部，散发了反战传单。

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成立了“喀琅施塔得军队党组织总干事团”，总干事团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下设立了负责在卫戍部队中进行工作的军事局。1916年8月，彼得格勒保安局局长呈报说：“喀琅施塔得干事团工作做得很慎重、很严密，参加者都是一些沉默寡言和作事谨慎的人。该干事团在岸上也派有自己的代表。”

党在前线进行了鼓动，号召交战国军队的士兵联欢,并着重指出：敌人就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只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才能结束战争。个别部队拒绝进攻的事件日益增多了。早在1915年，特别是1916年，就已有过这样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北方战线各集团军中进行了特别巨大的工作。1917年初，北方战线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向上级报告，说布尔什维克在北方战线开展了规模巨大的革命工作。

战争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最大转折。它使各个国

家的命运、各国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都处于决定的关头。因此，它同时又是对所有以社会主义自命的党派的试金石和考验。这些党派是坚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国际主义事业◇191◇呢，还是宁愿背叛工人阶级，卷起自己的旗帜,把它抛到本国资产阶级的脚下呢，——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战争表明，第二国际各党没有经住考验，背叛了工人阶级，在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放下了自己的旗帜。

这些党也不能不如此,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间培植机会主义，它们是用对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让步的精神教育出来的。

战争表明，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光荣地经住了考验，才彻底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

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新型的党，只有用同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党，只有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党，才能经得起伟大的考验，才能坚持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事业。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样的党。

四 沙皇军队在前线的失败。经济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战争已经进行三年了。战争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有的被打死，有的因伤致死，有的死于战争所引起的瘟疫，资产阶级和地主大发战争财。而工人和农民却愈来愈贫穷困苦。战争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约有一千四百万壮劳力被拉去当兵，脱离了生产。工厂纷纷停产。谷物播种面积因缺乏劳力而缩减。居民和前线士兵忍饥挨饿,赤脚露体。战争耗尽了国内的一切资源。

沙皇军队屡战皆败。德军炮兵轰击沙皇军队时弹如雨下，而沙皇军队则缺乏大饱,缺乏炮弹,甚至缺乏步枪，有时三个士兵用一枝枪。还在战争期间就已发觉了沙皇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同◇192◇德国特务勾结的卖国行为。苏霍姆林诺夫执行德国间谍机关的指令，破坏前线的弹药供应，不供给前线大炮和枪枝。沙皇的一些大臣和将领自己暗中协助德军获胜：他们同跟德方有勾结的皇后一起把军事秘密泄露给敌军。难怪沙皇军队屡遭失败，不得不退却。到 1916 年，德军已侵占了波兰边境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地区。

这一切激起了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对沙皇政府的深恶痛绝，使后方和前线、中心地区和边沿地区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加强和加剧起来。

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不满情绪。它看见权奸拉斯普庭之流悍然企图同德方单独媾和，而沙皇朝廷上又由他们说了算，感到十分恼火。它愈来愈确信沙皇政府不能进行胜利的战争。它害怕沙皇政府为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去同德方单独媾和。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决定举行宫廷政变，以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另立同资产阶级有勾结的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资产阶级是想借此一箭双雕：第一，僭取政权而保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用小小的宫廷政变来阻止当时已经汹涌澎湃的人民大革命。

英法政府在这方面完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它们知道沙皇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它们害怕沙皇会以同德方单独媾和而就此了事。要是沙皇政府缔结单独和约，英法政府就要失掉俄国这样一个战争中的同盟者，俄国就不仅不能在自己战线上牵制敌军力量，而且不能向法国提供数以万计的俄国精锐部队。因此，它们支持俄国资产阶级举行宫廷政变的尝试。

于是沙皇陷于孤立了。

在前线接连失利的同时，经济破坏也有增无减。1917 年 1、2 月间。粮食、原料和燃料生产方而的破坏,已达到最厉害最尖锐的地步。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食品，差不多完全停止了运输。◇193◇企业相继倒闭。企业的倒闭又使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生活特别困苦不堪。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确信：要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只有一条出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制度显然经历着毁灭性的危机。

资产阶级想用宫廷政变来解决危机。

但人民按自己的方式把危机解决了。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覆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年一开始就发生了1月9日的罢工。在罢工时，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和下新城都举行了游行示威，而且莫斯科参加1月9日罢工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当时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有两千示威群众被骑警驱散。在彼得格勒的维波尔格公路上，有士兵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

彼得格勒警察局报告说："有总罢工这种想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想法已经像1905年那样成为普遍的想法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纳入自由资产阶级需要的轨道。2月14日国家杜马开幕这天,孟什维克提议组织工人游行去向国家杜马请愿，但工人群众跟布尔什维克走了，不是去向杜马请愿，而是去游行示威。

1917年2月18日,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2月22日，大多数大企业的工人也宣布了罢工。2月23日(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女工们响应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号召，上街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工人们举行了全彼得格勒的总罢工来支援女工的游行示威。政治罢工开◇194◇始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示威了。

2月24日(3月9日)，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工工人已达二十万左右。

2月25日(3月10日)，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工人的彼得格勒。各区的政治罢工转变成全彼得格勒的政治总罢工。到处都在举行游行示威，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工人群众举着的红旗上写着这样的口号：

“打倒沙皇 ！”“打倒战争！”“面包！”

2 月 26 日(3 月 11 日)清晨，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开始转变为起义的尝试。工人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把自己武装起来。但当时同警察发生的武装冲突，却以示威群众在兹那缅斯克广场上遭受枪击而告终。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发出布告,说工人必须在 2 月 28 日(3 月 13 日)复工,不然就要把他们派往前线。2 月 25 日(3 月 10 日)，沙皇给哈巴洛夫将军下令：“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

但要“制止”革命已经办不到了。

2 月 26 日(3 月 11 日)白天，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开火了,不过不是向工人开火，而是向那些同工人交火的骑警队开火。当时大力地坚持地展开了争取军队的工作，尤其是女工，她们径直走到士兵面前，同他们欢谈，号召他们帮助人民推翻那个令人痛恨的沙皇专制制度。

当时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的，是设在彼得格勒的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2 月 26 日(3 月 11 日),中央局发表宣言，号召继续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2 月 27 日(3 月 12 日)，彼得格勒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开始转到起义的人民方面来。2 月 27 日早晨起义的士兵还只有一万◇195◇人，而到晚上就已超过了六万人。

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狱中的革命者。被释放的政治犯加入了革命斗争事业。

在街上，群众还在同那些架着机关枪盘踞房顶的巡警和宪兵互相射击。但军队迅速转到工人方面来，已决定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命运。

当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消息传到其他城市和前线时，各处的工人和士兵都起来推翻沙皇官吏。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

革命所以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工人阶级做了革命的先锋，领导了数百万身穿军服的农民群众“争取和平，争取面包，争取自由”的运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决定了革命的成功。

列宁在革命的初期写道：“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表现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率领了最广泛的劳苦大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23—24页）[①]

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准备了1917年的第二次革命的迅速胜利。

列宁写道：“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么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以内完成。”（同上，第13页）[②]

在革命的最初几无就出现了苏维埃。获得胜利的革命依靠着工兵代表苏维埃。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1905年的革命表明，苏维埃是武装起义的机关，同时又是革命新政权的萌芽。苏维埃思想已经深入到工人群众意识中，所以他们◇196◇在推翻沙皇制度后的第二天就实现了这一思想，不过所不同的是，1905年成立的还只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而 1917年2月则由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的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在苏维埃中夺取代表席位以组成自己的多数。其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部分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袖还在监狱和流放地（列宁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彼得格勒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因此，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握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页。——译者注

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权。莫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也是这种情况。只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其他几个城市，苏维埃中的多数才是从一开始就属于布尔什维克。

武装的人民——工人和士兵选派自己的代表到苏维埃去，是把苏维埃当作人民政权机关看待的。他们认为并且相信，工兵代表苏维埃定会实现革命人民的一切要求，并且首先会缔结和约。

但过度的轻信使工人和士兵上了大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结束战争，争取和平。他们想的是利用革命来继续战争。至于革命和人民的革命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革命已经完结了，现在的任务是巩固革命，转上按“正常的”宪制的原则同资产阶级共处的轨道。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竭力设法把结束战争的问题、和平的问题压下去，并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19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12 日)，国家杜马中的自由派代表根据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的秘密协定，成立了以第四届杜马主席、地主首领兼保皇派罗将柯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几天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197◇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又背着布尔什维克商定了组织俄国的新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让早在二月革命前就由沙皇尼古拉二世指定充任自己政府首相的李沃夫公爵来担任首脑。参加临时政府的有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米留可夫，十月党人的首领古契柯夫，以及资本家阶级的其他的有名的代表，而作为“民主派”代表参加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

结果就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把政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知道此事之后,又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而以多数表决认可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的行动。

于是在俄国就形成了如列宁所说的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①]的代表所组成的新的国家政权。

但是当时同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还有另一个政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中的士兵代表主要是被征召参战的农民。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反对沙皇政权的工农联盟机关，同时又是工农政权机关，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

于是就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专政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工农专政二者交错在一起的特殊局面。

结果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为什么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呢？

为什么获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呢？

列宁认为，这是因为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千百万人缺乏◇198◇政治经验。他们大部分是小业主、农民、不久前还是农民的工人，即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人们。当时俄国是欧洲所有的大国中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15页)[②]。

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涌到表面上来了。

列宁指出,另一个原因就是无产阶级的成分在战争时期起了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开始时缺乏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在战争时期，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0页。——译者注

无产阶级本身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骨干工人被征召入伍了。在战争年代，有很多同无产阶级心理格格不入的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为逃避征兵而钻进了企业。

工人中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取养料的土壤。

正因为如此，缺乏政治经验、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所吞没、沉醉于革命的最初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就成了妥协主义政党的俘虏，同意把国家政权让给资产阶级，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进行自己的工作。

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在群众中耐心地进行解释工作：揭穿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说明不用苏维埃政府代替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和平。◇199◇

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就用全力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

它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机关报。二月革命后第五天，《真理报》就在彼得格勒开始出版；再过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莫斯科出版了。党开始出来领导正在放弃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信任，放弃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信任的群众。党耐心地向士兵、向农民解释必须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党向他们解释，不继续发展革命，不以苏维埃政府来代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农民就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土地。

简 短 的 结 论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是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由于几大强国之间的均势遭到破坏，由于帝国主义者需要用战争重新分割世界和造成新的均势。

如果第二国际各党不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如果它们不违背第二国际几次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如果它们下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并发动工人阶级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反对战争挑拨者，那么战争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破坏性，或许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

布尔什维克党表明，它是坚持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事业并组织了国内战争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二国际所有其余的党因为经过它们的上层领导同资产阶级拴在一起，都成了帝国主义的俘虏，投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了。

战争本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而战争本身又加剧了这个危机，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俄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弱点，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了沙皇并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200◇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士兵以至工人沉醉于革命最初的胜利，满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谓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担保，都痴心信任临时政府并给它以支持。

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向这些沉醉于最初的胜利的工人和士兵群众说明：现在离革命完全胜利还很遥远；只要政权还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而苏维埃还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些妥协派所操纵，人民就既不能获得和平，也不能获得土地，也不能获得面包；要获得完全的胜利,必须前进一步,使政权转归苏维埃。◇201◇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17 年 4 月－1918 年)

一　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走出地下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

事变和临时政府的行为，日益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确。它们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不支持人民而反对人民，不主张和平而主张战争；临时政府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给予和平、土地和面包。布尔什维克的解释工作获得了适宜的土壤。

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政府和消灭了君主制的根基，而临时政府则分明想把君主制保存下去。1917 年 3 月 2 日，它密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见沙皇。资产阶级想把政权转交给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弟弟米哈伊尔。但是当古契柯夫在铁路工人的集会上演说完毕高呼“米哈伊尔皇帝万岁”的时候，工人们要求立即逮捕和搜查古契柯夫，并忿然说道：“洋姜不比萝卜甜。”

很清楚，工人是决不容许恢复君主制的。

工人和农民干革命、洒热血，是盼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和土地，要求采取坚决措施来消除经济破坏现象；而临时政府却对◇202◇人民的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闻。这个由资本家和地主的最有名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根本不想满足农民关于把土地转归他们的要求。同样，它也不可能给劳动者以面包，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得触犯大粮

商的利益，就得用各种办法征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但政府是下不了决心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就同这些阶级的利益分不开。同样，它也不可能给予和平。同英法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临时政府，不仅不想停止战争，反而企图利用革命来使俄国更加积极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和两个海峡、占领加里西亚的帝国主义计划。

很清楚，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所持的轻信态度很快就要完结了。

显然，二月革命后所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可能长久支持下去，因为事变进程要求政权集中到一方面：或是集中到临时政府宫墙内，或是集中到苏维埃手中。

诚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暂时还受到支持。当时还有不少工人，尤其是士兵和农民，相信“很快就会有立宪会议来把一切安排妥贴”,以为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需要。列宁把这种人叫作诚心诚意误入迷途的护国派。当时这些人还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许诺和劝说政策看作是正确的政策。但是很清楚，靠许诺和劝说是不可能支持多久的，因为事变进程和临时政府的行为日益暴露和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政策是拖延时日和欺骗轻信者的政策。

临时政府没有局限于暗中反对群众革命运动的政策，即用阴谋手段反对革命的政策。有时它也企图公开向民主自由进攻，企图“恢复纪律”(特别是在士兵中)，企图“整顿秩序”，即把革命纳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但不管它怎样朝这方面努力，总是不成◇203◇功。人民群众照样起劲地实现着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自由。工人和士兵力求充分利用他们第一次争得的民主权利来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以便认识和理解目前的局势，并决定今后如何行动。

二月革命后，曾在沙皇制度的极其困难条件下秘密活动的布尔什

维克党组织走出了地下状态,开始进行公开的政治和组织活动。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数不过四万至四万五千。但这是在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干部。各级党委会已按民主集中原则实行了改组,确立了全党上下各级机关都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党一转到合法状态,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加米涅夫和莫斯科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采取半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地回来)和莫洛托夫等人,同党内多数同志一起.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号召积极地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一部分党的工作人员态度动摇,反映出他们由于长期蹲监狱、被流放而造成的政治上的落后。

处处感觉到党的领袖列宁不在。

1917 年 4 月 3 日(16 日),列宁经过长期流亡以后,回到了俄国。

列宁的归来,对党、对革命有着巨大的意义。

列宁还在瑞士接到革命的最初消息时,就在从那里寄发的《远方来信》中向党和俄国工人阶级写道:

“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0 卷第 19 页)[①]◇204◇

列宁于 4 月 3 日夜到达彼得格勒。当时在芬兰车站和车站前的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欢迎列宁。列宁一下车,群众就狂热地欢腾起来。他们把列宁举在手上,就这样把自己的领袖举到车站大厅。孟什维克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开始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致“欢迎”词,“表示希望”列宁会找到和他们“共同的语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1 页。——译者注

言”。但列宁没有理会他们，而绕过他们走向工人和士兵群众，并从装甲车上发表了他有名的演说，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列宁这样结束他经过多年流亡回来后的第一个演说。

列宁一回到俄国就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工作。回国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报告，接着又在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会上重述了自己报告的提纲。

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向党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

列宁的提纲对革命、对党后来的工作有巨大的意义。革命是全国生活中最大的转折，所以党在推翻沙皇制度后新的斗争条件下，必须有一个新的方针，以便能大胆而有信心地循着新的道路前进。列宁的提纲向党提供了这样的方针。

列宁的四月提纲向党提出了一个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党自己所经历的全部历史，已使党准备好来执行这一伟大任务，早在 1905 年，列宁已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说过，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将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中的新东西，就是提出了一个有理论根据的着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计划。

在经济方面，过渡的办法是：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情况下把全国◇205◇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把所有的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并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加以监督，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

在政治方面，列宁提出由议会制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议会制共和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政治形式。现在列宁提出用苏维埃共和国来代替议会制共和国，认为苏

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

提纲中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88页)[①]

又说：“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同上，第88页)[②]

列宁说，在新政府即临时政府的统治下，战争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党的任务是要向群众说清这一点，并向他们指明，要用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产阶级不可。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所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

其次，列宁在提纲中指出,我们党在苏维埃中暂时还占少数,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孟什维克◇206◇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因此，党的任务是：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发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88页）[③]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5页。——译者注

③ 同上。——译者注

这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号召实行起义去反对当时得到苏维埃信任的临时政府，没有要求推翻它，而是力求用解释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维埃的政策，通过苏维埃去改变政府的成分和政策。

这是和平地发展革命的方针。

其次，列宁要求抛弃“肮脏的对衫”，即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第二国际各党和俄国孟什维克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已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们玷污、糟蹋了。列宁建议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呼自己的党那样，称呼布尔什维克党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共产主义。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各人的劳动分配产品。列宁说，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最后，列宁在提纲中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建立没有沾染机会主义，没有沾染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列宁的提纲引起了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疯狂叫嚣。◇207◇

孟什维克向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开头就警告说：“革命在危险中”。所谓危险，据孟什维克的意见，就是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要求。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统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列宁的演说叫做“**梦话**”。普列汉诺夫引用孟什维克齐赫泽的活说：“只有列宁一人仍将处于革命之外，而我们将走我们自己的路。”

4 月 14 日,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会议赞同列宁的提纲，并把它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

此后不久，党的各个地方组织也赞同了列宁的提纲。

全党，除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之流几个独夫外，都非常满意地接受了列宁的提纲。

二 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四月代表会议

当布尔什维克准备进一步开展革命时，临时政府却继续干着反人民的勾当。4 月 18 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盟国声明“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临时政府决意完全遵守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

这样，临时政府发誓忠于沙皇条约，并且许诺说，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最后胜利”还需要人民流多少血，它就让流多少血。

4 月 19 日,这个声明(“米留可夫照会”)已为工人和士兵们知道了。4 月 20 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号召群众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 年 4 月 20—21 日(5 月 3—4 日)，对“米留可夫照会”极表愤慨的工人和士兵群众，至少有十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旗帜上写的口号是：“公布秘密条约！”“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自城郊走向市中心，走向临时政◇208◇府所在地。在涅瓦大街和其他地方,他们和几群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冲突。

科尔尼洛夫将军之流最露骨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向示威者开枪，甚至下过这样的命令。但军队接到这种命令后拒绝执行。

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里的少数委员(巴格达齐也夫等)在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严厉地谴责了这种“左的”冒险主义者的行为，认为这个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且同党的和平地发展革命的方针相抵触。

4 月 20—21 日事件意味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

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政策中发生的第一个严重裂口。

1917 年 5 月 2 日，在群众的压力下，从临时政府中撤销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

成立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参加的除资产阶级代表外，还有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等人)。

这样，在 1905 年否认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可以参加革命的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现在却认为自己的代表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临时政府了。

这表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营垒去了。

1917 年 4 月 24 日，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开幕。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就其意义来说在党史上等于一次党代表大会。

全俄四月代表会议表明了党的蓬勃发展。出席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十八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万◇209◇名有组织的党员。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关于战争、关于临时政府、关于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等等）上的路线。

列宁在报告中发挥了他先前在四月提纲中所阐述的原理。党的任务是要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列宁)[①]。党应该采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当前任务。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必须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4 页。——译者注

面，即结束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掌政权的局面，必须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将地主资本家的代表驱逐出政权机关。

会议确认，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不倦地向群众说明这样一个真相,即“临时政府按其性质来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①，同时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政策的危害，指出他们是在用虚伪的诺言欺骗人民，使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和反革命的打击。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会上发言反对列宁。他们跟着孟什维克唱一个调子，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说俄国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建议党和工人阶级只限于“监督”临时政府。其实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存资本主义、保存资产阶级政权。

季诺维也夫也在会上发言反对列宁，他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应留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中还是同这个联盟决裂而建立新的国际这◇210◇个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正如战争年代所表明，这个联盟虽然进行和平宣传，但实际并没有同资产阶级护国派决裂。因此，列宁坚决主张立即退出这个联盟而组织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建议仍旧同齐美尔瓦尔得派留在一起。列宁坚决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个发言，称他的策略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有害的”策略。

四月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

根据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交给农民委员会支配和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号召农民为争取土地而斗争，并向农民群众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正帮助农民推翻地主的唯一的革命党。

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还在革命前，即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就已规定了民族问题上布尔什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437 页。——译者注

维克党的政策的原则。列宁和斯大林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各民族有权自决直到分离并成立独立国家。中央的报告人斯大林同志在会上捍卫了这个观点。

发言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有皮达可夫，他和布哈林一起，还在战争年代就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皮达可夫和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坚定的和一贯的立场，党为实现民族的完全平等和为消灭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保证党获得了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

下面就是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原文：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分化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211◇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消除民族压迫，除非建立最民主的共和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

必须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就等于拥护侵略政策或兼并政策。无产阶级只有承认民族分离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的充分团结，才能促进各民族真正民主的接近。……

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期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面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党要求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取消自上而下的监督，废除带强制性的国语，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

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边界。

无产阶级政党坚决摈弃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说，反对把原来由国家管理的教育事宜等等交给本民族议会管理。民族文化自治人为地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甚至在同一企业做工的工人按其所属的‘民族文化’分开，就是说，使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联系加强起来；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党要求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

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工人结成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如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教育组织等等。只有各民族工人结成这种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胜利地◇212◇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39—240页）①

这样，四月代表会议就揭穿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他们的一小撮志同道合者的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议一致拥护列宁，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推行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路线。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46—447页。——译者注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进攻的失利。工人和士兵七月游行示威的被镇压

党根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定展开了争取群众、用战斗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巨大工作。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是，通过耐心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揭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在群众中孤立这两个党，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

除在苏维埃中工作外，布尔什维克还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在军队中，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到处都开始建立军事组织。在前线和后方，布尔什维克孜孜不倦地努力进行着士兵和水兵的组织工作。布尔什维克的前线报纸《战壕真理报》，在促使士兵革命化方面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很多城市的工人就改选了苏维埃——特别是区苏维埃，驱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选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拥护者。◇213◇

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彼得格勒。

1917 年 5 月 30 日—6 月 3 日,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已占四分之三。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差不多全体都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1917 年 6 月 3 日(16 日)，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还占少数,他们在会上仅有一百多名代表，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却有七八百名代表。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坚决地揭露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危害性,揭穿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论证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正确,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给劳动者面包、给农民土地,才能争得和平,才能使国家摆脱经济破坏状态。

这时彼得格勒各工人区正广泛酝酿着组织游行示威和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一些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了防止工人自动游行示威,为了把群众的革命情绪引导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定6月18日(7月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望这次游行示威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举行。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准备着这次游行示威。斯大林同志当时在《真理报》上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彼得格勒6月18日的游行示威在我们的革命口号下举行。"①

1917年6月18日在革命烈士墓旁举行的游行示威,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的一次真正检阅。它表明群众的革命性日益高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日益提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信任临时政府、必须继续战争的口号,淹没在布尔什维克口◇214◇号的汪洋大海中了。四十万示威者举着旗帜,上面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的一次惨败,是临时政府在首都的一次惨败。

但是,临时政府因为得到了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支持,决定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恰巧在6月18日这天,临时政府遵照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旨意,驱使前线士兵进攻。资产阶级认为这次进攻是结束革命的唯一机会。如果进攻胜利,资产阶级打算攫取全部政权,排挤苏维埃,摧毁布尔什维克。如果进攻失利,照样可以把全都罪过推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3页。——译者注

给布尔什维克，就怪他们瓦解了军队。

进攻显然是要失败的，而它果真失败了。士兵的疲劳，他们对进攻目的的茫然不解，他们对异己的军官的不信任,炮弹和大炮的缺乏，——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前线进攻的失败。

前线进攻以及接着进攻失败，消息传来，首都大哗。工人和士兵愤怒万分。原来，临时政府宣布和平政策是欺骗人民。原来，临时政府主张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原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不想制止，或者说不可能制止临时政府的罪恶行动，并且自己做了临时政府的尾巴。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义愤达到了极点。7 月 3 日(16 日)，在彼得格勒的维波尔格区自发地开始了一次次的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持续了一整天。单个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了总的大规模的武装游行示威，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本来反对在这个时候实行武装发动，因为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省还没有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在首都举行孤立的和为时过早的起义只会有助于反革命击溃革命先锋队。但是当看到阻止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已不可能时，党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变成和平的和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做到了这点，于是几十◇215◇万示威者就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进发，要求苏维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虽然游行示威带有和平的性质，但还是调了反动部队(士官生和军官队伍)来对付示威者。彼得格勒街头洒满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为了击溃工人，从前线调回了最愚昧无知的反革命军队。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和白卫将军镇压了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之后，就猛攻布尔什维克党。《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真理报》、《士兵真理报》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被封闭。工人沃伊诺夫只是因为出售《真理小报》就在街上被士官生杀害。开

始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撤出首都而调往前线。在后方和前线进行逮捕。7月7日，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遭逮捕。印刷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劳动”印刷所被捣毁。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布告，说列宁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因“叛国”和策划武装暴动，应受审判。加给列宁的罪名，是邓尼金将军司令部根据特务和奸细的证词伪造出来的。

这样，有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代表参加的联合临时政府，滚到公开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泥潭中去了。它不实行和平政策，而实行继续战争的政策。它不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实行取消这种权利并用武力摧残工人和士兵的政策。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没有敢做的事情，“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却做了。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

结束得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全部政权转到了临时政府手中，而苏维埃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附◇216◇属品。

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因为刺刀已经提上日程。

鉴于形势改变,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党转入地下，把自己的领袖列宁深深地隐藏起来，开始准备起义，以便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四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刊大肆攻击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十年和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五年召开的。大会于1917年7月26日—8月3日秘密举行。报上只公布了开会的消息没有指明开会的地点。头几次会在维波尔格区举行。后几次会在纳尔瓦门附近的一个学校举行，现在那里已经盖起了文化馆。资产阶级报纸要求逮捕大会参加者。密探疲于奔命，想找到开会的地点，但怎么也没有找到。

这样，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五个月以后，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秘密开会，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躲藏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一个草棚中。

列宁虽因受临时政府的密探追寻没能出席大会。但他通过自己在彼得格勒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泽，秘密地领导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一百五十七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二十八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当时党员人数在二十四万左右。截至7月3日，就是说在工人的游行示威被摧残之前,布尔什维克还在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党拥有四十一个机关刊物，其中二十九个是俄文◇217◇的，十二个是其他文字的。

在七月事变时对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的迫害，不仅没有使我们党的影响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各地代表举出的大量事实说明：

工人和士兵开始大批脱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轻蔑地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狱卒”。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工人和士兵党员纷纷撕毁自己的党证，咒骂着离开他们的党，而请求布尔什维克接收他们加入自己的党。

大会上的主要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政治形势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倾全力镇压革命，但是革命仍然在不断发展。他指出，革命提出了关于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问题。他说，革命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七月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苏维埃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不想掌握全部政权。因此，苏维埃已经没有权力了。政权已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而这个政府还在解除革命的武装，摧残革命的组织，摧残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斯大林同志说，现在只有一条路：推翻临时政府，用暴力夺取政权。但能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只有同农村贫民联盟的无产阶级。

仍然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着的苏维埃，已滚入资产阶级的营垒，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起临时政府走卒的作用。斯大林同志说：在七月事变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当撤回。但暂时撤回这个口号并不是说不再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了。当时说的不是作为革命斗争机关的一般苏维埃，而仅仅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那些苏维埃。

斯大林同志说：“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不和平的时◇218◇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①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5页。——译者注

党朝着武装起义前进。

会上有人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同志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提议。

斯大林同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同上，第233—234页)[①]

布哈林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说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说农民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而不会跟工人阶级走。

斯大林同志驳斥了布哈林。他证明说，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有富裕农民，也有贫苦农民。前者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后者愿同工人阶级联盟，并一定会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支持工人阶级。

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提出的修正案，批准了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

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的要点是：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全国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把银行收归国有，把大工业收归国有，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大会强调了为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意义（工人监督生◇219◇产在把大工业收归国有时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它的所有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的原理。

大会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工会中立论。大会指出，只有在工会始终是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政治领导的战斗的阶级组织的情况下，俄国工人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4页。——译者注

阶级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才能实现。

大会通过了《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当时青年团往往是自动成立的。经过后来的努力，党终于把这些青年组织作为党的后备军管起来了。

大会讨论了列宁应不应当到法庭受审的问题。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等人还在大会召开以前就认为，列宁应当到反革命法庭去受审。斯大林同志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认为这不是审判，而是迫害。大会毫不怀疑，资产阶级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列宁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进行肉体摧残。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对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警察式的迫害，并致函列宁表示慰问。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党章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应当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

这就是说：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按选举产生；

(二)党的各级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四)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执行。

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根据党员二人介绍，经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后，由地方党组织接收入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接收了“区联派”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入党。这是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它从1913年起就存在于彼得格勒，成员是◇220◇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和一部分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前布尔什维克。战争期间，“区联派”是个中派组织。他们反对过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许多方面也不赞同孟什维克，因此他们采取的是中间的、中派主义的、动摇的立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区联派”声明，他们在一切方面赞同布尔什维克，并请求接收他们入党。大会满足了

他们的请求，指望他们将来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区联派”分子，如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等,后来真正成了布尔什维克。至于托洛茨基及其某些亲密朋友，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们入党不是为了进行有益于党的工作，而是为了动摇党和从内部炸毁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都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去实行武装起义。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武装起义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大会发表了党的宣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准备力量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宣言结尾说：

“我们的战斗同志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要坚定、勇敢、镇静，不受挑拨，积蓄力量，列成战斗的队伍！无产者和士兵们，站到党的旗帜下来！农村的被压迫者们，站到我们的旗帜下来!”①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507 页。——译者注

五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阴谋。阴谋被粉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资产阶级夺得全部政权之后，就准备摧毁软弱无力的苏维埃，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悍然声称他看到了摆脱现状的出路，说“饥饿的魔掌和人民的贫困定会扼杀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在前线，为士兵设立的战地法庭和死刑猖獗一时。1917 年 8 月 3 日，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在后方也实行死刑。

8 月 12 日，临时政府为动员资产阶级地主的力量,在莫斯科的大剧院召开了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将军、军官和哥萨克的代表。代表苏维埃出席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在国务会议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组织了有大多数工人参加的总罢工作为抗议。在其他许多城市也同时举行了罢工。

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在会上讲话时吹嘘自己的力量，扬言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革命运动的任何尝试，包括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尝试在内。

反革命将军科尔尼洛夫公然要求“取缔各委员会和苏维埃”。

银行家、商人和工厂主，接踵到大本营(当时这样称呼总司令部)来见科尔尼洛夫将军，答应会给他钱和支持。

“盟国”即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也来见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他立刻起事反对革命。

眼看科尔尼洛夫将军就要发动反对革命的阴谋了。

科尔尼洛夫的阴谋是公开准备的。为了转移视线，阴谋者们散布

流言，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于8月27日革命半周年那天在彼得格勒举行起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猛攻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政党加紧实行恐怖手段。同时，科尔尼洛夫将军调集军队，准备把它们开到彼得格勒来消灭苏维埃和建立军事独裁政府。◇222◇

科尔尼洛夫准备这次反革命发动，事先是同克伦斯基商量好的。但是在科尔尼洛夫举行发动的时候，克伦斯基突然改变方针，和自己的同盟者划清了界限。克伦斯基害怕，如果他的资产阶级政府不立刻同科尔尼洛夫叛乱划清界限，那么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和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时，也会把它一起扫除。

8月25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将军指挥的第三骑兵军开往彼得格勒，宣称他要“拯救祖国”。为了反击科尔尼洛夫的暴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工人和士兵对反革命势力进行积极的武装抵抗。工人迅速地武装起来准备抵抗。赤卫队在这些日子里增长了好几倍。工会动员了自己的会员。彼得格勒的革命部队也作好了战斗准备。在彼得格勒周围挖好了战壕，设置了铁丝网，拆毁了铁道。几千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开来保卫彼得格勒。向进攻彼得格勒的“野蛮师”派出了一些代表，去对山民士兵说明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实质，于是“野蛮师”拒绝进攻彼得格勒了。对科尔尼洛夫的其他部队也派去了鼓动员。凡是有危险的地方，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指挥部。

在这些日子里，吓得要死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包括克伦斯基在内，都到布尔什维克这里来寻求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在首都唯一能够击败科尔尼洛夫的实际力量是布尔什维克。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动员群众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同克伦斯基政府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在群众面前揭露了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他们的全部政策在客观上帮助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阴谋。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了。克雷莫夫将军开枪自杀。科尔尼洛夫及其同僚邓尼金和卢柯姆斯基被捕(不过克伦斯基不久就把他们释放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一下子被粉碎，揭示了和说明了革命和反革◇223◇命的力量对比，表明整个反革命营垒，从将军们和立宪民主党到沦为资产阶级俘虏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必然要灭亡。很清楚，把力不胜任的战争拖延下去的政策和由旷日持久的战争引起的经济破坏，彻底破坏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其次，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已成长为革命的决定力量，能够击败任何反革命阴谋。当时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它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是作为真正执政的力量在那里起作用的，因为工人和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它的指示。

最后，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仿佛已经死亡了的苏维埃实际上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抵抗力量。毫无疑义，正是苏维埃及其革命委员会挡住了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损伤了他们的力量。

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使气息奄奄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复活起来，摆脱了妥协主义政策的束缚，走上了革命斗争的康庄大道，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方面。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空前增长了。

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影响也迅速增长起来。

科尔尼洛夫暴动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地主和将军们摧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以后，接着就将进攻农民。因此，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至于中农，如果说他们的动摇阻碍过1917年4—8月时期的革命发展，那么在科尔尼洛夫被击溃以后，他们已在向贫苦农民群众靠拢，开始肯定地转向布尔什维克党方面。广大的农民群众已经开始了解，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使他们摆脱战争,才有能力摧毁地主并准备把土地转交农民。1917年9月和10

月，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事件大大增加。自行耕种地主土地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劝说或讨伐队，都已制止不住奋起革命的农民了。

革命高潮正在到来。◇224◇

苏维埃活跃和革新的阶段即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阶段开始了。工厂和部队改选自己的代表，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选进苏维埃去代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第二天，即 8 月 31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彼得格勒苏维埃原来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席团宣布辞职，让位给布尔什维克。9 月 5 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莫斯科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席团也宣布辞职，让路给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说，成功的起义所必需的基本前提已经成熟。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的口号重新提上了日程。

但这已不是把政权转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苏维埃手中的那个旧口号。不，这是苏维埃起义反对临时政府以便使国内全部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的口号。

各妥协主义党派内部一片混乱。

社会革命党内部在怀有革命情绪的农民的压力下出现了一个左翼，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开始表示不满意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

孟什维克中也出现了一个“左派”集团，即所谓“国际主义者”集团，他们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是个没有多大影响的集团，现在已彻底瓦解为一些很小的集团。有的去同社会渣滓中的刑事犯、盗贼和奸细为伍，有的去作“有思想的”剥夺者，抢劫农民和小市民，掠夺工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储金；有的公开转入反革命分子的营垒，在资产阶级豢养下过日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一切政权，特别是反对工农的

革命政权，因为他们深知，革命政权决不会让他们抢劫人民和侵吞人民的财产。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作◇225◇过一次尝试，想削弱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为此他们在1917年9月12日召开了全俄民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妥协派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以及军队的代表。由这次会议产生了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妥协派想利用预备议会来阻止革命,使俄国离开苏维埃革命道路而走上资产阶级宪制发展的道路，即走上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但这是已遭破产的政治家们想倒转革命车轮的绝望的尝试。它必然要遭到失败，而且果然遭到了失败。工人们嘲笑了妥协派的议会作业练习。他们挖苦预备议会是“澡堂预备间”。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抵制预备议会。诚然，像加米涅夫和泰奥多罗维奇这样的人盘踞着的布尔什维克预备议会党团，不愿意退出预备议会。但党中央强迫他们退出了预备议会。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顽固地主张参加预备议会，企图诱使党不去准备武装起义。斯大林同志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坚决反对参加预备议会。他把预备议会叫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

列宁和斯大林认为，甚至短时间参加预备议会也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预备议会真能替劳动者做些事情。

同时，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地准备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打算在这次会上争取到多数。不管盘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支吾搪塞,但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压力下，终于定于1917年10月下半月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226◇

六　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开始加紧准备起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时着重指出："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①]列宁在文章中和给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信中，提出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如何利用陆军、海军和赤卫队，彼得格勒哪些有决定意义的地点必须夺取以保证起义成功，等等。

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10月10日，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决定在最近期间开始武装起义。列宁给党中央起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说：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227◇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页。——译者注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 330 页)①

发言和投票反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的有两个中央委员，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梦想成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并诬蔑工人阶级，硬说它没有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硬说它还没有成长到夺取政权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虽然没有直接对这一决议投反对票，但是他对决议案提出了一个必然会使起义化为乌有和遭到失败的修正案。他提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就等于拖延起义一事，事先泄露起义日期，把这事预先告诉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派了全权代表分赴顿巴斯、乌拉尔、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西南战线等地去组织当地的起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同志，受了党的专门委托领导当地的起义。在乌拉尔的沙德林斯克军队中进行工作的是日丹诺夫同志。中央全权代表们向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传达了起义计划，组织他们做好动员准备，以便随时支援彼得格勒起义。

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下面成立了**革**

命军事委员会，它成了起义的公开的司令部

同时，反革命也赶紧纠集自己的力量。军官们成立了反革命的“军官联合会”。反革命分子到处都建立了突击营编建指挥部。到10月底，反革命已经拥有四十三个突击营，专门组织了几个乔治勋章军人营。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5页。——译者注

克伦斯基政府提出了把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由此可见，它准备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以防止彼得格勒发生起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反对迫使临时政府留在彼得格勒。

10 月 16 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它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发言反对起义。在遭到回击之后，他们竟在报刊上公开反对起义、反对党。10 月 18 日，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说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而他们认为起义是冒险。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向敌人泄漏了中央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这是叛变。列宁关于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①]列宁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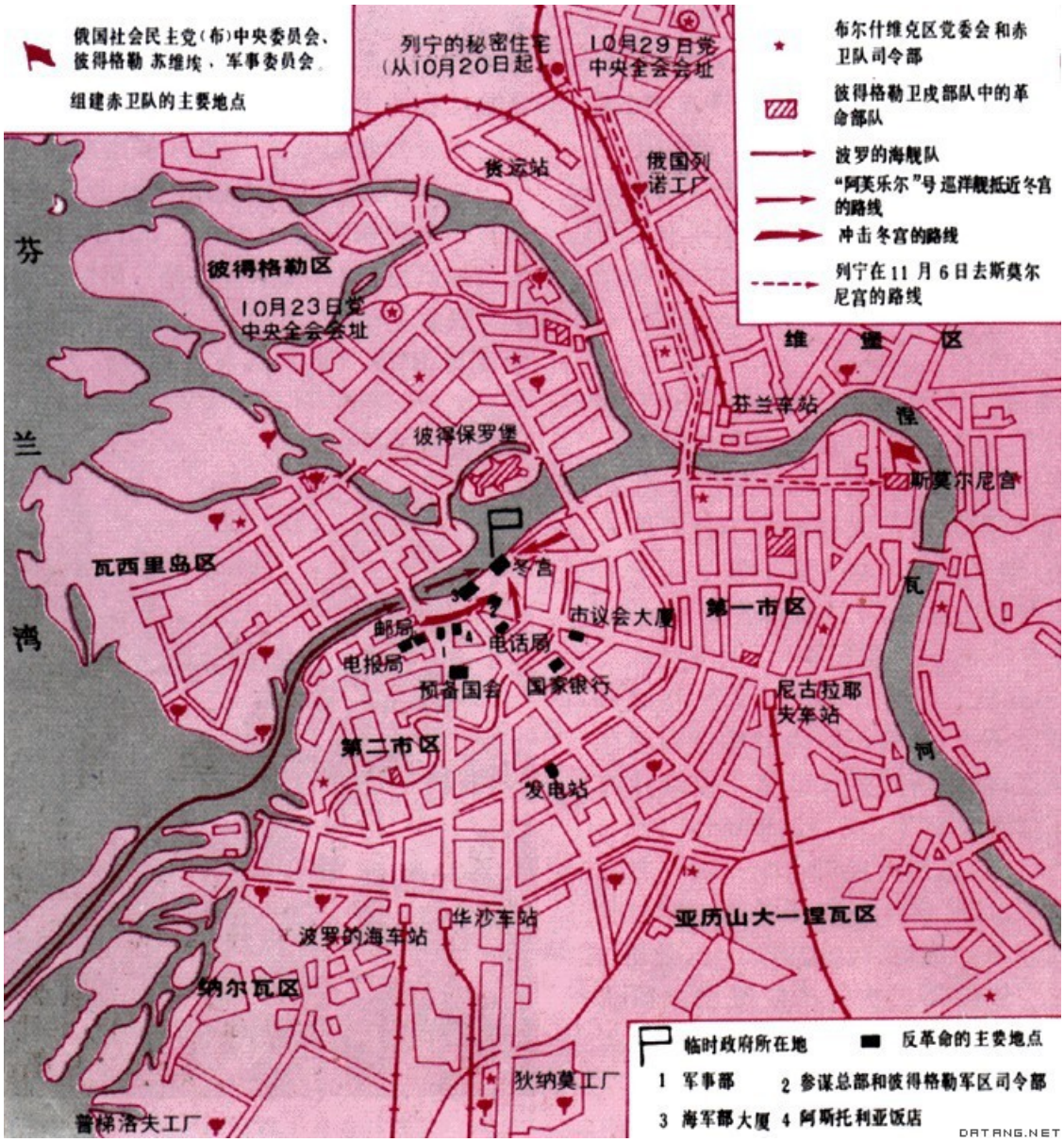
革命的敌人接到叛徒的警告，立即采取措施来防止起义，来摧毁革命的领导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临时政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解决了关于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措施问题。10 月 19 日，临时政府急忙从前线调军队来彼得格勒。街道上开始加岗巡逻。反革命在莫斯科纠集了特别大的力量。临时政府制定了一个计◇229◇划，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进攻和占领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斯莫尔尼，粉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心。为此，政府把它认为忠实可靠的部队集结到彼得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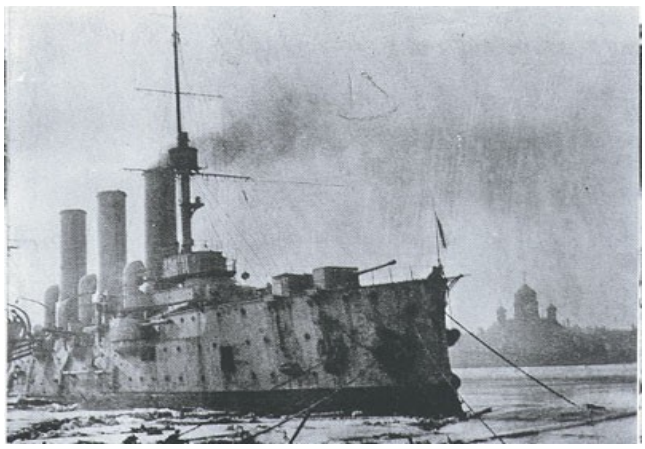
可是临时政府的末日已到。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了。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205－206 页。——译者注

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态势图





阿芙乐尔号

攻打冬宫

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向所有的革命部队派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起义前的所有日子里，各部队、各工厂都在加紧进行战斗准备。两艘战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自由曙光”号舰，也接到了明确的任务。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通过吹嘘，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泄露了布尔什维克预定开始起义的日子。为了不让克伦斯基政府有可能破坏武装起义，党中央决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即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开始和进行起义。

10月24日(11月6日)清晨，克伦斯基开始行动，下令查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并把一些装甲车开到《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印刷厂前。但到上午十点时，赤卫队和革命士兵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把装甲车赶走了，并在印刷厂和《工人之路报》编辑部附近加强了防卫。上午十一点，《工人之路报》出版了，报上号召推翻临时政府。同时，根据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的指示，革命士兵和赤卫队的队伍立即向斯莫尔尼集结。

起义开始了。

10月24日夜晚，列宁到了斯莫尔尼，直接领导起义。革命部队和赤卫队通宵不停地向斯莫尔尼开来。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派往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的老巢冬宫。

10月25日(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占领了火车站、邮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

预备议会被解散了。◇230◇

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在的斯莫尔尼，成了革命的战斗司令部，从这里发出战斗的命令。

在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的工人表明，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经布尔什维克做过工作而作好了起义准备的革命部队，准确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同赤卫队一起并肩战斗。海军也不

比陆军落后。喀琅施塔得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这里早就不承认临时政府的政权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

10月25日(11月7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告俄国公民书》，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苏维埃手中。

临时政府躲在冬宫里面，由士官生和突击营警卫着。10月25日深夜，革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起冲锋，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晚十点四十五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开幕，当时彼得格勒的胜利起义已达沸点，首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了。

布尔什维克在会上获得了压倒多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大势已去，声明不参加大会工作而离开了大会。他们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声明中,把十月革命称为“军事阴谋”。大会痛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且指出，对于他们的退出不仅不表示惋惜，反而表示欢迎，因为叛徒的退出使代表大会成了真正革命的工兵代表大会。

用大会名义宣布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说：

“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231◇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①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大会向各交战国建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2页。——译者注

以便进行和平谈判。大会在向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呼吁的同时，还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大会号召这些国家的工人帮助“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①]。

同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上面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②]。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就是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根据这个委托书，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

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一亿五千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寺院和教堂手中。

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五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

所有地下矿藏(石油、煤炭、矿石等等)、森林和水流都转归人民所有。

最后,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完全由布尔什维党组成。列宁被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232◇

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大会代表分赴各地，以传达彼得格勒苏维埃胜利的消息，并保证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全国。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权都是一下子转归苏维埃的。当彼得格勒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时，莫斯科街头还顽强激烈地进行了好几天战斗。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3页。——译者注

为了不让政权转到莫斯科苏维埃手中，反革命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跟白卫分子和士官生一起，发动了反对工人和士兵的武装斗争。过了几天，叛乱者被击败，苏维埃政权才在莫斯科建立起来。

就是在彼得格勒本城及其几个区里,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初几天，反革命分子还曾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1917 年 11 月 10 日，克伦斯基(他是在起义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往北方战线地区的)纠集了一些哥萨克部队,让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着向彼得格勒进发。1917 年 11 月 11 日，以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发动士官生叛乱。但是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叛乱者打垮了。经过一个白天，到 11 月 11 日傍晚，水兵和赤卫队就平定了士官生的叛乱，而到 11 月 13 日，又在普尔科沃高地击溃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列宁也如在十月起义时一样，亲自领导粉碎反苏的叛乱。他的坚定不移的精神和确信胜利的镇静态度，鼓舞并团结了群众。敌人被打垮了。克拉斯诺夫被俘虏，他“保证”以后决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凭这一“保证”被释放了，但是后来表明，克拉斯诺夫违背了自己的这种将军诺言。至于克伦斯基，已男扮女装藏得“不知去向”了。

在全军总司令的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杜鹤宁将军也企图发动叛乱。当苏维埃政府要杜鹤宁立刻着手同德军指挥部进行停战谈判时，他拒绝执行政府的指令。于是苏维埃政权下令撤掉杜鹤宁。反革命大本营被摧毁了，杜鹤宁本人则被起来反对他的士◇233◇兵打死。

党内人所共知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施喀普尼柯夫等人，也曾试图袭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让刚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1917 年 11 月 15 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坚决反对同这些反革命党派达成协议，宣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破坏革命的工贼。11 月 17 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柳亭因不同意党的政策，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同日，即 11 月 17 日，诺根用

本人的名义和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李可夫、弗·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亚·施喀普尼柯夫、达·梁赞诺夫、尤列涅夫和拉林等人的名义提出声明，说他们不同意党中央的政策，并退出人民委员会。一小撮懦夫的逃跑，使十月革命的敌人兴高采烈。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都幸灾乐祸，叫嚷布尔什维主义在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然灭亡。但一小撮逃兵丝毫也没能动摇党。党中央轻蔑地斥责他们是革命的逃兵和资产阶级的帮凶之后，就转而进行当前的工作。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想在明显地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农民群众中保持影响，决定不同布尔什维克争执，暂时同布尔什维克保持统一战线。1917 年 11 月召开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当时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了协议，几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也夫、斯皮里多诺娃、普罗相和施泰因别尔格)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这一协议只存在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成立贫农委员会时止，因为这时农民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而愈来愈反映富农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被苏维埃政权打垮了。

在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1、2 月这一时期，苏维埃革命扩展◇234◇到了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在广阔的国土上推进得如此迅速，列宁把这叫做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进军”。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从决定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俄国这样较为容易获得胜利的种种原因中，应该指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俄国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组织不好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敌人。在经济上还不强固而完全依赖政府定货的俄国资产阶级，既没有为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所必需的政治独立性，又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充分的主动性。它既没有如法国资产阶级那种大规模搞政治权术和政治欺骗的经验，也没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那种

大规模搞诡诈妥协的训练。它昨天还在谋求同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沙皇达成协议，所以后来到执政时根本想不出什么高招，只能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继续可恶的沙皇的政策。它和沙皇一样主张“战到最后胜利”，而不顾国家已经力不胜任、人民和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它和沙皇一样主张基本上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顾农民由于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压迫而奄奄待毙。至于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俄国资产阶级比沙皇更加仇视工人阶级，因为它不仅竭力保存和巩固工厂主的压迫，并且竭力用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使这种压迫变得更加不堪忍受。

无怪乎人民认为沙皇的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重大区别，把对沙皇的仇恨转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身上。

当妥协主义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人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还能靠它们掩护而保持住政权。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暴露自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而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之后，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就悬在空中了。

(二)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俄国工人阶级这伴一个革命阶级；它◇235◇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在短短的时期内经历过两次革命，在第三次革命前夜在争取和平、土地、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了人民领袖的威信。没有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受到人民信任的革命领袖，就不会有工农联盟；而没有这样一个联盟，十月革命就不能胜利。

(三)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有占农村居民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可以和几十年“常态”发展相比的八个月的革命经历，对于劳动农民群众并没有白白过去。在这个期间，他们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验俄国的一切政党，并且确信：无论立宪民主党，无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会为农民真正同地主翻脸和流血牺牲；俄国只有一个党同地主没有联系，并决心打倒地主，以满足农民的需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情况成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

盟的现实基础。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也决定了中农的态度,使他们在长期动摇之后，到十月起义前夜终于同贫苦农民站到一起,真正转到了革命方面。

根本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联盟，十月革命就不能胜利。

(四)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党,只有这样一个有充分的勇气、能引导人民进行坚决的冲击，又十分谨慎、能绕过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的党，才能非常巧妙地将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如争取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民主运动，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平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汇合成一个总的革命洪流。

毫无疑义,这些不同的革命潮流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的革命洪流,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五)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主要资产阶级国家分◇236◇裂成两个敌对营垒、它们正忙于互相交战和互相削弱而不可能认真干涉“俄国内政”和积极反对十月革命的时刻开始的。

毫无疑义，这种情形大大有助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78）

七月，资产阶级的屠杀

十月，无产阶级的复仇

十月革命时期的领导人

七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布列斯特和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破坏和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代之以新的苏维埃国家机构。其次，必须消灭等级制度残余和民族压迫制度，废除教会特权，取缔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最后，必须在土地国有化之后把全部大工业也收归国有，然后摆脱战争状态，结束那个最妨碍苏维埃政权巩固的战争。

这一切措施，在 1917 年底至 1918 年中这几个月内实现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的旧政府各部官吏的怠工被粉碎和消灭了。撤销了政府各部，代之以苏维埃管理机构和相应的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工业。组织了以费·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来同反革命和怠工行为作斗争。颁布了关于建立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基本上在十月革命前选出，拒绝批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政权转归苏维埃法令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了。

为了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等级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颁布了废除等级、取消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投利、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样一些法令。

苏维埃政府的一项专门决议，即人所共知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把俄国各族人民自由发展和完全平等定为法律。◇237◇

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新的苏维埃国民经济（首先是组织新的苏维埃工业),把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以及大工业

的所有部门——煤炭、冶金、石油、化学、机器制造、纺织和制糖等收归国有了。

为了使我国的财政独立和摆脱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废除(取消)了沙皇和临时政府向外国借的国债。我国各族人民不愿偿付那些用来进行掠夺战争并使我国奴隶般地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债款。

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官吏和反革命政党的势力，使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大为巩固。

但是，只要俄国还处于同德奥交战的状态，就不能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是完全巩固的。要彻底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党从十月革命刚一胜利就展开了争取和平的斗争。

苏维埃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①]。但是，英法两个“盟国”不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建议。由于英法两国拒绝和谈，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的意志，决定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

谈判于 12 月 3 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12 月 5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即暂时停止战争行动的协定。

谈判是在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们普遍疲于战争和我国军队从前线撤退、前线陷于瓦解的局势下进行的。在谈判期间看出，德帝国主义者企图夺取前沙皇帝国的大块领土，而把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变为德国的附属国。

在这些条件下继续战争，无异于拿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作赌注。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的是,必须接受苛刻的和◇238◇约条件,对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让步,以便取得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立一支能保卫国家抵抗敌人进攻的新的军队即红军。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54 页。——译者注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最坏的白卫分子,都疯狂地进行煽动，反对签订和约。他们的路线很明显，他们想破坏和谈，挑起德国人进攻，使尚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遭受打击，使工农获得的成果受到威胁。

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黑暗勾当的，是托洛茨基及其帮手布哈林——布哈林同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起领导着一个反党集团，这个集团为了掩饰自己，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党内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激烈斗争，要求继续战争。这些人显然是在帮助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力图使年轻的、还没有自己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去受德帝国主义的打击。

这是用左的词句巧加掩饰的一种挑拨政策。

1918 年 2 月 10 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是托洛茨基作为驻布列斯特的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却叛卖性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指示。他声明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提出的条件下签订和约，而同时他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将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

这真是骇人听闻。德帝国主义者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卖者的，无过于此了。

德国政府中断停战，转入进攻。我国旧军队的残部抵挡不住德军攻势而开始溃散。德军迅速推进，夺取了大片领土，并威胁着彼得格勒。德帝国主义入侵苏维埃国家，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把我们祖国变为它的殖民地。陷于瓦解的旧沙皇军队，抵挡不◇239◇住德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部队。它在德军打击下溃退了。

但是德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激起了我国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工人阶级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召换，加紧组织红军部队。年轻的新军队(革命人民的军队)英勇地击退

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强盗的攻击。德国占领者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附近遭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向彼得格勒的推进被阻止了。抗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日子2月23日，成了年轻的红军的生日。

还在 1918年2月18日，党中央就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致电德国政府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德方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和约条件而继续进攻，直到2月22日德国政府才表示同意签订和约，但这时的和约条件比原先苛刻得多了。

为了争取通过关于缔结和约的决定，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在中央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列宁全集》俄文第8版第22卷第307页)[①]。

2月23日,中央决定接受德军统帅部提出的条件并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叛卖行为使苏维埃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不用说还有波兰，都割让给了德国。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变成德国的附庸国(附属国)。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向德国人交纳赔款。

但“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愈来愈深地陷入叛卖的泥潭。

暂时被“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奥新斯基、雅柯夫列娃、斯◇240◇土柯夫，曼策夫)篡夺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通过了不信任中央的分裂主义决议,并说它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在这个决议中，他们甚至作出了反苏的决定。“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决定中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17页。——译者注

列宁称这个决定为“奇谈与怪论”[①]。

当时党还不清楚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的真实原因。但是正如不久前对反苏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判(1938 年初)所证实的：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当时策划过反苏维埃政府的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曾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新政府。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一面策划反革命阴谋，一面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公开的攻击，力图分裂党和瓦解党的队伍。但是，党在这个严重关头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周围，在和约问题上也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支持中央委员会。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孤立了，被击败了。

为了彻底解决和约问题，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3 月 6 日开幕。这是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着十四万五千个党员。实际上当时党至少已有二十七万党员。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差别，是因为这次大会带有非常的性质，相当一部分◇241◇组织没有来得及选派代表,而暂时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的组织又没有可能选派代表。

列宁在这次会上做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报告时说：“……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2 卷第 321 页)[②]

列宁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案以三十票赞成、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438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462 页。——译者注

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列宁在《不幸的和约》一文中写道：

“和约条件的确苛刻得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我们要从事组织、组织和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同上，第288页)[①]

大会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发动在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会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采取最有力最坚决的措施来加强工人和农民的自觉纪律和纪律，发动群众作好奋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准备，组织红军，对人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

大会确认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正确，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立场，痛斥了已遭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在这次会上继续进行分裂活动。

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调整全国的经济。

和约的缔结，使得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奥德两国同协约国在继续进行战争)，瓦解敌人的力量，组织苏维埃经济，建立红军。◇242◇

和约的缔结，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保持农民对自己的支持，为在国内战争时期击溃白卫将军们积蓄力量。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党，当具备进攻所必需的条件时应怎样大胆坚决地进攻。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教导党，当敌人力量显然超过我方力量时，应怎样有秩序地退却，以便用最大的努力准备对敌人实行新的进攻。

历史证明了列宁路线完全正确。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定。党开始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列宁提议把我们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页。——译者注

党称为共产党，是因为这个名称准确地符合党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选出了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列宁拟定的草案被采纳为党纲的基础。

这样，第七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击败了党内暗藏的敌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使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争得了和平即喘息时机，使党赢得了时间来组织红军，向党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要求。

八 列宁关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贫农委员会和制裁富农。“左派”社会革会党人的叛乱及其被镇压。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苏维埃政权在缔结了和约和取得了喘息时机后，就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这个时期，列宁称◇243◇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上半年成功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工厂、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等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胜利地消灭了反革命势力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次尝试。

但过一切还远远不够。要前进，还必须从破坏旧制度转到建设新制度。因此，在1918年春，就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过渡——“从剥夺剥夺者”过渡到组织上巩固既得的胜利，即过渡到建设苏维埃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喘息时机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列宁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学会管理俄国。

列宁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中所生产的东西进行计算，对一切产品的消费实行监督。当时国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在经济中占优势。城乡千百万小业主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土壤。这些小业主既不承认劳动纪律，也不承认全国纪律；他们既不服从计算，也不服从监督。在过个困难时刻，特别危险的是小资产阶级投机谋利的自发势

力和小业主、小商人利用人民困苦来发财的行为。

党同生产中的松懈现象、同工业中缺乏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群众养成新的劳动习惯很缓慢。因此，加强劳动纪律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列宁指出，必须在工业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在采取说服教育办法的同时还要用强制手段对付那些想从国家手里多捞一些的、游手好闲的和投机倒把的分子。列宁认为新的纪律，即劳动纪律、同志关系纪律、苏维埃纪律，是由◇244◇千百万劳动者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的。他指出：“这件事情要占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44页)①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些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问题,都由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名著中阐明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配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这些问题上也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斗争。布哈林和奥新斯基等人反对建立纪律，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反对在工业中利用专家，反对实行经济核算。他们诬蔑列宁，硬说实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回到资产阶级秩序。同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宣扬托洛茨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俄国是不可能的。

“左派共产主义者”用“左的”词句作掩护，来维护那些反对纪律，敌视国家调节经济生活、敌视计算和监督的富农、懒汉和投机分子。

党在解决了组织新的即苏维埃的工业问题之后，就来解决农村问题。当时农村里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十分激烈。富农得了势，夺取了从地主那里剥夺来的土地。贫农急需帮助。富农同无产阶级国家作斗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75页。——译者注

争，拒绝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想借助饥荒迫使苏维埃国家放弃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党提出了打垮反革命富农的任务。为了把贫农组织起来和顺利地反对拥有余粮的富农，组织了工人下乡运动。

列宁写道："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记着，革命情况危急。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才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我们需要几万名精悍、先进、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决不◇245◇会受贿行窃，而能组成钢铁一般坚强的力量去反对富农，反对投机者,反对抢劫者，反对贪赃受贿者，反对捣乱者。"(《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5页)①

列宁说："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当时就是在这个口号下来组织工人下乡运动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实行粮食专卖并赋予粮食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的特别权力。

根据1918年6月11日法令成立了贫农委员会(贫委)。贫委在同富农斗争中，在重新分配没收的土地和分配农具方面，在收购富农的余粮方面，在为工人中心区和红军供应粮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富农的五千万公顷土地转到了贫农和中农手中。富农的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被没收来给了贫农。

成立贫农委员会是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个阶段。贫委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据点。当时用农村居民编建红军基干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贫委来进行的。

无产者的下乡运动和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农村的苏维埃政权，对于争取中农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1918年底，贫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农村的苏维埃合并而不再存在了。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7卷第364页。——译者注

1918 年 7 月 4 日，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在这次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一场激战来反对列宁，维护富农。他们要求停止反富农的斗争，要求放弃派遣工人征粮队去农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看到他们的路线受到大会多数的坚决回击，便在莫斯科发动了叛乱，占据了三仙巷，接着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射击。但是经过几小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次冒险行◇246◇动就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下去了。在国内其他许多地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地方组织也企图暴动，但是这种冒险行动不管在哪里都很快被扑灭了。

正如现在对反苏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判所证实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知道和同意的，并且是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总计划的一部分。

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后来成了托洛茨基的代理人）钻进德国使馆刺死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同德国的战争。但是，苏维埃政府成功地防止了战争，使反革命分子的挑拨未能得逞。

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即第一个苏维埃宪法。

简 短 的 结 论

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八个月中完成了极其困难的任务。争得了工人阶级和苏维埃中的多数，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来。它使这些群众摆脱了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它一步一步地揭露了这些政党的反对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在前线和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工作，组织群众作好了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在党的这一段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列宁的回国，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人阶级从党的决议中汲取了力量和胜利的信心,找到了对革命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四月代表会议指引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247◇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实行武装起义去推翻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的目标。

妥协主义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党派，结束了自己的发展过程——还在十月革命前它们都已经成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完整无损的资产阶级党派。布尔什维克党独自领导了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时,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党内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想使党离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企图。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并在士兵和水兵的支持下，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转交农民使用，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资本家，争取到退出战

争而赢得了和平，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时机，从而创造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击溃了资本主义,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工厂、土地、铁路和银行变成了全民财产，即公共财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一个巨大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人阶级，从而使它成了统治阶级。

这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248◇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 年)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苏维埃政权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方面的革命措施而得到巩固(当时西方正在酣战)，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极大的惊慌。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担心，德俄两国缔结和约会有利于德国的作战地位，而相应地增加协约国前线军队的困难。其次，他们担心，俄德之间建立和平会加强各国和各战场要求和平的趋向，从而破坏战争事业，破坏帝国主义者的事业。最后，他们担心，苏维埃政权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存在以及它在推翻那里的资产阶级政权后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会使西方工人和士兵受到传染，因为西方工人和士兵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深感不满，可能效法俄国人，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因此，各协约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干预)，以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成立资产阶级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能恢复俄国的资产阶级秩序，取消对德和约，恢复对德奥的作战。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所以乐意干这种黑暗勾当，还因为他们深◇249◇信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以为只要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稍微努一把力，苏维埃政权必然很快灭亡。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巩固，引起了被推翻的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被打倒的党派(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

政府主义者及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白卫将军和哥萨克军官等等更大的惊慌。

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起，就到处叫嚷：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没有根基，它注定要失败，它经过一两个星期、一个月、至多两三个月就会灭亡。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敌人诅咒下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巩固，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要比他们先前想象的强大得多；要推翻苏维埃政权，需要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很大的努力，来一场激战。因此，他们决定广泛地进行反革命叛乱工作来纠集反革命力量，搜罗军事干部，组织叛乱，首先是在哥萨克和富农聚居的地区组织叛乱。

由此可见，还在1918年上半年就已经形成了两股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明显势力：协约国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

这两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势力，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推翻苏维埃政权。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虽然有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所必需的相当的军事干部以及相当的人力——主要是哥萨克上层分子和富农，但没有金钱和武器。反之，外国帝国主义者有金钱和武器，但不可能“抽出”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武装干涉，这不仅因为这些力量必须用于对德奥作战，而且因为这些力量用于反苏维埃政权会不十分可靠。

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条件迫使国内外这两股反苏势力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就在1918年上半年形成了。

这样，就形成了以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革命叛乱为◇250◇内应的外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

这样，喘息时机结束了，俄国的国内战争，即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内外敌人的战争开始了。

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没有宣战就发动了武装干涉，虽然这种武装干涉是对俄国的战争，并是一种最坏的战争。这些“文明”强盗不声不响地偷偷摸到俄国边境，驱使自己的军队在俄国登陆。

英国人和法国人驱使军队在俄国北部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支持当地的白卫叛乱，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白卫的“俄国北方政府”。

日本人驱使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夺取了沿海边区,解散了苏维埃，支持白卫叛乱分子，使这些叛乱分子得以在后来恢复资产阶级秩序。

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和邓尼金这几个将军在英法支持下组织了白卫“志愿军”，发动了哥萨克上层分子的叛乱，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两个将军在德帝国主义者秘密支持下(德国人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因为同俄国订有和约)发动了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了顿河区，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策动，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这个军是战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但是中途他们受社会革命党人和英国人法国人的利用而举行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这个军的叛乱成了一个信号，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富农、沃特金斯克工厂和伊热夫斯克工厂同情社会革命党的工人跟着也举行叛乱。伏尔加河流域成立了萨马拉白卫－社会革命党人政府。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251◇

德国没有参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这次武装干涉,因为----至少是因为----它同这个联盟还处于交战状态。但是，虽然如此，虽然订有俄德和约，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知威廉皇帝的德国政府也如英法日美干涉者一样，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而德帝国主义者也确实是在竭尽一切努力来孤立、削弱和消灭苏维埃国家。他们从苏维埃俄国(诚然是按他们和乌克兰拉达[①]订立的“条约”)夺去了乌克兰，应乌克兰白卫拉达之请派兵进驻乌克兰，残暴地掠夺和

———————————————

① 指乌克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18 年被推翻。——译者注

压迫乌克兰人民，禁止他们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从苏维埃俄国夺去了南高加索，应格鲁吉亚和阿捷尔拜疆的民族主义者之请派去了德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在梯弗里斯和巴库横行霸道。他们千方百计(虽然是暗地里)用武器和粮食援助在顿河区进行叛乱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样，苏维埃俄国同自己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苏维埃俄国在这一时期很困难。面包不够。肉类不够。饥饿折磨着工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两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根本得不到面包的时候。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工或几乎停工。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灰心丧气。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灰心丧气。这一时期所遭到的极大困难和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证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具有极其巨大和无法估计的力量。

党宣布全国为军营，并把全国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政治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人民进行抗战。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几十万工人和农◇252◇民志愿加入红军、奔赴前线。党员和共青团员约有一半上了前线。党发动人民起来进行**卫国战争**，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侵犯，消灭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叛乱。列宁组织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负责为前线供应人员、粮食、服装和武器。志愿兵改为义务兵，使红军得到几十万新兵的补充；红军在短时期内就成了一支百万大军。

尽管国内状况十分困难，尽管红军很年轻、还来不及巩固，但由于采取种种防御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克拉斯诺夫将军已经被撵出他认为保证能固守的察里津，而且被赶到顿河区以外。邓尼金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北高加索的狭小地区，科尔尼洛夫将军则在与红军交战时被打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社会革命党白卫匪帮被赶出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并被压迫到乌拉尔。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洛

卡尔特策动白卫分子萨文可夫在雅罗斯拉夫里进行的叛乱已被粉碎，洛卡尔特被捕。刺杀了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同志并恶毒地谋害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搞反布尔什维克的白色恐怖而受到红色恐怖的惩治，在俄国中部一切较为重要的地点都已被打垮。

年轻的红军在同敌人的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

当时在红军中任政治委员的共产党员，在巩固红军，进行政治教育、加强战斗力和纪律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知道，红军的这些成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还仅仅是它的初步成就。党知道，前面还有新的更加严重的战斗，只有同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之后，国家才有可能收复失去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因此，布尔什维克加紧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决定使整个后方都来为前线服务。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除对大工业实行监督外，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日用品供应军队和农村。它实行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253◇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搞好粮食储备、向军队和工人供应粮食。最后，它实行了遍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党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强制的体力劳动，从而腾出工人去从事其他的对前线更为重要的工作,这样就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暂时采取的这一整套措施，就叫做战时共产主义。

国家准备同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国内战争。它应当使军队人数到 1918 年底增加两倍。它应当积蓄供应这个军队的物资。

列宁当时指出：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三百万人的军队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87 页。——译者注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正当苏维埃国家准备对外国武装干涉进行新的战斗的时候，在西方，在各交战国的后方和前线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当时德国和奥地利被战争和粮荒压得喘不过气来。英、法和北美还能不断挖掘新的潜力，而德国和奥地利连最后一点潜力也快耗尽了。精疲力竭到了极点的德国和奥地利，眼看很快就要失败。

同时在德奥两国内部，民怨沸腾，怨恨战争无休无止、招致灭亡，怨恨两国帝国主义政府把人民弄到精疲力竭和饥饿的境地。◇254◇十月革命的伟大革命影响，布列斯特和约前就发生过的苏维埃士兵同奥德士兵在前线的联欢，以及后来同苏维埃俄国停战媾和本身的影响，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俄国人民通过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而结束了可恨的战争，这个实例不能不给奥德工人以教育。而德军方面那些原先在东线，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又调到西线的士兵，通过讲述他们先前怎样同苏维埃士兵联欢以及苏维埃士兵怎样摆脱了战争，也不能不在西线造成军心的瓦解。至于奥地利军队，还要更早一些，就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开始瓦解了。

由于这一切情况，德军中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了，他们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的战斗力了，他们开始在协约国军进攻之下节节败退；而在德国本国，于 1918 年 11 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威廉及其政府。

德国不得不承认战败，并向协约国求和。

这样，德国这个头等强国一下子就降到二等强国的地位。

从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来看，这种情况有某些消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变成了欧亚两洲的统治力量，

使它们有可能对苏维埃国家加强武装干涉和实行封锁，加紧围困苏维埃政权。结果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往下就可看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情况还有更为重大的积极的作用，即从根本上缓和苏维埃国家处境的作用。第一，苏维埃政权有了可能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停付赔款和进行公开的斗争(军事的和政治的)来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南高加索从德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在欧洲的心脏德国存在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必然会使欧洲各国革命化，而且也确实使他们革命化了，这就不能不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当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苏维埃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255◇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因为德国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德国白卫分子可以任意杀害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这样著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制裁，仅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德国的革命软弱无力到何等地步。但它终究是一场革命。威廉被推翻了，工人挣脱了锁链，单是这一点就不能不发动西方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欧洲国家革命的高潮。

欧洲革命高潮开始了。奥地利的革命运动展开了。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欧洲各国共产党在革命浪潮基础上出现了。

现在有了把各国共产党统一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现实基础。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虽然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迫害阻挠了许多代表来莫斯科，但是欧美各重要国家的代表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中，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指出它是真正的劳动者的民主。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他们为在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苏维埃在各国胜利而坚决奋斗。

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

这样，就成立了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国际，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

1919 年 3 月，一方面协约国反动联盟加紧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欧洲(主要是战败国)的革命高潮大大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在这样一种矛盾情况下，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256◇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零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零二人。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第一句话就是悼念大会开幕前夜逝世的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组织者之一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说明了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特征，党纲对比了两种国家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党纲详细地指出了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具体任务；把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按照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全国经济，使工会参加组织国民经济的工作，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在国民经济中由苏维埃机关监督利用专家，逐渐地有计划地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在党纲上除载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定义外，还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旧党纲说明工业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经济的那一部分写进去。列宁认为，在党纲上必须估计到我国经济的复杂情况，指出国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其中包括中农所代表的小商品经济。因此，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反对布哈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因为布哈林建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小商品生产、关于中农经济的条文从党纲上删去。布哈林的这种观点，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又抹杀富农分子正从小农商品经济中产生

和滋长的事实。

列宁还驳斥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他们反对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写进党纲，反对民族平等，借口是这个口号会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妨碍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列宁驳倒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种极其有害的大国沙文主义观点。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工作中占着◇257◇重要的地位。由于实现了著名的土地法令，农村愈来愈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已在农村居民中占多数。中农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他们的情绪和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至关重要。国内战争的结局如何，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中农倒向哪一边，取决于哪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能吸引中农跟自己走。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1918 年夏在伏尔加河流域所以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农支持了他们。富农在俄国中部举行叛乱时情形也是如此。但是从 1918 年秋天起，中农群众在情绪上开始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农民已经看到，白军胜利的结果就是：地主重新掌权，农民土地被夺，农民遭受掠夺，鞭笞和折磨。贫农委员会击败富农，也促进了农民情绪的转变。因此列宁在 1918 年 11 月提出了如下的口号。

“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3 卷第 294 页)①

当然，中农还没有完全停止动摇，但是他们比过去更接近苏维埃政权，更牢靠地支持苏维埃政权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对中农的政策，大大促进了这点。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党对中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列宁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决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路线。大会要求党的组织和全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12 页。——译者注

体共产党员严格地把中农与富农区别开、划分开，通过关心中农的需要把中农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必须用说服的方法，而绝不要用强制、暴力去克服中农的落后性。因此，大会指示，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措施(成立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时，不允◇258◇许采取强制手段。凡涉及中农切身利益的场合，都要同他们达成实际的协议，例如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要对中农让步。大会提出实行这样的政策：在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对中农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对富农作斗争。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大体上是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这就是说，党争取中农不站到富农方面去，不站到一般资产阶级方面去。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反对白卫匪帮和外国武装干涉，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对基本农民群众即中农所采取的路线，对于胜利地结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及其白卫走狗的国内战争，起了决定的作用。1919 年秋，正当需要在苏维埃政权和邓尼金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农民支持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就战胜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在会上占有特殊地位。会上出现了所谓“军事反对派”。它联合了不少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但是，除了已被打垮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参加“军事反对派”的，还有从未参加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工作者。大多数军人代表都激烈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崇拜来自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其中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直接背叛了我们)，反对他对军队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采取傲慢和敌视的态度。会上举出的许多“来自实践”的例子证明，托洛茨基曾企图枪毙许多他所不喜欢的在前线担任军事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借以帮助敌人；只是由于中央的干涉和军事工作人员的抗议,这些同志才幸免于死。◇259◇

“军事反对派”虽然反对托洛茨基对党的军事政策的歪曲，但是在军事建设的许多问题上维护不正确的观点。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因为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军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队。斯大林同志在反驳“军事反对派”时要求建立一支纪律非常严格的正规军。

斯大林同志说：“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遭到灭亡。”①

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的一系列提案，同时给了托洛茨基以打击，要求改进中央军事机关的工作，要求加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

由于大会成立的军事小组进行了工作．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使红军得到了加强，使它跟党进一步接近了。

其次，大会讨论了党和苏维埃的建设问题，即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回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的机会主义集团，因为他们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由于新党员大批涌入党内，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和重新进行登记的决议。

这是第一次清党的开始。◇260◇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2页。——译者注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三个月的喘息时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协约国把德国和奥地利打败之后，决定投入大批兵力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在德国战败，德军退出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后，英法两国就取代了德国，把自己的军舰开进了黑海,派兵在敖德萨和南高加索登陆。协约国武装干涉者在占领区横行霸道，残暴到竟然整批整批地屠杀工农。到后来占领土尔克斯坦时，武装干涉者甚至猖狂到将邵武勉、菲奥列托夫、查帕里泽、马里根、阿集兹别科夫、柯尔加港夫等二十六个巴库布尔什维克领导同志解到里海东岸，在社会革命党人协助下把他们残暴地枪杀了。

不久，武装干涉者宣布对俄国实行**封锁**。所有与外界来往的海上的和其他的通道，都被切断了。

于是，苏维埃国家陷入了几乎四面受围的境地。

当时协约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傀儡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高尔察克被宣布为“俄国最高执政”。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都听命于他。

于是，东线成了主要战线。

1919 年春，高尔察克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差不多推进到伏尔加河畔。为反对高尔察克派去了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力量，动员了共青团员和工人。1919 年 4 月，红军大败高尔察克。不久,高尔察克的军队开始全线退却。

正当红军在东线的攻势达到高潮的时候，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可疑的计划：在乌拉尔停下来，对高尔察克军队停止追击,把军队◇261◇从东线调往南线。党中央明白，不能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留在高尔察克手中，不能让他在那里靠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帮助恢复元气和重新站稳脚跟，因此否定了这个计划，指示继续进攻。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指示，提出辞职。中央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辞职，同时责令他立刻停止参加对东线战事的领导。红军开始更猛烈地向高尔察克展开进攻，使高尔察克遭到了一连串新的失败，并在白军后方的强大游击运动支持下从叛军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1919 年夏，帝国主义者责成领导西北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勒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借以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彼得格勒附近两个炮台的守备部队受旧军官的反革命煽动，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在前线司令部中又发现了反革命叛乱。彼得格勒岌岌可危。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措施，在工人和水兵的支持下，从白军手中解放了两个叛乱的炮台，打败了尤登尼奇的军队，把尤登尼奇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

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失败，有利于反高尔察克的斗争。1919 年底，高尔察克军队被彻底击溃。高尔察克本人被俘，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

这样高尔察克就完结了。

当时，西伯利亚民间流传着一首嘲讽高尔察克的歌谣：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叶，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脱落了，

烟叶吸完了，

执政王不见了。”◇262◇

武装干涉者看到高尔察克没有实现他们所寄托予他的希望，就改变了他们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敖德萨的陆战队不得不撤回，因为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同苏维埃共和国军队接触后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感染，开始起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例如，敖德萨法国士兵举行了起义。因此现在，在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协约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科尔尼洛夫的同僚和“志愿军”的组织者邓尼金将军身上。当时邓尼金正在南俄库班地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勾当。协约国供应邓尼金军队大批武器装备，驱使他北上去反对苏维埃政权。

于是，南线这次成了主要战线。

1919 年夏，邓尼金开始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大进军，托洛茨基把南线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使我军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到 10 月中旬，白军控制了整个乌克兰，攻占了奥勒尔，逼近到供应我军子弹、步枪和机关枪的土拉。白军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党敲响警钟，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列宁提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口号。在布尔什维克鼓舞下，工人和农民集中了全力来歼灭敌人。

为了组织好歼灭邓尼金的战事，中央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布琼尼四同志派往南线。托洛茨基被撤销领导南线红军作战的职权。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之前，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曾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察里津经顿河草原前往诺沃罗西斯克，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但红军在顿河草原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当时很大一部分居民还受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地区。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歼灭邓尼金的计划：取道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对邓尼金实行主要突击。这个计划保证我军能迅速前进去攻打邓尼金，因为在我们工作过的工农地

区，人心显然是归向我们的。◇263◇

此外，这个地区有稠密的铁路网，使我军有可能按时获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给。最后，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解放顿巴斯，保证我国燃料的供给。

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同志的计划。1919 年 10 月下半月，邓尼金经过激烈的抵抗以后，在奥勒尔附近和沃龙涅什附近的两次决战中被红军击败。邓尼金开始迅速退却，随后在我军追击下向南逃窜。1920 年初，整个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白军手中解放了。

在南线两次决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又把尤登尼奇军调来进攻彼得格勒，以牵制我南线兵力，缓和邓尼金军队的处境。白军进抵彼得格勒城下。彼得格勒英勇的无产阶级挺身捍卫第一个革命之城。和往常一样，共产党员战斗在最前面。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白军被击败，重新被逐出我国国境，被赶到爱沙尼亚去了。

这样，邓尼金完结了。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

帝国主义者看到白卫军队被击败，武装干涉不成功，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巩固起来，而在西欧，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又使工人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于是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1920 年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停止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

这是武装干涉墙壁上打开的一大缺口。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国家已消灭了武装干涉和结束了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波兰进犯的危险依然存在。远东、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武装干涉者还没有被彻底赶走。但是苏维埃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党有了可能来处理经济问题。

国内战争时期，许多熟练工人因为工厂关闭而离开了生产。◇264◇现在党动员熟练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从事本行工作。几千名共产党员被派去恢复情况严重的运输业。如果不恢复运输，就无法切

实地恢复基本工业部门。粮食耕作加强了和改进了。开始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近五百万现役红军战士由于存在战争危险，暂时还不能复员。因此一些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劳动军**，用来搞经济建设。工农国防委员会改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为了协助它工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1920 年 3 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五十多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二人。

大会规定了国家在运输业和工业方面当前的经济任务，并特别指出工会必须参加经济建设。

大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特别注意，这个计划要求首先发展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关于整个国民经济电气化的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占有主要的地位，这是列宁提出的“10-20 年的伟大纲领”[①]。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那个著名的计划，现在它已远远超额完成了。

大会回击了反党的“民主集中派”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而坚持在工业领导方面事事都实行“集体领导”，完全不要专人负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主要角色是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和弗·斯米尔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他们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265◇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434 页。——译者注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波兰计划的破产。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虽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虽然苏维埃国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从白军手中解放了北部边区、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顿河区、乌克兰等等，虽然协约国被迫取消了对俄国的封锁，但是协约国仍然不甘心承认苏维埃政权坚不可摧，苏维埃政权不可战胜。因此，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尝试。这次他们决定，一方面利用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波兰国家的实际首脑皮尔苏茨基，另一方面还利用在克里木收集了邓尼金的残兵败将并从那里威胁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弗兰格尔将军。

按照列宁的说法，地主波兰和弗兰格尔是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用来掐死苏维埃国家的两只手。

波兰人的计划是，占领苏维埃乌克兰的河西地区，占领苏维埃白俄罗斯，在这两个地区恢复波兰地主政权，把波兰国界扩大到“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但泽到敖德萨，并且帮助弗兰格尔击败红军，在苏维埃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以报答弗兰格尔对他们的帮助。

这个计划得到了各协约国的赞同。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持和平、防止战争，试图同波兰进行谈判，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皮尔苏茨基无意谈和，只想打仗。刚刚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的红军打得疲惫不堪,已经疲于应付波兰军队的进攻。

短暂的喘息时机结束了。

1920 年 4 月，波兰军队入侵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基辅。同◇260◇时，弗兰格尔也转入进攻，开始威胁顿巴斯。

作为对波兰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反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加里西亚的里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部队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

还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由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错，西线红军部队向华沙方面的进攻毫无组织，没有让部队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先头部队前进得越迅速，预备队和弹药越落在后方,先头部队由于没有弹药，没有预备队，战线过长而易于被突破。由于这一切，当波军一个不大的集团突破我西线一点的时候，缺乏弹药的我军不得不实行退却。至于进抵里沃夫城下，压迫着该处波军的我南线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却禁止他们攻占里沃夫，并命令他们把骑兵集团军即南线主力远近地调往东北，似乎是去援助西线，虽然不难明白，攻占里沃夫是对西线唯一可能的和最好的援助。但是骑兵集团军退出南线和离开里沃夫，实际上意味着我军在南线也实行退却。这样，就是托洛茨基自毁长城的命令迫使我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的、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这是直接的援助，但不是对我西线的援助，而是对波兰地主和协约国的援助。

过了几天，波兰军队的进攻被阻止住了，我军开始准备向波军发起新的反击。但是波军无力再战，又怕红军反击，不得不放弃占领乌克兰的河西地区和白俄罗斯的基辅而愿意同苏维埃共和国缔结和约。1920 年 10 月 20 日，在里加同波兰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波兰保留了加里西亚以及靠近俄罗斯的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 同波兰缔结和约后，决定消灭弗兰格尔。弗兰◇267◇格尔从英法方面得到了最新式的武器：装甲车、坦克、飞机和装具。他拥有白卫突击部队，主力是军官部队。但弗兰格尔没能给

也在库班和顿河区登陆的部队纠集起多少可观的农民和哥萨克力量。然而弗兰格尔推进到了顿巴斯附近，威胁着我们的产煤区。苏维埃政权之所以处于很困难的境地，还因为红军这时已经相当疲惫。当时红军战士必须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推进，既要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又要消灭援助弗兰格尔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匪帮。但是，虽然弗兰格尔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虽然红军根本没有坦克，红军还是把弗兰格尔驱逐到克里木半岛上。1920 年 11 月，红军攻占了皮列柯普筑垒阵地，冲进了克里木，击溃了弗兰格尔军队，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克里木。克里木成为苏维埃的了。

武装干涉时期以波兰大国主义计划的破产和弗兰格尔的溃败而宣告结束。

1920 年底，南高加索开始从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木沙瓦特派、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阿尔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胜利了。

但这还不是说武装干涉可以完全停止。日军在远东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 1922 年。此外，还有过组织武装干涉的新尝试(在东方有哥萨克军队首领明诺夫和男爵翁格恩，在卡累里亚有芬兰白军 1921 年的干涉)。但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武装干涉的主要力量，到 1920 年底已经被击溃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自卫分子的反苏维埃战争，以苏维埃胜利而告终。

苏维埃共和国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主权和自由生存。

这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结束。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性胜利。◇268◇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只要看看武装干涉时期的欧美重要报刊，马上就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有名的著作家(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或军事专家相信，苏维埃政权会获得胜利。相反，所有有名的著作家、军事专家、研究各国和各民族革命的历史学家即所谓学者，都异口同声地叫喊，苏维埃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必不可免。

他们确信武装干涉必获胜利的根据是，苏维埃国家还没有已经组织好的红军，还得临时建立，即所谓边打边建，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比较现成的军队。

其次，他们的根据是，红军缺乏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大多数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这样的干部。

再次，他们的根据是，由于俄国军火工业落后，红军的武器弹药数量少、质量差，而从其他国家获得军用品又不可能，因为俄国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却大批获得而且今后会继续获得头等的武器、弹药和军服的供给。

最后，他们的根据是，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当时占领了俄国最富饶的产粮区，而红军失去了这样的地区，痛感粮食不足。

的确，所有这些缺点和不足在红军部队中确实都有过。

在这方面，但也只是在这方面，武装干涉者老爷们是说得完全对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这么多严重缺陷的红军战胜了没有这些◇269◇缺陷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呢？

(一)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所捍卫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人民认识到和了解到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对它坚持到底。

布尔什维克知道，为不正确的、人民所不支持的政策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拥有一切：有经验的老指挥官、头等的武器、弹药、军服、粮食。但是就少一件——俄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俄国各族人民不愿意支持也不可能支持武装干涉者和白卫“执政”的反人民政策。因此，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失败了。

(二)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彻底忠实于和献身于自己的人民，因此人民也爱戴它、支持它，把它看作自己的，情同骨肉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儿子，只要它像儿子对待母亲那样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它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一定会胜利。而反对本国人民的军队一定会失败。

(三)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整个后方，整个国家来为前线的需要服务。军队如果没有坚固的、全力支持前线的后方，必然要遭到失败。布尔什维克知道这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全国变成了一个为前线供应武器、弹药、军服、粮食、兵员的军营。

(四)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红军战士了解战争的目的和任务，认识到了这些目的和任务的正确；(乙)由于认识到了战争的目的和任务的正确，红军战士加强了纪律性和战斗力；(丙)因此，广大红军战士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往往表现出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空前的普遍的英雄主义。

(五)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的后方和前线的领导核心◇270◇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一个由于自己的团结和纪律而统一的党，

一个由于具有革命精神、具有为共同事业的胜利牺牲一切的决心而强有力的党，一个善于组织千百万群众并在复杂环境中正确领导他们的出色的党。

列宁说："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前所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96页)①

(六)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它在自己的队伍中锻炼出了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这样一些新型的军事领导者；(乙)在它的队伍中战斗的有柯托夫斯基、哈巴也夫、拉佐、肃尔斯，帕尔霍缅柯等许多有才能的英雄；(丙)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的是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德列也夫、彼得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沙金柯、美赫利斯、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等这样一些活动家；(丁)红军有政治委员这样出色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团结了红军战士的队伍，培养了战士遵守纪律和英勇作战的精神，有力地(迅速和无情地)制止了个别指挥员的叛变行为；另一方面，又大胆和坚决地维护了献身于苏维埃政权并能果断地领导红军部队的那些指挥员（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的威信和荣誉。

列宁说："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②◇271◇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8-15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1卷第155页。——译者注

(七)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在白卫军队的后方,即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的后方，有出色的党员和非党员布尔什维克在进行地下工作。他们发动工农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后方，从而给红军的进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家知道，乌克兰、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白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游击队，通过破坏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后方，给了红军不可估量的帮助。

(八)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反对白卫反革命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及其成功，赢得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同情和援助。当帝国主义企图用武装干涉和封锁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工人站在苏维埃方面，援助苏维埃。这些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的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促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英法和其他参加武装干涉的国家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装载军用品去援助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建立了以“不许干涉俄国”作为自己口号的“行动委员会”。

列宁说：“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向我们举起拳头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05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76页。——译者注

简 短 的 结 论

被十月革命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同白卫将军们一起，牺牲祖国的利益，同各协约国政府勾结，想共同用武力来进攻苏维埃国家，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和俄◇272◇国边境地区的白卫叛乱，结果俄国同粮食和原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德国的军事失败和两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欧洲战争的结束，导致协约国的加强，武装干涉的加强，给苏维埃国家增加了新的困难。

另一方面，德国革命和欧洲国家中开始的革命运动，却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白卫匪帮。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把协约国的傀儡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弗兰格尔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打败，把协约国的另一个傀儡皮尔苏茨基驱逐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而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干涉军赶出了苏维埃国境。

这样，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被革命打倒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在武装干涉时期支持白卫将军和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搞反革命阴谋，对苏维埃活动家搞恐怖活动。这些十月革命前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某些影响的党派，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在人民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是反革命党派。

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是这些党派在政治上灭亡和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彻底胜利的时期。◇273◇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1－1925 年)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苏维埃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整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进行。国内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革命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

1920 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战前水平还是沙俄那个贫困农村的水平。不仅如此，1920 年还有许多省份歉收。农民经济情况困难。

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1920 年的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和矿井被破坏、被淹没。冶金业情况特别严重。生铁在 1921 年全年总共只炼了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274◇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物品缺乏的情况还能忍受，

有时甚至没有觉察。但是现在战争没有了，人们突然感到这种情况不堪忍受，要求立刻加以消除。

农民中间出现了不满情绪。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建立了和巩固了工人和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

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苏维埃国家为了国防的需要，当时不得不按余粮收集制收集农民的所有余粮。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战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由于战争和武装干涉而被迫采取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商品不足，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经过去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对征收全部余粮的办法即余粮收集制感到不满，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抵触。

不满情绪也侵入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承受了国内战争的主要重担，英勇忘我地进行了反对自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群寇的斗争，进行了消除经济破坏和饥荒的斗争。最有觉悟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优秀工人，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但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也影响了工人阶级。还在开工的少数工厂常常长时间停产。工人们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制作打火机和从事小宗的粮食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一部分工人跑到农村去，不再成为工人，脱离了本阶级。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和疲惫产生了不满情绪。◇275◇

一个问题摆在党的面前：要制定党在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上的新方针，以适应新的情况。

于是党就着手制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新方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企图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策动的富农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安东诺夫叛乱)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现在涂上了一层苏维埃色彩，已经不提“打倒苏维埃”这种破产了的旧口号，而是提“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新口号。

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就是阶级敌人实行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发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 1921 年 3 月。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外国的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起初，叛乱者力图打出“苏维埃”的招牌，掩盖他们恢复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所有制的意图。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想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个情况：军舰上水兵成分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几乎个个上了前线，参加红军队伍英勇作战去了。补充到海军中的新兵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这些新兵都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群众，反映了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它已经大大削弱。这两个情况使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有可能混进并控制了喀琅施塔得。◇276◇

叛乱分子掌握了这个头等要塞、舰队和大批武器弹药。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欢庆胜利。但是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叛乱很快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下去。当时为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分子，党派去了自己的

优秀子弟——以伏罗希洛夫同志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红军战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冰面踩破了，许多人被淹死。必须向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冲击。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占了上风。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红军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叛乱被肃清了。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列宁多数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没有理由再保持由战争和封锁的情况所造成的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必须代之以粮食税，好使农民能随意处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余粮。中央懂得，这种办法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运转，改善城市供应，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中央也知道，活跃工业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它认为如果不吸引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活跃工业；只要说服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也是人民的危险的敌人，他们是能够吸引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只要党和工会对工人阶级不是像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线确实需要采用命令)，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采用说服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277◇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都像中央这样想。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反对派小集团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在向和平经济建设轨道过渡的困难面前动摇不定。党内有不少从前的孟什维克、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前的崩得分子、从前的斗争派和俄国边沿地区的各种半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某个反对派小集团。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受过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而只是加强了反对派小集团的思想混乱和动摇。其中有的认为不需要削弱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相反需要“再拧紧螺丝”。有的认为党和国家应该把恢

复国民经济的事情丢开不管，应该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工会。

很明显，既然思想这么混乱,党内某些成分中间就一定有一些人，爱好争论的人,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首领”，会竭力强迫党进行争论。

结果正是如此。

争论是从工会的作用问题开始的，虽然工会问题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挑起争论、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的急先锋是托洛茨基。他唯恐天下不乱，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员会上提出了“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可疑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按选举产生。

托洛茨基派反对说服方法(不采用说服方法，工人组织是无法进行活动的)，而主张采用赤裸裸的强制方法，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托洛茨基派把持工会领导的地方，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政策在工会里引起了冲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278◇挑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

实际上，工会问题争论的意义，要比工会问题本身广泛得多。如后来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7日)决议所指出的，实际上当时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农民，关于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总的是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告结束的时期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651页)[①]。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的还有其他的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柯伦泰等人)、“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27页。——译者注

夫、德罗布尼斯、鲍古斯拉夫斯基、奥新斯基、弗·斯米尔诺夫等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对派”提出把整个国民经济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管理的口号。他们想把党的作用化为乌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工人反对派”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工人反对派”实际上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团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完全自由。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派一样,力图破坏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列宁称民集派为“叫喊得最响亮者”[①]的派别，而把它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纲领。

布哈林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反对党。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成立了“缓冲”集团。这个集团维护和掩护最凶恶的派别分子托洛茨基派。列宁称布哈林的行动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②]。不久,布哈林派就同托◇279◇洛茨基联合起来反对列宁了。

列宁和列宁主义者集中主要火力打击托洛茨基派，因为托洛茨基派是反党集团的主力。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揭露了托洛茨基派把工会同军事组织混淆起来,向他们指出不能把军事组织的方法搬到工会里来。针对各反对派集团的纲领，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拟定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指出：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该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贯彻说服方法。只有这样，工会才能发动全体工人消除经济破坏，才能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页。——译者注

在同反对派集团的斗争中，党的各个组织团结在列宁的周围。莫斯科的斗争特别紧张。反对派在这里集中了自己的主要力量，打算夺取首都的组织。但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给了派别分子的这种阴谋以坚决的回击。乌克兰党组织内的斗争也很尖锐。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乌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同志领导下，打败了托洛茨基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乌克兰共产党仍然是列宁党的可靠支柱。在巴库，在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领导下，打垮了反对派。在中亚细亚，拉·卡冈诺维奇同志领导了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主要的地方党组织全都拥护列宁的纲领。

1921 年 3 月 8 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六百九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二十一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二百九十六人。

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纲领。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争论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他指出，敌人正指望共产党发生内讧和分裂。

鉴于派别集团的存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280◇大的危险，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党的统一**问题特别注意。列宁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大会谴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指出它们“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①]。

大会责令立刻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并责成各级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而且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此项决议的，都将被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69 页。——译者注

所有这些决定，都写进了由列宁提出、经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在这个决议中，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第十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由于许多情况加剧了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决议指出："但是，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殊纲领、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闹独立并建立其集团纪律的集团。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了解，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大会在这个决议中接着说：

"无产阶级的敌人竭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281◇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资产所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得比共产主义者'更左'。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了孟什维克在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时所采用的方式：口头上装作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要给苏维埃政权加上一些不大的所谓的修正，实际上在鼓舞和支持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

决议指出，党的宣传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详细

说明派别活动的危害和危险。

大会决议说，另一方面党的宣传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

决议指出：“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竭力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象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集团，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事业。”（《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73－374页）①

决议接着指出，党的宣传“还应当阐明过去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证明反革命势力总是支持那些与极端革命政党最相似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以便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促使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势◇282◇力获得完全的胜利”②。

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密切相联的另一个决议是《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个决议也是由列宁提出、经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谴责了所谓“工人反对派”。大会确认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并号召全党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即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议。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显示了列宁政策的无比的英明和远见。

大会决议说明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实物粮食税征收额要比余粮收集制征收额低些。粮食税额必须在春播以前公布。明确规定了纳税期限。纳税后剩下的全部粮食完全归农民支配，即可以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3－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4—65页。---译者注

自由出卖。列宁在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时，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有某种活跃。必须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营工厂主开设小企业。但是用不着怕它。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能造成农民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国营工业将得到恢复，私人资本将被排挤，积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转入坚决进攻，以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的残余。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这时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堡垒转到较为长期地包围堡垒，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283◇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纯粹**是退却。这样的解释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极其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了一个口号：**“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18页）[①]

反对派分子是些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政策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他们既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了解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实行的退却的性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上面已经说过了。关于退却的性质，那么有各种各样的退却。有时候，党或军队因为遭到了失败，不得不实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党或军队实行退却，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人力，以利再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根本不是要实行这种退却，因为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没有遭到失败，

①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页。 ——译者注

没有被击败,反而击败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但也有这样的时候,获得了胜利的党或军队在进攻中向前跑得太远,不能保证得到后方根据地的支持。这就造成严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经验的党或军队为了不脱离自己的根据地,通常都要稍许后退一点,跟自己的后方靠得近些,以便同自己的后方根据地更牢固地联结起来,保证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更有信心地、确有把握地重新实行进攻。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的退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保证足够的根据地”[①],因此必须暂时向有保证的后方退却。

反对派的可悲,就在于他们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而不了解而且◇284◇至死也不了解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退却的这种特点。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能结成巩固的经济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会的另一个决议,即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也是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是斯大林同志作的。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即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赶上俄国中部。

其次,斯大林指出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会谴责了这两种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对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同时,大会集中主要火力打击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大国主义,即打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沙皇制度下对非俄罗斯民族所采取的那种态度的残余和遗毒。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61页。——译者注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十一次次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遇到了党内不坚定分子的抵抗。这种抵抗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左的”空谈家，如洛明纳泽和沙茨金等这种类型的政治畸形儿，他们“证明”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毁灭苏维埃政权。这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和不了解经济发展规律，所以不懂得党的政策，惊惶失措，在自己周围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公开的投降主◇285◇义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拜倒在资本主义“威力”面前，并且力图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则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

这两种人都是敌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党揭露并孤立了这两种人。党给了惊惶失措者和投降主义者坚决的回击。

这种对党的政策的抵抗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不坚定分子清洗出党。为此中央大力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在 1921 年进行了清党。清党工作吸收了非党员参加，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列宁建议彻底从党内清除“……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

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页)[①]。

清党结果共开除党员十七万人,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清洗工作大大巩固了党，改善了党的社会成分，加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提高了党的威信。党的团结和纪律性增强了。

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第一年，就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工农在新的基础上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坚强有力了。富农匪患差不多已全部肃清。余粮收集制取消后，中农帮助了苏维埃政权同富农匪帮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全部命脉；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党使经济战线的情况有了转变。农业进展很快。◇286◇工业和运输业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暂时还很缓慢,但是扎扎实实的经济高涨开始了。工人和农民已经感到和看到，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922年3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二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万二千名党员，即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党员数量减少，是由于开始了清党。

党在代表大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做了总结。根据这个总结，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

“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8页)[②]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谁战胜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为了胜利，必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29页——译者注

须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办法是大力发展城乡商品流转。为此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必须学会文明经商。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的链条中的主要一环是商业。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扩展城乡商品流转，不能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不能提高农业，不能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

当时苏维埃商业还很薄弱。商业机构很薄弱，共产党员还没有经商的技能，对敌人耐普曼[①]还没有进行过研究，还没有学会同他们作斗争。私商耐普曼趁苏维埃商业薄弱，把布匹和其他畅销◇287◇商品的贸易抓到手上。关于组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问题有了重大的意义。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国家遭到的歉收的后果，已被顺利地消除。农民经济恢复得很迅速。铁路运输已有所改善。重新开工的工厂日益增多。

1922 年 10 月，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巨大的胜利：红军和远东游击队从日本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海参崴。

这时，苏维埃国家的全部领土已经肃清了武装干涉者，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任务又要求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联盟，于是各苏维埃共和国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必须联合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必须保证我们祖国各民族全面发展。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使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更加接近起来。

1922 年 12 月，召开了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提议，建立了苏维埃各族人民自愿的国家联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

———————————————

① 耐普曼是俄语“нэ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在中亚细亚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加盟苏维埃共和国，即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有这些共和国都按自愿和平等原则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苏联。同时每个共和国都保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22 年 11 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演说。列◇288◇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来的情况时，表示坚信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这是他向全国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1922 年秋,党遭到了重大的不幸：列宁患重病了。全党和全体劳动者都感到，列宁患病如同他们自己遭到了巨大的痛苦。大家都为亲爱的列宁的生命担忧。但是，列宁即使在病中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列宁在病势已很沉重的时候，还写了好几篇很重要的文章。在这最后一批文章中，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拟定了在我国通过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吸引农民参加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由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的生产协作组织即集体农庄的道路。列宁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正确地组织起来的、拥有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是能用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01 页——译者注

1923 年 4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不能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百零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八万六千名党员，即比上次党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在继续清党，有相当一个百分数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七◇289◇人。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考虑了列宁在最后一批文章和书信中所作的各项指示。

大会坚决回击了所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出社会主义阵地，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分子和提议接受资本主义盘剥的分子。在会上作这种提议的，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他们提议向外国资本家投降，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提议偿还被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债务。党把这些投降主义的提议痛斥为叛卖性的提议。党不是不利用租让政策，但这只能以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部门和规格为限。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提议也是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当时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不可动摇性的侵犯。

大会还回击了托洛茨基强迫党对农民采取毁灭政策的企图。大会指出，不要忘记小农经济在国内占优势的事实。大会强调说，发展工业，包括发展重工业，不应同农民群众的利益相抵触，而应同他们的利益相结台，应有利于全体劳动居民。这些决定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因为他提议用剥削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因为他事实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

同时。托洛茨基还提议关闭普梯洛夫和布良斯克等等具有国防意义的大工厂，据他说，这些工厂不赢利。大会气愤地否决了托洛茨基

的提议。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向大会提出的书面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这个机关负有维护我们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全力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项◇290◇重要任务。

大会对民族问题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强调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国际意义。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都把苏联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和消灭民族压迫的榜样。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大力消灭苏联各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他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以及他们对少教民族的大国主义政策。当时发言反对党的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穆吉万等人。这些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成立南高加索联邦，反对巩固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友谊。他们对格鲁吉亚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特别是阿尔明尼亚人，都迁出梯弗里斯，用法律规定格鲁吉亚女子嫁给非格鲁吉亚人要丧失格鲁吉亚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和拉柯夫斯基支持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

大会以后不久，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民族问题工作者的专门会议。会上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集团和斐祖拉·霍札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集团。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的结果。这个总结使人鼓舞和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①]◇291◇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0页——译者注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恢复国民经济的头几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1924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种面积从1921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说明农民经济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增长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工资提高了。工农生活比1920--1921年好过了、改善了。

但是，还没有消除的经济破坏的后果，仍然令人感觉得到。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到 1923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商业的发展时好时环，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普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这一切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

到1923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策，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加上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292◇品不合算，就不买

了。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党中央委员会定出了克服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消除销售危机的种种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价格。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采用稳定的货币切尔克。整顿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工作。采取了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发展商业、把各种私商和投机商从商业中排挤出去的措施。

当时本应鼓起劲来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忠实于党的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但是托洛茨基派却不是这样。他们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以为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反党的斗争中利用了一切；1923 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患病。正是在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攻击。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纠集在自己周围，炮制了一个旨在反对党、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叫做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派、民集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遭灭亡,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这就是要竭力恢复被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禁止了的派别。

托洛茨基派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或农业，关于改进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趁列宁不能视事，恢复党内的派别，动摇党的基础，动摇党的中央。◇293◇

继四十六人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

污蔑党的干部，对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诽谤性的责难。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搬弄着党已听他讲过不止一次的孟什维主义陈词滥调。

托洛茨基派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青年党员身上打主意。托格茨基为了争夺青年学生而对他们阿谀奉承，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他指桑骂槐，用第二国际首领的蜕化来卑鄙地影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也在走着这条路。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反对派分子的两个文件，即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由托洛茨基派散发给各区和各支部，并交付党员讨论。

党接到了要党争论的挑战。

这样，现在也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夜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一样，托洛茨基派又强迫党来进行全党争论了。

党虽然忙于更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但仍接受了挑战而宣布进行争论。

全党都参加了争论。斗争很激烈，莫斯科的斗争特别尖锐。托洛茨基派力图首先夺得首都组织。但是争论并没有帮托洛茨基派的忙。争论只是使他们丢了脸。托洛茨基派无论在莫斯科或在全苏联各地，都遭到了惨败。只有少数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派。

1924 年 1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斯◇294◇大林同志对争论所作的总结报告。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指出它是党内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会议的决议后来由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但是，托洛茨基派并没有停止其破坏活动。1924 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他在文章中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这篇文章完全是诬蔑我们党和党的领袖列宁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都把这本诽谤性小册子奉为至宝。党愤怒地回击了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英勇历史的诬蔑。斯大林同志揭穿了托洛茨基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企图，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①

斯大林同志的 1924 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本小册子是对列宁主义的精辟阐述和理论上的深刻论证。它在当时和现在都起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锐利的武器武装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的作用。

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中，斯大林同志把党团结在它的中央周围，并动员起全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而继续斗争。斯大林同志证明了，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是保证继续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一时期时说："不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取得胜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295◇

但是，党的列宁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党和工人阶级遭到的最大的不幸而显得黯然无光。1924 年 1 月 21 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把列宁逝世看作最沉痛的损失。在列宁安葬的那天，国际无产阶级宣布一切行业都停止工作五分钟。铁路停运了，工厂停工了。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309 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31 页——译者注

全世界劳动者怀着极大的悲痛送别自己的父亲和导师，最好的朋友和保护者列宁。

苏联工人阶级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列宁党的周围来纪念列宁的逝世。在这些哀悼的日子里，每个觉悟工人都仔细考虑了自己应如何对待执行着列宁遗嘱的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成千上万非党工人请求接收他们入党的申请书。中央委员会欢迎先进工人发起的这一运动，宣布大批接收先进工人入党，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次加入了党。加入党的都是决心为党的事业、为列宁的事业而献身的人。当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二十四万多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即最觉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纪律的分子加入到党里来了。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列宁的逝世表明，我们党同工人群众多么亲密，工人们对列宁的党多么珍爱。

在哀悼列宁的日子里，斯大林同志代表全党在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伟大的宣誓。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296◇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

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①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自己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列宁的誓言。

1924 年 5 月，举行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297◇十一名党员。党员数量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大大增加，是因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党的队伍增加了约一十五万新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六人。

大会一致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肯定它是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同时批准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的总结》这两个决议。

从巩固城乡结合的任务出发，大会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业，首先是轻工业，同时强调必须迅速发展冶金业。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42-46 页——译者注

大会批准建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向一切商业机关提出了控制市场、把私人资本从商业领域排挤出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扩大国家对农民的低利贷款而把高利贷者从农村中排挤出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用各种方法使农民群众合作化的口号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最后，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青年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已经奋战了四年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英勇工作行将结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298◇政治实力日益增长。

这时国际形势已有变化。资本主义抵挡住了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第一次革命进攻。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各妥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这方面帮了资产阶级的忙。革命的暂时退潮到来了。西欧资本主义的暂时局部稳定，即资本主义阵地的局部巩固到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并没有消除使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各种基本矛盾。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使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稳定酝酿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新爆发和新危机。

除资本主义的稳定外，还有苏联的稳定。但是这两种稳定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稳定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苏联的稳定则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虽然西方的革命失败了，但是苏联的国际地位仍在继续巩固，虽然速度较为缓慢。

1922 年，苏联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会议上，各帝国主义政府因资本主义各国革命遭到失败

而气焰嚣张，企图对苏维埃共和国施加新的压力，不过这次是采取外交形式。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他们要求把十月革命宣布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外国资本家，要求偿还沙皇政府的一切债务。只有这样，帝国主义国家才答应给苏维埃国家少量的贷款。

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

热那亚会议没有什么结果。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 1923 年通过最后通牒再一次进行干涉的尝试，也遭到了应有的回击。◇299◇

资本主义国家在试探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确信苏维埃政权已不可动摇之后，就相继来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1924 年，同英法日意四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已经争得整整一个和平喘息的时期了。

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的忘我工作,已经开花结果。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1924—1925 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 1925 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 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 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对苏维埃国家来说，对一个建

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单单达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战前水平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平。必须继续前进。苏维埃国家争得的长时间的喘息，保证了继续建设的可能性。

但是这里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前途、关于我国发展即我国建设的性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循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循着其他什么方向？我们是应当建成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我们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去准备肥沃土壤呢？一般说来，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呢，如果有，那么能不能◇300◇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推迟和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做到呢？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从哪里开始这种建设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恢复时期快结束时提到了党的面前，已经不是作为理论问题，而是作为实践问题，作为日常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到了党的面前。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以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好让我们从事工农业建设的党的经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知道要朝什么方向走——朝社会主义走，还是朝资本主义走？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以明确的回答，那我们在建设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就会成为没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劳无益的工作。

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党回答说，是的，在我国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917 年 10 月,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粉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创造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措施就是：

剥夺资本家和地主；变土地、工厂、铁路和银行为全民财产；实行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建设，从而在**经济上**也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301◇经济的建设必须由以开始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方革命的推迟，无论非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

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党知道，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的全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仅仅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开。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在寻找机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武装干涉，在苏联作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尝试。由于苏联暂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从而产生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清楚,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也就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

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302◇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能给外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以应有的回击，正如他们在 1918—1920 年给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以回击一样。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此消灭了。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还继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即使新的武装干涉失败，也不会消灭武装干涉的危险。

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同苏联劳动者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去讨论，以便得到代表会议的批准和通过，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

党的这个方针使反对派分子大为震惊。其所以使他们大为震惊，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把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联系起来，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成党法，变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

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

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303◇“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 年 4 月)谴责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对派分子的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可奈何，只好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缓同党作斗争，因为他们拿定主意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来“向党开火”。他们在列宁格勒纠集了自己的同伙，组织了所谓的“新反对派”。

1925 年 12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内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整整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这个党员最集中地区的代表团，居然准备出来反对自己的中央，这种情况有党以来还没有过。

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名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名预备党员，即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微少一些。这是对混杂有反党分子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进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实

力增长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绘。由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优越，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恢复，并接近了战前水平。虽然有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事实。当时农业生产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二。而工业仅仅占三分之一。斯◇304◇大林同志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 1925 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们硬说什么(无视列宁的意见!)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294 页。——译者注

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又说什么(也是无视列宁的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但这也救不了他们的命。◇305◇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

很清楚,季诺维也夫派就是伪装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固联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危害这个联盟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农的危险,第二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低估中农的作用。对于哪一种倾向更坏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①

党确实把“左”右两种倾向都粉碎和消灭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时,一致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著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认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②(列宁)。代表大会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306◇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译者注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译者注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但是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根本没有反映列宁格勒广大共青团员的情绪。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一批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必须向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揭露，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犯罪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各单位的党员大会听了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介绍，会开得很激烈。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组织紧急代表会议。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

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307◇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150页)[①]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78—179页。——译者注

简 短 的 结 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特别是在最初——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分子，在这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拼命反对列宁的党。领导这些反党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分子指望在列宁逝世后瓦解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分裂党，使党产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苏联胜利的心理。实际上，托洛茨基派是企图在苏联建立一个新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建立另外一个党，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党。

党在列宁旗帜下团结在自己的列宁中央周围，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挫败了托洛茨基派以及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新朋友们，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布尔什维克党积蓄了人力物力，把国家引上了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308◇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 年)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首先活跃农业，从农业取得原料和粮食，并在农业的带动下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较为容易地解决了这些任务。

但是恢复时期有三大缺点：

第一，当时的工厂都是老厂，技术陈旧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生产了。任务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狭窄；在当时的工厂中缺乏数十个、数百个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国家绝对必需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而需要建立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厂，工业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工业。任务是要建立这些工厂,用现代化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309◇

第三，恢复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已有发展而且已走上正轨，但是轻工业发展本身后来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国家的其他种种只有靠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任务是要在现在侧重发展重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用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

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没有数十亿投资是不行的。指靠外债没有可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只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资金来从事建设。而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从外面流入资金，即靠掠夺殖民地，靠战败国人民的赔教，靠外债。苏维埃国家根本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至于外债，苏联又被切断了来源，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给苏联。必须在**国内**找到资金。

而在苏联也就找到了这样的资金。在苏联找到了任何一个资◇310◇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积累泉源。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资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的外债；这些外债，单是利息一项，人民每年就要支付几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摆脱了这一切重担，就能够帮助国家建设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迫切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 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是个威胁。因此，各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对苏联施加新的压力、制造混乱、破坏或者至少是阻挠苏联的工业化。

1927 年 5 月,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人(“死硬派”)向“阿尔柯斯”(苏联对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挑衅性的袭击。1927 年 5 月 26 日,◇311◇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1927 年 6 月 7 日，波兰籍俄国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杀了苏联大使沃依柯夫同志。

同时在苏联境内，英国特务和破坏分子在列宁格勒向党的俱乐部投掷炸弹，炸伤约三十人，其中有几人受重伤。

1927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差不多同时发生了袭击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

这就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额外的困难。

但是苏联没有屈服于压力，很容易地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挑衅性袭击。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的破坏活动，给党和苏维埃国家也带来了不少困难。难怪斯大林同志当时说，“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①]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尽管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了决定，反对派也声明对党忠诚，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不仅如此，他们的破坏活动、分裂活动搞得更厉害了。

1926年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结成一个反党联盟，把所有已被击败的反对派集团的残兵败将纠集在这个联盟的周围，奠定了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地下党的基础，从而粗暴地破坏了党章和历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组织的决议。党中央警告说：这个类似有名的孟什维克八月联盟的反党联盟如果不解散，它的参加者就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们不肯罢休。

同年秋，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他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厂党员大会上又搞袭击，企图强迫党再次进行争论。同时他们还提出自己的纲领要党员讨论，而这个纲领不过是通常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纲领的◇312◇翻版罢了。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干脆把他们赶出了会场。中央再次警告联盟的参加者说，党不能再容忍他们搞破坏活动了。

反对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签名向中央递交声明，谴责自己的派别活动，保证今后对党忠诚。然而这个联盟事实上仍继续存在，它的参加者并没有停止反党的地下活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译者注

动。他们继续拼凑自己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发自己的纲领。

鉴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些行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 年 11 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6 年 12 月)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在自己的决议中痛斥联盟参加者是分裂主义者，指出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已经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

但是，这并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1927 年，当英国保守党人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攻击党。他们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 “八十三人纲领”，并在党员中散发，要求中央再在全党展开争论。

在所有的反对派纲领中，这个纲领算是最虚伪最骗人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托洛茨基被和季诺维也夫派不反对遵守党的决议，并且表示对党忠诚，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决议，嘲笑对党和党中央的任何忠诚。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不反对党的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统一，实行分裂的路线，并且单独建立了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反苏反革命政党的一切条件。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实行工业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咒骂党关于社会主义在◇313◇苏联胜利问题的决议，嘲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系列工厂租让给外国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租让企业上。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进行集体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嘲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说工人阶级同农民必然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

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文明租佃人”富农身上。

这是反对派的一切虚伪纲领中最虚伪的纲领。

这个纲领原来就是为了欺骗党的。

中央拒绝立刻宣布进行争论，并向反对派分子说，进行争论只能根据党章的规定，即只能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举行。

1927 年 10 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进行全党争论。争论会开起来了。争论的结果对于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是极其可悲的。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党员有七十二万四千人。赞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反党联盟遭到了惨败。党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了这个联盟的纲领。

这就是党的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志，而联盟的参加者自己正是向党提出申诉的。

但是这次教训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他们不仅不服从党的意志，反而决定破坏党的意志。还在争论结束之前，他们看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抗议示威。他们选定了 11 月 7 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作为自己示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苏联劳动者要举行全民的革命示威。这样，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就是有意举行一个平行的示威了。不出所料，联盟的参加者能够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314◇撮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头目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和撵走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滚进了反苏泥潭，现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在进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中央的，而在这里，在他们举行这个可怜的示威时，他们已走上向敌对阶级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了。既然他们立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也就必然要滑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上去，因为在苏维埃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党和国

家是分不开的。这样，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头目们就是自外于党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不能再容忍有滚进反苏泥潭的人了。

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第聂伯河水电站

（358）

红色普梯洛夫工厂生产的拖拉机

建设中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

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成就

斯达汉诺夫运动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到1927年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短时期内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工业和整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的相应水平。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社会主义成分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营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315◇

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业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在沿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提前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

私商也被迅速排挤出商业。私商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批发商业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私商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社会主义大工业增长得还要迅速，它的产值在1927年，即恢复时期后的第一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创纪录的增长数，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所达不到的。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整个农业已超过战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

这就是说，1918 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 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三分之一强。

毫无疑义，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316◇村失败；或者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发展农业的第二条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

党在这方面遵循的是列宁的如下一些关于在农业中必须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经济的指示：

(一) “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4 卷第 540 页)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26 页。——译者注

(二)“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页)[①]

(三)“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9页)[②]

(四)“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页)[③]

这就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形势。◇317◇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十八万七千一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预备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高涨，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④]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和工业比较，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现代化技术而落后了，他着重指出，农业的这种不相称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④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 页。——译者注

的状况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威胁。

斯大林同志问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①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同时，大会还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318◇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60页)②

最后，大会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原则出发．并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全线组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成分有计划地展开进攻，指示有关机关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后，就来讨论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

大会确认：“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32页)③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0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64 页。——译者注

大会认为,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走走上了进行反苏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出党的决定,并通过决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等)开除出党。

思想上被打败和组织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参加者,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影响。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319◇里来。当然,那时党还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和受外国间谍机关雇用的特务,还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要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但党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紧要的关头反对列宁和列宁党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但是后来发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320◇子”(除少数外)的声明，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的声明。

原来，这些老爷还在递交声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准备在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一伙毫无原则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践踏自己观点的那一点残余，在大家面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的观点，像变色龙一样需要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只求自己能留在党内,留在工人阶级内，好有机会来危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都是政治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但是，绝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仅仅看作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图用各种方法来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骗的方法、变色龙变色的方法、招摇撞骗的方法

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动家的称号就行。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在“适当时机”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骑在人民头上当“统治者”，面对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死敌。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煽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321◇会主义建设，反对集体化。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现在富农从报刊上的反应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为他们辩护申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煽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情绪。果然，富农的反抗愈来愈厉害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

党懂得，只要富农的反抗还没有被打垮，只要农民还没有亲眼看到富农在公开的战斗中被打败，工人阶级和红军就要吃缺粮的苦头，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也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

党遵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实行这样的口号，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对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同时给了贫农一系列优待，如贫农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从富农那里没收的粮食。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 1928 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就在这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沙赫特破坏分子同从前的企业老板(俄国和外◇322◇国的资本家)和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紧密勾结。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促使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分子不合理地在并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他们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炸毁和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破坏分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

破坏分子被交付法庭审判了。他们受到了法庭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该成为生产技术行家，以免今后再受旧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的欺骗；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的决议，改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家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员被动员去学习。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吓唬头脑简单的人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溃)，而且硬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看不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高级形式的农

业的增长，一看见富农经济在衰落，就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农业的退化。为了使自己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323◇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

不难明白，党面前的这个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即仅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有某种可能用“不断革命”这种左的、空喊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在党转入对富农的进攻的时候跳出来反党的，因而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开地、不加粉饰地替我国的反动势力首先是富农辩护。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工作”来收罗支持者。通过布哈林纠集了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之流的资产阶级青年，通过托姆斯基纠集了官僚化了的工会领导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过李可夫纠集了腐化了的苏维埃领导人(阿·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盖自己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欣然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乌格拉诺夫、柯托夫、乌哈诺夫、柳亭、雅果达、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

部分右倾分子仍然是隐蔽的，没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324◇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修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揭露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同伙，向他们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34页）①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团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但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肯甘休。他们在中央又提出一个反党纲领（一项声明）。中央谴责了这个纲领。中央再次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下场。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仍不理睬，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译者注

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325◇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主义者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粉碎。

党和右倾投降主义者斗争的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

党内再次出现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的注意。他们以为党内“再次出现的纷争”是党削弱的表现，又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破坏我国还没有巩固的工业化事业。1929 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唆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了，被红军击败的军阀退却了，这次冲突以我国同满洲当局签订和平协定而宣告结束。

苏联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扰、克服了外敌的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胜利了。

不久,原被英国保守党人中断的苏英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在顺利地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开展重工业的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后，为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必要的条件。

1929 年 4 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计划的“理想”方案，要求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这样，党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 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一百九十五亿◇326◇卢布，运输业为一百亿卢布，农业为二百三十二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485页)①

这个计划虽然非常宏伟，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冲昏头脑的事情。它是由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部发展进程准备好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已普及于工农群众、反映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劳动高潮准备好了的。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告全体劳动者书。

社会主义竞赛展示了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的卓越榜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在许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了**响应计划**。他们做出了英勇工作的榜样。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人们对劳动的看法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不自由的苦役，而现在它开始变成“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斯大林)②。

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德涅泊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开展起来了。在顿巴斯，开始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和戈尔洛沃工厂的修建以及鲁干斯克机车制造厂的改建。新的矿井和高炉增多了。在乌拉尔兴建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伯列兹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两个化学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动工了。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都在兴建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如顿◇327◇河岸罗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巴斯在扩建。一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46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页。——译者注

座宏伟的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十一个月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来。在德涅泊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工人们打破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的新建设热潮、这样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高潮。

农民这次也不落后。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建立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农民群众开始确定地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观看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操作，看得眉飞色舞，马上决定“加入集体农庄”。农民过去分散成了小而又小的个体经济，没有什么像样的农具和牵引力，没有可能开垦大片的荒地，没有改善经济的前途，为贫困所压抑，孤苦零丁而无人过问。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在于把小农户联合为大集体即集体农庄，就在于采用能够开垦任何“硬地”、任何荒地的拖拉机，就在于从国家方面获得机器、资金、人员和意见的帮助，就在于有了可能免除富农的盘剥——因为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刚打败了富农，把他们打翻在地，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拍手称快。

在这个基础上，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接着又全面铺开了：它到 1929 年底时急剧发展起来，那空前的增长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也未曾有过。

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 1928 年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1929 年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到了 1930 年，集体农庄已经有可能提出耕种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计划了。◇328◇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1929 年)中讲到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时说：“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

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①

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发展中的转变。

这是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问道：“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他回答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就。”②

这就是说，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正在成熟，或者说已经成熟了。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简 短 的 结 论

党在1926—1929年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克服了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困难。党和工人阶级的努力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胜利。

工业化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即为建设重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能够重新装备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的基础奠定了。

采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新◇329◇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

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同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一斗争最重要的结果是：镇压了富农的反抗，揭露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投降主义者联盟是反苏联盟，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是富农的代理人，驱逐了托洛茨基派出党，确认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联共(布)党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派被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打败、在工人阶级中丧失了任何根基后，已不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变成了一伙毫无原则的怀有野心的政治骗子，一帮政治上的两面派。

党在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之后，就动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实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地展开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掀起了蓬勃的劳动高潮，培养出了新的劳动纪律。

这一时期以大转变的一年告终，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在工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农业取得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就，中农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330◇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1930－1934 年)

一　1930－1934 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两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迅速地发展着工业，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 1929 年底爆发了破坏力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这一危机。工业危机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更加恶化。

在危机的三年(1930－1933 年)内，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 1933 年达到了 1929 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国工业在 1933 年底却降到 1929 年的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国工业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这种情况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济危机的国家。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二千四百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痛苦的境地。几千万农民一直受着农业危机的折磨。◇331◇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即建立资本主义极端反动分子、极端沙文主义分子，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掠夺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结果正是如此。

1932 年，日本发动战争的危险加大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欧洲列强和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在国内忙得不可开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防御能力薄弱的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向中国宣战，狡诈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地方事件”，偷偷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东三省。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为侵占中国北部和进攻苏联准备了合适的阵地。为了便于自由行动，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自己的军备。

这种情况促使美英法三国去加紧扩充它们在远东的海上军备。日本的目的显然是征服中国，并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从这里赶走。后者就以加紧扩充军备来对付。

但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侵占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当然不能把这种危险置于不顾，于是就来努力加强远东边区的防御能力。

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不仅在远东尖锐化，而且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工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工人大批失业,贫苦阶级生活无◇332◇着，加强了工农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转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义愤。在德国，由于这个国家被战争、被付给英法战胜国的赔款以及经济危机弄得民穷财尽，由于工人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英法外国资产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张选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会使它吃苦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认定，为了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把国会化为乌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个能够镇压工人阶级而把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专政。于是它就叫那个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能把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工人阶级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这方面帮了忙，他们用自己的妥协主义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就是这些条件使德国法西斯分子在1933年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说：

“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作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作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45页）[①]◇333◇

德国法西斯分子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内政策。他们退出国际联盟、公开准备战争，企图用**暴力手段**按德国的需要来修改欧洲国家的边界，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15页。——译者注

这样，由于德国法西斯分子作祟，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当然不能把这样严重的事实置于不顾。于是它就警惕地注视着西方事变的进程．并加强它在西部边陲的防御能力。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1929—1930 年全面铺开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是党和政府过去全部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开始为农业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28 年和 1929 年粮食收购运动期间对富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使农民逐渐习惯了集体经济；第一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这一切为过渡到全盘集体化，为农民整村，整区、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做好了准备。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守富农的财产、◇334◇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

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

这就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当时苏联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铲除富农，打垮他们的反抗，消灭他们这个阶级，并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他们的生产。

1927 年,富农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商品粮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 1927 年能够提供的商品粮仅仅三千

五百万普特。1929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坚定方针，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方面取得了成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不下四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商品粮已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而在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的商品粮已达四亿多普特，即远远地超过了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

这样，由于我国经济方面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动，由于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布尔什维克党就有可能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

1929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同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颁布土地租佃法把富农的土地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颁布个体农民经济使用雇佣劳动法来限制富农经济的规模。但是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因为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容许富农存在，而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又对此给予了一定的保障。这样的政策限制了富农的增长，使那些经不住这种限制◇335◇的个别富农阶层受到排挤和陷于破产。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消灭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并没有消灭富农。这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政策在一定时期，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的时期，是必要的。

1929年底，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放弃这个政策而实行了急剧的转变。它采取了消灭的政策，采取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他农具转交集体农庄。富农被剥夺了。如同1918

年资本家在工业中被剥夺一样，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富农的生产资料这一次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联合起来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的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活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

这个革命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根本同题：

(一)它消灭了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即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富农阶级；

(二)它使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劳动阶级，即农民阶级，从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道路转上了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三)它在农业这个最广泛的，生活必需的、但又最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中，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336◇

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同时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1929年在论证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指出全盘集体化这一群众性农民运动的结果时写道：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作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破灭。”(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96页)[①]

联共（布)中央在1930年1月5 日《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这一历史性决议中，明文规定了消灭富农阶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36页。——译者注

级的政策。这一决议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对集体化准备的不同程度。

当时规定了不同的集体化速度。联共(布)中央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对集体化最有准备、拖拉机较多、国营农场较多、在过去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同富农斗争的经验较多的那些最重要的产粮区，即北高加索(库班、顿河、捷列克)、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下游。中央提议这一类产粮区在1931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第二类产粮区，即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地，可以在1932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其余各州、边区和共和国（莫斯科州、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等地)，集体化完成的时间可以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到1933年。

党中央认为，由于集体化速度日益增长，必须加速建立生产拖◇337◇拉机，农具等等的工厂。同时，中央要求“坚决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现阶段轻视马匹牵引作用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导致随意处置和变卖马匹”[①]。

1929—1930年度给集体农庄的信贷增加了一倍(达五亿卢布)。

规定由国家出资给集体农庄进行土地规划。

在这个决议中有一个极重要的指示：集体农庄运动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农业劳动组合。

中央十分严肃地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必须“反对任何从上面对集体农庄运动‘发号施令’的做法，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危险，把集体化当作儿戏，而不是开展真正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竞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62页)[②]。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1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5页。——译者注

中央的这一决议把如何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问题讲清楚了。

在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这一政策的基础上，蓬勃的集体农庄运动全面铺开了。农民整村、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扫除了前进路上的富农，摆脱了富农的盘剥。

可是，在集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党的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也很快暴露出一些缺点，即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的歪曲。尽管中央提醒不要在集体化取得成就时头脑过于发热，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是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

当时出现了违背集体农庄建设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地区不贯彻自愿原则，而以所谓“剥夺富农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来强迫加入集体农庄。◇338◇

有些地区不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不去耐心地解释党的集体化政策的一些原则，而是官僚主义地在上面发号施令，造成虚报集体农庄数字的现象，人为地扩大集体化的百分数。

中央指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但有些地方不顾这一指示，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等都实行公有。

某些州的领导人刚一看见集体化取得成绩就头脑发热，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莫斯科州为了追求浮夸的数字，竟责成该州工作人员在 1930 年春完成集体化，虽然他们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到 1932 年底)。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违背指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富农及其应声虫就利用这种过火行为进行挑拨，提出组织公社而不组织农业劳动组合，提出立刻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有。同时，富农还鼓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杀掉，诱骗农民说牲畜

到集体农庄内“反正会被没收”。阶级敌人指望地方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所犯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会激怒农民，会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

由于党组织的错误和阶级敌人的直接挑拨，1930 年 2 月下半月，在集体化普遍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的危险征兆。有的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煽起了农民公开反对苏维埃。

党中央在接到一连串警报、知道党的路线遭到歪曲因而集体化有失败的危险之后，就立刻开始纠偏，努力把党的干部引上迅速改正错误的道路。1930 年 3 月 2 日，根据中央决定，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这篇文章警告了所有由于集体化成就而头脑发热、犯了严重错误和离开了党的路线的人，警告了所有◇339◇企图用行政强迫手段使农民转上集体农庄道路的人。文章特别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的速度和方法时必须考虑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实行公有。

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这篇文章帮助党组织改正了错误，极其有力地回击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原以为他们一定能利用这种过火行为来煽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广大农民群众确信，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与某些地方发生的鲁莽的“左的”过火行为毫无共同之处。这篇文章使农民群众安了心。

为了把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所发动的纠正过火行为和纠正错误的运动进行到底，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这些错误再一次进行打击，于 1930 年 3 月 15 日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认为这是离开党的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结果，是直接违背党的指令的结果。

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

中央提议：“**撤换**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工作者。”(《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63页)①

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能改正错误的州和边区的党组织(莫斯科州、南高加索)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1930年4月3日，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340◇志们》一文。文章指出，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和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估计到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跳过了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克服了一些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的过火行为。

只是因为中央非常坚决，善于**逆潮流**而进，才把党内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使劲往下滑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确道路。

党把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行为克服了。

结果就把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巩固了。

结果就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党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以前，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而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的严重进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工业方面。农业、农村暂时还落后于工业，落后于城市。因此，进攻还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非总攻性质的。但是现在，农村的落后已开始从画面上消失，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20页。——译者注

农民为消灭富农而进行的斗争已十分清楚地呈现出来，党已进而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所以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有了总攻的性质，片面的进攻转变成了全线的进攻。到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总攻已经全线展开了。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6月26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六万零八百七十四名党员和七十一万一千六百零九名预备党员。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①](斯大林)载◇341◇入党的史册的。

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的比重。在1929—1930经济年度，工业的份额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三，而农业的份额约占百分之四十七。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6—1927年度，**全部**工业的总产值还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9—1930年度，已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的机器制造业，更加强大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说：“……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②]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但是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和工业发展的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32页。——译者注

水平混为一谈。虽然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但按工业发展的**水平**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电力生产的情形就是如此，尽管苏联在电气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属生产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联的生铁产量，根据计划在1929—1930年度末应为五百五十万吨，而德国1929年的生铁冶炼量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吨。为了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情形，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同企图减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最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342◇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369页)[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后，群众中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在许多先进工业部门(石油工业、泥炭工业、普通机器制造业、农业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在两年半至三年内完成这些部门的五年计划。这就证实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是完全现实的，并揭穿了那些缺乏信心、怀疑这个口号能实现的人的机会主义。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②]。

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苏联的农业发展实现了极其重大的转变。广大农民群众完全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截至1930年5月1日，在各产粮州的主要产粮区，集体化的农户已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在1928年春为百分之二三)。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达三千六百万公顷。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36页。——译者注

这样，中央1930年1月5日决议中所规定的那个提高了的计划（三千万公顷）超额完成了。而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在两年内超额百分之五十多完成了。

集体农庄的商品产量三年内增加了三十九倍多。1930年，国家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算)取得的商品粮，已占国内粮食的全部商品产量的一半多。

这就是说。今后决定农业命运的将不是个体农户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如果说在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以前，苏维埃政权◇343◇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业。那么今后它也要开始依靠农业中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成分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正如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所指出的，集体农民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真正的可靠的支柱”①。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1页。——译者注

广大农民踊跃加入集体农庄

（389）

农业生产机械化

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党和政府规划农业集体化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仅已经建立和巩固、而且向前发展得相当迅速的时候，党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必须向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新技术，提供新机床和新机器。由于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大量增长，必须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产量增加一两倍。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现代化的新设备来供给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旧的设备不能使产量提高得这么快。

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满足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更高的需要。

不改造，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就不能进行到底，因为要打垮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不仅要依靠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依靠新的技术。依靠自己技术的优越。

不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344◇义国家，因为从工业的发展速度看，苏联已超过这些国家，但从工业的发展水平看，从产量看，苏联还大大落后于它们。

为了消灭这种落后，必须用新的技术来供给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

这样，技术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阻碍这件事情的，并不是新机器和新机床不够，因为机器制造工

业已能提供新的设备，而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正确地对待技术，低估技术在改造时期的作用，鄙薄技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认为：技术是“专家”的事情，是交给“资产阶级专家”去做的一种次要的事情；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不应干预生产技术；他们应该抓的不是技术，而是更重要的事情，即对生产的“一般”领导。

这样，让资产阶级“专家”管生产上的事情，而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则从事“一般”领导，即签署公文。

用不着证明，采取这样的态度，“一般”领导必然变成“一般”地空谈领导，为签公文而签公文，在一纸公文上瞎忙。

当然，在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这样鄙薄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仅永远不能超过、而且也永远不能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对待技术，而且是在改造时期，就会使我国注定要落后，使我们的发展速度注定要降低。这样对待技术实质上掩盖和掩饰了一部分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愿望——放慢、降低工业发展速度而为自己造成一种“安静的环境”，办法就是把生产的担子推给“专家”。

必须使党员经济工作人员面向技术，使他们对技术产生兴趣，向他们指明：掌握新技术是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切身的事情，不掌握新技术就有使我们祖国永远落后，永远不能翻身的危险。

这个任务不解决就不能前进。

斯大林同志1931年2月在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345◇的演说在这方面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

旧俄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

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第10版第444—446页）①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党员经济工作◇346◇人员对技术的鄙薄态度，使他们面向技术，开辟了为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握技术而斗争的新时期，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从这时起，技术不再由资产阶级“专家”所垄断而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切身的事情，而“专家”这一鄙薄的称呼变成了掌握技术的布尔什维克的光荣称号。

从这时起，必然会出现而后来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一批、成千成万掌握了技术和能够领导生产的红色专家。

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即苏维埃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我们经济领导中的基本力量。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99—402页。——译者注

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促进并且也确实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改造工作不仅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进行，而且还以更快的速度在农业方面进行。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农业拥有的机器本来就比其他部门少，它比哪一个部门都更需要得到新机器。而现在特别需要加紧用新机器供给农业，因为现在集体农庄的建设每月每周都有新的发展，也就是说每月每周都提出了供给它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新要求。

1931 年，集体农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就主要产粮区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全盘集体化在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二等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个体农民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巨大胜利。

但是，集体农庄建设暂时还没有向深度发展,而只是向广度发展;还没有向改进集体农庄工作和集体农庄干部的质量方面发展,◇347◇而只是向增加集体农庄的数量和扩大集体化的地区的方面发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农庄积极分子的成长、集体农庄干部的成长，赶不上集体农庄本身数量的增加。因此，新集体农庄中的工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而集体农庄本身暂时还幼弱，不巩固。农村缺少集体农庄所必需的能读会写的人(会计、管理员、秘书)，农民缺乏经营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这些也妨碍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在集体农庄里都是些昨天的个体农民。他们只有经营小块土地的羟验，还没有领导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要获得这样的经验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这些情况，集体农庄工作在最初一个时期暴露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当时发现集体农庄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有许

多集体农庄不是按劳动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常有这样的时候，懒汉竟比埋头苦干不耍滑的庄员分的粮食还多。由于集体农庄领导方面的这些缺点，庄员们对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许多人甚至在大忙季节也不出工，一部分集体农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细，糟蹋很厉害。机器和马匹无人照管,工作没有专人负责，也削弱了集体农庄经济，减少了集体农庄的收入。

在那些被过去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钻进集体农庄窃取了某些职务的地区，情况特别严重。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往往跑到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区，钻进那里的集体农庄进行破坏和捣乱。有时候由于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缺乏警惕性,富农竟钻进了本地区的集体农庄。过去的富农之所以易于钻进集体农庄，是因为他们对集体农庄急剧改变了斗争策略。从前，富农公开反对集体农庄，用残酷手段来对付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先进庄员，躲在角落里对他们放冷抢，焚烧他们的房屋和仓库等等。当时富农想用这种手段吓倒农民群众，不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现在,公开反对◇348◇集体农庄的斗争已经失败，他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半截枪杀人了，而是装得很温和、驯服、听话和完全像个苏维埃人的样子。他们钻进集体农庄之后，就暗中进行破坏。他们到处设法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把计算收成和计算劳动的工作搅乱。富农企图灭绝集体农庄的马匹,并且居然害死了许多马匹。富农故意让马匹感染上鼻疽、疥癣和其他病症，不给马匹任何照料，如此等等。富农破坏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富农所以能够欺骗庄员和进行破坏活动而不受到惩罚，是因为集体农庄还幼弱和没有经验，而集体农庄的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

为了消灭富农对集体农庄的破坏活动和加速巩固集体农庄，必须迅速地、认真地给集体农庄以人员、意见和领导方面的帮助。

布尔什维克党给了集体农庄这样的帮助。

1933年1月,党中央通过决议：在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中成立**政治部**。为了帮助集体农庄，向农村派出了一万七千名党的工作人员去担任政治部工作。

这是一种重大的帮助。

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在两年(1933年和1934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消除集体农庄工作的缺点，培养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巩固集体农庄，清除集体农庄中的敌对分子，即从事破坏活动的富农分子。

政治部光荣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了集体农庄，培养了新的集体农庄干部，整顿了集体农庄的业务领导，提高了庄员群众的政治水平。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2月)和斯大林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说，对提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349◇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对比了农村中集体农庄以前的旧制度和集体农庄这个新制度，他说：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28页)①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指出了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以后所取得的实际成绩。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摆脱了富农盘剥。加入集体农庄并在农庄中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4-495页。——译者注

产工具的千百万贫农群众，从前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在农庄里上升到了中农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这是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个成绩。

斯大林同志说，第二步就是要把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要使集体庄员都成为生活富裕的人，使所有农庄都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休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32-533页）[①]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深深印在千百万庄员的心里，成了集体农◇350◇庄的具体的战斗纲领。

到1934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牢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苏联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1934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二十八万一千台，联合收割机三万二千台。1934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年早十五至十天完成，比1932年早三十至四十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1933年早三个月完成。

这样，由于党和工农国家的巨大帮助，集体农庄在两年之内就巩固了。

集体农庄制度的牢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高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取消面包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而规定食品可以自由购买。

由于作为临时政治机关而设立的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央决定把它们改为通常的党的机关，使其同当时党的区委会合并。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00页。——译者注

所有这些成就，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在工业方面，都是由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获得的。

到1933年初已看得很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已经提前完成，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

这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获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1933年，斯大林同志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全会上作的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总结。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过去这一时期，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取得了如下的基本成绩:

(一)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351◇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成分而成了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

(四)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村中的贫穷、困苦现象，几千万贫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五)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一些生产部门里保持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已改为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

(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些成就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们使工人和农民彻底摆脱了剥削的桎梏，并为苏联**全体**劳动者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开辟了道路。

1934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名党员和九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名预备党员。

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部门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确认党的总路线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352◇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3页)①

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已占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占我国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至于商品流转，资本主义成分已从商业中完全排挤出去了。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说过：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第一种成分是宗法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即几乎不进行任何贸易的经济。第二种成分是小商品生产，即占农民大多数的，出卖农产品的农户以及手工业者。这种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活跃起来了。第四种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第五种成分是社会主义，即当时还幼弱的社会主义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微不足道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同样很幼弱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列宁指出，在这五种成分中，社会主义成分一定会占绝对优势。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4页——译者注

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获得完全胜利。

而这个目的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这点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不存在了，第二种社◇353◇会经济成分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领导力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5页）[①]

政治思想领导的问题在斯大林同志报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党说：虽然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已被击败，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在兴妖作怪。经济中特别是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是已被击败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得以死灰复燃的良好土壤。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在经济中已经消灭，但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仍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存在下去。同时必须估计到，应当时刻加以防范的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力图复活和支持这些残余。

斯大林同志还讲到，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特别有生命力。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有些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内，党组织放松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竟让它发展到同敌对势力结合起来、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成了危及国家的一种祸害。斯大林同志在答复民族问题上什么倾向是主要危险的问题时说道：

“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同上，第587页)[②]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6页。 ——译者注

② 同上，第563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号召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揭露敌对阶级的和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354◇

接着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单是通过正确的决议本身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要保证事业成功，必须**正确配备**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员，并**组织**对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不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决议就有变成一纸空文而不能落实的危险。说到这里，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宁的著名原理：组织工作主要就是**挑选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同时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祸害，就是通过的决议同执行决议、检查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脱节。

为了改进对党和政府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直属联共(布)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完成了任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

斯大林同志把党在新阶段上的组织任务规定如下：

(一)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二)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三)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得到实现。

斯大林同志在结束报告时提醒说：虽然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伟大的，使我们产生了应有的自豪感，但是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不要高枕而卧。

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96页)[①]◇355◇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74页。——译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两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更加宏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37年，工业产值和战前水平比，大概增长七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一千三百三十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六百四十多亿卢布。

这样多的基建项目，能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都得到彻底的技术改造。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拖拉机的总功率要从1932年的二百二十五万马力，增加到1937年的八百多万马力。还规定要广泛采用各种农艺措施(实行正确的轮作制，用精选的种籽播种，秋耕等等)。

对运输业和邮电业规定要进行工程巨大的技术改造。

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广泛规划。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组织问题很重视，并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在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胜利，党的政策已经由实际生活即由千百万工农的经验检验过了的时候，组织问题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新的复杂任务，要求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

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掌握新技术和新企业，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些任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首先是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的领导质量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591页)①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84页。——译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它和旧党章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增加了导言部分。党章导言部分对共产党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说明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体系中的地位。新党章详细列出了党员的义务。党章中加进了关于接收党员的更严格的规定和关于同情者小组的条文。党章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的组织机构问题，重新拟定了关于党的支部（原称支部，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起改称基层组织）的条文。新党章还重新拟定了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的条文。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不仅使我们党，不仅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欢欣鼓舞，而且使我们的整个苏维埃知识界，使苏联全体忠实的公民欢欣鼓舞。

这些成就没有使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余孽感到高兴，而是使他们更加恼恨。

这些成就使被打倒的阶级的应声虫——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可怜余孽发了狂。

这些老爷评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时，并不是从欢迎每一个这样的成绩的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自己那个可怜的脱离实际生活和完全腐化了的派别集团的利益出发。我国社会主义◇357◇的成就意味着党的政策的胜利，意味着这些老爷的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他们不仅不承认明显的事实并加入共同的事业，反而为自己的失败和破产向党和人民进行报复，对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事业进行捣乱和破坏，炸矿井，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搞破坏，以便破坏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并在人民中间挑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同时，为了使自己那个可怜的集团免遭揭露和粉碎，他们戴上了一副忠诚于党的假面具，越来越起劲地巴结党、吹捧党、谄媚党，而事实上继续在暗中进行反对工农的破坏活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了忏悔的

发言，他们颂扬党,把党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但是代表大会感觉到，他们的发言有些言不由衷和两面派的味道，因为党要求于党员的不是吹捧和颂扬党的成绩，而是在社会主义战线上忠诚地工作，但这一点是布哈林派早已没有的了。党看到，实际上这些老爷是通过自己的虚伪发言同他们在会外的同伙遥相呼应，教他们耍两面派，叫他们不要放下武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了言，他们过甚其词地斥责自己的错误，也过甚其词地赞扬党的成绩。但是代表大会不能不看到，无论是令人作呕的自我斥责，还是甜言蜜语的歌功颂德,都是这些老爷心地龌龊和做贼心虚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党还不知道，也没有料到，这些老爷在台上甜言蜜语的同时，已经在准备凶杀谢·米·基洛夫了。

1934 年 12 月 1 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谢·米·基洛夫被人用手枪凶杀了。

当场捕获的凶手，原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参加者在列宁格勒组织的一个反革命地下集团的成员。

全党敬爱的、工人阶级敬爱的谢·米·基洛夫被杀害的消息，引起了我国劳动者无比的愤慨和深切的悲痛。

调查材料表明，1933—1934 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以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为首的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团。这个集团的宗旨是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谢·米·基洛夫是预定的第一名牺牲者。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口供中知道，他们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勾结，从他们那里领取经费。

这个组织中被揭露的成员，由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判处了枪毙的极刑。

很快查出存在着一个反革命地下“莫斯科总部”。调查材料和审判表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

导人在培植自己同伙的恐怖主义情绪方面，在准备杀害中央委员和苏联政府成员方面，起了卑鄙的作用。

这些人的两面手法和卑鄙龌龊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个组织和指使杀害谢·米·基洛夫、催促凶手赶快下毒手的人，居然写了一篇颂扬死者基洛夫的悼文，要求把它登载出来。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装出悔过自新的样子，其实他们就在这时也还在耍两面派。他们隐瞒了自己和托洛茨基的勾结，隐瞒了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事实，隐瞒了他们的特务活动和暗害活动。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隐瞒了自己和布哈林派的勾结，隐瞒了法西斯分子的雇佣走狗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的存在。

后来查明，基洛夫同志就是被这个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杀害的。

还在当时，即在 1935 年，就已很清楚，季诺维也夫集团是个暗藏的白卫组织，完全应该把它的成员当作白卫分子来严办。◇359◇

一年后知道，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准备杀害其他中央委员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伊·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尔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审判。这些当场捕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不仅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还作了准备要杀害党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领导人。后来调查材料表明，这些恶棍走上了组织破坏活动的道路，走上了充当特务的道路。1936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揭穿了这些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极其骇人听闻的堕落，揭穿了这些人用假装对党表示忠诚的两面派声明所掩盖的最下流的卑鄙勾当和叛卖行为。

犹大托洛茨基是这一大帮凶手和特务的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

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义的仆从，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和反革命指令的执行者。他们进行着使苏联在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的准备工作，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

各级党组织从谢·米·基洛夫凶杀案的审判中应该得出的基本教训是，要消灭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灭自己的政治麻木病，提高自己和全体党员的警惕性。

党中央在它为谢·米·基洛夫被凶杀一事发表的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指示说：

（一）“必须铲除机会主义的好心肠，它的根源就是错误地以为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会越来越驯服、善良。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那种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不声不响地爬进社会主义，最终将成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右倾思想的翻版。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要好心肠，而要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要◇360◇记住，敌人愈绝望，就愈要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的最后挣扎的手段。要记住这一点，并保持警惕。”

（二）“必须把下列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在党员中讲授党史，研究我党历史上的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手段，他们的策略，尤其要研究我们党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即保证我们党战胜并彻底击溃这些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必须使党员不仅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右倾分子、右的‘左’的畸形儿等等。不应该忘记，熟悉和了解我党的历史是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是 1933 年开始的把混进来的和异己

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工作，特别是在谢·米·基洛夫被凶杀后进行的仔细审查党员证件和更换党员证件的工作。

在审查党员证件以前，许多党组织中任意和随便对待党证的情况很严重。在好些地方党组织中发现，**党员登记工作混乱**到了根本不能容忍的地步，敌人利用了这一点来实现他们的卑鄙目的，他们以党证作掩护来搞特务、暗害等等活动。许多党组织的领导人竟把接收新党员和发党证的事情交给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员去作，甚至往往交给一些完全没有经过考查的党员去作。

1935 年 5 月 13 日，党中央在给各级组织的一封专门讲党证的登记、发给和保存问题的信中，建议各级组织对党员证件进行一次仔细的审查，“在我们自己党的屋子里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

审查党员证件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党中央全会◇361◇1935 年 12 月 25 日关于审查党员证件工作的总结这一决议中指出，这次审查对于巩固联共(布)的队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组织和政治措施。

在党员证件审查和更换以后，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对此，联共(布)中央要求，接收新党员时，不要用集体接收的方式，而要用严格地个别地接收的方式，“从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不同岗位上经受了考验的工人(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接收“我国真正先进的、真正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①]入党 。

中央在恢复接收新党员的工作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记住，敌对分子今后还会企图钻进联共(布)的队伍。因此：

“每个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竭力提高布尔什维主义的警惕性，高举列宁党的旗帜，保证不让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偶然分子钻进党的队伍。”(联共(布)中央 1936 年 9 月 29 日的决议，载于 1936 年《真理报》第 270 号)

———————————————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第 460 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党清洗和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消灭了党的敌人，坚决地克服了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和苏维埃国家过渡到了新的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

简 短 的 结 论

1930—1934 年，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千百万小私有农户转上集◇362◇体农庄道路，转上社会主义道路。

富农这一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被消灭和基本农民群众转上集体农庄道路，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最后根源的消灭、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完全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完全巩固。

集体农庄在克服了许多组织方面的困难后已完全巩固，并且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固基础——头等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消灭了失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为不断改善我们祖国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创造了条件。

我国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一切劳动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实行了大胆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力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就加紧进行他们的“工作”：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特务的匪帮。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反苏活动特别加紧起来。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来从事特务活动、暗害活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来促使苏联遭到失败，以便恢复资本主义。

苏维埃政权果断地惩罚了这些人类蟊贼，无情地惩治了这些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363◇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1935—1937 年)

一 1935－1937 年间的国际形势。经济危机的暂时缓和。新的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1929 年下半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 1933 年底。然后工业低落暂时停止，危机转为停滞，接着工业开始略见活跃，略见上升。但这次上升之后并没有接着就出现在新的较高的基础上的工业繁荣。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甚至不能上升到 1929 年的水平。到 1937 年年中只达到这一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而到 1937 年下半年又爆发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进去的是美国。到 1937 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又增加到了一千万。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迅速增加。

这样，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从不久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就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364◇

这种情况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因此，各侵略国愈来愈趋向于以掠夺其他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来弥补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并且这次除大家知道的德日两个侵略国外，还加上了第三个国家——意大利。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并征服了它。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从“国际法”来看是没有任何根据或理由的，它是采取当时法西斯分子惯用的方式，不宣而战，偷偷地干的。这不但打击了阿比西尼亚，而且也打击了英国，打击了英国从欧洲到印度和亚洲的海上通道。英国想阻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站稳脚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后来，意大利为了便于自由行动，就退出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军备。

于是，就在从欧洲到亚洲的最短的海上通道上结成了一个新的战争纽结。

法西斯德国用单方面的行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并决定实现它用**暴力**修改欧洲国家边界的计划。德国法西斯分子毫不隐晦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邻国，至少是占领这些国家里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这个计划预定首先占领奥地利，随后打击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也许打击波兰，那里也有整整一片与德国毗邻的德意志人居住区，然后……然后“再看分晓吧”。

1936年夏，德意两国开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意大利和德国借口援助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得到了可能悄悄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西班牙境内，即开到法国背后，又把自己的舰队开进西班牙的水域——南面到巴利阿里群岛和直布罗陀一带,西面到大西洋一带，北面到比斯开湾一带。1938年初，德国法西斯分子强占了奥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并扩展到欧洲南部,进到亚得利亚海附近。◇365◇

德意法西斯分子在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时向大家担保，他们在西班牙是进行反对“赤色分子”的斗争，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但这是用来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的一种蠢笨拙劣的手腕。其实，他们是打击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把英法两国通向其亚洲和非洲的广大殖民地领土的海上通道截断了。

至于强占奥地利，要说这是德国同凡尔赛条约作斗争，是德国为

保护“民族”利益而力求收回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丧失的领土，那已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奥地利无论战前或战后都不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用**暴力**兼并奥地利,就是用蛮横的帝国主义手段侵占别国的领土。这种做法无疑暴露了法西斯德国想称霸西欧大陆的野心。

这首先是对法国和英国利益的打击。

于是就在欧洲南部，在奥地利和亚得利亚海一带。以及在欧洲最西部，在西班牙及其周围水域，结成了两个新的战争纽结。

1937 年，日本法西斯军阀侵占北平，侵入中国中部，占领了上海。日本军阀侵入中国中部，也像几年前侵入东三省一样，用的是日本方式，即偷偷地干的，办法就是玩弄骗术，借日方自己制造的种种“地方事件”找岔寻衅，用实际行动破坏一切“国际的准则”、条约和协定等等。日本占领天津和上海，就抓到了同中国这一广阔市场通商的钥匙。这就是说，只要日本掌握着上海和天津，就随时都能把英美从它们有巨额投资的中国中部驱逐出去。

当然，中国人民及其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国规模巨大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土，以及中国民族政府誓将中国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国国境的决心，——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当日本还掌握着同中国通商的钥匙的时候，它对◇366◇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就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的利益，这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于是，在太平洋，在中国一带，又形成了一个战争纽结。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它是不宣而战．悄悄开始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不知不觉地陷进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侵略国，即由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挑起的。战争在从直布罗陀至上海

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着。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已有五亿以上人口。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反对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分割世界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受到损害。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前特点在于，进行和开展这次战争的是几个侵略国，而其他国家，即战争锋芒所指向的“民主”国家，却装作这次战争与它们无关的样子，袖手旁观，节节退让，吹嘘自己爱好和平，责骂法西斯侵略者，并……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阵地奉送给侵略者，同时却硬说它们在准备回击。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相当奇怪和带有单方面性质的战争。但它终究是一次残酷的和野蛮的侵略战争，是使防御能力薄弱的阿比西尼亚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受到蹂躏的战争。

如果认为这次战争的这种单方面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薄弱，那是不正确了。各“民主”国家无疑要比法西斯国家强大。目前正在扩大的世界大战所以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没有结成反对法西斯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当然不会赞同法西斯国家“走过了头”，并且害怕法西斯国家势力的加强。但他们更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付这一切“危险”运动的“良好消毒剂”。因此，各“民主”国家中的统治集团，特别是英国执政的保◇367◇守党，只限于采取一种劝导猖狂的法西斯头目们“不要走过了头”的政策，同时还暗示，他们“完全谅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头目们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反动警察政策。英国统治集团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大体上和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在沙皇制度下所采取的政策相同，当时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就是既害怕沙皇政策“走过了头”，但是更害怕人民，所以就采取劝导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结沙皇反对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阶级因采取这种两面政策

而吃了大亏。可以断定，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历史的报应的。

苏联看到这样一种国际局势,当然不能把这种严重事变置于不顾。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即使规模不大，也是对爱好和平国家的威胁。至于“不知不觉地”落到各国人民头上并且已包括了五亿多人口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更不能不是对各国人民、首先是对苏联的极严重的威胁。德意日三国“反共联盟”的成立，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一方面执行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国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1934 年底，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因为苏联知道，国际联盟虽然软弱，终究可以成为一个揭露侵略者的场所，成为一种虽很软弱但多少总能阻碍战争爆发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时候，即使是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当忽视。1935 年 5 月,法苏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以防止侵略者可能的进攻。同时，同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936 年 3 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互助条约。1937 年 8 月，同中华民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368◇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1930—1933 年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二年，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整个这一时期**，工业一直在继续高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到 1937 年年中只勉强达到 1929 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并且到 1937 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而苏联工业却蓬勃发展。到 1937 年底达到了 1929 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六倍以上。

这些成就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造政策的直接结果。

由于获得了这些成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 1937 年 4 月 1 日，即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

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胜利。

农业方面也差不多达到同样的高涨。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从 1913 年(战前)的一亿零五百万公顷增长到 1937 年的一亿三千五百万公顷。粮食产量从 1913 年的四十八亿普特增长到 1937 年的六十八亿普特；籽棉产量从四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亚麻(纤维)产量从一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千一百万普特；甜菜产量从六亿五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十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油料作物产量从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亿零六百万◇369◇普特。

应当指出，单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除外)在 1937 年供给国家的

商品粮，就达到十七亿普特以上，即比地主、富农和农民在 1913 年所供给的总数至少多四亿普特。

农业中只有畜牧业一个部门仍然落后于战前水平，而且继续保持着缓慢的发展速度。

至于农业集体化，那么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在 1937 年包括的农户达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刚已占农民的全部谷物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改造农业和大力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产生的成果，已经历历在目。

由于工农业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已装备了丰富的头等技术。工业和农业，运输业和军队，都已获得大量新的技术，大量新的机器和机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机车和轮船、大炮和坦克、飞机和军舰。必须配备几万以至几十万受过训练、能够驾驭所有这些技术并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作用的干部。没有这一点，没有足够数量的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这是严重的危险，它的造成是由于能够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并且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而使事情复杂化的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认为有了技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从前人们是过低估计技术和鄙视技术，而现在刚是过高估计技术，把技术变成了偶像。人们不了解，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人们不了解，只有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才能产生高度的生产率。

因此，掌握技术的干部问题，就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必须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过分迷信技术和低估干部的作用转◇370◇变为注意掌握技术，精通技术，在培养大量的能够驾驭技术并充分发挥技术技能的干部方面狠下功夫。

从前，在改造时期的初期，在国内痛感缺乏技术的时候，党提出

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现在,在技术已经很丰富、改造时期已基本结束、国内感到干部奇缺的时候，党应当提出新的口号，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技术上转到人才上，转到能够充分利用技术的干部上。

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1935年5月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得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才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371◇‘**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①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1—583页。——译者注

于是，加速培养技术干部和迅速掌握新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这种干部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人才已掌握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进一步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这个运动在顿巴斯，在煤炭工业中产生和开展起来,随即扩展到其他工业部门，推广到运输业，后来又普及到农业。这个运动之所以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伊尔敏诺”矿井(顿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还在斯达汉诺夫以前，尼基塔·伊左托夫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采煤纪录。1935 年 8 月 31 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这一榜样促成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提高生产定额，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的诞生。汽车工业中的布塞根，制鞋工业中的斯美塔宁，运输业中的克里沃诺斯，森林工业中的穆辛斯基，纺织工业中的叶沃多基亚·维诺格拉多娃和玛丽亚·维诺格拉多娃，农业中的玛丽亚·杰姆铁科、玛丽娜·格娜田科、普·安格林娜、波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尔达克和波林等，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第一批先驱者的名字。

继他们而起的还有其他先驱者，还有超过第一批先驱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整批整批先驱者。

1935 年 11 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的作用。◇372◇

斯大林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说：“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

座的这些人,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塔宁、克里沃诺斯、昔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①

然后，斯大林同志在说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阐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对于我国前进的巨大意义时说：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准确工作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时间的因素，他们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教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373◇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一定会增加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4—586页。——译者注

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①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为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创造了条件。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资基金在1933年为三百四十亿卢布，而到1937年则已增加到八百一十亿卢布。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在1933年为四十六亿卢布，而在1937年则已增加到五十六亿卢布。但仅在1937年这一年内，国家用在工人和职员的保险方而，用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疗养院、天然疗养地、休养所和医疗方面的经费，就大约有一百亿卢布。

在农村,集体农庄制度已最终巩固。1935年2月举行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及集体农庄的全部耕地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规定，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巩固，农村中的贫穷和生◇374◇活无保障的现象已经消灭。三年以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现在，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他产品和现金。已有几百万集体农庄农户，在产粮区每年分到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粮食，在棉花、甜菜、亚麻、牲畜、葡萄酒、柑橘和蔬菜产区每年分到几万卢布的收入。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建筑新粮仓和仓库已成为集体农庄农户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原有的贮藏室的设计只考虑到每年分到少量产品，对于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新的需要是十分之一也不能满足的。

1936年，鉴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同时又拟定了大规模建筑产科医院、托儿所，乳品厨房和幼儿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4—588页。——译者注

园的计划，1936 年，用于这些设施的拨款达二十一亿七千四百万卢布，而 1935 年只有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还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给多子女的家庭大量补助。按照这个法律，1937 年支出的补助金达十亿卢布以上。

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新学校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工作。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 1914 年为八百万，而 1936—1937 年已增加到二千八百万。高等学校学生人数 1914 年为十一万二千，而 1936—1937 年已增加到五十四万二千。

这是一次文化革命。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了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过去的革命所以遭到灭亡，是因为它们给了人身自由之后没有可能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切实的改善。它们的根本弱点就在这里。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义而获得了自由，并且根本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375◇生活状况。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得到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①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 590—591 页。——译者注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1935 年 2 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 1924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苏联宪法必须修改，是因为从 1924 年以来，即从通过第一个苏联宪法以来，苏联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里，苏联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完全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富农已被消灭，集体农庄制度已经获得胜利，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确立起来，成为苏维埃社会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有可能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化，已有可能实现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376◇

由斯大林同志主持的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拟定了苏联新宪法的草案。草案经过了五个半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草案被提交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

1930 年 11 月，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是批准或表决苏联新宪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叙述了自 1924 年通过的宪法以来苏维埃国家内发生的基本变化。

1924 年宪法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制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还容许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当时，苏维埃政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竞赛过程中组织和保证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当时，“谁战胜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立在旧的贫乏的技术基础上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当时农业更不成样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个体农户汪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小岛。当时还不是要消灭富农，而只是限制富农。在商

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还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1936年苏联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到 1936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观了。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量已超过战前六倍，并完全排挤了私人工业。在农业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已获得了胜利。到1936年，富农阶级已完全消灭了，而个体成分在国家的经济中已不起什么重大作用。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在国家和合作社手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永远铲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确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新社会◇377◇中已永远消灭危机、贫困、失业和破产，已为苏维埃社会的全体成员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说苏联居民的阶级成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旧时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被消灭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又消灭了所有的剥削分子——资本家，商人，富农和投机分子。现在只留下了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的少数残余，而完全消灭这些残余不过是最近时期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苏联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阶级已不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消灭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了生产资料而把它变成了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掌握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变成一个崭新的阶级。它已变成摆脱了剥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确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工人阶级，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人阶级。

苏联农民的情况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时代有两千多万分

散的个体农户——小农户和中等农户，都是单独在自己的份地上辛辛苦苦地耕作。他们使用落后的技术，受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等等的剥削。现在，在苏联成长起来的是崭新的农民，因为那些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已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农户已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基础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农民。这样的农民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变化。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不像◇378◇旧知识分子那样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缩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

苏联生活中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的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成就，都在苏联新宪法中得到了反映。

按照这个宪法，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组成，工人和农民之间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它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得以成长壮大。

苏联全部政权属于体现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城乡劳动者。

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苏联最高苏维埃由平等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选出，任期四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像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一样，是**普遍的**。这就是说，所有年满十八岁的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不分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的活动，都有选举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只有精神病患者和由法庭判决褫夺选举权者除外。

代表的选举是**平等的**；这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一票选举权，◇378◇所有公民都按平等原则参加选举。

代表的选举是**直接的**。这就是说，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从村的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有苏联公民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享有在年老以及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妇女在一切活动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是确定不变的法律。

一切公民都有信仰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宪法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召开群众大会的自由，保障结成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利，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因维护劳动群众利益或进行科学活动或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受迫害的外国公民有居留权。

同时，新宪法责成苏联一切公民履行下列重要义务：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忠实地履行社会义务，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维护和巩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

关于公民组成各种团体的权利，有一条宪法条文说：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则结成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者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先锋队，劳动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和批准了苏联新宪法草案。◇380◇

这样，苏维埃国家就有了新的宪法——社会主义和工农民主取得胜利的宪法。

这样，宪法就明文记载了一件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建设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任务。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1937年，发现了属于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的一群恶棍的新材料。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审判，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人案件的审判，以及对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晋哥里茨等人案件的审判，都表明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早已结成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共同匪帮，即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审判表明，这些人类渣滓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1918年初进行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挑衅尝试，在1918年春阴谋反对列宁，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在1918年夏恶毒地向列宁开枪，使列宁受伤；在1918年夏发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在1921年为了从内部动摇和推翻列宁的领导而故意使党内意见分歧尖锐化；在列宁患病时和列宁逝世后企图◇381◇推翻党的领导，出卖国家机密，向外国间谍机关提供情报；凶杀基洛夫；进行暗害、破坏和爆炸；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二十年来原来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走狗的参加或领导下，遵照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指示干出来的。

审判表明，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恶棍们遵照他们的主子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旨意，企图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破坏国防，帮助

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让苏联被肢解，把苏联的沿海边区割让给日本，把苏联的白俄罗斯割让给波兰，把苏联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生产奴隶制。

这些像虫子一样软弱无力的白卫小丑，俨然以国家主人自居(真可笑)，竟以为他们真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沿海边区割让和出卖给敌人。

这些白卫虫子忘记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爷不过暂时窃据了国家职务，而这个国家是随时都可以把他们从办公室里当作废物扔出去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忘记了，苏联人民只要动一动指头，就能把他们变成齑粉。

苏联法庭把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恶棍们判处了死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一判决。

苏联人民对消灭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表示赞许，接着转入当前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并有组织地进行这次选举。

党用全力开展了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党认为苏联新宪法的◇382◇实施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变。党认为这个转变就表现为选举制度完全民主化，从有限制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投票的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的选举。

在新宪法实施以前，对僧侣、过去的白卫分子、过去的富农以及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是有限制的，新宪法取消了对这几类公民的选举权的一切限制，使代表的选举成了普遍的选举。

从前代表的选举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选举名

额不同；现在选举的这种限制已没有必要，一切公民都有平等参加选举的权利。

从前苏维埃政权的中级和高级机关的选举是多级的；现在新宪法规定，各级苏维埃，从村苏维埃和市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从前选举苏维埃代表采取公开投票，并按整个名单投票，现在选举代表则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并按选区提出的候选人逐个投票而不按整个名单投票。

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明显的转变。

新选举制度应当是而且确实是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政权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这个转变。党应当领导这个转变，完全保证自己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起领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本身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成为彻底民主的组织，使它们在自己的党内生活中贯彻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各级党的机关都按选举产生，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充分开展起来，使党组织对党员群众完全负责，并使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充◇383◇分发挥出来。

1937 年 2 月底,日丹诺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就各级党组织作好准备以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作了报告，其中指出，许多党组织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违背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委派代替选举，用按整个名单投票代替按候选人逐个投票，用公开投票代替秘密投票等等。显然，采用这种做法的组织不可能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完成自己的任务。目此，必须首先消除党组织中这种反民主的做法，并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会听取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一)在无条件实现和彻底实现党章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原则的基础

上改造党的工作。

(二)取消委派党委会委员的做法，根据党章恢复各级组织领导机关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三)禁止在选举党机关时按整个名单投票，而要按候选人逐个投票，同时保证一切党员都有不选候选人和批评候选人的充分权利。

(四)党机关的选举采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五)各级组织都进行党机关(从基层组织的委员会起直到边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止)的选举，最迟到5月20日结束。

(六)各级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机关的选举期限，基层组织的党机关选举一年一次；区组织和市组织的一年一次；州组织、边区组织和共和国组织的一年半一次。

(七)基层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在全体党员大会上选举党委员会的制度，不得以代表会议代替全体党员大会。

(八)取消目前许多基层组织所通行的那种实际上是废止全体党员大会而代之以车间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做◇384◇法。[①]

这样就开始了党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准备。

中央的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开了党为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而进行的选举运动的序幕。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帮助了各级党组织去进行自身的改造，去贯彻开展党内民主的方针，去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最高苏维埃选举。

党在开展选举运动时，决定把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结成选举同盟的思想作为自己选举政策的中心。于是党就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同非党群众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它决定同非党群众一起提出各个选区的共同候选人。这是资产阶级国家选举运动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和完全

————————————————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67—468页。——译者注

不可能有的。而在我国，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却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在这里已没有了敌对的阶级，在这里各阶层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937 年 12 月 7 日，党中央发表了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

“1937 年 12 月 12 日，苏联劳动者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群众并没有隔开，相反，它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同工人和职员的工会,同共青团和其他非党的组织和团体结成同盟进行选举。因此，将要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对于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双方都是共同的，每个非党的代表也就是共产党员推举的代表，同样，每个党员代表也就是非党群众推举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告选民书在结束时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共产党◇385◇员和同情者像选举党员候选人那样一致投票选举非党的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台号召全体选民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那天，都到选举箱前选举联盟院代表和民族院代表。

每个选民都应当行使其选举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代表的光荣权利。

每个积极公民都应当把促进所有一切选民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当作自己的公民职责，1937 年 12 月 12 日应当成为苏联各族劳动者团结在列宁、斯大林胜利旗帜周围的伟大节日。”

1937 年 12 月 12 日，即在选举前夕，斯大林同志在他被提名的选区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讲到人民的使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应当是怎样的活动家时说：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像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

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现象，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像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386◇

12 月 12 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是在巨大的热潮中进行的。这不是平常的选举，而是伟大的节日,是苏联人民的盛典，是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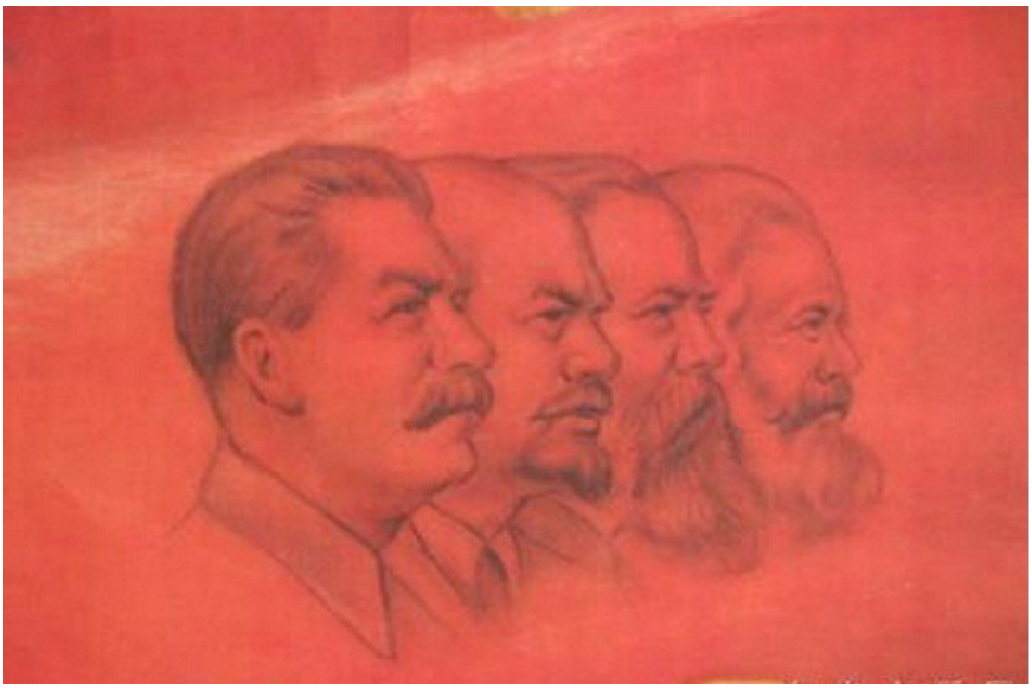
在九千四百万选民中，参加这次选举的有九千一百余万人，即占选民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万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选民，都投票选举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提出的候选人。只有六十三万二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选民，投票反对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当选。

这样，九千万人用一致的投票证实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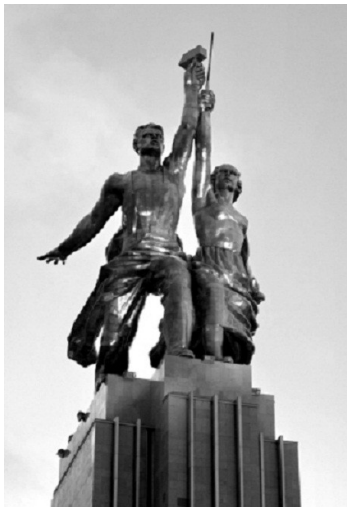
这是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获得的辉煌胜利。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胜利。

莫洛托夫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所说的苏联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在这里得到了光辉的证实。◇387◇



（43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结 束 语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和平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388◇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

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地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389◇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4页。——译者注

(二)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但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所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条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390◇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 2 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 1891 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391◇则。但是，俄国 1905 年的革命，特别是 1917 年 2 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 页。——译者注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392◇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

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393◇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埋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译者注

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①

(三)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394◇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页)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译者注

(四)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395◇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所有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396◇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存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 页)①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②

(五)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译者注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397◇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耐心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①]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选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六）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像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③]，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译者注

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398◇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存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399◇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ОМИССИИ ЦК ВКП(б)

☆

ОДОБРЕН ЦК ВКП(б). 1938 ГО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

☆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302,000 字
1975 年 7 月第 1 版　197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1·287　定价 0.83 元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为中心的材料。

——毛泽东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六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6
1941 – 1945

斯大林全集

第十六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二〇一五年·中国

斯 大 林

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3）
德国占领区与芬兰（1941年6月22日）
1942年11月以后苏联重新夺回的地区
1942年的中立国
1943年4月15日德国占领区
1941年12月初的战线
1942年11月19日的战线
1943年4月15日的战线
1943年12月23日的战线
巴伦支海
白海
卡宁半岛
芬兰
瑞典
波的尼亚湾
波罗的海
摩尔曼斯克
卡累利阿—芬兰
奥涅加湖
拉多加湖
阿尔汉格尔斯克
德维纳河
苏
沃洛格达
基洛夫斯克
基洛夫
维克特夫卡尔
赫尔辛基
斯德哥尔摩
哥得兰岛（瑞典）
塔林
爱沙尼亚
列宁格勒
季赫温
伊尔门湖
卢加
诺夫哥罗德
塔尔图
德国总督辖区
里加
立陶宛
杰米扬斯克
加里宁
高尔基
大卢基
涅韦尔
克林
莫斯科
维亚济马
莫托伊斯克
考纳斯
维捷布斯克
卡卢加
梁赞
图拉
古比雪夫
斯摩棱斯克
明斯克
莫吉廖夫
白俄罗斯
布良斯克
奥廖尔
米丘林斯克
华沙
布列斯特
戈梅利
俄罗斯联邦
萨拉托夫
卢布林
切尔尼戈夫
库尔斯克
沃罗涅日
日托米尔
基辅
别尔哥罗德
利沃夫
哈尔科夫
别尔季切夫
斯大林格勒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顿巴斯
塔甘罗格
罗斯托夫
雅西
基什尼奥夫
尼科波尔
敖德萨
克里木半岛
克拉斯诺达尔
伏罗希罗夫斯克
塔曼
新罗西斯克
塞瓦斯托波尔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保加利亚
黑海
亚速海
高加索山脉
第比利斯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土耳其
希腊
博斯普鲁斯海峡
爱琴海
伊朗

凡　例

1. 本卷正文译文均取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正文中的夹注符号（◇1◇、◇12◇、◇123◇ ……），即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文集》中的页码，便于引用时注明。

2. 正文中的注释号（①、②、③ ……），系《斯大林文集》编者注、译者注及本电子书制作者注，均放在当页末。

3. 点击页面左侧书签中的目录和年份的展开符号，有各篇的链接，可直接转至相应页面。

4. 正文中斯大林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电子书中均用黑体字标注。

5. 本卷中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

目　录

第十六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

广播演说
（1941 年 7 月 3 日）…… 3
关于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一六一步兵师
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近卫师的命令（摘录）…… 9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10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 11
“闪击战”的破产 …… 12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 14
“民族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 …… 16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 19
我们的任务 …… 21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1941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红场）…… 24

一九四二年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1942 年 1 月 10 日）…… 27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55号。1942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31
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弗·列·科马罗夫的两个电报
（1942年春）…… 37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130号。1942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38
答美联社记者问 …… 4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07号。1942年10月9日于莫斯科市） …… 46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49
1．后方的组织工作 …… 49
2．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 50
3．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 53
4．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
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 55
5．我们的任务 …… 58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45号。1942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61
给朱可夫的电报 …… 64
答美联社记者问 …… 65
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
（1942年秋）…… 67
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 69
关于剧本《前线》的一个电报
（1942年）…… 71

一九四三年

最高统帅给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
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 72
最高统帅给顿河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 74
最高统帅命令
（第95号。1943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75
最高统帅命令
（第195号。1943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81
答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 …… 86
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
（1943年5月8日） …… 87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 89
最高统帅给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同志、瓦图京大将同志、
波波夫上将同志的命令 …… 91
最高统帅给波波夫上将、索科洛夫斯基上将、罗科索夫斯基
大将、瓦图京大将、科涅夫上将的命令 …… 93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269号。1943年9月8日于莫斯科市） …… 9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1943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 96
1. 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 97
2. 全民支援前线 …… 100
3. 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 104
最高统帅命令
（第309号。1943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09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13号。1943年12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13

一九四四年

最高统帅命令
（第16号。1944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114
最高统帅命令
（第70号。1944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120
答《真理报》记者问 …… 124
最高统帅命令
（第152号。1944年8月2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2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1944年11月6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128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 128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 132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和平与安全问题 …… 135
最高统帅命令
（第220号。1944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 140
最高统帅命令
（第225号。1944年11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44

一九四五年

最高统帅命令
（第5号。1945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146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1945年3月5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军事思想》杂志和《军事通报》杂志）…… 149
在签订苏联和波兰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的讲话
（1945年4月21日） …… 151

最高统帅给作战部队的命令
（第346号。1945年4月27日） …… 153
告红军和盟军书
（1945年4月27日） …… 154
最高统帅命令
（第20号。1945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 155
告人民书
（1945年5月9日）…… 159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69 号。1945年6月6日） …… 161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 …… 163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1945年5月24日）…… 164
致《少先队真理报》 …… 165
最高统帅命令
（第370号。1945年6月22日） …… 166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1945年6月26日）…… 167
最高统帅给苏联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71 号。1945年7月22日）…… 168
最高统帅命令
（第51号。1945年8月19日于莫斯科市）…… 170
告人民书
（1945年9月2日）…… 172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73号。1945年9月3日）…… 175

补　遗（两篇）

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节选）…… 176

给瓦杜丁的训令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177

年表（1941 年至 1945 年） …… 178

附录（视频）

电影剪辑：《莫斯科保卫战》、《解放》…… 185

插图

一 在红场检阅红军时发表演说 …… 23

二 伟大卫国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 48

三 美英终于决定 1944 年开辟第二战场 …… 88

四 德国侵略者被全部驱逐出苏联国境 …… 127

五 战胜德国法西斯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 …… 162

第 十 六 卷 说 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六卷是根据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一九四六年的《斯大林全集》“出版说明”编辑的。

该“出版说明”确定：“第十六卷包括约·维·斯大林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著作，即当时他在各次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报告、讲话和命令，在德国和日本战败和投降时发表的告人民书，以及其他文件”。此卷后未出版。

本卷正文的中译文，均取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和编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部分。

《斯大林全集》第十六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广　播　演　说

（1941 年 7 月 3 日）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姊妹们！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希特勒德国从 6 月 22 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象法西斯的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可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威廉◇288◇[①]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可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

———————————

① 此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文集》中的页码，下同。——本书编者注

国军队和英法军队的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对于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应当这样说。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它才遇到了重大的抵抗。既然由于这种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象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曾经被击溃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 170 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 1939 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爱好和平的我国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 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289◇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

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英勇的陆军，我们全体英勇的海军，我们全体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国各族人民，欧洲、美洲、亚洲所有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政府，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对敌人的抗击日益加强。 全体苏联人民都◇290◇同红军一道奋起保卫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必须使我们苏联人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当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的时候，

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按照新的战时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全部工作，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其次，必须使怨天尤人的人和怕死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使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我们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解放战争。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苏联人的基本品质应当是在斗争中勇敢、大胆、不知畏惧、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斗。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海军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中千百万人所具有的美德。

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291◇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我们的祖国，是咬牙切齿、极为仇视的。苏联各族人民应当奋起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国土。

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应当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表现出我国人民所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我们应当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保证大力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应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护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的后方,使全部工作都服从于这个事业的利益,做到一切企业都能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子弹、炮弹、飞机,组织对工厂、电站、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的警卫工作,整顿地方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地协助我们的锄奸营。必须注意到，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善于欺骗和造谣。必须估计到这一切，不要受敌人的挑拨。凡是因惊惶失措和贪生怕死而有害防务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292◇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

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敌人侵犯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自己的◇293◇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抗击背信弃义地进犯我们祖国的敌人，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

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9—17 页◇294◇

关于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一六一步兵师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四近卫师的命令[①]（摘录）

我们的这些步兵师为什么能成功地打击敌人，并迫使嚣张一时的德军节节败退呢？其原因是：

第一，它们在进攻中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每次推进前都周密地侦察，认真地准备，摸清敌人的薄弱点，加强两翼侧的警戒。

第二，它们在突破敌人的正面后不是只照直前进，而是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和突破口的左右两侧突击，努力扩大突破口。

第三，它们在夺取敌人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巩固既得地区，在新的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加强夜间警戒,并向前方派出有力的侦察队,再次摸清退却之敌的情况。

第四，它们在防御时不是实行消极防御，而是实行同反冲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它们不是坐等敌人来突击和进逼，而是主动转入反冲击，以摸清敌人的薄弱点，改善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使所属各团在反冲击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做好进攻的准备。

译自《斯大林画传》1949 年俄文版◇295◇

————————————

① 本篇摘自《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 308 号，1941 年 9 月 18 日》。——编者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自从我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在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现在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五年。

在十月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确有可能作这样的总结，因为我们在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逐年增长，而且逐月增长。这些成就是什么，这些成就有多么大，——这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的。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同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只是在前 6 个月继续进行了我国的和平建设工作，下半年有 4 个多月是在同德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残酷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战争成了过去一年我国发展中的转折点。战争使我们的和平建设工作大大缩小了，而在某些部门则根本停止了。战◇296◇争迫使我们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战争把我国变成一个为前线服务、为我们的红军和海军服务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后方。

和平建设时期结束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了。

因此，提出关于过去这一年的下半年的，其实是下半年四个多月的

战争总结以及我们在这次解放战争中的任务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我在战争爆发时的一次演说中已经说过，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危险的威胁，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必须了解到和意识到这种危险，并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现在，我在作四个月战争的总结时，应当着重指出，这种危险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敌人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侵入了顿巴斯，象乌云一样笼罩了列宁格勒，并且威胁着我们光荣的首都莫斯科。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在掠夺我国，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城市和乡村。希特勒匪帮正在屠杀和蹂躏我国的和平居民，连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不怜惜。在我国境内的德军占领区里，我们的弟兄正在德国压迫者的枷锁下呻吟着。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捍卫着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奋勇击退野兽般的敌人的进攻，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使敌人血流成河。但是敌人不顾一切损失，丝毫不爱惜自己士兵的鲜血，仍旧向前线调遣◇297◇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接替被打垮的部队，并倾其全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敌人知道，冬季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四个月的战争中,我们的损失是，阵亡 35 万人，失踪 378 000 人,负伤 102 万人。在同一时期,敌人的损失是被打死打伤和俘虏 450 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由于四个月的战争，德国比苏联大为削弱了，因为德国的人员后备快要枯竭，而苏联的后备力量现在才充分显露出来。

“闪击战”的破产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开始进攻我国的时候，认为他们一定能够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应该说，德国人并没有隐瞒这个“闪击”制胜的计划。相反，他们倒是百般地宣扬这个计划。但是，事实表明“闪击”计划是十分轻率和毫无根据的。现在应该认为，这个疯狂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闪击战”在西欧成功了，而在东方遭到了失败和破产，其原因何在呢？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断言他们能够在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他们指望什么呢？

首先,他们指望的是,如他们曾渴望的那样建立一个反苏大同盟，他们以为预先用革命的怪影来恐吓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就能吸引这些国家参加这个同盟,这样就把我国同其他国家完全隔◇298◇离开来。德国人知道，他们利用各个国家内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矛盾的这个政策，在法国已经见效了，法国的执政者由于害怕革命的怪影而放弃了抵抗，惊慌失措地把自己的祖国葬送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德国法西斯战略家以为，英国和美国也会如此。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把有点小名气的赫斯派到英国，就是为了说服英国的政治家参加反苏大进军。但是德国人大大地失算了。不论赫斯如何努力，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反苏进军，反而同苏联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反对希特勒德国。苏联不仅没有被孤立，反而有了新的盟国，如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德国利用矛盾和以革命怪影吓人的政策失效了，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环境。这个政策不仅不适用，反而对德国侵略者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

政策在战争的新的条件下，正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第二，德国人指望苏维埃制度不巩固，苏联后方不巩固，他们以为,只要红军一遭到严重打击和失利，工人和农民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苏联各民族之间就会发生纠纷,暴动就会发生,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这就一定会便于德国侵略者长驱直入乌拉尔。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也大大地失算了。红军的失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工农联盟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红军的失利还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以忘我精神支援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的统一的牢不可破的营垒。苏联后方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巩固。可以肯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象我国现在这样丧失这么多的领土，一定经受不住考验而陷于崩溃。既然苏维埃制度这样容易地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后方,这就是说，苏维埃制度是现在最巩固的制度。◇299◇

最后，德国侵略者指望红军和红海军软弱，他们以为德国的陆海军可以一举击溃和驱散我们的陆海军，从而打开一条长驱直入我国腹地的道路。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又大大地失算了，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我们的陆海军。当然，我们的陆海军还缺少锻炼，它们总共才打了四个月的仗，还没有能成为一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而它们面对的敌人却是已经打过两年仗的经验丰富的德国陆海军。但是，第一，我军的士气比德军的士气高，因为我军是在保卫祖国，抵御外国侵略者，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德军则是在进行侵略战争，掠夺别的国家，他们甚至一分钟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卑鄙勾当是正义的。毫无疑问，保卫祖国的思想，我国人民为之而战的思想,必定会使我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能使红军紧密团结的英雄;而侵略和掠夺别国的思想，德国人专门为之而打仗的思想，也必定会使德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丧尽道德和腐蚀德军的职业强盗。第二，德军深入我国腹地,远离德国后方，不得不在敌对的环境中作战，

不得不在别国境内建立新的后方，而且这个后方又遭到我国游击队的破坏，这就从根本上瓦解着德军的供给，使他们害怕自己的后方，打破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地位巩固的信念；而我军却是在本土作战，不断得到自己后方的支援，得到人员、弹药和粮食供应的保障，并且完全信任自己的后方。正因为如此,我军比德国人所想象的要强大,而德军却比根据德国侵略者的夸大宣传所能想象的要软弱。不久以前，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中歼灭了德军大约 30 个精锐师，这表明，在卫国战争的烈火中正在锻炼而且已经锻炼出一批新的苏联战士和指挥员、飞行员、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步兵和水兵，他们明天就会成为使德军胆寒的力量。◇300◇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注定了“闪击战”在东方必然破产。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些对红军不利的条件，因此，我军遭受暂时失利，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我国的一些地区让给敌人，这也是实际情况。

这些不利的条件是什么呢？红军在军事上暂时失利的原因在哪里呢？

红军失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没有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战场。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而这种情况就使德国人以为他们在西方的后方是有保障的，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及其欧洲盟国的军队都调来进攻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国是在没有任何军事外援的情况下，单

独地进行解放战争，抗击德国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的联合力量。德国人由于暂时的胜利而神气起来，为自己的军队大肆吹嘘，硬说他们的军队在一对一的作战中总能够把红军打败。可是德国人的这种断语是空洞的吹牛，因为既然这样，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还要求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帮助他们进攻没有军事外援而全靠自己的力量作战的红军。毫无疑问，欧洲没有反对德国人的第二战场是大大有利于德军的处境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在欧洲大陆上一旦出现第二战场时——而第二战场必然会在最近◇301◇出现，——我军的处境就会大为有利，而德军则极为不利。

我军暂时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坦克不足，航空兵力量也有些不足。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坦克，没有足够的航空兵在空中掩护，步兵是很难作战的。我们的航空兵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航空兵，我们光荣的飞行员获得了无畏战士的荣誉。但是我们的飞机目前还比德国人的少。我们的坦克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坦克，我们光荣的坦克兵和炮兵曾多次把拥有大量坦克的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狼狈逃窜。但是我们的坦克毕竟只有德国人的几分之一。这就是德军所以暂时得胜的秘密。不能说我们的坦克工业搞得不好，给我们前线送去的坦克很少。不是的，坦克工业搞得很好，生产出不少的优质坦克。但是德国人生产的坦克要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不只是支配着本国的坦克工业，而且还支配着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法国的工业。不然，红军早就把德军击溃了。德军没有坦克就不去作战，如果他们在坦克方面不占优势，就经受不住我们部队的打击。

为了使德军在坦克方面的优势化为乌有，从而根本改善我军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不仅把我国的坦克生产扩大几倍，而且还要大量增产反坦克飞机、反坦克枪、反坦克炮、反坦克手榴弹

和反坦克迫击炮，更多地修筑防坦克壕以及其他各种防坦克障碍物。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302◇

“民族社会党人”[①]是些什么人？

我们通常把德国侵略者即希特勒分子叫作法西斯分子。而希特勒分子竟然认为这不对，并坚持继续自称为“民族社会党人”。可见，德国人想要我们相信，希特勒分子的党，掠夺欧洲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罪恶进攻的德国侵略者的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能这样吗？社会主义同掠夺和压迫欧洲人民的野兽般的希特勒侵略者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吗？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民族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现在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分子从事收拾德国领土、重新合并莱茵区和奥地利等地时，还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他们侵占了别国领土和奴役了欧洲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等等，并开始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希特勒的党就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党了，因为它从这个时候起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党了。

希特勒分子的党是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时又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中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者的党。

————————————

① 原文“национал социалисты”过去译为“国家社会党人”。——编者注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剥夺欧洲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起码的民主自由的最凶恶的反动派和黑帮。为了掩盖其反动的黑◇303◇帮本质，希特勒分子咒骂英国和美国的内部制度是财阀制度。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却有起码的民主自由，有工人和职员的工会，有工人的政党，有议会；而在德国，在希特勒制度下，所有这些组织都被消灭了。只要把这两类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解希特勒制度的反动本质和识破德国法西斯分子所谓英美财阀制度的一套鬼话。其实，希特勒制度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曾有过的那种反动制度的翻版。大家知道，希特勒分子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践踏工人的权利，知识分子的权利和各族人民的权利，他们也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制造中世纪式的虐杀犹太人的大暴行。

希特勒的党是民主自由的敌人的党，是中世纪式的反动势力和制造黑帮大暴行的党。

而如果这些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者和穷凶极恶的反动派继续披着“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外衣，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欺骗人民和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　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①]

希特勒说：“德国人要用一切手段征服全世界。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大德意志帝国，我们就应当首先撵走和消灭斯拉夫各族——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

① 这句话出典于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编者注

希特勒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能用暴力管理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他们。 如果政治上需要，就应当撒谎、出卖以至◇304◇屠杀。”

戈林说；“谁反对我们，就杀谁，杀吧，杀吧，对此负责的不是你们，而是我，因此，你们杀吧！”

希特勒说:“我要把人从所谓良心这个屈辱人的怪物下解放出来。良心也象教育一样，是摧残人的。我的优点就是，我不受任何理论的或道德的考虑的约束。”

在一名被打死的德国士官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 9 月 25 日给步兵第 489 团的命令，命令中说：

“我命令向每一个出现在 600 米距离内的俄国人开枪。俄国人应当知道，他们面对一个坚决的敌人，他们不能期待这个敌人给予任何宽恕。”

在一名被打死的中尉古斯达夫·齐格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告士兵书，里面说：

“你没有心和神经，在战争中不需要这些。消灭你自己的怜悯心和恻隐心吧，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每一个苏联人，即使在你面前的是老人或妇女，是女孩或男孩，也不要停手。杀吧，这样你才能拯救自己免于死亡，保证你一家的前途，使你流芳百世。”

你们看，这就是希特勒党首领们和希特勒统帅部的纲领和指示，这就是一群丧失人性和堕落到禽兽地步的人的纲领和指示。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竟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

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305◇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占领军一个不剩地歼灭干净。

对德国占领军决不留情！

消灭德国占领军！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德国侵略者道德退化，早已丧失人性，堕落到禽兽般的地步，——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他们必然自取灭亡。

但是，决定希特勒侵略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的，不仅仅是道德因素。

另外还有三个正在日益发挥作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巩固，欧洲的“新秩序”不巩固。德国侵略者奴役了从法国到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从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到巴尔干和苏维埃乌克兰这片欧洲大陆的人民，剥夺了他们起码的民主自由，剥夺了他们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夺去了他们的粮食、肉类、原料，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残杀了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而且认定自己在夺得了欧洲的霸权之后，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德国的世界霸权。他们把这叫作“欧洲的新秩序”。但是，这是什么“基础”，这是什么“新秩序”呢？只有妄自尊大的希特勒蠢才们，才看不见，欧洲的“新秩序”及其臭名昭彰的“基础”是一座随时都会爆发并把◇306◇德帝国主义的纸牌搭的小房子埋葬的火山。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

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只有柏林的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被奴役的欧洲人民将起来斗争和举行起义来反对希特勒暴政。在欧洲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中，苏联、英国和美国一定会给他们充分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有谁会怀疑呢？

第二，这就是希特勒侵略者的**德国**后方不巩固。当希特勒分子在收拾被凡尔赛条约弄得山河破碎的德国时，他们还能得到为复兴德国的理想所鼓舞的德国人民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任务一经解决，希特勒分子开始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上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的道路,把欧洲各族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都变为目前德国的仇敌之后，在德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反对继续战争,主张消除战争。已持续两年多但还看不到尽头的流血战争，几百万人的牺牲，饥饿,贫困,瘟疫,到处敌视德国人的气氛,希特勒的把苏联人民变成目前德国的仇敌的愚蠢政策，——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德国人民转过来反对这个不必要的毁灭性的战争。只有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不仅德军的欧洲后方，就连德军的德国后方也是一座即将爆发并把希特勒冒险家埋葬的火山。

最后，这就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同盟。英国、美国和苏联结成了一个旨在粉碎希特勒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军的统一阵营，这是事实。现代的战争是摩托战争。◇307◇谁在摩托产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谁就能赢得战争。如果把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摩托产量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摩托方面的优势至少是德国的三倍。这就是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之一。

不久以前，有英国代表比弗布鲁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参

加的三国莫斯科会议[①]，决定不断地支援我国坦克和飞机。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已经开始得到坦克和飞机。更早以前，英国就供应我国象铝、铅、锡、镍、橡胶这类紧缺物资。如果再加上美国最近决定给苏联十亿美元贷款这一事实，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同盟已经成为现实，它正在为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的利益发展着并将继续发展下去。

这些就是决定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因素。

我们的任务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类：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

德国人现在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掠夺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德国侵略者这个敌人。

与希特勒德国不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的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把欧洲和苏联被奴役的人民从希特勒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象支援解放者的军队那样支◇308◇援苏联、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队。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是对欧洲各国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各国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从德国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我国的领土和我国的人民。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期待我

———————————————

① 这次会议于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举行。——编者注

们帮助的斯拉夫民族和欧洲其他被奴役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民族进行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然后让他们完全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安排。绝对不干涉别国人民的内政！

但是，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粉碎德国侵略者的军事实力，必须一个不剩地消灭为奴役我们祖国而侵入我国的所有德国占领军。

为此，必须使我们的陆海军得到我们举国一致的积极有效的支援；使我国的男女工人和职员在企业中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越来越多的坦克、反坦克枪、反坦克炮、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和弹药；使我们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在自己的田地上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和国家越来越多的粮食、肉类、工业原料；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苏联各族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的陆海军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自由，为消灭德国军队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并消灭了德国侵略者，我们才能得到持久的正义的和平。◇309◇

彻底消灭德国侵略者！

解放在希特勒暴政压迫下呻吟的一切被压迫民族！

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我们的红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36 页◇310◇

1941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时发表演说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1941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红场)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智力劳动者同志们，在敌后暂时处在德国强盗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破坏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窜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敌人估计，我们的军队将一触即溃，我们的国家将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我们的陆海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

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严重的日子。请回想一下 1918 年我们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的情形。当时我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都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我们暂时失去了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当时我们没有同盟国，我们没有红军（那时我们才刚开始建立红军），我们缺乏粮◇311◇食，缺乏武器，缺乏服装。当时有 14 个国家围攻我国。可是，我们并没有灰心，并没有丧气。当时我们在战争的烈火中组织了红军，并把我国变成了

一座军营。当时,伟大的列宁的精神鼓舞我们为反对武装干涉者而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粉碎了武装干涉者，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国的状况要比 23 年前好得多。现在,我国无论工业、粮食和原料,都比 23 年前丰富许多倍。我们现在有同盟国，他们同我们一起结成反对德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我们现在得到陷于希特勒暴政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现在拥有精锐的陆军和精锐的海军，他们正在坚决保卫着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无论对于粮食、武器或服装都不感到严重的缺乏。我们全国，我国的各族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的陆海军，帮助他们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匪帮。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人员后备。现在伟大的列宁的精神和他的胜利旗帜，就象 23 年前一样，鼓舞着我们去进行卫国战争。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敌人并不象某些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强大。魔鬼也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谁能否认，我们红军曾屡次把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仓皇而逃呢？如果不是根据德国宣传家大肆吹嘘的声明来判断问题,而是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问题,那就不难了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面临崩溃。现在饥饿和贫困笼罩着德国，在四个月的战争中,德国已损失士兵 450 万人,德国血流殆尽,人员后备枯竭,不仅陷于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而且连看不到战争尽头的德国本国人民都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德国侵略者正在作垂死挣扎。毫无疑问,德国是不能够长久◇312◇挣扎下去的。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

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

消灭德国占领军！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37—40 页◇313◇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①]

(1942 年 1 月 10 日)

红军在极大地消耗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转入了反攻，迫使德国侵略者西退。

德军为迟滞我军前进而转入了防御，开始构筑设有掩体、障碍物和野战工事的防御地区。德军指望在春季来临之前以此迟滞我军进攻，以便调集兵力在春季重新转入对红军的进攻。可见，德军是想赢得时间，得到喘息。

我军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种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逼其西退,迫使它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消耗掉预备队,那时我军将有大量新的预备队,而德军却不再拥有预备队，从而保证在 1942 年彻底粉碎希特勒的军队。

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使我军学会突入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人防御全纵深的突破，并以此为我军步兵、坦克和骑兵打开前进的道路。现在德军不是只有一道防线，它正在构筑并且不久将要有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如果我军不学会迅速而彻底地◇314◇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就无法前进。

是否可以说我军已经学会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可惜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这样说。至少还远远不是我们所有的集团军都学会了突破敌人的防线。

————————————

① 1974 年 1 月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 1 期《文献和资料》栏刊载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1942 年 1 月 10 日指示信》一文，摘引和评论了斯大林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联名颁发的这封指示信。本篇是辑录这篇文章中的引文而成的。——编者注

要保证突破敌人防线的全纵深，需要什么呢？

起码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实践中用集中于一个方向的突击集团的行动来代替成一线配置的各个师的行动，第二，必须以炮兵进攻代替所谓的炮火准备。

(1)突击集团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军进攻时大多数集团军还没有学会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通常以沿正面配置成一线的各个师或旅实施进攻。显然，这样组织进攻不会奏效，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段都无法形成兵力优势。这样的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当我们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建立了对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时，进攻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每一个担负突破敌人防御任务的集团军都必须建立突击集团，即在战线的一定地段上集中三四个师实施突击。集团军首长的首要任务即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定的地段上造成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和成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

方面军首长在组织突破和进攻时的任务，同样如此。当然，方面军突击集团的编成不应是几个师，而应是几个集团军，因为方面军范围的突破是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行动，要求具有比集团军范围的进攻大得多的兵力。

(2)炮兵进攻的组织。在突破敌人防御和组织对敌人的进攻中，炮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集中在某一地段的炮兵有力的、长时间的支援，要突破敌人防御和实施进攻是不可能的。◇315◇

我们往往在没有炮兵，没有任何炮兵支援的情况下把步兵投入对敌人防线的进攻,然后却抱怨步兵不去对付防御工事里的敌人。显然，这种“进攻”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是进攻，而是犯罪，是对祖国犯罪，对被迫作出无谓牺牲的军队犯罪。

那么，炮兵应当怎样支援步兵进攻呢？

我们通常把炮兵对步兵的支援理解为进攻前的“炮火准备”。炮兵通常在步兵进攻前半小时、一小时，有时是两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

进行射击，然后炮兵就停止行动，让步兵进攻，而不顾敌人防御全纵深还没有被破坏，敌人的火炮和机枪发射点还没有被压制。这就叫作“炮火准备”。不难看出，这样的炮兵支援是不充分的，而在这种不充分的支援下所实施的进攻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因此，我军对敌人防御所实施的进攻，尽管经过了“炮火准备”，往往还是力量渐衰，而且为使进攻奏效，还不得不反复进行所谓的“炮火准备”。

由此可见，所谓的”炮火准备”，作为炮兵支援步兵进攻的一种手段，已经不符合战争的要求，已经过时，应当摈弃。

为了使**炮兵支援**有效，从而使步兵进攻奏效，必须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这意味着炮兵不能局限于进攻前一两个小时的一次行动，而应当同步兵一起进攻，应当在整个进攻期间实施射击，避免长时间的间断，直到敌人防线的全纵深被突破为止。

第二，这意味着步兵不应当象在所谓的“炮火准备”时那样在炮兵停止炮击后发起进攻，而应当在炮兵进攻的同时,在炮火隆隆声中，在炮兵音乐的伴奏下实施进攻。◇316◇

第三，这意味着炮兵不应当分散行动，而应当集中行动，并且不应当集中在战线的随便什么地方，而应当集中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并且只能集中在这个地域内，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炮兵进攻就不可能实施。

我们的任何一个集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集团军属炮兵团使用上，再从每师的师属炮兵中各抽调（譬如说）两个连和20—30门120毫米迫击炮，就可以在自己的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60—80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敌人的防御,从而给集团军突击集团以非常宝贵的炮兵支援。如果我们的集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任何一个方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方面军炮兵预备队使用上，再抽调一些集团军属炮兵团以及哪怕三分之一的师属炮兵，就同样可以在方面军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150—200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方面军地域内敌人的防御。如果我们的方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结论：

(1) 敌人为了迟滞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

(2) 红军不能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它应当进攻，迫使敌人西退。

(3) 为了顺利进攻，我们应当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

(4) 为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在集团军地域内，在方面军地域内实施突击集团行动。

(5) 为了使突击集团取得成功，就应当让它们在突破敌人防◇317◇御全纵深时始终得到有力的炮兵支援。

(6) 为了保证步兵得到这样的炮兵支援，就需要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7) 为了使炮兵进攻奏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员应当把炮兵的主要部分集中到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

(8) 只有步兵突击集团和大量炮兵的联合行动才能保证进攻取得胜利。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译自1974年1月《军事历史》杂志
第1期第70-71、72-73、74页◇318◇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55 号。1942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卑鄙无耻地侵犯我们祖国的生存和自由权利的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的。在从北冰洋到黑海的辽阔战线上，红军和红海军战士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以便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我国驱逐出去，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

红军抗击敌人侵略，保卫祖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十四年前建立红军，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瓜分我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外国武装干涉者的侵略军队作斗争。年轻的红军在初次作战时,在 1918 年 2 月 23 日，就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所以 1918 年 2 月 23 日就成为红军的诞生日。从此以后，红军就在同外国武装干涉者作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它在 1918 年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德国侵略者驱逐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在 1919—1921 年同协约国军队作战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他们驱逐出我们国境。

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所以苏联各族人民得到了长期的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二十年的和平◇319◇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庄农业，繁荣了科学和文化，巩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但是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敌人

有可能再来侵犯我们祖国。所以随着工农业和科学文化的高涨，苏联的军事实力也加强了。这个实力是某些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人已经亲身领略过的。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现在正在领略这个实力。

8个月以前，法西斯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了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敌人估计，红军将一触即溃，并丧失抵抗力。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他们没有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没有估计到苏联后方的巩固，没有估计到我国各族人民争取胜利的意志，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可靠，最后，也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内在的虚弱。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犯，红军曾被迫退却，放弃一部分苏联领土。但是在退却时，红军消耗了敌人的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我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敌人一定会被阻止，然后被击溃。

在战争过程中，红军不断汲取了新的活力，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得到了新的预备队师的加强。于是红军在辽阔战线的重要地段上转入进攻的时机来到了。在短时间内，红军就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在季赫温附近，在克里木和在莫斯科附近，给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在莫斯科附近的激战中，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解除了苏联首都被围的威胁。红军击退了莫斯科附近的敌人，并迫使敌人继续向西退却。莫斯科州和图拉州的全部以及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其他州的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乡村，◇320◇都已经从德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没有战争最初几个月里那种由于背信弃义突然进攻所造成的军事优势了。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一种潜力的突然性因素，已经完全消失。于是德国法西斯分子突然进攻所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等状态也就消除了。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

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当突然性这个因素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武库中刚一消失，这个军队就濒于覆灭了。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无敌的，断言在同红军单独作战时，一定能击溃红军。现在红军是单独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但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军队在前线上的直接支援。红军则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然而结果是：嚣张一时的德国军队正在遭受失败，红军却正在取得重大的胜利。德军在红军的强大打击下，正在向西逃窜，人员和技术装备受到巨大损失。他们节节顽抗，力图拖延他们覆灭的日子。但是敌人是徒劳的。现在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军手里，希特勒的这部松散生锈的机器，无论怎样拚命挣扎，也挡不住红军的攻击。不久以后，红军就会以强大的打击，赶走列宁格勒附近的野兽般的敌人，肃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的城市和乡村中的敌人，解放苏维埃的克里木，那时红旗将重新在整个苏联领土上胜利地飘扬。

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以为德军已经不足为患，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目光短浅的表现，那就是苏联人所不应有的虚夸和骄傲。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敌人虽然遭受着失◇321◇败,但是还没有被粉碎，更没有被彻底消灭。敌人还是强有力的。它将鼓起最后的力量去争取胜利。并且它愈是失败，就愈加凶残。所以我国一分钟也不能放松组织后备力量支援前线的工作。必须使源源不断的新部队开赴前线，打击野兽般的敌人，争取胜利。必须使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加倍努力地生产。必须使前线获得日益增多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自动枪和弹药。

这就是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红军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红军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进行的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红军的任务是解放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遭受德国侵略者压迫的我国城乡的居民,这些居民在战前是自由的,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则遭到压迫和掠夺,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红军还要解放遭受德国法西斯恶魔侮辱和欺凌的我国妇女。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任务更高尚更光荣呢?没有一个德国兵能够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不能不看到,他是被迫去为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作战的。德国士兵没有能鼓舞他,能使他引为自豪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相反地,任何一个红军战士都能自豪地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进行着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红军有鼓舞他们建立功勋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为祖国的自由誓死奋战的英雄。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红军的目的是要消灭德意志民族和消◇322◇灭德意志国家。这当然是一种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的。红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寇驱逐出我国和解放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苏联领土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匪帮的垮台或者覆灭。这种结局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同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

最后,红军的力量在于,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红军是按照各民族,各种族一律

平等的精神，按照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德国人的种族理论和种族仇恨的实践，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苏联的种族平等理论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实践，则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苏联的朋友。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苏联人所以仇恨德国人，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红军所以消灭德国士兵，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就因为仇恨德国的一切，因此红军抓住德国兵就杀掉。这当然是同样的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种族仇恨心理。它没有这种卑劣情绪，因为它是按照种族平等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此外，还不要忘记，在我国，表现种族仇恨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是既然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想奴役我们祖国，当他们已经被我军合围而又不肯缴械投降时,红军当然只好消灭他们。红军消灭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想奴役我们祖国。◇323◇红军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一样，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来消灭奴役自己祖国的匪徒，而不问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不久以前，在加里宁、克林、苏希尼奇、安德列阿波尔和托罗佩茨等城市，当德军守备部队已经被我军合围时，我军曾建议他们投降并且答应在他们投降后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是德军守备部队竟拒绝缴械投降。自然，只好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于是就有不少的德国兵被打死了。战争总是战争。如果德军官兵愿意投降，那么红军就接收他们为俘虏，并保全他们的生命。如果德军官兵拒绝投降，而且还手持武器企图奴役我们祖国，那时红军自然就要消灭他们。请想一想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吧：“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①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希望你们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列宁的旗帜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41—48页◇324◇

————————————

① 马·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他发表在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编者注

给苏联科学院院长
弗·列·科马罗夫的两个电报

(1942 年春)

一

我相信，虽然是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科学院的科学活动仍将随着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发展，科学院主席团在您的领导下，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实现科学院所面临的任务。

二

政府满意地接受您提出的关于全面开展科学院各科学机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活动，来加强苏联军事实力的建议。

我希望苏联科学院领导科学和生产方面的革新者运动，并且在对我国人民和其他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的斗争中，成为先进的苏联科学的中心。

苏联政府相信，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占领者的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日子里，以您为首的苏联科学院将光荣地履行自己对祖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义务。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约·斯大林

1942 年 4 月 12 日

译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简要大纲》1945 年版第 84—85 页和《苏联科学院献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949 年版第 536 页◇32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130 号。1942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男女工人、男女农民、智力劳动者同志们，在战线那一边，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后方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同志们！今年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环境中庆祝国际“五一”节的。战争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同样也给今天的“五一”节打上了烙印。我国劳动人民考虑到战争环境，放弃了节日休息，要在为保卫我们祖国而进行紧张的劳动中度过今天。他们同我们前线战士生死与共，把“五一”节变为劳动日和斗争日，以便给前线最大的支援，给前线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迫击炮、坦克、飞机、弹药、粮食、肉类、鱼类和蔬菜。

这就是说，我们的前线和后方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战斗营垒，它决心克服在战胜敌人的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同志们！自从德国法西斯侵侵略者把欧洲推入了战争深渊，征服了欧洲大陆各爱好自由的国家——法国、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榨取它们的脂膏而使德◇326◇国银行家大发横财,已经有两年多了。自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地进攻我国，掠夺和毁灭我们的乡村和城市，蹂躏和屠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

维亚的和平居民,已经有10个多月了。我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对野兽般的敌人的卫国战争,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已经有10个多月了。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已有可能来充分看清德国法西斯分子，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认识他们的真面目，并且不是根据口头声明，而是根据战争经验，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认识的。

他们,我们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究竟是哪一种人呢？关于这点，战争经验教导我们的是些什么呢？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保护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使它不受其他国家侵犯的民族主义者。这当然是谎话。只有骗子才会硬说,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希腊、苏联以及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侵犯了德国的完整和独立。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并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侵略别的国家，榨取它们的脂膏而使德国的银行家和财阀大发横财的帝国主义者。大家知道，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头子戈林本人就是经营几十家工厂的头等银行家和财阀之一。希特勒、戈培尔、里宾特洛普、希姆莱以及现在德国其他当权者,都是德国银行家的看家狗,把德国银行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德国军队就是这些老爷们手中的盲目工具，它的使命手并不是为德国的利益，而是为德国的银行家和财阀大发横财，去洒自己的和别人的鲜血，去残害自己和别人。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反对财阀而努力保护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者。这当然是谎话。只有骗子才会硬说，在德国和被征◇327◇服的国家的工厂中实行奴隶劳动，在乡村中恢复农奴制度的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工农的保护者。只有厚颜无耻的骗子才会否认，德国法西斯分子所建立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有利于德国的财阀和银行家而不利于工农。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反动的农奴主，而德国军队是农奴主的军队，是为德国贵族大发横财和恢复地主政权而卖命的军队。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去。这当然是谎话。只有职业骗子才会硬说，在欧洲遍设绞架、掠夺和蹂躏和平居民、焚烧和炸毁城市乡村、破坏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珍品的德国法西斯分子，会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敌人，而德国军队则是中世纪黑暗势力的军队，它的使命是为了培植德国银行家和贵族的奴隶制“文化”而破坏欧洲文化。

战争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战争经验所揭露并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我们敌人的面目。

但是，战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不限于这些。除此以外，战争的经验还表明，在战争时期，无论是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的状况，无论是我国和红军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首先，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比 10 个月以前削弱了。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失望、几百万人的牺牲、饥饿和贫困。战争终结无期，而人员后备消耗殆尽，石油消耗殆尽，原料消耗殆尽。在德国人民中，德国必然失败的意识日◇328◇益增长。德国人民日益明白，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是把德国从希特勒—戈林冒险匪帮的手中解放出来。

希特勒帝国主义占领了欧洲的广大领土，但是它摧毁不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被奴役的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制度的斗争，已开始具有普遍的性质。在一切被占领的国家内，军事工厂里进行怠工、炸毁德国人的仓库、颠覆德国人的军用列车、杀死德国官兵等事，已成为通常的现象。整个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的被德国人占领的

地区，都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德国后方削弱，因而也就使整个法西斯德国削弱。

至于说到德国军队，那么不管它怎样顽抗,毕竟比 10 个月以前削弱得多了。它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将领，象赖谢瑙、布劳希奇、托特以及其他人，不是被红军击毙了，就是被德国法西斯上层撤职了。它的基干军官，一部分为红军歼灭了，一部分由于抢劫和蹂躏老百姓而腐化了。它的兵员在作战过程中大大削弱，得到的补充日益减少。

其次，毫无疑问，在这一战争时期内,我国比战争初期更强大了。不仅朋友，就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我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合和团结在自己政府的周围，我国的前线和后方已团结成为万众一心的统一的战斗营垒，后方的苏联人向我们的前线输送愈来愈多的步枪和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坦克和飞机、粮食和弹药。

至于说到我们祖国的国际联系，那么它近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加强,更加发展了。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联合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他们注视着苏联。我国各族人民为自由、荣誉和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博得了全体进步人类的赞扬。一切爱好自由◇329◇的国家的人民都认定苏联是能够把世界从希特勒瘟疫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在这些爱好自由的国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英国和美国，友谊和同盟的纽带已把我们同它们联结起来，它们向我国提供愈来愈多的军事援助来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已经强大得多了。

最后，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内,红军比战争初期更加有组织,更加强大了。红军在因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进攻而暂时退却以后，夺得了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由积极防御转入向敌军实施胜利的进攻,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由于红军的胜利，卫国战争

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希特勒妖孽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虽然红军是在严寒积雪的冬季的困难条件下着手执行这个历史任务的,但它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夺得了作战的主动权，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败，迫使他们退出很大一片苏联领土。侵略者想利用冬季来喘息一下和巩固其防线的打算已经破产了。红军在进攻过程中，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缴获了敌人不少的技术装备，迫使敌人过早地消耗来自深远后方的原定用于春夏战役的预备队。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红军已经更加有组织、更加强大了，它的军官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它的将军更有经验，更有洞察力了。

红军的士兵也发生了转变。

在卫国战争头几个月战士中有过的那种对敌人宽容和麻痹大意的现象已经消失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施于和平居民和苏联战俘的种种残暴、抢劫和蹂躏行为，医好了我们战士的这种毛病。战士们变得更凶猛、更无情了。他们学会了真正仇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懂得了，如果不知道刻骨地仇恨敌人，就不能战胜敌人。◇330◇

战争初期有过的并隐藏着害怕德国人的心理的所谓德军无敌的空谈，再也没有了。在罗斯托夫和刻赤附近、在莫斯科和加里宁附近、在季赫温和列宁格勒附近的有名战斗中，红军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打得狼狈逃窜，这使我们的战士相信了，所谓德军无敌的空谈，是法西斯宣传家编造出来的神话。战争的经验使我们的战士相信了，所谓德国军官的勇敢是一种非常相对的东西，德国军官在对付手无寸铁的战俘和和平的居民时是勇敢的,但是当他们遇到红军有组织的力量时,就不勇敢了。你们该记得民间有一句谚语：“遇着绵羊是好汉，遇着好汉是绵羊。”

这就是从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这些结论说明什么呢？

这些结论说明,我们今后也能够而且应当击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完全歼灭，直到从希特勒恶棍手中完全解放苏联国土。

同志们！我们进行的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我们没有侵占别的国家、征服别的民族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而崇高的。我们要从德国法西斯恶棍手中解放我们苏联国土。我们要从德国法西斯恶棍的侮辱下解放我们的弟兄——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卡累利阿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如果德国占领者不投降，那就彻底消灭他们，一个不留。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的。

红军拥有实现这一崇高目的的一切必要条件。所缺少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祖国所供给的头等技术装备来打击敌人的本领。所以红军的任务，它的战士、它的机枪手、它的炮兵、它◇331◇的迫击炮手、它的坦克兵、它的飞行员和骑兵的任务是，学习军事，顽强地学习，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成为本行的能手，从而学会准确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学会战胜敌人的艺术。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时，我命令：

1.战士们熟练地掌握步枪，成为掌握自己武器的能手，要象我们那些歼灭德国占领者的光荣的特等射手那样，百发百中地消灭敌人！

2.机枪手、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飞行员们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成为本行的能手，痛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直到把他们彻底歼灭！

3.合成军队的指挥员们熟练地掌握诸兵种的协同动作，成为统率

军队的能手，向全世界表明，红军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的解放使命！

4. 全体红军争取使 1942 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

5. 男女游击队员们加强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通信和运输工具，消灭敌人的司令部和技术装备，对我们祖国的压迫者不要吝惜子弹！

在伟大列宁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49—58 页◇332◇

答美联社记者问

卡西迪[①]先生：

因为很忙，不自己同您面谈，对您提出的问题，只能作一简短的书面回答。

1.“关于第二战场的可能性问题，在苏联对目前时局的估计中占什么地位？”

答：占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占头等地位。

2.“盟国对苏联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效果，要扩大和改进这种帮助能做些什么？”

答：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同苏联吸引住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小的。要扩大和改进这种帮助,只须做一件事，就是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3.“苏联的抵抗力还有多大？”

答：我想，按本身实力来说，苏联抵抗德国强盗的能力，比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侵略国保证自己统治世界的能力，一点也不低，甚至还要高一些。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2年10月3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59—60页◇333◇

———————————————

① 亨·卡西迪当时是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07号。1942年10月9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2年10月9日《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的指令，**我命令：**

1．解除各部队、兵团、司令部、军事学校、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总部和红军其他机关的政治委员以及各分队的政治指导员所担任的职务，任命他们为相应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

2．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限期一个月在其受权范围内授予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

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1942年11月15日以前把授予正营级政治干部以上的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的鉴定材料，通过红军总政治部呈报国防人民委员部。

3，兵团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更坚决地把有军事素养的政治工作人员提拔到指挥岗位上来，特别是在连长、营长这一环节。

4，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本年10月20日以前组织方面军的为期两个月、有学员150—250人的指挥员训练班，以便把最有◇334◇担任指挥工作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培养成连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与红军总政治部配合进行。

5．红军总干部部从今年11月1日起在“射击”训练班中举办

为期两个月的训练班，训练最通晓军事的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便从他们当中培养200名团长和600名营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由红军总政治部协同总干部部进行。

6．本命令任命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保持原薪。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1942年10月10日《真理报》◇335◇

伟大卫国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我们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自从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六年。

在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把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过去一年的工作作一个总结。现在，我受委托向你们作过去一年，即从去年 11 月起到今年 11 月止的工作总结报告。

过去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和平建设和为我国前线组织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是领导红军进行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

1. 后方的组织工作

在这一时期内，我们领导机关的和平建设工作是，把我们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基地转移到我国东部地区，撤退工人和企业◇336◇设备，并在新的地区安置起来，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东部地区的秋播地，最后，根本改善我们为前线生产的企业的工作，加强后方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纪律。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管理经济和行政的各人民委员部（其中包括我们的铁路运输）的一项规模巨大，极

其困难,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但是,困难被克服了。而现在，尽管有战时的一切困难，我们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无疑做得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军事工厂和同它们协作的企业都忠实地、按时地供给红军以火炮、迫击炮、飞机、坦克、机枪、步枪和弹药。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忠实地、按时地供给居民和红军以粮食，供给我国工业以原料。应当承认，我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巩固的和有组织的后方。

这一切复杂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不仅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目，并且也改变了后方人们自己的面貌。人们更加振作，不那么松懈，更加遵守纪律，学会了按战时方式工作，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前线的祖国捍卫者——红军所负的职责。在后方，没有公民责任感的懒散松懈的人日益少了。充满公民责任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人日益多了。

但是，我已说过，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的一年。

2. 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领导机关的军事活动表现在保障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在过去的一年里，◇337◇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冬季时期，红军在打退德军向莫斯科的冲击后，取得了主动权，转入了进攻，驱逐德军，4 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 400 多公里。第二个时期——夏季时期，德国法西斯军队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他们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突破了西南方向的战线，取得了主动权，5 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约 500 公里。

第一个时期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红军在罗斯托夫、图拉、卡卢加地区，在莫斯科附近，在季赫温和列宁格勒附近的胜利的行动，揭示了两个极有意义的事实。第一，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红军及其战斗干部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够抵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势，而且能够在野战中粉碎他们，迫使他们后退。第二，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尽管非常顽强，但是有着严重的本质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对红军有利的某些条件下，会促使德军失败。德军以凯旋式的步伐踏遍了整个欧洲，一举击败了被认为精锐之师的法国军队，只是在我国才遇到了真正的军事抵抗，不仅遇到抵抗，而且在红军打击之下，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后退 400 多公里，在退却途中丢弃了大量的火炮、汽车和弹药，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单用冬季的作战条件，决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苏德战场军事行动的第二个时期显出有利于德国人的转变，主动权转到了德国人手里,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突破我军战线,进抵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皮亚季戈尔斯克、莫兹多克地区。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把自己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都投入战场,并且把它集中于一个方向,即西南方向，在这里造成了巨大的兵力优势，获得了重大的战◇338◇术胜利。

看来，德国人已经不那么强有力了，不能象去年夏季进攻的头几个月那样，朝南、北、中三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了，但是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在某一个方向组织重大的进攻。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在我国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照外国报纸包括德国报纸的反应来看,可能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石油区。但是事实完全推翻了这种假设。事实告诉我们，德国人向苏联的石油区方面挺进，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次要目的。

既然如此,那么德国人进攻的主要目的究竟何在呢？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切断莫斯科同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后方的联系，然后攻击莫斯科。德国人向南方、向石油区方面挺进的次要目的，不仅是占领石油区，而且与其说是占领石油区，不如说是把我们的主要预备队吸引到南方,削弱莫斯科战线,以便在攻击莫斯科时易于取胜。德军的主要集团现在不在南方，而在奥廖尔和斯大林格勒一带，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不久以前，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落到了我们手里。在这个军官身上搜到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明了德军进攻的时间表。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国人打算在今年 7 月 10 日占顿博里索格列布斯克，7 月 25 日占领斯大林格勒，8 月 10 日占领萨拉托夫,8 月 15 日占领古比雪夫，9 月 10 日占领阿尔扎马斯，9 月 25 日占领巴库。

这个文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情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和攻击莫斯科；而向南挺进的目的，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就是把我们的预备队远远地引离莫斯科，削弱◇339◇莫斯科战线，以便易于攻击莫斯科。

简单说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莫斯科,在今年结束战争。

去年 11 月,德国人打算以正面突击拿下莫斯科,迫使红军投降,从而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曾经向自己的士兵灌输过这种幻想。但是，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落空了。德国人去年在对莫斯科的正面突击中碰了钉子以后，想在今年通过迂回运动拿下莫斯科，以此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现在正在向自己的被愚弄的士兵灌输这种幻想。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也落空了。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原想一箭双雕，既夺得石油，又包围莫斯科，结果却使自己陷于困境。

因此，德国人夏季攻势的战术胜利，由于他们的战略计划显然不

现实，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 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德国人在今年仍然能够把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并且在我国战场上获得了重大的战术胜利，其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德国人及其盟国调集了自己的一切没有功用的预备队，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并在其中一个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措施，德国人不可能在我国战场上获得胜利。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调集自己的一切预备队，并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呢？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所以他们有可能不冒任何风险地采取这种行动。◇340◇

这就是说,德国人今年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没有第二战场，使他们有可能把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投入我国战场，并且在西南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

假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欧洲有第二战场，而且第二战场牵制住譬如说 60 个德国师和 20 个德国盟国师，那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处境会怎样呢？不难猜想，他们的处境会是悲惨的。不仅如此，那会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末日的开始，因为在那种情形下，红军就不会在现在所在的地方，而会在普斯科夫、明斯克、日托米尔、敖德萨附近一带。这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今年夏天就已经面临崩溃了。而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这一点挽救了德国人。

让我们从历史上来考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作战,在西方战场上主要对英国和法国，在东方战场上对俄军。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存在反对德国的第二战场。在当时德国拥有的 220 个师中，摆在

俄国战场上的不超过85个德国师。如果加上用在俄国战场上的德国盟国的军队，即37个奥匈师、2个保加利亚师和3个土耳其师，那么对付俄军的军队总共为127个师。德国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主要是用在对付英法军队的战场上，其中一部分担任欧洲被占领区的守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例如今年9月的情形怎样呢？

根据确实可靠的情报，在德国现在拥有的256个师中，摆在我们战场上的不下179个德国师。如果加上22个罗马尼亚师、14个芬兰师、10个意大利师、13个匈牙利师、1个斯洛伐克师和1个◇341◇西班牙师，那么现在用在我国战场上的军队总共为240个师。德国人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担任被占领国（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守备，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利比亚同英国进行争夺埃及的战争，而利比亚战场总共只牵制了4个德国师和11个意大利师。

因而，现在对付我国战场的师不下于240个，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27个，现在对红军作战的德国师是179个，而不是85个。

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今年夏季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基础。

时常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犯相比。但是这种比较是经不起分析的。在远征俄国的60万军队中,拿破仑带到博罗季诺的不过13—14万。这就是他在莫斯科附近时所能运用的全部军队。而现在我们红军面对的却是300多万用现代战争的一切手段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怎能相比呢？

有时也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相比。但是，这种比较也是经不起分析的。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国人的处境非常困难，而在这次战

争中却没有欧洲第二战场。第二，在这次战争中，对付我国战场的軍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一倍。很明显，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

现在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该是多么严重，多么罕见，而红军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又是多么伟大。

我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经受住德◇342◇国法西斯强盗及其盟国这伙野兽般的匪帮的这种猛烈攻势。只有我们苏维埃国家，只有我们红军才能经受住这种猛烈攻势。不仅经受住，而且粉碎它。

常有人问，欧洲第二战场究竟是否会开辟。是的，会开辟，早一些或者迟一些，但是会开辟。所以会开辟，不仅因为我们需要它，而且首先因为我们的盟国对它的需要并不亚于我们。我们的盟国不可能不了解，在法国失败以后，没有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会使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包括各盟国自己在内，都遭到不好的结局。

4. 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现在已经可以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希特勒德国强加于各国人民的战争的过程中,发生了力量的根本划分,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意德同盟和英苏美同盟。

同样不容争辩的是，这两个对立的同盟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对立的行动纲领。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可以由下列几点来说明：种族仇恨；“优等”民族的统治；征服其他民族并侵占它们的领土；经济上奴役被征

服民族并掠夺它们的国民财富；消灭民主自由；普遍建立希特勒制度。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是：消灭种族的特权；各民族平等和它们的领土不可侵犯；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和恢复其自主权；每一民族有权按自己意志来处理事务；经济上援助遭难的民族，协助它们真◇343◇正达到物质上的优裕；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 ——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以及苏联的被占领区——燃起了仇恨意德暴政的怒火，极力使德国人及其同盟者遭受损失，并且等待适当的机会为它们现在所受的侮辱和蹂躏向奴役它们的人报仇雪耻。

因此，目前的一个特点是，意德同盟日益孤立，它在欧洲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它本身日益削弱和瓦解。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完全同情这个同盟的成员国，并决心尽力给它们以各种援助。

因此，目前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个同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在欧洲，而且不仅在欧洲，日益增长，并且在这个同盟的周围有着愈来愈多的千百万同情者，决心同它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

如果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观点来考察这两个同盟的力量对比问题，那么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在这方面我们英苏美同盟无疑占着优势。

但是有一个问题：单靠这种优势是否足以获得胜利呢？常有这样的情形，资源很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使优势等于零。很明显，除了资源以外，还必须有善于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这些资源的本领。是否有根据怀疑英苏美同盟中人们具有这样的本领和这样的能力呢？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是他们根据什么怀疑呢？这个同盟中的人，在动员本国资源和正确地把它们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

经显示了本领和能力。试问有什么根据怀疑这些在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显◇344◇示了能力和本领的人,现在就没有能力为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同样的工作呢？我想这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说，英苏美同盟有一切可能获得胜利，而且肯定会胜利，要是它没有那个能够削弱和腐蚀它的本质上的弱点的话。按照这些人的意见，这个弱点表现在这个同盟是由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不同的成分所组成，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否认参加英苏美同盟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那是可笑的。但是，这是否就排斥这个同盟的成员国为了反对使它们受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呢？绝对不排斥。况且，已经造成的威胁，无条件地要求同盟的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以拯救人类免于倒退到野蛮时代和残暴的中世纪时代。难道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还不足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组织共同斗争反对希特勒暴政，并取得对它的胜利吗？我认为是完全够的。

这些人的假设所以不正确，还因为它已被过去一年的事件完全推翻。事实上，如果这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英苏美同盟的成员国彼此日益疏远的事实。然而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却看到证明英苏美同盟的成员国日益接近和结成为统一的战斗联盟的事实和事件。过去一年的事件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 1941 年 7 月,德国进攻苏联几星期后，英国同我国订立了《关于共同对德作战》的协定。那时我们同美国还没有就这一点订立任何协定。过了 10 个月以后，1942 年 5 月 26 日，莫洛托夫同志访问英国时，英国同我们订立了《关于在反希特◇345◇勒德国及其欧洲帮凶的战争中结成联盟和战后实行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期为 20 年它标志着我国和英国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 1942 年 6 月,莫

洛托夫同志访问美国时，美国同我们签订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这个协定使苏美关系有了一个重大的进步。最后应当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访问莫斯科,确立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完全的互相谅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苏联、英国和美国日益接近,并结成为反对意德同盟的战斗联盟。

由此可见，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别的逻辑都更加有力。

结论只有一个：英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5. 我们的任务

战争撕破了一切帷幕，暴露出了一切关系。情况如此明显，以致在这次战争中要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再容易不过了。

吃人的希将勒在同土耳其埃尔基勒特将军的谈话（这次谈话发表在土耳其《共和国报》上）中说道；“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看来，很明确，虽然有点蠢笨。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的任务,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就象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国家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第一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国家及其鼓舞者。

吃人的希特勒在同这位将军的同一次谈话中继续说道：“我们要把战争一直进行到俄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止。”看来，很明确，虽然无知。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一切有组织的军事力◇346◇量的任务，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懂得，这不仅对德国来说，也和对俄国来说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胜利者的观点看来也是不适宜的。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军队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军队及其领导者。

希特勒恶棍把残酷地折磨苏联战俘、成百地屠杀苏联战俘、成千地饿死苏联战俘当作常规。他们蹂躏和屠杀我国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男女老幼,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抱定目的,要奴役或消灭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和高加索的居民。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行同禽兽的下流败类，才会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犯下如此的暴行。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们在欧洲遍设绞架和集中营。他们实行了卑鄙的“人质制度”。他们常因有人妨碍某个德国畜生强奸妇女或抢劫百姓,而把抓来“做人质”的无辜百姓滥肆枪杀和绞死。他们把欧洲变成了各国人民的监狱。而他们竟把这称为 “欧洲新秩序”。我们知道这些暴行的凶犯，“欧洲新秩序”的建设者，所有这些新上任的总督、省长、警备司令和副司令是些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让这些刽子手知道，他们逃不脱对自己罪行所应负的责任，逃不出受害的各国人民的惩罚的手心。

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是要消灭这种可恨的“欧洲新秩序”，并严惩其建设者。

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些。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的盟国共同进行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正在使我们获得对人类的卑鄙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在这场战争的旗帜上写着：◇347◇

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万岁！

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万岁！

我们光荣的苏维埃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消灭万恶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欧洲新秩序”！

光荣属于我们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海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男女游击队员！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61—71页◇348◇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345 号。1942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

25 年前,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列宁的领导下，在我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此期间，苏联各族人民走过了光荣的道路。在这 25 年中,我们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业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争得了自由和独立，团结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大家庭里。苏联人摆脱了各种压迫，并以顽强的劳动保证自己过上了富裕和文明的生活。

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在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欧洲帮凶进行最激烈的残酷斗争的情况下,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在今年年初的冬季，红军曾给德国法西斯军队严重的打击。红军在打退德国人向莫斯科的冲击后争得了主动权，转入了进攻，迫使德军西退，从德国人的奴役下解放了我国的许多州。于是,红军表明了，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它是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的。

但是到夏季，前线的情况恶化了。德国人及其盟国利用欧洲◇349◇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自己的全部预备队，把它投到我们乌克兰战线上来，并突破了这条战线。在南方，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向前推进了，使斯大林格勒、黑海沿岸、格罗兹

尼和外高加索接近地受到了威胁。

诚然，红军的不屈不挠和勇敢精神，打破了德国人从东面迂回莫斯科、从后方对我国首都实施突击的计划。敌人被阻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但是，敌人虽然被阻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并在那里葬送了几万官兵，他们仍然在作最后挣扎，把许多新的师投入战斗。苏德战场上的斗争日益紧张起来。苏维埃国家的命运,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局。

我们苏联人民光荣地经受住了对他们的考验，对胜利充满了毫不动摇的信心。战争是对苏维埃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严酷检验。德帝国主义者指望苏维埃国家崩溃的打算完全破产了。社会主义工业、集体农庄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和苏维埃国家，显示了自己的稳固和牢不可破。我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知识分子，我国整个后方，都在为满足我们前线的需要而忠诚地忘我地工作。

红军担负着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的战争的全部重担。它以奋不顾身地抗击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业绩赢得了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从前没有足够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准确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粉碎敌人的阴谋，不屈不挠地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不受外国奴役者侵犯。莫斯科和图拉、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者，在无比勇敢、遵守铁的纪律、不屈不挠和善于战胜敌人方面，作出了榜样。我们全体红军都在向这些英◇350◇雄看齐。敌人已经亲身领略了红军的抵抗能力。他还将领略到红军的毁灭性的打击力量。

毫无疑问,德国侵略者还会进行新的冒险。但是,敌人的兵力已经消耗到了极点。战争开始以来，红军已歼灭了敌人官兵 800 多万。现在掺杂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芬兰人的希特勒军队，已比 1941 年夏秋间弱得多了。

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希特勒侵略者，要靠你们的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要靠你们作战的本领和履行自己对祖国职责的决心！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希特勒妖孽。

为此必须：

（1）坚决顽强地守住我们的战线，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耗敌人，歼灭其有生力量，消灭其技术装备；

（2）全力巩固我军的铁的纪律、最严格的秩序和一长制，提高军队的战斗素养，准备并坚定不移地准备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3）在敌后燃起全民游击运动的烽火，破坏敌人的后勤机关，歼灭德国法西斯恶棍。

同志们！

敌人已经在罗斯托夫附近、莫斯科附近和季赫温附近领略过红军的打击力量。敌人领略红军新的打击力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胜利的节日就要到来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万岁！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351◇

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78—81页◇352◇

给朱可夫的电报

康斯坦丁诺夫[①]同志：

如果叶廖缅科和瓦图京那里的战役航空兵准备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对德作战的经验表明，只有掌握制空权，才可能取得对德军的战役胜利。因此，我航空兵应完成三项任务：

第一，集中我航空兵的行动于我突击部队进攻的地域之内，压制德军航空兵并可靠地掩护我方部队。

第二，不断轰炸进攻部队当面的德军，为我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第三，以不断轰炸和强击的方法，追击退却的敌军，彻底打乱敌军并使其不能在最近的防御地区巩固下来。

如果诺维科夫认为我航空兵目前还不能完成这些任务，那就最好将战役推迟一些时间，以积蓄更多的航空兵力量。

请与诺维科夫和沃罗热伊金谈谈，向他们说明此事，并把你的意见概括地告我。

瓦西里耶夫[②]

1942 年 11 月 12 日 4 时

译自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74 年增订第 2 版第 109-110 页◇353◇

———————————————

① 康斯坦丁诺夫是格·康·朱可夫的化名。——编者注

② 瓦西里耶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编者注

答美联社记者问

卡西迪先生：

对您 11 月 12 日寄来的问题，回答如下：

1．“苏联方面怎样评价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答：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

非洲的军事行动又一次地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经过大洋在北非顺利登陆，迅速占领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一带港口和广阔地区,巧妙地粉碎西部沙漠上的意德军队。

2．“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方面有多大的效果以及苏联期待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援助？”

答：现在来谈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直接压力方面有多大效果，为时还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将是不小的，并且对苏联的压力在最近时期会有一定的减轻。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由于非洲的战局意味着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苏美同盟。它破坏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354◇勒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它使法国摆脱麻木状况振奋起来，动员法国的反希特勒力量，并为组织法国反希特勒军队提供根据地。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最后它为在更靠近德国的要害地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前提，而这对战胜

希特勒暴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为了加速取得最终的胜利，东方苏联的进攻力量同西方盟国相配合的可能性怎样？”

答：可以不用怀疑，红军会象它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执行了自己的任务那样，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2年11月13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2—84页◇355◇

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①]

（1942 年秋）

在实施进攻战役时，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时把为他们规定的分界线看作是一道不能越过的篱笆或隔墙，哪怕战事的利益和战役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情况要求越过时也这样。

结果是，我们的集团军在进攻时在自己的分界线范围内径直朝前走，不顾友邻部队，不作情况要求作的机动，不相互帮助，这样就方便了敌人的机动，使他们有可能逐个地打击我们。

大本营兹说明，分界线确定的只是指挥员对他们执行战斗任务的一定地段或地带负有责任，但不能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各集团军不可跨越的隔墙。在战役过程中，情况常常发生变化。司令员必须迅速而正确地对这种变化作出反应，必须使自己的兵团或集团军进行机动，而不要顾虑为他规定的分界线。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准许并授权各方面军司令员在战役过程中酌情改变方面军所属的各集团军之间的分◇356◇界线，改变个别集团军的突击方向,并随后报告大本营。

各方面军司令员应立即向所有集团军司令员说明这些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译自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

1978年第3版第545页◇357◇

————————————

① 这个指示摘自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该书说，指示是在准备斯大林格勒反攻时发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因此发出日期应在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反攻开始之前。原件见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第206号目录第294号卷宗第1号第200张。——编者注

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值此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二十五周年之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谨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致以兄弟的敬礼。

25 年前，乌克兰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乌克兰人民的压迫者的政权，建立了真正人民的政权。乌克兰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1918 年在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粉碎了德国占领者，把他们赶出了乌克兰国土。

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乌克兰人民过上了有文化的和富裕的生活。在乌克兰，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新的大工厂，数百个机器拖拉机站，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医院、俱乐部和剧院。在苏维埃政权年代，乌克兰变成了拥有先进的丰产的农业的国家。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乌克兰的国土在历史上第一次合并为统一的乌克兰国家。

乌克兰人民的和平的建设性劳动由于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入侵而遭到了破坏。希特勒分子破坏了苏维埃乌克兰几十个城市和数◇358◇百个乡村，玷污和毁灭了乌克兰人民无数的民族文物,屠杀和摧残了几十万乌克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吃人的希特勒妄想把乌克兰变成德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奴役爱好自由的乌克兰人民和使他们德意志化。这是办不到的！乌克兰人民的忠实儿女在红军中英勇作战，在苏联后方忘我地劳动，在游击队里

英勇地战斗，准备着从占领者手里完全解放祖国的土地。

乌克兰过去是，将来还是苏维埃乌克兰！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已经进入他们所解放的第一批乌克兰农村。愿人民解放斗争在乌克兰、在德国强盗的后方更加巩固和扩大。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坚信，乌克兰苏维埃爱国者定将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歼灭德国占领者！

受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约·斯大林
维·莫洛托夫

译自1942年12月25日《真理报》◇359◇

关于剧本《前线》的一个电报[①]

（1942 年）

您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

译自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部》
1981 年版第 1 部第 123 页◇360◇

————————————

① 这个电报摘自谢·马·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该书说，1942 年 8 月,当亚·叶·考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真理报》上连载时，有些人打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一剧本是对苏联红军的恶意攻击，要求停载和禁演。这是斯大林对其中的一封电报的答复。——编者注

最高统帅给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经过两个月的进攻战斗，红军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防御，粉碎了敌人102个师，俘虏了20多万人,缴获了13 000门火炮以及许多其他技术装备，前进了约400公里。我军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军的攻势在继续。

我祝贺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加里宁、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各方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祝贺你们取得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顿河流域、北高加索、沃罗涅日附近、大卢基地区、拉多加湖以南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盟友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胜利。

我向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歼灭了希特勒军队，打破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和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了坎捷米罗夫卡、别洛沃茨克、莫罗佐夫斯基、米列罗沃、旧别利斯克、科捷利尼科沃、济莫夫尼基、埃利斯塔、萨利斯克、莫兹多克、纳尔奇克、矿水城、皮亚季戈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阿尔马维尔、瓦卢伊基、罗索什、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大卢基、施吕瑟尔堡、沃罗涅日以及其他许多◇361◇城市和几千个居民点的统帅部和英勇的部队，宣布嘉奖。

前进，歼灭德国占领者，把他们从我们的祖国赶出去！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1943年1月2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5—86页◇362◇

最高统帅
给顿河方面军部队的命令

顿河方面军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炮兵元帅同志，

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同志：

祝贺你们和顿河方面军部队顺利地歼灭了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的敌军。

向顿河方面军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宣布嘉奖，嘉奖你们出色的战斗行动。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1943年2月2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87页◇363◇

最高统帅命令

（第 95 号。1943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

红军建立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建立红军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奴役我国的外国侵略者作斗争。1918 年 2 月 23 日,红军部队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的军队，于是这一天就成为红军的诞生日。

红军在 1918—1921 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我们苏维埃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捍卫了我国各族人民遵照伟大列宁的教导来建立自己生活的权利。

在 20 年的时间里,红军保卫了苏联人民和平建设的劳动。我国各族人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忘记过外国侵略者侵犯我国国土的阴谋，他们不倦地关心加强红军的实力，用头等的技术兵器来武装它，并精心地培养了苏联军人干部。

红军是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的军队。建立红军不是为了征服别国，而是为了保卫苏联的国界。红军向来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和独立。

但是在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于是红军不得不奋起作战，捍卫自己的◇364◇祖国，反对德国侵略者，并把他们驱逐出我们国境。从那时起，红军就变成了同希特勒军队作殊死斗争的军队，变成了为我们祖国沦陷区

遭受德国法西斯恶棍蹂躏和侮辱的兄弟姊妹报仇雪耻的军队。

红军是在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仆从的卫国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庆祝建军二十五周年的。

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匪军进犯的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已经有20个月了。由于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正单独担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是，红军不仅顶住了德国法西斯匪军的猛烈进攻，而且在战争进程中变成了使法西斯军队畏惧的力量。

红军在1942年夏秋两季的艰苦战斗中，堵截了法西斯野兽的进路。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英勇保卫战，不会忘记莫斯科附近和高加索山麓、勒热夫地区和列宁格勒附近的顽强战斗，不会忘记斯大林格勒城下所进行的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在这些伟大的战役中，我们英勇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红军的战旗上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荣，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个月以前，红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开始了进攻。从此以后，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且红军进攻的速度和突击力量一直投有减弱。目前，红军在艰苦的冬季条件下，在1500公里宽的战线上展开进攻,而且几乎到处都获得了胜利。红军在北方,在列宁格勒附近，在中部战线，在哈尔科夫的接近地上,在顿巴斯,在罗斯托夫附近,在亚速海和黑海沿岸,正接连不断地打击希特勒军队。三个月以来,红军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沃罗涅日州和斯大林格勒州,解放了切奇尼亚-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巴尔达-◇365◇巴尔卡尔和卡尔梅克等自治共和国，解放了斯塔夫罗波尔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解放了切尔克斯克、卡拉恰耶夫和阿迪格等自治州，几乎全部解放了罗斯托夫州、哈尔科夫州和库尔斯克州。

敌人已开始被大批地驱逐出苏联国境。

这三个月以来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德国人的这些严重失利从何产生的呢？这些失利的原因何在呢？

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改变了。法西斯德国日益耗尽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虚弱，苏联却日益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时间对法西斯德国是不利的。

迫使欧洲军事工业为自己生产的希特勒德国，在技术装备方面，首先在坦克和飞机方面，就在不久以前还是胜过苏联的。这就是它曾有过的优势。可是经过 20 个月的战争,情况已经改变了。由于苏联军事工业中男女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忘我劳动,在战争期间,坦克、飞机、火炮的生产增长了。就在这个期间，敌人在苏德战场上，在技术兵器方面，特别是在坦克、飞机和火炮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仅仅在 1942—1943 年冬季红军进攻的三个月中，德国人就损失了 7 000 多辆坦克、4 000 多架飞机、17 000 多门火炮以及其他许多武器。

当然，德国人在极力设法弥补这些损失，但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因为敌人要弥补技术装备上的这些巨大损失，就需要不少的时间。而时间是不等人的。

希特勒德国在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拥有在数量上超过红军并且已经作好动员和战斗准备的军队。这就是它曾有过的优势。但是经过 20 个月,这方面的情况也改变了。在战争期间，红军在防御和进攻战斗中歼灭了将近 900 万德国法西斯的官兵,其中战◇366◇场上被击毙的不下 400 万。被希特勒投到苏德战场上来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全部被粉碎了。仅仅在最近 3 个月内，红军就消灭了敌军 112 个师，其中被击毙的有 70 多万人，被俘的有 30 多万人。

当然,德军统帅部要采取一切办法来弥补这种巨大的损失。但是，第一，德军的弱点就是人员后备不足，因此不知道他们将依靠哪个来源来弥补这种损失。第二，即使德国人用尽一切办法拼凑了必需数量

的人员，但是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训练，还需要不少的时间，而时间是不等人的。

希特勒军队在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已拥有使用最新武器在欧洲大规模作战将近两年的经验。红军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自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作战经验。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曾有过的优势。但是，经过20个月,这方面的情况也改变了，红军在战争进程中已变成了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它已学会了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估计敌人的强弱方面，准确地打击敌人。几十万几百万的红军战士已成了熟悉手中武器的能手，即成了熟悉步枪、马刀、机枪、火炮、迫击炮、坦克、工兵作业和飞机的能手。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挥员已成了统率军队的能手。他们已学会了将个人勇敢无畏的精神同善于在战场上领导军队的才能结合起来,抛弃了愚蠢的和有害的线式战术，牢牢地掌握了机动战术。

红军统帅部不只是从敌人手中解放苏联国土，而且通过实施堪称军事学术典范的围歼敌军的重大战役而不让敌人活着逃出我们的国土。这种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指挥员成熟的标志。

无庸置疑，只有红军统帅部的正确战略和我们的指挥员-执◇367◇行者的灵活战术,才能够创造出如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围歼德国33万庞大精锐军队这样卓绝的业绩。

德国人在这方面却远不是万事大吉的。他们的战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照例是把敌人的力量和潜力估计过低，而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的战术是呆板的，因为它极力想让战场上的情况去适应条令的条文。当情况允许实行条令的要求时，德国人的行动是整齐而准确的。这是他们的长处。当情况复杂起来并开始“不符合”条令的条文，而需要在条令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独立地定下决心时，德国人就束手无

策了。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弱点。

最近三个月以来，决定德军失败和红军胜利的原因，就是如此。

但是，不应该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希特勒军队已经不足为患，红军只要把它追击到我国西部边界就完事了。这样想就是沉溺于愚蠢而有害的自欺自慰。这样想就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而陷入冒险主义。敌人遭受失败，可是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红军的打击正处在危机中，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就不能恢复元气了。同德国侵略者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个斗争才刚刚扩展和炽烈起来。如果以为不经过战斗德国人就会哪怕是退出我们的国土一公里，那也是愚蠢的。

红军面临着反对阴险残暴而且暂时还强大的敌人的严酷斗争。这场斗争要求时间，要求牺牲，要求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动员我们的一切能力。我们已开始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苏维埃乌克兰，可是，还有成百万的乌克兰人在德国奴役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在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卡累利阿，德国占领者及其奴仆暂时还在那里横行无忌。敌人◇368◇的军队已受到了强大的打击，可是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败。德国侵略者正在疯狂抵抗，进行反扑，企图守住防线，并可能进行新的冒险。因此在我们队伍中，不应该有泰然自若、疏忽大意、骄傲自大的情绪。

全苏联人民都为红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但是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必须牢牢记住我们导师列宁的遗训：“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

为了从万恶的敌人手中解放我们的祖国，为了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我命令：

1．在全体红军和海军中不断提高战斗技能,加强纪律、秩序和组织性。

2．加强对敌军的打击，不停地勇猛地追击敌人,不让敌人在防御地区进行巩固，白天黑夜都不给敌人休息，切断敌交通线,合围敌军，如果他们不缴械投降就歼灭他们。

3．更广泛地燃起敌后游击战争的烽火，破坏敌交通线,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敌军队调动，破坏敌武器和弹药的运送，炸毁和焚烧敌军用仓库，袭击敌守备部队，不让溃退之敌烧毁我们的乡村和城市，用全部人力和物力帮助进攻的红军。

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369◇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光荣的红军、我们英勇的海军、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红军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88—96 页◇370◇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95 号，1943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男女工人、男女农民、智力劳动者同志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我国人民是在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五一”节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红军，他们的期望并没有错。苏联军人挺身而起，保卫祖国，捍卫苏联人民的荣誉和独立，已近两年了。

在 1942—1943 年的冬季战局中，红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围歼了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两个集团军，俘虏了敌人官兵 30 多万，从德国人的枷锁下解放了苏联几百个城市和几千个村庄。

冬季战局表明，红军的进攻力量增强了。我军不仅把德国人从他们在 1942 年夏季占领的领土上赶了出去，而且还收复了许多已被敌人占领约一年半之久的城市和地区。德国人已经没有力量阻止红军的进攻了。

希特勒统帅部甚至为了在哈尔科夫地域一个狭窄的地段上反攻，都不得不从西欧调来 30 多个新的师。德国人打算在哈尔科夫◇371◇地域合围苏军，并给我军布置一个“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但是，希特勒统帅部想为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进行报复的企图破产了。

同时，我们盟国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域击溃了意德军队，肃清了这些地域的敌人，现在又在突尼斯地域继续打击敌人，而英勇的英美空军正在对德意军事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开辟反对意德法西斯分子的欧洲第二战场的预告。

这样，自战争以来，红军从东方对敌人的打击与我们盟军从西方对敌人的打击，第一次汇合成为一个总的统一的打击。

所有这一切就从根本上震撼了希特勒的军事机器，改变了世界大战的进程，并创造了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必要前提。

结果，敌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处境严重恶化,开始叫喊军事危机。诚然，敌人竭力用“总”动员的喧嚷来掩盖自己的危局。可是，任何喧嚷也不能抹煞法西靳阵营确实遭受严重危机的事实。

法西斯阵营的危机首先表现在敌人不得不公开放弃自己原来的闪击战方针。现在，在敌人阵营中谈论闪击战已经不时髦了，喧嚣一时的闪击战的侈谈已为持久战不可避免这种沮丧号泣所代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以前大吹特吹其闪击战术，现在却抛弃了这个战术，德国法西斯分子现在所吹嘘的已经不是什么他们进行了或准备进行闪击，而是他们如何巧妙地逃出了英军在北非的围击，或苏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的合围。法西斯报刊现在登满了夸张的消息，报道德军怎样从前线逃走，怎样避免在东方战场或突尼斯战场某一地段陷入新的斯大林格勒。看来，希特勒的战略家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来夸口了。

其次，法西斯阵营的危机表现在法西斯分子开始越来越经常◇372◇地谈论和平。如果按照外国报刊的消息来判断,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人想在英美背弃苏联的条件下同英美媾和,或者相反,他们想在苏联背弃英美的条件下同苏联媾和。德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之徒，他们厚颜无耻地以己之心度盟国之腹，以为盟国中总有某一个会陷入圈套的。显然，德国人空谈和平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处境很好。法西斯分子阵营空谈和平，只能说明他们正在遭受严重的危机。可是，同这批血洗欧洲并使欧洲布满绞架的德国法西斯阵营中的帝国主义强盗能谈得上什么和平呢？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德国法西斯分子空谈和平，岂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覆灭在即了吗？

德意法西斯阵营正遭受严重的危机，濒临覆灭。

当然，这还不是说，希特勒德国的覆灭已经到来了。不是的，不能这样说。希特勒德国及其军队已被震撼了，正在遭受危机，可是他们还未被粉碎。如果认为覆灭会自行到来，那就太天真了。要使希特勒德国的覆灭成为事实，就必须使希特勒军队再遭受两三次像它在最近五六个月中从西方和东方所遭到的这样强大的打击。

因此，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和我们的盟国及其军队一样，还面临着彻底战胜希特勒恶魔的严重和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发挥高度的坚忍精神，具有钢铁般的坚定性。他们应当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来粉碎敌人，以此来开辟走向和平的道路。

同志们！苏联人民对于自己的红军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决心贡献全部力量,来继续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实力。苏联人民在◇373◇不到四个月当中，就为红军捐献了 70 多亿卢布。这再一次证明，反对德国的战争，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真正的全民战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勇敢顽强地忍受战争所引起的困苦，在企业和机关中、在运输业中,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努力地工作。可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要求红军得到更多的火炮、坦克、飞机、机枪、自动枪、迫击炮、弹药、装备和粮食。这就是说，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全体苏联知识分子都必须为前线加倍努力工作。

我们后方的全体人民和一切机关，都必须象精确的钟表一样，协

调而准确地工作。我们要记住伟大列宁的遗训：**“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都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干劲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①

红军为了报答本国人民的信任和关怀，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毫不留情地歼灭德国侵略者，毫不停歇地把他们赶出苏联国土。战争以来，红军已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几十万战士已熟练地掌握了手中武器。许多指挥员已学会了在战场上巧妙地指挥军队的本领。但满足于这一点是不恰当的。战士们必须学会出色地掌握手中武器，指挥员必须成为指挥战斗的能手。但是这还不够。在军事上，特别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中,不能停步不前。在军事上停步不前,就等于落伍。大家知道，落伍的人是会挨打的。因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求全体红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要求红军全体指挥员和战士研究战争经验，学会怎样打胜仗。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374◇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和祝贺“五一”节时，

我命令：

1.全体战士——步兵、迫击炮手、炮兵、坦克兵、飞行员、工兵、通信兵、骑兵——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准确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执行条令和教令的要求,严守纪律，维护组织性和秩序。

2.各兵种的指挥员和合成军队的指挥员成为统率军队的能手，善于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指挥它们作战。要研究敌情，改善军队的耳目——侦察上作，要记住，不这样做就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要提高军队司令部的工作素养，使红军部队和兵团的司令部成为指挥军队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2页。黑体是斯大林用的。——编者注

的模范机关。要把军队后勤机关的工作提高到现代化战争所要求的水准，要牢记，战斗行动的结局，取决于军队弹药、装备和粮食的供给是否充分和及时。

3.全体红军巩固并发展冬季战斗的胜利，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给敌人，准备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决战。在防御中，要发扬我军战士所固有的顽强坚定的精神。在进攻中，要坚决果敢，正确协同，大胆实施战场机动来围歼敌人。

4.男女游击队员给敌人的后勤机关、交通线、军用仓库、司令部和各种企业以强有力的打击，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要吸收敌占区内广大苏联人民积极参加解放斗争，从而使苏联公民免被赶到德国去当奴隶，免受希特勒野兽的屠杀。要为我们的妻儿、父母、兄弟姐妹所流的鲜血和眼泪，无情地向德国侵略者报仇。要用一切力量支援红军同卑鄙的希特勒奴役者作斗争。

同志们！◇375◇

敌人已经尝到了我军歼灭性打击的力量。红军和我们盟军共同打断法西斯野兽脊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英勇的红军万岁！

我们英勇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97—104页◇376◇

答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

帕克[①]先生：

您寄来的关于波苏关系的两个问题已于5月3日收到。

现将我的答复寄上。

1.问：“苏联政府是否希望波兰在希特勒德国失败后成为一个强盛独立的国家？”

答：当然希望。

2.问：“在您看来，战后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答：建立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或者，如果波兰人民愿意的话，建立在共同反对苏波两国的主要敌人德国人的互助同盟的基础上。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4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5页◇377◇

————————————

①　帕克当时是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
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

(1943 年 5 月 8 日)

伦敦　邱吉尔首相

向您和英勇的英美军队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华盛顿　罗斯福总统

向您和英勇的美英军队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06 页◇378◇

斯大林和罗斯福、邱吉尔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金[①]先生：

您要我对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一答复的请求已收到。现将我的答复寄上。

问：“英国对关于取消共产国际的决议甚有好评。苏联对这一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影响，看法如何？”

答：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是因为：

（一）这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涉别国的生活，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

（二）这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三）这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的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379◇

（四）这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

————————————

① 金当时是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及其他联合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完全适时是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8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07—108页◇380◇

最高统帅给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同志、瓦图京大将同志、波波夫上将同志的命令

昨天，7 月 23 日，我军的胜利行动彻底粉碎了德军 7 月从奥廖尔以南地域和别尔哥罗德以北地域向库尔斯克方面的进攻。

从 7 月 5 日清晨起，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大量的坦克和步兵，在大批飞机的支援下，在奥廖尔、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两个方向上转入了进攻。

德军把集中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个地域的主力都投入了向我军的进攻。

现已查明，德军统帅部投入战斗的兵力，在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上为 7 个坦克师、2 个摩托化师和 11 个步兵师，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上为 10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7 个步兵师。

因此，敌方参加这次进攻的总共有德军 17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和 18 个步兵师。

德军统帅部将这些兵力集中在战线的两个狭窄的地段上，企图从北面和南面同时向库尔斯克实施向心突击，突破我军防御，围歼我配置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弧形地带上的军队。

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并没有使我军措手不及。我军不仅作好了击退德军进攻的准备,而且作好了对敌人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的◇381◇准备。

敌人以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的巨大损失为代价,才得以在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上楔入我军防御 9 公里，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上楔入 I5—35 公里。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消耗和疲惫了德军的精锐师，并随即进行了坚决的反突击，不仅击退了敌人，完全恢复了 7 月 5 日以前我军的态势，而且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向奥廖尔方面前进了

15—25 公里。

这次粉碎德军进攻的战斗，显示了我军高度的战斗技能，显示了各兵种战士、指挥员（包括炮兵和迫击炮手、坦克兵和飞行员）最典范的顽强、坚韧和英勇精神。

这样，德军夏季进攻计划应该说是完全破产了。

从而所谓德军夏季进攻总是胜利，而苏军似乎不得不退却的神话也就被揭穿了。

在这次粉碎德军进攻的战斗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有:**普霍夫**中将、**加拉宁**中将、**罗金**坦克兵中将、**罗曼年科**中将、**科尔帕克奇**中将、**契斯佳科夫**中将．**卡图科夫**坦克兵中将、**罗特米斯特罗夫**坦克兵中将、**扎多夫**中将、**舒米洛夫**中将、**克留琼金**中将所指挥的部队，以及**戈洛瓦诺夫**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中将，**鲁登科**空军中将、**瑙缅科**空军中将所指挥的航空兵团飞行员。

在 7 月 5 日至 23 日的战斗期间，敌人的损失如下：被击毙官兵 7 万多人，被毁伤坦克 2 900 辆、自行火炮 195 门、野战炮 844 门，被击毁飞机 1 392 架、汽车 5 000 多辆。

我祝贺你们和你们所指挥的部队胜利地完成了粉碎德军夏季进攻的任务。

我嘉奖你们所指挥的部队的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382◇员的出色的战斗行动。

在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1943 年 7 月 24 日

译自 1943 年 7 月 25 日《真理报》◇383◇

最高统帅给
波波夫上将、索科洛夫斯基上将、罗科索夫斯基大将、瓦图京大将、科涅夫上将的命令

今天，8月5日，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在西方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部队两翼协助下，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奥廖尔市。

同在今天,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打垮了敌军的抵抗，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市。

一个月以前,7月5日，德国人从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两地域发动了夏季进攻,企图围歼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我军部队，占领库尔斯克。

我军在击退敌人从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方面闯入库尔斯克的一切尝试后，自己转入了进攻，并于8月5日，正好是德国人发动七月进攻的一个月以后，占领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

从而德国人所谓的苏军似乎不能在夏季进行有效进攻的神话就被揭穿了。

为纪念这次胜利,特授予最先攻入和解放奥廖尔市的第5、129、380步兵师以“奥廖尔”师的称号，今后称它们为：第5奥廖尔步兵师、第129奥廖尔步兵师、第380奥廖尔步兵师。◇384◇

特授予最先攻入和解放别尔哥罗德市的第89近卫师和第305步兵师以“别尔哥罗德”师的称号，今后称它们为：第89别尔哥罗德近卫步兵师、第305别尔哥罗德步兵师。

今天，8月5日24时，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将以120门火炮齐鸣礼炮12响，向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我军英勇部队致敬。

为表彰出色的进攻行动，向你们指挥的参加解放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战役的整个部队宣布嘉奖。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占领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1943年8月5日

译自1943年8月6日《真理报》◇385◇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289号。1943年9月8日于莫斯科市）

1943年2月23日，第56近卫步兵师第254近卫步兵团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争夺**切尔努什基**村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冲向敌人的土木发射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眼，牺牲自己，从而保证了进攻分队的胜利。

1943年6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追授近卫军列兵**马特洛索夫**同志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马特洛索夫同志的伟大功勋应该成为全体红军军人发扬军人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榜样。

为了永远纪念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夫·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

我命令：

1．授予第56近卫步兵师第254近卫步兵团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254近卫步兵团”的称号。

2．把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的名字永远载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254近卫团第1连的名册。

国防人民委员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1943年9月11日《真理报》◇386◇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1943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我国在卫国战争环境中庆祝自己人民革命的纪念日是第三次了。

1941 年 10 月，我们祖国曾处在艰难的日子里。敌人逼近了首都，从陆地上包围了列宁格勒。我们的军队迫不得已曾实行退却。那时要求我军作出巨大的努力，要求人民竭尽全力，以便阻挡敌人，并在莫斯科附近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到 1942 年 10 月的时候,我们祖国面前的危险更加增大了。当时,敌人离莫斯科不过 120 公里，已经突入了斯大林格勒，进到了高加索山麓。但是，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国军民也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切考验。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来阻挡敌人和回击敌人。他们忠于伟大的列宁的遗训，不惜力量和生命来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大家知道,军队和人民所作◇387◇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

在去年十月革命节以后不久，我军就转入了进攻，给了德军以新的强大的打击，起初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在高加索、在顿河中游一带，后来，1943 年初,是在大卢基附近、列宁格勒附近、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域。从此以后，红军再没有丧失过主动权。在今年整个夏季中，红军对敌人的打击日益猛烈，它的作战艺术每个月都在提高。从

那时候起，我军不断获得巨大的胜利，德军则接连遭受失败。不管敌人怎样费尽心机,它在苏德战场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稍许重大的胜利。

1.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至二十六周年——是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首先因为这一年红军从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德军实现了夏季大进攻，并且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我军打击下，不得不慌忙放弃其占领的地区，时常靠逃跑来避免合围，把大量的技术装备、成堆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大批受伤官兵遗弃在战场上。

因此，这一年下半年我们夏季战局的胜利，是这一年年初我们冬季战局胜利的继续和完成。

现在，当红军发展冬季战局的胜利，在夏季给了德军以强大打击的时候，那种所谓红军不能在夏季实施胜利进攻的神话，可以说是被最終埋葬了。过去这一年表明了，红军在夏季也能够象在冬季一样很好地进攻。◇388◇

由于进行了这些进攻战役，我军在过去这一年中,且战且进,在中部战线前进了500公里，在南部前进了1 300公里，解放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即差不多等于被敌人暂时侵占的苏联国土的三分之二，而且把敌军从弗拉基高加索击退到了赫尔松，从埃利斯塔击退到了克里沃罗格，从斯大林格勒击退到了基辅，从沃罗涅日击退到了戈梅利,从维亚济马和勒热火击退到了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的接近地。

德军因为不相信自己过去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稳固可靠，所以长期以来预先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地带，特别是在大的江河一带。可是在今年的战斗中，无论是江河，还是强大的工事，都挽救不了德军。我

军摧毁了德军的防御，而且仅仅在1943年夏季三个月中,就巧妙地强渡了四条很大的江河障碍，即北顿涅茨河、杰斯纳河、索日河和第聂伯河。至于德军在罗斯托夫以西米乌斯河一带和在梅利托波尔附近莫洛奇纳亚河一带的防御这一类障碍，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红军正在第聂伯河以西胜利地打击敌军。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还因为红军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打死和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中许多最有经验的老干部，同时在这一年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增加了自己的干都。过去一年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中，损失了400多万官兵，其中被打死的至少有180万人。此外,德军在这一年中,损失了14 000多架飞机,25 000多辆坦克和不下4万门火炮。

现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不是战争开始时那样的军队了。在战争开始时，它有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干部，而现在，德军中掺杂了许多初出茅庐的尚无经验的年轻军官。德国人急急忙忙把他们派往前线,是因为既没有必需的后备军官，又没有时间训练他们。◇389◇

红军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它的干部成长起来了，并在过去这一年的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出来了。它的战斗干部的数量，正在增长，而且会继续增长，因为它有必需的后备军官，使它有时间和可能来训练年轻的军官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很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我军当面之敌240个师中有179个是德国师，而今年红军当面之敌257个师中有207个是德国师。德国人大概是打算用增加自己师的数量来补偿其质量的降低。但是，德国人在过去这一年来的失败表明，师的质量变坏，是不能用增加其数量来补偿的。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这两个极重要的事变已预先决定了今年年底以前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失败。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合围和消灭了30万德军,俘虏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被围敌军。要想了解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次空前大激战的规模，就必须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竟收殓和埋葬了147 200名战死的德军官兵和 46 700名阵亡的苏军官兵。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大家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激战以后已经不能恢复元气了。

至于说到库尔斯克会战，其结果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两个主要进攻集团被击溃,我军转入反攻,后来又发展成为红军强大的夏季进攻。库尔斯克会战是从德军南北两面进攻库尔斯克开始的。这是德军想实现其夏季大进攻并在进攻奏效时挽回自己损失的最后一次尝试。大家知道,这次进攻的结果是完全失败了。红军不只是击退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同时在夏季实施◇390◇了一系列连续的突击，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过了第聂伯河。

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就把它推到了覆灭的边缘。

最后，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因为红军的胜利进攻使得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根本恶化，使它面临极深刻的危机。

德国人曾打算实现今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的有效进攻，来捞回自己的损失和提高自己在欧洲已经动摇的威信。但是红军推翻了德国人的这种算盘，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自己转入了进攻，迫使德军西退,从而使德军威信扫地。

德国人曾打算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开始构筑防线和“壁垒”，同时大肆宣传，说他们的新阵地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在这里红军也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和“壁垒”,继续顺利进攻,不让他们有时间来拖延战争。

德国人曾打算用“总”动员来扭转前线状况。但是事变在这里也

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夏季战局已经消耗了“总”动员的三分之二的兵力，但并没有看到,这使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状况有什么改善。也许，还要宣布一次“总”动员。可是没有根据设想，重复这类办法就会使某个国家不走向“总”崩溃。

德国人曾打算紧紧抓住乌克兰，想用乌克兰的农产品来供给自己的军队和居民，用顿巴斯的煤来供给为德军服务的工厂和铁路运输。但是，在这里他们也失算了。由于红军的顺利进攻，德国人不只是失掉了顿巴斯的煤矿，而且还失掉了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州，并且没有根据设想，他们在最近时期不会失掉乌克兰的其余部分。◇391◇

很明显，这一切失算，不能不使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恶化，而且的确根本恶化了。

法西斯德国正遭受深刻的危机。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

2. 全民支援前线

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苏联人在工厂、矿山、运输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忘我劳动，红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人民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保证自己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最基本的必需品，不断改进了他们的技术兵器。在整个战争期间，敌人在武器的质量方面从来没有能够超过我军。同时，我国工业给前线生产的技术兵器的数量也愈来愈多。

过去的一年，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在我们的后方工作上，也是转折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把企业撤退到东部和使工业转入军火生产的那种任务了。现在苏联的战时经济已经安排就绪并且迅速发展着。因此人民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来增产和进一步改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飞机、火炮和自行火炮。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红军依靠全民的支援，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武器装备，向敌人倾泻了千百万颗炸弹和炮弹，把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投入了战斗。完全有理由说，苏联人在后方的忘我的劳动，将同红军的英勇斗争一样，作为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史无前例的功勋载入史册。

苏联工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又展开了紧张的、热火朝天的工作支援前线，在劳动中表现了真正的英雄气概。◇392◇

大家知道，希特勒分子在反苏战争中，不仅拥有本国的非常发达的工业，而且拥有各附庸国和被占领国的相当强大的工业。然而希特勒分子还是不能保持他们在反苏战争开始时的那种技术兵器数量方面的优势。如果说敌人在坦克、飞机、迫击炮和自动枪数量方面原有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我军现在对于武器、弹药、装具等不感到严重的不足，那么，这首先应当看作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功劳。

苏联农民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把落后的农业变成了先进的农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他们对于人民的共同利益表现了农村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觉悟。他们以忘我的劳动支援前线，这就证明,苏联农民认为目前反对德国人的战争是自己切身的事业,是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的战争。

大家知道，由于大批法西斯军队的突然进犯，我国曾暂时失掉乌克兰、顿河和库班等重要农业区，然而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于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还是没有严重地中断过。当然，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制度，没有男女集体农庄庄员的忘我劳动，我们是不能解决这个极端困难的任务的。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三年里，我们的军队没有感到粮食不足，如果说居民有粮食的供应，而工业有原料的供应，那么，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是**集体农民**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我国的运输部门，首先是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内河运输、海上运输和汽车运输部门,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运输是前线后方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手段。我们可以生产出大批武器和弹药，但是如果没有运输部门及时地运到前线，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对于前线毫无用处的东西。应当说，在把武器、弹◇393◇药、粮食、军服等等及时送上前线的工作中，运输部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尽管存在着战争时期的困难而且缺乏燃料，我们还是把一切必需品供给了前线，那么，必须承认这首先是我国**运输部门的职工**的功劳。

我国知识界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也不落后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苏联知识分子忠诚地为我国国防事业工作，不断地改进红军的武器装备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组织。他们帮助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发展工业和农业，在战争条件下把苏联科学和文化推向前进。

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苏联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奋起保卫祖国，正确地认为目前的卫国战争是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的一切劳动者的共同事业。现在连希特勒的政治家们都看到，他们指望苏联各民族分裂和冲突是多么的愚蠢。**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经受了战争的一切困难和考验，在全体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巩固了。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或是在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都是列宁的党——布尔什维克党。无论过去和现在，没有哪一个党象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这样的威信。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争得了自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时期，党又是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全民斗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党的组织工作把苏联人的一切努力联合在一起，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都服从于粉碎敌人的事业。在战争时期，党同人民更加亲密了，党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更加紧◇394◇密了。

我国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目前的战争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著名指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战争历史教导说，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定和团结一致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我们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

苏维埃国家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在卫国战争第三年，这样巩固和坚定。战争的教训证明，苏维埃制度不仅是和平建设年代组织国家经济文化高涨的最好形式，而且也是战争时期动员人民的全部力量回击敌人的最好形式。26 年前创立的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就把我们国家变成了不可摧毁的堡垒。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红军拥有最巩固的和最可靠的后方。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将是一个强大的和更加巩固的国家。德国侵略者破坏和蹂躏我国国土，力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实力。红军的进攻，比以前更大规模地揭露了希特勒军队野蛮的强盗本性。德国人在占领区内屠杀了我国数十万和平居民。德寇象中世纪的蛮族或阿提拉[①]匈奴军一样践踏田野，焚毁城市和乡村，破坏工业企业和文化机关。德国人的暴行说明法西斯侵略者的虚弱，因为只有横行一时但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胜利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勾当。因此希特勒

———————————————

① 阿提拉是公元 4—5 世纪侵入欧洲的匈奴人所建立的匈奴帝国的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阿提拉曾率军转战欧洲各地，大肆焚掠杀戮。——编者注

分子的处境愈是无望,他们的◇395◇掠夺暴行也就愈加猖狂。我国人民决不会饶恕德国恶魔的这些罪行。我们要迫使德国罪犯对于他们的全部暴行负责!

在法西斯匪徒暂时统治过的地区，我们要恢复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工业、运输业、农业和文化机关，为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苏联人创立正常的生活条件。现在已经在全力恢复我们解放的地区内的经济和文化。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内彻底消除德国人蹂躏所造成的恶果。这是全体人民的重大任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

3．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过去的一年，不仅是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而且是整个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一年来在军事形势和外交形势上所发生的变化，都有利于苏联和苏联的友好盟国，而不利于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劫掠帮凶。

红军胜利的结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苏德战场的范围，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意义。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时刻临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及其军队的战斗合作，却与敌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和巩固了。不久以前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英美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决定，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联合国家充满了决心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将导致最终战胜敌人。

在这一年中，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打击，曾得到了我们的◇396◇盟国在北非、地中海区域和意大利南部的战斗行动的支援。同

时盟国对德国的重要工业中心进行了并继续在进行大轰炸，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加上盟国经常供给我们各种武器和原料这一事实，那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军夏季战局的胜利。当然，目前盟军在南欧的行动，还不能看作是第二战场。但是这毕竟有些类似第二战场的地方。显然，不久就会在欧洲开辟的真正的第二战场，将大大加速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更加巩固盟国的战斗合作。

因此，过去这一年来的事变表明，反希特勒同盟是各国人民的牢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挑起了这场战争的希特勒匪帮，把德国及其附庸国引到了绝境。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和我们盟军给予意德军队的打击，动摇了法西斯同盟的整个大厦，它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倒塌。

意大利永远脱离了希特勒的同盟。墨索里尼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势，因为在实质上他是德国人的俘虏。现在轮到同盟的其他参加者了。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特勒的其他附庸国看见德国的军事失败也都灰心丧气，现在已经彻底丧失了战争结局会有利于它们的信心，一心想怎样逃出被希特勒拖下去的泥坑。协同希特勒德国抢劫的帮凶，不久以前还俯首听命于自己的主子，现在，到了要对抢劫负责的时候，就寻找方便的时机，偷偷离开匪帮，溜之大吉。

希特勒同盟参加者加入战争，是预计很快就会获得胜利的。他们早就安排好了：谁吃甜头，谁吃苦头。当然，他们是要叫敌人吃苦头，而自己来吃甜头的。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德国及其奴◇397◇仆不但吃不到甜头，而且不得不分吃苦头了。

希特勒的帮凶见势不妙，目前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样退出战争，以便少吃点苦头。

意大利的例子向希特勒的各附庸国表明，它们同德国人的必不可免的破裂越是拖延下去，让德国人在它们国内横行得越久，它们的国家遭到的蹂躏就越大,它们的人民受苦就越多。意大利的例子还表明，希特勒德国并不想保护自己的附庸国,它只图延缓自己毁灭的时刻,而故意把它们变成毁灭性战争的疆场。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事业已经输定了，它所建立的血腥的“新秩序”正在破产，在欧洲各被占领国中，全民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义愤的爆发日益增长。德国在其同盟国和中立国中原有的威望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立国家的联系已经破裂了。

希特勒匪帮叫嚣德国人要统治全世界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已顾不上统治全世界了，——不求发胖，只图保命。

由此可见，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是始终没有牢固的基础的。希特勒同盟是建立在其参加者进行侵略、抢劫这种意向的基础上的。当希特勒分子在军事上得胜的时候，法西斯同盟还似乎是一个坚固的联合体。可是法西斯军队一遭到失败，就使这个强盗同盟实际上陷于瓦解了。

希特勒德国及其附庸国正处在覆灭的前夜。

随着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组织和恢复欧洲各国人民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问题将提上日程。我国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应当同我们的盟国共同实行：◇398◇

(1)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并协助他们重建被法西斯奴役者所肢解的自己的民族国家,——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及其他处在德国枷锁下的各国人民，都应当重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2)给欧洲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来自行决定

他们的国家制度问题；

(3)采取措施使所有的法西斯罪犯,即挑起这场战争并使各国人民遭受灾难的罪犯，不管他们隐藏在哪一国，都要为他们的一切暴行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4)在欧洲建立一种使德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新进行侵略的秩序；

(5)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各国人民长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来恢复被德国人所破坏的经济和文化。

*　　*　　*

在过去的一年里，红军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已取得了在战争中有利于我国的根本转折，而战争现在正走向最好的结局。但是苏联人不应当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不应当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如果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安然自得的情绪，胜利是可能被放走的。没有斗争和努力,就不能获得胜利。胜利要从战斗中取得。现在，胜利很近了。但是，要争得胜利，就必须更加鼓起劲头，必须使整个后方都忘我地进行工作，使前线的红军善于作战和坚决作战。如果我们不利用一切可能来加速消灭敌人，那就是对祖国、对暂时处在法西斯专制下的苏联人、对在德国人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欧洲各国人民犯罪。决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来最终消灭◇399◇敌人。

苏联人民和红军对当前斗争的困难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已经很明显，我们胜利的时刻快到了。战争已进到了把占领者从苏联国土上完全驱逐出去和消灭法西斯“欧洲新秩序”的阶段。我们完全肃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敌人，把克里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人民，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同志们！

为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而战！

为把欧洲各国人民从法西斯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战！

为从我们国土上完全驱逐德国恶魔而战！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09—127 页◇400◇

最高统帅命令

（第309号。1943年11月7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我们是在红军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获得光荣胜利的时候庆祝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的。

我国人民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奴役者的解放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一年前，我们祖国曾处在艰难的日子里。当时敌人侵占了我们大片领土。千百万苏联人遭受了德国人奴役的痛苦。敌寇企图从东面迂回莫斯科，扑向了伏尔加河，包围了通向外高加索的接近地。但是红军奋不顾身地堵截了敌人的进路。我军挡住了外国匪帮，后来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击溃了他们，迅猛地驱赶他们西退。从那时起，红军就牢牢地掌握了作战主动权。

1942—1943年冬季，我们英勇的军队击溃了德意罗匈的精锐军队,歼灭和俘虏了敌军官兵100多万，解放了将近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

1943年夏季,红军给了敌人以新的毁灭性打击。我军在几天内就粉碎了德军的夏季进攻，从而埋葬了希特勒准备消灭红军主◇401◇力，从奥廖尔、库尔斯克方面迂回莫斯科的计划。不但如此，红军还转入了坚决的进攻，突破了敌人强大的防御地带，在三个月当中，在

有些地方把敌人向西击退了400—450公里。在夏季战局中,我军把敌人赶出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赶出了顿巴斯、塔曼、奥廖尔州和斯摩棱斯克地区，进入了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收复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进入了白俄罗斯,占领了通向克里木的接近地,解放了160多座城市和38 000多个居民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红军从德军手中夺回了以前被他们占领的我国国土的将近三分之二，从德军的铁蹄下解放了数千万苏联人。

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官兵400多万，其中被击毙的不下180万。

德国法西斯军队精锐的基干师,在苏德战场上遭到了可耻的下场。希特勒征服世界和奴役各国人民的计划，也与这些师一起永远被埋葬了。

诚然，德军现在还固守每道阵地进行顽抗。但是，德国人自从其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以来所遭受的失败，已挫伤了德军的士气。现在德军非常害怕被围,当他们一遇到有被我军迂回的危险时,就仓皇逃窜，把技术装备和伤兵都遗弃在战场上。

我军在过去一年的进攻战斗中，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军官和将军熟练地指挥军队，有成效地掌握统率军队的艺术。红军已成了最强大和最有锻炼的现代化军队。

红军的胜利更加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我军的进攻得到盟军在北非、意大利所属的岛屿以及意大利南部的战斗行动的支援。我们盟国的空军对德国工业中心进行了大轰炸。毫无疑问，红军从东方对德军所进行的打击，在盟军主力从西方打击的支援下,一◇402◇定会摧毁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实力，使反希特勒同盟取得完全的胜利。

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对前线的支援，红军就不能够获得今年的伟大胜利。苏联人民献出一切力量，支援自己的军队。武器、弹药、粮食

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乌拉尔和库兹巴斯，莫斯科和伏尔加河流域，列宁格勒和巴库，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我们所有的共和国和州都成了红军的大军需库。苏联人民正在有成效地恢复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工业区和农业区，使工厂、矿井投入生产，铁路通车，重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把已解放的地区的资源用来为前线服务。

我们的胜利的确伟大。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那就幼稚了。现在，当红军在第聂伯河以西打击敌人,并冲向我国西部边界的时候，如果泰然自若，安然自得，不充分估计到当前斗争的严重困难，那是特别危险的。现在,敌人将特别疯狂地为其所侵占的每寸土地而战,因为我军每前进一步，对德军在我国土地上的暴行进行惩罚的时刻就越接近。

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我国军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建立新的功勋。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你们在同万恶的敌人进行伟大搏斗中获得了巨大胜利，为红军和海军的战斗旗帜增添了不朽的光荣。红军和海军现在有一切可能在最近期间完全肃清苏联国土上的德国侵略者。

为了我们祖国战胜德国法西斯恶魔，**我命令：**

1.全体战士和军士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最严格地执行条令、教令的要求以及指挥员和首长的命令，时时处处遵守模范的◇403◇秩序、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

2.各兵种的军官和将军改进军队的战场指挥和诸兵种的协同动作，牢牢地巩固进攻的胜利，迅猛追击敌军,使后勤机关更迅速地跟上,更大胆地运用预备队去进行新的突击。

3.全体红军勇敢坚决地突破敌人的防御,日夜不停地追击敌人,不

让他们在中间地区巩固下来,用大胆灵活的机动去切断敌人交通线,合围并割裂敌军，消灭并俘获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

4.男女游击队员发动苏联人投身于反对德军的武装斗争，全力支援进攻的红军，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关和司令部，救出苏联人，不让他们遭受屠杀和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无情地消灭德国法西斯恶棍！

红军军人、男女游击队员们！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前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的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向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报仇，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28—133页◇404◇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13号。1943年12月7日于莫斯科市）

12月8日是两次荣获勋章的伏龙芝红军军事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国内战争第一年建立的学院，二十五年来向红军输送了大批训练有素、具有现代军事学术水平、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指挥干部。

学院的大批毕业生——卫国战争各个战场的军官和将军们，正在熟练地组织并有效地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在表彰军事学院为红军、为祖国建立的功勋的同时，我坚信学院的领导和全体教授、教员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工作，继续努力地向红军输送朝气蓬勃的、精通军事的军官。

战胜敌人的事业，要求经常地、深入地研究卫国战争的经验并迅速地在军队中推广这种经验。在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中，伏龙芝军事学院应一如既往，不负红军军事科学思想最大中心的崇高使命。

谨向两次荣获勋章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领导、全体教授，教员和学员祝贺建院二十五周年，希望学院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1943年12月9日《真理报》◇405◇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6 号。1944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苏联军队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情况下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的。

红军为粉碎希特勒侵略军并将其赶出苏联国土而实施胜利的进攻，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期间,红军顺利地进行了 1942—1943 年间的冬季战局，取得了 1943 年夏季各次会战的胜利，并且展开了 1943—1944 年间冬季的胜利进攻。在这些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战局中,红军一面战斗，一面向西推进,有些地方前进了 1700 公里，在约四分之三的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肃清了敌人。

在目前的冬季战局过程中，红军粉碎了德军从日洛宾到赫尔松的第聂伯河沿岸全部坚固的防御，从而使德军企图在苏德战场上顺利地进行持久防御战的打算落空了。

在冬季战局的三个月中，我们英勇的军队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完全解放了基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解放了整个日托米尔州，几乎全部解放了罗夫诺州和基洛夫格勒州，并且解放了文尼察州、尼古拉耶夫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州和沃伦州的许多区。红军的坚决行动粉碎了德军在日托米尔、克里沃罗格和乌曼地区进行反攻的企图。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为德军安排了一个新的斯大林格◇406◇勒，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域围歼了德军 10 个师和 1 个旅。

苏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军突破了敌人纵深梯次配置的强大的永备工事配系，粉碎了德军的强大集群，彻底解除了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和野蛮的炮击。苏联军人正在肃清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法西斯恶魔，并且进入了苏维埃爱沙尼亚境内。

把占领军从苏维埃白俄罗斯驱逐出去的大规模行动已经展开了：几乎全部解放了戈梅利州和波列斯克州，解放了莫吉廖夫州和维捷布斯克州的许多区。

我军在今年冬季的不利条件下，突破了敌人强大的防御地带，在冬季战局的三个月中肃清了约 20 万平方公里苏联国土上的侵略者。红军从敌人手里夺回了 13 000 多个居民点，其中包括 82 座城市和 220 个火车站。又有几百万苏联公民摆脱了法西斯奴役。重要的农业区和有极丰富的铁锰矿藏的工业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德国人失去了他们曾拚命死守的这些经济上重要的地区。

现在大概人人都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德国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固然，这次战争的作战条件,比上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更有利,当时它自始至终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但是,对德国一个很不利的事实是，这次战争中的苏联，比上次战争中的旧沙皇俄国强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两个战场上对德国联盟作战的有六个大国——法国、俄国、英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意大利和日本转到德国方面去了，芬兰加入了法西斯联盟，在上次战争中对德国作战的罗马尼亚也投到了德国方面，同时德国的主力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苏德一个战场上作战。大家从历史上知◇407◇道，德国如果在一个战场上作战，总是获得胜利，相反,当它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时,就遭到失败。在这次战争中，德国虽然把主力用在一个战场上，用在对苏联作战上，然而它不仅不能取得胜利，而且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强大打击下濒于覆灭。既然苏联在单独作战中，不仅经受住了德国军事机

器的进攻，而且还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那么，当我们盟国的主力加入战斗，当所有的盟国的军队都对希特勒德国展开强大的和日益猛烈的进攻时，它的处境就更加无望了。

德国法西斯强盗现在慌忙寻找逃避覆灭的出路。他们又抓住了在后方实行“总”动员的办法，虽然德国的人员后备已经枯竭，法西斯头子们还拚命想在反希特勒同盟中制造纠纷，从而拖延战争。希特勒的外交官们奔走于中立国之间，力图同亲希特勒分子相勾结，暗示有可能或者同我国，或者同我们的盟国单独媾和。希特勒分子的这一切诡计注定要破产，因为反希特勒同盟是以决心粉碎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帮凶的各盟国的切身利益为基础的。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共同性，使得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战斗联盟在战争过程中巩固起来。

最终清算希特勒分子在苏联国土上和欧洲被占领国内所干下的一切暴行的时刻不远了。

红军的胜利进攻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苏联人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建立了新的劳动功勋。苏联的劳动者用他们在后方生产上取得的新的胜利，促进了前线红军的夏季胜利。

我们工业部门的工人正在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使新的工厂，高炉和电站投入生产，在空前短暂的时期内恢复已解放的地区内被占领军破坏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英勇努力,进◇408◇一步加强了红军作战的物质基础，从而使我们最后胜利的时刻提前到来。

苏联农民向国家提供军队和城市所需的粮食及工业所需的原料，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

苏联知识分子在发展生产和满足红军的需要方面，给予工人和农民直接的指导性的帮助。

已解放的地区的劳动者对自己的解放者——红军的支援日益扩大，把恢复中的工厂和农业的产品汇集到运往前线的物资洪流中去。

毫无疑问,苏联人民今后也一定会以自己的英勇劳动和全部干劲,来保证国家生产力不断增长，以便最迅速地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苏联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和我国的全部历史,为在各加盟共和国组建新部队做了准备，新部队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强红军，并把新的战斗力量注入红军的队伍。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你们在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伟大解放战争中，表现了英雄主义的奇迹。红军使战争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性转折，现在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最后胜利。敌人虽然节节败退,但是他们还没有被粉碎。希特勒强盗们看到他们死期已近，看到他们在我国国土上所干下的一切骇人听闻的暴行必然要受到惩罚，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把最后的兵力和预备队投入战斗，抓住每一寸苏联国土和每一个有利的地区进行顽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管我们的胜利有多么大，我们仍然应该清◇409◇醒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提高警惕,决不容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有骄傲自大、安然自得和疏忽大意的情绪。战争史上还没有过敌人自己跳进深渊的事。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把敌人赶向深渊，并且把它推入深渊。只有用愈来愈猛烈的歼灭性打击才能粉碎敌人的抵抗，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为此，必须继续提高我军战士的战斗本领和指挥员的作战艺术。红军的天职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军事学术，不断地仔细地研究敌人的战术，善于及时地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用我们的更完善的战术去对付敌人的战术。必须使红军的先进部队和兵团的战斗经验和成就,为我们**所有的**部队所掌握。必须使**整个**红军,红军的全体战士和军官，学会完全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打击敌人。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和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的同时，

我命令：

1.全体战士和军士——步兵、迫击炮手、炮兵、飞行员、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和骑兵——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充分利用我国优良的技术兵器，象我们光荣的近卫军战士那样打击敌人，准确地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组织性。

2.各兵种的军官和将军提高统率军队的艺术，完善机动战术和诸兵种在战斗过程中的协同动作，把先进的近卫军部队和兵团的经验更大胆更广泛地运用到实际战斗中去，把司令部和军队后勤机关的工作素养提到更高的水平，千方百计地改进和发展我们的侦察工作。

3.全军把火力和机动巧妙结合起来，突破敌人防御的全纵深，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及时粉碎敌人以反冲击来阻止我军进攻的◇410◇企图，巧妙地组织对敌人的追击，不让敌人撤走技术装备，以大胆的机动包围敌军的翼侧，插入他们的后方，合围敌军，分割他们，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就消灭他们。

4.男女游击队员加紧支援红军,袭击敌人的司令部和守备部队,捣毁它的后勤机关,破坏它的交通线和通信联络,使它无法前调预备队。

5.为表彰苏联武装力量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2月23日，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18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戈梅利和罗斯托夫齐鸣礼炮20响,向英勇的红军表示祝贺。

光荣属于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

光荣属于苏联武装力量！

光荣属于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

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红军伟大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苏联共产党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34—141 页◇411◇

最高统帅命令

（第 70 号。1944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和被掳到德国去服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姊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红军获得卓越胜利的时候庆祝“五一”节的。

自从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消灭德军许多师以来，红军几乎不间断地在进攻。在这期间，红军从伏尔加河打到了锡雷特河，从高加索山麓打到了喀尔巴阡山，消灭敌魔，将其从苏联国土上驱逐出去。

在 1943—1944 年间的冬季战局进程中,红军在争夺第聂伯河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历史性会战中获得了胜利，摧毁了德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克里木的强固的防御工事，并以巧妙而迅猛的行动，突破了德军在南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锡雷特河的防御。几乎整个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以及白俄罗斯很大一部分领土上的德国侵略者都被肃清了。南方的冶金工业基地，克里沃罗日耶、刻赤和尼科波尔的矿◇412◇区，第聂伯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肥沃地带，又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几千万苏联人摆脱了法西斯的奴役。

红军执行着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国土的伟大任务，已进到了我国同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国境线，目前正在罗马尼

亚境内继续歼灭敌军。

红军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苏联统帅部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是由于我军战士和指挥员具有高昂士气和进攻精神，是由于我军大量装备了第一流的苏联技术兵器，是由于我军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飞行员、通信兵、工兵、步兵、骑兵以及侦察兵不断地提高了作战艺术和技能。

我们伟大的盟国——美国和英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这些胜利，它们在意大利坚守对抗德国人的战线，牵制着相当一部分德军，供给我们极宝贵的战略原料和武器，经常轰炸德国军事目标，从而破坏德国的军事实力。

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全体苏联人民、我们全国从后方对红军的支援，那么红军的胜利就会是不巩固的，并且一遇到敌人的严重反击，就会化为乌有。红军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表现了无比的英勇。苏联人民也报答了红军。苏联人民在战争的困难条件下，在大批生产武器、弹药、军服、粮食和及时将其运到红军前线的事业中，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苏联工业的力量在过去一年内大大增长了。几百个新工厂和新矿井投入了生产，几十个电站已经发电,几十条铁路已经通车，几十座桥梁已经建成。又有几百万苏联人初次上机床工作，掌握了极复杂的业务，成了本行的能手。我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光荣地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苏联农民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努力不懈地在田野里工作，供给我国军民粮食,供◇413◇给我国工业原料。至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则以新的卓越的成就和发明，丰富了苏联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苏联妇女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功劳，她们忘我地为前线工作，以刚毅精神忍受战时的一切困难，鼓舞我们祖国的解放者红军军人去建立战斗功勋。

卫国战争证明了，苏联人民有能力创造奇迹，经受最严重的考验

而取得胜利。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联知识分子、全体苏联人民都充满决心去加快消灭敌人，完全恢复被法西斯分子破坏的经济，使我国成为一个更加富强的国家。

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在红军的打击下正在破裂和瓦解。现在，在希特勒的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保加利亚“同盟者”中间，充满惊慌恐惧的心理。现在，这些希特勒的帮凶（他们的国家已被和正被德国人占领）不能不看到，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是输定了。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保加利亚现在只有一种避免覆灭的可能，这就是同德国人决裂而退出战争。可是很难指望这些国家现在的政府能够同德国人决裂。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担负起摆脱德国枷锁的任务。这些国家的人民，愈是迅速地了解到希特勒分子把他们引入了怎样的绝路，愈是迅速地停止对德国奴役者及其帮凶——本国的古斯林分子的一切援助，这些国家受到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破坏就愈少，就愈能指望得到民主国家的谅解。

由于胜利的进攻，红军已在400多公里宽的正面上进到我国的国境线，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了我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沦陷地区。现在的问题是要肃清我国全部国土上的法西斯侵略者，恢复苏联由黑海到巴伦支海的全部国界。◇414◇

但是，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把敌军驱逐出我们祖国的国境。现在德军正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不得不爬往自己的洞穴——德国的边境去医治创伤。但是，这只回到自己洞穴去的受伤的野兽，仍然是一只很危险的野兽。为了使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免遭奴役的危险，必须跟踪追击这只受了伤的德国野兽，把它打死在它的洞穴里。我们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同时就要把我们的波兰兄弟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以及其他和我们联盟的处于希特勒德国铁蹄下的西欧各国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当然，这个任务要比把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境的任务困难一些。这个任务，只有在苏英美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由我国军队从东方和我们的盟军从西方协同进攻，才能完成。毫无疑问，只有这种联合的打击，才能完全粉粹希特勒德国。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和被掳到德国去服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姊妹们！**我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

我命令：

今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20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戈梅利、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第比利斯、辛菲罗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庆祝红军在前线获得的历史性的胜利以及苏联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们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万岁！

苏联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415◇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42—147页◇416◇

答《真理报》记者问

《真理报》记者询问**斯大林同志对盟国登陆兵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作何估计**，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将盟国解放大军攻入法国北部的七天战斗情形作一总结，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盟国登陆部队在广阔范围内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是完全成功的。这无疑是我们盟国的光辉胜利。

不能不承认，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实施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没有类似的先例。

大家知道，号称“无敌”的拿破仑，当年企图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夺取不列颠群岛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狂人希特勒吹嘘了两年，说他定要强渡拉芒什海峡，结果连实现这种威吓的尝试都没有敢作。只有英美军队才光荣地实现了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大举登陆的宏大计划。

这件事将作为一项杰出成就载入史册。

1944 年 6 月 13 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48—149 页◇417◇

最高统帅命令

（第 152 号。1944 年 8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和侦察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领航员、空中射击员、无线电员、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兵、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在全苏空军节的日子，我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你们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苏联空军和全体红军一起，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残酷无情的斗争，给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给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以毁灭性的打击。

男女工人的忘我劳动，苏联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高度技术，使我们克服了德国空军过去在数量上的优势，并用成千上万架质量优良的战斗机武装了红军和海军中的空军部队。

在同敌人进行的空战中，我们的飞行员表现了无比的英勇果敢的精神，而我们的指挥员和首长也表现了指挥空战的无比的本领和作战艺术。

结果，我国的战斗空军现在压倒了敌人的空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

成千上万的卓越的飞行员、领航员和空中射击员，正越来越多地增添我国武装力量的胜利，歼灭陆上和空中的敌人。◇418◇

为了表彰我国战斗空军取得的胜利，我命令：

在今天空军节，8 月 20 日，17 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

祖国的名义，用224门火炮,齐鸣礼炮20响，向我国英勇的空军军人致敬。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50—151页◇419◇

德国法西斯被全部驱逐出苏联国境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1944 年 11 月 6 日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

我国在进行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的条件下庆祝苏维埃革命的纪念日，已经是第四次了。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的第四年的总结同战争的前三年没有差别。恰好相反，它们有根本的区别。战争的头两年是德军进攻并向我国腹地推进的两年，红军当时被迫进行防御战；战争的第三年是我国战场上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红军展开了强大的进攻战，在一系列决定性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肃清了苏联三分之二的国土上的德军，迫使他们转入防御，并且红军仍然是在没有得到盟国重大支援的情况下单独与德军作战的；而战争的第四年则是苏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取得对德军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这次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的德军已被击退到德国边界上去了。

过去一年的结果，是德军被驱逐出苏联、法国、比利时和意大◇420◇利中部，军事行动转到了德国境内。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红军在今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德军被驱逐出苏联国境，这是由

我军还在今年1月就已开始，后来在整个报告年度内展开的对德军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所早已决定了的。

第一次打击是今年1月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附近进行的，当时红军摧毁了德军的永备工事防御，把他们击退到波罗的海沿岸去了。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列宁格勒州。

第二次打击是今年2—3月在布格河一带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德涅斯特河对岸。由于这次打击，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三次打击是今年4—5月在克里木地域进行的，当时德军被打到黑海里去了。由于这次打击，克里木和敖德萨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四次打击是今年6月在卡累利阿地域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芬兰军队，解放了维堡和彼得罗扎沃茨克，把芬兰军队打退到芬兰内地。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大部分领土。

第五次对德军的打击是今年6—7月进行的，当时红军在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城市附近彻底击溃了德军，并以在明斯克附近合围德军30个师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我军：（一）完全解放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二）前出到了维斯瓦河，并解放了同我们联盟的波兰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三）前◇421◇出到了涅曼河，并解放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四）强渡涅曼河，逼近德国边界。

第六次打击是今年7—8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利沃夫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桑河和维斯瓦河对岸去了。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乌克兰西部；（二）我军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维斯瓦河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登陆场。

第七次打击是今年 8 月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域进行的，当时我军彻底击溃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附近合围了德军 22 个师,罗马尼亚师尚未计算在内，以此合围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二）打垮了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它已对德国和匈牙利宣战了；（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它也对德国宣战了；（四）为我军打通了进入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道路；（五）使我军能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反对德国侵略者。

第八次打击是今年 9—10 月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塔林和里加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驱逐出波罗的海沿岸。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二）解放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芬兰，它已对德国宣战；（四）德军 30 多个师被切断了同普鲁士的联系,在图库姆斯、利巴瓦地域内陷入夹攻，现正被我军歼灭中。

今年 10 月,我军在匈牙利境内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开始了第九次打击，目的是要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掉过头来反对德国。这次打击还没有结束,但已有如下的结果:（一）我军直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驱逐德军和解放贝尔格莱德；（二）我军得以越过喀尔巴阡山脉，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422◇国,它的一部分领土已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最后，今年 10 月底，在芬兰北部对德军进行了打击,把德军从佩琴加地域赶走了，我军追击德军，已进入同我们联盟的挪威境内。

我现在不来列举这些战役中敌人被击毙和被俘的数字，以及我军缴获的火炮、坦克、飞机、炮弹、机枪等等的数字。这些数字想必你们已从苏联新闻局的公报中知道了。

这就是红军过去一年进行的主要战役,经过这些战役,德军已被驱

逐出我国国境。

这些战役的结果，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被击溃和打垮的达120个师。去年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是257个师,其中德军207个师，而现在，在敌人进行了一切“总”动员和“额外总”动员之后，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总共才有204个德国师和匈牙利师，其中德军不超过180个师。

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中的希特勒德国及其法西斯军队，同过去各次战争中的德国及其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更强大、更阴险、更有经验的敌人。而且还必须补充一句，德国人在这次战争中利用了差不多全欧洲的生产力和各附庸国数量相当大的军队。然而，德国尽管有了这些有利的作战条件，仍然落到了必然灭亡的边缘，这只能说是因为德国的主要敌人——苏联在力量上超过了希特勒德国。

过去一年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一个新情况，就是红军在今年已不象前几年那样是单独地同德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共同对德军作战了。德黑兰会议并没有白开。德黑兰会议关于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共同打击德国的决议已在极其准确地实◇423◇现。在红军进行苏德战场上夏季各战役的同时，盟军开始攻入法国，并组织了强大的进攻战役，迫使希特勒德国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我们盟国的陆海军在法国沿海实施了就其组织程度和范围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登陆战役，并巧妙地克服了德军的工事。

于是，德国就陷入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了。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经不住红军和盟军的共同打击。敌人的抵抗被粉碎了，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就被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比利时和苏联国境。敌人被击退到了德国边境。

无可怀疑，如果没有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牵制住德军达75个师的话，我军是不能在那样短的期限内粉碎德军的抵抗并把它驱逐出苏联国境的。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红军今年夏季的强大进攻

战役牵制住德军达200个师的话，我们的盟军是不能如此迅速地打退德军并把它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国境的。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使德国处于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

这就是胜利的关键。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自己对祖国的职责，把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土，这是因为我们全国，我国各族人民从后方忘我地支援红军。过去一年中，所有苏联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领导工作，都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进行的。◇424◇

在过去一年中,工业、农业、运输业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战时经济有了新的高涨。

在战争第四年，我国工厂制造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和弹药比战争初期要多几倍。在恢复农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我国收复顿河与库班河一带肥沃田地以后，在解放乌克兰以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我国农业正在迅速恢复。苏联铁路运输部门担负起了其他国家的运输部门未必能够担负得起的重担。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之敌国的经济，有无比的生命力。

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以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尽管苏维埃国家担负着战争的重担，尽管德军暂时占领了我国经济上极重要的广大地区，然而苏维埃国家在战争进程中，对前线的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并没有减少,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现在红军所拥有的坦克、火炮、飞机、不是比德军的少，而是比德军的多。至于说到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质量，那要比敌人的优良得多。正

象红军在单独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在军事上战胜了法西斯军队一样，苏联后方的劳动者，在同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进行的单独战斗中，也在经济上战胜了敌人。苏联人放弃了许多必需的东西，自觉地忍受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以便给前线更多的东西。这次战争中空前未有的困难不但没有摧毁，反而更好地锤炼了苏联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英勇精神。我国人民理应赢得英雄人民的荣誉。

我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新的工厂。苏联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劳动功勋。

我国知识分子在技术和文化革新的道路上勇敢前进，有成效◇425◇地向前发展现代科学,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为红军生产武器。苏联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对打败敌人作出了极宝贵的贡献。

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可是，没有面包，没有粮食，军队也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红军在战争的第四年里，由于集体农民的关怀，没有感到缺乏粮食。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供给工人和知识分子以粮食，供给工业以原料，保证为前线制造武器和装备的工厂正常开工。我国集体农民充分认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义务，积极协助红军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苏联妇女和我国光荣的青年在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肩负着劳动的主要重担，他们所建立的史无前例的劳动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为了祖国的荣誉和独立，苏联妇女和男女青年在劳动战线上表现了英勇精神。他们真正无愧于他们的那些正在保卫祖国，打击德国法西斯恶魔的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兄弟。

苏联人在后方的劳动功勋，同我国军人在前线的不朽战功一样，是来自强烈的、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基础不是种族偏见或民族主义偏见,而是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耿耿忠诚和忠实，以及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兄弟友爱。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是同苏联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不是分裂我国各民族，恰好相反，是把它们团结成统一的兄弟家庭。应当认为，这就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日益巩固的友谊的基础。同时,苏联各族人民尊重外国人民的权利和独立,一向表示愿意同邻国和平友好相处。应当认为，这就是我国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联系日益◇426◇发展和巩固的基础。

苏联人之所以痛恨德国侵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异族人，而是因为他们使我国人民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遭受了数不清的灾难和痛苦。我国民间历来有句俗话：“并不是因为狼是灰的才打狼，而是因为狼吃了羊。”

德国法西斯分子把仇视人类的种族论选作自己的思想武器，本来是以为，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就可以给德国侵略者统治被奴役的民族造成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前提。可是希特勒分子所实行的种族仇视政策，实际上却成了德国法西斯国家国内虚弱和国际上孤立的根源。种族仇视的思想和政策，是希特勒强盗联盟瓦解的因素之一。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者的,不仅有被奴役的法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等国人民，而且还有从前希特勒的附庸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希特勒匪帮实行吃人的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起来反对德国，而所谓的“优等德意志种族”却遭到了举世的憎恨。

在战争进程中,希特勒分子不仅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而且遭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已在我国树立起来的一切种族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各族人民友爱的思想，完全战胜了希特勒分子的兽性民族主义

和种族仇视的思想。

现在，在卫国战争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人民的历史作用的全部伟大意义显现出来了。现在大家都承认，苏联人民以自我牺牲的斗争，从法西斯暴徒的铁蹄下拯救了欧洲的文明。这就是苏联人民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勋。◇427◇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过去的一年是反德同盟共同事业胜利的一年，苏英美三国人民正是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团结成了战斗联盟。这一年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三个主要国家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加强的一年。

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共同行动的决议以及这个决议的光辉实现，是反希特勒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历史上关于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动的大战役计划，很少有象德黑兰会议所拟定的共同打击德国的计划那样，实现得这样完满，这样准确。无可怀疑，如果没有三大国的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德黑兰会议的决议便不能实现得这样完满和准确。而另一方面，德黑兰决议的顺利实现，不会不促进联合国家战线的巩固，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组织战后安全问题的决议，应当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同样鲜明的标志。有人说，三国在某些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有分歧。分歧当然是有的，而且在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上也还会发生分歧。甚至就是在同一政党的人中间也常发生分歧。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的代表中，就更会发生分歧了。值得惊讶的倒不是有分歧，而是分歧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次都照例是本着三大国意见一致

和行动协调的精神解决的。问题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没有越出三大国一致的利益所容许的范围，以及归根到底都是根据这种一致的利益来解决的。大家知道，我们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有过比较重大的分歧。但是，大家同样知道，这些分歧终于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敦巴顿橡树◇428◇园会议上的分歧也是这样。这次会议的特点,并不是那里暴露了某些分歧,而是关于安全的问题，有十分之九都在这次会议上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决议应当看作是反德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

最近在莫斯科同英国政府首脑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友好的气氛和完全一致的精神下进行的谈判，应该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更鲜明的标志。

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分子拚命企图离间联合国家，使它们彼此对立，使它们相互猜疑和仇恨，并且使它们互不信任，而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使它们互相斗争，以削弱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希特勒的政治家们有这种企图是十分自然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联合国家在反对希特勒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致，最大的军事政治胜利莫过于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分裂。可是,大家知道,法西斯政治家们想破坏大国联盟的挣扎是如何地枉费心机。这就表明,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

可以不必怀疑，既然民主国家的战斗联盟经受住了三年多的战争的考验，既然这个联盟已经为奋起保卫本国自由和荣誉的各国人民的鲜血所凝结起来，那么,这个联盟更会经受住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考验。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盟国反德战线巩固的一年，而且是这一战线扩大的一年。继意大利之后，德国的其他盟国——芬兰、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也被迫退出了战争,这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必须指出,这些国家不仅退出了战争，而且已同德国决裂，并对德国宣战，从而加入了联合国家战线。这无疑是联合国家反希特勒德◇429◇国战线的扩大。无可怀疑，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不久也会被打垮。这将意味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完全孤立和必然崩溃。

联合国家即将胜利地结束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了。

联合国家将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一点，现在已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了。

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事业。可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还不是说保证了各国人民将来的持久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任务不仅是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而且是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

德国失败以后,它当然要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政治方面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以为它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实力和进行新的侵略，那就太天真了。谁都知道,德国的头目们现在就已在准备新战争。历史表明，只要有一个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德国就可以从失败中复原，恢复自己的实力。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得特别恰当，是因为历史表明，侵略国是进攻国，它们对于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准备，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意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是很晚才去备战。在这次战争中，侵略国还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已有准备好了的**入侵军队**，而爱好和平的国家甚至连十分象样的保证动员的**掩护军队**都没有，这是事实。象珍珠港“事件”、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失守、香港和新加坡的失守这样一些不幸的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430◇的，当时日本这个侵略国比奉行爱好和平政策的英国和美国对战争更有准备。同样地，

我们在战争的第一年就丧失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这种不幸的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时德国这个侵略国比爱好和平的苏联对战争更有准备。如果说这些事实的发生，是由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什么个人品质，由于他们优于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由于他们有什么远见等等，那就太天真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那些希望进行新战争的侵略国，是长期备战并为此不断积聚力量的国家，它们通常都比而且必然比不愿意进行新战争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战争更有准备。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规律性，不估计到这个规律性是危险的。

因此，不能否认，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被侵略弄得措手不及，当然,如果它们不在现在就制定能够防止侵略的特别办法的话。

总之，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为此，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国的武装以外，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捍卫和平、保障安全的特别组织，并使这个组织的领导机关握有为防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武装力量，责成这个组织在必要时毫不迟延地使用这些武装力量去防止或消灭侵略，并惩办侵略祸首。

这不应当是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手段来防止侵略的那个可悲的国际联盟的重演；这将是握有捍卫和平和防止新侵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431◇

能不能指望这个国际组织的行动是充分有效的呢？如果担负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主要重担的各大国今后也会本着一致和协调的精神行事，这种行动就将有效。如果违背了这个必要条件,这种行动就不会有效。

* * *

同志们！

苏联人民和红军正在顺利地实现卫国战争进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红军光荣地完成了它的爱国天职,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们祖国。我们的国土从此永远摆脱了希特勒妖孽。现在红军还有最后一个使命：就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穴里，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有根据指望红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海军万岁！

强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52—169 页◇432◇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20 号。1944 年 11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被掳到德国去服法西斯苦役的兄弟姊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我们是在红军取得对我们祖国敌人的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由于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勇努力，我国国土上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已被肃清。

苏军今年连续不断地痛击敌人，一次比一次更厉害。1944 年年初的冬天，红军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卓越的胜利，并在列宁格勒附近击溃了德军。这一年春天,红军肃清了在克里木的德军。1944 年夏天,我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到了几次极大的失败，根本改变了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场的局势。红军粉碎了敌人在卡累利阿地峡以及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之间的坚固防御，并迫使芬兰退出了希特勒强盗联盟。红军在白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的历史性战役中，彻底粉碎了由三个集团军组成的德军中央集团,歼灭和俘虏了 54 万德军官兵。红军在南方会战中,合围并全歼了由两个集团军组成的德军集团。当时,苏军歼灭和俘虏了 25 万以上的德军官兵。 红军在罗马尼亚击溃了德军，把德军驱逐出了保◇433◇加利亚,现在正在匈牙利境内打击德军。我军粉碎了希特勒军队的波罗的海沿岸集团。在 1944 年夏季战局中,红军从基什尼奥夫打到贝尔格莱德，前进了 900 多公里，从日洛宾打

到华沙，前进了600多公里；从维捷布斯克打到蒂尔西特,前进了550公里。战争现在已转移到了法西斯德国境内。

红军在战斗进程中，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卡累利阿-芬兰、摩尔达维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领土上驱逐出去了。在被德国人暂时侵占的我们兄弟苏维埃共和国国土上存在过三年的法西斯压迫被推翻了。红军使几千万苏联人重新获得了自由。被希特勒匪帮在1941年6月22日背信弃义地侵犯了的苏联国界,从黑海直到巴伦支海，都完全恢复了。

所以，过去的一年，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占领下把苏联国土完全解放出来的一年。

红军从希特勒妖孽的占领下解放了祖国国土以后，现在正在帮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人民斩断法西斯奴役的锁链和恢复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红军在过去这一年的冬季和夏季战斗中,表现了更高的军事技能。红军军人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筑垒地带，迅猛地追击、合围和歼灭敌人。在进攻战中，苏军各兵种表现了准确的协同动作和高度的机动艺术。苏联军人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学会了击破并战胜敌人。红军发展成了强大可畏的力量，在作战技能和技术兵器方面都超过了敌人。

苏联后方协调一致的工作使红军的力量增强了许多倍。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光荣地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职责，英勇◇434◇地克服战时的困难，源源不断地供给红军以武器、弹药和粮食。苏联经济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力量，给前线愈来愈多的支援。

红军和苏联人民决心给敌人以新的致命打击。希特勒血腥制度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法西斯联盟在红军的打击下已彻底崩溃，希特勒德国丧失了自己的大多数盟国。我们的盟军在西欧巧妙进行的巨大战役,

击溃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把这些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盟军已越过德国西部边界。红军和英美军队共同对希特勒德国进行的打击，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刻接近了。现在正在完成对希特勒德国的合围。法西斯野兽的洞穴已被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敌人无论使用什么狡猾伎俩，也不能挽救其必然覆灭的命运。

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向德国要害地区实施决定性进攻的出发阵地。现在的任务就是联合国家军队要以迅猛的进攻，在最短时期内粉碎希特勒德国。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苏联劳动者们！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们击退了侵略者,捍卫住了自己的祖国,彻底消除了法西斯恶魔奴役苏联各族人民的危险，现在我们正处在完全胜利的前夕。

为了表彰红军在前线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了庆祝苏联国土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我命令：

今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20 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彼得罗扎沃茨克、塔林、里加、维◇435◇尔纽斯、基什尼奥夫、第比利斯、塞瓦斯托波尔、利沃夫齐鸣礼炮 24 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万岁！

我们的自由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70—174页◇436◇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25 号。1944 年 11 月 19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炮兵部队的炮兵和迫击炮手、工程师和技术员、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红军炮兵节。

今天全国都在赞扬炮兵作为红军主要打击力量的伟大作用。

大家知道，炮兵是曾经协助红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接近地阻止敌人前进的力量。

炮兵是保证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附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在哈尔科夫和基辅附近，在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在列宁格勒和明斯克附近，在雅西和基什尼奥夫附近粉碎德军的力量。

在卫国战争历次大会战中，炮兵都以其毁灭性的火力为步兵和坦克成功地扫清了道路，其结果是敌人已被赶出我们祖国的疆界。

现在，在为战胜德国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中，苏联炮兵正同全体红军一起，给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装备和工事以毁灭性的打击。

大家知道，苏联炮兵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敌人炮兵的绝对优势，苏联炮兵和迫击炮手在同敌人进行的多次战斗中，获得了特别英勇的不朽的光荣，指挥员和首长们表现了指挥火力的高度◇437◇艺术。

这是我国理应引以自豪的胜利。

苏联炮兵部队的炮兵和迫击炮手，工程师和技术员，军官和将军

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炮兵节！

为了庆祝红军炮兵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我命令：

在今天炮兵节，11 月 19 日，19 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哈巴罗夫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莫洛托夫和图拉等城市，以祖国的名义，齐鸣礼炮 20 响，向我们光荣的炮兵致敬。

祝苏联炮兵永远强大，使我们祖国的敌人闻风丧胆！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75—176 页◇438◇

最高统帅命令

（第 5 号。1945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

伟大的列宁为了保卫我们祖国免遭外国侵略者的进攻而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抚育成长的红军，经历了光荣的发展道路。红军光荣地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真正不愧是苏联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在国内战争年代，红军击败了许许多多的敌人,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德国侵犯的卫国战争的伟大战斗中,红军拯救了苏联各族人民，使他们免受德国法西斯的奴役，捍卫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帮助欧洲各国人民摆脱了德国的桎梏。

我们现在是在取得对敌人的历史性新胜利的情况下庆祝红军二十七周年的。红军不仅从希特勒妖孽手里解放了祖国土地，并且还把德军打回到它向我国发动强盗式进攻的界线以外几百公里的地方，把战争转移到德国境内，现在正在同我们的盟军一起胜利地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

今年 1 月，红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整个战线上，向敌人进行了空前强大的打击。红军在宽达 1 200 公里的正面上摧毁了德国人多年来构筑的坚固防御。在进攻中，红军以迅速巧◇439◇妙的行动把敌人往西击退到很远的地方。苏军通过顽强的战斗，从东普鲁士边界打到维斯瓦河下游，前进了 270 公里；从华沙以南的维斯瓦河登陆场打到奥得河下游，前进了 570 公里，从桑多梅日登陆场打到

德属西里西亚腹地，前进了480公里。

我军冬季进攻胜利的结果，首先就是破坏了德军在西方以夺取比利时和阿尔萨斯为目标的冬季进攻，并使我们盟国的军队也能向德军转入进攻，从而把盟军在西方的进攻同红军在东方的进攻结合起来。

在1945年1—2月四十天的进攻中，我军从德军手中解放了300个城市，夺取了上百个制造坦克、飞机、武器、弹药的军事工厂，占领了2 400多个火车站,夺得了总长15 000多公里的铁路网。在这个短时期内，德军官兵被俘的在35万以上，被击毙的不下80万。在同一时期内，红军击毁和缴获了德国飞机约2 000架，坦克和自行火炮4 500多辆，火炮不下12 000门。

结果，红军解放了波兰全境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大一部分领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迫使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退出战争，占领了东普鲁士的和德属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并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柏林接近地的道路。

希特勒分子曾经自夸说，一百多年以来，没有一个敌国的士兵曾经到过德国境内，德军过去和将来都只在他国土地上作战。现在德国人的这种牛皮已经吹破了。

我军冬季进攻表明，红军能不断增长力量来解决日益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光荣的红军军人现在已学会完全按照现代军事科学的要求来粉碎和消灭敌人。我们的战士由于认识到自己的伟大的解放使命而受到鼓舞，创造出英勇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奇迹，巧◇440◇妙地把战斗中的英勇果敢同充分发挥自己武器的力量和威力结合起来。红军的将军和军官们娴熟地把强大的技术兵器的密集突击同巧妙迅速的机动结合起来。红军在战争的第四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的技术兵器已更加完善，它的战斗技能提高了许多倍。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彻底战胜德军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但胜利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到来，它要在艰苦的战斗和顽强的劳动中争得。注定要灭亡的敌人正在把他们最后的力量投入战斗,拚命抵抗,以图逃脱严厉的惩罚。敌人正在使用而且将来还会使用最极端最卑鄙的斗争手段。因此,应当记住,我们的胜利愈是临近，我们的警惕性就应当愈高，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就应当愈有力。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

为了庆祝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命令：

今天，2 月 23 日，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纪念日，20 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彼得罗扎沃茨克、塔林、里加、维尔纽斯、基什尼奥夫、第比利斯、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利沃夫，齐鸣礼炮 20 响。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441◇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77—181 页◇442◇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1945年3月5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军事思想》杂志和《军事通报》杂志

《军事思想》杂志，从内容来看，不符合交给它的任务，即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增进红军军官和将军的军事知识。

《军事思想》杂志对于战争、战略学和战役学、俄国名将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遗产等问题研究得不够，就是说，它正好忽略了它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

该杂志国外栏或者是完全没有，或者是向读者介绍国外作者的文章而对其中不正确的甚至有害的观点也不加批判。

该杂志没有辟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军事思想》杂志编辑委员会不胜任交给它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在前线，实际上没有参加编辑部的工作。

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给杂志以应有的领导，也没有组织起能给红军创办一本有权威的指导性杂志的作者队伍。

《军事通报》杂志没有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对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军事通报》杂志很少介绍外国军队的战术和武器装备问题。

为了改进《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两杂志的内容，提高它们◇443◇在研究军事理论、增进红军军官军事知识和教育红军军官方面的作用，——

我命令：

1.《军事思想》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每月

出版一期，篇幅是6个印张，发行15 000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总参谋长担任。

《军事思想》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

研究战争、武装力量建设、战略学和战役学等基本问题；

研究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合成军队指挥员的训练问题；

研究俄国名将和卓越军事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遗产；

介绍和批判外国军事权威的观点；

研究外国军队及其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军事历史栏，外国军事消息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师级和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2.《军事通报》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全军杂志，每月出版两期，篇幅是3个印张，发行5万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红军步兵总监担任。

《军事通报》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来阐明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诸兵种协同动作、战术训练和射击训练以及军人教育等问题；

介绍外国军队的编制、战术、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军官文化生◇444◇活栏，问题解答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团长以下的军官（包括团长在内）。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布尔什维克报刊资料汇编》

1945年第2版第2册第361—362页◇445◇

在签订苏联和波兰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的讲话

（1945 年 4 月 21 日）

总统先生，总理先生，各位先生！

我认为我们刚才签订的苏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标志着苏波两国关系向着同盟和友好方面发展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在这次抗德解放斗争进程中形成的，而现在在这个条约中正式地固定下来了。

大家知道，近 500 年来，我们两国关系中充满了相互疏远、不友好和时常发生公开军事冲突的因素。这种关系削弱了我们两国而加强了德帝国主义。

这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它结束和埋葬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些旧关系，奠定了用苏波同盟和友好的关系来代替不友好的旧关系的现实基础。

在最近 25—30 年内,即在最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做到了利用波兰领土作为侵略东方的走廊和进攻苏联的跳板。这种情况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友好、同盟的关系。波兰旧日的统治者不愿同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他们宁肯奉行一种在德苏之间投机取巧的政策。结果当然是弄得…… 波兰被占◇446◇领了，波兰的独立被取消了，并且由于这一极其有害的政策，德军得以出现在莫斯科门前。

这个条约的意义，就在于它结束了这种在德苏之间投机取巧的极有害的旧政策，而代之以波兰同它的东邻同盟友好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刚才签订的波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历史意义。

因此，我们两国人民焦急地期待签订这个条约，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觉得，这个条约是新的民主的波兰独立的保证，是波兰强盛繁荣的保证。

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当我们两国未缔结同盟时，德国就有可能利用我们之间没有建立统一战线这一点，能够使波兰同苏联对立或者使苏联同波兰对立，从而把苏波两国各个击破。在我们两国建立同盟之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两国相互对立了。现在我们两国已经有了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这条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德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现在可以坚信不移地说，德国的侵略势力已在东方受阻，无疑地，如果除这个东方的屏障以外再有一个西方的屏障，即我们两国同我们西方盟国的同盟，那就可以大胆地说，德国的侵略势力将受到约束，不容易再猖獗起来了。

因此，爱好自由的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都在焦急地期待签订这个条约，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看得见，这个条约意味着加强联合国家反对在欧洲的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

因此，我相信，我们的西方盟国将会欢迎这个条约。

自由、独立、民主的波兰万岁！◇447◇

波兰的东邻——我们苏联万岁！

我们两国的同盟和友谊万岁！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2—184 页◇448◇

最高统帅给作战部队的命令

（第 346 号。1945 年 4 月 27 日）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的英美盟军部队从东西两方夹击，截断了德军战线，于 4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在德国中部托尔高市地域会师。这样一来，德国北部的德军和德国南部的德军就被分割开来了。

为了庆祝获得的胜利和纪念这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今天，4 月 27 日,19 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我们祖国的名义，用 324 门火炮鸣放礼炮 24 响，向英勇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和我们的英美盟军部队致敬。

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对德胜利万岁 I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5 页◇449◇

告红军和盟军书

（1945 年 4 月 27 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红军和我们盟国军队的指挥员和战士们讲话。

在欧洲进行解放战争的各盟国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击溃了德军，在德国境内会师了。

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彻底打垮敌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红军一定会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彻底履行它对我国人民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所担负的这个职责。

我谨向目前与苏军在德国境内并肩作战，并充满决心彻底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盟国的英勇部队致敬。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6 页◇450◇

最高统帅命令

（第 20 号。1945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今天我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今年，我们祖国各族人民是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庆祝“五一”节的。

红军在莫斯科附近和列宁格勒附近、在格罗兹尼附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抗击敌军的艰苦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正在德国中部，在越过柏林很远的地方，在易北河一带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在一个短时期内，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奥地利很大一部分领土以及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都已解放了。

同时，红军占领了德帝国主义的巢穴东普鲁士，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占领了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德国首都柏林的主要区域，在柏林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由于红军进行这些进攻战斗，德军在 3—4 个月内，就有 80 多万官兵被俘，约 100 万官兵被打死。在这期间，红军部队缴获和击毁了敌人的飞机达 6 000 架，坦克和自行火炮达 12 000 辆，野战◇451◇炮 23 000 余门，以及大量其他种类的武器和装备。

应当指出，在这些战斗中，和红军并肩向共同敌人进行有效进攻的，有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师。

由于红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统帅部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到苏德战场上来，从而使其他战场的整个整个的地段完全空虚。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盟国的军队在西方展开有效的进攻。于是我们盟国的军队和红军就得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打击德军，把德军分割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部分，使我军和盟军连接成了一条战线。

无可怀疑，这种情况标志着希特勒德国的灭亡。

希特勒德国的末日快到了。它的大部分领土已被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占领。德国已丧失了最重要的地区。留在希特勒分子手中的工业已不能供给德军以充分的武器、弹药和燃料。德军的人员后备已经耗尽。如果不算它的盟国日本，德国已经完全孤立,已经孤独无援了。

希特勒冒险家们为了找寻摆脱绝境的出路，用尽各种诡计，直到向盟国献媚，力图在盟国阵营中制造不和。希特勒分子的这些新的狡诈诡计，一定会完全破产。这些诡计只能加速德军的崩溃。

骗人的法西斯宣传使用种种胡言乱语来恐吓德国人民，说什么联合国家軍队要灭绝德国人民。联合国家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德国人民。联合国家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严惩战争罪犯，并迫使德国人赔偿他们使其他国家遭到的损失。但是，只要德国和平居民忠诚执行盟国军事当局的要求，联合国家并不触犯而且也不会触犯他们。◇452◇

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辉煌胜利，表明红军有强大的威力和高超的作战艺术。在战争进程中，我们祖国锻炼出了一支能够保卫我国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成果和保障苏联国家利益的头等基干军队。

虽然苏联进行耗费极大的规模空前的战争已将近 4 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却在巩固和发展，各解放区遭到德国侵略者掠夺和破坏的经济正在顺利而迅速地恢复。这是我国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联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在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鼓舞和指引下英勇努力的结

果。

德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希特勒德国的崩溃已指日可待。自命为世界统治者的希特勒头目们的一切幻想都已落空。身受致命重伤的法西斯野兽已经奄奄一息。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打死法西斯野兽。

红军和海军军人们！

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巢穴作最后一次冲击。你们要在结束战争的最后战斗中,树立作战技巧和勇敢的新榜样，你们要更猛烈地打击敌人，巧妙地突破敌人防御，追击并合围德国侵略者，不让他们喘息，直到他们停止抵抗为止。

你们是在祖国国土以外作战，要特别警惕！

你们要同从前一样高度地保持苏联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苏联劳动者们！

你们要用顽强的和孜孜不息的劳动来加强对前线的全面支援。要迅速医治我国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要更加加强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实力！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453◇

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为了庆祝红军在前线获得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绩，为了庆祝国际劳动节，

我命令：

今天，5 月 1 日,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斯大林纳巴德、阿拉木图、伏龙芝、彼得罗扎沃茨克、基什尼奥夫、维尔纽斯、里加、

塔林，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前进！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87—191页◇454◇

告 人 民 书

(1945 年 5 月 9 日)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5 月 7 日，在兰斯签订了投降的初步议定书。5 月 8 日,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在柏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面前，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投降书自 5 月 8 日 24 时开始执行。

我们深知德国头目们的豺狼癖性，他们素来把条约和协定看成一纸空文，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今天从早晨起，德军为了履行投降书，已开始大批向我军缴械投降。这已经不是纸上空文。这是德国武装力量的真正投降了。的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批德军仍然不肯投降。但我相信，红军会使他们觉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声明，彻底击败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国人民取得对德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455◇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肢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本来就不能实现，战争的进程更把它打得粉碎。实际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梦话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军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肢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同志们！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完全胜利了。欧洲的战争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赢得对敌胜利的我们的英勇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了的、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2—194 页◇456◇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 369 号。1945 年 5 月 9 日）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地结束了，德国完全被击败了。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了庆祝对德国的彻底胜利，在今天,5 月 9 日,胜利日，22 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 1000 门火炮齐鸣礼炮 30 响，向获得这次辉煌胜利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和海军舰艇和部队致敬。

在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独立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5 页◇457◇

战胜德国侵略者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

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

值此苏联青年的战斗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创刊二十周年之际，谨向它致以敬礼。

在和平建设年代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共青团真理报》都用为我们祖国忘我服务的精神教育了苏联青年。

我相信，《共青团真理报》今后仍将卓有成效地用忠于列宁的党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帮助青年掌握科学和文化成就，动员青年爱国力量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进一步繁荣而奋斗！

约·斯大林

译自1945年5月24日《真理报》◇458◇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1945 年 5 月 24 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最后再一次举杯。

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

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

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 1941-1942 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旁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吧，我们要另立一个能同德国媾和并保障我们的安宁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正确,而甘愿承受牺牲,以保证把德国击溃。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459◇利的决定性力量。

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祝俄罗斯人民健康！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6—197 页◇460◇

致《少先队真理报》

在《少先队真理报》创刊二十周年的日子，谨向编辑部、少年通讯员们和报纸的读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少先队真理报》帮助苏联儿童掌握知识，用我们伟大导师列宁遗训的精神教育少年先锋队员们和小学生们。

祝《少先队真理报》在用忠于我们祖国的精神培养少年列宁主义者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约·斯大林

译自1945年6月10日《真理报》◇461◇

最高统帅命令

（第 370 号。1945 年 6 月 22 日）

为了庆祝伟大卫国战争中对德国的胜利，定于 1945 年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莫斯科卫戍部队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参加阅兵式的队伍,是各方面军混合团、国防人民委员部混合团、海军混合团、各军事院校和莫斯科卫戍部队。

胜利阅兵式由我的副手苏联元帅**朱可夫**检阅。

胜利阅兵式由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指挥。

阅兵式的总的组织领导，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兼莫斯科市卫戍部队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上将担任。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8 页◇462◇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1945 年 6 月 25 日）

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什么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象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译自 1945 年 6 月 27 日《真理报》◇463◇

最高统帅给苏联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 371 号。1945 年 7 月 22 日）

在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我国海军是红军的忠实助手。

法西斯德国在反苏战争中，利用突然的进攻和拥有强大的军队，力图在短时期内击败我国陆军和海军。同时，德国人还想利用陆军力量，在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协同动作下，取得制海权。

大家知道，无论在陆上或海上,德国战略家的计划都彻底失败了。红军和盟国一起彻底粉碎了希特勒军队，并迫使它投降了。

在红军防御和进攻时期,我国海军可靠地掩护了靠海的红军翼侧，严重打击了敌人的商船和航运，保证了我方交通线畅行无阻。苏联海军军人在战斗中表现了忘我的坚定和勇敢、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和军事技能。潜水艇和水面舰艇上的海军军人、海军飞行员、海军炮兵和海军陆战步兵，都继承并发扬了俄国海军历来的一切宝贵传统。

在波罗的海、黑海和巴伦支海,在伏尔加河、多瑙河和第聂伯河，苏联海军军人在这四年战争期间，在俄国海军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新的篇章。海军彻底履行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职责。

红海军战士，军士和军官同志们！◇464◇

苏联人民希望自己的海军更加强大。我国人民将为海军建造新的战舰和新的基地。海军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培养和提高海军干部，充分领会卫国战争中的战斗经验，进一步提高海上素养和加强自己队伍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我向你们祝贺苏联海军节！

苏维埃强国的海军和它的英勇海军军人万岁！

最高统帅

苏联大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99—200页◇465◇

最高统帅命令

（第 51 号。1945 年 8 月 19 日于莫斯科市）

在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我国空军光荣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职责。

我们祖国光荣的雄鹰们在激烈的空战中，击溃了嚣张一时的德国空军，从而保证了红军的行动自由，并使我国居民免遭敌机的轰炸。

他们同全体红军一起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给了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英勇的空军的巧妙行动经常协助地面部队取得胜利，帮助达到了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

在捍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斗中，苏联飞行员提供了不少忘我的坚定、勇敢和真正英雄主义的范例。他们给伟大卫国战争史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

苏联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理应为自己的飞行员的战斗荣誉而自豪。

在战争进程中，男女工人、工程师和职员们的劳动热情以及苏联航空设计师们的发明和天才，使我们能用成千上万架优良的作战飞机来武装我国空军，这些飞机歼灭了敌人，使我们伟大的苏联人民获得了不朽的光荣。

飞行员、领航员和空中射击员、无线电员、机械兵和军械人员、◇466◇机械员、技术员和工程师、军官和将军同志们！航空工业中的工人、工程师、职员和设计师们！

我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空军节！

为了纪念空军节和向我国光荣的空军军人祝贺，**我命令：**

今天，8月19日,20时,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224门火炮齐鸣礼炮20响，向我们英勇的空军军人致敬。

最高统帅

苏联大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201-202页◇467◇

告 人 民 书

（1945 年 9 月 2 日）

同志们！

男女同胞们！

今天，9 月 2 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已被彻底击败，四面八方被联合国家的武装力量所包围，它承认自己已被战败而放下了武器。

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它们。使人类和人类文明濒于毁灭的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也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为奠定全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已经赢得了。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受到了损失。他们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468◇在 1904 年 2 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地域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它果然击毁了俄国三艘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

37 年以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复使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在 1941 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好几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俄国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通向大洋的一切出口——进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半岛和苏联楚科奇半岛各港口的一切出口。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不止于此。1918 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又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态度，依靠它们来侵犯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 4 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 年日本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附近的哈桑湖地域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域，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②]一带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诚然，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地域的进攻被苏军粉碎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 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粉碎，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469◇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

① 即海参崴。——编者注

② 即哈拉哈河。——编者注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伟大的胜利，祝贺战争的胜利结束，祝贺全世界和平的到来!

光荣属于取得对日胜利的苏、美、中、英武装力量!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我国远东部队和太平洋舰队!

光荣属于我国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203-206 页◇470◇

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

（第373号。1945年9月3日）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在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苏联人民同我们盟国一起对最后一个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日本已被击败而投降了。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为了庆祝战胜日本，在今天，9月3日，对日**胜利节**，21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324门火炮齐鸣礼炮24响,向赢得这一胜利的英勇红军部队和海军舰艇与部队致敬。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祝我们红军和海军永远强大！

最高统帅

苏联大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207页◇471◇

补　遗（两篇）

给华西列夫斯基的电报[①]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七日）（节选）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是八月十七日三时三十分，而你却还没有给大本营送来八月十六日战役总结及你对情况判断的报告。我早已要求你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战役的每日日终前给大本营送来专门报告。你几乎每次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本营送来报告。

八月十六日是西南方面军（你就是大本营派到那里的全权代表）实施重要战役的第一天。这次你又忘记了自己对大本营所负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来报告。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一次忘记对大本营的责任，你将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被从前线召回。

约·斯大林

————————————

① 本篇和下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所编《斯大林军事文集》第313—315页。标题是编者加的。——本书制作者注

给瓦杜丁的训令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近日的战事表明，你在战役的计划和实施中，没有记取过去的经验，仍在重犯过去的错误。只想到处进攻并占领尽可能多的地方而不注意巩固胜利和可靠地保障突击集团的翼侧，这是一种莽撞的进攻。这种进攻必然要分散兵力和兵器，并给敌人以对我向前推进过远而翼侧又无保障的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逐步将其击破的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得以推进到位于阿列克谢耶瓦、科维亚奇地域的坦克第一集团军的后方，接着对前出到奥特拉达、维亚佐瓦亚、帕纳索夫卡地区的近卫第六集团军各兵团暴露的翼侧实施突击，最后敌人于八月二十日由阿赫台尔卡地域向东南对第二十七集团军、近卫坦克第四、第五军的后方实施了突击。

由于敌人的上述行动，我军遭到重大损失，并失去了粉碎敌哈尔科夫集团的有利态势。我不得不再次向你指出你在实施战役中一再重犯的不可容忍的错误，并要求消灭敌阿赫台尔卡集团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能在最近几天内完成。你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你有足够的兵器。务请不要分散注意力，不要迷恋于从波尔塔瓦方面包围哈尔科夫登陆场的任务，要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消灭敌阿赫台尔卡集团这样一项现实而具体的任务上，因为不消灭这个敌军集团，沃罗涅什方面军要取得重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约·斯大林

年　表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

六月三十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并任命约·维·斯大林为主席。

七月三日

斯大林向苏联全体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七月十九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斯大林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七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发布关于莫斯科防空的命命。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

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代表会议。

十月十九日

斯大林签署国防委员会保卫莫斯科的决定。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报告。

十一月七日

斯大林向在莫斯科受检阅的红军部队发表演说，说明红军的伟大的解放使命，并向苏联军人和男女游击队员们祝福。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出席列宁逝世十八周年纪念大会。

四月十二日

斯大林致电苏联科学院院长弗·列·柯马罗夫，请全面开展科学院的活动。

六月十日

“真理报”发表消息，斯大林所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用俄、英、中、波、罗等文字印刷的初版问世。

八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和游击队的指挥员们举行会议。

十月五日

斯大林致电斯大林格勒战线司令员，要求采取一切方法保卫斯大林格勒。

十月九日

斯大林发布命令“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取消政治委员制”。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报告。

十二月九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致唐波夫省男女集体农民们的电文，对他们为红军募集四千万卢布基金表示感谢。

一九四三年

一月十五日

斯大林发布命令“施用各种新符号和更改红军制服式样”。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出席列宁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五日

最高统帅斯大林向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隆涅什、加里宁、沃尔霍夫以及列宁格勒等战线的军队发布命令，总结了红军二个月的进攻战役，提出了加强斗争以粉碎德国占领军并将它们驱出苏维埃祖国国境的任务。

二月二日

斯大林因顿河战线的军队歼灭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的敌军，特发布命令。

三月六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苏联元帅的军衔。

七月二日

斯大林预告奥勒尔－库尔斯克方面的苏军指挥部说德军可能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三至六日以内实行进攻。

七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因苏军胜利完成粉碎德军夏季攻势的任务发布命令。

九月八日

斯大林因南方和西南战线的军队从德国强盗占领下解放了顿巴斯发布命令。

十一月六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苏联元帅斯大林以一等苏沃洛夫勋章，藉以表彰他“正确领导红军进行抗德卫国战争和争得多次胜利的功绩”。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报告。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参加德黑兰苏、美、英三联盟国领导人会议。

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签署了共同对德作战和战后合作的“三强宣言”，以及“三强关于伊朗的宣言”。

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因列宁格勒战线军队在沃尔霍夫战线军队的协助下突破德军防线解放姆高城，特发布命令。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内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次会议。

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因歼灭了柯尔宋—歇夫钦柯地区被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包围的德军，特发布命令。

三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因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开到苏联国境——普鲁特河，

特发布命令。

四月八日

斯大林因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强渡德聂斯特河，开到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国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突破德军防线强渡雅西城北的普鲁特河，特分别发布命令。

五月十日

斯大林因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从德国占领下解放了塞伐斯托波尔，完全歼灭克里米亚的德军，特发布命令。

六月二十日

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第一个“保卫莫斯科”奖章授给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全军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斯大林，藉以表彰他领导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在莫斯科近郊粉碎德军的功绩。

七月二十九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令将“胜利”勋章奖给苏联元帅斯大林，藉以表彰他“在组织和实现红军的进攻，使德军遭到致命的失败，使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战局根本改变为有利于红军方面的卓越功绩”。

十一月六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的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报告。

十一月十三日

斯大林和苏联科学院院长弗·列·柯马罗夫商谈科学院的各项任务。

十一月十五日

斯大林接见华沙代表团，代表团献给他一个象征性的礼物——青铜的波兰国徽，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斗争中给予波兰人民的帮助。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七日

斯大林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德国强盗占领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了普歇特布日、拉道姆斯柯、钦斯托霍夫，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华沙城北突破德军防线，特发布命令。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出席列宁逝世二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四日至十二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参加克里米亚苏、美、英三联盟国领导人会议。

四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苏波友好互助及战后合作条约时发表演说。

四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突破德军防线由东面攻入德国首都柏林，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聂依斯河突破德军防线由南面攻入柏林，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派华（特罗派乌），特发布命令。

四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因在波茨坦西北会师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完成全面包围柏林，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占领庇托乌城及其要塞，特发布命令。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红军五一大检阅。

五月二日

斯大林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协助下占领了德国首都——柏林，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歼灭在柏林东南被围的德军，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占领罗斯托克、华尔聂明特、里勃尼茨、马尔洛夫、拉阿格、契契罗夫、米罗夫等城，特发布命令。

五月九日

斯大林因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德国强盗的占领下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特发布命令。

斯大林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向红军部队及海军舰队发布命令。

斯大林因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向苏联全体人民作广播演说。

五月十二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施切尔巴柯夫的葬礼。

五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红军将领，在会上发言称赞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称赞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六月十九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参观高尔基城“莫洛托夫”汽车工厂在战后制造的新式汽车。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会议。

六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出席莫斯科红场胜利大检阅。

六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胜利大检阅的参加者并发表演说。

六月二十六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苏联元帅斯大林第三枚“胜利”勋章，藉以表彰他“组织苏联武装力量的特殊功绩，以及巧妙地领导苏联军队进行伟大卫国战争，击破希特勒德国而获得完全胜利的莫大功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保卫祖国和首都莫斯科的艰难时期指挥红军作战有功，以及他非常奋勇果决领导抗拒希特勒德国斗争有功”，奖以苏联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六月二十七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令将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授予苏联全军最高统帅斯大林。

六月三十日

斯大林与党政首长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苏联科学院年会的参加者。

七月十六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莅临柏林。

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参加柏林三强会议。

八月五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由柏林返抵莫斯科。

九月二日

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广播，对日战争胜利结束，全世界和平来临。

九月三日

斯大林因对日战争胜利结束向红军部队及海军舰队发布命令。

据苏联出版的《斯大林年谱》原文个别文字作了校订

附 录（视频）

《莫斯科保卫战》和《解放》，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摄制的两部反映伟大卫国战争的大型影片，其中集中表现了约·维·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军民进行卫国战争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生动地再现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伟大形象。

两片的内容均有可靠的事实基础，许多情节、对白、甚至细节，都见诸于苏军一些著名的将帅，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人士在战后撰写的回忆著作，有的台词还逐字逐句来自于斯大林的原话。

两部电影原片长分别为6小时和7小时30分钟，现经剪辑，取其精彩段落，均为1小时30分钟左右，可当作阅读《斯大林全集》第十六卷的音像辅助材料，进一步加深对斯大林在1941年至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论著的理解。

视频网址如下，可点击观看：

《莫斯科保卫战》中的斯大林以及希特勒（电影剪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wOTIyODgw.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fQ5BT4Xslc/

《解放》中的斯大林与罗斯福、邱吉尔及希特勒（电影剪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2NjE2NDE2.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9UZX1Yf_uE/

本卷正文译文均取自《斯大林文集》

斯 大 林 文 集

SIDALIN WENJI

（1934 -1952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491,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1·1240 定价4.55元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七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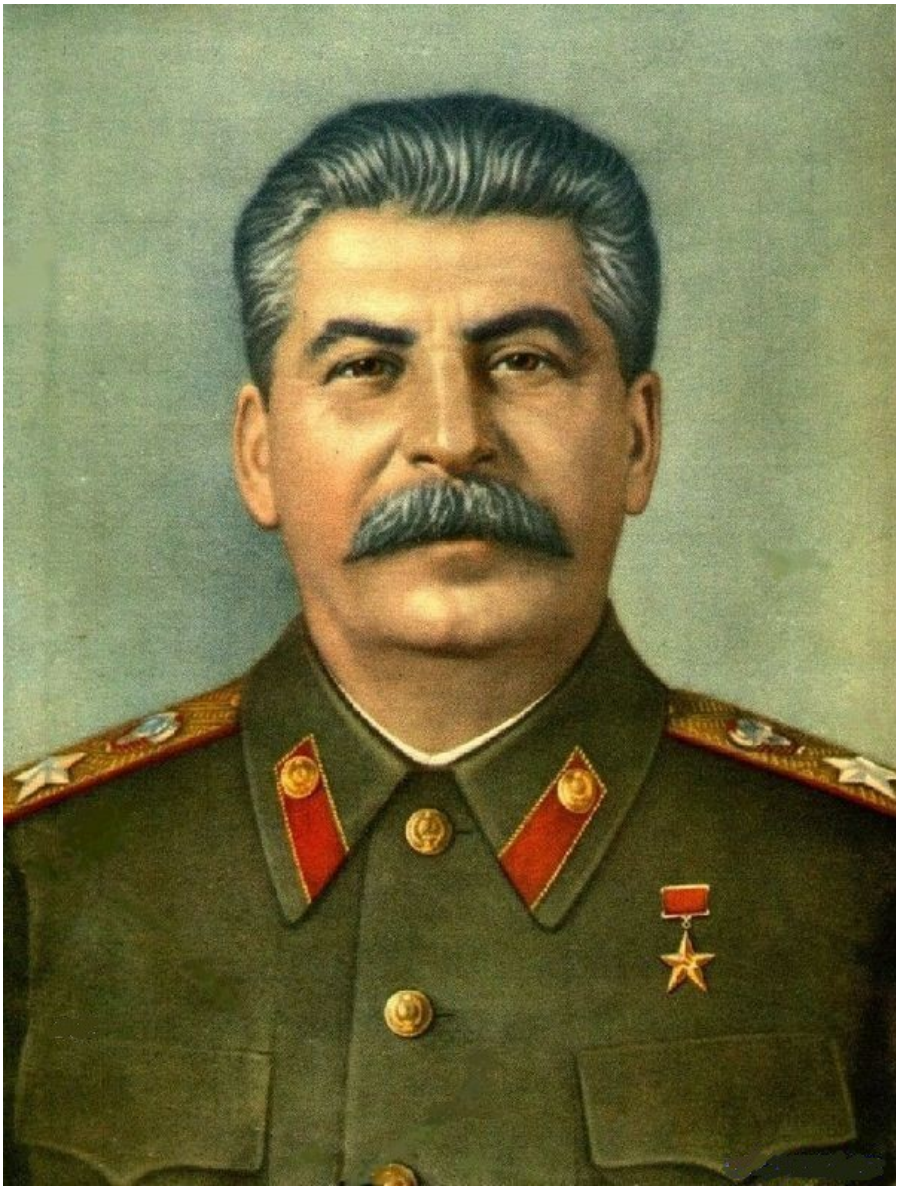
1941 – 1945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七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二〇一六年·中国



斯 大 林

目　录

第十七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艾德礼的通信

一、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 号—第 27 号） …… 3
二、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8 号—第 54 号） …… 29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55 号—第 97 号） …… 44
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98 号—第 167 号）…… 75
五、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68 号—第 218 号）…… 129
六、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19 号—第 287 号）…… 167
七、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88 号—第 380 号）…… 219
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381 号—第 498 号）…… 276

九、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一月

（信件第499号—第516号）…… 358

插图

一 斯大林、丘吉尔（1）…… 74

二 斯大林、丘吉尔（2） …… 166

三 斯大林、丘吉尔（3） …… 357

第 十 七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七卷，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中译本编辑的。

该卷汇集了这一时期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及艾德礼的来往书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英国政府首脑之间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

全卷共收录书信516件，其中，斯大林致英国首相的信件共215封。这些书信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位历史伟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精辟分析，展现了他高超的外交才能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本卷所收书信全部按收到或发出的时间排序、编号，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起，以半年为单位，分成九个部分。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七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艾德礼的通信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7月8日收到

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俄国军队正在对纳粹的完全无端的和残暴的侵犯进行着这样强有力的和英勇的抵抗。大家都很钦佩你们的士兵和人民的勇敢和坚韧。我们将在时间、地理和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们。战争愈持久，我们所能给的帮助也就愈多。我们正在用我们的空军日以继夜地对我们所能达到的德占区和德国本土进行极为沉重的轰击。昨天白天进行了约400架次的过海攻击。星期六晚上200多架重轰炸机轰炸了德国的城镇，有的携带了三吨炸弹；而昨晚出动了将近250架重轰炸机。这种轰炸将继续下去。我们希望以此迫使希特勒把他的部分空军抽回到西方来而逐渐解脱一些你们的重荷。此外，海军部按照我的意思已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在北极发动重大的军事行动，在那以后我希望英俄海军之间将会建立接触。同时由于扫荡了挪威沿岸，我们截获了正开往北方去对付你们的各种供应船只。

为了协调今后的计划，我们欢迎俄国军事代表团的到来。

只要我们继续战斗，就可以把这些坏蛋打得丧命。

第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7月10日收到

我刚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那里收到关于他同你会谈的报告和在会谈中作出的英苏协议宣言的建议，宣言包括下列两点：

（1）互相帮助，互助的数量或者性质不加明确的规定。

（2）每一方承担义务不缔结单独的和约。

我立即召开了英国战时内阁会议，目前在伦敦的新西兰自治领[①]总理弗雷塞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还需要征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这几个自治领的意见，这一点你是会了解的。但是，我愿同时向你保证，我们完全赞成你所提出的关于英苏协议宣言的建议。我们认为，一俟我们接到各自治领的答复后，宣言应该立即签字，随之应立即公开发表[②]。

————————————

① 自治领（Dominion），是英国殖民制度下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在19世纪，所有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英国殖民地，包括已具有宪政体制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都被称自治领。——本书制作者注

② 1941年7月12日，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缔结了一项共同对德作战的协议，以代替本来准备发表的英苏宣言。——原注

第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1年7月18日

对你的两封私人来信，表示感谢。

你的信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作了开端。现在，正如你怀着充分的理由所说的，苏联和英国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已成为战斗的盟国。我毫不怀疑，虽然有着一切的困难，我们两国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粉碎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把下面的情况告诉你可能并不是多余的：在前线的苏联军队的处境仍然是紧张的。希特勒突然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和突然进攻苏联这两件事使德国军队处于有利地位，并且还在影响着苏联军队的处境。可以设想：如果苏联军队不是在基什涅夫、里沃夫、布勒斯特、比亚里斯托克、考那斯和维堡地区，而是在敖得萨、卡麦涅茨—波多尔斯

克、明斯克和列宁格勒市郊等地区打击德国军队的话，那么德国军队的地位会更加有利好多倍。

因此，我认为如果能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方（北极地带）开辟反对希特勒的战场，那么苏联和英国的军事处境都会大大地改善。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不但能够转移希特勒在东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使希特勒不能侵入英国。开辟这样的战场一定会受到英国陆军和英国南部全体居民的欢迎。我也想到开辟这一战场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认为，应该不顾困难开辟这样的战场，这不但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且也是为了英国本身的利益。开辟这个战场的最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因为目前希特勒的力量都被吸引到东方来了，希特勒还来不及巩固他在东部所取得的阵地。

在北方开辟战场就更加容易了。这里只要求英国的海军和空军采取行动，不需要陆军或炮兵登陆。在这样的战役中，苏联陆、海、空军也可以参加。如果英国能够把大约一个轻装师或者更多的挪威志愿军派遣到这个战场上来，我们将很欢迎，这些挪威人可以调到挪威北部，以便组织反对德国人的起义。

第 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1 年 7 月 21 日收到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且从许多来源得知俄国军队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和多次有力的反攻。我充分了解你们迫使敌人在西部国境线上摆开阵势，进入战斗，因而消耗了敌人最初攻势的部分力量所取得的军事成就。

我们将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任何合理和有效的事来帮助你们。

然而，我请求你考虑到我们的资源和地理位置所加于我们的限制。从德国进攻俄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研究了进攻被占领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的

可能性。总参谋部看不出能作任何可能对你们有丝毫用处的大规模的事。德国人光在法国就有40个师，而且沿海还以德国人的勤勉修筑了一年多的防御工事，大炮、铁丝网、碉堡和海滩地雷比比皆是。我们能够暂时享有空中优势和战斗机掩护的唯一部分是从敦刻尔克到布伦。这里遍地是工事，几十尊重炮控制着海道，其中有许多可以直轰过海峡。每天天黑的时间不到5小时，而且甚至在这个时间里也要用探照灯把整个地区照得通亮。如果大规模登陆，会遇到一次血腥的还击，而小规模的袭击只能导致惨败，这对我们两国都会是弊远多于利的。他们从你方战线连一个部队也不需要抽调或者来不及抽调，战事就会结束了。

你要记得，我们已单独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虽然我们的资源在增长，而且从今以后将增长得很快，但我们在国内和中东的陆上和空中都极端紧张，同时，我们生命攸关的大西洋战役以及我们所有的护航舰队冒着潜水艇和FW型轰炸机的封锁而行动，使我们的海军——虽然它很庞大——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

但是如果谈到我们能给予的迅速帮助，我们只能把视线投向北方。海军参谋部过去三星期来一直在准备一个军事行动，用舰上飞机袭击德国在挪威和芬兰以北的船只，以期摧毁敌人从海上运送军队进攻你们北极侧翼的力量。我们已要求你们的参谋部在7月28日到8月2日之间在一定地区内不驶入俄国军舰，我们希望在那时进行袭击。其次，我们将立即派遣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到斯匹茨培根，从那里它们将能够配合你们的海军力量袭击敌人的船只。第三，我们即将派遣一队潜水艇去拦截德国人在北冰洋沿岸的交通，虽然由于那里一直是白昼，作这件事特别危险。第四，我们即将派遣一艘布雷艇携带各种供应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是目前我们所能作到的最大限度。我希望能再多些。请对这些保守最严格的机密，直到我们告诉你们公开将不会有坏处时为止。

挪威轻装师是不存在的，而且任何部队，不论是英国的还是俄国的，都不可能没有首先得到合理的战斗机空中掩护而在永远是白昼的德国占领区登陆。我们去年在南索斯，今年在克里特都有过尝试这类行动的惨痛经验。

我们也正在研究下一步将一些英国战斗机中队的基地设在摩尔曼斯克的部署。这首先需要运去一批高射炮和登陆人员及装备，然后运去飞机，有些飞机可以从航空母舰上飞去，其余的可以装箱运去。当这些都办妥后，我们在斯匹茨培根的中队就可以到摩尔曼斯克来。我们深信，当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海军到了北方之后，他们立刻会以他们不变的手段，用强大俯冲轰炸机队，来对付我们的武装力量，因此，需要一步步地来。然而，作好这些将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请不要犹豫向我们提出任何其他你们所想到的建议，我们也将认真寻求其他方法来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

第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7月26日收到

我很高兴地通知你，英国战时内阁已决定尽速派遣200架战斧式战斗机去俄国，尽管这会严重地减弱我们自己的战斗机力量。其中140架将从这里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60架将从我们在美国的军需中拨出。关于零件和装配飞机的美国人员的细节，还要同美国政府商量安排。

我国不久即可制就200万—300万双短靴，以待运去。我们也在安排在本年内供给大量的橡胶、锡、羊毛和呢绒、麻袋、铅和虫胶。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原料都在仔细考虑之中。那些这里不可能供给或是有限的东西，我们正在同美国商量。详情当然将通过惯常的官方途径给予通知。

我们正在以钦佩和激动的心情注视着你们军队的卓越战斗，我们所有的情报都表明敌人损失惨重和焦虑不安。我们将以日益增长的力量继续对德国进行空袭。

第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7月28日收到

关于你们要求供给橡胶的事情，我们将通过最好的和最快的路径从这里或从美国送交货品。请确切告知橡胶的品种，以及你们希望从哪条路运去。初步订货通知已经发出了。

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这几天同我在一起。上个星期他向总统请求允许他去莱斯科访问。我应当告诉你，这个人对民主是忠心耿耿的，他充满着战胜希特勒的愿望。不久前我向他要求25万支步枪，这些步枪立即就送到了。他是总统最亲近的私人代表。总统现在给了他详细的指示，他今夜离开我家到你那里去。有关他到达的情况，将通过适当途径通知你。你对他可以完全信任：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他将帮助你策划将来的胜利和组织对俄国的长期供应。你还可以很随便地同他谈关于政策、战略和日本的问题。

俄国军队保卫国土的伟大抵抗团结了我们大家。德国面临着遭受轰炸的恐怖的冬天。谁都还没有遭到他们行将遭受的东西。

上一封电报中我向你提到的海军军事行动正在进展中。

非常感谢你，在你们伟大的战斗期间，对我们不能作得更多的困难所给予的谅解。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第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8月1日收到

在我亲自干预之后，现在已安排就绪，即将从英国运出1万吨橡胶到你们的一个北方港口去。鉴于你们的需要的迫切性，我们冒险这样大量地减少了我们本土的储存，这种储存本来就不太多而且补充起来需要时间。

载运这宗橡胶和其他一些供应的英国船只将于一周，最多10天内，装载完毕，并且在海军部安排好护航舰队之后立即开往你们的一个北方港口去。

这次新的1万吨，是已经从马来亚调拨的1万吨橡胶以外的数量。后面的1万吨有2,651吨已在7月20日由“伏尔加”号轮船从巴生港运往

海参崴。“北极”号轮船也已从马来亚开出，船上装载着 2,500 吨。7 月 25 日从上海开出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轮船和预定于 8 月 1 日从香港开出的“红色游击队”号轮船将于 8 月初开到马来亚，并运走更多的橡胶，这些橡胶和先前两艘轮船运去的橡胶加在一起是 1 万吨，它是在第一段所指的 1 万吨以外又增加的 1 万吨。

第 8 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 年 8 月 15 日收到

我们曾利用在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从莫斯科回来后研究他的报告的机会，一起商量了我们两国如何能对你们国家对纳粹攻击所进行的辉煌的保卫战给予最好的帮助的问题。我们目前正进行合作来供给你们最大限量的你们所最急需的供应。已经有好几船的货驶离了我们的海岸，最近的将来还会有船出发。

我们现在必须转而考虑一个较长远的政策，因为在取得完全胜利（没有这种胜利，我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将是白费的）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

战争现在在好几条战线上进行着，而在战争结束以前，还可能发展出更多的战线。我们的资源，虽然丰富，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考虑这些资源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才能最大限度地有助于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制成的军需品和原料。

你们的和我们的武装力量的需求只能在对我们作出决定时所必须考虑的许多因素具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加以确定。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就我们的共同资源的分配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我们建议我们安排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可以直接和你讨论这些问题的高级代表出席。如果你对这一会议感到兴趣的话，我们愿意告诉你，在那一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我们将继续尽快地送去供应和物资。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的勇敢和坚决的抵抗对于击败希特勒主义有着多

么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在筹划我们的共同资源的未来分配计划这一事上迅速和立即行动起来。

第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8月30日收到

我一直在寻思有没有办法在我们正同美国进行商讨的，并且将成为莫斯科会议主题的长期安排还没有作出以前，来帮助你们所进行的辉煌的抵抗。迈斯基曾提出过，鉴于你们战斗机损失重大，所以战斗机极为需要。我们正加速运送我上次电报中所说到的那200架战斧式战斗机。我们的两个空军中队应在9月6日前后到达摩尔曼斯克，由40架旋风式战斗机组成。我相信你一定理解，战斗机是我们本土防卫的基础，此外我们正试图在利比亚取得空中优势，而且还要供应土耳其，以便把它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虽然如此，我还能够再送去200架旋风式战斗机，使战斗机总数达到440架，假如你们的驾驶员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飞机的话。这些旋风式战斗机装有8挺或12挺机枪，我们发现这些飞机在作战时致命率很大。我们可以现在就送100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而在不久以后再送两批各50架，连同机械士、教练、零件和器械。同时，可以作出安排使你们的驾驶员和机械士开始习惯于这种新型飞机，只要你们能把他们送到驻摩尔曼斯克的空军中队去。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有用的话，这里将发出相应的命令，同时一份完备的技术备忘录正通过我们的空军代表团用电报发去。

关于波斯人已决定停止抵抗的消息是很值得欢迎的。我们要进入波斯的目的，除了保护那里的油田以外，甚至更重要的就是要得到另外一条到达你们那里而且不会被切断的通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修通从波斯湾到里海的铁路，并且从印度运去铁路器材，以确保它的顺利通行。外交大臣已经交迈斯基转给你，我们愿和波斯政府达成协议的大体条款，其目的是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友好的民族而不致被迫仅仅为了保护铁路线而浪费好几个师。粮食正从印度运去，而假如波斯人听从我们的话，我们将恢复

现在应付给国王的石油税。我们正指示我们的先头部队向前推进并且在哈马丹和喀斯文之间由军事司令官们所确定的某地同你们的部队会师。让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和俄国的军队已经实际上携起手来，这将是一件好事。据我们看来，目前我们双方最好都不要以武力进入德黑兰，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条通道。我们正在巴士拉修建一个大型基地，我们希望把它建成一个设备很好的温水接纳港以接受美国的供应，这样一来，这些供应就肯定地可以到达里海和伏尔加地区了。

我必须再一次表示英国人民对于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反对纳粹罪犯的卓越战斗的钦佩。麦克法兰将军在前线看到的一切给了他极深的印象。我们面前有一段很困难的时间，但是在我们日益加强的轰炸下希特勒也不会有一个愉快的冬天。阁下就通过海参崴运送供应的问题对日本发出很坚决的警告，这使我感到欣慰。当我会见罗斯福总统的时候，他似乎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日本在南太平洋或者西北太平洋的进一步的侵略，而我也立即向他声明，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将站在他的一边。我急于给予蒋介石比我们直到现在所能给的更多的帮助。我们不愿意同日本打仗，而我相信，防止战争的办法就是让那些分隔开而又很缺乏自信心的人看到，他们将面对最巨大的力量的联合。

第 1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1 年 9 月 3 日发出

我很感谢你，除了以前答应出售给苏联的 200 架战斗机以外，答应再卖给 200 架。我毫不怀疑，苏联飞行员将学会操纵这些飞机并且很好地加以利用。

然而我不能不说，这些飞机看来不能很快地和全部地加以利用，而只能在不同的时期和分批地加以利用，因此它们将不能在东战场引起重大的变化。这些飞机之所以不能引起重大的变化，不仅由于目前

战争的规模很大，需要不断供应大量的飞机，并且主要是由于最近三周来苏联军队在像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这样重要地区的情况大为恶化了。

事实上，由于有30—34个新的德国步兵师以及大量坦克和飞机调到东战场来，同时20个芬兰师和26个罗马尼亚师的活动大大增加，我们在大约三周前在前线所赢得的相对稳定局面近几周来已被打乱。德国人认为西方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他们正自在地把所有的军事力量调到东战场来，因为他们相信西方不存在第二战场，并且将来也不会有第二战场。德国人认为很有可能各个击破他们的敌人：先击败俄国人，再击败英国人。

结果是，我们失去了乌克兰的一大半，并且敌人已迫近列宁格勒的大门。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失去了乌克兰的克里伏伊罗格铁矿区和一些冶金工厂，我们撤出了第聂伯河上的一个制铝工厂和基赫文的另一个制铝工厂，乌克兰的一个汽车工厂和两个飞机厂，列宁格勒的两个汽车工厂和两个飞机工厂，而这些工厂在七八个月内还不能在新迁去的地方开工。

这就削弱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而使苏联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个很不利的情况下解脱出来。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本年内在巴尔干或者法国的某地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足以使德国人从东战场抽走30—40个师，同时要保证苏联在10月初能得到3万吨铝和每月至少得到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小型或中型）的援助。

没有这两种形式的援助，苏联将会遭到失败或者被削弱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长期不能用它在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前线的积极军事行动来援助它的盟国。

我知道这封信将会引起阁下的沮丧情绪。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验教导我，要正视事实，不管它是多么令人不愉快；要不怕说出真实

情况不管它可能是多么不受人欢迎。

伊朗事件的演变结果很好。英苏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就预先决定了结局。只要我们的军队能共同行动，将来的事情也会这样。不过伊朗事件只是一段插曲。战争的命运当然不会决定在伊朗。

苏联和英国一样，不愿意同日本作战。苏联不认为可以破坏协议，包括苏日中立条约在内。但是如果日本背约进攻苏联的话，它将遭到苏联军队相应的反击，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你对正在为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对希特勒匪军进行流血战争的苏联军队的行动所表示的赞佩。

第1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1年9月6日收到

1.我立即根据你来电的精神予以答复。虽然我们不应吝惜任何的努力，但事实上英国不可能在西方采取空中行动以外的任何行动能够在冬季开始以前把德国军队从东方吸引过来。不得到土耳其的帮助，决没有可能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阁下需要的话，我可以列举促使我国总参谋部得出这些结论的全部理由。在今天贵国大使同我国外交部长和参谋长们会谈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这些理由。无论动机多么好的行动，如果只能导致代价很大的失败，除了对希特勒以外将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

2.我所掌握的材料给我的印象是，德国进犯的暴力高潮已经过去了，而冬季的来临将给予你们英勇的军队以喘息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3.关于供应问题。我们十分了解俄国工业所承受的严重损失，我们一直并且将来也会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你们。我就要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催促哈里曼先生的使团早日来伦敦，并且我们将试图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告诉你我们能够共同许诺每月供应的飞机和坦克的数目，以及橡胶、

铝、布匹等等。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现在准备**从英国产品中**提供你们所要求的每月供给飞机和坦克数额的一半。我们希望美国将供应你们所需要的另外一半。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立即开始把装备送给你们。

4. 我们已经下令给波斯铁路供应车辆，以便把它目前每天来回两列车的载运量提高到它的最高载运量，即每天来回各 12 列车。这个目标应于 1942 年春季达到，在此期间则将不断地有所增进。机车和车辆在改装成内燃机以后要从英国绕道好望角运去，而且铁路沿线的水的供应系统需要扩大。第一批 48 台机车和 400 辆钢制货车即将运出。

5.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同你们拟订共同的计划。英国陆军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 1942 年间进攻欧洲大陆，取决于不可预见的情况的发展。然而，当天黑的时间延长时，就有可能在极北方给你们援助。我们希望把我们在中东的陆军在今年年终以前增加到 75 万人，随后到 1942 年夏季再增加到 100 万人。一旦德意在利比亚的军队被摧毁以后，全部这些军力就可以用来支援你们的南翼，同时希望能够促使土耳其至少保持忠实的中立。在此期间我们将继续从空中日益猛烈地打击德国，并且保持海上通行无阻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

6. 在你来电的第一段里，你用了“出售”的字眼。我们没有按这样的条件来看待这件事，而且从来没有想到过付款的问题。我们所可能给予你们的任何援助最好像美国租借法案一样建立在同伴关系的基础上，不对钱数记正式的账目。

7. 我们愿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芬兰施加任何压力，包括立即发出通知：如果芬兰越出老的疆界，我们将对它宣战。我们正要求美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影响芬兰。

1941 年 9 月 4 日

第 1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电

1941 年 9 月 13 日发出

在我上次的电报中，我阐明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为了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开辟第二战场。你在回电中再次强调在目前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在答复你的时候我只能再次重申，不开辟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的阴谋。

我毫不怀疑，英国政府是愿意看到苏联取胜并且是在寻觅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像英国政府所认为那样，目前不可能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或许能够找到另一种办法给予苏联积极的军事帮助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我认为英国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 25 到 30 个师，或者通过伊朗把它们运到苏联的南部地区，以便在苏联国土上同苏联军队进行军事合作。上次战争期间在法国曾有过类似的情况。上述安排将是很大的帮助。我认为这对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我很感谢你答应英国每月运送铝、飞机和坦克来援助我们。

对于英国政府打算不是按通常的商务关系而是按同伴和合作关系的原则提供飞机、铝和坦克的援助一点，我只能表示欢迎。

我希望将会有足够的机会来使英国政府确信苏联政府是懂得如何珍视盟国所给予的援助的。

关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9 月 12 日递交给维·米·莫洛托夫的备忘录，我谈一点意见。这个备忘录中说：“如果苏联政府为了不使它在列宁格勒的海军舰只落入敌人手中而被迫毁掉这些舰只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将在战后承认苏联政府得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要求一定数额的赔偿，以便重建被毁的舰只。”

苏联政府了解并且感谢英国政府这种愿意赔偿苏联所承受的部分损失的表示，如果在列宁格勒的苏联舰只果真被毁掉的话。毫无疑问，如有必要，苏联人民就会毁掉在列宁格勒的船只。然而，这种损失的责任将不在于英国而在于德国。因此我认为在战后这项损失应由德国来偿还。

第1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9月19日收到

1.十分感谢你的来电。哈里曼使团已全部抵达并且终日同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工作着。工作的目的是通盘考察一下资源问题以便能够同你一起拟出通过每一条可能的路线每月运交供应的具体计划，从而尽可能帮助弥补你们的军火工业所遭受的损失。罗斯福总统的想法是，这第一个计划应该订到明年6月底，但是当然我们将同你们携手前进直到胜利。我希望会议能于本月25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但是在全部人员平安集合以前不应发布消息。路线和使用的交通工具将随后电告。

2.我很重视开辟从波斯湾到里海的通道，不仅是铁路而且开辟一条大型公路的问题，在修筑工作中我们希望取得美国在能力和组织方面的帮助。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将能够阐明全部供应和运输计划；他和哈里曼先生有着极密切的友谊关系。

3.参谋部已经研究了我们可能同你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所有战区。南北两翼肯定地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在挪威行动顺利，就会有力地影响瑞典的态度，但是目前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船只来实现这个计划。其次，在南边最重要的是土耳其；如果能够事先得到土耳其的援助，就可以有另外一支强大的陆军可供利用。土耳其是愿意到我们这方面来的，但是有些害怕，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答应派去大量的英国军队和供给土耳其人他们所缺少的技术物资，也许会对他们产生决定的影响。我们将同你们研究任何其他有效的援助方式，唯一的目的是动员最大限度的力量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4.我完全同意补充俄国舰队的首要来源应该由德国担负。胜利必然会使我们控制德国和意大利的重要的海军舰只，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舰只将最适宜于补偿俄国舰队的损失。

第1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1年9月21日

亲爱的斯大林总理，

英、美使团现在出发了，这封信将由比维尔勃鲁克勋爵交给你。内阁完全信任比维尔勃鲁克勋爵，他也是我最老的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同哈里曼先生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哈里曼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美国人，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胜利。他们会向你说明我们通过英、美两国之间很多次紧张协商后所能安排的一切。

罗斯福总统已经决定，我们的建议将首先提出我们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这9个月期间的每月供应额。你有权利确切地知道我们每个月能够提供些什么，以便你能够最恰当地处理你的储备。

美国的建议没有超过1942年6月底，但我毫不怀疑，到那时以后我们两国将能够提供比现在大得多的数量，而且你可以确信，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尽可能地弥补你们的军火工业由于纳粹的侵犯而遭到的严重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预先说出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将要说的话了。

你会了解，到1942年6月底的供应额差不多完全出自英国产品，或者出自本来由美国卖给我们或按照租借法案[①]供应给我们的产品。美国已经决定把他们能够出口的所有剩余物资几乎全都交给我们，而在这个期限内要他们有效地开辟新的供应来源是不容易的。我预期美国的产量会得到更大的推动，而到1943年时，美国的强大工业将会完全进入战时高涨。至于我们，我们将不仅从我们现在预计的产品中大大地增加自己的贡献，而且将设法要求我国人民作出进一步的额外努力以满足我们共同的需要。但是你会了解，我们的陆军和我们业已计划的陆军装备大概只等于贵国或德国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和需要是保证海上通行，第二项任务是取得空中的决定的优势。我们在英伦三岛上的4,400万人力需要首先为这两项任务服务。我们永远也不能想望拥有能够同大陆上的军事强国相比的陆军或陆军军火工业。虽然如此，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援

助你们。

在总参谋部委员会中我的私人代表伊斯迈将军，对于我们的军事政策全貌是完全熟悉的，他已受权同你的司令官们研究任何可能被提出来的具体合作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从西翼利比亚战场扫清敌人的话，我们就会有相当大的空军和陆军力量来在俄国战场的南翼进行合作。

在我看来，如果能够说服土耳其拒绝德国军队过境的要求，或者更好的是，如果土耳其能够参加我们这方面作战，那末最快最有效的援助就会到来。我相信你对这一点一定会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一直同你一样对中国人民保卫本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抱有同情。当然我们不愿意把日本加在我们的敌人那一边，不过由于我同罗斯福总统会谈的结果，美国的态度已经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清醒得多的看法。我曾紧接着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声明，如果美国被卷入对日作战的话，英国将立刻同美国站在一边。我认为我们三个国家都应该尽可能地继续援助中国，而且这一点可以做得相当多而不致于引起日本对我们的宣战。

毫无疑问，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还有一段长时期的斗争和苦难，但是我抱有很大的希望，美国会以交战国的身份参加战争，而如果这样，我毫不怀疑我们只需坚持就能够获胜。

我预期随着战争的继续，大英帝国、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合计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二，将并肩前进抗击他们的敌人；而且我确信他们的道路将通向胜利。

我衷心地预祝俄国军队胜利，纳粹暴君灭亡。

请相信我

你的诚挚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1 年 9 月 21 日

————————————

① 指 1941 年 3 月 11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租借法案。这项法律授权美国政府，把其他国家为其国防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和物资借给或租给这些国家，如果这对美国的国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话。——原注

第1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年10月1日

我很想彻底地整顿一下我们同波斯的联盟，以达到同你们在波斯的武装部队建立紧密、有效而实际的合作。在波斯，各部落中间有严重暴乱的征象，波斯政权的威信也有急剧下降的现象。这种暴乱如果蔓延开来，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用我们的军队去平定这些人，而这样，又要使我们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由于调动军队和运输供应而加重负担；然而我们现在正需要道路畅通并且尽可能地改善交通运输，才能保证把供应运交贵国。当我们忙于战争的时候，我们应该竭力使波斯人自己来维持秩序。阁下在这方面的果断指示会加速我们在这个次要战场上的事业已开始了的有利发展。

1941年10月1日

第1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1年10月3日

尊敬的丘吉尔首相，

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特别是这两个代表团由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和哈里曼先生亲自率领这一事实具有非常良好的意义。至于比维尔勃鲁克勋爵，他的确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以便三国莫斯科会议[①]上讨论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审议工作进行得迅速和有效，并且尽可能在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我应该告诉你，哈里曼先生也是这样。为此我代表苏联政府对你和罗斯福先生派遣这样有权威的代表来莫斯科，

————————————

① 指1941年9月29日到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代表关于相互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会议。——原注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瞒你说，由于我们目前在前线有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又一批企业的撤退，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军需品超过了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所规定的那些，更不要说有许多问题还要拖延到在伦敦和华盛顿作最后的研究和解决。但是莫斯科会议上所进行的工作是广泛和巨大的。我希望英、美政府尽一切可能增加每月的供应额，并且希望只要一有可能就抓紧时机加速运送已经确定了的供应品：因为希特勒匪徒将尽力利用入冬前的几个月来对苏联施加最大的压力。

对土耳其的态度和对中国的态度，我同意你的意见。我希望英国政府目前在这两方面都表示出必要的积极性，这在目前特别重要，因为目前苏联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是有限的。

至于说到我们反对盘踞在欧洲中心的希特勒匪徒的巢穴的共同斗争的远景，我相信，为了我们两国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利益，我们定会不顾一切困难完成击溃希特勒的事业。

你的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1 年 10 月 3 日

第 1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 年 10 月 6 日

我很高兴地从比维尔勃鲁克勋爵那里获悉莫斯科三国会议的成功。“Bis dat qui cito dat.”[①]我们准备组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运输队，每隔 10 天出发一队。以下物资正在途中并将于 10 月 12 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20 辆重型坦克；193 架战斗机（10 月前的定额）。以下物资将于 10 月 12 日海运，10 月 29 日抵达：140 辆重型坦克；100 架旋风式战斗

① 意为“给得快的等于给了两倍”（拉丁成语）。——原注

机；200 辆轻机枪拖车；200 支反坦克枪和弹药；50 门口径 42 毫米的大炮和炮弹。以下物资将于 10 月 22 日海运：200 架战斗机；辆重型坦克。以上表明 10 月份飞机定额总数和 280 辆坦克将于 11 月 6 日抵达俄国。10 月份的轻机枪拖车、反坦克枪和口径 42 毫米的反坦克炮定额全部将于 10 月份抵达。20 辆坦克已经由波斯运去，另外 15 辆即将从加拿大经海参崴运去。这样运去的坦克总数将是 315 辆，比我们的全部定额少 19 辆。缺少的数目将于 11 月份补足。上述计划并不包括美国的供应。

在安排这种定期的连环运输队时，我们打算依靠阿尔汉格尔斯克来接卸大部分供应物资。我想这部分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1941 年 10 月 6 日

第 1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1 年 10 月 12 日

对你 10 月 3 日的来信表示感谢。

我一直关心如何使供应物资吏快地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关于这些物资我已于 10 月 6 日用电报通知你。关于你 3,000 辆载重汽车的要求将立即予以满足，办法是从我们军事储备中拨出这些汽车。但是，这些车辆的供应不应当妨害坦克和飞机的运输。

我们请哈里曼先生安排一个由美国长期供应物资的更大的计划。

关于波斯的问题。我们在波斯唯一关心的是：第一，把它作为阻挡德国东进的障碍物；第二，作为直达里海区域的供应线。如果你想撤回那 5、6 个俄国师以便用在战争前线的话，我们将负起维持秩序和保持以及改善供应线的全部责任。我以英国的信用担保，无论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不为自己寻求任何利益而牺牲俄国的任何正当利益。为了避免内部混乱的增长，从而引起供应线中断的危险，无论如何，签订三边条约是迫切需要的。威佛尔将军将于 10 月 18 日抵第比利斯并同你的将军们讨论任何你所指示他们要和他一起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你们巨大规模的英勇斗争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们希望很快就用行动来予以证实。

1941 年 10 月 12 日

第 1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电

1941 年 11 月 7 日收到

为了澄清一些问题和订出今后的计划，我准备派遣印度、波斯和伊拉克战区总司令威佛尔将军到莫斯科、古比雪夫、第比利斯或任何你选择的地点去见你。此外，我们已决定任命为远东战区新总司令的裴杰特将军也将和威佛尔将军同去。裴杰特将军一直掌管这里的事务，他将带去我们的最高司令部的最近的和最好的意见。这两位军官能够确切地告你我们的处境，哪些是可能的，以及我们认为怎样作是明智的。他们大约在两星期内可以到达你处。你是否愿意会见他们？

我在 9 月 6 日的信中曾告诉你，我们愿意对芬兰宣战。然而你能否考虑一下，英国在这个时候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真是件好事吗？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们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封锁。我的判断是不赞成这样作的。因为第一，芬兰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应该审慎地考虑到这个事实。第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些国家里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他们被希特勒的优势压服和利用为工具。但是如果那个坏蛋倒运的话，他们会很容易回到我们这边来。英国宣战只会把它们全都冻结起来，而且使形势看起来似乎希特勒是一个与我们为敌的坚固的欧洲大同盟的头子。请不要以为我们是由于缺乏热情或同伴精神而怀疑这一步骤的好处的。我们的各个自治领，除澳大利亚以外，也不情愿。虽然如此，如果你认为这对你们真有帮助而且值得作的话，我将再把这件事提交内阁讨论。

我希望我们的供应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能迅即卸下和运走。现在通过波斯已经开始了一条供应细流。我们将尽最大力量通过这两条路来供

应。请注意使随同坦克和飞机前往的我们的技师们能有充分的机会将这些武器在最良好的情况下移交给你们的人。目前我们在古比雪夫的代表团对这一切事情都不接头。他们的唯一愿望是给予帮助。这些武器是我们冒险送去的，我们亟愿它们能得到最好的利用。由你下一道命令似乎是必要的。

我不能告诉你我们眼前的军事计划，正如你也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计划一样，但是请放心我们决不会懈怠的。

为了使日本安静一些，我们正派遣最新的威尔斯亲王号战斗舰到印度洋去，这只战斗舰能捕捉和击溃任何日本船只，我们并且正在那里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战斗舰队。我正在敦促罗斯福总统增加对日本人的压力并且使他们一直有所畏惧，以便使海参崴的路线不致被封锁。

我不用浪费词句来赞誉你们，因为你已经从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和哈里曼先生那里知道我们对你们战斗的观感了。请信任我们的不懈的支持。

我将很高兴从你那里直接听到你已收到这封电报的消息。

第 2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1 年 11 月 8 日发出

你的来电已经在 11 月 7 日收到。

1.我同意你的意见，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很明确。目前这种明确还不存在。这是由于两种情况所造成的：甲、我们两国之间关于战争的目的和战后组织和平的计划缺乏确切的谅解。乙、苏英之间关于在欧洲实行军事互助以对付希特勒没有订立条约。只要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英苏关系就不能澄清。不仅如此，坦白说，只要目前的局面继续存在，就很难达到相互信任。当然，关于对苏军事供应的协议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既没有解决，也不能概括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

你在来电中提到的威佛尔将军和裴杰特将军到莫斯科来如果是为了达成关于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的协议的话，我自然会乐于会见他们，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然而，假如这两位将军的使命仅限于情报的问题和考虑次要事项的话，那我就认为不值得打扰两位将军了，我也将会很难抽出时间来同他们谈论这样的问题。

2.我认为在英国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的问题上，已经造成不可容忍的局面。苏联政府是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苏联料想不到，整个问题，从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直到美国政府考虑这个问题，都被泄露而在友方的和敌方的报纸上发表出来并乱哄哄地讨论着。而在这一切之后，英国政府却宣称它对我们的建议持否定态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显示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不团结吗？

3.你可以放心，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从英国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军火及时抵达目的地。关于通过伊朗的运输钱，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这方面，我想提请你注意这个事实（虽然这只是一件比较小的事）：坦克、飞机和大炮在运来时包装得不好，有时同一架的部件被分装在不同的船上，而飞机由于装箱不妥善，运到这里已经坏了。

第2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1年11月22日收到

多谢你的来电，我刚收到。在战争一起始我就开始同罗斯福总统进行私人通信，这使得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稳固的了解，并且时常有助于推动事情的迅速完成。我的唯一的愿望是同你在同伴精神和信任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

关于芬兰：在我拍给你9月5日的电报时，我差不多已准备向内阁建

议考虑对芬兰宣战了。以后的情报使我认为，如果能使芬兰人停止战斗、留驻原地或是收兵回去，那将比我们正式宣战而把他们放在万恶的轴心国一伙、迫使他们作战到底，对俄国和我们共同的事业更为有益。然而，如果他们在最近两星期内还不停下来，而你仍然希望我们向他们宣战的话，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在这方面公布任何消息都是极其错误的。这当然不是我们的过错。

如果我们在利比亚的攻势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打垮那里的德意军队的话，我们将有可能比英王陛下政府迄今所能做的更从容地对整个战局作一次广泛的审查。

为此目的，我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派遣外交大臣艾登先生（他是你认识的）通过地中海前往莫斯科或其他地点同你会面。他将随带高级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并且能够讨论有关战争的任何问题，包括派遣军队不仅进入高加索，而且去南方你军战线上的问题。我们的船只和交通线都不容许大量运输，因此你将必须在通过波斯运输军队还是运输物资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我注意到你也希望讨论战后和平组织的问题。我们的意图是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在和你们结成同盟和经常商量的情况下进行战争，不论战争延续多久。在战争胜利的时候（我确信一定会胜利的），我们期望苏俄、英国和美国作为三个主要伙伴和击溃纳粹主义的主力，将在胜利者的会议桌上相会。自然，首要的目的将是防止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第三次向我们进攻。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则不是，也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为了共同的安全和正当的利益而制订出良好的计划。外交大臣将能够同你讨论这方面的全部问题。

很有可能你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战以及在俄国全线对侵略者的光辉抵抗将给纳粹政权的内部结构以致命的损害。但是我们不应该专指望这样好的运气，而只应该竭尽全力地继续打击他们。

第 2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1 年 11 月 23 日发出

多谢你的来电。

你在来电中表示愿意通过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私人通信来同我合作，我对此表示诚恳的欢迎，并希望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胜利。

在芬兰问题上，除了停止军事行动，并且要芬兰在事实上退出战争外，苏联并没有别的建议，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但是，如果芬兰在你所说的那段短期间内连这个建议也拒不接受的话，那末，我认为英国的宣战将是合理而又必要的。否则，可能造成一个印象，即在对希特勒及其最热心的帮凶作战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希特勒侵略罪行的帮凶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干他们卑劣的行径。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我们也许可以等待一下。

我全力支持你提出的关于外交大臣艾登先生早日访苏的建议。我相信，就苏英军队在我国前线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问题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达成协议，并且迅速予以实现，这将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讨论和制订关于战后和平组织的计划，应该从防止德国，首先是普鲁士，再次破坏和平和再次把各国人民拖入血腥的屠场这一总的概念出发，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也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苏联和英、美的国家制度的不同，不应当，也不能够妨碍我们就有关我们的共同安全和正当利益的各项根本问题达成完满的解决。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顾虑和怀疑的话，我希望在同艾登先生谈判的过程中都将得到澄清。

请接受我对英国在利比亚的攻势的顺利发动表示祝贺。苏联军队对希特勒军队的斗争仍然很紧张。但是，尽管有一切困难，我国军队

的抵抗正在增强，并且将继续增强。我们战胜敌人的意志是不屈不挠的。

第 2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贺信

1941 年 11 月 30 日

衷心地祝贺你的诞辰。衷心地希望你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这对战胜人类敌人——希特勒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致以最良好的愿望。

斯大林

1941 年 11 月 30 日

第 2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1 年 12 月 5 日收到

十分感谢你极其亲切而友好地祝贺我的生日。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告诉你，英国人民是怀着怎样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英勇的俄国军队保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坚强斗争，而且我们是多么高兴听到你们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第 2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1 年 12 月 16 日收到

我正在前往会见罗斯福总统的途中，我是去同他商讨我们共同的计划的。我将从华盛顿拍给你关于全部情况的报道电报。我将同李维诺夫接触，

我想这是你所希望的。

我无法形容当我每天听到你们俄国战场上的出色的胜利捷报时，我是感到何等的快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战争的结局满怀信心。

第 2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贺信

1941 年 12 月 21 日收到

欣逢你的诞辰，特致以衷心的良好愿望，希望在这样大的风暴以后，今后的诞辰纪念日会使你能够带给俄国胜利、和平和安宁。

第 2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1 年 12 月 27 日发出

非常感谢你在我的生日所表示的良好的愿望。特借此机会向你以及友好的英国军队在利比亚所取得的新的胜利表示衷心的祝贺。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第 2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1 月 5 日收到

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登载在 12 月 31 日“真理报”上的文章[①]后，我感到非常忧虑，因为想必这样的文章是得到苏联政府的认可的。我认为你会允许我向你指出：如果继续发表这样的批评，可能在美国引起的巨大危险。从纳粹分子进攻贵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尽力使苏俄能够得到美国一切可能的支援，因此我才向你提出这些完全属于私人性质的和极其友好的意见。

——————————————

① 丘吉尔指的是萨斯拉夫斯基的“菲律宾的贝当办法”一文。该文刊载在 1941 年 12 月 30 日的“真理报”上（丘吉尔误为 12 月 31 日）。——原注

第 2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 年 1 月 8 日发出

对你的来信以及信中所表示的对苏美关系顺利发展的关怀表示感谢。你所提到的“真理报”上的文章绝对不是官方的文章，并且这篇文章的用意除了与我们两国共同有关的同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利益外，决没有其他的目的。苏联政府方面现在和将来都将尽最大努力来加强苏美关系。

第 3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1 月 15 日收到

收到 1 月 9 日由李维诺夫先生转来的你的亲切的来电，我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报纸登满了赞扬俄国军队的文章。请允许我对俄国军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表示同样的钦佩，这些胜利应该归功于领导，归功于俄国武装部队的忠诚。我在这里所发表的谈话里着重指出，按业已答应给予的数量准时供应俄国以物资是极端重要的。

值此新年之际，我向你表示一切良好的愿望。

第 3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 年 1 月 16 日发出

1 月 15 日来电收悉。

在新年来临的时候承致良好的愿望并承祝红军胜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贺你和英国军队在北非获得巨大的成功。

第 3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11 日收到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对于贵国军队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继续获得辉煌成就的钦佩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我禁不住再一次对俄国为共同事业所作的一切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

第 3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 年 2 月 14 日发出

感谢你对红军的成就的祝贺。尽管在苏德战场和其他战场上都有着困难，我丝毫也不怀疑，苏英美三国的强大同盟会击溃敌人并且取得完全的胜利。

第 3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24 日收到

在红军进行了 8 个月的战斗以后（这些战斗使红军的指挥官和士兵们获得了莫大的光荣并且把它的事迹永远铭刻在史册上），今天大家来庆祝红军建军节 24 周年。

在这个隆重的节日，我向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表示钦佩和感谢，大英帝国的人民是怀着这种钦佩和感谢的心情注视着红军的功绩的，我还向你表示：我们相信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会获得胜利的结束。

第 3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3 月 12 日收到

1.我已拍电给罗斯福总统，促请他同意我们同你们签订关于战争结束后俄国边界的协议[①]。

————————————

① 指关于英国承认战后以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以前（即 1941 年 6 月 22 日以前）的边界作为苏联西部边界的协定草案。——原注

2.我已发出明确的指示，规定我们已经答应供应的东西绝对不能中止供应，并且不得延迟送达。

3.现在气候已有好转，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对德国的白昼和夜间的空袭。我们在继续研究其他的措施，以便减轻你们的一部分负担。

4.俄国军队继续挺进以及业已知悉的敌人的惨重损失自然使我们在这个艰苦的时期感到了莫大的鼓舞。

第3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3月14日发出

对3月12日在古比雪夫转交的来电深表感谢。

我代表苏联政府感谢你告诉我们你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保证对苏联的供应以及加强对德国的空中攻势。

我坚决相信：我们两国军队的共同行动尽管会遭到个别的挫折，但是最后一定会击溃我们的共同敌人，而1942年将是同希特勒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线上获得决定性的转折的一年。

至于来电中的第一点——关于苏联的边界问题，我想还需要就有关条约的文本交换意见，如果这个条约将能为双方所接受以供签字的话。

第3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年3月21日收到

1.我很感谢你对我最近去电的回电。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到华盛顿去了，在那里他将按照我们之间和我们政府之间的通信协助同美国总统商妥条约的问题。

2.上周迈斯基大使曾和我共进早餐，他提到某些迹象说明德国人可能在他们所策划的春季攻势中对你们使用毒气，经与我的同事们和总参谋部商量以后，我愿向你保证，任何对俄国使用毒气武器的行动，英王陛下政府都将当作是对我们自己使用一样。我已经积贮了很大一批可从飞机上投掷的毒气炸弹。一旦你们的军队和人民遭受这种攻击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国西部所有的适当的目标使用这些毒气炸弹。

3.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在恰当的时候发出公开警告来表明我们的决心。因为这样一个警告可能阻止德国人在他们给世界带来的许多恐怖之外再增加这个新的恐怖。请让我知道你对于这一点的看法，以及根据德国人准备的迹象是否应该发出这个警告。

4.事情还不是那么紧迫，而且在我采取足以使我国人民遭致这种新式进攻的步骤以前，我当然必须有充分的时间来使我们全部的预防毒气的设施准备就绪。

6.我相信你将给予我国的新任大使以亲自呈交此信的机会，并且得以亲自与你交换意见。你知道，他差不多是与蒋介石将军进行亲密的接触后直接前来的，他与蒋介石将军的联系，在最近四年内，一直维持着。我相信，他是被蒋将军所尊重和信任的，我希望并且也相信，他一定会同样地受到你的尊重和信任。他是我个人多年的朋友。

第3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年3月29日

感谢你日前由克拉克·寇尔先生转交给我的来电。我同寇尔先生谈了话，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共同的工作将会在充分的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

我向你表达苏联政府的感谢，感谢你保证英国政府将把德国人对

苏联使用毒气的任何行为看作是对英国使用毒气一样，而且英国空军将立即使用现在储存在英格兰的大量毒气炸弹，把它们投向德国的合适的目标。

根据我们的材料，不仅是德国人，甚至芬兰人也可能开始使用毒气来反对苏联，我想最好把你来信中所说的对德国进行毒气报复的措施扩大到适用于芬兰，如果芬兰用毒气来进攻苏联的话。

我想，如果英国政府在最近期间发出公开的警告，声明英国将把德国和芬兰对苏联使用毒气看作是向英国自己使用毒气一样，英国为此将对德国使用毒气来进行报复，那是非常合适的。

可以理解，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苏联方面准备对德国发出类似的警告，因为考虑到德国可能对英国发动毒气攻势。

苏联政府认力：英国政府如果向德国发出上述警告，应当在 4 月底或 5 月初以前发出。

考虑到德国向苏联发动化学攻势的可能，如果英国政府可以帮助苏联在英国获得某些缺乏的防御用化学品以及作为报复用的化学品，苏联将深为感谢。如果你们方面不表示反对，我可以在最近派遣负责这项事务的专人前往英国。

1942 年 3 月 29 日

第 3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4 月 10 日收到

对你 3 月 29 日的来电答复如下，

1. 在 5 月初我将发表一项声明，警告纳粹分子如果他们向贵国发动毒气攻击，我们将以同样的办法来报复他们。这个警告当然也同样适用于芬兰，在声明里也要提到它，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收拾他们。

2.请派遣你的化学防御战和反击战的专家前来，以便搞清楚苏联政府需要从英国获得哪些物资。到那时候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他的愿望。

3.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在接到这位专家的报告之前用最近的一艘轮船至少给你送去1,000吨糜烂性毒气和1,000吨氯。发射糜烂性毒气对于在空旷处的军队比对于城市居民有更大的危险。

第4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年4月22日

1.你准备在5月初向德国和芬兰发出警告：如果德国和芬兰在对苏联作战时使用毒气，那末英国也将使用这一武器，对此我向你表示感谢。

你还准备提供1,000吨糜烂性毒气和1,000吨氯，我也表示感激。但是因为苏联感到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其他化学品，因此苏联政府希望除了上述物品外再得到1,000吨次氯酸钙和1,000吨氯胺，如果不可能供给这些物品，请供应2,000吨瓶装的液体氯。

苏联政府打算派遣化学工业副人民委员会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卡萨特金作为化学防御战和反击战的专家前去伦敦。

2.日前苏联政府收到了艾登先生送来的苏英间两个条约的草案，草案中有几点和艾登先生在莫斯科期间所讨论过的条约文本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种情况牵涉到新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用通信的方式是很难解决的，因此苏联政府已决定不顾一切困难派遣维·米·莫洛托夫到伦敦去，以便通过当面的讨论来解决阻碍着条约的签订的一切问题。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在最近给我的电文里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并且邀请维·米·莫洛托夫前往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事先交换意见，所以莫洛托夫的伦

敦之行也就更加需要了。

请接受我的敬意，并预祝英国在对敌斗争中获得成功。

约·斯大林

1942年4月22日

第4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4月25日收到

我很感谢你4月23日的来电。我们当然欢迎莫洛托夫先生，我深信我们能够同他在一起做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很高兴你能够允许他前来访问，我确信这次访问一定会有很大的价值。

第4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年4月27日收到

对4月22日来电深表感谢。英王陛下政府当然会很愉快地接待卡萨特金先生，并且在同他会谈后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第4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5月6日

我想向你提出一个请求，目前有90艘装载着供苏联用的重要军需品的船只聚集在冰岛，或者正在从美国开往冰岛的途中。据我了解，这些船只之所以长期无法开航，是由于英国海军在组织护航舰队方面有困难。

我很清楚这件事的实际困难，也知道英国为这件事所遭受的牺牲。但是我认为有可能请求你尽力设法保证这些物资能在5月份运到苏联，因为5月份是我们前线特别需要这些物资的时候。

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并预祝成功。

约·斯大林

1942年5月6日

第4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5月11日收到

我已经收到你5月6日的来电，感谢你的来电和致意。我们决定打开通向你们的道路，以运去最大量的军事物资。由于在特伦海姆的“透匹茨”号和其他敌方水面军舰，每一个护航舰队的通过都已成为一次严重的海军军事行动。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你的海军顾问想必已经向你指出，护航舰队有遭受敌人水面力量、潜水艇和飞机袭击的危险，这些舰艇和飞机可以从护航舰队航线沿途的敌人基地出发来进行袭击。

由于天气不好，德国人迄今所展开的进攻的规模比我们有理由预料他们将来要发起的进攻的规模要小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调动了自己的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而危险地削弱了我们在大西洋的用于这个目的的护航力量，而且，你当然知道，我们在这些次行动中遭到了沉重的海上损失。

我确信，你不会反对我这种十分坦白的态度，也不会反对我特别强调在保证护航舰队安全通过时有必要增加苏联的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为了使你能收到目前在英国和美国装上轮船的物资的很大一部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苏联的海军和空军需要很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应对在东经28度以东地区的海面上（这片海面是在摩尔曼斯克沿岸的视线所及的范围以外）来往的护航舰队负很大的责任。

要求苏联军队给予以下几种援助：

1.苏联水上力量给予强大的和更坚决的帮助；

2.提供足够的远程轰炸机，以便在护航队通过诺尔卡布地区时能使德国人使用的机场遭受猛烈的轰炸；

3.拨出远程战斗机，以便在护航舰队接近你们海岸的一段路程上进行掩护；

4.进行空军和舰艇的巡逻来预防潜水艇。

明天（星期日）晚上我将在无线电广播中演说，那时我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来警告德国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俄国军队进行毒气战争的话，我们定将立即用同样的武器来对德国进行报复。

第4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5月12日发出

5月11日的来电已收到，感谢你答应采取措施把最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到苏联。我们完全了解，为了完成这样一项巨大的任务，贵国需要克服多么严重的困难，你们在海军方面还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损失。至于你提议的由苏联空军和海军更多地支援你所指出的区域内保护运输船只的工作，请你不必怀疑，凡我们所能做到的我们将立即做到。但是必须考虑到，我们的海军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至于我们的空军，很大一部分已经投入前线工作。

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

约·斯大林

第4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5月20日收到

由35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昨天启碇，奉命向你处挺进。德国人准备了将近100架轰炸机，想伏击这些船只和护航的船只。我们的顾问认为，如果气候还是对我们不利，足以阻挠德国空军行动的天气还不来到的话，那末我们应当预料到，船只和船上的军用物资将大部分遭受损失。

我在5月9日的电报中已经指出，这件事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你们的远程轰炸机在5月22日至29日期间能够把敌人的飞机场（包括在巴杜福斯的一个机场）轰炸到什么地步。我知道，你会尽你的一切力量来进行的。

如果我们不走运，护航舰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那末我们所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下一次护航舰队的出发日期延迟到7月间冰块退向北方而我们获有更大的海面的时候。

第4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5月24日收到

莫洛托夫先生抵达了伦敦，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曾经就军事和政治事务进行了收获颇大的谈话。我们已经告诉他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资源的详尽而真实的情况。至于条约[①]的问题，他将向你说明，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不能背弃我们以前对波兰的诺言，并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和美国人民的舆论。

我确信，如果莫洛托夫先生从美国回来时能经过这里的话，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有极大的价值。那时我们可以继续交换意见，我希望这将导致我们三国间密切的军事合作的发展。而且我将能够告诉他有关我们自己的军事计划的最近的发展情况。

最后，我希望那时政治谈判也能更向前推进一步。根据这一切想法，我很希望你能同意莫洛托夫先生在回国的途中再到我们这里来一次。

————————————

① 指英国承认苏联西部边界的协定草案。——原注

第 4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 年 5 月 24 日发出

我收到了由古比雪夫转来的 5 月 20 日的来电，其中你谈到装载着供苏联用的军需品的 35 艘轮船目前正在来苏联港口的途中。我对你的通知以及你为轮船开航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感谢。在我们这方面，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正在尽一切力量掩护你在今年 5 月 9 日给我的电报中所指明的那一段航线上的运输船只。

第 4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 年 5 月 24 日发出

你最近的来电已经在 5 月 24 日收到。维·莫洛托夫和我自己都认为他在从美国回来的途中，可以在伦敦停留一下，以便同英国政府的代表完成对我们两国有关的问题的会谈。

第 5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5 月 27 日收到

我们很感谢你们在条约问题上体谅了我们的困难。我确信，能在美国得到的报偿将是有分量的，而现在我们三大强国将能够携手前进克服一切困难了。

同莫洛托夫先生会见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并且我们消除了许多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障碍。我很高兴，他回来时将经过这里，因为还有更多有益的工作要做。

到现在为止护航舰队一切都很好，但是，目前它正处于最危险的阶段。非常感谢你采取了措施来帮助迎接它。

因为我们已经相互承担要在20年内作盟国和朋友，我借此机会向你表达我诚挚的良好愿望，并且向你确保我对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信心。

第5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5月28日发出

我对你在我们两国签订新的条约的时候所表示的友谊和良好愿望表示非常的感激。

我相信，这个条约对进一步加强苏英两国以及我们两国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保障我们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有很大的意义。

我还希望，莫洛托夫从美国回来时，你同他的会见能够有可能完成那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至于护航舰队的防卫措施，你可以不必怀疑，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做，并且将来还要继续做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工作。

请接受我衷心的良好愿望，并向你表示我对我们共同的彻底胜利的坚定信心。

第5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2年6月17日收到

我们曾向你报道，有各种迹象说明德国人正在加强挪威和芬兰北部的力量，并且派遣船只到那里去准备入侵。

这可能是一个预兆，表示敌人将进攻摩尔曼斯克，把北极地区当作重

型水上军舰的基地，企图切断我们的供应线。请你告诉我，你对我们在上述地区共同作战的想法是怎样的，特别是你是否欢迎我们派出皇家空军的六个中队，这件事我在致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中曾提到过。

第5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2年6月20日发出

你通知关于德国入有从挪威和芬兰北部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来信收到了。

我完全同意你关于我们在这两个地区共同作战的意见，但是我想知道英国的海陆军是不是也准备参加这次战役？参加的数量是多少？

我非常感谢你答应派遣六个空军中队来摩尔曼斯克地区。是否可以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到达？

第5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6月21日收到

在苏联进入战争第二年的时候，我，作为再过几个月将进入战争第四年的英国的首相，向你，伟大盟国苏联人民的领导人再次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武装部队、游击队和工人在过去一年中所进行的胜利的防御战争的敬佩，并且坚信继这些胜利之后，在未来几个月的战斗中，你们必将获得同样的甚至更大的胜利。我们两国和我们其他的盟国（包括资源丰富的美国）的战斗同盟一定能使我们的敌人屈膝。我们会倾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帮助你们，这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

希特勒不宣而战地进犯你们的国家至今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

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加强了。我们不但考虑到现在，而且也考虑到将来，不久前莫洛托夫访问英国时签订的我们关于在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结成同盟及关于合作的条约受到英国人民这样由衷的欢迎，正像我所知道苏联人民由衷欢迎这个条约一样。这个条约是我们必将击溃敌人以及在战争结束后为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建立持久和平的保证。

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5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7月10日收到

我刚从罗期福总统那里知道你已同意我们把前往贵国途中业已到达巴士拉的40架“波士顿”式轰炸机拨给我们在埃及的武装部队。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对你提出这样的请求本来是为难的。我非常感谢你这一迅速而又慷慨的答复。这些轰炸机已直接投入战斗，在那里我们的飞机正使敌人遭到严重的损失。

第5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7月18日收到

从1941年8月起我们开始向俄国北部遣送小型护航舰队，直到12月为止德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进行干扰。从1942年2月起护航舰队增大了，那时德国人就把数量相当大的潜水艇部队和大批飞机调到挪威北部，对护航舰队进行猛烈的袭击。由于护航舰队有着尽可能最强大的驱逐舰和反潜水艇舰的护送，因此它通过时只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但还不是非常大的损失。德国人显然不满于仅仅出动飞机和潜水艇所取得的结果，因为他们开始利用水面力量来进攻护航舰队。然而，对我们说来很幸运，开始时他们把重型的水面舰只用在熊岛的西边，而把潜水艇用在东边。

这样，我们英国本土的舰队就能够防止敌方水面舰只的进攻。在5月份的护航舰队出发以前，海军部曾提醒我们，如果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德国人把他们的水面力量调到熊岛东边的话，我们的损失是会很严重的。但是我们决定还是把护航舰队开出去。结果德国人并没有用水面舰只来进攻，护航舰队通过了，只受到六分之一的损失，主要是由于空中袭击。然而，对于P.Q.17次护航舰队，德国人终于以我们一直害怕的方式使用了他们的力量。他们把潜水艇集中在熊岛西边，把水面力量留作在熊岛东边进攻之用。P.Q.17次护航舰队最终的命运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只有4艘船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而另外6艘却在新地岛港里。可是这6艘船随时都可能遭受空中袭击。因此，至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船只可以幸存。

我必须说明，当敌方的作战舰队驻扎在极北方时，这些护航舰队的活动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我们认为不应该让我们英国本土的舰队到熊岛东边或者足以遭受从海岸基地起飞的德国飞机袭击的地方去冒险。假如我们很少几艘最强有力的主力舰中的一艘或两艘被击沉或者即使受到严重损伤，而同时德国的“透匹兹”号及其僚舰（不久还要加上“夏恩贺司特”号）却在继续活动的话，大西洋的整个控制权将要丧失了。不仅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粮食供应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作战力量也将削弱；而最重要的是，目前每月载运达8万美军部队过大西洋的巨大护航舰队也将受阻，致使在1943年逐步建立起一个真正强固的第二战场成为不可能。

我的海军顾问们告诉我，假定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统率德国的水面舰只、潜水艇和空军力量的话，他们能够保证全部毁灭任何开到俄国北部去的护航舰队。他们至今不存任何希望，试图在永久的白昼中通过的护航舰队会比R.Q.17次有较好的遭遇。因此，我们非常遗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试图派出下一个P.Q.18次护航舰队将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只能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造成肯定的损失。同时，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能够作出一种安排，有相当把握至少使很大一部分运送的物资运达你们那里去的话，我们将立刻重新派出护航舰队。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巴伦支海成为德国战舰的危险地带，就像德国人使它成为我们的危险地带一样。这是要以我们共同的资源致力去做的。我愿意派皇家空军的一位高级军官到俄国北部去同你们的军官们商谈并制订一个计划。

同时，我们准备立即把原定参加P.Q.护航舰队的一些船只派到波斯湾去。挑选船只的工作将和苏联驻伦敦的代表共同进行，以便和他们磋商载货的次序。如果选用“旋风”式和“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的话，你能否在南部战线上使用它们呢？我们将在巴士拉装配这些战斗机。我们希望增加通过伊朗路线的运输能力，以便在10月前达到每月运输量75,000吨，并采取措施使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我们要请美国政府帮助我们，请他们加速供应车皮和载重汽车。如果你同意把拨给苏联的美国载重汽车（这些汽车正在波斯湾沿岸进行装配）用于波斯湾和里海之间的公路运输，那么增加运输量的任务可以立即执行。为了充分利用运输能力，我们同意在9月份把运货量增加到95,000吨，10月份增加到10万吨，不包括汽车和飞机在内。

你6月20日给我的电报中曾提到在北方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那些目前阻挠我们再派护航舰队的障碍，同样也阻挡我们派遣地面部队和海军到挪威北部去作战。但是，我们的军官们应该立刻共同考虑，在10月间或10月以后黑夜较长的时候有可能组织怎样的联合作战。如果你能派军官到这里来，那当然更好，但是如果这样做不可能，我们的军官将到你们那里去。

除了在北方联合作战以外，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协助你们的南翼战线。如果我们能击退隆美尔，我们就有可能在秋天派遣强大的空军部队在你们战线的左翼作战。要经由通过波斯的运输线支持这些空军部队，而不减少对你们的供应，这很显然将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我希望能在最近将来向你提出详细的方案。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打败隆美尔。目前这个战役正进行得很剧烈。

请允许我对40架“波士顿”式飞机再次表示谢意。德国人不断向非洲增派人员和飞机，但是大批的增援部队将到达奥金列克将军那里，再加上英美重轰炸机的强大机队即将来到，这样就足以保证地中海东部的安全和封锁供应隆美尔的港口——托布鲁克和班加西。

斯大林总理，你好意地提议让三个波兰师[①]到巴勒斯坦去同他们的同

胞联合起来，而在那里我们能够把他们全副武装起来，我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好处。这些军队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及使土耳其人感到南边增加了军队因而加强士气方面，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这个为我们所重视的计划不会由于波兰士兵要把主要依赖他们的粮食配给为生的数量众多的妇女几童随带前往而无法实现。供养这些家属对于我们将是很大的负担。我们认为，为了组成这支能够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很好服务的波兰军队，负起这个重担也是值得的。我们自己在近东地区也很缺乏粮食，但是印度粮食很充足，如果我们能从那里运一些来就好了。

假如我们得不到波兰人，我们就不得不抽调目前正在为英美大军攻入欧洲大陆而大规模准备的力量来填补空缺。这些储备力量已经使得德国人把两个重轰炸机大队从俄国南部撤到法国去。请相信我，为了帮助你们巨大的斗争，我们和美国人将不惜做任何一件有用处的和有益的事。美国总统和我都在不断地寻求克服地理、海洋以及敌方空军所造成的特殊困难的方法。

这份电报，我已经给美国总统看过。

————————————————

① 指1941—1942年在苏联领土上组成的波兰军队。——原注

第5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2年7月23日发出

7月18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从来电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英国政府拒绝继续通过北方航线运送军事物资给苏联。第二，虽然双方协议的公报中规定了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但是英国政府却要把这件事推迟到1943年。

我们的海军专家认为，英国海军专家们用来为停止向苏联北部港口派遣护航舰队作辩护的理由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的意见是，

如果有诚意准备履行约定的义务的话，这些护航舰队是可以定期派出的，并且可以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损失。我们的专家还感到难于理解和解释为什么英国海军部发出命令要第17次的护航军舰驶回去，而货船却要分散开来并且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设法一条条地单独驶到苏联港口来。当然，我并不认为定期派遣到苏联北部港口的沪航舰队能够毫无风险和损失地到达目的地。但是在战时没有一桩重要的举动能够不经受风险和损失就完成的。你当然知道，苏联所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甚至多到无法比拟。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正当苏联政府由于苏德战线的严重情况而格外需要军事物资的时候，英国政府会停止运送军事物资给我们。显然，通过波斯湾运送物资决不能补偿由于停止向北方港口派遣护航舰队所造成的损失。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恐怕这个问题会开始受到不认真的处理。从苏德战线的现状出发，我必须最着重地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容忍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推迟到1943年。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认为必须坦率而老实地表达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对于来电所提出的问题的意见而见怪。

约·斯大林

第5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7月31日

1.我们正在为重新努力在9月份的第一周派遣一个大的护航舰队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作好初步的准备（请参阅我下一封电报）。

2.如果你邀请我，我愿意亲自到阿斯特拉罕、高加索或其他类似的方便的会面地点来同你会晤。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纵观战局并且在友好的接触中共同作出决定。那时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和罗斯福总统制定的关于在1942年进攻的计划。我将携带帝国总参谋长同来。

3.我立刻就要动身到开罗去。你可以想见，我在那里有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愿意，我将从那里通知你我们会见的合适日期；对我来说，8月10日到13日之间都可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4.战时内阁已经批准我的建议。

1942年7月31日

第5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年7月31日收到

这封电报是上一封电报的补充。我们正在采取初步措施，以便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派出由40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但是我应该直率地说，如果德国在巴伦支海上的军舰所遭受的空中威胁并不是强大到足以阻挠它们来袭击护航舰队的话，那末，我们很少有可能甚至使三分之一的船只安全通过，P.Q.17次护航舰队的经验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你当然也知道，这种情况已经同迈斯基商量过了，据我了解，他已经通知你，我们认为最低限度的空中防卫是必要的。

第60号　绝密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7月31日

7月31日的两封来电已经收到了。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到苏联来同政府的成员会面。

我将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到苏联来和我们共同考虑对希特勒作战中的紧要问题，因为来自希特勒方面的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目前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

我认为莫斯科是最合适的会见地点，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的各

个成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在进行这样紧张的对德斗争时，都不能离开首都。

英帝国参谋总长也能来，那是极好的。

请按照你在开罗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来确定会见的日期。我对日期的问题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你同意在9月初派遣下一个载运军事物资的护航舰队到苏联来，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上调出飞机十分困难，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加强对护航舰队的空中保护。

1942年7月31日

第6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8月1日收到

我一定到莫斯科来同你会晤，并且将在开罗通知到达的日期。

第6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8月5日收到

我们计划在最近的一天里离开开罗，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中途在德黑兰停留。

细节的一部分需待我们的空军驻德黑兰当局同你们的空军当局商量作出安排。我希望你能指示后者给予一切协助。

关于日期，除了我已向你提出过的以外，我还不能作任何肯定。

第6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8月6日发出

8月5日来电已收悉。已经根据你的愿望向苏联驻德黑兰的空军代表发出了一切必要的指示。

第64号

丘吉尔供斯大林参考的情报

1942年8月13日

去马耳他岛的护航舰队

1.最后的消息说明，我们遭受了下列损失：

一、被击沉“老鹰”号航空母舰一艘，运输船5艘；

二、触水雷或被鱼雷击中但情况不明者有“尼日利亚”号、“怯尼亚”号和“开罗”号三艘巡洋舰；

三、被击伤者有“无敌”号航空母舰（被炸弹击伤）和驱逐舰“远见”号（被水雷击伤）。

2.根据已经获悉的报道，敌人的损失如下：

两艘潜水艇被撞伤后沉没，一艘潜水艇由于空袭差不多肯定是沉没了（还有一艘潜水艇8月3日在大西洋被击沉，另一艘8月10日在地中海被击沉）。

3.敌人集中了大量飞机，大家认为我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工作得很好，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4.今天早晨（星期四）可能与敌人的巡洋舰进行战斗。敌人在公海上还有主力舰。

5.正如我们所设想的，开往地中海上指定的重要前哨的这次护航舰队必需克服极其严重的反击，在斗争中开辟道路，至于船只中有多少能够达到目的地，目前还不知道，

空　袭

在8月11日至12日的夜间我们总共派出427架轰炸机，220架轰炸机是飞往美因兹，在那里起了很大的火；154架飞往哈弗尔。其他的飞机

在海上敷设水雷等等。

丧失了16架轰炸机，还有3架轰炸机是在返航途中被击落的。

温·丘

1942年8月13日

第6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备忘录

1942年8月13日

由于今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了解到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是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决定了的，并且在今年6月12日发表的英苏协议公报里表达了出来。

大家也知道，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目的，在于把德国军队从东战场吸引到西方去，在西方建立一个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并且以此在1942年减轻苏德战场上苏联军队的负担。

十分明显，苏军统帅部在编制自己的夏季和秋季作战计划时是把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一点考虑在内的。

很容易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对于指望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公众舆论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它使前线红军的处境更困难并且损害了苏军统帅部的计划。

我还没有提到下面这个事实，就是由于拒绝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而使红军遭到的困难无疑地将会有损于英国和所有其他盟国的军事地位。

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看来，1942年具有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有

利的条件，因为几乎所有的德国军队，而且是他们最好的军队，已经调到东战场，在欧洲只留下少数质量较差的军队。现在不能知道，对于开辟第二战场1943年是否能提供像1942年那样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的意见是：正是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开辟的。然而很不幸，我没有能够说服英国首相先生，而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谈判中完全支持了首相先生的意见。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13日

第66号 绝密

丘吉尔致斯大林

备忘录

1942年8月14日

英国首相为答复斯大林总理8月13日的备忘录特声明：

1.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和唯一可能从大西洋方面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是“火炬”[①]。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在10月间实行，它将比任何其他计划给俄国以更多的帮助。它也为1943年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总理在8月12日谈话中所提到的四点好处。英国和美国政府对此已经下定决心，一切准备工作正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着。

2.和“火炬”比较起来，用6个或是8个英美师进攻瑟堡半岛和海峡群岛[②]将是一个冒险而无益的行动。德国人在西方有足够的军队，用几条防线就可以把我们拦在这个狭小的半岛上，也会把他们在西方的全部空军集中起来对付我们。按照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一致意见，这种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能守住桥头阵地，也不会使一师德国兵从俄国撤回。这一行动对我们比对敌人更是一个漏疮，它将无止境地、无谓地消耗我们的骨干部队和登陆艇，这一切将是1943年真正采取行动时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看法。帝国参谋总长将向俄国指挥官提供他们所想

知道的任何详情。

3.英国或美国并没有违反什么诺言。我想指出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的第5段，那里边明确地说，“所以我们不能许以诺言”。在送致这个备忘录以前，我们曾进行了很长的谈话，在谈话中对于这样一个计划很少有被采用的机会一点是谈得非常清楚的。有几次谈话是有记录可查的。

4.然而，关于英美将在今年进攻法国的谈论已经迷惑了敌人，把他们的大批空军和相当数量的陆军牵制在法国海峡沿岸。如果发生任何公开争论，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向全国说明它所持有的反对“铁锤”③计划的压倒的论据，这只会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俄国的利益。那时会引起俄国军队的普遍的沮丧情绪，因为他们的士气一直受到这个问题的支持；同时，敌人可以把更多的军队从西方撤走。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铁锤”作为“火炬”的烟幕，而当“火炬”开始时，就公开宣布它是第二战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打算。

5.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同莫洛托夫先生关于第二战场的谈话（这些谈话都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保留作了限制）能构成改变俄国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的根据。

6.我们重申决心，将以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来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国。

温·丘

1942年8月14日

————————————

① “火炬”，1942年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战役的代号。——原注

② 海峡群岛，又名诺曼底群岛，位于法国海岸附近，属于英国。1940年6、7月间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原注

③ “铁锤”，美英军队预定于1942年在加莱海峡地区进行的战役的代号。——原注

第6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年8月14日

尊敬的斯大林总理，

1.下面是关于为保护开往马耳他岛的护航舰队而进行的战斗的结果的消息。14艘运输船中只有3艘到达马耳他岛。还有两艘是被拖带着走的，可能到达目的地。到达那里的3艘送去了两三个月用的供应品。这样，对整个地中海的情势有着重大意义的要塞可以维持到埃及西部沙漠的不可避免的战役和“火炬”计划实现的时候。

2.为了这件事，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老鹰”号航空母舰被击沉了，“无敌”号航空母舰被三颗炸弹和三次近距离的爆炸所击伤，破坏得很厉害；两艘优秀的巡洋舰被击沉，一艘被击伤，另一艘下落不明；一艘驱逐舰被击沉，还有9艘，或者可能是11艘快速船只也沉没了。这样，幸存的是不多了。“罗德内”号也由于近距离的炸弹爆炸而受了轻伤。

3.我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却是悲惨的：军舰不得不在那许多以陆地为基地的敌机的包围下行动。我们击沉了3艘潜水艇，并且显然使来袭的飞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护航舰队进入马耳他岛空中防御的保护圈以后，意大利的巡洋舰和主力舰并没有出来对剩下的护航舰队进行袭击。敌人无疑将把这件事描绘成为海上的大胜利。要不是从将来计划的观点来看马耳他在战略上的意义是那样重大的话，那末的确可算是一个大胜利。

你的忠实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2年8月14日于莫斯科

第6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2年8月17日收到

经过迅速的和顺利的飞行之后，我抵达了德黑兰，我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友情和款待。我很高兴我曾到莫斯科来：第一，因为我有责任来把那些事告诉你；第二，因为我确信我们的接触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好处。请代我问候莫洛托夫先生。

第 6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8 月 31 日收到

隆美尔已开始进攻，这一点我们已有准备。现在可以进行巨大的战斗。

第 7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9 月 7 日收到

1. 由 40 只船组成的 P.Q.18 次护航舰队已经出发了。由于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重型船只走进敌人从海岸上的地面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航程之内，所以我们派去了一支强大的驱逐舰队，以备对付敌人的水面舰艇，如果它们在熊岛以东进攻我们的话。我们的掩护舰只里还有一只刚刚造成的辅助航空母舰，以便协助保护护航舰队免受空袭。再者，我们正在护航规队和德国基地之间布置一支强大的潜水艇巡逻队。但是，遭到德国人水面舰艇袭击的危险仍然是严重的。防止这种危险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巴伦支海上设置一支如此强大的空袭力量，以致德国人不敢冒险把他们的重型军舰派去，正如我们不敢冒险派我们的重型军舰到那个地区去一样。为了进行侦察，我们正在提供 8 架“卡塔利那”水上飞机和 3 架摄影侦察队的“喷火”式飞机，它们将从俄国北部基地出发进行活动。为了扩大空袭的规模，我们已经派去 32 架带鱼雷的飞机，这些飞机在途中已有损失，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将有 24 架可用于战斗，这些飞机，加上据了解你们将提供的 19 架轰炸机和带鱼雷的飞机，42 架短程战斗机和 43 架远程战斗机，我再重复一遍，还不足以最后制止敌人的袭击。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远程轰炸机。我们完全了解，你们在主要战线上所遭到的巨大压力使你们难以提供更多的俄国陆军的远程轰炸机，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支护航舰队的重要性。在这支舰队里我们用了 77 艘军舰，它们在执行这项任务中需要消耗 15,000 吨燃料。如果你能够暂时把多一些的远程轰炸机转移到北方，请

你就这样做吧。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这是非常需要的。

2.隆美尔在埃及的进攻已遭到有力的回击，我对本月内在那里获得对我们有利的结局感到很乐观。

3.“火炬”计划正在全力进行着，虽然它要比我曾告诉你的最早日期推迟约3星期。

4.我在等待美国总统答复我关于在冬天把一支英美空军在你们的南翼投入战斗的明确建议。他原则上已同意，我正在期待着他的详细计划，收到以后我将再打电报给你。在这以前，我希望当我在莫斯科时经你的军官们同意（尚需得到你的批准）关于飞机场和交通线的计划能够继续编制。

为此目的，我们想先从埃及派遣一些参谋官到莫斯科去，你们一准备就绪我们马上就派去。

5.我们正以十分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俄国军队不断进行着的辉煌的抗战。德国方面的损失的确很大，而且冬天已经临近了。星期二我在下议院讲话时，将叙述我在莫斯科的访问，对这次访问我留下了极愉快的回忆。我希望我的报告的措词是使你满意的。

6.请代问候莫洛托夫先生，并且感谢他对我平安回来的祝贺。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一切事业顺利。

第7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年9月8日发出

9月7日来电已收到。我理解P.Q.18次护航舰队安全到达苏联的全部意义和采取措施来保护它的必要性。尽管我们目前再加派远距离轰炸机来进行保护是困难的，我们还是决定了这样做。今天已经发出指示，为你所指出的目标加派远距离轰炸机。

预祝你在埃及反对隆美尔的战役中获得成功，并且在实施“火炬”计划时也获得完全的成功。

第7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年9月13日收到

1.对你派出48架远程轰炸机、10架鱼雷投射机和200架战斗机（其中包括47架远程战斗机）我表示非常感激，我现在已知道，这些飞机是你为了帮助P.Q.18次护航舰队而派出的。

2.我想你可能希望知道皇家空军从今年7月1日起在德国投下的全部炸弹数量。从7月1日到9月6日的总数是11,600吨。投向较重要的目标的吨数如下：杜伊斯堡2,500吨，杜塞尔多夫1,250吨，萨尔布鲁根1,150吨，不来梅和汉堡各1,000吨，奥斯纳布鲁克700吨，卡塞尔、威廉斯海文、美因兹和法兰克福4地共约500吨；纽伦堡300吨，其他许多目标的吨数较少。投下的炸弹中有6个炸弹是8,000磅重的，1,400个炸弹是4,000磅重的。我们发现，在这些炸弹中使用瞬间雷管在爆炸时非常有效，甚至不需要降落伞。

第7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年9月23日收到

我们对德国的作战飞机的生产情况作了下列估计，根据航空部的意见，这个估计是可靠的。你对这个估计可能会感到兴趣，同时我想知道，如果你认为这一点可以谈的话，这一估计同你自己对敌人的生产情况的估计符合到什么程度。

下列材料就是上述的估计。（表单略）

第7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年9月30日

1.在一年半以前我曾经利用一个情报来源向你预告过关于即将发动的向俄国的进攻，现在我从同一来源那里得到了下列情报。我认为这份材料是绝对可信的，希望你亲自看一下。

“德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个海军上将来负责里海的海军战斗，他们选择了马哈奇—卡拉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将近20艘舰艇，其中包括意大利的潜水艇、鱼雷艇和扫雷艇，只要线路一开辟，就用火车从马里乌坡耳运往里海。由于亚速海结冻，潜水艇将在铁路建筑好以前装运”。

2.毫无疑问，你已经准备好了应付这样的进攻。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帮助下使你在里海和高加索战区的空军增加20个英美航空中队这一计划（关于这个计划我曾经向你谈过）有着更为巨大的意义。在我们会见之后我没有中止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我希望大约再过一个星期我将获得美国总统的最后同意，而一定能够向你提出适当的联合建议。

3.至于从P.Q.19次护航舰队删减下来154架“空中眼镜蛇”，这是我应美军总司令马歇尔将军的紧急请求而亲自批准的。这是供我们用的并由我们转供你们用的美国飞机。美国人的要求是紧急的，并且是肯定了的，这一要求与“火炬”有联系。马歇尔将军答应立即用别的飞机通过经阿拉斯加的航线来加以弥补。最近10天内我将用电报将以后的情况通知你。

1942年9月30日

第7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2年10月3日

1.我必需通知你，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处境从9月最初几天起恶化了。看来德国人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空军后备力量是很大的，并且在空中取得了双倍的优势。我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掩护地面部队。甚至最英勇的部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特别需要“喷火”式和“空中眼镜蛇”式。关于这一切我已经同

威尔基先生详细谈过了。

2.装运军火的运输船已经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正在卸货。这是一次很大的支援。但是由于运输船只不足，我们可以暂时放弃某些援助，以减少对运输船的需要，只要战斗机的空中支援有所加强的话。如果英美两国一起能够每月供给我们800架战斗机，其中大约有300架是英国的，500架是美国的，我们可以暂时放弃对坦克和大炮的要求。这样的援助会更有效，并且会改善战场上的局势。

3.你关于德国每月生产不到1,300架作战飞机的调查材料同我们的材料不符。根据我们的材料，德国的飞机工厂连同它所占领的各国的飞机零件工厂加在一起，每月生产作战飞机不下2,500架。

1942年10月3日

第7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年10月9日收到

对我9月30日发出的电报的第一段作如下补充：我最近收到的材料证实，德国人用火车往里海运送舰艇的计划已经暂时停止执行。

第7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年10月9时收到

1.本月底我们将在埃及发动进攻，而“火炬”计划将在11月初开始。有些战役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或者是

（1）迫使德国人派遣空军和陆军来抵制我们的行动；或者是

（2）强迫他们接受由于我们的成功而造成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又会因西西里岛和南欧遭受进攻的威胁而转移敌人的兵力。

2.我们在埃及的进攻将很有力。“火炬”将是一个巨大的战役，其中除了美国海军以外，将有240艘英国军舰和50万以上的人参加。这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向前进行着。

3.美国总统和我都希望把一支英、美空军派到你们的南翼战线上去，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挥下作战。这支空军将包括：9个英国战斗机中队，5个英国轰炸队中队，1队美国轰炸机，1队美国运输机。我们已下令集合这支空军，并令它们配置就緒，以便在明年初就能参加战斗。这支空军大部分将来自埃及，一俟它们从那里的战斗中解脱出来，我们相信这次战斗我们将获得成功。

4.在10月5日迈斯基先生递交给我的信中，你要求我国和美国大量增加对俄国的战斗机供应。我们将尽速通过波斯湾路线送给你150架“喷火”式战斗机，外加相当于50架飞机的零件，这些飞机在准备好后即可送出，但这是一项特殊的增援，以后不能再给。这项特殊的增援是超出经由北路运送的议定书供应范围以外的。关于美国的部分，罗斯福总统将另有电报。

5.上次护航舰队有这样大一部分安全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使我很为宽释。只是由于有不下77艘之多的军舰参加护航，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在我们没有完成即将执行的军事行动以前，海军保护将不再是可能的了。当必要的护航舰只从“火炬”战役撤出之后，它们可以再应用于北方的海面上。

6.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我们仍打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用单独的船只而不是护航舰队通过北路把供应送给你们。我们已作好安排让船只在从10月28日到11月8日没有月亮的期间从冰岛启航，除了美国将派出的船只外，我们准备了10艘。这些船只将以200哩的间隔，其中偶然还有更大的间隔，各自单独航行。它们将依靠躲避和分散来避免损失。

7.我们希望从1943年1月起恢复物资供应，由强大的护航舰队护送。

8.如果能使德国人无法使用在挪威北部的飞机场，那对你我当然都是很大的帮助。如果你的参谋人员能制订出一项好的计划，美国总统和我都会立刻研究尽我们的可能来促其实现的可能性。

第 7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复信

1942 年 10 月 13 日发出

来电已于 10 月 9 日收到，谢谢。

约·斯大林

第 7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 年 10 月 19 日收到

我应当向你补充一点，150 架“喷火”式飞机每一架都装备有两门炮和 4 挺机枪。

第 8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11 月 5 日收到

1. 我曾经答应你，当我们的军队在埃及对隆美尔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把情况通知你。现在亚历山大将军报告说，敌人的战线已被突破，敌人正在非常狼狈地向西撤退。除掉主要战区的军队以外，在我们正在沿岸进攻的部队的偏南方的沙漠里还有意大利的 6 个师和德国的两个师。这个集团军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机械化运输和供应的工具，因而我们有可能在最近几天内使敌人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此外，隆美尔唯一的退路是沿岸的那条路，这条路已被军队和运输工具所堵塞，并且正在不断受到我们的占很大优势的空军的袭击。

2. 绝密。只供你本人参阅。“火炬”计划最近将以极大的规模开展。我认为，你所担心的那些政治方面的困难已经圆满地解决了。战役的军事

方面正在按照计划准确地进行着。

3.我很想尽快着手把英国和美国的20个航空中队调往你们的南翼。罗斯福总统完全同意，并且现在在埃及没有任何复灭的危险。但是，在可能有所行动之前，我们的军官和你们的军官们很有必要就降落场等问题进行细致的协商。请尽快通知我，你对组织这些会谈是怎样想的。准备派遣的空中队的数量在我10月9日发出的电报中已通知你，为此我们在做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可能进行到我们同你们协商之前。

4.请允许我为了将流传百世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希特勒对俄国的第二个攻势的彻底失败，向你们——斯大林总理和莫洛托夫先生——表示祝贺。如果我能从你那里获悉你们在高加索的情况，我将感到高兴。

欣逢你们的节日，我向你表示一切良好的愿望。

第8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年11月8日发出

你的来电已于11月5日收到。

对你们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的顺利进展表示祝贺，并且相信现在一定能够彻底粉碎隆美尔匪帮及其意大利盟军。

我们大家在这里都希望你在实施“火炬”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对你所通知的你和罗斯福总统决定在最近向我们南部战线派遣20个英国和美国的航空中队一事致以谢意。很快派来20个航空中队，这将是一支宝贵的生力军。至于为这项工作所必需的一些会谈以及英国、美国和我国空军的代表们共同制定具体措施的工作，那么有关的会谈最好首先是在莫斯科举行，以后如有需要，可直接在高加索进行。我已经获悉，美国方面为此将派来伊·埃·阿德勒尔将军。我在等候通知英国方面将任命谁。

我们在高加索战线上的情况比 10 月间的情况有些恶化。德国人占领了纳尔奇克城并逼近弗拉基高加索，现在那里正进行着大规模的战斗。我们在那里的弱点就是缺少战斗机队。

对你在苏联国庆节所表示的愿望致以谢意。

第 8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8 日收到

我刚从亚历山大将军那里收到了如下的报告：

目前肯定的俘虏人数是两万人；缴获坦克——350 辆；大炮——400 门；机械化运输工具一一数千件。我们的先头机动部队现位于迈尔沙—马特鲁赫的南面。第 8 军正在向前挺进。

第 8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8 日收到

毫无疑问，你会知道，如果希特勒没有希望攻占巴库的话，他将企图用空袭的办法来破坏它。

请相信我对你的通知。

第 8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2 年 11 月 9 日

你们在利比亚的胜利和“火炬”战役的顺利开始使我们非常高兴。

祝彻底胜利。

感谢你提醒我关于巴库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反击的措施。

1942 年 11 月 9 日

第 8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11 月 13 日

1. 非常感谢你在 11 月 8 日和 10 日的两封来电，这些电报我已收到了。

2. 我任命德鲁姆蒙德空军元帅为英国代表，参加苏英美三国代表讨论关于在贵国南部战场上使用英国的和美国的 20 个航空中队的初步安排的参谋会议。我已命令德鲁姆蒙德空军元帅带一小批参谋军官立刻从开罗前往莫斯科。

3. 我们在埃及和法属北非的战役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已经深入到悉列那伊卡。刚才又拿下了多布鲁克，所谓的装甲军现在剩下很少了，剩下的坦克不过十几辆，该军正在经受着强大的压力，我们正在跟踪追击。我差不多不怀疑我们很快就会占领班加西。敌人为了坚守奥吉拉战场将企图往的黎波里塔尼亚撤退。敌人已经从班加西撤走了仓库，并且正试图在锡尔特海湾建立一个新的临时的小型基地。

4. “火炬”燃烧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们的司令官们坚信对法属北非一定会取得完全的控制，并且在突尼斯的尖端部分建立占优势的空军力量。到目前为止，从英国开出的所有载运军队巨大的护航舰队有的已经顺利通过了海洋，有的正在顺利通过。我们希望在北非建立一支强大的由吉罗德将军指挥的法国的反德军队。

6.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政治方面的反应是极其令人满意的，直布罗陀港口和飞机场被破坏的危险暂时已不再令人焦虑。我和你在我们的会谈中已预见到的德国对维希法国的入侵正在好转。维希的影响——使法国民族陷于麻痹的毒素——正在削弱，而全体人民很快将学会像被占领区的人民仇

恨德国人那样强烈地仇视他们。土伦舰队的前途还不清楚。德国人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要求移交舰队，并且，正如所报道的那样，他们不准备占领土伦。在我们支配下的海军上将达尔朗已命令舰队开往西非的港口。但是否能执行这一命令还值得怀疑。

6. 整个非洲海岸沿岸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情况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一条经过地中海的路线以供军事运输的话，那么我们的航运问题将大有改善，并且我们将同土耳其进行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进行的更为密切的接触。我保持着同罗斯福总统的接触，美国人的成就使他非常高兴。为了进一步采取非常有力的行动，再过几天必须重新研究一下整个局势。最近我将把我们对未来的计划通知你。我相信你会晓得，我们是多么愿意减轻一部分你在最近几个困难的月份里坚韧地担负着的异常沉重的负担。同时我将继续根据这个假定行事：你仍旧相信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他们是不会越过高加索山脉的。

1942 年 11 月 13 日

第 8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11 月 14 日

感谢你 11 月 13 日的来电。我们在这里非常庆幸你们在利比亚所取得的成就和英美军队在法属非洲的胜利。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你们的胜利并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最近几天我们制止了德国人向弗拉基高加索的推进，现在局势已趋稳定。弗拉基高加索仍在我们的手里，并且我想它将永远是我们的。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坚守我们在北高加索的阵地。

我们想在最近开始冬季攻势。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要看天气，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关于战役进行的情况，将按期让你知悉。

1942 年 11 月 14 日

第 8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11 月 20 日发出

我们已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南部和西北部开始了攻势。攻势第一个阶段的目的是攻下斯大林格勒—利哈亚铁路线和破坏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交通。在西北部，22 公里长的德军战线已被突破，在南部，12 公里长的战线被突破。战役进行得不坏。

第 8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 年 11 月 24 日

1.蒙你热烈的、诚挚的祝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我们之间真挚的私人关系对完成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生命正处于紧要关头）所担负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

2.虽然十分遗憾总统不能够把我所要求的 12 艘美国驱逐舰借给我，但我现在还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便在 12 月 22 日从冰岛派出由 30 多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海军部像以前作的那样，正在同你们的军官们协商军事行动的问题。由于执行“火炬”计划的结果，德国人把空军的基本力量从挪威北部调往欧洲南部。另方面，德国人在挪威的地面力量依然处于戒备状态。

海军部到目前为止对 Q.P.护航舰队的行动是满意的，坏天气帮助了这个舰队，它正处于我们派出去迎接它的巡洋舰的护送下。

5.我已经把关于土耳其的一些初步想法告知罗斯福总统，并且发现他已独自得出很相像的看法。依我看来，我们大家似乎应该作一次新的努力来使土耳其和我们一起参加春天的战斗。为此，我希望美国参加一项英苏关于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地位的保证，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三个国家的力量

紧密地联合起来，美国人对土耳其人抱有很大希望；其次，我们已从中东送给土耳其相当数量的军火，包括200辆坦克。我准备在冬天通过陆路干线或者沿近东的海岸继续供应土耳其武器，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派些穿便衣的专家去，以便进行训练和服务。第三，我希望在早春的时候在叙利亚集结由我们的第8、9、10军组成的相当数量的军队，以便当土耳其遭到威胁或者愿意同我们站在一边的时候给它以帮助。显然，你们在高加索或高加索以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土耳其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不仅能够着手打开通向你们黑海左翼的航道，而且还可以从土耳其的基地猛烈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这些油田，鉴于你们成功地保卫住了高加索的主要石油供应，对于轴心国来说是极端重要的。进入土耳其的好处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动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并且可以作为在地中海中部进攻的补充。这个进攻将占用我们的一部分海军和很大一部分空军。

4.我同意了罗斯福总统的下列建议，即：我们每个人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派出两名高级的英国军官和两个美国人去莫斯科以便编制1943年在这方面的计划。请你通知我，你是否同意这样做。

5.斯大林总理，我希望你会了解，船只是我们的一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为了实现“火炬”计划，我们应当把我们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舰队大量缩减，以致11月上半月暂时成了我们最不利的月份。我们和美国人曾准备每月要损失70万吨但仍要能够使我们的吨位有所增长。在一年当中我们的平均损失并没有这样严重，但11月前两个星期内情况较为恶化。你们拥有大量的陆地，可能很难想像到：我们只有靠海上交通才能生存和进行斗争。

6.你不要由于骗子达尔朗而感到不安。我们已把强大的英美军队投到法属北非，我们很牢固地占据着这块领土。当时由于法国军队没有抵抗，而现在又由于法军日益增长的支持，我们可能比原定计划提前15天进行。在最近期间占领突尼斯尖端和比塞大海军基地是极其重要的。大概，我们第1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开始攻势。一旦我们在那里站稳了并且拥有占优势的空军以后，我们就能够把战争进行到使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匪徒遭受现在还不可能进行的猛烈打击。

7.同时，我们将用在英国建立强大的英美陆军和空军的办法，以及在我们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经常进行准备活动的办法，把德国人牵制在加莱海峡地区，我们将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我们的轰炸机将以不断增长的威力来攻击德国。这样，绳子就系在注定要失败的肇祸者的脖子上了。

8.关于你们进攻的光辉消息正接踵而至。我们在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这次进攻。向你表示一切良好的愿望。

1942 年 11 月 24 日

第 8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 年 11 月 27 日发出

感谢你的来电，这封电报我是在 11 月 25 日收到的。你说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有着很大意义，这种意见我是完全赞同的。

感谢你所采取的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派出一次大规模护航舰队的措施。我知道目前这样做会给你带来特殊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海战。

我赞同你和罗斯福总统关于希望尽一切可能使土耳其在春季能够在我们这边参战的意见。当然，这对加速粉碎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们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至于达尔朗，我觉得美国人很巧妙地利用了他来改善便利对西非和北非的占领。军事外交不但应该善于利用达尔朗之流，并且还要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达到军事目的。

我很仔细地读了你关于下列情况的通知：你同美国人一起，不会放松你们在东南方和南方海岸上的准备工作，以便牵制加莱海峡等地的德国人，以及你正在准备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但愿这不意味着取消你在莫斯科时答应的 1943 年春季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

我同意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和你的愿望，就是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参谋部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有关1943年战争的各项计划。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准备欢迎你们的以及美国的代表们。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胜利的，因为有雪和雾在帮助我们，雪和雾妨碍了德国空军施展它的威力。

我们想最近几天在中央战场采取积极攻势，以便在这里牵制敌人的力量并且使他们不可能把部分军队转移到南方去。

第9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贺电

1942年11月29日发出

欣逢你的寿辰，谨向你表示最良好的愿望，祝你身体健康和在你为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进行的战斗中取得成就。

约·斯大林

第9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复电

1942年12月1日收到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我非常感谢你在我生日的亲切的来电。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贺电，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快。

温斯顿·丘吉尔

第9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年12月4日收到

美国总统告诉我，他已建议我们三人于1月间在北非某处举行会议。

这远比我们在莫斯科讨论的冰岛计划为好。你可以在三天内到达所要去的任何地点，我只要两天，总统所需的时间和你大致相同。我真诚地希望你会同意。我们必须尽早决定在1943年以一切可能的力量在欧洲打击德国的最好的办法。这只有在各国政府和国家首脑随带他们的高级专家一起商谈才能作出决定。只有举行这样的会议才能使战争的全部负担得以根据可能和现有的力量来分担。

第9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2年12月6日收到

12月4日来信已收到。我欢迎安排一次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张，以便确定军事战略的共同路线。然而很遗憾，我将不能离开苏联。时间对我们很紧迫，甚至连一天我都不能离开，因为现在正在展开冬季战役的重要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在1月份将不会松滞下来，可能正好相反。

我上次去信中有一段谈到1943年春季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在等待着你对这一段的答复。

斯大林格勒地区以及前线中翼的战斗正在展开。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们正在包围一大批德国军队，我们想把他们全部歼灭干净。

第9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年12月12日

你11月27日来信的第五段最后一句和12月6日的来信中都特别问起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只能和美国总统一同答复

你，我一个人是无法回答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非常希望我们三人进行一次会谈。我们两人是了解使你无法离开俄国的极其重要的军事理由的，因为你现在正在进行着巨大的战役。我正在和总统联系，以便了解怎么办。

1942 年 12 月 12 日

第 9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2 年 12 月 20 日收到

欣逢你的寿辰，请接受我最良好的愿望和个人热烈的敬意。

我们都在以敬佩的心情注视着红军所进行的宏伟的攻势。

第 9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2 年 12 月 21 日发出

衷心地感谢你的祝贺和良好的愿望。

第 9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2 年 12 月 30 日

1. 你在南方日益扩大着的胜利深深地鼓舞着我们。它证实了你在莫斯科对我讲的一切。后果的确会是很深远的。

2. 轴心国正在突尼斯的尖端部分坚守自己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我们在第一次攻击时几乎把它攻了下来。现在看来，这里的战斗将继续到 1 月和 2 月。我希望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在 2 月初占领的黎波里。隆美尔很可能会带领自己将近 7 万人的德国部队和同等数量的意大利人向突尼斯的尖

端部分撤退。全部队伍的三分之二是行政和后勤人员。非洲海岸的战争使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在运输途中以及在港口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尽快地结束这个战役。

3.和所想像的完全相反，12 月的 P.Q.护航舰队目前还顺利。我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在 1 月份派出整整由 30 艘或更多的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虽然海军司令部对这些船只应该编成一批或两批出发航行的问题还未做出决定。

4.我准备很快就去拜访罗斯福总统，以便调整我们 1943 年的各项计划，这个消息我只通知你一个人。我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最近的时间内以最大的数量投入对敌人的战斗。船只不足是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我将把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通知你。

(74)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第9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1月5日发出

你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对你通知我关于你和美国总统即将举行会谈一事表示感谢。如蒙你把这次会谈的结果通知我，我将甚为感激。

第9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月11日

1.12月份的护航舰队经过战斗已经顺利抵达了，可能你已经收到了关于我们的少量部队对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战斗获得胜利的详细情况。

2.海军司令部本来准备使1月份的护航舰队分两批出发，每批15艘船只，第一批的开航日期是1月17日，第二批也是在同月内，但稍迟一些。但是从最近一个护航舰队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敌人力图使用水面力量来阻挠我们以后的护航舰队的行程，因此必须立即加强我们本来规定在1月份使用的掩护舰只，把它们增加到限额以上。随着白天的逐渐延长，下几次护航舰队的掩护力是还需大力加强。

3.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措施。一月份的护航舰队不再分两批出发，我们将在1月17日派出19艘船只（其中包括两艘油船），而不是像原来规定的15艘。以后，大约在2月11日左右，将派一支由28到30艘船只组成的完整的护航舰队。随即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于3月10日左右派出一支由30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然而这将取决于美国人在护航船

只方面对我们的援助如何。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这些援助，那么这支舰队的开航就不能早于3月19日。

1943年1月11日

第10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1月16日发出

今年1月11日的来电收到了。感谢你对我的通知。

我军在前线反击德寇的战役目前还进行得不坏。正在彻底消灭已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一股德军。

第10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月17日

我们在昨天夜里向柏林投了142吨烈性炸弹和218吨燃烧弹。

1943年1月17日

第10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月18日

在昨夜袭击的时候，我们向柏林投了117吨烈性炸弹和211吨燃烧弹。

1943年1月18日

第10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1月19日发出

感谢你通知我关于 1 月 16 日夜里轰炸柏林获捷的情况。祝英国空军，特别是在轰炸柏林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第 104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 年 1 月 27 日收到

1. 我们已经同我们的军事顾问开会商讨并且就美英军队在 1943 年头九个月所要进行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决定。我们愿立刻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你。我们相信，这些军事行动，连同你们的强大攻势，很可能使德国在 1943 年屈服。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2.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正确战略是集中打败德国，以便在欧洲战场早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我们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便在太平洋和远东保持主动，支持中国，并且防止日本把它的侵略扩大到其他战场，例如你们国家的滨海省份

3. 我们的主要愿望一直是把德国强大的陆空军从俄国前线吸引开并且把最大量的供应送给俄国。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利用每一条可能利用的路线把物质支援送给你们。

4. 我们当前的打算是把轴心国力量逐出北非并且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

（一）以开辟一条通过地中海的可靠的军事运输线；

（二）对轴心国在南欧的重要目标开始进行猛烈的轰炸。

5. 我们决定尽早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水陆两栖军事行动。现在已在为此进行准备工作，并且将牵涉到在埃及和北非的几个港口集中大量的军事力量，包括登陆艇和船只。此外，我们将在英国集中一支强大的美国陆空军。这些军队同在英国的英军一起，将准备尽早在实际可行的时候重新进入欧洲大陆。我们的敌人肯定会知道我们在集中力量，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规模来进行袭击。因而他们将被迫把他们的陆空军分散到所有沿海地区，如法国、低地国家、科西嘉、撒丁、西西

里和地中海东岸、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和多得卡尼斯群岛。

6. 在欧洲我们将迅速增强从英国攻击德国的盟军轰炸机攻势，而到盛夏之时应比目前的力量增强一倍。我们直到目前的经验证明，白天轰炸袭击能击毁和击伤德国的大量战斗机。我们相信，增加白天和黑夜袭击的次数和投弹量将会导致德国十分惨重的物力损伤和士气的低落，并且可以迅速地耗减德国战斗机的力量。如你所知，我们已经在西欧和地中海困住德国一半以上的空军。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轰炸攻势的加强和多样化以及我们所进行的其他军事行动将迫使德国从俄国前线上撤退更多的空军和其他军力。

7. 我们在太平洋的打算是在几个月以内把日本人从拉宝尔赶走，随后乘胜向日本的一般方向推进。我们还打算扩大我们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以便重开对中国的供应钱。我们打算立即增强我们在中国的空军力量。然而，我们不允许让我们对日本的攻势危及我们利用每一个机会使德国在1943 年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力量。

8. 我们的主导目的是把我们的能力所及的最大量的海陆空军力量加在德国和意大利身上。

第 10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 月 27 日

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共同商定由我向土耳其总统提议他和我进行会晤来为更好和更快地装备土耳其陆军进行安排，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土耳其总统已友好地答复，欢迎这个关于增强土耳其“总的防御安全”的计划，而且表示如果我希望的话，他同意在会晤举行以后的适当时候将此事公布。

对这个问题，你从我们之间所交换的电文已经知道了我的看法，你可以放心，我将迅速地将全部情况通知你。

请接受我对苏联军队不断的惊人的战绩再次表示钦佩。

1943 年 1 月 27 日

第10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绝密信

1943年1月29日

如果你不驳斥那些你可能听到的关于我即将再次前往莫斯科的谣言，我将非常感激，因为对我的实际行踪（关于这事我已经告诉过你）在几天内保守秘密是很重要的。

表示一切良好的愿望。

1943年1月29日

第10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3年1月30日发出

你们友好的联名信我已于1月27日收到了。对你们通知我关于在卡萨布兰卡商定的美英武装部队必须在1943年的头九个月内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定表示感谢。我把你们所商定的对德国的决定了解为在1943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击溃德国。如果你们能通知我在这方面预计要采取的具体军事行动以及实现这些军事行动的预定的日期，我将甚为感激。

至于苏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苏联的武装部队将尽一切力量继续攻击德国和它在苏德战场上的同盟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在今年2月上半月结束我们的冬季攻势。我们的军队都很疲乏了，他们需要休息，并且超出了这个期限他们也就未必有力量再继续进攻了。

第10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1月31日发出

关于你即将同土耳其总统会见的来电收到了。我将感谢你通知我会见的结果。对于这次会见的重要意义我是了解的。

你希望不要驳斥有关你这次旅行的一些谣言，自然，我们可以照办。

第10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2月1日

1.感谢你关于土耳其问题的来电。我于30日在阿达那见到了土耳其所有的首要人物，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和极友好的谈话。毫无疑问，他们对我们两国已靠近了很多，而且他们从德国获悉的消息使他们确信那里的情况不妙。首要的事是用现代武器装备他们，但直到目前我们只能挤出很少一些武器。我已安排好加紧供应他们可以通过托鲁斯铁路接受的东西，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并且还借给他们一些船只以便从埃及载运更多的供应物资。我还将给他们我们在沙漠里缴获的一些德国武器。我们正在安哥拉成立一个英土联合军事委员会来改善运输军需品的交通线。我们正在拟定共同计划以便在他们受到德国或者保加利亚攻击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援助。

2.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就在我们这边参战的问题作出确切的政治约定或许诺。但是，我认为：出不了今年他们就会这样做的，而且可能在此以前，他们会像美国参战以前那样把中立的含义广泛引伸一下，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机场来供英美飞机轰炸普罗也什蒂油田中途加添燃料之用，这些油田对德国来说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现在当你们的军队已收复梅科普之后。我再重复一遍，我并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确定的政治约定，我还告诉

了他们，他们有自由这样说。然而，他们同我的会晤，他们的整个态度，以及我电附给你的联合公报都说明他们已经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归属于反希特勒的阵营，而且全世界也会这样了解的。

3.鉴于苏联的强大他们自然会顾虑他们在战后的地位，我告诉他们：我的经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来没有破坏过一个约定或者条约；现在正是他们订一个有利的协定的时候，而且对土耳其来说，最安全的地位就是在议和的会议桌上能以参战国身份坐在胜利者之列。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同盟并从我们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我希望你会予以赞同。我相信他们对于苏联的任何友好的表示将会给予很好的反应。我将十分高兴能得到你对这些问题的坦率的意见。我已经和他们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特别是同伊诺努总统。

4.你在最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要求放缓盟军在北非的军事行动。就英国第8军而言，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拿下的黎波里和苏阿拉，并且希望不久就大举进入突尼斯并把敌人从马列特和加培斯阵地逐出。的黎波里港口清除障碍物和恢复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但是目前我们的交通线延伸到班加西，有的部分甚至直到1,600英里以外的开罗。有强大的美军支援的我们的第1军正运来它们的供应，并且将尽可能早地同第8军一起参加进攻。雨季和交通都是严重的因素，公路和铁路线都很纤弱，而且有500英里之长。然而我希望敌人将在4月底或许更早一些从非洲沿海完全消灭或者赶走。根据可靠的材料，我个人估计在突尼斯的德国第5装甲军给养人数有8万德国人，和25,000到3万意大利人。隆美尔军队的给养人数有15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也许只有4万人是战斗部队：而且武器装备很弱。我们当前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些力量。

5.以后我将答复你就我和美国总统在卡萨布兰卡商定了什么具体作战计划提出的极为自然的问题。

6.请接受我对保罗斯元帅投降和德国第6军被消灭这两件事的祝贺。这真是惊人的胜利。

1943年2月1日

第11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2月2日

有人请求我告诉他，你是否在事先就接到了关于英土会谈的情报。我认为我应该回答：“是的，斯大林总理是得到充分的通知的”。另一个办法是你可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你可以不必同我商量，因为我相信，无论你讲什么，总是有益的。

1943年2月2日

第11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3年2月6日发出

你关于土耳其问题的两封来电已经在2月2日和3日收到了。谢谢你通知我你在阿达那同土耳其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情况。

1.你说土耳其人对苏联方面的任何友好表示都会给予相应的反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指出，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几个月以及在战争爆发以后不久都曾对土耳其作过一系列的声明，这些声明的友好性质英国政府是知道的。可是土耳其人对这些措施毫无反应，想必是怕触怒德国人。可以预料，你所建议采取的姿态也会遭到土耳其人同样的对待。

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仍然是相当微妙的。土耳其一方面同苏联订有友好中立条约，同英国订有抵抗侵略的互助的条约，但是另一方面它同德国也订有友好条约，这个条约是在德国侵犯苏联前三天缔结的。我不知道土耳其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同时履行对苏联和英国的义务以及对德国的义务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想使苏土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那么就请他们表示一下态度吧。苏联在这种情况下是准备同

土耳其忍让的。

当然我不反对你发表声明说我曾收到关于英土会谈问题的情报，虽然我不能说这些情报是充分的。

3.预祝在北非的英国第1军、第8军和美国的军队即将开始的攻势获得成功，并且希望早日把德国军队逐出非洲。

4.在保罗斯元帅投降和顺利歼灭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敌军时，承致友好的祝贺，特表示感谢。

第11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2月12日收到

答复你1月30日来信。我已同总统商谈过，问题已提交大西洋两岸的两国的参谋部研究。我受权作出如下的联合答复：

（1）在东突尼斯有25万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希望如果不能更早的话就在4月消灭或赶走这些军队。

（2）当完成了这项任务以后，我们想在7月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更早一些夺取西西里，以便廓清地中海，促使意大利崩溃，其结果会影响希腊和南斯拉夫，并且消耗德国的空军力量。紧跟着将在东地中海发动一个军事行动，可能是攻击多得卡尼斯群岛。

（3）这一军事行动将涉及我们在地中海所能集合的全部船只和登陆艇以及我们所有的经过登陆攻击训练的全部军队，总计30万或者40万人。一旦建立了口岸和登陆基地，我们将尽力扩大战果。

（4）我们还在我们的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加紧准备在8月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在这里船只和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个军事行动由于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军力以便在9月再进行。什么时候进行这次袭击，当然要看当时德国在海峡对岸的防御情况而定。

（5）这两次军事行动都将有强大的美英空军进行配合，而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将有英国本土全部空军力量的配合。这两次军事行动加在一起将使英美船只的负担紧张到极点。

（6）美国总统和我已经命令我们的联合总参谋部必须尽量加快速度并以人力和物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来加强攻击的力量。

1943 年 2 月 9 日

第 11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2 月 14 日

今晚我们收到的关于解放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的消息和前此的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使我无法用言语向你表达我们对俄国军队的钦佩和感激。

我最热诚的愿望是作更多的事来帮助你们。

第 11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2 月 16 日

2 月 12 日收到你关于即将进行的英美军事行动的来电。

1.感谢你送来的关于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决议的补充报道。同时对来电（你说它也表达了美国总统的意见），我不能不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来电中可以看出，你原先预定在 2 月里结束在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现在这个期限推迟到 4 月。这样推迟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是不需要多加证明的。目前苏联军队还在继续进行广泛的进攻，正是在这个时候，英美军队在北非的积极行动是绝对必需的，从我们这个战线上和你们从突尼斯那方面对希特勒同

时施加压力，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并且会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造成极其严重的困难。到那时候你所预定的在西西里和地中海东部的军事行动就可以加速进行了。

至于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你的来电看来，只打算在8月到9月期间开始。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要求开辟西方第二战场的日期比上述日期早得多。为了使敌人无法复原，我认为从西方来的打击不应推迟到下半年，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

根据我们现有的可靠材料，从12月底起，当英美部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在突尼斯停止了活动的时候，德国人就把27个师从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本部调到苏德战场，其中有5个是坦克师。这样一来，非但没有把德国军队引离苏德战场来帮助苏联，反而便利了希特勒，由于英美减弱了在突尼斯的军事行动，使他有可能调动援军来反对俄国人。

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愈早共同利用希特勒匪徒前线上的困难条件，我们就愈有根据指望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如果在现在不考虑到这些，也不利用目前对我们大家都有利的这一时机，那么，德国人在经过喘息和集结力量之后可以恢复过来。你和我都很清楚，不应该做这种失算的事情。

2.我认为把这封复电同时寄给罗斯福先生是必要的。

3.谢谢你对解放罗斯托夫的热烈祝贺。我们的部队今天收复了哈尔科夫城。

1943年2月16日

第11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2月17日

1.关于你友好的来电我已通知土耳其人了。

现在土耳其政府授权我通知你，它很满意地准备通过有关的大使同你交换意见。我料想，土耳其人同你们驻安卡拉的大使曾有过适当的接触。

2.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知我国的大使说，他认为交换意见应尽早开始，并且最好是在莫斯科。他建议这次交换意见以阿达那会议为出发点，包括我提到的袭击普罗也什蒂空军基地等问题，以及，如果合适的话，规定到适当时候发表一个联合公报。

3.克拉克·寇尔爵士从我这里给你带去关于阿达那会议的比较完整的材料。很遗憾，由于天气不好，他耽误了一个星期。

4.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而不由你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请告诉我。

1943 年 2 月 17 日

第 11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2 月 25 日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答复你最近给我的电报。答复我已起草好了，但是我发烧得十分厉害，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暂时搁一下。希望在几天之内送致你关于全面情况的更多的材料。同时，你们所正在作的事简直是无法形容。在突尼斯的战斗还不错。敌人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而现在将被紧紧地钳住。

祝你好。

1943 年 2 月 25 日

第 11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3 月 2 日发出

我收到了你 2 月 17 日关于土耳其政府希望同苏联政府交换意见的来信。2 月 24 日我收到了经由寇尔先生转交的你送来的三份文件：（1）首相在阿达那会议上向伊斯梅特总统和土耳其代表团所作声明的提纲，（2）1943 年 1 月 30 日到 31 日在阿达那召开的英土会议的一致结论，（3）关于战后安全问题的备忘录。

感谢你送来的这些材料。

我认为有必要通知你，土耳其外交部长在 2 月 13 日向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声称，土耳其政府愿意就改善苏土关系问题同苏联开始谈判。苏联政府已经通过驻安卡拉的大使作了回答，欢迎土耳其政府关于改善苏土关系的愿望，并且表示准备开始会谈。现在正在等待土耳其大使返回莫斯科，我们是打算同他开始谈判的。

我想借此机会衷心地祝你痊愈并早日复元。

第 11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3 月 2 日

昨晚皇家空军向柏林投了 700 多吨炸弹。空袭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在 302 架四引擎轰炸机中损失了 19 架。

1943 年 3 月 2 日

第 11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3 月 3 日发出

向昨天轰炸柏林获捷的英国空军致敬。很遗憾，苏联空军由于致力于同德寇在前线的搏斗，暂时不能参加对柏林的轰炸。

第12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3月4日

1.由于天气不好，我们昨夜不能对柏林进行空袭，而把800吨炸弹投在汉堡，效果很好。如果注意到投下炸弹的时间是那样短，可以说，这次空袭是特别猛烈的。在今后几个月内，我们将不断增加空袭时的投弹量以及袭击次数，我希望让纳粹分子好好吃些苦头，使他们不要像到目前为止所表现的那样热中于战争。除了给他们的生产制造困难之外，我们正在迫使他们愈来愈多地将后备力量转移到高射炮队和其他各种防御措施方面去。

2.请接受我的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解放了利舍夫。从我们在8月里进行的谈话中，我知道你对解放这个据点是多么重视。

3.关于对你16日来电的答复问题，我正在同罗斯福总统商量，希望最近就可以把我们共同的答复送给你。

1943年3月4日

第12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3月6日发出

关于顺利地轰炸汉堡一事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向英国空军致敬，并对你加紧轰炸德国的意图表示欢迎。

感谢你对我军收复利舍夫的祝贺。今天我们的部队攻下了格札茨克城。

等待你和罗斯福先生对我2月16日去电的答复。

第12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3年3月6日

昨天夜里我们在良好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埃森大约两平方英里的面积上投下了468吨烈性炸弹和518吨燃烧弹（共986吨）。

1943年3月6日

第12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3月11日

1.罗斯福先生已送来他对你2月16日整个电报的答复的副本。我现在身体已经好到也能来亲自答复你。

2.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采取一个军事行动把轴心国军队从北非清除出去，这个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我将在下封信里告诉你。我们希望这项任务能够在4月底完成，到那时大约会有25万轴心国军队被我们牵制住。

3.同时，我们正在努力进行一切准备，以便于6月实行新代号为“爱斯基摩”的那个战役（请见我下次去电），这比我们在卡萨布兰卡所预定的要提早一个月。

4.我们也正在研究地中海东部的作战计划，例如：

（1）占领克里特或者占领多得卡尼斯群岛，或者同时占领这两个地点。

（2）在希腊登陆。

对这个战役的日期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爱斯基摩”的结果和有必要数量的船只和登陆的工具。当然，土耳其的援助和对土耳其机场的利用会提供很大的便利。我将在适当的时机提出这个要求。

5.由于敌人的兵力强大，雨季即将来临，土地已经又湿又松，以及从阿尔及利亚伸展出去的500英里的交通线和从朋恩伸展出去的160英里的交通线要依赖坏的公路并且要在法国人筑的单轨铁路上走一星期之久，英美在12月放弃了一口气拿下突尼斯和比塞大的企图。由于敌人轰炸密集和潜水艇袭击频繁，只能小规模地把供应从海上运给军队。因此就没有可能在前进地区积累汽油或者其他供应。的确，我们只能刚够供养已经在那

里的部队。空军的情况也是一样，临时修造的飞机场变成了泥淖。当我们在那里停止进攻的时候，在突尼斯全境有4万左右德国人，此外还有意大利人和隆美尔，他还在的黎波里。现在在突尼斯北部的德国部队比当时已经增加了一倍，而且他们正在用运输机和驱逐舰赶运去每一个能够运去的士兵。在上月底我们曾遭到了几次局部的严重挫折，但现在已经恢复了阵地。我们希望由于这次失利而造成的耽搁会由于蒙哥马利的军队的提前进攻而得到弥补，他的军队在3月底以前应该有6个有充分供应的师（大约20万人）从的黎波里向马列特阵地进军。在3月6日，蒙哥马利就已经打退了隆美尔的先发制人的进攻，并使敌人遭到极大的损失。在突尼斯北部的英美军队将配合蒙哥马利的战斗。

6.我想你可能想知道这些细节，虽然这同你所指挥的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较起来，规模是小的。

7.据英国参谋部估计，去年11月以后从法国和低地国家调往苏德战场的一些德国师中有一半左右已经主要由从俄国和德国调来以及部分由在法国新组成的师所代替。他们估计目前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有30个德国师。

8.我急于让你确切地知道一件供你个人参考的绝密情报，即我们有多少军事资源可用于横跨地中海或者英吉利海峡以进攻欧洲。英国军队的绝大部分是在北非、中东和印度，实际上没有可能把他们从海上运回英伦三岛。到4月底，除蒙哥马利将军的6个师以外，我们在突尼斯北部将会有5个师大约20万人。同时，我们正从伊朗调来两个受过特别训练的英国师并从本国派去一个师，以加强为实现“爱斯基摩”所必需的军力。这样总共有14个师。我们在中东有4个英国摩托机械化师，两个波兰师，1个自由法国师，和1个希腊师。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有相当于4个普通步兵师的部队。除了警备队和边防部队以外，我们在印度已经组成和正在组织10到12个师，以备在雨季以后收复缅甸和重新打通和中国的联系，这个军事行动的代号将在下一封信里告诉你。这样，在英国指挥下分布在从直布罗陀到加尔各答的6,300英里长的地区内有38个师，包括强大的装甲部队和大量空军部队。我们已经为所有这些部队规定了1943年的积极的和确定的任务。

9.一个英国师的总的力量，包括特种兵、步兵和通讯部队，可以估计为4万人左右。在英国本国还有19个已组成的师、4个本土防卫师和4个补充师。其中有16个师正在为8月间跨过海峡的军事行动进行准备。你应该记得，我们的总人口是4,600万，而他们必须首先满足皇家海军和商船的需要，因为没有它们我们不能生存。其次最需要人力的就是我们很庞大的空军，差不多有120多万人，以及军火工业、农业和防空。因此，我国全部的男女人力现在已经而且相当时期以来已经完全用上了。

10.去年7月美国曾想派27个师（每师4、5万人）到英国来，准备进军法国。那时以来，他们已把7个师派去参加“火炬”战役，还有3个师也将参加。在英国目前只有一个美国师，至少在两个月内不会有更多的军队来。到8月时，他们希望除了大量空军外，还会有4个师。这并不是贬低美国所作的努力。这些行动之所以远没有达到去年的期望，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么多军队，而是因为缺少供调遣的船只和护航舰只。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在上述时期内把比我已经提到的更多的部队运到英国来。

11.联合王国的轰炸攻势一直都在发展着。2月间向德国和德国占领地区投了1万吨以上炸弹，而在3月初已有4,000吨炸弹落到德国。我们的空军参谋部认为，德国第一线的4,500架战斗机中目前有1,780架在俄国战线上，而其余的都集中在德国以及西方、地中海战线上来对付我们。此外，还有意大利的空军，共有第一线飞机1,385架，其中绝大部分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12.关于横渡海峡进攻的问题，美国总统和我真诚希望我们的部队能参预你们以如此惊人的勇敢在进行着的欧洲的总战斗。但是为了维持在北非、太平洋和印度的军事行动和把供应运送给俄国，联合王国的进口计划已被减到最低限度，而且我们已经还在消耗我们的储备。但是，如果敌人有一定程度的减弱，我们准备在8月以前进攻，计划每星期都有调整。如果敌人不减弱，用劣势的和不足的部队作过早的进攻只会导致血腥的败退、纳粹分子对当地起义人民的报复、以及敌人的大胜利。海峡形势只有在更加接近实际进攻的时候才能作出判断。为了你个人的参考，我已向你说明

了我们在海峡方面的意图，但是不能把我的说明理解为限制了我们作出决定的自由。

1943 年 3 月 11 日

第 12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3 月 11 日

对我上次的去电作如下补充：

1. 第 2 段中提到的战役的代号是“火神”。

2. 第 3 段中提到的是矛头指向西西里的。

3. 第 8 段中提到的战役的代号是“阿那基姆”。

1943 年 3 月 11 日

第 12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3 年 3 月 11 日

我刚才看了一部关于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和俘虏保罗斯的很好的影片，这部影片使我非常满意。我们第 8 军的前线随军摄影记者摄制了一部第 8 军在沙漠中取得胜利的实录。我已经责成他们把解说词译成俄文，我现把这个影片寄给你一部，希望你能够抽时间看一下。

我相信，如果第 8 军的官兵知道，他们的同盟者、苏联的武装部队和各族人民将看到他们胜利斗争的实录，他们将会引以自豪。

1943 年 3 月 11 日

第 12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3 月 13 日

1.关于我最近的去电，我很希望作为元帅和总司令的你能够把信中的第8、第9和第10段当做向你提出的关于军事行动问题的个别信件来研究。希望这几项不要传出你我两人之外。

2.昨天夜里我们又用400架飞机向埃森进行了一次袭击，损失了飞机23架。但是，根据报道的情况，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袭击几乎是紧接着对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和埃森的袭击之后进行的。毫无疑问，这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的空袭对德国人的士气是有影响的，我想希特勒将不得不下令进行他力所能及的最猛烈的报复。他在西方拥有很大一批轰炸机以备我们登陆时在沿海地区使用。我们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迫使他动用这批力量来反对英国，在这里我们将热烈地欢迎它们，并为将来的战役扫清道路。

3.衷心地祝贺你在威士马取得的胜利，并诚恳地希望你在哈尔科夫取得彻底胜利。

1943年3月13日

第12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15日发出

3月12日美国大使斯丹特里先生代表美国政府交给莫洛托夫先生以下的电文：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建议由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芬兰之间进行斡旋，以便探寻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莫洛托夫先生曾问道，美国政府是否得到过情报，芬兰愿意和平以及它的真正态度如何，斯丹特里先生答称对这个问题他不能说什么。

如众所周知的，1842年5月28日的英苏条约规定，我们两国非经相互同意不能同德国或其盟国谈判单独媾和。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不可变更的原则。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义务第一，把美国的建议通

知你，第二，征求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我没有理由相信芬兰真正要求和平或者已经决定和德国分手并准备提出可以接受的条件。在我看来，芬兰尚未摆脱希特勒的手掌，即使它有这种意图的话。芬兰目前的统治者同苏联缔结过和约，后来又违反了它而和德国结盟一起来进攻苏联，这种人未必会同希特勒决裂。尽管如此，鉴于美国政府的建议，我认为有义务把上述情况通知你。

第12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15日

3月6日和13日发出的通知对埃森、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空袭顺利的来电已经收到了。衷心感谢英国的空军，它对德国各个工业中心展开了袭击。

你希望我把你3月11日来信的第8、9和10段看作是特别的军事情报，我是会这样来看待的。

感谢你对收复威士马的祝贺。可惜，我们今天不得不从哈尔科夫撤退。

刚刚收到你3月11日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第8军的影片，我是不会不看它一下的，并且将使我军和我国人民都可以看到这部片子。我懂得，这对于我们的战斗友谊来说是如何的可贵。请允许我送给你个人一部苏联影片“斯大林格勒”。

1943年3月15日

第129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15日

对我 2 月 16 日去信的复信已经收到了。

从来信中可知，英美在北非的军事行动显然不仅没有提早，相反却推迟到 4 月底。即便这个日期，也还不怎么肯定。这样，在我们对希特勒军队作战的最紧张阶段，即在 2、3 月间，英美在北非的攻势不仅没有加强，而且根本没有展开，并且还推迟了你们自己所规定的军事行动的日期。就在这同时，德国成功地把 36 个师（包括 6 个坦克师）从西方调过来对付苏联军队。显而易见，这给苏联军队造成了您样的困难，而使德国人在苏德战线上的地位得到了怎样的缓和。

“爱斯基摩”计划虽然极端重要，但是它当然不能代替在法国的第二战场。虽然如此，我仍然肯定地欢迎你所提出的加速这个军事行动的意见。

像过去一样，我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你还记得，你曾认为在 1942 年就已经有可能开辟这样的战场，而且无论如何不会迟于 1943 年春季。你的这种看法当时是有充分根据的。很自然的，我在上次电报中已着重指出有必要不迟于今年春季或夏初从西面发动进攻。

苏联军队整个冬季都在进行紧张的战斗，一直继续到现在。希特勒正在采取重要的新措施，想补充和加强他的军队来对苏联发动春夏季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从西面的攻击不再予以推迟而应该在春季或夏初实现，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研究了来电第 8、9 和 10 段中关于英美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有困难的论据。我认识到这些困难。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有责任以最坚决的态度警告你，从我们共同事业的观点出发，再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将有很大的危险。因此，你对计划中横渡海峡的英美攻势说得不肯定，引起了我的忧虑，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保持沉默。

1943 年 3 月 15 日

第13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20日

1.对你3月15日关于美国人就芬兰问题向你提出请求的电报表示感谢。

2.你是最能够判断，如果能使芬兰退出战争，这对于你们斗争的战线会有多么大的军事价值。我设想这将会使苏联能够比德国解脱出更多的师来以供在其他地方使用。此外，芬兰从轴心国脱离出来，可能对希特勒的其他仆从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3.把最亲德的芬兰部长从新政府排斥出去，看来是对社会舆论的让步，也好像是证明要摆脱德国监督的愿望。这样，这件事可能是芬兰改变政策的准备阶段，只要认为改变政策的时机已经来到了的话。虽然我所有的情报不是很完整的，但它说明了，芬兰人对谈判大概还没有考虑成熟，我还是认为，近几个月以来在你们战线上所发生的事件将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他们是不得不仰赖德国人曾答应从目前起到5月的这一阶段内向他们供应的粮食。在得到这些供应之后，芬兰大概可能不要德国的粮食供应也能维持到年底。

4.一般说来，我认为芬兰人一旦确信德国必将失败就会急于要退出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现在似乎时间并不过早，你可以问一问美国政府它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可以在不泄露你们利益的情况下去了解一下芬兰人愿意接受怎样的条件。但是，你当然是正确策略的最好的判断者。

1943年3月20日

第13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23日

1.我们在突尼斯的主要会战目前正处在非常紧张的阶段。3月17日美国从西方开始了进攻。3月19日夜第8军对马列特阵地的工事进行了攻

击，目前正穿过这些工事继续向西北方向进攻。同时新西兰军团用强大的装甲部队经过长达150余英里的迂回行军之后在加培斯以西大约30英里的地方攻陷了敌人的后方阵地。该军团还报告说：他们正在朝目的地——加培斯——附近的狭窄地带挺进。我们的包围圈内有将近7万名德国人和5万名意大利人，但现在来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为时太早。你自己可以根据地图判断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将把发生的情况随时告诉你。

2.英国的飞机场上10天来都有雾，这样就阻挠了我们空军的出击。只要天气一好转，我们就会以更大的威力重新开始空袭。我给你寄去一些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出破坏的结果，特别是对埃森破坏的结果，我相信，你将像我一样，喜欢这些照片。

1943年3月23日

第13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27日发出

关于在突尼斯进行的主要会战的情况的来电收到了。祝英美军队迅速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现在你们能够摧毁和击溃敌人，把他们统统赶出突尼斯。

我也希望对德国的空袭不断地加强。我将感谢你寄给我关于埃森破坏情况的照片。

第13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3月27日

尊敬的斯大林，

我任命了三级巴塞勋章、战斗功勋奖章、军功十字章获得者格·勒·克·马戴尔中将为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

马戴尔将军是位高级将领，曾在英国军队中历任高级职务，在敦刻尔克失守以前是驻在法国的一个师的师长，不久以前是皇家装甲部队的司令官；我特地选他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觉得他具有你和苏联军事当局所喜欢的那种军人品质和个性，这些将保证他的代表团取得成就。当我把具有卓越的履历的一名出色的军官派往苏联的时候，我想着重指出：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此把我们最优秀的军官之供你指挥，请给予他完全的信任。他早在1936年就有机会在演习期间见到过红军，现在他希望在战争的严重考验中同它恢复旧交。我相信你会发出必要的指示，使他能够有一切必需的条件来达到这个目的。

你的忠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3年3月27日

第13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28日

1.昨天夜间395架重型轰炸机在50分钟内向柏林投了1,050吨炸弹。目标上空很晴朗，所以袭击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是柏林到目前为止所受到的袭击中最厉害的一次，我们只损失了9架飞机。

2.在突尼斯的会战在稍有停滞之后又重新开始好转；我刚才接到的报道说，我们的装甲部队在进行包围之后现在驻扎在离埃尔哈玛2英里的地方。

3.昨晚我看了影片“斯大林格勒”。这部影片简直是宏伟极了，它给了我国人民最令人振奋的印象。

1943年3月28日

第13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29日

3 月 28 日的来电收到了。

祝贺英国空军对柏林所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获得胜利。

希望英国装甲部队能够充分利用在突尼斯已经好转了的局势，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昨天我和同事们一起看了你送来的影片“沙漠里的胜利”，这部影片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它绝妙地描绘了英国是怎样在进行着战斗，并且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这些人在我国也有），据他们说，英国似乎不在战斗，而是站在一旁观战。我以迫切的心情等待着关于你们在突尼斯的胜利的类似影片。

“沙漠里的胜利”这部影片将在我们前线的全体军队中和国内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普遍放映。

1943 年 3 月 29 日

第 13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3 月 30 日

德国人在那尔维克集中了强大的作战舰队，包括“透匹兹”号、“夏恩贺司特”号、“吕卓夫”号、1 艘备有 6 英寸炮的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因此去年 7 月 18 日我给你的信里所描述的对于俄国护航舰队的威胁重又以一种甚至更为危险的方式恢复了。那时我曾告诉你，我们认为不应该让我国本土的舰队在巴伦支海冒险，因为在那里它将没有充分的保护而处于德国海岸基地的飞机和潜水艇的攻击之下，我还说明过，如果我们最新式的战舰中的一艘或两艘被击沉或者即使受到严重损伤，而同时“透匹兹”号和德国舰队其他的大型舰只却可以继续作战的话，对大西洋的整个控制将陷于危殆，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2. 因此罗斯福总统和我万分不得已地决定，对于下一次开往俄国的护航舰队不可能提供适当的保护，而如果没有这种保护，任何船只冒着已经

知悉的德国人为破坏它们所作的准备，将绝对不会有机会到达你们那里。因此我们已经发出命令，延缓原定3月出发的护航舰队的航期。

3.不得不延缓这次护航舰队的航期，对于罗斯福总统和我来说是很失望的事，要不是德国人集中了舰只的话，我们已经坚决打算在3月间和5月初各派遣给你们一支由30只船组成的护航舰队。同时我们认为应该立刻让你们知道，5月上旬以后将不可能继续通过北方航线来派遣护航舰队，因为从那时起，每一艘护航舰都需要用来支援我们在地中海的进攻，只留下最少限度的舰只来保护我们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在这条路线上我们在最近三周内遭受了几乎是空前重大的损失。如果，“爱斯基摩”战役进展良好，我们希望在9月初恢复护航舰队，只要那时德国主力舰只的部署许可我们这样做，而且北大西洋的情况允许我们提供必要的护航舰只和掩护力量。

4.我们正尽力增加通过南方路线的供应。每月运输量在过去六个月内已经增加了一倍多。我们有理由希望运输量能够进一步增加，并且到8月能够达到24方吨。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十二个月内每月运输量将增加八倍。除此以外，美国将大量增加经过海参崴运输的物资。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我们双方对于停止派遣北方运输舰队所产生的失望。

1943年3月30日

第13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3月30日

昨天夜里我们又派了370架飞机向柏林投了700吨炸弹。根据第一批报告，结果极好，

第13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2日发出

我收到了你3月30日的来电，其中谈到由于需要，你和罗斯福先生在9月以前不得不停止向苏联派护航舰队。我把这一出乎意外的举动理解为英国和美国向苏联提供军事原料和军备的一种灾难性的缩减，因为通过太平洋航路的船只有限，并且不大可靠，而南线的运输能力又不大，因此北方航路停止运输以后不能以这两条航路来弥补。不用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苏联军队的处境。

第13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4月6日

1.我承认你在来电中关于护航舰队所说的一切是有根据的。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力作任何可能作到的改善。我深深地意识到俄国陆军所担当的巨大负担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无比的贡献。

2.星期六我们派了348架重轰炸机到埃森投掷了900吨炸弹，以便加剧对克虏伯工厂的损伤（这次又有效地击中了）和破坏以前空袭中损失很小的该城的西南部分。昨天晚上507架飞玑，其中除了166架外都是重型，在基尔投掷了1,400吨炸弹。这是我们至今轰炸吨数最多的一次。云层比我们预料的要厚，但是我们希望空袭击中了要害。美国空中堡垒的白天轰炸越来越有效了。昨天它们袭击了巴黎附近开始复工的雷诺工厂。它们除了在白天从很高的高空以惊人的准确进行轰炸外，还激起敌人战斗机的反击，这样空中堡垒的重武器就可把它们中间的许多架飞机击毁。在这三次空袭中损失了4架美国轰炸机和大约33架英国轰炸机。我现在必须强调，我们对德国的轰炸将逐月扩大规模，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更有把握地找到目标。

3.本周将在突尼斯开始全面战斗，英国的第8军和第1军以及美国和法国的军队都将按照计划加入战斗。敌人正准备撤退到最后的桥头堡。他们已经开始爆破并从斯法克斯撤走沿海的炮队。在受到即将重新施加的压力的情况下，他们似乎像要迅速地撤退到他们正在加强的从哈马麦特湾的

恩斐达维尔起始的一线。这个新的阵地将延续到他们目前在突尼斯所守的西面的主要战线上，阵地的北翼达到地中海离比塞大约30英里的地方。对这个北翼我们也在进行攻击。我将随时通知你关于我们进展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在他们到达最后的桥头堡以前切断所谓“隆美尔军”的大股部队。

4.希特勒以他一贯的固执劲正在把赫尔曼·戈林师和德国第99师派往突尼斯，主要是靠空运，在这个行动中至少使用了100架大型运输机。这两个师的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因此我们必须预期在突尼斯尖端将有25万人（减去途中损失的人数）的顽强抵抗。我们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有着相当的优势。我们正在破坏运送燃料、弹药、运输工具等等的大量船只。我们在占领了南部机场以后，就可以开始对港口进行极猛烈的不断的空袭，而我们还在作一切准备，以防止敦刻尔克式的逃脱。对“爱斯基摩”战役说来，这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占领比塞大和突尼斯以后大约一个月，我们希望就能够在地中海行驶军用运输补给船，以缩短到埃及和波斯海的路程，

1943年4月6日

第14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6日

北非最高司令部刚才向我报告说，蒙哥马利将军的军队在突然袭击了敌人并加以压服之后突破了阿卡里特战线，这个战线的全部控制性阵地现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现在蒙哥马利将军正在使自己的装甲部队通过缺口向后方开阔得多的地方挺进。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已经俘虏了2,000人，而且俘虏的人数正在增加中。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在凯卢安方面的攻击（关于这点我在上一次给你的信中已谈到），进行得令人很满意。

我知道你是很喜欢听到好消息的。现在正在继续追击。

第 14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7 日

被蒙哥马利的装甲部队跟踪追击的敌人正在向北方逃窜。目前已擒获 6,000 名俘虏。

第 14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7 日

4 月 6 日的两封来电和今天关于贵军在突尼斯的重要进展情况的来电收到了。祝贺你获得重大的胜利。希望英美军队这一次将彻底打垮并粉碎隆美尔以及在突尼斯的其他的希特勒匪帮。这对我们共同斗争的整个事业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对扩大对埃森、柏林、甚尔和德国其他工业中心的轰炸表示欢迎。你们的空军对德国重要城市的每一次打击，在我国千百万人的心中都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应，

1943 年 4 月 7 日

第 14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4 月 10 日

1.在已经取消了的 J.W.54 和 J.W.55 两个护航舰队中有给你们的 375 架“旋风式”战斗机和 285 架“空中眼镜蛇”和“小鹰”式飞机。后者是美国提供的数额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制定尽快通过其他路线把所有这些飞机运送给你们的计划。

2.“空中眼镜蛇”和“小鹰”可能经直布罗陀和北非去阿巴丹。“旋风”式飞机没有足够的飞行半径可以飞抵直布罗陀，因此，可能把它们经海路运往塔科拉第或卡萨布兰卡，在那里装配，装上热带设备，然后自行飞抵德黑兰，到德黑兰后，我们可以把它们的热带设备拆下来。在另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很快就能攻占突尼斯，我们可能把一些“旋风”式飞机从海路经地中海运往埃及或巴士拉装配。这两种办法中，每种都有自己的困难。运输大量的飞机零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会克服这些困难的。

3.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你为了在俄国战场上同德国装甲部队进行战斗，希望得到一些我们的装备有40毫米口径炮的“旋风”式飞机。不久以前在突尼斯的战斗中这些飞机对隆美尔的坦克所进行的袭击是很有成效的。由16架飞机组成的一个航空中队在4天中消灭了19辆坦克。这种飞机的名称叫“旋风IID”，装备有两门40毫米口径的炮，每门炮有16颗炮弹，还有两架口径为0.303英寸的机枪，每架有303颗子弹。它同“旋风IIC”相比，除了重430磅和时速大约慢20英里以外，没有其他的差别。我最多可以供给你60架这种类型的飞机。请告诉我，你是否希望得到这些飞机。可能这些飞机要经过塔科拉运去，它们也许会被列入正在编拟中的提供“旋风”式、“空中眼镜蛇”和“小鹰”三种飞机的计划之内（这三种飞机本来是要由护航舰运去的）。

4.美国总统同意由哈里曼先生同我们一起来制定这个计划。我想在下星期把我们的具体建议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使你尽快地得到这些飞机，只要我有力量把它们送达你处的话。

1943年4月10日

第14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11日

1.所有的纳粹法西斯军队都在往恩斐达维尔的战线上撤退，关于这点

我已对你讲过了。我们的装甲部队已从西面冲向凯卢安。第8军正向北方推进，而且我们准备用第1军给他们严重的打击。我们正在作巨大的努力，使得敌人在企图从海上逃窜的时候，要付出重大的伤亡。我希望很快就能把从非洲传来的好消息转告你。在包围网中的敌人有20多万人，其中包括伤员，我们擒获了25,000名俘虏，不包括打死的，被打死的估计可能有5,000到1万名。

2.空战。我们派遣了378架飞机去杜伊斯堡，第二天夜间又派去了103架。昨天夜里派了502架飞机去法兰克福。我们给了这两个城市很大的打击，但是受到了稠密的云层的影响。我想你已经收到有关破坏情况的短影片和照片，我将按期把这些影片寄给你，因为这些影片会使你们的士兵们感到满意，他们曾经看见过无数被破坏了的俄国城市。

3.我正在尽量想办法，只要地中海一开放，就把一些快速轮船经地中海往波斯湾给你们运去首批物资。这些物资中包括用我妻子的基金购买的一些特种药品和医疗设备，这种基金是由自愿捐款建立起来的，不论穷人和富人都捐了款，它不久将达到300万英镑。这笔基金是英国人民热情对待俄国人民的例证之一。

1943年4月11日

第14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12日

4月10日和11日的来信都收到了。

英美在突尼斯的推进发展得很快，这在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中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希望你们歼灭敌人并俘获尽可能多的俘虏和战利品。

我们很高兴你们不给希特勒喘息的机会。除了你们对德国大城市进行有力和成功的轰炸以外，我们现在又加上了我们对东普鲁士德国

工业中心的空袭。感谢你送来的描绘埃森被炸后的情景的影片。这部影片以及你所答应送来的其他电影都将广泛地放映给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看。

你所拟定的把取消了的护航舰队所载运的战斗机运来的计划，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也十分感谢你提出愿运给我们60架装有40毫米口径炮的“旋风”式战斗机。这种飞机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对付重型坦克，我希望你和哈里曼先生为给苏联运送飞机而进行的编制计划和保证运出的工作迅速获得成功。

我国人民十分珍视英国人民的热情和同情，这种情感已表现在你所提到的援俄医药基金的建立上。请把我的谢意转达给你的夫人，感谢她作为基金的主持人在这方面的积极活动。

今天我接见了马戴尔中将，他把你的信交给我了。当然，我们将给马戴尔将军一切协助，以便他可以了解红军和它的斗争经验。

1943年4月12日

第14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17日

1.不久以前你在给我的电报中说到：“我对扩大对埃森、柏林和德国其他工业中心的轰炸表示欢迎。你们的空军对德国重要城市的每一次打击，在我国千百万人的心中都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应”。我们的空军轰炸部队总司令很想把这段话转达给他的各个航空中队，这些话的确会使他们感到很高兴。你允许这样做吗？或者可以把这段话刊载在报上。这样做，除了良好的效果外，我本人看不出会引起任何其他的后果。对这一点你的意见如何？

2.这个星期内我们对下列几个地方进行了三次有效的袭击：斯派西亚、斯图加特，昨天夜里还袭击了普尔森的斯柯达公司的工厂和曼海姆城。第

一次袭击用 174 架飞机投了 460 吨炸弹，但是由于烟雾的关系使斯派西亚城市遭受的损失比停泊在港口的船只要大。第二次袭击（对斯图加特）获得了辉煌的成绩。参加袭击的有 462 架轰炸机，投了 750 吨炸弹。昨天夜里我们派了 598 架飞机去轰炸上述两个目标，当时投了 850 吨左右。根据现已接到的关于斯柯达工厂损失情况的消息，可以知道效果很好，虽然照片还未收到。对斯柯达工厂的袭击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埃森遭到破坏后敌人已把工人和重要的订货从克虏伯工厂转移到那里去了。在这三次袭击中我们损失了 81 架轰炸机，其中有 64 架重型轰炸机和将近 500 名熟练的空军人员。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保证：在夏季我们将以愈来愈大的规模继续进行空袭。我们很高兴，你对纳粹的军火工厂也在给予打击。

3.目前在突尼斯需要有个短期的间歇，在间歇期间亚历山大将军可以重整自己在北部的队伍，同时蒙哥马利将军将把他在战役中常使用的那些炮队调过来。然而很快就要开始一场巨大的战斗，这场战斗会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这次战争中所进行的最巨大的一次，并且一旦开始以后，不到把轴心国军队从非洲清除出去是不会停止的。

1943 年 4 月 17 日

第 14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4 月 19 日

从西班牙传来的谣言说德国人准备在俄国战场上使用毒气，我知道你也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情报。去年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候曾经有过同样的风声，请告诉我，你是否希望由我重复一遍我去年曾经作过的声明：为了答复向贵国进行的任何化学攻击，我们将立刻从空中以最大的规模给予德国以化学反击。我们一旦说出了恐吓的话，就完全有能力可以做到。

1943 年 4 月 19 日

第 14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19 日

我已经收到来电，其中你要求我同意把我对轰炸埃森、柏林和德国其他工业中心表示祝贺的一段话向英国的各个轰炸机队传达。当然我不反对你的建议。这一问题请你自己决定。你准备以愈来愈大的规模继续轰炸德国的城市，这使我很高兴。

看来在突尼斯的情况进展得很顺利。预祝你获得彻底的胜利。你关于德国人准备在我们的战场上使用毒气的情报，也被我们得到的材料所证实。我当然完全支持你的建议，希望你警告希特勒及其同盟者一下，并且当他们一旦在我们战场上使用毒气袭击时，就用强大的化学袭击来威胁他们。苏联军队也准备给予反击。

1943 年 4 月 19 日

第 14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4 月 20 日

在突尼斯的战斗开始了。亚历山大将军向我报告说，第 8 军已在今天夜里（从 19 日夜到 20 日晨）转入攻势，其他各军将按照总的进攻计划投入战斗。在这些战役中将有强大的部队参加，其中包括英国的第 1 军和第 8 军以及数量有限的美国军队。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经过辽阔的海洋调拨过去的。准备用不断施加压力的办法，尽可能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

在突尼斯的尖端部分和西西里岛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在这次战斗中德国的运输机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1943 年 4 月 20 日

第15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21日

苏联政府认为近来波兰政府对苏联的行为是非常不正常的，是破坏两个盟国相互关系中的一切规则和准绳的。

德国法西斯分子借口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些波兰军官被杀害的事件（其实这些军官就是他们自己杀死的）在德军占领区展开的敌视苏联的诬蔑宣传立刻得到了西科尔斯基政府的随声附和，波兰的官方报纸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煽动。西科尔斯基政府对法西斯对苏联的这种卑鄙的诬蔑不但不予以反击，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向苏联政府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或者请求就此事进行解释。

希特勒当局在对波兰军官们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后，正在排演调查的活剧。他们利用从波兰占领区去的几个波兰亲法西斯分子（其实有些人就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来充任这种角色；在被占领了的波兰，所有的人都处于希特勒铁蹄之下，正直的波兰人是不敢公开发表意见的。

西科尔斯基政府和希特勒政府都找国际红十字会帮助进行“调查”。国际红十字会在靠绞架和大批屠杀和平居民来维持的恐怖制度下被迫不得不参加希特勒导演的这次调查活剧。这种背着苏联政府而进行的“调查”是不可能使任何正直的人相信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敌视苏联的宣传是在德国和波兰的报刊上同时开始的，而且搞得一模一样，根据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盟国的敌人——希特勒——同西科尔斯基政府之间在进行这一敌对宣传的时候是有接触和勾结的。

当苏联各族人民正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残酷的搏斗中流血牺牲的时候，当他们正在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击溃爱好自由民主的各国的共同敌人的时候，西科尔斯基政府为了迎合希特勒的暴政竟对苏联进

行背信弃义的打击。

所有这些情况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认为，波兰目前的政府已滚到同希特勒政府勾结的道路上去了，它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并且已经站到敌视苏联的立场上去了。

根据这一切，苏联政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同这个政府中断关系。

我认为有必要把上述情况通知你，并且希望英国政府了解苏联政府被迫采取这一措施的必要性。

1943 年 4 月 21 日

第 15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24 日

1. 迈斯基大使昨晚把你的信交给了我。当然我们将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和任何其他组织在处于德国人统治下的任何领土上进行任何“调查”。这种调查只是一种骗局，它的结论将是用恐怖手段取得的。艾登先生今天将会见西科尔斯基，他将尽可能坚决地要求西科尔斯基对在纳粹分子的祖护下所进行的任何调查不要给予任何道义上的支持。我们从来也不赞同德国人举行什么会谈，或者同他们进行什么接触，并且在我们的波兰盟国面前我们也将坚持这个主张。

2. 我将钯西科尔斯基对上述意见的反应打电报告诉你。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根本不是亲德的或者同德国人有什么勾结，但在波兰人认为他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的人民反对苏维埃的情况下，他就有被波兰人赶下台的危险。如果他下了台，那我们所得到的人将要更坏。因此我希望，与其把你关于“中断”关系的决定理解为决裂，不如理解为最后警告，至少在用尽其他各种办法以前，这项决定无论如何是不能公布的。公开宣布决裂很可能在美国造成极为重大的危害，在美国的波兰人是很多的，而且是

有影响的。

3.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电报草稿，请求你考虑允许增加一些波兰人和由他们瞻养的人去伊朗的问题。这样可以减少在伊朗组成的波兰军队中正在增长的不满，而且也使我有可能影响波兰政府，使它能够根据我们的共同利益为着反对共同敌人而行动。由于收到了你的电报，我把发出这封电报的时间推迟了，我希望情况能够得到澄清。

1943 年 4 月 24 日

第 15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25 日

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收到了。感谢你过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应当通知你，同波兰政府中断关系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的，并且今天维·米·莫洛托夫就要送交关于同波兰政府断绝关系的照会。我所有的同事们都这样要求，因为波兰的官方报纸一分钟都不停止敌对的宣传，甚至变本加厉了。我也被迫不得不考虑到苏联的舆论，波兰政府的忘恩负义和背信行为使苏联人民感到非常愤慨。

至于公布苏联同波兰政府中断关系的文件的问题，很遗憾，不公布是绝对不行的。

1943 年 4 月 25 日

第 15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4 月 25 日

昨天晚上艾登先生会见了西科尔斯基将军，西科尔斯基声称，他的政府对红十字会的态度和德国人的态度绝对不是事前约定的，他的政府是主

动地采取行动的，并不知道德国人将采取什么作法。实际上德国人是在无线电中收听到了波兰人的声明之后才开始行动的。西科尔斯基并且通知艾登先生说，他的政府曾同时向鲍果莫洛夫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西科尔斯基强调指出，在此以前他曾几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一些失踪军官的问题，并且有一次曾亲自向你提出过。按照他的指示，波兰情报部长发表了广播演说，坚决反对德国的宣传，这个演说还引起了德国人忿怒的回击。由于艾登先生的一再要求，西科尔斯基答应不坚持要求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且他将分别通知红十字会在伯尔尼的各个组织。同时他将制止波兰的报纸继续进行论战。因此我在考虑是否能使在英国的那些曾经攻击过苏联，同时也攻击过企图同苏联政府进行合作的西科尔斯基的波兰报纸沉默下来。

鉴于西科尔斯基已担负起了这样的义务，现在我想请求你放下任何中断关系的想法。

我曾再次考虑过这一问题，并且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坚信，一旦苏波两国政府之间发生裂痕，它只能对我们的敌人有利。德国的宣传机构之所以制造这种事情，就是为了想在同盟国家的队伍中造成裂痕，并且使它的想迷惑世界的新企图，好像有一些根据的样子，它的这种企图就是说服世界的人民：德国正在保卫欧洲的利益和各个弱小民族的利益，免受欧洲境外的大国的侵犯，它所说的欧洲境外的大国就是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不列颠帝国。

我很了解西科尔斯基将军，并且我相信在他或他的政府同我们的共同敌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接触或协议，他正领导波兰人同这个敌人进行残酷的、顽强的反抗。尽管我相信他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不是同德国人勾结起来搞的，但很明显这种行动是错误的。

我希望现在，当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你在给我的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回过头来再谈一下我在 4 月 24 日去电中提到过的电报草稿中的建议。因此我最近将把这封早已写好的信按原来起草的辞句寄给你。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解决这些波兰人离开苏联的问题，那么西科尔斯基就比较容易完全放弃他的舆论界迫使他接受的那种立场了。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

1943 年 4 月 25 日

第15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4月30日

1.你连让我把我同西科尔斯基将军接触（关于这点我在4月24日已打电报给你）的结果通知你的时间都不给我，就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断绝同波兰人的关系，对此我不能抑制我失望的心情。我曾经希望，根据去年我们签定的条约的精神，对这样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到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时，我们将永远彼此协商。

2.艾登先生和我曾向波兰政府指出，当它用侮辱性的责难来反对苏联政府并且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是在支持纳粹分子的恶毒宣传的时候，同苏联恢复任何友好关系或者合作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容忍由国际红十字会在纳粹分子的庇护下和在纳粹分子恐怖主义的影响下进行调查。我很高兴地通知你，波兰政府同意了我们的见解，并且表示愿意忠诚地同你合作。目前它的要求在于：把依靠驻扎在伊朗的波兰军人养活的人和驻扎在苏联的波兰军人调离苏联，以便并入已经允许去伊朗的部队。当然这个问题是可以慢慢来讨论的。我们以为，如果这项要求在适宜的时机通过合适的形式提出来，那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完全相信，美国总统也会这样想。我们非常希望，当你回忆起纳粹分子的残酷侵略使我们大家所遭受的困难的时候，你是会以合作的精神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3.英国内阁决心对在英国的波兰报纸适当地约束一下。攻击西科尔斯基的那些可鄙的捣蛋分子可能会讲出一些被德国电台用来向全世界宣扬的东西，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停止，并且也是会停止的。

4.这件事算是戈倍尔暂时占了便宜。现在他正在拚命造成一种说法，说苏联将在俄国领土上组织波兰政府，又说苏联将只同这个政府打交道。当然，我们不便承认这样的政府，并且将保持我们同西科尔斯基的关系。西科尔斯基是你和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所能找到的最有用的一个人。我估计美国的看法也将是这样。

5.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打击，并且经过一个适当的时期之后，1941年7月30日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必须恢复。这是希特勒最不喜欢的，然而他最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偏要去做才对。

6.对于那些现在正在进行着战斗、并且很快将要进行更加残酷的战斗的军队，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持后方的有利局势。我和我的同事们坚决希望，不仅在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上，而且就是在战后，苏联、美国以及英联邦和帝国之间也将更加紧密地合作和谅解。对这个受尽折磨的世界来说，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希望呢？

1943年4月30日

第15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5月2日

1.刚才我以极其愉快和敬佩的心情读完了你在五一节的卓越的演说。我特别重视你所提到的各盟国的联合的打击，并且你确实可以指望，我将做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打断法西斯禽兽的背脊”。

2.虽然照片说明埃森已有三分之一被破坏，可是敌人有点像你们在斯大林格勒所做的那样，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同它生命攸关的克虏伯工厂继续工作。因此我们又向敌人投下了800吨炸弹。上星期我们还向杜伊斯堡投了1,450吨。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在一次空袭中投弹量最多的一次。斯才新得到了782吨，罗斯托克得到了117吨。我们在波罗的海上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敷设水雷的工作，这项工作的代价很昂贵，参加工作的有226架飞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近给你去信之后进行的。这项敷设水雷的工作有很多好处：敌人负担已经很紧张的船只的大部分将经常遭到损失；第二，我们迫使敌人制造大量的扫雷艇，并且将强迫他们把力量转到其他方面去。当天气不适于轰炸地面上的目标时，我们在敷设水雷方面找到了出路。在最近的两个夜晚我们为对鲁尔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袭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被天气耽误了。在空袭普尔森的时候我们对斯柯达工厂没有集中地给

予打击，但是只要再有可以进行这种空袭的良好条件时，这个目标是不会被忘记的。

3.突尼斯尖端地带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双方都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自从进入突尼斯以来，我们已俘获了4万人，此外，敌人还伤亡了35,000人。第1军损失约23,000人，第8军损失约1万人。盟军损失总数约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英国人。整个战线的战斗将以最激烈的程度继续进行，而且亚历山大将军正在调集人马，很快就要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将近20万敌人被包围了。敌人仍在不断增援，但是近日来，日益增强和日益靠近战区的我方空军已使敌人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艘驱逐舰和运兵船，包括一些载有德国增援部队的船只已被炸沉，因此一切交通都已暂告中断。除非敌人能够立即恢复交通，否则他们的供应情况将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敌人大量从海上逃跑的机会是不多的。突尼斯多崎岖陡峭的山峰，面临着平原，每个山峰都是一座堡垒，这种独特的地势有利于敌人的防御，延缓了我们的进展。但是我希望本月底以前将有好消息给你。而目前敌人由于在调动过程中遭到额外的损失，他在整个战事中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1943年5月2日

第15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5月4日

1.4月21日给你送去关于同波兰政府中断关系的电报时，我是从下列事实出发的：波兰人早在4月15日就在报纸上开始了众所周知的反苏宣传，这种宣传起初被波兰国防部的声明，后来被波兰政府4月17日的声明加以扩大，而在伦敦没有受到任何反击，而且关于波兰人准备进行反苏宣传一事苏联政府没有得到事先的通知，尽管很难设想英国政府没有收到关于宣传的策划情况的情报。我想从我们的条约精神这一观点来看，制止某一个盟国对另一个盟国进行攻击是完

全自然的，特别是当这种攻击直接帮助了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这样理解盟国的义务的。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把苏联政府对波苏关系问题的看法通知你。由于波兰人继续在那里进行诬蔑苏联的宣传，再加上这种宣传在伦敦并没有受到反驳，因此不可能期望苏联政府会无止境地忍耐下去。

你说你将对波兰的报纸适当地约束一下。对此我向你表示感谢。但是我怀疑目前的波兰政府，它周围的那些亲希特勒的大叫大嚷的家伙和它的肆无忌惮的报纸，难道是那么容易管束的吗？尽管你说波兰政府准备忠诚地同苏联政府进行合作，我怀疑它是否能履行自己的诺言。甚至假定西科尔斯基真的想忠诚的话，然而在波兰政府的周围有着那样一批亲希特勒分子，而且他在这些人面前是那样孤独无援、那样容易被他们所吓倒，以致我们对西科尔斯基能在对苏关系中保持忠诚一点没有任何信心。

至于希特勒分子所制造的那种似乎苏联正在组织一个新的波兰政府的谣言，这些谰言难道还值得驳斥吗？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大使已向你谈过。这并不排斥英国、苏联和美国从巩固盟国反希特勒统一战线这一观点出发而采取措施来改进目前波兰政府的组成。这件事做得越快越好。艾登先生从美国回来之后就在同迈斯基的谈话中说过，在美国拥护罗斯福总统的人认为目前的波兰政府是没有良好的前途的，并且怀疑它能否回到波兰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想保全西科尔斯基个人。我觉得，对目前波兰政府的前途的看法美国人是更接近于真理。

至于谈到在苏联的波兰公民（这些人的数目是不多的），和撤退到伊朗的波兰士兵的家属，苏联政府就是在以前也没有阻止过他们离开苏联。

2.你关于突尼斯近况的来电收到了。感谢你的通知。英美军队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很高兴，预祝他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1943年5月4日

第 15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3 年 5 月 8 日发出

祝贺你和英勇的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比塞大和突尼斯的辉煌胜利。预祝你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第 15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5 月 10 日

这是一封私人绝密信，仅供你个人亲阅。

1.我正在去华盛顿途中，现到达大西洋中部，此行的目的是解决在“爱斯基摩”之后在欧洲进行进一步打击的问题，以及劝美国不要过分偏重在太平洋方面，然后讨论印度洋的问题以及在那里组织对日本的进攻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下一次的电报将从华盛顿拍给你。

2.你可能听到了关于突尼斯和比塞大的好消息，在那里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正在向最后一个目标作强有力的挺进。

3.你们在诺沃罗西斯克城下的胜利和夺取克里米亚省的成功使我非常高兴。

4.在 6 日的海军护航战役中我们损失了 13 艘货船，这些船被击沉了，但是我们消灭了 5 艘潜水艇，而另外 5 艘被击伤，可能被消灭了。根据我们的统计，在 4 月我们至少消灭了 13 艘潜水艇，在同一时间大约生产了 20 艘新的。

5.590 架飞机对多特蒙德的袭击是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一次。

1943 年 5 月 10 日

第15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5月12日

非常感谢你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

波兰人没有同我们说过他们打算干些什么，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警告他们：他们打算干的那种行动是危险的。

波兰报纸以及用外文出版的一切刊物今后都将加以监督。

我同意波兰政府的组成是可以改进的，虽然要找到比较好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我和你的想法一样，西科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无论如何都应当留在政府里。如果西科尔斯基在外国的压力下必需改组自己的政府，他很可能会遭到谴责而被赶下台，而我们将找不到任何人能这样恰当地代替他的职位。因此，他大概不可能立即进行改革，但是，我将用一切办法努力说服他在这方面尽快地行动起来。我将同罗斯福总统讨论这一问题。

从你的通知中我看到苏联政府的政策不是阻挠住在苏联的波兰籍人或波兰军人家属出境，今后我将就这个问题通过大使同你联系。

对你在攻克突尼斯和比塞大时的来电表示非常的感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捉住多少俘虏。

1943年5月12日

第16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3年5月14日

我在4月10日的信中曾通知你，我们正在制定给你送去从J.W.54和J.W.55次护航舰队中抽出来的“旋风”式、“空中眼镜蛇”和“小鹰”的计划。

现在我可以通知你关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的某些材料。

“旋风”式现在是435架，包括60架“旋风IID”。235架“旋风”

式将通过海路运往直布罗陀，在那里装配并自行飞往巴士拉（而不是飞往以前预定的德黑兰），由贵国的代表在那里接收它们。我们希望这些“旋风”式将在6月上半月开始到达巴士拉。

其余的200架“旋风”式，包括60架“旋风IID”，将经地中海运去，并将在巴士拉移交。以前我曾说过，“旋风IID”大概将不经过塔柯拉第，但是现在决定把它们运往巴士拉，因为如果不把炮拆下（这些炮不得不在以后再运往德黑兰），我们就不能在飞机上装备飞经非洲时所必需外加的油箱。

哈里曼先生已在采取措施把285架“空中眼镜蛇”和“小鹰”经地中海和红海运送到阿巴丹，它们将在那里装配。

1943年5月14日

第16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6月9日

尊敬的斯大林，

我给你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你介绍空军元帅约翰·巴宾顿爵士，他现任第30代表团皇家空军组组长。

约翰·巴宾顿爵士近来曾指挥过我们的空军技术训练团。他在现代空战的一切方面都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我相信，委任他担任这个职务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苏英空军部队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相互了解。

你忠实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3年6月9日

第16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6月11日发出

我现在把我答复罗斯福总统关于你和总统先生在今年5月就战略问题所作出的决定的复信抄送给你。

附件 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关于通知你和丘吉尔就战略问题所通过的若干决定的来信已于6月4日收到，对此通知表示感谢。

从你这个通知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同你和丘吉尔在今年年初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问题所通过的决定相矛盾的。

当然，你还记得，你和丘吉尔在今年1月26日的联名来信中通知说：在当时就决定要把很大一部分德国陆空军从俄国战场上吸引过去，并且迫使德国在1943年屈膝投降。

此后，丘吉尔曾于2月12日以他自己和你的名义通知了英美在突尼斯和地中海以及在欧洲西海岸发动联合战役的确定日期。这个通知说，英国和美国正在积极准备在1943年8月进行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又说，如果天气或其他原因妨碍这一行动的话，那么准备在1943年9月以更大的力量实行这个军事行动。

现在已是1943年5月，你和丘吉尔却决定把英美进攻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这样，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在从1942年推迟到1943年之后，这次又要推迟到1944年的春天了。

你们的这一决定给倾全力同德国及其仆从国家的主力誓死血战已经两年的苏联造成非常巨大的困难，并且听任不仅为自己国家，而且也为盟国而战的苏联军队单凭自己的力量几乎是单独地同还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敌人搏斗。

开辟第二战场的再一次推迟和遭到那么重大牺牲的我国军队仍然无法得到英美军队的重大支持，这两个事实在苏联人民和军队中间引起了沉重的和恶劣的印象，这一点难道还需要我说话吗？

至于苏联政府，它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何况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同时也没有考虑到由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个决定对今后战争的进程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第16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6月19日

1.你大约在6月11日发给美国总统的电报的抄件已经收到了。我完全理解你的失望，但是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如果我们牺牲10万人，把他们投入必败的横渡海峡的进攻，那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企图用薄弱的力量取得某种用非常沉重的代价才能达到的成就但又难以为继的话，那么据我看来，这种进攻肯定是要失败的。据我和我的全体专门军事顾问的看法，我们能够登陆的话，也将被击退，因为德国人在法国已有的力量超过了我们今年可能在那里集结的任何力量，况且他们可以用比我们快得多的速度用平行的欧洲铁路干线调来支援部队，我们只能直接在岸上登陆或者在海峡的某些我们可以占领的遭受破坏的港口登陆。我真不能设想，怎么能用英国的惨败和流血来援助苏军呢。但是，假使这样设想一下：我们不顾我们军事专家的劝告而在你方的压力下把这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么这在我国就能引起极端恶劣的情绪。你还记得，在我拍给你的电报里一向都是讲得很清楚，我绝不会批准我认为只能导致无益的流血的任何横渡海峡的进攻。

2.我们援助你们的最好的办法是打胜仗，而不是吃败仗。我们在突尼斯已经作到了这一点。经过大西洋并经过一万英里绕过好望角开去的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就帮助了我们消灭轴心国家的陆、空军的巨大力量。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轴心国家在地中海的整个防御体系都遭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已经迫使德国人用陆、空军增援意大利、地中海各岛屿、巴尔干和

法国南部。我诚恳地并且理智地希望我们能在今年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们从你们的战场上吸引走的德国人要比用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所能吸引走的要多得多。我们不久就将发起进攻，这次进攻将使从直布罗陀到塞得港的地中海上每个在我们管辖下的港口充分发挥它们的能力。在用通力使意大利脱离战争之后，德国人不得不占领里维拉，在阿尔卑斯山或者沿波河开辟新的战场，首先得设法接替目前在巴尔干的32个意大利师。那时邀请土耳其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参加战争的时机就可到来。那时候，可以对罗马尼亚的石油产地进行大规模的有决定意义的轰炸。我们已在欧洲西部和南部牵制住大部分德国空军力量，而我们的优势将不断增长。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第一线的作战飞机的总数是4,800—4,900架，其中在俄国战场上的飞机现在只有2,000架，而去年同一时期却有2,500架。我们还在破坏着德国的大部分城市和军事工业中心，这很可能会有决定性的后果，因为这将削弱德国人在一切战场上的抵抗。在即将来临的秋季进行的大规模空袭将使我们赚进一大笔。如果近几个月来的反潜艇战的有利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以加速并扩大把美国军队调往欧洲的工作，目前我们正在充分利用现有船只进行这一项调动工作。没有人能像我那样重视苏联政府为共同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我也对你表示感谢，因为不久以前你承认了你的两个西方盟国所作的努力。我坚信，今年年底我们就可以把使你愉快和满意的结果通知你。

3.我从来没有请求你提供关于俄国军队的力量和驻扎情况的详细情报，因为你仍然跟过去一样在大陆上负担着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我能够知道你如何估计俄国战场上的情况和最近的发展，以及你是否认为在最近期间德国的进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将很高兴。现在已经是6月中旬了，但是进攻还没有开始。我们有某些根据来设想，轴心国家在北非的军队的意外的、迅速的失败已经打乱了德国的战略，由此而产生的对欧洲南部的威胁则是迫使希特勒动摇和推迟他打算在今年夏天向俄国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计划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对所有这一切作出一定的推论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听到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将非常高兴。

4.你在来电的末尾对我们不久前采取决定没有同俄国磋商一点表示不

满。我完全理解妨碍你同总统和我在喀土穆会见的原因，我们本来是应当在1月到达那里的；你连一个星期也没有放弃过对巨大的和胜利的战斗的领导，我相信你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会见的必要性和好处还是非常大的。我只能说，我会冒着任何危险到任何地方去，所以地点的问题可以由你和美国总统商定。我和我的顾问认为，苏格兰北部我们的主要海军军港斯巴卡—弗洛是最方便和最安全的地点，如果希望保守秘密的话，那里可以说是最机密的地方。我也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如果你能够在今夏季的任何时候乘飞机到那里去，你就会相信，你的英国和美国同伴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满足你的愿望，并且对你进行最诚挚的接待。

1943年6月19日

第16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6月23日

1.我从莫洛托夫先生那里知道，你打算承认不久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不安。很难想像英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会在不久以后承认这个委员会。它们只有在合理地证明委员会的性质和活动将符合于盟国的事业的利益以后，才会承认这个委员会。

2.戴高乐将军到阿尔及利亚以后曾进行了争取对法军实行有效管辖的斗争。司令部对他取得政权后将采取何种行动没有把握，对他对我们的友好感情也没有把握。罗斯福总统和我完全同意，戴高乐可能使即将参加“爱斯基摩”的军队的基地和交通遭到危险。我们不能冒这样的危险，因为这会关系到我们士兵的生命，并且也会妨碍战争的进行。

3.本来在委员会里有7名委员，但是委员的人数现在已增加到14人，并且我们对委员会的行动没有把握。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通知委员会：吉罗德将军必须仍旧任法军总司令，并对法军的性质和组织进行有效的管辖。毫无疑问，这将在下议院引起争论，正像在

美国一样。美国总统和我不得不列举理由，而理由是很多的，这些理由足以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作法。如果苏联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个委员会，那么对这些理由的简单叙述和说明将使苏联政府和西方盟国的意见发生分歧，这是非常值得遗憾的事。

4.我们很希望找出一个法国政权机关，使所有的法国人团结在这个机关的周圈，并且我们仍然希望这个政权机关将在目前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谈判以后产生。我们觉得，现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还为时太早。

1943年6月23日

第16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6月24日

6月19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

我完全理解组织英、美军队进攻西欧特别是调动军队横渡海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从你的通知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你去年和今年的通知使我相信，你和美国总统对组织这次战役的困难是十分清楚的，你和总统共同进行的对这次进攻的适当筹备将会充分估计到这些困难并且会动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和资源。还在去年，你曾通知说，英美军队将在1943年大规模进攻欧洲。你在1942年6月10日交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曾写道：

“当然，这也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把我们的最大力量集中在英美军队在1943年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组织和筹备工作上。我们对这次战役的规模和目标不确定任何界限，这次战役最初将由100万以上的英、美军队来完成，并且由相当的空军来支援”。

今年年初，你曾以你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美国总统两次通知你们对英美军队为了“从俄国前线吸引走大量德国陆空军”而进攻西欧的问题的决定。同时你提出了一项任务：在1943年就使德国投降，并

规定进攻的日期不迟于9月。

今年1月26日你在来电中写道：

“我们已经同我们的军事顾问开会商讨并且就美英军队在1943年头九个月所要进行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决定。我们愿立刻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你。我们相信，这些军事行动，连同你们的强大攻势，很可能使德国在1943年屈服”。

在今年2月12日我收到的你的另一封电报中，你明确了你和总统所通过的进攻西欧的日期，你是这样写的：

“我们还在我们的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加紧准备在8月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在这里船只和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个军事行动由于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军力以便在9月再进行”。

当2月份你写到你的这些计划和进攻西欧的日期时，这个战役的困难比现在要大得多。从那时起德国人遭到了不止一次的失败：在南部他们被我们的军队击退，并且在那里遭到不小的损失。在北非他们被英、美军队击溃，并且被逐出了北非；在潜艇战争中德国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而英美军队的优势则大大地增长了；大家也知道，美英空军在欧洲取得了支配地位，而军舰和运输船只的实力也有所增长。

这样一来，1943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不仅没有恶化，而且是大大地好转了。

由于上述的一切，苏联政府没有料想到英美政府竟会改变今年年初所决定的关于在今年进攻西欧的决定。相反，当时苏联政府有一切根据认为英美这一决定将要实现，必要的准备正在进行，西欧的第二战场终会在1943年开辟起来。

因此，当你现在写道，“如果我们牺牲10万人，把他们投入必败的横渡海峡的进攻，那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时候，我应该提

醒你以下几点：第一，关于你去年8月送来的备忘录，当时你声称，准备进攻的不是10万人，在战斗开始时英美的军队就将超过100万；第二，关于你2月份的来电，其中谈到在本年8月到9月间进攻西欧的巨大的准备措施，从这些措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预定的战役决不是只有10万人，而是有足够的军队的。

但是，你现在却说，“我真不能设想，怎么能用英国的惨败和流血来援助苏军”。对苏联作这种声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声明同上述你关于实行广泛的和大力的英美措施（这些措施足以决定这次战役的彻底胜利）在今年组织进攻的其他重要决定是完全矛盾的。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况且你和总统决定取消过去关于进攻西欧的决定是在没有苏联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根本就不想邀请苏联政府的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关于这些情况，我更毋庸多说了，虽然你不会不知道苏联在对德战争中的作用和它对第二战场问题的关心都是相当大的。

不言而喻，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来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

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完全理解”我的失望。应当向你声明一下，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苏联政府的失望，而是在于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的问题，这种信任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不能忘记，问题是在于保护西欧和俄国敌占区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减少苏军的巨大牺牲，英美军队的牺牲用这一点来衡量是很小的。

1943年6月24日

第16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6月26日

6月23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其中你指出，英美政府目前不拟承认已经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你说所以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是因为司令部对于戴高乐将军能采取何种行动没有把握，对他对盟国的友好感情也没有把握。

我们觉得英国政府到现在为止是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戴高乐将军从法国投降的时刻起就率领法国反希特勒的力量并且领导团结在“战斗法国”的周围的法国爱国人士的斗争。从去年11月起北非情况的演变和由吉罗德和戴高乐两位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参加英美军队所进行的战斗一事，为他们的联合造成了条件。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种联合是合理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对已成立的联合机构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应当说是在这个事件上所表现出的愿望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在吉罗德和戴高乐代表法国民族委员会正式向盟国提出承认该委员会的要求之后，苏联政府感到，如果拒绝承认，法国社会舆论将感到不能理解。

苏联政府没有掌握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英国政府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特别是对戴高乐将军采取目前这种态度是有根据的。

但是，既然英国政府要求延迟承认法国委员会并且通过它的大使提出了下列保证：在没有同苏联政府磋商以前将不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苏联政府准备接受英国政府的要求。

我希望你考虑到苏联对法国问题的关心，并且请你不要拒绝向苏联政府及时提供为作出有关的决定所必需的情报。

1943年6月26日

第16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6月27日

1.我很痛心地接到了你24日的来电。我给你的关于我们今后意图的

那份情报，每一阶段都是以英国和美国参谋部书面商定的结论为基础的，并且我在对你的关系上一向是真诚的。虽然直到1941年6月22日以前我们英国人是孤独地面对着纳粹德国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局势，然而自从俄国遭到希特勒进攻的时候起，我立即着手以我们有限的力量来援助苏维埃俄国。我相信，我为帮助你们已经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因此，你现在对西方盟国所作的贵难是与我无关的。如果不顾我们的军事利益将受损失的话，我也不难向英国国会和英国人民申述我的理由。

2.我们参谋部的见解（这些见解我在每个阶段都是赞同的）由于局势的影响总是在变化着。第一点，虽然所有的船只都已全部使用，但还是没有可能根据1942年6月所拟定的方案把美国军队运来英国。那时，曾希望，到1943年4月将有27个美国师驻扎在英国，但是实际上到现在，1943年6月为止，只有一个师，到8月份也不过只有5个师。原因是对日本作战的需要和船只不够，但是首先是由于北非战斗的扩大，纳粹分子的巨大力量已陷进这个战斗。此外，我们在今年1月为了进行横渡海峡的进攻而打算使用的那些登陆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造好，而现有的那些登陆艇将被拖进即将到来的地中海上的巨大战役中去。敌人对于他们将在哪里遭到打击和打击的力量怎样是没有把握的，据我的可靠的顾问的看法，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他们已把希特勒对俄国的第三次进攻延迟了，本来在六个星期以前就对这次进攻进行了巨大的准备工作。甚至可能这样：贵国在今年夏天将遭遇不到强大的进攻。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这就完全证实了你有一次曾说过的话：我们的地中海战略“在军事上是很恰当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当等待局势的演变。

3.因此，事情不仅在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对我们来说是愈来愈困难，和缺乏资源，并且也在于我们有可能在另一个战场上实行更有希望的和更有成效的政策，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根据我们的信念进行活动。我将把出于战争的巨大规模所引起的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上的见解的一些变化通知给你。

1943年6月27日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16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7月8日

1.“爱斯基摩”战役应在最近时期开始。这个战役包括从海洋上调运50万人，为此将利用1,600艘巨大的和1,200艘专门的登陆艇。敌人在“爱斯基摩”地区拥有300万军队。许多事情有赖于第一次出击。我只要有足够的情报，就会通知你战斗的进行情况。

2.同时，可以肯定，在70天的时间内我们击沉了50艘潜水艇。

3.我希望你们的战场上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德国人的报道显得乱七八糟，这表现出他们的混乱。

1943年7月8日

第16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7月10日

英美军队的登陆看来很顺利。天气好转了。

1943年7月10日

第17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8月9日

我刚从前线回来，并已阅读了英国政府8月7日的来电[①]。

1.我同意绝对需要举行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谈。这样的会谈，经和美国总统商定会谈的地点和时间之后，一有机会应即实现。

同时我应该告诉你，我很抱歉，在苏德战线目前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个星期也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和前线。虽然我们最近在前线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是为了防备敌人可能采取新的行动，苏军和苏军统帅部目前有必要竭力加强兵力并特别注意警惕。为此，我必须较平时更加经常地前往各个战线视察我军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前往斯卡巴—弗洛或其他任何遥远的地方同你和美国总统会见了。

然而，为了使我们三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能及时得到研究而不致拖延起见，最好组织一个我们三国的负责代表的会谈，我们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就这样一次会谈的地点和日期取得谅解。

此外，有必要先就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和要通过的提案的草案达成协议。如果事先不这样做，会谈就不会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

2.顺向英国政府和英美军队致贺，祝贺它们在西西里的十分成功的战役，这次战役已经使墨索里尼垮台，并使他的匪帮崩溃。

1943年8月9日

————————————

① 指英国政府1943年8月7日发给斯大林的信，其中提出：英国和美国政府认为，为了就加速对“霸王”（横渡海峡的大规模战役的代号）的准备工作达成协议，希望能在最近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谈。——本书制作者注

第17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8月12日

1.8月9日的来电使我有可能向你表示热诚的祝贺，我庆贺俄国军队不久前在奥勒尔和贝尔戈罗德城下获得的极其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为你们今后向布良斯克和哈尔科夫的进攻开辟了道路。德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

的失败是走向我们最后胜利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2.我来到了魁北克城堡并在今天白天前往美国总统的住处同他会见。同时参谋部准备在这里商议。总统和我在周末也将参加他们那一伙。我把你关于我们的负责代表在最近会谈的电报带给总统看了，当然过种会谈是我们所极为盼望的。我完全理解，当你正忙于指挥你们的军队胜利挺进的紧急关头，你是不能离开战场的。

3.承你对我们在西西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特表感谢。我们正在共同努力使这次的成就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不使“霸王”受到损害。当然我们的事业在一切方面都比--年前我们在莫斯科时的情况好得多了。

4.我现在把一架小型立体镜照像机连同许多照像底片一起送给你，这些底片表明了我们的轰炸机使德国的城市遭到的损失。这些底片将使你得到比从照像上能得到的更加生动得多的概念。我希望你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些底片。这样我们就能很准确地知道汉堡的房屋有80%遭到破坏。现在长夜即将来临，到那时柏林将遭到更大的破坏。问题只在于天气。这次的破坏将延续若干昼夜，并且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残酷的破坏。

5.最后在潜艇战争方面我们在5、6、7三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消灭一艘潜水艇，但是我们的损失比我们的估计的要小得多。我们在制造新船只方面所取得的纯利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这一切将使我们易于建立英美联军对德国的大规模战场，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战场是缩短战争时间所必要的。

1943年8月12日

第172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8月19日

8月15日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通知说，从巴多里奥那里来了一位卡斯特拉诺将军，他带着英国驻梵蒂冈公使的介绍信。这位将军宣称，他奉巴

多里奥之命通知说，意大利在它能够加入盟国的条件下准备无条件投降。后来英国驻梵蒂冈的代表接到了巴多里奥元帅的一份书面声明，其中说，他已用适当的方式授权给卡斯特拉诺将军。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很坚决的建议。

我们不想同巴多里奥政府签订任何契约来鼓励意大利转向另一方面；但是，这件事会有许多好处，并且这样就大大地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我们大概将在这个月月底以前开始进攻意大利大陆，而过一个星期我们将实行我们已经展开了的“雪崩”[①]进攻。很可能巴多里奥政府不能支持这么久。德国人在罗马城外掌握了一个或更多的装甲坦克师，他们已经猜到巴多里奥政府将欺骗他们，因此他们完全有力量推翻他并组织，例如，以法里那奇为首的法西斯傀儡政府。或者巴多里奥可能破产，如果是那样，整个意大利将陷于混乱状态。

鉴于这种情况，联军参谋部的参谋长作为军事外交的一项措施，已草拟了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下列训令作为行动准绳，这个训令已经总统和首相批准：

“经总统和首相的批准，联军参谋部的参谋长命令你立即派参谋部的两位军官：一位美国的和一位英国的，前往里斯本。他们到达之后必需和英国大使联系。他们必须随身携带商量好的停战条款，该条款已经送给你了。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根据他现有的指令正在安排同卡斯特拉诺将军的会谈。你们参谋部的军官将出席这次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应根据下列原则通知卡斯特拉诺将军：

1.（甲）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应在将送给他的文件中所规定的条件下予以接受（接着就把意大利停战条款交给他，这些条款是已商量好的，并且已经事先寄给你。应当通知他，这些条款**不**包括迟一些时候将通过其他途径交给他的政治、经济或财政条款）。

（乙）这些条款的确**没有**规定在同德国人斗争中给予意大利以积极的帮助。条款向有利于意大利的方向发展的程度将取决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战争的今后阶段对联合国家反对德国的斗争所给予的实际援助有多少。

——————————————

① “雪崩”，盟国军队1943年9月进攻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战役的代号。

但是联合国家无条件地宣布，无论意大利军队或意大利人民在哪里同德国人斗争，无论他们是在哪里破坏德国人的财产或者阻挠德国人的交通，他们将得到联合国家军队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在及时地和经常地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的条件下，盟国的轰炸将尽可能朝向对德军的调动和作战有意义的那些目标。

（丙）在由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的日期和时间停止联合国家和意大利之间的军事行动。

（注：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当在大批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前几小时作出这个通知。）

（丁）意大利政府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停战之后，应当担负起立即宣布停战和命令自己的军队和人民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同盟国合作以及反击德国的责任。

（注：从上述第二点丙项可以看出，将给意大利政府几个小时的期限。）

（戊）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宣布停战的同时下令立即释放有被德国人捕获的危险的一切联合国家战俘。

（己）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宣布停战的同时命令意大利的军舰和尽可能多的商船出海开往盟国的港口，命令尽可能多的军用飞机飞往盟国的基地，一切有被抢走的危险的船只和飞机应当予以炸毁。

2.应当把下列事情通知卡斯特拉诺将军：在此以前巴多里奥可以作很多事情使德国人搞不清他在准备些什么。决定他的行动的准确性和范围的问题应由他自行掌握。但是应该建议他坚持下列的总的路线：

（甲）如果可以发布指令给各地方当局而不会给德国人知道的话，应在全国掀起一个普遍的消极抵抗运动。

（乙）在全国，特别是在德国人使用的交通线上和飞机场上，进行小型的破坏活动。

（丙）保护盟军战俘。如果德国人施加极其强烈的压力来强迫意大利交出战俘，那么战俘必须予以释放。

（丁）意大利的军舰**不得**落到德国人的手里。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使这些军舰能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颁布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后，立即开往所指

定的那些港口。不应当把意大利的潜水艇调离巡逻活动，因为这样，就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共同意图。

（戊）意大利的商船**不得**落到德国人的手里。应当尽可能把停泊在北方港口的商船，派到位于威尼斯里窝那线以南的港口去。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船只应当予以击沉。一切船只应当升火待航，以便开往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指定的港口去。

（己）**不**允许德国人掌握意大利的海岸防御。

（庚）在适当的时期内应当使在巴尔干的意大利军队执行关于把他们调到沿海地区以便联合国家把他们运回意大利的指令。

3.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应当同卡斯特拉诺将军共同进行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意大利军队参谋部之间建立可靠联系途径的工作。

（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到此结束。）

我们现在转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通知你，英王陛下政府根据在“海王义”[①]所通过的决定，已经同葡萄牙开始谈判，目的是想在它的“救生带”[②]那里进行海军和空军的行动，为此英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援引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在600年内是一直有效的，并请葡萄牙提供上述的可能性；当然，萨拉查博士很害怕德国人为了报复可能进行的轰炸以及西班牙人可能进行的敌对活动。因此我们拨给了他一队高射炮和一队战斗机，高射炮队和战斗机队现在正在途中；我们又通知了萨拉查博士，如果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将立即向西班牙宣战，并给予我们力量所及的帮助。但是我们并没有签订规定提供某种军队的任何具体的军事条约，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是会发生的。萨拉查博士现在同意了英国人在10月初同葡萄牙合作使用葡萄牙的“救生带”。只要我们在那里一巩固下来，萨拉查博士的顾虑就会消除。我们将坚持把这种可能性扩展到美国的船只和飞机上去。

有了“救生带”，对进行海上战争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潜水艇已经

————————————————

①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3年5月在华盛顿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代号。——原注

② 属于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的代号。——原注

离开了北大西洋，因为在北大西洋上运输舰队从5月中旬开始就毫无损失地来往航行着，这些潜水艇已集中在南部的航线上。“救生带”的利用对于从空中袭击这些潜水艇是有极大好处的。此外，还有可能把美国的重型轰炸机调往欧洲和非洲，这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上述一切都是极机密的军事行动。

1943年8月19日

第173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8月19日

丘吉尔和我偕同参谋人员均已抵此并将在此商议，可能要10天光景。我们充分理解使你留在前线的重大理由，有你在战场上才产生这么多的胜利，然而我们仍愿意再次强调我们三人举行会谈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阿尔汉格尔斯克或者阿斯特拉罕两个地点都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准备携同适当的官员们前往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同你一起对局势作一番通盘的考虑。

看来目前是进行会晤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也是战争的转折点。我们，丘吉尔和我，恳切希望你再次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真是不可能安排这样一个很需要的三国政府首脑会谈的话，丘吉尔和我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外交代表的会谈。这个会谈将是探讨性的，因为最后的决定自然必需留待我们三国政府去作出。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在38天的时间内占领了西西里岛。

轴心国方面的军队总数达405,000人：其中意大利315,000人，德国9万人。我们是以13个美国和英国师发动进攻的，伤亡共18,000人。轴心国的军队伤亡共3万人：其中德国23,000人，意大利7,000人。掳获13万名俘虏。

西西里岛的意大利军队，除了一小部分穿上老百姓的衣服逃到农村以外，已被消灭。缴获了大量的胜利品：大炮、飞机和丢散在各处的各种武

器，包括在被占领的各个飞机场上的1,000多架飞机。

正像我们早已通知你的那样，我们不久即将对意大利大陆发起强大的攻势。

丘吉尔

罗斯福

1943年8月19日

第17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8月22日

1.你们关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和同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新条款的来电已经收到了。对你们这一通知表示感谢。

艾登先生告诉索波列夫说，关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问题莫斯科已得到了充分的情报。但是我应当指出，艾登先生的话是与实际不符的，因为我收到的你的那封来电遗漏了很多句子，而且最后几段也漏掉了[①]。因此应当说，苏联政府没有收到关于英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问题的情报。寇尔先生肯定地说，他在最近将收到你的来电的全文，但是，三天已经过去了，寇尔大使还没有把电报的全文交来。我不明白，在送交关于如此重要问题的情报时竟会发生这种拖延。

2.我认为，由美、英、苏三国代表成立一个军事政治委员会来研究同摆脱了德国的各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目前为止，事情是这样的：美英两国正进行商量，而苏联作为消极观察的第三者收到了关于两国谈判结果的报道。应当向你们说，现在这种局面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建议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且确定该委员会在活动的初期驻扎在西西里岛。

3.等待着你关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来电的全文。

1943年8月22日

————————————

① 指第172号信件（英美方面后已补全）。——本书制作者注

第17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3年8月24日

1.你们8月19日的联名来电已经收到了。

我完全赞成你和罗斯福先生关于我们三人会见的重要性的意见。同时，我恳切地请求你了解一下我目前的处境，目前我军正在同希特勒的主力进行极其紧张的战斗，希特勒不但不从我们战场上撤走一个师团，相反的，竟得以往苏德战场上增调新的师团并且还在继续增调。根据我的所有的同事的意见，我在这个时刻不能离开战场到菲尔班克斯那么遥远的地方去，要是去的话，我们的作战行动是会受损失的。虽然，假定我们战场上是另一种情况的话，菲尔班克斯无疑是我们会见的十分适当的地方。这一点我早就这样认为 。

至于我们三国代表例如外交代表的会谈的问题，我赞成你的意见：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会谈是适宜的。但是，这次会谈不应当具有狭隘的探讨性质，而是应当具有实际筹备的性质。这样，在这次会谈后我们两国政府能够作出一定的决定，并且在决定一些紧急的问题时避免拖拉。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谈一谈我的建议，就是应当事前决定哪些问题应该由三国代表来讨论，并且草拟出他们应当讨论的提案，以便交由我们各国政府作出最后决定。

2.昨天收到了寇尔先生交来的关于你和罗斯福先生来电的补充和

更正，在这封来电中你通知了关于在同卡斯特拉诺将军的谈判中为意大利拟定投降条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训令。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训令完全是根据使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方针而拟定的，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

为了在同意大利谈判期间能够判断盟国所采取的步骤的必要性，我还是认为目前所收到的情报是不够的。这种情况证实了在谈判的过程中需要有苏联代表参加通过决定的工作。因此，我认为由三国代表组成军事政治委员会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关于这个问题我已于 8 月 22 日给你写过信。

1943 年 8 月 24 日

第 176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 年 8 月 26 日收到

在刚刚结束的魁北克会议上，我们作出了下列关于军事行动的决定，这些军事行动必须在 1943 年和 1944 年进行。我们将继续以迅速增长的规模从英国和意大利的基地上对德国进行轰炸袭击。这种空中袭击的目的是消灭德国的空军力量、瓦解德国的军事、经济和工业的体系和准备横渡海峡进攻。目前美国的武装力量正在英国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这样将形成美国和英国的师团的集结，以便向海峡对岸行动。只要大陆上一旦建立了桥头堡，它就可以不断地得到美军的增援，速度是每月 3 个到 5 个师。这次战役主要是用美英的空军和地面上的力量去反对轴心国。地中海上的战争应当积极地进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任务将是使意大利同轴心国脱离同盟关系，占领意大利以及科西嘉和撒丁，用它们来作为对德国作战的基地。

巴尔干的战役将只限于从空中和海上向巴尔干的游击队供应物资，陆战队的小型袭击和对战略目标的轰炸。在太平洋和亚洲的东南部我们将加速对日本的行动。我们的意见是要消耗日本的空军、海军和船只方面的力量，割断它的交通线并保证可以用来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第177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8月29日收到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建议，并且确信，不论在三国外交代表的会谈方面，或者在成立三国委员会方面，使我们大家都满意的计划是可能制定的。首相和我将在下星期初再度会谈，然后再用电报同你联系。

第17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8月30日

你是否赞成在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委员会中应有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如果赞成的话，那么我就在这里提出这个意见。当然，委员会有充分的根据来要求这一点，并且这样一来事情可以办得更出色些。

1943年8月30日

第179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8月31日

我赞成在同意大利谈判的委员会中有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如果你认为这是合适的话，你可以就这件事代表两国的政府发表声明。

1943年8月31日

第180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3日

1.我们已经从卡斯特拉诺将军那里收到关于意大利人接受条件和他即将前来签字的声明，但是我们还不确切知道这是指你已经看见过的短期军事条款，还是指更为详尽和全面的条款（对于这个全面条款你已经表示同意签订）。

2.那里（意大利）的军事形势是既危急又有希望。我们对意大利大陆的登陆战差不多立即就要开始，而被称为“雪崩”的有力打击大约将于下周实现。由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难于挣脱希特勒的手掌，也许将有必要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将需要得到意大利人的尽可能多的协助。意大利人接受条款的主要前提，就是我们将派一个空降师到罗马，使他们能够抵御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已经在罗马附近调集装甲部队，并且可能推翻巴多里奥政府而代之以一个大概以法里那奇为首的傀儡政权。那里的形势发展极快，因此我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有权当机立断，不因长期和短期条款之间的区别而拖延和意大利人达成协议的时机。短期条款显然已包括在长期条款之内，它们是从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演绎出来的，短期条款第10条规定，解释权应交给盟军总司令。

3.因此我们假定，如果有必要免使卡斯特拉诺将军再度去罗马，以致拖延不决而影响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你是期望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你签订短期条款的。当然我们很希望意大利人的无条件投降不仅是对英美也是对苏联的。宣布投降的日期自然必须和军事打击相配合。

罗斯福

丘吉尔

1943年9月3日

第18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5日

1.关于军事委员会。

你关于由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军事政治委员会的建议我已同美国总统讨论过了。总统将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你。

2.如果必须成立正式的委员会的话，那么我对它的机构和职权提出下列建议，我认为，总统是不会不同意这些建议的。但是，他自己还会打电报告诉你。

3.至于委员会的地址，如果你已经这样决定了，我同意设在西西里。但是我希望，突尼斯或者是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地方是盟军总部所在地）可能会更加方便些。这两个方案都可以试一试，这样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4.我建议，三国政府所任命的政治代表将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每个人都将直接向自己的政府作报告。当然，委员会不能代替或超越各有关政府的职权。各代表可以取得军事顾问的帮助。各政治代表从本国政府取得对他们的工作有影响的一些军事和政治事情方面的报道，他们自己也应当把当地发生的事情报道给本国政府。他们可以向各国政府提出联合报告，但是无权作出最后的决定。当然，他们不能妨碍盟军总司令的军事职权。

5.如果我能知道你同意让法国代表参加，我将感到很高兴。我曾向总统说过这个意见，总统似乎倾向于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带有一些保留条件。我们应当记得，不久以后法国人大概将有10个或者更多的装备齐全的师，当然这些师是战斗所需要的。

6.还有其他国家，希腊和南斯拉夫，它们是直接有关的，因此我建议由我们拟定一个当讨论和他们直接有关的问题时吸收他们参加协商的程序。

7.据我了解，该委员会首先只能研究意大利问题。当发生其他问题时，经验将证明，是否会有某种机构可以作为协调我们的观点和计划的更加合适的工具。

8.总统向你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就是：可能你认为派一名军官驻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就够了。鉴于这个委员会如果成立的话，将几乎同外交部长会议同时开会，你可能会同意，总统的计划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9.如果已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请通知我你是否同意我上述的建议，

对此我将表示感谢。如果合适的话，这个委员会应当在本月开始工作，但是请阅读我的下一封电报。

1943年9月5日

第18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5日

请参看我前一封电报。

私人密件。作战问题。

1.经过长期斗争之后，卡斯特拉诺将军终于在9月3日晚上在短期条款上签了字，他目前正在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一起研究实施条款的最好的办法。这必然会立即导致意德军队之间的战斗，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有效而迅速地在各方面帮助意大利人。下周情况将有惊人的发展。意大利靴尖部分的登陆已经成功，现正在加紧展开，而“雪崩”和空降行动都将立刻进行。虽然我相信在“雪崩”战役中我们可以用强大的力量进行登陆，但是我不能预测在罗马或者意大利全境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杀伤德军，并使意军在这个战场上尽可能大规模地杀伤德军。

2.我准备留在大西洋此岸，直到事情有了眉目为止。同时，请让我对你在你们的主要战线上获得的一系列新的胜利和突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1943年9月5日

第18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5日

关于外长会议问题。

1.我愉快地收到8月25日的来电，其中你同意苏联、美国和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早日举行会谈。如果莫洛托夫先生能来，我们将派艾登

先生参加。

2.当然，会议即使由上述人员组成，也不能代替有关政府的职权。我们非常希望知道你对未来的愿望，同时，凡我们业已形成的意见，必将奉告。届时，我们的政府就必须作出决定，我希望我们能在某一个地点亲自会晤。如有必要，我愿意前来莫斯科。

3.政治代表可能需要军事顾问的协助。我准备派一位将级军官海斯丁斯·伊斯迈爵士，他是我在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私人代表，负责国防部秘书厅的工作。他可以就谈到的军事问题提供论据、事实和数字。我相信美国也将派遣相当职位的军官参加。我想在外长会议方面，在现阶段来说，这些已经是足够的了。

4.但是，如果你想研究我们为何还没有横渡海峡进攻法国，为何不能更早和以比目前所建议的更多的兵力进攻法国这些问题的技术细节的话，我将欢迎你另派一个由陆军和海军将领组成的技术代表团前来伦敦或华盛顿或前来这两处。届时，我们将尽可能充分地向他门说明我们的资源和意图，并且同他们一起讨论。事实上我很乐于让你听到这些说明，而且你也有权利得到这些说明。

5.我们倾向于认为，由于地位居中，英国将是最方便的会晤地点，虽然也许最好在伦敦以外的地方举行。我已向美国总统提出这一建议，但是他对此尚未给我最后的答复。如果你同意在英格兰会晤，我将很高兴得到你对这一建议的支持。

6.我希望我们能够预计这次会议在10月初举行。

1943年9月5日

第18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7日

你们9月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你们在这封电报中所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是否同意由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它签订意大利短期停战条

款的问题，应当认为这个问题在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9月2日给英国大使寇尔先生的信中已经解决了。在这封信中已经通知，苏联政府授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权力也包括签订短期停战条款的权力在内。

1943年9月7日

第18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8日

9月5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1.我正同时在给美国总统写信，我觉得成立军事政治委员会的问题是十分急迫的。关于这个委员会的问题我已经在8月22日和24日两次给你去信。在收到你上次的通知后，我曾期待，关于成立三国军事政治委员会的问题将毫不拖延地加以肯定的解决。但是，这样急迫的一个问题却被拖延下来了。当然，事情并不在于某项细节，细节是容易商妥的。至于往艾森豪威尔将军处派遣苏联军官的问题，那么这种办法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军事政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按理说应当是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

关于法国代表的问题，我已经把我的意见通知你。但是如果总统有疑问的话，法国人参加的问题可以推迟。

2.我认为你建议把三国政府代表会谈的时间订在10月初是可行的。会谈的地点我建议在莫斯科。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之间应当事先商妥要讨论哪些问题，并且就这些我们政府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议，以供作出决定。我依然认为，这样做是使会议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这次会议应当草拟三国政府将一致决定的方案。对有关会议组织的其他问题，我看不出在商定一致意见时会有什么困难。

3.至于三国政府首脑亲自会晤的问题，我已就这个问题写信给总

统，说我也正在努力使这个会见能尽快实现，而且他关于会晤时间（11月—12月）的建议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会晤的地点最好确定在三国都派有代表机关的一个国家里，如伊朗。同时，我又说，应当参照苏德战场上的情况另行确定会晤的确切日期，在苏德战场上双方共有500多个师进行着战斗，几乎每天都要求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监督。

4.感谢你对苏军胜利的祝贺。请接受我对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取得辉煌的成就的祝贺，并祝你在执行预定的新的作战计划时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1943年9月8日

第18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3年9月8日

1.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得到的消息证明，意大利人有根据认为，如果它退出轴心，德国人可能对意大利进行毒气战。

2.美国总统和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当就我们的报复措施向德国人提出专门的警告，如果他们竟敢利用这种形势来进行这样的战争的话，他们是会尝到我们的报复措施的。

3.由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没有时间事先同你商量，但是，考虑到你上次的态度，我们相信你是会同意的。

1943年9月8日

第18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8日

9月8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你在来电中通知说你和美国总统已经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报复措施的问题向德国人提出警告，如果德国

人竟敢对意大利进行毒气战争的话，他们将遭到这种报复措施。

从我这方面来讲，我也认为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我对你和美国总统已经发出的有关指示没有反对意见。

1943年9月8日

第18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政府在最近时期回避停战，因为他们肯定德国人即将进入罗马，并将成立傀儡政府。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将在已经商定的时间宣布关于停战的事实，即在今天格林威治时间16时30分，当然“雪崩”将在今天夜里开始。

我希望你收到这封电报后，通知我一下。如果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你能答复我关于外交部长会谈和地中海委员会会议给你的电报，那么对我说来，会是很方便的，因为总统和我现在都在这里，这些问题可能更容易得到解决。

1943年9月8日

第189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9日

9月8日的来电已经在9月9日收到，看来你在拍这封电报的那天还没有收到我9月8日的复电。

希望你现在看一看我的复电，其中答复了你所关心的关于外交部长会谈和三国委员会的问题。

1943年9月9日

第19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10日

1.你9月8日的来电收到了。总统通知我，他将另行打电报给你。英王陛下政府同意在西西里或者阿尔及利亚立即成立三国军事政治委员会。我们同意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做委员会的第四个成员。我认为，罗斯福总统也会同意这一点的。英王陛下政府指派驻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参谋部的我的私人代表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为代表，同时他还将继续担任我的私人代表的职务。麦克米伦先生是议员、具有公使衔，并且十分熟悉地中海的情况。他享有外交部的完全信任并且有权经常同我取得联系。

2.我不打算指派军事代表，因为麦克米伦先生将同英美联合参谋部取得紧密的联系。但是，我将派遣一名旅长级的高级参谋军官到他那里。我觉得美国代表的情况几乎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不知道美国人的计划将是怎样的。当然我们完全了解，你的代表因为远离祖国可能需要较强的军事代表。

3.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委员会的职权应该如下。三国政府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应该把它们所拥有的有关目前和今后对意大利政府或将来可能处于同等地位的任何其他敌国政府的态度的全部材料提供给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委员会的委员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可以经常会谈讨论这些事宜。他们应同自己的政府保持经常的联系，并且可以集体地或单独地向它们提供意见。他们在他们必须遵循的路线方面将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但同时也要鼓励他们发挥主动性。所有上述的一切都不涉及有关三国政府的最终和最高的职权。委员会不得擅自作出决定，以及为执行两项决定而采取行动。英国的最高机关是议会，它从来没有同意过自己的职权可以受到任何程度的剥夺。关于这一点在我上一次的电文中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

4.关于外交部代表的会晤，我们尊重你认为应在莫斯科召开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将于10月初去莫斯科。他将随带适当的参

谋人员。

5.议程。英王陛下政府声明，它愿意同盟国苏联和美国讨论任何问题。日内我们将向你提出我们的意见。但我们特别想了解你所想到的主要题目。

6.在我看来，这次外交代表会谈是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最重要、也是必需的先决条件。我觉得首脑会议很有可能在11月15日至12月15日之间召开，因而感到很高兴，也很放心。几个月来我一直向你表示，这样的会议不论在何地何时召开，我将不辞任何风险前往出席。因此我准备前往德黑兰，如果你不认为在伊朗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的话。我是认为塞浦路斯或者喀土穆更好一些，不过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斯大林我愿意告诉你，所有联合国家这样热诚渴望的我们三人的会议，不仅可以决定结束战争的最好的、最迅速的办法，同时也可以决定世界前途的良好的措施：使英、美和俄罗斯民族能够对人类作出永久性的贡献。

7.感谢你的祝贺。巴多里奥似乎工作得很忠实。据说意大利的海军舰队正在开来我们港口的途中。据萨勒诺来的报道看，目前情况还好。我们有很大一部分队伍已经登陆，并且正在同德国人进行战斗。

1943年9月10日

第191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9月10日收到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接受了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投降条款就是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所批准的。

盟国军队已在那不勒斯附近登陆，并且目前正同德国军队进行战斗接触。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南端也取得了良好的成就。

第19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10日

9月10日的来电已经收到。祝贺你们获得新的成就，特别是那不勒斯地区的登陆。毫无疑问，在那不勒斯地区顺利登陆和使意大利同德国决裂又给了希特勒德国一个打击，并且会大大便利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活动。

苏联军队的进攻现在进行得还算顺利。我想在最近两三个星期之内还会取得成就。可能我们日内即可攻克诺沃罗西斯克。

1943年9月10日

第19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9月12日

1.关于军事政治委员会，可以认为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我们任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副外交人民委员阿·亚·维辛斯基（他是你所熟悉的）为苏联全权代表。任命苏联驻伦敦各盟国的政府的大使鲍果莫洛夫为副代表。还派了一批负责的军事和政治专家和一个不大的技术机构随同他们前往。

我想，军事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在9月25日至30日左右开始。我不反对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开始自己的工作，以便以后该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去西西里或者去意大利的任何其他的地方是否适当。

我认为首相关于委员会的职权问题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若干时间以后，考虑到委员会初期的工作经验，我们就能够确定委员会对意大利以及相应地对其他国家的职权。

2.关于我们三国代表会谈的问题，我建议把会谈的地点定在大家已经商定的莫斯科。而会谈的时间定为10月4日，这是总统建议的。我仍然认为，为使这个会议能取得成就，有必要事先知道英、美政府准备在三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讨论的那些建议，关于这件事我早已给你

写过信了。但是，我并没有在议程方面提出任何限制。

3.至于三国政府首脑会谈，我并不反对把德黑兰作为会谈的地点，这个地方我认为比埃及更适当。在埃及苏联还没有代表机构。

1943年9月12日

第19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21日

现在墨索里尼已由德国人扶植成为所谓共和党法西斯党联合政府的首脑。为反对这一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加强国王和巴多里奥的政权，因为他们已经和我们签订停战，并已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和交出了大部分舰只。此外，由于军事上的理由，我们必须动员和集中所有在意大利的部队，这些部队正渴望着同德国人交战，至少是阻止德国人前进。这些都已动员了起来。

因此我建议告诉意大利国王，要他通过无线电呼吁意大利人民团结在巴多里奥政府周团，并且宣布打算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同时使意大利人民了解他们在战后可以不受阻碍地自行决定民主政府的形式。

还应该提到，在调整和执行停战的过程中将考虑到意大利政府、军队和人民在反对敌人方面所作的有益的贡献。但是，虽然意大利政府有自由向德国宣战，这样做并不会使意大利变为盟国，而只是在我们一方的交战国。

同时我要坚持签订仍被搁置一旁的全面停战条款，虽然这些条款中有一部分目前还不能实现。作为相对的条件，我们将告诉巴多里奥，当意大利大陆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以后，盟国政府打算把西西里、撒丁和历史上属于意大利的地方交由盟国管制委员会管辖下的意大利政府管理。

这些建议我同时要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并且希望能指望你的同意。当

然，正如你所了解的，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这件事是十分急迫的。举例来说，意大利人已经把德国人赶出撒丁，而且还有许多岛屿和战略点仍在他们手中，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取得的。

1943 年 9 月 21 日

第 19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9 月 22 日

9 月 21 日来电已经收到。

1.我同意你关于由意大利国王通过广播呼吁意大利人民的建议。但是我认为在国王的呼吁书中完全有必要清楚地说明意大利在向英、美、苏投降之后，将同英、美、苏三国一起对德作战。

2.我也同意你关于有必要签订全面停战条款的意见。至于你关于某些条款在目前不能实施的保留意见，根据我的理解，这只是指这些条款在目前尚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内无法实施。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对这一点加以肯定或者作必要的解释。

1943 年 9 月 22 日

第 19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3 年 9 月 26 日收到

艾登先生和我愿意就斯摩棱斯克的极好的战况向你表示祝贺。

第 19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3 年 9 月 26 日

在攻克斯摩棱斯克时承致祝贺，我向你和艾登先生表示感谢。

1943年9月26日

第19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9月27日收到

1.我一直在考虑将在德黑兰举行的我们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这个控制有些松懈的地区，对保证安全必须作妥善的安排。因此请你考虑一下：我建议我在开罗对住宿、安全等方面作一些筹备工作，这些筹备工作即使尽一切值得赞扬的努力去保密，还是一定会被人注意到的。然后也许在会议以前的两三天，我们应该用一旅英国的和一旅苏联的军队把德黑兰的一个适当地区，包括飞机场，隔绝起来，保持一条绝对严密的警戒线，直到我们结束会谈时为止。在时机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将不通知伊朗政府，也不为我们的会谈的布置工作做任何准备。自然，我们必须严格检查发出的全部消息。这样，我们将有一个有效的障眼法，用来对付各国的报界以及任何不喜欢我们的人。

2.我还建议在今后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中我们使用“开罗三”而不使用德黑兰的字样，后者应该被埋没起来，同时还建议以“尤列卡”作为我们行动的代号，“尤列卡”这个字我相信是古希腊字。如果你有其他意见，请通知我，好让我们向总统提出。迄今我还没有同他谈过关于这方面的任何问题。

第19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0月1日收到

1.我已经收到你关于重新派护航舰队到俄国北部的请求。我和我所有

的同事都非常愿意尽力帮助你和你所率领的英勇军队。所以我对莫洛托夫先生来电中所提出的可以争论的各点不作答复。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我们不顾自己的沉重负担，一直在竭力帮助你们保卫你们的国家抵抗希特勒匪帮的残酷侵略，同时我们一直承认和公开声明，你们获得的辉煌胜利和给予德国军队的致命打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2.四天以来我一直在同海军部一起研究一个派这一批新的护航舰队去俄国北部的计划，这件事牵涉到极大的困难。首先，大西洋上的战斗又开始了。德国潜水艇用了一种新的感音水雷来攻击我们，这种水雷已证明有效地伤害了我们搜索德国潜水艇的护航舰。第二，我们在地中海的力量极度紧张，要在11月底以前在意大利集结一支约60万人的军队，而且要设法充分利用意大利军队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崩溃的机会。第三，我们必须担负我们在对日作战中的一部分责任，美国对这个战争很感兴趣，如果我们不积极，美国人民就会不高兴。

3.虽然如上所述，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正计划在今年11月、12月和明年1月、2月先后派遣4次护航舰队前往俄国北部，每次包括约35艘英美船只。为了适合军事行动的需要，护航舰队可能分成两半航行。第一次将在11月12日左右离英，10天后抵俄国北部；以后每隔28天航行一次。我们打算在10月底尽可能多地撤走一些在俄国北部的商船，余下的将随同归航的护航舰一起回来。

4.但是我必须记录在案，这并不是合同，也不是买卖，而是我们的庄严和真诚的决心的宣言。在这个基础上，我已下令采取必要的措施派遣4次由35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

5.然而外交部和海军部要求我提请你注意，并且确实希望你亲自注意我们在俄国北部所遭遇到的以下的困难情况。

6.假如我们要重新派护航舰队，我们必须补充从今年3月以来已有所精简的我们在俄国北部的机关。现在我们海军人员的名额即使按目前需要而论仍少于实际需要，因为调遣人员回国后无人接替。凡是我们去俄国北部，甚至前往接替那些早已超过服役期限的人员的人，你们的民政当局一概拒发签证。莫洛托夫先生曾力促英王陛下政府同意：在俄国北部的英国

军事人员不得多于在英国的苏联军事人员和贸易代表团人员。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建议，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不同，而且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人员的名额，不能用这样不切实际的办法来决定。其次，正如我们已通知苏联政府的，很明显，为执行我们所负责的军事行动所必需的人员数目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判断。艾登先生已经提出保证：我们将十分注意把人数严格限制到最少的限度。

7. 因此我必须要求你同意立即发给现在需要加添的人员的签证，并且保证今后在我们因往俄国北部输送援助而需要申请时，不再拒发签证。我要强调指出，目前在北部的 170 名左右的海军人员中，有 150 名以上在几个月前即应轮换，但是苏联方面均未发给签证。这些人对气候和其他条件不习惯，健康状况不好，因此有必要不再拖延地去替换他们。

8. 我们还想派遣贵国当局业已同意的小型医疗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但是必要的签证尚未获得。请记住，我们是可能有很多伤员的。

9. 我也必须请你协助改善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海员目前在俄国北部的处境。这些人自然是在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从事于对敌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把盟国的供应运往贵国。我相信你会承认，他们所处的地位是同前往俄国的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却受到贵国当局的限制，依我看来，对于盟国派去执行对苏联有极大利益的军事行动的人加以这些限制是不合适的，限制情况如下：甲，英国军舰或英国商船上的任何人员不得登陆，除非乘苏联小船靠岸，有苏联官员在场，并且每次须检查证件；乙，事前未经通知苏联当局，英国军舰上的任何人员不得靠近英国商船。此条甚至适用于负责的英国海军将官；丙，英国官兵离船上岸或者来往于岸上的两个英国驻地之间须敢得特别通行证。此种通行证时常拖延很久才发给，从而造成工作的脱节；丁，除非苏联官员在场，送给这支部队的军需、行李或邮件不得上岸。运送一切军需品和邮件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戊，私人通信受检查，虽然我们认为对于作战部队的这种检查应该交由英国军事当局进行。

10. 这些限制给官兵们造成一种对英苏关系不利的印象，而且如果为国会得知，将大为有害。这些手续的累积效果已经大大妨碍这些人有效地执行任务，而且已多次影响紧急和重要的工作。我们这里对苏联人员没有

施加这样的限制。

11.我们已向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凡军人和护航舰队里的人员违犯苏联法律的案件，应交由英国军事当局处理。无疑的，有些这种案件，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在北方服务的条件太苛所致。

12.因此，我确信你会认为可以发出指示，本着友好精神消除这些困难，使我们可以相互帮助，并且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共同的事业。

第20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10月2日

1.英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建议（即总统于10月1日用电报通知给你的建议），我希望你对这些建议能表示同意。

2.我们也希望，你同总统和我一起参加三国宣言，这个宣言应当在意大利向德国宣战之后立即公布，

3.宣言的文本如下：

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承认巴多里奥元帅所持有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力量的积极合作，把它看作共同对德作战的一方。9月8日以来的战况以及德国人对意大利居民的残酷待遇导致了意大利对德宣战，使意大利在事实上变成了共同作战的一方，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的政府将在这个基础上同意大利政府继续合作。三国政府认为在将来德国人被逐出意大利以后，意大利政府应承担服从意大利人民意志的义务，这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损害意大利人民用合乎宪法的办法决定民主政府的形式。这一绝对不可让与的权利，这种民主政府的形式意大利人民归根结蒂是会得到的。

建筑在共同进行战争的基础上的意大利政府和各联合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并不能影响不久以前签订的条款，这些条款保持其全部效力，只有按照意大利政府对联合国家事业所作的协助的大小，并经各盟国政府一致同意后，才能予以变更。

1943年10月2日

第 20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0 月 2 日

10 月 2 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苏联政府准备参加应当在意大利对德宣战以后立即公布的三国宣言。我认为你送来的宣言文本是可以接受的。我建议，宣言同时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三地公布。

我附带告诉你，你说总统 10 月 1 日拍给我的讲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建议的电报，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

1943 年 10 月 2 日

第 20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10 月 3 日

关于即将举行的三国政府首脑会谈的 9 月 27 日来电已经收到。我对你打算在开罗进行假准备以迷惑敌人的想法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至于你建议的在我们会谈以前几天把一个英国旅和一个俄国旅调到“开罗三”的适当地区，我认为这种措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将引起不必谋的喧嚷和暴露。我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随带可靠的警卫。我认为，这就足够用来保证安全。

至于你关于即将举行的会谈的其他建议，我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我同意你所建议的在有关这次会谈的通信中使用的代号。

1943 年 10 月 3 日

第 20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0 月 13 日

1.我收到了你 10 月 1 日通知我你们准备在 11 月、12 月、明年 1 月和 2 月通过北方的路线派四个护航舰队前来苏联的电报。然而这份电报由于你的声明而减少了价值，你声称派遣北方护航舰队到苏联的意图“不是合同，也不是买卖”，而仅仅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可以理解为英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予以推翻，不管这将对苏联在前线的军队产生什么影响。我必须说，我不能同意这样地提出问题。英国政府提供给苏联的军备和其他军需物资是一项义务而不可能是其他。这项义务是经我们两国专门协议由英国政府对苏联承担的，后者已经第三年担负着对盟国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的巨大负担。

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北方路线是盟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把供应的军火运到苏德战场的距离最短的路线，而如果要想以适当的数量实现对苏供应计划，不充分使用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以前写信告诉过你的，并且正如经验所证明，通过波斯港口对苏联运送军火和军需物资完全不足以补偿未经北方路线运送的那些军火和物资，这些军火和物资显然都是包括在对苏军的供应计划之内的。同时由于某种原因今年通过北方路线运输的军需物资比起去年所收到的物资有大量的减少；这就使得苏联无法完成预定的对军队提供军事供应的计划，同时也是违反英苏有关军事供应的议定书的。因此，目前当苏联军队为了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主力而竭尽全力来满足前线的需要时，不能容许把苏联陆军的供应依赖于英方独断的决定。只能认为，这样提出问题表明英国政府拒绝执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是对苏联的一种威胁。

2.关于你所提到的莫洛托夫先生的声明中所包含的所谓可争论的

问题，我不得不说，我找不到这种评论有任何根据。我认为苏联方面所建议的在解决军事代表团人员的签证问题方面的互惠和平等原则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公正的原则。关于英国军事代表团和苏联军事代表团职责不同，可以不采用上述的原则以及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人数应该由英国政府独自决定的提法，我认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前的几个备忘录已就此问题作了详尽的阐明。

3.我看不出有必要增加在苏联北部的英国军人的数目，因为正如苏方多次指出过的那样，已经在那里的绝大多数英国军人还没有加以充分的使用，许多月来他们都在闲着。譬如，可以指出由于不需要而曾经几次提出取消英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第126港口基地问题，而最近英方才同意予以取消。还有一些遗憾的事，曾有几次个别英国军人进行了企图收买苏联公民从事搜集情报的不可容许的行为。这些侮辱苏联公民的事自然引起了导致令人不愉快的复杂情况的事件。

4.关于你提到的北方港口所存在的手续和某种限制的问题，如果没有忘记苏联的战争情况，就必须考虑到这些手续和限制在邻接前线的地区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对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对苏联公民都是同样适用的。然而苏联当局在这方面已经给予英国军人和海员许多特权，关于这些特权早在3月就已通知了英国大使馆。因此你提到的许多手续和限制是根据了不确实的消息。

关于检查和控告英国军人的问题，我并不反对根据互惠的条件对北方港口英国人员的私人信件的检查由英国当局自己来进行，以及如果英国军人犯了小的违法事情并且不牵涉到法院起诉的问题时，交由适当的军事当局来研究处理。

1943年10月13日

第20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0月13日收到

下列文件是否可以由我们三人签署予以发表，请加考虑：

“1.英国、美国和苏联（如果认为有其他更好的排列方法，我们完全同意列在最后），已从许多方面获得关于希特勒军队在他们曾经蹂躏过而如今正被步步逐出的许多国家中所犯的暴行、屠杀以及冷酷无情地执行集体死刑的种种证据。希特勒统治的暴行，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凡在他们劫持下的一切人民或领土，都已受到借恐怖手段而实行极端恶劣的统治形式的痛苦。新的事情是：在这些领土上有许多地方，目前正由解放国的挺进军队拯救出来，败退的希特勒匪徒陷于绝望，正加紧他们的残酷无情的暴行。

“2.据上所述，三个盟国兹代表32个联合国家的利益，严正宣告，并以下列的宣言提出警告：

‘在对在德国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允许停战的时候，凡曾经负责或自愿参加上述暴行、屠杀或执行集体死刑的德国军官、士兵和纳粹党员，都应当解回到他们犯下可恶罪行的所在地的国家，以便依照这些被解放的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的自由政府的法律审判惩处。应当根据从所有这些国家收到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来编制这种人的名单，特别是苏联的被占领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包括克里特岛和其他岛屿）、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

“因此，凡曾参与大批枪杀意大利军官，或把法国、荷兰、比利时或挪威的人质或克里特岛的农民处死；或曾参加杀戮波兰人民，或曾杀戮在现在敌人正被扫荡干净的苏联的领土内的人民的德国人，应当知道：无论费用多大，他们都将被解回到犯罪地点，并在当地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让那些直到现在手上还没有沾染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人们明白：慎勿厕身罪人之列，因为三个盟国，必定要追踪他们到海角天涯，必定要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俾使公道得以伸张。

“上述宣言不涉及首恶元凶的案件，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不拘于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罗斯福
斯大林
丘吉尔”

如果发表这类由我们三人签署的文件（在措辞方面我并不特别坚持），我认为这将使这些恶棍中的某些人，当他们已知道他们将被战胜的时候，现在不敢去参与这种屠杀。譬如，我们知道，我们在保护波兰人时所进行的镇压已缓和了那里的人民所遭受的迫害。毫无疑问，敌人利用武器从事恐怖行动使我们的军队担负着额外的负担。如果德国人知道，要把他们送回原地，在他们进行过暴行的那个国家，甚至可能在犯罪的地点受审，他们中间很多人或者会长出良心来也说不定。我十分恳切地建议你使用审判地方化的原则，这种原则对敌人的恐怖可以起抑制的作用。英国内阁赞同这个原则和这个政策。

第 20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1 月 12 日收到

我对你极其精致的礼物和你对艾登先生的好意款待表示十分的感谢。会议进行得那么成功，我感到很满意。

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应当在 11 月 22 日左右在开罗会见，以便进行对英美联军军事行动和对日战争的详细讨论。现在我们拟定了对日本长期作战的计划。在讨论后一个问题时，蒋介石本人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可望出席。

我们希望，在关于我们内部事务和远东事务的那些谈判结束后，能够召开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谈。此外，还考虑到，为了讨论整个战局以及战局的一切方面，应当召开苏、美、英三国参谋部的会议，这个会议应当在 11 月 25 日或 26 日左右开始自己的工作。因此，很希望你派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全权军事代表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有莫洛托夫先生随同前来。这一切将同三国政府首脑会谈分开进行，并且是作为会谈的补充。我很高兴地得悉总统准备飞往德黑兰。很久以来，我曾坚决请求他这样做。至于我自己，我在前几个月已经声明过，我愿意在任何时间到任何地方去，只要我们三个人能在一起会谈。

第 20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1 月 12 日收到

我的前一封电报还没有得到总统的认可，但是我有一切根据认为，它是会得到认可的。如果我弄错了，那么一切都应当重新开始。我不怀疑，令人满意的方案是会找到的。但是，靠三方面通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人们正在海上或者空中行动的时候。

第 20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 年 11 月 12 日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两封电报。

虽然我已去电给美国总统告诉他莫洛托夫将于 11 月 12 日抵达开罗，但是应当告诉你，很遗憾，由于某些具有严重性质的原因，莫洛托夫不能前往开罗。他可能在 11 月底去德黑兰，并且是同我一起去那里。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个军官。

不言而喻，德黑兰会谈应该只是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事，正像以前所讲定的那样。应当完全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祝你同中国人进行的关于远东问题的会谈获得成功。

1943 年 11 月 12 日

第 20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 年 11 月 15 日收到

11 月 12 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我完全理解你的态度，并且也完全同意

你的愿望。我目前正在海上。我对贵国不断的胜利的攻势表示祝贺。

第209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1月17日

你的复电已在11月15日收到。承你对苏军的攻势表示祝贺，特表感谢。苏军现在不得不在基辅以西经受巨大的压力，德国人已把增援的部队和坦克投到那里去。

1943年11月17日

第21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1月23日

1.总统把关于我们的会谈问题拍给你的电报给我看过了。我知道你希望把自己的代表团安置在苏联大使馆。因此对总统来说似乎住在英国使馆更好些，英国使馆就在附近。这样，两个使馆就可以用警卫队形成一个保卫圈。对三国首脑来说最不合适的是在德黑兰街道上游览。最好是划定适当的地区，并且不要越出它的范围。

2.陪同我前去的将有外交大臣和英国大使。此外，总统和我都将随带有自己的参谋长。我希望我们同你在一起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以便我们有充分的机会进行接触，并对战争的各个方面充分地交换意见。

1943年11月23日

第21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3年11月25日

你从开罗拍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了。我准备于11月28日晚上在德黑兰为你效劳。

1943年11月25日

[德黑兰会议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

第212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年12月7日收到

在刚才结束的开罗会议上，我们达成了下列关于1944年对德作战计划的决议，作为我们三人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的补充。

为了破坏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消灭德国空军力量以及为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作好准备，将把战略上最高的优先地位给予对德的空袭攻势。

我们已经缩小了原定在3月份在孟加拉湾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以便有可能增加进攻法国南部用的登陆工具。

为了增强横渡海峡的战役，我们已下令在英国和美国尽最大努力增加登陆工具的生产；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已下令从太平洋调动某些登陆工具。

第21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3年12月10日

承蒙你们联名来信通知关于1944年对德作战计划的一些补充决定，特表感谢。

致意！

1943年12月10日

第 21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12 月 20 日收到

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对你，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祝贺。愿今后这一年成为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以极大的规模开展起来的一年。

第 21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3 年 12 月 22 日发出

在我生日的时候，承致友好的祝贺，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热诚地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你的精力完全恢复，这对于对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是十分必要的。

第 21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12 月 26 日收到

对你的来电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正在顺利地恢复健康，并且已经以全部精力重新开始处理对我们双方都有关的问题。我对你和贵国英勇的军队表示最良好的愿望，预祝你们在 1944 年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第 21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

1. 前往俄国的北极护航舰队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昨天敌人企图用主力

巡洋舰“夏恩贺司特”号来截击。海军总司令弗雷塞将军用“约克公爵”（35,000吨的主力舰）切断了“夏恩贺司特”号的退路，并且经过战斗后把它击沉了。

2.我已经好多了，要动身到南方去休养。

第21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3年12月27日

对你关于“夏恩贺司特”的来电表示感谢。

我向你本人以及弗雷塞将军和“约克公爵”号上的英勇的水兵们表示祝贺，庆贺你们给予德国“夏恩贺司特”号战舰以出色的打击并且把它击沉了。

对你的痊愈表示高兴。

紧握你的手。

1943年12月27日

（166）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第 21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 月 1 日收到

非常感谢你。我把你的祝贺告诉了弗雷塞将军、他的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对来自勇敢的和光荣的盟国的赞扬表示欢迎。我很高兴，你们收复了柯罗斯汀（你在德黑兰时曾告诉过我们关于柯罗斯汀失守的消息）。我真希望我们能够每星期见一次面。请你代我问候莫洛托夫先生。如果你能把新的苏维埃俄国国歌的谱子送给我，我将让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有关俄国的重大胜利的一切场合都播送这首歌。

第 22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 年 1 月 2 日

新的苏联国歌的歌谱将由最近一班的信使带给你。莫洛托夫对你的祝贺和良好的愿望表示感谢。我完全赞成你关于我们经常会见的愿望。

1944 年 1 月 2 日

第 22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 月 5 日收到

1. 你们在基辅西方和西南方的威帖布斯克所进行的出色的进攻使我们

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月底能作出一点不大的贡献，为此，我正在这里进行工作。同时，对“霸王”的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蒙哥马利将军在到远征军团去的途中路过此地，他是去担任远征军团的司令的。自然，他对计划的细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充满着斗志，他对战斗的结局是有充分把握的。

2.今天贝奈斯总统来同我会晤。他是个英明的人，并且将会有助于劝导波兰。

3.我的健康情况正在日益好转。比维尔勃鲁克和我在一起，他向你致最热烈的敬意。我的儿子兰道尔夫将同我们代表团的团长马克林准将一起乘降落伞降落到铁托那里，这样我的消息将会很灵通了。已经向所有的军官发出训令，要他们在工作时同你派去的任何一个代表团进行最密切的协商。承你对希腊人进行了协助，我表示非常感谢。

第22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月7日

1.1月5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你告诉我对“霸王”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并且本月内还要采取其他的措施，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2.既然你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应当说，如果根据波兰流亡政府最近的一个宣言和波兰活动家的其他意见来看，显然，没有根据可以期望这些集团会接受劝导。这些人是不可救药的。

3.请转达我对比维尔勃鲁克男爵的谢意和良好的愿望。

4.我们的进攻正在继续进行，到目前为止已有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南方，虽然德国人正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顽强的反抗。

1944年1月7日

第 22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 月 12 日收到

我托日内即将乘降落伞降落的我方代表团带给铁托一封信。现在把这封信的原文送给你，仅供你本人参考：

“先生，

承蒙你以你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南斯拉夫爱国者的英勇的军队和游击队对我的健康情况来信问候，我非常感谢。关于你的英勇的努力，我从我的朋友埃希金少校那里了解得很详细。我以最真诚的心情力图用经海路供应物品的办法给予你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用开展‘康曼杜斯’[①]的办法从空中支持你们，以便帮助你们在岛上作战。马克林准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下议院的同事。我的儿子兰道尔夫·丘吉尔少校也是国会议员，他不久将同他们一起在你的大本营服务。我们面临着一个崇高的目标：即扫清欧洲的土地，除去纳粹法西斯的恶臭的脓包。你可以相信，我们英国人无意于把某种将来的政府形式强加在南斯拉夫人民身上。同时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为战胜共同的敌人更加亲密地一起工作，以后再根据人民的意志解决政府形式的问题。

我已经决定，英国政府今后将不给予米哈依洛维奇以任何军事上的援助，而只对你进行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他不再加以注意，那么我们将很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虽然还年轻，却已摆脱了摄政的保尔亲王的奸诈的魔爪，并且以南斯拉夫的代表和遭遇不幸的年轻王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里，如果英国不让他来的话，那么英国的行动是不讲义气和不正直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停止同自己国家的现有的一切联系。因此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无论如何我们将继续同他保持正式的关系。同时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军事上的支援。我还希望双方都停止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只能对德国人有帮助。

————————————————

① “康曼杜斯”——实行登陆战役的特种部队。——原注

你可以相信，我在工作中同我的朋友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将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真诚地希望苏联政府派往你们总部的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也将同由马克林准将领导的英美代表团密切配合。请你给我写信（信可由马克林准将转交）并通知我，根据你的意见，为了帮助你我能作些什么，当然，我将努力作一切可能作的事。

希望贵国的苦难早日结束并且希望整个欧洲从暴政中解放出来。

请相信我，

你的忠实的

温斯顿·斯·丘吉尔

1944 年 1 月 8 日于非洲”

第 22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 月 12 日收到

我们不断地注视着苏军的惊人进展。我虽不是专家，却感觉到日梅林卡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德黑兰相聚，那么我将在桌子的对面向你说：“请你预先通知我，我们什么时候应当停北对柏林的破坏，以便为苏军的驻扎留下足够的房子。”

制定我们的意大利战役的一切计划的工作已经在这里圆满结束。

我用紧紧的、真诚的握手来回答你的握手。

第 22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 月 14 日

1 月 12 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近来我们的军队确实有些成就，但是我们离柏林还很远。况且现在德国人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反攻，特

别是在文尼察以东的地区。当然这并不危险，但是在这里德国人还是能够击退我们的先头部队，并且暂时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因此，你能否不减弱、甚至尽可能大力加紧对柏林的轰炸。德国人在我们大家到达柏林之前还来得及建成若干房子，这些房子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必要的。

你在你给铁托的那封信里表示同意给予支援，这封信具有很大的意义。

希望贵国和美国人一起负责的“霸王”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1944 年 1 月 14 日

第 22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 月 15 日收到

1 月 2 日来电中所说的照会现在已经收到了，国歌将由英国广播公司的交响乐队在星期日晚上 9 点钟播送新闻以前演奏。

第 22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 月 17 日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能够用 20 只船（主要是美国船）组成一个额外的北极护航舰队，大概在 3 月 15 日到；18 日从英国出发，这样对我们的主要战役不会有什么损害。我希望你对此将感到高兴。

我从目前正在英王陛下的“约克公爵”号军舰上的弗雷塞将军那里知道，他在击沉“夏恩贺司特”号以前同戈洛夫柯海军上将和你们在柯尔港的全体军官和海军士兵举行了诚挚的和亲切的会见，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告诉我说，我们两国海军的各级军事人员都表现得很友好。

你很喜欢我给铁托的那封信，我对此感到高兴。当然，我们将继续不断地对柏林进行轰炸。现在我在海上，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到家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保证“霸王”的成功。

1944 年 1 月 17 日

第 22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 月 20 日

你通知说你已决定除了原来已规定的以外在 3 月中旬把一个由 20 只船只组成的补充护航舰队派来苏联，对此我表示感激。这对我们的前线将是极为可贵的。

1944 年 1 月 20 日

第 22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 月 22 日收到

1. 我们对保卫罗马的德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关于这次进攻我在德黑兰曾和你谈过。气候条件似乎很有利。我希望不久就有好消息告诉你。

2. 我现在给你送去总统和我关于意大利船只问题的联名电报。为了办好这件事，我曾做了不少努力，我并且希望这些建议都是你所能够接受的。如果不行，请直接通知我，我将研究一下是否能再做些什么。

3. 关于我同波兰人会谈的事情将另行电告。

第 230 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 月 23 日收到

苏联政府曾在莫斯科会议上要求把意大利的船只移交给苏维埃俄罗斯，关于这一点我们两人同你在德黑兰已经商妥。现在我们从联军参谋部收到一份备忘录，在这封电报以后马上发给你的一份电报中将包括这份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中所表示的意见，我们认为，从我们三国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目前进行任何船只的移交或者就这一点同意大利人进行任何该判都将是危险的。因为同他们的合作在目前对于军事行动能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在详细地讨论了问题之后，你希望我们继续活动，那么我们将秘密地向巴多里奥元帅提出要求，以便签订必要的协议，同时又不使意大利海军广泛地知道这些协议。如果通过这种办法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就可以向他建议，由他同意大利海军当局商定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规定应予移交的意大利船只开往盟国的适当的港口，在那里将由俄国的海员接收它们，并由他们开往俄国北部的港口，这些港口是可能进行必要的改装的唯一开放的港口。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根据我们向你叙述过的意见来行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决定建议下列办法，这个办法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具有很多优点的。

英国主力舰“君主”号不久以前在美国完成了改装工程。它装有雷达装置，可以测知一切类型的武器。美国大概也可在同一时间提供一只轻型巡洋舰。

英王陛下政府和美国政府方面愿意作好准备，以便这些船只由苏联海员在英国港口加以接收，并且开往俄国北部的港口。以后你可以按照北极的条件来进行你认为必要的改装。这些船只可以暂时借给苏俄并悬挂苏联国旗航行，一直到可以提供意大利船只而不使军事行动遭到损失时为止。

英王陛下政府和美国政府将各自采取措施提供2万吨的商船，这些商船将尽快交出，在为了不影响预定的“霸王”和“铁砧”[①]重要战役而暂时无法获得意大利商船的期间内供给使用。

这个办法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苏联政府能够较早地使用这些船只，因为否则的话，船只都需要改装，使其适应北方的海洋。这样，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作的努力可以使情况好转，海峡将会开放，这些船只可以准备用于黑海的战斗。我们希望你能特别仔细地研究这个建议。据我们看来，

这个建议在各方面都比第一个建议强。

丘吉尔
罗斯福

————————————

① “铁砧”，盟国军队1944年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战役的代号。——原注

第231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1月23日收到

请参阅我们上次的电报。

我们的联军参谋部提出了下列肯定的建议，并附有证实的材料：

甲、因为盟国即将展开战役，目前移交缴获的意大利船只是不适当的。

乙、现在命令移交就意味着剥夺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中必须利用的意大利资源，并且会妨碍我们得到目前意大利的修理基地所给予的援助。这可能会引起意大利军舰的凿沉和失去同意大利的合作，因而使“霸王”和“铁砧”遭到危险。

丙、只要作战的情况许可，意大利船只可以在最近期间移交。

丘吉尔
罗斯福

第23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1月24日收到

1.我们将派克拉克·寇尔大使立即返回你那里，以便他可以解释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虽然在开始时感到无关紧要，对我们两国来说可能变成极大的困难。

2.苏联政府以广泛的规模正式公布的“真理报”的消息[①]在这里造成

极端不良的印象，对此我不能置若罔闻。在英国，甚至苏俄的最好的朋友也搞糊涂了。由于我们不能理解这条消息的内幕，所以它使人更加感到侮辱。我相信，你是知道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单独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我们把他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通知给你们，正像你们通知我们一样。甚至在我们完全孤单的情况下，并且很容易在使英帝国不遭受严重的损失而让你们来承担重大牺牲的情况下缔结和约的那一年里，我们也没有考虑要缔结单独的和约。为什么在今天，正当我们三个国家的事业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呢？如果英国报刊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登载了什么消息使你生了气，你为什么不能拍电报给我，或者责成你的大使来找我，并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呢？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切已经遭到的损失，也可以避免已经引起的猜疑。

3.每天我都收到“战争和工人阶级”杂志的很长的摘录。看样子，这个杂志对我们在意大利的行政机关和对希腊的政策经常从左边来进行攻击。考虑到你在意大利事务委员会中也有代表，我们应当希望这些抱怨将在那里交付讨论，而且我们应当通过政府之间交换意见的方式来听取这些问题和阐明我们的观点。由于苏联报刊公开进行了这些攻击（而这些报刊在像这样的外交事务上不管对不对是不会脱离苏联的政策的），因而两国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成了我们国会中的严重的问题。我推迟了在下议院的发言，我想等到在意大利进行得很不坏的战斗有了结果之后再发言。但是，再过一星期或者10天我必须在下议院发言，并且要涉及到我在这封电报中所提到的问题，因为我不能允许对责难和批评始终不加答复。

4.我从德黑兰带回的对我们的良好关系的感觉，加上你托贝奈斯先生带给我的那封信，都使我感到非常振奋，我日夜在努力，想使事情进行得像你所希望的那样，也是像我们三个国家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我确信，如果我们能在一起，这些困难就不会发生。我现在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保证第二战场上的胜利，并且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扩大这个胜利。我的工作被

————————————————

① 指1944年1月17日“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其中说据可靠方面消息，为了明确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条件，里宾特罗普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议。——原注

各种微小的刺激搞得难以进行，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了。当然，如果你能说几句话，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全搞清楚。我们一向赞同相互之间开诚布公地通信，我现在正在这样做。但是我希望在克拉克·寇尔到达时你会接见他，并且给他机会来更详细地说明情况，正像盟国之间所应当做的那样，我们这两个盟国不仅在战争中团结一致，而且是被为期20年的条约联系在一起的。

5.关于同波兰人进行谈判的问题，我还没有可能打电报，因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应当了解美国的态度如何。但是，我希望几天以后可以给你去一封信。

6.马克林准将和我的儿子兰道尔夫已经顺利地降落在铁托参谋部的所在地。

第23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年1月29日

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关于把意大利船只移交苏联使用的问题的两封联名来信已经在1月23日收到了。

应当说，你们在德黑兰对我所提出的在1944年1月底以前把意大利船只移交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联合回答以后，我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三国之间已经通过和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个决定会产生什么重新考虑的可能。尤其是当时我们已经商定这个问题应当在12月和1月之内同意大利人完全交涉好。现在我看到，情况并不是如此，对这个问题甚至什么也没有同意大利人谈过。

但是，为了不使这个对我们反对德国的共同斗争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拖延下去，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你们提出的把“君主”号主力舰和一艘巡洋舰从英国港口派来苏联以及在把有关的意大利船只提供苏联之前把这两艘军舰拨归苏联海军司令部暂时使用的建议。同样，

我们将准备接受美国和英国的两万吨的商船；在把同等吨数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之前这些船只将由我们使用。重要的是现在不要在这方面拖延，并且把所指定的全部船只在2月份以内移交给我们。

但是，在你们的复信中一点也没有谈到把8艘意大利驱逐舰和4艘潜水艇移交给苏联的问题。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在德黑兰时就已经同意了在1月底就把这些船只移交给苏联的。对苏联来说，主要的是关于驱逐舰和潜水艇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军舰，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巡洋舰的移交是没有意义的。你们自己会理解到，巡洋舰和主力舰如果没有驱逐舰的护送是没有力量的。既然你们掌握了意大利的全部海军，履行在德黑兰通过的把意大利舰队中的8艘驱逐舰和4艘潜水艇交给苏联的决定就不应当发生什么困难。我同意以同等数量的美国的或英国的驱逐舰和潜水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水艇移交给苏联使用。并且移交驱逐舰和潜水艇的问题不能拖延，而应当与主力舰和巡洋舰的移交同时解决，正如我们三国在德黑兰已经商定的那样。

1944年1月29日

第23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月29日

1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由于前线的事务太繁忙，我的复信有些迟了。关于“真理报”的消息，请你不要对它过份重视，因为没有理由来否认报纸有权利刊登从经过考验的记者那里收到的关于新闻或流言的报道。我们俄国人至少是从来也不要求对英国报纸的事务进行这种干涉的，虽然对这点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具有多得无法比拟的理由。我们的塔斯社只对英

国报刊上所登载的值得批驳的消息中的一小部分进行驳斥。

至于谈到问题的本质，那么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即当时英国很容易在使英帝国不遭受严重的损失，而让苏联来承担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同德国单独媾和。我认为你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因为我还记得你的性质不同的声明。例如，我记得在苏联没有加入对德战争以前，对英国来说是在极其困难的时期，你认为英国政府可能被迫迁到加拿大去，从大洋彼岸进行对德斗争。另一方面，你还承认过，正是苏联，在它对希特勒展开战斗之后，消除了德国对英国的毫无疑问的威胁。如果仍然认为英国没有苏联能对付过去的话，那么对苏联说来，情况也是这样。我并不想谈这一切，我是被迫而谈这些和回忆起一些事实的。

关于“战争和工人阶级”杂志，我只能说，这是工会的杂志，政府对它所刊载的文章是不能负责的。况且这个杂志正如我们的其他杂志一样，是忠于巩固同盟国的友好这一个基本原则的，然而这并不排斥，相反地是允许友好的批评的。

正像你一样，我对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和我们的共同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寇尔先生来到后我当然是会同他会晤的。

1944 年 1 月 29 日

第 23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2 月 1 日收到

1. 上星期四，在外交大臣的陪同下，我由战时内阁授权会见了波兰政府在伦敦的代表。我对他说，保证俄国边界的安全免受德国方面的威胁对英王陛下政府说来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并且告诉他，我们当然是

支持一切苏联提出的、我们认为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措施的。我指出，俄国经受了两次来自德国方面的骇人听闻的侵犯，遭到了大量的牺牲和破坏，波兰的民族独立及其生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并且伟大盟国的政策是在这次战争之后重新恢复波兰。我说，虽然我们是由于波兰的缘故才加入了战争，但是我们这样作并不是为了什么肯定的国境线，而是为了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存在，根据斯大林自己的声明他是支持这一点的。此外，虽然在德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之前英国无论如何是会继续斗争许多年的，但是把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件事主要是靠苏联军队的重大牺牲换来的。因此盟国有权要求波兰在它将拥有的领土的边界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盟国的意见。

2.接着我说，根据德黑兰所发生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讨论，苏联政府是会同意波兰东部边界应依照寇松线[①]的，并且我劝他们接受寇松钱作为讨论的基础。我谈到了波兰将会在北部和西部取得补偿的问题。在北部这可能是东普鲁士。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涉及到哥尼斯堡问题。在西部他们是会安全的，并可以在占据奥得河线以东的德国土地这个问题上得到协助。我向他们说，盟国军队解放了他们，因此他们应该担负起这项任务，并且保卫自己的边界以防德国向东侵略。我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需要站在他们后面的友好的俄国，并且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三大国将保证支持他们以防德国的新的进攻。如果英国的盟国苏俄同意的话，英国是准备给予这种保证的。我不能预言美国的行动方式，但是我觉得三大国将共同反对一切和平的破坏者，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是会这样的。我解释说，将不会要求波兰政府承担义务，同意寇松线，把它作为讨论的基础，除非寇松线成为在北部和西部给予波兰政府很好的补偿的协定的一部分，关于这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

3.最后我说，如果俄国人的政策向我所指出的方向发展，我将恳切地要求波兰政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协商，并且英王陛下政府将建议由和会或

————————————————

① “寇松线”，协约国会议于1919年12月8日建议作为波兰东部边界的那条线的名称。——原注

在消灭希特勒主义后解决欧洲结构问题的会议来确定用这一方式解决问题，并且将不支持波兰除此以外的任何领土要求。如果波兰的部长们相信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那他们的职责将不仅是在适当时期同意这个协议，而且甚至当他们有遭受极端分子摒弃的危险时，仍能勇敢地将它推荐给自己的人民。

4. 波兰的部长们并不想拒绝已经有所开展的前景，但是他们要求给予他们时间以便同其他同事们共同研究这一问题，并且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我感到没有一个是同我向他们提出的建议的总的精神相矛盾的。他们特别希望得到如下的保证：波兰在拨给的新的领土上将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它将取得各大国的有效保证以防德国的报复；这些大国也将帮助他们把德国人从应该转让给波兰的新的领土上赶出去；并且将协助在应该并入苏俄的地区的那些愿意回去的波兰人前往他们新的住地。他们还问道，如果寇松线以西波兰很大的一块领土将被苏联军队所占据，那时他们的处境将是怎样。是否将允许他们回去并且根据人民的愿望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组织政府，以及是否允许他们像其他受侵略国家的政府一样在解放区执行行政职权？他们特别关心波兰地下运动和进攻中的苏联军队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他们的主要愿望是要协助赶走德国人。由于这一地下运动，产生了一些对我们共同的军事努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5. 我们也很重视在那些行将解放的地区中我们的行动能够一致。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意大利将执行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全部告诉你了，并且对法国和其他待解放的各国我们也想这样做。我们认为这种行动的一致对联合国家的事业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6. 为了使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关于波兰新国家的边界尽快达成原则协议是极其适宜的。

7. 虽然任何人都同意苏俄有权承认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外国政府，但是，你是否同意，建议更换一个外国政府的成员就是意味着接近于你和我都曾反对过的对国家主权的干涉？我可以指出，英王陛下政府是坚决主张

这一观点的。

8.我现在将这次的谈话通知给我的朋友和同志斯大林，这次谈话反映了目前英王陛下政府在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所遵循的政策。我衷心地希望，这些计划将是有益的。我曾经一直希望把边界问题的讨论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到胜利者一起坐在圆桌旁时再进行。迫使英王陛下政府放弃这一原则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理由希望，如果苏联军队继续顺利地挺进，并且德国侵略者从波兰的大部分领土上扫清出去，那么可以代表波兰讲话的任何力量和苏联之间的良好关系将是绝对必需的。除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承认的那个政府以外，在华沙组织另外一个波兰政府以及波兰所发生的骚动向英国和美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三大国之间现存的非常和睦的关系将遭受损失，而和平的未来是取决于这三个大国的。

9.我想说明一下，这并不是说，这封信是干涉了苏波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英王陛下政府对使它极其不安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的一个一般性质的声明。

10.我个人想从你那里得知，你准备采取那些措施来帮助我们大家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指靠我们的善意的协助，因为这些协助可能会是有价值的。

11.我把这封信的副本送给美国总统，并请求他对信的内容绝对保守秘密。

第23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2月4日

我从日前来莫斯科的寇尔先生那里收到了你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我已经同他进行了有益的谈话。

我看出你很重视苏波关系问题。我们都很珍视这些努力。

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现在应该是已经十分清楚的了，这就是

苏波边界问题。当然你说得很对，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受盟国的领导。至于苏联政府，它已经公开和明确地就边界问题表示了态度。我们声明，我们并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并且同意了寇松线从而对波兰人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波兰政府却回避答复我们关于寇松线的建议，并且在自己的官方言论中继续表示，根据里加条约[①]强加于我们的边界是不能改变的。从你的信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波兰政府准备承认寇松线，可是大家知道，波兰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一点。

我认为，波兰政府应该用宣言的方式正式声明，里加条约所确定的国境线应予改变，以及寇松线是苏波之间的新的国境线。它对这一点应该像苏联政府所做的那样作正式声明，苏联政府已宣布，1939年的国境线应予改变，以及苏波的国境线应该是寇松线。

你对波兰人声称，波兰可以在西部和北部大大地扩展自己的边界，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是同意这一点的，但要提出一项修正意见。这个修正意见我在德黑兰已对你和总统谈过了。我们要求东普鲁士的东北部，其中包括把不冻港哥尼斯堡并入苏联。这是我们所要求的唯一的一小块德国领土。如果苏联这一起码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末苏联在承认寇松线方面的让步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关于这点我在德黑兰已经对你说过了。

最后，关于波兰政府的成员问题。我想你会了解，同目前的波兰政府我们是不能够恢复关系的。并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对于明天不会再被迫由于波兰方面采取像“加顿事件”[②]那样惯用的法西斯挑拨

————————————————

① 里加条约是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的苏波和约。条约确定了苏波边界，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归属于波兰。——原注

② 指希特勒分子在1943年就他们在加顿附近（斯摩棱斯克地区）杀害波兰军官一事开始进行的反苏诬蔑宣传。参阅斯大林1943年4月21日给丘吉尔的信（第150号文件）。——原注

而断绝关系没有任何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同波兰政府的关系会有什么意义呢！在最近的整个时期中，由索斯科夫斯基操纵的波兰政府没有停止过反对苏联的敌对演说。波兰驻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使和在近东的安度斯将军所发表的极端敌视苏联的演说，在德军占领区的波兰非法的报纸对苏联的肆无忌惮的恶意宣传，按照波兰政府的指令消灭为反对希特勒占领军而进行斗争的波兰游击队以及波兰政府其他许多亲法西斯的行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根本改善波兰政府的成员，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收场的。可以期望，把亲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政府的成员中清除出去以及使有民主思想的人加入这一政府，会为建立苏波的良好关系、解决苏波边界问题以及总的说来为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复兴创造必要的条件。关心这样来改善波兰政府成员的首先是波兰人自己，波兰人民最广大的阶层。顺便提一下，去年 5 月你曾写信告诉我，波兰政府的成员是可以改善的，并且你在这方面将予以协助。当时你没有认为这将是对波兰国家主权的干涉。

关于来信第 4 点所谈到的波兰部长们所提出的问题，我想是不难商得一致意见的。

1944 年 2 月 4 日

第 237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联名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2 月 24 日收到

你关于把意大利船只移交苏俄的问题的来信收到了。

我们准备尽早进行移交，关于这一点在德黑兰已达成了协议，但是不能使“铁砧”和“霸王”的成就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战役在我们在最短期间内战胜德国的共同努力中应该享有优先权。

我们也并没有意思不实现在德黑兰已经达成了协议的移交。英国的主

力舰和美国的巡洋舰可以立即供给、并且将立即设法从英国舰队中拨出8艘驱逐舰交给你们。英国将再供给4艘潜水艇，供临时使用。我们相信，目前在意大利舰队中可能引起的不满会像你所恰当地说的那样是不必要的浪费精力，并且这样将对我们在法国取胜的远景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1944年2月7日

第23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2月9日收到

1.非常感谢你关于波兰问题的详细的来电。艾登先生和我在星期天对波兰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并且在顽强地继续工作着。两三天内我将通知你以后的情况。

2.不久以前贵国战场上发生的事件使我的军事顾问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向你致衷心的祝贺。

3.意大利会战的进展情况并不像我所希望和打算的那样。虽然陆战队的登陆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且做到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优势已经丧失，并且现在的问题是要进行顽强的战斗。然而敌人又往罗马以南地区调动了5个师，目前我们正以17个师进行着积极的战斗。我们非常希望战争能圆满地结束，并且从目前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战场上的积极精神消沉下去。

4.目前我同英国海军部和美国军事航运局商量好了在3月份再往俄国北部派遣一次额外的护航舰队。我希望，实际船数将是18只或20只，并且这些船只几乎全是美国的。虽然这不会扩大议定书所规定的提供数量，但是借此可以把应提供的物资用快得多的速度经北路运送给你，我知道你认为这条路要比经过波斯好些。北极护航舰队通过得很顺利，并且上次德国潜水艇被我们的护航舰狠狠地揍了一顿。

致一切良好的愿望。

第 23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4 年 2 月 10 日

尊敬的斯大林：

我从苏联大使那里收到了承蒙你根据我的要求送来的苏联国歌的歌词和歌谱。

这首国歌的令人感动的音乐被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好几次，并且今后在庆祝苏联的胜利时将继续播送。因此不久的将来英国人民将很熟悉苏联国歌，对这一点我是没有怀疑的。我为能得到一份苏联国歌而感到骄傲。

你的忠实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4 年 2 月 10 日

第 24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2 月 11 日

来电于 2 月 9 日收到了。

感谢你的祝贺。我们的部队在前线的某些地区还在继续挺进，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顽强反击。

我看到了你关于意大利的通知。希望盟国的情况最近就会好转。

你通知说在 3 月份还将往苏联派遣一个额外的护航舰队，对此苏联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请接受我最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2 月 11 日

第 24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2 月 19 日收到

1. 我们不断地同波兰人进行了斗争，并且我高兴地声明，最后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成绩。我想在最近两天内把提议用电报拍给你，供你考虑。我必须预先通知你，这些提议可能造成波兰政府的分裂。

2. 你肃清了南部的袋形阵地，这使艾登先生和我很高兴。我们正在意大利战场上进行着艰巨的和不懈的斗争，我相信最后将取得良好的结果。同时“霸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好。

第 24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2 月 27 日收到

1. 我将拍给你的下一封电报已给波兰总理和外交部长看过，是同他们进行了充分协商之后写成的，并且是经他们同意后才发出的。我坚信，它将成为波兰和苏俄之间在战时达成工作协议的一个媒介，并且成为欧洲持久和平和在和平处理问题的事业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的基础。

2. 上述电报的副本我将送给美国总统。

3. 艾登先生和我向你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2 月 20 日于伦敦

第 24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2 月 27 日收到

外交大臣和我同波兰的总理和外交部长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不想重复我们所用的一切论点，而只想说明一下，在我看来，波兰政府最

后的态度怎样。

波兰政府准备声明，里加线现在已与实际情况不符，并且它准备在我们参加下同苏联政府讨论关于波苏之间的新边界的问题以及将来波兰在北部和西的边界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当作全面解决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波兰在北部和西部将得到的补偿目前不可能公布或确定，波兰政府显然不能立刻公开发表宣言，说明它准备作上面所说的领土方面的让步，因为这一协议的公布会被看作完全是单方面的行动，这会使得国外的大部分人民和波兰的地下运动立刻起来否认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和他们之间目前还经常保持着接触。因此很显然，应该是欧洲总的领土处理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波苏领土协议，只有当战胜国坐下来讨论停战或和平条件的拟订工作时，才有可能正式取得协议和批准。

由于这些原因，波兰政府在它还没有回到波兰领土上以及还不可能同波兰人民进行协商之前，显然在形式上不可能放弃它对波兰目前所有的任何一块领土的权利，但是如果苏联政府协助波兰政府尽快地回到解放区去，如果苏联政府同自己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协商一下，并且随着俄国军队的挺进把在某些地区建立波兰政府民政机关的问题同波兰政府不时进行商讨，那么在苏军的协作下大力进行对德战争就会容易得多了。这种程序一般说来是符合其他国家根据它们解放的情况所应该采取的程序的。波兰政府很希望将来移交给波兰民政机关管理的地区会包括像维里诺和里沃夫那些波兰人集中的地区，而分界线以东的领土将在各联合国家的代表的协助下由苏联军事当局管理这个希望是很自然的。波兰政府指出，这样一来它就有最大的可能来吸收所有身体合格的波兰人参加军事活动。我对他们说，并且他们也很懂得，你是不同意由波兰来管理维里诺和里沃夫的。另一方面，我想可以向他们保证，应该交由波兰民政机关管理的地区至少将包括寇松钱以西的全部波兰领土。

在进行上面第二段中所谈到的关于边界的谈判时，波兰政府考虑到东波居民是杂居的，可能会赞同按下列办法划定边界，即该边界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在一个区域内只有一国的居民，同时尽可能减少居民的交换以及随之产生的困难。我个人并不怀疑，特别是考虑到波兰政府规定要迅速采取

的实际措施以及上述第三段中已说过的一切情况，这次的谈判一定会导致你对苏波边界的前途所期望的结果，可是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公开强调这一点，而且这样做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至于对德战争，波兰政府愿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波兰政府意识到，鉴于解放军已向波兰领土挺进，这些军队正在从这块领土上赶走德国侵略者，因此同苏联政府取得实际的协议是极为必要的。波兰政府向我坚决保证，它从未指示过地下运动的组织进攻“游击队”。相反，在同他们地下运动的领导者们并同这些人协商后，它向全体已经武装起来的波兰人或准备起来反对希特勒暴政的人们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的内容如下：

在俄国军队进入波兰任何地区后，地下运动必须出面来满足苏联指挥官们的要求，即使在波苏关系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也应当这样做。当地波兰的军事指挥官必须在当地地下公民代表的陪同下会见前来的苏军指挥官，并且向他声明，根据波兰政府的指示（而他们一直是忠于这个政府的），他们准备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使自己的行动同苏军取得配合。

我觉得，并且我也相信，业已生效的这一命令对你是特别重要并具有很大意义的。

2月6日我第一次通知波兰政府说，苏联愿以把哥尼斯堡划入俄国领土的办法来确定东普鲁士的边界。这个通知对波兰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它把这项决定看作是大大缩小德国应以赔偿的形式划归波兰的那块领土的面积及其经济意义。但是我说，按照英王陛下政府的意见，这是俄国方面的正当要求。我把反对德国侵略的这次战争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由1914年开始的30年的战争，所以我提醒米柯瓦依契克先生这样一个事实：东普鲁士的这部分土地染满了俄国人为共同事业毫不吝惜地流出的鲜血。俄国军队于1914年8月在这里开始了进攻，并且在古姆宾宁战役以及其他会战中取得了胜利，又以自己的进攻和在影响本国动员的情况下迫使德国人调走了进攻巴黎的两个军团，这对在马恩河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坦宁堡的失败无论如何也不能埋没这些重大的成绩。因此我觉得，俄国人对德国这块领土的要求是具有历史背景的，并有很充分的根据。

至于波兰政府的成员，波兰政府不可能容忍外国有进行干涉的任权利。

但是它可以向俄国政府保证，在它同苏联政府发生外交关系之前，它的成员中只能包括决心同苏联合作的那些人。我有这样一种意见：如果这种变动是自然发生的，并且这种变动是波兰人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整体利益的一个结果，那将会好得多。至于谈到正式恢复这种关系的时间，那末据我看来，最好是等到华沙解放以后，那时这样来改组波兰政府会是这一光辉的事件所造成的情况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如果苏联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在包括上述各点的协议中彼此间以及对波兰共同保证：第一，承认并尊重重建的波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每个国家有权利不受干涉地从事自己的内部事务；第二，尽一切力量使但泽自由港、奥彼林、西里西亚、哥尼斯堡线以西和以南的东普鲁士地区，以及波兰政府认为宜予接收的奥得河以东的那部分领土及时划归波兰；第三，把德国居民从波兰，包括应划归波兰的那部分德国领土在内，迁移出去；第四，议妥波苏间交换居民的程序以及波苏公民返回祖国的程序，那么这将是符合于你对我提出的那些保证的。依我看，波兰、苏联和联合王国彼此之间的所有义务应该用下列方法固定下来，即可以把这些义务载入一个文件里或用换文的办法确定下来。

我已经通知波兰的部长们，如果目前在电报来往中所取得的协议付诸实施，并且各方都按照它的精神行动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在战胜希特勒后所举行的会议上将支持这项协议，而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准备尽全力来保证这项协议的执行。

1944 年 2 月 20 日于伦敦

第 24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2 月 21 日

2 月 19 日的来电收到了。谢谢你的通知。

但是我不能不提请你注意，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关于 8 艘英

美驱逐舰和其他船只问题的答复，这些驱逐舰和船只是为了代替意大利的军舰和商船而暂时借给苏联使用的，这一点是你、总统和我在德黑兰共同决定了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拖延这么久。

等待你对我1月29日发出的电报的答复。

1944年2月21日

第24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2月22日

关于意大利舰只的问题。

2月7日我已发给你一封由总统和我签署的电报，我还写给克拉克·寇尔大使一封私人信，他应该向你本人阐述这封信的内容。情况是这样的：我正在从英国的后备舰艇中提供8艘驱逐舰和4艘潜水艇，及一艘主力舰和两万吨商船。美国将提供一艘巡洋舰和两万吨商船。我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收到你关于证实这件事情的来信，因为我想，你将满意我们作的那些努力。我得悉克拉克·寇尔大使曾经想把那封总统和我的联名信交给你本人，可是你当时在前线。我已打电报给他，希望他补救这种局面。在派遣这些舰艇的准备工作方面没有任何拖延。

1944年2月22日

第24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4年2月23日收到

欣逢红军建第26周年，我向你和红军全体士兵们表示我对他们的光辉成果的深切敬佩。他们受到你的领导和他们对俄国土地的热爱的鼓舞和指引，确信自己的指挥官们的才干和果断，正在向胜利前进，并通过胜利走向光荣的和平。

第 24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2 月 26 日

你们发来的两封电报，其中包括 2 月 7 日发来的关于意大利舰艇的电报都在 2 月 24 日收到了。我也看到了寇尔先生就这一问题写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

对你和总统先生决定把英国的 8 艘驱逐舰、4 艘潜水艇、一艘主力舰和两万吨商船以及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万吨商船供苏联临时使用的通知表示感谢。因为寇尔先生曾特意提示我，所有这些驱逐舰都是旧的，我有一些担心这些驱逐舰的战斗能力。因此我觉得，对英国和美国的舰队来说，在拨出的 8 艘驱逐舰中，即使有一半现代化的，而不是陈旧的，这是不会有困难的。我仍然希望你和总统将能够使移交的驱逐舰中至少有 4 艘是现代化的。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我们牺牲了很大一部分驱逐舰。因此，即使是部分地弥补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也有着很大的意义。

1944 年 2 月 26 日

第 24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信

1944 年 2 月 29 日收到

请你接受我和苏联武装部队的谢意，感谢你对红军建军 26 周年的祝贺，以及对它在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评价。

第 24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3 日

2 月 27 日我从寇尔那里收到了你在 2 月 20 日发来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两封电报。

在看过你关于同波兰流亡政府的活动家们的会谈的详细叙述之后，我再一次地得出了结论，这种人是没有能力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不仅不想承认寇松线，而且还要求里沃夫和维里诺。至于企图把某些苏联领土的管理权置于外国监督之下，这种野心我们是不能予以讨论的，因为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侮辱。

我曾经写信给总统说，解决苏波关系问题的时机还未成熟。需要再一次肯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1944 年 3 月 3 日

第 25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3 月 7 日

1. 感谢你 3 月 3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

2. 我已向波兰人解释说，他们既得不到里沃夫，也得不到维里诺；从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提出这些城市只不过是对处理这些地区的方式的一个建议，波兰人认为这样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会有所帮助。当然，无论是波兰人或者是我都未曾打算使这些建议带有侮辱性质。然而，既然你认为它是一个障碍，那么我请你把它当作已经从信中删去和勾消了。

3. 我向你提出的建议会使贵国军队到达寇松线后经过同波兰人的协商

而造成俄国事实上占据寇松线。而且我曾向你说过，如果问题是按照你和我在我们的会谈和通信中所指出的方式得到解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在停战会议或和会上将支持这样来解决问题。我不怀疑，美国对这样的建议也将给予同样的支持。从而你将会事实上得到寇松线，只要你方军队一到达该线后立即取得波兰人的同意，并且在总的处理的时候得到你的西方盟国的照顾。

4.力量能够取得很多东西，可是由全世界善良的意志所支持着的力量能够取得更多的东西。我衷心地希望你不要封死同波兰人签订工作协议的大门。这一协议在战时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将有所帮助，并且在签订和约时会给予你所必需的一切。如果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并且你也不可能同波兰政府（我们还继续承认这个波兰政府作为由于它我们才向希特勒宣战的一个盟国的政府）发生任何关系，那么这将使我感到十分痛心。战时内阁要求我通知你，它将同样感到惋惜。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应做的一切，这将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5.你向克拉克·寇尔大使谈到了关于波兰问题可能引起你我之间不和的危险性。我将用一切办法防止这一点。我对世界前途的一切希望都是寄托在西方民主国家同苏维埃俄国的友好和合作之上的。

1944 年 3 月 7 日

第 251 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3 月 9 日收到

虽然首相责成克拉克·寇尔大使通知你我们借给你们的驱逐舰是旧的，这只是本着完全坦率的精神才这样做的。事实上，这些舰只是好的、管用的舰艇，对于担负护航任务来说是完全合格的，意大利的整个海军舰队中只有 7 艘驱逐舰；其余的都是比较旧的驱逐舰和水雷艇。此外，意大利的这些驱逐舰，在我们接收以后，如果事先不进行改装，将完全不适合于北方的工作，而改装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英国政府所提供的

8艘驱逐舰将是对你进行帮助的一种最迅速而较为合适的方式。首相对他目前不能拨出任何新的驱逐舰表示遗憾。两个星期以前他损失了两艘驱逐舰，并且其中有一艘是属于派往俄国的护航舰队的，而仅仅为了在“霸王”登陆时进行对付炮垒的海岸工作，他就至少需要42艘驱逐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被击沉，他现有的属于这一级的每一只艇都在为共同事业的利益充分地利用着，日本舰队向新加调动为我们两国造成了印度洋上的新局势。在安乔桥头堡地区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斗正处在十分炽烈的关头。装载美国解放部队的巨大的运输队正在横渡大西洋。在驱逐规的强大力量护送下前往俄国的运输队将在“霸王”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出发。最后谈一下关于“霸王”本身的事。总统那里的情况也很紧张，但是目前主要是由于太平洋上的战役规模巨大和活跃而引起的。我们两个都有意思要把意大利的船只移交给你，这一点在莫斯科和德黑兰时都已经同意了，到现在仍没有变动，并且在意大利政府的成员扩充和新部长们任职之后我们将正式向意大利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支配意大利海军舰队的权利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问题仅仅是在于，要在我们共同的利益尽量少受损失的情况下来行使这些权利。同时所有我们上述的舰艇正准备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借给你。

罗斯福

丘吉尔

第25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3月10日收到

派往俄国的最近一次护航舰队已经顺利地抵达指定的地点，并且护航的军舰在沿途击沉了来袭击它们的4艘潜水艇，你听到这个消息将会感到高兴吧。

第 25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13 日

感谢你关于最近一次护航舰队的通知，它把必需的货物运到了苏联。我很满意地从你的电报中获悉，护航队沿途击沉了敌人的 4 艘潜水艇。

1944 年 3 月 13 日

第 25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16 日

3 月 7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在 3 月 12 日从寇尔先生那里收到了。

对你在该电中所作的解释表示感谢。

虽然我们彼此通电是秘密的，而且是私人性质的，然而若干时候以来我给你拍去的电报的内容却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并且有很大的歪曲，对这些歪曲我没有机会进行反驳。我认为这是对秘密原则的违反。这一情况为我的自由表达意见造成了困难。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意思。

1944 年 3 月 16 日

第 25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17 日

你们关于英国政府转交给苏联 8 艘驱逐舰的来电收到了。我将同

意，这些驱逐舰完全适合于护航工作，但是当然你们很清楚苏联需要也能适合于其他战斗行动的驱逐舰。盟国支配意大利海军舰队的权利自然是毫无问题的，而且应当使意大利政府理解到这件事，特别是关于应交给苏联的那些意大利舰艇。

1944 年 3 月 17 日

第 25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3 月 21 日

对 3 月 16 日来电的答复。

1. 首先我应当再次祝贺贵国军队的所有巨大的胜利以及你对芬兰人的极为温和的态度。我认为，在芬兰拘留德国 9 个师会给他们造成忧虑，因为他们害怕德国的这 9 个师可以拘留他们。我们非常感谢你把你们在这一战场上的一切行动通知我们。

2. 至于波兰人，在泄漏你的密信方面我没有任何过错。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已经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美国“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和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后者是古谢夫大使亲自告诉的。

3. 最近我要在下议院就波兰问题发言。那时我必须讲出，使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我们继续承认从 1939 年华沙沦陷之时起我们就与之经常保持关系的波兰政府；现在我们认为，关于改变领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延迟到停战或者战胜国的和会的时候再说，我们也不能承认任何用强力达成的领土的转移。

4. 我把这封电报的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即使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也希望能有更好的消息可以告诉他。

5.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衷心的愿望，希望我们之间由于波兰问题而产生的挫折将不会对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有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保持我

们的行动一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1944 年 3 月 21 日于伦敦

第 25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23 日

最近我收到了你关于波兰问题的两封电报，并且看过了寇尔先生受你的嘱托就同一问题向维·米·莫洛托夫提出的声明。我未能即时复电，因为战场上的事情经常使我撇开非军事的问题。

现在按问题进行答复。

一望而知，您的来电，特别是寇尔的声明，充满了对苏联的威胁。我想提醒你注意这一情况，因为威胁的方法在盟国相互关系中不只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可以引起相反的效果。

你在一封来电中把苏联为保卫和实现寇松线所作的努力认为是实力政策。这意味着你现在企图把寇松线说成是不合理的，为争取这条线而作的斗争是非正义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态度。不能不提醒你，在德黑兰时，你、总统和我已经商妥了，寇松线是合理的。你当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你把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们称为疯子，如果他们拒绝接受寇松线的话。而现在你所坚持的态度却简直相反。

这不是意味着你不再承认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商妥的问题，从而破坏德黑兰协议吗？我不怀疑，如果你继续坚持你在德黑兰的立场，则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冲突早已解决了。至于我和苏联政府，我们继续坚持在德黑兰时的立场，并且也不想放弃这一立场，因为我们认为实现寇松钱并非实力政策的表现，而是恢复苏联对自己领土的合法权利的

政策的表现，这块领土甚至连寇松和协约国最高会议也早在 1919 年就已承认不是波兰的土地了。

你在 3 月 7 日的来信中声称，苏波边界问题要拖延到召开停战会议的时候。我想这里有一些误会。苏联没有同波兰作战，也不想同它作战。苏联同波兰人民没有任何冲突，并且把自己当作波兰和波兰人民的同盟国。正因为如此，苏联才为把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流血。因此说到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停战是很奇怪的。但是苏联政府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冲突，波兰流亡政府并不代表波兰人民的利益，也不表达波兰人民的愿望。把波兰同与波兰隔绝的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等量齐观，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甚至很难说出波兰流亡政府和另一个流亡政府——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之间以及波兰流亡政府的一些将军们和塞尔维亚的米哈依洛维奇将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你在 3 月 21 日的来信中说，你准备在下议院声明，关于改变领土的一切问题都应延迟到停战或者战胜国的和会的时候再说，而且在那时候以前你们不能承认任何用强力达成的领土的转移。对这点我是这样理解的：你把苏联看作是敌视波兰的力量，并且实质上是否定苏联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的解放性质。这就等于企图把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妄加在苏联的身上，并以此来损害它的名誉。我不怀疑，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舆论将把你的这种演说理解为对苏联的不公正的侮辱。当然，你可以随便在下议院做住何报告，这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表这种演说，我将认为你对苏联采取了不公正和不友好的行动。

你在来信中表示希望在波兰问题上的挫折将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至于我，我过去主张，并且以后还是主张合作。但是我害怕，如果以后继续使用威胁和损害名誉的方法，那它将不利于我们的合作。

1944 年 3 月 23 日

第 25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3 月 25 日

你来信告诉我说，我同你之间来往信件的泄密问题是应由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和古谢夫大使本人负责的，对此我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这次检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大使馆或者古谢夫本人都没有过错，甚至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内容的文件，其中有一些他们那里根本是没有的。因此泄密不在苏联方面，而在英国方面。古谢夫同意就这件事进行任何检查，以便证实他和他的机关的人员与泄露我们来往信件的内容的事件完全无关。我觉得你对古谢夫和苏联大使馆产生了误解。

1944 年 3 月 25 日

第 259 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4 月 18 日

1.根据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总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是在“R”日左右，这个日期不久以前已责成迪安和贝罗斯将军通知苏军总参谋部。我们将以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进行。

2.大约在 5 月中，我们将在意大利大陆上以最大的力量采取攻势。

3.德黑兰会议以来，贵国军队为共同事业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甚至在你认为他们不会积极活动的那个月里他们也获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向你表示最良好的愿望，并且相信，你们的和我们的军队只要根据我们的德黑兰协议一致行动，是一定会歼灭希特勒匪帮的。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 年 4 月 18 日

第 26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4 月 22 日

4 月 18 日的来电收到了。你们通知说，将根据德黑兰协议在预定的日期横渡海峡（这一日期迪安和贝罗斯将军已通知了我们的总参谋部），还通知说，你们将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对此苏联政府感到满意。我对这次预定的战役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我同样希望你们在意大利进行的战役顺利。

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所商定的，红军将在同一日期采取新的攻势，以便最大限度地支援英美的战役。

请接受我对你们的谢意，感谢你们对红军的成就所表示的愿望。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的和我们的军队只要彼此相互支援，就一定会粉碎希特勒匪帮，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1944 年 4 月 22 日

第 26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5 月 3 日

1. 去年秋天我曾指示往贵国北部港口派遣循环护航舰队，由 41 个护航舰队组成，其中每个舰队有 35 艘英美船只，而且以后我又在初步计划中补加了两个由 20 艘船只组成的半数护航舰队。这样一来，派出的船只总数将达 180 艘，这些船只预计可运 100 万吨的物资（100 万吨这个数字包括船上需用的燃料、水等在内）。这一循环护航舰队的派遣工作现在已告结束，我愉快地把我们所作的努力的成果通知给你。

2. 除救援船只外，英国皇家舰队往贵国北部港口护送了 191 艘船只，

其中有49艘英国的和118艘美国的船只是运一般物资的，1艘是运卸货用的起重机，5艘是运美国的军用物资，18般是油船。运送物资的吨数是：

英国物资……232,600吨

美国物费……830,500吨

航空用汽油，酒精和重石油燃料……171,500吨

美国军用物资…… 25,000吨

共计 1,259,600吨

3.虽然机警的敌人采取了残酷的袭击，但是皇家舰队仍顺利地将所有派出的船只（除3艘外）护送到贵国港口。因此我高兴地通知你，我们的损失仅仅是被击沉了两艘驱逐舰和被击落了一架战斗机，而敌人却损失了“夏恩贺司特”号，8艘潜水艇和5架飞机，这是对我们损失的很好的补偿。我们在这个地区还使“透匹兹”号受了重伤。

4.所有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并且使我内心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武器是在你们英勇的军队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运到的。只要“霸王”的紧要时期一过去，我就会制定向你们进一步提供物资的计划。我已经发出指示，要研究这件事情，如果战斗进行的情况允许的话，我将同你商量再派遣一批护航舰队的问题。我预料在“霸王”战役中海军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因为战舰将同岸上的堡垒进行长时期的战斗，并且因为有水雷，所有的舰艇将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相当顺利地控制了敌人的潜水艇和空军，但是有一种不大的“F”型鱼雷艇，因为它航速很快，在夜里将是很危险的。至于提到生产部长里特尔顿先生（这次通过北极海的供应工作主要由他领导），我认为有义务向你介绍，我们的成就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致良好的愿望。

1944年5月3日

第26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5月8日

5月3日的来信收到了。往苏联北部港口运输货物的护航舰队的组织工作的确是值得赞扬的。感谢你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的极为深切的关怀。如果苏联政府授予做了那么多事情的里特尔顿先生以苏联勋章，你是否会反对？我们也乐于授予其他在护航舰队的组织和护航方面表现卓越的人们以奖励。

从你的来信中我满意地获悉，你已经指示研究今后的护航舰队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舰队的需求量仍是很大的。

我晓得现在你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霸王”上面了，当然它需要巨大的紧张的劳动，但是它也会给予我们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说来是巨大的良好的效果。

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年5月8日

第263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联名信

1944年5月14日收到

为了以最大限度的兵力横渡海峡进攻法国北部，我们已经把一部分登陆艇从地中海调到英国。这个事实以及目前在意大利的战斗中必须使用我们地中海的地面部队这一情况，使我们不可能在执行“霸王”的同时对法国的地中海沿岸进行攻击。我们准备再晚一些采取这种进攻，为此由美国往地中海运去了一些补充的登陆艇。为了把最大数量的德军引离法国北部和东部战场，我们将在意大利对德国人立刻展开极大规模的进攻，并且同时继续对法国地中海沿岸进行威胁。

罗斯福

丘吉尔

第 26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5 月 15 日

你们的联名电已经收到。怎样来分派你们的部队以及分派的先后，你们是更为清楚的。当然，主要是在于保证“霸王”的彻底胜利。同时我相信，业已开始的对在意大利的德国人的进攻将获得胜利。

1944 年 5 月 15 日

第 26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5 月 19 日

1. 非常感谢你 5 月 8 日的来电，里特尔顿先生将把接受苏联勋章看做是自己的荣誉，并且我愿意请求国王允许他接受这枚勋章。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有成效的还有一两个人，鉴于你的建议我愿意比迄今为止我所能够做到的更为详细地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你会允许我再次打电报给你。

2. 意大利的战役进行得很顺利。波兰人战斗得很勇敢，但是他们从已占领的卡西诺以北的阵地上被击退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们损失了好几千人。然而他们重新进行了攻击并取得了胜利。法国人也很出色。亚历山大将军非常果断地领导了战斗，卡西诺的攻克就是一个报酬。我们到 5 月 17 日为止损失了将近 13,000 人。我们抓了 7,000 名德国俘虏，并且击毙了很多德国人。现在我们正在靠近“阿道夫·希特勒”战线的碉堡，我们打算以全力冲入这些堡垒。

3. 即将从安乔的桥头堡发动的进攻，已经决定延迟到在主要战役中达到了对它更为适宜的时机再进行。然而很快就应当从这里给予一个很好的打击。

4. 我希望，这支由 17 个师或 18 个师组成的，但其中有 5、6 个师已

被击溃了的德国军队在这次战斗结束之前将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这将使我们有可能立刻组织陆海军联合行动，这个行动将威胁热那亚湾和里昂湾的整个海岸。现在还不能决定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袭击。美国人帮助了我们。他们为此目的派遣了额外的登陆艇。我希望，在这一战场上我们将把30到35个德国师，引离“霸王”地区。

5.正如你完全了解的，我们的全部考虑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全体指挥员充满着信心，士兵也都是跃跃欲试。

6.我还让外交部把我给铁托元帅的电报经莫洛托夫先生转交给你。从这封电报中你可看出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的儿子兰道尔夫（你在德黑兰见过他）现在在铁托元帅那里，他来信说苏联代表团和我们代表团之间现存的关系好极了。愿它今后也这样下去。

1944年5月19日

第26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5月22日

5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

好吧，我将等待你关于给予里特尔顿先生和其他人员以奖励的最后的通知。

我祝贺盟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攻击在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获得了顺利的进展。目前十分重要的是使盟国在意大利对德军的军事行动真正能够把很大一部分德国军队引离“霸王”。

你给铁托元帅的电报我看到了。我也欢迎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代表团之间确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今后也是这样。

1944年5月22日

第 26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5 月 24 日收到

1. 在意大利的战役正处于紧张阶段。5 月 22 日夜里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同在主要战场上开始了攻击，并从安乔调出了大量美军，去攻击交通线。敌人从罗马以北的地区撤走了第 278 步兵师的一个团以及第 29 和第 90 装甲师。正如英国参谋部所想的那样，希特勒在强大的后卫部队的掩护下根本没有撤退，很明显，他顽强地决定要把罗马以南的战斗进行到底。如果凯塞林的军队遭到失败，并且部分地被消灭在那里，这将为将来创造有利的条件。“赫尔曼·戈林”师是希特勒特种后备兵力的一部分，它可能还会被派来同我们作战。如果是这样，则所有这一切都在帮助“霸王”。应当把这次战斗看作极其严重的事；我们的武装部队比敌人的部队并不多很多。

2. 我打算为你们制定北极护航舰队的新的计划，但是首先我必须知道在“霸王”中我们海上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的损失如何。我访问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部队，发现他们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我们还制造了各种浮游用具和设备，这样就可以在无比强大的海上火力的掩护下把大量的人员和运输工具送上海岸。我们拥有 11,000 架第一线飞机，这些飞机都准备在同一天投入战斗。

3. 对你正在准备着的巨大的战役的成功表示一切良好的愿望。对贵国攻下敖得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还未向你祝贺呢。我现在向你表示祝贺。

第 26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5 月 26 日

感谢你在最近一次的来信中通知我关于在意大利的作战情况。我

们都以钦佩的心情在注视着你们的成就。

你关于展开了的对“霸王”的准备工作的通知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特别重要的是英美军队怀着那样的决心。

对你准备过些时候着手制定北极护航舰队的新的计划表示欢迎。谢谢你的祝贺。我们正在加紧进行新的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

1944 年 5 月 26 日

第 26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5 月 28 日

1. 非常感谢你的来电。意大利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并且我对截断一部分敌军的退路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只能把占领罗马设想成附带的收获。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最大数量的德国人陷入战斗，并且消灭他们。只要战斗刚一打胜，我们将立刻把我们在地中海的全部武装部队调去进行极有可能的陆海军联合战役，以支援“霸王”。

2. 这里一切都集中在“霸王”上面了，人力所及的一切都将做到，至少我们将努力这样做。

1944 年 5 月 28 日

第 27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5 月 30 日

感谢你最近关于意大利战况的来电。我们这里同样希望它将胜利地结束。无疑的，这样将便利为实现“霸王”而作的努力。

预祝你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1944 年 5 月 30 日

第 27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6 月 5 日

1.你一定已经很高兴地听到了盟军进入罗马的消息。我们一直认为更重要的是截断尽可能多的敌军部队的退路。亚历山大将军现在正在命令强大的装甲部队北取得尔尼，这样应该可以把希特勒调派在罗马以南作战的所有的师基本上包围起来。尽管在安乔和纳土诺的两栖登陆没有立刻得到像我当初计划时所希望的结果，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战略行动，而且最后还是带来了好处。首先，这个行动牵制住了下列 10 个师：来自法国的 1 个、来自莱因河区的 1 个、来自南斯拉夫和伊斯的利亚的 4 个、来自丹麦的 1 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 3 个。其次，这个行动导致了一场防御战，在这次防御战中我们虽然损失约 25,000 人，但是德国人被击退了，而且他们部队的战斗力被打垮了很多，损失了大约 3 万人。最后，安乔的登陆已经使得我们有可能实现原来计划的行动，只是在大得很多的规模上进行了。现在亚历山大将军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来包围罗马以南的敌军。有些敌军师抛弃了大批重武器，退到山里去了，但是我们希望可以俘获一大批俘虏和物资。这个战役一完毕，我们将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来支援我们主要的军事行动。波兰人、英国人、自由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在正面攻击中挫败或者打垮了他们对面的德国军队，不久将有各种重大的可能性有待于我们去考虑和抉择。

2.我才从艾森豪威尔总部回来，在那里我待了两天，并且观察了军队登船。得到合适的天气条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配合潮汐、波浪、雾和云而充分运用海、陆、空军部队。十分遗憾，艾森豪威尔将军被迫耽搁了一夜，但是天气预报将有非常有利的变化，因此今晚就要行动了。我们现在用 5,000 条船，并且有全副武装的飞机 11,000 架。

1944 年 6 月 5 日

第 27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4 年 6 月 5 日

英美联军攻克了罗马，对这样巨大的胜利我向你表示祝贺。

苏联以极大的满意来迎接这个消息。

1944 年 6 月 5 日

第 27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6 月 6 日

一切都开始得很顺利。地雷、障碍物和地面排炮基本上都已克服。空降很成动，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的登陆进展也很迅速，很多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已经运上岸了。天气预告在中等和良好之间。

1944 年 6 月 6 日

第 27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6 月 6 日

关于“霸王”战役开始成功的来电已经收到。这使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并且希望继续获得成功。

按照德黑兰会议的协议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在 6 月中在前线的一段重要的地段上发动。苏军的全面攻势将通过陆续把军队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在 6 月底和 7 月份个别进攻就将转为苏军的全面攻势。我一定会随时把攻势进展的情况通知你。

1944 年 6 月 6 日

第 27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6 月 7 日

1.感谢你的来信和有关罗马战役的祝贺。我对到今天（7 日）中午为止的“霸王”的战况很为满意。仅在美国人登陆的一处海滩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现在已经克服了。在敌人战线两翼的后方，安全地空降了两万名伞兵部队，他们已经分别同从海上登陆的美军和英军有了接触。渡过海峡的行动损失很小。我们本来预计会损失 1 万人左右。我们希望到今天晚上，25 万部队的绝大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装甲部队（坦克），将都已登陆，或者靠特种舰艇之助，或者从水里游上岸来。从水里上岸的坦克损失很大，特别是在美军的战线上，由于海浪掀翻了浮水的坦克。现在我们必须准备应付重大的反攻，但是，估计我们的装甲部队的力量将比敌人强一些，而且当然在天气晴朗时我们的空军占着绝对优势。

2.昨晚深夜，我方刚登陆的装甲部队的坦克同敌军第 21 装甲师的 50 辆坦克在靠近克恩的地方进行了坦克战，结果敌人逃跑了。英国第 7 装甲师现在正在进入阵地，这将使我们在这几天里具有优势的兵力。问题在于敌人在下周内能增派多少部队来同我们对抗？海峡天气的前景看来不会阻挡我军继续登陆。事实上，天气看来比过去更有利了。在实际登陆过程中，事情比原来预料的要好一些，全体指挥官对此都感到很满意。

3.绝密。我们计划在塞纳河口的宽广的沙滩上很快地修筑两个巨大的人造海港。这样的海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巨型远洋轮船将能在无数的码头卸货，把供应物资送给作战部队。这一着定将出乎敌人的意料，而我军的集结却能够因此不受天气的限制而继续进行。我们希望在战役的初期就攻下瑟堡。

4.另一方面，敌人会迅速地大量调集部队，战斗将继续不断地进行，并且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D+30”[①]把大约 25 个师

———————————————

① “D”日，盟国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日子的代号。“D+30”表示进攻之日起一个月后。——原注

的全部队伍摆好阵势，使第二线的两翼都伸到海边，而且至少拥有3个良好的港口——瑟堡和那两个人造海港。这条战线将不断地得到补充和扩展，我们希望过些时候将把布勒斯特半岛也包括在内。但是，这一切都要看战争的情况如何，这一点你，斯大林，是很了解的。

5.我们希望，这次登陆的成功和在罗马获得的胜利（胜利的果实还有待于消灭被切断的各德寇师之后才算取得）将鼓舞已经承受过重担的贵国英勇的士兵们，对于这种重担，在你们国外再没有人比我有更确切的感受了。

6.在口述以上电文以后，我收到了你关于“霸王”顺利开始的来电，其中你谈到了苏军的夏季攻势。我为此向你表示热忱的谢意。我希望你会注意到，我们对你、对贵国的人和军队有着充分的信心，所以从未向你提过任何问题。

1944年6月7日

第27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6月9日

我已经收到你在6月7日拍来的关于“霸王”行动的顺利进展情况的电报。我们大家向你和英勇的英美军队表示祝贺，并且热烈地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苏军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明天（6月10日）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就将在列宁格勒战线上开始。

1944年6月9日

第27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6月10日

1.我荣幸地接到了你的来信，我已把该信通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全世界都能从我们协同一致对共同敌人的进攻中看到德黑兰计划的体现。愿一切成功和幸福伴随着苏联军队。

2.今天（10日）夜里我们应该已经使大约40万人连同强大优势的装甲部队以及迅速增加的大量大炮和载重汽车登陆成功。我们发现了3个不大的渔港，可以接纳运输物资，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此外，两个大的人造海港的建设正在顺利进行中。据报道，前线的战斗进行得很令人满意。我们认为，隆美尔在战术性的反攻中已经消耗了他的一些战略后备力量。所有这些反攻都被击退了。我们应该预料到敌人在不久的将来会采取战略性的对策。

3.亚历山大将军在迅速向北追击被打败了的凯塞林的残余部队。可能他们将在曾经筑过一些工事的里米尼—比萨阵地上停下来。亚历山大将军报告说，20个德国师的战斗价值已经大大减低了。在后卫部队和破坏物的掩护下向北退却的有6、7个师。他在追击着他们，同时也在继续打扫战场。

1944年6月10日

第27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6月11日收到

巴多里奥元帅的事情[①]，使我很惊讶。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我们曾经同他打过交道的唯一内行的人，而且也是在为我们服务方面胜过任何人的一个人。目前的一小撮老朽而贪婪的政客们自然将竭力扩大意大利的野心，并且将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不便。如果你能通知我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那对我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

① 指巴多里奥在企图组织新内阁失败后，于1944年6月9日辞去意大利总理的职务。——原注

第 27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6 月 11 日

1. 你关于巴多里奥下台一事的来电收到了。巴多里奥的下台对我来说也是出于意料的。我觉得不经英美两个盟国的同意是不能罢免巴多里奥和任命包诺米的。但是从你的来电中可以看出，这件事的发生是违背盟国的意志的。必须认识到，意大利某些集团为了对自己有利试图改变停战条款。只要你们和美国人根据情况认为意大利必须有另外一个政府，而非包诺米政府，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指望苏联对这点将不会有所阻碍。

2. 你 6 月 10 日的来电也收到了。谢谢你的通知。可以看出，计划中的大规模登陆已完全成功。我和我的同事们不能不承认，从其规模、计划的广泛和执行的完善上看，在战争史上像这样的措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当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疯人希特勒曾吹嘘了两年，说他要强渡英吉利海峡，结果连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行动都没有敢做。只有我们盟国才光荣地实现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宏伟计划。历史将把这件事作为一项莫大的成绩记载下来。

1944 年 6 月 11 日

第 28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6 月 14 日

1. 6 月 11 日的来电使我和整个内阁（我把电报读给他们听了）都感到非常满意。来电中第 1 点同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正相符合，即问题必须

由总的协商委员会进行研究，并且在委员会讨论之后应该转交给三国政府，由三国政府商讨对待新政府的态度。同时巴多里奥（他显然同包诺米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关系）将在一个时期内继续进行活动。

2.可能你从报纸上已经知道，我在星期一参观了前线的英国地区。战斗在不断进行着，当时我们在近70英里的战线上有14个师在活动。对面有敌人的13个师，但是远不如我们的强。敌人在急忙从后方增援，可是我们想我们由海上增援要快得多。沿着海岸绵延约50英里长的一个舰艇之城，它能安全地自卫，不受飞机和近在咫尺的潜水艇的攻击，这个城的景象真是蔚为奇观。我们打算包围克恩，并且可能在那里捕获一些俘虏。两天前俘虏的人数是13,000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全部伤亡人数。因此可以说，尽管我们总是在进攻，敌人要比我们多损失几乎一倍多。昨天一天中，虽然敌人的反抗随着战略性的后备力量加入了战斗而逐渐加强，但是挺进的情况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认为把战斗扩展到下面这一规模是完全可能的，即在6月和7月每方各有近100万人参加战斗。我们预计到8月中我们在那里将有200万人。

3.向你致一切良好的愿望，预祝在卡累利阿取得胜利。

1944年6月14日

第28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6月15日

6月14日的来电收到了。

你建议在意大利问题协商会议上初步讨论意大利新政府的问题，以便我们三国政府以后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你关于在法国北部前线战况的通知。

预祝计划中的围攻克恩和诺曼底战役的进一步开展会获得完全的

成功。

感谢你预祝我们进攻的胜利。我们的战役正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着，它对我们全部的盟国战场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4年6月15日

第28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6月17日

1.我想在8月10日左右重新派遣去俄国的北方护航舰队。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他表示十分同意。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将近30艘货船装上货物，其中有三分之二将是美国的船只。正式的通知将通过通常的途径进行。

2.关于你6月15日就意大利问题的来电。可能你已经看到了6月14日外交部给那不勒斯高级专员的第285号电报，即抄给莫斯科的第1796号电报。我非常感谢你对待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的态度。现在当我从美国总统和我们在当地的代表那里得到了消息之后，我必须告诉你，我确信，巴多里奥重新上台已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他自己也认为他做得已经够了。他为我们工作得很好。我同意这些问题现在应由意大利问题协商会议去研究，以便我们三国政府能够同时声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重要的是使意大利新政府准确地了解到它所继承下来的义务是怎样的。

3.诺曼底的战斗现在在70英里长的战线上全部展开了，并且在规模和激烈的程度上将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对战斗的发展宁可从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的增长情况来估计，而不是从占领领土的大小来估计。我方损失近3万人，而我们肯定已经使敌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三天前在我们手里有3万名俘虏，从那时起又俘获了很多俘虏。我们在海岸上有将近55万人，目前他们组成20个师，还有一些军团和其他等。敌人只有将近16个师，而且比较弱。我刚才同美军中的马歇尔将军商谈过，马歇尔对我说，他对局势有充分的信心，并且由于隆美尔把战略性的后备

队伍过早地调去支援前沿，敌人在最近几天进行大规模反攻的能力是大大减弱了。

4.希特勒开始对伦敦使用秘密武器。我们渡过了一个喧嚣的夜晚。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力量同他搏斗的。在这充满伟大事件的时刻，向你致一切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6 月 17 日

第 28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6 月 21 日

1.感谢你告诉我你和总统准备在 8 月 10 日左右重新派遣北方护航舰队来苏联。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至于意大利问题，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协商会议关于意大利新政府的决议，苏联政府对这项决议没有反对意见。

英美军队在诺曼底进行的、现在已达到那么大的规模和实力的战役的顺利进展，使我们都很高兴。衷心地预祝你们的军队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2.最迟在一个星期之后，苏军将开始夏季攻势的第二个回合。参加这次攻势的有 130 个师，其中也包括一些装甲坦克师。我和我的同事们期待着重大的成就。希望我们的攻势将给予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以重大的支援。

1944 年 6 月 21 日

第 28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6 月 25 日

1.你6月21日的来电给予我很大的鼓舞。我们为你们出色的军事行动的首批战果感到高兴，我们将继续尽人力所及的一切来扩大同敌人接触的战线，并且继续使战斗达到最激烈的程度。

2.美军希望在几天内攻下瑟堡。瑟堡攻克后，很快就能解脱出美军三个师来加强我军的南进。在瑟堡可能将俘获25,000名敌军。

3.我们刚遇到了三、四天大风，这在6月份是极少见的。这场大风延迟了我军的调集，并且还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两个尚未完工的人造海港。我们已经作了安排来修复和加强这两个海港。从这两个人造海港通往内地的公路正在用筑路机和钢网迅速铺设着。这样，以瑟堡为中心将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基地，大量的军队将可以从这里出动而不受天气的限制。

4.我们在英国战场上进行了激战，5个德国装甲师中有4个参加了这场战斗。英军原拟在该处发动新的进攻，由于恶劣的天气迟延了几天，因而有几个师没有能够按时全部调集。进攻将在明天开始。

5.在意大利的进军开展很快，我们希望6月份就能占领佛罗伦萨，7月中或7月底到达比萨—里米尼线。我即将给你去电，向你说明这方面存在的各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在最广泛和最有效的战线上把尽可能多的希特勒军队不断地拖入战斗。我们只有奋力作战才能解除一部分你们身负的重祖。

6.你尽可以不理睬德国人宣传飞弹的效果的胡说。飞弹对伦敦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不足道的。在使用飞弹的过去7天中，仅死伤1万到11,000人。在下工和下班后，街道上和公园里仍是挤满了出来享受阳光的人群。议会在空袭期间照常开会。如火箭武器发射成功的话，可能较为厉害一些。人民为自己能稍稍分享一点我国士兵和英国人极其钦佩的贵国士兵所遭受的危险而感到自豪。祝你们新的进攻顺利。

1944年6月25日

第28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年6月27日

请接受我对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瑟堡的热烈祝贺。向取得辉煌成就的勇敢的英美军队致敬。

约·斯大林

1944年6月27日

第28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6月27日

你6月25日的来信收到了。

盟国已经解放了瑟堡，这是他们在诺曼底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我谨对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展开攻势的英勇的英美军队所获得的节节胜利表示祝贺。

如果说法国北部的战斗正在给希特勒带来日益增加的压力和威胁，那末，盟军在意大利的攻势的顺利进展也是值得重视和赞扬的。祝你们获得新的成功。

关于我们的攻势，可以这样说，我们将不会让德国人得到喘息的机会，我们将增强我军向德军进攻的力量，不断扩大进攻面。你一定会同意，这样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是必需的。

至于希特勒使用了飞弹，显然这个办法不管是对诺曼底的战事也好，或是对众所周知的英勇的伦敦居民也好，都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影响。

1944年6月27日

第28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年6月29日

为答复你6月27日来电。我们为你对解放瑟堡的祝贺和你对取得这一极其重大的胜利的美英军队所表示的敬意感到自豪。

1944年6月29日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 28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7 月 1 日

1. 你 6 月 27 日的来电使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并感到极大的愉快。我将把它转给总统，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

2. 我真应该告诉你，俄国军队的辉煌进展给了我们大家多么深刻的印象。俄国军队的威势越来越大，似乎要把从华沙，然后是柏林以东的德军全部粉碎。这里正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你们获得的每一个胜利。我清楚地体会到，这是德黑兰会议以来你们攻势的第二个回合。在第一个回合中，你们收复了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克里米亚，并且把你们的先头部队推进到喀尔巴阡山、塞列特河和普鲁特河。

3. 诺曼底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6 月份的天气很讨厌。我们不仅在海滩上遇见了多年来夏季从未有过的大风，而且天空中又多云。这使我们无法充分运用我们具有压倒优势的空军，却有助于飞弹飞来伦敦。但是，我希望 7 月里天气会有好转。同时，我军正在激战中继续占上风，虽然在英军战线上有 8 个德国装甲师对我们作战，我们的坦克仍然占很大的优势。我军已经有 75 万人以上登陆了，其中英军和美军各占一半。敌人在各条战线上都被打得鼻青眼肿，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种情势必须继续到最后。

1944 年 7 月 1 日

第 28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7 月 3 日收到

我收到了你送给我的壮丽的带有题词的照片，照片使我很高兴，而那个题词则使我格外高兴。非常感谢你。

第29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7月4日

7月1日的来电收到了。

感谢你对现在正进行着夏季攻势第二个回合的红军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都相信，来电中所说的在诺曼底的暂时困难不会影响英美军队很好地利用在空军和坦克方面的对敌优势，进一步扩大攻击战中的成就。请接受我们大家的敬意和最良好的愿望。

1944年7月4日

第29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7月5日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你们收复明斯克的光辉胜利和不可战胜的俄国军队在那么辽阔的战场上所进行的巨大的挺进。

1944年7月5日

第29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年7月7日

感谢你对苏军攻克明斯克所表示的热烈祝贺。

1944年7月7日

第 29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 年 7 月 11 日

当解放克恩的英国军队取得新的辉煌胜利之际，特向你表示祝贺。

1944 年 7 月 11 日

第 29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7 月 12 日收到

1.几个星期以前，艾登先生向贵国大使提出建议，苏联政府在罗马尼亚应采取主动，而英国政府则在希腊采取主动。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工作安排，以便尽量避免用三边交换电报这种使行动陷于瘫愈的尴尬作法。接着莫洛托夫先生非常恰当地建议我把这件事通知美国。我已经通知了美国，我本来就想这样做的，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总统表示同意作三个月的试验。斯大林，7 月、8 月、9 月这三个月可能是很重要的阶段。但是现在我发现你对这件事感到有些困难。请问，你是否同意让这个计划试行三个月。没有人能够说这个计划损害了欧洲的前途，或者划分了势力范围；但是，这样我们在各个战区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政策，而我们大家都将向其他两国报告自己正在采取的行动。然而，如果你告诉我毫无指望的话，我也不会见怪。

2.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你提出。土耳其愿意立即同轴心国断绝关系。我同意你的意见，土耳其应该宣战，但是我担心如果我们要求它宣战，它为了保卫自己就会要求我们供给飞机去保护它的城镇，而目前我们很难节省出飞机来派驻在土耳其，同时它还会要求在保加利亚和爱琴海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点我们目前也无力办到。除此以外，它还会再一次向我们要求各种军火，而我无法给它，因为我们在年初为它准备的军火已经另

作他用了。因此，在我看来比较聪明的办法是把同德国断绝关系看作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运去一些装备，帮助它对付来自空中的报复攻击，那时既然我们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就可能进一步使它参战。在上次大战中，同土耳其结盟对德国人说来是很关紧要的，现在如果土耳其同德国断绝关系，这将是为德国人的灵魂敲起丧钟。看来现在正是敲这个丧钟的良好时机。

3.我只是向你提出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想法，艾登先生也把我的想法转告了莫洛托夫先生。

4.我们现在在诺曼底约有105万人，配有大量的装备，而且每天都在增加25,000人。战斗很艰苦，在最近几次战斗之前（这几次战斗的伤亡数字尚未得到），我们和美国人一起就已经损失了64,000人。但是一切迹象说明敌人方面至少也损失了同样多的人，而此外我们还俘获了51,000名俘虏。考虑到我们方面采取了进攻，而且要从海上登陆，我认为敌人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战线将继续扩大，战斗将不断进行。

5.亚历山大也在意大利奋力进攻。他希望能够突破比萨—里米尼线，攻入波河流域。这样，要不是将吸引更多的德国师，就可以取得有价值的战略地区。

6.伦敦居民在轰炸下面表现得很好，到现在为止，死伤了22,000人，轰炸看来将是长期的。

7.再一次对你们向维里诺的光荣进军表示祝贺。

第29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7月13日

1.据可靠的材料，德国人曾经在波兰的第比茨试验站进行了很长时期的飞行火箭试验。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种炮弹可装将近12，000磅炸药，而我们的对策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在这一武器被用来攻击我们以前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第比茨是位于你们胜利进攻着的军队的道路上，从而你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占据这一据点是完全可能的。

2.尽管德国人几乎的确已经用了一切力量来破坏或运走第比茨的设备，但是这一地区落在俄国人手里的时候，还是可能得到很多情报的。我们特别希望知道火箭是怎样发射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火箭发射站。

3.因此，斯大林，如果你能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对贵国军队占领第比茨之后可能获得的仪器和设备加以保护，以及如果以后你能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专家去研究这个试验站，那么我将非常感谢。

1944 年 7 月 13 日

第 29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7 月 13 日

非常感谢你发来的贺电。我已把副本转给了蒙哥马利将军，并通知他可以把这份电报传达给他的部队。

1944 年 7 月 13 日

第 29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7 月 15 日

7 月 12 日的来电收到了。

1.关于罗马尼亚和希腊的问题，你从我们驻伦敦大使同艾登先生的通信中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在这里就不必再重复了。我明确了一点，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些怀疑，因此最好是在我们收到美国对我们所提问题的答复之后再来谈这一问题。只要一得悉美国政府的意见，我不会忘却把对这个问题的补充意见马上写信告诉你。

2.关于土耳其的问题，必须根据英国、苏联和美国政府从去年年底同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起已经了解的事实进行研究。自然你

会记得，早在1943年的11月和12月，我们三国政府就曾坚决地向土耳其建议要它站在盟国方面加入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但是毫无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由于土耳其政府的倡议，在今年的5、6月间我们再次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谈判，并且再次向它提出了去年年底三个盟国所提出的同样的建议。这次也是毫无结果。至于谈到土耳其方面所采取的某些敷衍办法，目前我看不出它对盟国有什么益处。鉴于土耳其政府对德国所采取的支吾搪塞和暧昧不清的态度，最好别打搅它，听它自便，对土耳其不施加新的压力。自然，这就意味着，逃避同德国进行战争的土耳其在解决战后的事务中将没有资格提出对特殊权利的要求。

3.我们很想完成你在7月13日来电中所提出的关于第比茨试验站的要求，如果那个试验站落在我们手里的话。请明确所指的是那一个第比茨，因为据说在波兰有好几个地方叫这个名字。

4.我对你关于诺曼底和意大利战况的通知，以及对我们在维里诺地区的进展的祝贺，表示感谢。

1944年7月15日

第29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7月19日

1.对你7月15日关于第比茨试验站的来电的答复。下面是英国关于上述试验站的位置的正式材料。

2.我们所关心的、试验大型火箭的发射的地区是位于北纬50度05分东经21度25分，从克拉科夫到里沃夫的铁路干线上的第比茨或第比查东北一些的地方。试验区的面积大约长10英里，宽3英里半，位于下列几个地点之间：

（1）北纬50度07分东经21度27分；

（2）北纬50度12分东经21度36分；

（3）北纬50度11分东经21度39分；

（4）北纬50度04分东经21度32分。

3.他们可能有1,000支这类的火箭，每支重5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这对伦敦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我们伤亡近3万人，但人们都表现出高度的坚韧性。议会要求我保证我们正在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因此如果你能得到可以得到的任何材料并且通知我们，以便我们派人前往研究这些材料的话，这将是你给予的帮助。我们从落在瑞典并未爆炸的火箭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但在波兰试验的痕迹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补充材料。落在瑞典的一支火箭有一个专门的无线电机件，我们非常想找到它，尽管这一机件看来是一个很小的零件。如果你让你们的军官同贝罗斯将军和迪安将军联系，并且命令你们的军官帮助他们，那么你对这个问题就不必再操心了。

4.我们的由700到800辆坦克并有一些高度机械化旅和炮队组成的强大的部队已进入诺曼底平原，我们现在是位于他们的后方，他们的战线由于多日的战斗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这些消息毫无疑问会使你很高兴。因此我对事情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并且希望我们将瓦解敌人的整个战线。但是大家对目前的战争都曾有过失望；所以我只想说，我希望尽快地告诉你好消息。明天我去那里，打算在那里待些日子。

1944年7月19日

第29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7月20日

1.你在5月8日的来电中谈到你将授予参加北极护航舰队的人员和军官们勋章的事情。我对这个问题很久没有作答，原因是在于我必须提出几

个问题。我建议把你准备奖给里特尔顿先生的那个勋章同样地奖给比维尔勃鲁克勋爵。他是向我们指出必须组织护航舰队的第一个人，并且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没有再拖延几个月。他是最先同代表团到你那里去的，因此我相信，他是非常希望获得俄国勋章的。所以这两位部长将把获得奖赏引为自豪。有一些人，他们在基层里曾做过有益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自己无意表扬一些比较低级的人员，我不想滥用你对他们的盛意。他们在完成重大的工作，然而却经常没有受表扬。在我们的奖章制度方面我们有很多种相类似的奖章，这些奖章可以进行合理的分发。我甚至可以把这些人的姓名告诉你。

2.新的循环周期中的第一次护航舰队在8月出发。此后我打算连续地派遣几次护航队，如果我没有向你指出在其他地方使用驱逐舰的充分理由时，这些舰队的派遣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我想在其他地方使用护航舰队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不久我们就可以利用比较短的路钱了。

3.对于波兰，我之所以避而不作任何声明，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地下运动给予德国人真正有力和准确的打击，你们将会同它建立友谊。如果米柯瓦依契克要求允许他到你那里去，我想你是会同意的。

4.全世界都在赞扬从三个方面同时对德国展开了有组织的进攻。我想，你、总统和我在冬季到来以前一定能在某个地方会面。为了各地不幸的人们，这次会见是值得举行的。

1944年7月20日

第30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7月22日

根据你最近的来电，我已发出了关于第比茨试验站的必要的指示。总参谋部的代表斯拉文将军正在就这个问题同贝罗斯和迪安将军建立必要的联系。我知道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因此我向你保

证，我将亲自督促这件事情，以便根据你的希望做到一切能够做的事。我很高兴地收到了你关于你们的军队在诺曼底已深入到德寇后方的消息。

预祝你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1944 年 7 月 22 日

第 30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7 月 23 日

7 月 20 日的来电收到了。现在我写给你的这封电报是关于波兰的问题。

我们战场上的情况正以极快的速度进展着。波兰的大城市之一卢布林今天被我军占领了。我军正继续向前挺进。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关于波兰领土上的行政机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不希望，也不会在波兰的领土上建立我们的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想干涉波兰的内政。这件事必须由波兰人自己去做。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同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在不久以前组织起来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联系。波兰人民代表会议是去年年底在华沙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关于这一点你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应该已经通知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准备着手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行政机关，我希望它能够实现。在波兰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其他能够建立波兰行政机关的力量。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所领导的所谓地下组织是失去了影响的蜉蝣。我不能把波兰委员会当做波兰政府，但它今后会成为从民主力量中间组织波兰临时政府的核心，这是可能的。

至于米柯瓦依契克，当然我并不拒绝接见他。然而，如果他能同波兰民族委员会联系，那会更好些，波兰民族委员会对米柯瓦依契克

是善意的。

1944年7月23日

第30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7月24日

1.感谢你7月22日关于第比茨的来电。我很高兴你将亲自关注这个问题。

2.无疑你已经收到了总统关于建议我们三人于9月的第二个星期在苏格兰北部再进行一次会见的电报。我没有必要说英王陛下政府和我个人是怎样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光临。我很了解你的困难，并且也很了解你的行踪是应该取决于战场上的局势。但是我请你注意，三方的会见将有很大的好处，并且正像在德黑兰以后那样，将会使我们所有的事情便于处理。我们认为，英凡戈顿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分别待在三艘主力舰上，也可以在岸上采取适当的措施，或者还可以两者配合进行。为了保守秘密（这应该被认为是适宜的）和保证安全，可以很方便地采取一切最必要的措施。在苏格兰北部和西北部，9月的天气经常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向你作任何保证。同时我在为总统和我自已进行准备工作，因为他已经通知我说他准备前来。请告诉我你的想法和愿望。

3.我在诺曼底进行了三天的旅行后刚才回来。我们的进攻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快，规模也没有那样大，天气经常使我们不可能利用我们的空中优势，并且严重地阻碍了战斗的进行。一有好天气出现，就会开始新的战斗。我希望是明天，25日。从登陆到现在我们一共损失了11万人，而敌人，根据我们的计算，最少损失了16万人，包括6万名俘虏在内。我们登陆的人数为140万人。6月间我们有一个人造海港被强烈的暴风所摧毁，但被毁后剩下来的部分每天还可以吞吐11,000吨，并且它的工作情况非常好。我们在用一切力量加强这个海港，以便使它能经得起冬季的风

暴。美国人在很快地恢复和扩建瑟堡，使它可以通航大量的船只。发现了有半打较小的港口可以加以很好的利用，而且在把敌人从克恩往东赶走相当远之后，克恩本身将成为可通航6,000吨轮船的港口。

4.无疑的，你已经知道“铁砧”将在8月15日开始。为了支援亚历山大经亚平宁向波河平原下游的进攻，我们从地中海各地聚集了较多的增援部队。他向德国的将近27个师展开了进攻，这些德国师中间有许多师的人数比规定的编制要少得多。亚历山大手下有7个国家的将近24个师。他准备在冬季到来之前抵达的里雅斯特。他将把自己的右手伸向铁托元帅，对铁托元帅我们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帮助。

5.最后，请允许我对苏军的有进无退的进攻和你们所获得的非常重要的胜利表示衷心的祝贺。

1944年7月24日

第30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4年7月25日

1.根据7月23日来电最后一段中的建议，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将在明天夜里出发。他带着罗梅尔先生和葛拉勃斯基先生。如果需要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为他提供到德黑兰或到莫斯科去的交通工具。他希望同你亲自进行一次详尽而友好的会谈。他在波兰政府中是受到全体同事的完全支持的，对这个波兰政府我们应当继续予以承认。

2.我们衷心地希望全体波兰人在把德寇驱逐出境的事业中，在建立自由、强盛、独立以及同俄国友好合作的波兰的事业中（你曾经宣布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你的目的）联合起来。

3.我已把你给我的电报通知了美国总统，并把这封电报的副本送给他。无疑的，他将同你进行联系。

1944年7月25日

第 30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7 月 26 日

1.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奖赏的意见，除了里特尔顿先生外，对在组织护航舰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的确应该得到高级奖赏的比维尔勃鲁克勋爵也给予奖赏。苏联政府主张由最高苏维埃奖给比维尔勃鲁克勋爵和里特尔顿先生以苏沃洛夫一级勋章。苏联政府同意你的意见，对在组织护航舰队和领航过程中有优秀表现的基层人员也给予奖赏，为此确定了 120 枚勋章和 50 枚奖章。关于这个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作具体的通知。

2.我从来电中满意地获悉 8 月份护航舰队的情况；正如你所写的那样，在 8 月份护航舰队之后必须开始护航舰队的新的周期，我们的确非常需要这些运输舰队。

3.至于你在 7 月 24 日的同一封来电中谈到的你、罗斯福先生和我三人的会见，我也认为这样的会见是适宜的。但是当苏军在这么广阔的战场上进行着战斗、而且攻势越来越扩大的这个时候，我无法离开苏联和放下对军队的领导，即使极短的时间也不行。根据我的所有同事们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4.请告知你们计划在诺曼底展开的新攻势的情况。如果展开这次的进攻，那它在希特勒目前的这种处境下将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将为希特勒造成极其严重的局面。

5.“铁砧”的成功将加速希特勒的崩溃，并且无论如何将为希特勒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希望你像攻入诺曼底那样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感谢你对苏军的成就的友好祝贺。

1944 年 7 月 26 日

第 30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7 月 27 日

1.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出发了。我相信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是很希望协助全体波兰人在你、我和总统三人已经商定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我认为，为了建立俄国的一个良好的邻邦以及贵国防止德国将来可能再行侵略的重要的屏障——个强大、自由、独立的波兰，同俄国友好的波兰人应当和同英国和美国友好的波兰人联合起来。我们三人必须适当地注意，使其他的屏障也能存在下来。

2.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处于这种境地，即它们承认一个波兰机关，而你承认另一个机关，那将是非常值得遗憾的，甚至是不幸的。这将会导致经常的摩擦，甚至会影响我们在世界上必须完成的伟大事业。因此请你本着这几行字所表达的精神，即忠诚的友谊和我们 20 年的同盟的精神，来接受这封信。

1944 年 7 月 27 日

第 30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7 月 28 日

7 月 25 日和 27 日关于米柯瓦依契克启程的两封来电都收到了。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和他的同行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将给予他们必要的协助。

你是知道我们对于波兰问题的观点的。波兰是我们的邻国，对苏联说来同波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欢迎已经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起来的由民主力量组成的波兰民族委员会，我想这个委员会的建立为联合同英国、苏联和美国友好的波兰人以及消除那些不能够同民主力

量进行联合的波兰人的反抗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我了解波兰问题对盟国共同事业的重要性，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准备协助所有的波兰人，并且进行斡旋，以便他们达成协议。苏军尽了并且正在尽一切可能加速从德寇手中解放波兰，并且帮助波兰人恢复自由和繁荣自己的祖国。

1944 年 7 月 28 日

第 30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7 月 29 日

1. 对来电第一点中所写到的奖赏一事以及对比较低级的人员的慷慨表示非常的感谢。这件事，正如你所说的，将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我们在进行极为周密的研究，我们将建议奖给哪一些人。

2. 以下这些完全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毫无凝问你还记得哈里·霍普金斯是怎样带病飞到你那里去的，因而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自然是非常疲倦的。在美国派出的那些数量极多的商船上肯定是有一些美国人。如果可能，请你注意一下他们的工作，那些工作也是进行得很好的。

3. 我应当以很大的遗憾，但却是十分谅解的心情来接受你对我们可能进行的会见所作的声明。我认为你也会把这一问题通知给美国总统。

4. 你们的成就一天比一天更加辉煌了。

致一切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7 月 29 日

第 30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1 日

关于嘉奖在组织和带领护航舰队方面有优秀表现的人员的问题，

我们自然也不会忽视美国人。感谢你的友好的提示。

关于在目前我同你和总统不可能进行会面一事，我当时就通知了总统，并且说明了理由。

请接受我对你的良好愿望的谢意。

1944年8月1日

第30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8月3日

在7月22日的来电中承蒙你向我表示，就第比茨试验站问题已发出了必要的指示。

虽然早在7月28日就责成克拉克·寇松大使先生请求苏联政府指示苏联驻德黑兰的代表发给签证，但是为了等待去苏联的入境签证，英国的一批专家在德黑兰已待了好几天了。

你曾经盛情地通知我说：你将亲自督促这件事情。因此我能不能请求你发出必要的指示以便让我们的专家能够立刻继续前往呢？

1944年8月3日

第31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8月3日有关试验站的来电收到了。已责成苏联驻德黑兰大使立即发给英国专家进入苏联的签证。

第31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8月4日

应波兰地下军的迫切要求，我们将根据天气条件的许可向华沙西南区

空投约60吨的装备和军火，据说波兰人在该地区发动了起义，正同德国人激战中。他们还说他们也向俄国人请求援助，俄国人的援助看来是很近便的。他们正受到一个半师的德国军队的攻击。这个消息也许会有助于你们的军事行动。

1944年8月4日

第31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8月4日

1.我刚才收到我向海军大臣索取的记录如后。考虑到在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被你们截住的德国军队数目很大，我想起你们愿意得到我们的一些潜水艇来帮助你们消灭他们在波罗的海的舰艇和包围希特勒匪徒。

2.如果你认为这个计划是有益的，请通知我，我们将立刻行动。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这个计划不会有什么益处、不方便或者过于晚了，请毫不犹豫地将这点通知我。

3.记录开始：

“如果俄国人能够打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话，我们可以派遣最多达6艘的潜水艇去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现有的材料说明，由于德寇在6月间撤退之前对水闸进行了很大的破坏，俄国人在9月以前将不可能打通这条运河。10月以后运河就不能通航了，而轮船航行平常需要14天左右。潜水艇在受到冰块的限制以前，在波罗的海上大概可以活动到12月。

“我们已经暂时借给俄国人一艘‘S’级的和三艘‘U’级的潜水艇，他们自己可以把这些潜水艇运到波罗的海。

“通过运河的任何潜水艇为了便于通行都必须减轻重量，储备物和备用的机械另行运送。”

记录结束。

1944年8月4日

第 31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5 日

有关华沙的来电收到了。

我想你所接到的关于波兰人的情况是过分夸大了，并且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只有根据波兰流亡者所说的他们似乎已经用地方军队的某些部队解放了维里诺这些话以及根据在电台上广播了这个消息的事实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当然是丝毫也不符合事实的。波兰人的地方军队是由一些被误称为师的队伍组成的，它既没有大炮、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不能设想，像这样的队伍能够攻下华沙，为了守卫华沙，德国人布置了 4 个坦克师，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师。

1944 年 8 月 5 日

第 31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5 日

对派遣 6 艘英国潜水艇来波罗的海一事必须作如下声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遭到了德国人的严重破坏，因此本年内是不可能利用了。如果英国潜水艇能够经斯喀格尔拉克—喀得加特进入波罗的海（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时它们就是这样做的），这将是一个卓越的措施，它将是对德国人的又一次打击。

1944 年 8 月 5 日

第 31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8 日

我想把同米柯瓦依契克、葛拉勃斯基和罗梅尔会见的情况通知你。同米柯瓦依契克的会见使我确信，对波兰的情况他没有令人满意的情报。同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米柯瓦依契克并不反对找到使波兰人联合起来的途径。

我认为不可能迫使波兰人接受任何决定，所以我向米柯瓦依契克建议，希望他和他的同事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会面，并就他们的问题，首先是使波兰解放区内的波兰一切民主力量尽快地联合起来的问题，亲自同他们进行讨论。这种会谈已经举行过了。他们双方都把会谈的情况通知了我。民族委员会的代表团建议把1921年的宪法作为波兰政府进行活动的基础，如果米柯瓦依契克同意，就给他的伙伴们四个部长的职位，其中包括由米柯瓦依契克充任总理这一职务。但是米柯瓦依契克没有同意这一点。很遗憾，会谈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但是它总还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使米柯瓦依契克同莫拉夫斯基以及刚从华沙来的贝鲁特得以广泛地相互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无论波兰民族委员会或者米柯瓦依契克都表示愿意一同工作，并且在这方面寻找实际的可能性。这可以算作波兰民族委员会同米柯瓦依契克和他的同事之间相互关系中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希望以后将会更好一些。

1944年8月8日

第31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8月10日

1.非常感谢8月8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我很高兴使你们双方接近了起来。无疑的，已经向我们共同的目的前进了一步。我也和你一样，希望以后将会更好一些。

2.波兰飞行员们昨天晚上采取了一个往华沙运送一些弹药的新计划。据说已经运去了。我很高兴地获悉你们自己也在运送军火。你认为可以作到的一切都会受到你的英国朋友和同盟者的热烈赞扬。

3.我现在可以通知你西线战斗的好消息。敌人在瑟堡和布列塔尼半岛之间的阿维兰契进行阻击战时，曾用5个坦克师来袭击我们，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是美国人牢固地坚守住了。经过我们的密集轰炸，敌人在这个地区的装甲坦克部队在战斗中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并不特别希望敌人过早地收场，因为美国人（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在德寇左翼的周围进行着战斗）准备通过阿兰逊和阿根坦去同由克恩往法莱斯方面进军的英国人、加拿大人和波兰人会师。蒙哥马利将军希望我们包围德国的主力部队。如果这次围攻只是部分成功，甚至很大一部分突了围（这是时常发生的），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们逼到塞纳河边去的（那里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了），并且用我们的空军来消灭他们。因此，如果说我们有希望取得一个头等的胜利，那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在法国总共有100万美国部队和75万英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的部队。部分的荷兰旅团和比利时旅团已经登陆了。我相信你一定会祝贺我们成功的。

4.今天晚上我将去地中海地区待一个短时期。在那里的时候，我将要会见铁托。我将把我们会见的情况通知给你。

致一切良好的愿望，希望你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1944年8月10日

第31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8月12日

我看到了波兰入从华沙打来的令人忧虑的电报。经过10天之后，他们还是在同把整个市分成三个区的大批的德军进行着搏斗。他们恳求给予一些机枪和弹药。你不能再给予一些援助吗？因为那里离意大利太远了。

1944年8月12日

第 31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8 月 12 日

我考虑了我们的潜水艇经斯喀基尔拉克—喀得加特进入波罗的海的问题，但是有人向我说，由于我们和敌人都敷设了大量的水雷和障碍网，这个建议是行不通的。

我为运河被毁感到非常遗憾。我们本来是想援助你们的。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31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14 日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看了你关于法国北部战况的消息和你们包围和消灭德国主力部队的计划。预祝你们在执行这项计划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感谢你预祝我们取得成就，以及通知我关于你即将同铁托元帅会见一事。

1944 年 8 月 14 日

第 32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8 月 14 日

1. 最近两天我拜会了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的首相。我向这两位南斯拉夫首领说，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他们能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南斯拉夫人民在同德寇的斗争中汇合成为一个整体。我们的目的在于协助建立一个

稳定和独立的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建立是向这个目标前进了一步。

2.两位首领就一系列的实际问题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们商定，现在南斯拉夫的全体海军部队将在斗争中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南斯拉夫首相和铁托元帅之间的这项协议使我们可以以更大的信心增加我们提供给南斯拉夫武装部队的军用物资。

3.他们彼此商定，过几天之后将同时发表一项宣言。正如我所希望的，这项宣言将减少内部的斗争，并将加强南斯拉夫的军事力量。今天他们去维斯继续进行会谈，

4.我也把会谈的结果通知了罗斯福总统。

1944 年 8 月 14 日

第 32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16 日

1.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谈话后，我就命令红军统帅部在华沙地区密集地空投武器。同时也空投了一名伞兵联络员。据统帅部报告，他被德国人打死了，因而没有达到目的地。

以后，在更详细地了解了华沙事件后，我确信华沙之举是一个轻率的、骇人的冒险举动，它使居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如果苏军统帅部在事变之前得到消息，如果波兰人同苏军统帅部维持联系，那末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苏军统帅部对业已形成的局势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军统帅部同华沙的冒险行为无关，因为它对此既不承担直接的责任，也不承担间接的责任。

2.你关于同铁托元帅和萧巴希奇首相会晤的通知收到了。谢谢你。

3.非常高兴地得悉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成功。衷心地祝盟军胜利。

1944 年 8 月 16 日

第 322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绝密急信

1944 年 8 月 20 日

我们考虑到，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遗弃不顾的话，世界舆论的反应会怎样。我们认为，我们三人都应该竭力来尽可能地挽救华沙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会把急需的物资和军火空投给华沙的波兰爱国者，或者你是否同意协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地进行空投？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极端重要。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 年 8 月 20 日

第 32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22 日

你和罗斯福先生关于华沙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愿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关于一帮罪犯发动华沙冒险事件企图夺取政权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这批家伙利用了华沙居民的诚意，把很多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推向了德国大炮、坦克和飞机的虎口。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每过一天不是有利于波兰人的解放华沙，而是有助于希特勒分子惨无人道地枪杀华沙居民。

从军事观点来说，这种局面不断地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引向华沙，对于红军和对于波兰人一样是毫无好处的。同时，虽然德国人最近又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向苏军进行反扑，苏联军队正在尽一切力量来粉碎

希特勒分子的反扑，然后要在华沙地区转入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毫无疑问，红军正在竭尽全力攻破德国人在华沙周围的防线，为波兰人解放华沙。对于反纳粹的波兰人，这将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帮助。

1944 年 8 月 22 日

第 32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8 月 24 日

今天（8 月 24 日）早晨，英国送交苏联政府的由 1 艘主力舰和 8 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安全抵达了你所知道的苏联港口。

谨以我个人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你和英国政府致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给予苏联军队这个重要的援助。

1944 年 8 月 24 日

第 325 号

美国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9 月 19 日

我们的魁北克会议刚刚结束。在会上我们对军事行动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1. 西北欧：我们打算迅速前进以歼灭德军和插入德国心脏。为了使敌人在西战场遭到失败，最好是袭击鲁尔和萨尔，因为敌人为防守这些极为重要的地区已集中其全部的残军。为此，北线的通路显然比南线的要优越；而我们绝对必须在坏天气到来之前开放几个北方港口，特别是鹿特丹和安特卫普。所以我们的主力将集中在左翼。

2. 意大利：我们现在在意大利的行动将导致：（1）或者全歼凯塞林的部队，这样就有可能迅速地重新布署力量，组织向卢布良隘口方面追击；

（2）或者打乱凯塞林的有计划的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只得满足于在本年内扫清伦巴第平原。

战斗的进程将规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计划正在拟制中，加果形势需要，将在伊斯的利亚半岛实现陆海军协同作战。

3.巴尔干：我们将陆续进行空军活动和“康曼杜斯”的行动。

4.日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进攻日本本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商定了以在所有战场上加强对日本进攻为目的的未来的军事行动。

5.德国崩溃后把军队迅速调往太平洋战场的计划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年9月19日

第32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9月27日

1.克拉克·寇尔大使爵士告诉我，你赞扬了英美军队在法国进行的战斗，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很珍视英勇的俄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这种评语。明天在下议院，我将乘机重提过去我已经说过的话：是俄国军队捣碎了德国军事机器的心脏，而且目前在前线吸引住了绝大部分的敌军。

2.我同美国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后刚刚回国，我向你声明我们都深切相信，全世界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英、美、苏三国的意见一致上。我感到很难过，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大好，而且你的医生不让你乘飞机作长途旅行。总统认为海牙是我们会面的一个合适地点。我们还没有占领海牙，但是甚至在圣诞节以前，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大大改变波罗的海沿岸的局面，以致你的旅行不会累人或者困难。但是，我们只有进行很多艰苦的战斗之后，这种计划才能实现。

3.绝密。总统打算在大选之后，不论当选与否，先访问英国，然后访问法国和低地国家。我所获得的材料使我相信，总统一定会当选。

4.我最诚恳地希望，而且据我所知总统也同样希望，苏联将按照你在德黑兰所作的诺言，在德军被击溃之后立即就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开辟一个对日战场将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特别在空军方面，这将大大加速日本的失败。从我所获悉的关于日本国内的情况和日本人的绝望心情看来，我相信在纳粹德国溃败后，我们三大国对日本的联合招降可能具有决定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一起来详细研究这些计划。如果我这里脱身得开，我将乐于在10月间前来莫斯科。如果我走不开，艾登就会代替我前来。我向你和莫洛托夫致最衷心的良好愿望。

1944年9月27日

第32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9月29日

我已经收到你和罗斯福先生关于魁北克会议的来电，其中说到你们的进一步的军事计划。你们的来电清楚地表明了美英军队所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请允许我祝你们和你们的军队一切顺利。

目前，苏军正忙于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威胁我军右翼的德国部队。如果不消灭这部分敌军，我们就不可能很深地插入德国东部。除此而外，我军还有两个眼前的任务：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和用一次进攻来探明德国人在东线的防御情况，如果条件有利，就攻破他的防御线。

1944年9月29日

第32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9月30日

9月27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我同你一样地相信，三个主要国家之间的牢固的一致意见是未来和平的真正的保证，同时也符合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最高愿望。在我看来，我们三国政府在战后继续奉行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形成的这一政策，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然我非常想同你和总统见面。从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利益出发，我对此极为重视。但是，就我来说，我必须作一点保留。医生教我不要作长途旅行。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我热烈地欢迎你10月份想来莫斯科的愿望。我们将商谈极重要的军事问题和其他问题。如果有什么事使你不能成行的话，我们自然很愿意会见艾登先生。你说到美国总统计划访问欧洲，我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我也相信他在大选中一定会获胜。

至于日本，我们的立场同在德黑兰时候一样。

我和莫洛托夫向你表示最良好的愿望。

1944年9月30日

第32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10月4日

你的下属很担心有人建议我走的那条航线。在8,000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很久对我的身体不太合适，虽然必要时我还是可以在高空飞行一个钟点左右。我们认为飞渡爱琴海和黑海危险较小。经过研究我认为，整个说来，这是最好的航线，而且没有不必要的危险。

只要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在辛菲罗波尔或者你愿意指定的海边的另一个着陆基地上安全降落加油的话，我对现有的各种设备就感到很满意了。我的飞机上备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唯一要紧的事就是让我们派一架飞机先去你处，同你们商量安排一个指挥我们归航和着陆的联合信号站。请为此下达必要的指令。

我正在盼望着这次在1942年8月以来所创造的愉快得多的条件下重游莫斯科。

1944年10月4日

第33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0月5日

10月4日的来电收到了。

已安排可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萨拉布兹机场着陆。请派你的信号机飞到这个机场来。

1944年10月5日

第331号

斯大林和丘吉尔致罗斯福的信

1944年10月10日

1.在非正式谈话中，我们初步研究了同我们有关的局势，并且拟定了我们会谈的方案，包括正式会谈和其他的会谈。我们邀请米柯瓦依契克先生、罗梅尔先生和葛拉勃斯基先生立刻前来，以便同我们和同波兰民族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我们商定，在我们的谈话中，不涉及敦巴顿橡树园的一些问题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会谈时将要讨论的那些问题。我们应该研究怎样能最好地就对巴尔干诸国，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在内的政策商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商定：哈里曼先生将作为观察员列席一切讨论重要事项的会谈，迪安将军将列席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谈。我们商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迪安将军之间应就过一些时候可能需要举行的有我们两人参加的任何一次会谈中所涉及的军事方

面的问题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我们也商定了由两国外交部长同哈里曼先生一起会谈。我们将随时使你充分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2.我们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最衷心的良好愿望，并且为美国军队的英勇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战场战斗的指挥，向你表示祝贺。

丘吉尔

斯大林

1944年10月10日

第33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4年10月10日 绝密

尊敬的斯大林：

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建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谈订于星期六（14日）晚10时举行。如果你愿意的话，艾登和我将偕勃鲁克元帅和国防部的两位军官（伊斯迈将军和贾可布少将）一同到克里姆林官。我已向哈里曼建议，请他同迪安将军一起来。勃鲁克元帅已经准备好在地图上阐述西战场的形势，并且说明我们和在那里的美国人关于西战场的计划和意图。他一定能比总统和我从魁北克发出的联名信中所通知你的解释要详细得多。然后，他将解释意大利的局势，并且把它同你的南翼部队在西线的攻势联系起来。他和我都乐意回答你或你的军官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我们同时将很乐于倾听你愿意告诉我们的有关你的东战场未来计划的任何报道。因为这些计划对英美联军在西线或南线的攻势自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关于欧洲的谈判结束时，勃鲁克元帅将简短地叙述我们在缅甸的抗日战争的情况以及我们对缅甸的计划和意图。哈里曼先生完全同意，在这之后，由迪安将军叙述一下盟军在太平洋的战斗进程和他们的计划，并将指出你方给予哪一类援助最为有利。我们希望听取一切你可能告诉我们的关于苏军在远东的配置情况，或在德军无条件投降或化为普通的游击队后，在远东所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我认为我们就这个问题初步交换意

见是极端重要的。

当我写这封信时，哈里曼先生就在我旁边。以上所述他都同意。

请信任我，

你的真诚的朋友

温斯顿·丘吉尔

1944 年 10 月 12 日莫斯科

第 33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4 年 10 月 12 日

尊敬的丘吉尔先生

10 月 12 日的来电收到了。来电中提议 14 日晚 10 时举行军事谈判。我同意你的提议，并同意你提出的会议计划。我提议：谈判地点是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办公室。

致真诚的敬意。

约·斯大林

1944 年 10 月 12 日

第 33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4 年 10 月 16 日

尊敬的斯大林：

你大概还记得我们今年夏季来往的电报。在那些电报里你对一些英国专家前往位于波兰的第比茨德国火箭试验站一事同意惠予协助。

现在我得到通知：专家们已返抵英国，并且带回了一些珍贵的情报，这些情报弥补了我们在远程火箭的知识方面的某些空白点。

请接受我的谢意，感谢你们对专家们这次波兰之行进行了良好的安排，感谢苏联当局给予我们代表团的帮助。

致真诚的敬意。

你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4年10月16日

第33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4年10月16日

尊敬的斯大林：

回来后，我看到了这几份电报。如果你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这些消息，你可能会对它们感到兴趣。请你不必将它们退回，因为我还有重份。

致真诚的敬意。

你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4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

第33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4年10月17日

尊敬的斯大林：

我们同米柯瓦依契克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并且获得了成就。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希望同你和民族委员会获得相互谅解，尽管他毫无疑问地是面临着困难。米柯瓦依契克极愿同你单独会面，以便把他现在的计划告诉你，并且听取你的意见。我们见面后，我同他进行了几次谈话。这几次谈话使我在你面前极为坚决地支持这个要求。

我期待着今晚我们关于分割德国的谈话。关于昨天你似乎已同意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能够搞得更明确些，并且以我们在德黑兰时当然还不可能有的那种精确程度来形成我们的见解，在那时胜利是比现在更遥远得多。

最后，请允许我通知你，我对下述这点感到极为满意，即我们在谈到困难的、并且往往难免是很棘手的国家政策问题时，是这样地毫无拘束和相互谅解。

小女萨拉将很欣赏斯大林小姐赠给她的精采礼品，并且把它保存在她最珍贵的物品中间。

致真诚的敬意和良好的愿望。

你的朋友和战友

温斯顿·丘吉尔

1944 年 10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第 33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4 年 10 月 19 日

莫斯科

尊敬的丘吉尔：

在你即将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请哂纳我的平凡的礼品——赠给丘吉尔夫人的“船上舵手”花瓶一只，赠给你的“猎人射熊”花瓶一只，作为你们来到苏联首都的纪念。

再一次祝你身体健康，精神焕发。

约·斯大林

1944 年 10 月 19 日

第 33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4 年 10 月 19 日

尊敬的斯大林：

我刚收到你送给我和我的夫人作为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纪念的两只精美的花瓶。我们将把它们和我们最心爱的物品放在一起，保存起来。

这一次，我曾不得不从事浩繁的工作。我还每天收到航空邮件，要我决定我国内部的一些事务。因此我无法参观莫斯科和它的一切名胜古迹。尽管如此，由于给予我的热情接待，特别是由于我们极友好的谈话，整个访问自始至终使我感到真正的满意。

我对我们两国人民未来的同盟的期望，从没有现在这样的强烈。为了医治战争的破坏，为了把全俄国从暴风雨般的时期引向阳光和煦的日子，我希望你长命百岁。

你的朋友和战友

温斯顿·丘吉尔

1944 年 10 月 19 日莫斯科

第 33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0 月 21 日收到

经过同你，斯火林大元帅，和你的同事们进行讨论以后，艾登和我在离开苏联时感到精神焕发、意志坚强。这次在莫斯科的值得怀念的会见表明，当我们聚在一起进行坦率和亲切的讨论时，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获得解决。俄国人的好客是有名的，这在我们这次访问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我们在莫斯科和克里米亚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人员的生活到处都受到了最深切的关怀。我向你和所有负责作这些安排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度会面。

第 34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0 月 24 日收

在莫斯科时你曾说过，你会通知我，我们能不能在挪威北部给你某种帮助。我得到通知：将派去由200名挪威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如果你有其他需要，请通知我。我一定立刻查明，它们是否能得到满足和满足到什么程度。

致最良好的愿望和真诚的敬意。

第34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0月24日

10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其中通知说拟派遣由200名挪威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到挪威北部去。我应该说，挪威驻莫斯科大使已经向莫洛托夫谈到挪威人对付德寇的更可靠的措施。

如果你能对在挪威的德寇采取某种海上的行动，当然这将有积极的意义。

祝你平安回到伦敦，并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年10月24日

第34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年10月29日

在我刚抵达伦敦后，我才知道你赠给我和我的代表团成员的俄国礼品是这样丰盛。请接受我们热烈的谢意。我们大家都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了这些再次表示俄国人的盛情的礼品。

1944年10月29日

第 34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0 月 31 日

1. 我接到通知：挪威驻莫斯科大使和莫洛托夫先生商定了象征性的挪威军队的数目。这支军队中应该从英国派出的只占 120 人。以后挪威驻英军事当局研究了这个数字，结果把数目增加到 230 人。这支部队已经出发。

2. 我应该强调指出：驻在英国的挪威军队的数量并不大。仅有 3 个山地连队，每连 200 人；一个伞兵连和一个野战营，各 170 人。因此，派到摩尔曼斯克的象征性部队已经占驻在英国的步兵部队的三分之一。到现在为止，挪威政府愿意让剩余的部队留在英国。因为考虑到，在德寇撤退时，他们应该同我们的军队一起回到挪威。可是如果你宁愿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派去同红军合作，我可以立刻同挪威首相商谈。

3. 至于海军行动的问题，我们的主力舰队经常向往来于挪威北部的敌船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这种攻击业已获得巨大的成效。如果你能写信告诉我你们预定的军事行动的要点，我将乐于考虑可能给予什么进一步的和更直接的海军援助。

1944 年 10 月 31 日

第 34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1 月 5 日

1. 顷悉你正向布达佩斯进军，特致贺。

2. 现在我们正有效地控制着通向安特卫普的通路。我希望沿海航行的船只在 10 天后可以通航；远洋三、四个星期后可以通航。这解决了从北翼向德国进攻的问题。在比利时和荷兰进行了严重的战斗。仅英国第 21 集团军在占领了布鲁塞尔后就损失了 4 万人以上（包括英国军队和英军司

令部属下的部队）。当许多袋形阵地以及虽已被包围但毕竟还为敌人控制着的港口被肃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擒获大批的俘虏，其数目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3.在英美战场上沉寂的时候；曾为大规模进攻作好了全部准备工作。

4.骇人的倾盆大雨冲毁了我们在意大利战线方面的大量桥梁。现在一切活动都只好停顿。

5.至于南斯拉夫，我正在等待萧巴希奇博士回来，和他向彼得国王报告的结果。我极为高兴地得悉：彼得国王对他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消息产生了良好的印象。马克林准将现在在我这里，他告诉我，当知道俄国和英国合作的消息后，游击队总司令部情绪大为好转。

6.虽然我一点也没有通知您有关波兰的消息，你可以相信我并没有在睡懒觉。现在他们仍在和美国政府进行着谈判。我不知道我将会得到怎样的答复。但是我在这里向你保证：我还坚持着我们分别时所抱的态度，同时，在任何停战会议或和会上，英王陛下政府一定支持苏联按照我们所商定的方针提出的要求。美国选举的结束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快慰。

致十分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11 月 5 日

第 34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4 年 11 月 6 日收到

在苏维埃国家国庆纪念日的时候，特欢欣地向你致贺。祝贵国和你本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获得各种成就，并愿英苏同盟成为我们两国、各联合国家和全世界福利的泉源。

第 34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1 月 7 日

10月31日的来电收到了。

根据挪威政府的请求和你上述的来信，我已经命令苏军当局接受从英国来到摩尔曼斯克的挪威军队，并且把他们送到解放了的挪威领土。他们将受苏军统帅部的总的领导。

至于其余的挪威部队，我认为对他们作决定是挪威政府的事情。

关于英国海军参与解放挪威，我没有具体建议。你们方面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将受到欢迎。

1944年11月7日

第34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1月9日

感谢你11月5日的来电。

我高兴地从你的来电中得悉，通向安特卫普这样重要的港口的通道正处于贵国的可靠的控制下。我希望你为新的进攻所作的准备正在顺利进行中；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德寇将重新感到英美联军强大打击的力量。

关于南斯拉夫，我手头的材料也说明了，局势向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萧巴希奇博士正准备到莫斯科来报告最近他同铁托元帅会晤的结果。看来，可以指望在最近就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

至于波兰问题，不得不承认米柯瓦依契克先生错过了许多珍贵的时刻，因此他失掉了一些机会。

承蒙祝贺苏军进军布达佩斯，特此致谢。在匈牙利，我军正在前进中。然而他们不得不在进军途中克服不少困难。关于残留在拉脱维亚的32个德国师，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加速把他们消灭。最近几天不断的雨和雾严重地阻碍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行动。可是这

使我们有可能加强措施，来准备行将到来的决定性的行动。

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在选举中总统已经取胜，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苏联，这将被看作是我们共同的新的胜利。

1944 年 11 月 9 日

第 34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1 月 12 日

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击沉了“透匹茨”号。让我们大家为这件事欢庆吧。

这里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我上次电报提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正在迅速地展开。今晚我要出发，先到法国总参谋部，然后到美国总参谋部。

致十分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11 月 12 日于巴黎

第 34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1 月 13 日

英国飞机击沉“透匹茨”号的消息使我们极为高兴。英国的飞行员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

你通知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祝你们这次的行动成功。

向你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11 月 13 日

第 35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4 年 11 月 16 日发出

在苏维埃国家国庆纪念日的时候，承你向苏联致祝贺和良好的愿望，特向你致谢。我深信：我们两国间日益巩固的同盟必将有利于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和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

约·斯大林

第 35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1 月 16 日

1. 无疑你希望得到关于我们巴黎之行的某些消息。在香谢丽舍和在市政府的抵抗运动参谋部，我曾受到将近 50 万法国人的真正隆重的欢迎。我还同戴高乐恢复了私人的友好关系。

2. 我注意到，法国报刊和别的新闻来源正在传布一种消息，说我们在巴黎已经对各项事情作出了决定。你可以相信，我们根据一切都应该提交三大国审查的原则，进行了若干重要问题的商谈。

11 日早餐后艾登和我同戴高乐和他周围的两三个人曾谈过两小时。戴高乐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法国人对业已决定了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他希望再得到为供应 8 个师所需要的完全现代化的装备，而这些装备只有美国人才可能提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决定：这些师将不用来参加在战场上击破德国；同时必须集中船只来满足应该为赢得冬季和春季战役的胜利而行动着的军队的需要。这个决定不是没有根据的，我支持这一论断。

3. 同时，我同情他们还想多掌握几个战区的愿望；他们还希望尽可能地参加作战或者参与打扫残局的战斗——战斗可能还是长期的，而不愿意作为一个没有作过战的名义上的胜利者进入德国。我感到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然而是应该加以注意的。法国必须：第一，负起在我军后方的法国维持和平和秩序的责任；第二，再迟一些时候可以协助管辖德国的若干地区。因此，拥有一支有准备的军队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对法国来说是重要的。

4.在第二点上，他们极其强烈地坚持不是简单地作为在英国或盟国司令部属下的一个参与者，而是作为法军司令部指挥下的占领军参与占领德国。我对此表示同情，并且坚持请他们研究便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军队的组织形式。这支军队应当在各方面大大不同于像师这样一种形式的军队。因为像师这样的形式的军队是在粉碎经过现代战争锻炼的军队的抵抗时所需要的。这一论证已使他们留下了印象。虽然如此，他们还坚持自己的意见。

5.我看到路透社从巴黎发出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无疑是非正式的。该消息说，关于给予法国某些地区（鲁尔区、莱因省等等）的问题已经商妥了；这些地区将由法军卫戍部队进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显然，这样的问题除非经过同总统和你的协议，是不可能决定的。关于这方面，我同戴高乐所谈的一切可以归结为：我们将把德国划分为俄国、英国和美国的范围；简言之，东部归俄国，北部归英国，而南部归美国。其次，在谈到属于英国政府部分的时候，我说，我们当然宁愿让法国负责它有可能负责的那一部分。然而这一切应该由各盟国间的会议来决定。我已经致电总统，告诉他这样的精神。我们不企图作什么最后的决定，或者签订肯定的协定。

6.但是显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比各国的总司令部更高一级的人来作出决定。如果没有那样的决定，各国总司令部将不可能作出任何指示。看来，这更加加强了我们三国和法国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会议的必要性。在这样的场合，法国人将参与讨论某些问题，而不参与讨论其他的一些问题。

7.一般说来，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个业已组织起来、有着广泛基础和迅速获得巩固的政府打交道。因此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危急的时刻作出任何足以削弱这个政府的事，那是极不明智的。我深感这个政府是稳定的。我想我们能放心地使它对我们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44年11月16日

第35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1月20日

谢谢你告诉我你和戴高乐会谈的情况。我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你的来电。只要总统也同意，我对你建议我们三人同法国人会晤一事并没有异议，但是首先有必要在我们三人间确定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戴高乐将军最近表示，他希望前来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已答复表示同意。预计法国人将于本月底到达莫斯科。法国人还没有具体提出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不论怎样，在我们同戴高乐将军会谈之后，我一定会把情况告诉你。

1944 年 11 月 20 日

第 35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1 月 24 日

萧巴希奇博士在稍事停留以后，已于今天动身离开莫斯科。我曾同他以及同民族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和南斯拉夫大使西米奇谈过话。在谈话中明确了：铁托元帅和萧巴希奇达成的关于组织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协议，对南斯拉夫将是有利的。因此，不应该拖延实现这个协定。你应该已经获悉这一防议的内容，并且如我所希望的，同意这一协议，特别是在同萧巴希奇谈过之后。他如今正在返回伦敦。现在，正当贝尔格莱德从德寇手中获得解放，而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特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准备联合起来共同工作的时候，我们两国政府支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这种联合的努力将是对德寇的新的打击，并且会在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

1944 年 11 月 24 日

第 35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1 月 25 日

1.11 月 20 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我很高兴戴高乐即将前去见你，我希望你们将一起谈谈全面的问题。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西方集团的说法。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首先我信赖我们两国的同盟条约和同美国的密切合作，它们将成为未来的世界组织的支柱，以保证并且促使这个遭受苦难的世界得到和平。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机构成立之后，并且在这个机构之下，才能着手在欧洲作出各种安排以增进友谊。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决不会对你保有任何秘密，因为我们确信你同样会告诉我们你的感觉和需要。

2.西线的战斗很艰苦，道路泥泞得可怕。主要冲突发生在亚琛—科隆线上。现在优势还没有肯定在于我方，虽然艾森豪威尔还有大量的预备部队可以投入战斗。在西北方面，蒙哥马利的部队正面向北方，把德国人逼退到荷兰麦司河线。这条河使我们在这个战线上可以节省兵力。在东面，我们正在取得虽然缓慢但却稳当的进展，并且连续不断地在同敌人交战。必须赞扬美国人攻克麦茨和把敌军赶回莱因河的光辉胜利。在南方，法国人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特别是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已经到达莱因河，并且占领了斯特拉斯堡。这些年方 18 到 21 岁的年轻的法国士兵证明了无愧于洗净法国国土所蒙受的耻辱这一光荣的任务。我很钦佩德拉特尔·塔西尼将军。戴高乐和我曾经去过那里，想要从一个良好的观察点观看这次战役的发动。但是由于夜间下了一英尺深的雪，一切都推迟了 3 天。

3.一个星期或 10 天之后就可能估计出德军在莱因河以西是否将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果德军确已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我们就可以不顾天气的变化继续前进。否则，在严冬期间，战事可能会有某些间隙。在这以后，再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应该可以粉碎德国人在西线的有组织的抵抗了。

4.你是否认为今冬是个严寒的冬天，而且这对你的战略是否有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你最近所发表的演说。要是发生什么麻烦的问题，请务必私下通知我，以便我们能够把它消除，并且继续最紧地扼住纳粹统治的咽喉。

1944 年 11 月 25 日

第 35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4 年 11 月 29 日发出

在你生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向你祝贺。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我向你表示友好的祝愿，祝你身体健康，精神焕发，长命百岁。

第 35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1 月 30 日

1.海军部要我请求你给予不大的但是重要的帮助。苏联海军曾通知海军部说：在塔林俘获的潜水艇上发现两枚德国“T-5”型感音鱼雷。这是唯一已知的根据音响原理进行控制的一种鱼雷。它不仅对商船，并且对护送的军舰都是极有效的。虽然这种鱼雷尚未大规模应用，但是已经利用它击沉或击伤了 24 艘英国护航舰，其中 5 艘是属于被派到俄国北部去的运输舰队的。

2.我们的专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仪器来保证在某些场合可以不受这种鱼雷的袭击。这种仪器已装置在现时苏联海军舰队正在使用的英国驱逐舰上。然而研究“T-5”型鱼雷的性能对寻觅对策是极为宝贵的。阿契尔将军请求苏联海军当局立即将其中一枚提供英国研究和试验。他们通知我，苏联海军当局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而是仍在考虑这个问题。

3.我相信，如果我提醒你，在以往好几个月中，敌人已准备好利用在水下航速特别快的新潜水艇开始新的大规模潜水战，那末你会认为苏联海军能够给予皇家海军这样大的帮助，立即将一枚鱼雷送给英国。上面所说的那种潜水战将为调运美国军队和经过大洋给两个战场运送给养增加各种困难。我们认为，获得一枚“T-5”型鱼雷的事情是十分急迫的。因此，我们准备派遣一架英国飞机到你指定的任何你认为方便的地方去运载那枚

鱼雷。

4.由于德寇可能将这种鱼雷的蓝图交给日本海军，所以我请求你惠予注意，这件事已成为更重要了。海军部将乐于把研究和试验这个鱼雷的全部结果，以及以后设计出来的任何新的防御性器械供给苏联海军。

1944年11月30日

第35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4年12月1日

1.对于11月7日在南斯拉夫发生的，由于盟国空军的失误而使宝贵的俄国人的生命遭到牺牲的不幸事件，我们深感遗憾。为避免在目前情况下可能重复发生类似的事件，联军参谋部部已限制英美军队从萨拉耶窝东南经普利列泼到南（斯拉夫）希（腊）边界一线以南地区的广阔战场上的活动。这种限制事实上冻结了我们迄今所采取旳轰击德寇从南斯拉夫撤退的通路的有效行动，而这无疑是让大量德寇毫无损伤地向北方逃窜。这样的情况只是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

2.为了使所有的盟军都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力量来对付德寇，同时减少发生不幸事件的可能，驻莫斯科的英美军事代表团正同贵国参谋部讨论重新划定将来可能遭受空袭的地区的界线。这条新的界线将沿着容易识别的地面标记而蜿延，以保证俄军的安全。同时这条界线将使我们可能对敌人的交通线和他们撤退的道路进行空袭。

3.我相信，你是不愿限制我们轰击正在撤退的敌人的行动的，只要这种行动没有误击友军的危险。同时我希望你指示你的参谋部同意这条作为临时性措施的新界线。我们的人向我担保，这条新界线足以保证俄军的安全。

4.关于保证在巴尔干的英美军队和俄国军队间联系的更经常和完满的措施问题，我将另拍电报给你。如果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而同

时避免可能误击友军，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1944 年 12 月 1 日

第 35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1 日

关于西方集团，我暂时还很少有所闻。报纸上的报道常常相互矛盾。如你答应将这个问题的发展情况通知我，我将感谢你。同样，我也准备这样做。

我满怀兴趣地得悉你关于西战场战斗的消息。真的，现在的天气正严重地妨碍着战斗的发展。

我决不会忘记利用你的好心的建议，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我就通知你。

1944 年 12 月 1 日

第 35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2 日

在我生日的时候，收到你极亲切的来电，特向你热烈地致谢。去年，当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和美国总统同我在一起。从那时起，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可以期望，如果我们最迅速、最热情和有目的地继续努力，明年希特勒主义就要被彻底消灭。我特别欢迎你在电文中所表示的希望，愿我们的友谊和私人关系在将来，不仅在战斗情况极度危急的时候，并且在解决和平问题的时候，会继续保持下去。

1944 年 12 月 2 日

第 36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2 日

根据一切材料，戴高乐和他朋友们（他们已到达苏联）将会提出两个问题。

1.签订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

我们很难反对。可是我希望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将你的意见示知。

2.戴高乐可能会提出改变法国东部边界，把法国边界扩张到莱因河左岸的问题。同时，据我们知道，有一个关于成立在国际管制下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草案。可能还规定法国参加这一管制。这样一来，法国人关于把边界推到莱因河的建议将同在国际管制下成立莱因州的草案进行竞争。

请你也对这一问题提供意见。

我已拍给总统同样的电报。

1944 年 12 月 2 日

第 36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2 日

1.我请你亲自阅读附去的致迪安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的电报，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如果希特勒的队伍沿着那些本来我们能够投掷大量炸弹的山路逃掉，那就不好了。所以请你放宽我们可以轰炸的地区的界线。新的界线将提供可能对撤退着的敌军进行强有力的甚至毁灭性的轰击。现在，请你给我这个可能。

2.然而，最好还是在我们的前线参谋部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友谊的联系，使得正在逃窜的敌军的任何部队都将遭到我们两方面有力的打击。让我们打击敌人吧，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希望你们方面的人会懂得，我们应该根据附去的电报的第三点和第四点中所叙述的情况进一步行动。为节省时间起见，我希望你在给我或别人复电之前先向各有关机关发出命令或批复。

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年12月2日

第36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12月3日

1.我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会晤了。他向我解释了辞职的理由。简言之，情况是这样：他无法指望内阁中有势力集团方面支持他的政策，所以现阶段不能在不久以前我们莫斯科谈判的基础上签订协定。

2.现在，在试图组成另一个波兰政府。米柯瓦依契克先生、罗梅尔先生和拉钦斯基大使拒绝参加这个政府。总理的撤换并没有触及国家间的正式关系。英王陛下政府关于恢复一个强大、独立而又同俄国友好的波兰的愿望仍然不变。我们不得不同波兰政府在一些实际问题方面打交道，特别是关于我们作战指挥部辖属的由8万名以上优秀战士组成的大量波兰军队的管理问题。现在这些军队对联合国家在意大利、荷兰和其他地方的战斗有着显着的贡献。因此，我们对任何新的波兰政府的态度应该是合乎体统的。当然，同时也应当是冷静的。我们同这样的政府的关系自然不能那样亲近和充满信任，如像我们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或他的前任、已故的西科尔斯基将军那样。我们将尽力保证使这个政府的活动不致对盟国的团结造成威胁。

3.有人设想，类似的政府即使可能组成的话，也将支特不了多久。实

际上，在我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谈话后，我认为，如果看到他重新执政，并且威望日益增长，同时又具有执行我们在莫斯科讨论过的计划所必需的权力，那是并不奇怪的。如果考虑到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曾以自己的辞职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是维护波俄友好关系的，那末这样的结局就会更加有利。

4.因此，我希望你同意这一点，即应该运用我们各自对这里的和在卢布村的波兰人的影响，来制止足以增加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任何措施。因为这种紧张会使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承担任务一事发生困难。他的情绪是乐观的。他首先极愿意看到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没有发现任何理由足以说明他不能作为一个活动家来摆脱这个危机，这样的活动家对复兴波兰来说是比过去更需要了。

1944 年 12 月 3 日

第 36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3 日

关于我们对南斯拉夫的共同政策的协议，我现在给你一份电报副本。我深感遗憾，这份电报的正本我不得不送交铁托元帅。我很愿意知道你的意见。

1944 年 12 月 3 日

第 364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3 日

同戴高乐将军的会晤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就法苏关系中的各项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会谈过程中，正如我所预料的，戴高乐将军坚持提

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法国以莱因河为界的问题和缔结一项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的问题。

关于法国以莱因河为界的问题，我向他说明了以下的看法：没有得到我们各主要盟国的谅解和协议，这个问题是无法决定的，盟军还正在法国领土上对德国人进行解放战争。我还强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建议缔结法苏互助条约的问题，我指出有必要从各方面来对这个问题作一研究，以及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条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法国方面应由谁来批准这个条约。因此，法国人还必须提出一些说明，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

在通知你以上情况时，希望你复电对这些问题提出意见，如果你能来电，我将甚为感谢。

我也给总统拍了内容相同的电报。

向你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12 月 3 日

第 36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5 日

1. 关于戴高乐访苏和他将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们毫不反对缔结一项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相反的，英王陛下政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有好处的，它将在我们大家之间增加一条纽带。事实上我们还想到，也许最好由我们三国缔结一项三边条约，把现有的英苏条约的内容包括在内加上某些必要的改进。这样我们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就会完全相同，并且联系在一起。请告诉我你对这一想法是否感到兴趣，我希望你会对它感到兴趣。当然我们双方都应该把这件事通知美国。

2.把法国的东部边界改划到莱因河左岸的问题，或者另一种安排即成立国际共管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以及其他的安排，都应当等到和平会议时再解决。但是在三国政府首脑会晤时，我们不妨对这些问题作出比现在远为肯定的结论。如你所了解的，总统不希望戴高乐也参加我们三国的会议。我希望他的意见能够修改一下，让戴高乐在迟些时候当讨论到特别有关法国的各项决定时再参加会议。

3.同时，可否让驻伦敦的欧洲事务谘询委员会（法国也是委员会的一员）来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并不在任何方面对政府首脑有所约束。

4.我随时把情况通知了美国总统。

1944 年 12 月 5 日

第 36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7 日

关于法苏条约和法国在莱因河方面的国界的复电已经收到了。谢谢你的意见。

收到你的复电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法国人开始了关于条约的谈判。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同意你关于签订一项较英苏条约更为完善的英法苏三边条约的提议。我们已向戴高乐提议签订这样的三边条约。可是尚未获得答复。

我拖延了对你其余来电的答复。希望很快能作复。

1944 年 12 月 7 日

第 36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8 日

关于米柯瓦依契克先生的来电收到了。

在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最后一次在莫斯科会晤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已经弄清了他没有能力来帮助解决波兰问题。相反，我们倒是查清楚了他所起的消极作用。业已查明，他同波兰民族委员会的谈判只是一种掩饰，以便有些人可以站在他的背后进行反对波兰境内的苏联军官和一般苏联人的恐怖罪恶活动。我们不能容许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容许受波兰流亡者指使的恐怖分子杀害我们在波兰的人和进行反对正在解放着波兰的苏联军队的罪恶活动。我们认为这些人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同盟者。我们从在波兰境内逮捕的波兰流亡者的代理人手中缴获的他们同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来往的无线电报，不仅揭露了他们的血腥计划，而且还令人怀疑到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本人和他的同伙们。

波兰流亡政府部长的重新调整，现在已使人不再感到浓厚的兴趣。这是换汤不换药，老是把那些脱离民族基础和同波兰人民没有联系的人换来换去。同时，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巩固波兰领土上的民族民主组织方面，在为波兰农民的利益实际施行土地改革方面和在扩大波兰军队的组织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成绩。因此它在波兰居民中享有巨大的威信。

我认为，在我们的任务是支持在卢布林的波兰民族委员会和支持一切愿意同它合作以及能够同它共事的人。如果估计到加速粉碎德寇的任务，那末这对盟国是特别重要的。

1944 年 12 月 8 日

第 36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8 日

12 月 2 日你发出的两封电报都已收到了。当然，我们应该保证

对在南斯拉夫的德寇的行动完全一致和有效。有人向我报告了11月29日收到的联合参谋部关于建立苏联和盟国空军在南斯拉夫行动的新界线的提议。你大概已经知道：早在12月3日我们的总参谋部已经同意沿着萨拉耶窝—莫克罗—萨柯拉茨—巴勃隆—乌伐茨—普利耶波列—谢尼察—彼奇，经过普利列泼到南斯拉夫南部边界建立这条界线，同时彼奇和普利列泼留在苏联空军行动的范围内；往下，沿保加利亚南部边界建立这条界线。我相信这条界线是符合你的愿望的。

希望其余的问题我们的军事代表能够自己解决。

1944年12月8日

第36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12月10日

1.极感谢你12月8日的两封电报，我正在仔细研究它们。我们应该保证不要使我们经常的、忠诚的关系在一些次要事件的发展不很顺利的情况下受到损害。关于波兰问题，在我同外交大臣协商以后，将电告你。

2.我接到通知说，我们的军事专家正在制定轰炸线。几天后我将再打电报给你。获悉你的军队在南方获得成就，特致最良好的祝贺。

1944年12月10日

第37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年12月10日

你关于最好签订英法苏互助条约的意见，我已通知了戴高乐将军，并且向他表示我赞成你的建议。可是戴高乐将军坚持签订法苏条约，

并且主张在下一阶段再签订三边条约，说是这个问题需要准备。这时收到了总统的电报。他在电报中通知说，他不反对法苏条约。结果我们就商谈了签订条约的问题。今天条约已经签字。条约将在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之后公布。

我认为戴高乐这次访问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它不仅将促进法苏关系的巩固，并且是对盟国共同事业的一个贡献。

1944 年 12 月 10 日

第 37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14 日

1.来电和你给铁托元帅的电文的抄件都已经收到。

关于你给铁托元帅的电报中所涉及的问题，我希望先知道铁托元帅本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见，然后再发表我的意见。我重申你的声明：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在莫斯科已经商定尽可能对南斯拉夫实行共同的政策。我希望你能同铁托元帅商妥，并且会支持他和萧巴希奇先生所达成的协议。

2.关于德国“T-5”型鱼雷的来电收到了。苏联海军确曾俘获两枚德国感音鱼雷。现在我们的专家正在进行研究。可惜我们现在已不可能将上述鱼雷中的一枚送到英国，因为两枚鱼雷都因爆炸而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对鱼雷进行研究和试验，不得不用一枚鱼雷的相当部分来补充另一枚鱼雷遭到破坏的部分。否则对它进行研究和试验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有两个可能：或者把研究鱼雷所得到的图样和说明立即交给英国军事代表团，而在研究和试验结束后把鱼雷交给英国海军部支配；或者英国专家立即来苏联，就地仔细地研究鱼雷，画下它的图样。对两个可能我们都作好了准备。

1944 年 12 月 14 日

第 37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19 日

很感谢你 14 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我还没有收到铁托元帅对我最后一封电报的复电。我现在通知你：我刚才收到了。

萧巴希奇博士告诉我，你对他和同他在一起的铁托元帅的代表暗示说，苏联和英国政府对南斯拉夫实行共同的政策。我相信这对保证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获得满意的协议是有很大帮助的。

艾登先生会晤了萧巴希奇博士，他向艾登解释了他同铁托元帅达成的协议。如果把这个协议和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是铁托元帅在萧巴希奇博士从莫斯科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同意的）合在一起来看，我以为它为建立新的联邦式的南斯拉夫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基础，在那里所有忠诚的南斯拉夫人都能够起自己的作用。我相信你会同意让整个南斯拉夫人民在一旦条件许可时具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关于君主制度和新的联邦宪法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只要南斯拉夫人具有良好的意志和忠诚，铁托和萧巴希奇之间的协议，看来已经足以保证有可能这样自由地决定问题。艾登先生和我本星期要会晤南斯拉夫国王，以便同他讨论这一切问题。我当然会将结果告诉你。

我同时正在就这件事向美国政府进行解释，我希望能说服它支持我们的方针。

1944 年 12 月 19 日

第 37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 年 12 月 19 日

昨天晚上我第二次观看了你送给我的影片“库图佐夫”[①]。看头一遍的时候我就很喜爱这部片子，但是由于全是俄语对白，没有能够了解每个

情节的确切意义。昨天晚上我看时带有英文字幕，整个故事就都能看懂了，我应当告诉你，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我所看过的最出色的影片之一。从来没有见过两种意志力的矛盾表现得这样明确。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这样有效地教育过指挥官和士兵具有赤胆忠心的重要性。从来不曾通过这种媒介把俄国士兵和俄罗斯民族这样光荣地呈显给英国人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摄影艺术运用得这样好。

我将很感谢你，如果你认为可以私下把我的钦佩和谢意转达给为创作这部充满高昂士气的艺术片尽过力的人们。同时我也向你表示祝贺。

当想到在那一场生死决斗中我们两国也是站在一起的，正如在这场30年战争中一样，我感到很高兴。我想你一定没有把这部影片演给戴高乐看，正如当他来这里同我们缔结一项类似法苏条约和英苏条约的条约的时候，我也不会把“汉密尔顿夫人”②这部影片演给他看一样。

此致敬礼。

1944年12月19日

————————————

① 库图佐夫，拿破仑于1812年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先后指挥博罗迪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以一时退出莫斯科为代价，最终大胜法军。——本书制作者注

② 指记述1805年战胜法国舰队的英国纳尔逊将军生平和活动的英国影片。——原注

第37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4年12月20日

在你生日的时候，特向你致最诚挚的祝贺。我相信你的生命对全世界的未来以及对不断加强联系的我们两国的纽带都是极为珍贵的。因此，在你生日的时候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绝不是一种美丽的辞藻。

1944年12月20日

第37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4年12月23日

复你关于德国鱼雷的来电。我通知你，对于你不能立即把一枚鱼雷送到英国一事，我是完全谅解的。我宁愿选择你的两个建议中的第二个，即派英国专家到苏联来就地研究鱼雷。我接到通知说，苏联海军打算在1月初进行试验。海军部认为，如果海军部的军官搭乘下一次护航舰队出发，那是最方便的；这样就能及时赶上试验。

我很感激你对此事的帮助。我正请海军部通过英国代表团商谈各项细节。

1944年12月23日

第37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4年12月24日

我不认为西战场的局势恶劣。然而，艾森豪威尔因为不知道你方的计划而不能决定他的任务，却是极明显的。我已同罗斯福总统交换了意见，他建议派一个完全内行的参谋部的军官去你处，目的是了解你的意图。我们为了领导，必须知道你的意图。知道你方行动的基本轮廓和行动日期，对我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信俄国军队是会采取它所应该采取的攻势的，因此我们过去从来未曾向你提过任何问题；而现在我们还是相信答复将是令人安心的。然而我们认为，从保密的观点出发，你最好是告诉绝对可靠的军官，而不用任何别的方式通知。

1944年12月24日

第 37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 年 12 月 25 日

在我生日的时候，承蒙祝贺并致良好的愿望，特向你致谢。你的友好的表示，永远是我所极为珍视的。

1944 年 12 月 25 日

第 37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4 年 12 月 25 日

我当然欢迎签订英法条约。

我很珍视你对影片“库图佐夫”的赞许，并且决不会忘记把你的评价转告影片的制作者们。

向你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4 年 12 月 25 日

第 37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派一个适当的军官来莫斯科的来电，已经收到。

我已经通知总统，我同意他的建议，并且准备同上述军官交换情报。

1944 年 12 月 25 日

第 38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27 日

收到你的来电，其中通知说你宁愿派英国专家到苏联来就地研究德国鱼雷。为此，我已给有关的苏军当局发出必要的指示。

1944 年 12 月 27 日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第 38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3 日

1. 当然，你已经知道，卢布林的波兰全国代表会议已经公布了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国民政府的决定。你也完全知道我们同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关系，我们认为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国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权威，而且就是波兰人民的意志的合法代表。波兰民族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适时的，特别是因为米柯瓦依契克已经退出波兰流亡政府，因此流亡政府也已经不象一个政府的样子了。我认为波兰不能没有政府。因此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承认波兰临时政府。

我感到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你，使你相信苏联政府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我相信，事态的发展会证明，我们承认卢布林的波兰政府是符合盟国总的事业的利益的，并且有助于加速德国的崩溃。

附上我关于波兰问题给美国总统的两封电报，供你参考。

2. 我知道总统已经征得你的同意，在本月底或 2 月初安排我们三人的会谈。我将很乐意在我国国土上会见你和总统，并且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获得成功。

顺致对新年的良好愿望，祝你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1945 年 1 月 3 日

附件一　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4 年 12 月 27 日

12 月 20 日收到了你关于波兰事务的来电。

至于斯退丁纽斯先生 12 月 18 日的声明，我愿在我们会晤时再加以评论。不论怎样，波兰局势的发展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上述声明所反映的情况了。

米柯瓦依契克先生上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所发生的几件事，特别是我们在波兰逮捕的恐怖分子——流亡政府的秘密代理人——身上所搜出的同米柯瓦依契克政府的无线电通信，无可置疑地表明，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同波兰全国委员会的会谈起了掩护某些人的作用，他们背着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对在波兰的苏军官兵进行着恐怖活动。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情况，即被波兰流亡分子所唆使的恐怖分子暗杀着在波兰的红军官兵，对解放波兰的苏军进行罪恶的反对，并且直接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和敌人结成了同盟。阿尔契赛乌斯基的接替米柯瓦依契克以及流亡政府部长的总的调换，使情况更恶化了，其结果是波兰同流亡政府之间形成了很深的裂痕。

在此期间，全国委员会在巩固波兰国家和波兰土地上的政权机构，在壮大和加强波兰陆军，和在实行一系列重要的政府措施，首先是对农民有利的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展。这些发展导致了波兰民主力量的巩固，而且使全国委员会在波兰人民和海外广大的波兰人中间明显地提高了威信。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注意支持全国委员会和所有那些愿意和有力量与之合作的人们，这对盟国和对完成我们共同的任务，即加速希特勒德国的溃灭，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对于承担着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波兰的全部重担的苏联说来，在目前的愦况下，对波兰的关系意味着同这样一个权力机关的日常的、密切的和友好的关系，这

个权力机关是波兰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立的，它已经壮大起来，而且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正同红军一起打击着德国人。我必须坦白地说，鉴于以上的理由，一旦波兰全国解放委员会成为波兰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将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拖延给予它以承认。应该记得，苏联比之任何其他国家，更关心于加强一个亲盟国的、民主的波兰，这不但因为苏联承担着解放波兰的主要负担，而且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波兰问题同苏联的安全是不可分的。我还要指出，红军在波兰击败德国人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波兰有一个平静和稳定的后方，对这一点波兰全国委员会是充分了解的，而流亡政府及其秘密代理人则用他们的恐怖行动制造着在红军后方引起内战的危险，并且抵销着红军的胜利。

另一方面，在波兰现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根据要继续支持流亡政府，因为流亡政府已经完全辜负了国内人民的信任，而且威胁着在红军后方制造内战，从而损害着我们击败德国人的共同利益。我认为这样做是自然的、公平的而且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利的，即由各盟国政府协议，作为第一步，现在就同全国委员会互派代表，以便日后在它宣布自己为波兰临时政府时承认它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如果不这样做，我担心波兰人民对盟国的信任将会减退。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波兰人有根据来指责我们为了在伦敦的一小撮流亡分子而牺牲波兰的利益。

1944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二 **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来电已经收到。

很可惜我没有能够说服你，使你认识到苏联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

立场的正确性。但我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你认识到，全国委员会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对盟国，特别是对红军，过去一向而且现在继续提供着重大的帮助，而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则正瓦解着这一斗争，从而帮助着德国人。

我自然很了解你要苏联推迟一个月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情况使我无力满足你的愿望。这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 12 月 27 日回答波兰人的一个相应的问题时，已经宣布当波兰临时政府成立时它将立刻给予承认。这一情况使我无力满足你的愿望。

请允许我向你祝贺新年，并祝你健康和成功。

1945 年 1 月 1 日

第 38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1 月 5 日

1. 关于你 1945 年 1 月 3 日发来的私人密电。

感谢你给我附来两封关于波兰问题致美国总统的电报。自然，我和战时内阁的同事们因一些事件的变动感到烦恼。我完全明白，最好是我们三人在一起会晤，并且讨论这一切事件；不仅是把它们看作孤立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有关战争和向和平过渡的总的国际形势来讨论。现时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你是知道的）仍然不变。

2. 我正在等待着这一极重要的会晤。我感到满意的是，美国总统准备作这次遥远的旅行。我们已经商定，如果你同意的话，就选择“阿尔戈航海者”作为代号。并且我希望你方从事各项准备措施的负责人员在交换情况时使用这一代号。

3. 我在分别访问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谋部和蒙哥马利元帅参谋部之后刚回来。比利时的战斗很艰巨；然而，大家认为，我们掌握着主动。德寇在阿尔萨斯发动的牵制性进攻也使法国人遭到困难，并且有牵制美军的趋

势。我还是持以前的意见，即盟军（包括空军）的数量和武器一定会使冯·伦斯泰德对自己的大胆的组织得很好的切断我们战线和尽可能占领安特卫普港的计划感到惋惜。现在安特卫普港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4.承你衷心地祝贺新年，我同样向你表示祝贺。愿新年会减轻我们为之服务的两大民族正在经历着的苦难，并且奠定由我们共同保证的持久和平。

1945年1月5日

第38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6日

西线的战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出重大的决定。你从自己的经验中一定知道，暂时失去主动权而不得不防守一条很长的战线时，这种处境是多么令人焦急。艾森豪威尔非常希望而且迫切需要扼要地了解你所计划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显然影响到他和我们所将采取的一切重大决定。昨晚接到报告说，我们的空军元帅泰德因天气受困在开罗。他的旅程已经耽误了很久，但是过错并不在你。如果他还没有到达你那里，请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指望1月份苏军会在维斯杜拉河战线或者在别处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附以其他任何你愿意说明的细节。除了陆军元帅勃鲁克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外，我将不把这一绝密的情报告诉任何人，而且只是在保守绝对机密的条件下通知他们两位。我认为这件事是迫切的。

1945年1月6日

第38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7日

1945年1月6日的来电已于1月7日晚收到。

可惜空军元帅泰德尚未到达莫斯科。

利用我们在空军和炮兵方面对德军的优势，甚为重要。为此目的，就需要有利于飞行的晴朗天气和没有妨碍炮兵瞄准的地面雾气。我们正在准备进攻，可是现在的天气不利。然而，鉴于我们的盟军在西战场上的局势，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且决定，不问天气怎样，至迟在1月下半月内在整个中央战线上向德寇展开广泛的进攻。请你不必怀疑，为协助我们的光荣的盟军，我们将一定做到我们所可能做到的一切。

1945年1月7日

第38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9日

1.我深深感谢你的令人兴奋的来电。我已经把它转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人过目。祝你这次光荣的进攻一切顺利。

2.西线的战斗进行得不太坏。有可能把突出阵地上的德寇击退，并且使他们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次战斗主要是由美国人打的，他们打得很出色，但是损失也很重。

我们和美国人正在把一切可能的力量投入战斗。 你告诉我的消息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会是很大的鼓舞，因为这将使他放心，德国的增援将不得不分用在两条激烈的战线上。据负责的将军们报告，西线的战斗将继续进行。

1945年1月9日

第38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1月10日

我同意你在1月5日的来电中所提议的用“阿尔戈航海者”作为有关会晤的全部通知的代号。

根据总统向我提出的建议，请你同意把雅尔塔作为会晤的地点；会晤的日期是2月2日。

1945年1月10日

第38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11日

1.艾登先生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竭力尝试说服彼得国王。他是一个任性的青年。他认为，铁托—萧巴希奇协议事实上就是要他退位。他现在没有同我们商量，而且是在违背我们的忠告的情况下发表了他的声明。他认为，如果他置身于南斯拉夫最近几年内所将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外，他总有一天会出头的。他对你是很钦佩的，依我看比对我们任何人更钦佩。

2.我现在建议，我们使铁托—萧巴希奇协议生效，并且干脆撇开国王彼得第二。他的声明是在没有得到任何首相认可的情况下作出的，而因为他自命为立宪君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明不能算作国家文件。这意味着我们赞成承认以摄政王为元首的铁托元帅的政府作为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并且和它互派大使。我希望你会认为，这是当人民尚不能自由地和客观地表达意见的时候，摆脱困境的好办法。

3.但是，在我们对这一问题最后表示意见之前，我们应该将此事通知美国。因为，如果它得不到通知，是会见怪的。我们当然没有任何义务接受美国的解决方案。在我打这个电报给你之前，只告诉了铁托元帅，请他等待我在同苏联政府协商后给他的通知，别的什么也没有告诉他。

1945年1月11日

第38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1月12日

复你1月10日的来电。

O.K.，并致良好的愿望。

1945年1月12日

第389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1月13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收到了。谢谢你的通知。

同意你关于实现铁托—萧巴希奇协议的建议。因而，我们一定要预防这方面可能发生的纠纷。我希望你已经通知美国总统。

1945年1月13日

第39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14日

1.1月11日我给你的电报发出后，发生了一件关于南斯拉夫的新事件。这就是萧巴希奇先生根据彼得国王原则上接受协议的情况，表示希望弄明确，有没有办法可以不提到彼得国王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应该给萧巴希奇先生时间，使他弄清这件事，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

2.彼得国王接受了艾登先生的劝告，至少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这证明了他并不反对摄政制度本身，而只是反对建议中的摄政制度的那种形式。这意味着萧巴希奇先生和国王之间的分歧意见可能不是不可调和的。

3.我将尽快把结果通知你。

1945年1月14日

第 391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1 月 15 日

今天曾同泰德元帅和随从他的将军们谈了话。我以为相互之间已经充分地交换了情报。这一点泰德元帅将会向你报告。应该说，泰德元帅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尽管天气不好，苏军的进攻正在按原定计划展开。从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的整个中央战线的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德寇正在疯狂地抵抗，然而仍被迫退却。我希望这一形势将有助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拟定的西战场的进攻，并将加速这一进攻。

1945 年 1 月 15 日

第 39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16 日

1 月 14 日关于南斯拉夫的来电收到了。

应该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迟实现我上次电报中所提到的我们的决定。在我看来，不应该错过时机，不应该使整个事情遭受各种的拖延。

1945 年 1 月 16 日

第 39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1 月 16 日

关于南斯拉夫。

你1月13日发出的对我1月11日电报的复电收到了，甚为感谢。1月14日，我又拍给你一封电报。我对这封电报作如下的补充。

根据我们的建议，彼得国王正在同萧巴希奇博士进行讨论，看是否可能设法使他接受铁托—萧巴希奇协议。

我想，我们应该稍微多给他们一点时间，使他们得以谈判成功。

1945年1月16日

第39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1月17日收到

尊敬的斯大林：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不久以前给我送来一封佛朗哥将军的信。

信中说到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我已经给佛朗哥复信，复信的辞句是经过战时内阁的仔细斟酌的，并且已得到内阁的一致同意。我的同事们和我想，你将高兴看到这封信，特别是因为信中还提到英苏友好问题。所以我特地把来信和复信送给你一阅。

你的忠实的

温斯顿·斯·丘吉尔

第39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17日

你的来电收到了，很感谢你。我也很高兴空军元帅泰德给了你这样良好的印象。

当贵国在东战场开始强大攻势的时候，谨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你深表谢意，并致祝贺。

你现在无疑已经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计划以及该计划的实施为冯·

伦斯泰德先发制人的进攻所阻滞的情形。我相信，我们全线的战斗将不会间断。蒙哥马利元帅统率的英国第21集团军今天已在罗尔蒙德以南的地区开始进攻了。

1945年1月17日

第39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1月17日

感谢你1月16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

虽然如此，如果你同意我们在几天内不采取什么措施，那我将很高兴。

萧巴希奇博士和他的内阁正在尽一切可能促使彼得国王意识到宪法上规定的他应尽的责任，而这样就能基本上保持原来的协议。如果他能成功，就能使我们（我相信也使美国）的事情好办些。关于要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一节，我是同你一致的，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做。

1945年1月17日

第39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1月21日

我建议在举行“阿尔戈航海者”时不让新闻记者到场，可是我们每人可以带上至多三、四位穿军装的摄影师，以便照相和拍摄电影。照片和电影应该在我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发表。请通知我，你是否同意。

当然，将发表一个或几个大家同意的例行公报。

我已拍给罗斯福总统同样的电报。

1945年1月21日

第 39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23 日

1 月 21 日的来电收到了。

同意你的提议，在举行“阿尔戈航海者”时不让新闻记者到场。不反对每人带几名摄影师。

我已将同样的电报拍给罗斯福总统，答复他的询问。

1945 年 1 月 23 日

第 39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23 日

彼得国王事先没有把他的意图通知我们，竟在昨天晚上把萧巴希奇撤职，并且解散了他的政府。

我们通知萧巴希奇，彼得国王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关心着实现铁托—萧巴希奇协议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因此，我们准备把他和他的政府，迁移到贝尔格莱德。

我提议：三大国决定现在就实现铁托—萧巴希奇协议；并通知铁托，如果他同萧巴希奇及其政府商妥实现协议，三大国就承认按照协议成立的联合政府，并向摄政院派遣大使。我还提议：在这个联合政府组成以前，不承认仅由彼得国王或铁托元帅单方面组成的任何政府。

我同时把这一建议送交美国政府，并且希望你同意这一建议。一得到美国人的反应，我就会通知你。这样，我们就能够就同时行动的问题商得一致意见。

1945 年 1 月 23 日

第 40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25 日

1 月 23 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收到了。

我同意必须实现铁托—萧巴希奇协议，不能再予拖延，正如他们二人间所商妥的那样。我并且同意三大国应该承认联合政府，我认为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执行这个计划。

1945 年 1 月 25 日

第 40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1 月 27 日

我们想，如果萧巴希奇博士不能同国王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末他和他的政府，不管他是否被撤职，都应该回到贝尔格莱德（尽可能在下星期就去），并同铁托元帅建立摄政机构；在摄政机构的监督下，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名义实现铁托—萧巴希奇协议，不管国王可能说些什么。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能讨论今后的一切事情和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正在努力，设法使美国政府同意这一计划。或许你愿意亲自同美国人商谈。

贵国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光荣胜利，以及在打击敌人时显示出来的强大威力，令人神往。请接受我们最热烈的谢意，并祝贺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1945 年 1 月 27 日

第 40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绝密私人信

1945 年 2 月 1 日

因为总统在2月2日以前不会到马耳他岛，我们不能在2月3日以前抵达雅尔塔。然而，当我一知道更确切的时间后，我将再给你去电。当然，我们要看天气而定。

我们将乘各自的飞机前往，但是飞机是在一起飞的。

期待着同你会晤。

1945年2月1日

第40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2月1日

你的电报收到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抵达会晤地点。

1945年2月1日

第40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秘密特急信

1945年2月3日

预定抵达萨基的时间为2月3日莫斯科时间12点钟。我们着陆以前，在飞机上进早餐。

我们将从萨基乘汽车到雅尔塔。

1945年2月3日

[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

第40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密信

1945年2月9日

尊敬的斯大林：

随信附去下列材料：

1.从伦敦收到的关于西战场的最后战讯；

2.根据最近材料编写的阐述希腊局势的备忘录。

我希望这些材料能使你感到兴趣。

你的忠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

1945年2月9日于伏龙促夫宫

第40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2月18日收到

英国代表团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承蒙盛情和友好的接待，特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你表示热烈的谢意。你们的高度组织才能和在匆忙中进行工作的本领，使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这些才能，会议得以在那样惬意而安适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大家对此都留下了最快乐的回忆，此外，我应该再加上我个人的感谢。当三国政府首脑怀着勇敢地迎接和克服困难的坚定意志相互会晤时，他们可能达到的结果竟表现得这样明确，这是过去几次会晤所没有的。你自己就曾说过，如果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时没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那末合作是会比较困难的。正如总统和你一样，我也充满着决心，我相信，我们决不允许在胜利后削弱这样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我祝福你获得长寿，以便你能掌握贵国的命运。贵国在你的领导下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伟大。

此致，

最良好的愿望和真诚的谢意。

1945年2月17日

第 40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5 年 2 月 20 日

2 月 18 日的来电收到了。你对克里米亚的安排感到满意，这使我很高兴。

1945 年 2 月 20 日

第 40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2 月 20 日

沉痛地得悉你们由于契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在战斗中因伤阵亡而遭受的损失。这位出色而勇敢的将军的天才和他的事迹曾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和英国军队的高度赞扬。

1945 年 2 月 20 日

第 40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5 年 2 月 21 日

红军优秀的统帅之一契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逝世的时候，承蒙吊唁，特此致谢。

1945 年 2 月 21 日

第 41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2 月 23 日收到

红军正在胜利地庆祝建军27周年。这种胜利使它的盟国称赞不已，这种胜利决定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将来的人世世代代都会像我们这些活着看到这些辉煌的胜利的人那样无条件地承认受了红军的恩惠。今天，最后胜利的前夕，我请你，伟大军队的伟大统帅，代我向红军致贺。

第41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信

1945年2月27日发出

承蒙对红军在粉碎德军的事业中所作的贡献给予崇高的评价，请接受我的谢意。

在红军27周年纪念日，我很高兴地把你的祝贺转至红军。

第41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3月9日

我刚刚从我们自塞瓦斯托波尔开回来的船上收到你赠予的俄国礼品。

承蒙赠予这样珍贵的礼品，请你接受我最热烈的谢意。礼品使我深感满意，这种满意差不多同我对你在送给我这些礼品时所表示的那种良好感情的谢意一样巨大。

1945年3月9日

第41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3月21日

1.艾登先生给我看了莫洛托夫先生给他的关于被贵国军队拯救的我国

战俘问题的信和在雅尔塔签订的关于这些战俘的协定。上述信件中所谈到的情况，使我们深感不安。没有什么问题比处于德寇魔掌中的我们的战俘的命运，以及从速将他们从监禁中解放出来并遣返祖国，更能引起英国人民如此强烈的感情。如果你亲自过问一下这个问题，我将极为感激。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愿意为我们的人作你所能作的一切；正象我能向你担保的，我们将同样为落到莱因河沿岸我们控制的地区的贵国的人们尽力。

2.英国人和加拿大人2月8日开始的进攻，使我们付出了将近16,000人的代价。本来希望美国第9军和第1军在2月10日左右在我们的右翼或南面开始进攻，可是因敌人毁堤而引起的泛滥，使得这两支军队实际上不可能在洪水退落以前开始行动。这就迫使我国在北方的军队在美国军队能采取某种重大进攻以前的15天时间内继续沿着极难行的沼泽地区进攻。我们完全同意：他们延迟进攻是有理由的。可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莱因河以西的德军仅存的一部精锐部队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当美国第9、第1和第3军在3月上旬开始进攻的时候，敌人在战线的其余部分的弱点，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是大大地增加了。然而，这三支美国军队的战果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期望。借助于出色而英勇的战斗，他们现在已完全摧毁了敌人自莱因河往西的防御阵地。而我们在北方经过长距离的行军之后，也终于到达了莱因河。战场上已经准备好了下一阶段的战斗；为要亲眼看看这个阶段的战斗，我将动身到蒙哥马利的本部去。加拿大军队、英国第2军和美国第9军将归蒙哥马利指挥。我希望很快就通知你好消息。看到你对正在日益缩小着的东普鲁士的纳粹袋形阵地实行进攻，我极为高兴。我觉得在占领了整个德国北部以及俄军同我们会合之后，希特勒会企图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以殊死战来继续进行战争，还可能跨过阿尔卑斯山同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军队取得联络。在布达佩斯以及目前在巴拉顿湖畔进行的残酷而顽强的战斗和其他的准备步骤都证实了这一想法。现时，我正期待着西线和北线的坚决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最近你也会在东线开始行动。上面第二点中所述一切仅供你个人参阅。

3.自从我们在雅尔塔分手以后，现在我们似乎遭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会晤的话，这些困难都将消散。

1945年3月21日

第41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3月23日

你的来电收到了。

你对英国战俘的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现在所处的条件要比在英国集中营中不时遭到迫害甚至鞭挞的苏联战俘的条件要好些。况且他们已经不在我们的营房里了，而是在赴敖德萨途中以便遣返祖国。

感谢你通知我西战场的局势。我信任蒙哥马利元帅的军事天才。

1945年3月23日

第41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3月24日

我现在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他刚才发出了命令，开始在以威塞尔为中心的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强渡莱因河的主力战。这次军事行动有着约两千门大炮的火力支援，并且将有一支空运部队降落。

希望今晚和明天就能渡过河去，并且建立起桥头堡。一旦渡河成功，一大批后备装甲部队就将发动突击。

蒙哥马利陆军元帅要我向你转致他的敬意。明天我再给你去电。

1945年3月24日

第41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4月1日收到

1.你想必已经收到美国总统的电报，承总统的好意，在发送该电报之

前先给我看了一下。我认为我有责任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你保证，战时内阁要我向你说明，我们完全赞成总统的这个电文，而且将给予完全的支持。

2.我想特别强调两三点。第一，我们认为莫斯科谈判[①]没有保持雅尔塔的精神，事实上在某些地方甚至连文字都没有遵守。我们绝没有想到，我们三人如此诚意地指派的委员会，竟然未能以互相让步的精神迅速地和顺利地完成他们的任务。我们曾经肯定地认为，现在应该已经产生了为所有联合国家所承认的“新的”、“改组过的”波兰政府。这样本来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和有决心为世界的未来共同努力。现在要做到这一点还不太晚。

3.而且，委员会已经协议，在成立这样一个新的、改组过的波兰政府之前，应该从波兰国内和国外召集波兰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一定参加政府，而只是为了进行自由和坦率的协商。可是由于苏联政府和卢布林政府要求有权否决它们所不同意的任何邀请以及协商，所以连这个初步的步骤也未能实现。我们决不能够同意让我们三国中任何一国握有这种否决权。这种否决在米柯瓦依契克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英美两国举国上下都认为米柯瓦依契克是波兰境外最杰出的波兰人。

4.我们还很惊讶和惋惜地听说，莫洛托夫主动提出的允许视察员和代表团访问波兰的建议现在已经收回了。这样我们就无法来核对伦敦的波兰政府几乎每天都提供给我们的常常是很令人痛心的消息。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在波兰的土地上拉上保守秘密的帷幕？我们提供着最充分的便利条件让苏联政府派代表团或个人去访问在我们军事占领下的任何地区。苏联机关已经有几次接受了我们提供的方便，并且进行了访问，使双方都感到满意。我们要求在这些事情上应遵守互惠原则，这一定会有助于建立起我们持久合作的良好基础。

5.总统也让我看了他和你之间关于莫洛托夫不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来往电文。我们本来希望三国外长在旧金山的会面，可以使自从我们在雅尔

————————————————

① 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英美驻苏大使就改组波兰临时政府等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原注

塔那次愉快的、充满希望的会谈以来象暴风雨一样降落在我们身上的许多困难得到清除。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把莫洛托夫羁绊在俄国国内的那些公务上的理由的重要性。

6.你给总统去的那封信的最后一句使我和他都感到很惊奇。他所讲的美国人民也是指英国人民和英联邦的各国人民而言，但是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目前英王陛下的顾问们只是按照经过普选而产生的议会的意志而担任着自己的职务。如果我们寻求波兰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归于失败，那末在议会在复活节休会后复会的时候，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人曾经象我那样热心地和有信心地为俄国的事业而呼吁过。是我第一个在1941年6月22日发出了呼声。一年多以前，我宣布俄国以寇松线作为西部边界是公正的，曾使全世界吃了一惊，并且现在英国议会和美国总统都已经接受了这条边界。我以俄国的忠实朋友的身份向你和你的同事们提出个人的呼吁，要求你们同西方民主国家就波兰问题取得良好的谅解，而不要打落我们现在所伸出去的为了将来领导世界而进行合作的友谊之手。

1945年3月31日

第41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4月5日

1.总统给我送来了他和你之间关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属下的一位英国军官和一位美国军官同名叫沃尔夫的一个德国将军就意大利北部凯塞林的军队可能投降一事在瑞士进行接触的问题的来往电文。因此我认为应该向你确切地综述一下英王陛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一接到关于进行接触的消息后，立即就在3月12日通知了苏联政府，而且我们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忠实地把一切经过都告诉给你。在瑞士谈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检查德国来使的证书并且试图安排凯塞林所指派的一个代表在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司令部或者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合宜地点同亚历山大会面。在瑞士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哪怕是关于凯塞林的军队的军事投降的问题。我们更没

有想到过像你在给总统的电报中所指责的什么政治军事性的阴谋，我们的思想决不是像你所暗示的那样不光采。

2.接着立刻邀请了你派代表来参加我们试图在意大利安排的会见。倘使会见实现了，你的代表也来参加了，他们就可以听到会见中所说的每一句话。

3.我们认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有充分的权利来接受在意大利前线同他对阵的25师德国部队的投降，并且同受权谈判投降条件的德国来使就这种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我们仍然特别注意了邀请你的代表来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参加这种纯军事性质的商谈，如果商谈举行的话。可是事实上在瑞士进行的接触没有导致什么结果。我方的军官从瑞士回来，没有能够安排让凯塞林的使者前来意大利进行会见。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克拉克·寇尔爵士，以及美国人方面，曾步步把充分的情况通知了苏联政府。我重复一遍，在瑞士根本没有进行，甚至都没有提到过什么谈判，不管是正式的也罢，非正式的也罢。

4.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德国沃尔夫将军所提出的谈判要求是敌人的一种阴谋，其目的在于挑拨盟国间的互不信任。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3月1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过这一点，他说：“请注意有两个领头人是党卫军和希姆莱分子，这使我很怀疑。”这份电报曾在3月12日抄发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以便转告苏联政府。如果德国的意图是在我们之间挑拨互不信任，现在他们的目的确实暂时地达到了。

5.克拉克·寇尔爵士得到艾登先生的训令在他3月21日发出的信中对于这一切情况已向莫洛托夫先生作了说明。在他收到的莫洛托夫先生3月22日的复信中有这样一个句子：“苏联政府认为这件事不是一种误解，而要更坏些”。在这封复信中对下面的情况也表示不满：“德军司令部的代表和英美驻军司令部的代表在伯尔尼瞒着担负对德战争主要重任的苏联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谈判”。为了英苏关系的利益，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对这个极其伤人的和毫无根据的指控不予作答，而且不加理睬。这就是你在给总统的电报中所说的“英国人的沉默”的来源。我们认为对莫洛托夫发来的这样一封电报与其作答，不如保持沉默好，但是老实告诉你，我们是感

到大为吃惊的，并且认为莫洛托夫把这种行为归诸于我们身上是对我们的侮辱。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照样指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把一切经过都通知你。

6.你对总统说，这件事情完全出于英国方面的主动，这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得到的关于德国沃尔夫将军愿意在瑞士作一次接触的消息，还是由一个美国机构带交给他的。

7.在伯尔尼或者别的地方进行的任何接触，同在西线上全面击败德军甚互不相干的。事实上德军作战很顽强，从我军2月攻势开始到3月23日为止，已经使英美军队伤亡87,000多人。但是，由于我军地面部队的人数超过敌军，而且英美空军对敌人的空军具有绝对的优势（英美空军光在3月份一个月内就向德国扔下了20万吨炸弹），西线的德军已经肯定地被击败了。西线敌军地面部队之所以被压倒，是由于苏军的卓越的进攻和威力。

8.至于你在4月3日给总统的电报中提出的指控，其中也攻击了英王陛下政府，我和我的同事们赞同总统给你的答复中的最后--句话。

1945年4月5日

第41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7日

4月1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已经收到。在就这一问题给总统同时也抄送给你的电报中，我已经对所有同关于波兰问题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主要问题作了答复。至于你电报中提到的其他问题，应该作如下的说明：

1.英国和美国的大使（莫斯科委员会的委员）不愿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并且坚持应该邀请波兰的一些活动家来进行协商，不管他们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和对苏联的态度怎样。他们坚持必

须邀请例如米柯瓦依契克到莫斯科来进行协商，并且是作为最后意见提出，而毫不考虑到米柯瓦依契克曾公开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这一事实。然而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我准备促使波兰临时政府撤消反对邀请米柯瓦依契克的意见，只要他公开声明承认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并且主张建立波苏友好关系。

2.你不明白为什么在波兰战场上进行的战事搞得这样神秘。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你忽略了这一点，即波兰人认为派遣英国观察家或其他外国观察家到波兰去是对他们民族自尊心的侮辱，如果注意到波兰临时政府认为现时英国政府对它的态度是不友好的，那末问题就更清楚了。至于苏联政府，它不能不考虑到波兰临时政府对派遣外国观察家到波兰去所抱的否定态度。此外，你知道，如果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波兰临时政府，那么它是不会阻碍其他国家的代表去波兰的，也不会给他们制造任何障碍，如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的代表和其他代表那样。

3.我曾同丘吉尔夫人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转交了你给我的礼品，对此，仅向你致衷心的谢意。

1945年4月7日

附件　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7日

由于你4月1日的来电，我认为必须对波兰问题表示一些意见。

真的，波兰问题已陷入绝路。

原因何在？

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莫斯科委员会的委员）离开了克里米亚会议的方针，而加进了一些克里米亚会议所没有规定的新的因素。

这就是：

（一）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人都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是应当加以改组的波兰现政府。它应该是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然而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却离开了这个方针，忽视波兰临时政府的存在，不理踩它，充其量也不过是把波兰临时政府同波兰或者伦敦的个别人相提并论。同时，他们认为改组临时政府应当理解为消灭临时政府而成立完全新的政府。并且哈里曼先生竟在莫斯科委员会中宣称：可能连一个临时政府的成员也不会被选入波兰民族统一政府。

显然，美国和英国大使这样的方针不能不引起波兰临时政府的愤怒。至于苏联，它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方针。因为这种方针意味着直接破坏克里米亚会议的决议。

（二）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人的出发点是：为了进行协商应该从波兰召来5位，从伦敦召来3位，一共8位，而不是更多。可是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却离开了这个立场，而要求授权给莫斯科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可以从波兰和伦敦邀请为数没有限制的人员来进行协商。

显然，苏联政府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根据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人员的邀请应该由整个委员会，即为一个组织来进行，而不是由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来进行。想邀请数目无限的人员来进行协商的要求，是同克里米亚会议的规定相矛盾的。

（三）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精神，应该邀请这样的波兰活动家来进行协商，他们第一要承认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包括关于寇松线的决定；第二应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坚持这一点，因为苏联军队在解放波兰的战争中曾经作出很大的牺牲，并且也因为最近30年内波兰领土曾两度为敌人用来侵犯俄罗斯。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政府有责任努力求取苏波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却不同意这一点，而力图邀请这样一些波兰活动家来进行协商，不管他们对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对苏联的态度怎样。

在我看来，阻碍着对波兰问题获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就是这些。

为要走出绝路而达到大家同意的决定，我以为必须采取以下步骤：

1.确定：临时政府的改组并不意味着它的消灭，而正是用扩大它的办法来进行改组。并且未来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应该是波兰临时政府。

2.恢复克里米亚会议的原意，只限于邀请8位波兰活动家，其中5位应该来自波兰，3位来自伦敦。

3.确定：不管怎么样，应该同临时政府的代表进行协商，并且同他们的这种协商应该首先进行。因为同那些从伦敦或波兰召来的个别人士比较起来，波兰临时政府是波兰最强大的力量；而这些人士在波兰居民中的影响更是不能同波兰临时政府在波兰所享有的那样巨大的影响相比拟。

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别的决定，在波兰都可能被看作是侮辱波兰人民和企图把不顾波兰公众意见而成立起来的波兰政府强加在波兰身上。

4.从波兰和伦敦邀请来进行协商的活动家，必须承认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并且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

5.改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的办法是：从未参加临时政府的波兰活动家中遴选新的部长来代替临时政府现任的部分部长。

至于波兰民主统一政府中新老部长数量的比例，在这里可以确定：近乎现在南斯拉夫政府所实行的那样的比例。

我想，只要是考虑到上述意见，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致同意的决定在很短的期间就可能达成。

1945年4月7日

第 41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7 日

4 月 5 日的来电已收到，其中所涉及的有关在瑞士谈判的所有基本问题，我已经在 4 月 7 日给总统的电报里答复了，现将该复电抄寄给你。至于你的来电中所提到的其他各项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下列事项：

1.无论是我或者莫洛托夫，都未曾有过“侮辱”他人的打算。问题不是在于想“侮辱”，而是在于我们在盟国的义务和权利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我给总统的电报中你会看到，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会保障每个盟国的权利，并且会消除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一切可能性。

2.我的信件是私人信件，而且是绝密的。这样就有可能明确而坦率地发表意见。秘密通信的优点也就在这里。但是，如果你把我每一句坦率的话都认为是侮辱的，那么就会使这种通信发生很大的困难。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曾有过，也没有侮辱任何人的想法。

1945 年 4 月 7 日

附件 **斯大林致罗斯福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7 日

4 月 5 日的来电已收到。

1.我在 4 月 3 日的电报里所谈的不是诚意和信任的问题，对你的诚意和信任，正像对丘吉尔的诚意和信任一样，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所谈的是，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暴露出了在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即一个盟国在对待另一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

可以做什么。我们俄国人认为，在各个战场目前的情况下，当敌人不可避免地即将投降的时候，一个盟国的代表就投降问题和德国人进行任何会谈，都应该让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在内。不管怎样，这个盟国争取参加这种会谈是绝对必要的。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想法却不同，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否定了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权利。我已经告诉过你并且认为有必要重复一下，俄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会否认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谈判的权利。我还是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互相猜疑的一切可能性，并且不给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可能。

2.认为德国人在西战场上所以不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经被击溃了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德国人在东战场上有147个师。他们可以安然从东战场上抽调15到20个师来增援他们在西战场的军队，这样对他们不会有什么损害。然而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为了死守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不大著名的泽姆良尼查车站同俄国人继续在进行着疯狂的战斗，他们象即将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那样死抓住这个车站，但是却毫无抵抗地放弃德国中部像鄂斯纳布鲁克、曼海姆和卡塞尔这样重要的城市。德国人的这种行为是极为奇怪和不可理解的，这一点你会同意的吧。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很诚实和谦虚的人，他们准确地履行着自己的职务而毫无侮辱任何人的企图，这些人是我们在实践中多次考察过的。请你自己判断吧。今年2月马歇尔将军供给苏军总参谋部许多重要消息，在这些消息里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预先通知俄国人说，德国人将在3月份在东线发动两次猛烈的反攻，一次从伯梅拉尼亚进攻多恩，另一次从莫拉夫斯卡·奥斯特拉瓦进攻罗兹。然而实际上德国人的主要打击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上述地区进行的，他们也没有在那里进行反攻，而是在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地区，即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地区进行的。目前已经搞清楚，德国人在

这个地区集中了将近35个师，其中包括11个坦克师，这是战争期间坦克兵力高度集中的最猛烈的打击之一。多尔布亨元帅之所以能够免于复灭并且在以后还能迎头痛击德国人，就是因为我的情报人员虽然稍微晚了一些，然而发现了德国人的这次主攻计划并且立即通知了多尔布亨元帅。这样，我就有机会又一次地确信苏联情报工作者的工作是精确的，他们的消息是灵通的。

为了帮助你了解这一问题，特附去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给迪安少将的一封信。

1945年4月7日

副本。密。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安少将

尊敬的迪安将军：

请你把下列事项通知马歇尔将军：

今年2月20日我收到迪安将军转来的马歇尔将军的通知，其中说，德国人在东线成立了两个兵团，准备反攻：一个在伯梅拉尼亚，用来打击多恩，另一个在维也纳区莫拉夫斯卡·奥斯特拉瓦，用来进攻罗兹，同时南方兵团还包括第6党卫军坦克军。2月22日，我又收到英国军事代表团军队小组组长布林克曼上校送来的类似消息。

马歇尔将军好意地供给了我们这种有助于我们共同目标的情报，我表示非常感谢。

同时，我认为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东战场3月份的军事活动证明了他所供给的情报不确，因为这些战斗表明，包括第6“CC”坦克军的德军主力兵团不是集中在伯梅拉尼亚，也不是莫拉夫斯卡·奥斯特拉瓦地区，而是集中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是从那里进攻，以图向多瑙河推进，并且在布达佩斯以南强渡多瑙河。

这一事实表明，马歇尔将军所掌握的情报是不符合3月份东线战事的真实进程的。

很可能这个情报的某些来源是旨在迷惑英美联军和苏军统帅部，并且企图把苏军统帅部的注意力引离德国人，准备在东线进行主要攻势的地区，

尽管事实是这样，我还是请求马歇尔将军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把他所掌握的有关敌人的情报通知我。

通知马歇尔将军这一情况，只不过是使他能够对于该情报的来源做出适当的结论，我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谢意。

红军总参谋长
安东诺夫大将敬启
1945年3月30日

第42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4日

1.4月7日来电已经收到。你的来电使人安心了，为此谨表谢意，我相信“字谜”[①]的误解现在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了。

2.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悲痛，在过去五年半的时光中，我同他已经建立起很密切的私人友谊。这个悲痛的事件使得你我之间甚至在我们已经克服了的各种患难之中还能由许多令人愉快的礼尚往来和记忆联系起来一事成为更加珍贵了。

3.我必须趁这个机会向你致谢，感谢你在我的妻子访问莫斯科期间给予她的殷勤接待，以及在她在苏联全部旅行期间所给予的关怀。由于她为减轻英勇的红军伤员们受的极大痛苦而作的工作，她接受了劳动红旗勋章，

————————————

① 指英美方面在瑞士伯尔尼同德国沃尔夫将军的谈判。——原注

我们把这看作莫大的光荣。她捐集的款子数目也许不大，但是，这是一笔出于仁爱之心的捐款，这笔钱不仅来自富人，而主要是来自收入微薄的贫苦人，他们都对每星期能够稍微捐献一点引以为荣。世界的未来依赖于我们两国人民群众的友谊，依赖于我们两国政府的相互谅解，依赖于我们的军队的相互尊重。

1945 年 4 月 14 日

第 42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14 日

我们两国的军队在战败的德国会师的光荣时刻快要来到了。我相信，如果你、杜鲁门总统和我在广播中作简短的讲话来庆祝这个事件，这对我们的人民将会产生鼓舞的作用。请告诉我，你是否同意这个建议。

我也把同样内容的电报拍给了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4 月 14 日

第 42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14 日

我在 3 月 22 日给你的电报中表示希望你和罗斯福总统能同我们一起来公开警告德国人，要他们注意目前掌握在他们手里的盟军战俘的安全。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也同意。我的军事顾问认为：可能很快就有必要发布这个警告。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在最近就把你的答复告诉我。

1945 年 4 月 14 日

第 42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14 日

4月14日的两封来电都已收到了。

1.同意你的下列意见，由你、美国总统和我就大家所期望的我们三国军队的会师发表简短的告军队书是适合的，当然，假如杜鲁门总统不反对这样做的话。然而发表这种文告的日期应该商定。

2.我也同意必须以三国政府的名义提出关于还处在希特勒政府手掌里的战俘的安全的共同警告。对于你送来的警告的本文我没有反对意见。警告书上是否要签署，请通知我。同时也请通知发表的日期和钟点。

1945年4月14日

第42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5日

你关于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来电已经收到了。

苏联人民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是我们三国密切合作的坚强捍卫者。

苏联人民将永远珍视和铭记富·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的友好态度。

至于我个人，这位伟大人物——我们共同的朋友——的逝世使我尤其感到沉重。

1945年4月15日

第42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4月15日

米柯瓦依契克先生今天来访问了我，他在谈话后作出了如下的声明，

他希望把这个声明立即公布。考虑到你4月7日给我的电报，我希望你会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

“1.我认为：同俄国的密切而持久的友谊是波兰在各联合国家更为广泛的友谊的范围内推行今后政策的基石。

“2.为了打消对我的态度的各种怀疑，我想声明，我同意克里米亚决议中关于波兰的未来、它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组成代表民族统一的临时政府等问题的部分。

“3.我支特在克里米亚通过的关于召开波兰主要活动家的会议的决议，以便成立一个能够更广泛而客观地代表波兰人民并受到三个主要强国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

1945年4月15日

第42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6日

1.我很高兴，你已经同意由我们三人在电台上讲话。最好是把讲话录音，之后在我们约定的日子在最适当的时间轮流播送，并加以必要的翻译。我想向总统建议，由他先讲，接着你讲，我最后讲。我将把我准备亲自读的那篇讲话稿送给你。

2.至于警告，当然应当由我们三个人签署，并在适当时候发表。我责成艾登先生在华盛顿同斯退丁纽斯先生并且也希望同莫洛托夫先生商谈此事

3.我正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三国外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

1945年4月16日

第427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8日发出

4月16日就告军队书和共同警告问题的来电已经收到。对于你所提出的告军队书的发表办法我没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就战俘安全警告德国人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委托莫洛托夫、艾登先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在华盛顿协商。

第42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8日发出

4月16日收到了你关于米柯瓦依契克声明的来电。感谢你的通知。

米柯瓦依契克的声明当然是前进了一大步。然而，他是否也承认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中有关波兰东部国界的那一部分，这一点还不清楚。最好是这样：第一，取得米柯瓦依契克声明的全文；第二，得到米柯瓦依契克关于他是否承认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波兰东部国界的那一部分的说明。

第42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8日

在我4月16日的去电中附有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声明的全文。

从收到你的来电的时候起，确实的材料使我完全相信，米柯瓦依契克先生是接受了整个克里米亚决议，包括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那部分决议在内。我如果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就不会把他的声明送给你了。

1945年4月18日

第 430 号

丘吉尔和杜鲁门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18 日收到

我们这封联名电是答复你 4 月 7 日关于波兰问题谈判的来电的，目的是使这件事更加明确，并且也是为了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致被误解。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十分诚挚地力求把问题处理得公正和具有建设性，并且今后仍将这样处理。但是，在向你叙述具体的建设性的建议之前（这种叙述正是发这封电报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纠正在你的心目中显然已经形成了的对英美政府的立场的那种完全错误的印象，这个立场我们的大使已经按照直接的指示在谈判中说明过了。

你说目前在华沙行使职权的政府在这次谈判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视，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不论我们的意图或者态度，都从来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无条件地同意华沙波兰政府的三个领袖应该包括在被邀赴莫斯科同波兰委员会商谈的波兰人的名单中。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在组成新的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三批人中间，目前华沙政府的代表无庸置辩地将起重要的作用。所谓大使要求邀请数目无限制的波兰人的权利这种说法，也是不公正的。委员会建议和同意从国外和从波兰邀请个别的波兰代表来莫斯科商谈的权利，是不能够作如此解释的。的确，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1 日的信中特别声明：“为了便于达成协议，委员会可以首先挑选一批为数不多的，但是有代表性的波兰活动家，由他们来提出其他人选供委员会审查”。实际上我们争执的问题是在于：华沙政府是否有权对参加商谈的个别人选行使否决权。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克里米亚决议中是找不到这种解释的。我们觉得，你是回到苏联代表团在克里米亚时所持的原有立场上去了，这个立场后来在协议中已经变过样了。我们将坚决地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只是应该被邀请去莫斯科商谈的那些波兰人。

你提出最好邀请八位波兰人（其中五位来自波兰，三位来自伦敦）来参加第一次的会谈，你在给首相的电报里还指出，米柯瓦依契克只要声明

支持克里米亚决议，他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我们向你提出下列建议，以便防止我们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和避免一切不可胜数的后果。我们希望你将十分密切而慎重地来注意这些建议。

1.责成我们在委员会里的代表立即发出邀请书，请下列的波兰活动家来莫斯科商谈：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罗略·齐美尔斯基、萨彼格主教，和目前华沙政府无联系的一个在波兰有代表性的政党的领袖一人（如果你认为下面的几个人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也将认为他们是可以接受的：维托斯、茹拉夫斯基、哈春斯基、雅秀科维奇），从伦敦方面邀请米柯瓦依契克、葛拉勃斯基和斯坦奇克。

2.在委员会一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书以后，华沙政府的代表就可以首先前来，如果这样做是合适的话。

3.事先同意，这些被召来商谈的波兰活动家可以向委员会推荐一定数量的其他波兰活动家，在波兰和国外的都可以，这些人可以作为会议的成员，以便使波兰所有的主要党派都有代表参加讨论。

4.我们并不认为，在同波兰活动家商谈之前我们就可以同意确定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成员的任何方式，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适用于波兰的。

我们请你再仔细地读一下4月1日美国和英国的去电，因为在那两封电报里把意见叙述得较为深刻，现在我们还是坚持这些意见，而且我们也应当坚持。

第43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19日

因为我们三人曾约定三国军队在德国会师的时候在电台上广播文告，所以我提出下列的程序。

每个国家应当在电台上广播所有三国的文告。我们应当交换录音带，用飞机来运送。我的文告如下：

“在陆地上和海洋上经过了长期的征战、艰苦的劳动并获得了胜利以后，在经历了许多次危险的战斗之后，伟大盟国的军队已经跨过德国领土而（在柏林）会师了。现在他们的任务将是消灭德闰军事抵抗的一切残部，根除纳粹政权和征服希特勒的国家。为完成这些任务具备着充足的力最，我们在忠诚的胜利的友谊中会师，我们怀着达到目的和完成天职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切为了战胜敌人”。

在录好音之后我马上派飞机送给你。如果你能尽快把你的文告的录音送给我们并且事先把稿子用电报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内容，那将是很好的。至于程序，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想到，如果我们中间每个人自己的文告首先在本国的电台上播送，这将是可行的。

我感到，最好是让每个国家的电台当局规定它愿意向听众播送录音的确切时间。当然，这些电台不得在正式公布俄、英、美三国军队巩固地会合之前进行广播。最方便的办法是三国在同一时间发表这种正式声明。你是否同意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时发表关于这一件事的声明？如果同意的话，我将请他就此事同你联系。

我已向杜鲁门总统发出同样的电报。

1945 年 4 月 19 日

第 43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20 日

我 4 月 19 日的电报中的最后三句话并不意味着（因为这与我有关系）除了有关政府的首脑以外，其他的人也可以发表这种告军队书之类的声明。这最后一句话指的只是宣布会师的事实，关于这件事将用通常的办法来公布。

1945 年 4 月 20 日

第 43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20 日

4 月 19 日关于告军队书的来电收到了。同意你提出的程序。

我的告军队书的内容如下：“在欧洲进行解放战争的战无不胜的盟国军队击溃了德军，并在德国的领土上会师了。

“我们的任务和职责是打败敌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和无条件投降。红军将彻底完成它对我国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这项任务和职责。

“我们向我们盟国的英勇的军队致敬，他们现在同苏联军队并肩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并且满怀着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决心。”

这个文告将在录音后立即送给你。

我并不反对在苏军和英美军队会师后由每个国家的电台当局规定播送我们的文告的确切时间。我也不反对把我们关于会师的声明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类似声明配合起来。

关于你所建议的我们三人中每个人的文告在自己的国家内都首先播送一点，我也认为是可行的。

1945 年 4 月 20 日

第 43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4 月 21 日

杜鲁门总统告诉我，他认为不可能在电台上播送关于军队会师的文告。因此他建议把这个文告作为一个声明，用自己的名义向报刊和电台发表，这个声明将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日子和时刻公布。

我建议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公布的适当时间与苏联军事当局洽商。我的文告的录音带将用飞机带给你。

1945 年 4 月 21 日

第 43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4 月 22 日

感谢你 4 月 20 日关于我们三国军队会师问题的来电。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建议，即在预定的日期华盛顿时间 12 时在三国首都同时公布，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反对意见，那末我们就着手准备了。

1945 年 4 月 22 日

第 436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4 月 22 日

下面一段是米柯瓦依契克先生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他在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中答复了你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接受了寇松线，包括把里沃夫移交给苏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希望这样会使你满意。

“根据俄国的要求，三大国表示赞成以尽可能少的变动沿寇松线建立波兰的东部边界。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里沃夫和石油产区应当留归波兰。但是考虑到，第一，苏联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绝对的要求；第二，我们两国人民的毗邻相处是依靠这个条件的执行，由此我们波兰人有义务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我们共和国的所谓完整而拒绝苏联的要求，以致使我们国家所有的迫切的利益遭受威胁呢？这个问题的答复应当是‘不’。”

1945 年 4 月 22 日

第 437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5 年 4 月 23 日

关于杜鲁门总统先生公布他的告军队书的办法的来电已于 4 月 21 日收到，感谢你的通知。

根据我们的协商，我的告军队书的录音将由一架“蚊式”飞机飞去时带给你。

1945 年 4 月 23 日

第 43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5 年 4 月 23 日

你关于宣布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会师的时间的来电已于 4 月 22 日收到。

杜鲁门总统提议应该在华盛顿时间中午 12 时同时在三国首都宣布我们三国军队的会师，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

类似内容的电报也将同时拍给杜鲁门先生。

1945 年 4 月 23 日

第 43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1945 年 4 月 24 日

你和杜鲁门总统先生 4 月 18 日的联名来电已经收到了。

从这封电报里可以看出，你继续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是将来的波

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而只不过是一个和任何其他波兰人的团体相同的团体而已。这样来了解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位并且对它抱这样的态度，是很难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相符合的。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个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认为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并且获得波兰大多数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应该成为改组以后的、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即主要部分。

看来，你是不同意这样来理解问题的。你拒绝把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的榜样，这就证实你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可能被看作是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和核心。

2.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情况，即波兰同苏联是接壤的，但它同英国和美国却并不接壤。

波兰问题对于苏联的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和希腊问题对于英国的安全的意义一样。

看来，你并不同意苏联有权利使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但是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血流成河，姑且丢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谈，仅仅这件事就要求达到上述一点。我不知道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而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正是一个民主政府。苏联对于该两国政府的成立并未加以过问。苏联政府不曾要求干预这些事，因为它理解到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有人会不愿意从安全的观点来考虑苏联的利益呢！

3.美、英两国政府事前就波兰问题进行了商议（而苏联对波兰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关心得多），然后企图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苏联，使苏联的代表们处于无法容忍的境地，这种情况应该认为是不正常的。我应当承认，类似的情况是不能有助于就波兰问题取得一致同意的决定的。

4.承蒙你把米柯瓦依契克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声明的文本供给我，我对你十分感激。我准备建议波兰临时政府对米柯瓦依契克的这一声明加以考虑并撤回反对邀请米柯瓦依契克就波兰政府问题进行协商的意见。

现在问题全赖于接受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的榜样。我觉得，如果这一点获得接受，关于波兰的事情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1945年4月24日

第44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4日

我已经读过了总统交莫洛托夫先生转给你的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鉴于它的特殊重要性，我已经同战时内阁商谈过。现在我有责任通知你，我们完全同意总统那封电报的内容。我诚恳地希望，将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严重的困难，否则，这些困难的继续存在会使胜利的时刻蒙上阴影。

1945年4月24日

第44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5日

4月23日的两封来电都已经及时收到，谨此致谢。承蒙你代表贵国勇敢的军队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这些军队现在已经同贵国的部队会师）致以祝贺，一并向你表示谢忱。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是会以同样的祝贺来回答这些祝贺的。

1945年4月25日

第 442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25 日

我刚才从英国驻瑞典公使那里收到了一份电报，在我这封电报发出后我将立即把它发给你。美国总统也已经获悉了这个消息。就英王陛下政府来说，毫无疑问，只能有一种投降办法，那就是同时向三个主要国家实行无条件投降。我们认为应该告诉希姆莱，各地的德国部队，不论作为个人或是建制单位，都应该就地向盟国部队或盟国代表投降。除非做到这点，否则盟军将在凡是遇有抵抗的各个方面和各个战场上对敌军进行最激烈的攻击。

在上述电报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发表关于会师的讲话。

1945 年 4 月 25 日

第 44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25 日收到

从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那里收别下述 4 月 25 日的来电。

绝密。

1. 瑞典外长曾约我和我的美国同事 4 月 24 日 23 时往访。在座的还有波曼先生和瑞典红十字会的贝纳多特伯爵。

2. 贝纳多特是今天晚上从德国经过丹麦回国的。在东战场的希姆莱请他迅速离开弗伦斯堡（他在该地受红十字会的委托进行工作）前往德国北部，以便同他会晤。贝纳多特建议在卢卑克，4 月 24 日夜间 1 时就在那里进行了会晤。虽然希姆莱已很疲乏并承认德国的末日已经到来，但他还很有精神，还保持着清醒地判别问题的能力。

3. 希姆莱说道，希特勒已经病入膏肓，救治无望，可能他已经死去，

如果还没有死的话，无论如何会在两天里断气。从希姆莱大本营里来的谢伦贝尔格将军告诉贝纳多特说，他害的是脑充血。

4.希姆莱声称，在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他，希姆莱，不能够实行他现在所建议的步骤，但是，既然希特勒已是一个气息奄奄的人了，他就拥有行动的全权。接着他又请贝纳多特通知瑞典政府，说他希望瑞典政府采取措施来安排他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会晤，以谋求在全部西战场上进行投降。贝纳多特指出，如果他能够直接命令自己的军队找降的话，那么这种会晤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一投降将不包括挪威和丹麦的话，那么他不愿意把希姆莱的询问转达瑞典政府。如果包括挪威和丹麦，那么会晤就有一定意义了，因为应当就下列技术问题达成专门协议，例如驻在那些国家里的德国人应该怎样并向谁交出武器的问题。希姆莱回答说，他准备命令驻丹麦和挪威的部队向英国、美国或瑞典的部队投降。

5.希姆莱希望在东战场继续抵抗，至少暂时抵抗一下也好，而贝纳多特对他说，这件事对盟国说来是未必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希姆莱曾提到，他希望西方盟国比俄国人早些进入麦克伦堡，以便拯救平民。目前谢伦贝尔格正在接近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他焦急地期待着获悉一些消息，如果有什么信件宜于由他转交的话，他是能够保证把任何信件立即面交希姆莱的。贝纳多特曾向我们指出，如果盟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反应的话，那么这可能使人类遭到巨大的而且无谓的灾难和牺牲。

6.外交部长解释说，依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所以他认为有义务立即通知我的美国同事和我。我的美国同事和我指出，希姆莱所以不顾意现在下令在东战场投降是和最近一个时期有人想在西方盟国和俄国之间煽起不和的企图相类似的。很明显，纳粹分子应该对所有的盟国同时投降。外交部长和波曼先生承认这一动机不可以说是没有，但是他们指出，纳粹的领导者可能下令在全部西战场上以及在挪威和丹麦的一切部队都投降的这一事实，对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盟国都会有很大好处，而事实上也会导致迅速的全面投降。不管怎样，外交部长认为应当把贝纳多特的情报转送给英、美政府，并且瑞典政府认为，英、美政府有充分的自由把这个消息转送苏联政府，因为瑞典政府决不愿意变成促进在盟国之间煽起

不和的任何企图的工具，并且也不愿意让人家把瑞典政府看作是这样的工具。瑞典政府所以不能直接通知苏联政府的唯一原因，乃是因为希姆莱曾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这一消息只能告诉西方盟国。

7.我的美国同事将把一份类似的电报发送本国政府。

第44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5日

感谢你4月25日关于希姆莱想在西战场投降的来信。

你建议向希姆莱提出在所有的战场上其中包括苏联战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唯一正确的。我是了解你的，我毫不怀疑，你是会这样行动的。请按你建议的精神行动吧，红军是会为着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进逼柏林的。

我并且告诉你，我已经给杜鲁门总统送去了同样的答复，因为他也曾向我问过这个问题。

1945年4月25日

第445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6日收到

1.关于“字谜”。前几天我们已经同他们中断了一切来往的那几个德国使者，现在又到达了吕森湖边。他们自称有全权来处理意大利德军的投降问题。因此，我们已通知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他可以准许那些使者前去意大利的前线司令部。那些使者到司令部去是很容易的，他们只要先去法国，然后我方的飞机就可去那里把他们带去。请你立刻就派贵国代表到陆

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司令部去。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完全有权接受同他作战的数目相当大的敌军的无条件投降，但是，一切政治问题都留待三国政府来解决。

2.你一定会注意到，在几小时以前，我在发给你的电报中只谈到希姆莱提出的在西方和北方投降的问题，而没有谈到意大利德军投降的问题。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都俘获住，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看来，实在是一个珍贵的收获。在那里，美国人也同我们一起付出了牺牲，一起经受了这场患难。

3.以上的情况都是给你个人参考的。我国参谋部已经去电同美国参谋部联系，为了使英美联合参谋部可以发布内容相同的指示给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他将奉命通过英美两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把一切情况通知贵国最高统帅部。

第446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6日

4月26日关于“字谜”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感谢你的来信。

从我这方面，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苏军统帅部委派现在苏联政府驻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基斯连科少将去参加在亚历山大元帅本部举行的关于意大利北部德军投降问题的谈判。

1945年4月26日

第44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4月27日

1.答复你4月25日的来电。我极其愉快地得悉，你并不怀疑我对伟大的贵国和对你本人会怎样对待并且以后一直会怎样对待。英、美两国政

府相信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将向你所赞许的方面发展自己的活动，我们三个人都将继续充分地相互交换消息。

2.下面的一件事虽然不大，但做起来是会有好处的。我们三国的军队将在辽阔的战线上很快地相互发生接触。我们应当有良好的空中走廊，这一走廊应该尽速地组织起来并使它尽可能地广阔一些，以便可以每日空运信件并且保证个人的接触。我曾请艾森豪威尔将军从他的方面采取措施来组织这一空中走廊。

1945年4月27日

第44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4月27日

1.英美两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很快就要在德国会师了，德军的抵抗将临结束，美、英、苏三国有必要商定一个程序，以便各自的军队可以有次序地去占领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

2.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最后击败德军。在这期间，三个盟国的军队之间的界线必须由战场上的指挥官来决定，并且服从于作战的考虑和需要。在这个阶段内，我们的军队不可避免地会占领超出最终的占领区的界线以外的土地。

3.在战斗结束以后，第二项任务就是在柏林和维也纳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且重新部署盟国的军队接管各自的占领区。德国各占领区的分界钱已经确定了，我们有必要毫不延迟地在即将按照你的提议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就奥地利的各个占领区达成协议。

4.现在看来不会有经过签署的投降文书了。如果是这样，各国政府应该决定立即设立这两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且责成它们具体安排各国军队撤至协议的各自的占领区内的步骤。

5.为了满足上面第二段说到的那种情况的需要，即为了战术上的分区作一些紧急的临时安排，已经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甲、为了避免两支军队之间的混乱和防止任何一方扩张到已经为另一方所占领的地区内，双方应该在他们会师的当时当地停止前进，但是为了对付任何残余的抵抗，得根据双方任何一方的当地指挥官的意见，对后方或两翼作必要的调整。

“乙、至于在一个地区内敌对行动结束后对部队作调整的问题，你的部队应当根据军事的需要进行部署，不受占领区界线的限制。只要情况的紧急程度许可，你应该先取得联合总参谋部的同意，然后进行任何不同于为作战和行政的理由而作的地方性调整的重大调整。”

6.请你向你的前线指挥官发出类似的指示。

7.我把这一份电报同时发送给你和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4 月 27 日

第 44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28 日

对我 4 月 27 日的私人信件补充下面一点。

在不签署投降文书的情况下，四大国应当发布一项宣言，来确定德国失败和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并且规定由四大国承担起在德国的最高权力。这个宣言的初稿正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中，我想请你迅速指示委员会的贵国代表，以便最后定稿得以早日拟就，

1945 年 4 月 28 日

第 450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28 日

1.对你 4 月 24 日的来电表示感谢。我们两国之间由于波兰问题的克里米亚协议而产生的误解使我感到十分痛心。当然，我是带着这种希望去

雅尔塔的，即：伦敦和卢布林的波兰政府都应当取消，而新的政府应当由善良的波兰人组成，在这个新政府中间贝鲁特先生的政府成员可以占显著的地位。但是，你不喜欢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已经同美国人商议好，贝鲁特的政府不应当取消，但是这个政府应当改变成“新”政府，“在更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把本来在波兰的民主活动家和国外的波兰人包括进去。为此目的，莫洛托夫先生和两位大使应当在莫斯科一起开会并设法在同现有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和其他波兰的和国外的波兰活动家协商后建立这种政府。

2. 然后委员会应当着手遴选那些应当来进行协商的波兰人。我们企图每一次都能寻找到一些代表人物，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作得这样细心，是为了不要把我们认为对俄国极不友好的那些人挑选进去。我们从现在加入伦敦波兰政府的人中只找到三个合适的人，即：米柯瓦依契克、斯坦奇克和葛拉勃斯基，他们对伦敦的波兰政府采取了反对的立场，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政府对俄国的态度，特别是因为它拒绝接受东部边界，即你和我早已商妥了的边界。除苏联政府以外，我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这条边界以及在西部和北部的补偿等问题是合理的。不错，米柯瓦依契克当时还希望得到里沃夫，但是你知道，现在他已公开放弃了这个要求。

3. 同样是从有助于事业的愿望出发，美国人和我们提出了应当从波兰和国外邀请的那些人选。英国人正在抱怨的第一个问题是：委员会在莫斯科经过了9个星期的讨论和在我们三国政府之间交换了一些电报之后连一点微小的进展都没有达到；因为莫洛托夫先生在委员会中一直拒绝对我们上述的波兰人发表意见，因此，他们中间甚至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来参加圆桌会议的初步讨论。请你注意，这些名字的提出并不是一定要把他们作为改组后的波兰政府的成员，而只是让他们前去参加克里米亚宣言所规定的圆桌会谈，而圆桌会谈的结果可能是组织有波兰社会主要阶层的代表参加的联合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准备同苏联政府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并且将具有我们和全世界都可以予以承认的那种性质。这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愿望。这个临时政府以后应当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共同决议负责“在秘密投票普选的基础上尽快地进行自由的和没有任何障碍的选举”，

在这种选举中“一切反纳粹的和民主的党派都有权参加和提出候选人”。可惜，不论是第一个问题或第二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处理。

4.你在来电的第一点中谈到接受“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的榜样”。你经常表示我们私人的通信应当是诚挚的和开诚布公的。我应当直截了当告诉你，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在波兰的问题上，三大国关于为了成立新政府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已经商妥。新政府的成立应当在委员会派人出席的情况下由贝鲁特政府的代表同波兰和国外的波兰民主活动家之间进行协商的办法来进行。南斯拉夫的问题则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在你们的代表在关于波兰问题的莫斯科委员会上把我们协定中所规定的谈判的开始变成不可能以后，我觉得，现在你正在建议拒绝已取得一致同意的裎序。因此，我们，英国人，认为在花费了这样多的时间以后，在组织“新”的和“经过改组”的波兰政府方面丝毫没有进展，相反，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目前的贝鲁特临时政府签订了一项为期20年的条约，虽然这个政府还不是“新”的和“经过改组”的政府。我们感到在这件我们确信已经在克里米亚根据友好和合作的精神解决了的事情上竟强迫我们接受条件，并且使我们进退维谷。

5.我也应当告诉你，南斯拉夫事件的进展使我感觉不到我们两国的利益的比例是50%对50%。铁托元帅已成了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他声称，他首先是忠于苏联。虽然他也允许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成员参加他的政府，但是，他们的人数只有6人，而铁托亲自任命的人却有25名之多。我们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即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没有同他们进行磋商，这是一党制的开始。但是对这一切不论在雅尔塔和其他场合我都没有发出任何怨言和评论，而是默默地同意了在南斯拉夫所达成的决定。我现在对你在南斯拉夫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也没有表示不满的情绪。虽然我很担心，但是我还是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地进行，而且使南斯拉夫人成为繁荣和自由的人民，希望他们不论对俄国和对我们都是友好的。

6.但是我们不能采用“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问题的指导原则。我们和美国人在波兰都没有任何军事的或特殊的利益。我们在物质的问题上所力求的一切都应当在各友好的国家之间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研究。你竟

以为我们会赞成成立一个同苏联敌对的波兰政府，我们都感到很惊讶。那同我们的政策是相反的。然而，英国人正是因为波兰的缘故而在1939年同德国开战的。从纳粹对待波兰的行为中，我们看出了希特勒妄想征服他国的穷凶极恶的欲望，希特勒对波兰的侵犯是点燃地雷的火星。英国人民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未加盘算，只是出于情感就参加了战争。若干年来，英国人民逐渐地感觉到，希特勒的所有那些扩张行为和对战争的准备，对我国以及对我们在欧洲所珍视的自由是一个威胁，而当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无耻地背弃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的时候，甚至连十分爱好和平的张伯伦都向波兰提出了共防希特勒的保证。当德国人进犯波兰，要求实现这一保证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就向希特勒开了战，尽管我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那时候，在人们的心胸中燃起了火焰，正象贵国人民在同德国人背信弃义的、野蛮的、以及在一个时期看来是一种毁灭性的进攻进行保卫祖国的崇高斗争时充满了胸膛的火焰一样。这股火焰在英国各阶级、各党派的人士中，以及在英属自治领中都还在燃烧着。除非波兰得到公平的待遇，即在同俄国友好的基础上获得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否则英国人就不能够认为这次大战结束得对头。我认为，我们在雅尔塔正是对这一点有过协议的。

7.—方面，我们对波兰的权利抱有这种强烈的感情，我相信在美国全国这种感情至少是同样强烈的。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英语地区内已经产生了很热烈而深切的愿望，愿意在平等和光荣的基础上同强大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友好相处，并且容许我们思想体系和政府制度的不同，同你们一起在全世界的绵长和光明的岁月中共同工作，这种未来只有我们三大国在一起才能够促成。我在担负重任期间是一直忠诚地为达到这种团结而努力的，今后也将尽我所能来这样做，而且我特别要向你保证，我们英国人决不会争取建立或者容忍一个对俄国不友好的波兰政府。如果一个波兰政府不是真正符合我们在雅尔塔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没有适当地尊重我们西方世界所了解的那种个人权利，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样的波兰政府。

8.关于你谈到希腊和比利时的那一段话，我承认在我们当初不得不派

出重兵去镇压全国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对雅典中央政府的进攻的时候，你曾给予我这种考虑。我们已经屡次发出指令说，贵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利益应该被视为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把我们完全排除在外，我们不喜欢你们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下层人员对待我们的态度同你们惯常对待我们这些最高级人员的友善态度如此不同。我们在希腊只寻求持久的友谊，并且只愿意看到它独立和完整。但是，我们并不想决定它应该成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们对希腊的唯一政策就是尽速使情况恢复正常，并且希望在四五个月内就举行公正的自由选举。选举将决定政权，然后再决定宪法。人民在享有自由和普遍选举权的条件下所表现的意志必须占首要地位：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如果希腊人决定成立共和国，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我们将设法影响希腊政府，使它邀请俄国代表来自由地观察希腊所发生的事，而且在选举的时候，我希望有苏、美、英三国的专员派往希腊各地，以保证希腊人民在竞争的各党派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不受威胁或者别的阻挠。在这以后，我们在希腊的工作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

9. 至于比利时，我们不要求任何条件，虽然如果比利时开始设置用来进攻我们的火箭炮设备和其他设备时，我们自然是会感到不安的。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不论按照人民的决定采取了哪一种形式的政府，一定要建立起防止德国西侵的总的防御制度。比利时象波兰一样，既是战场，又是交通要道，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些考虑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东西，大量的军队是无法行动的。

10. 至于你所提到的第三点，即关于波兰，我们确实已经同美国人协议好一个确定的行动方针。这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这个问题得出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我们都从心底里感觉到，自从克里米亚会议以来，我们是受了亏待。如果从相反的观点来看，无疑会觉得事情很不同。但是，我们绝对地一致认为，我们已经保证，波兰应该成为一个主权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国家，其政府必须充分地代表波兰人中间的所有民主分子，这个保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信用和责任的问题。我想英美两国的态度是决计不会改变的，而且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了，我们就一定会这样说的。归根到底，

1944 年初，主要是由于我的主动倡议，我们和你一起宣布了你所要求的波俄边界，即把里沃夫划归俄国的寇松线。我们认为，对于你同我们一起宣布的同一政策声明的另一半，即只要波兰对俄国友好，它应该有主权、独立和自由这一点，你应该接近我们的意见。因此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同意建立有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 4 名代表，其他各民主力量则各有 1 名代表参加的南斯拉夫类型的政府。在政府里应当保持适当的均衡和重要的职位应该作适当的分配。这个结果应该通过同反俄的情绪不很坚决的各种波兰力量的真正的代表进行讨论后达到，正像我们在克里米亚已商量好的那样。

11. 目前还产生了困难，因为从波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消息，很多议员都以急切的心情收听着这些消息，而且随时都会在议会中和报纸上猛烈地提出问题，尽管我反对这样做。关于这些消息，虽然我们再三要求，莫洛托夫先生根本就不供给我们任何情况。比如，有一个传言说，四个星期以前有 15 个波兰人会见了俄国当局，进行了商谈；还有关于维托斯先生的类似的传闻，不过时间更近一些；还有很多关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的说法，等等。你们既不供给我任何情况，而我和美国人又都不获准派任何人去波兰亲自了解事实真相，叫我怎么能够来否认这种种抱怨呢?在我们所占领或者解放的土地上，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派代表团来；人们不能理解，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英国代表团到你们所解放的外国去进行类似的访问。

12. 你们和你们所控制的那些国家，再加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靠拢在一边，而操英语的国家和它们的同盟者或自治领却靠拢在另一边，这样一种前景，不能使人感到安适。如果双方一旦发生争吵，显然会把世界撕成四分五裂，而所有我们这些各方的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将会在历史上遭到耻笑。即使长期地怀有猜疑，进行对骂，奉行敌对的政策这类事，也会成为阻碍人民群众在世界各地获得繁荣、昌盛的一种灾难，繁荣昌盛只有当我们三国团结在一起时才能取得。我希望在我这篇倾心相见的谈话中，没有任何在无意间得罪你的字眼或者语句。要是有的话，就请告诉我。但是，我的朋友斯大林，请你不要低估在这些事上开始产生的分歧，这些事你可能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小事，可是它们象征了操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人生的看法。

1945 年 4 月 28 日

第 45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29 日

我刚才接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来电，电报中说，在举行了有贵国军官出席的一次会议之后，德国人已经接受了向他们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并且正在把投降书的主要条款转致冯·维丁霍夫将军，要他提出结束敌对行为的生效日期和钟点。因此，看上去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全部德军几乎立刻就要投降了。

1945 年 4 月 29 日

第 45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4 月 30 日

4 月 28 日来电已经收到。

你建议以四大国的名义发布一项确定德国失败和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以防可能在德国不会组成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我对这一建议没有反对意见。

已向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发出指示，在宣言的序言中（该序言的初稿是由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加添一项确定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1945 年 4 月 30 日

第 453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加急极密信

1945 年 4 月 30 日

1.今天我接获亚历山大元帅的下述通知。我们大家都应当为这一次大规模的投降感到高兴。

“冯·希维尼茨中校和维尔涅尔少校分别代表西南线德军总司令冯·维丁霍夫将军以及党卫军和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德国驻意大利军队的全权总代表、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今天，4月29日英国时间14时00分签订了投降条款。冯·维丁霍夫和沃尔夫指挥的地区包括全部意大利（伊松卓河以东的威尼萨—朱里亚的部分地区除外）、福拉尔贝尔格、基洛尔、柴尔茨堡省和卡林基亚的一部分。

军事行动应在5月2日格林威治时间12时00分终止。

在举行签字仪式时冯·希维尼茨指出，在某些方面他已越出了冯·维丁霍夫所授予他的全权，但是我并不以为这会影响到结果。

冯·希维尼茨和维尔涅尔目前正经由瑞士返回位在波尔察诺的冯·维丁霍夫的参谋部。他们应在明天，4月30日，到达该地。等他们到达后，在我的参谋部和冯·维丁霍夫的参谋部之间将建立起直接的无线电联络。基斯连科将军同另一位俄国军官也在场。重要的是在条款生效以前不要走漏任何消息。”

2.杜鲁门总统建议，关于投降的第一条消息由亚历山大元帅发出。既然贵国军官也曾在场，我已给亚历山大元帅下了相应的指令。

1945年4月30日

第454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2日

4月27日关于红军和英、美武装力量占领德国和奥地利的程序的来电已经收到。

我这方面应该说，苏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发出指示，以便在苏军和盟军会师时苏军统帅部立即建立起同美英部队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并

使它们通过相互的协议：（1）确定临时的战术分界线，并（2）采取措施以便在自己的临时分界线的范围以内镇压德国部队的任何抵抗。

1945 年 5 月 2 日

第 45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2 日

4 月 29 日和 30 日关于德国人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两封来电均已收到。

谢谢你的通知。我并不反对关于德国人在意大利投降的第一条消息由亚历山大元帅发出。

1945 年 5 月 2 日

第 45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4 日

4 月 28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已经收到。

我应当说，你为了辩护自己的立场所作出的那些论据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你想把关于承认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对波兰的榜样的建议看作是拒绝我们之间业已商定的关于建立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程序。这一点是不能予以同意的。依我看来，南斯拉夫的先例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这个先例指出了关于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问题的最适当而实际的解决办法，并且把在国内实施国家权力的现有的政府机关作为联合政府的基础。

很明显，如果不把享有大多数波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波兰现行临时政府作为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那么，就没有可能指望顺利地解决克里米亚会议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任务。

2.关于你所提出的由三大国对希腊的一部分地方建立选举监督的见解，我觉得没有可能表示赞同。对于一个盟国的人民进行这种监督，只能看作是对该国人民的侮辱和对它的内政的粗暴干涉。即使对于那些以前曾是卫星国家而以后又曾对德国宣战并转到盟国方面来的国家，这种监督也是多余的，而这些国家，譬如说芬兰，进行选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芬兰，选举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

你关于作为战场和交通走廊的比利时和波兰两国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波兰，它是苏联的一个邻国，这一特点就要求将来的波兰政府真正力求波兰和苏联间保持友好关系，而这对所有其他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也都是有利的。这一情况也正说明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采用的。各联合国家是关心苏、波间有持久而经常的友谊的。因此，如果把那些像你所说的“并不坚决反俄”的人拉进来参加组成将来的波兰政府的工作，或者仅仅排斥那些据你认为是“对俄国采取极端不友好态度”的人参加这一工作，那是我们所不能感到满意的。这两类人都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只有那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并且忠实地、真诚地愿意同苏联合作的人才能够参加关于组织将来的波兰政府的协商工作。

3.我应当特别提一提来信中的第 11 点，这一点里谈到由于谣传逮捕了 15 个波兰人而发生的困难，谈到驱逐出境等等。

我可以就此事通知你，你所提到的那批波兰人不是 15 个，而是 16 个。这批人的头子是有名的波兰将军奥库里茨基。英国方面的消息对于这一个同其他 15 个“失踪的”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故意避而不谈，这是由于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我们不

打算对此事闭口不谈。这批以奥库里茨基将军为首的16个人，已由苏联前线军事当局予以逮捕并正在莫斯科审讯中。奥库里茨基将军等这一批人，首先是奥库里茨基将军本人，被控曾在红军后方策划和进行破坏活动，使红军中100多名军官和战士遭到牺牲，并被控在我军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发报台，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他们之中所有的人，或者一部分人，将视审讯的结果交由法庭处理。这是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部队和自己的后方以防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的阴谋所必需做的。

英国新闻界散布谣言，说在赛德列茨暗杀了或枪决了波兰人。英国新闻界这条消息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看来，这是由阿尔基谢夫斯基的党徒们供给英国方面的。

4.从你的来电中可以看出，你不同意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是将来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也不同意临时政府在将来的全国政府里占有它所应有的地位。我应当坦白地说，这种立场使得就波兰问题达成一致同意的决定成为不可能。

1945年5月4日

第45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5日

1.杜鲁门总统通知我，说他在给你的电报中曾建议我们在同一时间发表关于欧洲胜利日的声明。我对此完全同意。

2.对我说来最方便的时间是中午，我关于战胜德国的声明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考虑到英国夏令时间，这将相当于贵国时间下午1时。但是，这样就恶求杜鲁门总统的文件在清晨6时在华盛顿广播，这一点对于杜鲁门总统和美国人民未必方便。因此我建议同意美国的意见，并确定时间为

英国夏令时间下午3时，即相当于贵国现行时间下午4时。这样将使杜鲁门总统有可能在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声明。

3.你对此是否同意，希尽速通知杜鲁门总统和我。

1945年5月5日

第45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6日

5月5日关于发表欧洲胜利日声明的时间的来电，已于5月6日收到。

你建议把时间确定为英国夏令时间下午3时，即莫斯科时间下午4时。我对此没有意见。我也把此事通知了杜鲁门总统先生。

1945年5月6日

第459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7日

总统同意在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即伦敦时间下午3时和莫斯科时间下午4时用广播宣布欧洲胜利日。由于地球是圆的，这对我们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时间。我希望你打电报告诉他和我，说你同意此事。

日期预定为星期二，即5月8日，但我将在星期一，即5月7日，肯定星期二究竟行不行，或者应延期至星期三，即5月9日。

1945年5月7日

第46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5月7日

我们的军事代表团想必已将艾森豪威尔将军5月7日的电报转告你。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要把德国投降的消息保持秘密到星期二是不可能的。对德国部队下的命令将公开发布，要想防止这条新闻的传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些情况，他坚决请求尽早发表我们三国政府的声明。我认为这样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建议今天，星期一，晚上6时发表声明，即莫斯科时间晚上7时和华盛顿时间中午12时同时发表。

我衷心地希望，这样做不会使你感到不便。据我从艾森豪威尔将军处获悉，关于今天早晨1时41分达成的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定于星期二在柏林举行的问题，他将同你商量以求得一致的意见。

1945年5月7日

第461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7日

由于共同商定较早发表声明的时间有困难，很遗憾，我已决定把我的广播声明延迟到原先约定的时间，即延迟到明天，星期二下午3时，即相当于莫斯科时间下午4时。

报刊上已经发布消息，说到明天发表声明的时间，并指出把明天，即星期二，作为欧洲胜利日，并且要把它当作一个节日。由于需要考虑到劳动人民群众，所以这样做是必需的。

我已通知杜鲁门总统。

1945年5月7日

第46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7日

5月7日关于宣布德国投降的来电已经收到。

红军最高统帅部没有把握，东战场的德国部队会不会履行德军总司令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在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将处在不方便的地位，并会把苏联的舆论引入迷途。必须注意到德国部队在东战场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从无线电中截获的消息来判断，大批德国部队明目张胆地声明说他们打算继续抵抗而不服从邓尼茨关于投降的命令。

因此，苏军统帅部希望稍加观望，等到德国部队投降条款生效的时候为止，因此，希望把三国政府宣布德国人投降的时间延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7时。

1945年5月7日

第46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5月8日

我方才收到了你的来电，并且也看到了安东诺夫将军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在那封信里建议把宣布德国投降延迟到1945年5月9日。我不可能像你所建议的那样把我的声明推迟24小时。此外，议会还会要求关于昨天在莱姆斯签字的消息和关于预定今天在柏林进行正式批准的消息。我在电话里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谈了一下，他对我保证说，他打算用下面的办法来进行充分的合作，即用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来对付那些可能不服从他们本国政府和最高司令部命令的狂热的敌军部队。当然，这样就牵涉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一切英美武装力量。我将在我的声明里说清楚，在个别地方还在进行着抵抗。如果注意到战线十分漫长和德国政府的瘫痪状态，这就不足为奇了。我想杜鲁总统会在今天美国时间上午9时发表声明，我希望你也能够像原先约定的那样在适当的保留之下发表你的声明。

1945年5月8日

第 46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

——代表英国给红军和俄国人民的信——

1945 年 5 月 9 日收到

我衷心地庆贺你们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了敌寇并且击溃了纳粹暴力统治而取得的辉煌胜利。我坚信，人类的未来系于英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自己的岛国里，经常想念你们，并从内心深处预祝你们幸福和安宁。我们希望，在我们一同经历了黑暗的岁月并且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和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之后，我们现在被忠诚的友谊和相互同情联系在一起，我们将能够在胜利了的和平的旭日照耀之下继续前进。

我托我的夫人向你们大家转达这种友好和钦佩之意。

第 46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

——代表苏联各族人民给英国武装部队和英国人民的信——

1945 年 5 月 10 日

我向你本人、英勇的英国武装力量和英国全体人民致意，并衷心地庆贺你们击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德国帝国主义——而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结束了苏联、英国和美国军队为解放欧洲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在战争时期所结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的时期里将会获得进一步的顺利发展。

我责成我国驻伦敦的大使向你们大家转达我对你们所取得的胜利的祝贺和最良好的愿望。

1945 年 5 月 10 日

第466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12日

我已收到了你5月2日的来电，那封电报中谈到我们两国军队将来发生接触的时候在德国和奥地利应该实施的一些措施。我高兴地得悉，你已经给苏联的指挥官们发出了指示，并且把这一消息转达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元帅。

1945年5月12日

第467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15日

1.很遗憾，我应当说，在意大利的威尼萨—朱里亚省里发生了严重的情况。

2.过去一直认为，意大利在前一次战争以后所取得的这个省份的未来命运应当在讨论和约的时候加以确定，因为该省居民中的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而只有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在讨论和约之前，唯一正确和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个省份交由亚历山大元帅实行军事管制，由他来占领这一省份，并且以所有联合国家的名义来实行管理。

3.但是，在这一切能够实行之前，南斯拉夫的常规军开进了该省，不但占领了那些过去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曾经活动过的农村地区，并且还开进丁普拉、的里雅斯特、哥里齐亚和蒙法尔冈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从西部挺进的亚历山大元帅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在同时到达了的里雅斯特，并且已经接受了德国在的里雅斯特和在其他地方的卫戍部队的投降。

4.在这以后，亚历山大元帅曾向铁托元帅建议，让南斯拉夫的部队和

行政机关撤出该省的西部，以便使亚历山大元帅能够控制在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请求。亚历山大元帅建议在该省的西部建立起盟国军政府，特别是要把的里雅斯特包括在内。并且明确地表示了，所以采取这一措施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且决不会影响该省问题的最后解决；按英王陛下政府的意见是，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应当推迟到和平会议上去讨论。

5.亚历山大元帅曾派他的参谋长到贝尔格莱德去同铁托元帅讨论这一建议，但是很遗憾，铁托元帅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还坚持要把他的军政府扩大到伊松卓河为止，只是向亚历山大元帅表示愿意协助他建立起通过的里雅斯特同奥地利的联系。

6.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同意这一措施。由南斯拉夫来占领和管制这一省份是同我们力求遵循的原则相违背的，这一原则是：该省的命运不应该通过军事占领的途径以征服和片面建立主权的办法来求得解决。

7.正如你所知道的，亚历山大元帅既指挥着英国的部队，也指挥着美国的部队，因此他的举动不仅代表英国政府，也代表着美国政府。由于考虑到铁托元帅所采取的立场是不能接受的，他现在已把这个问题提交英、美两国政府研究。

8.英、美两国政府在仔细地研究了他们所面临的情况以后，已决定向南斯拉夫政府作如下的声明：

“关于威尼萨—朱里亚的问题只是那些应当通过共同和平协商求得解决的欧洲许多领土问题中间的一个问题。企图通过征服和片面宣布主权的办法用占领来解决问题的原则是一种敌人所采用并且已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的办法，这种原则已经为参加这次战争的各盟国政府所坚决地、庄严地否定了。由大家共同努力来寻找对各项领土要求的有组织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这一一致同意的意见应当成为基本原则，为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各同盟国家的人民曾经付出巨大的牺牲以求获得公正的持久和平。这是各联合国家的代表们在世界公众舆论的赞同之下，为了建立国际安全体系而正在努力解决的那些极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对威尼萨—朱里亚违立盟国军事管制的计划之所以曾被接受，正是

为了想求得问题的和平的、持久的解决，而这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是大家所公认的。上述计划的目的是尊重所有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这一计划的实现会保证各盟国政府的军事力量能够在敌国领土上实现今后的任务，同时在最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不会使南斯拉夫的要求受到任何损害。

“考虑到这控见解并注意到南斯拉夫政府总的说来已经同意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各项计划，我国政府已指示我通知你，我国政府期望南斯拉夫政府立即同意由地中海战场的盟军最高统帅来管制这一区域，该区域应该包括的里雅斯特、哥里齐亚、蒙法尔冈和普拉，经由哥里齐亚和蒙法尔冈通往奥地利的交通线，以及从交通线向东伸展的一定地区，使相应的行政管制得以实现；我国政府并且期待南斯拉夫政府给予驻在这一区域的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以相应的指示，使他们能够与盟军统帅合作，在这一区域内建立起在盟军统帅管辖下的军事管制。

“我已接获指示尽早向我国政府报告，南斯拉夫政府对上述各节是否准备立即同意”。

9.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应该在尽量短的时期内把英、美两国政府由于南斯拉夫的政府和军队在威尼萨—朱里亚所采取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通知你。

1945 年 5 月 15 日

第 468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17 日

1.虽然你 4 月 13 日对哈里曼先生发出了邀请书，苏联政府却仍然拒绝允许各盟国的代表访问维也纳，我对此事感到惊异。维辛斯基先生在他给英国代办的信里提请注意的一件事实，即盟国部队进入德国领土以前德国和柏林的占领区已经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在三国的基础上确定好了，在我看来，同苏联政府拒绝允许盟国的代表们前往由苏联武装部队解放的维也

纳是没有关系的。维辛斯基先生建议把关于占领区问题的最后决定从欧洲咨询委员会转到维也纳去处理，我却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在欧洲咨询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曾有一次由于发现原定的苏联占领区有一部分已被破坏，就修改他自己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这种情形使我感到，我们也有充分权利得到机会来就地研究那些足以影响我们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的因素。

2.为了使我们在欧洲咨询委员会里迅速缔结协定的工作便于进行，而我相信这一点你是认为适当的，我请求最好给予多尔布亨元帅以必要的指示，以便盟国代表们能够立即飞往维也纳。

1945 年 5 月 17 日

第 46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18 日

我收到了你 5 月 17 日关于英国代表为成立维也纳占领区而前往维也纳的问题的来电。

苏联政府认为，维也纳占领区的建立，正如研究其他各项有关奥地利地位的问题一样，完全属于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一点是我们同你和罗斯福总统商定了的。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同意盟国的军事代表前往维也纳建立占领区并解决有关奥地利地位的其他各项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的看法。从你 5 月 17 日的来电中可以看出，你也并不认为可以把关于占领区的问题移往维也纳去解决。既然我们对这个问题抱有同样观点，应当认为，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占领区问题将会在最近期内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中得到解决。

至于英国代表前往维也纳，以便就地了解该市的情况并准备关于维也纳占领区的建议，那么，苏联政府方面对此并无反对的意见。因

此，正在根据这一点向多尔布亨元帅发出必要的指示。并且还考虑到英国军事代表可以在5月底或6月初抵达维也纳，目前在返回莫斯科途中的多尔布亨元帅那时将已返回维也纳。

1945年5月18日

第470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22日

虽然你5月15日的通知并未要求答复，但是由于我对杜鲁门总统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必须答复，我认为把我复电的文本抄送给你，并不是多余的事。

1945年5月22日

附件 **斯大林致杜鲁门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22日

你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问题的来电，已经在5月21日收到。前些时候我已经收到你经凯南先生转交给我的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关于同一问题给南斯拉夫政府的通知的抄本。谢谢你的通知。

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么我应当谈谈下面各点。

你认为每个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并且认为在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领土问题上不允许有任何对南斯拉夫的合理要求以及南斯拉夫武装力量在盟国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不加充分估计的行为，我认为你的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不言而喻，这一块大多数居民是南斯拉夫人的土地的未来命运应当在缔结和约的时候加

以决定。但是现在涉及到的是对这一地区实行临时性的军事占领的问题。依我看来，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的部队把德寇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上赶走，并从而对盟国的共同事业立下了重要的功绩。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当南斯拉夫人民为争取南斯拉夫的民族权利并为各联合国家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之后，要否定南斯拉夫有权占领这一块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的土地，那是不公正的，而且对南斯拉夫军队和南斯拉夫人民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如果让南斯拉夫部队在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就地留下并让现在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的南斯拉夫行政机关存在下去，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才是正确的。同时盟军最高统帅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建立管制，并且由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如果接受这些建议，那么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行政权力的问题就会获得正确的解决。

既然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并且远在德国占领时期那里已经建立起南斯拉夫的地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到现在仍享有当地居民的信任，因此就应当考虑到既成的事实。让这个地区里现有的南斯拉夫民政机关隶属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指挥部，就会使这块土地上的行政管理问题获得适当的解决。

我希望美、英两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所发生的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区的地位问题的误解将会消除，而全部问题将获得妥善的解决。

1945 年 5 月 22 日

第 47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22 日

我高兴地接获你5月18日的来电。有关的指示将通过亚历山大元帅发给我们的军事代表，亚历山大元帅将通过通常的途径同多尔布亨元帅建立联系。正如我在5月17日的电报中已经通知你的，我不希望把最后解决占领区问题的工作从欧洲咨询委员会转到维也纳去处理。

1945年5月22日

第47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5月23日

根据苏联陆海军司令部的材料，德国已根据投降书把全部军用和商用船只移交给英国人和美国人。我应当通知你，德国人甚至连一只军舰或商船都不肯移交给苏联武装部队，而把全部船只开走，去移交给英、美武装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按照以前对意大利的先例把德国军舰和商船中的一部分拨给苏联的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它有充分理由并且依照公正原则可以期望至少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军舰和商船。我并且认为必须保证使苏联的海军代表有可能知道关于德国军舰和商船移交的一切材料以及移交后船只的实际情况。

苏联海军司令部指定列夫钦柯海军上将带领一批助手处理此事。

我并将同一电文拍给杜鲁门总统。

1945年5月23日

第47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5月24日

承将你给杜鲁门总统的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件副本送来，特致谢意。

1945年5月24日

第 47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26 日

谢谢你 5 月 23 日的来电。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们同杜鲁门总统间应该及早举行的一般性会谈中的题目。感谢你把你的意见事前通知我。

1945 年 5 月 26 日

第 475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27 日

前来莫斯科的霍普金斯先生代表他的总统提出了我们三人在最近期间会晤的问题。我想，会晤是必要的，并且最方便是在柏林近郊举行。这样做想必是正确的并且合乎政策的。

你是否有反对意见？

1945 年 5 月 27 日

第 47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27 日

八个多月以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同希特勒德国决裂了，同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站在盟国方面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而且为此派出了本国的武装部队。这样他们就对击溃希特勒主义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推动战争在欧洲的胜利结束。因此，苏联政府认为立即同罗马尼亚政府和保加利亚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是适时的。

苏联政府并且认为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是合适的，因为芬兰正在履行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我看，过一些时候对匈牙利采取类似的决定也是可能的。

我同时把同一电文拍给美国总统。

1945 年 5 月 27 日

第 47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5 月 29 日

兹答复你 5 月 27 日的来信。

1. 我将很高兴在最近期间在柏林近郊同你和杜鲁门总统会晤。

我希望这次会晤可能在 6 月中举行。

2. 我已把这一电报抄送杜鲁门总统，他曾通知我说这一问题在你同霍普金斯先生的谈话中已经提出了。

向你致一切良好的愿望。我很希望早些同你会见。

1945 年 5 月 29 日

第 478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5 月 30 日

5 月 29 日来电已经收到。

接到电报后几个小时，霍普金斯先生曾来访，并通知我说杜鲁门总统认为我们三人会晤最方便的日期是 7 月 15 日。如果你对这个日期同意的话，我也没有反对意见。

向你致最良好的愿望。

1945 年 5 月 30 日

第 47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1 日

我将高兴地率领英国代表闭前往柏林，但是我认为 7 月 15 日，我重复一遍，7 月，即 6 月以后的一个月份，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共同加以注意的紧急问题来说是太晚了，我并且认为如果我们让那些个人的或本国的要求来妨碍我们更早地会晤，那么，我们将对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带来损失。虽然我国目前尖锐的竞选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我不能把自己在本国的任务同我们三人的会晤相提并论。我建议 6 月 15 日，我重复一遍，6 月，即 7 月以前的一个月份，但是如果这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在 7 月 1 日、2 日或 3 日呢？

我已将此电拍给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6 月 1 日

第 480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5 日

鉴于你在来信中说你希望把三人的会晤日期提早到 7 月 15 日以前，我想再说一遍，7 月 15 日的日期是由杜鲁门总统指定的，而我对这一日期曾表示同意。既然你正在就这一问题同杜鲁门总统函商中，我就不对我们会晤的日期提出任何新建议了。

1945 年 6 月 5 日

第 481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6 日

谢谢你6月5日的来电。我已通知杜鲁门总统，我同意你和他谈妥的日期，即7月15日。

1945年6月6日

第482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6月10日

1.谢谢你5月27日的来信，该信通知说，据你的意见，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并通知说，最近期内对匈牙利可能采取类似的决定。

2.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关于我们今后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你和美国政府提出一些详尽的建议。我希望，在我们即将举行的会晤期间，我们将能对这些建议加以讨论。

1945年6月10日

第483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6月14日

谢谢你6月10日关于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匈牙利恢复外交关系的来电。我注意到你将在最近期间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建议送来。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再拖延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恢复外交关系，因为它们同苏联军队一起为击溃希特勒德国尽了力。也没有理由拖延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因为它正在履行和约条款。同匈牙利则可以稍稍晚一些。

1945年6月14日

第 48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14 日

1. 因为 7 月 15 日在柏林开始的我们的会议将在英国选举结果公布以前举行，我认为我带着反对党的官方领袖艾德礼先生一起赴会是适当的，这样可以保证英国的政策后继有人。我已本着同样的精神把自己的打算通知了杜鲁门总统。

2. 我愉快地期待着同你的新的会晤。

1945 年 6 月 14 日

第 48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15 日

我建议我们用“终点”一词来作为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的代号。你同意否？

1945 年 6 月 15 日

第 48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15 日

6 月 15 日来电收到。我同意你关于“终点”的建议。

1945 年 6 月 15 日

第 48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15 日

1.我看到了杜鲁门总统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本，该信是关于所有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的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于6月21日起开到他们的占领区的问题。

2.我也准备指示蒙哥马利元帅，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为英国部队同样地开到他们在德国的区域，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开进大柏林以及为保证英国部队在柏林和英国占领区之间空中、铁路和公路上运行自由所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

3.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特别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部队在驻德国的部队开始调动的同一天退出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原则协议应该成为英国占领区一部分的奥地利领土。

1945年6月15日

第488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6月15日

1.在我们的会议期间乔治国王将出访法国和德国，检阅本国的部队，同时他也许会访问美军总部，他将在7月15日启程。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同你和某些苏联将军会面。因此他希望在我们大家都在柏林的时候前往该地逗留一天。他当然不会参加会议的业务工作。他将住在英国占领区里。如果你能邀请他到苏军总部共进早餐，他将很高兴。晚上他将在英国占领区设宴，并邀请你和苏联其他活动家以及杜鲁门总统及其代表团人员赴宴。如果杜鲁门总统愿意的话，国王将在第二天出席总统的晨宴。然后他再去检阅本国的部队。国王在柏林逗留期间，他无疑地将愿意授予英国、俄国和美国的指挥官以英国纪念章，受奖人名单将经由通常途径共同商妥。总而言之，我希望这次出访会成为一次亲善的表现和隆重的事件，而这在其他各方面来说也是有利的。

2.我现在把同样内容的电报拍给杜鲁门总统。请你通知我，你对这事

意见如何，因为我需要向国王陛下报告。

1945 年 6 月 15 日

第 489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17 日

你关于盟国部队退回到各自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的来电，已经收到。

很遗憾，我应当说，英国和美国部队要在 6 月 21 日开始调往他们的驻区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部队要在 6 月 21 日开进柏林是有困难的，因为朱可夫元帅和我们所有其他的司令官将从 6 月 19 日起被邀前赴莫斯科参加最高苏维埃的常会以及筹备并且参加 6 月 24 日的检阅。他们只能在 6 月 28 日或 30 日以后才能返回柏林。同时应当考虑到，柏林的扫雷工作还没有结束，而扫雷工作只能到 6 月底才能结束。

至于奥地利，我应当重复一下我上面说过的关于苏联的司令官们被召回莫斯科以及关于他们返回维也纳的日期的话。此外，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近日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和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而这一工作迄今为止还没有办妥。

由于上述一切，我建议把有关部队开始调动和进驻它们各自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的日期推延到 7 月 1 日。

此外，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现在就应该确定由法国部队占领的区域。

必须在德国和奥地利采取的一切措施将由我们根据上述计划加以实行。

我并且已经把上述一切情况电告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6 月 17 日

第490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绝密信

1945年6月17日

1.尽早确定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的准确地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必须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2.我肯定地认为并且相信你会同意在这次开会时俄国、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都应当有各自的区域，并且他们应当自行负责关于准备房屋、组织膳食、交通、保卫、通讯等等方面的各项工作。我建议另外划出一个第四区，使三国代表团可以在这个地区聚集和开会。如果苏联政府负责这一个供集会用的公共地区的工作，那将是十分珍贵的。

3.杜鲁门总统完全同意上述建议。

4.因此，如蒙你尽速通知我，你认为柏林郊区的哪一地区可以当作会址以及这一地区内的哪些确定的地段可以分别拨给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那我将感到高兴。我在接获你的回答以后，将立即指示蒙哥马利元帅派出先行人员前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朱可夫元帅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协商，为英国代表团进行一切筹备事宜。

我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想使飞机场尽可能靠近我国代表团的所在区域。我希望这件事不致被忽视。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同美国人合用一个机场。

1945年6月17日

第49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6月18日

6月1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你认为英国代表团需要包括艾德礼先生在内，你就这个问题所举

出的理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45 年 6 月 18 日

第 492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18 日

6 月 17 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1.代表团团址的安排将如你在来电中所建议的那样办理，并且参照以前在克里米亚所采取的那种办法。每个代表团将有自己单独的团址，这个区域里面的制度由代表团团长自己决定。三个代表团的团址都在巴贝尔斯堡，位于波茨坦的东南方。一起开会时用的第四个地区是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宫殿。

2.朱可夫元帅将于 6 月 28 日回到柏林。在这个日期以前应该派遣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先遣人员去巴贝尔斯堡验收房屋。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先遣人员在那里可以从克鲁格洛夫将军处获得有关房屋的一切必需的参考资料和说明，克鲁格洛夫将军是贵国人员在雅尔塔时就认识的。

3.离开各代表团所在地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良好的飞机场，于克拉多夫，可以降落。

1945 年 6 月 18 日

第 493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21 日

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接受美英两国政府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

雅斯特地区的建议，在的里雅斯特进行的会谈看来已经陷于僵局。这主要只能归咎于地中海盟军司令部的代表们不愿意考虑南斯拉夫人的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愿望。但是，南斯拉夫人把那个地区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功绩，而且该地区内南斯拉夫人占了多数。从盟国的观点看来，这种情势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不愿意使事情恶化，我在函电中一直没有提起过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言行。但是，现在应该强调指出，我不能够接受亚历山大元帅在会谈中有时候谈到南斯拉夫人时所用的那种轻蔑的语调。亚历山大元帅在一次正式的公开函件中竟然把铁托元帅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比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作这种比较是毫无道理的，对南斯拉夫是一种侮辱。

英美代表在 6 月 2 日交给南斯拉夫政府的一项声明中竟然使用了最后通牒的语气，这也是苏联政府所料想不到的。用这种办法怎么能够获得可靠和积极的结果呢？

这一切使我不得不提请你注意已经产生的这种局面。同以前一样，我希望关于的里雅斯特一伊斯的利亚问题，南斯拉夫的合法利益应予满足，特别因为南斯拉夫人在主要问题上已经向盟国作了让步。

1945 年 6 月 21 日

第 494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
极为机要和绝对保密的私人信

1945 年 6 月 22 日

昨天我又同国王谈了一次，他的想法是，也许最好是由他在一个约定的日子前往柏林，日程只有一项，就是邀请你和杜鲁门总统并包括一些有关的客人，共进早餐，然后下午离柏林继续进行视察旅行。我觉得，这也

许对你会更加方便些。请你肯定地通知我，你的意见怎样，并请你相信，你这样做是不会使我们觉得有任何为难的。

1945 年 6 月 22 日

第 495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23 日

我建议按照克里米亚会议的先例不让新闻界的代表参加“终点”，但是可以准许摄影师出场。

我已把同样的电报拍给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6 月 23 日

第 496 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23 日

6 月 22 日关于国王出访柏林的来电以及关于同一问题的上次来电，都已收到。

在我的计划里本来没有同国王会见一项，而只考虑到三人会议，关于这次会议是我以前同你和杜鲁门总统通信时商量过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我进行这种会见是必要的，那我对你的计划也没有反对意见。

1945 年 6 月 23 日

第 497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6 月 24 日

十分感谢你6月21日的来电。我希望现在，即在事情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处理妥善之后，我们可以在柏林共同讨论局势。虽然亚历山大元帅的声明在公布以前我并未过目，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无论对俄国或者对铁托元帅的态度都是很好的。我相信，多尔布亨元帅是会证实这一点的。

1945年6月24日

第498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6月27日

我同意你在6月23日来电中所提出的建议。

1945年6月27日

© Getty Images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一月

第 499 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 年 7 月 1 日

关于国王在我们会议期间访问柏林的建议，承对此发来非常亲切的电报，我向你表示极大的感谢。我很感激你的答复。但是国王认为目前去德国旅行没有可能，因为三人会议已经需要大量机要人员和负责特殊任务的军官。他现在告诉我，他愿意在目前出访乌尔斯特尔。因此我应当请求你原谅我，因为我再度向你提出了我在 6 月 23 日已经接到你的答复的问题。

1945 年 7 月 1 日

第 500 号

丘吉尔给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 年 7 月 4 日

既然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让新闻界的代表参加“终点”，我认为事前公开宣布这一点是适宜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引起失望，并且新闻界著名的代表也就不会去柏林了。我建议我们每一个人都声明一下，记者是不许参加“终点”的，今后需要发表的一切消息都将用官方公报来发表，关于公报的问题可以临时解决。

我已把类似的电报拍给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7 月 4 日

第501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7月6日

关于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南斯拉夫问题的来电已经收到。我并不反对在我们即将在德国举行会谈的期间讨论这一问题。

1945年7月6日

第502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密信

1945年7月6日

7月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

你建议事前告诉新闻界的代表，他们不得参加“终点”，我同意这一建议。

1945年7月6日

第503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密信

1945年7月6日

我从总统那里知道，他将按照我们的协议在今天声明：新闻界不准进入“终点”，从“终点”发出的一切消息将用官方公报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临时解决。

总统通知我说：他也把类似的电文送给了你。

我预料你是会同意的，我们今天在伦敦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1945年7月6日

第504号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7月12日收到

现将里宾特罗普给我和艾登先生的信附去。我想，虽然这封信很长，而且很枯燥，但是有一部分内容你是会感到兴趣的。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

第505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7月27日收到

由于丘吉尔的辞职，英王陛下责成我组织政府。我相信，你会了解，由于我所面临的急不可待的任务，我不能及时回到波茨坦去参加规定在7月27日星期五5时召开的全体会议。

我打算在7月28日星期六下午开会前到达波茨坦，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能够为此而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我将十分感谢。对于由于这次延期而引起的麻烦，我表示很大的歉意。

第506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的私人密信

1945年7月27日

7月27日收到了你的来电。对于你提出的把我们会议的时间订为7月28日星期六的建议，我没有反对意见，开会的钟点可以由你决定。

1945年7月27日

第507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

1945年8月1日

尊敬的大元帅：

今天白天承蒙你通知我，对于最近三、四年来同在苏联服役的英军官兵和少数平民结了婚的一些年轻妇女退出苏联国籍的问题，你将促其早日办妥。

我想向你表示热烈的谢意，并且借此机会向你声明，你给将近20对年轻夫妇带来了幸福。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建议责成克拉克·寇尔爵士同莫洛托夫先生在他们回到莫斯科后就讨论这些人退籍的手续。

你的忠诚的

克·艾德礼

1945年8月1日于柏林

第508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的私人密信

1945年8月7日

8月1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我不反对由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同维·米·莫洛托夫讨论在战争期间嫁给英国公民的苏联公民去英国的问题。

1945年8月7日

第509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8月17日

正当和平来临和我们的联军对最后的一个侵略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我向你致热烈的祝贺。

现在在我们面前展现着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新精神的远景，这种新精神足以消除猜疑和对战争的恐惧，并且用信任和合作来代替它们，没有信任和合汚，世界是不会有多大希望的。为此我衷心地希望苏联和联合王国在战争中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谅解在恢复的年代里将会保持下来，并且会更加加强，我们的同盟条约是我们之间密切和持久的合作的基础。

1945 年 8 月 17 日

第 510 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

1945 年 8 月 20 日

欣逢战胜日本的时候，承致友好的敬意和祝贺，对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向你祝贺这次的胜利。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和我们同侵略者战斗的共同目标使苏联和联合王国接近起来，并且促进了我们的合作，现在我们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是我们的同盟条约。

我相信，这种经过了战争和军事危险的考验的合作在战后将会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而日益发展和巩固。

1945 年 8 月 20 日

第 511 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的加急私人绝密信

1945 年 9 月 23 日

1. 昨天在为和约的筹备工作而成立的外长会议的成员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集中在柏林议定书的解释问题上。

2. 贝文先生坚持，最主要的条款就是由联合王国、苏联、中国、法国

和美国的外交部长组成会议来为和平解决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这一决定（柏林会议议定书第一部分甲款和甲〔子〕项），因此应由整个会议对履行它所应尽的一切任务负责。因此他坚决认为会议在9月11日所通过的下述决定是正确的：

“现已达成协议：会议的所有5个成员国都应当有权出席一切会议并参加一切讨论，但是关于和平解决的事项，那些没有签订有关投降条款的成员国的政府没有表决权”。

3.我已同艾登先生谈过，他告诉我说，据他在波茨坦会议上的了解，外长会议可以安排自己的程序，它不必局限于波茨坦协定明确的条款的范围内。

4.莫洛托夫先生认为会议在9月11日的决定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应予撤销；以后负责和约工作的会议只应当由停战协定签字国的外交部长组成；在研究关于芬兰的问题时美国将列入会议的成员国中，中国将完全被排斥在会议之外，而法国则除意大利问题外将不得参加对其他一切和约的讨论。这是不符合我对在波茨坦达成的决定的精神和意图的理解的。

5.会议在9月11日的决定已由5位出席会议的外交部长（包括莫洛托夫先生）所通过，它符合于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所诚挚地持有的观点。按照我的看法，外长会议毫无疑问有权通过上述决议（见柏林议定书第一部分甲款丁〔丑〕项）。此外，不能认为这个决议在任何一点上同波茨坦决定不符，因为对表决权的限制实际上意味着会议在作出决定方面将具有如所建议的成员。既然已经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更广泛地来谈一谈它。9月11日的决定是在经过讨论之后一致通过的，如果对这样通过的决定提出疑问，并且企图改变它们，从而推翻英国外交大臣在其他国家外交部长的真诚同意下所作出的结论，那么我很担心这样会创造恶例。我害怕，这样就会使外长会议的性质，甚至价值，完全转变到不利的方面去，并且会给它的进程带来混乱的因素。我十分怀疑，推翻会议过去的决定是否会得到会议的一致同意，任何要想这样做的企图显然会严重地开罪于法国和中国，对英国的公众和议会说来也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他们我们曾诚恳地报告过：外长会议将作为五国会议而行动，这个声明英国人曾

以快慰的心情欢迎过。莫洛托夫先生提出来的论据是这样的：他的建议会大大加速会议的工作。即使情况是这样（但是讨论的过程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也显然无法抵偿这种开罪对和谐合作所造成的损失。按我的看法，这次会议的成就和外长会议的整个前途，并且实质上说来是对公正的和平的信念，都要被孤注一掷了。因此我衷心地希望你会同意授权你的代表团维持9月11日通过的决定。归根到底我们所努力建立的是和平，而这是比程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

1945年9月23日

第512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的私人密信

1945年9月24日发出

你关于对外长会议的意见分歧的来电收到了。

维·米·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由确切履行柏林会议的决议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这个决定曾明确地载入关于外长会议的决议丙款（乙）项中。外长会议9月11日的决定违背了柏林会议的上述决议，因此是不能同意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外长会议的工作程序，而在于外长会议是否有权取消柏林会议决议中的某些条款。我想，如果一旦让外长会议有权取消柏林余议的决议，我们就会使这些决议变得一文不值。

我认为，维·米·莫洛托夫坚持为了恢复柏林会议的决定而纠正所犯的错误，这不会对会议和外长会议产生消极影响，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委曲。

第513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的私人信

1945年10月30日收到

1.我希望你知道：我最近想去华盛顿会晤杜鲁门总统，以便同他和加拿大总理讨论由于发现了原子能而引起的问题。

2.我希望你会有益地渡过你的休假。

第514号

艾德礼致斯大林的信

1945年11月6日收到

在苏维埃国家建国纪念日的时候，我谨向你致最热烈的敬意和祝贺。愿苏联在你的领导下永远繁荣，愿建筑在我们的胜利、英苏同盟和我们都是联合国会员国这个事实之上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未来的和平年代里更加巩固。

第515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的私人密信

1945年11月8日

关于你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来电收到了。感谢你的来电。

1945年11月8日

第516号

斯大林致艾德礼

1945年11月15日发出

在苏维埃国家建立28周年的时候，承蒙祝贺，谨致谢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ТОМ I

ПЕРЕПИСКА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 И К. ЭТТЛИ

(ИЮЛЬ 1941 г.—НОЯБРЬ 1945 г.)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7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俄文版譯出

1941—1945 年

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

苏联部长会議主席

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第 一 卷

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

苏联外交部編

潘 益 柯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30 元

1961 年 12 月第一版　196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12\frac{3}{4}$ • 字数 303,000

統一书号 3003 • 549

我们的任务和职责是打败敌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和无条件投降。红军将彻底完成它对我国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这项任务和职责。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九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八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8

1941 – 1945

斯大林全集

第十八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二〇一六年·中国

斯 大 林

目　录

第十八卷说明 …… 1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的通信

一、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1 号—第 10 号） …… 3
二、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11 号—第 24 号） …… 11
三、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5 号—第 64 号） …… 20
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65 号—第 98 号） …… 41
五、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99 号—第 153 号）…… 69
六、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154 号—第 210 号）…… 106
七、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 211 号—第 255 号）…… 139
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信件第 256 号—第 347 号）…… 170

九、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二月

（信件第348号—第384号）…… 234

插图

一 斯大林、罗斯福（1）…… 68

二 斯大林、罗斯福（2） …… 169

三 斯大林、罗斯福（3） …… 233

第 十 八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八卷，是根据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中译本编辑的。

该卷汇集了这一时期约·维·斯大林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杜鲁门的来往书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政府首脑之间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

全卷共收录书信384件，其中，斯大林致美国总统的信件共180封。这些书信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位历史伟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精辟分析，展现了他高超的外交才能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本卷所收书信全部按收到或发出的时间排序、编号，从一九四一年八月起，以半年为单位，分成九个部分。

本卷中的注释，一为原书编者注，二为本书制作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视情况放在当页末或篇末。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八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的通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二月

第1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1年8月4日发出

苏联非常重视芬兰中立化并和德国脱离关系的问题。英国和芬兰断绝关系以及英国宣布对芬兰实行封锁，已经收到成效，并且在芬兰的统治集团中引起了争执。有人正在发出拥护中立并同苏联和解的呼声。

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用绝交来威胁芬兰，芬兰政府在同德国决裂的问题上将会更为坚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可以在领土方面对芬兰作出某些让步，以便使它感到宽慰，并同它缔结新和约。

第2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1年8月15日收到

在哈里·霍浦金斯先生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们曾利用研究他的报告的机会，一起商量了我们两国如何能对贵国对纳粹进攻所进行的辉煌保卫战给予最大帮助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合作把你们最迫切需要的供应品最大限度地提供给你们。已经有好多条船载货驶离了我们的海岸，最近的将来还有一些船要出发。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考虑一个较长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以前，还得经历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胜利，那么我

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将是白费的。

战争正在好多条战线上进行着，而在战争结束以前，还可能开辟另外一些战线，我们的资源虽然丰富，也是有限的，因此，这些资源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能最好地利用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们的共同努力，必须成为一个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制成的军需品和原料。

你们和我们的武装部队的需求，只有在充分了解我们在作出决定时所必须考虑的许多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加以确定。为了使我们大家 能就我们的共同资源的分配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我们建议，我们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讨论这些问题的高级代表出席。如果您对召开这次会议感到兴趣的话，我们愿意告诉您，在那一会议作出决定之前，我们将继续尽速运送供应品和物资。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的英勇和坚决的抵抗对打败希特勒主义有着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在制订将来分配我们共同资源的计划这件事情上迅速和立即行动起来。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温斯顿·斯·丘吉尔

第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1年9月30日收到

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这封信将由我的朋友阿富里尔·哈里曼交给您，我已经请他担任我们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团长。

哈里曼先生很了解你们的战线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他将尽其所能来使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获得圆满的结果。

哈里·霍浦金斯把他对您进行的令人鼓舞和满意的访问详尽地告诉了我。我无法向您叙述我们大家对苏军的英勇保卫战多么感动。

我确信，将会找出办法来提供在所有战线（包括你们的战线在内）同希特勒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和供应品。

我特别要乘此机会表示我对你们的军队终将战胜希特勒所抱的巨大信念，并且向您保证，我们是有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的巨大决心的。

您的十分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1年10月3日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您的信已由哈里曼先生转交给我了。

我乘此机会向您表示，苏联政府深深感激您把美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托付给像哈里曼先生这样一位权威人士，他参加莫斯科三国会议[①]的工作是如此卓有成效。

我毫不怀疑，您将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保证尽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实现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特别是因为希特勒匪帮必定会设法利用冬季到来以前的几个月，在前线对苏联施加种种压力。

和您一样，我毫不怀疑现在共同努力以加速消灭血腥的希特勒主义的所有各国终将战胜希特勒，苏联目前正在作出如此重大的牺牲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1年10月3日

————————————

① 指1941年9月29日到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代表关于相互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会议。——原注

第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备忘录

1941年11月2日

由美国大使斯坦哈特递交安·扬·维辛斯基

罗斯福总统在写给斯大林先生的私人信件里说：

（1）他看过了莫斯科三国会议的议定书，并且同美国使团的成员讨论了议定书里所列的材料。

（2）他批准了军事装备和军火的所有项目，并且指示在可能范围内尽快供给原料。

（3）他已下令立即开始交付，并以最大可能的数量继续进行。

（4）为了消除财政上的任何困难，他已指示立即作出安排，在这种安排下，可以根据租借法案[①]运送价值达10亿美元的物资。

（5）他建议（这个建议须经苏联政府同意），美国不对苏联政府由于这种运送可能负担的债务收取利息，苏联政府可能负担的债务须在战争结束后5年才开始偿还，并且在这5年期限届满后的10年内还清。

（6）总统希望，苏联政府作出特别努力向美国出售它所能有的和美国可能需要的商品和原料，向美国售货所得货款将存在苏联政府的账上。

（7）总统乘此机会对于斯大林先生及其同事们主持的莫斯科三国会议之迅速进行，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先生保证，那次会议规定的事项将最大限度地予以执行。

（8）总统表示希望，在情况需要时，斯大林先生将毫不犹豫地直接同他联系。

1941年11月2日于古比雪夫

————————————

① 指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租借法案。这项法律授权美国政府，把其他国家为其国防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和物资借给或租给这些国家，如果这对美国的国防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话。——原注

第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1年11月4日

总统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您的原信，但是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先生已于今年11月2日托维辛斯基先生转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叙述了这封信的内容。

首先，我愿表示完全同意您对莫斯科三国会议成绩所作的评价，这主要应归功于哈里曼先生和比维尔勃鲁克先生，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使会议早日圆满结束。苏联政府对您所说的将把这次会议规定的事项最大限度地予以执行深表感激。

总统先生，您决定给苏联一笔价值达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来偿付向苏联提供的军火和原料，苏联政府以衷心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个决定，认为这是在苏联为反我们的共同敌人——血腥的希特勒主义而进行的艰巨斗争中给予苏联的重大援助。

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我表示完全同意您关于提供这笔贷款的条件，即在战争结束5年后开始偿还，并在5年期限届满后的10年内继续偿还。

苏联政府准备尽力把它所能有的和美国可能需要的商品和原料供应美利坚合众国。

总统先生，至于您希望在情况需要时在您和我之间毫不延迟地建立直接的个人接触这一点，我欣然同意您这个顾望，并且在我这方面，我准备尽全力促其实现。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1年11月4日

第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1年11月6日

我高兴地告诉您，三国会议的药品供应委员会拟出的清单上的医药供应品，将在这些药品能够买到和装运之后马上提供，但不包括英国可能提供的部分。美国的供应和生产情况使得不可能立即大量买到所要求的若干项目，但是占清单总数25%的药品可以在30天到60天的期间内提供，其余部分将在以后的8个月内分期提供。

美国红十字会准备提供价值约500万美元、约占清单总数三分之一的药品作为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美国红十字会根据我的指示，将使用国会交我动用的款项以及美国人民为苏联国内的救济而捐助的款项来购买这些供应品。由于美国红十字会必须向国会和向捐款人报告这些款项和供应品使用的情况，它的代表团团长沃德韦耳在致苏维埃联谊会的科勒斯尼科夫的信中概述了我们两国红十字会之间的一种人们所希望的合作安排。红十字会今天还给科勒斯尼科夫一封信，指出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合理视察它的供应品分配情况的重要性，当然，这种视察要服从一切适当的军事考虑。如果您的政府能够向我保证，所希望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我将深为感激。我要指出，美国红十字会所建议的程序和它在英国以及其它国家进行援助所遵循的程序相同。

在上述基础上，美国红十字会准备随着需要的增长和要求的提出，考虑进一步对苏联提供大量援助。

1941年11月6日

第8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信

1941年11月14日发出

关于美国红十字会提供医疗物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的通知，我已经在11月11日收到。

关于确定我们两国红十字会之间合作的组织形式的问题，苏联政府没有什么意见，因为考虑到这种合作将以双方互换的信件为依据来组织，而这些信件的文本都已经两国红十字会代表于11月初在古比雪夫审阅同意。

斯大林

第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1年12月16日收到

（从俄文重新译成英文）

在我看来，为了不仅为今后数周内的联合作战，而且为最后打败希特勒主义的共同行动奠定基础，立即采取措施是极端重要的。我本来很想同您见面亲自谈一谈，但是既然在目前这样做不可能，所以我打算采取三项先行步骤，希望这些步骤将导致较为固定的共同规划工作。

1.我正在向蒋介石委员长建议，立即在重庆召开一次由中国、苏联、英国、荷兰和美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批代表至迟应在12月17日以前开会，并在12月20日星期六以前将会议结果绝对机密地报告给本国政府。这必能使我们从重庆的角度对共同问题获得初步的了解。

2.我正在要求英国人在新加坡召开一次海军会议，希望会议能在12月20日星期六以前提出主要从在南方地区作战的角度编写的报告。

3.如果您能同美国、英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亲自交谈一次，并且在20日星期六以前把您对整个问题的建议通知我，我将非常高兴。

4.下周内我将同此间英国使团讨论同样的问题，并把此间对局势的看法告诉您。我曾和李维诺夫作了一次有益的谈话，因而我充分了解您的当务之急。我想再一次告诉您，美国普遍对贵国军队在保卫你们伟大国家方

面取得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兴奋。我自己抱有这样的希望；我提议在下周召开的一些筹备性会议能导致成立一个规划我们的共同努力的较为固定的组织。霍浦金斯和我向您致以我们个人的热烈问候。

罗斯福

第1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1年12月17日发出

您的信我在12月16日收到了。鉴于您的信没有说明要在重庆和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的目的，并且由于离会议的召开只剩一天了，所以我觉得在会见艾登先生（他刚刚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应该向他问清楚召开会议的目的，这两次会议是否能推迟一下。可是，艾登先生原来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通知。因此，我认为最好能从您那里获得必要的说明，以便保证苏联代表参加会议能获得预期的结果。

感谢您对苏军战绩的赞许。

祝您在太平洋进行的反侵略斗争获得成功。

向您和霍浦金斯先生致以个人的热烈问候。

斯大林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六月

第1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2年2月11日收到

1、2月份，我们的装运已经包括和将要包括的东西，有449辆轻型坦克、408辆中型坦克、224架战斗机、24架B—25型飞机和233架A—20型飞机。

我认识到把我们的供应品尽可能早地运给你们的重要性，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货品装运出发。

这里的消息表明，你们在迫使纳粹后退方面很得手。

虽然眼前我们在远东有困难，但是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就能增强到足以制止日寇。但是我们也作了再遭受一些挫折的准备。

第12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2月13日收到

我很高兴，贵国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我的可靠的老友斯丹德雷海军上将担任美国大使。他同我密切共事多年，我完全信任他。我把他不仅作为一个正直和有魄力的人，而且作为一个赞扬和钦佩苏联成就的人来推荐给您，您会记得，去年他曾和哈里曼先生一起访问过苏联。斯丹德雷海军上将在从莫斯科归来后，已在美国为了促进人们了解苏联局势而做了不少工作，由于他的丰富的背景，由于他对我们两国面临的问题的了解，我深信，

在您的合作下，他为使我们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作的努力将获得成功。

我刚刚被引起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苏联政府要求我们提供的供应品和弹药的价值，将超过在我们之间互换信件后于去年秋天根据租借法案交由苏联政府使用的10亿美元。因此，我建议，根据同一法案，在拨出最初的10亿美元时所规定的那种条件下，再拨10亿美元供您的政府使用。如果您对于第二次提供的10亿美元所根据的条件有什么反建议，您可以放心，这些建议一定会得到仔细和同情的考虑。无论怎样，以后重新研究我们现在可能缔结的这种财政安排以适应改变的情况，将证明对双方都是适宜的。

第1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2月18日发出

我已经收到您关于1、2月份从美国运送武器情况的信件。我强调指出，当前，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他们的军队正在集中力量以顽强的攻势来进一步击败希特勒军队的时候，美国运送的东西，包括坦克和飞机在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和我们进一步的胜利是重要的。

第1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2月18日发出

您2月13日的来信收悉。我愿意首先指出，我同意您的信念：您如此尊重的新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丹德雷海军上将为使我们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而作的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

总统先生，您决定根据军火租借法案再给苏联政府 10 亿美元的贷款，条件像第一次提供的 10 亿美元一样，苏联政府以诚挚的谢意加以接受。关于您所提出的问题，我愿意说，为了不使决定延迟，苏联政府目前将不提出修改给苏联的上述第二笔 10 亿美元的条件的问题，也不要求应当考虑苏联的资源由于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争而极度紧张的问题。同时，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并且希望：以后我们将共同确定对双方都适合的时候来修改现在缔结的财政协定，以便特别考虑上述的情况。

我乘此机会请您注意这样的事实：在运送在美国购买的军火和物资这个问题上，有关的苏联机构在使用给予苏联的贷款方面正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合宜的从美国运武器的办法是像英国把军火运到阿尔汉格尔州时使用的那种有效办法，这是到现在为止从美国运货还未使用的一种办法。根据这一办法，提供军火和物资的英国军事当局自己选择船只、监督它们在港口的装货工作，并把它们护航到目的地港口。如果运送军火和护航船只到苏联港口的同样办法也被美国政府所采用，苏联政府将非常感谢。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第 1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23 日

（从俄文重新译成英文）

您 2 月 20 日的来信收悉。

我愿意让您知道，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乐于同您修改我们两国关于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所垫付的基金的协定。目前，首要任务是把供应品运给

你们。

我已经指示研究您提出的在这里集中运送给俄国的军火的建议。

你们军队获胜的最新消息大大地鼓舞了我们。

在红军建军24周年之际，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1942年2月23日

第1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3月16日收到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大林阁下

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哈里曼先生已经把您1941年10月3日的恳切的信件交给我。我非常感谢您的来信。

已经拍电报通知您，我们可以把苏联包括在我们的租借法案安排之内。

我愿乘此机会再次向您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把这些供应品运送到你们的战线上去。

你们的军队和人民抱有的击败希特勒主义的决心，是对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一个鼓舞。

您的十分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1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信

1942年4月12日收到

不幸，由于地理上的距离，您我实际上不可能在现在会晤。在私人会谈中这样谈心，对进行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会是有益的。如果情况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发展，您我或许会在今年夏天在阿拉斯加外面我们的

共同边界附近一起过几天。但是，同时，我认为，我们采取尽可能近于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军事上是极端重要的。

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利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来解脱你们西线困境的军事建议。这个目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我希望您考虑在最近期内派遣莫洛托夫先生和您所信任的一位将军到华盛顿来。如果我们要作重大帮助的话，时间是至为重要的。我们愿为他们提供一架良好的运输机，以便他们能在两星期之内作一次来回的旅行。

我一点也不想通过这样的旅行来超越我的朋友李维诺夫先生，他是会谅解这一点的；通过我所建议的访问，我们可以赢得时间。

我建议这样做不仅因为如此重要的机密问题，而且还因为在我们最后确定我们共同军事行动的战略方针以前，我必需听听您的意见。

我已派霍浦金斯前往伦敦，他的此行和这个建议有关。

美国人民对你们武装力量的辉煌作战深为感动，我们希望在摧毁希特勒的军队和物资方面给予您比现在我们正在给的更多的援助。

谨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罗斯福

第 1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5 年 4 月 20 日发出

几天前我在莫斯科收到您的信，谨表谢意。

苏联政府同意必须安排维·米·莫洛托夫和您之间的会晤，以便就不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交换意见。莫洛托夫可以至迟在 5 月 10—15 日到达华盛顿，陪同他的将有一位适当的军事代表。不用说，莫洛托夫也将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

我毫不怀疑，我将能够亲自同您举行一次会晤，我非常重视这种

会晤，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国面临着如何组织力量打败希特勒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

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和对您在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敌人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的祝愿。

约·斯大林

第1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5月4日

我们在北部护航路线上正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并且已经把由此所引起的情况告诉了李维诺夫。但是您可以放心，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使尽可能多的船只开出。

我已经听到斯丹德雷海军上将受到您诚挚接待的情况，我愿表示我的谢意。

我盼望着会见莫洛托夫，在我一听到他此行的路线时，我们将准备立即提供交通工具。我的确希望莫洛托夫在华盛顿期间能和我一起住在白宫，不过我们也可以在附近安排一个私人住所，如果那样是可取的话。

罗斯福

1942年5月4日

第2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5月15日发出

谢谢您交马·马·李维诺夫转来的信。关于目前船只航行和护航

到苏联这一工作所存在的困难，我已经请求丘吉尔首相帮助尽快加以克服。鉴于5月份将从美国和英国运到的货物刻不容缓，我向您，总统先生，提出同样的请求。

由于气候变化无常，维·米·莫洛托夫访美和访英的行期将推迟几天。据了解，这次旅英和旅美都可以乘坐苏联飞机。同时必须补充一句，苏联政府认为，莫洛托夫的行踪，在他返回莫斯科以前，丝毫也不在报端披露，就像去年12月间艾登先生访问莫斯科时一样，是有必要的。

至于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住所问题，我和他都对您的建议表示感激。

约·斯大林

第2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6月8日收到

我对您派了莫洛托夫先生来和我会面非常感激，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安返苏联的消息。我们的会晤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第2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6月12日发出

总统先生，苏联政府和您一样，认为维·米·莫洛托夫这次访问美国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我乘此机会向您，总统先生，表示苏联政府真诚感谢你们在莫洛托夫和他的随行人员逗留美国期间对他们的热诚招待。

莫洛托夫已在今天安返莫斯科。

第 2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6 月 17 日

在太平洋北部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正在发展的局势提供了确实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可能采取步骤对苏联滨海各州进行军事活动。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进攻，美国准备用美国空军帮助苏联，只要苏联在西伯利亚地区为它提供合适的降落机场。为了迅速执行这一行动，苏联和美国的努力当然必须小心地配合。

李维诺夫大使已经通知我，您已表示同意美国飞机经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北部调往西线，我获得这个消息感到高兴。我认为，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联合的陆海空军代表之间立即着手交换详细的情报以应付太平洋的这个新危险，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问题十分迫切，应当授予苏联和美国代表以充分权力，来采取行动并制定明确的计划。因此，我建议您和我指定这样的代表，我们并立即指示他们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会议。

1942 年 6 月 17 日

第 2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6 月 23 日

关于我 6 月 17 日给您的电报，我愿意强调，如果能够通过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苏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穿过非洲，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而且，如果建立起经由西伯利亚的运输线，就可以把短程飞机空运到苏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海路运输。

如果能在西伯利亚地区修建着陆机场，并且能建立同有关的美国航空部门联系的气象和航行设备，我准备指示美国的运送人员在贝加尔湖把飞机交给你们。这条航空线可以简便地和通向海参崴地区的着陆机场连接起来。万一日本攻击苏联滨海各州，这样一条西伯利亚航空线可以使美国迅速把美国空军部队调到后一地区，以便前来援助苏联。

从我对有关建立一条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空运线的问题所作的研究看来，很明显，流入北冰洋的若干河流可以用来把像燃料以及修建着陆机场所需要的机器这样一些体积庞大的东西运到西伯利亚东部。我之所以在收到您对我 6 月 17 日信件的复信以前同您联系，是由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次货运必须在上述河流封冻以前，即在今后几周内进行。

如果您同意这条航空线具有紧急性和重要性，那么，为了加速此事进展，我要求您准许一架美国飞机从阿拉斯加起飞，在拟议中的路线上空作一次勘察和试飞，以便肯定在修建必需的着陆机场和建立主要的航行设施方面将需要什么装备和供应品。从事这次飞行的人员将穿便服，他们事实上将作为一家商业机构的人员来进行这次飞行。而且，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这些人员决不会被辨认出是美国的军事人员。当然，一两位苏联军官或官员可以在阿拉斯加的诺姆搭乘这架美国飞机。

这次飞行将不代替我在 6 月 17 日的信里所建议的美国和苏联的联合陆海空军代表的会谈。进行这次飞行只是为了使这些代表们能够在进行他们的讨论时，对有关的问题得到比不进行这次飞行更为准确和详细的情报。

1942 年 6 月 23 日

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 2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 年 7 月 1 日发出

关于您最近的一些来信，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最好把飞机从美国取道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运往西部战线。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经发出必要指示，要求在最短期间完成现在正在西伯利亚进行的接收飞机的准备工作，也就是整修现有的机场并给它们补充相应的设备。至于由谁的飞行员把飞机从阿拉斯加飞来，我认为可以如国务院一度建议的那样，把这项任务委托给苏联驾驶员，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前往诺姆或者某个其它适当地点。您提议的勘察性试航，也可以委托这一批飞行员执行。为了充分保证这些飞机的接收，我们希望现在就能知道美国准备通过这条航线运交西线的飞机数目。

至于您建议尚美苏两国陆海军代表举行一次会晤来交换情报，苏联政府表示同意，并且认为最好能在莫斯科举行。

第 2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7 月 6 日收到

正在威胁着通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供应路线的埃及危机，已使丘吉尔首相向我提出一项紧急询问：现在取道伊拉克运往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途中的40架A—20型轰炸机是否可以转运到埃及战线。由于这里得到的情报有限，我不可能就这件事作出判断。因此，我想最好还是请您把整个联合国家的作战努力的利益加以考虑，作出决定。

第27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7月7日发出

鉴于盟国军队在埃及的处境，我不反对从目前在伊拉克待运苏联的那批A—20型轰炸机中，拨出40架转交埃及战线。

第2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7月7日

我即将任命福勒特·布莱德雷陆军少将、我们的海军武官邓肯上校和我们的陆军武官密歇拉上校作为美国代表，出席我在6月17日给您的电报中建议的要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布莱德雷将军将是唯一从美国派往莫斯科的代表。他将做好充分准备并受权讨论有关会议的一切计划。

我们准备在今后几天内在诺姆配备一架美国四引擎飞机来作这次勘察飞行，由三、四名苏联军官陪同。另一方面，我们将很高兴有美国军官随一架苏联飞机飞行。

1942年7月7日

第2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7月9日

我深深感谢您同意把40架轰炸机转运到埃反的电报。除了按照7月议定书的规定装运的全部坦克之外，我已经安排把115辆中型坦克连同弹药和零件立即运送给您。

1942年7月9日

第3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7月18日发出

您关于任命福·布莱德雷少将、邓肯上校和密歇拉上校作为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美国代表的通知，我已经收到了。美国代表在执行他们的任务方面将得到一切必要的协助。

苏联方面，参加会议的将有斯切尔利哥夫少将、卡巴诺夫上校和列万多维奇上校。

至于勘察飞行，可以在近日内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派一架飞机到诺姆，我的意思是说派一架美国双引擎飞机，它可以在从诺姆飞回时搭载几位美国军官。

我乘此机会感谢您关于另外给苏联运送115辆坦克的通知。我认为有责任告诉您，据我们前线的专家们说，美国坦克从后部或两侧被反坦克炮弹击中后很容易着火。原因是，美制坦克使用的优质汽油在坦克内部会蒸发成浓厚的油汽。德国坦克也使用汽油，但用的是劣质汽油，产生的油汽较少，因此它们是比较不易着火的。我们的专家认为，柴油机最适合制造坦克的发动机。

第3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7月23日

我已收到您关于拟议中的从阿拉斯加起飞的勘察飞行和莫斯科会议的信件。勘察飞行的人员将前往阿拉斯加，并准备在8月1日以前启程，为此将有一架四引擎轰炸机在诺姆备用。

我非常感谢您关于在前线使用美国坦克时所遇到的困难的报告。这个情报在消除这种坦克的缺点方面对我们的专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将来的坦克的着火危险将会减少，因为将用一种低度的辛烷燃料来发动它们。

1942年7月23日

第3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8月2日发出

我已收到您关于从阿拉斯加进行勘察飞行的最近信件。我们的B—25型飞机大概将在8月8日到10日之间到达诺姆，并且在起飞作预定的勘察飞行以前，将搭载参加这次飞行的3名美国人员。

第3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我已要求哈里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供您和您的客人[①]召唤，以便提供他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

————————————

① 客人，指正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的丘吉尔。——原注

第3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8月5日

我已获得我认为肯定是真实的消息，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不在目前

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采取军事行动。我认为这意味着对西伯利亚的任何进攻将推迟到明年春天。请您把这个情报告诉您的客人。

1942年8月5日

第35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8月7日发出

我已收到您8月5日的两封信。谢谢您告诉我哈里曼先生即将到达莫斯科。我很感兴趣地阅读了您关于日本的情报，当然，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转告我的客人。

斯大林

1942年8月7日

第3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8月9日

如果您对下列计划发表坦率的意见，我将非常感激，我认为这个计划可能是有用的：

为了向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到亚、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各国政府说明它们在德国胜利以后会遭受到的危险，和它们的前途的最大希望在于击败纳粹在近东和中东各地的统治这一首要目的，我将派遣温德尔·威尔基先生访问这些国家的政府。

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威尔基先生将很愿意访问苏联。除了亲自看看在击退入侵者方面的不朽的思想一致和你们全体正在作出的巨大牺牲之外，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俄罗斯人民取得的惊人的进步。

如您所知在1940年竞选时威尔基先生曾是我的对手，今天他是少数党的领袖。他对于我们反对纳粹主义和同您的政府建立真正的友谊的外交政策，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政府的，他正在大力地协助作战工作。为了目前和将来，我个人认为威尔基先生访问苏联将是一件好事。他将在9月上半月乘飞机前往苏联。

如果您机密地和坦率地告诉我您是否欢迎他的很短暂的访问，我将非常感激。

1942年8月9日

第37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8月12日发出

您8月9日的来信收到了。我可以告诉您，苏联政府赞成温德尔·威尔基先生访问苏联，他将受到最诚挚的接待。

第3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8月19日收到

我没有能够和您以及丘吉尔先生一起参加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实在感到遗憾。我是很了解军事局势——特别就苏德战线来说——的迫切需要的。

我认为，日本人要把我们从我们已经在西南太平洋区域取得的有利地位赶出去，是困难的。虽然我军在那个地区的海上损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已获得的有利地位会说明这种损失是值得的，我并且可以向您保证，我们将猛烈地压迫他们。另一方面，我很了解，我们两国的真正敌人是德国，我们两国必需尽早联合我们的兵力来对付希特勒。您可以放心，一俟尽最

大可能把运输工具集合起来，就将这么办。

同时，在8月间将有一千多辆坦克从美国启运到苏联，同时还要运出其它战略物资，包括飞机在内。

美国十分了解在1942年期间苏联在作战和损失方面是首当其冲的，我可以说，我们非常钦佩贵国所进行的雄伟的抗战。我们将尽我们力之所及迅速和有力地帮助你们，我希望您相信我对您所说的 一切。

第39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8月22日发出

您8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也感到遗憾，您没有能够参加丘吉尔先生和我最近举行的会谈。

关于您所谈的在8月间从美国运出坦克和其它战略物资一节，我愿意强调指出，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接受美国的飞机和其它武器，以及数量尽可能大的卡车。同时我希望您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早日把物资送交苏联，特别是经由北方海道。

第40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10月5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我写这封信把帕特里克·约·赫尔利将军介绍给您，他是前任陆军部长，现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

赫尔利将军将返回新西兰任所，我觉得极为重要的是，在他返任之前，

应当让他有机会访问莫斯科，并且有机会在可能范围内亲眼认识我们目前世界战略的最有意义的方面。我希望他这样就能以其亲身的经验使新西兰政府并同样使澳大利亚政府相信，联合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击败希特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给予英勇的俄国军队——他们已经十分辉煌地止住了希特勒军队的攻击——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我已请赫尔利将军同样地访问埃及以及伊朗和伊拉克，以便他能因此亲自熟悉中东的那一部分，并亲眼看看目前正在那个地区进行的战役。

如您所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府一直倾向于认为，联合国家立即对日本进行全面的进攻是十分必需的。我希望赫尔利将军在访问苏联之后能够对这两国政府说的是，联合国家所应采取的最好的战略是它们首先联合起来，使击败希特勒成为可能，而这是保证击败日本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

对于苏联军队的辉煌成就，我向您致以最热诚的祝贺，并为你们不断繁荣昌盛表示最好的祝愿。

相信我，

您的十分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2 年 10 月 5 日

第 4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 年 10 月 7 日

兹乘斯丹德雷先生前往华盛顿之便托他交给您这封私人信件，我愿意趁此机会就美国向苏联运交军用物资的问题说几句话。

运交的困难据说主要是由于缺少船只。为了弥补航运的这种局面，苏联政府准备同意对美国运交苏联的武器作某些削减。我们准备暂时完全放弃坦克、大炮、弹药、手枪等等的运送。但是同时，我们非常

需要增加新式歼击机——例如“空中眼镜蛇”式——和若干其它供应品的运送量。应当注意，“小鹰”式是敌不过德国的新式歼击机的。

如果美国能够保证每月至少运交下列项目，那就很好：500 架歼击机、8,000 到 10,000 辆卡车、5,000 吨铝和 4,000 到 5,000 吨炸药。此外，在 12 个月内，我们需要 2 百万吨谷物（小麦）和尽可能多的油脂、浓缩食品和罐头肉。如果美国同意交给苏联哪怕是 20 到 30 艘船来补充我们的船队，我们可以用苏联船只经由海参崴运进很大一部分粮食供应。我已经同威尔基先生谈过这一点，确信他会把此事转告您。

至于前线的局势，您无疑知道，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在南部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由于我们缺少飞机——主要是歼击机——而恶化了。德国人拥有大量的飞机储存。在南部，他们在空中至少占有一倍的优势，这使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军队。战争经验已经表明，最勇敢的军队如果不能免受空中攻击，也是无能为力的。

1942 年 10 月 7 日

第 4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0 月 9 日收到

我收到了英国首相给您的信的副本。我们即将尽快行动起来，把一支空军交给你们在高加索的战略司令部指挥。我现在正在设法立即为您找到更多的飞机，并将马上告诉您。我还在设法作出安排，把我们的一些商船转移给你们，来增加你们在太平洋的物资运输量。我刚刚下令把一所汽车轮胎厂提供给你们使用。我们将派遣非常大的增援力量到波斯湾，来增加通过这条路线的供应品的运送量。我们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正在运出大量的引擎和其它装备以及人员。我确信我们计划中的行动一定会成功。

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战使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激动，我们对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抱有信心。

第 4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0 月 12 日

我正在研究增加运往苏联的歼击机数量的一切可能性。事实是，现在所生产的全部“空中眼镜蛇”式都将立即送到前线。虽然这些紧急的战斗需求使得在目前增加给您的“空中眼镜蛇”式的架数成为不可能，但是我正在希望用减少其它型式飞机的产量的办法来增加我们这种型式的生产，以便给您更多的飞机。而且，如果您所知道的我们即将进行的作战行动像预期那样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就可以抽调出歼击机了。

我们的重轰炸机群已经奉命立即动员，以便在你们的南翼作战。这一调动将不因任何其它作战行动或义务而改变，这些飞机和足够的运输机将早日前往高加索。

关于炸药、铝和卡车问题，我将在一两天内打电报给您。

正在提供给您 20 艘商船供在太平洋地区使用。

在 10 月里我们将运送给您 276 架歼击机，正在尽一切可能来加速交付这些飞机。

1942 年 10 月 12 日

第 44 号

斯大林复罗斯福来信

1942 年 10 月 15 日发出

收到您 10 月 12 日的信。我感谢您告诉我的消息。

约·斯大林

第 4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0 月 16 日收到

为了答复您的要求，我高兴地通知您，能够拨出以供装运的有关项目如下：

小麦：在议定书年的剩余时间内，以每月大致同等的数量运送 2 百万美吨①。

卡车：每月 8,000 到 10,000 辆。

炸药：11 月份 4,000 美吨，以后每月 5,000 吨。

肉：每月 15,000 吨。

罐头肉：每月 10,000 吨。

猪油：每月 12,000 吨。

肥皂原料：每月 5,000 吨。

植物油：每月 10,000 吨。

我将早日告诉您铝的运送量，此事我仍在研讨中。

我已经发出命令，要按照您所希望的运送我们答应提供的物资的先后次序，不遗余力地使我们的航线保持充分船只载货航行。

————————————

① 美吨，即船舶吨，亦称短吨、小吨，等于 907.2 公斤。——原注

第 4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 年 10 月 19 日

我已经收到您 10 月 16 日的信。由于我忙于前线事务，没有及时答复您。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您预定的日期把答应提供的货物运交苏联。

1942 年 10 月 19 日

第 4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0 月 24 日

我刚刚从斯丹德雷海军上将那里收到您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副本您以前已寄给我了。这位大使还向我作了他对苏联局势的看法的很详尽的报告。他证实了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苏军的战斗素质和实力的报告以及您已经提出的对供应品的迫切需要。我充分了解这些需要。

1942 年 10 月 24 日

第 4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 年 10 月 28 日发出

您 10 月 24 日的信收到了。谢谢您提供的消息。

第 4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 年 11 月 14 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我在今天通过赫尔利将军收到这封信。我和他就战略问题作了长谈。我想他了解我，并已相信盟国目前的战略是正确的。他要求有机会访问我们的战线之一，特别是高加索战线。将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过去一周在苏德战线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计划在最近的将

来发动我们的冬季攻势，我们正在准备着。我将不断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您。

我们这里全都为美国和英国军队在北非的辉煌成就感到高兴。祝贺这次胜利。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您的十分诚挚的，

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14 日

第 5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19 日

您对赫尔利将军的礼遇使我感到高兴。正如您会很了解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民相信，对付日本威胁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摧毁纳粹。赫尔利将军将能够直接地告诉他们，您和丘吉尔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最近在西南太平洋的战斗使那里的地位更加巩固，虽然我们还没有消除日本人向南推进的企图。

美国和英国参谋部现在正在研究，在我们巩固从直布罗陀到叙利亚的整个地中海南岸的情况下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以前，丘吉尔和我都希望和您以及您的参谋部会商，因为不论我们下一步在地中海采取什么行动，都将对你们的辉煌战役和你们在今冬计划采取的行动发生肯定的影响。

我无需告诉您，把伟大事业坚持下去。你们正在那样做，我真正感到到处情况都显得更加光明。

向您致热烈的问候，

罗斯福

1942 年 11 月 19 日

第 5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2 年 11 月 20 日发出

我们已经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在它的南部和西北部开始了攻势。攻势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攻下斯大林格勒—利哈亚铁路线并破坏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交通。在西北部，22 公里长的德军战线已被突破，在南部，12 公里长的战线被突破。战斗正在顺利地进行着。

第 5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26 日

我希望您知道，我们已在所罗门群岛很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我们可能已经把他们舰队的主力粉碎了，不过使我不称心的是，他们仍然有很多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很可能不久再毁掉其中的几艘。

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有着很强大的空军、陆军和海军，我们不准备等待。我们要加紧利用我们的优势。

我确信，我们正在击沉的日本舰只和击毁的日本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他们能够制造出来的数量。

我对于我们不久将把德国人赶出非洲抱有希望，然后我们将让意大利人尝尝真正轰炸的滋味，我非常肯定，他们是绝对受不了那样的压力的。

从斯大林格勒地区来的消息最令人鼓舞，我向您致最热烈的祝贺。

1942 年 11 月 26 日

第 5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2 年 11 月 27 日发出

您的来信已于11月21日收到，谢谢。您希望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民解释目前的战局以及您全神贯注于西南太平洋的战役，我对这些都十分理解。至于正在顺利地进展和对于改变欧洲整个战局很为重要的地中海战役，我同意您的意见，即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总参谋部之间进行适当磋商的时刻已经成熟。

对您在今后攻势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功表示衷心的致意和最好的祝愿。

第5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2年11月28日

11月27日收到您信，谢谢。你们在所罗门群岛地区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贵国在太平洋实力如此强大增长，都使我很高兴。

我深信你们会很快地把德国人赶出北非，我希望，这将有助于盟军在欧洲展开进攻。当然，你们计划的大举空袭意大利，是会起重要作用的。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这方面雪和雾给了我们不小帮助，它们使德国空军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威力。我们已决定也在中部战线发动攻势，以阻止敌人兵力南调。请接受我对您的诚挚敬意和对美国武装部队的最良好的祝愿。

1942年11月28日

第5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12月2日

我愈是考虑我们的共同军事局势和早日作出战略决定的必要性，我愈

是相信，您、丘吉尔和我应当早日会晤。

在我看来，单单由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举行会议是不够的，首先因为没有我们的同意他们不能作出最后决定，其次因为我认为，我们应当对一旦德国崩溃时应当采取的处置办法获致某种初步谅解。

我的迫不及待的理由是我很渴望同您会谈。我的建议是，我们秘密地在非洲某一个安全的、对我们三人都方便的地方会晤。时间大约在1月15日到20日。

我们每人将各带少数海、陆、空高级指挥官。

我希望您将赞同地考虑这个建议，因为我认为没有其它方法来作出应当很快由我们大家一起作出的重大战略决定。如果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我相信一定会——比我们预计要快得多地打垮德国。

我可以马上起飞，但是我认为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冰岛或者阿拉斯加是不能考虑的。我想，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或者在喀土穆或其附近，可以找到一个能避免所有客人和记者访问的地方。在日期方面，我建议在1月15日左右，不知您以为如何？

1942年12月2日

第5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2年12月6日发出

您的信12月5日收到。

我欢迎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晤来制订共同战略方针的意见。然而很遗憾，我不能离开苏联。应该说，现在是如此紧要的时刻，我连一天都不能脱身。目前恰好是开展我们冬季攻势的重大作战行动的时候，就是到了1月份，这些作战行动也不会松弛下来。很可能情况正好相反。

无论是斯大林格勒近郊或中部战线，战斗都正在展开。我们已把

一大批德国军队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并且希望把他们全部彻底消灭掉。

第5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年12月8日

您觉得您不能抽身在1月里举行会议，这使我深为失望。我们之间有好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重大的战略决定，而且关系到我们应当初步讨论的事项，这些事项是关于万一在德国的情况许可时我们应当准备好的紧急政策的。

这些问题还将包括有关在北非和远东的未来政策的其它事项，这是不能单单由我们的军事人员加以讨论的。

我完全理解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极为忙碌的处境以及您留在战线附近的必恶性。因此我想会议暂定3月1日左右为我们在北非举行会晤的日期。

1942年12月8日

第58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2年12月14日发出

我对于我不能够在最近的将来或者甚至不能在3月初离开苏联也深以为憾。前线的事务实在不容我这样做。相反，这些事务需要我一直留在我军附近。

我还不知道您，总统先生，以及丘吉尔先生希望在我们联合会议上讨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在我们有机会会晤以前，我们不能用通信的方法来讨论它们吗？我想我们将不会有不同意见。

我相信时间并没有白过，您，总统先生，和丘吉尔先生将遵守关

于在 1942 年或至迟在 1943 年春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英国和美国会真正在明年春天在欧洲共同开辟第二战场。

由于关于苏联对使用达尔朗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的态度有着种种谣言，我愿意告诉您，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艾森豪威尔对达尔朗、波瓦松、吉罗德等人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认为您成功地把达尔朗等人争取到盟国一边来反对希特勒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早些时候我对丘吉尔先生也说过这一点。

第 5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2 月 16 日

我不清楚，关于我们在高加索提供美国空军援助的建议究竟怎样了。我十分愿意派遣包括美国驾驶员和机上人员在内的空军部队。我认为他们应当在他们的美国司令指挥下以队为单位进行作战，但是每个队在战术目标方面当然将处在俄国的全面指挥之下。

请让我尽快地知道您的愿望，因为我真正希望尽我所能来进行帮助。

驱逐机的计划将不受影响。我所指的主要是能够飞到高加索的轰炸机类型的飞机。

1942 年 12 月 16 日

第 6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2 年 12 月 18 日发出

非常感谢您愿意帮助我们。现在南高加索已不再需要配备有机上人员的英美航空中队了。主要战斗正在、并且将在中部战线和沃罗涅

日地区进行。如果您愿意迅速向上述地区派遣飞机，特别是驱逐机——但不要你们现在所亟需的——机上人员，我将十分感激。

苏联空军的特点是有过多的驾驶员，而缺少飞机。

第 6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2 月 21 日

我对于不能作出开会的安排很感遗憾，但是我很能了解您的地位。此信是通知收到您关于英美航空中队的信件。我们将尽快运交飞机。我已经作出安排在 1 月间给您 10 架运输机。

我将就某些战后活动写信给您。

1942 年 12 月 21 日

第 6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

为保卫自由、正义和人权而联合起来的大小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士兵们，正在并肩同强大敌人进行斗争，他们远离家乡、横越重洋或大陆，在沙漠或冰天雪地里，在丛林和森林里，在军舰或商船上，在从冰岛到所罗门群岛的岛屿堡垒上，在新旧世界里，欣逢这个佳节。

他们不问时间和岁月，竭尽全力来遏制敌人并把他们击退。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打击，也受到敌人的回击。他们出色地作战，以便能够赢得给世界带来和平、自由和增进人类幸福的胜利。

美国国会以深切和永恒的感激心情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要求我代表美国人民向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我们盟国的武装力量和辅助部队的人员和家属祝贺新年，并热烈希望和祝祷取得迅速、彻底的胜利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如果您将以美国国会、我本人和美国人民的名义，向您的武装力量和辅助部队转达联合决议中所表示的祝贺以及希望和祝祷，我将十分感激。

第 6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2 月 30 日

我从东京无线电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一艘日本潜水艇 10 月 12 日在太平洋击沉了一艘盟国的潜水艇。

这个报道看来指的是 10 月 11 日在从阿拉斯加开往美国途中被敌人击沉的你们的爱情—16 号潜水艇，我对你们潜水艇的损失及其英勇人员的牺牲表示惋惜，并对你们的英勇海军在你们陆军的光辉成就以外也对盟国的事业作出贡献，表示钦佩。

1942 年 12 月 30 日

第 6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2 年 12 月 30 日

万一日本在远东进攻俄国，我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时间内用一支大约有 100 架四引擎轰炸机的美国空军在那个战场帮助您，只要苏联当局提供某些供应品和装备，并事先准备好适当的作战设施。

我们的部队的供应必须完全空运，因此有必要由苏联政府提供诸如炸弹、燃料、滑润油、交通工具、掩蔽所、暖气以及尚待确定的其它一些次要的东西。

虽然我们没有肯定的情报说明日本将进攻俄国，但是看来这是终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为了我们能够对这种万一作好准备，我建议，您在

10月6日授权布莱德雷将军对远东空军设施进行的视察现在就进行，并建议，根据您的命令于11月11日开始的布莱德雷将军和科罗连科将军之间的讨论继续下去。

我打算派我完全信任的布莱德雷将军代表美国继续进行这些讨论，如果您同意的话。他将受权代表美国探讨在远东战场上苏美联合作战的每一个方面，并根据他的视察，就必要时拨出帮助你们的美国空军的组成和实力提出建议。

他还将决定为保证在战斗开始后我们部队能马上有效地参战所必须的和实际可行的准备工作的范围。他的随行人员将不超过20人，他们将乘两架美国道格拉斯DC-3型飞机飞入俄国。

如果这一点获得您的同意，我主张他们从阿拉斯加沿运输航线进入西伯利亚，然后在俄国人的引导下到苏军的远东总部，随后再到为他们悄悄地，进行视察和讨论作战计划而可能必须去的俄国其它一些地方。

如果派一位会说英语的俄国军官，像在华盛顿的符拉基米尔·奥夫诺万上尉，或者在莫斯科的斯莫利亚罗夫上尉，作为副官和联络官陪同布莱德雷将军，那将很有帮助。

我乘此机会对布莱德雷将军向我报告的和过去--个月你们的伟大胜利所表明的你们伟大苏军的英勇、顽强和战斗能力表示钦佩。

1942年12月30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

第 6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 年 1 月 1 日发出

总统先生，请您转达美国国会并请您本人接受我对您代表美国人民致苏联武装部队的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所表示的感谢。

约·斯大林

第 6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 月 5 日发出

您关于远东情况的电报已经收到。我感谢您准备为苏联派遣 100 架轰炸机到远东。然而我必须说，目前我们需要飞机的帮助，但不是在远东，因为目前苏联在那里没有战事，而是在对德国人进行最残酷的战争的战场上，就是在苏德战场上。如果这些飞机——不要驾驶员，因为我们有足够数量的驾驶员——到达西南战场或者中部战场，那将在我们反希特勒斗争的最重要部分起显著作用。

至于我们各条战线上战事进行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攻势整个说来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第 6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1 月 8 日

在读了您对我关于远东情况的无线电报的答复之后，我担心我没有把话说清楚。正如我以前在谈到南高加索时所说明的那样，除了现有的有组织的部队外，在目前派遣重轰炸机到俄国不是切实可行的。我们关于100架飞机的建议指的是万一日本和俄国真正爆发战争时会产生的一种局面。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估计，通过重新部署我们在太平洋战场的空军部队，在有组织的部队当中有100架飞机可以集中到东西伯利亚，因为它们的行动以及你们在那里的战斗，将使我们能够削减我们在太平洋战场其它地方的空军力量。

我的无线电报只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为应付一种可能性而预先作出防范性的计划。

建议立即采取的行动是有关视察和由布莱德雷将军同苏联军官们进行的讨论的。

只有通过这种初步视察和预先计划，才有可能在西伯利亚万一爆发战争时给予相当迅速的援助。我愿派遣马歇尔将军在最近的将来访问莫斯科，如果能够安排这个访问，我希望那时您将能同他讨论这个问题。

他将能够向您叙述非洲的当前局势，以及关于今年的剩余时间内在所有战场上计划采取的作战行动。我想这将很有帮助，而他将获得最新的消息。

同时，如蒙早日答复我在12月30日提出的关于由布莱德雷将军和他的一行毫不延迟地前往远东进行视察和参谋讨论的建议，我将很感谢。

我深为钦佩您的军队继续不断的挺进。在各个战线上消耗敌人力量的原则正在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1月8日

第6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1月9日

我已作出安排，在1943年中分派给您200架C—47型运输机，从1月

开始。

按月运交飞机的日期将通知您驻在这里的使团。

我将尽我所能以便另外再给您100架，不过您可以肯定指望得到上面提到的200架飞机。

1943年1月9日

第69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1月13日发出

我对您决定运送给苏联200架运输机表示感谢。

至于派遣轰炸机到远东一事，我已经在我以前的几封信里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空军部队，而是不带驾驶员的飞机，因为我们自己的驾驶员已绰绰有余。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们需要您在飞机方面给予帮助的地方不是远东，因为苏联在那里不处于战争状态，而是在苏德战场，那里特别急需飞机。

您提出的由布莱德雷将军对远东和苏联其它地方的俄国军事目标进行视察的建议，令人感到困惑莫解。十分清楚，只有俄国人能够视察俄国的军事目标，正如美国的军事目标不能由别人，而只能由美国人视察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容许丝毫含糊。

关于马歇尔将军访问苏联一事，我必须说，我不十分清楚他的使命。请将这次访问的目的和任务讲明白，以便我能够心中有数地考虑这个问题并相应地作出答复。

我的同事们对北非的军事行动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停滞的时间据说不是很短而是很长感到不安。您可否就这件事作些解释？

第 70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 年 1 月 27 日收到

1. 我们已经同我们的军事顾问们会商，并且就美英军队在 1943 年头九个月所要进行的作战行动作出了决定。我们愿意立刻把我们的意图告诉您。我们相信，这些作战行动，和你们强大的攻势一起，很可能使德国在 1943 年屈膝投降。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这个目的。

2.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正确战略是专心打败德国，其目的在于在欧洲战场早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我们必须对日本维持足够的压力，以便在太平洋和远东保持主动，支持中国，并且防止日本把它的侵略扩大到其它地方，例如你们的沿海各州。

3. 我们的主要愿望一直是把强大的德国陆空军从俄国战场吸引到别处，并且把最大量的供应品送到俄国。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在任何情况下利用每一条可能利用的路线把物质支援送给你们。

4. 我们当前的意图是在北非肃清轴心国军队，并且建立海空军基地，以便：

（一）开辟一条通过地中海的有效的军事运输线；

（二）对南欧的轴心国重要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

5. 我们决定尽早在地中海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现在已在为这种作战进行准备，并且将难免在埃及和北非的几个港口大量集结兵力，包括登陆艇和船只。此外，我们将在联合王国集中一支强大的美国陆空军。这些军队同在联合王国的英军一起，将准备尽早在实际可行的时候重新进入欧洲大陆。我们的敌人肯定会知道我们的兵力集结，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我们打算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规模来进行打击。因而他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的陆空军分散到法国、低地国家、科西嘉、撒丁、西西里、地中海东岸国家，以及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和多得喀尼斯群岛的所有沿海地区。

6. 在欧洲，我们将高速度增强从联合王国攻击德国的盟军轰炸机攻势，

而到盛夏之时应比目前的兵力增强一倍。我们目前的经验证明，白天的轰炸攻击造成了击毁和击伤大量德国战斗机的战果。我们相信，增加日夜袭击的次数和投弹量将导致德国十分惨重的物质和精神的损伤，并且迅速地耗减德国战斗机的力量。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牵制了德国一半以上的空军。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密集和多样化的轰炸攻势，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其它作战行动，将迫使德国从俄国战线撤退更多的空军和其他部队。

7.我们在太平洋的意图是在以后几个月内把日本人从拉布尔赶走，随后乘胜向着日本的总的方向推进。我们还打算扩大我们在缅甸的作战的规模，以便重新打开对中国的这条供应线。我们打算立即增强我们在中国的空军力量。然而，我们不允许我们对日本的攻势危及我们利用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机会使德国在1943年遭到决定性失败的能力。

8.我们的主导目的是把我们的能力所及的最大量的海、陆、空军力量加在德国和意大利身上。

第71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3年1月30日发出

你们的友好的联名信我已于1月27日收到了。对你们通知我关于在卡萨布兰卡商定的美英武装部队必须在1943年的头九个月内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定表示感谢。我把你们所商定的对德国的决定了解为：在1943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击溃德国。如果你们能通知我在这方面预计要采取的具体作战行动及其实现的预定时间，我将甚为感激。

至于苏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苏联的武装部队将尽一切力量继续攻击德国和它在苏德战场上的同盟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打算在今年2月上半月结束我们的冬季攻势。我们的军队都很疲乏了，

他们需要休息，因而超过这个期限，他们也就未必有力量再继续进攻了。

第 7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2 月 5 日收到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约瑟夫·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我向您祝贺在您的最高司令部指挥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为了保卫这座使您的名字万古流芳的城市而进行的一百六十二天的史诗般战斗，以及今天所有美国人都在为之欢庆的决定性的成果，将成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纳粹主义及其追随者而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最值得骄傲的篇章之一。在前线作战的您的军队的将士们，以及在工厂和田野里支持他们的男女，把力量联合起来，不仅是要为他们祖国的军队赢得光荣，而且要以他们的典范在所有联合国家中鼓舞起为促使共同敌人的最后失败和无条件投降而全力以赴的新的决心。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 7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 年 2 月 6 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
总司令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先生

华盛顿，白宫

谢谢您对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的祝贺。

我深信，美国、英国和苏联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不久将导致对我们共同敌人的胜利。

约·斯大林

第 74 号

丘吉尔（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3 年 2 月 12 日收到

您 1 月 30 日的来信收到了。我已同总统商谈过，问题已提交大洋两岸两国的参谋部研究。我受权为我们两人答复如下：

（1）在东突尼斯有 25 万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希望在 4 月里消灭或者赶走这些军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2）在这项任务完成后，我们打算在 7 月里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更早一些夺取西西里，目的在于肃清地中海地区，促使意大利崩溃，从而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影响，并且消耗德国的空军力量；紧接着将在东地中海发动一个作战行动，可能是进攻多得喀尼斯群岛。

（3）这一作战行动将投入我们在地中海所能集合的全部船只和登陆艇以及我们所有的及时受过登陆战训练的部队，总计约三四十万人。一旦建立了进口港和登陆基地，我们将尽力扩大战果。

（4）我们还正在想尽办法来加紧准备在 8 月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强渡海峡的作战行动。在这里，船只和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个作战行动由于天气或其它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兵力在 9 月进行。进行这次进攻的时间自然要看那时德国在海峡对岸的防御情况而定。

（5）这两个作战行动都将得到很大的美英空军的支援，而横渡海峡的作战将得到英国本土全部空军的支援。这两次作战行动加在一起将使英美船只的负担紧张到极点。

（6）美国总统和我已经命令我们的联合参谋部，必须尽量用最快速度并以人力和物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来加强攻击的力量。

1943 年 2 月 9 日

第 7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3 年 2 月 16 日

2 月 12 日我收到丘吉尔先生的来信，信中对你们二位在卡萨布兰卡所作的决定作了补充的叙述。既然据丘吉尔先生所说，他的来信是同样表达了您的意见的共同答复，我不能不谈谈我的看法，这些看法已同时告诉了丘吉尔先生。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原先预定在 2 月里结束的在突尼斯的军事行动，现在推迟到 4 月。这种推迟对反对德国和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是不合适的，这是不需要多加证明的。现在，当苏联军队还在继续进行广泛进攻的时候，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行动是十分必要的。从我们战线上和从你们在突尼斯的战线上对希特勒同时施加压力，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并且会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造成极其严重的困难。那样，您计划在西西里和东地中海进行的作战行动也可以加速进行了。

至于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您的来信看来，打算在 8 月或 9 月才开辟。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要求在比上述日期早得多的时候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为了使敌人没有复原的机会，我认为从西方来的打击不应推迟到下半年，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

根据我们现有的可靠情报，从 12 月底起，当英美部队为了某种原因在突尼斯停止了活动的时候，德国人就把 27 个师从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本部调到苏德战场，其中有 5 个是坦克师。这样一来，非但没有把德国军队引离苏德战场来帮助苏联，反而便利了希特勒，由于英美中止了在突尼斯的作战行动，使他有可能调动援军来反对俄国人。

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愈早共同利用希特勒匪帮前线上的困难条件，我们就愈有根据指望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些，也不利用目前的时机来促进我们共同的利益，那么很有可能的是，德国人在经过喘息和集结力量之后恢复过来。你们和我们都很清楚，不应该做这种不适当的失算的事情。

1943 年 2 月 16 日

第 7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密信

1943 年 2 月 22 日

答复您 2 月 16 日的来信。您在来信中提出了您在答复丘吉尔先生 2 月 12 日给您的信时向他表示的若干意见。我愿意说，我也像您一样对盟国在北非的作战未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感到遗憾。这个作战由于出人意料的大雨而中断，大雨使供应品和军队从我们登陆口岸到前线的道路极端难行。这场大雨使田野和山地都无法通行。

我充分了解这种延迟对盟国的共同努力的不利影响，我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开始对非洲的轴心部队采取有成效的进攻行动，以便达到摧毁他们的目的。

目前美国运输工具的广泛分散，您是很明白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正在作最大的努力来增加我们的运输工具。

我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日子在欧洲大陆进行作战，以便削弱轴心国对你们英勇军队的抵抗。您可以确信，在北非获胜之后，只要我们在作最大的努力后能够得到运输工具，美国将尽早在欧洲大陆采取作战行动。

我们希望你们的英勇军队继续获得胜利，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鼓舞。

1943 年 2 月 22 日

第 7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2 月 23 日收到

我代表美国人民，在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之际，对红军取得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表示我们的深切钦佩。许多月来，尽管在供应品、运输工具和土地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红军不让最强大的敌人取得胜利。它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在沃罗涅日、在高加索制止了敌人，并且最后在斯大林格勒的不朽战役中，不仅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发动了目前仍在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的巨大攻势。敌人被迫后退，在兵员、供应品、土地、特别是士气方面遭到沉重的损失。只有一支领导有方、组织健全、训练有素、尤其是有着不顾自我牺牲而决心击溃敌人的军队，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时我还想向俄罗斯人民致数，从他们当中产生了红军，并且依靠他们红军获得它的男人、女人和供应。他们也正在为战争贡献他们的全力和作出最大的牺牲。红军和俄罗斯人民已肯定地促使希特勒军队开始走上彻底溃败的道路，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永恒的钦佩。

第 7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 年 2 月 23 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华盛顿

请接受我对您在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之际发来的友好电报以及您对红军战绩所作的高度评价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您一样相信，这些战绩为最后击溃我们的共同敌人开辟道路，我们两国和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的联合力量必须并且一定会粉碎我们的共同敌人。

约·斯大林

第 7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3 年 3 月 16 日

现在我已收到丘吉尔先生对我 2 月 16 日去信的答复，我认为我有义务回答您 2 月 22 日的来信，这封信同样是对我 2 月 16 日去信的答复。

我从丘吉尔先生的来信中获悉，英美在北非的作战行动不仅没有加速，反而推迟到 4 月底；而且，甚至这个日期也不怎么肯定。换句话说，在我们对希特勒军队作战的最紧张阶段，即在 2、3 月间，英美在北非的攻势不仅没有加强，而且根本没有进行，并推迟了原定发动攻势的日期。就在这同时，德国得以把 36 个师，包括 6 个坦克师，从西方调过来对付苏联军队。显而易见，这给苏联军队造成什么样的困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德国人在苏德战场上的处境。

丘吉尔先生还告诉我，英美计划在 6 月对西西里采取作战行动。这个行动虽然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在法国的第二战场。但是，当然，我仍然十分欢迎你们准备加速采取这个作战行动。

同时，我认为我有义务说明，主要问题是早日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您会记得，您和丘吉尔先生都曾认为早在 1942 年或者至迟在今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是可能的。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显然，正因为如此，我在我 2 月 16 日的信中强调指出有必要至迟在今年春季或夏初从西面发动攻势。

苏联军队整个冬季都在奋战，现在还在继续这样做，而希特勒正在采取重要的新措施来恢复和加强他的军队，以便对苏联发动春季和夏季军事行动；因此，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西方的打击不应再推迟，应该在今春或夏初进行

您在来信中告诉我由于缺少运输工具而有不少困难，我承认这一

点。尽管如此，我认为，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我必须提出最有力的警告：再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将有严重的危险。因此，您和丘吉尔先生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一事的含糊答复使我忧虑，我不能对之保持沉默。

1943 年 3 月 16 日

第 8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4 月 21 日

苏联政府认为近来波兰政府在对苏关系上的行为是完全不正常的，并且违背了指导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的一切规则和准绳。

德国法西斯分子借口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些波兰军官被杀害的事件（其实这些军官就是他们自己杀死的），在德军占领区展开的敌视苏联的诬蔑宣传立刻得到了西科尔斯基政府的随声附和，波兰的官方报纸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煽动。西科尔斯基政府对于法西斯对苏联的这种卑鄙的诬蔑不但不予以反击，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向苏联政府提出问题或者请求就此事进行解释。

希特勒当局在对波兰军官们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后，正在排演调查的滑稽剧。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在被占领的波兰挑选出来的几个波兰亲法西斯分子，来充当这种角色；在被占领的波兰，一切都处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正直的波兰人不能公开发表意见。

西科尔斯基政府和希特勒政府都找国际红十字会帮助进行“调查”。国际红十字会在靠绞架和大批屠杀和平居民来维持的恐怖制度下，被迫不得不参加希特勒导演的这出调查滑稽剧。这种背着苏联政府而进行的“调查”，显然是不可能使任何正直的人相信的。

敌视苏联的宣传是在德国和波兰的报刊上同时开始的，而且搞得

一模一样，根据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希特勒——盟国的敌人——和西科尔斯基政府之间在进行这一敌对宣传的时候是有接触和勾结的。当苏联各族人民正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残酷的搏斗中流血牺牲的时候，当他们正在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击溃爱好自由民主的各国的共同敌人的时候，西科尔斯基政府竟对苏联进行背信弃义的打击来迎合希特勒的暴政。

所有这些情况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认为，波兰目前的政府已滚到同希特勒政府勾结的道路上去了，它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并且已经站到敌视苏联的立场上去了。

根据这一切，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必须同这个政府中断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把上述情况通知您，并且相信美国政府将会了解苏联政府方面被迫采取这一措施的原由。

1943 年 4 月 21 日

第 8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4 月 26 日

我正在美国西部视察的时候收到您的电报。我充分了解您的问题，但在同时，我希望您在目前这种局势中能设法明确您的行动是中止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进行的谈判，而不是把它作为完全断绝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外交关系。

我不能相信西科尔斯基曾以任何形式同希特勒匪帮勾结。然而我认为，他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此外，我倾向于认为丘吉尔首相将能设法说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今后要较有理智地行事。

如果您愿意让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和特别是关于照管您可能希望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遣送出来的任何波兰人方面，我是否可以进行任何帮助，我将很感激。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有几百万波兰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陆军和海军里服役。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全都是坚决反对希特勒匪帮的。然而，如果让人们得知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完全断绝，这对整个局势是没有好处的。

1943 年 4 月 26 日

第 8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4 月 29 日

您的复信，很遗憾，我直到 4 月 27 日才收到，而苏联政府在 4 月 26 日就被迫决定同波兰政府中断关系了。

由于波兰政府在将近两个星期中，不仅没有停止敌视苏联而只有利于希特勒的宣传，反而在报纸和电台上不断加强了这种宣传，这种行为深深激怒了苏联的舆论，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迟迟不作出决定了。很可能西科尔斯基先生本人并无意和希特勒匪帮合作。这种猜测如果为事实所证实，我将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印象是，某些亲希特勒分子——无论是在波兰政府内部或是在它的周围——已经劝诱西科尔斯基先生追随他们，结果是，波兰政府可能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成为您所知道的反苏宣传中的希特勒的工具。

我也相信丘吉尔首相将设法使波兰政府恢复理性，并帮助它今后有理智地行事。我可能错了，但是我相信，作为盟国，我们的义务之一是防止这个或那个盟国对任何其它盟国采取敌对的、使共同敌人感到高兴和得到好处的行动。

至于在苏联的波兰人以及他们的前途，我可以向您保证，苏联政府机关过去一直把他们作为亲人和同志来对待今后将继续这样。很清楚的是，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任何把他们从苏联放逐的事情。然

而，如果他们自己希望离开苏联，苏联政府机关将像过去一样决不阻碍他们，并且愿意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

1943 年 4 月 29 日

第 8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5 月 5 日

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我请我的老友约瑟夫·戴维斯把这封私人信件交给您。这封信只谈一个问题，我以为，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来谈这个问题对我们都方便些。我只同李维诺夫先生一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希望避免人数众多的参谋会议所会有的困难或外交会谈的繁文缛节。因此，我所能想到的最简单和最实际可行的方法，是您我二人进行几天不拘形式、极其简单的会晤。

我充分理解，您每天亲自过问你们的作战行动是合适的；我也觉得我离开华盛顿的时间若超过一个短时期是不相宜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选择时间的问题。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保卫战，继之以采取攻势，也许会在今年冬天引起德国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好以后的许多步骤。今天我们都没有作好准备。因此，我认为您和我应当在今年夏天会晤。

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会晤。在夏季，非洲差不多是不能考虑的，而喀土穆是英国的属地。冰岛我不喜欢，因为对您我来说都 涉到比较困难的飞行，而且，十分坦白地说，这样一来很难不同时邀请丘吉尔首相。

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在白令海峡的您的一边或者我的一边会晤。这样一个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从华盛顿去大约三天可到，我想从莫斯科去大约两天可到。这就是说，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您总可以在两天之内返回莫斯科。

我的想法是，我们二人都不带任何参谋人员。陪同我的将是哈里·霍浦金斯、一名译员和一名速记员，您和我可以非常不拘形式地交谈，进行我们所谓的“谈心”。我认为毫无必要发表任何正式的协议或声明。

您和我当然将谈到陆军和海军的局势，但是我认为，毋需参谋人员在场，我们两人都能进行这种讨论。

戴维斯先生不知道我们的军事问题，也不知道我国政府的战后计划，我派他到您那里去只是为了讨论我们的会晤。

我十分希望到5月底，我们的部队将完全控制突尼斯，丘吉尔和我将在下周安排攻势的第二阶段。

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德国将在今年夏天对你们进行全面进攻，我的参谋人员认为这一进攻将对准你们战线的中部。

您正在做一项崇高的事业。祝您顺利！

始终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3年5月5日

第8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5月6日

我愿意告诉您，丘吉尔首相将于下周前来华盛顿，目的是讨论我们当前的以后步骤。当然，我们将把会谈的情况随时通知贝利雅耶夫将军。

1943年5月6日

第85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年5月8日发出

我祝贺您和英勇的美英军队取得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使比塞大

和突尼斯城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我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第 8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5 月 14 日收到

我对于您为我军解放突尼斯的成功发来的贺电表示感谢。现在我们既已取得了主动权，可以合理地期待在东方和西方战线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及得到进一步的供应，包括飞机在内。

第 8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5 月 20 日收到

我知道，您将对美国对轴心国从 1940 年 12 月 8 日到 1943 年 5 月 12 日期间在北非遭受的损失所作的下列估计感到兴趣。除了人员的损失之外，这些数字大体上和英国所作的估计相符。英国对这些损失的估计比我们的估计略低一些。

1.人员损失总数：625,000 人。

2.飞机损失总数：（在北非和在地中海地区）：7,596 架被击毁，1,748 架可能被击毁，4,499 架被击伤。

3.坦克损失总数：不下于 2,100 辆。

4.商船损失总数：625 艘被击沉（约 2,200,000 吨），371 艘被击伤（约 1,600,000 吨）。

5.意大利人在东非的损失：150,000 人（不包括土人）。

第88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年5月26日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戴维斯先生已把您的信转交给我。

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们应当预料到，今年夏天——可能早在6月——希特勒匪帮会在苏德战场上发动一个新的巨大攻势。希特勒已经集结了德军约200个师和他的盟国的不下30个师，要用来进攻我们。我们正在准备击退德国的新攻势并且发动反攻，但是我们缺少飞机和飞机用汽油。当然，在目前不可能预见到我们可能必须采取的所有的军事步骤以及其它步骤。这将取决于我们前线战局的发展。很大一部分还将取决于英美在欧洲发动的作战行动的速度和强度。

我提到这些重要的情况，来说明为什么我对您主张由我们二人会晤的建议的答复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

我同意您的意见：进行这种会晤是必要的，并且不应拖延。但是我请求您对我所提到的情况的重要性作恰当的估价，因为夏季的几个月对苏联军队将是异常艰苦的。由于我不知道6月间苏德战场上的事态将怎样发展，我将不能够在那个月离开莫斯科。因此我建议在7月或者8月举行会晤。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将在会晤日期的前两个星期告诉您，究竟这次会晤能够在7月还是在8月举行。如果在我通知之后，您同意所建议的日期的话，我会及时到达。

戴维斯先生将亲自告诉您会晤的地点。

我同意您关于限制您的和我的顾问人数的建议。

谢谢您派遣戴维斯先生到莫斯科来，他是一位熟悉苏联的人，能够对事物作出公正的判断。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第 8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6 月 4 日收到

联合参谋部最近通过了若干决定，这些决定已由丘吉尔先生和我本人批准。

由于这些决定具有高度机密性，我将请斯丹德雷大使亲自向您转达。

罗斯福

第 9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3 年 6 月 4 日收到

联合参谋部最近批准的决定中的基本战略分为下列各类：

甲、首先考虑控制敌人潜水艇所引起的威胁，同时考虑盟国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支援苏联的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

乙、为土耳其作为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盟国而参战打下预备性基础。

丙、继续对日本施加不断的压力，以便削减它的军事力量。

丁、执行一些实际可行的措施以保持中国在战争中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和作为可以实行对日作战的基地。

戊、给予在非洲的法国部队以这样一种援助，以便他们可以准备积极参加将对欧洲的敌占区进行的进攻。

关于上述的（甲）项，由于最近对敌人潜艇使用携带新装置和装备的远程飞机以及成批的特别攻击舰只而获得的成果，我们已经大大地得到了鼓舞。从 5 月 1 日以来，我们已平均每天击毁一艘以上的潜艇。在一个时期中以这样的速度来击毁，将会对德国水底舰队人员的士气有极大的影响。这在最后会减少我们船只的损失，从而将增加我们航运的联合力量。

关于对苏联的支援，作了如下的决定：将加紧进行现在正在对欧洲敌占区进行的空中攻势，其目的有三：摧毁敌人的工业，削弱德国战斗机的

力量，粉碎德国平民的斗志。过去三周的事件表明这种空中攻势已在加强中，在这三周中，法国、意大利、德国、西西里和撒丁受到了沉重的袭击。在轰炸机司令部中的英国力量正在稳步地增长。在英国活动的美国重轰炸机力量已经以持续不变的速度在加强，并且将继续加强。3月间，在英国的美国重轰炸机大约有350架。目前约有700架。计划要求在6月底达到900架，9月底达到1,150架，明年4月1日达到2,500架。

已经决定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对西西里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是《爱斯基摩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奉到命令，当《爱斯基摩人》胜利结束的时候，他要准备立即发动攻势，以使意大利崩溃。在这次作战中供艾森豪威尔使用的部队将包括现在在地中海战场的全部部队，其中4个美国师和3个英国师除外，它们将被派到英国，作为下面即将谈到的集中在英国的部队的一部分。

意大利的崩溃将大大地便利对德国南部和东部发动空中攻势，将继续消耗他们的战斗力量并且将使轴心国在巴尔干区域的地位危殆。

非洲既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已经决定，在英国重新集结地面部队现在是可行的。英美联合参谋部过去和现在一直忙于使必要的计划订得十分精确，以便立即利用敌人在法国或挪威的任何弱点。按照目前的计划，应当在1944年春季在英伦诸岛集中足够多的兵力和军用物资，以便在那时对大陆进行全面的进攻。那时，巨大的空中攻势将达到它的顶点。若干大型登陆艇已必要地被派遣到西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和地中海。由于必须这样做，当然就使派遣到英国的这种船只的数目减少到那个程度。就从英国进行的作战行动而论，这是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上面列举和说明的一些决定据信会使敌人被迫把他们的地面部队极度地分散，既要抵抗实际的进攻，又要防御受到进攻的可能性。此外，他们还将不断受到沉重的空中打击。当轴心国软弱的迹象在任何一个地方变得明显的时候，实际的进攻和进攻的威胁将会很容易地和迅速地变为胜利的作战行动。我们认为，这里所谈的这些决定将需要我们所能够集中的全部资源。

罗斯福

第9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6月5日收到

请允许我对您热诚款待戴维斯先生从而是对我和美国政府表现的好意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已经安返华盛顿，随身带来了您给我的信件。我高兴地注意到，您和我原则上对您信中所提出的各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按照您的来信和您同戴维斯先生的谅解，我将等候您的下次来信。

请向布朗先生代为致意，并致以热烈的私人问候。

第9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年6月11日发出

您把您和丘吉尔先生就战略问题作出的若干决定通知我的来信已于6月4日收到，对此通知表示感谢。

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同您和丘吉尔先生在今年早些时候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问题所作的决定相矛盾的。

当然您还记得，您和丘吉尔先生在今年1月26日的联名来信中宣布了在当时作出的决定：要把很大一部分德国陆军和空军从俄国战场上吸引过去，并且迫使德国在1943年屈膝投降。

此后，丘吉尔先生曾于2月12日以他本人和您的名义通知了英美在突尼斯和地中海以及在欧洲西海岸发动联合作战的确切日期。这个通知说，英国和美国正在积极准备在1943年8月强渡海峡。又说，如果天气或其他原因妨碍这一作战行动的话，那么准备要在1943年9月以更大的兵力来实现。

现在已是1943年5月，您和丘吉尔先生却决定把英美进攻西欧

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也就是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起先从1942年推迟到1943年，而这次又要推迟到1944年的春天了。

你们的这一决定给倾其全力对德国及其仆从国家主力作战已经两年的苏联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困难，并且让不仅为自己的国家、而且也为盟国而战的苏军几乎单枪匹马地独自对付一个还是十分顽强而危险的敌人。

开辟第二战场的再一次推迟，和遭到如此重大牺牲的我军仍然无法指望得到英美军队的有力支持，这两个事实在苏联——在人民以及在军队中——引起了令人沮丧的消极印象，难道还需要我说吗？

至于苏联政府，它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何况这个决定是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同时也没有作任何努力来由大家共同讨论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个决定对今后战争的进程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第9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6月16日

我愿意在这里答复您关于供应铝的特别请求。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7月、8月和9月从加拿大和美国收到下列运货（长吨[①]）：原生铝每月5,000吨；再生铝每月1,000吨。

再生铝质量优良，我们用它来制造飞机。

原生铝每月的装运量比议定书里协议规定的4,000吨多1,000吨，这可能使得有必要在9月以后的运货中作相应的削感。我希望这将是不必要的。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原生铝，我们觉得不可能增加议定书协定中的数额。然而再生铝却是额外提供的东西。关于10月、11月和12月装运的计划，我们将在今后两个月内再通知您。我们还将设法在同时通知您关于议

——————————————

① 长吨，即英吨，亦称大吨，等于1,016.05公斤。——原注

定书年剩余时间内的装运量。

1943 年 6 月 16 日

第 9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6 月 16 日

我已发出指示，您将在 1943 年剩余的时间内在新议定书协定之外收到下列的额外飞机：

78 架 B—25 型轰炸机，

600 架 P—40—N 型战斗机。

我们没有比 P—40—N 型操纵更自如的战斗机了，最近在突尼斯战斗中使用这种飞机获得较好的成绩。这种飞机在对付俯冲轰炸机方面证明是我们最好的保障。它还证明在掩护 P—39 型飞机低空扫射时非常有用。

我们将能够在 11 月向您提供关于议定书年度下半年的装运计划，因为在那时我们将会已再次审查了飞机的情况。

1943 年 6 月 16 日

第 9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6 月 20 日收到

首相电告您的话都获得我的完全同意。请放心，目前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在做。我希望您将了解和体谅，航运的情况仍然很紧。然而，我们从过去两个月进行的反潜艇战役得到了鼓舞。这个作战使得在可以利用的船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这个答复晚了几天，因为在您的电报到达时我不在这儿。

第9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6月22日收到

致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
约瑟夫·维·斯大林元帅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两年前的明天，纳粹头目们采取了与纳粹的口是心非的长期记录相一致的背信弃义行为，向苏联发动了残暴的攻击。这样，他们便在不断增多的敌人名单上增加了苏联的强大部队。这些纳粹头目们低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为保卫他们祖国而发展和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的程度，并且完全没有认识到苏联人民在过去两年中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一直以日益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苏联武装部队名垂青史的功绩以及俄罗斯人民正在如此英勇作出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各联合国家的联合部队增长的力量正在日益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施加压力，这种力量确证了我们取得最后胜利所必需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我确信，这种团结和牺牲精神将激发我们接受迫切的和平任务。胜利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97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6月24日

我把我对丘吉尔先生来信的复信本文送给您，他的来信是您完全同意的，这是您在6月20日由斯丹德雷先生交给我的信中所说的。

1943年6月24日

附件 **斯大林致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您6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

我完全理解组织英、美军队进攻西欧，特别是调动军队横渡海峡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从您的信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您去年和今年的一些来信使我相信，您和美国总统对组织这次战役的困难是十分清楚的，您和总统共同进行的对这次进攻的适当准备将会充分估计到这些困难并且会动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和资源。还在去年，您就告诉我，英美军队将在1943年大规模进攻欧洲。您在1942年6月10日交给维·米·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曾写道：

“最后，并且也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正在把我们的最大力量集中在英美军队在1943年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上。我们对这次战役的规模和目标不确定任何界限，这次战役最初将由100万以上的英、美军队来进行，并且由适当数量的空军来支援。”

今年年初，您曾以您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美国总统两次把你们关于英美军队为了“把强大的德国陆空军从俄国战场吸引到别处”而进攻西欧的问题的决定通知我。同时您曾为您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在1943年就使德国投降，并规定进攻的日期不迟于9月。您在今年1月26日的来信中写道：

“我们已经同我们的军事顾问们会商，并且就美英军队在1943年头九个月所要进行的作战行动作出了决定。我们愿意立刻把我们的意图告诉您。我们相信，这些作战行动，和你们强大的攻势一起，很可能使德国在1943年屈膝投降。”

在今每2月12日我收到的您的另一封信中，您明确规定了您和总统所决定的进攻西欧的日期，您是这样写的：

“我们还正在想尽办法加紧准备在8月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作战行动。在这里，船只和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个作战行动由于天气或其它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以更大的兵

力在9月进行。”

当2月份您写到您的这些计划和进攻西欧的日期时，这种作战的困难比现在要大得多。从那时起德国人遭到了不止一次的失败：在南部，他们被我们的军队击退，并且在那里遭到不小的损失；在北非，他们被英、美军队击溃，并且被逐出了北非；在潜艇战争中，德国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而英美军队的优势则大大地增长了；大家也知道，美英空军在欧洲取得了支配地位，而军舰和运输船只的实力也有所增长。

由此可见，1943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不仅没有恶化，而是大大地好转了。

由于上述的一切，苏联政府没有料想到英美政府竟会改变今年年初决定的关于在今年进攻西欧的决定。相反，当时苏联政府有充分的根据指望英美这一决定将要实现，必要的准备正在进行，西欧的第二战场终会在1943年开辟。

因此，当您现在写道，“如果我们在一场损失惨重的横渡海峡的进攻中牺牲10万人，那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提醒您以下几点：

第一，1942年6月您本人的备忘录。您在备忘录里声称，准备进攻的不是10万人，而是战斗一开始英美军队就将超过100万。

第二，您2月份的信件。其中谈到在1943年8月到9月间进攻西欧的巨大的准备措施，从这些措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预定的作战行动中决不是只有10万人，而是有足够的兵力的。

但是，您现在却说，“我不能设想，英国的惨败和流血牺牲如何能援助苏军”。对苏联作这种声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声明同上述您所作的关于采取广泛的和强大的英美措施（这些措施足以决定这次作战的彻底胜利）在今年组织进攻的负责的决定是完全矛盾的，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况且您和总统关于取消过去关于进攻西欧的决定是在没有苏联政府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没有邀请苏联的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虽然您不会不认识到苏联在对德战争中的作用和它对第二战场问题的关心都是相当大的。关于这些情况，我更不用多说了。

不言而喻，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来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

您说，您“完全理解”我的失望。我必须对您说，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苏联政府的失望，而是在于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的问题，这种信任现在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不应当忘记，这是一个拯救西欧和俄国敌占区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减少苏军巨大牺牲的问题，英美军队的牺牲同苏军的牺牲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1943 年 6 月 24 日

第 9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3 年 6 月 26 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先生

华盛顿

谢谢您对苏联人民和武装部队在同希特勒入侵者战斗中表现的决心和英勇给予的高度赞扬。

由于苏联同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家进行两年的斗争和盟国在北非对德意军队进行了有效的打击，已经创造了最后击败我们共同敌人的条件。

我毫不怀疑，我们愈早从东方和西方联合给敌人以打击，胜利便就会愈早到来。

约·斯大林

（68）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 9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7 月 16 日收到

我对你们的一艘船在北太平洋不幸沉没极表惋惜，在此事发生后，我已发出指示，今后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虽然我没有获得详细的消息，我想我可以稳妥地向您祝贺你们军队在抵抗德国在库尔斯克的攻势方面的辉煌成就。

我希望不久从您那里听到关于其它问题的消息，我仍然觉得这对您和我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 10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8 月 6 日

贵国部队以他们的作战技巧、他们的英勇、他们的牺牲和他们不懈的努力，在一个月的奋战中，不仅制止了德国长期策划的进攻，而且发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胜利的反攻。

对于奥勒尔的伟大胜利，谨向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以及您本人致以诚挚的祝贺。

苏联完全有理由为它的英勇成就感到骄傲。

1943 年 8 月 6 日

第 10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8 月 8 日

我刚从前线回来，所以直到现在才能回答您最近的，即 7 月 16 日的来信。我毫不怀疑，您是了解我们的军事局势的，您会体谅复信的延迟。

和我们原来所预料的相反，德国人不是在 6 月而是在 7 月发动了他们的攻势，现在战斗正在苏德战场上激烈进行着。您知道，苏联军队已经击退了希特勒匪帮的 7 月攻势。您也知道，我国军队还进而发动攻势，拿下了奥勒尔和贝尔戈罗德，目前还在继续向敌人进攻。

显而易见，在苏德战场目前的紧张局势中，苏联司令部不得不作出巨大的努力并对敌人的活动保持最大的警惕。因此，除了我的主要职责即指挥前线作战以外，目前我也不得不稍稍撇开其它问题和我的其它职责。我不得不比较经常地亲临前线各战区，把其它一切从属于前线的利益。

我希望您将体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作远程旅行，并且不幸，将不能在夏季和秋季实现我通过戴维斯先生向您所作的诺言。

我对这一点很抱歉，但是您知道，形势比人强，不容不对它低头。

我认为由我们两国的负责代表会晤是十分适当的。在目前的军事局势下，会晤可以在阿斯特拉罕或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举行。如果这对您本人不适合的话，那么您可以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往上述两个城市之一。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应当在事前确定在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并草拟会上将通过的建议。

1. 我已经告诉戴维斯先生，我并不反对丘吉尔先生参加我们的会议并把两国代表会议改为三国代表会议。如果您不反对，我仍保持这个主张。

2. 我乘此机会祝贺您和英美部队在西西里取得的出色成就，它已导致墨索里尼及其匪帮的崩溃。

3. 谢谢您祝贺红军和苏联人民在奥勒尔取得的胜利。

1943 年 8 月 8 日

第102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3年8月19日

8月15日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通知说，从巴多里奥那里来了一位卡斯特拉诺将军，他携带着英国驻梵蒂冈公使的介绍信。这位将军宣称，他奉巴多里奥之命通知说，意大利在它能够加入盟国的条件下愿意无条件投降。后来英国驻梵蒂冈的代表接到了巴多里奥元帅的一份书面声明，说他已正式授权卡斯特拉诺将军。因此，看来这是一个牢靠的建议。

我们不准备同巴多里奥政府缔结任何契约来诱导意大利转向；但是，这件事会有许多好处，并且这样一来会大大地加速战争的进程。我们大概将在这个月月底以前开始进攻意大利大陆，并且在一星期后我们将展开我们的“雪崩”[①]的全面进攻。很可能巴多里奥政府不能维持这么久。德国人在罗马城外驻了一个或更多的装甲师，一旦他们认为巴多里奥政府正在欺骗他们，他们完全有力量推翻它并且组织一个例如以法里那奇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吉斯林政府。另一种情况是巴多里奥可能崩溃，那么整个意大利将陷于混乱。

鉴于这种情况，联合参谋部作为军事外交的一项措施，已草拟了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下列训令作为行动的准则，这个训令已经总统和首相批准：

“经总统和首相批准，联合参谋部命令你立即派两位参谋部军官——一位美国的和一位英国的——前往里斯本。他们到达之后必须和英国大使联系。他们必须随身携带已经寄给你的商量好的停战条款。英国驻里斯本大使将根据指示安排好同卡斯特拉诺将军的会谈。你的参谋部军官将出席这次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应根据下列原则通知卡斯特拉诺将军：

1.（甲）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应在将送给他的文件中所规定的条件下

———————————————

① 指盟军在那不勒斯地区进袭意大利本土的战役代号。——原注

予以接受（然后就把意大利停战条款交给他，这些条款是已经商量好的，并且已经事先寄给你。应当通知他，这些条款不包括迟一些时候将通过其它途径交给他的政治、经济或财条款）。

（乙）这些条款并没有规定积极帮助意大利对德国人作战。条款作有利于意大利的修正的程度将取决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战争的其余时间内对联合国家反对德国的斗争所给予的实际援助有多少。然而联合国家无保留地宣布，无论意大利军队或意大利人民在哪里同德国人作战，无论他们在哪里破坏德国人的财产或者阻挠德国人的调动，他们将得到联合国家军队一切可能的支持。同时，在及时地和经常地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的条件下，盟国的轰炸将尽可能地针对与德军的调动和作战有关的那些目标进行。

（丙）联合国家和意大利之间的敌对行动的停北，将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的日期和时间起生效。

（注：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当在盟军在意大利大举登陆以前几小时发出这个通知。）

（丁）意大利政府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停战之后，应当担负起立即宣布停战和命令自己的军队和人民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同盟国合作以及抗击德军的责任。

（注：从上述第二点丙项可以看出，将给意大利政府几个小时的期限。）

（戊）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宣布停战的同时命令立即释放有被德国人捕获的危险的一切联合国家的战俘。

（己）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宣布停战的同时命令意大利的军舰和尽可能多的商船出海开往盟国的港口，命令尽可能多的军用飞机飞往盟国的基地。一切有被抢走危险的船只和飞机应当予以炸毁。

2.应当告诉卡斯特拉诺将军，在这期间巴多里奥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让德国人知道在酝酿着什么。应当由他本人自行掌握他的行动的准确性和范围，但是应当向他提出下列的总方针：

（甲）如果可以在不会给德国人知道的情况下向各地方当局发布这个指令的话，应在全国掀起一个普遍的消极抵抗运动。

（乙）在全国，特别是在德国人使用的交通线和飞机场，进行小规模的破坏活动。

（丙）保护盟军战俘。如果德国人施加极其强烈的压力来迫使意大利交出战俘，那么必须把战俘释放。

（丁）意大利的军舰**不得**落到德国人的手里。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使这些军舰能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颁布关于这个问题的指令后，立即开往他所指定的那些港口。不应当把意大利的潜艇调离巡逻活动，因为这样，就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共同意图。

（戊）意大利的商船**不得**落到德国人的手里。应当尽可能把停泊在北方港口的商船开到位于威尼斯—里窝那线以南的港口去。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船只应当予以凿沉。一切船只必须升火待发，以便开往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指定的港口。

（己）必须**不**让德国人掌握意大利的海岸防务。

（庚）应当在适当的时间执行指令，使在巴尔干的意大利军队开到沿海地区，以便联合国家把他们运回意大利。

3.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应当同卡斯特拉诺将军作出安排，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意大利总部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途径

（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完。）

我们现在转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通知您，英王陛下政府根据在“三叉戟”[①]所通过的决定，已经同葡萄牙开始谈判，目的是想在它的“救生圈”[②]那里获得海军和空军的便利条件。为此，英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援引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同盟条约——这个同盟已持续不断达600年之久，并且请葡萄牙提供上述的便利条件。当然，萨拉查博士害怕德国人为了报复而进行的轰炸以及西班牙人可能进行的敌对活动。因此我们向他提供了高射炮和战斗机，这些武器现在正在途中；我们又通知了萨拉查博士，如果西

————————————————

①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3年5月在华盛顿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代号。——原注

② 属于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的代号。——原注

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将立即向西班牙宣战，并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我们并没有签订规定提供某种军队的任何具体的军事条约，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会发生。萨拉查博士现在同意了英国人在10月初同葡萄牙合作使用葡萄牙的“救生圈”。一俟我们在那里巩固下来和萨拉查博士消除了他的顾虑，我们将坚持把这种便利条件推广到美国的船只和飞机。

掌握了“救生圈”，对进行海上战争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德国潜艇已经离开了北大西洋而集中在南部航线上，因此在北大西洋上护航队从5月中旬起就毫无损失地来往航行着。“救生圈”的利用对于从空中袭击这些潜艇是有极大帮助的。此外，还有可能把美国的重轰炸机调到欧洲和非洲，这也是最值得想望的。上述一切都是属于极机密的作战性的。

1943年8月19日

第103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8月19日

丘吉尔先生和我偕同我们的参谋人员已经到达这里，并将在这里会商，可能要i0天光景。我们很希望向您再次强调我们三人举行会议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时完全理解使您留在前线附近的重大理由，您的亲临前线才产生这么多的胜利。

我们认为阿斯特拉罕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两个地方都不合适。但是我们完全准备偕同适当的官员前往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同您一起对局势作一番通盘的考虑。

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的决定性关头，正是进行会晤的再好不过的机会。丘吉尔和我二人都恳切地希望您再次考虑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不能就我们三国政府首脑举行这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取得一致意见的话，丘吉尔和我同意您的主张，即我们应当在最近的将来安排一次

外交部长级的代表会议。当然，最后的决定必须留待我们三国政府作出，因此这样的会谈将是探讨性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在38天的时间内征服了西西里岛。

轴心国方面的守军总数达405,000人：其中意大利315,000人，德国90,000人。我们是以美军和英军13个师发动进攻的，伤亡约18,000人。轴心国的军队伤亡共30,000人：其中德国23,000人，意大利7,000人。俘获130,000名俘虏。

西西里岛的意大利军队，除了一小部分穿上便衣逃到农村以外，已被消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大炮、飞机和遍地遗弃的各种武器，包括在各个机场上辙获的1,000多架飞机。

正如我们前已通知您的，我们不久即将对意大利大陆发动强大的攻势。

罗斯福

丘吉尔

1943年8月19日

第10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3年8月22日

1.我已收到了你们关于同意大利人进行谈判和对意停战的新条件的来信。对你们的通知表示感谢。

艾登先生告诉索波列夫说，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详情莫斯科已全部获悉。但是我应当指出，艾登先生的话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我收到的来信有很多删节，而且省略了最后几段[①]。因此应当说，苏联政府没有获悉英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详情。寇尔先生很有把握地说过，他很快就会收到来信的全文，但是三天已经过去了，寇尔大使还没有把来信全文交来。我不明白，传送如此重要问题的情报怎么会发生这种拖延。

2.我认为，由美、英、苏三国代表成立一个军事政治委员会，来研究同正在和德国脱离关系的各国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机已经成熟了。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有事美英两国商量，两国商量好了通知苏联，把苏联当作一个消极旁观的第三者。应当告诉你们，这种局面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我建议成立这个委员会，并确定会址暂设在西西里岛。

3.我等待着收到关于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来信全文。

1943年8月22日

————————————

① 指第102号信件（英美方面后已补全）。——本书制作者注

第105号

斯大林致丘吉尔和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8月24日

1.你们8月19日的联名来电已经收到了。

我完全赞成您和罗斯福先生关于我们三人会晤的重要性的意见。同时，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了解我目前的处境：目前我军正在同希特勒的主力进行极其紧张的战斗，希特勒不但没有从我们战场上撤走一个师，相反，竟得以向苏德战线增调新的师，并且还在继续增调。根据我的所有的同事们的意见，我在这样的时刻不能离开前线到菲尔班克斯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否则我们的作战行动是会受损失的，尽管，假如我们前线上是另一种情况的话，菲尔班克斯无疑是我们会晤的十分适当的地方，这一点我早就这样认为了。

至于我们三国的代表，例如负责外交的代表的会谈的问题，我赞成您的意见：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会谈是适宜的。但是，这次会谈不应当限制为狭隘的探讨性质，而是应当具有实际筹备的性质，以便在这

次会谈后我们三国政府可能作出一些具体的决定，从而避免拖延对一些紧急问题达成决议。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谈一谈我的建议，就是应当事前决定哪些问题应该由三国代表来讨论，并且草拟出他们应当讨论的提案，以便交由我们各国政府作出最后决定。

2.昨天收到了寇尔先生交来的关于您和罗斯福先生联名来电的补充和更正，在那封来电中您通知了就同卡斯特拉诺将军的谈判中为意大利拟定投降条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训令。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给艾森豪威尔将的训令完全是根据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方针而拟定的，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

为了在同意大利谈判期间能够判断盟国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我还是认为目前所收到的情报是不够的。这种情况证实了在谈判的过程中作出决定时需要有苏联代表参加。因此，我认为由三国代表组成军事政治委员会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关于这个问题我已于 8 月 22 日给你们写过信了。

1943 年 8 月 24 日

第 106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 年 8 月 26 日收到

下面是我们在刚刚结束的魁北克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应在 1943 年和 1944 年执行的作战的决定。我们将继续以迅速增长的规模从英国和意大利的基地上对德国进行轰炸机攻势。这种空中进攻的目的是消灭德国的空军战斗力，瓦解德国的军事、经济和工业的体系和准备横渡海峡的入侵。目前在联合王国的美国的武装部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加强。这样将形成一个美英师团的集结力量，以便进行横渡海峡的作战。一旦在大陆上巩固了桥头堡，它就可以不断地得到更多美军的增援，速度是每月 3 个到 5 个师。

这次作战将是美英空军和地面部队对轴心国的主要战斗。地中海的战争将大力地推进。在那个地区，我们的目标将是使意大利同轴心国脱离同盟关系，占领意大利以及科西嘉和撒丁，用它们来做对德国作战的基地。在巴尔干，作战将只限于从空中和海上向巴尔千的游击队供应物资、突击队的小型袭击和对战略目标的轰炸。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我们将加速对日本的作战。我们的目的是要耗尽日本的空军、海军和航运方面的力量，割断它的交通线，并且取得可以用来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第107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8月29日收到

（从俄文重新译成英文）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您的建议，并且几乎能肯定，不论在三国外交部代表的会谈方面，或者在建立一个三国委员会方面，使我们大家都满意的计划是可以制定的。首相和我将在下星期初再度会谈，然后再用电报同您联系。

第108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4日收到

查利将军曾说意大利人接受条件，他即将前来签字，但是我们还不确切知道这是指您已经看见过的短期军事条款，还是指更为详尽和全面的条款，对于这个全面的条款您已经明确地表示准备签字。

那里（意大利）的军事局势是既危急又有希望。我们对意大利大陆的登陆战差不多立即就要开始，而被称为“雪崩”的沉重打击大约将于下周左右实现。由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挣脱希特勒的魔爪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也许有必要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为此艾森豪威尔将军将需要得到意大利人的尽可能多的协助。意大利人接受条款的主要前提，就是我们将派一个空降师到罗马，帮助他们抵御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已经在罗马附近调集了装甲部队，并且可能推翻巴多里奥政府而代之以一个大概以法里那奇为首的吉斯林政权。那里的形势发展极快，因此我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有权当机立断，不因长期和短期条款之间的区别而拖延和意大利人达成协议的时机。短期条款显然包括在长期条款之内，它们都是以无条件投降为基础的，而短期条款第 10 条规定，盟军总司令有解释条文的权利。

因此我们假定您是期望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您签订短期条款的，如果这是必要的话，以免查利将军再度去罗马，以致拖延不决而影响军事行动。

当然我们很希望意大利人的无条件投降不仅是对英美，也是对苏联的。宣布投降的日期自然必须是和军事打击相配合的。

丘吉尔

罗斯福

第 10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9 月 6 日收到

首相和我本人都对召开外交部长级的政治和军事会议的主张感到高兴。

我认为，应当尽快地召开这次会议。9 月 25 日或许是一个好日子。您以为如何？

首相已经建议在伦敦或在英国其它地方召开会议，如果您也认为那是最好的话，我将同意派遣我的代表前往上述那些地方之一。不过我倾向于选择一个较为僻远的地方，可以不致有过多的记者包围会议。或许可以在卡萨布兰卡或者突尼斯，我并不反对在西西里，只是那里来往的交通不大方便。

这些政治代表当然将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报告，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授予他们以全权。可以派一两个军事顾问给他们，以便就军事形势的发

展向他们提供意见，但是我并不希望让会议在这个阶段发展成为正式的联合参谋长会议。

如果莫洛托夫先生和艾登先生出席会议的话，我愿意派遣赫尔先生，但是我不希望赫尔先生作这样的长途旅行，因此我愿派遣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哈里曼先生也将参加会议，因为他对航运和商务事务非常熟悉。我将努力从我的参谋部里派遣一个人作为美国的军事顾问。他将同联合参谋部的工作保持充分的接触。

让我再一次对您的军队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长驱直入向您表示祝贺。成就是辉煌的。

虽然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仍然希望您和丘吉尔先生以及我本人能够尽快地会晤。我本人可以安排在 11 月 15 日到 12 月 15 日之间在远达北非的某地会晤。我知道您会了解，我离开华盛顿不能超过 20 天，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在我不在时没有人能够代我签字。

关于为进一步同意大利人作出安排而在西西里设立委员会的问题，您怎么没有派遣一位军官驻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呢？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工作，您的这位军官可以与他们一起工作。

就我来说，我并不反对在这个委员会里增加一名法国委员，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北非为他们装备 10 个或者 11 个师。然而让法国人参加有关对意大利的军事占领的讨论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意大利人履行他们已经签署的投降条款，我希望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支持占领军。总的说来，意大利人很不喜欢法国人，如果我们让法国人参加关于占领的讨论，意大利的军民都将有极大的反感。

关于同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磋商的问题可以在以后加以讨论。

罗斯福

第 11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9 月 7 日

你们9月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你们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是否同意由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它签订意大利短期停战条款的问题，应当认为在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9月2日给英国大使寇尔先生的信中已经答复了。在那封信里已经通知，苏联政府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权力也包括签订短期停战条款的权力在内。

1943年9月7日

第111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8日

我收到您9月6日谈到若干重要问题的来信。

1.我仍然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成立三国军事政治委员会，开始时可以设在西西里或者阿尔及尔。往艾森豪威尔将军总部派遣苏联军官决不能代替军事政治委员会，需要这个委员会在现场指导同意大利以及同脱离德国的其它国家的政府进行的谈判。不少的时间已经消逝，事情却没有丝毫进展。

至于法国代表参加委员会的问题，我已经表示了我的意见。然而如果您有任何怀疑的话，我们自然可以在三国委员会成立之后讨论这个问题。

2.英国首相为我们三国代表的会谈提出的时间——10月初——是合适的；至于会谈的地点，我建议在莫斯科。到那时，三国政府可以就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建议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会议不会取得我们三国政府所希望取得的结果。

3.至于我们亲自会晤并由丘吉尔先生参加的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尽早实现。我同意您建议的日期。会晤的地点最好选择三国都有代表机构的一个国家，例如伊朗。但是我认为必须声明，考虑到苏德战场

的局势，会晤的日期应当进一步斟酌，因为在苏德战场上双方共投入了500多个师，几乎每天都需要苏联最高司令部的监督。

4.感谢您对苏军胜利的祝贺。我乘此机会向您并向英美联军最近在意大利取得的辉煌战绩表示祝贺。

1943年9月8日

第112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

1943年9月10日收到

我们高兴地通知您，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接受了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投降条款就是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所批准的。

盟国军队已在那不勒斯附近登陆，并且目前已和德国军队接触。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的南端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第11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电

1943年9月10日

9月10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我祝贺你们获得新的成就，特别是那不勒斯地区的登陆。毫无疑问，在那不勒斯地区顺利登陆和使意大利同德国决裂又给了希特勒德国一个打击，并且会大大便利苏军在苏德战线上的活动。

苏联军队的攻势迄至目前正在顺利进展中。我想在最近两三星期内我们将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可能我们在一两天内将攻克诺沃罗西斯克。

1943年9月10日

第 11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9 月 11 日收到

今天收到您的来电，谨致谢意。

我同意立即成立军事政治委员会，但是如果只拿通讯情况来说，我认为设在阿尔及尔比在西西里好，因此我建议他们于 9 月 21 日星期二在阿尔及尔开会。关于目前和将来的谈判的进展情况，当然将提供充分的情报，但是他们不应有全权。这种权力当然必须在采取最后行动以前请示他们的政府授与。

我完全愿意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一位法国代表。他们的全部的讨论应充分保密，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重要的。

关于我们三国代表的会晤，我将愉快地同意会晤的地点在莫斯科，日期在 10 月初，比方说 4 号，星期一。我将在两三天内送给您一份要讨论的问题的非正式的建议单，不过我认为三国代表在相互熟识之后，应当感到可以随便地讨论可能提出的任何其它问题。

您愿意同意第三个建议，我很高兴，在 11 月底左右这个时间是不错的。我充分理解，军事事件对您或者对丘吉尔先生或者对我本人来说，或许会改变局势。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干下去。对我个人来说，我唯一犹豫的是地点问题，但这只是因为它离华盛顿比我原先估计的稍为远了一点。我国的国会将在那时开会，而根据我们的宪法，我必须在 10 天之内就立法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我必须接受文件并且在 10 天之内把它们交还国会。如果在德黑兰开会的话，会冒很大的危险，如果飞行气候不好的话。如果亚速尔群岛这条路线不能用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取道巴西和越过南大西洋。由于这些原因，我希望您考虑在埃及的某一个地方，埃及也是一个中立国家并且可以为了我们的方便作出一切安排。

我真实地感到我们三人都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第115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12日

你们9月10日的来电收到了。

1.关于成立军事政治委员会，可以认为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我们已任命你们熟悉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副外交人民委员安·扬·维辛斯基为苏联全权代表。任命苏联驻伦敦诸盟国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为他的助手。他们将携带一批负责的军事和政治专家和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

我想，军事政治委员会可以订在9月25日至30日以前开始办公。我不反对委员会先在阿尔及尔开始工作，然后由它自己确定究竟迁往西西里还是迁往意大利的任何其它地方合适。

我认为首相关于委员会的职权问题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我认为，经过若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参照委员会的初步工作经验，更确切地规定委员会在对意大利关系上以及对其它同类国家关系上的职权。

2.关于我们三国代表会谈的问题，我提议大家同意把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而会谈日期则照总统的建议定为10月4日。

我仍然认为，如我前此已去信谈及的，为了使这个会议取得成就，有必要事先知道英、美政府准备提交三国代表会议讨论的提案内容。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对议程加以任何限制。

3.至于三国政府首脑会谈，我并不反对把德黑兰作为会谈的地点。我觉得这个地方比埃及更为合适，因为在埃及还没有代表机构。

1943年9月12日

第11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27日

我很遗憾，我认为有必要再提出外长会议的问题，只是因为在进一步考虑时，我非常渴望赫尔国务卿亲自参加同莫洛托夫先生和艾登先生的会语。

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赫尔先生对于前往莫斯科的长途飞行感到极为困难。因此，是否有可能使会议在英国举行。如果赫尔先生能够亲自参加这次会议，我认为这对大家都有很大好处。

我确信英国会愿意作这样的改变。会议是否可以在10月15日开幕。

1943年9月27日

第117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28日

我今天收到您9月27日的来信。

我同意您的意见，国务卿赫尔先生亲自出席即将举行的三国政府代表的会议是适当的。

同时我必须奉告，如果改变已经同意了的以莫斯科为会议地点的决定，我们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如果会议不在莫斯科，而是像您现在建议的那样在英国举行的话，那末，我认为应当作为苏联政府参加三国会议的代表的维·米·莫洛托夫将不能及时到达那里。莫洛托夫将不能够离开苏联——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担任莫洛托夫第一助手的安·扬·维辛斯基不久要前往阿尔及尔，这是您知道的。

而且，您也知道，美国和英国报纸早就宣布未来的会议将在莫斯科举行，现在改变会议地点可能引起令人不快的疑惑。

我不反对10月15日作为举行会议的日期。预料到那个日子，三国政府已经就会议的议程取得了最后的协议。

1943年9月28日

第11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9月28日

英国首相和我已经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项建击：投降文件的长期条款在意大利政府签字之后，应当处于保密状态，目前不予发表。

1943年9月28日

第11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10月1日

地中海地区的盟国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建议对《意大利投降书》作下列的修改。

文件的名称改为《同意大利停战的附加条件》。

序言的最后一句为“并且已由意大利政府首脑皮埃特罗·巴多里奥元帅无条件地接受。”

删去第一段里关于无条件投降一语。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所有的高级指挥官一致同意这项建议，认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在击败意大利的德军方面取得进展，因为这将有助于使意大利的陆军、海军和平民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艾森豪威尔紧迫地要求，在就这些建议作出决定以前，对投降文件的条款保守秘密，“对我们在意大利的成功是绝对重要的”。

我希望各盟国将批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对我们的作战努力有极大的好处而不会对我们不利。

请您在最早的实际可行的时间内用电报表示同意。

1943年10月1日

第12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年10月2日

您和英国首相已经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建议，即投降文件的长期条款在意大利政府签字之后保守秘密，同时目前不予发表，我对此没有反对意见。

1943年10月2日

第12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10月4日

我已经收到您的电报，我们的代表团将在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议是计划或者提出军事战略的一次会议，但是我不反对并且欢迎就您提出的关于对法国进行征讨的建议最广泛地交换意见。

迪安将军将是我们代表团的或员之一，我们的计划和意图将详尽地告诉他。

这是一次三大国会议，就我们的建议进行的任何讨论必须局限于这三大国的未来意图和计划，这是我所同意的。当然，这丝毫不排斥在以后的某个日子和在我们三国政府都同意的情况下，有较多的国家参加。

我确信我们将对必须最后由我们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这个预备会议将进行探索，如果在我们的外长会议上产生了一些困难，我仍然非常希望：当您和丘吉尔先生以及我会晤时能够解决这些困难。

看来美国和英国军队会在今后数周内进入罗马。

1943年10月4日

第12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年10月5日

今天（10月5日）我才收到您10月1日的来信。我不反对您所建议的对《意大利投降书》的修改。

1943年10月5日

第12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10月16日

您10月4日的来信收到了。

关于军事问题，就是说，关于英美缩短战争的措施，您已经从我前信中知道苏联政府的观点。我仍然认为，在这方面，举行一次三国预备会议将是有益的，并将为进一步作出重大决定准备条件。

如果我对您的意图理解正确的话，莫斯科会议将限于讨论只对我们三国有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点已经取得协议：一个四国声明将不在议程之内。

我们的代表们应当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克服在他们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困难。至于决定，自然只应当由我们三国政府作出，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您、丘吉尔先生和我本人亲自会晤的时候作出。

祝美国和英国军队圆满完成他们的使命并进入罗马，这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将是另一次打击。

1943年10月16日

第 12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3 日收到

巴多里奥将于 10 月 13 日对德宣战。

盟国军队已经在亚速尔群岛获得了空军和海军的便利条件。这一行动是以旧有的条约关系为基础的。

1943 年 10 月 12 日

第 12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4 日

您 10 月 13 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您提供的消息。

祝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顛的武装部队获得进一步胜利。

1943 年 10 月 14 日

第 12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4 日

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已启程赴莫斯科，但是他们是否能在 17 日以前到达那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他们的行止我将随时奉告。

关于另一次会晤的地点问题使我感到很烦恼，但是我将在另一封信里同您谈这个问题。

1943 年 10 月 14 日

第12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10月14日

关于我前往您所建议的地方的问题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致我认为要坦率地告诉您，由于宪法上的原因，我不能冒此风险。国会即将开会。我在收到新的法案和决议案之后，就得对它们采取行动，并且必须在10天之内把原件交还国会。无论那一件事，都不能用无线电或电报来做。您提出的那个地点过于遥远了，不能保证满足这些要求。在先向东、然后向西飞越山岭的飞行中，耽搁的可能性是难以克服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无论东飞还是西飞，常常要耽搁三、四天。

我认为，我们当中谁也不需要使馆提供的便利条件，因为我们每人都可以携带足够的随行人员和技术工作人员。因此，我冒昧地提出另一些建议。我希望您加以考虑，或者提出能保证我可以履行我的宪法义务的任何其它地点。

开罗在许多方面是吸引人的，据我所知，在那里的城郊，金字塔附近，有一家旅馆和几所别墅，这些场所都可以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在前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首府阿斯马拉，据说有一些非常好的建筑物和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飞机降落场。

其次，也可以在东地中海的某一港口会晤，只要我们每人都备一条船，如果这个想法合您的意的话，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一艘很好的船，完全听您和您的随行人员支配，使您可以完全独立活动，同时可以同你们前线保持经常的联系。

另一个建议是在巴格达附近会晤，在那里我们可以设三间舒适的营房，周围布置足够数量的俄国、英国和美国警卫人员。最后这个想法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我认为，无论如何，记者一律不许到场，而且整个场地四周应设立警戒线，以保证我们不受任何干扰。以11月20日或者11月25日为会晤的日期，您的意见如何？

我非常重视您、丘吉尔和我将要进行的这次当面亲密会谈，因为未来世界的希望将取决于这次会谈。

你们在自己整个战线上继续掌握着主动权，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1943 年 10 月 14 日

第 12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7 日

我收到您 10 月 14 日的两封来信。

谢谢您告诉我关于国务卿和他的工作人员已在途中的消息。我希望他们不久将平安地到达莫斯科。

关于您在第二封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同我的政府同事们商量之后，将给您答复。

1943 年 10 月 17 日

第 12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7 日

鉴于莫洛托夫先生于 10 月 14 日给美国代办的照会，以及为了在政治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权问题上不致有误解，我想我应当说清楚：正如在我 9 月 5 日的信里向您所指出的那样，我觉得法国代表权应当局限在对意大利的军事占领以外的、建立这个委员会的三国政府认为法国有直接利益的那些问题上。

我觉得，在这方面，法国代表权应当与我在 10 月 13 日的信中所建议的，给予中国、巴西、希腊和南斯拉夫，或可能通过共同协议邀请参加的任何其它政府的代表权相适应。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图：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当和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职权或者参加对所有问题的讨论。

1943 年 10 月 17 日

第 13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19 日

关于三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地点问题，我愿意将下列情况通知您。

很遗憾，我不能认为以您所提议的那些地点来代替德黑兰作为会晤的地点是合适的。问题并不在于安全，因为安全问题并不使我感到担心。

在今年夏季和秋季苏军作战的过程中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军队能够继续对德军发动攻势，因而夏季的战役将会进而转为冬季战役。我的同事们认为，这些军事行动需要最高司令部每天的指导，并且要由我亲自同司令部联系。在德黑兰，和其它地方不同，这种要求可以通过电报或电话和莫斯科直接联系而得到满足。因此我的同事们坚持在德黑兰会晤。

我同意在会晤时应当不让记者接近。我也同意您建议的确定 11 月 20 日或者 25 日作为举行会晤的可能日期。

赫尔先生已经平安地到达莫斯科，我希望他出席莫斯科三国会议将会带来很大好处。

1943 年 10 月 19 日

第 13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21 日

收到您 10 月 17 日的来信。我不反对您提出的关于给予法国参加盟国军事政治委员会的代表的权力范围的建议。

1943 年 10 月 21 日

第 13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

今天（10 月 21 日）收到您关于我们会晤的来信。我感到深为失望。

您提出理由说，需要每天由最高司令部给予指导并且需要您亲自和最高司令部接触（这样做正在产生极为出色的成绩），我对此完全了解。在这方面，请接受我的保证。

所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我希望您了解，还有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些就是在我们美国立宪政体中为我规定的义务。我不能改变这些义务。根据我们的宪法，在一项法律通过后，必须由总统在十天之内对这项法律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总统必须接受并且在这个期间内以其书面的同意或者否决把文件的原本送回国会。就像我上次告诉您的那样，我不能用电报或者无线电来做这件事。

去德黑兰这个地方的困难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越过高山才能到这个城市，这常常使飞机一次要好几天不能飞行。这种延误的危险是双重的：从华盛顿载运文件的飞机要冒这样的危险，把这些文件送回国会的飞机也要冒这样的危险。我遗憾地说，作为国家的元首，我不可能去一个我不能履行我根据宪法所承担的义务的地方。

空运文件一直到波斯湾（包括低地国家在内）的危险，我可以通过飞机接力飞行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是我不能承担从两个方向飞越高山进入德黑兰所在的盆地所遭遇的延迟。因此，非常遗憾，我必须告诉您，我不能前往德黑兰。我的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们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

然而可以提出最后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让我们三人都到巴士拉去，

在那里我们可以在由我们各自的军队建立和防卫的三个宿营地里受到完全的保护。您知道，您可以容易地取得一条由您控制的从巴士拉直到德黑兰的电话专线，这条线将在德黑兰同您自己的线路联接起来而进入俄国，您所需的一切都可以由这样一条电话线获得解决。拿乘飞机来说，从俄国到那里只比到德黑兰稍稍远一点。

我决不考虑这样的事实，我必须从美国领土旅行到离俄国领土不到600英里的地方。

我必须使一个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立宪政府继续工作下去。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走十倍远的路和您相会也是高兴的。

在努力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方面，您对您的人民所负的义务是重大的。但是我请您不要忘记我对美国政府以及对保持美国全面的作战努力所负的重大义务。

我把我们三人的会谈看作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情；这不仅对今天我们人民来说是这样，而且从为后代建立和平世界方面来说也是这样。我在过去已对您这样说过了。

如果只是由于几百英里而使您本人、丘吉尔先生和我不能会晤，后代子孙将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我再一次表示，如果不是由于我不能加以控制的限制妨碍了我，我将欣然前往德黑兰。

为了您的通讯问题，容许我建议巴士拉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不合您的心意，请允许我深深地希望您会再次考虑巴格达或者阿斯马拉，或者甚至安卡拉。我想最后这个地方是值得考虑的。它是在中立国家的领土内。土耳其人可能认为当东道主这个主意是好的。当然，我还没有对他们或者对任何其他人谈过这一点。

在这个紧要关头，请不要使我失望。

罗斯福

第13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11月5日

赫尔先生在10月25日把您最近的来信转交给了我，我就同他交谈了这封信。我没有立即作答，因为我确信赫尔先生已经把这次谈话的内容以及我对于同您和丘吉尔先生会晤问题的意见转告了您。

我不能不重视您提出的妨碍您前往德黑兰的事由。不言而喻，您能否前往德黑兰，只能由您自己决定。

依我看来，应该说，没有比上述城市更适合会晤的地点了。

我担负着苏军最高统帅的职责，这就使我必须经常不断地领导我们前线的作战。这在此刻特别重要，因为连续四个月的夏季攻势正在转入冬季攻势，并且作战行动在几乎长达2,600公里的整个战线上都在日益扩大着。在这种情况下，我身为最高统帅，我不可能到比德黑兰更远的地方去。政府中的同事们都认为：由于前线局势极其复杂，目前我万万不能离开苏联。

正因为如此，我产生了我已经对赫尔先生谈过的那个想法。我们政府的第一副总理锥·米·莫洛托夫完全可以代替我进行这一次会晤，他在谈判期间将按照我们的宪法享有苏联政府首脑的全部权利。这么一来，选择会晤地点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消失了。我希望，这个建议在目前会使我们大家都满意。

1943年11月5日

第13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3年11月8日

承蒙您的大使葛罗米柯先生把您11月5日的来信交给我，我为此向您表示感谢。

我希望日内离开这里并在11月22日到达开罗。

您将高兴地获悉，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我获得消息说明国会已通过并送来一项需要我否决的法案时，我将飞往突尼斯处理它，然后再回来开会。

因此我已决定前往德黑兰，这使我特别感到高兴。

正如我已对您说过的那样，我认为您和丘吉尔先生以及我会晤是十分重要的事。即使我们的会晤仅持续两天，目前的心理状态的确需要它。因此，我打算使参谋人员11月22日在开罗开始他们的工作，我希望莫洛托夫先生和您的军事代表们将在那时到开罗。

然后我们能够在11月26日前往德黑兰，并于27日、28日或30日在那里同您会晤，您觉得您能够出国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晤多长时间。丘吉尔和我以及高级参谋人员然后可以回到开罗去完成细节。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三人的这次会晤，您、丘吉尔和我亲自互相熟悉这一事实将对我们三国国内的良好舆论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有助于进一步扰乱纳粹的士气，即使我们不发表像最近非常成功的莫斯科会议所宣布的那样重要的声明，情况也会是这样。

我热切地盼望着和您进行一次良好的会谈。

罗斯福

1943年11月8日

第135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年11月10日

收到您11月8日的来信。谢谢您的答复。

我同意您关于我们在伊朗会晤的计划，并且希望丘吉尔先生也表示同意。

维·米·莫洛托夫和我们的军事代表将于11月22日到达开罗，

并在那里和您详细拟定关于我们在伊朗会晤的一切事项。

1943 年 11 月 10 日

第 13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电

1943 年 11 月 12 日

现在发生的情况是，由于某些具有严重性质的原因，维·米·莫洛托夫不能于 11 月 22 日到开罗。他将在 11 月底左右陪我同去伊朗。同时我正在把此事告诉丘吉尔先生，您将得到关于这一点的通知。

又及：由于某些办事人员的差错，这份电报的送发不幸延误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及时到达。

1943 年 11 月 12 日

第 13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3 年 11 月 13 日发出

我觉得我必须告诉您，今天我寄给丘吉尔先生一封信，内容如下：

“今天我收到了您的两封来信。

“虽然我已曾经写信给美国总统，告诉他维·米·莫洛托夫将于 11 月 22 日到达开罗，但是应当告诉您，很遗憾，由于某些具有严重性质的原因，莫洛托夫不能前往开罗了。他将在 11 月底同我一起去德黑兰。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名军官。

“不言而喻，德黑兰会谈应该只是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事，正像以前所商定的那样。应当绝对排斥任何其它国家的代表参加。

“祝您同中国人进行的关于远东问题的会谈获得成功。

“1943 年 11 月 12 日”

第13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年11月13日收到

您11月10日的来电以及我们会晤的肯定前景当然使我很高兴。我将很愉快地在11月22日在开罗见到莫洛托夫先生。

我即将动身前往北非。

致以热烈的问候。

第13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年11月20日

我对你们连续获得出色的胜利衷心地感到高兴。

我刚刚着陆。我对莫洛托夫先生的情况很关切，希望他不久复原。我将高兴地在德黑兰见到他和您在一起。请让我知道您希望我在什么时候到达那里。从明天起我将在开罗，丘吉尔先生将在附近。

1943年11月20日

第140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年11月24日收到

今天早晨我到达开罗并且已经开始同英国首相进行讨论。到本周末，将继之以同蒋委员长的会谈，他将在会后返回中国。随后首相和我本人在我们高级参谋人员陪同下将可以前往德黑兰和您、莫洛托夫先生以及您的参谋官员们会晤。我可以在11月29日下午到达，如果这个时间对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那里逗留两天到四天，这要取决于您能够离开您难以分身

的职务多久。如果您愿意打电报告诉我，您希望确定哪一天开会和您能逗留多长时间，我将非常感谢。如果您随时把您的计划告诉我，我将很感激，因为我了解，每年的这个时候，恶劣的天气常常使从莫斯科到德黑兰的旅行遭到拖延。

我知道，在德黑兰，您的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离得很近，而我的公使馆则离得较远。有人对我说，如果我们住的地方相距太远，在驱车往来我们的会谈地点时，我们三人都会冒不必要的危险。

您想我们应当住在哪里？

我热切地盼望着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

第 14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1 月 25 日

您从开罗的来电已经收到。我将于 11 月 28 日晚在德黑兰候教。

1943 年 11 月 25 日

第 14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

非常感谢您 11 月 23 日来电告诉我您准备在 11 月 28 日或者 29 日到达德黑兰。

至于我本人，我希望在 27 日到达那里。和您相见将很愉快。

[德黑兰会议于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 1

第14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11月29日

美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美国代表团在最近莫斯科会议期间建议苏联提供空军基地，以便美国飞机在从联合王国进行穿梭轰炸时可以在这些基地上加油、进行紧急修理和重新装置弹药。代表团还建议更为有效地互相交换气候情报，并且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信号和空中交通。

我的了解是，苏联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些建议，同时将指示苏联有关当局同我的军事代表团会见，以便考虑为执行这些建议所必需的一些具体措施。

我希望有可能迅速作出这些安排。

1943年11月29日

第14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年11月29日

关于西北太平洋海军作战的预定计划

我愿意现在和您作出安排来交换情报并制订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关于德国从战争中被消灭后最后对日本作战的初步计划。愈是能制订这项初步计划，而不对局势产生不应有的危害，愈是能把整个战争结束得更快。

具体地说，我考虑到下列各项：

甲、我们将乐于接受关于日本的战斗谍报。

乙、鉴于你们的远东潜水艇和驱逐舰队的各个港口可能受到陆上或空

中攻击的严重威胁，如果美国充分地扩大基地设施来使这些舰只进入美国基地，您是否觉得可取？

丙、万一美国攻击千岛群岛北部，您能够给予什么样的直接或间接援助？

丁、您能否指出哪些港口——如果有的话——是我们的舰队能够使用的？您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些港口在海军使用方面和港口运送货物量的情况？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这些问题可以同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讨论，程序和为空军作战计划所建议的程序相似。

1943 年 11 月 29 日

第 14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11 月 29 日

关于西北太平洋空军作战的初步计划

为了缩短战争，我们认为，在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敌对行动开始之后，立即从你们滨海各州轰炸日本，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将能够使我们摧毁日本的军事和工业中心。

如蒙同意，您是否愿意作出安排，使我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得到关于在滨海各州的机场、住房、供应、交通和气候的必要情报以及从阿拉斯加到那里的路线。我们的目标是驻扎数量尽可能多的轰炸机部队，从 100 架到 1,000 架四引擎轰炸机，并驻扎维修人员和作战人员，飞机的架数要取决于可以使用的设备，

应当立即开始制订为达到这项目的的计划，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了解，目前我们人员所作的实际勘查应当仅由很少数人员进行并且应当绝对保密。我们当然会满足您在这方面可能规定的任何条件。

如果现在就作出上述安排，我深信用我们的轰炸机袭击日本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

1943 年 11 月 29 日

第 14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3 年 12 月 3 日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俄国，莫斯科

在我们离开德黑兰的那天，飞越山岭的气候条件是理想的，所以我们这次前往开罗的飞行是舒适的。我赶忙对您为我在您驻德黑兰大使馆提供住所方面所作的周到考虑和款待表示我个人的谢意。我不仅在那里非常舒服，而且我充分认识到，由于在整个逗留期间我们是那样近的邻居，因而在短暂的时间内我们能够完成那么多的工作。

我对我们聚会的那些重要日子感到最大的满意，认为这是人类事务的进步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感谢您以及您的参谋人员和事务人员给我和我的参谋人员的盛情款待。

我正在动身回国，并且将在途中视察在意大利的我国军队。

您的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3 年 12 月 3 日

第 14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2 月 4 日

我们一行人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全都诚挚地希望，你们这时也已安全到达。我认为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确信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它不仅证明我们完全能够在一起作战，而且也能在极为融洽的气氛中为未来的和平而工作。我非常欣赏我们在一起进行的私人会谈，特别是有机会和您面对面地会晤。我盼望在某个时候再与您会晤，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祝您和您的军队获得最大的成功。

1943 年 12 月 4 日

第 14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2 月 6 日

谢谢您的来电。

我同意说德黑兰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亲自进行的会晤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我们几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不久将感到这点。现在肯定的是，我们的人民在目前以及在战后都将协调地合作。

我祝您和您的武装部队在未来的重大作战中取得最大的胜利。

我还希望我们在德黑兰的会晤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将再次会晤。

1943 年 12 月 6 日

第 14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2 月 7 日收到

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横渡海峡作战的司令。

第 150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3 年 12 月 7 日收到

除了我们三人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之外，在刚刚结束的开罗会议上，我们达成了下列关于1944年对德作战计划的决定。

为了破坏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摧毁德国空军的战斗力，并为横渡海峡的作战铺平道路，将把战略上最高的优先地位给予对德的轰炸机攻势。

我们已经缩小了原定在3月份在孟加拉湾进行的作战的规模，以便有可能增加进攻法国南部用的登陆工具。

为了增强横渡海峡作战的力量，我们已下令在英国和美国尽最大努力增加登陆艇的生产。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已下令从太平洋调动若干登陆艇。

第151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电

1943年12月10日

承蒙你们联名来信通知关于1944年对德作战计划的一些补充决定，特表示感谢。向你们问候。

1943年12月10日

第15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3年12月10日

收到您关于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来电。我表示欢迎。我祝他在准备和执行未来的决定性战役方面获得成功。

1943年12月10日

第15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3年12月20日

谢谢您的来信，我在 12 月 18 日经由您的大使收到了这封信。

我很高兴有机会使我能够在德黑兰为您效劳。我也很重视我们的会晤以及我们就加速取得我们的共同胜利并在各国人民间建立持久和平这个重大问题所进行的谈话。

1943 年 12 月 20 日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第 15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总统电

1944 年 1 月 4 日

我高兴地从报纸上获悉您的健康正在恢复中。我向您致最好的问候，主要的是，祝您迅速完全恢复健康。

1944 年 1 月 4 日

第 155 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 月 23 日收到

苏联政府曾在莫斯科会议上，要求把意大利的船只移交给苏俄，关于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您在德黑兰已经商妥。我们从联合参谋部收到--份备忘录，在我们马上将发给您的另一份电报里将包括这份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所叙述的理由，我们认为在意大利人的合作对于作战行动不再重要之前，进行任何船只的移交或者就这件事对意大利人说什么话，实际上对我们三国的利益都将是危险的。

但是，如果在充分考虑之后，您希望我们进行下去，那么我们将向巴多里奥元帅秘密交涉，以便作出必要的安排，同时又不使意大利海军普遍地知道这种安排。如果这样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同意大利海军当局作出的那种必要的安排，可以让他去做。这些安排应当符合这样的目的，就是使规定应予移交的意大利船只开往盟国适当的港口，由俄国的海员在那里接收，并由他们开往俄国北部的港口，这些港口是可能在那里进行必要

的改装的仅有的开放港口。

然而，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行动的危险性，理由我们已经向您说明，因此我们决定建议下面的代替办法，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办法有许多优点。

英国主力舰“君主号”不久以前在美国完成了改装工程。它装配有可以探测一切类型武器的雷达。美国大概也可以在同一时间提供一艘轻巡洋舰。

英王陛下政府和美国政府方面愿意这些船只由苏联海员在英国港口加以接收，并开往俄国北部的港口。然后您可以按照北极的条件来进行您认为必要的改装。

这些船只将暂时以租借形式移交给苏俄，并且悬挂苏联国旗，一直到可以提供意大利船只而不使作战行动遭到损失时为止。

英王陛下政府和美国政府将各自采取措施提供2万吨商船，这些商船将尽快提供使用，直到可以获得意大利的商船而不影响预定的“霸王”和“铁砧”[①]重要作战为止。.

这种办法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苏联政府能够在早得多的时候使用这些船只，因为否则的话，船只都需要改装，使其适应北方的海洋。这样，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作的努力情况好转，同时海峡开放的话，这些船只就可以随时用于在黑海作战。我们希望您能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个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个建议在各方面都比第一个建议强。

丘吉尔

罗斯福

————————————

① “霸王”，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战役的代号。“铁砧”，盟国军队1944年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战役的代号。——原注

第156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4年1月23日收到

请参阅我们上次的信件。

我们联合参谋部提出了下列积极的建议，并附有支持这些建议的材料：

甲、由于盟国即将展开作战行动，目前移交缴获的意大利船只是不适当的。

乙、现在强行移交就意味着剥夺在目前的战斗中所利用的必需的意大利资源，并且会妨碍我们得到目前意大利的修理设备所给予的帮助。这可能会引起意大利军舰的凿沉和失去意大利的合作，因而使“霸王”和“铁砧”遭到危害。

丙、只要作战的情况许可，意大利的船只可以尽早移交。

丘吉尔

罗斯福

第157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年1月29日

总统先生和首相先生，你们关于把意大利船只移交给苏联使用的问题的两封联名信我已经在1月23日收到了。

我必须说，你们在德黑兰对于我所提出的在1944年1月底以前把意大利船只移交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共同答复后，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三人已经通过和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个决定会产生什么重新考虑的可能。尤其是当时我们已经商定，这个问题应当在12月和1月之内同意大利人完全交涉好。现在我看到，情况并不是如此，甚至丝毫没有同意大利人谈过这个问题。

然而，为了不使这个对我们反对德国的共同斗争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的解决拖延下去，苏联政府愿意接受你们提出的把“君主号”主力舰和一艘巡洋舰从英国港口开往苏联，以及在把相应的意大

利船只交给苏联之前，把这两艘军舰暂时拨归苏联海军司令部使用的建议。同样，我们准备从美国和英国接受各 2 万吨商船，在把同等吨数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之前，这些船只同样将由我们使用。重要的是现在不要在这方面拖延，并且把上述的船只在 2 月底以前交给我们。

但是，在你们的复信中没有提到把 8 艘意大利驱逐舰和 4 艘潜水艇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而这是你们，总统先生和首相先生，1 月底在德黑兰时就已经同意了的。但是驱逐舰和潜水艇这个问题对苏联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军舰，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巡洋舰的移交是没有意义的。你们自己会理解到，巡洋舰和主力舰如果没有护航驱逐舰是没有力量的。既然你们掌握了意大利的全部海军，履行在德黑兰通过的把意大利舰队中的 8 艘驱逐舰和 4 艘潜水艇交给苏联的决定就不应当发生什么困难。我也同意以同等数量的美国或英国的驱逐舰和潜水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水艇移交给苏联。驱逐舰和潜水艇的移交不应拖延，而应当与主力舰和巡洋舰的移交同时进行，正如我们三人在德黑兰已经商定的那样。

1944 年 1 月 29 日

第 158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联名信

1944 年 2 月 24 日收到

亲收绝密信

您关于把意大利船只移交苏俄的问题的来信收到了。

我们打算在实际可行的尽早时间执行在德黑兰达成协议的移交，而不使“铁钻”和“霸王”的成功受到危害；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作战在我们在最短期间战胜德国的共同努力中应该享有优先地位。

我们无意不实现在德黑兰所同意的移交。英国的主力舰和美国的巡洋

舰可以立即提供，并且将立即设法从英国舰队中拨出8艘驱逐舰交给你们。英国还将暂时提供4艘潜水艇。我们相信，目前在意大利海军中引起不满会像您所恰当地说的那样，是不必要的浪费精力，并且这将对我们在法国获胜的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

1944年2月7日

第15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11日收到

我一直在十分密切地注视着您同波兰关系的最近发展。我觉得我充分了解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因此我乘此机会在我们德黑兰会谈的基础上写信给您。首先，请让我说明，我既不希望也不打算设法向您建议——更谈不上劝告您——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利益所在，因为我充分认识到，您的国家未来的安全正当地是您首要关心的事。我所要谈的意见完全是由于更大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都在走向的共同目标。

您知道，我国人民和国会的绝大多数都热情地欢迎在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所同意的一些广泛原则，我知道您同意我的看法，即不使人们对这些谅解的诚意有任何怀疑，是极为重要的。我相信能够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来充分保护俄国的利益，满足您想见到一个友好和独立的波兰的愿望，同时又不对在莫斯科和德黑兰如此辉煌地确立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已经仔细地考虑了您的政府的意见，这就是莫洛托夫先生在1月18日对哈里曼先生概述的、关于从苏联观点来看不可能同目前那个样子的波兰流亡政府打任何交道，同时考虑了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议：应当改组波兰政府，把目前在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波兰人包括进去。您希望只同您能够信任和能够指望同苏联建立永久友好关系的波兰政府打交道，我充分理解这种愿望，但是我的诚挚的希望是，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不应做任何事情把这个特殊问题变为对未来国际合作的一些较大的问题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当支持国际合作的原则的舆论正在形成的时候，我们

特别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看来会妨碍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行动。

丘吉尔首相告诉我说，他正在努力劝波兰总理明确地接受您的政府所提出的改变领土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是有可能对波兰政府组成的问题获得某种将使波兰总理本人在他的政府中作出可能是必要的更动，而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外国施加了压力或发出了命令的解决办法吗？

在我看来，在时间问题上，目前首先考虑的应当是使波兰游击队同您的挺进部队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作为第一步，在所有波兰人方面作出某种保证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16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16日

您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收到了。不用说，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苏联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是很重要的。

有两个主要问题应当加以考虑：第一，苏波边界：第二，波兰政府的组成。看了苏联政府最近发表的一些声明以及维·米·莫洛托夫对赫尔先生信件的复信，（赫尔先生的信是通过苏联大使葛罗米柯于1月22日在莫斯科收到的）您是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的。

首先，关于苏波边界问题。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已经正式宣布它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线是不可更改的，并且同意了寇松线[①]。宣布了这一点，我们就是在边界问题上对波兰人作了很大的让步。我们有理由期待波兰政府方面发表相应的声明。它原应正式宣布里加条约[②]所

——————————————

① “寇松线”，协约国会议于1919年12月8日建议作为波兰东部边界的那条线的名称。——原注

② 里加条约是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的苏波和约。条约确定了苏波边界，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归属于波兰。——原注

规定的边界应当修改，并接受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新边界线。它原应像苏联政府所做的那样，发表承认寇松线的正式声明。可是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寸步不让，并且在正式言论中继续坚持，在我们的困难时刻根据里加条约强加于我们的边界是不应改变的。因此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基础，因为在我们看来，目前波兰政府的立场排除了协议的可能性。

鉴于这种情况，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同样变得更加尖锐。很清楚，由索森科夫斯基之流的亲法西斯的、敌视苏联的帝国主义分子起着主要作用的，并且几乎没有任何民主力量在内的波兰政府，不可能在波兰国内有任何基础，它也不可能同一些民主邻国建立友好关系。显然，这样一个波兰政府不可能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不可能期待它不在民主国家之间散布不和，而这些国家是希望加强它们的团结的。由此可见，彻底改进波兰政府的组成是一项紧迫的问题。

由于前线工作繁忙，我不得不延迟了答复。

1944 年 2 月 16 日

第 16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2 月 18 日收到

在答复您 1 月 29 日来信的时候，我高兴地告诉您，下列美国船只将暂时提供给苏联海军司令部使用，直到能够向苏联提供适当吨位的意大利船只来代替它们为止。

“密尔窝基号”巡洋舰计划于 3 月 8 日到达联合王国，停泊的港口尚未确定。

一万吨的货轮“约翰·戈里号”和“哈里·佩西号”现在分别停泊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

第16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21日

您2月18日的来信收到。感谢您告诉我的消息。

但是它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它丝毫没有谈到关于根据德黑兰决定由英美驱逐舰和潜水艇代替8艘意大利驱逐舰和4艘潜水艇的问题。我期待着及早答复我在1月29日的信中所谈到的各点。

1944年2月21日

第16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年2月21日收到

我们密切地注视了您的军队最近在西北部和在乌克兰的胜利，并且深深感到满意。我向您致最好的祝愿和祝贺。

第16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电报

1944年2月23日

我收到您祝贺苏军最近胜利的来电。请接受我对您的友好祝愿表示的感谢。

1944年2月23日

第16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年2月23日收到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约瑟夫·维·斯大林阁下
（从俄文重新译成英文）

莫斯科

值此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之际，我愿意向担任最高统帅的您，对苏联武装部队在过去一年获得的伟大和重大的胜利表示诚挚的祝贺。红军在您的领导下取得的煌辉胜利是对我们大家的鼓舞。列宁格勒城的英勇保卫战取得了成功，使敌人最近在该城城下遭到大败。由于红军的胜利攻势，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从奴役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些成就，加上在莫斯科和德黑兰达成协议所赖的合作，将保证我们对纳粹侵略者的最终胜利。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16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24日收到

您2月21日关于把英美军舰租借给苏联海军的来信已经收到。

据我了解，英国将提供1艘主力舰、4艘潜水艇和8艘驱逐舰。我已就这一点打电报给英国首相。在我接到他的回音时，我将告诉您。

第16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25日收到

关于我1944年2月23日的信，我已经接到丘吉尔首相的回信，我对您所说的我们的了解现已获得证实。

第168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2月25日收到

联合国家的各国政府为了战后在国际经济关系各个方面的合作行动打下基础，最近几个月已经采取了若干重要步骤。您会记得，1943 年 5 月举行的关于粮食和农业的联合国家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正在起草一项向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以便在这方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最近成立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现在已在进行工作。

联合国家的许多国家就成立国际货币稳定机构问题已经在专家一级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非正式的技术讨论；这些讨论是为可能召开一次联合国家货币会议进行准备。在可能建立促进国际开发投资的机构方面也在较为有限的规模上举行了类似的讨论。在联合国家的某些国家之间，还就贸易政策、商品政策和卡特尔这样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举行了非正式的讨论。还在考虑对于像民航、石油以及其它问题进行讨论。4 月间将举行国际劳工组织会议，这次会议的部分目的是考虑这个组织的未来活动。

美国国务卿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国际经济合作计划的基础》的文件里强调了就各种经济问题举行非正式讨论和举行正式会议的必要性。这个文件建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家的主要国家的代表以及可能还有联合国家中其它一些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的时刻已经到来，以便共同规划在这些问题上应当遵循的程序。”我确信，显然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国机构来共同规划一些程序，根据这些程序来考虑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应当讨论的问题、讨论的顺序以及协调现有的和未来的一些安排和活动所使用的方法。

目前我在这方面的目的不是要提出建立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这些较广泛的问题。我们三国政府目前正在根据莫斯科议定书的规定计划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为战后经济合作而建立联合国机构所要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问题，国务卿在莫斯科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已由您、丘吉尔首相和我本人在德黑兰讨论过。

如果您愿意告诉我您对国务卿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看法，以及关于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应当遵循的最好程序的任何其它看法，我将非常感激。

第169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密信

1944年2月26日

通过哈里曼先生，我在2月24日和25日收到你们发来的关于意大利船只问题的两封信。我还收到由英国大使寇尔先生在2月24日转来的您和首相2月7日的联名信。

对您和首相决定把英国的8艘驱逐舰、4艘潜水艇、1艘主力舰和两万吨商船以及美国的1艘巡洋舰和两万吨商船暂时移交给苏联的通知表示感谢。寇尔先生曾特意告诉我，所有这些驱逐舰都是旧的，所以我有些担心这些驱逐舰的战斗能力。我觉得，对英国和美国的海军来说，在8艘驱逐舰中，至少拨出4艘现代化的而不是陈旧的，是不应有困难的。我仍然希望您和首相将能够移交至少4艘现代化的驱逐舰。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我们损失了很大一部分驱逐舰。因此，那怕这种损失部分地获得弥补，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大的意义。

1944年2月26日

第17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年2月28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先生

华盛顿，白宫

请接受我对于您对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以及对苏联武装部队在反对希特勒入侵者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的友好祝贺表示衷心的感激。

我坚决相信这样的日子不远了：苏联武装部队同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在莫斯科和德黑兰取得的协议的基础上共同进行的胜利斗争，将使

我们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遭到最后的失败。

约·斯大林

第17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年2月28日收到

我获悉英国首相在2月20日给您的关于通过苏联和波兰政府之间的协议初步解决波兰战后边界问题的信件。

如果被接受的话，首相的建议将大大有助于增加我们早日击败德国的可能性，我并愿建议您对首相的建议给予有利的和同情的考虑。

像我过去对您说过的那样，我认为，最现实的问题是保证在您的军队进入波兰时，将获得波兰人的协助。

第172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密信

1944年3月3日

尽管我很想对丘吉尔先生关于波兰人的信件，（这封信您是知道的）持赞同的态度，但我还是应当指出，波兰流亡政府并不希望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在伦敦的流亡者不仅拒绝寇松线，他们还要求获得里沃夫和立陶宛的首都维尔那（即维尔纽斯。——译者）。

不能不认为，解决波苏关系问题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附上我就这个问题给丘吉尔先生的复信，供您参考。

1944年3月3日

附件 **斯大林致丘吉尔亲收密信**

2月27日我从寇尔先生那里收到了您在2月20日发来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两封信。

我在看过了您同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会谈的详细记录之后，我比过去更加深信他们那种人是不能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不仅不准备承认寇松线，而且还要求里沃夫和维尔那。至于企图把某些苏联领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这种意向我们是不能予以讨论的，因为我们认为，仅仅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侮辱。

我已经写信告诉美国总统，解决苏波关系问题的时机还未成熟。我不得不再次肯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1944年3月3日

第17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3月4日收到

今天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们坚持提出的问题时说，意大利的军舰和商船现在正由盟军地中海司令部在我们的作战中使用，同时为了帮助苏联海军作战努力的需要，将拨给苏联海军一些意大利船只，或者用美英船只来代替意大利船只。

第17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3月6日

我收到了您关于您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把若干意大利船只或者同等吨数的美英船只移交给苏联的声明的通知。谢谢您。

1944年3月6日

第175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绝密信

1944年3月9日收到

虽然首相指示克拉克·寇尔大使通知您，我们租借给你们的驱逐舰是旧的，这只是本着绝对坦率的精神才这样说的。事实上，这些舰只是好的、可用的舰只，对于担任护航任务来说是完全合格的。意大利的整个海军中只有7艘驱逐舰，其余的都是比较旧的驱逐舰和鱼雷艇。此外，意大利的这些驱逐舰在我们接收时，如果不经过很长时间的改装，将完全不适合于北方的任务。因此我们认为，英国政府所提供的8艘驱逐舰将对你们是一种较为迅速而方便的帮助方式。首相对他目前不能拨出任何新的驱逐舰表示遗憾。两星期以前，他损失了两艘驱逐舰，其中一艘是派往护航俄国船只的，而仅仅为了在“霸王”登陆时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对炮台进行轰击，他就至少需要42艘驱逐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被击沉。他现有的属于这一级的每一艘舰只都在为共同事业而最大限度地被利用着。日本舰队向新加坡的调动，在印度洋上对我们两国造成了新局势。在昂齐奥桥头堡以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斗正处于高潮。装载美国解放部队的巨大的军队运输船队正在横渡大西洋。在驱逐舰的强大力量护送下前往俄国的运输船队正在航行，一直到“霸王”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最后还有“霸王”本身。总统那里的情况也同样紧张，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太平洋上的作战的巨大规模和活跃而引起的。我们两人都有意思要把意大利的船只移交给您，这一点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上都已经同意了，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意大利政府的成员扩大和新部长们就职之后，我们将正式向意大利政府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有权利处理意大利的海军，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我们的共同利益尽量少受损失的情况下来行使这些权利。同时，所有我们上述的船只正准备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租借给您。

罗斯福

丘吉尔

第 17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10 日

收到您关于战后经济合作的来信。赫尔先生备忘录里所提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值得注意。我认为目前正是时候，应当成立一个联合国家工作组来研究这些问题，并按照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来确定审查国际经济合作的各种条件和方法。

1944 年 3 月 10 日

第 17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17 日

你们关于英国政府移交给苏联 8 艘驱逐舰的来信收到了。我愿意同意，这些驱逐舰完全适合于护航工作，但是，你们当然很清楚，苏联也需要能适合于其它作战行动的驱逐舰。盟国支配意大利海军的权利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而且应当向意大利政府说清楚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应交给苏联的那些意大利船只。

1944 年 3 月 17 日

第 178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 年 3 月 18 日收到

今天我已用飞机向伊诺努总统发出一封关于铬的问题的私人信件，因为我对土耳其供应德国大量的铬感到不安。我已将这封信送往驻安卡拉的

斯坦哈特大使让他转交。我确信您是会同意的，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行动是否会同您现在正在采取或者打算采取的任何步骤背道而驰，以便我可以不送交这封信。我给伊诺努总统信件的大意如下：

“在本星期中几乎每天都有许多我想同您谈的事，我但愿您和我不是相隔数千里之遥。

“这一次我要和您谈谈关于铬的问题。

“正如您所知道的，俄国人在占领了尼科波尔以后，已经成功地使德国人得不到锰的重要来源。土耳其的铬矿在许多用途上可以代替锰，在德国人不能从尼科波尔获得锰以后，土耳其的铬对德国军事生产的重要性便大大增加。

“很明显，土耳其继续向德国大量供应铬砂这一事实现在已使联合国家深感不安。您最能够决定如何使德国人不再获得土耳其的铬砂。您是有创造性天才的，我希望您会找出某种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我坚信您将认识到这是土耳其能够对世界的真正福利作出独特的贡献的机会。

“无需对您说，我在我们的开罗会谈中是多么感到高兴，我觉得现在您和我能够像老朋友一样彼此交谈。

“谨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希望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会面。”

我将向丘吉尔先生发出一份同样的电报。

第 17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20 日

我收到了您概述您给土耳其总统关于土耳其运铬给德国的信件的来电。

我认为您打算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我必须说，我对获得积极的结果不抱什么希望。

1944 年 3 月 20 日

第18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3月23日

既然丘吉尔先生曾把他3月21日给我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件的副本送给您——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认为把我给他的复信的副本送给您参考是适宜的。

附上复信的副本。

1944年3月23日

附件　斯大林致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最近我收到了您关于波兰问题的两封信，并且看过了寇尔先生根据您的指示就这同一问题向维·米·莫洛托夫提出的声明。由于前线的事务经常使我撇开非军事的问题，我未能较早地作答。

我现在逐点答复来信所提的问题。

我感到震惊的是，您的两封来信，特别是寇尔的声明，充满了对苏联的威胁。我愿意提醒您注意这一情况，因为威胁这种方法不仅在盟国的相互关系中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可能引起相反的效果。

您在一封来信中把苏联为维护和实现寇松线所作的努力称为实力政策。这意味着您现在企图把寇松线说成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这条线而作的斗争是非正义的。我完全不同意您这种态度。我必须指出，在德黑兰时，您、总统和我已经一致同意寇松线是合法的。

您当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您说，如果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拒绝接受寇松线，他们就是疯子。但是现在您却采取某种相反的态度。

这是否意味着您不再承认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商妥的事情并从而破坏德黑兰协议呢？我毫不怀疑，如果您坚持您在德黑兰的立场，那么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冲突早就解决了。至于我和苏联政府，我们仍然坚持在德黑兰的立场，并且也无意放弃这一立场，因为我们认为实现寇松线并非实力政策的表现，而是恢复苏联对自己领土的合法权利的政策的表现，这块领土甚至连寇松和协约国最高会议早在 1919 年就已承认不是波兰的了。

您在 3 月 7 日的来信中声称，苏波边界问题要拖延到召开停战会议的时候。我想这里有一些误会。苏联没有同波兰作战，也不想同它作战。苏联同波兰人民没有任何冲突，并且把自己当作波兰和波兰人民的同盟国。正因为如此，苏联才为把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流血。因此，说到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停战是很奇怪的。但是苏联政府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冲突，波兰流亡政府并不代表波兰人民的利益，也不表达波兰人民的愿望。

把波兰同与波兰隔绝的、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等量齐观，更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甚至很难说出波兰流亡政府和另一个流亡政府——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之间，或者波兰流亡政府的一些将军和塞尔维亚的米哈依洛维奇将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您在 3 月 21 日的来信中对我说，您准备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大意是，关于改变领土的一切问题都应推迟到停战或者战胜国举行和会的时候再说，而且在这以前您不能承认任何用强力实现的领土的转移。对这一点我是这样理解的：您把苏联看作是敌视波兰的，并且实际上否定了苏联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的解放性质。这就等于企图把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妄加在苏联身上，并以此来损害它的名誉。我毫不怀疑，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舆论将把您的这种声明理解为对苏联的无理的侮辱。

当然，您可以随便在下议院发表任何声明，这是您的事情。但是

您如果发表这种性质的声明，我将认为您对苏联采取了不公正和不友好的行动。

您在来信中表示希望在波兰问题上的挫折将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其它方面的合作。就我而论，我过去主张，并且现在还是主张合作。但是我担心，如果以后继续使用恫吓和诽谤的方法，将不利于我们的合作。

1944 年 3 月 23 日

第 18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 年 3 月 23 日收到

哈里曼大使刚刚告诉我，苏联不准备参加 4 月 2 日在费拉特尔费亚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

我曾经充分地考虑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不断改善全世界的劳工和社会水平方面应起的作用。我非常希望您了解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际劳工组织应当是制定关于直接影响劳工福利事项的国际政策以及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我希望它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团体，既作为联合国家讨论关于劳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构，又作为考虑直接致力于改善生活水平的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机构。如果我们两国政府不利用在费拉特尔费亚举行的会议来帮助发展我们的共同目标，那将是不幸的。这样我们可以使现有的国际劳工组织处理世界面临的一些任务，而不丧失时机。

我已指示出席费拉特尔费亚会议的美国政府代表提出关于扩大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和任务的一些措施，并提出它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的未来关系的问题。鉴于您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以及由于有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我们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我非常希望您的政府将参加这次会议。

第 18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25 日

我也像您一样希望我们两国政府进行合作，来研究有关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劳工福利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基于致哈里曼先生的信里所叙述的理由，苏联不能派代表出席在费拉特尔费亚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因为苏联工会反对参加这个会议，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苏联工会的意见。

不言而喻，如果国际劳工组织的确成为联合国的、而不是苏联不能与之发生关系的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那么苏联代表的参加将是可能的。我希望这将成为可能，并在不久的将来采取适当的步骤。

1944 年 3 月 25 日

第 18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25 日收到

根据您的建议，将发护照给兰格博士和奥勒曼斯基神父，以便接受您的邀请前往苏联。但是由于军事调动，目前我们的运输工具十分紧张，因此从美国到苏联的交通工具应由苏联提供。我知道，您将了解，兰格博士和奥勒曼斯基神父是以他们私人身份作为公民前去的，美国政府不能对他们的观点或活动负任何责任。万一这个访问成为公众评论的题目，美国政府把这一点说清楚可能是必要的。

第 18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3 月 28 日

我收到了您告诉我已经发给兰格博士和奥勒曼斯基神父护照的来信。苏联的运输工具虽然也非常紧张，但是我们将为兰格和奥勒曼斯基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苏联政府把兰格和奥勒曼斯基访问苏联看作是他们私人的访问。

1944年3月28日

第18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4月4日收到

非常感谢您3月25日的来信。我的希望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说清楚，它不再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而将附属于联合国。因此，我相信，苏联将派代表出席下次会议。我将把在费拉特尔费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随时告诉您。

第18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4月6日

4月4日收到您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来信。谢谢您的答复。我认为，执行改组国际劳工组织的措施将为苏联代表在今后参加这个组织的工作铺平道路。

1944年4月6日

第187号

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绝密信

1944年4月18日

1,根据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全面的渡海作战将在“R”日左右举行，这个日期最近已责成迪安和贝罗斯将军通知苏军总参谋部。我们将以我们最大的兵力采取行动。

2.大约在5月中，我们将以最大限度的兵力在意大利大陆上发动攻势。

3.德黑兰会议以来，贵国军队为共同事业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您认为他们不会积极活动的月份里，他们也获得了这些伟大的胜利。我们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且深信，你们的和我们的军队只要根据我们的德黑兰协议一致行动，一定会歼灭希特勒匪帮。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年4月18日

第188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年4月22日

4月18日来信收到了。苏联政府满意地获悉，根据德黑兰协议，将在预定的日期渡海作战，这个日期已由迪安和贝罗斯将军通知了我们的总参谋部；并且获悉你们将以最大的兵力采取行动。我深信预定的这次战役一定会获得胜利。

我希望你们在意大利进行的作战也将同样取得胜利。

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所商定的，红军将在同时发动新的攻势，以便最大限度地支援英美的作战。

请接受我对你们的谢意，感谢你们对红军的成就所表示的良好祝愿。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和我们的军队只要彼此相互支援，就一定会粉碎希特勒匪帮，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4年4月22日

第189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年4月29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先生

华盛顿，白宫

在美国由于美国海军部长富兰克林·诺克斯逝世而遭受沉痛损失之际，请接受苏联政府的诚挚吊唁。

约·斯大林

1944年4月29日

第190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4年5月5日

请接受我以及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您关于美国海军部长富兰克林·诺克斯先生悲惨逝世的唁电，表示真诚的感谢。

1944年5月5日

第191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年5月6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激您帮助斯坦尼斯拉夫·奥勒曼斯基神父获得前来莫斯科

的许可。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你的真诚的，

斯大林

第 192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的联名信

1944 年 5 月 14 日收到

为了以最大限度的兵力渡海进攻法国北部，我们已经把一部分登陆艇从地中海调到英国。这个事实以及目前在意大利的战斗中需要使用我们地中海的地面部队这一情况，使我们不可能在执行“霸王”的同时对法国的地中海沿岸进攻。我们正在计划在晚些时候采取这种进攻，为此目的正在从美国往地中海运去另外一些登陆艇。为了把最大数量的德军引离法国北部和东线，我们将在意大利对德国人立即展开最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对法国地中海沿岸保持威胁。

罗斯福

丘吉尔

第 19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5 月 15 日

你们的联名信已经收到。怎样分派你们的部队以及分派的先后，你们是更为清楚的。当然，主要的是在于保证“霸王”的完全成功。同时我相信，业已开始的对意大利德军的进攻将获得胜利。

1944 年 5 月 15 日

第19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5月23日

如蒙告知您对于我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意见，我将很感激。这项声明将按照下列各点在“D”[①]日以后发表，以代替要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发表的三国声明：

“有人建议盟国政府向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同情者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的重点放在最近在欧洲大陆的登陆上。我尚未同意此点，因为它可能过分强调这些登陆的重要性。我希望让德国人和他们的同情者认识到，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还想向他们着重指出，他们今后把战争继续下去是不明智的。他们在内心应当了解，从他们目前的目标和他们目前的领袖来看，他们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从现在起，每一个德国人的生命的丧失都是不必要的损失。不错，从冷静的观点来看，盟国也遭受损失。但是盟国方面的人口和资源远远超过德国，以致比较说来，德国人要比盟国遭受更大的打击——直到最后的一户人家。而且归根结底，光是顽强是决不会有助于德国的。盟国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它们不打算彻底消灭德国人民。它们追求的目的是彻底消灭一些德国人的哲学，这些人声称他们能够征服全世界。

“盟国期望达到人类自由这个长期目标——更大的真正自由，政治的，思想的，宗教的；一个更大的正义，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

“我们的时代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群人能够强大得足以统治全世界。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几乎为德国人口的两倍——愿向德国人民说，现在是他们放弃他们的邪恶的教义的时候了。

“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将近20亿人民，抱有相同的看法。唯有德国和日本起来反对其他部分的人类。

“每个德国人在内心里都知道这是真实的。德国和日本犯下了一个灾

———————————————

① “D”日，盟国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日子的代号。——原注

难性的、可怕的错误。德国和日本应当对他们所进行的肆意屠杀人民和毁坏财产的罪行作合理的赔偿。他们必须抛弃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哲学——对于这种哲学的欺骗性，现在他们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了。

战争和屠杀结束得愈早，一个更美好的文明就能愈早地来临。

“我们希望，美国、英国和苏联以及它们的盟国的军队在欧洲战场所发动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德国人民必须了解，这些进攻只不过是许多次进攻的一部分，而这些进攻都将在规模和数目上不断增长，直到取得必然的胜利为止。”

丘吉尔首相已经同意继我之后发表内容如上的声明。

1944 年 5 月 23 日

第 19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 年 5 月 25 日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部队
最高司令约·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我寄给您两份献给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颂词卷轴，这两个城市赢得了美国人民的衷心钦佩。这两个城市的公民和奋勇保卫这两个城市的士兵们的英雄主义不仅鼓舞了美国人民，而且将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已经成为坚忍不屈一词的同义语，它将使我们能够进行反抗并将最后战胜我们的敌人的侵略。

在献给这两个城市颂词卷轴的时候，我希望您将认为向这两个城市的公民转达我个人表示的友谊和钦佩并转达我的这个希望是适宜的。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将继续发展我们亲密无间的谅解，这种谅解是我们的共同努力的特点。

您的十分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4年5月25日

第19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5月26日

我收到您关于对德国人民的声明的来信。

考虑到对德国人的战争的全部经验和德国人的性格，我认为您建议的声明不会有积极的效果。因为这个声明预定发表的时间是在登陆开始的时候，而不是在英美军队进行的登陆和苏联军队即将进行的进攻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

至于声明本身的性质，我们可以在适合于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再来发表意见。

1944年5月26日

第19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5月27日

我在5月23日的信中提出我要发表的一项旨在影响德国人民的声明供您考虑。我现在得知，英国首相和他的内阁不同意这个建议。

由于建议中的声明并不是至关紧要的，并且考虑到英国政府明确和肯定地反对，我不打算在目前发表这种性质的声明。

1944年5月27日

第198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5月30日

我收到了关于通知我您已决定不打算在目前向德国人民发表声明的来信。

谢谢您的通知。

1944年5月30日

第19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5月30日

我收到您5月26日给我的关于我打算发表的旨在影响德国人民的声明的信件。

我在5月27日给您的那封信（很明显，在那封信发出时，您的来信正在途中）同意了您的意见，即在目前不发表此类声明。

1944年5月30日

第20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年6月5日

英美盟军攻克了罗马，对这样巨大的胜利我向您表示祝贺。苏联对这个消息感到极为满意。

1944年6月5日

第 20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6 月 7 日发出

我认为有必要让您知道，我在 6 月 6 日回答丘吉尔先生的来电时，给他本人发出了关于苏军夏季攻势计划的下列电报。

“您关于‘霸王’发动成功的来电已经收到。这使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并且希望继续获得成功。

“按照德黑兰会议的协议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在 6 月中旬在重要的一段战线上发动。苏军的全面攻势将通过陆续把军队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在 6 月下旬和 7 月底期间进攻就将转为苏军的全面攻势。

“我一定会随时把攻势进展的情况通知您。

“1944 年 6 月 6 日”

第 20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6 月 8 日收到

您的关于攻克罗马的贺电已经收到，非常感谢，并且感谢您给我寄来您给丘吉尔先生的电报的抄本。所有这些都使我十分高兴。

从法国北部来的消息说，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向您致热烈的问候。

第 20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6 月 19 日收到

您知道，波兰总理米柯拉契克先生刚刚结束对华盛顿的短期访问，由

于哈里曼大使已经向您说明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他的访问在目前是相宜的而且是必要的。

因此，您了解，他的访问同我这方面任何企图插入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存在的分歧的是非曲直毫无关系。尽管我们坦率地和有益地交换了有关波兰的各方面问题的意见，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没有拟订任何与波苏关系有关的计划和建议。不过，我相信，您对于我个人对米柯拉契克先生的印象和他对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各个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会感到兴趣的。

米柯拉契克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诚恳和讲理的人，他的唯一愿望是做一切对他的国家最有利的事。他完全认识到波兰的整个未来取决于与苏联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根据我的意见，他并愿为此目的竭尽一切力量。

他当前最大的关怀是，急需建立红军和波兰地下部队间的最充分的合作，以便共同对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相信，您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波兰地下部队的合作，不仅是你们东方军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因素，而且也是我们联合努力消灭纳粹禽兽于其巢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因素。

我觉得，总理唯一考虑的是波兰和波兰人民，他决不允许任何不重要的因素阻碍他为了和您达成协议而作的努力。事实上，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到莫斯科去，如果他认为您是欢迎他这样做的话，以便亲自与您坦率地讨论与你们两国有关的问题，特别是立即进行军事合作这个迫切的问题。我知道，您将会明了，我在发表这种意见时，丝毫不是想强使您接受我个人对于您和您的国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的看法。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向您直言不讳地说明我在与米柯拉契克先生会谈时所得到的印象。

第 20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6 月 21 日

我谨通知您，在最近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军队将开始夏季攻势的

第二阶段。参加这次攻势的将有130个师，其中包括坦克师。我和我的同事们预期会取得重大的成就。我希望我们的攻势将给予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盟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以重大的支援。

1944年6月21日

第20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6月23日收到

谢谢您6月21日的来信。你们出色的作战和我们在西线所作的努力将迅速迫使纳粹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第20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6月24日

感谢您通知我关于您与米柯拉契克先生的会晤。

如果我们考虑到红军同对希特勒占领军进行斗争的波兰地下运动力量之间建立军事合作，毫无疑问，这在目前对于最后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件迫切的事。在这方面，苏波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您是知道苏联政府的观点的，它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波兰，希望苏波关系是睦邻的和建立在巩固的友谊的基础上的。苏联政府认为，在这方面的重要条件是：改组波兰流亡政府，以保证在英国、美国和在苏联的波兰活动家，特别是在波兰本国的波兰民主人士参加政府，以及波兰政府承认寇松线是苏联和波兰间的新的国界线。

但是必须指出，从米柯拉契克先生在华盛顿的声明中看不出他在

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进步。因此，目前我对于米柯拉契克先生访问莫斯科一事，很难表示意见。

我们大家对于您关心苏波关系和您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十分感激。

1944 年 6 月 24 日于莫斯科

第 20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6 月 27 日

1.您关于献给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颂词卷轴的来电已经收到。哈里曼大使先生已亲手将颂词卷轴交给我，我一定将它们送交到目的地。在收到颂词卷轴时我发表了下述的声明：

“我把罗斯福总统的颂词卷轴看作是我们两国为我们两国人民的自由和人类进步事业而进行的有效合作的象征。

“颂词卷轴将交给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代表。”

2.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感谢您对于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的努力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1944 年 6 月 27 日

第 20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电报

1944 年 6 月 27 日

请接受我对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瑟堡的热烈祝贺。我向取得辉煌成就的勇敢的英美军队致敬。

约·斯大林

1944 年 6 月 27 日

第 20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6 月 28 日收到

你们在威得比斯克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我谨向您和您的英勇的军队表示祝贺。

第 21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6 月 30 日

我代表我自己和红军对您关于苏联军队解放威得比斯克的祝贺表示感谢。

1944 年 6 月 30 日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 21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7 月 19 日收到

鉴于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和成功，我认为，应该在相当近的将来由您、首相和我举行一次会晤。丘吉尔先生衷心同意这种想法。

在 9 月 10—15 日期间内举行会晤，对我最为相宜。目前我正在美国西部旅行，我回到华盛顿以后还必须在那里住几个星期。

对我和您来说，最居中的地点是苏格兰北部。您可以乘船或乘飞机来，而我将乘船。

希望您能告诉我您的意见。无论在岸上和船上，安全和机密都可以得到保证。

第 212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 年 7 月 21 日

莫斯科

尊敬的元帅，

正当我准备动身去太平洋旅行的时候，我收到您的非常令人喜欢的镶框的照片，我认为这个照片很好。我特别高兴收到它，并且十分感谢您。

你们军队的前进速度令人惊异，我非常希望能够拜访您，并且看看你们是怎样维持你们的运输和把供应品运给你们前进的部队的。

我们在遭受严重的损失以后，已攻克了塞班岛这个重要岛屿，目前正在进行占领关岛的战斗。同时，我们刚收到德国特别是希特勒总部陷入困

境的消息。这一切都是很好的。

向您致热烈的问候。

您的十分诚恳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4年7月21日

第213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7月22日

我同意您关于由您、丘吉尔先生和我三人举行会晤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必须说明，现在，当苏军在这么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时候，我无法出国，并且在任何时间内也不能停止对前线事务的指导，我的所有同事们都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1944年7月22日

第214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7月23日

我现在将我就波兰问题给丘吉尔首相先生的信的全文寄给您参考。

1944年7月23日

附件 **斯大林致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7月20日的来信收到了。现在我写给您的这封信只谈波兰问题。

我们的战局正以极快的速度进展着。波兰的大城市之一卢布林今

天被我军占领了。我军正继续向前挺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前产生了关于波兰领土上的行政机关这一实际问题。我们不希望，也不会在波兰的领土上建立我们的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想干涉波兰的内政。这件事必须由波兰人自己去做。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同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在不久以前组织起来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联系。波兰人民代表会议是去年年底在华沙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关于这一点，你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想必已经通知您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准备着手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行政机关，我希望它能够实现。在波兰，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其它能够建立波兰行政机关的力量。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所领导的所谓地下组织不过是蜉蝣，已无影响。我不能把波兰委员会当作波兰政府，但它今后成为由民主力量组成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核心，却是可能的。

至于米柯拉契克，当然我并不拒绝接见他。然而，如果他能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联系，那会更好些，波兰民族委员会对米柯拉契克是善意的。

1944 年 7 月 23 日

第 21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7 月 28 日收到

您关于波兰局势的来信已经收到了，首相告诉我，米柯拉契克将动身去莫斯科访问您。

不用说，我非常希望您和他能够使整个问题取得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最为有利的解决。

第 21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7 月 28 日收到

考虑到最近军事上的迅速发展，我完全了解您前来同首相和我举行会议有困难，但我希望您能够把这个会议记在心上，希望我们能早日会晤。我们正面临作进一步战略决策的时刻，这样的会晤对于我处理国内事务将有所帮助。

第 21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8 月 2 日

您 7 月 28 日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我同意您关于我们会晤的重要性的意见，但是，遗憾的是，上次我已谈到的与我们前线战事有关的情况使我不能指望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举行这种会晤。

关于波兰问题，首先取决于波兰人自己，取决于波兰流亡政府某些成员能否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后者已经在波兰进行工作，而且波兰的民主力量正愈来愈向它靠拢。至于我，我已准备在这件事上给予一切波兰人以可能的协助。

1944 年 8 月 2 日

第 21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4 年 8 月 9 日

我想把同米柯拉契克、葛拉勃斯基和罗梅尔会晤的情况通知您。

同米柯拉契克的会谈使我确信，他对于波兰国内事务的了解不能令人满意。同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米柯拉契克并不反对寻求使波兰人联合起来的途径。

我不认为可以迫使波兰人接受任何决定，所以我向米柯拉契克建议，希望他和他的同事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会面，并就他们的问题，首先是尽快把波兰解放区的一切波兰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的问题，亲自同他们进行讨论。这种会谈已经举行过了。

他们双方都把会谈的情况通知了我。民族委员会的代表团建议把1921年的宪法作为波兰政府进行活动的基础，如果米柯拉契克同意，就给他的同事们四个部长的职位，其中包括由米柯拉契克担任总理这一职务。但是米柯拉契克没有同意。很遗憾，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它总还有些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使米柯拉契克、莫拉夫斯基以及刚从华沙来的贝鲁特得以广泛地相互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无论波兰民族委员会或者米柯拉契克都表示愿意一同工作，并在这方面寻找实际的可能性。这可以算作是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米柯拉契克和他的同事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一阶段。但愿以后事情会更好些。

我获悉，卢布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决定邀请兰格教授参加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如果兰格——波兰的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能够去波兰担任该项职务，那么，无疑的，它将促进波兰人的团结和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我希望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不反对在这件事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件事对于我们盟国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1944年8月9日

第21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8月12日收到

我已经收到您8月9日的来电，并且非常感谢您把米柯拉契克总理同

您和同波兰委员会在莫斯科的会谈情况通知我。

您知道，我迫切希望这些会谈能产生一切有关方面都能满意的某种解决办法，以便建立一个临时的、合法的、有真正代表性的波兰政府。

我相信您会了解，我国政府在目前阶段很难对兰格采取官方的行动。作为一个公民，在法律上，当然他有权做他认为合适的事，包括放弃美国国籍在内。我相信，您将了解为什么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得知米柯拉契克总理——我们仍正式承认他的政府——与波兰委员会会谈结果以前，美国政府不愿意卷入关于波兰委员会要求兰格教授加入委员会作外交部负责人一事，并且不愿意对于这个要求发表意见。

第 220 号

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急电

1944 年 8 月 20 日

我们正在考虑，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遗弃不顾的话，世界舆论的反应会怎样。我们认为，我们三人都应该竭力拯救尽可能多的华沙爱国者。我们希望您会把急需的物资和军火空投给华沙的波兰爱国者，或者您是否同意协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地进行空投？我们希望您会赞同。时间因素极端重要。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8 月 20 日收到

我刚刚见到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指挥官。尽管我对目前取得的进展感到十分高兴，但我非常担心任务的重大。哈里曼已向我报告，您同意立

即开始计划我们双方部队未来的合作。迪安将军已经向我叙述了他提交给红军参谋总部的关于苏美合作的建议。我希望您将指示您的参谋部急速与莫斯科美国军事代表团共同制定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指令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代表它参加制定此项计划，以便在您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备用。我认为，在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情中，它是对迅速结束太平洋战争最有帮助的。

第 22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8 月 22 日

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我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也非常重视你们在那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我相信，您完全了解我军现在为了保证在欧洲已展开的战斗的成功而作的努力是多么紧张。这使我们有理由可以希望，我们完成我们的紧急任务，从而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其它事务的时刻已经不远了。我希望迪安将军现在就能和我们参谋部进行有成效的合作。

1944 年 8 月 22 日

第 22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8 月 22 日

您和丘吉尔先生关于华沙事件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愿意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关于一小撮罪犯企图夺取政权而策动的华沙冒险事件，真相迟早是会大白于天下的。这批家伙利用了华沙居民的诚意，把很多几乎是

赤手空拳的人民推向了德国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虎口。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每个新的一天不是被波兰人利用于解放华沙的事业，而是被希特勒匪帮利用于惨无人道地屠杀华沙居民。

从军事观点来说，这种不断地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引向华沙的局面，对于红军和对于波兰人也是十分不利的。然而，虽然苏军最近不得不面临德国人的新的反攻，却正在尽全力击退希特勒匪帮的反扑，并将在华沙转入新的大规模攻势。毫无疑问，红军将不惜一切来粉碎德国人在华沙的防线，为波兰人解放华沙。对于反纳粹的波兰人，这将是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帮助。

1944 年 8 月 22 日

第 22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11 日收到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您的代表团谈到，苏联政府可能希望考虑让 16 个加盟共和国分别成为新的国际组织的成员，这个意见引起我的很大关注。尽管您的代表团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将不再在目前阶段的会谈中提出，我感到我必须告诉您，就美国以及无疑就其它重要国家来说，如果这个问题在国际组织最后建立和开始工作以前的任何阶段提出，都非常肯定将使整个计划受到损害。我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重新向我保证。

现在把这个问题推迟并不会损害以后在大会成立时进行的讨论。届时，大会有作出决定的全权。

第 22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7 日

您关于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参加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的来信已经收到。

我认为，苏联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是十分重要的。自从今年年初我国宪法作了某种改革以来，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十分关心友好国家对于苏联宪法规定扩大它们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力一事的反应。您当然知道，举例来说，加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人口和政治作用上，都要超过某些我们大家都同意应当成为国际组织创始国的国家。因此，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向您说明苏联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政治重要性。

1944 年 9 月 7 日

第 22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9 日收到

我和您的大使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进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和愉快的会谈。目前显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没有达成协议。这就是理事会的投票问题。我们和英国坚决主张理事会在作出决定时，争端的当事方面不应参加投票，即使一方是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我从您的大使那里知道，您的政府持有相反的意见。

按照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传统，争端的当事者从来不对与自己有关的案件投票。我知道，美国的舆论将永远不会了解或支持成立一个违反这一原则的国际组织的计划。我还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持有同样看法，而且我完全相信，小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大国坚持在理事会中关于牵涉大国在内的争端有投票权。无疑，它们将认为这是大国想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一种企图。我会在参议院中遇到实际的困难。

因此，我希望您能指示您的代表团同意我们关于投票问题的建议。如果做到这一点，敦巴顿橡树园会谈能够迅速地结束而取得完全的和突出的成功。

第 22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14 日

我收到您关于敦巴顿橡树园谈判的来信。

我也希望这次重要的谈判能够成功。它对于进一步巩固我们两国的合作和对于整个未来的和平和安全事业，将会有重要作用。

我认为，理事会的投票程序，对于这个国际安全组织的工作的成就将有不小的意义，因为非常重要的是，理事会的工作应当建立在四大国对所有问题（包括与每一大国直接有关的问题）一致同意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我认为，美国最初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它主张为与理事会一个或数个常任理事国直接有关的争端规定一个特别的投票程序。否则，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本着首先保证四大国行动一致（这种一致是为防止未来的侵略所必须的）的原则所达成的协议将化为泡影。

自然，这种一致要求各大国之间没有猜疑。至于苏联，它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某些无稽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妨碍对苏联采取真正客观的态度。此外，其它国家也应考虑各大国之间缺乏一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希望您能了解这些考虑的重要性，并希望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协议。

1944 年 9 月 14 日

第 228 号

美国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19 日

我们的魁北克会议刚刚结束。在会上我们对作战行动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1.西北欧：我们打算迅速前进以歼灭德军和插入德国心脏。为了使敌人在西战场遭到失败，最好是袭击鲁尔和萨尔，因为敌人为防守这些极为重要的地区将集中其全部的残军。为此，北线的通路显然比南线的要优越；而我们绝对必须在坏天气到来之前开放几个北方的港口，特别是鹿特丹和安特卫普。所以我们的主力将集中在左翼。

2.意大利：我们现在在意大利的行动将导致：（1）或者全歼凯塞林的部队，这样就有可能迅速地重新部署力量，组织向卢布良隘口方面追击；或者（2）凯塞林的有计划的撤退可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只得满足于在本年内扫清伦巴第平原。

战斗的进程将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计划正在拟制中，如果形势需要，将在伊斯的利亚半岛实现陆海军协同作战。

3.巴尔干：我们将继续进行空军作战和突击队式的作战。

4.日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进攻日本本土，我们商定了以在所有战场上加强对日本进攻为目的的未来的作战行动。

5.对德国崩溃后把军队迅速调往太平洋战场的计划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罗斯福

丘吉尔

1944 年 9 月 19 日

第 22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9 月 29 日

我已经收到您和丘吉尔先生关于魁北克会议的来信，其中谈到你们的未来军事计划。你们的来信表明，美英军队面临着何等重要的任务。请允许我祝你们和你们的军队完全成功。

目前，苏军正在扫荡波罗的海沿岸威胁我军右翼的德国部队。如

果不消灭这部分敌军，我们就不可能深入德国东部。此外我军当前还有两个任务：击败匈牙利使它退出战争，和用一次进攻来试探德国人在东线的防务，如果条件有利，就把它攻破。

1944 年 9 月 29 日

第 23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0 月 5 日收到

尽管我希望下一次会晤是您、丘吉尔和我三人之间的一次会晤，但我了解首相先生期望和您早日举行会晤。

我相信您了解，在这次全球战争中，不论是军事的或政治的问题，美国没有不关心的。我坚信，我们三人，而且只有我们三人才能够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了解丘吉尔先生举行会晤的愿望，我愿意把您即将和首相进行的会晤看作是我们三人会晤的预备会议。我们三人的会晤，就我来说，可以在我国大选以后的任何时候举行。

我现在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您和首相同意的话，我在莫斯科的大使将作为我的观察员参加你们即将举行的会晤。当然，哈里曼先生对于应由您和丘吉尔先生讨论的重大问题不能代表我的政府承担义务。

现在您可能已经收到迪安将军代表联合参谋部关于对日作战情况的声明，我愿向您重申，我完全接受您在这一点上给予我们的保证。我们三国正在胜利地对德国作战，无疑我们也能联合起来同样胜利地击溃那个国家，我确信它既是俄国的大敌，也是我们共同的大敌。

第 23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0 月 8 日

您 10 月 5 日的来信使我有点疑惑不解。过去我一直以为，丘吉

尔先生将根据和您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前来莫斯科。但是，我的猜想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

我不知道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想在莫斯科讨论什么问题。他们二人至今没有和我谈过什么。丘吉尔先生在一封信中表示，如果我不反对的话，他愿意到莫斯科来。我当然复信表示同意。这就是丘吉尔访问莫斯科问题的情况。

我同丘吉尔先生会晤以后，将把情况弄清楚告诉您。

1944 年 10 月 8 日

第 232 号

斯大林和丘吉尔致罗斯福的信

1944 年 10 月 10 日

1.在非正式谈话中，我们初步研究了同我们有关的局势，并拟定了我们会谈的方案，包括社交性的和其它会谈。我们邀请米柯拉契克先生、罗梅尔先生和葛拉勃斯基先生立刻前来，以便同我们和同波兰民族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我们商定：我们的会谈将不涉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留待我们三人会晤时讨论。我们应该研究出一个对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各国的政策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好办法。我们商定：哈里曼先生将作为观察员列席一切讨论重要事项的会谈，迪安将军将列席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谈。我们商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迪安将军就以后可能需要我们亲自参加的任何会谈的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我们也商定了由两国外交部长和哈里曼先生一起会谈。我们将随时使您充分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2.我们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最衷心的良好祝愿，并且为美国军队的英勇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战场战事的指挥，向您表示祝贺。

丘吉尔

斯大林

1944 年 10 月 10 日

第 233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和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0 月 12 日收到

感谢你们 10 月 10 日第 794 号的联名信。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你们二人对国际政策取得一致意见，由于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将共同努力以防止国际战争，我们对这些政策是共同感到兴趣的。

罗斯福

第 23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0 月 19 日

1. 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在莫斯科期间，我们曾就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哈里曼大使谅必已把所有这些重要的会谈通知了您。我还得知，首相要写信把他对这次会谈的看法告诉您。至于我，我可以说，会谈对于我们了解彼此在诸如德国的前途、波兰问题、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和未来军事政策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会谈表明，我们能够没有很大困难就协调我们对一切重要问题的政策，即使我们还不能立即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如波兰问题，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已打开了比较有利的前景。我希望这次莫斯科会谈也有助于我们三人会晤时就我们共同关心的一切迫切问题作出具体的决定。

2. 葛罗米柯大使把他最近与霍浦金斯先生会谈的情况通知了我。霍浦金斯表示，您可能在 11 月底抵达黑海，并在苏联黑海海岸与我会见。我非常欢迎您这个愿望能实现。我同首相的谈话使我相信，他

也有同感。那就是说，我们三人有可能在11月底会晤，以便讨论自从德黑兰会谈以来积聚下来的问题。我将很高兴知道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1944年10月19日

第235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年10月21日收到

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在外交上承认目前存在的法国政权是法国临时政府。这个政权由于最近扩大了协商议会而更加代表法国人民了。希望法国人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同意下，将在最近的将来建立一个在法国管辖下的真正的国内地区，希望在这个任务完成时，那将是承认法国政权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我预先通知您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因为当法国管辖下的国内地区建立起来的时候，您可能希望采取类似的行动。

第236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年10月22日

我收到您10月21日的来信。来信提及您打算承认目前存在的法国政权为法国临时政府，并建立一个在法国管辖下的国内地区。英国政府也将它想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愿望通知了苏联政府。至于苏联，它欢迎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决定，并已对它驻巴黎的代表发出了有关指示。

1944年10月22日

第 23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4 年 10 月 25 日收到

我很高兴地从哈里曼大使的报告和您 10 月 19 日来信得知，您和首相就若干问题达成协议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些问题是我们大家在实现和维护持久的和令人满意的和平的共同愿望中所非常关心的。我确信，你们在莫斯科会晤中取得的进展，将促进和加速我们在下次会晤中的工作；在下次会晤时，我们三人应就未来的行动、政策和共同利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我们举行 11 月会晤的各个地点的实际问题，即从居住条件、安全和易于前往等方面来考虑。我如果能接到您的建议，我将很感激。

我一直考虑在塞浦路斯、雅典或马耳他会晤是切合实际的，因为我坐船进入黑海将是非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我愿意坐船旅行和在船上生活。我们知道安全和生活条件在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都是令人满意的。

我非常高兴地期望能再次看到您。

我将很高兴接到您的意见和建议。

第 23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0 月 29 日

您 10 月 25 日的来信收到了。

如果您原先表示的我们可以在苏联黑海海岸举行会晤的想法现在对您是合适的话，我认为最好就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在那里举行会晤的条件十分好。我相信，到时您的船只安全驶入黑海是可以保证的。医生们建议我暂时不要作长途旅行，我不得不重视这个意见。

如果您认为作这样的旅行是可能的话，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1944 年 10 月 29 日

第 23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 年 11 月 9 日发出

华盛顿

我祝贺您再次当选。我相信，在您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美国人民与苏联、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人民一起，定能完成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事业，从纳粹暴政下解放全人类定能成功。

约·斯大林

第 24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信

1944 年 11 月 11 日收到

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贺电。我感到高兴的是，您和我能够继续同我们的盟国一起消灭纳粹匪徒和建立一个长期的和平，在这个和平时期里，从战争的重担解放出来的我们各国人民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取得更高度的发展和文化。

第 24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4 年 11 月 19 日收到

我们三人都有一个意愿，就是我们应在最近期间会晤，但是，主要是地理上的问题使得在目前举行会晤并不那么容易。在困难条件下，我可以安排在现在到某个地方去，以便在圣诞节以前赶回来，但是坦白地说，如

果我能把它推迟到1月20日我就职以后，那就更加方便了。

我的海军当局强烈反对在黑海举行会晤。他们不愿意一艘主力舰冒险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爱琴海，因为这样就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护航队，而这种护航队别的地方更加需要。丘吉尔曾建议在亚历山大港或耶路撒冷，也可能在雅典，虽然这还不肯定。

此外，我对于目前离开这里非常犹豫，因为我国的旧国会正处于结束阶段，它很可能到12月15日才最后休会。而且根据宪法我必须留在这里，以便在1月初向新国会提出一年一度的咨文。

我的建议是，我们三人于1月28日或30日会晤。我希望到那个时候，您可以乘火车到亚得里亚海的某个港口，我们可以在那里与您会面，或者您从那里坐我们的船走几小时到巴利，然后乘汽车到罗马，或者您坐同一只船再往前走一点，我们三人在像西西里东部的塔奥米纳一类的地方会晤，在那时，那个地方的气候一定很好。

地中海沿岸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可以去的。这样，我就很容易乘飞机飞回华盛顿，以便我可以对立法采取行动——这个问题您是熟悉的。我必须有可能在10天之内收到并寄回从这里发出的法案和决议。我希望您在1月的作战行动不致妨碍您在那个时候前来，我认为我们不应把会晤推迟到1月底或2月初以后。

当然，如果在此期间，纳粹军队或人民迅速瓦解，我们应当提早会晤，尽管我非常希望在1月底举行会晤。

另外一个建议是，我们的会晤地点应当在里维埃腊的某地，当然这要取决于德国军队从意大利西北部撤退。我希望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有很多事情希望和您谈谈。您和我了解彼此的问题，而且您知道，我愿意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因此我不愿意拟订正式的议程。

我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正在作最大努力解决华北部队和蒋委员长之间的问题。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尚未签订任何协议。

我向您致最热烈的问候。

第 24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1 月 23 日

您的海军当局怀疑您原先提出的我们三人在苏联黑海沿岸会晤的建议是否可取，这是很糟糕的。就我来说，您建议的在 1 月底或 2 月初举行会晤的时间，我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我期望我们能够选择苏联一个沿海港口作为会晤地点。我必须听取我的医生们对我提出的不能冒险作长途旅行的劝告。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就一个我们都能同意的地点达成最后的协议，如果现在不行，可以再等一个时期。

向您表示最好的祝愿。

1944 年 11 月 23 日

第 24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4 年 12 月 2 日

根据一切材料，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已到达苏联）将会提出两个问题。

1.签订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

我们很难拒绝。可是我希望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请提出您的意见。

2.戴高乐可能会提出改变法国东部边界，把法国边界扩展到莱因河左岸的问题。同时，据悉，现在有一个关于成立国际管制下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计划。可能规定法国也参加这一管制。这样一来，法国人关于把边界推到莱因河的建议将同成立国际管制下的莱因州的

计划发生竞争。

请您也对这一问题提供意见。

我已将同样内容的信寄给丘吉尔先生。

1944 年 12 月 2 日

第 24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3 日

同戴高乐将军的会晤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就法苏关系中的各项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在会谈过程中，正如我所预料的，戴高乐将军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把法国的边界推到莱因河的问题和缔结一项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的问题。

关于把法国的边界推到莱因河的问题，我向他说明了以下的看法：没有得到其军队正在法国领土上对德国人进行解放战争的我们各主要盟国的谅解和协议，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强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建议缔结法苏互助条约的问题，我指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研究，有必要弄清楚这样一个条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法国方面应由谁来批准这个条约的问题。因此，法国人还必须提出一些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

谨此奉闻。如蒙复信并对这些问题提出意见，我将甚为感谢。

我也将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丘吉尔先生。

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1944 年 12 月 3 日

第 24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7 日收到

非常感谢您 12 月 5 日和 3 日两封内容丰富的来信。

关于建议缔结类似英苏互助条约的法苏条约的问题，如果您和戴高乐将军认为这样的条约对于你们两国和整个欧洲安全是有益的话，美国政府在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条约。

对于您就战后法国边界线问题给戴高乐将军的回答，我完全同意。目前我认为，企图在目前解决这个问题不会为我们共同的作战努力带来好处，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留待德国崩溃以后解决。

第 24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10 日

谢谢您关于法国问题的来信。戴高乐将军和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签订法苏互助条约对法苏关系和整个欧洲安全是有益的。今天条约已经签订了。

至于战后法国边界线问题，正像我通知您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推迟了。

1944 年 12 月 10 日

第 24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14 日收到

由于我们早日举行会晤的前景还没有肯定，由于我深信——我相信您

同意我的这种看法——我们必须尽快促使召开联合国大会以讨论国际组织的问题，我要求哈里曼大使将这封信交给您，并且代表我与您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的重要问题。在大会有可能召开以前，我们当然应该就这个问题或其它问题达成协议。我也将与丘吉尔首相讨论这个问题。

我现在感到，在进一步考虑整个问题以后，下述条文草案的实质会使一切有关的人感到满意。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一章的第三节的建议：

第三节

投　票

1.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2.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表决之。

3.安全理事会对于其它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八章第一节和第八章第三节第一款内各事项之决议，争论当事国不得投票。

您会注意到，这要求常任理事国对于安全理事会所有关于断定和平受到威胁的决定、为消除此种威胁或为制止侵略或其它破坏和平的事例而采取行动的决定投一致票。实际上，如果要使这类行动可行，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准备接受您的政府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就国际安全组织提出的备忘录中所表示的观点。自然，这意味着，每一常任理事国对于此类性质的决定永远有一投票权。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同时在第八章第一节内规定了在司法或其它方面的建议性程序，安理会可以采用这种程序来促进自愿和和平地解决争端。在这方面，我也确信，如果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安理会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具有大得多的力量。但是我也相信，这些程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有效：大国用表示忠于正义原则的办法来进行道义上的领导。因此，我坚决相信，常任理事国接受的关于所有争端当事国对于这类程序不得投票的规定，从而表明它们在这方面不愿意为自己要求特殊地位，将会大大提高常任理事国的道义声誉，并加强它们作为未来和平的保卫者的地位，这不仅不会损害它们的切身利益，也不会损害这一主要原则：对于影响这种

利益的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大国必须一致行动。这样做将使所有国家更容易接受全面计划；这个计划必须使大国在维护和平方面有特别的地位。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或美国提出的备忘录中都没有关于此类性质问题的投票程序的具体规定。当然，我们在那里的代表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肯定的协议。我们的代表已出色地进行了工作，您和我现在应该设法来完成此项工作。

如果您愿意赞同地考虑我现在建议的对于在安理会投票问题的这种处理办法，您是否愿意由您、我和丘吉尔首相指派的代表尽速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就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并讨论关于迅速召开联合国大会的必要安排？

第 248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20 日收到

我相信，鉴于昨天丘吉尔首相在下院发表的声明在我国引起了兴趣和我们处于要我们表明对波兰态度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政府可能有必要在最近几天内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如果发表的话，这个声明将按照下述各点阐明我们的态度：

（这里接着就是斯退丁纽斯先生 12 月 18 日发表的声明的内容，附声明全文。）

您将看到，拟议中的声明所包括的关于我国政府的总态度，我确信，没有一点是您不知道的，因此，就目前内容来说，我相信它大体上与您和丘吉尔首相今秋在莫斯科讨论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我确信您将因此而会欢迎这个声明的。

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三人会晤并彻底讨论这个麻烦的问题以前，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会使我们的讨论更加困难的任何行动。

我看到的迹象表明，卢布林委员会可能想使自己具有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位。我完全了解，从您的观点来看，在苏联军队进一步深入波兰境内以

前，使波兰政权问题得到澄清是适宜的。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步骤必然产生重大政治影响，我非常希望您能够在我们三人会晤以前不要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政府，我希望在1月20日我就职以后立即举行会晤。您是否能够在那个日期以前继续与目前那个形式的委员会打交道？我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丘吉尔首相所同意的。

附件 斯退丁纽斯先生的声明

1944年12月18日发表

美国政府明确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波兰国家，波兰人民有不受束缚的权利来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规定他们的内部生活。

美国政府一贯遵循的政策是，有关边界的问题应当留待战争结束以后处理。正如赫尔先生在1944年4月9日的演说中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内有些问题不可能或不应当通过友好的会议或协商予以解决”。至于波兰未来的边界，如果直接有关的联合国家达成协议，则本政府将不反对这样的协议，因为它可以对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根据这个协议，波兰的政府和人民决定为了波兰国家的利益而转移某些民族集团，那么美国政府将在其它国家政府合作下，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协助波兰进行这种转移。美国政府将继续执行它的传统政策，即拒绝对于任何特定边界给予保证。美国政府正在为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组织而努力，通过这个组织，美国将和其它成员国一起承担维护普遍安全的责任。

美国政府的宣布了的目的是，在立法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协助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治愈战争中受到的创伤，以便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机会作为正式伙伴参加为全体人民建设更繁荣和更安全的生活的任务。这点适用于波兰，也适用于其他联合国家。

上述美国政府关于波兰的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公开宣布的基本原则。

第 24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4 年 12 月 22 日收到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理约·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在阁下生日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向您致以诚挚的祝贺，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 25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24 日收到

为了使我们大家可以获得对协调我们努力极为重要的情报，我想命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派遣他的参谋部的一名全权军官到莫斯科与您讨论艾森豪威尔部队在西线的情况和它与东线的关系。我们将绝对保密。

我希望您将接见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这位军官，并安排与他交换对双方有利的情况。比利时的形势不坏，但是我们已到达谈论下一阶段的时候了。

由于问题紧迫，请您早日答复这个建议。

第 251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派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名全权军官到莫斯科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当然我同意您的建议，并且我已经准备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官会晤和同他交换情报。

1944 年 12 月 25 日

第 25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4 年 12 月 26 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华盛顿

在我生日的时候，承蒙祝贺并致良好的祝愿，特向您致谢。

约·斯大林

第 25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26 日

12 月 14 日通过哈里曼先生收到了您的来信。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在召开联合国大会来讨论建立国际组织以前，我们应当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未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的问题达成协议。我应该提醒一下，原来的美国草案曾经特别强调，对于发生直接涉及一个或数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争端时的投票程序，有必要订出特别的规则。英国的草案也指出，解决大国争端的一般程序，万一发生这类争端时，可能是不合用的。

在这方面，您的建议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没有引起异议，可以接受，因为第二点包括第六章第四节提到的程序问题方面的规定。

至于您的建议中的第三点，我应该很抱歉地通知您，我看不出有

可能同意您提出的关于这一点的措词。正如您自己所承认的，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在安理会所有断定对和平的威胁的决议中，以及在那些号召采取行动来消除威胁或制止侵略或其它破坏和平行为的决议中，都是必不可缺的。毫无疑问，在通过关于这类问题的决议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对于维护和平和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大国必须意见完全一致。不用说，要在某个阶段上排斥一个或数个常任理事国参加对上述问题进行投票的任何企图——而在理论上讲甚至大多数常任理事国被排斥参加解决问题也是可能的——对维护国际安全的事业可能发生极有害的后果。这种情况与四大国协同一致作出决定的原则背道而驰，而且有可能造成大国反对大国的局面，这是足以破坏普遍安全的事业的。小国不能容忍发生上述情况，其关切是不亚于大国的；因为，共同承担着保障和平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安全的任务的大国之间的分裂，对于所有这些小国来说，孕育着最危险的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理会投票的问题上，我必须坚持以前的立场。我认为这种立场将保证四大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团结，有助于避免某些大国反对另一些大国的企图，而这一点对于它们将来反对侵略的联合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自然，这种情况可以保障小国在维护它们的安全方面的利益，并且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相信，您会认清上述支持四大国一致原则的意见的全部重要性，并且希望我们将能就这一问题以及其它悬而未决的各点取得一致的协议。在这种协议的基础上，我们的代表能够完成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草案，并讨论为尽速召开联合国大会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1944 年 12 月 26 日

第 254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27 日

12月20日收到了您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

至于斯退丁纽斯先生12月18日的声明，我愿在我们会晤时再表示意见。不论怎样，波兰局势的发展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上述声明所反映的情况了。

自从米柯拉契克先生上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所发生的几件事，特别是我们在波兰逮捕的恐怖分子——流亡政府的秘密特务——身上所搜出的同米柯拉契克政府的无线电通信，无可置疑地表明，米柯拉契克先生同波兰民族委员会的会谈起了掩护那些分子的作用，他们背着米柯拉契克先生对在波兰的苏军官兵从事恐怖活动。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情况，即被波兰流亡分子所唆使的恐怖分子暗杀在波兰的红军官兵，对解放波兰的苏军进行恶罪的勾当，并且直接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和我们的敌人结成了同盟。阿尔契赛乌斯基的接替米柯拉契克以及流亡政府部长的全面调换，使情况更恶化了，其结果是波兰同流亡政府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在此期间，民族委员会在巩固波兰国家和波兰土地上的政权机构，在壮大和加强波兰军队，在执行一系列重要的政府措施，首先是对农民有利的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展。这些发展导致了波兰民主力量的巩固，而且使民族委员会在波兰人民和海外广大的波兰人中间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关心支持民族委员会和所有那些愿意和有力量与它合作的人们，这对盟国和对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即加速希特勒德国的溃灭，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对于承担着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波兰的全部重担的苏联说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同波兰的关系问题意味着同这样一个政权建立正常的、密切的和友好的关系的问题，这个政权是波兰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的，它已经壮大起来，而且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正同红军一起打击着德国人。我必须坦白地说，鉴于上述情况，如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

兰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就没有什么严正的理由搁置给予承认的问题了。应该看到，苏联比任何其它大国更关心加强一个亲盟国的、民主的波兰，这不但因为苏联肩负着波兰解放斗争的主要重担，而且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波兰问题同苏联安全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红军在波兰与德国人作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波兰有一个安定的和可靠的后方，对这一点，波兰民族委员会是充分了解的，而流亡政府及其秘密特务则用他们的恐怖行动制造着在红军后方引起内战的危险，并且抵销红军的胜利。

另一方面，在波兰现行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要继续支持流亡政府，因为流亡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内人民的信任，而且造成在红军后方发生内战的威胁，从而损害着我们击败德国人的共同利益。我认为这样做是自然的、公平的，而且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是有利的，即由各盟国政府协议，作为第一步，现在就同民族委员会互派代表，以便日后在它宣布自己为波兰临时政府时承认它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如果不这样做，我担心波兰人民对盟国的信任将会减退。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波兰人民有根据来指责我们为了在伦敦的一小撮流亡分子的利益而牺牲波兰的利益。

1944 年 12 月 27 日

第 25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4 年 12 月 31 日收到

我必须告诉您，您 12 月 27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使我感到不安和深为失望，您在这封信里告诉我，您不能把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的问题推迟到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会议上仔细讨论整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认为，如果您把这个纯属法律上的承认的行为推迟短暂的一个月的时间直

到我们会晤时为止，对于您的政府或您的军队本不会有什么严重的不便之处。

在我的要求中，未曾建议您割断您与卢布林委员会的实际关系，并且丝毫无意要您与目前组成的伦敦政府打交道或承认它。我主张您推迟是因为我认为您应当了解到，如果在战争的这个时期，您的政府正式承认一个波兰政府，而大多数联合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却继续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与它保持外交关系，这对世界舆论和敌人士气将会产生多么不幸甚至是严重的影响。

我必须本着像您一样的坦率的态度告诉您，我认为我国政府不可能仿效，从而将把它对伦敦政府的承认转变为对目前形式的卢布林委员会的承认。这丝毫不是由于我们与伦敦政府有任何特殊关系或感情。事实是，不论美国政府或美国人民，都没有看到它成立的方式或后来的发展所产生的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有理由断定目前组成的卢布林委员会代表波兰人民。我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仅仅寇松线以西的一小部分波兰领土从德国暴政下得到解放，因此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波兰人民还没有机会表示他们对卢布林委员会的意见。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波兰解放以后建立了群众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我国政府当然将根据波兰人民的决定来决定自己的态度。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米柯拉契克先生离开伦敦政府以后，局势恶化了。我一直认为，米柯拉契克先生——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诚希望解决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所有争端的人——是人们看到的唯一的波兰领袖，他似乎提供了真正解决困难的和危险的波兰问题的可能性。根据我个人对米柯拉契克先生的了解，和我在他来华盛顿时与他会谈以及他后来在访问莫斯科时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政策，我很难相信他曾经知悉有关恐怖行动的任何指示。

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使您知道我国政府对于在目前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问题的立场。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当我们三人会晤时，我们能取得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仍然希望您能把正式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一事推迟到那个时候。从军事角度来看，我看不出推迟一个月有什么很大的异议。

（169）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六月

第 25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的来信已经收到。

十分遗憾，我没有能够说服您相信苏联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性。但我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您相信，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对盟国，特别是对红军，一向而且将继续提供重大的帮助，而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在破坏这一斗争，从而帮助德国人。

当然，您要苏联推迟一个月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建议，对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情况使我无力满足您的愿望。这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 12 月 27 日回答波兰人的有关问题时已经宣布，波兰临时政府一成立，主席团就要给予承认。这一情况使我无力满足您的愿望。

请允许我向您祝贺新年，并祝您健康和成功。

1945 年 1 月 1 日

第 25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1 月 15 日

今天，1 月 15 日，我同泰德元帅和陪同他的将军们进行了交谈。

依我看来，交流情况相当充分。双方对于所提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解答。应该说，泰德元帅给了我极好的印象。

在苏德战场上发动进攻四天以后，我现在有可能告诉您，尽管天气不好，苏军的进攻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从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的整个中部战线正在向西移动。德国人虽然拚命抵抗，终究不得不退却。无疑，德国人将被迫在两条战线之间分散他们的后备力量，其结果将不得不放弃在西线的进攻。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形势将缓和盟军在西线的处境，而加速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计划的进攻的准备工作。

至于苏联军队，您可以不必怀疑，无论目前如何困难，他们将竭尽全力给德国人以最有力的打击，

1945 年 1 月 15 日

第 258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1 月 18 日收到

十分感谢您 1 月 15 日关于与泰德空军元帅会谈和贵军在苏德战场发动进攻的令人鼓舞的来信。

贵国英勇的战士早先已树立的功绩和他们在这次进攻中已经表明的效率，为我们在两个战场上的军队早日取得胜利提供了很大的希望。我们的联合努力的巧妙配合大大缩短了迫使野蛮的敌人接受投降所需的时间。

您知道，美国正在距离本国 7,000 英里的太平洋作出巨大的努力，我希望，德国的早日崩溃将使我们可以将充分的力量调到太平洋地区，以便迅速消除日本对我们各盟国的威胁。

第259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5年1月23日收到

我已经决定只允许一小批穿着军装的美国海军摄影人员为我们举行“舡鱼”[①]时摄影，而不允许任何新闻记者参加。丘吉尔首相同意这一点。

罗斯福

————————————

① “舡鱼”，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举行的会议的代号。——原注

第260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5年1月23日

关于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参加“舡鱼”的来电已经收到。我不反对您的建议。我已对首相的询问寄出了同样的答复。

1945年1月23日

第261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的亲收密电

1945年1月26日收到

对于苏联驻墨西哥大使的逝世我表示深切的哀悼。

奥曼斯基先生在华盛顿有很多朋友。他在这里担任大使职务期间我们很了解他。

罗斯福

第 26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1 月 29 日

在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克·阿·奥曼斯基不幸逝世的时候，承蒙来电吊唁，谨表示感谢。奥曼斯基的工作得到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

1945 年 1 月 29 日

第 26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5 年 1 月 30 日发出

总统先生，在您生日的时候，请按受我的衷心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第 26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2 月 2 日收到

在我生日的时候，承蒙您来电祝贺，特此致谢。

[雅尔塔会议于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举行]

第 26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备忘录

1945 年 2 月 5 日

如果在这次会议上早日答复下列两个基本军事问题，美国参谋长将很感激。

1.一旦在俄国和日本之间爆发战争，使横渡太平洋到西伯利亚东部的供应线保持畅通对于你们是否重要？

2.您是否可以向我们保证，美国空军将被准许在共青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或其它适当的地区建立基地，如果事态发展表明，这些空军可以作战并得到供应而不致破坏苏联的作战行动？

富·德·罗

1945年2月5日

第266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5年2月6日

克里米亚，考来兹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今天下午我详细地考虑了我们的会晤，我想坦白地告诉您我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就波兰政府而论，使我极感不安的是，三大国对于波兰的政治结构没有一致的意见。在我看来，由于你们承认一个政府而我们和英国承认另一个在伦敦的政府，我们大家在整个世界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应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它只能使我们的人民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裂痕，而这并非事实。我决心不使我们和苏联之间有任何裂痕。毫无疑问，我们之间的分歧肯定是有调和的办法的。

我对您今天所说的某些事情，特别是您决心在贵军进入柏林时保障你们的后方这一点，有很深刻的印象。您不能容忍，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容忍任何一个会给贵国武装部队任何诸如此类的麻烦的临时政府。我希望您了解，我非常关心这件事。

您必须相信我对您说的话，即我国人民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认为在战争的这个紧要关头我们之间的不和。他们实际上说，现在当我们的军

队正在围歼共同敌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将来如何能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取得谅解。

我曾不得不向您表明，我们不能承认像目前那样组成的卢布林政府[①]，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而明显地发生分歧的情况下分手，全世界将认为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的一个悲哀的结局。

您今天说，您将准备支持有相当成功希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建议，您还提到有可能将卢布林政府的几位成员带到这里来。

认识到我们都同样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稍稍发展您的建议，并提议我们立即邀请卢布林政府的贝鲁特先生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先生到雅尔塔来，同时也从下列波兰人名单中邀请两三位，据我们所知，作为在成立一个我们三人都能承认和支持的新的临时政府中波兰人的其它成分的代表，这个名单是会合适的：克拉科夫的萨彼哈主教、温森特·威妥斯、楚洛夫斯基先生、布亚克教授和库兹巴教授。如果，由于这些波兰领袖来到这里，我们能和他们就组成波兰临时政府问题共同达成协议（无疑，这个政府应包括波兰国外的领袖如米柯拉契克先生、葛拉勃斯基先生和罗梅尔先生），那么，美国政府，我肯定还有英国政府，就将准备和您一起研究它们与伦敦政府脱离关系和转而承认新的临时政府的条件。

我希望，我无须向您保证，美国政府绝不会支持任何一个敌视贵国利益的波兰临时政府。

不用说，由于我们与波兰人在这里的会议而组成的任何临时政府必须保证尽早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一点与您要看到从战争的混乱中出现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波兰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您的最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6 日

————————————

① 指波兰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设在波兰的卢布林。——原注

第 267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备忘录

1945 年 2 月 7 日

绝密

目前以意大利东南部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的全部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因为从仅有的可用基地到敌人地区的目标的距离过远，以及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北部上空经常遇到恶劣天气。在布达佩斯地区建立战斗机的中途运输站或基地，对于提供重型战斗机的护航具有特殊重要性，这种护航在目前在深入敌区时是需要的，而且由于最近德国使用喷气式飞机后其战斗力得到了恢复，就可能越来越需要了。此外，在布达佩斯地区建立重轰炸机的中途运输站将大大增加美国空军向阿尔卑斯山北部目标进攻的活动范围和投弹的吨数。

因此，要求您同意在布达佩斯地区提供两个机场供美国空军部队使用。如果您同意，我们的陆军参谋人员可以立即就这个计划开始工作。

1945 年 2 月 7 日

第 268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5 年 2 月 7 日

克里米亚，考来兹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关于您驻墨西哥大使奥曼斯基先生、他的妻子和苏联大使馆的三位秘书由于飞机失事不幸逝世一事，我想您可能愿意由美国陆军飞机把他们的遗体运到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然后转交苏联飞机，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美国飞机可以直接将这些遗体运到莫斯科。

如果您通知我您认为这些办法中那一种最合适，我将非常愿意实现您的愿望。

我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上述建议，他们对于这个不幸事件深深感

到震惊。

您的十分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7 日

第 269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备忘录

1945 年 2 月 8 日收到

目前迫切需要尽早对被美国战略空军轰炸过的目标进行视察，同对普洛也什蒂进行的视察一样。为了使视察有效，必须在确实的证据被消灭和轰炸时在场的人员从该地被移走以前进行。详细的视察要点已交给胡迪雅各夫元帅。

我要求您同意进行这些视察。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 270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9 日

克里米亚，“里瓦佳”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感谢您代表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克·阿·奥曼斯基、他的妻子和三位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不幸逝世所表示的悼唁。

苏联政府感谢地接受您提出的将他们的遗体用美国陆军飞机运往莫斯科的建议。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5 年 2 月 9 日于考来兹

第 27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5 年 2 月 10 日

克里米亚，考来兹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

我一直在考虑（因为我必须考虑），关于大国在国际组织的大会上享有的票数问题，我在美国可能会遭遇到政治上的困难。我们已经同意（而且我一定要实行这个协议），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支持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为国际组织大会的成员国。我有些担心的是，深怕有人会指出，美国在大会上将仅有一票。因此，如果我要保证美国国会和人民全心全意同意我国参加国际组织，似乎有必要要求在大会得到额外的票，以便给予美国同等的待遇。

我想知道，在我面临这个问题以前，您将不表示反对，并支持这一方针的提案，如果我有必要在行将举行的大会上提出的话。如果您在答复这封信时让我知道您的意见，我将非常感激。

您的最诚挚的，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10 日

第 27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11 日

克里米亚，“里瓦佳”

尊敬的罗斯福先生：

您 2 月 10 日的来信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由于苏联的票数将因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被接纳为大会会员国而增加为三票，美国的票数也应该增加。

我认为，像苏联和它的两个主要的共和国一样，美国的票数可以

增加为三票。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个建议。

您的最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5年2月11日于考来兹

第273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5年2月13日收到

在我离开好客的苏联海岸的时候，我愿意再次对您说，我对于在克里米亚作为您的客人时受到您的热情款待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您、首相和我之间的会议的结果，我在离开时感到非常鼓舞。我相信，全世界人民不仅赞许这次会议的成就，而且还会把它看作是我们三大国在和平时期像在战争时期一样能够合作的一个真正的保证。

第274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

1945年2月23日收到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约瑟夫·维·斯大林阁下

在我们即将共同战胜纳粹侵略者的时候，我愿趁此机会向您，最高司令，衷心祝贺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我们在雅尔塔作出的意义深远的决定，将加速胜利的到来，并为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打下了坚定的基础。红军不断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联合国家军队在南方和西方的全面进攻，将保证加速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建立在相互了解与合作基础之上的和平的世界。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第 275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

1945 年 2 月 27 日发出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先生

华盛顿，白宫

总统先生，承蒙您对红军建军二十七周年发来的友好祝贺，请接受我的谢意。

我相信，克里米亚会议决议所表示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将很快导致我们共同敌人的彻底失败和建立以所有爱好自由国家间合作原则为基础的持久和平。

约·斯大林

第 276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4 日收到

我得到关于在集合、供给和撤退美国前战俘和滞留在俄国战线以东的美国空军人员问题上遭遇到困难的可靠消息。因此，迫切请求您颁发命令，准许 10 架载有美国机上人员的美国飞机在波尔塔瓦和美国前战俘和滞留的空军人员可能居留在波兰的各地方之间飞行。要求这种许可是为了给所有美国士兵提供补充服装、医药和食物供应，撤退滞留的空军人员和得到解放的战俘，特别是将伤病人员转移到波尔塔瓦。我认为这项要求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且还因为美国公众非常关心我们的前战俘和滞留的空军人员的福利。

其次，关于仍在德国人手中的战俘的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措施。俄国、英国和美国战俘的数目是很大的。鉴于您不同意我们提出的建议，您的建议是什么？

第 277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5 日

您 3 月 4 日关于战俘问题的来信收到了。我已经再次和我们负责这一事务的地方代表商谈过，现在我应该奉告如下。

从直接作战区域迅速撤走美国战俘的初期阶段所遭遇的困难，现在已经大大减少。苏联政府特为处理外国战俘事务而设立的机构，目前拥有适当数量的工作人员、交通工具和粮食供应，因此每发现一批美国战俘，就立即采取措施给他们帮助，把他们撤到集合地点等待随后遣返。根据苏联政府截至今天所掌握的情报，在波兰境内和其它已被红军解放的地区，没有大批集中的美国战俘，因为除了住在医院的个别伤员以外，他们已经全部被送到敖德萨集中地点，现在已经有 1,200 名美国战俘到达那里，其余的大概不久也会送到。因此，照目前情况看来，没有必要由美国飞机从波尔塔瓦飞到波兰境内去处理美国战俘事务。您可以放心，对于被迫降落的美国飞机乘员，我们也一定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但是，这并不排斥可能需要美国飞机协助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苏联军事当局将要求美国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从波尔塔瓦派遣美国飞机。

目前，对于在德国人手中的盟国战俘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建议，但我可以向您保证，一旦他们所在的地区为苏军占领，我们当立即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方便。

1945 年 3 月 5 日

第 278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18 日收到

关于从波兰遣返美国前战俘一事，我得知，允许迪安将军视察波兰境内的美国战俘情况的许可已被撤销。您在前一封来信中说，没有必要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让美国飞机运送供应物资到波兰并从那里撤出伤病员的要求。我得到我认为是确凿可靠的消息说，仍有大批美国伤病员住在波兰的医院里，并且肯定在过去几天有、而且可能现在仍有大批解放了的美国战俘在苏联集中点等待乘火车前往敖德萨，有些战俘由于没有和苏联当局建立上联系而三五成群地徘徊，期待着美国联络官的到来。

坦白地说，我不能理解您为什么不愿意让备有必要手段的美国联络官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们自己的人。我国政府对于您所提出的每项要求都是尽量满足的。现在我要求您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满足我的请求。请召哈里曼大使向您详细说明我的愿望。

第 27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22 日

我收到您关于从波兰遣返前美国战俘的来信。

关于您所掌握的所谓有大批美国伤病员留在波兰、或者等待遣送到敖德萨、或者尚未与苏联当局取得联系的消息，我必须声明，这项消息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除了正在送往敖德萨途中的若干人数的美国战俘以外，截至 3 月 16 日，在波兰国土上的美军伤病员总共只有 17 名。我今天接到的报告说，他们（17 人）将于最近几天内由飞机运往敖德萨。

关于您来信由所提的要求，我必须说，如果它是关系我个人私事，即使它有损我个人的利益我也愿意让步。但是，所提之事与前线的苏军及苏联指挥官的利益有关，他们不愿意让多余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多余的军官既与作战无关，同时却又需要种种照顾，如给他们安

排生活，为他们组织会见和各种联系，保护他们不遭受尚未肃清的德国特务分子的暗害，和其它转移指挥官及其所属军官对于他们的直接职务的注意力的事情。我们的指挥官用生命担保着前线和附近后方的局势，我不认为可以对他们的权利作任何限制。

同时我还必须说明，被红军解放了的美国前战俘在苏联收容所里处境良好，无论如何比苏联前战俘在美国收容所里处境要好得多，在美国的收容所里有一部分苏联前战俘和德国战俘住在一起，而且有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非法的压制，甚至于受到殴打，关于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通知过美国政府了。

1945 年 3 月 22 日

第 280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3 月 25 日收到

国务院刚刚收到葛罗米柯大使关于苏联参加旧金山会议[①]的代表团名单的通知。我们非常尊重葛罗米柯大使的为人和能力，相信他会胜任地代表苏联。但是，我对于莫洛托夫先生看样子不打算参加会议一事不禁深深感到失望。回忆起莫洛托夫先生、艾登先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在雅尔塔的友好而有成效的合作，我相信国务卿一直期望在旧金山会议上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进行合作，以便最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以保证世界有一个安全和和平的未来。

如果没有莫洛托夫先生参加，会议将遭受很大的损失。如果他由于在苏联的迫切和紧要的公务而不能参加全部会议，我十分希望您能想办法使他至少能参加要的开幕会议。会议的所有发起国和其它与会国的大多数国家都将以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莫洛托夫先生

———————————————

① 旧金山会议，1945 年 4 月 25 日到 6 月 26 日举行，以制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未来国际组织的宪章。——原注

不能到会，恐怕全世界将认为这表明苏联方面对于会议的伟大目的不像其它国家那样关心。

第 281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3 月 25 日收到

哈里曼大使已交给我他从莫洛托夫先生那里收到的一封信，是关于亚历山大元帅对所传在意大利的德军有可能部分或全部投降问题进行调查一事的。在这封信里，莫洛托夫先生要求，由于没有苏联军官的参加，将要在瑞士进行的这种调查应立即停止。

我确信，由于一种误会，这件事情的真相没有正确地向您提出。真相如下：

几天以前，在瑞士收到未证实的情报说，有些德国军官正考虑安排使在意大利同亚历山大元帅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对抗的德军投降的可能性。

在华盛顿收到这个情报以后，就授权亚历山大元帅派遣他的参谋部的一名或数名军官到瑞士去，以肯定这一报告的准确性，而如果看来是大有希望的话，就同任何有资格的德国军官安排一次同亚历山大元帅在他的意大利的司令部举行的会议，来讨论投降的细节。如果能安排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见，当然欢迎苏联代表参加。

关于将在瑞士进行这一调查的情报，是立即交给苏联政府的。后来又通知贵国政府说，如果在伯尔尼最后作出由亚历山大元帅同德国军官在卡赛塔会见来讨论投降细节的安排，苏联军官的出席是适宜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代表安排与德国军官举行会见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可是看来举行这样会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您当然了解，我的政府必须给予在前线指挥盟军作战的所有军官以一切的援助，他们相信迫使在他们地区的敌军投降是有可能的。对我来说，采取任何其它态度或允许任何拖延（这必然会造成美军更多的和可以避免的丧失生命），是完全不合理的。作为一个军人，您一定了解立即采取行

动以免错过时机的必要性。如果在哥尼斯堡或但泽城下的敌人向贵国的将军送来休战的旗子，就将属于同一范畴。

前线敌军的这种投降决不会违反我们同意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也决不会有任何什么政治含意。

在前线美军司令对投降细节进行讨论时，我将高兴得到任何一位能出席的贵国军官提出的经验和意见，但是我不能同意为了莫洛托夫先生由于某种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反对理由而停止调查这种可能性。

对于所传的可能性虽然并不抱很大期望，可是为了消除我们的军官之间的误会，我希望您向有关的苏联军官指出，我们为了实现在前线与美军对抗的任何敌军的投降而毫不拖延地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我确信，当同样的机会出现在苏联前线的时候，您也会抱同样的态度和采取同样的行动的。

第 282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27 日

对于负有为世界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奠定基础的使命的旧金山会议，我们都评价很高而且非常重视，然而事与愿违，维·米·莫洛托夫实在没有可能参加会议。我和莫洛托夫对此都感到十分遗憾，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要求将于 4 月间召开会议，而莫洛托夫的出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甚至没有可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最初几次会。

您也知道，葛罗米柯大使十分胜任地完成了他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任务，而我们确信，他也将很成功地领导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团。

至于各种不同的解释，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是不能对将要作出的

决议起决定作用的。

1945 年 3 月 27 日

第 283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3 月 29 日

我已经研究清楚您在今年 3 月 25 日来信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苏联代表既然被拒绝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进行的关于探讨德军投降和在意大利北部向英美联军开放战线的可能性的谈判，苏联政府也就不可能作出其它的答复。

我不仅不反对，而且恰恰相反，完全赞成利用德国军队瓦解的机会来加速他们在无论哪一个战区的投降，鼓励他们向盟军开放战线。但我只同意在下列情况下与敌军举行这类问题的谈判，即这些谈判不会导致敌人处境的缓和，不会使德国人乘机进行阴谋诡计，利用谈判机会把他们的军队调到其他战区、首先是苏联战场。

正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保证，苏联政府才认为有必要派遣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参加与敌人进行的这种谈判，不管这种谈判在那里举行——在伯尔尼还是在卡赛塔。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苏军司令部的代表被拒绝参加这种谈判，他们在什么地方会妨碍盟军司令部的代表。

我应当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与盟军司令部谈判的机会，从意大利北部调遣了三个师到苏联战场。

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宣布的关于从南方、西方和东方打击德国人的协同作战的任务，是要将敌人的军队就地困住，制止敌人作任何调动，不让敌人将部队转移到他们所需要的地点。苏军司令部正在执行这一任务。可是亚历山大元帅正在破坏这一任务。这种情况使苏军司令部感到焦虑，并且为不信任提供基础。

您来信写道，“作为一个军人，您一定了解立即采取行动以免错过时机的必要性。如果在哥尼斯堡或但泽城下的敌人向贵国的将军送来休战的旗子，就将属于同一范畴。”很遗憾，这一比拟在这里并不合适。无论是但泽城下或哥尼斯堡城下的德军都是遭到包围的。如果他们投降，那是为了避免被歼灭；但是他们不可能向苏联军队开放战线，因为战线已经远离了他们，西移到了奥得河。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的处境则完全两样。他们并没有被包围，没有面临被歼灭的威胁。如果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虽然处境不同而还是力求谈判投降和向盟军开放战线，那么，他们必然是另外抱有某种关系德国命运的更深远的目的。

我应当向您声明，如果在东线奥得河沿岸什么地方产生类似的情况，遇到德军可能投降和向苏联军队开放战线的机会，我一定立即通知英美联军司令部，并要求派遣代表参加谈判，因为在这种场合，盟国之间是不应相互保守秘密的。

1945 年 3 月 29 日

第 284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4 月 1 日收到

我不能向您隐瞒，我对于自从我们卓有成效的雅尔塔会晤以来所发生的我们彼此有关的事态感到不安。我们在那里作出的决议是好的，决议的绝大部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我们能够找到谅解的共同基础是战后建立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的最好保证。正是由于这些决议提出的希望和期望，人们才密切注意这些决议的实现。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失望。全世界的人民期待着我们实现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议，特别是有关波兰问题的那些决议，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令人沮丧地没有什么

进展。坦白地说，我不懂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我必须告诉您，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政府在很多方面所抱的显然是漠不关心的态度。由于我们在雅尔塔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我相信我们三人能够而且一定会消除自那时以来所产生的障碍。因此，我打算在这封信里完全坦白地向您陈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虽然我主要想到波兰问题的谈判所遭遇到的困难，但是我必须简短地谈一谈关于解放了的欧洲的宣言中所体现的我们的协议。坦白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最近罗马尼亚的发展不应视为处在这个协议的条款之内。我希望您能抽出时间亲自研究一下我们两国政府就这一问题来往的信件。

但是，我们在雅尔塔协议中最引起公众的兴趣和最紧要的部分是波兰问题。您当然知道，我们建立的委员会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是由于您的政府对于克里米亚决议所作的解释。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对于协议的各点提出下述的解释，这与莫斯科委员会所遭遇到的困难是有关的。

在迄今为止所举行的谈判中，您的政府看来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同意应该成立的新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应当是目前的华沙政府的继续。我觉得这一点同我们的协议或我们的谈判都不符合。不错，卢布林政府将要改组，它的成员将起显着的作用，这样做是为了要组成一个新政府。协议全文的几个地方已经明显地提到了这一点。我必须向您明白地指出，凡是使目前的华沙政权不加掩饰地继续下去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将使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协议失败了。

同样明显的是，由于相同的理由，华沙政府根据协议不能声称有权选择或拒绝由委员会决定去莫斯科参加协商的波兰人选。我们是否可以同意，首先由委员会选择波兰领袖来莫斯科参加协商，并相应地发出邀请。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没有重大理由反对卢布林集团第一个前来，以便他们可以完全熟悉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这一点的决议为大家所接受的解释。当然，要有这样的谅解：如果卢布林集团第一个前来，在奉召参加协商的其他波兰领袖抵达以前，不能单独同卢布林集团作出安排。为了便于达成协议，委员会可以首先挑选一批为数不多的，但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由

他们提出其他人选供委员会考虑。我们没有而且不会拒绝或否决莫洛托夫先生可能提出的任何参加协商的候选人，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提出任何反对克里米亚决议的意图的波兰人。我认为，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给予我的大使以同样的信任，而且委员会的任何成员提出的参加协商的候选人应当为委员会其他成员诚心诚意地接受。很明显，如果选择波兰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者与华沙政府共享这个权利，那么我们的协议所依据的基础将受到破坏。

在我看来，以上所述是妨碍我们的委员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的直接障碍，另外还有两点建议未取得协议，但是它们对于我们大家寻求的结果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您的政府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我指的是：

（1）波兰应有最大程度的政治安宁，意见不一致的集团应停止为相互反对而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应当各自利用我们的影响，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2）鉴于协议赋予委员会英美成员的代表的责任，允许他们访问波兰似乎是完全自然的。您还记得，莫洛托夫先生在委员会会议的最初一次会议上曾提出此项建议，只是后来又撤回了。

我希望我能使您知道，波兰问题公平合理和迅速的解决对我们国际合作计划的有成效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在克里米亚达成决议时如此关心的盟国团结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危险将会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您了解，在美国，为了贯彻政府的任何一项外交或内政政策，都需要得到人民的真正支持。一旦美国人民作出自己的决定，政府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改变它。我说到这个事实，是因为您关于莫洛托夫先生出席旧金山会议问题的来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使我怀疑您对于这个因素是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第 285 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1 日收到

在我们关于将来可能与德国人谈判意大利德军投降问题的来往信件中，我觉得，虽然我们在各个基本原则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处于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的气氛中。

关于投降的谈判并未进行，如果进行任何谈判，那一定是在卡赛塔在从头到尾有您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尽管在伯尔尼曾试图安排举行谈判而没有结果，但是我们还是指示亚历山大元帅把此事的进展情况随时通知您。

我必须重复一遍，伯尔尼会见只是为了与有资格的德国军官进行接触，而不是为了举行任何谈判。

根本不存在与德国人举行任何谈判而使他们可以从意大利前线调军队到别处去的问题。谈判如果举行的话，将以无条件投降为基础。关于在意大利的盟军没有发动攻势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预料会与德国人达成协议。事实上，最近在意大利的攻势的中断，主要是因为盟军即英国师和加拿大师最近从那个战线调往法国。目前正在准备在 4 月 10 日左右在意大利前线发动攻势，但是，尽管我希望成功，攻势只能由有限的兵力进行，因为目前亚历山大缺乏可用的部队。他有 17 个可靠的师，而与他对阵的是德军的 24 个师。我们打算在现有的力量的范围内竭尽全力来制止德寇从意大利撤出军队。

我认为，您得到的关于德军从意大利调走的时间的情报是错误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可靠情报，德军 3 个师在今年 1 月 1 日以后调离意大利，其中的 2 个师调到东线。3 个师当中的最后一个师在 3 月 25 日左右开始调动，也就是在人们听说德军有可能投降两个多星期以前。因此，很明显，德国代表在伯尔尼进行接洽是发生在军队最后一次调动之后，因而不可能对调动有什么影响。

这整个插曲是由于一个据称与希姆莱接近的德国军官的倡议而发生的，当然，很可能他的唯一目的是挑拨盟国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他达到这种目的。我相信，以上关于目前局势和我的意图的明确说明将会打消您在 3 月 29 日来信中所表示的忧虑。

第 286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3 日

我收到您关于伯尔尼谈判问题的来信。

您说的很对，由于英美联军司令部同德军司令部在伯尔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举行谈判的事件，“情况处于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的气氛中”。

您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没有举行过任何谈判。大概您收到的情报并不全面吧。至于我的军事同僚，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他们却不怀疑谈判确实举行了，并且谈判的结果是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达个协议，西线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同意向英美联军开放前线并让路放他们到东部去，而作为交换条件，英美则答应德国人把停战条件放宽。

我想，我的同僚们是接近真实的。否则，英美拒绝让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同德国人举行的谈判就很难理解。

英国人的沉默也是很难理解的。他们让您跟我通讯谈论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而他们自己则继续保持沉默，虽然大家知道，整个伯尔尼谈判事件是英国人发起的。

我了解，英美军队从伯尔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举行的这类单独谈判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英美军队有了可能几乎没有遇到德国人的任何抵抗就进入德国心脏地带。但是为什么要向俄国人隐瞒这一点，为什么事先不把这一点告诉他们的盟军俄国人呢？

因此，目前的情况是，西线的德军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美作战。与此同时，德国人对俄国——英国和美国的盟军——则继续作战。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能有助于保持和促进我们盟国之间的信任。

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声明，而且认为还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遍：我

个人和我的同僚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性步骤，因为我们意识到，眼前利益不管多大，在保持和促进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个基本利益面前是要相形见绌的。

1945年4月3日

第287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年4月5日收到

我已经收到您4月3日的来信，它使我吃惊，因为信中说，亚历山大元帅和凯塞林在伯尔尼所作的安排“允许英美联军向东移动，而作为交换条件，英美答应德国人把停战条件放宽”。

我在给您的前一封信中谈到的在伯尔尼试图安排一次会议，以便讨论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的问题，我对您说：（1）在伯尔尼没有举行任何谈利，（2）会议没有任何政治含意，（3）在意大利的德军的任何投降绝不违反我们共同协议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可能安排的讨论投降的任何会议都欢迎苏联军官参加。

为了共同对德作战——这种作战今天已产生了使德军瓦解而早日胜利的很大可能性——的利益，我必须继续认为您非常信任我的忠诚和可靠，就像我一贯信任您一样。

我也完全了解您的英勇军队在使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属部队有可能渡过莱因河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您的部队今后在最后击溃德军对我们的联合进攻的抵抗方面的作用。

我完全信任艾森豪威尔将军，并且相信他在和德国人达成协议以前一定会通知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要求、将来也要求在他的战线上可能被击败的敌人无条件投降。我们在西线的进展基于军事行动。他们前进的速度主要是由于我们空军的可怕威力使敌人交通线遭到破坏，并且由于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在西线德军主力仍在莱因河以西的时候予以击溃。

我确信任何时候都未在伯尔尼举行过谈判，我认为您得到的关于举行谈判的情报一定是从德国方面得来的，他们一直努力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他们的战争罪行的责任。如果这就是沃尔夫[①]的目的，那么您的信证明他已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深信您认为我这人是可信赖的，认为我决心同您一起使纳粹无条件投降，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苏联政府似乎认为我事先未得到您的完全同意而与敌人达成协议。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即将胜利的时候，如果这种猜疑、这种不信任在人力、物力和财富遭到巨大损失后损害了整个事业，这将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坦率地说，我对于您的情报人员（不管他们是谁）对我的行动或者我所信任的部属的行动的这种恶意曲解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

————————————————

① 沃尔夫，英美方面在伯尔尼与之会谈的纳粹德国将军。——本书制作者注

第 288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4 月 7 日

我已经收到您 4 月 5 日的来信。

1. 在我 4 月 3 日的信里所谈的不是诚实和可靠的问题。对您的诚实和可靠，正像对丘吉尔先生的诚实和可靠一样，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所谈的是，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暴露出了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一个盟国在对待另一盟国的关系上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我们俄国人认为，在各个战场目前的情况下，当敌人不可避免地即将投降的时候，一个盟国的代表就投降问题同德国人进行任何会谈，都应该让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那个盟国力求参加这种会谈的话。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想法却不同，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否定了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同德国人会谈的权利。我已经告诉过您，并且认为有必要重复一下：俄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会否认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谈的权利。我依然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它排除了互相猜疑的一切可能性，并且不让敌人有机会在我们中间散布互不信任。

2.认为德国人在西战场上所以不抵抗，仅仅是由于他们已经被击溃了，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德国人在东战场上拥有147个师。他们可以安然无损地从东战场上抽调15到20个师来增援他们在西战场的军队。然而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为了死守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不大著名的杰姆良尼查车站，竟然继续疯狂地同俄国人搏斗，就好像那个车站是他们的命根子似的；可是他们却毫无抵抗地放弃德国中部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俄斯那布鲁克、曼海姆、卡塞尔。德国人的这种行为是极为奇怪和不可理解的，这一点您是会同意的吧。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向您保证，他们都是很诚实和谦虚的人，他们准确地履行着自己的职务而无侮辱任何人的企图。这些人都是我们在实践中多次考察过的。请您自己判断吧。今年2月马歇尔将军供给苏军总参谋部许多重要消息，其中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预先通知俄国人说，德国人将在3月份在东线发动两次猛烈的反攻，一次从波美拉尼亚进攻多恩，另一次从莫拉夫斯卡·俄斯特拉发地区进攻罗兹。然而，实际上，德国人所准备和实行的主要攻击战并不是在上述地区，而是在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地区，即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地区。目前已经搞清楚，德国人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将近35个师，其中包括11个坦克师。这是战争以来以如此高度集中的坦克兵力投入战斗的最猛烈的攻击之一。托尔布辛元帅之所以能够免于复没之祸并且还能在以后迎头痛击德国人，就是因为我的情报人员，固然稍微晚

了一些，然而发现了德国人这次主攻计划并立即通知了托尔布辛元帅。这样，我就有机会再一次确信苏联情报人员消息的准确和灵通。

为了帮助您了解这一问题，附去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给迪安少将的一封信。

1945 年 4 月 7 日

密件。副本。

致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安少将

尊敬的迪安将军：

请您把下列事项通知马歇尔将军：

今年 2 月 20 日我收到迪安将军转来的马歇尔将军的通知，其中说，德国人在东线成立了两个兵团，准备进行反攻；一个在波美拉尼亚；准备攻击多恩，另一个在维也纳—莫拉夫斯卡—俄斯特拉发地区，准备向罗兹进攻。并且，南面那个兵团要包括党卫军的第六坦克军。2 月 22 日，我又收到英国军事代表团陆军组组长布林克曼上校送来的类似消息。

马歇尔将军好意地供给了我们这种有助于我们共同目标的情报，我表示非常感谢。

同时，我认为有义务通知马歇尔将军，东战场 3 月份的战斗并没有证实他所供给的情报，因为这些战斗表明，包括党卫军第六坦克军的德军主力兵团不是集中在波美拉尼亚，也不是在莫拉夫斯卡—俄斯特拉发地区，而是集中在巴拉顿湖地区，德国人正是从那里发动进攻，以图向多瑙河推进，并从布达佩斯以南强渡多瑙河。

这一事实表明，马歇尔将军所掌握的情报是不符合 3 月份东线战事的真实进程的。

很可能，这个情报的某些来源有意要迷惑英美联军和苏军司令部，并把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引离德国人准备在东线进行主要攻势的

那个地区。

尽管有上述情况，我还是请求马歇尔将军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把他所掌握的有关敌人的情报通知我。

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马歇尔将军上述情况，但这只不过是要使他能够对于该情报的来源作出适当的结论而已。

请向马歇尔将军转达我的敬意和谢意。

红军总参谋长
安东诺夫大将敬启
1945 年 3 月 30 日

第 289 号

斯大林致罗斯福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4 月 7 日

关于您 4 月 1 日的来信，我认为需要对波兰问题表示如下意见。

波兰问题的确已陷入僵局。

原因何在？

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莫斯科委员会的委员）离开了克里米亚会议的方针，并给工作加进了一些克里米亚会议所没有规定的新因素。

这就是：

（一）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人都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是目前正在行使职权而有待改组的波兰政府，它应该成为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然而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却离开了这个方针，无视波兰临时政府的存在，不理睬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波兰临时政府同来自波兰和来自伦敦的个别人士之间划个等号。同时，他们认为改组临时政府，应当理解为消灭临时政府而成立全新的政府。事情甚至到了

这样的地步：哈里曼先生竟在莫斯科委员会中宣称：可能连一个临时政府的成员也不让参加波兰民族统一政府。

显然美国和英国大使这样的立场不能不引起波兰临时政府的愤慨。至于苏联，它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意味着直接破坏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

（二）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人的共同看法是，为了进行协商，应该从波兰邀请 5 人，从伦敦邀请 3 人，一共 8 人，不能再多。可是美国和英国大使却离开了这个立场，而要求授权给莫斯科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可以从波兰和伦敦邀请数目没有限制的人来进行协商。显然，苏联政府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根据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邀请应该由整个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发出，而不是由委员会的个别委员发出。想邀请数目无限的人来进行协商的要求，是同克里米亚会议的规定相矛盾的。

（三）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精神，应该邀请这样的波兰活动家来进行协商，他们第一要承认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包括关于寇松线的决定；第二应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坚持这一点，因为苏联军队在解放波兰的战争中曾经作出很大的牺牲，并且也因为波兰领土在最近 30 年内曾两度被利用来侵犯俄国。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政府有责任努力争取苏波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却不理会这一点，而力图邀请一些波兰活动家来进行协商，不管他们对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对苏联的态度怎样。

在我看来，阻碍在一致同意情况下解决波兰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些。

为要摆脱僵局而达成大家同意的决定，我以为必须采取以下步骤：

（1）确定临时政府的改组并不意味着它的消灭，而正是用扩大它的办法来进行改组，并且波兰临时政府应该是未来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

（2）恢复克里米亚会议的原议，只限于邀请8位波兰活动家，其中5位应该来自波兰，3位来自伦敦。

（3）确定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协商，并且首先应该同他们进行这种协商。因为同那些从伦敦或波兰召来的个别人士比较起来，波兰临时政府是波兰最强大的力量；而这些人士在波兰居民中的影响更不能同波兰临时政府在波兰所享有的那样巨大的影响相比拟。

我请您注意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别的决定，都可能在波兰被看作是侮辱波兰人民和企图把不顾波兰公众意见而成立的波兰政府强加在波兰身上。

（4）只从波兰和伦敦邀请这样的活动家来进行协商，即他们承认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并且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

（5）改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的办法是：从未参加临时政府的波兰活动家中遴选新的部长来代替临时政府的一部分现任部长。

至于波兰民族统一政府中新老部长数目的比例，这里可以确定近乎现在南斯拉夫政府所实行的那样的比例。

我想，只要考虑到上述意见，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致同意的决定在很短的期间就可能达成。

1945年4月7日

第290号

罗斯福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年4月13日收到

感谢您坦率地解释了苏联对伯尔尼事件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事件已经成为过去而毫无成就。

无论如何，不应当有互不信任，这类性质的小误会将来不应发生。我

确信，当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会师并联合发动充分配合的攻势时，纳粹军队必将瓦解。

第 291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4 月 13 日发出

华盛顿

我谨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个人对于罗斯福总统过早逝世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表示深切的哀悼。美国人民和联合国家损失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政治活动家和战后和平与安全组织的倡导者。

苏联政府对于美国人民的沉痛损失表示衷心的同情，并坚信，在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肩负了主要重担的各大国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也将得到加强。

约·斯大林

第 292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 年 4 月 18 日收到

我对您就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文明事业作出的贡献所发表的善意的和真诚的意见以及您对我们将为同一事业作共同努力的保证，表示感激。

第 293 号

杜鲁门和丘吉尔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4 月 18 日收到

我们这封联名信是答复您4月7日关于波兰问题谈判的来信的，目的是使这件事更加明确，并且也是为了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致被误解。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十分诚挚地力求把问题处理得公正和具有建设性，并且今后仍将这样处理。但是，在向您叙述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之前（这种叙述正是发这封信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纠正在您的心目中显然已经形成了的对英美政府的立场的那种完全错误的印象，这个立场我们的大使已经按照直接的指示在谈判中说明过了。

您说目前在华沙行使职权的政府在这次谈判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视，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不论我们的意图或者态度，都从来不是这样的。您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无条件地同意华沙波兰政府的三个领袖应该包括在被邀赴莫斯科同波兰委员会商谈的波兰人的名单中。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在组成新的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三批人中间，目前华沙政府的代表无庸置辩地将起重要的作用。所谓大使要求邀请数目无限制的波兰人的权利这种说法，也是不公正的。委员会建议和同意从国外和从波兰邀请个别的波兰代表来莫斯科商谈的权利，是不能够作如此解释的。的确，罗斯福总统在4月1日的信中特别声明：“为了便于达成协议，委员会可以首先挑选一批为数不多的，但是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由他们来提出其他人选供委员会考虑。”实际上，我们争执的问题是在于：华沙政府是否有权对参加商谈的个别人选行使否决权。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克里米亚决定中是找不到这种解释的。我们觉得，您是回到苏联代表团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持的原有立场上去了，这个立场后来在协议中已经改变了。让我们清楚地记住：我们现在所说的只是应该被邀请去莫斯科商谈的那些波兰人。

您提出最好邀请8位波兰人（其中5位来自波兰，3位来自伦敦）来参加这些初步的商谈，您在给首相的信里还指出，米柯拉契克只要声明支持克里米亚决定，他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我们向您提出下列建议，以便防止我们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和避免一切不可估计的后果。我们希望您将十分密切而慎重地来考虑这些建议。

1.责成我们在委员会里的代表立即发出邀请书，请下列的波兰活动家

来莫斯科商谈：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罗略·齐美尔斯基、萨彼哈主教；与目前华沙政府无联系的一位在波兰有代表性的政党的领袖（如果您认为下面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人是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也将认为他是可以接受的：维托斯、茹拉夫斯基、哈春斯基、雅秀科维奇），从伦敦方面邀请米柯拉契克、葛拉勃斯基和斯坦奇克。

2.在委员会一发出参加协商的邀请书以后，华沙政府的代表就可以首先前来，如果这样做是合适的话。

3.事先同意，这些被召来商谈的波兰活动家可以向委员会推荐一定数量的其他波兰活动家，在波兰和国外的都可以，这些人可以作为会议的成员，以便使波兰所有的主要党派都有代表参加讨论。

4.我们并不认为，在同波兰活动家商谈之前我们就可以同意确定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成员的任何方案，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适用于波兰的。

我们请您再仔细读一下4月1日美国和英国的去信，因为在那两封信里提出了一些较大的理由，现在我们还是坚持这些理由，而且我们也应当坚持。

杜鲁门

第294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4月20日收到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总理约·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您的唁电对我们的损失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和我国人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确信，罗斯福总统为自由事业而作的牺牲将有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决心，即一定不使他如此忠诚地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落空。

哈里·斯·杜鲁门

第 295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 年 4 月 21 日收到

关于宣布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会师的安排问题，我务必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得到指示，要他将三国政府首脑可以宣布苏、英、美军队在德国会师的日期尽早通知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

为了在三国首都同时宣布，我想建议，艾森豪威尔提出日期的时间应为华盛顿时间中午 12 时。如果您同意这个建议，我将很高兴。

我正在向丘吉尔发出同样的电报。

杜鲁门

第 296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4 月 23 日

您关于宣布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会师的来电已于 4 月 21 日收到。

您建议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宣布时间，即华盛顿时间中午 12 时，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

我同时给丘吉尔先生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

1945 年 4 月 23 日

第 297 号

杜鲁门供斯大林参考

1945 年 4 月 23 日

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协议（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这次会议）改组目前在华沙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以便通过华沙临时政府的代表和波

兰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的事先协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全国统一政府。

美国政府认为，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只有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一批波兰民主领袖被邀请到莫斯科来商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波兰领袖们的任何方式的商谈不能导致成立一个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分的新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那么，美国政府是不能参与其事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在4月18日致斯大林的联名信中已尽其所能来迁就形势和实现克里米亚决定的意图。

美国政府诚挚地请苏联政府接受总统和首相致斯大林的联名信中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莫洛托夫先生继续在那个基础上同国务卿及艾登先生在旧金山举行商谈。

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如不能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像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

哈里·杜鲁门

1945年4月23日

第298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年4月24日

您和丘吉尔首相先生4月18日的联名信及由维·米·莫洛托夫在4月24日转来的信件，都已经收到了。

1.从来信里可以看出，您继续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是将来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而只不过是一个和任何其他波兰人的团体相同的团体而已。这样来了解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位并且对它抱这样的态度，是很难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相符合的。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我们三个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认为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

并且获得波兰大多数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应该成为改组以后的、新的民族统一政府的核心，即主要部分。

看来，您是不同意这样来理解问题的。您拒绝把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波兰的榜样，这就证实您认为波兰临时政府不可能被看作是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和核心。

2.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情况，即波兰同苏联是接壤的，但它同英国或美国却并不接壤。

波兰问题对于苏联的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和希腊问题对于英国的安全的意义一样。

看来，您并不同意苏联有权利使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但是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血流成河，姑且抛开其它一切情况不谈，仅仅这件事就要求达到上述一点。我不知道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正是一个民主政府。苏联对于该两国政府的成立并未加以过问。苏联政府不曾要求干预这些事，因为它理解到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有人不愿意从苏联的安全的观点来考虑苏联的利益。

3.美、英两国政府事前就波兰问题达成了协议（而苏联对波兰要比其它国家更加关心得多），然后企图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苏联，使苏联的代表们处于无法容忍的境地，这种情况应该认为是不正常的。应当说，这种情况是不能有助于就波兰问题取得一致同意的决定的。

4.我准备答应您的要求并尽我的力量来达成一致的决定。但是您对我要求得太多了。简单地说，您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

我认为，目前情况只有一条出路，即承认南斯拉夫的先例是波兰的榜样。我相信，这样可以使我们取得一致同意的决定。

1945年4月24日

第 299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4 月 25 日收到

您 4 月 23 日的来信已经收到，谨表谢意。

我打算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日期和时间宣布的文告如下：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在预定的地点——纳粹德国的中心和苏联军队会师了。敌人被切为两段。这虽不是在欧洲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全体美国人民、全体英国人民和全体苏联人民长期以来为之辛劳和祈求的时刻临近了。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中心的会师，有着全世界都不会忽略的世界性意义。这些意义是，第一，希特勒及其匪帮政府的最后一丝黯淡的希望被扑灭了。在这次反对暴政、反对非人道的战争中结成同盟的各大国的共同战线和共同事业，现在已经用事实来表现，正如它们早已用决心来表现的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分裂或削弱我们老练的军队的共同意志：贯彻他们胜利的目的，直到盟国在德国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我们的军队此时的会师向我们自己和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各国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而进行的合作是有效的合作，它能够克服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中最大的困难而取得胜利。不顾像我们已经克服了的诸如距离、语言和交通等方面的障碍而能共同策划、并肩作战的各国，是能在共同缔造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的。最后，盟国军事上和战略上的这一伟大胜利，乃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果敢和决心的一种无法形容的祭礼，而这是依靠同盟国家陆海军战士们的顽强和勇敢才能完成的。但是，在把欧洲和太平洋的敌人最后战胜以前，在后方支援我们英勇的陆海军战士们的努力决不能放松，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前线的战斗是决不停顿的。”

第 300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4 月 26 日收到

1.美国驻瑞典公使通知我，在希特勒据说是因病不能视事期间，希姆莱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向瑞典政府提出在包括挪威、丹麦和荷兰在内的西部战线的全部德军投降的建议。

2.按照我国与英国和苏联政府的协议，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的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是在所有战场上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

3.如果德国接受上述第2段的条件，他们就应立即在所有战场上向战地司令官投降。

4.如果您同意上述第2段和第3段，我就指示我的驻瑞典公使照此通知希姆莱的代表。

我给丘吉尔首相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

第301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4月26日

您4月26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感谢您告诉我希姆莱想在西战场投降的消息。我认为，您打算向希姆莱提出的要求在所有的战场上——其中包括苏联战场——无条件投降的答复是完全正确的。请按您的建议的精神行动，至于我们俄国人，我们保证继续向德国人进攻。

我并且告诉您，我已经给丘吉尔首相送去了同样的答复，因为他也曾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1945年4月26日

第302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4月27日收到

我今天已将下述的电报发给在斯德哥尔摩的约翰逊先生：

“关于你 4 月 25 日晨 3 时的电报，请通知希特勒的代表，唯一可以接受的德国投降条件是在所有战场上向苏联政府、英国和美国实行无条件投降。

“如接受上述投降条件，德国军队应立即在所有战场上向战地司令官投降。

“在各个战场上，只要继续抵抗，盟军的猛烈攻击将进行到完全胜利为止。”

杜鲁门

第 303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4 月 28 日

您关于向约翰逊先生发出的指示的电报在 4 月 27 日收到了。感谢您的这一通知。

您和丘吉尔先生所采取的要求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我认为是对德国人的建议的唯一正确的答复。

1945 年 4 月 28 日

第 304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 年 4 月 28 日收到

我收到了丘吉尔首相 4 月 27 日给您和我的关于商定一个程序以便我们的军队可以有秩序地去占领他们将在德国和奥地利占领的地区的电报。

我对丘吉尔首相给我们两人的上述电报完全同意，并将同样把我的同意的意见通知首相。

第 305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 年 4 月 30 日收到

我给丘吉尔首相发去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关于亚历山大元帅的 NAF934[①]，我建议，德国军队在意大利地方向英美联军投降的消息应当在亚历山大认为适宜和正确的时间由他宣布，并且不在其它任何地方首先宣布这个消息。

“如果您同意，请给亚历山大发出相应的指示。”

杜鲁门

——————————————

① 系亚历山大元帅报告的序号。——原注

第 306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6 年 5 月 2 日

您表示同意温·丘吉尔首相先生关于占领德国和奥地利的程序的来电已于 4 月 28 日收到。

苏联最高司令部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在苏军和盟军会师时，苏军司令部立即与美军或英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以便它们通过相互的协议，（1）确定临时战术分界线，并（2）采取措施以便在自己的临时分界线的范围以内镇压德国部队的任何抵抗。

1946 年 5 月 2 日

第 307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 日

感谢您给我送来您给温·丘吉尔首相先生关于德国人在意大利投降的电报全文。我并不反对您所提议的由亚历山大元帅发布投降消息。

1945 年 5 月 2 日

第 308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5 月 4 日发出

鉴于您对波兰问题的兴趣，以及您大概已了解丘吉尔先生 4 月 28 日给我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我认为理应把我在 5 月 4 日给丘吉尔先生复信全文抄送给您。

附件 **斯大林致丘吉尔亲收的密信**

4 月 28 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已经收到。

我应当说，您为了辩护自己的立场所提出的那些论点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您想把关于承认南斯拉夫的先例作为对波兰的榜样的建议，看作是拒绝我们之间业已商定的关于建立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程序。这一点是不能予以同意的。依我看来，南斯拉夫的先例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这个先例指出了关于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问题的最适当而实际的解决办法，并且把在国内实施国家权力的现有的政府机关作为联合政府的基础。

很明显，如果不把享有大多数波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波兰现行临时政府作为将来的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那么，就没有可能指望顺利地解决克里米亚会议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任务。

2.关于您所提出的由三大国对希腊的选举进行监督的见解，我不

能表示赞同。对于一个盟国的人民进行这种监督，只能看作是对该国人民的侮辱和对它的内政的粗暴干涉。即使对于那些以前曾是卫星国家而以后又曾对德国宣战并转到盟国方面来的国家，这种监督也是多余的，而这些国家，譬如说芬兰，进行选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芬兰，选举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

您关于作为战场和交通走廊的比利时和波兰两国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波兰，它是苏联的一个邻国，这一特点就要求将来的波兰政府真正力求波兰和苏联间保持友好关系，而这对所有其他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也都是有利的。这一情况也正说明南斯拉夫的先例是可以采用的。各联合国家是关心苏、波间有持久而经常的友谊的。因此，如果把那些像您所说的“并不坚决反俄”的人拉进来参加组成将来的波兰政府的工作，或者仅仅排斥那些据您认为是“对俄国采取极端不友好态度”的人参加这一工作，那是我们所不能感到满意的。这两类人都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只有那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并且忠实地、真诚地愿意同苏联合作的人才能够参加关于组织将来的波兰政府的协商工作。

3.我应当特别提一提您来信中的第 11 点，这一点里谈到由于谣传逮捕了 15 个波兰人和驱逐出境等等而发生的困难。

我可以就此事通知您，您所提到的那批波兰人不是 15 个，而是 16 个。这批人的头子是有名的波兰将军奥库里茨基。英国方面的消息对于这一个同其他 15 个“失踪的”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故意避而不谈，这是由于这个人特别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我们不打算对此事闭口不谈，这批以奥库里茨基将军为首的 16 个人，已由苏联前线军事当局予以逮捕：并正在莫斯科审讯中。奥库里茨基将军等这一批人，首先是奥库里茨基将军本人，被控在红军后方策划和进行破坏活动，使红军中一百多名军官和战士遭到牺牲，并被控在我军

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发报台，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他们之中所有的人，或者一部分人，将调审讯的结果交由法庭处理。这是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部队和自己的后方以防备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的阴谋所必需做的。

英国新闻界散布谣言，说在希特利兹暗杀了或枪决了波兰人。英国新闻界这条消息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看来，这是由阿尔基谢夫斯基的党徒们供给英国方面的。

4.从您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您不同意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是将来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也不同意临时政府在将来的全国政府里占有理所应得的地位。我应当坦白地说，这种立场使得就波兰问题达成一致同意的决定成为不可能。

1945年5月4日

第309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5月5日收到

已经安排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宣布欧洲胜利日之前先通知我们，以便我们有充分时间使我们的声明可以和他的宣布相配合。我接到他的通知后将立即告诉您，以便我们可以同时宣布。想您一定同意，您和丘吉尔和我自己同时发表声明是件最重要的事情。给丘吉尔发去同样的电报。

第310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年5月5日收到

兹答复您4月24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信如下。

我收到了丘吉尔首相4月28日给您的信件抄本。既然您从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给您的信件中已深深地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就无须告诉您，我是同意丘吉尔先生4月28日的信里关于改组波兰政府的意见的。我的政府仍然认为克里米亚决定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公正基础，并应在这个时候予以实现。

三外长在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上还没有制订出一个圆满的方案，我认为尽早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圆满办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应该告诉您，关于邀请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的代表到旧金山的任何建议，无论有无条件，都是美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若同意这个邀请，就意味着承认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是波兰的代表，而这就等于放弃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议了。

第311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年5月6日

您关于宣布欧洲胜利日的电报已在5月5日收到。

我同意您的建议，我们三人——您，丘吉尔先生和我——同时各发表有关的声明。丘吉尔先生建议的时间是英国双夏令时间下午3时，相当于莫斯科时间下午4时，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我已通知丘吉尔先生这个时间对苏联是适宜的。

1945年5月6日

第312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5月7日收到

下面是有关艾森豪威尔将军本日发来的关于宣布投降时间的电报。假

定您同意，我将在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5月8日星期二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宣布投降消息。

这是联合国家和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给丘吉尔首相发去了同样的电报。

杜鲁门

第313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年5月7日

5月7日关于宣布德国投降的来电已经收到。

红军最高司令部并不确信，东战场的德国部队会执行德军总司令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在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将处在不方便的地位，并会引起苏联公众的迷惑。必须记住，德国部队在东战场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从截获的无线电消息来判断，大批德国部队明目张胆地声明他们打算继续抵抗而不服从邓尼茨关于投降的命令。

由于这个原因，苏军司令部希望等到德国部队投降生效的时候，而把三国政府宣布德国人投降的时间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下午7时。

1945年5月7日

第314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5月8日收到

苏—英—美军队现已击溃法西斯侵略军而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了，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您的英雄部队致以我国人民及政府的热烈祝贺。我们十

分钦佩伟大的苏联对文明和自由事业所作出的宏伟贡献。

你们显示了爱好和平和非常英勇的人民摧毁无论多么强大的野蛮恶势力的能力。在我们共同胜利的时刻，我们向苏联人民和军队及其最高领导致敬。

敬请向您的各个战场上的司令官们转为致意。

哈里·斯·杜鲁门

第315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电

1945年5月9日

我衷心地感谢您对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友好的祝贺。苏联人民对友好的美国人民在这次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极为钦佩。反击德国侵略者并终于使他们全部溃败的苏、美、英武装力量的共同努力将作为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军事联盟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值此伟大胜利的时刻，恳请转达我代表苏联人民和政府向美国人民和英勇的美国武装部队致以热诚的祝贺。

约·斯大林

1945年5月9日

第316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5月10日

您5月5日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件已经收到了。

在收到来信的前一天，我已把我对丘吉尔先生4月28日关于同一问题的来信的复信全文给您送去，想您已收到。

因此，我想我不必重复这个问题。我只想补充这一点：

我觉得您不愿意考虑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并且您反对波兰临时政府在那个政府里占有应得的地位。我不得不指出，这种态度使得不可能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

1945 年 5 月 10 日

第 317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5 月 17 日收到

4 月 13 日您向哈里曼大使提出一项好的建议：美国和盟国代表前往维也纳了解维也纳占领区，以便解决欧洲谘询委员会悬而未决的占领奥地利的协议问题。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当局现在却与您的建议相反，拒绝允许这些代表前往维也纳。

由将来负责使盟国对奥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军事当局就地进行研究和讨论，会大大有助于就维也纳占领区作出妥善安排。例如，在欧洲谘询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最近建议，为了满足美国部队的空中交通线的需要，把维也纳西北 20 公里的特伦机场交美国管理，代替维也纳机场。但是，不论他或是我们都不了解这机场的确实面积和情况，如果要我们对他的建议予以适当考虑，就应该允许我们去视察这个机场。

鉴于要划分的地区已不再为敌人所占领，似应按您的建议前往调查为宜，以便易于在欧洲谘询委员会中达成协议。美国公众对苏联当局不顾您原来的建议而继续不允许这样做，是不会理解的。

所以我希望请您自己告诉我，您是否要给多尔布亨元帅发出指示使盟国代表便于在目前正由欧洲谘询委员会讨论的维也纳各地区进行视察。

杜鲁门

第 318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6 月 18 日

您 5 月 17 日关于美国和各盟国的军事代表前往维也纳的信件已经收到了。实际上我原则上已同意他们去维也纳，当然，我在同意时有一个谅解，就是在上述代表到达维也纳之前，已经就奥地利占领区问题达成必要的协议，并且占领区本身已由欧洲谘询委员会决定。正如丘吉尔先生、罗斯福总统和我所商定了的，这些问题完全属于欧洲谘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我现在仍然持有这种观点。因此，对于把占领区问题和关于奥地利的其它问题移到维也纳处理的观点，我们不能同意。

但是，我对美国及各盟国代表赴维也纳了解该市的情况及起草关于该市占领区的建议的问题，并没有反对意见。多尔布亨元帅即将接到必要的指示。但美国军事代表必须在 5 月底或 6 月初到达维也纳，因为目前在来莫斯科途中的多尔布亨元帅那时将已返回维也纳。

1945 年 6 月 18 日

第 319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0 日收到

我确信您和我同样感觉到通过函电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我们可能会见之前，我派遣哈里·霍浦金斯先生同哈里曼大使前往莫斯科，以使他们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些问题。霍浦金斯先生将在会谈完毕后立即返回华盛顿向我当面汇报。霍浦金斯先生和哈里曼大使计划在 5 月 26 日左右到达莫斯科。如蒙您告诉我这个时间对您是否方便，我将很感激。

第 320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0 日

关于霍浦金斯先生和哈里曼大使将在 5 月 26 日到达莫斯科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欣然同意您提出的与霍浦金斯先生和哈里曼大使会晤的建议。5 月 26 日对我完全适宜。

1945 年 5 月 20 日

第 321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5 月 21 日收到

您 5 月 18 日关于派遣各盟国代表前往维也纳以便使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并准备关于占领区的建议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并已经把您提出的日期通知了我们的代表。

杜鲁门

第 322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 年 5 月 21 日收到

我一直在通过驻莫斯科大使馆把美国对于威尼萨—朱里亚的临时行政管理问题所持的立场通知您。我还特别把最近美国和英国给铁托元帅的一些照会的抄本送交给贵国政府，这些照会建议按照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在今年 2 月间所达成的谅解由盟军最高统帅在包括的里雅斯特、蒙法尔冈、戈里齐亚和普拉等地在内的地区实行管制，以免妨碍争执的任何一方对这个地区的最后处理。

我们现已收到铁托元帅的答复。这个答复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表示，他的政府不准备“放弃南斯拉夫军拥有到伊松卓河为止的领土的权利”。至于该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他提出一个与我们所提出的原则不能调和的解决办法。同时，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的部队在未划定的占领区内的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管理上的双重性，都充满了危险。您可以从3月间哈里曼大使给莫洛托夫先生的信件里，以及从我们最近的公开声明里和给铁托元帅的信件里了解，我们认为这不单纯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边界争端，而必须把它看作是涉及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和奠定欧洲持久和平的原则问题。不论现在或将来，对于这块土地，任何不充分考虑南斯拉夫的合法要求和南斯拉夫军队对我们大家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对德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的行动，都是我们所不能采取或容许的。不过，我们也不能接受对有秩序的和迅速的解决的原则的任何让步。我正在把这一点通知铁托元帅。

我知道，您会同意，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必须坚持。我希望我们能同样期望您运用您的影响来帮助实现我们最近给铁托元帅的照会中所概述的临时解决办法。只要亚历由大元帅的权力能扩大到我们的照会中所指出的威尼萨—朱里亚地区并从而能恢复安宁，我们就能按照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的精神，继续为进一步调停这个问题而努力。

杜鲁门

第323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5月22日

您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问题的来电，已经在6月21日收到。前些时候我已经收到您经由凯南先生给我的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转给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同一问题的信件的抄本。谢谢您的通知。

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么我应当谈谈下面各点。

我认为您的意见完全正确，这个问题是原则性问题，对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领土问题不允许有任何对南斯拉夫的合理要求以及南斯拉夫武装部队在盟国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不加充分考虑的行为。不言而喻，这一块大多数居民是南斯拉夫人的土地的未来命运应当在缔结和约的时候加以决定。但是现在涉及到的是对这一地区实行临时性军事占领的问题。依我看来，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的部队把德寇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赶走，并从而对盟国的共同事业立下了重要的功绩。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当南斯拉夫人民为争取南斯拉夫的民族权利并为联合国家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之后，要否定南斯拉夫有权占领这一块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的土地，那是不公正的，而且对南斯拉夫军队和南斯拉夫人民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如果让南斯拉夫部队在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就地留下并让现在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的南斯拉夫行政机关存在下去，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才是正确的。同时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这一地区建立管制，并且由亚历山大元帅和铁托元帅相互协商确定分界线。如果接受这些建议，那么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行政权力的问题就会获得正确的解决。

既然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并且远在德国占领时期那里已经建立起南斯拉夫的地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到现在仍享有当地居民的信任，因此就应当考虑到既成的事实。让这个地区里现有的南斯拉夫民政机关隶属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指挥部，就会使这块土地上的行政管理问题获得适当的解决。

我希望美、英两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所发生的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的地位问题的误解将会消除，而全部问题将获得妥善的解决。

1945 年 5 月 22 日

第 324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3 日收到

关于霍浦金斯先生的访问的电报已经收到了，这使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我在他离开美国之后就把他这次访问莫斯科的消息公布，会比走漏消息而变成新闻界猜测的题目要强一些。霍浦金斯先生计划明天（5 月 23 日）早晨离此，在当天的晚些时候我打算向新闻界宣布他同哈里曼大使前往莫斯科和您商谈两国政府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些事务。

第 325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3 日

根据苏联陆海军司令部的材料，德国已根据投降书把全部军用和商用船只移交给英国人和美国人。我应当通知您，德国人甚至连一只军舰或商船都不肯移交给苏联武装部队，而把全部船只开走，去移交给英、美武装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按照以前对意大利的先例把德国军舰和商船中的一部分拨给苏联的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它有充分理由并且依照公正原则可以期望至少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军舰和商船。我并且认为必须保证使苏联的海军代表有可能知道关于德国军舰和商船移交的一切材料以及移交后的船只的实际情况。

苏联海军司令部指定列夫钦柯海军上将带领一批助手处理此事。

我并将同一电文发给丘吉尔首相。

1945 年 5 月 23 日

第 326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5 月 25 日收到

5 月 22 日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问题的信件已经收到，感谢您就此问题所表示的意见。

第 327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5 月 27 日

八个多月以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同希特勒德国决裂了，同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站在盟国方面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而且为此派出了本国的武装部队。这样，它们就对击溃希特勒主义和欧洲战争的胜利结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期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用行动证明它们愿意与联合国家合作。因此，苏联政府认为立即同罗马尼亚政府和保加利亚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是正当的和适时的。

苏联政府并且认为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也是合适的，因为芬兰正在履行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我看，过一些时候对匈牙利采取类似的决定也是可能的。

我同时把同一电文发给温·丘吉尔先生。

1945 年 5 月 27 日

第 328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5 月 30 日收到

感谢您在5月23日来电中关于投降的德国船只问题的建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应当由我们三人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讨论的恰当的题目，我相信届时一定会获得我们都完全同意的解决。

至于现有的德国海军投降记录，据我所知，在有关地区的我们的主管司令官正在考虑检查德国档案。

第329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5月30日

今天霍浦金斯先生把您提出的三人会晤的意见告诉我。我对您所建议的日期——7月15日——没有反对意见。

1945年5月30日

第330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5月31日收到

我已收到您5月23日的来信，我很高兴您和我一样深信，威尼萨—朱里亚地区的前途应该在和平调整期间决定。只有把有关各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加以考虑的原则予以维护，我们才能为将来保证和平的和有秩序的发展。

继我在5月20日发给您的一电之后，铁托元帅通知美英两国政府说，他同意在地中海战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管辖下建立盟国军政府。为了使盟军司令能负起我们授予他的这方面的责任，他必须有充分的权力来执行这项任务和维护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让他去决定实行民政管理的方法和在该地区可能保持的由他指挥的南斯拉夫部队的人数。他要作好准备，利用他认为工作得满意的南斯拉夫民政机构，但是，特别在意大

利人占大多数的各中心地点，他必须有权随意更换行政人员。

我确信，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针求得一个解决办法。我正指示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把英国和美国政府向铁托元帅提出的建议的详细内容提供给贵国政府，深信我们能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

第 331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2 日收到

谢谢您 5 月 30 日关于我们三人会晤的日期的信件。

我已通知丘吉尔首相，您和我同意在 7 月 15 日在柏林近郊会晤。

第 332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6 月 3 日

您 6 月 2 日的信件收到。

我已写信给您，我同意 7 月 15 日是三人会晤的非常适宜的日期。

1945 年 6 月 3 日

第 333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7 日收到

我仔细考虑了您 5 月 27 日的来电，您在电中建议我们各国政府目前应该同芬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过些时候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

您的建议表明，您和我共同感到，我们应努力把停战后的政权的期限尽量缩短，并对迅速承认我们以前的敌国为使自己参加盟国的民主原则而

作的一切努力。所以我同意，应当在最早可能的时间同这些国家建立正常关系。

所以，我准备立即同芬兰互派外交使节，因为芬兰人通过选举和其它政治调整表示出他们是真正忠于民主程序和原则的。

但是，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却找不到同样令人鼓舞的标志。特别是后两个国家，我发现这些政府不给人民中的民主分子以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且我觉得这些政府的行政系统既不代表又不能同情人民的意志，这使我很不安。从哈里曼大使3月14日的信中，您已经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认为应把罗马尼亚的政治情况作为三个主要盟国政府协商的问题。您也明了美国对保加利亚的拟议中的选举程序及某些政治作法的关注。

我真诚地希望，我能委派外交使节到这些国家的日子不久会到来。为了这个目的，我随时准备让我的代表和苏联及英国代表会晤，以便更有效地协商我们在这个地区内的政策和行动。我想这是恢复对这些国家——作为愿意承担义务和分享参加国际大家庭的好处的独立国家——的和平时期的正常关系的建设性建议，

本信内容同时通知丘吉尔首相。

第334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6月8日

谢谢您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问题的第二封信。我也看了哈里曼先生的信，内载美国和英国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谋求解决的建议。

我从您的信件中得悉，关于在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地区建立一个在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管辖下的盟国军政府问题，已由美国和英国政府一方与南斯拉夫政府另一方达成原则上的协议。但是我认为，为了使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的情况完全解决，还需要就美国和英

国政府提出的具体建议同南斯拉夫政府达成协议。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宣布同意在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地区建立盟国军政府，我希望南斯拉夫的利益能全部实现而不受任何阻碍，并希望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的全部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

1945 年 6 月 8 日

第 335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6 月 9 日

我收到了您答复我关于恢复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的建议的信件。

从您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您也认为最好尽早同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对芬兰有所偏爱；芬兰和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不同，它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并没有参加盟国方面。苏联舆论和全体苏军将会感到难以理解，如果把其武装部队在击败希特勒德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放在比芬兰较次的地位的话。

至于政治制度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主人士的机会并不比——譬如说——意大利少，而美国政府和苏联已经同意大利恢复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人们都能看到，近来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治是沿着平静的道路发展的，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使人有理由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原则将来的发展感到不安。所以，我认为，在这些国家里是用不着由盟国采取特别措施的。

因此，苏联政府认为，恢复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外交关系不应再拖延下去，匈牙利问题可以稍后考虑。

1945 年 6 月 9 日

第 336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6 月 11 日发出

华盛顿，白宫

当苏美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订立三周年之际，谨请您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接受苏联政府和我自己的感激之忱。

美国根据这个协定在整个欧洲战争中以租借法案方式，供给苏联军需品、战略物资和食品。这个协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于胜利结束同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完全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幸福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持久合作的利益，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加强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

约·斯大林

第 337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12 日收到

我深深感激您 6 月 10 日的来电，并感谢您对我们为与铁托元帅就在的里雅斯特地区成立军政府问题达成友好协议所作的努力的密切关怀。

6 月 9 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协定包括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具体建议我完全同意。就军政府问题达成一个肯定的协议是不应再拖延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亚历山大元帅的参谋长将在下星期和铁托元帅的参谋长会见，来制订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详细条款。

第 338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 年 6 月 15 日收到

我建议，既然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已经宣布，而且德国管制委员会已经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我们应立刻发出明确的指示，使军队分别进入各自的地区并开始对战败国领土进行有条不紊的管理。至于德国，根据各区司令官的协议，这些协议中包括各国卫戍部队同时开进大柏林和美国军队可以自由地由空中、公路和铁路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到柏林的规定，我准备向所有美国军队发出指示，于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

我认为，解决奥地利问题同解决德国问题同样迫切。进驻到已由欧洲谘询委员会原则上协议的各占领区的军队的重新配置、各国卫戍部队的开进维也纳、和成立奥地利问题的盟国委员会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与在德国采取的类似措施同时进行。因此，我极度重视解决突出的奥地利问题，以便使有关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整个协议能同时付诸实施。我希望，最近美、英、法三国代表团的来到维也纳，将使欧洲谘询委员会能毫不延迟地为此目的作出必要的其余的决定。

如果您同意上述意见，我建议立即向我们各自的司令发出适当的指示。

第339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6月15日收到

宋子文今天乘飞机离此经重庆前往莫斯科。

他将于6月底到达莫斯科商谈缔结苏中协定的细节。

已指示赫尔利大使在6月15日把苏联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并尽一切努力取得他的同意。还指示赫尔利大使通知委员长，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第340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6月15日

关于准备苏中协定及您给赫尔利大使的指示的来电，我已收到。谢谢您采取的措施。

1945年6月15日

第341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6月15日收到

请接受我并代表美国政府对您6月12日的友好信件的感谢。

我完全相信，我们之间今后继续下去的友好合作的谅解将像我们在反纳粹战争中的共同努力取得胜利一样，在维护和平与国际亲善方面取得胜利。

我很高兴地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同您会晤，并充分地讨论我们的共同问题。

第342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6月16日

您关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部队撤回到各自占领区的来信已经收到。

很遗憾，我应当说，您建议美国部队在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驻区以及美国部队在6月21日开进柏林，这是有困难的，因为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军事司令官将从6月19日起前赴莫斯科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筹备并参加6月24日的检阅。此外，柏林某些地区的地雷还没有清除，而扫雷工作最早到6月底才能结束。由于朱可夫元帅和其他苏联军事司令官不能在6月28—30日之前回到德国，我请求把撤军工作推迟到7月1日开始，那时，司令官们将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且扫雷工作将会结束。

至于奥地利，我上面说过的关于苏联的司令官们被召回莫斯科以及关于他们返回维也纳的日期的话也是适用的。此外，欧洲谘询委员会必须在近日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和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直到现在尚未结束。

由于上述一切，我建议把有关部队调动和进驻他们各自在奥地利的占领区的日期也同样推延到7月1日开始。

此外，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现在就应该确定由法国部队占领的区域。

我们将根据上述计划在德国和奥地利采取必要的步骤。

1945年6月16日

第343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年6月19日收到

我已收到您6月16日关于盟国占领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商定的区域的信件。

我已指示美国司令官，像您要求的那样，在7月1日开始调动。大概将有足够的美国部队早日进驻柏林，以便执行他们的任务，为我们的会晤作好准备。

第344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6月19日收到

我完全同意，您在6月9日的电报中所重新提到的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建立外交关系将是一个建设性步骤。我们就这个问题互换的函电表明，我们两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

我们两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的状况不是一样的。例如，立即恢复美国和芬兰之间的外交关系不会有任何障碍，至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虽然我们总的利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在各个国家中有不同的方面。

我正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作为达成一致的协议的最实际的途径，因此我建议我们在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第 345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6 月 21 日

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接受美国和英国政府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地区的建议，的里雅斯特谈判看来陷入了僵局。

主要原因是在地中海的盟军司令部代表拒绝考虑甚至是南斯拉夫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愿望，而从德寇手中解放那个地区是要归功于南斯拉夫人的。此外，在该地区的居民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从盟国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由于不愿使关系恶化，我在我的信件中迄今一直未提亚历山元帅的行为，但是现在我必须着重指出，在谈判过程中，亚历山大元帅有时使用的轻视南斯拉夫人的傲慢语调是不能同意的。亚历山大元帅在一次正式的公开讲话中竟然把铁托元帅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这是决不能同意的。对南斯拉夫来说，这是不公正的，是一个侮辱。英美代表在 6 月 2 日向南斯拉夫政府发表的声明所使用的最后通牒式的语调也使苏联政府感到惊讶。使用这种办法，怎能期望取得持久和积极的结果呢？

上述情况迫使我提请您注意这个局势。我仍然希望，就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而论，南斯拉夫的正当利益将得到尊重，特别是由于

在主要问题上，南斯拉夫人已经向盟国作了让步。

1945年6月21日

第346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6月23日

我已接到您6月19日关于恢复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外交关系的信件。

我知道您仍在研究这个问题。至于我，我仍然像以前一样认为，没有理由再推迟恢复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了，

1945年6月23日

第347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年6月26日收到

在收到您6月21日关于在的里雅斯特谈判的信件之后，盟军最高统帅通知我说，在的里雅斯特的这次谈判已经结束，并且签订了一项补充军事协定。这次谈判的唯一目的，是执行美国、英国和南斯拉夫政府在6月9日达成的政治协议中的军事方面的条款。6月9日的协议包含这一原则：威尼萨—朱里亚地区的未来处理问题应予保留以便进行有秩序的调整，作为最后和约的一部分；协议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或影响对这个地区的最终处理。

在就这一点达成协议之后，承认南斯拉夫可以在争执的地区（直到为适应盟国的军事需要所必需的土地为限）建立行政机构。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不论是在政府一级或军事一级，对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居民的合法利益以及对南斯拉夫在消灭德国军事力量方面所作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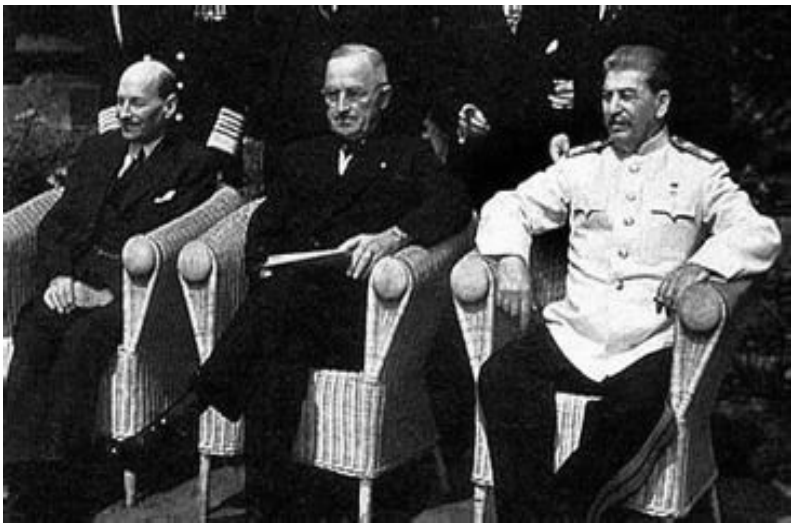
已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正如我前此就这个问题给您的信中所说的，盟军司令在他受命负责的地区里必须有充分的权力，使他能执行他的任务和维护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同样，南斯拉夫司令的责任得到了承认，并没有企图干涉他在商定的界线以东受命负责的威尼萨—朱里亚地区里行使他的职权。特别是由于两位司令商定他们将不采取任何妨碍最后协议的行动，因此盟国政府必须坚持，不得干涉他们在界线以西行使他们的职权。

在的里雅斯特会谈期间，的确产生了困难，因为看来南斯拉夫当局并不充分理解，6月9日协议的基本原则是，不得采取妨碍这个地区的最终处理的任何行动。南斯拉夫军司令最初拒绝承认贝尔格莱德协定第三条所规定的盟军司令对界线以西的行政权力。地方指挥官在6月9日后采取的这个行动和其它行动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同铁托元帅和贝尔格莱德政府达成的协定的全部内容并没有传达给这些地方的指挥官。

如果您认为这项协定还有什么应当予以考虑的方面，我们将在我们及早举行的会晤中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233）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348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密信

1945年7月5日收到

我今天将根据我们的谅解宣布，记者不得参加“终点”[①]，所有将从“终点”发表的文件将是可能随时决定发表的那种官方公报。

我将寄给丘吉尔首相同样内容的信。

————————————

① “终点”，波茨坦会议的代号。——本书制作者注

第349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总统亲收的密信

1945年7月6日

您6月26日关于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信件已收到。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讨论。我准备当我们在德国会晤时讨论这些问题。

1945年7月6日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

第350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7月20日

绝密

德国巴贝尔斯堡国际会议

苏联代表团总部

尊敬的大元帅：

目前美国飞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来往是通过德黑兰进行的。美国认为，除了在旅行中损失时间以外，这还大大浪费了迫切需要的空中运输工具，

美国现在已经设立了飞往柏林的军事运输机构来处理美国的官方运输，这种机构也能为苏联的官方运输效劳。因此我要求您同意让目前通过德黑兰进行的美、苏航线改用通过柏林的航线。

哈里·斯·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20 日

第 351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7 月 21 日

绝密

德国巴贝尔斯堡国际会议

苏联代表团总部

尊敬的大元帅：

由于海军和空军在日本和西伯利亚附近的作战日益增加，扩大收集和散布西伯利亚东部的气候情报的设施，是极其需要的。加强这项工作会同样使苏联得到好处。日本和日本海地区的气候不仅受到在西伯利亚东部上空从西到东的气流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从西太平洋向北经过日本的台风流动的影响。

据认为，通过扩大美国的通讯网以及提供设备和联络人员以便在伯力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设立电台和气象控制站，就能最充分地满足上述紧急需要。美国的人员在伯力将有大约 66 名官兵，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 33 名官兵。关于这项建议的细节在此以前已经通知苏联总参谋部。

由于气候对目前和今后的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早日完成拟议中的这些改进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要求您表示赞同，并发出必要的指示，以便由我们两国的工作人员早日完成详细的安排。

哈·斯·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21 日

第 352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的备忘录

1945 年 7 月 27 日

欧洲今冬有严重缺煤的危险，除非德国能够出口大量的煤。尽管我们自己缺煤、缺乏国内运输工具和远洋船只，我们目前正在把煤运往欧洲，作为使目前的危机有所缓和的紧急措施。但是显然，由于我们以大量的工业和军事资源用于对日作战，我们对欧洲提供的煤的数量将不足以满足欧洲的迫切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应该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增加德国的煤产量，并且使得可以有最大数量的煤出口。

为了避免拖延，我已指示美军总司令在他的占领区采取必要措施。据我了解，英国和法国政府已经分别向它们在德国的司令官发出类似的指示。附上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示的副本。

我迫切希望四个占领国遵循有关煤的一项共同政策，因此我已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尽早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讨论上述指示中提出的政策。我相信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同我们一道执行这项政策。我希望它将准备指示它的司令官在苏军在德国占领的地区采取类似的行动，并在管制委员会中着手制订整个德国的煤生产和出口计划。

哈·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27 日

附件 **给驻德美军司令的指示**

除非解放了的欧洲在今后几个月可以得到大量的煤，否则就有发生政治和经济混乱的严重危险，这种混乱将危害盟军的重新部署并妨碍经济稳定的恢复，而经济稳定是巩固的和正义的和平的必要基础。实际上，除了从德国之外，绝大部分欧洲地区无法从其它任何来源得到足够的煤。因此迫切需要使德国能够生产煤以向其它欧洲国家输出，这些国家必须有这些煤以便至少是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生活。

因此指示你以驻德美军司令官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委员的身份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达到下列目标：

1.在1945年内使西德的煤产量中至少有1,000万吨煤可供出口，在1946年4月底以前再有1,500万吨煤供出口。

2.为了按照所指示的速度完成2,500万吨煤的出口指标的必需限度，可以最优先地处理与最大限度地生产和运输德国煤有关的一切问题，特别是提供采煤供应品、运输设备和足以把采煤工人的工作效率维持在必要水平上的粮食的问题。这个需要只应该从属于为了保证占领部队的安全、健康、供养和活动所需的军事和非军事要求以及为了保证在德国的盟国部队的重新部署。

3.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甲）指示东德生产煤并出口煤，其紧急程度与要求西德在1946年4月底以前出口2,500万吨煤一样，（乙）制定一项整个德国有关煤的生产、分配和出口的协调的计划。

4.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协助为使你的占领区以外的其它占领区的煤产量达到最大限度而作的努力。

5.向管制委员会建议，并在你自己的占领区遵循这一原则：在德国境内分配煤的时候，出口煤应比德国境内的工业用煤和民用煤占优先地位，以达到为按照建议的速度完成从西德出口2,500万吨煤的指标所必须的限度；同时要符合上述第三条的规定，只从属于上述第二条所指出的要求。

我们认识到，在严重缺煤时期奉行这项政策将推迟德国工业活动的恢复。还认识到，执行有关德国煤的上述政策可能在德国人中间引起大规模的失业、不安和不满，这种情况可能使得有必要采取坚定而有力的行动。为控制局势所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将得到充分支持。

6.将有关德国境内的煤产量和煤分配的全部详情告知欧洲煤组织，以便欧洲煤组织的成员国可以知道德国境内煤消费量和解放了的欧洲的煤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7.优先生产并出口褐煤块以及生产和出口第一条规定的2,500万吨以外的煤。

8.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将对它们各自占领区的司令官发出类似的指示。

第353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年7月29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哈·斯·杜鲁门先生

柏林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已接到您7月20日关于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运输线从经过德黑兰改为经过柏林的信件。

苏联政府对您的建议表示赞同。有关的苏联当局已经奉命同美国代表讨论由这个建议所引起的技术问题。

约·斯大林

1945年7月29日于柏林

第354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年7月29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哈·斯·杜鲁门先生

柏林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已接到您7月27日关于德国煤的备忘录和您给艾森豪威尔将

军的指示的副本。

对于您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用德国煤满足欧洲的需要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将予以适当的研究，并将把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但是我必须说，应该小心行事以便保证出口的措施不会在德国引起您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示中所提请注意的任何骚乱。我认为，从盟国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是十分可行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

约·斯大林

1945年7月29日于柏林

第355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7月30日

柏林

尊敬的斯大林大元帅：

我听说您正患病，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病情并不严重，并希望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向您表示最好的祝愿。

您的诚挚的，

哈·杜鲁门

1945年7月30日于柏林

第356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年7月30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哈·斯·杜鲁门先生

柏林

尊敬的总统先生：

谢谢您 7 月 30 日的来信。我今天好了一些，我期望能够参加明天即 7 月 31 日的会议。

您的十分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5 年 7 月 30 日于柏林

第 357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30 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哈·斯·杜鲁门先生

柏林

尊敬的总统先生：

谢谢您把您的照片送给我。当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我一定把我的照片送给您。

您的诚挚的，

约·斯大林

1945 年 7 月 30 日于柏林

第 358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的备忘录

1945 年 7 月 31 日

您要我写一封关于远东局势的信件给您，我应您的建议，兹附上一信稿，我打算在您通知我您已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在您方便的时候把这封信寄给您。如果这信稿使您满意，您可以在您达成这种协议的时候立

即让我知道，我将用电报把这封信拍给您，在您认为合适时加以使用。我还愿意由最快的信使把我签名的正式信件送上。如果您决定使用此信，就请使用。但是，如果您决定发表一项声明，以其它理由作为您的行动的根据，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不愿使用此信，我也会感到满意。一切听凭您处理。

哈·斯·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31 日

附件　杜鲁门关于远东局势致斯大林的信稿

苏联代表团

尊敬的斯大林大元帅：

美国、苏联、联合王国和中国于 1943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宣言的第五节规定：

“5、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在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各该国将彼此磋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

拟议中的联合国宪章第 106 条规定：

“在第 43 条所称之特别协定尚未生效，而安全理事会认为尚不得开始履行第 42 条所规定之责任前，1943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签订四国宣言之当事国及法兰西应依该宣言第五项之规定互相洽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洽商，以代表本组织采取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宗旨所必要之联合行动。”

宪章第 103 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虽然宪章尚未正式得到批准，但是它在旧金山会议上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同意，而且苏联政府将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的条款和宪章的规定，苏联表明它愿意同目前在对日作战的其它大国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将是适当的。

您的诚挚的

1945 年 7 月 31 日

第 359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的绝密信

1945 年 8 月 12 日收到

美国于 8 月 11 日致函瑞士政府，由它转交日本政府，以答复 1945 年 8 月 10 日从瑞士政府收到的照会。按照该信件，我提议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为接受、协调和执行日本武装部队总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

如果您把您任命的、希望充当您的代表的军官的名字通知我，我将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在投降的时间和地点上为您的代表作必要的安排。

还准备由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帝国总部让在贵国作战区域的日军向苏联的远东最高司令或向他的下级司令官无条件投降。我假定您一般是同意上述程序的，我将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大意如此的初步指示。请您立即把您所任命的代表通知我，以便我可以通知麦克阿瑟将军。我建议立即开始就各项安排同麦克阿瑟将军进行直接联系。

第 360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8 月 12 日

我已接到您 8 月 12 日关于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为盟国最高统帅以便接受、协调和执行日本武装部队的总投降的信件。

苏联政府接受您的建议，并同意您所建议的程序，该程序规定，

麦克阿瑟将军将向日本帝国总部颁发有关日本军队也向苏联在远东最高司令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杰列维安科中将已被任命为苏联军事最高司令部代表，并且已得到一切必需的命令。

1945年8月12日

第361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电

1945年8月14日

下面的信件已在今天送交美国驻太平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司令官们：

“日本政府已在8月14日接受盟国政府要日本投降的要求，因此命令你们停止对日本陆军部队和海军部队的进攻，只要这同在你们地区内的盟军的安全没有矛盾。”

1945年8月14日

第362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的绝密信

1945年8月15日

我已批准下述给麦克阿瑟陆军上将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

总命令第一号

1.陆军和海军

（1）帝国总部根据天皇的指示、并依照天皇发布的一切日本武装部队向盟国最高统帅投降的敕令，兹命令它在日本和国外的全体指挥官，指示日本武装部队和在他们指挥下的由日本控制的部队依照下面所指示的，或依照盟国最高统帅可能进一步指示的，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放下他们的武器，留在他们目前的驻地，无条件地向代表美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和不列颠帝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司令官投降。应当立即与所

指明的司令官或他们所指定的代表进行接触，但须服从盟国最高统帅所详细规定的任何改变，他们的指示应立即全部加以执行。

甲、在中国（不包括满洲）、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当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乙、在满洲、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和桦太岛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当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

丙、在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缅甸、泰国、北纬16度以南的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俾士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以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向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总司令或澳大利亚军司令——蒙巴顿和澳大利亚人的确切分工将由他们自行安排，然后由盟国最高统帅准备本条的细节）投降。

丁、在日本托管岛屿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其它太平洋岛屿上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当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投降。

戊、帝国总部、它在日本本岛、与本岛毗邻的小岛、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和菲律宾的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切海陆空部队和辅助部队应当向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投降。

己、上述司令官是受权接受投降的唯一的盟国代表，日本部队应当只向他们或他们的代表投降。

日本帝国总部进一步命令它在日本和国外的指挥官完全解除一切日本部队的武装或在日本控制下的部队的武装，不论这些部队可能驻在何处，并在上述盟国司令官可能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整无损地交出一切武器和装备。（在发出进一步指示以前，日本本岛的日本警察部队不受本条解除武装的规定的限制。警察部队应当继续留在本岗位上，并负责维持治安。这样一支警察部队的人数和武器将予以规定。）

（2）日本帝国总部应当在接到本命令（时限）之内向盟国最高统帅提供下列的有关日本和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地区的完整的情报：

甲、一切陆空部队和高射炮部队的清单，清单应说明驻地和官兵人数。

乙、一切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民航飞机的清单，清单应提供有关这种飞机的数目、类型、驻地和状况的完整情报。

丙、日本和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海军舰只——现役的或非现役的以及正在建造中的水上舰只、潜水艇和辅助舰只的清单，清单应说明这些舰只的驻地、状况和调动情况。

丁、日本和在日本控制下的百吨以上的一切商船（在使用中或不能使用的以及正在建造中的），包括从前属于联合国家中的任何一国而现在为日本人所控制的商船的清单，清单应说明这些商船的位置、状况和调动情况。

戊、有关一切地雷、水雷、布雷区和阻挠海陆空军行动的其它障碍物的方位和分布情况以及有关海陆空行动的安全通道的完整而详细的情报，并附以地图说明之。

己、一切军事设施和设备，包括机场、水上飞机基地、防空工事、港口和海军基地、储藏仓库、永久和临时性陆上和海岸防御工事、碉堡和其它设防地区在内的位置和情况。

庚、拘留联合国家战俘和平民的一切营场和其它地方的位置。

（3）在处理一切日本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民航飞机的进一步通知发出之前，日本武装部队和民航当局保证这种飞机继续留在地上、水上或舰上。

（4）日本或日本控制的各种类型的海军舰只或商船应当加以维护使其不受损害，并在盟国最高统帅发出指示以前不作调动。在海上的舰只应当立即使各种爆炸物无害于人，并把它们抛入海中。不在海上的舰只应当立即把各种爆炸物移到岸上安全的储藏所。

（5）负责日本军事和民政当局或日本控制下的军事和民政当局应当保证：

甲、按照盟国最高统帅的指示拆除日本的一切地雷、水雷、布雷区以及其它阻挠海陆空军行动的障碍，不管它们设在什么地方。

乙、立即恢复对航运事业的一切援助。

丙、使一切安全通道畅通无阻，并在做到上述甲款之前作出清楚的标记。

（6）在盟国最高统帅发出进一步指示以前，负责的日本军事和民政当局和日本控制下的军事和民政当局应当使下列各项完整无损和处于良好状况：

甲、一切武器、弹药、爆炸物、军事装备、贮藏品和供应品、其它各种战争工具和其它一切军用物资（本命令第（4）条具体规定的除外）。

乙、一切陆、海、空运输和通讯设施和装备。

丙、一切军用设施和设备，包括机场、水上飞机基地、防空工事、港口和海军基地、储藏仓库、永久性和临时性陆上和海岸防御工事、碉堡和其它设防地区，以及所有这种工事、设施和设备的设计图和图样。

丁、一切制造厂、工厂、车间、研究机构、化验室、试验站、技术资料、专利品执照、设计图、图样和旨在生产或便于生产或使用一切战争工具和其它物资的发明，以及任何军事组织或非正规的军事组织为了它的军事活动而使用或打算使用的财产，

（7）日本帝国总部应在接到本命令（时限）之内，向盟国最高统帅提供上述第（6）条甲、乙和丁款具体规定的一切项目的完整的清单，清单应表明各项项目的数目、类型和所在地。

（8）一切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制造和分配应立即停止。

（9）关于在日本人手中或日本控制下的当局手中的联合国家战俘和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

甲、认真维护一切联合国家战俘和被徇留的平民的安全和福利，包括提供足够的食物、住所、衣服和医疗所必不可少的行政和供应服务在内，直到盟国最高统帅接管这项责任时为止；

乙、把拘留联合国家战俘和非军事人员的各个营场或其它场地及其设备、仓库、档案、武器和弹药立即交给高级军官管辖或交给指定的战俘和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的代表；

丙、按照盟国最高统帅的指示，把战俘和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送到安全地点，以便在那里能为盟国当局接收；

丁、日本帝国总部应在接到本命令（时限）之内向盟国最高统帅提供关于一切联合国家战俘和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的完整清单，并标明地点。

（10）一切日本的和日本控制下的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应帮助和协助盟国部队占领日本和日本控制下的地区。

（11）日本帝国总部和有关日本官员应根据盟国占领司令官的指示准备收集和交出日本平民拥有的一切武器。

（12）日本和日本控制下的军事和民政官员以及平民应当立即认真地服从盟军最高统帅或其他盟国军事当局发布的本命令和随后发布的一切命令。拖延不遵守或根本不遵守本命令或随后发布的命令的规定的任何行动以及盟国最高统帅断定有害于盟国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盟国军事当局和日本政府的严厉处分和即刻处罚。

本命令由我批准，但它可以由于通过联合参谋部发布的进一步指令和由于盟国最高统帅参照他所知道的作战情况在细节问题上作的改变而修改。命令中括号内的部分的行动是由盟国最高统帅决定的事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

第 363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8 月 16 日

您附有第一号总命令的信件已经收到。我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人们知道，辽东半岛是满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我建议对第一号总命令作如下修正：

1.整个千岛群岛应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将向苏联军队投降的地区之内，因为按照克里米亚会议三国的决议，整个千岛群岛将由苏联占有。

2.北连拉彼鲁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桦太岛和北海道之间）的北海道北半部应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将向苏联军队投降的地区之内。在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从该岛东海岸的钏路镇到该岛西海岸的留萌镇划一道分界线，把该岛北半部的上述域市包括在内。

最后一点对俄国的舆论特别重要。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

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1945年8月16日

第364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8月18日收到

绝密

这是答复您8月16日的来信。我同意您所提出的修改第一号总命令以便把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将要向苏军远东总司令投降的地区之内的要求。但是我想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在千岛群岛的某个岛屿上，最好是在中部，拥有为陆海飞机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利，以便用于军事和商业的目的。如果您愿通知我，您同意达种安排，我将感到很高兴，地点和其它细节可通过为此目的而任命的我们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来解决。

关于您所提出的有关北海道的日本部队向苏军投降的建议，我打算要日本本土各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的日本部队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为此作出安排。

麦克阿瑟将军将使用盟国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他认为需要占领多少，就占领多少，以便实现我们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第365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8月22日

您8月18日的信件已经收到。

1.我理解您的信件是暗示拒绝满足苏联提出的关于把北海道北半部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将向苏军投降的地区之内的要求。我必须说我和我的同僚未曾料到您会作这样的答复。

2.至于您希望在千岛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建立永久性空军基地的要求（按照在克里米亚会议三国决议，千岛群岛将归苏联占有），我认为我有责任作如下声明。第一，我必须指出，无论在克里米亚或在柏林，三国的决议都没有规定这种措施。无论如何也不能从那里作出的决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这种要求通常是向一个战败国或是向这样一个盟国提出的，即这个盟国本身没有能力保卫其领土的某一部分，因而表示愿意给予它的盟国一个适当的基地。我认为不能把苏联列为这两类国家中的任何一类。第三，由于您的来信没有说明要求给予永久性基地的任何理由，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对您说，我和我的同僚都不了解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对苏联提出这种要求的。

1945年8月22日

第366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绝密信

1945年8月27日收到

这是答复您1945年8月22日的来信。就千岛群岛基地而论，我的想法是，在占领日本期间使用在千岛群岛中部的降落权，对于我们为执行日本投降条件而要采取的合作行动是一个重要贡献，因为这会在占领日本期间提供作为紧急用途的通往美国的另一条航空路线。

我在提出给予供商用的降落设施的问题时也是毫不犹豫的。您显然误解了我的信，因为您提到这种要求通常是向一个战败国或是向一个不能保卫自己的一部分领土的盟国提出的。我不是在谈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任何部分，我是在谈日本领土千岛群岛，这些岛屿的处理必须在和约中决定。我得知，我的前任同意在和约中支持苏联得到这些岛屿。当您要求我确认

这项协议时，我并不认为是冒犯。您既然期望我们支持您关于永久拥有整个千岛群岛的愿望，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请您考虑关于只在其中的一个岛上拥有降落权的要求时，您认为是冒犯。由于在我们两国政府和我们私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关于进行讨论的要求尤其合理。虽然我认为早日讨论这些问题将是有帮助的，如果您不愿在目前讨论的话，我也不会强迫要求这样做。

第 367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8 月 30 日

我已接到您 8 月 27 日的来信。我很高兴，在我们来往信件中发生的误解已经消除。虽然您的建议丝毫也未使我感到屈辱，但是它使我感到困惑，因为现在很清楚，我误解了您。

当然我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占领日本期间使美国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在千岛群岛一个岛上的我们的机场降落。

我也同意在千岛群岛中一个岛上的苏联机场给予商用飞机以着陆的便利。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期望美国政府采取互惠行动，给予苏联商用飞机在阿留申群岛之一的一个美国机场降落的权利。原因是，目前从西伯利亚取道加拿大前往美国的航空路线由于路线太长而并不令人满意。我们希望在千岛群岛和西雅图之间建立一条取道阿留申群岛的较短的航空线。

1945 年 8 月 30 日

第 368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9 月 2 日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先生

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日子，请允许我向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并向美国人民祝贺对日本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向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祝贺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

约·斯大林

1945年9月2日

第369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9月6日收到

请接受美国人民和我对您就我们盟国对日胜利发来的亲切贺电所表示的感激。

所有的盟国都对胜利作出了它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大家现在都可以期望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实现持久和平和新的繁荣。

第370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9月10日收到

谢谢您8月30日的来信，该信已经收到。

第371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9月14日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部队

最高司令约·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尊敬的斯大林大元帅：

请接受我对现已安全送到的那张亲笔签名照片的谢意。我对热诚的题词的感激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将始终珍视这张照片，因为它可以令人高兴地想起在波茨坦的非常愉快的会晤。

您的非常真诚的，

哈·杜鲁门

1945 年 9 月 14 日

第 372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9 月 22 日收到

我得悉，在就法国和中国参加讨论巴尔干局势问题达成协议方面遇到了困难，由于这个原因，莫洛托夫先生正在考虑退出伦敦的外长会议。

我迫切要求您同莫洛托夫先生联系，对他说，由于这种做法会对世界和平产生不利影响，他不应当让会议垮台。

第 373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9 月 28 日发出

您的来信已收到。

我已向莫洛托夫询问，但是迄今还未得到答复。我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是法国和中国参加解决巴尔干局势的问题，那末按照柏林会议的决议的确切意义，不应该邀请这两个国家参加。

第 374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9 月 23 日收到

关于我的上一封信。国务卿已把外长会议碰到的困难详细地告诉了我。

我同意，按照对波茨坦协定的措词的严格解释，法国和中国无权参加研究和约的会议，除非它们是投降条款的签署国，或者除非根据波茨坦协定的第三节（2）款邀请它们参加。这一款规定，在讨论与签字国以外的会议成员国直接有关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协议邀请它们参加。

我记得，在波茨坦的会议桌上，在讨论期间商定，非签字国的成员可以出席并参加讨论，但是不能表决。看来在外长会议开会的第一天就一致商定，非签字国的成员可以参加讨论，但是不能表决。如果我们现在改变这项规定，以法、中两国不是投降书的签字国为由而不给它们参加讨论据它们声称与它们有关的事项的权利，那末我担心这会引起不好的印象。人们将指责说，三大国甚至不给予会议的其它成员提出它们的看法的机会。

难道我们不能同意把外长会议在开幕日采取的一致行动视为是根据波茨坦协定对法、中两国发出的参加会议的邀请吗？这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不应妨害会议的工作和拖延在和平和更好的谅解方面的进展。

第 375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9 月 23 日发出

您关于外长会议的第二封来信已经收到。

今天我接到了维·米·莫洛托夫的答复，答复说，他遵守柏林会议的决议，并且认为不应违反这项决议。至于我，我必须提醒，在柏林会议上，我们既没有决定，也没有商定非投降书签字国的会议成员能够参加讨论，但是不能表决。我认为莫洛托夫在严格遵守柏林会议

决议这一意义上的态度不可能造成不好的印象，也不可能得罪任何人。

第376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年10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尊敬的斯大林总理：

罗斯福总统的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有您、丘吉尔先生和他本人的画像挂在此间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里，作为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历史重要意义的见证。

他已同艺术家道格拉斯·钱多尔先生讨论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位艺术家具有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高超的绘制这一特殊的油画的天才。

我知道，罗斯福先生是多么希望这样一幅油画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性纪念品中的又一件珍贵作品。我想问一下，您是否愿意牺牲您的一些宝贵时间让钱多尔先生前来莫斯科画像。

我也写信给丘吉尔先生，问他是否也能拿出足够的时间让钱多尔先生为他画像，以便完成象征我们三国的团结的这项历史性工作。

您可以确信，如果您同意协助实现罗斯福总统的这个宿愿，我将表示非常感激。

您的诚挚的，

哈·杜鲁门

1945年10月11日

第377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的亲收密信

1945年10月24日收到

贝尔纳斯先生在从伦敦返国后已向我作了报告。我很高兴地获悉，外长会议在若干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我认为外长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是我惊讶地获悉，不仅在莫洛托夫先生和贝尔纳斯先生的私人谈话中，而且还在外长会议的会议桌上，莫洛托夫先生曾说，美国对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政策似乎是受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所驱使。

我不能相信贵国政府当真相信美国的政策具有这样的动机。我们对承认芬兰、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临时政府的政策表明，我们急于，并且愿意作很大的努力使我们的政策同苏联的政策步调一致。正如我在柏林会议上竭力说明的那样，我国政府只是在设法执行罗斯福总统所发起、并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三国政府所接受的政策。

贝尔纳斯先生还向我报告了使伦敦会议陷于僵局的程序性困难。看来在9月11日，外长会议曾邀请并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成员国参加条约的讨论，但是没有表决权。在通过这项程序时并未遭到会议的任何成员国的怀疑，我觉得，它显然是根据柏林协定而采取的一项适当的和可以允许的程序。

贝尔纳斯先生认为不能同意莫洛托夫先生在9月22日建议的对这项程序的更改。他正当地认为我国政府不会在会议中途撤销对法国和中国发出的请它们参加讨论条约的邀请（在它们已经参加了十六次会议之后），而使它们受辱。

为了寻求一项能为会议的所有成员国接受的解决办法，贝尔纳斯先生说，他愿意接受一项缩小拟订中的程序的方案，如果大家同意，像柏林协定第二条（4）、（11）款所授权的那样，由外长会议召开一次主要有关国家的和平会议。

我希望您会觉得有可能接受贝尔纳斯先生的提案。我认为，我们大家既然邀请了中国和法国参加这些条约的讨论，我们就应该拟订一项能保证由整个外长会议召开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条约的程序。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代表们能按照有关他们的程序的明确指示来进行已经交给他们的重要工作。

早日解决在和平机构问题上的分歧，对于防止我们两国人民的误解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误解可能使今后的合作更为困难。我确信您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我们两国在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比我们之间任何可能的分歧远为重要。

我已经到伦敦并完全知道我的看法的哈里曼大使亲自向您送交此信，以便您有机会讨论您所考虑的关于此信的任何问题。

第 378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 年 10 月 26 日

哈里曼先生在 10 月 24 日交给我您的信件。我就伦敦外长会议讨论的问题同他进行了两次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答复了哈里曼先生奉您的指示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

1945 年 10 月 26 日

第 379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亲收的信

1945 年 11 月 2 日收到

如您所知道的，自从故总统威尔逊本人亲自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从哈普斯堡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以来，我国一直以深切和同情的兴趣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经济巩固的斗争。我们始终钦佩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建设民主制度和对欧洲国家大家庭的和平国际生活作出贡献方面所表现的辛勤努力。.

在战争末期，美国军队为了追击我们的共同敌人，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国界，并挺进到比尔森以北一线。而从东方英勇地打过来的红军则开入了布拉格城。这样，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就使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解

放。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两国的武装部队一直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以便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灭残余的纳粹军队。

但是，盟军的继续留驻正在枯竭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资源，并且延迟这个盟国的正常恢复和复兴，而它受纳粹统治的时间比联合国的任何其他成员国都长。因此，我希望在1945年12月1日以前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撤出美国军队。如果苏联政府没有类似的意愿，那就仍将有大量的红军士兵留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我想向您建议，红军同我们的军队同时撤出。

由于不再有必要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免遭纳粹的蹂躏，由于我们军队的留驻无疑地在消耗他们的经济，我还认为，美军应在切实可行的时间尽早撤出，以便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取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它机构对他们提供的援助的全部好处。在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同时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美国人民就可以确信，捷克斯洛伐克资源的消耗已经停止。

我希望您能够考虑我的建议，并希望我们能以同时撤军的行动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意愿是要消除延迟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恢复元气的一个障碍。

第380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信

1945年11月7日

我已接到您关于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的信件。很遗憾，由于气候情况使莫斯科和索契之间的航空路线不能按期通航，信收到得迟了。

我欢迎您的主张在11月撤军的建议，尤其是因为这项建议完全符合苏联的复员和撤军计划。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的工作将到12月1日结束。

1945年11月7日

第 381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12 月 9 日收到

在批准贝尔纳斯先生向莫洛托夫先生提出的主张在今年年底前召开三国外长会議的建议时，我并未忽视这样的意见：在对重大问题趋于达成协议的进展有较大的保证以前，不应举行会议。但是我认为，在这个紧急时刻，继续犹豫不决和拖延是极不明智的。

我真诚地希望您将和我合作，使这次会议成功，并对大国合作的能力给予重新的保证。

我极愿让贝尔纳斯先生把我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您。我真诚地希望，当他在莫斯科时您能早日会见他并同他进行坦率的谈话。请您告诉我这一点是否可能。

第 382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亲收的密电

1945 年 12 月 9 日

对您 1945 年 12 月 8 日的来电向您表示感谢。

您可以放心，我也希望同您合作，以便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取得会使我们的共同事业得到好处的结果。我不久将回莫斯科，并愿意非常坦率地同贝尔纳斯先生会谈。

1945 年 12 月 9 日

第 383 号

杜鲁门致斯大林

1945 年 12 月 19 日收到

致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莫斯科

尊敬的大元帅：

我们从不同的出发点处理我们的共同问题，在开始时碰到一些困难，那是很自然的。但是越来越明显，这种困难在我们两国人民心目中占了过大的比重，并且正在许多方面推迟我们两国都希望迅速取得的向和平与复兴方面的进展。

我再次向您保证，我的真诚愿望是，——并确信这是美国人民的愿望——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应共同努力来恢复与维护和平。我确信，我们两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我们之间任何可能的分歧。

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我已设法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迎合您对盟国对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意见，我真诚希望贵国政府将接受我们提出的提案。如果这些提案被接受的话，我向您保证，在将这些提案付诸实施时，我要坚持同苏联政府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合作来执行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件。

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我还作了很大努力来迎合您对将来处理和约的程序的意见，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的分歧是不大的。鉴于我们愿意接受您所提出的关于由代表们进行准备工作的建议，我非常希望贵国政府能接受我们的关于正式的和平会议的提案，我确信这些提案将大大有助于使其它国家普遍接受我们的代表们所进行的工作。

如果我们就缔结欧洲和约的程序和指导盟国对日关系的机构问题迅速达成协议，那末对于大国进行合作的能力的信心就不会削弱，而渴望和平的世界将得到新的希望。

如果贵国政府参加提出这样一些建议，即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在联合国组织的主持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控制原子能的问题并提出建议，那么这种希望就会大大加强。

如果我们能不再拖延地就程序问题的总的要点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开始讨论其它问题，因为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协调起来，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希望您将会见贝尔纳斯国务卿，并同他进行坦率的谈话。他完

全了解我的意思，我可以肯定，如果您能同他进行一次充分和坦率的谈话，将会是大有帮助的。

您的诚挚的，

哈·杜鲁门

第 384 号

斯大林致杜鲁门

1945 年 12 月 23 日

绝密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很高兴接到了由贝尔纳斯先生转交给我的您的信件。您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同意您的意见：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恢复与维护和平；我们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即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某些分歧。

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已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您和贝尔纳斯先生所采取的关子日本问题及和约问题的步骤有很大帮助。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就这种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会议已经做了工作，这种工作在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目前时期将大大有助于建立我们两国之间的适当的相互谅解。

原子能问题仍然在讨论中。我希望我们也将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共同的努力，将作出使我们两国和其它国家都感到满意的决定。

您当然已获悉我同贝尔纳斯先生的第一次会谈情况。我们将继续举行会谈。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认为我能够说，总的说来，我对于我们目前就紧急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是乐观的。我希望这将提供进一步的机会来协调我们两国在其它问题上的政策。

我趁此机会答复我最近接到您的关于艺术家钱多尔来到莫斯科的

信件。我离开莫斯科已有好久，我很遗憾，由于我公务繁忙，很难在最近的将来腾出时间来会晤钱多尔先生。当然我准备把我的肖像送给他，如果您认为这样做是适合的话。

约·斯大林

1945 年 12 月 23 日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es of the U.S.S.R.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nd the Presidents of the U.S.A.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of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1941—1945
Volume Two
Correspondence with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Harry S. Truman
(August 1941—December 1945)

根据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 1957 年英文版譯出
(其中斯大林的信件和从俄文譯成英文的个别信件均根据
俄文版校訂)

1941—1945 年
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
苏联部长会議主席
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第 二 卷
斯大林同罗斯福和
杜魯門的通信

苏联外交部編
宗 伊 譯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15 元

1963 年 5 月第一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9\frac{1}{2}$ · 插頁 2 · 字数 226,000
統一书号 3003 · 662

反击德国侵略者并终于使他们全部溃败的苏、美、英武装力量的共同努力，将作为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军事联盟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斯大林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九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十九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19

1943–1945

斯大林全集

第十九卷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二〇一六年·中国

斯 大 林

目　录

第十九卷说明 …… 1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　记录·文件

德 黑 兰 会 议

（194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一、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1 月 28 日） …… 4
二、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
（11 月 28 日） …… 8
三、附录　军事代表会议
（11 月 29 日）…… 18
四、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1 月 29 日）…… 25
五、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会议
（11 月 29 日）…… 30
六、斯大林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1 月 30 日）…… 42
七、午餐时的会谈
（11 月 30 日）…… 47

八、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三次会议
（11月30日）…… 49
九、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四次会议
（12月1日） …… 53
十、德黑兰会议文件
（1943年12月1日）…… 66
1、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同盟国领导人
德黑兰会议公报 …… 66
2、三国宣言 …… 66
3、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 67

雅 尔 塔 会 议[①]

（1945年2月4日—11日）

一、里瓦基亚宫第一次会议
（2月4日〉…… 70
二、里瓦基亚宫第二次会议
（2月5日）…… 81
三、里瓦基亚宫第三次会议
（2月6日）…… 95
四、里瓦基亚宫第四次会议
（2月7日） …… 111
五、里瓦基亚宫第五次会议
（2月8日） …… 118
六、里瓦基亚宫第六次会议
（2月9日） …… 128

————————————

① 即克里米亚会议。——本书制作者注

七、里瓦基亚宫第七次会议
（2 月 10 日）…… 138
八、里瓦基亚宫第八次会议
（2 月 11 日）…… 143
九、克里米亚会议文件
（1945 年 2 月 11 日） …… 148
1、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盟国领导人
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 148
2、克里米亚会议议定书 …… 154
3、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 …… 157
4、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 158

波 茨 坦 会 议

（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

一、第一次会议
（7 月 17 日）…… 161
二、第二次会议
（7 月 18 日）…… 173
三、第三次会议
（7 月 19 日）…… 183
四、第四次会议
（7 月 20 日）…… 200
五、第五次会议
（7 月 21 日）…… 214
六、第六次会议
（7 月 22 日）…… 230
七、第七次会议
（7 月 23 日）…… 246

八、第八次会议
（7月24日）…… 257
九、第九次会议
（7月25日）…… 271
十、第十次会议
（7月28日）…… 277
十一、第十一次会议
（7月31日）…… 290
十二、第十二次会议
（8月1日） …… 311
十三、第十三次（最后一次）会议
（8月1日） …… 326
十四、波茨坦会议文件
（1945年8月2日）…… 337
1、三国柏林会议公报 …… 337
2、三大国柏林会议议定书 …… 351

附录 丘吉尔评说斯大林 …… 358
插图
一 德黑兰会议 …… 65
二 雅尔塔会议 …… 147
三 波茨坦会议 …… 336

第 十 九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九卷，是根据苏联国际关系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编辑的。这三次会议，先后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1945年2月4日至11日和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美国、英国三国最重要的政府首脑会议。

“文件集”汇总了历次会议的会谈记录和结束后发表的会议公报及议定书。其中，记载了约·维·斯大林的大量发言和论述，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位历史伟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精辟分析，展现了他高超的谈判艺术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本卷第一部分是德黑兰会议的四次会谈和斯大林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谈话的记录，以及会后发表的公报和两个宣言。

第二部分是雅尔塔会议的八次会谈的记录和会议的公报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和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第三部分是波茨坦会议的十三次会谈的记录和会议关于处理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后的各项问题的公报和议定书。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九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

记录·文件

德 黑 兰 会 议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28日15点

谈话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①]

开始：当地时间15点或15点15分

结束：当地时间16点

参加者：**美国**　罗斯福总统

苏联　斯大林元帅

别列日科夫[②]

罗斯福问，苏德战场上的情况如何。

斯大林回答，最近我军放弃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托米尔。

罗斯福问，前线的天气如何。

斯大林说，只有乌克兰天气很好，前线其它地区是一片泥泞，土地还没上冻。

罗斯福表示，他想把三十一四十个德国师从苏德战场上引开。

斯大林说，如果能这样就好。

罗斯福指出，这是他最近将要加以说明的许多问题之一。美国人面临的任务是在离美国大陆三千英里之外保持一支为数二百万人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就需要运输工具，他完全理解这一点。

罗斯福说，美国正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制造船只。

他说，过些时候他想同斯大林元帅谈谈战后的问题以及如何分配

---

① 会谈地点、时间和参加者名单为德文译本编者所加。下同。

② 苏方译员。——本书制作者注

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商船问题，使苏联有可能发展商船运输。战争结束以后，英美都拥有一支十分庞大的商船队，他希望把这些商船队的一部分商船分给其它联合国家。

斯大林回答说，这很好。只要美国愿意，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应当说，战后俄国将是美国很大的市场。

罗斯福说，战后美国将需要大量的原料，所以他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将会有密切的贸易来往。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说，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设备，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原料。

罗斯福说，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谈话。他，罗斯福当时很谨慎，想避免在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元帅会晤时有中国人在场。罗斯福认为中国人对通过的决议感到满意。

斯大林指出，蒋介石的军队仗打将很糟。

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并且说，现在美国正在华南装备三十个中国师，等这三十个师装备好以后，美国将再装备三十个中国师。

斯大林问，在黎巴嫩发生了什么事。谁应对这种局势负责。

罗斯福说，应由法国委员会负责。英国人和法国人曾保证过黎巴嫩的独立，黎巴嫩人有了自己的宪法和总统。他们想对宪法稍作修改，但法国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总统和内阁成员。现在黎巴嫩一切正常了。

斯大林问，英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黎巴嫩是否恢复了平静。

罗斯福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假如斯大林元帅见到了戴高乐，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喜欢他的。

斯大林说，他本人不了解戴高乐。

罗斯福说，他认为法国人民是好的，但是他们需要在原来法国政府中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的、四十岁以下的全新的领导人。

斯大林说，这需要很多时间。

罗斯福同意这点。他说，美国正在装备十一个法国师。吉罗是个令人喜欢而又出色的将军，但他在民政和政治方面却完全是外行。

斯大林说，法国某些领导阶层的人士想比所有的盟国都高明，想蒙蔽他们。看来，他们以为盟国会捧着一个现成的法国献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想同盟国共同战斗，而宁愿同德国人合作。这些人采取的是同德国人合作的方针，至于对法国人民他们则不闻不问。

罗斯福回答说，丘吉尔认为法国会完全复兴并很快要成为一个强国。他，罗斯福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要过很多年才能实现。如果法国人以为盟国会把一个现成的法国盛在盘子里端给他们，那他们就错了。要使法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法国人还要付出很大努力。

斯大林回答，他不能想象，盟国在为解放印度支那流血后却让法国人拿过去并在那里恢复殖民制度。他认为当日本人在缅甸和泰国嘲弄了独立的观念之后，需要以较为自由的制度來代替旧的殖民制度。他认为黎巴嫩的行动就是在以新制度代替旧的殖民制度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骤。他想，丘吉尔会赞同黎巴嫩有一个比较自由的制度。他，斯大林认为在印度支那也应当做到这一步。

罗斯福说，对此他百分之百的同意。他很高兴地了解到蒋介石并不想要印度支那。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统治了一百年，而目前印度支那人民的生活状况比一百年前更糟。蒋介石说，印度支那人民没有进行自治的准备。于是他，罗斯福，说了菲律宾的例子，几年前菲律宾人也没有实行自治的准备，但现在由于美国的帮助，菲律宾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美国也答应给他们以自治。罗斯福认为可以向印度支那任命三—四个托管人，然后经过三十—四十年，使印度支那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其它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在实现关于托管制的建议方面采取坚决行动，因为他怕不得不对他的殖民地也实行这个原则。赫尔在莫斯科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份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该

对各殖民地国家进行视察，以便研究这些国家的状况和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委员会的全部工作要公布于众。

斯大林回答，能做到这一点就好。可以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要同丘吉尔谈印度的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丝毫未予考虑。丘吉尔想把这个问题留到战争结束时再说。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痛处。

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说，英国在印度总归要有所行动。他，罗斯福希望同斯大林谈谈印度问题。他认为，议会的体制对印度并不合适。在印度问题上局外人比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看问题会更客观些。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
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

1943年11月28日

德黑兰

16点会议开始，19点30分结束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6点

结束：当地时间19点2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霍普金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莱希海军上将	迪尔陆军元帅	伏罗希洛夫元帅
金海军上将	布鲁克将军	巴甫洛夫
迪安少将	坎宁汉海军上将	别列日科夫
查罗尔上尉	波特尔空军元帅	
波伦	伊斯梅中将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　作为在座的政府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冒昧地第一个发言。我愿意向我们这个新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桌周围的全体与会者保证：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

关于会议如何进行我还想说几句。这里谈论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

打算发表，但我们彼此要象朋友一般开诚布公。我想这次会议将是成功的。在这次战争中联合起来的三个国家将加强自己的联系并为世世代代的密切合作创造条件。我们的参谋部人员可以讨论军事问题，而我们代表团，虽然没有规定出议事日程，可以讨论诸如战后体制等其它问题。但是，你们各位要是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的愿望，我们也可以不谈。

在开始工作之前，我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是否愿意就这次会谈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的意义讲几句话。

丘吉尔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力量的最伟大的集会。我们手中掌握着缩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钥匙。我愿为我们要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

罗斯福　斯大林元帅可能也想说几句话？

斯大林　在祝贺三国政府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我想讲几句话。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历史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和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竭尽全力为了共同合作而很好地利用我们的人民授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罗斯福　也许，由我先来概括地谈谈目前总的战局和战争的需要。当然我是从美国的观点出发来谈的。我们和不列颠帝国、苏联一样也希望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我想先谈谈与苏联和大不列颠相比更多地关系到美国的那部分战争。我指的是太平洋战争。在那里，美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下，肩负着战争的主要负担。

现在我谈谈更重要，也是苏联更感兴趣的问题——横渡海峡的战役。我想告诉大家，一年半以来，我们就在制定我们的计划，但由于吨位不足，我们不能确定这一战役的日期。我们不仅想横渡海峡，而且还要向纵深追击敌人。英吉利海峡是这样一个讨厌的水域，要在5月1日前开始渡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魁北克制定的计划，出发点就是这个战役应在1944年5月1日左右付诸实行。对一切登陆战

役来说，都要解决专门的登陆艇问题。如果我们将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登陆战，那么可能就得把横渡海峡的战役推迟两个月或三个月。因此，我们想就这个问题以及在舰艇少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地中海地区现有军队的问题，听听我们苏联同事的意见。但我们并不想把横渡海峡战役的日期推迟到5月或6月之后。与此同时，有许多地方可以利用英美军队。这些军队可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地区和爱琴海地区发挥作用。最后，如果土耳其参战，它们还可以用来帮助土耳其。所有这些我们在这里都应该作出决定。我们很想帮助苏联，从苏联战场上引开一部分德军。我们想听听苏联朋友的意见，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改善他们的处境。

也许丘吉尔先生想作些补充？

丘吉尔　我请求推迟我的发言，等斯大林元帅发言之后我再讲。但我想说我原则上同意罗斯福总统的讲话。

斯大林　关于总统先生发言的第一部分，即太平洋战争部分，可以这样说：我们俄国人祝贺英美军队在太平洋已经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胜利。

至于总统先生发言中谈到欧洲战争的第二部分，我想谈几点意见。

首先介绍一下自德军7月份攻势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战役的情况。也许我这样讲过于详细，那我可以缩短我的发言。

丘吉尔　我们乐于听取您打算讲的一切。

斯大林　顺便提一下，最近本来我们自己也往准备进攻。德国人抢了先。但既然我们本来准备进攻，并集结了大量兵力，所以在击溃德军的进攻之后，我们自己能较快地转入进攻。虽然人们说我们总是事先把一切都计划好，但我应该说，8、9月份所取得的胜利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完全出乎我们所料，原来德国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弱。根据我们的侦察，现在德军在我们的战场上有二百一十个师，还

有六个师正在调往前线的途中。此外，还有五十个非德国师，其中包括芬兰师。这样在我们战场上德国人共有二百六十个师，其中大约有十个匈牙利师，二十个芬兰师，十六或十八个罗马尼亚师。

罗斯福　一个德国师有多少人？

斯大林　德军每师大约有八—九千人，其中不包括辅助部队。如把辅助部队也算在内，则一个师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人。去年我们战场上有二百四十个师，其中德军是一百七十九个师，今年我们战场上有二百六十个师，其中二百一十个是德国师，而且还有六个德国师正在调往前线的途中。俄军参加战斗的有三百到三百三十个师。这样，我们的兵力比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兵力要多，正是这一部分超过的兵力被用来发动进攻，否则，根本谈不到什么进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军和德军在数量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德国人在撤退时野蛮地摧毁一切，这就造成很大的困难，给我们运送弹药带来麻烦。这就是我们攻势放慢的原因。最近三周德国人在乌克兰的基辅以南和以西地区发动了进攻，他们占领了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托米尔，这已经公布了。大概他们日内还要夺取科罗斯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

在那个地区德军有五个新坦克师和三个原有的坦克师，总共八个坦克师，还有二十二至二十三个步兵师和摩托化师。它们的任务是重新占领基辅。所以，我们前面将会遇到一些困难。

以上是关于我们夏季作战的情况介绍。

现在谈谈在欧洲的英美军队最好在什么地方作战才能减轻我们战场上的负担。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我们俄国人过去认为，意大利战场的重要性仅在于保证盟国船只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战场才是重要的。我们过去这样看，现在仍然这样看。至于说到从意大利直接对德进攻，那我们俄国人认为，意大利战场是不合适的。所以，意大利战场只对地中海的自由航行有其重要性，而对进一步对德作战并无意义，因为阿尔卑斯山脉挡住了向德国本土推

进的道路。我们俄国人认为，在法国的北部或西北部进攻敌人效果最好。就是在法国南部作战也比在意大利好。如果土耳其肯让盟国通过，那当然好。从巴尔干到德国的心脏毕竟要近些，这里既没有阿尔卑斯山脉，又没有英吉利海峡挡道。但德国最弱的地方是法国。当然，这是一次艰巨的战役，在法国的德军将疯狂抵抗，但这终究是上策。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丘吉尔　我们很早就同美国商定从法国的北部或西北部向德进攻，为此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如果要说明为什么我们没能在1943年进行这些战役，需要举出许多数字和事实。我们已决定1944年向德发动进攻，进攻的地点已在1943年选定。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为使军队在1944年春末渡海入法创造条件。我们能够在5月或6月为此目的而集中的兵力有十六个英国师和十九个美国师。但这些师的人数比斯大林元帅所说的德国师的人数要多。在这些部队之后要紧接上主力部队。我们预计在整个“霸王”战役中，在5、6、7三个月内总兵调动约一百万人横渡海峡。这些兵力加上我们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兵力，就是我们英国这个四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按现有的空军规模所能提供的全部兵力。要增援前面提到的部队，那就靠美国了。但现在距我刚才说的期限尚远，还有六个月。我和总统会谈时，我们反复讨论了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来帮助俄国人而又无损于“霸王”计划，让它按预定期限或只稍迟一些付诸执行。为发动“霸王”战役，我们已从地中海地区抽调七个有作战经验的师及部分登陆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此外还有意大利的恶劣天气，那么必须指出，我们为至今还没有拿下罗马而有些失望。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占领罗马，我们认为，1月份将会有一场决战，而我们将会打胜。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下的亚历山大将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认为，罗马战役完全能够打赢，可能俘虏和歼灭敌人十一—十二个师以上。我们不想再向伦巴第推进或越经阿尔卑斯山向德国前进。我们只打算

推进到罗马稍北的彼萨—罗米尼一线。在此以后，就可以实现横渡海峡和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战役。

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说服土耳其参战的问题。这可以打开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道，使我们能经黑海向俄国运送物资。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利用土耳其的机场同敌人作战。只需要有限的兵力即可占领罗得岛和其它一些岛屿。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俄国人直接联系并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物资。而到目前为止，由于护航舰只不足，我们只向俄国北方港口发出了四个由军舰护航的（货运）船队。但在打通黑海通道后，我们就能定期地向俄国南部港口运送物资。

斯大林 应当指出，这些（货运）船队都已平安到达。途中没有遇到敌人。

丘吉尔 我们怎样才能迫使土耳其参战？它应该做些什么？它是否应当进攻保加利亚并对德宣战？它是否应当向色雷斯发动攻势，还是不应向色雷斯推进？俄国人对至今还记得是俄国把他们从土耳其手中解放出来的保加利亚人将持什么立场？这对现在已在寻求摆脱战争出路的罗马尼亚人将会有何影响？对匈牙利有何影响？这是否会导致许多国家发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当然，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俄国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地中海东部要采取的行动可能会稍微推迟横渡海峡战役的日期，苏联政府对此是否感兴趣？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决定，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罗斯福 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比较合适的是当苏军逼近敖德萨时，我们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地区登陆。

丘吉尔 如果我们夺取罗马后，进而从南部封锁德国，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发动攻势，并可以增援游击队。这些战役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拟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制定

详细的方案。

斯大林 我问几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将有三十五个师来进攻法国北部。

丘吉尔 是的，正是这样。

斯大林 计划在开始进攻法国北部之前，先在意大利战场进行一次作战，目的是占领罗马，然后准备在意大利转入防御。

丘吉尔 对，我们现在就正从意大利调出七个师。

斯大林 我理解，除此以外还计划进行三个战役，其中之一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

丘吉尔 实施这些战役可能对俄国人会有好处。从地中海地区调去七个师之后，我们进攻法国北部的军队将达到三十五个师，此外，我们将有二十一二十三个师留在意大利北部。

我还想说明，最大的问题是必要兵力的调动问题。我已经说过，“霸王”战役将用三十五个师开始，之后，由美国调来的部队补充，其数目将达到五十六十个师。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英国的英美空军最近六个月将增加一至二倍。此外，英国正在不断地聚积兵力。

斯大林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我理解得是否正确。除占领罗马的战役外，还计划在亚得里亚海地区以及法国南部分别发动一次战役。

丘吉尔 在“霸王”战役开始时，计划向法国南部发动进攻。为此，将利用能从意大利抽出的兵力。但这个战役的详细方案还没有拟定。

斯大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土耳其参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丘吉尔 我可以说，只要不到两三个师就能占领土耳其西岸诸岛，从而保证运送物资的船只到达土耳其，又可以打开去黑海的航道。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给土耳其人派二十个航空大队和几个防空团，这样做并无损于其它战役。

斯大林 我认为最好是把“霸王”战役作为1944年一切战役的基础。假如在发动这个战役的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那么两股队伍

就能在法国汇合。所以最好是进行两个战役：一个是“霸王”战役，一个是支援它的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战役。而与此同时罗马地区的战役将是牵制性的战役。如果在法国南北两面登陆，这两股力量汇合时可以达到增加兵力的效果。法国是德国薄弱的一环。谈到土耳其，我对它能否参战表示怀疑，无论对它施加多大压力，它也不会参战。这就是我的看法。

丘吉尔　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苏联政府对迫使土耳其参战极为关切。当然，我们可能无法迫使土耳其参战，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尽极大的努力。

斯大林　是的，我们应该想办法迫使它参战。

丘吉尔　我同意斯大林元帅关于最好不要分散力量的看法，但既然我们在地中海地区有二十五个师，那么把三一四个师和二十个航空大队拨给土耳其还是可以的。更何况这些军队现在反正已在埃及担任防务，可以把它们往北调。

斯大林　二十个航空大队这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当然，如果土耳其参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丘吉尔　我担心，在这六个月的时间内，我们的军队会无所作为，不去给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本来可以占领罗马并进行在欧洲展开大战役的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议会将责备我没给俄国人以任何帮助。

斯大林　我认为“霸王”战役是个大规模战役，如果能从法国南部加以支援，将大大有利于它的进行，并肯定能够奏效。如果是我，我将宁肯走这样的极端：在意大利转入防御，放弃攻占罗马，而在法国南部发动进攻，从而把法国北部的德军引过去。两三个月后，我再从法国北部开始行动。这个计划将能保证“霸王”战役的胜利，而且两军能够汇合进而壮大兵力。

丘吉尔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理由，但我只想说，如不占领罗马，

那我们将被动得多。此外，为对德国进行空袭，也必须到达彼萨—罗米尼一线。我想让军事专家们去讨论这个问题，攻打罗马的战斗已在进行。我们估计1月份可以拿下罗马，放弃攻克罗马，意味着我们的失败，我将无法向议会对此作出解释。

罗斯福　如果不进行地中海战役，我们就能按期实施“霸王”战役。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那么将势必推迟“霸王”战役。我是不想推迟“霸王”战役的。

斯大林　根据我们的作战经验，两面夹击能够取胜，而一面进攻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所以我们总是力图对敌人腹背夹攻，使敌人不得不来回调动兵力。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以从法国的南、北两面发动攻势为好。

丘吉尔　我本人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不管是否向法国南北两面进攻，我们可在南斯拉夫采取一些牵制性行动和迫使土耳其参战。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在地中海地区无所事事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确定这个日期将会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能仅仅为了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而牺牲地中海战役。当然我们应该就此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这个问题可由军事专家们来讨论。

斯大林　好。我们没想到要讨论纯军事问题，所以也没带总参谋部的代表，但我想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我能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丘吉尔　土耳其的问题怎么办？或许我们也把它交给军事专家讨论？

斯大林　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军事问题，土耳其是大不列颠的盟国，与苏联和美国部很友好。应该使土耳其不要再在我们和德国之间做游戏。

丘吉尔　我可能有六，七个与土耳其有关的问题，但我想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　好。

罗斯福　当然我是赞成迫使土耳其参战的，但假如我是土耳其总统，我索取的代价恐怕一定会使“霸王”战役受些损失。

斯大林　应当想办法让土耳其参战，它有许多师现在无所事事。

丘吉尔　我们彼此都怀着友好的感情，但我们之间自然也存在着分歧。需要时间和耐心。

斯大林　说得对。

罗斯福　就这样吧，明天早晨军事专家们开会。首脑会议四点钟举行。

附录　军 事 代 表 会 议

1943年11月29日10点30分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0点30分

结束：当地时间1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莱希海军上将	布鲁克将军	伏罗希洛夫元帅
马歇尔将军	波特尔空军元帅	巴甫洛夫
麦克法兰上校	雷德曼准将	
韦尔上尉	伦吉上尉	

海军上将莱希建议让布鲁克将军介绍一下地中海战区的战况。

布鲁克将军说，英美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对敌人施加压力。同时最好牵制住德国可能派往法国北部的大量师团，因为在法国北部德军的增加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霸王”战役将吸引德军的大批力量。但是这次战役不能在5月1日前进行，因为这不是登陆的最好时机。所以在此战役开始前将有五、六个月的空隙时间，在这段时间杓，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以牵制德军。布鲁克指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兵力雄厚，他们愿意最有效地发挥这些兵力的作用。

布鲁克对马歇尔将军说，如果他的发言与美国人的意见有所出入，请马歇尔将军打断他。

马歇尔将军请布鲁克继续讲下去。

布鲁克说，英美共同制定的计划中规定，要在包括地中海地区在内的所有战线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目前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有二十三个德国师。英美有足够的兵力把战线推向意大利北部。但是，由于地形条件，英美部队不能对德军直接施加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从海上进行迂回战。预计这个战役将使德军投入十一至十二个师，而且德军司令部将被迫补充这些部队。在意大利境内的这些战役将牵制目前在那里的同样数目的德国师，而且这些兵力将会被大大

削弱。

在谈到土耳其问题时，布鲁克说，如果抛开纯粹的政治上的考虑，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应该让土耳其参战，这样做好处极大。首先，这将打开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航线，并可能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退出战争起很大的作用。此外，可以通过黑海和俄国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并经这条航道向俄国运送物资。最后，在土耳其建立盟军的空军基地，就可以对德国人的重要设施进行空袭，比如罗马尼亚的油田等等。通过黑海而不绕道波斯运送物资可以缩短路程，从而腾出一些船只，在其它地区使用。为打开通往黑海的道路只需占领罗得岛以北土耳其沿岸的几个岛屿就够了。这个战役并不艰巨，不必使用大量兵力。布鲁克说，英国人在地中海有一种特制的登陆驳船可用于上述战役。只不过需要把“霸王”战役推迟一段时间，以便在此期间内在地中海利用这些船只。同时这些战役可以牵制德军，否则德国人会在我们进行“霸王”战役时利用这些兵力。布鲁克说，为了对德国南部的工业开始进行空袭，保证盟军在意大利的机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空袭和从英国本土出发的空袭对1944年的战事将有极大的作用。如果接受昨天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不结束战役就转入防御的建议，就必须在那里保持大量兵力以牵制德军。这样就只可能拨出有限的兵力到法国南部作战。布鲁克表示，他完全同意斯大林元帅提出的两面夹击敌人的战略。但是陆地作战做到这一点比渡海登陆要容易。渡海登陆时两方面的战役不一定总能互相支援，因为给两方兵力及时调运后备力量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现在派六至八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德国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吃掉。所以两个战役必须在比较近的时间内进行。但是为此需要大批的登陆工具。布鲁克说，盟军打算在进行“霸王”战役时，在地中海进行小规模登陆，以便调开对付“霸王”战役的部分德军。但问题就在于很难给这样的辅助性的登陆战役及时补充部队。因为一开始只能有三至四个师登陆，而后来必须要增加到三十五个师。应该使德军在盟军兵力尚少的时候，不能增加自己的兵力。布鲁克说，这就是有关陆地作战的一切情况。他建议空军元帅波特尔介绍空军作战的情况。

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最好先听取美国人关于陆地作战的报告，然后再谈空中作战的问题。

马歇尔说，他想从美国的观点出发来阐述战局。目前美国要在两个战场作战，也就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问题在于美军的行动遍及两个如此之大的海洋。与通常的情况相反，美国人并不感到兵力和物资的不足。马歇尔说，除

了正在作战的师以外，美国还有五十多个师打算尽快地利用起来。但是问题在于船只和登陆艇不足。马歇尔说，尽管如此，美国人可以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现在正准备给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人希望把他们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尽快地投入战斗。讲到登陆艇，首先指的是运送坦克和摩托机械化部队的船只。为了顺利地实施布鲁克将军所讲的地中海战役，这样的船只尚感不足。马歇尔重复说，美国既不缺乏兵力，也不缺乏物资供应。马歇尔指出，美国人对缩短运输期限和船只在港口停留的期限极为关切。马歇尔指出，“霸王”战役的优点是它在最初阶段所必须克服的距离最短。随后打算从美国直接往法国派遣部队。将往法国派遣近六十个师。马歇尔指出，地中海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因为原来就打算在德黑兰讨论这一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最近的三个月应该做些什么，并根据这一点决定最近六个月应该做些什么。马歇尔说，在“霸王”战役前两个月就开始法国南部的战役是很危险的。但法国南部的战役将有助于“霸王”战役的成功，这也是完全正确的。马歇尔认为，最好在“霸王”战役前二至三个星期在法国南部登陆。必须注意到，实现这些战役的严重障碍是德国人将破坏一切港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在没有任何设施的海岸给部队输送物资。美国的工兵部队在修复港口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然而，马歇尔仍然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仍会受到影响。他说，在萨勒诺登陆时，在最初的十八天内，只运送了一百零八吨物资。通过没有设施的海岸总共运送了十八万九千人。还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强大的歼击机来掩护。马歇尔说，在萨勒诺，英美的飞机只有十五至二十分钟的行动时间，而在“霸王”战役中，飞机可能将有三十分钟的行动时间。马歇尔再一次指出，美国人的问题不在于兵力和物资的不足，而是登陆工具不足。马歇尔说，他希望伏罗希洛夫元帅了解，目前美国要在太平洋进行五次登陆战，每次都要配合以激烈的空战。在1月份还将进行四次登陆战，马歇尔说，这就是他所想要讲的全部情况。

莱希建议空军元帅波特尔补充布鲁克和马歇尔的报告。

波特尔元帅声明，他将只讲空中战役。到目前为止，对德国的空袭主要是从英国本土出发的，现在也开始从地中海地区出发。目前英美向德国每月投下一万五千到三万吨炸弹，主要目的是破坏敌人的工业、交通和空军。此外，相当数量的德歼击机是在空中被消灭的。我们面前的斗争还很艰巨，但是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英美摧毁德国空军的计划一定会取得成功。从敌人的兵力布署就

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正在顺利进行。目前，在德国西部和南部有一千六百五十架到一千七百架歼击机，而在其它所有的战场上一共只有七百五十架德国歼击机。英美空军从地中海出发对德国南部只进行了一次空袭，就迫使德国人从德国中部调来三百架歼击机，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人对空袭是何等地敏感。波特尔说，他明白苏联空军几乎全部用于配合陆地作战。但是如果苏军司令部能够拨出一部分空军轰炸德国东部就好了，这将对其它所有战场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波特尔说，这就是他所要讲的全部情况。

莱希说，最好听听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意见。

伏罗希洛夫说，从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他得知，美国有五十到六十个师准备在法国使用，而只是运输和登陆工具有困难。伏罗希洛夫问，现在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运输和登陆工具问题。

伏罗希洛夫说，从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他得知，美国人认为“霸王”战役是主要战役。他问，布鲁克将军作为英国的总参谋长，是否也认为这个战役是主要战役，他会不会认为在地中海或其它某个地区进行的某个其它的战役能够代替这个战役。

马歇尔说，他想回答伏罗希洛夫元帅关于“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准备实施“霸王”战役，问题在于交通和登陆工具。马歇尔补充道，8月份在英国只有一个美国师，现在已有九个美国师，而且新的师正在不断增加。

伏罗希洛夫援引迪安将军和伊斯梅将军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中指出英国和美国正在大规模生产登陆工具，而且正准备制造临时浮动码头。他问道，现在是否可以说这些工作能保证在“霸王”战役开始之前备齐必需数量的登陆艇。

马歇尔回答说，关于浮动码头情况可以由布鲁克将军详细谈谈。至于说到美国，美国将尽力使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在“霸王”战役开始前结束。其中包括制造每艘能载近四十辆坦克的登陆驳船。

布鲁克说，首先他想回答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第一个问题：英国人如何看待“霸王”战役。布鲁克说，英国人很重视这次战役，并把它看成是这次战争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赢得此次战役的胜利，应该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使德国人不能利用法国北部的良好道路补充兵援。布鲁克说，英国人认为，这些条件将在1944年具备。为了即将进行的战役，英国的一切力量都进行了

改组。为此，正在训练特种部队。现在已经从意大利和非洲调出四个师，还从地中海抽调了部分登陆船只。英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实施1944年应该进行的战役。但是英国的困难就在于登陆艇。为了在5月1日前发动“霸王”战役，必须现在就从地中海抽调大部分登陆艇，这就会使意大利战役暂停下来，而英国人想以不间断的战斗最大限度地牵制德军力量。这不仅是从俄国战场上引开德军的兵力，而且也是保证“霸王”战役的成功所必需的。至于临时浮动码头的制造，布鲁克说，现在正在这方面搞试验。这些试验中有的并不象预计的那样成功，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成绩。布鲁克说，即将进行的战役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会不会有浮动码头。

伏罗希洛夫说，他想再次问问布鲁克将军，英国人是否认为“霸王”战役是主要战役。

布鲁克回答，他料到会提这个问题。他应该说，他既不希望法国北部战役的失败，也不希望法国南部的战役失败。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战役注定要失败。

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元帅和苏联总参谋部认为地中海地区的战役是次要的战役。然而，斯大林元帅认在法国北部战役前二至三个月进行的法国南部的战役，将对“霸王”战役的成败有决定意义。英美部队在北非的胜利和在意大利登陆战役的胜利及其作战经验，英美空军对德的空袭，美国和联合王国军队的组织程度，美国雄厚的技术装备，盟军的海上威力，尤其是在地中海的优势，这一切都说明，只要有愿望“霸王”战役是能够成功的。只是必须有决心。

伏罗希洛夫说，军事人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应使辅助战役不仅不妨碍主要战役，而且要尽量配合主要战役。接着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是，横渡海峡的战役应得到盟军在法国南部行动的支持。为此目的，他认为可以在意大利转入防御，用腾出来的兵力在法国南部登陆，从而两面夹击敌人。如果在法国南部的登陆不能在“霸王”战役前二至三个月实行的话，斯大林元帅并不坚持这一点，这次登陆可以与“霸王”战役同时进行甚或稍晚一些，但是一定要进行。

至于谈到苏联的空军，那么很清楚，它正忙于配合陆军作战。正如斯大林元帅所说，目前在苏德战场上仅德国师就有二百一十个，敌军总共有二百六十个师。所以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空军完全用于前线作战和袭击敌人的后方。我们没有多少可能利用的空中力量袭击德国东部，然而，一旦有此可能，我国

的最高统帅部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决定。

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认为横渡海峡的战役不是轻而易举的战役。我们明白，这比横渡河流困难得多。但是，根据我们强渡诸如第聂伯河、杰斯纳河、索日河这样一些右岸多山、德军防守严密的大河的经验，我们还是可以说，只要认真进行，横渡海峡的战役必将获得成功，德国人在上述河流的右岸修筑了强大的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工事，配备了强大的炮兵，它可以向低洼的左岸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使我军无法靠近岸边。但是，经过我军大炮、迫击炮集中火力攻击以及猛烈的空袭之后，我军终于渡河成功，击溃了敌人。

伏罗希洛夫说，我深信，如果准备得很好，主要是得到强大空军的充分配合，霸王战役必将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盟军的空军应当在地面部队行动之前取得绝对的空中优势。

布鲁克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同样认为，地中海的战役不是主要战役。但是，既然在地中海地区有强大的兵力，可以而且应该进行这些战役来配合主要战役。这些战役和整个战局，包括法国北部战役的成败，都是密切相关的。

布鲁克说，刚才伏罗希洛夫元帅讲到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困难。他想表示，英国人对红军的渡河作战颇为关心并极为钦佩。英国人认为，苏联在登陆战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要求有专门的工具，还要进行细致的研究。英美对与此战役有关的所有细节进行研究已经有好几年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法国的海岸坡度很小，并有大片浅滩，所以在许多地方船只很难靠近岸边。对所有这一切必须做好准备。

伏罗希洛夫说，英国人于8、9月间在英吉利海峡地区进行了演习。他想知道英国人对这些演习的结果评价如何。

布鲁克说，这些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挑起德国人进行空战，此外，这些演习对于训练部队很有益。当然，这不是登陆训练。登陆训练英国人正在英国海岸进行。

伏罗希洛夫问，德国人对这些演习的反应如何？

布鲁克回答，德国人对这些演习的反应没有达到英国人预料的那样程度。

马歇尔说，他应该对伏罗希洛夫元帅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发言提异议。他，马歇尔，学过陆地作战，他也懂得渡河作战。但是当他遇到渡海登陆的战役时，他不得不完全从头学起。如果说渡河时登陆部队的失败仅仅意味着一次不成功，那么渡海登陆时的失败就意味着灾难。

伏罗希洛夫说，他不同意这一点，在象“霸王”战役这样一次重要的战役中，关键的问题在于组织、计划和周密的战术。如果战术符合任务的要求，那么先头部队即使不成功，也只是不成功而已，而不会是灾难。空军应该取得制空权并击溃敌人的炮兵，先头部队只有在猛烈的炮击之后才能派出。在这些部队站稳脚根并取得成果之后，再开始主力部队的登陆。

马歇尔说，这里应该注意到，从海上进行炮火支援要比从河对岸进行支援复杂得多。

伏罗希洛夫同意这一点，并问道，进攻之前英美和德国之间空军力量的比例如何。

波特尔回答说，将是五比一或者是六比一。

伏罗希洛夫说，应该就这次会议要通过哪些决议达成协议。

布鲁克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并没有把所有的问题讨论完，所以他建议明天继续举行会议。

全体商定在11月30日举行会议，

会议进行了三小时。

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29日14点30分

会谈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4点45分
结束：当地时间大约15点30分
参加者：**美国**　罗斯福总统　波伦
　　苏联　斯大林元帅　别列日科夫

罗斯福说，首先他想交给斯大林元帅一些材料。他收到了一个在游击队里和铁托一起呆了六个星期的美国军官的报告。罗斯福说，他想让斯大林元帅看看这个报告，并请斯大林在阅后把报告还给他。接着，罗斯福递给斯大林一份关于在莫斯科会议上美国代表团要求给美国轰炸机提供基地，以便对德进行直接空袭的建议书。罗斯福说，他还想交给斯大林元帅关于准备使用苏联沿海地区的空军基地和准备在太平洋西北部进行海战的两份建议。

在交给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两份材料时，罗斯福说，当然，他认为这件事是绝密的，并且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守这个机密。罗斯福说，除了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其它事情他想同斯大林元帅讨论，比如最好能讨论一下将来世界体制问题。如果能在离开这里之前做完这些事情是很理想的。罗斯福说，必须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证战后持久和平的组织。正是为此目的，他，罗斯福，才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建议签订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宣言，因为中国对未来的世界将有重要意义。罗斯福补充道，他并不急于讨论这类组织的问题，但他如果能在离开这里之前做到这一点，他将感到高兴。

斯大林指出，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种讨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罗斯福说，他觉得，战争结束后，应该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将建立在联合国家的原则基础上，而且，它将处理的不是军事问题。它不应象国联那样。这个组织将由三十五个或者五十个联合国家组成，它将提出各种建议。除了提出建议以外，这个组织不应有任何别的权力。这个组织应在不同的地点而不应固定在一个地点开会。这样做会产生很大影响。罗斯福举例说，二十一个美洲国家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开两次会。

斯大林问，这是指的欧洲组织还是世界组织？

罗斯福回答，这应是个世界组织。

斯大林问，这个组织的执行机构由谁组成？

罗斯福回答，他记不清细节。但他认为执行委员会将由苏联、大不列颠、美国、中国、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国家、一个中东国家、一个亚洲国家（除中国外）和一个英属自治领组成。罗斯福说，丘吉尔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票——大不列颠一票，自治领一票。罗斯福接着说，这个执行委员会可以于最近召开会议，但是最好不要在日内瓦或其它类似的特殊的地点。这个执行委员会可以处理农业、粮食、经济问题，还有卫生问题。除了这个委员会，最好再有一个警察委员会，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也就是由一些国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德、日重新侵略。这将是第三个机构。

斯大林问，这个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其它国家是否必须遵守。如果某个国家拒绝执行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怎么办？

罗斯福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执行决议的国家从此将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表决。

斯大林问，执行委员会和警察委员会将是总的组织的一部分，还是独立机构？

罗斯福回答，这将是三个独立的机构。总组织将由三十五个联合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正如他说的由十个或十一个国家组成。警察委员会则只由四个国家组成。罗斯福接着说，他的意思是说，在出现侵略或其它某种破坏和平的危险时，必须有一个能够迅速行动的机构。因为到那时甚至在执行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里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讨论这样的问题。

斯大林指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带有强制性的机构。

罗斯福说，他想举个例子，当1935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不宣而战时，他，罗斯福，曾请求法国、英国封锁苏伊士运河，使意大利无法继续这场战争。可是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却把这个问题交给国联去解决。这样，就给意大利造成了继续侵略的机会。罗斯福现在建议的这个机构只由四个国家组成，它将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在类似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地做出关于封锁苏伊士运河的决定。

斯大林说，这个他理解。

罗斯福说，他很高兴能够让斯大林元帅了解他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还很笼统，还需要认真仔细地研究。他，罗斯福，想避免过去的错误，所以他认为建立这样三个机构是有益的：第一，要成立一个由四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第二，成立一个处理除军事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的执行委员会；第三，成立一个总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每个国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小国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斯大林说，他觉得，欧洲的小国对这样的组织是不会满意的。也许成立一个欧洲组织比较合适，这个组织最好有美、英、俄三国或者还有某一个欧洲国家参加。此外，再成立另一个组织，如远东组织，也许这样会好一些。斯大林说，他认为总统提出的格局本身是好的，但是否还是不要建立一个组织，而是建立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这样的话，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和

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和一个世界组织。斯大林说，他想听听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罗斯福说，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和丘吉尔的建议相吻合。区别仅在于，丘吉尔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组织，一个远东组织和一个美洲组织。但问题是美国不能成为欧洲组织的成员。罗斯辐说，只有象这场战争这样巨大的震动才能迫使美国派遣军队远渡重洋。如果不是日本在1941年进攻美国，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国会同意派美国部队到欧洲去。

斯大林问，如果建立了罗斯福提议的那种世界组织，美国就必须往欧洲派兵吗？

罗斯福说，这倒不一定。如有必要使用武力反对可能的侵略时，美国可以提供自己的飞机和船只，而往欧洲派兵的应该是英国和俄国。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的方法有两种。如果出现革命或侵略的危险，或其它类型的破坏和平的危险，那么当事国将被隔离，使那里的战火不致蔓延到别国领土。第二个方法就是组成委员会的四个国家可以向该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危及和平的行动，并指出，否则它将遭到轰炸，甚至被占领。

斯大林说，昨天午餐时，在罗斯福走后，他和丘吉尔谈到了维护未来的和平的问题。应该说，丘吉尔把这件事看得很容易，他认为德国不能很快恢复。斯大林说，他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德国能够很快地恢复起来。为此它只需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时间。斯大林担心，如果对德国不加任何控制，德国很快会东山再起。德国不需要很多年就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在1870年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在1871年结束的。这次战争之后仅仅过了四十二年，也就是在1914年，德国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二十一年之后，即1939年，德国又一次发动了战争。看來，德国为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正在缩短。这个时间今后显然还会缩短。不管我们给德国施加什么禁令，德国人都能够有办

法绕开它。我们禁止它生产飞机，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家具工厂。可是大家都知道，家具厂可以很快改为生产飞机。我们禁止德国生产炮弹和鱼雷，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钟表厂，而每个钟表厂都可以很快地转而生产炮弹和鱼雷的最重要部件。所以，德国可能东山再起，重新侵略，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让它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即将成立的这个机构应该有权占领重要战略据点。在出现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的危险时，应该立即占领这些据点，以便包围德国和日本，把它们打下去。最好能做出一项决定，使即将成立的组织有权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斯大林说，他的想法就是这些。

罗斯福回答，他百分之百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说，那就一切都有保障了。

罗斯福说，他能做到象斯大林元帅那样坚定。至于说到德国，那么，当然，德国人可以把自己的工厂转为军工生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如能采取坚决措施，那么德国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武装起来。他，罗斯福，讲过的四国委员会正是要对此负责。

斯大林说，现在就要举行向斯大林格勒赠送乔治六世宝剑的仪式。

罗斯福说，他知道这件事。罗斯福表示，他和斯大林元帅在会谈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
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会议

1943年11月29日

德黑兰

会议于16点开始，19点40分結束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6点

结束：当地时间19点15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霍普金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
哈里曼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莫洛托夫
莱希海军上将	迪尔陆军元帅	伏罗希洛夫元帅
马歇尔将军	布鲁克将军	巴甫洛夫
金海军上将	坎宁汉海军上将	别列日科夫
阿诺德将军	波特尔空军元帅	
迪安少将	伊斯梅中将	
罗亚尔上尉	马特尔中将	
韦尔上尉	伯尔斯少校	
波伦		

罗斯福　我不知道今天早晨军事会议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伏罗希洛夫元帅、布鲁克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把他们的工作跟我们谈一下。

斯大林 我同意，但是看來，军人的事情似乎没有做完。

丘吉尔 我想，听听军人的意见毕竟还是有益的。

布鲁克 我们今天的会议还没结束。首先我们研究了可能进行哪些战役和这些战役之间的联系。我们研究了“霸王”战役以及它所产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很重视从现在起到“霸王”战役开始前这段间隙时间。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在进行“霸王”战役前这段时间内在地中海不采取积极行动，那我们将使德国有可能把军队调到苏德战场或调到西方来对付“霸王”战役。我们分析了我们在意大利继续作战的可能性，在那里我们现在牵制着德军并集结了大量兵力。然后我们注意到东方的情况，研究了希望土耳其参战的问题，研究了对于帮助我们进行战争、打开经达达尼尔海峡向苏联提供物资和开辟通往巴尔干的道路将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研究了为了配合“霸王”战役在法国南部可能进行什么样的战役。英国空军参谋长综述了英美空军对德作战的情况及其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马歇尔将军报告了有关美军在英国集结的各种数字并谈到英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的准备情况。对“霸王”战役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伏罗希洛夫元帅提出了几个问题，就此我们尽力作了回答。同时伏罗希洛夫元帅阐述了昨天会上斯大林元帅已讲过的关于下一年应进行那些战役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在会上所讨论的大概情况。

也许，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发言要有所补充。

马歇尔 我对布鲁克将军所谈的没有多少要补充的，他介绍得相当详细了，对美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人力，而在于船只、专门登陆工具以及有没有距战区较近的空军基地。我说的登陆工具是指可以装载四十辆坦克或汽车的特种登陆艇。而恰恰是这些船只的数量有限。现在美国的军队、物资和弹药正按计划运往英国。已有一百万吨各种补给物资运到英国，但登陆工具仍然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我们英

国和美国都扩大了生产登陆工具的计划，加速生产登陆工具可以为横渡海峡和进行地中海战役提供更多的登陆工具。简言之，如就物力和人力来说，“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往按计划进行。问题主要是运输和登陆工具的分配问题。布鲁克将军说过，从意大利已调出几个师。

伏罗希洛夫 布鲁克和马歇尔两位将军的报告与我们今天早晨的谈话是一致的。我提出的问题是要了解“霸王”战役的技术准备情况，得到的回答就是马歇尔将军刚才所说的那些。我们没有打算明确规定“霸王”战役的日期以及与此次战役有关的全部细节。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下一次还要开会，这些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

斯大林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谁将被任命为“霸王”战役的总司令。

罗斯福 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

斯大林 那“霸王”战役将完全落空。谁对“霸王”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承担道义上和军事上的责任呢？如果这点都不明确，“霸王”战役只不过是一场空谈。

罗斯福 英国摩根将军负责“霸王”战役的準备工作。

斯大林 谁负责“霸王”战役的实施呢？

罗斯福 要参加实施“霸王”战役的全部人员，除总司令之外，我们都已明确了。

斯大林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摩根将军认为，已为战役作好了准备，但在任命负责实施这次战役的总司令之后，总司令可能认为并没有为战役作好准备。应该由一个人既负责战役的准备又负责战役的实施。

丘吉尔 委托了摩根将军负责战役的初步准备工作。

斯大林 是谁委托摩根将军的？

丘吉尔 这是几个月前由英美联合参谋部经总统和我同意委托给摩根将军的。摩根将军负责同美国和不列颠参谋部一起进行“霸王”

战役的准备，但总司令还没有任命。不列颠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在“霸王”战役中把自己的部队交给美国总司令指挥。因为美国负责军队的集结和补充并且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另一方面不列颠政府建议任命英国人为地中海战役的总司令。因为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数量占优势。总司令的任命问题不能在象今天这样大范围的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在三国政府首脑之间，在小范围内决定。正如总统刚才对我说的：任命总司令的问题将取决于我们在这里会谈的情况。对此我也表示同意。

斯大林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俄国人并不想参与任命总司令的事，但俄国人想知道，谁将是司令。俄国人希望尽快任命总司令，由他既负责“霸王”战役的准备，也负责“霸王”战役的实施。

丘吉尔 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过两星期我们将任命总司令并把他的姓名通知你们。我想，总统会同意我的意见。会议的任务之一就是任命总司令。

斯大林 对布鲁克和马歇尔的发言，我没有什么问题。

丘吉尔 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复杂，我为此感到有些不安，这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会议，千百万人对这次会议满怀希望，举世为之瞩目。我非常希望，只要我们不就委托我们解决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就不离开。今天我打算指出几个要在小组委员会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地中海拥有相当大的一支军队，我和英国参谋部对那里的局势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我们希望这支军队全年都在那里积极作战，而不受那些可能会使它们无所事事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俄国盟友研究这个问题的全部情况和我们向他们提出的使我们在地中海的现有兵力发挥最大作用的各种方案。

有三个必须仔细研究的问题。

第一个当然是利用地中海地区的兵力能够给“霸王”战役提供什

么援助的问题。这里指的是从意大利北部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应有多大规模的问题。昨天我和总统都谈到这点，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得很充分并可做出最后决定了。我欢迎我们的参谋部从问题的紧迫性这个角度去研究它。这里，斯大林元帅正确地强调了法国南部迂回战的重要性。日期问题事关重要。如果在一个地方开始战役时兵力少，而在第二个地方兵力较多，那么第一个战役将会遭到失败。我们的参谋部应对战役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我希望地中海有足够运送两个师的登陆工具。有这两个师的兵力我们就可以帮助英美军队沿意大利半岛向前推进，消灭那里的敌军。还有另一种利用这些兵力的可能性，如土耳其参战，这支兵力足以占领罗得岛。利用这些兵力的第三种可能性是，这些兵力虽遭到一些伤亡，还可以在六个月之后在法国南部支援“霸王”战役。这三种可能性任何一种都不能排除。但时间问题很重要。在地中海地区把这两个师用于我上面谈到的三个战役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霸王”战役延期或者要从印度洋调出部分登陆工具。二者必居其一。为了决定我们作何选择，我们想知道斯大林元帅对整个战略形势的看法，因为我们俄国盟友的作战经验使我们不胜钦佩和倍受鼓舞。我提议，军事委员会明天继续研究我提出的问题。

我想谈的下一个问题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因为我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打算抽出的兵力并不多。我指的是巴尔干问题。在巴尔干有二十一个德国师，此外还有卫戍部队。在这二十一个师中，有五万四千人集结在爱琴海诸岛。此外在巴尔干至少还有十二个保加利亚师。敌人在巴尔干总共有四十二个师。如土耳其参战，保加利亚人将被迫把军队调往色雷斯战场来对付土耳其，这势必加重对盘踞在巴尔干半岛的德军的威胁。我列举这些数字是为了证明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不打算往巴尔干半岛调正规师，而仅限于由混合部队进行一些骚扰。我们在巴尔干既不谋求什么利益，也没有任何沽名钓誉的野心。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把二十一个德国师牵

制在巴尔干，并尽可能消灭他们。所以我建议，今天两国外长和总统指定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力求同我们的俄国盟友齐心协力。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在小范围内加以澄清，军事问题可以稍晚些讨论。

我谈下一个问题，即土耳其问题。我们英国人是土耳其的盟友，我们承担了责任要努力说服或迫使土耳其在圣诞节前参战。如果总统希望参加进来或是愿意起领导作用，我们也认为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现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决议方面，需要斯大林元帅的充分支持。我可以代表不列颠政府表示，英国政府准备警告土耳其：如果土耳其不接受参战的建议，这对土耳其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并影响到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今天早晨由将军们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从军事角度讨论了土耳其问题，但土耳其问题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土耳其参战时，我们想派往这个地区的兵力除空军外不超过二至三个师。

我提出的几个问题主要的是政治问题，例如，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什么想法，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在土耳其对德宣战，而保加利亚进攻土耳其时，对保加利亚人宣布，苏联政府认为保加利亚是自己的敌人。这将对保加利亚产生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问题。我建议，两国外长和总统指定的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就迫使土耳其参战和由此会产生什么后果向我们提出建议。在我看来，效果将是巨大的，而机会是决定性的。如土耳其对德国宣战，这将是对德国人的沉重打击。如我们能很好利用这个机会，就能使保加利亚中立。至于谈到巴尔干其他国家，那么罗马尼亚已经在考虑它可以向哪个国家投降了。匈牙利同样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到我们收获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认为合适，现在就是我们为收获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提议，由三国代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可以在讨论后告诉我们，为减轻俄国的负担和保证“霸王”战役的胜利可以做些什么。

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想抽出两个师来支援土耳其和游击队，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我们认为为两个师提供经费并支援游击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讨论军事问题，那么我们认为“霸王”战役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问题。

我希望军事委员会要有明确的任务，我建议给这个委员会提出明确的指示，以便它可遵循这个指示进行工作。当然，俄国人需要帮助。我想声明，如果说要帮助我们，那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人应该实施預定的战役，我们希望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应给军事委员会做出哪些指示呢？这些指示应规定“霸王”战役的日期不得拖延，5月份为实施“霸王”战役的最后期限。第二点指示按俄国人的愿望应规定，要在法国南部登陆以支援“霸王”战役。如不能在“霸王”战役开始前二至三个月在法国南部登陆，则与“霸王”战役同时进行亦无不可。如运输上的困难使法国南部的登陆不能与“霸王”战役同时进行，那么法国南部的这次战役可以在“霸王”战役开始后稍晚些再进行。我认为，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对于“霸王”战役来说，是一次辅助性的战役。这次战役将会保障“霸王”战役的成功，而占领罗马的战役只是一次牵制性的战役。第三点指示是责成委员会要抓紧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这些问题最好在我们在此开会期间内解决。我看没有什么原因使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只要不任命总司令，“霸王”战役就休想能获得成功。任命总司令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任务，不过俄国人想知道，谁将是总司令。这就是对军事委员会的三点指示。如果委员会遵循这些指示进行工作，它的工作就会卓有成效并可尽快结束。我希望会议考虑我谈的这些意见。

罗斯福 我很感兴趣地听了大家的全部发言，从“霸王”战役一直到土耳其问题。我认为期限的问题十分重要。如果同意进行“霸王”战役，那么就需要商定这一战役的日期。

“霸王”战役可以在5月份第一周或稍晚些进行。“霸王”战役可能因为我们在地中海进行一两次需要登陆工具和飞机的战役而延期。如果在地中海东部发动进攻而进展不利，就必须往那里增派物资和军队。这样“霸王”战役就不能按期实施。

斯大林 德国用八个师对付南斯拉夫，其中五个师在希腊，在保加利亚有三至四个德国师，在意大利有九个德国师。

丘吉尔 我们的数字和这个有出入。

斯大林 你们的数字不正确。德国人在法国有二十五个师。

罗斯福 我们的参谋部应制定在巴尔干牵制德军的计划。制定计划时，要使我们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不致影响“霸王”战役。

斯大林 对。

丘吉尔 说到要在巴尔干采取措施，并不是要为此使用大量兵力。

斯大林 如有可能，最好在5月内实行“霸王”计划，譬如说5月10、15、20日。

丘吉尔 我不能作这样的保证。

斯大林 如象昨天丘吉尔所说，在8月份进行“霸王”战役，那么由于这段时间的天气不好，这次战役就会完全落空。4月和5月是进行“霸王”战役最合适的月份。

丘吉尔 我觉得，我们之间观点分歧不象乍看起来那么大。我准备做到英国政府力所能及的一切，使“霸王”战役尽可能早日实施。地中海有很多机会，利用这些机会可能使“霸王”战役的实施推迟二—三个月，我不认为因此就得把这些机会当作毫无意义的东西忍心抛弃。

斯大林 丘吉尔谈的地中海地区的行动只是一些骚扰性的活动，我不否认这种骚扰有它的意义。

丘吉尔 我们认为，人数众多的英国军队不应在六个月内无所事事，他们应对敌人进行战斗。我们还希望在美国盟军的帮助下把在意

大利的德军消灭掉。我们不能在意大利处于消极状态，因为这样会破坏我们在那里的整个战局。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俄国朋友。

斯大林 按照丘吉尔的说法，那俄国人是要求英国人无所事事啰。

丘吉尔 如果从地中海地区调走船只，这个地区作战的规模势必大大縮小。斯大林元帅会记得莫斯科会议上曾经指出过“霸王”战役获得胜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到发动进攻时在法国的德军机动师不超过十二个，在六十天内德国调往法国的增援部队不超过十五个师。这里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这些条件是“霸王”战役的基础。我们应在意大利、巴尔干和土耳其地区（如土耳其参战的话）牵制尽可能多的德军。意大利战场上同我们作战的德国师是从法国调来的。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战场上表现消极，德国可以重新把军队调到法国破坏“霸王”战役，所以我们必须以战斗來捆住敌人手脚，使我们在意大利战场上保持积极状态，从而在那里牵制住相当数量的德国师。

至于土耳其，我同意坚持要它参战，如果它不愿意这样做，那也没有办法。如果土耳其同意，就要利用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的空军基地占领罗得岛。这个行动有一个突击师就够了。之后，这个岛可由驻扎在岛上的卫戍部队防守。获得罗得岛和土耳其基地之后，我们可以把爱琴海其他岛屿上的德国驻军赶走并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这并不是需要大量部队的战役，而是一个有限的战役。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又占据罗得岛，这就能保证我们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到时候爱琴海全部岛屿都将属于我们。如果土耳其不参战，我们也不必为此忧虑，我也不必要求抽调部队去占领罗得岛和爱琴海诸岛了。不过这样德国倒也不会忧虑，因为它将继续保持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在埃及的防务部队以及同样为保卫埃及而驻在那里的空军即可向前推进。在占领爱琴海诸岛后可以利用上述兵力在埃及以北地区发挥作用。我建议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从德国将在这个地区保持优势这点来看，土耳其不参战，会使我们遭受极大的不幸。我希望，使现

在在埃及无所事事的军队和飞机在土耳其参战后能尽快发挥作用。这一切取决于登陆工具。困难就在于从海上运送部队。我随时准备同盟国讨论所有的细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登陆工具的数量。如果这些登陆工具留在地中海地区或印度洋而不用于“霸王”战役，那就无法保障“霸王”战役和法国南部战役的成功，而法国南部战役是需要大量登陆工具的。我希望考虑到这一点。

最后，我认为，为军事委员会做出指示是可行的并代表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我建议由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提出自己关于对委员会的指示的建议。我想，我们的观点多少是一致的。

斯大林 我们打算在德黑兰呆多久？

丘吉尔 这些指示不拟定好，我就不准备吃饭。

斯大林 我是说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会议。

罗斯福 斯大林元帅在德黑兰呆多久，我就准备呆多久。

丘吉尔 如果有必要，我准备永远留在德黑兰。

斯大林 我想问问，现在有多少个法国师？

罗斯福 预计装备十一个法国师，但现在只装备好五个，最近还要装备四个。

斯大林 这些法国师在作战还是无所事事？

罗斯福 一个师在意大利作战，一个或两个师在科西加岛和萨丁岛。

斯大林 盟军司令部打算怎样利用这些法国师？

马歇尔 计划把法国兵团编入在意大利战线左翼作战的第五军，现在有一个师正在调往意大利战场的途中，它将在那里经受战斗考验。此后将解决如何更好地利用法国师的问题。再装备四个法国师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训练这些师的人员所需的时间。

斯大林 这些师是按照法国编制组成的吗？

马歇尔 这些师是按美国编制组成的，每师一万五千人。大部分

士兵是法国人，坦克装甲师四分之三的人员是法国人，其余是非洲人。

罗斯福 我想说几句。依我看，如果我们三人给军事委员会做出指示，那么军事委员会可以讨论所有问题。

斯大林 不需要任何军事委员会。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会上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应决定日期、总司令的问题和法国南部辅助战役是否必要的问题。我们俄国人呆在德黑兰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在这儿呆到12月1日，但2日我们就应起程，总统还记得，我们同他商定好的时间是三至四天。

罗斯福 我想，我提一个可以简化军事人员工作的建议。军事委员会应把“霸王”计划作为基础，委员会应就地中海地区的辅助战役提出自己的建议。委员会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些战役可能会拖延“霸王”战役的实施。

斯大林 俄国人想知道“霸王”战役的开始日期，以便自己作好打击德寇的准备。

罗斯福 “霸王”战役的日期已在魁北克确定，只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才能改变这次战役的预定日期。

丘吉尔 我刚才听了总统建议给委员会下的指示，我希望能好好考虑一下总统的建议。我认为在这问题上没有原则分歧，不过我希望能有时间研究一下总统的建议。我很乐意在德黑兰呆到12月1日，2日起程。我不清楚，总统是否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因为斯大林元帅提出可以不要委员会，我本人主张成立这样的委员会。

至于确定“霸王”战役的日期，如果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上要研究究战略问题……

斯大林 我们不要求进行任何研究。

罗斯福 我们都知道，我们同英国人之间的分歧不大。我反对推迟“霸王”战役，而丘吉尔先生更多地强调地中海战役的重要性。军事委员会可以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斯大林 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比军事委员会权力更大。如果可以提一个冒昧的问题，那么我想问问英国人，他们对“霸王”战役究竟有没有信心？还是只不过是为了安慰俄国人说说而已？

丘吉尔 如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条件都能具备，那我才坚信，我们应当在“霸王”战役开始实施时，投入一切可能的兵力来对德作战。

罗斯福 现在我们都很饿了，所以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持我们的午宴。我提议，明天早晨军事委员会继续开会。

斯大林 没有必要召开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这是多余的。军人们的会议不能加速我们的工作，能加速我们工作的只有我们自己。

丘吉尔 也许最好是我跟总统先协调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把我们的共同观点向您报告？

斯大林 这可以加速我们的工作。

丘吉尔 关于由霍普金斯和二位外长组成委员会的事怎么样？

斯大林 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必要，但如果丘吉尔先生坚持，我们也不反对成立。

罗斯福 明天早餐时霍普金斯、莫洛托夫和艾登可以进行商谈。

斯大林 明天我们做什么？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方案能够准备好吗？

罗斯福 我们的方案能准备好，我建议明天我、丘吉尔和斯大林元帅一点半一起吃午饭，同时讨论所有问题。

丘吉尔 这就是我们明天的日程。

斯大林 同意。

斯大林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

1943年11月30日12点40分

会谈地点：？

开始：当地时间12点40分

结束：大约13点30分

参加者：

大不列颠	苏联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伯尔斯少校	别列日科夫〔？〕[①]

丘吉尔说，他首先想说明他从母系來讲是半个美国人。

斯大林说，这个他听说过。

丘吉尔继续说，他对美国人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不要以为他说下面这些话是想要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是完全忠于美国人的。不过，有些事还是两个人单独谈谈更好。首先他，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在地中海英国的兵力大大超过美国。他估计，英国在地中海的兵力是美国的三至四倍。丘吉尔说，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斯大林元帅了解，为什么丘吉尔如此关心地中海的局势，不愿意这支庞大的不列颠军队无所事事。他，丘吉尔，希望英国的军队在整个这场战争期间经常不断地同敌人作战。在意大利有十三或十四个英国师，九或十个德国师。那里有两个军：一个是美国第五军，其中一半是英国军队，另一个是第八军，全都是由英军组成的。丘吉尔声明，他谈这

———————————————

① 记录原文如此。——本书制作者注

些，目的是要斯大林元帅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地中海战场。目前的情况是不得不在确保“霸王”战役的日期和进行地中海战役之间进行选择。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美国人希望英国人明年3月在孟加拉湾登陆。他，丘吉尔，对此战役并不十分赞成，当然，如果英国人有足够的登陆工具既可以在孟加拉湾又可以在地中海进行战役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他，丘吉尔，既可以按期实施“霸王”战役，又能在地中海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问题不仅是要在地中海战役和“霸王”战役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还要在进行孟加拉湾战役和确保“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进行选择。丘吉尔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斯大林元帅从上几次有美国人在场的会谈中当然不可能了解到这些情况。丘吉尔说，但他认为，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会有足够的进行所有战役所需的登陆工具。美国人坚持要按期实施"霸王”战役，因此，近两个月来地中海战场的战役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英军特别感到失望的是从地中海地区撤走七个师。英国人已派遣自己的三个有作战经验的师去参加“霸王”战役。美国人也要在最近派四个师。这正是英美之所以没能充分利用意大利崩溃形势的原因。

丘吉尔继续说，英国人同时也在为“霸王”战役作准备。然后丘吉尔转到指挥问题，他说，任命总司令非常重要，这点他完全同意。8月份以前，英国人认为“霸王”战役将由英国军官指挥，但总统在魁北克提出希望另作考虑，即由美国军官指挥“霸王”战役，而让英国军官指挥地中海战役。丘吉尔说，他同意了。因为甚至在“霸王”战役一开始，美国人在数量上就会占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往后会越来越大。而在地中海战场，英国的军队占多数，英国人对这一地区的战役也更为关切。所以丘吉尔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现在只剩下任命总司令了。

斯大林问是否应理解为将任命一位英国司令官来代替艾森豪威尔？

丘吉尔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只要美国人一任命自己的总司令，他也任命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总司令。美国总司令迟迟不能任命是与某些国内问题有关，而且和美国某些高级人士有关。但丘吉尔表示在这次会议参加者分手之前就有希望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丘吉尔还说，这次战役的时间在我们离开之前显然能够商妥。

接着丘吉尔说，他想谈谈登陆艇的问题。这是一个薄弱环节。英美就是调走七个师以后，在地中海地区的军队还有很多。5月份在联合王国将有大量的英美军队。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全在于登陆工具问题。丘吉尔说，他想向斯大林元帅说明一下英国人和美国人争执的问题。丘吉尔说，斯大林元帅可能会认为他，丘吉尔，对“霸王”战役不够重视。其实不是这样。问题是他，丘吉尔，了解，他既能确保“霸王”战役按期开始，也能够获得在地中海所必需的登陆工具。在开罗时，他曾指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这种保证。但很遗憾，蒋介石委员长在那里，几乎全部时间都是谈论中国的事。不过丘吉尔深信，可以为所有的战役弄到足够的登陆工具。

丘吉尔接着说，他想就“霸王”战役说几句话。在确定的日期以前英国人会作好准备的。到那时，英国人将有十六个师。加上集团军、运输部队、防空部队及其它兵种共计近五十万人。这是不列颠的精锐部队，其中包括从地中海地区调来的几个有作战经验的师。此外，不列颠海军将保证提供必要的支援。最后，不列颠空军还有四千架第一线飞机准备投入战斗。并且，现在已开始调遣美国军队。在这以前美国人调运的主要是空军和补给，但在今后四至五个月内，每月将调运十五万人，这样，到5月份总数将达六十万——八十万人。由于德国的潜艇正在受到打击，所以我们能够完成这些调动。

丘吉尔接着说，他对在“霸王”战役开始时，或稍前或稍后，从法国南部登陆持十分积极的态度。他在意大利有足够的兵力既能进行这次战役，又能同时牵制住那里的德国人，从地中海地区现有的二十

二——二十三个师中抽调足够的兵力去法国，其余的师将在意大利坚持战斗。

接着丘吉尔说，他想再谈谈即将在意大利进行的战斗。在罗马以南的东部战线是由第五军和第八军组成的第十五集团军，是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现在在意大利共有五十万人，即英美十三——十四个师，德国九——十个师。现在是雨季，河水泛滥，很多桥梁被冲垮。尽管如此，英国人仍打算在12月份对敌人发动进攻。蒙哥马利的军队将在意大利西岸、现在战线以北的地区登陆，进行迂回运动。

斯大林问，是否要迂回包围罗马？

丘吉尔回答，是。

接着丘吉尔说，与此同时，在战线西南部向德军阵地施加压力，而在意大利西岸，目前战线以北的地区，在台伯河口一带进行大规模登陆。所有这些战役结束时应包围住在此地区作战的全部德军。这将是一次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如此次战役成功，这将不仅是德军的失败，而且是它的灭亡。德军目前已陷入困境，因为英美军队断绝了德军的交通线，使德国不能给自己的部队运送足够的补给。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就在于此，而不在于占领罗马。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可以使英美向北推进，直逼亚平宁山。

丘吉尔说，他反对进入意大利的开阔地带。他想把战场设在狭窄地区，这样既可以牵制德军，又可将腾出的兵力调往法国南部实行登陆。

丘吉尔问，斯大林元帅对他刚才所谈的一切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还有什么其它方面的问题。

斯大林说，他应告诉丘吉尔，红军寄希望于法国北部的登陆能够实现。他担心，如果5月份不进行这次战役，那么这个战役就算吹了。因为几个月之后天气转坏，无法给登陆部队输送必要的补给。斯大林必须事先声明，如果这次战役不进行，这将使人大失所望并产生很不

好的情绪。他担心，不进行这次战役可能会引起很不好的孤立感。所以他很想知道，“霸王”战役究竟打不打。如果打，那很好。如果不打，他想事先知道，以便防止由于不进行这次战役可能产生的情绪，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丘吉尔回答，这次战役当然要打，但要在敌人的兵力不超过那时英美的兵力的情况下才能打。比如说，德国人如能往法国调三十或四十个师，那他，丘吉尔，认为登陆不可能成功。他对登陆本身并不担心，但他担心的是过三十——四十天后会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说，一旦在法国北部登陆，红军这方面马上就转入进攻。如果要知道战役将在5月或6月进行，那么俄国人就可以准备给敌人不是一次，而是几次打击。斯大林说，春季是最合适的时机。4月份战场上一般都有间歇，部队可以休整。可以运送弹药，并且在法国北部开始登陆之前打击德寇，使他们不能把部队调往法国。现在的情况则是德国人正在把自己的部队调往东部战场，并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向德国边境推进。德国人懂得，他们和我们之间既没有海峡，也没有大海，从东面可以逼近德国。而在西面，德国人知道，他们有海峡保护，还要通过法国领土才能逼近德国，德国人是不会往西线调兵的，特别是如果红军将发动进攻的话。而红军如得到盟军“霸王”战役的援助，是一定要进攻的。

斯大林说，他还是希望丘吉尔告诉他“霸王”战役开始的日期。

丘吉尔回答，对此他现在还不能作答复，因为他正打算等进早餐时同总统谈谈这个问题。丘吉尔接着说，他想交给斯大林元帅一张说明南斯拉夫局势的地图，可能斯大林元帅想要把自己掌握的材料跟这张地图进行核对。

丘吉尔把南斯拉夫地图交给斯大林。

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

午 餐 时 的 会 谈

1943 年 11 月 30 日 13 点 40 分

会谈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 13 点 30 分

结束：？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波伦	伯尔斯少校	别列日科夫（？）

罗斯福说，他想告诉斯大林元帅一个好消息。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参加下，联合参谋部今天通过了下列决议：

“霸王”战役定于 1944 年 5 月进行，并将得到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的配合。这次辅助战役的兵力大小视当时登陆工具的数量而定。

斯大林说，他对这个决定很满意。

丘吉尔指出，战役开始的确切日期显然要取决于月相。

斯大林说，他当然不要求告诉他准确的日期。而在 5 月份内当然需要有一周或两周作为机动。

罗斯福说，据现在判断，最合适的日期是从 5 月 15 日到 20 日这段时间。

斯大林说，他想告诉丘吉尔和罗斯福，往法国登陆战役开始时俄国人将准备好给德寇以沉重打击。

罗斯福说，这很好。因为这可以使德国人不能把部队调往西面。

丘吉尔说，英国正在为“霸王”战役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如果时间允许，他想找时间把这一准备工作的一些细节告诉斯大林元帅。比如说，为登陆部队运送燃料就是个相当大的问题。英国有一种特殊的空心缆绳可以拉开铺设在海底，用这种管状空心缆绳可以把燃料输送到对岸。

斯大林指出，这是输送燃料的好办法，一定会大大减轻困难。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
政府首脑会议第三次会议

1943年11月30日

德黑兰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6点

结束：当地时间18点15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霍普金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哈里曼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伏罗希洛夫元帅
莱希海军上将	迪尔陆军元帅	巴甫洛夫
马歇尔将军	布鲁克将军	别列日科夫
金海军上将	坎宁汉海军上将	
阿诺德将军	波特尔空军元帅	
迪安少将	伊斯梅中将	
罗亚尔上尉	马特尔中将	
韦尔上尉	伯尔斯少校	
波伦		

罗斯福　英国和美国参谋部的决定已通知了斯大林元帅，他对此决定表示满意。如果斯大林元帅不反对，我希望布鲁克将军就这项决定向会议提出报告。

斯大林 同意。

丘吉尔 布鲁克将军的这个发言既代表美国人也代表英国人。

布鲁克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们建议总统和首相通知斯大林元帅："霸王"计划于5月份开始实施。它将得到进攻法国南部战役的支援，法国南部作战的规模将取决于那时的登陆艇的数量。

丘吉尔 不言而喻，英美联合参谋部当然要和斯大林元帅保持密切接触，从而使所有盟国的行动协调一致，使敌人在同一时间内腹背受敌

斯大林 我了解盟军参谋部这些决定的重要性和执行这些决定的困难。可能危险不在于"霸王"战役的开始，而在这个战役的发展阶段。那时，德国人将企图把部分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阻止"霸王"的行动。为了使德国人不能调配预备队和把相当数量的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俄国人保证将于5月前在某些地段组织大规模进攻，以便把德军牵制在东线，使其不能给"霸王"战役造成任何困难。今天我已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声明过这一点。不过我想向会议再次重申。

罗斯福 我十分满意斯大林元帅将采取措施协同打击敌人的声明。我希望，我们这些国家，现在都懂得了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我们三国即将进行的战役将表明：我们已经学会了一致行动。

美国还没有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但我相信，在最近三、四天内，一俟我们返回开罗即可任命总司令。

我仅提议，我们的参谋部应毫不迟延地着手研究在这里通过的提案。所以，我想，如果斯大林元帅没有反对意见的话，我们的军事人员明天就可以返回开罗。

斯大林 我同意这个意见。

丘吉尔 我认为，今天我们通过了一项重大的决定。现在，总统、我以及我们的参谋部应该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并解决应从哪里得到所

需要的登陆艇。我们前面还有5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我们能够弄到所需数量的登陆艇。我已布置研究这个问题，一俟军事人员返回，就立刻提出详细报告。为使“霸王”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应具备相当优势的兵力。我希望，我们的参谋部是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到5月底，我们就已经处于与敌人艰苦激战之中。我看，我们已经结束了军事问题的讨论。现在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了。我们可以利用12月1日、2日做这件事，3日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能在分手之前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告诉舆论界，我们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那就好了，我相信，如果斯大林元帅同意留下的话，总统也能象我一样，留到12月3日。

斯大林　同意。

罗斯福　我很高兴听到斯大林元帅同意再留一天。我还想谈谈关于公报的事情：也许，我们的军事人员能够向我们提出公报草案。

斯大林　是与军事问题有关的那一部分。

丘吉尔　当然是这样。公报应该简短而又难以捉摸。

斯大林　但不要有神秘气味。

丘吉尔　我相信，敌人很快就能发现我们的准备行动，因为他们可能根据我们的列车大量聚集和港口运输繁忙等情况发现这一点。

斯大林　一次大的战役在口袋里是藏不住的。

丘吉尔　应该让我们的军事人员设法制造假象，掩护准备工作，迷惑敌人。

斯大林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坦克和飞机模型，修建假机场，来蒙骗敌人。然后用拖拉机带动这些模型，敌人得到关于这些调动的情报，就会以为我们要在这个地区准备进攻。而在真正准备发起进攻的地区，却是一片沉寂。全部运输工作都在夜间进行。我们在有些地区内制造的坦克模型达五千——八千个，飞机模型达两千个，还有大量的假机场。此外，我们还利用无线电来迷惑敌人。在不准备发动进

攻的地区，进行电台呼唤。敌人测出这些电台就以为这里有大部队集结。敌机往往日以继夜地轰炸这些实际上完全空旷无人的地区。

丘吉尔　真象要用假象来掩护。无论如何将要采取各种措施来迷惑敌人。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
政府首脑会议第四次会议

1943年12月1日

德黑兰

1.午餐时的会议

会议13点开始，
15点结束。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3点
结束：当地时间大约15点2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霍普金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哈里曼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巴甫洛夫或别列日科夫
波伦	伯尔斯少校	

霍普金斯　请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与土耳其能够从大不列颠和美国方面得到什么援助的问题是相联系的。此外，必须使土耳其的参战同整个战略协调起来。

罗斯福　换句话说，伊诺努将会问我们，我们是否支持土耳其。我想，这个问题还需要再研究。

斯大林　丘吉尔说过，不列颠政府要给土耳其提供二十至三十个

航空大队和二至三个师的援助。

丘吉尔 我们没有同意过提供二至三个师。在埃及我们现有十七个航空大队，它们现在不归英美联军司令部使用。如果土耳其参战，这些航空大队可用于它的防务。此外，英国同意给土耳其提供三个防空团，这就是英国人答应给土耳其的全部东西。英国人没有答应给土耳其提供部队。土耳其现有五十个师，土耳其人很能打仗，但他们没有现代化武器。至于斯大林元帅提到的二至三个师，是不列颠政府准备在土耳其参战时，为占领爱琴海诸岛用的，不是援助土耳其。

罗斯福 （对丘吉尔说）进攻罗得岛的战役的确需要大量登陆艇吗？

丘吉尔 这次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不超过地中海现有的登陆艇的数量。

罗斯福 我的困难是，美国参谋部还没有研究进行意大利战役、在英国准备“霸王”战役以及印度洋作战所需登陆艇的数量问题。因此，在向土耳其做出许诺方面，我不得不持慎重态度。我担心，这些许诺是否会影响执行我们昨天达成的协议。

斯大林 土耳其除了参战之外，还要为盟国空军提供基地。

丘吉尔 当然。

斯大林 我看，这个问题可以结束了。

丘吉尔 我们并没有提出给予任何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我们提出给土耳其三个新編的歼击机航空大队，这样，航空大队总数包括在埃及的达到二十个。也许，美国人还能补充一些。我们答应向土耳其提供防空部队，但没有答应派遣任何陆军部队，因为我们没有。至于登陆艇要到3月份才使用，我估计，我们在占领罗马到开始“霸王”战役这段时间内能够弄到。

罗斯福 我想和军事人员商量一下。我希望丘吉尔是正确的。不过，我的顾问们说，在拿下罗马到开始实施“霸王”战役这段时间内，

使用登陆艇可能会遇到困难。他们认为，“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必须要在4月1日以前备齐。

丘吉尔　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我们还没有向土耳其提出过任何建议，我也不知道伊诺努是否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伊诺努将去开罗了解时局。我可以向土耳其人提供二十个航空大队，任何陆军部队我都不给土耳其人，而且，我想他们也不需要部队。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伊诺努是否到开罗去。

斯大林　伊诺努不会生病吧？

丘吉尔　他很容易生病。如果伊诺努不同意到开罗同我和总统会见，那我准备乘巡洋舰去阿达纳与他会晤。伊诺努到达那里之后，我要向他描绘，土耳其人不同意参战时会面临怎样不愉快的前景，而同意参战时会面临怎样愉快的前景。那时我将把和伊诺努会谈的结果通知诸位。

霍普金斯　美国军事人员没有讨论过在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问题。因此，我怀疑在军事人员没有研究好这个问题之前，邀请伊诺努到开罗是否合适。

斯大林　这么说，霍普金斯建议不邀请伊诺努。

霍普金斯　我并不是建议不邀请伊诺努，但我强调的是，预先了解我们能给土耳其提供什么援助是有益的。

丘吉尔　我同意霍普金斯的意见，我们应就可能给土耳其提供什么援助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斯大林　没有军人参加，就解决不了吗？

丘吉尔　我们应该和军事人员一起研究登陆艇的问题。通过从印度洋或者大平洋抽调，或者新建，也许会得到比我们现在预计的更多的登陆艇。如果这不可能，就要有所放弃。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霸王”战役不应受到影响。

罗斯福　丘吉尔提出了可能从太平洋抽调登陆艇的问题。因此，

我想在这里扼要地谈一谈太平洋的局势是有好处的。我要着重指出：第一，从太平洋到地中海距离十分遥远；第二，为了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我们正在太平洋向北移动，因此，我们在这个地区需要登陆艇。

霍普金斯　丘吉尔和艾登没有和土耳其人谈过占领爱琴海诸岛的问题吗？

艾登　没有，我没有谈过。我只是要求土耳其人提供空军基地，没有涉及登陆艇的问题。

罗斯福　如果我见到土耳其总统的话，我将向他提议，让我们占领克里特和多德卡尼诸岛，因为这些岛屿离土耳其非常近。

丘吉尔　我想得到土耳其人在伊斯密尔地区的空军基地，这是英国帮助他们修建的。一旦有了这些基地，我们就能把德国空军从那些岛上驱逐出去。为此目的，我们准备每消灭一架德机，就损失一架自己的飞机。倘若我们能在该地区保证我们的空中优势，就一定能把在那些岛上驻防的德军赶走。完全没有必要去攻占罗得岛。那里有八千意大利人和五千德国人，可以把他们困死在岛上。如我们在土耳其得到基地，我们的舰队就能在空军的协助下切断德军交通线，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斯大林　说得对，我看，在开罗的二十个航空大队现在毫无作为，如果它们行动起来，那么德国空军就会被消灭干淨。不过，要给歼击机大队补充一定数量的轰炸机。

罗斯福　我同意丘吉尔为土耳其防务提供二十个航空大队和一定数量轰炸机的建议。

丘吉尔　我们给土耳其提供有限的空中掩护和防空部队。现在正值冬季，入侵土耳其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继续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土耳其得到的大部分是美国武器。现在，我们给土耳其一个极宝贵的机会：接受苏联政府关于参加和会的邀请。

斯大林　土耳其缺少什么武器？

丘吉尔　土耳其人有步枪，大炮也不坏，但没有反坦克炮，没有空军和坦克。我们在土耳其开办了一些军事学校，但土耳其人去学习的并不多。土耳其人没有使用无线电设备的经验。不过他们很能打仗。

斯大林　如果土耳其给盟军提供机场，那么保加利亚就完全可能不会进攻土耳其，而德国人却要提防土耳其的进攻。土耳其不会去打德国人，只不过与他们处于战争状态。盟国却能从土耳其得到机场和港口。如果事态这样发展，那也不错。

斯大林也问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苏联给什么其它的支援。

首相回答说，对苏联没有其他要求。可是如果苏联军队到达保加利亚，则保加利亚的亲德势力，显然会惊恐万状。

艾登　我已经告诉土耳其人，他们可以给盟军提供空军基地而不打仗，因为德国不会进攻土耳其。

罗斯福　在这方面，土耳其可以葡萄牙为先例。

戈登　努曼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德国一定会作出反应的，土耳其宁可自愿参战，而不愿被迫卷入。

丘吉尔　这话说得对，但我想告诉你们：当您要求土耳其为我们提供空军基地而继续保持中立时，土耳其人回答说，他们宁愿打一场认真的战争，但当您要他们参加一场认真的战争时，他们又回答说，没有打仗的武器。如果土耳其人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应该对其阐明严肃立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将不能参加和会。至于说到英国，我们这方面要说，对土耳其人的事我们并不感兴趣。此外，我们将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武器。

艾登　我想明确一下，在开罗我们应向土耳其提出哪些要求。我理解，我们应要求土耳其人对德国作战。

斯大林　对，就是要对德国作战。

2.圆 桌 会 议

会议16点开始，
19点40分結束。

会议地点：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开始：当地时间18点

结束：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霍普金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哈里曼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巴甫洛夫
波伦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　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讨论波兰问题、德国问题。

斯大林　还有公报问题。

罗斯福　公报已在起草。

莫洛托夫　关于把部分意大利商船和军舰转交给我们的问题现在能否给我们答复。

罗斯福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意大利船只，我认为这些船只暂时应由各联合国家使用，而且，要充分利用，等到战后再在各联合国家间分配。

莫洛托夫　如果这些船只不能归我们所有，我们就要求给我们暂时使用。我们使用这些船只也是为了盟国和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

斯大林　如果土耳其不参战，交给我们的意大利船只就无法进入黑海，那我们就想把它们开进北海。我们知道，大不列颠和美国都需

要船舰，但我们所求不多。

丘吉尔　我同意。

罗斯福　我也同意。

丘吉尔　我希望这些舰只在黑海。

斯大林　我们也宁愿它们在黑海。

丘吉尔　是不是可以让英国船和交给苏联的意大利船一起开进黑海支援苏联舰队。

斯大林　好的，请吧！

丘吉尔　船只的移交问题我们要和意大利人安排好。因为他们的舰队正在帮助我们，有些舰只在作战，有些担负巡逻任务，潜水艇用于运输补给。当然，最好从意大利舰队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不使它反对我们。因此，我希望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来和意大利人安排把他们的船舰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來要象猫对老鼠那样。

斯大林　那么，我们在明年1月底以前能得到这些船舰吗？

丘吉尔　同意。

罗斯福　同意。

斯大林　这些船上将用我们的船员。

丘吉尔　我愿意让我们的军舰到黑海协同苏联舰队作战。此外，我们将乐于帮助修复黑海的苏联海军基地，比如塞瓦斯托波尔。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有好处，我们也将乐于派四至五艘不列颠潜水艇到黑海去击沉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的船只。我想指出，我们在黑海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利害关系。

斯大林　很好，对给予我们的任何帮助，我们将表示感谢。

丘吉尔　如果土耳其参战，有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如果土耳其害怕参战，但同意继续保持中立，那它可能允许几艘潜水艇和为潜水艇运送补给的船只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美国

潜水艇在太平洋击沉了许多日本船，我们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了大量的德国船和意大利船。现在这些潜艇可以在黑海助一臂之力了。

斯大林 这个问题完了吗？

丘吉尔 完了。

罗斯福 我想谈谈波兰问题。我想表示一个希望，希望苏联能够与波兰政府开始谈判和恢复关系。

斯大林 波兰政府在波兰的代理人与德国人有勾结。他们屠杀游击队员，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你们简直无法想象。

丘吉尔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对德国宣战就是因为德国进攻波兰。当年，我曾为张伯伦没有在慕尼黑为支持捷克人进行斗争，而在1939年4月又突然向波兰作了保证感到惊奇。我奇怪的是他摒弃了较好的机会之后，而又诉诸战争政策。但同时我又为此感到高兴。正是为了波兰，为了履行我们的诺言。尽管我们除了海军之外没有准备好，还是对德国宣战了，并且对促使法国参战起了很大作用。法国崩溃了，但我们凭借自己岛国的地位，成了积极的战士。我们十分重视我们之所以参战的原因，我了解，在历史上我们和俄国对波兰的观点是有差别的。但是，在我国对波兰问题十分关注，因为正是对波兰的进攻迫使我们作出了今天的种种努力。我也十分了解俄国在战争初期的处境，而且考虑到我国力量在战争开始时的薄弱以及法国背弃自己在慕尼黑作出的保证这一事实，我谅解苏联政府当时不能拿自己的生存在这场斗争中冒险。现在形势不同了。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参加了战争？我们将回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对波兰作了保证。我想提起我曾经举过的三根火柴的例子。一根代表德国，第二根代表波兰，第三根代表苏联。这三根火柴都应该向西拨动，从而解决盟国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确保苏联的西部边界。

斯大林 昨天并没有谈到与波兰政府进行谈判。昨天谈的是要指示波兰政府，它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指出，俄国对同波兰建立友好关

系的关切比其它大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因为波兰是俄国的邻邦。我们赞成恢复波兰，赞成加强波兰。不过，我们把波兰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分开。我们和这个政府断绝关系并非由于我们闹什么意气，而是因为波兰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苏联。这些诽谤都已见诸报章。我们能得到什么保证，使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不再干这种勾当呢？我们很希望得到这样的保证：波兰政府的代理人不再屠杀游击队，波兰的流亡政府将真正号召抵抗德国，而不再搞什么阴谋诡计。我们将同号召和德国人积极斗争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现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本应如此，但它是不是这样，我没有把握。如果它能和游击队合作，如果能向我们保证他们的代理人将不与在波兰的德国人勾结，那我们准备与他们开始谈判。

丘吉尔刚才讲到三根火柴，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丘吉尔　如果能够在这里，在这个圆桌会议上了解一下俄国人关于波兰边界的想法，那就好了。我觉得，这样艾登或者我就可以把这些想法告诉波兰人。我们认为，波兰的要求无疑应该由德国来满足。我们准备告诉波兰人，这是一个好的方案，而他们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方案了。然后，我们可以提出恢复关系的问题。但是我想着重指出，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同俄国友好的波兰。

斯大林　问题在于乌克兰的领土应归还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应归还白俄罗斯，也就是说，我们与波兰之间的边界线应是1939年的边界线，就是苏联宪法规定的边界线，苏联政府坚持这条边界线，认为这是正确的。

还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吗？

罗斯福　德国问题。

斯大林　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罗斯福　分割德国。

丘吉尔　我赞成分割德国。不过我想要仔细考虑一下分解普鲁士

的问题。我主张把巴伐利亚和另一些省从德国划出去。

罗斯福 为了引起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想阐述一下我两个月以前拟定的把德国分为五个国家的方案。

丘吉尔 我想强调一下，德国的祸根是普鲁士。

罗斯福 我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总的轮廓，然后再谈细节问题。我的意见是，应该尽可能削弱普鲁士和缩小它的领土。普鲁士应该是德国第一个独立的部分。第二部分应包括汉诺威及德国西北部一些地区。第三部分——萨克森和来比锡地区。第四部分——黑森省、达姆斯达特、卡塞尔以及莱茵河以南地区和感斯特伐利亚的各旧城。第五部分——巴伐利亚、巴敦、符腾堡。这五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外，还应把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从德国分割出来，这些地区将由联合国家或四大国来管辖。鲁尔和萨尔省应置于联合国家或整个欧洲的托管机构的监督之下。这就是我的建议。我事先声明，这个建议不过是抛砖引玉。

丘吉尔 你是全部都端出来了。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破坏性的，另一个是建设性的。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把普鲁士从德国其余部分孤立出采。第二是把德国南部诸省——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帕拉蒂纳特包括从萨尔到萨克森分割开。我将置普鲁士于十分苛刻的条件之下。我认为，很容易使南部各省脱离普鲁士而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生活在多瑙河流域的人不是战争的起因。无论如何，我对普鲁士人可要比对其他德国人严厉得多。南部的德国人不会发动新的战争。

斯大林 我不喜欢成立几个新的联邦国家的计划。既然决定分解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罗斯福建议将德国分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这个削弱德国的方案可以研究。丘吉尔很快就要象我们一样，要和大批德国人打交道，那时候丘吉尔就会发现在德国军队里作战的不只是普鲁士人，还有其他省份的德国人。只有奥地利人要

当俘虏时叫喊：我是奥地利人。于是我们的战士就接受他们的投降。至于其他省的德国人，他们打起仗来都一样残酷。不论我们怎样处理分割德国的问题，都无需建立什么新的毫无生命力的多瑙河联邦。匈牙利、奥地利应各自独立存在，奥地利在没有被侵占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罗斯福　我同意斯大林元帅的看法。出生于德国不同省份的德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五十年前曾有过区别，而现在所有的德国兵都一样。当然普鲁士军官又当别论。

丘吉尔　我并不希望人们把我的意思理解为我不赞成分割德国。但我想指出，如果仅限于把德国分成几个部分，而不进行联合，那么就象斯大林元帅说过的那样，有朝一日，德国人要统一起来的。

斯大林　没有任何办法能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丘吉尔　斯大林元帅喜欢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吗？

斯大林　这和欧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成立四个、五个或者六个独立的日耳曼国家，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罗斯福　是否需要成立研究德国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还是把这个问题提交伦敦委员会[①]研究？

斯大林　可以把问题提交伦敦委员会，那里有我们三国的代表。

丘吉尔　现在我还想回到波兰问题上来。我认为这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波兰人会大吵大闹。我想宣读一下我关于波兰问题的提案。这里并不要求大家同意现在念的这个提案，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我的提案如下：

————————————

① 指的是欧洲谘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美国、大不列颠和苏联外长在莫斯科会议（1943 年 10 月 19—30 日）上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在战后研究欧洲出現的问题，并向三国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原注

“原则上通过，波兰国家及人民的领土应该位于寇松线和奥德河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别尔省。但边界的最后划定还需要仔细研究，有些地区可能进行移民。”

斯大林 俄国人在波罗的海没有不冻港，因此，俄国人需要哥尼斯堡和默麦尔这两个不冻港及东普鲁士相应的部分领土。况且，历史上这自古就是斯拉夫人的土地。如果英国人同意移交给我们上述领土，我们将同意丘吉尔的提案。

丘吉尔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建议，我一定要加以研究。

德 黑 兰 会 议

（65）

德黑兰会议文件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同盟国领导人德黑兰会议公报

三同盟国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德·罗斯福先生，大不列颠首相温·丘吉尔先生，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①]。

会议通过了三国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和战后合作的宣言，以及关于伊朗的宣言。上述宣言全文公布。

三 国 宣 言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大不列颠首相及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于过去四天，在我们盟国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举行了会晤，确定并重申了我们的共同政策。

我们表示决心，我们三国在战时及战后的和平时期，都将进行合作。

关于战争，我们三国参谋部代表参加了我们圆桌会议的讨论，我们商定了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计划。我们就从东、西、南三方面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我们在这里达成的相互谅解，保证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

① 下面省略了其他与会人员的名单。——原注

关于和平，我们确信，我们之间现存的协同一致，必将保证持久和平。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及所有联合国家对实现这种和平负有崇高的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球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并在未来许多世代中，消除战争的祸患与恐怖。

我们和我们的外交顾问一起研究了未来的问题。所有和我们三国一样专心致力于消灭暴政与奴役、压迫与苦难的大小国家，我们都将努力谋求它们的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欢迎它们在它们愿意的时候加入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在陆地上消灭德国的军队，在海上消灭德国的潜艇和从空中消灭德国的军工厂。

我们将无情地、日益猛烈地进攻。

我们结束了我们友好的会议，满怀信心，期待着那样一天的到来，那时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受暴政的压迫，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和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生活。

我们满怀希望和决心而来，我们作为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而离去。

1943 年 12 月 1 日于德黑兰签署。

罗斯福

斯大林

丘吉尔

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合众国总统，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首相，经过相互协商并与伊朗首相协商后，愿意就三国政府在与伊朗的相互关系上取得的一致意见发表声明。

合众国、苏联，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伊朗对为反对共同敌人而战的事业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为方便向苏联运输国外物资所提供的援助。

三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对伊朗造成的特殊的经济困难，并且同意，尽管三国在全世界的军事行动需求极大，而且目前世界普遍感到民用运输工具、原材料及生活供应品之不足，仍将一如既往，向伊朗政府提供可能提供的经济援助。

关于战后时期，合众国、苏联、联合王国政府同意伊朗政府的观点，伊朗在军事行动结束后面临的任何经济问题，都将与其它联合国家遇到的经济问题一起，由为讨论国际经济问题而召开的会议或成立的国际组织充分加以研究。

合众国、苏联、联合王国政府与伊朗政府一致希望保持伊朗的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它们期望，伊朗将与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按照所有四国政府都已签字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参加战后国际和平、安全与进步的确立。

丘吉尔

斯大林

罗斯福

1943 年 12 月 1 日

雅 尔 塔 会 议

（1945年2月4日—11日）

里瓦基亚宫第一次会议

1945年2月4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7点或17点10分

结束：当地时间19点5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
莱希海军上将	布鲁克陆军元帅	安东诺夫陆军大将
马歇尔陆军上将	波特尔空军元帅	楚贾科夫空军元帅
金海军上将	坎宁汉海军上将	科兹涅佐夫海军上将
库特少将	亚历山大陆军元帅	维辛斯基
迪安少将	伊斯梅中将	葛罗米柯
麦克法兰将军	伯尔斯少校	古谢夫
哈里曼		
波伦		

斯大林请罗斯福宣布开会。

罗斯福表示，无论从法律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不一定由他来宣布开会。在德黑兰是他主持会议开幕的，但那也完全是偶然的。罗斯福认为，能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对他是极大的荣誉。首先他想对给予他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

罗斯福说，三国首脑彼此已十分了解，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互谅解还在增进。他们都希望尽决结束战争，建立持久和平。所以与会者之间可以开始非正式的交谈。罗斯福认为，交谈应是开诚布公的。经验证明，谈判中的坦率态度有助于尽快达成圆满的决议。

在与会者面前将会展开欧、亚、非三洲地图，但今天的会议是讨论东线的形势，在这条战线上红军正在十分顺利地向前推进。他，罗斯福，希望有人来报告一下苏德战场的形势。

斯大林说，他建议由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来作报告。

安东诺夫：（1）苏军已于 1 月 12 至 15 日在从涅曼河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长达七百公里的战线上转入进攻。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部队向哥尼斯堡发动了进攻。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沿维斯瓦河北岸发起进攻，切断了东普鲁士和德国中心地区的联系。

朱可夫元帅的部队在维斯瓦河以南向波兹南进攻。

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向琴斯托霍瓦和布累斯劳进攻。

彼得罗夫将军的部队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向诺夫塔尔格发起进攻。

主攻由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和科涅夫集团军在从奥斯特罗连科到克拉科夫宽达三百公里的战线上进行。

（2）由于气候恶劣，这次战役曾打算在 1 月底待天气好转时开始。由于这次战役是作为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来准备的，本来是想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再进行。

但是，鉴于德军在阿登山地发动了进攻，西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已命令，不待天气好转，应不迟于 1 月中旬发起进攻。

（3）在苏军前出到那累河及维斯瓦河之后，敌人在战线的中部地段布署最为密集。因为从这一地区实施攻击，能使我军以最短的距离向德国要害地区推进。

为给我军的进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分散敌人中部集团军的兵力。

为此目的进行了一次对东普鲁士的辅助战役，并且在匈牙利朝布达佩斯方向持续进攻。

德军对达两个方向都极为敏感，因此他们对我们的进攻迅速作出了反应：把战线中部地段的兵力调往两翼。这样，在构成德军在我军前线的主要攻击力量的二十四个坦克师中，就有十一个师调往布达佩斯方向，六个师调往东普鲁士方向（三个坦克师在库尔良吉亚），结果，战线的中部地段只剩下了四个坦克师。

最高统帅部既定目的已经达到。

（4）主攻方向的力量对比：

在奥斯特罗连科至克拉科夫一浅，也就是在我们主攻方向上，敌人拥有八十个师。为造成对敌人的优势，我们的布署是：

步兵比敌人多一倍（达一百八十个步兵师）。

炮兵、坦克和空军占压倒优势。

在突破地段，大炮密集度为每公里阵地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门（口径在七十六毫米以上）。

（5）进攻是在极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发起的（云层很低，有雾）。这就使得空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并且使炮兵的观察被限制在一百米以内。

由于我军事先进行了很好的侦察和发动了强大的炮火攻势，敌军的火力被压倒，防御工事被摧毁，这种情况使我军在进攻的头一天就向前推进了十至十五公里，也就是完全突破了敌军全部战术纵深内的整个防御。

（6）进攻的结果：

（甲）截至2月1日，也就是在十八天的进攻中，苏军在主攻方向向前推进了五百公里。这样，每昼夜平均推进二十五至三十公里。

（乙）苏军已前进至库斯特林以南（法兰克福以北）地段的奥得河，并控制了西里西亚工业区。

（丙）切断了敌人东普鲁士集团军和德国中部各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线。

这样，除库尔良吉亚集团军（二十六个师）外，在东普鲁士的敌集团军（达二十七个师）已被孤立；其它一些个别的德国集团军（在罗兹、托恩、波兹南、施奈德米尔及其它一些地区，总数达十五个师）也被包围并在被歼灭之中。

（丁）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列特钦方向，德军坚固的永久性防御阵地已被突破。

（戊〕歼灭德军四十五个师，敌人损失为：

被俘十万人左右，被击毙三十万人左右，共达四十万人。

（7）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

（甲）德军将固守柏林，为此，他们将力图在奥得河一线阻止苏军向前推进，利用败退下来的部队和从德国、西欧、意大利调来的预备队在这里组织防御。

为固守波美拉尼亚，敌人将努力利用库良吉亚集团军，把它们从海路调往维斯瓦河以西。

（乙）德军将把在意大利作战的部队调来增援，以尽可能加强维也纳方向的掩护。

（8）敌军的调动：

（甲）在我军前线已发现有：

从德国中心地区调来的九个师；从西欧战场调来的六个师；从意大利调来的一个师；共十六个师。

（乙）正在调运中的有：

四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计五个师。

（丙）大约还将调来三十至三十五个师（从西欧战场、挪威、意

大利及德国本土的后备部队中抽调。

这样，在我军前线敌军可能补充三十五至四十个师。

（9）我们希望：

（甲）盟军在西线加速转入进攻。这样作的有利条件是：

（一）德军在东线的失败；

（二）进攻阿登山地的德集团军的失败；

（三）由于向东线抽调预备队而造成的西线德军兵力的削弱。

希望进攻最好在2月上半月内开始。

（乙）轰炸交通线以阻止敌人从西线、挪威以及意大利向东线调动部队，特别要使柏林和来比锡这两个铁路枢纽陷于瘫痪。

（丙）不让敌人从意大利抽走兵力。

（安东诺夫的报告文本交给了罗斯福与及吉尔。）

斯大林问，还有没有问题。

罗斯福说，他希望知道苏联政府打算怎样处理德国的火车机车、车辆和铁路。苏联政府是否打算把德国铁路改成宽轨？

安东诺夫回答说，由于德军留下的火车车辆和机车都不大能用，因此只好在德国若干主要干线上加宽路轨。

罗斯福说，他的意见是最好由各盟军参谋部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各盟国的部队正在迅速相互靠拢。

安东语夫说，苏军司令部只加宽为保证苏军供应所必需的最少量的线路。

斯大林说，大部分铁路没有加宽。苏军司令部对加宽铁路并不十分热心。

丘吉尔说，他有几个问题。丘吉尔认为，有一些问题最好由三国的参谋部来讨论。比如时间问题。应当弄清楚，德军如从意大利调八个师到苏联战场，需要多长时间？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一调动？是不是要调一部分盟军部队经留布良通道去同红军汇合？这里还要搞

清楚，这样作需要多少时间？并且是否会为时过晚？

他，丘吉尔，只不过举出了可由我们三国参谋部讨论的一个问题。现在，他提议由马歇尔将军报告一下关于西线战役的情况，实施这些战役将是对苏军的帮助。

罗斯福说，他同意首相的意见。以前，各盟国军队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作战，现在德国变小了，所以三国参谋部之间保持密切接触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马歇尔将军说，在西线，德军在阿登山地发动进攻的后果已被消除。近几个星期来，艾森豪威尔将军重新布署了自己的兵力。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继续在德军反攻的地区对敌人施加压力。通过几次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现，德国人在阿登山地的兵力极为雄厚。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开始在北部集结兵力。

在战线南部，也就是瑞士以北，计划中的战役的任务是要把德军赶到米尔豪森和科耳马尔地区去。在斯特拉斯堡以北发动的战役任务是要摧毁莱茵河左岸敌军的据点。目前蒙哥马利指挥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和美国第九军正准备在北部发动进攻。美国第九军将在东北方向发动进攻。

盟军司令部希望上述战役中第一个战役于2月8日开始，第二个战役在一星期之后，或可能稍早一些开始。盟军预计，德军将向杜塞尔多夫退却，然后盟军向柏林挺进。只要补给没问题，在这次进攻中将投入一切可以投入的兵力。将使用伞兵都队。可望于3月初在北部渡过莱茵河。北部有三个适于强渡莱茵河的地点。

有一段时间西线战役因运输吨位不足而进展缓慢。现在，在打通安特卫普以后，情况有了好转，盟军每天可以运进七万至八万吨物资和一万二千吨液体燃料。德军正千方百计破坏盟军的供应，并继续用飞弹轰炸安特卫普。今天收到消息说，在安特卫普地区一昼夜内就投

下了六十枚飞弹和六枚火箭。

斯大林说，飞弹和火箭很少能命中目标。

马歇尔回答说，炸弹随时都可能击中停泊在港口的船只。

他说，只要天气好，盟军的空军总是在积极作战，歼击机，轻、重型轰炸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破坏。据今天接到的报告说，对开往苏德战场的载有德军部队的机车车辆进行了空袭。对斯特拉斯堡以北的铁路线破坏极大。重型轰炸机主要是轰炸生产液体燃料的工厂，使德军无法供应坦克所需的燃料。德国的燃料生产已减少百分之六十。空军还对交通线进行轰炸。对坦克工厂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至于意大利国内以及瑞士以南地区的形势，马歇尔报告说：德国在瑞士以南有一、两个师，在意大利有二十七个师。盟军在意大利的兵力同德军的兵力相当。此外，盟军在意大利还拥有空军，用来摧毁德国人的机车车辆，破坏铁路、桥梁。

马歇尔说，德军大约很快就可以恢复水下攻击，因为他们制造出了一种改进型的潜水艇。目前，德军拥有近三十艘潜艇。尽管潜艇为数不多，却可能成为盟军水路航行的严重威胁。原因是盟军制造的仪器不能发现这些结构已经改进了的潜艇。所以重型轰炸机对制造潜艇的船坞进行了轰炸。但这并没有影响空军对德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对生产液体燃料的工厂进行轰炸。

丘吉尔说，他希望布鲁克元帅和坎宁汉海军上将谈一谈自己的意见。现在苏军前进的速度十分重要，因为但泽是潜艇大量集中的地区之一。

斯大林问，还有哪些是潜艇集中的地方。

丘吉尔回答说，塞尔和汉堡。

布鲁克说，他认为盟军在西线的计划与行动已经讲得很详尽了。

丘吉尔说，在与会者转向其它非军事问题之前，他还想谈一个与强渡有关的问题。盟军有一个专门研究强渡问题的小组。领导这个小

组的一个军官现在在雅尔塔。丘吉尔说，倘若这个军官能够同苏联军人进行接触，得到有关强渡问题的情报，我们将十分感谢。大家都知道，俄国人经验很丰富，特别是在冰上强渡方面。

斯大林说，他有几个问题。他希望知道，准备实施突破的那一段战线有多长。

马歇尔回答说，有五十至六十哩长。

斯大林问，在准备突破的战线上德军是否筑有工事。

马歇尔回答说，德军在这一段战线上修筑了重型防御工事。

斯大林问，盟军有没有用于扩大战果的预备队。

马歇尔作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苏军司令部了解预备队多么重要。这点在这次冬季攻势中表現得尤为明显。他想问一下，盟军在准备突破的地段集中了多少个坦克师。苏军司令部在冬季突破作战中在前线中部集中了近九千辆坦克。

马歇尔回答说，这个他不大清楚，但是大约每三个步兵师将配备一个坦克师，也就是说，三十五个步兵师将配备十至十二个坦克师。

斯大林问，盟军的一个坦克师有多少辆坦克。

马歇尔回答说，三百辆。

丘吉尔说，在整个西欧战场，盟军拥有一万辆坦克。

斯大林说，这不少了。苏军司令部在主攻战线集中了八千至九千架飞机。盟军有多少架飞机？

波特尔回答说，盟军飞机的数量与此大致相等，其中有四千架轰炸机，每架能够携带三至五吨炸弹。

斯大林问，盟军步兵的优势如何？在主攻战线苏军司令部的步兵优势是以一百个师对德军的八十个师。

丘吉尔说，盟军的步兵过去和现在都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在空军方面，盟军有时具有很大的优势。

斯大林说，苏军司令部的炮兵拥有很大优势。或许，盟军对于苏军如何使用炮兵会感到兴趣？斯大林说，作为战友，我们可以同盟军交流经验。一年前，苏军司令部组建了专门进行突破的炮兵，效果很好。每一炮兵师配备有三百三十至四百门大炮。比如科涅夫元帅那里，在三十五至四十公里长的战线上就布置了六个炮兵突破师，此外还加上一个炮兵兵团。结果，每一公里的突破地段平均有约二百三十门大炮。炮击之后，许多德国兵被炸死，其余的也被震聋吓昏，许久不能恢复常态。这就为红军开辟了道路，继续向前推进就不困难了。

斯大林对他谈这些占用了时间表示歉意。斯大林说，我们谈了我们希望盟军给红军什么帮助。他想了解盟军对苏军有什么希望。

丘吉尔说，他愿借此机会对苏联红军在进攻中表现山的强大威力表示极为钦佩。

斯大林说，这不是希望。

丘吉尔说，盟军认识到自己任务的艰巨，并不低估这一点。但盟军相信他们能够完成提出的任务。盟军所有指挥官对这一点都充满了信心。尽管进攻将要在德军防守最强的地区进行，但盟军确信，进攻将取得成功，将有助于苏军的作战，至于说希望，那么盟军希望苏军的攻势能一如既往，顺利推进。

罗斯福表示同意丘吉尔的意见。

斯大林说，丘吉尔对红军的冬季攻势表示感谢，采取这次攻势是我们履行自己战友的职责。根据德黑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苏联政府并未承担发动冬季攻势的义务。

总统曾问过，他，斯大林，是否可以接见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他，斯大林，当然同意了。丘吉尔曾写信询问他是否考虑在 1 月份内转入进攻，他，斯大林，懂得，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是直接请求他发动攻势。他很欣赏盟国这种婉转态度。但他看到，这样一次攻势对盟军非常必要。苏军司令部甚至在预定期限之前就发起了进

攻。苏联政府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是作为一个盟友的义务，虽然在形式上并未作出过这样的保证。他，斯大林，希望盟国的领导人了解，苏联领导人不仅实现自己作出的保证，而且还准备尽可能地履行自己道义上的责任。

至于说到希望，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特德曾表示过，希望苏军在3月底以前不要停止进攻。他，斯大林，理解这可能不仅是特德一个人的希望，也是盟军其它将领的希望。斯大林说，倘若天气好，道路畅通的话，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攻势。

罗斯福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在德黑兰会议上不可能制订出共同作战的计划。罗斯福是这样认为：每一个盟国从道义上说都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向前推进。开德黑兰会议时，分别从东、西两面挺进的盟军部队，相互之间距离很大。但现在到了盟军应该更为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时候了。

丘吉尔说，他欢迎斯大林元帅讲的话。丘吉尔觉得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总统表示：盟国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同苏联政府就未来的战役缔结一个协议，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有信心。

罗斯福回答说，德黑兰会议是在他重新当选之前开的。当时还不清楚，美国人民是否支持他——罗斯福。所以那时很难制订共同的军事计划。

丘吉尔说，特德在同斯大林元帅谈话中提出的问题，以后可以由盟军参谋部来讨论。丘吉尔说，当然，人们可能因为盟军的进攻作战没能够协同一致而批评我们。如果天气将影响苏军作战，那么是不是要盟军在自己的阵地上发起进攻？不过这个问题应由我们的参谋部去决定。

斯大林说，出现了各打各的情况。去年秋天苏军停止了攻势，而盟军这时却开始了进攻。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今后应避免发生这种现象。或许应让我们的军事人员讨论一下夏季作战的计划。

丘吉尔说，可能需要这样作。他说，趁政府首脑们研究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军事人员可以去研究军事问题。

斯大林回答说，对。

坎宁汉说，他想对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作一些补充。德军进行新的潜艇战的威胁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潜在的。德国人在改进潜艇结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还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德国人正在制造新型的潜艇。这种新型潜艇有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在水下高速航行。所以我们的海军将很难与之匹敌。德国人在不来梅、汉堡和但泽制造潜艇。如果允许他，坎宁汉，表示一个愿望的话，那么，作为海军部的代表，他想要求苏军尽快攻克但泽，因为百分之三十的潜艇的生产集中在那里。

罗斯福问，但泽是否处予苏军炮火射程之内。

斯大林回答说，苏军的炮火还达不到但泽，但苏军司令部相信，很快就将逼近但泽，使之处于炮火射程之内。

丘吉尔说，军人们可以在明早开会。

斯大林表示同意这一意见。他建议军事人员在中午12时开会。

丘吉尔说，军事人员会谈不仅应该讨论东、西两线的局势，而且应该讨论意大利战场的形势，以及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现有兵力的问题。丘吉尔建议明天的首脑会议讨论政治问题，也就是讨论德国的前途问题，如果说德国会有什么前途的话。

斯大林回答说，德国会有前途的。

里瓦基亚宫第二次会议

1945年2月5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
结束：当地时间19点45分或20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德尔爵士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贝尔纳斯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马伊斯基
哈里曼	狄克逊	古谢夫
马修斯	威尔逊	葛罗米柯
波伦	伯尔斯少校	巴甫洛夫

罗斯福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政治问题。我们应该选择与德国有关的问题。至于象达喀尔和印度支那这些世界性问题可以推迟研究。我们三国政府早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占领区问题。这指的不是长期占领，而是暂时占领。这个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

斯大林说，他希望今天的会上能讨论下面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分割德国的提案。在德黑兰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后来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他，斯大林，和丘吉尔又交换过意见。无论在德黑兰还是在莫斯科，都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现在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出某

种结论了。

还有一个涉及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允许在德国成立某种中央政府，还是仅限于建立一个行政机构，或者，如果决定分割德国，是否德国分成几块就成立几个政府？这几点应该澄清。

第三个问题是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我们都主张德国无条件投降。但是他，斯大林，想知道，如果希特勒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话，盟国是否保留这个政府？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是这样，就应当这样说明。盟军有接受意大利投降的经验，当时提出了构成无条件投降内容的一些具体要求。我们是否打算明确一下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内容？这个问题也需要澄清。

最后是赔偿问题，关于德国赔偿损失和赔偿数额的问题。

他，斯大林，提出上述问题作为对总统提出的问题的补充。

罗斯福说，据他理解，斯大林元帅提出的这些问题涉及到长远的状况。不过这些问题是从划分德国占领区问题引申出来的。也许，划分占领区将是分割德国的第一步。

斯大林说，如果盟国打算分割德国，那就应该这么说。盟国之间就德国战败后分割德国的问题曾两次交换过意见。第一次是在德黑兰，当时总统建议把德国分成五部分。首相当时尽管有所犹豫，但也同意分割德国。不过那仅仅是交换意见而已。

第二次是去年10月在莫斯科，他，斯大林，和首相讨论了分割德国的问题。当时谈的是英国提出的把德国分成两个国家的计划，一个是普鲁士加上几个省，一个是巴伐利亚，同时还打算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置于国际管制之下，但是在莫斯科没有，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总统当时不在莫斯科。

丘吉尔指出，原则上他同意分割德国，但是划定德国各部分边界的方法本身过于复杂，以致不可能在五、六天内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立一个分组委员会或委员会来详细研究各种方案并提出如何做

法的建议，这里需要十分周密地研究各种历史的、种族的和经济的因素，进行长达数周之久的讨论。三国政府首脑在德黑兰就此问题进行的会谈和后来他，丘吉尔，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元帅的非正式会谈，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探讨，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计划。

他，丘吉尔，不能立即对怎样分割德国的问题作出回答。他只能稍微谈谈他感觉哪种做法较为合适。但他必须保留在收到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建议之后改变自己意见的权利。他注意到普鲁士的雄厚实力是一切灾祸的主要根源。十分明显，如果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就将大大限制它发动新战争的能力。他本人认为，在德国南部成立一个可以维也纳为首都的日尔曼大国，就能保障普鲁士和德国其余部分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德国的人口也正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平均分开。

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应当研究。首先，我们同意德国应该失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俄国军队占领的那部分领土，把它交给波兰人。还有一些与莱茵河谷、法德边界有关的问题，以及对鲁尔、萨尔这些具有军事潜力（指生产武器）的工业区的占有问题。是否应把这些地区交给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还是应当把它们留给德国的行政机关管理，或是由一个世界组织以长期的但是有期限的共管形式进行监督？所有这一切都有待研究。他，丘吉尔，应该说明他不能代表自己政府就这个问题发表肯定的想法。不列颠政府必须与盟国协调自己的计划。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普鲁士从德国分出之后，它内部是否需要再行划分。在德黑兰谈过这个问题。看来有一个问题很快能够解决，就是成立一个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在各国政府作出最后决定前向各国政府提出报告。

他，丘吉尔，想说，对于马上接受德国投降，盟国已做了不坏的准备。有关投降的一切细节已经研究好了，并告诉了三国政府。剩下的是就占领区和对德管制机构问题正式达成协议。假设德国在一个月

或六周后，或在六个月后投降，那么盟国只要分别占领德国就行了。

斯大林说，这还不清楚。德国的某个集团可能会说，他们象意大利的巴多里奥那样，已经推翻了政府。盟国是否同意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呢？

艾登说，那要向这个集团提出欧洲谘询委员会通过的投降条款。

丘吉尔说，他想谈谈事态可能的发展进程。德国已经无法再进行战争。假设希特勒或者希姆莱要求投降，很显然，盟国的答复是，不同他们举行谈判，因为他们是战犯。如果德国只有这些人，那盟国就继续打下去。更可能的是希特勒设法隐藏起来或者由于德国发生政变被打死，那里成立另一个政府，然后要求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立即互相磋商，决定能不能同这些德国人对话。如果我们决定可以，那就要向他们提出投降的条件。如果我们认为不屑与这些人谈判，那就继续打下去，并占领整个德国。如果这些新出来的人按照给他们提出的条伴签署无条件投降，那就没有必要再同他们去谈他们的前途了。无条件投降使盟国能够向德国人提出分割德国的补充要求。

斯大林说，分割的要求不是补充要求，而是非常实质性的要求。

丘吉尔说，当然，这是重要的要求。但是他不认为在最初阶段就需要向德国人提出这个要求。盟国之间应就这一点达成明确的协议。

斯大林说，正是为此他才提出这个问题。

丘吉尔说，尽管我们可以研究分割德国的问题，但他不认为现在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他——丘吉尔——的意见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和会上研究更为合适。

罗斯福说，他觉得斯大林元帅提出的我们是否将分割德国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复。他，罗斯福，认为现在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细节可以留待以后研究。

斯大林指出，这是正确的。

罗斯福继续说，首相谈到，现在不可能确定德国各部分的边界，

整个问题需要研究。这是对的。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要在会上决定基本的一点：即我们同意不同意分割德国？罗斯福认为，最好还是在向德国人提出投降条款之外，也向他们宣布德国将被分割。在德黑兰，罗斯福主张在德国实行地方分权。四十年前，当他住在德国时，那里还实行地方分权。在巴伐利亚、黑森分别有巴伐利亚政府、黑森政府。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政府。当时还没有“帝国”这个词。但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地方分权逐渐取消了。一切行政权力集中于柏林。我们今天谈论德国地方分权的种种计划，那只是空想。所以，在现今的条件下，罗斯福认为，除了分割之外别无他策。分成几部分呢？是分成六、七个部分还是少些？在这一点上，罗斯福不能立刻表示什么肯定的意见。这个问题需要研究。然而，在这里，在克里米亚，就应该商定我们要不要把德国将被分割一事告诉德国人。

丘吉尔说，他认为，没有必要让德国人知道将对他们的国家采取什么政策。应该向德国人宣布，在德国投降后，他们必须听候盟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要求将根据盟国的一致意见向德国人提出。至于谈到分割，他，丘吉尔，认为不可能在几天之内作出这样的决定。盟国面对的是八千万人民，为了决定他的的命运，当然不止需三十分钟，而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委员会大概得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罗斯福说，首相又给这个问题加进了一个时间的因素。如果公开讨论分割问题，那就会提出几百个方案。所以，他，罗斯福，建议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由三国外长作出一项关于研究分割德国问题的程序的计划，而后在三十天之内拟定出一个分割德国的详细计划。

丘吉尔说，不列颠政府准备接受分割德国的原则并建立一个研究分割程序的委员会。

斯大林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弄清楚，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局势将朝着德国崩溃的方向发展。德国正遭到失败，而且盟国即将发

动的攻势必将加速这个失败。除了军事上的惨败之外，德国由于没有煤，没有粮食，还可能经历一场内部的灾难。德国已经失掉唐波夫煤田，鲁尔煤田很快就处于盟国的炮击之下。形势发展是如此之快，他，斯大林，不希望盟国面临这种局势而措手不及。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使盟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准备。他完全理解丘吉尔的想法，即目前很难制定出分割德国的计划。这是对的。他也不是建议现在就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但这个问题应该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并且写进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中去。

丘吉尔说，是无条件投降就不应签订停火协议，无条件投降就是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谁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谁就要服从战胜国的意志。

斯大林说，投降条款总还是得签字的。

丘吉尔作了肯定的回答，并提醒大家注意欧洲咨询委员会制定的无条件投降条款的第十二条。

罗斯福说，这一条里根本没谈到分割德国的问题。

斯大林说，是这样。

丘吉尔问，是否打算公布停战条件？

斯大林答，这些条件在公布之前，只限于盟国之间知道，到适当时机再向德国政府提出。何时公布将由盟国确定。现在盟国对意大利就是这样做的，意大利的投降条件将在盟国认为必要的时候予以公布。

罗斯福问，盟国是否要让德国人建立政府或是行政机构？如果德国将被分割，那么它的每一部分都将有一个隶属于该区盟军司令部的行政机构。

丘吉尔说，这个他不知道。他，丘吉尔，除了刚才说的不列颠政府准备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并成立一个研究分割计划的委员会之外，很难再进一步表明什么。

罗斯福问，丘吉尔是否同意在十二条中加进分割德国的词句？

丘吉尔答，他可以同意由三国外长研究第十二条，看看是否有可能加进“分割德国”的字样或是其它的提法。

（会上决定，委托外长们去研究这个问题。）

丘吉尔说，现在可以讨论关于德国的政府的问题了。

斯大林说，他倾向于讨论赔偿问题。

罗斯福同意，并说赔偿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象丹麦、挪威、荷兰这样的小国也希望能从德国得到赔偿。第二，使用德国劳动力的问题。他想问问，苏联希望得到多少德国的劳动力。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它既不需要德国的机器，也不需要德国的劳动力。

斯大林回答，苏联政府有一个物资赔偿的计划。至于讨论利用德国劳动力的问题，苏联政府暂时还没有准备。

丘吉尔问，是否可以多少了解一下苏联的赔偿计划？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他建议由马伊斯基谈谈。

马伊斯基说，实物赔偿计划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德国的赔偿，不应该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用货币支付，而应用实物支付。

第二条，德国以实物支付赔偿应采用两种形式，即（甲）战争结束从德国国内国外的国家资产中进行一次提取（工厂、机床、船舶、机车，在外国企业中的投资等）；（二）战后每年提供商品。

第三条，通过赔偿应使德国在经济上也解除武装，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保障欧洲的安全。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没收百分之八十的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冶金、机器制造、金属加工、电机工业、化学工业等）。要百分之百地没收飞机制造业和生产合成燃料的企业。对战前已有或战时新建的全部专门的军工企业（枪炮工厂、弹药厂等）也同样应百分之百地予以没收。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剩下战前重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就完全可以满足国内的、确实是经济上的需要。

第四条，赔偿的期限定为十年，其中对德国国家资产的提取应在

战后两年内进行。

第五条，为使德国能够严格履行赔偿义务和保证欧洲的安全，美、英、苏三国应该对德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监督。监督的形式以后再行研究。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规定；在德国剩下的工业、交通和其它企业中，对于那些可能导致德国军事潜力的恢复从而构成最大危险的企业，必须实行有苏、美、英三国参加的国际共管。对德国经济的监督在赔偿支付期满后，即战争结束十年之后，仍应保留。

第六条，由于德国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如此浩大，即使向德国索取最苛刻的赔偿也无法弥补。苏联政府曾大致估算了一下损失，得到的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苏联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采取现实的态度，则在全部损失中，只能赔偿可以认为是直接的物资损失的部分（毁掉或损坏的房屋、工厂、铁路、科研究机关，被没收的牲畜、粮食、公民的私有财产等）。可是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仅直接的物资损失一项，总额也超过通过没收资产和战后逐年提供货物所可能支付的赔偿数额，因此对于所有有权索取赔偿的国家，不得不规定获得赔偿的先后次序。确定次序的依据应该是两点：甲、这个国家对战胜敌人所作贡献的大小。乙、这个国家直接物资损失的大小。凡是这两项都大的国家应该优先获得赔偿，其次才是其他的国家。

第七条，苏联认为，它通过没收资产和逐年接受产品所得的对于自己直接物资损失的赔偿，应不少于一百亿美元，这是公平合理的。当然，这在苏联所受的直接物资损失的总额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准备满足于这个数目。

最后，第八条，盟国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详细制定赔偿计划，应在莫斯科设立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专门的赔偿委员会。

苏联政府提交会议讨论和通过的物资赔偿计划，内容大致如此。

丘吉尔说，他清楚地记得上次大战的结局。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制定和约，但他可以出席所有的会议。当时的赔偿是使人大失所望的。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德国索取到十亿英镑。而且，要不是美、英在德国有投资，甚至连这个数目也得不到。英国从德国拿走了几艘陈旧的远洋轮船，可是德国却用英国给的钱建立了一支新舰队。他，丘吉尔，希望这一次英国不会再碰上这样的麻烦。

丘吉尔无保留地的认为，俄国作出的牺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他一直认为拆走德国的工厂是一个正确的步骤。但他同样也确信，从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德国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资产來补偿那怕是俄国一国的损失。他怀疑是否每年能从德国得到二亿五千万英镑。在上次大战末期英国人也幻想过种种天文数字，然而结果如何呢？

大不列颠在这次大战中遭到很大损失。大部房屋被摧毁或遭到破坏。英国卖掉了全部的国外资产。英国必须出口商品以进口粮食，国内所需粮食的一半不得不向国外购买。为了为共同事业而战，英国除了按租借法案租借的以外，还欠了巨额款项。英国的债务总额达三十亿英镑。任何一个战胜国在战争末期都不会象大不列颠那样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陷入如此困窘的状况。如果他，丘吉尔，能看到通过向德国索取赔偿可以支撑英国的经济，他会坚决走这条路。然而，他怀疑能否成功。

其他国家也遭到很大破坏，荷兰被淹没，挪威深受灾难。当然，这些国家的人口不多。

此外，德国将会怎样呢？一个有着八千万人口的饥饿的德国的幽灵浮现在丘吉尔的眼前。谁来养活他们呢？谁来付这笔钱呢？到头来是不是至少有一部分赔偿还得由盟国自己来掏腰包？

斯大林说，当然这些问题迟早会出现。

丘吉尔说，要想骑马，就得喂草料。

斯大林回答，可是，马不应该踢我们。

丘吉尔承认自己的比喻不恰当，并说，如果用汽车代替马来打比方，那么要使用汽车，总得需要汽油吧。

斯大林说，不能这样比较，德国人不是机器，是人。

丘吉尔同意这一点。他回到赔偿问题上，表示同意成立一个赔偿委员会，秘密地进行工作。

罗斯福说，他对上次大战的情况也记忆犹新，他记得合众国损失了一大笔钱。美国曾贷给德国一百多亿美元，不过这一次美国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了。合众国不打算使用德国的劳动力，也不想要德国的机床。上次大战结束时，在合众国有许多德国的资金和财产。所有这些都归还给德国人了。

他，罗斯福，认为这次战争结束后，情况会不同。可能得颁布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在美国的所有德国财产将留在美国人手里。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意见，多少得为德国的前途着想。但是，合众国尽管慷慨地向别国提供援助，却不能保障德国的将来。合众国不愿意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合众国愿意帮助苏联从从德国获得必需的一切。美国人愿意帶助英国人增加出口并找到代替德国的新的销售市场。

罗斯福认为，成立一个赔偿委员会来研究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需要，这个时刻已经到了。他同意这个委员会设在莫斯科。罗斯福非常希望苏联遭到的一切破坏都能得到恢复。同时他也相信，靠赔偿是不可能补偿一切的。应给德国人留下的工业数量，只要使德国人不致饿死就够了。

丘吉尔说，他不反对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

马伊斯基说，他想简短地答复一下丘吉尔和罗斯福。他要讲的涉及到三个基本点。

第一，关于丘吉尔特别谈到的一个问题，即：上次大战后赔偿搞得不成功的问题。那次的经验的确极不令人满意。但为什么呢？原因不在于德国应赔偿的数额太大。事实上赔偿的数目很有限：三百亿美元分五十八年支付。这难道算多吗？按照它的国力和国民收入，德国

本可毫不费力地支付这个数额。然而糟糕的是，盟国不是要求德国赔偿实物，而主要是支付现金。德国得想方设法弄到必需数量的外汇，而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如果当时盟国愿意接受实物赔偿，就不会有任何麻烦。可是盟国不愿这样做，结果出现了无法解决的转帐问题，也就是把德国马克兑换成英镑、美元和法郎的问题，这个难题也就断送了上次战后的赔偿。

还有一个因索大大促使 1914—1918 年以后的赔偿落了空，这就是美、英、法三国所执行的政策。美、英、法向德国大量投资，从而就怂恿了德国人不履行自己的赔偿义务。结果，德国给盟国的赔偿数目只是美，英、法三国在 1914—1918 年战后最初几年给德国贷款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才是上次赔偿不成功的根源。为了避免转帐所产生的困难，现在打算全部以实物来支付赔偿。同时我们希望，这次战后美英不再向德国提供资金。（罗斯福和丘吉尔一面做手势，一面大声表示，他们决不再干这种事。）有了这些条件，没有理由根据上次赔偿不成功的经验而对现在的赔偿做出悲观的结论。

第二，丘吉尔刚才的意思是说，苏联要求的赔偿数额是德国力所不及的。这一点未必正确。事实上，一百亿美元算得了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合众国 1944—1945 年度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斯退丁纽斯：“完全正确。”）它等于美国和平时期（如 1936—1938 年期间）国家预算的一又四分之一倍。如果同英国相比，那么一百亿美元这个数目仅仅等于大不列颠六个月的战争开支或者等于和平时期（1936—1938 年）国家预算的两倍半。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苏联提出的要求过分呢？绝对不能这么说。倒不如说这些要求是过于微薄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如此微不足道，是由于它从可靠的现实基础出发，而不愿想入非非。

第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必须防止在德国发生饥荒。苏联政

府决没有意思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国家。相反，苏联政府在制定自己的赔偿计划时，始终都注意到创造条件使德国人民在战后能保持欧洲中等的生活水平。苏联的赔偿计划也能够保证这种可能性。德国完全有可能在扩大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战后经济，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都具备。对于德国经济中的上述两个部门，苏联的赔偿计划没有规定任何特别的限制。

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战后的德国将根本无需有军备开支，因为它将完全解除武装。这是一项很大的节约，要知道，战前德国各种形式的军备支出每年高达六十亿美元。（丘吉尔高声说，“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所以，苏联政府确信，即使完全实现这个赔偿计划，也能保障德国人民生活过得不错。

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可以从上述的一切看出，苏联的赔偿计划是经过周密思索、建立在十分清醒和现实的考虑基础上的。

丘吉尔说，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

斯大林问，在什么地方？

丘吉尔说，需要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有关它的工作的任何情况都不予公布。

斯大林回答说，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情况都不公布。但是应该明确，丘吉尔希望在什么地方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吗？

丘吉尔回答，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在这次会议上只需要通过一个决议，即应该成立一个赔偿委员会，它在以后将审议各种要求和研究德国实有的资产，同时将确定得到赔偿的优先权。在确定赔偿次序时，最好不仅考虑一个国家对胜利作出的贡献，而且还要考虑到它所遭受的灾难，苏联按照任何一条标准都居首位。委员会里将出现的各种分歧部应由各国政府协商解决。至于俄国的赔偿计划，需要时间对它进行研究，不可能马上就通过。

罗斯福说，赔偿委员会应该由三国代表组成。

丘吉尔支持罗斯福的这一建议。

斯大林说，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这一点到会者都同意。这是件很好的事情。然而这还不够。即使是最好的委员会，如果工作中没有适当的指导方针也不会有多大作为。必须在现在，在这次会议上就确定这样的指导方计。

他，斯大林，认为分配赔偿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那些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负担并且作为战胜敌人的组织者的国家应优先得到赔偿。这些国家就是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非但俄国人应获得补偿，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要获得补偿，而且都应得到可能的最大份额。如果合众国象罗斯福所说的不想得到德国的机器和劳动力，那可以找到对它更为合适的其它赔偿形式，比如获得原料等等。不管怎样，应该明确规定，谁对打败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谁就有权首先获得赔偿。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一点吗？

罗斯福说他同意。

丘吉尔也不反对。

斯大林接着说，在计算德国拥有的用于支付赔偿的资产时，不应从现在的状况出发，而要考虑到德国战后全部人口回国、工厂开工时将拥有的资源。那时德国的资产将比现在多，所以他上面提到的几个国家可望得到相当可观的赔偿以抵消自己的损失。这些问题最好先由三国外长进行商谈，然后再向我们的会议报告。

丘吉尔同意会议应给委员会作出几点主要指示

斯大林回答，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在讨论赔偿问题时，他显得不肯通融，那只是因为他家里有个议会和内阁。如果他们不同意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会议上赞同了的东西，就可能把他赶下台。

斯大林也用丘吉尔的口气回答说，这可不那么容易，胜利者是不

会被赶下台的。

丘吉尔说，三国外长明天就可以讨论赔偿问题，然后向会议报告。他，丘吉尔，喜欢这样的原则：各国各取所需，而德国尽其所能。这一原则应该成为赔偿计划的基础。

斯大林回答说，他更喜欢另外一个原则：按功取偿。

里瓦基亚宫第三次会议

1945年2月6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15分

结束：？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维辛斯基
贝尔纳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哈里曼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马修斯	杰布	葛罗米柯
希斯	威尔逊	巴甫洛夫
波伦	狄克逊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说，今天可以着手讨论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了。罗斯福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至少保证五十年的和平。由于不论是他，罗斯福，还是斯大林元帅，或者丘吉尔都没有出席敦巴顿橡树林会议，请斯退丁纽斯就这个问题作一次汇报是适宜的。

斯退丁纽斯说，根据在敦巴顿橡树林达成的协议，某些问题应留待进一步研究，以后再解决。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安理会采取什么

样的表决程序。在敦巴顿橡树林，三国代表团曾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后，三国各方都不断对此问题加紧进行了研究。

1944年12月5日，总统致函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建议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将敦巴顿橡树林通过的提案第六章丙节规定如下：

“丙　投票

1. 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2. 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通过。

3. 安全理事会关于其他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但对第八章甲节和第八章丙节第一段第二句规定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他，斯退丁纽斯，刚才宣读的条文，采纳了苏联和大不列颠对总统所提草稿的意见，作过不大的文字上的修改。

美国这个提案完全符合大国应对维护普遍和平负有特殊责任的精神。的确，美国的提案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作出包括采取经济及军事强制手段在内的一切有关维护和平的极为重要的决定时，必须一致同意。

同时，美国的提案确认常任理事国应公开声明，和平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争端是各国共同关切的事情，非常任理事国的主权国家有权毫无限制地就此阐述自己的立场。如果安理会中不能保证这种自由讨论，就很难建立起，甚至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我们大家期望的世界性组织。如果在安理会上没有充分和自由地讨论这类问题的权利，那即使建立起一个国际安全组织，它与我们期望的也会大相径庭。

美国代表团向其它两国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包括他，斯退丁纽斯，刚才宣读的条文，以及一份依照美国提案要求一致同意的安理会各种决议的清单，另外，还列举了任何争端当事国都不得投票的各种问题（指关于争端及其和平解决的问题）。

从合众国政府观点看来，表决程序问题包括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为了维护他，斯退丁纽斯，刚才提到的普遍和平，常任理事国必须意见一致

第二，对美国人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所有成员国都要公平合理。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两个主要因素协调起来。

总统1944年12月5日向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提出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把这两方面圆满地结合了起来。

罗斯福说，他觉得，请斯退丁纽斯列举一下，哪些类别的决议须经安理会一致同意才能通过，是有益的。

斯退丁纽斯说，根据总统建议的条文，下列各种决议须有安理会的七票可决票，其中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才得通过。

一、就下列事项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提案：

1. 接纳新会员国；

2. 暂停会员国资格；

3. 开除会员国；

4. 选举秘书长。

二、恢复被暂停会员资格的会员国的权利和待遇。

三、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包括下列问题：

1. 争端当事国通过自行选择的方法或根据安理会的建议仍不能解决争端，是否构成对和平的威胁？

2. 某一国家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是否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

3. 安理会应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和平，如何实现这些措施；

4. 是否需要委托区域机构实施强制性措施。

四、批准关于提供武装部队和军事物资的专门协议或其他协议。

五、制定调节军备的一般办法的计划并提交各会员国。

六、确定某区域机构或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区域性措施的性质和活

动是否符合本世界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下列决议也应以安理会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其中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但参与争端的安理会成员国，对涉及争端的一切决议不得投票。

一、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争端或事态如继续发展，是否可能构成对和平的威胁？

二、安理会应否促请各方以自行选择的方法解决或调停争端？

三、安理会是否应就调停方法和程序向各方提出建议？

四、提交安理会审议的问题的法律方面，是否应转送国际法院征询意见？

五、如设有和平调停地方争端的区域性机构，是否应促请该机构解决争端？

罗斯福说，他相信，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解决。大国小国的目的都是一个：保障和平，表决程序问题不应妨碍达到这个目的。

斯大林问，斯退丁纽斯所讲的提案和12月5日总统信件中所说的相比较，有什么新东西？

罗斯福回答，这个提案里讲的还是那些东西，只是文字上做了些不大的改动。

斯大林问有哪些文字上的改动。

斯退丁纽斯说明有哪些文字上的修改。

莫洛托夫说，苏联代表团同样十分重视提出的这些问题，想研究一下斯退丁纽斯的提案。因此，他建议这个问题推迟到明天讨论。

丘吉尔说，他同意这一点。研究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要匆匆忙忙。问题可以推迟到明天讨论。他，丘吉尔，对敦巴顿橡树林最初拟定的草案不十分满意，因为他对于这个提案是否充分考虑到三大国的实际情况没有把握。研究了总统的新提案之后，他的疑虑消除了，至少在涉及到不列颠联邦和不列颠帝国的方面是如此。这也包括英帝国的自

治领在内。

丘吉尔承认，是否能把和平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取决于三大国的友好和协作。但是，如果我们不规定小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就把自己置于令人怀疑的境地，而且也违背了我们的初衷。这样，看来似乎是三大国企图主宰世界。可事实上他们是想为世界效力，拯救世界，使它不再遭受这次战争中落到世界大多数人民头上的灾难。正因为如此，三大国应该对于自己愿意服从共同事业的利益作出某种表示。

自然，他，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新提案对不列颠联邦的前途有何影响。他想举一个使英国感到为难的具体例子——香港。如果总统的提案得到采纳，中国要求归还香港，那么大不列颠有权阐明和维护自己的立场，但大不列颠不能参加对美国文件最后列举的五个问题的表决。中国方面有权充分阐述自己对香港问题的观点，安理会则要在没有不列颠政府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决定这个问题。

斯大林问，埃及是否将成为联大成员国？

丘吉尔回答，埃及将是联大成员国，但不是安理会成员国。

斯大林说，他想举另一个例子——埃及领土上的苏伊士运河。

丘吉尔要求先研究他的例子。假定说，不列颠政府不同意研究第三条提及的某个问题，因为它认为这个问题触犯了不列颠帝国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不列颠政府稳操胜券，因为根据第三条规定，每个常任理事国有权对安理会的行动行使否决权。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就争端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也是不公正的。

对于埃及也同样如此。如果埃及提出苏伊士运河的问题来反对英国人，他，丘吉尔，将毫无顾虑地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不列颠的利益受到第三条中否决权的保护。他还认为，假如阿根廷向合众国提出要求，那合众国要遵守规定的审议程序，但是它将有权反对和否决安理会的决议。它可以运用门罗主义。

罗斯福说，在德黑兰宣言中，三大国曾经声明决心承担责任建立起为全世界人民所欢迎的和平。

丘吉尔说，根据他刚才讲到的原因，不列颠政府不反对通过合众国的建议。丘吉尔认为，最好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三个大国企图主宰整个世界，而不让其它国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斯大林说，首先他请求把斯退丁纽斯宣读的文件交给苏联代表团，因为光靠听是难以研究文件中提出的建议的。他，斯大林，觉得，这个文件是对总统建议的一个注解。

谈到对美国在会上提出的建议如何解释时，斯大林说，他认为，敦巴顿橡树林会议通过的决议，其宗旨并非仅仅是保障各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值钱的。没有人否定这种权利。假如某个国家提出一个对它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之所以提出，并不只是为了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想求得问题的解决，那么事情就要严重得多了。在场的人中没有哪一个会对各个国家在联合国中发表意见的权利提出异议。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看来，丘吉尔认为，如果中国把香港问题提出来，它仅仅是希望能发表一下意见。不对。中国要求解决问题。同样，如果埃及提出归还苏伊士运河问题，那么它不会只满足于就此发表一番自己的意见。埃及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谈的不是简单地保障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远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

丘吉尔刚才谈到自己的担心，怕人们会以为三大国想统治世界。但是谁想统治世界呢？是合众国吗？不是，它不想这样。（总统发出笑声并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是英国吗？也不是。（丘吉尔也笑着做了个富有表情的手势。）这样，两个大国都不在怀疑之列了。剩下一个第三国——苏联。那么，是苏联想统治世界？（全体大笑。）或者，可能是中国想统治世界？（全体大笑。）显然，根本谈不上谁要统治世界。他的朋友丘吉尔也说不出有哪一个大国想统治世界。

丘吉尔插话说，当然，他自己并不相信三个盟国中有谁想要统治世界。不过，盟国的地位这么强大，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性措施，别的国家可能会那样想。

斯大林继续说，现在两个大国已经接受了一个国际安全组织的章程。这个章程据丘吉尔的看法不会使盟国遭到企图统治世界的指责。第三个大国对这个章程还未表示同意。但他将研究斯退丁纽斯的建议，那时他可能会更清楚问题的所在。不过，他觉得，目前盟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让各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三大国是否想要统治世界重要得多。

丘吉尔刚才说，既使采纳了美国建议，也没有理由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利情况。不错，只要我们都活着，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不会允许我们之间发生危险的分歧。我们不会答应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新的侵略。但是过十年或者也许更短一点的时间，我们就都不在了。将出现一代新人，他们没有经受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和我们不同。那时会怎样呢？我们的目标好象是要保障今后至少五十年的和平吧。也许，他——斯大林——的这种想法大天真了？

维护持久和平最为重要的条件是三大国的一致。如果能保持这种一致，德国的危险就并不可怕。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三大国间的统一战线，这里还应加上法国和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安全组织未来的章程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应该尽可能多想办法防止三大国之间今后发生分歧。应该拟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三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章程。这是主要任务。

接着在比较具体地谈到安理会投票问题时，斯大林对他没来得及研究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文件的全部细节向与会并表示歉意。他由于一些别的事情，非常忙，所以希望英国和美国代表团能够谅解。

罗斯福和丘吉尔做手势并高声表示，他们十分清楚斯大林在忙什么。

斯大林继续说，据他理解，所有可能交由安理会审议的冲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须要采取经济、政治、军事或其他某种制裁手段加以解决的争端。第二类是可以通过和平方法解决，而不必采取制裁手段的争端。他的理解是否正确？

罗斯福和丘吉尔回答说，对。

斯大林接着说，据他理解，在讨论第一类争端时要有辩论的自由，但通过决议必须要全体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参加投票，也就是说对争端当事国也不应拒之门外。至于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的第二类争端，则采用另一种程序：这时争端当事国（其中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参加投票。斯大林问，他对于规定的理解是否正确？

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肯定，斯大林的理解完全正确。

最后，**斯大林**说，有人责备苏联过分强调安理会的投票问题。有人指责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作。不错，苏联确实十分重视投票程序问题，因为苏联最关心安理会将通过什么样的决议。而一切决议都要靠投票表决才能通过。可以争它一百年，而什么也不能解决。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做出决定，其实也不只是对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稍微谈谈今天举的例子。如果中国要求归还香港或者埃及要收回苏伊士运河，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进行表决。斯大林可以向自己的朋友丘吉尔担保，中国和埃及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是孤立的，他们在国际组织中会有朋友，这就直接关系到投票问题。

丘吉尔宣称，如果上述的国家要求满足它们的要求，那么大不列颠就要说：“不行”。国际组织的权力不能被利用来反对三个大国。

斯大林问，果真如此吗？

艾登回答说，各国可以讲话，可以争论，但没有三个主要国家的同意不能通过决议。

斯大林再一次问，果真如此吗？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退丁纽斯说，没有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安理会不得采取任何经济制裁。

莫洛托夫问，安理会提出的各种建议是否也是如此。

丘吉尔回答说，这里只包括美国文件最后那五条中所提到的建议。建立国际安全组织，并不是取消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外交程序仍然继续存在。过分夸大（安理会的）权力或者滥用这种权力，或是挑起一些会引起三大国发生分歧的问题，都是不对的。

斯大林说，还有另一种危险。他的同事们不会忘记，在俄芬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曾利用国联反对俄国人，孤立苏联，并且动员起所有国家把它开除出国联。应设法使类似情况今后不再重演。

艾登说，倘若采纳美国的建议，就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了。

丘吉尔也申明，那样就可以排除这种危险。

莫洛托夫说，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罗斯福说，类似斯大林元帅提到的那种情况不会重演。因为开除一个成员国需要得到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斯大林说，如果采纳美国建议后，连开除一个成员国都不可能，那总还是可以动员舆论来反对某个成员国的。

丘吉尔回答说，他可以假定会有广泛动员舆论来反对某个成员国的情况，不过那时外交可以发挥作用嘛。丘吉尔不认为总统会要反对英国或者支持反对英国的某种行为。他相信，总统会希望制止这种行为。丘吉尔也相信，斯大林元帅不会预先不同英国对话就采取行动来反对英国。他，丘吉尔，相信，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解决争端的途径。至少，他可以替他自己担保。

斯大林表示，他也可以为自己担保。（半开玩笑地）可是，也许马伊斯基会攻击英国吧？

罗斯福说，大国的一致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他，罗斯福，认为美国的建议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倘若大国之间不幸发生什么分歧，那不管表决程序如何，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在联合国里讨论这些分歧。美国政府认为，大国允许安理会上进行自由辩论，正好向全世界表明它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并建议明天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丘吉尔问，现在是否能讨论波兰问题？

斯大林和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提议。

罗斯福说，合众国离波兰很远，所以他，罗斯福，请其它两国的代表讲讲自己的想法。在美国有五、六百万波兰裔的居民。他，罗斯福，现在的立场，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大多数波兰人的立场同他在德黑兰说过的一样。他，罗斯福，赞成寇松线。实际上，多数波兰人也同意这条线。不过，波兰人同中国人一样，总是非常担心“不要丢面子”。

斯大林问，我们说的是哪些波兰人？是真正的波兰人还是指波兰侨民？真正的波兰人是在波兰。

罗斯福回答说，凡是波兰人都希望得到点什么好挽回自己的“面子”。如果苏联政府肯给波兰人留“面子”的话，他做为总统的处境就会好些。最好能研究一下在寇松线南段对波兰人作些让步的问题。他，罗斯福，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加以考虑。

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是波兰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罗斯福认为，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美国承认卢布林政府，因为美国人民觉得卢布林政府仅仅代表波兰人民的一小部分。据他了解，美国人民希望看到波兰有一个民族统一政府，要有波兰所有党派的代表参加，包括工人党或共产党、农民党、社会党、民族民主党和其它党派。他，罗斯福，本人并不认识卢布林政府或伦敦波兰政府中的任何成员。他只认识一个米科拉伊奇克。这个人在去华盛顿时给罗斯福留下的印象是个

正派人。

他，罗斯福，认为，重要的是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全国的人民群众并得到他们拥护的波兰政府。这也可能只是临时政府。建立这样的政府可以有许多办法，选择哪种办法并不重要。他，罗斯福，建议由为数不多的波兰优秀人物组成一个总统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组建波兰临时政府。这就是他从三千里以外的美国带来的唯一的建议。总统补充说，当然，我们希望波兰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

斯大林说，波兰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所有盟国保持友好关系。

罗斯福说，他想听听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对他的建议有什么意见。波兰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有助于盟国的事业。

丘吉尔说，他受权宣布，英国政府赞同总统的建议。丘吉尔在国会和其它场合一直公开表示，英国政府打算承认苏联政府解释的寇松线，也就是把里沃夫划归苏联。因为这个，他和艾登在议会和保守党内曾遭到许多批评。但是他向来认为，在俄国为捍卫自己反对德国侵略而经受了这场悲剧之后，在俄国为解放波兰而作出种种努力之后，俄国人要求里沃夫和寇松线就不是基于实力，而是基于权利了。丘吉直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但丘吉尔对波兰主权问题，对波兰的自由与独立比对确定波兰边界要更为关切。他希望波兰人有一个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祖国。他曾几次听到斯大林元帅极为坚定地宣布过同一个目标。由于丘吉尔对斯大林元帅关于波兰的主权与独立的声明向来是信任的，所以，他不认为边界问题非常重要。

大不列颠在波兰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英国参战是为了保卫波兰免遭德国的侵略，英国之所以关心波兰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英国的荣誉。英国任何时候决不会对一个不能保证波兰自己当家作主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但丘吉尔同时又声明：波兰的自由不应意味着允许波兰对苏联抱有敌意或是搞反苏阴谋。丘吉尔说，如果波兰对苏联抱有敌意我

们就不会要求给波兰自由了。

丘吉尔表示希望，对波兰问题不采取实际措施，与会者就不离开这里。目前存在着两个波兰政府，盟国对这两个政府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丘吉尔，同伦敦目前这个波兰政府中的成员并没有直接接触。尽管英国政府承认伦敦波兰政府，但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有会见这个政府的成员的必要。不过，米科拉伊奇克、罗梅尔和格拉布斯基都是有头脑的正直的人，英国政府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

丘吉尔问，能否在这里先建立一个如总统所说的那样的波兰政府，它要一直存在到波兰人民能够自由地选举出一个将为苏、英、美以及目前承认伦敦波兰政府的其它联合国家所承认的政府。丘吉尔认为，建立一个总统说的那样的机构，可以为波兰人民制定自己的宪法并选举自己的行政机构铺平道路。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就是在通向中欧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丘吉尔支持总统的建议。丘吉尔补充道，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证红军的交通线。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如刚才丘吉尔所说，对英国政府来讲是一个荣誉问题。斯大林理解这一点。从他这方面来看，他要说，波兰问题对于俄国人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其所以是荣誉问题，因为俄国人过去曾对波兰犯过不少过错。苏联政府力求弥补这些过错。其所以是安全问题，因为苏维埃国家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相关。

问题不仅在于波兰是同我们毗邻的国家，这点当然也并不无意义，不过问题的实质却要深得多。历史上，波兰从来就是敌人借以进攻俄国的走廊。只要回顾一下最近三十年的情况就够了：这个期间德国人曾两次通过波兰进攻我国。为什么敌人至今能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波兰呢？首先因为波兰是个弱国。波兰走廊光靠俄国的力量机械地从外部加以封锁是不行的，只有从内部依靠波兰自己的力量才可能牢牢地把它关住。为此就得让波兰强大起来。这就是苏联关心建立一个强大、

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原因。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在波兰问题上对沙皇政府的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变，原因就在这里。大家知道，沙皇政府是想同化波兰。苏联政府则彻底改变了这种不人道的政策，走上了对波兰友好并保证其独立的道路。这正好是俄国为什么赞成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和自由的波兰的原因所在。

现在谈谈在讨论中涉及到的有分歧的一些具体问题。

首先谈谈寇松线。他，斯大林，应当指出，寇松线并不是俄国人想出来的。寇松线的发明者是参加 1919 年巴黎会议的寇松、克里孟梭和美国人。俄国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寇松线是无视俄国人的愿望，根据人种方面的资料确定的。列宁不同意这条线。他不想把按寇松线应归属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和比亚威斯托克州划给波兰。

苏联政府已经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了。你们还希望什么呢？是要我们还不如寇松和克里孟梭那样替俄国着想吗？这样你们要使我们大为丢脸的。如果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乌克兰人会怎么说？恐怕，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维护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利益上，原来还不如寇松和克里孟梭那样可靠。那时，他，斯大林，有什么脸回莫斯科呢？不，还不如让对德战争再继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应该能够从西边用德国领土来补偿波兰。

米科拉伊奇克在莫斯科时曾问斯大林，在波兰西部，苏联政府承认怎样一条边界线？当他听说我们承认以尼斯河一线为波兰西部边界时，他非常高兴。要解释一下，尼斯河有两条，一条偏东，在布累斯劳（今弗罗茨瓦夫——译者）旁边，另一条偏西。斯大林认为，波兰西部边界应以西尼斯河为界。他请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此给予支持。

另一个问题，斯大林想说几句的，就是建立波兰政府问题。丘吉尔建议在这里，在会上建立一个波兰政府；斯大林觉得，丘吉尔失言了：怎么能在没有波兰人参加的情况下建立波兰政府呢？许多人都称

他，斯大林，是独裁者，认为他不民主，不过他还有足够的民主精神，而不致于在没有波兰人参加的情况下试图建立一个波兰政府。波兰政府只能在有波兰人参加并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建立。

去年秋天本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当时丘吉尔到了莫斯科并带去了米科拉伊奇克、格拉布斯基和罗梅尔。那时还邀请了卢布林政府的代表到莫斯科。在伦敦的波兰人和卢布林的波兰人之间安排了会谈。甚至还拟定了几点协议。丘吉尔想必记得这一点。然后米科拉伊奇克动身回伦敦，准备尽快返回莫斯科完成组建波兰政府的各项步骤。但米科拉伊奇克并没有回来，反倒因为坚持同卢布林政府达成的协议而被逐出了伦敦的波兰政府。目前这个以阿尔齐舍夫斯基为首、由拉奇凯维奇领导的伦敦波兰政府反对同卢布林政府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这个政府敌视这种协商。伦敦的波兰人称卢布林政府是一帮罪犯和匪徒。自然，过去的卢布林政府，即现在的华沙政府也不肯示弱，它把伦敦的波兰人列为叛徒和卖国贼。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他们联合起来呢？他，斯大林，可回答不出。

华沙政府的领导人——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里利亚-日米耶尔斯基——对于同伦敦波兰政府搞什么联合连听都不愿听。斯大林曾问华沙的波兰人，他们可以作什么让步？回答是：在伦敦的波兰人中只有格拉布斯基和热利戈夫斯基，华沙的波兰人可以勉强与之共事，至于让米科拉伊奇克出任总理之类的话，他们听都不要听。斯大林准备作各种尝试來使波兰人联合起来，但这些尝试一定得有成功的希望。怎么办呢？是不是把华沙的波兰人请到这里來？或者，邀请他们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同他们谈一谈？

在结束发言时，斯大林想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他已经是以军人的身份来讲话了。作为军人，他对被红军解放了的国家的政府有什么要求呢？他只有一点要求：就是这个政府要保证红军后方的秩序和安定，防止在我们战线的背后发生内战。归根结底，对军人来

说，这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很无所谓的，重要的只是不要有人朝他们背后开枪。波兰有一个华沙政府。波兰国内还有一些伦敦政府的代理人，他们同称为“内部反抗力量”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作为军人，斯大林把这两种人的活动作了比较，结果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华沙政府在保证红军后方的秩序与安定方面相当称职，而所谓“内部反抗力量”对我们则专搞破坏。这股“力量”已杀害了二百一十二名红军的军人。他们袭击我们的仓库，夺取武器。他们违反我们关于在红军解放的区域内进行电台登记的命令。这个“内部反抗力量”破坏一切战时的法令。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斯大林要直接了当地宣布，如果这个“力量”还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

总之，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华沙政府是有益的，而伦敦政府及其在波兰国内的代理人是有害的。不言而喻，军人总是支持能保证他们后方秩序和安定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红军的胜利。后方的安定和秩序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不仅军人，就连非军事人员也都懂得。事情就是这样。

罗斯福建议，波兰问题明天再讨论。

丘吉尔说，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情报来源不同。英国政府认为卢布林政府连三分之一的波兰人民都代表不了。英国政府的看法就是这样。当然，这里可能有错误。对于从波兰来的人每次讲的话自然也不能都相信。英国政府希望能达成协议，因为它担心波兰地下军队同卢布林政府的冲突会导致流血和大规模逮捕。英国政府承认，在红军后方进行袭击是不能容许的。不过英国政府不能认为，卢布林政府有什么根据可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政府。至少，根据英国政府所得到的情报来判断是如此。当然啰，这些情报也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罗斯福说，五个世纪以来，波兰问题都使世界感到头痛。

丘吉尔说，应该尽力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类感到头痛。

斯大林回答说，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里瓦基亚宫第四次会议

1945年2月7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10分

结束：当地时间20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克尔爵士	维辛斯基
贝尔纳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哈里曼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马修斯	杰布	葛罗米柯
希斯	威尔逊	巴甫洛夫
波伦	狄克逊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说，昨天听取了斯大林元帅就波兰问题所作的发言。 他，罗斯福，最感兴趣的是波兰政府问题。这样或那样一条波兰边界线，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他对波兰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或者连续性不感兴趣，因为人所共知，有几年波兰根本不存在任何政府。然而，他认为，在波兰人尚无可能实行全国自由选举之前，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点新东西，给

这个令人烦闷的问题吹来一些新鲜空气。

斯大林说，一个半小时之前，他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波兰找来两个代表卢布林政府的人，从另一个阵营的社会人士中（即从总统在信中提出的五个人当中）找来两个代表，在这四个波兰人在场的情况下，解决成立波兰新政府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新政府就应该在波兰组织自由选举。

此外，罗斯福在信中还希望能有波兰某些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波兰政府。信中提出米科拉伊奇克和格拉布斯基。斯大林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罗斯福信中提到的、而且据罗斯福所知又是在波兰的那些人？如果能找到这些人，那就可以弄清楚他们什么时候能来到。如果文岑托斯·维托斯或者萨皮耶加到了，那事情就好办了。但他不知道他们的地址，所以担心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们不可能等到波兰人来克里米亚。苏联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响应罗斯福建议的草案。这个草案还没打印出来。因此他建议先讨论一个别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敦巴顿橡树林会议的问题。

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同意。

（接着**苏联代表团**对斯退丁纽斯的报告和丘吉尔就成立国际安全组织的解释表示满意。苏联代表团发表了意见，认为战后三国在保证安全方面是能够达到一致的，还认为在敦巴顿橡树林会议上拟出的建议以及罗斯福的补充建议能够作为大小国家将来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基础。

在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接受的同时，苏联代表团又回到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提出但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上来，即让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发起国资格参加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苏联代表团这次提出问题的形式和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时不同，但它建议，苏联的三个或至少两个加盟共和国（这里指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应作为国际组织的发起国。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至少其中的两个，

应予承认为发起国。

罗斯福说，他听到苏联政府同意他的建议感到荣幸。由此可见，事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中，应邀请哪些国家参加国际组织的成立大会。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尽快地举行。人们希望会议能在三月底召开。各联合国家的代表一个月后会晤实际上是可能的。罗斯福本人认为，越是尽快作出召开会议的决定，就越能尽早着手研究苏联方面提出的令人很感兴趣的问题，这个组织建立后就可以讨论第一批成员国的问题了。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是否在邀请对德作战国家的同时，也应该邀请已和德国断交但没有对德宣战的“协同国家”如巴拉圭、秘鲁、乌拉圭、智利，埃及、冰岛参加会议？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体制和传统不同，例如，不列颠帝国是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组成的。苏联则有很多加盟共和国。美国相反，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通用一种语言。美国按照宪法规定只能有一个外交部长。因为，苏方提出的问题须要研究。这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大国是否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如果我们给予某个国家一票以上的表决权，那我们就违反了每个成员国只应有一票表决权的规定。罗斯福建议委托外长们讨论第一批会员国的问题以及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问题。

丘吉尔表示，他要热情地感谢苏联政府，感谢它为支持在敦巴顿橡树林确定的共同观点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丘吉尔相信，三大国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将使所有善于思考的人们感到高兴。

我们的俄国盟友以新的形式提出了联合国成员国数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感到，在这方面朝着达成协议前进了很大一步。丘吉尔同意，

美国和不列颠帝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不列颠帝国有自治领。这些自治领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曾经在国际安全组织中起了显著的作用。那个国际安全组织在这次大战前瓦解了。所有自治领都曾为和平和民主进步事业尽过力。尽管它们了解英国力量薄弱，但都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对德战争。英国当时没有什么办法能迫使这些自治领跟着自己走，也没有权利号召它们这样做，但所有自治领都自愿地参战了。

他，丘吉尔，怀着深切的同情听取了苏联政府的建议。他深受感动，他想到伟大的俄国正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流血牺牲，战胜强暴。丘吉尔认为，象俄国这样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如果只有一票表决权，那它恐怕有理由对不列颠联邦侧目而视，因为它的人口大大超过了不列颠帝国的白种居民。

如果总统对于苏联代表团建议的回答不能说是否定的，那丘吉尔会感到高兴。至于丘吉尔本人，他不能超越他的授权范围。他希望能有时间和外交大臣以及伦敦的战时内阁交换一下对苏联建议的看法。因此，丘吉尔请求给予谅解，他不能代表不列颠政府立即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作出回答。

罗斯福重申了自己的建议，即由外长们讨论苏联加盟共和国问题、会议地点和时间问题，以及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在敦巴顿橡树林曾决定尽快地召开这次会议。从国内政局来看，尽快开会对罗斯福也是重要的。

丘吉尔表示，如果三位外长能研究总统提出的三点，他将感到高兴。至于联合国会议，丘吉尔怀疑能否在3月份召开。3月份将是各条战线上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投入战斗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各国的国内问题也很复杂。比如，英国正在感到住宅不足，还要支撑对前线的供应。此外，英国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国会，它占去了大臣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交大臣也不例外。2月份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和欧洲的局势允许在3月份召开会议

吗？即使会议在3月份能召并，各国代表团能否由真正的领导人物率领参加？是不是把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时间推迟一点为好？

罗斯福解释道，现在谈的不是召开联合国大会，而是召开这个国际安全组织的成立会议。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大约得过三至六个月后才能召开。

丘吉尔说，有些应向会议派出代表的国家在会议召开时仍将处于德国人的压迫之下。不清楚这些国家的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人民。另一些国家那时还将忍饥挨饿，经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说到这里，丘吉尔举出了荷兰和法国。同这些不幸的国家同时参加会议的，却还有一些根本没有遭受战争痛苦、没有参战的国家。丘吉尔认为，往这种情况下会议很容易开得乱七八糟。有些国家的人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另一些国家的人却在安然自在地讨论未来的问题。根据上述种种估计，丘吉尔预感到召开会议时将会遇到困难，至少从大不列颠的情况来看是如此。

罗斯福说，敦巴顿橡树林会议决定要尽快建立国际组织。罗斯福同首相一样，也有内政上的困难。但是如果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计划能在战争期间得以实现的话，他将比较容易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

丘吉尔表示，大不列颠宪法对英国的立场是有影响的。英国可能很快举行议会选举，如果本届不列颠政府继续执政，那它就得使一个新议会跟着政府走。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当然，大不列颠将尽一切可能来满足罗斯福的愿望。不过丘吉尔仍认为有必要直言不讳地讲明白，据他预料，如果实现总统的愿望，将会产生一些实际困难。关于首批成员国问题，假如一直拖到联合国会议召开时去解决，那丘告尔本人是会感到遗憾的。

罗斯福说，他想重申自己先前的建议，即由外长们去解决联合国成员国问题，开会的地点和日期问题，而后由他们向三国政府首脑汇

报自己的工作结果。

斯大林表示同意这一点。

丘吉尔不反对让三位外长讨论这个问题，但同时强调这绝不是技术性质的问题。丘吉尔对他们的讨论能否取得成效没有信心，但鉴于总统的请求，他准备接受总统的建议。

斯大林表示，三国外长可以在一起先研究研究，然后将自己的工作结果向政府首脑汇报。

（接着**苏联代表团**就波兰问题提出以下提案：

“1.认为波兰东部应以寇松线为边界线，并在某些地区作出有利于波兰的五至六公里的外移。

2.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线应从什切青市（属于波兰人）起，沿奥得河向南，再沿尼斯河（西尼斯河）下行。

3.认为以波兰流亡者中某些民主人士来扩大波兰临时政府是适宜的。

4.认为同盟国政府承认扩大后的波兰临时政府是适宜的。

5.认为应该由按第三项办法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在最短期间内组织波兰居民进行普选，以建立波兰常设的国家管理机关。

6.委托维·米·莫洛托夫、哈里曼先生和克尔先生同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一起讨论扩大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交三国政府审议，

罗斯福表示，苏联的提案有一定的进步。他希望能与斯退丁纽斯一起研究一下这项提案。现在他只能指出，他不喜欢苏联提案中“波兰流亡者”的提法。如他昨天所说的，除米科拉伊奇克外，其他任何流亡者罗斯福都不认识。其次他认为，完全不必要非吸收流亡人士参加波兰政府不可。在波兰国内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

斯大林指出，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

丘吉尔说，是否用“流亡者”这个词，他同罗斯福一样，是有疑

问的。原因是，这个词最初用于法国革命时期，它是指被法国人民驱逐出国的那部分人。现在在国外的波兰人不是被波兰人民赶出去的，他们是被希特勒赶出去的。丘吉尔建议用“在国外的波兰人”代替“流亡者”这个词。

斯大林同意丘吉尔的建议。

丘吉尔接着指出，提案的第二项谈到尼斯河。在波兰边界西移的问题上，不列颠政府想提出这样一个保留意见：波兰只应当有权取得它希望得到并且有能力管理的那么多领土。要是给波兰鹅填满了德国的美味食品，以致于消化不良而死，那就未必合适。此外，英国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一想到需要强制迁出大批德国人就感到害怕，丘吉尔本人对这种前景倒毫不觉得可怕。上次世界大战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迁移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说，在红军占领的那部分德国地区几乎没有德国人了。

丘吉尔说道，这自然减轻了工作负担。此外，有六百万到七百万德国人已被打死，到战争结束时大约至少还得死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德国人。

斯大林回答说，丘吉尔的数字大体上是正确的。

丘吉尔声明说，他绝不是要建议停止消灭德国人。

丘吉尔建议往苏联草案第三项中加上“以及波兰境内的”几个字。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以接受的。

丘吉尔说，应当深入考虑一下苏联的提案，然后到下一次会议上再讨论。他认为这个提案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里瓦基亚宫第五次会议

1945年2月8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15分
结束：当地时间19点4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克尔爵士	维辛斯基
贝尔纳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哈里曼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马修斯	杰布	葛罗米柯
希斯	威尔逊	巴甫洛夫
波伦	狄克逊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说，正如他所料，外长们顺利地结束了交给他们的工作。他建议由艾登报告他们取得的结果。

艾登报告说，外长们讨论了召开会议的日期、国际组织的成员、给予两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发起国权利等问题，还讨论了哪些国家应被邀请参加成立大会。决定建议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通过了一项初步的决定：邀请所有联合国家，即1945年2月某日截止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参加会议。会上要确定这个国际组

织的第一批成员国名单。那时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代表将支持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作为国际组织的第一批成员。有关邀请的一切细节已委托专门的小组委员会进行研究。

斯大林说，他有一份对德宣战国家的名单。是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将成为联会国的成员？其中有十个国家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

罗斯福回答说，有几个国家非常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暂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由于国内天主教的影响很厉害，没有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应当看到，那些没有同苏联建交的国家曾与苏联一道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大西洋城会议。

斯大林指出，同那些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是难以建立国际安全的。

罗斯福说，邀请这些国家参加会议将是迫使它们同苏联建交的最好办法。

接着罗斯福谈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据他说是有一段来历的。三年前，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劝南美洲几个共和国不要对德宣战，而只是同德国断交。这些国家听了美国的劝告。后来它们对美国帮助很大（例如，供给美国原料）。这些国家的名声是好的。一个月前罗斯福给六个南美国家的总统写了信，说如果他们希望被邀参加会议，就得对德宣战。厄瓜多尔已经这样做了，但它还没来得及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巴拉圭再过十天就对德宣战。不久秘鲁和委内瑞拉也会这样做。过去这些国家采纳了美国政府的主意，尽管那个主意，说句老实话，是错误的。在这之后如不邀请它们参加会议，美国政府将过意不去。

斯大林问，阿根廷的情况怎么样？

罗斯福回答，在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名单上并没有阿根廷。

斯大林说，要知道，阿根廷也同德国断交了。

罗斯福指出，阿根廷并没有被承认是一个联合国家。

斯大林说，他想请大家注意，如果被邀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宣战国，而且还有“协同国家”，那么真正对德作战的国家同在战争期间摇摆不定、投机取巧的国家并排坐在一起，是会感到委屈的。

丘吉尔说，据他想，这一类国家在被邀请参加会议之前必须对德宣战。他同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坐观胜负，扮演了十分可悲的角色。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如果再有一批国家对德宣战，也会使德国感到苦恼的。其他敌国也会看到，全世界都在对它们作战，这对它们会有强烈的影响。

罗斯福指出，他想在被邀国家名单中加上冰岛。

丘吉尔说，王国政府觉得自己对埃及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埃及曾两次表示对德、意宣战的愿望，但不列颠政府劝埃及不要这样做。因为埃及保持中立可以防止开罗遭到空袭。除此而外，从各种观点来看，埃及保持中立对英国人都是有利的。当敌人距离亚历山大港三十海里的时候，埃及军队保卫了桥梁和运输线，从而帮助了盟国。埃及保持中立比它对德、意宣战更有好处。当然，如果现在埃及想宣战，不列颠政府是不会反对的。

在美国都还没有参战时，冰岛也起过有益的作用。冰岛同意美军开进自己的国家，这样才结束了自己的中立地位，冰岛保证了盟军的交通线。

丘吉尔认为，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国家宣战，那它们有理由参加会议。同盟国应当给它们这种机会。丘吉尔想知道一下是否打算让3月1日以前宣战的所有国家都参加会议？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丘吉尔说，由于爱尔兰那里有德国和日本的公使团，被邀国家名单中就没有它。另一方面，他，丘吉尔，却要主张邀请土耳其，尽管这个建议可能不会得到普遍的赞同。土耳其还是在战争开始以前，在很危险的时候就同英国结了盟。战争开始后，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军队

的装备不够好，不足以应付现代化战争。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土耳其的立场都是友好的，有益的。土耳其人甚至至提议向英国人提供援助，不过英国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丘吉尔提出问题：应该不应该给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

斯大林回答，如果土耳其在2月底以前对德宣战，那么应该邀请它参加会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同意。

罗斯福说，丹麦在一昼夜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国王被俘，国会被取缔。丹麦现在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只有一个人不承认丹麦新政府，他声明他有权代表丹麦。这个人就是丹麦驻华盛顿公使。他无法对德宣战，但是他申明不同意德国人建立的丹麦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丹麦怎么办？毫无疑问，如果丹麦人是自由的，那他们会站在盟国这一边。

丘吉尔问，丹麦人承认了冰岛的独立吗？

斯大林回答没有。

丘吉尔不认为，冰岛和丹麦之间会出现麻烦。他同意斯大林元帅和总统的意见，所有在2月底以前宣战的国家都应该允许参加会议。在丹麦将来有可能代表自己说话时，它将参加这个安全组织。

罗斯福提议批准外长们的整个报告，只做一点修正，说明凡于3月1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联合国家都将被邀参加会议。罗斯福说，如果土耳其3月1日前向共同敌人宣战，可以把它也列入这个名单。

斯大林问，我们的会议对于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3月1日前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持什么态度？

罗斯福指出，外长决议中的这一条已经通过了，就是说在联合国会议上，三大国将提议把苏联的两个共和国列为发起国。

丘吉尔指出，如果邀请所有对战争的胜利几乎毫无贡献，只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才宣战的小国参加会议，而同时却拖延邀请苏联的两

个加盟兵和国，那他觉得是不大合逻辑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蒙受的牺牲是人所共知的。他，丘吉尔，以为如果这两个共和国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就应当邀请它们。

斯大林说，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将来会议召开了，会上提出邀请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建议，但有人会站起来说，它们没有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所以最好能让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就签署这个宣言。不然的话，怎么好推荐它们呢？他不想使总统为难，不过仍想请总统解释一下，问题在哪里？

罗斯福回答，这是个技术性问题，但却很重要。问题在于要给苏联三票表决权。

斯大林问，如果乌克兰、白俄罗斯在3月1日以前不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会不会妨碍邀请它们？

罗斯福回答，不妨碍。

斯大林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他撤回自己的建议。他只希望在外长决议的文本中加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的名称。

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同意。

有关敦巴顿橡树林会议的问题到此结束，罗斯福转到波兰问题。

丘吉尔说，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先声明一点，他研究了昨天外长会议的结果，表示赞同。

罗斯福指出，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美国代表团对苏联提案的第一点没有反对意见。美国代表团还同意用德国的领土，即科尼斯堡以南的东普鲁士和直到奥德河的上西里西亚地区来补偿波兰。然而罗斯福觉得，把波兰边界移到西尼斯河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至于谈到波兰政府问题，罗斯福想提议授权苏联外长和英美驻苏大使在莫斯科同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萨皮耶加，维托斯、米科拉伊奇克和格拉布斯基举行会谈，研究在下列基础上建立新政府的问题，即首先成立一个三人的总统委员会，可以由贝鲁特、格拉布

斯基和萨皮耶加组成。总统委员会将代表波兰总统行使权力。

这个总统委员会将组建由华沙现政府中人士及波兰国内外民主人士组成的政府。这样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要保证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立宪会议再选出永久性的波兰政府。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立后，我们三国政府将予以承认。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打算取消伦敦政府？

丘吉尔和罗斯福作了肯定的回答。

丘吉尔说，建立起临时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后，不列颠政府就将撤销对伦敦的波兰政府的承认，并向新政府派驻大使。

斯大林问，在这之后，现在为伦敦的波兰政府掌管的国家财产，是仍留在阿尔齐舍夫斯基手里，还是转交给波兰新政府？

罗斯福回答，在国外的波兰财产自动地转归波兰新政府所有。

丘吉尔指出，法律上该怎样办他不熟悉，但他认为总统的意见是对的。

随后，丘吉尔表示，不列颠代表团就波兰问题拟定了一份文件，提出两个方案以供选择。文件已交给俄国朋友。但因为讨论是根据总统的建议开始的，所以丘吉尔也准备就这样辩论下去。

丘吉尔说，他对罗斯福的建议有些修正意见。他认为会议已进行到了关键时刻。事情关系到一个全世界都在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就这样分手，各自继续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那么谁都会明白，在以英美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将在全世界造成非常可悲的后果，给我们的会议打上失败的标记。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对基本事实或者至少是对某些基本事实持有不同的观点。

据不列颠政府掌握的情报来看，卢布林政府即现在的华沙政府还不是能为绝大多数波兰人民所承认的政府。如果我们抛弃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支持卢布林政府，那么可以估计到，这将引起全世界的抗

议，也必将毫无例外地引起所有在国外的波兰人的抗议。

我们那里有一支由在国外的波兰人组成的波兰军队，他们曾勇敢地进行了战斗。丘吉尔不相信这支波兰军队能够与卢布林政府和解。这支波兰军队会把不列颠政府承认卢布林政府并从此撤销对伦敦波兰政府的承认看做是一种背叛行为。

正如苏联政府所了解的那样，他，丘吉尔，不同意伦敦波兰政府的观点，并认为它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不过如果正式承认一年前成立的波兰新政府，必然会招致对不列颠政府的强烈批评。人们将要断言，不列颠政府过去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就完全向苏联作了让步，如今在波兰政府的性质问题上又向苏联屈膝投降。结果，不列颠政府在议会中要受到指责。如果因此引起一场辩论，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并且对盟国之间的团结会产生消极影响。

按照丘吉尔的看法，苏联提案迈的步子不够大。王国政府只有在确信波兰新政府完全能够代表波兰人民的时候，才能放弃自己目前的立场，即撤销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承认波兰新政府。当然，如果在波兰举行全民投票的自由选举，那么不列颠政府的一切困难就都迎刃而解了。不列颠政府会欢迎任何一个通过这样选举产生的波兰政府，并同伦敦的波兰政府断交。但是，不列颠政府怀着极大的不安注视着在实行选举之前的过渡阶段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罗斯福说，作为来自另一半球的客人，他断定所有与会者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在波兰应尽快进行普选。不过罗斯福关心的是，在实行自由选举之前的过渡阶段中波兰将如何管理。

斯大林说，丘吉尔抱怨他缺乏有关波兰的情报，抱怨无法从波兰得到情报。

丘吉尔回答，某些情报他还是有的。

斯大林指出，虽然丘吉尔也掌握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与苏联政府的情报是不相符的。

丘吉尔回答，是这样。

斯大林说，他想，大不列颠和美国在波兰可以有自己的采访人员。随后谈到华沙政府的领导人，他说，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罗利亚-日米耶尔斯基在波兰人民中的威望的确是很高的。这种威望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在沦陷期间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留在德国人占领的华沙，从事过地下工作，后来又转到地上。这一点深受波兰人民的赞扬。而波兰人民自然同情那些在困难时刻同他们患难与共的人们。波兰人民不喜欢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人，因为在沦陷的艰难岁月里，这些人没有在人民中间。应当考虑到人民的这种心理。

使华沙政府领导人获得威信的第二个重要事实是红军的胜利。苏联军队向前挺进，正在解放波兰。这使波兰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波兰人过去是不喜欢俄国人的，因为俄国人曾三次参加瓜分波兰。但是红军的进攻和把波兰人民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完全转变了波兰人的情绪。他们对俄国人的反感消失了。代之而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感情：波兰人因为俄国人追歼德寇，因为波兰人民得到解放而感到高兴。他们对待俄国人出现了友好的态度。

波兰人认为他们正在渡过自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节日。可是波兰人感到奇怪的是，伦敦波兰政府的人却不来参加这个庆典。波兰人民问自己，为什么在节日里他们看到了波兰临时政府的成员，却看不见伦敦的波兰人。这自然会损害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威信。

这就是波兰临时政府成员之所以享有很高威望的两个基本原因。我们能不顾这个事实吗？当然不能，如果我们想考虑人民意志的话。关于华沙政府成员的威信问题，他想说的一些看法，就是这样。

现在谈谈丘吉尔的顾虑，他担心与会者可能达不成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就得分手。这怎么办呢？我们的情报不同，结论不同。是否可以把波兰各派人士召集到这里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或许这会增加我们

对情况的了解？丘吉尔对波兰临时政府不是选举出来的感到不满意。当然最好是有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可是至今因为战争一直未能这样做。斯大林想，在波兰可以进行选举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其实，法国的戴高乐政府也不是选出来的，这个政府包括有各种成分。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仍愿意同戴高乐打交道，和他签订协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对待扩大后的波兰临时政府呢？为什么对波兰的要求要高于法国呢？他相信，如果对待波兰问题不抱成见的话，问题是可以顺利解决的。

情况并不象丘吉尔描绘的那样悲观。只要不过分纠缠于次要的事情，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上，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改组现有的波兰临时政府比完全重新成立一个政府要容易。至于总统委员会的问题，这需要与他们波兰人谈谈。

罗斯福问，什么时候有可能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

斯大林回答，只要前线不出现什么灾难，只要德国人不打败盟国，再过一个月便可以进行选举。而他相信，德国人是打不败盟国的。

丘吉尔表示，举行自由选举自然会使英国人放心。不列颠政府会支持波兰的新政府，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当然，我们不能提出可能妨碍苏军作战的任何要求。应把作战放在首位。但假如过两个月就有可能进行选举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形势，任何人对此也提不出异议了。

罗斯福提议把讨论的问题交给三国外长进行研究。

丘吉尔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他想提一个小问题。如果能够商定三国外长每隔三至四个月轮流在各国首都定期会晤进行磋商，那是非常有益的。

斯大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

罗斯福说，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是斯退丁纽斯还要处理南美洲的事务。所以罗斯福认为，外长会晤可视需要而定，不规定期限。

丘吉尔建议第一次会晤在伦敦举行。

斯大林表示同意。

里瓦基亚宫第六次会议

1945年2月9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15分

结束：当地时间19点5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克尔爵士	维辛斯基
贝尔纳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哈里曼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马修斯	杰布	葛罗米柯
希斯	威尔逊	巴甫洛夫
波伦	狄克逊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请斯退丁纽斯报告三国外长会议情况。

斯退丁纽斯说，他想代表外长们把工作结果简要报告如下。外长们以美国代表团的备忘录为基础，详细地讨论了波兰问题。根据苏联代表团的提议，从这份备忘录中撤销了关于总统委员会的问题。至于有关建立波兰政府的提法，外长们决定继续加以讨论再向政府首脑报告，三外长暂时还未能达成协议。外长会议上还讨论了赔偿问题。

丘吉尔说，是否应先讨论波兰问题。

罗斯福回答同意。

（在阐述自己对美国代表团关于波兰政府问题的备忘录的意见时，**苏联代表团**说，由于它希望尽快达成一致意见，不再拖延，它同意以美国的提案作为基础，但建议作某些修改。苏联代表团提出，美国关于建立波兰政府的提法中，第一句话应该这样措词：“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吸收波兰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加以改组。改组后的政府将称为临时民族政府。”

在这一段的末尾，苏联代表团建议添上“非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党派”一语，这样整句话就成了：“在这次选举中，所有非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都应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

苏联代表团认为还有必要增加下面一句：“当波兰民族统一政府按上述方式建立后，三国政府将予以承认。”最后，苏联代表团建议删去美国建议中的最后一句，即三国驻华沙大使有责任观察并汇报关于进行自由选举的保证的实施情况。理由是：三国派往波兰政府的大使完全可能观察波兰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直接职责。苏联代表团指出，它认为美国的建议如作这样的修改，是可以接受的。）

丘吉尔表示，朝着波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他为此感到高兴。但他想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谈几点一般性意见。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仓促解决。现在要达成协议已经酝酿成熟，不过危险的是会由于过分匆忙而把事情弄糟。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最好再考虑考虑。不错，我们开会的时间只剩四十八个小时了。但丘吉尔不愿意由于会议缺二十四个小时而把事情断送，如果为了作出决定需要二十四个小时的话，那就必须找出这个时间來。有一点不要忘记，如果与会者就波兰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各自分手，那么整个会议将被认为是个失败。

罗斯福提议让斯退丁纽斯结束自己的报告，然后休会半小时来研

究苏联的建议。

丘吉尔再次强调，与会者几乎就要拿到一个珍贵的奖杯了，可不要由于过分匆忙把奖杯打碎。应该有点时间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过丘吉尔并不反对罗斯福的建议。

斯大林也接受罗斯福的建议

斯退丁纽斯继续自己的报告说，现在他谈赔偿问题。美国代表团提出了索取德国赔偿的原则草案。美国草案的第一、二点各代表团一致同意。对于第三点，外长之间达成了折衷方案，那就是：莫斯科赔偿委员会把包括一次提取和每年提供货物的赔偿总额二百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五十给苏联）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

艾登对波兰问题提出保留说，他还未收到伦敦的指示。

苏联代表团说，赔偿应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再根据实物的性质分别提高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然后，斯退丁纽斯谈到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他说，美国代表团建议，在会议召开之前，未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外交途径就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托管问题进行磋商。

丘吉尔（非常激动地）坚决反对讨论这个问题。大不列颠为维护不列颠联邦和不列颠帝国的完整进行了多少年的艰苦斗争。他相信，这个斗争将获得完全的胜利，只要不列颠旗帜飘扬在不列颠王国的领土上空，他绝不肯让哪怕是一小块不列颠土地由四十个国家参加实行拍卖。不列颠帝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因为对未成年民族实行托管的问题而被置于国际法庭的被告席上。

斯退丁纽斯请丘吉尔放心，他说这里指的不是不列颠帝国。

美国代表团希望世界组织在必要时对从敌人手里夺得的领土建立托管。

丘吉尔说，如果谈的是敌人的领土，那他不反对。对这些领土建立托管可能是合适的，

斯退丁纽斯补充说，三国外长会议认为在联合国会议上讨论托管问题是适宜的。

丘吉尔坚持在决议文本中加进一个说明，即讨论托管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涉及不列颠帝国的领土。丘吉尔转向斯大林问道：如果国际组织提出把克里米亚作为国际疗养区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他会作何感想？

斯大林回答，他乐于提供克里米亚作为三大国的会议地点。

斯退丁纽斯说，为研究邀请联合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而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正在继续工作，将在今天向外长们汇报工作结果。

（接着，根据斯退丁纽斯的提议，决定由英国和苏联方面指定人员准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报告。）

丘吉尔指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没有多大的分歧。

斯退丁纽斯说，已通过决议在克里米亚会议结束前就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不管“彼得国王存在什么幻想”。

丘吉尔说，不列颠代表团对铁托—舒巴希奇协议有两个非常宝贵的修正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已经交给俄国朋友。与会者如认为这些修正意见是可行的，那就可以建议舒巴希奇和铁托予以采纳。

斯大林指出，苏方同样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然后，不列颠代表团再提出点什么来。问题就要拖下去，而南斯拉夫的局势仍然不能稳定。

丘吉尔说，铁托在自己国内是一个独裁者。我们可以要求他采纳修正意见。

斯大林回答说，铁托决不是一个独裁者。南斯拉夫的局势仍然不明朗。

艾登说，这里谈的不是要修改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而是舒巴希奇迟早要向铁托提出的两项要求。

斯大林说，英国人提出的修正意见的意思是要吸收那些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而保持了自己声誉的议会成员参加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第二项修正意见建议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通过的立法议案以后应得到立宪会议的批准。实际上苏联代表团同意这些修正意见，这些意见是对的。不过，他认为不应因此而耽误成立新政府。

艾登表示，不列颠政府希望尽快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然后可以建议铁托采纳我们所提的这些修正意见。

斯大林回答同意

丘吉尔也表示同意。

艾登说，舒巴希奇应于二月七日离开伦敦去南斯拉夫。

丘吉尔指出，他是否已经动身，明天就可得到消息。不管怎样，只要天气允许，舒巴希奇就会动身。

斯大林表示，三国首脑在离开克里米亚之前，应建议立即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并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不管彼得的头脑里有些什么幻想。

丘吉尔提议在公报里写进相应的条款。说到这里，丘吉尔问，是否同意以后向铁托提出上述修正意见。

斯大林回答，他不说空话。他向来是说话算数的。

（休息以后）

罗斯福说，他详细地看了苏联代表团有关波兰问题的提案并同英国方面交换了意见。他觉得，现在问题仅仅在于一些词句上的差别。与会者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改组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这句话，使承认伦敦波兰政府的那些政府感到为难。罗斯福希望用“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波兰政府”代替“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

接着，罗斯福说，苏联代表团建议删掉末尾关于我们三国的大使有责任观察波兰进行的自由选举这句话。最好不这样做。说到这里，罗斯福想提醒一下，在美国有六百万波兰人。对他们需要做出某种姿态，使他们确信波兰的选举将是公正和自由的。罗斯福认为，既然与

会者已十分接近于达成协议，最好由外长们今天晚上再研究一下在明天向会议报告工作结果。

丘吉尔同意总统说的，今天同盟国朝着拟定波兰问题的联合宣言迈进了一大步。丘吉尔不反对由三国外长对此进行最后的研究。但他现在想谈两点小意见，这是由于斯大林元帅昨天的讲话引起的。斯大林元帅讲了波兰如何获得解放，红军如何把敌人赶出了波兰。这是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此，丘吉尔认为向全世界强调指出这一事实是合理的，关于波兰的宣言大致可以这样开头："红军解放了波兰，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波兰政府。现在成立这个政府比在波兰西部解放之前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基础。"

丘吉尔想提请注意的第二点，是美国草案的最后一句话。不列颠政府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对波兰国内发生的事情了解甚少。与此同时，不列颠政府又必须就波兰问题作出一些重要决定。丘吉尔知道，波兰各派人士之间关系很紧张。例如，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久前对伦敦政府使用了很有威胁性的语言：卢布林政府打算把波兰军队全体士兵和地下活动的参加者作为叛徒送交法庭审判。这使不列颠政府极为不安。

当然，首先必须排除一切妨碍红军作战的干扰。尽管如此，丘吉尔想请斯大林元帅注意不列颠政府所处的困难处境。不列颠政府的确对波兰国内所发生的事态一无所知，因为它获得情报的唯一方法只是有时在波兰投下一些伞兵，或者同从波兰来的一些地下活动参加者交谈。这种状况十分不能令人满意。

在不给红军作战带来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丘吉尔再次重申，他把苏军作战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即或如此，是不是能给英国人提供相应的机会，来亲眼看看波兰现有的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呢？丘吉尔想，美国人也会同样乐意利用这些机会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不列颠代表团觉得美国方案的最后一句话很为重要。

据丘吉尔理解，在南斯拉夫进行选举时，铁托元帅将不反对苏联、美国和不列颠的观察员在场，以便由他们使全世界确信选举进行得很正常。至于希腊，等那里进行选举时，英国人是欢迎苏联、美国和不列颠的观察员去的。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当意大利北部获得解放后，意大利的国内局势将发生急剧变化，要举行立宪会议或议会的选举。不列颠政府认为，苏联、美国和不列颠的观察员应该有可能看到意大利的选举，以便使各大国确信选举是正常进行的。

丘吉尔说这些想法是有实际根据的。例如在埃及，任何一届政府进行选举总是获胜的。纳哈斯帕夏同国王发生争吵，打算举行选举。国王说，只要纳哈斯帕夏是政府成员，就不进行任何选举。自然，在纳哈斯帕夏被赶出政府以后，拥护国王的人就在选举中获胜并取代了他的地位。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那里至今盛行收买的风气。斯大林问，在埃及识字的人占百分之几？（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波兰识字的人达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这些人能够读报，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埃及同波兰是不能相比的。

丘吉尔回答说，他并不是拿波兰和埃及相比。他只是想说，选举应该是自由的和公正的。例如，他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让不让米科拉伊奇克参加选举？

斯大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和波兰人讨论。

丘吉尔问：这个问题应不应该由大使们在莫斯科同波兰人会谈时加以讨论？

斯大林回答说，这一点要按照现在就要通过的那个决议去做。

丘吉尔回答说，他不想就这个题目继续争论下去。然而他希望能够告诉议会，选举将是自由的，可以保障公平地进行。

斯大林说，米科拉伊奇克是农民党的代表。这个党不是法西斯党。

当然应允许它参加选举。农民党候选人中将会有人参加政府。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应等到同波兰人讨论时再决定。波兰人到达后，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波兰人中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丘吉尔表示，他努力要做的仅仅是在回英国之后能使议会通过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丘吉尔认为这是可能的，如果波兰人能够自行解决政府问题的话。他，丘吉尔，对波兰人的估计并不很高。

斯大林指出，波兰人中有很好的人。波兰人是英勇的战士。波兰人民中出过优秀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丘吉尔说，他只是希望使各方都有同等的机会。

斯大林指出，所有非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各方都有同等的机会。

丘吉尔说，他认为按照“法西斯和非法西斯”来划界线是不完全正确的。他倾向于用“民主主义者”这个词。

斯大林说，他面前有一份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草案。草案里有一句话：“在欧洲建立秩序和改组国家的经济生活应通过这样的途径，即能使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消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最后痕迹并建立他们自己抉择的民主机关”。这话说得好！这里把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区别得一清二楚。这句话说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不可能有一致之处。

丘吉尔承认，这种一致不应该有，也不会有。

罗斯福说，依照他的想法，波兰将成为实施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所提的原则的范例。斯大林元帅读的那句话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使我们有可能消灭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痕迹。这个宣言的下一段讲到，各国人民将能够建立代表一切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而后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建立常设的政府机关。罗斯福希望波兰的选举能象恺撒的妻子那样，是不容怀疑的。

斯大林说，恺撒的妻子如何，不过是人们那样说罢了。实际上她也是有些过错的。

罗斯福说，波兰的选举应该是完全“干淨”的。要干淨得使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使波兰人自己（他们性情急躁）也无保留地接受这次选举。罗斯福最后归纳说，外长们很了解各国政府首脑对波兰选举的意见，请外长们今天晚上研究这个问题，明天报告结果。

斯大林说，他同意罗斯福的修改意见：用“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代替“现在的临时政府”。

罗斯福转到下一个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丘吉尔说，艾登想就这个宣言的草案提一点意见。丘吉尔本人同意宣言。他认为有必要在议定书中指出，大不列颠是根据丘吉尔从纽芬兰回国后在议会上对大西洋宪章所作的解释来遵循宪章原则的。丘吉尔将在下一次会议上提供自己在国会所作的声明的全文。

罗斯福建议散会。

丘吉尔说，他想讨论一下战犯问题。这里指的是那些罪行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罪犯。

罗斯福表示，战犯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在本届会议上不可能讨论它。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研究是否更好些？请他们三、四个星期以后作出回答。

丘吉尔说，他曾为1943年的莫斯科会议起草过一份关于战犯的宣言草案。当时丘吉尔提出建议，战犯在哪个国家犯了罪就把他交给哪个国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在那个宣言中也提到了那些罪行不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主要战犯。对这些主要战犯该怎么办呢？按照丘吉尔的意见，首先应列出这类战犯的名单，这个名单将来还可以补充。这样就使他们在他们国家的人民中孤立起来。丘吉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抓到这些主要战犯，就立即把他们枪决。

斯大林问：对已经抓到的战犯该怎么办，例如赫斯？他是不是要列入丘吉尔建议拟定的名单？战俘是否能列入战犯之内？直到现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战俘不能审判。

丘吉尔回答，犯法的战俘当然是可以审判的。否则，战犯就会为了逃避惩罚而投降。不过，丘吉尔理解斯大林元帅的意思是，主要战犯在枪决之前应该受到审判。

斯大林做了肯定的回答。

丘吉尔问，起诉程序应是怎样的：用法律程序还是政治程序？

罗斯福说，程序不应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记者和摄影师进入法庭。

丘吉尔说，按他的意见，对主要战犯的审判应该是政治行动而不是法律行动。丘吉尔希望三国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应该明确。不过就这个问题不要发表任何消息，免得那些主要战犯先对盟国的战俘进行报复。

罗斯福建议把战犯问题交给三国外长去研究。

（这项建议得到通过。）

斯大林问：西部战场上是否已经开始进攻？

丘吉尔回答，昨天上午10点十万不列颠军队在奈梅根地区开始进攻。部队在宽五英里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三千码，他们到达了齐格菲防线。除了两个村庄外，防御都不很强。俘虏了几百人。明天开始第二次进攻。美国第九军正在扩大进攻的战线。这次进攻将是不停顿的，并且力量在不断增强。

里瓦基亚宫第七次会议

1945年2月10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50分

结束：当地时间20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维辛斯基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马修斯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希斯	杰布	葛罗米柯
波伦	威尔逊	巴甫洛夫
富特	狄克逊	
厄尔利	伯尔斯少校	
	罗伯茨	
	艾伦	

艾登宣读2月9日晚和2月10日上午三国外长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文本。

罗斯福表示，他同意艾登宣读的关于波兰问题声明的文本。

丘吉尔说，现在就波兰东部边界线达成了协议，对于波兰人获得

东普鲁士和直至奥得河一段的领土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丘吉尔怀疑波兰人是否应该得到沿尼斯河（西尼斯河）的边界？丘吉尔补充说，他收到了战时内阁的电报，电报中对于把大批人迁往德国会出现的困难表示担心。

罗斯福指出，关于西部边界问题希望能了解一下波兰新政府的意见。

斯大林说，声明中应该就边界问题提出些肯定的东西。

丘吉尔认为，公布关于东部边界（寇松线）问题达成协议的报道是重要的。但假如同时对西部边界却只字不提，那人们立即会问：波兰西部边界在哪呢？丘吉尔认为，必须考虑波兰人自己对于西部边界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在和会上解决。

罗斯福考虑，关于波兰边界最好什么也不提，因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拿到参议院讨论，现在他，罗斯福，没有受权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定。

丘吉尔说，关于西部边界总还得说点什么。他认为，既然三国政府都同意波兰应该在西部和北部增加领土，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将考虑波兰政府的意见，那么总能够找到某种适当的提法。

斯大林也认为决议中必须提到波兰边界问题。

罗斯福原则上同意这一点，提议委托三外长研究这个问题，并在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文本中增加一个关于边界问题的新段落。

（会议采纳了这项建议，转入讨论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苏联代表团建议在倒数第三段中补充一句话，内容是：“他们将就履行这一宣言中确定的共同责任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立即进行磋商。”

苏联代表团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艾登说，关于法国人的问题还有一点补充。补充的文本是：

“三国在发表这个宣言时，希望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能在三国

所建议的程序方面予以协作。”

罗斯福指出，他经过再三考虑得出结论，如果法国人参加盟国的对德管制机构，那么戴高乐可能会对实施这个宣言予以协作。从前他，罗斯福，反对法国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但现在他赞成法国参加。

斯大林声明，他不反对法国人参加管制委员会，并赞成法国人参加宣言。

丘吉尔说，这一点应在公报中公布。

斯大林和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建议表示同意。

（会议转到南斯拉夫问题。）

艾登建议给铁托和舒巴希奇拍电报。

斯大林提议，在电文中要提出立即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吸收议会成员参加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并由新的国会批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斯大林建议删去电文的第三点，即这个政府只是在人民自由表达意志以前的临时性政府，并建议把这封电报的全文列入公报。

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接着会议决定委托三国外长起草公报。）

艾登报告说，关于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完全的一致。

（会议讨论赔偿问题。）

丘吉尔说，目前任何赔偿数额都不必提。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并说现在恐怕不应该讲赔偿的货币数额。最好委托赔偿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然后确定赔偿数字。

斯大林指出，造成这种印象是不对的：似乎我们打算获得现金赔偿。这里说的不是现金，而是价值二百亿美元的货物。现在已经有同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的三个协定，协定中都写明了以实物来支付的赔偿数额，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误解，也许，这次会议是想要俄国人完全不拿赔偿？

丘吉尔说，完全不是这样，恰好相反。我想提议由委员会研究赔偿问题并起草一个获取赔偿的报告。

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同意从德国索取货物来补偿损失？关于赔偿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甚至连索取赔偿的原则也没确定。他建议通过下面的决议：“三大国同意，德国应以货物（或实物）赔偿它在战争过程中给各盟国造成的最为严重的损失。委托赔偿委员会以苏美的方案为基础讨论赔偿损失的数额，并向三国政府报告讨论结果。”

斯大林接着指出，美国方面同意接受以二百亿美元的数目做为讨论的基础，当然这里指的是以实物赔偿损失。苏联方面不主张现在就发表这个决定。在三国都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时，再这样做。

罗斯福说他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丘吉尔再一次重申，在赔偿委员会调查这个问题并得出一定结论之前，会议不能用任何数字来束缚自己。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要会议通过数字，只是建议委员会把提出的数目做为讨论的材料。

丘吉尔说，他收到了战时内阁的一封电报，其中有一段他想读一下。接着丘吉尔说，英国人认为现在提出任何一个赔偿数额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丘吉尔指出，英国人对德国人支付进口的能力极为关心。丘吉尔说，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得给德国人钱，而别人却获得赔偿。

斯大林请丘吉尔提出自己的赔偿数字。苏联方面并不认为它提出的数字是不可改变的，而只是供讨论之用。斯大林提议通过下面这样的一项关于赔偿的决议：

1.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德国必须以实物赔偿它在战争过程中给盟国造成的报失。

2.委托莫斯科赔偿委员会讨论应予赔偿的损失的数额问题，并将

自己的结论报告各国政府。

罗斯福和丘吉尔说他们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斯大林讽刺地问：“你们明天不会又否定这一条吧？”

（会议转入波兰边界问题。）

艾登宣读美国对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所加的有关波兰边界的一项补充草案。

罗斯福说，关于波兰边界问题，他对文本有一点修改意见：把“三国政府”改为“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解释说，如果写“三国政府”，那么他做为总统，必须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讨论。最好避免这样做。第二句中要删去“三国政府”，改为“得到承认”。最后一句中应删去“他们同意”几个字，换上“他们认为”。作了上述修改后，罗斯福接受对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所作的这项补充全文。

（有关波兰边界问题的补充文本按罗斯福的意见修改后得到通过。）

里瓦基亚宫第八次会议

1945年2月11日

会议地点：雅尔塔里瓦基亚沙皇故宫

开始：当地时间12点

结束：当地时间12点5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莫洛托夫
霍普金斯	克尔爵士	维辛斯基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马伊斯基
马修斯	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古谢夫
希斯	杰布	葛罗米柯
波伦	威尔逊	巴甫洛夫
富特	狄克逊	
	伯尔斯少校	

罗斯福宣布开全，建议先讨论公报草案。

斯大林建议以美国提出的公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

丘吉尔表示同意。

（会议同意以美国的草案为基础，开始讨论公报第一部分——“击败德国”。）

丘吉尔建议去掉第二句话里的“共同”一词。

（丘吉尔的建议得到采纳。）

斯大林指出，公报第一部分写得很好，建议讨论第二部分。

（斯大林的建议得到采纳。）

关于法国占领区的范围，艾登建议补充一句：“法国占领区的面积将由有关四国政府通过它们在欧洲谘询委员会的代表商定。

（艾登的补充被采纳。会议转入讨论第三部分——德国的赔偿。）

丘吉尔要求给他看看今天早上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德国赔偿的特别议定书的草案。

丘告尔看过议定书文本后指出：英语中用“reparation”〔赔偿，单数名词——译者〕要比“eparatkms”〔赔偿，复数名词——译者〕好得多，有力得多。

丘吉尔同意在公报第三部分概括地指明德国应赔偿它给盟国造成的损失。

罗斯福同意公报第三部分和丘吉尔对这部分的意见。

艾登不反对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议定书，但建议在审订公报全文时再对议定书进行最后的讨论。

（会议转而讨论第四部分——关于联合国会议。

苏联代表团建议在头两段后面另增加一段，内容如下：“还决定建议会议邀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国际安全组织的首批成员国。”）

罗斯福表示，现在宣布这个决定将会在国内给他造成政治上的困难，他提议，会上达成这样的协议就够了，即：美国人将支持邀请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作为国际安全组织首批成员国的提案。

丘吉尔也认为，如公布关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决议，可能引起很大的困难和争论。不列颠各自治领会对一个国家拥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提出抗议。丘吉尔必须同各自治领取得联系，使它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首批成员国参加国际安全组织的问题有所准备。所以他建议把关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协议写进决议中去。

斯大林说，既然这样，苏联代表团可以撤销自己的建议，并提议

接着往下讨论。

罗斯福说，斯大林同意撤销苏联的补充意见，帮助他，罗斯福，避免了一场同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冲突。

（会议讨论第五部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丘吉尔表示，他提不出任何意见和修正。

罗斯福和斯大林表示，他们也提不出任何修改意见。

（第五部分得到通过。会议转入第六部分的讨论——波兰问题。关于波兰的宣言未作修改就得到通过。）

丘吉尔就这一部分指出，他预料英国政府将受到激烈的批评，特别是来自在伦敦的波兰人的批评，英国政府还将受到指责，说它对苏联让步了。

罗斯福说，在他们美国的波兰人人数相当于在丘吉尔的英国的十倍，但尽管如此，他仍将尽力维护关于波兰的宣言。

（会议讨论第七部分——关于南斯拉夫。第七部分得到通过。会议转入讨论第八部分——关于外长会议。）

斯大林建议采纳英国文本。

（全体同意。会议讨论英方草案中关于战俘的部分。）

斯大林建议不把战俘部分列入公报，可作为一个专门的决议予以通过。

丘吉尔问，我们能不能公布今天白天会议之后要签署的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

斯大林回答，协议可以公布。

（会议转入讨论第九部分——为建立和平而团结正如为进行战争而团结。这部分的英美草案得到一致通过，没有任何异议。会议转而讨论公报最后一部分的美方草案——“总结”。）

斯大林提出建议：是不是不要“总结”这部分更好些？因为它还不如公报本身的内容有力。

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一点。

（公报的讨论到此结束。）

罗斯福说，公报应由政府首脑签署，他建议斯大林第一个签字。

斯大林表示反对，指出美国的报界说话是很尖刻的，它会把事情说成是斯大林左右了总统和首相。因此斯大林建议按字母顺序签署公报，也就是说；第一是罗斯福，第二是斯大林，第三是丘吉尔（这是按俄文字母的顺序。——译者）。

丘吉尔说，如果按英文字母顺序，他的名字应该是第一个。

斯大林说，他愿意接受丘吉尔的提议。

（政府首脑们约定在早饭后，等外长们根据今天会上讨论公报全文的结果进行修改以后签署公报。）

罗斯福回到关于德国赔偿的议定书问题上，他说，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议定书草案对他说来是可以接受的。

丘吉尔说，他希望再读一遍议定书草案，他感到，这个草案在修辞上还要做一些改动，但内容不需要改了。读过一遍之后，丘吉尔表示，除需作某些修辞上的改动之外，他同意议定书草案。

丘吉尔建议讨论发表公报的时间问题。

厄尔利建议在2月13日华盛顿时间早8点发表公报。

（经过讨论，政府首脑们商定于2月12日星期一莫斯科时间3点30分，在莫斯科、伦敦、华盛顿同时广播公报全文。）

雅 尔 塔 会 议

克里米亚会议文件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盟国领导人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三盟国领导人——大不列颠首相温·丘吉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德·罗斯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于过去八天中，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会议，随同参加会议的有三国外交部长、参谋长及其他顾问。

美国总统、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大不列颠首相就克里米亚会议结果作如下的声明：

一　击 败 德 国

我们研究和确定了三盟国彻底击败共同敌人的军事计划。三盟国的军事人员在整个会议期间每天进行会商。这些会商，从一切观点来看，都极为令人满意，它们使三盟国间军事行动的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我们已经互相最充分地交换了情报。关于我们的陆军和空军从东、西、北、南四面对德国心脏进行新的更强有力的打击的时间、规模和配合，都已完全协商一致，并已详细拟定计划。

我们的联合军事计划，只有在我们付诸实施时，才会为人所知。但我们相信，三国参谋部之间在这次会议中达成的紧密协作，必将使战争时期缩短。三国参谋部的会议今后将继续根据需要随时举行。

纳粹德国已注定灭亡。德国人民如果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

只会使自己由于失败而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

二 德国的占领与管制

我们已就强制实行无条件投降条款的共同政策和计划达成协议，此项条款在德国武装抵抗被彻底击溃后，由我们共同迫使纳粹德国接受。在德国被彻底击溃之前，这些条款将不予公布。根据已协商同意的计划，三国的部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计划规定，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在柏林。已经商定：法国如愿意承担一个占领区，并作为第四个成员参加管制委员会，三大国当予邀请。关于法占区的范围，将由有关的四国政府经由它们在欧洲谘询委员会中的代表共同商定，

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乎。我们决心把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并予解散；永远解散曾一再图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管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并对德寇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并对德国采取其它为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地位的希望。

三 德 国 的 赔 偿

我们讨论了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同盟国家造成损害的问题，并且

认为理应由德国以实物对这种损害尽可能进行最大限度的赔偿。将成立一个损失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德国对同盟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数额与方法问题，委员会设在莫斯科。

四 联合国会议

我们决定尽快与我们的盟国一起，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要通过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密切而持续的合作来防止侵略和消除引起战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原因，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十分重要的。

敦巴顿橡树林会议已奠定了这一组织的基础。但关于表决程序这个重要问题，在那次会议上未达成协议。此次会议已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一致同意：于 1945 年 4 月 25 日在合众国的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以便按照橡树林非正式会谈时确定的原则起草这一组织的宪章。

我们将立刻同中国政府和法兰西临时政府进行磋商，并邀请它们与合众国、大不列颠及苏联政府一起，共同发起这次会议。

一经同中国及法国磋商完毕，关于表决程序的建议全文将予公布。

五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我们拟定并签羿了一份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三大国在处理被解放的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按照民主的原则，协调政策，共同行动。宣言全文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首相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为了他们国家的人民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互进行了磋商。他们共同宣布：他们商定，在被解放的欧洲处于暂时稳定的时期中，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

援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及欧洲的前轴心附庸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

欧洲秩序的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重建，必须通过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能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体制的途径来实现。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借以生活的政府形式的原则，应使那些被侵略国家被强行剥夺了主权和自治的各国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

为了改善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借以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三国政府如认为有必要，将共同协助任何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或前轴心国附庸国的人民，（甲）创造国内和平的条件；（乙）实行紧急措施赈济难民；（丙）成立能广泛代表各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以及（丁）在必要时，应促成这种选举的进行。

在研究与其它联合国家及欧洲的临时政府或其它政府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三国政府将与它们进行磋商。

当三国政府认为任何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或前轴心国附庸国的情况有采取这类行劫的必要时，他们之间将就履行本宣言中规定的共同责任所必需的措施立即进行磋商。

在本宣言中，我们重申，我们对大西洋宪章诸原则的信念，重申我们在联合国家宣言中提出的保证，并且重申，我们决心与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以建立一种在法治下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的福利。

在发表本宣言时，三国希望，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按所建议的程序予以合作。

六 波 兰

我们参加克里米亚会议，来解决我们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

充分讨论了波兰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重申我们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看见波兰建成为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经过会谈，我们对通过能为三大国所承认的途径，建立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达成了以下协议：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形势。这种形势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所可能有的、基础更为广泛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在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波兰国内外的民主人士参加。这个新政府应称作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授权莫洛托夫、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尔爵士组成一个委员会，在莫斯科首先与现临时政府成员以及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应保证尽速根据普选与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反纳粹的和民主的党派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

当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根据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同波兰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同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各该国政府将根据大使的报告了解波兰的情况。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以寇松线为准，而在若干地区作出有利于波兰的五至八公里的外移。三国政府首脑承认，波兰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应有较多的扩增。它们认为，扩增范围的问题，应在适当时机征询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然后，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留待和会解决。

七 南 斯 拉 夫

我们认为有必要向铁托元帅和舒巴希奇博士建议：他们之间的协议应立即生效，并在该协议基础上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我们还决定建议，南斯拉夫新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声明：

（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应予扩大，吸收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参加，这样组成一个称为临时议会的机构；

（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通过的立法案，将提交制宪会议批准。

对巴尔干的其它问题，也作了一般的研究。

八 外 长 会 议

在整个会议期间，除政府首脑和外长们每天举行的会议外，三外长和他们的顾问们每天还单独举行会议。

这些会议已证明具有极大价值。因此这次会议同意，为使三国外长经常进行磋商，应当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所以外长们将根据需要经常会晤，大约每三、四个月一次。这些会议将轮流在三国首都举行，第一次会议应在成立国际安全组织的联合国会议以后于伦敦举行。

九 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了我们的共同决心，即我们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能确定无疑地取得胜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政府对本国人民以及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应负的神圣义务。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不断增进合作与相互了解，才能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意愿——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应能“确保所有国家的一切人，都能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地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可能，在最近几年内为这种和平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温斯顿·丘吉尔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约·斯大林
1945年2月11日

克里米亚会议议定书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首脑于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世 界 组 织

会议决定：

1. 关于拟议中的世界组织问题的联合国家会议应1945年4月25日星期三召开，在美利坚合众国举行。

2. 应邀请以下国家参加这次会议：

（甲）1945年2月8日前实有的联合国家；

（乙）1945年3月1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协同国家（所谓“协同国家”是指八个协同国家和土耳其）。当举行关于世界组织问题的

会议时，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将支持接纳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作为创始会员国的提案。

3. 美利坚合众国应代表三大国将与中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就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拟议中世界组织的各项决议进行协商。

4. 向所有参加联合国家会议的国家发出的邀请书，全文如下：

邀 请 书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本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政府派遣代表参加将于1945年4月25日或稍晚一些时候在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以拟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宪章。

上述五国政府提议，会议以去年10月公布的敦巴顿橡树林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为拟订这一宪章的基础，对该项建议中的第六章丙节现作如下补充：

‘丙、投票

1. 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

2. 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通过。

3. 安全理事会关于其它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七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但对第八章甲节和第八章丙节第一段第二句规定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关于安排方面的进一步情况容后通知。

如果……政府愿在会议召开之前提出关于该项建议的意见或评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乐于将这些意见与评论转达其它与会国政府。”

领 土 托 管

会议决定，在联合国会议召开之前，将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五国应就领土托管问题相互协商。

通过此项建议的条件是，领土托管仅适用于：（甲）国际联盟的现有委任统治地；（乙）由于此次战争的结果割自敌国之领土；（丙）一切自愿要求置于托管制度下之领土；并且（丁）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或在初步协商中，将不就具体领土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而上述各类领土中哪些领土应置于托管之下，应进一步通过协商决定。

法国占领区和对德管制委员会

会议决定，应分给法国一个德国地区，由法军占领。该地区将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其范围则由英、美同法兰西临时政府协商决定。

还一致同意，应邀请法兰西临时政府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

赔 偿

签订了克里米亚会议三国政府首脑关于向德国索取实物赔偿问题会谈议定书。

三国政府首脑同意：

1.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

赔偿应首先支付给那些承受了战争的主要重担、蒙受了最大损失和组织了对敌斗争胜利的国家。

2.向德国索取的赔偿有三种形式：

（甲）在德国投降或停止有组织抵抗两年内对德国本土上及国外的德国国民财富（设备、机床、船舶、机车车辆、德国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德国工业、运输业、航运业和其它企业的股票等等）进行一次没收，其主要目的在于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

（乙）在规定的时期内，每年交付当年产品。

（丙）使用德国劳动力。

3.为了按上述原则制定详细的赔偿计划，在莫斯科设盟国赔偿委员会，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

4.关于确定赔偿总额及其在德国侵略的各受害国之间的分配问题，苏联和美国代表团同意：“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在进行初步研究时，应以苏联政府的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即第二段中（甲）、（乙）两项之赔偿总额应为两百亿美元，其中50%应归苏联。”英国代表团认为，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研究赔偿问题之前，不能提出任何赔偿数字。

上述苏—美建议已交莫斯科赔偿委员会，作为有待该委员会考虑的提案之一。

主 要 战 犯

会议决定，主要战犯问题应由三国外长在此次会议闭幕之后进行研究，并在适当时候提出报告。

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

盟军正在进入德国，关于盟军解放的大不列颠、苏联和美国的战俘及平民的处理问题，英、美、苏三国代表团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签订一项对他们进行保护、赈济和遣返的全面协议，进行了会谈。苏

联—英国及苏联—美国之间在2月11日分别签订的两项协议文本完全相同。在苏—英协议上签字的是莫洛托夫和艾登先生。在苏—美协议上签字的是格雷兹洛夫中将和丁将军。

根据这两项协定，在未拨出运输工具遣返盟国平民之前，各盟国应对其他盟国的平民提供饮食、衣物、医疗及其他方面的帮助。苏联军官将帮助英、美当局解决为英、美军队解放目前尚留在欧洲大陆或联合王国境内等候遣返工具的苏联平民的生活安排问题。

英、美军官将帮助苏联政府解决英、美平民的生活安排问题。

协议既已签订，三国政府保证，只要不影响作战，将尽一切努力，尽快遣返全部战俘和平民。

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及大不列颠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约·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

波 茨 坦 会 议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第 一 次 会 议

1945 年 7 月 17 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 17 点或 17 点 10 分

结束：当地时间 18 点 55 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波利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葛罗米柯
戴维斯	克尔爵士	古谢夫
邓恩	威廉·斯特兰爵士	诺维科夫
克莱顿	伯尔斯少校	索波列夫
科恩		巴甫洛夫
马修斯		
波伦		
汤普森		

丘吉尔　谁担任我们这次会议的主席？

斯大林　我提议由美国总统杜鲁门担任。

丘吉尔　英国代表团支持这个提议。

杜鲁门　我接受主持这次会议的工作。

我要向大家提出我们会晤前积累起来的急待研究的某些问题。然后我们讨论会议的工作程序。

丘吉尔 我们有权对议事日程提出补充意见。

杜鲁门 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设立某种机构来处理和约谈判的问题。不然，欧洲的经济发展将会继续危及盟国和全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凡尔赛会议的经验表明，如果战胜国事先不对和会进行准备，和会会有很多缺点。没有事先准备，和会会处于各方争执不休的紧张气氛中，这势必使会议迟迟不能作出决议。

因此，考虑到凡尔赛会议的经验，我建议现在就设立一个专门的外长会议，由大不列颠、苏联、美国，法国、中国，即旧金山会议上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组成。这个筹备和会的外长会议应在我们这次会晤之后尽快召开。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和这个方针，我拟出了关于设立筹备和会的外长会议的草案，现在提交给大家研究。

丘吉尔 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外交部长们讨论，让他们在我们的下次会议上提出报告。

斯大林 同意。只是关于中国外长参加这个会议的问题我不大清楚。这里指的不是欧洲问题吗？那么中国代表参加有多大必要呢？

杜鲁门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听取外长们的汇报之后再讨论。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关于对德管制委员会问题。这个委员会应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尽快着手工作，为此目的，我现在提出一项草案，请你们讨论。草案中提出的原则据我们看来应该成为这个管制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指导原则。

丘吉尔 我没能读完这个文件，不过我将极其认真、满怀敬意地把它读完。那时就可以讨论这个文件了。这个问题牵涉太广，不应交给外长们而应由我们自己来研究讨论，以后不得已时再交给外长们。

杜鲁门　我们明天就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　我们也可以明天就讨论这个问题。部长们可以预先熟悉一下这个问题，这并没有害处，因为我们将同时亲自研究这个问题。

丘吉尔　我们的部长们研究第一个文件的任务就已经够重了。是不是到明天再把第二个问题交给他们？

斯大林　好吧，明天再交给他们。

杜鲁门　宣读备忘录，备忘录说：根据雅尔塔会议上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的各项决议，三大国对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及前德国附庸国承担了某些义务。这些决议规定了三大国在根据民主原则解决被解放的欧洲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应采取的一致的政策和共同的行动。

雅尔塔会议以来，我们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承担的义务并没有付诸实施。美国政府认为，如再不履行这些义务，全世界将认为这是三大国之间缺乏团结的表现，并且会使各联合国家对我们所抱目的是否真诚和一致失去信任。因此，美国政府提议：本次会议应就履行这个宣言中规定的义务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三大同盟国应一致同意，必须严格按照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第三段第三款，立即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现政府。应迅速进行协商制定改组这些政府所必需的程序，以便使所有重要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政府。这些政府改组后，盟国可以随即给予外交上的承认并签订相应的条约。

根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第三段第四款所述的三大国的义务，三国政府应当讨论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临时政府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可能还有其它国家将会需要这种帮助。

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我们对意大利的态度。鉴于意大利不久前已经对日宣战，我希望这次会议将能够同意支持意大利加入联合国。外长们可以用各联合国家政府的名义就此问题起草一项

相应的声明。

这个文件需要全念吗？你们是否有时间？

丘吉尔 总统先生，这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时间讨论。问题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一致。意大利从背后袭击了法国，并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发动了进攻。美国参战前，我们在非洲已同意大利奋战两年之久，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甚至不得不拿联合王国的军队去冒险，减少联合王国本身的防卫力量，以便向非洲派兵。在地中海我们还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海战。我们对意大利怀有最良好的意愿，而且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把他们的舰只留给了他们。

斯大林 这非常好，不过我们今天应只限于制定议程和提出补充问题。议程确定之后，可以就任何一个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杜鲁门 我完全同意。

丘吉尔 我很感谢总统，他首先展开了这场讨论，从而为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我想，我们应该有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问题。我不想说我不能同意这些建议，不过得有时间来讨论它们。我提议如果总统还有什么建议的话，就让他说完，然后好拟定议程。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对于意大利，三国政府的宗旨是发展它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复兴，保障意大利人民有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利。

意大利作为一个正在和我们共同作战的国家和作为一个无条件投降了的国家，它目前的处境是不正常的。这既有碍盟国，也有碍意大利本身作出任何努力来改善它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有通过和意大利締结和约才能最终消除。起草这种条约应该是外长会议的首要任务之一。

同时，意大利国内形势的改善，有赖于创造一种承认意大利对击

败德国作出了贡献的局面。因此，建议停止执行意大利投降的简要条款和详细条款，而代之以由意大利政府根据意大利的新形势承担一定的义务。

这些义务应该包括：意大利政府不对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采取敌对行动；意大利政府除将由盟国规定允许的以外，不得拥有任何海、空军事力量和装备，并将遵守盟国的一切指令；在签定和平协定之前应根据需要对意大利进行管制；同时应解决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境内留驻多久的问题；最后应该保证领土争端的公正解决。

由于我没料到会被选作本次会议主席，所以我不能立刻表达出自己的感情。我很高兴认识您，大元帅，还有您，首相先生。

我深知，我在这里是代替一位无法代替的人——前总统罗斯福。如果我能够哪怕是部分地不辜负你们对罗斯福总统的怀念，我将感到高兴，我愿意把他和你们之间的友谊巩固下来。

我向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排除再提出补充问题列入议程。

丘吉尔　大元帅，对于总统先生的讲话，您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者允许我来谈一谈？

斯大林　您讲吧。

丘吉尔　我谨以不列颠代表团的名义，对美国总统接受主持本次会议，表示衷心感谢。我感谢他阐述了他所代表的、以他为首脑的一个伟大国家的观点。我想对他说（我相信大元帅会同意我的话）：我们非常真诚地欢迎他，我们愿意在这个重要时刻告诉他，我们对他也将怀有如对罗斯福总统一样的情谊。他是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到这里的。我们的愿望是使我们为之而战的真正的任务和目的能够在取得了和平的今天得以实现。我们不仅对美国人民，而且对他们的总统本人怀有敬意。我相信这种敬意将与日俱增，并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关系。

斯大林　我可以代表俄国代表团表示，丘吉尔先生所表达的感情，

也完全是我们的感情。

丘吉尔 我以为，我们现在应该讨论议程上比较简单的问题，制定出某种工作计划，以便看一看，我们能否自己完成这个议程，或者要将部分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下子把全部议程都拟出来。我们可以仅限于确定每天的工作日程。我们，譬如说，想补充一个波兰问题。

斯大林 最好还是让三国代表团把他们认为需要列入议程的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俄国想提出关于分配德国船舰等问题。关于船舰问题我和总统交换过信件，并已取得一致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赔偿问题。

然后应该讨论被托管的领土问题。

丘吉尔 您所指的被托管领土是欧洲的，还是全世界的？

斯大林 这我们将要讨论。我还不确切了解，这是指哪些领土。但是俄国人想参加对托管领土的管理。

我们想单独提出同前德国附庸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

需要研究的还有西班牙政权问题。我们俄国人认为，现在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是德国和意大利强加给西班牙人民的，它对于热爱自由的联合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我们认为，最好是创造条件，使西班牙人民能建立他们所喜欢的政权。

丘吉尔 我们现在还只是讨论把哪些问题列入议程。我同意西班牙问题应该列入议程

斯大林 我只是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内容是什么。

其次，应该把丹吉尔[①]问题列入议程。

————————————

① 丹吉尔(Tangier)是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湾口，为西方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1923年，法国将丹吉尔划为国际共管区，由英、法、西、葡、意、比、荷、瑞典等欧洲8国和后来的美国代表组成共管委员会长期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西班牙占领。——本书制作者注

丘吉尔　艾登先生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讨论到丹吉尔问题，由于法国缺席，我们只能达成临时性的协议。

斯大林　不过了解一下三大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有益的。

其次应该讨论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需要讨论的还有波兰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由于波兰建立了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因而必须解散波兰流亡政府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丘吉尔　我认为波兰问题必须讨论。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经过克里米亚会议的讨论已经获得圆满的解决。我完全同意讨论这个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解散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问题。

斯大林　对，对。

丘吉尔　我希望大元帅和总统会理解：在我们那里有一个伦敦的波兰政府，它曾是维持波兰军队对德作战的基地。因此，要解散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就会产生一系列其他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我国的任务比其他两国无疑要困难一些。由于解散波兰政府，就不能不由我们来负责士兵的给养。但我们应该本着雅尔塔会议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谈到波兰问题，我们认为对波兰來说，选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使选举表达出波兰人民的真实愿望。

斯大林　俄国代表团暂时没有别的问题要列入议程。

丘吉尔　我们已经向大家提出了我们的议程。总统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就本次会议的工作程序提出一项建议。我建议三国外长今天或者明天早晨开一次会，挑选出明天我们在这里能讨论得好的问题。这样一种工作程序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也可以采用。外长们可以选择三个、四个、五个问题，较好地定出工作日程。他们可以明天早晨开会，为我们拟定议程。

斯大林　我不反对。

杜鲁门　同意。

丘吉尔　我认为，我们大体上已经明确了我们的任务和工作范围。

我觉得，现在该由外长们选出问题提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工作。

斯大林 同意。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呢？在外长们给我们提出五、六个问题之前，我们是否要继续开会？我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设立外长会议作为未来和会的筹备机构的问题。

杜鲁门 同意。

丘吉尔 同意。

斯大林 假如外会议是要处理欧洲问题，那得讨论一下中国外长是否参加的问题。

杜鲁门 中国将是在旧金山成立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斯大林 克里米亚会议有一个决议，外长们应定期会晤协商各种问题。这个决议是否不再有效了？

杜鲁门 我们建议设立外长会议，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拟定和约条款，筹备和会。

斯大林 克里米亚会议规定：外长们每隔三、四个月会晤一次，讨论一些问题。这一条看来现在不再有效了吧？如果那样，大概欧洲咨询委员会也不成立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我理解的对不对，请解释一下。

杜鲁门 设立外长会议只是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拟定和约条款。

斯大林 我不反对设立外长会议，不过这么一来，克里米亚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外长定期会议显然要取消，而且应该认为，欧洲咨询委员会也无须存在了。这两者都将被外长会议这个机构代替。

丘吉尔 三外长应象克里米亚会议规定的那样，每隔三、四个月会晤一次，以便就与欧洲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向我们提供意见。我想，如果我们再让中国代表参加三国外长会议，那只能使事情复杂化，因为外长会议将要讨论的是有关欧洲各国的问题。等我们讨论不仅涉及欧洲，而且涉及全世界的和约时，可以邀请中国代表参加。我们的三

位外长能够更加容易、更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让中国外长参加外长会议的日常工作只能增加麻烦。通过一纸决议建立一些组织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这些组织实际上无所裨益，那我看它们就是多余的。比如，难道没有中国参加，我们就不能解决关于德国将来的行政机构问题吗？外长会议就限于三国外长参加吧。

杜鲁门　关于雅尔塔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外长定期会晤是否停止的问题，我建议暂缓讨论。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为起草和约而设立外长会议的问题，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大家研究美国关于外长会议的文件草案，里面阐明了外长会议的组织原则。

根据我们的草案，外长会议要由苏联、美国、大不列颠、中国和法国的外长组成。外长会议应定期开会，首次会晤将在某月某日举行。

每位外长应配有一位高级的副手，他要有正式授权，在外长缺席时，能独立进行工作。每位外长还应带有少数技术顾问，草案还规定设立共同的秘书处。

外长会议将被授权起草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和平条约，并提交给各联合国家的政府。外长会议还要就欧洲战争结束后的领土悬案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外长会议应拟出对德和约的详尽条款，这些条款将在德国组成合乎此项目的的政府后，为该政府所接受。

当外长会议要讨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某个在外长会议里没有代表的国家时，这个国家将被邀请参加外长会议的例会，以便参与对问题的讨论。这不是为外长会议的工作规定一成不变的规章。外长会议根据每个问题的情况来确定工作程序，有时外长会议可以在其它有关国家的参加下，进行预备性讨论，而有时又最好在邀请有关方面之前先开会。

斯大林　这个外长会议就是筹备未来的国际和会的吗？

杜鲁门　是的。

丘吉尔　就是那个将结束战争状态的和会。

斯大林　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了。外长会议要确定并提出召开和会的日期。

杜鲁门　我们认为，和会不应该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准备好以前召开。

丘吉尔　我觉得，要协调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来起草和约。不过这个外长会议不应代替那些目前已经存在的、处理日常问题的机构，即三外长的定期会谈和有法国参加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外长会议是一个职能较广的机构。人们在这里可以确定，欧洲咨询委员会和外长的定期会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研究和约问题。

斯大林　究竟谁服从谁呢？

丘吉尔　外长会议与有中国参加的安理会是平行的，与外长定期会谈和欧洲咨询委员会也是平行的。在战胜日本之前，中国难以参加欧洲问题的讨论。要是中国现在就参加欧洲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欧洲一直是座大火山，所以欧洲问题应当作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也许到召开和会时，我们会从远东得到好消息，那就也可以邀请中国了。

在原则上我建议：和约由五个主要国家来准备。至于谈到欧洲，那么欧洲问题应该只由与此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四大国讨论。这样，我们将不影响欧洲咨询委员会和外长定期会谈的工作。这两个机构可以同时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　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交给部长们讨论？

杜鲁门　我同意。我也不反对把中国排除在外长会议之外。

丘吉尔　我认为可以这么办，某些成员国虽然享有和所有其它成员国一样的充分权力，但却不是始终都参加例会，只是在讨论与他们有关的问题时才参加。

杜鲁门　照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外长们去讨论。

斯大林　对，正确。

杜鲁门　今天我们还能讨论些什么吗？

斯大林　因为所有问题都要由外长们去讨论，我们今天无事可做了。

丘吉尔　我提议由外长们讨论一下外长会议应该有四个还是五个成员的问题，不过这个外长会议应该是只负责准备和约的工作，首先是为欧洲准备和约，然后为全世界准备和约。

斯大林　是起草和约还是筹备和会？

丘吉尔　外长会议可以拟定一个计划提交各国政府首脑进行研究。

斯大林　让外长们讨论一下，在欧洲有多大必要保留欧洲咨询委员会，雅尔塔会议决议规定的三外长定期会谈有多大必要继续执行自己的职能。让外长们把这些问题也讨论一下。

丘吉尔　这一点取决于欧洲的形势如何，也取决于这两个机构工作进展的情况如何。我提议三外长继续举行定期的会议，欧洲咨询委员会也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杜鲁门　我们得给明天的会议提出要讨论的具体问题。

丘吉尔　我们很希望每天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的皮包里能有点具体的东西。

杜鲁门　我希望外长们每天都向我们提出某些具体东西以供讨论。

斯大林　我同意。

杜鲁门　我还建议我们的会议下午四点钟开始，而不是五点。

斯大林　四点？嗯，好吧。

丘吉尔　我们服从主席。

杜鲁门　如果这点通过了，那我们就把问题留到明天下午四点再讨论。

斯大林　就这样吧。只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丘吉尔先生不让俄

国人得到分给他们的那份德国船舰呢？

丘吉尔　我不反对。不过您既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我的回答是：这些船舰应该沉没或者是分掉。

斯大林　你主张沉没还是主张分掉？

丘吉尔　一切战争工具都是可怕的东西。

斯大林　船舰应该分掉。如果丘吉尔先生宁肯沉掉这些船舰，那他可以沉掉他自己的那一份。我可不打算把自己的一份沉掉。

丘吉尔　目前，几乎全部德国船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斯大林　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们才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杜鲁门　明天四点开会。

第 二 次 会 议

1945 年 7 月 18 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 16 点或 16 点 15 分

结束：当地时间 18 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邓恩	威廉·斯特兰爵士	葛罗米柯
戴维斯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古谢夫
哈里曼	克尔爵士	索波列夫
波利		
波伦		
科恩		
汤普森		

杜鲁门宣布开会。

丘吉尔　有一个议程外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不十分重要，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我想谈一谈。我们在德黑兰会谈期间，新闻记者很难得到有关会议的消息；到雅尔塔会议时，则完全不可能得到消息。现在柏林聚集了约一百八十名记者，他们愤懑若狂，在柏林近郊转来转去。

斯大林 这是整整一连人了。谁放他们到这里来的？

丘吉尔 他们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区内，而是在柏林。当然，我们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安静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必须保证。如果我的两位同事同意我的意见，我作为一个老记者，可以去同他们谈谈，向他们解释一下我们会议保密的必要性，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同情他们，但不能讲这里的情况。我认为，应该抚慰他们一下，好让他们平静下来。

斯大林 他们要干什么，有什么要求？

杜鲁门 我们每个代表团都有专门负责新闻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我们不受记者的纠缠。让他们负起自己的责任吧。可以委托他们去和记者们谈一谈。

丘吉尔 我当然不想当替罪羊。如果大元帅保证在必要时派军队去搭救我，那我可以同他们谈一谈。

杜鲁门 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们拟定了议程提交我们审议。外长们商定，由贝尔纳斯报告议程。

贝尔纳斯 外长们开会决定建议把下述问题列入今天的议程：

1. 关于进行和约谈判和解决领土要求的程序和机构问题。

2. 关于对德管制委员会在政治方面的权限问题。

3. 波兰问题，其中包括解散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进行和约谈判和解决领土要求的程序和机构问题（设立外长会议），原则上已赞同美国代表团在外长开会时提出的草案。会上通过了草案中关于设立外长会议的第三条的新条文。外长会议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是起草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草案，以及准备对德和约

外长会议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拟定筹备和召开和会的详细办法并提交给各联合国家的政府。还应该利用外长会议来研究和平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为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外长会议要由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组成。

如外长会议审议的问题涉及到在外长会议中没有代表的国家的直接利益时，这些国家将被邀请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外长会议也可以在邀请有关国家的代表之前，自己先对问题进行讨论。

苏联代表团做了保留，说它保留对美国代表团关于设立外长会议的草案第一条提出修正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会上商定，外长会议的工作将不涉及克里米亚会议决议规定的三国外长的定期会晤。

至于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职权，外长们在会上商定把它移交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这样，美国代表闭提出的关于设立外长会议的草案，除苏联代表团对第一条持有保留意见外，基本上获得通过。

斯大林 苏联代表团撤销对草案第一条的保留意见。至于所有其余的部分，苏联代表团都同意，并接受这个草案。

杜鲁门 那么，关于设立外长会议的草案就一致通过了。

斯大林 可以接受这个文本：三大国代表着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它们可以承担责任。

杜鲁门 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

丘吉尔 我们的外长们干得很好。

斯大林 当然，当然。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关于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政治权限问题。

贝尔纳斯 外长们讨论了德国管制委员会的政治权限问题，也讨论了它的经济权限。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分歧意见已经转交给新设立的分组委员会。这些分组委员会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外长们都认为，最好政府首脑们能在今天的会议上初步讨论一下德国管制委员会的政治权限问题。外长们还认为，牵涉到德国的各种

经济问题十分困难而且复杂，应该交给分组委员会的专家们去研究。这些分组委员会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报告给外长们。外长们再决定，把其中哪些问题提交政府首脑研究。

外长们还商定：虽然他们今天不建议讨论德国的军舰和商船问题，但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要讨论。

丘吉尔　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里用了“德国”这个词。现在“德国”指的是什么？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战前的德国？

杜鲁门　苏联代表团怎样理解这个问题？

斯大林　德国就是战后那个样子的德国。现在不存在别的什么德国。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杜鲁门　讲到德国，是否可以理解成是战前的1937年的那个德国？

斯大林　是现在1945年的德国。

杜鲁门　德国1945年失去了一切。实际上德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斯大林　如我们通常说的，德国现在是一个地理概念。让我们暂时先这样理解。不能脱离开战争的后果抽象地谈。

杜鲁门　是这样，不过总应该给“德国”这个概念下个什么定义吧。我认为，1886年或者1937年的德国都不是现在1945年的德国。

斯大林　德国由于战争的结果起了变化，我们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德国。

杜鲁门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不过还是应该给“德国”这一概念下个定义。

斯大林　比方说，是不是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建立德国的行政机构？在这个地区，德国人曾经把捷克人赶走。

杜鲁门　或者我们讲德国时还是以战前的、1937年的德国为准？

斯大林　形式上可以这样理解，实质上并非如此。要是在哥尼斯

堡出现德国的行政机构，我们要把它撵走，一定要撵走。

杜鲁门　克里米亚会议上已经商定，领土问题应当在和会上解决。我们究竟如何确定“德国”这个概念呢？

斯大林　让我们把波兰的西部边界确定下来吧，那德国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我很难说出来，现在的德国是什么。这是个没有政府、没有确定边界的国家，因为边界不能由我们的军队来划定。德国现在没有任何军队，连边防军都没有。它被分割成几个占领区。你们来下个定义看，“德国”是什么。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杜鲁门　或许我们就以1937年德国的边界作为出发点吧？

斯大林　以什么作为出发点都可以。反正总得有个出发点，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取1937年。

杜鲁门　这是签订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

斯大林　是的，可以以1937年的德国为准，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这只不过是为了我们工作的方便而做的一种假设。

丘吉尔　是仅仅作为出发点。这不意味着，我们将受它的约束。

杜鲁门　我们同意拿1937年的德国作为出发点。

我们还没有讨论完第二个问题，不过我们会就此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　政治方面的权限拟好了吗？

贝尔纳斯　政治方面的权限已经拟好，可以讨论了。

斯大林　俄国代表团基本上接受有关这个问题政治部分的所有条款。只对第五条有一点修正意见：最好把后四行删去，因为这里有些漏洞，纳粹分子可能利用来钻空子。

杜鲁门　同意这四行应该删去。

斯大林　那很好。其余的我们都同意。我希望再由加工委员会把这个文件校订一次。

贝尔纳斯　外长们在会上指定了一个专门的分组委员会做这件事。

斯大林　好，没有反对意见。

艾登 最好是外长们明天早晨开会时把加工委员会提交的这一文件再看一下。

斯大林 这当然更好了。

丘吉尔 在这个草案中，第二项第一条（乙）里讲到要销毁武器和其它战争工具，以及生产它们的一切专门设施，但在德国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实验设备，最好不要销毁。

斯大林 草案里写的是：占有或者销毁。

丘吉尔 我们大家可以共同使用或者平分。

斯大林 可以。

苏联代表团有一项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有俄、英两种文本。我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草案

杜鲁门 我建议让贝尔纳斯报告完外长开会的情况，然后再看你们的草案。

贝尔纳斯 外长们一致同意建议政府首脑从两个方面讨论波兰问题：一个是解散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问题，一个是履行克里米亚会议决议，在波兰举行不受干涉的自由选举的问题。

（接着宣读**苏联代表团**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文本：

“三国政府首脑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

鉴于波兰已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决议组成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又鉴于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与波兰已建立外交关系，波兰与苏联之间早已存在外交关系，我们商定，英国和美国政府断绝同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的一切关系并给于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必要的协作，以便迅速向它移交全部基金、贵重物品和其他一切属于波兰而至今由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及其机构掌握的财产，不管这些财产表现为何种形式，现在在什么地方，由谁掌握。

我们还认为必须使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管辖的军队，其中包括海

军舰队以及商船队，隶属于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将确定对这支武装力量、军舰和商船的进一步措施。”）

丘吉尔　总统先生，我想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上的困难落在大不列颠政府身上。因为当希特勒进犯波兰时，我们在英国收容了波兰人，允许他们避难。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多少财产，但在伦敦有二千万镑的黄金，我们把它冻结了。这笔黄金是波兰中央银行的资产。至于在什么地方冻结这笔黄金，是否把它转到另一个什么中央银行去，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正常途径加以解决。不过这笔黄金不属于伦敦的波兰政府。

斯大林　是二千万英镑吗？

丘吉尔　大约是。我要补充一点，伦敦的波兰使馆现已腾出，波兰大使不再住在里面了。因此，这个大使馆空着，可以接待波兰临时政府的大使，而且大使的任命越快越好。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五年半的期间内伦敦波兰政府的经费是哪里来的？它的经费是不列颠政府拨给的。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提供了大约一亿二千万英镑的经费，好让他们能够供养自己的军队，维持外交关系并执行其它的职能，以及接济为逃避德国人而在我们的岛上避难的大批波兰人。我们这里是他们所能有的唯一的避难所。

当伦敦的波兰政府不再被承认时，我们决定付给全体职员三个月的薪金，然后再解雇他们。我们认为不给他们某些补偿就解雇是不公正的。

总统先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请允许我谈谈这个问题。我们的处境是很特殊的。我们现在得着手解散或者转移曾经和我们一起对德作战的波兰军队。这支部队是1940年从法国来的。其中有一些经瑞士进入意大利并继续分成小股在那里活动。我们把法国投降时正在法国的波兰人撤了出来，他们有四万或五万人。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支由五个师组成的波兰军队，基地在英国。

现在大约有两万波兰人在德国，他们感到很大的不安，在意大利有一个由三个师组成的波兰军团，同样很不稳定。

总起来说，波兰军队有十八万到二十万人。

我们的政策是说服尽可能多的波兰人返回波兰。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了安德斯将军的演说之后非常生气的原因，这个人，大元帅是知道的。安德斯在意大利对自己的部队宣称，如果他们返回波兰，就要被送往西伯利亚。我们对这位将军采取了纪律措施，使他今后不再讲类似的话。

要克服所有这些困难，需要时间。但我们的政策是要说服尽可能多的波兰人返回波兰。这里也包括文职人员。当然，波兰国内的形势越好，波兰人回去的就越快。我想借此机会说一下，我为最近两个月内波兰局势的好转成到高兴。

我祝愿波兰新政府取得进一步的成就。新政府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它不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一切，但由于三国政府的耐心工作，它却标志着进步。在改善波兰局势方面，米科拉伊奇克所起的作用也应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希望，随着波兰局势的改善，大多数波兰人将逐步返回自己的祖国。我已向议院许诺，我们将接受那些不想回国的波兰士兵加入不列颠国籍和军队。最好新的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能作出保证：凡回国的波兰人都将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经济保障，波兰政府的这个保证将会大大促进波兰人返回祖国，返回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土地。

斯大林 您看了俄国代表团关于波兰问题的草案吗？

丘吉尔 看过了。我的发言就是对俄国代表团草案的回答，同时也是表示原则上我同意，不过有一个条件，要考虑到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况。

斯大林 我理解不列颠政府的困难处境。我知道，它收容了波兰流亡政府。我知道，尽管如此，前波兰执政者还是给大不列颠政府造

成了许多麻烦。我理解不列颠政府的难处。但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我们的草案并不是要给不列颠政府增加困难，而是照顾到了不列颠政府的困难处境。我们的草案只有一个目的：结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暧昧局面，了结这件事。

事实上，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还存在。它有自己的部长，在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它有自己的代表机构，有自己的基地和自己的报刊。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不好的印象。我们草案的目的是结束这种暧昧的局面。如果丘吉尔先生能指出这个草案中那些使大不列颠政府为难的地方，我准备把它们删去。我们草案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不列颠政府为难。

丘吉尔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愿意了结这个问题。当某个政府不再得到承认和资助时，它就没有任何可能存在下去了，但您无论如何总不能阻止某些个人在英国继续生活和讲话。这些人同议员们往来，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同情者。不过我们作为政府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本人和艾登先生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自从米科拉伊奇克先生离开以后，我甚至都不知道，对他们该怎么办。我同他们从来不见面。如果阿尔齐舍夫斯基在伦敦街上散步，同新闻记者们闲谈，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认为他们在外交上已不存在，已被取消了。我并且希望他们很快将完全失去影响。但对军队，我们当然应该慎重。

军队是会暴动的，那样我们将受到损失。我们在苏格兰有大量的波兰军队。不过我们的目的与大元帅和总统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只是请求给予我们信任和时间，也请求你们帮助在波兰创造能吸引这些波兰人回国的条件。我们可以同意把苏联代表团的草案交给三国外长去研究，但应考虑到今天进行讨论的情况和我国外交大臣提出的文件。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个问题我们解决得越快越好。

杜鲁门　我看不出大元帅和首相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分歧。丘吉尔先生只不过要求给予他信任和时间，以便克服他在这里所谈到的那些

困难。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有很大的困难。更何况斯大林先生说他准备删去有争议的地方。雅尔塔会议决议规定，在新政府成立之后，应该尽快地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大选。

丘吉尔　是不是由外长们讨论整个这个问题，包括选举问题在内。

斯大林　波兰政府不拒绝举行不受干涉的选举。我们就把这个草案交给外长们讨论吧。

杜鲁门　这些就是贝尔纳斯先生今天提出供政府首脑讨论的全部内容。我是不是应该委托外长们准备明天的议程？

斯大林　最好是这样。

丘吉尔　我理解对德政治原则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我明白，我们今天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我希望，我们明天能够讨论。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则是：我们是应该在德国全部四个占领区内采取同样的管制制度呢，还是在不同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原则。

斯大林　这个问题恰好在草案的政治部分里作了规定。我的理解是，我们主张实行一致的政策。

杜鲁门　完全正确。

丘吉尔　我想强调一下这一点，因为这很重要。

斯大林　这是对的。

杜鲁门　明天四点开会。

第 三 次 会 议

1945年7月19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零5分或17点（？）

结束：当地时间16点55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邓恩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戴维斯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库兹涅佐夫
哈里曼	克尔爵士	海军上将
波利	伯尔斯少校	葛罗米柯
邓恩		古谢夫
马修斯		索波列夫
科恩		巴甫洛夫
波伦		
汤普森		

杜鲁门宣布开会。

丘吉尔　昨天，会议一开始，大元帅就提到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冲突的问题。我们对此做了相应的调查，但没听说那里发生过战斗。可能那里双方有过小规模的射击。那里的人民彼此之间并不特别融洽。

这个地区没有希腊的野战部队。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那里有我

们的人。那里有七千国民近卫军，他们驻扎在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接壤的边界上。他们是为国内治安的目的装备起来的。边境对面驻有三万阿尔巴尼亚军队，三万南斯拉夫军队和二万四千保加利亚军队。

我提这些是因为我认为，三大国会议应坚决主张不许对任何国家有这种越境侵犯的事件发生。边界要到和会上确定，因此我们应该申明，如果谁企图先划定自己的边界，那他将陷入最坏的境地。

斯大林 这里有些误会。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在这个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在个别交谈中谈到这件事的。

丘吉尔 我同意大元帅说的，这个问题没有在会上提出过。然而，如果这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我们愿意讨论。

杜鲁门 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我们现在讨论外长们向我们报告的问题。

（接着，英国代表团汇报说，鉴于美国代表团在关于设立外长会议的草案第三条中作了文字上的改动，外长们已同意将这项条文送交审订委员会。

其次，外长们讨论了管制初期必须遵循的对德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协议中的政治部分。英国代表团提醒说，昨天政府首脑们讨论过这个协议草案并委托外长们今天提出报告。

代表团报告说，外长们研究了这个草案，作了某些补充，现在把协议政治部分的新文本提交政府首脑研究。代表团指出，外长们认为等到对协议草案的经济部分讨论和磋商结束之后，就需要在我们的会议上研究有关公布协议全文的问题。

英国代表团接着汇报说，外长们研究了波兰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讨论，然后交给了审订委员会。部长们表示希望：如果审订委员会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可在明天就此问题向政府首脑会议提出报告。

外长们商定提交今天全体会议研究的问题有：德国军舰和商船问题、西班牙问题、履行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及其它问题。）

杜鲁门　第一个问题：关于德国船舰问题。我觉得，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什么是战利品，什么是赔偿物资。如果商船属于赔偿物资，那么就应该在解决赔偿问题时再行解决。我们需要委托赔偿委员会确定应作为赔偿的贵重物资的范围。我对德国商船所以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些船只或许能用于对日作战。

斯大林　海军舰艇和任何战争武器一样，应作为战利品缴获。放下武器的军队应向受降者交出自己的武器。就海军舰艇也可以这样说。三国军事代表的建议中直接了当地提出：海军舰艇应解除武装并予交出。德国的投降条件就是这样。对于商船，也许可以提出它是战利品还是应该列为赔偿物资的问题。至于说海军舰艇，它就是战利品，并应当交出，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意大利的例子，就会看到，两类船只——海军舰艇和商船，都是列为战利品的。

丘吉尔　我不想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也不想使用准确的术语。但是，我想力求使这个问题得到公平合理和友好的解决，力求三大国之间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作为就此次会议全部问题达成的总协议的一部分。现在我只想谈谈德国海军舰艇问题。确实，所有能用的德国船舰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认为，这次会议所提出的问题都将能得到共同一致的友好的解决。我相信这一点，所以原则上我们不反对把德国船舰分掉。

我现在不谈意大利的船舰。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联系我们对意大利的总政策单独地加以讨论。当然，这里还有个赔偿损失的问题。说到大不列颠，它的损失是巨大的。它损失了大约十艘主要舰只，即主力舰、大型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除此而外，至少还损失了二十艘巡洋舰和数百艘鱼雷舰、潜艇和小型舰只。

我觉得，潜艇不同于其它的德国军舰，应该单独算一类。这些潜艇起着特殊的作用。根据德国也签了字的公约，潜艇的使用是受限制的。然而，德国却破坏了这个公约，极为广泛地使用了潜水艇，也就是说，德国非法地使用了潜艇。所以，我们在战争期间也被迫不得不违背合法使用潜艇的规定。我的意见是，这些潜艇应该销毁或者沉没。

但我了解，德国最新式的潜艇，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好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价值，这些潜艇有必要保留下来供研究之用。关于这些潜艇的情报应提供给所有三个大国。我不是纯粹从海上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我完全承认红军在这次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依我看，我们不必在此作出最后决定，但在会议结束之后，这些潜艇的大部分应该销毁，一部分则可以在我们大家之间如数平分。

至于水上舰只，应该在我们之间平分，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就所有其他问题达成总的协汉，并且极其友好地分手。我毫不反对俄国获得德国舰只的三分之一，不过一定要具备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条件。我知道，象俄国人民这样伟大强盛并对共同事业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人民，应该在各大洋上受到热情的欢迎。我们将欢迎俄国舰队出现在海洋上。我理解，在短期内很难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所以这些德国舰艇可以用来进行研究，用来建立俄国舰队。此外我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如果愿意谈谈商船问题，我也可以在这里说几句。

杜鲁门　请说吧。

丘吉尔　我觉得，当对日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德国商船可以在这一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能否尽快结束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船。说到陆、空、海军的兵员，这些我们都不缺。但是我们缺乏运送这些人员以及物资的工具。

此外，需要商船来给不列颠诸岛运送粮食，给被解放了的欧洲国家运送粮食，这些国家的供应本来就不能完全保证。这里每一吨粮食

都十分宝贵。我们和美国已将我们的全部商船都用于共同事业。如果一百二十万个吨位的德国商船不能用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以尽快结束对日作战，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我还想提一件事。芬兰拥有约四十万吨位的商船队，这些船转到了我们俄国盟友的手中。转到俄国盟友手中的还有一部分罗马尼亚的轮船，其中包括两艘重要的运输船，是运送军队所急需的。如果船只要在我们之间按三份平分，那我认为，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商船也应列入应分配的船舰总数之内。

斯大林 我们没有拿芬兰的任何船只，一艘也没有。从罗马尼亚拿了一只船。

丘吉尔 我只是想讲一讲我们均分商船所应遵循的原则。

最后，不应忘记除了我们三国之外，还有其它的国家。例如挪威的商船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挪威的商船吨位，特别是挪威的油船，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船只交给我们使用，结果遭到了巨大损失。其它一些国家也损失了自己的大部分船只。我觉得，恐怕应该提出把商船不是分成三份，而是分成四份的问题，这第四份用来满足那些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代表的某些国家的利益。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来供研究和讨论。

杜鲁门 我也想对这个问题谈一点我们方面的意见。我乐意把除潜艇外的德国舰队分成三份。但为了有利于对日作战，我希望推迟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军舰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不仅用它运送部队，而且用它往欧洲运送物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现有的船只根本不够用。因此，为了对日作战，我十分想保留全部德国水上船舰。

我认为在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到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美国将不仅有很大数量的军舰，而且还将有很大数量的商船，这些商船可以卖给有关国家。假如所有德国商船都能用于对日作战的话，我将非常高

兴。

斯大林 如果俄国人将同日本作战呢？

杜鲁门 当然，俄国人有权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船只，以后要移交给你们。这一点可以达成协议。

斯大林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原则。

丘吉尔 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协议。我觉得，现在可以把分给每个与会国家的船作上标记，对日战争一结束，就把这些船分别交给各国。

斯大林 什么船？

丘吉尔 我指的是商船。不过我觉得，这里原则是最重要的东西。应当记住，是红军在波罗的海岸的进攻迫使德国人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港口，从而把德国舰队从波罗的海赶走。我应该承认，我是支持斯大林大元帅的，我支持俄国人想得到德国部分舰艇和商船的愿望。我认为另一种解决办法只能是把所有的船沉掉。但是既然我们的盟友希望得到其中一部分船舰，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斯大林 不能把俄国人描绘成是有意妨碍盟国舰队对日顺利作战。也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俄国人想从盟国那里得到礼物。我们不是索取礼物，我们只不过想知道，是否认为俄国人想得到部分德国舰只的要求是正当的，承认不承认这个原则。

丘吉尔 我没有说礼物。

斯大林 我没有说你说了这个。

我希望澄清俄国人是否有权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舰只和商船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俄国人有这个权利，他们要得到的东西也是他们理应得到的。我只想澄清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同事们另有想法，那么我希望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如果原则上承认，俄国人有权得到德国军舰和商船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满足了。

至于谈到德国商船的使用，其中包括理应分给俄国的那三分之一

船只的使用，我们当然不会阻挠盟国在对日作战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三分之一。我还同意这个问题到这次会议结束时解决。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不让我们的人接近德国军舰和商船，不准许他们参观这些船。大家知道，大部分德国船舰在我们的一个盟国手里，可是却禁止我们的人接近这些船，他们不能参观这些哪怕给我们看看这些船舰的清单也好嘛。是不是能取消这个禁令，让俄国舰队委员会的代表看看这些船并查明它们的数量？

丘吉尔　我们也遇到不允许我们的人去参观波罗的海的某些战利品的情况。

斯大林　在波罗的海缴获的只是潜艇。不过那都是一些完全报废的被击毁的潜艇。如果愿意看看这些潜艇，随时都可以提供这种方便。

丘吉尔　我们的原则是对等和公正。因此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是请求可否做出安排，让我们的人有机会参观一下令人极感兴趣的德国设施，例如在波罗的海的设施，其中包括某些潜艇？

斯大林　请吧。

杜鲁门　我想代表美国在这里声明，我们所有的地区对你们都是开放的，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愿意看到的一切。但我们希望互相都提供机会参观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丘吉尔　我在这里谈到过潜艇和水上舰只的区别。斯大林大元帅会理解，我们作为生活在岛上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我们这个岛能给我们提供的食物还不到我们需要的三分之二。战争期间我们深受潜艇之害，比谁都严重。我们曾两次濒临毁灭，因此潜艇在英国是不得人心的舰种。我主张把大部分潜艇沉掉。

斯大林　我也赞成。

丘吉尔　剩下的潜艇要在我们之间平分，用于科学和技术的目的，因为它们具有很大价值。由于敌人潜艇的活动，我们曾两次几乎濒于

灭亡，因此，我同意把大部分潜艇沉掉，其余部分在三大国之间分掉。我请大元帅和总统原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特殊。这些潜艇使我们的军事力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在赞成这个原则的同时，我要提一个条件，就是多少潜艇应沉掉，多少潜艇应分掉，这个问题留到这次会议结束时解决。

斯大林 好，我同意。

杜鲁门 我们已经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转入下一个问题。

艾登 下一个问题是西班牙问题。

杜鲁门 大元帅想就这个问题发言吗？

斯大林 建议已经分发了。对建议中谈到的，我没有什么补充。

丘吉尔 总统先生，本届的和上届的不列颠政府都是痛恨佛朗哥和他的政府的。有人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说我对这位先生很友好。所有我说过的话的意思都是说，在西班牙的政治中还有比仅仅为佛朗哥画漫画的材料更甚的东西。我认为，不断地大批屠杀那些因为六年前的旧事而被投入监狱的人以及西班牙的其它一些情况，按照我们英国人的观念，是完全不民主的。

当佛朗哥给我来信说，他和我以及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來自苏联的威胁时，我征得内阁准许，给他发去了一封极为冷淡的回信。苏联政府大概还记得这封回信，因为我把我回信的抄本寄给了苏联政府，同一抄本也寄给了总统。所以在对西班牙现政权的感情上我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

那么，通过大元帅提出的草案有什么困难呢？我看困难就在于第一条，这一条里说要同西班牙现政府佛朗哥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我觉得，考虑到西班牙人高傲自负并且相当敏感，这种性质的步骤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不是使西班牙人脱离佛朗哥，而是使他们团结在佛朗哥周围。因此，我以为，同西班牙政府断交，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样做会使我们感到某种满足，但却失去了今后我们在困难时期可能需要的那种接触。我想，这个步骤只会巩固佛朗哥的地位。而如果他的地位得到巩固，我们就不得不受他的气或者是对他使用武力。我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除非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向我们发动进攻，否则我们不应干涉一个观点与我们有分歧的国家的内政。

至于那些被我们战败的国家，我们应该在那里实行我们的管制。而那些在战争期间被解放的国家，我们不能允许在那里建立法西斯政权或者佛朗哥式的政权。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国家并没有参战，所以，我反对干涉它的内政。英王陛下政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才能下决心同西班牙断绝关系。

我以为，佛朗哥政权正处于危机之中。我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能使它垮得更快。依我看，断绝关系是一种很危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应该估计到，在西班牙随时都有重新爆发内战的可能。而上次内战使人口总数为一千七百万或一千八百万的西班牙付出了二百万人死亡的代价。目前，我不愿积极地介入这件事，因为我认为那里有一股力量在积极行动，使局势朝着更好的方面变化。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旧金山建立的世界组织，不主张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涉。如果我们积极参与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正确的。这与在旧金山通过的国际组织的章程是背道而驰的

杜鲁门 我并不同情佛朗哥政权。但我不想参加西班牙的内战。对于我来说，欧洲的战争已经够了。我们会很高兴地承认取代佛朗哥政府的另一个西班牙政府。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应由西班牙自己来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 这就是说，在西班牙一切都将原封不动啰？可是我认为，佛朗哥政权正在巩固，并且这个政权在给某些欧洲国家的半法西斯政

权撑腰打气。不能忘记，佛朗哥政权是从外部强加给西班牙人民的，而不是西班牙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你们非常清楚，佛朗哥政权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加的，是他们留下的遗产。如果铲除了佛朗哥政权，我们便铲除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余孽。同时不能忽略，欧洲的民主解放事业使我们承担着某种义务。

我不是建议进行军事干涉，也不是建议在那里发动内战。我只是想让西班牙人民知道，我们民主欧洲的领导人对佛朗哥政权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我们不用某种形式声明这一点，西班牙人民将有理由认为我们不反对佛朗哥政权。他们可以说，既然我们不触动佛朗哥政权，就意味着我们支持它。

有什么外交手段可以向西班牙人民证明，我们不是站在佛朗哥一边，而是站在民主一边呢？假定说断绝外交关系这种手段是过于强硬了，那我们能否考虑一下采用其它较为缓和的外交手段？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到，好让西班牙人民知道，我们是同情他们，而不是同情佛朗哥的。

依我看，把佛朗哥政权照现在这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是很危险的。正如从报上看到的那样，欧洲各国的社会舆论，还有美国的社会舆论也一样，都是不同情佛朗哥政权的。要是我们回避这个问题，人们就会以为我们默许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承认它是合法的。这对我们将是一种很严厉的责难。我可不愿意担当受责难的角色。

丘吉尔　你们同西班牙政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谁也不会这样指责你们。

斯大林　但我有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和可能。人们怎么能够知道，苏联同情还是不同情佛朗哥政权呢？人们通常认为，“三巨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和总统、首相一样是“三巨头”之一。对于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对于佛朗哥政权及其对整个欧洲所构成的巨大

危险，我有权保持沉默吗？如果我们绕开这个问题，什么也不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丘吉尔　每一个政府都有单独发表意见的充分自由，报界也有这种自由。斯大林大元帅刚才提到了这点，苏联报刊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对西班牙的局势很自由地发表了意见。至于不列颠政府，虽然我们也经常不断地对佛朗哥及其大使谈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不愿意中断同西班牙政府的关系。

很久以来我们同西班牙之间就存在着贸易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柑桔、葡萄酒和其它一些食品。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供应给他们。要是我们的干预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我可不愿意使这种贸易受到威胁。但同时我完全理解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佛朗哥竟敢厚颜无耻地把“蓝色师团”派到俄国去，所以我对俄国人的观点是理解的。

但是，西班牙丝毫没有妨碍过我们。甚至在它本可以在阿尔赫西拉斯湾阻挠我们的行动时，它也没有那样做。任何人都不怀疑，斯大林大元帅是痛恨佛朗哥的；我想，大多数英国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我们没有受过它的害。

斯大林　问题不在于受了什么气。顺便提一句，我觉得，英国也受过佛朗哥政权之害。西班牙把自己的海岸线长期提供给希特勒的潜艇使用。因此可以认为，英国也遭受过佛朗哥政权这样或那样的危害。

但我并不希望从受了什么气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蓝色师团”，而在于佛朗哥政权对欧洲构成了严重危险。因此我认为应该采取某种行动反对这个政权。如果断绝外交关系不合适，我倒不坚持这一点。可以找到其它的办法。只要我们一旦表明，我们不同情佛朗哥政权，并且我们认为西班牙人民对民主的渴望是正义的，只要我们一旦表明这一点，佛朗哥政权就会土崩瓦解。请各位相信这一点。

我建议让外长们谈谈，看能否想出一个较为缓和的有伸缩性的形

式使人们了解，几个大国是不支持佛朗哥政权的。

杜鲁门 这个建议我可以接受。我同意把问题交给外长们讨论。

丘吉尔 我反对这个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在这个大厅里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 决定当然要我们在这里做，不过预先要让外长们讨论一下。

杜鲁门 我也不反对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预先讨论。

丘吉尔 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问题在于涉及到一个原则，就是干涉了别国的内政。

斯大林 这不是内政。佛朗哥政权构成了国际危险。

丘吉尔 任何人对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政权都可以这样说。

斯大林 不对。象西班牙这样的政权，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欧洲再没有一个国家还保留着这样的政权。

丘吉尔 对葡萄牙就可以谴责它是独裁政权。

斯大林 佛朗哥政权是由外部建立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预的产物。佛朗哥的表现是很有挑衅性的，他藏匿纳粹分子。我并没提出葡萄牙问题。

丘吉尔 我不能建议议会干涉西班牙内政。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就奉行的政策。同时我会因为西班牙政权发生变革而感到高兴，但这种变革只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实现。如果西班牙发生革命，譬如说，如果那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大赦政治犯的话，我本人会非常高兴。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或者不列颠政府在这方面对西班牙施加影响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在感情上会变得与我们对立而趋向佛朗哥。依我看，目前佛朗哥就要垮台。

如果我们在这里采取一致同意的行动，那么这只能加强他的地位。而不列颠政府，除了我在这里谈过的将继续同西班牙进行贸易外，将不以任何方式支持西班牙佛朗哥现政府。

杜鲁门　如果我们一致同意把此问题交外长们进行初步讨论，并由他们就这个问题研究出一个恰当的措词，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斯大林　我理解丘吉尔先生会由于议会的质询而为难，但这是可以设法缓和的。如果说，不单独提出佛朗哥政权的问题，大家商定，这个问题不作为佛期哥政权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和进行研究，这样来解决问题行不行？

委托外长们考虑我们就佛朗哥政权问题交换的意见，对这个问题研究出一个恰当的提法，其中应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提法，即：佛朗哥正在走向自己的末日，他的政权得不到民主国家的同情，社会舆论对这个政权的评价不高。这个提法可以写到我们某一个关于欧洲的宣言里去，作为其中的一条。我们本来就要发表某些共同宣言，可以将这个外长们拟定的提法包括到那里去。

这不要求不列颠政府承担任何义务，但在这条中却包含了对佛朗哥政权的简短的评价，社会舆论也将知道，我们不站在佛朗哥政权一边。依我看，我们应该这样处理，让外长们去考虑用哪种式去表述吧。

丘吉尔　我原则上还没同意我们就这个问题发表共同宣言。

斯大林　我们不是对西班牙，而是对欧洲作出总的评价，所以可以把这一点作为其中的一条包括进去。在我们所有的文件里，我们谈到了所有的国家，就是不谈西班牙，这算什么呢？

丘吉尔　我所遵循的方针是：西班牙是一个未卷入战争的国家，它不是附庸国，它也不是由盟国解放的，因此我们不能干涉它的内政。这是个原则问题。

至于谈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其它国家，那里有很多我们不喜欢和我们可以批评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卷入了战争，并且是被同盟国解放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可以制定一个作为各民主政府基础的一般原则的宣言。这是可以讨论的。譬如说我指的是美国宪法。毫无疑

问，佛朗哥与这个宪法相距甚远。每个国家都不同于别的国家，因此，如果我们进行干预，这会给我们带来大量困难。

我不知道西班牙人自己怎么想，但我觉得，有的人这样想，有的人那样想。我相信，很多西班牙人都愿摆脱佛朗哥，但是不要有外来的压力。我看不出外长们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些什么。我觉得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十分困难的工作，而讨论这个问题也会是徒劳无功的。

杜鲁门 我看在今天的会议上就此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也许过些时候再回头来讨论更好？

斯大林 是否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让他们设法研究出一个合适的提法？

丘吉尔 我们恰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达成协议。

杜鲁门 我想，我们现在最好是讨论另一问题，西班牙的问题回头再说。

丘吉尔 我并没有提出要否定这个问题。我只是建议现在先讨论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晚些时候再讨论。

杜鲁门 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

艾登 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问题。

杜鲁门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我已于7月17日提出。

斯大林 我建议现在推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提出另一个提案。

杜鲁门 我不反对现在推迟讨论这个问题。

艾登 下个问题是南斯拉夫问题。我们已就这个问题提出一项简短的草案。

斯大林 我认为，不听取南斯拉夫代表的意见我们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艾登 应该注意到：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参加，我们也达成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协议。

斯大林 现在南斯拉夫是成立了合法政府的同盟国。现在解决问题不能没有它的代表参加。当时曾有两个政府，他们互相间怎样也不能和解。我们干预了此事。而现在那里只有一个合法政府。我们邀请南斯拉夫的代表前来，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丘吉尔 是邀请舒巴希奇和铁托吗？

斯大林 是的。

丘吉尔 但他们之间是谈不拢的。双方敌对情绪很强烈。

斯大林 这我不知道。我们来核实一下吧，邀请他们到这里来，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

杜鲁门 难道这件事竟严重到非把他们叫到这里来不可吗？我认为不便这样做。

丘吉尔 我们在克里米亚协议上签了字。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宣言在南斯拉夫并未得到履行：没有选举法；议会尚未扩大；司法程序尚未恢复；铁托的行政机构受到他建立的党内警察的控制；新闻也象在某些法西斯国家里一样，受到控制。

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局势辜负了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宣言中所表达的希望。我们在自己力量微薄时就曾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武器，因此我们对于那里的事态竟然如此发展感到失望和遗憾。我们的建议很简单，只是要把雅尔塔宣言中所说的东西付诸实现而已。

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不是回答总统的问题，而是立即转入了讨论。总统提出的问题是：丘吉尔先生是否认为这个问题如此严重和重要，以致于非要在我们的会议上讨论并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前来参加不可。如果总统先生允许的话，我也可以步丘吉尔先生的后尘，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我们并不知道有丘吉尔先生在这里所讲的违反克里米亚会议某些决议的情况。我认为正确的是听听南斯拉夫人自己的意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要么驳倒这些指责，要

么承认这些指责是正确的。

丘吉尔 我希望您把“指责”一词换为“申诉”。

斯大林 问题不在于用什么词，当然，我可以把指责”换成“申诉”，但不能不听取一个国家代表的意见就来非议整个国家。

丘吉尔 我们现在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周密考虑。我认为，如果双方，即铁托和舒巴希奇能在这里会晤，那是合适的。可能那时这些困难将会解决，并且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但你们是否认为铁托元帅会同意到这里来呢？

斯大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来，这需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杜鲁门 我想在结束之前声明一点，我是作为美国代表到这里来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同你们讨论各种世界问题的。我可不是来评论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研究那些本应由在旧金山成立的世界组织解决的争端的。

如果我们将研究对某一个人的政治控诉的话，那我们只是白费时间。如果我们把铁托、佛朗哥或者其他人物叫到这里来，那么这不会导致任何好的结果。我们不是审理对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控告的司法机关。我们应该研究讨的是那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的问题。

斯大林 这是个正确的意见。

杜鲁门 我们应该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丘吉尔 总统先生，这是个美国也同样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是否执行克里米亚会议通过的决议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当然，应该注意到南斯拉夫的局势和铁托元帅的处境，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国家安定下来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草案里指的一切，也就是希望克里米亚会议上所谈到的东西得以执行。

斯大林 据我看，铁托元帅完全、彻底地执行了克里米亚决议。

杜鲁门 正确地说，不是克里米亚会议的所有决议都在南斯拉夫得到贯彻。我们也有意见。需要向南斯拉夫政府指出这点。但我们可

以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丘吉尔　我要感谢斯大林大元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表现的耐心。如果我们不能讨论有时在我们之间发生的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分歧，那么还能在哪里讨论呢？

斯大林　我们不正是在这里讨论嘛。但不能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您指责南斯拉夫政府首脑，我请求听取他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然后可以进行讨论，讨论多长时间都行。

丘吉尔　我同意这点，但总统反对要铁托到这里来。

斯大林　那就只好撤销这个问题。

杜鲁门　今天的议事日程完了。明天下午4点开会。

第 四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0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6点或16点零5分

结束：当地时间18点4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邓恩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克赖顿	威廉·斯特兰爵士	葛罗米柯
戴维斯		古谢夫
哈里曼		索波列夫
波利		
墨菲		
邓恩		
马修斯		
科恩		
波伦		
汤普森		

（杜鲁门宣布开会。

苏联代表团汇报说，在今天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了以下问题：

1. 对德经济原则。

会上指出，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尚未结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未对此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会议决定要该委员会在 7 月 21 日前结束自己的工作。

2. 波兰问题。

会上报告，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尚未结束自己的工作，因此未对此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会议决定要该委员会在 7 月 21 日前结束自己的工作。

3. 关于安排和约问题。

负责起草关于制订和约问题的草案的委员会由于委员们忙于其它委员会的事务而未能完成此项任务，因此，外长们决定今天 15 点 45 分再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在三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外长们在会上通过了对这个草案第三条的修正，修改后的第三条条文如下：

“3.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外长会议将受命起草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以便提交联合国家，并就欧战结束时出现的未决的领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外长会议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以便合乎此目的的德国政府成立时，由德国政府予以接受。

为执行上述每一任务，外长会议将分别由在各敌国投降书上签字之国家组成。研究对意大利和约时，法国应被看作是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

其它成员将于讨论直接与他们有关的问题时，被邀请参加。”

4. 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问题。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向大不列颠外交大臣和美国国务卿递交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苏联建议草案，就提出的草案一方面讨论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局势问题，另一方面讨论了希腊的局势问题。讨论的结果表明，外长们对这些国家局势的估计是不一致的。

美国国务卿和大不列颠外交大臣指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存在着新闻限制。外交人民委员指出，在战争条伴下，实行过某些不可

避免的新闻限制。目前，鉴于战争已经结束，新闻记者在这些国家的工作条件可以大为放宽。

美国国务卿建议三国签定一项关于由三国对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情况进行观察和关于保证美国、苏联、大不列颠的新闻记者自由进入这些国家并允许他们来往自由和自由发送新闻报导的协议。英国外交大臣同意这个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声明，他认为没有必要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专门的观察员。至于谈到希腊，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它所提出的文件中阐明。如果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外长就这个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可以在三外长会议上予以讨论。

5. 关于意大利问题。

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三国政府首脑的决议草案，草案支持意大利加入联合国。至于西班牙，则只要它仍处于现存政权控制之下，三国就不支持它加入联合国。大不列颠外交大臣声明，他支持这个建议，并说，如果将就这个问题拟定某种宣言的话，他认为在宣言里提及三大国同时也支持接纳某些中立国家，比如瑞典、瑞士和葡萄牙等国加入联合国，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把这个建议的范围扩展到已由敌国变为共同对德作战的那些国家。大不列颠外交大臣声明，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个人认为，可以在同这些国家签定和约之后，允许它们加入联合国家的行列。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建立了小组委员会。

因此，决定委托赔偿问题委员会研究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赔偿问题。

6.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苏联政府关于确定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议已交给了美国和大不列颠两国外长，同时还交给了相应的地图。决定于 7 月 20 日在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7. 关于被托管领土问题。

苏联政府关于确定领土托管措施的建议已交给美国和大不列颠两国外长。决定于7月20日在三国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8. 关于7月20日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议事日程问题。

外长们商定向三国政府首脑推荐如下议程：

1. 关于和约问题。

2. 美国总统7月17日关于对意大利政策的备忘录。

3. 奥地利，其中包括维也纳的局势问题。（由大不列颠首相报告。）

4.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5. 关于被托管领土问题。）

丘吉尔　总统先生，为了便利我们的工作，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有关我们工作程序的小问题。我们的外长们每天都举行会晤并为我们每天晚间的会议准备内容广泛的议程。例如，今天他们直到两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这样，留给我们看和讨论他们所准备的文件的时间就很少。是否我们下午的会议五点开始更好。

杜鲁门　我不反对。

我们转入讨论日程上的问题。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

丘吉尔　据我理解，苏联代表团对于设立外长会议的决议草案有某种修正意见。

杜鲁门　修正意见已宣读过了。我同意这项修正。

丘吉尔　（重读了修正意见的条文。）我也同意这项修正。

杜鲁门　需要确定外长会议举行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我准备让外长们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

丘吉尔　我完全同意。这个问题应当加以讨论。但我有一个想法，即这个地点应当是伦敦，它应是秘书处的常驻地点。至于会议，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在其它的地方开。作为我的理由，我想提醒大家一

点，伦敦是在战争期间遭受敌人轰炸破坏最为严重的一个首都。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除此之外，它位于美国和俄国的中间。

斯大林 这是最主要的。（笑声）

丘吉尔 而且，现在也该轮到伦敦了。

斯大林 是的。

丘吉尔 我只想补充一点，为了有幸同美国总统会谈，我曾六次飞越大洋，我还两次访问莫斯科。然而伦敦从未用来作为我们会晤的地点。在英国对这一点的情绪是很强烈的。我想，艾德礼先生也可以就这一点说几句。

艾德礼 我完全同意首相在这里说的话，我还想补充说，我国的人有权在自己的首都看到诸位杰出的人物。我国的人将为此十分高兴。他们经受了很多痛苦。除此之外，我认为，伦敦的地理位置也起重要的作用。我支持首相表达的愿望。

杜鲁门 我也同意首相的建议，并同意地理位置起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 好，我不反对。

杜鲁门 但我想保留邀请各位政府首脑访问美国的权力。

丘吉尔 请允许我对总统和大元帅慷慨地采纳我的建议表示感谢。

杜鲁门 我认为，中国和法国的外长在适当的时候也将参加我们三外长的会议。我还认为，可以委托外长们决定外长会议召开的日期问题。

（斯大林和丘吉尔同意杜鲁门的建议。）

杜鲁门 第二个问题是对意大利的政策问题。我们关于对意大利政策的建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分发。我的建议的实质如下：

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意大利作为对德参战国的功绩的话，它的地位将大为改善，我建议，由意大利政府承担下列义务来取代投降条款：（1）在签订和约之前，意大利政府不采取针对任何一个联合国

家的任何敌对行动；（2）除盟国授权者外，意大利政府将不保持任何陆军、海军或空军及其设施，并将服从一切有关这些武装力量和设施问题的指令。

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对意大利的管制应仅保持在下列必需的范围以内：（甲）保证盟国军队留驻意大利或从意大利出发作战期间的军事需要，（乙）保证领土争端的公正解决。

斯大林 最好外长们讨论一下对意大利的政策问题。我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但是可能需要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改。最好把这个文件交给三国外长们最后校订。并且请他们在讨论意大利问题的同时，也讨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把意大利问题与其它一些国家的问题分开。诚然，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国家，并且后来帮助过对德作战。它的兵力纵然不多，总共才三个师，但它终究是出了力。它正在考虑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它的一个长处。但这样的长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家也有。这些国家投降后第二天就调兵对德作战。保加利亚参加对德作战的军队有八至十个师，罗马尼亚有大约九个师。因而也应使这些国家的处境得到改善。

至于谈到芬兰，它在战争中出力不很大，但表现不错，认真地履行了自己承担的义务。它的处境也可以改善。

因此，最好在改善意大利处境的同时，也改善这些国家的处境，并将这些问题一并讨论。如果诸位同事们同意我的建议，就可以委托三位外长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加以研究。

杜鲁门 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国家。并且据我所知，它的投降条件较之其它国家的投降条件要苛刻些。但我同意，对其它附庸国的处境也应重新加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丘吉尔 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与我的两位同事所持的立场

不尽一致。意大利1940年6月向我们发动了进攻。在地中海以及在我们本身面临入侵的危险时不得不组织的埃及保卫战中，我们的损失都极大。我们在地中海损失了大量的军舰和商船。在北非大陆和沿海，我们也损失惨重。而当德国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非洲时，我们损失就更大了。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在阿比西尼亚作战，这次战役的结果是使阿比西尼亚皇帝恢复了皇位。意大利还派出了航空大队专门轰炸伦敦。

还需要提到的是，意大利毫无道理地对希腊发动了进攻。而就在战争爆发前夕，它又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同样毫无道理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完全是孤军作战的时候。

我之所以讲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忘记意大利使我们蒙受的那些损失。我们不能为意大利人民开脱，就象我们不能因为德国人民是处于希特勒桎梏之下，而为他们开脱一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支持了作为欧洲和地中海重要国家之一的意大利应得到恢复的主张。一年前，当我在那里时，我曾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许多建议，其中大部分都包括在后來公布的宣言中。

我不想使人觉得，好象我对意大利抱有复仇的情绪。我曾反驳过在各种报刊上出现的、硬说我们怀有反对意大利情绪的报导。我曾以国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声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问心无愧的，是希望取得最良好的结果的。我希望所有这些想法能得到注意。

我原则上可以同意总统和大元帅的意见，我们应对意大利人民有所表示，因为意大利人民在战争期间曾经备受苦难，并曾为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土而尽力。因此，不列颠代表团原则上不反对签订对意和约。拟定和约条款的工作无疑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

我还要指出，意大利现政府并不是建立在自由与独立的选举的民主基础上的。这个政府不过是由那些自称是各种政党领袖的政治家组成的。据我了解，意大利政府打算在入冬前举行选举。因此，虽然我

也同意外长会议着手草拟和约的工作，但是我认为：外长会议在意大利未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政府之前，最好不要结束自己的工作。

与此同时，我应该说，我不完全同意美国关于临时条件的备忘录。根据这个备忘录，现行停战条件应以意大利现政府承担某些义务来代替。我认为，任何意大利政府，如果它不依靠意大利人民的话，都不能做出言之有信的保证。假使投降条款中所规定的我们现有权利将被取消，由意大利政府承担某些义务来代替，而到签订和约又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除使用武力外，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能使意大利一定履行我们的条件。而我们中间任何人都不愿意为达到这种目的而诉诸武力。

就拿美国备忘录的第一条来说，这里对意大利船舰的前途，对意大利的殖民地，对赔偿及其它重要问题都只字未提。这样我们就丧失了我们根据投降文件所应享有的权利。

最后，我应该说明，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不仅有大不列颠，还有不列颠帝国内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在战争期间蒙受损失的自治领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必须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希腊也是意大利大规模入侵的牺牲品。我愿意原则同意外长会议开始进行草拟和约的工作，今天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至于这里提到的其他国家，那么，我应该说，保加利亚无权对大不列颠提出任何要求。保加利亚曾给我们残酷的打击，并在巴尔干地区对我们极尽破坏之能事。保加利亚对俄国的忘恩负义行为当然不应由我来讲。俄国军队当年曾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长期的暴虐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次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几乎未受损失，她是德国的仆从，在德国的指使下进攻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使这两个国家受害极大。然而，关于解除保加利亚武装问题却只字未提。我认为，它现在和以前一样强大，它拥有十五个师。关于保加利亚的赔偿问题也只字未提。老实说，我对尽快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没有很大兴趣，至少比同意大

利签订和约的兴趣要小。

我对我的同事们如此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非常感谢。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应该说，在某些问题上，我与总统和大元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

斯大林 我认为，意大利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三巨头的任务在于使德国的附庸国脱离德国这股主要的侵略势力。为此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使用武力。这种方法我们已成功地使用了，盟国军队正驻扎在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土上。但是，要使德国的帮凶国脱离德国，只用这一种办法还不够。如果我们今后也只是用武力对付这些国家，就会有一种危险，即我们会为德国将来进行侵略准备好条件。所以，使用武力的方法应该以改善这些国家处境的办法来补充。依我看，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是使这些国家团结在我们周围并永远脱离德国的唯一办法。

这就是从大的方面、政策方面考虑问题。所有其他的想法，报复也罢，委屈也罢——统统不能成立。

我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美国总统的备忘录的。我认为，总统的备忘录符合这个政策，即通过改善附属国的处境使它们永远脱离德国的政策。因此，我对总统备忘录中提出的条款没有原则上的反对意见。可能这里有必要作一些文字上的润色。

现在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我指的是丘吉尔先生的发言。当然，意大利对俄国也犯了很大的罪过。我们同意大利军队不仅在乌克兰，还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作过战，——他们深入我国国土竟如此之远。然而，我认为，本着记仇或报复的心理来制定自己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在政治问题上，报复或仇恨心理或者泄忿情绪都是很坏的参谋。依我看，在政治问题上我们应该以力量的考虑为依据。

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意大利站在我们一边，从而使它脱离德国那些有朝一日可能起而反对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希

望这样，并且我们应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应使德国过去的帮凶国脱离德国。

这些国家曾使我们饱受苦难，譬如：罗马尼亚曾派出不少个师的军队同苏军作战；匈牙利在战争后期曾有二十个师同苏军作战；芬兰也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不用说，没有芬兰的帮助，德国是围困不了列宁格勒的。芬兰曾派出二十四个师同我军作战。保加利亚使我们遭受的困难和痛苦要少些。它帮助德国侵犯和进攻俄国，但它本身没有参加反对我们的战争，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同苏军作战。停战协定规定，保加利亚应提供军队对德作战。这一协定是由三大国——美国、大不列颠和苏联——的代表签署的。协定说，一俟对德战争结束，保加利亚军队就应进行复员并削减到和平时期的规模。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并且将会做到。保加利亚不能抗拒执行协定，它应该履行协定。

这就是附庸国对盟国，特别是对苏联犯下的罪过。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附庸国曾使我们遭受巨大牺牲就对它们实行报复，这是一种政策。我不赞成这种政策。在这些国家已被战败，并且已经有三大国管制委员会在那里监督他们执行停战条件之后，应该转而采取另一种政策——改善这些国家处境的政策。而改善这些国家的处境就意味着使它们脱离德国。

现在谈谈具体的建议。据我理解，杜鲁门总统没有提议立即制定对意和约。杜鲁门总统只是提议为在最近的将来缔结这个条约扫清道路，而目前他建议造成某种介乎意大利已接受的投降条件和未来的和约之间的过渡性局面。

我认为，很难反对这样的建议。它完全合乎实际需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谈到其他附庸国，我认为，可以从恢复同它们的外交关系入手。有人会反对说，那里没有自由选举出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政府意大利也没有。然而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已经恢复。法国和比利时也没有这样的政府。但是，谁也不认为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

问题。

丘吉尔 这些国家是同盟国。

斯大林 我明白。但是，民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民主，不管是在同盟国，还是在附庸国。

杜鲁门 据我理解，情况是这样的。我提的是关于意大利的一项具体建议。停战条件是所有我们三国都签署了的。

艾登 我们没有代表自治领签字。

杜鲁门 在其他附庸国问题上，自治领也没有签字。不过，让我们回到现在讨论的问题上来吧，列入议程的是关于对意政策问题。苏联方面提出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问题。据我理解，大元帅是建议将有关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的问题交给我们的外长们讨论。

这里谈的是拟定缔结和约前的初步条款问题。我完全同意大元帅的意见，这些条约不应建立在报复、仇恨和泄忿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为全人类的和平生存创造条件的正义感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达到这一点。

关于意大利的赔偿问题我应讲几句话。意大利目前的局势使我们面临一个要向它提供七亿到十亿美元援助的问题。但是，我要声明，对其他国家我们不能不要任何报酬地提供同样的援助。我认为，我们应在这里努力创造条件，使这些国家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交给外长们讨论，他们会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使我们能对所有这些国家取得共同意见。

丘吉尔 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意大利问题应交给外长们讨论。我只是反对废止现行的投降条件，这将会剥夺我们极其重要的权利。我同意总统关于必须对意大利放宽条件并有所表示的意见。我不反对在这里宣布：对意和约的准备已在进行。

我完全同意大元帅和总统讲的所有关于不应凭报仇泄忿的感情来

决定未来的那些话。我很满意地听取了两个伟大民族的领导人代表他们的人民所作的声明。我对意大利抱有很大的同情，大不列颠政府也将本着这种精神行事。我对意大利使用了“赔偿”一词，不过，我们当然不是为自己索取任何赔偿，我们想到的是希腊。

杜鲁门 我提议将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问题交由三位外长讨论。

丘吉尔 我同意将拟订对意和约的准备工作交给外长会议。

斯大林 哪一个外长会议？

丘吉尔 未来的外长会议。我只是对临时措施提出了保留意见。这可以在我们外长们的每日例会上加以讨论。

斯大林 我提议外长们对其他德国帮凶国的问题也能进行讨论。丘吉尔先生，请您不要反对这一点。（全场笑声）请三位外长在讨论意大利问题的同时，也讨论其他国家的问题。

丘吉尔 我从未反对过。（笑声）

杜鲁门 我也同意。

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由首相作关于奥地利的局势，其中包括维也纳的局势的报告。

丘吉尔 我深感遗憾的是，在今天的讨论中我几次没有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见。不过，我认为，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局势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曾商定，我们将在奥地利占领不同的地段，不同的区域。这件事已拖延了很长时间。

两个多月前，我曾请求允许不列颠军官进入维也纳，以便察看我们所必需的房屋、机场，以及我们驻扎军队的地方。这一切事先都曾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我们的军官们到维也纳去了，但是，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这些代表被迫离开那里，一无所获地回来。现在不仅不准我们进入维也纳，而且不准我们的军队进驻根据协议划归我们的区域。

苏联军队解放奥地利已有三至四个月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

个简单的问题上存在这样的困难，而且是发生在已就这个问题签订协议之后。我常收到亚历山大元帅的报告，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至今我们还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我认为，根据已签订的协议，应该允许我们这样做。

昨天要我说明，俄国代表团可否看一看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德国舰只。对这个问题我回答说：请给我们提供对等的方便。如果俄国代表可以参观在英国的德国舰只，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权进入在俄国占领下的敌方城市去。我们从德国北部的俄国占领区调出了自己的军队，美国军队也撤离了这一地区，可我们却无权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区。

斯大林 是曾有过一个关于奥地利占领区的协议，但是，关于维也纳的占领区，却没有过任何协议。很清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协议。这个协议现在已经达成，是昨天才达成的。还得就哪些机场交给谁的问题达成协议。这也需要时间。现在这个问题也达成了协议。我们昨天刚收到法国人的答复。现在，已经确定了你们军队开进维也纳和我们军队撤离维也纳的日期。可以在今天或明天开始行动。丘吉尔先生十分愤慨，但情况并不完全是他说的那样。不能这么说：不准进入我们的占领区。（笑声）不能这么说。在德国，整整一个月没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占领区。我们没有怨言，我们知道，撤走部队并为苏军进驻做好一切准备是多么复杂的事情。苏联政府完全无意违反已达成的协议。如果奥地利，其中包括维也纳的局势问题仅在于此，那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柏林地区人们的行动较为明智，那里的问题也就解决得快些。

亚历山大元帅做得欠妥，这也是使事情拖延下来的因素之一。他表现得好象俄国部队是从属于他似的。这只能拖延问题的解决。在德国，英美的军方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过。现在，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斯提尔，不存在任何阻碍各方军队进入各自占领区的障碍，这是因为

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

丘吉尔　我非常高兴，这个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占领区了。至于亚历出大元帅，我认为，没有埋怨他的理由。

斯大林　没有人抱怨过艾森豪威尔，没有人抱怨过蒙哥马利却有人抱怨亚历山大。

丘吉尔　我们很希望把抱怨的内容告诉我们。

斯大林　我不想为控告亚历山大作证，我的发言不是检查官的起诉词。（笑声）

丘吉尔　我觉得有责任说明，由于没有人对亚历山大正式起诉，大不列颠政府将保持对他的充分信任。我们将支持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斯大林　我本人没有任何抱怨。我只是转达了指挥官们向我报告的情况，指出这是使问题拖延的原因之一。

丘吉尔　不仅我们关心这个问题，美国指挥官们也很关心。

杜鲁门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据我理解，苏联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

斯大林　如果我的同事们没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是否转入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明天讨论？

杜鲁门　最好明天讨论。这个问题是明天会议日程上的第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关于领土托管问题。

斯大林　这个问题是否也可以明天研究？

杜鲁门　我同意。我们的议程讨论完了。明天5点开会。

第 五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1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7点

结束：当地时间19点25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戈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波利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葛罗米柯
戴维斯	克尔爵士	古谢夫
邓恩	威廉·斯特兰爵士	诺维科夫
克赖顿		索波列夫
科恩		巴甫洛夫
马修斯		
波伦		

杜鲁门　今天的外长会议情况将由贝尔纳斯先生汇报。

贝尔纳斯　外长们讨论了正式成立外长会议的日期问题，并达成协议：外长会议应不晚于9月1日成立。他们同时一致同意，在公开宣布成立外长会议之前，应向中国政府和法国临时政府发电，邀清他们参加外长会议。应不列颠代表团的要求，委托这一提案的审订委员会对提案的现有文本稍作修改。

下个问题是对德经济原则问题。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刚刚提出报告，三国代表团未能充分研究，所以我们同意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明天讨论。

下个问题是波兰问题——关于解散伦敦的波兰政府和执行雅尔塔宣言的问题。负责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做了报告。鉴于小组委员会未能达成全面协议，外长们对那些仍有分歧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外长们就其中几点达成了协议，但下面几点交政府首脑们作最后决定。

我想，如果你们每人有一份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就容易明白提请你们解决的是哪些分歧。提请你们解决的问题如下：（甲）关于向波兰政府移交资产和波兰政府承认对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债务的条款。（乙）关于举行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条款。

关于（甲）项中涉及向波兰政府移交资产及波兰政府承认对英、美政府债务的分歧，小组委员会主席报告如下：大不列颠政府和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防止将在大不列颠和美国境内并由两国政府控制的波兰财产转给他人，不管此种财产具有何种形式。他们准备立即采取措施，将这些财产根据法律要求转交波兰民族政府，为此他们准备同波兰临时政府的有关代表讨论移交此项财产的办法和日期。

这个提案的提法引起了分歧。美国政府的立场是，资产的问题应是波兰国家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讨论的问题。他们之间还应同时讨论波兰政府的债务问题。美国政府相信，波兰临时政府毫不怀疑我们准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将属于它的一切财产交它支配。

因此，我们建议这个问题措词如下：“波兰临时政府既已公认为波兰国家的政府，大不列颠政府和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在其境内并在其控制下属于波兰国家的财产利益，不论此种财产具有何种形式，予以保护。英、美两国政府已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此种财产转给第三者，并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条件，俾能运用正常法律手段，收回一

切可能被非法转给他国之波兰国家财产。”

我们是讨论有分歧的各点，还是继续汇报？

斯大林 我们先听完汇报，然后再转入讨论。

贝尔纳斯 下一点未引起任何分歧：“三国极愿协助波兰临时政府，向侨居国外而愿意回国的波兰人，其中包括波兰军队和商船人员提供方便，使他们在实际可能范围内，尽快返回波兰。三国期望，这些波兰人返国后将享有与一切波兰公民平等的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

对下面一点有分歧：“三国注意到，波兰临时政府已按照克里米亚会议决议同意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尽速举行自由的与不受任何限制的选举。一切民主的及反纳粹的政党将有权参加和提出候选人。三国郑重希望，选举进行的方式应使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波兰社会一切民主的及反纳粹的舆论界人士均有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充分参加恢复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

其次，三国期望，盟国新闻记者将享有向全世界报导波兰在选举前及选举期间的情况的充分自由。”

分歧在于，苏联代表团建议删去这一段的最后两句话。艾登先生同意删去，但要保留盟国新闻记者自由进入波兰这句话。这样，引起分歧的首先是移交资产而不提债务这一点。

杜鲁门 按照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在谈及资产时，只字不提债务。我昨天就谈了这一点。美利坚合众国不打算背这种包袱。我们不可能在不讨论波兰政府的债务的情况下承担向它移交全部资产的义务。

丘吉尔 我们同意总统的建议：只有在同时提到波兰政府债务的条件下才向波兰政府移交资产。

贝尔纳斯 我们的提法是想取得折衷的解决，它既未提资产，也未提到债务。我们说，不列颠政府和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属于波兰国家但在英、美两国境内的波兰政府财产利益，不管此种财产具有

何种形式，均予以保护。在草案中也提到，两国政府均已采取措施，防止将这些财产转给第三者。除此之外，还提到向波兰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条件，俾能运用通常法律手段，收回一切可能被非法转给他人的波兰国家的财产。

丘吉尔　这里既未谈到资产，也未谈到债务。

贝尔纳斯　我已经说明我们的草案包括有哪些方面。

丘吉尔　这里根本没提把波兰欠大不列颠的债务——即我们为前伦敦波兰政府垫付的一亿二千万英镑，转到波兰临时政府帐上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情况和你们的一样。

贝尔纳斯　如果苏联政府那里也有属于波兰政府的财产，那么，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公开提，我们将把由于美国政府承认波兰政府而应转交的波兰财产，转交给波兰政府。

丘吉尔　我想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把资产和债务的问题放一放。当然，这个问题对我们比对美国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曾为前伦敦波兰政府大量垫款。

杜鲁门　我不喜欢在这里作出有关偿还这些债务的公开声明。

丘吉尔　我同意您的意见。

斯大林　不列颠政府想向波兰索取为维持波兰军队而提供的全部垫款吗？

丘吉尔　不，这个问题我们将同波兰人讨论。

斯大林　我们向锡科尔斯基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也为创建临时民族政府军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但我们认为，波兰人民已用自己的鲜血偿还了这笔债。我认为，除“将向波兰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条件，俾能运用通常法律手段”一处外，美国政府的折衷建议，是可以接受的。我建议这句话改为“将向波兰临时政府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一切条件”。这样修改后可以通过美国代表团的折衷建议。

丘吉尔 那有什么区别呢？

斯大林 区别在于不会有在运用通常的法律手段时经常发生的那种扯皮现象。如果说根据法律，就要简单些。但归根结底这是小事情，也可以按照美国代表团自己的提法通过这个提案。

贝尔纳斯 下一个分歧涉及到这样的提法："三国注意到，波兰临时政府按照克里米亚会议决议已同意进行……"等等。艾登先生反对这样的提法。

艾登 我提出了折衷的提法，但苏联代表团反对，那就是，从"三国郑重期望"到"自己的观点"全部删去，但保留最后"允许盟国新闻记者进入……"这句话。

斯大林 艾登先生照顾了波兰的利益和尊严，这是好的，应当欢迎这一点。如果他朝着这个方向再前进一步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这个建议。（笑声）前一行已谈到波兰政府应履行克里米亚宣言，何必再次重复同一个意思呢？

外国记者是到波兰去，而不是去找波兰政府。他们将享有充分自由，从他们方面不会抱怨波兰政府。何必还要再次重复这一点呢？波兰人将因此感到委屈，把这看作是怀疑他们似乎不愿意让记者进去。这一段我们在"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将有权参加和提出候选人"这句话这里结束吧，其余的话都删掉。

丘吉尔 这就不是妥协了。（笑声）

斯大林 这对波兰政府是个妥协。（笑声）

丘吉尔 我本来还指望加强这个提法，而不是削弱。

斯大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杜鲁门 我们对波兰的选举问题很关心。因为我们有六百万波兰血统的公民。如果波兰的选举将完全自由地进行，我们的记者可以完全自由地报导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那么，对于我这个总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如果波兰政府事先知道三大国期待波兰政府举

行自由选举，并让盟国新闻记者自由进入波兰，那波兰政府当然会十分认真地履行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中包括的各项要求。

斯大林 艾登先生，您看，我要妥协了：我想提出这样的建议，在“提出候选人”后面打一个逗号，然后说：“盟国新闻记者将享有向全世界报导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充分自由。”

杜鲁门 我可以同意。

丘吉尔 这段开头的“注意到”这几个字在这里也很起作用，我也同意。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关于履行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及前德国附庸国的协定。美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文件，但外长会议决定推迟讨论，以便有可能对他们进行研究。外长们一致同意将这两个文件交给审订委员会。但是，审订委员会是应该将这两个文件分别加以研究，还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文件呢？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苏联代表团主张作为统一的文件加以研究，而美国代表团则主张作为两个单独的文件以研究。鉴于对意大利和其它附庸国的政策问题是政府首脑交给外长们讨论的，各方同意请政府首脑在今天的会议上对审订委员会作出指示：是拟定一份有关所有这些国家的统一文件，还是在美国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两份文件。

杜鲁门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交了两个文件：第一个关于对意政策（昨天和前天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关于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我们认为，应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因为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国家，并在此后参加了对德作战。此外，美国和意大利政府之间有外交关系，而美国和上述几个国家之间则没有这种关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认为，意大利问题应先于这些国家的问题得到解决。我重复一遍，我们认为需要分别地研究这两个问题。

斯大林 我对美国人关于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

政策问题的提案，有一点修正意见。我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提案。但对第二条我想补充一点。第二条中谈到：“三国政府将发表关于……的声明”，我建议在这后面加上：“而目前它们声明，它们认为与之恢复外交关系是可能的”。

杜鲁门　我不能同意这一点。

斯大林　那就只好将关于意大利和关于这些国家的两个草案都推迟讨论。

杜鲁门　我们不准备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此外，我们从未和芬兰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正象我已指出的那样，当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改组后，我们将准备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斯大林　如不采纳我的补充我不能同意。

丘吉尔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一个星期，然而很多问题都被我们搁置起来了。

不列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关于今天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我们达成协议，外长们将向政府首脑建议，将上述两个问题列入今天首脑会议的议程；这两个问题是政府首脑在早些时候交给外长们讨论的，现在外长们想就这两个问题得到进一步指示；此外，列入议程的还有昨天首脑会议遗留的三个问题。因此，建议今天的会议议程如下：

1. 波兰问题——解散伦敦政府，履行雅尔塔协定。

2. 审订委员会在制订对意大利及其它附庸国政策时，是应该单独拟定一份关于意大利的提案，还是拟定一份关于以上所涉及的所有国家的统一提案问题。

3. 波兰西部边界。昨天苏联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

4. 托管。昨天苏联代表团也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

5. 土耳其。看来，不列颠政府希望口头提出这个问题。

杜鲁门　请允许我对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作一个声明。雅尔塔协定规定，德国领土由大不列颠、苏联、美国及法国等四国军队占领，其中每个国家均拥有自己的占领区。那次会议上谈到了波兰边界问题，但决议指出，这个问题应最后在和会上得到解决。在前面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以1937年12月的德国边界作为讨论未来德国边界的出发点。

我们划定了占领区及这些区域的界线。我们已按照规定将自己的军队撤到了各自的占领区内。但是看来，现在还有一个政府得到了占领区，并且没有和我们协商就这样做了。假如原来认为，波兰应是分得占领区的国家之一，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很难同意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没有就此问题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我对波兰是友好的，并且我也许会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提案，但是我不想现在就这样做，因为另有地方来做这件事，这就是和会。

斯大林　克里米亚会议的决议中说明，三国政府首脑同意波兰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可见波兰东部边界在那次会议上就已确定下来，至于西部边界，会议决议中说：波兰北部及西部的领土应有相当的扩大。决议中接着指出：它们——三国政府——认为，将在适当的时候就这部分领土扩大的范围问题征询新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尔后，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留待和会解决。

杜鲁门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权力给波兰一个占领区。

斯大林　波兰民族统一政府就西部边界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意见。

杜鲁门　这条西部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

斯大林　我现在讲的是波兰政府的意见。这个意见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而最后划定应

在和会上完成。

杜鲁门 贝尔纳斯先生今天才收到波兰政府的声明，我们还没来得及很好地了解内容。

斯大林 我们提出的建议意思是，我们要就波兰政府希望有这样一条西部边界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是今天还是明天来发表这个意见，这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说我们未经盟国政府同意，就给了波兰人一个占领区的问题，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美国政府和不列颠政府曾几次在照会中向我们提出，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未最后解决之前，不要让波兰行政当局进入西部地区。我们无法做到达一点，因为德国居民跟着败退的德军向西逃跑。波兰居民则向西前进，而我军需要在自己的后方，在我军占领的领土上有个地方行政机构。我军无法同时既在后方建立行政机构，又要作战，肃清领土上的敌人。我军不习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让波兰人进來了。

我们当时就是本着这种精神答复了我们的美、英朋友。由于我们知道波兰原西部领土将扩大，我们就更可以这样做了。我不知道，假如波兰人在本来应给它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这对于我们共同的事业有什么损害。我讲完了。

杜鲁门 我对上面关于波兰未来边界所发表的意见没有任何异议。但我们曾经商定，德国所有各部分应由四大国管理。而如果德国的一些重要部分将处于一个不在四大国之列的国家的占领之下，那么将很难就合理解决赔偿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斯大林 你何必那么担心赔偿呢？我们可以不要这些地区的赔偿，可以嘛。

杜鲁门 我们并不想得到这些赔偿。

斯大林 至于这些西部领土，过去这方面并没有任何决议，现在问题是如何解释克里米亚决议。关于西部边界没有做过任何决议，这

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许诺过要扩大波兰西部和北部的疆界。

丘吉尔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线我有相当多的话要讲，但据我看，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到。

杜鲁门　未来边界应由和会来确定。

斯大林　很难在西部地区恢复德国行政机构，人都跑光了。

杜鲁门　如果苏联政府想得到帮助，以便在这些地区恢复德国行政机构，这个问题倒可以讨论。

斯大林　我们的观点，我们俄国人在战时占领敌人领土时的观点是这样的：军队在作战，在前进，除了如何赢得战斗之外，别无任何其它考虑。但要使军队能前进，就应要让它有个安宁的后方。它不能在前线和后方同时和敌人作战。如果后方稳定，如果后方同情和帮助军队，军队就能打得好。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德国居民不是跟着他们败退的部队逃跑了，就是从背后袭击我们的部队。而波兰居民则跟着我们的军队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希望在后方有一个同情和帮助它的行政机构，是很自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杜鲁门　这一点我理解，也同情。

斯大林　没有别的办法。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自己确定边界。如果你们不同意波兰政府建议的边界线，问题就继续悬着。就是这样。

丘吉尔　可是，这个问题能搁起来不解决吗？

斯大林　总有一天要解决的。

丘吉尔　还有个供应问题。粮食供应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区域是向德国居民提供粮食的主要地区。

斯大林　可谁将在那里干活，生产粮食呢？除波兰人外，那里没有人干活。

杜鲁门　我们可以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摆在我们面前并使我们不安的问题，其实质是这些地区将有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机构。我们还关心这些地区在占领期间将是德国的一部分还是波兰的一部分。问

题是这样的：我们有占领区，法国有占领区，英国人和苏联也有占领区。我想知道，现在谈的这些地区是否属于苏联占领区。我认为关于波兰未来边界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达成协议，但现在我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在占领期间内的归属问题。

斯大林 在纸上这暂时还是德国领土，而实际上这是波兰领土，事实如此。

杜鲁门 当地居民怎么样了？那里大概曾有三百万居民。

斯大林 居民都走了。

丘吉尔 如果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局面：既然德国人已离开的这些地区不再交给德国，也不归德国管辖，那么这些居民就要吃他们去的那些地区的粮食。据我理解，按照波兰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我看也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1937 年德国境内全部耕种面积的四分之一将被割让。

至于居民，将会有三四百万波兰人从东部迁到西部地区。根据俄国的材料，战前这些地区的德国居民是八百二十五万。也就是说，除了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所产生的严重困难之外，德国其它地区还将承受超过比例的巨大负担，而粮食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杜鲁门 法国将要求得到萨尔区和鲁尔区，如果我们把萨尔区和鲁尔区给法国，那还有什么能剩给德国呢？

斯大林 这一点没有决议，而关于波兰西部边界则有决议，即关于波兰领土应在西面和北面得到扩大的决议。

丘吉尔 斯大林大元帅说，所有德国人都离开了这个地区，对这一点有一点意见。有另外一些材料说，那里仍然剩下了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当然这些数字还有待核实。

斯大林 当然需要核实。我们本来讨论的是边界问题，现在谈起德国粮食供应问题来了。如果你们想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好吧，我不反对。

丘吉尔　的确，我们本来谈的是边界问题，而现在转到了讨论德国粮食供应问题。不过，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边界问题为我们解决其他一些问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斯大林　我同意，德国供应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但出现这些困难主要归罪于德国人自己。战争使这八百万德国人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留在那里。拿什切青来说，那里曾有五十万人口，而当我们进入什切青时，那里一共只剩下八千人。

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往西跑了，到后方他们的部队那里去了，另一部分则去科尼斯堡地区，到俄国人那儿。当我们来到预定要给波兰的那个地区时，那里的德国人一个也没有剩下。剩下的全是波兰人。你们看，情况就成了这样。

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德国人扔下了自己的田地，这些田地现在由波兰人耕种和收获。波兰人未必会同意把他们耕种的土地交给德国人。这就是这些地区形成的局面。

杜鲁门　我想再重复一遍：根据我的意见，占领区应是给已有决议规定的那些国家的。我丝毫不反对讨论波兰边界问题，但我想，我们不能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

丘吉尔　我们已同意用德国的领土补偿波兰在寇松线以东失去的领土。但这两者应该相等。现在波兰要求得到的领土大大超过了它在东部放弃的领土。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欧洲，更不要说有利于盟国了。如果三、四百万波兰人将从寇松线以东西迁的话，那么，可以从西部地区迁走三、四百万德国人，好给波兰人让出地方。可是现在要迁移八百万人，这是我不能支持的。补偿与损失应该相等，否则这对波兰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象斯大林大元帅所说，德国人离开了奥德河东西两岸的地区，那么，应该鼓励他们回到那里去。

不管怎么说，波兰人无权给德国居民的粮食供应造成灾难性的局面。我想再一次强调这一观点。我希望大元帅能谅解我们的困难，我

相信，正如我们会谅解他的困难一样。

我们不希望没有任何换食来源的大量德国居民留在我们这里。就拿鲁尔煤矿区的大量居民来说吧。这些居民住在英国占领区。如果不向他们供应充足的粮食，我们自己的占领区内就将出现德国集中营那种状况。

斯大林 反正，德国过去不进口粮食不行，将来也不行。

丘吉尔 是的，当然是这样。但是如果拿走它的东部领土，它就更不能养活自己。

斯大林 让他们向波兰买粮食嘛！

丘吉尔 我们不认为这块土地是波兰的领土。

斯大林 那里住着波兰人，他们耕种了土地。我们不能要求波兰人耕种田地，却把种得的粮食送给德国人。

丘吉尔 此外，我要指出，在波兰人占据的地区内，总的来说情况是很奇怪的。比如，有人告诉我说，波兰人正在把西里西亚的煤卖给瑞典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英国正感到缺煤，而且面临一个酷寒而又没有燃料的严冬。我们从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出发：德国的粮食和燃料供应——不管这些粮食和煤在哪个占领区——必须在1937年疆界以内，按人口比例加以分配。

斯大林 那谁来开采这些煤呢？德国人没有挖煤，是波兰人在挖煤，他们在干活。

丘吉尔 但他们是在西里西亚干活。

斯大林 那里的矿主都跑掉了。

丘吉尔 他们是因为害怕打仗而离开的。既然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可以再回去。

斯大林 波兰人不希望、也不很赞成他们回去。

丘吉尔 昨天我深为大元帅的话所感动。当时他说：不宜出于报复心理来处理现在和将来的种种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今天的见解应

得到他的同情。因为假若如此众多的德国人被推到我们这边来，而波兰人却拥有一切优越条件，那是不合理的。

斯大林 我讲的是那些从矿区逃跑的企业主。我们现在同瑞典人一样也正从波兰人那里买煤，因为我们的某些地区，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缺煤。

杜鲁门 看来很大一部分德国领土交由波兰人占领，这已是既成事实。那么，还剩下什么可以作为赔偿呢？甚至我们美国也缺煤。但尽管如此，我们今年往欧洲运了六百五十万吨煤。我认为，德国这部分领土，也就是煤矿区，无论是从赔偿还是从粮食供应上说，都应被认为是仍属于德国的领土。我认为波兰人无权占据德国这部分领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波兰未来边界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在和会上解决。

斯大林 谁将在那里采煤呢？我们俄国人自己的企业中还缺少工人。在德国，所有的工人都当兵去了。戈培尔的宣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现在只能是：要么停止一切生产，要么就让波兰人来干。其它出路是没有的。至于谈到煤，我要指出，波兰人在他们原来疆界内有自己的煤矿，藏煤很丰富。现在除这个煤矿区外，又增加了过去由德国人经营的西里西亚煤田。波兰人正在那里采煤。我们不能拿走波兰人采的煤。

丘吉尔 据我理解，西里西亚的煤旷是波兰工人在开采。我们不反对让这些矿井作为苏联政府在苏占区的代理机构进行生产，但不能算作波兰政府的代理机构，因为这个地区并未划归波兰占领。

斯大林 这样就会破坏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的一切关系。其次我请丘吉尔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自己正感到劳动力不足。我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外国工人在做工，比如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等等。他们都是被德国人强迫背井离乡的。当俄国军队来到这些地区时，这些外国

工人认为自己已经自由，便都回国了。而德国工人又到哪去了呢？原来他们绝大部分都已应征入伍。这些人不是在战争期间被打死，就是当了俘虏。

结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部分德国工业企业是靠为数不多的德国工人和大量的外国工人生产的。这些外国工人被解放后，都纷纷离去，企业中没有人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要么关闭这些企业，要么允许当地居民，即波兰人，在这些企业中生产。

现在不应该赶走波兰人。这种局面是自然形成的。说实在的，这谁也不能怪。

艾德礼　我想从德国各占领国的立场出发，就当前局势讲几句话。撇开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问题不谈，我们看到，我们面前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她以前是一个经济整体，我们面前的这个国家过去在粮食以及部分煤的供应方面依赖于自己的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居住着部分波兰人。我认为，1937 年整个德国的资源，应用于维持全体德国居民的生计。如果先把德国一部分领土割走，那就会给那些占领西部和南部的国家造成极大的困难。

假如东部地区需要劳动力，应当能从德国其余地区的居民中找到，从那些退伍军人或不再从事军工生产的德国居民中找到。这些劳动力应当派到他们可能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些地方去，使盟国在最近数月内不致陷入困境。

斯大林　也许艾德礼先生会注意到，波兰同样深受这场战争之害，并且也是一个盟国吧！

艾德礼　是的。但它已经处于优越地位。

斯大林　比德国优越。本应如此嘛。

艾德礼　不，是比其它盟国优越。

斯大林　远不是这样。

杜鲁门　我愿意开诚布公地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想法。我不能同

意在解决赔偿问题和向全体德国人供应粮煤问题上排除1937年德国的东部地区。

丘吉尔　我们还没了结这个问题。此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更为令人愉快的问题要讨论。（笑声）

杜鲁门　我建议现在散会。我们是否暂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我希望能这样。

斯大林　可以，我也觉得这样好。

杜鲁门　明天下午5点开会。

第 六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2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7点

结束：当地时间19点5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波利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葛罗米柯
戴维斯	克尔爵士	古谢夫
邓恩	威廉·斯特兰爵士	诺维科夫
克赖顿	伯尔斯少校	索波列夫
科恩		巴甫洛夫
马修斯		
波伦		
汤普森		

杜鲁门宣布开会。

斯大林　我想通知大家，在奥地利的苏联军队今天已开始撤离，有些地区内他们要后撤一百公里。撤退将于7月24日完成。现在盟军的先遣部队已进入維也纳。

丘吉尔　我们非常感谢大元帅如此迅速地将协定付诸实施。

杜鲁门 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感谢。

斯大林 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我们有义务这样做。

（接着英国代表团汇报说：外长们在上午的会议上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外长们研究了7月21日美国代表团提交的备忘录。备忘录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对某些欧洲国家的选举进行观察的问题；第二，在被解放国家及前附庸国内为各国新闻记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问题；第三，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各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问题。

不列颠代表团表示同意美国的备忘录。苏联代表团对观察选举的建议没有同意。

关于第二、第三个问题，即有关新闻记者问题和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各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问题，则决定转交小组委员会讨论。该小组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美国方面——坎农、拉塞尔；苏联方面——索波列夫；大不列颠方面——海特。

苏联代表团决定提交一项备忘录，说明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各管制委员会中不列颠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地位得到改善的情况。苏联代表团还同意准备一项备忘录，说明他认为对驻意大利盟国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必须和最好作哪些修改。

第二个问题：对德经济原则。

经济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美国代表团请求将报告中的赔偿问题推迟到下一次会议讨论；苏联代表团提议，讨论在小组委员会中取得了一致意见的那些经济原则。因此外长们决定：只讨论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则，既不涉及有争议的原则，也不谈赔偿问题。决定将赔偿问题列为7月23日外长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第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及十七条在其余有争议的条款达成协

议的条件下被通过。

至于其余各条；同意将第十条末尾一句改成：“凡为将来允许保留的工业所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必须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提出并经各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予以没收，如不没收，则将其摧毁。”

第十三、十六、十八条留待以后讨论。

外长们决定为今天的政府首脑会议提出以下议程：

1. 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恢复讨论。

2. 托管问题——昨天政府首脑会议留下来的问题。

3. 土耳其问题——也是昨天留下的问题。

4. 苏联西部边界的部分更动问题——苏联代表团提案。

5. 伊朗问题——7月21日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其它若干问题决定交明天的外长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是：

1. 在解决紧迫的欧洲经济问题中的合作问题——美国代表团提案。

2. 政府首脑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原则就对德管制发出指示的问题——美国代表团提案。

3. 丹吉尔问题——苏联代表团提案。

4. 叙利亚及黎巴嫩问题——苏联代表团提案。）

杜鲁门 你们是否同意把这些问题交给明天的外长会议讨论。

丘吉尔 我不清楚，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提案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关系比和其它任何国家都大。它与我的各位同事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不列颠军队卷入了那个地区。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与法国人有过麻烦。我们愿意从叙利亚、黎巴嫩走开，我们在那里不谋求任何东西。但是，现在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英国人一走，法国人就要遭到屠杀。我先要了解，提案谈的是什么问题，我才能做出某种决定。也许这一点在这里能够做到？

斯大林 当然能够。是这么回事：叙利亚政府曾向苏联政府呼吁，

希望我们干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当时曾就此问题向法、英、美各国政府发出照会。我们希望给我们提供与此有关的相应情报，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感兴趣。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先在外长会议上研究。

丘吉尔　我认为，最好把前三项交外长会议讨论，而叙利亚、黎巴嫩问题在这里讨论。

斯大林　可以。

杜鲁门　我的意见是将前三项交外长们讨论；而叙利亚、黎巴嫩问题由政府首脑在讨论完列入议程的问题之后，进行研究。现在讨论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即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昨天我已做了阐述。

丘吉尔　总统先生，我听到了，您说，您的观点昨天已阐述过了。我对我昨天讲过的观点同样没有任何补充。

杜鲁门　（对斯大林）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斯大林　你们是否已经看过波兰政府的声明？

杜鲁门　是的，我看过了。

丘吉尔　是贝鲁特的那封信吗？

斯大林　是贝鲁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信。

丘吉尔　是的，我也看过了。

斯大林　是不是所有的代表团都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

杜鲁门　显然是这样。

斯大林　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悬案。

杜鲁门　我们能否转入下一个问题？

丘吉尔　还是悬案——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任何决定吗？

杜鲁门　假如问题还是悬案，我们可以再讨论一次。

丘吉尔　可以期望，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是会成熟的。

斯大林 有可能。

丘吉尔 假如在我们分手时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将十分遗憾，这个问题无疑将在世界各国议会中讨论。

斯大林 那我们就答应波兰政府的要求吧。

丘吉尔 这个建议不列颠政府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我昨天已指出一系列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占有这么一块领土对波兰不会有好处。这将破坏德国的经济状况，并将使占领国在供应德国西部粮食和燃料方面承受过重的负担。另外，我们也怀疑，从道义上讲，迁移如此大量的人口是否恰当。我们原则上同意迁移人口，但是要与从寇松线以东西迁的人口保持平衡。如果要把八百万或九百万人迁走，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是很矛盾的。根据我们的材料，那里有八百或九百万人，根据苏联的材料，所有这些人都跑光了。我们认为，在这些情报没有核实以前，我们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可能核实那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我本来还能举出其它一些理由， 但我不想给会议增加麻烦。

斯大林 我不想反对丘吉尔先生列举的理由，但有些理由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关于燃料问题。据说，在德国没有燃料了。但莱茵河地区还是它的，那里有燃料。失去西里西亚煤矿不会给德国造成任何特别的困难，德国的主要燃料基地在西部。

第二，关于迁移人口问题。这些地区的人口不仅不是八百万、六百万，连三百万、二百万都没有。那里的人不是被征入伍，而后战死或被俘，就是跑掉了。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德国人很少，但这一点可以核实。是否可作出安排，听取波兰代表关于波兰边界的意见？

丘吉尔 考虑到总统对请南斯拉夫代表来一事所表达的观点，我目前不能支持这个建议。

斯大林 那就让外长会议邀请波兰代表到伦敦去，在那里听取他

们的意见吧。

杜鲁门　对这一点我没有反对意见。

丘吉尔　但是，总统先生，要知道外长会议到9月份才开会呢。

斯大林　对了，是否那个时候外长会议邀请波兰政府代表到伦敦去。

丘吉尔　去核实情况吗？

斯大林　到那时三方都会搜集到情况了。

丘吉尔　不过这只意味着把一个难题从这次会议转给外长会议，而这次会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斯大林　我也认为是可以解决的。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决定，我们有义务听取波兰政府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意见。

杜鲁门　对。我认为应该接受苏联关于让外长会议邀请波兰政府代表去伦敦的建议。当然，这并不排除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　我建议在9月份把波兰政府的代表邀请到伦敦的外长会议上，并在那里听取他们的意见。

丘吉尔　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还以为是要核实这个地区有多少德国人的问题。

斯大林　是指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丘吉尔　可是既然边界问题应该在和会上解决，在外长会议上怎么解决得了呢？

杜鲁门　我认为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听取波兰人的意见将是有益的。

斯大林　对。

丘吉尔　把如此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交给一个权威不及我们这次会议的机构去解决，对此我表示遗憾。

斯大林　那我们就把波兰人请到这里来，在这里听取他们的意见吧。

丘吉尔 我宁愿这样，因为这是急迫的问题。但是不难预见，波兰人将提出什么要求。他们要求的当然比我们所能同意的要多。

斯大林 但是如果我们邀请波兰人到这里来，他们就不会责备我们，说我们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决定了问题。我希望波兰人不会对我们提出这种责备。

丘吉尔 我并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

斯大林 不是说您，而是波兰人会说：不听取我们的意见，就决定了边界问题。

丘吉尔 现在我清楚了。

杜鲁门 有必要这样忙着解决这个问题吗？我重复一遍，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后应交给和会决定，我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是十分有益的，这并不排除今后再讨论。我只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紧急。

斯大林 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紧急的，那么就把它交给外长会议讨论吧。这不会是多余的。

杜鲁门 但这并不排除在这里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丘吉尔 总统先生，我对您是十分尊敬的，但我想指出，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紧迫性。如果这个问题推迟解决，那么现存的局面就将被固定下来。波兰人就要着手经营这块土地，他们将在那里扎根，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那以后就很难再作其它什么决定。所以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在这里达成某种协议，这样我们对波兰问题就心中有数了。我不能想象，如果我们在这里都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伦敦的外长会议又怎么能解决它。而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粮食和燃料问题就继续悬着，供应德国居民粮食和燃料的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肩上，首先是落在英国人肩上，因为他们的占领区内粮食来源最少。如果外长会议听取了波兰人的意见还不能达成协议，问题就将无限期地拖下去。然而冬天即将来临，协议却还未达成。

我非常愿意采取合作态度，来找到解决斯大林大元帅昨天讲到的那些实际困难的办法，找到解决那些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困难的办法。我们准备提出一个可以在从现在到和会这个过渡阶段内执行的折衷方案供你们研究。我建议划一条临时分界线，线以东的领土，在和会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作为波兰的一部分由波兰人占据；线以西如果有波兰人的话，他们可以作为苏联政府在苏占区的代表进行活动。

德黑兰会议以来，我和大元帅曾几次举行会谈。我觉得，我们大体上都同意新波兰的边界应该西移到奥德河。但这个问题不这么简单。大元帅和我的意见分歧是，不列颠政府虽然同意波兰扩大自己的领土，但不想走得象苏联政府那么远。我说的沿奥德河的界线，是指两年前我们在德黑兰所讲的那条线而且当时并没有谈确切划分边界的问题。现在，我们准备提出一条波兰临时边界线供会议研究。如果把这个问题推迟到9月，并硬要外长会议和波兰人讨论它，这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在入冬以前得不到解决。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不能在原则上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将感到遗憾。据我看，如果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并交给有波兰人参加的外长会议去讨论，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对于这块领土和这条边界线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实际办法。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会议去讨论，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得很久。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希望在这里解决。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把我们决定给波兰人的所有地方都给他们，而把其余部分留在苏联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拖到9月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的失败。

我再重复一遍，当我们用“奥德河线”这个提法时，指的只是一条粗略的界线。应该在地图上看看我们提出的界线。有一个地方我们这条线甚至越过了奥德河。

我请求会议继续努力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今天不行，晚一天也行，因为如果外长们在9月份会晤，再和波兰人讨论上两星期，讨论时又是苏联一方、美国和大不列颠另一方各执己见，那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不到解决，或者很晚才能解决，那时柏林会是什么局面呢？柏林现在用的煤有一部分是从西里西亚来的。

斯大林 柏林不是用西里西亚的煤，而是用托尔高（萨克森州）的煤。过去就是这样。

丘吉尔 柏林的供煤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城市是我们共同占领的。

斯大林 让他们到鲁尔，到次维考去搞煤吧。

丘吉尔 就是那种褐煤吗？

斯大林 不，这是很好的烟煤。褐煤做成煤砖后很好烧，而德国人有很好的砖煤工厂。他们是什么条件都有的。

丘吉尔 我只是说，柏林用的煤一部分以前是从西里西亚来的。

斯大林 在不列颠军队占领次维考地区之前，德国人是从那里往柏林运煤的。盟国部队从萨克森西撤以后，柏林用的是托尔高的煤。

杜鲁门 如果你们允许，我想再一次谈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斯大林 请吧。

杜鲁门 这里我想援引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中的一段话。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应以寇松线为准，但有些地区外移五至八公里，归属波兰。三国政府首脑承认：波兰北部及西部的领土应有相当的扩增。他们认为，扩增多少的问题应在适当时候征询新成立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的意见，并认为波兰西部边界之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讨论。”

这个协定是由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大元帅和丘古尔首相达成的。我同意这个决议。我很理解斯大林大元帅昨天讲到的困难。我也很理

解丘吉尔首相昨天谈到的在粮食和燃料供应方面的困难。但我想，这些困难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

斯大林 既然你们对讨论这个问题不厌其烦，我愿意再作一次发言。我根据的也是刚才总统援引的那个克里米亚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确切涵义是：在波兰成立民族统一政府之后，我们就应该听取新的波兰政府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意见。波兰政府已把它的意见告诉我们。现在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批准波兰政府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意见，或者——如果我们不同意波兰的建议的话——我们应该听取波兰代表的意见，并只能在这之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我认为应在我们的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和波兰政府的意见不一致，应把波兰政府的代表请到这里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这里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把波兰人邀请到这个会议上来。如果这样，那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会议去讨论。

我想提醒丘吉尔先生和参加过克里米亚会议的其他几位，当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发表过一种意见，我没有同意。丘吉尔先生当时讲，波兰西部边界线是从奥德河入海口起，沿奥德河直到它与尼斯河汇合处，然后，边界线是往尼斯河以东。我当时坚持边界线应在尼斯河以西。根据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的方案，什切青、布累斯劳和尼斯河以西地区将继续为德国所有。（指地图示意。）

这里研究的是边界问题，而不是临时分界线。这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假如您同意波兰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邀请波兰政府代表到这里来，就作出决定。但是既然你们不同意波兰政府的意见，并想提出修改，那我们最好请波兰人到这里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是个原则问题。

丘吉尔 我愿意以不列颠政府的名义撤销反对邀请波兰人到这里来的意见，以便在和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谋求取得某种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决办法。

杜鲁门 对于把波兰政府的代表召到这里来，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他们可以在这里和我们的外交部长们交换意见。

斯大林 对。

丘吉尔 而和波兰人会谈的结果可以报告给政府首脑。

斯大林 对，对。

丘吉尔 谁向他们发出邀请呢？

斯大林 我看，主席发吧。

杜鲁门 好。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我想，苏联代表团有一个关于托管问题的提案。

（**苏联代表团**在阐述苏联关于托管问题的提案时声明，它提交的书面提案中表达的观点是以旧金山会议决议为依据的。接着代表团指出，鉴于托管的主要问题已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解决，因此，首脑会议面临的只是有关领土的具体问题。苏联代表团表示一种看法，认为首脑会议未必能够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然而首脑会议可以讨论：第一，意大利在非洲和地中海的殖民地问题；第二，那些由国联委任统治下的领土问题。苏联代表团指出，在它的提案中提出了解决意大利原有殖民地问题的两种可能的方案。苏联代表团建议把这一问题交给外长会议讨论。）

丘吉尔 当然，就任何问题都可以交换意见，但是如果与会各方意见分歧，结果也只是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讨论而已。我觉得，托管制度问题在旧金山会议上已经解决了。

杜鲁门 请允许我宣读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托管问题的条文。

“（一）托管制度适用于依托管协定所置于该制度下之下列各类土地：

（子）现在委任统治下之土地。

〔丑）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或将自敌国割离之土地。

（寅）负管理责任之国家自愿置于该制度下之土地。

（二）关于上列种类中之何种领土将置于托管制度之下，及其条件，为此后协定所当规定之事项。”

我认为，苏联的提案与本条文第二项有关。我同意苏联代表团把这个问题提交外长们讨论的建议。

丘吉尔　我们同意的只是在旧金山通过了的东西，而不能更多。鉴于托管问题由国际组织掌握，我怀疑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是否合适。

杜鲁门　我认为，就象讨论波兰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适当的。

丘吉尔　国际组织没有研究过波兰问题。

我们曾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地、在旧金山会议上公并地就托管问题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并且不会改变。

杜鲁门　大不列颠的立场在联合国宪章的另一条文中得到充分的保障。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

斯大林　比如，从报紙上看到，艾登先生在英国议会发言时曾说：意大利永远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这是谁决定的？如果是意大利失去了，那么又是谁撿去了呢？（笑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丘吉尔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列颠军队以持久的奋战、巨大的牺牲和辉煌的胜利独自赢得了这些殖民地。

斯大林　而柏林是由红军攻克的。（笑声）

丘吉尔　我想把我的话讲完，因为总统先生对“不列颠军队……独自赢得了”这句话表示怀疑。我指的是下面这些意大利殖民地：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我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单独攻占了这些地方。

然而，我们并不谋求扩大领土。尽管我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想从这场战争中搜取任何利益。当然，在人员的牺牲方面，我们没有苏联和它英勇的军队的牺牲那么巨大。但是由于战争，我们欠了

美国很大一笔债。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象美国那样的海上力量了。战争期间我们建造的主力舰只有一艘，而损失了十艘。然而，尽管我们蒙受了所有这些损失，我们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因此，我们在被托管的领土问题上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

现在谈谈艾登在议会的讲话，他说过：意大利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现在无权对这些殖民地提出要求。这不排除在拟定对意和约时，讨论应否将部分意大利原有殖民地归还给它的问题。我不会支持这样的提议，但无论是在草拟对意和约的外长会议上也好，还是在最后确定边界的和会上也好，我们都不反对讨论殖民地问题。

我应指出，在我访问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时，我曾看到意大利人开发和耕种的土地。尽管条件艰苦，那些地种得好极了。我是想说，虽然我们不主张把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归还给它，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排除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目前这些殖民地都在我们手里。谁想要这些殖民地呢？如果在座的有谁要求得到这些殖民地，那他最好提出来。

杜鲁门 我们不需要这些殖民地。我们国内需要我们养活的贫困的意大利人就够多了。

丘吉尔 我们曾研究过，在这些殖民地中，有些是否可以安置犹太人，但是我们认为，犹太人并不适合在那里定居。

当然，我们在地中海有巨大的利益。这一地区现状的任何改变，都要求我们进行长期和审慎的研究。

我们不十分了解，我们的俄国盟友想要什么。

斯大林 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认为意大利已永远失去了它的殖民地。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些殖民地交给哪些国家负责托管呢？我们想知道这个。如果谈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我们可以等一等，但总有一天是要谈到的。

丘吉尔　当然，我们应该解决应否剥夺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斯大林　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丘吉尔　假如这些殖民地将被剥夺——我们完全有权这样做——那么，就需要决定把它们交给谁负责托管。至于意大利哪些殖民地应被剥夺，必须由和会来决定。而今后管理这些领土的问题，则属于国际组织的职权。

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会议无权研究这个问题？

丘吉尔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会议不能解决，应由和会来解决。当然，如果我们“三巨头”能达成协议，将有重大的意义。

斯大林　我不是提议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提议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这个会议无疑是有权讨论这个问题的。

丘吉尔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假如大元帅说出他想要什么，我不反对，并且同意立即研究这个问题。

斯大林　问题不在什么大元帅，而在于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但应该研究。

丘吉尔　究竟是什么问题？

斯大林　苏联代表团提的问题。

杜鲁门　我同意苏联代表团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讨论的建议。

斯大林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杜鲁门　对于这个建议，我们不反对。

丘吉尔　我也不反对，不过我不同意把所有问题都交给外长们讨论。

杜鲁门　这是很自然的。

丘吉尔　我认为，有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解决。我们已经决定，9月份在外长会议上首先讨论对意和约问题。那

时自然会提出如何处理这些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我反对现在再拿这个问题来加重我们外长们的负担。但是，假如外长们能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把它列入议程。

斯大林 交给外长们吧！

杜鲁门 我支持这个建议。

丘吉尔 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但有一个条件，不要因此而耽搁他们研究那些最紧迫的问题。

斯大林 不！不要这种保留吧！没有叫人家讨论问题而又附带这种条件的。要么交给他们，要么就不交。

丘吉尔 如果您坚持，我可以让步。

杜鲁门 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研究。

（随后，苏联代表团向美国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递交了关于哥尼斯堡区问题的提案。）

杜鲁门 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讨论。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已达成协议，邀请波兰政府的代表到这里来。我想，记者们将极力打听我们为什么邀请波兰政府代表来。我觉得，最好就这个问题发表一项公报。

斯大林 在波兰人到达之前吗？

杜鲁门 对，在他们到达之前。

斯大林 我看可以。

丘吉尔 这违背我们到目前为止一贯遵循的原则。

斯大林 怎么都行，可以发表一项公报，也可以不发表，两个我都同意。

丘吉尔 要说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吗？

斯大林 我觉得，不用说目的。

丘吉尔 我请求不要说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杜鲁门 我们就不说他们来的目的好了。

斯大林 好。

（**苏联代表团**向会议报告了在意大利的苏联战俘营的情况。代表团指出，它讲的情况是在切尔金纳基卡市一带由不列颠当局控制的五号战俘营。那里主要是乌克兰人。苏联代表团说，起初不列颠当局宣称战俘营里有一百五十人。但当苏联代表来到战俘营时，却发现那里原來有一万乌克兰人。英军司令部把他们編成了一个整师，组织了十二个团，其中包括一个通讯团和一个工兵营。任命的军官主要是过去在德军中担任过指挥官的原彼得留拉分子。最后苏联代表团指出，在苏联军官来到这个战俘营时，有六百二十五人表示了要迅速返回苏联的愿望。）

丘吉尔 我们欢迎贵方的任何监督。我将要求专电向我汇报这一情况。也许，那里曾有过很多波兰人。

斯大林 没有波兰人，那里只有乌克兰人，他们具有苏联国籍。

丘吉尔 这大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斯大林 我们是今天收到的电报，而事情是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

丘吉尔 这件事我至今一无所知。

（杜鲁门宣布闭会并确定下次会议明天下午5时开始。）

第 七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3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7点或17点10分

结束：当地时间19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
戴维斯	艾德礼	莫洛托夫
哈里曼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葛罗米柯
波伦	伯尔斯少校	维辛斯基
艾伦	亚历山大元帅（非经常	巴甫洛夫
科恩	出席人员）	

（杜鲁门宣布开会。

苏联代表团汇报外长会议情况说，今天的外长会议议程如下：

1.德国、奥地利及意大利的赔偿问题。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向美国国务卿和大不列颠外交大臣递交了苏联代表团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草案及关于德国以实物预付赔偿等问题的草案。

会议决定委托经济委员会对这两个草案进行初步研究，然后在下一次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

2.对德经济原则问题。

会议讨论了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及苏联代表团新提出的第十九条。

苏联代表团声明：撤销它对第十三条提出的修正，并建议删去第十八条，而该条所涉及的问题由盟国驻德的机构讨论，然后由管制委员会决定，或者如果管制委员会不能达成协议，由各政府间协商解决。会议没有达成协议，决定将第十八条的问题提交三国首脑解决。

至于苏联代表团新提出的第十九条，美国国务卿声明：这一条美国不能接受。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一个供选择的第十九条草案，根据这个草案，盟国管制委员会批准的、德国用于平衡进口的货物，应较其它货物供应优先出口。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应优先支付赔偿。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这个问题提交三国首脑解决。

3.关于外长会议的问题。

审订委员会提交的草案得到通过，未作修改。

4.关于托管领土问题。

会议讨论了苏联代表团的草案。大不列颠外交大臣声明，首先应解决是否将剥夺意大利的殖民地以及具体剥夺哪些殖民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在拟定对意和约时解决。至于决定剥夺的这些前意大利殖民地将来应委托谁托管的问题，应由联合国组织来决定。美国国务卿建议把这个问题推迟到签订对意和约时解决，那时将解决一切与意大利有关的领土问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建议将苏联备忘录交今年九月在伦敦召开的外长会议的首次会议讨论。英国外交大臣声明，他认为没有必要将苏联备忘录交外长会议讨论，因为在制定对意和约时将自然会提出如何处置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提请与会者注意：苏联政府将在九月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它备忘录中所涉及的问题。

5.关于给驻德各盟军总司令的指示问题。

会议商定，本会议与所有驻德盟国占领军总司令有关的全部决议，都在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协商一致后通知他们。

为此决定成立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美国方面：墨菲、里德

尔伯格；大不列颠方面：斯特兰、哈利森；苏联方面：古谢夫、索波列夫。

6.关于在解决紧迫的欧洲经济问题时进行合作的问题。

为了初步研究美国代表团提交的备忘录，决定成立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美国方面：克莱顿、波利；大不列颠方面：布兰德、考尔森；苏联方面：阿鲁纠尼安、格拉申格，

7.关于丹吉尔问题。

会议讨论了苏联草案。

决定：

（1）通过苏联代表团草案的第一段，具体内容如下：

“在研究了丹吉尔地区的问题之后，我们商定：这个地区，包括丹吉尔市及其毗连域，鉴于其特殊的战略意义，仍由国际共管”。

（2）整个丹吉尔问题应于近期内在巴黎召开的苏联、美国、大不列颠、法国等四大国代表会议上讨论。

8.批准致中国政府、法国政府的信件文本。

会议决定：此项信件将于会议公报发表之前四十八小时发出。

9.关于七月二十三日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问题。

会议决定向三国政府首脑建议如下议程：

（1）关于黑海海峡及国际内水航线问题。

（2）关于哥尼斯堡地区的问题。

（3）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

（4）关于伊朗问题。）

杜鲁门 请允许我就黑海海峡问题以及总的国际内水航线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蒙特勒公约应予修订。我们认为，黑海海峡应成为对全世界开放的自由水道，我们应一致保障一切船只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力。我曾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所有

这些战争是从哪里爆发的呢？近二百年来战争都是在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从法国东部边界到俄国西部边界这一地区开始的。最近一次，世界和平首先是被德国破坏的。我以为，我们这次会议的任务以及将来和会的任务，是不允许类似现象重演。

斯大林 对。

杜鲁门 我以为，如果，我们能规定并保障水上交通线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的话，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

斯大林 比方说，是哪些水上交通线呢？

杜鲁门 我有一个关于水上交通线自由通航的提案，并且我以为，我们应该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俄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将自由进入一切世界海洋。就是这个提案。（递交提案草案）

我们的草案规定，在一切国际内陆水道确立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通航。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通航应适用于那些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内陆水道，并应由各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机构来管理。

我们认为，这种机构应尽快建立。首先必须建立多瑙河及莱茵河的临时航运管理机构。这些临时机构的职能应该是：恢复和扩建上述河流的航行设施；监督船舶航运以保障各国公民的平等机会；规定利用航行设施的统一规章以及通航、海关、防疫检查等规章和其它类似问题。这些机构的成员国应是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联、法国及被这些国家承认的沿岸主权国家。

我认为，对基尔运河也应采用这样的程序，并以同样的精神修订蒙特勒公约。这样我们就将在这些地区进行自由交流。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提案，是因为我不想在最近二十五年内再参加一次由两海峡或者多瑙河问题引起的战争。

我们的希望是看到一个自由的、经济上健康的欧洲，一个将促进苏联、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繁荣和美国可以与之进行平等互利的

贸易的欧洲。我想，我们的提案可能成为朝这方面迈出的一步。

丘吉尔 我坚决支持关于修订蒙特勒公约的提案，以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自由无阻地通过两海峡。我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和他关于应由我们一致保证这些海峡的自由通航制度的提案。各大国和有关国家的保证无疑将是有效的。

至于总统提到的其他水路航线，我们原则上同意总统声明的一般原则。我们还同意总统关于自由开放基尔运河并由所有大国给以保证的提案。我们还认为，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自由通航很重要。

杜鲁门 在修改蒙特勒公约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一致，这是毫无疑问的。

丘吉尔 对于我们修改公约的目的也是毫无疑问的。

斯大林 要仔细看一下总统的提案，只听一听不能全弄明白。我们是否可以暂时先讨论其他问题？

杜鲁门 议程中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把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地区划给苏联的问题。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昨天已经分发了。

斯大林 这一点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表示同意，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希望，这个协议在这次会议上得到确认。

杜鲁门 原则上我同意。我只是请求让我研究一下条款，但我相信，我们这方面将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同意，俄国应得到这块领土上的某些地区。

斯大林 好。

丘吉尔 大元帅说得完全对，这个问题早在德黑兰时就已提出了，后来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又讨论过。

斯大林 在莫斯科。

丘吉尔 是的，是在莫斯科，是谈到寇松线时引起的。

斯大林 对。

丘吉尔 1944 年 12 月 15 日我曾就这个问题在议会发表演说。我解释说，不列颠政府同情苏联的观点。唯一有问题的是把这个地区划给苏联这一问题的法律方面。这里提出的苏联草案似乎要求我们承认东普鲁士已不复存在，承认哥尼斯堡地区不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管制之下。

至于说到不列颠政府，我们支持苏联政府把这块领土并入苏联版图的愿望。我原则上声明这一点。当然，我们还没有在地图上研究确切的边界。但我再一次向苏联政府保证，我们一贯支持俄国在这个地区的立场。

斯大林 我们也别无所求。如果美国政府和大不列颠政府原则上赞成这个提案，我们就满意了。

丘吉尔 同意。

杜鲁门 同意。

丘吉尔 这个文件需要稍加修改。如果这将是这次会议公报的一部分，我建议把这个文件的措辞改得更笼统一些。

斯大林 我不反对。

杜鲁门 这样，我们原则上同意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草案。

议程中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

丘吉尔 现在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维持秩序与和平的重担完全落在我们肩上了。除那些别的国家也享有的特权之外，我们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在这两个国家得到什么特权。当我们为赶出德国人和维希的军队而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时，我们和法国人曾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们应该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自主。鉴于法国和这些国家悠久的历史联系，我们曾声明，我们将不反对法国在与这两个国家的独立的新政府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在那里拥有优惠地位。

我们已通知戴高乐，一俟法国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签定使这两个国

家满意的条约之后，我们就立即撤出自己的部队。如果我们现在撤军，那里的法国平民和为数不多的法国军队马上就会遭到屠杀。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会在阿拉伯人中间引起极大的动荡，进而可能将破坏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定。如这个地区出现这种骚乱可能也将在埃及引起骚乱。现在在阿拉伯人中间发生这种骚乱是最糟糕不过了，因为这将危及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交通线，而现在正通过这条交通线为远东战争运送军火和增援部队。对日战争的交通线不仅对大不列颠很重要，对美国也一样重要。

戴高乐将军在这个地区的做法很不明智，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和恳求，用军舰向那里派遣了五百人。这些人的出现为骚乱提供了借口，至今仍未平息。这真愚蠢，这五百人顶什么用呢？但他们一去，却成了引起骚乱的导火线。

这些反对法国人的骚乱立即在伊拉克引起不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想去帮助叙利亚，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因为这个事件而激动起来。不过现在戴高东将军已同意把所谓特种部队交给叙利亚政府。

我希望，我们同法国人就这个问题即使不能达成一项协议，也要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它既保障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自主，又保证法国的文化和商业利益得到某种承认。

请允许我在此再次重申，如果没有必要，大不列颠在那里一天也不愿多呆。我们将非常乐于摆脱我们为了同盟国的利益而承担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由于这个问题只涉及法国和我们，当然还有叙利亚和黎巴嫩，我们不欢迎这样的建议，即召开一个除英国和法国外还有美国和苏联参加的会议，并由它们作出联合决议。以前整个负担都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孤军作战，除法国的某些援助外没有得到任何授助，但我们的行动是为大家的利益。因此，我们不希望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如果美国想代替我们，我们只表示欢迎。

杜鲁门　不，谢谢。（笑声）当法国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发生这场争执时，我曾与首相就这个问题交换过信件。当首相告诉我，大不列颠在这个地区拥有足够的军队维持那里的和平时，我曾请他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维护这种和平。因为我们也同样关切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远东的交通线。也许我们与首相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大的分歧。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这些地区享有特权。这些地区应一视同仁地向所有国家开放。我们还认为，法国不应享有任何超过其它国家的特殊的优惠地位。

斯大林　您的意思是，美国不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任何特殊的优惠地位。

杜鲁门　是的。

丘吉尔　我们的立场是希望法国在那里拥有优惠地位，因为当我国力量薄弱而又要与德国人在那里打仗时，我们曾向法国许下这种诺言。但这只是我们的事，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无权约束别人，此外，我们并没有保证要特别努力使法国在那里保持优惠地位。假如法国能取得这种特权，我们将不反对，甚至会体谅它取得的成就。

斯大林　法国能从谁那里获得这些特权呢？

丘吉尔　从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共和国。

斯大林　只是从他们那里吗？

丘吉尔　是的，只从他们那里。法国人在那里有自己的学校、考古研究所等等。许多法国人很早就居住在那里，他们甚至有一首名叫《到叙利亚去》的歌。他们说，他们的特权要求溯源于十字军东征年代。不过我们不打算为这件事与各大国吵起来。

杜鲁门　我们希望一切国家均应在这些地区享有平等权力。

丘吉尔　总统先生，您是否也将阻止叙利亚给法国人特权呢？

杜鲁门　如果叙利亚人愿意这样做，我当然不会阻止。但我怀疑他们未必有这种愿望。（笑声）

斯大林 俄国代表团感谢丘吉尔先生提供的情报并撤销我们的提议。

丘吉尔 我感谢大元帅。

杜鲁门 我也表示感谢。

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伊朗问题。丘吉尔先生有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

丘吉尔 我们已把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提交各代表团，并且乐于知道各大国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

杜鲁门 至于我们，我们早就准备从伊朗撤军了。但我们在那里有大量的各种物资。我们想把这些物资用于太平洋战争。

斯大林 俄国代表团认为至少可以从德黑兰撤军。

丘吉尔 我希望转到其余两条，好结束这个草案的讨论。关于条约里规定期限的问题，条约中规定：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六个月内军队应撤出伊朗。从战争结束到现在才两个半月。不过我们曾向伊朗人保证，一旦对德战争结束，军队立即撤离。

我建议立即从德黑兰撤军，而进一步撤军的问题，在9月份的外长会议上讨论。

斯大林 我不反对。

杜鲁门 我们将继续从伊朗撤出自己的部队，因为那里有的部队我们要在太平洋使用。

斯大林 当然，这是您的权为。我们从自己方面保证：我们的部队将不会采取任何反对伊朗的行动。

杜鲁门 对把这个问题交给伦敦外长会议研究，我没有反对意见。

丘吉尔 我们还有一个维也纳的问题。我想谈的是大不列颠和美国军队在维也纳的占领区问题。就拿不列颠占领区来说，那里竟有五十万居民，由于維也纳的粮食来源在它以东的地区，我们无法负责供应这五十万人的粮食。因此，我们建议签订一项临时性协定，在达成

较长期的协定之前，暂由俄国人向这些居民供应粮食。亚历山大元帅将就实际情况作一个发言。

亚历山大　情况正如刚才首相所讲的那样。我们占领区内有五十万居民。我没有从意大利运来的粮食。克拉根福有少量粮食储备，但只够维持三个星期或者最多一个月。因此，如果我们承担起养活这些居民的责任，那就只好从美国运来粮食。

杜鲁门　我们的占领区内约有三十万五千居民。我们的船只现在正忙于运送对日作战的物资，向欧洲运送粮食以及向苏联运送某些材料。我们感到运输工具不足，因此我们甚至维持自己占领区内居民的供应都感到困难。

斯大林　法国占领区情况怎样？

亚历山大　这我不知道。

斯大林　请允许我和科涅夫元帅商量一下。我以为可以把维也纳居民的粮食供应缓一个月再移交给我们的盟国。要我们供应多久？供应到新粮收割，还是怎么样。

丘吉尔　困难在于我们占领区内的这五十万人和美国占领区内的三十七万五千人以前一直是从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得到粮食的。

斯大林　我们与奥地利政府之间有一项协议，在新粮收获之前向他们提供少量粮食以换取商品。我想，这种状况可能将延续到9月份。但我仍要事先与科涅夫元帅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可以办好这件事。那时我将给你们答复。

丘吉尔　情况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元帅已率领自己的军队进入施蒂里亚，但只要居民粮食供应问题不解决，他就难于进驻维也纳。

斯大林　难道现在维也纳的粮食状况真的这样糟糕吗？

丘吉尔　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去过那里。

斯大林　那里居民的粮食供应并不坏。

亚历山大　如果您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愿意向前

推进，并担负起我们应做的工作。

斯大林 这一点我只能明天答复。

丘吉尔 我们感谢您。

斯大林 如果英国当局和美国当局同意把与伦纳政府签定的这个协定也应用于自己的占领区，那就好了。这不意味着承认伦纳政府或与之恢复外交关系，但却使伦纳政府处于一种与芬兰政府相同的地位。伦纳政府的权限就将扩展到这些占领区。这将使问题易于解决。

杜鲁门 一旦我们的军队进入维也纳，我们就準备讨论这个问题。

丘吉尔 我们也同意。

我想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总统先生和大元帅想必已经知道，艾德礼先生和我十分关心能在本星期四访问伦敦。（笑声）因此，我和外交大臣将不得不在 7 月 25 日星期三离开这里。但是，我们将返回这里参加 7 月 27 日晚上的会议，或许我们当中只有某些人能够回到这里来。（笑声）因此，能否在星期三上午安排一次会议？

斯大林 好吧。

杜鲁门 可以。

丘吉尔 我建议外长们照常继续会谈，只是当艾登先生缺席时由卡多根先生代替他。

斯大林 好吧，

杜鲁门 我们商定，7 月 25 日会议将于上午 11 时举行。

明天会议 17 时开始。

第 八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4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7点或17点15分

结束：当地时间19点3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艾德礼	莫洛托夫
戴维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维辛斯基
波伦	伯尔斯少校	古谢夫
科恩	亚历山大元帅（非经常	巴甫洛夫
汤普森	出席人员）	

（杜鲁门宣布开会。

美国代表团就三国外长会议情况汇报如下：

三国外长会议认为，负责经济问题和赔偿问题的委员会尚未拟出自己的报告。苏联代表团建议，把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赔偿问题也交给这个委员会。苏联代表团递交了关于这两个国家赔偿问题的简短的文件。

决定把对德经济原则和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赔偿问题的讨论推迟到明天。外长们被告知：经济问题委员会将于今晚开会，结束自己的工作。

7月20日美国代表团递交了关于供应欧洲石油的文件。决定把

这个问题也交给经济问题委员会。但是，鉴于该委员会以前未曾研究这个问题，外长们同意推迟这个问题的讨论。

外长们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和附庸国的宣言的执行情况问题。会议认为，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尚未结束自己的工作，这个问题也推迟讨论。

然后，外长们讨论了准许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建议，鉴于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未达成协议，外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可以该委员会研究过的那个文件为基础。

苏联代表团声明，它不能参加这一讨论，因为这个文件中没有提到准许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英国代表团建议删去这个文件第一条的最后一句话。美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同意。英国代表团对这个文件的第二条提出了新措词，以期照顾与对意和约有关的其他同盟国的利益。美国代表团同意把英国的建议列入经过修改的关于准许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文件中去。

为了满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美国代表团建议在文件里增加一个补充条款。条文如下："三国政府还希望外长会议不加拖延地立即着手草拟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平条约。三国政府还愿意在与这些国家负责的民主政府缔结和约之后，支持他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苏联代表团坚持认为，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不应被置于较意大利为差的地位。美国代表团表示希望，它提出的补充条款能满足苏联代表团的要求。

鉴于外长们未就此问题达成全面的协议，决定把它提交给政府首脑解决。这个问题已被列入今天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

各方同意建议政府首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以下问题：

（1）准许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今天早上提交给外长们的文件可以作为三国政府首脑讨论的基础。

（2）关于黑海海峡问题和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通航问题。昨天的政府首脑会议推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以便能够研究总统的提案。

外长们还同意建议三国政府首脑把以下问题列入他们明天上午会议的议程：

（1）关于德国海军舰艇和商船问题。

（2）关于德国赔偿问题。

接着美国代表团报告说，应美国总统根据三国政府首脑的决定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的邀请，由贝鲁特总统率领的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团已抵达波茨坦。波兰代表团在外长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意见，其内容扼要归结如下。

波兰代表团认为，波兰西部边界应起于波罗的海，经施维纳明德（什切青划归波兰），然后沿奥得河至西尼斯河，再沿西尼斯河至捷克斯洛伐克边界。

按照新的波兰疆界，波兰就能使自己的居民不致侨居国外，同时波兰将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以前被迫到外国去的波兰人的劳动。

波兰代表团建议的边界是波兰和德国之间可能有的最短边界，它较易防守，这从安全方面来说极为重要。

德国人曾企图消灭波兰人，摧毁波兰文化。从历史角度来看，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抵御德国任何侵略的波兰国家是公平合理的。

这些地区曾是德国军事工业最强大的基地之一，是德国帝国主义基地之一。波兰建议的方案将剥夺德国东部的进攻基地和军火生产的基地。

波兰将成为一个没有少数民族的国家。

战前波兰的农业人口过剩，由于工业不够发达，不可能将农业人口用于工业生产。波兰得到的这些领土将使它有可能让农村居民在城市中就业，并使那些以前从波兰迁居国外的人可以返回家园，安居就

业。

波兰代表接着指出，奥得河流域应整个划归波兰，因为奥得河本身流量不足，要靠西尼斯河地区的水源来补充。

波兰代表团最后声明，它认为，应就这个问题尽速作出决定和达成协议，以便波兰政府有可能早些把波兰人迁回国内，让他们参加重建波兰的工作。）

杜鲁门　第一项议程是准许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其中包括芬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贝尔纳斯　不列颠和美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

艾登　你们最初的草案我们是完全同意的，但对第二稿，我们有些疑问。第二稿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我们要求，在着手缔结对意和约之前，就得改组意大利政府。

贝尔纳斯　我提出这一稿是希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折衷方案，也是为了满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即使其他附庸国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不被置于较意大利为差的地位。但我想请英国代表团注意，这一稿并不引起对意大利现政府的任何怀疑。

这一稿只是规定同负责的民主的政府缔结和约。这是将来的事。美国政府已同意大利现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态度。

艾登　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同意了您的观点，问题只在于措词。

斯大林　如果是说要改善各附庸国的处境，就应在这个决议中把这一点表述出来。现在意大利的处境已在改善，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改善意大利的处境的同时，并未改善前德国其他帮凶国的处境。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在搞人为的区分：一方面是意大利，它的处境正在改善；另一方面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对于这些国家的处境却无意改善。这样，我们这个决议将有失去权威的危险；意大利的功劳比别的国家究竟大在哪里？意大利唯一的“功

劳”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投降的。在所有其它方面意大利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一个附庸国都更恶劣，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四国中，任何一国给同盟国造成的危害比意大利无疑都要小得多。至于说到意大利政府，难道它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匈牙利的政府更民主些吗？当然不是。难道意大利政府比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政府更负责些吗？无论是在意大利或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进行过民主选举。在这方面它们是一样的。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对意大利如此厚待，而对所有其他前德国帮凶国又采取如此否定的态度。

意大利的处境，从和它恢复外交关系起，就开始改善了。现在又要再走一步：吸收意大利加入联合国。好吧，我们就对意大利再走一步吧，但是既然这样，我建议对上述其他国家采取几个月前就已对意大利走出的第一步，即和它们恢复外交关系。这将是公平的，并且还照顾了意大利优先，其余附庸国次之的顺序。

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局面，即对意大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又要迈出第二步，而这都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是第一个投降的，尽管意大利给同盟国造成的危害比所有其他前德国帮凶国要大得多。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就是这样。

丘吉尔　我们大体上同意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杜鲁门　我想指出，我们对于意大利政府和对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政府两者之间之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代表不曾有机会获得有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必要情报。在意大利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在那里所有我们的政府——美国、大不列颠和苏联——都有机会自由地获得情报。

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我们则不能这么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没有可能自由地获得情报。此外，这些国家现政府的性质使我们不可能立即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我们提供讨论的文件中，

我们已试图满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不使其他附庸国处于较意大利为差的地位。

斯大林 但是你们和意大利已有外交关系，而同这些国家却没有。

杜鲁门 不过如果其他附庸国的政府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它们也可以得到我们的承认。

斯大林 什么要求？

杜鲁门 来往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要求。

斯大林 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妨碍、也不可能妨碍盟国新闻记者的来往自由和新闻自由。这里有些误会。战争一结束，这里的局势就已经改善了。在意大利，对苏联代表也实行了许多限制。

杜鲁门 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够改组，并且当它们变得更负责和更民主时，我们将给予它们承认。

斯大林 我向您担保，保加利亚政府要比意大利政府更民主。

杜鲁门 为了满足苏联的愿望，我们已建议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采取和意大利相同的提法。

斯大林 但是这个提案没有包括恢复外交关系。

杜鲁门 我已经说过几次，在这些国家未按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组成政府之前，我们不能和它们恢复外交关系。

贝尔纳斯 我们建议改善意大利处境的唯一步骤是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我想请您注意我们提案中以同样的措词谈到了其他附庸国的那个地方。这样，与意大利处境改善的同时，其他附庸国的处境也会得到改善。这里我们是力求满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的。

斯大林 我建议凡是在谈到意大利政府时使用的“负责的”这个词全部删去。它降低了意大利政府的地位。

杜鲁门 任何政府，如果它不是负责的和民主的政府，我们都不能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斯大林 阿根廷政府不如意大利政府民主，然而阿根廷却是联合

国的会员国。如果写政府，就写民主政府，要是加上“负责的”这个词，就会使人认为这是某种别的政府。此外，还应增加恢复外交关系的内容

我建议在谈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段落中加句话：我们三国政府最近都将分别研究同这些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三国政府将同时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同时与这些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但却意味着三国政府中的每一个政府都将研究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有的早些，有的晚些。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在意大利有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代表，但是却没有大不列颠的外交代表，也没有法国的外交代表，这两个政府在那里没有大使。

丘吉尔　我们认为，我们驻意大利的代表是享有全权的。由于形式上我们还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代表的地位不能与大使的地位完全相等，按照不列颠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我们把这个代表叫做大使。

斯大林　但是，他和苏联、美国的大使不一样。

丘吉尔　不完全一样，百分之九十是一样的。

斯大林　不完全一样，是这样。

丘吉尔　不过原因是形式上的和技术上的。

斯大林　就给罗马尼亚派一个这样的大使好了，这种不完全的大使。（全场笑声）

丘吉尔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样做。

杜鲁门　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创造一种使我们能够和这些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局面。我已经解释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

斯大林　过去是存在困难，现在已不存在了。我们很难同意现在这个样子的决议。我们不想同意。

丘吉尔　我们不想使用那种可能影响我们之中任何人名誉的言辞。我只想替意大利说个情，这也不只是因为它是第一个退出战争的。意

大利退出战争已经很久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已经两年了。但其它国家停战到现在只有很短的时间——四、五个月；罗马尼亚稍微早些。

斯大林 先是罗马尼亚，后是芬兰。但对意大利，在她投降七、八个月之后便同她恢复了外交关系。

丘吉尔 意大利情况是这样。两年前意大利退出了战争，并在这以后尽它的可能与我们并肩战斗。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在意大利呆过，了解那里的一切政治情况。而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它国家则不能这么说，再有，意大利那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的北部当时处于敌人的铁蹄之下，两个月前才刚刚解放。我们与意大利在那里共同战斗过，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

但是人们总是认为，意大利北方不解放，就不可能有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府。然而我们却承认了意大利政府，并与它一起共事。关于支持巴多里奥将军政府的问题，我们与苏联政府有过协议。当时我没有同意我们美国朋友的意见，我想在北部未解放之前，支持这个政府，以便以后能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组成意大利政府。但是事态的发展引起了其它的情况。

我们已同意大利建立了友好关系。那里没有对书刊的政治检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以后刚几个月，那里的报刊便经常攻击我。在意大利，自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北方已经解放，意大利人正准备进行民主选举。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能现在就讨论对意和约问题。

我应该指出，对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保加利亚了。我们驻布加勒斯特的使团被置于一种类似拘留的隔离状态中。

斯大林 这种话难道不加核实就可以讲吗？

丘吉尔 这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告诉我们的。我相信，大元帅要是知道如何对待我们驻布加勒斯特使团的种种事实，会感到惊讶

的。

斯大林 这是神话!

丘吉尔 当然，您可以把我们的发言叫作神话，但是我完全信任我们的政治代表和空军元帅史蒂文斯。我本人认识他已经多年，我们使团的工作条件很困难。使团使用的飞机总是耽误很久。我们的苏联朋友经常对我们使团的人数提出抱怨，其实它人数并不算多。应由三国组成的管制委员会开会时几乎总是只有两国代表。作为管制委员会主席的苏军总司令有时会见美国代表，有时会见英国代表，却很少与这两国代表同时会晤。至于说意大利，许多苏联代表都到过那里。

斯大林 没有的话，我们在意大利什么权力都没有。

丘吉尔 但是至少，那里的情况是：你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到意大利去。因此我不认为，可以将意大利的情况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相提并论。

杜鲁门 我们应该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的使团在进行工作时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

贝尔纳斯 为了达成协议，我建议将“负责的政府改为“被承认的政府”。

斯大林 这还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还应通过一项决议，三国政府同意研究与这四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建议在贝尔纳斯先生提出的有关四国的那一段的结尾加这样一句话：“三国政府同意各自分别于最近期间研究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丘吉尔 这不是与我们刚才谈的矛盾吗？

斯大林 不矛盾，因为如果我们决定研究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缔结和约的问题，我们甚至还没有承认这些国家，那么很清楚，承认问题将由每个政府单独提出。

杜鲁门 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斯大林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丘吉尔 我认为有矛盾。据我了解，总统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他不想现在就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它附庸国的政府。

杜鲁门 这里说的是，我们只是承担研究这个问题的义务。

丘吉尔 这会使社会舆论产生错觉。

斯大林 为什么？

丘吉尔 因为从声明的涵义可以引伸出，我们很快就要承认这些国家；然而据我所知道，这既不反映美国政府的立场，也不反映联合王国政府的立场。

斯大林 我同意总统的意见，而对丘吉尔先生的意见想提出异议。我们大家都已经同意将草拟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约的任务交给外长会议。我们大家都认为，和约只能与被承认的政府签订。因此，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提一下对这些国家的承认问题，那时就不会有任何矛盾了。假如我们不提三国政府准备在最近期间提出承认问题，那么草拟与这些国家的和约的段落就应该删掉。

丘吉尔 我想问一下总统，他是否预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现政府代表将在今年秋天参加外长会议，并且我们将在那里同他们讨论和约？

杜鲁门 只有我们承认的政府才能派代表出席外长会议。

斯大林 对。

丘吉尔 现在的这些政府不会被承认，因此不能同他们讨论和约。

斯大林 您怎么知道呀？

丘吉尔 这是逻辑上必然得出的结论。

斯大林 不，得不出这种结论。

丘吉尔 可能我的思维方法不对，但我觉得，能得出这种结论。

斯大林 这些政府可能被承认，也可能不被承认。谁也不知道，他们会被承认，还是不会被承认。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研究承认问

题”这个提法。而与他们之间的和约将在他们被承认之后缔结。

丘吉尔　人们读这一段时不可能理解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现在的政府。但是如果能成立我们能够承认的另外的政府，那时我们就着手草拟对他们的和约。请原谅我如此坚持这一条，但是不要忘记，假如这个文件公布，就得对它进行解释，尤其是我，要在议会这样做。我们说，我们要与我们将承认的政府缔结和约，但是我们却不打算承认这些政府。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毫无意义。

杜鲁门　我建议把这个问题退给外长们，让他们再次研究。

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说得不正确。这里根本没有谈到缔结和约，这里谈的是草拟和约。即使一个政府没有被承认，为什么不能草拟和约呢？

丘吉尔　我们自己当然可以草拟和约。如果这样，我建议把“同”字改成“为”字，这样一来就不是写成“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草拟和约”等等，而是“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草拟和约”等等。

斯大林　我不反对用“为”字。

丘吉尔　谢谢您。

斯大林　不值得谢。（全场笑声）

丘吉尔　希望外长们再看一遍这个文件。

斯大林　可以，我不反对。

杜鲁门　他们应该考虑到今天讨论的情况。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关于黑海海峡和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通航问题。美国代表团已就这个问题提交了自己的提案。

斯大林　大概有比海峡问题更紧急的问题，海峡问题可以推迟一下。

丘吉尔　这个问题是大不列颠由于希望修订蒙特勒公约而提出的。假如苏联方面希望推迟，我同意。

斯大林 最好推迟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和土耳其谈一谈。

杜鲁门 我们关于国际共管的提案的意思是，海峡将不能由任何一国来把持。我们要努力使土耳其人懂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斯大林 好。就这样办吧！

杜鲁门 我想向会议提出一项建议。我以为，已经该考虑起草会议公报了。因此我建议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公报。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应该就委员会人选问题进行协商。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我们委托外长们提出委员会的候选人。

斯大林 好吧。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开会行吗？

杜鲁门 行。

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原来说不行。

艾登 今天早餐时我们估计可能没有多少问题要在明天首脑会议上讨论。但既然今天的议程没有谈完，没有讨论的问题留到明天会上讨论。

杜鲁门 一旦我们断定我们再也无事可做了，我们马上就回家。（笑声）但暂时我们还有事做。

丘吉尔 艾德礼先生和我应该回伦敦，参加八月八日的议会开幕式。至迟，八月六日以前我要离开这里。

斯大林 还有波兰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讨论完，这是今天会议的最后一个问题

丘吉尔 此外，还有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的战俘营问题。我想现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斯大林 我们是否有时间并且愿意现在讨论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呢？

丘吉尔 我们正在与波兰人会晤，并在明天上午与贝鲁特先生会

谈。

斯大林 那就推迟讨论吧。

丘吉尔 这个战俘营的情况简单说是这样的。战俘营里确实有一万人。但是要知道，我们不久前俘虏了一百万战俘。现在苏联驻罗马使团正调查这一万人，这个使团能自由进入战俘营。据报告，战俘营内的人员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但不是苏联公民。战俘营内还有为数不多的波兰人。据我们查明，这些人是居住在1939年波兰疆界内的居民，六百六十五人希望立刻返回苏联，现在正采取措施遣返他们。我们还准备交出其它愿意回国的人。

这一万人几乎是作为一个编制完整的部队向我们投降的，只是出于行政管理上的考虑，我们保留了它的建制，由它自己的指挥官管理。如果戈利科夫将军有什么意见向亚历山大元帅或他的司令部提出，我们是欢迎的。

亚历山大 我对首相讲过的情况没有很多要补充的。我希望所有在座的诸位都了解，我一直为俄国在意大利的代表提供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向他们提供一切机会，让他们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且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因为当我们这里有大量俄国士兵时，负责的俄国代表的建议对我们会大有好处。我想，假如大元帅同意，我将一如既往，继续本着这种精神行事。

斯大林 根据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不应阻挠公民们返回祖国，而是相反，要帮助他们返回家园。

丘吉尔 如果你们的代表为这个问题派出一名将军或者亲自来司令部，那一切该办的事都会办好。

斯大林 好。我认为问题讨论完了。

我今天已同驻维也纳的科涅夫元帅谈过了。他并没有停止发放维也纳居民的口粮，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占领区的，而且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找到其它解决办法之前，也一直不会停止。

丘吉尔　原来还有一个把伦纳的行政机构扩大至不列颠和美国占领区的问题。

斯大林　最好将它的权限扩大到所有占领区。

丘吉尔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一进入维也纳马上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原则上我们同意，最好只和一个奥地利行政机构打交道。

斯大林　这样当然更好。

丘吉尔　我们不想给地方当局设置障碍。

斯大林　这样更好。

杜鲁门　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再会。

第 九 次 会 议

1945 年 7 月 25 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 11 点

结束：当地时间 12 点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艾登	外交人民委员
戴维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波伦	艾德礼	维辛斯基
科恩		葛罗米柯
汤普森		巴甫洛夫

杜鲁门　昨天提议今天继续讨论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我记得丘吉尔先生有一个补充提案。

丘吉尔　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我和波兰代表团有过一次谈话。今天上午我再次有幸会见了贝鲁特先生。昨天艾登先生和波兰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波兰人承认，在他们所占据的那些西部地区有一百五十万德国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与赔偿问题相关联的，也是与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问题相联系的。

杜鲁门　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贝尔纳斯先生也同波兰代表团会见过，并打算再次同他们会晤。请允许我就程序问题提出一项建议。鉴于贝尔纳斯先生以及艾登先生都将继续和波兰人进行

会谈，我认为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星期五是有好处的。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我们的下一项议程是关于德国海军舰艇和商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丘吉尔 当然，还应该研究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我想，我们要研究这些具体建议。

杜鲁门 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诉我说，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和兰德海军上将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制订了具体的建议。我准备在任何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最好是首先听取贝尔纳斯先生的意见并看一看我刚收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会议决定推迟讨论这个问题。）

丘吉尔 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程，但是应该讨论，就是迁移人口的问题。有大量的德国人需要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往德国。

斯大林 这些德国人已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遣返，他们现在正在德累斯登、来比锡和开姆尼斯。

丘吉尔 我们认为，有两百五十万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需要迁移，此外，捷克斯洛伐克人希望尽快摆脱当初从第三帝国迁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五万德国公民。根据我们的材料，十五万德国人中只有两千人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迁走两百五十万人，这可是个大问题。把他们迁到哪去呢？迁到苏联占领区？

斯大林 他们很大一部分人正在往苏联占领区迁移。

丘吉尔 我们不想让这些人到我们占领区去。

斯大林 我们也没有提这种建议呀？（笑声）

丘吉尔 他们是带着嘴来的。我觉得，移民还没有真正开始。

斯大林 从捷克斯洛伐克吗？

丘吉尔 对，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目前迁移的规模不大。

斯大林 据我了解，捷克人事先通知了德国人，然后才把他们迁

出来。至于波兰人，他们留下了一百五十万德国人，为的是在收获季节使用这些人力。一到收获工作结束，波兰人便会将德国人遣送出波兰。

丘吉尔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要考虑粮食、赔偿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粮食和燃料在波兰人那里，而人口在我们这里，这些人的粮食供应问题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斯大林　应该体谅波兰人的处境。在五年半的时间里德国人使他们遭受了许多苦难和欺凌。

杜鲁门　我昨天非常用心地听取了贝鲁特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对波兰人和俄国人都表示同情，并且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我已经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我想向我的同事们解释一下，在有关和约问题上我的权限有多大，我相信，当我们在这里讨论到应列入和约的那些问题时，大家都明白，按我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在得到美国参议院的同意下，才能缔结和约。毫无疑问，当我支持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某项提案时，这意味着，我将尽一切可能使参议院也能批准这项决定。但我不能保证它一定会被通过。

我应该告诉你们，没有我国社会舆论的支持，我在这里不能支持任何提案，美国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的。我声明这一点并不是要改变我与诸位同事讨论问题的基础，而是想解释清楚，宪法所赋予我的职权有多大。我的意思是：缔结和约时，我应该考虑这些条约须获得美国参议院批准这样一个事实。

斯大林　总统说的只涉及和约，还是涉及所有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杜鲁门　只涉及按宪法规定应送交美国参议院批准的协定和条约。

斯大林　也就是说，所有其它问题都可以决定？

杜鲁门　只要勿需送交参议院批准，我们在这里可以决定任何问题。

斯大林 就是说，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只是有关和约的问题？

杜鲁门 是这样的。我的权限很大，但我不想滥用这些权力。

丘吉尔 我建议回到波兰西移的问题上来。

斯大林 我们没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它是突然提出来的。当然，交换意见我同意。但是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丘吉尔 我不希望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想指出，这个问题是整个这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比方说，假如十天以后会议结束时没有就波兰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假如在德国全境平均分配粮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所有这一切无疑将意味着会议的失败。到那时我们只有回到贝尔纳斯先生的提案上去，即各方要靠自己占领区内的粮食来维持。我期望我们能就这些关系到我们整个会议成败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杜鲁门 我同意首相的看法，即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斯大林 我认为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整个德国煤和钢铁的供应问题。德国百分之九十的钢铁和百分之八十的煤炭是鲁尔区生产的。

丘吉尔 如果鲁尔区要给苏联占领区供应煤，那么苏占区就该用粮食来偿付。

斯大林 如果鲁尔区仍是德国的一部分，它生产的煤就应供给整个德国。

丘吉尔 那么为什么不能拿你们占领区的粮食呢？

斯大林 因为这块领土要转归波兰了。

丘吉尔 然而，假如鲁尔区的工人没有粮食吃，他们怎么能生产煤呢？他们又能从哪里弄到粮食呢？

斯大林 人们早就知道，德国历来都进口食物，尤其是粮食。如果德国的粮食和食物不够的话，它会去买。

丘吉尔 那它怎么能支付赔偿呢？

斯大林 能支付的。德国留下的东西还很多。

丘吉尔 的确，鲁尔煤矿在我们占领区内，但是如果我们采取的某种办法会使不列颠占领区今冬挨饿，而波兰人在这个时候却把全部粮食留给自己，那我可不能对这种处理承担责任。

斯大林 不是这样的。波兰人不久前曾请求支援他们粮食。他们的粮食不够用，请求在新粮收获前向他们提供一部分粮食。

丘吉尔 我希望大元帅能象我们承认他有困难那样，承认我们也有某些困难。我们英国今年冬天非常缺煤。因为我们的煤不够用。

斯大林 为什么？英国历来都出口煤嘛。

丘吉尔 矿工都还未复员，我们的煤炭工业劳动力不够。

斯大林 有不少战俘嘛。在我们那里，战俘都在煤矿中干活，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很困难。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各煤矿区的生产，并且利用战俘來做这件事。你们在挪威有四十万德国士兵坐着没事干，他们甚至还没有被解除武装。不晓得他们在等待什么。这就是你们的劳动力嘛！

丘吉尔 我不知道这些德国战俘还没有被解除武装。至少我们是打算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我还未确切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是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处理的。不管怎样，我要查问一下。

我想再重复一遍，并提请你们注意，我们缺煤是因为我们在向法国、比利时及芬兰出口煤。我们不明白，在我们今冬缺煤的时候，波兰人为什么能够把还不属于它的领土上出产的煤卖给别人？

斯大林 他们卖的是栋布罗瓦地区出产的煤，这个地区是他们的。我不习惯于诉苦，但我要说，我们的处境更糟。我们牺牲了几百万人，我们现在人不够。如果我们诉起苦来，恐怕您会为饿国如此困难的处境而掉眼泪的！但我不想让您不愉快。

丘吉尔 我们控制着鲁尔区。我们打算用鲁尔的煤换取粮食。

斯大林 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

丘吉尔 我也不指望今天就作出某种决定。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与会者在这个短暂的休会时间里考虑一下，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这个重大的问题。

杜鲁门 假如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话，那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

丘吉尔 星期五5点钟我们再开会。

艾登 我们收到了贝奈斯博士的通知，他表示希望我们在这里讨论把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的问题。外长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吗？

斯大林 我认为，迁移工作已经完成了。

丘吉尔 我们不认为大量的德国人已经从捷克斯洛伐克迁走了，如何处理这件事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斯大林 请吧。

丘吉尔 让外长们去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查明事实真相。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我同意。

在休会前我想再次提请诸位注意我就有关国际内陆水道问题提出的建议。我想外长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的这个提案。

（**斯大林**和丘吉尔表示同意。

随后**苏联代表团**向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递交关于在奥地利和德国为阻挠苏联公民返回祖国设置障碍的备忘录，以及在首脑会议上已经提及了的有关在挪威的仍未解除武装的德国军队的备忘录。）

丘吉尔 但我可以保证，我们的意图是解除他们的武装。

斯大林 我不怀疑这一点。（笑声）

丘吉尔 我们不是把他们储备起来，以便有朝一日突然把他们从袖口里放出来。我将立即要求就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报告。

（杜鲁门宣布闭会，并通知下次会议将于7月27日星期五下午5时举行。）

第 十 次 会 议

1945年7月28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22点30分

结束：当地时间零点5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艾德礼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贝文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戴维斯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维辛斯基
波伦	克尔爵士	古谢夫
科恩	伯尔斯少校	
汤普森		

（杜鲁门宣布开会。

苏联代表团就1945年7月25日苏、美、英外长会议情况报告如下：

1.美国代表团提议在外长会议上讨论水路航运问题。它表示希望先由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英国和苏联代表团同意这项建议，于是由以下成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美国方面；拉塞尔、里德尔伯格

大不列颠方面：沃德

苏联方面：格拉申科、拉夫里谢夫

2.接着美国代表团提到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德国居民的问题。

英国代表团指出，问题不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德国人，还有从波兰西部和匈牙利迁出德国人的问题。它表示意见说，移民问题要置于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监督之下。盟国管制委员会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政府协同行动。

苏联代表团提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委员会进行初步研究，然后将委员会拟定的草案交三国外长审议。

美、英代表团同意这个建议。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

美国方面：坎农

不列颠方面：哈利森

苏联方面：索波列夫、谢苗诺夫

3.英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会议公报，另建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会议各项决议的总议定书。

苏、美代表团同意这项建议。决定成立下列委员会：

（甲）会议公报起草委员会：

美国方面：沃尔特·布朗、怀尔德·富特

苏联方面：索波列夫、戈伦斯基

（乙）会议决议总议定书起草委员会：

美国方面：邓恩、马修斯、科恩

苏联方面：葛罗米柯、柯兹廖夫、格里巴诺夫

大不列颠方面（同时参加两个委员会）：布里奇斯、布鲁克、海特、金

苏联代表团接着报告1945年7月27日外长会议情况。代表团说在这次外长会议上讨论了以下问题：

1.关于没有研究完的问题。

会上指出，迄今为止没有研究完的还有下列问题：

（1）关于对德经济原则；

（2）关于德国的赔偿；

（3）关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赔偿；

（4）关于欧洲的石油供应；

（5）接纳意大利和其它原附庸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6）履行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问题；

（7）关于放宽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停战条件的问题；

（8）关于波兰西部边界；

（9）关于在解决欧洲迫切的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问题；

（10）关于战犯；

（11）关于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迁走德国人的问题；

（12）关于把对德经济原则草案中第13条的两点补充到对德政治原则中去的问题；

（13）关于德国船舰；

（14）关于国际内河航道。

2.关于接纳意大利和其它已签订停战协定并与盟国一道作战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声明，如果苏联和英国代表团不能就有关这一问题的措词达成一致意见，它将在美国总统的同意下，建议从会议日程上完全取消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团补充说，照它的意见，必须首先讨论最紧迫的问鼴，这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德国船舰问题和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英国代表团建议用下面的措词代替第三段最后一句苏联代表团的提法：

“在和这些国家负责的民主政府签订和约之后，三国政府可以同这些国家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支持这些国家参加联合国的要求。”

苏联代表团声明不能接受这个修正。

由于三国外长会议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决定提交三国政府首脑解决。

3.关于德国的赔偿。

苏联代表团说，它认为赔偿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建议德国赔偿问题直接由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对这一建议没有异议。接着苏联代表团宣读了克里米亚议定书的第四部分关于赔偿问题，并指出美国代表在赔偿问题委员会中声明他收回美国政府对这条决定的赞同。苏联代表团问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是仍遵守克里米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美国代表团回答说，这是误会。美国政府在克里米亚同意以二百亿美元的数目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从那以后，苏联和盟国的军队在德国造成很大破坏，有些省份脱离了德国。现在实际上已无法以美国代表团在雅尔塔接受的、可能作为讨论依据的总数为出发点了。

英国代表团说，它不想提什么建议。

根据美国代表团的建议，一致认为把这个问题留待下一次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是适宜的，之后再将这个问题向三国政府首脑报告。

4.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赔偿。

苏联代表团提议以它提出的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赔偿问题的建议作为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美国代表团表示，它不认为奥地利和意大利可能以现在生产的产品支付赔偿。按照美国代表团的意见，只能是一次拆迁无法用于和平时期的生产的军工设备。英国代表团声明，它赞成美国代表团的意见。

鉴于没有达成协议，决定把出现的分歧报告三国政府首脑。

5.关于对德的经济原则，

根据美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个问题推迟讨论。

6.关于欧洲的石油供应。

由于这个委员会没有结束工作，这个问题决定推迟讨论。

7.关于欧洲的经济合作。

决定赞同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并汇报给三国政府

首脑。）

杜鲁门　现在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呢，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斯大林　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讨论意大利和其它国家的问题。您今天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工作一个小时吧？

杜鲁门　这个我同意。我们工作到12点。

斯大林　我想通知一下，我们俄国代表团收到了日本的一项新建议。尽管别人在制定关于日本的什么文件时没有很好地向我们通情报，但是我们仍认为当有什么新的提议时应该互相通告。（用英文宣读了日本关于调停的照会。）这个文件没有一点新东西，只有一个建议：日本提出要同我们合作。我们打算按上次的精神回答他们。

杜鲁门　我们没有异议。

艾德礼　我们同意。

斯大林　我要通知的就是这些。

杜鲁门　有两个问题是苏联代表团想要我们首先考虑的。第一是意大利和其它附庸国的问题，第二是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赔偿问题。

斯大林　此外，最好是还能提出德国船舰问题和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杜鲁门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任何问题，我准备听取各种建议，然后好就这些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

艾德礼　我想申明，我同意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同时，我对英国发生的事情影响了会议的工作表示歉意。不过，我们在这里准备呆多久都可以，研究什么问题都可以。

斯大林　前一次“三巨头”会议上讨论过接纳意大利等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但是，正象刚才汇报的那样，外长们对于那次讨论的结果有不同的理解。苏联代表团觉得，在首相对有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提法作了一些修正以后，三国政府首脑已经就这

个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往讲到和约的地方，曾经决定用“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来替换“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之后这个问题交给了三国外长最后加工。可是，在外长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又对这个草案提出了新的修正案，但未能通过。政府首脑会议上谈到对前面提到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如何称法，是“负责”的呢，还是“得到承认”的？俄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说是“负责”的，那么这些政府将会感到难堪。因为它们会觉得，现在人们认为它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象我们在三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那样称为“得到承认的”，那就不会感到有什么难堪了。我们中间每一个政府，在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民主的时候，便可以承认它们。这些政府既不会感到难堪，而提法的含义和内容又和原来的一样。我们在这里已经作了决定，可是后来外长们一开会，又推翻了我们的决定。这不对。这点在原则上是已经通过了的。

杜鲁门　我请贝尔纳斯先生就此发表意见。

贝尔纳斯　在三国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说，据它记忆，美国代表团接受了它的建议。我代表美国代表团指出：总统原则上接受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同时又说这一建议需要交外长们加工。总统指的只是换一个词，就是用“研究”代替“审议”（这个改动在英文里是有意义的。）因此，美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但我当时向外长们指出，我记得丘吉尔先生反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研究承认附庸国政府问题的建议。在三国政府首脑会谈结束后，丘吉尔先生告诉我，他不同意这个建议。我还向外长们说，美国代表团最初提出自己关于意大利的提案，目的是要使意大利的处境得到某些改善。建议中只是说，三大国将发表宣言，申明他们支持意大利加入联合国。

英国代表团建议在我们要支持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中应包括某些中

立国家。我们同意了这一点。苏联代表团建议把关于佛朗哥政权的一点写到文件中去。为了支持苏联代表团，我们补充了一条，表明三大国对佛朗哥政权统治下的西班牙加入联合国持否定态度。

而后，苏联代表团提议加进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等国政府的一条。我们对这一条作了某些修改后也同意了。接着，又有人建议对有关上述国家的这一条作些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又同意了。

遗憾的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当我们同意我们的苏联朋友时，英国代表团不肯同意。而当我们同意我们的英国朋友时，又得不到苏联代表团的赞同。（笑声）现在如果苏联和英国代表团能够就苏联的提案达成协议，那我们准备接受这个文件。要是他们不能达成协议，我们打算撤销我们关于意大利的小小的提案。

艾德礼　总统先生，我请求让贾德干先生就这个问题阐明我们的立场。

贾德干　我们现在研究的文件，牵涉到接纳意大利和其它附庸国，也可能还有某些中立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文件的文本除了两条之外是可以通过的。其中一条斯大林大元帅已经讲过了，就是用“得到承认的政府”代替“负责的政府”。我觉得，两天以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已经同意作这个改动。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关于第三段的问题。这里说三国政府同意最近将研究与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丘吉尔先生曾解释说，虽然他同意研究同这些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但如把这一点写到宣言里去，就会引起误解。因为英国人根据宪法不能和形式上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我们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意思是说在签订和约之后我们可以和这些国家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但我觉得我们这一建议遭到了苏联代表团的反对。

斯大林 我理解贾德干先生的意思是，他同意用“得到承认的政府”代替“负责的政府”。

贾德干 是的。

贝尔纳斯 这点我们可以接受，用“得到承认的”代替“负责的”。

斯大林 这里，意大利和盟国之间的状况，其它国家和盟国之间的状况，这两者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罗马尼亚，在匈牙利或保加利亚，都没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这种政府只有芬兰有。所有这些国家和意大利一样，政府是经过各主要政党协商产生的。

如果说意大利得到美国和苏联的承认，得到英国百分之九十的承认，那么为什么不能提出研究，譬如说，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呢？从民主不民主的观点看，那里的情况和意大利一样，然而意大利却得到了三大国的承认。这里并没有讲要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我真不理解贾德干先生提出的修正案意义何在。意大利没有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其它国家除芬兰外也没有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为什么要在意大利和其它国家之间制造这种区别呢？

贝文 区别是否就在于意大利的情况我们清楚，其它国家的情况我们毫无所知？

斯大林 并没有要你们承担承认这些政府的义务。等你们要讨论承认问题时，你们会有可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的。

贝文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以前就承担这个义务呢？

斯大林 我们和意大利建交时，对它同样了解不多。可能还不如你们现在对这些国家的了解。问题在于要为从意大利到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改善处境开辟某种道路。对于意大利，这里规定了它加入联合国的前景。这已经是改善它处境的第二步了。第一步是在它投降后

只不过六到八个月就同它恢复了外交关系。改善意大利处境的第二步是我们在它投降两年之后使它能够加入联合国。

当前的任务是要对其它国家迈出第一步。要保证三大国能够讨论承认它们的问题。这是在它们投降十个月以后才提议这么做的。既然我们已经同意改善意大利的处境，那么对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所行动。问题就在这里。

艾德礼　我想在这里已经解释过了，同这些国家签订和约之前，我们不能和它们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接受苏联的建议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正打算对这些国家作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英国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主张在同这些国家签订和约以后才能与之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则恰好反映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斯大林　如果这么说呢：三国将各自单独地审议关于部分地或完全地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同芬兰无论如何都得恢复外交关系了。因为那里成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好再拖延了。问题在于其它国家。

艾德礼　我觉得这个建议不符合实际。

斯大林　好。那我们就接受美国人的措词：不说“审议”，而说“研究”。

艾德礼　我认为换一个词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议会里只要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事情就都会戳穿。

斯大林　我们什么也没有隐瞒，有什么可戳穿的？“审议”是一回事，“研究”又是一回事。反正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是我们不研究承认这些政府的问题，那才奇怪呢。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我想英国人是可以接受美国措词的。你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只会赢得这些国家的舆论。

贝文　我们回国以后，议会里会问我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我愿意完全诚实地回答人民，要是我承认一个政府，那我就真正地承认它。我可不想用词藻来掩盖一些可能产生歧义的东西。我宁

愿接受美国人最新的建议，把这个问题推迟解决。

斯大林 那就推迟吧。

杜鲁门 现在我们讨论什么问题？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还是意大利和奥地利赔偿问题。

（决定讨论赔偿问题）

杜鲁门 那我想就意大利赔偿问题做个声明，在第一次讨论意大利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讨论放宽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时，我曾说过，为了恢复意大利的经济，我们同英国政府一起向意大利提供了近五亿美元的贷款。为了同一个目的，我们还打算再给意大利五亿美元。美国政府准备提供这些贷款，是为了我已经讲过的既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让意大利向盟国和其它国家支付赔偿。如果在意大利有装备重型设备的军工厂，而苏联又需要这些设备，那么我们同意苏联拿走这些设备。不过我们打算给意大利提供的贷款应该首先用意大利的出口来偿付。

斯大林 可以不向奥地利索取赔偿，因为它过去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点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意大利若没有任何赔偿，我们苏联人民是难以理解的。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军队打到了伏尔加，参予了对我国的破坏。奥地利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可以不向它要赔偿。意大利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它应该赔偿。

杜鲁门 如果有东西支付赔偿，那我完全同意把它交给苏联。但我不准备、也不能同意给意大利钱，然后让它用这笔钱向盟国和其它国家支付赔偿。

斯大林 我理解总统的观点。但我希望总统也理解我的观点，是什么东西给了苏联人民道义上的权利来谈论赔偿呢？这就是苏联的大片领土曾经被敌军占领，苏联人民被占领者铁蹄蹂躏了三年半。如果没有被占领过，俄国人可能就没有道义上的权利来谈论赔偿了。可能是这样的。

杜鲁门　我完全同情你们。

斯大林　总统说，在意大利可能有俄国人需要的设备，又说这些设备可能用来抵销赔偿。那么好吧，我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我只希望为这种赔偿确定一个大体的数字。意大利是一个大国，从意大利可以拿到多大数额的赔偿呢？用价格计算赔偿该是多少呢？如果总统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等一等，不过赔偿的数额总应该确定下来。

杜鲁门　我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贝文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我建议不要把美国和大不列颠给予意大利的贷款考虑进去，而只计算意大利目前实有的东西。

斯大林　当然啰，我不打算无视美国和英国的利益。

艾德礼　我想说明，我完全同意总统的话。同时，我对俄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怀有完全的同情。不过我们也由于意大利的进攻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同样有被毁坏的土地。因此，如果意大利要用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给予的贷款去支付赔偿的话，那么英国人民的情绪将会怎样是可以想象的。当然，如果在意大利有可以拆迁的设备，那是另一回事。若是用我们和美国给的贷款去支付赔偿，我们的人民任何时候也不会答应。

斯大林　我们同意领取设备。

艾德礼　军用设备？

斯大林　军用设备。

艾德礼　这是对军用设备实行一次拆迁，而不是用现在生产的产品支付赔偿吧？

斯大林　是一次拆迁。

贝文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生产军用产品的军用设备？

斯大林　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呢。是指军工厂中将要用于民用生产的设备。我们現在从德国拆迁的就是这种设备。

艾德礼　我指的是不可能用于民用生产的设备。

斯大林 什么设备都可以用于民用生产。我们目前正在把我们的军工厂转向和平时期的生产。没有一种军用设备不能用来生产民用产品。例如我们的坦克工厂已经开始出产汽车了。

贝文 很难确定你们要拿走什么东西。

斯大林 当然，我们现在还说不出是那些设备。我们只是希望这里在原则上作出决定，以后我们再提出我们的要求。

杜鲁门 据我的理解，你是想在这里原则上达成协议，意大利应该付出赔偿。

斯大林 完全正确。应该确定一个赔偿的数额，而且我们同意接受一个不大的数额。

杜鲁门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原则上没有多大分歧。我们只希望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要动我们给意大利的贷款。

斯大林 我没有指望这种贷款。

贝文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首先应该支付什么？在对意大利的支付要求中，给意大利提供贷款的英、美两国的要求应该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才是赔偿要求。

斯大林 我们不能鼓励意大利和其他侵略者，让它们对造成的破坏哪怕是部分的赔偿也不付出：发动了战争而不受到惩罚。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是因为他们发动了战争反而给他们奖赏。

杜鲁门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贝文 我听不清，这是飞机的过错。（有人又给贝文重复了斯大林的话。）

杜鲁门 我同意大元帅的看法，侵略者不应得到奖赏，而应受到惩罚。

斯大林 英国人吃意大利的苦头特别多。

艾德礼 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

杜鲁门 让我们确定一下明天开会的时间。象平常那样，五点？

斯大林 好吧。

杜鲁门 或者我们四点钟开始？大家都同意，明天四点钟开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1945 年 7 月 31 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 16 点

结束：当地时间 17 点 15 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艾德礼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贝文	外交人民委员
莱希海军上将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戴维斯	伯尔斯少校	维辛斯基
波伦		戈伦斯基
科恩		马伊斯基

杜鲁门　由贝文先汇报昨天外长会议的情况。

贝文　我建议不必再专门报告了，因为昨天外长会议议程上的全部问题都列入了今天“三巨头”会议的议程。

（采纳了贝文的建议）。

杜鲁门　今天第一项议程是美国关于德国赔偿、波兰西部边界和接纳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几项提案。现在由贝尔纳斯先生报告这些建议。

贝尔纳斯　我们关于赔偿问题的建议是涉及三个有争议问题的总建议中的一部分。这些问题是：赔偿问题，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所有这三个问题是联在一起的。在外长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曾声明，如果能就所有这三个问题都达成协议，它可以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进入联合国问题上作出让步。

斯大林 这些问题之间没有联系，这是不同的几个问题。

贝尔纳斯 对，这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却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代表团就所有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是为了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在此再一次声明，我们将不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不能就另外两个问题达成协议的话。

在昨天外长会议上讨论过的我们关于赔偿问题的建议规定，从鲁尔区为维持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基本设备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转给苏联，换取苏占区的粮食、煤、锌、钾、石油制品、木材等。此外，我们还提议从鲁尔区那些为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基本设备中，抽取百分之十五，无偿地、不须任何交换地交给苏联。

在昨天讨论的时候，英国代表团声明，它不能同意所有这些东西都只由鲁尔区交付，但它可以同意由所有西部占领区向苏联交付设备。我们承认，英国和美国建议的唯一区别就在百分比的大小。如果百分比就三个西部占领区来计算，那么百分数就应该比为一个鲁尔区所规定的降低一半，也就是说，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五降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原来的百分之十五降为百分之七点五。

苏联代表团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但是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认为，这样在行政方面将简便得多。我们还认为，如果从西部三个占领区进行拆迁，就是对苏联也极为有利。

斯大林 我们也认为，不仅仅从鲁尔区拆迁，而是要从所有西部占领区进行拆迁，这是对的。

贝尔纳斯 这将使你们挑选设备有很大的余地，因为这些设备可以从美、英、法三个占领区拆迁。

外长会议上有人建议应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确定，哪些设备是维持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可以用作赔偿。苏联代表团认为，应该明确指出由谁来确定这些为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可以用作赔偿

的工业设备的数量和性质。我建议这应由管制委员会根据盟国赔偿问题委员会的指示来确定，并应得到拆迁设备所在的占领区的总司令最后同意。我之所以建议由管制委员会来确定，是因为管制委员会里有所有四个大国的代表，而且管制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执行职能的行政机构，而赔偿委员会则只是一个制定有关赔偿问题总政策的机构。

我在此再重申一遍我昨天提出的建议，即基本设备的拆迁应该在两年之内完成，而为换取苏占区货物向苏联提供设备应在五年内完成。我还建议，其它国家的赔偿要求由西部占区给以满足。

我曾讲过的、在我们的建议中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两个问题，是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在主要问题，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提下，我们同意解决这两个问题。

根据我们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建议，要给波兰政府权利，在波兰人所要求的全部区域内建立管理机构。

至于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三天前我们撤销了自己的建议。但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个建议的提法应该使苏联满意。

四天前我们讨论的那个建议的提法是“三国政府同意各自将在最近研究关于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英国代表团声明，这点它无法接受，因为英国政府不能同意和同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当时苏联政府首脑曾经问过，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完全或者部分地承认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现在我提出的建议采用这样的措辞：

“三国政府同意，各自将在最近根据当时的条件，研究在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约以前在可能的程度上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的苏联朋友和英国朋友准备接受我们这样措辞的建议。

斯大林 我原则上不反对这个提法。

贝尔纳斯　我们还建议补充新的一点，即三国政府表示希望，由于欧洲战事结束后条件发生了变化，盟国的新闻界应享有充分自由向世界报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内情况。这和我们以前谈到波兰问题时所同意的提法几乎一样。

斯大林　这个可以接受，不过应该改变一下措辞，用“三国政府不怀疑”代替“三国政府表示希望……”等等。

贝尔纳斯　就美国来说，这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就按现在这个样子通过这个文件了。

这样，我们共提出了三项建议。我非常希望这三项建议都能在这里通过。

斯大林　关于赔偿问题我们有一项提议。

（随后宣读**苏联代表团**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下述建议：

1.各国政府在自己的占领区取得赔偿。赔偿有两种形式：一次拆迁德国的国家财产（设备、物资），于投降后两年内完成；逐年从当时生产的产品中提供货物，于投降后十年内完成。

2.赔偿的目的在于促使蒙受德国占领之苦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同时考虑到必须尽可能削减德国的战争潜力。

3.除了从自己的占领区取得赔偿外，苏联再从西部占区得到：

（甲）由德国管制委员会根据赔偿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应作为赔偿而予拆迁的西部占区基本工业设备（可以使用的成套设备，首先是冶金、化学和机器制造业设备）的百分之十五。这些设备在五年期间内交付苏联，并换回同等价值的粮食、煤、钾、木材、陶器及石油制品。

（乙）西部占区中应作为赔偿而予拆迁的基本工业设备的百分之十；这是无偿的，不须作任何交换。

西部占区中应作为赔偿而予拆迁的设备和物资的数额，应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内确定。

此外，苏联还得到下列赔偿：

（甲）西部占区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中价值五亿美元的股份。

（乙）德国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三十。

（丙）现由盟国控制的德国黄金的百分之三十。

5.苏联负责用自己所得的赔偿份额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美国和英国负责解决法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的赔偿要求。）

斯大林 贝尔纳斯先生在这里提议，把所有这三个问题联在一起。我理解他的观点，他提出了一种他认为适宜的办法。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是每个代表团的权利。不过苏联代表团不受这个约束，它将就这几个问题中的每一个单独投票。

俄国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争论与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德国的赔偿问题。这里已经讲了我们的看法。想必你们已发现，俄国代表团转向了美国代表团的观点，因为它放弃了提出固定数字和数量的要求而同意采用百分比。

我要稍微离开主题，谈一谈在苏军占领以前英国人在俄占区进行的拆迁。这里指的是运走货物和设备。此外，苏军司令部有报告说，美国当局也从这个地区拉走了一万一千个车皮。这笔财产怎么办，我不清楚。是否把这些财产归还俄国人，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加以补偿？总而言之，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仅从自己的占领区、还从俄占区运走了设备，而我们却没有从你们那里拉走一个车皮，也没有从工厂拿走任何设备。美国人曾经保证不外运，可还是运走了。

现在谈谈问题本身。我认为，我们能够在德国赔偿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计划的基本点是什么呢？第一，各方在自己的占领区进行拆迁。这点我们同意。第二，不仅仅从鲁尔，而是从所有西部占区拆迁设备。这第二点我们已经接受。第三，出自西部占区的赔偿物资，其中一部分须用俄占区的相应等价物交换，期限为五年。然后是第四点，由管制委员会确定从西部占区拆迁设备的数量，这点也可以接受。

现在的分歧到底在哪里？我们关心的是期限问题，什么时候能够估算出赔偿数额，这一点在美国的草案里没有提到。我们希望规定三个月的期限。

贝尔纳斯　期限问题应该协商一下。

斯大林　这指的是确定赔款数额的期限。总得提出个期限吧。我们建议三个月。够吗7

杜鲁门　我看够了。

艾德礼　这个期限短了。我得考虑一下。

斯大林　考虑一下当然必要。是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反正总要规定一个期限。

艾德礼　我建议六个月。

斯大林　好吧，同意。

下面还剩下一个拆迁设备的百分比问题。这也可以达成协议。多百分之一还是少百分之一，这无关紧要。我希望，在确定拆迁的百分比这伴事上，英国人和美国人会支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损失了很多设备，多得惊人。哪怕是补偿其中的二十分之一呢，总是应该的吧。我指望艾德礼先生能支持我们的建议。

艾德礼　不行，我做不到。

斯大林　你考虑考虑就会支持我们的

艾德礼　这个问题我昨天考虑了一整天啦。（笑声）

斯大林　那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同协议。

贝文　苏联的文件中没有包括我昨天用过的那句话，就是“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

（苏联代表团把自己关于赔偿问题的建议中的有关部分重新宣读了一遍。）

贝文　我建议您采纳我的这句话，它十分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思想。

斯大林　什么思想呢？

贝文 管制委员会应该首先确定，为了维持德国的和平经济，应该留下多少设备。

斯大林 这是一回事。

贝文 既然这样，也许您会采纳我的说法吧？

斯大林 这有什么区别呢？

贝文 区别很大。我不愿意以后出现误解，你们的文本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就是说，是全部设备的百分之十五。

斯大林 不，我指的是应拆迁设备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那些设备的百分之十五。

贝文 我还是提议把这点加到文件中去，让它清清楚楚。

斯大林 有什么不清楚的？由管制委员会确定哪些设备对于维持德国和平经济是必要的，剩下的部分就是赔偿总额嘛。

贝尔纳斯 我们这一句修正的措辞，表达了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共同观点。

斯大林 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贝尔纳斯 凡被认为是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因此可以用作赔偿的工业设备，它的数量由管制委员会根据盟国赔偿问题委员会的指示确定，并且要得到拆迁设备所在占领区的总司令最后同意。

斯大林 我不反对。

贝尔纳斯 这样，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百分比的问题。你们是想要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十二点五和百分之七点五吗？

斯大林 是的。

贝尔纳斯 但除此之外，作为赔偿，你们还想得到西部占区工业企业中五亿美元的股份，德国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和现由盟国控制的德国黄金的百分之三十。关于黄金问题，据我了解到我们司令部的意见，我可以说，是有部分黄金，但原来是属于其它国家的。要是

拒绝这些国家提出的偿还要求，那是不公正的。

斯大林 这里说的是德国的黄金。

贝尔纳斯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存在有德国的黄金，因为这些黄金全是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掠夺来的。它原来属于哪些国家我们就应该还给哪些国家。如果苏联代表团坚持苏联应在上面所说的百分数之外，象苏联建议中讲的那样，再得到五亿美元的工业企业股份，以及百分之三十的德国国外投资和百分之三十的黄金，那么这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讨论。

斯大林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得到这些。

贝尔纳斯 你所说的德国国外投资是指什么？

斯大林 德国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投资。

贝尔纳斯 至于在美国的投资，我们已经把它冻结了。对这笔资金提出要求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好象国会已经这样作了。我不怀疑，目前在美国的难民也会对这笔资财提出各种要求。这个问题需要法律上的解决。

另外，我相信，假如拉丁美洲各国也有一定数量的德国投资，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会对这笔资金提出要求。

斯大林 这可能。

贝文 昨天我们商定让法国也参加赔偿问题委员会，以便能参与核定可拆迁用作赔偿的设备。我希望法国能参加这个委员会。

斯大林 我不反对。

贝文 关于百分比，我觉得，昨天在外长会议上我们同意百分之十二点五，这已经是考虑了你们的要求。

此外，鉴于我们郁已同意了各项经济原则和在德国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流，我想知道，赔偿问题会不会影响整个德国的正常的商品交流。

斯大林 谈到经济原则时，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贝文 解决黄金问题有很大的困难。至于说到德国在国外的投资，

你是否同意局限于在中立国家的资产。

斯大林 这点倒还可以同意。

贝尔纳斯 我们不能同意对我们的基本建议作任何补充。我指的是苏联建议的第四条。

斯大林 如果那样，百分比就得提高。让我们把第三条中的百分比提高吧，更何况你们已从我们的占领区运走了很多设备。（笑声）我们那里被毁坏的设备多得惊人。至少应该补偿其中一小部分没备吧。

杜鲁门 我想就从你们占领区拆迁设备一事作一个说明。当三天前交给我们这些设备的清单时，我们才得知这件事。我已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让他调查这件事并作出报告。如果进行过这种拆迁，那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根据美国政府的命令干的。我可以请你相信，我们会找到办法补偿的。

斯大林 我建议还是回过来讨论百分比的问题。

杜鲁门 如果你准备撤销第四条，那我准备接受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十这个比例。

斯大林 好，我撤销。

贝文 我们将难于用剩下的那些设备满足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要求。依我说还是以百分之十二点五和百分之十为好。除此以外，我们要求取消第四条。

斯大林 这点我们已经同意了。美国能理解我们的处境，你们怎么就不愿理解呢？

贝文 我们负责的是拆迁设备数额最多的占领区。而且，法国、比利时、荷兰方面也将提出很多的要求。

贝尔纳斯 我们建议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其它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其赔偿要求应由西部占区给予满足。我要求讨论一下我们关于其它国家赔偿要求的提法。

斯大林 好吧，我同意不列举国家，而只笼统地提一下。

贝尔纳斯　我想这样比较合适，因为已经说过，这个名单里没有希腊。我们同样认为笼统地提一下较为适宜。

斯大林　好。

贝文　我想到一点，如果你们得到你们要求的百分比，再加上你们从自己占领区得到的那些，那你们就要拿到德国全部赔偿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斯大林　要少得多。另外，要知道有百分之十五是我们用等价物交换的，这实际上是赔偿物的交换，而不是什么新的赔偿。我们从西部占区总共只得到百分之十的赔偿。这个其实才真是赔偿。至于那百分之十五，它是用一定的等价物换来的。我们的要求是最低不过了。我们从你们那里得到百分之十，其余我们是交换的，要支付等价物品。你们却还剩下百分之九十。如果我们只得到赔偿的百分之七点五，而不是百分之十，那就不合理了。我同意应该是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十，这样此较公正。美国人同意了。你呢，贝文先生？

贝文　好吧，我同意。

杜鲁门　我们也同意。

贝尔纳斯　这就是说，接受我们的提案，但规定了新的百分比，并决定了确定赔偿数额的期限。

斯大林　看来，我们已经解决了在赔偿问题上的全部分歧。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草案拿去最后加工？

（采纳了这个建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加工通过的决议。）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是波兰西部边界问题。

贝尔纳斯　昨天我们提交了我们的建议，而且昨天就已经讨论过。我想，不必再把它重新念一遍。如果有什么意见或修正，我准备听取，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苏联朋友和英国朋友能够同意我们的建议。

贝文　关于英国政府的立场，我接到指示，要以东尼斯河为界。因此，我想弄明白，这项新建议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整个这片地区

全交给波兰政府？苏联军队是否将完全从那里撤出？就象在其它占领区那样，一方的军队撤出而另一方接收这个地区？

我会见了波兰人，问过他们对履行美国建议中提到的那项宣言有什么打算。我问他们，对于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自由的、不受干涉的选举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向我保证说，他们愿意尽快地进行选举，并打算在1946年初进行。这个当然还要取决于是否具备举行这次选举的某些条件。

他们也同意在波兰实行新闻自由，同意外国记者进入波兰，并让他们能够不受检查地发出已的报道。他们向我保证，在全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不仅是让非军事人员回国，而且让在盟军指挥下驻扎在各国的军队返国。我要求波兰人就此发表一个声明，以便使我们确信这些人回国后能得到和其它公民平等的待遇。

下一个问题，特别关系到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而且是波兰政府现在所不能解决的，这就是在华沙、柏林和伦敦之间开辟军用航线，使英国政府能够和自己驻华沙的大使保持经常的联系。我希望立即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提出的建议说，这个地区将由波兰政府管理，不再作为苏联占领区的一部分。按照贝尔纳斯先生的说法，这个地区将由波兰人负责。但我理解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将这个地区交给波兰行政当局管理，但它仍将处于盟国的军事管制之下。

贝尔纳斯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波兰在苏联的同意下实际上在管辖这块领土。鉴于这一点，三大国同意这块领土仍然归波兰管理，以免再对它的地位产生争议。同时，波兰也无须在管制委员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参加。

贝文　我不坚持我的意见。如果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我也不反对。我回国后，会给我提出各种问题，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地区将来情况会是怎样的。是不是波兰人接管整个这个地区，而

苏联军队撤走呢？

斯大林 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红军的交通线，如果不是通过它供应红军部队的给养，那苏军就撤走了。那里有两条路，一条是北面通向柏林的，另一条在克拉科夫南面。这两条路都是苏军给养的运输线。这和在比利时、法国、荷兰的情况一样。

贝文 驻军的数额是不是仅仅限于这些目的？

斯大林 对，就是。对德作战时驻在那里的军队我们已撤走了五分之四。就是剩下的部分，我们也还打算再缩减。至于根据提出的建议要划归波兰的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实际上已由波兰人管辖，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行政机构，那里没有俄国的行政机构。

贝文 你们现在能不能在军用航线问题上帮助我们？我们曾力求就这个问题同波兰政府达成协议，但它现在无法同意。

斯大林 为什么不能同意？

贝文 我的理解是，这个问题涉及到苏军司令部，因为我们要飞经部分俄占区。

斯大林 你们现在已经是经过俄占区飞往柏林嘛。

贝文 你能否同意我们飞到华沙？

斯大林 如果让我们经过法国飞往伦敦，我们就同意这一点。（笑声）另外，还得和波兰人协商。我的设想是这样的：从柏林到华沙之间将开辟航线，根据英、波之间的协议，用英国或者波兰的飞机飞行。至于从这条线到莫斯科之间的航线，那么从苏联边界开始，就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如果苏联人要飞往巴黎和伦敦，显然那里要用英国或者法国的飞机。这样就形成了伦敦—巴黎—莫斯科航线。我是这样设想的。

贝文 当然，整个航线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难以在这里解决。不过我们随时准备讨论伦敦—莫斯科航线这个问题。现在我请你们帮助我们开辟伦敦—华沙航线，这对方便我们的交通是必不可

少的。

斯大林 我理解，我将尽力而为。

贝文 谢谢您。

杜鲁门 波兰问题我们结束了吧？

斯大林 英国代表团同意吗？

贝文 同意。

斯大林 事情就看波兰人了，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件事解决了，很好。

贝文 我们应该把波兰边界的改动通知法国人。

斯大林 可以。

贝尔纳斯 我们的下一个建议，是关于意大利和其它附庸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已经提交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

贝文 英国代表团同意。

斯大林 我们的修正意见说过了。修正案涉及的是新提出的第四条。确切地说是这句话，它的开头是：“三国政府希望……”。我们建议改为：“三国政府不怀疑……”。

（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这一文字上的改动。）

杜鲁门 原来把对德经济原则问题推迟到解决赔偿问题时再说，我认为，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贝尔纳斯 关于经济原则的文件我有两点建议想谈一下，第一是第十三条，这条说的是关于货币和银行体制，集中管理税收和关税的总政策，（宣读修正案，得到通过。）另外，我建议在这条中新加一个关于交通运输的“庚”项。这个也应该集中管理。

斯大林 这就需要德国有一个中央的行政机构。没有一个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很难贯彻对德的总政策。

贝尔纳斯 这是对的。

第二是第十四条中的“丁”项，我建议把最后一句改成这样：

“除非有关占领国认为是为必需的进口所要求的以外，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不得向德国或德国人提供任何资助和贷款。”

贝文　也许把这句话完全删去为好？

贝尔纳斯　同意。我还要指出一点，由于我们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认为，第十八条已经不再成立了。

（斯大林和贝文同意取消这一条。）

贝文　还有一个优先支付进口的问题，昨天我们在外长会议上已经谈过。英国代表团昨天建议在经济原则中加进这样一句话：“支付获准的对德进口货价，首先应该使用现产产品和储备商品的出口所得。”

苏联代表团建议加进下面一句话：“除此以外，与满足其它经济需要相比较，应首先支付赔偿。”英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苏联的这个建议。英国代表团要求通过它的建议。

斯大林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了。

杜鲁门　我正是这样理解的。

贝文　我觉得，这同在进出口等方面把德国当作一个整体的原则是矛盾的。这会把德国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将不可能在诸如税收等问题上把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斯大林　这就需要一个集中的德国行政机构，通过它来向德国居民进行工作。这个问题到“对德政治原则”那部分再讨论。

贝文　原则上我们已同意成立这样一个中央机构，我们只是提出某些修正。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一放，来讨论政治原则，那我们就会看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斯大林和杜鲁门表示同意。

苏联代表团提醒说，在讨论经济原则时，它就鲁尔区问题提出过一项建议。建议中规定：鲁尔工业区应当看作是德国的一部分，对鲁尔区应建立四大国的监督。为此要成立一个由美国、大不列颠、法国

和苏联代表组成的相应的管制委员会。）

贝文 我昨天说过，没有法国人在场，我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且法国人对此十分关注。

斯大林 是不是现在把对鲁尔区建立监督的问题先放一放。可是，鲁尔区仍是德国的一部分这个思想在我们的文件中应该有所体现。

杜鲁门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的一部分。

斯大林 是不是把这一点写到我们的某个文件里去。

贝文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一次会议上，即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提出把鲁尔从德国版图划出去，成立一个独立区，由管制委员会实行监督。德黑兰会议后过了几个月，丘吉尔先生访问莫斯科时，俄国人和英国人在交换意见当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又一次有人表示，最好是把鲁尔省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区。把鲁尔省从德国版图分割出去这个想法是根据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来的。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德国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代表团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同意不同意让鲁尔省仍然留在德国版图之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杜鲁门 我的意见是：鲁尔省现在是德国的一部分，将来也是德国的一部分。

斯大林 最好是在我们的一个文件里写上这一点。英国代表团是否同意鲁尔区仍然留在德国？

贝文 我无法表示同意，因为我不了解上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形。我只知道曾经提出过为削减德国的军事潜力对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的想法，这个想法也曾经讨论过。我同意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鲁尔区仍由管制委员会管理。不过我希望能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同我的政府商量一下，因此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会议，以便有时间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

（斯大林和杜鲁门同意贝文的建议。）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政治原则问题。

贝文　苏联代表团就组织一个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来协助管制委员会进行工作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草案。我们建议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我们的草案，它比较简短，我们建议在一段时间内不建立任何德国的中央政府。

我建议采纳我们简短的草案，不用苏联代表团的草案。

斯大林　可以接受。

杜鲁门　至于经济原则中第19条，我建议交给经济委员会去研究，让他们趁现在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进行讨论。

斯大林　让他们讨论吧。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迁走德国居民的问题。

贝尔纳斯　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除了最后一句话以外，已经完全通过了。最后一句是："同时，上述各项将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政府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并要求它们在有关各国政府没有研究完这个问题之前停止外迁。"我认为最后这一点非常必要，这样，决议才会有效。

斯大林　可是我担心这样的决议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问题在于人们不是说一声撵，就把德人从这些国家一下子撵走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是，人们可以给德国人造成一种处境，使他们最好还是离开这些地区。表面上，捷克人和波兰人可以说，他们不禁止德国人在那里居住，但实际上德国人所处的境遇使他们无法在那里住下去。我担心，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决议，那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效果的。

贝尔纳斯　这一条里说，要求这些政府在管制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暂时停止迁走德国居民。如果这些政府并没有迁走德国人，也不强迫他们离开波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那这个文件当然不会有效果。

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请他们暂时停止这种活动。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正在强迫德国人离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把德国人向其它国家迁移增加了我们的负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同我们合作。

斯大林 波兰人和捷克人会对你们说，他们没有发布过迁走德国人的命令。不过如果你们坚持的话，我可以同意这个建议。我只是担心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杜鲁门 你要是能同意，我们很感谢。也许这个建议改变不了现状，但却使我们有可能向这些政府呼吁。

斯大林 那好，我不反对。

贝文 我们想把这一点通知法国人。

（斯大林和杜鲁门同意。）

斯大林 我们希望能解决德国船舰的问题。

杜鲁门 这个问题今天还没准备好。

斯大林 我们说定明天准备好这个问题吧！

杜鲁门 好，我同意。我本打算明天走，不过我可以留下来。

斯大林 关于德国船舰问题的决议原则上已经通过。但这个决议还没有形成文字。三国政府首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成文。

杜鲁门 委员会明天早上可以汇报。

斯大林 好吧。既然这个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了，是否可以把它交给外长们？

贝文 也许能够达成协议吧。

贝尔纳斯 据我了解，这个委员会想要在今天达成协议，会谈定在今天晚上。

斯大林 原则上已经决定，除潜艇外（潜艇大部分将要沉掉），把三分之一的军舰和三分之一的商船交给苏联。我请求这个问题不要拖，明天把它解决吧。

（杜鲁门和艾德礼表示同意。）

杜鲁门　合众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关于修改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的文件。

贝尔纳斯　我们提出了有关执行雅尔塔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提案，并且得到了讨论。我们未能就提案的某些部分达成协议。不过，已就有关修改驻三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的两条达成了协议。、

第一条是：

“三国政府注意到，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已把关于在欧洲战事已经停止的现在改进各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建议，通知给他们的联合王国和合众国的同事。这项建议明确表示了三方代表定期经常会晤、改善英美代表工作条件和预先共同研究各种指令的愿望。”

第二条是：

“三国政府同意现在开始对驻这些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进行修改，并以上述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要考虑到曾向有关国家共同提出过停战条件的三国政府的利益和责任。”

我们要求研究这两条，现将题为“关于修改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的问题”的文件交给你们，文件上写的日期是1945年7月31日。

斯大林　这个问题议程上没有。可能我们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不会反对。

贝尔纳斯　这个问题可以在明天研究。

斯大林　好吧，明天研究。

杜鲁门　下一个问题是南斯拉夫问题。英国人有个提议。

斯大林　我们刚刚散发了一个关于希腊问题的草案。至于南斯拉夫，我们昨天就提交了一个有关特里雅斯特港和伊斯特利亚半岛的草案。

贝文 我觉得，我们就南斯拉夫问题提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另外，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建议。我提议这三个建议都不讨论。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战犯问题。

（**苏联代表团**说，它准备采纳英国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草案作为基础，但要作一个小小的修正。它建议，在这个草案的最后一句话，即“三国政府认为尽快开始对主要罪犯的审讯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中，在“主要罪犯”之后加上“如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罗森堡、凯特尔等人”。）

艾德礼 在确定提出哪些战争罪犯方面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向检察长提出了协议草案，但他很可能会加进许多其它的人。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维持我们原来的提法，不点主要罪犯的名。

斯大林 我们建议作的修改不是说只有这些人必须审讯，但我们建议要审讯如里宾特洛甫之类的人。不能再回避某些臭名昭著的主要战犯的名字了。关于战犯问题已经议论得很多了，各国人民期待着我们点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不点出这些人会损害我们的威信，我敢担保。所以，我们要是点出一些人，在政治上将得到好处，欧洲的舆论也会感到满意。如果我们作为举例点出这些人的名字，那我想检察长也不会不满的。检察长可以说某些人点的不对，但他没有理由会不高兴。要是我们点出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在政治上他们只会得到好处。

贝尔纳斯 昨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过不宜点出具体的人名或者试图在这里给他们定罪。每一个国家在纳粹罪犯中都有自己的“偏爱”。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罪犯列到名单里去，那我们将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包括他们。

斯大林 但建议中不是这么说的吗，如某某某等人，这样并没有限制数量，却使问题很清楚。

贝尔纳斯 这样就优待了你点的人啰。（笑声）

艾德礼　我不认为列举人名就会使我们的文件增加份量。比如，我认为希特勒还活着，可我们的名单中没有他。

斯大林　但他不在我们手里呀。

艾德礼　可你是要以主要罪犯举例嘛。

斯大林　我同意加上希特勒，（全场笑声）尽管他不在我们手里。我作这个让步。（全场笑声）

艾德礼　我认为，全世界都清楚谁是主要罪犯。

斯大林　可是你看吧，人们会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看成是我们打算放过主要罪犯，准备用一些小战犯搪塞，而放过主要战犯。

贝尔纳斯　今天我给杰克逊法官——我们的最高法院院长——打了电话。他是正在伦敦开会的战犯问题委员会的我方代表。他表示希望，也许今天或者明天早上能就国际法庭的问题达成协议。杰克逊法官准备明天早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关于建立国际法庭的情况。成立国际法庭的消息对于希望尽快审判战犯的各国人民来说将是一个喜讯。

斯大林　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贝尔纳斯　不过我们可以把伦敦这项协议写进我们的声明里。这会使我们的声明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　不把德国战犯中某些民愤极大的人点出来，我们的声明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影响。我同俄国的法律专家们讨论过，他们认为，最好是列举一些人作为依据。

杜鲁门　我想提个建议。我们正等待明天早上我们在伦敦的代表发来的报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明天？

斯大林　好吧。

杜鲁门　我对内水航运问题十分关心。最好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作出某些原则性的决定。7 月 23 日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把它交给了一个委员会。据我所知，这个委员会一次会也没开过。我非常希望这些航道的使用问题能得到某种明确的解决，因为这些航道的通航

自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一项有关利用这些内水航道的总政策会起重要的作用。很可能我们无法就这个问题的细节达成协议，但我认为，这个问题甚为重要，值得讨论一下。

艾德礼　我基本上同意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

斯大林　这个问题是由曾经在这里提出过的黑海海峡问题引起的。黑海海峡问题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后来被搁置了。内水航运问题在这里是附带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乎意料的，我们手头没有相应的材料。这是一个新问题，需要有通晓这些事情的人。或许在会议结束前能够有所作为，不过也很难指望。

杜鲁门　我提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伦敦外长会议，在这之前可以收集一切必要的材料并进行研究。

（斯大林和艾德礼同意。）

杜鲁门　我可以把我们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告诉在这里的波兰政府的代表吗？

斯大林　可以。

杜鲁门　委派谁去通知呢？

斯大林　可以委托外长们去或者发一个书面通知。还可以请总统做这件事，因为他主持我们的会议。

杜鲁门　好吧。我想告诉大家，公报起草委员会工作得很好。

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开会？4点？

斯大林　我想，我们得开两次会：第一次让我们定在3点，第二次在晚上8点。这将是最后一次会议。

〔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1945年8月1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15点30分
结束：当地时间17点5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艾德礼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贝文	外交人民委员
戴维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波伦	伯尔斯少校	维辛斯基
科恩		戈伦斯基
汤普森		马伊斯基

杜鲁门　今天由贝尔纳斯先生报告外长会议情况。

贝尔纳斯　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委员会报告说，他们没能就关于赔偿问题的协议草案中所有的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和大不列颠代表认为，苏联代表为获得协议草案第四条商定的向苏联提供基本设备的百分比，作为交换，已同意放弃自己对德国国外资产、缴获的德国黄金和西方占领区内企业股票的要求。因此，美国和英国代表认为，德国的国外资产应用来赔偿除苏联以外的其它国家而列入第三条。他们声明，不这样办，第四条中规定的工业设备的百分比，美国和英国代表将不能接受。

苏联代表认为，关于苏联放弃对德国国外资产、黄金和股票的要求，这一点还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所以，苏联代表不同意把德国国

外资产列入第三条，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政府首脑解决。

美国和英国代表声明，关于赔偿问题的协议草案，只有苏联代表同意上述处理德国国外资产、黄金和股票的办法，他们才能接受。苏联代表表示，他不能同意美国和英国代表这样提出问题。

问题在于能不能认为，当昨天苏联代表声明他不再坚持要给苏联百分之三十的德国黄金、国外资产和股票时，“三巨头”已经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 如何理解你们建议中说的苏联不对工业股票提出要求？这只是指西部占领区吗？

杜鲁门 我认为，当外长们谈到西部占领区时，他们指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区。

斯大林 能否达成这样的协议：苏联代表团放弃对黄金的要求；至于西部占领区中德国企业的股票，我们也不要，并且承认，凡属德国西部占领区的归你们，而属于东德的归我们。

杜鲁门 这个建议需要讨论。

斯大林 关于德国的投资，我想建议这样办，德国在东欧的投资留给我们，余下的都给你们。

杜鲁门 是仅指德国在欧洲的投资，还是也包括在其它国家的投资？

斯大林 我再说具体些：德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投资归我们，剩下所有的都归你们。

贝文 德国在其它国家的投资都给我们？

斯大林 在所有其它国家，在南美、在加拿大等国都是你们的。

贝文 那么，在德国各占领区以西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资产将属于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这也包括在希腊的投资吗？

斯大林 是的。

贝尔纳斯 这是否适用于德国企业的股票？

斯大林 在我方占领区的股票归我们，在你们占领区的归你们，不是有西部和东部两个占领区嘛。

贝尔纳斯 我们理解你昨天提出的建议是这样，你们对西部占领区的股票将不提出要求。

斯大林 不提。

贝尔纳斯 那你们的第二个建议，关于国外投资的建议，也撤销吗？

斯大林 这里情况有些不同。

贝文 昨天我们研究赔偿问题时，我理解苏联代表团的意思是，它已放弃对德国国外投资的要求。

斯大林 我当时认为，东部占领区的投资要留给我们。我们谈到放弃对投资的要求时，指的是西部占领区。我们放弃在西欧和所有其它国家中的投资。人所共知，德国在西欧和美洲的投资要比在东方的多得多。我们本来希望得到这笔投资的30%，但后来放弃了这一点。不过你们得放弃对于在东欧投资的要求。

贝文 我应该说明，我在同意大元帅的建议时，是把这个建议理解为，苏联代表团放弃对德国一切国外投资的要求。

斯大林 但不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

贝尔纳斯 这一点清楚了。我想明确一下德国国内的工业或运输企业的股票问题。譬如说，假使这种企业的管理机关设在柏林，而企业本身和它的全部财产在西部占领区或者在美国，那你们是否将对这些企业提出要求呢？

斯大林 如果企业在西方，我们将不提任何要求。管理机关可能在柏林，但问题不在于此，要看企业本身在什么地方。

贝尔纳斯 如果一个企业不是在东欧，而是在西欧或在其它洲，那么这个企业也将归我们？

斯大林 不管在美国，在挪威，在瑞士，在瑞典，在阿根廷（全

体笑声）等等，都是你们的。

贝文 我想问一问大元帅，他是否准备对俄军占领区之外的所有德国国外股票放弃要求？

斯大林 准备放弃。

贝尔纳斯 黄金呢？

斯大林 我们已经撤销了我们对黄金的要求。

贝尔纳斯 有的德国资产是在其它国家，在这一点上应该如何理解苏联的建议？

斯大林 我们只要在东部占领区的那些资产。

贝尔纳斯 我认为，我们要做到互相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贝文先生问的是，俄国人对于股票的要求是不是仅仅限于俄国军队占领的区域。我希望你们能同意贝文先生的观点。

斯大林 我们同意。

贝尔纳斯 几分钟前你谈到了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资产问题，我想现在彻底弄清楚，好使以后不产生任何误解，你们的建议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对你方占领区以外的资产不提出任何要求？你们只是要得到苏占区的资产？

斯大林 是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包括在内，南斯拉夫不包括在内，奥地利东部包括在内。

贝文 显然，这个占领区内属于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资产不会受到触犯吧。

斯大林 当然，我们并没有同英国和美国打仗。（全体笑声）

贝文 但是这些资产在战争期间可能被德国人抢占了。

斯大林 这要对每个具体情况进行研究。

杜鲁门 我认为，我们昨天已经同意满足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要求。但如果他们不对在他们领土上的德国资产提出要求，那怎么办？

斯大林 我们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西奥地利的资产不会提出要求。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决定写到议定书里去？

贝尔纳斯 我想，为了不产生任何误解，最好这样做。

斯大林 好。

贝尔纳斯 或许可以把它公布出来？

斯大林 怎样都行。随你们的便。

贝尔纳斯 我想请你们注意赔偿问题委员会报告中第3条里的一句话，即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有权取得赔偿的国家，其赔偿要求将从西部占领区以及德国的国外资产中给予满足。既然我们现在达成了协议，我想，我们对于这个提法不会有任何分歧了。

斯大林 我建议这样提：“以及相应的德国国外资产中”。议定书中的提法可以这样明确起来。

贝尔纳斯 我们让加工委员会来加工这项建议吧。

斯大林 我不反对。

艾德礼 我有两个问题想在这里提出来。第一，由大不列颠、苏联、美国三国政府邀请法国政府从今天起参加赔偿问题委员会。

斯大林 我们把波兰也请来吧，它受了很大的损失。

艾德礼 照我理解，我们已同意邀请法国了。

斯大林 可是为什么不可以邀请波兰？

杜鲁门 昨天您同意，由苏联负责满足波兰的赔偿要求，我们方面则承担义务满足法国和其它国家的赔偿要求。让法国加入这个委员会，我看会引起一些混乱。

斯大林 艾德礼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艾德礼 我希望能这样。

斯大林 那好吧，我不反对。

艾德礼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要英军和美军司令部从7月15日开始，在30天内向柏林的英、美占领区每月提

供四万吨粮食，每天提供二千四百吨煤。应该委托管制委员会立刻制定今后六个月内大柏林区的粮食、煤和其它燃料的供应计划。上述数量的物资应由苏联政府根据赔偿问题协议第四条“甲”项作为预付物资向大柏林区供应。这是保证目前需要的实际措施。

斯大林 这个问题没有准备，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管制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困难。我认为，应该预先了解管制委员会的意见，看他们准备怎样满足居民的需要，在供应方面他们有什么计划。

艾德礼 照我的理解，由鲁尔区提供基本设备的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并且我觉得，向大柏林提供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也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做。当然，数量可以由管制委员会来定。

斯大林 协议当然应该有，不过更要定出一个数目。可正是这一点，如果管制委员会不报告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计划，那么我们现在是无法做到的。我应该指出，这个问题由管制委员会处理，比我们在这儿决定要好些，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实际。

艾德礼 这恰恰是我所要求的。我要求由管制委员会制定一个计划，但我们在这里应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斯大林 我不了解这件事的情况。没有可靠的材料，我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不能凭空想出数字来，数字要有根据才行。

艾德礼 我没有要求提出数字。在备忘录里我要求管制委员会制定这方面的计划，

斯大林 每月四万吨粮食，每天二千四百吨煤，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根据？

艾德礼 这些数字是协商同意的，并且实际上已按这个数目在供应。

斯大林 这我不知道。

贝文 问题在于有一个按月向柏林提供物资的临时协议。

斯大林 谁同意了这个？

贝文 在管制委员会中签订过一个关于提供物资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英国和美国当局承担义务，在一个月内按这个数字向柏林提供物资，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建议管制委员会在原则上制定一个必要的计划，并由苏联当局在这一个月期满后开始按上述数量提供物资，等这个月结束时，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由谁继续提供粮食和燃料。

斯大林 应该问问管制委员会，听听他们的意见，那时才能作出决定。

艾德礼 我理解你们是想从现在就开始由鲁尔区提供基本设备。我们要求你们在提供粮食和燃料方面也这样做。

斯大林 这个我明白。但我想知道管制委员会有什么考虑，然后加以讨论，并作出决定。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推迟解决。

贝文 我们希望共同研究。

斯大林 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那怎么办呢？

贝文 那就只得推迟了。

斯大林 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

贝文 我们只是希望相互间能达成协议，以便互相帮助。

斯大林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准备，我没有能同管制委员会商量，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

杜鲁门 看来，赔偿问题上的所有分歧我们都解决了吧？

艾德礼 我理解大元帅的意思是，对奥地利我们将不提出赔偿要求。这点是不是应该写进议定书里？

斯大林 可以写进议定书。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是对德经济原则问题。美国和英国代表建议，在关于经济原则的文件中加进一个关于德国海外资产的条款。这该是第十八条。内容是：“管制委员会应采取适当步骤，实行管制和处理尚未在参加对德作战的联合国家控制下的德国国外资产。”

斯大林 这是修正意见，还是新的建议？

贝尔纳斯 这是经济问题委员会的意见。它建议把这一条加到对德经济原则的文件中去。

斯大林 这一条在有关赔偿问题的决议通过之后，是否还需要修改？我们是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以后才听说这一条的。

贝尔纳斯 经济问题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直到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还没放弃这一立场。这个问题是一个实行管制的问题。

斯大林 我不反对。

杜鲁门 谢谢。

贝尔纳斯 对于经济原则第十九条，即德国支付进口的问题，委员会尚未达成协议。此外苏联代表声明，它暂时没有准备好进一步讨论向西欧供应石油的问题。

斯大林 我们不反对第十九条中英国的提法。

贝尔纳斯 我的理解是，英国代表同意美国代表所说的，如果要通过第十九条，就应该加进美国代表提出的一句话，即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德国赔偿问题协议第四条“甲”和“乙”中所提及的设备与产品。我们认为，这个补充是根据我们昨天达成的赔偿问题协议而来的。

斯大林 好吧。

艾德礼 我同意。

贝尔纳斯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关于经济原则草案的所有分歧。

下一个问题——战犯问题。

贝文 请原谅。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经济原则通知给法国人。

斯大林 可以。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是战犯问题。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要不要点出一些最大的德国战犯。在今天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和英国代表认为不必点这些人的名，应该把这个权力授予检查长。他们还一致同

意，应该通过英国的文本。苏联代表表示，他们可以同意英国的草案，但有一个条件，要加进几个人名。

斯大林 点名依我看是需要的。这样做对社会舆论是需要的。要使人们知道这个。我们要不要审判一些德国的工厂主？我想是要的。我们提出克虏伯。如果克虏伯不合适，那再点别人。

杜鲁门 这些人我全都不喜欢，（笑声）我认为，如果我们点出一些人，而不点另一些人，那人们就会以为我们不打算对另一些人起诉。

斯大林 可是，这里点名是作为举例的。比如说，奇怪得很，为什么赫斯至今仍在英国养尊处优，逍遥法外呢？应该点这些人的名，这对社会舆论，对各国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

贝文 赫斯的事，你可以不必担心。

斯大林 问题不在于我的意见如何，而在于社会舆论，在于遭受过德国占领的各国人民的舆论。

贝文 在赫斯问题上你如果有什么疑虑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他将被送交法庭。

斯大林 我不要求贝文先生作任何保证。只消他说一声，我就毫不怀疑一定会这样做的。但问题不在于我，问题在于各国人民，在于社会舆论。

杜鲁门 你们知道，我们已委派杰克逊法官为伦敦委员会的我方代表。他是一个杰出的法官，并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学家。他对法律程序十分熟悉。杰克逊反对点战犯的名，说这样做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他保证在三十天内准备好起诉工作，所以，可以不必担心我们对这些人的看法。

斯大林 要不然少点几个人，比如说三个。

贝文 我们的法律专家们和美国法学家观点一样。

斯大林 可是我们的法学家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是不是可以商

定，在不迟于一个月的期限内公布第一批要起诉的德国战犯名单。

（杜鲁门、艾德礼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是把盟国的财产作为附属国支付的赔偿还是作为战利品的问题。昨天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在今天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要求能够让它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建议。

（**苏联代表团**说，由于今天两次会议之间实际上没有休息，所以它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建议的措辞。它指出，它觉得这个建议实质上是正确的，可以接受，但是需要研究一下它的措辞。）

贝尔纳斯　我准备推迟到晚上讨论。

艾德礼　我建议，今天晚上会议讨论的问题应尽量少一些。

贝尔纳斯　下一个问题——向欧洲供应石油的问题。这个问题经济委员会现在正在研究。

下一个问题，关于白俄侨民和其它反苏分子及组织在德国的美英占领区和奥地利进行反苏活动的问题。英美代表表示，他们将调查苏联有关文件中指出的情况和事实，并迅速将调查结果通知苏联，然后他们准备研究措施制止这种行动。

苏联代表团提请注意他们已向英美代表团提交的关于遣返苏联公民的备忘录，英国代表表示，他们将澄清苏联文件中提到的情况，并于返回伦敦之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苏联代表就这个问题又提交了一份新的文件，并且强调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美国和英国代表表示，他们将尽快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外长们讨论了会议议定书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在四个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但部长们却就这些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还商定，议定书只包括重要决议，他们指示议定书起草委员会说，议定书还应包括会议新通过的决议。

下一个问题，关于修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问题。已经通过了美国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草案，但

是其中第二句话删掉了，决定改用苏联代表给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美英代表的信里列举的第三、第四、第五条。这个问题交到了加工委员会，经过讨论后这个委员会向我们建议采用如下的措辞："三国政府注意到，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已把关于在欧洲战事已经停止的现在改进各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建议通知给他们的联合王国和合众国的同事。

三国政府同意现在开始对驻这些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进行修改，修改时应考虑到曾向有关国家共同提出过停战条件的三国政府的利益和责任，并且以苏联政府为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作为修改所有三国中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的基础。"

我们是不是就这样通过加工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 我不反对。

杜鲁门 我今天接见了波兰总统和波兰临时政府的四名成员。我把关于波兰的决议通知了他们，并且把决议副本交给了他们。在这些决议见报以前，他们不会就此表态。他们以波兰政府的名义要求我向参加本次会议的三国政府表示感谢。

贝文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昨天谈到的开辟伦敦—华沙航线的困难已经解决，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和波兰人谈妥了。

贝尔纳斯 在外长会议上，我建议在关于波兰问题和接纳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文件中，在谈到应该向盟国报界代表提供方便的地方加上一句"以及电台的代表"。

斯大林 没有必要这样做。

艾德礼 我也认为这不大合适。

杜鲁门 在美国，电台的地位和在其它国家，比如英国，是不一样的。英国的电台是由政府控制的。可是在美国，电台和报纸的地位一样。我们希望，电台的代表也能够得到和报刊记者相同的权利。

斯大林 没有必要。

杜鲁门 美国电台的代表将和报社记者一样活动，只不过他们把报道发给美国电台。

斯大林 我不主张这样做。而且，要和波兰人协商。

贝文 那你不会反对和有关政府进行协商吧？

斯大林 不，为什么要反对呢？

杜鲁门 这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斯大林 好吧，不过，这一点我们决定不要写进去了。

杜鲁门 行，我同意。

贝尔纳斯 下面一个问题——关于德国的军舰和商船问题。

杜鲁门 据我理解，我们同意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并且准备批准已经拟好的决议。

斯大林 对，是这样的。

贝尔纳斯 我们还一致同意这个决议的全文晚一些时候公布。

贝文 总统先生，我草拟了一项关于波兰等国应得到的份额的条款，我觉得，这一条我们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它的内容是“联合王国和合众国将从自己所得的德国投降商船的份额中提出适当数量转给在对德共同作战中商业航运遭受重大损失的其它盟国，但不包括波兰。苏联将从自己所得份额中提出部分船舶转给波兰”。

斯大林 我没有异议。

杜鲁门 我同意。

艾德礼 在体会以前，我想了解一下，政府首脑们是否觉得应该给丘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发封电报，对他们参加了我们这次会议的前一部分和以前的几次会议表示感谢？

斯大林 这样做是应该的。

杜鲁门 我同意。

（休息以后）

贝尔纳斯 我们提出的关于盟国财产作为附庸国支付的赔偿或者

作为战利品的文件，你们来得及研究了吗？

斯大林 我不认为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实质上会有什么困难。但在措词方面我得和人商量一下。

艾德礼 我认为，对这个文件需要作些研究。因为不是其中所有条款都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贝尔纳斯 这个草案什么地方不能接受？

艾德礼 如果盟国把原属于它们的财产从附庸国取走作为战利品，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附庸国理应赔偿作为财产所有国的盟国。但是如果这些财产被第三方拿走，那就产生一个问题，第三方是否应该为这些财产向盟国付款，或者是我们应该强迫附庸国为这些财产付款。另外，我认为关于货币问题的第三条也需要讨论。我觉得所有这些都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杜鲁门 好吧。

现在我们是否研究一下公报？

斯大林 委员会起草公报还没有完全结束。

艾德礼 我建议让议定书起草委员会和公报起草委员会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散会。等这两个委员会一结束工作，我们马上会晤。什么时候会晤可以通过电话协商。最好是由政府首脑来研究公报，让外长们去研究议定书。

斯大林 最好能确定一下开会的时间——八点半或者九点。规定一个时间是为了督促一下委员会，这样他们会加把劲。

杜鲁门 我看休息三个小时可以了。

贝尔纳斯 总统还提出过一个关于内水航运的建议。议定书起草委员会和公报起草委员会暂时还没能就总统的建议达成一致的决议。

杜鲁门 这个问题交给伦敦的外长会议去研究。不过我希望在公报中宣布这一点。我要求在公报里提一下这个问题。

斯大林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呀。

杜鲁门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三次，而且委员会讨论了好几天。

斯大林 议程上没有它，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也没有任何材料，我们这方面的专家都在莫斯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要仓促从事呢？

杜鲁门 这个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而是交给伦敦的外长会议去研究。

斯大林 黑海海峡问题在公报中也不准备提嘛，尽管议程包括了这个问题。内水航道问题是谈到海峡问题时附带提出来的。为什么对内水航道问题比对海峡问题那么偏重，我不明白。

杜鲁门 黑海海峡问题在公报中，在议定书中都要提到。

斯大林 我认为没有必要写入公报，只要写到议定书里就够了。

我建议在公报中既不提海峡问题，也不提内水航道问题，而把这两个问题都写到议定书里去。

杜鲁门 好吧，我不反对。

贝文 我建议，我们应邀请法国附议我们关于战犯问题的决定，法国是伦敦外长会议的成员。

斯大林 好吧。

杜鲁门 我不反对。

我还是不大理解，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决议，已经写进了议定书，为什么却不能放到公报里呢？

斯大林 没有必要这样做。公报本来就已经很长了。

杜鲁门 我想提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有没有秘密协定？

斯大林 没有。都不是秘密协定。

贝尔纳斯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已经决定让外长会议研究内水航道的问题。这样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有没有权力宣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呢？如果这点不写进公报，而只写进议定书，那我们能否正式向外长会议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 应当看一看克里米亚会议或者德黑兰会议的材料。在德黑兰会议上，有一系列问题写进了议定书。但另外有些决议是大家都关心的，并且是决定我们在基本问题上的政策的，这些决议写进了公报。

再谈一谈克里米亚会议的工作。在那里也有两类决议。第一类决议——数量很大——列入了议定书，谁也没有要求把这些写到公报里面去。另一类决议——要少得多——写进了公报。这是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些决议。我认为应该坚持这个好作法，因为，不然的话，就不成其为公报，而成了流水账。

有一部分决议没有重要意义。有些问题，象内水航道这样的问题甚至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就应该放到议定书里。谁也不能责怪我们，说我们隐瞒了这些问题。可是德国问题、意大利问题、赔偿问题等等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又当别论了，应当写入公报。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破坏这个好传统，所以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写进公报。公报是公报，议定书是议定书，

杜鲁门 如果对我们的所有决议都这样处理，那我不反对这个程序。不过，要是我不得不对国会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交给外长会议去研究了，我有这样做的权力吗？

斯大林 谁也不能侵犯你的权利。

杜鲁门宣布闭会。

第十三次（最后一次）会议

1945年8月1日

会议地点：波茨坦塞西莉宫

开始：当地时间22点30分或22点40分

结束：当地时间零点30分

参加者：

美国	大不列颠	苏联
杜鲁门总统	艾德礼首相	斯大林元帅
国务卿贝尔纳斯	外交大臣贝文	外交人民委员
戴维斯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莫洛托夫
波伦	伯尔斯少校	维辛斯基
布朗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	戈伦斯基
科恩	克尔爵士	马伊斯基

杜鲁门宣布开会。

贝尔纳斯　经济问题委员会准备好了关于赔偿问题的报告，拟出了一份为所有代表团都能接受的建议。其中第一条说，苏联的赔偿要求应由德国的苏占区和相应的德国在国外的投资予以满足。

我请大家注意这个文件的第八条和第九条。我很不愿意现在就提出修改，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第八条是“苏联政府不对德国企业的股票提出任何要求”等等。我提议在“要求”前加上“赔偿”两个字。提出这个修正的目的是避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除了赔偿外，苏联对德国企业还有什么要求。第九条讲到美国和英国的要求，也应作同样的修改。

斯大林　对。

贝尔纳斯　这是我唯一的修改意见。是否可以认为关于赔偿问题的文件大家都同意了？

贝文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比如1939年以前，德国人为了战争目的占用了原属英籍公民的工厂。这样一改，碰到这种情况英国人就要失去自己的财产。

贝尔纳斯　遇到贝文先生说的那种情况，这项修正不起作用。

贝文　那我不反对。

贝尔纳斯　如果苏联代表团已经研究好了的话，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把盟国财产用作支付赔偿或者作为战利品的问题。

斯大林　我们没来得及研究这个草案的文字。我提议写上这样的决定："会议决定在原则上采纳美国建议。建议的文字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审订。"

我们来不及很好地考虑措词，但就实质内容来讲，我们同意这项建议。

杜鲁门　我同意苏联代表团的建议。

艾德礼　我也同意。

贝尔纳斯　我得到通知，议定书起草委员会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议定书全部都读一通，只读读那些原来有点分歧的条款。当然，这里应该加进我们刚刚通过的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利品问题的建议。我没有其他的修改意见了。

斯大林　我有个修正案。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第二段中讲到，边界线应从波罗的海起，通过施维纳明德。似乎边界线是通过城市本身。所以，我提议改成：边界线从波罗的海起，在施维纳明德稍西或以西不远处通过。这在地图上已经画出来了。

（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施维纳明德稍西"的提法。）

斯大林　第二个修正是关于科尼斯堡的省界问翹。第二段中说，边界应由专家们勘定。我提议改为：并且由苏联和波兰专家勘定实地

边界线。

贝文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只交给苏联和波兰去解决。

斯大林 可那是波兰和俄国之间的边界。

贝文 但是这必须得到联合国家的承认。我们曾同意在和会上我们将支持苏联关于这条边界的要求，可现在你却说，这条边界由苏联和波兰来定，与我们无关。

斯大林 这是误会。总的边界线由和会确定，但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实地边界线。先确定一条总的边界，但实地的边界可能比设想的边界要偏向这边或那边半公里或者少一些。例如边界线通过村庄，何必要用一条边界线把一个村子切开呢？确定实地边界只同波兰和俄国有关。如果你认为这样不十分可靠，那你还想让谁参加委员会呢？由英国出人，还是美国出人？谁参加都可以，我们不反对。

艾德礼 我觉得，问题是在这里。我们同意原则上接受关于边界问题的建议。至于最后划分领土和确切地定界，这是和会的事。如果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交给波兰和苏联的专家们去解决，那我们就破坏了和会的技术工作。

斯大林 贝文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贝文 我希望由和会指定一个专家委员会。

斯大林 我不明白问题在什么地方。

贝尔纳斯 我想，可否用这样的提法：如果在召开和会的时候波兰和苏联能在边界问题上观点一致，那这件事就此完结，不需要任何专家了。但如果和会期间，波兰和俄国之间出现分歧，则应指定一个专家委员会。它的成员由外长会议或者和会自己来确定。不过，只是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发生分歧时才这样做。

斯大林 仍然保留原来的提法吧。不过那里没有说明委员会应由哪些专家组成。

（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保留原来的提法。

然后，**苏联代表团**对关于签订和约和接纳进入联合国的部分提出一项修正案。苏联代表团指出，这个文件的第一段和第三段有矛盾。第一段说，三国政府表示希望，在签订和约以后应结束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状况。可同时在第三段中却规定，在签订和约以前，有可能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代表团建议从第一段中取消“在签订和约以后”这一句话。）

艾德礼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我们草拟第三段的时候指的是“在可能的限度内”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从第一段删去“在签订和约以后”这句话，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原来的设想走的更远。这句话应该保留。

斯大林　可是第一段中说只有在签订和约后才能恢复外交关系，而第三段中却是另外的提法，这里有矛盾。

艾德礼　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希望加进这句括，第一段中规定的是必须采取的行动，就是在签订和约后建立外交关系。第三段则是建议我们在签订和约以前尽可能地这样去做。

斯大林　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因为第三段中允许的尝试建立外交关系，直接就被第一段给否定了。这一点改变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怎么能同意这个呢？

艾德礼　我觉得这没有矛盾：第一种情况讲的是建立正常的关系，也就是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第二种情况指的是作出努力尽可能接近于建立这种关系。

斯大林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解释。我举个具体例子——芬兰。没有任何理由再反对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了，可是第一段中的“在签订和约以后”这句话，就干脆禁止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根本不对的。

艾德礼　我们和芬兰还处于战争状态。

斯大林 同意大利的战争状况也没有结束，然而美国却同意大利有外交关系。我们同它也有外交关系。

艾德礼 我觉得我们现在又回到几天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上了。我们已充分地解释了我们的观点，并在我们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支持了苏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我们不可能走的再远了。

斯大林 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芬兰比意大利更有权利要求建立外交关系。芬兰有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早就停止了对盟国的战争，并且对德宣战了。意大利却没有自由选举的政府，并且它在投降之后参加对德作战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迟迟不与芬兰建立外交关系呢？这合乎逻辑吗？

贝文 我希望能达成协议，所以提出下述建议。我建议，第一段采取这样的提法：“三国政府表示希望，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状况应通过缔结和约予以结束。他们相信，其他有关的盟国政府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斯大林 好。苏联代表团没有修改意见了。

贝文 乌拉！（全场笑声）

贝尔纳斯 下一个是公报问题。我们收到了英国代表团引言部分的新的文本。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斯大林 出入很大吗？差别在哪儿？

贝尔纳斯 第二页上有一处作了纯属文字上的改动，内容没有变。

斯大林 可不可以这样：等译成俄文后，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改动，现在让我们先研究下一部分。

（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

贝尔纳斯 第二部分——关于建立外长会议。对这部分没有分歧。

（通过第二部分。）

贝尔纳斯 第三部分——关于德国问题。第一段中的“热烈欢

呼”几个字有人反对。

斯大林 可以改成：“公开表示赞同”。

贝文 盲目的服从，也就是愚蠢的服从。

斯大林 我提议改成：“在他们得势时，他公开表示赞同，并且盲目服从……”。

（建议被采纳。）

贝尔纳斯 没有其他修改意见了吧？

斯大林 没有。

贝文 经济原则第十二条中有同政治原则第九条（丁）重复的地方。

斯大林 我建议在经济原则中删掉这个词，在政治原则中保留这个词。（大家同意）其它我没有要修改的了。

贝尔纳斯 第四部分——关于德国赔偿问题。没有修改意见。

第五部分——关于德国军舰和商船问题。

斯大林 已经有了协商一致的决议，我们没有要改的。

贝尔纳斯 第六部分——关于科尼斯堡及附近地区问题。

斯大林 同意。

贝尔纳斯 第七部分——战犯问题。

斯大林 我认为第一段引言应该删去，只留下第二段。即从“三国政府注意到”等开始。

贝文 我们已经删掉了。

斯大林 好。

贝尔纳斯 第八部分——关于奥地利问题。

（**苏联代表团**建议在奥地利问题部分删去最后一句关于赔偿的话，把它放在议定书里。）

杜鲁门 我们采纳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公报里删去这最后一句。

贝尔纳斯 第九部分——关于波兰问题。

斯大林 没有要改的。

贝文 我想提出一个小小的文字上的改动，把第二段中“他们的立场确定如下”改成“他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是”。

斯大林 可以。

贝文 还是波兰问题的第二页上，我希望把开始的一句话“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改成“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他们确认下述立场”。

杜鲁门 我已经通知波兰政府的代表，说我们同意了原来的提法。

斯大林 那最好还是保留原来的提法。

贝文 大元帅建议改成“在施维纳明德稍西”，我看非常恰当。

斯大林 是呀，这样说比较好。讨论第十部分吧。

贝文 这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改动，主要是心理上的。我想第十部分的开头这样写：“会议同意就欧洲战争胜利结束后尽快创造持久和平条约的总政策声明如下。”这样听起来好些。

斯大林 这个提法实际上和原来的一样，没有什么新东西。

杜鲁门 两个提法都可以接受。

贝文 按照英文，这样读起来好些。可能在美国话里这要差些吧？（笑声）

杜鲁门 两个提法都可以接受。

斯大林 原来提法的含意和贝文先生讲的一样，不过说得简短些。当然，采用哪个提法都可以。

贝文 这一回你们采纳我们的措词吧。（笑声）

斯大林 如果贝文先生坚持的话，好吧，可以采纳他的提法。

杜鲁门 我同意。第十二部分——关于修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问题。

斯大林 这已经协商通过了。

杜鲁门 第十三都分——关于遣返德国居民问题。

斯大林 这里的提法就比较好了：“有秩序的遣返”。

杜鲁门 关于军事会谈问题。

斯大林 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反对把这个问题写入公报。

贝文 对于第十二部分——关于修改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问题，英国代表团有一个问题。最后三行说“并且以苏联政府为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作为修改所有三国中管制委员会工作程序的基础。”但我们没有说明这些建议指的是什么。所以可以改成：“以协商一致的建议为基础。”

斯大林 可以同意。公报最后由谁来签署呢？

杜鲁门 大家都签字。

斯大林 好。

杜鲁门 让我们回过来看看公报的引言部分。

斯大林 我们不反对。

贝文 我们希望星期五早上能在报上发表公报。

斯大林 电台什么时候可以广播？

贝文 星期四晚上，格林威治时间 9 点 30 分。

斯大林 好吧。

贝尔纳斯 关于鲁尔省问题，议定书的俄文本中说，会议研究了苏联提出的关于鲁尔工业省的建议。这个问题已决定交给伦敦外长会议讨论。议定书的英文本中没有提到鲁尔省。我以为，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但总统说，这是根据他的建议通过的。因此，我提议澄清一下提法。这里一点也没说明要交给伦敦外长会议审议的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内容是什么。

斯大林 这个问题我看应该删去。

杜鲁门 好。

斯大林 （看了给丘吉尔和艾登的致意电文之后）我对于拟就的

电文没有意见。

艾德礼　我建议，英文的电报稿由总统和大元帅签字。

斯大林　总统是不是以会议主席的身分第一个签署？

艾德礼　三个人的名字都签在这里。

（三国政府首签署电文。）

贝尔纳斯　我认为，应该指定代表校订议定书的文本。

（指定代表组成加工议定书的委员会。）

杜鲁门　我宣布柏林会议现在结束。下次再见，我想会很快的。

斯大林　但愿如此。

艾德礼　总统先生，在我们即将分别之际，我想对于大元帅为我们在这里逗留和工作方便所提供的良好条件表示我们的感谢。对您，总统先生，如此卓越地主持了我们这次会议表示感谢。

我希望这次会议将成为我们三国人民共同走向持久和平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希望我们在此参加会晤的三人之间的友谊牢固而持久。

斯大林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杜鲁门　我想以美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大元帅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且我赞同艾德礼先生在这里表示的意思。

斯大林　俄国代表团同意艾德礼先生的话，对于总统卓越地、认真地主持了会议表示谢意。

杜鲁门　我对于你们为解决所有重要问题所给予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

斯大林　我想以个人的名义向贝尔纳斯先生表示感谢。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并帮助我们达成了一系列决议。

贝尔纳斯　大元帅的恭维使我深为感动。但愿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对这次会议的工作能有所裨益。

斯大林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成功的。

杜鲁门　我想对其他外长和所有那些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的

人们表示谢意。

艾德礼　我也赞成对我们的外长们表示谢意。

杜鲁门　我宣布柏林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于1945年8月2日零点30分闭幕）

波 茨 坦 会 议

波茨坦会议文件

三国柏林会议公报

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哈里·C·杜鲁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大元帅和大不列颠首相温斯顿·斯·丘吉尔及克·理·艾德礼先生，于1945年7月17日举行三国柏林会议，随同出席会议的有三国政府外长维·米·莫洛托夫、詹·Φ·贝尔纳斯先生和安·艾登先生，参谋长及其他顾问人员。

7月17日至7月25日期间，共举行九次会议，此后因英国宣布大选结果休会两日。7月28日艾德礼先生以英国首相资格返会，新任外相爱·贝文先生随同出席，又举行了四次会议。会议进行期间，三国政府首脑偕同三国外长经常会晤。三国外长也经常举行会商。由外长会议指定的就会议问题作初步准备的各委员会也逐日开会。历次会议均于波茨坦附近的塞西莉宫举行。

会议于1945年8月2日结束。

会议通过了重要的决议和协议，并就一系列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上设立的外长会议，将继续讨论上述问题。

这次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的关系，扩大了三国政府合作及了解的范围。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大元帅和艾德礼首相满怀新的信心结束了会议，相信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与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将保证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二 设立外长会议

甲、会议达成协议，设立五大国外长会议，继续进行关于缔结和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并讨论根据参加外长会议各国政府的协议随时可以提交外长会议的其他问题。

设立外长会议的协议全文如下：

（一）外长会议应由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法国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外长组成。

（二）（甲）外长会议通常于伦敦举行，伦敦将为外长会议所设立之联合秘书处的常设地点。每国外长将各由一高级助理及少数技术顾问随同与会，高级助理被授以适当权力，于本国外长缺席时，执行会议工作。

（乙）首次外长会议将不迟于 1945 年 9 月 1 日在伦敦举行。此后随时经共同协议，会议也可在其他国家首都举行。

（三）（甲）外长会议当前的重要任务，为受权起草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芬兰的和约，以提交联合国家，并就欧战结束时未决之领土问题，拟出解决方案。会议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待合乎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该政府予以接受。

（乙）为执行上述每一项任务，会议将由在本任务所涉及的某一敌国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代表组成。在研究对意和约时，法国将被认为是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其他成员国将于讨论与之直接有关的问题时应邀参加会议。

（丙）其他事项可根据成员国政府间的协议，随时提交外长会议。

（四）（甲〉会议讨论直接涉及某一未参加外长会议的国家的问题时，该国应被邀派代表参加讨论和研究。

（乙）会议可就其考虑问题的性质，调整会议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前，外长会议先作初步讨论。在其他情况下，会议可邀集对解决某一问题最为关切的国家举行正式会议。

乙、三国政府依照本会议之决议，已分别向中国和法国政府发出相同的邀请书，请它们采纳这一文件并共同参与设立外长会议。

丙、为本公报所提出之特定目的而设立之外长会议，将不与克里米亚会议协议相违背，该项协议规定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联合王国三国外长应举行定期会晤。

丁、本会议鉴于设立外长会议一事已达成协议，对于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地位亦有所考虑。会议满意地指出，该委员会提出了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德国及奥地利境内占领区，以及盟国在这两国内成立管制机构的建议，已出色地执行了它的主要任务。会议认为，今后协调盟国对德、奥管制政策的具体工作，将由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及维也纳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因此，建议取消欧洲谘询委员舍。

三　关于德国

盟军现正对整个德国实行占领，德国人民曾经在他们公开拥护并盲目服从的领导人得势时在其指使下犯了严重罪行，他们现在开始偿还这些罪行。

会议对于盟国在占领期间对已战败之德国所持共同政策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已经取得协议。

这项协议的目的在于履行克里米亚宣言关于德国之条款。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将一致同意，于现在和将来还采取其它必要措施，使德国永远不再威胁邻邦或世界和平。

盟国无意消灭或奴役德国人民。盟国愿意给德国人民在民主及和

平的基础上重建其生活的机会。德国人民倘能不懈地努力以实现这一目的，则在适当时期，德国人民将能在世界自由与和平之人民中获得其地位。

本协议全文如下：

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

甲、政治原则

（一）依照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及法兰西共和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的指令，分别在其各自占领区内实行。他们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共同处理有关全德事宜。

（二）对德国全国居民之待遇，应尽可能一致。

（三）管制委员会应遵循的占领德国之宗旨是：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作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为达到这些目的：

（子）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军、挺进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参谋部门及各种机关，包括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的一切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与半军事机构，以及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丑）一切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们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他们不能

逃避对自己所作所为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德国的残暴作战与纳粹的疯狂抵抗，使德国经济崩溃，因而混乱困苦，势所难免。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这类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

（4）为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能重新建立并使德国将来参加国际生活中可能的和平合作作好准备。

（四）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的或按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造成歧视的纳粹法律，应予废除。这种歧视不论是属于法律、行政或其它方面，均不容存在。

（五）战争罪犯以及参加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而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的人物，必须逮捕法办。纳粹领袖、支持纳粹之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其他危害盟国占领及其目的者，均应逮捕和拘留。

（六〕一切納粹党徒，除仅在名义上参与该党活动者外，以及其他对盟国目的持敌对态度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以及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的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被认为在政治上和道德品质上有助于发展德国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人予以接替。

（七）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

（八）司法制度应按照民主、法律平等之原则，根据法律以及一切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予以改组。

（九）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分散行政机构及增强地方责任感为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

（1）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特别须经过选举委员会，在符合维护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的情况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

（2）整个德国的一切民主政党，应准予存在并得到鼓励，给予它们集会及公开讨论的权利。

（3）代表与选举的原则，在证明实用于地方自治时，应尽速在区、省和邦政府中推行。

（4）目前暂不设立任何德国中央政府。但某些急需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是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方面，应予设立，以国务秘书为其首脑。这些部门将在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十）在考虑必需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自由，宗教团体也将受到尊重。同样，在考虑必需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建立自由职业工会。

乙、经济原则

（十一）为消灭德国作战潜力，武器、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海船均须禁止和防止其生产。金属、化学产品、机器制造以及其它为作战直接需要的其它产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以被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时期的需要为限，借以实现第〔十五〕款列举之各项目的。为被准许的工业部门所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拟定的、并经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予以拆迁，如不拆迁，则予摧毁。

（十二）德国经济应尽可能在最短期间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特别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协定所形成的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

（十三）在组织德国经济时，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农业及和平工业上，以满足国内需要。

（十四）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为达到

这个目的，在以下方面应确定共同政策：

（甲）采矿及加工工业的生产和分配；

（乙）农业、林业及渔业；

（丙）工资、价格及配给；

（丁）全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戊）货币和银行制度，中央赋税和关税；

（己）赔偿和消除工业作战潜力；

（庚）交通运输。

实行这些政策时，应适当考虑各地区的不同情况。

（十五）盟国必须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但以达到下列各项需要的程度为限：

（甲）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赔偿与经核准的进出口计划；

（乙）保证所需的商品生产，保证服务供应，以满足德国境内占领军和迁入人口的需要，以及在德国保持一个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的生活水平（欧洲国家是指除联合王国和苏联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

（丙）根据管制委员会的规定，确保各占领区间主要物品的平均分配，俾使在全德建立一平衡的经济并减少进口的需要；

（丁）管制德国工业及一切经济和金融的国际转移，包括进出口在内，以防止德国发展战争潜力及达到上述其它各项目的；

（戊）管制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国公私科研和实验机关及实验室等。

（十六）为设立和维持管制委员会所规定的经济管制，须建立德国行政机构，而德国当局必须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宣布和执行对此种机构之管理。因此，务使德国人民认清实行此种管理的责任，如有任何违反之处，概由他们自行负责。任何德国的管理如有违反占领目的者，一律禁止。

（十七）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甲）对运输工具作必要的修复；

（乙）增加煤产量；

（丙）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生产；

（丁）对房屋及必须的公用事业，作紧急的修复。

（十八）盟国管制委员会应采取适当步骤，对于尚未为参加对德作战的联合国家所管制的德国国外资产，实行管制并予以处置。

（十九）德国支付赔偿时，应保留足够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不依靠国外的援助而生活。在制订德国的经济计划时，应拨出必要的资金，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现产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首先应用于偿付这种进口。

以上规定，对于德国赔偿协定第（四）款（甲）项 、（乙）项提出的设备及产品，均不适用。

四 德国的赔偿

根据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应迫使德国对于使联合国家所蒙受的损失与苦难，尽最大可能予以赔偿，对这些损失与苦难，德国人民不能逃避责任。达成的赔偿协定如下：

（一）苏联所提的赔偿要求，将以没收德国境内苏占区内的资产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

（二）苏联将从其所得的赔偿额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

（三）美国、英国以及有权获得赔偿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将从西部各占领区及相应的德国国外投资予以满足。

（四）苏联除在苏占区获得赔偿外，尚可自西部占领区取得赔偿：

（甲）为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并且应自德国西部占领区拆迁的可用的成套工业设备，首先应从冶金、化学及机器制造工业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以交换同等价值的食物、煤、钾碱、锌、木材、陶瓷、石油产品以及其它商定的物资。

（乙）凡属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并且应从德国西部占领区拆迁的主要工业设备，应从中抽取百分之十，在赔偿项下交给苏联政府，苏方无须付款或以任何实物相交换。

上述（甲）（乙）规定的设备的拆迁将同时进行。

（五）在赔偿项下，自西部占领区拆迁的设备数量，至迟必须在从现在起六个月内确定。

（六）主要工业设备的拆迁应尽速开始，并在第（五）款所规定的决定的日期起两年内完成。第（四）款（甲）项所规定的货物交付，应尽速开始，由苏联自开始之日起，于五年内按照协定分批完成。德国经济所不需、因而可作为赔偿的主要工业设备，其数量及性质将由管制委员会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在法国参加之下所通过的政策予以决定，并由设备所在的占领区司令官最后核准。

（七）在应行拆迁的设备总数确定之前，按照第（六）款最后一句所规定的程序决定可以交付的设备，将预先交付。

（八）苏联政府对于在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的德国企业的股份以及除下列第（九）款所规定以外的在各国境内之德国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对于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的股份以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十）苏联政府对于盟军在德国缴获的黄金，不提任何要求。

五 德国的舰艇和商船

本会议原则上商定了使用和处理德国舰艇及商船的办法。决定由三国政府委派专家共同拟订详细计划，以实施商定之原则。三国政府将在适当的时间，同时发表联合声明。

六 科尼斯堡城及其附近地区

本会议研究了苏联政府的提案，即于和约中最终解决疆界问题之前，苏联毗邻波罗的海的西部疆界部分，应自但泽湾东岸的一点，往东经勃朗斯堡——戈乌达普以北，至立陶宛、波兰共和国及东普鲁士交界的地方。

会议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的提案，即科尼斯堡城及上述其附近之地区让与苏联，须由专家勘定其实际边界线。

美国总统和大不列颠首相声明，他们于未来的和约中当支持本会议的这项提案。

七 关于战争罪犯

三国政府已注意到最近数周内英、美、苏、法四国代表在伦敦举行的商谈，这次商谈的目的是对于按 1943 年 10 月的莫斯科宣言，其罪行不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主要战犯，议定审判办法。三国政府重申把这些战犯迅速交付公正审判的意图。他们希望在伦敦举行的谈判能本着这个目的，迅速达成协议，并认为尽快开始审判这些主要罪犯极为重要。首批被告名单将于今年 9 月 1 日以前公布。

八　关于奥地利

会议审议了苏联政府关于将奥地利临时政府的权限扩展至奥地利全国的建议。

三国政府同意在英美军队进入维也纳之后，准备研究这个问题。

九　关于波兰

会议讨论了关于波兰临肘民族统一政府和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

关于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三国政府表明它们的立场如下：

甲、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波兰国内外代表已达成协议，此次协议使按照克里米亚会议通过的决议组成为三国承认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为可能。英美政府与波兰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结果便撤销了对前伦敦波兰政府的承认，该政府已不复存在。

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既已被承认为波兰国家政府，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它们两国境内或其控制下属于波兰国家财产的利益，不论这种财产的形式如何，均予保护。

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已进一步采取办法，防止这种财产转与第三者。应给予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一切可能，以便使用通常法律措施收回任何被非法让与他人的波兰国家财产。

三国政府愿意协助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便利所有侨居海外而愿意回国的波兰人，包括波兰军队和商船人员，尽可能迅速返回波兰。三国政府期望，这些回国的波兰人将和一切波兰公民一样，享有个人的及财产的权利。

三国注意到，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按照克里米亚会议之决议，宣布同意将在普选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

的选举，一切民主的与反纳粹的党派有权参加选举并提出候选人，同时盟国新闻记者对于波兰选举前及选举过程中的情况，将有向世界报道的充分自由。

乙、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达成协议如下：

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就波兰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三国政府首脑研究了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关于它在北部、西部应获得领土的意见。波兰国民会议主席及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员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且充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国政府首脑重申他们的主张，认为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待和会解决。

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在波兰西部边界最后划定之前，原德国的东部领土，即自施维纳明德稍西的波罗的海起，沿奥得河至与西尼斯河会合处，再沿西尼斯河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包括按柏林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的部分东普鲁士和以前的但泽自由市，均由波兰政府管辖，因此不得视为苏联在德占领区的一部分。

十　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

会议决定就欧战胜利结束后，尽速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的共同政策声明如下。

三国政府认为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目前的不正常的状况，必须通过缔结和约予以终结。三国政府确信其它有关的盟国政府也会同意这一观点。

在三国政府方面，已将准备缔结对意和约列为未来外长会议一项最紧要的任务。意大利是第一个同德国断绝关系的轴心国家，对于击败德国具有实际的贡献，并且目前已和盟国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意大利本身已从法西斯政权下获得解放，并在重建民主政府与制度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一个被承认的民主的意大利政府缔结这项和约将使三国政府得以实现它们支持意大利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愿望。

三国政府并把为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准备和约的工作委托给外长会议。同这些国家的被承认的民主政府缔结和约，也将使三国政府能够支持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同这些国家缔结和约以前，三国政府同意在最近期间，根据当时的局势，分别考虑与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可能限度内建立外交关系。

鉴于欧洲战争结束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三国政府无疑认为，盟国新闻记者将享有充分自由，向世界报道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动态。

关于接纳其它国家加入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宪章第四条规定如下：

“一、凡其它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

二、准许上述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将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

三国政府本身，将支持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能履行上述条件的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

但三国政府认为必须说明，它们本身将不支持现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要求。由于西班牙政府在轴心国支持下成立以后，就其产生、性质、活动以及与侵略国家的密切关系，不具备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所必备的资格。

十一　领土托管

本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及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提出的领土托管的提案。

会议通过交换意见，决定前意大利殖民地领土的问题，应待准备

对意和约时解决。关于意大利殖民地领土的问题，将由9月份举行的外长会议予以研究。

十二 修改盟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

三国政府注意到，盟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曾向联合王国和美国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提出建议，目前由于欧战结束，该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应予改进。

三国政府同意立即着手修改盟国在这三国的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但须考虑共同向各该国提出停战条件的三国政府的利益与责任，并以协商同意的建议作为基础。

十三 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

对于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遣返德国人的问题，会议达成下列协议：

三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尚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德国居民或其中的一部分的遣送工作，应予进行。它们同意，办理任何遣返工作，都须井然有序并合乎人道。

由于大批德国人返回德国，势必加重占领当局已有的负担。三国政府认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首先应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将这些德国人按德境内各占领区合理分配的问题。三国政府将训令管制委员会中本国的代表，尽速将已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返回德国的人数，以及对未来可能进行的遣送时间及人数比例的估计，参照目前德国状况，分别呈报本国政府。

上述情况将同时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府和盟国对匈管制委员会，并要求它们在三国政府在对盟国管制委员中本国代表所提出的报告进行研究审阅以前，停止继续驱逐德国人。

十四　军事谈判

会议期间，三国参谋长同时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共同利益的军事问题。

十五

（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名单——略）

约·斯大林
哈里·杜鲁门
克·理·艾德礼
（签名）

三大国柏林会议议定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三国政府首脑自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举行的柏林会议达成的结论如下：

一　设立外长会议

甲、会议达成下列协议：设立一外长会议，以便进行关于缔结和

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外长会议的设立

（一）外长会议应由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五国外长组成。

（二）（甲）会议通常于伦敦举行会议，伦敦也将是会议将设立的秘书处的常驻地。每国外长由一高级助理及少数技术顾问随同与会。高级助理受有适当权力，于本国外长缺席时，执行会议工作。

（乙）首次外长会议将不迟于 1945 年 9 月 1 日在伦敦举行。此后随时经共同协议，也可在其他首都举行会议。

（三）（甲）会议当前的重要任务，为受权起草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芬兰的和约，以提交联合国家，并就欧战结束时未决之领土问题，拟出解决方案。会议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待合乎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该政府予以接受。

（乙）为执行上述每一任务，会议将由在本任务所涉及的某一敌国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代表组成。在研究对意和约时，法国将被认为是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其它成员国将于讨论与之直接有关的问题时，应邀参加会议。

（丙）其它事项可根据成员国政府间的协议，随时提交外长会议。

（四）（甲）会议讨论直接涉及某一未参加外长会议的国家的问题时，该国应被邀派代表参加讨论和研究。

（乙）会议可就其考虑问题的性质，调整会议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前，外长会议先作初步讨论。在其他情况下，会议可邀集对解决某一问题最为关切的国家举行正式会议。

乙、经决定，由三国政府向中国和法国政府发出同样邀请书，请它们采纳这一文件并共同设立外长会议。经过核准的邀请书措词如下：

外长会议

由三国政府向中、法两国政府

分别发出同样邀请书的草案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三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立即着手进行关于欧洲和约的主要准备工作。为此目的，三国政府同意设立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同欧洲敌国的和约以便提交联合国家。外长会议将被授权就解决欧洲未决的领土问题提出建议，以及研究根据成员国政府的协议委托给他们的其他问题。（上面是三国政府通过的文本）

……政府根据同……政府的协议向中国（法国）发出请柬，请予采纳上述文件并参加设立外长会议。……政府对中国政府（法国政府）参加建议中的安排极为重视，并希望早日获得对此项邀请有意赞助的答复。”

丙、为文件中所列举之特定目的而设立的外长会议将无碍于克里米亚之协议，该项协议规定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联合王国三国外长应举行定期会晤。

丁、本会议鉴于设立外长会议一事已达成协议，对于欧洲谘询委员会的地位亦有所考虑。会议满意地指出，该委员会提供了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德国及奥地利境内占领以及盟国在这两国内成立管制机构的建议，已出色地执行了它的主要任务。会议认为，今后协调盟国对德奥管制政策的具体工作，将由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及维也纳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因此，建议取消欧洲咨询委员会。

（以下部分与柏林会议公报重复，略。）

四 德国军舰和商船的处置

甲

关于德国军舰的分配原则如下：

（一）德国全部水面舰只，除已被击沉和从盟国获得者外（但在修建中的舰艇仍包括在内）应由苏联、联合王国及合众国均分。

（二）在建造或修理中的舰艇是指根据不同的舰型可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修建完竣的舰艇。这些建造和修理中的舰艇应否完工应由下述的由三国指派的技术委员会予以确定，须遵守如下原则：此项舰艇的建造或修理必须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完工，而在德国船坞中不得增雇熟练技工，并且不准德国造船工业或与之有关的工业复工。完工日期是指舰艇可以驶出作首次航行，或者依照和平时期的标准，由造船厂向政府交船的习惯日期。

（三）大部分德国潜水艇应予沉掉。应保存的潜水艇不得超过三十艘，由苏、英、美三国均分，用于试验和技术的目的。

（四）凡属于依照上列第（一）（三）项应予移交的船舶的、为德国海军储存的一切武器、军需和给养，均移交给接收该项舰艇的有关国家。

（五）三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三国海军委员会，由每一政府派代表二人组成，各随带必要的人员，将所同意的关于具体分配德国军舰的建议提交三国政府，并处理三国政府关于德国舰艇的协定所产生的其它具体问题。委员会应不迟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柏林召开第一次会议，柏林为委员会所在地。委员会的每一代表团在对等基础上，对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德国军舰，将有权进行视察。

（六）三国政府同意舰艇的移交，包括在修建中的舰艇，应尽速

完成，不得迟于1946年2月15日。委员会每两周提出报告，包括委员会同意的逐步分配舰艇的建议在内。

乙

关于德国商船的分配原则如下：

（一）三国受降的德国商船，无论在什么地方，由苏、英、美三国均分。向有关国家实际移交船舶应尽可能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立即进行。联合王国和美国将从两国所得德国投降的商船份额中提出适当的数量给在对德共同作战中商船损失重大的其它盟国，但波兰则由苏联从其份额中拨给。

（二）在对日作战期间，此项船舶的分配、配备船员和使用应归联合航运管理局和联合海运机关管辖。

（三）船舶的实际移交应推迟到对日战争结束以后，但三国航运委员会应对所有船舶进行清点和估价，并依照上述第（一）项的规定，提出具体分配的建议。

（四）德国内河和沿海船舶，经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认为对维持德国基本的和平经济确有必要者，可不包括在三国分配的船舶数额之内。

（五）三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三国商船委员会，由每一政府派代表二人组成，各随带必要的人员，将所同意的关于具体分配德国商船的建议提交三国政府，并处理三国政府关于德国商船的协定所产生的其他具体问题。委员会不迟于1945年9月1日在柏林召开第一次会议，柏林将为委员会所在地。委员会每一代表团在对等基础上，对无论任何地方的德国商船，将有权进行视察。

（以下部分与柏林会议公报重复，略。）

十四 伊朗

经同意，盟国军队将立即从德黑兰撤退，关于今后从伊朗撤军的步骤，应由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外长会议进行研究。

十五 丹吉尔国际共管区

对苏联政府的建议进行了审议，达成下列决议：

在研究了丹吉尔区问题之后，三国政府同意：这个区域，包括丹吉尔城及其附近地带，由于其战略上的特殊重要性，应仍为国际共管。

丹吉尔问题将于最近在巴黎召开的苏联、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四国代表会议予以讨论。

十六 黑海海峡

三国政府认为，在蒙特勒签订的关于海峡的公约已不适合目前状况，应予修改。

一致同意，作为下一个步骤：这个问题将由三国政府各自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

十七 国际内水航道

会议研究了美国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同意交给即将在伦敦召开的外长会议予以讨论。

十八　关于欧洲内陆运输会议

英、美两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将两国政府希望重新召开欧洲内陆运输会议一事通知苏联代表团，并表示他们欢迎苏联政府保证参加这次会议。苏联政府同意参加这次会议。

十九　对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司令官的指示

三国政府同意：每个政府将向其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发出指示，使其了解本会议有关其职责范围内事项的决议。

二十　以盟国财产作为附庸国的赔偿或战利品

会议原则上通过美国代表团的建议。这项建议的审订工作，须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以下部分与柏林会议公报重复，略。）

约·斯大林
哈里·杜鲁门
克·理·艾德礼
（签名）

附录　丘吉尔评说斯大林

1959年12月21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上院发表演说，以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

他说：

对于俄国来说，其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艰难考验的年代里，有约瑟夫·斯大林这样一位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领导着她。他是一位完全与这一残酷的历史时期相应的杰出人才，在这一时期中他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

斯大林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精力和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交谈中，他总是一个少有的、强硬的和毫不留情的人，即使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有修养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斯大林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和讥讽感，以及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斯大林总是自己起草文章和发言稿，所以在他的文稿中总是能嗅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斯大林的身上，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所有古往今来的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之中，只有他才是独特无比的。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

他具有高深的智慧和处惊不变的才能。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最束手无策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过的巨匠。在最悲惨的时刻，亦如在扬扬得意的日子，斯大林总是同样地审慎镇定，从不为错觉所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们作战。

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不，无论我们如何评说斯大林，这一切，历史和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

——温·丘吉尔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六年九月制作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十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И.В.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20

1946 – 1953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十卷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

二〇一六年·中国

斯 大 林

目　录

第二十卷说明 …… 1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四六年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 年 2 月 9 日）…… 3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8 号。1946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15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1946 年 2 月 23 日）…… 18

附录：拉辛给斯大林的信 …… 21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6 年 3 月 13 日）…… 25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1946 年 3 月 22 日）…… 31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 7 号。1946 年 5 月 1 日于莫斯科市） …… 32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1946 年 9 月 17 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35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 年 10 月 23 日接到的问题） …… 38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
（1946 年 12 月 21 日） …… 42

一九四七年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10号。1947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 46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 50
贺 词
（1947年9月7日） …… 60

一九四八年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1948年4月7日）…… 62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1948年5月17日）…… 64
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8年10月29日）…… 66

一九四九年

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问
（1月27日接到的问题） …… 68

一九五〇年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 69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69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 91
答同志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 97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 98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 100

一九五一年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 106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1951 年 10 月 6 日） …… 111
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
（1951 年 12 月 31 日）…… 113

一九五二年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1952 年 2 月—9 月）…… 115
对于和 1951 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115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115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 121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 127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
对立的问题以及若干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 132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危机加深的问题 …… 135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 137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 141
8. 其他问题 …… 144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 147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 148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 149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 155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 156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 164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 175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175
2．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
办法问题 …… 177
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提出的问题
（1952 年 4 月 20 日） …… 184
致苏联少年先锋队员
（1952 年 5 月 20 日） …… 185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4 日）（视频）…… 186
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
（1952 年 12 月 21 日接到的问题）…… 190

补 遗（一）

给萨拉托夫—莫斯科煤气管建设与开采管理局的
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8 月 16 日） …… 192
给查坡罗什建设工程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 3 日） …… 193
给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1 月 4 日） …… 194
给阿尔泰农业机械厂的同志们的信
（1948 年 10 月 25 日）…… 195
庆祝荣膺列宁勋章索尔莫沃工厂
建立一百周年的信
（1949 年 7 月 19 日） …… 196
电贺苏联内河航运部北极远征队
经北海航行欧亚成功
（1949 年 9 月 12 日） …… 197

庆祝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
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电报
（1949 年 11 月 19 日）…… 198
庆祝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建厂二十周年
（1952 年 4 月 3 日）…… 199

补 遗（二）

给芬兰总统的信
（1948 年 2 月 22 日） …… 201
关于苏联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
（1948 年 10 月 12 日）…… 202
给金斯布里·史密斯的复电
（1949 年 2 月 2 日）…… 203
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先生及
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先生
（1949 年 10 月 13 日）…… 204
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1949 年 11 月 28 日）…… 206
复尼赫鲁先生电
（1950 年 7 月 15 日） …… 207

补 遗（三）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1950 年 9 月 30 日） …… 20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 年 2 月 13 日） …… 210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 年 9 月 2 日）…… 212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
（1951 年 9 月 28 日） …… 214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 年 2 月 12 日） …… 215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 年 9 月 2 日）…… 217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1952 年 9 月 29 日） …… 219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祝贺
（1953 年 2 月 11 日） …… 220

代 跋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
（1953 年 3 月 9 日）…… 223
视 频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4 日）…… 186
年 表
（1946 年至 1949 年） …… 227
插 图
一 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 …… 49
二 最后两部伟大的经典著作 …… 114
三 约·维·斯大林与世长辞 …… 222

第 二 十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二十卷，是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两书，以及苏联《真理报》、中国《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刊载的约·维·斯大林的著作编辑的。

至此，我们编纂完成的《斯大林全集》正卷第一卷至第二十卷，已基本上包括了斯大林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

毛泽东同志指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在斯大林逝世后撰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中，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伟大理论贡献。现特将此文作为《斯大林全集》共二十卷的“代跋”一并收录。

从新编《斯大林全集》附卷、即“档案选编”第一卷起，我们将陆续编辑现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的大量斯大林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著作，以飨广大读者。

新编《斯大林全集》第二十卷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随时指正，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修改。

本电子书制作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1946年2月9日）

同志们！

从上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是一个富有极重大事件的时期。前4年是苏联人民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紧张工作的年份。后4年包括了同德国侵略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事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战争无疑是过去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

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务活动家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472◇[①]

如果这些国家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能避免战祸。但是这在现今资本主义

————————————————

① 此为之前文字在《斯大林文集》中的页次，下同。——本书制作者注

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即德日意三国，在侵犯同盟国之前，就把自己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宣布侵占他国领土是自己的国策，并公开声明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而且轴心国又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事实，表明他们决心把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这种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而这个同盟后来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就是这样。

现在，大概谁都承认：这次战争确实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成了各国人民为保护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一场速决的闪击战。◇473◇

对于我国说来，这次战争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

但是这次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次战争暴露了后方和前线的一切真情实况，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使它们不戴面具、毫无粉饰地登上舞台，显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

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好像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人和组织，这就是他们的活动和经历，——请仔细查看查看他们，并按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以报偿吧。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好处之一。

这个情况，对我们选民说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和客观地评价党及其人物的活动，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是在别的时期，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党的代表人物的演说和报告，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两相对照，作出总结等等。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并且还不能担保这中间不犯什么错误。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形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战争本身已经检查了我们各个组织和领导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总结。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并做出正确的结论，就容易得多了。

那么，战争的总结究竟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总结，所有其他的总结，都是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作出来的。这个总结就是，战争的结局是敌人失败，而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得胜。我们以彻底打败敌人结束了战争，——这就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总结。但是这个总结太一般了，所以我们决不◇474◇能以此为限。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故争中打败敌人，这就意味着争得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一个一般的总结，我们也就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为了认识我们这次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就要更具体地来考察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我们这次所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从我国内部力量的状况和发展来看，这次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

大家知道，在外国报刊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断言，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试验”，说苏维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根基，是肃反委员会机关强加于人民的一座“纸牌搭的小房子”，说只要有人从外面稍微推一下，这座“纸牌搭的小房子”就会完全倒塌。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一切毫无根据的断语。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

不仅如此，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经过这次战争的明显的教训以后，任何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都不敢再怀疑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雄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475◇

第二，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经住了战争的一切考验，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

大家知道，外国报界的著名人士不止一次地声称，说苏维埃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说一旦发生某种麻烦，苏维埃联盟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苏维埃联盟一定会遭到奥匈帝国那样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些毫无根据的议论。战争表明，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制度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它在战争时期更加巩固了，证明它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些先生不懂得，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

作的感情。

不过，经过这次战争的教训以后，这些先生再也不敢否认苏维埃国家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第三，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红军，它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现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承认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476◇的伟大使命。但是在五六年以前，也就是在战争前夜，却不是这种情形。大家知道，当时外国报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和外国许多公认的军事权威都不止一次声言，说红军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说红军装备差，而且没有真正的指挥人员；说红军士气低得不成样子；说红军也许适于防御，但是决不适于进攻；说红军一遭到德军打击，就会像“泥足巨人”一样坍塌。这种议论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

现在我们可以说，战争驳倒了这些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议论。战争表明，红军并不是“泥足巨人”，而是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非常老练的指挥人员以及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的现代头等军队。不要忘记，正是红军彻底粉碎了不久前还使欧洲各国军队胆战心惊的德国军队。

应当指出，这些评论红军的“批评家”愈来愈少了。不但如此，目前外国报刊上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评论，赞扬红军的优良素质，赞扬红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技能，赞扬红军战略、战术十分完善等等。这是很自然的。既然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在基辅和基洛夫格勒附近，在明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

附近，在列宁格勒和塔林附近，在雅西和利沃夫附近，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畔，在多瑙河和奥得河畔，在维也纳和柏林附近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不承认红军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头等军队了。

我们就是这样来具体地认识我国这次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的。

这次战争的总结，基本上就是这样。

假如以为不必预先使全国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就能够获得◇477◇这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那就错了。假如以为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在 3—4 年以内就能够作好这种准备，那同样是错误的。假如以为我们获得胜利只是由于我国军队勇敢，那就更加错误了。没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获得胜利。但是单靠勇敢精神，也还打败不了军队众多、装备优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要能经住这样一种敌人的打击，并且给以回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那么除了我国军队那种无比的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是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而且是在数量上充分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用的**金属**，维持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

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已经拥有为基本上满足这些需要所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肯定地说的。为了准备这一宏伟的事业，必须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个五年计划。正是这三个五年计划帮助我们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 1940 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 1913 年要好几倍。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拥有怎样的物质条件呢？

为了帮助你们弄清这点，我现在把共产党在使我国做好积极防御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简略地报告一下。

如果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1940年的材料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913年的材料比较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1913年，我国生产了422万吨**生铁**，423万吨**钢**，2900万吨**煤**，900万吨**石油**，2160万吨**商品谷物**，74万吨**籽棉**。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478◇

这就是旧俄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到1940年，那么，我国在这一年里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即几乎等于1913年的4倍；1830万吨**钢**，即等于1913年的4.5倍；16600万吨**煤**，即等于1913年的5.5倍；3100万吨**石油**，即等于1913年的3.5倍；3830万吨**商品谷物**，即比1913年多1700万吨；270万吨**籽棉**，即等于1913年的3.5倍。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可见，差别是极大的。

生产上这样一种空前的增长，决不能认为是国家由落后达到进步的一种简单平常的发展。这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如果同时还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年完成的，而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第四年度就被战争打断了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能不承认，实现这样宏伟的事业，十三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短的期限。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当时这些数字一公布，就引起外国报刊纷纷议论。朋友们认为是出现了“奇迹”，而不怀好意的人却说五

年计划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肃反委员会的把戏”。但是，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而肃反委员会又不是那样神通广大，竟能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取消，于是,国外的“舆论”也就只好承认事◇479◇实了。

共产党是依靠什么政策来保证我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呢？

首先，就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

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流入重工业，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聚集资金，并使它流入重工业。

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

其次，就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政策。

为了消灭我国农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更多的棉花等等，必须由小农经济过渡到大经济,因为只有◇480◇大

经济才能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但是，大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集体的。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且因为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先要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变成雇农。因此，共产党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以扩大农业规模的道路。结果表明，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布满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

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

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不但那些始终厌弃一切新事物的落后的人，而且党内有许多著名的党员，也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派和右派所干的一切反党阴谋诡计，他们在暗中破坏我国政府的措施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保持着领导力量的地位。毫无疑问，共产党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就不能坚持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共产党是不是正确利用了这样造成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军工生产并供给红军必需的装备呢？◇481◇

我认为它做到了这点，并且做得极有成效。

如果不算战争的第一年，当时工业由于往东撤退而阻碍了军工生产的发展，那么，党在战争其余三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它不仅能供

给前线足够数量的火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同时，大家知道，我们的装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

大家知道，我国的坦克工业在战争的后三年，每年平均生产了3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

其次，大家知道，我国的航空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4万架飞机。

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枪炮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12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将近45万挺轻重机枪，300多万枝步枪，以及约200万枝自动枪。

最后，大家知道，我们的迫击炮工业在1942—1944年期间，每年平均生产了将近10万门迫击炮。

自然，我们同时生产了相应数量的炮弹、各种迫击炮弹、航空炸弹，以及步枪和机枪子弹。

大家知道，例如，单是在1944年内就生产了24000多万颗炮弹、炸弹和迫击炮弹，74亿发子弹。

红军的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形火体上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情况同我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供给情况是不相同的，当时前线经常缺乏火炮和炮弹，军队作战没有坦克和飞机，三个士兵用一枝步枪。

至于说到红军的粮食和军服的供给，谁都知道，前线在这方面不仅一点也不缺乏，甚至还有必要的储备。◇482◇

我国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的工作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我来稍微谈谈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大家知道，这一计划已在最近期间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计划中载明。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最近期间就将废除配给制

就更不用说了，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

我不怀疑，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家们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最近期间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

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 3 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 5000 万吨，钢达 6000 万吨，煤达 5 亿吨，石油达 6000 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但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

这就是我关于我国共产党不久以前的活动以及它将来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简短报告。

你们的任务就是来裁判一下：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正确到什么程度，它能不能做得更好些。

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①]，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483◇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我认为选举运动就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

① “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这句话出自一则俄国故事：据说俄军名将亚·瓦·苏沃洛夫 1773 年在俄土战争中违反彼·亚·鲁勉采夫元帅的命令进攻图尔图凯获胜，因此被交付军事法庭裁判。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编者注

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从前，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这是因为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团体在选民面前假若不戴起假面具，便很不利，所以它们往往用无党无派的旗子来掩饰。从前就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一个叫作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这个壁垒同时又把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成为一个由**苏维埃人**所组成的共同的集体。他们生活在共同集体里，一起为加强我国实力而斗争，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流血战斗，一起锻造并锻造出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些人入了党，而另一些人没有入党罢了。但这是形式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两者都在创造一个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是一件自然而至为重要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提出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你们可以不必怀疑，我一定竭力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4 年版第 10—24 页◇484◇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 8 号。1946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红军是在其力量全盛的时候，是在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誉满天下的时候，迎来二十八周年的。红军在经过长期严酷的战争之后，已经成了一支具有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和经验丰富、久经锻炼的指挥人员的头等军队。

在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战争中，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伟大使命，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国家利益的忠实可靠的保卫者。我们的战士、军官和将军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光荣地完成了祖国所赋予的职责。苏联人从亲身的体验中确信，红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国各族人民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军队，为自己军队的胜利而自豪，并将永远铭记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红军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胜利，首先因为它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它保卫人民的利益。苏联人热爱自己的军队，并经常关心加强这支军队的实力。这种关心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表现得格外明显。为了前线，为了胜利，我国全体人民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劳动，如果没有他们◇485◇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红军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其次，红军所以取得胜利还因为有共产党对它的关怀和教育。

苏联人民遵照伟大列宁的遗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而为红军战胜敌人创造了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共产党把我们国家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把人民和军队的全部力量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歼灭敌人。共产党向苏联军人阐明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提高他们的士气，培养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纪律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苏联人民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在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之后，继续前进，争取新的经济高涨。我们不能仅仅巩固这些阵地，因为这会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要继续前进，为国民经济新的更大的高涨创造条件。我们要在最短期限内医治好敌人给我国所造成的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发展水平，以便在最近期间大大超过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并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

在新的条件下，红军要警惕地保卫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设劳动，可靠地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确保我们祖国的边界不受敌人侵犯。

在战争时期，红军战士、军官和将军的主要任务是夺取胜利，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知识去彻底粉碎敌人。在和平时期，全体战士、军官和将军的首要任务则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知识。全体红军战士和军士要刻苦学习军事，熟练手中武器，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善于训◇486◇练和教育部属。在战争年代，红军的军官和将军出色地掌握了在战场上统率军队的本领；现在，所有的军官和将军应当娴熟地掌握在和平环境里训练和教育军队的本领。

伟大卫国战争使军事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战场上取得的战斗经验，对于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來说，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因此，整个军队训练应当以善于汲取以往这场战争的经验为基础。这一经验同样必须全面地应用于军官的理论教育以及进一步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应当记住，军事在不断地、迅速地发展着。红军应当不仅跟上军事的发展，而且推动它前进。

红军拥有头等的武器装备，这是它的战斗实力的基础。任务就在于要精通这些武器装备，熟练地掌握它，并像爱护服珠一样地爱护它。

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军人秩序，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成绩，因此，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军队全体人员首要的职责。维护纪律和秩序的骨干，首先应当是我军各级指挥干部，包括军士长和军士——红军战士最直接的首长和教育者。

红军的战士、军官和将军为人民、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或贪图安逸。不居功骄傲，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把全部力量和知识贡献给红军的建设，这就是对每个苏联军人的要求。

红军和红海军的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为了庆祝红军节，**我命令：**

今天，2 月 23 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487◇都，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 20 响。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祖国万岁！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大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

1952 年版第 43—46 页◇488◇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1946 年 2 月 23 日）

尊敬的拉辛同志：

您 1 月 30 日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信和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收到了。

（1）您问，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了？

据我看，问题提得不对。

这样提出问题，可能使人以为，列宁分析过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著作，对它们作出了军事上的评价，并遗留给我们一系列我们应当遵循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指导原理。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关于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及其著作的这样一些“原理”，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和恩格斯不同，他并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不仅在过去，在十月革命以前，而且后来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时，他都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曾责成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会内的年轻同志“周密地研究军事”。至于说到他自己，他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他研究军事已经晚了。实际上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在自己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和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评论中没有涉及纯粹的军事问题，诸如：军事战略和战术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攻和退却之间、防御和反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489◇

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列宁对克劳塞维茨感到兴趣，列宁又为什么要赞扬他呢？

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当时已享有军事问题权威声誉

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①]。

其次，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②]。

可见，列宁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对待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列宁感兴趣的是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那些说明战争同政治的联系的问题。

所以，在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这件事情上，列宁没有任何指示束缚住我们这些列宁的继承者，限制我们的批评自由。

由此可见，您把美舍利亚科夫同志批评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的论文（见 1945 年《军事思想》第 6—7 期）估计为“反列宁主义的攻击”，估计为对列宁所作评价的“修正”，都是文不对题的。

（2）我们是不是应当根据事情的实质来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490◇事学说呢？是的，应当。我们必须从我们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仅批判克劳塞维茨，而且批判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凯特尔和德国军事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近 30 年来，德国曾两次把流血最多的战争强加于世界，而两次它都被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不仅整个德国，而且连它的军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95、284 页和第 24 卷第 368—339 页以及其他各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06—307 页。——编者注

事思想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无疑是这样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包括我们俄国军人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是否必须消除这种不应有的尊重呢？必须消除。为此就需要批判，特别需要我们方面，即德国的战胜者方面的批判。

至于说到克劳塞维茨个人，他当然是过时了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克劳塞维茨是战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然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争的**机器**时代。毫无疑问，机器时代需要新的军事思想家。现在还到克劳塞维茨那里去求教，那就可笑了。

不对那些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了的原理和见解进行批判的分析，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推进科学。不仅对于军事权威人士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有一次说过，在 1812 年时期的俄国统帅中，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统帅。[①] 当然，恩格斯是错了，因为库图佐夫作为统帅来说，无可争辩地要比巴克莱-德-托利高明得多。但就在我们这时代，也可能有人口沫飞溅地坚持恩格斯这一错误的见解。

我们在进行批判时，不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个别原理和见解，而应遵循列宁当年所作的著名指示：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491◇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沦，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492 页）[②]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92—93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3 页。——编者注

我们对待军事权威人士，更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

（3）至于说到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因为它是概略性的，所以我只能提出一般的意见。提纲里哲学和抽像原理太多。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语法和逻辑的术语听起来刺耳。关于军事科学的党性问题提得太粗浅。那些对斯大林的过分的歌颂也非常刺耳——简直使人读不下去。提纲里缺少**论反攻**（不要同反冲击混为一谈）的部分。我所说的反攻是指在敌人进行了顺利的、但没有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攻以后进行的反攻，在敌人进攻期间，防御方面聚集力量，转入反攻，并使敌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我认为，组织得好的反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进攻类型。您是个历史学家，似应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统帅克拉苏及其军队深入本国腹地，然后转入反攻，并消灭了他们。我们的天才统帅库图佐夫也很懂得这一点，他用准备周密的反攻，打垮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

约·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23 日

译自 1947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6—8 页◇492◇

附　录

拉辛给斯大林的信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如果可能，恳请您给我解释下列问题：

1. 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了？

2. 应该怎样对待克劳塞維茨的军事理论遗产？

当我读了我军指导性军事理论杂志《军事思想》1945年6—7期上登载的美舍利亚科夫中校的《克劳塞维茨和德国军事思想》一文之后，我对上述问题就搞不清楚了。

1944年我在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曾不得不反对该院政治副院长巴兹上校的言论，他竟说什么应当修正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觉得，《军事思想》上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把巴兹上校的论点付诸实行。编辑部刊登这样的文章，是否做得对呢？

该杂志的这篇论文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原则性评价，可以归结为下列几个论点：

“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反动观点占优势”（第93页）；

“不懂得战争的本性和实质”（第110页）；

“落后于当时的军事理论思想”（第110页）。

大家知道，列宁称克劳塞维茨是**熟谙**军事问题的著作家之一，是**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之一，认为他的基本思想现在已经成了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493◇第18卷第197、249页，第22卷第511页，第30卷第333页）①

可见，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同《军事思想》杂志上这篇论文对他所作的评价是恰恰相反的。

在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价方面，如果对的是美舍利亚科夫，而不是列宁，那么，要对这种问题表示意见，该文作者的威望未免太低了。当然他并没有公开地反对列宁。而正因为是这样，这篇论文会使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们是非莫辨，从而给红军带来危害。

如果美舍利亚科夫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是不对的，那么就不能不认为他的这篇论文是反列宁主义的攻击，而这是必须给以反击的。

我认为，这篇论文在**政治上**的害处就在这里。

可见这不是“纯粹军事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我才决定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在一个命令中指出了军事理论杂志《军事思想》的严重缺点，给它提出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3、626页，第3卷第537、71页。——编者注

了一系列重大的具体任务。而关于上述问题的详尽指示，对于执行这一命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于最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历史科学來说，对待过去的理论遗产的态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怍家那里看到这方面的清楚而明确的方针——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批判地重新探讨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387页）[①]“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同上）[②]这一段话也完全适用于军事文化。

例如，法西斯分子曾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来达到其最野蛮残暴的目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就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我们也并不机械地吸收资产阶级科学的全部知识，我们批判地重新探讨这一◇494◇切，并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冶的基础上，把科学推向前进。

人所共知，有两种基本的批判形式：

低级形式——找出断章取义之处、唯心主义、机械论、反动观点等等，然后整个地加以抛弃；

高级形式——批判地重新探讨，在不正确的形式里面寻找出有积极内容的内核，保存它并进一步发展它。

发现--般的缺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论）是要容易得多，它对于批判的初级阶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批判地重新探讨就困难得多了，需要寻找合理的内核，保存并发展它。“采金者翻挖了许多土地，而只能找到一点点金子。”（**赫拉克利特语**）

我们的军事理论思想正应当处在这个批判的高级阶段上，而美舍利亚科夫的论文却把我们拉向后退。我认为，这篇论文在**理论上**的害处就在这里。

我认为，该文的作者不了解克劳塞维茨，因此他才劝我们抛弃这种军事理论遗产，这是否正确？可是恩格斯说得对：“一个人评论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48页。——编者注

据他的体系，——这种人还是少说为佳。”（**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 年 7 月 1 日》）①

把克劳塞維茨军事理论著作中全部积极的东西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等一起抛弃，是否正确呢？

美舍利亚科夫是不是重复了已被联共（布）中央斥责过的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呢？

或者，也许是由于有了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对克劳塞维茨的全部军事理论著作，都得给以和列宁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评价呢？

正确地了解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军事学术史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我花费了将近 15 年的时间准备出版八卷本的著作，其中前面 5 卷大致已经弄好了。战前出版的两卷主要是根据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指示作了根本的修改。

从附送的第 1 卷的提纲和全书的序言，可以看清我的著作是从什么出发◇495◇的。很明显，如果作为这部作品出发点的材料是错误的，那就会使全部著作变得毫无价值。已有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部书红军是很需要的。

亲爱的斯大林问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恳请您给我解释这些问题。

教授、上校 **叶·拉辛**

1946 年 1 月 30 日

译自 1947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4—6 页◇496◇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23 页。——编者注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
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6 年 3 月 13 日）

问：您怎样评价邱吉尔先生最近在美国发表的演说？

答：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

问：是否可以认为,邱吉尔先生的演说会损害和平和安全的事业？

答：无疑是的。实际上，邱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邱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

应当指出，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希特勒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民族。邱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实际上，邱吉尔先生和他在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向不讲英语的◇497◇民族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自愿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各民族在五年残酷的战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为了以邱吉尔之流的统治来代替希特勒之流的统治。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不讲英语的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是不会同意接受新的奴隶制度的。

邱吉尔先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这个死硬派托利党人，不懂得这一普通而明显的真理。

毫无疑问，邱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同样明显的是，邱吉尔先生的这种方针是同现有的英苏同盟条约不相容的。诚然，邱吉尔先生为了混淆视听，顺便地说到苏英互助合作条约的期限完全可以延长到50年。但是邱吉尔先生的这种声明和他的反苏战争方针，和他的反苏战争宣传，怎么可以相容呢？很明显，这两个东西是绝不相容的。如果邱吉尔先生一方面号召进行反苏战争，同时认为有可能把英苏条约的期限延长到50年，那就是说他把这一条约看成了一纸空文，他之所以需要它只是为了用它来掩盖和粉饰他自己的反苏方针。因此，不可认真地对待邱吉尔先生在英国的朋友们的虚伪声明，说要把苏英条约期限延长到50年或更多年。如果一方破坏条约并把它变成一纸空文，那么把条约期限延长是没有意义的。

问：在邱吉尔先生的演说中；有一部分是攻击那些和我国相邻的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批评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建立的睦邻关系的，您怎样评价邱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呢？

答：邱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是诽谤成分、粗鲁和毫无分寸的成分混合起来的。◇498◇

邱吉尔先生硬说：“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城市和这些城市区域的居民，都是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内，并且他们不仅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服从于日益增强的莫斯科的控制。”邱吉尔先生把这一切说成是所谓苏联无限制的“扩张倾向”。

用不着特别费力，就可以说明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是蛮横无礼地诽谤莫斯科和上述的苏联邻邦。

第一，说维也纳和柏林完全受苏联的控制，这是十分荒谬的，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设有四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苏联只占四分之一的票数。有时有些人不能不造谣诽谤，可是总应当有个限度。

第二，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由于德国的侵犯而在同德国人作战中，以及由于德国的占领和苏联人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苏联便永远地丧失了约700万人。换句话说，苏联所损失的人要比英美两国损失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好几倍。可能在某些地方有人想忘记苏联人民为保证把欧洲从希特勒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作出的巨大牺牲，但是，苏联是不会忘记这些牺牲的。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

其次，邱吉尔先生硬说，“处在俄国人统治下的波兰政府，被鼓励对德国进行巨大的非正义的侵犯。”◇499◇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

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500◇

再其次，邱吉尔先生硬说：“原来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中无足轻重的共产党，已获得了大大超过其党员人数的非凡势力，力图到处建立极权控制，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内，警察政府都占上风，直到现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

大家知道，现今在英国管理国家的是一个政党——工党，而且在野党都没有参加英国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都是由几个政党——四个到六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来管理国家，而且，如果反对派是比较诚实的，就保证有参加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极权主义、暴政和警察制度。为什么？有什么根据？不要期待邱吉尔先生能够回答。邱吉尔先生不懂得，他关于极权主义、暴政和警

察制度的叫嚣，使他陷于多么可笑的境地。

邱吉尔先生希望波兰由索森科夫斯基和安德斯管理，南斯拉夫由米哈伊洛维奇和巴维利奇管理，罗马尼亚由什蒂尔贝伊公爵和拉德斯库管理，匈牙利和奥地利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一个国王来管理，如此等等。邱吉尔先生想使我们相信，这些替法西斯看家的老爷们能保证“真正的民主主义”。邱吉尔先生的“民主主义”就是这样的。

当邱吉尔先生谈到共产党影响在东欧日益增长时，他是在接近真理。可是还须指出，他说的不完全确实。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增长起来，而且几乎在欧洲一切以前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或者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侵占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都增长起来了。

不能认为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增长是偶然的，这完全是一种合◇501◇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艰难年代里，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制度，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战士。邱吉尔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有时候也提到“出身并不高贵的普通人”，并且老爷式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假装是他们的朋友。可是，这些人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普普通通。他们这些“普通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策，他们也知道如何保卫自己。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把票投给工党，而使邱告尔先生和他的党在英国落选了。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孤立了欧洲反动派，孤立了主张同法西斯主义合作的人，而支持左派的民主政党。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在斗争和反抗法西斯的烈火中考验了共产党人，认定共产党人是完全值得人民信任的。共产党人在欧洲的影响，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就是这样。

当然邱吉尔先生不喜欢事变这样发展，他正在敲起警钟，诉诸于

武力。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也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 国”讨伐俄国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但是，结果是历史比邱吉尔的干涉更强大有力，邱吉尔先生的唐·吉诃德式的行为，使他当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不知道，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否能够组织新的进军来讨伐“东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千百万“普通人”都在保卫和平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 26 年前一样被击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
1952 年版第 47—55 页◇502◇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

（1946年3月22日）

问：您认为作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的联合国有怎样的意义？

答：我认为联合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这一国际组织的力量在于，它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平等的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国家统治另一些国家的原则上。如果联合国在将来仍能继续保持这种平等原则，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在保证普遍和平和安全方面起巨大的良好的作用。

问：许多国家中的许多人现在担心发生战争，据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我深信，任何民族，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发生，他们要和平，他们力图保障和平。这就是说，“现在担心发生战争”不是由这方面所引起的。我认为“现在担心发生战争”，是由于某些政治集团从事宣传新战争，从而散播纠纷和不信任种子的行动所引起的。

问：爱好自由的各国政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宁，目前应该做些什么？

答：必须由各国社会人士和统治集团组织广泛的反宣传来反对新战争的宣传者和保障和平，必须使新战争宣传者的任何言论都受到社会人士和报界的应有的驳斥，从而必须及时地揭露战争◇503◇挑拨者，不让他们滥用言论自由来反对和平的利益。

1946年3月22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54—55页◇504◇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7号。1946年5月1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同志们！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今天，我们是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以来，第一次在以对敌艰苦斗争中的重大牺牲和损失为代价赢得的和平生活的条件下，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

一年以前，红军在柏林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彻底击败了法西斯德国，在对德战争胜利结束以后4个月，帝国主义日本也放下了武器，由国际反动势力准备并由主要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了。

法西斯主义及世界侵略势力的主要策源地被粉碎和消灭，使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得到了广泛发展。人民群众受到战争教训以后，懂得了不能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那些追求自私的狭隘阶层的反人民目的的反动统治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人民不愿意再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正在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建立民主秩序，积极地进行反对反动势力、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

世界各国人民不愿战争的灾难重演，他们坚持不懈地为巩固和平和安全而斗争。

苏联过去在粉碎法西斯主义的事业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并完◇505◇成了伟大的解放使命，它现在站在为和平和安全而斗争的前列。

由苏联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已有可能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生活，实现自己的历史愿望。在这一道路上，他们得到苏联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

全世界已有可能不仅确信苏维埃国家的威力，而且确信以承认一切民族平等和尊重它们的自由和独立为基础的苏联政策的正义性。毫无疑问，苏联今后也将忠于自己的政策——和平和安全的政策，各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政策。

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就着手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人在热情奋发地从事为战争所中断了的和平建设劳动。

苏联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1946—1950年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法令，为我们祖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为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为我国物质福利和文化的提高展开了新的前景。

我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把新五年计划当作是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战斗纲领。可以期望，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将不遗余力地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新的五年计划。

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必须记住伟大的列宁的指示：转向和平劳动之后，我们还应经常保持警惕，并且像爱护服珠一样爱护我国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力量。

苏联的武装力量——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履行了他们对祖国的职责。

现在，我们的武装力量面临着同样重要的任务——警惕地保卫已赢得的和平和苏联人民的建设性劳动，做苏联利益的可靠的支柱。◇506◇

这一光荣的任务，只有在我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艺术进一步提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胜利完成。

苏联武装力量必须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

发展的基础上，日益提高自己的军事学术水平。

毫无疑问，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光荣地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同志们！军官、将军同志们！

男女工人同志们！男女农民同志们！智力劳动者们！

红军复员军人们！

我代表政府和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五一”节！

为了纪念劳动人民的国际节，

我命令：

今天，5月1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同首都以及在利沃夫、柯尼斯堡，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旅顺口，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我们英勇的武装力量万岁！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苏　联　大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60—63页◇507◇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1946 年 9 月 17 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问：现在全世界都在不负责任地纷纷谈论“新战争”的危险，您是否相信有这种实际危险呢？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存在，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防止战争呢？

答：我不相信“新战争”的实际危险。

现在发出“新战争”叫嚣的，主要是军界和政界的情报人员和他们在文官中的为数不多的拥护者。他们所以需要这种叫嚣，至少是为了：（一）用战争的怪影来恐吓他们的缔约伙伴中的某些天真的政治家，以便帮助自己的政府从缔约伙伴那里获取更多的让步；（二）使本国在一个时期内难以缩减军事预算；（三）阻止军队复员，并以此来预防本国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

必须把现时所进行的“新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实际危险严格区别开来。

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有意识地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

答：我不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能够“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够断言。

问：用华莱士先生最近演说中的话来说，英国、西欧和美国是◇508◇否可以相信苏联的对德国的政策不会变成俄国人图谋反对西欧的工具？

答：我认为苏联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是不会有的事情。我认

为这是不会有的事情，不仅因为苏联同英法之间有反对德国侵略的互助条约，同美国之间有三大国波茨坦会议决议，而且因为这种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的政策违背苏联根本的民族利益。

简单地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于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我想，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是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证之一。

问：有人说西欧共产党的政策是“由莫斯科指使的”，您对这种指责有什么意见？

答：我认为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是从破产了的希特勒—戈培尔武库中借来的。

问：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您是否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否相信华莱士演说中说到的两种制度间的“友好竞赛”？

答：我无条件地相信。

问：据我了解，当工党代表团在这里时，您曾表示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有可能建立友好关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建立英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的这种友好关系呢？

答：我确实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两国之间政治，贸易和文化的联系，将大大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

问：您是否认为全部美军最迅速地从中国撤退，是未来的和平所迫切需要的？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509◇

问：您是否认为美国在事实上垄断原子弹是对和平的主要威胁之一？

答：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活动家爱那么说的那样厉害。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种经衰弱的人的，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

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

问：就苏联而言，您是否认为，当苏联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时，它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会减少？“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是否可能？

答：我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

“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68—70页◇510◇

答美国合众社社长休·贝利先生问

（1946年10月23日接到的问题）

1.**问**：国务卿贝尔纳斯上星期五在广播演说中说苏美关系已日益紧张，您是否同意这种意见？

答：不同意。

2.**问**：如果存在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您是否可以指出产生这种紧张的一种或几种原因，以及用哪些主要方法来消除它？

答：由于已答复上一问题，这一问题就不成立了。

3.**问**：您是否认为目前的谈判将导致和约的签订，从而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是盟国的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诚挚的关系并消除前轴心国家发动战争的危险？

答：我对此寄予希望。

4.**问**：不然的话，在曾经是这场伟大战争中的盟国的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这种诚挚的相互关系，有哪些主要障碍？

答：由于答复了上一问题，这一问题就不成立了。

5.**问**：俄国对于南斯拉夫不签署对意和约的决定的态度如何？

答：南斯拉夫不满意是有根据的。

6.**问**：您认为目前对全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是什么？

答：是新战争挑拨者，首先是邱吉尔及其在英国和美国的同◇511◇谋者。

7.**问**：如果这一威胁一旦发生，那么为了避免新战争，世界各国人民应当采取哪些步骤？

答：应当揭露和制止新战争挑拨者。

8. **问**：联合国是不是各小国保持完整的保障？

答：现在还难说。

9. **问**：您是否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德国的四个占领区应当实行统一的经济管理，以便便德国恢复为和平经济的单位，从而减轻四大国占领的负担？

答：需要恢复的不仅是德国的经济统一，而且还有政治统一。

10. **问**：您是否认为目前有可能成立一个由德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央行政机关，由盟国监督，使外长会议有可能制定出对德和约？

答：是的，我认为有可能。

11. **问**：根据今年夏季和秋季在德国各占领区进行的选举来判断，您是否确信德国在政治上正沿着民主道路发展，因而它将来有成为和平国家的希望？

答：我暂时还不相信这一点。

12. **问**：您是否认为，正像某些人士所提议的那样，应当把准许德国保留的工业的水平提高到达成协议的水平之上，以便使德国的生活较有保障？

答：是的，我认为应当。

13. **问**：为了防止德国重新成为对世界的军事威胁，除了现有的四大国计划之外，还应当做些什么？

答：应该在实际上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并使它彻底民主化。◇512◇

14. **问**：是否应该允许德国人民恢复自己的工业和商业，使他们有可能自给？

答：是的，这是应该的。

15. **问**：据您的意见，波茨坦会议决议是否已在执行？如果没有执行，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使波茨坦宣言变成有效的工具？

答：没有一贯执行，特别是在德国民主化方面。

16. **问**：您是否认为在四国外长谈判时和联合国理事会会晤时滥用了否决权？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

17. **问**：依照克里姆林宫的意见，盟国捉拿德国次要战犯归案的工作应做到什么程度？是否认为纽伦堡的决定已为这种行动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基础？

答：做得愈彻底愈好。

18. **问**：俄国是否认为波兰西部边界是永久的？

答：是的，是这样认为。

19. **问**：苏联对英国军队驻在希腊的看法怎样？它是否认为英国应当供给目前希腊政府以更多的武器？

答：这是不必要的。

21. **问**：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驻有多少俄国军队，据您的意见，为了保障和平这些军队应当驻扎到什么时候？

答：在西方，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苏联现在共驻有 60 个师（步兵师和装甲坦克师都在内）。这些师大部分没有满员。在南斯拉夫没有苏联军队。再经过两个月，即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年 10 月 22 日关于最后一批复员的◇513◇命令实行后，将在上述国家留下苏军 40 个师。

21. **问**：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军舰驻在地中海的态度怎样？

答：无所谓。

22. **问**：目前俄国和挪威的贸易协定的前途怎样？

答：现在还难说。

23. **问**：芬兰在支付赔款后，能否仍为自给的国家，是否存在某种意见，主张重新审查赔款计划，以便加速芬兰的复兴？

答：问题提得不对。芬兰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完全自给的国家。

24. **问**：苏联和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对于苏联的恢复工作有什么意义？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您愿意得到何种外援？

答：苏联和瑞典签订的协定，是对各国经济合作的一种贡献。

25. **问**：俄国是否还愿意取得美国的借款？

答：愿意。

26. **问**：俄国是否已有自己的原子弹或任何类似的武器？

答：没有。

27. **问**：您对于作为战争工具的原子弹或类似的武器有什么看法？

答：我在大家都知道的对沃斯先生所提的问题的答复中，已对原子弹作了自己的估计。

28. **问**：按照您的意见，怎样才能最好地管制原子能？这种管制是否应当建立在国际的基础上？为了建立有效的管制，各大国应当在何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主权？

答：需要严格的国际管制。

29. **问**：恢复俄国西部被严重破坏的区域需要多少时间？◇514◇

答：6—7 年或更多的时间。

30. **问**：俄国是否准许在苏联领空开辟商业性航线？俄国是否打算在互惠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航线扩展到其他大陆？

答：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31. **问**：您的政府对占领日本的看法怎样？您是否认为在现有的基础上占领日本是有成绩的？

答：成绩是有的，但是可以达到更好的成绩。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
1552 年版第 71—75 页◇515◇

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①]

（1946年12月21日）

1.**问**：您是否认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制有可能同像苏联现存的那样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管理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并肩相处，而且任何一方也不会企图干涉另一方的内部政治事务？

答：当然可能。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的不同并没有妨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

2.**问**：您是否认为，联合国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苏、英、美之间在根本的政策问题和目的上能否达成协议？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许多方面，联合国这个组织的命运取决于三大国能否达到协调。

3.**问**：大元帅是否认为，我们两国达成关于互相交换工业品和原料的广泛经济协定会是走向普遍和平的重要步骤？

答：是的，我认为这会是走向建立普遍和平的重要步骤。我当然同意这点。国际贸易的扩大，会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两国◇516◇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发展。

4.**问**：苏联是否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建立有所有联合国国家的武装力量参加的、可以立刻开到任何一个和平受着军事行动威胁的地方去的国际警察部队呢？

————————————

① 埃利奥特·罗斯福是美国总统富·德·罗斯福的儿子。他于1946年12月21日访问了斯大林，并于1947年1月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展望》双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记述这次访问的文章。本篇是塔斯社根据这篇文章摘发的斯大林对他提出的12个问题的回答。——编者注

答：当然赞成。

5.**问**：如果您认为原子弹应该由联合国加以管制，那么，联合国要这样做，是否应当对一切研究机关和制造各种武器的工业企业，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发展进行检查，建立管制呢？（此处埃利奥特·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斯大林立刻问我：‘是所有的国家吗？’我说：‘是的，但具体地说，俄国在原则上是否同意这计划？’”）[①]

答：当然同意。根据平等的原则，对俄国不应当有任何例外。俄国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应该服从同样的检查和管制的规则。（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甚至也没有提到保留否决权的问题。”）

6.**问**：您是否认为，召集另一次三大国会议来讨论目前威胁着普遍和平的一切国际问题是有益的？

答：我认为应当召开的不是一次会议，而是几次会议。如果召开几次会议，那它们将有助于达到非常有益的目的。（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这时，我的妻子问道，他是否认为这种会议会促进在各有关政府较下级的代表之间建立较紧密的关系。她还问，是否由于战时的历次会议而达到了这样的状况。斯大林向她笑了笑回答说：‘这没有丝毫疑问。战时的会议和所达到的结果，大大地◇517◇帮助了建立较下级人员之间的合作。’”）

7.**问**：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其他国家存在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我想问您，您是否认为美国11月举行的选举表明人民已不相信罗斯福的政策，转而相信他的政敌的孤立主义政策？

答：我不那么熟悉美国人民的国内生活，但是，我觉得，选举已表明现在的政府是在糟蹋已故总统所建立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资本，这样它就便利了共和党人获得胜利。(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大

———————————————

① 括号里的话是塔斯社加的，下同。——编者注

元帅是用非常着重的语气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

8. **问**：您认为在罗斯福逝世以后，我们两国之间友好联系和相互了解减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认为，如果这一问题所指的是美国人民和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了解，那就一点也没有恶化，相反地，关系是改善了。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是发生了误会。先是有点恶化，然后就有人大肆喧嚷，叫喊什么今后关系将更加恶化，但是在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可怕的东西，足以破坏和平或引起军事冲突。任何一个大国，即使它的政府力图这样做，在目前也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去反对另一个盟国，另一个大国，因为在目前，没有本国的人民，谁也不能打仗，而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人民已经疲于战争。此外，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目的，可以用来为新战争辩解。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应该去打仗，所以，美国政府的某些代表谈论我们两国的关系恶化，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可怕。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新战争的威胁不是实际存在的。

9. **问**：您是否赞成在我们两国之间广泛地交换文化和科学性质的情报，您是否也赞成彼此交换大学生、艺术家、科学家和教授？◇518◇

答：当然赞成。

10. **问**：美国和苏联是否应当制定一个共同的长期援助远东各国人民的政策？

答：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和美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11. **问**：如果美苏之间达成一项借贷办法的协定，这种协定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的利益吗？

答：这种信贷办法无疑会对美苏双方都有利。（此处罗斯福在括号里指出：“然后我提了一个使欧洲许多国家显然感到不安的问题。”）

12. **问**：德国的美、英占领区没有实行肃清纳粹主义的计划，这个事实是不是造成苏联政府不安的重大原因？

答：不，这不是造成严重不安的原因，但我们的共同计划的这一部分没有实行，苏联当然感到不快。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
1952 年版第 76—80 页◇519◇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

（第10号。1947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

陆海军士兵和军士同志们！陆海军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今天我国庆祝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军队走过了光荣的道路。苏联军队的全部历史是发扬英雄气概、忘我地为祖国服务和英勇地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的生动范例。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卓越胜利上面。祖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军队的英雄业绩。

苏联军队是在我国全体人民为了完成消除战争后果、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而紧张劳动的条件下，庆祝自己的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的。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胜利地完成了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计划，现在正在为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速度，为工农业的新高涨，为增加日用品的产量，为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忘我地奋斗。

这次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完全胜利了。这说明苏联社会的一致是牢不可破的，这说明全体苏联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府和共产党的周围，并决心使自己的祖国进一步繁荣。◇520◇

在平时的条件下，苏联军队在完成规定的战斗训练任务时，也必须不断前进，在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方面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巩固和平的事业、保证我们祖国安全的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

战争中需要什么，军队就训练什么，这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苏联

武装力量进行战斗训练的指导原则，经验证明，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和精神素质，具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素养，能熟练掌握技术兵器，能密切协同动作以及具有很大的耐力。

我陆军、空军和海军全体人员的任务在于，每天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作战艺术，继续深入研究战争经验，并且要善于运用这种经验。

陆海军的将军和军官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的理论知识，以及掌握在平时训练中十分需要的部队训练法。

陆海军军士应该努力提高指挥能力，以便在维护军纪、训练和教育陆海军士兵方面，真正成为军官的最亲密的助手。

陆海军士兵应该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射击、战术、队列、专业、政治等方面的素养，锻炼身体，成为善于克服行军和战斗中的任何困难的熟练的军人。

所有指挥员和首长在训练和教育部属的同时，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伙食、住处、服装，使军人及时地得到他们应得的全部供给品。

我国武装力量战斗力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首先建立在军人的高度觉悟和对军人的政治教育基础上的严格的军纪。所以，所有指挥员和首长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军纪，严格要求，同时，必须经常教育部属忠于祖国，自觉地履行军人职责和加强对保卫祖◇521◇国这一事业的个人责任感。

陆海军士兵和军士同志们！陆海军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

为了庆祝苏军建军二十九周年，**我命令：**

今天，2 月 23 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加里宁格勒、利沃夫，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旅顺口和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齐鸣礼炮 20 响。

苏联陆军和海军万岁！

我们苏联政府万岁！

我们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祖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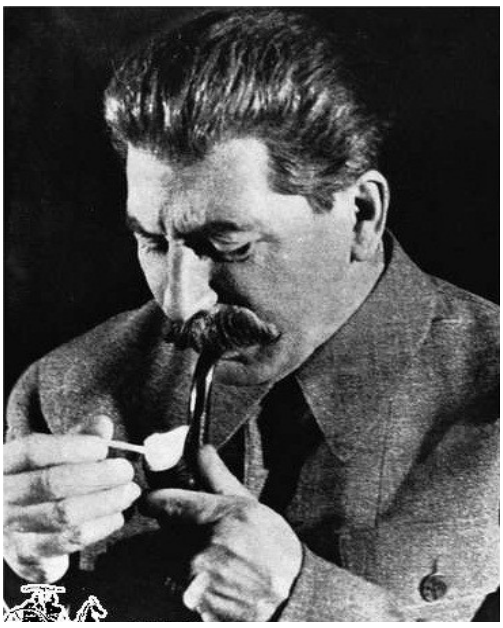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苏　联　大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 1947 年 2 月 23 日《真理报》

◇522◇

开玩笑的斯大林



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舔犊情深

促膝谈心

送别战友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
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的记录
（1947年4月9日）

史塔生说，他感谢斯大林的接见。他史塔生请求接见，是为了向作为国家元首的斯大林表示敬意。他史塔生已完成其周游欧洲各国的有趣旅行，旅行时他对各国战后经济状况特别关心。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各国人民的繁荣有重大意义。苏美之间的关系，在战时曾经有过重大意义，今后也将有重大的意义。他史塔生了解到苏美两国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苏联的经济建筑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它的发展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美国存在的是私人资本的自由经济。他史塔生很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这两种经济制度能在战后在同一世界内共同生活和彼此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既然是谈它们的合作，它们彼此的差别也就没有重大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这里当然是指，如果有合作的愿望，那么，尽管经济制度不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的愿望，那么，◇523◇即使是经济制度相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会打起来的。

史塔生说，合作的愿望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过去在战前，两国都有人在各种不同的讲话中说不能合作，在战前，斯大林本人也谈过这一点。但是，他史塔生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由于战争事件，由

于德日法西斯轴心的失败，形势已经改变，现在如果有合作愿望，则苏美之间即可望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他决不可能说过两种不同的制度不能合作。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斯大林说，列宁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苏联人则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可能他斯大林曾经说过：一种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不愿合作，但这是指愿望这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至于合作的可能性，他斯大林所持的是列宁的观点：两种经济制度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合乎愿望的。同样，讲到苏联的人民和共产党的合作愿望，那他们是有这种愿望的。这种合作无疑只会对两国有益处。

史塔生回答说，这是很显然的。他所提到的那些话，是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 1937 年全会上说的。在这些话中所谈的是“资本主义包围”以及“垄断的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从今天斯大林的话中，他史塔生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现在日本和德国失败以后，形势已经改变了。

斯大林说，在共产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或任何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斯大林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过两种制度不可能合作。他斯大林说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和进攻苏联的危险。如果一方不愿合作，这就是说，存在着进攻的威胁。的确，德国不愿意同苏联合作，就进攻了苏联。苏联能不能同德国合作呢？◇524◇苏联能够同德国合作，但德国人不愿意合作。否则，苏联就会像同其他任何国家合作一样，同德国合作了。可见，这是指愿望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而言。

应当把合作的可能性同合作的愿望区别开来。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意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

史塔生说，愿望应该是相互的。

斯大林回答说，他应当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俄国人是有合作愿望的。

史塔生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一点，并且说他想谈谈斯大林关于美国同德国经济制度相同的说法。他应当说，当德国发动战争时，美国同德国的经济制度是彼此不同的。

斯大林不同意这一点，并说，美国与德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在经济制度上却没有差别。政治制度是 暂时的政治的因素。

史塔生说，曾有很多文章大谈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垄断，帝国主义以及压迫工人等祸害。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在美国，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发展，而且美国的工人享受到的投票权，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得多。美国的经济制度同当时希特勒德国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的差别就在这里。

斯大林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525◇才能合作。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逝世 40 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能得到合作。应该从存在着人民所赞同的两种制度的历史事实出发。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合作。

至于醉心于批评垄断和极权主义，那是进行宣传，而他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宣传家，而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斯大林说，我们不应该成为宗派主义者。当人民希望改变制度时，他们就会把它改变的。当他

斯大林同罗斯福会晤并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漫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

史塔生说，双方自战争结束以来的这类批评，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他史塔生想知道，如果苏联同美国建立了合作，斯大林是否希望将来更广泛地交换思想、学生、教师、艺术家和旅行者。

斯大林回答说，如果建立了合作，那必然会如此的。商品的交换会引起人的交换。

史塔生说，过去苏联同美国产生误解，是因为苏联方面不愿意交换思想，这表现在对外国记者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实行检查上面。例如，拒绝准许《纽约先驱论坛报》派记者驻莫斯科，便是苏美两国人民缺乏相互了解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回答说，拒绝给《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办理签证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这种误会是偶然的现象，同苏联政府的政策无关。他斯大林知道《纽约先驱论坛报》是一家大报，但一部分美国◇526◇记者对苏联的态度恶劣，这一事实也是重要的。

史塔生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已得到允许驻在莫斯科，但只是在外长会议开会期间。现在该报提出派记者常驻莫斯科的问题。《纽约先驱论坛报》是共和党的主要机关报，而现在，在共和党已在国会占多数之后，它就有更重大的意义了。

斯大林说：“这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看不出共和党同民主党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至于记者问题，他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情。三大国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时，在会上，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做了很好的工作。一个美国记者，这人的姓名，他斯大林现在记不起了，发出一个报道，说铁木辛科元帅出席了德黑兰会议，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那里，并且说他斯大林在宴会上打了铁木辛科元帅。这是无礼的和诽谤性的捏造。怎么样呢？这样的记者应该称赞吗？在德黑兰会议的

参加者庆祝邱吉尔65岁寿辰的宴会上，出席的有邱吉尔、布鲁克、李海等近30人，他们都可以作证，绝对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可是这位记者将他臆造的报道发给了报社，而美国报纸便发表了它。这样的记者，能够信任吗？斯大林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应归罪于美国或它的政策。然而这类事件经常发生。这使苏联人产生了一种恶感。

史塔生说，当然，记者发出错误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些记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知道哪些记者可以信赖，哪些记者不可以信赖，结果我们看到，人们会认识清楚，并为进行巨大的军事努力而团结起来。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正确的。◇527◇

史塔生说，每当一个记者显然有意地作出完全不正确的报道时，他的报馆便会把他撤回去，这样，我们的报纸便会为自己造就出能干的诚实的记者干部了。

斯大林说，先是这些记者写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报馆发表了，赚了钱，然后便把这些记者辞退。

史塔生说，两种制度应该在出版、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范围内，找到搞好相互关系的手段。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

史塔生表示他认为，如果对记者的报道不规定检查制度，那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合作和相互谅解来说，就是比什么基础都要好的基础。

斯大林说，苏联很难不实行检查制度。莫洛托夫曾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每当苏联政府废除检查制度，它都得后悔，结果只得重新实行。前年秋天，苏联废除了检查制度。他斯大林当时正在休假，于是记者们开始报道莫洛托夫强迫斯大林去休假，以后他们开始报道他斯大林要回来赶走莫洛托夫。这些记者就这样把苏联政府描绘得像一个动物园似的。当然，苏联人感到愤怒，于是只好重新实行检查制度。

史塔生说，照他现在的了解，斯大林认为如果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合作是可能的。

斯大林回答说，完全正确。

史塔生说，机械化和电气化对提高生活水平有重大的意义，而把原子能用于工业，对各国人民，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史塔生认为建立原子能检查、管制制度，并宣布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为非法，这对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重大意义。◇528◇斯大林是否认为将来有制订出关于管制和调整原子能的生产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的前景？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此抱有希望。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美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正如他斯大林所希望的，双方终归会相互了解的。照他斯大林看来，国际管制和检查将会建立起来，这将有重大的意义。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将使生产过程发生重大变革。至于利用原子能于军事目的，这大概会被禁止。这是各国人民的愿望和良心所要求的。

史塔生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解决了的话，原子能将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的福利，而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将成为最大的祸害。

斯大林说，他认为是能够建立国际检查和管制的。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史塔生为这次谈话向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回答说，请史塔生不必客气，俄国人是尊重他们的客人的。

史塔生说，在旧金山会议时，他曾同莫洛托夫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这次谈话的结果是邀请他访问俄国。

斯大林说，他认为欧洲的情况现在很坏。史塔生先生以为如何？

史塔生回答说，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未遭到战争灾难，它们的情况并不那么坏。例如，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

斯大林说，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小国。

史塔生说，大国的情况很坏。它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是财政、原料和粮食问题。◇529◇

斯大林说，欧洲是世界上这样一块地方，那里工厂很多，但是缺乏原料和粮食。悲剧就在这里。

史塔生说，由于鲁尔的煤矿采掘水平低，所以欧洲缺煤。

斯大林说，英国也缺媒，这是十分奇怪的。

史塔生说，幸亏美国的煤炭采掘水平高。美国每一昼夜采掘 200 万吨肥煤。因此美国能够把大量煤炭运往欧洲。

斯大林说，美国的情况不坏。美国有两个大洋保护。北与弱国加拿大为邻，南与弱国墨西哥为邻。美国用不着怕它们。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后，有 60 年一直享受和平而没有打仗。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的迅速发展。此外，美国居民是由那些早已从国王和土地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情况也有利于美国的蓬勃发展。

史塔生说，他的曾祖父是为摆脱帝国主义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当然，美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有很大的帮助。史塔生说，我们很走运。在离我们海岸很远的地方就把敌人打败了。美国能够将战时生产恢复为平时生产，并在战争结束后大规模地恢复生产。现在的任务是避免萧条和经济危机。

斯大林问，美国是不是将要发生经济危机？

史塔生回答说，他认为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他史塔生相信可以调节美国的资本主义，把就业率稳定在高水平上，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可是主要的任务是避免美国经济制度中的危机。但如果政府实行英明的政策，并考虑到 1929—1930 年的教训，那么在美国占优势的就将是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就能避免危机。

斯大林说，要这样做，就必须有一个抱有很大决心的很强有力◇530◇的政府。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人民应该了解旨在稳定和支持经济制度的那些措施。这是一个新任务，因为在世界各种经济制度中还不曾有过与此相类似的先例。

斯大林说，现在美国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两个竞争者——日本和德国——已被排除。因此，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将增长，这将为美国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像欧洲、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市场对美国是开放着的。这将帮助美国。这种条件以前从未有过。

史塔生说，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市场没有用以支付的资金，因此是美国的一种负担，而不是有利的生意。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危险的体现者的排除，从和平的角度来说，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自然是件大好事，当然世界贸易在过去并不是对美国有重大意义的因素。美国的市场曾经只限于美国境内或西半球范围内。

斯大林说，在战前，美国的生产品大约有10%输出到其他国家。至于购买力，他斯大林认为商人们会找到资金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并把它们转卖给本国的农民。中国、日本、欧洲和南美的商人已经积累了金钱。现在美国的出口将可能增加到20%。是这样吗？

史塔生说，他并不以为如此，

斯大林问：“真的么？”

史塔生肯定地回答并且说，如果美国的出口增加到15%，他将认为美国很走运了。大多数商人积累的是地方通货，这种通货多半只限于在当地使用，而不能用来汇拨。因此，照他史塔生的估◇531◇计，美国的出口不会超过15%。

斯大林说，然而，如果注意一下美国的生产额，15%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史塔生同意这点。

斯大林说，据说美国工业现在有许多订货。这是真的吗？据说美国的工厂做不完这些订货，所有工厂都是百分之百的开足了工。这是

真的吗？

史塔生回答说，是真的，但这些订货都是国内的。

斯大林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史塔生说，对粮食、妇女衣服和鞋子的要求现在能够满足，但是车床、汽车和火车头的生产是落后的。

斯大林说，美国报刊上有这样的报道，说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

史塔生说，报刊上曾报道说，美国失业人数去年11月份必定达到800万人。可是结果证明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任务在于平衡高的生产水平并获得稳定，以避免经济危机。

斯大林指出，史塔生大概是指调节生产。

史塔生回答说是的，并说美国有人断言将发生萧条，但他史塔生较为乐观，断定美国人能够避免萧条，因为他史塔生可以断言，人们对调节的了解比以前更深刻了。

斯大林问："工商界人士怎样呢？他们是否愿意被调节和受限制呢？"

史塔生回答说，工商界人士通常是反对这样做的。

斯大林指出，他们当然要反对。

史塔生说，然而他们了解1929年的萧条不应重演，并且他们◇532◇现在比较懂得调节的必要性了。政府的高度调节，大量的决定和接着采取的合理行动，当然是必要的。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史塔生说，这在任何制度和任何形式的政府下都是必要的。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下，犯错误对于人民都是不好的。

斯大林同意这点。

史塔生说，日本和德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由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军人管理的。例如在日本，经济是由只知道如何打仗的东条领导的。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他史塔生对斯大林给予他谈话的机会和时间表示感谢。

斯大林问，史塔生打算在苏联逗留多久。

史塔生说，他想明天到基辅去，以后他想去向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者表示敬意，然后打算经列宁格勒离开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史塔生正在太平洋美国舰队，他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斯大林格勒的史诗。

斯大林说，尼米兹海军上将看来是位很出色的海军领导者。

斯大林问史塔生是否到过列宁格勒。

史塔生说，他还没有到过列宁格勒，他打算经由列宁格勒离开苏联。

斯大林说，他同史塔生谈话得益非浅。

史塔生说，他同斯大林谈话，对他研究经济问题方面的工作也得益不少。

斯大林说，在战前他也用过很多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他之成为军人是由于必要。◇533◇

史塔生问，他是否可以得到巴甫洛夫所记的谈话记录，以及是否允许他史塔生见到记者时同他们谈论这次谈话。

斯大林说，史塔生可以得到谈话记录，史塔生当然可以同记者谈论这次谈话，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
1952 年版第 1 册第 15—27 页◇534◇

贺　　词

（1947 年 9 月 7 日）

值此莫斯科八百周年的纪念日，谨向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致敬。

今天全国都在庆祝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由于莫斯科对祖国的伟大功绩，全国不是形式主义地，而是满怀热爱和尊敬来庆祝这个日子的。

莫斯科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在我们祖国历史上曾三次从外国的压迫下——从蒙古的枷锁下，从波兰-立陶宛的侵略下，从法国的入侵下解放了祖国。莫斯科的功绩首先在于，它成了把分散的罗斯联合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的基础。如果不摆脱封建割据和诸侯纷争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

可是，莫斯科对于祖国的功绩还不仅在于此。自从莫斯科按伟大列宁的意愿，重新定为我们祖国的首都以后，它已成为新的苏维埃时代的旗手。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新的苏维埃社会经济制度的鼓舞者，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用劳动的统治代替了资本的统治，并且不容许人◇535◇对人的剥削。莫斯科同时还是劳动人类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新的苏维埃民主制的鼓舞者，这种民主制不容许在公民、性别、种族和民族之间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平等而保障劳动权和同工同酬权。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

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毫无疑问，没有这种政策，莫斯科就不可能成为在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内建立各族人民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中心。

现在莫斯科不仅是建设首都劳动者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不再有几百万贫民和失业者处于穷苦和苟延残喘的状态中。莫斯科同时还是世界各国首都在这方面的范例。欧洲、亚洲、美洲各国庞大首都的最严重的毒疮之一，就是存在贫民窟，几百万贫穷的劳动者在那里苟延残喘，缓慢地、痛苦地死去。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完全消灭了这种贫民窟，使劳动者能够从地窖和茅屋中搬进资产阶级的住宅和房屋，搬进苏维埃政权新建的设备完善的住宅。

最后，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是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的倡导者，是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倡导者。对于帝国主义者说来，战争是一件最有利可图的事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竭力用各种方法挑起新战争，这是不足为奇的。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不断地揭露新战争的挑拨者，并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在和平旗帜的周围。大家知道，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莫斯科这个爱好和平的伟大强国的首都，这个和平的强大堡垒。◇536◇

就是因为这些功绩，今天我们祖国怀着对自己首都这样的热爱和尊敬来庆祝莫斯科八百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强大的、亲爱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莫斯科万岁！

约·斯大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
1952 年版第 1 册第 27—29 页◇537◇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1948 年 4 月 7 日）

我想就昨天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意义讲几句话。

这个条约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的转变。大家知道，150 年来，俄国同芬兰的关系是互不信任的。芬兰人不信任俄国人，而俄国人也不信任芬兰人。苏联方面过去曾经试图消除俄国人同芬兰人之间的不信任。这是 1917 年列宁宣布芬兰独立时的事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卓越的行动。但遗憾的是，不信任未能因此而消除，——不信任依然是不信任。结果，我们之间发生了两次战争。

我希望，我们能从我们曾彼此交战两次、长久的互不信任的时期转入我们关系上的新时期——互相信任的时期。必须使我们所缔结的条约消除这种不信任，并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创立新的基础，必须使这个条约成为我们两国关系走向信任和友好的重大转折点。

我们希望，这一点不仅在座的各位能很好的理解，而且这个大厅以外的芬苏两国人民也能很好的理解。

不能认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一下子就可以消除。这一点是不能很快就做到的。不信任的残余和尾巴还会在长时期内存在，◇538◇要消除它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进行很多斗争，來建立苏芬两国相互友好的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得到巩固。

条约有平等的，也有不平等的。苏芬条约是平等的条约，因为它是在双方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

许多人不相信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的关系能够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苏联人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

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本质上的特点，即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就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作出的、使这个宝库更加充实、更加丰富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

因此，苏联人认为，芬兰虽然是个小国，但在这个条约中是作为与苏联平等的一方。

在大国的政治家中，把小民族看成同大民族平等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们大多数都是藐视小民族的。他们并不反对有时对小民族作单方面的保证。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政治家是不愿意同小民族缔结平等条约的，因为他们不认为小民族是自己的对手。

为了苏芬条约，为了这一条约所标志的我们两国关系上的好转，干杯。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 年）》
1950 年版第 1 册第 23—24 页◇539◇

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

（1948 年 5 月 17 日）

我认为，在最近许多以巩固和平、建立国际合作和保证民主为目的的政治文件中，美国第三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是一个最重要的文件。

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不能认为单纯是一个希望改善国际局势、希望和平解决苏美分歧、希望为这种解决寻找途径的声明。美国政府 5 月 4 日的声明和苏联政府 5 月 9 日的答复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们除了声明希望解决苏美分歧以外，没有更进一步。

这封公开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限于声明，而是进了一步，认真向前跨了一步，给和平解决苏美分歧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不能说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已把一切分歧问题包罗无遗。也不能说公开信中某些说法和解释已无须改进。但目前主要的事情不在这里。主要的事情是华莱士先生在他的信中作出了公开和诚实的尝试，对苏美一切主要分歧问题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缔结对德和对日和约，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从中国和朝鲜撤军；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不许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内建立军事基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消除一切歧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援助和在经济上恢复那些遭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在世界各◇540◇国保卫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华莱士先生的方案。但有一点毕竟是无疑的：任何一个关心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合作的国务活动家，都不能无视这个方案，因为它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巩固和平的希望和意愿，并

且无疑会得到千百万“普通人”的拥护。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赞同把华莱士先生的方案作为苏美协议的基础。至于苏联政府，它认为华莱士先生的方案，是可以作为达成这种协议和发展国际合作的一个良好而有成效的基础的，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苏美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绝对必要的。

1948 年 5 月 17 日于莫斯科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 年）》
1950 年版第 1 册第 27—28 页◇541◇

答《真理报》记者问

（1948 年 10 月 29 日）

问：对于安全理事会讨论柏林局势问题的结果和英、美、法代表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这是英、美、法统治集团的政策的侵略性的表现。

问：今年 8 月，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曾一度达成协议，这事是否确实？

答：是的，是确实的。大家知道，今年 8 月 30 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曾在莫斯科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同时实行如下措施：一方面撤销运输限制，另一方面在柏林采用苏占区的德国马克为唯一通货。这一协议并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威信，它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并保证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但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宣布不同意它们在莫斯科的代表的行为，宣告这一协议无效，也说是说，破坏了这个协议，而决定将问题提交英国人和美国人拥有有保证的多数的安全理事会。

问：最近在巴黎，当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在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以前，就在非正式谈判中又就柏林局势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事是否确实？

答：是的，是确实的。阿根廷的代表，即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布拉穆利亚先生,代表其他有关国家同维辛斯基同志作了非正◇542◇式谈判，他手里确实有过一份协商好了的解决柏林局势问题的方案。但是，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又宣告这个协议无效。

问：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能否解释一下？

答：问题在于，美英侵略政策的鼓舞者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同苏联达成协议和合作。他们需要的不是协议和合作，而是谈论协议和合作，

以便破坏协议，委罪于苏联，并以此“证明”不可能同苏联合作。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战争挑拨者，最怕同苏联达成协议和合作。因为同苏联达成协议的政策会削弱战争挑拨者的地位，使这些先生的侵略政策成为无的放矢。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撕毁业已达成的协议，宣布不同意和苏联一道拟定这种协议的自己的代表的行为，并违反联合国宪章，把问题转交给安全理事会，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有保证的多数，他们在那里可以“证明”他们所乐意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不可能同苏联合作，“表明”新战争的必要，从而为发动战争准备条件。美国和英国现在的领导人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

问：对于中国、加拿大、比利时、阿根廷、哥伦比亚、叙利亚等六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行为，应作如何看法？

答：显而易见，这些先生是在支持侵略的政策，支持发动新战争的政策。

问：这一切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

答：结果只能是新战争挑拨者可耻地破产。邱吉尔这个新战争的主要挑拨者所已得到的，就是丧失了他本国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对他的信任。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所有其他的战争挑拨者。各国人民对不久前的战争惨祸记忆犹新，拥护和平的社会力量非◇543◇常强大，所以主张侵略的邱吉尔的徒子徒孙们是不可能战胜他们，使他们转到新战争方面去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 年）》
1950 年版第 1 册第 32—34 页◇544◇

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问

（1月27日接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愿意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同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证实两国政府都无意诉诸针对对方的战争？

答：苏联政府愿意研究发表这种宣言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和美国政府共同实行一些旨在实现这种和平公约的措施，如逐步裁军那样的措施？

答：在实行旨在实现和平公约和导致逐步裁军的措施方面，苏联政府自然能够同美国政府合作。

第三个问题：如果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同意把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是否愿意取消苏联当局对柏林同德国西部各区之间的交通所实行的限制？

答：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遵守第三个问题中所说明的条件，苏联政府不认为取消运输限制有什么障碍，但是，同时要取消三国所实施的运输和贸易的限制。

第四个问题：阁下是否愿意同杜鲁门总统在一个双方都能同◇545◇意的地点会晤，以讨论缔结这种和平公约的可能性？

答：我从前就声明过，不反对会晤。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9年）》
1953年版第21—22页◇546◇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①

（1950年6月—7月）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547◇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

————————————————

① 1950年5月9日—7月4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每周定期出版两整版的讨论专刊。该报编者说：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这一年的6—7月写了几篇著作，在《真理报》发表，随后于8月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由真理报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编者注

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作例子来说吧。最近30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如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失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548◇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

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在十月革命以前为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就同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很好一样。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就同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很好一样。◇549◇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它对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对社会是统一的，同样地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

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使自己必然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550◇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先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

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在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宥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像唐·吉诃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551◇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

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是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552◇

至于后来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①]，那么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

① 俄文 народность 和 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 нация 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 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一句子中与 народность 并用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是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①]、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553◇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

———————————————

① 原文是 диалект ，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也用以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①]。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554◇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不包含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的一个地方，那里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②]，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像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像马克思否定了统

————————————————

① 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 salon 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55 页。——编者注

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圣麦克斯》中引证另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①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555◇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②。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卷第410页。——编者注

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556◇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①]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使贵族显得与众不同的人造语……是从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像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伯爵领地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

———————————————

① 即保尔·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编者注

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而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557◇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对社会是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

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558◇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559◇具，永远是全民的，

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①]。奇怪的是，我们某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②]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③]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560◇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属于在社会存在的时间内始终起作用的社会现象之列。它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561◇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

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对社会一切成员是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①]。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词组合成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语法（词法，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的汇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才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562◇

语法的特点在于，它得出词的变化的规则，而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得出造句的规则，而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语、具体的谓语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如何。因此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像出来，研究作为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的基础的一般的东西，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

————————————————

① 指仅由一个词根构成的单纯词。——编者注

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

就这一方面来说，语法很像几何学，几何学得出自己的定理，也是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不是规定某些具体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规定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像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像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563◇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况且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出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就会把人们相互交际的事情完全弄糟。

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自己的规则并使之更精确，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563◇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

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规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条件。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的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格说在法国“1789 年到 1794 年间发生了突然的语言革命”（见拉法格的《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任何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当然，在这个时期中法语◇564◇的词汇增加了许多新词语，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有些词的含义改变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丝毫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语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用说，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五六年的时间是少得可笑，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 3—10 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

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时候，新语言的形成是经过爆发,经过从旧质到新质◇565◇的突然过渡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像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但是这并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强它。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巾，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

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

至于俄语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留了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趋于完善。

无疑地，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任何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567◇这个任务，——它简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或者是不懂得这个任务。

问：《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十分胆怯地试图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或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

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美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568◇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①]，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中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

——————————————

① 19世纪头25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编者注

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或“拉普派”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569◇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不应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以至于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①]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②]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③]理论的表现。其实，不可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

————————————————

① 19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编者注

② 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來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сал，бер，йон，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编者注

③ 亦称基础语、母语或祖型语。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一般理解，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语分化发展而成的。——编者注

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570◇带来很大的益处。更不用说，“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这就是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中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浯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載于 1950 年 6 月 20 日《真理报》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 **问**：您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571◇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572◇生产工具，像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2.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②]。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③]依据您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來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573◇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25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5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109 页。——编者注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574◇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防止像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

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裨大的益处。

3. **问**：您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绝对对立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您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简单说来，您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惰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575◇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4. **问**：您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

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來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宥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5. **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576◇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聪明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疡，才会使苏联

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1950 年 6 月 29 日

载于 1950 年 7 月 4 日《真理报》

答 同 志 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您的来信太迟了，因为您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577◇

您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

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年7月11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578◇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像19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579◇人[①]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 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人的思想是赤裸裸

———————————————

① 澳洲人指澳洲土著人。他们在19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火地人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16世紀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靠渔猎生活，十九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编者注

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像、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像、知觉、◇580◇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年7月22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您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19世纪40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581◇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

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582◇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通常是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583◇(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那里说：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①]。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页。——编者注

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您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您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像是走投无路了。霍洛彼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584◇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其中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吉，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融合为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许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585◇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像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

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译自《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3 年版◇586◇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问：英国首相艾德礼最近在下院说，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没有裁军，即没有把军队复员，说从那时起，苏联愈来愈多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艾德礼首相这样说是对苏联的诽谤。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在战后已经把军队复员了。大家都知道，复员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和第二两批是在 1945 年，第三批是自 1946 年 5 月至 9 月。此外，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又把苏军中年龄较大的人员复员，而在 1948 年初，所有剩下的年龄较大的人员都已经复员了。

这些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如果艾德礼首相擅长财政学或经济学，他就不难了解：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苏维埃国家在内，能够在尽力发展民用工业的时候，在开工修建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类似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阿姆河上的水电站那样的伟大建设工程的时候，在继续实行同样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不断降低日用品价格的政策的时候，在投资数千亿以恢复被德国占领者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时候，还同时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大军事工业。不难了解，这种轻率的政策必将招致国家的破产。艾德礼首相应该从他自己以及美国的经验中懂得，增加国家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备竞赛，就会使军事工业扩◇587◇大，民用工业缩减，就会使巨大的民用建设工程停顿，赋税增加，日用品价格上涨。显然，如果苏联不是縮减而是扩大民用工业，不是收缩而是扩大新的规模很大的水电站和灌溉系统的建设，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

那么，它要是不冒破产的危险，就不能同时又扩大军事工业和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

如果艾德礼首相不顾所有这些事实和科学见解，仍然认为可以公开诽谤苏联和它的和平政策，那么，这只能说，他是想用诽谤苏联的办法来为工党政府现在正在英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作辩解。

艾德礼首相所以需要诬蔑苏联，他所以需要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而把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说成是和平政策，是为了迷惑英国人民，硬要他们相信对苏联的诬蔑，从而用欺骗手段把他们拉进美国统治集团正在策划的新的世界大战。

艾德礼首相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苏联、英国、美国、中国、法国立即缔结和平公约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关于立即开始裁减军备、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迫害拥护保卫和平的人，为什么他禁止保卫和平大会在英国召开呢？难道保卫和平的运动会威胁英国的安全吗？

显然，艾德礼首相所主张的不是维护和平，而是发动新的侵略性的世界大战。

问：关于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您的看法怎样？它的结局会怎样？◇588◇

答：如果英国和美国最终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朝鲜的战争便只能以武装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

问：为什么？难道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比中国和朝鲜的差吗？

答：不，并不差。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一点也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将军和军官差。至于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之好。那么，

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士兵们认为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是完全正义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在美英的士兵中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的确，很难便士兵们相信：既不威胁英国又不威胁美国而其台湾被美国人侵占了的中国是侵略者，而侵占了台湾并将军队推向中国边境的美国倒是自卫的一方。很难使士兵们相信；美国有权在朝鲜领土上和中国边境附近保卫美国的安全，而中国和朝鲜却没有权利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或在本国边境附近保卫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在英美士兵中是不得人心的。

显然，如果士兵们认为强迫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极端非正义的，如果士兵们因此而在前线敷衍塞责，不相信他们的使命合乎正义，情绪低落，那么，就是最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也要吃败仗的。

问：您对于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看法怎样？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

的确，只有丧尽了天良，才会硬说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逼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自己的边境并力求收复被美国人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589◇略者。

原来作为维护和平的堡垒而建立的联合国，现在正在变为战争的工具，变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工具。组成联合国中侵略核心的是10个参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和20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现在在联合国中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命运的就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就是他们在联合国中通过了可耻的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决议。

现在联合国中事态的特点是：例如，美洲的一个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未必有200万，现在却在联合国中和印度占有同样的比重，而比起在联合国中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比重就更大得多了。

这样，联合国正在变成侵略战争的工具，同时它也就不再是权利平等的国家的世界性组织了。实际上，现在联合国与其说是世界性组织，还不如说是满足美国侵略者需要的美洲人的组织。不仅美国和加拿大力图发动新的战争，而且还有20个拉丁美洲国家，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这些国家的地主和商人，渴望在欧洲或亚洲的某个地方爆发新的战争，以便以特别高的价格，向交战国出售货物，在这种血腥的生意中大发横财。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20个代表，现在是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抱得最紧、最顺从的队伍，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

联合国就是这样走上了国际联盟的不光彩的道路。因而它正◇590◇在埋葬自己的道义上的威信，并注定要瓦解。

问：您是否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答：不。至少在目前，不能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都存在渴望新战争的侵略势力。他们需要战争，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这就是那些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他们把战争看作是能产生巨额利润的收入的源泉。

他们，这些侵略势力，掌握着并且指挥着反动的政府。但他们同时又害怕本国人民，因为人民不要新的战争，主张维护和平。所以，他们力图通过反动政府，用谎言蒙蔽和欺骗本国人民，把新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把爱好和平国家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他们竭力欺骗本国人民，以便强使人民接受自己的侵略计划，并把人民拖入新的战争。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害怕保卫和平的运动，怕这个运动会

揭穿反动政府的侵略意图。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否决了苏联关于缔结和平公约、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他们害怕通过这些建议便会破坏反动政府的侵略措施，并使军备竞赛成为不必要。

侵略势力和和平力量之间的这一斗争，会怎样结束呢？

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如果战争挑拨者蒙蔽了人民群众，欺骗了他们，把他们拖入新的世界大战，那战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

因此，广泛的维护和平的运动，作为揭露战争挑拨者罪恶阴谋的工具，现在具有头等的意义。◇591◇

至于苏联，它在今后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译自《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1952 年版◇592◇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1951年10月6日）

问：对于苏联试验原子弹，近来外国报刊在吵吵嚷嚷，您对这种吵嚷的看法怎样？

答：的确，我国在不久以前试验了一种原子弹。今后还要按照我国防御英美侵略集团进攻的计划，进行各种规格的原子弹的试验。

问：由于原子弹的试验，美国各式各样的人士在发出警报，叫嚷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种警报是否有任何根据？

答：这种警报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人士不会不知道，苏联不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而且还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大家知道，苏联曾几次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但是每一次都被大西洋集团的国家拒绝了。这就是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当然，侵略者希望在他们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没有武装。但是苏联不同意这样，认为应当有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因此，如果美国不想进攻苏联，那么美国人士的警报就应该认为是无的放矢的，是虚构的，因为苏联并不想在什么时候进攻美国◇593◇或任何其他国家。

美国人士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原子武器的秘密已不仅仅为美国所有，而且已为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所有。他们想使美国成为原子弹生产的垄断者，想使美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来恫吓和讹诈其他国家。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呢？难道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这种垄断吗？事情恰好相反，正是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首先消

除这种垄断，然后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吗？我想，只有鼓吹原子弹的人看到他们已不再是垄断者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意禁止原子武器。

问：对于原子武器方面的国际管制，您的看法怎样？

答：苏联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苏联主张建立国际管制，使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并把已经制成的原子弹完全用于民用目的的决定，得到十分严格的和认真的执行。苏联所主张的正是这种国际管制。

美国人士也谈“管制”，但是他们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继续这种生产，而且其数量要同各国所拥有的原料的数量相适应。所以，美国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禁止原子武器，而是要使这种武器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使战争挑拨者用原子武器来消灭几万几十万和平居民的那种权利，也成为合法的。不难了解，这不是管制，而是对管制的嘲笑，是对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的欺骗。很明显，这种“管制”是不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意的，他们所要求的是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

译自1951年10月6日《真理报》

致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

（1951 年 12 月 31 日）

东京

尊敬的岩本清先生：

您要我向日本人民致新年贺词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苏联人士没有那种由外国总理向另一国人民表示祝愿的惯例。但是苏联人民对于因被外国占领而遭到不幸的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使我不能不破例答应您的要求。

请转告日本人民，我祝他们自由和幸福，祝他们在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获得完全胜利。

过去苏联人民亲身经　过被外国占领的灾祸，这种占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参加过的。因此苏联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难，深切同情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同当时的苏联人民一样，获得自己祖国的复兴和独立。

祝日本工人能够摆脱失业和低工资的痛苦，消灭日用品价格高昂的现象，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祝日本农民能够摆脱无地和少地的痛苦，取消重税，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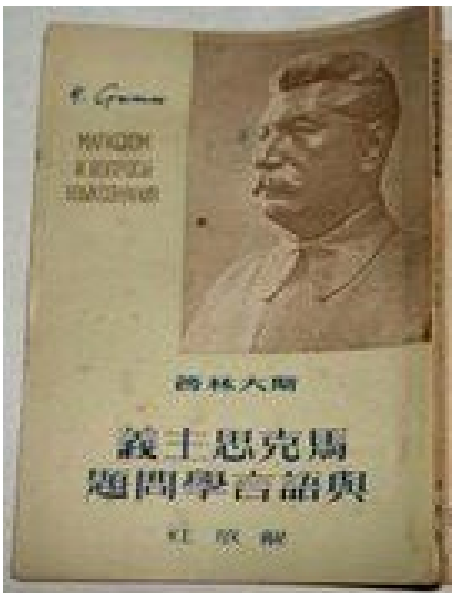
祝全体日本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取得日本民主力量的完全胜利，全国经济生活的活跃和高涨，民族文化、科学和艺术的繁荣，◇595◇并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顺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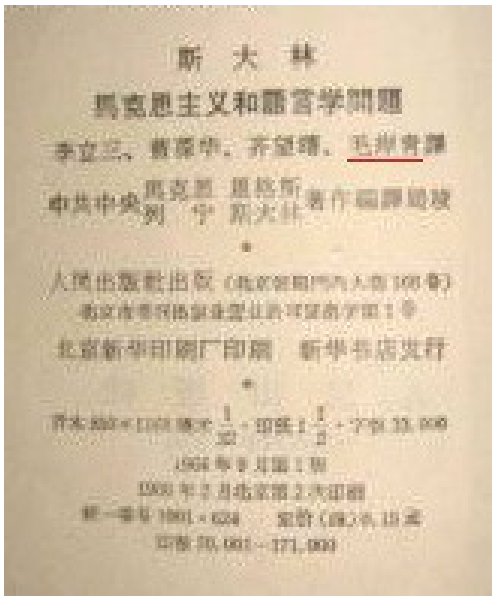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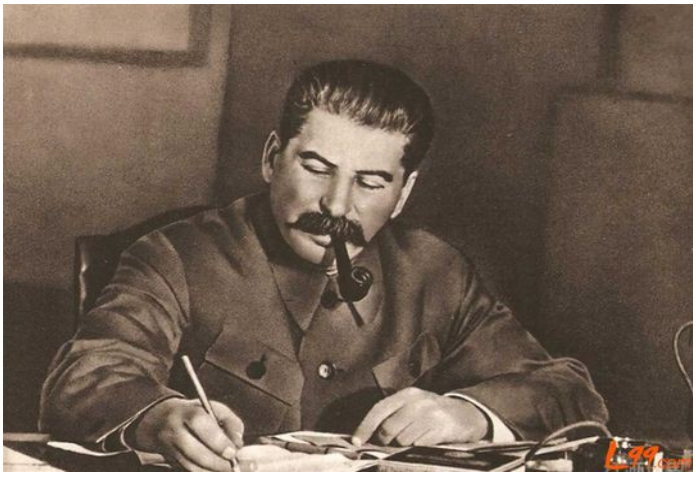
约·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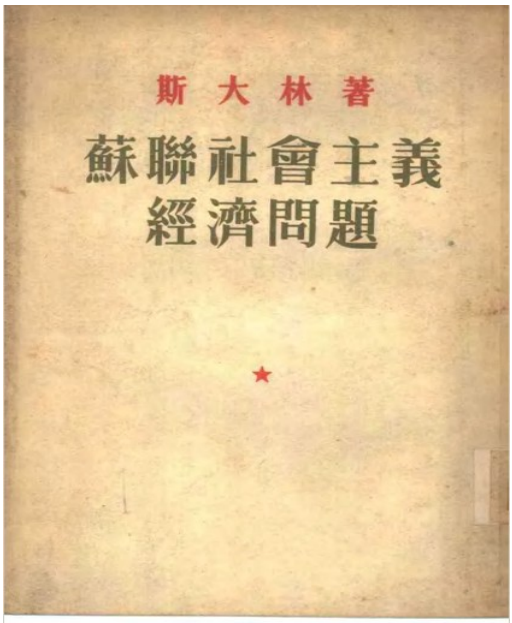
1951 年 12 月 31 日

译自 1952 年 1 月 10《真理报》◇596◇









最后两部伟大的经典著作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①]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1952年2月—9月）

对于和1951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我已经收到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597◇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

————————————

① 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于1951年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在1952年2—9月就这次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著作，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编者注

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598◇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規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599◇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对必然的认识”[①]。究竟“对必然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

（“必然”）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①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对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经济规律的人们，决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600◇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像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扰。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601◇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

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602◇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现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

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603◇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①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604◇

在19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19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

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605◇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

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606◇时期内保存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

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607◇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占有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占有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608◇买卖

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來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609◇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

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用”，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用，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610◇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它的作用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611◇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

的真正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612◇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613◇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像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

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614◇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

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 10—15 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614◇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一些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并不是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只是为了节省篇幅。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616◇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①]，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编者注

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617◇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顺当的，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间成批的同志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修正技师和工程师的意见，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实行新的更现代的定额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

所不能达到的高◇618◇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将来，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所依据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同志们正是这样理解我的说法，以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代之以另一个说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619◇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但同时，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620◇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

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

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①]，仍旧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621◇要快得多”[②]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5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

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622◇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

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623◇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间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一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彻底垮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彻底垮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 15—20 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

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624◇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是以根本消除资本主

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是，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曾经几◇625◇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强烈的反应，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规律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何在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律，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规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不是的。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它像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当然，价值規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价值规律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或各国资本主义

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626◇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这个规律确实预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然而，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平均利润总还可以认为是足够的。这是不对的。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只是想给自己保证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

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意义之一也就在于：这个规律既◇627◇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就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止发展的另一种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情彭，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

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628◇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是不对的。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这一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不能自行产生任何效果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即表现于这一规律的上述要求内。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么，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一）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8.其 他 问 题

（1）关于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地主-农奴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629◇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

人财产。“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搬来的。但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拥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作为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为其个人财产。

（3）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5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包括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630◇

（4）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只是很肤浅和叙述式地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

从于垄断组织。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5）关于在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不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机器。

（6）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么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631◇

（7）关于国民收入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之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

里删去。这一章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乏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列昂节夫、谢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因此，一本好◇632◇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领会、掌握。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学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500页至多不超过600页的教科书。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可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这是不公正的。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633◇以了。的确，只要把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教科书未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认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校审委员会来最后校审教科书，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送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约·斯大林

1952年2月1日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诺特京同志：

我没有急于回信，因为您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紧急的。加上另外有些问题带有紧急性，自然就把您的来信搁下了。◇634◇

现在我来逐点回答。

关于第一点。

在我的《意见》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论点：社会在科学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您断定这个论点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说它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效，说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没有可能利用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封建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封建主反抗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们愚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阻挠这一规律的实现。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说。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已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竭力反抗这一规律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对这一规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635◇

1.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都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2.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在《意见》中说到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阶级背景。那里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但是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

您断定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完全适合，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时代，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

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无疑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有像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有过的那样迅速◇636◇的发展了。

其次，“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第三点。

从您的议论中可以看出，您把我们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看作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看作是商品呢？据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637◇业，丝毫

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这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便于把生产资料出售给外国所必需的。这里，在对外贸易领域内，并且**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生产资料才确实是商品，才确实被出售（不是带引号的出售）。

这样看来，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

原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638◇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

关于第四点。

您断定说，价值规律对于农业中所生产的、依照收购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着调节的影响。您在这里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这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您还可以再加上亚麻、羊毛及其他农业原料。

应该首先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所生产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产资料”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者说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首先是指生产工具的生产，——马克思把这叫作“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它构成“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原料〉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量齐观，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来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谁都知◇639◇道，原料本身不能生产生产工具，虽然某几种原料也是生产生产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

其次，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价格的影响，是否像您诺特京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调节**的影响呢？如果我国存在着农业原料价格的“自由”涨跌，如果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如果我国没有计划经济，如果原料的生产不是由计划来调节的，那么，价值规律的影响就会是调节的影响了。但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

系中，并没有这些“如果”，所以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调节的影响。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并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呢？其实，价值规律本身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上述事实来调节的。

因此，不能否认，价值规律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形成的，它是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

关于第五点。

说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赢利，我在《意见》中曾经反驳了某些同志，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我国计划性的国民经济并不偏重于赢利的企业，既然容许不赢利的企业也和这些企业并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经营的赢利原则本身。在《意见》中说，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640◇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地增长。

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没有特别价值，不值得重视，那就不对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从发展我国生产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无论在计划建设或计划生产时，这都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我国现今发展阶段上经济活动方面的起码知识。

关于第六点。

您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所说的“大大改变了形态的扩大的生产”，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应该说，这样的生产、而且还是扩大的生产，是

世界上所没有的。

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

关于第七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641◇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约·斯大林

1952 年 4 月 21 日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今年 3 月 20 日，雅罗申科同志写了一封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信中谈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讨论会上所讨论过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在这封信中抱怨说，在讨论会的一些总结性的主

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罗中科同志在信中还建议：请淮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他两个助手来做这一工作。

我认为，必须从实质上来分祈一下雅罗申科同志的抱怨和他的建议。

我们先从他的抱怨谈起。

在上述文件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642◇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

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泾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643◇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中科同志在分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

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644◇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 1917 年 10 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 20—25 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 30 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

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645◇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646◇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①]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②]之类的东西了。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③]◇647◇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

————————————————

① 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这部著作于1913—1917年出版。该书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建立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均衡”，是“组织”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无关的单纯的工艺学。——编者注

② 参看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自，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648◇

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

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像小孩那样简单地想像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649◇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

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益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650◇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

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6小时，然后再缩短到5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①]，“劳动◇651◇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②]，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像雅罗申科同志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如果像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3页。——编者注

雅罗申科同志从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作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雅罗申科同志从每一社会形态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经济规律出发，否认需要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与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背道而驰了。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①]。因◇652◇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所作的评注中说，布哈林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与此完全符合的。在这个未定稿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这是很明白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恩格斯说得完全对：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

② 见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编者注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①

显然，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应的。◇653◇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丧失自己独立的作用，并被生产力吞没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必须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组织问题来代替经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科同志正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②。雅罗申科同志没有这样说，却在这样**做**，却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诚然，他同时装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样子，但这是诡计，而且是一钱不值的诡计。事实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为列宁所反对的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编者注

② 见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编者注

事情。雅罗申科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654◇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①]；（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没有用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词。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这有时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一词所指的东西，显然在上述定义中已作为其组成部分包括在内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

2. 当人们谈到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时，他们通常是从下列这点出发的：一个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不然的话，每个社会形态就会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2 页。——编者注

几个基本经济规律，而这是和基本规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罗申科同志并不同意这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655◇是事实。他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总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会生产中的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增长的前途来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雅罗申科同志在同一发言中宣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要有把一切能劳动的人口吸引到社会生产中来所必需的规模。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又是我国宪法根据苏联人享有劳动权这点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所谓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宣称：

“从这点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这已经是第三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了。

所有这些规律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或者仅仅它们中间的一个才是呢？如果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些问题，雅罗申科同志在最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并没有给予回答。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想必是“忘记了”他在三个月前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他已经表述过的其他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概他以为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很成问题的手法。但他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

我们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现在认为在他给中央政治◇656◇局委员们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个公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一看雅罗申科同志的这封信吧。

雅罗申科同志在这封信中说，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见》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他说：

“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您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

显然，雅罗申科同志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并且看不见，谈论消费或者生产占首要地位，这与问题毫不相干。当人们讲到某种社会过程对其他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这两种过程多少是同一类的。可以而且必须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首要地位，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所说的都是生产，因而它们多少是同一类的。但决不能说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或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不正确的。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诚然，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着的领域，但毕竟是各不相同的领域。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了解，这里所说的不是消费或生产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它使社会生产——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服从于什么**任务**。因此，雅罗申科同志关于“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基础，犹如是其他任何社会的生活基础一样”的说法，也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讲社会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讲资◇657◇本主义生产或社会主义生产所服从的任务呢？我以为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①

马克思这些话之所以精辟，因为这些话不仅简要而精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提示了应当向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应◇658◇当服从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4—625页。——编者注

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

雅罗申科同志想保持所谓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于是断定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这是完全不对的。雅罗申科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损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见》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科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罗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弄成了不是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而好像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首要地位”◇659◇这类的东西了。

3.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问题是要单独谈一谈的。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它不包含对于其他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可能有效的什么东西。他说：

“把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上来，是对马克思学说作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而且是和他的学说的本质相矛盾的。”（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其次，他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不能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同上）

讲到马克思在其中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生产（第 I 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 II 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时，雅罗申科同志说：

“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由马克思的第 I 部类的 v+m 和第 II 部类的 c 这个公式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述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是不应当存在的。”（同上）

他断定说：“马克思所制定的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因为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规律。”（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

雅罗申科同志就是这样糟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

当然，马克思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再生产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形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础，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基本内容，就是◇660◇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理论。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就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

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罗申科同志本人虽然如此高傲地蔑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时却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于这些“公式”。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注，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中科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仍然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么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20 章《第 I 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 I 部类的产品在这一部类◇661◇内的交换时，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 I 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见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 8 版第 2 卷第 307 页）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73—474 页。——编者注

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那种“共同社会体系”和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时，也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结果，在这里，在再生产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虽然对于马克思的“公式”发出放肆的议论，却又碰了壁。

4.雅罗中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的末尾，建议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写道：

“根据我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以及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662◇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定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我能在一年内，至多一年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从理论上来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定会把这一科学变成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认，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并不是谦虚。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笔法，可以说：“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经讲过，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社会基金的形成等等——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

我更不必说，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们不能给予他这样的委托。

* * *

结论；

（1）雅罗申科同志对讨论会领导人的抱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能在自己总结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罗申科同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雅罗申科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①]的气味。

约·斯大林

1952 年 5 月 22 日 ◇663◇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可以看出，你们是在深刻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信中有不少正确的说法和有意思的见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我在这封回信中只想谈谈这些错误。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① 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后來成了撒谎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词。——编者注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地、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种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664◇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这就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归根到底，我们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规律性而决心“消灭”经济发展规律和“创造”新规律的“经济”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曾经提出了如下一个

马克思主义对这问题的经典说法：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665◇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①

2. 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国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什么办法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有些同志认为，应该依照从前处理资本主义财产的例子，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这些同志以为，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是唯一的或无论如何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666◇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那么，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所建议的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是：把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提供基本建设投资的负担，让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的文化需要上，而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投资，大部分仍旧应该由国家负担，那就不正确了。由于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一负担承当起来，解除国家这一负担，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为了使我国的消费品极其丰富，国家在

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为了论证这一建议，建议人提出了几个论据：

第一，建议人援引斯大林所说生产资料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向集体农庄出售生产资料，如像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们认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那么国家也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给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像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提并论，或者，把它们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论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丝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像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以及土◇667◇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的。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土地。建议人玩弄“生产资料”这个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又引证说，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1929 年底和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经主张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内偿清机器拖拉机站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贫穷”而失败了，但是现在，当集体农庄已经富裕的时候，可以重新实行这个政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经通过一项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由突击队员的建议，作为试验、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

的，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加以考察。但头一次检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 1930 年底，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导工作人员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们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668◇泉就是现代技术，就是许许多多为这一切生产部门服务的现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丰富的收获，要使农产品丰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把几十万台轮式拖拉机作废，代之以履带拖拉机，把几万台陈旧了的联合收割机作废，代之以新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例如，为经济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负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经过 6—8 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们负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吗？不，负担不了，因为它们没有力量负担要在 6—8 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费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负担得起由于旧机器作废和换用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在 6—8 年之内承担这种损失，直到这笔费用收回为止。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损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降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

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就暂且假定一下，我们接受了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句◇669◇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大概，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就对他们更糟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

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670◇

关于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子。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又是什么呢？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计在内。问题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现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

产品的“换货”。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甜菜和其他的集体◇671◇农庄的产品早已实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使集体农庄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的不仅是货币，而主要是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这将是实际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这样的制度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否有利呢？无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为集体农庄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产品，将比在商品流通中获得的要多得多，价钱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如果把产品交换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那么我国全体集体农庄农民就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了。

约·斯大林

1952 年 9 月 28 日

译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 年版◇672◇

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提出的问题

（1952 年 4 月 20 日）

问：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比两三年前更加临近了？

答：不，不是更加临近。

问；大国首脑会晤有益处吗？

答：可能有益处，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是德国统一的适当时机？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问：在怎样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处才是可能的？

答：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

译自 1952 年 4 月 20 日《真理报》

致苏联少年先锋队员

（1952 年 5 月 20 日）

值此列宁少年先锋队组织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少年先锋队员们和小学生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身体健康，在学习、劳动和社会工作中取得成就。

愿少年先锋队组织今后继续把少年先锋队员和小学生们培养成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忠诚儿女。

约·斯大林

译自 1952 年 5 月 20 日《真理报》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①]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4 日）

同志们！

让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大会，向所有派遣代表光临我们的代表大会或给代表大会拍来贺电的兄弟党和团体表示谢意，感谢它们的友好祝贺，感谢它们希望我们成功的愿望，感谢它们的信任。

我们特别珍视这种信任，这种信任表示它们决心支持我们党为各国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而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如果认为我们党已成为强大的力量而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错了。

这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我们国家过去和将来始终需要外国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这种支持的特点就在于：任何兄弟党对我们党的和平愿望的一切支持，同时也就是对它们本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当 1918－1919 年英国资产阶级武装进攻苏联的时候，英国工人在

——————————————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 1952 年 10 月 5—14 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 1951—1955 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修改党章和选举党中央机构。大会通过决议，把党的名称由“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并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党监察委员会改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编者注

② 斯大林此次讲话当时苏联摄有记录影片，长度 12 分钟，现配上中文字幕供观看，视频链接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MjA4MzczMg==.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TWtRkMttWo/

——本书制作者注

“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下组织了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他们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支持。现在多列士同志或陶里亚蒂同志宣布他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对苏联人民作战，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法国和意大利正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和平愿望的支持。这种互相支持的特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党的利益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不但不矛盾，反而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苏联，它的利益是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根本分不开的。

自然，我们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我们党也必须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大家知道，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在 1917 年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我们党采取了实际措施来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以后，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粉碎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暴政，使欧洲和亚洲的各国人民摆脱了法西斯奴役的威胁。当然，只要这支“突击队”还是唯一的一支突击队，只要它还是几乎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个先进的任务，那么，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从中国和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新的“突击队”，——现在，我们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676◇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当然，它们工作起来是比较困难。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在沙皇制度时期那样困难了，那时候，稍微往前动一动都被宣

布为滔天的罪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坚持下来了，没有为困难所吓倒，而且获得了胜利。这些政党也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进行工作，终究不像沙皇时期俄国共产党人那样困难了呢？

第一，因为在它们面前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和成就的榜样。因此，它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

第二，因为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本身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已经变得更加反动，已经失去同人民的联系，因而把自己削弱了。自然，这种情况也一定会便于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连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了。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料”。人人平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而占公民大多数的被剥削者毫无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677◇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连“民族原则”的影子也没有了。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

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自然，所有这些情况一定会便于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因此，有一切理由指望受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能够成功和胜利。

我们的兄弟党万岁！

兄弟党的领导者们永远健康！

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万岁！

打倒战争挑拨者！

译自《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1952 年版◇678◇

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
詹姆斯·赖斯顿问
（1952 年 12 月 21 日接到的问题）

问：在新年即将到来、合众国新政府即将就职之际，您是否仍然保持自己的信念，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合众国在未来的年代里能够和平相处？

答：我仍然相信：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

问：照您看来，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凡是表现出反苏“冷战”政策的侵略行动的一切地方和事情上。

问：您是否欢迎同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代表举行外交会谈，来研究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答：我赞成这样的建议。

问：您是否愿意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中进行合作？

答：我同意进行合作，因为苏联是希望结束朝鲜战争的。

译自 1952 年 12 月 26 日
《真理报》◇679◇

补 遗（一）

给萨拉托夫—莫斯科煤气管建设与开采管理局的同志们的电报①

（1947年8月16日）

祝贺萨拉托夫—莫斯科煤气管的建设人员、安装人员和开采人员们的生产上的胜利——完成了建设工作并且掌握了世界上第一个远距离煤气输送干线。

萨拉托夫—莫斯科煤气管的建设对于改善我国首都劳动人民的生活、对于发展苏联新的工业部门——煤气工业，是一个巨大贡献。

祝你们在建设新的煤气和石油干线输送管的工作中获得成就。

约·斯大林

原载1947年8月16日《真理报》

———————————————

① 本篇及以下补遗各篇，均分别取自苏联《真理报》、中国《人民日报》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一书。——本书制作者注

给查坡罗什建设工程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 3 日）

谨向查坡罗什建设工程的建设人员和安装人员们以及查坡罗什钢铁厂的冶炼人员们致敬，并祝贺你们巨大的生产上的胜利——完成了修复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破坏无余的查坡罗什钢铁厂的第一期工程，并使冷辗钢片机开工。

苏联人民高度地估计胜利地担当了查坡罗什钢铁厂第一期恢复工作的工人、工程师和技师们的奋不顾身的劳动。

你们的工作表明了，苏维埃人如何运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解决恢复被德国占领者破坏无余的企业的巨大而复杂的任务。

党和政府相信，查坡罗什钢铁厂的全体建设人员、安装人员和冶炼人员，以过去工作的经验丰富了自己，会用全力在最短时期内全部恢复查坡罗什钢铁厂。

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原载 1947 年 10 月 3 日《真理报》

给罗斯托夫顿河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的同志们的电报

（1947 年 11 月 4 日）

祝贺海军第十号建设工程处的建设人员和安装人员们以及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的全体人员的巨大的生产上的胜利——完成了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破坏了的我国最大的农业机器制造厂罗斯托夫厂的第一期的恢复工作，并掌握了新型的“斯大林式－六号”联合机的生产。

我相信，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的建设人员们和联合机制造人员们，以恢复工作的大量经验丰富了自己，会以全力争取在 1948 年内完成工厂的恢复工作，并且掌握工厂生产联合机的能力。

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原载 1947 年 11 月 4 日《真理报》

给布鲁错夫斯克
阿尔泰农业机械厂的同志们的信
（1948 年 10 月 25 日）

祝贺第 211 号管处局和陆军与海军企业建设部特殊组以及农业机器制造部阿尔泰农业机器厂的全体建设人员的生产上的胜利——完成了农业机器制造厂第一期的建设工作和大量生产耕地机。

阿尔泰农业机器厂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你们会同样胜利地完成增加拖拉机犁头的产量工厂的第二期建设工程的任务。

同志们，祝你们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约·斯大林

原载 1948 年 10 月 25 日《真理报》

庆祝荣膺列宁勋章索尔莫沃工厂建立一百周年的信

（1949年7月19日）

工厂经理鲁宾契克同志、总工程师马尔库谢夫同志、联共中央委员会所派党组织者科辛同志、工厂委员会主席尼科诺夫同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所派团组织者马尔科娃同志：

值此索尔莫沃工厂奠立一百周年与荣膺列宁勋章之际，我祝贺全体男女工人、领班、工程师、技师和职员们。

索尔莫沃工厂的人员们，继承着他们的革命传统，以忘我的劳动组织了用加速的方法建造江河轮船的工作，而在履行战后五年计划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我祝你们，索尔莫沃的同志们，在你们供给我国的江河与铁路运输以轮船和机车的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约瑟夫·斯大林

选自《人民日报》1949年7月21日第1版

电贺苏联内河航运部北极远征队经北海航行欧亚成功

（1949年9月12日）

我祝贺内河航运部的北极远征队全体人员，因为你们模范地完成了政府所指定的将内河船只自亚尔干日尔航驶至鄂毕—伊尔蒂施与叶尼塞地区的任务。由于船上的全体人员在完成任务中表现了组织和忘我的精神，所以能够克服了北极航行中的一切困难，并且在短短的时期中，完整无损地把船只驶到了目的地。祝你们在精通新型船只在西伯利亚河流中的远程航行上，及在履行为了国民经济的货运计划获得胜利。

斯大林

选自《人民日报》1949年9月13日第1版

庆祝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
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电报

（1949 年 11 月 19 日）

我为莫斯科汽车工厂二十五周年纪念及工厂获得列宁勋章的荣幸向男女工人们、工程师们、技师们、及其他雇员们致贺。

苏联第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莫斯科汽车工厂，在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上和布尔什维克式的制造汽车人员的训练上，起着主导的作用。

战后，工厂人员已经获得重大的成就，并且在采用进步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完全精通了一九五〇年计划所规定的新型汽车的大量生产。

同志们，我盼望并祝贺你们在技术方面的新成就和我国汽车生产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

选自《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23 日第 3 版

庆祝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建厂二十周年

（1952年4月3日）

斯大林斯克
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
厂长比兰同志：
总工程师叶莫莱耶夫同志：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党组织者卡波夫同志：
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工会委员会主席皮斯吉辛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团组织者莱兹尼可夫同志：

值此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我国的强大的和具有先进技术的冶金企业落成开工二十周年纪念之际，我特向库兹涅茨克联合钢铁厂和斯大林斯克工业建设托拉斯的男女工人、工程师、技师和职员致敬和祝贺。

库兹涅茨克冶金工作者走在苏联英勇的工人阶级的前列，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而且正在继续完成党和政府指定的关于以五金供应国民经济部门的任务。

我衷心祝贺你们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约·维·斯大林

补 遗（二）

给芬兰总统的信

（1948 年 2 月 22 日）

我们两国在反对希特勒侵略战争中，曾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我们容许那种侵略重演，我们和你们将来就都应该对我们两国的人民负责。我认为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以反对可能的德国侵略，是符合于芬兰的利益的，并希望为了巩固和平与安全，在我们两国间造成根本改善邦交的条件，苏联政府建议缔结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如果芬兰不反对，我就建议芬兰派代表团来苏缔约，如果你觉得在芬兰谈判缔约更方便的话，苏政府将准备派代表团去赫尔辛基。

选自《人民日报》1948 年
3 月 7 日第 2 版

关于苏联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

（1948 年 10 月 12 日）

接获阁下十月八日来函，得悉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已开始执行其职务，并建议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大使以及建立两国间适当的经济关系。始终扶持朝鲜民族权利使其建立单一的独立国家的苏联政府，庆贺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贺它在为朝鲜的民族复兴及民主发展的活动中获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建立苏联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间的外交关系，交换大使，同时并建立两国间适当的经济关系。

选自《人民日报》1948 年
10 月 19 日第 3 版

给金斯布里·史密斯的复电

（1949年2月2日）

巴黎“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布里·史密斯先生

二月一日来电获悉。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我前赴华盛顿。访问华盛顿是我的宿愿，我过去在雅尔塔向罗斯福总统、在波茨坦向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很遗憾，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从事任何长途旅行，特别是海路或空中旅行。

苏联政府欢迎总统访问苏联。假使总统不认为这是不方便的话，会议可以随总统择，或在莫斯科，或在列宁格勒，或在加里宁格勒，或在敖德萨，或在雅尔塔。

然而，假若这个提议遭到异议，那末，可以随总统处理，在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会晤。

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见《一九四九年苏联对外政策》

1953年版第22—23页

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先生及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先生

（1949年10月13日）

我谨向你们及你们所代表的德国人民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及你们之分别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

德意志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共和国的成立，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无可怀疑，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与爱好和平的苏联之并肩存在，使得欧洲不再有新战争的可能，结束了欧洲的流血并使世界帝国主义奴役欧洲国家成为不可能。

最近这次战争的经验表明，在这次战争中担负牺牲最大的是德国和苏联的人民，表明这两国人民在欧洲拥有最大的潜力，以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行动。只要这两国人民表现决心为和平而斗争，像他们在进行战争时那样努力，那么和平在欧洲可以认为有了保证。

因此，你们奠立统一的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基础，同时就是对全欧洲作了伟大的事情，保其持久和平。

你们无需怀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加强和平事业，你们将得到世界上一切人民，包括美、英、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各国人民的同情和积极支持，更不用说爱好和平的苏联人民了。

祝你们在这条新的光荣的道路上成功。

祝统一、独立，民主、爱好和平的德国长存和繁荣！

约·斯大林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见《一九四九年苏联对外政策》
1953 年版第 28—29 页

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1949 年 11 月 28 日）

值此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个人，向你并通过你向友好的蒙古人民致贺。若干年来，蒙古人民以勤勉的劳动，消灭旧时代的遗产——许多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并在提高他们国家的福利和文化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谨祝友好的蒙古人民及其政府在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方面进一步成功。

斯大林

选自《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29 日第 1 版

复 尼 赫 鲁 先 生 电

（1950 年 7 月 15 日）

致印度共和国总理
潘迪特·雅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

欢迎您的和平倡议。您认为宜经由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五大国的代表必须参加的安全理事会，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我认为，为了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在安全理事会上听取朝鲜人民代表陈述意见是合宜的。

敬礼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七月十五日

见《一九五〇年苏联对外政策》
1953 年版第 27 页

补 遗（三）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1950 年 9 月 30 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

兹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周年之际，请您，主席先生，接受我友谊的祝贺。

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及您个人在独立的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78—79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年2月13日）

斯大林大元帅致毛泽东主席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主席：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我深信我们的条约将始终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

约·斯大林

二月十三日二时三十五分于莫斯科

毛泽东主席致斯大林大元帅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大元帅：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请接受我对阁下、苏联政府与人民的衷心感谢与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

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谨此，祝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北京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79—80 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1年9月2日）

致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大元帅

斯大林大元帅：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

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

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主席同志，感谢您对苏联及其武装部队在击溃日本侵略势力事业中的作用作高度的估计。

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不顾国民党的阴谋，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根本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无庸置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摧毁的友谊，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为着保证远东和平，反对所有一切侵略者及战争挑拨者的事业的。

值此东亚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六周年之际，请您，主席同志，接受苏联及其武装部队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86—87 页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

（1951年9月28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主席同志，请接受我友谊的祝贺。

衷心地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伟大友谊——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障永远巩固。

约·斯大林

九月二十八日于莫斯科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年版第87—88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年2月12日）

斯大林大元帅致毛泽东主席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为着全世界和平事业利益的同盟及合作获得更进一步的巩固。

约·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于莫斯科

毛泽东主席致斯大林大元帅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表示深切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

我们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依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各协定的精神，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热诚的、慷慨的援助，这些

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

我们祝贺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日臻亲密。中苏两国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好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98—99 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
与毛泽东主席互电致贺

（1952年9月2日）

致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大元帅

斯大林大元帅：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的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

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军队的主力——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国的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

现在，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日本侵略势力又重新抬头的时候，中国与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有有力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主席同志，请接受我对您的谢意，感谢您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七周年纪念时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所表示的友情。

中国人民及其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促进了消灭日本侵略的事业。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主席同志，值此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七周年之际，请接受苏联及苏联军队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于莫斯科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100—102 页

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1952 年 9 月 29 日）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您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祝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强大的人民民主的中国国家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友谊——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强支柱更加巩固和发展。

约·斯大林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莫斯科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102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与毛泽东主席互电祝贺

（1953年2月11日）

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为着各国人民和平及安全事业的友好同盟获得更进一步的巩固。

约·斯大林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于莫斯科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三年来中苏两大盟国之间的亲密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新中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不仅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中国大规模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实施，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祝中苏两国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新侵略阴谋、保卫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日益巩固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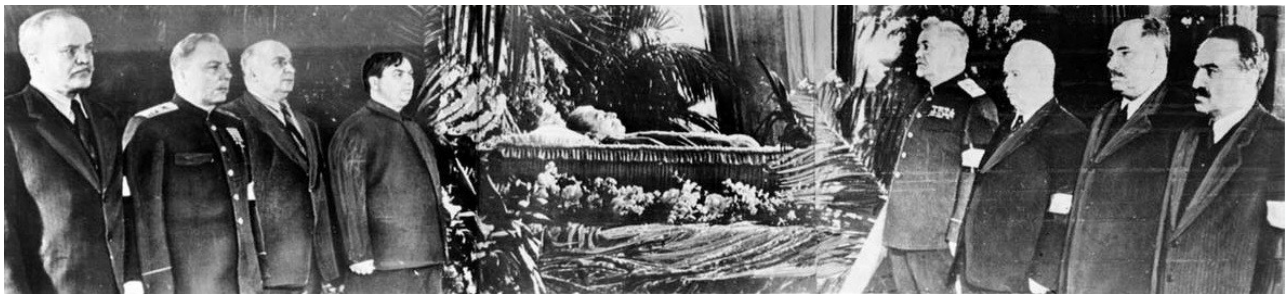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　北京

《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
1956 年版第 108—109 页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约·维·斯大林与世长辞



（222）

代跋　最伟大的友谊

（1953年3月9日）

毛 泽 东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

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末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

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载于1953年3月9日《人民日报》

年 表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六年

一月二日至八日

在全国各地的选举大会上，劳动人民提名斯大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一名候选人。

一月九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二斯大林选区被登记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

一月十九日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出版斯大林全集的决议。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出席列宁逝世二十二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

斯大林为自己的全集第一卷撰写序文。

二月九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

二月十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乔巴山元帅进行苏蒙关系的谈判。

二月二十五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大元帅斯大林为苏联武装力量人民委员及苏联全军最高总司令。

三月十二日

斯大林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

三月十三日

斯大林就邱吉尔在美国的演说向“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

三月十九日

斯大林将苏联部长会议人员名单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审查。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批准斯大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三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答复“美联社”记者基尔摩尔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波兰工会代表团。

三月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批准斯大林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及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芬兰政府代表团进行苏芬关系的谈判。

五月九日

斯大林发布命令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一周年纪念。

六月五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加里宁的葬礼。

七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接见联合国秘书长，莫洛托夫亦在座。

九月三日

斯大林发布命令庆祝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日。

九月十九日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签署苏联部长会议及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集体农庄中消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的决议。

九月二十五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对“星期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惠尔斯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致斯大林函中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十月二十九日

“消息报”公布斯大林对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接获美国通讯社“合众社”社长休·白里所提问题的答复。

十二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与爱里奥特·罗斯福晤谈有关国际形势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

一月二日至七日

在全国各地的选举大会上，劳动人民提名斯大林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第一名候选人。

一月七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被登记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九日

斯大林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日到莫斯科城第一列宁选区的选举处投票。

二月九日，十四日，十六日

斯大林被选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开幕时参加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的联席会议。

二月

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三月十七日

斯大林接见法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亦在座。

三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接见英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亦在座。

四月十五日

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莫洛托夫亦在座。

六月二十日

斯大林参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进行关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谈判。

八月十九日

斯大林乘“莫洛托夫号”巡洋舰从雅尔达航行到索溪，并在该舰的航海日志上题字。

九月七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庆祝莫斯科城建立八百周年的贺词。

十一月十五日

斯大林被登记为第二斯大林选区选举莫斯科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代表的候选人。

十二月十四日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签署苏联部长会议与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行货币改革并废除粮食与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

一九四八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的联席会议。

二月四日

斯大林出席签订苏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出席签订苏匈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苏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的庆祝大会，并提议向苏联的武装力量致贺。

三月十八日

斯大林出席签订苏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四月六日

斯大林出席签订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四月七日

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就苏芬友好条约的意义发表演说。

五月十七日

斯大林撰写答复华莱士的公开信。

七月十四日

斯大林就陶里亚蒂同志被刺未遂事，致电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八月二日，二十三日

斯大林接见美、英、法三国代表讨论柏林问题，莫洛托夫亦在座。

九月二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日丹诺夫的葬礼。

十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答复。

一九四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在大剧院出席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对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总社长金斯堡·史密斯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签署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重新减低日用必需品的国定零售价格”的决议。

三月三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关于经济与文化合作的谈判。

三月十日

斯大林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联盟苏维埃与民族苏维埃的联席会议。

七月二日

斯大林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担任季米特洛夫灵柩的荣誉守卫。

九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庆祝马塞尔·加香八十寿辰的贺词。

十月十三日

斯大林撰写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的贺词。

十月十四日

斯大林撰写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的贺电的复电。

十一月二十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工厂全体工作者，庆祝该厂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和荣获列宁勋章的贺词。

十一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公布斯大林致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乔巴山元帅及蒙古人民，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贺词。

据苏联出版的《斯大林年谱》（1879年至1949年）原文个别文字标点经校订

斯 大 林 文 集
SIDALIN WENJI
（1934 -1952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91,000 字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1240 定价 4.55 元

斯 大 林
論 戰 後 國 際 形 勢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三年

人民出版社編

頁數 109

SS 號 11005995

出版日期 1956 年 4 月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
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

——毛泽东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五年九月制作